

中国大百科全书

语言 文字

中国大百科全书

语言文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北 京

1998. 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9
ISBN 7-5000-5997-3

I. 中… II. 中… III. 百科全书-中国-现代
IV. Z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2041 号

中国大百科全书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100037)

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印装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3336 插页 2271 字数 120,000,000

2002 年 9 月第 1 版第 6 次印刷

ISBN 7-5000-5997-3 / Z·103

定价:19800.00 元(74 卷)



中国大百科全书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

主 任 胡乔木

副主任 (按姓氏笔画顺序)

于光远	贝时璋	卢嘉锡	华罗庚	刘瑞龙	严济慈
吴阶平	沈 鸿	宋时轮	张友渔	陈翰伯	陈翰笙
武 衡	茅以升	周 扬	周培源	姜椿芳	夏征农
钱学森	梅 益	裴丽生			

委 员 (按姓氏笔画顺序)

丁光训	于光远	马大猷	王 力	王竹溪	王绶琯
王朝闻	牙含章	贝时璋	艾中信	叶笃正	卢嘉锡
包尔汉	冯 至	司徒慧敏	吕 骥	吕叔湘	朱洪元
朱德熙	任新民	华罗庚	刘开渠	刘思慕	刘瑞龙
许振英	许涤新	孙俊人	孙毓棠	杨石先	杨宪益
苏步青	李 珩	李国豪	李春芬	严济慈	肖 克
吴于廑	吴中伦	吴文俊	吴阶平	吴作人	吴学周
吴晓邦	邹家骅	沈 元	沈 鸿	宋 健	宋时轮
张 庚	张 震	张友渔	张含英	张钰哲	陆 达
陈世骧	陈永龄	陈维稷	陈虞孙	陈翰伯	陈翰笙
武 衡	林 超	茅以升	罗竹风	季 龙	季羨林
周 扬	周有光	周培源	孟昭英	柳大纲	胡 绳
胡乔木	胡愈之	荣高棠	赵朴初	侯外庐	侯祥麟
段学复	俞大绂	宦 乡	姜椿芳	费孝通	贺绿汀
夏 衍	夏 鼐	夏征农	钱令希	钱伟长	钱学森
钱临照	钱俊瑞	倪海曙	殷宏章	翁独健	唐长孺
唐振绪	陶 钝	梅 益	黄秉维	曹 禹	董纯才
程裕淇	傅承义	曾世英	曾呈奎	谢希德	裴丽生
潘 菽	潘念之				

语言文字编辑委员会

顾问 王 力 吕叔湘

主任 季羨林

副主任 周祖谟 许国璋

委员 (按姓氏笔画顺序)

马学良	王宗炎	朱德熙	刘涌泉	许国璋	许宝华	李 荣
张 斌	张志公	陈 原	季羨林	周有光	周祖谟	胡裕树
俞 敏	倪海曙	傅懋勳				

各分支学科编写组

语言学、世界诸语言	主 编	许国璋			
	副主编	王宗炎	黄长著		
	成 员	周流溪			
中国各民族语言文字	主 编	傅懋勳			
	副主编	马学良	王 均	戴庆厦	道 布
汉语音韵学	主 编	俞 敏			
	副主编	邵荣芬			
	成 员	杨耐思	谢纪峰		
汉语训诂学、汉语文字学	主 编	周祖谟			
文 字 改 革	主 编	倪海曙			
	副主编	周有光	尹斌庸		
汉语语法修辞	主 编	胡裕树			
	副主编	张 斌	林祥楣		
汉 语 方 言	主 编	许宝华			
	副主编	詹伯慧	汤珍珠	颜逸明	
应用语言学	主 编	刘涌泉			
	成 员	冯志伟			

前 言

《中国大百科全书》是我国第一部大型综合性百科全书。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编辑类书的传统。两千年来曾经出版过四百多种大小类书。这些类书是我国文化遗产的宝库，它们以分门别类的方式，收集、整理和保存了我国历代科学文化典籍中的重要资料。较早的类书有些已经散佚，但流传或部分流传至今的也为数不少，这些书受到中国和世界学者的珍视。各种类书体制不一，多少接近百科全书类型，但不是现代意义的百科全书。

十八世纪中叶，正当中国编修庞大的《四库全书》的时候，西欧法、德、英、意等国先后编辑出版了现代型的百科全书。以后美、俄、日等国也相继出版了这种书。现代型的百科全书扼要地概述人类过去的知识和历史，并且着重地反映当代科学文化的最新成就。二百多年来，各国编辑百科全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知识分类、编辑方式、图片配备、检索系统等方面日益完备和科学化。今天，百科全书已经在人类文化活动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各种类型的和专科的百科全书几乎象辞典那样，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一向有编辑类书传统的中国知识界，也早已把编辑现代型的百科全书作为自己努力的目标。本世纪初叶就曾有人试出过几种小型的实用百科全书，包括近似百科型的辞书《辞海》。但是，这些书都没有达到现代百科全书的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当时的出版总署曾考虑出版中国百科全书，稍后拟定的科学文化发展十二年规划也曾把编辑出版百科全书列入规划，1958年又提出开展这项工作的计划，但都未能实现。

直到1978年，国务院才决定编辑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并成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负责此项工作。

因为这是中国第一部百科全书，编辑工作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是，由于读书界的迫切要求，不能等待各门学科的资料搜集得比较齐全之后再行编辑出版；也不能等待各学科的全部条目编写完成之后，按照条目的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混合编成全书，只能按门类分别邀请全国专家、学者分头编写，按学科分类分卷出版，即编成一个学科（一卷或数卷）就出版一个学科的分卷，使全书陆续问世。这不可避免地要带来许多缺点，但是在目前情况下不得不采取这种做法。我们准备在出第二版时，再按现在各国编辑百科全书一般通行的做法，全书的条目不按学科分类，

而按字母顺序排列，使读者更加便于寻检查阅。《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按学科分类分卷，每一学科的条目还是按字母顺序排列，同时附加汉字笔画索引和其他几种索引，以便查阅。

《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内容包括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文化教育、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各个学科和领域。初步拟定，全书总卷数为80卷，每卷约120~150万字(包括插图、索引)。计划用十年左右时间出齐。全书第一版的卷数和字数都将超过现在外国一般综合性百科全书，但与一些外国百科全书最初版本的篇幅不相上下。我们准备在第二版加以调整和压缩。

《中国大百科全书》按学科分卷出版，不列卷次，每卷只标出学科名称，如《哲学》、《法学》、《力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等等。

全书各学科的内容按各该学科的体系、层次，以条目的形式编写，计划收条目10万个左右。各学科所收条目比较详尽地叙述和介绍各该学科的基本知识，适于高中以上、相当于大学文化程度的广大读者使用。这种百科性的参考工具书，可供读者作为进入各学科并向其深度和广度前进的桥梁和阶梯。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除编辑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之外，还准备编辑出版综合性的中、小型百科全书和百科辞典，与专业单位共同编辑出版各种专业性的百科全书，以适应不同读者的需要。

《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辑工作是在全国各学科、各领域、各部门的专家、学者、教授和研究人员的积极参加下进行的，并得到国家各有关部门、全国科学文化研究机关、学术团体、大专院校，以及出版单位的大力支持。这是全书编辑工作能够在困难条件下进行的有力保证。在此谨向大家表示诚挚的感谢，并衷心希望广大读者提出批评意见，使本书在出第二版的时候能有所改进。

《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部

1980年9月6日

凡 例

一、编 排

1. 本书按学科(知识门类)分类分卷出版。一学科辑成一卷或数卷,或几个学科合为一卷。

2. 本书条目按条目标题的汉语拼音字母顺序并辅以汉字笔画、起笔笔形顺序排列。同音时按汉字笔画由少到多的顺序排列,笔画数相同的按起笔笔形一(横)、丨(竖)、丿(撇)、丶(点)、㇀(折,包括乚、乚、乚等)的顺序排列。第一字相同时,按第二字,余类推。

3. 各学科(知识门类)卷在条目分类目录之前一般都有一篇介绍本学科内容的概观性文章。

4. 各学科(知识门类)卷均列有本学科全部条目的分类目录,以便读者了解本学科的全貌。分类目录还反映出条目的层次关系,例如:

语言学	480
语言	475
副语言	84
文字	400
语音学	490
音系学	450

5. 学科(知识门类)与学科之间相互交叉的知识主题在有关学科卷中均设有条目,例如“吉尔吉斯语”、“乌兹别克语”,在《语言文字》卷和《民族》卷均设有条目,但释文内容分别按各该学科的要求有所侧重。

二、条目标题

6. 条目标题多数是一个词,例如“语言”、“成语”;一部分是词组,例如“计算机情报检索”。

7. 条目标题上方加注汉语拼音,多数的条目标题附有对应的外文,例如:

yīngyǒng yǔyánxué
应用语言学 (applied linguistics)

无通用译名的纯属中国内容的条目标题,例如“四声”、“读若”,一般不附外文名。

三、释 文

8. 本书条目的释文力求使用规范化的现代汉语。条目释文开始一般不重复条目标题。

9. 较长条目的释文一般设有层次标题。

10. 一个条目的内容涉及其他条目并需由其他条目的释文补充的,采用“参见”的方式。所参见的条目标题在本条释文中出现的,用楷体字排印,例如“叠音字和联绵字都是双音的单纯

词”；所参见的条目标题未在本条释文中出现的，另用括号加“见”字标出。

11. 条目释文中出现的外国人名、地名、著作名等不附原文。外国人名和著作名一般在“内容索引”中注出原文。释文中的外国人名，在姓的前面加上外文名字的缩写，即名字的第一个字母，例如 E. 萨丕尔，J. 库里沃维奇。

四、插 图

12. 本书在条目释文中配有必要的插图。

13. 彩色图汇编成插页，并在有关条目释文中注明“(参见彩图插页第××页)”。

五、参考书目

14. 在重要条目的释文后附有参考书目，供读者选读。

六、索 引

15. 本书各学科(知识门类)卷均附有全部条目的汉字笔画索引、外文索引和内容索引。

七、其 他

16. 本书所用科学技术名词以各学科有关部门审定的为准，未经审定和尚未统一的，从习惯。地名以中国地名委员会审定的为准，常见的别译名必要时加括号注出。

17. 本书字体除必须用繁体字的以外，凡已简化的字，一律以 1986 年 10 月重新公布的《简化字总表》为准。

18. 本书所用数字，除习惯用汉字表示的以外，一般用阿拉伯数字。

语言和语言研究

吕叔湘

语言和文字曾经是人们崇拜的对象

语言是人类的创造，只有人类有真正的语言。许多动物也能够发出声音来表示自己的感情或者在群体中传递信息。但是这都只是一些固定的程式，不能随机变化。只有人类才会把无意义的语音按照各种方式组合起来，成为有意义的语素，再把为数众多的语素按照各种方式组合成话语，用无穷变化的形式来表示变化无穷的意义。

人类创造了语言之后又创造了文字。文字是语言的视觉形式。文字突破了口语所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语言和文字是人类自己创造的，可是在语言文字的神奇作用面前，人们又把它当做神物崇拜起来。他们用语言来祝福，用语言来诅咒。他们选用吉利的字眼做自己的名字，做城市的名字，做器物 and 店铺的名字。他们甚至相信一个人的名字跟人身祸福相连，因而名字要避讳。皇帝的名字、长官的名字、祖宗和长辈的名字不能叫，一般人也都在“名”之外取一个“号”，彼此不称名而称号。在后世，认为这是礼貌；在远古，这是人身保护。现代各地口语里也常常有些词语起源于避讳；不久以前，很多行业有各自的避讳字眼。从前有些人家，因为小孩儿不懂得避讳，在堂屋里贴一张纸条“童言无忌”，意思是小孩儿说的话不算数。

文字的发明，古人更加认为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淮南子》里说：“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最能表示文字的神力的是符篆，这是跟口语里的咒语相当的东西。一般的文字也都沾上迷信的色彩，有字的纸不能乱扔，要放在有“敬惜字纸”标签的容器里，积聚起来烧掉。文字里边当然也有避讳，嘴里不能说的名字，纸上也不能写，非得要写就得借用同音字，或者缺一笔。

语言研究的开始和发展

语文学的兴起 有了语言，人们用来抒情达意；有了文字，人们用来记言记事。于是有了书册，世代相传，成为经典。为了方便后世的人读通这些经典，有人出来加以解释，这样就产生了语文学，这是语言学的早期形式。把语言文字从崇拜的对象改变为研究的对象（或研究兼崇拜的对象），这是一大进步。

为了读通古书而产生语文学，这是中国与西方——印度、希腊、罗马相同的，但是表现的形式不同。西方用的是拼音文字，中国用的是汉字。汉字自成一种体系，跟语言的配合关系比较复杂。这就使得中国的语文学和西方的语文学呈现不同的面貌。

中国语文学的重点是汉字的形、音、义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语文学的著作大致有四种形式：①随经典本文加注字音字义，往往跟“串讲”相连。也有汇集成书的。如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慧琳的《一切经音义》。②按部首排列的“字书”，创始的是许慎的《说文解字》，演变到清初的《康熙字典》。③按韵排列的“韵书”，如《广韵》、《集韵》。④按字义分类罗列的，如西汉写定的《尔雅》、三国时代的《广雅》。

西方语文学除考订语词的意义外，特别重视语词的形态变化，因为语句的理解以它为关键。所以他们很早就产生语法学。上古时代的汉语是否有过某种形态变化，现在还没有定论，至少是不表现在汉字的字形上。积字成句，理解不难，因而语法在中国语文学中没有形成一个科目。

走向语言学 从语文学发展为语言学，有几个方面的变化。①研究的重点从古代转向现代，从文字转向语言。把现代语的研究提高到应有的地位，并且认识到口语是书面语的根本，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是晚近的事情。②研究的范围从少数语言扩展到多种语言。过去，不但是中国学者的研究局限于汉文，印度学者的研究局限于梵文，西方学者的研究对象也只是从希腊文、拉丁文转移到本国语文。现在是各种语言，有文字的和没有文字的，都有人在研究，并且不限于本国或者本民族的学者。许多语言的比较研究使人们对语言的了解更深入了。③零散的知识得到了系统化。拿中国的情形来说，许慎在写定《说文解字》的时候，一方面为 9 353 个汉字作注，一方面提出他认为是造字原则的六书说。这以后，很多学者为六书说作补充和发挥，近来由于古文字学的发展，又有学者提出了新的造字理论。字音方面，宋代人在韵书的基础上编制出来韵图，由此产生了等韵学；从南宋开始，又有人根据古代韵文里押韵的情形提出古韵问题。到了清代，不但是古韵的研究更加细密，并且在用反切和谐声字做材料研究古声母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从《尔雅》开始的训诂学，到了清代的学者手里，运用字音和字义相关的道理，也提出了一些理论。在西方，17 世纪的法国学者写出了“理性语法”，把语法和逻辑联系起来。19 世纪的学者发展了历史比较研究法，构拟了印欧语系诸语言的谱系。从 20 世纪初年起，语言内部规律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的进展，新理论层出不穷。④语言的研究完全摆脱为文学、哲学、历史的研究服务的羁绊。中国的语言研究也不再是作为经学的附庸的“小学”了。

语言与时间和空间

共时的研究和历时的研究 语言是经常在变的，语音、语义、语汇、语法都在不断的变化之中。短时间内看不出，时间长了就明显了。因此在对某一种语言进行研究的时候，必须明确是在研究它的现状还是在研究它的历史。第一个强调语言的共时研究（主要指当代）和历时研究的区别的语言学家是瑞士的 F. de 索绪尔，他这个主张对后来的语言研究的影响很大。可是有一点是索绪尔当时没怎么强调而是后来的语言学家加以发挥的，那就是历时的研究是以若干个共时的断面研究为基础的。这个认识对于汉语研究者特别重要，因为直到不久以前，还有很多人把“古代汉语”当作一个单纯的东西来论述。

跟语言的历史研究有关的是历史比较语言学，就是研究有亲属关系的诸语言之间的亲疏次第，拟订出一些较原始的“祖语”，构成一个语系或语族。这一门学问，撇开零碎的比较乃至猜测不算，认真的研究是 18 世纪末才开始的，这个时候欧洲学者认出来梵文和希腊文、拉丁文以及日耳曼语之间的亲属关系。印欧语系的历史比较研究吸引了 19 世纪欧洲语言学家的最大注意力，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特别是在语音历史演变的规律方面。别的语系的历史比较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还赶不上，汉藏语系的比较研究只能说是刚起步。

标准语和方言 有人的地方就有语言，在地球上分布着很多很多语言。常常听到有人问：世界上有多少种语言？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要分清这是几种语言，那是一种语言里边的几种方言，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一般的说法是：完全不能通话的是两种语言，基本上能够

通话的是一种语言的两种方言。实际上这不能用来作为唯一的标准。比如德语，在联邦德国和荷兰交界的地方，两边的居民基本上可以通话，然而他们说的话一个算是德语方言，一个算是荷兰语方言。反之，北德意志方言和南德意志高地的方言通话相当困难，可是都算是德语方言。由此可见，能否通话不能作为区别方言和语言的唯一标准，还得加上一条：有没有共同承认的标准语，并且这标准语有统一的书面形式。有些外国学者的著作里讲到汉语常常安上一个复数语尾，这就是只承认前一条而忽视了后一条的结果。

方言是历史地形成的，既跟空间有关，也跟时间有关。原来说一种语言的人民，由于居住区域的扩展，不同地区之间交通不便，人们很少来往，语言演变就不会一致，久而久之就形成不同的方言。以后，为了适应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形成了以某一方言为基础的标准语。有了标准语之后，通过教育的普及，方言的使用范围就越来越小了。但是对于语言学家，方言还是很值得研究的。

汉语方言数目多，变化多，对于研究汉语史的人，对于研究普通语言学理论的人，都是非常珍贵的材料。汉语方言的记录可以上溯到汉代扬雄的《方言》，后世的地方志也很多有方言志。但是由于没有精密的注音方法（只能用汉字），也缺少理论的指导，这些方言志的参考价值是有限的。20世纪50年代曾经进行过一次方言普查，有一定收获，但是各地成绩的差别很大，有些地方还是空白。随着交通和经济的发展，方言的变化很快，有些有用的材料有消失的危险，需要赶快收集。

语言和语言之间，方言和方言之间，往往有互相渗透的现象，主要在语汇方面。于是某一语言中的外来词的研究就成为这一语言的语源学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使用这个语言的民族的文化史的一部分。

由于民族间的交往，主要是贸易往来的需要，曾经产生过许多种“混合语”。有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不再有人使用，如曾经在中国通商口岸使用过的“洋泾浜英语”。有的经过长时间的使用，已经由临时性的辅助语言变成本地居民的母语，如海地的海地混合语（法语和非洲语言的混合语）、苏里南的斯拉南汤加语（又名 takitaki，是英语和非洲语言的混合语，又掺杂些荷兰语）。

语言的单一性和多样性

语言和语言之间 语言和语言之间有很多共同之处，也有很多不同之处。拿语音来说，所有语言的语音都可以分析成元音和辅音，可是元音和辅音的数目不完全相同，组合方式不完全相同。语法也是这样，两种语言的构词方式可能不同，形态变化可能不同，词类区分和造句方式也不会完全相同。比较各种语言的异同，可以把语言分成某些个类型。19世纪欧洲语言学家把世界上的语言分成孤立、粘着、屈折三个类型，并且说这个代表语言进化的三个阶段。汉语被认为是孤立语的典型，代表发展的低级阶段。过后又有语言学家发表相反的意见，认为语言从综合型向分析型发展，汉语代表发展的高级阶段。其实是各种语言各有自己的发展方向，都能够满足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在一定历史时期的表达要求，可以说是各有千秋，不必勉强分别高低。撇开这种进化论的偏见，语言类型的研究也还是很有意思的。

探寻各种语言之间的共同点的语言学者，过去有，现在也有。过去曾经有西方的语言学家拿西方语言做底本，写“普遍语法”。后来由于交通的发达，发现很多原来不知道的语言，不怎么符合甚至完全不符合那种“普遍语法”。现在研究语言共性的学者谨慎多了。

一种语言之内 一种语言之内也有异同问题。没有异同,就不会有方言。除了方言,还有其他内部变异。不同的人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场合,说的话不完全一样,用的字眼有所不同,词语的组合有所不同。研究这些问题的是社会语言学。

先说社会集团,农民说话跟工人不一样,不同行业的工人也各有各的“行话”,知识分子说话又有自己的一套。还有无业游民乃至流氓团伙,他们有他们的“黑话”。再还有一种“社会方言”是历史地形成的,例如美国的“黑人英语”。当然,不同集团的人互相接触的时候,需要彼此适应,这种适应的方式也是可以研究的。

年龄不同的人说话会有差异,不仅在词语方面,甚至在语音系统方面也是如此。有些所谓“俚语”往往是在青少年中间产生和流行。在有的民族里,妇女说话所用字眼跟男人有些区别,甚至有很大的区别。

再有一个因素是语言之间的接触。商业往来产生“混合语”,前边已经说过。比这更重要的是由移民引起的双语现象,这是一个内容丰富的研究课题。双语现象不限于移民,在使用几种官方语言的国家,如瑞士和比利时,居民中间也有双语现象。在教育发达的国家,人民中间能说一种或几种外国语的人也不少。方言与方言之间也常常产生双语现象,比如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不同方言背景的人家杂居在一起,就有人能说几种方言,特别是儿童。

最后应该提到“风格”问题,就是使用语言随着不同场合而变化。这种变化从极其严肃到十分随便,是一种渐变,如果要分别,可以大体上分成庄重、正式、通常、脱略四级。这里又涉及语言规范问题:对于不同风格的语言恐怕不能作同样的要求。

这里所说的风格应当作最广义的理解,适用于书面和口头。在书面语里又可以区别各种“文体”,如诗歌、小说、新闻报道、行政文件、法律文书等等。再进一步又可以研究一个个作家的风格特点。这些都已经超出社会语言学的范围了。

语言与人和机器

语言的学习 儿童学说话主要是通过生活和游戏,向家里人学习,向游戏的同伴学习,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自觉的,可是收效之快是惊人的。儿童语言的科学的研究,虽然开始比较晚,却已经有可观的成绩。

儿童进学校之后开始语言的正规学习,主要是学习书面语。在用拼音文字的国家,就是学习把口语写下来,并通过阅读文学和其他作品提高自己运用语言的能力。在中国,多出来一个学习汉字的问题,这一直是小学语文教学中的一个难题。语言教学的对象主要是儿童和少年,对成人的书面语教学,即所谓扫除文盲,是在普及教育的前提下产生的。由普通的语言教学衍生出来的是盲人和聋哑人的教学。

语言教学的科学研究开始于外语教学,在中国和在西方国家都是这样。这是不奇怪的,因为用不同的方法教外语,收效可以悬殊。一直到今天,语言教学研究的进展,包括现代技术的运用,还是外语教学方面领先。

语言的使用 人人都使用语言,但是运用语言的能力却大有高下之分。即使在没有受过多少学校教育的人中间,也是有人能说会道,有人笨嘴拙舌。在文字表达上也同样有这种差别,有的人文章写得好,有人写得不好。演讲术是锻炼口语表达能力的,作文法和修辞学是提高写作能力的。戏剧、广播等等“艺术语言”需要特殊训练。

语言使用方面的一个特殊问题是翻译。现在国际交往越来越频繁,从事翻译工作的人越

来越多。翻译技巧的研究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不同语系的语言之间的对译比起同语系的语言之间相互转译来要难得多,因此汉语与西方语言的对译是特别需要研究的课题。

文字改革 一个民族所用的语言是很难改变的,一种语言所用的文字却是可以改变的。改变有大有小。文字体系内部的改变是小改变。汉字的字体由甲骨文而金文,而隶书、楷书,是小改变;简化一部分汉字的笔画也是小改变。俄文在十月革命之后废除几个字母,德文印的书刊把花体字母改为拉丁字母,也都是小改变。用一种文字体系代替另一种文字体系是大改变,例如土耳其用拉丁字母代替阿拉伯字母,蒙古人民共和国用俄文字母代替老蒙文字母,越南用拉丁字母代替汉字系统的“字喃”。汉语要不要,以及能不能不用汉字而用拉丁字母或其他字母来标写,有不同的意见,还在研究和试验之中。

语言学和别的学科 跨学科的研究是近若干年来科学发展的总的趋势,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有这种情况。语言涉及人类活动的许多方面,因而跟许多学科发生关系。例如社会语言学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社会上的形形色色的语言。心理语言学研究人们怎样通过语言认识外界事物,不同的语言会不会影响人们对外界的认识。神经语言学研究语言活动的生理机制以及这个机制的种种失调如失语症等等,后者也称为医学语言学。

研究一个民族的语言还常常涉及这个民族的文化。例如从词语的来源(汉语则包括汉字的构造)看古代文化的遗迹;从地名和方言的分布看居民迁徙的踪迹;从人名看宗教和一般民间信仰;从亲属称谓看古代婚姻制度,等等。这可以称为文化语言学,有些学者称之为人类学语言学或民族学语言学。

语言是文学创作的工具,评论文学作品必然会涉及它的语言。文学语言研究中的一个特殊部门是诗律学。语言又是思维的工具,因而和逻辑的关系也非常密切。可是语言不是按照逻辑的需要设计的,任何语言在表达上都有不符合形式逻辑的地方,近代逻辑论著趋向于尽量用符号来代替语言。

语言和机械化 近百年来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为语言研究提供了新的手段。首先利用新技术的部门是实验语音学。随着声学仪器的发展,语音分析已经有了丰硕的成果,语音合成也正在取得迅速的进展。录音录像技术的普及对于语言教学也是一大帮助。

给语言研究以更大的推动的是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逐步完善。电子计算机发明不久,就被用来储存语言材料,进行各种统计和检索,被用来做机器翻译的试验。不久又尝试用它模拟自然语言,进行人工智能的研究。这不仅有很大的实用价值,而且可以对于人类语言机制获得更清楚的认识,它的理论意义也是很重大的。这一切,可以概括为计算机语言学。

计算机的发展非常迅速,从第一台计算机问世到现在不过40年,已经经历了三次大的更新,无论在运算速度上,在解题能力上,都有一日千里之势。这就引起了一些人的误会,以为将来一切研究工作都可以请计算机代劳,只要把问题提出来,把材料交给它,就可以向它要结果。这种想法自然是错误的。如果不把解决问题的步骤详细告诉它,它是一筹莫展的。计算机做工作,能够比人快多少倍而不出错,时间长多少倍而不疲倦,但是它不会做人所不会做的工作。并且有些工作只有人会做,计算机不会做。说到底,语言学本质上仍然是一门人文科学。它也跟别的人文科学一样,可以尽量利用技术科学的帮助进行它的工作,但是它自身不会变成一门技术科学。

目 录

前言	i
凡例	1
语言和语言研究	1
条目分类目录	1
正文	1
条目汉字笔画索引	553
附：繁体字和简化字对照表	562
条目外文索引 (INDEX OF ARTICLES)	563
内容索引	569
附：外国人名译名对照表	599

条 目 分 类 目 录

说 明

一、本目录供分类查检条目之用。

二、有的条目同时在几个分支学科中出现。例如“汉藏语系”条既列入中国诸民族语言文字分支，又列入世界诸语言分支。

语言和语言研究 见正文前专文

语言学..... 480

语言..... 475

副语言..... 84

文字..... 400

语音学..... 490

音系学..... 450

音位学(见音系学).....450(450)

语法学..... 467

结构主义语法..... 228

生成语法..... 340

语义学..... 488

词汇学..... 40

词源学..... 42

词典学..... 38

百科全书..... 15

心理语言学..... 426

神经语言学..... 338

社会语言学..... 336

方言学..... 80

方言地理学..... 77

语用学..... 496

风格学..... 81

话语语言学..... 213

历史语言学(见历史比较语言学)..... 256(255)

历史比较语言学..... 255

人类语言学..... 326

类型语言学..... 251

语言类型学(见类型语言学).....480(251)

语言学常用符号..... 487

国际音标..... 118

〔学派〕

巴士拉学派..... 12

库法学派..... 242

新语法学派..... 428

青年语法学派(见新语法学派).....323(428)

法兰西学派..... 67

喀山学派..... 235

莫斯科学派..... 297

布拉格学派..... 26

功能语言学派(见布拉格学派).....97(26)

伦敦学派..... 267

美国结构主义学派..... 279

美国描写语言学派(见美国结构主义学派) 281(279)

哥本哈根学派..... 95

〔人物〕

波你尼..... 23

海利勒, 'A. 126

西伯维..... 413

阮詮..... 330

琼斯, W. 324

洪堡特, W. F. 211

格林, J. 96

拉斯克, R. K. 249

博普, F. 26

波斯塔尼, B. 24

施莱歇尔, A. 350

斯坦塔尔, H. 370

惠特尼, W. D. 216

阿斯科里, G. I. 7

波铁布尼亚, A. A. 25

舒哈特, H. 362

斯维特, H. 370

博杜恩·德·库尔德内, J. N. 25

维尔纳, K. 398

保罗, H. 18

福尔图纳托夫, Ф. Ф. 84

布鲁格曼, K.	29
索绪尔, F. de	378
博厄斯, F.	25
帕西, P.	306
叶斯泊森, O.	444
沙赫马托夫, A. A.	334
巴利, C.	12
梅耶, A.	279
乌伦贝克, C. C.	407
浮士勒, K.	84
巴尔托利, M. G.	11
山田孝雄	334
夏姆孙德尔达斯	419
房德里耶斯, J.	80
谢尔巴, И. B.	425
琼斯, D.	323
桥本进吉	314
马泰休斯, V.	273
金田一京助	229
萨丕尔, E.	332
布龙菲尔德, L.	28
特鲁别茨科伊, H. C.	382
弗斯, J. R.	83
贾德佳, S. K.	225
萨默费特, A.	332
赵元任	514
维诺格拉多夫, B. B.	399
库里沃维奇, J.	243
雅柯布逊, R.	437
沃尔夫, B. L.	406
瓦尔玛, D.	391
叶尔姆斯列夫, L.	444
时枝诚记	352
阿瓦涅索夫, P. H.	8
马丁内, A.	271
服部四郎	84
哈里斯, Z. S.	125
派克, K. L.	306
格林伯格, J. H.	96
罗宾斯, R. H.	268
韩礼德	127
瓦恩里希, U.	391
乔姆斯基, N.	313

〔机构〕

国际语言学协会	118
国际语音协会	120
世界诸语言	354
汉语系	191
汉语	128
藏缅语族	509
缅甸语	289
苗瑶语族	289
壮侗语族	543
泰语	381
老挝语	250
印欧语系	455
日耳曼语族	328
英语	458
德语	50
依地语	446
荷兰语	210
弗拉芒语	83
阿非利堪斯语	4
瑞典语	331
丹麦语	48
挪威语	305
冰岛语	22
罗曼语族	269
拉丁语	247
法语	67
西班牙语	413
意大利语	448
葡萄牙语	309
罗马尼亚语	268
摩尔达维亚语	297
利托-罗曼诸方言	257
斯拉夫语族	369
古斯拉夫语	99
俄语	62
白俄罗斯语	13
乌克兰语	407
波兰语	22
捷克语	229
斯洛伐克语	369
保加利亚语	18
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	332
斯洛文尼亚语	369

马其顿语	273
凯尔特语族	235
威尔士语	397
布列塔尼语	28
爱尔兰语	9
苏格兰盖尔语	374
亚美尼亚语	438
阿尔巴尼亚语	1
希腊语	417
波罗的语族	22
拉脱维亚语	249
立陶宛语	256
印度-伊朗语族	454
梵语	75
巴利语	12
印地语	453
乌尔都语	406
孟加拉语	288
旁遮普语	306
尼泊尔语	302
僧伽罗语	333
波斯语	24
古吉拉特语	97
克什米尔语	237
马拉提语	271
奥里亚语	9
信德语	429
阿萨姆语	7
普什图语	310
塔吉克语	380
安纳托利亚语族(见印欧语系)	9(455)
赫梯语	210
吐火罗语	390
乌拉尔语系	407
芬兰-乌戈尔语族(见乌拉尔	
语系)	81(407)
芬兰语	81
爱沙尼亚语	9
匈牙利语	431
萨莫耶德语族(见乌拉尔语系)	332(407)
高加索语系	93
格鲁吉亚语	96
阿尔泰语系	1
突厥语族	386

土耳其语	389
乌兹别克语	408
阿塞拜疆语	7
土库曼语	389
哈萨克语	126
吉尔吉斯语	219
鞑靼语	46
蒙古语族	283
蒙古语	283
满-通古斯语族	274
通古斯语支	382
古西伯利亚诸语言	108
达罗毗荼语系	45
泰米尔语	381
泰卢固语	380
坎纳达语	236
马拉雅拉姆语	272
南亚语系	301
孟-高棉语族(见南亚语系)	288(301)
越南语	499
高棉语	93
马六甲语族(见南亚语系)	272(301)
蒙(扪)达语族(见南亚语系)	282(301)
尼科巴语族(见南亚语系)	302(301)
南岛语系	299
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见南岛	
语系)	272(299)
印度尼西亚语族(见南岛语系)	454(299)
印度尼西亚语	454
马来语	272
爪哇语	514
他加禄语	380
马达加斯加语	271
密克罗尼西亚语族(见南岛	
语系)	288(299)
美拉尼西亚语族(见南岛语系)	281(299)
波利尼西亚语族(见南岛语系)	22(299)
阿非罗-亚细亚语系	4
闪语族(见阿非罗-亚细亚语系)	334(4)
阿拉伯语	5
希伯来语	416
马耳他语	271
阿拉米语	6
古叙利亚语	108

阿姆哈拉语·····	7
柏柏尔语族(见阿非罗-亚细亚语系)·····	25(4)
库施特语族(见阿非罗-亚细亚语系)·····	243(4)
乍得语族(见阿非罗-亚细亚语系)·····	513(4)
豪萨语·····	209
埃及-科普特语族(见阿非罗-亚细亚语系)·····	8(4)
尼日尔-科尔多凡语系·····	303
尼日尔-刚果语族(见尼日尔-科尔多凡语系)·····	302(303)
班图诸语言·····	17
斯瓦希里语·····	370
科尔多凡语族(见尼日尔-科尔多凡语系)·····	236(303)
尼罗-撒哈拉语系·····	302
沙里-尼罗语族(见尼罗-撒哈拉语系)·····	334(302)
撒哈拉语族(见尼罗-撒哈拉语系)·····	332(302)
马巴语族(见尼罗-撒哈拉语系)·····	271(302)
科马语族(见尼罗-撒哈拉语系)·····	237(302)
科依桑语系·····	237
美洲印第安语·····	281
瓜拉尼语·····	111
巴布亚诸语言·····	11
〔语系未定〕	
巴斯克语·····	13
朝鲜语·····	34
日语·····	329
〔人造语言〕	
世界语·····	354
〔世界古文字〕	
佉卢字母·····	324
婆罗米字母·····	309
比布鲁斯字母·····	19
腓尼基字母(见比布鲁斯字母)·····	81(19)
楔形字·····	424
埃及圣书字·····	8
玛雅文·····	274

史读·····	257
宰利文·····	375
突厥文·····	385
阿姆哈拉文·····	7

〔中国诸民族语言文字〕

中国诸民族语言·····	523
汉藏语系·····	191
汉语·····	128
藏缅语族·····	509
藏语支·····	513
藏语·····	512
嘉戎语·····	223
门巴语·····	282
景颇语支·····	233
景颇语·····	233
彝语支·····	447
彝语·····	447
哈尼语·····	125
傈僳语·····	258
拉祜语·····	249
纳西语·····	299
基诺语·····	218
缅语支·····	289
载瓦语·····	509
阿昌语·····	1
〔语支未定〕	
白语·····	15
土家语·····	389
珞巴语·····	270
羌语·····	313
普米语·····	309
怒语·····	304
僛语·····	53
独龙语·····	58
苗瑶语族·····	289
苗语支·····	292
苗语·····	291
布努语·····	29
瑶语支·····	443
勉语·····	288
〔语支未定〕	
畲语·····	336
壮侗语族·····	543

侗台语族(见壮侗语族).....	58(543)
壮傣语支.....	543
壮语.....	546
布依语.....	30
傣语.....	48
侗水语支.....	58
侗语.....	58
水语.....	366
仡佬语.....	298
毛南语.....	279
毛难语(见毛南语).....	279(279)
拉珈语.....	249
黎语支.....	254
黎语.....	254
仡佬语支.....	94
仡佬语.....	94
阿尔泰语系.....	1
蒙古语族.....	283
蒙古语.....	283
东乡语.....	57
土族语.....	389
达斡尔语.....	46
保安语.....	18
东部裕固语.....	57
突厥语族.....	386
西匈语支.....	415
维吾尔语.....	399
哈萨克语.....	126
撒拉语.....	332
乌孜别克语(见乌兹别克 语).....	408(408)
塔塔尔语(见鞑靼语).....	380(46)
东匈语支.....	57
柯尔克孜语(见吉尔吉斯 语).....	236(219)
西部裕固语.....	414
图瓦语.....	388
满-通古斯语族.....	274
满语支.....	278
锡伯语.....	419
赫哲语.....	211
满语.....	278
通古斯语支.....	382
鄂温克语.....	63

鄂伦春语.....	63
南岛语系.....	299
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见南岛 语系).....	272(299)
印度尼西亚语族(见南岛语 系).....	454(299)
高山族语言.....	94
阿眉斯语.....	6
排湾语.....	306
布嫩语.....	29
南亚语系.....	301
孟-高棉语族(见南亚语系).....	288(301)
佤-德昂语支.....	391
佤-崩龙语支(见佤-德昂语 支).....	391(391)
佤语.....	391
布朗语.....	28
德昂语.....	49
崩龙语(见德昂语).....	19(49)
印欧语系.....	455
印度-伊朗语族.....	454
塔吉克语.....	380
斯拉夫语族.....	369
俄语.....	62
〔语系未定〕	
朝鲜语.....	34
京语.....	231
中国诸民族文字	520
〔现行文字〕	
汉文(见汉字).....	128(195)
藏文.....	512
景颇文(见景颇语).....	233(233)
彝文.....	446
哈尼文(见哈尼语).....	125(125)
纳西文(见纳西语).....	299(299)
傈僳文(见傈僳语).....	258(258)
拉祜文.....	249(249)
载瓦文(见载瓦语).....	509(509)
白文(见白语).....	15(15)
苗文(见苗语).....	289(291)
瑶文(见勉语).....	443(288)
壮文(见壮语).....	546(546)
布依文(见布依语).....	30(30)
傣文.....	47

侗文(见侗语).....	58(58)
蒙古文.....	282
土族文(见土族语).....	389(389)
维吾尔文.....	399
哈萨克文.....	125
柯尔克孜文(见吉尔吉斯语).....	236(219)
锡伯文.....	419
佤文(见佤语).....	391(391)
朝鲜文.....	33
〔古文字及已不使用的文字〕	
佉卢字母.....	324
婆罗米字母.....	309
吏读.....	257
宰利文.....	375
粟特文(见宰利文).....	376(375)
突厥文.....	385
回鹘文.....	215
契丹文.....	312
西夏文.....	415
东巴文.....	56
女真文.....	304
八思巴字.....	10
察合台文.....	32
满文.....	277
于阗文.....	465
哥巴文.....	94
〔著作和文献〕	
《三十颂》.....	333
《性入法》.....	431
《藏汉大辞典》.....	509
《藏汉对照拉萨口语词典》.....	509
《白狼王歌》.....	15
《彝文丛刻》.....	44
《文海》.....	400
《同音》.....	384
《五音切韵》.....	412
《番汉合时掌中珠》.....	68
《蒙文启蒙诠释》.....	287
《蒙文指要》.....	287
《二十一卷本蒙文词典》.....	66
《蒙汉辞典》.....	287
《突厥语词典》.....	386
《维汉词典》.....	399
《清文启蒙》.....	323

《五体清文鉴》.....	412
《朝汉词典》.....	33
华夷译语.....	213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	519
〔人物〕	
图弥三菩札.....	388
捌思吉斡节儿.....	369
崔世珍.....	44
达海.....	45
乔玛, A. de K.	313
兰司铁, G. J.	250
周时经.....	537
马洛夫, C. E.	272
波普, N. N.	24
王静如.....	394
冯·加班, A.	83
雅林, G.	437
傅懋勳.....	85
季羨林.....	222
马学良.....	273
邢公畹.....	429
张琨.....	513
李方桂.....	254
清格尔泰.....	323
汉语.....	128
汉语语音.....	183
汉语音韵学.....	173
古音.....	109
叶音.....	425
古纽.....	97
古韵.....	109
韵部.....	504
通转.....	384
阴阳对转.....	449
旁转.....	307
古四声.....	100
梵汉对音.....	74
汉藏词音比较.....	189
《切韵》音.....	318
声类.....	345
声纽.....	345

双声	366
体语	382
类隔(见汉语音韵学)	251(173)
音和(见汉语音韵学)	450(173)
韵类	504
叠韵	55
韵目	505
四声	370
平仄	309
韵书	505
平水韵	308
反切	71
反语	73
等韵	51
字母	551
三十六字母(见字母)	333(551)
七音(见等韵)	312(51)
五音(见等韵)	412(51)
喉音	212
牙音(见等韵)	437(51)
舌音(见等韵)	336(51)
舌头音(见等韵)	336(51)
舌上音(见等韵)	336(51)
齿音(见等韵)	37(51)
正齿音(见等韵)	516(51)
齿头音(见等韵)	37(51)
唇音(见等韵)	38(51)
重唇音(见等韵)	537(51)
轻唇音(见等韵)	323(51)
半舌音(见等韵)	18(51)
半齿音(见等韵)	18(51)
清浊	323
全清(见清浊)	325(323)
次清(见清浊)	43(323)
全浊(见清浊)	325(323)
次浊(见清浊)	43(323)
韵图(见等韵)	508(51)
等(见等韵)	51(51)
内外转	301
撮	337
呼(见等韵)	212(51)
开口(见等韵)	235(51)
合口(见等韵)	210(51)
开合齐撮(见等韵)	235(51)

介音(见等韵)	229(51)
洪音(见等韵)	212(51)
细音(见等韵)	419(51)
汉藏对音	191
直音	517
宋初汴洛音	371
《中原音韵》音	533
早梅诗	513
十三辙	350
儿化音节	64
阴调	449
阳调	442
切口	314
徽宗语	215
歇后语	425
〔著作〕	
《声类》(见韵书)	345(505)
《切韵》	317
《唐韵》(见韵书)	382(505)
《韵镜》	504
《七音略》	312
《广韵》	115
《集韵》(见韵书)	219(505)
《礼部韵略》(见韵书)	254(505)
《切韵指掌图》	322
《五音集韵》(见韵书)	412(505)
《古今韵会举要》(见韵书)	97(505)
《中原音韵》(见《中原音韵》音)	533(533)
《蒙古字韵》	287
《五方元音》	411
《音学五书》	451
《六书音均表》	262
《诗声类》(见阴阳对转)	350(449)
《说文声类》	368
《切韵考》	318
《成均图》	36
《十韵汇编》	351

〔人物〕

孙炎	377
李登	254
吕静	266
陆法言	266
陆德明	265
王仁昫	396

孙愐	376
神珙	338
守温	362
陈彭年(见《广韵》)	35(115)
丁度	55
韩道昭(见韵书)	127(505)
黄公绍(见韵书)	215(505)
周德清(见《中原音韵》音)	537(533)
陈第	34
顾炎武	111
戴震	48
钱大昕	313
孔广森(见阴阳对转)	242(449)
江有诰	227
陈澧	34
章炳麟	514
黄侃	215
曾运乾	513
高本汉	92
陆志韦	266
罗常培	268
王力	395
俞敏	466
汉语词汇	133
成语	36
谚语	442
〔词典〕	
《辞源》	43
《辞海》	43
《现代汉语词典》	420
汉语训诂学	167
形训	431
义训	448
声训	349
互训	213
浑言	216
析言(见浑言)	419(216)
通训	383
本义	19
转义	542
引申义	453
假借义	225

比喻义	20
读若	59
读如(见读若)	59(59)
读为	59
读曰(见读为)	59(59)
当为	49
当作(见当为)	49(49)
通名	383
别名	21
通语	384
凡语	71
雅言	437
俗名	375
俗言(见俗名)	375(375)
常言	33
恒言(见常言)	211(33)
转语	542
一声之转	446
重言	37
叠字	55
诋语	258
联绵字	258
右文	465
字族	552
词族	42
同源字	384
雅学	437
音义书	452
〔著作〕	
《尔雅》	65
《广雅》	115
《小尔雅》	424
《尔雅翼》	66
《埤雅》	307
《通雅》	383
《骈雅》	307
《骈字分笺》	308
《叠雅》	55
《比雅》	19
《别雅》	21
《辞通》	43
《联绵字谱》	259
《联绵字典》	258
《释名》	361

《广释名》	115
《匡谬正俗》	243
《订讹杂录》	56
《字诂》	551
《义府》	447
《通俗编》	383
《恒言录》	211
《春秋名字解诂》	37
《经传释词》	232
《助字辨略》	539
《词诠》	41
《古书虚字集释》	99
《诗词曲语词汇释》	349
《小说词语汇释》	424
《戏曲词语汇释》	419
《敦煌变文字义通释》	61
《经典释文》	231
《一切经音义》(玄应)	445
《一切经音义》(慧琳)	445
《续一切经音义》	436
《新译华严经音义》	428
《资治通鉴释文》	546
《小学钩沉》	424
《小学蒐佚》	424
《经籍纂诂》	232
〔人物〕	
郑玄	517
刘熙	260
张揖	514
郭璞	117
程瑶田	37
刘台拱	260
王念孙	396
王引之	396
阮元	331
王先谦	396
刘师培	259
沈兼士	339
张相	514
周祖谟	537
汉语文字学	160
汉字	195
独体字	59

合体字	210
合文	210
意符	449
声符	344
省形	349
省声	349
部首	30
六书	260
象形(见六书)	424(260)
指事(见六书)	518(260)
会意(见六书)	216(260)
形声(见六书)	430(260)
转注(见六书)	542(260)
假借(见六书)	225(260)
甲骨文	223
金文	230
古文	102
鸟虫书	303
籀文	538
篆书	542
隶书	257
八分	10
八体	11
草书	31
真书	515
楷书(见真书)	236(515)
行书	430
正体	516
俗体	375
异体字	448
别字	22
避讳字	20
繁体	71
简体	226
简化字	226
本字	19
后起本字	212
假借字	225
通用字	383
古今字	97
字书	551
古文字学	102
〔著作〕	
《仓颉篇》	31

《三仓》	333
《急就篇》	219
《说文解字》	367
《字林》	551
《玉篇》	497
《类篇》	251
《六书略》	261
《六书故》	261
《龙龕手鏡》	262
《字汇》	551
《正字通》	517
《康熙字典》	236
《中华大字典》	530
《新华字典》	428
《字样》	552
《干禄字书》	87
《五经文字》	411
《九经字样》	233
《殷墟书契》	453
《载寿堂所藏殷墟文字》	226
《殷墟文字类编》	453
《甲骨文编》	224
《甲骨文合集》	224
《卜辞通纂》	26
《殷契萃编》	452
《殷墟卜辞综述》	452
《甲骨文字释林》	224
《说文古籍补》	366
《金文编》	230
《两周金文辞大系》	259
《金文丛考》	231
《积微居金文说》	218
《古文字学导论》	108
〔人物〕	
许慎	436
顾野王	111
徐铉	435
徐锴	435
郑樵	517
段玉裁	59
桂馥	116
王筠	396
朱骏声	539
孙诒让	377

罗振玉	269
王国维	394
容庚	330
董作宾	57
于省吾	466
唐兰	381
郭沫若	116
陈梦家	34
商承祚	334
文字改革	
白话文运动	13
大众语运动	46
国语运动	123
普通话	310
汉字整理	208
汉字查字法	201
汉字简化	205
手头字	362
教会罗马字	227
切音字	315
注音字母	539
国语罗马字	120
威妥玛式拼音	397
邮政式拼音	464
耶鲁方案	443
拉丁化新文字	245
汉语拼音方案	157
汉语拼音正词法	159
全国文字改革会议	324
〔著作〕	
《西字奇迹》	415
《西儒耳目资》	414
《宋元以来俗字谱》	374
《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	49
《汉语拼音词汇》	157
〔人物〕	
卢慧章	265
王照	397
劳乃宣	250
〔机构〕	
正音书院	517
国语统一筹备会	122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	520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见中国 文字改革委员会).....	120(520)
〔汉语语法修辞〕	
汉语语法.....	177
标点符号.....	20
汉语修辞.....	165
修辞格.....	432
〔著作〕	
《修辞鉴衡》.....	435
《马氏文通》.....	273
《国文法草创》.....	120
《国文法之研究》.....	120
《修辞格》.....	434
《新著国语文法》(见黎锦熙).....	429(253)
《高等国文法》(见杨树达).....	93(443)
《修辞学发凡》(见陈望道).....	435(35)
《中国文法要略》(见吕叔湘).....	520(266)
《中国文法革新论丛》.....	519
《中国现代语法》(见王力).....	520(395)
《汉语语法论》.....	183
《语法修辞讲话》.....	467
《中国古代语法》.....	518
《现代汉语语法讲话》.....	420
《现代汉语修辞学》.....	420
《中国话的文法》(见赵元任).....	519(514)
〔人物〕	
杨树达.....	443
黎锦熙.....	253
陈望道.....	35
吕叔湘.....	266
朱德熙.....	538
汉语方言.....	137
官话方言.....	112
吴方言.....	408
湘方言.....	421
赣方言.....	89
客家方言.....	237
粤方言.....	500
闽方言.....	292
〔著作〕	
《方言》.....	76
《方言》续补.....	79

《吴下方言考》.....	411
《越谚》.....	499
《客话本字》.....	237
《新方言》.....	428
《现代吴语的研究》.....	421
《闽音研究》.....	297
《厦门音系》(见汉语方言).....	420(137)
《蜀语》.....	362
《钟祥方言记》(见汉语方言).....	537(137)
《临川音系》.....	259
《粤音韵汇》.....	504
《湖北方言调查报告》.....	212
《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	213
《关中方言调查报告》.....	112
《方言调查字表》.....	79
《汉语方言调查手册》.....	152
《四个闽南方言》(见汉语方言).....	370(137)
《昌黎方言志》.....	32
《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	226
《汉语方言概要》.....	152
《汉语方音字汇》.....	153
《汉语方言词汇》.....	150
《香港粤语语法研究》(见汉语 方言).....	421(137)
《湖南方言调查报告》(见汉语 方言).....	213(137)
《台湾语言源流》(见汉语方言).....	380(137)
《现代汉语方言》(见汉语方言).....	420(137)
汉语方言词典.....	150
《潮语词典》(见汉语方言词 典).....	34(150)
《广州话方言词典》(见汉语方言 词典).....	116(150)
《普通话闽南方言词典》(见汉语 方言词典).....	311(150)
汉语方言地图.....	150
《苏州方言地图集》(见汉语方言 地图).....	375(150)
〔人物〕	
扬雄.....	442
丁声树.....	56
李荣.....	255

〔其他〕

中国主要语言研究机构	527
中国主要语言科学学术团体	526
中国主要语言研究刊物	529
应用语言学	460
语言教学	478
汉语教学	153
语文教学(见汉语教学)	475(153)
少数民族汉语教学	335
对外汉语教学	60
外语教学	392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教学	519
聋哑盲语言教学	263
计算机辅助语言教学	219
正写法	516
正音法	516
翻译	69
术语	363
缩略词语	377
标音	21
转写	542
译音	448
人名学	326
地名学	54
语言规划	477
国际辅助语	117
速记	375
实验语音学	352
生理语音学	341
声学语音学	345
感知语音学	87
言语病理学	438
言语识别	441
言语合成	439
数理语言学	365
统计语言学	384
代数语言学	48
形式文法	430
自动机理论	547

句法类型演算	234
孟德鸠语法	288
语言模型	480
计算语言学	221
机器翻译	217
机助翻译	218
媒介语	279
中介成分体系	530
从属分析法	43
预示分析法	498
树形分析法	364
优选语义学	463
计算机情报检索	220
语义因子	490
术语数据库	364
频率词典	308
计算风格学	219
自然语言理解	547
自然语言书面理解系统	548
汉语书面理解系统	159
扩充转移网络	243
概念从属论	86
语义网络理论	488
分辨网络	81
自然语言语音理解系统	550
汉语语音理解系统	189
人机对话(见自然语言理解)	326(547)
自然语言处理	547
中文信息处理	531
汉字编码	199
〔著作〕	
《四声实验录》	371
〔人物〕	
卢赛洛, J. P.	265
巴尔-希列尔, Y.	12
方特, C. G. M.	76
〔机构〕	
国际计算语言学协会	118
文学与语言计算学会	400

突厥、蒙古、满-通古斯 3 个语族类型上的一致性 3 个语族的语言都有元音和谐律，构拟的各语族共同语和原始阿尔泰语也有元音和谐律。从理论上讲，元音和谐的内容就是元音分为阳性(后列、紧)和阴性(前列、松)两类，每类再按舌位高低及圆唇不圆唇来区分，可以假定有下列 8 个元音：

	前 列		后 列	
	不圆唇	圆 唇	不圆唇	圆 唇
高	i	ü	ɪ	u
低	e 或 ə	ö	a	o

在同一个词(词干和粘附成分)里面，要么都是后列(阳性)元音，要么都是前列(阴性)元音。也就是说同性相适应，异性相排斥。现代各语言实际上的元音系统，有恰巧是 8 个元音的，也有比 8 个有增减和变化的。如：土耳其语和吉尔吉斯语恰巧有 8 个元音；维吾尔语减去 i，增加 ε；乌孜别克语(又称乌兹别克语)和达斡尔语都是 o 和 u 不分，ö 和 ü 不分，ɪ 转变为其他元音；蒙古书面语减去 i；蒙古语察哈尔方言增加 ε、œ、y；满语减去 i、ö，增加 e、e；鄂温克语增加 ε、e。但是各种语言的元音系统都和假定的 8 个元音系统有严整的对应规律，并且元音增减以后仍旧受元音和谐律的支配。

阿尔泰语系各语言在辅音上的共同特点表现在大多数语言都有 16 个辅音：b、p、m、d、t、s、n、l、r、j、č、š、g/ɣ、k/q、ŋ。其中塞音 3 对，塞擦音一对，每一对都是古代以清浊相对立，现代或以清浊对立，或以清音不送气与送气相对立；擦音 3 个，鼻音、边音、颤音共 5 个。每一种现代语言在这 16 个辅音之外又增加了少数几个辅音。就维吾尔、乌孜别克、蒙古、达斡尔、满、鄂温克 6 种语言增加的辅音而论，共有 13 个。把 6 种语言都有的辅音和各语言分别增加的辅音排列在一起，成为下面的辅音表：

*b		*d		*g/*ɣ		
*p		*t		*k/*q		
		dz	dz	*j		
		ʈ	ʈ	*č		
φ	f	*s	ʃ	*š	x/χ	h
w	v	z	ʒ	*j		
*m		*n		*ŋ		
		*l				
		*r				

斜线前表示靠前的软腭音和前列元音相结合，斜线后表示靠后的软腭音和后列元音相结合。这就是“辅音和谐”。不加 * 号的辅音都是后来增加的，6 种语言中每种语言具体增加的辅音如右上表。

从表中可以看出：新增加的都是擦音或舌尖塞擦音；翘舌音是后起的，只出现于达斡尔语及满语；新增加的音在每种语言的辅音系统里都只占少数。这 6 种语言在辅

	φ	w	f	v	dz	ʈ	ʃ	ʒ	ʃ	ʒ	x/χ	h
维吾尔语			+	+			+				+	+
乌孜别克语			+	+		+	+				+/+	
蒙古语	+	+									+	
达斡尔语		+	+				+	+	+	+	+	
满语			+	+	+	+	+	+	+	+	+/+	
鄂温克语		+									+/+	

音上的共同性(只有鄂温克语减去 s、č、k/q 3 个辅音)代表了整个阿尔泰语系语言的共同性。

阿尔泰语系各语言都是粘着语，在构词法和形态学上有很大的共同性。以在词根之后加构词附加成分为派生新词的主要手段，以在词干之后加语法粘附成分为形态变化的主要手段。构词成分和语法成分都既可以是单层的，又可以是多层的。由一个以上的根词素构成的合成词在古老的语词中比例很小，在晚近的语词中才逐渐增加，用词干内部屈折手段表示语法的情况极为少见。

总之，从语音结构上、语词派生上和语法构造上看，阿尔泰语系 3 个语族各语言之间都表现出类型上的高度一致性。

突厥、蒙古、满-通古斯 3 个语族共同的语法成分 3 个语族有同源关系的有力证据是名词(体词)后面所接的格粘附成分彼此很相似。下面以土耳其语代表突厥语族，蒙古书面语代表蒙古语族，满语代表满-通古斯语族，列出各自的属格、宾格、与格、位格、离格的粘附成分，以见它们的同源关系。

	土耳其语	蒙古书面语	满 语
属格	ın/un/in/ün	u/un/jin	i/j/ni
宾格	ı/u/i/ü	i/j	bə/b
与格	a/e	a/e	də/d
位格	da/de/ta/te	da/de/ta/te	də/d
离格	dan/den/tan/ten	ača/eče	dəre

各种语言的动词都至少可以接 3 套粘附成分，以表达 3 种不同的句法功能。一套出现在作句子的主要谓语的动词词干之后，称为述谓形式或终止形式；一套出现在作句子状语的动词词干之后，称为动副词或动副形式；一套出现在能仿照名词作句子的几种不同成分的动词词干之后，称为动名词或动名形式。带后两套粘附成分的动词词干也可再带宾语、补语、状语、主语、定语。

在历史上，动词的一种功能可以向另一种功能转化，转化时形式可以不变，也可以添加某种成分。下表列举动名词、动副词各两种形式(其中将来时有的语言称为现在将来时或未完成体，过去时有的语言称为完成体)，用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蒙古语、土族语、满语、鄂温克语的材料作对照。

从下表看，在这 4 种动词形式上，3 个语族有整齐的对应关系。其中少数语音形式不同，有可能是发生了历史音变，也可能不是共同成分。现代蒙古语和土族语没有

	动 名 词		动 副 词	
	过去时	将来时	条件式	目的式
哈萨克语	yan/gen qan/ken	ar/er/r	sa/se	yalə/geli qalə/keli
吉尔吉斯语	yan/gen qan/ken	ar/er or/ör	sa/se so/sö	yalə/geli yolu/gölü qalə/keli qolu/kölü
蒙古书面语	γsan/gsen	{r}	basu/besü	ra
土族语	san	—	sa	ra或la
满语	xa/xə	ra/rə/r	če	—
鄂温克语	ʃaa/ʃəə ʃoo/ʃöö	r	xxi/xxi	daa/dəə doo/döö

带 r 这种形式的将来时动名词, 但是有 ra(土族语有 la) 这种形式的目的式动副词。ra 中的 a 是与格成分, ra 中的 r 可能是古代将来时动名词的遗迹(上表用加括号表示)。4 种动词形式之中, 过去时动名词和条件式动副词形式有一点相似, 即许多语言都有一个擦音 s 或由 s 转变来的其他擦音或塞擦音, 将来时动名词和目的式动副词形式有一点相似, 即都有一个 r 或 l 或 d。r、l、d 三者互相对应的情况是比较常见的。

突厥、蒙古、满-通古斯 3 个语族之间词汇的共同性和差异性。这 3 个语族之间词汇的共同性最引人注意的是第一、二人称单、复数的人称代词。现以哈萨克语、蒙古书面语和满语为 3 个语族的代表说明彼此之间的一致关系。表中有斜线的, 左方是主格形式, 右方是主格以外其他各格的词干形式, 语音形式不同的可以从音变规则中得到解释。

	哈萨克语	蒙古书面语	满 语
第一人称单数	men	bi/min	bi/min 我
第二人称单数	sen	či/čin	si/sin 你
第一人称复数	biz	bida/man	bo/mon 我们
第二人称复数	siz	ta/tan	so/son 你们

3 个语族各有一套数词, 这种词汇的差异性也是最引人注意的。下面举土耳其语、蒙古书面语和满语一至十的数词为例, 以见彼此的不同。

土耳其语	蒙古书面语	满 语
bir	nigen	emun 一
iki	qojar	jume 二
üç	yurban	ilan 三
dört	dörben	duin 四
beş	tabun	sunja 五
altı	jiryuyan	ningun 六
yedi	doluyən	nadan 七
sekiz	naiman	jakun 八
dokuz	jisün	ujun 九
on	arban	juwən 十

下面再举两组常用词来观察 3 个语族词汇的异同。突厥语族以维吾尔语、哈萨克语为代表, 蒙古语族以蒙古书面语、土族语为代表, 满-通古斯语族以满语、鄂温克语为代表。

第 1 组

维吾尔语	哈萨克语	蒙古书面语	土族语	满语	鄂温克语
kün	kün	naran	nara	šun	šigün 日
aj	aj	sar	sara	bija	beegə 月
ot	ot	yal	yal	tuwa	toyo 火
su	su	usun	şdu	muke	müü 水
köz	köz	nidun	nudu	yasa	iisal 眼
qulaq	qulaq	čikin	čigə	šan	šeen 耳
til	til	kelen	kele	iləngu	iŋgi 舌

第 2 组

维吾尔语	哈萨克语	蒙古书面语	土族语	满语	鄂温克语
altun	altən	altan	xaldan	aisin	altan 金
batur	batər	bayatur	baatur	baturu	baatar 勇士
buğa	buğə	buyun	bodo	buğu	bog 鹿
kök	kök	köke	kugo	kuk	xöxö 蓝色
qara	qara	qara	xara	kara	χara 黑色

第 1 组词和数词的性质相似, 3 个语族各自内部一致, 而语族之间不同; 第 2 组词和人称代词的性质相似, 3 个语族似乎是同源的。经过第一派学者精心考察, 类似第 2 组词的数目可以增加一些, 但类似第 1 组词和数词的彼此不同, 是构拟原始阿尔泰语的困难所在。第二派学者认为第 2 组词所以彼此相同, 是词汇借贷造成的。但是, 推论下去就会引出人称代词是否也可以互相借贷的问题。

3 个语族之间存在的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错综的语言现象, 应该联系历史上说这些语言的人民之间的相互关系去考察。

历史学家和历史比较语言学家都明确指出, 使用阿尔泰语系各种语言的人民在历史的早期都起源于中国的北方并长期生活在这个地区。匈奴、乌桓、鲜卑、室韦、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满各个民族在这一地区建立过幅员辽阔的国家, 在一定的历史年代又把他们生活的地域向西扩展, 直至西亚和东欧, 并在那里建立了国家。历史上的这些国家(元代、清代两个王朝另当别论), 特别是封建前期的国家, 疆域广大, 但人口密度较小, 并且每个国家都是由许多民族组成的, 多民族成分中使用阿尔泰语的民族居多数。一个民族在军事和政治上取得统治以后, 往往还没有来得及在经济和文化上达到高度统一时, 统治权又转移到另一个民族手中去了, 如此循环递嬗。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 对于语言发展来说, 由一种语言分化为地域方言并在方言基础上形成不同语言的发展道路是不稳定的。由于战争和其他原因, 居民的流动性很大, 接触其他语言的机会很多, 说一种语言的人转用另一种语

言的机会也多。阿尔泰语言发展历史的复杂性就在于此。因而研究阿尔泰语言中什么是同源关系,什么是互相影响的关系,有时也难于判断。

阿尔泰语研究简史 用历史比较法研究阿尔泰语始于20世纪初。在掌握多种语言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比较,提出并论证阿尔泰语有亲缘关系,贡献最大的是芬兰学者G. J. 兰司铁。从1902年起,他写了许多揭示语族之间共同的语法成分和重要的语音对应关系的论文。他的全部成果都荟萃在他死后由他的学生P. 阿尔托编辑的《阿尔泰语言学导论》一书中。他的著作作为阿尔泰语言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受兰司铁的影响,不少学者继续他的工作。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波兰学者W. 科特维奇和美国学者N. N. 波普。波普用他的研究成果维护阿尔泰语系语言同源论的观点。他在作了许多专题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了《阿尔泰语比较语法》,把探索同源词和建立音变规律的工作向前推进了一步。

波兰学者科特维奇和兰司铁一样,在阿尔泰语比较研究中作了大量工作并受到重视。他的代表作是《阿尔泰语言研究》。他在探索每个语族的语言历史、揭示3个语族之间一些共同的词和语法成分以及一些语音对应规律以后,得出的结论却不是这些语言同出一源,而是这些语言彼此之间在历史上产生过强烈的互相影响。

到20世纪50、60年代,阿尔泰语系各语言的单独研究更趋深入,突厥、蒙古、满-通古斯各个语族内部的比较研究取得更好的成果,分化演变的历史更趋清楚。这就要求在3个语族各自的共同语的基础之上建立原始阿尔泰语的工作提高一步。不仅要认识语族间的个别同源成分,还要说明整个语言系统的发展演变,不仅能解释相同的语言成分,还要解释为什么有那么多相异的语言成分。以兰司铁为代表的学者的工作和波普等人的著作都还没有达到这样的要求。因此许多学者在对于阿尔泰语系的亲缘关系问题上态度更为谨慎了。例如匈牙利学者C. 李盖蒂认为阿尔泰语的亲缘关系只是一种假说。丹麦学者K. 格伦贝克认为阿尔泰语系的存在还没有证明。J. 本辛认为同源关系虽然不是不可能,但目前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证明。苏联学者H. A. 巴斯卡科夫则强调了阿尔泰语系语言的演变历史中存在着十分复杂的关系,在以分化为主的趋势中,分与合交织在一起。

怀疑阿尔泰语言亲缘关系的学者也发表了一些论著。如英国学者G. 克劳森在20世纪50、60年代发表的论文,提出3个语族之间的共同成分多半是互相借贷的理论。这个理论在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

在提出阿尔泰语系学说的早期是把乌拉尔语系(包括芬兰-乌戈尔语族和萨莫耶德语族)和阿尔泰语系联系在一起称为乌拉尔-阿尔泰语系的。后来经过深入研究,看到了那些语言和阿尔泰语相远的一面,不应划入同一语系。从此包括3个语族的阿尔泰语系应是独立语系的观点才日益明确。用3个语族的材料和朝鲜语比较时

也能找出某些共同的语言成分,因此有人主张阿尔泰语系中应包括朝鲜语。但是朝鲜语本身的独特性质,朝鲜语和阿尔泰语大量的相异成分是难于解释的。因此,朝鲜语属阿尔泰语系也就只停留在假说阶段。

参考书目

G. J. Ramstedt, *Einführung in die altaische Sprachwissenschaft*, Helsinki, I Lautgeschichte, 1957, II Formenlehre, 1952.

N. N. Poppe, *Vergleichende Grammatik der altaischen Sprachen*, I Vergleichende Lautlehre, Wiesbaden, 1960.

В. Котвич,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по алтайским языкам*, Москва, 1962.

(喻世长)

Afellikanslyu

阿非利堪斯语 (Afrikaans language) 又称南非荷兰语。南非的两种官方语言之一(另一种是英语)。属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西支。分布于南非和纳米比亚(西南非洲)。使用人口500多万。阿非利堪斯语由17世纪中叶以后在南非定居的荷兰、德国和法国移民使用的荷兰语演化而成,偶称布尔语,“布尔”原义boer(农民),因为这些移民到达南非后主要以农牧业为生。

在欧洲移民到达南非以后的200年间,阿非利堪斯语只有口语,到19世纪中叶,标准书面语才逐渐形成。阿非利堪斯语语音系统以荷兰南部方言为基础,它的拼写规则和荷兰语基本相同,但稍简化。语法也比荷兰语简单。名词没有性和格的变化;动词的时态和人称形式都已消失,只剩有规则的变化,时态和语气用情态词表示,用助动词构成现在完成时。阿非利堪斯语的另一个特点是使用重叠词。词汇和荷兰语相似,但有许多马来-葡萄牙语(17~18世纪东南亚与南非沿海地区的一种商用语言)、霍屯督语、班图语借词。来自英语的借词数量很大,主要是科学技术和体育词语。

(沈涯涵)

Afeilluo-Yaxiya yuxi

阿非罗-亚细亚语系 (Afro-Asiatic family) 又称闪-含语系(Semito-Hamitic family)。分布于北非和西南亚的一个主要语系,包括阿拉伯语、希伯来语、豪萨语和阿姆哈拉语等主要语言。使用人口近2亿。通常分为以下5个语族:闪语族、埃及-科普特语族、柏柏尔语族、库施特语族和乍得语族。乍得语族的归属问题。学者们有不同意见。有些学者否认乍得诸语言跟其他各语族之间有亲缘关系,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有亲缘关系。

阿非罗-亚细亚诸语言在古代的一些主要共同特点:①语音方面:a.都有长、短a、i、u 6个元音;b.擦音都有3类:清、浊和喉擦音;c.用声门闭塞与否作为区别性特征;d.辅音与半元音(w和y)一起使用;e.有3类辅音:清、浊和“强势”辅音,后者等于清辅音加上喉塞音,或等于喉化辅音(包括清、浊),或内爆发音。②词法方面:a.名词和动词的词根由动词派生而来,动词由两个部分构成:辅音构成词根,元音构成内容。b.绝大多数

词根都由3个辅音构成,两个辅音的词根很少。c.加中缀的系统非常发达,即在词根中插进各种成分,构成新义。d.后缀系统较不发达。e.名词、代词至少有3个格;名词、代词和动词有3个数——单数、双数和复数。③语法方面:a.事件的结果用名词的零谓语表示。动词都有互相对立的体:完成体对未完成体,一次体对持续体;动词的时、态表达法到现代阶段才发展起来;b.用添加后缀的方法表示代词的所有关系和宾语,给动词加前缀,表示动作者。c.古代阿非罗-亚细亚诸语言的名词、代词和动词有许多性,现在只有两个性。d.句法方面,修饰结构用得很多。保留上述所有或大部分特点的非罗-亚细亚诸语言,属于古代阶段;保留不少于2/3特点的,属于中古阶段;失去一半以上特点的,则属于现代阶段。除了阿拉伯和希伯来书面语言外,所有阿非罗-亚细亚诸语言都是属于现代阶段的语言。

闪语族 主要包括阿拉伯语、希伯来语、阿拉米语、马耳他语和阿姆哈拉语等。使用人口近1.3亿。主要语言特点是:保存有强势塞音 t 和 q 。古代的塞擦音已经消失,代之以咝音 s, ζ, z 和齿间音 th, dh 。阿拉伯语中保留有喉音。原来的6元音系统也已经发生变化。词没有阳性标记,只有阴性标记。南部闪语族诸语言名词复数的构成,采用所谓的“中分性复数”,例如:阿拉伯语 *kalb*(狗)、*kilab*(许多狗)。用复杂的中加元音系统和加前、后缀的方法构成新词。闪语族诸语言的典型句法是修饰结构:①支配的名词置于被支配名词之前,前者以简缩的形式出现,后者用所有格;②两个名词并列,名词用复杂格的形式表示,中间用代词连接。阿拉伯语中有不少来自波斯语和突厥语的词语。

埃及-科普特语族 最初的代表是古埃及语,约4世纪以后为科普特语所取代,后者现仅用于宗教仪式。科普特语采用简化了的象形文字(见图)。

柏柏尔语族 分布于北非,主要是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其次是尼日尔、马里等国。主要语言有什卢赫语、塔

马齐格特语、瑞非安语和图阿列格语(又称塔马舍克语)。柏柏尔诸语言的使用人口800万左右,其中摩洛哥有500万,阿尔及利亚有250万,其他国家有50万。柏柏尔诸语言彼此极为相似。语音系统中的元音 $*a, *i, *u$ 已失去,或简化为 ∂ ; $*\bar{a}, *i, *u$ 变成 a, i, u , 齿间音、边音和塞擦音已失去。除了动词以外,构词采用内部屈折法。名词的复数采用中分性复数。图阿列格语动词的时好几种表达法。来自阿拉伯语的借词很多。

库施特语族 主要语言包括索马里语、盖拉语、锡达莫语、贝贾语等。分布于索马里、埃塞俄比亚等地,使用人口1500万左右。库施特诸语言的特点:保留大部分强势辅音,闪语族诸语言中的齿间音在这里变成塞擦音。只有一部分动词利用前缀(动作者标记)变化表示变位,大部分动词采用新的变位系统。有阳性和阴性;重复词干表示复数;代词系统跟闪语族诸语言非常接近。有来自埃塞俄比亚诸语言、阿拉伯语、尼罗-撒哈拉诸语言的许多借词。索马里语采用阿拉伯字母。

乍得语族 分布于撒哈拉以南地区。主要语言包括豪萨语。乍得诸语言的使用人口约3000万,主要的语言特点:都是声调语言,声调有区分词义的功能。跟阿非罗-亚细亚诸语言的早期阶段相比,乍得诸语言已失去许多音。大部分动词是助动词后接动词性名词。大多数语言的名词都有性,但没有格。有来自英语、阿拉伯语、弗拉尼语、东苏丹诸语言的借词。

参考书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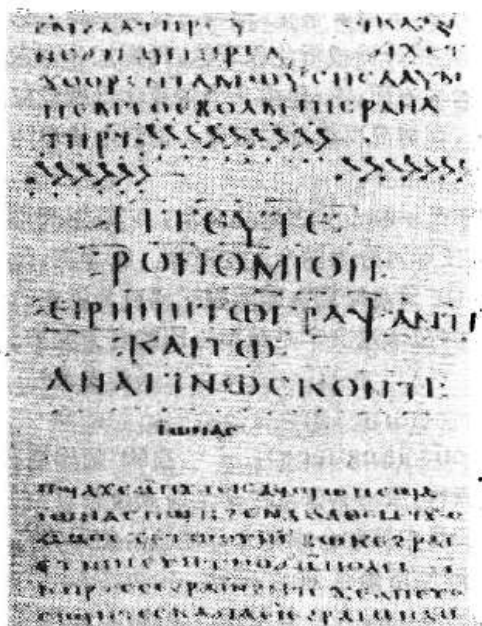
G. Bergsträsser, *Introduction to the Semitic Languages*, Eisenbrauns, Indiana, 1983.

I. M. Diakonoff, *Semito-Hamitic Languages: An Essay in Classification*, Nauka Publishing House, Moscow, 1965.

(林书武)

Alaboyu

阿拉伯语 (Arabic language) 沙特阿拉伯等19个国家的官方语言。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之一。属阿非罗-亚细亚语系闪语族。分布于西亚和北非22个阿拉伯国家和地区。使用人口约近2亿。阿拉伯语源出阿拉伯半岛。公元5世纪前后,在北方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统一的阿拉伯语文学语言。7世纪随着伊斯兰教和阿拉伯帝国的兴起,这种语言很快成为东起印度河,西到直布罗陀,南到北非,北至里海这一广大地区信奉伊斯兰教的各民族的通用语;在欧洲中古世纪,它是保存希腊文化和沟通东西方文化的媒介语。阿拉伯帝国衰亡后,阿拉伯语的使用地区大大收缩,但它对亚、非、欧许多地区产生过巨大的文化影响。如波斯语、土耳其语、乌尔都语、印度尼西亚语、斯瓦希里语、豪萨语等36种语言都曾大量吸收阿拉伯语词,并用阿拉伯字母拼写,其中波斯语、乌尔都语以及中国的维吾尔语等现在仍然使用这种字母。阿拉伯语有元音8个,辅音28个,以多顶音和喉音为其特色。因为在世界诸语言中独具 *dad* (达德) 这个顶音而有“达德语”之称。



科普特语《圣经》中的一页(4世纪初)

阿拉伯语是一种综合型语言。词大都具有内部屈折变化,构词法和词形变化有独特的规则,词根通常由3个辅音搭成框架,填进不同的元音,或附加词缀,形成不同的词或赋予不同的语法意义。例如表示“写”的词根,其基本音素是 k-t-b 三个辅音,填进不同的元音,构成 ka:tib (作者、文书,写的人),kita:b (书,写成的作品),ma-ktab (书房,办公室、书桌,写字的地方,单数),ma-ka:tib (书房、图书馆、办公室、书桌,复数),kataba (他写,过去时),je-ktubu (他在写,现在进行时)。阿拉伯语分名词、动词、虚词3大类。可作主语、宾语的词都列入名词范畴。名词有性、数、格、式(即确指或泛指)的区别。动词有人称、性、数、时态及语态等各种变化。实词在句中的地位都由格的形式来显示,语序有较大的灵活性,但修饰语只能紧跟在被修饰语之后。阿拉伯语的外来语成分不多。古代的借词主要来自波斯、土耳其、印地、古希腊、拉丁以及希伯来等语言,近、现代的外来语主要是西方的科学技术词语。

自7世纪上半叶伊斯兰创教以后近300年时间内,随着阿拉伯人在半岛以外的扩张和外族语言的侵袭,阿拉伯语方言逐渐形成了与文学语言的巨大差异。现在,阿拉伯语的方言已发展为叙利亚、伊拉克、内志和希贾兹、也门、埃及、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8大支,其中以埃及方言影响最大。

阿拉伯文字是一种音位文字,4世纪由闪语族西支的音节文字发展而来,共有28个辅音字母,元音没有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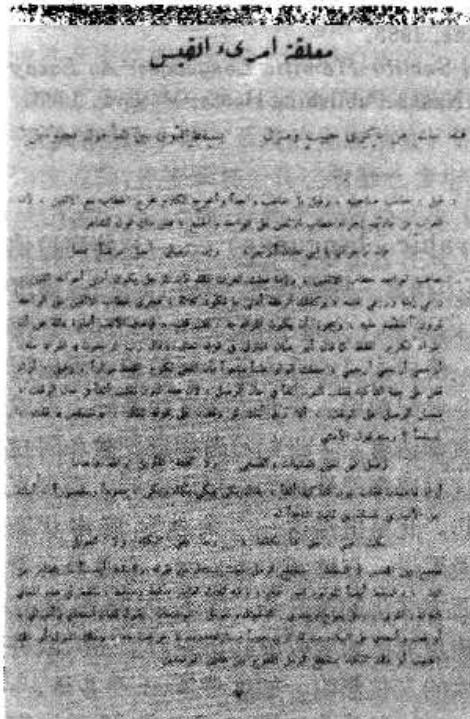


图1 《悬诗》中的一页



图2 《古兰经》手稿片段(644~6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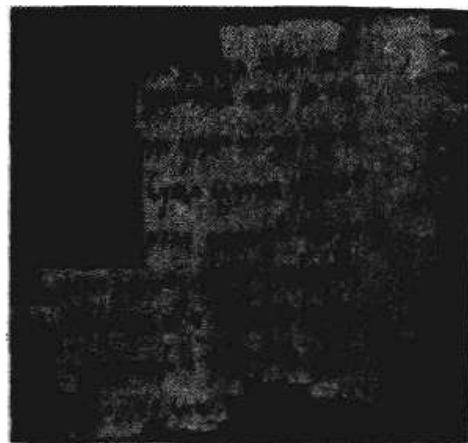
母,需要标识时,可在字母上方、下方加符号表示。自右而左书写。阿拉伯语的重要文献,7世纪以后的有伊斯兰教的经典《古兰经》(图2),7世纪以前的如《悬诗》(图1),在伊斯兰教兴起后追录成文。(张甲民)

Alamlyu

阿拉米语 (Aramaic language) 古代近东的通用语言和波斯帝国的官方语言,近代通常指叙利亚的一种方言。属阿非罗-亚细亚语系闪语族西支。

阿拉米语在中近东文化史上有着重要意义。公元前6世纪以前的2000年中,古代语言阿卡德语的两种方言——亚述语和巴比伦语——在近东广为通行,但到公元前6世纪,阿拉米语逐渐取代了它们,成为近东的共同语言,其后又成为波斯帝国的官方语言。基督教《圣经》的《旧约全书》中有一部分是用阿拉米语写的,历史传说认为,耶稣也使用阿拉米语的一种方言。

阿拉米语的方言很多,但主要可分为东、西两支。在叙利亚大马士革北部的一些很小的社团里,现在还有少



用阿拉米语写的一个故事的一部分(公元前5世纪)

数人仍在使用的东部方言;而在黎巴嫩的一些偏僻村落中,也有少数人仍在使用的西部方言。

跟闪语族其他语言相比,阿拉米语保留了更多的古代成分。如语音方面,元音a常见,辅音出现频率高。语法方面,被动语态常用分词或祈使句表达,代词加分词常构成一种时态。构词方面,一般由3个辅音字母构成框架,中间加进元音,视情况再添加前后缀。词汇中借自阿卡德语和波斯语的词很多。

阿拉米语文字是一种十分古老的文字,它是亚洲许多文字的基础,其发展可分为两个主要时期:①早期。公元前9~前7世纪;②“黄金时期”,即阿拉米语成为近东的通用语时期,当时阿拉米语文字是波斯王国的官方文字。

(林书武)

Ameslyu

阿眉斯语 (Amis language) 自称“阿眉斯”的高山族使用的语言。属南岛语系印度尼西亚语族。分布于中国台湾省花莲县东部和台东东北部地区。使用人口约10万(1982)。阿眉斯语有17个辅音:p,m,f,t,n,l,t,r,j,k,ŋ,x,h,ʔ,j,w;有4个元音:i,ə,a,u。没有复

辅音和复元音。属多音节粘着语,重音在最后音节上。在词根上递加词缀为构词和构形的主要手段。词缀有前加、后加和中加。如 nanum(水),ni-nanum(喝水);fafahi(妻),fafahi-an(女人);tirəŋ(身体),t-um-irəŋ(站立)。重叠形式在构词和构形上有重要作用,词根重叠后主要表示事物繁多或动作重复。句中主语、宾语、定语用冠词表示。普通名词没有性、数、格的形态变化。代词有变格形态。人称代词的领属性定语有独立式和连接式之分,指示代词有远指和近指之别。动词有及物和不及物的形态,有体、态、式的范畴。句子语序为谓语—主语—宾语。修饰性定语在中心词之前,领属性定语在中心词之后。借词主要来自汉语闽南话。(何汝芬)

Amuhalawen

阿姆哈拉文 (Amharic script) 埃塞俄比亚的现行文字。这种文字有 37 个表示辅音的基本符号,每个符号大都有 7 种表示元音的变化,其中 4 个带有复元音的符号只有 4 种变化。一共 247 个符号(不算表示数字的符号),组成音节字母表。从左而右横写,词与词之间用两个点子(象冒号)隔开,句子末尾用 4 个点子(象两个冒号)表示。公元 5 世纪传入基督教以后,埃塞俄比亚产生葛爱兹字母,后来演变出阿姆哈拉字母,在 14 世纪成为埃塞俄比亚的通用文字。阿姆哈拉文是一种形制特殊的音节文字,在这个有基督教传统的古老非洲国家流传至今。(周有光)

Amuhalayu

阿姆哈拉语 (Amharic language) 埃塞俄比亚的官方语言。属阿非罗-亚细亚语系闪语族。原先分布于埃塞俄比亚阿姆哈拉地区,故此得名,现分布于埃塞俄比亚中部、南部地区。使用人口约 900 万。

跟阿非罗-亚细亚语系诸语言的早期阶段相比较,阿姆哈拉语的几种方言之间区别不大。阿姆哈拉语丧失了大部分喉音,名词格的变化也已经消失。动词中的元音有两类:一是完全元音,另一是简化元音。

阿姆哈拉语采用音节文字(见阿姆哈拉文)。

(林书武)

Asamuyu

阿萨姆语 (Assamese language) 印度阿萨姆邦的语言,印度宪法承认的语言之一。属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印度语支。使用人口约 1400 万。它是奥里亚语和孟加拉语的近亲。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4~15 世纪的文献,如《罗摩衍那》的译本。

阿萨姆语的元音系统里 i 和 u 没有长短音的区别,例如 nila(蓝黑),梵语 nīla; dhuli(尘土),梵语 dhūli,印地语 dhūl。元音鼻化现象常见,例如 dāt(牙齿),源出梵语 danta。中古雅利安语的 a 在阿萨姆语中变成 o。由于受周围藏缅语言的影响,辅音中没有卷舌音。阿萨姆语把中古雅利安语词首的 s 变成 x,又把元音之间的

s 变成 h。例如 xəhur(家公),通俗梵语 sasura,孟加拉语 šošur。语法方面,阿萨姆语没有“性”的范畴。名词有 6 个格,代词有 4 个格,每个格不止一个形式,此外还有敬体形式。阿萨姆语的文字和孟加拉文字相似。

(周流溪)

Asaibajiangyu

阿塞拜疆语 (Azerbaijan language) 阿塞拜疆族的语言。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西南(乌古斯)语支,与土耳其语最接近。使用人口约 600 万。主要分布在苏联阿塞拜疆、格鲁吉亚、达吉斯坦和伊朗等国。阿塞拜疆语方言可划分为下列几组:东部(库宾、德尔本、巴库、舍马赫等地),西部(哈萨克、卡拉巴赫等地),北部(努赫、札卡塔雷等地),南部(纳希切万、奥尔杜巴德、大不列孜等地)。伊朗境内的卡施卡依语则组成南部阿塞拜疆语的特殊方言。阿塞拜疆语有 9 个元音: a, ä, e, i, i, o, u, ö, ü。有 23 个辅音: b, ç, d, f, g, v, h, j, k, l, m, n, p, q, r, s, š, t, v, x, y, z, ž。语法特点与其他突厥语相同,名词有数、领属人称、格的变化。动词有人称、式、态、时的变化和多种形式的形动词和副动词。使用后置词。阿塞拜疆书面语出现于 11 世纪,具有悠久的文学传统。现代书面语则在巴库和舍马赫方言基础上形成于 19 世纪中期。苏联阿塞拜疆语文字 1929 年以前采用阿拉伯字母。1929~1939 年采用拉丁字母。从 1939 年后采用俄文字母。

(耿世民)

Asikeli

阿斯科里, G. I. (Graziadio Isaia Ascoli 1829~1907) 意大利语言学家。1829 年 7 月 16 日生于戈里齐亚,1907 年 1 月 21 日卒于米兰。自 1860 年起任米兰大学教授,对比较印欧语音学有深入研究,是方言调查的先驱之一。

19 世纪中期以前,欧洲学者以为印度的梵语与原始印欧语在结构上是彼此一致的,甚至认为是最接近原始印欧语的语言。1870 年阿斯科里发表一篇论文,彻底推翻了 this 说法。

阿斯科里提出了底层说。他认为,学语言的人,由于自有其母语,因此第二语言说得不够好,同时第一语言也受到了损害,这就形成了语言演化的条件。例如不列颠群岛的凯尔特人为盎格鲁-撒克逊人所征服,英语成了胜利的语言,凯尔特语成了底层语言,但是凯尔特语对英语仍有影响。被征服的人虽然采用了新语言,可是保留着原有语言的许多习惯,甚至在使用新语言的词汇时也保留着旧语言的发音方法和重音。他举例说,拉丁语的[u]变为法语的[y],是由于受被征服的高卢语的影响;拉丁语的 h 在伊比利亚人占领区变为 f,也是由于受被征服的巴斯克语的影响。但是 O. 叶斯泊森认为阿斯科里的话证据不足。现代美国学者 R. 沃多也认为,人们对于那已被淹没的语言的本来面目所知太少,因此底层语言对于现行语言究竟有哪些影响,难以确定。

阿斯科里的重要著作是《罗曼殊方言论文集》(1873),

《梵语、希腊语、拉丁语比较语音演讲集》(1870)和《语言学书信集》(1886)。(王宗炎)

Awaniesuofu

阿瓦涅索夫, Р. И. (Рубен Иванович Аванесов 1902~1982) 苏联语言学家。1902年2月14

日生于阿塞拜疆舒沙市, 1982年5月1日卒于莫斯科。1925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

1937~1982年任莫 斯科大学

教授。自1944年起任苏联科学院

俄语研究所语言史与方言学

学部主任。1957年起任共同斯

拉夫语言地图国际委员会主

席。1958年起为苏联科学院通

讯院士。1967年起任国际语音

协会副主席。1976年起任欧洲

语言地图国际委员会副主席。

主要研究音系学、语音学、俄语史、俄语方言、语言地理学。



阿瓦涅索夫是莫斯科音位学派创始人之一。他的音位理论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早期观点反映在《俄罗斯标准语语法概要》中(同В. Н. 西多罗夫合著,1945),认为音位变体的归属问题决定于词素的同一性。如俄语прут(细树枝)和пруд(池塘)中的尾辅音都发t音,但它在前一词中是音位/t/的变体,而在后一词中是音位/d/的变体,因为当后面出现元音即该辅音处于强位时(如二格的形式 прута 和 пруда 中),分别发清音t和浊音d。同样,валы(巨浪,复数)和волы(犍牛,复数)中的非重读元音都发[ʌ]音,但它在前一词中是音位/a/的变体,而在后一词中是音位/o/的变体,因为它处于重读音节中(强位)时(如单数形式 вал 和 вол),分别发a和o音。简言之,就是把某个词素内由于现代语音规律而发生交替的音视为同一音位的变体(见Л. В. 谢尔巴)。1956年阿瓦涅索夫又在《现代俄罗斯标准语语音学》中发展了自己的观点,提出强音位、弱音位、音位列(由强音位及与之交替的弱音位组成)等概念,在国际上得到R. 雅柯布逊、M. 哈利、J. 库里沃维奇等学者的肯定。

(信德麟)

Aiji-Lipute yuzu

埃及-利普特语族 (Egyptian-Coptic group) 见阿非罗-亚细亚语系。

Aiji shengshuzi

埃及圣书字 (hieroglyphics) 埃及5000多年前第一王朝创始的文字。埃及圣书字有3种字体:碑铭体、僧侣体和大众体。

碑铭体起初是雅俗通用的。后来成为雕刻在金字塔和神庙石壁上,以及绘写在石器和陶器等器物上的庄严字体。古埃及人把文字叫作“神文”。希腊人把埃及文字

的碑铭体称为“圣书字”,同时也是3种字体的总称。碑铭体的符号外形好象图画,实际大都早已失去象形功能。过去翻译者把“圣书字”译为“象形文字”,并且扩大含义作为同类型文字的统称。

碑铭体是装饰性的正体。僧侣体是实用性的草体。古埃及用毛笔和墨水在纸莎草上写字,工整的正体变成快写的草体。第一王朝时期,正草两体并用,不分僧俗。到公元前第3世纪,草体主要用于宗教写经,因此称为“僧侣体”。僧侣体好象“狂草”,外形跟碑铭体很不相同,但是内部结构完全一致。

大众体又称书信体或土俗体,它是僧侣体的简化。大众体大约在公元前660年前开始应用于下埃及,后来上下埃及全都通用。大众体的外形虽然简化了,可是内部结构没有改变。到多来美时期(公元前323~前30),大众体成为主要的字体。最晚的大众体遗物是425年的石刻。在这以后,埃及圣书字衰亡了。它留下丰富的多方面的文献,曾在古埃及历史上活跃了三千几百年。

埃及圣书字由意符、音符和定符组成。在古埃及的古典时期,符号总数有700来个,后来不断增加,到公元前500年左右达到2000个以上。这些基本符号可以组成全部语词。埃及圣书字是一种语词-音节文字。

碑铭体中的意符有许多是明显的象形字。例如,圆圈中加一点表示“太阳”;持弓的人表示“军人”或“军队”;一张弓表示“长度单位”;鸟展两翅表示“飞”;眼睛下面三条线表示“哭”;两条腿表示“走”。意符可以单独表示词义,但是所表词义不是都能象上面所说的例子那样望文生义。写成僧侣体以后,完全失去了象形作用。

音符大都是从早期的意符转化而成。埃及圣书字的音符,只表辅音,附带不写出的元音。例如“神文”(mdwntr)这个词是由辅音符号构成,阅读时候由读者加上应有的元音。音符有单音符、双音符和三音符。这些音符是后世辅音字母的最初萌芽。

定符是规定意义类别的记号,本身不读音,跟其他符号结合成词,有区别同音词的作用,类似形声字的部首。定符举例:长方形表示“天”,长方形下加一颗星表示“夜”,长方形下加几条曲线表示“下雨”。“日”、“月”、“山”、“水”等定符一看就知道它们表示的意义类别。表示君王名字的定符是一个椭圆形,加一条底座线(象中国的“神主”牌位)。椭圆形中间的君王名字是用纯表音的音符写成的,这样就提供了后世释读埃及圣书字的最初突破口。

埃及圣书字被人们遗忘了一千几百年。1799年在埃及罗塞塔地方发现一块纪念碑,有碑铭体、大众体和希腊文3种文字对照。以这块石碑为线索,经过长期的研究,到19世纪20年代,终于对3种字体基本上释读成功。古埃及语和古埃及文化完全不同于今天埃及的阿拉伯语和阿拉伯文化。以金字塔为象征的灿烂的古埃及文化,由于圣书字的释读成功,重新在现代人的历史书上放出光芒。(参见彩图插页第43、44页) (周有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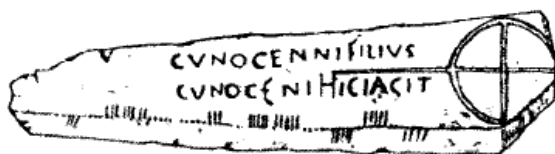
Ai'erylanyu

爱尔兰语 (Irish language) 又称盖德尔语或盖尔语。爱尔兰的官方语言之一(另一种是英语)。属印欧语系凯尔特语族海岛凯尔特语北支。爱尔兰 17 世纪并入英国后,英语逐渐占优势地位。1893 年盖尔联盟成立,致力提倡盖尔语言和文化。1922 年爱尔兰独立,爱尔兰语重又用于学校教育。在全国数百万人口中,盖尔语使用者仍是少数(约 50 万人),但各种盖尔语出版物不断增多。这种语言起着复兴民族意识的作用。

现代爱尔兰语有 15 个元音: i:, i, e:, e, a:, a, o:, o, u:, u, ə, ai, au, iə, uə。5 个基本元音 i, e, a, o, u 各有长短,前两对为细音,后三对为洪音,ə 用于非重读音节。辅音有 p, t, k, b, d, g, m, n, l, r, f, s, x, v, w, h。有两重音值,即“软腭音质”和“硬腭音质”。硬腭音质为 φ, θ, x, β, ð, γ, μ, π, λ, r, f, j, ç, j, v, 只有 h 没有异读,硬腭音质起辨义作用。例如 éan[e:n](鸟,单数)—éin[e:p](鸟,复数)。爱尔兰语和不列颠群岛其他凯尔特语言一样,有系统的“头音交替”音变。

爱尔兰语的词形变化是现存各凯尔特语言中最复杂的,动词有人称、数、时、式、态(主动、自动)的变化,名词、形容词和定冠词也有性、数、格的变化。名词有 4 个格。人称代词除单用外,还有与动词或介词融合的特殊形式。句子的语序是动词位于主语之前。谓语常用复合形式,例如 táim tar éis ligean“我在允许之后”(我已经允许)。

爱尔兰语最古的文献,见于 4~8 世纪,是用欧甘字母刻写的铭文。5 世纪以后,出现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两



拉丁字母(上)和欧甘字母(下)

种文字。较早的一种有特殊的字体,例如 d 是横向的 ρ; 另一种和普通拉丁字母一样。两种文字同时使用。爱尔兰语历史悠久,有丰富的文献,对研究凯尔特诸语言具有特殊的价值。

(周流溪)

Aishaniyayu

爱沙尼亚语 (Estonian language) 爱沙尼亚人的民族语言。属乌拉尔语系芬兰-乌戈尔语族芬兰语支。使用人口约 100 万。除分布于苏联爱沙尼亚苏维

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外,在列宁格勒、普斯科夫、鄂木斯克等州以及拉脱维亚等地也有使用者。有 3 种主要方言:东北近海方言、北方方言和南方方言。北方方言即塔林方言,是爱沙尼亚标准语言的基础。19 世纪后半叶,统一的民族语言开始形成。

爱沙尼亚语有 9 个元音和 16 个辅音,其中 4 个辅音只用于外来语。元音和辅音各有三阶音长(短、长、特长),有辅音交替现象,但并不要求元音和谐。主要重音落在词的第一个音节上。爱沙尼亚语是有词尾变化的粘着型语言。语法方面有数和格的变化,没有性的区别。动词有变位和不变位形式。词与词之间的句法关系主要由一些词的语法形态和虚词表示。前置词数量少,后置词则广泛使用。句中词序比较自由。词汇中有古芬兰-乌戈尔语词和古波罗的-芬兰语词,也有古德语和古斯拉夫语词。近代则有许多来自德语、俄语和拉脱维亚语的借词。爱沙尼亚语文字使用拉丁字母。

(佟丕礼)

Annatuoliya yuzu

安纳托利亚语族 (Anatolian group) 见印欧语系。

Aoliyayu

奥里亚语 (Oriya language) 印度东部奥里萨邦的地方语言,印度宪法承认的语言之一。属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印度语支的东部分支。使用人口约 2 000 万。奥里亚语和阿萨姆语及孟加拉语是近亲语。它的标准语形成于 15 世纪。由于奥里萨地处偏僻,较晚为外族所征服,所以奥里亚语受外来语(波斯语和英语)的影响不大,而较多保留了本族语的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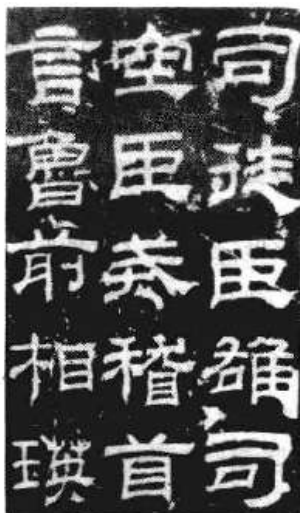
奥里亚语的元音系统没有长短音的区别,例如 niḷo(蓝黑,梵语 nīla), dhuli(尘土,梵语 dhūli,印地语 dhūl)。古雅利安语的 a 在奥里亚语中变为 o(不象印度西部语言变为 ə)。辅音系统比梵语简单,ś, ṣ, s 已经合并,但别的卷舌音仍然存在,除上举 niḷo 的 ḷ 外,还有 ṛ 等。ṛ(h) 往往是古代 ḍ(h) 变来的,例如 daṛhi(胡子,来自通俗梵语 daḍhiā,孟加拉语作 daṛi,阿萨姆语作 dari), saṛi(裹身女服,来自通俗梵语 sāḍiā)。在语法方面,奥里亚语没有“性”的范畴,名词分为两类:一类表示有理智的实体,另一类表示无理智的实体;对于有理智实体名词,动词要用复数(作为敬体)。奥里亚语的文字和孟加拉文同出一源,但带有更强的草书笔势,类似达罗毗荼文字。

(周流溪)

B

bafen

八分 古汉字一种书体的名称。又称楷隶，指东汉中期出现的新体隶书。字形方正，有规整的波势、挑法，横划起笔顿抑，终端上扬，所谓“蚕头”、“燕尾”。这种书体



汉乙瑛碑

庄严典雅(见图)。汉灵帝熹平四年(175)蔡邕书写7种经书，刻石立于太学，成为东汉晚期的标准书体。隶书从此向真书过渡，汉字的方块形象，也就由八分书奠定了基础。(参见彩图插页第7页)

八分的名称始见于魏，历代说解纷纭。《古文苑》所录闻人牟准《魏敬侯碑阴文》明确记述魏文帝《受禅表》是卫觊著文并用八分书写的。这块表石现存许昌，书体与洛阳出土的蔡邕书《熹平石经》残石上的书体相同。关于

这种书体的形成年代，蔡邕《劝学篇》说：“上谷王次仲初变古形”，六朝书家有“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次仲始以古书方广，少波势，建初中以隶草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楷模”，“灵帝时，王次仲饰隶为八分”等说法。所谓“初变古形”和“以古书方广，少波势”所指的是什么？现在有了甲骨文、金文和秦汉简牍等考古资料，可以看出汉字在演变的过程中，字的形体是从竖长到扁宽又到方正的，笔势是从无波和大波又到规整的波势的。甲骨文、金文、篆书，秦隶和早期的汉隶都属竖长型，西汉中期隶书发展成扁宽型，东汉中期才出现了方块字的形象。从甲骨文到秦隶都没有波势，西汉中期以后，波势在扁宽的形体中逐渐发展到放纵的地步，东汉中期才开始收敛成适度的工整波势。唐代人看不到出土的古文字，不能理解“初变古形”和“古书方广，少波势”里的“古”是指中期的汉隶，“方广”就是扁宽，“少波势”是说没有像八分书那样规范的波势。唐代张怀瓘《书断》把“古”和“少波势”当做指篆籀之无波，而且纠缠关于王次仲是秦始皇时的仙人的传说，竟作出“八分已减小篆之半，隶又减八分之半，……故知隶不能生八分矣”，以及“楷隶初制，大范几同，故后人惑之，学者务之。盖其岁深，渐若八字分散，又名八分”等说法，又把汉末到东晋的一些真书列入八分的妙品或能品。一千多年间关于八分的误解，《书断》实开其端。宋代周越《古今法书苑》又有所谓蔡文姬说“臣父造八分，割程隶八分取二分，割李篆二分取八分”的话。这句话是从什么地方抄录的，不得而知，却更增加了混乱。唐宋至今，有

从八字的字形、从分字的字义等方面所作的说解，以及八分是指字的大小的尺度说，都属傅会。“字方八分”当是说字的高度有小篆的八分而成方形。八分成为正式书体的年代，有《熹平石经》为证，王次仲始作楷法的年代，从有年号的汉简看，当在东汉中期。由于王次仲作楷法，使这种书体的传授有章法可循，所以后世又称八分为楷隶。
(张政稼)

Basibazi

八思巴字 ('Phags-pa script) 中国元世祖忽必烈命国师八思巴创制的拼音文字(图1、2)。初称蒙古新字，不久改称蒙古字，现在称八思巴字或方体字。12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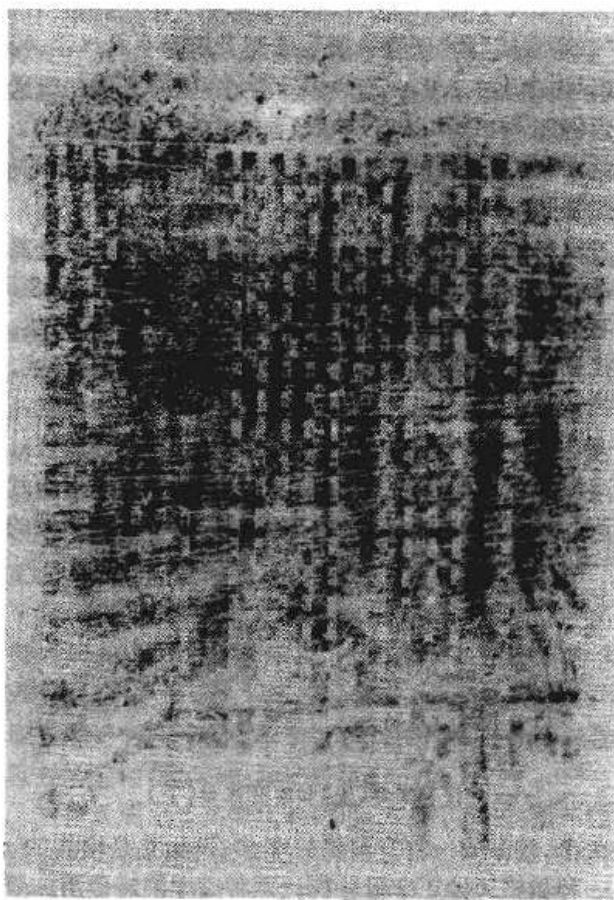


图1 八思巴字蒙古语元世祖忽必烈圣旨(12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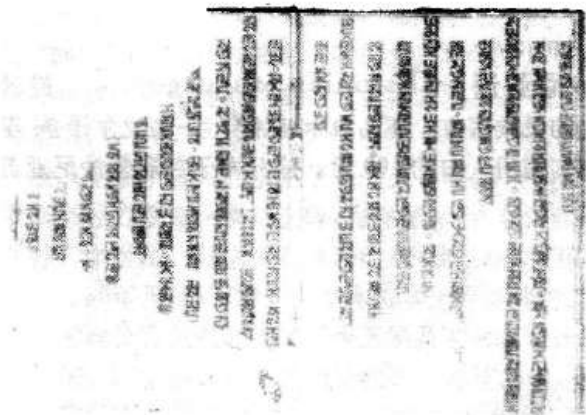


图2 八思巴字蒙古语《萨迦格言》刻本残页

年忽必烈颁诏推行。元王朝灭亡后逐渐被废弃。八思巴字按忽必烈的规定,是“译写一切文字”的,曾用它书写过蒙古、汉、藏、梵、维吾尔等多种语言。字母表主要由藏文字母组成,也有少数梵文字母,还有几个新造字母。字母多呈方形。字母数目最初为41个,后陆续增加,据现存资料归纳,包括各种变体有57个。八思巴字以音素为表音单位,字母分元音和辅音。元音a不设专门字母,用依附于辅音字母(包括作介音的半元音字母i、u)的零形式表示,即音节首的辅音字母(包括零声母符号)或介音字母后面不写其他元音字母时,就表示后面有元音a。字母有正体和篆体两种,篆体多用于官方印章。行款从左至右直写,与藏文自左至右横写不同。书写单位是音节,不是词,与藏文相同。由于书写单位不是词,加上不使用标点符号,所以阅读时只能靠上下文判断词的界限和句子的界限。拼写汉语时不标声调,因此如果原文没有汉字对照或没有其他参考材料,往往难以确定所代表的汉字。

现存八思巴字资料中,译写维吾尔语、藏语和梵语的很少,译写蒙古语和汉语的较多,其中包括元朝官方文件的原件、碑刻、印章、牌符、钱钞、图书、题记等。

(照那斯图)

batl

八体 指秦代汉字的8种体式。“八体”的名字见于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许慎说:“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大篆是春秋战国时期秦国使用的篆书,《说文解字》中所录的籀文,就是大篆。小篆是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就大篆略有改变,去其繁复而成的字体。如秦泰山刻石、琅邪刻石。虫书也称为鸟虫书,是在文字上作出鸟形、虫形的图案。隶书是解散篆书而成的一种字体。刻符是刻在符节上的,摹印是摹写在玺印上的,署书是题在封签扁额上的,殳书是写在兵器上的。大篆、小篆、虫书、隶书是4种字形结构不同的文字,刻符、摹印、署书、殳书是施用在不同的器物上的4种各有特殊性的字形。

(周士琦)

Babuya zhuyuyan

巴布亚诸语言 (Papuan languages) 主要分布于新几内亚及其周围地区的近700种语言,其次还分布于西起阿洛尔群岛、哈马黑拉岛和帝汶岛,东达圣克鲁斯群岛的大片地区。美国有的语言学家把它们称为印太诸语言(Indo-Pacific languages)或非南岛诸语言(Non-Astronesian languages)。鉴于语言识别的工作难度很大,尤其是西伊里安等地区的语言,目前仍鲜为人知,因此对巴布亚诸语言数目的统计分歧较大。较早的说法是150种以上,后来有人说500多种。美国人类学语言学家B. F. 格兰姆斯编辑的《人种学家眼中的世界诸语言》(1984)列举了696种(包括1种已消亡的语言)。比较普遍的说法是650种以上或近700种。但得到比较可靠识别的语言不过650种,使用这些语言的人共约250万。

“巴布亚”这个名称,主要表示地理概念,而不是语言

概念,因为巴布亚诸语言彼此差别很大,不可能有一个语言学上的名称把它们全包括在内。目前已证实有远亲关系的语言有350~450种,分属于76~105个语系,使用这些语言的人分布在新几内亚大陆3/4的地区。这些语言合在一起构成新几内亚中部大语群。美国语言学家J. H. 格林伯格认为,该大语群主要由以下7组语言组成:中部诸语言、东部诸语言、东北部诸语言、北部诸语言、南部诸语言、西南部诸语言和西部诸语言。余下的200多种语言,有的语言学家把它们中的大部分划为若干大小不等的语群,但已知有一部分(约50种)应看作是独立的语言,另一部分的亲属关系尚不清楚。尤其是有些巴布亚语言因受南岛语言影响极大,对它们分类就更加困难。

巴布亚诸语言中,使用者超过1万人的语言寥寥无几。许多语言的使用人口不过几百,有的甚至只有几十。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是分布于新几内亚东部高地的恩加语,约13万人。新几内亚的内陆地区,是世界上最闭塞的地区之一。交通不便,居民往来很少。有时山谷两边的邻近村子,使用的语言竟不能互通。

巴布亚诸语言在结构上差异相当大,但是多数语言还是有某些共同特征的。语音方面,许多语言都是声调语言,声调的变化导致词义的改变;有元音交替现象;声调系统和重音类型及音节长度之间的相互作用十分复杂。词汇方面,许多语言都有性和名词的类别系统,有的类别多达10个以上;许多语言都没有冠词。语法方面,名词常有格的变化,但数的变化不常有;典型的词序是主语—宾语—动词;许多语言的主语、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都结合进动词中,作为动词的组成部分,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这种情况跟许多印第安语的情况相似。许多语言中动词形式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正规形式,即在句子中只提及一个行为时使用;另一类是特殊形式,即在句子中提及一个以上行为时使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外界对巴布亚诸语言几乎毫无所知。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特别是60年代以后,许多新的语言材料逐渐为学者们所认识,过去把全部巴布亚语言仅简单地划归一个语系的做法逐渐被否定。但更详尽准确的分类尚有待于语言识别工作的进一步完善。

参考书目

M. Ruhlen, *A Guide to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Stanford University, 1975, 1976.

B. F. Grimes(ed.), *Languages of the World: Ethnologue*, Wycliffe Bible Translators, Inc., Texas, 1984.

C. F. Voegelin and F. M. Voegelin, *Classification and Index of the World's Languages*, Elsevier North-Holland, Inc., 1977.

(黄长著)

Ba'ertuoli

巴尔托利, M. G. (Matteo Giulio Bartoli 1873~1946) 意大利语言学家。1873年11月22日

生于意大利伊斯特拉半岛上的阿尔波那(今南斯拉夫的拉宾),1946年1月23日卒于都灵。1908~1946年任都灵大学教授。他是罗曼语学家和印欧语学者。他的闻名是由于他是“新语言学”,又称“区域语言学”的缔造者。

巴尔托利早期致力于历史比较方法的研究,中晚期致力于地区典型形式的原则及原始语言构拟方法的研究。他反对德国新语法学派的机械的语言观。他认为,语言的运用乃至变化都带有个人的创造性和意志;每个词都有其独特的历史,一个词在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分布地区。他提出了一套语言的典型形式分布原则,用以决定两个来源相同而外表不同的语言形式的时间先后。他说,分布地区较广的形式会比分布较窄的古老些;边缘地区的形式会比中心地区的古老些;孤立地区的形式会比连成一片的古老些。此外,他强调要从语言的时间、空间、文化、政治、社会背景各方面来解释语言的演变。在晚年,他提出了语言演变的假设,共11条,但这套假设在逻辑上并无内在的必然联系,因而遭到语言学家们的反对。

巴尔托利研究过拉丁语的源起,拉丁语与其他印欧语的关系,拉丁语在印欧语系中的地位。他认为,不能简单地说,原始印欧语经过“意大利克语”直接演变为拉丁语,一脉相承。他还否定了原始印欧语分化成东西两大支的看法。

巴尔托利的主要著作有《新语言学入门》(1925)和《区域语言学文集》(1945),后者收入了他的名作《拉丁语在印欧语系中应有的地位》一文。(廖秋忠)

Ba'er-Xilie'er

巴尔-希列尔, Y. (Yehoshua Bar-Hillel 1915~1975) 哲学家、逻辑学家、语言学家。犹太人,1915年出生于维也纳。1938年在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获学士学位,1949年获博士学位。1949~1958年在希伯莱大学任研究员,50年代前期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电子学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1958~1961年任哲学高级讲师和助理教授,1961~1975年任逻辑和科学哲学教授。他常在许多国家任客座教授。1967年任国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联合会主席。

他的研究领域包括逻辑学、语言学理论、信息储存和检索、机器翻译、科学方法论、哲学等。著作有100多种,有关语言学的主要有《语言、逻辑和方法》(1970)、《语言和信息》(1964)、《语言哲学、语言学哲学和语言学方法论论文集》(1970)、《论逻辑和理论语言学》(1975)。

(冯志伟)

Bali

巴利, C. (Charles Bally 1865~1947) 瑞士语言学家。1865年2月4日生于日内瓦,1947年4月10日卒于同地。巴利是由F. de 索绪尔创始的日内瓦学派第一代中最有影响的人。索绪尔遗著《普通语言学教程》就是他和A. 塞什文两人根据一些学生的听课笔记整理出版的。

巴利是法语词汇学和风格学专家,他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关于风格的新看法。他反对当时德国语言学家K. 浮士勒的观点。他认为一般的语言风格和个别作家的风格是两回事,前者出于常人说话时的需要,后者才是作家对语言的美学加工。他认为风格学应该研究感情在言语中的表达和言语对感情的作用。巴利在语法分析中提出“实现手段”这一概念,认为词在语言中只有抽象的存在,从语言进入言语,总是伴随着某些实现手段。例如法语 l'arbre(这树), cet arbre(这棵树), un grand arbre(一棵大树), 分别由定冠词 le, 指示代词 cet, 不定冠词 un 和形容词 grand 帮助名词 arbre 来实现。实现手段也可以是语调、手势或情景。

他的主要著作有《法语风格学纲要》(1909)、《语言与生活》(1913)、《普通语言学与法语语言学》(1932)。

见法兰西学派、索绪尔、浮士勒。(叶斐声)

Baliyu

巴利语 (Pali) 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印度(又称印度-雅利安)语支的一种古代语言,现在仍是斯里兰卡、缅甸、泰国等国的小乘佛教的经堂语言。和同语支的梵语相比,从形态变化来看,巴利语要晚一个发展阶段。但它并不是梵语的子语;因为在巴利语中还保留了一些比梵语更古老而与吠陀语接近的形态变化。梵语中的辅音丛在巴利语中变为同位的辅音丛,辅音尾音消失。至于巴利语究竟是哪一个地区的语言或方言,语言学家还没有一致意见。古代佛教徒说它是东部摩揭陀方言,是佛祖释迦牟尼使用的语言。近代西方有一些语言学家附和此说。但是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它是西部方言,此说几成定论。最近又有人主张,巴利语是摩揭陀某个地区使用的语言。

巴利语没有专用的字母。在印度,有时使用天城体。在斯里兰卡、缅甸、泰国等地,则使用当地流行的字母。现在国际上一般使用加符号的拉丁字母。元音分简单元音和二合元音;辅音分喉音、腭音、顶音、齿音、唇音、流音、半元音、啞音、气音。名词有性(阳性、阴性、中性)、数(单数、双数——消失中、复数)、格(体格、业格、具格、为格、属格、依格、呼格)的变化。动词变位包括数(单数、双数、复数);人称(第一、第二、第三人称);时间(现在时、未完成时、完成时、不定过去时、将来时、假定时);语态有主动、中间(消失中)、被动;语气(陈述式、虚拟式、命令式、祈使式——不定过去时的虚拟语气);语尾(原始的、派生的)。

巴利文献主要有小乘佛教上座部的经典,通常称为巴利三藏。藏外还有一些经典,比如《那先比丘经》等。此外,对佛典的注释也非常重要。历史著作有《大史》、《岛史》等。

(李美林)

Bashila xuepai

巴士拉学派 (Basra school) 阿拉伯语法学的一个主要流派。8世纪产生于伊拉克南方的海港城市巴

士拉。这座城市当时是这一地区的交通枢纽和商业中心,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与中世纪外国(希腊、波斯、印度)文化的接触提供了方便。这里的语言学家为了维护阿拉伯语的纯洁性和推广阿拉伯语的需要,参照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原理,采用惯用法、分析法和类比法等,研究阿拉伯半岛中央地带和红海西岸若干部族比较规范的阿拉伯语以及古代史话、古诗、阿拉伯谚语等材料,探索阿拉伯语的一般规律,从而扩大了100年来阿拉伯语言研究的成果,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阿拉伯语法体系,构成一个独立的学派。

这个学派的创始人海利勒制定了一个阿拉伯语法大纲。但这个大纲并未写成文字流传下来,只由他的学生西伯维加以充实发展,写成第一部阿拉伯语法著作——《书》。此书长达千页,分上、下两卷。上卷及下卷前一部分讲句法,下卷后一部分讲词法。书中把词分为名词、动词和虚词3类,而统领全书的是“施事”、“受事”论的格位学说,论据丰富,权威性高。书中引证了1050行诗,其中1000行都出自名家。

巴士拉学派为阿拉伯语法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它虽曾受到库法学派延续百年的挑战,但它的基本观点却一直未被动摇。(张甲民)

Basikeyu

巴斯克语 (Basque language) 也称欧斯卡拉语(Euskara),语系归属未定。分布于西班牙北部的吉普斯夸省、比斯开省、纳瓦拉省和阿拉瓦省的部分地区,以及法国西南部与西班牙接壤的比利牛斯-大西洋省的部分地区。使用人口近100万。

由于缺少历史文献,人们对巴斯克语的起源知之甚少。有一种假设:在青铜器时代开始时(公元前2000),从小亚细亚来的移民,把巴斯克语的原始母语带到伊比利亚半岛,后来发展为巴斯克语,由于这里与外界隔绝,它得以在印欧人来到伊比利亚半岛之后保留下来。它有8种方言,其语言结构基本一致。

巴斯克语有6个元音a、e、i、o、u、ü(苏勒方言中无此音),几个二合元音;有腭化辅音;有软r和硬r。新词的构成主要用词根合成法和加后缀的派生法。语法变化主要靠后缀。名词性词类没有语法上的性,自然性别用不同的词表示。名词和形容词有非限定、限定单数和限定复数。例如:gizon(男人),gizona(这个男人),gizonak(这些男人)。冠词置于名词之后,连写,形如后缀。在名词后加后缀表示领属关系。数词使用20进位法。动词变化很复杂,在动词的人称形式上添加后缀或前缀表示从属关系。巴斯克语属于主动格类型的语言,及物动词要求主语用主动格,宾语不必变格。巴斯克语采用拉丁字母。

(佟丕礼)

Bal'eluosiyu

白俄罗斯语 (Belorussian language) 白俄罗斯族的语言。属印欧语系斯拉夫语族东支。主要分布于苏

联白俄罗斯以及立陶宛部分地区,此外,波兰等地也有少数使用者。使用人口约1000万。最古的文献见于13~14世纪。在立陶宛大公国统治时期,白俄罗斯语曾是国家的官方语言,1696年明令禁止作为官方语言使用。19世纪产生以大众口语为基础的文学作品,对白俄罗斯语的规范起了奠基作用。十月革命后获得官方地位。白俄罗斯语有两种主要方言:东北方言和西南方言。标准语是在中间地带的明斯克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白俄罗斯语在语音、语法和词汇方面与俄语有许多共同之处,不同之处也有规律可循,因此两种语言可以互通。语音特征主要有:a(e)、o(ë)、a在重音前第一音节中读作a(写作a,я);软塞音т'、п'演变为软塞擦音т'、п',颤音р永远发硬音;硬音л在动词过去时阳性形式与许多其他闭音节中变为短ŷ。语法方面,名词、形容词的性、数、格和动词的体、时、人称等与俄语大体相同,部分名词除6个格外尚有呼格。动词不定式词尾是-ць、-ці、-чы,第一变位法单数第三人称词尾失去-т。词汇的基础是原始斯拉夫语词。此外,还有不少白俄罗斯语成为独立语言后产生的词,以及从波兰语等其他斯拉夫语言中借的词。文字以俄语字母为基础,共32个,与俄语基本相同,但没有俄语中的я、ш、ъ,而有i、ŷ(短y),以撇号(')代替分音符号ъ。(信德麟)

Baihuawen Yundong

白话文运动 (Vernacular Movement)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从北京推向全国的一场划时代的文体改革运动。它提倡书面语不用文言,改用白话或语体。白话文运动先在“文学革命”的口号下发动,进而在“思想革命”中发展,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环节。运动的提倡者主要是胡适(1891~1962)、陈独秀(1880~1942)、钱玄同(1887~1939)、鲁迅(1881~1936)等。他们以《新青年》杂志为主要阵地,以北京大学进步师生为主力,同形形色色的文言维护者开展论战,赢得了白话文的胜利。

白话文运动的历史背景 文言文原是古人口语的摘要,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出现。到西汉,封建统治者独尊儒家学派,记载这些经典的文言文也就成了不可更改的万古楷模。越到后世,文言文同实际口语的距离越远。这种情况是不能适应社会和语言的发展的。从唐宋以来,白话文书面语逐渐兴了起来。先是采用比较接近口语的“变文”、“语录”一类文体,传播佛教教义,后来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和市民阶级的抬头而出现了用当时口语来书写的明清章回小说。不过直到清代末年,白话文还只是局限在通俗文学的范围之内,未能改变文言文独尊的局面而作为通用的书面语。

历代不少学者为了让更多的人看懂书面文字,都主张书面语同口语相一致。1861年,洪仁玕(1822~1864)根据洪秀全的指示,颁布《戒浮文巧言谕》,提出了改革文体的方针:“不须古典之言”,“总须切实明透,使人一目了然”。又过了二三十年,资产阶级改良派为宣传变法维新、开发民智而提倡白话文。如黄遵宪(1848~1905)引

俗话入诗,宣称“我手写我口”(《杂感》);裘廷梁(1857~1943)认为“白话为维新之本”,发出了“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口号;陈荣衮第一个明确主张报纸应该改用白话文;王照更声明自己制定的官话字母,只拼写“北人俗话”,不拼写文言。同时,他们还积极写作通俗浅显的文章。梁启超(1873~1929)最先向霸占文坛的桐城派古文挑战,创制了“新文体”,用的虽还是文言,但平易畅达,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已向着白话文迈出了第一步。接着白话书报在各地涌现,日见兴盛,其中白话报纸有10多种,白话教科书有50多种,白话小说有1500多种。可是直到辛亥革命(1911)之前,还没有人自觉地去实现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个重大的变革。从清代末年到民国初年,接连出现了几件可以决定文体改革方向的大事:一是科举制度的废除(1905);二是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皇帝;三是粉碎了袁世凯称帝迷梦(1916),《新青年》发出提倡科学和民主、打倒孔家店的号召。思想的解放带来文体的解放,觉醒了的广大人民群众,掀起了民主主义的浪潮,为白话文运动打下了群众基础。

白话文运动的经过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题为《文学改良刍议》的文章,这是白话文运动的公开信号。文中提出:白话文学为文学之正宗。这个纲领性的意见,很快就得到陈独秀的响应。钱玄同也及时发出打倒“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寄胡适之》,1917)的口号,最先把反对文言文同反对“独夫民贼”、反对弄坏白话文章的“文妖”(《尝试集序》,1918)联系起来,并在陈、胡强调“文学革命”的时候,第一个考虑到应用文的改革。1918年1月,《新青年》实现自己的主张,全部改用白话文。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标志着白话文运动在文艺方面首先突破,显示实绩。年底,李大钊(1889~1927)、陈独秀创办白话周刊《每周评论》,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1896~1950)、罗家伦(1897~1967)等创办白话月刊《新潮》。不久,鲁迅指出,白话文应该是“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杂感录五十七·现在的屠杀者》),这就把白话文放在现代中国人口语的基础上。

白话文运动的各种口号提出以后,遭到一些支持文言文的学者的猛烈攻击。如古文家林纾(1852~1924)攻击白话文为“引车卖浆者言”,南京东南大学教师胡先骕(1894~1968)认为白话文“随时变迁”,后人看不懂,等等。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1868~1940)等据理驳斥,引起一场关于白话文和文言文的论战。

1919年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爆发,白话文运动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一年之内,白话报至少出了400种。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命令,小学教科书改用白话文。新文学的团体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也相继成立。

1921年以后,胡适去“整理国故”了。胡先骕的《学衡》杂志、章士钊(1882~1973)的《甲寅》周刊,为迎合封建势力复辟,先后对白话文进行反攻。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文化上以《向导周报》、上海《民国日报》等为阵地,共同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

文。在这种形势下,鲁迅先后发表了《估学衡》(1922)、《答KS君》(1925)、《再来一次》(1926)等文章,大抵采取“以毒攻毒”的方法,用古书作法宝,证明鼓吹文言的“学衡”派和“甲寅”派实际自己也做不通古文,错用典故,白话派(1900~1934)、唐钺(1891~1986)也在《雅洁和恶滥》(1925)、《告恐怖白话的人们》(1925)等文中给以批驳,这才把那批反对派打退了。

白话文运动的成就 白话文运动的结果,是使白话文在文学作品和一般学术著作的范围内取得了合法的、正统的地位。它的成就首先表现在白话文理论的建设上:①关于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学说。这学说的框架有3条:a.白话为文学之正宗。为打倒文言文的正统提供了历史的根据。b.用白话作各种文章。让白话文成为通用的书面语,为白话文的推行提出了奋斗的目标。c.白话文以现代中国人的口语为源泉。为白话文的建设指出了正确的方向。②关于文体改革的具体规划。主要在散文、应用文、诗歌3个方面。第一,对散文文体改革的要求,胡适概括为4条主张:a.要有话说方才说话;b.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c.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d.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话(《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第二,对应用文文体改革的意见。钱玄同在《论应用之文亟宜改良》(1917)里,提出不少切实可行的主张,如改用白话(国语);选取最普通的常用字;多义字只用最普通常用的一义;不许用倒装移置的句法;“书札之款式称谓,务求简明确当。删去无谓之浮文”;文中加标点符号;数目字改用阿拉伯字,“用算式书写”;改右行直排为左行横排;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印刷之体,宜分数字”等等。第三,对诗体改革的主张。分为两派。一派由钱玄同、胡适带头提倡“自由体”。另一派由宗白华(1897~1986)、闻一多(1899~1946)带头主张“格律体”。这两派对新诗的形式,都作了认真的探索。

白话文运动的成就,主要表现在白话文的作品上。白话文能不能代替文言文,要看写作实践。“五四”时期,白话论文在表现新思想、批判旧思想上,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如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论文,虽在语言上有不同的风格,但在说理上都有明白、清晰、准确、富有逻辑力量的特点。这就叫那种不宜说理的古文相形见绌。在文学上,散文、小说、诗歌等文体,都开了新生面。特别是1921年,鲁迅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的发表,郭沫若诗集《女神》的出版,为白话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阿Q正传》更是中国现代白话文学中赢得世界声誉的第一部杰作。

“五四”白话文运动,是一个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运动,它在文艺语言上宣告了文言文时代的结束、白话文时代的开始。数千年来,中国通用的书面语没有白话文的合法地位,只有与口语脱节的文言文才算正统。直到“五四”时期,才把这种反常的局面翻了过来,开辟了一个白话文学的新纪元。这正好与中国社会在“五四”期间实现了从封建向民主的转变相适应。

白话文运动的影响 由于历史的局限,白话文运动不可能迅速彻底完成它的任务。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政府的公文、法律,报纸的新闻等等,仍用文言或半文言。在文学作品上取得“正宗”地位的白话文,也夹杂着脱离人民口语的文言腔。但从“五四”开始,白话文的推行,已成了时代的潮流,历史之必然。30年代又进而发起大众语运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报纸、公文和法律都一律采用白话文。

(胡奇光)

Bailangwangge

《白狼王歌》 《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中记载的一首使用藏缅语族某语言写作的诗歌。后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75),白狼王为了歌颂当时中央政权的统一领导,写了这首表达他们心向汉朝的诗歌。这首歌由一个叫田恭的官员“译其辞语”,并由从事史李陵与田恭护送到都城洛阳,“帝嘉之,事下史官,录其歌焉”(《后汉书》卷八十六)。这首歌的汉语歌辞共44句,每句4个字,共176个字。用汉字记音的“白狼语”也是44句,每句4个字,共176个字。例如第一、二句的汉文是“大汉是治,与天意合”,“白狼语”的汉字译音是“提官隗构,魏冒踰槽”。

对这首歌所用语言的系属,中外学者有不同的看法。近年来他们运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探讨白狼语同藏缅语族语言的关系,发表了一些有价值的论著。一般认为白狼语属藏缅语族。但究竟同哪种语言最近,说法不一,曾有普米语、嘉戎语、彝语、纳西语、西夏语等说法。关于《白狼王歌》与汉语对译的问题,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先有汉语歌辞,然后再用汉字译注“白狼语”;但也有相反的说法。《白狼王歌》是最早用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对译的一首较长的古歌,是研究藏缅语族语言和汉语古音的珍贵资料。

(马学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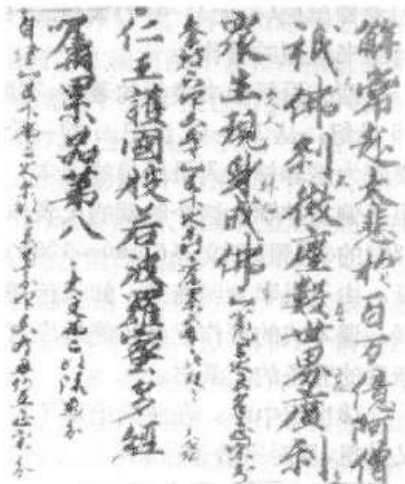
Baiwen

白文 (Bai writing) 见白语。

Baiyu

白语 (Bai language) 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也有人认为语支未定。主要分布在中国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使用人口110多万(1982)。分南、中、北3个方言,说南部方言的人较多。南部方言和中部方言比较接近,与北部方言差别较大。白语有22~29个辅音。北部方言的塞音、塞擦音有清浊对立,南部方言的浊塞音、浊塞擦音只出现在33和31两个声调上。北部方言有翘舌音t、th、d和小舌塞音q、qh、g;韵母以单元音为主,有i、e、ɛ、a、o、u、y、v、w等元音,各分松紧。中部和北部方言有一套鼻化元音。一般有4个声调(如果松紧元音当声调处理,则有7~8个声调)。词序和虚词是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句子成分的次序是主语—谓语—宾语,宾语后加助词时,宾语可提到谓语或主语之前。名词、形容词修饰名词时,位于中心词之前。表示性别的

名词、量词或数量词组修饰名词时,位于中心词之后。状语在中心词之前,补语在中心词之后。人称代词的数和格用元音和声调交替表示。大多数词由一个或几个单音节词根构成,有丰富的四音格词,有大量的汉语借词,是藏缅语族中汉语借词较多的一种语言。白族曾有一种



《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的汉字和旁注白文,1959年发现于大理

参照汉字创制的方块白文,始于唐代。现存有唐、宋、元、明的文献和碑刻。字体结构有两种:①音读或训读汉字,如“宾”读[pɿ⁵⁵],表示“盐”,“蝉”读[tə⁴²pɿ⁴²],表示“蝉、知了”;②自造新字,如“貳”读[pia⁴⁴],表示“钱”。现代白族民间艺人都用白文写大本曲、吹吹腔、祭文、民歌等。

(徐琳)

baike quanshu

百科全书 (encyclopaedia) 荟萃人类各学科、各门类一切基本知识的出版物,它既是为使用者解决疑难问题的工具书,又是为广大读者提供系统知识的教科书。

历史 中国人在较早的时候就用分门别类的方式编出传播知识的工具书。相传在西周时就已出现,后来在汉代又经多人增补的《尔雅》(公元前2世纪),被视为中国最早的工具书。这部书包含19个门类,解释字和词的含义,解释天地、山川、草木、禽兽、牲畜、鱼虫、宫殿和亲属等名称,说明其内容,具有百科全书雏型。

中国有编撰类书的传统,类书也是百科全书型的著作。远在汉末三国魏文帝时就编出第一部完整的类书《皇览》(220~226),广集经传,随类相从,字数达800万。这种类书以后各代都有编撰,总计大小有三四百种,其中最大型的有明代永乐皇帝命解缙、姚广孝等编的《永乐大典》(成于1408年),共22937卷,约3.7亿字,装成11095册,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但是以类书而论,清代蒋廷锡的《古今图书集成》(1726,共1万卷),编得比《永乐大典》更切合实用,可惜引文不完全准确。

无论东方西方,学者们为了把各种知识推广和传之后代,几千年来一直在编撰当时最适用最有效的百科全书类型的书。

在欧洲古希腊,公元前5~前4世纪已开始出现百科

全书式的著作。德谟克利特(公元前460~前370)和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把当时所知道的各种科学知识,写进他们的著作。这些著作都是为讲学用的,可见古希腊最初的百科全书类型的书是教育性质的。古罗马的M. T. 瓦洛(公元前116~前27)编写的《学科要义》和老普林尼(公元23~79)编写的《自然史》,也是古代百科全书类型的著作。

西方百科全书类型的著作,有两个发展阶段,从5~16世纪,从16~18世纪。前一阶段主要是僧侣在修道院为培养神职人员所编的课本,虽然涉及各种知识,但是偏重神学。这个时期的代表作有:伊西多尔(560~636)的《词源》和文岑(1190~1264)的《大宝鉴》。后一阶段,由于科学发明渐多,知识传播日广,生产又迅速发展,课本式的著作已经不能适应客观的需要,必须编出新型的完备的工具书。

18世纪中叶,在法国出现了启蒙运动,传播唯物主义思想,反对宗教迷信和君主专制,反对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封建制度。唯物主义哲学家D. 狄德罗(1713~1784)等人主张在各学科各知识部门批评旧思想,宣传新思想,介绍最新科技和生产知识,促进社会发展。当时以狄德罗为首编辑百科全书,形成了百科全书派。狄德罗等人主编的百科全书自1751年开始出版到1772年,共出了28卷。这部百科全书的传播,动摇了封建思想基础,成为1789年掀起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重要因素之一。这部百科全书的正式名称是《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与手工艺词典》。“百科全书”是encyclopaedia的译名,此词源出于希腊文,是“全面教育”的意思。随着各国所编的百科全书的出版,这个词的含义逐渐变化和扩大,有一切知识都包括在内的意思。

英国从1768年开始出版《不列颠百科全书》,一再修订,现在已出到15版(从1929年起改由美国编辑出版)。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接着还有美国、俄国以及日本等,也先后编辑出版自己的百科全书。现在世界许多国家都出版了各种百科全书。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素有编辑类书传统的中国学者们认识到过去的类书只是撷拾已有书籍中的知识资料,分门别类地辑成不够完备的工具书,而且大多数是诗文章句、典故辞藻的摘录,很少科学知识,更没有外国的资料和最新科技成就的介绍,认为应编出新型的百科全书。清代末年有人编译日本中学教材,用《普通百科全书》之名出版,实际上是一种丛书。民国初年出过《日用百科全书》、《少年百科全书》,虽有百科全书之名,实际上也只是简单的常识性的文集。1936年出版的《辞海》是既解释语词又提供各门学科知识的百科全书类型的辞书。1978年,国务院决定成立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开始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这才是中国编辑出版的第一部现代型百科全书。自1980年起,这部书开始按学科分类分卷出版。

种类 百科全书在性质上可分为两类:综合性百科

全书和专业性百科全书。前者把各学科、各门类的知识综合地编在一套书里,后者只把某一学科或某一领域的知识汇编而成。《中国大百科全书》、《苏联大百科全书》、《不列颠百科全书》、法国《大拉鲁斯百科全书》、德国《布洛克斯豪斯百科全书》等都是综合性百科全书。专业性的百科全书则有《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国农业百科全书》、美国《科学技术百科全书》、《苏联军事百科全书》等等。

从编法看,有按大类分卷的百科全书,如《中国大百科全书》,一个学科一卷或数卷,几个小学科合为一卷。但世界各国一般综合性百科全书都是把所有条目按标题字母顺序排列,不是按学科分卷编写的。另外,还有地区百科全书,宗教或民族百科全书及其他专题百科全书。

从卷数看,有大型的,一般是20~40卷(西班牙《欧美插图百科全书》已出到120卷),也有小型的,一般在10卷以内。

指导思想 任何百科全书的编辑都有自己的指导思想。狄德罗主编的《法国百科全书》是以资产阶级的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苏联大百科全书》说自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明确地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百科全书是学术性著作,对学术上的不同流派,凡有独特见解的,都要充分反映,使读者能了解到这些学术上的不同观点,得到广泛的知识。

编法 综合性的或专业性的百科全书,都以条目的形式按知识主题对各学科的内容作出全面、系统、简明扼要的叙述和介绍。根据编辑意图,各条目或详或简,分为大条、中条、小条。

200年来,各国百科全书的编撰,向来有大条目主义和小条目主义之分。大条目的优点是叙述详尽而有系统,缺点是不便于检索,使用者不能迅速地找到自己需要的解说。小条目则相反,易于检索,但是各条目介绍的知识不全面,不系统。大条目编法适于阅读,具有更强的教育作用;小条目编法适于查阅,有灵活省时的工具书的作用。

《中国大百科全书》采用以中、小条目为主的编纂方法。大条目不过长,约在两三万字之间;中、小条目则是数百字到数千字。

一般综合性的百科全书收条七八万个到十万个,字数在七八千万至一亿左右。须有数百人、数千人甚至上万人参加撰写。

经过一二百年积累编写经验,世界各国的百科全书已经形成一套体例,其中最重要的是:

① 参见。许多条目在释文中标出那些内容、概念上互相联系的其他条目,用特定的符号标出,以便使用者翻阅参考,取得更完整的知识。

② 参考书目。在重要条目之后,列出参考书目,以便读者取得更进一步的专业知识,或认识钻研某一问题、某一专门学科的途径。

③ 索引。每一部百科全书必须有多种索引,使读者

能迅速查到所需要的条目。最重要的是“内容索引”。索引主题数要多于全书条目总数几倍至十几倍,以使读者左右通达,触类旁通,取得更广泛、更深入的知识。

④ 附录。在书末附上多种必要的参考资料和图表,如大事记、元素表、度量衡表以及人名地名索引等。《中国大百科全书》在每一学科之前还附一篇该学科的总论或综述,以及每一学科的分类目录,使读者能获知该学科的全貌。

⑤ 图片。世界各国的百科全书都重视图片与文字的配合,黑白图和彩色图并重,有些百科全书文字与图片的篇幅几乎相等。这样文以图显,图以文明,能让使用者更全面、更深入、更迅速地掌握各种知识。

修订 百科全书包括许多学科,各学科的内容在不断更新,但是百科全书卷帙浩繁,重印再版都比较困难。由于百科全书的部分内容和科学文化知识的不断更新存在着矛盾,各国百科全书采取几种不同的修订办法来解决它。一种是再版修订法,即隔一段时间,一般是10年左右再版一次,把全书条目修改一次;一种是连续修订法,即每隔一两年重印一次,把一部分必须更新的条目加以修订,其他不动(修订的数量约占全书5~10%);再有一种是补卷法,即把更新条目编印成一两卷,作为原版的增篇。一般百科全书每年都出版一卷《年鉴》,把一年来的变化,主要是经济生产等方面的统计数字以及一部分更新的知识独立地编为一卷。

新发展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各国现在已开始利用电子计算机编排、印刷百科全书,并制出各种索引。对于书中有关音乐方面的条目,有的出版社还附上小型密纹唱片或录音磁带,与本书一同发行。近年来有些国家试制一种视听机,把各种条目录音,与电视片同时使用。使用者打开这种机器,一面听条目内容的口述,一面在电视屏幕上看到所讲条目的各种实物的形象。利用电子计算机,还随时可以检索所需要的条目,把它印出,这是百科全书的一项新发展。(参见彩图插页第33页)

参考书目

R. Collison, *Encyclopaedias: Their History throughout the Ages*, Hafner Publ. Co., London, 1966.

胡道静:《中国古代的类书》,中华书局,北京,1982。

(姜梅芳)

Bantu zhuyuyan

班图诸语言 (Bantu languages) 非洲赤道以南广大地域内约150种语言的统称。使用者称为班图人,总人口在1亿左右。但实际上,他们之中在人种和文化上很不一致。随着班图诸语言逐渐为语言学者所了解,人们提出了“班图语系”的概念,另外还认定了许多“半班图语言”。但是据近来的研究,“半班图语言”中的一些语言应该划归真正的班图语言,另一些则并非班图语言,只是从班图语言借入大量的成分。美国语言学家J. H. 格林伯格认为,班图诸语言不但不能称为一个语系,甚至不能称为一个语族,而只是尼日尔-科尔多凡语系尼日尔-刚

果语族贝努埃-刚果语支下面的一个分支。虽然如此,有的学者鉴于班图语言的数目以及每个班图语言的使用人口同本语系别的语支乃至其他非洲语系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往往把它们当作独立的语系看待。班图语言最初可能起源于贝努埃河中游峡谷地带,后来扩展到东非的大湖区,再向南扩展到好望角。可以粗略地把班图诸语言分为中部班图语言、东南班图语言和西南班图语言3支。其中比较重要的语言,第1支包括刚果语(使用于刚果、扎伊尔和安哥拉)、卢巴语(扎伊尔)、卢旺达语(卢旺达、扎伊尔)、隆迪语(布隆迪)、卢干达语(乌干达)、吉库犹语(肯尼亚)、斯瓦希里语(肯尼亚、坦桑尼亚)、尼昂加语(赞比亚、莫桑比克、马拉维(称契切瓦语));第2支包括绍纳语(津巴布韦)、聪加语(莫桑比克、南非德兰士瓦)、茨瓦纳语或称西索托语(博茨瓦纳、南非)、索托语(莱索托、南非)、祖鲁语、柯萨语(均在南非);第3支有奥旺博语、赫拉罗语(纳米比亚)。应该指出,斯瓦希里语一直通用到刚果东部。另外还有几种混合型交际语或皮钦语,即林加拉语(刚果、扎伊尔)、山戈语(中非)、凡那加罗语(南非)。班图语言的分类也可以按照声调和词头的标准分为高调语言和低调语言,或单音节词头语言和双音节词头语言。

班图诸语言在语音上的特点之一是音节结构比较简单。象日语和波利尼西亚诸语言一样,班图诸语言大体上只使用5个基本元音和8~9个单辅音。由这些音构成的基本(单)音节只有几十个(通例没有复辅音音节),它们以各种方式配列成一两千个词根;由于一个音节通常是辅音加元音,班图语言的开音节十分丰富。班图诸语言都有声调,只有斯瓦希里语例外。

在语法上班图诸语言的最大特点在于名词有“类”的范畴。名词按概念类别的标准分成16~20个类,每类有特殊的词头作形态标记。这些词头通常是单数/复数配套使用的。例如mu-/ba- (单数/复数)表示人类[muntu“人”,bantu“人们”;Basuto“巴苏陀(人)”];mu-/mi-表示树木;le-/ma-表示成对的东西[原始班图语*(le)-iso“眼睛”,索托语ma-naka“兽角”];(u)bu-表示抽象事物。但是类的划分从一开始就是很武断的,不少词头的意义也很不明确。例如ko-表示身体各部分:“臂”是ko-boko,但“手”却是(li)-to,仿佛应该划入成对的东西一类。不过虽然“眼”是属于成对的东西一类,“耳”却作ko-to(或ku-toi),又不与“眼”同样看待了。这些词头还有句法上的协调关系。例如ba-kazana ba-enda(姑娘们去)中动词enda上也带着主语那个词的类词头。

班图诸语言属于典型的粘着型语言(例如斯瓦希里语的粘合指数为0.67,比阿尔泰语系雅库特语的0.51还高),语法关系主要靠在词根上加词头(有时也加词尾)来表示。在词的内部结构里各个语素都是分别表示出来的。词根的形态一般比较稳定,但词头的异形较多,例如ba-的异形有ma-等;Mashona“马绍纳(人)”。

班图语言句子成分的基本次序为主语—动词—宾语

语,但是也容许自由词序。由于动词里必须有与主语的类相协调的语素和与宾语的类相协调的语素,施受关系凭着类的协调而表达得很清楚。

班图人的民族文化在语言上打下了烙印。例如聪加人以及卓比人,由于还有原始的婚姻制度,以致在他们的语言里“母亲”一词可以指中国观念里的母亲、姨母、舅父的女儿;而“舅父”一词则兼指中国观念里的舅父和舅父的儿子。班图人与外界的接触也使语言受到影响。祖鲁语和柯萨语从布须曼人的语言里借入了一套吸气音。斯瓦希里语有大量阿拉伯语借词,南非一些语言也有阿拉伯语借词。班图诸语言在借入外来词时一般在语音上加以改造,例如斯瓦希里语的 *petroli* 来自英语 *petrol* (汽油),柯萨语的 *isiporo* 来自阿非利堪斯语 *spook* (鬼)。

参考书目

W. D. Hammond-Tooke (ed.), *The Bantu-Speaking Peoples of South Africa*, London & Boston, 1974.

(周流溪)

banchiyin

半齿音 见等韵。

bansheyin

半舌音 见等韵。

Bao'any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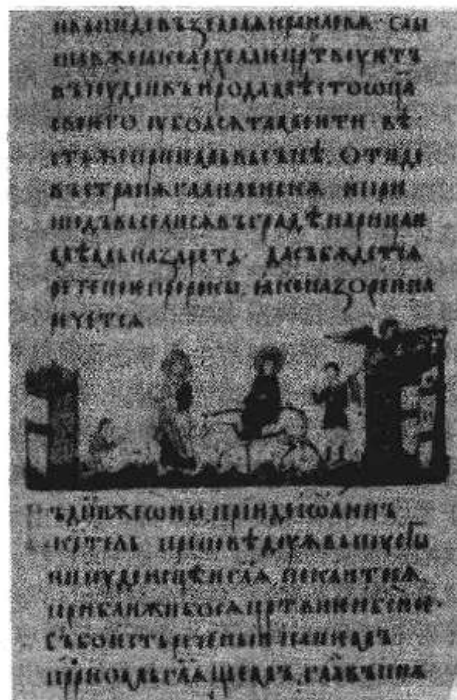
保安语 (Bao'an language) 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主要分布在中国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境内的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和临夏县,居住在青海省同仁县原保安城附近的下庄、嘎斯尔等地的一些土族也使用保安语。使用人口共约 8 000 (1982)。分大河家和同仁两个方言。语音方面(以大墩语音为代表),有 11 个元音: i, i̯, y, e, ə, a, ā, o, u, ũ, ʊ, 有 26 个辅音: b, p, m, f, w, d, t, n, l, r, ɖ, ʈ, s, ɕ, ʑ, ɟ, ʒ, ʃ, g, k, ŋ, ɣ, h。复元音较多,有 4 个前响复元音: ai, oi, ao, ou 和 9 个后响复元音: ia, iə, io, iu, ua, uā, uə, ue, ye。元音和谐已基本消失。比较稳定的复辅音有 9 个: mb, nd, ndɖ, ndɕ, ŋg, tɕ, ɕɖ, rɕ, lɖ, 还有不稳定的复辅音 fd, ft, ʃb, ʃg 等。元音在以 -n, -ŋ 结尾的音节里一律鼻化。13 世纪记录蒙古语的文献里出现在词首的辅音 h (现代蒙古语已经失落)在保安语里一般都保留着(个别词是 f)。语法方面,人称代词的变格与名词不同,第一、二人称的领格独立,宾格和与格合并并且有错根现象。陈述式动词有确定语气和非确定语气的语法范畴。数量词组作定语时可以放在中心词之后。词汇方面,除吸收了相当数量的汉语借词外,还吸收了不少来自藏语的词。保安族多兼通汉语,长期以来使用汉文。

(刘照雄)

Baojialiyayu

保加利亚语 (Bulgarian language) 保加利亚的官方语言。属印欧语系斯拉夫语族南支。主要分布于

保加利亚,使用人口约 1 000 万。在斯拉夫诸语言中,保加利亚语具有最悠久的文献。它的发展可分为 3 个时期: ① 9~11 世纪的古保加利亚语,同其他斯拉夫语言十分接近,保留了许多原始斯拉夫语的特点,在词汇方面受到希腊语的影响; ② 12~15 世纪的中古保加利亚语,从综合型结构向分析型结构过渡; ③ 16 世纪以后的新保加利亚语(或称现代保加利亚语),受到土耳其语和俄语的影响。现代保加利亚规范语主要是在巴尔干山脉中段和东段流行的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保加利亚作家 П. 斯拉维伊科夫(1827~1895)等对现代保加利亚规范语的形成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其他斯拉夫语言比较,保加利亚语主要有以下特点:有辅音丛 щ(即 шт)和 жд,如 свещ(蜡烛),межда(田界);有元音 ъ,如 България(保加利



用基里利查字母手写的四福音书片段

亚);不用综合型而用分析型结构,名词无变格形式,形容词和副词的比较级和最高级用语气词 по-和 най-表示,词与词之间的关系靠前置词或直接搭配表示;动词无专用的不定式形式,有 9 个时态,有表示非亲自观察的动作用的“转述式”形式;有后置定冠词。9 世纪末在希腊字母的基础上创立了称为基里利查(即基里尔)的古保加利亚字母(见图),共 30 个,沿用至今。

(杨燕杰)

Baoluo

保罗, H. (Hermann Paul 1846~1921) 德国语言学家。1846 年 8 月 7 日生于萨尔布吕肯,1921 年 12 月 29 日卒于慕尼黑。1874 年任弗赖堡大学教授,1893~1913 年任慕尼黑大学教授。

保罗与 K. 布希格曼, H. 奥斯特霍夫等都属于新语法学派,致力于语言史和日耳曼语言的研究。他的主要著作《语言史原理》(1880)曾产生广泛的影响。他认为语音变化有规律,并指出类比在语言演变中的作用。他

说,就是在原始印欧语时期,人们也只知道有词而不知有词根词尾,他们构成词的数和时态等形式全靠从听到的话类推而不是靠复述和背诵,这与 N. 乔姆斯基的说法一致。在他之前,历史比较语言学家侧重词法,保罗则除词法外还讲句法。对于词义的历史演变,他主要讲词义扩大和词义废弃两方面的问题。L. 布龙菲尔德认为,保罗的缺点在于只指出词的废弃是由于使用频率低,而没有注意使用频率低是因为这个词所指的事物在实际生活中的重要性减少了。



在日耳曼语研究方面,保罗有许多著作,包括《德语词典》(1897)和5卷本《德语语法》(1916~1920)。

(董光熙)

benyl

本义 (original meaning) 指一个汉字由最初书写的字形上所反映出来的意义。例如“从”,甲骨文作,一人随从一人,表示相从的意思。这就是“从”字的本义。《说文解字》说:“相听也”,那是引申发展出来的意思。又如“莫”,篆书从日从莫,莫是众草,日没于众草之中,表示日暮的意思。《说文》说:“日且冥也。”这是“莫”字最初造字的本义。后来借用为否定词,又另造一“暮”字,代表原来的意思,那就是一般所说的后起本字了。本义是对引申义、转义和假借义来说的,也可以称之为基本意义。汉字数量很大,除一小部分象形字和表意字以外,大多数只能从古代文献中去探求其最早使用的意义,很难知道最初的意义。汉代许慎作《说文解字》,采录古代经籍中的训释,多能申明字的本义,但有些须根据商周古文字参验,正其谬误。

(周祖谟)

benzi

本字 也称正字,指直接为表示某一词义而造的汉字,与通用的假借字不同。表示词的本义的字称为本字,不表示本义的称为假借字。就字形来看,可分为两类:甲类本字与假借字同为一字。如“女”本义指女人,又借用指第二人称(汝),后一用法的“女”是假借字,而用于本义的“女”是本字。乙类本字与假借字是两个字。如“涓”本义指水草之交的岸边,这个意义古籍有时借“麋”来表示。《诗经·小雅·巧言》:“彼何人斯,居河之麋”。“麋”是假借字,“涓”是本字。

甲类在汉字发展中,本字与假借字可发生转换。有两种转换,一种是假借义通行,本义另造字。如“然”本义指燃烧,假借用作代词等,本义另造“燃”。“然”是“燃”的古本字,“燃”是“然”的后起字。另一种是假借义另造字。如“祭”本义指祭祀,假借指地名,后造地名字“鄯”,“鄯”是后起本字。“祭”和“鄯”处于不同的时间层次上,它们是古字与后起字的关系。

有些本字后来废弃不用。一种是古本字,如“堙”为壅塞字,“湮”为湮没字,后来“堙”字不用,而另造“堙”字。另一种是后起本字。如“率”本义指捕鸟器,假借用指率领。这个意义造“衛”字,但未得流传。一些有复古主义思想的人认为凡本字都应该是通行的字。他们提倡写这些已废弃不用的字。这种主张违反了文字约定俗成的原则。

确定本字有赖于正确分析字形结构,找出字的本义。《说文解字》是中国古代一部分分析字形结构注释本义的专著,是一部重要的文字学著作。然而所解释的意义多有错误,例如“不”字释为“鸟飞不下来也”。据甲骨文、金文资料分析,“不”本义指花柎,《说文》所释不是本义。今作否定词用,是假借字。

本字有时指本应该写的字,是就字的常用义说的。例如“由”用作假借字,指“好象”、“如同”的意思,其本字是“犹”。这是根据“犹”的常用义来说的,同“犹”的造字本义(指一种猿类动物)无关。在本有其字的假借中,这类本字占有很大的比重。

(曹先擢)

Benglongyu

崩龙语 (Benglong language) 见德昂语。

Bibulusi zimu

比布鲁斯字母 (Byblos alphabet) 比布鲁斯(今黎巴嫩朱拜勒)地方发现的古代字母。这是公元前11世纪刻在国王阿希拉姆墓碑上的文字。1923年发现,已经解读,有22个字母,表示辅音,带有不写出和不固定的元音,自右而左书写。这是迄今为止已经解读的最古字母。(参见彩图插页第46页)

在这以前,1868年在死海东岸帝朋地方发现麻阿比国王美沙的记功碑,是公元前9世纪的遗物。也已经解读,字母形制跟阿希拉姆碑相同,只有微小的差别。在比布鲁斯字母发现以前,一直认为麻阿比字母是已经解读的最古字母。(参见彩图插页第46页)

比布鲁斯是古代腓尼基的海口商埠。以黎巴嫩为中心,包括叙利亚和以色列等四周地方,古称迦南,后称腓尼基。腓尼基大致在公元前15世纪就应用字母。比布鲁斯字母是现存最古的腓尼基字母。后来腓尼基人把字母传播到地中海沿岸各地。再传而成为近代西方各种字母。“比布鲁斯”(Byblos)是英文“圣经”(Bible)一词的语源。Bible原义为“书本”。

(周有光)

Biya

《比雅》 分别解释意义相类语词的书。清代洪亮吉编。洪亮吉,生于乾隆十一年(1746),卒于嘉庆十四年(1809)。江苏阳湖人,字君直,一字稚存,号北江,举乾隆进士,督贵州学政。嘉庆时上书论事,语过激烈,减死,改戍伊犁,后赦还。平生沉研经史、地理,又善为诗文。有《洪北江全集》。

《比雅》依照《尔雅》体例而作,搜录古书训诂集成一

书。原为遗稿,尚未编次就序,后人依照《尔雅》编排,始于《释诂》,终于《释畜》,分为19类。惟篇次和名目略有改变。移《释天》、《释地》、《释山》、《释水》列于《释亲》之前;把《释亲》改称《释人》,并《释丘》于《释山》;又于《释水》之外别出《释舟》,包括《释车》。原书因为未定稿,其中归类错乱之处也不少。

作者的目的是要把见于古书中有关义类相近的语词的解释比写在一起,以便省览和理解。同南北朝刘宋时何承天(370~447)的《纂要》(清任大椿《小学钩沉》内有辑录)和唐代徐坚(659~729)的《初学记》有些相似。例如,《释训》引《诗经毛传》:“洗洗武也,湔湔怒也。”引《通俗文》:“不长曰么,细小曰麽。”引王逸《楚辞注》:“爱财曰贪,爱食曰婪。”《释山》引《诗经毛传》:“山无草木曰赜,山有草木曰屺。”《释水》引高诱《吕览注》:“有水曰泽,无水曰藪。”这在训诂书中自成一格。对涉猎文辞,考求字义都很有用。不过,有些单字在现代语中已经构成成为一个复合词,而不是单个的词了。

《比雅》有《粤雅堂丛书》本,有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排印本。

(周祖谟)

blyuyi

比喻义 (metaphoric meaning) 就汉字(词)的原有的某义因比喻而产生的意义。比喻也是一种引申义。例如“轮”是有辐的车轮,是能转动的,由此而产生“轮班”、“轮换”、“轮流”的意义,由名词转为动词,是比喻义。同样,“鼓”是一种乐器,形圆而中空,本义是名词,而用为凸出高起的意义,如“鼓出来”、“鼓起来”,转为动词,那也是一种比喻。又如“灰心”一词,出于《庄子·齐物论》:“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人的意绪消沉,有如死灰,因而说“灰心”,这也是一种比喻。语词的词义出于比喻的,在双音词里比较多。如“眉目”指“端绪”,“荆棘”比喻困难险阻,“机械”比喻死板等都是。比喻义跟修辞学所说的比喻不同。文辞的比喻是作者临时而施设的,汉语训诂学所说的比喻义是久已约定俗成,固定下来的,两者有分别。

(周祖谟)

bihuizi

避讳字 指中国古代回避君父尊亲的名字而改写的字。避君主的名字,据说始自秦代。秦始皇名嬴政,一名正,所以秦代称“正月”为“端月”。秦以后避讳成为惯例。汉高祖名刘邦,所以汉代人把“邦”改写为“國”;汉景帝名“啓”,就把“啓”改写为“開”。同见于史书和长沙马王堆汉墓所出帛书。汉代以后,避讳的要求渐严。梁武帝名萧衍,刘孝标注《世说新语》称晋代的王衍为王夷甫。唐太宗名李世民,唐代人写书把“世”写作“世”,或改写为“代”;“民”缺笔写作“𡵓”,或改写作“人”。避讳不仅要避当代皇帝的名字,而且要避皇帝的父祖的名字。如唐太宗的父亲名李渊,史书遇到“渊”字就改为“泉”,或改为“深”。宋太祖的祖父名赵敬,宋代人书中“敬”字改为

“恭”,或改为“严”;同音的“镜”字改为“鑑”,这又叫做“避嫌名”。宋代避讳,极为繁乱。

(周祖谟)

biaodian fuhao

标点符号 (punctuation marks) 书面语中用来表示停顿、语气以及词语性质和作用的标记。

句读 中国的古籍,没有类似今天使用的标点。古代有些文字(例如甲骨卜辞)有时用分行或隔离来表示停顿,这种情况也并不普遍。所以历来认为学会断句是读书的基本要求。汉代的《礼记·学记》上记载:“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经学家郑玄(127~200)注:“离经,断句绝也。”当时表示断句的符号是“、”和“└”。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有所绝止,、而识之也。”又说:“└,钩识也。”就是说,“、”用来表示较小的停顿,“└”表示较大的停顿。这在史学家司马迁(约公元前145)的《史记·滑稽列传》上也得到证明:“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人主从上方读之,止,辄乙其处,读之二月乃尽。”文字训诂学家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加以解释:“乙其处”就是“└其处”。说明“└”表示较明显的停顿。20世纪初发现的汉简(《流沙坠简》)中有使用了这种符号的简片。“└”和“、”汉朝人称之为句读。古代的“句”读音如同“钩”,许慎讲的“钩识”也就是句号的意思。“读”音逗,含有停顿的意思,用来表示句中的停顿。这两种符号到了宋代才逐渐推广使用,但形态有些改变。一种是句号用“。”,读号用“、”;另一种是句号读号都用同样的点,句号的点用在字旁,读号的点用在两字之间。宋元时代出版的书籍,特别是经书,一般不加句读。句读符号多用于教学或校勘方面。元黄公绍编辑,熊忠举要的《古今韵会举要》中说:“凡经书成文语绝处,谓之句;语未绝而点分之,以便诵读,谓之读。今秘书省校书式,凡句绝则点于字之旁,读分则点于字之中。”由此可见,句读是在诵读时或校勘时使用的符号。宋刻本也有仿照校书式印上圈点的,但不多见。

元明刻本小说多在句子的末了加圈,也有一律用“、”或用“。”的。有些戏曲和启蒙读物也采取这种方法。明刻本小说还增添了人名号和地名号,前者是在人名右边加一条直线,后者是在地名右边加两条直线。

标点 这两个字,始见于宋代。《宋史·何基传》:“凡所读,无不加标点,义显意明,有不待论说而自见者。”这里的标点指的是阅读古书时添加的句读符号,即所谓旧式标点。

新式标点 新式标点是模仿西方的书写习惯而借用的,在清代末年才开始使用。翻译家严复(1853~1921)的《英文汉诂》(1904)是最早应用外国标点于汉语的著述。“五四”运动(1919)前些年,不少作家已经开始使用新式标点。《新青年》杂志第4卷(1918)也开始部分地使用。由于汉语文有自己的特点,特别是当时的出版物多半采取直排方式,照搬西方的标点有时会遇到困难,于是使用者都做了不同程度的修改。这样就出现标准不一

的现象。1919年马裕藻、朱希祖、钱玄同、刘复、周作人、胡适等人联名提出《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并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一次大会上决议，1920年由当时的教育部正式颁行。这个议案先说明了使用标点符号的必要性，再列出各种符号，包括句号、点号、分号、冒号、问号、惊叹号、引号、破折号、删节号、夹注号、私名号、书名号共12种。

“五四”运动以后，公布的标点符号逐渐普遍推广应用。比较西方使用的标点，有几处明显的不同：①句号用“。”，不用“.”，这是为了醒目。②引号用“”和“'”，不用“”和“'”。这是为了适应直排文字的特点，是依照日本的用例而加以变通的。③西方文字的人名和地名等专有名词的开头用大写字母表示，汉字没有这种标记，所以要有私名号和书名号。

1951年国家出版总署重新公布《标点符号用法》，包括14种符号：

- ① 句号(。)表示一句话完了之后的停顿。
- ② 逗号(,)表示一句话中间的停顿。
- ③ 顿号(、)表示话中间并列的语汇(包括作用跟并列的词相仿的并列的短语，并列的分句)之间的停顿，又表示“次序语”之后的停顿。
- ④ 分号(;)表示一句话并列的分句之间的停顿。
- ⑤ 冒号(:)表示提示语之后的停顿。
- ⑥ 问号(?)表示一句问话完了之后的停顿。
- ⑦ 感叹号(!)表示一句感叹话完了之后的停顿。
- ⑧ 引号(“ ”)表示文中引用的部分。
- ⑨ 括号(())表示文中注释的部分。
- ⑩ 破折号(——)在文中表示底下有个注释的部分，又表示意思的跃进。
- ⑪ 省略号(……)表示文中省略的部分。
- ⑫ 着重号(·用在文字的右边)表示文中特别重要的语句。
- ⑬ 专名号(——用在文字的左边)表示文中的人名、地名、团体名之类。
- ⑭ 书名号(《 》)用在文字的左边)表示文中的书名、篇名之类。

以上的符号，有专门表示语言中的停顿的点号(如逗号、句号等)，有专门给书面语作标记的标号(如引号、括号等)，也有兼有点号和标号性质的符号(如问号、感叹号)。同1919年公布的方案相比，增加了顿号和着重号，同时把“点号”、“惊叹号”、“删节号”、“夹注号”、“私名号”改称“逗号”、“感叹号”、“省略号”、“括号”、“专名号”。

由于出版物由直排改为横排等原因，在使用中对上述规定作了如下的修正和补充：①横排时引号改用“”和“'”。②书名号用《 》、〈 〉。③增加间隔号(·用在两个字的中间)表示人名中的音界，也用在书名和篇名中间。此外，还有一些符号扩大了使用范围。例如破折号也用来表示时间、地点、数目的起止，或用来表示人或事物之间的关联。这样用的时候，有人称之为连接号。表示声音的延长，有人也用——。表示声音的断续，有人用……。

也有人把感叹号和问号用在一起，如!?或?!，表示反诘语气，多见于文艺作品。至于表示文中某些词语须另外加注解，一般用数字表示；对篇题的注解多用*表示。

参考书目

徐世荣：《标点符号讲话》，大众书店，北京，1952。

(张 斌)

biaoyin

标音 (transcription) 用字母或音标标记语音的方法。分宽式和严式两种，前者也叫音位学标音法，可采用本族语的拼音字母(或增加一些附加符号)作标记工具；后者也叫语音学标音法，一般采用国际音标(简称IPA)作标记工具。标音法可用来标记另一种语言的语音，也可以用来标记方言的语音。在不要求精确表达语音时，采用宽式标音法。但在调查语言和方言时，为了正确归纳出它的音位系统，只能用严式标音法；另外，在教人们如何正确发音时，也采用严式标音法，如词典里都用国际音标注音。

(刘涌泉)

bleming

别名 一种事物在通常的名称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名称，或同是用之于书面，或同是用之于口语。例如《尔雅·释草》：“荷，芙渠。”郭璞注说：“别名芙蓉，江东呼荷。”“别名”也说“一名”。如《尔雅·释虫》：“蟪，白鱼。”郭璞注说：“衣书中虫，一名蛭鱼。”“一名”也说“亦名”。同书“蟋蟀，蝈。”郭璞注说：“今促织也。亦名青蚨。”“别名”、“一名”、“亦名”意思相同，都指的是通常称谓以外的名称，不限定流行区域的广狭。

(周祖谟)

Bleya

《别雅》 以训解双音词为主的书。清代吴玉搢作，凡5卷。吴玉搢(1698~1773)字藉五，号山夫，江苏淮安人。康熙生，官凤阳府训导。这本书原名《别字》，后改名《别雅》。所收的词，都是字形不同而音义相同的双音词和少数的单音词。体例类似《尔雅》的“释诂”和“释训”，有的单独解释一个相通的同义词，有的解释几个相通的同义词。这些被解释的词语大都出于经书诸子史传和汉代碑刻，跟通常的写法不同。例如：

① 從頌，從容也。注云：“《史记·鲁仲连传》世以鮑焦为无從頌而死者皆非也。”注音：從容。

② 扶於、扶疏、扶苏、扶胥、扶疎也。注云：“《史记》司马相如《上林赋》‘垂条扶於’。郭璞曰：‘扶於，犹扶疎也。’五臣本竟作扶疎。疎乃俗字。故李善本改作扶疏。注引《说文》曰：‘扶疏，四布也。’《吕氏春秋》曰：‘树肥无使扶疏，’……《诗·郑风》‘山有扶苏，’……盖古於、疏、胥、苏皆相通，犹姑苏亦作姑胥。”

注文中除举出书证外并解释“某与某二字相近古通用”，或云“某与某一声之转，故多通用”，或云“某某音同，故两相假借”。又说：“古人形声相近之字多通用无别，此即假借转注之义，今人不知此理，始株守一字以为一义，

然日用寻常之字,其非本意而能假通用者不可胜数,学者童而习之,不以为怪耳。”又说:“凡诸变体,其义则一,盖古人不能借声,见形义相近者,时牵率书之。”又说:“凡形容之辞初无正字,皆假借同音之字书之。”这些意见大都正确。

本书资料丰富,所引有焦竑《俗书刊误》、周伯琦《六书正讹》、方以智《通雅》。受方以智《通雅》的影响尤多。近代朱起凤《辞通》之作又比《别雅》加详。《别雅》有乾隆七年(1742)新安程氏督经堂刊本。前有镜湖王家夔序和水南程嗣立序。后来道光末又有重刻本。另外沂州日照许瀚有《别雅订》5卷,在《滂喜斋丛书》内。订正《别雅》解说之不当处,可以参考。(周祖谟)

blezi

别字 (misused characters) 指跟正字不同的字。凡当写某字,而写为另外一个音同或音近的字,这个字就称为别字。别字就是另外一个字的意思。清代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别字”条说:“别字者,本当为此字,而误为彼字也。今人谓之白字,乃别音之转。”清代赵之谦有《六朝别字记》,近代罗振玉有《碑别字》,都是采录古代碑刻中别字的书。(周祖谟)

Bingdaoyu

冰岛语 (Icelandic language) 冰岛的官方语言,属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北支(又称斯堪的纳维亚语支)。主要分布于本土,使用人口超过20万。

冰岛人的祖先是9~10世纪来自挪威西部的移民。由于冰岛远离欧洲大陆,冰岛语始终保持古代挪威语西部方言的特点,词汇很少受外来语的影响。有的语言学家称它为欧洲“最保守的”语言之一。冰岛语曾经吸收丹麦语、凯尔特语、拉丁语和罗曼语族的词语,但19世纪以后,由于纯语主义运动的开展,这些外来词已让位给冰岛语词。科学和工程术语也用冰岛语成分构成。语法上格的变化、名词性的区别、动词结尾的人称变化、音节组合、特别是首音节的组合等,均保留着古斯堪的纳维亚语(即古诺尔斯语)的特点。现代冰岛人仍能阅读1000年前写的古冰岛语史诗。

冰岛语重音总在第一个音节上。它保持着完整的屈折变化系统。动词有人称、时态变化;名词有4个格(主格、生格、与格、受格);名词、形容词、代词等分阳、阴、中性(其他斯堪的纳维亚语言只分通性和中性),有单、复数之分;定冠词通常作为后缀附着于名词之后。冰岛语的语法和词汇稳定,但现代冰岛语的发音和古代有很大差别。冰岛语采用拉丁文字,但仍然使用古代北欧文字中的字母þ和ð分别表示清、浊齿擦音。(任元华)

Bolanyu

波兰语 (Polish language) 波兰的官方语言。属印欧语系斯拉夫语族西支。使用人口约4800万,

其中3800万在波兰,1000万在世界各地。

波兰语的发展可分为4个时期。①10~14世纪。这个时期的历史文献都用拉丁语写,只有人名、地名是波兰语。②14~17世纪上半叶。14世纪出现了大量波兰语文献,有圣十字经文、格涅兹诺经文、圣母颂诗等;16世纪文学语言兴起,第一部波兰语语法于1568年问世。③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末。一般认为这是波兰语衰落时期,出现了波兰语同拉丁语、意大利语、法语混杂的现象,文学语言中这种现象更甚。④18世纪末至今。19世纪是波兰人民为纯洁和丰富本民族语言而奋斗的时代。A.密茨凯维奇(1798~1855)和H.显克维奇(1846~1916)等文学家对近代波兰文学语言的形成作出了巨大贡献。

Mateusz się porwał w ten mig do niego, ale nim mógł zmiarkować co bądź, już Antek skoczył jak ten wilk wściekły, chyłił go jedną ręką za łyżkę, przydusił aż tamten dech i głos stracił, drugą ujął za pas, wyrwał z miejsca jak kierz, nogą drzwi wywalił na dwór, i poniosł go prędko za tartak, do rzeki ogrodzonej płotem i cisnął z całej mocy, aż cztery żerdki trzaśły kiej słomki, a Mateusz niby kłoc ciężki padł we wodę.

波兰作家 W. 莱蒙特的小说《农民》片段

波兰语有8个元音,35个辅音;名词、形容词、代词、数词都有性、数、格的变化;名词有7个格,形容词有长、短尾之分,动词有人称、时、式、体、态、形动词和副动词等形式。同其他斯拉夫语比较,波兰语语音有以下特点:有两个鼻元音,有典型的元音交替现象,重音固定在倒数第二个音节上;在变格变位时,复数有阳性人称和阴性物称两种形式。波兰语有5种方言:小波兰方言、大波兰方言、西里西亚方言、马佐夫舍方言和卡舒布方言。方言和全民语言的区别在不断缩小。波兰语采用拉丁字母,外加一些二合字母变音符号(见图)。(易丽君)

Bolinixiya yuzu

波利尼西亚语族 (Polynesian group) 见南岛语系。

Boluodi yuzu

波罗的语族 (Baltic group) 印欧语系的一个语族。现仅存两种活的语言:立陶宛语和拉脱维亚语(又称莱蒂语),是波罗的海东岸居民使用的语言。主要分布在苏联立陶宛和拉脱维亚两个加盟共和国,少量在国外。使用人口近500万。波罗的语族分东支和西支。东支包括立陶宛语、拉脱维亚语,以及已消亡的库罗尼亚语、塞米加里语和塞罗尼亚语,后两种语言通常被看作是立陶宛语和拉脱维亚语之间的过渡语言;西支仅包括一种已消亡的语言——古普鲁士语。

所有波罗的语言都是屈折型语言。在有文字记载的波罗的诸语言中,古普鲁士语历史最悠久,它跟立陶宛语和拉脱维亚语有很大的差别。例如,古普鲁士语保留原始波罗的语的二合元音ei,后两种语言没有保留;古普鲁士语的名词有中性,后两种语言则失去了中性;此外在形态

方面也有不少差别。波罗的语族中,立陶宛语和拉脱维亚语最接近。在较古的形态特征方面彼此相似,但在发展过程中各自有一些创新;在语法上都有阳性和阴性,单数和复数,有主格、属格、与格、宾格、工具格、方位格和呼格,有3种变位法和3个人称;有3种共同的时态:现在时、过去时和将来时,但立陶宛语多一个反复过去时。在构词、借词等方面,二者也很相似。

印欧语系中,波罗的语族跟斯拉夫语族的关系比跟其他语族的关系更接近。波罗的人跟斯拉夫人的接触从原始印欧语时期以来从未中断,他们的语言不仅有共同的形态特征,而且还有某些共同的句法特征和词汇项目。因此有的语言学家主张把波罗的语族和斯拉夫语族合为一个波罗的-斯拉夫语族。(黄长著)

Bonini

波你尼 (Pāṇini) 印度古代语法学家,对后世语言学的发展有巨大的影响。

生平 生活年代不十分清楚,一般认为是在公元前4世纪。诞生地在今巴基斯坦的白沙瓦附近。现存最早的记载见于中国唐代高僧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第2卷,健驮罗国娑罗观逻邑。玄奘说:“是制《声明论》波你尼仙本生处也。”他接着说,远古时期,文字繁广,异道诸仙各制文字,学习者难以详究。到了人寿百岁时,波你尼仙“拈摭群言,作为字书,备有千颂,颂三十二言矣,究极今古,总括文言”。对波你尼的生平没有细谈。

著作 印度古代极重祭祀。祭神要唱颂歌,颂歌多取自吠陀。由于努力保持吠陀圣典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发展了所谓吠陀六分支,其中尼录多是词源学,毗伽罗是语法学。婆罗门世代相承,发展了这两门学科。因此在波你尼之前,印度语法学已经有了长期的历史,波你尼是集大成者。他留下了一书:《波你尼经》(见图),因为内容有八章,亦称《八章书》,即玄奘所谓的《声明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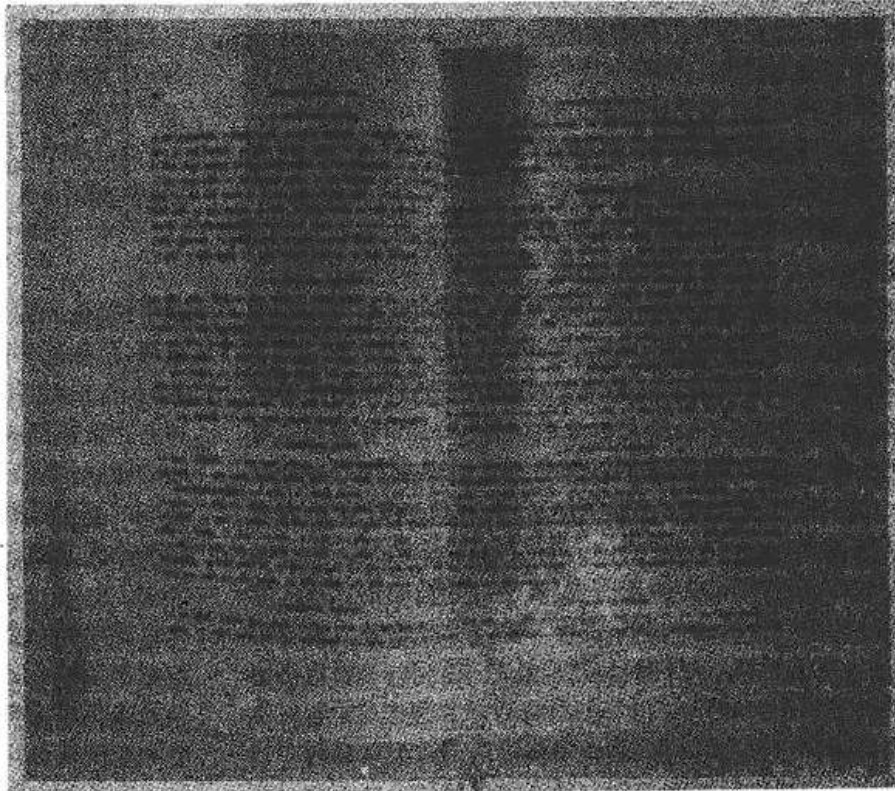
《波你尼经》的体裁与玄奘所述不同,不是颂体,而是口诀式的经体。所谓“经”,是印度古代的一种著述体裁,是尽量压缩的口诀。产生时代约在公元前4世纪,与波你尼的时代相符。也有人主张早于此时,尚无定论。另外一种经体,则产生较晚。之所以采用这种口诀式的文体,最初目的不外是便于记忆。当时还没有书,师徒口耳传承,简便易于背诵的文体便应运而生。

《波你尼经》全书共分8章,每章4节。第1章,说明术语及其运用,论词根(“界”),说明 it(符号),论动词“自句”,论动词“他句”,论名词八格(“咄”),论投词,说明动词、名词的

数、格等。第2章,论复合词,“不变”复合词、“依主”复合词、“持业”复合词、“带数”复合词、“有财”复合词、“相违”复合词,论名词各格用法,论复合词的性,论“半界”,论若干后缀(“缘”)。第3章,论直接后缀(“作”),论 san 等后缀,论介于词根与动词词尾中间的后缀,论 krtya 类的词尾(分词等的词尾),论表示过去的后缀,论表示现在的后缀,论“温那地”后缀(uṇ 等不规则后缀),论表示过去和将来的后缀,论动词各式(“罗”)用法。第4章,论阴性名词及间接后缀(“加”),论后缀 aṇ,论后缀 thak,论后缀 yat。第5章,续论间接后缀,论后缀 cha,论后缀 thañ、thak 等,论后缀 vati,论含“有”(性质)与“业”(行为)意义的后缀,论比较级后缀,论 tadrāja 后缀。第6章,论“音变”与“音增”,论词的音调,论复合词的音调,论复合词成分的变化,论词干(“身”)的“音变”,论“半界”前的词干变化,论“一切界”前的词干变化,论词干中 bha 类的变化。第7章,续论词干的“音变”,论“音增”num,论词干在后缀前的变化,续论词干的变化,论词干在间接后缀前的变化。第8章,论词的重叠,论“低调”,论“连声”及音的变化。全书共有3983句。

波你尼以后,出现了一些修订、补充和注释《波你尼经》的著作。约在公元前3世纪,有迦旃延那,一名婆罗流支的《释补》。约在公元前2世纪,有波颠闍利的《大疏》。

《波你尼经》的语法体系。《波你尼经》的近4000句口诀包含着一个完整的、科学的语法体系。字母排列非常合乎科学。先元音,后辅音,依照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排列。这种排列顺序比希腊语、拉丁语、阿拉伯语和



《波你尼经》中的一页。

所有的西方语言的那种脱离语言体系的字母表都合理得多。

谈到语法结构,波你尼的特点在于分析。他从语音分析开始,不分析句,只分析词;不管语义,完全以语形为分析对象。他分析词根、词干、词尾、前缀、后缀、派生词、复合词等等。分析到最后就是词根,即所谓“界”。加到“界”上使它成为词,或者再使它表现出名词、动词等所有的关系的都称为“缘”,即直接后缀。因此,构词的基本公式是界+缘=词。这种分析到最后的词根全是动词,也可以说,只有动词的根才是最后的成分。名词都出于动词。这种奇特的理论有其合理的成分;但是,同世界上许多理论体系一样,一旦形成,就必然要求统一,要求完整,不允许有例外,于是削足适履、牵强附会就随之而生。波你尼的理论也不例外。按波你尼的说法,词类共有4种,即名词(包括名词、代词、形容词)、动词、介词、不变词(包括叹词等)。波你尼只承认名词和动词,这两个还要再变化,而介词、不变词则不再变化。一件行为的过程用动词来表达;一旦行为完成了,动作固定了,那就成为一件事,则用名词来表现。名词与动词的关系就是如此。总之,名词出于动词。

在印度,《波你尼经》是学习梵语的主臬。在欧洲,它促成了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的产生。(季羨林)

Bopu

波普, N. N. (Nikolaj Nikolaevic Poppe 1897~) 阿尔泰语言学家、语文学家、东方学家。1897年8月8日生于中国山东烟台。8岁时随父母定居俄国圣彼得堡(今列宁格勒)。1921年毕业于彼得格勒大学,1923年获硕士学位,1934年获列宁格勒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2~1941年,先后任教于列宁格勒地理学院、列宁格勒现代东方语言学院和列宁格勒大学。1928年任列宁格勒大学教授。1931~1941年领导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蒙古语室。1933年当选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43年赴德国,任柏林大学教授。1949年移居美国,任华盛顿大学教授。1968年退休后继续主持这所学校的阿尔泰学研究。1970年任加拿大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波普早年攻读自然科学,后来受到阿尔泰语言学家W. 科特维奇、Б. Я. 弗拉基米尔佐夫、А. Д. 鲁德涅夫等人的指导,研究阿尔泰语言。他着重实地调查,1929~1941年每年都去阿尔泰语民族中生活、考察。曾游历蒙古、布里亚特、卡尔梅克、中亚、西伯利亚东部、日本等地。除语言文字外,研究领域还涉及历史、文学、宗教、民俗、经济、文化等方面。发表著作300多种,评论100余篇。名著有《蒙古书面语法》(1954),被广泛用于教学;《蒙古语比较研究导论》(1955),内容涉及语音学和形态学,取材于书面语、中世纪蒙古语、蒙古语族诸语言;《阿尔泰语比较语法》第1卷(1960),以大量文学素材和个别语族语言的比较为基础,内容丰富;《阿尔泰语言学导论》(1965)

有全面历史的描述及评论。

波普是芬兰-乌格尔学会和乌拉尔-阿尔泰学会的荣誉会员,梅因茨德国科学与文学研究院的通讯院士。1968年被波恩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1977年被芬兰科学院选为外籍院士。(应琳)

Bositani

波斯塔尼, B. (Buṭrus al-Bustani 1819~1883) 黎巴嫩语言学家,近代阿拉伯文艺复兴的先驱之一。通晓阿拉伯文学,掌握古叙利亚语、意大利语、拉丁语、希伯来语和希腊语。先后从事教学工作、翻译工作,协助美国传教士将希伯来语《圣经》译成阿拉伯语,编写并出版了阿拉伯语两卷本大词典《新词海》及其缩编本《词海点滴》、语法专著《明灯之钮》。曾通过其长子创办《叙利亚号角》、《心灵》、《天堂》、《园地》等4种报纸。波斯塔尼最主要的编著为阿拉伯《百科全书》,但他只编到第7卷。(张甲民)

Boslyu

波斯语 (Persian language) 伊朗的官方语言,也是阿富汗境内两种主要语言之一(另一种是普什图语)。属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伊朗语支。使用人口约6000万。波斯语还分布于苏联的中亚部分地区和中国新疆的个别地区。

波斯语是世界上的古老语言之一。古波斯王大流士一世(公元前6世纪)有碑,刻有波斯楔形文字(图1),今



图1 波斯楔形文字(公元前6世纪)

存伊朗。公元前3~公元8世纪,古波斯语演变为中古波斯语(又称巴列维语)。现代波斯语主要在中古波斯语的基础上,由8世纪左右通行于伊朗南方法尔希族中的一种方言发展而成。该方言自阿拉伯哈里发政权在波斯东南方建立朝廷后逐渐成为朝廷的官方语言。在长期的发展中,波斯语积累了丰富的文学、哲学、历史和其他科学著作的文献。它至今仍然是近东地区最重要的语言之一。

波斯语为拼音文字,共有32个字母,其中28个是阿拉伯字母,4个是波斯字母(图2)。波斯语有8个元音,长元音和短元音各为3个,双元音2个;有辅音22个,其中8个清辅音,14个浊辅音。单词的重音基本上落在最后一个音节上。句法特点是词序相对固定,基本词序是主语—宾语—谓语。修饰语在中心语之后。动词有人称、数、

بازار بتان شکست گیرد بارم چو قلدح بخت گیرد
کو محسی که مست گیرد هر کس که بدید چشم او گفت
تا هزار سرا بخت گیرد در بحر فتادام چو ماهی
آها بود آنکه دست گیرد در پاش فتادام بزاری
جای ز می الست گیرد غم دل آنکه میجو حافظ

图2 14世纪波斯诗人S. M.哈菲兹《手中握着杯》的片段

时态、语态和语气等语法范畴，时态共有9个，通过动词的词尾，或者加助动词来体现。名词和代词没有明显的格和性的范畴，领属关系由一个连接符（波斯语称伊扎菲）表示。波斯语在历史上受阿拉伯语影响最大，约有近一半的词语来自阿拉伯语。此外，它还部分地吸收了土耳其语和蒙古语词语，近年又较多地吸收了法语、英语和俄语等欧洲语言的词语。（曾廷生）

Botlebutniya

波铁布尼亚, A. A. (Александр Афанасьевич Потебня 1835~1891) 乌克兰与俄罗斯语言



学家、语文学家。1835年9月22日生于波尔塔瓦，1891年12月11日卒于哈尔科夫。1856年毕业于哈尔科夫大学，1875年起任该校教授。自1877年起任彼得堡科学院通讯院士。主要研究普通语言学、俄语以及其他斯拉夫语、语文学、民间文学、诗歌和人种史。前期受W. F. 洪堡特和H. 斯坦塔尔影响，

多从哲学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语言；后期侧重各斯拉夫语的方言、语音和语法问题。所著《思维与语言》(1862)一书探讨了词的内部形式问题。主要代表作《俄语语法札记》(4卷，1874~1941)详细阐述了对词、语法形式、语法范畴等基本问题的观点。（信德麟）

Bobo'er yuzu

柏伯尔语族 (Berber group) 见阿非罗-亚细亚语系。

Bodu'en de Ku'erdenei

博杜恩·德·库尔德内, J. N. (Jan Niecisław Baudouin de Courtenay 1845~1929) 波兰语言学家。1845年3月13日生于波兰拉杰明，1929年11月3日卒于华沙。1866年在华沙高等学校毕业。1870年获德国莱比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875年获俄国彼得堡大学比较语言学博士学位。自1897年起任彼得堡科学院通讯院士。曾任喀山大学、彼得堡大学、华沙大学等校教授。在喀山执教期间，创立了喀山学派。

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的主要贡献在于建立音位学说，是现代音位学的先驱者之一。他主张除从发音和音

响的角度外，还要“从形态学和构词法的角度分析语音”。他指出语音的生理、物理属性和功能属性彼此不一致，从而区分音素和音位。他提出语音交替理论，例如，在俄语 *везу* (运送，第一人称单数) 与 *воз* (大车)、*муха* (苍蝇) 与 *мушка* (苍蝇，指小) 这些词源上有联系的词形中，*e* 和 *o*、*x* 和 *ш* 彼此交替，这使语音学和形态学挂起钩来，为形态音位学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博杜恩·德·库尔德内把语言看作心理社会现象，认为语言学属于心理-社会科学。他越过当时德国学者偏重历史比较研究的樊篱，提出了一些为现代语言学所关心的问题，如语言的系统性，“音位”和“语素”这些语言基本单位的描写和分析方法，语言的静态(共时)研究和动态(历时)研究的区别等，都极其重要。他主要从事普通语言学和印欧语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学术视野广阔。他用波兰语、俄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写作，一生写了600多篇(本)论文和专著。主要著作收在《普通语言学文选》第1、2卷(1963)中。

见喀山学派。

(戚雨村)

Bo'esl

博厄斯, F. (Franz Boas 1858~1942) 美国人类语言学家，近代人类学的创始人。1858年7月9日生于德国威斯特伐利亚州明登市，卒于1942年12月22日。他在学生时期受严格的自然科学和古典语言的训练，



23岁在基尔大学得博士学位。25岁(1883)到加拿大东北巴芬岛(属北极区)调查民俗，历时一年。1886年再度去北极区考查美洲印第安人部落，特别注意克瓦克特尔族的神话、语言、习俗，确立了他后来40年的学术方向。当时德国在俾斯麦军国主义统治下，实行文化禁锢，青年的博厄斯深表厌恶，

于是决定留居美国，从事印第安族语言文化的调查。1896年任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讲师，三年后任教授，直到1936年退休。40年间，他培养了几代的美国人类学家。一生有专著6种，论文700多篇，创立了三种论述人类学和人类语言学的期刊。

博厄斯深入美洲印第安人部落，学习他们的语言，记录他们口授的历史。他训练印第安人学会记音方法，让他们记下自己的语言，申述他们对自己语言的看法。在博厄斯倡导下，人们不再把欧洲的语言系统强加于美洲印第安语言，而开始如实地描写这些语言的音位系统和语法系统。在美洲语言里，语言学家遇到了前所未见的

现象,例如有的词没有元音,有的动词与名词的概念不同于欧洲语言。许多欧洲语言学家曾经认为,语言的演变模式是由一种“始祖语”演变成为多种语言,博厄斯则认为美洲语言演变的模式与此不同,往往是多种毫不相关的语言聚在一起,互相影响,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所受的文化影响。他认为,语言学应该从传统的模式中跳出来,多研究一些历来受到忽视的、尚未有文字记录的语言,从而取得更为全面的观点。在他的号召下,美洲语言学成为单独的学科,1917年起就有专门的刊物,博厄斯的《美洲印第安语手册》(1911)是这一学科的必备参考书。

博厄斯是国际主义者。他痛惜美洲印第安人在白人文化的侵蚀下,有的语言已经失传,有的即将失传,因此他致力于记录保存,40年不怠。他认为各民族应该多了解各自的语言和风俗的特征,消灭历史遗留的谬误。

(许国璋)

Bopp

博普, F. (Franz Bopp 1791~1867) 德国语言学家。1791年9月14日生于美因兹,1867年10月23日卒于柏林。1812年他到巴黎攻读梵语,1817年到伦敦,1818年到格廷根继续研究梵语。1821~1864年在柏林任东方文学与普通语文学教授,1822年任普鲁士科学院院士。他与 R. K. 拉斯克、J. 格林都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创始人。他的第一篇论文是《梵语动词变位同希腊、拉丁、波斯、日耳曼等语言动词变位的比较》(1816),他根据动词结构对这些语言的亲缘关系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古代欧洲诸语言与印度的梵语同出一源,但是那原始语言的形态在梵语中保持得更好。后来他把比较范围从动词变位扩大到名词、代词变格,并注意各语言之间的语音对应,编成了他一生的主要著作《梵语、古波斯语、希腊语、拉丁语、立陶宛语、哥特语和德语的比较语法》,1833~1839年分卷出版。1835年增添古斯拉夫语,1838年增添凯尔特语,1856~1861年增添亚美尼亚语。其他著作有《梵语语法》(1827)和《梵语词汇表》(1830)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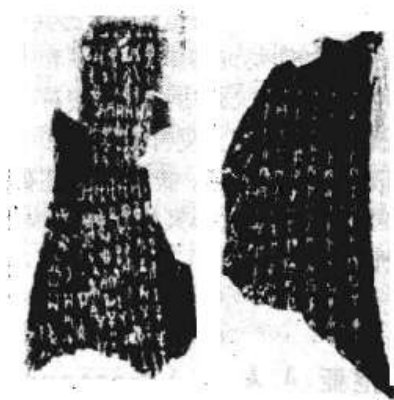
(董光熙)

Buci Tongzuan

《卜辞通纂》 甲骨文著作。郭沫若著。1932年,作者在日本访求公私各家所藏殷墟甲骨,所见约3000片,拟辑为一书,但因多未拓存,没有成功,便决定选释传世甲骨,编成本书,1933年在日本东京出版。1958年曾作为《考古学专刊》,由作者加了校语、注释,并在考释方面吸收了一些专家的意见。科学出版社作了编辑加工,并重编索引。书中拓本、照片也有所更换,对一些不清晰的

附以摹本。1983年,列为《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2卷出版。

本书分:干支、数字、世系、天象、食货、征伐、畋游、杂纂等8部分,共选甲骨800片。除选自当时已印行的著录



《卜辞通纂》所录
甲骨拓片

外,还使用了马衡《凡将斋藏甲骨文字》等拓本。书后附别录之一,包括中央研究院藏大龟四版、《新获卜辞》拓片、何遂藏甲骨拓片三项;别录之二,则收录日本收藏的部分甲骨,题为日本所藏甲骨择尤。全书所选均为甲骨精粹,为研习卜辞提供了很大便利。

《通纂》考释精详,代表了郭沫若对甲骨的见解,有许多创获。如本书序及后记所论商王世系中的阳甲,以及帝乙迁沫的问题,对于研究商代历史文化都很重要。《通纂》初版印数较少,但发行后流行甚广,受到学术界普遍重视,成为甲骨研究领域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

(李学勤)

Bulage xuepai

布拉格学派 (Prague school) 也称功能语言学派。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主要流派之一。活动中心是布拉格语言学会。

形成与发展 布拉格语言学会成立于1926年10月。创建人是布拉格查理大学教授 V. 马泰休斯。主要成员除捷克学者 B. 哈弗拉内克、B. 特伦卡、J. 瓦赫克、V. 斯卡利奇卡、J. 穆卡若夫斯基、A. V. 伊萨钦科等人外,还有当时侨居国外的俄国语言学家 H. C. 特鲁别茨科伊(在维也纳)、R. 雅柯布逊(在捷克)和 S. O. 卡尔采夫斯基(在日内瓦)。1929年,学会向第一次国际斯拉夫学者代表大会(在布拉格召开)提交一份《提纲》,全面阐述了自己的理论原则;1930年,他们在布拉格召开的国际音系学代表会议上又详述了自己对语言(尤其是对语音结构)的观点。此后语言学界遂以“布拉格学派”称之。学会自1929~1939年出版了8卷《布拉格语言学会学报》,发表了许多有国际影响的著作,此外,自1935年起还创办了期刊《词与语文》。

1939年3月德军占领捷克后,学会成员流散,活动中断,至1948年方恢复,其组织存在至1952年。后来,特伦卡、瓦赫克等人以及一些年轻的捷克学者继承布拉格学派的传统,在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以现代语文学部功能语言学小组的形式从事研究工作。

布拉格学派的鼎盛时期是20年代末和30年代。当时学会同各国语言学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进行过许多学术交流活动。有些语言学家虽非学会成员,但因观点不同程度地接近布拉格学派,也对功能语言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如奥地利的K.比勒、法国的A.马丁内和E.班维尼斯特、波兰的J.库里沃维奇、挪威的A.萨默费特、荷兰的A.W.德·格罗特等。

一般认为布拉格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马泰休斯、特鲁别茨科伊和雅柯布逊,但是也有人把马丁内包括进去。

基本观点 布拉格学派的基本观点是在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和F. de 索绪尔的影响下形成的。他们同哥本哈根学派、美国结构主义学派的想法有同有异。相同之处是反对德国新语法学派的历史主义及分割主义,认为语言是一个系统,应对其结构进行共时的研究,不同之处是布拉格学派把语言的结构与功能结合起来研究。他们认为语言的基本功能是作交际工具,语言是一个由多种表达手段构成的、为特定目的服务的功能系统。因此要用功能的观点去研究语言。

布拉格学派同意把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区分开来,但不赞成把两者割裂。由于语言永远处在运动变化之中,而这种运动又触及语音、词汇和语法各方面,所以共时研究不能绝对地排除演化的概念(如有的成分已经陈旧、正在消亡,有的则产生不久,尚在发展);另一方面,历时研究也不能完全抛开系统和功能等概念。布拉格学派反对哥本哈根学派那种将语言视为封闭性符号系统,脱离符号的实体去研究纯粹的关系等做法,因为语言既然是在一定社会中产生和发展的,那么研究这个系统时就不能不考虑它同社会现实(文化、文学、艺术等等)的联系,不能抛开实体去研究语言结构中的纯关系。在方法上,布拉格学派认为无须再用历史比较法去研究谱系关系和构拟母语,而应采用共时的分析比较法去研究各种语言(包括非亲属语言)的结构特征与发展趋势。他们针对语系的概念,提出“语盟”的概念,认为有些语言虽不一定有谱系关系,但在地理上相毗邻,在音系和语法结构上有近似特征,如巴尔干诸语言,就可以算是语盟。他们还主张在语言研究中把传统的定性分析同定量分析(统计方法)结合起来,以便得出一些贯通性的结论,例如考虑什么是能产型,什么是非能产型等。

布拉格学派区别于美国结构主义学派之处是:他们主要研究已有悠久文化的欧洲语言,从功能观点出发广泛探讨标准语、语言修养、修辞学、文艺学、诗学、美学等问题。他们重视语义标准,主张采用对立论,而不接受美国结构主义学派的分布论和直接成分分析法。

为了强调自己的特点,布拉格学派曾明确表示应该把自己称为功能语言学派。

音位理论 布拉格学派主要以音系研究著称,代表作是特鲁别茨科伊的《音系学原理》(1939)。他认为音系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并以对立关系为原则来研究语音单位的各种功能,主要是辨义功能。凡能区别两个词的意义语音对立叫作辨义性对立,如英语pig(猪)和big(大)中的/p/和/b/。使得一个音位同其他音位构成辨义性对立的特征称为区别特征,如英语/p/的区别特征是双唇爆破(同/t/、/k/对立)、声带不振动(同/b/对立)、软腭封住鼻腔通路(同/m/对立),但送气特征不是区别性的,因为没有同/p/对立的不送气音。从音系的角度看,音位就是区别特征的总和。20世纪50年代初,已经移居美国的雅柯布逊又同别的学者合作,通过声学实验,进一步发展了这一套理论。

特鲁别茨科伊在书中还提出了“中和”的概念,即辨义性对立在一定的语音位置上可能不再对立,从而丧失其辨义功能。例如在德语和俄语中,词末只能出现清音/p/、/t/、/k/等,不能出现浊音/b/、/d/、/g/等,因而清音浊音不再对立,换言之,二者在词末位置上彼此中和了。又如英语中/p/、/t/、/k/与/b/、/d/、/g/的对立,在/s/后也彼此中和了,因为没有spark—*sbark, still—*sdill, skate—*sgate的对立(/s/后的/p/、/t/、/k/是不送气的清音)。

标记 《音系学原理》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把对立关系分为许多类型,其中最重要、后来用得最广的是正负对立。在这种对立的双方中,一方有某一区别特征,另一方没有,成为有和无对立,如浊音对非浊音、鼻化音对非鼻化音、唇化音对非唇化音等等。具有特征的一方称为有标记项,而对方则称为无标记项。一般规律是无标记项的使用频率高于有标记项。后来,这些音系学概念和方法又被布拉格学派推广,用到语法和语义领域中去。例如,在词法学中,有标记项表示有某一特征,无标记项则既不表示有,也不表示无——没有信号。如英语名词的复数形式birds是有标记项,单数形式bird则是无标记项,动词过去式worked是有标记项,现在式work则是无标记项。在语义研究中也作了类似的分析,如英语bitch(母狗)是有标记项,只表示雌性,dog(狗)则是无标记项,既可表示雄性,又可表示雌性。

实际切分 在句子的功能分析方面,马泰休斯于1939年正式发表了关于实际切分的理论。与成分分析不同,实际切分的理论是根据话语在具体上下文或语境中的交际目的(要表达的实际意思),把句子分为两部分:主题是叙述的出发点,述题是叙述的核心。前者是说话人要叙述的对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表示已知的或不言而喻的信息;后者说明前者做什么或怎么样,表示新的信息。实际切分的表达手段因语言而异,不过一般地说,首先是词序,其次是语调(包括逻辑重音)以及某些强调句式或者虚词。

布拉格学派发展了索绪尔和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的理论。他们的主要贡献是首次系统地阐明了音系学的任务、原理和研究方法,使它在结构主义语言学诸领域中居于领先地位。音系学中的理论原则、基本概念和研究方法对语法学、词汇学、语义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布拉格学派的实际切分的理论已得到公认和发展,为话语语言学奠定了基础;他们的分析比较法对类型语言学和语言普遍现象的研究起了推动作用;他们的定量分析法又为数理语言学的形成准备了条件。他们对语言结构的研究是机器翻译产生的重要前提之一。1976年,法国成立了以马丁内为首的国际功能语言学协会,旨在发展布拉格学派的基本思想。

布拉格学派的薄弱环节是语法学（尤其是词法学）。他们未能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结构语法学体系。此外，他们的有些概念，如正负对立原则、区别特征、中和论等等，能否绝对化，并推广到语言的所有层次中去，也是仍有争论的问题。

见索绪尔、美国结构主义学派、哥本哈根学派。

参考书目

J. Vachek, *The Linguistic School of Prague*,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Bloomington, London, 1966.

(信德麟)

Bulangyu

布朗语 (Blang language) 属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佤-德昂(原称佤-崩龙)语支(一说属布朗语支)。主要分布在中国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和思茅、临沧等地区。使用人口约5.8万(1982)。分布朗和阿佤两个方言。语言特点(以勐海县新曼俄话为例),声母有43个:p、ph、mp、mph、m、ɱ、f、v、t、th、nt、nth、n、ɲ、s、l、ɭ、ɓ、ɸh、ɲɸ、ɲɸh、ɲ、ɲ、ʒ、k、kh、ŋk、ŋkh、ŋ、ŋ̊、qh、nqh、x、ʔ、h、pl、phl、mpl、mphl、kl、khl、ŋkl、ŋkhl,韵母有单元音9个:i、e、ɛ、a、ɔ、o、u、ɤ、w,复元音有16个:ie、ia、iu、ei、ei、ai、au、yu、oi、oi、ui、ua(ɔa)、yi、ui、iau、uai;辅音韵尾有10个:-p、-t、-k、-m、-n、-ŋ、-h、-ʔ、-l、-ɭ;有4个声调:35、33、331、21。词序和虚词为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句子基本语序是:主语—谓语—宾语。名词的修饰语在中心词之后,动词形容词的修饰语一般在中心词之前。辅音屈折区别词性。一般动词、形容词之前加前缀表示使动。人称代词有单数、双数和复数的区别。指示代词有近指和远指的区别。有结构助词。词汇以单音节词和双音节词为主,多音节词较少。合成词的构成有联合、偏正、动宾、补充、主谓等5种形式。借词主要来自汉语和傣语。

(邱继锋 薛锡珍)

(邱铿鋒 晉錫珍)

Bulletaniyu

布列塔尼语 (Breton language) 法国布列塔尼半岛的一种少数民族语言。属印欧语系凯尔特语族。使用人口约 90 万。这是欧洲大陆上唯一残存的凯尔特语言，但是不属于大陆凯尔特语系统（大陆凯尔特语已消

亡)。它属于海岛凯尔特语系统。据语言学家推测它可能是科尼什语的一个方言。

公元5世纪,来自北方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屡次入侵不列颠诸岛,大批不列颠人移居现在法国西北的半岛地带,该地遂称不列颠尼(法国人称布列塔尼),也称“小不列颠”(以别于“大不列颠”)。这一语言可作为英国在被盎格鲁-撒克逊人征服之前的语言的参考资料。

(周浦澤)

Bulongf ei'erde

布龙菲尔德, L. (Leonard Bloomfield 1887~1949) 美国语言学家。1887年4月1日生干芝加

哥，卒于1949年4月18日。1906年毕业于哈佛学院。1909年在芝加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1909~1913年先后在辛辛那提大学和伊利诺伊大学教德语。1913~1914年在德国莱比锡、格廷根大学深造，受历史比较语言学家A.拉斯基安和K.布鲁格曼的影响。1921~1949年在俄亥俄州大学、芝加哥大学、耶鲁大学等校任教授。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布龙菲尔德开始研究菲律宾的他加禄语。当时对于这种语言，还没有人做过严格的科学研究，布龙菲尔德设计了一套符号来标音，并由此认识到，研究不属于印欧语系的语言，不能以拉丁语法为标准。后来他又转而研究马来-波利尼西亚诸语言。但是没有工夫做实地调查，因此没有写出著作。1917年后，布龙菲尔德研究北美印第安人的阿尔贡金诸语言。当时有人认为，印欧语言的语音变化有规律，其他语言未必如此。通过研究，布龙菲尔德相信，阿尔贡金诸语言的语音变化也是有规律的。1921~1927年，他在俄亥俄州大学教书，做了两件重要的事情。①他和 G. M. 博林、E. H. 斯特蒂文特两人联名倡议设立美国语言学会。1924年这个学会成立，次年出了会刊《语言》，从此语言学在美国的地位蒸蒸日上，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②他与行为主义心理学家 A. P. 韦斯互相影响，使韦斯相信，人类的行为不能与一般动物同样看待，人类有语言，其行为以语言为基础，而一般动物没有语言。他还认为，人类行为（心理）既然以语言为基础，那么解释语言现象就再也不能求助于心理，而要在物理世界中找原因，这就是所谓“物理主义”。这种语言学理论的根源，是哲学上的逻辑实证主义。布龙菲尔德承认语言是有意义的，也承认有爱情、忠心、智力等，但是觉得这些东西不能用客观方法来观察测量，因此暂时不必去研究。由于他有这种倾向，他的后继者中有些人竟认为分析语言不必讲意义。

1927 年布龙菲尔德离开俄亥俄，到芝加哥大学讲日耳曼语文学，1933 年他写出了名著《语言论》，因为材料充实，方法严密，以后 20 年间此书成为美国语言学家的

必读书。但现在看来,书中不少论调还需要修改补充。例如他认为,语言的最小单位是音位,若干音位构成语素,若干语素构成词,若干词构成词组和小句,若干词组或小句构成句子。但是音位属于语音层,是没有意义的;语素属于语法层,是有意义的。他把两个不同层次的东西归为一层,分明不对。在语法方面,布龙菲尔德对词法有较多的贡献,对句法贡献不大。他所提出的直接成分分析法不是无往而不利的。由于少谈意义,同构异义和异构同义的句子他也无法说清楚。1935、1939 两年,布龙菲尔德各写了一篇论文讨论语言与数学的关系。他认为,“语言的最高成就就是数学”。他还说,数学来自语言和文字,因此数学的根源是经验,并不完全是抽象的东西。这个论点有的数学家赞同,有的不同意。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布龙菲尔德注意儿童阅读教学问题。他认为,儿童进小学时已经学会本族语,以后只要学文字。这个看法,经后人研究证明过分简单化。1940 年,布龙菲尔德到耶鲁大学讲语言学。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开始,美国急需大量的外语人才。布龙菲尔德除训练培养青年语言学家外,还亲自编了 3 种外语教材,其中两种是荷兰语教本,一种是俄语教本。

(赵世开)

Bulugeman

布鲁格曼, K. (Karl Brugmann 1849~1919) 德国语言学家。1849 年 3 月 16 日生于威斯巴登, 1919 年 6 月 29 日卒于莱比锡。

布鲁格曼与 B. 德尔布吕克(1842~1922)、H. 奥斯特霍夫、H. 保罗等人组成新语法学派, 宣传“语音规律无例外”, 这引起了老一辈语言学家如 G. 库尔蒂乌斯等的不满, 也招致了同辈如 J. 施密特(1843~1901) 的反对。布鲁格曼由 1884 年起在弗赖堡大学任教授, 但到 1887 年不得不转到莱比锡大学, 所以他们的学派也叫莱比锡学派。



布鲁格曼继承 19 世纪初期和中期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传统, 从事印欧系诸语言的比较研究和原始印欧语的构拟工作。他的重要著作是《印度日耳曼诸语言比较语法概要》(1~2 卷, 1886~1892, 3~5 卷由德尔布吕克续成)。L. 布龙菲尔德和 W. P. 莱曼(1962~) 都认为还没有第 2 本专门著作可以取代这本书的地位。

布鲁格曼《概要》的长处是注意古代语言的文字纪录和当代的方言口语, 他认为, 所谓原始印欧语形式不过是一些公式而非实有的词语。对于 A. 施莱歇尔所构拟的原始印欧语语音系统, 他作了重要修正。

1822 年 J. 格林提出了语音演变的规则, 1875 年 K. 维尔纳又加以补充, 从而把一些例外现象解释清楚。布鲁格曼和奥斯特霍夫因此认为语音演变问题已经

解决, 1878 年他们在一篇文章中说, 一切音变都是机械性过程, 在一种方言中遵照无例外的法则产生出来, 同样的音在同样的环境中都同样地演变着; 但是在史前和有史以来, 类推作用往往使词汇和语法形式改变, 这也是语言演变的一个普遍存在的原因。他把语音和音变当做独立存在的实体, 不受社会和个人的任何制约, 这种说法已受到方言地理学家如 H. 舒哈特和 J. 吉耶龙(1854~1926) 等人的强烈反对。

(董光熙)

Bunenyu

布嫩语 (Bunun language) 中国台湾省自称“布嫩”的高山族使用的语言。属南岛语系印度尼西亚语族高山族语言排湾语组。分布于中国台湾省中部关山玉里等地区。使用人口约 2 万(1982)。布嫩语有 14 个辅音: p, b, m, v, t, d, ð, ʔ, n, ɲ, k, ŋ, ʔ, h; 有 9 个元音: i, a, u, ia, iu, ai, au, ui, ua。属多音节粘着语, 重音在倒数第 2 个音节上。词根上递加词缀为构词和构形的主要手段。词缀有前加、后加和中加。如 ɬumah(房子), ka-ɬumah(盖房子); hudan(雨), hudan-an(下雨); painuk(穿), pin-ainuk(衣服)。重叠形式在构词和构形上有重要作用。

由词素合成法构成含有词组意义的合成词, 也是布嫩语构词的重要形式。如以 jiða(取)的词素 ji-与 mahtuŋ(完毕)合成 jihatŋ(取完毕), 以 tupa(讲)的词素 tu-与 matmaŋ(随便)合成 tutmaŋ(随便讲)。普通名词没有性、数、格的形态。句中主语、宾语、定语用冠词表示。代词有变格形态。人称代词有单、复数之分, 并有独立式与连接式两套。指示代词有近指和远指的区别。动词有时、体、态、式的范畴。句子语序为谓语—主语—宾语。修饰语一般在中心词之前。

(何汝芬)

Bunuyu

布努语 (Bunu language) 中国自称“布努”的瑶族使用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使用人口约 34 万, 约占中国瑶族人口总数的 24%。主要分布在中国广西都安、巴马、凌云、南丹、田东、平果、东兰、凤山等 32 个县的部分山区, 贵州、湖南、云南靠近广西的某些县份也有一些使用者。布努语有声母 59 个, 韵母 36 个。除单辅音声母外, 还有一套带鼻冠音的复辅音声母, 送气音声母只出现在单数调的音节里。有 8 个声调, 同汉语的平、上、去、入各分阴阳的情况一致, 另外还有 3 个派生调。

虚词和词序是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人称代词有单数、双数、复数的区别。指示代词有近指、中指、远指之分。名词、形容词、状词和指示代词作修饰语时, 一般在中心词后。数词修饰量词或量名词组时, 序数词在中心词后, 数量词在中心词前。量词、单音节形容词和部分状词重叠后表示某种语法意义。句子的语序是主语在谓语前, 宾语或补语在谓语后。词根基本上是单音节的。合成词以

修饰结构的居多。固有词中有不少名词带前加成分。词根与词根相结合是基本的构词方式。根据语言的特点以及语言和自称的内在联系,可以分为布瓒、巴哼、唔奈、炯奈、优诺 5 个方言。方言之间的差别主要表现在词汇上,相互间不能通话。5 个方言都有不少汉语借词,有的方言里的汉语借词是通过壮语借入的。(毛宗武)

Buylwen

布依文 (Bouyei writing) 见布依语。

Buylyu

布依语 (Bouyei language) 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分布在贵州省南部。使用人口约 200 万。语言特点和这一语支的其他语言大体相同。单音节词占优势。词序和虚词是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

声母有单纯的、腭化的和唇化的。韵母由元音或元音加韵尾组成。元音有长短对立,韵尾有 i、u、w、m、n、ŋ、p、t、k 等。音节由声母、韵母、声调组成。多数地区有两个促声调,音节以 -p、-t、-k 结尾;有 6 个舒声调,音节以元音或鼻音结尾。

从语族的角度看,布依语的声母与同语族其他语言相比,简化与合并较快,以水语和布依语为例对比如下:

水语	tok'	tón'	ndjən'	ʔdoŋ'	ʔna'	ŋa'	nun'
布依语	tok'	toŋ'	tin'	ʔdoŋ'	na'	na'	nun'
	落	桶	短	簸箕	厚	箭	睡觉

布依语 t、ʔd、n 3 个声母和水语 t、t'、nd、ʔd、ʔn、ŋ、n 7 个声母相对应。

布依语的句子可以分析出一层、两层到多层的词组。词组里实词和实词的主要结合规则举例如下:

zok'	ʔbi:n'	鸟飞	施动主体在动词前
tam'	paŋ'	织布	支配对象在及物动词后
kuun'	ʔim'	吃饱	补足成分在动词后
pai'	tæ'	去集市	补充成分在动词后
za:n'	te'	房子·那	限定成分在名词后
pai'	to'	去·独自	疏状成分在动词后

布依族 1956 年创制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文字,80 年代初作了修改,现正在民族聚居区试验推行。

(喻世长)

bushou

部首 (radicals) 汉语字典里属于同一偏旁的部目。东汉许慎作《说文解字》,以小篆为主,分析字形的结构,把具有同一个形旁的字归在一起,称为“部”,全书共分为 540 部,开始是“一”部,最后是“亥”部。每部把共同所从的形旁字列在开头,这个字就称为部首。如玉、山、人、水、木等都是部首。

自许慎创立以形旁编排文字的方法以后,这种方法千百年来一直为编纂字书的人所采用,只是分部的多寡有所不同。梁代顾野王(519~581)作《玉篇》,分为 542 部,明代梅膺祚作《字汇》,则减为 214 部,张自烈作《正字通》,清代编《康熙字典》,都跟《字汇》相同。不过由篆书变为隶书,由隶书变为楷书,字形笔画的结构改变很大,有些独体字就很不好归部,如年、及、也、丸等一些不好定部的字,在字典里只好另立检字表,以便检查。

以前字书的分部是根据篆书的写法来制定的,如果按照楷书的写法来分部,有些形旁就要有增有并,如从“火”与从“灬”的,从“心”与从“忄”的,从“人”与从“亻”的,从“手”与从“扌”的,就应当各分为两部。《新华字典》的《部首检字表》分为 189 部,比《康熙字典》的 214 部少 25 部,这样的改变是必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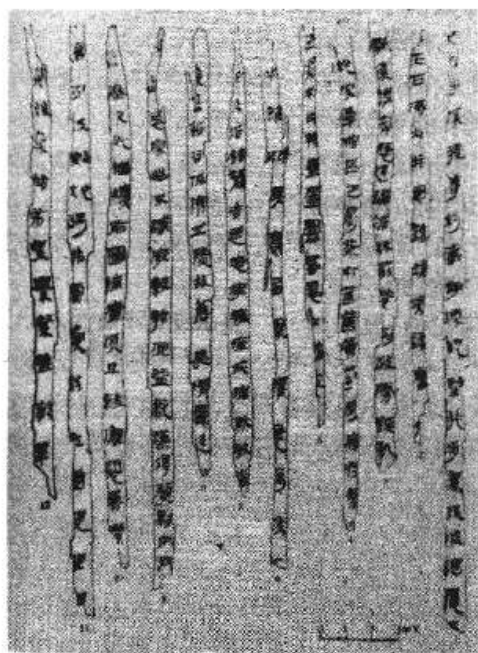
(周士琦)

C

Cangjieplan

《仓颉篇》原是教育学童识字的字书，秦始皇帝统一文字时又成为小篆书体的样板。秦李斯著。

战国时期，七国分立，文字异体。秦始皇帝既灭六国，采纳李斯的请求，“罢其不与秦文合者”。这时秦使用籀文已500多年，笔划繁复，实用中渐趋简化。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从此定型为小篆。汉初，闾里书师合《仓颉》、《爰历》、《博学》3篇，断60字以为一章，凡55章，统称《仓颉篇》。《仓颉篇》流行直到东汉，后来被保存在《三仓》中，唐以后才完全亡佚。20世纪，各地考古发现许多汉简，时有《仓颉篇》。其中最早的离秦代不过50年，但已是汉代书师合并的本子，字体是隶而不是篆了。有一支简上有40字：“仓颉作书，以教后嗣。幼子承昭，谨慎敬戒。勉力风诵，昼夜勿置。苟辑成史，计会辨治。超等轶群，出元别异。”这是《仓颉》首章的前一



阜阳汉简《仓颉篇》摹本

部分，“幼子承昭”指二世胡亥继位，其事发生在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李斯作书应当在前，这可能是赵高等人的窜改。又有“爰历次贍，继续前图。……”这是《爰历》开头的几句。从这些资料看，四言成句，二句一韵，内容夹叙夹议，和《急就篇》性质相似。由于这是教学文字的工具，不免吸收一些教师的经验，反映出一些中国文字上的问题：①文义相近的字放在一起，如“傲悍骄裾”、“诛罚赏耐”、“丰盈囊炽”、“而乃之於”、“□□邑里，县鄙封疆。径路衡□，街巷垣墙。开闭门闾，阙□□□。□□室内，窗牖户房”、“□□唐厦，因窳廩仓”，等等，这种编排文字的办法《急就篇》中有，往上推则有《尔雅》。②偏旁相同的

字放在一起，如“甜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11个从黑的字，3个从赤的字，放在一起。这类例子很多，单从形旁讲有艸牛走齿言肉竹木贝禾广网巾衣山广黑赤心水谷门手女系金阜20多个，在许慎《说文解字》中都建立为部首。许慎以前形声偏旁区别不严，《仓颉篇》偏旁以类相从，有的是声旁相同而联在一起，如“□□杞芑”、“□□挾挾”、“赏勳向尚”之类，历史上无人注意这一点，要到宋代王圣美创“右文”说，清代朱骏声作《说文通训定声》才成为有用的知识。

《仓颉篇》的年代早，是小篆通行初期的书，所以常被学者注意，近200年来有七八个辑本，限于材料都不令人满意，有的把《三仓》及其注解都混入。现在应当根据考古资料作出一个好的辑本，作为中国文字学史的资料。

（张政烺）

caoshu

草书 汉字一种书体的名称。草书形成于汉代，从汉到唐，有章草、今草、狂草之分。章草如吴皇象《急就章》的松江本，今草如晋代王羲之《初月》、《得示》等帖和孙过庭《书谱》，狂草如唐代张旭《肚痛》等帖和怀素《自叙帖》，都是现存的珍品（图1）。

任何书体在使用中都有简便易写的要求，发生省简笔划和潦草的趋势。这种趋势是文字演变的主要原因。每当社会变革和文化大发展的时期，文字应用频繁，个人随手省简，异体字出现的速度加快，为了使文字利于应用，势必要加以纠正。“周宣王太史作籀书”、“李斯作小篆”、“程邈作隶书”以及蔡邕以八分书写熹平石经等，都是两周、秦、汉各自对当时流行的字加以规范化而颁定的标准字样，也是公认已形成的新的书体为正体字的开端。但是要求简易的趋势并不因此停止。早在记录帝王公卿大事的商代甲骨文、周代金文里就有简笔和潦草的字迹，史籍中“屈原属草藁”、“董仲舒藁书未上”，说明战国古文和西汉隶书在急速书写时也非正体。据魏晋人记载，东汉北海敬王刘睦“善史书，当世以为楷则”，刘睦死前，明帝派驿马“令作草书尺牍十首”。章帝时，齐相杜度善作习字的范本，章帝曾诏令杜度草书奏事。可见



图1 汉碑草书《公羊传》

公元1世纪中叶以来,草书已经不尽是出于匆促书写而是被珍视和仿习的字体了。从近世出土的汉简可以看到,西汉武帝时字划省简的隶书已经通行。到新莽时期,有更多省划和连笔的字。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简就已经完全是草书了。但是从周代到新莽时期都不曾把草书列为一种书体。《说文解字》成书于和帝十二年(公元100),许慎在《叙》里说“汉兴有草书”,是以草书为一种书体之始。东汉末期,张芝被誉为草圣,其同时以及稍晚的钟繇等名家辈出,各成流派。当时赵壹有《非草书》之文,蔡邕有类似之议,以维护正体字的地位,这反映出草书已极一时之盛。汉末直到唐代,草书从带有隶书笔意的章草发展成韵秀宛转的今草,以至奔放不羁、气势万千的狂草。历代对草草的名称有不同的说解。有见汉末以来《急就章》有草书写本而说章草因《急就章》的章字得名的,最为无稽。有以章帝爱好草书或曾令用草书作奏章,甚至说章帝创造草书的,都属臆测。有以章法之章与章程书、章楷的章同义,符合早期草书略存八分笔意,字与字不相牵连,笔划省变有章法可循的事实,近人多信此说。今草起于何时,又有汉末张芝和东晋王羲之、王洽两种说法。从传世的表、帖和出土的汉简、汉砖看,在汉末以八分书为正体字的同时,已经出现近似真书的写法。草书也会随之变异。略晚于张芝的草书家崔瑗作《草书势》,对草书有“状似连珠,绝而不离”、“绝笔收势,余笔纠结”、“头没尾垂”、“机微要妙,临时从宜”的描述,可见汉末的草书



图2 黄山谷《李白忆旧游诗》狂草

笔势流畅,已不拘于章法。书体演变本来没有截然的划分。说今草起于张芝是从新体的萌芽看;说今草起于二王,是着眼于典型的形成。唐代以来真书沿袭至今。草书在唐代出现了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的狂草,成为完全脱离实用的艺术创作,从此草书只是书法家临摹章草、今草、狂草的书法作品。宋代黄山谷的《李白忆旧游诗》堪称狂草的佳作(图2)。(张政烺)

Chahetaiwen

察合台文 (Chagatay script) 从中世纪到20世纪20年代拼写东突厥古典文学语言的一种阿拉伯字母系统的拼音文字。除通行于中国新疆和中亚外,莫卧儿王国和埃及也曾使用过。察合台一词源于以成吉思汗(1162~1227)的次子的名字取名的察合台(?~1242)汗国。始用于重建其汗国的察合台后裔都哇汗时期(1274~1306)。语文学上指察合台汗国的突厥人及突厥化的蒙古人使用的书面语言,在帖木儿(Timūr-i-lang 1336~1405)统治时期得到发展,并在相当程度上作为其汗国交

际语基础的突厥文学语言。察合台文即察合台语的书面形式。

对察合台语的定义和分期,突厥语言学家尚无一致看法。有人认为,回鹘文学语言在受伊斯兰文化影响前就已相当发达,是察合台语的基础。20世纪30~60年代,一部分学者用“老乌兹别克语”一词代替察合台语,并把它扩展到察合台语以前的中亚突厥书面语发展的各个时期。一般认为,8~9世纪的回鹘语延续到黑汗王朝(10世纪下半叶至13世纪初)时,称作哈喀尼耶语(喀什噶尔语)。13世纪以后,分化为3支,其中一支是在回鹘-葛逻禄语基础上吸收西突厥语某些成分发展起来的东支(维吾尔、乌兹别克等语言),在帖木儿时期被称作察合台语。直到19世纪末,是维吾尔、乌孜别克、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塔尔等民族的共同书面语。

察合台文有28~32个字母。有的字母专用于拼写阿拉伯-波斯语源的词。词中的元音往往省略。有些辅音用发音近似重复的2~4个阿拉伯字母拼写,有个别的双字母及清浊音混用字母,有几个元音用同一个字母(单字母或双字母)表示,或一个字母在不同音节中既表示元音又表示辅音的现象。有些辅音字母在阿拉伯文中发音近似,字形不同,但在察合台文中发音相同。除字母外,还有辅助符号。字母分词首、词中、词末、单独等形式。从右至左横书。阿拉伯-波斯语源的词,依阿拉伯-波斯文正

字法拼写;一部分维吾尔语固有词受阿拉伯-波斯文正字法及回鹘文书写传统影响,其音节仅由辅音构成。词干与某些后缀不连写,正字法遵循形态学原则。察合台文具有超方言的性质。其作品在历史上从小亚细亚直至阿尔泰、印度(莫卧儿王朝)使用突厥语的民族中广为流传。察合台文献,除较晚的铅印本外,多用阿拉伯字母的“纳斯塔里克体”(正体字)传抄(参见彩图插页第29页)。现代维吾尔文是察合台文的延续。(李森)

察合台文学的代表
作《四代赞诗》

Changli Fangyanzhi

《昌黎方言志》 (A Survey of the Changli Dialect) 调查研究河北省昌黎县方言的著作。河北省昌黎县县志编纂委员会、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合编,1960年7月北京科学出版社出版。1984年7月新一版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1959年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方言组对昌黎县方言进行了调查,为编纂《昌黎县志》准备了语言方面的材料,并整理成详、略两本,略本作为“昌黎县志”的方言部分,详本即《昌黎方言志》。它的出版,为各

[wi]、ㅜ[wa]、ㅟ[wə]、ㅠ[we]、ㅡ[we]。拼写时以音节为单位,由字母组成一个一个方块形的字。元音前的辅音字母居左或居上,元音字母居右或居下,元音后的辅音字母居元音之下。元音单独成音节时,元音的左边或上边要加符号“ㅇ”。行款横竖均可。现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中国通用横排。朝鲜文创制以前,曾长期采用汉文作为朝鲜语的书面形式。后来,又创造了借用汉字的音和义标记朝鲜语的一种特殊文字形式,称为吏读,但仍然无法解决言文不一致的问题。朝鲜文的创制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

(徐永璽)

Chaoxianyu

朝鲜语 (Korean language) 系属未定,有人主张属阿尔泰语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国语,南朝鲜也通用。主要分布于朝鲜半岛,其次是中国、美国、日本和苏联境内朝鲜族聚居的地区。使用人口共约6000万,其中176万在中国境内。分6个方言:东北方言、西北方言、中部方言、东南方言、西南方言、济州岛方言。除济州岛方言外,其他方言之间差别不大。朝鲜语有10个单元音:a,ə,o,u,w,i,ε,e,ø,y;有11个复元音:ja,jə,jo,ju,je,je,ui,wa,wə,we,we;有19个辅音:k,n,t,r,m,p,s,ŋ,ts,th,ph,h,kʰ,tʰ,pʰ,sʰ,ʃʰ。塞音、塞擦音各分松、紧和送气音三套,擦音只分松、紧。闪音r不出现在固有词的词首,鼻音ŋ只出现在收音位置上。有音高与音长相结合的自由重音。有元音和谐现象。朝鲜语属粘着型语言,主要用附加成分表示语法范畴。名词和代词有格和数,动词有态、尊称、时、式和阶称。形容词有尊称、时、式和阶称。尊称和阶称范畴是朝鲜语语法的重要特点。尊称范畴具有说话者对听话者以及谈话所涉及的对象表示尊敬的意义。阶称范畴是说话者对听话者表明一定的尊卑礼节关系,分尊敬阶、对等阶和对下阶3种。基本词序为主语—宾语—谓语,修饰语在被修饰语之前。谓语中的主要动词或形容词置于最后。词汇中除固有词外,还有大量汉字词和一些外来词。声态词和叹词非常丰富。朝鲜语在古代使用汉字。1444年1月创制了文字“训民正音”,后来改称朝鲜文。现代朝鲜语都用朝鲜文拼写。这是一套音位字母,但符号的组合以音节为单位,表现出一套间架结构,近似汉字的形体。

(徐永璽)

Chaoyu Cidian

《潮语词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auchou Dialect) 见汉语方言词典。

Chen Di

陈第 (1541~1617) 中国明代音韵学家。字季立,号一斋,连江(今福建连江)人,万历时秀才,曾从俞大猷学兵法。善诗,尤善音韵,对古今音之不同,多有阐发。著有《毛诗古音考》、《屈宋古音义》、《读诗拙言》等书,对后世音韵研究颇有影响。

古音学的研究,是从后人读先秦韵文感到不押韵的时候开始的。对于上下文押不上韵的现象,宋代以前,总认为一个字临时可以有不同的读音,用叶音、协句来解释。陈第第一个明确指出这是由于古今语音的不同所致。他首先从研究《诗经》韵入手,认为《诗经》无所谓叶韵,宋人所谓叶韵的音,恰是古人本有的读音。他举例说,“母”古音本读“米”,所以常跟“杞”、“止”、“祉”、“喜”押韵;“马”古音本读“姥”,所以常跟“组”、“黼”、“旅”、“土”押韵,等等。他最早悟出“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毛诗古音考·自序》)的道理,力斥一个字可以任意改读叶音的错误观点。他确定了一条很重要的原则:同一个字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地域,读音是统一的。所以他的研究成绩被后世誉为古音学的开创之作。

(谢纪铤)

Chen Li

陈澧 (1810~1882) 中国清代音韵学家。字兰甫,号东塾,广东番禺(今广州)人。道光十二年(1832)举人,曾任河源县训导,作学海堂学长数十年,晚年主讲菊坡精舍。主要学术著作有《东塾读书记》、《切韵考》、《说文声表》、《东塾集》等,内容涉及经学、小学、天文、地理、乐律、算术等;又善作诗文,有《忆江南馆词》。《切韵考》是研究隋唐声韵的重要著作。作者创造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即反切系联法,用以考证《切韵》的声类、韵类。系联法有两条原则,一是正例,一是变例。所谓正例,即凡是反切用字同用、互用、递用的,必属同类。所谓变例,指实际同类而不能直接系联,由别的字可以推求同类。陈澧用这种方法通过《广韵》考定出《切韵》有40声类,311韵类。

见《切韵考》、《切韵音》。

(刘广和)

Chen Mengjia

陈梦家 (1911~1966) 中国古文字学家。浙江上虞人,青年时为新月派诗人,有诗集多种,曾在中央大学读法律,1932年入燕京大学,由研究中国古代宗教、神话、礼俗,转而致力于古文字与古史。1937年起,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讲授古文字学。1944年赴美国讲学,其间曾到欧洲搜集中国青铜器资料,至1947年回北京清华大学任教。1952年,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于1966年9月因受迫害逝世。

陈梦家在古文字学上的工作是多方面的。在青铜器方面著作最多,注意青铜器的形态学研究及分期标准。在《考古学报》发表的《殷代铜器》(第7册,1954)、《西周铜器断代》(第9册,1955;至1956年第4期)为其代表作。后者只连载6篇,其余遗稿已由考古研究所整理待印。他所搜集的海外所藏青铜器资料,已辑印的有《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

陈梦家在甲骨学方面的主要著作,是1956年出版的《殷虚卜辞综述》。该书综合各家研究成果,加以裁断,并提出许多新的见解。书内《断代》部分,基本上是他1949

年起撰写的《甲骨新代学》4篇,区分出自组、子组、午组等卜辞,对甲骨分期是一重要贡献。

60年代,陈梦家集中精力于汉简,整理研究甘肃武威磨嘴子出土东汉简,出版为《武威汉简》一书。他还写了论文多篇,当时只发表了一部分,后辑集为《汉简缀述》,于1980年印行,书中对敦煌、居延等地汉简作了广泛的探讨。

陈梦家还有一些关于古代史和古文献的著作,如《尚书通论》、《西周年代考》、《六国纪年》等。《六国纪年》一书也利用了战国文字资料。(李学勤)

Chen Pengnian

陈彭年 见《广韵》。

Chen Wangdao

陈望道 (1890~1977) 中国语文学家和教育家。原名参一、融,浙江义乌人。1890年12月9日出生于农民家庭,1977年10月29日在上海去世。1915年陈望道赴日本留学,1919年回国,任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语文教员。1920年12月起,负责《新青年》的编辑工作,



历任上海大学、复旦大学、安徽大学、广西大学等校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任复旦大学校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四届代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三、四届代表和第三、四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

陈望道毕生从事文化教育和语文研究工作,是中国现代修辞学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所著《修辞学发凡》出版于1932年,全书共分12篇,分别讲述修辞学的各个方面。其特色之一是引例丰富。所引用的书约250部,单篇论文约170篇,文言、白话各种文体兼收并蓄。二是归纳系统,阐释详明。该书在大量语言材料的基础上,对汉语中种种修辞方式作了系统而详尽的分析归纳。在批判地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首先提出了“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两大分野的理论,进而把积极修辞分为辞格、辞趣两种。辞格归纳为38格,每格又分若干式,对汉语中的修辞格式作了全面的概括。陈望道是中国第一个把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带进汉语修辞领域的学者。他在谈到写作的目的时说,该书“是想将修辞学的经界略略画清,又将若干不切合实际的古老定见带便指破。除了想论述当时所有的修辞现象之外,还想对于当时正在社会的保守落后方面流行的一些偏见,如复古存文,机械模仿,以及以为文言文可以修辞,白话文不能修辞,等等,进行论争,运用修辞理论为当时的文艺运动尽一臂之力”(《1962年重印前言》)。《修辞学发凡》创立了中国第一个

科学的修辞学体系,开拓了修辞研究的新境界。刘大白(1880~1932)在序言中指出,正如《马氏文通》(1898)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语法著作一样,《修辞学发凡》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修辞学著作,“书中既引古人文章为证,并及时通用语言,不但可以为通文者之参考印证,而且可以为初学者之津梁。”(《修辞学发凡》初版刘序)

30年代,陈望道在上海发动了中国文法革新问题的讨论。在讨论中,他先后发表了《谈动词和形容词的分别》(1938)、《“一提议”和“炒冷饭”读后感》(1938)、《文法革新的一般问题》(1939)、《从分歧到统一》(1939)、《回东华先生的公开信》(1939)、《漫谈语法学的对象以及标记能记所记意义之类》(1939)、《文法革新问题答客问》(1940)、《答复对于中国文法革新讨论的批评》(1941)、《文法的研究》(1943)等10余篇论文。这些论文从方法论上批判了机械模仿、生搬硬套的错误,明确地提出了用功能观点来研究汉语语法的见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他仍继续研究语法。1955年12月,他在复旦大学设立了“语法、修辞、逻辑研究室”,并主持研究室的工作。在此期间,撰写了《漫谈“马氏文通”》(1958)、《对于主语宾语问题讨论的两点意见》(1956)等论文。1977年,他在病榻上完成了他最后一部著作《文法简论》(1978)的定稿工作。这本书共分7章,其中不少地方是30年代末40年代初一些见解的进一步发挥。书中对词类问题用了较多的笔墨,既讲了词类区分的依据,又讲了汉语的词类系统。他把汉语的实词分为体词、用词、点词、副词4大类。体词包括名词、代词,用词包括动词、形容词、断词、衡词,点词包括数词、指词,加上副词,合为9类。虚词包括介词、连词、助词3类。在实词、虚词之外另立感词一类,共计13类。句法部分讲得比较简单,他把复合谓语分为并列、顺递、接合、提带4种。这本书是他继《修辞学发凡》之后又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

陈望道是语文改革的积极主张者和实践者。早在30年代,他就积极提倡新文字运动,并组织 and 领导当时上海的语文运动。他主编《每日译报》的《语文周刊》,经常在拉丁化新文字的理论刊物《中国语文》上发表文章,有《中国语文的演进和新文字》(1938)、《拉丁化北音方案对读小记》(1938)、《中国拼音文字的演进》(1939)、《语文运动的回顾与展望》(1940)、《从“词儿连写”说到语文深入研究》(1940)等,并编制了《拉丁化汉字拼音表》(1938),对语文运动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1949年以后,他积极支持文字改革和普通话推广工作,曾多次参加有关这些工作的专门会议。在现代汉语规范化工作中,他为确定“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的汉民族共同语的科学概念,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陈望道还发动了“大众语运动”,于1934年先后发表了《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建立大众语文学》、《这一次文言和白话的论战》、《大众语论》、《怎样做到大众语的“普遍”》、《文学和大众语》等文章,对大众语的建立提出

许多科学性、建设性的意见,促进了文学语言的大众化和大众语文学的发展,同时也为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了实践“大众语”,他于1934年9月创办并主编《太白》半月刊,首创“科学小品”新文体,开辟“掂斤簸两”新栏目,专登匕首式的杂感,并首倡采用民间的“手头字”。

此外,陈望道所著的《作文法讲义》(1922),是中国有系统的讲作文法的第一部书。他还是最早在刊物上提倡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学者之一。

陈望道从事文化学术活动和教育工作达60年,几乎涉猎了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撰写和翻译了许多论文和著作。他的论文和著作,已由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编成《陈望道文集》3卷(第1卷1979,第2卷1980,第3卷1981,上海人民出版社)、《陈望道语文论集》(1980,上海教育出版社)、《陈望道修辞论集》(1985,安徽教育出版社)。(参见彩图插页第25页)

参考书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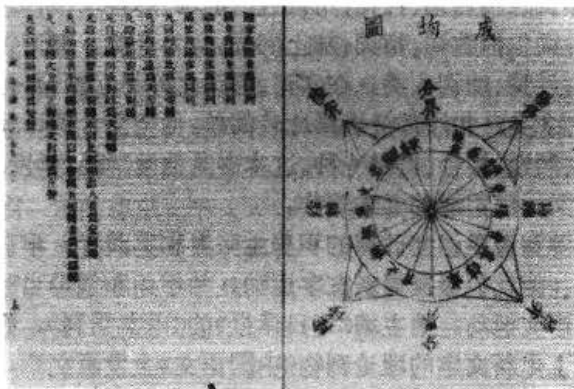
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编:《陈望道语文论集》,上海教育出版社,上海,1980。

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编:《陈望道修辞论集》,安徽教育出版社,合肥,1985。

(胡裕树)

Chengjuntu

《成均图》 章炳麟继承清代学者讲古韵的成果,并且调查了各部之间的远近关系以后,把古韵部安排成的图。这是带总结性的图。目的在于用它解释文字通转的现象。



章炳麟设计的《成均图》(收入《国故论衡》)

长处是眉目清楚,短处是使效法他的人随意运用它来破字。

见章炳麟、阴阳对转、旁转。

(俞敏)

chengyu

成语 (idioms) 语言词汇中的一部分定型的词组或短句。汉语成语有固定的结构形式和固定的说法,表示一定的意义,在语句中是作为一个整体来应用的。例如:

言简意赅 勇往直前 相反相成 实事求是
海人不倦 经年累月 千钧一发 缘木求鱼
削足适履 七手八脚 细大不捐 坐井观天

成语有很大一部分是从古代相承沿用下来的,在用词方面往往不同于现代汉语。其中有古书上的成句,也有从古人文章中压缩而成的词组,还有来自人民口里常说的习用语。有些意义从字面上可以理解,有些从字面上就不易理解,特别是典故性的。如“汗牛充栋”、“虎踞龙蟠”、“东山再起”、“草木皆兵”之类,在汉语成语里占有一定的比例。汉语历史悠久,成语特别多,这也是汉语的一个特点。

成语是一种现成的话,跟习用语、谚语相近,但是也略有区别。最主要的一点是习用语和谚语是口语性质的,成语大都出自书面,属于文语性质的。其次在语言形式上,成语几乎都是约定俗成的四字结构,字面不能随意更换,而习用语和谚语总是松散一些,可多可少,不限于四个字。例如“快刀斩乱麻”、“九牛二虎之力”、“驴唇不对马嘴”、“前怕狼,后怕虎”,这是常说的习用语;“百闻不如一见”、“真金不怕火炼”、“有志者事竟成”、“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这是一些经验之谈,表示一个完整的意思,属于谚语一类。成语跟习用语、谚语是不一样的。

成语大都有一定的出处。如“狐假虎威”出于《战国策·楚策》,“鹬蚌相争”出于《燕策》,“画蛇添足”出于《齐策》,“刻舟求剑”出于《吕氏春秋·察今》,“自相矛盾”出于《韩非子·难势》,都是古代的寓言。如“完璧归赵”出于《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破釜沉舟”出于《史记·项羽本纪》,“草木皆兵”出于《晋书·苻坚载记》,“一箭双雕”出于《北史·长孙晟传》,“口蜜腹剑”出于《唐书·李林甫传》,都是历史上的故事。至于截取古书的文句用为四字成语的更为普遍。如“有条不紊”取自《尚书·盘庚》“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举一反三”取自《论语·述而》“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痛心疾首”取自《左传》成公十三年“斯是用痛心疾首,暍就寡人”,“分庭抗礼”取自《庄子·渔父》“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未尝不分庭抗礼”,“奴颜婢膝”取自晋代葛洪《抱朴子·交际》“以岳峙独立者为涩吝疏拙,以奴颜婢膝者为晓解当世”,“胸有成竹”取自宋代苏轼《文与可画筍簞谷偃竹记》“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其他采用古人文章成句的也为数很多。如“忧心忡忡”出自《诗经·召南·草虫》,“外强中干”出自《左传》僖公十五年,“以逸待劳”出自《孙子·军争》,“水落石出”出自苏轼《后赤壁赋》,“萍水相逢”出自唐代王勃《滕王阁序》,“牢不可破”出自唐代韩愈《平淮西碑》。

在人民口里常说的一些四字习用语也可以归入成语里来。如“咬文嚼字”、“拖泥带水”、“阳奉阴违”、“不三不四”、“心直口快”之类,与成语的结构相同。在成语中也有些是接受外来文化而出现的。如“天花乱坠”、“当头棒喝”、“不可思议”、“不二法门”都是。

成语一般都是四字格式,不是四字的较少。如“五十步笑百步”、“欲速则不达”、“醉翁之意不在酒”。成语一般所以用四个字,这与汉语本身句法结构和古汉语以单音词为主有关系。

四字的语法结构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主谓式:名副其实、盛气凌人、杞人忧天、胸有成竹;

动宾式:好为人师、莫名其妙、视为畏途;

联合主谓式:天翻地覆、水落石出、手舞足蹈;

联合动宾式:知己知彼、养精蓄锐、防微杜渐、发号施令;

联合名词式:粗心大意、南辕北辙、镜花水月;

联合动词式:突飞猛进、勇往直前;

动补式:逍遥法外、问道于盲;

兼语式:以邻为壑、令人生畏。

成语的结构是多种多样的,上面只是简单举例的性质。成语在语言表达中有生动简洁、形象鲜明的作用。它的本身就有不少比喻和对比以及加重的措辞方法。如“阳奉阴违”、“外强中干”、“五光十色”、“一知半解”、“七嘴八舌”、“患得患失”、“不寒而慄”等各有妙用。所以文学家对成语的运用都非常注意。(周祖谟)

Cheng Yaotian

程瑶田 (1725~1814) 中国清代学者,字易畴,安徽歙县人。生于雍正三年,卒于嘉庆十九年。乾隆三十五年(1770)举人,选嘉定县教谕,嘉庆元年(1796)举孝廉方正。他对于经学、制度、舆地、声律、各种名物都有研究,著有《通艺录》42卷,包括24种。如《释宫小记》、《释虫小记》、《释草小记》、《考工创物小记》、《解字小记》、《九穀考》等,多有发明,对研究名物训诂很有帮助。他又有《果羸转语记》,以声音通转的道理来说明事物形状相似,具有相类的特征,其名称往往相近。他说:“声随形命,字依声立,屡变其物而不易其名,屡易其文而弗离其声。”这话在陈说事物的命名与声音的关系方面对我们考查词族有一定的启发,可是必须重视证据,不能随意牵合,不能把偶然的现象作为必然的规律来看待。(周祖谟)

chitouyin

齿头音 见等韵。

chiyin

齿音 见等韵。

chongyan

重言 指两个相同的汉字重叠在一起。重言通常是一个词。从字上来说,也称为“叠字”。古人称一字为一言。如《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说老子著书五千言,五千言就是五千字。重言的名称见于明代方以智《通雅·释诂》,后来一直沿用。清代王筠有《毛诗重言》一书,专讲《诗经》中的重言。

在《诗经》里,两字重叠为一个词的很多,或摹仿物的声音,或形容事物的形貌状态。如“关关”状鸟鸣,“呦呦”状鹿鸣,“嘒嘒”状虫鸣,“丁丁”状伐木声,“依依”形容杨柳枝叶摇曳,“楚楚”形容衣服鲜明闪光,“蹲蹲”形容舞

蹈之状,“迟迟”形容行路舒缓之状都是。物的发声和物的动作姿态经常是持续重复的,所以在语言里就采用重言来表示,这是汉语所有的特殊的东西。发展起来,也就成为一种修辞上加重意思的手段。如“洋洋得意”、“姗姗来迟”、“夸夸其谈”、“岌岌可危”、“茫茫一片”、“惶惶不安”等等。

普通话口语里的亲属称呼也大都都是重言,可能也是由表示声音的重复而来。如“爸爸”、“妈妈”、“姐姐”、“妹妹”、“哥哥”、“弟弟”、“爷爷”、“奶奶”、“姑姑”、“舅舅”都是如此。这些词第二个音节一般都读为轻声。“姐姐”、“奶奶”第二音节的音调变为半上。(周祖谟)

Chunqiu Mingzi Jiegu

《春秋名字解诂》 训诂书。清代王引之著,收入《经义述闻》卷二十二、卷二十三。古人的名与字,义多相应,有些字义不明的字可以利用古人的名字来考察,所以许慎的《说文解字》里每每引古人名字以证发字义。如舛部的舛字,《说文》说:“舛,旌旗之游舛蹇之貌,读若偃。古人名舛,字子游。”舛字不是常用字,可是利用名与字相对比,就可以了解其义了。《左传》成公六年郑公子偃字子游,昭公十四年驷偃也字子游。其他如《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的言偃,《庄子·齐物论》的颜成偃也字子游。这些都是很明显的证据。因此王引之就本着许慎的意思,作《春秋名字解诂》两卷,钩沉索隐,触类引申,并阐发文字假借,就音以求义,创见极多,对研究训诂开辟了一条门径。王引之从古人名与字意义相应方面考察到有5种条例:

① 同训。即名与字为同义词。如《史记·仲尼弟子列传》鲁宰予字子我,又施之常字子恒,《左传》襄公二十八年齐庆嗣字子息。

② 对文。指字义相反、相对照。如《国语·晋语》晋阎没字明,没与昧古字通,昧训为暗,故字明,取相反之义。《左传》襄公二十八年齐庆封字子家,封读为邦,邦与家相对为文。又襄公二十七年楚公子黑肱字子皙,二十九年郑公孙黑也字子皙,皙是白的意思,与黑相对成文。

③ 连类。指意思相类。如《史记·仲尼弟子列传》鲁南宫括字子容,括就是包容的意思;又鲁原宪字子思,宪就有思的意思。

④ 指实。联系实物来命字。如《左传》昭公十三年郑然丹字子革,古人用革多用丹色染,所以字子革。又襄公六年楚公子启字子闾,闾是里门,字闾取启门之义。《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卜仲由字子路,取行必由路之义。《国语·鲁语》展获字禽,取获禽之义。

⑤ 辨物。取物名为名与字。如《左传》襄公十五年陈瓘字子玉,瓘为玉石之名,所以字子玉。《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梁丘字叔鱼,《孔子世家》鲁孔鲤字伯鱼,都是以共名为字。

在这5种条例之外,王引之又从声音上审辨一些难以解释的例子,发前人所未发。后来俞樾(1821~1906)

又校补其书,作《春秋名字解诂补义》一卷,胡元玉又有《周秦名字解诂补》,收入《聚学轩丛书》。(周祖谟)

chunyin

唇音 见等韵。

cidianxue

词典学 (lexicography) 研究按什么范围收词,按什么原则释义和针对什么目标编辑词典的学科。词典是按一定的次序编列语词,分别加以解释的工具书。信息论兴起以后,词典的概念有所扩大。凡是学科就有信息,有信息就有必要编出词典以便检索,于是词典就和知识的储存和编排同义了。和“词典”同属词典学的有“难词汇”、“词汇”、“名著或名家用词索引”、“分类词汇”;中国古时有“字源”、“字通”、“字鉴”等书名,而“字书”是通称。

据古希腊记载,公元前2世纪已有字书家35人,不过他们的书没有传下来。中古世纪所出拉丁文词典多为解释《圣经》和古典作品之用,语词释义不足。1612年,意大利佛罗伦萨学士院编出《词集》,释义用文史引语,是第一部欧洲民族语词典(图1)。1694年法兰西学士院出版《法语词典》。1726~1739年西班牙学士院编出6卷本《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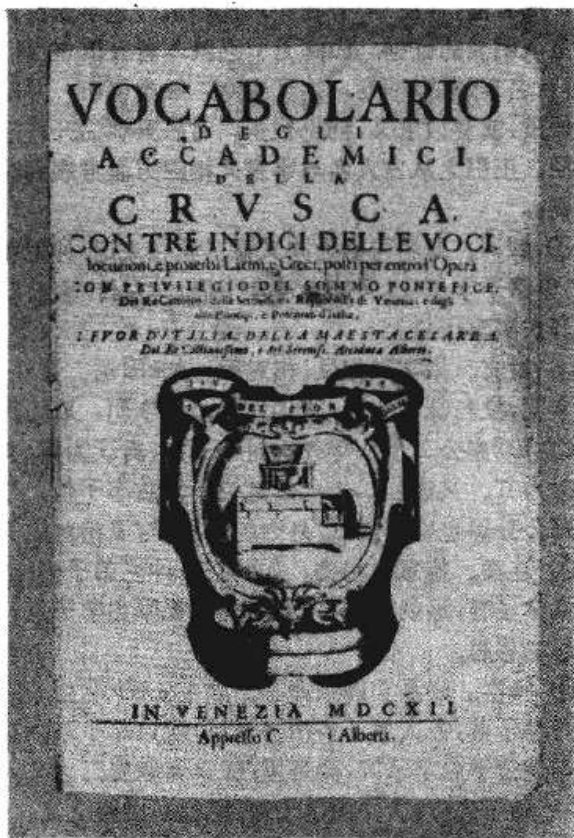


图1 《词集》

班牙标准语词典》。第一部大型英语词典出版于1755年,编者S.约翰逊,收43500词,文史引语118000条。近代西方最大的词典是《牛津英语词典》,倡议于1857年,1928年成书,共12卷,又补编一卷。这部词典收1150年以后曾见于英语文献的414000词,每词有引语为证,按

年代列明词的意义和形态的演变,共1827000条。此书出版后,成为英语民族的骄傲,各国也相继仿效,编出同样规模的词典。

中国古代的字书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世纪的《史籀篇》,现存最古的是史游的《急就篇》(公元前1世纪),是一种儿童识字课本。按意义编排的《尔雅》大约成书于公元前3世纪,是解释字义和分类编排事物名称的字书。扬雄的《方言》是中国第一部记录方言的书,成书于公元1世纪初。许慎的《说文解字》成书于公元100年,它将汉字分为540部,并按“六书”说明文字。中国从汉代以后,词典学即分为①没有注解的分类识字课本,②有注解,按意义编排的分类字典,③按部首编排并解释字的形、声、义字典,④按意义排列的方言字汇。清代官修的《康熙字典》成书于1716年,收47021字。按部首编排近几十年出版的词典,通行最广的是《辞源》和《辞海》。此外,《汉语大词典》和《汉语大字典》从1986年起陆续出版。

词典惯常分历时性的和共时性的,规定性的和描写性的,语文性的和百科性的,通用的和专科性的等类。但在信息时代,词典数量很多,有必要采取更为概括的分类法。新的分类法把一切词典分为两类,一是语文词典,二是专科词典。

语文词典 分3大类,构成3个同心圆(图2)。A最小,是语言的核心, B大于A, C最大。分别说明如下:

学习用词典 4~6万词,是语言的核心部分。以现代常用词为主;释义先列常见的词义,次列不常见的词义;着重说明词的用法,详细注明搭配。不注或简注词源,如《牛津高年级学生通用英语词典》。

参考用词典 14~18万词,适合参考的需要。收词以现代为主,力求全面,包括通用的、专科的,以及百科知识的词;义项先列词的中心意义,次列边缘意义,主要以文史引语为例句,注明词源,例如《考林斯英语词典》。

研究用词典 40~60万词,属词库性质,供学术研究之用。收词原则:凡属某一年以后出现于本民族文献的词,以及词的语音和形态变体,都予列入;义项按历史上出现先后排列,各有注明年代和出处的文史引语为证;分层次释义,多义性的词按基本词义、语境词义、习惯词义注明;详述词源,例如《牛津英语词典》。

上述三类语文词典中,A类的特点是着重说明常用词的词义和词的用法,以适合学习的需要;B类的特点是尽可能全面地收录现代语言通用的词,以适合各行各业参考的需要;C类的特点是尽可能完全地收录自古以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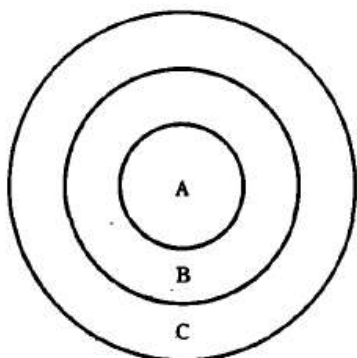


图2

A表示学习用词典 B表示参考用词典 C表示研究用词典

曾出现的民族语词,记录它们语音、形态、语义的变化,以适合各种研究工作的需要。在义项排列上,A类从最常用的词义开始,B类从最中心的词义开始,C类从最早出现的词义开始。A、B都从现代语言收词,但B大于A一倍或几倍,因为B包括A所不包括的专科的和百科知识的词。B、C都用文史引语作为例句,但C着重说明词义的历史演变,B着重说明当代的词义,C注明引语的年代和出处,B一般只注明作者。

三类之中,最具词典学特色的是A、C两类。A类的对象是语言的学习者,而且多半是非母语的学习者。为这类学习者编辑的词典,构成词典学一个特殊的课题。例如外国人学汉语,有声调问题,词类识别问题,词序变换引起语义不清楚等问题;中国人学英语,有名词的可数与不可数,动词的及物性和搭配问题,冠词和介词的惯用法等问题。母语使用者认为不成问题的语言现象,非母语学习者总是要求有明确的规则可以遵循,满足这一要求,是A类词典的特殊任务。至于学习用的双语词典,还有单语词典所没有的问题。单语词典用定义,双语词典用译义,而译义所用的词可能和原词的若干义项相符,和另一些义项并不相符。又如词典里的惯用词组,单语词典解释其中关键词的意义即可,双语词典则需全译,但因其是惯用,释文往往不易达意。A类词典的编者所面临的形态、句法、跨文化的语义传输等问题是很多的。单语的《牛津高年级学生通用英语词典》自1948年在英国出版以来,已有过四次大修改。名词可数不可数的精细处理,动词搭配的模式化,语境语域描写的标准化,便是几次修改的结果,也代表了词典学的进展。

B类词典收词多,除广收常用词以外,还收专科性和百科性的词。它力求以一卷本的形式提供最全面的词的语义信息和百科信息。

C类词典代表词典学的历史主义结晶。研究者利用它作为词库,可以从历时角度观察同一个词在不同时段里发生的形态、语音、语义上的变化。也可以从共时的角度观察一组词在某一时期形成的语义场和它的语义结构。研究者还可以从不同时期的借词观察文化的接触,从词所反映的文物制度观察社会形态。从几百年的文献中收集到的几十万个词,按一定次序编列和注明义项,在这样条件下编成的一部(通常为多卷本的)词典本身即是非常有价值的信息库。

专科词典 专科词典(图3)和语文词典有根本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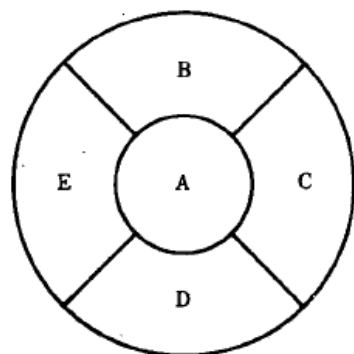


图3

A表示百科词典 B表示人文学科的词典 C表示社会科学的学科词典 D表示人类历史的学科词典 E表示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学科词典

不同。语文词典提供词义,专科词典提供知识。语文词典的核心是语言的共核,专科词典的核心是总汇各科知识的百科词典。语文词典以收词的范围分类,分小中大三种类型,三类的关系是由小到大的同心圆关系;专科词典以知识的部门分类,各类的关系是在人类知识总汇中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即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专科词典分类如下:

百科词典 包括百科全书、百科性语文词典、书目总汇、分类书目等。

人文学科的词典 包括哲学、宗教、语言学、语文学、文学、美术、艺术、音乐等的词典。

社会科学的学科词典 包括教育学、社会学、人类学与民俗学、神话学,风俗研究,统计学、经济学、政治科学、法律学、地理学等的词典。

人类历史的学科词典 包括世界通史、地区历史等的词典。

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学科词典 包括天文学、生物科学、化学、地文科学、数学、物理学、心理学、工程学、医学科学、农业科学等的词典。

最后,专科词典和语文词典还有一点根本性的不同。语文词典很自然地限于民族语言范围之内,而专科词典则具有很大的国际性,基础科学学科和应用科学学科术语的国际性尤为重要。但是国际间科技信息的传输还有一个问题没有很好解决,即术语的统一问题。各国的科技专家使用的术语往往和标准术语不一致。世界上资力雄厚的企业,为了推销自己的科技产品,各自印发科技术语手册,他们之间也不一致。还有,科技术语不可能不用某些非术语的词语,但所用含义并不统一。在这种情况下,国际间要求统一科技术语的呼声已越来越高。有人建议编出一部两级科技词典,第一级编列具体的科技操作,第二级是用多种语言编列的科技术语词典,以保证国际科技信息的准确传输。

纵观词典学的发展趋势,语文词典中的学习用词典多为各类学习者着想,参考用词典以多收现代新词新术语见长,研究用词典以历时地收列词语、详列书证为其主要目标。专科词典以不断更新不断填补空白作为科技信息的软件而愈益受到重视。但是,真正足以表示一国学术成就的,仍是集中人才、长期工作而编出的多卷本研究用的语文大词典。20世纪已完成和正在进行中的大词典有:

《丹麦语大词典》(1918~1956),哥本哈根出版,28卷。

《现代俄罗斯文学语言词典》(1948~1965),苏联科学院出版,莫斯科-列宁格勒,17卷。

《牛津英语词典》12卷,又补编1卷(1884~1928);《牛津英语大词典补编》,4卷(1972~1986),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瑞典语词典》(1892~),瑞典科学院出版,已出27卷,在进行中。

《拉丁语词库》(1894~), 德国慕尼黑出版。自1900年起已出A—M部(L部尚未出齐), 在进行中。

《法语宝库: 18世纪与20世纪(1789~1960)法语词典》, 1971年起已出版8卷, 全书现定15卷(最初定为60卷), 法国南锡出版, 在进行中。

《西班牙语历史词典》, 1914年倡议, 1933~1936年出版2卷; 1947年重组编辑部, 1960年新版, 已出12分部, 西班牙马德里出版, 在进行中。

《格林兄弟德语词典》,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柏林出版; 格林兄弟原稿编成3卷(1854~1862); 近年续编的16卷本于1960年在莱比锡出齐; 1965年开始出版新编本, 收词和引语已大大增加, 已出7个分部, 在进行中。

参考书目

李荣:《语文论衡》, 商务印书馆, 北京, 1985。

R. R. K. Hartmann ed., *Lexicography: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Academic Press, London, 1983.

E. P. Sheehy et al ed., *Guide to Reference Books*, 9th edition,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Chicago, 1976.

(许国璋)

cihuixue

词汇学 (lexicology) 在语文学时期, 是语言学的组成部分, 曾经与语音学、语法学并列; 在现代语言学里, 一般认为音系学、句法学、语义学是语言学的3个组成部分, 而词汇学是语义学的一支, 也称词汇语义学。前期词汇学注重分类——历时的词义变异的分类(扩大与缩小, 褒义与贬义, 抽象与具体, 本义与转义等)和共时的功能的分类。现代词汇学着重理论模式的建立, 力求把前期词汇学已有的分类放在符号与公式的基础上, 提高它的精密性和可验证性, 同时也探索前期未曾探索的领域, 例如不同语言里词汇的共性成分。下面分5部分说明。

词的定义 19世纪西方语言学把“词”定义为语言的最小单位, 词组成词组, 词组组成句子, 词是句子的重音所在, 又是词的屈折变化的基础; 这是这一定义的依据。20世纪初期, 素的观念逐渐成熟, 于是有了小于词的“词素”, 但是对于词的定义, 并没有较好地解决。现代词汇学倾向于用分解的办法给词下定义, 即“词”是形态的、句法的、语义的具体特征的结合。承认词的三个因素, 各用不同的符号代表, 可以较为简便地说出词的派生和词类转换等现象并写出支配规则。

词义分析 可分为:

概念意义 现代词汇学采取基本范畴分析法, 即选定若干范畴为标志, 相联的概念都按此定义。例如关于“人”这一大范畴, 以“人类的”、“成年的”、“男性的”三项为标志, 外加正号(+)、负号(-)、零号(0)作区别。“妇女”是:

人类的 +
成年的 +
男性的 -

即“成年的、非男性的人”。

而“男孩”则是:

人类的 +
成年的 -
男性的 +

即“未成年的、男性的人”。

联想意义 “妇女”一词, 可以联想“持家”、“养育儿女”、“温柔”等, 某一种文化会加上“脆弱”, 另一种文化会加上“一族之主”等。对于“联想性的意义”, 现代词汇学的贡献只是在区别它和概念性意义的不同, 即: 概念意义以逻辑为根据, 不因文化不同而不同, 义项固定, 属于封闭系统; 联想意义以经验为根据, 因文化不同而不同, 义项变异, 属于开放系统。

社会意义 这是现代词汇学与前期词汇学最为不同, 也是最能体现它的现代性的地方。前期词汇学着重静态的(即词典的、固定的)词义分类, 现代词汇学则强调动态的、社会的词义分析。社会性词义有下列变素:

- ① 地区方言与社会方言的变素。
- ② 不同职业的变素。
- ③ 不同语域与语用的变素。
- ④ 作家风格的变素。

⑤ 作者的意图与不同读者的不同理解的变素。诸变素中又存在交叉的关系, 例如可以从一个作家的语言中研究地区方言或社会方言, 又可以从社会方言角度研究不同作家的语言。

不同语言中词汇结构的共性成分 不同语言中存在着共性成分, 这是长期以来哲学家从事研究的问题。宏观的共性成分是肯定的, 凡属人类(也只有人类)都有语言, 凡是语言都有语音和语法的体系, 不管体系本身如何不同。但是, 语音和语法是封闭系统, 是有抽象的法则可循的, 词汇是开放系统, 抽象很不容易。但是语音中区别性特征的提出和语法中生成理论的设想都被认为是抓住了语言的某些共性成分。在这种对共性成分的热烈追求下, 语言中亲属词的研究和基本颜色词的研究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 也受到现代词汇学的重视。

B. 伯林与 P. 凯伊在调查近100种语言的基础上, 提出了11种基本颜色词, 如下图:

白				
橘				粉红
… 红				…
棕	绿	蓝	紫	红
黑				

这11种基本颜色词, 不同民族差异很大, 文化中颜色词的多少被认为是发展阶段的标志。11种颜色可能的组合在2000种以上, 但实际发现的组合仅22类, 可见人类对世界的认知有其共同的地方。11种颜色词都有, 构成共性集; 只有其中一部分, 构成准共性集。

关于语言中的亲属词, 已经发现双亲、性别、婚姻这三个概念是共性成分, 语言学家用这三个概念作为基本

范畴,把直系亲属词表达如下:

父亲 + 男性 $\rightarrow$ 父
 母亲 - 男性 $\rightarrow$ 母
 儿子 + 男性 $\leftarrow$ 父母
 女儿 - 男性 $\leftarrow$ 父母

顺向箭头表示“生父和生母”,

逆向箭头表示“父母所生”。

祖父 + 男性 $\rightarrow$ 父母 $\rightarrow$ 父母

两个顺向箭头表示父母的父母。

孙子 + 男性 $\leftarrow$ 父母 $\leftarrow$ 父母

两个逆向箭头表示前一代父母所生的父母所生。

不同语言中共性成分是在的,但要建立共性成分,必须做大量的调查,而调查所得的结果往往是纷繁庞杂的,这就有赖于哲学的分析。因此,到现在为止,词汇的共性成分和语音、语法的共性成分一样,还仅是一种假设,不能说是定论。

除颜色词和亲属词的共性成分研究外,还有植物分类术语的研究。

写出词的变化规则的规则 现代词汇学受生成语法的影响,力求找出词的变化规则,并把这些规则用符号写成公式。这样的公式比文字说明要清楚,概括性也强。

① 词的派生,写法如下:

$M_1 \rightarrow M_2$ M =形态,加词尾以后,形态从 M_1 变成 M_2 (例如名词加词尾)。

$S_1 \rightarrow S_2$ S =句法关系,例如名词加词缀以后变形形容词, $S_1 \rightarrow S_2$ 。

$R_1 \rightarrow R_2$ R =语义,由于上述变化,词义有相应的变化, $R_1 \rightarrow R_2$ 。

② 词的转换,写法如下:

$M_1 \rightarrow M_1$ 转换指词类变而形态不变, $M_1 \rightarrow M_1$ 。

$S_1 \rightarrow S_2$ $S_1 \rightarrow S_2$ 反映词类的转换,例如动词转为名词。

$R_1 \rightarrow R_2$ 动词转为名词,词义有相应的变化, $R_1 \rightarrow R_2$ 。

③ 词义的转变,写法如下:

$M_1 \rightarrow M_1$ 形态不变, $M_1 \rightarrow M_1$ 。

$S_1 \rightarrow S_1$ 词类也不变,只是可数名词转为不可数名词,仍写为 $S_1 \rightarrow S_1$ 。

$R_1 \rightarrow R_2$ 可数名词转为不可数名词,引起词义的相应变化。

③中所用的符号是不完善的。一个名词从可数转为不可数,终究是一种变化。这一变化没有在公式里反映出来。

不及物动词、及物动词、系动词,可以写成:

不及物动词 NP + V

及物动词 NP + V + NP

系动词 NP(+V) + NP

动词的组配(通常所谓搭配)能力,可以用“价”来表示。“价”原是化学术语,指一个原子和可结合的其他原

子的数目,借来指一个动词可以支配多少个句子成分。如:

他在唱。(有支配主语,称1价动词)

他在唱一支西班牙歌曲。(有支配主语和直接宾语,称2价动词)

他为来宾唱一支西班牙歌曲。(有支配主语和间接宾语与直接宾语,称3价动词)

一种语言的词汇结构 一种语言的词可以多达几十万,要作实证主义的结构描写显然是不可能的。比较可行的是提出一种研究模式去进行结构描写。F. de 索绪尔和 J. 特里尔都曾提出不同的模式(两种模式都经后人增益)。索绪尔的词汇模式分横组合与纵聚合两个方面,横组合指句子中的词的线性系列,纵聚合指一组功能相同(因而可以互相替代)的词里面哪个词在句子里最为恰当。前者考虑词的句法功能,是如何造成合乎语法的句子的问题;后者考虑词的修辞功能,是如何使表达充分的问题。显然,纵聚合与词汇学的关系更为密切。

特里尔认为,既然不可能考查整个词汇,不如选择一定的词义场(由一组具有丰富文化内涵而意义相联的词构成)来作考查。其次,在历史上可以选定不同的时间,比较同一词义场所发生的变化。

对比 a, b, c 三个词构成的词义场在第一历史时间 t_1 与第二历史时间 t_2 ,会有几种可能的发现:

① 没有变化: $t_1 a, b, c \rightarrow t_2 a, b, c$

② 某个词受到代替: $t_1 a, b, c \rightarrow t_2 a, b, d$

③ 某个词的词义扩大: $t_1 a, b, c \rightarrow t_2 a, bb, c$

④ 加入了某个新词: $t_1 a, b, c \rightarrow t_2 a, b, c, d$

关于词义场,实际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特里尔本人的研究取材于13世纪中古高地德语,普遍意义不大。但是,词义场仍然是一个可以利用的理论模式。它的用处是:①把研究限制在可以进行工作的范围内;②写成公式的研究结果易于和前人的研究所得进行比较。

参考书目

B. Quemada, *Lexicology and Lexicography, in Current Trends in Linguistics*, Vol. 9, 19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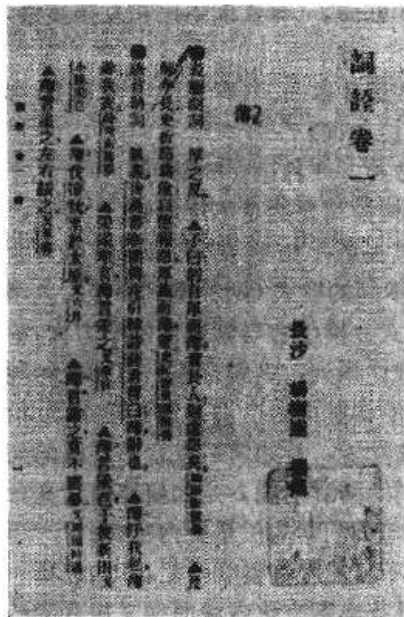
G. Leech, *Semantics*, 2nd ed., 1981.

(成雨村 陆国强)

Ciquan

《词诠》 解释古书中虚词的书。杨树达著。著者于20世纪20年代曾在清华大学教授中国文法课程,著有《高等国文法》一书,《词诠》系《高等国文法》的姊妹编。《高等国文法》以词性论虚词,系语法书;《词诠》则以注音符号为次排列虚词,缕列其用法,系古汉语虚词工具书。先见于《词诠》的,有刘淇的《助字辨略》、王引之的《经传释词》等。《词诠》较之以前所有讲虚词的书有三大特点:①这本书是拉丁语法输入中国之后,即马建忠所著《马氏文通》流行以后所著书,每个虚词的每一解释都能定其词性,这是学术随时代进步而进步的表现。②这本书总结了刘淇、王引之以及孙经世、马建忠、童斐诸人的著述,采其所长,

弃其所不确,等于给过去讲虚词的书作了总结。③杨氏本人博览先秦两汉以至六朝的书,兼好文法之学,于虚词心得尤多。《经传释词》所采字仅 160,而《词诠》采字近 500,



杨树达撰《词诠》

增出 2 倍有余,尤其许多释义,是前人所没有发现的。直到现在还不失为一部很有价值的工具书。

(杨伯峻)

ciyuanxue

词源学 (etymology) 研究词的形式和意义的来源的学科。例如汉语“佛”和“佛陀”源出梵语 buddha (觉悟)，“木乃伊”源出阿拉伯语 mūmiyā (蜜人)。例如，现代英语 cat (猫)，在古英语是 catt(e)，在古高地德语是 kazza，在古斯堪的纳维亚语是 köttr，其来源可能是晚期拉丁语 cattus, catta, 或借自某种非印欧语。

并不是每一个词的来源都能弄清的。例如现代英语 dog (狗)，在古英语是 docga，在中古荷兰语是 dogge，但来源不明。

古代关于词源的议论 词最初是怎样产生的，古代哲学家早已谈论过。中国古代学者往往用音近义通的方法解释词源，这种方法，训诂学家叫作“声训”。汉代刘熙的《释名》是声训的专著，但是往往牵强附会，例如他解释干支，说：“子，孽也，阳气始萌，孽生于下也。……丑，纽也，寒气自屈纽也。……寅，演也，演生物也。卯，冒也，载冒土而出也。”(《释天》)

在欧洲，古代希腊哲学家也讨论过词是怎样产生的。赫拉克利特(约公元前540~约前480)认为事物与它的名称有自然的联系，德谟克利特(约公元前460~前370)则认为事物的名称是约定俗成的。

科学的词源研究 按现代语言学的要求，研究一个词的词源，必须查明它的旁系亲属语言中这个词的词义和词形是什么，据此构拟出它最古的形式和意义。这在古代是不可能的。在现代也只对部分语言才能进行。词源学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一部分，但是在 18 世纪以前，欧洲人相信基督教《圣经》，误以为希伯来语是欧洲一切

语言的始祖。因此不可能找出近代欧洲诸语言的真正起源，更不能认识现代欧洲诸语言的词的真正来源。

根据可靠的资料考察词源，在中国早已有人做过。例如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100)根据下述汉字的偏旁“糸”等资料推论，古汉语中有许多颜色词原来是专指布匹颜色的，如：“紺，帛深青扬赤色。”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根据《文选注》，指出“深青”二字后应有“而”字，他还指出这儿的扬字应为“阳”字。“缁，帛黑色也。”“绿，帛青黄色也。”“红，帛赤白色。”“紫，帛青赤也。”但是那时许慎不可能有亲属语言的概念，当然不可能追溯出这些词更古老的起源。1786 年英国 W. 琼斯发现，梵语和英语等欧洲语言有某些共同的地方。18 世纪初丹麦语言学家 R. K. 拉斯克和德国语言学家 F. 博普最早指出，现代英语、法语、德语、丹麦语、冰岛语、俄语、意大利语和古代拉丁语、希腊语乃至更古的梵语都同出一源。从此以后，欧洲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便勃然而兴。他们根据近代和古代印欧系语言的知识，构拟原始印欧语的语音。例如表达数字“十”这个意义的词，在梵语是 daśa，在拉丁语是 decem，在德语是 zehn，在英语是 ten，这些学者根据这些词和印欧语中的其他语言表示“十”的词构拟出原始印欧语词 *dekm。这里的星号表示后面的形式只是一种假设，并不是确凿可靠的。

对词源的错误解释：流俗词源 从不熟悉的词联想起一些语音相近的熟悉的词，误以为后者是前者的词源，例如以为 Welsh rarebit (涂在面包上的溶化干酪) 原是 Welsh rabbit (威尔斯兔)，以为 asparagus (天门冬属) 原是 sparrow grass (麻雀草)。这种错误的猜想，称为流俗词源。

参考书目

A. S. C. Ross, *Etymolog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nglish*, André Deutsch, 1958.

D. Bolinger, D. A. Sears, *Aspects of language*, 3rd Edition,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Inc., 1981.

(伍铁平)

cizu

词族 在语言发展的过程中积累很多声音和意义相通或相近的同源词，不同的同源词可以一组一组的分开，每组自成系统，通常称为词族。例如“吾”、“我”、“印”声母相同，都是疑母字，同是自称之词。“吾”见于《论语》，“我”见于《诗经》和《左传》，“印”见于《诗经》。古韵“吾”为鱼部字，“我”为歌部字，鱼歌韵近，“印”为阳部字，与“吾”为对转，这三个词是同源词，成为一族。又如“夷由”、“夷犹”、“犹豫”都是双声联绵词，同是迟疑不前的意思。如“徜徉”、“相羊”、“常羊”、“彷徨”都是叠韵联绵词，同是逍遥的意思。如“阿那”、“猗傩”、“婀娜”、“旖旎”、“猗猗”等声音的结构相同，声母都是影泥[ʔ, n]的形式，韵母相近，“那”、“傩”古韵歌元对转，“那”、“旎”歌脂通协，同是柔弱、舒迟飘动的意思。这些也都音义相通，各成一族。清代王念孙作《广雅疏证》，把音通义近的词联系在一起，触类引申，不限形体，就是“词族”的研究，他为训诂的研究开

拓了一条新路。瑞典学者高本汉作《汉语词族》，研究的范围更加扩大，但是有些是不可靠的。

“词族”也有人统称作“字族”，不作分别。从科学的严谨性来讲，以分作两个名词为好。“词族”跟“字族”的意义不完全一样。二者有两种分别：一种是“字族”是从一个个汉字就其声符既相同，字义又相近来说的，“词族”是从声音相通意义又相同或相近的同源词来说的，包括单音词和双音词，二者范畴不同。另一种分别是“字族”从文字论，“词族”从语词论。说“字族”就是要从形体的谐声系统区分，说“词族”就不为形体所限。这两个名词是有区别的。

(周祖谟)

Cihai

《辞海》 一部大型的兼收语词和百科词语的综合性辞书。《辞海》最初是由舒新城、沈颐、张相等人主编，1936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与商务印书馆所出的《辞源》都曾风行一时，而各有特色，对当时中国文化教育的提高发生过很大的影响。但是经过了几十年，旧版《辞海》早已不能适应现在读者的需要，所以从1958年春成立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1959年成立“辞海编辑委员会”，组织学者另行改编。经过数年的努力，先出试用本，最后重加修订，于1979年10月由上海辞书出版社正式出版《辞海》3卷本。全书选收单字14872个，选收词目91706条，包括成语、典故、人物、著作、古今地名、历史事件以及各学科的名词术语，成为当前发展文化教育的一部重要的工具书。全书按部首排列，另有笔画查字表和汉语拼音索引。同时还附录有十几种有关历史和自然科学的数据表格。书中所收词目，以解决一般读者在学习和工作所需要的知识为主，解释文字力求简明扼要。1982年辞海编辑委员会又另外补出了《辞海·增补本》，补充已出的3卷本没有收录的语词和百科词语。语词部分有15730条，百科部分有2281条，内容更加充实适用。

(周士琦)

Citong

《辞通》 一部解释古书中异体同义词语的辞典。近代朱起凤撰。朱起凤(1875~1948)字丹九，浙江海宁人。此书草创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写成于民国十九年(1930)，历时三十余载，易稿十余次，足见用力之勤。书中所录都是古籍中两字连用在一起的异形同义的词语。作者指出某为音近假借，某为义同通用，某为字形讹误，分辨极细。所有词语都取第一个词语的下一个字按《佩文韵府》的106韵的韵次排列，分为平上去入四声。凡见于经史子集中的词语都以最习见的写法为纲，其下所列的种种异文别体，则按经史子集的次序排列。体例谨严，秩然有序。其中一词一语之下可以有多至十余种的写法，既可以借此研究声音转变通假的道理，也可以借此研究文字在使用中的演变，比以前纂集经典异文以及吴玉搢《别雅》、钱坫《十经文字通正》之类的书所收的词例都广泛得多。

此书原名《新读书通》，1934年由开明书店出版，改名《辞通》，编为24卷。其最大的特点是每一组词语之后几乎都加有按语，以声韵为枢纽，指出文字异同之间的关系。何者为假借字，何者为声近义通字，何者为同声通用，何者为形误，何者为别体，有时还刊正旧注的误解。自序说：“此书音训，有沿用旧注者，有采清儒之说者，要皆参以己意，折衷一是。”现在看来，其中创见颇多。惟对古声韵部类未能详究，但云一声之转，尚有不备，甚且时有错误。书末有补遗7条，并采录字同而义异的词语99条附录于后，以广异闻。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已有重印本。

(周士琦)

Ciyuan

《辞源》

一部大型的为阅读古籍用的古汉语辞书。《辞源》最初是由陆尔奎、方毅等人倡议，为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开发民智，普及文化学术知识而编的一部辞书。经始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直至1915年，历时8年才编成。1931年又出版了《辞源》续编。《辞源》以旧有的字书、韵书、类书为基础，吸收新的国外辞书的优点，以语词为主，兼收百科术语，用意在于实用，注重探求词义的源委，并详举书证，故名《辞源》。这是中国出版的第一部较大型的百科性辞书，共收1万多字，词目10万余条。先后曾印行过400多万部。

1958年开始进行《辞源》修订工作，为与《辞海》分工，专门编为古汉语词典，以供阅读古书之用。修订稿第一册于1964年出版。全书从1976年起由广东、广西、河南、湖南4省(区)协作修订和商务印书馆编辑部共同编辑审定，197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共4巨册。内容包括古书中的语词典故和有关古代文物典章制度等方面的事典词语，为阅读古籍和研究古代文化所必备的工具书。本书所收单字系按部首排列，单字下均注出汉语拼音和注音字母，并加注《广韵》反切。释义也比较简明精当，而且特别注意语词的来源出处和语词在使用过程中的发展演变。书证一律标明作者的时代、篇目和卷次，并做了复核。遇必要时，在有关词目下还略举参考书目，以供读者参考，这是旧版《辞源》所不具备的。收词一般止于鸦片战争(1840)，而又增补了一些比较常见的词目。每册后附四角号码索引，颇便检阅。

(周士琦)

ciqing

次清 见清浊。

cizhuo

次浊 见清浊。

congshu fenxifa

从属分析法 (dependency analysis method)

自动句法分析的一种方法，是1960年美国语言学家D.G.海斯根据机器翻译特点提出的。

20世纪50年代，法国语言学家L.特斯尼耶尔(1893~

1954)提出从属关系语法。他认为,当词结合成句子时,词与词之间的关系不是这些词简单机械的组合,而是一个整体。句子以动词为中心,其他成分从属于动词,由动词支配。动词的从属成分有名词词组和副词词组两种。名词词组充当动词的行动元,副词词组充当动词的状态元。行动元的数目决定了动词的价。根据行动元的有无和多少,动词可分为零价动词、一价动词、二价动词和三价动词。从属关系语法在法国语言学界独树一帜,并在法国的机器翻译研究工作中得到了应用,成了从属分析法的先驱。

从属分析法的基本原则与从属关系语法是一致的,

N 它力图从形式上建立句子中词与词之间的从属关系,并用图加以表示。如在英语中,冠词(Art)与名词(N)之间的关系是:名词是中心词,冠词是从属词,冠词位于名词的左侧,这种从属关系可图示如左。

从属词写于中心词的下方,如从属词位于中心词的左侧,就写在左下方,如从属词位于中心词的右侧,就写在右下方。

这种从属关系还可用符号来表示。假定 X_1 为中心词, $X_{j1}, X_{j2}, \dots, X_{jk}$ 为 X_1 的左侧从属词(X_{j1} 位于最左侧), $X_{jk+1}, X_{jk+2}, \dots, X_{jn}$ 为 X_1 的右侧从属词(X_{jn} 位于最右侧),那么,表示 X_1 与其从属词间的语法规则可写为:

$X_1(X_{j1}, X_{j2}, \dots, X_{jk}, *, X_{jk+1}, X_{jk+2}, \dots, X_{jn})$,

式中 * 代表中心词相对于从属词的位置。

除了这种形式的规则之外,还有两种形式的规则:

① $X_1(*)$: 表示 X_1 在句中没有从属词,这是终极型规则;

② $*(X_1)$: 表示 X_1 不是任何词的从属词,即 X_1 为全句的中心词,这是初始型规则。

采用这 3 种形式的规则,可以从形式上表示句子的中心词及其从属词之间的关系,以造出句子的从属关系树,从而表示出句子的句法结构,达到自动句法分析的目的。

(冯志伟)

Cuanwen Congke

《爨文丛刻》 中国古爨文经籍的汇编。编者丁文江。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见图)。“爨文”即爨文。据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诸葛亮平南中(相当于今四川大渡河以南及云南、贵州两省)“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分其羸弱配大姓焦、雍、晏、爨、孟、量、毛、李为部曲。”又说:“亮受其俊杰建宁爨习、朱提、孟炎及获为官。”由此可知爨原是当时的一种大姓。爨由姓氏变为族名,最早见于樊绰的《蛮书·名类篇》,记述西爨为白蛮,东爨为乌蛮。并说“第七程至竹子岭。岭东有暴蛮部落;岭西卢鹿部落”。“卢鹿”即旧时称彝族为“罗罗”的转音,可见唐代即已称彝为爨。明清以来的汉文方志中多称彝族文字为“爨”字。如《天启滇志》卷三十《爨夷条》:“有夷经,皆爨字,状类蝌蚪。”《爨文丛刻》中共收《千

《爨文丛刻》

岁衡碑记》、《说文(宇宙源流)》、《帝王世纪(人类历史)》、《献酒经》、《解冤经》(上下两卷)、《天路指明》、《权神经》、《夷人做道场用经》、《玄通大书》、《武定罗婺夷占吉凶书》等11种彝文经典,可以概括川、黔、滇、桂彝族的重要文献。全书连注音、释读、意译共约十余万字,是研究彝族语言文字、社会历史、民族文化的珍贵资料。该书译者是贵州大方县彝文经师罗文笔,限于当时的条件和水平,标音和译文多有不妥之处。尤其用注音字母标音,既不准确,又不通行。1981年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彝族历史文献组对原书做了增订,改注音字母为国际音标,改正书中错译,补译未译部分,并增补近年发现的彝文金石碑铭,较原书增加了三倍。译文随文注释,分上下两卷。这是研究彝族文献科学性较强的资料,1986年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马学良)

Cui Shizhen

崔世珍 (?~1542) 朝鲜语文学家。朝鲜忠清北道槐山人。1503年登科,历任通训大夫、承文院提调、同知中枢府事,兼任讲隶院教授,讲授汉语、吏文,培养翻译人才。他精通吏读、朝鲜文和汉语文,对音韵学和文字学造诣颇深。其著作多为韵书、字书和汉、朝对译的谚解书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老乞大谚解》、《朴通事谚解》、《四声通解》和《训蒙字会》。《老乞大》、《朴通事》是当时朝鲜流传很广的汉语教材,崔世珍用新创制的朝鲜文“训民正音”对这两本书进行对译,并用这一套拼音文字代替传统的反切给汉字注音。1517年编纂了《四声通解》,用朝鲜文给汉字注音释义。1527年编著《训蒙字会》,用朝鲜文对 3360 个常用汉字注音释义。这些汉字注音和他对汉字音的论述较准确地反映了当时汉语语音的演变情况。在《训蒙字会》凡例中,根据口语实际,他对15世纪中叶创制的朝鲜文字提出了改进方案,并重排了字母顺序,首次规定了字母的名称。现行的朝鲜文字母名称和排列顺序就是在此基础上补充修订的。这些著述对朝鲜文的普及和发展、对朝鲜族学习汉语文起过重大作用,也为研究朝鲜语史和汉语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宣德五)

D

Da Hal

达海 (1594~1632) 中国清代满族语文学家。先世居觉尔察, 隶属满洲正蓝旗。清太宗皇太极时主持文馆, 天聪四年(1630)授游击, 五年赐号巴克什, 六年奉太宗命改进满族早期的文字老满文。他的主要贡献是: ①在字母上用加圈加点的办法, 区分了原来未区分的语音, 使字母在表音上比原先精确。②制定了10个“外字”, 用以拼写本民族语中外来语的语音。③创造了“切音法”。在“十二字头”中有规范写法的1411个音节里, 没有辅音同后响复元音或三合元音相拼的音节及其写法, 为了拼写这样的外来音, 达海使用两个音节拼合在一起的“切音法”表示。这种方法后来也用于拼写满语词。经过达海的改进, 满文字母的形体和拼写方法就固定下来了。达海还精于满汉两种语文的翻译, 译有《黄石公素书》、《六韬三略》、《纲鉴会纂》等书。 (胡增益)

Daluopitu yuxi

达罗毗荼语系 (Dravidian family) 又译德拉维达语系。主要分布在印度南部和中部, 其次在斯里兰卡北部和巴基斯坦等地。使用人口约1.3亿。

早在1816年, 语言学家就已证实达罗毗荼诸语言跟印度其他语言没有亲属关系, 它们之间的一些相似点, 是语言接触和相互借用的结果。一般认为, 达罗毗荼语系包括约20种语言。但晚近时期又新发现了分布在山区的一些使用人口较少的语言, 确数有待调查。该语系中, 最重要的是泰米尔语、马拉雅拉姆语、坎纳达语(又称卡纳里斯语)和泰卢固语。这4种语言分别为印度泰米尔纳德邦、喀拉拉邦、卡纳塔克邦和安得拉邦的官方语言。它们有自己的文字和文化传统, 其中泰米尔语的文化传统最悠久。

达罗毗荼语系通常分为南部、中部和北部3个语族(见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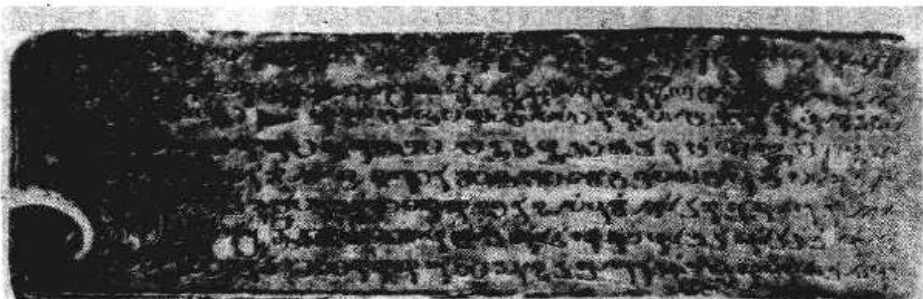
语言特征 元音有长短之分, 包括eo、ēē。鼻化音不是固有的特点, 是后来发展起来的。元音和谐比较弱, 亦无规律可循。辅音按发音部位排列, 由内及外, 由喉音至唇音, 与印度-雅利安诸语言相同, 前者可能受后者的影响。特有的辅音是顶音摩擦音ɭ和齿龈卷舌音ɮ, 重复时, 与其他辅音联在一起, 产生ɭɭ。南部达罗毗荼语中的字, 以元音收尾。重音微弱, 一般都落在第一个音节上。

形态变化 总的说, 属于粘着

语族	主要语言	主要通行地区	使用人口 (约数, 万)
南部	泰米尔	泰米尔纳德邦和斯里兰卡北部	3500
	马拉雅拉姆	喀拉拉邦	2200
	坎纳达	卡纳塔克邦	2000
	图卢	芒格洛尔市附近的马拉巴尔沿海地区	100
中部	泰卢固	安得拉邦	4000多
	贡迪	泰卢固语区的北部	近2000
	库依	普里、甘贾姆、科拉普特等县	60
	帕尔吉	巴斯塔尔地区	11
北部	库鲁克语(奥拉昂语)	比哈尔邦的乔塔纳格普尔高原地带	130
	布拉会语	巴基斯坦的俾路支和信德省, 阿富汗和伊朗的东部地区	超过25

型。名词性的词类分两种: 名词和形容词。除了一小部分真正的形容词外, 还包括分词、名词间接格、代名词形容词。这些都没有形态变化。名词, 包括代名词, 分为两类: ①人类名词(有理性的); 人(神等)的名字; ②非人类名词(无理性的)。其余的名词在人类这一类中, 南部语言有阳性与阴性之别; 但是在泰卢固语和中部语言中, 阴性实际上不存在, 单数与中性同, 复数与阳性同。人类名词常有特殊的词缀, 与动词相适应。构成复数利用词缀粘着的形式; 在构成过程中, 人类名词可以改变单数的词尾。名词变化有两个基本的格: ①直接格(主格); ②间接格, 一般具有所有格的含义, 加上粘着的词缀或后置词, 以表示不同的含义。加上人称词缀形成的派生名词(所谓人称名词或者代名词化的名词), 是达罗毗荼语的特征。代名词复数第一人称有两个形式: 一个包括说话的对方在内, 另一个不包括。这与北京话的“咱们”和“我们”相似。前者包括说话的对方在内。

代名词第三人称和指示代名词有阳性、阴性、中性之分。没有关系代名词。动词有3个基本形式: ①现在不



印度古代的一份泰米尔文证书(769~770), 图中最上面一行用格兰塔体书写, 其他部分用瓦德鲁图字体书写

字母共有 3 种:泰米尔语使用一种;马拉雅拉姆语使用一种;泰卢固语和坎纳达语使用一种。(季羨林)

达斡尔语 (Dagur language) 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主要分布在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境内和黑龙江省齐齐哈尔附近沿嫩江及其支流一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县也有一些人使用这种语言。使用人口约9万(1982)。分布特哈和齐齐哈尔两个土语。语音方面,有6个短元音:a、ə、o、u、i、e及与之相配的6个长元音和主要出现在借词中的y和舌尖元音ɿ。有8个复元音:ai、oi、əi、ui、au、əu、ya、ye。元音和谐不严谨。辅音有23个,b、p、m、w、f、d、t、s、n、l、r、ɬ、ʂ、ʑ、ʈ、ʣ、j、g、k、x、ŋ。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腭化辅音、唇化辅音、复辅音数目很多,但出现频率不高。语法方面,复数第一人称代词有排除式ba:和包括式bed的区别,并且保存着两套完整的变格形式。有与指示代词相区别的第三人称代词i:n(单数)和a:n(复数)。有加在作谓语的动词或作表语的名词后面的与代词形式相对应的第一、二人称附加成分:-bi:(-məi/-wəi)“我”、-ba:(-wa:)“我们”、-da:“咱们”、-ji:(-f)“你”、-ta:(-to:)“你们”。词汇方面,以和蒙古语族语言同源的词为主,历史上吸收过一些满语词,近代和现代吸收了大量汉语借词。词汇中反映渔业、狩猎、畜牧和农业的词语很丰富。

(仲素地)

鞑靼语 (Tatar language) 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在苏联使用人口 600 多万, 大部分居住在鞑靼自治共和国和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 此外, 也有一些居住在西伯利亚西部、中亚及乌克兰等地。鞑靼语分中心方言、东部方言和西部方言。鞑靼自治共和国的大部分居民说中心方言, 鞑靼标准语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主要语言特点: 在语音方面, 有 9 个元音: а, э, ә(е), ы, и, о, ө, у, ү, 有 24 个辅音: б, в, г, д, ж, з, к, л, м, н, ң, п, р, с, т, ф, х, ц, ч, ш, щ, ж, й, һ。元音的腭音和谐较严整, 唇音和谐有一定的局限性。动词词干末尾的 а, э 加上 й 或以 й 开头的附加成分后变为 **ый, и**。以 **п, к** 结尾的词干加上以元音开头的附加成分后, **п, к** 变为浊辅音 **б, г**。与同语族的许多语言相比, 某些词中的宽元音变窄, 而另一些词中的窄元音展宽。在语法方面, 某些附加成分具有以 **-н** 开

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塔塔尔族人口很少，他们的民族名称与苏联鞑靼族相同，只是在汉文中用“塔塔尔”这一译名。其语言与苏联的鞑靼语略有差别。

大众语运动 (Popular Language Movement) 1934 年在上海掀起的一个要求白话文写得更加接近大众口语的文体改革运动。运动的起因是当时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报刊上接连发表反对白话文、主张学校恢复教文言、甚至提倡小学读经等文章,提出“文言复兴运动”。与此相反,上海的文化教育界人士陈望道、陈子展、胡愈之、叶圣陶、黎烈文等发起,并得到鲁迅的支持,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发起了“大众语”的讨论。讨论迅速在全国报刊展开,延续三四个月,发表了两三百篇文章,头两个月每天平均有 4 篇新文章发表。讨论中批判文言文,也批判“五四”以来半文半白的白话文,要求白话文进一步大众化,而且认为要彻底改革文体必须同时改革文字,提出了文字拼音化的问题,介绍了在苏联制订的中国拉丁化新文字。

“五四”运动以后，白话文在小说、散文、诗歌、戏剧文学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在文学作品和一般学术著作之外的文化领域，如报纸上的社论、新闻，政府的公文、法律条文，学校的国文、作文及试卷，中上层社会交往的信札、应酬文等，仍是文言文残存的地盘。在白话文学里，虽然有一部分为人民群众欢迎的好作品，但是，仍有不少作品连“明白如话”也没有做到，常常夹杂许多文言的字眼和句子，滥用欧化的句法、日语的句法，造成了严重违背现代中国人民的语言习惯的文腔和洋腔。因此，有必要对这种文言化或者欧化的白话文作进一步的改革。

大众语运动提出了“五四”白话文运动尚未触及的新问题,如怎样防止白话文变质,如何使白话文成为大众的工具等。这些问题的提出,促使人们对“大众语”讨论的重视。经过讨论,大家明确了一条基本原则:即要从人民大众的实际需要出发,去看待文体改革上的问题。具体说就是,①关于大众语的特点。从语言形式上看,大众语是大众“说得出,听得懂,写得来,看得下”(陈望道《大众

言论》的语言。从它所表达的内容看,应是代表大众意识的语言。这样的大众语,才能为大众所有,为大众所需,为大众所用。②关于建设大众语的前提。一要明白大众语与大众生活的关系。陈望道提出,建设大众语,必须实际接近大众,向大众学习语言(《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二要弄清大众语与白话文的关系。讨论中,既反对在大众语与“五四”以来的白话文或“国语”之间划一等等号,更反对把白话文同大众语对立起来,而认为,建设大众语,要对“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进行合理的扬弃,即吸收白话文中合乎大众语需要的部分,排除白话文中不合乎大众语需要的部分。③关于大众语提高的途径。为了使大众语更加丰富、精密,需要输入一些外来语及欧化句法,起用一些古典语,择取一些方言词。这些纯属语言成分上的问题,与所要反对的语录体、文言腔、洋腔之类语体风格上的问题不同。陈望道还提出“三路并进”,建立“普遍”的大众语的路线。这“三路并进”是:方言土语“从下送上”,即从语言流入文字;文学科学等用语“从上迎下”,即从文字流入语言;中间由普及教育、语言教育等编定通用的语汇、语法“从横通过”(《怎样做到大众语的‘普遍’》)。

大众语运动还提出了一些促进语文改革的新课题,①关于大众语与现代口语的关系。这里包括两个相关的问题,即大众语的基准问题,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问题。在大众语的基准问题上,多数人认为,大众语应该就是现代中国普通话。鲁迅在《门外文谈》里就指出大众语的主力是北方话。②关于大众语与汉字、拉丁化新文字的关系,讨论中较多地强调用拉丁化新文字比汉字更容易做到“话文合一”,认为新文字是大众语最理想的书写工具。

大众语运动的结果,是彻底击退复兴文言、废止白话的逆流,并把中国语文改革运动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即推动了白话文的大众化,促成了拉丁化新文字在国内的研究推行。大众语运动是“五四”白话文运动在新的社会语境中合乎逻辑的发展,对于文学创作运用群众语言、形成独创的民族风格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胡奇光)

Daiwen

傣文 (Dai writing) 中国云南省傣族使用的拼音文字。在双版纳等地通行的称傣仂文,又称西双版纳傣文;在德宏等地通行的称傣哪文,又称德宏傣文;在瑞丽、澜沧、耿马等县部分地区使用的称傣绷文;在金平县使用的称金平傣文、又称傣端文。4种傣文都从婆罗米字母演化而来,与老挝文、泰文、缅甸文、柬埔寨文同属一个体系。字序皆自左而右,行序自上而下,但形体结构互有不同。傣仂文和傣绷文为圆形字母,傣哪文为方形字母,金平傣文方圆兼备,并有一些尖角形字母。傣仂文和金平傣文的辅音字母较多,都分高音和低音两组,各拼3个声调,傣哪文和傣绷文辅音字母较简单,分别为19个和18个,不分高低音组。傣仂文至少已使用七八百年,傣哪文始用于14世纪。这两种文字通行面较广,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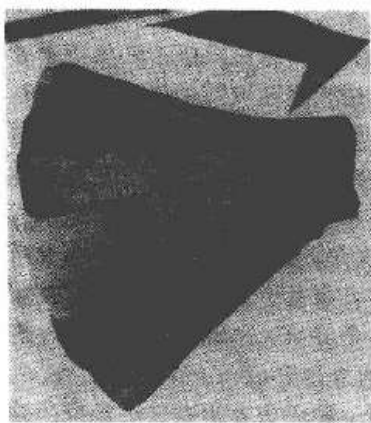


图1 傣绷文贝叶经

28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根据本族的意愿,对傣仂文和傣哪文分别进行改进。改进后的新傣文在保留原来字母形式和表音特点的基础上,根据实际音位增删了若干

存文献资料丰富。傣绷文和金平傣文创制年代尚待考证,使用面较窄,金平傣文文献不多。傣文文献包括政治历史、法律道德、天文历法、农田水利、宗教、占卜、故事唱词以及语文学、军事学等方面的著作。傣仂文并有大量贝叶经。(参见彩图插页第

图2 傣仂文贝叶经

图3 用两种新傣文出版的书籍

字母,改变或增添了声调符号,对字母读音、附加符号的使用和书写规则进行了规范化。改进后的傣仂文有42个辅音字母,分高低两组,表示21个辅音音位,有90个表示元音及复合韵母的字母或字母的组合形式,另设计了两个声调符号。傣哪文改进后仍保留19个辅音字母。有84个表示元音及复合韵母的字母或字母的组合形式,并增加了5个声调符号。这两种傣文改进后,取消了原来的合体字和异体字,只保留了少量省略形式。声韵调系统清楚,文字结构严密,较便于学习与印刷。出版了报刊、教材和各类书籍。

(张公瑾)

Daiyu

傣语 (Dai language) 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主要分布在中国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以及西南和南部的一些县。使用人口约84万(1982)。此外还分布在泰国、老挝、缅甸和越南。使用西双版纳方言和德宏方言的人口较多。西双版纳方言有21个声母,91个韵母;德宏方言有16个声母,84个韵母。两个方言各有6个舒声调、3个促声调。韵母中都有单元音韵母9个:a、i、e、ε、u、o、ɔ、w、ə(a带韵尾时分长短)。西双版纳方言带-i、-u、-m、-n、-ŋ、-p、-t、-k、-ʔ韵尾的韵母有82个,德宏方言没有带-ʔ韵尾的韵母,但有-w韵尾。词序和虚词是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句子的语序是主语—谓语—宾语。名词的修饰语在中心词之后,副词修饰动词或形容词时,其位置有前有后,因副词而异。语气助词很丰富,一般位于句末。单音节词和双音节的合成词占大多数,多音节的单纯词较少。四字格结构的词很丰富。有相当多的汉语借词。早期的汉语借词大多是单音节词,现代汉语借词大多是多音节词。在外语借词中,西双版纳方言由于受小乘佛教经书的影响,从巴利语借进了许多语词,这是同语族中其他语言所没有的。

(周耀文)

daishu yuyanxue

代数语言学 (algebraic linguistics) 数理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应用集合论、数理逻辑、算法理论、图论、格论、模糊数学等离散的、代数的方法研究语言现象的学科。

代数语言学的研究领域,目前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① 建立语言的数学模型,如美国逻辑学家、语言学家N. 乔姆斯基、苏联数学家O. C. 库拉金娜、语言学家Y. 巴尔-希列尔分别提出了语言的生成性模型、分析性模型和辨识性模型。

② 研究形式语言及其与自动机的关系。乔姆斯基等人发现,一定类型的形式文法是与一定类型的自动机相对应的,文法是语言的生成程序,而相应的自动机则是该语言的识别程序。

③ 建立自然语言自动处理各种方法的理论。在人机对话研究中提出了扩充转移网络、语义网络等方法,在机器翻译研究中提出了从属分析法、预示分析法、树形分析法等方法,代数语言学要对这些方法进行理论上的研究。

④ 研究语音、语法、词汇、语义中的模糊现象。

⑤ 研究语言的句法结构与语义解释之间的关系,如孟德鸠语法等。

随着科学的发展,代数语言学正在不断地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代数语言学的研究,对于计算机程序语言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因而这门学科也引起了计算机科学家们广泛的注意。

(冯志伟)

Dai Zhen

戴震 (1723~1777) 中国清代思想家、考据学家。字东原,安徽休宁人。乾隆举人,后参加纂修《四库全书》。对经学、天文、历算、地理、音韵、训诂等均有深入研究,为乾嘉时期“皖派”考据大师。著述有《毛郑诗考正》、《声韵考》、《声类表》、《考工记图》、《勾股割圆记》、校《水经注》等。



戴震在古音学的研究上有重要成就。他最初把古韵分为7类20部,后来又改为9类25部。他所选定的韵目全是影纽字,这正表明了他懂得音理,因为影纽字没有辅音声母,更容易看出韵母的实际情况。他的第1类是收喉音的,第2类至第5类是收鼻音的,第6类、第7类是收齿音的,第8类、第9类是收唇音的。每一类之中又分阳声、阴声、入声3类。认为阳声韵是《切韵》音系里有入声之韵,阴声韵是无入声之韵。他对古韵的研究首先有主观的音理(实即等韵),不肯纯任客观,这是与段玉裁、王念孙等人最大不同的地方。凡是他认为应该合在一韵的,就说是审音本一类;凡是他认为应该分开的,就说是审音非一类。这影响到他对古韵的进一步深入研究。

概括起来,戴震对古音学的最大贡献有两点:①把入声韵独立,看到了阴、阳、入三者相配的事实。同时,还用音理来说明声韵正转的道理:“正转之法有三:一为转而不出其类,脂转皆,之转咍,支转佳是也;一为相配互转,真、文、魂、先转脂、微、灰、齐……是也;一为联贯递转,蒸、登转东,……是也。”(《答段若膺论韵》)这对以后古音学的研究产生很大影响,他的学生孔广森(1752~1786)据此明确提出阴阳对转的理论。②把去声祭、泰、夫、废4韵同入声月、曷、末、黠、德、屑6韵分开,各自独立成一部。他认为这些韵无论从谐声系统,还是从《诗经》用韵,都不应该合在脂微部。

(谢纪锋)

Danmalyu

丹麦语 (Danish language) 丹麦的官方语言。属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北支(又称斯堪的纳维亚语支)。使用人口除本国约500万外,德国北部毗邻诸州以及其他国家有40余万。丹麦语与挪威语、瑞典语十分接近。

丹麦语的历史可分为4个时期:①早期中古丹麦语(1100~1350),丹麦语与瑞典语分离,成为独立的语言。拉丁与希腊语的宗教语词被大量吸收,语音有较大变化。②后期中古丹麦语(1350~1500),从德语吸收了大量名词和动词,也吸收了前缀和后缀。③早期近代丹麦语(1500~1700)。1550年丹麦文《圣经》译本问世,标准国语初步形成。④晚期近代丹麦语(1700以后)从意大利、

荷兰、德国、英国、美国吸收了大量有关文化和科技的词汇。第一部丹麦语拼写法于1889年制订。

丹麦语语音中有一个特别的喉塞音，即喉头有一个短促而明显的停顿。有些词虽然书面形式相同，但发音时是否带喉塞音可以使词义截然不同。重音通常落在第一个音节上。除某些方言外，乐音音调正在消失。近代丹麦语语法形式已经简化，只有两个格（主格和属格），两个性（通性和中性）。动词有时态变化。不定冠词通性用en，中性用et；定冠词通常加在名词之后，通性单数名词加-en，中性单数加-et，复数不分性一律加-ne。名词词首字母的大写已经废除。数词21~99用20进制。丹麦

丹麦作家 H. C. 安徒生《皇帝的新装》片段

语采用拉丁字母（见图），但多3个元音字母：æ、ø、å。和挪威语一样，许多字母不发音。（朱昌年）

Dangqian Wenzhi Gaige de Renwu

《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Present-Day Tasks of Language Reform) 周恩来总理于1958年1月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报告会上作的报告。目的是为了消除当时一些人（主要是知识分子）对文字改革的误解和疑虑，号召大家积极支持和促进文字改革工作。这个报告是中国文字改革工作的重要指导性文件，对文字改革的方针、任务和政策作了明确的规定，对文字改革的健康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报告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谈简化汉字。指出简化字是受到包括工人、农民、小学生和教师在内的广大群众热烈欢迎的。认为“汉字简化既然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我们知识分子就应该积极支持这项工作，而不是消极对待。我们应该从六亿人口出发来考虑文字改革的问题，而不是从个人的习惯和一时的方便来看这个问题。”指出汉字简化方案的制定可以把社会上使用简化字的一些分歧引导到一个统一的规范。并指出书法艺术不受汉字简化的限制。

第二部分谈推广普通话。指出当前中国存在着严重的方言分歧：“对于我国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都带来了不利影响。”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实现了历史上空前的统一，人们就越来越感觉到使用一种共同语言的迫切需要。“因此，在我国汉族人民中努力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就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推广普通话应该以学校为重点，首先在儿童和青年中进行。对不同的对象应该有不同的要求。推广普通话不是禁止和消灭方言。

第三部分谈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首先说明汉语拼音方案是用来帮助识汉字和推广普通话，并不是今

天就用来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以消除一部分人的误解和顾虑。此外，汉语拼音方案还有其他用途，如作为各少数民族创造或改革文字的共同基础，帮助外国人学习汉语，促进国际文化交流，音译外国的人名、地名和科学技术术语，编制索引等等。认为从这些功用看来，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是中国人民文化生活中一件大事。

报告中还谈了汉字和拼音文字的难易，汉语拼音方案的历史渊源，以及汉语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的理由等等。关于汉字要不要改革，认为目前可以不忙作出结论，但是“文字总是要变的，汉字过去的变化就可以证明”，“希望大家积极支持文字改革工作，促进这一工作而不要‘促退’这一工作。好使中国文字能够稳步地而又积极地得到改革。以适应六亿人民摆脱文化落后状态的需要，以适应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

（叶籁士）

dangwei

当为 又作当作，为汉代训诂学家所创术语，并被历代沿用。意思是某字是错字，当作某。段玉裁《周礼汉读考·序》说：“当为者，定为字之误、声之误而改其字也，为救正之词。”“字误声误而正之，皆谓之当为。”字之误，即因二字形体相近而误；声之误，即因二字声音相同或相近而误。例如《周礼·天官·内饔》：“豕盲眦而交睫，腥。”郑玄注：“腥，当为星，声之误也。”“星”指肉中的绦虫卵，因与“腥”同音而误书。又《小宰》：“掌建邦之官刑以治王官之政令，凡官之纠禁……”郑玄注：“杜子春云，‘官’皆当为‘官’。”官、官即因形近而误书。当为（当作）既为“救正之词”，所以也为后代校勘学所沿用。（许嘉璐）

dangzuo

当作 见当为。

De'angyu

德昂语 (De'ang language) 原称崩龙语。属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佤-德昂(原称佤-崩龙)语支。在中国主要分布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以及临沧、保山、思茅等地区。使用人口1万多(1982)。缅甸境内也有使用者。德昂语分为纳昂、布雷、若买3个方言。以纳昂方言硝厂沟话为例，有辅音31个。鼻音有清化和不清化两套；塞音、塞擦音分清浊；复辅音比较丰富，如pl、phl、bl、kl、khl、gl、pr、phr、br、kr、khr、gr、mp、mph、mb、mpl、mphl、mbl、ŋ²、ŋh等。辅音都可以居于音节的开头，居于音节末尾的有p、t、k、m、n、ŋ、²、h以及布雷方言的r等。有长短元音15个，但有的短元音只出现在极少数的词里，起区别词义的作用；有二合、三合复元音；元音后面还可以带辅音尾。词汇以单音节根词为基础。构词除了用词根复合法外，也有用词根加前加成分的，如gǎi²（胶）、a gǎi²（胶子）。用语音变化表示词性，如dih（夯，动词）、ndih（夯，名词）。人称代词有单数、双数和复数的区别，以根词元音内部的屈折变化区分人称代词的双数与

复数,如?ai(咱俩)、?e(咱们)、zai(我俩)、ze(我们)。修饰语一般在被修饰语之后。句子成分的基本次序是:主语—谓语—宾语。(颜其香)

Deyu

德语 (German language)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奥地利的官方语言,也是瑞士的4种官方语言之一,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之一。属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西支。分布于民主德国、联邦德国、奥地利和列支敦士登,也是瑞士和卢森堡的主要语言之一。此外,法国的阿尔萨斯、洛林、苏联和罗马尼亚等国的德国移民区、以及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等地也有少数人使用德语。使用人口总计约1.1亿。

德语分为高地德语和低地德语。高地德语是共同语,它采用了低地德语的某些发音规则。通用的书面语以高地德语为准。各方言间的差别很大。高地德语和低地德语的语言分界线大致从联邦德国西北部的亚琛起,向东经莱茵河畔的本拉特、卡塞尔、民主德国的马格德堡直到奥得河畔的浮斯滕堡,这条线以南是高地德语,以北是低地德语。

从5~8、9世纪,在日耳曼语中发生的第二次音变(也称高地德语音变)使德语从共同日耳曼语中分化出来,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语言。12~16世纪,由于德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以及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1483~1546)的《圣经》德语译本和他的其他著作的传播,书面共同语开始形成。

现代德语标准音到19世纪末才形成,有5个单元音:a、e、i、o、u,3个变元音:ä、ö、ü,这8个元音都有长音和短音,有3个复合元音:ei(ai)、au、eu(äu)。元音的长短区别是德语语音的重要特征。长元音和短元音具有区别词义的功能,如Staat/jta:t/(国家),Stadt/jtat/(城市)。长元音的拼写标志可以是元音字母重叠aa、ee、oo、ie,也可以在元音字母后加字母h作为长音符号,如ah、eh、ih、oh、uh、äh、öh、üh,也可以在元音后加单个辅音字母,如Bad、gut。短元音的标志是在元音后面有重叠的辅音字母或两个以上的辅音,如Bett、Bild。元音e在非重读音节和前缀中大部分弱化,在后缀和词尾中全部弱化。辅音的特点:有7对清浊相对的辅音。浊辅音b、d、g在词尾时起清化作用,如lieb、Feld、Tag分别念为/li:p/、/felt/、/ta:k/。颤音既可发舌尖音/r/,也可发小舌音/ʀ/。

德语的词按语法功能分为10类:冠词、名词、代词、形容词、数词、动词、连词、介词、副词、感叹词。前6类有词形变化,称为可变词类;后4类无词形变化,称为不变词类。名词有3种性(阳性、阴性和中性)、4个格(主格、宾格、与格、所有格)和两个数(单数、复数)。在使用中,除名词本身发生某些变化外,主要依靠名词之前的冠词、代词、形容词和若干数词的变化来表示名词在句中的性、数、格。动词的变位包括人称、数、时(现在时、过去时、将来时、现在完成时、过去完成时、将来完成时)、语态(主动

语态、被动语态)、语式(直陈式、命令式、虚拟式)的变化。动词不定式的词尾大部分为en,少部分为eln、ern,根据其基本形态(不定式、过去式、第二分词式)变化时词尾的不同和词干元音是否变换,可分为弱变化、强变化和 irregular 变化动词。动词将来完成时在现代德语中已极少使用。

德语句子结构的特点:动词谓语为句子的核心,它要求各格的宾语或介词宾语和各种补语。在普通陈述句中,主语或其他句子成分居句首时,谓语动词总是居第二位。如果谓语由两部分构成,即由可变部分(时间助动词或情态助动词)和不变部分(动词的不定式或第二分词)构成,则可变部分居第二位(在有些句子中居第一位),而不变部分居句尾,这是德语特有的谓语“框架结构”。句法的另一个特点是从句中动词谓语位于句末,其句子成分的排列次序是:连词或关系代词—主语和其他句子成分—动词谓语。

德语的词汇量估计为30万~50万。按其来源可以分为3种:①继承词,指从印欧语和日耳曼语时期流传下来的词语及其派生词与复合词;②借词,指在历史上从外族语吸收的并已为德语同化了的词;③外来词,指从外族语吸收而仍保留原有特点的词。继承词和借词的重音绝大部分在第一个音节上,外来词的重音或在最后一个音节上,或在倒数第二或第三个音节上。词汇构成的特点是大量使用派生与复合的手段,复合构成在德语构词法中最为普遍。两个以上的各种词类的词均可复合成一个新词。名词第一个字母都要大写。



马丁·路德译的《圣经·新约》

德语采用拉丁字母,有26个,其中元音a、o、u有变音形式ä、ö、ü。另外还有一个字母ß作为短元音之后的ss的代用形式;ß本是由手写花体小写字母s与z所组成,不算作新字母。瑞士德语已正式废除了ß,一律用ss。x和y只用来拼写外来词。20世纪30年代以前,德语一直用花体字母,以后使用普通的拉丁字母。

德语对世界文化有过明显的贡献。马丁·路德所译的《圣经·新约》(见图)对现代德语共同语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在他的启发下,用北欧诸语言译出的《新约》也在本国起了语言的规范作用。19世纪德国哲学提供了启迪人的心智的概念和术语,直到今天人们谈到哲学问题仍不得不用德文原词以明本义。德国的医学和化学长期领先,这也使德语成为这些学科的研究者必须学习的语言。

参考书目

W. Schmidt,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prache*, 3. durchgesehene Auflage, Volk und Wissen Volkseigener Verlag, Berlin, 1980.

W. König, *Atlas zur deutschen Sprache*, 4. Auflage, Deutscher Taschenbuch-Verlag, München, 1981.

(董光熙)

deng

等 见等韵。

dengyun

等韵 等韵学研究的对象,通常二名不分。它是以音节表为主要方式对汉语字音进行分析的一门学科,是汉语音韵学的一个分支。

起源 《康熙字典》前头载的《明显四声等韵图》的说明说:“夫等韵者、梵语悉昙。”这就是说:等韵是比照梵文的悉昙章(siddham)仿造的。悉昙是印度小孩子刚识字用的拼音表,唐代和尚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说:“六岁童子学之六月方了。”(《大正藏》2125号228页,以下引《大正藏》,只注号和页码)梵文一共有14个元音:a、ā、i、ī、u、ū、ṛ、ṝ、l̄、e、ai、o、au。此外还有两个书写的附加号:“大空点”ṃ (anusvāra),表示前头元音鼻化;“涅槃点”ḥ (visarga),表示前头的元音末尾上声带停止颤动。如果连这两个(用am、ah作代表)也算上,就可以把元音数成16个。唐代和尚智广以下多数人认为从ṛ起以下4个字平常少用(第4个根本不用),就把元音数成12个。梵文的辅音一共有k、kh、g、gh、ṅ、c、ch、j、jh、ñ、t、th、d、ḍh、ṇ、t、th、d、dh、n、p、ph、b、bh、m、y、r、l、v、ś、ṣ、s、h 33个。拿一个一个的元音来轮流跟33个辅音拼,比方ka、kā、ki、kī……kha……ga……gha……ṅa……; ca……cha……; ṭa……ṭha……; ta……tha……; pa……pha……; ya……ra……la……va……śa……ṣa……sa……ha……。一共33×12=396个不同的音节,这就是第一章。第二章往下,第一个辅音(前)后头就有别的辅(介)音了。第二章是kya……khyā……gya……ghya……ṅya……, cya……chya……。第三章是kra……khra……gra……ghra……ṅra……, cra……chra……。轮流拼,就

叫“转”(parivarta)。这个梵文字也等于“章”(见内外转),在佛经里叫“品”。

从东汉起,汉人开始学佛翻经。可是绝大多数是显教经。学这个,不用懂梵文。除了《大般涅槃经·文字品》那类的零星几处接触到梵文以外,人们并不理会悉昙。

到初唐,掺杂着巫术的密教大规模流入中国。译这种经,需要对译大段的咒语(真言),人们才开始学悉昙,并且斟酌用什么字对梵文某个音才妥当。日本释安然(841~?)《悉昙藏》五说:“上代翻译,梵汉不定。真言对注,梵唐粗定。”(2702号418页)可以证明。日本1984年3月新刊《六地藏寺善本丛刊,别卷》318页有《真言宗教时义问答》正是安然的另一部作品,可以说明密教跟悉昙学的关系有多么密切。

汉人学悉昙久了,就仿造出唐音表来了,这就是等韵图。现存最早的韵图是《韵镜》,是宋代流到日本清末又从日本传回来的。可是《别卷》316页著录《韵镜字相传口授目录·指微韵镜序闻书》一册,编者引“相传口授”原文说:“悉昙末师有誤其故。”可见日本和尚还认为《韵镜》就是悉昙学。

比照悉昙造韵图并不完全是亦步亦趋。梵文元音14个,汉语韵有206个。字母(开头辅音)相传是36个。用206×36作一章根本办不到。只好用一韵或是几个相似的韵作一个图,用声母轮转。全书用206韵(分成若干组)轮转。几个韵概括成一个单位就叫“摄”。摄(parigraha)是佛书里表示“概括”的词,比方《因明入正理论》就说:“如是总摄诸论要义。”(1629号10页)206分为平、上、去、入4部分,得数在60上下,再概括成12或是16摄就不难了(最早的等韵图只概括成40左右个“图”。《韵镜·调韵指微》叫“四十三转”,还没有“摄”这个术语。《明显四声等韵图》直接叫“章”)。

图式 现在用《韵镜》的《外转第二十三开》图举例说明(图1)。“开”表示没有u类介音,“合”表示有。后代音韵学家合起来叫“呼”。这个字原来只不过当现代话“发音”或者“念”讲,后来“呼”也变成术语,成了“开口呼”和“合口呼”的总名称。整个图横着有6大格,竖着有5大格。顶上的6个大格是作图的人用来说明开头辅音(字母)的性质的。从右往左第1格里是“唇音”,第2格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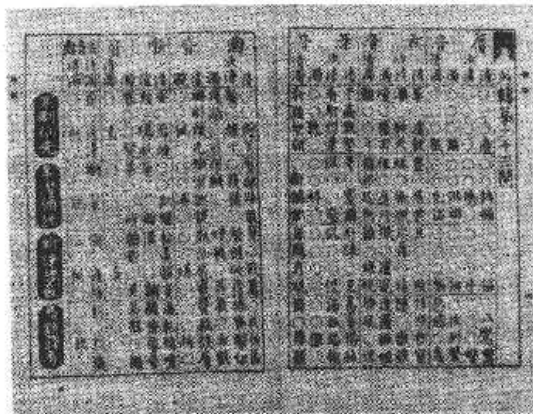


图1 《韵镜》外转第二十三开

“舌音”，第3格是“牙音”，第4格是“齿音”，第5格是“喉音”，这5组总名“五音”。《通志·七音略》用宫、商、角、徵、羽，是借用音乐术语(C、D、E、G、A)，没什么道理。第6格是“舌齿音”，包括“半舌音”、“半齿音”。《韵镜》卷首的《调韵指微》说：“若来字则先舌后齿，谓之舌齿；日字则先齿后舌，谓之齿舌。”《七音略》叫“半徵、半商”。唇、舌、牙、齿、喉、半舌、半齿总名叫“七音”。一共得36字母，排列为23竖行。在《调韵指微》后头有一张《三十六字母》表：

帮滂並明端透定泥见溪群疑精清从心邪影晓匣喻来日
非敷奉微知彻澄娘 照穿床审禅

这里“唇音”有两组。一组叫“唇音重”(后来习惯叫“重唇”)，包括帮滂並明。据现代人拟测，大概作书的时候发“双唇音”。另一组叫“唇音轻”(后来叫“轻唇”)包括非敷奉微，大概发“唇齿音”。“舌音”也有两组。一组叫“舌头音”，包括端透定泥。这就是用舌尖在齿背发塞音，另一组叫“舌上音”，包括知彻澄娘，罗常培说就是用舌尖在齿龈后发音。“齿音”也有两组，一组叫“齿头音”包括精清从心邪，这就是舌尖在齿背发塞擦音和擦音。另一组叫正齿音，包括照穿床审禅，大概用舌叶(或舌尖)在齿龈或齿龈后发音。“牙音”包括见溪群疑，是舌根塞音和同部位鼻音。“喉音”包括影晓匣喻，是舌根擦音、喉塞音和半元音。“半舌音”指来母，是边音。半齿音指日母，一般认为是舌面前鼻音加擦音。梵文的“摩多”*māta*或*mātrkā*原来当母亲讲，以后用来指14个元音再加大空、涅槃两个点，大致就是母音。再用来称开头辅音是借用，因为梵文偶然也用*māta*泛指一切字母表。

顶上的每一个大格里在“唇音”、“牙音”等总名下还有“清”、“次清”、“浊”、“清浊”各种注释。“清”和“浊”从先秦就用作音乐的术语。《韩非子·十过》就提到过“清商”、“清角”等等乐曲。孔颖达《礼记·乐记·正义》说：“黄钟至仲吕为浊，长者浊也。蕤宾至应钟为清，短者清也。”长短是指律管说的。管子长，音就低；管子短，音就高；这是管乐器的规律。因为辅音，特别是塞辅音的声带颤动一般地说是低频的，那么梵文的*nādaḥ*、*ghoṣaḥ*译成“浊”是最自然的。*śvāsaḥ*、*aghoṣaḥ*自然要译成“清”。辅音影响字调。全国大多数分清(阴)浊(阳)平的方言，绝大多数都是清高浊低。广州方音是最典型的。它的四声分裂后每一种都是清高浊低。日本释明觉《悉昙要诀》一：“初低终昂之音可为上声之重。”(2706号507页)说明唐代输入日本的音浊上声是开头低的。日本释了尊《悉昙轮略图抄》一：“上声重，初低后昂；上声轻，初后俱昂。”(2709号657页)也可以作证。释安然《悉昙藏》三引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说：“右脚等廿五字并下八字，总有卅三字，名‘初章’；皆须上声读之，不可著其字而为平去入也。”(2702号380页)这就是说，念梵文*ka*……等辅音字母必得用高平调(*udātta*)，不该光执着汉字改念别的调。从这里看，“清”就是声带不颤动，影响得字调高。梵文比声第1个字叫*prathama*，第2个叫*dvitiya*，汉译

“次清”，不过是第2个清音的意思。误以为“次”是“较差”，从而给“清”上加“全(清)”等字是望文生训。鼻、边音叫“清浊”是因为分析不精密。

从上文所引释了尊的话来看，他用“轻重”代替“清浊”。裴氏《涅槃文字》(2702号412页)在*ka*下注“稍轻呼之”，*kha*下注“稍重声呼之”。可见“轻”指*alpaprāṇa*(小气)，“重”指*mahāprāṇa*(大气)。等韵书里不都遵从这个正确定义，有不少用得不正确。

竖着第2大格是平声字，第3是上声字，第4是去声字，第5是入声字。平、上、去、入总名“四声”。每图最左边末一格里的大字是《广韵》或《礼部韵略》的韵目，图里有音没字的就划圈儿。在一个大格里，字排成4个小横行。第1行叫一等，第2行叫二等，第3行叫三等，第4行叫四等。“等韵”这个名字就从这里兴起。“等”代表什么呢？清代江永《音学辨微》说：“音韵有四等。一等洪大，二等次大，三四皆细，而四尤细。”从这个话看，“等”是说主元音的开口度。拿《韵镜》外转第二十三开看，尽左边格子里写“寒、删、仙、先”4个韵目，正对着一、二、三、四等。据瑞典高本汉等人拟测，唐代人念一等用[ɑ]元音。念二等用[ɐ]类元音。念三等用[ɛ]元音，并且有*i*类性质的介音。念四等用[e]元音。既然分4个韵，那主元音肯定不能一样。江永的话可信。不过因为有些开头辅音(字母、组)只和某一“等”的韵拼，比方非、敷、奉、微一般地说只和三等韵拼，人们也就叫它们“三等纽”。这是术语借用。要是有一些纽，只拼一、四等韵，如精、清等纽，又有些纽，只拼二、三等韵，如照、穿等纽，人们就可以把它们合写在一个大格里了。由于声母和“等”有固定的配合关系，所以江永又说：“辨等之法，须于字母辨之”，就是利用声母逆推韵属于哪一等。有韵图的人可以不必费这个事。

等韵家用术语，并不划一。《韵镜》齐韵列在外转第十三开，是四等韵。“雞”字“古奚切”，跟一等韵的“该”字“古哀切”用同一个切上字。内转第五合的支韵“规”字也填在四等，可是“居随切”，并不用“古”作切上字。据高本汉等人研究，《切韵》的“古”、“居”不是一类：那么四等就有两种了。陆志韦把齐、先、萧……和一等用相同切上字的叫“纯”四等韵，把支、脂、祭、真、仙、宵、侵、盐等既有三等字又有四等字的韵叫“三、四等合韵”。把这类三、四等合韵里喉牙唇音既有三等又有四等的叫“重出喉牙唇音”，董同龢叫“重组”。陆的解释是纯四等没介音，三、四等合韵的三等用*i*介音，四等用*i*介音。日本释明觉《悉昙要诀》二说：“i……玄奘云‘壹’……。”(2706号527页)唐释慧琳《一切经音义》廿五把*rī*注成“乙上乙去声”(2128号470页)。这两种材料可能显示唐音重组三等介音是*r*，四等介音是半元音*y*。从这儿往下推，他念*r*用*ri*音，跟印度、欧洲大多数人一样。他的“乙”念[*ʔrid]，“一”念[*ʔyid]。“乙”是质韵重组三等字，“一”是重组四等字。

用法 后代人用等韵，主要是帮助人们从反切推出各个字的当代念法来。现在拿《切韵指掌图》作例(图2)。



图2 《切韵指掌图·二十图总目》

这部书开头有个《二十图总目》这就等于个索引。它们是：①高、娇(-ao、-iao)，②公、弓(-ong、-iong)，③孤、居(-u、-ü)，④钩、鳩(-ou、-iou)，⑤甘、兼(-am、-iam)，⑥金(-im)，⑦干、健(-an、-ian)，⑧官、涓(-uan、-üan)，⑨根、斤(-en、-in)，⑩昆、君(-un、-ün)，⑪歌、迦(-e、-ia)，⑫戈(果)、瓜(-uo、-ua)，⑬刚、薑(-ang、-iang)，⑭光(-uang)，⑮觥、肩(-ong、-iong)，⑯柜、惊(-eng、-ing)，⑰该、皆(-ai、-ie)，⑱基(-i)，⑲傀(-uei)，⑳乖(-uai)。⑤⑥的音只有唱昆曲的人用。这里发音和现代音有些不谐调，是因为成书在宋代。查字的人遇见一个“缸”字，注说“古红切”。利用总图，知道“古”在第3图。翻到第3图，查着“古”在上声格第1横行，竖行黑地白字“见”字下头。再利用总图知道-ong在第2图。翻到第2图，查着“洪”(=红)字在黑地白字“匣”字下头。现在横着推到“见”字格，就知道“缸”字在这里念“公”。本书《检例上》说：“先求上字居何母，次求引韵去横搜。”就说的就是这个过程。

再比方查着“良”字“许良切”。从第3图知道“许”属“晓”母第3横行。再利用总图查到第13图，“良”在黑地白字“来”字下头第4横行。从这里横着推到“晓”字格，遇上一个○，再往上错一个格，是“香”字。就知道“良”字该念“香”。《检例上》说：“本眼空时上下取。”再比方查着“枉”字“篇夷切”。查总图知道-ian在第8图，查到那里“篇”本身是在黑地白字的“滂”字下头。从总图查到-i属第18图。查到那里，“移”字在“喻”字底下。横推到“滂”字竖行，一片白圈。只好查第19图，“滂”字行下是“铍”字，就知道“枉”字念“铍”。《检例上》说：“此叶全无前后收。”再比方查着“甥”字“余救切”。利用总图查着“余”的同音字“昇”在第3图“喻”字下头第4横行。查第4图知道“救”在“见”字下头。横推到“喻”字下头去声第4横行，遇上“狄”这个怪字。本身难认，只好从上头的平声推到上声，是“由、酉”，那么这个字念“又”。《检例上》说：“见字偶然又不识，平上去入可寻求。”说的就是查这一类字的办法。

音韵学家利用早期等韵书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切韵》音系，利用晚期等韵书，可以推求作书的人的方音，考定宋以来的音变。

演变 流传久了，语音变了，人们就觉着某些等韵书跟实际语音不合。大势所趋，人们不得不改动。大致说，

宋元人是零修碎补，明清人就不免大拆大改，特别利害的是“官话”区的作者。这种作品，与其说是作等韵书，不如说写方音调查报告，到这里，等韵跟悉县的关系一点儿也没了。

例外 在演变的过程里人们发现《韵书》中有些反切跟等韵的安排并不完全吻合。比方《切韵指掌图》卷首《辨匣喻二字母切字歌》说：“匣阙三四喻中觅，喻亏一二匣中穷。上古《释》(如《经典释文》)《音》(如臣瓚《汉书音义》)多具载，当今《篇》(《玉篇》、《类篇》)《韵》(《广韵》、《集韵》)少相逢。”就是说的这类现象。

和尚们是很谨慎(保守)的。他们只立些条例说明些例外，但是并不轻易改动。比方《切韵指掌图》有《辨检类隔切例》说：“以‘苻’代‘蒲’，其类‘奉’、‘並’。……以‘无’代‘模’，其类‘微’、‘明’，以‘丁’代‘中’，其类‘知’、‘端’。……‘皮’字《广韵》‘苻’切……(‘苻’字是奉字母)下合为类隔；于‘並’字以下取一‘蒲’字，作‘蒲’切音皮字明矣。”这类解释例外的文字后来叫“门法”。《四库提要》在《经史正音切韵指南》底下说的“原本末附明释真空《直指玉钥匙》一卷。验之即真空编《贯珠集》中，……不知何人割裂其文，缀于此书之后，又附若愚《直指法门》一卷，词旨拙涩，与《贯珠》相等，亦无可采……”可以代表后代多数学者的评论。大体贬多褒少。

《广韵》每卷韵目下头注“独用”、“×同用”字样，说明归并韵是半合法的。如《指掌图》把“支脂之”合成一类，人们没有怨言。“字母”后代变了，有人合并，就招来反对。江永《音学辨微辨字母》说：“不可增不可减不可移易。”代表正统意见。《康熙字典》前头录的《内含四声音韵图》，字母保持36个，韵只剩两页了。也有大胆删字母的，如《早梅诗》。

参考书目

- 释安然：《悉县藏》(《大正新修大藏经》)，日本。
- 汲古书院刊：《六地藏寺善本丛刊·别卷》，日本。
- 《韵镜》。
- 郑樵：《通志·七音略》。
- 司马光(旧题)：《切韵指掌图》。
- 江永：《音学辨微》。
-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俞 敏)

Dengyu

僇语 (Deng languages) 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景颇语支，国外有人认为属喜马拉雅语支，也有人认为语支未定。分布在中国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察隅县，使用人口约1万多(1982)。印度北阿萨姆地区也有少量使用者。僇人根据自称的不同，分别使用“达让”和“格曼”两种语言。

察隅县巴安通乡夏尼村的达让僇语有49个声母，其中单辅音34个，复辅音15个；有44个韵母，其中单元音6个，复元音和鼻音尾韵各19个；有4个声调。名词后加 tɕu³¹(们)表示复数，加 a⁵⁵(子)表示指小，亲属称谓名词前加 a³¹(我的)、na⁵⁵(你的)分别表示第一、二人称的人

称领属。量词不丰富。动词有体、式、态、方向等语法范畴,用屈折形态和语尾助词等方式表达。助词分结构、定指、语气、语尾4类。领属结构助词用 $a^{31}ba^{55}$ (的),受动用 we^{55} 或 we^{31} (对),施动、工具、处所用 go^{31} (用、里),从由用 nu^{31} 、 ma^{55} (从),比较用 don^{31} (比)。基本语序为主语—宾语—谓语。附加法和复合法都是构词的重要手段。加词头、词尾的派生词约占词汇的1/3以上,有30个构词词头。

察隅县下察隅区萨穹村的格曼僇语有53个声母,其中单辅音声母31个,复辅音声母22个,有91个韵母,其中单元音韵母6个,复元音韵母17个,带-m、-n、-ŋ、-p、-t、-k、-l韵尾的韵母68个,有4个声调。名词后加 $s\dot{a}n^{55}$ (们)表示复数,加 sa^{55} (子)表示指小。量词不丰富。人称代词有单数、双数和复数。疑问代词重叠表示复数。动词有人称、数、时态、体、态、式、方向等语法范畴,用屈折形态、加附加成分等方式表达。助词有结构、定指、语气3类。领属助词用 $mp\dot{h}a^{35}$ (的),施动用 ka^{35} (把),受动用 ji^{35} 或 wi^{35} (对),比较用 $n\dot{a}ŋ^{55}xi^{55}$ (比),处所助词如表示高处则用 xai^{55} (上)、 xa^{55} (上)、 tau^{55} (上)、 xi^{55} (之间),低处用 li^{55} (下)、 lit^{55} (下),从由用 $ja^{55}ka^{35}$ (处在下游方)、 $tau^{55}ka^{35}$ (处在上游方)、 $li^{55}ka^{35}$ (处在下方)、 $xai^{55}ka^{35}$ (处在上方)。句子的基本语序为主语—宾语—谓语。有34个构词词头,复合词中有并列、修饰、表述、支配等关系。

(孙宏开)

dimingxue

地名学 (toponomastics) 研究地名的由来、语词构成、演变、分布规律、功能以及地名与自然和社会环境之间关系的一门学科。英语中又称 toponymy 或 toponomy。

地名是人们在相互交往中为了识别周围的环境对位于地表特定空间位置上的地方所赋予的指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地理领域的扩大,地名命名的对象目前已不限于地球表面而扩大到海底和星球。

地名由词或词组构成,是表示单独概念的专有名称。地名作为语词既有语音又有意义,用文字书写又有了字形。地名的意义除了指称意义外,也指构成地名的各个词(或词素)的本来意义,即书面场合中的字面意义。如“长江”这一地名,是指位于中国中部横贯东西的一条特定的大河,这是“长江”的指称意义。而长长的河是它的字面意义。地名是指称特定位置和特定类型的地方的,因此地名的指称意义又可细化为指位意义和指类意义。

民族不同,语文各异,地名构成的方式不尽相同。即使同一语言,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也会有一定的差别。

大多数地名都是以已有的语词为基础来构成的。尽管不少地名由于时代久远,命名的语言已不复存在,或在长期流传中原来的语音、字形已经变更,致使命名的理据难于查考,但地名的命名总是有一定原因的,或反映自然特征,或反映社会历史背景。

随着社会的发展、民族的迁徙或命名对象自身的兴废,地名会有不同程度的演变。但是,由于地名命名以后作为特定地方的代号被长期传播而又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从而使相当一批地名以及反映在地名语词中命名时代的某些信息得以流传下来。

依据不同的条件,例如按照语言系属、构词形态、产生年代、对象类型以及语义等等可以对地名进行不同的分类。不同类型地名的分布既受当地民族成分和语言的制约,又与社会发展水平和当地自然景观密切相关。

通过历史文献关于地名演变情况的记载与新旧地名的对比,通过地名语言分析和与地理景观相互关系的研究,对探索历史上的自然面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民族分布和迁徙以及方言、古语特征等可以提供有价值的资料。

地名功能的研究对发挥地名的作用和效能有重要意义。地名不仅是社会交际工具之一,本身还是信息的载体。地名被应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地图的重要内容之一。做好地名的科学管理、地名书写标准化、译写规范化,出版地名工具书,建立地名资料数据库提供快速检索等一系列实用问题,都属地名功能的研究范围。

地名的研究源远流长。中国大量的史书、志书、韵书等古籍中不仅记载了数量极多的地名,而且对许多地名的读音、含义、位置、演变以及命名规律都有阐述。如东汉初年班固(公元32~92)撰写的《汉书·地理志》中,就载有各类地名4000多处,并对部分地名的命名原由和名称演变作了说明。北魏郦道元(466?~527)的《水经注》中,所记载地名达2万处左右,有语源解释的达2300多处。不过地名学正式作为术语却是在19世纪后期,在西方语言学和测绘学的发展过程中,对地名研究兴趣激增的情况下提出来的,并开始出版地名学的专门著作,如1872年瑞士J. J. 埃格利的《地名学》,1903年奥地利J. W. 纳格尔斯的《地名学》。一些国家还相继成立了研究地名的机构,如1890年成立的美国地名委员会,1902年成立的瑞典地名委员会,1919年成立的英国地名常设委员会等。早期的地名学著作在探讨地名的基本性质之外,尤重于地名语源的考证,包括根据残留在地名中的古语成分来推论古代民族的分布和迁徙。J. 吉耶龙(1854~1926)于1902~1910年出版的《法兰西语言地图集》,促进了地名研究向地理学的方向发展。1926年法国A. 道扎的《地名起源和发展》,提出了用文化地理学的方法来探讨地名的年代层序。

当前地名学正处在发展阶段,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大致上有综合研究地名基本原理的普通地名学,包括地名产生和发展的基本规律,地名与语言、历史、地理的相互关系等内容;有研究一定区域内反映地名系统的历史地理条件的区域地名学;有研究个体地名的地名地志学;有研究地名的读音、书写和译写标准化等内容的实用地名学等。地名学的研究除了采用或综合地采用语言学、地理学、历史学的方法以外,还采用地图分析法来研究地名

的空间关系和数学统计法来研究不同类型的地名在数量上的对比关系。

地名学在科学上的归属问题目前有不同的看法。有些学者认为地名是语言词汇,属词汇学、词源学、语音学、语义学、方言学的研究内容,地名的语音、语法、词形等变异的研究又离不开语言学的方法,因而把地名学纳入专名学的范围,而专名学属于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另一部分学者认为地名是地方的指称,而这些地方是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地名不但指出地方的空间位置和类型,通常还反映出命名时代当地的或区域的自然地理或人文地理的特征,地名研究可以帮助了解现代一般性的和地方性的地理现象,并勾画出历史地理的面貌,探索区域开发过程,因而认为地名学应属地理学的分支。有些学者认为地名是历史的产物,地名的得名、演变都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地名特别是地名来源的研究离不开历史学的资料和方法,同时利用地名资料来解决某些历史问题有重要的意义,因而认为地名学应属历史学的范畴,成为历史地理学的一个分支。考虑到地名学研究的对象——地名既与语言学有关,又与地理学、历史学、测绘学、民族学、民俗学、考古学等多种学科有关,它不是孤立地借助于某一有关学科的方法,而是需要综合地运用有关科学的资料和方法。从发展角度来看,地名学应是多种学科有关的一门综合性的独立学科。

中国地名学的研究除了传统的地名沿革的考证以外,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地名的产生、发展和分布规律的研究,对地名形成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历史背景的论述,已日益增多。目前除了在历史学、地理学、语言学、测绘学、民族学的有关刊物上发表论著以外。全国发行的专业地名杂志已有《地名知识》和《地名丛刊》。1977年成立了中国地名委员会作为国家的地名管理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大比例尺地图测绘和地名普查,已搜集到数以百万计的地名资料。这些都为中国地名学的进一步发展创立了良好的基础。

参考书目

中国地名委员会办公室编:《地名学文集》,测绘出版社,北京,1985。

褚亚平主编:《地名学论稿》,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1985。

В. А. 茹奇克维奇著,崔志升译:《普通地名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1983。(В. А. Жучкевич, *Общая топонимика*, 3 изд., Минск, 1980.)

(杜祥明)

Dieya

《叠雅》 训诂书。清代史梦兰作。史梦兰(1818~1898)字香厓,号砚农,乐亭人。全书13卷,序作于清同治三年(1864)。作者把古代经史子集和诸家注疏中所用的叠字汇集在一起,按照《尔雅·释训》的体例,类聚意义相同的为一条,并加训释。所收的叠字有不见于《尔雅》、《小尔雅》、《广雅》、《骈雅》、《埤雅》的。搜罗较富,而且每条之后都自为疏证,引书极广,包括经史子集、类书、字书、韵书、训诂书、石鼓文以及《一切经音义》、《太平广记》

等书。所引都根据原书。经书、子书都注明出自哪一篇,史书注明出于哪一个人的传,诗文必注出题目和作者的时代,毫无含混之处,这是很可贵的。书末另附《双名录》一卷,辑录古代以双字为名的人。因为也是叠字,所以附录于后。

(周祖谟)

dieyun

叠韵 (assonance) 指两个汉字的韵部相同。如现代汉语普通话“苗条”[miao t'iau],是叠韵,韵母都是[iau]。所谓韵部相同,指韵腹韵尾相同,韵头的有无或有什么样的韵头可以不论,如普通话“蓝天”[lan t'ian]两字中,一个有韵头[i],一个没有韵头,可是韵腹和韵尾相同,也是叠韵。两个字是不是叠韵,不同方言区或不同时代的人认识并不完全一样。如闽南方言“屡次”[lu ts'u],“轮船”[lun tsun]都是叠韵,普通话则不是叠韵。又如“拙劣”,从《广韵》音系来说,拙,职悦切,劣,力辍切,都在薛韵,两个字是叠韵,但现代汉语则不是叠韵。

(谢纪锋)

diezi

叠字 指两个相同的汉字重叠起来用。有些是表示一事的重复,是两个词,但联在一起说。如《诗经·采芣》:“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是连续的动作,不是一采,所以说“采采”。有些则是在语意上有所加重,以增强感染力。如《文选·古诗十九首》:“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这种文字的叠用又是一种特殊的修辞手段。

通常在语言里所用的叠字,包括书面的和口头的,实际就是叠音,也就是两个音节的一个词。如《诗经·柏舟》:“耿耿不寐,如有隐忧。”《楚辞·湘君》:“石濂兮浅浅(jiān jiān),飞龙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长,期不信兮告予以不闲。”白居易《长恨歌》:“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尽期。”温庭筠《梦江南》:“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苹洲。”这些叠字都是一个词,跟单独的一个字意义不同,有的只能重叠用,不能单用,如“翩翩”,“翩”是“翩翩”一词的词素。其他如“迢迢”、“姍姍”、“娓娓”、“侃侃”、“婷婷”、“萋萋”等都是如此。

在语言里应用叠字的地方还很多。例如“红彤彤”、“白花花”、“绿油油”、“黑黝黝”、“乱糟糟”、“懒洋洋”之类的叠字加在形容词的后面成为一种后缀成分,使词意形象化,增强语感。又如“清清楚楚”、“庸庸碌碌”、“慌慌张张”、“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彷徨徘徊”、“空空洞洞”之类把一个词的两个词素都分别重叠起来加强语义,又是一种叠字的形式。这些都是汉语里特殊的東西。因为语言里使用了这样一种声音上的重叠,构成语言更加悦耳的声音美。叠字也称为重言。

(周祖谟)

Ding Du

丁度 (990~1053) 中国宋代音韵学家。字公雅,祥符(今河南开封)人。大中祥符中(约1012)登服勤

词学科,官至观文殿学士、尚书右丞。著有《迹英圣览》、《龟鉴精义》等。仁宗景祐四年(1037),奉诏与李淑主编《集韵》、《礼部韵略》。《集韵》是继《广韵》之后的一部重要的韵书。针对《广韵》的“繁略失当”(《集韵·韵例》),作了增益和删减工作。《礼部韵略》是由礼部颁行,供科举考试使用的官韵,是《集韵》的删节本,由《集韵》的53 525字减到9 590字(见韵书)。(刘广和)

Ding Shengshu

丁声树 (1909~) 中国语言学家。号梧梓,河南省邓县人,生于1909年3月9日。193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同年进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4~1948年赴美国考察。1949年后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委员、语言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语文》杂志主编等职。30和40年代,丁声树致力于古代汉语的研究,先后发表过《释否定词“弗”、“不”》、《诗经“式”字



说》、《论诗经中“何”、“曷”、“胡”》等论文。丁声树曾参加湖北、湖南、云南、四川等省的方言调查,并参加撰写《湖北方言调查报告》(1948),50年代与李荣一起领导方言调查专业人才的培训工作,主持调查昌黎方言和编写《昌黎方言志》(1960),并与他合编《汉语方言调查简表》(1956)以及署名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辑的《方言调查字表》(1955)、《方言词汇调查手册》(1956)、《古今字音对照手册》(1958)和《汉语音韵讲义》(1984)两书是丁声树对汉语音韵学的重要贡献。此外,他与吕叔湘、李荣等合著《现代汉语语法讲话》(1961)。60年代以来,丁声树主编《现代汉语词典》(1973)。(叶祥苓)

(叶祥苓)

Ding'e Zalu

《订讹杂录》 订正文字写法和读音谬误的书。清代胡鸣玉作。胡鸣玉字廷佩。江苏青浦人。《订讹杂录》刻于乾隆初年,后又一再重刻。嘉庆十八年(1813)萧山陈氏湖海楼雕本前有乾隆二十三年(1758)长洲沈德潜序。这部书共有10卷,类似唐代颜师古所作的《匡谬正俗》,考证常见的文字写法和

读音的谬误以及用典相沿的讹谬,分条驳正,所以书名《订讹杂录》。胡鸣玉善校讎,书中各条考订详明,间或有采录前人成说处,如顾炎武的《日知录》、王士禛的《居易录》之类,也不无参考价值。(周祖谟)

Dongbawen

东巴文 (Tomba script) 中国纳西族过去使用的图画文字以及由这种图画文字演变出来的象形文字。东巴文在纳西语里称sa³³ta⁵⁵lu³³ta⁵⁵,意思是“木石痕迹”。主要用于书写宗教经书。纳西族中通习宗教经书执行法事的人称东巴(to³³mba³¹),因而这种文字也就被称作东巴文。东巴文经书90%以上是用图画文字写成的(图1、2)。图画文字在文字发展史上处于从图画发展到文字的第一步。石刻纳西族《木氏历代宗谱》有16世祖牟保阿宗“且制本方文字”的记载。据此推算,图画文字的创制年代大约在12世纪下半叶到13世纪上半叶之间。图画文字大体上保持从左向右的书写方向。但是有时须从上向下或从下向上甚至从右向左阅读。字体多变,常常根据上下文形成新的字形结构和字组。一个形体往往可以同时表示几个意义。有许多结构互相依赖的复合字形。象形文字是东巴文发展的新阶段,是在哥巴文影响下产生的。书写咒语的需要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这个发展过程。象形文字的特点是:书写行款固定,一律从左向右横写。一个字只表示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往往就是一个词,不过也有几个音节组成一个词的情况。语音相同或相近的字可以通假,基本上已经由表意发展到表音。以单体象形字和指事字为主,也有形声字和会意字。国内现存东巴经书1万多册,仅北京图书馆、云南东巴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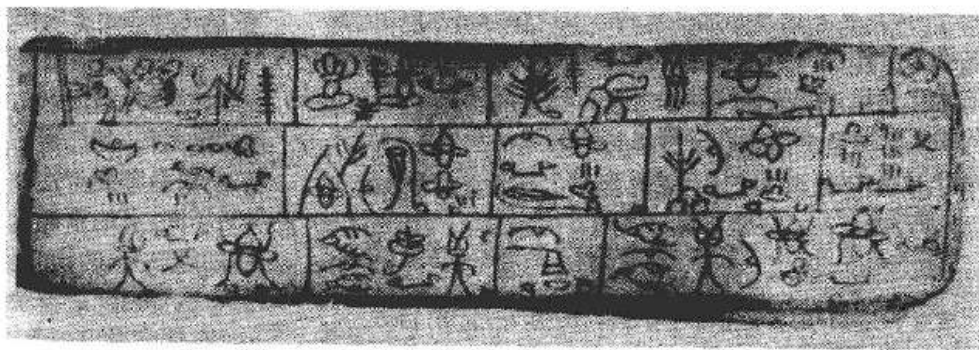


图1 东巴经之一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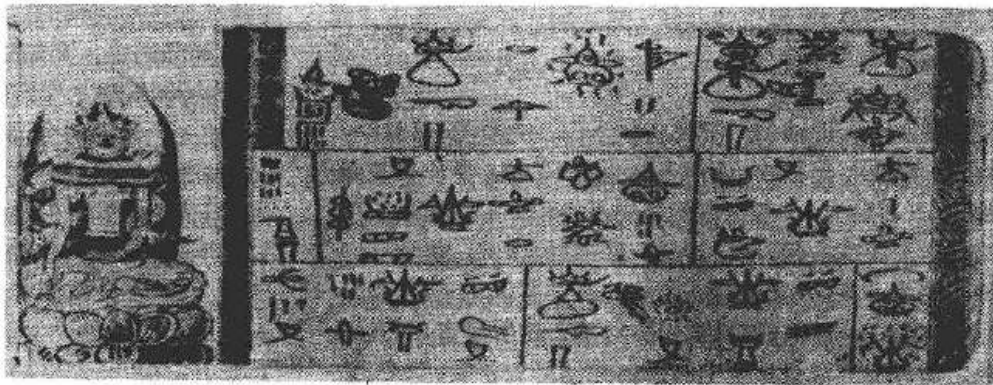


图2 东巴文《清严什罗经》的首页

化研究室两处就有8000多册。在国外,美国收藏最多,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有3000多册,哈佛燕京图书馆有500多册。东巴文经书内容丰富,是研究纳西族语言、文字、文学、哲学、宗教、神话、民俗、舞蹈、艺术、占卜的宝贵资料。(参见彩图插页第30页) (傅懋勤)

Dongbu Yuguyu

东部裕固语 (Eastern Yugur language) 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主要分布在中国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的康乐区、皇城区。使用人口约3000多人,占裕固族总人口的1/3。语音方面,单元音分长短,有15个: i、y、e、ø、ə、u、o、a、i:、y:、e:、ø:、u:、o:、a:。复元音也有15个: ia、iu、io、iou、ye、øi、ai、əu、ai、ui、ua、uai、uo、oi、ou。元音和谐有部位和谐和唇状和谐两种,包括词干内的和谐及词干与附加成分之间的和谐,但都只涉及一部分元音。辅音有32个: b、p、m、f、w、d、t、ʈ、ʂ、s、n、ŋ、r、l、ʃ、ʈ、ʂ、s、ʈ、ʂ、j、g、k、x、ŋ、q、q、x、h。由于第一个音节中的元音失落,在词首出现了复辅音。多音节词的重音落在最后一个音节上,如果在词干后递加附加成分而增加音节时,重音往后移动。语法方面,名词没有领格与宾格的区别,合成一个格,附加成分有3种形式: -ə、-in、-n,分别用在尾音不同的词干后。复数第一人称代词有排除式和包括式的区别,排除式为 buda(我们),包括式为 budas(咱们)。指示代词“这个”、“那个”各有两个词干,主格词干是 ene、tere,其他诸格词干是 un-、tun-。动词保留着以 -gda/-gde 为标志的被动态,以 -sa/-se/-so 为标志的希望式,以 -dac/-deg/-dog 和 -ma/-me/-mo 为标志的形动词,以 -magda/-megda/-mogda 为标志的紧随副动词等语法形式。词汇方面除蒙古语族同源词外,还有不少汉语借词、藏语借词、突厥语借词,其中突厥语借词多于其他任何一种蒙古语族语言。与蒙古语相同的语词比例也大于土族语、东乡语和保安语。(照那斯图)

Dongxiangyu

东乡语 (Dongxiang language) 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主要分布在中国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境内的东乡族自治县、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临夏县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伊宁、霍城等县,以东乡族自治县最为集中。使用人口约28万(1982)。各地口语比较一致。语音方面,有7个元音: i、ə、a、o、u、w、ɜ。有28个辅音: b、p、m、f、d、t、n、l、r、ʈ、ʂ、s、ʈ、ʂ、ʃ、ʈ、ʂ、z、g、k、x、ŋ、q、h、j、w。复元音较多,前响二合元音有 ai、ai、ao、ou,后响二合元音有 ia、ia、ua,三合元音有 iao、iou、uai、uoi。元音和谐已基本消失。出现在音节末的辅音只有 n,在以 n 结尾的音节里,主要元音鼻化。13世纪记录蒙古语的文献中出现在词首的辅音 h(现代蒙古语已经失落)在东乡语里是 x、f、h 或 ɕ。语法方面,领格和宾格合并为领-宾格,附加成分是 -ni。有使用频率不大的方面格 -rə 和方向格 -yun。造格用于人称代词,含鄙视

的意义。动词的语法范畴与蒙古语族的其他一些语言相比,较为简单。词汇方面,固有词里派生词占一定的比例,但是许多构词后缀现在已不活跃。有相当数量的汉语借词,还吸收了一些与宗教生活有关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借词。东乡族多兼通汉语,长期以来一直使用汉文。

(刘照雄)

Dongxiang yuzhi

东匈语支 (Eastern Huns branch) 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语支之一。按照苏联 H. A. 巴斯卡科夫(1905~)的分类法,凡历史上属于东匈部落联盟、东突厥汗国、回鹘汗国和黠戛斯部落联盟的突厥族诸语言,均划入突厥语族东匈语支。该语支包括古代的鄂尔浑-叶尼塞碑铭语言、回鹘语和现代的图瓦语、卡拉嘎斯(托伐)语、雅库特语、哈卡斯语、卡玛沁语、厥里克语、硕尔语、西部裕固语、柯尔克孜语和阿尔泰语。使用东匈语支语言的人口共有220多万(1970)。主要的语言特征:语音方面,除古代的鄂尔浑-叶尼塞碑铭语言和回鹘语外,多数语言都有由 -ax/-eg 变化来的长元音;除柯尔克孜语和阿尔泰语外,大都有辅音 z、d、t 的交替现象,而不是西匈语支语言的 j,例如, adaq//azaq(脚); b—p、d—t、k—g 等浊辅音与清辅音之间的分化较弱或没有分化;没有辅音 w、h。语法方面,复合句结构不发达,连词较少;名词和动词的结合形式非常多。词汇方面,有关畜牧业的词很丰富,并有大量的蒙古语借词。(胡振华)

Dong Zuobin

董作宾 (1895~1963) 中国甲骨学家、古史学家。字彦堂,号平庐,河南南阳人。清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1895年3月20日)生。1923~1924年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当研究生。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辑员,后改任研究员,曾多次参加该所的殷墟发掘工作。1949年随所往台湾。此后曾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和台湾大学教授。1963年11月23日在台北逝世。主要著作有《甲骨文断代研究例》(1933,收入《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册)、《殷历谱》(1945)、《西周年历谱》(1952,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3本下册)、《甲骨学五十年》(1955,后由严一萍改编为《甲骨学六十年》)、《中国年历总谱》(1959)等。台北艺文印书馆搜集董氏著作,编成《董作宾先生全集》,于1978年出版。



董作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历史语言研究所发掘殷墟所得的大量甲骨文的主要整理者。他第一个发现殷墟甲骨卜辞中记“贞人”之名的现象(董氏把为商王等卜问的人称作贞人),并根据卜辞中所记的商王对先人的

称呼、贞人之名以及卜辞字形、书体等方面的特点，进行综合的研究，以划分卜辞的时代，建立了甲骨文断代研究的学说。殷墟甲骨文存在的时间前后 200 余年，董作宾划分为 5 期：武丁以前为第 1 期，祖庚、祖甲为第 2 期，廪辛、康丁为第 3 期，武乙、文丁为第 4 期，帝乙、帝辛为第 5 期。后来董氏又提出了分派的说法，作为分期学说的补充。他根据甲骨卜辞所反映的礼制，把祖庚以前诸王和武乙、文丁划入旧派，其他诸王划入新派。董氏的断代学说，对甲骨文研究水平的提高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他的那些具体结论并非完全正确，后来的研究者已经提出了不少不同的意见。董氏还从“新派”的祭祀卜辞里整理出了商王按照严格规定的日程逐个祭祀先王先妣的“五种祀典”（后来的研究者或称为“周祭”）。这也是对甲骨学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贡献。

参考书目

严一萍：《董作宾先生年谱初稿》，收入《董作宾先生全集》第 12 册，艺文印书馆，台北，1978。

（裘锡圭）

Dong-Shui yuzhi

侗水语支 (Dong-Sui branch) 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语支之一。分布在中国贵州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和湖南省。包括侗语、水语、仡佬语、毛南语、拉珈语侗语、莫等。使用人口约 180 多万(1982)。把以上语言归为一个语支，除壮侗语族语言的共同特点外，主要依据 20 世纪 50 年代进行的壮侗语族常用词汇比较的结果。侗水语支内诸语言的同源常用词达 60~70%，侗水语支与仡佬语支诸语言的常用同源词为 30~45%，侗水语支与黎语支黎语的同源词仅 22%。除壮侗语族的共同词汇外，有一批侗水语支的共同词汇，其中包括壮侗、侗水、黎 3 个语支互不相同而各语支内部基本相同的词和两个语支相同而另一语支内部相同的词。这有助于确定语支的归属。侗水语支语言可分 3 个语组（见表）：①北部组，包

侗水语支 3 个语组的例词

	我	咱们	你	他	那	眼睛	鼻	舌	肠	一
侗语	ja:u ²	ta:u ¹	ŋa ²	ma:u ²	ta ²	ta ¹	naŋ ¹	ma ²	sa:i ²	la:u ²
仡佬语	həi ²	hja:u ¹	ŋa ¹	mə ²	ka ²	ja ¹	naŋ ¹	ma ²	khja:i ¹	ŋa:u ¹
水语	ju ²	da:u ¹	ŋa ²	man ¹	tɕa ²	da ¹	ʔnaŋ ¹	ma ²	ha:i ²	to ²
毛南语	fe ²	da:u ¹	ŋ ²	man ²	ka ²	da ²	ʔnaŋ ¹	ma ²	sa:i ²	to ²
拉珈语	tsi ¹	tau ¹	ma ²	lak ²	ŋan ² , nu ²	pla ¹	naŋ ¹	ŋwa ²	kjai ²	in ²

括侗语和仡佬语；②中部组，包括水、毛南、仡佬、莫等语言；③南部组，有拉珈语。现以榕江侗语、罗城仡佬语代表北部组，三都水语、环江毛南语代表中部组，金秀拉珈语代表南部组。从表中可以大体看出 3 组语言的异同情况。

（王 均）

Dong-Tai yuzu

侗台语族 (Dong-Tai group) 见壮侗语族。

Dongwen

侗文 (Dong writing) 见侗语。

Dongyu

侗语 (Dong language) 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分布于中国贵州、湖南、广西三省(区)交界的 20 多个县。使用人口约 140 万(1982)。分南部和北部两个方言。方言内又各分 3 个土语。语言特点：浊塞音声母已消失。韵母趋于简化。北部方言 6 个元音中只有一个短元音 ə；南部方言 6 个元音中有 2~4 个分长短。北部一些地区部分辅音韵尾如 -m、-p、-t、-k 有失落或合并的现象。声调有分化。南部方言第 2、第 3 两个土语有 6 个舒声调和 4 个促声调；北部方言第 1、第 2 两个土语和南部方言第 1 土语有 9 个舒声调和 6 个促声调。阴调类的送气声母字各分化出一个新调值。北部另一土语仅第 1 调有分化，因此有 7 个舒声调，4 个促声调。虚词和词序为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量词可以受它后边的实词或词组的修饰，在句子里做主语或宾语。名词的修饰语除数量词组在前外，一般在后；指示代词在最后。主语在谓语前，宾语在谓语后，补语多在宾语后。南部方言有“我们”和“咱们”的区别，北部方言一般不分。固有词汇以单音词为主；多音词中以双音的居多。南、北方言常用词的差异很小，相同词的平均数达 70% 左右。不同的词大都是各方言自成一派；北部方言的汉语借词比较多。有些词语，侗语固有词和汉语借词并存并用，新老借词也有并存并用的现象。1958 年创制了拉丁字母的拼音文字。

（王 均）

Dulongyu

独龙语 (Derung language) 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景颇语支，也有人认为语支未定。分布在中国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使用人口约 1 万(1982)。分独龙江和怒江两个方言。此外，还分布于

缅甸喀钦邦北部恩梅开江流域，称日旺 (Rawang) 或怒 (Nong)。语言特点（以云南贡山四区独龙江公社龙拉话为例）：有 51 个声母。塞音、塞擦音分清浊，不分送气与不送气。有腭化辅音、唇化辅音和复辅音，如 pj、lj、kw、ŋw、pl、mr 等。有 132 个韵母，其

中单元音 7 个，复元音 9 个，带辅音韵尾的 116 个。辅音韵尾有 -p、-t、-k、-ʔ、-m、-n、-ŋ、-l、-ɹ。有 3 个声调：55、53 和 31。以词序、助词和形态为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指人名词后加助词表示复数。亲属称谓名词前加词头表示不同的人称。量词较丰富。第一人称代词的双数和复数分包括式和排除式；人称代词重叠表示反身，疑问代词重叠表示复数。动词有人称、数、体、态、式、方向等语法

范畴,分别用屈折变化、加词头、词尾表示。一个动词词干可以连续接缀5个附加成分。助词有结构、定指、语气3类,结构助词包括施动、受动、工具、处所、从由、比较等。基本语序为主语—宾语—谓语。借词来自汉语、藏语、傣语、缅甸语等。

(孙宏开)

du tizi

独体字 (single characters) 指汉字的一个字只有一个单个的形体,不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形体组成的。这种字大都是一些简单的象形字和表意字。因为这类字是从图画演变而成的,所以每一个字都是一个整体。如日、月、山、水、牛、羊、犬、隹、人、止、子、戈、矢等都是独体的象形字;如天、立、上、下、一、二、三、三(四)、企、见、卧等都是独体的表意字。

独体字在现在使用的汉字里所占的比例很小,大多数的汉字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形体组成的合体字。独体的象形字和表意字是构成合体字的基础。

见合体字。

(周祖谟)

duru

读如 见读若。

du ruo

读若 又作“读如”、“读若某同”、“读与某同”。为汉代训诂学家所创术语,并被历代沿用。传注多用“读如”,其余则见于《说文解字》。段玉裁《周礼汉读考·序》说:“读如、读若者,拟其音也。古无反语,故为比方之词。”清代学者对此多持异议。钱大昕认为:“许氏书所云‘读若’、云‘读与同’,皆古书假借之例,假其音并假其义,音同而义亦随之,非后世譬况为音者可同日而语也。”《潜研堂文集·古同音假借说》王筠《说文释例》和张行孚《说文发疑》都认为,明音、明假借二者兼有,不可一概而论。洪颐煊《说文读例》则认为“读若”除释字音、通假借外,还有训字义的作用。近代学者的研究表明,《说文》中“读若”的基本作用是比况被释字的读音;读若字与被释字既然音同或音近,而用以比况的字又往往是比较通行的字或人所易晓的成语方言,因此读若字就有可能是被释字的假借字,或与被释字意义相通。例如“𪔐,门户疏窗也。读若疏”;“𪔐,调也,读与‘和’同”;“雁,鸟也。读若鴈”。古代文献中用“疏”不用“𪔐”,有些即为“𪔐”之假借;“𪔐”与“和”、“雁”与“鴈”,古多通用。

对传注中的“读如”,意见较为一致,即:不但拟音,而且指明假借。例如《周礼·春官·男巫》:“春招弭。”郑玄注:“杜子春读弭如弥兵之弥。”《礼记·儒行》:“起居竟信其志。”郑玄注:“信,读若‘屈伸’之‘伸’,假借字也。”杜、郑即以“弭”、“信”为“弥”、“伸”的假借。

读若、读如等都有以本字相释的情况。有时是该字一音数义,用读若、读如等指出该字在此处应是某义;有时该字虽然只有一音一义,也用读若、读如引出常语俗词

明确该字的音义。前者如《周礼·天官·大宰》:“六曰主,以利得民。”郑玄注:“利读如上思利民之利。”《说文》:“𪔐,数祭也。读若春麦为𪔐之𪔐。”后者如《周礼·考工记·陶人》:“庾实二𪔐。”郑玄注:“庾读如‘请益,与之庾’之‘庾’。”《说文》:“𪔐,固也。读若《诗》‘赤𪔐𪔐’。”

在传注中,读如与读为有时混乱。例如《周礼·天官》:“胥十有二人。”郑玄注:“胥,读如谿,谓其有才知为什长。”而在《大行人》“七岁属象胥”下又说“胥,读为谿。”

(许嘉璐)

du wei

读为 又作“读曰”,为汉代训诂学家所创术语,并被后代沿用,主要用于传注中,意思是改读为某字。段玉裁《周礼汉读考·序》说:“读为、读曰者,易其字也,易之以音相近之字,故为变化之词。”“变化主乎异,字异而义惊然也。”所谓“易字”,即换用本字以释借字。例如《诗经·卫风·氓》:“淇则有岸,隰则有泮。”郑笺:“泮,读为畔。”“泮”本为“诸侯饗射之宫也”(《说文系传》),在此处为涯岸之义,郑谓为畔之借字。《礼记·乐记》:“武坐,致右,宪左。”郑玄注:“宪,读为轩,声之误也。”此谓“宪”为“轩”之借字,假借的缘由是二字声近误用。《尚书·舜典》:“播时百穀。”郑玄注:“时,读曰蒔。”“时”无种植义,所以以“蒔”读之则意义了然。

后代训诂学家在注释中单言“读”或“音”,其作用有时与读为(读曰)的意思相同。例如《淮南子·主术训》:“器械不苦而职事不嫚。”高诱注:“苦读𪔐。嫚读慢缓之慢。”即谓“苦”、“嫚”分别为“𪔐”、“慢”的假借字。𪔐是不坚牢的意思,慢是缓的意思。《汉书·息夫躬传》:“京师虽有武猛精兵,未有能窥左足而先应者也。”苏林注:“窥音跬。”意谓跬为正字,窥为借字。跬是半步的意思。

与读若(读如)一样,读为(读曰、读、音)也有以本字为训的情况。例如《汉书·高帝纪》:“五月丙寅,葬长陵。已下。”苏林注:“下音下书之下。”“下”字旧有上去二音,此说既定其音为去声,实际上也就明确其义,指出“下”是送下的意思。这种情况后来学者称为“破读”。

(许嘉璐)

du yue

读曰 见读为。

Duan Yucal

段玉裁 (1735~1815) 中国清代经学家、文字音韵训诂学家。字若膺,号茂堂,晚年又号砚北居士,长塘湖居士,侨吴老人。江苏金坛县人。生于雍正十三年,卒于嘉庆二十年。乾隆二十五年(1760)中乡试,入都会试,屡不中。乾隆三十五年(1770)吏部铨授贵州玉屏县知县,后又为四川富顺、南溪和巫山知县。经10年,称疾告归乡里。58岁时移居苏州阊门外之枝园。

段玉裁在京时,得师事戴震,并结识了钱大昕、邵晋涵(1743~1796)、姚鼐(1731~1815)等学者。返里后,又

得与卢文弨(1717~1795)、刘台拱、汪中(1744~1794)、金榜(1735~1801)等人相交。55岁时,二次入都,得识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商讨音韵、训诂,颇为契合。乾嘉时代汉学昌盛,段、王两家在音韵、训诂方面的贡献极大。



段玉裁博览群书,著述宏富,由经学以治小学。在小学范围内,又从音韵以治文字训诂。根基充实,深得要领。所著有《六书音均表》、《诗经小学》、《古文尚书撰异》、《周礼汉读考》、《仪礼汉读考》、《汲古阁说文订》、《说文解字注》及《经韵楼集》等书。《六书音均表》在顾炎武《音学五书》和江永(1681~1762)《古韵标准》的基础上剖析加密,分古韵为17部,在古韵学上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说文解字注》积30余年的功力写成,体大思精,为前所未有。他先为《说文解字读》,每字之下博引群书,详注出处,晚年才删去繁文,简约成《说文解字注》。嘉庆二十年(1815)五月全书刻成,风行一时,大为学者所称赞,《说文》之学也由此而盛。

《说文》段注的主要特点是:①比勘二徐(徐铉、徐锴)本,刊正传写和刻本的谬误。②阐明许书著作的体例。③引证经传古籍,解释许说,推求许说所本。④在许慎训解之外,说明字义的引申和变迁,指出字有古今,义也有古今。⑤阐发音与义之间的关系,根据谐声声符说明音义相通之理。

段玉裁注《说文》的成就极大。他不仅贯串全书,详加注释,把《说文》在考订文字、声音、训诂三方面的真实价值阐发无遗,而且创通许多研究词义的方法,对汉语训诂学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内容和新的门径。尽管书中不免有偏执武断之处,可是其中精粹之处终不可没。其后钮树玉作《段氏说文注订》,徐承庆作《说文段注匡谬》,王绍兰作《说文解字段注订补》,徐灏作《说文段注笺》,虽各有发明,然成就不大,且有以不谬为谬者,转增烦扰。段书旧有经韵楼原刻本,后又有苏州书局翻刻本。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原刻本影印行世。惟原刻本误字不少,苏州局本稍胜。学者可参考冯桂芬《段注说文考证》,冯将原书误处均已校出。

见《说文解字》、《六书音均表》。(周祖谟)

duiwai hanyu jiaoxue

对外汉语教学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指对外国人的汉语教学,是一种外语教学。它的任务是训练、培养学生正确使用汉语进行社会交际;对以汉语教学、研究和翻译为终身职业的学生则要求掌握必要的基础理论知识。对外汉语教学的对象多半是成年人。

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由来已久,肇始于汉代,大兴于唐代。当时外国留学生、学问僧在国学肄业或在寺院习经

法者多达数千。西起安息、天竺,东至高丽、日本都有来学汉语文的。他们学习或以经商、传教为目的,着重口语,或以研究汉学为目的,着重书面语。明末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和清末威妥玛的《语言自述集》可算当时影响较广的、有代表性的汉语教材。

中国把汉语作为外语在大学讲授是从1950年开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5个东欧国家派来了第一批留学生。教育部为此在清华大学设立了东欧留学生汉语专修班。学生在专修班进行1~2年语言训练,然后转入其他大学学习文学、历史等专业。

1952年,上述专修班调整到北京大学,改名为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留学生的国别又增加了民主德国、苏联、蒙古、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等。以后又有荷兰、意大利、加拿大、古巴等。50年代初为越南学生开办了南宁育才学校附属中文学校和桂林语文专科学校。60年代初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大批学生来华,为了对他们进行汉语教学,北京外国语学院成立了非洲留学生办公室。1962年成立了北京外国留学生高等预备学校,负责各国留学生的汉语预备教育。这所学校1965年改名为北京语言学院。其他有留学生的高等院校,如北京大学等,仍继续进行留学生的汉语教学工作,结合他们的专业提高其语言水平。1965年越南政府派来大批留学生,中国20多所高等院校分别担负对越南学生的汉语预备教育。汉语作为外语教学达到空前规模。

1973年以后,来华学习的外国留学生逐年增加。70年代初,来自亚非第三世界国家的学生较多。随着中日关系的发展,中美外交关系的建立,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日本及欧美学生大量增加,至1986年有10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在我国高等学校学习。

目前外国学生来华学习的目的已不限于为入中国大学作语言准备;有许多学生来华前就已学过汉语,因此,对外汉语教学在学制、课程设置以及教材上都应考虑各种不同的要求。现在设有为学习专业做语言准备的正规班,有为已经学过汉语、来华进修以提高某方面实践能力的各种进修班,以及读学士学位的四年制汉语文专业班,调整和增设了有关的课程,编写了相应的教材。

1978年夏,中国首次举办暑期汉语进修班。从1982年起这种短期进修班改为常年招生。目前共有60多所大学对外国留学生开设长期或短期的汉语课程。

把汉语作为外语在外国人中进行教学,有下列特点:

① 教学时间一般只有1~2年,最多4年,这就要求选择最切合实际的教学内容。

② 汉语是有声调的分析型语言,书写形式是方块字,汉语语法又有一些独特之处,所以,母语是没有声调、以拼音为书写形式的屈折语言的学生对汉语感到特别陌生,这就要求更加讲究教学方法。

③ 学习环境、学习方式和语言习得过程均有不同,必须在没有现实语言交际活动的条件下,创造学习汉语

的环境,精心设计并组织教学和模拟的交际活动。

针对上述特点,对外汉语教学过程始终要遵循实践性原则、与学生母语进行对比的原则和启发学生自觉性的原则,并结合不同的文化背景具体地解决外国学生的疑难。

在教学法方面,从50年代起到现在经历了很大的变化。50和60年代初虽然明确教学目的不是讲理论,但是仍受传统教学法的束缚,对初学者通过翻译讲解语音、语法理论。60年代发展成以精讲多练为核心的强调培养语言技能的方法。后来受国内外外语教学理论的影响,部分地采用过听说法。70年代又试验过句型教学。80年代以来,中国对外汉语教学法的研究更加受到重视,注意在总结自己经验的基础上吸收其他外语教学法的长处,逐渐形成了下列主要的教学法倾向:以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为目的,力求正确处理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加强文化内容的教学;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继续贯彻实践性原则;正确处理听、说、读、写、译之间的关系,根据学生的需要和语言教学的规律,在不同的教学阶段采用不同的处理方法;正确处理语言的结构、意义和功能的关系,把结构和功能有机地结合起来;正确处理汉语和学生母语的关系,有控制地使用学生的母语或媒介语。

对外汉语教学活动包括4个环节:①总体设计,即针对既定的教学对象及其学习目的确定总的教学要求、教学内容和教学时间,据此确定课程设置及各课程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制定出教学大纲和教学进度计划。②教材编写(包括电教软件的设计与制作)。③课堂教学(包括有计划、有组织的课外语言实践活动)。④语言测试(包括各种衡量语言知识和能力的手段)。

关于教材,迄今为止已出版了数十种,影响较大的有:《汉语教科书》2册,1958年时代出版社出版,有英语、法语、德语、缅甸语注释本;《基础汉语》2册,1971~197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它的续编《汉语读本》4册,1972~197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都有英语、法语注释本;《汉语课本》2册,1977~197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有英语、法语注释本;《基础汉语课本》5册,1979~1980年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有英语注释本和教师手册;《实用汉语课本》6册,1981~198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有英语注释本。

《汉语教科书》较为注重语言知识的系统性。《基础汉语》企图摆脱传统方法,以突出“范句”来提高学生对基本句式的掌握,也偏重语言结构。《汉语课本》和《基础汉语课本》突出了句型操练。《实用汉语课本》则较多地吸收了功能法的长处,使学生能在生活中运用所学语言以达到熟练的目的。以上5种教科书,前4种适合中国国内课堂教学使用,第5种供国外课堂教学使用,也可供自学用。

此外,各大学根据实际情况也编写了各种教材以满足不同的要求。今后将有计划地编写适用于各种教学对象的不同类型的教材,并注重声像配套。

为了交流对外汉语教学的经验,1979年出版了专业刊物《语言教学与研究》。1983年6月成立了全国性学术团体“中国教育学会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会”。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外汉语教学方面的理论研究和教材建设,1984年在北京语言学院成立了语言教学研究所,出版了《汉语词汇的统计与分析》(1985)和《现代汉语频率词典》(1986)。这两项成果是通过人工统计和计算机处理相结合的方式取得的,不仅提供了词的出现频率,而且还提供了词的使用度,字的频率及其构词能力。这对编写教材有重要参考价值。1985年又成立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该社的主要任务是出版对外汉语教材和跟对外汉语教学有关的其他书籍。

在国际交往方面,建国初期中国政府即应若干国家之聘,派遣了汉语教师出国任教。近年来,随着世界各国汉语教学的进一步开展,派出任教的汉语教师日益增多,1976~1985年间,共向37个国家派出教师数百人次。从1980~1983年,中美汉语教师定期举行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学术讨论会。1983年7月中美双方教师代表在北京商定了教材编写、对比研究等多项合作项目。1985年8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有20个国家的260名代表参加,在汉语教学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深入的讨论。会议还建议成立世界汉语教学研究组织、世界汉语教师培训中心和情报资料中心,以加强各国汉语教学、研究人员的交流和合作。

(王 还 常宝儒 施光亨)

Dunhuang Bianwen Ziyi Tongshi

《敦煌变文字义通释》 解释唐代变文词义的书。蒋礼鸿著。蒋礼鸿字云从,浙江嘉兴人,精于训诂学。敦煌石室所出的变文是唐五代间流行于民间的文学作品,其中保存不少当时口语的材料。有些词语现在已不易理解,必须比证研究才能理解其意义。本书作者取《敦煌变文集》中此类词语疏通诠释,就所释各词的义类分为6节:①释称谓,②释容体,③释名物,④释事为,⑤释情貌,⑥释虚字。六者之中以第4类词为最多,且极难解释,第6类虚字部分则又牵涉语法。六类范围包括甚广,非综合比较,并联系其他有关材料,如唐五代人的诗词、笔记、小说之类相互证发不可。作者用力甚勤,创获极多。又几经修订补充,对研究唐五代民间文学和汉语词汇发展史都大有帮助。可与张相《诗词曲语词释》媲美,同为不可多得之书。自从这两部书出版以后,关于唐以后口语语汇的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第4次增订本。

(周祖谟)

E

Eyu

俄语 (Russian language) 俄罗斯族的语言, 苏联各民族间的通用语言, 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之一。属印欧语系斯拉夫语族东支。据 1970 年统计, 苏联境内以俄语为母语的人有 1.4 亿多, 以俄语为第二语言的人有 4 000 多万。在中国, 主要分布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塔城、阿勒泰及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额尔古纳右旗等地。使用人口 2 900 余人 (1982)。俄语的近亲语言是乌克兰语和白俄罗斯语。

俄语的发展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远古时代的原始斯拉夫语(斯拉夫母语)在公元前 2000~前 1000 年间逐渐脱离其他印欧语言而独立发展, 6~7 世纪, 由于内部方言差别不断扩大而分化为斯拉夫语东支、西支和南支。东斯拉夫语(也称古俄语)存在于 7~14 世纪。10 世纪末, 基辅罗斯接受基督教后, 基里尔文字随着古斯拉夫语宗教文献传入俄国, 这就是今天俄语字母的前身。现存最早的古俄语文献有《奥斯特罗米尔福音书》(11 世纪, 图 1)、《往年故事》(12 世纪)、《伊戈尔王远征记》(12 世纪)、《俄罗斯法典》(11~12 世纪, 图 2)等。斯拉夫语东支约在 14 世纪逐渐分化为俄罗斯(旧称大俄罗斯)、乌克兰(旧称小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三种独立的语言。14 世纪后, 莫斯科公国成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俄罗斯部族语言在莫斯科方言基础上逐渐统一。16 世纪中印刷术传入俄国, 促进了俄语的统一(图 3)。17~19 世纪初, 随着俄罗斯民族的形成, 俄语发展为民族语言。从诗人 A. C. 普希



图1 《奥斯特罗米尔福音书》(1056~1057)

金(1799~1837)时代起为现代俄罗斯标准语时期。除普希金外, M. Ю. 莱蒙托夫(1814~1841)、H. B. 果戈理(1809~1852)、И. С. 屠格涅夫(1818~1888)、Л. Н. 托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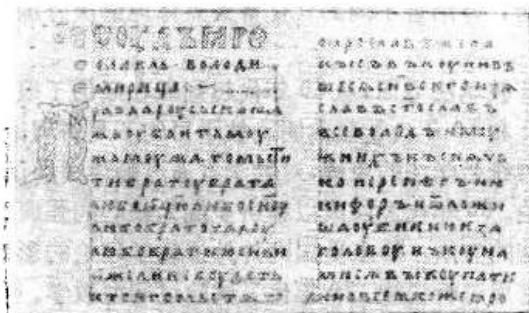


图2 《俄罗斯法典》(11~12世纪)

斯泰(1828~1910)、A. П. 契诃夫(1860~1904)等杰出作家也为俄罗斯标准语规范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现代俄语有两种主要的地域方言: 南俄方言和北俄方言。南俄方言分布于俄罗斯联邦南部, 主要语音特征



图3 第一部俄国印刷书《使徒行传》(1564)

是: a 音化, 即元音字母 o 在非重音节中读作 a; 辅音字母 r 读作擦音 y, 即同 x 相对的浊音; 动词现在时第三人称词尾 r 发软音 -тЬ。中国俄罗斯族使用的俄语属南部方言。北俄方言分布于苏联欧洲部分的北部与东部, 以及乌拉尔、西伯利亚大部, 主要语音特征是: o 音化, 即元音字母 o 在非重音节中仍读 o; 辅音字母 r 读作浊塞音 g; 动词现在时第三人称词尾发硬音 -т。在南北方言区之间, 从西北到东南有一个过渡性的区域(普斯科夫—加里宁城—莫斯科—平扎—萨拉托夫), 习称中俄方言区。其语音特征是混合型的: a 音化; r 读作 g; 动词现在时第三人称词尾发硬音 т。

现代俄语的标准音是在莫斯科音的基础上形成的。自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 莫斯科艺术剧院和小剧院便坚持使用莫斯科音。现在这种“舞台音”仍是公认的标准, 但个别读音已不再是唯一的标准, 甚至已为新的规范所

取代。例如: две(二)中的 д 按“旧莫斯科音”只能读软音,现在读硬音也算符合标准; немки(德国女人)中的 м 过去的标准是读软音,现在的标准是读硬音。标准音的发展趋势之一是读音逐渐接近拼写形式所表示的音。

俄语共有 33 个字母,表示 42 个音位: 5 个元音, 37 个辅音(一说 6 个元音和 36 个辅音)。俄语语音的主要特点是: ①元音少,辅音多; ②大多数辅音是清、浊相对和软、硬相对; ③元音在非重音节中发生明显的弱化,音值有时含混不清; ④词重音在不同的词中可以落在不同的音节上,没有固定的位置,而当词发生词形变化时,重音可能移动位置,比较: голова(头,单数第一格), головы(复数第一格), голов(复数第二格)。

俄语语法结构的特点是: 词与词的语法关系和词在句中的语法功能主要通过词形变化来表示。俄语是印欧语系中保留古代词形变化较多的语言之一。名词大都有 12 个形式,单、复数各有 6 个格;形容词有 20 多、甚至 30 多个形式,单数阳性、中性、阴性和复数各有 6 个格,另有短尾、比较级;动词形式可有一二百个,包括体、时、态、式、形动词、副动词等。实词一般都可以分解为词干与词尾两部分,如 учительница-а(女教师)。词干表示词的词汇意义;词尾表示语法意义,通常包含几个语法意义。例如:

учительница-а	чита-ет	пионер-ам
女教师(阴性单数主格)	读(现在时第三人称)	(给)少先队员(复数与格)
интересн-ую	сказк-у.	
有趣的(阴性单数宾格)	故事(阴性单数宾格)	

关于俄语词汇,1950~1965 年苏联科学院编的 17 卷《现代俄罗斯标准语词典》收词 120 723 条(不包括比较专门的科技词、职业词以及方言词等)。词汇中有: ①历史最久的、从原始印欧语继承下来的词,如 мать(母亲),第二格 матери,比较:德语 Mutter,英语 mother,法语 mère,拉丁语 māter,три(三),比较:德语 drei,英语 three,法语 trois,拉丁语 trēs 等; ②在原始斯拉夫语时期和东斯拉夫语时期产生的词,如 отец(父亲)、сердце(心)、человек(人)、хороший(好)、сорок(四十)、дешёвый(便宜)等; ③14 世纪俄语独立发展以来产生的词,如 бросать(扔)、очень(很)、здешний(这里的)等。此外,俄语还在各个历史时期借入许多外来词,例如:借自古斯拉夫语的 страна(国家)、воскресение(复活)等;借自德语的 штаб(司令部)、галстук(领带)等;借自英语的 трактор(拖拉机)、митинг(群众大会)等;借自法语的 премьер(总理)、актёр(演员)等。俄语科技领域中的外来词,18 世纪初多借自德语,19 世纪多借自法语,20 世纪中叶以来多借自英语,主要是美国英语。

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俄语在国际上的使用范围有明显的扩大。来自俄语的科技信息受到国际上的重视。

参考书目

王超尘、黄树南、信德麟等编:《现代俄语通论》,商务印书馆,北京,1984。

张会森、华劭主编:《现代俄语语法新编》,商务印书馆,北京,1979。

Ф. П. Филин (отв. ред.),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мире*, Москва, 1974.

(信德麟)

Elunchunyu

鄂伦春语 (Oroqen language) 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通古斯语支。主要分布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扎兰屯市和黑龙江省塔河、呼玛、逊克、嘉荫等县和黑河市。鄂伦春族的人口约 4 000(1982),居住在城镇和农村的青少年多使用汉语。无方言差别。

鄂伦春语有元音 18 个,分长短。复元音只出现在借词里。根据元音和谐的特点,元音分阴性、阳性两类,阴性元音有: i, i:, e:, ə, ə:, o, o:, u, u:, 阳性元音有: ɪ, ɪ:, ɛ:, ɛ:, a, a:, ɔ, ɔ:, ʊ, ʊ:, 一个词里只出现同类的元音。此外,元音在唇状上也保持一定的和谐。辅音有 19 个: b, p, m, f, w, d, t, n, l, r, ʧ, ʃ, ʤ, ʒ, g, k, ŋ, x。辅音 ŋ 可出现在词首。能出现在词末的辅音比其他满-通古斯语言多。体词有格、人称领属、反身领属等范畴。名词有两对格,区别动作的对象和方向是确定的还是不确定的。领属附加成分除了附在体词后,还可以附在副动词后。动词有人称范畴,体的附加成分丰富,使动态和被动态的语音形式不同。祈使式有两类,一类是即时进行的动作,一类是可在做完某事以后再进行的动作。句子成分的位置比较固定。从句和主句大都由表示主句从句的位置(从句在前,主句在后)、语调和从句谓语的附加成分来连接,很少使用连词。词汇方面,反映狩猎生产活动和独特生活方式的词比较丰富。

(胡增益)

Ewenkeyu

鄂温克语 (Ewenki language) 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通古斯语支。分布在中国内蒙古自治区鄂温克族自治旗、陈巴尔虎旗、额尔古纳左旗、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阿荣旗、鄂伦春自治旗、扎兰屯市以及黑龙江省的讷河县。使用人口约 1.7 万(1982)。分 3 个方言: ①海拉尔方言,主要通行于鄂温克族自治旗; ②陈巴尔虎方言,通行于陈巴尔虎旗; ③额尔古纳方言,通行于额尔古纳左旗。牧区通用蒙古文,其他地区通用汉文。在国外,鄂温克语分布于苏联,称作埃文基语,使用人口约 1.2 万(1979)。另外,蒙古人民共和国约有 1 000 人使用这种语言。语音方面,有 8 个短元音: i, ɪ, ə, a, o, ɔ, u, ʊ, 有 10 个长元音: i:, ɪ:, e:, ɛ:, ə:, a:, o:, ɔ:, u:, ʊ:, 元音根据搭配特点,分阴性元音和阳性元音两类。元音和谐以性属和谐为主,以唇状和谐为辅。辅音有 15 个: b, p, w, m, d, t, n, l, r, ʧ, ʃ, ʤ, ʒ, g, x, ŋ。辅音有大量同化现象,因此在词中常出现长辅音。语法方面,名词的格较多,半数以上

表示方位或兼表方位的意义。宾格、方位格各有两个，分别表示动作的对象和方向是确定的还是泛指。动词有人称形式。副动词根据带不带领属附加成分，分为人称、反身、不变化3类。句型的特点是动词谓语句比体词谓语句多。动词居于句尾。词汇中反映畜牧生产方式的词较多。构词手段主要是派生法，其次是合成法。有来自汉语和蒙古语的借词。

(胡增益)

erhua yinjie

儿化音节 汉语拼音方案里用r收尾的音节。“儿、耳、二”等字的音节[ər]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同其他韵母结合，[ər]不再独立，而和前头的音合成一个音节。这种语音现象叫做“儿化”。儿化音节的特点是，给音节中的平舌韵母加卷舌动作，变为卷舌韵母，整个音节的音值也起一定的变化。例如：

鸟 [niau] 鸟儿 [niaur]
凉粉 [liānfēn] 凉粉儿 [liānfēr]
鸡蛋清 [tāitānqīng] 鸡蛋清儿 [tāitānqīēr]

儿化音节，用汉字书写，加“儿”做后缀。汉语拼音方案规定在原韵母的拼音后加“r”，如花儿 huār。

儿化音节的音变 音节儿化发生的音变比较复杂，约分三大类。

第一类 开尾韵、[i]尾韵、[n]尾韵儿化后的音变：

① [u]——儿化时，原韵母不变，只加卷舌动作，即[ur]。如水珠儿 shuǐzhūr [ʂu]→[ʂur]。

② [i]、[ɿ]、[ei]、[ən]——儿化时，[i]、[ɿ]失落，[ei]的[i]尾失落，[ən]的[n]尾失落，变为[ər]，例如：

棋子儿 qízǐr [ʂɿ]→[ʂər]
小吃儿 xiǎochīr [ʂɿ]→[ʂər]
傍晚儿 bānghēir [xei]→[xər]
树根儿 shùgēnr [kən]→[kər]

③ [i]、[in]——儿化时，[i]不变，[in]的[n]尾失落，变为[iər]。例如：

小鸡儿 xiǎojīr [tɕi]→[tɕiər]
脚印儿 jiǎoyīnr [in]→[iər]

④ [uei]、[uən]——儿化时，分别失落[i]尾、[n]尾，变为[uər]。例如：

香味儿 xiāngwēir [uei]→[uər]
嘴唇儿 zuǐchúnr [ʂuən]→[ʂuər]

⑤ [y]、[yn]——儿化时，[y]不变，[yn]的[n]尾失落，变为[yər]。例如：

小曲儿 xiǎoqūr [tɕy]→[tɕyər]
一群儿 yíqúnr [tɕyn]→[tɕyər]

⑥ [r]——儿化时，韵母不变，只加卷舌动作。例如：

山歌儿 shāngēr [kɿ]→[kɿr]

⑦ [ie]——儿化时，韵母不变，只加卷舌动作，即[iər]。例如：

台阶儿 táijiēr [tɕie]→[tɕiər]

⑧ [ye]——儿化时，韵母不变，只加卷舌动作。例如：

概儿 juér [tɕye]→[tɕyər]

⑨ [o]、[uo]——儿化时，韵母不变，只加卷舌动作。例如：

土坡儿 tǔpōr [p'o]→[p'or]

大伙儿 dàhuǒr [xuo]→[xuor]

(以上9种儿化韵，在用十三辙的小辙儿押韵时，都并为“小人辰儿”。)

⑩ [a]、[ai]、[an]——儿化时，[a]不变，[ai]、[an]分别失落韵尾，变为[ar]。例如：

那儿 nàr [na]→[nar]

孩儿 háiér [xai]→[xar]

蔓儿 wànr [uan]→[uar]

⑪ [ia]、[ian]——儿化时，[ia]不变，[ian]失落[n]韵尾，合并为[iar]。例如：

价儿 jiār [tɕia]→[tɕiar]

线儿 xiànr [ɕian]→[ɕiar]

⑫ [ua]、[uai]、[uan]——儿化时，[ua]不变，[uai]、[uan]分别失落韵尾，合并为[uar]。例如：

瓜儿 guār [kua]→[kuar]

块儿 kuàir [k'uai]→[k'uar]

环儿 huánr [xuan]→[xuar]

⑬ [yan]——儿化时，[n]尾失落，成[yar]。例如：

花园儿 huāyuánr [yan]→[yar]

(以上4种儿化韵，在用十三辙的小辙儿押韵时，都并为“小言前儿”。)

总的说来，这一类中的[i]尾、[n]尾韵儿化后失落韵尾，大部分与开尾的儿化韵混合。

第二类 [u]尾韵([au]、[iau]、[ou]、[iou])儿化时韵母不变，只加卷舌动作。这种卷舌动作，不是从韵尾[u]开始，而是从[a]、[o]开始，直到末了。例如：

杓儿 shāor [ʂau]→[ʂaur]

鸟儿 niǎor [niau]→[niaur]

猴儿 hóur [xou]→[xour]

球儿 qiúr [tɕiou]→[tɕiour]

第三类 [ŋ]尾韵儿化时，[ŋ]尾同前面的主要元音合成鼻化元音，同时加卷舌动作：

① [aŋ]→[ār]，如：缸儿 gāng [kār]

- ② [iaŋ] → [iār], 如: 秧儿 yāngr [iār]
 ③ [uaŋ] → [uār], 如: 光儿 guāngr [kuār]
 ④ [əŋ] → [ēr], 如: 灯儿 dēngr [tēr]
 ⑤ [iŋ] → [iēr], 如: 铃儿 língr [liēr]
 ⑥ [uəŋ] → [uār], 如: 瓮儿 wèngr [uār]
 ⑦ [uŋ] → [ūr], 如: 钟儿 zhōngr [tūr]
 ⑧ [yueŋ] → [iūr], 如: 熊儿 xiōngr [xiūr]

从上述三大类儿化韵中可以看出, ①普通话韵母39个, 除独用的 [ɛ]、[ər] 以外, 其余 37 个韵母都可儿化。② 经过儿化, 有些原来不同的韵母变得相同, 因此儿化韵只 26 个。③ 儿化的基本性质是卷舌作用。有些韵母的发音能同时加卷舌势, 儿化时只须在韵尾加卷舌动作, 如开尾的 [a]、[o]、[ɤ]、[ɛ]、[u]、[y] 等; 有些韵母的发音不能同时作卷舌势, 就不得不改变原韵母中的元音或失落原韵母的韵尾, 如 [i] [ɪ] 韵、[ɤ] 尾韵、[i] 尾韵、[n] 尾韵等。

儿化韵母 见儿化韵母表。

儿化音节的来源和作用 儿化音节的词, 主要是从一个词加“儿”做后缀产生的。“儿”不自成音节而与另一音节合一, 在北京话里是清代中后期才发展起来的, 嘉庆年间刻的民间曲集《霓裳续谱》才开始用“小撇”, 如“一个人儿”、“跟我玩儿”等。也有些儿化音节的词与“儿”字无关。或者由“了(le)”变来, 如“追儿去”。或者由“里”变来, 如“这儿”、“哪儿”。或者由“日”变来, 如“今儿”、“后儿”等。

儿化音节的词, 一般有区别词义或词类的作用, 也表示物量的微小、感情上的喜爱等。例如:

- 对儿 用于“双”、“对联”等义
 宝贝儿 对小儿的爱称, 不指珠宝
 截儿 动词“断”义转为名词
 零碎儿 形容词转名词
 小车儿 加“儿”适应小的特点
 细丝儿 加“儿”适应细的特点
 苹果脸儿 表美丽可爱
 一朵花儿 同上

象声词也常儿化, 如“打嘟噜儿”、“忒儿的一声飞了”。

儿化词不能滥用。古语词汇、新兴事物、学术名词等都不儿化。口头的儿化词, 写在纸上常省略“儿”, 如“小说(儿)”。儿化词有丰富词汇、加强表达力量的优点, 对汉语的发展有积极意义。但由于地方性的局限, 还不宜大量吸收到普通话词汇中来。 (孙崇义)

Erya

《尔雅》 中国最早的一部训诂词义的书。《汉书·艺文志》著录《尔雅》3 卷 20 篇。今本 19 篇。分释诂、释言、释训、释亲、释宫、释器、释乐、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原无作者主名。汉代郑玄《驳五经异义》说:“某之闻也,《尔雅》者孔子门人所作,以释六艺之旨,盖不误也。”魏太和中博士张揖《上广雅表》,又以为周公著《尔雅》一篇,“今俗所传三篇,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孙通所补,或言沛郡梁父所考,皆解家所说,先师口传……疑不能明也。”后人大都以为是秦汉间人所作,作者又非一人,当是学者采集训诂注释,递相增益而成。“尔雅”是近正的意思。汉末刘熙《释名》说:“五方之言不同,皆以近正为主也。”唐初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也说:“尔,近也;雅,正也。言可近而取正也。”《尔雅》在东汉时就有刘歆、樊光、李巡几家注,魏时又有乐安孙炎注,都久已亡佚。现在所存最早的注本是郭璞注,凡 3 卷。郭璞又有《尔雅音义》2 卷,今已不存。郭璞精究训诂,荟萃旧说,又补其疏略,以成一家言,所以流传不废,一直为

儿化韵母表

(儿化韵用国际音标注音, 原韵母用汉语拼音字母注音)

开 口	齐 齿	合 口	撮 口
儿化韵 原韵母	儿化韵 原韵母	儿化韵 原韵母	儿化韵 原韵母
		[ur] u	
[ər] -i[ɪ]、-i[ɪ] ei, en	[iər] i, in	[uər] uei, uen	[yər] ü, ün
[ɤ] e			
	[iər] ie		[yər] üe
[or] o		[uor] uo	
[ar] a, ai, an	[iar] ia, ian	[uar] ua, uai, uan	[yar] üan

以上是从开尾韵、[i]尾韵、[n]尾韵变来的

[aur] ao	[iaur] iao		
[our] ou	[iour] io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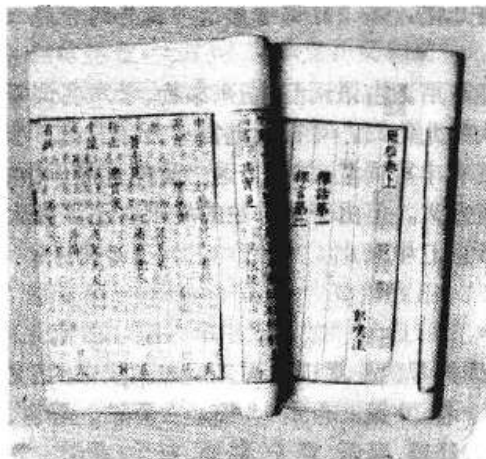
以上是从[u]尾韵变来的

[ār] eng	[iār] ing	[uār] ueng	
		[ūr] ong	[iūr] iong
[ār] ang	[iār] iang	[uār] uang	

以上是从[ŋ]尾韵变来的

人所重视。北宋真宗时邢昺(932~1012)根据郭注作《尔雅疏》10卷,与注别行。郭璞注《尔雅》,一方面用经传文句证明雅训,另一方面用今义释古义,又用晋代方言以释古语。邢昺疏,则又疏解郭注,对《尔雅》条例又多所发明,并非奉旨虚应故事之作。

到南宋高宗时,郑樵又为《尔雅》重新作注,攻击经文,认为以数十言为一义,多昧于言理,解释《诗》义又多昧于物之情状,从而加以辨证。又孝宗淳熙元年(1174)罗愿(1136~1184)又作《尔雅翼》32卷,专释草木鸟兽虫鱼的名称、形状。不因循旧文,而重视目验。下至清代以



郭璞注《尔雅》

迄近代,研究《尔雅》的不下20家。大致可分4类:

① 校正文字。因《尔雅》流传抄写不无讹误窜乱,所以以校正文字为先务。阮元有《尔雅注疏校勘记》可为代表。其后严元照(1773~1817)又有《尔雅匡名》20卷,他以《说文解字》为主要参证材料,一方面校正讹体,一方面说明字有假借。

② 补正郭注邢疏。周春(1729~1815)有《尔雅补注》4卷,潘衍桐有《尔雅正郭》3卷。

③ 疏证《尔雅》。一部是邵晋涵(1743~1796)的《尔雅正义》20卷,注重采集《尔雅》古注和汉人诸书注解注释《尔雅》,兼释名物为郭注不备的。文字讲解简明精核,远胜于邢疏。另一部是郝懿行(1757~1825)《尔雅郭注义疏》20卷,这部书在辨释名物上注重目验,胜于邵氏《正义》,在疏解字义方面能因声以求义,略胜于邵。然剿袭邵书处极多,实是疵累,不免为人所鄙薄。

④ 释例。主要有两家:一为近代陈玉澍(1853~1906)《尔雅释例》5卷,虽多创见,然条例过繁,反而不易

得其要领。另一为王国维《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收入《观堂集林》卷五,对古今雅俗之命名、《尔雅》释词之体例发明至多,为前人所未道,又近人黄焯所集黄侃《尔雅音训》一书,就音以说义,也颇有胜处,可供参考。

(周祖谟)

Eryayl

《尔雅翼》 训诂书。宋代罗愿作。解释《尔雅》草木鸟兽虫鱼各种物名,以为《尔雅》辅翼,所以名为《尔雅翼》。

罗愿字端良,徽州歙县人。此书作成于南宋孝宗淳熙元年(1174)。度宗咸淳六年(1270)王应麟守徽州时,得方回访得的罗愿从曾孙的家藏本刻于郡斋。

书分32卷。卷一至卷八为释草,卷九至卷十二为释木,卷十三至卷十七为释鸟,卷十八至卷二十三为释兽,卷二十四至卷二十七为释虫,卷二十八至卷三十二为释鱼。包容很广。每释一物都原原本本,既考之于书传,又参之以目验,足以解疑释惑。全书五万余言。今传本有元仁宗延祐七年(1320)洪焱祖音释。见清代张海鹏所刻《学津讨原》第4集。

(周祖谟)

Ershiyi Juanben Mengwen Cidian

《二十一卷本蒙文词典》(*Mongol Dictionary in 21 Volumes*) 中国近代蒙古语解释词典。仁钦

戈瓦、额尔根巴雅尔、那木吉勒玛等人根据《满蒙文鉴》整理而成。《满蒙文鉴》系清代拉锡、丹金、阿日毕德呼等人编纂,康熙五十六年(1717)成书。乾隆八年(1743)班第、那彦泰、奈曼泰等改版重印。全书21卷,故称《二十一卷本词典》,1977年11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印行整理本时沿用了这个名称。康熙版《满蒙文鉴》为满、蒙文对照的分类双解词典,分天文、地理、人事、五行、四时等280个门类,共万余条。蒙古语以察哈尔八旗话为依据,兼顾其他方言特点。有按十二字头检字的索引。乾隆八年改版重印时,为了更准确地反映口语读音,便于满族学习蒙古语,曾采用满文字母拼写蒙古语词。此书是近代蒙古语的第一部解释词典,对后来各种类型蒙古语词书的编纂影响较大。在蒙古语的语音规范和词汇规范方面起过积极作用。通过书中所注的异体字,可以了解蒙古语的演变情况,对蒙古语的比较研究有一定参考价值。1977年的整理本,删除了满文部分,增补了少量词目,并且按蒙古文字母顺序重新作了编排。

(陈乃雄)

F

Falanxi xuepai

法兰西学派 (French school) 通常指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 由 M. 格拉蒙(1866~1946)和 A. 梅耶在法国建立的语言学学派。他们二人是第一代。J. 房德里耶斯和 M. 柯恩是第二代, E. 班维尼斯特(1902~1977)和 A. 马丁内是第三代。格拉蒙和梅耶的特点是主张研究语言演变要注意心理生理因素, 并强调语言的社会性。但是到了后来, 这一派的成员已经向多方面发展, 再也不是一个清一色的队伍了。

格拉蒙和梅耶由 1881~1891 年受教于瑞士语言学家 F. 索绪尔, 还受到方言地理学家 J. 吉耶龙(1854~1926)和语音学家 J. P. 卢赛洛(1846~1924)的影响。他们的学说与德国的 H. 舒哈特、丹麦的 O. 叶斯泊森有某些共同点, 而对德国的新语法学派则有许多不同意见。

1895 年, 格拉蒙在一篇论文中首先提出, 语言演变有生理心理原因, 不可忽视。在语音方面, 如拉丁语“预言家”*divium* (有两个相同的元音) 变为法语 *devin* (第一个元音变为 e), 这是一种异化作用, 有心理因素, 不能用新语法学派那些“定律”来说明。另一位法国学者 L. 鲁德也指出, 语义也会有历史演变, 如“热”指温度, 本与颜色无关, 可是后来深红、深黄也称为“热色”, 这是因联想而变; 又如法语 *pas* 这个词本来没有否定意义, 但是由于常与 *ne* (不) 连用, 结果自身也取得了否定意义, 这是因搭配而变。以上这样的演变, 各种语言都有, 应从心理生理方面找答案。

梅耶认为, 词义演变是心理过程, 但是原因是社会性的。他把词义变化分为 3 种: 一是因为社会生活不同, 一个词所指的事物有所改变, 如 *plume* 本指鹅毛, 后来变为指书写用的笔; 二是一个小集团的专用语变为全社会的通用语, 如法语 *arriver* 本是水手用语, 专指船已到岸, 后来变成“到达”, 不论是谁都用, 也不管到什么地方都用; 三是上文所说的 *pas* 这个词, 它的意义起变化, 全是词语搭配的结果。

梅耶认为, 语言是社会行为, 是“社会事实”。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 有什么样的文化, 就有什么样的语言。文化进步使人们的抽象思维随之进步, 因而在印欧语系诸语言中, 综合性的语法形式逐渐消失了, 而与抽象范畴符合的语法形式则保留了下来, 甚至还更加发展。例如古印欧语名词中的性别, 本来是有意义的, 如长果子的“树”是阴性的, 长在树上的“果子”是中性的, “脚”常在活动, 走路, 是阳性的, “手”常在接受东西, 是阴性的。可是到了后来, 原有的意义消失了, 名词性别就毫无系统, 说不出其所以然来。

梅耶注意语言的社会性, 自然对各种语言的外部社

会历史感兴趣。他用心研究语言作为社会事实在社会中起什么作用。他所著的希腊语史和拉丁语史, 可以作为这种研究的典范。

法兰西学派致力于说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原则。梅耶认为, 要证明两种语言是否有亲属关系, 最重要的是研究其语法形式。语法形式的证据最可靠, 因为音位排列的方式和语法功能的表现, 如果在许多情况下两种语言都相同, 那必然不是偶然的。但是在各种语言中, 语法形式相对应, 并不意味着音位序列必然相同或相似。例如亚美尼亚语“二”是 *erku*, 这与拉丁语“二”*duo* 在音位序列上并不相同; 但是亚美尼亚语的 *erk-* 与印欧语系许多语言的 *dwi-* 相对应, 而 *dwi-* 又与拉丁语的 *duo* 相对应, 可见亚美尼亚语的 *erku* 与拉丁语的 *duo* 同出一源, 即这两种语言在远古时代有共同的祖先。

格拉蒙和梅耶都是索绪尔的学生, 索绪尔强调语言的系统性, 他们也一致赞同。现在人们一谈到语言系统, 就必然使用“音位”、“系统”、“结构”等等术语, 可是这两位先驱对这些术语都没有下过严格的定义。在这方面作进一步研究的, 是后来的结构主义者和音位学家。梅耶死得早些, 20 世纪 30 年代就去世了; 格拉蒙活到 1946 年, 房德里耶斯活到 1960 年, 他们对于语言学界新学说都不拒之门外。

1950 年后, 法国语言学界百花齐放。班维尼斯特和柯恩注意文化和社会, 马丁内讲语法功能, B. 波蒂埃讲结构和意义, O. 杜克罗讲逻辑, L. 特斯尼耶尔(1893~1954)讲分布和转换, P. 基罗则运用统计方法。语言研究已与多种学科结合起来, 法国学者们的研究范围扩大了, 研究方法和手段也更加多样化, 更加精细和复杂了, 但是把语言看作社会现象的基本观点没有改变。

(岑麒祥)

Fayu

法语 (French language) 属印欧语系罗曼语族西支。分布地区除法国外, 还有比利时南部、加拿大的魁北克省、瑞士部分地区、海地、卢森堡, 以及非洲一些国家: 塞内加尔、马里、几内亚、扎伊尔、刚果、贝宁、布隆迪等。它是上述国家的官方语言或官方语言之一, 也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之一。使用人口超过 1 亿。

近代法语的前身是通俗拉丁语演变而来的高卢-罗曼语。公元前 51 年罗马人征服高卢全境, 高卢地区逐步罗马化, 接受了罗马人口头使用的通俗拉丁语, 形成高卢-罗曼语。公元 5 世纪, 日耳曼部族法兰克人入侵高卢, 推翻罗马在高卢的统治, 建立法兰克王国。高卢-罗曼语受日耳曼语的影响, 继续发生演变。语言学家把高卢-罗曼语的方言大体分为两类: 南方的奥克语(得名于普罗旺斯语中表示“是”的词 *oc*) 和北方的奥依语(得名于法语中表示“是”的词 *oïl*, 即现代法语中的 *oui*)。奥克语演变为普罗旺斯语, 奥依语则演变为法语。其他方言还有皮卡方言、瓦隆方言、洛林方言等。813 年, 在图尔召开的天主教会议作出决定, 允许教士不用拉丁语, 而用罗

曼语布道,于是罗曼语得到正式认可。现存最早的高卢-罗曼语文献是842年的《斯特拉斯堡盟约》,这是第一部用这种语言书写的官方文书。

古法语(13世纪以前) 中古的法国,由于诸侯割据,政权分散,出现了以多种方言从事文学创作的局面。13世纪,加佩王朝在与诸侯的争战中取得胜利,王权加强,巴黎逐渐成为全国政治和文化中心。巴黎地区的法兰西岛方言因而广泛传播,地位超过其他方言,逐渐成为民族共同语。古法语的著名文学作品是口头文学《罗兰之歌》(11世纪末)。古法语用于官方文书始于13世纪初。

中古法语(14~16世纪) 1337年法、英开始百年战争,法国长期陷于战乱,中央集权削弱,语言发展不受约束,变化很大,于是产生了与古法语有显著差异的中古法语。15世纪末法国又逐渐趋于统一,语言也随之趋向统一。1539年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1494~1547)颁布《维莱-科特雷敕令》,宣布以法语(即法兰西岛方言)为国家语言,规定在司法文件中必须使用法语,禁用拉丁语和其他方言。1549年,诗人J. 杜倍雷(1522~1560)发表《保卫与发扬法兰西语言》一文,主张用法语进行文学创作。自此以后,除了在天主教会内部仍用拉丁语外,法语在国民生活中取得优势。

近代法语(17世纪以后) 17世纪文学上古典主义盛极一时,许多文人学者努力于法语的规范化,这种规范在现代文学语言中仍然保持。18世纪启蒙运动兴起。百科全书派为了表达科学研究中出现的新事物和新概念,新创不少技术词语,对来自农村和工场的方言俗语也予以吸收。法国革命给语言的发展也带来重大影响。从中世纪以来,第一次出现了民间语言的文献。1789年选民送交三级会议的陈情书就是以民间语言撰写的。19世纪浪漫

Au fond de son âme, cependant, elle attendait un événement. Comme les matelots en détresse, elle promenait sur la solitude de sa vie des yeux désespérés, cherchant au loin quelque voile blanche dans les brumes de l'horizon. Elle ne savait pas quel serait ce hasard, le vent qui le pousserait jusqu'à elle, vers quel rivage il la mènerait, s'il était chaloupe ou vaisseau à trois ponts, chargé d'angoisses ou plein de félicités jusqu'aux sabords. Mais, chaque matin, à son réveil, elle l'espérait pour la journée, et elle écoutait tous les bruits, se levait en sursaut, s'étonnait qu'il ne vint pas; puis, au coucher du soleil, toujours plus triste, désirait être au lendemain.

法国作家 G. 福楼拜著《包法利夫人》(1857)片段

主义等流派的作家,大量吸收生动活泼的语言,增强了法语的表达能力。

法语现状 近代法语共有36个音位,其中元音16个,辅音20个。法语元音多,而且有4个鼻元音,在印欧语系中是少见的。法语元音都是单元音,发音紧张而有力,清楚明确,没有二合元音。辅音中没有塞擦音。重音落在最后一个音节上。在最近几十年中,法语语音有了较大变化,/ɑ/在法国北部和中部居民的发音中倾向于发作为靠前的/a/,在青年中尤为普遍,仅在南方的某些方言中保留了/a/、/ɑ/的区别,甚至/œ/也有发作/ɛ/的趋势。和拉丁语相比,法语的词形屈折已大大简化。名词没有

格的变化,性和数主要通过名词前的冠词、限定词等来区别。动词的变位形式虽然书写形式不同,但其中有一些读音是相同的。只有人称代词还保留多种不同形式。形容词也有性与数的变化,少数阴性形式还比较复杂。修饰形容词一般放在被修饰的名词之后。词与词之间的语法关系主要以词序和虚词表示。词汇的发展很快。根据J. 杜布瓦等人就1948和1960年版《小拉鲁斯辞典》所作的分析统计,12年间有1/4的词条发生变化,其中删去的占14%,新增的占11.4%,另有12%的词义有所增减。新词多数是技术词语,一般词语较少。法语增加词汇的重要途径之一是向其他语言借词或借用词缀。绝大部分借词来自拉丁语、希腊语、英语。19世纪曾有过英语热,第二次世界大战又输入大量美国英语词语。各种英语借词在报刊、广告、科学著作中大量涌现,有些英语借词的读音甚至不加改变地进入法语,以至有“英式法语”之称,引起纯语主义者的担忧。但是也有人认为:语言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不同语言的相互影响是正常的。这两种意见的冲突导致70年代末的一场公开辩论,后来法国政府出面干预,赞同努力拯救法语,防止英语的蚕食。

法语采用拉丁字母,有些字母可以附加音符或拼写符号,如é、à、û、ï、ç等。法语拼法和读音大体相符,但也有不规则的地方。

从中世纪起法语在国外就有较大影响。在17、18世纪,法语是重要的国际语言,欧洲很多国家的宫廷和上层社会以使用法语为风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的国际地位下降,法语的影响随之减低,但目前仍不失为较重要的国际通用语言。

参考书目

C. Bruneau, *Petite histoir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Armand Colin, Paris, 1958.

M. Cohen, *Histoire d'une langue: le français*, Editions sociales, Paris, 1973.

W. von Wartburg, *Evolution et structur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A. Francke, Berne, 1958.

(周世勤)

Fan-Han Heshi Zhangzhongzhu

《番汉合时掌中珠》 中国西夏文和汉文双解通俗语汇集。西夏党项人骨勒茂才著于乾祐二十一年(1190)。1909年在中国黑水城遗址(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境内)出土。木刻本,蝴蝶装,共37页。原本现藏苏联。1924年罗福成据原本抄印。序言有西夏文和汉文两种,内容相同。其中记有:“不学番言,则岂和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这表明编纂目的是为了便于番(党项)汉相互学习语言。书中每一词语都并列4项,中间两项分别是西夏文和汉文,右边靠西夏文的汉字为西夏文注音,左边靠汉文的西夏文为汉字注音。词语共800余条,以事门分为9类:①天体上(天空等8条),②天相中(日月星辰等158条),③天变下(天体变化等28条),④地体上(大地等5条),⑤地相中(山川河海等10条),⑥地用下(矿物、植物、动物等156条),⑦人体上(君

子、小人等8条),⑧人相中(人体各部等40条),⑨人事下(人事活动及用品等410余条)。最后一类约占全书一半,包括亲属称谓、佛事活动、房屋建筑、日用器皿、衣



《番汉合时掌中珠》第17页后半页

物首饰、农事耕具、政府机构、诉讼程序、弹奏乐器、食饌、马具、婚姻等。此书有两种版本,是研究西夏语言、文字、社会历史的重要文献,对解读西夏语起了重要作用。

(史金波)

fanyl

翻译 (translation) 把已说出或写出的话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的活动。这种语言活动,人类几千年来一直在进行,它影响到文化和语言的发展。与翻译有关的可变因素很多,例如文化背景不同,题材不同,语言难译易译不同,读者不同等等,很难把各种不同因素综合起来,都纳入一条通则。

在欧洲,翻译实践有悠久的历史。有人甚至认为,欧洲文明源于翻译,上至罗马帝国,下至今天的欧洲共同市场,都要靠翻译来进行国际贸易。有人说,用古希伯来语写的《圣经》和用阿拉米语写的《福音》,如果没有先译为希腊文和拉丁文,后来又译为中世纪和近代诸语言的话,2000年来的犹太基督教文化就不会产生,因而欧洲文化也不会出现。自翻译《圣经》起,将近2000年来,欧洲的翻译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圣经》的翻译是一件大事,它帮助许多国家的语言奠定了基础。在古代希腊、拉丁文学方面,荷马的史诗、希腊悲剧、喜剧和抒情诗,忒奥克里托斯(约公元前310~前250)、卡图卢斯(约公元前87~前54)、普卢塔克(约公元46~120或127)的作品等等也多次被译成欧洲许多国家的语言。在保存古希腊文艺方面,阿拉伯译者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至于欧洲各国古代和近代的其他大作家,如维吉尔、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塞万提斯、安徒生、易卜生、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莫里哀等等的作品,也都多次被译成其他国家的语言。在东方文学方面,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日本的能剧、中国的小说诗歌、印度的《故事海》、《薄迦梵歌》、《沙恭达罗》等

等都译成了欧洲语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印度的《五卷书》,它通过中古波斯文和阿拉伯文译本,反反复复地被译成了多种欧洲语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实践产生理论,欧美许多国家的翻译理论是五花八门的。从大的方面来看,可以分为两大派:一派是翻译可能论,一派是翻译不可能论。其实,完完全全百分之百的可能是没有的,完完全全百分之百的不可能也是没有的。世界上一切翻译活动都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进行的。欧洲许多著名的人物,比如马丁·路德、M. 阿诺德、F.W. 纽曼、J. B. 波斯特加特、H. 白洛克、Fr. R. 诺克斯、V. 那巴可夫等等,都对翻译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据《开塞世界文学百科全书》的意见,这些理论中有些是刚愎自用的。

翻译一篇作品或者一段讲话,必然涉及两种语言:一种是原来那个作品或者讲话的语言,德国学者称之为 Ausgangssprache(源头语言),英美学者称之为 Original 或 Source language,一种是译成的语言,德国学者称之为 Zielsprache(目的语言),英美学者称之为 Target language。二者之间总会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差距。因为,从严格的语言学原则上讲,绝对的同义词是根本不存在的。一个翻译者,不管水平多么高,也只能尽可能地接近源头语言,而不可能把原意和神韵完全传达过来。翻译者的任务就是处理两种语言之间的关系。关于翻译工作,一般的看法是,逻辑的抽象的东西,比如说数学、物理、化学等等著作,翻译起来比较容易。但是也有含义转移的危险。重在故事情节的作品,比如浅薄平庸的小说之类,翻译起来也比较容易。重在说理或鼓动的作品,比如格言诗、论战文章、政治演说、有倾向性的剧本,以及讽刺文学等等,翻译起来也不十分困难。但是重在表达感情的高级文学作品,翻译起来就极为困难。在这里,翻译或多或少只能是再创作,只能做到尽可能地接近原作,原作的神韵、情调是无论如何也难以完全仿制的。特别是源头语言中那些靠声音来产生的效果,在目的语言中是完全无法重新创造的。

除了翻译可能与不可能的争论之外,还有直译与意译的争论。这种争论在欧洲也有很长的历史,但在中国尤其突出。

中国的翻译理论和实践在世界上有显著的地位。《礼记》已有关于翻译的记载。《周礼》中的“象胥”,就是四方译官之总称。《礼记·王制》提到“五方之民,言语不通”,为了“达其志,通其欲”,各方都有专人,而“北方曰译”。后来,佛经译者在“译”字前加“翻”,成为“翻译”一词,一直流传到今天。

在中国,佛经的翻译自后汉至宋代,历一千二百年,这样历久不衰的翻译工作,在世界上是空前的。从实践中产生的理论,也以佛家为最有系统,最深刻。晋代道安(314~385)主张质,即直译。他提出了“五失本”,意思是在用汉文翻译佛经时,有五种情况允许译文与原文不一致。他又提出了“三不易”,意思是,三种不容易做到的

情况。苻秦的鸠摩罗什(344~413)则主张除“得大意”外,还须考虑到“文体”。他说:“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的,以入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高僧传》卷二《鸠摩罗什传》)隋代彦琮(557~610)最推崇道安的理论,他主张直译,提出“八备”和“十条”。“八备”指翻译者必须具备的八项条件;“十条”指他对译文体例、格式的十种规定。到了唐代,玄奘(602~664)是中国翻译史上集大成的人,文质并重,但似以质为主。他没有留下专门阐述翻译理论的文章。《翻译名义集》中记载了他的“五种不翻”的学说,指出有五种词语只能译音。北宋赞宁总结了前人的经验,提出翻译佛经的“六例”,详细探讨了翻译中六个方面的问题。他给翻译下的定义是:“翻也者,如翻锦绮,背面俱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这个生动的比喻,说明翻译是一种艺术(如翻锦绮),它将(语言的)形式加以改变(左右不同),而内容不变(背面俱花)。

北宋(960~1127)初期还有翻译活动,以后逐渐衰微。它的重新兴起始于明代(1368~1644)永乐五年(1407)。那时由于对外交通的需要,创立了四夷馆,培训翻译人才。明代末期,西学东渐,翻译工作更活跃起来。但此时翻译的方向已完全改变,不再是印度的佛经,而是欧洲的天文、几何、医学等方面的典籍,中国翻译史已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明代一些著名的翻译家对翻译工作也提出自己的看法。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说:“且东西文理,又自绝殊,字义相求,仍多阙略。了然于口,尚可勉强,肆笔为文,便成艰涩矣。”这是说,中西语言结构不同,文章脉络不同,西方有的术语为中国所无,口头解释一下还可以做到,笔译成文,人家就看不懂了。同时代的一位中国科学家李之藻(?~1631)在描写当时外国传教士的译书态度时说:“诸皆借我华言,翻出西义而止,不敢妄增闻见,致失本真。”此时的翻译往往用合作方式,同初期佛典翻译相似,即中国学者与外国人合作翻译,润文的责任则放在中国学者身上。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有识之士痛感学习西方之必要,翻译活动又逐渐兴起,在中国翻译史上形成又一个新阶段。马建忠(1845~1900)强调译事之难。梁启超(1875~1929)鼓吹佛典翻译之高明。毕生从事西方社会科学翻译的严复(1853~1921)在几篇序文里申述了他在翻译中遵循的原则。在《天演论》序中他说:“译事三难:信、达、雅。”“信”是忠于原作,“达”是忠于读者,“雅”是对于文学语言的忠诚。信、达、雅虽然只三个字,但体现了作品、读者、语言三者之间的关系。在严复那些译本当中,《天演论》接近意译,《原富》则近于直译。他说:“是译与《天演论》不同,下笔之顷,虽于全节文理不能不融会贯通为之,然于辞义之间无所颠倒附益。”不过他对本书“繁赘而无宏旨”的地方,则又有所删除。在《群己权界论》译凡例

中他说:“原书文理颇深,意繁句重,若依文作译,必至难索解人,故不得不略为颠倒,此以中文译西书定法也。”可以看出,《天演论》是意在达旨的述译,《原富》是辞义无所颠倒的严译,《群己权界论》是不依文作译的宽译。但是不论译法如何,有一点是始终如一的:即避免按字直译,努力用新的词或词组以求词义的全部传递。例如 evolution 中文没有与之相应的词,于是采用“天演”一词; liberty 这个法制观念中国当时还没有,于是用“群己权界”这一词组。严复对于西文词义的翻译作出了可贵的尝试,但是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开展。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历史进入了现代,翻译的重要性远迈前古。中国新文学的兴起同翻译是分不开的。第一个重视翻译并大力加以倡导的人是鲁迅。鲁迅主张直译。他这样做的目的是:在介绍外国思想以供借鉴的同时,还要通过译文改造我们的语言。1931年12月28日他在给瞿秋白的信中谈到严复。他说:“他的翻译,实在是汉唐译经历史的缩图。中国之译佛经,汉末质直,他没有取法。六朝真是‘达’而‘雅’了,他的《天演论》的模范就在此。唐则以‘信’为主,粗粗一看,简直是不能懂的,这就仿佛他后来的译书。”鲁迅不主张译文完全中国化。不完全中国化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他认为中国语法不够精密。“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糊涂。”

在主张直译方面,瞿秋白和鲁迅见解一致。他说:“翻译——除出能够介绍原来的内容给中国读者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的现代言语。”但是他同时指出:“当翻译的时候,如果只管‘装进异样的句法’等等,而不管是否活人嘴里能够说得出来,——那么,这些‘异样的句法’始终不能‘据为己有’。”他认为,“新的言语应当是群众的言语——群众有可能了解和运用的言语。”现代许多翻译家基本上都是直译派。所谓“直译”是指,原文有的,不能删掉;原文没有的,不能增加。这与译文的流畅与否无关。鲁迅译的《苦闷的象征》等书,文字就非常流畅,但仍然是直译。所谓“意译”是指对原文可以增删。古代的鸠摩罗什属于这一派。郭沫若一方面说:“我们相信理想的翻译对于原文的字句,对于原文的意义,自然不许走转,而对于原文的气韵尤其不许走转”;另一方面,他也主张:“我知道翻译工作绝不是轻松的事体,而翻译的文体对于一国的国语或文学的铸造也绝不是无足轻重的因素。”茅盾更是简洁了当地指出:“翻译文学之应直译,在今日已没有讨论之必要。”他又说:“‘直译’这名词,在‘五四’以后方成为权威。”傅斯年、郑振铎、周作人、艾思奇等都主张直译。因此,可以说,在近现代中国翻译史上,直译是压倒一切的准则。

比较欧洲和中国翻译的历史,以及翻译的理论,可以看出,东西双方探讨的问题基本相同。双方都讨论翻译的可能与不可能的问题,也讨论直译与意译的问题。但是

双方也有不同之处。西方谈翻译理论,偏重于可能与不可能的问题,以及可能的程度。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文学翻译难,科技翻译易。直译与意译问题,也偶尔涉及;但不是重点。在翻译的基础或背景方面,欧洲与中国不同。在欧洲,除了最早的希伯来语以外,基本上是同一语系的语言之间的互相翻译。因此才产生了某一些理论家主张的翻译三分法:一,翻译;二,变换;三,逐词对照本。这种三分法对中国是完全不适用的。中国决不可能有变换。因为在中国几千年的翻译史上都是不同语系语言之间的翻译,在同一语系语言间才能变换。中国偏重于直译与意译之争,所谓文与质者就是。这是由于从佛经的翻译到现代科学文学著作的翻译,都有其特殊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中西双方的思维方式有所不同,在这里也表现了出来。中国讨论翻译的人没有对语言本质做细致的分析,而是侧重于综合,侧重于实际应用方面,因此谈翻译技巧多,而谈抽象理论少。在直译与意译的问题解决以后,如何解决具体作品和文句的译法问题将提到日程上来。

(季羡林 许国璋)

fanyu

凡语 指各地一般普遍说的词语。见于汉代扬雄的《方言》。例如《方言》卷一说:“嫁,逝,徂,適,往也。自家而出谓之嫁,由(犹)女出为嫁也。逝,秦晋语也;徂,齐语也;適,宋鲁语也。往,凡语也。”这里所说的“凡语”就是一般通行的都可以这样说的话。在扬雄书里有时也说“通语”。

(周祖谟)

fanti

繁体 指与简体相对的汉字字体。汉字是一种方块字,有不少笔画繁复的字,如變、屬、圖、鹽、鐵之类都不便书写。因此,在长期使用中就产生简体。如变、属、图、盐、铁几个字就是简体字。原来的字就称之为繁体。繁体都是由篆书、隶书演变成的楷体字。唐以前的书籍都是用手抄写的,凡是高文典策都是根据字书的正规的写法来写。唐代简体字应用较广,民间一般的笔札、契券、帐簿之类往往采用通常流行的简体。宋代以后刻板书盛行,经史要籍字体要求合乎规范,文字都根据通行的字书、韵书用繁体,惟话本小说之类或杂用简体。现在所写的楷体字基本上是从唐代的开成石经和宋代以来的字书一直传下来的写法,有些稍繁的常用字和偏旁进行了适当的简化。

(周祖谟)

fangle

反切 用两个汉字合起来为一个汉字注音,有时单称反或切,是中国传统的一种注音方法。例如,《广韵》“冬,都宗切”(以下凡不注出处的反切均出自《广韵》),就是用“都宗”为“冬”注音。用作反切的两个字,前一个字叫反切上字,简称切上字或上字,后一个字叫反切下字,简称切下字或下字。“冬”是被注音字,所以叫被反切字,简称被切字。

反切原理 反切的基本原则是上字与被切字的声母相同,下字与被切字的韵母(包括介音)和声调相同,上下拼合就是被切字的读音。

反切与拼音主要有3点不同:

① 拼音是用一个或几个音素符号来表示声母、韵母的实际音值,而反切所用的每一个汉字都代表一个音节,单纯表示辅音的汉字不存在,以元音开头的汉字也是少数。所以代表声母的反切上字不能不带韵母,代表韵母的反切下字又常常带声母。这样,代表声母和韵母的反切上下字都含有多余的成分,在拼合的时候,必须去掉多余的成分——上字的韵母、下字的声母。进一步细说反切的原则应该是这样:反切上字只取它的声母,不计较它的韵母和声调;反切下字只取它的韵母和声调,不计较它的声母。

② 理想的拼音字中的一个声母或一个韵母,只能用固定的一个或一组字母表示,绝不允许随意更动;反切上下字的选用则是灵活的,选用与被切字声母、韵母相同的任何字做反切上下字,都不会改变被切字的实际读音。例如,“孤,古胡切”。假如上字不用“古”,而用“过”、“姑”、“公”等字,下字不用“胡”,而用“乎”、“吴”、“都”等字,被切字的读音都不会变。这是因为前者声母都是[k],后者韵母都是[u]。从原则上说,同一类声母或韵母,各用一个字表示就可以了。假如规定只用一个字来表示,那么就无法给这个字自身注音,因此同一类声母或韵母至少得用两个字,而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又远不止两个。《广韵》同类声母的上字最多有17个,同类韵母的下字也基本类似。

③ 现代汉语拼音除了有双拼法之外,还有三拼法、四拼法。从书写形式上看,一个音节可以用1~4个音素字母表示;而反切只能用双拼,只容许用两个字。即使是零声母字,也必须有反切上字。例如在普通话里,“爱,乌代切”,被切字“爱”ai是零声母。如果是拼音,声母就可以不必表示了。反切注音法,则必须用一个“乌”字代表零声母来做反切上字。即使是既有韵头又有韵尾的韵母,也只能用整个字做反切下字。例如,“劝,去愿切。”被切字“劝”的韵母是üan,包含3个音素。反切注音法只用一个与“劝”韵母相同的“愿”字做反切下字。

反切刚刚产生的时候是容易学习和掌握的。当时一般人不仅可以通过反切认字,制造反切来注音,而且还能用反切来打哑谜、说隐语(见反语)。后来反切变得难懂了,甚至有些读书人也往往不懂。这是因为语音不断发展变化,用当代音去读古人造的反切,自然不免隔膜。

今音与反切不合举例 从中古到现代,汉语的声母和韵母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正是近现代入使用中古反切感到不方便的根本原因。语音变化对反切原则的影响很大,但大体上有规律可循。下面试举几条。

① 反切的基本要求之一是被切字的声调与反切下字相同。下字是平声,被切字也读平声。但今音平声分阴阳,被切字如果是平声,读阴平还是读阳平,则由上字

决定。这是因为中古平声不分阴阳，今音的阴阳是由中古的清浊变来的。中古清声母字归阴，浊声母字归阳。例如：“刊、苦寒切。”下字“寒”是阳平字，但被切字“刊”读阴平，这是因为上字“苦”是中古清声母字。又如：“坛，徒干切。”下字“干”是阴平字，但被切字“坛”读阳平，这是因为上字“徒”是中古浊声母字。

② 反切的基本要求之二是被切字与反切上字的声母相同。但有一类反切按今音读，被切字与反切上字的送气和不送气不一致。这是因为中古全浊声母今天普通话里已变成送气和不送气两类清声母，平声送气，仄（上去入）声不送气。当上字是全浊声母时，下字是平声，被切字今音为送气清声母；下字是仄声，被切字今音为不送气清声母。例如：“权，巨员切。”上字“巨”今读不送气声母，被切字“权”今读送气声母，这是因为下字“员”是中古平声字，而上字“巨”又属中古浊声母。又如：“度，徒故切。”上字“徒”今读送气声母，被切字“度”今读不送气声母，这是因为下字“故”是仄声字，而上字“徒”又属中古浊声母。

③ 中古的某些反切，按今音读，被切字声母是[k]、[kʰ]、[ç]，而反切上字声母是[k]、[kʰ]、[x]或[b]、[bʰ]、[s]。被切字的声母与反切上字的声母不一致。这是因为中古[k]、[kʰ]、[x]和[b]、[bʰ]、[s]两组声母，各有一部分字变成今音[k]、[kʰ]、[ç]。分化的条件在于有无[i]、[y]介音（或主元音，下同）。凡是不带[i]、[y]介音的洪音字，原声母保持不变；凡是带[i]、[y]介音的细音字，声母变成[k]、[kʰ]、[ç]。例如：

绛 古巷切 [kʰiaŋ] ← [ku] + [çiaŋ]
 怪 苦闲切 [kʰien] ← [kʰu] + [çien]
 孝 呼教切 [çiau] ← [xu] + [çiau]
 酱 子亮切 [kʰiaŋ] ← [bʰi] + [liaŋ]
 青 仓经切 [kʰiŋ] ← [bʰaŋ] + [çiŋ]
 嗽 苏弔切 [çiau] ← [su] + [tiau]

上述6例，被切字今读[k]、[kʰ]、[ç]，反切上字今读[k]、[kʰ]、[x]、[b]、[bʰ]、[s]。当然也有反过来的情况，例如：

归 举韦切 [kuei] ← [kʰy] + [wei]
 匡 去王切 [kuaŋ] ← [kʰy] + [waŋ]
 毁 许委切 [xuei] ← [çy] + [wei]
 钻 借官切 [tsuan] ← [kʰie] + [kuan]
 窳 七乱切 [bʰuan] ← [kʰi] + [luan]
 赛 先代切 [sai] ← [çien] + [tai]

类似的变化规律还有一二十条，但仍不能包括全部例外。

对反切术语本身的不同理解 大致说来可分为3种：

① 模棱两可的解释。宋代丁度等编撰的《礼部韵略》（1037）中说：“音韵展转相协谓之反，亦作翻；两字相摩以成声谓之切。”这种说法似乎认为“反”是指反切上下字与被切字声韵相合，“切”是指反切上下字的拼合过程。宋元之际黄公绍、熊忠《古今韵会举要》（1297）说：“一音

展转谓之反，一韵展转相摩谓之切，以子呼母，以母呼子也。”这话好象在说反切上字叫反，反切下字叫切。但并不明确。

② “反”、“切”同义，都是拼合的意思。清代顾炎武《音学五书·音论》说：“反切之名，自南北朝以上皆谓之反，孙愐《唐韵》谓之切，盖当时讳反字，……唐玄度《九经字样·序》云：‘避以反言，但纽四声，定其音旨。’其卷内之字，‘盖’字下云公害翻，代反以翻，‘受’字下云平表纽，代反以纽。是则反也，翻也，纽也，一也。”顾炎武认为“反”就是“切”，“切”就是“反”，也有作“翻”和“纽”的。但他提出的南北朝以上称反、唐代以后称切的说法并不精密。孙炎《尔雅音义》保存下来的反切确实作反，但隋唐以前也有称切的。北齐颜之推（531~?）《颜氏家训·音辞》说：“徐仙民（344~397）《毛诗音》反骤为在遽，《左传音》切椽为徒缘，‘河北切攻字为古琮’。颜氏‘反’、‘切’并用。”

③ 从分析“切韵”两个字入手，认为反切上字叫“切”，反切下字叫“韵”。隋代陆法言《切韵·序》批评前人说：“支脂鱼虞，共为一韵，先仙尤侯，俱论是切。”这是说“支脂”反切下字误为同类，“鱼虞”反切下字误为同类，陆氏称“韵”，“先仙”反切上字本不同类，“尤侯”反切上字本不同类（曾运乾说），陆氏称“切”。宋代沈括（1029~1093）《梦溪笔谈》卷十五说：“所谓切韵者，上字为切，下字为韵。”金代韩道昭《五音集韵·序》说：“夫《切韵》者，盖以上切下韵，合而翻之，因为号以为名。”沈、韩两家阐述得尤为清楚。各种说法不合，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反切的起源 关于反切产生的时代，历代学者的认识很不一致。主要有以下3种看法。

① 认为反切是三国魏孙炎创造的。其根据是《颜氏家训·音辞》中的话：“孙叔然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至于魏世，此事大行。”仔细玩味颜氏的话，只说孙炎“创《尔雅音义》”一书，全用反切注音，并未说孙炎首创反切之法。看来是人们可能片面理解了颜氏的话。

② 认为从产生汉字的时候就产生了反切。清代刘熙载（1813~1881）《说文双声·序》说：“切音……起于始制文字者也。许氏《说文》于字下系之以声，其有所受之矣。夫六书中较难知者莫如谐声，叠韵、双声，皆谐声也。许氏论形声，及于江河二字，方许氏时未有叠韵、双声之名，然河可为叠韵，江工为双声，是其实也。”与此相近的看法还有合音说。宋代沈括、郑樵，明清之际顾炎武也都持有这种看法。顾炎武《音学五书·音论》说：“按反切之语，自汉以上即已有之。宋沈括谓古语已有二声合为一字者，如不可为叵，何不谓盍……郑樵谓慢声为二，急声为一，慢声为者焉，急声为旃，慢声为者与，急声为诸，……是也。愚尝考之经传，盖不止此。如《诗·墙有茨》传，茨，蒺藜也，蒺藜正切茨字……。”形声字也好，合音字也好，既不是反切的开始，也不等于反切。这两者与反切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反切是对一个音节的声母和韵母有意识地进行分析，并且对反切上下字做了规定；而形声

字大量产生的时代(周、秦),还不可能对汉字作音理上的分析;合音字是急读、缓读问题。所以它们属于无意识的或偶然的,这与反切以注音为宗旨有着本质的区别。

③ 认为反切产生于后汉服虔、应劭时代。章炳麟、吴承仕(1884~1939)等力主此说。章炳麟认为:“服、应训说《汉书》,其反语已著于篇,明其造端汉末,非叔然创意为之。且王子雍与孙叔然,说经相攻如仇讎,然子雍亦用反语,其不始叔然可知也。”(转引自黄侃《声韵略说》的转述)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说:“寻颜师古注《汉书》,引服虔、应劭反语,不下十数事。服虔、应劭皆卒于建安中,与郑玄同时。是汉末已行反语,大体与颜氏所述相符。至谓创自叔然,殆非实情。”这些看法比较合乎情理。首先,《汉书》注中保存着服虔、应劭的反切,这是事实;其次,王肃、孙炎两人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观点截然相反,王肃一直攻诘孙炎的老师郑玄,如果反切是孙炎创造的,王肃也用反切,就等于授人以柄,自己甘拜下风,这是不可能的;再次,服虔、应劭都是汉末人,这与颜之推说的“是汉末人独知反语”的话相合。

反切的产生,是为了补救读若、直音注音方法的不足。反切与读若、直音比较起来,无疑是个巨大的进步。从音韵学史角度说,反切的产生,标志着汉族语音学的开始——从此懂得了对汉语音节做音理上的分析,把一个音节分成声、韵两个部分。

反切的改良 用反切注音,有很大的局限性。这表现在3方面:①反切上下字都含有多余成分,在拼合时有一定障碍;②反切上下字可用的字过多,使用的人难于掌握;③有些窄韵,不得不偶尔借用其他韵的字作反切下字,造成切音不准确的弊病。

正因为早期反切存在这样严重的缺陷,所以后代人不断从各方面对反切进行改良。代表性的主张反映在下面几种书里:

明代吕坤《交泰韵》,清代潘耒《类音》。这两部书立志革除旧反切的弊病,设计反切的基本出发点是尽量使两字连读就能拼出被切字音来。他们的改良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①反切上字不仅考虑到与被切字的声纽相同,清浊一致,而且也考虑到等呼相应。被切字是洪音字,上字用洪音;被切字是细音字,上字用细音;被切字是开口字,上字用开口;被切字是合口字,上字用合口。②下字尽量用不带辅音声母的字。③不全用与被切字声调相同的字作反切上字。在这个问题上,吕坤、潘耒的做法不完全一致。吕坤主张以入切平,以平切入,以上切上,以去切去;潘耒主张以仄切平,以平切仄。④被切字是平声字,反切下字照顾到阴阳分类,被切字阴平,下字用阴平;被切字阳平,下字用阳平。这是因为当时北方话和多数方言平声已经分化成阴阳两类。⑤反切下字尽量减少、划一,减轻使用者的负担。这样的改良固然给人们带来很大的方便,但同时也产生了新的弊端。一定要以元音开头的字做反切下字,而同韵的以元音开头的字毕竟是少数,这样势必找出一些冷僻字做反切下字。用难认

的字为常见字做反切,就失去了注音的作用。

明清之际杨选杞《声韵同然集》。这部书作于1659年,平入二声已完稿,上去二声未成,现在存世的是平声和入声的一部分。他的改良主要有两点:①减少反切上下字的字数。杨氏把所有韵归并为25类,称为“大韵”;把声纽定为31个,称为“字祖”。每“大韵”又分“宏”、“中”、“细”3类。“宏”相当于合口洪音,在“宏”声韵里确定15个字充当反切上字,13个字充当反切下字;“中”相当于开口洪音,在“中”声韵里确定21个字充当反切上字,24个字充当反切下字;“细”相当于开口和合口细音字,在“细”声韵里确定31个字充当反切上字,24个字充当反切下字。“宏”、“中”、“细”3类反切上下字的总和是124个,不到《广韵》反切上下字总数的1/12。②尽量选用不带声母的影响两组字做反切下字,有些韵没有影响两组的字,不得不选用晓匣等组的字。杨选杞的改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同时也有不足之处。因为反切上下字数目太少,有时不能不采取“借用”的方法,书中多次说“勉借”、“勉求”,甚至说“勉而又勉”。

清代李光地、王兰生《音韵阐微》和清代刘熙载《四音定切》。这两部书分别完成于1726年和1878年。《音韵阐微》作者是在满文十二字头的启发下,吸取《交泰韵》、《类音》等所有改良反切的长处而写成的。《四音定切》则是以《音韵阐微》为基础,而比它更加精密和严谨。这两部书的改良反切已经达到最佳状态了,但仍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韵母为[i]、[ɿ]的字,就没有以元音开头的字可用,只能用带辅音的字做反切下字,因此在拼合过程中仍有扞格不入的现象。

以上各家对反切做了各种改良,始终没有达到理想境地。只有改用一套分析各种音素的符号,才能解决这个矛盾。

参考书目

顾炎武:《音学五书·音论》,中华书局影印,北京,1982。

陈澧:《切韵考》卷六,中国书店影印,北京,1984。

(谢纪锋)

fanyu

反语 汉语里一种近于文字游戏的隐语。把一个双音节词语拿来,用第一个音节的声母跟第二个音节的韵母相拼,用第二个音节的声母跟第一个音节的韵母相拼,得出一组新的双音节词语来,这种反复相切的方法就叫反语。如,现代汉语“冬天”[tʊŋ tʰiən]的反语是“颠通”[tʰiən tʊŋ]。六朝人喜欢用反语开玩笑或评论别人文章的用字,甚至用到迷信、预言上。例如,日本释空海《文镜秘府论》西卷:“鲍明远诗云:‘伐鼓早通晨’……‘伐鼓’反语‘腐骨’是病。”因为“伐”字取声母,“鼓”字取韵母,切成“腐”;“鼓”字取声母,“伐”字取韵母,切成“骨”,而“腐骨”一词是不吉祥的。某一时代的反语,可用来作为研究该时代语音系统的材料。反语有时候也指反切,如,《颜氏家训·音辞》:“汉末人独知反语。”这句里的反语就是反切。

(俞敏)

Fan-Han dullyn

梵汉对音 (Sanskrit-Chinese transliteration)
用汉字对译梵文音。多见于佛典中的专名、咒语等。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在翻译梵文佛经的工作中,对专名和咒语往往采取音译。例如一种神灵名 *yakṣa* 译作夜叉,国名 *śravastā* 译作舍卫国,花名 *padma* 译作波头摩,咒语 *Tad yathā idī vidi* 译作怛𑖀𑖄也他引伊上臚尾臚,等等。利用梵汉对音材料,通过梵文的读音来了解汉字的读音,是汉语音韵研究方法的一种。

最先倡导用梵汉对音研究汉语音韵的是俄国汉学家钢和泰(1877~1937)。1923年,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一卷刊载了他的《音译梵书和中国古音》的译文。该文利用宋代法天的对音材料同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拟测的隋代《切韵》音相比照,来说明利用梵汉对音研究汉语音韵的重要性,在方法论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

汪荣宝实践了钢和泰提出的新方法,他的《歌戈鱼虞模古读考》(《国学季刊》1卷2号,1931)论文,考证出唐宋以上歌戈韵的字都读 *a* 音,不读 *o* 音;魏晋以上鱼虞模韵的字也都读 *a* 音,不读 *u*、*ü* 音。他的新方法和新成果打破了传统音韵学研究的成见,因此引起古音学上一场空前的大辩论。围绕着如何认识和评价译音材料和音韵研究方法等问题,以林语堂、唐钺、汪荣宝为代表的新派同以章炳麟、徐震为代表的旧派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在辩论过程中,一方面暴露了新派引用材料方面的某些缺点,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新方法的优越性。

法国汉学家马伯乐(1883~1945)1920年发表的《唐代长安方音》利用了天竺高僧不空的汉译梵咒(30多个汉字)的材料,虽然这些材料只占不空全部译音用字的5%,但是从中发现了唐代长安音鼻声纽字对梵文鼻音,又对浊塞音这一特点,从而最先提出汉语鼻声纽包含鼻音和浊塞音两个成分的见解(例如,“娜”应当读 *nda*)。后来罗常培在汉藏对音材料里也发现唐五代西北方音有类似的情形。

梵汉对音的研究,促使汉语音韵研究由清代学者的古韵分部转向古音音值的拟测。并考定了个别声母、韵母的音值。但最初阶段也不免有粗疏、简单化的弊病,例如,用宋音证隋音和用魏晋隋唐音证先秦音而时代不分,用历史音变解释不同来源的材料而忽视这些材料的地域差异,所以得出的某些结论与古文献的事实不符。

罗常培《知彻澄娘音值考》论文,考证出6世纪末至11世纪初知彻澄三个声纽读 *[t]*、*[tʰ]*、*[d]*(或 *[dʰ]*)、娘纽读 *[ŋ]*,订正了高本汉在《中国音韵学研究》里所作的 *[tʰ]*、*[tʰʰ]*、*[dʰʰ]*、*[ŋ]* 的拟测。选取对音材料时也注意到了它的时间性、地域性以及梵文文本之间的差别,同时又参证了汉藏对音、现代方言和韵图等材料,所以结论比较可靠。

陆志韦和李荣用梵汉对音证明《切韵》的浊音声母不送气,读作 *[b]*、*[d]*、*[g]*,订正了高本汉所拟测的送气音 *[bʰ]*、*[dʰ]*、*[gʰ]*。陆志韦的《古音说略》指出,梵文的不送

气浊音可以直接译成《切韵》的浊音,梵文的送气浊音好象无从对译,肯定古汉语的浊音全作不送气的,不至于有大错。李荣的《切韵音系》把隋以前各家对译梵文字母的情形归纳成如下几种:

ḍa 茶	dha 重音茶	送气浊音另加说明
da 陀	dha 陀呵	送气浊音对二字
ga 伽	gha 嘎	送气浊音对带口旁字
da 轻陀	dha 轻檀	送气浊音对鼻韵尾字

他们还分别参证了《广韵》又读、壮语的汉语借字和广西侬歌等材料。

以上诸家考证的问题大多集中于声纽,取材也以《圆明字轮》和《四十二根本字表》等字母译音表为主。

俞敏《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论文,取材范围扩大了,研究方法进一步改善,由零星的某些声纽、韵部的考证转向对一个时期、一个地区的整个语音系统的研究。他考证的后汉三国时期的声纽系统(部分声纽缺而不论)是:

k 见	kh 溪	g 群、匣一	ṇ 疑
t 端	th 透	d 定	n 泥
p 帮	ph 滂	b 並	m 明
(ṭ) 精	ṭh 清	(ḍ) 从	
ṭ 庄	ṭh 初	(ḍ) 床	
y 喻四		l 来	v 匣二
ś 审	ṣ 山	s 心	h 晓

韵部(部分韵部证据少,存而不论)是:

阴	歌 <i>a</i>	鱼 <i>a</i>	幽侯 <i>u, o</i>	宵 <i>au</i>	脂支 <i>i, ir</i>
入(去)	泰 <i>ad, as</i>				至 <i>id, ed, is</i>
阳	元 <i>an</i>				真 <i>in, en</i>
阴			之 <i>ei</i>		
入(去)	队 <i>ud, us</i>	职 <i>eiḡ</i>	缉甲 <i>ib</i>	缉乙 <i>ub, ob</i>	盍 <i>ab</i>
阳	諄 <i>un</i>	清 <i>iṅ</i>	蒸 <i>eiṅ</i>	侵甲 <i>im</i>	侵乙 <i>um, om</i>
					谈 <i>am</i>

论文利用20多位经师所译的全部经本,收集到500多个音节,材料丰富。在对音研究上有如下贡献:①用日本悉昙家的理论解决对音上的疑难问题,例如运用梵文元音替换规律解释对音材料里 *i*、*e*、*ai* 之间或者 *u*、*o*、*au* 之间的混淆现象;用“连声之法”分析梵文和汉语之间的音节对应。②辨识汉译梵音的中亚、印度方言因素,解决对音上的疑难问题,例如利用 *prakṛta*(梵语方言)清辅音在两个元音中间发生浊化的现象来解释对音材料里一部分清浊辅音混淆的原因。③处理对音材料时,用梵文原文和别种译本进行校勘。此文确证后汉入声收浊塞音,发现至祭两部去声收 *-s* 韵尾,订正了高本汉关于闭音节不用 *i*、*u* 作主元音的学说,考定四声的起源年代和分类,讨论了平、入、去声的调值,论证了歌部韵值应为 *a*,侵部应两分,匣于互补,后代所谓重组三等字有 *r* 介音,喻为审

浊,等等,并肯定了古无轻唇、古无舌上和娘日归泥等。

美国学者柯蔚南 1981 年发表的《汉朝佛教徒对音方言札记》考证出后汉时期的声纽是:

p 帮	p' 滂	b 並	m 明	
t 端	t' 透	d 定	n 泥	l 来
ts 精	(ts' 清)	dz 从	s 心	z 邪
tz 照		dz 床	ç 审	z 禅
		(ŋ 疑)	h 晓	ɣ 匣
				ʔ 影

韵尾入声 -p、-t[t,θ]、-k,阳声-m、-n、-ŋ。介音 w、r、j。元音 i、e、a、ə、u、o、ɑ。此文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高本汉等人的某些拟测。但关于邪禅二纽的拟音只能算作凭空推论。

梵汉对音材料里也存在音近替代现象,这是由于梵语和汉语是不同系属的语言,各有各的语音系统和组合规则,不是一对一的关系。这就要求研究者分析对音材料时,力避简单从事,应从多方面去考虑问题,参证尽可能多的材料。

参考书目

罗常培:《知彻澄娘音值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本1分,1931。

俞敏:《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收入《中国语文学论文选》,日本光生馆,东京,1984。

(刘广和)

Fanyu

梵语 (Sanskrit) 属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印度(又称印度-雅利安)语支的一种古代语言。广义的梵语包括3种:吠陀语——印度古代四吠陀的语言;史诗梵语——两大史诗的语言;古典梵语——许多文学作品,包括迦梨陀娑等的作品,以及宗教、哲学、科学著作的语言。狭义的梵语只指古典梵语。有人说,梵语是印度古代伟大的语法学家波你尼的《八章书》规范化了的文学语言。这是不正确的。波你尼的语法书不是吠陀分支,讲的不是吠陀语,同时也不纯粹讲古典梵语。书中的语法规律,同古典梵语比较起来,更接近于梵书、奥义书和经书的语言。波你尼的继承者迦旃延那讲的是古典梵语。

从梵语的原名 saṃskṛtam (整理好的)看,梵语似乎是人工组成的语言。也有人认为,梵语曾经是活语言。在印度古代的戏剧中,神仙、国王、婆罗门等高贵人物说的是梵语。而同他们对话的妇女等低级人物只允许说方言俗语,关于这个问题,至今尚无统一意见。

唐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二说:“详其文字,梵天所制,原始垂则,四十七言”(47个字母)。梵语这个名词,可能就代表印度语言学者早有的想法。不过,梵语一词在中国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梁高僧传》卷一《安清传》说:“于是宣译众经,改胡为汉。”“胡”字在同书的元、明本作“梵”。用“梵”代替“胡”,表示中国学者对梵语有了进一步认识。

语言特征 梵语在历史上使用过一些不同的字母。目前在印度流行的是天城体(Devanāgarī)字母。

梵语元音分简单元音、二合元音、三合元音,辅音分

喉音、腭音、顶音、齿音、唇音、半元音、啞音和气音等。

名词有性(阳性、阴性、中性)、数(单数、双数、复数)、格(体格、业格、具格、为格、从格、属格、依格、呼格)的变化。

动词变位包括单数、双数、复数;人称有第一、第二、第三人称;时间分现在时、未完成时、完成时、不定过去时、将来时、假定时;语态有主动、中间、被动;语气分陈述式、虚拟式、命令式、祈使式(不定过去时的虚拟语气);语尾分原始和派生两种。

梵语文献 在世界上所有古代语言中,梵语文献的数量仅次于汉语,远远超过希腊语和拉丁语,内容异常丰富,可以称为人类共有的瑰宝。广义的梵语文献包括四吠陀:《梨俱吠陀》、《娑摩吠陀》、《夜柔吠陀》和《阿达婆吠陀》,包括大量的梵书、经书、奥义书,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图1)和《罗摩衍那》,以及大量古事记。此外,它还包括大量的语法书、寓言故事集,以及医学、自然科学、文



图1 《摩诃婆罗多》古抄本

艺理论等著作。用典型的古典梵语(也就是狭义的梵语)写成的印度古典文学作品,更是文采斐然,影响深远。许多著名的作家,如跋娑、首陀罗迦、迦梨陀娑、檀丁、波那、苏般度、薄婆菩提等等,在印度文学史上,灿如列星。佛教大乘的经典大部分也是用梵语写成的。有几部原始佛教的经典,原来用俗语写成,后来逐渐梵语化,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语言——佛教梵语或混合梵语。

欧美的梵语研究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梵语文学作品引起了欧洲学者的注意,用近代科学方法研究梵语,从此开始。一方面产生了19世纪最重要的新兴学科之一: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另一方面又促成了德国学者称之为比较文学史的学科。由后者又衍变出现在几乎风

摩世界的比较文学。

中国古代的梵语研究 中国有1000多年的翻译佛经的历史,对梵语的语言特点当然非常注意,但是系统的研究却非常缺乏。既没有翻译梵语语法,也没有写出梵语语法。唐代出现了一批有关梵语的书籍,比如智广撰《悉昙字记》,义净撰《梵语千字文》(图2),全真集《唐梵文字》(图3),礼言集《梵语杂名》,僧坦多夔多、波罗瞿那弥舍沙集《唐梵两语双对集》等等。这些书的撰写目的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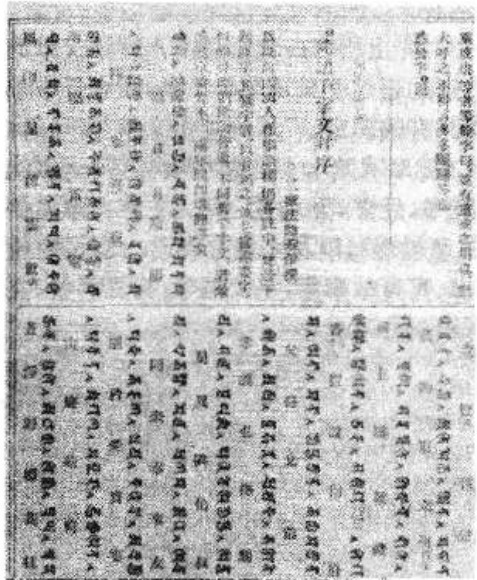


图2 《梵语千字文》并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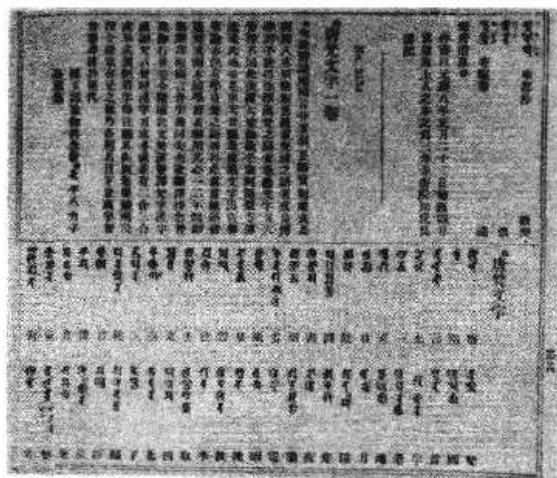


图3 《唐梵文字》首页

为了翻译佛经。但是这些书中有的只研究字母,有的则是模仿中国流行的《千字文》一类的书籍,只列举梵汉两语的单词,而根本不讲语法。义净在《梵语千字文》的序言中说:“并是当途要字,但学得此,则余语皆通,不同旧千字文。若兼悉昙章读梵本,一两年间即堪翻译矣。”但是,这是难以做到的。其后还有一些书,如《翻梵语》、《翻译名义集》等,也只是单词对译一类的书。从《高僧传》中可以看出,唐代一些佛教寺庙教授梵语,至于用什么课本,怎样教,我们都不清楚。唐代和唐代以前的一些僧传和其他书籍中间或有一些论述梵语语法的记载,如《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等,但所记几乎只限于名词变化。(参见彩图插页第51页) (季羨林)

Fang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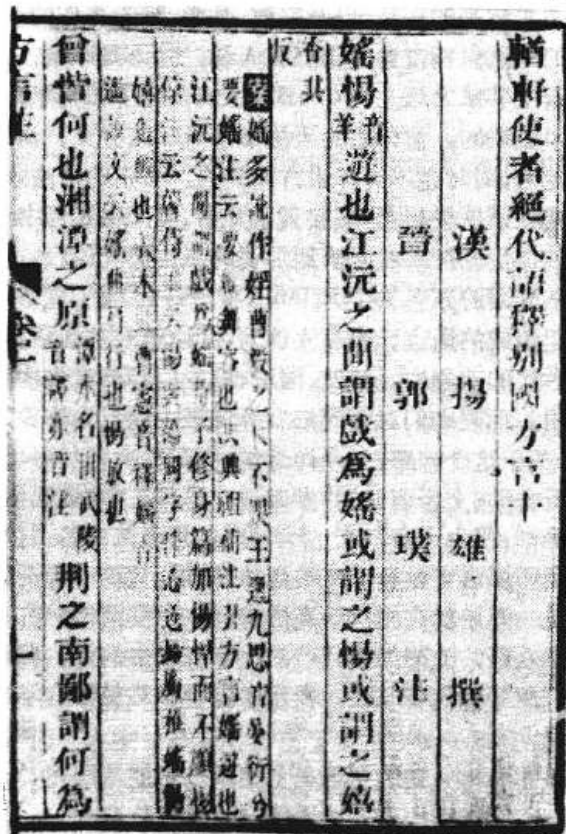
方特, C. G. M. (Carl Gunnar Michael Fant 1919~) 瑞典声学语音学家。1919年10月8日出生于瑞典尼雪平。1958年在皇家理工学院获博士学位。现任该学院言语通讯和音乐声学系主任、教授,并主持领导言语传输实验室。1949~1951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进修期间,与著名语言学家R. 雅柯布逊及M. 哈利合作研究言语声学分析。他所设计的言语合成系统(OVE IV)为美国采用。他是把语音学和言语工程贯通应用的学者之一,1973年曾获美国声学学会荣誉奖,1985年又获瑞典L. M. 埃里克森奖。



主要著作有《言语产生的声学理论》(1960)、《言语分析初探、区别特征及其关系》(1952)。 (吴宗济)

Fangyan

《方言》(Fang-yan) 全名《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中国第一部比较方言词汇的重要著作(参见彩图插页第27页)。西汉扬雄撰,今存13卷,见东晋郭璞《方言注》(涵芬楼四部丛刊本)。《汉书·艺文志》和《汉书·扬雄传》都没有提及《方言》,所以后代便有人对《方言》的作者发生怀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经“反覆推求,其真伪皆无显据。姑从旧本,仍题雄名”。现代学者



《方言》中的一页

王国维、罗常培等主张《方言》为扬雄所撰。根据扬雄《答刘歆书》和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序》等材料,可知周秦时期已有人采集方言。扬雄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以周秦残存的资料作为起点,进一步收集和整理各地方言。他利用各方人士来京的机会进行调查,用了27年时间,完成这部著作。《方言》刻本北宋有国子监本,南宋有蜀本、闽本和赣本,现存宋本是南宋庆元六年(1200)浔阳(今江西九江)太守李孟传的刻本。《方言》所记载的都是古代不同地区的词汇,还掺杂少数当时少数民族的语言。它的体例是先列举词条,然后分别说明通行情况。例如第1卷第1条:“党、晓、哲,知也。楚谓之党,或曰晓,齐宋之间谓之哲。”《方言》对所记录的词汇,往往注明“通语”、“某地语”、“某地某地之间语”、“转语”等。通语即当时通行的语言,某地语即当时某个地方的方言,某地某地之间语即通行区域比通语小比某地语大的方言,转语则是由于时间和地域上的不同而语音发生变化的词。《方言》对所记词汇大都说明通行区域,可从中大体了解汉代方言分布的轮廓。《方言》以各地的活方言作为记录对象,不受文献记载和文字形义的限制,并注意综合时间和地域的不同去研究方言,这在研究方法上为后世树立了优良传统。《方言》以它突出的成就,不仅在中国方言学史上,而且也在世界的方言学史上成为一部不朽的著作。后代学者为《方言》作注疏的著作有多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方言注》、《方言疏证》和《方言笺疏》等。

《方言注》,这是《方言》的第一个注本,13卷,东晋郭璞撰(涵芬楼四部丛刊本)。郭璞继承和发扬了以活的方言口语作为调查对象的传统,在为《方言》作注时,采用晋代活的语言来和扬雄所记汉代方言相比较。从《方言注》中可以看出某些词语古今的意义已发生变化。例如卷一:“虔、刘、惨、淋,杀也。”注:“今关西呼打为淋。”卷六:“孽,楚谓之勿。”注:“今亦以线贯针为勿,音刃。”《方言注》还指明某些方言词依旧在某地保存,或已经在某地消失转而在他处保存。例如卷一:“娥、嫫,好也。……自关而东河济之间谓之嫫。”注:“今关西人亦呼好为嫫,莫交反。”“虔、假,慧也。……楚或谓之瞽。”注:“他和反,亦今通语。”扬雄《方言》的原本虽无可查考,但因有郭注本而得以长期保存下来。现在能见到的宋以后的几种《方言》刻本,都是郭注本。《方言注·序》和扬雄跟刘歆间往来的书信都说《方言》共有15篇,但今本《方言注》仅存13卷,这大概是六朝时期的变动。至于字数,应劭《风俗通义·序》说9000字,清代戴震统计,《方言注》正文则有1.9万余字,其间变化,因时代推移,已无从查考。

《方言疏证》,清代为扬雄《方言》正伪补漏,逐条疏证的第一个校本。13卷,戴震撰(四库全书和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扬雄《方言》的刻本,自宋代以来有多种,经流传写刻,难免有些错漏。戴震以《永乐大典》本跟明本校勘,并进一步搜集古籍中引用《方言》和《方言注》的文字来和《永乐大典》本互相参订,共改正讹字281个,补脱字27个,删衍字17个。辨析疑义,取证确凿。例如卷五:

“甌,自关而东谓之甌,或谓之鬻”,注:“梁州呼甌。”文中“梁州”为“凉州”之讹,戴氏加以改正。又如卷十三:“冢,……凡葬而无坟谓之墓,言不封也。”“言不封也”下面有脱字,戴氏从《永乐大典》本补注“墓犹墓也”4个字。卷六:“怠,阨,坏也。”注:“谓坏落也,音虫豸,未晓。”戴氏认为“未晓”二字是阅读者所记,为衍文,故删。《方言疏证》还有疏漏和可以商榷之处。例如卷五:“薄,……自关而西谓之薄。”戴氏下脱“南楚谓之蓬薄”六字。卷十二:“蒔、殖,立也。”戴氏误改“殖”为“植”。清代王念孙撰《方言疏证补》(高邮王氏遗书本),有不少见解可以补戴氏的不足。

《方言笺疏》,清代为扬雄《方言》作注的著作。钱绎撰。卷首有咸丰建元辛亥(1851)自序。《方言笺疏》主要参考戴震的《方言疏证》和卢文弨(1717~1795)的《重校方言》这两种本,又用玄应《一切经音义》参校一遍。共13卷20余万字,旁征博引,资料丰富。如卷一第一条“党、晓、哲,知也。楚谓之党。或曰晓,齐宋之间谓之哲。”《笺疏》引书有《广雅》、《荀子》、《白虎通义》、《吕氏春秋》、《礼记》、《左传》、《逸周书》、《孟子》、《庄子》、《诗经》、《楚辞》、《史记》、《释名》、《说文》、《广韵》等20多种。钱氏不理解《方言》一书以活的方言口语作为调查对象的主旨,只是从史传、诸子、类书以及古佚残篇中搜集材料,加以考证,所以用力虽勤但创见较少。《方言笺疏》在清代有3种传本:一为广雅书局本,一为徐氏《积学斋丛书》本,都有脱文,一为光绪十六年仁和王文韶红蝠山房校刊本,相传以后者最为完备。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根据红蝠山房刊本影印发行。

参考书目

周祖谟校、吴晓铃编:《方言校笺及通检》,科学出版社,北京,1956。

周因梦:《扬雄和他的〈方言〉》,载《中国语文》,1956,第5期。

(叶祥苓)

fangyan dilixue

方言地理学 (dialect geography) 方言学的一支,研究一种语言在不同地区的差异。过去,“方言学”一词专指方言地理学,现在,方言学还另有一支即社会方言学,与方言地理学并立。方言地理学是传统名称,现在也称语言地理学、地理语言学或区域语言学。

发展简史 人们很早就注意到语言内部因地而异的现象,西汉末年扬雄的《方言》是最早的记录汉语词汇在地理上的差异的著作。欧洲近代方言地理学发源于德国。德国语言学家G.温克尔(1852~1911)想根据19世纪新语法学派提出的“语音演变没有例外”的假说来确定高地德语与低地德语的边界线,对这两大方言区交界处杜塞尔多夫地区的方言进行了邮寄调查。1881年他绘制了第一组方言地图,共6张,包括30个调查项目。然而,直到今天,根据这个调查绘制的方言地图仍没有出齐。1896年瑞士人J.吉耶龙(1854~1926)主持法国方言地图集的绘制工作。他派E.埃德蒙对法国及邻近的法语区的

639个点进行实地调查。这部地图集共分13册,1902年开始出版,1910年出齐。以后的大规模方言调查大都以吉耶龙的方法为蓝本,加以取舍增益。其中比较有名的有意大利、罗马尼亚、美国、英国、中国等的方言调查。意大利和美国的学者开始注意到城市里的方言,美国学者还调查了不同教育程度和年龄的人的方言。

方言地理学的课题和方法 方言地理学有几项主要工作:一是记录某些方言的特殊成分或结构;二是对个别方言做出局部或全面的描写;三是调查一种语言在整个或局部地区的一些差异;四是划分方言区;五是说明语言内部差异产生的原因和过程。方言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指上述第三项工作的方法,通常包括几个步骤:确定调查地区和调查点;确定调查方式;确定调查项目并编制调查表;确定调查对象,进行调查,按调查项目和调查点排列调查结果,然后将结果列表或绘制成方言地图集出版。方言地图有好几种形式。常见的有:①将一个或几个项目的调查结果标在地图上每个调查点旁边;②调查结果相同的,用同一符号标在地点旁边,并加注说明所用的符号;③用同语线将调查结果相同的各点连起来,或用异语线将调查结果不同的各点分开(见图)。同语线或异语线表示不同的语言形式的边界。如果许多同语线或

对新语法学派的,并且看到现阶段的方言分布情况在一定条件下能对语音演变的历史提供线索,20世纪20年代意大利M. G. 巴尔托利等想用典型的方言分布研究法来替代历史比较法。这就是所谓新语言学,后来称为区域语言学。早期方言地理学的注意力集中在搜集各方言的不同形式,藉以解释语言的演变和划分方言区。然而,方言的差异有的重要,有的不重要,并不是同等的。随着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发展,有些学者想按方言结构系统的差异来描述各方言的区别程度,并且在划分方言区时,从结构的角度赋予各种不同的重要性,于是从50年代中期起有结构方言学的尝试。当学者们开始对城市进行调查时,他们发现语言的差异与社会因素有紧密的对应关系。这样,到了60年代,对于城市里不同阶层的人的语言的研究就发展成为狭义的社会语言学,也称社会方言学或城市方言学。60年代中期,随着生成语法的发展,开始有人尝试用共同的底层表达式和语法规则的增加、减少、改变顺序的差异和简化形式等来说明方言间的异同,语言的分化和方言的分区等问题,这就是生成方言学。另外,在深入研究克里奥耳语的基础上,70年代开始,有些语言学家尝试建立多变体语法来描述语言内部变异的连续性以及一个人同时能掌握多种语言变体的能力。

方言地理学与政治、社会、文化、地理的关系 政治边界和地理障碍常常限制语言演变的扩散和不同方言的互相影响。两地距离的远近及交际网络的疏密和语言演变扩散的速度及相互影响的大小有密切的关系。两地政治、文化地位高低不同又经常决定语言演变的扩散方向。各种社会因素,如社会地位、教育程度等也与人们语言的差异有对应关系,有时还决定语言演变的扩散方向。

展望 方言地理学的方法对了解语言内部较显著的差异仍是最有效的办法。它面临的重大课题是提出一个较为全面的语言演变的模式来解释方言间的差异、这些差异的分布情况以及方言演变的可能方向等等。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结合社会语言学对方言点的深入研究,以及人文地理学对人和物的迁徙传播的研究。另外,方言地理学也应多多

调查方言在句法上的差异并加以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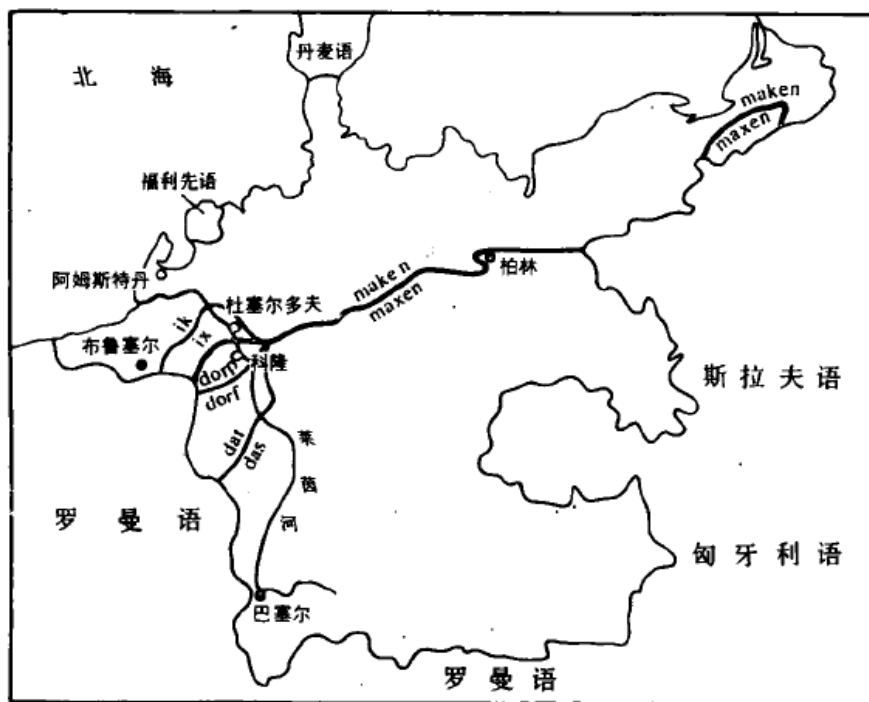
参考书目

J. K. Chambers and P. Trudgill, *Dialect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80.

H. Kurath, *Studies in Area Linguistic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Bloomington, 1972.

K. M. Petyt, *The Study of Dialect: An introduction to dialectology*, André Deutsch Limited, London, 1980.

(廖秋忠)



德语清塞辅音[p, t, k]与对应的清擦音[f, s, x]的地理分布图

异语线重叠或接近,这就形成了同语线束或异语线束,表明什么地方是重要的方言边界。在确定方言区后,就可以绘制方言分区地图了。

方言地理学与其他语言学分支的关系 现代方言地理学是为了寻找方言边界和验证新语法学派的语音演变的假说而发展起来的,它与历史语言学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许多语言学家认为,方言地理学的研究后来否定了“音变没有例外”的假说,证实了与之相对的波浪说。由于

Fangyan Diaocha Zibiao

《方言调查字表》(Questionnaire of Characters for Dialect Surveys)

供调查整理汉语方言字音用的著作。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辑,1955年7月北京科学出版社出版。该字表是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0年编的“方音调查表格”为底本加以修改编成的。删去了原表格中不必要的罗马字注音和一些不常用的字,改正了字的音韵地位,加入了一些常用字。第2版修订本出版于1964年9月,删去了一些不常用的字和又音字,增加了一些方言常用字,改正了个别字的音韵地位,删改和增补了一些字的注释。新版修订本1983年5月在北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第2版的基础上,改正了3个字的音韵地位。本书选择了比较常用的单字3700多个。书前有用法、说明,发音合作人及声调表、声母表、韵母表。书后附有音标及其他语音符号表。字的次序按切韵、广韵一系韵书所代表的古音系统排列。先按十六摄排列,摄的次序是:果、假、遇、蟹、止、效、流、咸、深、山、臻、宕、江、曾、梗、通。同摄的先分开合口,再分一二三四等。相承的四声并列,每页第一横行的韵目举平以赅上去。声母分36类,次第是:帮(非)、滂(敷)、並(奉)、明(微);端、透、定、泥(娘)、来、精、清、从、心、邪;知、彻、澄,照庄、穿初、床崇、审生、照章、穿昌、床船、审书、禅、日;见、溪、群、疑、晓、匣、影、喻云、喻以。声母、韵母、声调搭成框架,每个字放在各自应有的音韵地位,形成一张张韵图,相当于现代汉语声韵调配合表。用这个字表调查方言的音系,许多复杂不易理解的现象大都可以得到理解,从而得出方言音系在古今演变上的要点。用这个字表调查方言的音系也便于归纳整理。几十年来的实践证明,用这个字表作为调查研究汉语方言语音的基础是一个比较

Fangyan xubu

《方言》续补 (addenda of Fang-y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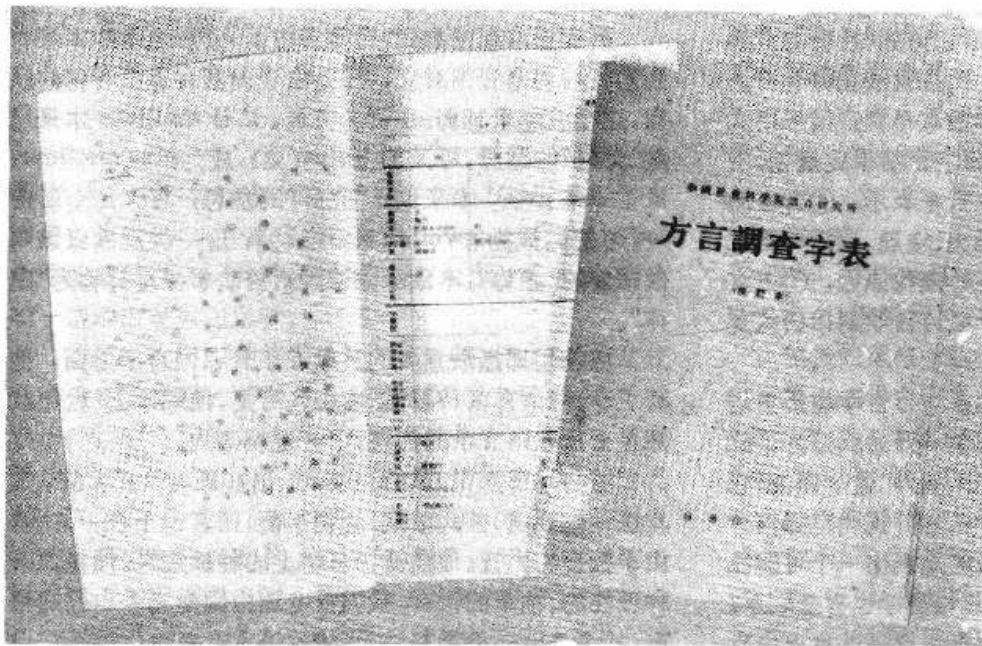
清人对扬雄《方言》的研究十分重视。一方面,戴震、卢文弨、刘台拱、钱绎、王念孙等人先后为《方言》作校勘疏证,订正伪文脱字;另一方面,效法《方言》,辑录古代方言词语续补《方言》的著作不断问世,如杭世骏的《续方言》(两卷,杭大宗七种丛书,四库全书经部小学类,丛书集成初编语文学类),程际盛的《续方言补》(一卷,艺海珠尘本),徐乃昌的《续方言又补》(两卷,积学斋丛书本),程先甲的《广续方言》(四卷,千一斋丛书本),张慎仪的《续方言新校补》(两卷,夔园丛书本)等,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杭世骏的《续方言》和程先甲的《广续方言》。

《续方言》,清代续补扬雄《方言》的第一本著作。杭世骏(1696~1773)编纂。此书摘录《十三经注疏》、《说文解字》、《释名》等10多种古籍中的方言词语500多条,分上下两卷。上卷包括言辞、称谓、计量、衣着等各类词300多条,下卷包括天文、地理、树木、虫鱼等各类词220多条。内容分类和次序编排大体依照《尔雅》。所引材料一般写明出处,有的还加反切注音或作校勘说明,引文用大字,出处、注音和校勘用小字写在原文后面。如“江东呼大为狙,郭注释言”。这里“郭注”指东晋郭璞的《尔雅注》,“郭注释言”指前面引文来自郭璞《尔雅注》的“释言”部分。《尔雅·释言》:“樊、狙也”,郭注:“今江东呼大为狙。”此书汇编的古代方言词语,为考释古词古义提供了有用的资料,但所列条文也有和扬雄《方言》相重的,如《续方言》中说:“齐人谓之颛,汝南淮泗之间谓之颛”,《方言》中说:“颛、颛、颛,颛也。湘江之间谓之颛,中夏谓之颛,东齐谓之颛,汝颍淮泗之间谓之颛。”

《广续方言》,清末续补扬雄《方言》较详的一本方言

训诂著作。程先甲编纂。此书仿《尔雅》、《广雅》体例,分“诂、言、训、亲、官、器、乐、天、地、丘、山、水、草、木、虫、鱼、兽、畜”等18类,共4卷。卷一为“诂、言、训”,解释一般词语,如“泓,似流反,谓浮水上也,江南言拍浮也”。卷二以下为“亲、官、器、乐”等,解释各种事物的名称。解释亲属称谓的,如“爹,吴人呼父”;解释建筑物名称的,如“江东呼甍为甍”;解释节气名称的,如“梅熟而雨曰梅雨,江东呼为黄梅雨”;解释花草名称的,如“秦人谓花为葩”,“枸出蜀,子可食,江南谓之木蜜”等。此书博引群书方言资料,分类较细,有的词语虽

然已经在《续方言》中出现,但不完全重复,仍有参证价值。如“姐”,《续方言》引《说文解字》:“蜀谓母曰姐”,《广



《方言调查字表》

简便的办法。此书还可以作为学习和研究汉语音韵的参考资料。(参见彩图插页第27页) (汤珍珠)

续方言》：“姐，羌人呼母”，两处都说“姐”，而“羌”与“蜀”不同。

(颜逸明)

fangyanxue

方言学 (dialectology) 语言学的一支。以研究民族语言内部的差异为其任务。它有两个分支：一是方言地理学；二是社会方言学，即狭义的社会语言学。前者研究语言的地区性差异，后者研究语言的社会性差异。

发展简史 中国西汉末年扬雄撰写的《方言》一书是最早记录语言内部词汇差异的专著(见《方言》)。但是，方言学作为现代语言学的一支开始于19世纪后半叶德国学者G. 温克尔(1852~1911)对国内各地德语的一些差异所做的调查。其后，瑞士人J. 吉耶龙(1854~1926)对法国及邻接的法语区进行了法语内部许多差异的调查。在这两项调查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方言地理学的传统。到了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美国学者W. 拉博夫(1927~)对麻省马萨葡萄园岛上居民以及纽约市部分居民所说的英语中的一些差异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在他这两项研究的基础上，逐步确立了社会方言学，即狭义的社会语言学的传统。

基本内容 方言地理学与社会方言学虽然都研究一种语言内部的差异，但是研究方法和方向各不相同。比较明显的区别有：①方言地理学通常对一个大地区内的若干点进行调查，以一个点的语言代表一个分区，选出一两个人为分区的样本；社会方言学则对分区内某个点进行调查，选出一组人的语言代表这个点。②方言地理学调查项目一般比较多，社会方言学调查项目通常只有少数几个。③在选择调查对象时，方言地理学专门挑选能说“纯粹”方言的人，社会方言学则用随机取样的办法来找调查对象。④在调查时，方言地理学的调查项目通常脱离语境，所得到的只是正式语体的表达方式；社会方言学则将调查项目放在一定的语境中，而且设法获得各种语体的不同表达方式。⑤方言地理学通常将调查结果用文字和地图表示出来，社会方言学则将调查结果量化，用统计数字或图表表示，有时也用规则来表示。⑥方言地理学在解释语言的差异时通常从历史、地理、政治与文化等找原因，社会方言学则从社会与心理找原因。⑦方言地理学不注重语言变体的研究，社会方言学则以研究变体为其核心。

方言学与语言学其他分支的关系 方言学与历史语言学一向有紧密的关系。方言地理学一开始就是为了验证19世纪新语法学派的“语音演变无例外”这个假说。它的研究结果后来也被用来构拟早期语言并说明它如何分化。社会方言学的一个主要研究目的是提出一个可能性较大的语言演变模式。方言学与普通语言学也有些联系。在过去，方言地理学与结构语言学可以说是基本上各自独立进行研究。然而，社会方言学的基本出发点之一是建立一个符合语言实际的、适用于社会交际的语言理论，它反对F. de 索绪尔以来让语言研究与社会交际脱节，以致

脱离语境或光凭语感的语料而建立起来的理论。

展望 方言地理学与社会方言学虽然有许多差别，但却能互相补充。后者需要借助于前者的初步调查，却又能摸出前者无法发现的细微差异。方言地理学的研究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已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但社会方言学的研究则仍须在更多的社团里进行检验并逐步完善，所以这两种研究还需进一步地配合与结合。方言学与普通语言学之间的相互渗透还不够。方言学要重视普通语言学所提出的理论问题，而普通语言学也应重视方言学所累积的大量材料。另外，方言学要从一些相关学科，如历史学、人文地理学、社会学等吸取更多有关的研究结果，以便更好地解释语言内部差异的现状并预测其未来的发展。

参考书目

J. K. Chambers and P. Trudgill, *Dialect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80.

W. Labov, *Sociolinguistic Pattern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Philadelphia, 1972.

K. M. Petyt, *The Study of Dialect: An introduction to dialectology*, André Deutsch Limited, London, 1980.

(廖秋忠)

Fangdelyesi

房德里耶斯, J. (Joseph Vendryes 1875~1960) 法国语言学家。1875年1月13日生于巴黎，1960年1月30日在同地去世。1907年起任巴黎大学教授。长期担任巴黎大学文学院院长和语言研究所所长，在20世纪上半叶的法兰西学派中地位仅次于A. 梅耶。

房德里耶斯研究印欧语系语言及其具体问题，对希腊语、拉丁语、凯尔特语尤其精通。在他的论文集中，他探索了民族语言史上的一些变化，并且不赞成德国新语法学派的论调。

房德里耶斯注意到，在语音方面，爱尔兰语中本来有强塞音与弱塞音的对立，可是由于弱塞音有擦音化的倾向，这样就越来越弱。在词义方面，法语 meilleur 本来已是“更好”的意思，可又加上 plus(更)，成为 plus meilleur；威尔士语 gwell 本来也是“更好”的意思，可又加上后缀 -oc'b(更)，成为 gwelloc'b。他认为，这一类现象应该叫做语言的“趋势”，不应该像德国新语法学派那样称为“定律”。

房德里耶斯最重要的贡献在于普通语言学方面，他写了专著《语言》(1921)。由书名可见，他继承19世纪欧洲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传统，十分重视历史。

房德里耶斯说，从历史看来，语言既有分化倾向，又有统一化倾向，彼此相抵，达到平衡。语言趋于统一，这是由于社会的力量。他批评语言学上的种族主义。他说，“一种理性的、抽象的语言，我们没有理由因为它是自己的语言，就说是比一种神秘的、具体的语言有多少优越性”。但是他又承认，民族语言与民族心理大有关联。

见法兰西学派、新语法学派、梅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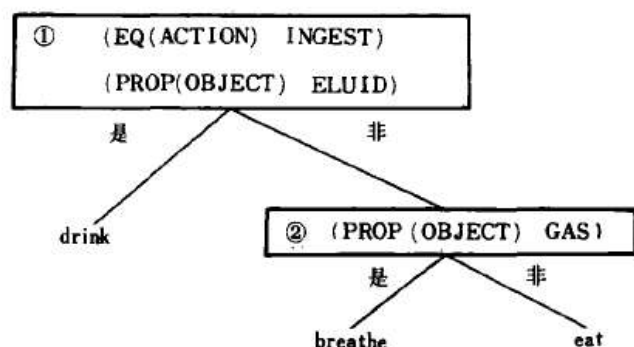
(岑麒祥)

Felnljl zimu

腓尼基字母 (Phoenician alphabet) 见比布鲁斯字母。

fenblan wangluo

分辨网络 (discrimination network) 在自然语言信息处理中用来选择动词意义的一种二叉树构成的网络。1975 年由美国学者 N. 戈尔德曼提出。例如, INGEST(摄入)可以表示 eat(吃)、drink(喝)、breathe(呼吸), 究竟选择哪一个意义, 要根据 INGEST 所涉及的事物的性质来决定, 为此提出如下的分辨网络来进行选择。



在第①个结点, 如果 INGEST 所摄入的客体(OBJECT)是液体(FLUID), 则其意义选择为 drink(喝), 否则, 转入第②个结点, 继续进行选择; 如果所摄入的客体(OBJECT)是气体(GAS), 则其意义选择 breathe(呼吸), 否则, 其意义选择为 eat(吃)。

采用这样的分辨网络, 可以通过计算机程序精确地确定动词的语义。(冯志伟)

Fenlan-Wuge'er yuzu

芬兰-乌戈尔语族 (Finno-Ugric group) 见乌拉尔语系。

Fenlanyu

芬兰语 (Finnish language) 芬兰的两种官方语言之一(另一种是瑞典语)。属乌拉尔语系芬兰-乌戈尔语族芬兰语支。使用人口 500 多万。此外, 苏联、瑞典的一些地方也有使用者。

芬兰人的祖先是原始乌拉尔人, 于公元 1~8 世纪迁入芬兰南部定居, 芬兰语也随之形成与发展。12 世纪后半叶, 芬兰为瑞典所占, 瑞典语成为官方语言, 芬兰语为群众使用的口头语言。芬兰语书面语始于 16 世纪(图 2), 1809 年成为官方语言之一。1835 年, 杰出的民歌古诗搜集家和研究家 E. 兰罗特(1802~1884) 将民间传说、神话和歌谣编成了一部民族史诗《卡勒瓦拉》(一译《英雄国》, 1835, 图 1)。《卡勒瓦拉》的出版标志着芬兰语成为一种标准语言。

芬兰语的书写与读音基本一致。有 21 个音位, 其中 8 个元音, 13 个辅音。元音与辅音均有长短之分。词重音

始终落在第一个音节上。芬兰语在语音上的特点是元音和谐, 辅音有强弱式的交替。语法具有粘着语的特点, 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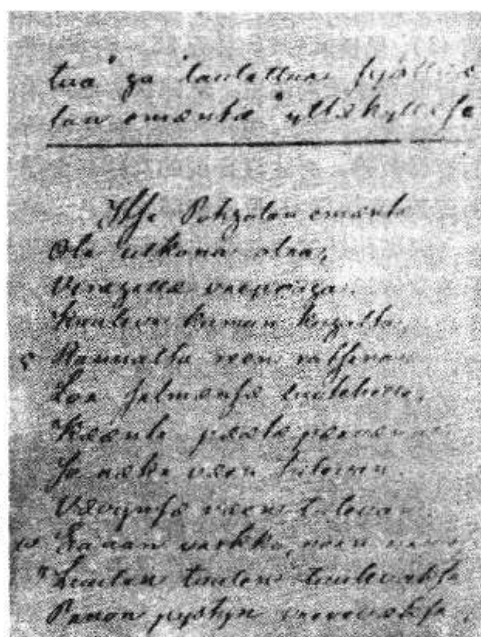


图 1 《卡勒瓦拉》第 14 章, 芬兰民歌古诗搜集家 E. 兰罗特手迹

一定语法意义的附加成分接在词根或词干上以表示各种语法意义。没有冠词。名词没有性的范畴, 有数、人称领属和格的范畴, 有 15 个格, 是世界上格最多的语言之一。动词现在时以在动词词干后接固定的人称后缀表示, 有过去时, 没有将来时, 现在时兼表将来时。动词有 4 种不定式和 2 种分词。它们大多数都跟名词一样, 根据格、数、人称领属发生屈折变化。芬兰语采用拉丁字母。(余志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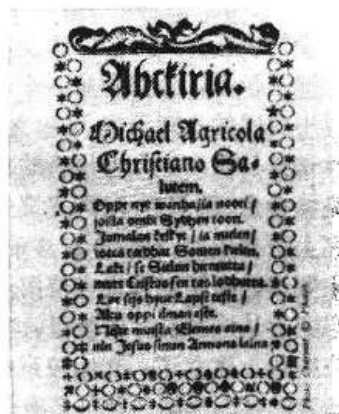


图 2 启蒙教科书《ABC 读物》(约 1542)

fenggexue

风格学 (stylistics) 研究语言的风格的学科, 可分广义、狭义两种, 且有古今之别。

狭义的风格学古已有之, 即修辞学。在中国, 对于语言运用之术早就有人注意, 所以孔子说: “辞达而已矣”, “言之无文, 行之不远”。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各逞雄辩的时候, 更是讲究说话作文的本领。研究这些问题, 而在理论上加以总结的是 5 世纪的刘勰(约 465~约 532)。他的论著《文心雕龙》把文章按风格分为八体, “一曰典雅, 二曰远奥, 三曰精约, 四曰显附, 五曰繁缛, 六曰壮丽, 七曰新奇, 八曰轻靡”(《体性》), 并且进一步指出: “雅与奇反, 奥与显殊, 繁与约舛, 壮与轻乖”, 将风格分成了两种对立的类型。

在西欧, 古希腊的哲人亚里士多德(公元前 384~前

322)专门写了《修辞学》一书来探讨运用语言的艺术,其重点在于研究如何能打动听众,因此为作政治演说与法庭辩护的人所必读。古罗马时期,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昆提利安(约公元35~约95)等人又进一步研究各种修辞手段的运用,从此修辞学成为西欧各国学校中的必修课,与文法、逻辑并列。其影响所及,凡上层人士而标榜教养,必注意言词的文雅与合乎身分,结果是矫饰过甚,套语层积,反成修辞之病。

突破传统的风格学格局而另立原则与方法的是20世纪的文体学,即广义的风格学。它以F. de 索绪尔以来的现代语言学为基础,着重当代语言实例的收集、纪录与审辨,以别于传统修辞学之重古文范例与喜作规定。所谓广义,是指:

① 研究的范围不限于书面语言,也扩充到口语,而两种之中,又各有若干类别,如书面语有法律文书体与私人书信体之别,口语之中课堂演讲体又迥然不同于电话问答题,此外旁涉广告、商品说明、科技报告、新闻报道等等实用文体。

② 研究的学派众多。以欧洲而论,有以C. 巴利等人为代表的法国学派,研究全民语言中语音、词汇与句法手段的表达力;有以L. 施皮策(1887~1960)等人为代表的德国学派,致力于从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的语言特点寻出共同的心理因素,可称之为心理文体学派;有以B.B. 维诺格拉多夫等人为代表的苏联学派,在文学语言特别是普希金、果戈理、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作家语言风格的研究上著有成绩;有以布拉格学派成员为主的东欧学派,其主要贡献在于区别语言使用上的常规与变异,以及如何以变异达成“突出”的效果;有在理论上着眼社会环境并在实践上建立了一套比较系统的研究方法的以韩礼德为代表的英国学派。此外还有计量文体学派、数学文体学派等等。

20世纪60年代以来风格学领域内更是活动频繁,新作迭出。对于若干根本理论问题,多数研究者已经趋向一致。归纳起来,他们的论点主要是:

① 语言起交际作用,其功能有三,即:达意、对话与成章。

② 由于交际的场合、媒介(口语或书面语)、对手、目的、内容等的不同,语言的运用也不同,因此存在着不同文体。

③ 语言里最常用的语音、词汇、句法项目是全民共用的,然而每人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里对这些项目常须作出不同的选择。选择的目的是适合。适合社会、文化环境的语言就是能达成交际任务的得力的语言。

④ 对于语言中一个项目的运用,有约定俗成的常规,然而在人们运用的时候,常对常规作或大或小的变异。

⑤ 变异可以是语音语调的,词汇的,句法的,也可以是艺术手法的,如比喻和形象的运用,如某些不常见的词或情景的猝然并列。即在语言现象完全合乎常规时,其出

现的频率与分布的格局异常,也形成一种特殊的变异。

⑥ 变异的目的一是为了突出某一点(事实、思想、感情),有量的突出,也有质的突出。

⑦ 变异最多、突出最明显的是在文学文体里,在那里人的创造力得到最大的发挥。变异之道,人各不同,因此不同作家各有风格特色。

以上论点已经产生了实际效果。以英语为例,已有根据各种实用文体特点而开设的大学课程。口语文体的描述已有一套程序,方法也比较细致。另一方面,文学文体的研究也已见成效,前有R. 雅柯布逊等对于诗律的探讨,后有G. N. 利奇等人关于小说文体的著作。在作家语言的研究上,成果也陆续出现,其中韩礼德根据及物动词的用法与频率,阐明W. 戈尔丁(1911~)小说《承继者》的主题思想,更有创见。

由于风格学所牵涉的社会的、个人的、语言的、文学的、心理的因素极为复杂,关系到心理学、社会学、文学理论、美学等其他学科,它还有许多未解决的问题,就是已大体解决的问题也还有争论,最大的争论之一在于文学风格学的地位。传统的文学批评家认为风格学对于一篇作品的分析失之于机械、烦琐,往往大费周章之后,结论肤浅,远不如文学批评之能一针见血,或虽自命为客观,其实仍是凭直觉去搜集语言事实作为证据。语言学界内部,则又感风格学不易捉摸,怀疑其是否有科学性可言。但风格学虽受到两面夹击,却仍然发展,原因是有此需要。人们对于语言的表达力以及如何达成各种交际任务是自古就注意的,对于作家的文章风格也是一直进行研究的。现在有了这门风格学,视野较广(看到整个语言,注意社会文化),立论较有根据(从语言事实出发,而不是纯凭印象)。几十年努力结果,已有一定的基本理论和成套的研究方法,使初学者有阶可循,使语言学家注意“变异”与“突出”,使文艺学家注意过去易于忽略的语言事实,确立了语言的运用必须适合具体场合这一对全社会有用的原则,应该说是已经另辟一个学术领域,成为兼有语言学与文艺学之长的综合学科了。

参考书目

-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教育出版社,1932。
王佐良:《英语文体学论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1980。
B. Charles, *Traité de stylistique française*, 2v, Heidelberg, 1909。
S. Chatman(ed.), *Literary Style: a Symposium*, London, 1971。
M. A. K. Halliday, *Explorations in the Function of Language*, London, 1973。
R. Jakobson, *Linguistics and Poetics*, in *Style in Language*, ed. T. A. Sebeok, 1960。
G. N. Leech, *A Linguistic Guide to English Poetry*, London, 1969。
G. N. Leech and M. Short, *Style in Fiction*, London, 1981。
L. Spitzer, *Linguistics and Literary History*, Princeton, 1948。

В.В. Виноградов, О языке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9.

(王佐良)

feng Jiaban

冯·加班, A. (Annemarie von Gabain 1901~) 德国突厥学家。汉文名葛玛丽。1901

年7月4日生于莫尔欣根(今属法国)。1920年入柏林大学学习突厥比较语言学、汉学和佛教学。1926年获博士学位



后入德国科学院专门从事中国新疆吐鲁番出土古代维吾尔语文献的研究工作。1976年退休前是联邦德国汉堡大学教授,长期任国际乌拉尔-阿尔泰学学会理事长和《乌拉尔-阿尔泰学年鉴》主编。1971年获国际阿尔泰学常设会议颁发的金质奖章。冯·加班撰有专著

200余篇,对古代突厥语和古代维吾尔语以及中国新疆的历史、文化、宗教、艺术等方面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1929~1934年期间,和她的老师 W. 邦格一起刊布了6册《古代突厥语吐鲁番文献研究》。此外还发表了《回鹘文〈玄奘传〉第五卷研究》(1935)、《回鹘文〈玄奘传〉中的书信》(1938)等专著。1941年出版了《古代突厥语法》。该书取材丰富、论述系统、具体。1950年出第2版,1974年出第3版。20世纪50年代陆续发表《古代突厥语吐鲁番文献研究》第8册(1954)、第9册(1956)、第10册(1958)。1957~1961年刊布古代维吾尔语佛教原始剧本《弥勒会见记》。

冯·加班也是突厥史,特别是突厥文化史方面的专家。40年代末50年代初发表了《古代突厥人生活中城市的作用》(1949)、《维吾尔人的早期历史》(1952)、《突厥人中的佛教》(1954)等重要论文。60年代起,积极从事古代吐鲁番地区的物质文化、宗教和艺术方面的研究。先后发表了《高昌回鹘王国》(1961)、《古代吐鲁番地区的印刷术》(1967)、《高昌回鹘王国的文化生活》(1973)、《中亚学研究导论》(1979)等专著。1982年夏访问过中国,在北京、乌鲁木齐等地做了一系列学术报告。

(耿世民)

Fulamangyu

弗拉芒语 (Flemish language) 又译佛兰芒语。比利时的两种官方语言之一(另一种是法语)。属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西支。通行于比利时北部,使用人口约600万。弗拉芒语原是比利时北部佛兰德地区的方言。从13世纪开始,该地区出现了繁荣的商业城市,弗拉芒语的地位逐渐确定。比利时北部同荷兰南部相连,历史上荷兰、比利时曾是一个国家,所以弗拉芒语实际上即是南部荷兰语。但由于两地文化和宗教不同,习惯上使用不同的名称来称呼同一种语言。

从比利时西部的科特赖克至东部的奥伊彭以北,可以划一条语言分界线,把比利时分为两半,以北为弗拉芒语区,以南为法语区,使用法语方言瓦隆语。首都布鲁塞尔地区为弗拉芒语和法语混合使用区。

现代的频繁交往使弗拉芒语和荷兰语的差别日益缩小。1980年荷兰、比利时两国签约成立“荷兰语联盟”。条约规定两国将共同促进荷兰与比利时北部荷语区之间在语言和文学方面的一体化,并在语言文学的教学和科研方面进行合作,双方鼓励在国际上推广和使用荷兰语。现在荷兰、比利时两国在官方文件中及正式场合均不再使用弗拉芒语一词,而统一改用荷兰语。(沈雁冰)

Fusi

弗斯, J. R. (John Rupert Firth 1890~1960) 英国语言学家。生于1890年6月17日,卒于1960年12月14日。

弗斯是现代语言学伦敦学派的创始人。曾在利兹大学攻读历史,1913年获硕士学位。1914年参加英国印度教育司工作,在阿富汗、非洲、印度各地服务。他早年对语言和 H. 斯威特的速记术有兴趣,喜欢探讨语音问题。1920~1928年在印度旁遮普大学任英语教授。1928~1938年,在伦敦大学语音学系任高级讲师,系主任是 D. 琼斯。人类学家 B. 马林诺夫斯基也在同校经济学院任教。他们对弗斯的学术思想影响很深。1937年弗斯到印度研究古吉拉特语和泰卢固语15个月,1940年回校后任特级讲师。1941年升任语音学系主任,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办了一些短训班,致力于培养英国所急需的日语人才。1944年伦敦大学首次设普通语言学讲座,他是第一任教授,直至1956年退休。

1947~1951年,弗斯多次到英国国内、欧洲大陆和埃及各地讲学,曾任美国密执安大学访问教授。他兼任过的职务很多,1957~1960年曾任英国语文学会副会长。20世纪40~60年代,弗斯是英国语言学界的中心人物,但是在外国名声不大,因为他的意见与欧美各派相左。使他和伦敦学派声誉鹊起的是他的后继者 R. H. 罗宾斯、韩礼德、R. A. 赫德森等人。

弗斯自担任伦敦大学语音学系主任以后,就提倡语言研究和语音研究。他坚持语言理论研究有其独立性,不应被视为其他学科或语言教学的附庸,但是又不断指出,语言学发展史与知识发展史、文化发展史有密切关系。他肯定语言研究不同于文学研究,但是又运用语言研究方法去研究英国文学,最后几年还研究莎士比亚戏剧。他尊重印度古代波你尼的语言研究传统,不承认欧洲的语言学由19世纪的德国新语法学派或者20世纪的瑞士索绪尔学派开始。他说,古代希腊、罗马学者,中世纪的烦琐哲学家,文艺复兴时代及其后的词典编者和正音学家对语言研究都有其贡献。

弗斯在语言学上有两项独特见解,一是根据言语背景和上下文来寻求意义,二是用一套新方法描写语言

“节律”。他坚持谈语言不能不谈人生和文化,分析语言不能撇开意义。他一生只写了两本小书,一是《话语》,一是《人的语言》,都是通俗之作。他的创见主要发表在一些论文中,后来编成《1934~1951年论文集》(1957)和《1952~1959年论文集》(1968)。(王宗炎)

Fubu Silang

服部四郎 (Hattori Shiro 1908~)

日本语言学家。1908年5月29日生于三重县龟山市。1931年东京大学文学部语言学科毕业,1943年获语言学博士学位。1943~1969年在东京大学讲授语言学。1949年



任东京大学教授,1969年任该校名誉教授。1972年被选为日本学士院院士。1975~1977年任日本语言学会会长。1982年任第13届国际语言学家会议主席。早年对蒙古语作过精辟的分析,著作有《蒙文元朝秘史(一)》(1939,与都嘎尔扎布合编)、《蒙古及其语言》(1943)、《元朝秘史里蒙古语汉字表记

法研究》(1946)。在汉语研究方面,出版了《中原音韵的研究》(1958,与藤堂明保合编)。他对即将灭绝的阿伊努语作了调查研究并出版了《阿伊努方言辞典》(1964)。在语音学和音韵学方面也很有造诣,著有《语音学》(1951)、《新版音韵论和拼写法》(1979)等著作。他对琉球方言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并主编了《冲绳语辞典》(1963)。服部四郎对日语也进行过系统的研究,就日语的“祖语”问题发表过有用的见解。(参见彩图插页第32页)

(廖雅章)

Fushile

浮士勒, K. (Karl Vossler 1872~1949)

德国罗曼语文研究者和语言学家。1872年9月6日生于霍恩海姆,1949年5月18日卒于慕尼黑。先后在蒂宾根、日内瓦、施特劳斯贝格、罗马、海德堡各大学读书。1902年任海德堡大学教授,1909~1910年任维尔茨堡大学教授,1911年任慕尼黑大学教授。1937年因反对希特勒政权限制学术自由,被迫提前退休。1945年重返该校任教,1946年担任校长职务,1947年退休。

浮士勒的主要著作是关于罗曼语族各国人民的精神文化的。他研究了意大利、法兰西、西班牙的文学和语言,晚年还研究了葡萄牙和南美洲的文学。

在语言学方面,他是讲“新语言学”的唯心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新语言学”也叫区域语言学,它把一个语言集团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发展放在一块来研究,与当时德国新语法学派片面强调语音,不考虑其他问题的做法不同。新语法学派说,人们发音是不自觉的,语音规律不允许有例外,新语言学派则强调个人在语言中的创造作用。浮士勒在《语言研究中的实证主义和唯心主义》一

书(1904)中说,新语法学派所走的是实证主义道路,只看到语言中那些机械的、死板的东西。他讲唯心主义,指出语言主要是自我表现,语言的演化导源于个人的有意识的审美创造,而不是“盲目的必然性”所驱使。他还说,语言反映民族文化。语言发展与各时代的思想和艺术密切相关,研究语言要注意思想、文化与语言的相互作用,尤其要注意个人的艺术创造,而不应从声音和符号入手。

浮士勒深受 W. F. 洪堡特和 B. 克罗齐的影响,他的语言研究是从哲学出发,而不从语言史出发。他没有直接论述过语言史方面的问题。英国 R. H. 罗宾斯认为,浮士勒指出了新语法学派的缺点,可是他自己过分强调语言的文学和美学方面,而忽视人们不自觉地学语言,不自觉地发音和运用词法、句法规则这些事实,也未免所见不全。

见历史比较语言学、新语法学派、巴尔托利。

(胡祖彦)

Fu'ertunatuofu

福尔图纳托夫, Ф. Ф. (Филипп Федорович Фортунатов 1848~1914) 俄国语言学家。

1848年1月14日生于沃洛格达。1914年10月3日卒于科萨尔马。1868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不久去莱比锡、巴黎等地研究比较语言学,1876年起任莫斯科大学教授,福尔图纳托夫是莫斯科学派的创始人。他认为语法是研究形式的科学(词法学研究词的形式,句法学研究词组的形式),建立了所谓“形式派”。主要研究普通语言学以及印欧语(尤其是斯拉夫语)比较语言学。著作由后人辑录成两卷《福尔图纳托夫选集》(1956~1957)。他揭示了原始印欧语已



有3个鼻元音,特别是在古斯拉夫语和古俄语中存在鼻元音[ẽ]、[ē],并提出斯拉夫语和波罗的诸语言中重音自词首移往词末的规律。福尔图纳托夫关于词与词组形式的理论对后世俄语研究影响很大。

见莫斯科学派。

(信德麟)

fuyuyan

副语言 (paralanguage) 语言学术语。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副语言”指有声现象,如说话时气喘、嗓子沙哑或者尖溜溜、吃吃笑,整句话带鼻音,某个字音拉得很长,压低嗓音打喳喳,结结巴巴说话不连贯等等。这些是伴随话语而发生或对话语有影响的,有某种意义,但是那意义并非来自词汇、语法或一般语音规则。广义的“副语言”指无声而有形的现象,即与话语同时或单独使用的手势、身势、面部表情、对话时的位置和距离等等,这些也能表示某种意义,一般有配合语言加强表达能力的作用。

英国人提到“副语言”，往往用于狭义；美国人提到“副语言”，往往采用广义，也叫做“体语”或身势语。

关于有声的副语言，美国的 G. L. 特拉格(1906~) 最早提出了定义。1958 年他指出，副语言现象不属于语言，不能归入音位系统。这个定义许多人讨论过，但是什么才是副语言；至今没有一致看法。1974 年，英国 D. 克里斯特尔指出，音高、重音、“音渡”，这些音位应属于语言，但是发音时提得特别高，念得特别响，拉得特别长，还有其他一些超音段效果，应属于副语言。1964 年，N. N. 马克尔说，一个人的音质会表现出他的体格特点和行为特点。1966 年，P. H. 普塔西克和 E. K. 桑德尔说，从嗓音可以测出说话人的年龄。但是这些语言特征与音位不同，难于严格分类，更难于下严格的定义。

一个人非但有言谈，还有举止。按广义看法，举止就是无声的副语言。1959 年美国 E. T. 霍尔指出下面这些常见现象：一个人倾听别人说话时，会望着那人的脸，尤其是他的眼睛。为了表示注意，听话人会轻轻地点头，或者说 hmm。如果哪一句话他很同意，点头就点得很深。感到怀疑，他会扬起眉来，或者两个嘴角往下搭拉。要是不想再听下去了，他会把身子挪一挪，把腿伸一伸，或者移开视线，不再注视说话人。关于诸如此类的现象，50~60 年代美国有些人如 R. L. 伯德惠斯尔、J. 法斯特等做过比较细致的研究。

用手势和身势表示意义的方式，全人类基本上相同，但仍略有民族之分。摇头表示不赞成，点头表示同意，似乎没有例外，但是在一些阿拉伯国家里，把头从这边转到那边，却是表示同意。赵元任指出，向人招手叫他前来，中国方式与外国不同。中国人掌心向下，手指向内摆动；外国人掌心向上，手指向内摆动。由此可见，副语言有一部分是某一民族所特有，约定俗成，并非都出于本能。

身势语、手势语能加强有声语言的意义，例如一边说“不对”，一边使劲摆手。但是副语言也能改变有声语言

的意义，例如用正常语调说“佩服”，那是赞赏；如果“佩”字起点特别高，终点特别低，中间又拉得很长很长，那就分明有讽刺之意了。语言有真真假假，副语言如语调、面容等作为思想感情的表现却较为真实，因为往往是不自觉的。

(王宗炎)

Fu Maoji

傅懋勤 (1911~) 中国语言学家。字兹嘉。1911 年 5 月 16 日生于山东省聊城县。1939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曾任华中大学、华西协成大学讲师、副教授、华中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1950 年获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学位。1951 年起，先后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民族研究所副所长、《民族语文》杂志主编、中国民族语言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会长、中国语言学会顾问、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傅懋勤主要从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著《纳西族摩些语研究》(1940、1941、1943)、《丽江摩些象形文〈古事记〉研究》(1948) 和《纳西族图画文字〈白蝙蝠取经记〉研究》(1981、1984) 对纳西族东巴文经书中的两部名著做了详细的译解，为纳西族语言、文化历史、民间文学以及一般文字发展史和古文字解读提供了可贵的资料。他还就彝语、羌语、纳西语、傣语、维吾尔语和汉语的语音、语法、文字改革以及少数民族语文工作、社会语言学等方面的问题进行过研究，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傅懋勤于 196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培养语言学人才和组织、领导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以及创制、改革民族文字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王 均)

G

gainian congshulun

概念从属论 (conceptual dependency theory) 简称 CD。自然语言自动处理中的一种理论。1973 年美国人工智能专家 R. C. 尚克提出。尚克认为, 人脑中存在着某种概念基础, 语言理解的过程就是把语句映射到概念基础之中去的过程。概念基础具有完善的结构, 人往往能根据初始的输入预期可能的后续信息。因此, 必须研究概念的结构和映射规则。尚克还认为, 句法分析对语言理解的作用不大。

CD 理论有 3 条重要的原理:

① 任何语言中的两个意义相同的句子, 其意义的表达式只有一个。

② CD 表达式可由数目有限的若干个语义基元组成, 这些语义基元可以分为基本行为和基本状态两种。前者主要有:

PTRANS, 表示物体的物理位置的转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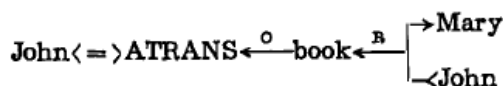
PROPEL, 表示在某个物体上使用体力。

ATRANS, 表示抽象关系的转移。

MTRANS, 表示人与人之间或在一个人身上的精神信息的转移。

MBUILD, 表示从旧的信息创造出了新的信息。

这些表示基本行为的概念之间的关系叫做从属关系或依存关系, 其数目也是有限的, 每种从属关系用一种特殊的箭头在图上表示出来。例如, John gives Mary a book (约翰给玛丽一本书) 这个句子的 CD 表达式如下图所示:



其中, John、book、Mary 叫做概念结点, ATRANS 也是结点, 它表示一个基本行为, 是“给”这种抽象关系的转移, 标有 R 的三道箭头表示 Mary、John 和 book 之间的接受或给予的从属关系。因为 Mary 从 John 那里得到了一本书(book), 标有 O 的箭头表示“宾位”从属关系, 即 book 是 ATRANS 这个基本行为的目的物。

CD 理论中的基本状态数目较多, 这里仅举出几种:

HEALTH($\pm n$), 表示健康状态。

MENTAL STATE($\pm n$), 表示精神状态。

PHYSICAL STATE($\pm n$), 表示物理状态。

括号中的($\pm n$)表示基本状态的程度, 程度高的用 $+n$, 程度低的用 $-n$, 高低的程度可用 n 的大小来表示。例如:

Mary HEALTH(-10), 表示 Mary is dead. (玛丽死了。)

John MENTAL STATE($+10$), 表示 John is ecstatic. (约翰入迷了。)

Vase PHYSICAL STATE(-10), 表示 The vase is broken. (瓶子打碎了。)

基本状态和基本行为可以结合起来。例如, John told Mary that Bill was happy (约翰告诉玛丽说, 比尔是幸福的) 这个句子, 可以不用上面那种带箭头的表达式, 而用基本状态和基本行为表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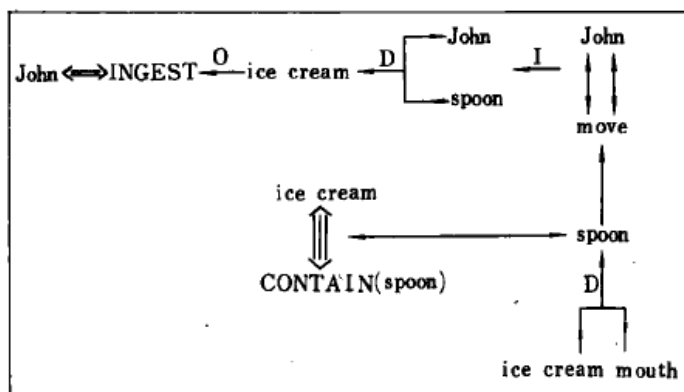
John MTRANS(Bill BE MENTAL—STATE($+5$)) to Mary.

其中, MTRANS 表示 John 把某种精神信息转移给 Mary, 也就是“约翰告诉玛丽”, MENTAL—STATE($+5$)表示精神状态还好, 即指“比尔是幸福的”, 这是精神信息转移的内容。

行为和状态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CD 理论中提出了如下 5 条因果规则: 行为可以引起状态的改变; 状态可以使行为成为可能; 状态可以使行为成为不可能; 状态和行为都可以激发一个精神事件; 精神事件可以成为行为的原因。

③ 在句子的意义表达式中, 必须把隐晦地存在于句子中的信息尽量地显现出来。

例如, John eats the ice cream with a spoon. (约翰用勺吃冰淇淋。) 这个句子可以用 CD 表达式表示如下:



图中标有 D 的箭头表示方向从属关系, 标有 I 的箭头表示工具从属关系。mouth (嘴) 在原来的句子中并不存在, 但它却作为一个概念结点进入了 CD 表达式中, 因为根据 CD 理论的第三条原理, 约翰的嘴是作为冰淇淋的接纳器隐晦地存在于句子的意义之中的, 不管它是不是在句子中用文字或词语表示过, 因此, 应该把它在 CD 表达式中表示出来。

采用 CD 理论, 可对一个句子进行同义互训输入一句话到计算机中, 计算机可用另外一些语句对这句话进行解释或进行推理。例如:

输入: John hit Mary. (约翰打玛丽。)

输出: John was angry with Mary. (约翰生玛丽的气了。)

Mary might hit John back. (玛丽可能反过来打约翰。)

Mary might get hurt. (玛丽可能受伤。)

同义互训可以检验计算机对自然语言理解的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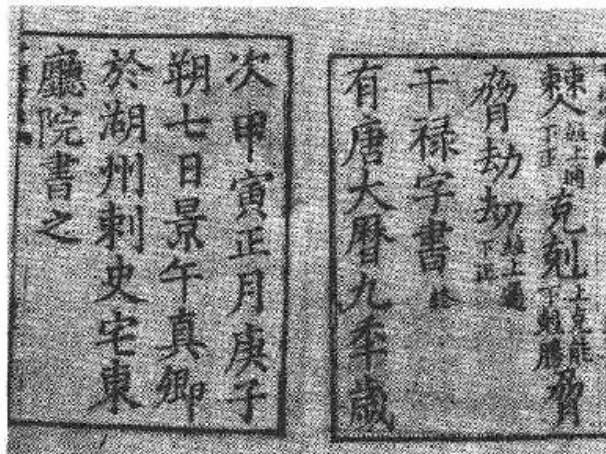
参考书目

R. C. Schank, *Conceptu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New York, North-Holland, 1975.

(冯志伟)

Ganlu Zishu

《干禄字书》 一本刊正汉字形体的书。唐武后时颜元孙撰。元孙是颜师古四世从孙，颜杲卿的父亲。《旧唐书·颜杲卿传》说：“父元孙，垂拱初登进士第。考功员外



颜元孙撰《干禄字书》

郎刘奇榜其词策，文瑰俊拔，多士耸观。历官长安尉，太子舍人，豪州刺史。”颜师古在唐太宗贞观年间在秘书省校正经籍，曾著《字样》一卷，作为校勘楷书正误的根据。后来杜延业又作《群书新定字样》，文字虽有增加，可是缺乏条理，该有的字没有，有的也不尽正确，所以颜元孙又编辑这本书，辨别楷书笔画写法的正俗，供为官和应试写字的参考，因此取名为《干禄字书》。

《干禄字书》所收的文字按平上去入四声编排。同属一声的字又按唐本《切韵》一类韵书的韵次排列。如平声为东、冬、钟、江、支、脂、之、微、鱼、虞、模、齐、佳、皆、灰、咍、真、臻、文、殷、元、魂、痕、寒、删、山、先、仙、萧、宵、肴、豪、歌、麻、覃、谈、阳、唐、庚、清、青、耕、尤、侯、幽、侵、盐、添、蒸、登、咸、衔、严、凡。这里耕韵不在庚韵之后，而入声部分与耕韵相对的入声麦韵也不在庚韵入声陌韵之后，略与陆法言《切韵》不同，其他都是一致的。

颜元孙分别文字为俗、通、正三体，有的一个字列举三体，有的一个字列举两体，一一加以说明。如果同样偏旁的字很多，就只举一个例子，加注“他皆倣此”。或“诸同声者并準此”。遇有形体近似，容易相混的，如形与彤，充与究之类，就一并举出，说明有不同。这是现存最早的一本辨正楷书字体的书。

颜元孙所谓俗，大都指与通行的隶楷不同，在点画之间略有误差的字。如坐作𡗗，𡗗作𡗗，貌作𡗗，凡作𡗗。所谓通，指通行已久，大半是隶省、隶变，或改易偏旁的字。如等作𡗗，走作𡗗，𡗗作𡗗，板作𡗗，糧作𡗗。所谓正，是指符合篆隶，都有凭据的字。他认为“自改篆行隶，渐失

本真。若总据《说文》，便下笔多碍，当去泰去甚，使轻重合宜”(自序)。这跟他的上辈颜之推在《家训·书证篇》的主张是一致的。他对于俗体并不绝对排斥。他认为俗、通、正三体可以在不同方面应用。俗体可用于书写契券、文案、户籍帐簿、药方等。通体可用于书写表奏、笺启、尺牍、判状。但书写著述、文章、对策、碑碣最好用正体，进士考试，理应用正体。颜元孙所作的工作可以说是一次整理辨正的工作。对后来楷书的规范化起一定的作用。不过，书中所定的正俗只反映当时社会上的书写情况，有些也不甚妥当。(参见彩图插页第11页)

参考书目

段玉裁：《书干禄字书后》，《经韵楼集》卷七。

周祖谟：《干禄字书之湖本与蜀本》，《问学集》，中华书局，北京，1966。

(周祖谟)

ganzhi yuyinxue

感知语音学 (perceptual phonetics) 研究语言感知的学科，又称言语的感知(speech perception)。语音由说话人说出的，成为言语波，通过空气传到听话人耳中，经过听觉机制、神经系统而使对方理解。广义地说，这一全部过程都是言语的感知过程。听觉的研究属于生理方面，神经系统的研究属于感知方面。语言的感知研究要用间接实验来进行，和语言学、语音学有密切关系，因此成为一门独特的学科。

言语感知的系统 言语信号的感知是将一连串的语音通过连续的、从听觉到神经的感知系统来完成。由于实验手段的限制，有些理论还在假说阶段，有许多事实还得通过语音实验间接取得。对于感知的重要机制、神经系统的功能还在探索中。言语声波的刺激在耳蜗的听觉感受器中转化为听觉神经的冲动，再传递给大脑的中枢神经系统，由这个系统加以整理、分类和译码。

言语感知的过程 一般可分为4个阶段：①听觉的，②语音的，③音位系统的，④语法结构的。听觉阶段是对纯声音的感觉阶段，所接收的是语音的物理参量。它把言语波转换成为一组按时间变化的声型，起着刺激神经的作用。这些声型包括频谱结构、基频、振幅、时长等，分别被感觉为一种语言的音位、声调、响度和快慢等，成为语音感知的阶段。它与听觉阶段紧密相联。听音人对这类音的认识，或出于习得的本能，或由于环境的濡染，辨别出各种语音信号，所感知的是一种概念模型。这一阶段感知的正确程度，因听话人的母语习惯而有差别。第3阶段由听音人根据自身熟知的语言音系，或通过学习后的理解，把所听到的语音归纳、对比而辨别出不同的特征或音位。第4阶段是感知的最高层次，有直接的和间接的两种感知效果。直接的是从声音的参量来感知，例如一个词或句子的特点可由其声音随时变的强弱、基频的变化、音节分配的快慢等而区别出词义或语义。但是，语音在连续语言中的变化很大，有些音会因受前后音的影响而变质，有的会在说快时失落(吃掉)，有时

或把整词整句说得含糊,甚至有些词或被别的词或插入的咳嗽等所替代,但听话人还能根据全句全章总的感知而似乎“听到了”这些音。这个阶段有许多成分依赖于社会因素。实验证明,听话人每因自身的母语音系与所听音系的不同,造成感知上的“偏误”或者用一种似是而非的所谓“中间语”来判断、摹仿。

言语感知的实验方法 语音的声学特征和感知特征往往不相吻合。为了弄清哪些音听起来与实际声学参量相符,哪些不符,需要用听觉测验来判断、选择、分类和对比。对这类实验通常采用两种方法:范畴感知和选择适应。

范畴感知。以元音为例,元音按舌位的高低,例如从*i*到*a*,连续渐变。尽管语音学家可以把它分为4个标准元音[i]、[e]、[ε]、[a],或作更细的分级,但各等级之间仍有无数的过渡。从前到后各音的舌位也都是如此。所以从音质来讲,元音的变化是无限的,而从一个特定语言中具有辨义功能的音位来分,元音又是有限的。从音位的应用可以把无数的元音归纳成若干个音位范畴,因而产生了各范畴之间的音位界线。在不同语言中,由于音系不同,范畴的界线也不同。例如英语的[i:]和[ε]是两个音位范畴,而西班牙人看来只是一个。汉语中吴方言的塞音有清浊两个范畴,而在官话方言中就只归入一个范畴。

选择适应。把范畴感知的实验用比较、对比等方法来使听者作出判断。这个实验方法又分两部分:①辨认,这是用人工合成出来的一系列循序渐变的语音(见言语合成),要求被试者辨认这些音的音位(不是音素),从而找出音位界线;②区分,用合成的3个音素的音作ABX实验。其中AB两音有微小差别,第3个X音则与AB中的某一个音相同,让被试者区分出哪两个音是相同的,剩下的一个音是独特的。这类的实验只有在高质量的合成技术问世以后,才能得到满意的结果。它可以用合成手段把各音的声学参量加减、变型或改变其环境来取得直接或间接的测验结果。图1是通过改变一个音节中的元音第二共振峰VOT(见声学语音学)的频率和趋势来测试辅音听辨范畴的示例。

言语感知的运动理论 运动理论在言语感知的研究中,近年已被采用。它的一些假说虽然还有争议,但它能解释许多关于语言的理解、学习等方面的问题,同时对言语信息处理工程也有指导作用,因此已广为人们所注意。运动理论的基本内容是:把听话人听懂语言的过程分为几个阶段。人们听辨语音,首先是耳朵听到各音段的物理特征,成为听觉模型。然后通过一系列的处理过程(生理的、物理的、……)变成可听懂的音位。还有一种说法是:

听话人所感知的音位模型,必然是他自己所能说出的音位模型。一系列的感知过程联系到听音和发音两方面。这些复杂过程在神经系统中进行得极快,而且有相互校正的功能。这些理论通过大量的实验(包括辅音、元音和声调的感知测验)提供了根据。运动理论由于实验对象和方法的不同而有多种解释。这里介绍一种“分析—合成”的运动理论(图2)。语音首先由听觉机制A来分析(例如,用区别特征的理论来分析),然后在记忆中“存储”,如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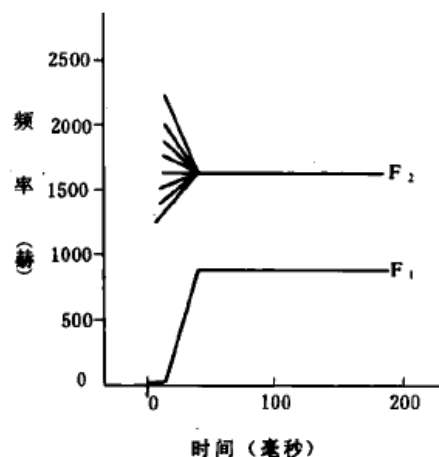


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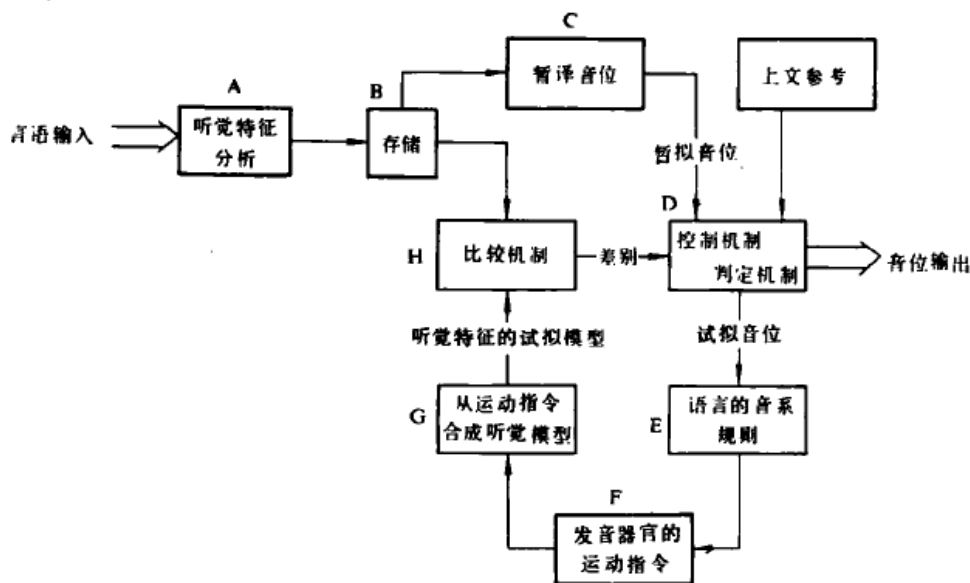


图 2

它随即把所听到的特征送到比较机制H中和初步的音位解码机制C中备用。后者将听觉特征转换成一连串暂时译解的音位,再送到控制机制/判定机制D,并与这个音位前面的文句混合,得到一连串的试拟音位。这一系列的试拟音位再由音系规则E转换成一套调音(发音)运动指令F。这些都送入一个合成装置G,它把指令再转成一套听觉特征模型,来和原来所存的听觉模型在H中作比较,其差别(或错误)由判定机制来确定。如误差很小,则判定成立,就把初步拟定的音位作为最终决定。如误差大,则产生一个新的试拟音位,重复一次合成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反复进行,直到得出最佳的判断。这套理论模型不只用来表达音位的感知运动,对于更高层次如音节、词、句等的感知,也同样可用(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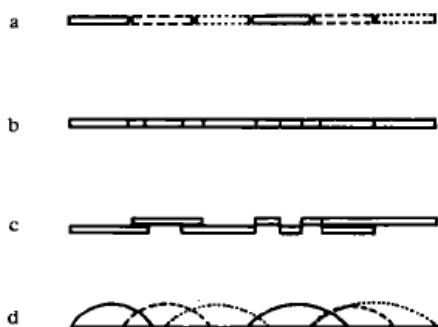


图3 连续言语中不同层次的分段示意

a 音位的分段 b 音素的分段 c 声学特征的分段
d 音位-音素的相关性

参考书目

C. G. M. Fant, *Speech Sounds and Features*, The MIT Press, Cambridge, 1973.

M. Studdert-Kennedy, *The Perception of Speech*, T. A. Sebeok (ed.), *Current Trends in Linguistics* (Vol. XII), Mouton, The Hague, 1974.

M. Studdert-Kennedy, *Speech Perception*, J. Lass (ed.), *Contemporary Issues in Experimental Phonetics*, Academic Press, New York, 1976.

J. M. Pickett, *The Sounds of Speech Communication—A Primer of Acoustic Phonetics and Speech Perception*, University Park Press, Baltimore, 1980.

(吴宗济)

Ganfangyan

赣方言 (Kan dialects) 又称赣语,是汉语七大方言区中通行面积较小、使用人口最少的一个方言。赣方言并非“江西话”,江西省境内除赣方言外,还有客家方言、吴方言和江淮官话,江西的邻省也有赣方言。由于赣方言和客家方言有不少共同特点,有的语言学者认为可以把二者合并为一个大方言区,称为客赣方言。

通行地域 赣方言通行于江西省中部和北部,湘东和闽西北,鄂东南和皖西南一些县市通行的方言,其特点近似赣方言,有的学者认为也可以划入赣方言。

江西省内通行赣方言的有60多个县市。包括南昌、景德镇(城区)、萍乡和宜春、抚州、井冈山三地区的各县市:南昌、新建、安义、靖安、奉新、高安、宜丰、铜鼓(也有人认为通行客家方言)、上高、万载、分宜、新余、清江、丰城、进贤、东乡、临川、金溪、资溪、南城、黎川、崇仁、宜黄、乐安、南丰、新干、峡江、永丰、吉水、吉安、泰和、永新、莲花、安福、宁冈、遂川、万安、上饶、九江两地区的大多数县市;波阳、余干、万年、鹰潭、贵溪、余江、弋阳、横峰、铅山、乐平、永修、德安、星子、都昌、湖口、彭泽、武宁、修水,赣州地区的广昌、石城、宁都、兴国、于都、瑞金、会昌等县也有使用赣方言的乡镇。此外,通行赣方言的还有湖南省东界的13个县:临湘、平江、浏阳、醴陵、攸县、茶陵、酃县、桂东、汝城、常宁、耒阳、资兴、安仁,有人认为岳阳、永兴也属赣方言区;福建省西北部的4个县市:邵武、光泽、建宁、泰宁;湖北省西南部与江西省连界的8个县:通城、蒲

圻、崇阳、通山、阳新、咸宁、嘉鱼、大冶;安徽省西南部安庆地区的望江、东至、宿松、怀宁、太湖、潜山、岳西、桐城等县的方言,据初步了解,也和赣方言相近,目前归属未定,可能也将划归赣方言。使用人口约3000万。

主要语言特征 赣方言和南方诸方言相比,不论在语音或词汇方面都和普通话的差别较小。

语音方面 多数地区的语音特点有以下8点:①古全浊声母字不论平仄,今读多数为相应的送气清音声母。例如(标音下加双横线为文读音,单横线为白读音):

	南昌	临川	高安	浏阳	邵武
婆	p'o	p'o	p'o	p'o	p'o
薄	p'ok	p'o?	p'ok	p'o	p'o
桃	t'au	t'au	<u>t'ou</u>	t'au	<u>t'au</u> <u>t'au</u>
道	t'au'	t'au'	t'ou'	t'au'	t'au'
才	t'ai	t'ai	t'ei	t'ai	t'ai
在	t'ai	t'ai	<u>t'ei</u>	t'ai	<u>t'ai</u> <u>t'ei</u>
朝	t'eu	t'iau	t'ieu	t'au	t'iau
赵	t'eu	t'iau	t'ieu	t'au	t'iau
乔	t'ieu	t'iau	t'ieu	c'iau	k'iau
桥	t'ieu	t'iau	t'ieu	c'iau	k'iau

② 古晓、匣合口字和非组字今读都是f声母。例如:

	南昌	临川	高安	浏阳	邵武
灰	fai	fai	fi	fei	fei
飞	fai	fai	fi	fei	<u>fei</u> <u>p'ei</u>
花	fa	fa	fa	fa	fa
发	fat	fat	fat	fæ	fai
婚	fən	fən	fən	fən	fən
分	fən	fən	fən	fən	fən

③ 古见系三四等字多数声母腭化为t, t', c, 有的与精组字混同。例如:

	南昌	临川	高安	浏阳	邵武
精	<u>t'in</u>	t'in	<u>t'in</u>	t'in	t'in
经	t'in	t'in	<u>t'in</u>	cin	kin
齐	t'i	t'i	<u>t'i</u>	t'i	t'i
旗	t'i	t'i	<u>ci</u>	c'i	k'i
修	ciu	ciu	siu	siu	sau
休	ciu	ciu	ciu	ciu	xu

④ 古泥、来母字(n, l)今读逢细音都能区别,逢洪音多数地方相混。例如:

	南昌	临川	高安	浏阳	邵武
脑	'lau	'lau	'lau	'nau	'nau
老	'lau	'lau	'lau	'nau	'lau
南	lan'	lam	lom	nan	nan
蓝	lan'	lam	lom	nan	lan
年	nien'	nien	ien	niē	nien
莲	lien'	tien	lien	liē	lien
娘	niong'	niong	iong	niong	niong
良	liog'	tiong	liog	liog	liog

⑥ 撮口韵不多,管的字也较少,多数来自古合口三等韵,少数来自非合口三等韵。例如:

	南昌	临川	高安	浏阳	邵武
鼠	'ɕy	'su	'ɕy	'ɕy	'tɕ'y
军	.tɕyn	.tɕyn	.tɕyn	.tɕyẽ	.kyn
传	.ts'on	.t'on	.tɕ'yon	.tɕ'yẽ	.t'ien
闪	'sɛn	'sem	'ɕiem	'ɕyẽ	'ɕien
月	nɿyot,	nɿyɛt,	yot,	nɿyɛ,	vie'
涉	sɛt,	sep,	ɕiet,	ɕyɛ,	ɕien,

⑦ 古流摄字多数读为 eu, ieu 等复合韵母。例如:

	南昌	临川	高安	浏阳	邵武
头	.t'eu	.t'eu	.t'eu, hɛu	.t'iau	.t'eu
受	səu'	ɕiu'	ɕiu'	ɕəu'	ɕieu,
秋	.tɕ'iu	.tɕ'iu	.ts'iu	.ts'ieu	.t'əu
有	'iu	'iu	'iu	'ieu	'ieu

⑧ 高元音、前元音之后往往前后鼻韵尾不分,后鼻音混为前鼻音。古臻、曾、梗各摄字合为 in, ən。例如:

	南昌	临川	高安	浏阳	邵武
新	.ɕin	.sin	.sin	.ɕin	.sən
应(应该)	.in	.in	.in	.in	.in
星	.ɕin	.sin	.sin	.ɕin	.sin, .sən
婚	.fən	.fən	.fən	.fən	.fən
灯	.tɛn	.tɛn	.tɛn	.tɛn	.tɛn
声	.sən	.sin	.ɕin	.sən	.ɕin, .tɕ'in

⑨ 声调多数为 6 或 7 类,去声多数分阴阳,入声有的分阴阳,有的不分阴阳。例如:

	南昌	临川	高安	浏阳	邵武
汉	'hən	hon'	hon'	xuan'	xon'
汗	hən'	hon'	hon'	xuan'	xon'
发	fat,	fat,	fat,	fæ,	fai,
月	nɿyot,	nɿyɛt,	yot,	nɿyɛ,	vie'

词汇语法方面 ① 赣方言内部比较一致,和别的方言不同之处比较少,但也有特点,例如:公公(祖父)、婆婆(祖母)、姑爷(姑夫)、姑娘(姑妈)、日上(白天)、柱头(柱子)、拐子(瘸子)、拘礼(客气)、来记(忘记)、缝(缝衣)、旋磨风(旋风)、结壳(结疤)、髻(缸)、闪(傻)、跼(蹲)、缙(铜钱)、藻(浮萍)、嫫(菜畦)、睭(看守)。② 有些常用词赣方言各地有不同说法,以南昌、高安、临川三个距离不远的点为例:

普通话	南昌	高安	临川
太阳	日头	日头	热头
早晨	早上	早晨	早间
晚上	夜里	夜头	夜间
今天	今日	今下	今朝
小孩儿	细伢子	细人子	伢子

续表

普通话	南昌	高安	临川
伯母	伯娘	姆妈	姐姐
手绢儿	手捏子	巾子	手捏子
臭虫	臭虫	壁虱	乌婢
咳嗽	咳嗽	咳	坎
热闹	热闹	闹热	漾
美(长相)	客气	济正	排场
丑	毛客气	丑陋	雄
谁	孰哩	谁哩	孰个
哪个	哪个	下个	何个

③ 在外省边远地区和中心地带之间词汇的差别更大,以南昌、平江、邵武为例:

普通话	南昌	平江	邵武
我们	我东	我哩	伢多
你们	你东	你哩	伢多
他们	佢东	佢哩	伢多
男人	男个	男人家	畚人
女人	女个	女人家	阿娘
丈夫	老公、男客	老公	老子
妻子	老婆、女客	老娘	妈娘
女婿	郎	郎	姐夫
桌子	桌子	桌子	桌
毛线	头绳子	红索	羊毛索
鸟儿	鸟	爪哩	爪子
蝉	家鲁子	蝉蛉	蝉
玩儿	玩	嬉	搞
睡觉	睏觉	睏落	瞌眠

④ 在赣方言内部比较一致的语词里,有些词和南方诸方言不同而和普通话相同,例如:眼睛、舌头、坟、洗澡、啃、舔、鸡蛋、老鸦等;有些词和几种南方方言相同而和普通话相异,例如:旧年(去年)、落雨(下雨)、颈(脖子)、倚(站)、屙(拉)、寻(找)、走(逃走)、讲古(讲故事)、缴鸡(阉鸡)、莫(别)、我个(我的)、放到(放着)等;有些词和客家方言共有,例如:月光(月亮)、屋(房子)、当昼(中午)、衫袖(袖子)、鼻公(鼻子)、话事(说话)、转去(回去)、屋下(家)、爷(父亲)、老弟(弟弟)、跌(遗失)、几多(多少)、几久(多久)等;有些词和湘方言一样,例如:崽(儿子)、女(女儿)、郎(女婿)、脑壳(脑袋)、灰面(面粉)、洋泥(水泥)、小酒(醋)、划子(小船儿)、狗公(公狗)、狗婆(母狗)、天干(天旱)、心子(馅儿)、妹子(妹妹)、毛(没有)等;有些词和吴方言相同,例如:霍闪(打闪电)、姆妈(母亲)、手节头(手指头)、蛮好(很好)、团近(附近)等。赣方言和南方诸方言词汇的交叉与它的语言环境有密切的关系。赣方言通行地域较小,四周受到湘、吴、客家、闽诸方言的包围,赣江流域和鄱阳湖周围无天堑阻隔,历史上和邻近地区的交往也较多,因此词汇受到各方言的渗透。

在江西省境外的赣方言中,受当地方言词汇的影响更多。湖南省境内的赣方言有许多和湘方言共有的语词。

例如湘东北的平江话：炸雷(打雷)、罩子(雾)、阶基(台阶)、现饭(剩饭)、凹谷(秕谷)、料(棺材)、里手(内行)、把(给：“把他一本书”)、梆硬(硬梆梆)、飞薄(很薄)、拍满(很满)、喷腥(腥味重)等就和长沙话相同。福建境内的赣方言区，历史上曾是闽方言通行的地域，词汇上也有许多闽方言的成分，例如邵武话的埕(路)、蛟(脚)、厝(房子)、樵(柴)、啐(岁)、笕(晒衣竹竿)、鼎(铁锅)、筲(筛子)、箸(筷子)、蟻儿(蚊子)、树箸(树叶)、粟(稻谷)、团子(小孩儿)、亲情(亲戚)、目珠(眼睛)、鸡角(公鸡)、结疤(结疤)、颂(穿)、遮被(盖被子)等都是闽方言里常见的。

赣方言内部差异不小，但一些很有特色的差异或缺乏明显的区域性，或分布的界线很不一样，加上赣方言的调查还不够深入，各地材料对不齐，因此，赣方言的分区至今还不明确。有人将江西省境内的赣方言分为(南)昌靖(安)片、宜(春)萍(乡)片、吉(安)莲(花)片、抚(州)广(昌)片和鹰(潭)弋(阳)片。从以下若干重要语音特点的分布情况可看出大概情形。

① 鄱阳湖西北岸的湖口、都昌有全浊声母，其来源和吴方言、湘方言不同，它相当于别处赣方言的送气声母，包括古全浊声母和古次清声母以及古来母。例如：

湖口	贪 .don	杜 .du	丑 'dzɛu	赵 dzau'
	秋 .dziu	草 'zau	全 .dzien	绝 dzie'
都昌	步 bu'	贪 .don	栗 dil	吕 'di
	赵 dzɛu'	秋 .dzieu	全 .dzon	钳 .j'en

② 在南昌以西的新建、奉新、高安、靖安、宜丰、修水、临川及其附近的余干、贵溪、南城、南丰、吉安及其附近的永新、峡江、新干和福建省的四个县，把一些古知彻澄、章昌船、庄初崇声母字读为 t、t' 声母，但字的范围很不一致，大致知组字多，庄组字少。例如：

修水	沉 .t'an	郑 t'an'	周 .tu	政 tən'
靖安	猪 .tə	丑 't'u	出 t'œt	站 tan'
高安	耻 't'ə	陈 .t'an	终 .tuŋ	充 .t'uŋ
余干	猪 .tu	丑 't'iu	迟 .t'e	主 'tu
临川	猪 .tu	丑 't'iu	郑 t'an'	章 .toŋ
南丰	尧 t'a'	赵 t'u'	楚 't'u	栈 t'am'
峡江	中 .tu	著 ty'	之 .ti	成 .tin
邵武	猪 .ty	丑 't'əu	郑 t'ian'	装(～饭) .toŋ

③ 比上述范围略小，在高安、奉新和闽赣边界的南城、黎川、南丰、光泽、邵武、泰宁、建宁，古清从母字读 t' 声母，透定母字读 h 声母，字的范围也大不一样。例如：

高安	情(亲～) .t'in	贪 .hom	大 hai'	潭 .hom
黎川	蔡 t'ai'	在 t'ai'	贪 .han	大 hai'
	达 hat			
南丰	菜 t'ai'	惨 't'an	在 t'oi'	坐 t'o'
	贪 .ham	托 ho?	大 hai'	
邵武	菜 t'ə'	在 t'u	坐 t'oi'	托 ho.
	择 hyo'			
建宁	菜 t'ai'	惨 't'am	在 t'ai'	坐 t'o'
	贪 .ham	托 hək	大 hai'	

④ 和上述范围相仿，在高安、奉新、靖安、临川、南丰、黎川、石城、宁都和福建省的建宁，各有 m、n、ŋ、p、t、k(或?) 6 种韵尾(南丰还有 l 韵尾)。例如：

	高安	奉新	临川	南丰	石城	建宁
三	.sam	.sam	.sam	.sam	.sam	.sam
难	.lan	.lan	.lan	.nan	.nan	.nan
农	.luŋ	.luŋ	.luŋ	.nuŋ	.nuŋ	.nuŋ
答	top	top	tap	tap	tap	tap
七	ts'it	tɕ'it	ts'it	ts'it	ts'it	ts'it
骨	kut	kət	kut	kul	kut	kut
麦	mak	ma?	me?	me?	mak	mak

⑤ 江西省境内的赣方言中，多数都有塞音韵尾和入声调，只有鄱阳湖周围的波阳、湖口、乐平及井冈山地区的萍乡、永新、峡江没有塞音韵尾，除波阳外各县也没有入声调类。在江西省境外，湖南省的赣方言多数县没有塞音韵尾，少数县没有入声调类；福建省的赣方言中，邵武、泰宁没有塞音韵尾，泰宁也没有入声调类。例如：

地点	古入声字今声调			例 字
	清	次浊	全浊	
波阳	入声55	阳去		忽 xuə, 陆 tieu'
乐平	阳平		上声	答 .ta 纳 .na 合 'xo
萍乡	阴平			缺 .k'ue 月 .ny
峡江	阴平			囑 .tu 略 .lio
浏阳	入声42			节 tsie, 药 io,
平江	入声44			谷 ku, 月 nyɿ, 石 [a,
耒阳	阳平	阳平(文)	阴平(白)	节 .tsie 绝 .tsue .tsue 落 .lo .lo
邵武	入声53	阳去		拍 p'a, 岳=饿 ɣo' 学=贺 ho'
泰宁	上声	阴平		息=死 'sei 褥=幽 .iu 席=西 .sei

⑥ 在南昌、高安，古影母开口字逢今洪音与疑母相混读为 ŋ 声母。这一特点在江西省的赣方言并不普遍存在，在湘东的赣方言则是普遍现象。例如：

南昌	爱 ɣai'	扶 'ɣau	暗 ɣon'	恩 .ɣen
	鸭 ɣat	恶 ɣək		
高安	爱 ɣuai'	扶 'ɣou	暗 ɣom'	
	安 .ɣon	鸭 ɣap	恶 ɣək	
平江	爱 ɣai'	哀 .ɣai	鸭 .ɣa	安 .ɣan
耒阳	拗 ɣau'	晏 ɣā'	压 .ɣa	
攸县	安 .ɣon	哀 .ɣəə	恩 .ɣēi	

这一现象在多数湘方言也有同样的反映,可以说,它是赣方言和湘方言共有的特点。

⑦ 临川、黎川两处有一个重要特点: 古来母字逢今细音读为 *t* 声母。例如: 临川: 黎 *ti*、辽 *tiau*、流 *tiu*、廉 *tiam*、林 *tim*、连 *tien*、炼 *tyen'*、领 *'tin*、轮 *tyŋ*、亮 *tioŋ'*、粒 *tip*、列 *tiet*、六 *tiu?*、黎川: 黎 *ti*、廉 *tiam*、两 *'tioŋ*、力 *ti?*。在其他赣方言点,也有少数类似情况,例如乐平: 礼 *'ti*、林 *tin*、新余: 力 *tie?*、略 *tio?*。据了解,在闽西的长汀、连城、武平、上杭一带的客家方言中,部分来母开口三四等字在口语里也有读为 *t* 声母的,看来,这可能是赣方言和客家方言共有的特点之一。

附: 赣方言代表点南昌话的声韵调

声母 19 个 *p, p', m, f, t, t', l, ts, ts', s, ɸ, ɸ', n, ɕ, k, k', ŋ, h, ʃ*。

韵母 65 个

韵 头	韵 尾												鼻韵	
	-ə	-i	-u	尾 韵		鼻 尾 韵				塞 尾 韵				
开	l	a	o	ɛ	ə	an	on	en	ən	at	ot	et	ət	ŋ
齐	i	ia		ie		ien in				iet it				ɲ
合	u	uə	uo			uan	uon	uen	un	uat	uot	uet	ut	ŋ
撮	y					yon yn				yot yt				
开		ai		eu	əi	aŋ	oŋ			ak	ok			
		au			əu									
齐				ieu	iu	iaŋ	ioŋ		iuŋ	iak	iok		iuk	
合		uai		ueu	ui	uəŋ	uoŋ		uŋ	uak	uok		uk	

声调 6 个

阴平 42、阳平 24、上声 213、阴去 35、阳去 11、入声 5。

参考书目

罗常培:《临川音系》,科学出版社,北京,1958。

袁家骅等:《汉语方言概要》,第2版,文字改革出版社,北京,19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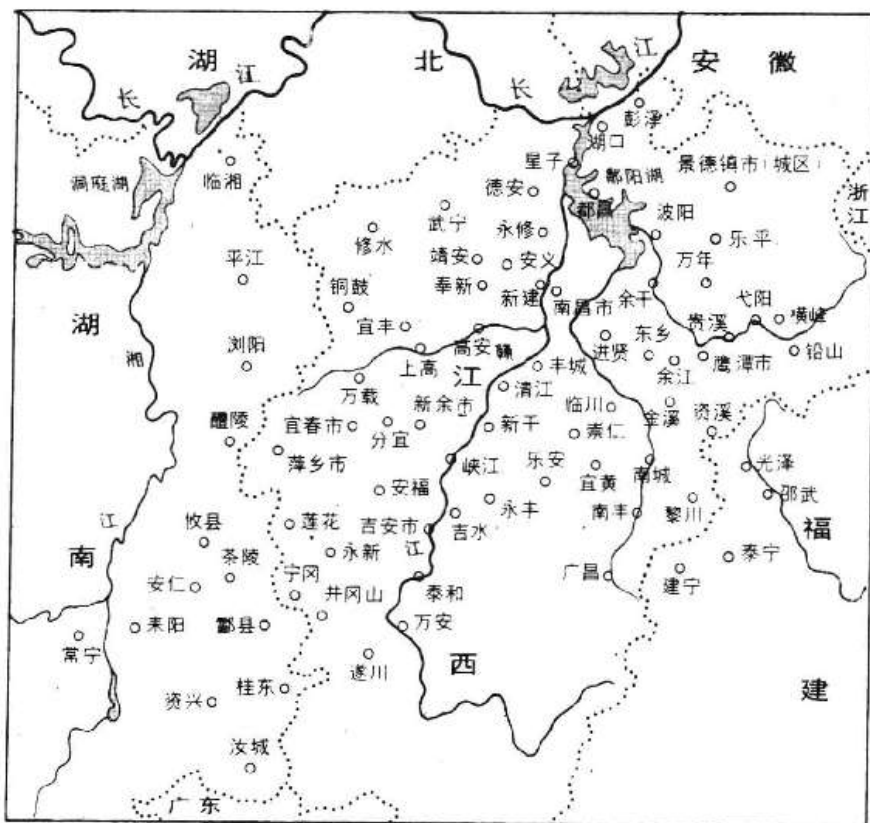
熊正辉:《南昌方言词汇》,载《方言》,1982~1983。

颜森:《高安(老屋周家)方言的语音系统》、《高安(老屋周家)方言词汇》,载《方言》1981~1982。

杨时逢:《江西方言的内部分歧现象》,《清华学报》新14卷,第一、二期合刊语言学专号,台北,1982。

杨时逢:《南昌音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9本,台北,1969。

(李如龙)



赣方言分布示意图

Gaobenhan

高本汉 (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 1889~1978) 瑞典汉学家。



早年利用汉语方言调查材料,写成《中国音韵学研究》,在中国引起极大反响。1936年由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译成中文。以后高本汉又进而研究上古音,陆续写了《分析字典》、《诗经研究》等书。后来研究金文、甲骨文。在1940年发表《汉语文字》。最后著作比较重要的

有《汉语音韵史纲要》，算是总结。

高本汉最大的贡献是把印欧比较语言学的构拟古形式的方法介绍到中国来，使汉语音韵学除分类外，在拟音上有了一套合适的方法和方便的工具。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音韵学著作，不论申述他的意见还是改正他的意见，都离不开他的影响。除音韵学著作以外，他还论述过古汉语语法、文字结构、假借字、字源学等等。高本汉是外国学者里能直接阅读古汉语文献的少数人之一。不过比起音韵学来，他在其他方面的成就就要逊色得多。

(俞敏)

Gaodeng Guowenfa

《高等国文法》 见杨树达。

Gaojiasuo yuxi

高加索语系 (Caucasian family) 指分布于高加索山脉南北、黑海和里海之间高加索山区的许多语言。所包括的语言众说不一，从30~40种不等。使用人口约500万。分南、北两个语族。

南部语族有格鲁吉亚语、明格雷利亚语、拉兹语和斯凡语。这些语言的语音比较一致，只是元音系统有些不同。除了斯凡语以外，元音没有长短的区别。塞音和塞擦音有清、浊和喉塞3类。辅音丛很常见，有多达6~8个辅音的辅音丛，如格鲁吉亚语prckvna(剥皮)。语法屈折形式很多，动词分人称、数(单、复数)、时、体、语气、语态、使役和确定主宾关系的特殊格式。这些范畴主要用前缀、后缀表示，也用动词词干内部屈折表示。动词变化复杂，在动词上加特定的前缀，就能表示动词的主语和直接、间接宾语，如格鲁吉亚语m-çer-s(他写给我)，m-xatav-s(他画我)，其中m表示作为宾语的“我”，s表示作为主语的他。名词性的词有格的变化，其数目从6~11个不等。名词性的词不分性别；也没有特别的冠词。句法的基本结构是主语—宾语—动词，但主语—动词—宾语的句型也很常见。特点是有唯被动结构，其中及物动词的主语用动者格表示，而真正的直接宾语用不及物动词的主语(传统上叫主格)表示。南部语族诸语言有共同的词汇，包括亲属词、动、植物名称、人体各部位名称、表示人类各种活动的词，等等。

北部语族分西北和东北两个语支。西北语支的主要语言是卡巴尔达语，通行于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使用人数约32万；此外，还有阿布哈兹语、阿迪格语、阿巴齐尼亚语等。东北语支约有30种语言，主要语言是车臣语和印古什语，前者使用人数约60万，后者约15万，二者通行于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此外，还有阿瓦尔语、莱兹金语、拉克语、达尔金语、列兹吉语和塔巴萨兰语等。西北语支诸语言的特点是，元音少，辅音多，有些语言达七八十个。除了有南高加索诸语言的所有辅音之外，还有唇化辅音、硬辅音、半硬辅音和软腭化辅音。名词系统非常简单，动词变位比较复杂。有些语言没有语法上的格，有些语言有两个

格。名词的领属关系用代词性前缀表示。动词的特点是，多为多式综合词，即不同的词结合在一起，构成复合词，作为一个完整的陈述。前缀表示最重要的动词范畴。在人称标记之后的前缀表示状语。句中词序多为主语—宾语—动词。简单句有3种结构：不定、主格和唯被动结构，分别用不定格、主格、动者格表示这3种句子的主语。东北语支诸语言的特点：语音系统的成分丰富。基本元音有5个：a、e、i、o、u。此外，在一些语言中还有鼻化长元音，喉化、唇化元音。在车臣语中，元音系统复杂，区别性元音达30个之多(包括二合元音和三合元音)，多数语言有强势辅音和非强势辅音的对立。词法的共同特征是按类别划分名词，例如“物”类和“人”类，“人”类又细分为“男人”类和“女人”类。名词格的变化繁多。句中词序多为主语—宾语—动词，特点是有唯被动结构的句子，复杂句通常由分词—形容词和分词—状语结构构成。北部语族诸语言保存许多本族词，但也有相当数量来自阿拉伯语、突厥语、波斯语的借词。在近代和现代，俄语是借词的主要来源。

高加索语系主要的语言都采用以基里尔字母为基础的文字。

参考书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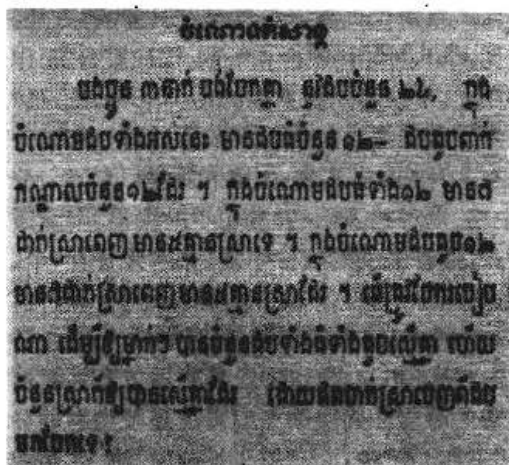
B. Comrie, *The Languages of the Soviet Un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M. Ruhlen, *A Guide to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Language Universals Project, Stanford University, 1975, 1976.

(林书武)

Gaomianyu

高棉语 (Khmer language) 属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分布于柬埔寨和越南南部与柬埔寨接壤的地区。使用人口约700万，其中越南南部的高棉族约60万。高棉语的语音较为复杂，共有33个辅音、27个元音符号和12个独立元音。辅音分高、低两大类。元音随高、低辅音的不同在读音上又有高、低之分，形成两套元音，有长短、轻重之分，书写时可放在辅音的上、下、左、右。辅音可单独构成音节。复合辅音用上下重迭的形式来表示。词重音落在短元音上。无声调变化。大部分词没有词形变化，小部分词的词性可按规律进行变化(动→名，形→名，动→使动)；此外，还有几个特殊名词可起前缀作用，置于动词或形容词之前，使之变成名词。来自巴利语和梵语的借词通常由词根与前缀或后缀构成。高棉语属分析型语言，语法意义主要由词序与功能词表示。词序一般是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放在所修饰的名词、动词或形容词之后，状语结构可放在句首或句尾。来自巴利语和梵语的借词仍保留其性和数的特征。高棉语在近2000年中起了很大的变化。在吴哥王朝(802~1432)以前和吴哥王朝前半期，梵语词随着婆罗门教和大乘佛教的传入而融汇进入高棉语中。在吴哥王朝的后半期，巴利语词随小乘佛教取代大乘佛教而被吸收进来。19世纪中叶，由于法国殖民主义的侵入，又有一定数量的法语词被吸收进高棉语，其中科技词较多。



高棉语文字

高棉语的文字最初来源于印度南部，公元1世纪柬埔寨建国后，在印度古代婆罗米字母的变体帕拉瓦字母的基础上改造而成。

(彭晖 邓淑碧)

Gaoshanzu yuyan

高山族语言 (Gaoshan languages) 属南岛语系印度尼西亚语族。分布于中国台湾省。使用人口约30万。分3个语群：①排湾语群，分布在台湾省的东南部山地，遍及高雄、屏东、台东、花莲、南投等县，包括排湾语、阿眉斯语、布嫩语、鲁凯语、赛设特语、卑南语、邵语。②泰耶尔语群，分布在台湾省北部山地，南投、台中、苗栗、新竹、桃园、台北、宜兰、花莲等县的一部分地区，包括泰耶尔语、赛德语。③邹语群，分布在台湾省中部阿里山一带，嘉义与高雄两县接壤处，包括邹语、沙阿鲁阿语、卡那卡那布语。另外还有一支是兰屿岛上的耶眉语，与菲律宾巴丹岛上的伊巴坦语有密切的关系。语言特点：清塞音送气与不送气不对立。泰耶尔语群和排湾语群的多数语言有浊塞音。有的语言有卷舌音 t, d, l 和舌面音 η, j 。元音系统以 i, e, a, u 4个元音的居多。无声调。重音辨义各语群不一致。词大多由一个以上的音节组成。词干加附加成分为构词和构形的主要手段。附加成分有前加、中加和后加3类。句子的基本语序是谓语在前，主语在后，宾语在谓语之后，形容词常在修饰语之前，但各种语言不完全一致。

(陈康)

Gelao yu

仡佬语 (Gelao language) 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仡佬语支。主要分布在中国贵州毕节、安顺、遵义等地区和六盘水市，广西隆林和云南麻栗坡等县。使用人口6000多。分稿、阿欧、哈给、多罗4个方言。仡佬语清的塞音、塞擦音声母分不送气和送气两套，大多数地区有小舌塞音，有清化的鼻音和边音。有复辅音声母。只有 n, η 两个韵尾。有4~6个声调。句子的语序是主语在谓语前，宾语在作谓语的动词后。数量词组作修饰语时在中心词之前。数词和量词组合时一般是数词居前。在个别地区数词11~19与量词组合时，个位数居前，量词居中，“十”在后。如“十三个”说成“三个十”。名词、代名词、形

容词、指示词作修饰语时在中心词后。单音节词占多数，合成词除带后加成分的是形容词外，都是名词。有大量的汉语借词。自有一套数词，只有个别数词和黎语同源。中国学者曾认为仡佬语属汉藏语系，语族、语支未定。1942年美国学者白保罗认为仡佬语、黎语、拉珈语和越南的拉梯语构成加岱语，这个加岱语与台语、印尼语构成一个语族，属原始南方语系，1975年又改称澳泰语系。中国学者通过比较研究，认为仡佬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自成一个语支，称仡佬语支。

(王辅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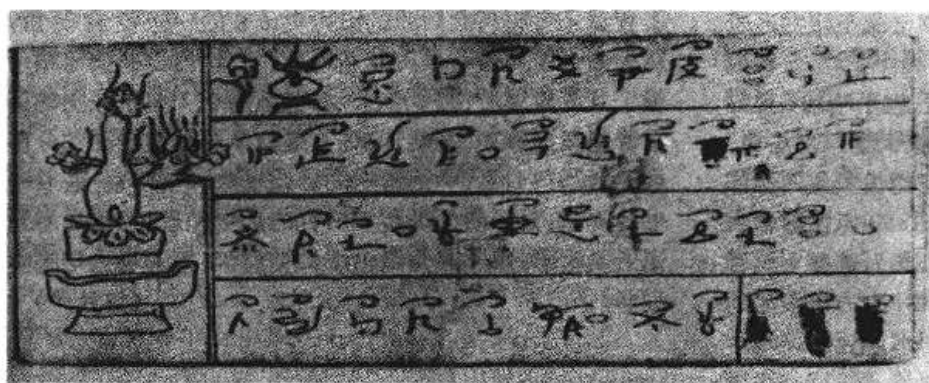
Gelao yuzhi

仡佬语支 (Gelao branch) 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语支之一。属于这个语支的语言在国内只有仡佬语。在国外，越南北部靠近中国边界的拉梯语也属此语支。仡佬语支和同语族的壮傣语支、侗水语支、黎语支有一些同源词并有语音对应关系。语音方面的不同之处是仡佬语支的辅音韵尾只有鼻音韵尾(仡佬语有 n, η ，拉梯语有 m, n, η)，而另3个语支的辅音韵尾除有鼻音韵尾 m, n, η 以外，还有塞音韵尾 p, t, k ，黎语支黎语的个别方言还有 n, t 。仡佬语支的仡佬语有两个方言有 q, qh 等两个小舌塞音声母，有一个方言有 $pl, vl, kl, mpl, nts, \eta kl$ 等复辅音声母；拉梯语有带鼻冠音的声母，这些声母在同语族其他三个语支很少出现。词汇方面，仡佬语支和黎语支都有固有的数词，而壮傣、侗水两个语支基本上借用汉语的数词。语法方面，仡佬语支的语言，句子的主语在谓语前面，如果作谓语的动词有宾语，在动词后面。仡佬语支两种语言的代名词、名词作领属性修饰语时，和同语族的其他三个语支的语言相同，都是在被修饰的名词后面。仡佬语支的主要语言仡佬语的否定副词修饰动词和形容词时在动词和形容词的后面，如果动词有宾语，则否定副词在宾语后面。

(王辅世)

Gebawen

哥巴文 (Geba script) 中国纳西族过去使用的一种音节文字。哥巴是纳西语 $ga^{31}ba^{31}$ “弟子、徒弟”的音译，取先有东巴文后有哥巴文，哥巴文以东巴文为师的意思。关于哥巴文的创制年代有两种不同意见。中国研究纳西族文字的学者都认为哥巴文的创制年代比东巴图画文字晚得多。李霖灿1945年在《哥巴文字典》序言中谈到他调查哥巴文创始人的经过，确定哥巴文是大东巴何文裕创制的，并且推断时间距今不超过100年。美国学者J. F. 罗克认为，哥巴文比东巴文字早，是纳西族从西藏草地带到丽江的，而东巴文是纳西族迁徙到云南以后才创制出来的。以上两种意见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哥巴文主要用于书写宗教经书。重文别体很多。字形结构来源大部分还不清楚。现在已经知道的有以下4类：①选用东巴图画文字中笔画简单的字；②对图画文字中的字形略加变化或简化；③采用笔划简单的汉字，只取其义不取其音，或略变其形但仍保留其音或义；④用表意的方



哥巴文经典之一页

法造字。哥巴文经书比东巴文经书少得多，使用范围也小得多。下面是哥巴文经书中的一个谚语。

① 𐄎𐄎𐄎𐄎 | 𐄎𐄎𐄎𐄎
𐄎𐄎𐄎𐄎 | 𐄎𐄎𐄎𐄎

标音和直译：

dzi³³ mbe³³ ʂo⁵⁵ ma³³ mbu³¹ | ʂu³³ xa¹ ma³³

衣 单 连接 不 裂开， 冬 风 不

se³¹ gu³¹

凉了。

ku³³ mo³¹ ʂo⁵⁵ ma³³ mbu³³ | zo³¹ xu³¹ ma³³ igu³¹

帽子 连接 不 裂开， 夏 雨 不 怕了。

意译：

单衣不裂缝，冬风不冷了。

帽子不裂缝，夏雨不怕了。

(傅懋勤)

Gebenhagen xuepai

哥本哈根学派 (Copenhagen school) 受F.

de 索绪尔影响而出现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主要流派之一。这个学派的产生以 1931 年哥本哈根语言学会的成立为标志，它的创始人和主要理论家是丹麦哥本哈根大学语言学教授 L. 叶尔姆斯列夫。早期的理论家还有 H. 乌尔达尔(1907~1957)，以及对理论的建立间接作出贡献的 V. 布伦达尔(1887~1942)。学派的规模很小，成员大多是北欧的一些语言学家，活动地区基本上限于哥本哈根。学派的机关刊物叫《语言学文献》，创刊于 1939 年。

哥本哈根学派的理论叫做“语符学”。20 世纪 30 年代初，叶尔姆斯列夫和乌尔达尔研究语音学和音位学的问题，提出了“音声学”理论，接着又把它发展成为一般性理论。为了强调跟以前的语言学截然不同，他们把自己的理论定名为 glossematics(glossa 在希腊语中是“语言”的意思)。语符学的基本设想由乌尔达尔写成小册子《语符学大纲》，1936 年在哥本哈根国际语言学大会上散发。其后不久，乌尔达尔往希腊工作，继续创建理论的任务由叶尔姆斯列夫独自担负。他的论著颇多，代表作是《语言理论基础》(1943)，因用丹麦文写成，读者不多。1953 年

这本书有了英文译本，语符学才为更多的人所注意。

理论要点 叶尔姆斯列夫批评传统语言学缺少统一的科学研究原则，因为它所研究的是语言的生理、心理、逻辑、社会、历史等方面的表现，而不是语言本身。他同意索绪尔关于“语言是形式，不是实质”，“语言是价值的系统”的论断。他主张把语言从物理方面的声音和心理方面的语义抽象出来，并且摆脱语言对

社会的依存性和语言历史演变的因素，以便集中研究语言的内在结构。他的方法论的基础是 R. 卡纳普的符号逻辑。他要建立“语言的代数”，用一套形式的定义来描写语言。

叶尔姆斯列夫认为，语言的内在结构是各级要素共同构成的关系网络。为了确定语言的基本要素，他把语言成分分为“内容”和“表达”两个平面。这两个平面又各分为“形式”和“实质”两层，“形式”是结构关系，“实质”是体现形式的语言外的实体(一方面是声音，另一方面是意义)。语言学只研究形式，包括“内容形式”和“表达形式”。这两种形式各有自己的最小要素，叫做“成素”。“表达形式”的成素是音位或音位特征；“内容形式”的成素是语义特征，例如“父亲”这个词的语义特征包括“动物”、“人”、“男性”、“亲属”、“一等亲”(区别于叔伯)、“上代”等。成素不同于符号。符号是内容和表达相结合的双面体，成素却是单面体，它为数有限，但能构成无数的组合。内容形式和表达形式的成素通过“接换”，能结合成为既有内容又有表达的符号。语言归根到底是一套成素。

另一方面，叶尔姆斯列夫在语言中区分“序列”和“系统”。“序列”是词、短语、句子等形式结构。符号的序列包含内容平面和表达平面，两者都由系统中的要素构成。序列的成分之间，系统的大类、小类、要素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关系。这关系视关系主体的性质而定，分为两类：不决定于其他价值的叫“常体”，受其他价值制约的叫“变体”。关系不外乎 3 种：两个常体间的关系叫“相依”，一个常体和一个变体间的关系叫“决定”，两个变体间的关系叫“群集”。这 3 种类型能够包括语言中的全部关系。语言归根到底是一套形式要素的关系的总和。

哥本哈根学派试图通过成素和关系来说明语言的内在结构，揭示语言的表达平面和内容平面上以及这两大平面之间各个形式要素的依存关系的网络。他们认为，同样的方法也可以用来描写语言以外的其他符号系统。

学术影响 哥本哈根学派的语符学十分抽象，方法上多主观成分。50 年代初有人用它来分析法语和西班牙语，并不成功。但是，这种理论尽管很少实际应用，却代表着人文科学和精密科学相结合的趋势，而且它把好些学者的想法综合为统一的、一贯的理论，这就使得哥本哈根学派成为当代语言学的重要流派之一。(叶蜃声)



(董光熙)

格林伯格的研究领域很广，著有《人类语言学导论》(1968)，写过许多关于非洲语言的论著，其中《非洲的语言》(1963)是对非洲语言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书中对非洲语言的分类法已为许多研究者所接受。他还把人类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同普通语言学结合起来，在观察和比较

(伍铁平)

格鲁吉亚语有 5 个基本元音, 28 个辅音。塞音和塞擦音按发音方式可分为 3 种: 浊音、清送气音和清喉化音, 这是高加索诸语言的共同特点。词类跟印欧语言的

No.	世紀				現代印刷體
	v	x	x1	xv	
1	ㄅ	ㄆ	ㄇ	ㄏ	ㄅ
2	ㄉ	ㄊ	ㄋ	ㄌ	ㄉ
3	ㄋ	ㄌ	ㄍ	ㄆ	ㄋ
4	ㄍ	ㄆ	ㄇ	ㄏ	ㄍ
5	ㄏ	ㄏ	ㄏ	ㄏ	ㄏ
6	ㄏ	ㄏ	ㄏ	ㄏ	ㄏ
7	ㄏ	ㄏ	ㄏ	ㄏ	ㄏ
8	ㄏ	ㄏ	ㄏ	ㄏ	ㄏ
9	ㄏ	ㄏ	ㄏ	ㄏ	ㄏ
10	ㄏ	ㄏ	ㄏ	ㄏ	ㄏ
11	ㄏ	ㄏ	ㄏ	ㄏ	ㄏ
12	ㄏ	ㄏ	ㄏ	ㄏ	ㄏ
13	ㄏ	ㄏ	ㄏ	ㄏ	ㄏ
14	ㄏ	ㄏ	ㄏ	ㄏ	ㄏ
15	ㄏ	ㄏ	ㄏ	ㄏ	ㄏ
16	ㄏ	ㄏ	ㄏ	ㄏ	ㄏ
17	ㄏ	ㄏ	ㄏ	ㄏ	ㄏ
18	ㄏ	ㄏ	ㄏ	ㄏ	ㄏ
19	ㄏ	ㄏ	ㄏ	ㄏ	ㄏ

图1 格鲁吉亚
语字母表

«ღმერთსა შიგჳდნი, ნუთუ კალა დამხმარს სოფლისა შრომასა,
ცუცხლსა, წაღლსა და მკინას, ბაჳრთა თანა შრომასა;
მომხმერს ჟურთერი და აღაჳრინდე, მოჳსხდე მას წემსა ნდომასა,
დღისიტი და ღამითი გაჳხედეჲ მისინა ვლავათა კითომასა.»

„შეა უშუროდ ვერ იქმნებიან, რატუნს შენ ხარ მისი წილი,
განაღამე მას ეახლე მისი უკლი, იმ თუ წილი!
შენა გნახო, მადე გნახო, განმინათლო გული ჩრდილი,
თუ სიცოცხლე შეიწე მქონდა, სიკვდილიცა მქონდა გბილი!

图2 格鲁吉亚诗人III.鲁斯塔维里《虎皮骑士》片段

大体相同;没有冠词。名词有6个格,没有宾格,而有动者格(即及物动词的主语的格)。没有性的范畴。修饰性形容词习惯置于名词之前,跟名词的格一致,但在数上不要求一致。格鲁吉亚语动词跟动作的主、客体之间的句法联系非常独特,动词必须根据动作的主体和客体的人称和数来变化。动词时态有现在、不定过去和完成3个系统。文字形成于5世纪,现行文字有希腊字母的痕迹。

(佟丕礼)

gongneng yuyan xuepai

功能语言学派 (functional linguistics)

见布拉格学派。

Gujilateyu

古吉拉特语 (Gujarati language) 印度西部

古吉拉特邦的语言,也用于孟买。是印度宪法承认的语言之一。属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印度语支。使用人口约2500万。

古吉拉特语源出通俗梵语的方言。标准语言形成于12世纪。它和马拉提语为近亲。

古吉拉特语的元音有长短之分,但i:~i和u:~u已分别归并为一个音位。单词重音不象梵语与音长有关,而是与相邻音节的某种元音及音节本身的开闭有关。元音鼻化现象常见。辅音中仍然有印度语言中常见的卷舌音及送气浊塞音等音位;但梵语里的-d(h)往往已经变成-r(h)。例如sarī(裹身女服,通俗梵语作sādiā)。

古吉拉特语的名词有3个性(阴性、阳性和中性)、两个格(直格和斜格,斜格用于后置词之前)、两个数(单数和复数,复数里往往不分直格和斜格)。人称代词有敬体和非敬体的区别。例如tū(你),tame(你们,您),ap(你)。动词现在时一般体和现在时进行体的形式一样,过去时一般体和过去时进行体的形式一样。例如hū kam kārū chū(现在我在工作),hū kam kār-to hō-to(过去我在工作)。在别的印度语言里则往往以一般体和进行体为标准分为两类形式。句子的基本词序为主语—宾语—动词(包括助动词)。

古吉拉特语的文字使用源出梵文天城体的一种草书。

(周流溪)

Gujin Yunhui Juyao

《古今韵会举要》 见韵书。

gujinzi

古今字 指同表某一字义而古今用字有异的汉字。古今字分两类:甲类等义的,即古字与今字字义完全相同,如出/塊、灋/法、壅/野、飲/饮、概/桮等。乙类不等义的,即古字与今字字义不完全相同,如莫/暮、景/影、辟/避等。

甲类古今字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今字的产生不涉及汉字的孳乳分化,古今字属同字异形,是异体字的一类。乙

类古今字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今字产生是汉字在发展上孳乳分化的结果;另有一些是因为字义变用而形成古今字关系的。

汉字的孳乳分化,分以下3个方面:①今字是由古字的本义产生的。“莫”本义指日落天晚,“莫”假借用作无定代词,本义另造“暮”字。同类的如止/趾、要/腰、衰/蓑、采/採、匪/筐、其/箕、匡/筐、然/燃、益/溢、禽/擒等。②今字是由古字的引申义产生的。“景”本义指日光,引申指明暗形成的影子,这个意义后造“影”字。同类的如弟/悌、解/懈、责/债、竟/境、坐/座、中/仲等。③今字是由古字的假借产生的。“辟”,本义指法,假借用作逃避,这个意义后造“避”字。同类的如辟/僻、辟/闢、辟/嬖等。以上所列,古字是声符字,今字是以古字为声符产生的形声字。今字产生在古字之后,也称做后起字。清代王筠称本义产生的后起字为累增字;称由引申义、假借义产生的后起字为分别文(《说文释例》卷八)。有些今字虽属后起字,但在字形上与古字无相承关系,如罢/疲、蚤/早等。

由字义变用形成的古今字,古字与今字不存在产生先后问题;只是由于字义使用上的变化,使某字成为古字,另一字成为今字。如表示容貌的意思古代用“頌”,后代用“容”。

古今字是就某一字义用字不同而言。例如“尉”既是“慰”的古字,又是“慰”的古字,前者是就“尉”的本义说的,后者是就引申义说的。

今字如再产生后起字,对后起字来说,它又是古字。例如表示前进的意思“𨔵”是古字,“𨔵”是今字。“前”的本义指剪断,后造“剪”字,“前”是“剪”的古字,“剪”又是今字。

(曹先鞭)

guniu

古纽 (archaic Chinese initials) 指先秦两汉时期汉语的声母。在汉语音韵学的研究里,古纽一直不象古韵那样受重视,成就也没有古韵那样大。这主要由于材料缺乏。到目前为止,研究古纽主要利用5种材料,即:谐声偏旁,声训,读若,异文,异切。最先从事古纽研究的学者是清代钱大昕,以后有章炳麟、黄侃、曹运乾等人,他们先后提出不少有意义的见解。

①古无轻唇。大意是说上古汉语中没有轻唇音声纽,这是钱大昕提出来的。中古唇音后来逐渐分为两类,通常叫重唇和轻唇。重唇是双唇塞音,以及同部位的鼻音,即三十六字母的帮、滂、並、明;轻唇是双唇塞音变来的塞擦音,以及从双唇鼻音分化出来的唇齿鼻音,即三十六字母中的非、敷、奉、微,古无轻唇即中古后期的轻唇音在上古一律都读重唇音。钱大昕主要是利用古书的异文来证明的。例如:“封域”就是“邦域”,“妃”读如“配”,“附娄”就是“部娄”,“芫菁”就是“蔓菁”等等。其中的封、妃附、芫分别属于中古后期轻唇音声纽非、敷、奉、微;邦、配、部、蔓分别属于中古后期的重唇音声纽帮、滂、並、明。钱大昕从它们可以互相通假的现象中,得出了古无轻唇

的结论。根据通假,说重唇轻唇不分,那是证据确凿。但是,就这些材料而言,既可以说明古无轻唇,也可以说明古无重唇。人们所以会信从古无轻唇的结论,是参证了现代方言。在闽方言、吴方言里,普通话的轻唇字大多数仍然读重唇,而普通话的重唇字却没有读轻唇的。另外,印欧语言也有同样的历史音变现象——重唇变轻唇,而不是轻唇变重唇,如梵文 *pitar* 和德语 *vater* 对应。因此,钱大昕古无轻唇的说法还是有道理的。

② 古无舌上。大意是说上古没有舌上音声纽。这也是钱大昕提出来的。中古舌音声纽分两类,通常叫舌头音和舌上音。舌头音指舌尖与上齿的塞音,以及同部位鼻音,即三十六字母中的端、透、定、泥。舌上音即知、彻、澄、娘 4 母,它的具体发音部位,各家说法不一,高本汉认为是舌面与前腭的塞音,以及同部位的鼻音。钱大昕的古无舌上,是说上古没有知、彻、澄 3 组(不包括同部位的鼻音声纽“娘”),这 3 组分别归属于舌头音端、透、定 3 组(也不包括同部位的鼻音声纽“泥”)。他从古书异文中举出了很多例证。例如,“竺”又作“笃”,“抽”又作“搆”,“直”又作“特”,等等。竺、抽、直属于中古舌上音知、彻、澄,笃、搆、特属于中古舌头音端、透、定。因此得出古无舌上音的结论。上古的舌上音与舌头音不分,为什么认为古无舌上音,而不认为古无舌头音呢?这与古无轻唇是同样的道理,从汉语方言的历史和现状看,处处都有舌头音,而闽方言白读几乎没有舌上音,赣方言也近似,因此认为古无舌上音的说法基本可信。根据中古舌上音声纽都是二三等字的事实,可以推知上古的舌头音后来分化出舌上音,是以韵属二三等为条件的。

此外,钱大昕还提出古人多舌音和上古影、喻、晓、匣双声的看法。前者说正齿音照系三等在上古读舌头音,这个观点被后来黄侃发展为“照系三等归端系”;后者说喉音影、喻、晓、匣 4 组在上古是同一类声纽。这两条也都有道理,但是很多学者持有保留意见。

③ 娘日归泥。大意是说中古娘、日 2 组在上古属于泥纽。这是章炳麟最先提出来的。章炳麟通过谐声、声训、异文等几个方面材料来加以证明。例如,“涅”《广韵》奴结切,中古泥纽字。他认为“涅”从日得声,从谐声偏旁看,在上古应该是日纽字,“涅”又有个声训为“泥”,《广雅·释詁》:“涅,泥也”;古书异文“涅”“泥”互用,“涅而不缁”,又作“泥而不滓”,由此知道上古“泥”和“日”同纽。再如,“𪔐”《广韵》女久切,中古娘纽字,古书异文“公山不𪔐”又作“公山不𪔐”,“𪔐”《广韵》而沼切,日纽字;“𪔐”有往来频繁的意思,在这个意义上《说文解字》作“𪔐”,“𪔐”徐铉引《唐韵》作人久切,日纽字,由此知道中古娘日 2 组在上古是同一类声纽。他还举出了很多例证,证明中古娘日 2 组在上古属于泥纽。

章炳麟还认为照系与精系古音同属一类,这种看法不大符合实际,所以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

章炳麟为上古声纽编制了一个总表,收在他所著《国故论衡》里,摘录如下:

喉音:见谿群疑

牙音:晓匣影(喻)

舌音:端(知)透(彻)定(澄)泥(娘日)来

齿音:照(精)穿(清)床(从)审(心)禅(邪)

唇音:帮(非)滂(敷)並(奉)明(微)

表中括号里的是中古声纽,古纽分为 5 类 21 个。这里明显的缺点有两处:一是精系归入照系是照搬东北部印度方言;一是喉音与牙音颠倒,跟通行说法不合。这两个缺点,在他的弟子黄侃那里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纠正。

④ 照系二等归精系,照系三等归知系。大意是说中古照系二等字在上古属于精系,照系三等字在上古属于知系(舌上音)。这是黄侃明确提出来的看法。他认为中古照系二等庄、初、床、山在上古与精系精、清、从、心同属一类;照系三等照、穿、神、审、禅在上古与知系知、彻、澄同属一类。钱大昕已经证明古无舌上,所以,黄侃照系三等归知系,实际上等于照系三等归端系。

黄侃照系二等归精系的结论主要从谐声偏旁和异切得来的。例如,“则”是精系字,而从“则”得声的侧、测、厠都是中古照系二等字;从“且”得声的字有阻、组、祖、粗、阻、组、阻、阻等,其中阻、组、祖、粗是中古精系字,阻、组、阻、阻是中古照系二等字,这是同一谐声偏旁分属精系和照系二等两类声纽的例证。再如,《广韵》“管”侧伯切,又在各切,前一个(正音)反切是中古照系二等字,后一个(又音)反切是中古精系字;《广韵》“洒”先礼切,又所卖切,前一个反切是中古精系字,后一个反切是中古照系二等字,这是一个字有精系和照系二等两个反切的例证。黄侃根据这些现象,认为中古的照系二等在上古可能与精系就是一类声母。在今天看来,这个结论基本上还是可以成立的。

至于照系三等归端系的说法就有一定问题了。一方面可以找出正面的例证如:“旃”《广韵》诸延切,是照系三等字,“旃”从“丹”得声,“丹”《广韵》都寒切,是端系字;“闾”《广韵》昌善切,是照系三等字,“闾”从“单”得声,“单”《广韵》都寒切,是端系字。另一方面,也有许多相反的例证,例如:“松”《广韵》职客切,中古照系三等字,“松”从“公”得声,“公”《广韵》古红切,中古见系字;“枢”《广韵》昌朱切,中古照系三等字,“枢”从“区”得声,“区”《广韵》岂俱切,中古见系字。这说明照系三等字来源复杂,既有从端系得声的字,又有从见系和其他系得声的字,可见把照系三等简单地归结为来源于端系是不合理的。只能说中古照系三等中的一部分字在上古属于端系。

黄侃关于上古声纽的见解,集中表现在他归纳的 19 组上:

喉音:影(喻、于)晓匣

浅喉:见(群)溪疑

舌音:端(知照)透(彻穿审)定(澄神禅)来泥(娘日)

齿音:精(庄)清(初)从(床)心(疏邪)

唇音:帮(非)滂(敷)並(奉)明(微)

这里把古纽分为 5 类 19 个。这 19 纽,是黄侃从“古本

韵”中推得的。他从等韵出发,把凡是纯一四等的韵叫做“古本韵”。因为“古本韵”中只出现这19个声纽,所以断定它们是“古本纽”。“古本韵”、“古本纽”之说的弊病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经论断取消了好多声纽,二是论证方法不甚详尽。因此,“古本韵”、“古本纽”的说法还没有被多数学者所接受。

⑥ 喻三归匣,喻四归定。意思是中古喻纽三等字在上古属于匣纽,喻纽四等字在上古属于定纽。这是曾运乾的研究成果。曾运乾把喻纽三等叫做于母,把喻纽四等叫做喻母。他认为“于母古隶牙声匣母,喻母古隶舌声定母。部件秩然,不相陵犯”(《喻母古读考》)。他举例很多。比如他说:“古读‘营’如‘环’,《韩非子》‘自营为私’,《说文》作‘环’,按‘环’户关切,匣母;又古读‘营’如‘还’,《诗·齐风》‘子之还兮’,《汉书·地理志》作‘营’,‘还’,户关切。”(同上)“营”《广韵》余倾切,曾运乾考证“余”是错字,当作于倾切,是中古喻纽三等字,即曾氏的于母,它的异文作“环”、“还”,是中古匣纽字,由此得出喻三归匣的结论。又如他说:“古读‘夷’如‘弟’,《易·涣》‘匪夷所思’,《释文》‘夷’荀本作‘弟’;又《易·明夷》‘夷于左股’,《释文》子夏本作‘睇’,又作‘睇’;《说文》‘鸛’从鸟夷声,金文作‘鸛’,从鸟弟声。按:弟,徒礼、特计二切,睇,特计切,杜兮切,并定母。”(同上)“夷”《广韵》以脂切,中古喻纽四等字,即曾氏的喻母,它的异文作“弟”,中古定纽字,由此得出喻四归定的结论。曾运乾的这条结论有不少人遵信。

上述5条是现在学术界基本认定的结论。所谓基本认定,是指承认每条结论之中的两组或几组声纽之间有相同或极其相似的阶段,并不意味着二者在上古时期都绝对相同。至于每组声纽从什么时候开始分化,到什么时候最后完成,各组演化的历程和条件又是怎样的,等等,都还没有确切的说法,还有待深入的研究。关于上古声纽的拟音,各家说法纷纭,尚无定论。

最后说说上古声纽的复辅音问题。认为上古汉语可能有复辅音声纽,最早是高本汉和林语堂提出来的。他们认为,只有承认上古有复辅音声纽,才能更好地解释同一谐声偏旁在中古分属不同的声纽,在方言中分属不同发音部位的声母的现象。他们提出这个问题时,多半属于一种设想和推理。以后陆续有人从这方面进行过探索,有的依据汉字的谐声偏旁和连绵字,有的利用从甲骨文中发现的形声字,有的通过各种方言的比较,有的以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进行比较,等等。他们用不同的方法和材料,进一步论证了上古汉语中可能存在着复辅音声纽kl、tl、pl、ml、xm、……这类的音。如果复辅音能够得到充分证明,那么上古声纽就不象前人想象的那样单纯了。直到现在为止,上古到底有多少复辅音声纽,它们的结合关系是怎样的,怎样演变成单纯辅音的,演变条件是什么,等等,这一系列重要问题,尽管有些人做出种种设想和构拟,但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参考书目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十五,《十驾斋养新录》卷五。

章炳麟:《国故论衡》,收入《章氏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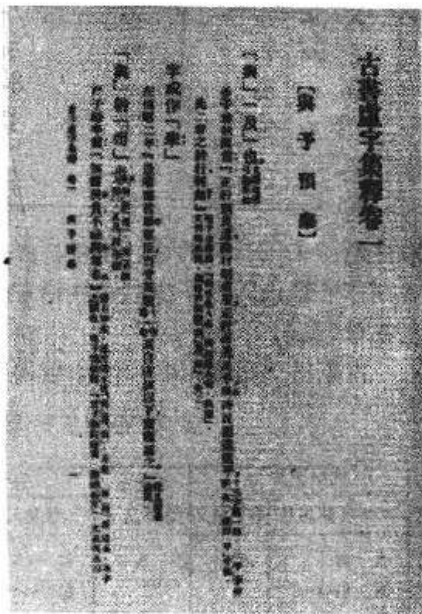
黄侃:《黄侃论学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曾运乾:《喻母古读考》,载《东北大学季刊》,第2期,1927。

(谢纪锋)

Gushu Xuzi Jishi

《古书虚字集释》 解释古书虚字的书。裴学海于1932年作。全书共分10卷,虚字按字音声母喉、牙、舌、齿、唇五音次第排列。所出虚字共290字。



裴学海著《古书虚字集释》

关于古书虚字的解释,前人已有一些成书。一直为人所称道的有清代刘淇的《助字辨略》,王引之的《经传释词》,吴昌莹的《经词衍释》,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近代杨树达又有《词诠》一书,续有补充,涉猎更广。可是千虑一失,智者不免。本书作者自1927年即从事古书虚字研究,就周秦两汉的古籍搜集其中的虚字,寻绎其解释,参酌前人有关的著述,条分缕析,而以《经传释词》的训解为主,集成一编。一方面补前人之不备,一方面纠正前人的错误,创见颇多。对阅读古书很有帮助。

(周祖谟)

Gusláfuyu

古斯拉夫语 (Old Slavic language) 见于公元10~11世纪文献的最古老的斯拉夫书面语言。属印欧语系斯拉夫语族南部斯拉夫语支。它的基础是古保加利亚语的一种方言:南部马其顿方言。它包括其他斯拉夫语的一些成分,受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影响很深。古斯拉夫语曾用两套字母记载:①格拉哥里字母,该词源自 глагол (言语),这套字母大部分按希腊古体小写字母创造(表1),在保加利亚和克罗地亚一直使用到18世纪末。②基里尔字母,因创制者基里尔得名。基里尔(827~869)是斯拉夫文化的启蒙者之一,基督教传教士,也是最早把《圣经》等文献从希腊文本译为古斯拉夫语的译者之一。他熟谙古斯拉夫语、希腊语、拉丁语、犹太语和阿拉伯语。在摩拉维亚传教期间,在其兄梅福季(约815~885)的协助下,他移植了25个希腊多角字体字母,另创了18个字母来

如‘戒’之音‘亟’，‘庆’之音‘羌’，‘享饗’之音‘香’，‘至’之音‘质’，学者可以类求矣。古平上为一类，去入为一类。上与平一也，去与入一也。上声备于三百篇，去声备于魏晋。第十五部古有入声而无去声，随在可证。如，《文选》所载班固《西都赋》“平原赤、勇士厉”而下，以“厉、宰、秒、暨、折、噬、杀”为韵，“厉宰秒噬”读入声……法言定韵之前，无去不可入。”

段玉裁说的“泊乎魏晋，上入声多转而为去声”，是指魏晋以来经师多用去声表示词义分化。比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饮我酒”，“饮”是使动用法，《释文》“於鸠反”，用 yìn 跟原来的 yīn 区分开。《周礼·虞人职》：“若食不能人二鬴，则令邦移民就穀，诏王杀邦用。”郑注：“杀犹减也。”《释文》：“杀，所界反。”用 shāi 跟原来的 shā 区分开。这当然是事实，不过得出“无去不可入”这个结论就夸大了，就一部说，已经是夸大，何况扩大到全体古韵上去呢？到后来也没人全盘接受他的主张。

孔广森(1752~1786)《诗声类》说：“至于入声，则自缉合等闭口音外，悉当分隶自支至之七部而转为去声。盖入声创自江左，非中原旧读。”不过多数人看出来孔广森是北方人，受了方音影响，没人信从他的话。

近代人黄侃有《〈诗〉音上作平说》，主张单就《诗经》论，上声调不存在。

凡是主张“古无××”，“×声古归×”的学者从来没把下面两个问题说清楚过：①既然古代×类调不存在，合并到y类里头，那么后来×类分出来是因为有什么内在的或是外部的条件呢？②说×类并到y类里头，是光指用一种调值念它们，还是连音节结构（用什么尾音……）、元音长短，有没有或是有什么样的词头等等等方面全都一样呢？

顾、段、孔、黄都没回答过这两个问题。在这一点上，他们都不如钱大昕。钱氏说“舌上”古归“舌头”，虽然没给出条件来，可是舌上音在等韵里永远排在三等（它后头有个i类介音）是众所周知的。这也就等于给出条件来了。说“古无×声”的人却什么也没给。没有限制条件，一个音不能分裂成两个，这是语音史的常识。

另外一派古韵学家，如王念孙、江有诰就主张古音四声全有，只是哪个字归哪一类跟后代人不同。江有诰为这个单写了一部《唐韵四声正》。近代人王国维认为阳声韵的调子跟别的调类不一样，应该单分出来。他创了个“五声”说。不过几乎没有反响。

前述两派的争论一直没定论。比方现代人周祖谟就写过《古音有无上去二声辨》，继续申述王念孙、江有诰的论点。

辩论的双方利用的资料往往都是押韵字。有时候一章《诗》里用了“平平平上上”5个韵字。主张分的说“这是两段”，主张合的说“少数服从多数，这是一气”。谁也难以说服对方。推到“至矣尽矣”的地步，到底哪个字入韵本来也是后人推测的。

故宫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上平、下平、上、去、入

各声卷头上记着“旧韵……字”。唐兰跋据《封氏闻见记》证明“旧韵”就是陆法言《切韵》，共12158个字。从这儿推算，《切韵》各声的字数占全书字储存的百分比是：

	上平	下平	上	去	入	总计
字数	2908	2692	2070	2332	2156	12158
百分比	23.9%	22.1%	17%	19.2%	17.8%	100%

陆法言《切韵序》里各调类字次统计是：

平	42.5%	上	19.4%	去	19.9%	入	18.1%
---	-------	---	-------	---	-------	---	-------

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里字次统计是：

平	43.5%	上	19.4%	去	19.5%	入	15.3%
---	-------	---	-------	---	-------	---	-------

这里入声字百分比低。可是要是“不”字按现代广州、客家、闽南话算入声的话，它就高了。

从这里看，一个时代的作品各个调类的字次百分比大致跟当时的字储存里各个调收字的百分比成正比。

把这个论断倒着用，要是能知道周代初年的作品里用各调类（当时字归调类跟《切韵》时代的差别只是零星的）的字次的百分比，也就可以大致推断当时的调类有几个，它们的字储存百分比大致是什么样子的。当然，材料不该用一句一个“兮”，一句一个“之”的。

大孟鼎是周康王时代的铜器。它的铭文的字次百分比是：

平	41%	上	19%	去	19%	入	21%
---	-----	---	-----	---	-----	---	-----

《周易·上经》是周初的作品。从《左传》引的字句看，后人有些改动，可是不大。它的字次百分比是：

平	44%	上	21%	去	17%	入	18%
---	-----	---	-----	---	-----	---	-----

《书·洛诰》也是周初的作品。它的字次百分比是：

平	46%	上	22%	去	15%	入	17%
---	-----	---	-----	---	-----	---	-----

从这些统计数看，周初，也就是《诗经》产生时代的作品里字次百分比大致和《切韵》时代的作品里字次百分比一样。可以推出：《诗经》音里的调类数目和字储存百分比同《切韵》大致一样。

王力认为古去声是长调入声，跟这个结论并没矛盾。因为这里调类的名字只是从俗，并没肯定调值什么的。王力已经回答了上文提出的两个问题了。一大类里再分两小类同一开始就分两类一样。

周代人的调值没法子知道，后汉人开始用汉字对梵文音。梵文用的是音乐重音。重叫 udātta，高调，轻叫 anudātta，低调。从现在看，用“浮屠”对 būdha，平声兼对 udātta 和 anudātta，好象是不会分别轻重，不过从译经师经常省略词末轻音节（“佛陀”省成“佛”）看，大概还是会分的。可见平声可能是中平调，高低调都可以用。入声也可能是中平短调。比方“萨和”对 sārva，“萨埵”对 sattva。只有去声是低调。“憊”是为对 kṣamā 造的字，“𪔐”是为对 dāksīṇa 造的字，都对 anudātta。

支谦译《释摩男本四子经》（《大正藏》54号）用“迦维罗卫兜”对 kapilavastu，说明祭部字在后汉可能收 -s。段玉裁说的“无去不可入”是根据不足的。其实可能是 -as，-ad 或 -at 通押。“沸”对 puṣ，“替”对 tiṣ，说明质部里也有一些这样的字。

参考书目

顾炎武：《音学五书》。

段玉裁：《六书音均表》。

王力：《汉语音韵》，中华书局，北京，1963。

周祖谟：《汉语音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北京，1957。

俞敏：《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中国语文学论文选》，日本光生馆，东京，1984。

(俞敏)

guwen

古文 古汉字字体的名称。古文有广狭二义。广义的古文名称起于汉代，后世继续沿用，泛指秦统一文字前所有的文字，时间地点皆无限制，没有一定的字形。狭义的古文指《说文解字》中所见的古文。

许慎作《说文解字》，所收正字是小篆，有9353字。另外列出两种异体字，一是古文，一是籀文，许慎称前者为“孔氏古文”，称后者为“史籀大篆”。古文和籀文的分别是地区性的差异。古文出于壁中书，古人尊经所以放在籀文之前，其年代不一定比籀文早。许慎说：“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又说：“壁中书者，鲁恭王（公元前155～前129）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礼记》的《记》是战国晚期的作品。古代典籍皆用竹简，经过无数次的阅读和传抄，会“韦编三绝，漆书三灭”，使用时间是不长的。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下令焚书，各地掩藏不一定都有极早的写本，一般总是当时的通行本。即使有孔子所书六经也不过公元前500年。许慎说他所用的资料“其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大约都是汉代古文经学家辗转摹写的。它和小篆有差别，许慎从中采用了500多字，约合小篆的1/18。古文的特点，如一、二作弌、弌，增加不必要的繁饰，禮、棄作礼、弃，作出大胆的省简，都不是原始汉字的形式，是应时代需要而产生的。

王国维作《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有很好的意见。籀文行于秦可考而信。古文出于邹鲁儒生之手，流传于东方，也是事实。但是说有“六国古文”则未免武断。当时“诸侯力政，不统于王，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政治上没有统一的政权，经济上没有统一的市场，不可能有六国共同使用的文字。王国维习于战国纵横家言，以“合纵”与秦对立，不知道军事联合是一时的，语言文字



三体石经

自发地统一则需要较长的时间和一定的条件。近年来，各地发现战国文字资料很多，如长沙缙书、侯马盟书、温县盟书、江陵信阳长沙简策，以及平山县中山国铜器、新郑县韩国兵器等各种文字资料，但是找不出和《说文》古文相同的“六国古文”。许慎所谓古文大约就是邹鲁（也许还有齐）儒生习用的文字。

魏正始（240～248）三体石经中，首列古文，只刻成《尚书》、《春秋》（见图），即许慎所谓《书》孔氏、《春秋》左氏，和《说文》古文来源相同，字形偶有不同，可能是古书抄写中的讹误。这是研究古文的宝贵资料。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宋代郭忠恕《汗简》、夏竦《古文四声韵》等，都保存一些古文经中的古文。（张政烺）

guwenzixue

古文字学 (paleography) 以古汉字和各种古汉字资料为研究对象的学科。

古文字的范围 按照中国传统文字学的观点，古文字指先秦时代的汉字。现代的文字学者多数认为秦统一后的篆文，即所谓小篆，也应该划入古文字的范围。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不少秦和西汉早期的简牍和帛书出土。这些简帛上的隶书，字形还保留着篆文的不少特点，跟后来成熟的隶书有明显区别，因此有人主张把秦和西汉早期的隶书也看作古文字。按照这种意见，古文字可以说是隶书成熟之前的汉字。

古文字学的内容 在中国，对古文字的研究开始得很早，但是，长期以来是包含在作为“小学”一部分的传统文字学和以古铜器和碑刻等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金石学里的，一直到20世纪才有“古文字学”的名称。人们所说的古文字学，内容并不一致，大体上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

广义的古文字学既包括对古文字本身的研究，也包括对各种古文字资料的研究。后一方面的研究继承了金石文字之学的传统，主要以各种古代遗留下来的实物上的古文字资料（如甲骨卜辞、铜器铭文等）为对象，着重于释读这些资料，弄清它们的性质、体例和时代，并阐明研究这些资料的方法，这方面的研究也有人认为应该称为古铭刻学。在广义的古文字学里，这方面的研究往往被视为重点。狭义的古文字学主要以古文字本身为对象，着重研究汉字的起源，古汉字的形体、结构及其演变，字形所反映的本义以及考释古文字的方法。狭义的古文字学是文字学的一个分支。

古文字资料的种类很多。按照所研究的资料的范围，古文字学已经形成了甲骨学（以研究殷墟甲骨卜辞为主）、殷周铜器铭文研究、战国文字研究、秦汉简牍帛书研究（如去掉“秦汉”二字，可以包括对战国简帛帛书的研究）等分支。

古文字学跟其他学科的关系 古文字学跟不少学科有密切关系。它跟考古学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古文字资料有很多是考古发掘所提供的，而且发掘记录对这些

资料的研究往往有很大用处。反过来看,这些资料对判断有关墓葬或遗址的性质和时代,也往往能起很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器物上的铭文对研究这些器物本身也极为重要。要考释古文字或通读古文字资料,语言文字学方面的知识是必不可少的。举例说,如果不懂先秦语音,对先秦古文字资料里的通假现象就无法正确理解。反过来看,古文字资料和古文字本身,对研究先秦以至秦汉的语言也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例如要研究商代语言,就几乎只能根据商代的古文字资料。古文字的字形对研究上古的词义和语音也有很大用处。古文字在文字学上的重要性就更不用说了。此外,古典文献学、古史(包括古文化史)学以至民族学等方面的知识,对通读古文字资料和考释古文字也都是需要的。同时,古文字资料和古文字本身,也都能为这些学科提供重要的研究根据。在古文字学和上述各种学科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互促进的关系。

古文字学简史 汉代 研究古文字的风气是在汉代开始形成的,汉代人看到的古文字资料主要有3种。一种是先秦铜器的铭文,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的叙里说,各地“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西汉张敞“好古文字”,宣帝时美阳(今陕西扶风)出土古铜鼎,他曾释读其铭文,事见《汉书·郊祀志下》。一种是相传为周宣王时太史籀所作的字书《史籀篇》的抄本。汉代人所说的籀文,就指《史籀篇》的字,其字体属于大篆。一种是所谓古文经,即秦始皇焚书时被藏匿起来的一些儒家经籍抄本,如汉初张苍所献的《春秋左氏传》,汉景帝时鲁恭王在孔子故宅墙壁里得到的《尚书》、《礼》、《论语》等书。这些经籍抄本的字体既不是隶书,也不是小篆和籀文,汉代人多称之为古文。推崇古文经的经学家如许慎等人,认为这种字体比籀文还要早。但是据后人研究,所谓古文其实是战国时代东方国家(指秦以东各国)的文字。

汉代推崇古文经的那一派经学家,后人称为古文学家。另一派经学家,反对古文经,只相信世代相传的本子,后人称为今文学家。古文学家为了读通古文经,必须从文字学的角度研究古文,所以往往同时是文字学家。他们进行了收集古文并把古文跟当时使用的文字相对照的工作,有些人还进一步对汉字的构造进行了理论上的研究。《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古今字》和《隋书·经籍志》等著录的后汉卫敬仲(即卫宏)撰的《古文官书》等书,是前一方面工作的成果。六书说的建立是后一方面工作的成果。六书一词最早见于属于古文经系统的《周礼》。不过据近人研究,把六书解释为“造字之本”,大概是汉代古文学家的创造。公元1世纪末,许慎撰写《说文解字》,为古文学家对文字的研究作了出色的总结。

《说文》收字的体例是“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字形以小篆为主,同时收入一些写法跟小篆不同的古文和籀文,在解释文字的时候,许慎依据六书理论,尽可能结合字形指出字的本义。所以即使按照不以小篆为古文字的传统文字学的观点来看,许慎的工作也是带有古文字研

究的性质的。可惜许慎等古文学家所看到的古文字资料,时代都比较晚。在当时虽然古铜器铭文已经受到了有些人的注意,但是搜集、研究这种资料的风气却还没有形成,学者们很难加以利用。《说文》叙提到了鼎彝上的“古文”,但是书中所收的古文看来全都出自古文经,实际上只是战国时代的文字。籀文的时代也不算很早,而且许慎等人所看到的《史籀篇》是屡经传抄的本子,有些字形显然已经讹变。这些古文字以及小篆的字形往往不能反映本义。因此许慎对古文字的发展过程缺乏正确的认识,他对字形的解释和所指出的本义也往往不可信。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些缺点是很难避免的。

魏晋至宋初 从魏晋一直到宋初,古文字的研究没有很大的进展。这一时期最受重视的早于小篆的古文字,仍然是古文学家所说的那种古文。曹魏正始年间将古文学家传授的《尚书》和《春秋》刻石立于太学,每个字都用古文、小篆、隶书三体写刻。这就是所谓三体石经。晋武帝咸宁五年(279,或谓在太康元年或二年,即280或281),在汲冢(今河南汲县)的一个被盗掘的战国后期魏国大墓里发现了大量竹简书,共有75卷,10余万字,字体跟古文经相类。这就是所谓汲冢古文。这批竹书被收入官府,先后由荀勗、和峤、卫恒、束皙等人加以整理,写定为今文。竹书原本早已不存,写定之本除《穆天子传》外也都已亡佚。据史书记载,南北朝时也间有古文简册发现,但是其内容一点也没有流传下来。

在从魏晋到宋初这段时期里,仍有人继续做搜集古文的工作,而且还有人用古文刻写碑碣或伪造典籍古本。他们所用的古文,有的有根据,有的则是杜撰的。五代末宋初的郭忠恕(?~977)根据当时所能见到的各种古文资料编成古文的字汇,名为《汗简》。稍后的夏竦(985~1051)编《古文四声韵》(1044),材料来源跟《汗简》基本相同,不过《汗简》是按部首编排的,夏书则是按韵编排的。这两部书虽然收入了不少杜撰的古文,大部分字形还是有根据的,是现代研究战国文字的重要参考资料。郭、夏之后,古文之学就逐渐衰微了。

在这一时期里,有铭文的古铜器也时有发现,可惜仍然没有形成搜集、研究全文的风气。唐初在天兴县(今陕西凤翔)发现了重要的先秦石刻——石鼓文。唐代人对石鼓文很重视,讲字体、书法时往往提到它。由于石鼓文的字形跟籀文比较接近,当时人多附会为周宣王太史籀所书。秦始皇巡行天下时所立的篆文刻石,在唐代也很受重视。南北朝时石经已有拓本,在唐代,秦刻石和石鼓也都有拓本流传。

唐代篆文书法家李阳冰曾整理过《说文》。他根据秦刻石改了《说文》的一些篆形,如改𠂔(欠)为𠂔等,受到后人的很多批评。李阳冰擅改古书是不对的,但是他根据古代遗留下来的实物上的文字资料纠正《说文》,这却是值得重视的。他解释字形也时出己见,虽多荒谬,但也间有可取之处。例如许慎解释“木”字说:“从卩,下象其根”,他则认为整个字“象木之形”。

宋代 在宋代,由于金石学的兴起,古文字研究出现了一个高潮。真宗咸平三年(1000)句中正等人考定乾州(今陕西乾县)所献“史信父觚”,这是宋人研究青铜器铭文之始。由仁宗朝到北宋末年,搜集、著录、研究青铜器及其铭文的风气日盛,南宋时,关中、中原等发现青铜器的主要地区先后为金、元占据,搜集新出土铜器的工作基本上陷于停顿,但由于北宋学风的影响,南宋前期著录、研究金文的风气仍相当兴盛,到后期就衰落了。

宋代学者在研究金文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的,主要有北宋的杨元明(南仲)、欧阳修(1007~1072)、吕大临(1046~1092)、赵明诚(1081~1129)和南宋的薛尚功等人。宋人编了不少青铜器和铭文的著录书,流传至今的有吕大临《考古图》(1092)、宋徽宗勅撰的《博古图录》、南宋赵九成《续考古图》、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1144)、王俅《啸堂集古录》和王厚之(复斋)《钟鼎款识》。前3种兼录器形和铭文,后3种单录铭文。吕大临另编有《考古图释文》,按韵收字,是最早的一部金文字汇(或谓此书为赵九成所编,似非)。政和年间王楚撰《钟鼎篆韵》,绍兴年间薛尚功撰《广钟鼎篆韵》,材料较吕书增多,但皆已亡佚(王书实际上还保存在元代杨炯的《增广钟鼎篆韵》里)。

殷周金文是学者们最早接触到的早于籀文和古文的文字。宋代学者对金文的搜集、著录和研究在古文字学史上有重要意义。他们通过较古的金文已经认识到“造书之初”象形之字“纯作画象”,“后世弥文,渐更笔画以便于书”(《考古图》4·26上)。《考古图释文》的序对金文形体上的某些特点(如笔画多寡、偏旁位置左右不一等)以及辨释金文的方法作了简明的概括,也很值得注意。宋人正确释出的金文,大都是比较容易认识的。不过他们有时也有很好的见解,如杨南仲释晋姜鼎铭文,疑“𣎵”为“旂”字,读为“祈”,就比近代古文字学名家吴大澂、罗振玉等人以“𣎵”为“祈”之本字的说法确切。

在石刻文字方面,石鼓文和秦刻石在宋代都继续受到重视。南宋前期的郑樵创石鼓文为秦篆之说,认为石鼓是秦惠文王以后始皇以前的刻石。时代稍后的巩丰认为是秦襄公至献公时的刻石。这在石鼓文的研究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北宋时还发现了战国时秦王诅楚王于神的刻石,即所谓诅楚文,欧阳修(1007~1072)、苏轼(1037~1101)、董道等人也都曾加以研究。

在宋人的六书研究中,可以看到金石学的影响。郑樵《通志·六书略》对某些表意字字形的解释明显胜过《说文》。例如《说文》说“止”字“象艸木出有趾”,《六书略》则认为“象足趾”;《说文》说“步”字“从止、艸相背”,《六书略》则认为“象二趾相前后”;《说文》说“立”字“从大立一之上”,《六书略》则认为“象人立地之上”;《说文》说“走”字“从夭、止,夭者屈也”(从段注本),《六书略》则说“夭”“象人之仰首张足而奔之形”。“步”、“立”、“走”等字一般都看作会意字,《六书略》却收在象形类里。郑樵对金石文字颇有研究(《通志》有《金石略》)。他能有上述那类见

解,显然是由于受了金石文字中较古字形的启发。宋元间的戴侗作《六书故》,直接采用金文字形。由于金文字少,往往杜撰字形,因此受到后人的很多批评。不过戴氏说字颇有独到之处,这也是后人所承认的。如他认为“星”的初文,“鼓”字所从的“壺”本象鼓形,就是很好的见解。

元明 元、明两代是古文字研究衰落的时期,金石学方面值得一提的,只有明人搜集、著录古印的工作。这项工作宋人就开始做了。但是宋元时代的古印谱大都已经亡佚,流传下来的如《说郛》所收的《汉晋印章图谱》,资料贫乏,用处不大。明人所编古印谱,如顾氏《集古印谱》(1571),内容比较丰富,为古文字研究提供了有用的资料。

在这一时期里,古文字字汇继续有人编纂,但是所收字形大都据前人之书辗转摹录,没有多大参考价值。元初杨桓《六书统》、明代魏校《六书精蕴》等书也都想根据早于小篆的古文字来讲六书。这些书“杜撰字体,臆造偏旁”之病甚于《六书故》,而见解则不及《六书故》,不为后人所重。

清代 进入清代以后,金石学和小学复兴,古文字研究重新得到发展。清代古文字研究的水平是逐渐提高的。清初闵齐伋作《六书通》,后由毕弘述整理刊行。这是兼采古文、印文和钟鼎、石刻文字的一部古文字字汇,流传很广,但是内容杂乱,摹录失形,水平很低。乾隆时,清高宗先后命梁诗正、王杰等人仿《博古图录》体例对内府所藏古铜器加以著录,编成《西清古鉴》(1751)、《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编》及《乙编》4书(后3书稿本民国时方印行),其水平尚在宋人之下。从乾、嘉之际开始,清人在古文字研究上才有明显超过前人之处。道光以后,重要的金石收藏家辈出,陈介祺(1813~1884,号簠斋)是其中的代表。他们收藏的古文字资料在种类、数量、质量等方面都超过了前人。由于古文字资料的日益丰富,同时也由于小学、经学等有关学科的发达,古文字研究的水平不断提高,到清代晚期同治、光绪时期达到了高峰。吴大澂(1835~1902)、孙诒让是高峰期最重要的学者。

清代古文字研究的重点仍然是金文。乾隆时,由于朴学的兴起以及《西清古鉴》等书的编纂,士大夫中对金文感兴趣的人逐渐增多。嘉庆元年(1796),钱坫刻《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专收自藏之器,器形、铭文并录。九年(1804),阮元刻《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著录所收集的各家铭文,加以考释,以续《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此后出现了很多跟钱书或阮书同类的著作,影响较大的有吴荣光(1773~1843)《筠清馆金文》(1840)和吴式芬(1796~1856)《捃古录金文》(1895),体例都是仿阮书的。

清代研究金文的主要学者,乾嘉时期可以上举的钱坫、阮元为代表,道咸时期有徐同柏(1775~1854)、许瀚(1797~1867,字印林)等人。徐同柏著《从古堂款识学》(1886)。许瀚曾为吴式芬校订《捃古录金文》,他在金文方面的见解多见于此书。同光时期,金文研究出现高潮,

主要学者有吴大澂、孙诒让、方濬益(?~1899)、刘心源(1848~1915)等人。吴大澂跟金文有关的主要著作有《说文古籀补》、《字说》等书。《古籀补》是古文字字汇,所录之字以金文为主,兼及石刻、玺印、货币和古陶文字,释字颇有出自己见者。此书一改《古文四声韵》以来按韵收字的体例,分别部居悉依《说文》,不可释和疑而不能定之字入于附录。所录之字皆据拓本慎重临摹,跟过去那种辗转摹录,字形失真的古文字字汇大不相同。后来的古文字字汇,在编排的体例上大都仿照吴书。孙诒让著《古籀拾遗》(1888)和《古籀余论》(1929),订正前人考释金文之误。方濬益著有《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1935),但在他去世多年后才出版。刘心源的主要著作是《奇觚室吉金文述》(1902)。上述诸人对金文的考释有很多超过前人之处。

宋代以来多把春秋战国时鸟篆之类笔画屈曲奇特的金文视为夏商文字。龚自珍(1792~1841)曾疑王复斋《钟鼎款识》著录的、铸有这类铭文的“董武钟”是吴越器。方濬益明确指出:“若薛录之四商钟、王氏所录之董武钟,要亦周器,乃当时自有此一体,如秦之有缪篆、殳书者”(《缀遗》卷首《彝器说》中)。这是一种进步。在把铭文跟古籍中有关的历史资料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方面,清人也超过了前人。

货币文字真正成为古文字研究的资料是从清代开始的。搜集、研究古钱币的风气开始得很早。但是宋代以来研究古钱的人大都把基本上属于战国的东周时代的刀、布等类钱币,说成太昊、尧、舜等古帝王和夏商时代的东西,解释币文极尽穿凿附会之能事。直到乾隆时敕撰的《钱录》(1751),仍然停留在这种水平上。古币文字的研究出现转机,也在乾嘉之际。据蔡云《癖谈》(1827),钱大昕曾说过“币始战国”的话。嘉庆时,初尚龄作《吉金所见录》(1819),把古刀、布断归春秋、战国。先秦古币的研究自此渐上轨道。吴大澂《古籀补》收入了不少币文,刘心源在《奇觚》里也考释了一些币文。

乾嘉以后,玺印文字的研究也有相当大的进步。元明人不知古印中有早于秦代之物(明人古印谱中其实已收入不少战国印,但他们不明其时代)。乾隆五十二年(1787),程瑶田为潘氏《看篆楼印谱》作序,释出战国印中的“私玺”二字,并说“‘玺’但用‘尔’者,古文省也”(《通艺录》卷八《看篆楼印谱叙》)。这是清人辨识先秦古印的先声。道光十五年(1835)张廷济(1768~1848)编《清仪阁古印偶存》,称先秦印为古文印。同、光间,陈介祺编《十钟山房印举》,在汉印之前列“古玺”和“周秦”印两类。按其内容,前者基本上是六国印,后者包括战国时的秦印、秦代印和汉初印。陈介祺本认为周秦印是周末与秦代之物,古玺是三代之物。光绪四年(1878),他在致吴大澂的信中说:“……朱文铜玺,前人谓之秦印,不知是三代,今多见,亦似六国文字”(五册本《簠斋尺牘》第五册戊寅四月二十二日札),对古玺时代的认识已接近实际。《古籀补》收入了一些玺文。在汉印篆文方面,嘉庆时就有桂馥

《缪篆分韵》(1796)等字汇刊行,摹录印文比较谨严,胜于以前其他各类古文字字汇。

道光以后还发现了一些古文字资料的新品种,如封泥文字(即打在封泥上的印文,以汉代的为多)、古陶文字以及在清末才发现的具有重要意义的甲骨文。古陶文字首先于同、光间在山东临淄等地发现,稍后又在直隶易州(今河北易县)等地发现,陈介祺是第一个鉴定“三代古陶文字”(实际上大都属于战国时代)并加以收藏的人。吴大澂第一个认真研究古陶文。他曾据陈介祺藏陶的拓本写过一些考释,还在《古籀补》里收入了不少陶文。

安阳殷墟的甲骨文(主要内容为卜辞)大约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开始受到古董商的注意。次年,王懿荣(1845~1900)鉴定为三代古文并加以收藏。殷墟甲骨文资料丰富,内容重要,时代属商代后期,早于大多数铜器铭文,其发现在古文字学史上有重大意义。王懿荣在鉴定甲骨文的次年,就因八国联军侵入北京自杀殉国,所藏甲骨后归刘鹗(1857~1909)。刘鹗选拓了一部分甲骨编为《铁云藏龟》,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出版。这是第一部甲骨文著录书。刘鹗在序中已称甲骨文为“殷人刀笔文字”。次年,孙诒让据《藏龟》写成《契文举例》。这是第一部研究甲骨文的专著。此书遗稿由甲骨学的奠基者罗振玉在1917年印行。甲骨文发现后,古董商欺瞒收藏家,把出土地点说成汤阴。罗振玉是学者中最早打听到真实出土地点的人。宣统二年(1910),罗振玉作《殷虚书契》,考定甲骨出土之地是殷都故墟,甲骨文是殷王朝占卜的遗物,把甲骨文研究推进了一大步(他当时认为殷墟只是“武乙之墟”则是错误的)。此书印行的次年,清王朝就覆灭了。

清代金石学的发达,在专门研究《说文》的著作里也得到了反映。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在“鑿”字下引用金文的“攸勒”来作解释。桂馥本是金石学家,他在《说文义证》里屡次引用金石文字。王筠在《说文释例》里更是常用金文的字形跟《说文》的字形作比较。

随着古文字研究的逐渐深入,《说文》的一些错误就变得越来越明显了。吴大澂在《古籀补》自序里指出《说文》中古文的形体跟习见的铜器铭文不合,怀疑他们皆“周末七国时”文字。陈介祺也有类似看法(《古籀补》陈序)。吴、陈二氏还都对《说文》所收的籀文的时代表示了怀疑。从《古籀补》、《字说》等书中关于玺文、币文和陶文的一些话可以看出,吴大澂已经认识到这些文字资料基本上都是“周末”、“六国”时的东西。他在《古籀补》“二”、“钩”两字下,还明确指出《说文》中这两个字的古文的字形跟六国铜器铭文相合,应是“六国时”文字,不是真正的“古文”。可见吴大澂对《说文》古文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他对战国文字的研究为基础的。对《说文》篆形以及许慎讲字形和本义的错误,吴大澂、孙诒让等人也时常根据古文字加以指出。《古籀补》凡例第一条就说:“古器所见之字,有与许书字体小异者……可见古圣造字之意,可正小篆传写之讹。”

孙诒让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写成《名原》一书,从文字学角度总结自己研究甲骨、金文的成果。他指出文字“本于图象”,汉字最初“必如今所传巴比伦、埃及古石刻文,画成其物,全如作绩(绘)”,后来由于书写不便逐渐简化,“最后整齐之以就篆引之体”,才成为《说文》所载的那种文字。书中还很注意把同从一个偏旁的字放在一起加以考察。《名原》在一定程度上跳出了金石学和传统文字学的圈子,是古文字学史上有重要意义的一部著作。

中华民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时期到了民国时代,在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现代的历史学、考古学和语言学逐渐形成,古文字学也逐渐加强了科学性。

民国前期古文字研究的代表学者是罗振玉和王国维。罗振玉对古文字的研究开始于清末,不过他的学术活动主要是在民国时代进行的。罗氏对甲骨、铜器、金文拓本、玺印、封泥等古文字资料都有丰富的收藏。他既勤于著录、传布各种资料,也勤于研究、著述,贡献是多方面的。在他的著作里,最重要的是在《殷虚甲骨文字考》的基础上写成的《殷墟书契考释》(1915)。此书在甲骨文字的考释和卜辞的通读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突破,为甲骨学奠定了初基。王国维是在罗振玉的影响下开始从事古文字研究的。他在甲骨、金文和古文、籀文的研究上都取得了成就。在甲骨文方面,王国维新识之字并不是很多,但往往对通读卜辞有重要意义。他的主要贡献是以甲骨卜辞与典籍互证,进行历史、地理和礼制等方面的研究。他在金文方面,著有《观堂古金文考释五种》和很多单篇文章。在古文、籀文方面,著有《魏石经考》、《史籀篇疏证》以及《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桐乡徐氏印谱序》等文章。他认为古文是战国时东方六国的文字,说法比吴大澂精确。此说现已成为定论。至于籀文究竟是不是战国时秦国的文字,古文字学界尚有不同意见。

罗、王都已受到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对旧的金石学有所不满。罗振玉主张把金石学改为古器物学(《云窗漫稿·与友人论古器物学书》)。王国维曾把前人对古铜器和铭文的研究称为“古器物及古文字之学”(《国朝金文著录表序》),还时常单独使用“古文之学”、“古文字之学”或“古文字学”的名称,可见他倾向于把金石学分为古器物学和古文字学。这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学术界客观存在的趋势。不过从罗、王的研究工作来看,他们还未能真正摆脱金石学和传统文字学的束缚。

20年代以后,随着现代考古学的形成,古器物学为考古学所吸收,古文字学正式成为独立的学科,并且在考古学、语言学等学科的影响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发掘殷墟,古文字资料的出土情况开始由盗掘和偶然发现变为科学发掘。虽然由于盗掘无法禁止,这种转变只是局部性的,但是其意义仍然十分巨大。进入30年代以后,古文字研究的方法也出现了划时代的变化。

郭沫若在20年代末,为了探讨中国古代社会性质开

始研究甲骨、金文。在30年代前期,他借鉴考古学的类型学方法,根据器物的形制、花纹和铭文的字体、内容,对西周王朝的铜器进行区分所属王世的研究,又对周代诸侯国铜器(大部属于东周时代)进行分国的研究,写成了《两周金文辞大系》这部名著,建立了铜器铭文研究的新体系。他还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去研读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对它们的某些内容有了比前人深刻的理解。他的《卜辞通纂》和《殷契粹编》,在卜辞的通读上有重要贡献。他在收入《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的《殷彝中图形文字之一解》(1931)这篇论文里,指出殷周铜器铭文中的很多“图形文字”是“国族之名号”,一扫过去把这类文字任意释为“子”、“孙”等字,或视为非文字的图画的说。

与郭沫若用新方法研究铜器铭文同时,参加殷墟发掘、负责出土甲骨整理工作的董作宾,对甲骨文也进行了分期断代的研究。他在1932年写成、1933年发表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里,全面论述了殷墟甲骨文断代的根据,把甲骨文时代划分为5期,大大提高了甲骨学的水平。后来他还在甲骨文断代方面提出了一些补充的意见,如新、旧派的划分等,这些意见引起了不少争论。

清代以来,虽然古文字研究得到了迅速发展,考释古文字的方法却一直没有人认真加以探讨。有些研究古文字的人在语言文字学上缺乏修养,主要凭想象去考释古文字,甚至自己就把释字比作“射覆”。另一方面,由于一般文字学者不熟悉古文字,不能及时吸收古文字学者的研究成果,文字学也长期不能从一些有问题的旧观念中解脱出来。唐兰针对这种情况,在1935年写成了《古文字学导论》。此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由古文字的立场去研究文字学”。第二部分阐明研究古文字,主要是考释古文字的方法,特别强调了偏旁分析法和历史考证法的重要性。这是古文字学的第一部理论性著作。郭沫若、董作宾等人从事的古文字研究工作,大体上属于古铭刻学的范围。唐兰则把古文字学看作文字学的分支,把它跟古铭刻学(他称为古器物铭学)区分开来。不过他也指出二者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通过上述这几位学者和其他一些学者的努力,古文字学终于摆脱了金石学和传统文字学的束缚,呈现了新的面貌。如果把古文字学史分作古代、近代、现代3段,也许可以把汉代到清代道光时期划为古代,清代同光时期到20世纪20年代划为近代,20世纪30年代以后划为现代。进入30年代以后,古文字学发展的势头很猛。可惜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殷墟发掘被迫中止,古文字学的发展也受到了一定影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考古事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出土的古文字资料不但数量多,内容重要,而且绝大多数有科学的发掘记录。因此古文字研究者越来越重视考古学所提供的有关知识,使他们的研究的深度和科学性都有了增加。在新发现的资料里,有些品种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其中有的过去从来没有发现过,有的虽然在古代曾经发现过但没有实物遗留下来,如

西周甲骨文、春秋战国间的“盟书”(民国时代曾有少量发现,但当时不明其性质)、战国竹简以及秦和西汉早期的简牍和帛书等。这些资料的发现为古文字学开辟了新的领域。一些旧领域的研究工作,也由于新资料的发现而有了很大进展。

以上对民国时代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古文字学发展的大势,作了一个粗略的概述。下面再以几个重要研究领域为纲,简单地补充一些这一时期古文字研究的情况。

先补充甲骨学方面的情况。在甲骨文字的考释方面,罗振玉、王国维之外还有不少学者作出了贡献。其中最重要的是唐兰和于省吾。唐兰在这方面的代表作是《殷墟文字记》(讲义本1934,新版1981),于省吾的是《甲骨文字释林》。在甲骨文断代研究方面,对董作宾的意见作出补充和纠正的,主要有胡厚宣、陈梦家和日本的贝塚茂树。贝塚在这方面的代表作是他和伊藤道治合写的《甲骨文断代研究法的再检讨》(《东方学报》京都第23期,1953)。陈梦家的研究成果包括在他的《殷墟卜辞综述》里。70年代晚期开始的李学勤等人跟萧楠等人关于“历组卜辞”时代问题的争论,现在还没有得到结论,但是对甲骨文断代的研究已经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此外,在甲骨卜辞的文例、语法以及历史、地理等方面问题的研究中,也有不少学者取得了成绩。甲骨学的通论性著作以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为最重要。甲骨文字汇等工具书,主要有王襄(1876~1965)《簠室殷契类纂》(1920,增订本1929)、高承祚《殷墟文字类编》、孙海波(1910~1972)《甲骨文编》和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1965)。日本岛邦男(1907~1977)的《殷墟卜辞综类》是一部有创造性的工具书。此书根据甲骨文的字形特点分部排字,除部分极常用的字外,每个字下都按甲骨文原样摹出含有这个字的所有卜辞,极便于研究者使用。1979~1983年出版了郭沫若为主编胡厚宣为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这是一部大型的甲骨文著录书,共13册,收甲骨4万余片。70年代以前已著录的有研究价值的甲骨文资料,大抵都已收入此书。

在殷周铜器铭文的研究方面,除郭沫若外,作出比较重要贡献的还有唐兰、陈梦家、杨树达、李学勤和日本的白川静等人。唐兰有《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古文字研究》第2辑)等论文。陈梦家的主要著作是《西周铜器断代》(《考古学报》第9册至1956年第4期,未完)。杨树达的主要著作是《积微居金文说》。白川静的主要著作是《金文通释》(1964~1984)。唐兰和李学勤在西周铜器断代问题上跟郭沫若有较大分歧。金文字汇等工具书有容庚的《金文编》、周法高主编的《金文诂林》(1975)及其《附录》(1977)与《补》(1982)。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的大型金文著录书《殷周金文集成》预计收铜器铭文万件以上,1985年已出了第一册。《甲骨文合集》和《殷周金文集成》的出版,对古文字研究无疑会起很大的促进作用。

在殷周时代的某些甲骨、铜器和其他物件上,可以看到一种用6个或3个数字组成的符号,其意义长期以来没有确解。张政烺在《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考古学报》1980年4期)等论文中证明它们是易卦,解决了古文字学上的这个悬案。

在民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这一时期里,战国文字的研究逐渐发展成为古文字学的一个重要分支。30年代出版了对研究战国文字很有用的两种古文字字汇:罗福颐(1905~1981)《古玺文字徵》(1930,1981年出版的故宫博物院编的《古玺文编》是修订此书而成的)、顾廷龙《古陶文彙录》(1936)。1938年出版的丁福保(1874~1952)主编的《古钱大辞典》,为研究战国币文提供了方便。40年代初在长沙战国楚墓里发现了一件写有近千字的帛书,这是战国文字的重要新资料。早在1924年出版的丁佛言(1879~1930)的《说文古籀补》,值得在这里特别提一下。此书释出了不少战国玺文,可惜由于缺乏论证,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古玺文字徵》就没有吸收此书的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一方面由于在民国时代已经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一方面由于楚简等重要新资料不断发现,战国文字的研究迅速发展起来。通过朱德熙、饶宗颐、李学勤等一大批研究者的努力,在对战国铜器、竹简、帛书、玺印、货币和陶器的文字的研究上,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王国维把战国文字分成秦国和六国两系,现在战国文字研究已经进入了分国研究的阶段。研究者对战国文字的认识已经比过去深刻得多了。

秦和西汉早期的简牍帛书的研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随着这些新资料的发现而兴起的。70年代发现的几批重要资料,如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和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等,现在都已完全或基本上整理完毕,正在陆续刊布。此外,近年来又发现了一些重要的新资料: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今后无疑会有很大的发展。

在古文字的考释方面,还应该特别提一下早在20年代就出版的日本高田忠周的《古籀篇》(1925)。此书糅合各种古文字加以考释,内容显得有些庞杂,错误也较多,因此不为古文字学者所重。其实书中颇有一些很好的创见。例如唐兰在《古文字学导论》里释甲骨、金文的字为“巫”(《导论》166~167页),此书早就如此释了(《古籀篇》卷八·7下)。

最后,简单提一下这一时期里古文字研究在文字学上的重要贡献。

统治文字学界2000年之久的六书说,实际上是汉代学者主要根据他们对小篆的理解建立起来的,并不能很好地说明较古的汉字的构造。唐兰在《古文字学导论》里提出了“象形”、“象意”、“形声”三书说。陈梦家在《殷墟卜辞综述》里提出了“象形”、“形声”、“假借”三书说。他们冲破了六书说的樊篱,对文字学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在汉字起源问题上,唐兰等古文字学者也批判了过去的一些不合理的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新石

器时代陶器上的符号的大量发现,尤其是大汶口文化象形符号的发现,使汉字起源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更为深入的阶段。

由于《说文》“古文”的性质有了明确结论,并由于对各种古文字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古文字形体、结构发展变化的过程越来越清楚了。70年代秦简等新资料的发现,使大家对隶书的形成也有了比过去正确的认识。这一时期的古文字学者,对《说文》篆形和许慎讲字形和本义的错误指出得更多了。可惜在这方面还没有一部总结已有成果的高质量专著。在传统文字学得到改造的过程里,古文字学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参考书目

唐兰:《古文字学导论》,齐鲁书社,济南,19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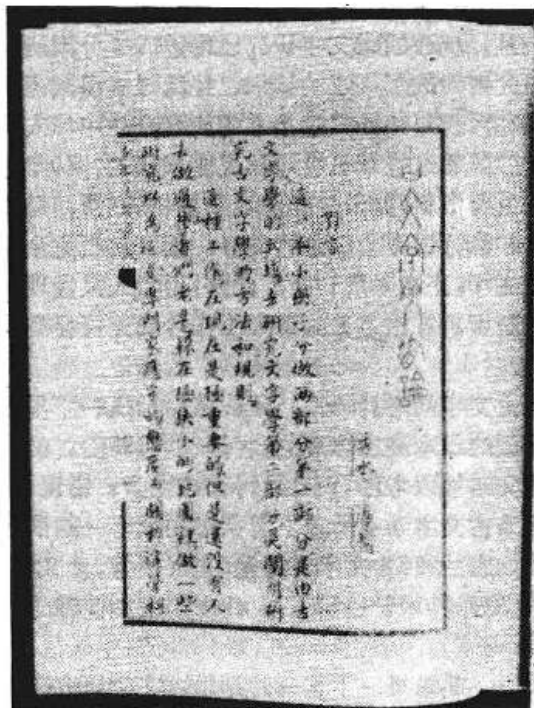
李学勤:《古文字学初阶》,中华书局,北京,1985。

(裘锡圭)

Guwenzixue Daolun

《古文字学导论》 中国古文字学的通论。唐兰著。分上下两编,上编先介绍古文字学的范围和历史,然后叙述汉字的起源和演变过程;下编着重论述古文字学的研究方法。

这部书本为作者在北京大学讲授古文字学的讲义,撰于1934~1935年,手写石印,只印200部,流传未广。



唐兰著《古文字学导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央党校历史教研室曾影印作为教材。1981年,齐鲁书社重新影印,补齐图版,并附以作者1936年部分改订稿及为1963年中央党校版作的跋,成为定本。

《导论》在古文字学界有广泛影响。书中有不少创造性见解。例如,作者分古文字为殷商系文字、两周系文字(止于春秋末)、六国系文字、秦系文字4系。在讨论古文

字演变过程时,不用传统的六书说,改用象形、象意、形声,有学者称之为“三书”说。论述古文字分类,不用《说文解字》部首,提倡以象形为部首,由象形字分化的单体表意字隶属于“部”,复体表意字隶属于“科”,由象形、象意孳乳的形声字隶属于“系”,称为“自然分类法”。

在古文字学的研究方法方面,书中对晚清学者孙诒让的成果备加推崇,就以“偏旁分析”法释读古文字作了详尽的讨论。

《导论》还有一些地方体现了作者独到的观点。如论汉字起源,不同意文字发生于商代之说,认为中国的象形文字至少已有一万年以上的历史,并说自夏初已有历史记载。又如追溯古文字学的原始,充分肯定汉代古文经的发现以及古文经学的作用。这些论点,在作者晚年论著中还继续有所反映。

(李学勤)

Guxiboliya zhuyuyan

古西伯利亚诸语言 (Paleo-Siberian languages) 也称极北诸语言,苏联学者则多称作古亚细亚诸语言。指分布于亚洲最北部的西伯利亚地区的3组语言和一种独立语言,它们彼此没有亲属关系。使用人口总计不超过3万。这些语言并不构成一个语系,语言学家把它们归并为“古西伯利亚诸语言”,主要是从地理方面考虑,同时也是沿用长期的习惯做法。

3组语言彼此处于隔绝状态,它们分别为:叶尼塞诸语言,卢奥拉维特兰诸语言,尤卡基尔诸语言,以及独立的吉利亚克语(也称尼夫克语)。叶尼塞诸语言中仅存凯特语(也称叶尼塞-奥斯恰克语),使用人口约1000。当代历史学家认为,匈奴人的语言就是古代的凯特语。卢奥拉维特兰诸语言包括:楚科奇语,使用人口约1.2万;科里亚克语(也称尼米兰语),使用人口约8000;以及其他几种使用人口很少的语言。尤卡基尔诸语言中仅存尤卡基尔语,其他几种语言均已消亡。独立语言吉利亚克语的使用人口约4000。

19世纪20~30年代以后,尚存的西伯利亚诸语言都有了自己的标准语,并逐步采用了以基里尔字母为基础的文字。

苏联学者通常把北美的爱斯基摩-阿留申诸语言归入古西伯利亚诸语言,理由之一是这些语言和古西伯利亚诸语言中的楚科奇语等具有某些相似的形态特征。西方学者,如美国语言学家E.萨丕尔等则认为,古西伯利亚诸语言既然主要是地理上的归类,那么北美的爱斯基摩-阿留申诸语言应归入北美语言。有些学者把亚洲的阿伊努语划归古西伯利亚诸语言,但至今尚未取得一致意见。

(黄长著)

Guxuliyayu

古叙利亚语 (Syriac language) 属阿非罗-亚细亚语系闪语族。公元2世纪后中东地区基督教使用的一种语言,是罗马帝国东部仅次于希腊语的重要语言,也是把希腊文明传播到阿拉伯地区的重要媒介。伊斯兰教



《古叙利亚语古卷》中的一页

兴起后,才让位于阿拉伯语。8世纪以前,古叙利亚语用于礼拜仪式。现在,古叙利亚语仍是中东若干教派的礼拜仪式语言。古叙利亚语有丰富的文献,包括《圣经》译本(见图)、哲学著作、语法、医药和科学著作。有22个辅音字母,原来没有表示元音的字母,但8世纪初设计了3种表示元音的不同书写系统。文字由阿拉米文字草写体衍生而来,自右至左,也可自上而下书写。

(林书武)

guyin

古音 (archaic Chinese sounds) 指中国周秦两汉时期的汉语语音,这是与隋唐语音通称今音相对而言。从20世纪20年代起,人们称周秦两汉语音为上古音,称隋唐语音为中古音。广义的古音包括上古音的声、韵、调,狭义的古音指以《诗经》、《楚辞》押韵为中心的周秦两汉韵,等于古韵(见古纽、古四声)。(俞敏)

guyun

古韵 (archaic Chinese rhymes) 指以《诗经》为主的先秦两汉韵文的韵。这些韵,从早就有人发现有些不大顺口,到宋代,出了一种叶音说,凡字用到韵文里,可以按不同的上下文随便改变平时的念法,好叫它顺口。比方虞字,在《驺虞》一章,上文韵脚是葭狔,就念 yá; 在二章,上文是蓬、縱,就念 wéng。

明代陈第开始提出古音不同于今音的见解,反对叶音。明末清初顾炎武写了《音学五书》,开始认真研究先秦的音。因为唐以下科举要求作诗,人们都记熟了诗韵有哪些韵,每个韵里有哪些字;这些早期研究者也把注意力集中到先秦韵文里的韵该分多少类,每类收哪些字这两个问题上去。

为便于叙述,现在先把分类分得最多的现代人罗常培、周祖谟合作的分类法稍加变动、注释,列到底下:

① 之部。包括《广韵》的之、哈(用平声代表平上去)韵和尤韵的一部分字,如期、莱、犹……。这些字里的谐声偏旁,是其、来、尤……。

② 幽部。包括尤、幽韵字,如優、猷。谐声的偏旁是憂、求……。

③ 宵部。包括萧、宵、肴、豪韵字,如苕、消、郊、桃……。偏旁是召、肖、交、兆……。

④ 侯部。包括侯韵字和一部分虞韵字,如蕞、驹……。偏旁是婁、句……。

⑤ 鱼部。包括鱼、虞、模韵的字,如踞、虞、蒲……。偏旁是居、吴、浦……。

⑥ 歌部。包括歌、戈、麻韵字和一部分支韵字,如何、過、蛇、饒……。偏旁是可、馮、它、義……。

⑦ 支部。包括支、佳韵字,如枝、提……。偏旁是支、是……。

⑧ 脂部。包括脂、齐、皆韵字,如脂、妻、咎……。偏旁是旨、妻、皆……。

⑨ 微部。包括脂、微、灰韵字,如遺、違、鬼……。偏旁是贵、韋、鬼……。

⑩ 祭部。包括祭、泰、夬、废韵字,如泄、艾、敗、滅……。偏旁是世、父、贝、歲……。

⑪ 东部。包括东的一部分韵字和钟、江韵字,如空、縱、邦……。偏旁是工、從、丰……。

⑫ 冬部。包括冬、东的一部分韵字,如宗、冲……。偏旁是宗、中……。

⑬ 蒸部。包括蒸、登韵字,如蒸、憎……。偏旁是蒸、曾……。

⑭ 阳部。包括阳、唐、庚的一部分韵字,如裳、筐、觥……。偏旁是尚、匡、光……。

⑮ 耕部。包括庚、耕、清、青韵字,如苹、耕、清、庭……。偏旁是平、井、青、壬……。

⑯ 真部。包括真、臻、先的一部分韵字,如薪、蕤、顛……。偏旁是新、秦、真……。

⑰ 淳部。包括淳、文、欣、魂、痕韵字,如惇、闻、欣、遜……。偏旁是辜、门、斤、豚……。

⑱ 元部。包括元、寒、桓、刪、山、仙、先一部分韵字,如垣、翰、觀、關、蘭、僊……。偏旁是亘、軌、藎、舛、间、罌……。

⑲ 谈部。包括谈、咸、銜、严、凡韵字,如談、譚、嚴、嚴……。偏旁是炎、彘、嚴……。

⑳ 侵部。包括侵、覃、盐、添韵字,如歆、覃、愔、簪……。偏旁是音、覃、晉……。

㉑ 职部。包括职、德韵字,如極、國……。偏旁是亟、或……。

㉒ 屋部。包括屋(一部分)、燭、觉韵字,如讀、绿、濁……。偏旁是𩇛、录、蜀……。

㉓ 沃部。包括屋(一部分)、沃韵字,如復、毒……。偏旁是复、毒……(也有人称觉部)。

㉔ 藥部。包括藥、铎、沃、觉韵里若干散字,如謔、鑿、瀑、濯……。偏旁是虐、舉、暴、翟……。

㉕ 铎部。包括藥、铎韵字和陌、麦、昔韵一部分字,如臈、作、客、獲、戮……。偏旁是康、乍、各、蔓、墨……。

㉖ 锡部。包括锡韵字和陌、麦、昔韵一部分字,如哲、謫、璧、……。偏旁是析、適、辟……。

㉗ 质部。包括质、栉、屑韵字,如室、櫛、结……。偏旁是至、節、吉……。

㉘ 術部。包括術、物、迄、没韵字,如述、蔚、仡、忽……。偏旁是术、尉、乞、勿……(此外还有至、未、怪、队韵的若干散字)。

②月部。包括月、曷、末、黠、糖、薛韵字，如揭、褐、活、拔、肇、说……。偏旁是曷、昏、发、隹省……。

③盍部。包括盍、洽、狎、業，乏韵字，如甲、業、法……。偏旁是甲、業……。

④緝部。包括緝、合、業、怙韵字，如泣、合……。偏旁是立、合……。

⑤以上通称阴声，收元音或湿音；⑥~⑨是阳声，收鼻音；⑩~⑬是入声，收塞音。

顾炎武《音学五书》里的《音论》是理论性总结，他在那里强调过“什之七”、“什之三”。这反映出来他可能以为现代音跟《诗经》音不同的不过3/10，只要根据7/10的音来改这少数，就功行圆满了。他在“琴瑟友之”的“友”字下说：“古音‘以’”。可见他没拟音，只是从现存甲音改成乙音。他的分类（不按原次序）是：①之职支锡脂微质祭月。②幽沃侯屋宵藥。③鱼铎。④歌。⑤东冬。⑥蒸。⑦阳。⑧耕。⑨真淳元。⑩侵緝谈盍。他的入声是放在阴声底下（⑩是例外）。

段玉裁在顾炎武的基础上再分类，得17部：①之职。②宵藥。③幽沃屋。④侯。⑤鱼铎。⑥蒸。⑦侵緝。⑧谈盍。⑨东冬。⑩阳。⑪耕。⑫真质。⑬淳。⑭元。⑮脂微術祭月。⑯支锡。⑰歌。可见，除了屋沃不分，质放在阳声底下，东冬不分，脂微術祭月不分这4点以外，别的地方都得出和现代人一样的结果了。只是入声还放在阴声下是沿用顾炎武的办法。除了分部以外，段玉裁还把《诗经》和“群经”用来押韵的字列了谱，便于查看，更突出的是他把谐声字分类也跟古韵联系起来了，说：“一声可谐万字，万字而必同部。同声必同部。”除了不该用全称肯定以外，大致是正确的。这是因为谐声字大量产生的时代，大致和《诗经》产生年代相合，他除了列韵谱以外，还列了《古十七部谐声表》。比方他的第6部就列了：馨声、梦声、蝇声、朋声、弓声……他还把本不在一部偶然借来押韵的字叫“合韵”，列在每部韵谱后头。段玉裁的《六书音均表》出来以后，引起极大的反响。钱大昕说他“凿破混沌”。后来的人再取得进展，差不多都只是补他的不足。

段书写成以后，请他老师戴震作序。戴震回了一封长信。信里说祭、泰、夬、废、月、曷、末、黠、糖、薛这些韵里的字，如《采芣苢》的掇、捋，《草虫》的蕨、馥、说等偏旁是𠂔、𠂔、𠂔、𠂔的字可以单成一组。用上文段氏的17部来说，就是祭、月应该从15部单分出来独立。分出以后算几类呢？从后来戴震的著作看，他立过霰、遇两部，只有去入。这是戴震的一个特点，他自己的创新是用影纽字代表一个韵部。比方他的东、侯、屋3类就叫翁、诨、屋。这是比较科学化的。因为他除了分部以外，还管拟音。他的缺点是拘泥等韵，凡是等韵一摄里的字，如尤、侯，他拒绝分开。所以他不听从段把尤、幽从侯分开的主张。凡是这样的学者都用“审音”作借口，坚持某些论点，有时候妨碍他们接受别人的正确主张。

王念孙曾当面纠正段玉裁的失误。在他写给江有诰

的信里说：“段君以事入都，始获把晤，商订古音。告以侯部自有入声，月曷以下非脂之入，当别为一部，质亦非真之入，又质月二部皆有去而无平上，緝盍二部则无平上而并无去。段君从者二（谓侯部有入声、及分術月为二部），不从者三。”请复察上文段玉裁的17部。若是依了王念孙的意见，他的屋沃不分、质附真下、脂微術祭月不分，緝盍附侵谈下就可以说全改过来了。只要再分东冬、脂微、把入声全独立，就是现代人的格局了（只有祭月合成一类）。

孔广森（1752~1786），也是戴震的学生。他在《诗声类》里说：“唐韵一东三钟四江……合为一部。其偏旁见《诗》者有从东……同……丰……充……公……工……豕……囟……从……龙……容……用……封……凶……邕……共……送……双……虢……。”又说：“凡从冬、中、农、弓、官、虫、宗、众、戎、梦、夆等声者不得阑入。”除弓、梦是蒸部字以外，剩下的就是冬部了。

孔广森还有一个突出的贡献，就是把各部分成阴、阳两大类（他主张古无入声）。本来戴震已经有“两两相配，以入声为相配之枢纽”的话，孔广森把它彻底实现出来，为后代研究部与部的关系作了个准备。不过他只图对得整齐，把分部倒弄得粗疏了，竟把真淳又合成一部（见阴阳对转）。他还写了《诗声分例》，把《诗经》里各种押韵的格式罗列出来，能使读者打破从近体诗里养成的成见。

继承并且发展了孔广森成就的是章炳麟。他在分部、拟音两方面都有贡献。在分部方面，他把術部从脂微底下分出来，算只有去入韵的队部，说：“脂队二部同居而旁转，旧不别出。”在拟音方面，他有《二十三部音准》专讲拟音。章炳麟的话比较清楚，比方说“东当从支韵之江（江南呼‘江’穹口而大……江西尤确）”。能让人懂他说的是用[ɔ]元音。他是个佛教徒，通些梵文，拟音常用梵文作模式。所以他的分部和拟音都比较清楚。现在把他的《韵目表》注上音标列到底下：

寒	諄	真	青	阳	东	侵	冬	蒸	谈	盍
an	uən	in	ien	aŋ	om	iem	um	im	am	ap
⋮	⋮	⋮	⋮	⋮	⋮	緝	⋮	⋮	⋮	⋮
⋮	⋮	⋮	⋮	⋮	⋮	iep	⋮	⋮	⋮	⋮
⋮	⋮	⋮	⋮	⋮	⋮	幽	⋮	⋮	⋮	⋮
歌	脂	至	支	鱼	侯	iu	之	宵		
oa	uəi	i	i	u	ou		ai	au		

自注：“上列阳声、下列阴声、为‘对转’。其数部同居者同一对转。”

对转就是韵前半个大体相同，后头加不加鼻音收尾的问题。他还有旁转。就是韵的介音收尾音不动（有些也有收尾音变化），主元音变化的问题。他的改进是把部与部的关系整理得比较有条理，所以他说：“孔氏所表……以审旁转则寔。”他的旁转安排得合理得多。

章炳麟的拟音引起人们认为怪的是把青、东、冬、蒸不算收-ŋ，可改到收-n、-m类里去。这是受梵文影响。梵文元音本有14个。有一派学者只用10个，外加am、ah，一共12个。m本是个表示元音鼻化的附加号，在摩擦音

前用,在k、t、p前头它就变成h[ŋ]、n、m。有一派和尚把在擦音前的m也念h,这就是章炳麟的模式。他说:“印度音摩那皆在体文,而缺独在声势”,就是他学的那派梵文。

章炳麟的学生黄侃立28部。除了“幽沃”不分,“脂微”不分,“祭月”不分外,所有入声全独立。他在每部里找出等韵家叫一、四等的韵,叫古本韵,剩下的叫今变韵。一、四等韵虽然从古到今的确变化少,但是没说今变韵因为什么条件才变。比方“元”部有寒、桓两个古本韵,在长沙话里就用两种元音念。光说“寒桓”是古本韵,各地人看了,意思不明白。所以他的拟音学说反不如章炳麟的可以译成音标。

现代人钱玄同(1887~1939)把“幽沃”分立,王力把“脂微”分开,所以一共有30部。要是把“祭月”依戴震意见分开,那就是本文开头举的31部了。

分类是中国学者研究古韵的最大贡献,不过有一点要指出:部大字多,押韵容易守规矩。部小字少,押韵难,免不了从别部借用。有些分类犬牙交错,象侵谈分立,屋沃……几部入声独立不独立,意见分歧就从这里产生。这里免不了有些个人爱好起作用。

参考书目

顾炎武:《音学五书》。

段玉裁:《六书音均表》。

孔广森:《诗声类》。

章炳麟:《国故论衡》。

王力:《汉语音韵》,中华书局,北京,1963。

(俞敏)

Gu Yanwu

顾炎武 (1613~1682) 中国明末清初思想家、学者。江苏昆山亭林镇人。初名绛,明亡改名炎武,字宁人,号亭林,学者称亭林先生。他研究经学、音韵、历史、地理等,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谈,注意广求证据。著有《日知录》、《肇域志》、《音学五书》、《亭林诗文集》等。



顾炎武把古韵分为10部,其中有4部成为定论,即歌部、阳部、耕部、蒸部。其余几部也都粗具规模,后来各家古韵分部,都是在顾氏分部的基础上加细加详。

顾炎武在音韵学上的最大贡献是用离析“唐韵”(实际是《广韵》)的方法研究古韵。宋人也曾研究古韵,但把《唐韵》

的每一个韵部看成一个整体,没有想到把它们拆开,因此,尽管把韵部定得很宽,仍然不免出韵。另一个极端是遇字逐个解决,没有注意到语音的系统性。顾炎武则把某些韵分成几个部分,然后重新与其他的韵部合并。这样有分有合,既照顾了语音的系统性,又照顾了语音的历史发展。他首先废弃平水韵,回到“唐韵”。比如把尤韵一部分字如“丘”、“谋”归入“之哈”部,这就是“离析唐韵”,

回到古韵。再比如把支、麻、庚三韵各分为二,屋韵分为三,令它们归入不同的古韵部,充分体现了古今语音系统的差别。他的这种离析工作,直到今天大家还公认是很有价值的。其次,他最先提出用入声配阴声。《诗经》常常有入声字跟阴声字押韵,以及一个字有去入两读的现象,顾炎武从这些现象中认识到,除了收唇音的入声缉、合等韵没有相应的阴声韵以外,入声都应该配阴声。在古音学的分部问题上,有阴阳入三分法,有阴阳两分法,按两分法说,他的作法是对的。

顾炎武在古音学的研究中,一方面有理论的建树,另一方面有对大量材料的分析,所以后来被学者誉为古音学的奠基者。他的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音学五书》中。

(谢纪锋)

Gu Yewang

顾野王 中国南朝梁陈间文字训诂学家。字希冯,吴郡吴人(今江苏吴县)。博学,通经史,精于天文、地理、文字音义。在梁朝为临贺王萧正德府记室。梁亡,入陈。陈宣帝陈顼太建中(569~582)领大著作,掌国史,后为黄门侍郎。平生著述有《玉篇》、《舆地志》等书。《玉篇》凡30卷,根据许慎《说文解字》和吕忱《字林》而作,分部略有变动,文字音义都有增加。

见《玉篇》。

(周祖谟)

Guaraníyu

瓜拉尼语 (Guaraní language) 南美印第安人的一支——瓜拉尼人的语言。属安第斯-赤道语系的图皮-瓜拉尼语族,但也有学者认为,图皮诸语言本身足以构成一个语系,图皮-瓜拉尼语族是其主要语族之一。瓜拉尼语主要分布于巴拉圭,此外巴西、玻利维亚、乌拉圭等国也有少数使用者。使用人口总计超过300万。在巴拉圭,它是得到官方正式承认的第二语言,其地位仅次于西班牙语,也是所有印第安语言中唯一具有官方地位的语言。在一个国家,社会各阶层如此广泛地使用一种本地语言,在印第安语言中再没有第二种。

瓜拉尼语是一种加后缀的语言。词根是名词性的或动词性的,可通过添加词缀变成别的词类。时态方面,仅区分将来时和非将来时。语音方面,鼻音化和喉音化很突出。词汇方面,来自西班牙语的借词很多。从类型学上讲,属主-动-宾型语言。

瓜拉尼语的使用,明显具有社会语言学上的意义。在巴拉圭,瓜拉尼语是民族感情的体现,是民族团结和民族自豪感的象征。1911年巴拉圭获得独立后,一度曾卷入同邻国之战。巴拉圭人发现,把瓜拉尼语作为战争中的“密码”非常有用,因为对方无法“破译”。战争结束后,这一传统被沿袭下来。凡有外族人在场时,只要巴拉圭人不想让外族人了解自己的谈话内容,彼此之间就说瓜拉尼语。因此瓜拉尼语有“秘密语言”之称。

巴拉圭宪法明文规定瓜拉尼语应受到保护,它是学校中的必习语言。瓜拉尼语有自己的文字。有瓜拉尼文

刊物、书籍,电台与电视台有瓜拉尼语节目。有些西班牙文报纸,各版文章常配有瓜拉尼文标题,甚至有瓜拉尼文句子和引语穿插其间。

(黄长著)

Guanzhong Fangyin Diaocha Baogao

《关中方音调查报告》(Report on a Survey of the Middle-Shanxi in Dialect Pronunciations)

20世纪早期调查研究关中方言的著作。白涤洲遗稿,喻世长整理。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入《语言学专刊》第6种,1954年在北京刊行。

“关中”指陕西省函谷、武关、散关、萧关4关之中的西安、咸阳、宝鸡等地。1933年春,白涤洲调查了关中42个县50个点的方言,第2年秋就去世了。他的调查材料只整理了声调部分,发表了《关中声调实验录》和《关中入声之演变》两篇报告,音韵材料由罗常培保存,1948年由喻世长整理并写成此书。《报告》包括语音的描写,声韵的音位,音变的讨论,音缀,声调,方言地理,历史音韵比较等7章,主要篇幅是各调查点的声韵系统和427个单字在各地读音的对照。《报告》根据各地语音歧异现象绘制方言地图23幅,最后1幅综合地图把关中方言分为东西两区,东区又分为4组。《报告》最后说明关中方言属于北方普通话范围,但与北京话相比又有自己的特点。本书分析关中方音细致,同时重视音位系统,材料也很丰富,但这次调查单字只记声韵,声调除入声有专题讨论外,只作了简单说明。

(颜逸明)

Guanhua fangyan

官话方言 (Mandarin dialects)

通称北方方言,即广义的北方话,一般所谓“大北方话”。在汉语各大方言中,官话方言有它突出的地位和影响。近1000年来,中国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从唐宋白话到元曲到明清小说,都是在北方话的基础上创作的,再加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话通行地区从元代以来一直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高度集中的心脏地带,向来官场上办事交际,都使用北方话,因而有“官话”的名称。实际上它是汉语各方言区的人共同使用的交际语言,现在全国推行的普通话,就是在“官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

通行地域 官话方言通行于长江以北各省全部汉族地区,长江下游镇江以上、九江以下沿江地带;湖北省除东南角以外的全部地区;广西省北部和湖南省西北角地区;云南、四川、贵州三省少数民族区域以外的全部汉族地区。此外,在非官话方言区中,还有少数由于历史原因而形成的官话方言岛。如海南岛崖县、儋县的“军话”,福建南平城关的“土官话”,长乐洋屿的“京都话”等。使用人口7亿以上。

分区 官话方言内部按其语言特点一般可以分为4个支系,即4个方言片(或称4个次方言),华北官话、西北官话、西南官话和江淮官话。

华北官话 即狭义的北方话,它通行于北京、天津两

市,河北、河南、山东、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以及内蒙古自治区的一部分。其中东北三省和河北省的方言最接近民族共同语——普通话。山东、河南的官话各有特色,近来有的语言学者认为可以另立胶辽官话和中原官话两支。其中中原官话包括山东、河南部分地区以及长江以北的徐州、阜阳、陕西的西安、山西的运城等地区。

西北官话 通行于山西、陕西、甘肃等省以及青海、宁夏、内蒙古的一部分地区。新疆汉族使用的语言也属西北官话。山西及其毗邻陕北部分地区、河南省黄河以北地区保留古入声字,自成入声调,不同于一般西北官话,也不同于华北官话,近来有学者认为可根据“有入声”这一特点另立“晋语”,从官话方言中独立出来。与此同时,有学者提出西北官话作为官话方言的一支,范围宜缩小到只包括甘肃兰州、宁夏银川等地的方言,改称“兰银官话”。

西南官话 通行于湖北省大部分地区(东南部、东部除外)、云南、贵州、四川三省汉族地区以及湖南、广西两省北缘地带。西南官话地域辽阔,但内部比较一致。

江淮官话 俗称下江官话,通行于安徽省长江两岸地区,江苏省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徐州一带除外),长江南岸镇江以上、南京以下地区,以及江西省沿江地带。江淮官话是官话方言中内部分歧较大、语言现象较为复杂的一支。其中皖南徽州一带方言,有许多与众不同的特点,历来不少语言学家认为可以从官话方言中分出,独立为皖南方言或徽州方言。

主要语言特征 语音方面 ①塞音和塞擦音声母大都有清声送气与清声不送气之分,而没有清声与浊声的对立,反映出清声母多而浊声母少的特点。古全浊声母字在现代官话方言各支系中几乎都念为清声母,很少例外。一般古全浊平声念送气清声母,古全浊仄声念不送气清声母。以古並母和定母为例,並母平声字爬、旁、蒲、排、陪、袍、朋、平等,各地官话大都念送气双唇塞音p';並母仄声字部、罢、败、备、暴、病、白、勃等,各地官话大都念不送气双唇清塞音p;定母平声字徒、台、题、桃、条、头、谈、甜、同等,各地官话大都念送气舌尖清塞音t';定母仄声字惰、度、待、弟、队、道、豆、电、定、动、独、笛等,各地官话大都念不送气舌尖清塞音t。依此类推,古从、澄、床、群等全浊声母字,各地官话也大都念为清声母,平声送气,如t'、t'、t'、k'等,仄声不送气,如t、t、t、k等。

②韵母方面最突出的特点是辅音韵尾比较少。古鼻音韵尾-m、-n、-ŋ在官话方言中大都只保留-n、-ŋ而失去了-m,来源于古-m韵(咸、深两摄)的字在各地官话中大都转念为-n韵(合并入山、臻两摄),也有转为鼻化韵的;古塞音韵尾-p、-t、-k在官话方言中大都消失,只有少数地方合并为喉塞韵尾-ʔ。塞音韵尾消失后,大都转为开尾韵母。表1举例看古鼻音韵尾和塞音韵尾在官话各支系中的变化情况。

③声调方面最突出的特点是调类的数目比较少。除江淮官话、华北官话中河南黄河以北地区、西北官话中山

表 1

	参 (古-m)	深 (古-m)	陈 (古-n)	斤 (古-n)	程 (古-ŋ)	京 (古-ŋ)
北京	.ts'an	.ʃən	.tʃ'an	.tɕin	.tʃ'əŋ	.tɕin
西安	.ts'æ	.ʃē	.tʃ'ē	.tɕ'iē	.tʃ'əŋ	.tɕin
武汉	.ts'an	.sən	.ts'an	.tɕin	.ts'an	.tɕin
扬州	.ts'ē	.sən	.ts'an	.tɕin	.ts'an	.tɕin
	鸽 (古-p)	腊 (古-p)	脱 (古-t)	割 (古-t)	各 (古-k)	托 (古-k)
北京	.kʏ	la'	.t'uo	.kʏ	kʏ'	.t'uo
西安	.kʏ	.la	.t'uo	.kʏ	.kʏ	.t'uo
武汉	.ko	.la(na)	.t'o	.ko	.ko	.t'o
扬州	kəʔ	laʔ	t'oʔ	kəʔ	kaʔ	t'aʔ

西南端、陕西的陕北及内蒙古西部部分地区有入声调外，其余各地官话大都没有入声调。整个官话方言区的声调以4~5个为最多，尤以4个声调最普遍，少于4个或多于5个的都较少。古四声中，平、上、去三声在各地官话中的分化、发展情况大体相似，即：古平声清声母字各地官话大都念为阴平，如包、周、基、夫、甘、尊、当、江、光等；古平声浊声母字各地官话大都念为阳平，如爬、徒、锄、奇、条、林、沉、群、同、红等；古上声清声母和次浊声母字各地官话大都念为上声，如补、早、胆、粉、党、井、榜、选、暖、染、老等；古上声全浊声母字和古去声字，各地官话多念去声，如古上声全浊声母字部、父、道、愤、荡和古去声字过、怕、步、带、共、耀等。古入声字在官话方言中的念法比

较复杂，除江淮官话及西北官话中山西、陕西部分地区、华北官话中黄河以北河南省部分地区保留入声自成调类外，其余入声调消失的各地官话，古入声字的归属各不相同。大致说来，华北官话跟北京话一样，入声消失后入声调的字分派平、上、去各声，即所谓“入派三声”；全浊声母入声字归阳平，次浊声母入声字归去声，清声母入声字分派到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各调中去；少数地方（如济南、大连）与北京略有不同：古入声清声母字或全归阴平（如济南），或全归上声（如大连）。西北官话没有入声的地方古入声调字的分派有两种情况：或是古全浊声母入声字归阳平，其余归阴平，如西安；或是古全浊声母入声字归阳平，其余归去声，如兰州。西南官话古入声字的分派最为划一：只要是古入声字，不论声母是什么，一律念阳平调，几乎没有例外（表2）。

词汇方面 官话方言的词汇和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词汇大同小异。官话方言中通行范围比较广的语词，大都已进入共同语，作为基本词汇，没能为共同语吸收的官话方言词，大都只流行于某一个官话方言片或方言小片，南北各地官话在词汇上的差异，比官话和其他各大方言之间的差异小。但官话方言通行范围如此辽阔，有的地方也有与众不同的方言词语。例如北京土话“二乎”意为“犹疑”，“咋呼”意为“嚣张”，“冲道”意为“敢做敢说”，天津话“广”意为“打”，“老公”意为“乌鸦”，“罢了”意为“了不起”；西安话“瞎了”意为“浪费”、“糟踏”；山东聊城话“毁”意为“打”；河南洛阳话“连连儿”意为“赶快”。“悠悠”意为“蹒跚”；新乡话用“乱”表示“住”，用

表 2 官话方言 12 个地点声调对照表

古调类		平		上		去		入		声调总数		
古声母	清	浊		清	浊	清	浊	清	浊			
例字	春天	群	名	短、老、体、卵	巨、抱	快、半	共、洞	八、德、铁、各	目、白、达			
方言点	北京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阴平上声	阳平去声	去声	阳平	4
	银川	平声	上声		去声						3	
	大连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上声	去声	阳平	4	
	济南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阴平	去声	阳平	4	
	太原	平	声	上声	去声			阴入		阳入	5	
	大同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入声			5	
	兰州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去声		阳平	4	
	西安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阴平		阳平	4	
	成都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阳平			4	
	武汉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阳平			4	
	南京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入声			5	
	扬州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入声			5	

“红”表示“卖力气”；成都、昆明等地“聊天”说成“摆龙门阵”，武汉、重庆等地“倒霉”说成“背时”，“可怜”说成“造孽”，……如此等等，都各具一格。“太阳”一词在官话方言区有各种不同的称呼：北京、保定称“老爷儿”（北京也称“太阳”），沈阳、西安称“日头”，太原、呼和浩特称“阳婆”，合肥称“热头”，成都、武汉、昆明称“太阳”；光是河北一省，对“太阳”的称呼就有“老爷儿、爷爷儿、爷爷、日头、日头爷、日头影儿、阳婆儿、阳婆、前天爷、佛爷儿”等等，可见词汇上的分歧，即使是在官话方言内部，仍然不容忽视。官话方言的词汇跟其他方言比较，还显示出以下一些特色：

① 双音节词特别占优势。双音节词在汉语中是整

个词汇里占比重最大的一部分,在官话方言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许多在官话方言中加“子”而成为双音节词的,在其他方言中往往是没有“子”的单音节词,如“稻子”在南方方言或叫“稻”(吴方言、闽方言),或叫“禾”(客家方言、湘方言、赣方言、粤方言);“谷子”在南方方言或叫“谷”(吴、湘、赣、客家、粤等方言),或叫“粟”(闽方言);“相片”一词官话方言区各地大都叫“相片”或“相片儿”,而南方各方言,除客、赣方言仍用双音节“相片”外,吴方言、粤方言、闽方言都是单音节词,或叫“照”(吴方言苏州话),或叫“相”(粤方言、闽方言)。

② 古代语词保留得比较少。尽管每个汉语方言都继承了不少古代汉语的语词,但是相对而言,官话方言区各地方言保留古语词的现象比较少。例如“眼睛”一词,官话方言区各地大都说“眼睛”,而闽方言至今仍叫“目”,粤方言仍叫“眼”,保留了古代汉语对这一人体器官的名称;又如“站立”一词,除官话方言区及湘方言外,吴方言叫“立”,闽、粤、客家、赣等方言叫“企”,都沿用了古代汉语的说法;人称代词第三人称官话方言一律叫“他”(她),而南方各方言却沿用古代的语词叫“佢”(客家、赣、粤方言)或“伊”(闽方言);此外,还有一批极常见的生活用词,南方各方言保留了古代的说法,而官话方言则采用了跟现代汉语普通话一致的说法。如“看”是官话方言普遍通用的,而粤方言、闽方言(部分地区)却用古代的语词“睇”。

③ 外来借词比较少。和南方诸方言比较,官话方言中外来的借词比较少。南方闽、粤等地向来为出海门户,与外国接触多,方言中较易借入外语语词,如闽方言中借入不少印度尼西亚-马来语词,粤方言中借入不少英语语词。有时候同一个事物,官话方言与南方各方言却采用不同的词语来表达,显示出“舶来”词与“土产”词的差别。例如“水泥”一词,粤方言区有人叫“士敏土”,吴方言叫“水门汀”,都是英语 cement 的译音;闽方言叫“番家灰”、“红毛灰”之类,也显示出外来的色彩,而官话方言大多数和共同语一样用“水泥”(部分地方叫“洋灰”)则是地道的汉语语词。又如照相用的“胶卷”,官话方言各地都叫“胶卷”,而粤方言、闽方言、客家方言却都采用英语 film 的译音词“菲林”。

④ 语气词比较少,用法比较概括。和南方各方言比较,官话方言的语气词比较少,用法更加概括,分工不那么细。例如常见的语气词“呢、吗、啊”之类,官话方言跟共同语是一致的,而南方吴、粤等方言的语气词则丰富得多。

语法方面 比较突出的特点是:

① 构词方面,修饰性的词素一般在前。如除西南官话偶有“鸡公”、“鸡母”一类说法外,各地官话大都是“公鸡”、“母鸡”、“客人”、“拖鞋”等说法,不象南方某些方言把修饰性的词素加在后面。如“鸡公”、“鸡佬”(粤方言)、“人客”、“鞋拖”(闽方言)之类。

② 运用语音内部屈折变化表现语法意义的现象比较少。除个别地方外,官话方言很少有语法学上所谓“构形法”,即“狭义形态”的东西,粤方言、闽方言用变音的方

式来表现某种语法意义的现象在官话方言中很少见。例如广州话用变调表示动作行为的“体”,如 jik⁵⁵la⁵⁵——吃过了。用 jik⁵⁵(食)变调表示完成体。闽方言用变韵表示人称代词的复数,如厦门话:li⁵³你——lin⁵³你们,这类形态变化在官话方言中比较罕见。

③ 结构助词“的、地、得”的运用。官话方言中不少地方有结构助词“的、地、得”,用途各不相同。这几个结构助词以北方官话用得最普遍,已进入共同语的语法体系中。在官话以外的南方各大方言中,却很少见,就是有类似的结构助词,也不象官话方言那样“的、地、得”分工明确,用法不混。

④ 重叠式的运用范围相当广。官话方言的重叠式内容相当丰富,使用范围相当广泛。例如亲属称呼,南方闽、粤、客家、吴等方言一般都不重叠式,多用单音节词素前加“阿”来称呼,如“阿爸”、“阿弟”、“阿嫂”之类。而在官话方言中,则普遍用重叠音节的方式来称呼人,如“哥哥”、“舅舅”、“爸爸”、“嫂嫂”、“叔叔”之类。又如某些常用的名词,在南方各方言中是不能重叠的,在官话方言中却以重叠的形式出现,如“星星”一词。在西南官话、西北官话中,重叠表示附加的小义。如成都话“盘盘”意为“盘儿”,“眼眼”意为“眼儿”。“豆豆”意为“豆儿”,西安话“帽帽”意为“帽儿”。西北官话有的地方量词和指示词也可以重叠,如西安话度量词重叠表示计量方式:“这米不卖升升”(不按升卖);指示词重叠表示所指的具体位置:“你的站在这这等着”(你们站在这儿等着),这些重叠的用法在南方各大方言中都是没有的。

⑤ 量词的使用比较概括。官话方言中最常用的量词“个”用途很广,可以用在许多事物上面,虚的实的,都能和“个”配搭。称人一般在官话方言中用“个”和“位”(尊称),而在其他各大方言中,却用各种不同的量词,并往往在量词的选用中体现出一定的感情色彩和修辞风格。例如粤方言,既有“这位先生”、“那个同学”等合乎规范的说法,而在某些场合,又有“咁隻衰野”(那个家伙)、“呢条老坑”(这个老头儿)、“吓单细佬”(那个小孩儿)等指人量词的独特用法,闽方言的潮州话口语中,还有表示人物的专用量词“主”[tu⁵³],如“只主物”(这家伙),相比之下,官话方言的量词,用起来要概括得多。

⑥ 官话方言中一个句子里可出现两个“了”字,前者表示动作、行为的完成,后者作为句末的语气词。如:“他吃了饭了”,这种用法在南方各方言中比较少见。

⑦ 表示被动的介词比较多。在被动句里,表被动的词在官话方言中除了用“被”以外,还可以用“给”(他给人骂了)、“受”(小张受人欺负)、“让”(老鼠让猫逮住了)、“叫(教)”(我今天叫雨淋了一场)等。

⑧ 官话方言疑问句有两类不同的格式。一类是北方官话用的,跟共同语一样,有“是什么?”“好吗?”“是不是?”等句式;另一类是西南官话(云南、贵州)及江淮官话用的,跟共同语不一样,有“ke(果)是?(或‘可是’?)”“ke(果)好?”“是不?”等句式。(参见彩图插页第62页)

参考书目

袁家骅等：《汉语方言概要》，第2版，文字改革出版社，北京，1983。

李荣：《官话方言的分区》，载《方言》，1985，第1期，北京。

詹伯慧：《现代汉语方言》，湖北人民出版社，武汉，1981。

(唐伯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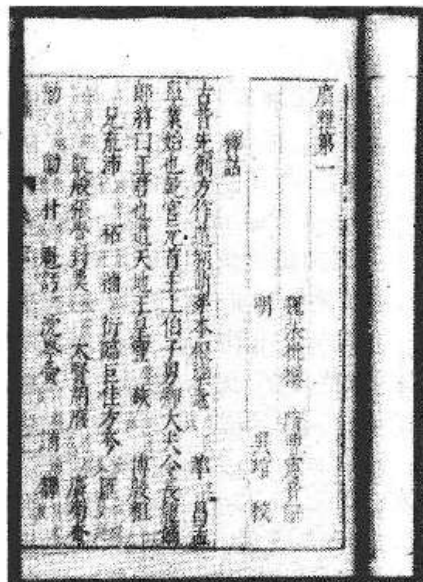
Guangshiming

《广释名》 训诂书。清代张金吾撰集。张金吾字慎旂，号月霄，江苏昭文(今江苏常熟县)人。生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卒于道光九年(1829)。著有《言旧录》、《爱日精庐藏书志》。本书作于嘉庆十九年(1814)，共2卷，为增广汉末刘熙《释名》而作。《释名》是从语音上推求语词得义的由来，并加以解说，在训诂学上称为声训。张金吾更从古书中就声音以训解词义的材料搜集在一起，按照《释名》区分语词的类目，自“释天”、“释地”、“释州国”以迄“释丧制”，依类排列成书，以备一家之学，所以名为《广释名》。他所引用的书都是汉代的书，如《尔雅》、《诗毛传》、《左传》、《周礼》郑玄注、《白虎通义》、《淮南子》高诱注、《说文解字》等等。不过其中有些不是声训的材料，删削未尽。有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刻本。

(周祖谟)

Guangya

《广雅》 训诂书。三国魏时张揖撰。张揖字稚让，魏明帝太和初为博士。张揖在《上广雅表》里说，《尔雅》一书所集训诂还很不完备，所以把群书中文同义异，音转



张揖撰《广雅》

失读，八方殊语，庶物易名，不在《尔雅》的都详录品核，以著于篇。其意在增广《尔雅》，因此所释仍用《尔雅》旧目，自《释诂》、《释言》、《释训》以下，直至《释兽》、《释畜》凡19篇。其书搜集极广，举凡汉代以前经传的训诂，《楚辞》、《汉赋》的注释，以及汉代的字书、《方言》、《说文解字》等书的解说都兼括在内。为研究汉魏以前词汇和训诂的重要著作。

《广雅》原书分上、中、下3卷，隋代曹宪作音释，因避隋炀帝杨广讳，改称《博雅》，自称所著为《博雅音》。曹宪

所著本，《隋志》作4卷，《唐志》则改作10卷，书名仍称《广雅》，沿用至今。

清代乾嘉语言音韵训诂之学盛行，王念孙始治《广雅》，成《广雅疏证》10卷，每卷又分为上、下。清儒誉为“盖藉张揖之书以纳诸说，而实多揖所未知，学者比诸郢道元之注《水经》，注优于经云。”疏证成书至第9卷止，第10卷是其子王引之所述。王氏疏证《广雅》，其最大特点在于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书中推阐“声近义同”、“声转义近”之理，随处皆是。其以声音通训诂，书中屡言“某之言某也”，探求词源、词族意。同时郝懿行作《尔雅义疏》，钱绎作《方言笺疏》都直接或间接受其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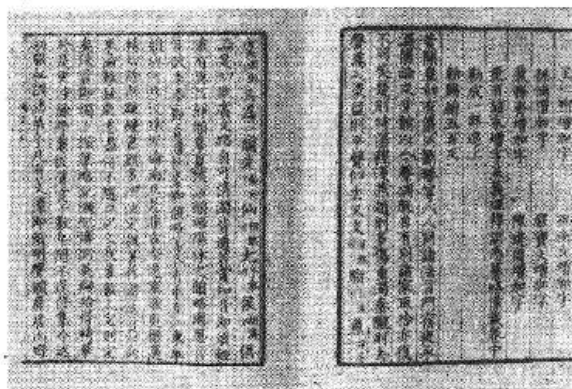
《广雅》旧刻本讹字较多，且曹宪音夹在正文之下，有正文误为音的，也有音误入正文的，王氏父子都一一校勘。把曹宪音分出，列于《广雅》原书之末，眉目一清。《广雅疏证》有学海堂本、畿辅丛书本、王氏家刻本。近年北京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均有影印本刊行；江苏古籍出版社亦影印出版高邮王氏4种，其中《广雅疏证》编有词目索引附后，极便检核。《广雅疏证》刊成后，王氏又不断加以修改，成《补正》一卷。此书1918年上海广仓学窘有排印本；罗振玉据手稿本抄录，1929年编印入《殷礼在斯堂丛书》中。王氏之后又有为之补证的数家，惟精义不多。

与王念孙同时疏解《广雅》的，还有钱大昭作《广雅义疏》20卷，当时只有传抄本，未经刊行，影响不大。桂馥看过原稿，叹其精审。又卢文弨有《广雅释天以下注》，收在《广雅义疏》中。日本刊有《静嘉堂丛书》本，国内各大图书馆都有度藏。

(徐 复)

Guangyun

《广韵》 中国现存的一部重要韵书。全名《大宋重修广韵》，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陈彭年，丘雍等人奉诏根据前代《切韵》、《唐韵》等韵书修订而成。《广韵》是宋代的官韵，也是中国第一部官修的韵书。由于《广韵》继承了《切韵》、《唐韵》的音系和反切，《切韵》、《唐韵》又已亡佚，《广韵》就成为研究汉语古音的重要材料。陈澧作《切韵考》依据的是《广韵》，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研究中国隋唐时代《切韵》所代表的中古音，依据的韵书也是《广



《大宋重修广韵》

韵》。由此也可看出《广韵》一书的重要性。

《广韵》的韵类韵母 《广韵》共分5卷，平声分上下2卷，上、去、入声各1卷。分206韵，包括平声57韵（上平声28韵，下平声29韵），上声55韵，去声60韵，入声34韵。《广韵》206韵中有193韵和陆法言的《切韵》分韵相同；有2韵和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增加的相同（即增加上声俨韵，去声酈韵）；有11韵和蒋斧印本《唐韵》增加的相同（据合理的推测，蒋斧印本《唐韵》从真韵分出淳，从轸韵分出准，从震韵分出粹，从质韵分出術，从寒韵分出桓，从旱韵分出缓，从翰韵分出换，从曷韵分出末，从歌韵分出戈，从智韵分出果，从箇韵分出过）。《广韵》和《切韵》、《唐韵》的韵目用字有些改变。

《广韵》206韵分列上平、下平、上、去、入五卷之内，每一个声调中每一个韵部和其他声调中相应的韵部，有一定的搭配关系。入声韵只和有鼻音韵尾的阳声韵相配。阴声韵部都有平上去。全书平上去韵数不等，阳声类韵数与入声韵数也不相符。这是因为去声泰、祭、夬、废4韵都没有平上入声相配，所以多出4韵；冬韵、臻韵的上声，臻韵的去声，痕韵的入声，字数都极少，附见于邻近的韵，没有单独列出韵目来。

《广韵》206韵，如不计算声调，以“东董送屋”为一韵，“支纸寘”为一韵，用平声包括上去入三声，那么平声57韵，再加上没有平上入相配的那4个去声韵，实际上只有61韵。如果把34个入声韵独立出来，则有95韵。用系联法细分，韵数还可分得更多。

《广韵》的韵类、韵母为什么这样多，历来有两种不同的看法。章炳麟在《国故论衡·音理论》中说：“《广韵》所包，兼有古今方国之音，非并时同地得有声势二百六种也。”陈澧在《切韵考》中却说，陆氏分206韵，每韵又分二类三类四类者，“非好为繁密也，当时之音实有分别也”。据黄侃对《切韵考》统计，206韵共有311个韵类。高本汉的看法与陈澧类似。这仍是学术界讨论的问题。

《广韵》的声母 音韵学上传统的三十六字母，大体代表唐、宋间汉语语音的36个声母，但却不能代表《广韵》音系的声母。因为《广韵》的声韵系统是从隋唐韵书沿袭下来的。研究《广韵》的声母得从《广韵》的反切上字归纳。陈澧作《切韵考》，首先考究《广韵》的声类，实际上就是研究《广韵》的声母。他用系联的方法，从反切上字考得《广韵》共有40声类。即36字母再加上照、穿、床、审、喻中分出的庄、初、神、山、于5字母，而把明、微2母合在一起。一般音韵学家认为明、微还应分开，所以称41声类。1931年白涤洲作《广韵声纽韵类之统计》（北京女师大《学术季刊》2卷1期），使用陈澧的系联法，考定《广韵》的声纽为47类。即41类再加见、溪、疑、影、晓、来的腭化音居、去、鱼、於、许、力6声类。同时（或稍前），黄淬伯作《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声类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一本二分，1930），也考定《广韵》声类为47。高本汉也主张47声类说。前此，曹运乾作《切韵五声五十一纽考》（《东北大学学术季刊》1927，第1期），后此陆志韦

作《证广韵五十一声类》（《燕京学报》25期），都是把精、清、从、心又各分为两类。陆志韦说：“五十一类能反映《广韵》里反切上字的分类情况，然而不能代表《切韵》时代的声母系统。因为反切上字的分类只和反切下字有关。所以有时候反切上字虽分两类，声母往往相同。”近年来又有不少《切韵》音系研究的著作，其中都涉及《广韵》的声母、韵母研究问题。

《广韵》每卷的韵目下都有一些韵目加注“独用”，或与某韵“同用”的字样。这对研究《广韵》音系和唐宋的实际语音，以及后来的韵书韵目的归并很有关系，非常值得注意。

韵书的内容，从唐代王仁昫的《刊谬补缺切韵》开始，以及《唐韵》，注释逐渐加多，并且引文都有出处，韵书便具有辞书、字典的性质。到了《广韵》，这种体制已经成型。《广韵》也可以说是一部按韵编排的同音字典。现存的《广韵》版本很多。一般认为清代黎庶昌《古逸丛书》覆宋刊本较好。涵芬楼影印黎氏覆宋刊本也较好，并且容易得到。

（曹述敬）

Guangzhouhua Fangyan Cidian

《广州话方言词典》（A Dictionary of the Guangzhou Dialect）见汉语方言词典。

Gul Fu

桂馥（1736~1805） 中国清代文字训诂学家。字冬卉，号未谷，山东曲阜人。生于乾隆元年。乾隆五十五年（1790）举进士，分为云南永平县知县，嘉庆十年卒于官。



桂馥博览群书，精于金石篆刻、文字训诂之学，生平著述有《说文解字义证》、《札朴》、《晚学集》、《缪篆分韵》等书。《说文解字义证》凡50卷，用40余年写成，最为知名。此书目的在于证明《说文》训释，所以称为“义证”。他首先在每字下广引古书的文句词字的训解可以跟许说相发明的，或数义、或十数义，资料极为丰富。然后再分别解说许氏原文，并订正二徐（徐铉、徐锴）本传写的讹误。给研究《说文》者提供极大的便利。

桂氏《札朴》凡10卷，内分“温经”、“览古”、“匡谬”、“金石文字”、“乡里旧闻”、“滇游续笔”6部分。其中涉及的方面很广，有关经史、诗文、训诂、方言、民俗、风物等考释极为精到，而以考订经义训诂的居多。“乡里旧闻”所记曲阜方言也是很值得重视的资料。

（周祖谟）

Guo Moruo

郭沫若（1892~1978） 中国文学家、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字鼎堂，四川乐山人。平生著作极多，对古文

字的研究功力极深,所著有《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卜辞通纂》、《殷契粹编》、《金文丛考》、《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等书。他研究古文字不是只注重于识别文字,而是结合古代社会的发展,从文辞上考查其时代所反映的事实内容,由文字以证史,由史以证文字,所以发明甚多。《卜辞通纂》是在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以后又一部有系统的按卜辞的内容分门别类进行研究排比材料的书,是学习甲骨文首先必读之作。两周铜器数量众多,散见在不同金石书内,他能广泛搜集按时代和地区国别来排列,进行解释整理,贡献很大。郭沫若还写过一些有关金文的论文,收在《文史论集》中。晚年还主编《甲骨文合集》。这是一部甲骨文资料的总汇,所收甲骨近5万片,分期分类,编纂成册,为研究商代社会文化和甲骨文字的资料宝库。



不同金石书内,他能广泛搜集按时代和地区国别来排列,进行解释整理,贡献很大。郭沫若还写过一些有关金文的论文,收在《文史论集》中。晚年还主编《甲骨文合集》。这是一部甲骨文资料的总汇,所收甲骨近5万片,分期分类,编纂成册,为研究商代社会文化和甲骨文字的资料宝库。

(周祖谟)

Guo Pu

郭璞 (276~324) 中国晋代文字训诂学家,文学家。史称:“郭璞字景纯,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也。……璞好经术,博学有高才,而讷于言论,词赋为中兴之冠。好古文奇字,妙于阴阳算历。”(《晋书》卷七十二本传)惠帝怀帝之际,曾为宣城太守殷祐参军。明帝时,王敦谋逆,为王敦所杀。郭璞既注《尔雅》,又别为《音义》、《图谱》,又注《三仓》、《方言》、《穆天子传》、《山海经》及《楚辞》、《子虚赋》、《上林赋》。他注意疏通古训,旁采方言,创通以俗语释雅言,以今语释古语的方法,对训诂学和历史地理学以及动植物学贡献都很大。

(周祖谟)

guoji fuzhuyu

国际辅助语 (international auxiliary languages) 简称国际语。以沟通各民族交际为目的的辅助性国际通用语言。倡导国际辅助语的人们希望,它是全世界各民族共同的第二语言(各民族除了本族语之外都只须学习和使用这种语言)。从社会语言学上说,国际辅助语是一种计划性语言。

这种计划性语言可以用3个办法选择:复活某种已死的语言(如古希腊语、拉丁语、梵语、古希伯来语);选择某种现存的民族语言(如英语、法语);从头创制一种新的语言(人造语)。第1个办法很难实行,因为那些死去的古典语言都非常难学,又脱离现代生活。第2个办法如果实行,会损害世界上大多数民族的自尊心,因为只有其语言被选中的民族可以免去任何学习任务,而其余民族则不得不费力去学习别民族的语言。第3个办法有较大的选择余地,因为新的语言可以按照一个理想的语言模式去创造,而又可以做到不违背民族平等的原则。

许多著名的学者,如英国的F. 培根(1561~1626)、法国的R. 笛卡儿(1596~1650)、德国的G. W. von 莱布尼茨(1646~1716),都从语言和逻辑的关系这个角度探讨过国际语问题。在他们的思想影响下,早期的国际语方案都按照“先验的”(也可以说是演绎的)原则去构拟。例如G. 达尔加诺的符号语,J. 贝克尔和M. 佩茨的数字语。在这些方案中,词按逻辑和语义分类,每类都标记特定的符号。19世纪上半叶还一度流行过一个很特殊的方案——音乐语,是J.F. 苏德尔提出的,用音符的组合表示词句。但这些方案都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语言。

构拟国际语更常用的办法是按“后天的”(也可以说是归纳的)原则效法民族语言去创造。1880年德国人J.M. 施莱耶(1831~1912)公布了他创造的沃拉普克语,其中有大量人为地硬性规定的成分;它虽然曾经作为人造语的第一个成功的尝试风行过一时,但很快就归于失败。在它的基础上1903年人们创造了向民族语言靠拢的中立语。1908年意大利人G. 皮阿诺(1858~1932)主持“中立语”改革工作,抛开了中立语的基础,引进他自己早就发明的无屈折拉丁语。后来这个方案改称英特林瓜语,几经修改,1951年由美国的国际辅助语协会定型为中介语。这个语言正如其早期的名称所示,其实是拉丁语,只是去掉了拉丁语繁琐的词形变化。中介语曾为不少医学会议和杂志所采用,但60年代之后没有进展。

1887年,波兰医生L.L. 柴门霍夫(1859~1917)倡导的世界语是能较好地效法民族语言而又有人造语特点的一个成功的语言。它取代了沃拉普克语迅速流行开来。但是试图修改它的方案也多达10种以上;其中最重要的是伊多语,1907年为法国人L. 博弗龙和L. 库蒂拉所提出,参与其事的有皮阿诺和O. 叶斯泊森等人。1928年叶斯泊森自创了新国际语。此外,从中立语改革派转为世界语者的E. de 瓦尔也退出了世界语阵营于1922年另创西方语。后面3个方案都没有成功。

至今已提出的国际语方案在500种以上,只有世界语存活下来。不过人们仍在试图创造新的国际语,近20多年来还有人提出多种方案,包括先验派的符号方案。伴随着国际语的创造活动,兴起了一个新的语言学科——国际语学。国际语学一方面研究各民族语言的关系及世界通用语言的前景,研究国际辅助语的实施经验、推广条件和宣传策略,另一方面又从一切民族语言的结构(包括基本概念及其表达方式)入手,研究国际辅助语的创制原则、语言结构和语言规范等方面的问题。前一方面可以称为国际语政治学,后一方面则是国际语语言学。目前,国际语学主要是世界语学。

国际语的语言结构必须简明、逻辑性强、具有国际性。世界语的音系包括5个基本元音i、e、a、o、u和23个辅音,避免了法语的[ø]和英语的[θ]之类难发的音。名词和形容词有数和格的协调关系,动词有12个形式,比英语复杂得多。这似乎违背了简明的原则,但实为表达各种精密关系所必需。如果语法简单到了贫乏的程度,反

而为反对国际语的人提供了口实。世界语的所有词形变化都是有规则而无例外的,所有的语素都是完全独立而且固定不变的。这使操粘着语和孤立语的人们容易学习。它的基本词汇取自印欧语言,这是有历史原因的;否则反而会把事情复杂化。1950年的反巴比伦语在基本词汇里集中了欧亚非三大洲85种语言的材料,1772年的一个方案糅合了全世界各种文字的符号为一个书写体系,表面上似乎达到了国际性,结果都遭到失败。但是世界语的成功不仅在其语言本身。世界语者的崇高理想和献身精神是任何其他国际语信徒所缺乏的。靠着不止一代人的持续努力,世界语的语言社群已经形成,已成为一种社会势力。现在很难再有条件创造一个同样的国际语社群。1984年,法国人A.皮拉斯发表了阿得利语的方案,它的词汇是用电子计算机由英、法、西、德、意5种语言中精选出来的。但这个新方案还不能拥有足够的支持者。

参考书目

A. L. Guérard, *A Short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Language Movement*, Boni and Liveright, New York, 1922.

M. Pei, *Artificial Languages: International (Auxiliary)*, in T. A. Sebeok (ed.), *Current Trends in Linguistics*, vol. 12, The Hague, Mouton, 1974.

(周流溪)

Guoji Jisuan Yuyanxue Xiehui

国际计算语言学协会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n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简称

ICCL。计算语言学工作者的国际性学术组织,成立于1961年。其宗旨是促进计算语言学领域内的国际学术交流。自1965年起,一般每两年召开一届国际会议,称为COLING。至今已开了10次。第一届于1965年在美国纽约召开。第二届于1967年在法国格勒诺布尔召开。第三届于1969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城郊的桑加塞比召开。第四届于1971年在匈牙利德布勒森召开。第五届于1973年在意大利比萨召开。第六届于1976年在加拿大渥太华召开。第七届于1978年在挪威卑尔根召开。第八届于1980年在日本东京召开。第九届于1982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召开。第十届于1984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召开。

自1982年开始,中国学者参加了这个协会的学术活动。

(冯志伟)

Guoji Yinbiao

国际音标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

bet) 原义“国际语音字母”,简称IPA,国际语音协会制定。19世纪末期,西方语言学界鉴于当时的语言注音方案紊乱,对研究和教学都不利,一些学校的语言教师在英国伦敦成立了“语音教师协会”,他们共同讨论、制定一套国际语音字母方案。这个方案由英国的H. 斯维特倡议,由法国的P. 帕西、英国的D. 琼斯等人于1888年完成,发表在该协会的刊物《语音教师》上。这是历史上第一个国际音标表。其后协会逐渐发展,各国语音学教师入会,1897年协会改名为“国际语音协会”。国际音标

表经协会多次修订补充,现在通行的是1979年修订的方案(见第119页国际音标表)。

早期的语言学家因各人研究需要,自定标音方法,不便交流。国际音标发表后,严格规定以一符一音为原则。使用拼音方案的语言,同一字母在不同词中常有几种读法。例如英语“like”和“lit”中的“i”,用国际音标注音,分别为[ai]和[i] (国际音标采用方括弧[],以别于普通字母)。又如汉语普通话ban(班)和bang(邦)的a,用国际音标注音分别为[a]和[ɑ]。此外,在不同语言中,同一个音有不同的拼法。例如英语的sh,法语的ch,德语的sch,波兰语的sz,捷克语的š,实际上都是国际音标的[ʃ]音。这些都是国际音标的长处。

国际音标表的排列,辅音大致按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来定横纵坐标,元音按舌位高低前后来定位置,便于分析和掌握。

国际音标所用字母以拉丁字母为基础,但人类语音差异甚大,有限的拉丁字母远不够用,就以改变字形和借用别的语言字母的办法来补充。为照顾习惯,多数符号以仍读拉丁语或其他语言的原音为原则。例如,以拉丁字母注原音的有[m]、[i]等;改变字形的有二:或颠倒字形,如[ə]、[ɱ];或加些笔划如[ɕ]、[ɹ];借用其他语言字母的如[æ]、[ɸ]等。还有极少数另立的符号如[ʔ]、[ʒ]等。目前通行表上的音标计有辅音72个,元音23个,用来标注语音已大致够用。

这个国际音标表是英、法两国的学者创订的,主要适用于标注印欧语言、非洲语言和一些少数民族语言。它发表后,在欧洲语言学界比较通行。美国人多数仍用他们自己研究美洲印地安语的符号。汉语各方言中的有些音,本表也不能包括。例如普通话的两种舌尖元音[i]和[ɿ]是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增订的。吴方言中大多数的腭化辅音[tʃ]、[dʃ]、[nʃ]是语音学家赵元任提出的。国际音标表内所定的声调符号只有分为高低的平、升、降和两个凹凸调共8种,这对研究描写声调语言是不够的。赵元任提出了声调的五度制调符,称为“声调字母”,发表于1930年的《语音教师》上,它适用于一切声调语言,已为国际多数学者所采用。汉语普通话的四声标为[˥]、[˨˩˦]、[˨˩˦]、[˨˩˦]已成为常识。

(吴宗济 周流溪)

Guoji Yuyanxue Xiehui

国际语言学协会 (The International Linguistic Association) 简称The ILA或ILA。总部设

在美国康涅狄格州耶鲁大学。它的任务是发表各种不同派别的语言学理论,传播语言学的新资料和新见解。

这个协会原名纽约语言学会。1943年由一批因战争而流亡至美国的欧洲语言学家和纽约各大学原有的语言学家共同组成。由于会员成分独特,它在语言学界占有特殊地位。正如H. A. 格利森所讲的那样,“纽约语言学会从一开始就是欧洲和美国之间的学术观点和科研方法交流的场所”。

	双唇		齿唇或 后腭	卷舌	腭		软腭	小舌	唇软腭		喉壁	声门
	双唇	齿唇或 后腭							唇软腭	喉壁		
鼻音	m	n										
塞音	p b	t d										
(中缝)擦音	ɸ β	θ ð										
(中缝)通音		s z										
边擦音		ʃ ʒ										
边通音		ɹ										
液音		l										
闪音		ɾ										
挤喉音	p'	t'										
缩气音	ɸ											
(中缝)搭嘴音	ɔ											
边搭嘴音												

附加符号

• 清音化 ɸ^h ɸ^h
 • 浊音化 ɸ^l ɸ^l
 • 送气音 ɸ^h ɸ^h
 • 漏气音 ɸ^h ɸ^h
 • 齿音 ɸ^h ɸ^h
 • 唇化 ɸ^h ɸ^h
 • 软腭化或咽化 ɸ^h ɸ^h
 • 成音节 ɸ^h ɸ^h
 • 或同时发音 ɸ^h ɸ^h
 (参见塞擦音)

+ 或较高 ɸ^h ɸ^h
 - 或较低 ɸ^h ɸ^h
 + 较前 ɸ^h ɸ^h
 - 或较后 ɸ^h ɸ^h
 .. 较央 ɸ^h ɸ^h
 ~ 鼻化 ɸ^h ɸ^h
 : 长音 ɸ^h ɸ^h
 ~ 半长音 ɸ^h ɸ^h
 ~ 非音节 ɸ^h ɸ^h
 ~ 更圆 ɸ^h ɸ^h
 ~ 更展 ɸ^h ɸ^h

其他音标
 2 腭擦音
 ɸ^h ɸ^h 腭化的 ɸ^h ɸ^h
 ɸ^h ɸ^h 腭擦音
 ɸ^h ɸ^h 同时发音的 ɸ^h 与 ɸ^h
 ɸ^h ɸ^h 似 ɸ^h 的变体等等
 ɸ^h ɸ^h
 ɸ^h ɸ^h
 ɸ^h ɸ^h 的变体
 ɸ^h ɸ^h 色彩的 ɸ^h

元音



不圆唇

圆唇

1969年纽约语言学会已发展到拥有会员2000多人,包括世界各地的著名语言学者,因此改名国际语言学协会。现在该会会员分布在六大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有不少很有影响的人物,如D. 鲍林杰、N. 乔姆斯基、Z. S. 哈里斯、R. 雅柯布逊、W. 拉博夫、R. 拉多、A. 马丁内、K. L. 派克、P. 波斯塔尔、T. A. 塞比奥克、U. 瓦恩里希等。从1955年以来,协会每年举行一次年会。会刊《词》于1943年创刊,每年出版3期。(廖雅章)

Guoji Yuyin Xiehui

国际语音协会 (The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ssociation) 简称IPA。语音工作者的一个国际组织。会址伦敦。其宗旨是促进语音学研究,并把其成果用于语言教学及文字制订或改革,鼓励研究罕用语言的现代读音,并改进标音法。

协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86年初。当时法国语音学家P. 帕西和本国一批英语教师组织了一个“语音教师协会”,出版会刊《语音教师》。帕西任协会主席和会刊主编。同年6月后丹麦的O. 叶斯伯森、德国的W. 费尧特、英国的H. 斯维特和瑞典的J. A. 龙德尔等学者相继入会,协会很快发展为一个国际性组织。

1888年1月协会成立了第一届国际理事会,其中有法国、英国、德国、奥地利、比利时、挪威、瑞典、丹麦、冰岛、芬兰、美国 and 加拿大的代表。同年8月,经过两年磋商和研究,制订出第一个国际音标方案并在会刊上发表了。

1889年,协会决定改名为“当代语言教师语音协会”,以法语为会内正式语言,会刊亦以法语命名(Le Maître Phonétique)。1897年协会再次易名为“国际语音协会”(L'Association Phonétique Internationale, 简称API)。英语名称为The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ssociation。

国际语音协会的一大功绩是创制和提倡使用国际音标。这套音标几十年来经过多次修订(最近一次修订是在1979年),不但广泛应用于语音学专著,而且也越来越普遍地应用于语言课本和词典。费尧特(1888~1917年任主席)、帕西(1927~1940年任主席)、D. 琼斯(1950~1967年任主席)等人都曾在国际语音协会中发挥过重大作用。

近年来实验语音学迅猛发展,国际语音协会因之作重大改革。从1971年起,会刊名称改为《国际语音协会学报》(半年刊),并放弃了过去用国际音标刊登文章的传统,改用英文刊登。80年代,协会的机构改为秘书处,不设主席。全体大会每4年召开一次。

国际语音协会现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会员,共800多人,其中美国人和英国人占多数。

(周流溪)

Guojia Yuyan Wenzhi Gongzuo Welyuanhui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State Language Commission) 见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

Guowenfa Caocuang

《国文法草创》 汉语语法著作。陈承泽著。192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57年重印,1983年再版。陈承泽(1885~1922),字慎侯,福建闽侯人。语法学家。年轻时曾中乡举,后游学日本。归国后主要从事编辑工作,并致力于汉语语法的研究。《国文法草创》是陈承泽的代表作。这本书经七八年的时间,易稿十余次,始得完成。全书约5万字,以文言为研究对象。这是一本纲要性的著作,叙述多于例证,议论多于描写。

全书分13节,第1节为“绪言”,讲著作的缘起。第2节为“研究法大纲”,提出研究语法的主张。第3节为“文法上应待解决之诸悬案”,主要讨论词类问题。第4~12节分别叙述各类词的特点和用法。第13节为“活用之实例”。其中第2、第3、第13节给后学者以较深影响。第2节讲研究方法,提出3个原则:①说明的,非创造的;②独立的,非模仿的;③实用的,非装饰的。这些原则是全书的总纲。第3节和第13节讨论词类,反对马建忠(1845~1900)的“字无定类”说,主张根据词的本用定类,不能以修辞上的特例作为语法上的通例,不能以例外否定规律。又创动词的“致动”、“意动”两个术语(见汉语语法),为后来所沿用。(参见彩图插页第25页)

(张斌)

Guowenfa zhi Yanjiu

《国文法之研究》 汉语语法著作。金兆梓著。1922年上海中华书局初版,1955年修订再版,1983年商务印书馆新1版。金兆梓(1889~1975),字子敦,号笔盒,浙江金华人。文史学家。早年从事教育工作。这本书是他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授课时的讲稿,经过整理而成的。清末民初,语言学者研究汉语语法,大多以马建忠(1845~1900)所著《马氏文通》(1898)一书为规范。这本书从语言实际出发,按照逻辑的要求,根据语句的结构方式,探讨其条例与法则。全书共分3章。第1章“导言”,说明探讨一国语法,应根据该国语文在长期使用中的习惯及历史发展来研究。第2章“文法之研究法”,扼要地介绍了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和普通研究法,上述3种方法在研究中应同时并用。第3章“名学的现象与文法的现象”,认为语言文字是表达思想的工具。思想构成的基本概念及其理论程序是名学的现象,如何按照表达的需要,用字、字群和句通过组织配合,把思想如实地表达出来,这就是文法的现象。这一章是全书的重点。这本书在语法研究方面立足于革新,在当时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胡裕树)

Guoyu Luomazi

国语罗马字 (National Language Romanization) 全称为“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1925~1926年国语统一筹备会“罗马字母拼音研究委员会”研究制订,1928年国民党政府大学院公布。这是中国推行国语和供一切注音用的第一个法定的拉丁字母拼音方案。

产生经过 “五四”运动前后,在“文学革命”的影响

下,《新青年》和《新潮》等杂志讨论文字改革,提出采用罗马字(拉丁字母)拼音的问题。1923年,《国语月刊》出版“汉字改革号”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发表钱玄同的《汉字革命!》、蔡元培的《汉字改革说》、黎锦熙的《汉字革命军前进的一条大路》、赵元任的《国语罗马字的研究》等文章。赵元任提出制订国语罗马字的25条原则和一个国语罗马字方案的草稿。钱玄同、周辨明、林语堂、许锡五等也都提出了各自的罗马字拼音方案。1923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开会,钱玄同提出《请组织国语罗马字委员会案》,黎锦熙、叶谷虚等也提案请求公议一种罗马字拼音方案,与注音字母同时推行。大会通过决议,成立“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指定钱玄同、黎锦熙、黎锦晖、赵元任、周辨明、林玉堂(语堂)、汪怡、叶谷虚、易作霖、朱文熊、张远荫¹¹人为委员。但由于时局变动,委员会无法开会,改由刘复发起的研究音韵学的“数人会”进行讨论。“数人会”的6个成员中,5个是“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的在京委员。经过一年时间,开会22次,九易其稿,终于议定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1926年9月,“国语统一筹备会”召开“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通过并提请教育部公布。1928年9月26日,国民党政府大学院公布,作为“国音字母第二式”。

国语罗马字方案

声母

ㄅ	ㄆ	ㄇ	ㄏ	ㄏ*	b	p	m	f	v*
ㄉ	ㄊ	ㄋ		ㄌ	d	t	n		l
ㄍ	ㄎ	ㄎ*	ㄏ		g	k	ng*	h	
ㄐ	ㄑ	ㄑ*	ㄒ		j	ch	gn*	sh	
ㄓ	ㄔ		ㄕ	ㄖ	j	ch		sh	r
ㄗ	ㄘ		ㄙ	ㄙ*	tz	ts		s	z*
ㄩ	ㄨ	ㄩ			y	w	y(u)		

韵母(基本形式)

开	ɑ	ɿ	ɛ	ɛ*	ɿ	ɿ	ɿ	ɿ	ɿ	ɿ	ɿ	ɿ	ɿ	ɿ	ɿ
齐	ɿ	ɿ	ɿ	ɿ	ɿ	ɿ	ɿ	ɿ	ɿ	ɿ	ɿ	ɿ	ɿ	ɿ	ɿ
合	ɿ	ɿ	ɿ	ɿ	ɿ	ɿ	ɿ	ɿ	ɿ	ɿ	ɿ	ɿ	ɿ	ɿ	ɿ
撮	ɿ	ɿ	ɿ	ɿ	ɿ	ɿ	ɿ	ɿ	ɿ	ɿ	ɿ	ɿ	ɿ	ɿ	ɿ
开	y	a	o	e	ê*	ai	ei	au	ou	an	en	ang	eng	ong	el
齐	i	ia	io		ie	iai*		iau	iou	ian	in	iang	ing	iong	
合	u	ua	uo			uai	uei			uan	uen	uang	ueng		
撮	iu				iue					iu	iun				

① 表有*号者系今音不用或罕用之音。

② 声母 j、ch、sh 仅有齐撮，ch、sh 仅有开合，故可同用 j、ch、sh 三母而不混，以避字形过于繁细。

③ i、ɤ、u 本兼声韵两用，故国语罗马字亦列 y、w、y(u)。在上去齐撮韵字别无声母时须将第一字母改为 y 或 w，如 -iee、-uay 独用时作 yee 也、way 外。但如改后形与他韵混或全无元音时则在第一字母前加 y 或 w，如 -eu、-uh 独用时作 yeu 雨、wuh 雾(非 yu、wh)。

④ 注音字母对于“知、痴、诗、日、兹、此、四”等字未制韵母，今以 y 表之。

⑤ “东、送”与“翁、瓮”等不同韵，故ㄨㄥ 分为开口 ong 与合口 ueng 两韵。ㄨㄥ 韵近齐齿，故亦归第二排。

声调

阴平:

① 用“基本形式”，如 hua 花、shan 山。本式包括轻声、象声字、助词，如 ma 吗、aia 阿呀。

② 但声母为 m、n、l、r 者加 h, 如 mhau 猫、lha 拉。

阳平：

① 开口韵在元音后加r, 如 char 茶、torng 同、parng 旁。

② 韵母第一字母为 i、u 者，改为 y、w，如 chyn 琴、hwang 黄、yuan 元；但 i、u 两字母为全韵时改为 yi、wu，如 pyi 皮、hwu 胡、wu 吴。

③ 声母为 m、n、l、r 者用“基本形式”，如 ren 人、min 民、lian 连。

上声：

① 单元音双写,如 chii 起、faan 反、eel 耳。

② 复韵母首末字母为 i、u 者改为 e、o，如 jea 假、goan 管、sheu 许、hae 海、hao 好；但既改头则不再改尾，如 neu 鸟、goai 拐。

③. ei、ou、ie、uo 四韵准上声第①条，如 meei 美、koou 口、jiejie 解、guoo 果。

去声：

韵尾为 -i、-u、-n、-ng、-l 或(无)者各改为 -y、-w、-nn、-nq、-ll 或 -h, 如 tzay 在、yaw 要、bann 半、jenq 正、ell 二、chih 器。

附记

① 在官话区域内仅长江下流有短促之入声。如欲表入声时可用 -q 韵尾, 如 tieq 铁, loq 洛。

② 罗马字母之 v、x 二母，不作拼国音用，惟重字可

用x代之,如pianpian(偏偏)可作pianx,隔一字重者可用v代,如kann i kann(看一看)可写作kann i v,重二字者可作vx,例如feyshin feyshin(费心费心)可作feyshin vx。

③ 南京、杭州、北平新旧都城皆富于卷舌韵。国音也可采用，其拼法原则如下：

a. 韵尾之 i、n 音省去, 例如“孩儿”(hair-erl)作 harl, 扇儿(shann-erl)作 shall, 味儿(wey-er)作 well.

b. (y)、i、iu 三韵加 el, 其余加 l, 如丝儿(sy-erl)作 sel, 今儿(jin-erl)作 jiel, 鱼儿(yu-erl)作 yuel, 明儿(ming-erl)作 mingl, 后儿(how-erl)作 howl。

④ 根据国语罗马字原则可拼各地之方音。如江浙间有 bh、dh、gh、dj、dz 等浊母，如 bhu 蒲、dji 其、dzy 慈。西安有 bf、pf 等声母，如 bfang 庄、pfu 初。广州有 m、p、t、k 韵尾，如 sam 三、lap 立、tzit 节、hork 学。

⑤ 如用西文次第读字母名称时，须依照国音读之如下：

a b c d e f g h i j k
Y ㄩ ㄜ ㄝ ㄆ ㄇ ㄊ ㄋ ㄌ ㄍ ㄏ ㄐ ㄑ ㄒ ㄓ ㄔ ㄕ ㄖ ㄗ ㄘ ㄙ
l m n, o p q, r s t, u v
ㄌ ㄇ ㄋ ㄝ ㄆ ㄇ ㄊ ㄋ ㄌ ㄍ ㄏ ㄐ ㄑ ㄒ ㄓ ㄔ ㄕ ㄖ ㄗ ㄘ ㄙ
w, x y z.
ㄨ ㄛ ㄜ ㄝ ㄆ ㄇ ㄊ ㄋ ㄌ ㄍ ㄏ ㄐ ㄑ ㄒ ㄓ ㄔ ㄕ ㄖ ㄗ ㄘ ㄙ

拼写举例(摘自赵元任《最后五分钟》序言)

Shiantzay de shin wenshyue buneng meiyiou shin
现在的新文学不能没有新
wentzyh, yooule shin wentzyh, feidann tzay shyryjih
文字，有了新文字，非但在实际
shang yooou duoshaude biannlih, tzay Jonggwo
上有多少的便利，在中国
jianglaide jingshern wenming shang yee kaile i-tyau
将来的精神文明上也开了一条
shin luh—tianx tingjiann de “Jong-Shi goutong”
新路——天天听见的“中西沟通”
de lao huah, yee jiow yaw deeng jehme i-lai
的老话，也就要等这末一来
tsair chitourl yooou ge bannfaa.
才起头儿有个办法。

国语罗马字的方案有以下几个特点：①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同时也适当兼顾其他“官话”区域的读音；②完全采用现成的拉丁字母，不增加新字母也不附加符号；③充分考虑到现代汉语的语音特点，同时也尽可能地照顾到国际习惯；④用变化拼法的办法来表示声调，避免附加符号。但缺点是表示声调的规则较繁，带来学习上的不便。

推行情况 国语罗马字公布以后，除了出版数量很少的一些课本、教材、字表、读物外，没有在学校里和社会上广泛传习。课本只出了黎锦熙的《国语罗马字模范读本首册》(1930)和赵元任的《新国语留声片课本》(1935)两种，读物只出了赵元任的《最后五分钟》(1929)一种。此外出了齐铁恨的《国语罗马字》(1930)、陆衣言的《国语罗马字使用法》(1930)、黎维嶽的《国语罗马字》(1930)、萧家霖的《国语罗马字入门》(1931)等传习小册。不过字典注音都逐渐采用，与注音字母并列。1930年7月成立推行团体“国语罗马字促进会”，创刊《G. R.》(国语罗马字)周刊(后改双周刊)，办了若干期暑期讲习班。济南和郑州的分会也出了一些刊物。

台湾省修订国语罗马字方案 1984年，台湾省在很多年不用这个方案之后，又作了修订，予以采用。1984年5月10日发表修订草案，试用一年，征求意见。1986年1

月28日正式公布，名“国语注音符号第二式”。修订的要点如下：

① 声调改用符号标调，即阴平“—”，阳平“/”，上声“v”，去声“\”，轻声不标。如 mā(妈)、má(麻)、mǎ(马)、mà(骂)、ma(吗)。声调符号加在主要元音之上，如 huái(怀)。

② 韵母 r (“知痴诗日资此思”的韵母)在翘舌音后改为 r，如 shī(师)；在舌齿音后改为 z，如 sī(思)。卷舌韵母由原来的 el 改为 er，儿化韵写作 -r，如 huār(花儿)。韵母 -ong、-iong 改为 -ung、-iung。

国语注音符号第二式与第一式对照表

		第一式				第二式			
声母	唇音	ㄅ	ㄆ	ㄇ	ㄈ	b	p	m	f
	舌尖音	ㄊ	ㄊ	ㄋ	ㄌ	d	t	n	l
	舌根音	ㄍ	ㄍ	ㄎ	ㄏ	g	k	h	
	舌面音	ㄐ	ㄑ	ㄒ		j(i)	ch(i)	sh(i)	
	翘舌音	ㄔ	ㄕ	ㄖ	ㄛ	j	ch	sh	r
韵母	舌齿音	ㄗ	ㄘ	ㄙ		tz	ts	s	
	单韵(一)	(ㄚ)				r, z			
	单韵(二)	ㄟ	ㄚ	ㄛ		i, yi	u, wu	iu, yu	
	单韵(三)	ㄜ	ㄝ	ㄞ		a	o	e	ê
	复韵	ㄟ	ㄚ	ㄛ		ai	ei	au	ou
声调	声随韵	ㄟ	ㄚ	ㄛ		an	en	ang	eng
	卷舌韵	ㄟ	ㄚ	ㄛ		er			
	结合韵母(前有字母时用)								
	齐齿呼	ㄟ	ㄚ	ㄛ		ia	io	ie	
	合口呼	ㄟ	ㄚ	ㄛ		iai	iau	iou	
声调	撮口呼	ㄟ	ㄚ	ㄛ		ian	in	iang	ing
	撮口呼	ㄟ	ㄚ	ㄛ		ua	uo	uai	uei
	撮口呼	ㄟ	ㄚ	ㄛ		uan	uen	uang	ung
	撮口呼	ㄟ	ㄚ	ㄛ		iue	iu	iun	iung
	撮口呼	ㄟ	ㄚ	ㄛ					
声调	阴平声	(不加)				—			
	阳平声	/				/			
	上声	v				v			
	去声	\				\			
	轻声	.				(不加)			

参考书目

- 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商务印书馆，上海，1934。
赵元任：《最后五分钟》，中华书局，上海，1929。
倪海曙：《中国拼音文字运动史简编》，时代出版社，上海，1948。

(尹武庸)

Guoyu Tongyi Choubelhui

国语统一筹备会 (Preparatory Committee for Standardizing National Language) 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时期教育部附设的推行“国语”的机构。北洋政府时期称“国语统一筹备会”，简称“国语统一会”，成立于1919年4月21日。会长张一鵬，副会长袁希涛、吴敬恒，会员中有由教育部指派的黎锦熙、陈懋治、沈颐、李步青、陆基、朱文熊、钱稻孙等，由部辖学校推选的

钱玄同、胡适、刘复、周作人、马裕藻等，由会中陆续聘请的赵元任、汪怡、蔡元培、白镇瀛、萧家霖、曾彝进、孙世庆、方毅、沈兼士、黎锦晖、许地山、林语堂、王璞等，先后共 172 人。1928 年国民党政府成立，改名为“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聘定吴敬恒为主席，钱玄同、黎锦熙、陈懋治、汪怡、沈颐、白镇瀛、魏建功 7 人为常务委员，蔡元培、张一麋、李石曾、李书华、李步青、胡适、刘复、周作人、陆基、朱文熊、曾彝进、孙世庆、方毅、沈兼士、许地山、林语堂、任鸿隽、马体乾、钱稻孙、马裕藻、萧家霖等 31 人为委员。在北洋政府时期，“国语统一筹备会”设有“汉字省体委员会”、“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审音委员会”、“国语辞典委员会”和“国语辞典编纂处”等机构。国民党政府时期，“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的任务为：①编辑国语书刊；②撰拟和刊布国语宣传品；③征集和审查国语读物；④编制关于国语的各项统计；⑤调查国语教育状况；⑥视察学校国语教学；⑦计划各种促进国语统一的办法。

“国语统一筹备会”和“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先后做了以下的工作：①分期举办国语讲习所、国音字母讲习所和协助各地举办讲习班；②修订注音字母方案；③修改国音标准；④制订《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⑤规定注音字母单用和“词类连书”办法；⑥促请国民党政府大学院公布《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作为注音字母第二式；⑦编辑出版《国音常用字汇》，并请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公布“新国音”标准；⑧设计铸造汉字旁附注音字母的注音汉字字模；⑨成立“中国大辞典编纂处”，进行大规模的辞典编辑工作。第一部完成的辞典为《国语辞典》；⑩出版《国语月刊》、《国语周刊》、《国语旬刊》等宣传和研究国语的刊物；⑪成立“国语文献馆”，对国语史料进行调查、征集、整理、陈列、统计；⑫调查全国语言分布状况；⑬调查学校教育和民众教育的国语教学状况。

“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在抗日战争时期工作停顿。抗战胜利后，“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继续出版注音书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的机构不再存在，“中国大辞典编纂处”一部分并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一部分并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

(倪海曙)

Guoyu Yundong

国语运动 (National Language Movement)

从清末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推行的把北京话作为汉民族共同语的运动。它提出“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两大口号。“言文一致”是书面语不用古代文言，改用现代白话。“国语统一”是现代白话要以北京话为全国通用的国语。这个运动对于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建立和推行，对于文体改革和文字拼音化，都有一定的贡献。

产生的经过 由于受到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在清末的后十年，就已经提出统一国语的问题。最早提到“国语”这个名称的，是当时被委任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桐城派古文名家吴汝纶。1902 年他去日本考察学政，看到

日本推行国语(东京话)的成绩，深受感动，回国后写信给管学大臣张百熙，主张在学校教学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推行以“京话”(北京话)为标准的国语。1909 年，清政府资政院开会，议员江谦提出把“官话”正名为“国语”，设立“国语编查委员会”，负责编订研究事宜。1911 年学部召开“中央教育会议”，通过《统一国语办法案》，决议在京城成立国语调查总会，各省设分会，进行语词、语法、音韵的调查，审定“国语”标准，编辑国语课本、国语辞典和方言对照表等。1912 年民国成立后，召开“临时教育会议”，决定先从统一汉字的读音做起，召开“读音统一会”。1913 年“读音统一会”开会，议定了汉字的国定读音(即“国音”)和拼切国音的字母“注音字母”(也叫“国音字母”)。议定以后，北洋政府迟迟不予公布。于是在 1916 年，北京教育界人士组织“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简称“国语研究会”)掀起了一个催促北洋政府公布注音字母和改学校“国文”科为“国语”科的运动。研究会规定了 5 项任务：①调查各省方言；②选定标准语；③编辑标准语的语法辞典；④用标准语编辑国民学校教科书及参考书；⑤编辑国语刊物。提出学校的“国文”教科书改称“国语”教科书。运动得到各地教育界人士的响应。国语研究会的会员 4 年中增加到 12 000 多人。1918 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召开“全国高等师范校长会议”，决定在全国高等师范附设“国语讲习科”，专教注音字母及国语，并于 11 月公布了“注音字母”。同年，《新青年》等刊物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开始用白话文写作。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在这个运动的推动下，北洋政府教育部成立政府的推行机构“国语统一筹备会”，并训令全国各国民学校改“国文”科为“国语”科。与此同时，又通令修改原来的《国民学校令》，规定首先教授注音字母，改革教科书的文体和教学方法等，这样，国语运动在学校方面得到了初步的成功。

“国语”的推行 “五四”以后，国语运动进入推行期。主要工作是修订注音字母方案，制订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调整“国音”标准，扩大国语的教育和应用，以及出版、宣传等。现逐项分述如下：

① 修订注音字母。改变公布时的字母顺序(“守温字母”顺序)，改为ㄅ、ㄆ、ㄇ、ㄋ的顺序。增加ㄘ母(开始时写为ㄗ)。声调标注改“四声点法”为符号标调法(见注音字母)。

② 制订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由于注音字母不便于国际应用，黎锦熙、赵元任等人又发起国语罗马字的研究和制订。这个方案于 1926 年由国语统一筹备会发表，1928 年由大学院(教育部)作为注音字母第二式予以正式公布(见国语罗马字)。

③ 调整“国音”标准。1913 年读音统一会用投票方式议定了“国音”标准，1919 年出版《国音字典》初印本。这种标准音习惯上称之为“老国音”。各界对此议论颇多，主张改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1923 年国语统一筹备会成立“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决定采用北京语音标准，称

之为“新国音”。1932年教育部公布发行《国音常用字汇》，采用了“新国音”。

④ 推动学校的国语教育。1920年，教育部通令初小“国文”科改为“国语”科。1921年教育部发布训令：“凡师范学校及高等师范均应酌减国文钟点，加授国语。”1923年，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三次大会提案议决函请教育部规定中等以上学校实行国语教育，教育部复函表示同意。同年实行学制改革，全国教育联合会组织了“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公布《中小学各科课程纲要》，规定小学、初中、高中的语文科一律定名为“国语”科，小学课本取材以儿童文学为主。

⑤ 培训国语师资。1920~1923年间，教育部开办“国语讲习所”培训各省区选送的学员四五百人。各省区教育厅也分别举办了各种短期训练班。1921年中华书局创办“国语专科学校”，商务印书馆创办“国语讲习所”，两个单位在三四年间为南方各省以及南洋各地培训了两三千名国语教员。1928~1934年间，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直辖的“国音字母讲习所”办了8期，毕业学员170多人。此外，河南、河北、山东、陕西各省也都举办了短期讲习所，利用暑期培训国语教员。

⑥ 出版书刊。出版宣传和研究国语的刊物《国语月

刊》、《国语旬刊》、《国语周刊》等。1920~1922年间，《民国日报》、《时报》、《时事新报》、《申报》、《教育杂志》、《星期评论》、《上海青年》等报刊，不断发表宣传国语的文章。出版了《国民学校用新体国语教科书》、《新法国语教科书》（商务印书馆）、《新教育国语课本》（中华书局）等各种课本，此外国音的字汇、字典、国语辞典、语音教材、语法、会话读本、留声片等也陆续出版。编纂国音字汇、字典和国语辞典成为国语运动后期的重点工作，专门成立了编纂机构“中国大辞典编纂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语的推行陷于停顿。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改为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现代典范的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普通话的标准与国语略有不同，但是运动的性质仍旧一样，是国语运动的继续。另外在光复后的台湾省，国语运动的推行获得了很大的成绩，只花了大约10年时间，就在台湾同胞中普及了国语。

参考书目

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商务印书馆，上海，1934。

周有光：《文字改革概论》，文字改革出版社，北京，1961。

倪海曙：《推广普通话的历史发展》，载《语文现代化》（丛刊），1980，第1、2辑。

（颜逸明）

H

Halisi

哈里斯, Z. S. (Zellig Sabbettal Harris 1909~) 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1909年10月23日生于乌克兰南部巴尔塔城,4岁时移居美国。1930年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1932年得硕士学位,1934年得博士学位。以后一直在该校教语言学。

哈里斯的名著是《结构语言学的方法》(1951)。据 D. 海姆斯说,这本用抽象的数理方法研究语言的书出版之后,在美国语言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许多赞赏者同时又是批评者。一些布龙菲尔德派学者赞成以严格的数学方法为基础,但是觉得只凭语言项目的分布情况来分析语言而不讲意义,未免片面。哈里斯对语言学的看法与 G. L. 特拉格、H. L. 史密斯等不同。他们认为语言学是经验科学,对于一定的语言材料,只有一种分析法是对的;哈里斯则认为语言学是数理科学,对于一定的语言材料,可以有几种能互相转化的分析方法。

哈里斯在 20 世纪 50 年代首先讲转换语法,他的观点是结构主义的,只涉及表层结构间的转换。N. 乔姆斯基受到他的启发,但采用唯理主义观点,发展为生成语法。他的转换是指深层结构到表层结构的转换。哈里斯于 1968 年出版《语言的数理结构》,1982 年又出版《按数理原则的英语语法》,但乔姆斯基派 F. 亨尼认为他还停留在 60 年代,没有新发展。

(赵世开)

Haniwen

哈尼文 (Hani writing) 见哈尼语。

Haniyu

哈尼语 (Hani language) 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中国境内分布在云南省的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以及墨江、江城、普洱、镇沅、景东、澜沧、新平等县。使用人口约 100 万(1982)。分哈雅、碧卡、豪白 3 个方言。哈雅方言又分哈尼和雅尼(傣尼)两个次方言。在缅甸、老挝、泰国境内称阿卡语,和西双版纳一带的雅尼次方言大体一致。越南境内的哈尼语和金平县哈尼次方言基本相同。各方言都只有单辅音声母。部分地区有腭化唇音,如 pj、bj、phj、mj 等。哈雅方言有浊塞音和塞擦音,如 b、bj、d、g、dz、dz 等。各地擦音都分清浊两套,如 s 和 z,ɸ 和 j, x 和 ɣ 等。有的地区有清边音 l 或 lh。韵母以单元音为主,常见的有 i、e、ɛ、a、ɔ、o、u、v、w、ə、ɪ 等。大部分地区元音分松紧,如 i 和 i̯, e 和 e̯ 等。复元音大都出现在借词上。有的地区有鼻韵尾 -ŋ (或读作鼻化音),有的地区还有 -m。多数地区带鼻音成分的韵母限于借词读音。没有塞音韵尾。声调都较少,

固有词一般分 55、33、31 三个调。语序和虚词是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形态变化较少。人称代词有形态变化,但一般限于单数第一、二人称。名词和形容词有前加或后加成分,前加成分一般是词类标志,形容词的后加成分表示不同的色彩。有表示时态、语气和各种结构的助词。形容词修饰名词时一般在名词后,但带助词时可以在名词前。句子成分的次序是主语—宾语—谓语。1957 年,以绿春县大寨话为标准音,设计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文字方案,共 26 个字母。

(李永遂)

Hasakewen

哈萨克文 (Kazak writing) 哈萨克族使用的拼音文字。主要有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和以斯拉夫字母为基础的两种。13 世纪伊斯兰教传入哈萨克地区,哈萨克族开始采用阿拉伯字母拼写自己的语言。由于阿拉伯字母不能充分表达哈萨克语的语音系统,在正音和正字上存在过混乱状况。苏联哈萨克族于 1917 年和 1924 年前后两次对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哈萨克文进行了改革,去掉了一些不必要的字母并增加了软音符号。于是,用 3 个阿拉伯字母拼写哈萨克语 9 个元音的混乱现象才得到克服。中国哈萨克族在上述两次改革的基础上,于 1954 年修订了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哈萨克文字母表(表 1)。现行的哈萨克文字母共有 33 个,其中有 9 个

表 1 中国哈萨克文字母表

次序	词首	词中	词末	字母	读音	次序	词首	词中	词末	字母	读音
1	А	а	а	А	a	18	У	у	у	У	o
2	Б	б	б	Б	æ	19	Ф	ф	ф	Ф	φ
3	В	в	в	В	b	20	Х	х	х	Х	p
4	Г	г	г	Г	v	21	С	с	с	С	r
5	Д	д	д	Д	g	22	Ш	ш	ш	Ш	s
6	Е	е	е	Е	h	23	Т	т	т	Т	t
7	Ж	ж	ж	Ж	d	24	У	у	у	У	w
8	З	з	з	З	ε	25	У	у	у	У	u
9	И	и	и	И	dy	26	У	у	у	У	y
10	Й	й	й	Й	z	27	Ф	ф	ф	Ф	f
11	К	к	к	К	j	28	Х	х	х	Х	x
12	Л	л	л	Л	k	29	А	а	а	А	h
13	М	м	м	М	q	30	Б	б	б	Б	ts
14	Н	н	н	Н	l	31	Ш	ш	ш	Ш	ʃ
15	О	о	о	О	m	32	У	у	у	У	ɸ
16	П	п	п	П	n	33	У	у	у	У	i
17	С	с	с	С	ŋ						

元音字母, 24 个辅音字母。每一个字母视其在词里的位置不同, 写法略有变化, 有词首、词中、词末 3 种变体。拼写时以词为单位从右往左连写。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哈萨克文, 在哈萨克族人民的文化发展史上起过重要的作用, 通过它保存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用哈萨克文出版了大量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方面的图书, 其中包括本民族的创作和中外名著

表2 中国哈萨克文新文字

印刷体	书写体	印刷体	书写体
A a	A a	R r	R r
B b	B b	S s	S s
C c	C c	T t	T t
D d	D d	U u	U u
E e	E e	V v	V v
F f	F f	W w	W w
G g	G g	X x	X x
H h	H h	Y y	Y y
I i	I i	Z z	Z z
J j	J j	Ol ol	Ol ol
K k	K k	H h	H h
L l	L l	K k	K k
M m	M m	Ə ə	Ə ə
N n	N n	Ө ө	Ө ө
O o	O o	Ü ü	Ü ü
P p	P p	Ê ê	Ê ê
Q q	Q q		

表3 苏联哈萨克文字母表

印刷体	书写体	印刷体	书写体
А а	А а	Р р	Р р
Б б	Б б	С с	С с
В в	В в	Т т	Т т
Г г	Г г	У у	У у
Д д	Д д	Ф ф	Ф ф
Е е	Е е	Х х	Х х
Ё ё	Ё ё	Ц ц	Ц ц
Ж ж	Ж ж	Ч ч	Ч ч
З з	З з	Ш ш	Ш ш
И и	И и	Щ щ	Щ щ
Й й	Й й	Ъ ъ	ъ
К к	К к	Ы ы	ы
Л л	Л л	Ь ь	ь
М м	М м	Э э	Э э
Н н	Н н	Ю ю	Ю ю
О о	О о	Я я	Я я
П п	П п		

的译本,并出版了多种刊物。1959年中国哈萨克族设计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新文字方案(表2),1965年开始推行。实践证明,全面使用新文字的条件尚不成熟,而同时使用新、老两种文字又对发展民族文化、教育事业不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于1982年9月13日决定全面恢复使用老文字,将新文字作为拼音符号加以保留。

在苏联,哈萨克族于1940年全面使用以斯拉夫字母为基础的文字(表3)。这种文字共有42个字母。除原有的斯拉夫字母外,增加了9个字母。42个字母中有7个字母主要用来拼写俄语借词。蒙古人民共和国西部地区约有13万哈萨克人也使用这种文字。

(努尔别克)

Hasakeyu

哈萨克语 (Kazak language) 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西匈语支。主要分布于苏联哈萨克、中国新疆和蒙古人民共和国部分地区。使用人口共约740万,在中国约90万(1982)。一般认为哈萨克族及其语言形成于15世纪前后,哈萨克族标准语言形成于19世纪下半叶。哈萨克语有9个元音和24个辅音。有元音和谐和辅音同化现象。元音o、ө、e在词首出现时读成复合元音,分别在前边带u、ü、i。哈萨克语词首的q相当于其他突厥语词首的j。名词、代词和数词有7个格,比同语族的许多语言多一个造格。词的结构和同族诸语言基本相同,构词和构形附加成分均在词根之后,也有个别来自波斯语的前加成分。哈萨克语从阿拉伯、波斯、蒙古、俄、汉等语言中吸收了借词。方言内部差别不大。苏联、中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哈萨克族语言可以互通。中国哈萨克语大体上可以分为西南和东北两种方言。阿勒班、苏万部落操西南方言;克列依、乃蛮和克宰部落操东北方言。中国的哈萨克族使用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苏联的哈萨克族从1940年起使用以斯拉夫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

(努尔别克)

Halile

海利勒, 'A. (al-Khalil 'lbn 'Aḥmad 718?~791) 阿拉伯伍麦叶朝和阿拔斯朝语言学家,生于阿曼,成长于伊拉克巴士拉城,早年常出入圣训学、教义学和语言学等学术讲坛;对数学有相当研究;和当时的大翻译家伊本·麦加发交往密切,读过他的各种译著,其中包括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和古希腊乐理学等;对梵文的研究方法也有所了解。他编写的《艾因书》是阿拉伯历史上的第1部词书。他所论述的阿拉伯诗歌韵律,系统全面,不仅一直为阿拉伯诗人所沿用,而且还对西亚许多民族的诗歌产生深远的影响。他所改进的杜埃利阿拉伯文字标音符号一直沿用至今。海利勒对阿拉伯语法学的重要贡献,是在早期研究者成绩的基础上,首先讲授了一套比较完整的阿拉伯语法大纲,他虽未将此大纲写成定稿,但是他的讲演为他的学生西伯维的语法名著《书》奠定了基础。

海利勒的主要著作除《艾因书》以外,还有《施事论》、《虚词含义》、《阿拉伯工具词一览》、《韵律学》、《字母点标与格位标示》等。

见巴士拉学派。

(张甲民)

Han Daozhao

韩道昭 见韵书。

Hanlida

韩礼德 (Michael Alexander Kirkwood Halliday 1925~) 英国语言学家。1925年4月13日生于利兹。曾在伦敦大学学习中国语言文学,获学士学位;后到北京大学和剑桥大学进修,获博士学位。1944年后,曾在英国剑桥、爱丁堡、伦敦,美国印第安纳、耶鲁、布朗,肯尼亚内罗毕等大学任教。1963年任伦敦大学语言学教授,主持过多项英语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1973~1974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当研究员。1974~1975年任英国埃克塞斯大学教授。自1976年起任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授。

韩礼德是J. R. 弗斯的学生。人们认为他是伦敦学派的主要成员,又是“新弗斯派”的领袖。M. 格雷戈里说,在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韩礼德受弗斯和B. 马林诺夫斯基的影响最深。60年代后期,他接受了布拉格学派的“功能句子观”和美国S. 拉姆的“语言层次和体现”的理论,后来又从英国B. 伯恩斯坦的社会学理论得到启发,他的学说就进一步发展了。在《作为社会符号的语言》(1978)的引论里,韩礼德自己承认,他有许多思想来自瑞士的F. 索绪尔,丹麦的L. 叶尔姆斯列夫,捷克的V. 马泰休斯,波兰的B. 马林诺夫斯基,英国的弗斯,美国的F. 博厄斯、E. 萨丕尔和B. L. 沃尔夫。他赞赏美国的W. 拉博夫(1927~),而批评N. 乔姆斯基的理论与人们实际写出的文章和说出的话彼此脱节。他坚持,讲语言体系不能不讲语言实践,讲语言表现不能不讲语言能力。

在论文《语言理论的范畴》(1961)和专著《语言科学和语言教学》(1964)中,韩礼德提出了他的早期理论,名为“阶和范畴的语法”。这时他对语言的看法,可以列表如下:

实 质	←→ 形 式 ←→	情 境
声音实质	音系学	{语法} {词汇} 衬托
文字实质	正字法	

他所谓“实质”,指具体的语音和文字,所谓“形式”,其中心是语法和词汇。他把词汇归入语法,称为“词汇语法”。语法和词汇一方面靠音系学与声音联系,靠正字法与文字联系;一方面又通过语义与客观世界的情况联系,这种联系他叫做“衬托”。

在“阶和范畴的语法”中,韩礼德认为语言组织有3个“阶”,4个“范畴”。3个“阶”:一是“级别”,如句子高

于分句,分句高于词组;二是“精度”,如“新书”比“书”意义限制较严,因此它的精度比“书”高;三是“标示”,即作为具体例证,如“书”可以标示名词,“新书”可以标示名词词组。4个范畴:一是“单位”,如词素、词、词组,分句是由小到大的单位;二是“类别”,如名词、动词、名词词组,各是一个类别;三是“结构”,如“新”加上“书”是两个单位合为一个结构,这里有组合关系;四是“系统”,如在“新书、旧书、奇书”这3个结构中,“新、旧、奇”都可以放在“书”前,3个形容词成为一个“系统”,这里有聚合关系。

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阶和范畴的语法”中,“系统”只是范畴之一,地位并不特别重要。到了70年代,“系统”便提到中心地位,整个语法改称为“系统语法”。“系统”并不是一般人所谓有条理、有组织的意思,而另有其特殊涵义。韩礼德认为,整个语言体系是由许多“小系统”组成的“大系统”,其基本特点是选择。一个“系统”有许多可供选择的项目,由于作出了选择,人们才能说出话来。例如谈到某个人时,在词汇方面有选择。可以在“人”前放“青年、老年、本地、外来”等等形容词,选择哪一个,要看这人的性质而定。谈到某件事时,在语法方面也有选择。可以用英语陈述式、命令式或疑问式来讲这件事,选择哪一个,要看说话人的态度而定。就英语说,在一般情况下你要发出命令,就得用命令式:Open the door(开门),不能用陈述式:You open the door(你开门),否则便与叙述事实的口气难以区别了。

70年代韩礼德出版了5本书:《语言功能探索》(1973)、《学习做到有所指》(1975)、《语言的系统与功能》(1976)、《英语的连贯问题》(1976)、《作为社会符号的语言》(1978)。在这些书中,他指出语言有3种功能,各有其相应的结构来作为表现方法。

第1种功能是通过语言来理解说话人所处的环境,这叫做“观念功能”;第2种是通过语言对别人施加影响,这叫做“人际功能”;第3种是说出既有内容又有效力的话,这叫做“篇章功能”。例如Balbus built a wall(巴尔布斯砌一道墙),这句话就同时包括3种结构,3种功能。首先,它说出有个什么人作了什么事,这是“观念功能”,由“及物结构”(行为者+过程+结果)来表示。其次,它让听话人知道,所说的是事实,这是“人际功能”,由英语陈述式来表示。又其次,这句话里有两个成分,一是已知的“巴尔布斯”,一是未知的“砌一道墙”,要由位次表示,这是“篇章功能”,所以我们将Balbus放在前头,作为主位,把built a wall放在后头,作为述位。由于韩礼德既讲系统又讲功能,他的语法也叫“系统功能语法”。韩礼德一向致力于英语中各种变体和文章风格的研究。1985年,他写了《功能语法引论》。这是以“系统语法”为框架来讲语言功能的,重点在讲结构,其主旨是进行篇章分析,以便帮助人们了解:①某一篇章有什么意义,为什么要那样表达意义;②这个表达法是否有效,是否达到了原定目标。

韩礼德的学说包罗宏富,体系严密,远远超过了他的老师弗斯。但是英国有些学者如 R. H. 罗宾斯和 T. F. 米切尔对这种学说仍不免怀疑。在 1985 年出版的《功能语法引论》里,韩礼德自己也承认“英语语法中有许多范畴我还不懂得它的意义”,而且认为“语义与语法没有什么明显的界线”。

见伦敦学派、弗斯。(王宗炎 胡壮麟)

Hanwen

汉文 (Chinese characters) 见汉字。

Hanyu

汉语 (Chinese language) 世界主要语言之一。属汉藏语系,是这个语系里最主要的语言。除了中国大陆和台湾省以外,汉语还分布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大约有 9.4 亿。汉语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之一。

汉语的标准语是近几百年来以北方官话为基础逐渐形成的。它的标准音是北京音。汉语的标准语在中国大陆称为普通话,在台湾称为国语,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称为华语。

语音 汉语的音节可以分析成声母、韵母、声调 3 部分。打头的音是声母,其余的部分是韵母,声调是整个音节的音高。把声调也看成音节的组成部分,是因为汉语的声调是辨义的。例如“汤、糖、躺、烫”4 个字的声母都是[tʰ],韵母都是[aŋ](方括弧里是国际音标,表格里的国际音标省去括弧),只是因为声调不同,意义就不一样,在语言里分别代表 4 个不同的语素(最小的有意义的语言单位),在书面上写成 4 个不同的字。

声母都是辅音。最复杂的韵母由介音、主要元音和韵尾 3 部分组成。韵尾有的是辅音,有的是元音。北京音的辅音声母有 22 个。介音有[i]、[u]、[y] 3 个。辅音韵尾有[n]和[ŋ],元音韵尾有[i]和[u]。在组成音节的声母、介音、主要元音和韵尾 4 部分里,只有主要元音不能没有,其余 3 部分都不是必须出现的。这种情形可以从表 1 举的例字里看出来。北京话的声母见表 2,北京话的韵母见表 3。

以上说的是每个字单说时的声调。连读的时候,某些声调会发生变化。例如两个上声字相连,前一个会从原来的 214 调变成 35 调,变得跟阳平调一样。此外,有些字连读时读得很短,并且失去了原来的声调。这种字调叫轻声,例如“石头”的“头”,“我们”的“们”。

传统的注音方法是反切。反切用两个字来注一个字的音。前一个字(反切上字)定被反切字的声母,后一个字(反切下字)定被反切字的韵母和声调。例如:“耐,奴代切”,“奴”跟“耐”的声母相同,“代”跟“耐”的韵母和声调相同,所以就用这两个字来注“耐”字的音。由于语音的演变,古代字书上的反切跟今音有的相合,例如上边举的“耐,奴代切”([n(ú+t)ài=nài])。有的不合。例如,

表 1 音节的成分

例字	声母	韵母			
		介音	主要元音	韵尾	字调
雨			y		上声
牙		i	a		阳平
远		y	a	n	上声
音			i	n	阴平
瓜	k	u	a		阴平
摩	m		o		阳平
僧	s		ə	ŋ	阴平
条	tʰ	i	a	u	阳平
类	l		e	i	去声

表 2 北京话声母

国际音标	拼音方案	注音字母	例字
p	b	ㄅ	布
pʰ	p	ㄆ	铺
m	m	ㄇ	木
f	f	ㄈ	富
t	d	ㄊ	德
tʰ	t	ㄊʰ	特
n	n	ㄋ	纳
l	l	ㄌ	勒
k	g	ㄍ	格
kʰ	k	ㄎ	客
x	h	ㄏ	黑
ɕ	j	ㄐ	基
ɕʰ	q	ㄑ	欺
ʃ	x	ㄒ	希
ʃʰ	zh	ㄓ	知
ʃ	ch	ㄔ	痴
ʃ	sh	ㄕ	师
ʒ	r	ㄖ	日
ʒ	z	ㄗ	资
ʒʰ	c	ㄘ	雌
s	s	ㄙ	思

“东,德红切”,“东”与反切下字“红”的声调不同。“蓬,薄红切”,“蓬”与反切上字“薄”的声母不同,与反切下字“红”的韵母也不同。

1918 年由当时的教育部颁布的国语注音字母是利用汉字字形制定的一套拼音字母。这套字母把主要元音与韵尾合在一起用一个符号表示(例如:ㄠ=[au],ㄢ=[an],ㄣ=[aŋ]),体现了传统的声母韵母两分的精神。注音字母广泛流传,影响很大。台湾省一直沿用至今。

声调是一个音节发音时音高的高低升降的型式。北京话的声调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 4 种型式。如果把音高分成五度,北京的阴平是从五度到五度的平调,阳平是从三度到五度的升调,上声是从二度下降到一度再升到四度的曲折调,去声是从五度到一度的降调。关于北

表3 北京话韵母

国际音标	拼音方案	注音字母	例字
ī	i	丕	诗
i	i	丨	基
u	u	ㄨ	孤
y	ü*	ㄩ	居
a	a	ㄚ	八
ia	ia	丨ㄚ	加
ua	ua	ㄨㄚ	瓜
o	o	ㄛ	波
uo	uo	ㄨㄛ	锅
ɤ	e	ㄜ	哥
ie	ie	丨ㄜ	街
ye	ue	ㄩㄜ	厥
ai	ai	ㄞ	该
uai	uai	ㄨㄞ	乖
ei	ei	ㄟ	杯
uei	uei**	ㄨㄟ	归
au	ao	ㄠ	高
iau	iao	丨ㄠ	交
ou	ou	ㄡ	沟
iou	iou**	丨ㄡ	鸠
an	an	ㄢ	干
ian	ian	丨ㄢ	肩
uan	uan	ㄨㄢ	官
yan	üan	ㄩㄢ	卷
ən	en	ㄣ	根
in	in	丨ㄣ	今
uən	uen**	ㄨㄣ	滚
yn	ün	ㄩㄣ	君
aŋ	ang	ㄤ	冈
iaŋ	iang	丨ㄤ	姜
uaŋ	uang	ㄨㄤ	光
əŋ	eng	ㄥ	庚
iŋ	ing	丨ㄥ	经
uəŋ	weng	ㄨㄥ	翁
uŋ	ong	ㄨㄥ	公
yuŋ	iong	ㄩㄥ	用
er	er	儿	二

* ü 在 l 和 n 以外的声母之后都写成 u。

** uei, iou, uen 前边加声母时, 分别写成 ui, iu, un。

京话的声调见表4。

1958年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表2、3)。自1978年开始, 中国人名地名一律改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写, 取代了威妥玛式等各种旧拼法。

表4 北京话声调

调类	起讫点	调号	例字
阴平	55	1	汤
阳平	35	1	糖
上声	214	4	躺
去声	51	4	烫

语法 汉语的语素绝大部分是单音节的(手|洗|民|失)。语素和语素可以组合成词(马+路→马路|开+关→开关)。有的语素本身就是词(手、洗), 有的语素本身不是词, 只能跟别的语素一起组成复合词(民→人民|失→丧失)。现代汉语里双音节词占的比重最大。大部分双音词都是按照上面提到的复合方式造成的。

把汉语跟印欧语系的语言相比较, 可以看出汉语语法上的一些重要的特点。汉语和印欧语的一个明显的区别是没有形态变化。这主要指以下两种情形。第一, 印欧语的动词和形容词后头可以加上一些只改变词根的语法性质(转化成名词)而不改变其词汇意义的后缀, 例如英语的-ness、-ation、-ment之类。汉语没有此类后缀。第二, 印欧语的动词有限定式和非限定式(不定式, 分词, 动名词)的区别。汉语没有这种分别。这种差异使得汉语语法在以下两个重要方面跟印欧语语法大异其趣。

首先, 在印欧语里, 词类的功能比较单纯。例如名词只能充任主语和宾语, 形容词只能充任定语和表语, 定式动词只能充任谓语里的主要动词。在汉语里, 由于动词和形容词不变形, 无论在什么句法位置上出现, 形式都一样。这就造成了词类多功能的现象。例如形容词既可以充任谓语(这儿干净)、定语(干净衣服)和补语(洗干净), 又可以充任主语(干净最要紧)和宾语(他爱不干净)。

词类多功能的必然的结果是相同的词类序列有时代表不同的句法结构。例如“出租汽车”可以理解为一个名词性词组(=出租的汽车), 也可以理解为“动词+宾语”的结构。由于这种现象的存在, 汉语语法著作比起印欧语语法著作来, 更着重句法结构关系的分析。

由于汉语词类多功能, 划分词类时, 手续要复杂一些。过去有人认为汉语没有词类。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其次, 印欧语的句子和分句里必须有定式动词, 而词组(短语)里要是没有动词的话, 只能是非限定形式, 不能是限定形式。因此, 句子和分句是一套构造原则, 词组是另一套构造原则。汉语的动词没有限定式和非限定式的对立, 动词不管用在哪里, 形式都一样, 因此句子的构造原则跟词组的构造原则是一致的; 句子不过是独立的词组而已。正是因为这一点, 有的汉语语法著作采用一种以词组为基点的语法体系, 即在词组的基础上描写句法, 而不是象印欧语法那样以句子为描写的基点。

汉语句法结构的特点还表现在主谓结构和动补结构(或称述补结构)上。汉语的主谓结构跟印欧语的句子或分句不同, 构造比较松散。这表现在主语后头可以有停顿(因此书面上往往用逗号点断), 或者加上语气词(这

个人呐,很会说话)。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口语里常常没有主语。

主谓结构的另一个特点是可以充当谓语。例如:
中国地方真大。

这个人我从前见过他。

这两句的谓语“地方真大”和“我从前见过他”本身都是主谓结构。这种句式不但现代汉语里有,古汉语里也有,《孟子·离娄下》:“匡章通国皆称不孝焉”;《史记·蒙恬列传》:“蒙恬者其先齐人也”,应该看成是汉语的基本句式的一种。

动补结构是现代汉语里非常重要的一种句法构造。印欧语里没有跟它相对应的格式。简单的动补结构是由两个动词或者一个动词一个形容词组成的(听懂|切碎|染红|洗干净)。这种结构后头可以带动词后缀“了”和“过”,语法功能相当于一个动词。值得注意的是动词和补语的组合极其自由。例如“洗干净”是常说的,因为“洗”能导致的最自然的结果是“干净”。可是除了“洗干净”之外,也能说“洗脏了|洗破了|洗丢了”,甚至还可以说“把我洗胡涂了|把他洗哭了”。

从词序方面看,汉语一个重要的特点是所有的修饰语都必须放在被修饰成分的前边,所以修饰语不宜太长、太复杂。把外文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原文后置的修饰语都得提到前边去。如果修饰成分比较多,句子就不太容易组织。这种时候,往往得把原来的长句拆成几个短句,使修饰语适当分散或者转成谓语。

文字 从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最早的成批的文字资料——商代甲骨文字算起,汉字已有3000年的历史。由于甲骨文字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文字体系,我们可以推断汉字的发生一定远在3000年以前。汉字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两个大阶段。从甲骨文字到小篆是一个阶段,从秦汉时代的隶书以下是另一个阶段。前者属于古文字的范畴,后者属于近代文字的范畴。大体说来,从隶书到今天使用的现代汉字形体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从汉字跟汉语的关系看,汉字是一种语素文字。从汉字本身的构造看,汉字是由表意、表音的偏旁(形旁、声旁)和既不表意也不表音的记号组成的文字体系。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就汉字跟它所记录的对象汉语之间的关系来看,汉字代表的是汉语里的语素。例如[tàn kǎu]的[kǎu]、[kǎu iào]的[kǎu]和[t'iào kǎu]的[kǎu]读音相同,意思不一样,是3个不同的语素,分别由3个不同的汉字“糕、膏、高”(蛋糕、膏药、跳高)来表示。从这个角度看,汉字可以说是一种语素文字。

汉字起源于图画。在汉字产生的早期阶段,象形字的字形跟它所代表的语素的意义直接发生联系。虽然每个字也都有自己固定的读音,但是字形本身不是表音的符号,跟拼音文字的字母的性质不同。象形字的读音是它所代表的语素转嫁给它的。随着字形的演变,象形字变得越来越不象形。结果是字形跟它所代表的语素在意义上也失去了原有的联系。这个时候,字形本身既不表音,也

不表义,变成了抽象的记号。如果汉语里所有的语素都是由这种既不表音也不表义的记号代表的,那么汉字可以说是一种纯记号文字。不过事实并非如此。汉字有独体字与合体字的区别。只有独体字才是纯粹的记号文字。合体字是由独体字组合造成的。从构造上说,合体字比独体字高一个层次。因为组成合体字的独体字本身虽然也是记号,可是当它作为合体字的组成成分时,它是以有音有义的“字”的身份参加的。合体字可以分成以下3类:

① 形声字。形声字由表示意义的形旁和表示读音的声旁两部分组成。拿构造最简单的形声字来说,形旁和声旁都是由独体字充当的。作为形声字的组成部分,这些独体字都是有音有义的字。不过形旁只取其义,不取其音,例如“鸠”字的偏旁“鸟”,声旁则只取其音,不取其义,例如“鸠”字的偏旁“九”。

由于字义和字音的演变,有些形声字的形旁或声旁现在已失去了表意或表音的功能。例如“球”本来是一种玉的名称,所以以“玉”为形旁。现在“球”字不再指玉,这个形旁就没有作用了。再如“海”字本来以“每”为声旁。由于字音的变化,现在“海”和“每”的读音相去甚远,声旁“每”也就不起作用了。有的时候,形旁和声旁都丧失了原来的功能,例如“给、等、短”。这一类字已经不能再作为形声字看待了。

形声字和非形声字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造字之初,形声字和它的声旁的读音本来就不一定密合。发展到现代汉字,出入就更大了。有人拿7500多个现代合体汉字进行统计。就普通话读音来说,合体字跟声旁完全同音(声母、韵母、声调全同)的不到5%。声母、韵母相同而声调不同的约占10%。只有韵母一项相同的约占20%。如果我们只把前两类看作形声字,那么形声字大概只占通行汉字的15%。如果把以上三类全看作形声字,形声字大概会占通行汉字35%的样子。要是把标准再放宽或者完全根据来历确定形声字,那么通行汉字中形声字的百分比还要高得多。

② 合体会意字。古人说“止戈为武”,“人言为信”。对于“武”、“信”两个字来说,这种解释是错误的。不过汉字体系里确实有按照这种方式造成的字,例如“不正为歪”,“不好为尪”。这一类字的特点是合偏旁(或字)的字义来表现整个合体字的意义。这种字为数很少,只有个别的例子。

以上两类合体字里的偏旁有的有表意作用,有的有表音作用。下边一类的情形不同。

③ 合体记号字。这一类合体字的偏旁既不表意,也不表音。这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由于字音和字义的变化,原来的声旁和形旁已经不再表音、表意了。例如上文举过的“给、等、短”一类字。另一种情形可以举“章”字为例。按照汉代许慎《说文解字》的分析,“章”字从“音”从“十”。可是现在一般人说“立早章”(以区别于“弓长张”)的时候,是把它分析成“立”和“早”两部分。其实从古文看,“章”本来是一个独体象形字,跟“音、十、立、早”都没有关系。

汉字用来记录汉语已经有3 000年以上的历史,一直沿用到今天,没有中断过。在如此长的历史时期里,汉字不仅为人们的现实生活服务,而且记录下极其丰富的文化资料,甚至跨越国界,被日本、朝鲜、越南等邻国借去记录非汉语语言。

另一方面,长期以来也不断有人批评汉字的缺点,主要是说汉字难认、难写、难于机械化(印刷排版、打字等)。因此在扫盲、儿童识字教育、文化传播等方面,都不如拼音文字效率高。

跟拼音文字比较起来,汉字有它的短处,但是也有它的长处。汉字最大的长处就是能够超越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古今汉语字音的差别很大。但由于2 000年来字形相当稳定,没有太大变化,字义的变化比较小,所以先秦两汉的古书今天一般人还能部分看懂。如果古书是用拼音文字写的,现代人就根本无法理解了。有些方言语音差别也很大,彼此不能交谈,可是写成汉字,就能互相了解,道理也是一样的。

近年来,有的心理学家通过实验,指出儿童学习汉字似乎比学习拼音文字还容易些,至少不比学拼音文字难。这方面的研究刚刚开始,目前还难以得出明确的结论。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讨论这个问题,必须把认汉字、写汉字和用汉字三者区别开,不能混为一谈。三者之中,认最容易,写就比较难。例如繁体字“龜”和“龍”特点鲜明,很容易认识,要记住怎么写就难多了。用汉字比起认和写都要难得多。所谓会用,就是要学会区别同音字,知道哪种场合下用哪个。例如“唯、惟、维”3个字同音。“维持”“维护”只能写“维”,不能写“惟”,而“思维”也可以写成“思惟”。“惟独”、“惟恐”可以写“惟”,也可以写“唯”,可是“唯心论”、“唯物论”又只能写“唯”,不能写“惟”。

50年代开始进行简化汉字的工作。1986年重新公布的《简化字总表》规定了2 200多个简化汉字(包括用简化偏旁类推的字)。这项工作目前已告一段落,今后在一个时期内将保持稳定,不继续简化。因为不断简化会破坏文字的稳定性,而且简化一批字以后,原来的繁体字并不能废除。结果是汉字的总数有增无减,反而加重了学习和使用的人的负担。

关于文字拼音化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有争论。从理论上说,任何自然语言都可以用拼音文字记录。但是由于汉语方言分歧,在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没有取得广泛、切实的成效以前,改用拼音文字会给方言区的人带来很大的困难。此外,由于汉字历史悠久,大量的文献都是用汉字记录的。一旦改弦易辙,势必在文献的广泛利用上造成一定困难,在社会心理和民族感情上也可能引起波动。

方言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方言情况复杂。下边把汉语方言粗分为官话和非官话两大类来说明。官话分布在长江以北地区和长江南岸九江与镇江之间沿江地带以及湖北、四川、云南、贵州4省,包括北方官话、江淮官话、西南官话几个方言区。官话区域的面积占全国3/4,人口占全国2/3。官话方言内部的一致程度比较高。从哈

尔滨到昆明,相距3 000公里,两地的人通话没有多大困难。非官话方言主要分布在中国东南部,包括吴方言(江苏南部,浙江大部)、赣方言(江西大部)、湘方言(湖南大部,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粤方言(广东大部,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南部)、闽方言(福建,台湾,广东的潮州、汕头、海南地区)、客家方言(广东省东部和北部,福建西部,江西南部,台湾)。非官话区域比官话区域面积小,可是方言差别大,彼此一般不能通话,甚至在同一个方言区内部(例如浙南吴方言与苏南吴方言之间、福州话和厦门话之间),交谈都有困难。

汉语方言之间语音上的差别最大,词汇次之,语法方面的差别最小。语音的差别在声母的繁简、辅音韵尾的多寡以及调类的区分上表现得特别明显。例如吴方言塞音声母有浊塞音[b、d、g]、不送气清塞音[p、t、k]和送气清塞音[pʰ、tʰ、kʰ]3套,官话方言只有后2套。广州话辅音韵尾有[m、n、ŋ、p、t、k]6个,苏州话只有[n、ŋ、ʔ]3个,北京话只有[n、ŋ]2个。广州话有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上阴入、中阴入、阳入9个调类。北京话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4个调类。烟台话平声不分阴阳,所以只有平声、上声、去声3个调类,是声调系统最简单的方言之一。

由于现代方言的调类与古调类之间有相当整齐的对立关系,所以通常就用平、上、去、入等古调类的名称来标记现代方言调类。要注意的是方言的调类名称相同,并不表示调值相同。例如北京话的阳平是升调(35),天津话的阳平是高平调(55),而汉口话的阳平则是曲折调(214)。

上文说汉语方言语音的差别大,词汇和语法的差别小。这是从大体上说的。从细处看,词汇和语法上相异之处也并不少。拿词汇来说,政治、文化、科学方面的词是全国性的,可是日常生活里用的词有许多是地方性的,因方言而异。拿语法来说,方言之间在词法方面的差异比较明显。例如人称代词和指示代词的形式、形容词的后缀、动词和形容词的重叠式、象声词的构造以及名词后缀“子”和“儿”的表示方式(例如“儿”杭州话用成音节的语素表示,而广州话和温岭话用变调表示)等等在不同方言里有时有相当大的差别。

方言之间句法上的差别可以举“把”字句和反复问句为例。“把”字句是官话区方言里十分重要的一种句式,可是粤方言和吴方言都没有这种句式。例如北京话用“把”字的句子(把衣服洗干净),广州话往往要用“动词+宾语”的说法(洗干净件衫)。在大部分官话方言里,反复问句的形式是“V不V”(V代表动词,例如:去不去|认得不认得)。可是在某些江淮官话和西南官话(例如昆明话)以及一部分吴方言(例如苏州话)里,反复问句的形式是“可V”(可去|可认得)。

历史 方言反映历史。汉语方言之间语音的差别大,语法和词汇的差别相对来说比较小。同样,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之间也是语音的差别大,语法和词汇的差别小。从总体上看,从上古音(先秦时代)到中古音(隋唐时代)再

演变到现代北京音,经历了逐渐趋向简化的过程。在先秦时代,塞音声母和塞擦音声母都有浊音、不送气清音和送气清音三套。鼻音声母也分清浊两套。很可能还有[kl-,pl-,gl-,bl-,sn-,st-,sk-]等形式的复辅音。所有的音节都以辅音收尾,没有开音节。辅音韵尾除了见于现代方言(例如广州话)的[m、n、ŋ、p、t、k]之外,还有[b、d、g]。到了隋唐时代,复辅音声母和清鼻音声母早已消失,辅音韵尾也只剩下了[m、n、ŋ、p、t、k]。只是塞擦音和擦音却按发音部位的不同分化为舌头、舌面和卷舌三套。在现代北京音里浊塞音和浊塞擦音都清化了,辅音韵尾只有[n]和[ŋ]两个。

声调的演变是另一种情形。隋唐时期只有平、上、去、入4个调类。在现代方言里,同一个古调类有时以声母的清浊为条件分化成阴阳两类。因此有些方言调类的数目比隋唐时期多,许多非官话区的方言就是如此。

隋唐以来,在调类的分合上发生过两件事。一是在许多方言里,古全浊声母上声字跟古去声字合为一类。二是官话方言的入声韵尾消失以后,入声字分别归入平、上、去三声。北京话就是如此。

分析谐声字和经典的注音,可以发现上古汉语有过以变调和/或变化声母的清浊作为转变词性(包括分别自动词和使动词)的手段的痕迹。在句法方面,先秦汉语的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否定句和疑问句里的代词宾语要提到动词的前边去(吾谁欺|不我欺)。

宋元时期汉语语法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例如动词词尾“了”和“着”的产生、动补结构的产生等等。“了”和“着”原来都是动词,后来意义逐渐虚化,终于演变为词尾。动补结构[包括不带“得”的(染红)和带“得”的(染得红)两类]也是在这个时期才定型的。

词汇演变的主要趋势是双音节词的不断增长。本来在先秦汉语里占优势的单音节词逐渐双音节化。这种趋势近百年以来尤为明显。据统计,在180万字的现代文资料里,一共出现了3万多个不同的词,其中70%以上是双音节词。

书面语和口语 书面语和口语的差别一直相当大。在“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以前,书面语和口语的区别实际上是古今语的区别。以唐宋时代为例,当时人口里说的是白话,笔下写的是文言,即以先秦诸子和《左传》、《史记》等广泛传诵的名篇为范本的古文体。这种情形往上大概可以推到两汉时期。往下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叶。孙中山1925年立的遗嘱就还是用文言写的。不过2000年来作为书面语的文言本身也在变化。仿古终归难以乱真,后人模仿古语不可能不受当时口语的影响。有人指出韩愈的文章里就有明显的不合先秦语法的地方。清代桐城派古文家模仿先秦文和唐宋古文家的文章,结果当然更为驳杂。清末梁启超用一种浅显的文言文写政论文章。由于通俗易懂,风行一时,为报章杂志所广泛采用。目前台湾、香港以及海外中文报刊多数仍旧沿用这种文体。

“五四”运动时期开展的文学革命提出了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主张。这场运动席卷全国,影响深远。短短几年之间,白话文学就站稳了脚跟。不过这种白话文学作品的语言并不是真正的口语,而是拿北方官话做底子,又受到明清白话小说相当大的影响,还带着不同程度的方言成分以及不少新兴词汇和欧化句法的混合的文体。鲁迅的作品可以作为这种文体的典型的代表。

以上说的是文学作品。至于新闻报道、政府文告、公文、商业合同、甚至私人信件,往往还是用的文言。这一方面是传统习惯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文言文有简括的优点。这种情形,就全国范围来说,一直延续到40年代末。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文言文才完全让位给白话文。除了打电报和有意拟古以外,没有人再写文言了。

上文指出,现代书面汉语是包含许多不同层次的语言成分的混合体。无论从句法上或词汇上看都是如此。从句法来说,书面语句式除了跟口语相同的那一部分之外,有的是从文言来的,后来渐渐溶化在书面语里,成为书面语句式的一部分。例如“进行、加以、予以、给予”是书面语用得十分频繁的几个动词。这些动词原来的意义已经虚化,主要的功能是放在双音动词前边以适应句法和节奏上的要求。这种句法构造来源于文言。“进行”的前身是“行”(另行议处)，“加以”的前身是“加”(严加管束)，“予以”和“给予”的前身是“予”(不予追究)。在文言句法里,“行、加、予”前边必须跟一个单音副词配合,造成双音节构造,后边的动词也必须是双音节的。在现代书面语里,这几个动词都双音节化了,后边还是要求跟双音节的动词,语法上的制约是一脉相承的。

现代书面语开始形成的时候,曾经从旧白话小说的语言里继承了一些句式。这个阶段现在已经结束。我们能看到的只是一些遗迹。例如“在+处所词”的构造可以放在动词前头(“在台上坐着”),也可以放在动词后头(“坐在台上”)。在北京话里,前置的“在”用“跟”、用[āi]或是[tāi],后置的“在”用[·tə],都不用“在”。用“在”的说法是从旧白话小说里继承下来的。

有些书面语句式是受外国语(英语、日语、俄语等)的直接或间接(通过翻译作品)的影响产生的。在这方面可以举一个影响全部书面语句式的重要语法现象为例证。上文曾经提到,汉语里主语和谓语关系松散。句子的主语往往可以不说出来。有些句子甚至根本没有主语。现代口语和古汉语都是如此。可是现代书面语要求句子在形式上都要有主语。如果没有,就会感到结构不完整,逻辑上不周密。这显然是受了印欧语的影响。

书面语在词汇方面的特点是双音词的比重大。书面语双音词除了从文言里继承下来的一部分以外,大都是19世纪末叶以来100多年间新出现的。其中一部分是从日文转借过来的,另一部分是新造的。新创造的词大都是利用原有的语素(书面上就是汉字)造成的复合词。这种构词方式是能产的,生命力很强。

汉语研究 在中国传统的语言学领域里,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都有辉煌的成就。最古的按字义编排的字典《尔雅》是战国时代编的。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是最早的按汉字偏旁编排的字典,同时也是第一部对汉字的结构作出全面、系统的分析的著作。在古代韵书里,隋代陆法言的《切韵》(601)地位特别重要。无论是研究现代方言,还是上推《切韵》以前的音韵系统,都是重要的资料。9世纪开始出现的韵图(《韵镜》、《七音略》、《切韵指掌图》等)是一种表示整个音韵系统及声韵调三者配合关系的表格。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看,描写汉语的音韵系统,这种性质的表格是不可缺少的。古音的研究在清代有飞跃的进步。段玉裁首先指出谐声字系统跟《诗经》用韵基本上相符。清代学者根据这两种材料给上古音韵母分部,取得了显著成绩。到了王念孙、江有诰,这项工作几乎已经达到了顶点,可以补充修改之处已经不多。在训诂学方面,清代学者也有重大贡献。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和王念孙《广雅疏证》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

语法学方面,中国学者向来着重虚词的研究。清代王引之的《经传释词》是最有影响的著作。马建忠(1845~1900)的《马氏文通》出版于1898年。这是第一部系统地研究汉语语法的书。

20世纪上半叶,古音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主要的成绩是对中古音和上古音的构拟。这方面工作的开创者是瑞典学者高本汉。其后李方桂在上古音研究上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马氏文通》研究的对象是古汉语。现代汉语语法的研究是从20世纪开始的。吕叔湘《中国语法要略》(1942~1944)和王力《中国现代语法》(1943)两部书反映了前半世纪汉语语法研究达到的水平。丁声树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1952)虽然是通俗性著作,但是在近年来的语法研究上有一定的影响。60年代以来,汉语语法研究进步很快。赵元任《中国话的文法》(1968)是这个时期比较重要的著作。

在历史语法学方面,吕叔湘《汉语语法论文集》(1955,增订本,1984)里的一部分论文开创了近代汉语语法的研究。王力的《汉语史稿》中卷(1958)和日本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1958)也是这方面有影响的著作。

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是第一部用现代语言学方法调查方言的报告。这部书对以后的方言调查工作有重要影响。1956~1957年起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次方言调查。1979年创办了专门性的方言刊物《方言》,对方言调查和方言研究起了推动的作用。

20世纪考古方面的重大发现——商代甲骨文字和战国、秦、汉简帛的出土,为古文字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资料,促进了这一门学科的发展。

参考书目

- 李荣:《语音常识》,文化教育出版社,北京,1955。
朱德熙:《语法答问》,商务印书馆,北京,1985。
Yuen Ren Chao,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北京,1987。

中国社会科学院、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编:《中国语言地图集》,第一册,朗文出版(远东)有限公司,香港,1988。

Fang-Kuei Li, *Archaic Chinese*, in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朱德熙)

Hanyu cihui

汉语词汇 (Chinese lexicon) 汉语里词的总汇,即所有的词的集合体,其中也包括性质和作用相当于词的固定词组(如成语)。汉语的某个历史断代、某个地域方言或社会方言(如行业语)的词语的集合体也使用词汇这个名称,如:先秦词汇、广州话词汇、水手词汇;某种特殊类别或某种作品的词语的集合体也可称为词汇,如:口语词汇、《红楼梦》词汇。

汉语词汇丰富多彩,源远流长,下面就它的一些特点和历史发展情况作一概述。

汉语词汇的特点 世界上每个民族语言的词汇都各有其特点,汉语的词汇有自己的一些特点。

单音节语素和复合构词法 词汇由词组成,词由语素构成。汉语的语素绝大部分是单音节的。它们不单用的时候是构词成分,单用的时候就是词。由于许多单音节语素能独立成词而语素和语素又能相当自由地复合成词,这就使汉语构词具有很大的灵活性。用复合法构成的词,人们容易理解和接受。因此汉语在历史发展中就能方便自如地创造新词,以表示不断出现的新概念,满足社会对于语言的要求。例如“生”、“产”两个语素,它们既能单独成词,又能相互组成复合词“生产”、“产生”;同时还能个别地跟其他单音节语素组成一系列复合词,包括许多新词在内。例如:生活、生存、生物、生理、生态,发生、滋生、派生、寄生、卫生;产业、产品、产量、产值,出产、资产、特产、包产。

构词法和句法的一致 汉语缺乏形态变化,语音-形态学构词法仅存上古遗迹,如:入(-p)/内(-d)、立(-p)/位(-d)、执(-p)/贽(-d)、接(-p)/际(-d)、结(-t)/髻(-d)、锲(-t)/契(-d)、脱(-t)/蛻(-d)、列(-t)/例(-d);汉语又缺少地道的前缀和后缀,词缀附加法在构词上不占重要地位。汉语里应用最广的构词法是词根复合法,即依照句法关系由词根组成复合词的方法,这种构词法跟由词结合为词组的造句法基本上是一致的。比如,汉语词组的主要结构类型为“偏正”、“并列”、“述宾”、“述补”、“主谓”,而复合词的构成格式也同样是这5种。因此,汉语里常有词组转化为词的现象(如“国家”、“衣裳”),而一个双音组合是词还是词组有时难以确定(如“打仗”、“吵架”)。

叠音字和联绵字 汉语词汇的基本构件是单音节语素。这个特点表现在书写形式上就是“一字一义”,即每个字代表一个成词的或不成词的语素,不代表语素的字是例外。就汉语固有词而言,这些例外主要见于“叠音字”和“联绵字”。叠音字和联绵字都是双音的单纯词,其中每个字只代表一个音节。叠音字由两个相同的字组成,

多数是形容词和象声词,如:盈盈、楚楚、孜孜、喋喋、熊熊、习习、喃喃、啾啾。联绵字大多由两个具有双声、叠韵关系的字组成,多数是形容词,也有一些指具体事物的名词,如:参差、踌躇、忸怩、陆离、玲珑、伶俐、拮据、倜傥、磊落、仿佛、鸳鸯、孖孖、蟾蜍、辘轳(以上双声),伶仃、混沌、酩酊、迷离、腴腴、依稀、潺湲、玫瑰、螳螂、蜻蜓、碌碌(以上叠韵)。古代汉语里有不少叠音字和联绵字,近现代汉语沿用了一些,也新创了一些。

外来词的义译 跟其他许多语言一样,汉语词汇以民族固有词作为主体,也适当吸收外语词来丰富自己。但汉语的词大多数是字各有义的,字不表义的音译外来词在说汉语的人的心理上较难接受,因而纯粹音译词在汉语词汇里所占的比重很小,通用的为数更少。一时一地曾经流行的某些音译词也往往逐渐为自创的词所取代。如:扑落(plug,插头)、水汀(steam,暖气)、卡通(cartoon,动画片)、麦克风(microphone,扩音器)、盘尼西林(penicillin,青霉素)。汉语里比较通行的吸收外语词的方式是:①译音加类名,如:卡车(car)、啤酒(beer)、芭蕾舞(ballet)、高尔夫球(golf);②半译音半译义,如:霓虹灯(neonlamp)、珂罗版(collotype)、摩托车(motor-cycle)、冰淇淋(ice-cream);③仿译,即用汉语语素对译原词的组成部分,如:篮球(basket-ball)、马力(horse-power)、汽船(steamboat)、笔名(pen name)、快餐(quick lunch)、机关枪(machine gun)、幼儿园(kindergarten)。最后一种义译法尤其常用。

双音节化趋势 汉语词汇的发展倾向于把单音节扩充为双音节,把多音节压缩为双音节。把单音节扩充为双音节的方式是在单音节的前面或后面加上一个成分,如:发/头发、唇/嘴唇、雀/麻雀、鹈/喜鹊、鲤/鲤鱼、韭/韭菜、鼻/鼻子、指/指头,或者把两个意义相近或有关的单音节合起来用,如:皮肤、牙齿、墙壁、窗户、云彩、月亮。把三音节压缩为双音节的方式是省去其中一个音节,如:落花生/花生、山茶花/茶花、机关枪/机枪、潜水艇/潜艇、生地黄/生地、川贝母/川贝。把四个以上音节压缩为双音节的多见于某些词组的简称,如:初级中学/初中、化学肥料/化肥、华侨事务/侨务、对外贸易/外贸、文化教育/文教、政治法律/政法、彩色电视机/彩电、科学技术委员会/科委、高等学校入学考试/高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

四字成语 汉语词汇里包含大量成语。汉语成语的特点是绝大部分是四个字,而且正如汉语复合词多由两个语素并列构成,四字成语的内部成分也大多两两并列。这是汉语骈偶性的一种表现。四字成语结构紧凑,语法功能相当于一个实词。它们具有特殊的修辞作用,应用十分广泛。例如:铜墙铁壁、凤毛麟角、粗枝大叶、落花流水、来龙去脉、油腔滑调、东鳞西爪、狼吞虎咽、轻描淡写、胡思乱想、里应外合、半斤八两、一干二净、五花八门、千方百计、开宗明义、顶天立地、兴风作浪、设身处地、发号施令、捕风捉影、咬牙切齿、改头换面、惊心动魄、开诚

布公、标新立异、驾轻就熟、好高骛远、避重就轻、挂一漏万、风平浪静、海阔天空、水深火热、兵荒马乱、心平气和、筋疲力尽、眉飞色舞、目瞪口呆、貌合神离、身败名裂、德高望重、人微言轻、夜长梦多、凶多吉少、尔虞我诈。

汉语词汇的历史发展 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里指出:“语言是随着社会的产生和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语言的词汇对于各种变化最敏感,它处在几乎不断变化的状态中。”“工业和农业的不断发展,商业和运输业的不断发展,技术和科学的不断发展,都要求语言用工作需要的新词新语来充实它的词汇。”汉语词汇正是这样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经过漫长的历程,达到非常丰富的境地。主要的趋势是:新词不断产生,构词法逐渐完备,双音节化倾向越来越显明。以下分4个时期略述大概。

先秦 现在能看到的反映汉语词汇最早状况的文献是殷代甲骨卜辞。从中已经认识的甲骨文字有1 000个左右。从这些文字可以看出许多属于基本词汇之列的词当时已经出现。就词性看,它们绝大多数是实词,其中名词最多,动词次之,形容词很少。就语义内容看,它们包括的范围颇广,涉及自然现象、生产劳动、物质文化、社会关系、日常生活、意识形态等方面。以一部分名词为例,如关于自然界的名称:天、日、月、星、风、云、雨、雪、雾、雹、虹、山、阜、丘、陵、陆、岩、岳、河、川、泉、州、社、涧、谷、土、石、水、火;季节和时间的名称:年、岁、春、秋、时、旬、今、昔、翌、晨、旦、朝、昃、昏、暮、夕;方位的名称:上、下、右、中、左、内、外、东、西、南、北;动植物的名称:马、牛、羊、豕、豚、鼈、犬、兔、兕、象、狼、狐、虎、鹿、麋、牝、牡、鱼、龟、蛇、鸟、雉、雀、雉、鸡、蠃、蠋、蠹、木、林、杞、栗、杏、桑、竹、禾、粟、稷、麦、秫、麋;人体和器官的名称:人、身、首、面、眉、目、耳、鼻、口、舌、齿、肘、趾、心、腹、骨;生产和生活资料的名称:田、畴、圃、园、宫、室、宅、寝、门、户、仓、廩、卵、牢、圉、井、舟、车、舆、刀、斧、斤、耒、犁、弓、矢、网、罗、毕、阱、鼎、鬲、尊、俎、豆、鬯、簋、皿、盘、壶、爵、米、羹、酒、鬯、丝、帛、衣、裘、巾、带、旂、橐、玉、贝、角、磬、鼓;武器的名称:戈、矛、钺、介、盾;人伦和身分的名称:祖、妣、父、母、兄、弟、妻、妇、嫔、妾、子、侄、孙、宾、臣、宰、民、奴、俘、奚、众、工、峻、君、王、侯、伯、尹、卿、巫、史;天干地支的名称: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甲骨卜辞里双音组合很少,但在传世今文《尚书》的《商书》里却为数较多,构成格式主要是偏正式和并列式。如:天命、天时、王庭、少师、冲人、百姓、师长、邦伯、众庶、谗言、神祇、奸宄、法度、心腹、田亩、津涯、老成、笃敬、先后、远迩、安定、震动、颠越、攘窃、殄灭。其中有一些已经可以看作复合词。

周秦时代,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化较大较快,诸如生产力的提高、经济基础的变动、政治制度的演进、学术文化的进步,都促使汉语词汇迅速发展,主要表现为新词大量产生和双音节化倾向渐趋明显。古代汉语

词汇的基本规模在这个时期初步形成。

这个时期实词中的各类名词、动词和形容词都大为增加。以反映物质文化的一部分词为例,如农作物的名称:穀、稷、稗、稷、稌、秬、秠、芑、粱、穠、穉、麻;农具的名称:耜、耨、铤、鋤、钱、耨、枷;田地和耕作的名称:畎、町、畦、畔、畛、畹、畝、畹、耕、稼、种、穫、穰、耘、耔;金属和冶铸的名称:金、铁、铅、镉、铍、冶、铸;衣着的名称:裳、袞、袷、襦、袍、袷、襦、襟、衽、袂、冠、冕、屨、舄;乐器的名称:琴、瑟、笙、竽、箫、管、簧、壎、篪、钟、镛、鼗、祝、敔。在反映上层建筑方面,出现了许多关于政治、职官、礼制、军事和刑法的词,关于伦理道德的词陆续增多,如:孝、弟(悌)、德、忠、信、仁、义、知(智)、勇、廉、耻。

其他词类也有比较充分的发展。诸如指示代词、人称代词和疑问代词,表示时间、范围、程度、方式、状态和语气的副词,表示并列、承接、转折、选择、因果、假设和让步的连词,以及各类介词、语气词和叹词,大都具备。后世书面语里的一套“文言虚字”这时已经基本形成。

这个时期又出现了许多双音单纯词(叠音字、联绵字)和大量复合词。前者多见于《诗经》、《楚辞》等韵文学作品,如:天天、菁菁、冉冉、萋萋、喈喈、坎坎、萧萧、飒飒、萋萋、邂逅、栗烈、窈窕、婆娑、缤纷、缱绻、滂沱;后者普遍见于各类典籍,如:角弓、金罍、羔羊、魴鱼、旭日、寝衣、蛾眉、云梯、良人、赤子、玄鸟、白茅、二毛、三星、四海、五谷、九有、万舞、处士、征夫、支解、草创、燕居、伫立、宫室、道路、丘陵、声音、朋友、宾客、爪牙、干戈、社稷、缙绅、爵禄、婚姻、奔走、征伐、扶持、教诲、修饰、束缚、恐惧、离别、变化、瞻望、纯粹、悠远、劬劳、枯槁、恭敬。复合构词法在周秦时代的广泛应用为此后汉语创造新词以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开辟了广阔的途径。

汉唐时代 在这个长时期里,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文化学术的发达、民族接触的频繁和中外交通的兴盛,汉语词汇相应地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的情况是:新词继续产生,书面语和口语词汇的差异逐渐加大,双音词的构成格式多样化,以及外来词成批出现。

这个时期产生的新词里还不乏单音词,以魏晋以后出现的为例,如:店、麪、滩、觅、趁、透、蓦、硬、摊、捩、瞳、怕、闹、帖、剩、懒、瞎、爷、娘、哥、依、这。但双音词为数更多,特别是表示抽象概念的词大为增加,如:情形、意义、操行、神气、风采、情绪、性质、威信、权力、本领、举止、异同、界限、比喻、考验、揣度、商量、通融、醒悟、差异、均等、错乱、繁华、安稳、光荣、敏捷、冷淡、质朴、公正、风流、仔细、透彻。同时双音虚词也陆续增多,如:往往、常常、每每、渐渐、一再、一向、向来、当即、立地、登时、随时、毕竟、终归、从来、元本、一齐、非常、极其、公然、果然、必定、未必、千万、互相(以上副词)、如若、若或、如其、倘若、假使、设使、虽则、无论、不问、除非、因为、所以、因而、不但、不唯、宁可(以上连词)。这都是汉语词汇进一步充实的明显标志。

就构词法看,这个时期产生的双音词以偏正式和并

列式复合词为主,但述宾式和述补式也已出现,如:努力、注意、知心、拼命、下手、障泥、隔壁、临时、吃苦、矫正、制服、说合。此外,魏晋以后出现了一些类词缀成分,如前加的“阿”、“老”,后加的“子”、“儿”、“头”,从而构成一批附加式双音词。例如:阿大、阿五、阿母、阿谁,老鼠、老鸦、老兄、老姊、老奴、老伦,兔子、鹌子、燕子、蚊子、果子、竹子、刀子、亭子、艇子、袋子、巾子、冠子、帽子、鞋子、眼子、面子、合子、拂子、托子,婆儿、猪儿、狗儿、猫儿、雀儿、鱼儿、花儿、衫儿,阶头、馒头、膝头、舌头、骨头、手头、心头、地头、日头、东头、前头。

汉魏以后,书面语和口语渐渐脱节,词汇上的差异越来越大。六朝时代的一些文献已经或多或少透露这方面的消息。到了晚唐五代,禅宗语录(如《六坛经》、《祖堂集》)和通俗文学作品(如敦煌变文)比较充分地反映出当时口语的面貌,其中出现了大量的不见于“正统文言”的词语,是研究近代汉语前期词汇发展的重要资料。

外来词的成批出现是这个时期汉语词汇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早在先秦时代汉语词汇里就有从亲属语言和非亲属语言吸收的外来成分,但它们大都跟固有成分融为一体,难以辨别。西汉以后,由于民族关系的密切和国际交往的频繁,汉语里陆续加入了一些明显可辨的外来词,主要是从西域南海传来的物名,如:蒲陶、苜蓿、涂林、仁频、槟榔、烟支、茉莉、琉璃、琥珀、鼈壳、鼈壳、白叠、笠篋、鸱巢、师比、郭洛、鞞鞞。通过从东汉后期开始的佛典翻译,汉语又从古印度语言(梵语、巴利语)和古中亚语言(如焉耆语、龟兹语)吸收了跟佛教有关的大批外来词,如:般若、菩提、南无、伽陀、羯磨、涅槃、阎罗、菩萨、罗汉、比丘、阇黎、头陀、和尚、沙弥、夜叉、泥犁、伽蓝、兰若、招提、袈裟、贝多、摩诃、刹那。其中一部分应用较广,进入了汉语的一般词汇。有一些复音节的词因常用而省缩为单音,如:僧伽(saṅgha)/僧、魔罗(māra)/魔、塔婆(thūpa)/塔、劫波(kalpa)/劫、忉摩(kṣama)/忉、禅那(dhyāna)/禅、比丘尼(bhikṣuṇī)/尼、钵多罗(pātra)/钵,而这些单音词又可以作为语素造出许多复合词,如:高僧、僧徒、恶魔、魔鬼、宝塔、浩劫、劫数、忏悔、参禅、禅师、尼姑、尼庵、钵盂、衣钵。此外,在佛典翻译中还出现了大量“义译词”,如:法宝、世界、天堂、地狱、因果、信心、真理、变相、圆满、平等、慈悲、方便、烦恼、金刚、庄严、报应。其中一部分产生引申义,也成了汉语里的通用词。

宋至清 宋代以后中国社会经济继续进步,农副业、手工业、商业和贸易都有较大发展,学术和文艺(包括自然科学和通俗文学)也颇为发达。跟经济、文化的进展相适应,汉语词汇里出现了许多变化和创新。主要表现为:反映生产、生活和学艺的新词大为增多;口语词更为丰富并大量进入白话文学作品;在新产生的词里双音词占明显优势,三音词也有所增加。

在反映生产和生活方面,由于宋代工商业和都市生活繁荣,有关作坊、市场、商行、店铺的词语空前增多。例如:木作、竹作、油作、砖瓦作、裁缝作、碾玉作,米市、肉

市、花市、金银市、鱼行、菜行、果行、麻布行、骨董行、面店、酒店、茶店、馄饨店、针铺、漆铺、药铺、绒线铺。同时各种日用消费品的名目也大为增加。以食品中的面、糕、饼、糖为例，如：三鲜面、鸡丝面、炒鳝面、笋辣面、乾魷面、糕糕、蜜糕、豆糕、玉屑糕、镜面粉、重阳糕、烧饼、炊饼、月饼、荷叶饼、菊花饼、芙蓉饼、姜糖、麻糖、乳糖、乌梅糖、鼓儿糖、五色糖。由于农业生产的进步，有关作物品种的词语明显加多。以稻米名称为例，宋代就已有几十种，如：早稻、旱稻、赤稻、小香稻、杜糯米、蛮糯米、梗米、红米、黄米、黄籼米、箭子米、黄芒、上秆、冬春、早占城。又如关于蚕桑业的词语，在宋元时代也已积累得十分丰富，如：桑几、桑笼、桑网、蚕宅、蚕屋、蚕箔、蚕槌、蚕椽、蚕架、茧瓮、茧笼、火仓、抬炉、热釜、冷盆、丝篁、绵矩、络车、缲车、絮车、纬车、经架、捻绵轴。

宋代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如天算、律历、土木建筑、农田水利)进步较大，有不少发明创造和专门著述，元明时代又从近东伊斯兰世界传入一些科技知识和观测仪器。与此相应，汉语里出现了一批新词。到了明末清初，欧洲来华耶稣会士和中国知识分子合作，译述了许多西方科技书籍(包括数学、天文、历法、乐律、舆地、水利、机械制造等)，从而汉语里又增添了一批近代科技术语，如：天顶、日球、月球、地球、经度、纬度、仪器、远镜、测算、测量、算术、几何、界说、推论、比例、对数、象限、割圆、直角、椭圆、平面、面积、体积、容积、等边、多边、三角、八线、机器、射线、透视。

自宋代迄明初，由于对外贸易发达，汉语里出现了一些从阿拉伯语、马来语等语言吸收的外来词，大部分是域外特殊物产的名称，如：罽蜡(长颈鹿)、花福禄(斑马)、马哈兽(大羚羊)、金颜香、笃耨香、打麻儿香、祖母绿、喷呐、火不思、沙糊、考黎(海蚶)、押不芦、巴旦杏、荦澄茄、腥脐脐。但通行开来的只有一小部分。

在元代，由于汉蒙民族接触密切，不少蒙古语词渗入汉语，见于杂剧等作品，如：抹邻(马)、兀刺赤(马夫)、米罕(肉)、答刺孙(酒)、铁里温(头)、撒因(好)、牙不(走)、约儿赤(去)。其中作为外来词在汉语词汇里巩固下来的不多，除了少数几个例外，如驿站的“站”、好歹的“歹”。此外，今天还在使用的把势、胡同、蘑菇、搭裢，大约也是元代以后从蒙古语吸收的外来词。

这个时期是汉语口语词汇大发展并源源进入语体文学的时期。从南宋到清代，各种体裁的白话作品(如南戏、诸宫调、杂剧、平话、小说)与日俱增，较为完全地显示出近代汉语各个发展阶段的词汇面貌。从宋元话本和明清小说所反映的当代口语状况可以清楚看到汉语词汇一步步接近它的现状的历史进程。

近百年 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经历急剧的变革，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新事物、新概念层出不穷。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的巨大深刻的变化推动着汉语词汇迅速发展，不断创新。

从1898年戊戌变法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前50年间，汉语里增加了许多新词，其中绝大部分是双音词，小部分是三音词，也有少数三个音节以上的词。词汇增补的主要来源是：①自创新词。例如：总统、国会、法院、公司、火车、轮船、飞机、炸弹、水泥、纸烟、罐头、电影、钢琴、邮票、执照、拍卖、汇兑、民工、机车、壁报、剧本、金笔、胶卷、部门、机构、集体、骨干、阶段、功能、因素、总结、精简、显微镜、收音机、消炎片、降落伞、羽毛球、游击队、儿童节、意识形态、唯物史观。②借用日语汉字词。例如：总理、议会、政党、主义、代表、干部、协议、选举、否决、机关、法庭、警察、宣传、讲演、情报、标语、时事、银行、企业、市场、学位、权威、课程、美术、讲座、会话、座谈、演奏、喜剧、标本、图案、索引、出版、现实、环境、要素、前提、作用、性能、原理、积极、绝对、肯定、场合、手续、引渡、打消、取缔、俱乐部、混凝土。③吸收印欧语词。例如：沙发(sofa)、扑克(poker)、咖啡(coffee)、可可(cocoa)、苏打(soda)、吐司(toast)、吉他(guitar)、尼龙(nylon)、坦克(tank)、雷达(radar)、绷带(bandage)、引擎(engine)、逻辑(logic)、幽默(humour)、摩登(modern)、维他命(vitamin)、模特儿(model)、托拉斯(trust)、布尔乔亚(bourgeois)、歇斯底里(hysteria)、卡片(card)、雪茄烟(cigar)、法兰绒(flannel)、吉普车(jeep)、蜜月(honeymoon)、超人(Übermensch)、下意识(subconscious)、闪电战(Blitzkrieg)、时代精神(Zeitgeist)。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社会政治状况变更之大之快为历史上前所未有，诸如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马列主义的传播、经济建设的发展、文化教育的普及、科学技术的进步、国际往来的频繁、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精神风貌的改变，无不促使汉语词汇发生种种变化。这些变化表现在各个方面，例如：①政治、哲学用语大普及，有的成了常用词。如：政策、策略、方针、口号、阶级、成分、党派、民主、协商、谈判、立场、观点、思想、意识、理论、实践、现象、本质、抽象、具体、主观、客观、相对、绝对、量变、质变、感性、理性、对立面。②科技、卫生用语大发展，有的进入了一般词汇。如：宏观、微观、塑料、磁带、电脑、软件、频道、激光、扫描、遥控、缩微、复印、录像、半导体、显像管、溃疡、血栓、发炎、休克、抗体、疫苗、镜检、输液、造影、免疫、气功、理疗、抗菌素、心电图。③不少词语的意义或用法有了新的扩展。如：“革命”可指在共产党领导下从事任何有益于国家人民的工作；“斗争”可指用体力或脑力来解决问题或克服困难；“同志”可指人民群众的任一成员；“群众”可指人民中每一个人，又为“领导”或“党团员”的对称；“集体”可指每一个人所在的若干人组成的总和，又为“全民”或“个体”的对称；“单位”可指机关、团体，或属于一个机关、团体的各部门；“叔叔”可指跟自己父母同辈的任何男子；“态度”可指一个人对任何事情的看法和采取的行动；“精神”可指重要文件或高级领导人讲话的要点。

在构词法上也有一些新的趋势：①复合词仍以偏正式和并列式为主，如：工地、车间、能源、侨胞、国格、新秀、

普查、扩建、赊销、空投、筛选、项目、环节、效益、拼搏、离休。但述宾式、述补式和主谓式也有发展,特别是述宾式出现较多,如:供电、分洪、截流、脱粒、投料、待业、夺魁、投标、合资、创汇、挂钩、牵头、保健、务虚、碰硬。②一些构词成分词缀化,由此构成的附加式复音词逐渐增多。以带后加的“性”、“化”、“员”、“家”的词为例,如:计划性、技术性、趣味性、知识性、全民性、综合性、可行性、主观能动性、绿化、老化、大众化、绝对化、一元化、年轻化、专业化、制度化、炊事员、饲养员、邮递员、售货员、驾驶员、理论家、实干家、改革家、美食家、社会活动家。③简称不断出现,不少简称因常用而转化为词。如:统一战线/统战、武装警察/武警、化学纤维/化纤、民用航空/民航、电视大学/电大、体格检查/体检、空气调节/空调、展览销售/展销、旅游/游览、表示态度/表态、节约能源/节能、失去控制/失控、少年先锋队/少先队、奥林匹克运动会/奥运会。

从有文字记载以来,汉语词汇经过3000多年的历史进程,发展到现在已是面目全新,无比丰富。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前进,汉语词汇将越加丰富。

参考书目

陆志韦等:《汉语的构词法》(修订本),第1版,科学出版社,北京,1964。

吕叔湘:《文言读本》导言,上海教育出版社,1980。

王力:《汉语史稿》下册,新1版,中华书局,北京,1980。

(张永言)

Hanyu fangyan

汉语方言 (Chinese dialects) 汉族的先民开始时人数很少,使用的汉语也比较单纯。后来由于社会的发展,居民逐渐向四周扩展,或者集体向远方迁移,或者跟异族人发生接触,汉语就逐渐地发生分化,产生了分布在不同地域上的方言。汉语方言分布区域辽阔,使用人口在9亿以上。

汉语方言的形成和发展

汉语方言的形成和发展跟社会的发展和变化息息相关,只有密切联系汉族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行研究,才有可能了解汉语方言形成和发展的具体过程。

相传黄帝时中原有万国,夏朝为三千,西周初期还分封八百诸侯,那时候汉语及其方言的情况到底如何,因史料很少难以具体论述。但中国社会发展到春秋战国时代,汉语的方言差别已可以从先秦古籍的记载中得到证实。《左传·文公十三年》(公元前614):“秦伯师于河西,魏人在东。寿余曰:‘请东人之能与夫二三有司言者,吾与之先’使士会。”这段记载说明当时黄河东西的汉语方言已有差异。《孟子·滕文公下》:“孟子谓戴不胜曰:‘…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传诸,使楚人传诸?’曰:‘使齐人传之。’曰:‘一齐人传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这里说到齐语、楚语,表明

在公元前3、4世纪孟子生活的战国时代,北方的汉语方言跟南方的汉语方言已有相当显著的差异。

秦始皇消灭了各诸侯国,建立起统一的封建帝国,实行“书同文”,“罢其不与秦文合者”。这种规定标准字体、使汉字定型化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方言的发展,但方言的分歧还是明显地存在,这在后来西汉扬雄所著《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一书中反映得十分清楚。《方言》是一本各地方言比较词汇集,所收词语按通行情况大体可分4类:①通语,是各地普遍通行的;②某地某地间通语,通行区域较广的;③某地语,通行区域较窄的;④古今语(或古雅之别语),是冷僻古语之残留,通行区域很窄。现代学者根据《方言》所称引的地名进行分合,得西汉方言区13个:秦晋、郑韩周、梁和西楚、齐鲁、赵魏之西北、魏卫宋、陈郑之东郊和楚之中部、东齐与徐、吴扬越、楚(荆楚)、南楚、西秦、燕代。从中可以看出西汉汉语方言分布的大体情形。《方言》一书所反映的汉语方言分布的情况是汉语随着社会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所造成的。

根据古书记载,在秦汉以前的上古时代,汉语方言除了汉语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北方话以外,吴方言、粤方言、湘方言也可能已经在东南地区内逐渐形成。《汉书·地理志》注说:“自交趾(今越南北部和广东、广西大部)至会稽(今江苏长江以南、茅山以东和浙江大部)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百粤”即“百越”。从《史记》、《汉书》及《吕氏春秋》、《吴越春秋》等书的记载,可知百越之地古代早就有汉人居住,但他们的来源地并不一致。在汉人跟汉人、汉人跟异族人长期接触的过程中,发生语言的互相影响和融合,逐渐地形成吴、粤、湘等方言。《吕氏春秋·贵直篇》引伍子胥的话说:“夫齐之与吴也,习俗不同,言语不通……夫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壤,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这表明当时北方话的齐语跟南方话的吴语差别已经很大,而吴语、越(粤)语之间的差别倒还很小。《吴越春秋》里的渔父歌,写伍子胥由楚奔吴至江中遇渔父的故事。渔父所唱的吴歌,诗句结构接近楚辞,例如“日月照耀兮寝已驰,与子期兮芦之漪”,“日已夕兮,余心忧悲,月已迟兮,何以渡为,事寝急兮将奈何!”这个例子似乎表明春秋时代吴语跟楚语的差别并不大。扬雄《方言》多次提到“南楚江湘”,有时也提到“荆汝江湘”和“江湘九疑”,今天湖南省境内的湘方言,或许在上古时期就已形成并从属于楚语这个南方大方言之内。周秦以后,汉人逐渐南下进入南粤(今广东、广西等地),作为交际工具的汉语,一方面由于山川阻隔,交通闭塞,跟北方汉语越来越疏远;另一方面由于民族杂居而引起语言的相互影响和融合,于是就逐渐形成了粤方言。

汉以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动。居住在北方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入居中原,相继在北方地区建立政权。原来统治北方地区的司马氏政权南迁江南,大批汉人也因社会动乱而不断南迁。在北方地区,汉语和异族语发生了融合,引起汉语

面貌的重大变化;在南方地区,南渡的北方人把北方汉语带到江南,跟当地的汉语方言相互影响和渗透,从而使这一时期的汉语出现“南染吴越,北杂夷虏”(《颜氏家训·音辞篇》)的混杂局面。社会的变动,人民的迁移,民族关系的发展等因素都会推动方言的形成和发展,这在魏晋南北朝急剧的社会变动时期更为明显。客家方言、闽方言乃至赣方言的形成和发展就跟中古以后发生的人口大规模集体迁移密切相关。根据历史记载,客家先民第1次大规模的迁徙发生在西晋永嘉之乱以后,他们自河南并州、司州、豫州等地南迁,定居在江西中部一带今赣方言区域;第2次大规模的迁徙发生在唐末和五代十国时期,黄巢起义的战火迫使河南西南部、安徽南部的汉人以及已经南迁江西的移民继续往南迁移,到达闽西及赣南一带;第3次是在蒙古元人南下、宋室濒亡之际,中原汉人随着抗元义军继续南迁,到达粤东和粤北一带。这三次中原汉人的大规模南迁,语言学家认为是形成汉语客家方言的主要社会原因。今天的闽方言地区在秦汉之际就有中原汉人移居,但人数尚少。中原汉人第一次大规模南移入闽是在“五胡十六国”时代,当时中国处于兵荒马乱之中,北方汉人相率离乡背井,播迁于大江东西、五岭南北,入闽的汉人比较集中地定居在闽北以建瓯为中心的建溪、富屯河流域,闽东以福州为中心的闽江下游以及闽南以泉州为中心的晋江流域。经过这次大规模的南迁,汉人进一步成了福建境内居民的主体,他们带来的当时河南中州一带的中原汉语,跟当地原有汉人所说的汉语乃至异族人所说的语言发生接触,逐渐地形成了闽方言。今天所谓“十五音”系统的闽方言,它的源头或许就是东晋中原汉人入闽后逐渐形成的一种汉语方言。赣方言的历史形成,因限于史料,目前还难以作准确的论断。江西在春秋时代位于吴、越、楚三国的交界处,在汉代则介于荆州、扬州之间。据此推测,这一片土地上的居民当时所使用的汉语,很有可能包括在吴语和楚语的范围之内,或者跟吴语和楚语有很密切的关系。魏晋以后,随着中原汉人几次大规模的南移,江西为必经之地,当地的原有汉语方言跟被带进的北方方言互相影响、渗透和吸收,导致形成既不同于吴、粤方言又不同于北方方言的赣语。由于长期受四周方言的影响,赣方言的语言特征不够突出,分布的地域也不很明确,就现代赣语主要的语音特征看,赣方言跟客家方言比较接近,因而有的语言学者把二者合称为“客赣语”或“客赣方言”。汉语存在着方言差别的同时,也一直存在着共同语,共同语的书面形式自秦代以来都是统一的。这种汉语共同语在春秋时代叫做“雅言”。《论语·述而篇》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孔子是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他平时大概说山东方言,但在读《诗》、读《书》、行礼的时候,则用当时的共同语“雅言”。汉语共同语往后发展,至汉代扬雄在《方言》里称之为“通语”,元代周德清在《中原音韵》里称之为“天下通语”,明代张位在《问奇集》里称之为“官话”,辛亥革命以后称之为“国语”,现在称之为“普通话”。由“雅

言”、“通语”、“天下通语”到后来的“官话”、“国语”以至现在的“普通话”,其发展过程是一脉相承的,反映了汉语共同语在两千几百年间发展的大体过程。汉语共同语是在北方方言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基础方言及其中心地带则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上古时期的秦晋方言在各方言中影响最大,可以把它看作当时汉语共同语的基础方言。汉代以后,中国社会经历魏、晋、南北朝长时期的社会变动,汉语发生了重大变化,共同语的基础方言随着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的东移,它的中心也逐渐由陕西、山西东移至河南汴洛中州以至江苏金陵一带。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音辞篇》中谈论当时的审音标准时,认为“权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辽、金、元、明、清各朝近千年间,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心逐步东移,汉语共同的基础方言的通行区域不断扩大,达到东北和西南各省,基础方言的中心也进一步东移至北京一带。汉语共同语随着基础方言的扩大、变化而变化。作为统一的汉语共同语的书面语,也由古老的文言文发展到现代的白话文。

自秦汉以来,中国一直是封建社会,薄弱的经济基础使社会处于不够统一的状态,因而使汉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北方话始终不能完全取代方言而实现汉语的高度统一。正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殊条件下,汉语方言一方面能保持自己的特点并不断发展,甚至由于各地方言的不同演变,造成新的方言分化;另一方面由于汉族和整个中国社会的统一,汉语方言又要服从自己所从属的汉语共同语的发展趋势而继续作为汉语的方言。因此,汉语的各大方言尽管分歧很大,仍是一种语言的不同方言,而不是与共同语平行的不同语言。

作为汉语统一的书面语表现形式的汉字,它的读音在不同的方言区各不相同,方言区的人遇到不认识的字,只要知道它读如某字,就可以用自己方言里该字的读音去读。同时,词语的读音虽然古今有别,但汉字的写法却是一样的,这在客观上也便于沟通古今,加上自有汉字以来,政府法令、契约文书、经典文献、圣人立言以及优秀的文学作品和历史、哲学的名著等都用汉字记载,人们不敢轻易改动其中的字句,甚至古代一些句式和词语的用法,通过师生传授,代代相传,一直沿用下来。汉语共同语和各方言在发展的过程中都不能不受到这种统一的汉语书面语的影响和制约,比如在许多方言里都有口语音与读书音(接近书面语和共同语的读音)的差别,而在一些方言(例如闽南方言)里二者的差别几乎成了双重的系统;只有在汉语这样的语言中才出现书面语跟口语这样特殊的关系。

汉语方言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发展过程,这个发展过程是不间断的、渐变性的,然而现代汉语方言跟古代汉语方言的面貌已大不一样,如同现代汉语共同语的面貌有别于古代汉语共同语的面貌一样。事实上每一种汉语方言(无论是大的方言区或小的方言片)都经历了复杂的发展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语言发展的大量事实表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汉语方言发展的必然趋势

是向作为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普通话靠拢,普通话的口语和书面语的规范形式必将逐步取代各地的方言。

现代汉语方言的分区

汉语方言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各种不同程度的差异,从而构成了不同的方言区属。

汉语方言分区的原则 方言分区是不同语言的划分,有别于地理上、行政上的分区。不同方言可以同在一个地理区域内,同一方言也可以分布在不同的地理区域中。例如南方的闽方言通行于闽、粤、台、浙四省的部分地域,而在闽、粤两省之中,又分别有闽、客方言并存和粤、客、闽方言并存。行政管辖范围可以变更,方言区属却不可能在短期内随之更改。广东省的海丰、陆丰两县,大部分说闽方言,原隶属于说闽方言的汕头专区。近年来这两个县改属大都不说闽方言的惠阳专区管辖,可是海丰话和陆丰话仍属闽方言。

不同方言之间的关系有亲有疏,必须对近亲和远邻有充分的了解,才能把不同的方言恰切地归到适当的区属中。方言的分区要有不同的层次,根据亲、疏的程度把不同的方言划归不同的层次。最高的一个层次通常称做方言区,例如官话方言区、吴方言区、粤方言区等。同一个方言区中的方言又可以作第2层的区分,通常称做方言片或次方言,例如闽方言区的方言又可以分闽南方言片、闽东方言片、闽北方言片,莆仙方言片、闽中方言片等;吴方言区的方言又可以分为太湖片、台州片、温州片、婺州片、龙衢片等。必要时,方言的划分还可以有第3层次乃至第4层次。第3层次在“片”以下,根据同一片内方言差异的情况可分为若干小片。小片中的各个地点如果方言差异仍然存在,可以再区分为若干地点方言,一般叫做“点”。方言区分的四个层次就是:方言区—方言片—方言小片—方言点。不论是哪一个层次的方言,在分区中始终要从实际出发,判明亲疏关系,该分即分,可合便合。有的地方方言处在不同方言的过渡地带,特别是几种不同方言犬牙交错的地区,如闽、浙、赣交界地区,鄂、湘、赣接壤地区等。方言现象复杂,一时不易确定归属的,只好承认它是过渡地带的方言,不必勉强划归哪一个方言区。

汉语方言分区的依据 语言特征是方言分区最主要的依据。其次还要考虑社会历史背景。地方志中关于本地建制沿革、移民情况等的记载都有参考价值。以通行地域很广的客家方言来看,历来语言学者把说客家话的各个地区看作是同一个方言区。首先根据语言特征确认粤东客家话、粤北客家话、闽西客家话、赣南客家话、台湾客家话,以及散处湖南、广西、四川等地的客家话都同属一个方言区——客家方言。其次借助有关客家先民播迁的历史资料来说明。以目前定居台湾省的100多万客家人为例,他们的族谱记载着祖先是从粤东嘉应州(今梅县地区)和惠州迁去的。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台湾客家话和粤东客家话那么近似。又如语言学上经常提到“方言岛”这一概念,

为了准确判明某个方言岛的方言区属,更非把语言特征的调查和社会历史背景的了解密切结合不可。除了语言特征和社会历史背景以外,方言地区人民通话的情况对于确定方言的归属也有参考作用。一般说来,同一方言区的人比不同方言区的人通话交际的可能性要大一些。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各方言区内部分歧的程度不一,各方言区之间差异的程度也不一,能相互通话的有可能不同属一个方言区,而同一方言区的人,由于方言片、甚至方言小片之间的差别很大,也有可能通话比较困难。例如客家方言区人民与官话方言区人民之间相互通话的难度就不及闽方言区内闽东方言片人民与闽南方言片人民之间通话的难度大。

区分汉语方言时,必须对方言间的差异性和一致性都要有充分的了解,光注意方言的差异性而忽略其一致性是片面的。一种方言有别于其他方言,首先从语言差别中表现出来,而在这个方言内部,与之同属一个方言区(片、小片)的,必然又都明显地存在着一致性。缺少这种内部的一致性因素,就很难把它们归并到一起。可见方言间的一致性因素是体现某个方言的基本特征,也是分别方言区属的重要依据。以跟民族共同语普通话差别最大的闽方言为例,尽管它内部各方言片的差别很大,闽南、闽东、闽北、闽中、莆仙等方言片从语言现象看,几乎都难以相互通话。可是,仔细观察闽方言各地的语言特点,不难发现一些突出的共性,依据这些共同的语言特征,并参考有关社会历史文献,闽方言才有可能被划为一个大方言区而和汉语其他各大方言区并列。在选取语言特征来作为划分方言的依据时,要通过反复比较,使最有代表性、最典型的语言特征入选。就语音方面来看,下面这些特征是方言工作者常常考虑的问题:古双唇塞音在三等合口韵前的读法,古全浊塞音b、d、g的演变,古知彻澄母的读法,古照穿床审禅各母的读法,古泥来母的分混,古舌根音声母是否腭化,古塞音韵尾的演变,古鼻音韵尾的演变,古调类的分合,古入声的演变,f-和xu-的分混,鼻音声母是否失去鼻音成分,浊塞擦音及浊擦音的有无,介音的分合,复元音与单元音的转化,元音的长短等。这些特征大都结合汉语语音的历史发展来考虑。有的普遍性较大,一两个特征就能对方言的划分起关键性的作用(表1)。

表1把汉语七大方言在语音上的特点勾划出了一个粗略的轮廓。方言的特点往往交叉出现,有的特点覆盖面很大,有的特点覆盖面小一些。不同特点在区分方言中所起的作用不一。例如古塞音b、d、g的演变,官话方言和粤方言就完全相同,而古塞音韵尾-p、-t、-k的保存,南方粤、客、闽诸方言又或多或少有近似之处。在这种情况下,单凭一两条特征就难以把汉语方言划分清楚。这时不妨再找一些普遍性不那么大,但对于鉴别某一方言却能起作用的特征来补充,使各方言的面目更为清晰。例如古知彻澄母今读t-、t'-这一声母上的特征对于确认闽方言就有作用,古入声调演变成成为3个或4个入声调的

表1 从古全浊塞音 b、d、g 的演变和古塞音韵尾 -p、-t、-k 的演变看汉语各方言的情况

七大方言名称	古全浊塞音 b、d、g 的演变	古塞音韵尾 -p、-t、-k 的演变
官话方言	清化、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	大都消失，个别地方保留塞音韵尾 ^①
吴方言	浊、不送气	合并为 ^②
湘方言	①浊、不送气(老湘语) ②清化、不送气(新湘语)	消失
客家方言	清化、平仄声大都送气	大都保存 -p、-t、-k
赣方言	清化、平仄声大都送气	保存 -t、-k 或 ^③
闽方言	清化、大都不送气	①保存 -p、-t、-k 或 -p、-k、 ^④ 或 -p、-k (闽南) ②保存 - ^⑤ 或 -k (闽东、莆仙) ③基本消失 (闽北、闽中)
粤方言	清化、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部分地区例外)	保存 -p、-t、-k

特征，在辨认粤方言时也有作用。有的覆盖面很小的语言特征，却往往能在厘清方言区界时发挥它的作用。例如古匣母字有少数白读为舌根塞音 k，如“糊、猴、寒、含、行、厚、汗、滑”等，从福建到广东到台湾，凡是通行闽方言的地方，都具有这个特点。又如古微母字与明母字合为 m-，古溪母合口韵的字一部分念 f-，这样的语音特征虽然覆盖面很小，也可用来作为辨认粤方言的参考。典型的语音特征对于划分任何一个层次的方言都是必不可少的。例如官话方言区中几个方言片的划分，古入声字的今调类如何就是很重要的语言条件。向来语言学界把官话方言中“古入声字一律念阳平”作为西南官话的一个突出标志。近来有的语言学家认为山西部分地区、陕北部分地区和河南黄河以北部分地区的方言可以考虑另立晋语方言区，其主要根据也是着眼于这些地区古入声字仍保留入声一类，有别于邻近没有入声的官话。又如在考虑广东省内闽方言应该划分几个支系时，首先应该注意“有没有把送气塞擦音读为擦音”和“有没有出现鼻化韵母”这样的语音特征，因为这正是海南岛闽语和粤东潮汕闽语分立两支的重要依据。海南闽语送气塞擦音念为擦音，没有鼻化韵母，而潮汕闽语则恰恰相反，送气塞擦音不念为擦音，有一系列鼻化韵母。以这类突出的语音特征来衡量雷州半岛的闽语，发现那里的语音特色恰恰介乎海南闽语和潮汕闽语之间，因此，根据语言实际情况，可以把雷州半岛闽语另立一支，作为广东省内闽语方言的三大支系之一。

在选取语音特征来区分方言时，除了声、韵、调三方面的特征外，还要注意某些整体性的特征。整体性的语音特征往往能在区分方言时产生显著的效果。例如音节结

构上的特征，什么样的声母能和什么样的韵母拼合，各地方言很不一样。又如口语音和读书音在某些方言中异读现象很丰富，文读和白读几乎形成双轨的局面，这一语言特征无疑可以作为辨认闽南方言的重要依据。再如连读时声母、韵母必然产生变化，这是闽东方言独有的特色，可以作为辨认闽东方言的一个依据。语言特征表现在语音、词汇、语法等各个方面，划分方言时，除了考虑语音方面的依据外，也要同时考虑词汇、语法方面的因素。例如闽方言常用词中的“厝”(房子)、“鼎”(铁锅)、“割”(宰杀)、“冥”(夜晚)等，在别的方言中没有，而在闽、粤、台、浙各省的闽方言中却都普遍存在，可以用来配合语音方面的典型特征，作为确认闽方言的重要依据。又如人称代词复数加“哋”(我哋、你哋、佢哋)这一点，可以作为确认粤方言的语言条件之一，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别的方言也用“哋”来表示人称代词复数的。量词和名词、动词的配搭，各地方言也颇为不同。称人用“只”(一只人、两只人)是客家方言区独有的习惯，这也许可以作为确认客家方言的语言依据之一。总之，语言特征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只要具有典型性，能够对方言的划分产生积极效果的，都可加以利用。

现代汉语七大方言区 近 50 年来，语言学家们陆续运用语言材料对现代汉语方言进行分区，有的分为九区，有的分为八区，有的分为五区。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以后，国内最流行的是汉语八大方言的分区，即把汉语方言分为：北方方言区、吴方言区、湘方言区、赣方言区、客家方言区、粤方言区、闽南方言区和闽北方言区。70 年代以前出版的汉语教材及有关论著，大都采用上述“八大方言”说。后来方言工作者根据日益增多的汉语方言调查成果，感到七大方言中的闽南、闽北两区宜于合并为一个方言区，再在第 2 层次中区分若干不同的闽方言片，其余六区仍然照旧，于是就形成了现代汉语七大方言的分区法。这七大方言区是：官话方言(又称北方方言)区，吴方言区，湘方言区，赣方言区，客家方言区，粤方言区，闽方言区。

方言的分区随着方言调查工作的不断深入，方言资料的不断增加，今后会有新的调整。近年来有的语言学者认为客家方言和赣方言可以合为一个大方言区：客赣方言区，这样就有了六区之说；还有的方言工作者认为皖南一带徽州方言应该独立一区，则又有了新的八区说；最近有的语言学者提出晋语应从官话方言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方言区，如果原有的七区不动，加上晋语和徽州方言，则可构成新的“九区”说。目前我们暂时采用国内比较通行的“七大方言”说，以便和大多数现代汉语教材及有关汉语方言的论著取得一致。

现代汉语方言的特点

汉语方言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各方言之间相似的程度和互异的程度不尽相同。大致说来，汉语方言中差异较大，情况较复杂的地区多集中在长江以南各省，特别是江

苏、浙江、湖南、江西、安徽(皖南地区)、福建、广东、广西等地,长江以北广大地区,尤其是华北、东北地区,汉语方言的一致性比南方要大得多。总的格局是:北方各方言一致性大、差异性小;南方各方言差异性大,一致性小。就七大方言比较来说,闽、粤两大方言和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差别最大,吴方言次之,客家、赣、湘等方言和普通话的差别要小一些,官话方言作为民族共同语的基础,各地官话和普通话之间的差别自然要小得多。方言差异表现在语音、词汇、语法各个方面。下面扼要介绍汉语方言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的主要特点。

语音特点 汉语七大方言的语音系统各具特色。联系历史发展来看,官话方言的音系比较简单,反映了汉语语音从繁向简的发展趋势;南方各大方言音系比较复杂,更多地保存了古代语音的因素。就声、韵、调三部分来说,官话方言的韵母和声调要比闽、粤、吴、客家诸方言简单得多,唯有声母方面,南、北方言各有繁简,官话方言并不从简。某些整体性的语音现象,例如音变现象、异读现象等,南方各方言大都比北方方言复杂一些。

声母方面 北方方言声母分类较细,南方方言声母分类较粗。官话方言中的北京、西安、济南等地声母都在20个以上,而南方六大方言中,除了吴方言以外,闽、粤、客家、湘、赣等方言,声母一般都不到20个,只有湘方言中的老湘语才有20个以上的声母。闽方言素以语音复杂难懂著称,而声母系统却大都是所谓十五音,即15个声母,如厦门、福州都是十五音。现从几个方面联系古声母来看各大方言声母的特点。

① 古全浊声母的保留与演变。古並、定、从、澄、崇、船、群、匣、邪、禅等声母都是声带颤动的浊声母,有别于声带不颤动的清声母。这一清、浊声母对立的现象在现代汉语七大方言中,除吴方言和湘方言中的老湘语外,其余大都已经消失,官话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闽方言等古浊声母字都合并到清声母字中去了。合并的情况不尽相同,大致有3种类型:一是古全浊声母平声字合到送气清声母中,古全浊声母仄声(上、去、入)字合到不送气清声母中,官话方言属此类,粤方言也基本上属此类;二是古全浊声母字不论什么声调大都合到送气清声母中,客家方言、赣方言属此类;三是古全浊声母字不论什么声调全部或大部合到不送气清声母中,湘方言中的长沙话(新湘语)属此类,闽方言大部分古浊声母字也念为不送气清声母,但仍有部分古浊声母字念为送气清声母。闽方言中有带鼻音性质的浊声母b、g,这在来源上与古全浊声母並、群无关,是从古明、微母和疑母来的(表2)。

② 塞擦音和擦音的分合。古精组声母和知、照组声母发展到现代官话方言的代表点北京话中仍然分为两类,形成tʂ、tʂʰ、s和ʈʂ、ʈʂʰ、ʂ这两套发音部位不同的塞擦音和擦音,加上精组声母在细音(i-、y-)前舌面化,又和见组(舌根音)声母在细音(i-、y-)前舌面化合流而为另一套舌面的塞擦音和擦音tɕ、tɕʰ、ç,这就使以北京话为代表的北方官话有了tʂ、tʂʰ、s、ʈʂ、ʈʂʰ、ʂ、tɕ、tɕʰ、ç共3套塞擦

表2 几个古全浊声母字在汉语各大方言中的读音

地点	爬(並平)	定(定去)	字(从去)	旧(群去)	极(群入)
北京	p'a	tiŋ'	tʂɿ'	tʂiou'	tʂi
苏州	bo	din'	zɿ'	dʒiəy'	dʒiɿʔ
长沙	pa	tin'	tʂɿ'	tʂiou'	tʂi
双峰	bo	din'	dʒɿ'	dʒiu'	tʂi'
南昌	p'a	t'an'/tian'	tʂɿ'	tʂiu'	tʂit
梅县	p'a	t'in'	tʂɿ'	k'iu'	k'it
厦门	pa/pe	tiŋ'/tiā'	tʂu'/li'	kiu'/ku'	kɿk
福州	pa	tiŋ'/tian'	tʂei'	kieu'	kiʔ
广州	p'a	tiŋ'	tʂi'	kau'	kɿk

音和擦音。这3套并存是北方官话声母数目较多的重要因素。南方赣、客家、闽、粤诸方言则3套塞擦音和擦音大都只有一套,或为舌尖的tʂ、tʂʰ、s,或为舌叶的tʃ、tʃʰ、ʃ,至于tʂ、tʂʰ、s,不但只有一套的方言很少见到,拥有两套塞擦音和擦音的方言,如吴方言、湘方言(新湘语)以及官话方言中的西南官话等,一般也只有tʂ、tʂʰ、s和tʂ、tʂʰ、ç而缺少tʂ、tʂʰ、s。与此相关,闽方言和客家方言(部分字)由于保存了“舌上归舌头”的上古语音特点,古知、彻、澄的字与端、透、定的字有合流念为t、tʰ的现象,而tʂ、tʂʰ、ç在只有一套塞擦音和擦音的方言中,一部分精组字仍念tʂ、tʂʰ、s,一部分见组字仍念k、kʰ、x(或h),粤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都如此(表3)。

韵母方面 比较汉语各方言的韵母,可以看出官话方言的韵母比南方各方言的韵母简单得多。官话方言区各地一般都只有30多个韵母,如北京、济南、西安都是38个韵母,沈阳、成都都是36个韵母,只有江淮官话韵母超过40个(扬州46个,合肥43个)。官话方言以外的六大方言中,吴方言、湘方言的韵母数目比较少:长沙38个,上海43个,苏州49个,其余客家、赣、粤、闽等方言区各地方言韵母都在50个以上,韵母特别多的,如闽方言潮汕话有76个,泉州话有72个,比官话方言韵母数多一倍左右。各方言韵母繁简如此悬殊,主要体现在韵母中韵尾的保留和消失上。和古音相比,南方各方言较多保留古音中的系列韵尾,特别是鼻音韵尾和塞音韵尾,而官话方言则保留韵尾比较少。此外,在韵腹方面,各方言拥有的主要元音虽然差别不很大,但当两个以上的元音组成复合韵母时,各方言各具特色。有的方言有比较特殊的组合方式,有的方言还有复韵母和单韵母相互转换的现象。韵头方面也存在一些差异,古代汉语语音中所谓两呼(开、合)四等(一、二、三、四)发展到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成了开、合、齐、撮四呼。以四呼来衡量各地方言,也可看出方言韵母的不同特色。下面从四呼的分合变化、元音韵母的组合、辅音韵尾的保留和分合等方面来看汉语方言韵母的一些表现。

① 四呼的分合。四呼的分合在各地方言中的表现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四呼不齐的现象,这在闽方言、客家方言都有所表现,官话方言中的西南官话部分地区,如云

表3 三套塞擦音和擦音在汉语七大方言区中分合的实际情况

例字	北京	苏州	长沙	南昌	梅县	广州	厦门	福州
资精	.ts ₁	.ts ₁	.ts ₁	.ts ₁	.ts ₁	.tʃi	.tsu	.tsy
之章	.ts ₁	.ts ₁	.ts ₁	.ts ₁	.ts ₁	.tʃi	.tsi	.tsi
知知	.ts ₁	.ts ₁	.ts ₁	.ts ₁	.ti	.tʃi	.ti/.tsai	.ti
基见	.tɕi	.tɕi	.tɕi	.tɕi	.ki	.kei	.ki	.ki
雌雌	.ts ₁	.ts ₁	.ts ₁	.ts ₁	.ts ₁	.tʃi	.ts'u	.ts'i
赤昌	.tʃ ₁	.tʃ ₁	.tʃ ₁	.ts'at/.ts'ak	.ts'ak	.tʃ'rk	.ts'ia ²	.ts'ia ² /.ts'ia ²
耻彻	.ts ₁	.ts ₁	.ts ₁	.ts ₁	.ts ₁	.tʃi	.t'i	.t'i
欺溪	.tɕi	.tɕi	.tɕi	.tɕi	.k'i	.hei	.k'i	.k'i
思心	.s ₁	.s ₁	.s ₁	.s ₁	.s ₁	.ʃi	.su	.sy
诗书	.ʃ ₁	.ʃ ₁	.ʃ ₁	.ʃ ₁	.ʃ ₁	.ʃi	.si	.si
希晓	.çi	.çi	.çi	.çi	.hi	.hei	.hi	.xi
西心	.çi	.si	.çi	.çi	.si	.ʃai	.se/.sai	.se

表4 四呼齐全与否的情况

四呼及例字	北京	西安	无锡	长沙	南昌	昆明	梅县	厦门	潮州
		(四呼齐全)				(无撮口呼)			
开口 车	.tʃ'v	.tʃ'ə	.tʃ'ou	.tʃ'ə	.tʃ'a	.tʃ'ə	.tʃ'a	.tʃ'ia	.tʃ'ia
齐齿 鸡	.tɕi	.tɕi	.tɕi	.tɕi	.tɕi	.tɕi	.ke	.ke	.koi
合口 关	.kuan	.kuæ	.kuε	.kuan	.kuan	.kuā	.kuan	.kuan	.kuen/.kuē
撮口 雨	'y	'y	'y	'y	'y	'i	'i	'u	'hou

表5 部分古果撮合口一等字在七大方言中的读音

例字	北京	武汉	扬州	苏州	长沙	南昌	梅县	广州	厦门
朵	'tuo	'to	'to	'təu	'to	'to	'tə	'tə	'to
锁	'suo	'so	'so	'səu	'so	'so	'sə	'sə	'so
坐	tsuo'	tsə'	tsə'	zəu'	tsə'	ts'o'	.ts'ə	.ts'ə	.tsə'/tsə'
果	'kuo	'ko	'ko	'kəu	'ko	'kuo	'kə	'kwə	'ko
锅	.kuo	.ko	.ko	.kəu	.ko	.uo	.kə	.wə	.o/.e
卧	uo'	o'	o'	ŋəu'	o'	ŋə'/ŋək	ŋə'	ŋə'	go'

表6 北京话和苏州话元音韵母的组合情况

地点	才	开	陪	美	包	到	臭	口
北京	.ts'ai	.k'ai	.p'ei	'mei	.pau	tau'	ts'ou'	'k'ou
苏州	.zə	.k'a	.bə	'mə	.pə	tə'	ts'y'	'k'y

南昆明也存在四呼不齐的现象。不齐主要是缺少撮口呼 y、y- 韵母,有的与齐齿呼 i、i- 合流,如广东梅县、云南昆明,有的与合口呼 u、u- 合流,如厦门(表4)。二是四呼转换的现象。表4中无撮口呼的方言点已显示出有转呼的情况。转呼的突出表现为有些古音属合口呼的字在北京音仍是合口呼,而在某些方言中却转念为非合口韵。常见的如北京念 uo 韵的字,在南北各地方言中,包括湘、

赣、客家、粤、闽等方言和西南官话、江淮官话以及西北官话的部分地区,都有念为开口呼的现象,以古果撮合口一等的字为例(表5)。

② 元音韵母的组合。汉语方言中单元音韵母大多数相同,象 a、o、i、u、e 等许多方言都有,ə、œ、y、ɥ、u、ɥ 等元音在汉语方言中则覆盖面比较小,只出现在少数方言中。相同的元音可以用不同的组合方式构成各具特色的复合韵母,这也是显示方言语音特点的一个方面。例如客家方言的韵母特征之一就是 e 和 u 结合成为 eu 韵,这个 eu 韵几乎各地客家话都有,而在其他方言却不多见。又如 o 和 i 组成的 oi 韵,官话方言和吴方言、湘方言等都没有,而在粤方言、客家方言和某些闽方言,如广东的潮州、海南、雷州等地闽语中却很常见。元音的组合一般多以 i、u 为韵尾,但有的方言却有以 y、u 为韵尾的复合韵,如粤方言的 œy 韵(虚, hœy),闽中方言永安的 au 韵(草'ts'au)和 iu 韵(妙 miu')等,这些都体现出元音组合上的特色。某些韵母在不同方言中有的元音和元音组合成的复韵母,有的却只由单元音独自组成单韵母,显示出复合韵母简化的趋势。例如古蟹、效、流三摄的字,官话方言大都念为 ai、ei、au、ou 等韵,但有的方言却念为单元音韵母,吴方言表现最为突出,湘方言中的老湘语、闽方言、客家方言和官话方言区的部分方言点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表6)。与此同时,另一种相反的现象也显示出方言韵母的特色。某些单元音韵母在个别方言中转化为由元音和元音组合而成的复韵母。例如“毙”字粤方言广州话念为 pɐi',闽方言福州话念为 pei'。又如“具”字北京话念为 tɕy',广州话念为 kœy',福州话念为 kœy',也是由单元音韵母转化为复韵母。

③ 辅音韵尾的保留和分合。古音中的辅音韵尾有鼻音韵尾 -m、-n、-ŋ 和塞音韵尾 -p、-t、-k。这 6 个韵尾在现代汉语各方言中保留和分合的情况很不一致，总的来说，南方方言保留较多，北方方言保留较少，官话方言大多取合并和脱落的方式：鼻音韵尾合并为 -n、-ŋ 两个（有的地方合并为一个），塞音韵尾基本上脱落，只有个别地方把 -p、-t、-k 合并为 -ʔ；长江南岸的吴方言一般是鼻音韵尾只保留一个 -n 或 -ŋ，塞音韵尾只保留一个 -ʔ；湘方言鼻音韵尾保留 -n、-ŋ 两个，塞音韵尾已脱落；客家方言代表点广东梅县话完整地保留了 -m、-n、-ŋ 和 -p、-t、-k 6 个辅音韵尾；赣方言南昌话则少了 -m、-p 韵尾，留下 -n、-ŋ 和 -t、-k；粤方言是 -m、-n、-ŋ 和 -p、-t、-k 齐全；闽方言各支系情况不一，闽东福州话鼻音韵尾合并为一个 -ŋ，塞音韵尾合并为一个 -ʔ，而闽南厦门话除保留 -m、-n、-ŋ 和 -p、-t、-k 外，还多一个 -ʔ，成了 7 个辅音韵尾。在汉语方言的辅音韵尾中，鼻音韵尾 -n、-ŋ 的覆盖面最广，从南到北各地方言几乎都有，或至少有其中的一个。与鼻音韵尾有关的还有鼻化韵。鼻化韵由鼻音韵尾弱化而来，湘、吴、闽诸方言以及官话方言中的华北、西北一部分地区都有鼻化韵，有的地方鼻音弱化以至于从鼻化韵进一步转为开口韵，这在吴方言中表现最为突出（表 7）。

声调方面 现代汉语方言的声调，总的说南方方言调类多，北方方言调类少。官话方言一般以 4 个声调为多，少数 5 个声调，西北有的地方少至 3 个。长江以南只有属于官话系统的西南官话仍保持 4 个声调，其余各方言的声调都在 5 个以上：湘方言 5~6 个，吴方言一般 7~8 个（只有上海是 5 个），客家方言、赣方言都是 6 个，闽方言 7~8 个，粤方言 8~10 个（个别地方少于 8 个）。声调数目的多少是反映方言语音复杂程度的一个重要标

志，声调中有没有保留古音中的入声调类，又是南方各大方言和官话方言的重大差别。粤方言的调类是汉语方言中最多的，它的入声有 3~4 个调类（表 8）。

音变和异读方面 汉语方言的语音特点除了分别从声、韵、调三方面加以分析以外，还可以从音节结构的特点，声、韵、调配合的规律，语音在语流中的变化，字音在实际运用中的异读现象等方面作进一步考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方言中连读音变和文白异读的现象。总的说，连读音变和文白异读在南方各方言中普遍存在，官话方言区的方言，音变和异读现象没有南方方言那样复杂。以连读音变中的变调一项来看，南方各地几乎每个方言都有独自的一套，规律性都很强。例如变调内容非常丰富的吴方言和闽方言，就各有自己的规律：闽方言两字组连读时主要由后一音节决定前一音节的变调，吴方言两字组连读时主要由前一音节决定后一音节的变调。闽方言的连读变调使得每一个字（音节）都有单字调和连读调两种不同的调值，闽东方言（以福州话为代表）连读以后不但声调有变化，连声母韵母也要发生变化，形成声母、韵母在运用中的一系列变体，这些变体正是最能体现闽东方言个性的语音特征。文白异读即通常所谓读书音和口语音的不同。南北各地方言都或多或少有所表现，其中闽方言的闽南一片表现特别突出，以厦门话为例，读书音和口语音各司其职，几乎各自形成一个语音系统，成为体现闽南方言特色的重要内容之一。

词汇特点 汉语方言之间存在着词汇上的差别，具体表现为各地方言都拥有相当数量的方言词，这些方言词有的只通行于某个方言区或某几个方言区，有的只通行于某一个方言片，甚至只通行于某个方言小片，某个方言点。方言词汇的差异，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表 7 各大方言辅音韵尾保留和分合的情况

例字	北京	西安	太原	武汉	扬州	苏州	长沙	南昌	梅县	广州	厦门	福州
三	.san	.sā	.sæ	.san	.sē	.se	.san	.san	.sam	.ʃam	.sam/.sā	saŋ
班	.pan	.pā	.pæ	.pan	.pē	.pe	.pan	.pan	.pan	.pan	.pan	.paŋ
陈	.ʈʂ'an	.ʈʂ'ē	.ʈʂ'æŋ	.ʈʂ'an	.ʈʂ'an	.ʐən	.ʈʂ'an	.ʈʂ'an	.ʈʂ'an	.tʃ'en	.tin	.tiŋ
京	.tʃiŋ	.tʃiŋ	.tʃiŋ	.tʃin	.tʃin	.tʃin	.tʃin	.tʃin	.kin	.kiŋ	.kiŋ	.kiŋ
东	.tuŋ	.toŋ	.tuŋ	.toŋ	.təuŋ	.toŋ	.toŋ	.tuŋ	.tuŋ	.tuŋ	.toŋ	.tun/.təyi
娘	.niaŋ	.niaŋ	.niō	.nian	.nian	.ɲiaŋ	.ɲian	.ɲioŋ	.ɲioŋ	.noeŋ	.liəŋ/.niū	.nuoŋ
鸽	.kʏ	.kʏ	kəʔ/ kaʔ	ko	kəʔ	kʏʔ	ko	kot	kap	kəp	kap	kaʔ
脱	.t'uo	.t'uo	t'uaʔ/ t'uaʔ	t'o	t'oʔ	t'yʔ	t'o	t'ot	t'ot	t'yt	t'uat	t'uaʔ
各	kʏ'	.kʏ	kəʔ/ kaʔ	ko	koʔ	koʔ	ko	kok	kok	kək	kak/.koʔ	kauʔ
托	.t'uo	.t'uo	t'uaʔ/ t'uaʔ	t'o	taʔ	t'oʔ	t'o	t'ok	t'ok	t'ək	t'ək	t'oʔ

表8 从古今调类的异同看汉语方言的声调由3~10个的情况

地点	平			上			去			入			声调数目	
	清	浊		清	浊		清	浊		清	浊			
	春天	群	名	短体	老卵	巨抱	快	半	共	洞	八	德		目日
北京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阴平 上声	阳平 去声	去声	阳平	4
银川	平声	上 声				去 声								3
天水	平声			上声		去声				平声				3
大连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上声	去声	阳平	4	
济南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阴平	去声	阳平	4	
兰州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去声		阳平	4	
太原	平声			上声		去声				阴入		阳入	5	
大同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入声			5	
成都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阳平			4	
武汉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阳平			4	
扬州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入声			5	
苏州	阴平	阳平		上声	阳去		阴去	阳去	阴入	阳入		7		
南通	阴平	阳平		上 声		阳去	阴去	阳去	阴入	阳入		7		
温州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阴入	阳入		8		
长沙	阴平	阳平		上声		上声	阳去	阴去	阳去	入声			6	
湖南双峰	阴平	阳平		上声		上声	阳去	阴去	阳去	阳平(多)阴去(少)			5	
南昌	阴平	阳平	阴去	上声		上声	阳去	上声	阴去	阳去	入声			6
广东梅县	阴平	阳平		上声		上声	去声			阴入	阳入		6	
广州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上阴入 下阴入	阳入		9	
广西博白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上阴入 下阴入	上阳入 下阳入		10	
厦门	阴平	阳平		上声		阳去	阴去	阴去	阴入	阳入		7		
潮州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阴入	阳入		8	
福州	阴平	阳平		上声		上声	阳去	阴去	阳去	阴入	阳入		7	
建瓯	平声	上声	阴去	上声		上声	阳去	阴去	阳去	阴入	阳入		6	

都是“自古有之”的古语词，应该说是同源异流。此外，异源的差异也显示出方言词汇的特色，粤方言中较多借入英语的语词，闽方言却借入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语词，例如“手杖”一词，粤方言叫“土的”，借自英语，闽方言叫“洞葛”，借自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语。北方东北一带借入了一些俄语、满语的语词。这些来源不同的外来词增添了词汇的方言色彩，各有各的特色。

造词差异 同样的概念，汉语各方言往往采用不同的语素，从不同的角度命名，从而形成了一些词形有别、含义相同或相近的方言词。例如粤方言把“手套”叫“手袜”，湖北有的地方叫“手笼子”，就是从不同的角度选用语素。南方“冰”、“雪”不分，粤方言就从这个错觉出发把“冰棍”命名为“雪条”，与之相关，带“冰”的词也都一律用“雪”，如“雪糕”（冰淇淋）、“雪藏”（冰镇）、“雪柜”（冰箱）等等。又如“萤火虫”吴方言叫“游火虫”，赣方言叫“夜火虫”，客家方言叫“火兰虫”，闽方言叫“火金姑”（厦门）、“火夜姑”（潮州）、“兰尾星”（福州）等等。着眼点不同，也就产生了形形色色的同义异形的方言词。这一类的方言词汇在从南到北的方言中都很多，是词汇差异中最主要的一个方面。

构词差异 汉语方言利用共同的语素构词，但在方式上有所不同，形成一批各具特色的方言词。

比如闽、客家方言把“客人”叫“人客”，闽、客家、吴方言把“热闹”说成“闹热”，把“拖鞋”说成“鞋拖”（闽）、把“拥挤”叫“挤拥”（粤），都是把共同的语素颠倒的结果。附加成分的有无和不同，也形成不同的词汇特点，如北方方言多用“子”结尾，南方方言常用“阿”开头（表示人）等等。

词义差异 词形和意义之间的联系有一定的灵活

源流差异 有的方言较多的继承了古代汉语的词汇，这些词汇在别的方言已不用或少用，自然就形成了某一方言的词汇特色，南方闽、粤、吴等方言都有不少这类词语。例如粤方言常用的“睇”（看）、“企”（站）、“行”（走）、“着”（穿）、“镬”（铁锅）、“饮茶”（喝茶）、“佢”（他）……，闽方言常用的“鼎”（铁锅）、“目”（眼睛）、“惊”（怕）、“厝”（房子）、“箸”（筷子）、“索”（绳子）、“头毛”（头发）……，这些

性。不同方言的同一词形在词义上常有所不同,有的甚至与原来的词义几乎失去联系。这类因词义转化而形成的方言词汇差别,最常见的是词义的扩大和缩小。例如闽、粤、客家方言的“肥”和“胖”都叫“肥”,指人的“胖”和指动物的“肥”没有区别;又如南方“食”的含义和北方的“吃”基本相同,但某些南方方言,如闽方言“食”可兼指“喝”(茶)、“吸”(烟);“水”在粤方言、客家方言都兼指“雨”,“下雨”叫“落水”;“手”在闽方言中兼指“手臂”;“蚊子”在长沙话中兼指“苍蝇”。这些都是南方方言词义广、北方方言词义狭的例子。也有南方词义狭、北方词义广的现象,例如官话的“面”,普遍用来兼指面粉和杂粮的制成品,如“小米面”、“棒子面”,儿化后还可以指碾成粉末的东西,如“胡椒面儿”,而在吴、粤、闽、客家等方言中,“面”却用来单指“面条”。词义转化以至所指完全不同的情况在方言中也时有所见。如“冤家”指的是“吵架”(闽)、“对手”指的是“帮忙”(福州)、“爷”指的是“父亲”(客、赣)、“地”指的是“坟墓”(客家)、“客气”指的是“漂亮”(赣)等等。有的方言词义刚好对换,如粤方言的“房”等于普通话的“屋子”,粤方言的“屋”等于普通话的“房子”。形形色色的词义差异,显示出不同方言在词汇上的不同特色。

价值差异 同样一个词,往往在某个方言中是很活跃的常用词,而在另一个方言中却是生僻词。这种价值上的差异也是表现汉语方言词汇特色的一个方面。例如“下”跟“落”这两个动词,南、北各地方言都有,但在粤、闽、客家等方言中,“落”的使用频率和构词能力都要比官话高得多。试以粤方言和北方官话比较:

粤方言	北方官话	粤方言	北方官话
落乡	下乡	落力	卖力
落雨、落水	下雨	落面	丢脸
落课	下课	落形	消瘦变形
落本	下本钱	落船	上船
落手	下手	落定	给定钱
落车	下车		

再如闽方言和普通话都有动词“拍”和“打”,在闽方言中“拍”用得比较广,以厦门话为例,“拍人”(打人)、“拍战”(打仗)、“拍粉”(涂粉)、“拍破”(打破)、“拍条”(开条子)、“拍铳”(打枪)、“拍折”(弄折)、“拍火”(救火)等等,在普通话中,“打”比“拍”使用频率要高得多,据《现代汉语词典》统计,“打”字领头的词目有 179 条,而“拍”字领头的词目只有 14 条。

以上所举汉语方言词汇的差异大都体现在日常生活用词中。总的说来,南方闽、粤两大方言在词汇方面跟官话方言系统各方言之间的差别最大,有人作过粗略的统计,常用语词中,闽、粤方言和共同语不同的,总数大约在 30% 以上(表 9)。

语法特点 语法结构是语言体系中最稳固的。相对来说,汉语方言在语法上的差异性要小一些,但综观各地方言,仍反映出各种各样的语法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 4 个方面。

实词的形态变化 实词中表示语法意义的形态变化,即语法学上所谓构形法的手段,在方言中有不少独特的表现,拿重叠来说,闽方言莆田话单音名词有的可以重叠,重叠后作谓语,例如“目珠柴柴”(眼神呆滞);陕西话单音名词重叠后又可用作定语,如“盒盒粉”(用盒子装的粉);单音动词重叠表示动作概遍性的意义是闽南方言的特色,如厦门话“出出去”(全部出去)、“收收起来”(全部收起来)。形容词在各地方言中都可重叠,但形式各异,吴方言就有前加成分重叠(AAB)、后加成分重叠(ABB)、双音形容词重叠(ABAB、AABB)、嵌词重叠(A 头 AB、A 里 AB、A 透 A 透)等多种不同的重叠方式。普通话和多数方言里的单音形容词只重叠一次,如“红红”、“白白”,而闽方言的单音形容词却可以重叠多次,并且一次比一次表示的程度更高,如“红—红红—红红红”,必要时甚至可以重叠至 5 次之多。再从附加前缀和后缀来看,各地方言也有不同表现,例如“阿”是南方方言常用的前缀,“子”虽是南北各地方言普遍存在的后缀,但使用的范围却很不一致,四川话有“树子”、“羊子”的说法,吴方言用得更广,“车子”、“镢子”、“学生子”,甚至表示时间的词也可以加“子”,如“昨日子”、“明朝子”等。利用语词内部语音变化来表示语法意义,这种内部屈折在方言中也不乏例子。如粤方言用声调的变化来表示动作行为的完成,如“我食啦”和“我食(过)啦”,后句意思是“吃”的行为已完成,用变调(jik 的调值由 22 变 35)来表示。闽方言许多地方都利用音素的变化表示人称代词的复数,如厦门话:gua⁵³“我”、li⁵³“你”、i⁴⁴“伊,他”,变成复数时是:gu(a)n⁵³“我们”、lin⁵³“你们”、in⁴⁴“伊们,他们”。

虚词的不同用法 虚词的运用是汉语语法的特色。汉语方言在这方面也有不少特点。拿助词来看,各地方言的助词跟普通话差别很大。表领属关系的结构助词“的”在官话方言中大体上都以舌尖音 t 开头,如 ta、ti 之类,而在南方各方言中,大体上都以 k、g 等舌根音开头,如上海话 go²、南昌话 ko²、梅县话 ke²、广州话 ke²、福州话 ki。俨然分成南、北两派。又如表示时态的助词,各地方言也很不一样,动作的完成苏州话用“仔”,如“去仔一趟”,广州话用“咗”,如“去咗广州”,四川话用“倒”,如“吃倒饭”,湖南双峰话(老湘语)用“解”,如“他上解课就回去”等等,各有特色。再拿语气词的运用来看,各地方言有很多独具一格的语气词,如吴方言苏州的“哉”、“哉晚”、“唉”、“噢”、“阿”,粤方言的“咩”、“噯”、“噃”、“啱”、“啱”、“啱啱”、“之嘛”等等,其中有的语气词所表达的语气很复杂,不容易用共同语对译,如粤方言的“啱”,有时有提醒对方的口气,有时有轻蔑的意味,有时又只是一种没有意义的口头禅。形形色色的语气词表达了丰富多采的感情,对增添方言的特色很有作用。例如介词、连词等虚词,在方言中也都或多或少有独特的表现。

语序的特点 语序在汉语语法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各地方言的语序跟普通话差别不大,一些最基本的结构,

表9 部分常用语词在一些方言中的说法

普通话	北京	沈阳	西安	成都	扬州	苏州	长沙	南昌	梅县	厦门	广州
白天	白天	白天	白日	白天	日里	日里	白天、日中间	日里、日上	日时头	日时	日头
晚上	晚上	下晚儿、晚上	黑咧	黑了	夜头	夜里	夜间子	夜晚	暗晡头	暗冥、夜昏	晚头、晚黑
头	脑袋	脑袋	脑壳	脑壳	头	头	脑壳	头	头那	头壳	头壳
脖子	脖子	脖子	脖子	颈项	颈项	头颈、颈根	颈根	颈	颈筋	颈管	颈
东西	东西	东西	东西	东西	东子	物事	东西	东西	东西	物件	野
衣服	衣裳	衣裳	衣裳	衣裳	衣裳	衣裳	衣服	衣裳	衫裤	衫裤	衫裤
肥皂	胰子	胰子	洋碱	洋碱	洋胰子、肥皂	肥皂	胰子油、肥皂	肥皂	番视	雪文	番视
丈夫	男人	男人	男人	男人	男人、丈夫	男人	男人	老公、男客	老公	翁	老公
妻子	媳妇儿	老婆	女人	婆娘、女人	老婆、女人、堂客	女人、家主婆	堂客	老婆、女客	老婆	嫩	老婆
儿子	儿子	儿子	儿子	儿	儿子	儿子	伢子、崽	崽	赖ㄟ	仔、后生	仔
亮	亮	亮	亮	亮	亮	亮	光	光	光	光	光
干净	干净	干净	干净	干净	干净、清爽	清爽	干净	干净	净	清气	干净
舒服	舒坦	舒坦、如作	舒服	舒服、安逸	好过	适意	好过	舒服	舒服、快活	舒服、畅	舒服、自在
知道	知道	知道	知道	晓得	晓得	晓得	晓得	晓得	知得	知影、知	知(道)
找	找	找、摸	找	找	找	寻	寻	寻	寻	撵	搵
吸(烟)	抽	抽	吸、抽	吃、抽	抽、吃	吃	抽	抽	食	食	食
看	瞧、瞅、看	看、瞅	看	看	看、望	看	看	看、望	看	看	睇
睡觉	睡觉	睡觉	睡觉、瞌睡	睡瞌睡	睡觉	瞌觉	瞌觉	瞌觉	睡目	瞌	瞌觉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俚	他	佢	佢	伊	佢
什么	什么	什么、啥	啥	啥子	什么	啥	么子	𪗇t ³ /i ³³	脉介	什物	乜嘢

如主语—述语—宾语、定语和状语在前、中心语在后的格式，各地方言的语序大都相同。可是，大同中仍有小异，例如状语的位置，粤方言有一些常用的词作状语时经常后置，例如：“你去先”(你先去)，“食多啲”(多吃一点儿)，“买两斤香蕉添”(再买两斤香蕉)，“呢条裤长得滞”(这条裤子太长)等；补语的位置在方言中也有特别的现象，例如“我打不过他”在粤方言中既可说成“我打唔过佢”，也可说成“我打佢唔过”，吴方言的绍兴话有“打伊败”(打败他)的说法。双宾语中两个宾语的次序在普通话中一般是指人的宾语在前，指物的宾语在后，但南方粤、闽、客家、吴、赣等方言中都存在着另外的格式：指物的宾语在前，指人的宾语在后。例如“给他一本书”这句话，广州话说成“畀”(给)一本书佢(他)”，上述其他方言也都类此。

几种句式的不同结构 有几种汉语中常用的句子，方言中存在着特殊的结构方式。比较句中的不等式：客家方言用“甲—比—乙—过—性状词”，如“佢比佢过大”(他比我大)，粤方言用“甲—形容词—过—乙”，如“今日冻过琴日”(今天比昨天冷)，闽方言用“甲—较—形容词—乙”的格式，如台北话“台南较细台北”(台南比台北

小)。被动句：不少方言中的被动句跟普通话不同，由于没有专用介词“被”，大多采用表示“给予”意义的动词来兼表被动，如广州话的“畀”，厦门话的“互”，梅县话的“分”，上海话的“拨”等，如广州话“佢畀狗咬亲”(他被狗咬了)，厦门话“伊互人拍一下”(他被人打了一下)。被动句的结构有些方言也与众不同，如青海话用“给”表示被动，但却置于动词之后，如“他的书看给了”(他的书被人看了)。普通话被动句中的“被”字后面不一定要引出主动者来，而在南方一些方言里，却非把主动者引出不可，例如“茶杯被打破了”，上海话说“茶杯拨伊(或某人)打破了”，“伊”是不能少的。处置句：就是把字句，汉语各方言结构大致一样，但在介词的选用上各有特色，有用“将”(闽、粤、客家)，有用“拨”(吴)等等，有的地方处置句跟被动句完全一样，同一句话可以有两种解释，如鄂东楚语“我把他气死了”这句话，既可以是我“把”他气死，“我”是主动者，也可以是我“被”他气死，“我”是被动者。疑问句：普通话的疑问句可以单纯用语调表示，可以在句末加疑问语气词，也可以在谓语部分肯定与否定相叠，南方各方言在运用肯定与否定相叠时，结构上有独特之处，粤方言常把宾语提到肯定与否定之间，如“你去学校唔去”(你

去不去学校),闽方言和吴方言则采取在句末加否定副词的办法表示疑问,如海南闽语“你去看电影无?”(你去看电影吗?)除了上述几种常用的句子在汉语方言中存在着不同的特点以外,有的方言还存在一些独有的特殊句型,也很引人注目。闽方言中有一些用“有”、“无”带上动词(或动词结构)、形容词组成的句子,在其他方言中就很少见。例如厦门话“者久伊有来我无去”(这一向他来过我没去过),台北话“去新竹有远无?”(到新竹去远不远?)潮州话“伊有睇戏,我无睇戏”(他看了戏,我没看戏)等。

汉语方言的研究

汉语方言的研究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大体说来,从扬雄的《方言》到章炳麟的《新方言》,古代汉语方言学经历了1900年左右,从“五四”运动到现在,现代汉语方言学又经历了近70年的发展过程。

古代汉语方言学 先秦古籍中已有方言的著录。相传古代帝王为了体察民情风俗,博通天下名物,在每年秋后的农暇季节,派遣使臣乘坐轻便的车子到各地去搜集方言异语。这大概就是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序》上所说“周秦常以岁八月,遣輶轩之使,采异代方言,还奏籍之,藏于密室”的情形。但这些都还不能说是方言的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汉语言文字从先秦发展至汉代已经有了重大的变化,人们阅读古籍已有许多困难。为了适应阅读和研究古代典籍的需要,汉代便兴起了以诠释词语为主要内容的训诂学。扬雄《方言》(全名《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是汉代训诂学一部重要的工具书,也是中国第一部汉语方言比较词汇集。它的问世表明中国古代的汉语方言研究已经由先前的萌芽状态而渐渐地发展起来。《方言》被誉为中国方言学史上第一部“愚之日月而不刊”的著作,在世界的方言学史上也具有重要的地位。

从汉末创制反切以后,中国古代语言学在发展训诂学的同时,又渐渐地兴起了音韵学。汉语方言研究跟训诂学和音韵学都有密切的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的许多韵书,如李登的《声类》、吕静的《韵集》、夏侯咏的《韵略》、周思言的《音韵》、李杲的《音谱》等,它们大都是“各有土风”的方言同音字表。到了隋唐时代,中国社会结束了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的局面,加上经济的发展,科举制度的实行,反映在语言文字上,对共同语规范的要求十分迫切,着重中原正音、排斥方言土语的风气相当突出。因此隋代陆法言编撰《切韵》之后,方言韵书不仅很少有新著出现,就是原有的一些也都因被忽视而先后亡佚。从隋唐到宋元之际,汉语语音又发生了重大变化,以正音为目的的《切韵》、《唐韵》、《广韵》、《集韵》一系韵书,由于跟口语相距日远,渐渐失去了语音规范的作用,只是作为诗韵而被文人沿用。这多少为音韵的研究转向从实际语音出发的道路创造了客观条件。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了元末周德清以14世纪初期反映北方口语语音的北曲为依据而编成的《中原音韵》,而且以它为先导,以后产生了一系列北音系统的韵书。这在汉语音韵学上是一

个划时代的重大革新,也给汉语方言的研究带来了新的变化。比如明朝晚于《中原音韵》100多年兰茂编的《韵略易通》,晚于《中原音韵》300多年毕拱宸编的《韵略汇通》等韵书,反映了北方话即官话方言中某些地点方言的语音系统。这一类北音韵书不仅对研究某些方音的历史演变有参考价值,而且对研究地方音跟其他官话方言音系的关系等也都有一定的作用。除韵书以外,某些字书和笔记杂谈性质的著作也有方音材料的著录。如唐代颜师古的《匡谬正俗》、宋代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明代张位的《问奇集》等书中都谈到各地的一些方音。从魏晋迄于元明时期,方言词汇的研究专著很少,零星的材料大多散见于笔记、杂谈之类的著作之中。如宋代陆游的《老学庵笔记》、明代陶宗仪的《辍耕录》、扬慎的《丹铅总录》、胡应麟的《庄岳委谈》、郎瑛的《七修类稿》等书中都有方言俗语的记载,但其规模和成就远不及扬雄的《方言》。东晋的郭璞继承了扬雄重视活的方言词汇的传统,为扬雄《方言》作了第一个注本,他以晋代方言来跟扬雄所记的汉代方言相比较,指明某些汉代方言词语保存在某地,转移到何处,或已发展为通语,因而《方言注》保存了汉晋时期语言流变的不少材料,正如王国维所说:“读子云书,可知汉时方言;读景纯注,并可知晋时方言。”(《观堂集林》卷五《书郭注〈方言〉后一》)。

清代是中国传统语言学的鼎盛时期。汉语方言的研究这时也得到了比较全面的开展,取得了较大的学术成就:①撰写了许多调查、辑录和考证方言俗语的著作。其中有的以比较通行的一般性的方言俗语作为调查、辑录和考证对象,如钱大昕的《恒言录》、陈鱣的《恒言广证》、孙锦标《通俗常言疏证》、钱坫的《异语》、翟灏的《通俗编》、梁同书的《直语补证》、张慎仪的《方言别录》、钱大昭的《述言》、平步青的《释彥》、胡式钰的《语彙》、郑志鸿的《常语寻源》、易本煌的《常语接》、顾张思的《土风录》、梁章钊的《称谓录》、罗振玉的《俗说》等;有以某个地点方言或区域方言的方言俗语作为调查考证对象的,如孙锦标的《南通方言疏证》、李实的《蜀语》、张慎仪的《蜀方言》、胡韞玉的《泾县方言》、胡文英的《吴下方言考》、范寅的《越语》、毛奇龄的《越语肯綮录》、茹敦和的《越言释》、刘家谋的《操风琐录》、詹宪慈的《广州语本字》、杨恭恒的《客话本字》等。这些著作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以考证某一词语的历史渊源为目的,旨在指出某一方言词语最初见于何书,或出自何人所撰著作,寻找所谓“初见”;另一类是以考求某一词语的“本字”为目的,旨在“证俗世之伪字”,或使他人“多获一字之益”。②撰写了好多种续补扬雄《方言》的著作。如杭世骏的《续方言》、程际盛的《续方言补》、徐乃昌的《续方言又补》、程先甲的《广续方言》和《广续方言拾遗》、张慎仪的《续方言新校补》和《方言别录》等,这类著作大都引经据典,就古文献资料探求古方言词语。③做了校勘疏证扬雄《方言》的工作。如戴震的《方言疏证》、卢文弨的《重校方言》、刘台拱的《方言补校》、钱绎的《方言笺疏》、王念孙的《方言疏证

补》等。这类著作有助于研读《方言》。在清儒研究方言词汇的著作中,章炳麟的《新方言》取得了突出成就。它发扬了扬雄《方言》重视活的方言词语、不受文字束缚等优点,吸取了训诂学和音韵学的研究成果,采用了音、义结合的原则,即所谓“疑于义者,从声求之;疑于声者,以义正之”,能从语音的关连上来证明词义之间的联系,探求词的渊源,依据古今音变的条例来考释词源而不受文字的束缚,并且能以今天的方言事实来加以证明。清人在方言音韵的研究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①有的音韵学者比较重视各地方音,在他们的论著中往往记述了某些方言的特点。如胡垣的《古今中外音韵通例》、陈澧的《广州音说》、劳乃宜的《等韵一得》、潘耒的《类音》、李邕的《切韵考》、顾炎武的《日知录》、江永的《音学辨微》、李汝珍的《李氏音鉴》、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等著作中都有实际方音的记载。②有不少流传于民间、用反切方法编成的地方韵书。如福州的《戚林八音》、泉州的《汇音妙悟》和《拍掌知音》、漳州和厦门的《雅俗通十五音》、潮汕的《潮汕十五音》、广州的《千字同音》、徐州一带的《十三韵》、武昌的《字汇集》、江西靖口一带的《辨音摘要》、河北一带的《五方元音》、山东一带的《十五音》等。这些韵书以方音为依据,以帮助当地人辨音识字为目的,虽然在审音上有的并不够精确,但大体上还是符合当时的方音实际的,因而给后人留下了不少难得的材料。③清代一些研究戏曲声律的著作也常涉及方音。如王德辉、徐沅所撰的《顾误录》,里面所记的南北方音的一些差别,证之于今天的方音实际也还是符合的。④清代各地编修的地方志中也有不少方音材料。如段玉裁参与编修的《富顺县志》、俞樾参与编修的《续天津县志》和《上海县志》、钱大昕参与编修的《长兴县志》和《鄞县志》、杭世骏参与编修的《乌程县志》和《平阳县志》等,除录有方言土语方面的材料外,还有一些当地方音情况的记述。

现代汉语方言学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汉语方言研究由古代进入了现代时期。现代汉语方言学跟古代汉语方言学具有各不相同的特点,研究的对象、目的和方法都发生了根本变化。现代汉语方言学要求全面地调查研究活的方言口语,要求使用音标和运用现代语言学的原理,以记录方言事实并分析它们的特点和结构系统;而古代汉语方言学则主要搜集、考证文献资料,即使是调查当代的方言词语,主要目的也是为了考求“本字”和寻找词语的所谓“初见”,从而为阅读和研究古籍服务。1923年沈兼士说:“我们今后研究方言之新趋势与旧日不同者,综有三点:①向来的研究是目治的注重文字,现在的研究是耳治的注重言语;②向来只是片断的考证,现在需用有系统的方法实行历史的研究和比较的研究,以求得古今方言流变之派别,分布之状况;③向来只是孤立的研究,现在须利用与之直接或间接关系之发音学、语言学、文字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民俗学等,以为建设新研究的基础。”(《段砚斋杂文·今后研究方言新趋势》)这三点不同表明现代的汉语方言研究不仅在研究的对象

和目的上,而且在方法论上都跟汉语方言研究的古典传统具有本质差别。1924年1月,北京大学成立了方言调查会并发表了宣言书,规定了方言调查会的任务,制订了一套以国际音标为基础的记录方言的字母,并且标注了14种方音作为实例。调查会开展了对方言的含义和范围问题的讨论,进行过一些方言调查工作,并在《歌谣周刊》和《国语周刊》等刊物上发表了一些调查研究方言的文章,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一时呈现活跃的景象。1927年清华学校组织了对吴语的调查。随后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倡导和组织下进行过多次规模较大的调查:1928~1929年两广方言的调查,1933年陕南方言的调查,1934年徽州方言的调查,1935年春江西方言的调查,1935年秋湖南方言的调查,1936年湖北方言的调查,1940年春云南方言的调查,1940年秋四川方言的调查。由于以现代的活方言作为调查研究的对象,又采用了新的记录、描写和分析方言的方法,这些有计划的调查也就取得了空前丰富的方言材料。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是第一部吴方言综合性的调查报告,也是第一部研究现代汉语方言的代表性著作,影响很大。《湖北方言调查报告》(1948)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出版的篇幅最大、学术价值很高的一部方言调查报告。白涤洲遗稿、喻世长为之整理的《关中方音调查报告》(1954),内容包括陕西南部50个地点的语音材料,并附有方音地图23幅,注意到方言的音变问题是它的一个显著特点。现代汉语方言的研究除上述区域性的著作外,还有不少专门研究某一地点方言的著作,如赵元任的《钟祥方言记》(1939)和《中山方言》(1948)、罗常培的《厦门音系》(1931)和《临川音系》(1941)、陶燠民的《闽音研究》(1930)、董同龢的《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1956)、黄锡凌(1908~1959)的《粤音韵汇》(1941)等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赵元任的《钟祥方言记》共分4章,包括语音分析、本地音韵、比较音韵、分类词汇等,其中本地音韵和比较音韵的写法较多采用表格形式,简明扼要。罗常培的《厦门音系》细致地分析了厦门方音,对厦门音跟《广韵》的比较颇为精密,并指出了区别单字音和说话音的重要性,促进了现代汉语方言的研究。至于在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的研究汉语方言的单篇论文那就更多了。20世纪20~40年代的现代汉语方言研究,一般都比较注重语音的细致描写和分析,兼顾古今音韵的对比,审音比较严格,考证古音也下过很深的功夫。这一时期出版、发表的论著涉及全国汉语方言的县、市约近200个,这一数目虽然只占全国2000多个汉语方言调查点(以1县、市为1个点计算)的1/10左右,但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却使汉语方言学从此建立在比较坚实的基础之上,并从过去作为语文学的附庸发展成为现代语言学领域中一门独立的学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由于文字改革、推广普通话、汉语规范化这3项语文政策的贯彻执行,现代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受到了重视,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表现为:

① 方言普查取得了很大成绩。1955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文字改革工作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为了更有效地开展推广普通话的工作,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于1956年3月联合发出了《关于汉语方言普查工作的指示》。随后中央和各省市都相继成立了有关的领导机构,制订了汉语方言普查工作的计划和步骤。这次汉语方言普查的主要任务是初步调查汉语方言的语音情况,但调查范围之广,参加人数之多,都是汉语方言研究史上前所未有的。只用了两年多时间就基本上完成了以1个县、市为1个点的全国汉语方言的普查任务,然后运用普查所得的方言材料编写各地学习普通话的手册,随后又转入综合整理普查材料、编写各省市方言概况。据有关部门统计,当时全国除西藏外共有县、市2298个,已普查汉语方言1849个点(以1县、市为1个调查点),编写调查报告近1200份,各省市随后编出了300多本《××人学习普通话手册》(或《××人怎样学习普通话》),其中已出版的有72种,还编写出方言概况一类综合性调查报告18种,其中有的已经正式出版,如《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1960)等,有的尚未正式出版,如《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等。这一批研究成果不仅对贯彻各项语文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进一步调查汉语方言和提高整个汉语研究的水平也都是一宗十分宝贵的资料。

② 出版了一些研究现代汉语方言、指导方言调查的专著和工具书。如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的《方言调查字表》(1955)、《汉语方言调查简表》(1956)、《方言词汇调查手册》(1956),李荣著的《汉语方言调查手册》(1957),河北省昌黎县县志编纂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合编的《昌黎方言志》(1960),袁家骅等著的《汉语方言概要》(1960),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编的《汉语方言字汇》(1962)和《汉语方言词汇》(1964)等,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与此同时,还翻译、出版了一些国外方言学理论的书。

③ 整理、出版了清人研究方言俗语的一些著作。如钱大昕的《恒言录》,陈鱣的《恒言广证》,翟灏的《通俗编》等;在整理、校勘扬雄《方言》方面,有周祖谟校笺、吴晓铃编制通检的《方言校笺及通检》。

近年来汉语方言的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①出版了中国方言研究领域内第一份专业杂志《方言》季刊。②1981年成立了全国性的学术组织全国汉语方言学会,有的省市,如山东、山西、湖南、广东、天津等也成立了省市一级的研究汉语方言的学术团体;有的大学,如厦门大学、复旦大学、暨南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成立了汉语方言研究室。③第6个五年计划期间(1981~1985)全国语言学发展规划中列入了《汉语方言分区图集》、《山西省方言志丛书》、《苏州方言志》、《上海市区方言志》等研究汉语方言的项目。④再版和出版了一些汉语方言学方面的著作,如《方言调查字表》(1983,新1版),《汉语方言概要》(1983,第2版),《昌黎方言志》(1984,新1版),詹伯

慧的《现代汉语方言》(1981),饶秉才、欧阳觉亚、周无忌的《广州话方言词典》(1981),高华年的《广州方言研究》(1980),叶祥苓的《苏州方言地图集》(1981),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的《普通话闽南方言词典》(1982),钱曾怡等的《烟台方言报告》(1982),梁德曼的《四川方言与普通话》(1982),张振兴的《台湾闽南方言记略》(1983),李永明的《衡阳方言词汇》(1984)等。詹伯慧的《现代汉语方言》,首先简要地说明方言与方言学的有关知识,然后分章综合论述汉语方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的特点,并分别论述汉语七大方言区的形成和分布,以及各方言区有代表性的音系。张振兴的《台湾闽南方言记略》,根据发音合作人所提供的材料,对通行在台湾省台北和台南的闽南方言进行了简要的描写和分析,除语音方面的材料外,还记录了4000条左右常用的方言词语,比较详细地说明了几个主要的语法特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现代汉语方言的研究具有新的特点,就是为贯彻文字改革、推广普通话、汉语规范化等各项语文政策服务。近年来更注意方言研究的实用性跟学术性、系统性的进一步统一,注意区域方言的综合研究跟单点方言的深入研究的进一步统一,注意从语音研究逐渐向词汇、语法方面扩展并开拓其他新的研究领域,注意更好地介绍、借鉴国外语言学者研究汉语方言的新方法和新成果。

此外,近二三十年来,香港、台湾以及日、美等国的学者也先后撰写、出版了不少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汉语方言的著作。主要的有赵元任的《台山语料》(1951)、《绩溪岭北音系》(1962)、《绩溪岭北方言》(1965,与杨时逢合著),杨时逢的《云南方言调查报告》(1969)、《湖南方言调查报告》(1974)、《四川方言调查报告》(1984),董同龢的《四个闽南方言》(1959)、《记台湾的一种闽南话》(1967,与赵荣琅、兰亚秀合著),丁邦新的《台湾语言源流》(1979),罗肇锦的《客语语法》(1984),张洪年的《香港粤语语法研究》(1972),蔡俊明的《潮语词典》(1976),余儒芹的《粤语研究》(第1卷,1972),包拟古的《福建厦门口语》(1955),易加乐的《隆都方言》(1956),罗杰瑞的《福建建阳方言》(1969),桥本万太郎的《客家方言》(1973)、《海南文昌方言》(1976)、《临高方言》(1980),村上嘉英的《现代闽南语辞典》(1981),司马侃的《现代上海话口语的共时音韵论》(1980),辻伸久的《广西粤语比较音韵》(1980),中岛干起的《吴语的研究》(1984),以及杨福绵的《中国方言学分类参考书目》(1981)等。(参见彩图插页第62页)

参考书目

袁家骅等:《汉语方言概要》,第2版,文字改革出版社,北京,1983。

詹伯慧:《现代汉语方言》,湖北人民出版社,武汉,1981。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编:《汉语方言字汇》,文字改革出版社,北京,1962。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编:《汉语方言词汇》,文字改革出版社,北京,1964。

(许宝华 詹伯慧)

Hanyu fangyan cidian

汉语方言词典 (dictionaries of the Chinese dialects) 汇集和解释汉语方言词语的工具书。中国古代的汉语方言研究比较注重词汇, 杨雄的《方言》就是一部比较词汇集, 但它还不是方言词典。词典要求注音准确、释义周全并注明词语的具体用法和语法类别, 词汇集一般都比较简单。

清末以来, 西方传教士运用拼音文字调查了不少南方方言, 编纂了一些方言词典。其中规模较大、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有 R. S. 麦克莱和 C. C. 博德温合编的《福州方言词典》(1870, 福州出版), E. J. 艾特尔编的《广东方言词典》(1877, 香港出版), C. 道格拉斯编的《厦门方言口语词典》(1899, 伦敦出版), C. 雷伊编的《客家方言词典》(1901, 香港出版), D. H. 戴维斯等编的《上海方言词典》(1911, 上海出版) 和 D. C. 依巴涅兹编的《班华(福安方言)词典》(1941, 上海出版)。这类方言词典都用罗马字母注音, 按音序排列方言词语, 注明汉字的写法, 用西文解释。拿它们和现代方言口语作比较, 可以了解近百年间方言语音和词汇的变化。但这些词典有的审音不严、释义不准, 又由于注重传教的需要, 收了不少日常少用的书面语词, 口语词常有遗漏。此外, 所注汉字也比较凌乱, 或本字, 或训读, 或取俗字、同音字。

近 50 年间, 随着语言学的发展, 一些学者运用现代的科学方法先后编写了不少规模较大的汉语方言词典。官话方言方面, 陆志韦编的《北京单音词词汇》(1951, 科学出版社), 前面有说明, 阐述作者分解北京话单音词的方法和确定词类的方法, 正文按音序排列, 先为每一个词标音定性, 然后用 6 000 多个例句说明每个单音词和单音语素的不同义项和用法。该书不但是一部比较完整的北京单音词典, 而且是研究北京话语法的重要参考书; 张洵如编的《北平音系小辘编》(1949, 开明书店) 和《北京话轻声词汇》(1957, 中华书局) 收集了富于北京方言特色的儿化词和轻声词各 5 000 条左右, 除逐条标音并按音序排列外, 凡在普通话里不十分通行的词都作了解释, 儿化词引用了《红楼梦》等书面语言的例句。陈刚编的《北京方言词典》(1985, 商务印书馆) 收词较多。此外, 还有一些规模较小的北京话、东北话等北方方言的词典。

为南方诸方言编的词典中, 数量多、质量高的首推闽南方言词典。比较重要的有台湾学者蔡培火编的《国语闽南话对照辞典》(1969, 台北), 蔡俊明编的《潮语词典》(1976, 台北三民书局), 日本学者村上嘉英编的《现代闽南语辞典》(1981, 日本天理大学) 和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汉语方言研究室主编的《普通话闽南方言词典》(1982, 福建人民出版社)。后两部收词都达数万条, 词义的解释也比较细。蔡培火和村上嘉英多从台湾闽南话取材, 蔡俊明从粤东的潮州方言取材, 厦门大学主要收集厦门话词语, 兼顾泉州和漳州的说法。《潮语词典》以多收口语、多附例句、为名词逐一注明相应的量词等见长, 《普通话闽南方言词典》以分注文白读、考本

字、分词性见长。这几部词典对于全面地研究闽南方言, 了解其内部差异, 帮助闽南人学习普通话都有重要价值。

此外, 成果较多的是粤方言的词典。其中影响较大的有 3 部: ①黄伯飞编的《英粤·粤英辞典》(1970, 美国耶鲁大学) 是粤方言和英语的双语词典, 粤方言词用罗马字母注音并注有汉字, 附有例句, 便于懂英语的人学习粤方言和粤语区的人学英语。②饶秉才、欧阳觉亚和周无忌合编的《广州话方言词典》(1981, 香港商务印书馆), 专收和普通话说法不同的方言词语 5 000 多条, 按方言音序把同根词排列在一起, 分义项加以解释, 并附有方言音系和词汇特点的说明、俗字表, 以及广州话和普通话对照字表, 这对于推广普通话及进一步研究广州话都有实际意义。③曾子凡编的《广州话普通话口语词对译手册》(1982, 香港三联书店), 收入 8 000 多条词语, 按词义和词性分为 33 类, 普通话解释部分并注有汉语拼音, 每一类词语之后还编了会话材料, 适用于熟悉广州话的人学习普通话。

吴方言方面, 有闵家骥、范晓等编的《简明吴方言词典》(1986, 上海辞书出版社), 收词 5 000 多条。

1979 年《方言》季刊创刊以来, 先后发表了不少方言词汇, 这些方言词汇有的规模较大, 收集了数千条方言词语, 全都用国际音标标音, 释义也比较细, 有的还注意到把同根词排在一起, 有的列有例句, 这些都可以作为编写方言词典的基础。

汉语方言种类多, 历史长, 彼此之间的词汇差异也大, 因此无论编写哪种类型的方言词典都具有学术价值和实用意义。

(李如龙)

Hanyu Fangyan Cihui

《汉语方言词汇》 (*Lexicon of Chinese Dialects*) 比较方言词汇集。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编。1964 年 5 月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本书收集了 18 个方言点的 905 条词语。18 个方言点是: 北京、济南、沈阳、西安、成都、昆明、合肥、扬州(以上属官话方言), 苏州、温州(以上属吴方言), 长沙(湘方言), 南昌(赣方言), 梅县(客家方言), 广州、阳江(以上属粤方言), 厦门、潮州、福州(以上属闽方言)。905 条词语按词类和词义相结合的分类法排列。书中词汇表前列有 18 个方言点的声韵调, 所收词语依据各方言的语音系统用国际音标标音。本书为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和进一步开展汉语方言词汇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汤珍珠)

Hanyu fangyan ditu

汉语方言地图 (maps of the Chinese dialects) 用符号显示汉语方言差异和分区的地图。中国绘制汉语方言地图的历史比较短暂。大多数汉语方言地图都是现代汉语方言专著的一部分, 如《湖北方言调查报告》、《昌黎方言志》、《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等, 单独成书的有《苏州方言地图集》。

汉语方言地图的安排一般前面都有一张综合图或参考图,反映该方言的分区和调查点的情况,后面是条目图,标记具体方言现象的地理分布。每幅图都有图例。标记方言现象的符号不一致,大致可分为圆形符号和线形符号两种。可以《昌黎方言志》和《湖北方言调查报告》两书为例说明汉语方言地图的绘制情况。

《昌黎方言志》(1960)收有昌黎方言地图12幅,先是1幅参考图,列举193个调查点;然后是第1~11图,都是方言现象分布图,其中第1图是声母方面的条目,第2图、第3图是韵母方面的条目,第4~6图是声调方面的条目,第7~11图是个别字音和词汇方面的条目。昌黎方言地图(图1)在画法上有两个特点:一是图上圆形符号表示调查点的位置,同时表示语言现象;二是图例一致,都用黑圆点“●”表示昌黎北部的语言现象,用圆圈“○”表示昌黎南部的语言现象,用半黑半白的圆圈“◐”表示两者都可(少数图有例外情况)。《昌黎方言志》对昌黎方言南北两区的差别及地图都有详细说明,可惜当时没有画综合图。由于条目都经过选择,如果把11幅图里的语言现象画成同言线,即可看出昌黎方言的同言线大致是东西向的走向和昌黎方言分为南北二区的面貌。例如第4图为“头·上、黄·瓜”的声调,第5图为动词

“没”字和副词“没”字的声调,第6图为“倒·上、道·上”的声调,这3幅图里的条目都有代表性,使用频率也高,因而在昌黎方言分区上具有重要意义;如果把它们画成同言线,都呈现东西向的走向,其中第4、5二图的同言线完全重叠。《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1960)收方言地图42幅。叶祥苓著的《苏州方言地图集》收方言地图50幅,画法跟昌黎方言地图差不多,都采用圆形符号标记法。《苏州方言地图集》是第一本单独成书的方言地图集,前面有苏州地理人口概况、调查经过、方言地图的体例和说明等内容,后面的主要部分为50幅苏州方言地图,详细地标记出苏州方言地区263个调查点的有关语音和词汇条目的分布情况。

《湖北方言调查报告》(1948)共收湖北方言地图66幅。前面的第零图参考图,反映湖北方言分为4个大区的大致情况。接着是64幅方言现象分布图,其中第1~44图为声韵调方面的条目。第45~54图为特字方面的条目,第55~64图为词类方面的条目。最后1幅为综合地图,用同言线综合反映前面64幅方言地图中所列方言现象的地理分布情况。湖北方言地图选条合理,内容丰富,在画法上采用线形符号,并连接同言线使之成圈的办法。例如第7图(图2)反映邪母平声“囚、详”二字声母的发音方法,“图例”列6种符号表示6种读法:①“(无号)”,“囚、详”读s方法;②“三三”,“囚、详”读t'方法;③“三三三”,“囚”读t'方法,“详”读s方法;④“|||”,“囚”读s方法,“详”读t'方法;⑤“:::”,“囚、详”读t'方法;⑥“三三三”,“囚、详”读t, z方法。第7图就用上述符号标记“囚、详”二字读法的地理分布,并用同言线把读法相同、分布区域相连的地方圈起来,共有10个同言线圈,其中读①、④、⑤、⑥的各有一个同言线圈,读②、③的各有一个同言线圈。两种不同读法之间同言线的画法,采取两边相邻点之间等距离中分画线的办法。《关中方音调查报告》(1954)收方言地图23幅,《河北方言概况》(1961)收方言地图24幅,《云南方言调查报告》(1969,台湾)收方言地图64幅,画法和《湖北方言调查报告》相似,大都采用线形符号表示法。圆形符号标记法的优点是比较客观。有多少调查点就标多少调查点,凡无调查点的地区都如实地放空,缺点是如果方言情况复杂,则各种不同的圆形符号较多,看上去显得眉目不很清楚。线形符号标记法的优点是图面清晰,方言界限比较清楚,缺点是用调查点的材料概括许多未调查点的情况,难免以偏概全、不符合方言实际。可见方言地图的不同画法各有短长,重要的是要方言条目设计得合理,做到能较好地反映方言分区的客观情况,至于采用何种画法则可根据具体情况斟酌决定。例如《湖南方言调查报告》(1974,台湾)收湖南方言地图52幅,采用3种不同的画法:①声母图(第1~9图)、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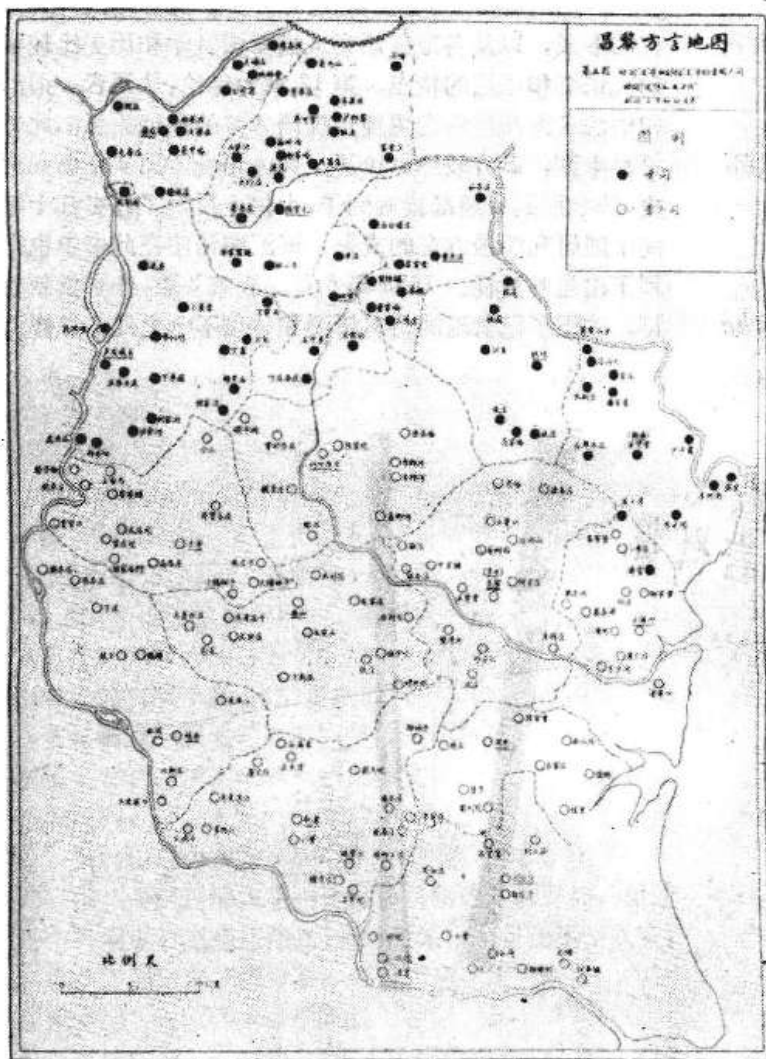


图1 昌黎方言地图

“囚、详”二字声母的发音方法,“图例”列6种符号表示6种读法:①“(无号)”,“囚、详”读s方法;②“三三”,“囚、详”读t'方法;③“三三三”,“囚”读t'方法,“详”读s方法;④“|||”,“囚”读s方法,“详”读t'方法;⑤“:::”,“囚、详”读t'方法;⑥“三三三”,“囚、详”读t, z方法。第7图就用上述符号标记“囚、详”二字读法的地理分布,并用同言线把读法相同、分布区域相连的地方圈起来,共有10个同言线圈,其中读①、④、⑤、⑥的各有一个同言线圈,读②、③的各有一个同言线圈。两种不同读法之间同言线的画法,采取两边相邻点之间等距离中分画线的办法。《关中方音调查报告》(1954)收方言地图23幅,《河北方言概况》(1961)收方言地图24幅,《云南方言调查报告》(1969,台湾)收方言地图64幅,画法和《湖北方言调查报告》相似,大都采用线形符号表示法。圆形符号标记法的优点是比较客观。有多少调查点就标多少调查点,凡无调查点的地区都如实地放空,缺点是如果方言情况复杂,则各种不同的圆形符号较多,看上去显得眉目不很清楚。线形符号标记法的优点是图面清晰,方言界限比较清楚,缺点是用调查点的材料概括许多未调查点的情况,难免以偏概全、不符合方言实际。可见方言地图的不同画法各有短长,重要的是要方言条目设计得合理,做到能较好地反映方言分区的客观情况,至于采用何种画法则可根据具体情况斟酌决定。例如《湖南方言调查报告》(1974,台湾)收湖南方言地图52幅,采用3种不同的画法:①声母图(第1~9图)、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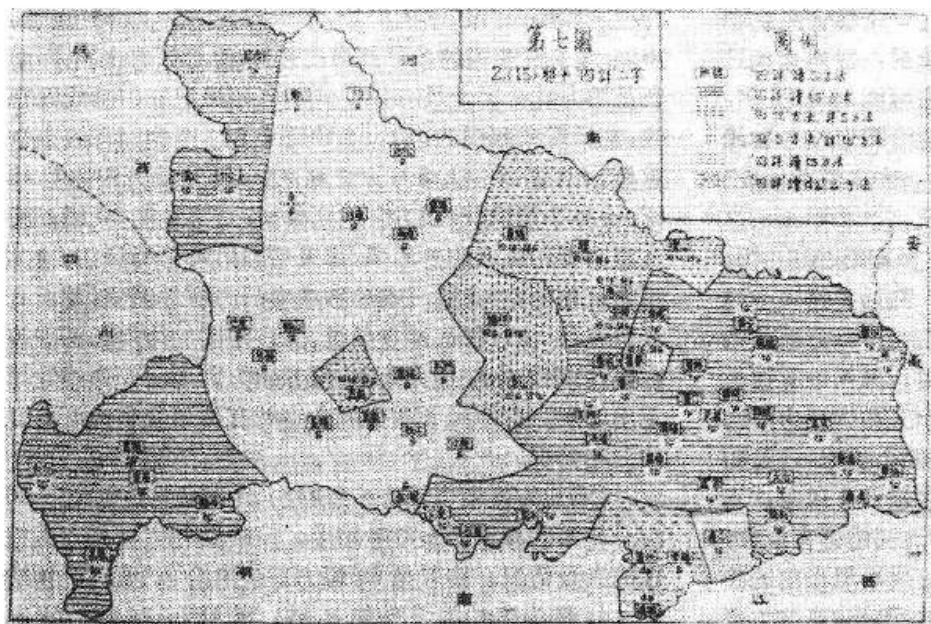


图2 湖北方言地图

合图(第10~12图)、韵母及韵尾图(第13~28图)及特字图(第36~38图)采用圆形符号标记法;②声调图(第30~35图)采用调值符号标记法;③调类图(第29图)及词类图(第39~52图)则采用线形符号标记法。可见汉语方言地图的画法是不拘一格的。反映全国汉语方言分区情况的《中国语言地图集》(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编)目前正在绘制中。

参考书目

李荣:《汉语方言分区的几个问题》,载《方言》,1985,第2期,北京。

(许宝华)

Hanyu Fangyan Diaocha Shouce

《汉语方言调查手册》(A Handbook for the Surveys of Chinese Dialects)

论述汉语方言调查方法的著作。李荣著,1957年12月北京科学出版社出版。本书内容分汉语方言普查的工作方式,语音训练,北京语音概要(附北京同音字表),记音和整理的步骤,怎样求出汉语方言音系的轮廓,怎样使用汉语方言调查字音整理卡片,怎样求出方音和北京音的语音对应规律,怎样记词汇和语法例句,怎样编写方言调查报告和本地人学习普通话手册,以及方言调查资料,记音样张,音标举例,文白异读举例,比较字音举例,方言里的“儿”和“子”举例等16章,系统地讲述了调查方言和整理材料的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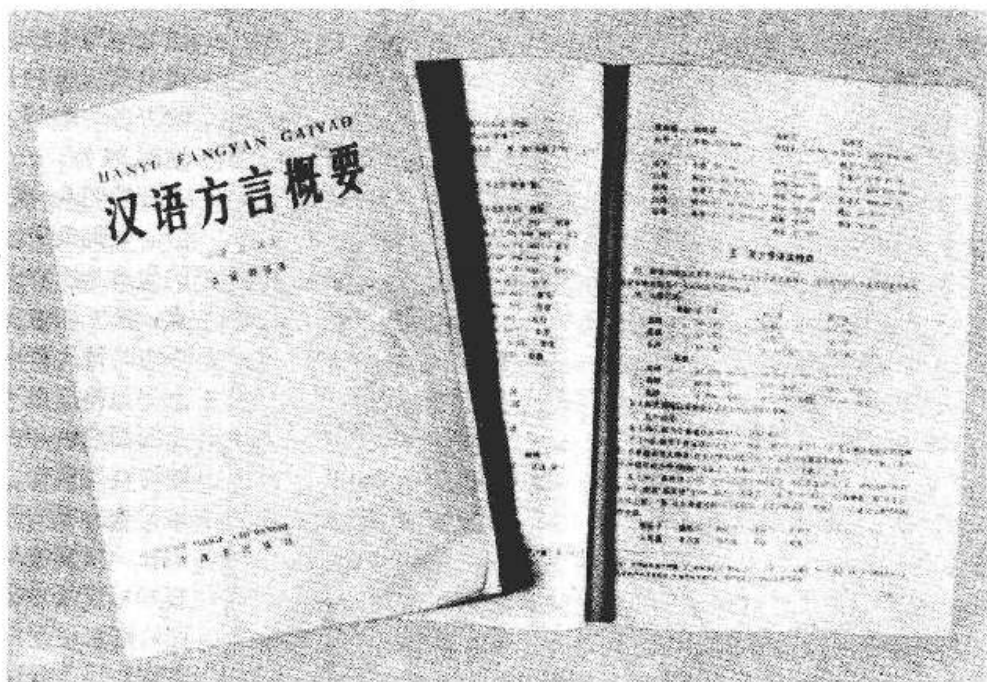
法。书前转录了4个有关方言普查的文件,书后附有音标及其他语音符号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根据方言调查工作的需要,语言学工作者对方言调查方法进行了新的探索,《手册》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它从汉语方言的实际出发,贯穿古今语音演变的规律,以具体实例阐述了调查方言和整理材料的方法,对方言调查和方言研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20多年来,它在培养方言调查工作人员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汤珍珠)

Hanyu Fangyan Gaiyao

《汉语方言概要》(Outline of Chinese Dialects)

论述汉

语方言的著作。袁家骅(1903~1980)等著,1960年2月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全书50万字,分12章。第1~3章为绪论:论述方言、汉语方言学和汉语方言发展的历史。第4~11章为分论:分别阐述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闽南方言、闽北方言的形成,以及各方言语音(描写语音学和历史比较音韵)、词汇和语法的特点。第12章为综论:从语音、词汇和语法3方面举例说明现代汉语方言的亲疏关系。此书材料丰富,审音较细,论述全面。语音方面从平面到历史,从个别到一般都接触到了,大体上反映了过去几十年间中国研究汉语方言的成果,词汇和语法在此书也得到了相当的重视。1983年6月出版第2版,作者重新校订,改正了已发现的材料错误和体例不一之处,并修订



《汉语方言概要》

了个别章节,如“吴方言”一章改写了变调一节,第10、11两章因将“闽南方言”和“闽北方言”合为“闽方言”而作了相应的调整和补充。(汤珍珠)

Hanyu Fangyin Zihui

《汉语方音字汇》(*Syllabary of Dialect Pronunciations of Chinese Characters*) 比较方言字

汇集。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编,1962年9月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本书收集了17个方言点2400余字的读音。17个方言点是:北京、济南、西安、太原、汉口、成都、扬州(以上属官话方言),苏州、温州(以上属吴方言),长沙、双峰(以上属湘方言),南昌(赣方言),梅县(客家方言),广州(粤方言),厦门、潮州、福州(以上属闽方言)。书中字汇总表前列有17个方言点的声韵调,所收单字,根据各方言的语音系统,用国际音标注音。单字按北京韵目排列,并注有中古音。《字汇》根据1956~1958年全国方言普查的结果编制,主要供汉语语音比较研究使用,为了解方音之间的共同特点和差异,以及古今语音的演变,提供了参考资料。(汤珍珠)

Hanyu Jiaoxue

汉语教学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汉语教学应当包括汉语作为母语的教学,国内各少数民族以汉语为第二语言的教学(见少数民族汉语教学)以及汉语作为外国语的教学(见对外汉语教学)。本文只讲汉语作为母语的教学,并且遵从一向的习惯称之为“语文教学”。

语文教学及其历史 “语文”是一个整体,包括“语”(语言)和“文”(文字、文学、文化)两个方面。

语文教学的内容和方法决定于3个因素:语言因素——语言、文字的特点;社会因素——社会制度、教育政策、文化背景;科学因素——语言科学、教育科学及其他相关科学的发展水平。

从殷周到春秋战国时代,教育已经相当发达,先后建立过官学和私学。《礼记》里的《学记》以及《荀子》里的《劝学篇》等,表述古人的相当成熟、完备的教育和教学思想。孔子授徒,有“文学”科和“言语”科。他整理删订的《诗》300篇,是作为教材使用的。他说,读《诗》可以多知道草木鸟兽的名称;又说,不学《诗》就不善于言辞。从屈原、宋玉等人的文学作品、诸子百家的著作、几种史书上记载的各诸侯国互相派遣的使节的辞令来判断,当时的语文教学相当发达,对于培养人们的语文能力很重视并且是卓有成效的。

秦汉以来2000多年的语文教学可以分作3个时期。①从秦汉到清末是一个绵延不断的传统时期。虽然各个时期也有发展变化,但总的看来,是量变不是质变,从教学思想到内容到方法,都以封建主义为主导。②从清末,尤其是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到1949年,是一个变革的时期。这几十年间,由于国内要求变革的思潮的兴起以及受国外的影响,语文教学发生了激荡,产生

一些新的思想和新的作法。语文教学的面貌,有了改变。

③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语文教学在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传统的语文教学 识字教学 从秦汉到现在,汉字教学一直是语文教学的一个重点和难点。是重点,因为学好汉字是学习语文的基础。是难点,因为汉字不是字母文字而是一种独特的文字体系。汉字是形、音、义的结合体:每个字有由某些笔画构成的固定的形体,表示一个带调的音节,表示语言里的一个语素。构成字的笔画很复杂,有二十几种,形状不同,走向不同。每个字的笔画,少的只有一两画,多的可达二三十画或更多。字的数量多,《康熙字典》收字4万多,现代一般字典、词典收字也多在1万以上。据统计,现代常用的字有7000多,其中最常用的有3000多。此外还有多音字、多义字、异体字、形似字、音近字、义近字等种种复杂问题。因此,在初学阶段,认识、理解、书写都有相当的困难。为了对付这个重点和难点,教育工作者设计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办法,取得了不少可贵的经验,主要表现在识字教材方面。

汉语是非形态语言。汉语的语素以单音节为主,写出来是一个汉字;在古代汉语里,单音节词占的比例很大。古人利用这些特点,采取几个字一句的整齐押韵的办法编写儿童识字教材,便于朗读记诵。从西汉史游编的《急就篇》,到南朝梁武帝时周兴嗣编的《千字文》,宋初人编的《百家姓》,相传为王应麟编的《三字经》,到元明以后的各种识字教材,都采用这个办法。如“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千字文》)、“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褚卫,蒋沈韩杨”(《百家姓》)、“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三字经》)。这些教材在教儿童识字的同时,也附带教一点知识。清代末年废除科举,兴办新学堂。初期的“国文”教科书,包括民国初年的,仍旧不同程度地采取这种传统的办法编写,如“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一身,二手;大山,小石。天,地,日,月;父,母,男,女”(《共和国新国文》第一册)。30、40年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也曾采用类似的办法进行扫除文盲和普及初级教育的活动,例如辛安亭在延安编写过《儿童三字经》等教材。

《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从宋代起形成了互相配合的整套识字教材,通称《三百千》,在全国范围内使用了1000多年。《三百千》的总字数是2720,把重复字作为一个字计算,大约共有2000单字。史游的《急就篇》是2016字,东汉人增补了128字,现在所见的传本是2144字。清代的文字学家和小学教育学家王筠认为,教儿童先识2000字左右,就可以打下初步阅读的基础(据近年统计,最常用字中的前2400个,在现代白话文著作中的覆盖率可达95%以上)。

另有一种流行于一时一地,带有浓厚的地域色彩和行业色彩(如农业、商业等),用字用语也更为通俗以至十分接近口语的识字教材,叫做“杂字”。起源不晚于《三百千》,而品种极多。这种教材主要流行于中下层社会,不



图1 《对相四言杂字》

被重视，流传下来的很少。现在能够见到的约有二三十种。

图文对照，看图识字，这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流行的一种识字教学方法。中国现存两种《对相四言杂字》（图1、2）就是采用这种办法编写的教材。一种刊印于明太祖洪武辛亥年（1371），另一种稍晚，小有修改。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看图识字教材（根据内容考证，此



图2 《新编对相四言》明初14世纪刻本

书产生于南宋，元、明、清历代有略加增删的多种复刊本，现存的是其中的两本）。

书法教学 汉字结构复杂，儿童初学写字有困难，古人设计了一整套的训练方法。①先学写大约5厘米见方的所谓中楷，把笔画的安排组合充分掌握之后，才学写小楷和大楷。②分几步训练。开始学写字是“描红”（图3），把印好的红字按照教师指点的笔顺描成黑的。第二步是“影写”，用比较薄的纸铺在印好的或者教师写好的字样上描摹。第三步是写“米字格”或“圆格”纸，便于安排笔画。第

四步是在白纸上印好的方格里写。最后脱格。③在学写字的入门阶段，写字和识字分开进行，不求同步前进。例如，读《百家姓》的“赵、钱、孙、李”等，这些字复杂难写，因此，开始时学写笔画很简单的“上、大、人”等，逐渐复杂，逐步与识字结合。从上述的第四步开始临摹名家碑帖。



图3 描红

先临摹楷书，进而临摹行书以至草书，有的甚至学写隶书和篆书，逐步进入学习书法艺术的阶段。

读书教学 儿童的语文教学，在识字教学告一段落之后，进入读书阶段。首先读的是《四书》，依次序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些是儒家的根本经典，每个学童都要读，不论他将来是读书应科举还是从事其他职业。这以后，如果他将来要读书应科举，他就要诵读《诗经》、《尚书》、《周易》、《礼记》、《春秋经传》（合称《五经》）。还可以进一步读其他经书如《周礼》、《仪礼》、《尔雅》，史书如《史记》、《汉书》，子书如《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等。

如果不准备应科举，另有一些读物供儿童和少年阅读。就内容而论，主要有两类。第1类是按照儒家思想进行伦理、道德、待人接物的教育。最早的有相传是管子编的《弟子职》，东汉班昭编的《女论语》。以后有宋代、明代理学家编的《性理字训》、《小学韵语》、《小儿语》等，以及明代、清代人编的《昔时贤文》、《弟子规》等。第2类是历史知识性的读物。流行最广的有宋代黄继善编的《史学提要》，明代赵南星编的《史韵》和清代王仕云编的《鉴略》等。第3类是讲各科知识以及各种掌故趣闻、名言隽语的读物，始于唐代的《兔园策》和《蒙求》，以后有宋代方逢辰编的《名物蒙求》，明代、清代人编的《龙文鞭影》、《幼学琼林》等。

与此同时进行的初步文学教育有两种项目，一种是教儿童读诗。唐代胡曾的《咏史诗》作为儿童教材，内容既有历史故事，也有不少文学性的传说故事。宋代以后有《千家诗》，选唐宋名家的优秀小诗编为读本。这本教科书长期广泛流行，和《三百千》相提并论，合称《三百千千》。另一种是教儿童读散文（文言的）故事，大致始于明代，从明嘉靖（16世纪）之后，陆续出了好几种这类教材，一般称

为《日记故事》(即每天读记一则故事之意),并且多为图文对照本或插图本(图4),现存最早的版本是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熊大木校注本,此后也有称为《书言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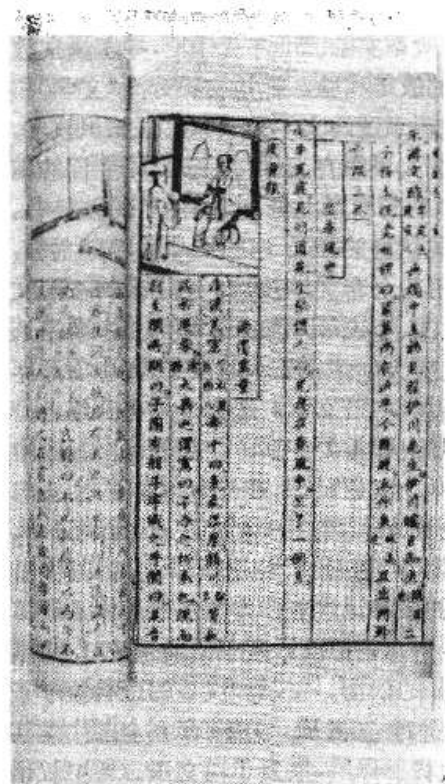


图4 《日记故事》
明末刻本

《黄眉故事》、《童蒙观鉴》等名称的。(参见彩图插页第38页)

有志于读书应科举的儿童、少年,除读《四书》、《五经》外,往往也同时读以上这些读物。

作文教学 如果一个儿童是读书应科举的培养对象,一般在读完《四书》之后开始学做八股文。还要学会对对子,这是学做试帖诗的准备。八股文和试帖诗都有各种选本供学生仿效,更有书商选取历科考中举人、进士的考卷,印成阅读教材,称为“闾墨”,被不少教师学生视为应考的捷径而争相教、学。年龄稍大一点就要在八股文之外学做“古文”,在试帖诗之外学做其他诗体。为学习作文和作诗提供范本,有各种诗文选。诗的选本如果从《昭明文选》、《玉台新咏》算起,那是很多的,但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清初人选的《唐诗三百首》,甚至有“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之说。在散文方面,从宋代就已经出了多种专作教材使用的古文选本,如真德秀的《文章正宗》,谢枋得的《文章轨范》,吕祖谦的《古文关键》。以后又有若干种。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清初人编的《古文观止》,选编从先秦到明代的200多篇有名的文章。《唐诗三百首》和《古文观止》这两种选本广泛流行了200多年,直到现在还有人使用,其影响之大,没有别的选本可以相比。各种选本大都有或繁或简的注释,解析、评点。教师逐字逐句串讲,要求学生熟读成诵。不准备应考的学生,除了念念《古文观止》以外,还要念些在生活上有用的书,如各种《尺牍》以及《事林广记》之类的书。

1919~1949年的语文教学 清末废除科举,1904年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在全国开办新学堂。新学堂的学制、课程以至教材,大都从东西方先进国家引进。唯有语文一科无从引进,因此,只是取消了八股文的教学,代之以国文教科书,形式不同,在内容和方法上没有实质性的变化。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语文教学才真正受到了一次大的冲击。识字教学和阅读教学经历了较大的变化。

① 小学里设“国语”课,全用白话文(合乎或接近当时口头语言的书面语),从一开头就学简短的白话句子以至短小的文章,如儿歌、故事,等等。“国语”课把识字教学和阅读教学结合起来,一边识字一边阅读,从阅读中逐步识字。阅读教材,除了语言用接近口语的白话文之外,内容也与儿童的生活和学习兴趣比较接近,并且逐步增加了文学性,如选用一些当代的儿童文学作品或用白话翻译的外国儿童文学和中国古代的寓言故事之类。

② 识字、阅读工具的改进。随着国语运动的开展,逐步产生并且广泛推行了注音字母,为识字教学创制了一种较好的工具。中国古代没有很方便的表示字音的办法,只有直音法,如“虹,音红”,反切法如“虹,胡翁切”。这两种方法都有缺点。20世纪初叶,随着国语运动的展开,出现了许多拼音方案,最后总结为“注音字母”,由当时的教育部颁行全国。此外,供中小学生用的字典和词书也越来越多,供少年儿童自由选读的各种课外读物也多起来了,并且有了专为儿童和中学生编的期刊,如《儿童世界》、《学生杂志》、《中学生》,等等。

③ 阅读范围逐步扩大,白话文和文学教学的分量也逐渐增加。1949年以前,中学里仍设“国文”课(有一段时间,有些初级中学也同小学一样称为“国语”课)。初级中学的“国文”课,仍以文言文为主,但是白话文所占的比例逐渐增加,并且大都是“五四”前后的新文学作品,如蔡元培、鲁迅、叶圣陶、谢冰心、郭沫若、徐志摩等人的作品,以后渐及于茅盾、巴金、朱自清、老舍等人的作品,并逐渐选读早期白话小说的节录,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镜花缘》、《老残游记》,等等。高级中学的“国文”课大都全部学习文言文,不过艰深古奥的古代经典减少,清浅优美的唐宋古文以及史传、传奇小说、笔记小说等等逐渐增多。与此同时,提倡课外阅读,有的学校指定若干种著作作为必读书,如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胡适文存》,等等。出版了适合于中学生阅读的综合性和文艺刊物,如《新青年》、《小说月报》、《东方杂志》、《新中华》、《生活周刊》,等等,其中不少在引导学生自由阅读之中介绍了一些新的思想观点,有助于活跃学生的思想。

④ 教学理论和教学法的研究。20世纪初有人开始引进东西方现代教育学理论,翻译了一些专著,出版了《教育杂志》,“五四”运动以后,教育学、教育心理学方面的研究更加发展,推动了语文教学理论和教学法的探讨,逐渐为传统的语文教学注入了一些新的因素。这期间从事这方面研讨的人很多,其中影响比较大、比较长远的有陶行知、夏丏尊、叶圣陶、王森然、阮真、朱自清、浦江清,

等等。他们共同的主张是：反对以阅读古代经典为主，提倡读白话文，读与社会生活接近的作品，包括文学作品和有实际应用价值的文章；反对注入式讲解和让学生呆读死记；提倡鼓励学生广泛阅读，独立思考，学以致用。他们中间多半都有实际的教学经验，有的探讨理论，如王森然，有的长期从事课程标准、纲要的制定和教科书的编写工作，并编写了多种使用广泛的课本，如叶圣陶、夏丏尊，此外还有傅东华等人。叶圣陶、夏丏尊二人从30年代后期就提出过“语文”这个概念，提出了语文教学应当摆脱盲目性，力求科学化的设想，并且合编了《国文百八课》的教材来体现他们的主张。可惜教材只编出了2/3就因爆发了抗日战争而中断，实验也停止。

⑤“解放区”的经验。20年代在东南地区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区”，30年代以后在西北等地区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这些地区的语文教学，更彻底地实现了“五四”运动前后提出的主张，同时并结合地区和战时状态的实际，创造了一些经验。主要是在成人识字教学（扫盲）方面推行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既适当利用了传统方法，也利用了拉丁化字母的办法。其次是结合语文教学进行思想教育。教材既重视语文本身的系统性，教学步骤的科学性，又密切结合实际。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编的《中等国文》可为代表。主持解放区的语文教学改革的教材研究的有胡乔木、徐特立、辛安亭等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语文教学 这个时期的语文教学有几项重大改革和实验。

① 1949年以后，从小学到高级中学，这门学科统称“语文”，不再划分为“国语”和“国文”两个段落。整个基础教育（或称普通教育，即从小学到中学的教育）阶段都有语言教育的任务，不再把“语”的教育局限在小学阶段。

② 对识字教学进行了多种实验。主要的有3种。一是“分散识字”。把小学阶段应当学会的字有计划地分配在小学几个年级的阅读材料里，随课文教识字，以减轻小学初期阶段识字量大的负担，把注意力更多地用于说话、阅读等训练。二是“集中识字”。利用汉字大多数是合体的特点，选定造字能力强的字（即本身可以是其他若干字的构成部件的）作为基本字，把基本字相同的一批字放在一起集中学习。一般可以在两年或稍多一点的时间使儿童认识2500个左右的汉字，为阅读教学打下基础。三是充分利用汉语拼音帮助识字和读写，首先提高学生运用汉语拼音方案的能力，用汉语拼音阅读和作文，让学生的口语能力得到充分的发挥。然后在阅读和作文中逐步引进汉字，最后达到全部用汉字阅读和写作。目前一些学校正在进行这种实验。

③ 改革阅读教学的内容。随着社会制度和教育方针的变革，阅读教学在思想内容和语言方面都有不少变革。小学语文，不仅全用白话，而且更加接近于日常口语，但是必须合乎规范；此外，也选用少量清浅短小的旧体诗词和近代白话小说的片段。初级中学仍以白话文为主，选入少量文言文。高级中学，文言文的分量稍有增加，白话

文的选材面有所扩充，除文学作品外，也选入一些科学性、政治性和应用性的材料。文言文的选材面也有所扩充，除了历来脍炙人口的名家散文之外，历史上著名科学家的传记等等也在入选之列。

④ 一次重要的改革实验。50年代中期，中学语文教学进行了一次重要的改革实验，把语文学科分为“文学”和“汉语”两科，分别进行系统的文学教学和汉语知识教学。为此选派专业人员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内设立了专门的编辑机构，负责拟订两科的教学大纲，编写两科的教科书。文学科，在叶圣陶、吴伯肖的指导下，由张毕来担任主编，编出了初中和高中用的全套文学教材。初中教材按照文学体裁分为故事、散文、小说等几部分，每部分主要是选文，并有介绍有关这类文学体裁知识的课文。高中前两年按照文学史的顺序教学中国文学，选文之外有介绍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发展史和重要作家、作品的课文；高中第3年讲授外国文学。汉语科，在吕叔湘指导下，由张志公主编，编出了汉语课本，主要用于初中阶段，按照语音、词汇、语法、修辞的顺序系统地介绍这些知识，并附大量的练习作业。当时的多种语法著作中所用语法体系很不一致，为此草拟了一个《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作为编写汉语教材语法部分的依据。文学和汉语的分科教学于1955年在少数中学进行过试验，1956年在全国中学实行。1958年，两种教科书停用，恢复了语文课。《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继续使用，并且对部分高等学校的语法教学、语法研究产生了一定作用。根据多年使用的经验，吸收教师们反映的意见，1984年重新拟定了《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试用）》，取代《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

⑤ 语文教学研究的新进展。1949年以来，语文教学的研究工作有了新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a. 正确处理“文道关系”。语文是人们生活、学习、工作的基础工具。语文教学必须教学生学好、用好这个工具；语文教学又是向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和文化教育的一个重要渠道，如何处理好这两个方面的关系，是研究语文教学的一个重要课题，人们把这种关系称为“文（语文工具）道（思想，文化）”关系，一般认为“文”与“道”应当统一。在语文教学中，“道”的教育应当寓于“文”的教育之中，并且通过“文”的教育来实现，不能妨碍了“文”的教育，也不能忽视“道”的教育。b. 对传统语文教育的研究。中国有很长的语文教育历史，60年代起，有人对传统经验进行了整理和探讨。c. 对国外语文教学的研究。50年代对苏联语文教学的研究进行的比较多，特别是如何把教学论的原理运用于阅读教学，打破了以往多数教师惯用的“串讲”法（逐句讲解）。近年来研究的范围扩大了，对国外语文教学的各种学术流派的理论以及课程设计等等进行研究的人越来越多，促进了对中国语文教学研究工作的开展。

结束语 在语文教学中，汉字教学始终处于一个重要的地位。加快速度，提高质量，把这两个方面统一起来，是从古到今教育工作者一直在研究和实验的课题。目前，无论在理论研究上或在教学手段上都比以往具备更

多更好的条件。

语文教学中还有一个中国特有的问题，即文言文的
教学问题。所谓文言文是秦汉以下逐步定型了的、与
实际使用中的活语言脱节的一种书面语，在历代的官府和
文化教育界一直作为标准的书面语使用了2000多年。
中国悠久的文化遗产主要是用文言文记载的，要保存和
继承民族传统文化不能不理睬文言文；但是由于它与现
代实际语言脱节太远，教学困难，而收效往往不大。因此，
几十年来，文言文在基础教育阶段如何处理始终是一个
有争议的问题，变化比较多，起伏比较大。至今，这个
问题仍在继续研讨之中。

语文教学本应包括听说和读写两个方面的训练。从
先秦到汉魏，听说能力以至捷辨能力很受重视。唐宋以
后，自从科举考试，以文取士的制度逐步确立之后，语文
教学形成了识字→读书→作文章这样一个程序，口头语
言的教育被严重忽视。这个传统历时久，根深蒂固，一直
影响到当代。随着现代化通讯技术的发展，信息技术
的革新以至人工智能研究的开展，口语能力的重要性越来
越大，从事语文教学的人对这个方面越来越重视，正
被作为一个重点课题在进行了研究和实验。作文教学，由
于受到持续了几个世纪的八股文传统的影响，在当代语
文教学中，与汉字教学、阅读教学、语文知识教学比较，
进度缓慢。如何进一步改革，在基础教育阶段打好合格
的写作能力的基础，是当前语文教学研究中另一个重点
项目。

在全世界，使用汉语、汉字的人口有10多亿。在许
多国家，学习汉语的人越来越多。语文教学的研究和发
展既是中华文化、教育、科学发展的需要，也是国际关
系发展和国际文化交流的需要。使语文教学与教育科学
和语言科学的发展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纳入应用语言
学的发展轨道，提高教学效率，这是当前语文教学研究
的重要内容。

参考书目

叶圣陶：《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教育科学出版社，北京，1980。

陈必祥主编：《语文教育发展史》，云南教育出版社，昆明，1982。

(张志公 蒋仲仁)

Hanyu Pinyin Cihui

《汉语拼音词汇》(Chinese Pinyin Glossary)

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以后出版的以词和词组为拼写单位
的中型现代汉语词汇。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词汇小组编，
1958年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初稿。后来，又于1963年出
版增订稿。初稿收词20100多条。增订稿收词59100多
条。其中单音词2100多条，双音词35000多条，三音词
15000多条，三音节以上的词、词组和成语6000多条。这
本词汇的特点是：词条一律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无调号字母在前，阴、阳、上、去各调在后。不是先按音
节顺序排汉字，再按词头汉字以后的音节排词条，因此
同音词都排列在一起。这是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以后最早
纯粹

以字母作为排序单位，因此能提供同音词资料 and 正词
法初步规范的词汇。
(尹诚庸)

Hanyu Pinyin Fang'an

汉语拼音方案 (Chinese Phonetic System)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拼音方案。1955~1957年中国
文字改革委员会“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研究制订，1958
年2月1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公布，1982年国际
标准化组织承认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

制订经过 1949年10月成立民间团体“中国文字改
革协会”，协会设立“方案研究委员会”，讨论采用什么
字母的问题。1952年2月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成立“中
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设立“研究并提出中国文字拼
音化的方案”的“拼音方案组”，几年中拟订了好几种以
汉字笔画为字母的民族形式拼音方案。1954年12月
国务院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1955年组织“拼音
方案委员会”，由吴玉章、胡愈之任正副主任，黎锦熙、
罗常培、丁西林、韦恂、王力、陆志韦、林汉达、叶籁士、
倪海曙、吕叔湘、周有光为委员，在民族形式字母的方
案之外，研究制订采用拉丁字母的方案，最后确定拼音方
案采用拉丁字母。

1956年2月，拉丁字母的汉语拼音方案第一个草案
发表，使用了6个新字母。经过征求全国意见和国务院
“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的审订，1957年10月拼音
方案委员会又提出完全采用拉丁字母的修正草案，也就
是今天的汉语拼音方案。

《汉语拼音方案》

一 字母表

字母: Aa	Bb	Cc	Dd	Ee	Ff	Gg
名称: ㄚ	ㄅ	ㄘ	ㄉ	ㄜ	ㄝ	ㄍ
Hh	Ii	Jj	Kk	Ll	Mm	Nn
ㄏ	ㄌ	ㄐ	ㄎ	ㄌ	ㄇ	ㄋ
Oo	Pp	Qq	Rr	Ss	Tt	
ㄛ	ㄆ	ㄑ	ㄖ	ㄙ	ㄊ	
Uu	Vv	Ww	Xx	Yy	Zz	
ㄨ	ㄨ	ㄨ	ㄒ	ㄩ	ㄗ	

v 只用来拼写外来语、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
字母的手写体依照拉丁字母的一般书写习惯。

二 声母表

b	p	m	f	d	t	n	l
ㄅ	ㄆ	ㄇ	ㄈ	ㄉ	ㄊ	ㄋ	ㄌ
g	k	h		j	q	x	
ㄍ	ㄎ	ㄏ		ㄐ	ㄑ	ㄒ	
zh	ch	sh	r	z	c	s	
ㄓ	ㄔ	ㄕ	ㄖ	ㄗ	ㄘ	ㄙ	

在给汉字注音的时候，为了使拼式简短，zh、ch、sh
可以省作z、c、s。

三 韵母表

	i	衣	u	乌	ü	迂
a	ia	ua				
Y	Y	Y	Y	Y	Y	Y
o		uo				
o		uo				
e	ie			üe		
e	ie			üe		
ai		uai				
ai		uai				
ei		uei				
ei		uei				
ao	iao					
ao	iao					
ou	iou					
ou	iou					
an	ian	uan	üan			
an	ian	uan	üan			
en	in	uen	ün			
en	in	uen	ün			
ang	iang	uang				
ang	iang	uang				
eng	ing	ueng				
eng	ing	ueng				
ong	iong					
(X)ong	(X)iong					

①“知、蚩、诗、日、资、雌、思”等七个音节的韵母用 i, 即: 知、蚩、诗、日、资、雌、思等字拼作 zhi, chi, shi, ri, zi, ci, si。

② 韵母儿写成 er, 用做韵尾的时候写成 r。例如: “儿童”拼作 ertong, “花儿”拼作 huar。

③ 韵母 e 单用的时候写成 ê。

④ i 行的韵母, 前面没有声母的时候, 写成: yi(衣), ya(呀), ye(耶), yao(腰), you(忧), yan(烟), yin(因), yang(央), ying(英), yong(雍)。

u 行的韵母, 前面没有声母的时候, 写成: wu(乌), wa(蛙), wo(窝), wai(歪), wei(威), wan(弯), wen(温), wang(汪), weng(翁)。

ü 行的韵母, 前面没有声母的时候, 写成: yu(迂), yue(约), yuan(冤), yun(晕), ü 上两点省略。

ü 行的韵母跟声母 j, q, x 拼的时候, 写成: ju(居), qu(区), xu(虚), ü 上两点也省略, 但是跟声母 n, l 拼的时候, 仍然写成: nü(女), lü(吕)。

⑥ iou, uei, uen 前面加声母的时候, 写成: iu, ui, un。例如 niu(牛), gui(归), lun(论)。

⑦ 在给汉字注音的时候, 为了使拼式简短, ng 可以省作 ŋ。

四 声调符号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 ˊ ˋ ˋ

声调符号标在音节的主要母音上, 轻声不标。例如:

妈 mā 麻 má 马 mǎ 骂 mà 吗 ma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轻声)

五 隔音符号

a, o, e 开头的音节连接在其他音节后面的时候, 如果音节的界限发生混淆, 用隔音符号(') 隔开, 例如: pi'ao (皮袄)。

《汉语拼音方案》与历史上 4 种主要拉丁字母拼音方案的比较

汉语拼音方案	威妥玛式拼音	注音字母	国语罗马字	拉丁化新文字
b	p	ㄅ	b	b
p	p'	ㄆ	p	p
m	m	ㄇ	m	m
f	f	ㄈ	f	f
d	t	ㄉ	d	d
t	t'	ㄊ	t	t
n	n	ㄋ	n	n
l	l	ㄌ	l	l
g	k	ㄍ	g	g
k	k'	ㄎ	k	k
h	h	ㄏ	h	x
j	ch	ㄐ	j	g
q	ch'	ㄑ	ch	k
x	hs	ㄒ	sh	x
zh	ch	ㄗ	j	zh
ch	ch'	ㄘ	ch	ch
sh	sh	ㄙ	sh	sh
r	j	ㄖ	r	rh
z	ts, tz	ㄗ	tz	z
c	ts', tz'	ㄘ	ts	c
s	s, ss, sz	ㄙ	s	s
a	a	ㄚ	a	a
o	o	ㄛ	o	o
e	ê	ㄜ	e	e
ê	eh	ㄝ	è	—
er	êrh	ㄞ	el	r
-i	ih, ü	(ㄟ)	y	—
i(y)	i(y)	ㄟ	i(y)	i(y)
u(w)	u(w)	ㄠ	u(w)	u(w)
ü(yu)	ü(yü)	ㄡ	iu(yu)	y(jy)
ai	ai	ㄞ	ai	ai
ei	ei	ㄟ	ei	ei
ao	ao	ㄠ	au	ao
ou	ou	ㄡ	ou	ou
an	an	ㄢ	an	an
en	ên	ㄣ	en	en
ang	ang	ㄤ	ang	ang
eng	êng	ㄥ	eng	eng
ong	ung	ㄨㄥ	ong	ung

从上面的比较可以看出,汉语拼音方案兼收国语罗马字、拉丁化新文字、威妥玛式拼音和注音字母之长。方案中*j*、*q*、*x*用独立字母表示,是为了使全部声母没有同符异读的不便。

方案的推行 1958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以后,秋季开始在全国小学教学。小学生入学,先学汉语拼音字母,然后用拼音字母帮助识字。同时在推广普通话和外国人学习汉语方面,采用汉语拼音字母作为学习的工具。

现在拼音字母已经普遍用于字典、词典的注音,用于各种产品的型号标记,用于辞书和百科全书的条目排列顺序,用于书刊的索引,用于视觉通信和无线电报,用于聋人的手指字母。1977年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采用拼音字母作为拼写中国地名的国际标准。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采用拼音字母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中国对外书报文件和出国护照中的汉语人名地名一律用汉语拼音字母书写。

(周有光)

Hanyu pinyin zhengcifa

汉语拼音正词法 (Chinese Pinyin orthography) 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普通话语词的规则。也叫“正字法”或“写法”。汉语拼音正词法最主要的原则是“分词连写”,就是把语言划分为词,并把多音词的各个音节连写在一起成为一个拼写单位。例如“大家来学习普通话”这句话,应该按词分写成“Dàjiā lái xuéxí pǔtōnghuà”4个书写单位。制订分词连写的规则除了参考语法上的词类区分外,还要考虑听觉心理(语感)和视觉心理的要求。因此,汉语拼音的写法和传统语法并不完全一致。

汉语拼音正词法的内容还有音译外来词、文言成分、缩略语等的写法,同音同形词的处理法,声调的标注法,大写字母和标点符号(包括短横“-”)的使用法等等。汉语拼音正词法制订以后,有一个通过群众书写实践并不断修改补充完善的过程,也就是约定俗成的过程。

汉语拼音正词法在100多年前的汉语拼音中就开始使用了。最早是教会罗马字用加短横的方法分词连写。其次是清末的一些切音方案,如卢慧章的《切音新字》(1892)、蔡锡勇的《传音快字》(1896)、沈学的《盛世元音》(1896)、王照的《官话字母》(1900)、朱文熊的《江苏新字母》(1906)、刘孟扬的《中国音标字母》(1908)、刘世恩的《音韵记号》等。这些方案,都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了分词连写的方法。其中,蔡锡勇最早提出“连书”的概念,沈学提出了“缮连为书”的主张。朱文熊不但实行分词连写,而且还规定了大写字母和短横的用法。到20世纪20年代国语罗马字产生,开始制订完整的“词类连书条例”,如黎锦熙、赵元任、萧迪忱(萧家霖)、孙先六等都拟订过方案。30年代拉丁化新文字有系统的词儿连写规则。吴玉章、林汉达、倪海曙等在这方面都作过补充修订,使规则更加完善。50年代汉语拼音方案公布时,没有制订正词法规则。但是公布后,全国出版的大量普通话拼音读物,

都是分词连写的。这些读物承袭了国语罗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的分词连写法。后来《中国语文》等杂志讨论了汉语拼音正词法的问题。《现代汉语词典》、《汉语拼音词汇》、《汉英词典》等辞书,都采用了汉语拼音分词连写的编排方式,提高了汉语拼音正词法的水平,丰富了分词连写的经验。

为了使汉语拼音正词法有统一的条例,1982年3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汉语拼音正词法委员会,着手制订汉语拼音正词法的基本规则和各种专用规则。经过两年多的研究讨论,并征求各有关部门和专家的意见,最后制订成《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试用稿)》,于1985年10月发表。

参考书目

周有光:《汉字改革概论》(第五章),文字改革出版社,北京,1957。

周有光:《拼音文字写法资料选辑》,文字改革出版社,北京,1957。

(尹武庸)

Hanyu shumian lijie xitong

汉语书面理解系统 (written Chinese understanding systems) 指人和计算机之间用汉语书面对话的系统。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70年代后期才开始。80年代初期取得成果,建立了几个实验模型。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北京自动化研究所合作,于1981年建成“机器理解汉语——实验I”,这是一个人机问答系统,以动物常识为主题,贮存单词70余条,句型20多个,用汉语拼音输入输出。这个系统采用M. R. 奎连1968年提出的“语义记忆”网络,加以修改,属于心理学模型。计算机能正确回答问题,并具有一定的推理能力。例如人问:“麻雀、燕子和鸵鸟都是鸟吗?”机答:“它们都是鸟。”人:“麻雀、燕子和鸵鸟都有翅膀吗?”机:“它们都有翅膀。”人:“它们都会飞吗?”机:“麻雀和燕子都会飞,鸵鸟不会飞。”人:“既然鸵鸟有翅膀,为什么它不会飞?”机:“虽然鸵鸟有翅膀,可是它的翅膀是退化的,没有飞的功能,所以不会飞。”

此后心理研究所从事计算机理解古汉语的研究,以“郑人买履”、“刻舟求剑”两个小故事进行实验,于1982年取得成功,称为“一个古汉语机器理解系统——ACLUS”,能分析句法,把整篇故事译成现代汉语,并回答问题。例如人问:“‘先度其足’中的‘度’字是什么意思?”机答:“‘度’是动词,是测量某种东西的尺寸的意思。”人:“‘吾忘持度’中的‘度’字是什么意思?”机:“‘度’是名词,是尺寸的意思。”还能区别同一代词所指的不同事物,例如“先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计算机能理解首尾两个“之”字指的是“脚的尺寸”而不是“脚”。为扩大ACLUS理解古汉语的功能,心理研究所近年来在修改和补充句法规则,特别对虚词的用法作了较详细的探索。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于1981年建成“RJD-

80型汉语人机对话系统”(简称RJD-80),是人和计算机直接对话的一个问答系统。以中国文学作品常识为对话的主要内容,贮存单词250余条,句型30多个。人用键盘输入问题,计算机屏幕显示回答,随问随答,回答一个问题只需1~30秒,输入输出都采用汉语拼音。可查询25个作家的120多种作品,任何人无需学习计算机,只要懂汉语拼音,都能自由使用。

RJD-80属于语言学模型,着重应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以N.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和W. A. 伍兹的ATN为基础,吸收C. 菲尔莫尔的格语法、韩礼德系统语法的合理内核,根据汉语特点制定句法、语义规则。计算机具有句法分析、语义解释、知识检索、言谈分析、逻辑推理、根据语义成分生成语句和排除非法输入的功能。语句输入,计算机分析句法,屏幕显示深层结构表达式,语义规则根据深层结构作出语义解释,查询知识库求得答案输出。例如人问:“《茶馆》的作者是曹禺吗?”(输入不用标点,全凭句法形式判断)机答:“不是,是老舍。”(输出用标点)人:“曹禺有小说吗?”机:“没有。”人:“巴金有哪些著作?”机:“《家》、《春》、《秋》。”人:“《背影》是什么?”机:“散文,作者朱自清。”按深层结构解释语义,可以对形式不同而语义相同的句子统一处理。例如“巴金有剧本吗?”、“巴金有没有剧本?”、“巴金有剧本没有?”3种不同句式的深层结构相同,语义相同,答案也相同。RJD-80具有一定的言谈分析(上下文关系)和逻辑推理的功能。例如人问:“你知道艾青吗?”机答:“不知道。”人:“他写过很多诗?”机:“哦,他是诗人。”人:“你还知道谁是诗人?”机:“郭沫若。”人:“他是剧作家,怎么又是诗人?”机:“他写过诗歌,又写过剧本,所以既是诗人,又是剧作家。”人:“老舍呢?”机:“老舍既是小说家,又是剧作家。”RJD-80还能输入某些语义成分,并指定某一成分做主语,令计算机造句输出。此外,凡输入句中有不符合贮存的词汇和句法、语义规则时,能加以排除,显示“词汇不合”、“句法不合”或“语义不合”。

1984年语言研究所又完成“TK-84汉语人机对话实验”(简称TK-84),以铁路客运咨询为主题,贮存单词200余条,句型30多个。内容包括北京至东北某几条铁路线客运快车的到站、中途站、开点、到点、车次、车种、车组等,也是一个人机直接对话的问答系统。例如人问:“从北京到大连有特快吗?”机答:“没有特快,只有直快。”人:“有哪几次直快?”机:“101/104,129/132。”又如“153次经过唐山吗?”机:“153次走京坨线到沈阳,不经过唐山。”再如“开往沈阳的快车都有卧铺吗?”机:“11次没有卧铺,其他都有。”人:“11次为什么没有卧铺?”机:“11次8点从北京开,18点49分到沈阳,卧铺没有必要。”TK-84根据汉语特点,提出了一种新的句法、语义分析方法——“语义短语语法”。词和语义成分构成语义短语,如介词短语(PP)“从〈处所〉”表示起点,动词短语(VP)“到〈处所〉”表示去处,动词短语“有〈车种〉”表示存在某种车运行。〈〉中是语义成分,内容由用户自行定

义。设〈处所〉定义为“北京、沈阳、大连……”,〈车种〉定义为“特快、直快、快车……”,即可用于本系统。某些语义短语能组合成句,某些不能;短语组合又有不同序列,有的成句,有的不成句;成句的短语序列还往往不止一种,有的语义相同,有的不同,据此建立句法、语义规则。例如“从北京到大连有特快吗?”(PP+VP₁+VP₂),“从北京有特快到大连吗?”(PP+VP₂+VP₁),“有特快从北京到大连吗?”(VP₂+PP+VP₁),3种短语序列语义相同,计算机输出同一回答。TK-84对上下文中的省略句和输出回答时语句生成的规则也作了进一步探索,取得一定成效(见自然语言书面理解系统)。

参考书目

李家治、郭荣江、陈永明:《机器理解汉语——实验I》,载《心理学报》,1982,第1期。

范继淹、徐志敏:《RJD-80型汉语人机对话系统的语法分析》,载《中国语文》,1982,第3期。

范继淹、徐志敏:《应用扩充转移网络理论分解汉语》,载《语言研究》,1981,创刊号。

(范继淹 徐志敏)

Hanyu wenzixue

汉语文字学 (Chinese graphology) 研究汉字的形体和形体与声音、语义之间的关系的一门学科。

汉语文字学的内容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符号,每一个字代表一个音节,一个字可能就是一个有完整意义的单音词,也可能是一个复音词中的一个构词的词素。词素或称为语素。

汉字远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新石器时代就已经产生。开始是用绘画来表示语义,后来由图画发展为象形字。以后,又以简单的象形字为基础向表意和一半表意一半表音的方向发展,而以一半表音一半表意的形式为主。但始终没有走上纯粹用拼音符号来记录语音的道路,从古到今汉字一直守着方块的形式没有变,在世界文字中有自己的特点。对汉字进行研究,是了解汉语的重要阶梯。

文字学的名称是近代才有的,古人称之为“小学”。“小学”的名称最早见于东汉班固(公元32~92)的《汉书·艺文志》。《汉书·艺文志》根据西汉末刘歆(?~公元23)的《七略》,把幼童识字用的字书和解释字义的书附在经学《六艺略》之后,统称之为“小学”。后代也就以此来称语言文字之学。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经部小学类又把语言文字书分为训诂、字书、韵书三类,三者各有所侧重。训诂之属侧重解释字义;字书之属侧重辨别字形,兼及音义;韵书之属侧重辨别字音,兼释字义。前人也曾称小学为字学,到近代才称为文字学。

文字学研究的内容,基本上就是前人所说的小学的内容,应当照顾到形、音、义三方面。因为三者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不能全然脱离音义孤立地去研究文字。不过,由于近代音韵学和训诂学都各自独立为一门学科,所以有人主张文字学就以专门研究文字的形体为主。主要研究文字的结构,形体的变迁,文字的发展,字形的规范化和

简化以及文字改革等问题,自成一个系统。然而自从清末光绪二十五年(1899)在河南安阳殷墟发现甲骨文以来,大家对于汉字早期的面貌,形体的结构和发展增加了许多新的认识;同时西周以迄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和其他文物又大量出土,更加强了学者对古文字研究的兴趣;因而古文字学在文字学的领域中蔚为大国,成为专门之学。如果按照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字形体进行研究,就可以分为以下几方面:①先秦古文字研究;②秦汉篆隶文字研究;③魏晋以后的楷书、楷书研究;④六朝唐宋以来的俗字、简体字研究;⑤近代方言字的研究。这里单就先秦古文字来说,又可按不同的资料分为商代的甲骨文,周代的金文,春秋战国时期的玺印、货币、陶器等文字以及相传的秦以前的“古文”,品类繁多,各成项目。学者除了做资料的整理和分析辨认的工作以外,还要进一步探讨文字发展史上的理论问题和当前使用汉字在文化教育方面的实际问题。如汉字发展的规律,汉字与汉语发展之间的关系,汉字的教学法和正字法等等都需要探讨。最终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在历史上汉字怎样表现汉语,为记录汉语服务的;一个是现在怎样使汉字在发展中国文化教育事业上和开展国际文化交流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汉语文字学发展的历史 战国秦汉间的识字书 中国的文字学已有长久的发展历史。远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学童识字的字书。班固《汉书·艺文志》小学类载《史籀》15篇,他说:“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史籀篇》早已亡佚,许慎《说文解字》还保存了200多字,字形繁复,跟春秋到战国初期的铜器文字很接近,据王国维推测,《史籀篇》应是秦国早期教学童的识字书。籀文就是战国时秦国使用的文字。籀文也称为大篆。

后来,秦始皇兼并天下,实行统一文字,李斯等又改《史籀》大篆为小篆,字形既求其整齐方正,笔画又要求简化,偏旁写法也要求一致;这是一次极为重要的文字整理工作,对后代汉字的发展有很大影响。李斯又作《仓颉篇》,赵高作《爱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这些书都是教学童的字书,对推行小篆,统一文字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汉代初年把三部书合在一起,总称为《仓颉篇》。这种书本为学童识字而设,所以编为韵语,以便记诵。《仓颉篇》是四字一句,两句一韵。《汉书·艺文志》说:“仓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宣帝时征齐人能正读者,张敞从受之。”所谓正读,就是能认识是什么字,能知道它的音义。《仓颉篇》本用小篆书写,汉代隶书盛行,也就用隶书来写了,所以传习不绝。到汉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李长作《元尚篇》。《凡将篇》是七言韵语,据说没有重复的字,《急就篇》则有三言、四言、七言,而以七言为主。三言、四言隔句一韵,七言每句押韵。到平帝时扬雄又作《训纂篇》,去《仓颉篇》中的重复字,凡89章,5340字。这些书只有《急就篇》流传下来,我们可以看到汉代通行字书的样式。《仓颉篇》既多古字,到东汉光武帝时杜林作《仓颉故》,以解释其中的字义,这是字书有注解之始。《汉书·杜邺传》说:“世言小学者由

杜公”,等于说文字之学创始于杜林。

六书说与文字学的建立 汉代通行使用的文字是隶书,对文字有研究的是一些古文经家。“古文经”是六国晚期的写本古书,如《毛诗》、《春秋左氏传》、《古文尚书》、《古文论语》等都是用六国时期的古文字写的,跟篆书不同。古文经家在朝廷秘阁校书,他们能看到许多古书,他们从篆书和古文、籀文中分析出造字的条例,创为六书说,六书的名称曾见于《周礼·保氏》。汉人所称的六书细目始见于《汉书·艺文志》。《艺文志》说:“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班固《汉书·艺文志》大都本于刘歆《七略》,所以很明显,六书说是古文经家创造出来的。这种造字条例的分析成为早期文字学理论的一部分。到汉和帝时,侍中贾逵的弟子许慎根据六书进一步分析篆书的形体结构,建立研究文字体系的方法,作《说文解字》14篇,按照偏旁分为540部,始“一”终“亥”,凡同从一个偏旁的都列在一起,同条共贯,杂而不越;每个字的解说都兼顾到形音义三方面,这是极大的特点。全书以小篆为主,兼收古文、籀文,共收字9353字,重文1163字,是中国也是世界最早的一部最有创造性的字典,在中国也是最有影响的一部字典。书中保存了大量的古文字和古音古义,对研究文字的功用极大。中国文字学在这时已经建立起来了。后代许多字书都仿照《说文解字》的体例,按部首编排文字,这种方法一直到现在还在应用(见《说文解字》)。

魏晋南北朝的字书 汉代篆书不通行,通行的是隶书和草书。《说文》的正文是篆书,在社会上不易通行,所以晋代任城人吕忱作《字林》7卷,用隶书书写,全书沿袭《说文》的编排方法,仍分为540部,而收字有12824字,比《说文》多3471字。在唐代《字林》跟《说文》同为士林所重,但到宋代以后反而亡逸,清人任大椿始有辑本。南朝梁代,吴郡人顾野王又编纂一部《玉篇》,共分30卷,仍沿袭《说文》的编法,分为524部,但是部次有变动。书中每字下详举字义,并引证经传文句和注解,这是前所未有的。字有异体,则分列在两部或数部,也跟《说文》列于一字之下不同。全书收字达16917字,又比《字林》多4000多字,这正反映文字在随着语言不断发展。这部书在唐代跟《说文》一样流行,一直流传至今。不过,今本《玉篇》是唐代孙强的增字本,注文已大加删节,宋代重修,名为《大广益会玉篇》,跟顾野王原书的面目全不一样了(见《玉篇》)。

魏晋南北朝的文字学主要表现在编纂字书上。一是多收罗古今异体,二是多列举训释例证,原原本本,信而有徵。这两方面对后世字书的编纂都有很大的影响。如宋代的《类篇》,明代的《字汇》、《正字通》,下至清代的《康熙字典》,都合于《玉篇》的格局,广采众书编纂而成。其次,魏晋时代有关文字的杂书也不少,如魏张揖的《古今字诂》、《杂字》、《埤苍》,晋王羲之的《小学篇》,晋葛洪的《要用字苑》,宋何承天的《纂文》,齐王劭的《俗字难字》,梁阮

孝绪的《文字集略》等都见于前代史志，唐人书中引到的很多，他们对文字跟语言的实际配合以及俗语、今义之类都极为重视，这是一大特点，可惜这些书今已亡佚无存。在魏晋时代“仓雅之学”盛行，“仓”即《仓颉篇》，“雅”即《尔雅》。《尔雅》是秦汉间小学家所编的解释词义的书。张揖、郭璞学识都极为渊博。郭璞尤精于训诂，著述亦多。

唐代刊正字体与《说文》研究 南北朝时期解散隶体，行书、草书、楷书盛行，字的写法日趋于混乱。如“惡”写为“𡙇”，“鼓”写为“𡙇”，“席”写为“𡙇”之类，都是一些别字讹体，所以到隋唐时代开始刊正文字。隋代曹宪曾著《文字指归》4卷。到唐代贞观年间秘书监颜师古作《字样》1卷，以刊订经籍文字。其基本精神是折衷于篆隶正俗之间，取其适中，以为楷法。后来他的侄孙颜元孙又作《千禄字书》，分字为正、通、俗三体，提倡高文典策应当用正体。其后唐玄宗有《开元文字音义》一书，以隶书居首，而以篆文附下，以确定楷体的写法。到唐代宗大历中张参又作《五经文字》一书，根据《说文》、《字林》、《经典释文》等书审定字体；文宗开成二年(837)唐玄度又作《新加九经字样》，补充《五经文字》所不备，由此楷书有了一定的规范。这是文字学史上在整齐文字方面所取得的重要成果。

唐代本是韵书盛行的时期，虽然也有人编制了很大的字书，如武则天的《字海》就有100卷之多，但是没有传布。反之，在社会上却有不少记载日常用语的书，如敦煌古书中的《时要用字》、《字宝》、《碎金》、《俗务要名林》等，自成一类，很切合实用。

《说文》在唐代虽为应“书学”考试的人所必学，可是因为有《玉篇》、《切韵》可以检字，就很少有人真正理解《说文》的价值去从事整理工作。大历中李阳冰精于篆书，曾刊定《说文》，但多荒谬无稽之说，徒知篆法，不足以言学。直到唐末五代时期南唐徐铉、徐锴兄弟二人，才精究许书，而徐锴尤为精通。徐铉入宋后曾与句中正等校订《说文》，使《说文》流传至今。徐锴著有《说文解字系传》40卷，这是《说文》最早的注本。徐锴认为“文字之义，无出说文”，所以把许书比之于经，而称自己的解释为传。《系传》的主要工作是疏证许说，引书以证古义，并且从文字的谐声偏旁和字音上推导语义的本源，创见很多。在文字方面特别说明古书中字有假借，由于时移世易，字又有古今之异。辨析精审，在文字学史和训诂学史上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徐锴又有《说文解字韵谱》10卷，把《说文》的字按韵书的韵部来排，颇便于检索。

宋代的金石文字之学 五代末和宋代初年好古之士注意搜集古文奇字，编纂成书，如郭忠恕的《汗简》，夏竦的《古文四声韵》都是。他们所根据的材料主要出自书本和一部分的石刻。可是后来商周钟鼎彝器出土日渐增多，有些学者如刘敞、杨南仲、欧阳修等开始从事古器物的著录和研究。一方面摹绘器形，一方面试着认识铭文。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蓝田吕大临作《考古图》，并作了释文，这是属于古文字学的第一本书。他虽然只认识了凡

百字，但是为古文字学的建立开创了道路。后来类似《考古图》的书有王楚的《宣和博古图》。专录铭文的有南宋绍兴年间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王俅的《啸堂集古录》。专门集录文字的有王楚的《钟鼎篆韵》。后来薛尚功又作《广钟鼎篆韵》，集录的文字稍稍加多。这是研究钟鼎文字的先驱。

宋代不单是对钟鼎彝器文字开始进行研究，而且对石刻文字也很注意。欧阳修《集古录》和赵明诚《金石录》都有关于石刻的记载。在南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洪适作《隶释》一书，凡26卷，收碑碣258通，专门研究汉碑的隶书，考证了不少文字的假借，提供了很多重要的材料，代表了一种新的研究方向。

宋元间的六书之学 六书自东汉人提出以后，应用六书来研究文字构造的不多。宋代王安石作《字说》，过分强调形声字的声旁有义，把形声字都解释为会意字，六书就缺一。南宋时郑樵创新，不用《说文》系统，专用六书作文字形体的分析，以独体为文，合体为字，立330母为形之主，870子为声之主，合为1200文，成无穷之字。他把《说文》的540部归并为330部，开后人归并部首之先河。他的学说保存在《通志·六书略》里。宋末元初戴侗作《六书故》，则不用《说文》部目，而另分为九部。一曰数，二曰天文，三曰地理，四曰人，五曰动物，六曰植物，七曰人事，八曰杂，九曰疑。分为33卷。文字以钟鼎文为主，注用隶书，以六书说明字义，颇有创见，可惜不为人所重视。元世祖时杨桓又作《六书统》20卷，用六书来统摄文字，先列古文大篆，次列钟鼎文字，再列小篆，他想利用古文字来推寻造字本意，但为六书所囿，类例庞杂，反不足取。

明代的《字汇》和《正字通》 自许慎作《说文解字》创以形旁编排文字的方法以后，《字林》、《玉篇》和宋代的《类篇》都仿效《说文》而作，惟《玉篇》稍变许慎部次，而把字义相近的序列在一起，《类篇》则一如《说文》原来的部序不改。明代万历四十三年(1605)，梅膺祚作《字汇》12卷，另外创制新的排列法，颇有革新精神。他按照楷书笔画多少排列部目，自1画至17画列为214部，而一部之内的字也按笔画多少排列次第，这是很便于检查的一种新方法。因为从篆书变为隶书，部首之间已经很难据形系联，为便于查检，势不得不以笔画多寡为序。所以后来的字书如崇祯末年张自烈、廖文英所编的《正字通》，清康熙年间所编的《康熙字典》都沿袭承用。至今还是编排检字常用的方法。《字汇》收字以见于《洪武正韵》的为主，兼采经史中常见的字，怪僻的字一律不收。注释比较简要，在明代极为流行。《正字通》就是根据《字汇》而作的，全书也分为214部。不过收字多于《字汇》，注解也增繁，并援引前代书籍为证，兼及一般俗语意义，虽稍嫌芜乱，然比宋代的《类篇》切于实用。清代的《康熙字典》也就是以《正字通》为蓝本修辑而成。收字加多，例证更加充实，惟成于众手，不无错误。道光年间王引之奉命作《字典考证》12卷，刊正其误。

清代的说文之学 中国文字学到清代有了很大的发展,这跟考证经史、推重汉学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要通五经就不能不通小学,而小学里最重要的一部书就是《说文》,所以《说文》之学在清代最为盛行,以说文学名家的很多。段玉裁有《汲古阁说文订》和《说文解字注》30卷,桂馥有《说文义证》50卷,王筠有《说文释例》20卷和《说文句读》30卷,钱坫(1744~1806)有《说文斟论》14卷,朱骏声有《说文通训定声》18卷。其他有关《说文》的论述极多,不胜枚举。

他们对《说文》的研究,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

① 校勘许书。《说文》经过历代传写到宋代刻板,讹夺已多,明代毛晋、毛扆用宋本开雕,又出现一些错误,所以段玉裁首先根据不同的宋刻本和徐锴《说文解字系传》,熊忠《古今韵会举要》以及其他古籍校订汲古阁本的讹误。段氏以后又有几家刊正《说文》,进一步改正宋以后传本的疏失。

② 解释许书的体例。为读通《说文》,首先要了解《说文》的体例。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里最先指出《说文》中有注文连篆文读例。如“参”字下注文是“商星也”,应读为“参商星也”。段玉裁作《说文解字注》更随注阐发许书通例,王筠极为推重。王氏又作《说文释例》一书,多所发明。后来又有人对《说文》中的“一曰”、“读若”、“引经”等等作考证。

③ 疏证许书的训解。《说文》中保存了很多的古字古义。在清代最先注解《说文》的是段玉裁:他引证经传子史来解释许说,并且从形体和声音两方面说明字义,最有创见。同时注《说文》的还有桂馥、钱坫。桂馥的《说文义证》搜集的古书训解最为完备,对研究许书的训解很有帮助。后来王筠又参照段、桂两家书作《说文句读》,简当易读。

④ 说明古今字和假借字。文字在使用上因时代的不同而有古有今。段玉裁说:“古今者,不定之名也。三代为古,则汉为今;汉魏晋为古,则唐宋以下为今。”(《广雅疏证序》)许慎书中有些是古字跟后代通用的字形不同。清人研究《说文》,根据许书的训释而说明古某字与今某字相当,以见文字的孳乳和演变。古人写字,有时同音或音近假借,古书所以难读,往往由于文字有假借。清代研究《说文》的人,如段玉裁、王念孙、桂馥、朱骏声对古书的假借字都有所发现,解释了不少经传中文字训诂的问题。

⑤ 根据《说文》的谐声字研究古音。古音的研究自宋代就已经开始。郑庠有《古音辨》,吴械有《韵补》。到明代陈第又作《毛诗古音考》和《屈宋古音义》。主要都是根据《诗经》和《楚辞》等韵文考察古韵。到清代又开始注意到文字的谐声。段玉裁据《诗经》押韵分古韵为17部,又按照《说文》的文字谐声系统把声旁按17部列为谐声表,以与《诗经》押韵情况相印证,在考证古音方面创出另一种方法,识见超卓,引起很多学者重视。后来就出现不少《说文谐声谱》之类的著作。影响所及,也就有人利用文字的谐声系统研究古声母的分类了。

⑥ 根据《说文》的文字谐声系统因声以求义。形声字的声符相同的字,其意义有时相近或相通。在清人的小学著作中,段玉裁阐发的最清楚。他说:“学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广雅疏证序》)又说:“声与义同原,故谐声之偏旁多与字义相近,此会意形声两兼之字致多也。”(《说文解字注》示部孳字注)他在《说文注》里举出很多谐声字声中见义的例子。如凡“于”声字多训大,凡从“皮”之字皆有分析之意,凡“丕”声之字皆训直而长者,如此之类很多。这样把形音义贯串在一起研究,执简驭繁,掌握规律,使知识条理化,成为新的语言文字之学,这是前所未有的。

近代的古文字学 清代学者除了研究《说文》篆书以外,也还注意到隶书和草书。如顾藹吉有《隶辨》,翟云升有《隶篇》,石蕴玉有《草字汇》,都是属于字典的性质。可是自乾隆、嘉庆时期起,金石学特盛。清朝官修的《西清古鉴》和《宁寿鉴古》著录的是宫内所藏的钟鼎彝器,而在民间又不断有古器物出土,收藏家不仅摹为图录,而且研究器物上的铭文,古文字学也就有了很大的发展。研究的主要对象是金文、石鼓文、古玺和古陶文字。光绪间,吴大澂著《字说》,提出一些文字的新的解释,他又作《说文古籀补》,搜集了各种古文字材料以增补《说文》,为用古文字与《说文》籀篆相对照进行研究提供了方便。

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100年之间,集录铜器铭文的,在阮元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之后,有吴式芬(1796~1856)的《捃古录金文》,吴荣光(1773~1843)的《筠清馆金文》,方濬益(?~1899)的《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等,著为图录的,有吴大澂的《恒轩吉金录》,刘喜海的《长安获古编》。品类繁多,盛极一时。关于文字的研究,如刘心源的《古文审》,孙诒让的《古籀拾遗》、《籀廬述林》、《古籀余论》等书对研究金文都有所发明,而孙诒让倡偏旁分析法尤为重要。

到了近代,古器物收藏家更注意摹拓传印。罗振玉对影印铜器铭文不遗余力,有《殷虚存》,《三代吉金文存》,搜罗甚富,为研究铜器铭文提供极大的便利。王国维又作有《金文著录表》,把前人书中已著录的钟鼎彝器都注明见于何书。学者也就可以按图索骥,检视原书了。

引起古文字学家有更大兴趣的是商代甲骨卜辞的发现。自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在安阳殷墟发现甲骨文以后,古文字学转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王懿荣、刘鹗首先搜罗甲骨。刘鹗又印出《铁云藏龟》一书,学者大为惊喜。孙诒让开始认识甲骨文,写出《契文举例》,后又作《名原》,对汉字的发展有了更多的理解。

后来甲骨文出土的数量越来越多。罗振玉把他历年收藏的汇编为《殷虚书契》前后编印出,并作《殷虚书契文字考》和《殷虚书契考释》,王国维作《殷虚书契文字考》,又根据卜辞考证商代的先公先王,成就独多。在罗、王之后,已故的著名的古文字学家有董作宾、容庚、郭沫若、唐兰、于省吾、陈梦家、孙海波等人。这些人里,容庚有《金文编》,孙海波有《甲骨文编》,都按《说文》部次编

排,等于是金文字典,甲骨文字典。董作宾曾从事安阳殷墟的发掘工作,最先提出卜辞要作断代的研究,并作有《殷历谱》。陈梦家有《殷虚卜辞综述》一书,对甲骨卜辞作了全面的说明。郭沫若、唐兰、于省吾三家著述极多,他们在考释甲骨文、金文两方面都各有发明,成绩超卓。在文字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上建树较多的是唐兰。唐兰论文字的构成破除六书说,而倡三书说,即象形、象意、形声,以三书范围一切文字,这是一种新的见解。

现在古文字的研究正在蒸蒸日上,甲骨文、金文都有集录在一起的书,如《甲骨文合集》、《殷周金文集成》,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近年来,出土文物日多,春秋战国时期的铜器、陶器、货币以及秦汉的竹简、木简,汉代的帛书都是研究的材料,古文字学定将有更大的发展。

结语 根据上面的叙述,中国文字学发展的历史按照时代来说,可以概括为以下6个时期:

① 秦汉时期。秦代到西汉以编纂学童的识字书为主。东汉时期古文经家注意研究相传的篆文、古文、籀文,分析造字的原理,创六书说,开始建立文字学。和帝时,许慎作《说文解字》,以篆文为主,兼采古文、籀文,创按形体偏旁编排文字的方法,分别部居,据形系联,成为中国第一部字典,影响极大。

② 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个时期文字逐渐增多,一字往往有异体,而且有不少增益偏旁的字,因此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注解详细的字书,同时也出现了按韵编排文字的韵书。还有解释古今字和俗语、俗字的书。这个时期是编纂字书的时期。自东晋以后,也是音义书盛行的时期。

③ 隋唐时期。这个时期为了确定楷书的规范,减少南北朝时期的别字讹体,因而有字样之学,目的是确定楷法,使楷书趋于定型。在这个时期内虽然韵书盛行,但是在文字形体方面仍尽量要求纯正,对正体、俗体分别很清,这个时期内,除刊正文字的书籍以外,还有很多属于《时要用字》一类的书和编纂日常口语词汇的书,这类书在社会上颇为流行。唐代篆学衰微,注意篆法的只有李阳冰堪称独步,到五代时,南唐徐锴始有《说文解字》的注解,成为一家言。

④ 宋元明时期。宋代有了《说文》的刻本,字学开始复兴。始而学者注意搜集古文字,编订成书;继而开始根据古器物 and 古代石刻等实物从事古文字的研究,为文字学开辟了一条新路。古文字学随着古器物学的兴起而建立起来。铜器的铭文由收录于古器物的图录中而被摹录为法帖,成为研究古代文字和文化历史的资料。由南宋到元代又有杰出之士,重新利用六书探讨文字制作的原理,虽时有新解,而所立类例不免支离破碎,明人承其弊,除编有新的部首检字的字书和刊正俗体字者以外,虽有述作,但大都无可取。

⑤ 清代时期。清代是经学昌盛的一个时期,要通经传,就不能不研究文字、音韵、训诂,所以文字学也随之而兴盛。乾嘉之际,学者尊崇汉学,《说文》的研究最为盛

行。他们以古音知识为基础,把文字、音韵、训诂融会贯通,向新的语言文字学的方向发展。道光、咸丰间学者注意到以钟鼎文字与《说文》篆书相比较。同治、光绪间钟鼎文字研究成为文字学的新的领域。到近代就有了极大的发展。

⑥ 近代。近代学者对文字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比较多。研究的资料包括甲骨卜辞、铜器铭文以及玺印、竹简、木简、绢帛、石刻等所有的古文字和唐宋元明书籍中的俗体简字,研究内容之广泛为前所未有。而且不单纯局限于识字,由识字进而涉及语词文句的意义和语法结构。有的学者如王国维、郭沫若更由文字以考证古史和古代的社会文化。研究的方法特别重视分辨材料时代的早晚。例如甲骨卜辞要作断代的研究,铜器铭文分西周和春秋战国来诠释。多数学者能破除六书旧说,根据古器物上的文字探求古人造字的原理和字形结构发展的规律,同时也从形体上考索字的本义跟引申义的关系。因此文字学有了很大的发展,并成为语文教育的一部分。语言文字学家又从事整理汉字和简化汉字的工作,以促进汉字规范化,使汉字更好地为记录汉语服务。所有这些就是近代的新成就。

文字学与音韵学、训诂学的关系 文字学虽是以研究形体为这一门学科的主体,但是文字本身具有形音义三方面,所以文字学跟音韵学和训诂学互相有联系。不懂得古音,就不能理解谐声字和声旁在声音上的关系,也就不懂得文字的假借或通用在声音上的关系。

宋代初年徐铉校订《说文解字》,对有些字的谐声就产生疑问,如“代”从“弋”声,徐以为“弋”非声,“𢇛”从“𢇛”声,徐以为“𢇛”非声,当从“𢇛”声,“𢇛”从“𢇛”声,徐以为当从“挥”省,“𢇛”从“各”声,徐以为“各”非声,当从“路”省。诸如此类都是由于不了解古音而疑所不当疑。明代张位的《问奇集》论字的假借,以为内外的“内”作收内的“内”,伯仲的“伯”作王伯的“伯”为“意借”,而与声音不相涉,也是不对的。

清人因为了解了古音系统,所以能理解文字的假借。由于理解了假借,所以能讲明古书,发前人之所未发。唐宋学者所不能理解的都涣然冰释,怡然理顺。足见研究文字必须以了解古音系统为关键。研究古文字更不能不了解古音,否则就不易识别古器物中的一些不易认的字。

文字通假是秦汉古书中极普遍的事情,反过来从文字的通假也可以考证古音。汉字中形声字占大多数,从文字形体上所标记的声符既可以推求声韵的部类,也可以推求同从这一个声符的字所具有的共同具有的意义,为训诂学增添有系统的理论知识。清人所说的因声以求义主要是以形声字为根据的。这些都可以说明文字学跟音韵学、训诂学是互相有联系的。清代的小学之所以昌盛,就是由于深切理解三者的关系,以三者互相求的办法来研究字形、字音和字义,所以能有特殊的成就。

参考书目

许慎:《说文解字》(清代孙星衍刻《平津馆丛书》本,商务印书

馆《四部丛刊》本,中华书局影印一篆一行本)。

徐中舒主编:《汉语古文字字形表》,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1981。

唐兰:《中国文字学》,古籍出版社,上海,1979。

唐兰:《古文字学导论》,齐鲁书社,济南,1981。

(周祖谟)

Hanyu xiuci

汉语修辞 (Chinese rhetoric) 修辞是使用语言的过程中,利用多种语言手段收到尽可能好的表达效果的一种语言活动。所谓好的表达,包括它的准确性,可理解性和感染力,并且是符合自己的表达目的,适合对象和场合的得体的、适度的表达。修辞有民族性,不同民族各有自己的修辞习尚。修辞有社会性和历史性,修辞的习尚与社会历史发展有密切关系。研究这种语言活动及其规律的科学是修辞学。它是语言科学的一个分支。它与逻辑学、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民俗学、美学、文艺学等多种学科有关联。

汉语与修辞 修辞运用语言(包括它的书面形式即文字)的特点,同时也受语言特点的制约。汉语的语素以单音节的为主,词以单音节的和双音节的为主,而汉语又是非形态语言,没有词形变化的约束。这两个特点,一向被充分运用于修辞,反映在如下几个方面。

① 语言单位的组合灵便。《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老”本是形容词,这里第一个“老”当动词用,第二第三个“老”当名词用。现代汉语中某些说法如“他铁了心了”,“母亲情词恳切的来信温暖了她被多次挫折冷透了的心”等等,都有浓厚的修辞色彩,描写景物,抒发感情,都有明显的特殊效果。“铁”原本是名词,“温暖”是形容词,“冷透”是短语性的词,在这里所举的例句中都带了宾语,这正是汉语的特点提供的便利。

不仅实词,虚词也可以产生修辞效果。唐代韩愈的名句“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这个句子里,可以只用第一个“而”,后面不再重复它,或者重复用三个“而”,二者使句子在节奏快慢,语调舒畅或迟滞等方面有差异,从而在听者或读者的心理上引起的反响不同。韩愈用了后一种说法,使人感受到他当时的沉郁心情。现代汉语的某些虚词在有些场合也有修辞作用。比较:“你放心,我不会让他逃掉。”“你放心吧,我不会让他逃掉的!”用不用“吧”和“的”表示不同的语气。

② 非常容易组合成音节数目相同而结构上平行的语句,通常称为对偶。并且很容易押韵。大量运用整齐押韵的语言结构是汉语修辞的特色之一。《诗经》、《楚辞》有大量整齐、对偶、押韵的句子,就连先秦诸子和史传的散文里也夹用了不少。从古及今,无论口头上还是书面上,无不大量使用。魏晋南北朝时期甚至产生了一种全篇整齐、对偶押韵的文体——骈体文。启蒙的识字教材和阅读教材也大量使用。各行各业往往各有自己的一套口诀,都是整齐押韵的,如医药有“汤头”歌诀,珠算有“九九”歌诀,打拳练功的有拳诀,例如最普及的“八段锦”

歌诀,等等。这些,至少有容易上口记诵的作用,有的还能起些概括性强,以至谐趣幽默的作用。许多谚语俗语,这后一种作用就非常显著。在封建社会,官府的公文书,通令告示,以及诉状判词之类,也大量运用。后来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苏区、解放区,扫除文盲,普及教育以及政府公告等等也常用,主要是为了易于记诵传播,对于识字不多的群众很有便利之处。在生活和各种实际工作中这样大量使用整齐、对偶、押韵的语言形式以达到特定的目的是汉字特点提供的一种独特的实用性修辞手段,为别种语言社会中所少见(见修辞格)。

③ 汉语里陆续出现并且积累了数量可观的“四字成语”,这些成语中绝大部分富于显著的修辞效果。从修辞的角度对汉语成语进行深入研究,是汉语修辞学中重要课题之一(见成语)。

除上述几个大的方面之外,运用汉字的特点还产生了若干特殊的修辞技法,如回文、顶针、谐音双关,等等(见修辞格)。

汉民族文化传统与汉语修辞 修辞与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有密切的关系。这里所谓文化传统,包括由种种因素形成的民族心理特征,思维习惯,哲学观点,审美观点,以及反映这些特征、习惯、观点的各种文化成就。

① 在汉语修辞中大量用“比”,用得多,用的方面广。“比”的方式有种种,总的就是不直说,而以此喻彼,让听者或读者自己去理解。一般修辞学上讲的“明喻、隐喻、借喻”等都是“比”,就连“夸张”、“移就”等,往往也是“比”或者包含有“比”的因素;各种成语,许多都是“比”的运用。大量的、多方面的用“比”,反映汉民族文化传统的一个侧面。有些比,许多年来长期使用,几乎成了一种定型的惯用语,甚至浓缩成为一个常用词,如“推敲”、“琢磨”等。在汉语词汇里有一部分词,实质上就是用比的方法构成的。这样的词并不是先有一个基本义或本义,然后才孳生出来一个比喻义(如“扣帽子”的“帽子”,“背包袱”的“包袱”),而是即以比喻义为本义的,如“蚕食”、“鲸吞”、“瓜分”、“席卷”、“囊括”、“海碗”、“海量”、“童心”、“水蛇腰”、“八字脚”、“漆黑”、“焦黄”等。动词、名词、形容词各类里都不少。不少文章整篇是一个比喻,用来阐明一种道理。这个事实是汉语用比特别多的一个有力证明。喜欢用比,善于用比,既是民族智力和语言素养的反映,也有某些社会历史因素,并且产生某些社会影响。历代很多关于婉言进谏,以至象《史记·滑稽列传》中那些俳优用幽默的比况向君主进谏成功的例子。同时,探求“弦外之音”,向字里行间揣测含有什么深文大义,以至流于牵强附会的风气也很盛。《诗经》里不少民歌以及历史上其他一些状物抒情的诗文被解释成为称颂在上者的事情很多;被解释成为讽刺在上者因而遭受贬谪以至酿成文字狱的事例也不少。这种风气,一直影响到现代。借助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义学的研究方法对汉语修辞的这种习尚进行研究,是汉语修辞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领域。

② 以整齐、对称为主,以参差错落为辅的审美观,在民族文化传统的好些方面有所反映,例如音乐、绘画、雕塑、建筑等。修辞,特别是书面语言的修辞,具有同样的特点。无论诗、赋、词、曲、各体散文,都是一样,既见于整首、整篇的总的结构,也见于段落语句的局部组织。不仅古文如此,而且从早期的比较接近口语的白话散文小说,包括中短篇的所谓话本小说和长篇的所谓章回小说,直到“五四”运动之后,以至目前,各体散文都已使用白话,这种整齐对称和参差错落相间杂的特点,始终明显地存在。这是一种具有民族特点的审美观在语言运用中的反映。探讨这种审美观的形成,是美学研究对象之一。

③ 在汉民族文化传统的许多领域中,广泛运用一种朴素的辩证观点。事物被认为是包含着两种对立因素的统一体。这两种因素被概括为“虚”和“实”两个范畴。“虚”与“实”的关系被说成是“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虚实相生”。修辞,同样运用这种观点。无论诗、文,都有“虚写”和“实写”之分。整首、整篇,有虚写部分和实写部分。虚的部分和实的部分相资相生,相辅相成,或足以引起读者的悬念,或有助于读者理解而又节省笔墨,或足以引起读者深思与感情上的共鸣。在语言表达中有意识地运用“虚实”观点,取得某种效果,这是汉语修辞的又一个特点。

汉语修辞学中古今一贯的两个基本观点 历史上,汉语修辞学专著极少,直到20世纪初叶之后才渐渐增多。在历代的各种论著中,有关修辞的论述并不少见。集中起来,可以看出,有两个基本观点是从古到今一脉相承的。

① 自古以来,有关语言表达的有两组概念。一组包括“道,义,理,情,志,意”等,都属于思想、感情之类,也就是表达的内容方面;另一组包括“文,辞,章,文辞,文章,辞章”等,都属于言辞组织之类,也就是表达的语言形式方面。前者概括称之为“质”,后者概括称之为“文”。总的要求是“质文相资”,也就是形式和内容要相适应,相协调,相辅相成。其后,在“质”的方面,逐渐突出了“道”,于是有“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等说法。再后,又有“义理,辞章,考据”的说法,针对往往陷于空疏说教的所谓“道”,改为突出“义理”,并且加上“考据”或“考证”,实指清代经学家的考证之学,也泛指踏踏实实的作学问,实际上仍是两个方面:内容(义理、考据)和形式(辞章)。到当代,就直截了当地说成“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与内容统一”。无论对“修辞”两个字作怎样的解释,都离不开语言的运用。语言的运用要为表达内容服务。这是汉语修辞古今一贯的主导的基本观点。

② 文体、风格、技法三者可以分别研究,但以联系、统一为主,着重对全诗、全文的考察,重视三者的相互作用。这里所谓技法,主要指现在所说的“修辞格”,还包括别的一些运用语言的方法在内。《文心雕龙》除了讲文章的起源和作文的基本原则之外,既讲文体,也讲风格,也讲技法。曹丕的《典论论文》更是明确的讲技法和文

体、风格的关系的。宋代陈骥的《文则》,讲技法比较多,也讲了文体和风格。王构的《修辞鉴衡》是20世纪之前唯一用“修辞”命名的一部书。他引《珊瑚钩诗话》中的一段话,列举了几十种不同的文体,并多处讲到了风格和技法。很明显,王构认为“修辞”是文体、风格、技法三者的综合。清代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也兼论文体、风格和技法。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运用了现代语言学的若干理论,运用了比前人的论著更为科学的研究方法。在内容上,则依然是文体、风格、技法三者综合论述的,尽管技法方面的修辞格分析论列最为详备,文体虽涉及,没有列为专题来讲。陈望道自己评论《修辞学发凡》时,说它“没有深入地谈文体”,是不足之处,可见,他也认为研究文体是修辞学分内的事。

文体、风格、技法三个方面需要综合研究,这是自古及今治汉语修辞学的一个共同一致的基本观点。

汉语修辞学的历史发展 ① 修辞有社会性和历史性。从文字记载日渐丰富的先秦时代起直到20世纪初,社会性质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文化生活也不会有本质的变化。但是,两千年那么长的历史,在社会性质基本不变的条件下人们的风俗习惯必然也会有些变化发展。这种变化一定会反映到文化生活,包括文艺创作和修辞习尚中来。

宋、元、明、清四代,市民文学有很大发展,从“说话”(后代称为“说书”)起,逐步有了多种类型的讲唱文学,有了相当发达的戏曲和长篇章回体小说。文学的发展,必然对修辞的发展有影响。这些文学形式在语言上不同程度地向口头语言(白话)靠近。这些新的文学形式(有的论著中称之为俗文学)不再只是写出来供人阅读,而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了口耳之事,要好讲,好唱,让尽可能多的各阶层的人,包括文盲,能够听得懂。这种作品写出来也要让“略识之无”的人大概能看得懂。这些特点无疑会产生若干新的修辞手段。从文艺学的角度研究这些新的文学形式的已经不少,并且取得了成果。但专门从修辞学角度来研究的,至今似乎还是个空白。汉语修辞研究者需要在这方面加以弥补。

② 从古代到近代,研究汉语修辞的都忽略了口头语言和俗文学里的修辞现象,研究对象都是书面上的诗赋词章史传典籍中的“雅言”。两部影响最大的著作是:

刘勰的《文心雕龙》成书于公元6世纪初年,南朝齐末梁初,共10卷,50篇。第1卷的5篇,总论辞章的本源和基本原则,发挥了《质文相资》的基本观点。第2~5卷的20篇,列出了20种文体,其中既有诗、赋等文学体裁,也有史传、论说,以至诏策、奏启等实用文体,每种文体既叙其源流,也品评了前人的作品。第6~8卷的15篇讲风格和技法,其中包括如现在所说的辞格。以下两卷10篇讲对辞章的鉴别,其中《时序》篇提出了辞章与社会的联系。这是一部承前启后的巨著。它是先秦以来探讨辞章之学的总结,开此后1000多年研究辞章之学的先河。

陈骥的《文则》成书于南宋乾道六年(1170)。它把比喻细分为直喻、隐喻、类喻、诂喻、对喻、博喻、简喻、详喻、引喻、虚喻10类,是古代修辞学著作中讲比喻讲得最为详备的。它不只讲应当怎么样,还讲了不应当怎么样,或者在什么情况应当怎么样。它讲到用语要注意搭配得当,避免语病,以至讲到语助词的修辞表达效果。这些都是对《文心雕龙》以下有关修辞学的各种著作的重要补充,并且影响到后世以至现代。有人认为《文则》是历史上第一部名副其实的修辞学专著。

从北宋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开始,经宋、元、明、清四代,陆续出现了一大批诗话、词话、文话一类的著作和论述文章作法的著作,虽然其中有很多芜杂庸劣之作,但是也有不少精到的见解,特别是在修辞技法方面。

③ 20世纪初叶,“五四”运动前后,汉语修辞学的研究有了一个重大的发展和突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引进或参考了欧洲和日本的修辞学,开始建立了系统的汉语修辞学学科,并且在有的高等学校开设了修辞学课程;二是逐渐有了专以现代白话文为研究对象的现代汉语修辞学。从20~30年代,陆续出现一批修辞学专著。可举以下3种为代表:

唐钺《修辞格》(1923)。主要参考了欧洲传统修辞学,专讲修辞格(见《修辞格》)。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1932)。这部书参考日本修辞学较多,但是有自己的创见。它继承并发扬了《文则》和元代王若虚《津南遗老集》中指瑕、正误的传统,把修辞区分为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它继承古代著作中讲比喻、夸张、偶偶等修辞技法的传统,参考东西方修辞格的讲法,条分缕析,列为38格,这些,对此后的汉语修辞学研究有很大影响(见陈望道)。

汪震《国语修辞学》(1935),全讲白话文。第一章里说“国语修辞学限于中国标准的语言,既不是某处的方言,也不是专为读阅而不能用来讲话的文言,……我们为活人,说活话,把活人要说的话用一种技术写出而没有讹谬,有效而没有误会。这就是国语修辞学的意义。”这个出发点和当时国语运动的历史形势是合拍的。

④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修辞学研究也有了一些新的发展。

《文则》、《津南遗老集》里那些正误指谬的部分以及《修辞学发凡》概括为消极修辞的部分,不少地方是和语法交错着的。在汉语这种非形态语言里,语法、修辞以至逻辑的相互关系,比在西方语言里更为密切一些。这个事实逐渐被语言学界感受到,从而有了为致用的目的把它们结合起来讲述的设想和尝试。1951年发表了吕叔湘、朱德熙《语法修辞讲话》。这里所谓修辞,比较侧重《修辞学发凡》所说的消极修辞那类内容,结合着语法来讲述的。《语法修辞讲话》在序言里明白指出,此书以“匡谬正俗”为主要任务(见《语法修辞讲话》)。

50年代,参考苏联的学术发展的比较多。当时苏联修辞学界有一种区分语言修辞和艺术修辞的主张。鉴于

中国古代修辞学中就有讲句法、字法的传统,而在汉语里语法与修辞的关系又很密切,因而也有人作了参考所谓语言修辞的主张,把用词、造句的某些内容从积极的表达效果方面纳入修辞学里讲述的尝试。

60年代,语言学界在《中国语文》上发起了关于修辞学研究的讨论。出现了一些新的观点、新的尝试和设想。

1979年,郭绍虞《汉语语法修辞新探》出版。这是一部试图把语法和修辞融汇探讨的著作。

80年代,汉语修辞学的研究重新蓬勃开展起来了。许多年轻一代的学者正分头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着新的探索。有的更为广泛深入地探讨汉语修辞技法,特别是修辞格;有的把注意力指向对近代汉语的全面研究,包括对近代汉语修辞以及修辞专著的研究;有的着重对现代和当代作家作品的修辞的研究;有的试图探讨密切结合写作训练的实用修辞学,或者称之为文章学;有的着重探讨不同文体的不同交际功能的所谓功能修辞学;有的侧重探讨处于语法学和修辞学边缘的以连贯语言的运用为研究对象的所谓话语语言学,等等。成熟还需要时间。不过形势已使人们预感到,一种或几种新的汉语修辞学体系正在孕育形成之中,一些新的领域正在开拓之中。

参考书目

- 何文焕辑:《历代诗话》新版,中华书局,北京,1981。
周钟爵辑:《文学津梁》,有正书局,上海,1916。
郑奠、谭全基编,周定一校补:《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商务印书馆,北京,1980。
郑子瑜:《中国修辞学史稿》,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
周振甫:《现代汉语》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1985。

(张志公)

Hanyu xinguxue

汉语训诂学

中国语言文字学中一门传统的解释语词和研究语义的学科。“训”是说明解释的意思,“诂”本义是古言的意思,引申也作解说古语讲。“训诂”的原意是用通行的语言解释不易为人所懂的古字古义,目的在于疏通古书的文义,讲明字义。后来就作为解释词语音义的泛称。

“训诂”一词在班固《汉书》里多写为“训故”。“故”就是古语。如《刘歆传》说:“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又《扬雄传》说:“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训故”与“训诂”同义。章句是分章析句,解释一章一句的意思,训诂是专指讲明文词的音义,两者不相同。训诂学就是解释语词和研究语义的学问。旧日只看作是“小学”的一个部门,现在正逐渐发展为一门有科学体系的汉语语义学。

语言里的词因时代有变迁,而有古今之异,因地域有不同,而有方言之别。因此,后代的人读古代的著作不能懂,就要以今语释古语;同一事物,不同的方域称名或有不同,就要用通语释方言。语言总是在发展的,语词在使

用中意义也常常会有改变。一个词由一个意义引申发展出别的意思,就成为一个多义词。多义词在使用时场合不同,意义就不一样。为免去误解,也往往需要加解释。这些就是训诂所由起。久而久之,就有集中讲解字义词义的书,这种书就称为训诂书。语言的各个方面都是有系统的。语音的声韵有系统,词汇的构词有系统,词的音与义和词与词的音与义之间的关系也是有条理可寻的。因此由一字一词的解释进而有意识地从事联贯的、有系统的语义研究工作,创造出科学的理论,对汉语发展历史的理解,对解释古书,对编纂字典、词典,对语文教育都会有重要的贡献。

训诂学的内容和任务 训诂学既然是研究词义的学问,其研究的对象主体即是古代的书面上的语言材料,而现代方言的口语资料也在参考之列。要研究古代的书面语,应当具备文字、词汇、语法以及语音史的基本学识,掌握语言文字一般的发展规律,才能从事整理研究前代的训诂资料,总结前人研究词义的理论和方法,并进一步开创新的途径,作深入广泛的研究。

前代解释语词的资料极为丰富,研究工作者应当按照时代的先后,按照不同的性质,分别层次加以整理。前代的训诂学家解释语词时所应用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训诂学上有所谓形训、义训、声训。形训是就字形本身的结构说明所表现的词义的。义训是用现代人所理解的词语解释字在书面上使用的含义。采用一个同义或义近的词或一句话作解释。声训也称音训,是从词的读音上着眼,使用音义相通的词来说明词义,或有意识地从音上探求词义的来源。三者之中,义训用的最为广泛,不过如何加义训也是随词而异的。要研究前代的训诂,对古代的训诂书、字书、音义书以及韵书中怎样解释单词,怎样解释固定的词组和联绵词,怎样就文意说明词的通用和假借以及字音改变而意义不同之类的问题,都需要从事分门别类整理,求出通则,评定是非,从中吸取符合语言实际的有用的经验。

进而言之,凡是一门学术必然有理论、有方法。前代许多研究训诂的专家在解释词义的实践中曾提出很多重要的见解。如词与词之间音义相比的关系,通语与方言同实异名的关系,谐声字声符与字义的关系,本义与引申义和假借义的关系等等。在理论上就有所谓右文说,字义起于字音说,音同义近说,一声之转说,古假借必同部说。同时还提出探求词义的一些主要的方法。如形、音、义三者互求,因声以求义,比例文辞以相证,“疑于义者以声求之,疑于声者以义正之”(戴震《转语二十章序》)等等。这些都是从研究《诗》、《书》古训而发展成为一门学科的缘由。今日在总结继承前人的成果的基础上,语言研究工作者就要根据现代语言学的原理,研究词义的引申和由旧词派生新词的规律以及正确解释词义的方法;还要研究辨别同义词的法则,词义与语法的关系以及修辞对词义的影响等问题,从而建立起科学的汉语语义学。

训诂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 汉语历史久远,有文字

的记载已经有4 000多年,而语言却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地有变化。春秋战国以前,一个字大都是一个词。春秋战国以后,构词法有了发展,双音词逐渐多起来,字在增加,字义也有引申和变迁。想要了解古书中的词义不能不有解释。因此在先秦书里就有不少解说字义的材料。其中有据字形说义的,如《左传》宣公十二年说:“夫文,止戈为武”;宣公十五年说:“故文,反正为乏”;昭公元年说:“于文,皿虫为蛊”。有从字音推求字义的,如《孟子滕文公上》说:“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庠”与“养”,“校”与“教”,“序”与“射”都音韵相近。在《易经》里,如《说卦》说:“乾,健也”,“坤,顺也”,“坎,陷也”,“离,丽也”,都从音立训,也属同一类。又有用同义字来讲解的,如《易经·杂卦》说:“恒,久也”,“节,止也”,“解,缓也”,“蹇,难也”。这些都是字的常用义。有些字所代表的概念比较难懂,或别有专指,就采用语句加以说明。如《易经·系辞下》说:“幾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说卦》说:“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孟子·梁惠王下》说:“老而无妻曰嫠,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一一分别说明,力求明确,免有疑惑。在战国时代,“名家”是一时的显学,辨析名实,尤为精密。如《墨子·经上》说:“平,同高也”,“中,同长也”,“圆,一中同长也”,“信,言合于意也”,“间,不及旁也”,“盈,莫不有也”,“梦,卧而以为然也”。这些可以说近似科学的定义了。

周代自平王东迁雒邑以后,王室的势力日趋衰弱,诸侯争霸,战争频繁,人民转徙不安,语言也随之有了很大的变化。北方黄河流域有了区域共同语,凡是古语或方言为人所不能理解的就要用当时通行的语言即所谓“雅言”来解释。《论语·述而》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雅言”就是“中夏”之言。《孟子·梁惠王下》解释齐景公时命太师作乐,诗云“畜君何尤”一句说:“畜君者,好君也。”又《滕文公下》解《书经·大禹谟》“洚水警余”句说:“洚水者,洪水也。”又《左传》宣公四年说:“楚人谓乳,穀;谓虎,於菟。”这些又是以通语解释方言的例子。由以上所说可以充分理解训诂之兴在春秋战国时代。

训诂所以在春秋战国时代兴起,约有4种原因:①语言有发展,古今语有不同和方言有不同;②书面语用词与当时口语用词有不同;③社会不断发展,名物繁多,一词多义的现象比较普遍;④对用词表达思想的作用的理解和认识有了提高,逻辑思维日趋严密。因为有了以上几种原因,所以训诂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了很好的开端。

两汉的训诂书与经传的注释 汉代是训诂学蓬勃发展的时期。由于秦末社会的动荡,语言起了很大变化,先秦古籍多凭口耳传受,用隶书写出,世称为“今文经”。而从汉武帝以后前代的“古文经”出现日多,其中多古字古义,不尽为人所识,因此就有训诂学家为之注释。但在西汉时期,今文经盛行时,注释五经的人已经很多。以《诗

经》而论,就有齐、鲁、韩三家,文字颇有不同。其他各经也有章句训释之类。汉代的训诂学就是依靠经学而发展起来的,而且汉代已有专门解释词语的训诂书。主要的训诂书有《尔雅》、《方言》、《说文解字》、《释名》4种。这4种书各有特点,是中国训诂学的基石。

《尔雅》是由古代流传下来的最早的一部训诂书,无作者主名,从内容看应当是战国至秦汉之间经学家和小学家迭相增益而成的。旧说是周公所作,或说是孔子门人所作,都不足信。《汉书·艺文志》著录为3卷,20篇,今存19篇。书中《释诂》、《释言》、《释训》3篇是解释名物以外的语词,其余16篇是解释各种事物名称的,如亲属、宫室、器物、山川、草木、虫鱼、鸟兽之类。书中所释的词语主要是出自经传古籍。“尔”是近的意思,“雅”是正的意思,“尔雅”就是言辞近于雅正的意思。书中有的以汉代的今语释古语,有的以雅言释方言,有的以俗语释雅言。《释诂》、《释言》、《释训》3篇主要是类聚一般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语用一个通用词作解释,如《释诂》:“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权舆,始也。”其他各篇主要是类聚同类事物的名称分别解释。有古今称名不同的,有异名同实的,有同名异实的、用单词不能解释的,就用一句两句话作解释。品物多方,训解的方法也有不同。这是汉代早期一部训诂的总汇,成为后代解词释义的重要根据。汉代的训诂学也就由此开始发展起来(见《尔雅》)。

《尔雅》之后,西汉末扬雄作《方言》,东汉和帝时许慎作《说文解字》,东汉末刘熙作《释名》,都是极为重要的著作。

《方言》的全称是《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其中有绝代语释和别国方言。《隋书·经籍志》题为《方言》。扬雄,蜀郡成都人。汉成帝时到长安为郎,他由从四方来到长安的孝廉、卫卒的口里调查殊方异语,条列排比,整理成书。原书为15卷,今存13篇。这是专门解释方言语词的一部著作,所解释的语词有的是古代的方言,有的是当时不同区域的方言,把意义相近的列为一条,用当时通用的同义词作解释,并分别说明不同语词所通行的地区。这不仅是一部重要的训诂书,而且也是研究中国古代方言的一部重要著作,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有很高的价值(见《方言》)。

继《尔雅》、《方言》之后出现的《说文解字》为东汉和帝时许慎所作,这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按照字形偏旁分部编排的字典,虽是一部字书,也是一部训诂书。许慎是贾逵(公元30~101)的学生,精通五经,既通今文经,也通古文经。他在《说文解字》里利用不同方式解说字义。有根据字形的构造说明造字的本义的:如“理”,治玉也;“忘”,不识也;“须”,面毛也;“突”,犬从穴中暂出也;“炙”,炮肉也。有根据古训以说明常用的词义的:如“慈”,爱也;“劲”,彊也;“辟”,法也。其中有许多是字的古义:如“沫”,洒面也;“浴”,洒身也;“澡”,洒手也;“洗”,洒足也;“頌”,貌也(同容);“翁”,颈毛也;“奭”,盛也;

“爱”,行貌;“颶”,丹砂所化为水银也(即“汞”)。书中也有从声音上来作解释的:如“诗”,志也;“尾”,微也;“马”,怒也,武也;“夜”,舍也,天下休舍也;“晋”,进也,日出万物进也。还有从字的声旁说词义的:如“斐”,分别文也;“贫”,财分少也。又有根据方言为训的:如“夥”,齐谓多为夥;“眊”,吴楚谓瞋目顾视曰眊。《说文》解释一个字从形音义三方面着想,立意精深,对后代的字书、训诂书影响极大(见《说文解字》)。

《释名》又是另外一种训诂书,作者刘熙专从词的语音上推求事物所以得名的由来,用同音或声韵相近的语词作解释。这种方法训诂学上称之为“声训”,或称之为“音训”。声训本起于战国末,西汉时今文经家多从声音上解说字义,刘熙是要从语言出发来研究事物命名所以之故,跟今文经家不同。他是有意识地要把语音和语义联系起来,就音以求义。例如《释名·释天》说:“天,豫司充冀以舌腹言之,天显也,在上高显也;青徐以舌头言之,天坦也,坦然高而远也。”虽然不免有主观唯心成分。但是从声音上推求各种事物名称的取义,类似寻求语源,对训诂学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见《释名》)。

汉代的训诂书还有《小尔雅》、《通俗文》。总起来说,各种解释词义的方法在汉代已经具备。最著名的训诂学家大部分都是古文经家。东汉时期古文经盛行,如贾逵、马融(公元79~166)、服虔、郑玄都先后注解经传。郑玄,兼通今古文经,所注最多。他能就其原文,字之声类,考训诂、据秘逸,以发疑正读,成为“汉学”的正宗,与许慎并称为“许郑”。

魏晋南北朝训诂义疏之学 在魏晋时期,张揖和郭璞是最著名的训诂学家。张揖是三国时魏明帝太和年间的博士,他搜罗汉代以前古书的词语和相传的古训纂集为《广雅》一书,体例完全依照《尔雅》,而补充《尔雅》所不备,所以名为《广雅》。张揖又作《古今字诂》和《难字》,见于《隋书·经籍志》,今已失传。郭璞是东晋河东人,为弘农太守著作郎,博学多识,精通训诂,所作古书注释最重要的有《尔雅注》和《方言注》。《尔雅》在汉代已有好几家注本,郭璞别为新注,超越前人所作,他既能以今语释古语,又能以方言释雅言,诠释品物的形貌,以及其功用等尤为明晰(见《尔雅》)。他所作的《方言注》能贯通古今,以晋代方言解释古代方言,并且联系语音,提出音有通转,为训诂研究增添了新的方法。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人民播迁流转,语言起了很大变化,古书词义艰深,不易理解,于是注释古书的风气日盛。魏晋时期,不仅《易》、《书》、《诗》、《左传》、《穀梁》、《论语》等儒家经典有注,其他古书如《史记》、《汉书》、《老子》、《庄子》以及辞赋之类也有人注释,训诂之学得以不致废坠。其中精义颇多,不无可取。自宋齐以后,兼释经注的“义疏”体出现,如梁代国子助教皇侃著有《礼记义疏》、《论语义疏》。义疏的兴起可能是受了佛教经典有“讲疏”的影响。

魏晋以后除经传有注释外,字书和辞书都多起来。字

书和辞书之增多与语言词汇的范围扩大,文字的增多和一词多义有直接的关系。晋代有任城吕忱作《字林》7卷,仿照《说文解字》而有所增益。宋代何承天有《纂文》3卷,北魏阳承庆有《字统》21卷。梁代阮孝绪有《文字集略》6卷,顾野王有《玉篇》30卷。现在所存只有唐人增字本宋修《大广益会玉篇》。顾野王原书只有5卷残卷。其他各书清人都有辑佚本。

隋唐时期的训诂学 隋唐时期承接魏晋南北朝注释古书的风气,著述更多。隋代陆善经有《昭明文选注》,唐代李善也有《文选注》。孔颖达(574~648)奉诏作《五经正义》,包括《毛诗》、《尚书》、《周易》、《礼记》、《春秋左氏传》。同时又有贾公彦作《周礼注疏》,徐彦作《春秋公羊传注疏》,杨士勋作《春秋穀梁传注疏》。这些书都是参照前代已有的注释而有所抉择。李善书除解释文词字义外,并注明字音和字的通借,对文句的出典尤为注意,成为一种注释的体式。孔颖达的《五经正义》不仅解释经文,而且解释注文,对语言中的虚词和文法也有不少的解说,这是以前古书注释中少见的。

在经部集部以外,子部、史部书籍也有注释。如杨倞有《荀子注》,成玄英有《南华真经义疏》,司马贞有《史记索隐》,张守节有《史记正义》,颜师古有《汉书注》,章怀太子李贤有《后汉书注》,这都代表了一时的风气。虽然是随文释义,但是也汇集了许多前代的训诂资料。

隋唐时期,韵书盛行,可是字书也不少。如隋代诸葛颢的《桂苑珠丛》100卷,唐武则天的《字海》100卷,唐玄宗的《开元文字音义》30卷,卷帙都极繁富,应有可观。可惜久已亡佚无存。但就前代书中所引到的材料来看,解词释义已改变旧观,由笼统而趋向于清晰,同时也由只记书面常训进一步注出当时口语使用的意义。这确是一种新的改变。就解词的范围而论,既有专门解释双音词的书(如《兼名苑》),又有专门解释日常应用的口语词的书。现在还能见到的有出自敦煌石窟的《字宝碎金》和《俗务要名林》,都是极珍贵的材料。

唐代在字书、韵书以外还有一类音义书。音义书一类始自魏晋,主要为经部书注音。到陆德明纂集前代各家所作书音(经书外,包括老子、庄子、孝经、论语、尔雅)为《经典释文》30卷,注音之外,有时涉及字义。到北齐时曾有沙门为佛典作音义。后至唐代高宗时释玄应作《大唐众经音义》(通称《一切经音义》),唐宪宗时释慧琳又根据玄应书扩充,作《一切经音义》。这两部书都仿照《经典释文》的体例,就原本经文摘字为训,所采古代训诂资料极多,而且有所辨析,在传统小学书中独为一类,对研究前代训诂极为有益,所以随着藏经一直流传下来。清代学者从中辑录出许多训诂材料。

宋元明时代的字义研究 宋代承接五代时期研究古文奇字的风气,学者对大量出土的钟鼎彝器广事搜罗,扩大了眼界,学术思想也因之大为解放。在经学方面已不完全斤斤墨守古人的成说,而别创新义,如欧阳修的《诗本义》,王质的《诗总闻》都是如此。在解说文字方面则出

现了王安石(1021~1086)的《字说》。王安石《字说》把形声字都说成是会意字,“六书”缺而为五,如谓“与邑交”为“郊”,“同田”为“富”,“讼者言冤於公”之类,完全出于主观臆断,虽行于一时,终不免为人所弃置不顾。

但同时有另一学者王子韶,他倡“右文说”,认为形声字的声符不仅表音,而且表义。凡诸声声符相同的字大都有一个共同的基本意义。如“戈”是小的意思。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贝之小者曰贱。如此之类,都以戈为义。汉字的形声字一般是形旁在左,用以表义,声旁在右,用以表音,所以称声旁为右文。王子韶,字圣美,浙右人,有《字解》20卷,失传。他所创声旁有义的学说对后代的训诂学家提出因声求义的方法有很大的启发。

宋代研究《尔雅》的有邢昺(932~1012)、郑樵两家。邢昺有《尔雅疏》,补郭璞注所未详;郑樵有《尔雅注》,引旧书以证郭;都各有发明。在南宋期间,朱熹(1130~1200)是重视训诂的人,他著有《周易本义》、《诗集传》、《四书章句集注》、《楚辞集注》等书。既采用前代旧注的优点,而又参酌新解;解经说字能运用到钟鼎彝器的铭文,见于《诗·大雅》、《行苇》、《既醉》、《江汉》诸篇,这是以前所少见的。

在宋代以前,学者对古今音异是比较模糊的。到南宋时期才开始注意到古韵问题。吴棫作《韵补》,从古代的韵文材料中考察古人分韵与《广韵》的异同,项安世的《项氏家说》也提出“诗韵”与后代音不同。郑樵又作《古音辨》,讨论《诗经》分韵的大类。这是清代学者研究古韵的先导。对研究词义有一定的帮助。

元代在字学上承接南宋时期的“六书”之学,并不注意研究训诂,所以在训诂方面除有两三种经传注释外,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

明代学术不振,受宋代性理之学的影响,游谈无根。训诂书籍有万历时朱谋㙔所作的《骈雅》,类聚古书中义近的双音词,按《尔雅》体例分类,每条予以解释,所以称为《骈雅》。这是一部属于雅学的书。在万历以后研究古学的风气日盛,如江宁焦竑(1541~1620)、成都杨慎(1488~1559)、桐城方以智(1579~1671)等人都有著述阐发字义。方以智的《通雅》,根据古代的语言材料说明音义相通之理,兼论方言俗语,创见极多,对清代的学者有不少启示。

清代训诂学理论的建立 清代学者受晚明焦竑、杨慎等人提倡古学的影响,极力推崇汉代的经学和小学,重考据,求实证,不尚空谈性理之学。到乾嘉时代“汉学”大为昌盛,为经书、子书作注解的人很多。要解释经传就不能不研究文字、音韵、训诂,因此语言文字之学盛极一时。《说文》、《尔雅》成为人所必读之书。研究《说文》、《尔雅》的重要著作都多至数十种,或刊正文字,或发明古训,各有述造。其他如《方言》、《释名》、《小尔雅》、《广雅》等书也有人人为之疏通证明。训诂之学有了极大的成就。著名的训诂学家指不胜数。

清代训诂学的发展跟古音学的成就有密切的关系。

自清初顾炎武作《音学五书》，根据《易经》、《诗经》等书的韵字开始把古韵分之为十部起，经过江永（1681～1762）、段玉裁、王念孙、孔广森（1752～1786）、江有诰等人的研究，逐渐加详，发展为二十二部，同时戴震又提出韵类通转的学说。在声母方面，钱大昕又提出声转的说法，而且发明轻唇音古读重唇音，舌头音、正齿音古归舌头。这些都成为研究先秦古籍和探讨字义的根据。

在理论方面，清代学者在训诂学方面最大的贡献是沟通语言与文字的关系，提出研究文字和字义必须理解声音，不理解声音就无以解决从文字形体上所不能解决的问题，甚至有时会陷于迷惘而不知所措。因为语言是用声音来表达意义的，文字只是记录语音的符号，所以必须了解文字的声音，从声音去探求意义。戴震说：“训诂音声相为表里。”（《六书音均表序》）这是很重要的见解。后来王念孙在《广雅疏证自序》里说：“窃以诂训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段玉裁为王念孙《广雅疏证》作序，也说：“圣人之制字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学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这些话十分精辟，成为清代学者研究训诂的准绳，从而建立了许多推考字义的理论和方法，把零散的知识贯串起来，使训诂学在中国语言学科中成为有系统、有理论、有严谨方法的一门学问。

清人研究训诂的目的，从实用的意义来说，首先是要解释经传和其他隋唐以前的古书。他们应用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① 从声音上推求文字的假借。古书之所以难读，一是由于有古字古义，二是由于文字上有假借。古字古义当考之《尔雅》、《说文》和其他前代书中的诂训，文字上的假借当求其本字。王念孙说：“诂训之旨，存乎声音，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则涣然冰释。”（王引之《经义述闻序》）那么，假借与本字的关系首先是音同或音近。段玉裁指出：“假借必取诸同部。”（《六书音均表》“古假借必同部说”）所谓“同部”就是属于古韵的同一部。因此，凭借古韵的知识，按照文字上的同音或音近的关系，再参之以文义来推求本字，就可以解决许多古书中难解的文句和古人所加的训诂上的问题。这是清人研究训诂方面的一大发现。

② 确定字的本义，根据本义以说明引申义。清人认识到音有古今之异，同时也认识到词义有古义，有今义；有本义，有引申义。如“曾”作为虚词用，古义同于“乃”，后世用为“曾经”的意思。“仅”唐以前作“约近于”的意思用，后世用为“但”的意思。这就是古义与今义之分。又如“荟”，《说文》解为“草多貌”，引申为凡物荟萃之义（《说文》段注）。“过”，《说文》训“度也”，引申为有过之过（段注）。这就是本义与引申义的关系。汉语词汇中一词多义是常见的现象。段玉裁说：“凡字有本义焉，有引申假借之余义焉。守其本义，而弃其余义者，其失也固；习其余义，而忘其本义者，其失也蔽。蔽与固皆不可

以治经。”（《经韵楼集》卷一“济盈不濡轨”条）他以历史发展的眼光说明词义的发展，对辨析字义极为重要。

③ 比证文句以考定词义。采用古书中相同的文句互相比证以考定词义，宋代人已经这样做了。在清代尤其重视这种方法。段玉裁注《说文》，刘台拱作《论语骈枝》，都能从实证出发解释古训。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尤其善于利用古书的资料，解决从来没有解决的问题。例如解《诗经》“终风且暴”，为“既风且暴”；解“邦之司直”为“主正人过”（《经义述闻》卷五），都是颠扑不破的。王念孙的《读书杂志》，胜义环生，尤为人所称道。王引之作《经传释词》，专门解释古书的虚词，综合各种古书中的用例参互比证，而得其确解，对研究古代文献有极大的帮助。他的书已经联系到语法的范畴了。后来又有人作了补充。

④ 因声以求义。研究字义从声音上来考察，在清代以前虽然也有人注意到，如南唐徐锴的《说文解字系传》，宋代王子韶的《字解》，元代戴侗的《六书故》，明代方以智的《通雅》等，但都不曾进行全面有系统的研究，也没有能总结出具体规律来。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古音的知识，清人有了先秦古音的知识，在前人成说的启发下进一步提出因声求义的原理，把形、音、义统一起来，因形以知音，由音以求义，为训诂的研究开辟了新的科学的途径。

段玉裁注《说文解字》首先提出“声与义同原，故谐声之偏旁多与字义相近”（示部“禛”字注），进一步又说“凡同声多同义”（言部“警”字注）。如从“农”声的字有厚重义，如浓、醢、脓，从“辰”声的字多有动义，如振、震、唇。当然这不是绝对的。同从一个声符的字不一定只有一义，而不同声符音同或音近的也可以有同义的关系。段氏指出有这类现象，这就比前人的右文说有了新的认识。王念孙作《广雅疏证》，就古音以求古义，而又把古书中有关的声近义通的字都联系起来解释，“引申触类，不限形体”，着重从语言的角度说明其间的音义相通和声音相转的关系。这种作法接近于词族的研究，是前所未有的。王念孙又作《释大》一篇，从声母方面观察声母相同而意义也相近的现象，又是一种新的尝试。与王氏同时的程瑶田作《果臝转语记》，指出凡物的形状、作用相同或相似的往往用声母相同的词来称谓，但字形不必相同。这又把声近义近的道理阐发无遗了。清代的训诂学到王氏父子已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研究的范围不仅是单音词，也注意到双音词，不仅研究实词，还研究虚词，初步进入了语法的范畴，对古书的解释提出许多新的见解，贡献极大。

清人对于训诂的研究所应用的方法主要是以上几种。他们除了注释古书和疏证古代训诂著作以外，还研究一些古代的钟鼎彝器款识，探讨一些文字的古义。并且做一些古代训诂音义的辑佚工作。如黄奭的《汉学堂丛书》，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任大椿的《小学钩沉》，顾震福的《小学钩沉续编》等都是些资料书。另外，

清人还编纂了不少训诂书,如吴玉搢(1698~1773)的《别雅》,史梦兰(1813~1898)的《叠雅》,夏燮的《拾雅》,洪亮吉(1746~1809)的《比雅》等书。阮元还主编了一部《经籍纂诂》,把古书中所见的每字的训释都编录在一起,检一字,而众义俱在,是一部训诂资料的总汇,极为有用的工具书。在历代书籍当中还有很多方言的记载资料,也有人搜集编录,如杭世骏(1696~1773)有《续方言》2卷,程际盛又有《续方言补正》1卷。程先甲又有《广续方言》。其他方言、俗语也有人集录。如钱大昕有《恒言录》,胡文英有《吴下方言考》,毛奇龄(1623~1716)有《越语肯綮录》,翟灏(1736~1788)有《通俗编》等等,为研究古今方言俗语提供了方便。

清代人研究训诂的成绩是大的,但也不无缺点。主要的缺点有两方面:一是在段玉裁以后有些学者墨守《说文》,以为《说文》的字都是本字,《说文》的训解都是本义,一词一语都要到《说文》去寻本字,执碍而难通。不知《说文》9353字中有古字,也有汉代后起的增益偏旁字,具有前后不同的产生层次,不能作为平面的看待;其训解以通用义为多,也并非都是本字本义,甲骨文、金文的佐证很多。二是讲解训诂,声转无方,凡言“语转”、“一声之转”之类未必合于先秦古音,滥用通转之说,所言多误,如钱绎《方言笺疏》之类,足为先戒。

近代以来训诂学的发展 20世纪之初到现代研究训诂的学者继承清代学者研究的成果,吸收了外国的一些早期的语言学的知识,开展了一些新的研究工作。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① 字原和语根的探求。章炳麟作《文始》,取《说文》中的510个独体字和半独体字作为“初文”和“准初文”,推求由同一“初文”而繁衍出来的音义相关的语词。凡音义皆近,叫作孳乳,音近义通,叫作变易。目的在求“语源”,求语词之间的亲属关系。但可惜没有脱离文字形体的束缚,所求不是“语源”,结果是文字之原,他用的方法是演绎法,而不是归纳法;在声音的通转上又以他所定的《成均图》为根据,有些也失之勉强。

其后,沈兼士作《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主张以形声字为出发点,用归纳的方法研究形声字同一声符所表现的基本意义。但同一个声符所表现的意义不一定就是一个,也当有所区别。形声字的声符,凡音义相同或相近的可以构成一个词族,由此再联系音韵,借重古音的知识(包括声母韵母),以求其语根。以实际证据为主,不以主观想象为断,其结果必较可信。这种理论无疑问是正确的。就研究的方法来说,把语言文字作为一个有系统的整体来研究,溯源探委,具有创新的精神,大为学者所重视。他后来所主编的《广韵声系》就是为从事这项研究工作的张本。

② 研究同源字。同源字是音近义同和义近音同的字,合在一起可以定出是同出一源。类聚同源字的意思也是在寻求语源。同源字的研究,其实就是语源的研究。同源字大都是同义词,或意义相关的词。在原始的时候

本来是一个词,代表某一基本概念,后来语音分化为两个以上的读音,才产生细微的意义差别。但是同义词不都是同源字,要以声音是否相近为定。王力在这方面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根据古代的训诂资料,探微索隐,编成《同源字典》一书,以韵部为纲,声纽为目,条理秩如,是研究汉语词义学的一部新著。

③ 虚词的研究。近代因为语法学的兴起,虚词的研究有了新的发展。最明显的改变是研究虚词的人对虚词的词类和用法都有比较清晰的说明。杨树达曾根据《马氏文通》作《高等国文法》,后来就以《高等国文法》为基础,参照王引之《经传释词》,作《词诠》一书。专门解说虚词。其后裴学海又作《古书虚字集释》,集录前人所说,并加以补正,与《词诠》相得益彰。吕叔湘有《文言虚字》一书,简明扼要,是学习古代文言文的一本重要的参考书。

④ 根据出土的古铜器铭文考订古书的训释。先秦的古书都以篆书古文书写,到汉代经过传写,后来又转写为隶书,文字伪变已多,汉代以来的解释往往有误。现代可以借助商周铜器铭文解决一些前代义训中的症结问题。王国维首先以铜器铭文解释《诗》、《书》中的常用词语(《观堂集林》卷二《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别开生面。后来一些古文字学家继踵而起,创获更多。在这方面成就最多的是于省吾。他平生所最服膺的是王念孙,所以他所著的书都重实证,不为凿空之论,如《尚书新证》、《诗经新证》、《楚辞新证》等书驳正前人误解的地方极多,为利用古文字资料刊正古书创立出一种新的门径。

⑤ 研究的范围扩展到唐宋以后语词的考释。清代学者对一些通常在书面上见到的口语词已经有所集录,大都是随笔札记,略明出处,而解释不多。近代以来,罗振玉虽有《俗说》一书,稍补前人著述所不备,但仍属札记性质,还不能说是训诂的研究。惟到张相作《诗词曲语词汇释》一书才开始作唐以后诗词曲语词的研究。诗词曲中很多习用的不容易懂的口语词在字书和词书中都没有解释,张相一一举例,比证详考,作出解释,是一种新的成就。同类的著作还有陆澹安的《小说词语汇释》、《戏曲词语汇释》和蒋礼鸿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都有很精到的解释,为阅读唐以后的文学作品提供參考。

训诂研究的展望 中国传统的训诂学肇始于先秦春秋战国时代。训诂之所以兴,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有变化。古的语词,后人不懂,就要有解释,方言有歧异,或语词在表义的内涵上赋予了新义,也需要有解释,所以就产生训诂。

从训诂学发展的历史来看,训诂学的兴盛,两汉是一个高峰,清代是一个高峰。两汉学者的训诂著作和经传的注释为训诂学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两汉训诂学的兴盛跟语言变化的加剧和古文经的传布有极大的关系。清代的训诂学有理论,有方法,发展为一门语言学科,跟经学、史学的考证和古音学等的成就有密切的关系。近代以来,学者受语言学、语法学的影响在理论和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的范围上都有了新的建树,改变了旧日墨守古

训,拘牵文字形体,和重古略今的风习,开创了新的途径。

研究训诂对解释古书,了解古代的科学文化和考证语言发展的历史以及校勘古书、编写字典辞书都有重大的作用。今后的训诂学从理论上和实用上都会向建立有科学体系的汉语语义学的方向发展。理论的开拓将给词汇学和词典学提供科学的根据。具体的工作,首先是总结前人的成果,吸取前人研究的经验和外国语义研究方面的理论,联系古今,旁及方言,分别层序,研究词义发展的各种现象,并寻出一般的规律,给语文教学和编纂词典以帮助。还有根据古今不同时代的语音系统,从音与义的关联上从事词与词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进一步发展为全面的词族的研究,这项工作的完成将为汉语发展史增添新的内容。

参考书目

-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经韵楼原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
郝懿行:《尔雅义疏》,家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3。
王念孙:《广雅疏证》,家刻本,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南京,1985。
王引之:《经义述闻》,家刻本,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南京,1985。
黄侃:《训诂述略》,载《制言》杂志,1935,第7期。
陆宗达:《训诂简论》,北京出版社,1980。
洪诚:《训诂学》,江苏古籍出版社,南京,1984。

(周祖谟)

Hanyu yinyunxue

汉语音韵学 (Chinese historical phonetics)

也叫声韵学,在普通语言学里叫历史语音学,它是研究汉语史上语音情况和它的发展的学科。历史语音学大致可以划分成两个方面。第一是研究一组历史上的材料,推求它当时代表的音。比如研究《诗经》押韵音、《切韵》音等等。这有时候需要从现代方言材料倒着往上推求。第二是就某一个或一组音,把它从某个历史时期的面貌变成现代某些音的历史叙述清楚。这两个方面经常是互相交叉,互相验证,互相辅助的。

学术研究的方法、结论是从材料产生的。音韵学的材料不幸有残缺的。有什么样的材料,就有什么样的方法和结论。底下以材料为纲,把过去研究家采用的方法举例讲出来。也就是介绍音韵研究“做什么”、“怎么做”。这两样讲明白了,音韵学“是什么”也就不言而喻了。最后说说音韵学发展的简史。

韵文 各民族在史前或有史的早期,即便没有文字,就有史诗了。这些史诗多数有半专业的人演唱或是念。和史诗同时或稍后又产生了抒情的民间小诗。有些诗可能押韵,汉族的最早的诗就大部是押韵的。最早结成集的就是《诗经》。

先民多半迷信。有的故事,包括一部分史实,都在算卦的卦辞里保存着。这种卦辞也大半押韵,保存在《易经》里。

在开始结集的时候,这些押韵绝大多数是好听、顺口的。年代久了,语音变了,就有些地方不顺口了。比方《诗经》的第一首《关雎》第一章的1、2、4句末字是“雉”、

“洲”、“逑”,很顺口,第三章的1、2、4句末字是“得”、“服”、“侧”,就不那么顺口了。这时候就有人出来研究。研究的结果,认为现代读音“服”念[-u?]类音是错了,应当念[ba?]。出错儿由谁负责呢?由唐朝官方承认的《切韵》和它的修订本《唐韵》负责,因为他们把“服”和读“族”“屋”的字收在一韵。用这个观点写成书的,就有顾炎武的《唐韵正》。虽然他也有所承受,不过他是第一个作得详尽的。有单讨论古四声的,就象江有诰的《唐韵四声正》。体例都是先列一个字,再说明“唐韵”注音怎么“错”了。

根据“正”的结果,有人把许多古书用来押韵的字标出来,有的加上自己认为对的音注。这么作的有顾炎武的《诗本音》等等。直到现在,还有人继续作。

“正”了以后,把几千常用字分成多少类,或者叫“部”。作法常是列十几个格子,每个格子里写上本部包括《广韵》的哪几个韵。这样,除零星的例外字以外,大多数字该归入什么部就一目了然了。这种工作就叫分部的工作。如段玉裁的《六书音均表》一。为表示根据充足,还有单把入韵字列成谱的。例如《六书音均表》四。

从整理单个韵脚字到分部在方法上是跨进了一步,自然科学的方法总是从个体审查到分类的。不过韵脚字分类和自然界的动植物分类有些不同的地方,实例太少,使分类的界限不清。清代人给“阳唐”部[-aŋ, -iaŋ]分类界限相当清楚,例外不多。因为这个部字数多,押韵就容易遵守比较严格的规矩,提起“闭口九韵”(即现代粤、客、闽南文读里用[-m]收尾的部)来,因为字少,诗人们就往往漫出分部的界限——内容和形式有矛盾,内容总是冲破形式。把这九韵里哪些字分成两部,清代人从来没有统一的结论。段玉裁《答江晋三论韵》说:“九韵古人用者绝少,既难识别,其可分者,又犬牙错出,莫辨宾主;可勿论其短长也。”就反映了这个情况。这是材料少带来的先天缺陷。

分部定了以后,人们发现还有本属甲部的字押进乙部去的情形。一派人认为这是字少韵难押,偶然出韵。就给这种例子起了个名字叫“合韵”。最详细的还有给这样的字列出谱来的。比方王念孙就有《合韵谱》。

有人不赞成或不完全赞成合韵这个提法,就说某些字从原来的甲部流进乙部去了。从部说,这叫“通”;从字说,就叫“转”。讲“通转”是因为材料是汉字,和拼音文字里说句“a变成e”那么清楚的话比起来,困难得多,所以始终没有明确的定义。从戴震开始讲“相配互转”、“邻近递转”到孔广森(1752~1786)“阴阳对转”,再到章炳麟《成均图》的“对转”、“旁转”、……六种“转”算发展到顶点了。

以上提到的人和著作都把注意力集中到《诗》上,《易》、《楚辞》就摆在次要的位置。后代人学会“分部”、“合韵”或“通转”两种方法,有人把它们应用来讲汉魏六朝诗赋的韵。罗常培、周祖谟就曾经列过这种谱。至于给唐诗、宋词列谱的人就多了。

谐声 《说文解字》收了9000多字,80%是谐声字,比方“工”字北京音念gong,韵是-ong。从“工”声,也就

是说用“工”作主谐字来表示全字读音的有功、攻、红、空、邛、汞、贡、……后头全有-ong 这样的音。段玉裁《六书音均表》说：“一声可谐万字，万字而必同部。”这么一来，研究谐声字可以用不到 700 个字作代表，正好象用一个“工”代表“功”等 7 个以上的字一样。虽然谐声字大量产生的年代，开始比《诗》、《易》早些，结尾晚得多，但是它们的音分起来跟《诗》韵大致相合，所以有人把主谐字（像上文的“工”）列成表来和韵谱印证。段玉裁《六书音均表》二就是。

有人把主谐字派生出来的字整个儿分层次列在底下。这样做的有好几个人。比较通用的是严可均（1762~1843）的《说文声类》。

“一声可谐万字，万字而必同部”只是说大势。“求”在《说文》是象形字，画了一件皮袄。“裘”只是加了个偏旁。可是“求”在“尤幽”部，“裘”在“之哈”部。换句话说，谐声里也不真能“万字而必同部”，也有“通转”。所以严可均书后头有个十六部《声类出入表》。结果几乎没有一个部不跟另一个部有通转关系。

甲骨文金文释读的多了，就有人比照《说文声类》来造表。现代人孙海波《古文声系》就是。《说文》以后还陆续产生了大量谐声字，也有人列谱，象沈兼士《广韵声系》。利用谐声研究声母的没有专书。

异文 一部书传抄久了，不能保证一字不走样。秦始皇烧书，《诗》因为好背，汉初就又流行了。离烧书时间不过十几二十年。可是就有齐、鲁、韩三家，字句不完全一样。东汉灵帝熹平四年（175），蔡邕写石经，《公羊春秋》碑后有“颜氏言……”等字样，记下异文。世传《春秋经》三家文字就有差异。左氏《经》隐公元年：“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邾”金文作“𡵓”，《公羊》作“邾娄”。看来这个地名在《公羊》家是念[*tro] 一类音。清代钱大昕利用古书异文证明古代没有某几个声母，比方《诗·邶·谷风》“匭匭救之”，《礼记·檀弓》引作“扶服”，结论说“古无奉纽”，扩大了说“古无轻唇”。这些异文里多数可以反映先秦两汉文字通借的情况，间接反映古代一些语音情况。《左传》昭公十五年“费无极”，《汉书·古今人表》作“费亡极”，这就是“鱼阳对转”的好例子，可以给讲“通转”的人提供旁证。清代人用得最多。不过异文有起得比较晚的。不都可靠。

读若读如等 汉代人给经书作注，经常用“×读若×”，“×读如×”。从字面看，“若”只能翻成现代话“像”。至于像到什么程度，那没法子肯定。有些“读若”简直暗示某个字是错字，该改成另一个字。《周礼·大卜》：“三曰‘咸陟’”，郑玄（127~200）说：“陟……读如王德翟人之‘德’，言梦之皆‘得’”。这就是等于把“陟”改成“德”。“德”是从“得”派生的词。

另外，说“若”不过是“像”，有人拿他来讲古韵分部，也不周全，还得加上不少讲“通转”的话。

除“读若”以外，还有《公羊》何休（129~182）注的“长言”、“短言”、“内而深”、“外而浅”，高诱（东汉人，生卒不

详）注《淮南子》的“急气言”、“缓气言”等等，都因为材料太少，下定义各家意见不一，也没什么人利用。

声训 《易·说卦》说：“乾，健也。坤，顺也……坎，陷也。离，丽也……兑，说也。”这里训释字和被训释字声音非常近。可能一个是通语、一个是行业语，或是两个词是同源词。后代的研究者发现每一对字音近，就起个名字叫“声训”。《说卦》大约是战国时代的作品，是创始的。《书·尧典》：“在璇璣玉衡。”伏生《大传》说：“璇者，还也；璣者，幾也。”已经用声训了。伏生从秦活到汉。汉代人大大发展了这种注释法。到《白虎通》达到极盛。汉末刘熙《释名》就写成专书了。过去讲古韵的人常用声训作古韵分部的辅助材料。清代人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作的比较详细。利用声训研究声母的人比较少。俞敏《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曾利用《释名》“天显也”证明“天竺”译的是古波斯文Hindu，等于梵文Sindhu“身毒”。

反切和韵书 反切出现，最早在汉末。历来相传是孙炎开始作的。章炳麟《国故论衡·音理论》说：“……是应劭时已有反语。”日本释安然《悉曇藏》一引《韵诠·反音例》云：“服虔始作反音，亦不诂定。”看起来反切是东汉末创始的。有了反切，汉族人才有了比较准确的注音方法。

如果有人为上千个字作了反切，人们就可以推测出来他的声韵有多少类。推测用系联的方法。这是清末陈澧创始的。这里又分 3 种情况：①同用：冬都宗切、当都郎切同用“都”字，所以“冬”、“当”是一类。②互用：当都郎切、都当莫切 两个字互用，所以是一类。③递用：冬都宗切、都当莫切 原则是后一个字给前一个字作切，再后一个字又给第二个字作切，所以这一串字是一类。

除此以外，还有反证法。比如《广韵》支韵灼居为切、规居随切。既然切上字同类，那么“为”、“随”韵不同类。

靠这些方法，再加上别的一些补充手段，人们有研究专人专书用的反切上下字的。现代人黄淬伯《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可以算最早的这类著作。

有人把上万个常用字分成若干组，每组里的字音相同，在前头加一个○，在第一个字底下注上反切，若干组音节后半发音相同，放到一处就叫一个“韵”。每韵用第一个字作代表，比方所有某些组后半发-ong 音的字抄到一起，用第一个字“东”作代表，就叫东韵。若干个韵总集成一部书，就叫韵书。

现存最权威的韵书是隋代陆法言的《切韵》，本书残缺，有几种增修本，最通行的是宋代修的《广韵》。拿《广韵》作《切韵》的代表，用系联法推求它的声类韵类的第一个人是陈澧。他著有《切韵考》内、外篇。从“照穿床审禅”里分出“庄初神山”，让流行的“正齿”音分成两组，从“喻”里分出“于”，让三四等分开，都是他创始的。把“支、脂、……”等韵分成三、四类，让人们注意到“重组”现象也是他的贡献。

从汉末到隋，作反切的人也有不完全一致的。这是时间地域的不同造成的。《广韵》“卑”字“府移切”，在现代大多数方言里可能切出一个像“飞”字的音。宋代修《广

韵》，每卷后头就加一行“新添类隔今更音和切”，第一个字就是“卑必移切”。所谓“类隔”是说两类切上字历史上来源相近，互相代用。“音和”是类隔的反面，也就是正常的反切。有人就利用这种“类隔”反切作线索，加上别的材料，证明在古音里这两类不分。钱大昕《古无轻唇》、《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两篇文章就是出名的开创工作。研究古韵的越分越细，研究古纽的越并越少。这是材料方法造成的，未必十足反映真相。

反切的方法是用切上字的声母，切下字的韵母合成一个新音节。有时候切上切下字连着念恰好就是要切的新音节，像“雍”用“於用”作切，只是偶然碰巧了。有一种改良者，想把一切切上字都改用-e、-i、-u、-ü 收尾的，一切切下字都用零声母字，让反切变成连读。这种人用心很好，效果可不好。明吕坤(1536~1618)的《交泰韵》就是这么作的。结果为符合上头的两个条件，像“空屋”切“酷”那样的例不易多得，就不得不找好多怪字来作切上下字。比方用“壘翁”给“终”字注音就是。改良方法是历史语音学方法论范围里的东西。

时代一久，语音变了。比方元代人演戏的语言就和《切韵》的大不相同，也就有人出来作新反切，编成新韵书。周德清(元代人，生卒不详)的《中原音韵》就是最有名的。那里切上下字、韵数变动很大。

用同一种书的不同本子互相校勘，也是音韵学的辅助部门。用古今两种以上韵书比较，是语音演变史的准备工作。陈澧就把这两种工作全作过。

有些韵书亡佚，研究家从别的书引用他的字句并企图恢复原书面貌。最早的是清代纪容舒的《唐韵考》。这本是辑佚工作的一部分。

韵书是给韵文押韵用的。这两项研究经常互相交叉。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本是从北曲用韵归纳出来的，后来也被作曲的人遵循。清代樊腾凤的《五方元音》是北方人的新韵书。

对音 从先秦起，汉族人就曾经和外国接触，试着记下他们的地名、族(国)名。《山海经·海内经》里有“天毒”，就是 Hindu，《史记·大宛传》的“身毒”，今天的印度。汉武帝时候的“匈奴”，梵文叫 Hūna。这些最早是口头相传。到东汉明帝时，印度僧人摄摩腾、竺法兰用白马驮经，来到洛阳，出《四十二章经》，里头就开始出现像“阿罗汉”(梵文 arhan)那样的对音。到初唐，密教盛行，需要对译大段的咒语，对音事业大大兴旺起来了。古代“念”佛是一心想念佛。密教念佛，是大段的背梵文咒。咒靠汉字写。后人研究哪些梵文音用什么汉字记，是研究当时汉字读音的捷径。另外唐初汉藏王室通婚，立碑结盟，有一大批人名、官名，是双语的。这种对音材料也是极有用的。罗常培《知彻澄娘音值考》和《唐五代西北方音》就是利用梵汉藏汉对音研究作成的。

日本、朝鲜、越南人记录的汉字读音，也曾被瑞典汉学家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利用。元代有八思巴(1239~1280)创的蒙古字，那对音是研究古官话的资料。

等韵 从武则天时代起，密教大量流行。密教掺杂着巫术，得大量念咒，咒音不准，引来恶果。人们就开始学悉昙。悉昙就是梵文的识字发音的入门读本，包括字母、拼读、连音规矩等等。汉族和尚学了它，得到分析语音的能力和术语。他们也利用这些知识分析汉语语音。最早的尝试是分出汉语的开头辅音。明吕维祺(1587~1641)《同文铎》说：“大唐舍利创字母三十，后温首座(守温)益以‘娘、床、邦、滂、微、奉’六母，是为三十六母。”叫“大唐舍利”可能为的是和日本著名尼僧“舍利”分开。但是历代高僧传里不见大唐舍利。敦煌出的“南梁汉比丘”《守温字母》残卷里可只有 30 个字母。可见早期和尚们是比照梵文来分析汉语的声母的。一是创造了三十六字母，并按发音部位把它们分成“喉牙舌齿唇”，每一个部位又按发音声带颤动不颤动分出“清、次清、浊、清浊”四个大类。二是把韵母分为开合两类和四个等，分开合这一点显然是汉族创造的。梵文悉昙章横行以 a、ā、i、ī 等 14 个元音为次序排，和它们拼的字母写成竖行，按 k、kh、g 等 33 个辅音分组排，粗分类可以说按发音部位排。中国和尚是把悉昙章转了一个顺时针 90° 角，横行是喉牙舌齿唇，竖行是一个(分平上去入)或一组韵。这样，就列出早期的音节总表来了，那就是等韵图。研究者从这种图表出发，对《切韵》和当时的语音能够有比较明确和细致的了解。

宋代人开始允许“××同用”，和尚们因此也敢大胆归并。安然《悉昙藏》二说：“又如真旦《韵詮》五十韵头，今于天竺悉昙十六韵头皆悉摄尽，更无遗余；以彼罗刹反家古牙反摄此阿、阿引……。”和尚们归并汉语韵成十六摄(parigraha)是从武周开始的，为唐音分类提供了线索。凡在一摄里的韵彼此相像，后来有些书干脆就合并。

语音变了，韵图也逐渐随着变。到了明清的时候，有些人就大刀阔斧地描写方音，像《戚林八音》就是。到这个阶段，等韵就完全摆脱了《切韵》的旧框框，人们研究它们，宁可说把它作为研究近古通语或方音的材料。现代人陶燠民《闽音研究》就借助于《八音》。再底下的学者就受东西洋影响试拟新字母了。

直音 从读若到反切，是在记音技术上一大进步。可是举个最好认的字来说明某个难字的音和它相等或相似这种方法也方便。《广韵》“拯”字注说“无韵切，音蒸上声”(故宫本王仁昫《切韵》字迹模糊，似亦即此语)就是个例。因为这个韵里别的字全是怪字。这可以说明直音还有它的作用。唐代唐玄奘作《九经字样》说：“避以‘反’言，但纽四声，定其音旨。”他注音“刊”，音“渴平”，就是利用讲四声八病的文艺理论家“刊、侃、看、渴”是“正纽”(两句里用两个同纽的字就算文病)，倒过来给“刊”字注音。其余古注像东晋郭璞《山海经南山经》注说：“麇，音几。”早就有了。

碰上一组字同音，里头只有两个常用，直音就遇上困难。用难字帮不了读者的忙，用不十分常用的字常遇上“甲音乙”、“乙音甲”这类循环注音的例子。

研究家用直音,可以证明在某时某地两个字音相等。比如“屿”,音“序”。今天厦门人鼓浪屿的“屿”正念“序”[su˥˩]。这两个字在《广韵》里本是同音字。

借词 近两个世纪,西欧北美的人跟汉族往来,从汉语借过去一些词。汉族是喝茶的发明者,别的民族就一面学这种习惯,一面学这个话。北方人茶念 chá,俄罗斯人就学会说 чаи,日本人说チャ。南方出口茶的地方是厦门。厦门人茶念[te˥˩],荷兰人学说 tee,英吉利人学说 tea。从这里可以推测某一个时代汉语某些方言的个别字音。

国内少数民族也曾经大量地向汉族借过字,比方藏族学汉语“铜子”,就说 doñtse。

这方面的研究,搜集资料的有赵元任《广西僮歌记音》,分量很大。研究成果还比较零星。

这种研究总跟民族交通史交叉。这种资料也是“古已有之”了。梵文里称中国为“支那”cina,印度古史诗《摩诃婆罗多》里已经有了,不过很零星。

玩弄语言 汉族人和别的民族一样,也有利用语言来寻开心的习惯。在意义方面有双关一类手法,在语言方面就有用“愚魏衰收”来嘲笑魏收的体话,也有“……创‘同泰’寺。开‘大通’门以对寺之南门;取反语以协‘同泰’”的事(《世说新语》)。到现代有利用反切原理造隐语的切口,有歇后语里利用同音词的,像“外甥打灯笼——照舅”那类,可以作证明古代不同音的字“舅”、“旧”在现代北京话念得一样的例证。这些材料零散,也可以作研究音韵的辅助材料。

方言 现代方言绝大多数是从南北朝的音演变下来的。北齐颜之推在《家训·音辞》里评论各地方音,认为最淳正的数金陵和洛下两处。现代方言,除闽方言以外,都可以用《切韵》作起点讲它的演变。即便是闽方言,特别是闽南话白话音,虽然缺舌上,轻唇两组音,却并没出《切韵》的范围,更没出钱大昕学说(见古纽)的范围。闽南“老”字有上、浊去两种音。前者跟一切“官话”、粤等方言相合,后者正是“浊上变去”的好例,这是在唐代已经发生的现象。国内的学者从来没怀疑过,现代汉语方言包括闽方言都跟《切韵》音系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历史渊源关系。调查明白了现代方言,可以倒推出来《切韵》的面目的轮廓。当然这种拟构法有缺点,瞄准差一点儿,中靶差几尺。拟构出来,免不了有些不着边际的成分在里头。这得靠别的材料来校正。只要不断进行修正,最后还是能够获得比较正确的结论的。高本汉《中国音韵学》就是利用这种方法的好例。

此外像利用汉语和同系语如藏语的词音比较来推测古汉语语音等新兴边缘学科,都还在萌芽状态,不详述。

简单的回顾 回顾音韵学发展的历史,那道路好像闪电一样曲折。大致看它的主流,可以粗略地分为4期。当然,这些期是互相交错。

第1期从汉代起到宋代为止。这一期的成就主要是有人发现了一种析音的方法,比如说汉末人发明了反切,

用来给汉字注音。这件工作本身是语音学的工作,并不是历史语音学。不过给历史语音学储备了资料。又比如从吕静作《韵集》,开始把字按音分类,引起了夏侯咏(原作该)等人仿效,写了《韵略》等书,直到陆法言《切韵》出现,在汉族的语言研究里出现了详尽的韵书,成为中国语言学里独有的音序语素典。在析音方面作出巨大贡献。但是工作也是断代描写,记录资料性质。又比如唐五代僧徒讨论用哪些汉字对哪些梵文音合适,从玄奘《大唐西域记》里批评旧译讹、略的话起,直到五代正式订出字母,随后比照印度《悉昙章》造出等韵图,列出那个时代的音节总表。这一来使汉族有了比较语音学的雏型。功劳是大的。不过也只限于断代,仍旧是资料性质。

另一面,也有颜之推等人在陆法言家讨论“古今是非,古今通塞”,颜著《家训》评论古韵书。又比如陆德明在《诗·燕燕》的《音义》里说:“南,如字。沈云:‘协句宜乃林反’。今谓古人韵缓,不烦改字。”一方面引了最早讲叶音的话,一方面对他的任意性表示反对,作出解释。这些才是真正的历史语音学。第一期可以叫“萌芽期”。

第2期大致可以说从宋代就开始了。宋代吴棫采用叶音说,后人从不。但是他却开始给古韵粗粗的分部。经明代陈第《毛诗古音考》提倡,清代顾炎武发扬光大,古韵学才走上科学化的路。一方面排斥了叶音说的任意性,一方面建立了古今音不同的史的概念。音韵学才脱离了偶发的阶段,进入了正式研究的阶段。

这个阶段的学者原始的动机是求给《诗经》、《楚辞》的韵脚定出顺口、悦耳的念法来。这是“通经”的工作。另外,顾炎武希望从语音复古唤起汉族人的民族意识来,未免迂曲少功。但是这也是“致用”的工作的一种内容。到段玉裁“一声可谐万字,万字而必同部”的说法出来,就利用音韵学来讲文字构造和通借了。

从钱大昕开始讨论古纽,创立“古无轻唇、舌上”音的理论,直到曾运乾的《喻母古读考》,研究古纽的稳步发展着。但是精神和讲韵部的一样:分类,和类与类之间的通转。精神是越古的就越越好。

总的看起来,这个时期的音韵学从给经学服务出发,到“小学”“蔚为大观”,音韵为《说文》作注脚结束,始终没离开经学,因为“小学,所以通经”。清代经学最盛,所以讲古韵讲谐声的真是百花齐放。里头也有毛奇龄(1623~1716)这样专跟流行说法唱反调的人。古纽跟通经关系没那么直接,就比较冷落。这就是第2期的为经学作附庸的精神。第2期直到1940年左右才结束,可以叫“分类期”。在这一期里,音韵学从“自在”的变成“自为”的了。

第3期从清代陈澧作《切韵考》内、外篇开始。上期作者材料多、引书博,免不了有粗枝大叶的地方。陈澧开始就一部书——《广韵》的反切作深入的研究。有多少声类,多少韵类?声类能分清、浊不能?四声相承关系怎么样?以及字属几等?是开口还是合口?有一字多音的没有……,等等。就各个方面作了细致的研究。这就是彻底分析一批材料内部提供的信息。这跟印欧语史学里所谓

一种语言内部的上溯大致相像。从这里开始,方法可以说是相当科学化了。以后研究《切韵》音的人,每个人都下过这样的工夫。

陈澧虽然没见过《切韵》残本,可是他先抓《切韵》音系是“一发中的”了。切韵上承上古音,下开现代音的局面,正是研究音韵学的核心资料。音韵学家许多人,各有贡献。但是第一个找着正门的金钥匙的是陈澧。推求上古音韵,解释古方言的,讨论古韵文的,调查现代方言的,都拿切韵音系作始发站。这个时期的高潮晚到20世纪50年代。这第3期可以叫“内析期”。

第4期从20世纪30年代高本汉发表他的《中国音韵学研究》开始。他的工作里用了一种新方法——印欧比较语史学的比较法。从各个方言现在读音出发,加上外国译音,像日本的吴音、汉音,越南朝鲜的汉字音,等等。他用比较法上溯,推求并且用音标记录出所谓“7世纪长安音”,实际上是洛阳及其附近地区的通语音。高本汉的材料偏重西北。东南方言,如客家话,连第一手材料都没有。偏巧在保存汉语语音古代面目方面,东南远比别的方言重要。只看见北方话广州话阳平吐气,就把“並”定成[bʰ],虽经陆志韦、李荣二家纠正也坚决不接受。甚至于内部分析工作还不如陈澧仔细,竟把重组现象抹杀。这些在欧美都让好多人以讹传讹,工作说不上完美。不过他带来了新方法,运用了新材料。所以在运用历史比较法和方言资料上他和陈澧成了“百世不祧之宗”。现在讲音韵学的多数学者都在他们的流派里头。这个第4期和第3期一样,还远没结束。第4期可以叫“旁征期”。

参考书目

王力:《汉语音韵》,中华书局,北京,1963。

(俞 敏)

Hanyu yufa

汉语语法 (Chinese grammar) 研究汉语结构规律的学科。它包括词、短语、句子的结构规律。

汉语语法概述 构词 汉语的词是用方块字记录下来的。有的词只有一个音节,用一个字记录,这就是单音词。有的词有几个音节,用几个字记录,这就是多音词。比如“学而时习之”,说出来是5个音节,写下来是5个汉字,语法上是5个语素,同时又是5个词。古汉语里单音词占绝大多数,所以古人习惯上把字既当作书写单位,也当作语言单位,不加分别。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就不是这么简单了。

古汉语里的多音词,主要是双音词,所占比例很小。单纯的多音词多数是所谓联绵字,由两个字组成,其中每个字不单独表示意义,如“玲珑、造次、披靡、骹棘”。合成的多音词是由几个单音语素组合而成的。有多种组合方式:①并列式,有的是近义组合,如“道路、商贾、风云、牺牲、爪牙”。有的是反义组合,如“长短、存亡、味爽、缓急、成败”。这些词往往在原有的字义上有所引申,如“爪牙”指党羽,“味爽”指黎明。少数词有偏义现象,如“缓急”指急,“成败”指败。近义组合的方式现代还在应用,反义组

合的方式现代很少用了。②偏正式,如“匹夫、门人、生民、附庸、燕居”。在古汉语里,偏正式组合多半是名词,动词不多。现代汉语里除名词外,动词也不少,如“回忆、后悔、迷信、误会”。古代有一些偏正式名词是大名加小名的组合,如“帝喾、城濮、祖乙、母辛、鸟鸟、虫蚁”,这种特殊的偏正结构,汉代以后就少见了。③动宾式,如“司寇、牵牛、惊蛰、知音”。这一类词在先秦时代多数属专有名词,如官名、星宿名,汉代以后逐渐多了起来。近代并且不限于名词,如“起草、效劳、出席、担心”。④主谓式,如“冬至、秋分、地震、耳鸣、胆怯”,这一类词为数极少,在先秦语言中更属罕见。有些双音形式,原来是由两个单音词组成的短语,到后来逐渐变成双音词。如《孟子·公孙丑上》:“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这里的“具体”指具备大体,即大体相似。现代汉语的“具体”是一个词,与“抽象”相对。又如《汉书·苏武传》:“女为人臣子,不顾恩义,畔主背亲。”这里的“臣”对“主”而言,“子”对“亲”而言,“臣子”是并列的两个词。现代汉语的“臣子”只是一个词。

汉语里很少构词性质的前缀、后缀。秦代以前,少数词带有类似词缀的标记。有些名词前边带“有”,如《尚书·汤誓》:“有夏多罪,天命殛之。”《诗经·小雅·巷伯》:“豺虎不食,投畀有北。”在《诗经》中,有些动词前边带“言曰、聿、于”,它们在语音上有密切联系,可能属于同一来源。如《周南·葛覃》:“言告师氏,言告言归。”《小雅·采薇》:“曰归曰归,岁亦莫止。”《大雅·文王》:“无念尔祖,聿脩厥德。”《邶风·燕燕》:“之子于归,远于将之。”但这些标志用得并不普遍,而且在秦汉以后大部分消失了。使用时间较长的是“有”,多用于朝代名,如“有唐、有宋”之类。形容词和副词后边有带“然、尔、而、若、如”的。如《列子·汤问》:“杂然相许。”《论语·阳货》:“夫子莞尔而笑。”《诗经·齐风·猗嗟》:“猗嗟昌兮,颀而长兮,抑若扬兮。”《论语·乡党》:“闻闾如也。”这里边只有“然”字的应用一直延续到现代,如“井然、茫然、枉然、猛然”等。汉代开始出现的名词前缀“阿”也一直沿用至今,古代有“阿母、阿兄”,现代方言里有“阿爸、阿哥”。

现代汉语里最常见的是名词后缀“子、儿、头”。这些原来都是一般的语素,在构词过程中逐渐虚化,位置趋于固定,意义逐渐抽象,语音也变成轻声,在普通话和某些方言里“儿”已经不成为一个独立的音节了。我们可以比较“菜子、莲子”和“桌子、刀子”,“女儿、健儿”和“花儿、亮儿”,“额头、葱头”和“舌头、看头”,“和”字前面的例子里的“子、儿、头”是一般语素,“和”字后面的例子里的“子、儿、头”是构词的后缀。这种虚化现象是长期历史演变的结果。词缀“子”在上古已经出现了,例如《礼记·檀弓下》:“使吾二婢子夹我。”“儿”在唐代开始产生,例如金昌绪诗:“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头”的出现比“儿”略早一些,可能产生于六朝。例如《水经注》:“沔水有物如三四岁小儿……常没水中,出膝头,小儿不知,欲取弄戏,便杀人。”现在也还有一些语素正在虚化的过程之中,如“教

员、议员、演员”的“员”，“公家、作家、行家”的“家”，“博士、志士、名士”的“士”，“对手、猎手、能手”的“手”，“懦夫、脚夫、屠夫”的“夫”。这些可以称为类后缀。

现代汉语以双音词占优势，不过在最常用的词中单音词仍占相当大的比重，特别是动词。古代双音词中的联绵字，有一部分已经逐渐淘汰，如“侏儒、赅赅、栗烈”之类。现代沿用的联绵字有的是上古遗留下来的，如“从容、参差、磅礴”等，有的是中古及近代才出现的，数量不很多。

汉语词汇中有一部分是借词，其中有些很早就出现了，如“葡萄”是西汉时借自西域的词。佛教传入中国，东汉魏晋时代流行很快，从此汉语中出现许多来自梵语的借词，如“菩萨、罗汉、比丘、刹那、伽蓝”等。近百年来，由于翻译欧美书籍，又增添了不少借词，如“沙发、可可、芭蕾、坦克、尼龙、幽默、苏维埃”之类。同时，还引进了好些日语词，如“主观、动机、义务、企业、有机、手续”等。

词类 汉语的词可分为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代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语气词、叹词、象声词等类。

现代汉语同古汉语相比，各类词都有部分成员新陈代谢，这是语言中常见的现象。但介词和语气词几乎全部更换，这一现象值得注意。上古汉语介词常见的有“于（於）、以、为、与”，由于数目少，往往一词多用，有时不免表意含混。在现代汉语里，代替“于”的有“在、向、给”等；代替“以”的有“用、把”等；代替“为”的有“被、对、替”等；代替“与”的有“和、跟、同”等。现代汉语里出现的“于、以、为、与”，多半是在成语或者带点文言色彩的语句里。介词的不断丰富，在中古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了，现代汉语的介词都是由动词演变而来。如“被”，在先秦两汉时用作动词，表示“遭受”的意思，后边接名词宾语。如《史记·高帝纪》：“高祖被酒。”后来出现了“被”与动词组合的形式，如“被杀、被诛”之类。到了南北朝时期，“被”常用来引进施事名词，如《世说新语·方正》：“亮子被苏峻害。”这里的“被”已经是介词了。这种“被”字句逐渐广泛运用，在近代和现代汉语中，动词用法的“被”基本上已经消失。又如“把”，原来也是个动词，是“握”的意思。如《战国策·燕策》：“左手把其袖。”一直到唐宋还有动词的用法。如韦应物诗“把酒看花想诸弟”，苏轼词“把酒问青天”。后来才逐渐演变为介词。现代汉语里有些介词还兼属动词，如“在、对、给、比、到”等。

语气词或称助字、助词。古代表示陈述语气常用“也、矣、焉、耳”，表示疑问语气常用“乎、邪（耶）、哉、与（欤）”，表示感叹语气常用“哉、夫”，有时也用“也”，表示祈使语气常用“矣、也、乎”。有时连用两个语气词，如“也夫、也哉、也耶、也欤、乎哉、矣乎、焉耳、焉哉”，有时连用三个语气词，如“焉耳矣、也乎哉、也欤哉”。大都是在陈述语气之后加上疑问或感叹语气，而重点在疑问或感叹。语气词一般用于句末，有时也用于句中，表示停顿。现代汉语普通话常用的语气词有“的、了、吗（么）、呢、吧、啊”。“的”表

示事情确实如此，“了”表示出现新的情况，多用于陈述句。“吗”表示可疑，多用于是非疑问句。“呢”有两个，一个用于特指疑问句和选择疑问句，一个用于非疑问句表示确认事实。“吧”表示半信半疑，常用于疑问句，有时也用于祈使句。“啊”用来增加感情色彩，它的变体有“呀、哇”等。这些语气词也可以连用，如“的么、的呢、的吧、的啊、了么、了呢、了吧”。“呢”和“啊”叠用写作“哪”，“了”和“啊”叠用写作“啦”，“吗”原来也是由“么”和“啊”合成的，现在“么”已经很少单用了。

代词由繁而简，这又是古今汉语演变的一个方面。上古第一人称代词有“吾、我、余、予、朕、台、印”等。第二人称代词有“汝（女）、若、尔、而、乃、戎”等。第三人称代词有“彼、夫、其、之”等。指示代词，近指用“此、兹、斯、是、若、之、时”等，远指用“彼、夫、其、尔”等。疑问代词中，“谁、孰”主要是问人，“何、曷、奚、胡”主要是问事物，“恶、安、焉”主要是问处所和事理。中古以后逐渐淘汰了一些，如“台、印、戎、时”等，同时又增加了一些，如“身、依”（第一人称）、“渠、伊”（第三人称）、“底”（疑问代词）等。形式的多样或者由于书写异形，或者由于方言异读。随着时间的推移，语言日趋于规范化，现代汉语（普通话）的代词在数量上明显减少，读音和书写形式也统一了。人称代词主要是“我、你、他、咱”，指示代词主要是“这、那”以及由它们派生的“这儿、那儿、这么、那么”等。疑问代词主要是“谁、什么、哪、哪儿、怎么、怎（么）样”。这些疑问代词除了表示疑问之外，还可以用来泛指或虚指，如“谁也没有来过”、“谁先到，谁买票”、“我什么也不知道”、“什么好就买什么”。

古汉语有词类活用现象。最常见的是形容词、名词、数词活用作动词。这种活用的标志是带上了宾语。如《史记·留侯世家》：“然上高此四人。”“高”，形容词，用作动词，意思是说皇帝尊重这四个人。《史记·项羽本纪》：“范增数目项王。”“目”，名词，用作动词，是“看”的意思。《诗经·卫风·氓》：“士也罔极，二三其德。”“二三”，数词，用作动词，是“改变”的意思。形容词、名词用作动词，有时含使动（致动）的意义。如《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能富贵将军者，上也。”“富贵将军”是“使将军富贵”的意思。《史记·项羽本纪》：“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王我”是“使我为王”的意思。不及物动词用作及物动词，也可以表示使动的意义。如《史记·项羽本纪》：“项伯杀人，臣活之。”“活之”是“救活”的意思。形容词、名词用作动词，有时含有意动的意义，就是以为如何如何。如晁错《论贵粟疏》：“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贵五谷”即“以五谷为贵”，“贱金玉”即“以金玉为贱”。《战国策·齐策》：“孟尝君客我。”“客我”即“把我当客人看待”。

现代汉语同古代汉语的差异，表现在词类上还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量词的普遍化，二是动词时态范畴的出现。

在上古汉语里，数词多与名词直接组合，或在名词之

前,如“五犬、十羊”;或在名词之后,如“弓一、矢百”。也有在名词后边用上数词再带上原来的名词或表示事物单位的词的,如“牛十牛、马五匹”,但比较少见。中古以来,表示事物单位的词逐渐丰富,它们与名词有特定的选择关系,而且作为数词与名词的中介而存在。于是普遍出现“五只狗、三朵花、十匹马、几封信”之类的用法。这样,一种区别于名词的语法范畴——量词就形成了。同时,表示动量的词,如“番、遍、次、下、回、顿”等也广为运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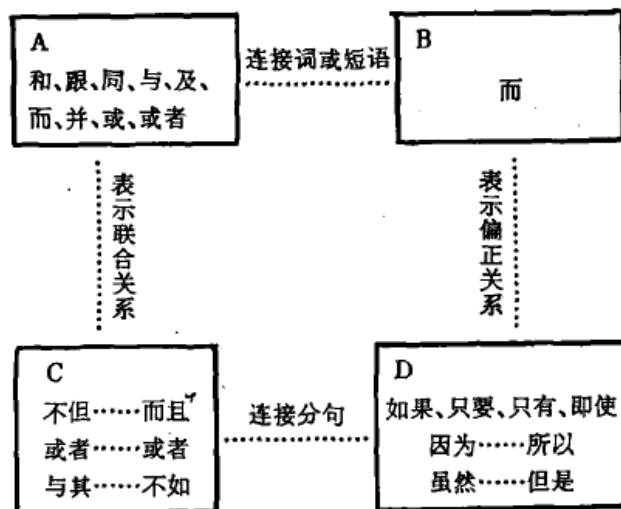
现代汉语动词的时态,是用附加时态助词表示的。时态助词“了、着、过”原来都是实词。“着(著)”在先秦文献中是个动词,意思是“附着”,如《左传·庄公二十二年》:“风行而着于土。”汉代开始,“着”也用在别的动词后边作为补语,但没有改变词性。如王充《论衡·雷虚篇》:“今钟鼓无所悬着。”南北朝以后,动词后边的“着”逐渐虚化,出现了新的用法。如《敦煌变文·维摩诘经讲经文》:“初闻道着我名时,心里不妨怀喜庆,”“道着”是“说到”的意思,“着”的词性近似助词。再往后,到了元明时代,就完全

变成时态助词了,如《水浒·第二十五回》:“只见武大挑着炊饼担儿,正从那条街上来。”由于有了“着”、“挑”和“来”在时间上发生了“同时”的联系。“了”原来也是动词,是“完结”的意思。如《晋书·傅咸传》:“官事未易了也。”后来出现“了”的虚化用法。如《敦煌变文·欢喜国王缘》:“夫人闻了,又自悲伤。”又如《水浒·第四回》:“行了几步,又望见一家酒旗儿,直挑出在门前。”由于用上“了”、“闻”和“悲伤”,“行”和“望见”,在时间上发生了“先后”的联系。“过”出现比较晚,到宋代才多起来,如《朱子语类》:“而今只是那一般合看过底文字也未看,何况其他。”除了上述“了”表示完成态,“着”表示持续态(进行态),“过”表示经验态之外,现代汉语动词还有短时态(尝试态),如“你说说,我听听”;可能态,如“说得清,听不懂”。

现代汉语的词可以分为实词和虚词两大类:能够单独充当句法成分的是实词,不能单独充当句法成分的是虚词。实词和虚词各包括若干次类,如左表。

实词里边有几个附类值得注意。方位词是比较特殊的名词,它虽然有一般名词的某些特点,但是经常附着在别的词语后边,组成表示处所或时间的名词或短语,如“屋里、国外、开会前、假期当中”。非谓形容词跟一般形容词一样,能充当名词的修饰语(大型屏幕、初级中学),但是不能做谓语。趋向动词除了有一般动词的特点之外,还经常用在别的动词或形容词后边充当补语,如“拿来、寄出、说下去、热起来”。动词“是”在意义上表示判断,在功能上起着联系主语和谓语里主要成分的作用。助动词从一个方面看,有点象副词,用来修饰动词或形容词,从另一个方面看,又象是主要动词,拿后面的动词做它的宾语。有时候能单独充当谓语,如:“我会”,“谁敢?”

虚词的作用表现在“连接”和“附着”两个方面。连词的作用是连接,有的连接词或短语,有的连接分句。列表如下:



A、B两组跟C、D两组之间的区别,在于连接的单位不同;A、C两组跟B、D两组的区别,在于表示的关系不同。

介词的作用是附着在别的词语(主要是名词或名词短语)上边,组成介词短语,用在句中表示施事(“被他”)、

实词和虚词的分类

实	名词		人、报纸、任务、今天、从前、东方
		方位词	上、前、东、以下、之后、左边
	动词		坐、休息、失败、研究、开始
		趋向动词	来、去、起来、下去、进来、出去
		判断动词	是
		助动词	能、敢、会、肯、可以、应该
	形容词		大、小、高、热、伟大、认真、雪白
		非谓形容词	大型、初级、慢性、人为、共同
	数词		零、半、一、五、十、千、万
	量词	物量词	尺、斤、亩、个、只、张
		动量词	次、遍、顿、番、趟
	副词		很、已经、不、也、亲自、大力
	代词	人称代词	我、你、他、咱、大家、自己
指示代词		这、那、这儿、那儿	
疑问代词		谁、什么、怎么、哪儿	
虚	连词		和、跟、同、或、不但、而且、因为
	介词		把、被、从、对于、关于、依照
	助词	结构助词	的、地、得
		时态助词	了、着、过
	语气词		的、了、吗、呢、吧、啊
	叹词		唉、呀、喂、哎哟
	象声词		乒乓、哗啦、叮当

受事(“把他”)、范围(“关于这件事”)、时间或处所(“在昨天晚上、在桌上”)、根据(“凭这个”)、比较(“比他”)、目的(“为工作”)、起点(“从此”)、方向(“朝前”)等。

结构助词里边,“得”的作用是引进表示结果或程度的补语。“的”的作用是附在别的词或短语后边,组成“的”字短语,如“我的、教书的、从前方回来的”,在句子里的功能与名词相当。“地”的作用与“的”相似,组成“地”字短语,如“慢慢地”、“轻易地”,在句子里的功能与副词相当(“的”和“地”是书面上的区别,语音相同)。

叹词和象声词是特殊的词类。一般习惯把它们划归虚词,其实它们并无连接或附着的作用,不跟句子里别的词语发生关系。

句法 汉语的基本句型是主语在前,谓语在后。感叹句有时候改变这种次序。古代的例子如:《尚书·牧誓》:“逖矣,西土之人!”《论语·子路》:“野哉,由也!”现代的例子如:“得了吧,你!”“好难见啊,你这位科长!”疑问句也有类似的例子。古代的如:《礼记·檀弓上》:“谁与,哭者?”现代的例子如:“吵什么呀,你们?”“跟谁学的,这是?”

在有宾语的动词谓语句里,一般次序是动词在前,宾语在后。但是在古代汉语里,如果宾语是代词而句子是疑问句或否定句,宾语在动词之前。如《论语·里仁》:“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之”是“见”的宾语,前置。《论语·子罕》:“吾谁欺?欺天乎?”“谁”是“欺”的宾语,前置。在现代汉语里,如果宾语表示周遍性的事物,位置在动词之前,并且动词之前常有副词“都”或“也”。例如:“不用说了,我什么都知道了。”“他忙了一天,一件事儿也没办成。”

动词性谓语是说明事实的过程的,事情的过程往往同施事、受事有关。古汉语的主语表示施事或受事,用的动词相同,一般没有虚词作标志。如《庄子·胠篋》:“鲁酒薄而邯郸围。”这里的“围”是“被围”的意思。《史记·春申君传》:“而吕不韦废。”这里的“废”是“被废”的意思。表示被动意义的句式是逐渐形成的。①用“为”或“为……所”加在动词前边,如《庄子·天下》:“道术将为天下裂。”《汉书·霍光传》:“卫太子为江充所败。”②动词后边用“于”,如《论语·公冶长》:“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③动词前边加“见”,如《孟子·梁惠王上》:“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④最后产生的是用“被”的句式,已经是汉代以后了,如《世说新语·言语》:“祢衡被魏武谪为鼓吏。”这种句式一直保留到现代。

在动词谓语句里,如果不止一个动词,动词可以有多种关系。以古代汉语为例,有并列关系,如《论语·子张》:“君子尊贤而容众。”有修饰关系,如陶潜《归去来辞》:“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有动宾关系,如《左传·庄公十年》:“惧有伏焉。”有连动关系,如《史记·项羽本纪》:“项庄拔剑起舞。”有递系关系,即兼语式,如《木兰诗》:“送儿还故乡。”现代汉语的动词谓语句里同样有这种情况。但现代的动词谓语句里最值得注意的是动词常有多种连带成分,形成多层次的动词短语,形式比古汉语繁复。试

以结果补语为例,先秦时期动词很少带结果补语,汉代才比较多见,以后广泛流行,沿用到现代,所表达的意义更加多样,形式也更为灵活。补语可以是说明主语的,如“我吃饱了”;可以是说明宾语的,如“我已经看完了上册”;可以是说明动词的,如“看准了方向”;可以是说明动作的次数或时间的,如“读了两遍”、“读了三天”。用结构助词“得”连接的补语,始见于唐宋之际的白话,现代汉语里广泛运用。连动句和兼语句在现代汉语里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并且往往互相套叠。连动中套兼语,如“我马上发电报催他回来”;兼语中套连动,如“他让我留下来整理记录”。

现代汉语里有一种广泛运用的动词谓语句,就是用“把”字把代表受事的词语引到动词前边去。这种句式开始出现在唐代,除用“把”外还用“将”。在唐诗里有时一联之中一句用“将”,一句用“把”。例如:“如将月窟写(泻),似把天河扑”(皮日休诗)。后来用“将”的越来越少,现代只用“把”了。这种句式原来只是连动式,“把”和“将”的意义比较实在,后来逐渐虚化,变成了介词。这种句式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补语发展的影响,因为补语和宾语都需要靠近动词,如果动补结构比较复杂,后边再带宾语就不方便了。

名词谓语句,如果是肯定句,在古代是不用系词的(否定句用“非”)。古汉语里典型的结构是在主语后边用“者”,句末用“也”。如《庄子·逍遥游》:“南冥者,天池也。”也可以单用“者”或“也”,如晁错《论贵粟疏》:“粟者,民之所种。”《庄子·德充符》:“夫子,圣人也。”“者”、“也”都不用的,如《资治通鉴·汉纪》:“刘备,天下枭雄。”加进系词“是”字的句式,大概在战国后期已经产生。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中有一幅根据天象判断吉凶的占书,当中有“是是帛彗”、“是是竹彗”、“是是蒿彗”等句子,这些句子中的第二个“是”字显然是系词。这幅占书是汉初人抄录的,原书为战国后期楚人所著。现代汉语使用“是”字就十分普遍了。“是”字后面的名词对主语的语义关系多种多样。首先是认同和归类,前者如“鲁迅是周树人的笔名”,后者如“熊猫是熊,不是猫”。这是汉语和别的语言相同的,但是象下面的例子就比较特殊了:“初中一是算术,初中二是代数”,“人家是丰年,我们是歉年”,“人是衣裳马是鞍”,“山坡上全是栗子树”。

主谓谓语句古代汉语里就已经有了,例如《论语·公冶长》:“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孟子·告子》:“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这里的“之”、“其”、“所”都可以视为这种句式的标记。现代汉语里的主谓谓语句,固然有有标记的,例如:“老张,他肯帮助人,人也愿意帮助他”;“事不过夜,这是我们公约的第八条”;“可我有我的工作呀,整天这么着,那算怎么回事!”可是没有标记的也很多,例如:“二华这家伙,人不错”;“她跟爹妈一样,小事心粗,大事心细”。

以上略述汉语的基本句式,也就是所谓单句的结构。句子分单复,来源于西方的语法学传统。印欧语系语言靠词语形态的帮助,分别单句和复句比较容易。拿书面语来看,汉语则议论文字还不难分别单句和复句,因为复句的几个分句常常用连词衔接。日常谈话里边很少用连词,因而往往难于决定某一语段是一个复句还是几个单句。关于断句,中国有中国的传统,古人所说的“句”,用现在的标准来衡量,可能是复句里的一个分句,也可能是一个单句,还可能只是一个单句的一个部分。中国旧时的断句,主要依据词语的长短,也就是诵读的方便。这可以用黄侃的话做代表:“文以载言,故文中句读,亦有时据词气之便而为节奏,不尽关于文义。”黄侃曾经拿《马氏文通》里引来做区别句和读的例子的一段《孔子世家》加上他自己的断句,断得较长;《马氏文通》的划分句读也跟现在分别句和分句有出入。这就说明区别句子的大小繁简,中国和西方的传统很不一样。

汉语语法特点 拿汉语同印欧语系语言作比较,它显示出一些特点。首先是没有词形变化。有人认为汉语里的“们、着、了、过”等,没有独立的词汇意义,在句子里不能独立运用,总是附着在实词后边表示某种语法意义,它们也有词形变化的语尾性质。尽管如此,它们同印欧语言中的语尾有相当大的差别。拿“们”同英语里表示名词复数的“-s”比较,①“们”不但可以附着在单词的后边,而且可以附着在并列的几个成分后边。如“子女们”、“大哥哥大姐姐们”。②汉语中名词没有单数和复数的对立,“学生们”是复数,但“学生”并不一定是单数。“们”的使用没有强迫性,“工人们和农民们”、“工人和农民们”、“工人和农民”表示的都是不止一个工人、不止一个农民的意思。③“们”字的使用也没有普遍性,一般只能加在人称代词和指人的名词后边(指物名词后边加“们”是修辞的用法)。此外,带“们”的名词的句法功能也受到限制,比如可以说“学生们”,不能说“三个学生们”;可以说“我们是学生”,不能说“我们是学生们”。“着、了、过”同“们”的性质相似,它们都可以附着在短语后边,如“打扫干净了大客厅”、“正在研究和讨论着的问题”、“无论试验或未试验过的方法”。它们的使用有一定的灵活性,有的场合一定要用,有的场合可用可不用,如“你看见(了)没有?”以上事例足以说明汉语缺少象印欧语言那样的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缺少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这是汉语同印欧语言的根本差别,由此产生一系列其他特点。

① 语序是汉语里的重要语法手段。a. 同样的语素,次序不同,构成不同的词,如“前门”和“门前”,“上边”和“边上”。b. 同样的词,次序不同,组成不同的短语和句子,如“经济计划”不同于“计划经济”,“方便群众”不同于“群众方便”,“一吨煤用不了一个月”不同于“一个月用不了一吨煤”。c. 句法成分的次序一般是固定的,即主语在前,谓语在后,动词在前,宾语在后,如此等等。为了适应语用上的需要,有时可以改变语序,如“我没有什么印象”和“我什么印象也没有”。

② 汉语词类和句法成分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在印欧语言里,词类和句法成分之间有一种简单的对应关系。大致说来,动词跟谓语对应,名词跟主语、宾语对应,形容词跟定语对应,副词跟状语对应。动词和形容词只有通过构词手段或句法手段转化成为名词性成分之后,才能在主语、宾语位置上出现。汉语则不然,动词和形容词无论是做谓语还是做主语、宾语,都是一个样子。汉语的名词,除了充当主语、宾语之外,还可以做定语和状语,在一定条件之下,也可以做谓语。名词做谓语,古代很普遍,如:“孔子,鲁人也。”现代一般是表示日子、天气之类,如:“今天中秋。”“昨天阴天。”如果名词前边带有修饰语,就不限于表示日子和天气了,如:“鲁迅浙江人”,“那个人大眼睛,黄头发”等等。名词直接修饰动词,在古汉语里是常见的现象。如《左传·庄公八年》:“豕人立而啼。”《史记·项羽本纪》:“吾得兄事之。”现代汉语里最常见的是时间名词、处所名词直接修饰动词,如:“我明天动身”、“您屋里坐”。其次是表示某种方式,如“要礼貌待人”;有时表示使用的工具或材料,如:“电话联系”、“冷水洗澡”。以上事实表明:汉语里名词、动词、形容词是多功能的,这与印欧语言不一样。

③ 在现代汉语里,音节多寡影响语法形式。a. 有些单音节词不能单说,比如称呼姓张的人,可以叫他“老张”或“小张”,但不能叫他“张”。b. 有些双音节词要求后边也是一个双音节词,如“进行调查”、“加以整顿”、“互相埋怨”、“共同使用”,不说成“进行查”、“加以整”、“互相怨”、“共同用”。c. 双音节词常常联合起来造成一个短语,如“先进经验、宝贵意见、图书仪器、轻松愉快”等。这样,汉语里就有大量的四字语存在。

④ 简称是很多语言中都有的现象,但是现代汉语里的简称不但数目多,并且有它的特点。a. 常常是两个平列的修饰语合用一个中心语,如“中小学”、“动植物”、“进出口”(早先已经有过少量例子,如“南北朝”、“新旧唐书”)。b. 用数字概括平列的几项,如“四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c. 简称的地位介乎词和短语之间。一方面简称代表全称,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短语,另一方面,简称比全称更加凝固,更象一个词。实际上简称是一种过渡形式,用得久,用得广,往往就变成一个词,以致很多人都忘了它原来是一个简称了。例如:“语文、科技、疗效、外贸”等等。

⑤ 汉语里有丰富的量词和语气词。

汉语语法研究 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的语法研究1898年的《马氏文通》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文言语法著作。在这部书出版之前,语法研究没有成为独立的学科。古代关于语法的论述散见于两类著作,一类是文字训诂学家的著作,一类是文艺理论家的著作。训诂学研究古书的词义,在随文释义的时候,必然要注意到词义与上下文的关系,往往涉及语法现象。如《诗经·小雅·常棣》:“原隰裒矣,兄弟求矣。”《毛传》加以注释:“求矣,言求兄弟也。”这里说明,“兄弟”是“求”的受事,而非施事。又如

《诗经·大雅·常武》：“王命卿士，南仲大祖。”《毛传》加以注释：“王命南仲于大祖。”这里说明：①原诗两句实为一句；②“命”的对象是南仲；③“大祖”（太庙）是“命”的处所，原诗省略了表示处所的“于”。训诂的另一种方式是逐字为训。《说文解字》（东汉许慎著）把9 000多字分部首排列，逐个地加以解释。即使是虚词，也从词义上加以说明。如：“矣，语已词也。”“乎，语之余也。”后来出现了专门解释虚词的著作，如元代卢以纬的《语助》，清代刘淇的《助字辨略》、王引之的《经传释词》。特别是《经传释词》，例证多，可信的程度高，对语法研究很有启发。因为虚词同语句结构的关系密切，所以说明它们的作用须寻求出现的语境。如《助字辨略》解释“而”：“而，承上转下，语助之辞。《论语》‘本立而道生’是也。又如《论语》‘敬事而信’，此而字，但为语助，无所承转，去‘而’字则不可以句也。”这样就把逐字为训与随文释义结合在了一起。

然而文字训诂学家从古籍中抽出词语，分类编次，并未能从用法上加以概括。开创这一工作的是几位文艺理论家和文学家。他们根据自己使用虚词的经验来归纳其用法，把作用相同或相近的概括成类。南朝梁代的刘勰在《文心雕龙·章句篇》中说：“至于夫、惟、盖、故者，发端之首唱；之、而、于、以者，乃剖句之旧体；乎、哉、矣、也者，亦送末之常科。”唐代柳宗元在《复杜温夫书》中说：“所谓乎、欤、耶、哉、夫者，疑辞也；矣、耳、焉、也者，决辞也。”刘勰按照虚词在句中的位置分为句首、句中、句末三类，柳宗元按照虚词的表意作用分为疑辞和决辞两类，都给后世的研究以深远的影响。此外，作家在创作实践中，也注意到词在功能上的异同。如从唐代开始的格律诗，讲求对仗，上下句相应的词语大体上有相似的功能。如杜甫《春望》：“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宿府》：“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月色好谁看。”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可以想见作家心目中已经意识到词的功能类别。在宋代，文学家重视虚实的划分，更重视虚词的使用。南宋张炎在《词源》中说：“词与诗不同，词之句语有二字、三字、四至六字、七八字者，若堆叠实字，读且不通，况付之雪儿乎？合用虚字呼唤，单字如正、但、甚、任之类，两字如莫是、还又、那堪之类，……此等虚字却要运用得其所。”诸如此类的论述和实践，多少都涉及语法现象，但是并没有发展成为独立的语法科学。讲虚词的专著，有虚词词典的性质，但并非语法书。文学家和文艺理论家的论述，着眼点是诗文的创作，并不打算总结语言结构的规律。因此，《马氏文通》以前的汉语语法研究只是汉语语法学的萌芽。

《马氏文通》的写作目的，在帮助人们阅读古书和使用文言。作者马建忠在序言中说：“愚故罔揣固陋，取四书、三传、史、汉、韩文为历代文词升降之宗，兼及诸子、语、策，为之字栉句比，繁称博引，比例而同之，触类而长之，穷古今之简篇，字里行间，涣然冰释，皆有以得其会通，辑为一书，名曰文通。”全书引证古书达七八千句，可以说已经集文言句式的大成了。至于研究方法，一方面

模仿印欧语法建立体系，同时也注重汉语的特点，不少地方突破了西方语法的框架。在汉语语法研究上，马建忠的开创之功是不可磨灭的。《马氏文通》给后来的汉语语法研究以深远的影响，主要有几方面。第一，重视句法。在马建忠的时代，西方的一般语法书多详于词法而略于句法。汉语缺少词形变化，不可能象印欧语法那样叙述各类词的形式特点。因此《马氏文通》尽管全书10卷中有8卷讲字类，但莫不联系句法来论述。第二，划分词类着重意义标准。书中说：“义不同而其类亦别焉，故字类者亦类其义焉耳。”又说：“字无定义，故无定类，而欲知其类，当先知上下之文义何如耳。”第三，列助字一类。拿汉语和印欧语言相比，助字（语气词）确是一大特点。马建忠认为助字是“华文所独”，所以单独列为一类。

此后陆续有语法著作问世，大都以《马氏文通》为范本，或多或少加以修补。章士钊的《中等国文典》（1907），注重字和词的区别，较为合理，在术语上也作了一些改变。（参见彩图插页第25、26页）

1919年“五四”运动至1949年的语法研究 从“五四”时期开始，汉语语法研究者渐渐对《马氏文通》不满，企图有所改革。刘复的《中国文法通论》（1920，参见彩图插页第25页）颇受英国语言学家H. 斯维特的《新英语语法》的影响。金兆梓的《国文法之研究》（1922）参照刘复的书而又有所变通。陈承泽的《国文法革创》（1922）在词类区分上分别本用和活用，这在辨识词性方面有所改进。稍后有杨树达的《词诠》（1928）和《高等国文法》（1930），两书内容大部分相同，只是编排方式两样。《高等国文法》的语法体系与《马氏文通》相近，但在细节上有所修正。

以白话文为研究对象的语法，以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1924）最为著名。这本书首创“句本位”语法体系，在词类问题上主张“依句辨品，离句无品”。在句子分析方面，采取以主语和谓语为中心的分析法，拿J. C. 纳斯菲尔德的《英语语法》（1910）作参考来确定句子成分。同时还采用A. 里德等人的图解法来表示句子分析的结果。这本书多次重印，对语法学界，特别是在大中学校的语法教学上，影响很大。

如何根据汉语自身的特点来研究汉语语法，这是许多学者想解决的问题。刘复、陈承泽等人对此发表过原则性的意见。30年代末开展的文法革新问题讨论，主张“根据中国文法事实，借镜外来新知，参照前人成说，以科学的方法、谨严的态度缔造中国文法体系。”（《中国文法革新论丛》序言）这次讨论，为摆脱语法研究中的机械模仿、为革新汉语语法研究作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

40年代初，一些语言学者既借鉴国外语言学理论，又重视汉语的实际，撰写了一批新著。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3卷，1942~1944）和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上册1943，下册1944）是这一时期的硕果。《中国文法要略》拿文言和白话对照，着重语法现象的描写。“词句论”探讨了句子和词组之间的变换关系，细致深入。“表达论”以语义范畴为纲描写汉语句法，是迄今为止对汉语句法

进行全面语义分析的唯一著作。《中国现代语法》十分重视汉语的特点,特别是在句法的描写方面,对推动汉语语法研究有重大影响。这本书在句型上提出“能愿式”、“使成式”、“递系式”、“处置式”、“被动式”、“紧缩式”等,对于后来的研究起了引导和启发的作用。在40年代,学者们开始重视近代汉语的研究,但大都偏重词汇方面,在语法方面引人注目的是吕叔湘所作的一些专题研究。

1949年以来的语法研究 无论从规模看,从成果看,从培养人才看,都取得很大成绩。这一时期的语法研究有下列特点:

① 注重社会实践的效用。1951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全国人民正确地使用祖国语言,同时连载吕叔湘、朱德熙合著的《语法修辞讲话》,帮助读者掌握语法修辞知识,用来指导语言的运用。于是,掀起学习语法的高潮。研究工作者都十分重视语法知识的普及工作,包括在中学开展语法教学。与此同时,语法知识也成为高等学校“现代汉语”课的重要内容。

② 开展了全国性的专题讨论。影响最大的有3次:词类问题的讨论、主语和宾语问题的讨论、析句问题的讨论。词类问题的讨论是1953年开始的,延续了一年多,讨论的主要问题是:a. 根据什么标准划分词类? b. 如何理解形态和功能?主语和宾语问题的讨论是1955年7月开始的,延续了一年左右。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汉语的主语和宾语的判定是根据意义(施受关系)还是依据形式(语序)?句法成分的标志是什么?析句问题的讨论,可以说是前两次讨论的继续,因为词类问题和主宾语问题都与析句问题密切相关。从整个语法体系来看,析句的目的、方法以及有关的理论,是更根本的问题。讨论从1981年开始,历时一年多。讨论的主要问题是成分分析法(中心词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直接成分分析法)孰优孰劣?它们各自的适应性和局限性怎样?两种方法是否矛盾?能否结合?不属于这几次讨论的产物之列,但对于汉语语法里种种问题作了系统论述的,有吕叔湘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1979)。

③ 借鉴和吸收现代语法学理论。美国结构主义学派的学说在50年代初引进中国,由李荣摘译赵元任的《国语入门》的序论开始,接着是在《中国语文》上连载的《语法讲话》,这个《讲话》在一定程度上运用了直接成分分析法,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影响。60年代出现若干篇立足于汉语而借鉴现代语言学理论的论文,如吕叔湘的《说“自由”和“黏着”》(1962)、《关于“语言单位的同一性”等等》(1962),朱德熙的《说“的”》(1961)和《句法结构》(1962)。同时,国外一些语法学者,采取现代语言学的方法分析汉语语法,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

参考书目

- 马建忠:《马氏文通》,商务印书馆,北京,1983。
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山西人民出版社,太原,1981。
王力:《汉语史稿》(中册),科学出版社,北京,1958。
吕叔湘:《汉语语法论文集》(增订本),商务印书馆,北京,1984。

丁声树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商务印书馆,北京,1961。
朱德熙:《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北京,1982。

赵元任著,吕叔湘译:《汉语口语语法》,商务印书馆,北京,1979。(Yuen Ren Chao,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1968.)

林玉山:《汉语语法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长沙,1983。

(张斌 胡裕树)

Hanyu Yufalun

《汉语语法论》 汉语语法著作,高名凯著。1948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1957年修订,由北京科学出版社出版。高名凯(1911~1965),语言学家,福建平潭人。毕业于燕京大学哲学系,1936年入法国巴黎大学,攻读语言学,1940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在燕京大学任教,并担任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这本书的内容除绪论外分3编:第1编句法论,第2编范畴论,第3编句型论。修订本增加一编构词论。

高名凯认为汉语既缺乏形态变化,词又没有固定的功能,因而实词不能分类,只能注重造句法和虚字。第1编句法论,包括最基本的句子结构和结构关系两个方面。最基本的句子结构分为名词句和动词句,“我好”、“我大”归入名词句;修订本将形容词句单独列为一类,成为名句、形容词句、动词句3类。句子中的结构关系分为规定关系、引导关系、对注关系、并列关系和联络关系5种。第2编范畴论,以范畴来概括他所认为范围实词的虚词及其他语法成分,包括指示词、人称代名词、数词、辅名词、动词之态、动词之体、未来事素之表示、动词之性、绝对动词与分合动词、量词。第3编句型论,根据语气划分句子类型。分为否定命题、询问命题、疑惑命题、命令命题和感叹命题5种。

高名凯认为以往的语法著作都是摹仿之作,而这本书是根据语言学理论来建立汉语语法体系的,因而偏重理论的说明。对汉语的特性、词序和虚词的重要性、语法范畴和语法形式的关系等问题,都曾提出一些见解。是20世纪40年代汉语语法研究的重要著作之一。

(林祥楠)

Hanyu yuyin

汉语语音 (Chinese phonetics) 研究汉语语音系统及其结构规律的学科。

汉语语音概述 汉语语音的特点是音节结构简单,音节界限分明,声调是音节的重要组成部分。

汉语的音节结构有很强的规律性。元音是一般音节中不可缺少的成分,一个音节内部最多可以连续出现3个元音(如iao,uai)。辅音主要处在元音的前面,即音节的开头;只有少数辅音可以处在元音的后面,即音节的末尾。处在元音前后的辅音一般只能有一个,在汉语中,不存在sk,fl,str之类的辅音丛。

中国传统把一个音节分为声母、韵母和声调3部分。

声母指处在音节开头的辅音,如dā(答)、kǒu(口)、bān(班)、liào(料)、suàn(算)中的d-、k-、b-、l-、s-就都是声母,音节的开头如果没有声母,就是零声母音节,如àn(暗)、ōu(欧)。韵母指音节中声母后面的成分,可以只是一个元音,如gū(姑)里的-u,也可以是元音的组合或元音和辅音的组合,如guā(瓜)里的-ua或guān(关)里的-uan。韵母可以进一步分为韵头、韵腹和韵尾3部分。韵头和韵腹都是元音,韵尾也可以是辅音。韵腹是一个韵母不可缺少的成分,如tā(他)、huā(花)、diāo(雕)、kuān(宽),都有韵腹a,可是韵头u、i和韵尾o、n就不是每个音节所必须具备的。声调指整个音节的高低升降,汉语是有声调的语言,音节的高低升降具有辨义作用,如fān(翻)、fán(烦)、fǎn(反)、fàn(饭)以及多音词tóngzhì(同志)、tōngzhī(通知),都是凭声调的不同来区别意义。

把汉语音节分为声母、韵母和声调3部分,能很好地反映出汉语语音的特点,便于说明汉语语音的历史发展情况和目前汉语各方言之间语音结构的关系。这种分析方法已经被公认为分析汉语语音最方便有效的方法。

汉语的声母和韵母的內部都有很强的系统性。例如,汉语拼音方案的“声母表”和“韵母表”列出了普通话的21个声母和35个韵母,这21个声母和35个韵母是相当整齐有系统的。21个声母可以排列成(方括号内是国际音标宽式注音,下同):

b[p]	p[p']	m[m]	f[f]
d[t]	t[t']	n[n]	l[l]
g[k]	k[k']		h[x]
j[tʃ]	q[tʃ']		x[ç]
zh[tʂ]	ch[tʂ']		sh[ʂ]
z[ʈ]	c[ʈ']		s[s]

横行各声母的发音部位相同或相近,竖行各声母的发音方法相同或相近,21个声母形成相当整齐有系统的局面。35个韵母则可以排列成:

[ø]行	[i]行	[u]行	[y]行
	i[i]	u[u]	ü[y]
a[a]	ia[ia]	ua[ua]	
o[o]		uo[uo]	
e[ɤ]	ie[ie]		üe[ye]
ai[ai]		uai[uai]	
ei[ei]		uei[uei]	
ao[au]	iao[iau]		
ou[ou]	iou[iou]		
an[an]	ian[ien]	uan[uan]	üan[yan]
en[ən]	in[in]	uen[un]	ün[yn]
ang[aŋ]	iang[iaŋ]	uang[uaŋ]	
eng[əŋ]	ing[iŋ]	ueng[uəŋ] ong[uŋ]	iong[yŋ]

从竖行看,ø行韵母都没有韵头,[i]行韵母的韵头或韵腹

都是[i],[u]行韵母的韵头或韵腹都是[u],[y]行韵母的韵头或韵腹都是[y]。传统称ø行韵母为“开口呼”,[i]行韵母为“齐齿呼”,[u]行韵母为“合口呼”,[y]行韵母为“撮口呼”。表中的35个韵母相当整齐地分配在这“开、齐、合、撮”四呼中([uəŋ]前面不能有声母,[uŋ]前面一定要有声母。汉语拼音方案为了书写清楚方便,把[uŋ]写成ong,把[yŋ]写成iong,这两个韵母在汉语拼音方案韵母表中的位置也相应地有所改变)。从横行看,上4行韵母都没有韵尾,中4行韵母都有元音韵尾[-i]或[-u],下4行韵母都有鼻音韵尾[-n]或[-ŋ],也是相当整齐有系统的。

除声母和韵母内部的系统性外,汉语的声母和韵母之间还有相当严谨的配合规律。例如,普通话的声母g、k、h只能同开口呼和合口呼的韵母配合成gāi(该)、kè(客)、huán(环)等等,不能同齐齿呼和撮口呼的韵母配合;j、q、x恰恰相反,只能同齐齿呼和撮口呼的韵母配合成jī(鸡)、qián(前)、xuě(雪)等,不能同开口呼和合口呼的韵母配合。

汉语声调的数目比声母和韵母少得多,普通话只有4个声调,根据传统名称,分别称为:

阴平: -[155], 如“妈、灰、妻”

阳平: / [135], 如“麻、回、奇”

上声: v [4214], 如“马、悔、起”

去声: \ [51], 如“骂、会、器”

汉语许多方言还有所谓轻声音节,这种音节读得短而轻,没有明显的高低升降的变化。例如普通话fángzi(房子)、dōngxi(东西)、zǒule(走了),第2个音节都要读轻声。

两个或两个以上音节连在一起时,音节的高低升降往往发生变化,这种现象称为“连读变调”。例如,普通话两个上声音节连读时,前一个要变读成阳平,yǒujǐng(有井)和yóujǐng(油井)变成了同音。汉语各方言的连读变调现象相当复杂,各有各的特点,苏州话的连读变调就比普通话复杂得多,几乎每一个声调都存在连读变调现象,而且变调发生在后一个音节,例如,苏州话两个阴平音节连读时,后一个阴平调值要由原来的高而平[144]变成低而降[21],“东风”[toŋ‘foŋ‘]要变读成[toŋ‘foŋ‘1]。

儿化韵也是汉语语音中很常见的现象。当“儿”音节处在其他音节之后时,往往和前面音节的韵母合并成为儿化韵,例如普通话“花儿”由huā'ér合并成huār。韵母儿化以后声音有时发生较大的变化,有些韵母在儿化以后变成了同音,普通话“(小)罐儿”的guǎn'ér合并成guǎnr以后,韵尾-n就不再发音,变得和“(小)褂儿”的guàr声音相同了。汉语许多方言都有儿化现象,但儿化的情况和程度不尽相同。浙江一些方言“儿”音节读[n]或[ŋ],儿化韵就是在原韵母之后加上[n]或[ŋ],例如浙江义乌“鸡”[tɕi]儿化成“(小)鸡儿”,就读成[tɕi:n]了。

汉语各方言虽然语音分歧相当大,但声母、韵母和声调的基本结构是一致的。方言之间的语音分歧主要表现

在声母、韵母和声调的数目和内容不同。例如苏州话有26个声母(不包括零声母,下同),45个韵母,7个声调;福州话有15个声母,43个韵母,7个声调;广州话有20个声母,53个韵母,9个声调;南昌话有19个声母,65个韵母,6个声调;烟台话有21个声母,37个韵母,3个声调。数目不同,内容自然不一样;数目相同,内容也不一定完全一致。例如烟台话有21个声母,和普通话相同,但烟台话并没有普通话zh、ch、sh、r这4个声母,而是另有4个普通话没有的声母。各方言的声调数目一般都在3~9个之间,同一个声调在不同方言里实际读音高低升降的差别往往非常明显,成为分辨方音时很重要的标志。

虽然汉语各方言的声母、韵母和声调各有自己的特点,但相互之间存在着相当有系统的对应关系。有的对应关系很简单,例如广州话有[-m]、[-n]、[-ŋ]三套鼻音韵尾,普通话和许多方言都只有[-n]和[-ŋ]两套,广州话的[-m]、[-n]两套韵尾和这些方言[-n]一套韵尾对应,即广州话的[-m]在这些方言也读[-n] (广州话“贫”[tʰam]和“滩”[tʰan]普通话都读tan)。大部分对应关系都比较复杂,往往是声母、韵母和声调三方面相互制约。例如,绝大多数方言都有[p]、[pʰ]和[t]、[tʰ]这两套清塞音声母,苏州话还另有浊塞音声母[b]和[d]同这两套清塞音声母相配。这两个声母是许多方言都没有的,苏州话声母读成[b]和[d]的音节在这些方言里或是读不送气的[p]和[t],或是读送气的[pʰ]和[tʰ],要受到声调的制约。苏州话“平、病”声母都是[b],“图、杜”声母都是[d],这些方言“平”和“图”读送气的[pʰ]和[tʰ],都是阳平声,“病”和“杜”读不送气的[p]和[t],都是去声,声调不同,声母的对应关系也不一样。由于声母、韵母和声调三方面相互制约,有些对应关系形成相当错综复杂的局面,必须对两种方言的语音系统都有较全面的了解,才能进行比较,弄清它们之间的各种对应关系。

错综复杂的对应关系主要存在于语音分歧较大的方言之间。就大多数汉语方言来说,是具有相当大的语音一致性的。大致说来,除长江以南沿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台湾各省和湖南、江西一带以外,其他地区所说的汉语方言语音都比较接近,都属于所谓“官话”区。从长江以北向北直到中国北部边疆,向西南延伸到四川、贵州、云南、广西一带,面积达700多万平方公里,在这广大的区域内,有7亿以上说汉语的人,说的都是这种“官话”。如此众多的人口,可以听懂或大致听懂相互之间的方言,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在这广大的官话区域内,北京话有其特殊重要的地位。从元代开始,北京就成为全国的首都,800年来,始终是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除当地居民外,北京一直居住着大量的各民族和各地来的人,对传播北京话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北京话也就逐步成为官话区的核心,对全国各地发生影响。北京语音很早就已经成为全国各地的人学习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语音标准。

汉语语音的历史发展 古人讲话的声音不可能保留到今天,研究语音的历史发展,只能依靠古代的文字材料。汉字本身保留了大量的古代语音信息,古代诗歌的用韵和中古以后出现的各种韵书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语音资料,从现代方言的比较研究中更可以看出汉语语音演变的种种线索。此外,古代的音译词以及汉语和其他汉藏语系语言的比较也都能帮助人们了解汉语语音的历史发展情况,但是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还没有真正展开。

对汉语语音历史的研究传统称为“音韵学”,有悠久的历史。一般把汉语语音的发展分为4个时期:①上古音时期——先秦至魏晋(约公元前10~公元5世纪);②中古音时期——南北朝至唐宋(5~13世纪);③近古音时期——元代和明代(13~17世纪);④现代音时期——清代至现代(17~20世纪)。对各时期的起迄时代目前还有一些不同看法,但前后相差并不很大。每个时期都长达数百年甚至上千年,在一个时期内自然还有不同阶段的变化,各时期的方言分歧情况目前也了解很少,因此,研究古代各时期的语音,一般只能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语音资料作为各时期语音系统的代表,然后旁及其他材料。

从上古音到现代音的2000多年时间内,汉语语音的基本结构并没有改变,即音节分为声母、韵母和声调3部分,韵母又分为韵头、韵腹和韵尾。2000多年来汉语语音的演变主要是声母、韵母和声调内部的变化,这些变化在现代方言中有时还能反映出来,例如上古音和中古音都有鼻音韵尾[-m],到现代还保留在广州话和其他一些方言里。

上古音 一般以《诗经》韵脚和谐声字所反映的语音系统作为代表。《诗经》并非一时一地的作品,谐声字是用声旁表音的字(如“途、除、徐、叙、斜”都用声旁“余”表音),来源更要复杂一些,但这两种材料反映的语音系统是相当一致的。上古音距今已逾千年,语音资料也较零散,目前只能推测出上古音系的基本轮廓,对其中的细节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上古声母共有30个左右,其中[p]、[pʰ]、[m]、[t]、[tʰ]、[n]、[l]、[k]、[kʰ]、[ŋ]、[x]、[ʃ]、[ʃʰ]、[s]是从上古直到现代绝大多数方言都存在的声母,表现了汉语声母的历史继承性。上古浊塞音声母[b]、[d]、[g]和浊塞擦音[ɖ]也还保留在现代一些方言里,其余十几个声母的性质则各家说法很不一致。上古很可能还存在[kl]、[pl]之类的复辅音声母,例如在谐声字中,舌根音声母[k]、[kʰ]往往和边音声母[l]互谐,“各”既可以作“格、阁、客”的声符,也可以作“洛、路、略”的声符,这些字很可能原来都是由[kl]之类的复辅音演变来的。对上古音是否有复辅音以及有多少复辅音,目前还有种种不同看法。

根据《诗经》用韵和谐声字的情况,传统把上古韵母分为若干韵部,用一个汉字来代表,如“之部、幽部”等等,上古韵部共有30个左右。同韵部的字只是韵腹和韵尾

相同,韵头可以不同,因此每个韵部实际不只包含一个韵母。根据韵尾的不同可以把上古韵部分为阴、阳、入 3 大类:有鼻音韵尾[-m]、[-n]、[-ŋ]的是阳声韵,有清塞音韵尾[-p]、[-t]、[-k]的是入声韵,其余的都属于阴声韵。如果韵腹相同,阴阳入 3 类往往可以相互押韵或谐声,如《诗经·郑风·女曰鸡鸣三章》“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中,“来”和“赠”押韵,就是因为这两个字在上古韵腹相同,都是[ə],只是“来”属于阴声韵,“赠”则属于有鼻音韵尾[-ŋ]的阳声韵,这种押韵现象传统称为“阴阳对转”。

大多数上古韵母的读音和现代相去甚远,和中古也有很大区别。例如“姑”现代韵母是[u],中古相同或近似,上古时韵母则可能是[a],“台”现代韵母是[ai],中古也是类似的复元音,上古时韵母则可能是[əi]。也有一些韵母如[an]、[ən]、[aŋ]、[əŋ]等从上古经中古到现代变化不大,象“班”[pan]和“登”[təŋ]等字的读音 2000 多年来并没有显著的改变,但这类字究竟是少数。目前对上古音韵头的多少、韵部的分合以及阴声韵是否也有辅音韵尾等问题有种种不同看法,还远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

现存的上古音语音资料不能系统地反映出上古声调情况,历来对上古声调的看法分歧也最大。目前较有影响的有 3 种意见:①上古和中古一样,分为“平、上、去、入”四声;②上古没有去声;③上古只有平声和入声,但各分长短两种。近年来从汉藏系语言的比较研究中又产生一种新意见,认为汉语在远古时期可能并没有声调的分别,声调是远古时期不同的韵尾辅音脱落或保存才逐渐产生的。

中古音 一般以隋唐时期盛行的韵书《切韵》的语音系统作为代表。魏晋南北朝是从上古音向中古音转变的时期,南北朝时已经出现了许多供作诗押韵用的韵书,对当时的语音系统做了一定的分析和归纳,隋代陆法言集各家之大成,于 601 年编成《切韵》一书。《切韵》的原本和它以前的韵书今已佚,现存的《切韵》都是后人的增订本,而且大多是残卷。目前流传最广的完整增订本是宋代陈彭年等编的《大宋重修广韵》,《广韵》对《切韵》的增订主要在字数和释义,对《切韵》的语音系统并没有重大的改动,现在研究《切韵》音系一般就都以《广韵》为主要依据。《广韵》把当时的语音系统分析归纳为四声、206 韵,每韵内又根据声母的不同分为若干小韵,这个语音系统是否代表当时一时一地之音,目前尚无定论,但它能分门别类详细列举出隋唐时期声母、韵母和声调的情况,是研究中古音最重要的语音资料。

《切韵》并没有系统地列出它的声母系统,根据后人分析归纳,大体上是和传统的三十六字母相当的。三十六字母可能起源于唐末,到宋代经过不断补充修订,基本上能代表当时的声母系统。每个字母用一个汉字来代表,至于它们的实际读音,经过多年研究,目前已大致取得一致的意见。但为了便于说明中古的声母系统,目前一般仍沿用三十六字母的名称,例如,用“帮、滂、並、明”代表中古声母[p]、[pʰ]、[b]、[m],用“端、透、定、

泥”代表中古声母[t]、[tʰ]、[d]、[n]等。上古声母有相当一部分仍保存在中古音中,但大都经过了较为复杂的分化或合并的过程,并不完全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切韵》把不同声调的韵母算作不同的韵,每个韵用一个汉字来代表,例如“东韵”、“江韵”、“鱼韵”、“真韵”等。在计算中古韵母时,如果只是声调不同,就只能算是一个韵母,例如“之韵”、“止韵”和“志韵”的分别只在声调,实际上只是一个韵母。《切韵》共列出 193 个韵,《广韵》增订为 206 韵,除去声调的分别不计,只有 90 多个韵。当时的分类不大重视韵头的作用,有时把不同韵头的韵母合并成一个韵,例如,“删韵”就包括开口呼和合口呼两类韵母,可是“寒韵”和“桓韵”又根据开口呼和合口呼的不同分成两韵。如果把该分开的韵母都分列出来,实际上共有 150 多个不同的韵母,这说明《切韵》所记录的韵母系统是相当复杂的。

中古音的韵头只有[i-]和[u-],但隋唐时期韵头[i-]可能还分为长短两类,这样就有了三种不同的韵头。中古音的韵腹元音非常丰富,这是中古韵母多达 150 多个的主要原因。近几十年对上古韵腹元音的实际读音做了相当细致的研究和推测,其中大部分已经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意见。中古音的韵尾继承了上古阴声韵、阳声韵和入声韵的分别。阴声韵的韵母除没有韵尾的(如“歌韵”)以外,还包括元音韵尾[-i] (如“灰韵”)和[-u] (如“豪韵”)。中古阳声韵的鼻音韵尾和入声韵的清塞音韵尾与上古相同。在《切韵》的韵母系统中,入声韵和阳声韵相配,即[-m]和[-p]相配,[-n]和[-t]相配,[-ŋ]和[-k]相配,例如东韵[-uŋ]和“屋韵”[-uk]相配,“删韵”[-an]和“辖韵”[-at]相配,“衍韵”[-am]和“狎韵”[-ap]相配等等,形成相当整齐的局面。

中古音的声调分为“平声、上声、去声、入声”4 类。《切韵》以声调为纲,在四声之下分列各韵,后代韵书一般都遵循这种编排方法。平声、上声和去声的分别主要在音节的高低升降不同;入声则是韵尾收[-p]、[-t]、[-k]的发音短促的入声韵,和另外三声的阳声韵相配,例如“东、董、送、屋”四韵的分别就在于“平、上、去、入”四声不同,至于阴声韵如“之、止、志”、“鱼、语、御”等则只有“平、上、去”三声。从中古到现代四声的发展和声母的清浊关系很密切,为了便于说明这种关系,习惯上把中古的四声分为阴阳两类:中古是清音声母的称为“阴平、阴上、阴去、阴入”,如“官、管、灌、括”;中古是浊音声母的称为“阳平、阳上、阳去、阳入”,如“郎、朗、浪、乐”。

在唐初,已有人批评《切韵》分韵过细,不利使用,说明《切韵》的语音系统已与当时的口语不尽相合。从《广韵》开始,已在《切韵》的一些韵目下注明与某韵“同用”,实际就是承认这两个韵并没有明显的区别。到宋末元初时,为了便于作诗,一些韵书根据《广韵》“同用”的办法,索性把 206 韵合并为 106 韵,这 106 韵从此成为做旧体诗押韵的规范。最早合并的是平水人刘渊主持刊行的《壬子新刊礼部韵略》(1252),因此世称这 106 韵为“平水

韵”。平水韵主要只是把《广韵》韵目中同用各韵加以合并，并不能真正代表宋元时期口语的语音。

近古音 一般以元代周德清所编《中原音韵》的语音系统作为代表。《中原音韵》成书于1324年，正是元代戏曲盛行的时期，周德清根据当时北曲作家用韵的情况归纳整理成书，成为写作北曲用韵的准绳，对中国古代戏曲创作有很大影响。《中原音韵》是专为戏曲而作的，因此能跳出《切韵》系统韵书的窠臼，记录下活跃于元代舞台上的北方语音系统。至于这个语音系统是否能代表当时的元大都（今北京）的方言，目前尚有不同看法，但它无疑是现代北方官话的源头，代表了汉语语音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中原音韵》所代表的近古音语音系统比《切韵》所代表的中古音语音系统简单得多，已经相当接近于现代北京话。《中原音韵》改变了《切韵》以声调为纲的编排方法，改为以韵为纲，各韵之下分列声调，然后再分为若干小韵，同音字都列在同一小韵内，并没有单列声母。根据小韵的分布情况分析，《中原音韵》可能共有20个声母（不包括零声母），和现代北京话已很近似。汉语的声母系统从中古到近古大大简化，主要是因为中古大部分浊音声母到近古变成了清音，除了[m-]、[n-]、[l-]等少数浊音声母外，其余都变成清音，和原来的清音声母合并，例如“步”[b-]并入“布”[p-]，“在”[d-]并入“再”[t-]，“似”[z-]并入“四”[s-]等。

《中原音韵》把韵母分为19个韵部，以两个汉字命名，如“东钟、江阳、支思”等，这只是韵母的大类，各韵部内还包括韵头不同的韵母。19个韵部实际共包括40多个韵母，只有中古韵母的1/3左右，这主要是因为中古入声韵到近古已经全部消失，和阴声韵完全合并。此外，中古有不少韵母的韵腹元音非常接近，到近古也合并在一起了，例如“东、冬、钟”在中古本是3个韵，到近古就合为一韵。近古音的韵头可能只有[i]和[u]，韵头[y]当时是否已经出现，目前还有不同看法，但至迟到明代就已经形成了现代四呼的局面。中古的鼻音韵尾[-m]、[-n]、[-ŋ]和元音韵尾[-i]、[-u]在《中原音韵》中仍完整地保存，但不久[-m]就和[-n]合并，只留下了[-n]、[-ŋ]两套鼻音韵尾。中古的塞音韵尾[-p]、[-t]、[-k]由于入声韵消失，也不复存在，其中有不少并入元音韵尾[-i]、[-u]，如“麦”并入“卖”，“脚”并入“搅”；另一些韵尾则完全失落，和原来的无韵尾韵母合并，如“舌”并入“蛇”，“滑”并入“华”。

《中原音韵》把声调分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4类，和现代北京话完全相同。中古的平声根据声母的清浊到近古分为阴平和阳平两类；中古清音声母读阴平，如“通、诗、坡、春”；中古浊音声母读阳平，如“同、时、婆、纯”。由于中古浊音声母到近古大部分都已变成清音，因此阴平和阳平就纯粹是声调的区别了。中古和近古虽然都有上声和去声，但内容不尽相同。中古浊音声母中除[m-]、[n-]、[l-]等少数以外，读上声的到近古都变成了去声，如“上”和“赏”、“杜”和“赌”在中古都读上声，但是

“上”、“杜”是浊音声母，到近古就读成去声，“赏”、“赌”是清音声母，仍旧读上声。从中古到近古声调最大的变化是入声不再独立成为一类，中古的入声字到近古分别归入阳平、上声和去声，如“达”归入阳平，“笔”归入上声，“麦”归入去声。近古以后，一部分归入上声的入声字又改归阴平，如“说、瞎、督”，《中原音韵》归入上声，现代北京话都读成阴平。至于《中原音韵》时期入声是否已经完全消失，目前仍有不同看法，但入声在当时已丧失独立作为声调的地位，则是可以肯定的。

语音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汉语有一些方言到目前还保留着中古音甚至上古音的一些特点。例如，广州话完整地保存3套塞音韵尾[-p]、[-t]、[-k]和鼻音韵尾[-m]，苏州话系统地保存浊音声母[b-]、[d-]、[g-]、[dʒ-]、[z-]等。至于入声独立作为声调，不但长江以南大部分方言仍然如此，从黄河下游中原地区直至西北地区也有不少方言仍旧有入声，保存了近古以前汉语声调的一个重要特点。

汉语语音研究 古代的语音研究 公元3世纪，中国就有了反切注音的办法，据传最早使用反切的是三国时孙炎，所著《尔雅音义》今已佚。反切的发明说明当时人已能够根据汉语语音特点把一个字（即一个音节）分为声母和韵母两部分。到南北朝时，沈约等人又注意到“平、上、去、入”四声的分别，从此奠定了汉语音节分为声、韵、调3部分的基础，揭示出汉语语音的基本特性。以《切韵》为代表的韵书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发展形成的。韵书根据声母、韵母和声调分析汉语语音，归纳出相当完整的语音系统，是汉语语音研究很重要的发展。中国历代都有韵书，虽然其中往往杂有古音和方音成分，但有不少韵书能够描写出当时语音系统的基本面貌，这在古代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韵书编写的目的是为了便于读书人做诗押韵，到唐末宋初出现的三十六字母则完全是为了归纳当时的声母系统，已自觉地进入了语音研究的领域。宋元以后盛行韵图，韵图把韵书归纳出的韵母和三十六字母结合起来，根据发音特点各分为若干大类，整理成表格，使人查检，虽然所用名词术语纷繁芜杂，有的不易理解，但由于把语音系统简化成图表，汉语语音的系统性就表现得更加明显。

古代学者很早就发现了古今音的不同。公元3世纪，汉末刘熙《释名》中就曾提到：“古者曰车，声如居……今曰车，声近舍。”但这种认识只限于个别的字音。对语音的历史发展有系统的认识开始于16世纪，明代陈第从历史观点出发提出“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的主张，是正确认识语音发展变化的理论先驱。顾炎武在陈第的影响下，对上古音做出开创性的研究，他把上古韵分为10部，为上古音的研究方法奠定了基础。清代考据学盛行，一些著名学者如戴震、段玉裁、王念孙、钱大昕等人都对上古音的研究作出很大贡献，研究越精，韵部就分得越细。清代学者很少研究上古音的声母，只有钱大昕提出“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

的主张,今天看起来仍是完全正确的。江有诰集各家之成,编成《音学十书》,把上古音分为21部,并列出声母表,可以算是清代研究上古音的总结。20世纪初,章炳麟和黄侃又对江氏结论有所修正,清代研究上古音的方法和成就到此就告一段落。

清代学者研究语音是为考据学服务的,目的主要在于疏通先秦古籍,因此对上古音以后的语音发展不大重视,称《切韵》所代表的中古音为“今音”,很少有人专门研究。清末陈澧扭转这种偏向,所著《切韵考(内外篇)》用逐字系联的方法分析归纳《广韵》的反切上下字,考订中古音的声母和韵母。他所创的系联法虽有一些缺点,但方法比较严密,结论基本可信,至今为人所引用。

“五四”时期至1949年的语音研究 “五四”前夕,北洋政府教育部在1918年公布了注音字母,对当时的“国语运动”起了很大推动作用,1928年,又肯定了国语(即普通话)应该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赵元任、黎锦熙、钱玄同等语言学家在当时都对北京话的语音系统做了相当详尽的分析,改变了长期以来语音研究重古轻今的倾向。

“五四”以后,西方语言学理论传入中国,对汉语语音研究产生很大影响。瑞典学者高本汉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汉语语音,对上古音和上古音的实际音值做出构拟,使汉语语音研究摆脱汉字的束缚走上音标化的道路。高本汉的著作很多,影响最大的是《中国音韵学研究》(法文,1926),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把该书译成中文,于1940年出版。译本对原著内容做了必要的订正和补充,比原著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赵元任在1934年所写《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英文)一文从汉语方言和古音中的一些现象阐述音位的应用和理论,至今仍被国际公认为音位学创始时期的重要理论著作。在此时期,李方桂连续发表《切韵a的来源》等3篇讨论上古音的文章,罗常培发表《知彻澄娘音值考》、《切韵鱼虞之音值及其所据方音考》等讨论中古音的文章,这些文章对上古音和中古音音值的拟测都作出了重大贡献。20世纪40年代,陆志韦《古音说略》(1947)一书出版,从统计学方法入手研究上古音和中古音,提出许多独到见解。陆志韦还系统地研究近古音的一些资料,写出《释中原音韵》等9篇文章,推动了近古音的研究工作。董同龢《上古音韵表稿》(1944)一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为上古音列出同音字表,使上古音的拟测更加系统化,可以说是这个时期上古音研究的总结。

赵元任在1928年完成的《现代吴语的研究》是中国第一部用现代语言学方法调查汉语方言的专著,对后来的方言调查影响很大。方言调查工作开始为许多语言工作者所重视,出版了不少专著,方言调查方法也日趋完善。赵元任根据中古音研究成果制定的方言调查表至今仍然是调查方言语音系统所用表格的基础。方言调查首先必须了解方言的语音系统,这个时期方言调查的开展为语音研究积累了大批方言语音资料,大大加深了对汉语语音特性的认识。

20年代,刘复和王力先后在法国用实验语音学的方法分析研究汉语语音,为语音研究开辟了新领域。刘复《四声实验录》用仪器分析了汉语12种方言的声调,王力《博白方言实验录》(法文)对广西博白方言的元音、辅音和声调进行了实验。刘复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创立了语音乐律实验室,设计发明了声调推断尺,是中国实验语音学的先驱。实验语音学的研究工作因抗日战争开始缺乏仪器设备而中断达20余年。

1949年以来的语音研究 50年代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推广普通话,并且制定了汉语拼音方案,对汉语语音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从1956年起进行全国性的汉语方言普查工作,训练了大批方言调查工作人员,编写出大量的各地人学习普通话的小册子,掀起了全国学习普通话的热潮,这种以普及为主的调查工作基本上弄清了全国各地方言语音系统的轮廓和特点。在拟定汉语拼音方案的过程中,展开了有关普通话音位的讨论,加深了研究语音的理论认识。与此同时,语音研究的范围也逐步扩大,除声母、韵母和声调外,也开始注意普通话的轻重音、儿化韵、连读音变和语调等方面的研究,对普通话的描写更加细致深入。

1959年以后,在方言普查工作基本完成的基础上,方言调查工作逐步深入,江苏、福建、山西等省陆续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全省方言调查工作。1979年《方言》杂志创刊后,陆续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方言调查文章,大部分以描写方言语音系统为主,其中有不少文章注意到方言内部的语音差异和邻近方言之间的语音关系等问题,大大丰富了汉语语音研究的内容。

王力《汉语史稿(上册)》(1957)是中国第一部用现代语言学观点系统论述汉语从古至今语音发展的著作,包含了王力多年来研究古音的成果,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王力晚年又在原书基础上写成《汉语语音史》(1985),内容比原书更加丰富。李荣《切韵音系》(1952)根据1947年发现的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列出《切韵》的单音字表,并且系统地讨论了构拟《切韵》音值中存在的问题,是中国第一部全面研究《切韵》音系的专著。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期,研究汉语语音发展的文章比较多,对《切韵》音系和《中原音韵》音系的性质都曾有过相当深入的讨论。周祖谟《广韵校本》(1960)、《唐五代韵书集存》(1983)和陆志韦等校勘影印的明刊本《中原音韵》(1978)先后陆续出版,为上古音和近古音的研究提供了翔实可靠的资料。80年代,汉语语音史的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专著和论文不断出版,数量远远超过过去,其中有不少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研究领域有所拓展,研究方法也正在做新的探索。

自抗日战争后中断的实验语音学研究到50年代开始恢复。70年代以后,由于电子计算机以及其他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实验语音学的内容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已经超越传统语音学的范围,成为一门多科性的学问。利用现代仪器设备研究汉语语音已成为中国一个新的科学

领域,语音学家、声学家、心理学家和通信工程师都开始从各个不同角度对汉语语音进行实验研究,在普通话元音和辅音以及声调、轻重音、语调等方面都已初步取得可喜的研究成果,并在国际上进行了频繁的学术交流。一些高等院校也开始建立语音实验室,培养这方面的人才。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利用电子计算机人工合成语音,近几年取得很大进展,已逐步接近于国际水平,为今后人工合成语言打下了基础。

参考书目

- 赵元任:《语言问题》,新版,商务印书馆,北京,1980。
王力:《汉语语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5。
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山西人民出版社,太原,1981。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新版,商务印书馆,北京,1980。
李荣:《切韵音系》,科学出版社,北京,1952。
杨耐思:《中原音韵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1。
周殿福、吴宗济:《普通话发音图谱》,商务印书馆,北京,1963。
林焘、王理嘉等:《北京语音实验录》,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1985。

(林 焘)

Hanyu yuyin lilie xitong

汉语语音理解系统 (oral Chinese understanding systems) 指人和计算机之间用汉语口语语音对话的系统。汉语连续语音理解的研究目前尚无具体成果,但汉语单词和简单口令的语音识别取得了不少进展,有的系统已投入应用。语音合成方面也建成了一些系统。

汉语语音识别 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研究,做出汉语单元音的识别装置;60年代对汉语清晰度进行系统试验,取得了基础数据;70年代末、80年代初用模式匹配法事先存入发音人的语音样板,计算机可识别几十条口令,内容包括数字、算数四则运算符号以及少数操作命令,实现了单呼语音识别。

1980年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用模式匹配法使计算机能识别中国十几个大城市的地名。口呼地名语音输入,屏幕显示汉字;同时可用口语查询清华大学内部电话号码;在此基础上,于1984年建成“8000台电话声控查号系统”,已交付使用。用户查询电话,由话务员对计算机复述单位名称,屏幕上即显示号码,并通过语音合成将号码自动报给用户。方法是:各个话务员事先口呼各单位名称,贮存在软盘上作为样板,话务员上班时换上自己的软盘。用户查号时,由话务员将待查单位名称及所属地区、部门等口呼输入。例如用户查清华大学电话号码,话务员需口呼“海淀区”、“高校”、“清华大学”三个名称,屏幕上即显示汉语拼音 Hai Dian Qu, Gao Xiao, Qing Hua Da Xue, 282451。话务员检查无误,按“报号”键,系统即自动将号码报给用户;并设有“改正”、“清除”、“列表”等功能键以避免错误,可保证报给用户的号码准确无误。与此同时,建成“连续数字语音识别系统”,只需贮存0~9个数字的语音样板,即可识别连续数字。三位数的识别率为90%。

这方面的研究,目前还停留在模式匹配的语音识别

上,需要进一步探索汉语连续语流的语音理解。(见自然语言语音理解系统)

语音合成 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于1983年在瑞典与瑞典皇家工学院语言通信和音乐声学系合作,建成“汉语文语转换系统”。分析了语音频谱,建立了语音区别特征,编写了语音规则和音系规则(包括轻声和儿化)。文本用汉语拼音(主要元音后加特定调号)键盘输入或光电阅读输入,计算机即可用合成语音读出;并能根据句型调整语调,也可在句中任何单词上加着重点据以重读。采用字素-音位转换,合成语音的词汇量无限,能根据输入文本朗读故事。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于1984年建成“无限词汇汉语语音合成系统”。将元音、辅音和过渡音的压缩波形参数存入机内,使用时键盘输入汉语拼音(加四声),计算机即可调出相应的参数,得出近似的语音波形合成语音输出。能读出所有的汉语音节,也可读出句子。

目前合成语音的自然度尚不够理想。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近年从声学语音学和发音语音学两方面入手研究汉语语音特征,包括辅音过渡、滑音、连续变调、轻重音、节拍等,以提高合成语音的自然度,在单元音和复合元音的合成方面已取得一定成效。

参考书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音研究室:《实验语音学知识讲话》,连载《中国语文》,1979,第1、2、4、5、6期。

(范继淹 徐志敏)

Han-Zang ciyin bijiao

汉藏词音比较 (Sino-Tibetan word comparison) 利用汉语和藏语同源词或古借词推求语音对应,考证上古汉语语音系统,是汉语音韵学一个边缘分支学科。从汉语藏语古文献的常用词可以发现,藏语汉语很多意义相近的词读音也相近,如果承认汉藏同源,或者只承认古汉藏语里有大量借词,都能利用这批材料研究汉语古音。例如汉语“孔”字和藏语的[k'uŋ]都是常用词,都有相当于现在北京话“窟窿”的用法,它们应当是同源词,或是上古的借词,可以推测汉语的“孔”字上古读音类似[k'uŋ]。

汉语古文献早到两周金文(甲骨文系属未敢肯定,暂缺),藏语古文献不早于初唐,要晚近得多,可是并不妨碍比较。正象梵语文献早到公元前4世纪,古日尔曼系语文献最早到4世纪,相差也有近千年,印欧历史比较语言学学者也能利用它们之间的语音对应规律,推测古印欧语语音系统。

汉藏词音比较的前提是汉语藏语同源说,20世纪初就有一批欧洲学者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如德国A.康拉德(1864~1925)和德国B.劳佛(1874~1934),他们在很广的范围探求汉台藏缅语同源。30年代王静如继续这种研究,用数目字一至十和人称代词我、吾、女的汉语、藏语词音对比证明汉藏同源。例如,“二”的汉语古音是[ni],藏语古音是gñis,“三”的汉语古音是[sam],藏语

古音是 gsum。英国 W. 西门华德也作过一定的研究，例如他举证的“目”(眼)汉语古音[mjuk]，藏语古音 mig，“鱼”汉语古音[ŋa]，藏语古音 na，就比较有力。

20 世纪 40 年代进入了利用汉藏同源语法成分考证古汉语语音的阶段，俞敏的《汉语的“其”和藏语的“gji”》就是一例。他研究了藏语 gji 的 5 种形式(gji, gi, kji, ji, i)汉语其字的 3 种用法(“配天其泽”，“彼其之子”，“子曰何其”)用其字和 gji 的比较表明了他作汉藏词音比较的方法。他鉴于传统的汉语音韵学研究韵部的成绩比声纽好，只对韵部音值作了比较研究，但是规模比较大，所得成果一部分以《汉藏韵轨》(即韵的语音对应规律)的题目附在《汉语的“其”和藏语的“gji”》后面(见表)。

汉藏韵轨(摘要)

汉语古韵部	藏 字	词 义	汉 字
东	abups	生、出、碰上	逢
	hraj	胡同	巷
冬	dom	熊	熊
覃甲	sgrim	抓住	禽
	brtsem	针	针
覃乙	btsums	簪子	簪
	adoms	八尺、一拓	寻
添	rams	蓝	蓝
唐	rmoŋ	看不见	盲
	kjaŋ	又	更
青	rkaŋ	干、本、大腿	茎胫
	miŋ	名字	名
	k'eŋs	骄傲	轻
先	bjin	腿、肚子	骸
	bkren	穷、饿、可怜	谨、廛
痕	kun	全	混
	lon	信、新闻	论
	ben	水罐	盆
	dɣul	银	银
	sel	打扫	洒
寒	klaŋ	检查、责备	拣、冻
	jon	钱	媛
锡	bkag	隔开	隔
	kjig	坯、砖坯	塹
灰	si	死	死
	me	火	焜
	ap'ir	飞	飞
	ts'er	回、遍	次
	bkur	敬重	贵
	or	漩涡	回
	k'ol	一小块	块
	gñis	二	二
	hkres	饿	饥

续表

汉语古韵部	藏 字	词 义	汉 字
没	stud	重说	述
	rkod	掘	掘
屑	skid	好	吉
	p'jed	分、一半儿	匹
曷	k'ad	个	介、个
	bgod	切开	割
估	babs	形式	法
合甲	adzib	汁	汁
	bslebs	来到	泄、蔽
合乙	nub	西边儿	入
	kob	全份儿	合
哈	rdzi	管理人、牧人	司
德	rig	力量、阶级	力
模	lga	五	五
	jar	夏天	夏
铎	log	回来	落
侯	tso	主儿	主
	dbu	头	头
屋	kuk	角、弯	角
萧	dgu	九	九
	glu	龙	虯
萧入	dug	毒	毒

俞敏采用黄侃 28 部部目，求得了除登歌齐豪沃 5 部外 23 部的音值。

这里每类音只举一个例，实际例字多得多。比如 -im 类字就可以再加 khriims(法律)=钦、坎；gnim(剪子)=钻；grim(急)=今(迫其今兮)；adzim(泥塘)=浸；stim(吸水)=渗；thim(沉)=沉；zim(好吃)=甚；gzim(睡)=寝；rim(行列)=林。

1973 年，加拿大汉学家 E. G. 蒲立本在《关于汉语词族的几个新假说》中，从《汉书》用“都赖”对中亚 Talas 河证明汉语去声有齿擦音韵尾，又利用藏语 agebs-pa(盖)，完成体 bkab 和古汉语“盖”、“盍”同源关系论证古汉语有 -s 收尾音。

1977 年美国汉学家包拟古写了《原始汉语和汉藏母语》，从添前字(不独立成音节的词头)、声母、介音、尾音各方面来探讨，有些是很成功的。比如引 chepang 语中的“hme”和古汉语火、焜(还可以补上“煨”)比较，试建 *hm-复声母就很有说服力。因为不看古文献，只查二手字书，有些努力是失败的，比如给“庠”字下的注释全是“祥”的意思，就是一例。

汉藏词音比较还是在萌芽阶段，在理论和实践上都

有须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声纽的清浊对应没规律,数目字“九”汉语里属清音见纽,声纽古音读k,在藏语里是dgu, g是浊音,这类现象还没有一种合乎实际的解释。目前用来比较的常用词数量也不够多,材料还需要大量开掘。研究汉藏同源词的语音对应,拿藏语语音推测古汉语语音的结果,利用活语言材料,是这个边缘学科的优越性。

(刘广和)

Han-Zang duiyin

汉藏对音 (Sino-Tibetan transliteration)

汉译藏音或藏译汉音的总称。它是研究古代汉语语音的一项文献材料。敦煌石室所藏千字文残卷,汉字左侧注着藏译汉音,如车驾肥轻: kigabikhye。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唐蕃会盟碑,有唐朝官名、人名的藏译汉音,如太中大夫: thai cuñ da'i phu; 也有吐蕃人名的汉译藏音,如 zañ khri btsan; 尚绮立赞。可以凭借这一类材料里的藏音来推测当时的汉字读音。

早在19世纪末,国外就已经有人注意到唐蕃会盟碑上的汉藏对音材料了。20世纪初,法国学者马伯乐(1883~1945)、伯希和(1878~1945)和日本学者羽田亨等人,用敦煌写本和唐蕃会盟碑的汉藏对音材料进行了初步研究。

20世纪30年代初,罗常培发表《唐五代西北方音》。这本书是利用汉藏对音材料研究中国古代西北方言音系的第一部专著。

《唐五代西北方音》集中了6种材料,其中5种是敦煌千佛洞所藏佛经写本和识字课本:①藏文译音阿弥陀经残卷;②藏文译音金刚经残卷;③汉藏对音千字文残卷;④汉藏对音大乘中宗见解残卷;⑤注音本开蒙要训。另外一种为拉萨唐蕃会盟碑拓本。前4种材料根据发现地点和写本字体可以推定为唐五代写本,反映了当时在西北流行的一部分方音。第5种汉字注音只供作旁证。唐蕃会盟碑有纪年,能够据以考证前4种汉藏对音材料的时代顺序。

《唐五代西北方音》在研究方法上受了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所著《中国音韵学研究》的影响,把《切韵》作为研究唐五代西北方音的出发点。用现代西北方音作比较来探讨方音流变。参照其他译音材料和现代汉语方言,结合音理分析,识别并解释了两种语言对音难免的音近代替现象。例如,明、泥二纽在《切韵》里读m、n,在4种汉藏对音材料里,一般都分化为两类读音:鼻韵之前读m、n,例如孟 meñ, 南 nam; 非鼻韵之前读'b、'd, 例如目'bug、泥'de。本书参照现代山西、厦门方音,提出'b、'd读如山西文水、兴县方音的[mb]、[nd], 浊塞音前面有同部位的鼻音。又参照现代藏语口语里的“^h” (藏文^h的对音符号)作联词第2个字的前缀音时,常常使第一个音节的末尾音素变成鼻音,例如, mi'dug > 现代 mindu, dge-'dun > 现代 gen-dün, 这就说明'b、'd的“^h”本来带有轻微鼻音,遇到鼻韵就更易恢复m、n的本音,读[mb]、[nd]。这样

就对这一系方音声母系统的一个重要特点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又如,《切韵》里江宕梗曾通5摄各韵收[-ŋ]尾,[-ŋ]尾在《千字文》里对音按照一定的条理演变,东冬钟江登蒸6韵保存,唐阳庚清4韵大部分消失,青韵全部消失。但是,其他3种材料(《阿弥陀经》、《金刚经》、《大乘中宗见解》)的对音,除去庚清青3韵有个别的消失,各韵都保存着[-ŋ]尾。[-ŋ]尾究竟是完全消失了,还是个别地方消变了呢?本书分析了前人的研究结论,参照古代中亚粟特语借字[-ŋ]尾消失,维吾尔语借字[-ŋ]尾有的消失有的保存这种现象,判断出[-ŋ]尾没有完全消失。提出'b、'd等声母在鼻韵前面保持m、n本读,正是[-ŋ]尾没有完全消失的证据。《方音》参照赵元任在《南京音系》里的拟测,认为唐代[-ŋ]尾消变为不很稳定的鼻擦音[ɣ]、没受过语音训练的人很难辨别,所以吐蕃人听得过了头就记成[-ŋ],听得不及就记为无[-ŋ]尾。这样就对几种对音材料里的错综复杂现象作出了比较合乎情理的说明。

本书指出唐五代西北方音一系列重要特点。声母方面:轻重唇音有分化的痕迹;明泥2纽在鼻韵前面读m、n,其余的变成'b、'd,疑纽一律读'g,舌上音混入正齿音;正齿音二三等不分;唐代全浊声母开始清化;y化声母不限于三等,四等也有。韵母方面:宕梗二摄[-ŋ]尾一部分开始消变;鱼韵字大部分变入止摄,念[-i];通摄一、三等元音不同;入声的舌收声大部分读r;入声韵尾的消变过程是上古的[-p, -t, -k]→中古[-b, -d(-r), -g] > [-β, -ð(-r), -ɣ]→官话、西北方言的失去收音音。

本书利用汉藏对音材料,在跟《切韵》和现代西北方音的比较当中研究唐五代西北方音,不仅作了历史方言的断代描写,也勾勒了这一系方音历史发展的概貌。但是,作者没有沙州、敦煌一带的嫡系现代方言材料,就参证了兰州、西安、文水等地的方音,这自然会影响到某些结论的准确性。由于材料零散,汉藏对音的研究后来没有重要的进展。

参考书目

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科学出版社,北京,1961。

(刘广和)

Han-Zang yuxi

汉藏语系 (Sino-Tibetan family) 用汉语和藏语的名称概括与其有亲属关系的语言群。这两种语言文献最丰富,使用人口也较多。“汉藏语系”为通用的名称,有的著作中也曾用过“藏汉语系”和“印支语系”。

分类与分布 汉藏语系的语种及分类历来说法不一,比较通行的有两种分类法。一种是分为汉语、藏缅语族、苗瑶语族、壮侗语族(或称侗台语族、侗泰语族、台语族等)。最早提出这一分类法的是李方桂。他在《中国的语言与方言》(1937)中提出汉藏语系分汉语、侗台语族、苗瑶语族、藏缅语族,在1973年发表的同名论文中仍坚持这个分类法。中国学者罗常培、傅懋勳在《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概况》(1954)中提出的汉藏语系分类表,与李方桂的分类法大致相同。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

学者大都采用罗、傅二人的分类法,认为壮侗语族、苗瑶语族同汉语、藏缅语族不仅在现状上有许多共同的特点,而且存在发生学上的关系,应属同一语系。另一种分类法以美国学者白保罗为代表。他在《汉藏语概要》(1972)一书中,把汉藏语系分为汉语和藏-克伦语两大类,又在藏-克伦语下面分藏缅语和克伦语两类。他认为苗瑶语、壮侗语同汉语不存在发生学上的关系,其相同或相似之处或来自相互借用,或来自类型学上的一致。他还认为苗瑶语和壮侗语在发生学上同印尼语有密切关系,应属同一语系,称澳泰语系。并举出一些壮侗语同汉语不同源但同印尼语同源的词,以此证明其论点。早在1942年,白保罗在《台语,加岱语和印度尼西亚语:东南亚的一种新联盟》一文中就已提出台语同印尼语的亲属关系。后来他的观点又进一步发展,于1965年提出了建立澳泰语系的主张。以上两种不同分类法分歧的焦点在于:苗瑶语、壮侗语同汉语之间相同或相似之处是发生学上的同源关系,还是类型学上的一致或是借用关系。

我们采用上述第一种分类法,即苗瑶语、壮侗语属汉藏语系。按这种分类法,汉藏语系的分布地区主要在中国、泰国、缅甸、不丹、锡金、尼泊尔、印度、孟加拉、越南、老挝、柬埔寨等亚洲各地,此外,在世界其他各地也还有不少汉藏语系语言的使用者。以汉藏语系中的某一语言为国语或主要语言的国家,有中国(汉语)、泰国(泰语)、缅甸(缅甸语)、不丹(宗卡不丹语)、老挝(老挝语)等。由于汉藏语系语言和方言的界限不易划清,对语言数目也有各种不同的估计。美国学者R. 谢飞认为大约有300种语言和方言,日本学者西田龙雄估计约有400种语言和方言。使用人口在10亿以上,约占世界人口的1/4,仅少于印欧语系。

中国是使用汉藏语系语言的人口最多,语种也最多的国家。到目前为止,已确定的语言有30多种,分属不同的语族、语支。其中汉语分布遍及全国各地,下分官话、吴、湘、赣、客家、粤、闽等7大方言。藏缅语族分布在西南、西北和中南地区。苗瑶语族分布在中南、西南和东南地区;壮侗语族分布在中南、西南地区。现以罗常培、傅懋勳的分类法为基础,结合近年来的调查研究成果,将中国境内的汉藏语系语言分类列表如右上:

有些语言的分类问题,目前还存在不同意见。如:有人认为应立羌语支,包括羌语、普米语、嘉戎语等;有人则认为这些语言应属藏语支。过去许多人认为白语应属彝语支,而后来有人又认为应分属另一语支。有人认为独龙语应属景颇语支,怒语应属彝语支。对畲语的系属也有两种意见:一些人认为属苗语支,另一些人认为属瑶语支。仡佬语的系属,中国学者一般认为应属壮侗语族,国外有的学者认为应属澳泰语系。在藏缅、苗瑶、壮侗3个语族中,藏缅语族悬而未决的问题最多,反映出这一语族分类上的复杂性。此外,京族语言的系属尚有争论:有人认为属汉藏语系,而有人认为属南亚语系。

由于社会和语言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因素,在语言和

汉藏 语系	汉语	藏语支:藏语、嘉戎语、门巴语
		景颇语支:景颇语
	藏 缅 语 族	彝语支:彝语、傈僳语、哈尼语、拉祜语、纳西语、基诺语
		缅语支:载瓦语、阿昌语
		语支未定:路巴语、僜语、独龙语、怒语、土家语、白语、羌语、普米语
	苗 瑶 语 族	苗语支:苗语、布努语
		瑶语支:勉语
		语支待定:畲语
	壮 侗 语 族	壮傣语支:壮语、布依语、傣语
		侗水语支:侗语、水语、仡佬语、毛南语、拉珈语
		黎语支:黎语
		仡佬语支:仡佬语

民族的关系上出现许多复杂的情况。多数情况是一个民族使用一种语言,但也有一个民族使用两种或3种语言的。如瑶族使用3种语言:瑶语支的勉语,苗语支的布努语和壮侗语族侗水语支的拉珈语。景颇族使用两种分属不同语支的语言:景颇语支的景颇语和缅语支的载瓦语。藏族除使用藏语外,有一部分使用嘉戎语,等等。还有一种特殊现象:居住在海南岛的苗族,不说苗语而说瑶语。

除了以上已确定的30多种语言外,还有一些“话”是不是独立的语言有待进一步确定。如佯僮话、村话、临高话、木雅话、尔苏话、尔龚话等。随着汉藏语系语言调查的深入,今后还有可能发现一些新的语言。

语言特征 由于汉藏语系语言的历史比较尚未全面、深入进行,因而对其特点的认识主要在现状方面。通过语言比较可以看出,不同语言间不仅在现状上有许多共同的特点,而且还存在许多共同的发展规律。

语音 每个音节有固定的声调是汉藏语系语言在语音上的重要特点。声调能区别词汇意义。如汉语的 xan^{35} (寒), xan^{51} (汉)。在有些语言里,声调还能区别语法意义。如彝语凉山话的单数人称代词用声调表示格的差别: ηa^{33} (我,主格)—— ηa^{55} (我,属格)—— ηa^{31} (我,宾格)。水语用声调区别词类,如 $kəm^{55}$ (锅盖,名词)—— $kəm^{35}$ (盖,动词)。声调同声母、韵母的关系很密切。三者在发展过程中互相影响、互为条件。声调因声母清浊而分阴阳,这一规律在整个语系中具有普遍性。从中古汉语到现代各方言的四声,普遍经历了分阴阳的过程。例如,古四声在温州话和潮州话里都分阴阳两类,共有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阴入、阳入等8个调。壮侗语族的声调一般也依四声八类的系统发展,数目都在8个上下。例如壮语武鸣话有6个舒声调、2个促声调,与汉语的四声各分阴阳的8个调相当。苗瑶语族也存在这种分化。古苗瑶语有4个调,后来由于声母的清浊各分阴阳。如苗语凯里话的声调就是由古四声分化为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阴入、阳入等8个调。藏缅语族的许多语言也有因清浊分声调的现象,清浊对立

造成声调的分化,往往是清声母使声调变高,浊声母使声调变低。如藏语拉萨话分高低两类调,其分化与清浊声母有关,高调来源于清声母,低调来源于浊声母。壮语武鸣话中平、上、去、入的阴调类调值是 24、55、35、55(35 为长元音),阳调类调值是 31、42、33、33,也是阴类高,阳类低。此外,声母的送气与不送气、单辅音与复辅音的声母、元音的长短、元音的松紧、韵尾的有无等特点,也能影响声调的变化。许多语言的声调,因韵母是否带塞音韵尾而分舒促,舒声调一般都比促声调多。如壮侗语族和苗瑶语族通常有 5~6 个舒声调,但促声调则以两个为多,有些地方还因元音长短而分为 4 个。总的看来,汉藏语系语言的声调发展不平衡。从调值来看,数量上最少的只有两个(如普米语),最多的有 12 个(如苗语宗地话)。汉语方言有 3~10 个,苗瑶语族有 4~12 个,壮侗语族有 6~10 个。相对说来,藏缅语族的声调最少,有 2~4 个,还有的语言或方言没有声调(如路巴语和藏语安多方言)。汉语、壮侗语族、苗瑶语族之间声调的特点比较接近,都是四声八类系统,声调对应关系也比较明显。

汉藏语系许多语言的元音分长短,以壮侗语族为最普遍。汉语的粤方言,苗瑶语族的勉语、藏缅语族的藏语、路巴语、独龙语等也有这种对立。汉语、壮侗语族、苗瑶语族长短元音的对立大多出现在带韵尾的主要元音上。例如广州话的 kai⁵⁵(鸡)和 ka:i⁵⁵(街),水语的 tap⁵⁵(肝)和 ta:p⁵⁵(挑),勉语大坪江话的 nau²³¹(舅父)和 na:u²³¹(老鼠)。就多数语言情况而言,主要元音是长的,韵尾则短,主要元音是短的,韵尾则相对地略长。所以,就整个音节来说,长元音韵母和短元音韵母的音节长短大致相等。元音单独作韵母时,长短不对立,一般念长音。藏缅语族不带韵尾的单元音韵母也分长短,长元音韵母和短元音韵母的长短不同。如塔巴语米林话的 oŋo(五)和 oŋo(鱼)。在长短元音的分布上,有的语言配对整齐。如黎语保定话有 a、e、i、o、u、u 6 个元音,带韵尾时各分长短。而有的语言长短的对立只出现在个别元音上。如水语三洞话有 i、e、a、o、u、ə、17 个元音,单独作韵母时只有长音,带韵尾时只有元音 a 分长短,其余都读长音。长短往往影响其他语音特征的变化。一种是长短往往伴随元音舌位上的某些差别:长元音比短元音舌位低的如勉语兴安话的 a:,实际音值为[A:],a 为[ə],lai³¹(箩筐)读[lai³¹],lai³¹(菜)读[lai³¹] (广州话“街”、“鸡”二词中主要元音的实际音值也是这种情况)。长元音比短元音舌位高的如壮语隆安话的 u:,实际音值为[u:],u 为[ɔ],tsu:n³⁵(锥)读[tsu:n³⁵],kun²²(裙)读[kon²²]。其次,长元音往往还带有元音性的过渡音,其舌位一般比主要元音低。如黎语黑土话的 o: 都带过渡音 ə, o:m 读 [o:əm]。广东中山话的 o: 也带过渡音 ə, o:t 读 [o:ət]。另一种更普遍的现象是元音的长短影响声调。如布依语兴义话的第 7 调,长元音韵调值是 13,短元音韵调值是 35。例如:za:p¹³(挑)和 zap³⁵(小猪笼)。壮语广南话的入声有 4 个调,是长短对立消失后分化而成的。汉语广州话的入声

分阴入、中入、阳入 3 类;中入从阴入中分化而出,条件是元音的长短:中入是长元音,阴入是短元音。从发展上看,大多数语言的长短对立有逐渐消失的趋势,所以在有些语言里长短的配对已不整齐。如侗语北部方言的元音长短对立已消失,只有一个短元音 ə;南部方言的一些短元音韵已合并于长元音韵,长元音韵比短元音韵多。

许多语言的声母有清浊对立,并存在共同的发展趋势。如汉语的吴方言,壮侗语族的壮语、水语、毛南语、黎语,苗瑶语族的勉语,藏缅语族的嘉戎语、彝语、哈尼语、傈僳语、拉祜语等。在多数语言里,清浊对立主要出现在塞音、塞擦音、擦音上。塞音、塞擦音的清浊对立大多只出现在不送气音上。有些语言,如苗语、缅甸语、彝语、阿昌语、勉语、拉祜语等的鼻音、边音(或其中一个)也分清浊。如阿昌语陇川话的 mu²⁵⁵(泼)和 mu²⁵⁵(弄泼),ɬ³¹(豹子)和 ɬ³¹(裤子)。此外,有些语言除了纯浊音声母(如 b、d、g 等)外,还有一套带鼻冠音的浊声母(如 mb、nd、ŋg 等)。如纳西语的 be⁵⁵(鸡冠)和 mbe³³(雪),dy³¹(地)和 ndy³³(慢)。水语的两套浊声母是带鼻冠音的浊声母同带喉塞音的浊声母的对立,如 mba³³(靠拢)和 ʔba³³(蝴蝶),水语的鼻音有 3 套:浊鼻音、清鼻音、带喉塞音的鼻音。如 ma³¹(舌头)、ŋa²⁴(狗)、ʔma²⁴(青菜)。声母的清浊同声调的关系最密切,同送气不送气、元音的松紧等还有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清浊由对立到不对立,是汉藏语系语言共同的发展趋势。就塞音、塞擦音、擦音而言,一般是浊音清化;就鼻音、边音而言,一般是清音浊化。清浊对立往往引起声调的分化。

汉藏语系语言的辅音韵尾常见的有 -m、-n、-ŋ、-p、-t、-k、-ʔ 等 7 个(发音只有成阻,无除阻)。有个别的语言还有 -r、-l、-s 等延续音韵尾。如门巴语(错那)的 sar(东)、nis(七),门巴语(墨脱)的 ŋul(银)。个别的语言或方言还有复辅音韵尾。如羌语麻窝话有 -st、-zd、-rb、-ɛp、-xs、-yl、-ɛz 等 22 个复辅音韵尾。韵尾的发展很不平衡,但存在从繁到简的趋势。一般是:塞音韵尾由部分合并(如 p 并于 t)和转化(如 k 变为 ʔ)到全部转化为 -ʔ,然后 -ʔ 又脱落;鼻音韵尾与塞音韵尾发音部位相同的,往往平行发展(如 p 并于 t 则 m 并于 n),然后转化为元音的鼻化,直至鼻化成分进一步消失。中古汉语有 -p、-t、-k、-m、-n、-ŋ 等韵尾,到了现代方言,有的全部保留(如粤方言),有的局部消失了(如吴方言)。藏语的发展也经历过这个过程。7 世纪的藏语有 -b、-d、-g、-m、-n、-ŋ 等韵尾,到了现代方言,有的地方完全保留下来,如阿力克话仍有 -p、-t、-k、-m、-n、-ŋ 等韵尾,有的地方已丢失了一部分,如拉萨话保留了 -m、-p、-ʔ 3 个韵尾,-t 转化为 -ʔ,-n、-ŋ 转化为元音的鼻化。有的地方塞音韵尾都转化为 -ʔ,鼻音韵尾都转化为元音的鼻化,如德格话。缅甸语也经历了多种塞音韵尾转化为 -ʔ、多种鼻音韵尾转化为元音鼻化的过程。彝语支语言的大多数地区,辅音韵尾和鼻音韵尾都已消失。苗瑶语族也存在韵尾简化、脱落的趋势。如中国境内的苗语一般已无塞音韵尾,鼻音韵尾也

只保留了一个(在后元音后读 -ŋ, 在前元音后读 -n)。在苗语石门坎话里, 韵尾已全部脱落。

汉藏语系一部分语言还保留有复辅音声母。复辅音以二合的为多, 还有少量三合的。二合复辅音主要有 4 种类型: ①鼻音加其他辅音(前后辅音的发音部位大多数相同)。如彝语凉山话的 mby³³(饱), 纳西语的 ndo³³[上(去)], 苗语高坡话的 nto¹⁵(布)。②喉塞音加其他辅音。如拉珈语的 ?ba:n¹³(村子), 水语三洞话的 ?na³³(脸), 布依语佯僂话的 ?va³¹(傻)。③塞音(或鼻音)加边音(或颤音, 或浊擦音)。如壮语贵县话的 prak⁵⁵(菜), mra¹³(野果), 苗语高坡话的 pla²⁴(五), 独龙语的 gla⁵⁵(掉), 佤佬语的 pya⁴²(山)。④擦音加其他辅音。如羌语桃坪话的 xte⁵⁵(蛋), 羌语麻窝话的 ste(七), 藏语道孚话的 zgo(门), 藏语阿力克话的 ylo(肺)。三合复辅音如拉珈语的 ?bla²¹³(摸)、佤语格曼话的 ŋkhlog³⁵(翅膀)、嘉戎语的 jkra(细筛子)。复辅音以藏缅语族语言为最丰富, 有上述①、③、④ 3 种类型; 其次是苗瑶语族, 有上述①、②、③ 3 种类型; 壮侗语族只有上述②、③两种类型。其发展有简化、脱落的趋势。以藏语为例, 7 世纪的藏语有丰富的复辅音, 不仅有二合的, 还有三合、四合的, 但发展到现在, 有的方言(如安多方言)还保存较多的复辅音(最多的有 90 个左右), 有的方言(如卫藏方言)很多地方已无复辅音。其变化主要有两种形式: 一是脱落部分辅音, 如藏文的 dgu(九), bsad(杀), 拉萨话读[ku¹²], [se²⁵⁴], 一是复辅音合并为单辅音, 如藏文的 gru(船)、drug(六), 拉萨话读[ʃhu¹²], [ʃhu²¹²]。现代汉语除个别地区外, 大都无复辅音。一些学者认为, 上古汉语有丰富的复辅音。

藏缅语族有些语言, 如彝语、哈尼语、傈僳语、拉祜语、白语、景颇语、载瓦语等, 元音分松紧两类。其作用主要是区别词汇意义, 有些语言还能区别语法意义。如载瓦语: kjo²¹(听)—kjo²¹(使听), mju²¹(浮)—mju²¹(使浮)。松紧的差别常常还伴随着声调、舌位等方面的一些差别。如紧元音音节的调值比松元音音节略高, 紧元音的舌位比松元音略低。有的紧元音后还带有喉塞音。松紧对立的来源, 一种是由于塞音韵尾的脱落, 即带塞音韵尾的元音, 韵尾脱落后转为紧元音, 与原来不带韵尾的松元音形成对立, 如彝语支诸语言。一种是由声母的清浊转化而成, 浊变松, 清变紧, 如景颇语、载瓦语。有的语言, 紧元音存在松化的趋势, 如哈尼语的碧卡方言、豪白方言。

语法 汉藏语系各语言以词序和虚词为表达语法意义的重要手段。词序比较固定。虚词种类较多, 在句中表示各种不同的语法意义。各语言都有一些形态变化, 包括语音交替(辅音、元音、声调等), 增添附加成分(前加、中加、后加), 重叠等各种语法手段。但除藏缅语族外, 形态均不丰富。藏缅语族有些语言, 使用大量的附加成分表示各种语法意义(如嘉戎语)。除形态变化较多的一些语言外, 大多数语言划分词类的标准主要不是根据

形态变化, 而是根据词的结合规则和词在句中的功能并参考词义。词序是汉藏语言表达语法意义的重要手段。各语言的基本词序有共同点, 主语都在谓语前。但也有差异, 宾语的位置存在不同的类型。汉语、苗瑶语族语言、壮侗语族语言是“主语+谓语+宾语”, 而藏缅语族语言是“主语+宾语+谓语”。以“他煮饭”为例:

藏语(拉萨话): khə²⁵⁴(他)kha⁵⁴la²⁵⁴(饭)so¹²ki²⁵⁴(煮)

景颇语(盈江话): ji³³(他)jat³¹(饭)jä³¹tu³³(煮)ŋa³¹(在)ai³³(句尾词)

哈尼语(绿春话): a³¹zo³¹(他)xo³¹(饭)ṭa³¹(煮)

苗语(黔东话): nen⁵⁵(他)ho⁴⁴(煮)ka⁵⁵(饭)

勉语(来宾话): nin³¹(他)ṭou⁵³(煮)ŋa:ŋ³⁵(饭)

壮语(武鸣话): te²⁴(他)ɬau⁵⁵(煮)hau⁴²(饭)

侗语(榕江话): ma:o³³(他)tuŋ⁵⁵(煮)ou³¹(饭)

名词作定语时, 汉语、藏缅语族语言、苗瑶语族语言是“名词定语+名词中心语”, 而壮侗语族语言是“名词中心语+名词定语”。以“弟弟的裤子”为例:

藏语: pi⁵⁵ca²⁵⁴o²¹²ma²⁵⁴phyi¹²(弟弟)ki(的)khu¹²thun⁵⁵(裤子)

景颇语: kā³¹nau³³(弟弟)a²³¹(的)lā³¹pu³¹(裤子)

哈尼语: a³¹ŋi⁵⁵(弟弟)ɣ³³(的)la³¹ṭhe³¹(裤子)

苗语: te¹¹(个)u⁴⁴(弟弟)le³³(条)qha⁴⁴(裤子)

勉语: jou²³¹(弟弟)nei³³(的)hou³⁵(裤子)

壮语: va³⁵(裤子)tak⁴²(个)nu:ŋ⁴²(弟弟)

侗语: so⁵³(裤子)non³¹(弟弟)

形容词作定语时, 汉语是“形容词定语+名词中心语”, 而藏缅、壮侗、苗瑶等语族的语言一般是“名词中心语+形容词定语”(勉语有少数形容词定语在名词中心语前)以“新衣服”为例:

藏语: thuk¹²lo²⁵⁴(衣服)sa⁵⁵pa⁵⁵(新)

景颇语: pā³³lon³³(衣服)n³¹nan³³(新)

哈尼语: phe⁵⁵xo³¹(衣服)phe⁵⁵(重叠成分)sl³¹(新)

苗语: u³⁵(衣服)xhi³³(新)

勉语: sjaŋ³³(新)lu:i³³(衣服)

壮语: pu³³(衣服)mo³⁵(新)

侗语: uk²³(衣服)mei⁴⁵³(新)

数词或数量词作定语时, 汉语、苗瑶语族语言是“数量词组定语+名词中心语”, 藏缅语族语言是“名词中心语+数词(或数量词)定语”, 壮侗语族语言的数词定语有的在名词中心语之前, 也有在其后。以“一只鸡”为例:

藏语: ṭha¹²te⁵⁵(鸡)ṭi²⁵⁴(一)

景颇语: a³¹u³¹(鸡)lā⁵⁵ŋai⁵¹(一)

哈尼语: a³¹xa³³(鸡)ṭhi³¹(一)mo⁵⁵(只)

苗语: i³³(一)te¹¹(只)qei³³(鸡)

勉语: jet¹²(一)no:m³³(只)ṭai³³(鸡)

壮语: tu²¹(只)kai³⁵(鸡)deu²⁴(一)

侗语: ʔi⁵⁵(一)tu¹¹(只)ai⁵³(鸡)

汉藏语系语言词类上的一个特点是有量词。除藏缅语族有些语言(如藏语、景颇语等)量词还不太发达外,一般都有丰富的量词。量词的作用主要是表示事物的单位和动作行为的量。此外,许多语言的量词还兼表事物的类别、形状、性别、级别等特征。如阿昌语陇川话有表示事物类别和形状的量词:zu²⁵⁵(个)用于人;tu³¹(头、只)用于动物;seŋ⁵⁵(棵)用于植物;lum³¹(个)用于圆形、块状、方形等物品;ɬau³¹(根)用于长条形硬物;khzəŋ⁵⁵(根)用于长条形软物。壮语武鸣话有表示性别的量词:tak⁴²(个)用于男青少年;koŋ²⁴(个)用于中年男子;ta³³(个)用于青少年女性;me³³(个)用于中年女子。还有通过元音变化来表示级别的:je:p³³表“小撮”,ja:p³³表“大撮”,ye:k⁴²表“小条”,ya:k⁴²表“大条”。在壮侗、苗瑶语族里,量词还具有标志名词的冠词性作用,有些名词在使用时往往要在前面加量词。如苗语黔东话的te¹¹(个)ne⁵⁵(人)意为“人”,le³³(个)te⁵⁵(房子)意为“房子”。在广州话里,量词也可以起冠词作用,例如:“条棍呢?”(那根棍子在哪儿?)从来源上看,量词大多来自名词、动词,如汉语的“碗、口、瓶、桌、背、挑、捆”等。藏缅语族有些语言,名词称量时用其自身形式当量词(双音节词多数取后一音节,少数取前一音节)。如哈尼语绿春话:mja³³(眼睛)ɬhi³¹(一)mja³³(只)意为“一只眼睛”,lɔ⁵⁵ɬɔ⁵⁵(座)ɬhi³¹(一)ɬɔ⁵⁵(座)意为“一座桥”。量词从少到多,从简单到复杂是汉藏语系语言共同的发展趋势。

汉藏语系语言有词的重叠形式,在许多语言里具有共同的特点,表现在重叠的范围、作用、形式等方面。比较普遍的是形容词、量词的重叠。形容词重叠大多表示性质、状态的程度。如阿昌语陇川话的na⁵⁵(红)和na⁵⁵na⁵⁵(红红(的)),lum³¹(圆)和lum³¹lum³¹(圆圆(的)),勉语大坪江话的ŋje⁵²(重)和ŋje⁵²ŋje⁵²(重重(的)),pe¹²(白)和pe¹²pe¹²(白白(的))。通常重叠表示程度的提高,但也有例外,在汉语广州话里可以表示程度的降低(必带词尾-tei³⁵),如pak pak tei(有点儿白的)。量词重叠表示“每”的意思。如壮语武鸣话的pou⁴²(个)和pou⁴²pou⁴²(每个),pai³¹(次)和pai³¹pai³¹(每次)。在许多语言中,名词、代词、动词也能重叠。景颇语重叠名词表示多数,如phun⁵⁵(树)和phun⁵⁵phun⁵⁵(有些树),kă³¹thoŋ³¹(寨子)和kă³¹thoŋ³¹thoŋ³¹(有些寨子)。载瓦语重叠疑问代词表示多数,如o⁵⁵(谁)—o⁵⁵o⁵⁵(哪些(人)),xai²¹(什么)—xai²¹xai²¹(一些什么)。彝语凉山话的人称代词重叠后构成反身代词,如ŋa³³(我)—ŋa⁵⁵ŋa⁵⁵(我自己)。ŋo³¹(我们)—ŋo³¹ŋo⁴⁴(我们自己)。汉语动词重叠表示“做一做”,如“走走”、“打打”、“商量商量”。纳西语动词重叠表示“相互”,如la⁵⁵(打)—la⁵⁵la³³(打架),ɬha⁵⁵(咬)—ɬha⁵⁵ɬha⁵⁵(互相咬)。彝语凉山话动词重叠表示疑问。如la³³(来)—la³³la³³(来吗?),bo³³(去)—bo³³bo³³(去吗?)。

汉藏语系语言广泛运用各种助词来表达复杂的语法意义。首先,各语言有多种表示句子成分结构关系的助

词。其中有表示限制、补充关系的,有指明主语、宾语、主动者、被动者的,有用在表示处所、时间、工具等状语后面的,等等。这类助词使某些语序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如景颇语的形容词定语加助词后能够移至中心语之前,宾语加助词后能移至主语前。例如:kă³¹thoŋ³¹(寨子)kă³¹ɬi³¹(小),“小寨子”也能说kă³¹ɬi³¹(小)ai³³(助词)kă³¹thoŋ³¹(寨子),ŋai³³(我)ɬi³³(他)phe²⁵⁵(助词)mu³¹(见)ju³³(过)să³³ŋai³³(句尾词):“我见过他了”,也能说ɬi³³(他)phe²⁵⁵(助词)ŋai³³(我)mu³¹(见)ju³³(过)să³³ŋai³³(句尾词)。其次,各语言还有一批表示不同句式和语气的助词(语气词),一般都用于句子末尾。例如汉语有“了”、“吗”、“吧”等等。傣语(德宏方言)有hu³⁵(吗)、li³⁵(呢)、po⁵⁵(吧)、lo³³(嘛)、la⁵⁵(啦)等。布努语有ni¹²(吗)、lo²²(啊)、fi²³¹(吧)、ma²¹(嘛)等。

词汇 除藏缅语族有些语言(如嘉戎语、景颇语等)有较多的多音节单纯词外,汉藏语系大多数语言的词主要由单音节的单纯词和多音节的复合词组成。多音节的单纯词很少,其中有些词在语音上有双声、叠韵的现象。如毛南语:təm²³¹təŋ²³¹(螳螂),tuŋ²¹³tin²¹³(蜻蜓),buŋ²¹³ba²⁴(蝴蝶),moŋ²³¹tuŋ⁴²(惊慌)。合成词以复合式为主,派生词较少,复合式一般都有并列、限制、支配、主谓等格式。还有一种特殊的四音格联绵词,其结构主要有AABB、ABAC、ABCD等格式,音节之间还有双声、叠韵的关系。如载瓦语:ɬi⁵⁵ɬi⁵⁵ɬun²¹ɬun²¹(详详细细)、ŋium⁵⁵kji⁵⁵ŋjum⁵⁵kjo⁵⁵(参差不齐)、a²¹sok²¹a²¹pjok²¹(糊里糊涂)、nik⁵³ɬi⁵¹lɛ²¹mji⁵⁵(死心塌地)。中国境内由于使用汉语的人口多,分布广,所以汉语以外的汉藏语系语言都普遍借用汉语词。

参考书目

罗常培、傅懋勳:《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概况》,载《中国语文》,1954,第3期。

马学良、罗季光:《我国汉藏语系语言元音的长短》,载《中国语文》,1962,第5期。

张琨:《苗瑶语声调问题》,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6本,1947。

Fan-Gua Li, *A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Tai, Oceanic, Linguistics Special Publication, No.15, Hawaii, 1977.*

R. Shafer, *Introduction to Sino-Tibetan*, Harrassowitz, Wiesbaden, 1966.

(马学良 戴庆厦)

Hanzi

汉字 (Chinese characters) 汉族人民自古以来一直用以记录汉语、交流思想的工具,是汉族祖先在生产劳动和生活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从出土的远古时代的文物来考查,汉字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新石器时代就早已产生了。汉字是一种音节文字,一个字代表语言里的一个音节。汉语是以单音节语素为主的,所以汉字正适应于记录汉语。每一个字都有一定的音义。在字形的结构上以一半表意、一半表音的形声字为最多,占汉字的80%以上。汉字本身有一定的严谨的结构规律,自有其完整的系统性。在中国几千年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汉字

对团结汉族人民、发展全民族的经济文化、巩固国家的统一、对外传播文化等都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尽管汉语方言比较分歧,可是用汉字写下的书面语言,南北各地的人都能看得懂,虽然古今语音有很大的变化,但是商周的古文和由秦汉传下来的古书现在仍然能读得懂。这不是其他民族的文字所能相比的。

汉字随着汉语的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出现一些新字,文字日益增多,字书所收盈千累万,其中有很多古老的废字和异体字。实际上我们现在经常使用的汉字约在六七千之数,见于古书中流传下来的字也不过一万五千字,所以不用的字就要废除掉。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现名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对异体字和印刷用字都做了精细的整理工作,以便于文字的使用趋向现代规范化,汉字对发展中国的文化事业和进行国际文化交流都将起更大的作用。

汉字的产生 汉字有极悠久的历史,在战国时期曾经传说文字是黄帝史官仓颉所造。一说仓颉是古帝王。这种传说只是传说而已,本不足信。因为文字绝对不是一个人所能独创,而是在社会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需要有文字记事的时候,人们在集体生产劳动过程中经过观察自然的事物,并根据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而创制出来的。然后又一步一步使之完善起来,成为记录语言的工具。汉字有繁富的体系,非经过很长的时间是不能创制成功的。

汉字开始产生的时间,还难以确实断定。今天所能见到的最古的文字是商代刻在甲骨上和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商代的文字已经很发达的文字了,最初产生文字的时代必然远在商代以前,那就是夏代或更早于夏代。距今当在四五千年以上,应当在新石器时代。

商代是奴隶社会时代,已经有宫室城郭,有农业,还有制陶、冶炼等手工业。

商王好占卜,凡是祭祀、征伐、田猎、农事等都要占卜,占卜所用的东西主要是龟腹甲,有时也用牛肩胛骨。占卜的文辞就刻在龟甲兽骨上。商代占卜的甲骨是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在河南安阳西北五里小屯村发现的。这个地方是殷商的旧墟。从1928年以后又经过几次发掘,前后所得甲骨在10万片以上,其中绝大部分是商朝后半期盘庚自奄迁于殷以后的东西,约在公元前13~前11世纪,在甲骨上所刻的文字我们称之为甲骨文。甲骨文字的发现使我们对于汉字产生的最初情况有了明确的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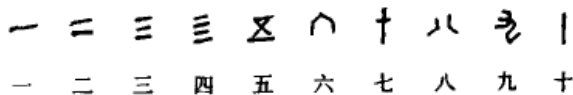
甲骨刻辞大部分是贞问之辞,也有一部分是记事的。现在能认识的字有2000多个,还有些字我们还不认识。从已经认识的字来看,很明显汉字是从图画发展而来的。由图画而变为笔画简单的文字,再由笔画简单的文字进一步创制大量的新的文字。

甲骨文已经很发达的文字了。但在甲骨文里图画式的文字还很多。凡是实物有形可画的大都用图形来表示。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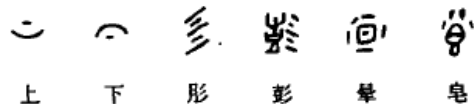


以上这些字所表示的都是有形可画的实物。在文字学上称这类字为象形字。这类字虽然接近于图画,但是已经成为一种代表语词的文字,笔画采用线条式,只要能把事物形象的特征表现出来使人一看就能明白是什么字就行了,并不需要像图画那样复杂。如𠂇、𠂈的犄角有不同是很容易分辨的。另外,有些字如𠂉、𠂊之类,横写占的地位太大,所以改为竖写,这说明甲骨文字已经脱离了图画阶段,演变成真正记载语言的文字了。

语言里的词并非都有具体的形象可画的。例如数词,在甲骨文里就用线条来表示数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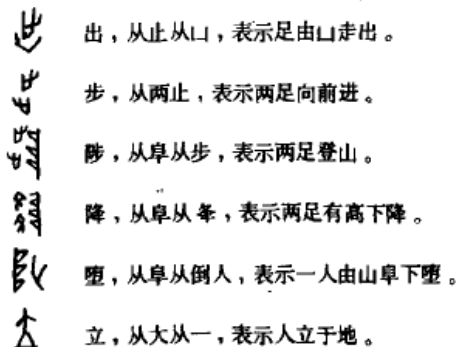


有些事物没有实际的外形可做为表象,而在甲骨文里也想方设法用图形来表示。例如:



这些字都是一种表意文字,用点画来表示所要指出来的意思。上和下无形可象,而用“一”在“乚”的上下来表示事物所处的方位。彤就是《尚书》“高宗彤日”的彤。古人称祭而又祭曰彤。甲骨文的𠂇字即表示连续不断的意思。彭字左边是鼓,右边的几画表示的是鼓的声音。皐字在日的四周画上几画表示日周围的光圈。皂字《说文》解释为“谷之馨香也”,甲骨文𠂇为食器,上面的几点表示食物上的香气。像这类的表意文字在文字学上称为指事字。

在语言里除事物的名词用图形来表示以外,属于行为动作的词在甲骨文里也利用图画来表示。例如:



至，从矢从一，表示矢至于地。

聑，从耳从口，表示耳有所听。

折，从斤从𠂔，表示以斤断木。

𢦏（獲），从又从佳，表示手獲一佳。

𢦏（得），从又从贝，表示得贝。

为，从又从象，表示牵象。

𡥉，从又从马，表示御马。

牧，从攴从牛，表示牧牛。

伐，从戈从人，表示以戈伐人。

这些字都是用绘画的形式把两个形体组合在一起的表意文字，在文字学上称为会意字。

以上所举出的字有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都是用图形来表示的。后来字形变成篆文、隶书，又变为楷书，始终没有改掉原来图形的基础，也就没有改变为拼音文字了。

汉字形体的演变 现在我们日常手写的规规矩矩的汉字字体称为楷书，或称为正楷。楷书是从公元3~4世纪魏晋时代开始形成的一种字体。魏晋以前，从殷商到秦汉，汉字的写法有过很大的变迁。汉字形体的变迁主要可以分为3个大的阶段：

商周的古文字到秦代的小篆 商代的文字见之于卜辞和铜器铭文的已经不是图画，而是一种笔画简单的记录语言的符号了。但是很多文字在表形表意上还离图画的形式不太远。例如：

佳 齿 興 星 竝 逐 男

这里佳、齿二字都是象形字，興象四支手共举，星象人企立远望，竝象二人竝立，逐象人逐豕，男象以耒耜在田耕作。

到了周代，铜器上的文字在写法上跟甲骨文还很接近，只是在笔画上或有改变。例如：

止：止（止） 斤：斤（斤） 豕：豕（豕）

为：为（为） 戈：戈（戈） 自：自（自）

女：女（女） 禾：禾（禾） 贝：贝（贝）

月：月（月） 令：令（令） 血：血（血）

到了春秋战国之间，书写工具有了竹简和丝帛，文字可以用笔来写，不用契刻和陶铸了，因而使用日广。这

时，列国的文字各有地方特色，不完全一致。秦人承继了西周的文字，笔画趋于繁复，如秦刻石（通称石鼓），即所谓大篆；而东方诸国的文字又趋于简易，改变比较多。秦灭六国以后，建立了统一的王朝，李斯倡议进行统一文字，罢其不与秦文合者，于是有小篆。小篆对大篆而言，形体比大篆简单，结构比金文整齐，写法有一定的规范，而且同从一个偏旁的字，偏旁的写法和地位也都有一定，因而文字走向系统化。例如从女旁的字在金文里大都写在右边，有时写在左边，在小篆里则一律改写在左边。从言字边的字，在金文里有的写在左边，有的写在右边，如“许”字、“谏”字，在小篆里一律也改写在左边。又如在金文里从彳又从止的字，彳写在左边，止写在右下边，在小篆里就一律合写在左边，作彳。秦朝统一文字在汉字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是一大进步。小篆是由商周文字发展而成的。小篆以前是一个大的阶段。

秦汉的隶书 隶书是由简略的篆书逐渐发展而成的。战国时代的兵器文字已趋简捷，相传秦代开始有了与篆书接近的隶书，隶书在民间使用。到了汉代，隶书不断发展，由接近篆书而改变篆书，成为日常应用的字体了。隶书不同于篆书的地方很多。主要表现在3方面：①笔画简化。如言字边、疋字边、阜字边之类。②结体改变。如晋字、秦字、曹字、春字的上边一部分都不同于篆书。③变篆书的圆笔为直笔或方笔。如月、木、文、六、女、大、甲、有、以等都是。

隶书的出现是汉字由繁复变简单的一大发展。隶书解散了篆体，使文字完全脱掉了图画的性质，成为便于书写的符号，文字也就走向大众化的方向，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从东汉时起，纸已经大量生产，书写文字也更加方便，因此隶书的笔势带有波折，在体势上与篆书大不相同，东汉时期有不少的书法家善于楷隶。

在汉代隶书开始发展的时期，又有了草书。草书是草率的隶书，汉魏时通行的是章草。汉末又有了由楷隶简化的行书，东晋时又有了今草。足见文字为便于实用，不断有新体出现。但草书只求整个形体与隶书相似，不容易认，行书又偏于草率，所以楷法为人所重。

魏晋以后的正楷 “楷”是有规矩的意思。从汉代有楷隶以后，到魏晋时代就有了正书。正书也称为真书。这种字体比楷隶又有了不同。波势减少，笔画也趋于平易圆转。所以从唐代以后一直成为手写的字体。

总之，汉字的形体演变从商周古文字到小篆是一期，由小篆发展为隶书是一期，由隶书发展为正书又是一期。总的趋向是由繁难变为简易。文字在使用上尽量求其易写，不再斤斤于表意了。

汉字的结构 汉字自古至今都是方块式的文字，有的是独体字，有的是合体字。独体字来源于图画式的象形字和指事字，合体字是以独体字为基础而构成的，包括会意字和形声字。在汉字总体内，独体字很少，合体字占90%以上，而合体字中又以形声字占绝对多数。

合体字是把两个已有的字组合在一起，组合的形式

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左右排列的形式，另一种是上下组合的形式。形声字的结构是一半形旁，一半声旁，形旁表意，声旁表音。形旁和声旁所摆的位置则有6种不同的方式：

① 左形右声。如：组、红、语、提、伍、校、忙、江、城、附、唱、鲤、舫、狗、炬、神、迷、距。

② 左声右形。如：放、和、鸭、视、收、颈、翅、部、勃、额、剂、救、谿、钦、敲。

③ 上形下声。如：简、花、室、草、定、覆、岌、麋、冕、岑、星、露。

④ 上声下形。如：吾、常、裂、帛、含、盟、婆、斧、忽、摩、烹、费、翡、恭、贡、瞽、驾、忌、密、努。

⑤ 外形内声。如：匡、衷、痕、病、废、闺、弼、街、圃、甸。

⑥ 外声内形。如：闻、闷、辨、问、赢。

这些不同的写法，最初是为了书写的方便和形式的美观，以致形旁跟声旁的位置有不同，后来同从一个形旁的字就大都有一定的格式。例如：“亻、口、彳、冫、火、木、扌、土、彳、艹、禾、米、虫、酉、足、玉、巾、衤、日”等形旁一般都在左边；“力、支、彡、见、刂、戈、页、欠、瓦、鸟、斤”等形旁都在右边；“宀、穴、艹、竹、钅”等形旁都在上边；“皿、子、心、灬(火)、尾”等形旁都在下边。这些不同的形旁在字形结构中所处的位置看起来仿佛复杂，实际上具有一定的规律，对认字和书写两方面都有很大的方便。这种结构的形式从秦汉时期的篆书发展为隶书就已经固定下来了。书写的笔顺也必然要从左到右，从上到下，从外到内不能错乱。

汉字与汉语的关系 汉字是一种表意注音的音节文字，每一个汉字代表语言里的一个音节。在上古时代汉语有单音节词，也有双音节词，而以单音节词为主，一个汉字就是一个词。自汉代以后，双音节词逐渐加多，一直发展到现代，汉语就变为以双音节词和多音节词为主了。这样，语言里的词大多数需要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来表示，字跟词的数目就不能相应。因此，一个字不一定就是一个词，它可能只是构成一个词的词素（或称语素），它只代表整个词的一个音节。

汉字虽然是音节文字，但是汉字本身不都能确切地表示语音。汉字中的象形字和表意字，如山、水、首、目、大、文、京、方、走之类，都是不表音的字。汉字的形声字，一半是形，一半是声，表声的部分跟字音相同的固然不少，可是也有很多不相同的。例如词、资、堂、杜、汤、荡、欣、汗、都、循之类，声旁跟字音只是韵母相同而声母不同；其他如涤、灞、仍、特、雕、凝之类，声旁跟字音就全不相同，很难看出应该怎样读。声旁也就失去了表音的作用。

声旁跟字音不相应，主要有两种原因。一种原因是古今音异，古代原来音是相同的，由于时代的变迁，语音有了改变，读音也就不一样了。如铺从甫声，铺、甫古音同，结从吉声，结、吉古音韵同，今音就不一样。另一种

原因是前人制字，声旁与字音本不相同，只取其相近。例如浩从告声，聚从取声，暖从爰声，蔡从祭声，似从以声，枢从区声，喘从喘声之类都是。因此汉字中形声字尽管占大多数，而字形上所标识的声旁跟语言并不都相协合，表音的作用也就不显著了。汉字本身既不能明确表音，每个字就只能按照字典所注的读音来读了。

汉语的语词极为丰富，古代字少，一字多义，或一个字代表几个词，连带着都有一字多音的现象。例如“说”有yuè、shuō、shuì三个音，表有喜悦，说话，游说三个意思。喜悦的意思是一个词，说话、游说两者又各是一个词。“卒”有zú、cù两个音，zú有兵卒的意思，又有终了，死亡的意思；cù是猝然的意思。兵卒是一个词，终了，死亡是一个词，猝然又是一个词。罷字音pí，又音bà，pí是疲敝的意思，bà是停歇的意思，疲敝是一个词，停歇又是一个词。又如行字有xíng、háng两个音，xíng是行走，háng是行列。贾字有gǔ、jiǎ两个音，有商贾、价值两个意思。遗字有yí、wèi两个音，有遗留、馈赠两个意思。这些都是一字多义。要分辨意义和读音只有凭仗上下语句来断定了。这是文字与语音不相应的又一种情况。

汉字在记录语言时，每一个字都有一定的约定俗成的用法。汉字当中同音字也特别多，除古代已经通行的同音假借字一直沿用的以外，其他是不能随便写的。写错了就称为写“白字”，例如shì这样一个音，见于下列一些词里：城市、表示、战士、方式、考试、教室、形势、解释、装饰、合适、事情、世界。这里每一个词都有一定的写法，其中每个字都是组词的一部分，因为它又联系着许多相关的词，自成一组，所以不能写错。例如“市”，既有“城市”一词，又有“都市”、“市场”、“市井”、“市价”一些词。因此，汉语的语音系统虽不复杂，而文字却成千累万。一个字作为一个词素构成一个词，它本身承担着一定的意义，每个词怎么写是受字义和词义所制约的，所以不能错乱。

汉字在记录语言当中也出现不少古今字和异体字，例如洒(灑)、兒(貌)、罷(疲)、辟(闢)、莫(暮)是古今字；泄(洩)、窺(闚)、迹(跡)、懶(嬾)、轄(鎡)等是异体字。一个词也可以写成几个形体。如“箇”、“個”、“个”；“泛”、“汎”、“汜”。为了使文字规范化，许多不必要的异体字现在就都不用了。

汉字的增繁与简化 汉字在商代除了有象形字、表意字以外，还有形声字和假借字。象形、表意主形，形声、假借主音。为配合语言，表音是汉字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从周代以后形声字成为造字的主体。语言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的发展，语词不断增多，文字也随之日益增加，形成一个繁富的文字体系。

秦代的《仓颉》、《博学》、《爰历》三篇有3300字，汉代扬雄作《训纂篇》，有5340字，到许慎作《说文解字》就有9353字了（不算“重文”）。晋宋以后，文字又日渐增繁。据唐代封演《闻见记·文字篇》所记晋吕忱作《字林》，有12824字，后魏杨承庆作《字统》，有13734字，梁顾野王作《玉篇》有16917字，隋陆法言作《切韵》，有12158字，

都达一万数千字。唐代孙强增字本《玉篇》有 22 561 字。到宋代司马光修《类篇》就多至 31 319 字,到清代《康熙字典》就有 47 000 多字了。

字书中文字数量的增多是由不同时期所产生的文字累积而成的。各时期都有不少新的语词出现,就要造许多形声字,字数自然增加。并且在文字使用中也出现很多不同情况的异体字和孳生的字。不同形体的字有以下几种:

① 相传下来的古文奇字。如《说文解字》所收:“儿”是古文奇字“人”字,“无”是奇字“無”字,“礼”(禮)、“际”(視)、“夂”(多)、“恩”(懼)等字是古文,“旁”(旁)、“墜”(地)是籀文。

② 字的异体。如鷄雞,譌譌、逌逌、踣踣、抵抵、谿谿、偈偈、臂臂等字形旁不同;枹枹、谄谄、朕朕、情情、搯搯、激激、磨磨等字声旁不同,但音义是相同的。这种异体字特别多。

③ 古今字。同是一个字而古今的写法不同。今字或就古字增加偏旁,或另成一字。如“从”作“從”,“辰”作“派”,“孚”作“摶”,“𣎵”作“敝”,“𣎵”作“淵”,“𣎵”作“煮”,“𣎵”作“燭”,“𣎵”作“蛙”,“𣎵”作“蛛”,“𣎵”作“釜”,“𣎵”作“廬”,“𣎵”作“涎”,“𣎵”作“𣎵”。这些字音义都一样。

④ 俗体字。民间流行的手写体字很多。如:“煞”(殺)、“柒”(漆)、“吊”(弔)、“头”(頭)、“楞”(棱)、“𣎵”(辯)、“𣎵”(憂)、“𣎵”(淚)等都是。以上这种异体字在字书里占有很大的比重。

其次,文字在使用中还产生一些增添偏旁的字。有些是属于俗体字一类,如“棟樑”的“樑”,“水菓”的“菓”、“筴筴”的“筴”,徒增赘疣,自当会废弃不用。但有些因为原来的字作为另外一个词来用,与原来造字的意思毫无关系,于是又就原字加偏旁代表原字的意思,这在文字学上称为后起本字。如“莫”的本义为日暮,因“莫”另作“無”的意思来用,所以又造“暮”字。“暴”的本义为晒,因“暴”作“暴虐”的意义来用,所以又造“曝”字。“须”的本义为胡须,因“须”用为“必须”字,所以又造“鬚”字。“韋”的本义为围,因“韋”用为“皮革”字,所以又造“圍”字。“然”原义为燃烧,因用为“如此”的意思,所以又造“燃”字。又有些字由于义有引申,原义不用,而通常作引申义讲,于是加偏旁又为原义另造一字。如“监”字原义是人俯身向水鑑中看自己,引申有监察、监督等意义,原义不用,因而又造“鑑”字。“益”字原义是水从皿中溢出,引申有增加、有利等意义,原义不用,所以另造“溢”字。“原”字原义是水源,引申有原始、本来等意义,原义不用,因而又造“源”字。以上这些都是后起本字。

另外在汉字发展过程中还产生一些义近音同或音近的分别字。如“輓”为輓车,但属于一般牵引的意思就别作“挽”。“版”为版图、版筑的“版”,木板、铁板都别作“板”。“称”为称举、称量轻重,可是称量轻重的器具却另造“秤”字,音 chēng。“受”为接受,受与别人就另作“授”。

“知”为知道、明白的意思,聪明有知识就别作“智”,音 zhì。这些都是分别字。

从这些方面来看,汉字在历史上之所以日趋繁富,一方面由于不同时代有新的语词增加,须要创造新字与之相适应;另一方面由于产生了大量的异体字、俗体字和用增益偏旁的方法以表现新的意义的孳生字;因此由汉代以后字书的字日益加多。实际上日常使用的字不过六千而已。

汉字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分歧旁出的异体字就要废除掉。选择的标准就是要求简易使用,而且要符合约定俗成的规范。因此废去古字而用今字,不取繁复的异体字,而取简便易写的字。由繁复趋向简化,这是汉字形体发展的规律。从商代到近代,一直是如此。由篆书变隶书就是一次大改革。例如泰、秦、春、奉几个字的头,篆书都不相同,可是隶书就都变得一样了。又如心字在字的左边,楷书都作忄,火字在字的下边,楷书都写作灬,都是有意的简化。至于各时代受行书、草书的影响出现的简体字更是指不胜数。如斷作断,牀作床,莊作庄,潛作潜,條作条,備作备,憐作怜,召作召之类,从隋唐时代以来就已在民间流行了,所以有条理的、符合汉字的形体结构方式和表音作用的简体字还是有利于识别和书写的。但不能违背约定俗成的原则。随意简化,师心自用,就失去作为交流思想工具的作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在整理异体字和制定简化字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对汉字的规范化起了重大作用。

参考书目

徐中舒主编:《汉语古文字字形表》,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1981。

顾野王编:《玉篇》,张士俊泽存堂刻本。

张参编:《五经文字》,唐开成石经本,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本。

唐兰:《中国文字学》,古籍出版社,上海,1979。

(周祖谟)

Hanzi bianma

汉字编码 (Chinese character encoding)

为汉字设计的一种便于输入计算机的代码。由于电子计算机现有的输入键盘与英文打字机键盘完全兼容,因而如何输入非拉丁字母的文字(包括汉字)便成了多年来人们研究的课题。

汉字信息处理系统一般包括编码、输入、存储、编辑、输出和传输。编码是关键。不解决这个问题,汉字就不能进入计算机。

汉字进入计算机的三种途径 分别为:

① 机器自动识别汉字:计算机通过“视觉”装置(光学字符阅读器或其他),用光电扫描等方法识别汉字。

② 通过语音识别输入:计算机利用人们给它配备的“听觉器官”,自动辨别汉语语音要素,从不同的音节中找出不同的汉字,或从相同音节中判断出不同汉字。

③ 通过汉字编码输入:根据一定的编码方法,由人借助输入设备将汉字输入计算机。

机器自动识别汉字和汉语语音识别,国内外都在研究,虽然取得了不少进展,但由于难度大,预计还要经过相当一段时间才能得到解决。在现阶段,比较现实的就是通过汉字编码方法使汉字进入计算机。

汉字编码的困难点 汉字进入计算机,有许多困难,其原因主要有三点:

① 数量庞大:随着社会的发展,新字不断出现,死字没有淘汰,汉字总数不断增多。一般认为,现在汉字总数已超过 6 万个(包括简化字)。虽有研究者主张规定 3 000 多或 4 000 字作为当代通用汉字,但仍比处理由二三十个字母组成的拼音文字要困难得多。

② 字形复杂:有古体今体,繁体简体,正体异体;而且笔画相差悬殊,少的一笔,多的达 36 笔,简化后平均为 9.8 笔。

③ 存在大量一音多字和一字多音的现象:汉语音节 416 个,分声调后为 1 295 个(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统计,轻声 39 个未计)。以 1 万个汉字计算,每个不带调的音节平均超过 24 个汉字,每个带调音节平均超过 7.7 个汉字。有的同音同调字多达 66 个。一字多音现象也很普遍。

五种类型的编码法 据粗略统计,现有 400 多种编码方案,其中上机通过试验的和已被采用作为输入方式的也有数十种之多。归纳起来,不外 5 种类型:

① 整字输入法:前一阶段,一般是将三四千个常用汉字排列在一个具有三四百个键位的大键盘上。近来,大多是将这些汉字按 XY 座标排列在一张字表上,通常叫“字表法”,或“笔触字表法”。比如, X25 行和 Y90 列交叉的字为“国”,当电笔点到字表上的“国”字时,机器自动将该字的代码 2 590 输入。键盘上或字表中字按部首或按音序或按字义联想而排列。不常用的字作为盘外字或表外字,另行编码处理。

② 字形分解法:将汉字的形体分解成笔画或部件,按一定顺序输入机器。笔画一般分成 8 种:横(一)、竖(丨)、撇(丿)、点(丶)、折(乚)、弯(乚)、叉(十)、方(口)。部件一般归纳出一二百个。由于一般键盘上只有 42 个键(包括数字和标点),容纳不下这么多部件,因而有人设计中键盘,也有人利用部件形体上的相似点或出现概率的不同,而把 100 多个部件分布在 26 个字母键上。

③ 字形为主、字音为辅的编码法:这种编码法与字形分解法的不同在于还要利用某些字音信息。如有的方案为了简化编码规则,缩短码长,在字形码上附加字音码,有的方案为了采用标准英文电传机,将分解归纳出来的字素通过关系字的读音转化为拉丁字母。

④ 全拼音输入法:绝大多数是以现行的汉语拼音方案为基础进行设计。关键问题是区分同音字,因而有的方案提出“以词定字”的方法,还有的方案提出“拼音-汉字转换法”,即“汉语拼音输入——机内软件变换(实为查机器词表)——汉字输出”系统。

⑤ 拼音为主、字形为辅的编码法:一般在拼音码前

面或后面再添加一些字形码。拼音码有用现行汉语拼音方案或稍加简化的,还有的为了缩短码长而把声母和韵母都用单字母或单字键表示的“双拼方案”或“双打方案”。如 F 键既表声母 F,又表韵母 ang,连击两下,便是 Fang“方”字。区分同音字的字形码也多种多样。除了大部分采用偏旁部首的信息外,还有采用起末笔或采用语义类别的。

上述各种编码法,各有短长。例如,字表法的特点是一字一格(键),无重码,直观性好,操作简单。缺点是需特制键盘,速度较慢。字形分解法的好处是按形取码,不涉及字音,因而不认识的字(包括生僻字、古字)也同样可以编码输入;但汉字形体结构非常复杂,写法也有许多差异,分解标准不易统一,因而不少方案规则较多。拼音输入法(包括拼音-汉字转换法)的优点是操作简捷,可以“盲打”,不受汉字简化、字形改变的影响,符合拼音化方向,并且还便于作进一步信息处理;缺点是不认识的字无法输入;另外,如果不加字形码或不用以词定字法或显式选择法,同音字较难处理。

双轨制编码 汉语拼音推广应用,并逐步过渡到汉字和汉语拼音文字并存并用,这是一种双轨制。汉字信息处理领域中,音码和形码的并存并用,同样是一种双轨制。因此,不少人认为,采用双轨制好,理由有以下 5 点:

① 对掌握普通话的人来说,使用音码比形码方便,速度比较快。形码虽然较慢,但能输入任何汉字(包括古字)。采用双轨,操作员认识的字可按音输入,不认识的字按形输入,会普通话的人可按音输入,方音重的人可按形输入。

② 对于用字量少的单位,按音输入无问题,但对用字量多的单位来说,按音输入就不如按形输入,因为一般人只能念出一部分汉字。

③ 按形输入(尤其是整体输入)对于中文信息处理的某类工作,如统计汉字,非常适合;但是对于其他类工作,例如统计汉语的音(声韵调)则无能为力。按音输入则正相反。双轨正好是相辅相成。

④ 有的形码可以照顾多种汉字(如日本的汉字、南朝鲜的汉字),而音码能分词连写,便于作进一步的信息处理。

⑤ 适当的双轨方案,不会增加设备上的麻烦。如不考虑采用整字输入,一般均可使用现有的小键盘。

汉字编码研究的新发展 除了单轨向双轨发展之外,还有下列趋势:

① 混合式编码法。笔触字表示法中除整体字之外,增加一些部件或字元,可以解决盘外字问题,甚至能具有字形分解法的全部优点。而笔画方案为了提高速度,一般也增加一些部件或整字。

② 充分利用简码和词汇码。这样可以提高输入速度。因而人们为少量出现频率高的字或词设计了单字母和双字母的简码。

词汇码也是提高速度的手段。有一种形码方案的词汇码是根据每个字的部件规定的,如“汉字编码”的词汇码是43、45、55、13(彳 宀 乡 石)。另一种形码方案的词汇码是利用计算机引导方式输入的。例如,当“中”字输入后,一按语词键,屏幕上便显示出“中国”、“中型”、“中性”、“中华”等双音词;选择“中国”后,如再按一下语词键,便可显示出“(中国)话”、“(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等词或词组。音码方案的词汇码实际上为词组码,如ZRG“中华人民共和国”,ZZXY“中国中文信息研究会”。词汇码不仅能提高速度,而且也能区别同码。但是,如果用得太多,也会产生重码。因此,有必要划分通用词汇码和专业词汇码,以减少重码。

③ 充分发挥“电脑”的作用,尽量减少“人脑”的负担。上述计算机引导输入法就是一例。还有的方案不断以开窗口方式向操作员提供选择的范围。这样,操作员不必再记忆大量的编码规则。

编码工作中的定型化和标准化 编码方案的定型化,即一般所说的选优工作,对计算机的普及应用非常重要。当然,定型或选优并不意味着只定一种或只选一种,而要照顾到多种用户的需要。关于选优,曾提出多种评定标准,一般包括字码无二义性、操作方便易学、输入和处理效率高、存储节省、传输可靠、设备经济实用、组词能力强。

编码方案繁多,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1981年,国家标准局公布了《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简称汉字标准交换码),共分两级,一级3755个字,二级3008个字,共6763个字。这种汉字标准交换码是计算机的内部码,可以为各种输入输出设备的设计提供统一的标准,使各种系统之间的信息交换有共同一致性,从而使信息资源的共享得以保证。目前,正在制定《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辅助集》,以满足少数用字量超过基本集的用户和台湾、香港等地的需要。

参考书目

刘涌泉:《语言应用和现代化——中文信息处理研究》,载《语文研究》,1983,第1期,太原。

中国汉字编码研究会编:《汉字编码方案汇编》,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北京,1979。

(刘涌泉)

Hanzi chazifa

汉字查字法 (indexing method of Chinese characters) 给汉字规定便于查找的排列方法。汉字的查字法一直没有统一的规定。社会上通行的有按部首、按号码、按笔形(包括笔顺)、按音序(以拼音字母为顺序)、按画数等排列的各种查字法。每种都有不同的方案,因此比较混乱,不仅不便于语文教学,而且也给字典、词典等的编辑出版和资料、档案、索引、目录等的排列造成困难。

1961年11月,由文化部、教育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联合组成汉字查字法整理工作组,邀请各方面专家参加,设立几个专门小组,审核

各类查字法方案。工作组商定的查字法整理原则是:

① 选择查字法方案的标准,首先应当是便于检索,易于学会;

② 既要照顾多数人的查字习惯改进通用的方案,又要综合群众提出的各种建议,拟订更为合理的方案;

③ 整理查字法方案必须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

④ 最后应提出几种方案,同时推行,并容许自由选用。

汉字查字法整理工作组先后征集到专家和群众提出的查字法方案170件,意见144件,经过全面和认真的研究,并反复进行修改,于1964年4月提出以下4种草案,推荐给文化、教育和出版界试用。

《拼音字母查字法》(草案)

一、这个查字法是按拼音字母顺序检查汉字的。

二、这里说的拼音字母顺序,是《汉语拼音方案》字母表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的顺序。ê排在e后,如“ê”(欸)排在“è”(饿)后“ēi”(诶)前。ü排在u后,如“nǚ”(女)排在“nù”(怒)后“nuǎn”(暖)前。ch、sh、zh声母和ng韵尾都按单字母顺序排列。ch、ng、sh、zh分别跟c、n、s、z排在一起,如“chā”(插)排在“cèng”(蹭)后,“chuò”(辍)排在“cǐ”(疵)前。

三、声韵母相同的字按照声调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轻声的顺序排列。例如:巴(bā)、拔(bá)、把(bǎ)、爸(bà)、吧(ba)。

四、读音(声母、韵母、声调)完全相同的字,按照起笔笔形横(一)、直(丨)、撇(丿)、点(丶)、正折(乚)、反折(ㄣ)的顺序排列。例如:芭捌八笆把巴。

五、这个查字法是用来检查单个汉字的。如兼排多音词,应以单字的次第为纲,把多音词分别排在单字的下面。第一个字相同的多音词,按第二个字的音序排列次序,第二个字也相同的,按第三个字的音序排列。依此类推。例如:

红	hóng
红榜	hóngbǎng
红茶	hóngchá
红军	hóngjūn
红旗	hóngqí
红色	hóngsè
红松	hóngsōng

《部首查字法》(草案)

一、依据字形定部。一般采取字的上、下、左、右、外等部位作部首;其次是中坐和左上角。按照以上七种部位都无从确定部首的,列入余类。

二、部首共250个,按笔画画数排列,同画数的按一(横)丨(竖)丿(撇)丶(点)乚(折)五种笔形顺序排列。另有余类,排在最后。

三、查字的方法,规定如下:

(一) 部首的一般位置在字的上、下、左、右、外。

今(人部) 齋(十部) 厥(厂部) 奉(夹部)

——部首在上

忍(心部) 眉(目部) 且(一部) 盃(皿部)

——部首在下

務(矛部) 𡗗(是部) 临(丨部) 臧(爿部)

——部首在左

新(斤部) 昶(日部) 歐(欠部) 馗(首部)

——部首在右

固(口部) 威(戊部) 巨(匚部) 同(冂部)

——部首在外

(二) 一般位置没有部首的,查中坐,中坐没有部首的,查左上角。

夹(大部) 串(丨部) 办(力部) 世(一部)

——中坐

疑(匕部) 聽(耳部) 整(束部) 嗣(口部)

——左上角

(三) 一个字具有几个部首的,按照下列次序确定部首:

① 上、下都有部首的,取上,不取下。

含(查人部,不查口部) 暨(查厂部,不查足部)

思(查田部,不查心部) 聲(查殸部,不查牛部)

② 左、右都有部首的,取左,不取右。

相(查木部,不查目部) 划(查戈部,不查刂部)

魁(查鬼部,不查斗部) 鴻(查彡部,不查鸟部)

③ 内、外都有部首的,取外,不取内。

闷(查门部,不查心部) 医(查匚部,不查矢部)

旬(查勹部,不查日部) 因(查口部,不查大部)

④ 中坐、左上角都有部首的,取中坐,不取左上角。

坐(查土部,不查人部) 半(查丨部,不查、部)

⑤ 下、左上角或右、左上角都有部首的,取下、取右,不取左上角。

渠(查木部,不查、部) 帑(查巾部,不查女部)

楚(查疋部,不查木部) ——取下,不取左上角。

肄(查聿部,不查匕部) 隸(查隶部,不查木部)

凱(查几部,不查山部) ——取右,不取左上角。

⑥ 在同一部位有多笔和少笔几种部首互相叠合的,取多笔部首,不取少笔部首。

章竟意 ——部首有、一立音,查音部。

磨糜靡 ——部首有、一广麻,查麻部。

⑦ 单笔部首(即一丨丿㇏乙)和复笔部首都有的,取复笔部首,不取单笔部首。

吾(口部) ——上下都有部首,一是单笔部首,口是复笔部首,查口部,不查一部。

旧(日部) ——左右都有部首,丨是单笔部首,日是复笔部首,查日部,不查丨部。

(四) 部首无从采取或所在位置不合规定的,查余类。

长东农曲 ——部首无从采取,查余类。

壽腹衙囊 ——部首不在上、下、左、右、外、中坐、左上角,查余类。

《四角号码查字法》(草案)

一、笔形和代号

查字法分笔形为十种,用 0 到 9 十个号码代表,如下:

笔名	号码	笔形	字例	说明
复笔	0	㇀	主病产言	点和横相结合
单横	1	一	天土	横
垂	2	丨	活培织兄风	挑,横上钩和斜右钩
点	3	丶	旧山	直
捺	4	㇏	千顺力则	撇和直左钩
叉	5	乂	室社罕外去亦	点
串	6	十	造瓜	捺
方	7	𠃊	古草	两笔交叉
角	8	𠃍	对武度猪	一笔穿过两笔或两笔以上
小	9	口	登本	四角整齐的方形
		𠔁	打去琴申史	一笔的转折
		𠔂	男扣圆甲曲曲	两笔笔头相接所成的角形
		𠔃	刀写亡表	八字形
		𠔄	阳央又雪	八字形的变形
		𠔅	分共	小字形
		𠔆	余央余羊牛	小字形的变形

二、查字方法

(一) 取角顺序 每字按①左上角、②右上角、③左下角、④右下角的次序取四个角的号码。

例: ㇀ ㇀ ㇀ ㇀ = 0212

‘顔’=0128 ‘裁’=4325 ‘烙’=9786

(二) 取角方法

① 一笔可以分角取号。

例: 以 乱 七 习 乙 凡

② 一笔的上下两段和别笔构成两种笔形的,分两角取号。

例: 水 火 木 美 火 米

③ 下角笔形偏在一角的,按实际位置取号,缺角作 0。

例: 产 户 亏 飞 弓 妒

但“弓”等字用作偏旁时,取 2 作整个字的左下角号码。

例：‘张’ ‘鄂’

④ 凡外围是“口(門)門”的三类字，左右两下角改取里面的笔形。

例：‘园’=6021 ‘田’=6040 ‘闹’=3724 ‘闻’=7721

但上、下、左、右有附加笔形的字，都不在此例。

例：‘苗’=4460 ‘恩’=6033 ‘泪’=3610 ‘睛’=6502
‘简’=8822 ‘润’=3712

⑤ 一个笔形，前角已经用过，后角作为0。

例：‘王’ ‘冬’ ‘之’ ‘直’ ‘冲’ ‘全’

‘卜’ ‘心’ ‘斗’ ‘持’ ‘时’

‘一’ ‘十’ ‘回’ ‘八’ ‘小’

《笔形查字法》(草案)

一、笔形：把汉字的笔画分成七种笔形，名称次序如下表：

笔形	一	丨	㇀	丶	㇏	㇚	囗
名称	横	竖	撇	点	正折	反折	方
次序(号码)	1	2	3	4	5	6	7
特征	—	↓	↙	↘	ㄣ	ㄥ	□

折笔以第一折为准，例如‘乚’‘乙’都作正折(ㄣ)，
‘㇚’都作反折(ㄥ)。

二、字形：把汉字的字形分成单结构的和多结构的两类。

单结构字——字的笔画相交、相连：



或者单笔与其他笔画相配相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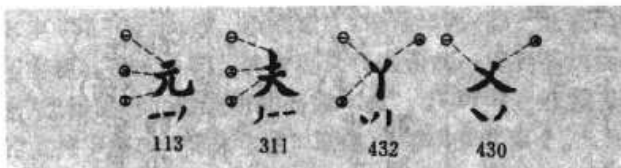
多结构字——由几个结构合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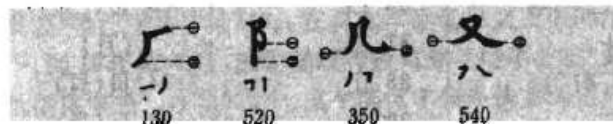
三、查字

① 查单结构字：取最高的三笔，按三笔的笔形或号

码查字。取笔次序以笔画的起点为准——先高后低，同高的先左后右，



起点相接的看终点的高低，终点又同高的再看终点的左右。



② 查多结构字，先查字中的第一结构(即“偏旁”)。结构在字中的次序——先左后右，先上后下，先外后内。



偏旁“木” 偏旁“小” 偏旁“辶” 偏旁“日”

偏旁查法与单结构字同。

查到字的偏旁后，再以同样方法按字的第二结构查字。



偏旁“氵” 偏旁“氵” 偏旁“氵” 偏旁“氵”

第二结构“工” 第二结构“古” 第二结构“辶” 第二结构“又”

前三笔笔形相同的结构，按第四笔排列次序。

笔画分类源自清代档案中所用的“元亨利贞”、“江山千古”等旧法，以后不断加以改进。如1930年陈德芸编的《德芸字典》(良友版)分一丨丿丶㇏㇚七类笔画。1934年10月陈立夫编的《五笔检字学生字典》分一丨丿㇏五类笔画，以每字的第一笔、第二笔、第三笔的形状各依一丨丿㇏分别计算，各以5乘之，得125类。如“立”字，第一笔为丶，第二笔为一，第三笔为丿，就归入丶一丿类。同理，“夫”字归入一一丿类，“安”字归入丶丶㇏一丿类等。1964年汉字查字法整理工作组也把汉字的基本笔画分为5种，按一丨丿丶㇏的顺序排列(“札”字法)。这种排列顺序被后来出版的多数工具书采用。

1983年6月，根据各方面的要求，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文化部出版局又联合召开了统一汉字查字法座谈会，成立统一部首查字法工作组。工作组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汉语大字典编纂处、汉语大词典编纂处、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室组成。统一部首查字法工作组根据依据字形定部、贯彻“以大包小”、“口径一致”的原则，参照目前通行的《康熙字典》、《辞海》、《新华字典》三部辞书的部首制订了一个草案共设部首201个(见表)。

汉字 201 部首表

一 画	32 尢(兀允)	67 戈	(步)	142 米	179 革
1 一	(兀)	68 比	102 业	143 聿(聿圭)	(頁)
2 丨	(才)	(无)	103 目	144 艮	180 面
3 丿	33 寸	69 牙	104 田	145 艸(艸)	181 韭
4 丶	34 弋	70 瓦	105 皿	146 羽	182 骨
5 乙(一乚)	(彡)	71 止	106 皿	147 糸(乡)	183 香
丿)	35 口	72 支(攴)	(攴)	七 画	184 鬼
二 画	36 口	73 日(日)	107 生	148 麦(麥)	185 食(食)
6 十	37 巾	(月)	108 矢	149 走	(風)
7 厂(厂)	38 山	74 贝(貝)	109 禾	150 赤	186 音
8 匚	39 彳	75 见(見)	110 白	(車)	187 首
9 卜(卜)	40 彡	76 牛	111 瓜	151 豆	(章)
(丿)	(彡)	77 手(手)	112 鸟(鳥)	152 酉	(飛)
10 冂(冂)	41 夕	78 毛	113 疒	153 辰	十 画
(亻)	42 夂	79 气	114 立	154 豕	188 鬲
(厂)	(夂)	(女)	115 穴	(豕)	189 髟
11 八(ㄨ)	43 丩(丩)	80 长(長)	(衤)	155 鹵(鹵)	(馬)
12 人(人)	44 广	81 片	(圭)	(貝)	190 門
(入)	(十)	82 斤	116 疋(疋)	(見)	191 高
(夂)	45 门(門)	83 爪(爪)	117 皮	156 里	十一画
13 勹	(勹)	84 父	(氷)	157 足(足)	192 黄
(冂)	46 宀	(允)	118 夂	158 邑(邑)	(麥)
14 匕	(宀)	(𠂔)	119 矛	159 身	(鹵)
15 儿	47 ㄣ(ㄣ)	85 月(月)	(母)	160 辵(辵)	(鳥)
16 几(几)	48 尸	86 氏	六 画	161 采	(魚)
17 ㄣ	49 己	87 欠	120 耒	162 谷	193 麻
18 勹	50 弓	88 风(風)	121 耳	163 豸	194 鹿
(勹)	51 巾(巾)	89 爻	122 老(耂)	164 龟(龜)	十二画
19 一	52 女	90 文	123 臣	165 角	195 鼎
(勹)	53 飞(飛)	91 方	124 面(面)	166 言(言)	196 黑
20 凵	54 小(小)	92 火(火)	125 而	167 辛	197 黍
21 卩(卩)	55 子	93 斗	126 页(頁)	八 画	十三画
(卩左)	56 马(馬)	(𠂔)	127 至	168 青	198 鼓
(卩右)	(乡)	94 户	128 虍(虎)	169 卓	(𧰨)
22 刀(刀)	(亠)	(衤)	129 虫	170 雨	199 鼠
23 力	57 彡	95 心(心)	130 肉	(長)	十四画
24 厶	58 彡	(彡)	131 缶	171 齿(齒)	200 鼻
25 又	四 画	(彡)	132 舌	172 非	(齊)
26 彡	59 王(王)	(小)	133 竹(竹)	(虎)	十五画
(巳)	60 无(无)	96 毋(毋)	134 白	173 黽(黽)	(齒)
三 画	61 韦(韋)	97 水(水)	135 自	174 隹	十六画
27 干	(步)	五 画	136 血	175 阜(阜)	(龍)
28 工	62 木	(玉)	137 舟	176 金(金)	十七画
29 土(土)	63 支	98 示(示)	138 色	177 鱼(魚)	201 龠
(彡)	64 犬(犬)	99 甘	139 齐(齊)	(門)	(龠)
30 升	65 歹(歹)	100 石	140 衣(衣)	178 隶	
31 大	66 车(車)	101 龙(龍)	141 羊(羊)	九 画	

汉字查字法的整理和统一工作还在进行中。需要有一个较长的过程才能完成。(傅永和)

Hanzi Jianhua

汉字简化 (simplific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有两种含义: 一是指把汉字加以简化这项工作, 一是指被简化了的汉字。后一含义一般多称为简化字。简化字是繁体字的对称。同一汉字, 简体比繁体笔画为少。简化字旧称破体、小写、简体字、简易字、简字、手头字、俗体字、俗字。简化汉字, 在古代是汉字形体的自然演变, 到近代是字形的有意识的改革。

汉字的简体 早在甲骨文和金文中, 汉字就有了简体。发展到小篆时期, 很多字体简化了。到了隶书和楷书时期, 简化的字体更多。在汉魏六朝的碑刻中, 在唐代的写经里, 都有不少简体字。宋代以后, 简体字由碑刻和手写转到雕版印刷的书籍上, 从而扩大了流行的范围, 数量也大大增加。到了近代, 太平天国在其文书以至玉玺上都使用简体字。1909年, 陆费逵在《教育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提倡简体字的论文《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1921年又发表论文《整理汉字的意见》, 提出了整理汉字的办法, 限定通俗用字在2000汉字左右, 减少笔画, 第一步采用已有社会基础的简体字, 第二步把其他笔画多的字也加以简化。1922年, 钱玄同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提出了一项《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 由陆基、黎锦熙、杨树达联署。这个提案是把简体字作为运动推行的号召。提案指出: “文字本是一种工具, 工具应该以适用与否为优劣之标准。笔画多的, 难写、费时间, 当然是不适用。笔画少的, 容易写、省时间, 当然是适用。”“改用拼音是治本的办法, 减省现行汉字笔画是治标的办法”, “治标的办法实是目前最切要的办法。”提案主张把这种过去只通行于平民社会的简体字, 正式应用于一切正规的书面语上。

钱玄同把简体字的构成归纳为8种: ①全体删减, 粗具匡廓(如“龜”作“龟”); ②采用草书(如“為”作“为”); ③仅写原字的一部分(如“聲”作“声”); ④原字一部分用很简单的几笔替代(如“觀”作“观”); ⑤采用古体(如“雲”作“云”); ⑥音符改少笔画(如“燈”作“灯”); ⑦别造简体(如“響”作“响”); ⑧假借他字(如“幾”作“几”)。

此后, 接连出版了几种系统整理简体字的书籍: 1928年, 商务印书馆出版胡怀琛的《简易字说》, 书中提出9种简易字汇, 除日本字、译音字、复音字外, 收简体字300多个; 1930年,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刘复、李家瑞合编的《宋元以来俗字谱》, 根据《古烈女传》等12种书收简体字1600多个, 反映了八九百年来简体字的发展情况; 同年, 北京自清榭出版卓定谋的《章草考》, 收集了106种章草资料得章草3000个; 1932年, 商务印书馆出版国语筹备委员会编订、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的《国音常用字汇》收入不少简体字。《国音常用字汇》说明中指出: “宋元以来有一种通俗的简体字, 旧称破体或小写, 其笔画较普通之体锐减, 赴速急就, 颇切实用。现在应该把

它推行, 使书写处于约易。故本书对于习见之简体字, 酌收若干, 用小字附注于普通体之下, 以示提倡。”1934年, 中国图书馆服务社出版社定友的《简字标准字表》, 收简体字353个。同年, 徐则敏在《论语半月刊》上发表《550俗字表》。1934年, 钱玄同又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提出“搜集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1935年, 在钱玄同的主持下编成《简体字谱》草稿, 收字2400多个。

1935年新春, 上海文化界人士陈望道等组织“手头字推行会”, 选定第一批手头字300个。二月间由文化界200人和《太白》、《世界知识》、《译文》等15个杂志联名发表“推行手头字缘起”。在简体字运动日益发展的形势下, 到1935年8月, 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不得不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 收字324个。这个简体字表是钱玄同主持编写的《简体字谱》草稿中的一部分。到1936年2月, 国民党政府又通令收回。这个时期, 其他的简体字出版物有: 1936年10月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出版的容庚的《简体字典》, 收字4445个。都本草书, 省笔而不失旧形, 保持原字轮廓。1936年11月北新书局出版陈光尧的《常用简字表》, 收字3150个。其中来自草体的占48%, 来自俗体的占40%, 有些字经过作者改写。1937年5月, 北平研究院字体研究会发表《简体字表》第一表, 收字1700个。

抗日战争时期, 简体字的发展主要在当时的解放区。解放区的油印报刊采用并创造了许多简体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 不仅解放区使用的简体字在全国广泛流行, 而且经过有组织、有领导的搜集和整理研究, 最终公布了全国通用的简化字, 确定了简体字的合法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简化汉字工作 1950年, 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编制《常用简体字登记表》。当时依据的原则是: 整理已经通行的简体字, 必要时根据已有简体字的简化规律加以适当补充, 所选定补充的简体字, 以楷体为主, 间或采用行书和草书, 但注意容易书写和便于印刷; 简体字的选定和补充, 以最常用的汉字为限, 不是每一个繁难的汉字都简化。后经过征求意见, 决定根据“述而不作”的原则, 于1951年拟出《第一批简体字表》, 收字555个。

1952年2月5日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 在《第一批简体字表》基础上, 经反复研究和多方听取意见, 于1954年底拟出《汉字简化方案(草案)》。草案分三个部分: ①798个汉字简化表草案; ②拟废除的400个异体字表草案; ③汉字偏旁手写简化表草案。1955年2月2日,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在中央一级的报刊上发表《汉字简化方案(草案)》。把其中的261个字分3批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50多种报刊上试用。1955年7月13日, 国务院成立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 董必武任主任委员, 郭沫若、马叙伦、胡乔木任副主任委员, 张奚若、沈雁冰、许广平、朱学范、邵力子、张修竹、项南、徐忻、老舍、曾昭抡、邓拓、傅彬然为委员。1955年9月,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根据征求意见结果提出修正草案。删除原草案中的《拟废除的400个异体字表草案》和《汉字偏旁手写简

化表草案》，并把 798 个简化字，减为 512 个，增收简化偏旁 56 个。修正草案经 1955 年 10 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讨论，简化字由 512 个增加为 515 个，简化偏旁由 56 个减少为 54 个。

修改后的修正草案经国务院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审订，1956 年 1 月 28 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 23 次会议通过。1 月 31 日由《人民日报》正式公布。

《汉字简化方案》共分三个表。第一表为已经大部分报刊使用，即可正式应用的 230 个简化汉字（表 1）。第二表为先试用两个月，经过修正再正式推行的 285 个简化字（表 2）。第三表为先试用两个月，经过修正，再正式推行的 54 个可类推的简化偏旁（表 3）。

表 1 《汉字简化方案》第 1 表

罢〔罷〕	当〔當〕	了〔瞭〕	环〔環〕
卜〔蔔〕	党〔黨〕	刘〔劉〕	还〔還〕
备〔備〕	灯〔燈〕	帘〔簾〕	几〔幾〕
宝〔寶〕	敌〔敵〕	联〔聯〕	击〔擊〕
报〔報〕	淀〔澱〕	粮〔糧〕	际〔際〕
办〔辦〕	点〔點〕	灵〔靈〕	家〔傢〕
板〔闆〕	电〔電〕	罗〔羅囉〕	价〔價〕
帮〔幫〕	垫〔墊〕	乱〔亂〕	借〔藉〕
别〔別〕	独〔獨〕	个〔個〕	旧〔舊〕
标〔標〕	夺〔奪〕	盖〔蓋〕	艰〔艱〕
表〔錶〕	对〔對〕	干〔乾幹〕	荐〔薦〕
边〔邊〕	断〔斷〕	赶〔趕〕	歼〔殲〕
宾〔賓〕	冬〔冬〕	谷〔穀〕	尽〔盡儘〕
补〔補〕	东〔東〕	刮〔刮〕	美〔美〕
辟〔闢〕	动〔動〕	过〔過〕	举〔舉〕
朴〔樸〕	态〔態〕	归〔歸〕	剧〔劇〕
扑〔撲〕	台〔臺檯颱〕	关〔關〕	据〔據〕
么〔麼〕	头〔頭〕	观〔觀〕	卷〔捲〕
迈〔邁〕	体〔體〕	巩〔鞏〕	齐〔齊〕
霉〔霉〕	铁〔鐵〕	克〔剋〕	气〔氣〕
蒙〔蒙濛蒙〕	条〔條〕	开〔開〕	窃〔竊〕
弥〔彌彌〕	听〔聽〕	垦〔墾〕	乔〔喬〕
蔑〔蔑〕	团〔團團〕	恳〔懇〕	秋〔秋〕
庙〔廟〕	难〔難〕	困〔困〕	千〔千〕
面〔麵〕	拟〔擬〕	号〔號〕	迁〔遷〕
范〔範〕	乐〔樂〕	后〔後〕	区〔區〕
奋〔奮〕	类〔類〕	护〔護〕	确〔確〕
丰〔豐〕	累〔累〕	画〔畫〕	权〔權〕
妇〔婦〕	里〔裏〕	划〔劃〕	劝〔勸〕
复〔復復覆〕	礼〔禮〕	伙〔夥〕	牺〔犧〕
达〔達〕	丽〔麗〕	怀〔懷〕	系〔係繫〕
斗〔鬥〕	厉〔厲〕	坏〔壞〕	协〔協〕
担〔擔〕	励〔勵〕	会〔會〕	献〔獻〕
胆〔膽〕	离〔離〕	欢〔歡〕	咸〔鹹〕

衅〔讐〕	尝〔嘗〕	灶〔竈〕	优〔優〕
向〔嚮〕	偿〔償〕	总〔總〕	犹〔猶〕
响〔響〕	厂〔廠〕	辞〔辭〕	邮〔郵〕
兴〔興〕	称〔稱〕	才〔纔〕	养〔養〕
选〔選〕	惩〔懲〕	参〔參〕	痒〔癢〕
旋〔旋〕	处〔處〕	惨〔慘〕	样〔樣〕
只〔祇隻〕	触〔觸〕	蚕〔蠶〕	蝇〔蠅〕
致〔緻〕	出〔齣〕	从〔從〕	应〔應〕
制〔製〕	冲〔衝〕	聪〔聰〕	务〔務〕
执〔執〕	虫〔蟲〕	洒〔灑〕	袜〔襪〕
这〔這〕	湿〔濕〕	扫〔掃〕	为〔爲〕
折〔摺〕	时〔時〕	丧〔喪〕	伪〔偽〕
战〔戰〕	实〔實〕	苏〔蘇蘇〕	万〔萬〕
征〔徵〕	势〔勢〕	虽〔雖〕	余〔餘〕
症〔癥〕	师〔師〕	随〔隨〕	御〔禦〕
证〔證〕	舍〔捨〕	孙〔孫〕	吁〔籲〕
朱〔硃〕	晒〔曬〕	松〔鬆〕	郁〔鬱〕
筑〔築〕	寿〔壽〕	爱〔愛〕	与〔與〕
准〔準〕	沈〔瀋〕	碍〔礙〕	远〔遠〕
庄〔莊〕	伤〔傷〕	尔〔爾〕	云〔雲〕
种〔種〕	声〔聲〕	医〔醫〕	运〔運〕
众〔衆〕	帅〔帥〕	义〔義〕	拥〔擁〕
迟〔遲〕	双〔雙〕	压〔壓〕	
丑〔醜〕	热〔熱〕	叶〔葉〕	

表 2 《汉字简化方案》第 2 表

坝〔壩〕	粪〔糞〕	誉〔譽〕	栏〔欄〕
摆〔擺擺〕	风〔風〕	柴〔糶〕	烂〔爛〕
笔〔筆〕	凤〔鳳〕	厅〔廳〕	砾〔礫〕
币〔幣〕	肤〔膚〕	涂〔塗〕	历〔曆歷〕
毕〔畢〕	麸〔麩〕	图〔圖〕	隶〔隸〕
毙〔斃〕	带〔帶〕	椭〔橢〕	篱〔籬〕
盘〔盤〕	导〔導〕	恼〔惱〕	猎〔獵〕
凭〔憑〕	单〔單〕	脑〔腦〕	疗〔療〕
苹〔蘋〕	邓〔鄧〕	镊〔鑷〕	辽〔遼〕
仆〔僕〕	余〔繙〕	酿〔釀〕	浏〔瀏〕
买〔買〕	递〔遞〕	宁〔寧〕	炼〔煉〕
卖〔賣〕	迭〔疊〕	农〔農〕	练〔練〕
麦〔麥〕	堕〔墮〕	疟〔瘧〕	怜〔憐〕
梦〔夢〕	队〔隊〕	蜡〔蠟〕	邻〔鄰〕
灭〔滅〕	吨〔噸〕	腊〔臘〕	临〔臨〕
亩〔畝〕	摊〔攤〕	来〔來〕	两〔兩〕
发〔發髮〕	滩〔灘〕	垒〔壘〕	俩〔倆〕
飞〔飛〕	瘫〔癱〕	姿〔姿〕	辆〔輛〕
矾〔礬〕	坛〔壇〕	兰〔蘭〕	岭〔嶺〕
坟〔墳〕	叹〔嘆〕	拦〔攔〕	龄〔齡〕

续表 2

卢〔盧〕	拣〔揀〕	昼〔晝〕	灿〔燦〕
沪〔滬〕	茧〔繭〕	毡〔氈〕	仓〔倉〕
芦〔蘆〕	紧〔緊〕	郑〔鄭〕	层〔層〕
炉〔爐〕	烬〔燼〕	嘱〔囑〕	窠〔窠〕
庐〔廬〕	仅〔僅〕	烛〔燭〕	丛〔叢〕
虏〔虜〕	进〔進〕	浊〔濁〕	音〔音〕
卤〔鹵〕	将〔將〕	专〔專〕	涩〔澀〕
录〔錄〕	奖〔獎〕	桩〔樁〕	伞〔傘〕
陆〔陸〕	浆〔漿〕	壮〔壯〕	肃〔肅〕
龙〔龍〕	浆〔漿〕	装〔裝〕	岁〔歲〕
虑〔慮〕	酱〔醬〕	妆〔妝〕	恶〔惡〕
滤〔濾〕	讲〔講〕	状〔狀〕	袄〔襖〕
驴〔驢〕	惊〔驚〕	钟〔鍾〕	肮〔骯〕
沟〔溝〕	竞〔競〕	肿〔腫〕	儿〔兒〕
构〔構〕	惧〔懼〕	齿〔齒〕	艺〔藝〕
购〔購〕	启〔啓〕	彻〔徹〕	亿〔億〕
顾〔顧〕	岂〔豈〕	产〔產〕	忆〔憶〕
国〔國〕	壳〔殼〕	缠〔纏〕	亚〔亞〕
龟〔龜〕	窍〔竅〕	搀〔攙〕	哑〔啞〕
柜〔櫃〕	牵〔牽〕	谗〔讒〕	业〔業〕
广〔廣〕	纤〔纖〕	馋〔饞〕	爷〔爺〕
夸〔誇〕	签〔簽〕	忤〔忤〕	尧〔堯〕
扩〔擴〕	亲〔親〕	尘〔塵〕	钊〔鋤〕
块〔塊〕	寝〔寢〕	衬〔襯〕	药〔藥〕
亏〔虧〕	蓄〔蓄〕	长〔長〕	忧〔憂〕
矿〔礦〕	墙〔牆〕	础〔礎〕	艳〔艷〕
合〔閤〕	枪〔槍〕	刍〔芻〕	厌〔厭〕
汉〔漢〕	庆〔慶〕	疮〔瘡〕	严〔嚴〕
壶〔壺〕	曲〔曲〕	适〔適〕	盐〔鹽〕
沪〔滬〕	琼〔瓊〕	杀〔殺〕	阴〔陰〕
胡〔鬍〕	穷〔窮〕	摄〔攝〕	隐〔隱〕
华〔華〕	习〔習〕	兽〔獸〕	阳〔陽〕
获〔獲〕	戏〔戲〕	审〔審〕	无〔無〕
回〔迴〕	虾〔蝦〕	渗〔滲〕	雾〔霧〕
秒〔秒〕	吓〔嚇〕	绳〔繩〕	洼〔窪〕
汇〔匯〕	写〔寫〕	圣〔聖〕	韦〔韋〕
轰〔轟〕	泻〔瀉〕	胜〔勝〕	卫〔衛〕
饥〔饑〕	胁〔脅〕	术〔術〕	稳〔穩〕
鸡〔雞〕	衰〔衰〕	书〔書〕	网〔網〕
积〔積〕	显〔顯〕	树〔樹〕	屿〔嶼〕
极〔極〕	宪〔憲〕	属〔屬〕	誉〔譽〕
继〔繼〕	县〔縣〕	铄〔鑠〕	跃〔躍〕
夹〔夾〕	象〔像〕	扰〔擾〕	园〔園〕
阶〔階〕	乡〔鄉〕	认〔認〕	渊〔淵〕
节〔節〕	须〔鬚〕	让〔讓〕	愿〔願〕
疖〔癰〕	悬〔懸〕	杂〔雜〕	酝〔醞〕
洁〔潔〕	逊〔遜〕	茜〔薺〕	佣〔傭〕
胶〔膠〕	寻〔尋〕	枣〔棗〕	踊〔踴〕
监〔監〕	滞〔滯〕	脏〔臟〕	痛〔痛〕
舰〔艦〕	质〔質〕	赃〔贓〕	
鉴〔鑒〕	斋〔齋〕	钻〔鑽〕	
硷〔鹼〕	赵〔趙〕	纵〔縱〕	

表 3 《汉字简化方案》第 3 表

乡〔鄉〕	韦〔韋〕	产〔產〕	金〔金〕
见〔見〕	页〔頁〕	专〔專〕	农〔農〕
讠〔言〕	风〔風〕	发〔發〕	宾〔賓〕
贝〔貝〕	乞〔食〕	单〔單〕	齐〔齊〕
车〔車〕	易〔易〕	几〔幾〕	寿〔壽〕
丕〔丕〕	另〔另〕	乔〔喬〕	监〔監〕
钅〔金〕	马〔馬〕	只〔戠〕	吓〔嚇〕
长〔長〕	刍〔芻〕	尧〔堯〕	齿〔齒〕
门〔門〕	师〔師〕	当〔當〕	卖〔賣〕
东〔東〕	冉〔冉〕	圣〔聖〕	龙〔龍〕
仑〔侖〕	重〔重〕	会〔會〕	罗〔羅〕
冈〔岡〕	乌〔烏〕	肃〔肅〕	亦〔亦〕
戈〔戈〕	娄〔婁〕	义〔義〕	
収〔収〕	区〔區〕	兴〔興〕	

加*号的偏旁表示一般只能用于左偏旁。

经过试用,《汉字简化方案》中的三个简化偏旁作了修改:钅(金)改为钅,重(魚)改为鱼,乌(鳥)改为鸟,乌作鳥的简化字。此外,三个简化字作了调整:娄(婁、嘍)改为娄(婁)不兼嘍,彻(徹、澈)改为彻(徹)不兼澈,仓(倉、艮)改为仓(倉)不兼艮。

简化汉字的原则是:“约定俗成,稳步前进。”约定俗成是在社会习惯的基础上因势利导,尽量采用已经流行的简化字,只作必要的修改补充。这是为了既照顾初识字人的容易学习,也照顾已识字人的使用习惯,便利简化字的推行。稳步前进是不把需要简化的字一次解决,而是分期进行;每期简化的字,也不是一次推行,而是分批使用。

《汉字简化方案》的简化方法是:①保留原字轮廓。如“龜”作“龟”、“慮”作“虑”;②保留原字的特征部分而省略其他。如“聲”作“声”、“醫”作“医”;③改换笔画较简的声符。如“擁”作“拥”、“戰”作“战”;④另造新形声字。如“驚”作“惊”、“護”作“护”;⑤同音代替。如“里”代“裏”、“丑”代“醜”;⑥草书楷化。如“專”作“专”、“東”作“东”;⑦会意。如“衆”作“众”、“從”作“从”;⑧用简单的记号代替复杂的偏旁。如“鷄”作“鸡”、“歡”作“欢”、“難”作“难”;⑨采用古旧字体。如“塵”作“尘”等。

1964年2月24日,国务院又批示:《汉字简化方案》中的简化字用作偏旁时,也同样简化;偏旁独立成字时,除讠、乞、乡、钅四个外,其他也要简化。1964年5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根据这个批示编辑出版了《简化字总表》。《简化字总表》分为三个表。第一表是352个不作偏旁用的简化字;第二表是132个可作偏旁用的简化字和14个简化偏旁;第三表是经过偏旁类推而成的1764个简化字;共2238字(因“签”、“须”两字重见,实际为2236字。1986年10月重新发表时又删去“迭”、“象”两字)。

《简化字总表》中有少数字附有注解。例如干是乾(gān)的简化字,但乾坤的乾(qián)并不简化;吁是籲(yù)的简化字,但长吁短叹的吁仍读xū等等。

《简化字总表》有两个附录,一个是1955年文化部和文字改革委员会发布的《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中的39个选用字,这些字习惯上被看作简化字。二是更改了的原来使用生僻字的地名。

海外一些国家华人社会的汉字简化 1969年,新加坡共和国教育部公布第一批简体字502个,供华人社会之用。其中大多与中国公布的简化字相同,不同的只有67字。如场作坊、开作闹等。新加坡把这些字称为异体简化字。1974年,新加坡共和国教育部又公布《简体字总表》,收简体字2248个。其中只有10个是中国尚未简化的。如窗作囪,要作妥等,其余的都与中国的《简化字总表》相同。1976年5月,新加坡共和国教育部又对《简化字总表》进行修订,颁布《简体字总表》的修订本,删除这10个中国没有简化的字和67个异体简化字,做到与中国的《简化字总表》完全一致。

马来西亚于1972年成立“马来西亚简化汉字委员会”,研究拟订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使用的简化汉字。1981年2月28日出版《简化汉字总表》,收简化字2238个,也与中国的《简化字总表》一致。

泰国教育部本来规定兼教华文学校一律不准用中国公布的简化字教学,后来联合国接受中国的简化字,国际上也都承认,于是宣布取消原来的限制,允许一部分兼教华文学校教学。1983年12月18日又同意所有华文学校都可教学。泰国教育部还通知各有关部门发行简体字与繁体字对照的手册,并在兼教华文的小学课本上附加简体与繁体字对照表。

一些使用汉字的国家的汉字简化 日本的简化字 日本使用汉字有1900多年的历史,民间也长期流行一些简化字。1946年11月16日日本内阁训令第二号,内阁告示第三十二号公布为数1850个的《当用汉字表》,其中有131个简化字。这131个简化字中,与中国相同的有53个:宝、参、蚕、惨、痴、虫、担、辞、胆、当、党、灯、点、独、断、堕、国、号、会、挟、尽、来、礼、励、楼、乱、欧、麦、寝、区、声、湿、寿、枢、属、数、双、狭、献、学、医、余、昼、嘱、装、壮、状、随、台、体、万、峡、旧。字形稍异的有9个:

中国:触 写 条 窃 与 誉 妒 殴 称

日本:触 写 条 窃 与 誉 妒 殴 称

南朝鲜的简化字 1983年4月26日南朝鲜《朝鲜日报》公布第一批简化字90个,在《朝鲜日报》上使用。其中与中国相同的有区、国、欧、旧、担、断、独、当、胆、党、乱、礼、宝、寿、属、数、湿、声、辞、随、医、余、蚕、嘱、虫、会、学、献、号29个,字形稍异的有殴、与、誉、触4个。

(叶籁士 傅永和)

Hanzi zhengli

汉字整理 (regulariz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给汉字定量、定形、定音、定序,使它规范化、

标准化的工作。目前,整理工作的对象是现代汉字。主要内容有:定量工作,规定现代汉字的常用字、通用字、专用字(人名、地名、物名、文言等用字)的字数;定形工作,规定现代汉字印刷体和手写体(包括行、草)的字形,确定正体,淘汰繁体、异体;定音工作,规定现代汉字的普通话读音,确定正音,清除不必要的多音、异读;定序工作,规定现代汉字的几种统一的排检法或查字法。目的在制订一套标准现代汉字,以提高学习和使用的效率。

历史上的汉字整理工作 春秋战国至秦汉之间,《史籀篇》、《仓颉篇》、《急就篇》等童蒙识字课本的编纂是规定字量的滥觞。秦代用小篆统一六国文字,东汉许慎编纂《说文解字》来确立解释、书写字形的权威。唐代颜元孙的《干禄字书》、宋代郭忠恕的《佩觿》、宋代张有的《复古编》对当时字形混乱的纠正,都是统一字形的典型例子。始于汉末的反切,兴于魏晋的韵书,目的都是为了统一汉字的读音。《说文解字》创造了部首检字法,辽僧行均的《龙龕手鑑》、金代韩孝彦的《篇海》开了音序检字法的先河。明代梅膺祚的《字汇》则首先采用了笔画排列法。

1913年,读音统一会逐字审定了“国音”,编成《国音汇编草》。1919年第一次出版《国音字典》,1921年,经国语统一筹备会校订后再次出版,定名为《教育部公布校改国音字典》,共收13000多字,可以看作20世纪中国政府第一次正式公布的现行汉字表。1923年,国语统一筹备会成立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1926年完成了《增修国音字典稿》。后又几经修订,于1932年5月定名为《国音常用字汇》,由教育部正式公布。《国音常用字汇》收正字9920字,别体重文(异体字)1179字,变音重文(异读字)1120字,共计12219字,重新确定了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的“新国音”,加收了一些通用的简体字形,正文按注音字母音序排列,从而在字量、字形、字音、字序方面建立了初步的规范。《国音常用字汇》的公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中国整理现代汉字的一块里程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汉字整理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扫除文盲、普及教育受到政府的重视。1952年6月,教育部公布《二千常用字表》,收一等常用字1010个、次等常用字490个、补充常用字500个,作为扫除文盲的标准。

为了减少字数,逐步消除字形混乱现象,1955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公布《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该表收异体字810组,以从俗从简为原则,选用810个正体,淘汰1053个异体。该表从1956年2月1日起在全国正式实施,全国出版的报纸、杂志、图书一律停止使用表中括号内的异体字,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用的打字机盘中的异体字也应逐步改正。只有4种情况可以作为例外:①翻印古书需要用原文原字的;②一般图书已经制成版的或分册尚未出齐的,可以等重排再版时改正;③商店原有牌号不受限制;④用作姓氏的,在报刊图书中可以保留原字,不加变更。

为了缓和汉字难学难用的矛盾,减少学习和书写中的困难,1956年1月国务院公布《汉字简化方案》,收简化字515个、简化偏旁54个。196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又根据国务院关于简化偏旁类推的指示,编制《简化字总表》,共收2236字,确定了简化字的字形规范。1986年10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重新发表《简化字总表》,对原表作了微小的修改(见汉字简化)。

1956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对1100多个异读词和190多个地名的读音进行审议,并于1957年10月、1959年7月和1962年12月先后发表《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初稿》正编、续编和第三编,对现代汉语的语音规范和普通话的推广起了积极作用。随着语言的发展,《初稿》中原审的一些词语的读音需要重新审定,作为语音规范化的标准,《初稿》也亟需定稿,因此,1982年6月恢复了普通话审音委员会,进行修订工作。修订以符合普通话语音发展规律为原则,以便利广大群众学习普通话为着眼点,采取约定俗成、承认现实的态度,对《初稿》原订读音的改动力求慎重。1985年12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广播电视部联合发出通知,决定把修订稿用《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的名称予以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文教、出版、广播等部门及全国其他部门、行业所涉及的普通话异读词的读音、标音均以此表为准。

随着出版事业的发展,消除印刷物上的字形混乱对实现文字标准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1955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组成标准字形研究组。1956年9月研究组拟订《标准字形方案(草案)》。1957年,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进行修订,改名为《汉字字形整理方案(草案)》。1959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召开革新铅字字形座谈会,委托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联合组成汉字字形整理组,于1960年9月拟订《通用汉字字形表(草案)》。1962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再次召开联席会议,并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为汉字字形整理组的组成单位,继续研究工作,于1964年5月制订《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1965年1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布。该表收字6196个,遵循从简从俗、便于学习和使用的原则,提供了通用汉字印刷字体(宋体)的标准字形,规定了表内字的笔画数目、笔画形状、笔画顺序和构件部位,它既是印刷字体的标准,也是写字教学的标准。《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的发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汉字整理工作的一项重要成果,对统一印刷字形,促进用字规范和方便中文信息处理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为了促使汉字排序标准化,196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联合组成汉字查字法整理工作组,对音序、部首、四角号码和笔画笔形等4类查字法方案进行研究讨论,于1964年提出这4类查字法的方案

草案,推荐给各方面试用。1983年6月,又拟订出《统一汉字部首表》(征求意见稿),共立部首201个(见汉字查字法)。

1980年5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提出并通过了关于研究和制订《标准现代汉语用字表》的建议和科研计划(草案),对“五四”以来的现代汉语用字进行全面的、系统的、科学的整理,制订一套标准现代汉字。为了完成这项工作,1983年起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与武汉大学合作,利用电子计算机对1979年版《辞海》所收的16296个单字以及未收的43个单字共16339字的结构进行分析统计,取得了笔画、部件和结构方式等的数据库。1984年,又与山西大学合作,利用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用电子计算机对174900个人名进行抽样综合统计,取得了人名用字的数据库。另外还与中国地名委员会合作,对中国的地名用字进行摸底调查;与北京航空学院等单位合作,用电子计算机对“五四”以来的用字进行字频统计。1986年1月召开的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把“研究和整理现行汉字”定为当前语言文字工作的一项主要任务。汉字整理工作还将在一个较长的时期中进行。

(费锦昌)

Haosayu

豪萨语 (Hausa language) 属阿非罗-亚细亚语系乍得语族。主要分布于尼日利亚北方10个州和尼日尔、贝宁、加纳、喀麦隆等国及乍得湖沿岸。作为商业的共同交际语通行于赤道以北的西非各地。豪萨语有多种方言,主要的有卡诺、扎扎乌、卡契纳、道拉、索科托、哈得贾及包奇等。卡诺方言为标准语。

豪萨人远在11世纪通过撒哈拉之路与阿拉伯国家进行贸易,受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很深。豪萨语有7个元音:a、e、i、o、u、ai、au;有30个辅音:b、c、d、f、g、h、j、k、l、m、n、r、s、sh、t、ts、w、y、z、b、d、k、'y、fy、gy、ky、kw、kw、kw,其中有4个声门辅音:b、d、k、'y,又称声门塞音;有4个声调和长短音,不少词因声调和长短音的变化,引起词义的变化。语法方面,名词有阴、阳性及单、复数的变化。人和动物取自然性别,一般以-a结尾的名词属阴性,其余属阳性,有少数例外。除“一”以外,数词及一个星期的天数均为阴性。12个月份为阳性。形容词也有阴、阳性及单、复数的变化,修饰名词时需和名词的性、数一致。在名词主语后,必须加该名词的代词主语,时态由代词主语加时态指示词构成。豪萨语属主谓型结构,句子的基本语序是主语—谓语—宾语。古豪萨语吸收了大量阿拉伯语词语,特别是宗教、行政、法律、教育等方面的词语。现代豪萨语借用了大量英语词语。

古豪萨语采用以阿拉伯语字母为基础的阿贾米文字,约11世纪起有文献,内容大都是伊斯兰教义及诗歌。19世纪末采用拉丁字母拼写。20世纪初,经过若干改革,成为目前使用的文字,共26个字母。

豪萨语目前不是国语,但它是西非最通行的语言,使

用人口众多。随着尼日利亚迁都至豪萨语区的阿布贾,它的地位和作用将日臻重要。(程汝祥)

hekou

合口 见等韵。

hetizi

合体字 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个字组成的汉字。合体字有两种。一种是从组合的两个成分上来显示字义。如“伐”字从人从戈,表示以戈伐人;“取”字从又从耳,表示提取一个人;“休”字从人从木,表示人倚着树木。这类字文字学上称为会意字。另外一种是两个字组合在一起,一个字表示义类,一个字表示字音。如“河”为水名,从水可声;“张”字指张弓,从弓长声;“经”字指经线,从系丕声;“球”字指玉球,从玉求声。这类字文字学上称为形声字。在现在常用的汉字里形声字占80%以上。

见独体字。

(周祖谟)

hewen

合文 指合写在一起的汉字。汉字是音节文字,一个字代表语言的一个音节。用汉字记录汉语,从古至今一直是字与字分开写的,但在商代的甲骨文和周代的金文里有少数把两个字或三个字合写在一起的,文字学家称之为合文。在商代,合文的形式有4种:

① 上下合写在一起,如𠄎(五十)、𠄎(六十)、𠄎(小甲)。

② 左右合写在一起,如𠄎(太乙)、𠄎(太丁)、𠄎(太甲)、𠄎(示癸)、𠄎(五月)。

③ 包容在一起,如𠄎(雍巳)。

④ 左右上下排在一起,如𠄎(十三月)、𠄎(十三月)。

在金文里,也有少数的合文,如𠄎(小子)、𠄎(小臣)、𠄎(武王)、𠄎(文王)。到秦汉以后就不大出现了。

(周祖谟)

Helany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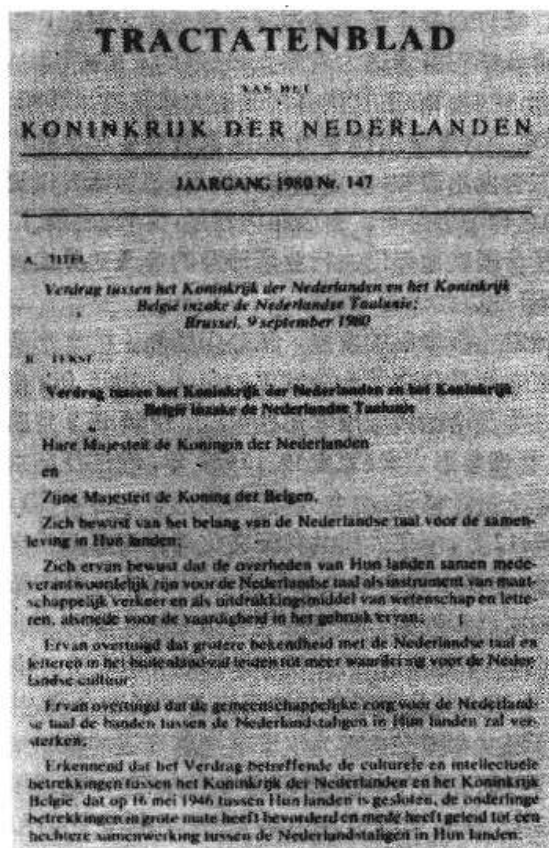
荷兰语 (Dutch language) 荷兰的官方语言,也是比利时的官方语言之一。属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西支。分布于荷兰、苏里南和比利时(在比利时也称弗拉芒语)。南非、加勒比海荷属安的列斯群岛也有使用者。使用总人口约2000万。

荷兰语起源于原始日耳曼语;它的发展可分为3个时期:①古荷兰语(约1100前)。特点是元音a、o、i、u没有弱化现象。②中古荷兰语(1100~1500)。在中世纪标准荷兰语尚未形成,但是由于商业繁荣和其他历史原因,荷兰省方言逐渐成为共同语。当时拉丁语仍然是科学和教会的语言,民间使用的语言叫“迪茨”(Diets,意即民间语言)。英语称荷兰语为Dutch,即来源于此。③近代荷兰语,约始于1600年。当时荷兰南部被西班牙占领,不少弗兰德和布拉邦地区的人移居北方,促进了北方的繁荣和大城市的兴起。南方的印刷业随之北移,文

学得到很大发展,形成了标准荷兰语。它的元音经历了双元音化的过程:û变成ui,如bruun变成bruin(褐色的);i变成ij,如riike变成rijk(富裕的)。原来在南方的印刷出版业随之北移,促进了语言和文学的发展。

荷兰语的口语,从标准语到各地方言有很多变体。标准语用于公众场合、官方谈话、文件和大学讲课,口语在家庭中和跟朋友、同乡交谈时使用。以阿姆斯特丹、海牙和鹿特丹为界的地区方言,比其他方言区的方言更接近于标准荷兰语。

荷兰语有元音13个,辅音19个。单词重音一般落在第一个音节上,荷兰语介于英语和德语之间,它比其他任何日耳曼语言都更接近英语。荷兰语名词的格已经消失,语法形式比德语简单,许多词尾屈折已经脱落。动词有直陈、祈使、虚拟3种语气,有过去分词和现在分词。代词有3种人称。名词分单、复数。双数的概念已不存在。



《荷兰王国条约汇编》(1980, 荷兰文本)

荷兰语使用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文字,拼写法比英语简单、有规则。(沈雁冰)

Hetiyu

赫梯语 (Hittite language) 属印欧语系中已消亡的安纳托利亚语族。曾分布在小亚细亚(今土耳其的亚洲部分)一带。但赫梯语并不是小亚细亚本土固有的语言,而是外来的原始印欧人带进来的。赫梯语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语言,其历史至少可以上溯到公元前1200年前。赫梯语文献是20世纪初在土耳其一个叫做博阿兹柯伊的村庄附近发现的。1986年,学者们同一地方又发现了新

的楔形文字铜质书板,据专家们分析,至少是公元前12世纪赫梯王国使用的书板。这两次发现对于证实赫梯语的存在和推断它的历史发展都有很重要的意义。公元前1400~前500年间,还有用象形文字书写的另一类赫梯语文献,称做象形文字赫梯语。1915年,语言学家B.赫



赫梯语象形文字的碑文(公元前900年)

罗兹尼首次发现了赫梯语和印欧语言之间的相似点,进而确认赫梯语属印欧语系。这一观点很快得到语言学家的普遍认可。赫梯语的发现,一度导致有些学者提出:应把赫梯语看作是印欧语的“姊妹语言”,而不是“后裔语言”,甚至有人建议用“印度-赫梯语系”之说来取代原有的“印欧语系”。这一主张曾经吸引了许多学者,直到后来人们释读了用线形文字B书写的希腊语文献,并证明赫梯语文献不过是跟希腊语文献同时代,“印度-赫梯语系”之说才逐渐失去了先前的魅力。

语音方面,赫梯语保留了印欧语的腭音,当赫梯人离开了印欧人共同体后,这些腭音中的一部分变成了咝音;赫梯语有喉头音,而在其他印欧语言中却消失了。词汇方面,虽然赫梯语保留了印欧语言中的一些古词语特征,但许多词语跟印欧语词并无同源关系,创新成分较多。这是因为赫梯人从印欧人社团中分化出来的时间很早,而且分离的时间特别长。语法方面,赫梯语的语法系统比印欧语中印度-伊朗诸语言和希腊语的语法系统都更简单。在名词屈折变化方面,赫梯语在形式上跟拉丁语和希腊语很相似;前接成分人称代词-mu、-ta、-ši很象拉丁语的me、te、se;主动动词的词形变化与希腊语中的-mi动词的词形变化非常相似。

见印欧语系。

参考书目

W. P. Lehman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INC., 1973.

J. M. Anderson, *Structural Aspects of Language Change*, Longman, 1973.

(黄长著)

Hezheyu

赫哲语 (Hezhen language)

属阿尔泰语系

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分布在中国黑龙江省同江县的街津口、八岔两个民族乡,饶河县西林子乡四排村。赫哲族有1400余人(1982),但只有五六十岁以上的人还能讲本族语。分奇楞话(自称na nio、na bai“本地人”的一部分人使用)和赫真话(自称na nai“本地人”的一部分人使用)。能讲赫真话的人已极少。在国外和赫哲族自称相同、语言相近的有苏联境内那乃族使用的那乃语。由于赫哲语既有满语支语言的特点,也有通古斯语支语言的特点,因此研究者对赫哲语属于哪个语支有不同意见。较新的分类法认为赫哲语属于通古斯语支的那乃次语支。语音方面,有7个元音:a、ə、i、o、u、œ、y,有16个复元音:ai、ei、ia、iə、ua、ui等;有28个辅音:b、p、m、f、w、dz、ts、s、d、t、n、l、r、dz、ts、s、z、dz、ts、j、g、k、x、ŋ、g、q、χ;有不太严整的元音和谐律。语法方面,名词有7个格,有领属范畴,但无复数第一人称(包括式)的领属附加成分。在名词和代词后可以接附加成分-ŋgə/-nəŋgə代替“领格形式的名词、代词加中心词”的结构。例如,ti(那)sukə(斧子)nianinəŋgə(他)(那斧子是他的,nianinəŋgə代替nianiji sukə)。动词有人称形式。多用人称副动词和带格附加成分的形动词作从句的谓语。在词汇中表示渔猎生产活动的词丰富。派生法和合成法都是构词的重要方式。

(胡增益)

hengyan

恒言 见常言。

Hengyanlu

《恒言录》 考证俗语常言的书。清代钱大昕著。本书搜求通常口语中应用的语词,追溯其源流所自,凡6卷,分为吉语、人身、交际、毁誉、常语、单字、叠字、亲属称谓、仕宦、选举、法禁、货财、俗仪、居处器用、饮食衣饰、文翰、方术、成语、俗谚等共19类,约800余条,每条都注明出处。生前未能刻板,嘉庆十年(1805)阮常生(阮元子)据原稿和乌程张鑑的补注刻入《文选楼丛书》内。1958年商务印书馆又得海宁陈鱣于嘉庆十九年(1814)所作《恒言广证》一书传抄稿,乃补《恒言录》而作,仍分为6卷,搜罗俗语更广,因与《恒言录》同时排版印出。

考证通俗词语,远自东汉服虔《通俗文》始,但亡佚已久。宋代无名氏有《释常谈》,王楙《野客丛书》说龚颐正有《续常谈》,收罗不广。《恒言录》一书比清人翟灏《通俗编》体例更为谨严,没有翟书那样芜杂。钱大昕弟大昭又著《述言》6卷,近代罗振玉有《俗说》1卷,互相补益,可资参考。

(周士琦)

Hongbaote

洪堡特, W. F. (Wilhelm Freiherr von Humboldt 1767~1835) 一译洪堡。德国语言学家、

哲学家、政治家。1767年6月22日生于波茨坦,1835年4月8日卒于柏林附近的泰格尔。1787~1789年就读于法兰克福大学和格廷根大学,1801~1810年任普鲁士宗教和教育大臣,致力于教育事业的改革。1809年创建柏林大学,即现在的洪堡大学。1810~1819年任外交官。1919年以后辞去公职,专门从事学术研究。

洪堡特研究过巴斯克语、美洲语言、埃及语言、梵语、汉语、日语等,是比较语言学创始人之一。他的语言学著作《论爪哇岛的卡维语》在他去世后刊行(3卷,1836~1840),其中的前言为语言学研究开辟了新道路。



洪堡特认为,“语言不是一个实体或已完成的事物,而是行动”,是人的心灵不断地用声音来表达思想。他说,民族语言具有本民族的精神特征,用特殊方式来实现本民族关于语言的理想。语言有比较完善的和比较不完善的,但是“即使是最野蛮的部落的语言也不应该受到谴责或轻视,因为每一种语言都是人类原有的创造语言的能力的表现”。

洪堡特把世界语言(除汉语外)分为屈折语、粘着语和综合语3种,但是他说一切语言都或多或少地包含3种成分。他认为梵语每一个词都结构紧密,是最发达的语言;汉语虽然在单词方面没有语法形式,却给人以深刻的庄严感。

洪堡特的理论启发了他的学生H. 斯坦塔爾和心理学家W. 冯特。近年来欧洲语言学有L. 魏斯格贝尔等“新洪堡特派”,美国的F. 博厄斯、E. 萨丕尔和B. L. 沃尔夫也受到他们的影响。

(董光熙)

hongyin

洪音 见等韵。

houyin

喉音 指声门和会厌一带发出的辅音。狭义的“喉”只表声门,在那里发元音、浊辅音时声带颤动,如塞音[p],擦音[h]、[ʁ]等。后来范围扩大也用来指小舌、舌根音[x]、[χ]等。等韵家用来指影、晓、匣、喻4个声母,现代拟测的《切韵》音是影[pʰ]、晓[x]、匣[ɣ]、喻[j]。章炳麟把舌根辅音[k]、[ŋ]等也叫喉音,把原属喉音的影母叫牙音,违反了习惯,没有得到人们的承认。

(俞敏)

houqi benzi

后起本字 指在假借字基础上造的汉字。古人字少,一个字有时代表几个意义不同而语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用,后来在原本借用的字的基础上造出与词义相应的新字,这样的新字在文字学上称为后起本字,也就是后起的

正字。例如斋、剂、脐、跻、齏、荠这些字,开始时借“齐”字来表示。《论语·乡党》:“齐必变食,居必迁坐。”《周礼·天官·亨人》:“掌共鼎饔,以给水火之齐。”《左传》庄公六年:“若不早图,后君噬齐。”《礼记·乐记》:“地气上齐,天气下降。”《周礼·天官·醢人》:“掌共五齐七菹。”《礼记·玉藻》:“趋以采齐。”“齐”都是假借字。后造斋、剂、脐、跻、齏、荠,是表示上述各字义的正字。有的后起本字,与前用的假借字,只有字义上的关联,字形上并无关联,如“罷”假借指疲困意,后造“疲”字。

本有其字的假借字与本字,是共时性的关系,后起本字与前用的假借字是历时性的关系,是今字与古字的关系。

(曹先鞭)

hu

呼 见等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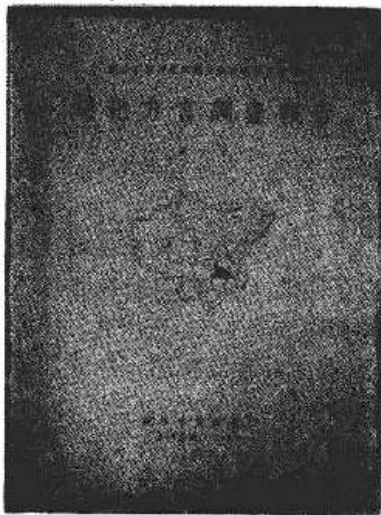
Hubei Fangyan Diaocha Baogao

《湖北方言调查报告》(Report on a Survey of the Dialects of Hubei) 20世纪30~40年代汉语方言地区性调查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赵元任、丁声树、杨时逢、吴宗济、董同龢(1910~1963)编著。194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列为专刊由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出版。

该书内容包括分地报告(卷一)和综合报告(卷二)两大部分,分卷之前有长达40页的总说明。分地报告排列64个调查点的材料,

每份报告都有发音人履历、声韵调表、声韵调描写、与古音比较、同音字表、音韵特点、注音读物等内容。综合报告的内容有综合对比材料,湖北方言特点和分区说明,湖北方言地图等。报告在对比各地记音材料、分析各地方言特点的基础上把全省方言分为4区:第1区西南官话,第2区楚



《湖北方言调查报告》封面

语,第3区赣语,第4区湘语。音韵特点:第1区声调分阴平、阳平、上声、去声4类,古入声字归阳平,没有阳去调;其他3区都有入声,古去声分为阴去、阳去两类。方言地图66幅,包括音类图、特字图、词类图、综合图和分区图。该书是汉语方言调查研究中篇幅最大的一部著作,内容丰富,编排合理。对方言调查工作和编写方言调查报告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该书偏重语音,在比较音韵方面只限于跟古音的历史比较,缺少跟共同语的平面比较。(参见彩图插页第27页)

(颜逸明)

Hunan Fangyan Diaocha Baogao

《湖南方言调查报告》(Report on a Survey of the Dialects of Hunan) 见汉语方言。

huxun

互训 (mutual commenting) 两个字互相训释,即用甲解释乙,又用乙解释甲的训诂方式。因为语言里有很多同义或义近的词,在经传注解和字书及训诂书里往往采用这种方法解释词义,避免用繁琐的语句作说明。汉代许慎《说文解字》里就很多,例如:“老,考也”,“考,老也”;“更,改也”,“改,更也”;“追,逐也”,“逐,追也”;“寄,托也”,“托,寄也”;“奉,承也”,“承,奉也”;“切,刳也”,“刳,切也”;“极,栋也”,“栋,极也”。这些都是互训的例子。后代的字书也多袭用《说文》。这种互训的方法,固然简便,但遇到两者之中有一个不懂,或两者意义有广狭之分,解释就失去作用。所以现代的辞书字典里就尽量不用互训的方法,而代之以精确的说明。

(周祖谟)

Huayang Liangshuijing Kejliahua Jiyin

《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A Hakka Dialect in Huayang District Sichuan). 记录地点方言口语的著作。董同龢(1910~1963)著。1936年1月完稿,原载194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9本。1956年8月北京科学出版社重印出版。全书11.7万字。“前言”简单地说明了客家入川的经过、四川客家话应用的情况以及本书记音和处理材料的方法。正文分3部分。第1部分“标音说明”,内容包括声母、韵母、声调、字音的连读变化、句调、音韵表等。第2部分“记音正文”共分20段,有对话、独白、祷词、童谣、故事等。第3部分“语汇”,约3000个词语,按音序排列,并附有普通话释文。本书研究的是在四川方言包围之中的客家方言,较多地记录了当地人成段的口语材料。

(饶秉才)

Huayi yiyu

华夷译语 中国明清两代会同馆和四夷馆(清初改为四译馆)编纂的多种语言与汉语对译的辞书的总称。语种主要有蒙古、女直(女真)、高昌(畏兀儿)、达达(鞑靼)、西番(藏)、河西(唐古特)、保俾(彝)、僮(壮)、八百、百夷(傣)、南掌(老挝)、占城、真腊(柬埔寨)、安南(越南)、日本、琉球、朝鲜、暹罗、缅甸、苏禄(菲律宾)、爪哇、苏门答腊、满喇加、回回(波斯)、西天(梵),以及英、法、德、意、拉丁、葡萄牙等。译语一般是词汇(杂字)对译,少数附有公文(来文)的对译。杂字分门排列,从11~20门,收词多在500~2000之间,每个词下列有汉字注音、汉义、原字(民族文字)三项(或前两项)。

国外学者一般依时代先后对译语加以分类。1930年日本石田幹之助分为3种:甲种为明代火原诘用汉字记写蒙古语的《华夷译语》(见图);乙种为四夷馆本,收杂字和来文,有原字;丙种为会同馆本,仅收汉字注音的杂字,

没有来文和原字;1948年法国伯希和增补丁种,即故宫所藏的42种本,仅收杂字,大都有原字。

从语文学观点看,中国学者认为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有原字的,包括乙种及丁种的绝大部分;第二类无原字的,包括甲、丙两种及丁种的琉球馆译语。有原字的通常比无原字的学术价值大一些。因为用原字注音较确切,

从所附来文中也可看出语法的梗概。第二类中有的由于成书较早,保存了一部分古语的面貌,如朝鲜馆、琉球馆的译语,价值较高。这些译语多数保留了较早的拼写形式和语音面貌,因此对拟定古音有一定价值。当然,第一类也有不同情况。以暹罗馆的两种译语为例:一为明抄本,一为故宫本(《暹罗番书》),依理明抄本应优于故宫本,但明抄本完全依据当时口语,而且 $\tilde{n}$ (l)和 $\tilde{r}$ (r)不分,明显系汉族译字生所记,而故宫本则系该国素养的人所作,保存了许多古读痕迹,远胜于明抄本。(参见彩图插页第31页)

(闻宥 史有为)



用汉字记写蒙古语的《华夷译语》

huayu yuyanxue

话语语言学 (text linguistics) 新开拓的语言学科。它探索言语内部构成的规律,包括3个部分:话语理论、话语语法和话语修辞。

话语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连贯性话语。所谓连贯性话语是指任何在内容和结构上构成一个整体的言谈或文字,包括整篇文章、整部作品。话语语法主要研究大于句子的言语单位(超句统一体),借助话语分析来揭示连贯性话语的横向线性扩展规律。话语修辞主要研究大于超句统一体的言语单位——节、章、篇,借助修辞分析来揭示连贯性话语的纵向线性扩展规律。研究句际关系和句际连接手段,是分析连贯性话语的前提;研究话语的结构及其交际功能、交际条件,分析篇章结构及表达方式,是探索连贯性话语线性扩展规律的基础。

话语语言学用来进行话语分析的基本方法叫“句子实际切分法”。这种方法是捷克语言学家V. 马泰休斯提出来的。句子实际切分法是一种功能-意义分析法。马泰休斯根据词语在句中不同的交际功能,把句子切分为两个表意部分:一是叙述的出发点,二是叙述的核心。德国语言学家K. 布斯特把叙述的出发点称为主题,把叙述的核心称为述题。主题指叙述的对象,表示已知的信息或不重要的内容,述题指对叙述对象的说明,表示新的信息

或重要的内容。句子实际切分法就是把句子切分成主题和述题的方法。例如：

家乡的日头/从东山上冉冉升起。(《北方,我的北方》)

主题 述题

河水上/跳动着月光。(《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主题 述题

因为离海近,/所以这里的集市最精彩不过。(《芦花虾》)

主题 述题

如果没有拉夜网的,/海边上是安静的。(《拉拉谷》)

主题 述题

对连贯性话语进行实际切分,最能显示主题和述题之间的关系。在交际过程中,通常都是主题在前,述题在后。这是连贯性话语构成的基本规律。如果前面一个句子的主题和述题与后面一个句子的主题和述题,分别叙述两个并存的客观事物,话语横向线性扩展为并列式或平行式:

主题 / 述题。 主题 / 述题。

渠岸、路旁和坟地上的迎春花/谢了。肥壮而且显得大方的蒲公英/开了。温柔而敦厚的马兰花啊,/也在路旁讨人喜欢哩。(《创业史》)

风/把地面刮干净了。风/把田野刮成了斑斓的颜色。风/把高粱穗子刮黄了。(《暴风骤雨》)

如果前面一个句子的述题为后面一个句子的主题,而第二个句子的述题又成为第三个句子的主题,这时话语横向线性扩展呈现为链式:

主题 / 述题。 主题 / 述题。 主题 / 述题。

我/站起身,捎上行李又上路了。大路/被人踩车辗得平平展展,弯弯曲曲地上了大坝。走上大坝,/便被绿色的浓荫包裹了。(《从疾驶的车窗前掠过的》)

九年来他的心/好象一个平静的湖泊。尽管湖泊的深处有旋涡,有波动,甚至有火山的爆发和死灭,/然而湖面是愈来愈平静了。平静的湖面/是美丽的,每个人都可以从湖面上看到/自己的倒影,而且,倒影/往往比活人更有魅力。(《蝴蝶》)

句子实际切分法与所谓的“成分分析法”不同。成分分析法的理论基础是逻辑学,它根据词语在句中的句法作用,把句子的各组成部分划分为主要成分(主语和谓语)和次要成分(定语、宾语、状语)。实际切分法的理论基础是心理学,它根据词语在句中的交际功能,把句子切分为主题和述题。实际切分理论受到了苏联语言学家的重视。1961年出版了И. П. 拉斯波波夫著的《句子实际切分法》,1976年出版了И. И. 科夫图诺娃著的《现代俄语》及О. А. 克雷洛娃和С. А. 哈夫洛尼娜合著的《俄语词序》。1970年苏联科学院俄语研究所出版的《现代俄语语法》及1980年苏联科学院出版的《俄语语法》,

都是以实际切分理论为依据来阐述词序问题,分析句子的各种交际结构形式和交际功能,研究句子的实际切分与上下文和语言环境的关系。

话语语言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它同逻辑学、心理学、心理语言学、社会心理学、语法学、修辞学、信息论、言语行为理论、翻译理论等学科都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话语语言学与中国的“文章学”十分相近。文章学研究在中国已有悠久的历史,不过最初不用“文章学”这个名称。最著名的著作是梁代刘勰的《文心雕龙》。在该书的《章句》篇里,刘勰把语言单位分为字、句、章、篇:“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同时还指明了它们之间的关系:“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讲到篇章结构时,他说:“然章句在篇,如茧之抽绪,原始要终,体必鳞次。启行之辞,逆荫中篇之义;绝笔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绮交,内义脉注,跗萼相衔,首尾一体。”最早提出“文章学”这个名称的是北宋时代的理学家程颐。自1925年起,龚自知、蒋祖怡、张志公、林祝敏、张寿康等人曾先后发表论著,讨论文章学问题。

话语语言学的理论基础是20世纪初在欧洲奠定的。在这方面,捷克语言学家们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认为语言是一个功能体系,研究语言必须同人们交际的具体语言环境联系起来,同社会与文化联系起来。马泰休斯创立的句子实际切分理论使句法研究摆脱了赤裸裸的形式逻辑的窠臼,成为一门新的学科。

苏联话语语言学开创于1948年。在这一年,H. C. 波斯别洛夫撰写的《复杂的句法整体及其主要结构特征》及И. А. 菲古洛夫斯基发表的《从单句句法到话语句法》两文,奠定了苏联这门学科的基础。苏联话语语言学者从一开始就形成一个特殊的学派,它重视研究超句单位——复杂的句法整体(又称散文段)。

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上半期,话语语言学尚未引起各国语言学家们的足够重视。从60年代下半期起,特别是到了70年代,话语语言学才逐渐形成一门独立的语言学科。德国语言学家R. 哈尔维克、W. 德莱斯勒、S. 施密特以及H. 温利希等人对话语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都做了详细的叙述。他们主要研究人类正确交际的前提和条件以及话语与语境和上下文的相互关系。

在此期间,话语语言学在苏联成为许多学术讨论会的重要议题。1970、1974、1975、1977这几年,都开过专门讨论话语和话语分析等问题的会议。70年代,苏联语言学家在应用句子实际切分法研究俄语词序、分析句际关系和连接手段、研究超句统一体的结构特点及其结构-意义类型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近年来尤其重视研究话语修辞,已出版了Г. Я. 索尔甘尼克、B. B. 奥金佐夫、O. И. 莫斯卡里斯卡娅等人的著作。

目前,话语语言学正处在一个形成阶段,各国语言学

家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还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

参考书目

И. И. Ковтунова, *Современный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Порядок слов и актуальное членение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росвещение», Москва, 1976.

О. И. Москаль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текст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Москва, 1981.

Т. М. Николаева, *Лингвистика текста и проблемы общей лингвистики*, «Известия АН СССР, Сер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языка», Т. 36, № 4, 1977.

В. В. Одищев, *Стилистика текст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0.

Г. Я. Солганик, *Синтаксическая стилистика, Сложное синтаксическое цел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Москва, 1973.

(王福祥)

·Huang Gongshao·

黄公绍 见韵书。

Huang Kan

黄侃 (1886~1935) 中国音韵训诂学家。原名乔馨,后改名侃,字季刚,湖北蕲春人。受业于章炳麟。历任北京大学、东南大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金陵大学等校教授。在音韵学领域,他主要提出以下3个观点:①古韵分28部,晚年又提出闭口韵平入各分3部问题;②古音分19纽;③古音上声作平声。

黄侃的古韵28部,采用的是古韵三分法。他吸收了戴震入声独立的见解,继承了前人的古韵研究成果,把古韵定为28部:

阴声: 歌灰 齐模侯萧豪咍

阳声: 寒痕先 青唐东 冬登 覃添

入声: 曷没屑 锡铎屋 沃德 合帖

28部的韵目,都是用“古本韵”。

黄侃的古本韵是从等韵原理出发,认为凡是纯一、四等韵都是古本韵,按《广韵》韵目确定了32个古本韵。这32个古本韵,除了上文28部的28个韵以外,还有4韵:歌韵的合口戈韵,曷韵的合口末韵,寒韵的合口桓韵,痕韵的合口魂韵。这就是有名的黄侃古韵28部和古本韵说,在音韵学界有比较大的影响。不过按照黄侃古本韵的理论,古本韵不应是32个,而应是34个。因为《广韵》的谈、盍两韵都是一等韵。后来黄侃重新解释了这个问题,他采取以收-ŋ尾的韵部与收-m尾对校的方法,认为谈相当于痕,盍相当于没,应该独立。但是因为例字太少,他没有把这个主张正式公布。

黄侃的19纽说,也是在继承前人古纽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认为凡是在一、四等韵(即古本韵)中出现的声纽就是古本纽,共有19个。它们是:

见(群)溪疑

晓匣影(喻三喻四)

端(知照)透(彻穿审)定(澄神禅)泥(娘日)来

帮(非)滂(敷)並(奉)明(微)

精(庄)清(初)从(床)心(山邪)

括号里的是隶属于古纽的《切韵》音系声纽。黄侃19纽比28部的影响小些。

黄侃《诗音上作平证》一文中,指出《诗经》上声与平声押韵的现象,意思是在《诗经》时代没有上声。《广韵》的上声在《诗经》时代与平声是同一个声调。这个观点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

(俞敏)

Huizongyu

徽宗语 流行在北京、天津一带盲艺人和迷信职业者中间的一种切口,传说是宋徽宗发明的,俗称“瞎子话”。说这样的话,主要为保密,因为迷信职业有好多话不便让外人知道。保密的办法是把一个音节拆成两个,拿声母加介音u(如果有的话)作一截,后头加上-ai;再拿韵母作一截,前头加上g-。这样,“抽头”chōu tóu就说成chāi-gōu tāigōu。如果声母后头有i、ü介音或是主元音,ai就变成-ei,g-就变成j-。这样,“你”nǐ就说成niēji,“吃饭”chīfàn偶然也可以说成chāili fāigàn。这类资料可以为音韵学研究提供旁证。研究徽宗语,可以推定说当地方言的人的声韵分类的直感,供研究者分析声韵作参考。如从chāili切“吃”可以懂得民间文艺为什么把“吃”归入“一七辙”,因为这是符合民间艺人的听觉或直感的。

(俞敏)

Huihuwen

回鹘文 (Uighur script) 也称回纥文。回鹘(古代维吾尔)人使用的拼音文字。自唐代至明代(8~15世纪)主要“流行于今吐鲁番盆地和中亚楚河流域。这种文字的文献,近代发现于哈密、吐鲁番和甘肃地区。11世纪的《突厥语词典》、13世纪的《蒙鞑备录》都曾记述过这种文字。根据《九姓回鹘可汗碑》等文物推断,回鹘文是在宰利(粟特)文字母的基础上形成的。回鹘文从什么年代开始使用,目前尚无定论。10世纪后,今新疆南部回鹘人虽已改用阿拉伯字母,但回鹘文并未完全停止使用。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重抄的《金光明经》回鹘文译本,证明这种文字一直到17世纪仍在用。字母数目各个时期不尽相同,最少为18个,最多达23个。23个字母中有5个字母表示8个元音,18个字母表示22个辅音。在早期文献中有的字母表示两个以上的语音,在后期文献中才在相应字母左方或右方加一个点或两个点予以区别。字母分词首、词中、词末等形式。有句读符号。在摩尼教文献中还在句读符号上加红色圆圈。段落用对称方形的四个点“··”隔开。有印刷体和书写体。书写体又分楷书、草书两种。楷书用于经典,草书用于一般文书。行款起初由右往左横写,后改为从左往右竖写。

回鹘文字母在元代为蒙古族所采用,形成后来的蒙古文。16世纪以后,满族又仿照蒙古文创制了满文。

现存回鹘文文献甚多,包括宗教(佛教、摩尼教、景教)经典、医学著作、文学作品、公文、契约(图1、2)、碑铭等。明代《高昌馆杂字》传到欧洲后,德国人J. 克拉普罗特(1783~1835)进行研究,于1820年出版《回鹘语

言文字考》。1870年,匈牙利人H. 万伯里(1832~1913)发表《回鹘语文献与福乐智慧》。19世纪末,俄国人B. B. 拉德洛夫(1837~1918)翻译并出版了《福乐智慧》全文。随着20世纪中国西北考古工作的兴起,已出土大量文献,多存于欧洲。中国学者袁复礼(1893~19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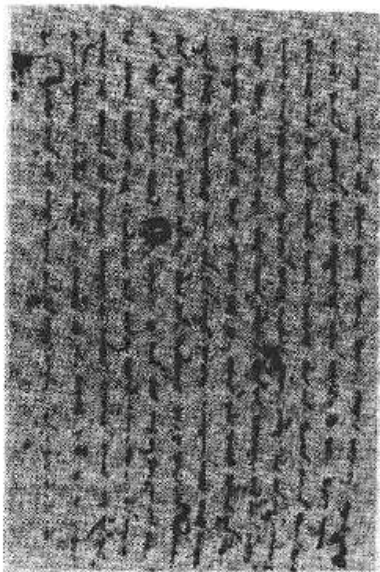


图1 回鹘文类身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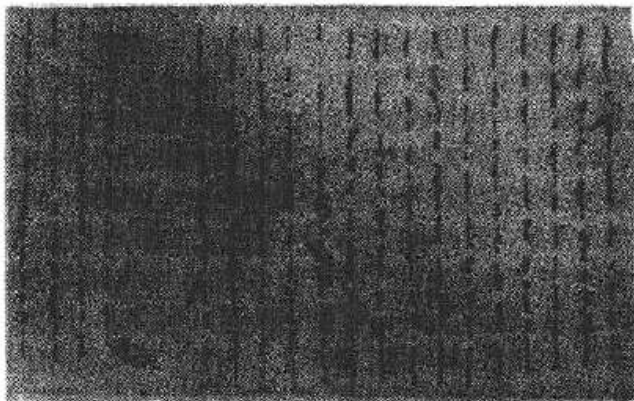


图2 尤素夫·哈斯·哈吉布用回鹘文写的《福乐智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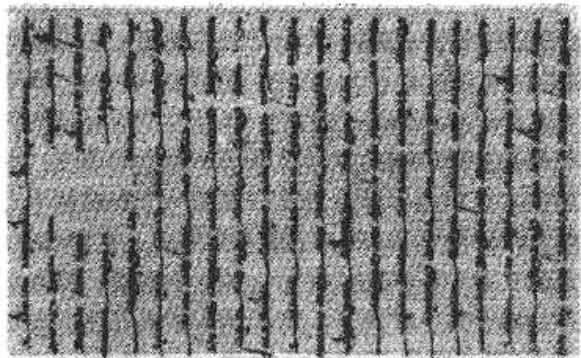


图3 新疆哈密县出土的回鹘文《弥勒会见记》

1930年在新疆发现的《回鹘文写本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残本),经历史学家冯家昇(1904~1970)整理,于1951年影印出版。近年在新疆陆续发现新的文献(图3)。

参考书目

冯家昇:《回鹘文写本“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研究报告》,考古学专刊丙种第一号,中国科学院出版,北京,1953。

C. E. Малов, Памятники древнетюрк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АН СССР, Москва-Ленинград, 1951.

A. von Gabain, Alttürkische Grammatik, Wiesbaden, 1974.

(李森)

huiyi

会意 见六书。

Huiteni

惠特尼, W. D. (William Dwight Whitney 1827~1894) 美国语言学家。生于1827年2月9日,卒于1894年6月7日。1848年在耶鲁大学学梵语,后从德国学者研究梵语并与他们合校梵文经典。1854年回耶鲁大学教授梵语,直至1894年。所著《语言的生命与发展》(1875)、《梵语语法》(1879)问世后,法、德两国即有译本。F. de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对于惠特尼一再赞赏。惠特尼受到欧洲学者推崇,是因为①他说语言是符号,是约定俗成的,但又有系统,这种理论在当时是先进的;②他关于语言的论述不是追溯词源,也不是比较词形,而是通论语言的性质,因此,有的欧洲语言学家称他为“普通语言学的创始人”;③他的《梵语语法》被当时德国语言学家B. 德尔布吕克誉为“我们有的最好的梵语语法”;他对波你尼的《语法》有深刻的研究;他是美国梵语研究的开路人。惠特尼主编的百科性《世纪词典》(6卷,1889~1891)以解释精详著称。

(许国璋)

hunyan

浑言 指对同类事物的统称。如果对同类事物细加分别,辨析异同,另加别名,那就是“析言”。例如《说文解字》走部:“走,趋也。”段玉裁注:“《释名》:‘徐行曰步,疾行曰趋,疾趋曰走。’此析言之。许浑言不别也。”又鸟部:“鸟,长尾禽总名也。”段注:“短尾名隹,长尾名鸟,析言则然,浑言则不别也。”“浑言”段玉裁也称之为“统言”。例如《说文》示部:“祭,祭祀也。”“祀,祭无已也。”段注:“统言则祭祀不别也。析言则祭无已曰祀。”

又古人用事物义类相近的单词组合而成的复合词,通常总是统称。析言之,则意义不完全相同。见于前代古书的训诂,例如:

言语 《诗·大雅·公刘》毛传:“直言曰言,论难曰语。”

雕琢 《诗·棫朴》毛传:“金曰雕,玉曰琢。”

商贾 《周礼·大宰》郑玄注:“行曰商,处曰贾。”

陶冶 《书·梓材》伪孔传:“治土器曰陶,治金器曰冶。”

离别 《楚辞·离骚》王逸注:“近曰离,远曰别。”

绵絮 《急就篇》颜注:“精者为绵,粗者为絮;新者为绵,故者为絮。”

这些复合词后代一直使用,相沿至今也就不细加分别了。

(周祖谟)

J

Jiqi fanyi

机器翻译 (machine translation) 又称自动化翻译。应用语言学中的一门新兴的实验性学科,研究如何利用电子计算机按一定程序自动进行自然语言之间的翻译问题。

20 世纪 30 年代初,法国科学家 G. B. 阿尔楚尼提出了用机器来进行翻译的想法。1933 年,苏联发明家 И. И. 特罗扬斯基设计了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的机器,并在同年 9 月 5 日登记了他的发明。但是,由于 30 年代技术水平还很低,他的翻译机没有制成。1946 年电子计算机问世后,英国工程师 A. D. 布斯和美国工程师 W. 韦弗在讨论电子计算机的应用范围时,提出了利用计算机进行语言自动翻译的想法。1949 年,韦弗发表了一份以《翻译》为题的备忘录,正式提出了机器翻译的问题。1954 年,美国乔治敦大学在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协同下,用 IBM-701 计算机进行了世界上第一次机器翻译试验,此后,苏联、英国、日本、中国等国,也相继进行了机器翻译试验。1966 年 11 月,美国科学院语言自动加工咨询委员会公布了一个题为《语言与机器》的报告,对机器翻译采取否定态度,一些国家的机器翻译研究转入低潮。70 年代初,由于现实的需要及技术的进步,机器翻译又重新兴旺起来,现在仍在不断发展中。美国、加拿大、法国、日本、苏联都先后建立了一批翻译能力较强的机器翻译系统。有的系统已提供给一些单位试用,如法国的俄法机器翻译系统。有的系统已在一定范围内正式投入使用,如加拿大的 TAUM-METEO 英法机器翻译系统,用于天气预报。还有的系统已投入市场,如美国的 SYSTRAN 系统和 WEIDNER 系统。前者在大计算机上运行,每小时能译几十万词,但译后需加工。后者在微型机上运行,速度虽比前者慢,但仍比人译得快。

中国机器翻译研究起步于 1957 年,是世界上第 4 个开始搞机器翻译的国家,60 年代中期以后一度中断,70 年代中期以来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黑龙江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单位都在进行机器翻译的研究,上机进行过实验的机器翻译系统已有十多个,翻译的语种和类型有英汉、俄汉、法汉、日汉等一对一的系统,也有汉译英、法、日、俄、德的一对多系统。此外,还建立了一个汉语语料库和一个科技英语语料库。中国机器翻译系统的规模正在不断地扩大,内容正在不断地完善。

机器翻译的研究是建立在语言学、数学和计算机科学这 3 门学科的基础之上的。语言学家提供适合于计算机进行加工的词典和语法规则,数学家把语言学家提供

的材料形式化和代码化,计算机科学家给机器翻译提供软件手段和硬件设备,并进行程序设计。缺少上述任何一方面,机器翻译就不能实现,机器翻译效果的好坏,也完全取决于这 3 个方面的共同努力。

整个机器翻译的过程可以分为原文分析、原文译文转换和译文生成 3 个阶段。

在具体的机器翻译系统中,根据不同方案的目的和要求,可以将原文译文转换阶段与原文分析阶段结合在一起,而把译文生成阶段独立起来,建立相关分析独立生成系统。在这样的系统中,原语分析时要考虑译语的特点,而在译语生成时则不考虑原语的特点。在搞多种语言对一种语言的翻译时,宜于采用这样的相关分析独立生成系统。也可以把原文分析阶段独立起来,把原文译文转换阶段同译文生成阶段结合起来,建立独立分析相关生成系统。在这样的系统中,原语分析时不考虑译语的特点,而在译语生成时要考虑原语的特点,在搞一种语言对多种语言的翻译时,宜于采用这样的独立分析相关生成系统。还可以把原文分析、原文译文转换与译文生成分别独立开来,建立独立分析独立生成系统。在这样的系统中,分析原语时不考虑译语的特点,生成译语时也不考虑原语的特点,原语译语的差异通过原文译文转换来解决。在搞多种语言对多种语言的翻译时,宜于采用这样的独立分析独立生成系统。

迄今存在和正在研制的机器翻译系统按其加工的深度可以分为 3 种类型:第 1 类是以词汇为主的机器翻译系统;第 2 类是以句法为主的机器翻译系统;第 3 类是以语义为主的机器翻译系统。

从美国乔治敦大学的机器翻译试验到 50 年代末的系统,基本上属于第 1 类机器翻译系统。它们的特点是:①以词汇转换为中心,建立双语词典,翻译时,文句加工的目的在于立即确定相应于原语各个词的译语等价词;②如果原语的一个词对应于译语的若干个词,机器翻译系统本身并不能决定选择哪一个,而只能把各种可能的选择全都输出;③语言和程序不分,语法的规则与程序的算法混在一起,算法就是规则。由于第一类机器翻译系统的上述特点,它的译文质量是极为低劣的,并且,设计这样的系统是一种十分琐碎而繁杂的工作,系统设计成之后没有扩展的余地,修改时牵一发而动全身,给系统的改进造成极大困难。

60 年代以来建立的机器翻译系统绝大部分是第 2 类机器翻译系统。它们的特点是:①把句法的研究放在第一位,首先用代码化的结构标志来表示原语文句的结构,再把原语的结构标志转换为译语的结构标志,最后构成译语的输出文句;②对于多义词必须进行专门的处理,根据上下文关系选择出恰当的词义,不容许把若干个译文词一揽子列出来;③语法与算法分开,在一定的条件之下,使语法处于一定类别的界限之内,使语法能由给定的算法来计算,并可由这种给定的算法描写为相应的公式,从而不改变算法也能进行语法的变换,这样,语法的

编写和修改就可以不考虑算法。第2类机器翻译系统不论在译文的质量上还是在使用的方便上,都比第1类机器翻译系统大大地前进了一步。

70年代以来,有些机器翻译者提出了以语义为主的第3类机器翻译系统。引入语义平面之后,就要求在语言描写方面作一些实质性的改变,因为在以句法为主的机器翻译系统中,最小的翻译单位是词,最大的翻译单位是单个的句子,机器翻译的算法只考虑对一个句子的自动加工,而不考虑分属不同句子的词与词之间的联系。第3类机器翻译系统必须超出句子范围来考虑问题,除了义素、词、词组、句子之外,还要研究大于句子的句段和篇章。为了建立第3类机器翻译系统,语言学家要深入研究语义学,数学家要制定语义表示和语义加工的算法,在程序设计方面,也要考虑语义加工的特点。

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机器翻译系统都是第2类机器翻译系统,研究的重点主要放在句法方面。有些系统以句法为主,适当增加了一些语义参数,以解决句法上的歧义问题。由于语义研究还不成熟,建立第3类机器翻译系统还有相当大的困难。

参考书目

刘涌泉等著:《中国的机器翻译》,知识出版社,上海,1984。

B. Henisz-Dostert et al, *Machine Translation*, Mouton Publishers, The Hague-Paris-New York, 1979.

刘涌泉,高祖舜,刘倬:《机器翻译浅说》,科学普及出版社,北京,1964。

(刘涌泉 冯志伟)

jizhu fanyi

机助翻译 (machine-aided translation)

由电子计算机辅助人进行翻译。这是一种初级的、自动化程度较低的机器翻译系统(见机器翻译)。由于在整个翻译过程中,人机交互操作,因而也叫人机对话式机器翻译。

根据自动化程度的高低,又可分出不同类型的机助翻译。①最简单的机助翻译系统可归结为一部机器词典(或称自动词典)。这样的系统只加工词汇,帮助人把单词及成语的意义查出(某些多义词也还要求人最后确定)。至于语法分析和转换生成等工作,则由人来完成。②比较复杂的机助翻译系统具有语法分析的能力,基本上能帮助人把原文的语法关系找出来;至于如何进行转换和生成译文,则由人来完成。③更为完善的机助翻译系统既具有语法分析能力,又具有转换生成能力。计算机在复杂的加工过程中,凡是能自己解决的问题,就一直运行下去,遇有难题便报警向人提问,请求解答。人通过键盘给予指示,机器根据新的指示继续进行,直到整个翻译过程结束。

机助翻译系统,尽管翻译速度不够快,但翻译质量尚能得到保证,因而作为一个阶段性的产品,还是有其实用价值的。据报道,采用机助翻译系统的翻译人员能使自己的翻译速度提高4~5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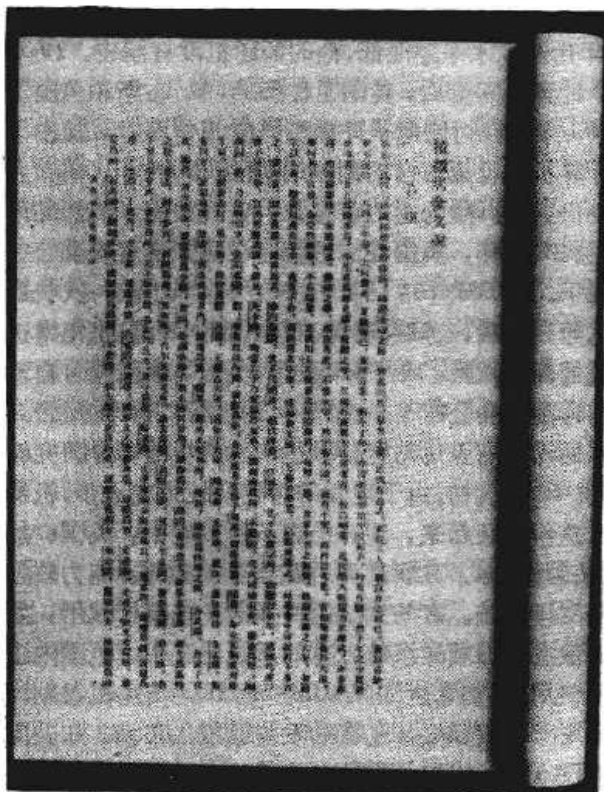
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一些机助翻译系统可逐

步减少人工参与,向全自动的机器翻译系统过渡。

(刘涌泉)

Jiweijū Jinwenshuo

《积微居金文说》 解释铜器铭文的书。杨树达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1952年9月科学出版社出版。本书以解释清代金文书籍所著录的两周铜器铭文为主,所涉及的铜器有239器,收文286篇,按著作时间先后排列,自1941年至1951年,分为7卷。前代金石文字学家和近代古文字学家所释铭文至多,但同为一器,关于其时代与地区以及文字等方面解说未尽一致。本书作者根据前人所说参考经传子史,一一论定是非。前人无说的,也略作诠释,用力甚勤。其中超逸前人之说处颇多,大抵从字之有假借入手,可供研究金文者参考。



杨树达撰《积微居金文说》

本书最值得注意的是卷首开头“新识字之由来”一章,详述识辨古文字的途径与方法。分14节。第14节说:“古人字形无定,而文义都有定,吾人对此,当以有定决不定。换言之,当以文义定字形,不当泥字形而害文义。文义当,则依字读之可也;依字不通,则当大胆改读之。”他所谓“改读”,就是借重文法和声音,用假借字去解释,当然,有些解释得对,有些则不免于牵强。

(周祖谟)

Jinuoyu

基诺语 (Jino language) 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分布在中国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县基诺山(旧称攸乐山)和补远山地区。使用人口约1.2万(1982)。分攸乐和补远两个方言,方言间词汇差别较大。语言特点:声母中擦音分清浊,塞音和塞擦音有清无浊,

有复辅音、腭化辅音、清化鼻音。韵母以单元音为主，复元音少，有鼻化元音和卷舌元音。辅音韵尾大多出现在汉语、傣语借词里。有6~8个声调，其中44、42两个声调的元音带有紧喉作用。语序和助词是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句子成分的次序为主语—宾语—谓语。名词作修饰语时在被修饰的名词之前，数量词、形容词作修饰语时在被修饰的名词之后，动词、形容词的修饰语在中心词之前，加助词的修饰语也都在被修饰语之前，结构助词较多，有主语助词、宾语助词、方位助词、关联助词等。形态主要有词的内部屈折、重叠和附加前缀3种形式。例如以变换元音、声调表示名词、人称代词的变格，以变换声调表示不同的语气，以变换辅音、元音、声调或附加鼻音前缀的方式表示动词的使动态。此外，实词和部分副词可以重叠，重叠后表示一定的词汇和语法意义。

(盖兴之)

Jl'ərjɪslyu

吉尔吉斯语 (Kirgiz language) 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东匈语支。主要分布于苏联吉尔吉斯以及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境内的一些地区。使用人口约149万。在中国，主要分布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南部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称柯尔克孜语，使用人口约11万(1982)。新疆的柯尔克孜语分南、北两个方言。标准语言以北部方言为基础。吉尔吉斯语有8个短元音：a、ə、o、u、e、i、ə、y，6个长元音：aa、oo、uu、ee、øø、yy，22个辅音：b、p、m、f、v、d、t、n、l、r、g、k、ŋ、x、q、χ、ç、ʃ、j、s、z。元音和谐严整，辅音同化现象较多。重音落在词的最后一个音节上。固有词有6种音节形式。构形附加成分繁多，每种都有较多的变体。名词有数、格、领属人称和谓性人称，形容词有级，动词有态、式、时、数、人称、形动词、副动词等语法范畴。有以-elek构成的过去时形动词否定形式。词汇中与畜牧业有关的词很丰富。有来源于汉、阿拉伯、伊朗、蒙古、俄等语言的借词。中国新疆的柯尔克孜族使用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文字，有30个字母。苏联的吉尔吉斯族使用以斯拉夫字母为基础的文字，有36个字母。

(胡振华)

Jlɪlɪpɪan

《急就篇》 一本教学童识字的字书。西汉元帝时(公元前48~前33)黄门令史游作。汉代教学童识字的书，如《仓颉篇》、《训纂篇》、《凡将篇》、《滂喜篇》等都已亡佚，只有《急就篇》流传下来(参见彩图插页第9页)。全书为三言、四言、七言韵语。三言、四言隔句押韵，七言则每句押韵，以便诵习。“急就”是很快可以学成的意思，所以开头说：“急就奇觚与众异，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部居不杂厕，用日约少诚快意，勉力务之必有喜。”篇中分章叙述各种名物，如姓氏人名、锦绣、饮食、衣服、臣民、器物、虫鱼、服饰、音乐以及宫室、植物、动物、疾病、药品、官职、法律、地理等，不仅为识字而设，还有传布知识，以应实际需要的意思。儿童学书，写在三棱木上，上小下大，所以说“急

就奇觚”，一般也写在简牍上。原书可能是用隶书写的，东汉时章草盛行，书家喜用草书书写，魏晋时期钟繇、皇象、索靖、卫夫人、王羲之都有写本，所以一直流传不废。后人于末尾也有所增改。旧分32章，相传吴皇象写本为31章，宋太宗所写为34章，不同传本文字也略有异同。现在所见有元代书家赵孟頫、邓文原写本，有明代杨政松江府学石刻本，各有优劣。注本有唐代颜师古注和宋代王应麟补注，《小学汇函》和《学津讨原》都有刻本。

参考书目

孙星衍：《急就章考异》(《岱南阁丛书》内)。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五《校松江本急就篇序》。

(周祖谟)

Jlyun

《集韵》 见韵书。

Jlsuan fenggexue

计算风格学 (computational stylistics)

数理语言学的一个分支。采用计算机技术和统计方法，编制特定的数学程序和数量模型来研究文章风格的学科。主要研究内容有：①根据语言单位之间的数量关系，对不同的比率进行比较，归入不同的类型，确定文章风格的差异；②把语言成分看作变量，研究语言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推断风格的变异情形；③把语言集团的语言变异与语言集团的地理位置结合起来研究，测定不同地理区域的人群之间的语言关系，确定相关性最高的区域；④通过语言单位出现频率的统计，揭示语言成分在较大序列中的分布特征，了解不同文章的风格，判断文章的作者或写作年代。目前，在电子计算机上一般可以采用相关矩阵的方法来确定作者的文体风格特征。

设某一作者*m*的二阶相关矩阵为*m*(*i*, *j*)，则他的语言与标准语之间的偏离指数δ(*m*)可按如下公式计算：

$$\delta(m) = \sum_{i,j} [m(i, j) - E(i, j)]^2$$

其中*E*(*i*, *j*)为标准语的二阶相关矩阵，δ(*m*)的值越小，作者*m*的语言就越接近标准语。

设有两个作者*m*与*n*，作者*m*的二阶相关矩阵为*m*(*i*, *j*)，作者*n*的二阶相关矩阵为*n*(*i*, *j*)，则这两个作者的风格的接近程度可用相关指数*S*来表示：

$$S(m, n) = \sum_{i,j} [m(i, j) - E(i, j)][n(i, j) - E(i, j)]$$

*S*的值越大，两个作者的风格就越接近。(冯志伟)

Jlsuanji fuzhu yuyan jiaoxue

计算机辅助语言教学 (computer-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简称CALL。计算机按照人们事先安排的语言教学计划和内容进行课堂教学和辅助课外操练。

1955年左右(计算机诞生后约10年)，开始有人探讨如何把计算机用于教育。1958年前后，计算机开始进入大学理工科课堂。1965年后，计算机在教学活动中的作用开始被人们承认，计算机在语言教学中的应用即计

算机辅助教学(简称 CAI)也成了热门课题。目前,全世界已有许多包括语言教学在内的 CAI 系统,其中著名的有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 PLATO 系统、斯坦福大学的社会科学中数学问题研究所的系统以及梅特公司开发的 TICCIT 系统。PLATO 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 CAI 系统,仅在伊利诺伊州,就可以容纳上千人同时上课。根据 1980 年 PLATO 的课程表,它共可教授汉、英、法、俄、希腊、拉丁、西班牙及世界语等 8 种语言。斯坦福大学的系统则可利用电话线把 CAI 的教材送向美国全国许多地方,其中包括若干种大学外语课程。TICCIT 是一个中型系统,一般可允许 100 个学生同时使用。这一系统的开发得到美国一所在 CALL 方面颇为出名的杨伯翰大学的合作,包括一系列为小型学院外语系开发的语言课程。

美国的语言教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主要采用传统的“教授语法加翻译”的方式,培养读和写的能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则因录音机的使用,听说方式应运而生,各地学校设置了语言实验室。由于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这些边缘学科的发展,人们对语言交际有了更多的了解,在外语教学中更加强调人际的语言交际本领以及其心理、文化基础。于是计算机就成为一种非常合适的语言教学的培训工具。

CALL 可以分成 4 种类型:①讲授型,②操练型,③模拟型,④工具型。讲授型是指由计算机向学生提供讲授的教材,学生通过计算机显示屏上显示的课文(也许还加上计算机所放出的语音解释)进行学习。操练型是指由计算机向学生提供各种练习题,学生即时回答,计算机作出评价,并决定学生是复习前一课文,还是学习下一课。模拟型是利用计算机的动画、语音,或与录像技术相结合,通过逼真地模拟人们日常生活的实际情景,让学生在这种环境的刺激、诱导下作出恰当的言语反应。以上 3 种计算机软件都叫做课件。而工具型软件与上述 3 种完全不同,它不是面向学生,而是面向教师,一般指由计算机给语言教师的教学或研究工作提供必要的智力工具。它可以分成两类。一是为教师编制上述 3 种课件提供特殊的程序设计语言,称为编著语言。二是能给教师起智力助手作用的软件,例如,帮助教师自动地编制索引,统计词汇,分析句型,或是拟出各类试题等等。目前还有一种帮助教师对学生的考试结果进行分析的软件,也归入这一类,称为测试研究。

由运行课件所形成的 CALL 环境,在教育方面一般具有以下 4 个优点:①自定步调。学生的学习能力自然地决定了课件运行即课程进行的速度,可以真正做到“因材施教”。②减轻学生的心理负担。计算机不表露任何情感,永远是耐心、细致地诱导、鼓励学生,达到预期的效果。③课件可以吸收多位专家、教师的经验。④便于教学资料的积累和学生档案的保存。

工具型软件的优点是能提高教师备课、教学、研究等活动的效率,使他们把精力集中到更有创造性的方面去。

CALL 课件的典型工作过程如下。①计算机把信息,

如课文、语法说明等,通过显示器等设备呈现在学生面前,让他们阅读、学习;②计算机根据所显现的教材,向学生提出有关问题,作为练习,并等待回答;③学生使用键盘等输入设备回答问题,计算机对答案作出“正”或“误”等判断;④如果答案为“误”,计算机指示学生重做,或重学原先课程;如果答案为“正”,计算机就会给以某种鼓励,并转入下一步的练习或学习新的课文。

体现上述功能的课件,是语言学家、语言教师、心理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紧密合作的产物。首先,语言学家根据学科内容提出某一课程的教材,由语言教师指出学习重点和教学方法。心理学家则制定教学方案和评定学习效果的原则。然后由计算机科学家把上述材料编制成程序,经过反复演示、修改,成了投放技术市场的课件。

CALL 研究总的发展趋向,是更多地利用计算机科学、信息技术和心理学的最新成果,与计算语言学等学科紧密结合,提高软件的智能。目前正在研究有关计算语言学在语言 CAI 上的应用,例如教师的智能助手将逐步扩充为一个自然语言的理解和处理系统,计算机自动命题,通过语音识别来理解学生以自然语言形式出现的答案,并通过言语合成提供评分结果等。

从技术的广泛性和多样性来看,目前 CALL 正在利用和开发计算机和信息技术上的先进手段。计算机图像和动画已经成了课件的重要组成部分,言语合成促使计算机逼真地模仿教师的声音,语音识别则使学生的口答信息有可能进入计算机。为了更便于学生输入答案或信息,已经有一种利用手指在显示屏上的触感而输入的设备。计算机与激光盘相结合,使 CALL 所需要的文字、语音与图像可以存贮在同一种介质里,应用极其方便。计算机网络和卫星通信使得课件能够传送到边远地区,甚至世界各地。数据库的发展,使课件、智能工具等的研制和利用有了更好的软件工具。另外,还要将集中型的系统过渡到分散的个人型和家庭型的 CALL。

中国的 CALL 研究近年来已有较大发展,有些工作已接近国际水平。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是中国研制 CALL 系统最早的单位之一,取得的主要成果是作为英语教师和研究者助手的智能软件 ETRA 系统,作为德语教师和研究者智能助手的 GERTRA 系统,以及与计算机图像、文字同步的语音产生系统。哈尔滨工业大学的研究主要在操练和测试方面。上海交通大学在建立大型语料库。广州外国语学院则主要从事测试研究等。

(钱 锋)

jisuanji qingbao jiansuo

计算机情报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by computer) 利用计算机从众多的文献资料中找出符合特定需要的文献或情报的过程,目前已成为科技情报现代化的核心内容。

计算机情报检索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分类。

按存贮情报内容的表现形式,可以分为:

① 数据检索:存贮的信息是数据,检索时要搜索数

据资料档,并针对提问输出答案。

③ 事实检索:存贮的信息是各种事实,检索时可以对被检索的事实作某种逻辑推理,进行比较和分析,然后再输出答案。

③ 文献检索:存贮的信息是文章标题、著录项目和关键词组成的文献单元,检索时,按提问检索词查找文献资料档,输出文献题录和文摘。

按存贮情报内容的时间,可以分为:

① 现刊检索:检索时可提供当前现刊上的情报。

② 追溯检索:检索时可追溯若干年前的情报。

按计算机检索的方式,可以分为:

① 脱机检索:检索时利用计算机作批处理。

② 联机检索:检索时利用计算机的近程或远程终端进行人机联作。

计算机情报检索工作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1954年,美国海军军械试验站图书馆利用IBM-701电子计算机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计算机情报检索系统。1959年,美国H. P. 卢恩利用IBM-650电子计算机进行计算机定题情报检索服务。60年代,在图书情报工作中广泛利用计算机脱机批处理系统进行情报检索。1962年,美国M. M. 凯塞尔利用IBM-7094电子计算机及其多道控制台进行了世界上最早的联机情报检索试验。1964年,美国系统发展公司(SDC)研制成功ORBIT(On-Line Retrieval of Bibliographic Information-Time shared)联机情报检索软件。70年代以来,联机情报检索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向计算机网络过渡。联机情报检索系统除了上述的ORBIT之外,还有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的MEDLINE系统、美国洛克希德公司的DIALOG系统。与此同时,法国、英国、日本、加拿大也先后建立了联机情报检索系统,如欧洲空间组织情报检索中心的ESA-IRS系统。

中国从1963年开始进行机械情报检索的研究工作。1965年进行了机械情报检索试验。70年代以来开始研究计算机情报检索。1975年进行了首次计算机情报检索试验。1977年进行了计算机联机检索试验。1983年在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建立了连接美国、欧洲主要国家的数据库联机检索系统,这个系统通过意大利的ITALCABLE分组交换中心连接到欧洲空间组织的ESA-IRS系统,并由数据交换网转接到美国的DIALOG、ORBIT系统,这样,中国就可以在北京利用通信卫星检索到欧美200多个数据库的几千万篇文献。目前,不少单位在建立各种汉字文献库,有的单位在研究自动标引和自动作文摘的问题。

语言是信息最重要的载体,是科学技术情报的主要负荷者,文献语言研究的深度对于情报检索的效率有很大的影响。在词汇方面,如果深入地分析文献的主题内容,从文献中抽取足够的检索词,文献标引的范围就比较大,检索时就能把相关主题的文献查出来,从而提高情报检索的查全率。如果突出检索词的专指性,使其能准确地揭示文献的主题内容,检索时就不必再到其上位词

或其他专指性较低的词中去查找,从而提高情报检索的查准率。在句法语义方面,如果从语言学的角度揭示了检索文章的主题中各个检索词的句法语义关系,就不易造成误检。

目前,计算机情报检索一般采用逻辑式提问,这给用户带来许多不便,因为用户不熟悉逻辑式这样的不自然的提问方法。如果计算机能理解自然语言的含义,让用户直接采用自然语言提问,就可以大大地方便用户,有利于计算机情报检索的推广和应用。而要用自然语言直接提问,就必须把自然语言的句法和语义加以形式化,使计算机能予以分析和理解。语言研究是情报检索系统中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

(冯志伟)

jisuan yuyanxue

计算语言学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专指利用电子计算机进行语言研究。

电子计算机问世不久,人们便考虑到它的非数值运算问题,并选中机器翻译作为第一个非数值运算的课题。这个选择可以说开辟了计算机非数值应用无比广阔的领域,许多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以及许多技术成果都是在它的基础上或启发下产生和解决的。例如,文字的输入输出设备、大存储装置、言语识别和文字识别等课题均在机器翻译研究初期便已提出。但是由于机器翻译是一种比较高级的人工智能,至今尚未能真正或广泛付诸应用,而计算语言学的其他方面却得到了很大发展。计算机情报检索在60年代末期便已实现,现在通过卫星已可进行洲际检索。利用计算机进行言语统计已成常事,在统计分析的基础上编成了一大批正序、逆序词表和频率词典,建立了各种语料库,促进了计算风格学的诞生。同时还编制了大量索引和逐词索引。大字符集的信息处理问题已得到一定解决,这为中文和其他东方语文的信息处理提供了方便条件。计算机辅助教学日趋成熟与普遍。作为人工智能一个重要分支的自然语言理解也已奠定了基础,与此相联系的文字自动识别、言语识别和言语合成等项语言工程也在蓬勃开展。计算机在实验语音学、方言研究、语法分析和词典编纂等方面也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计算语言学之所以有这样长足的发展,是由于社会的需要。当今世界处于新技术革命时代,一个以电子计算机为基本工具的现代化语言文字信息处理系统正在世界范围内形成,这标志着高度发展的信息化社会的到来。计算语言学正是为担当这一历史使命而诞生和发展的。

计算语言学发展到今天,按其工作性质和复杂程度,可以归结为以下3个方面:①自动编排,这是计算机最擅长的工作,也是计算语言学中最成熟的部分。对各种语言素材进行统计、分类、排序,编辑各种词表、索引和词典,建立语料库、术语数据库等等,已经得到广泛运用。由于这些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因而已有现成的软件包提供服务。②自动分析,这是一种较复杂的语言自动处理。这种自动分析系统是根据事先存入计算机内的特定语言

信息进行工作,目的在于得到预先规定的结论,例如让计算机查词典或进行语法测试,均属此类。若结论有误,就证明词典或语法不够完备,需要对原先的数据或规则加以修订或补充。这类系统一般尚处于试验研究阶段。

⑨ 自动研究:这是一种更复杂的语言自动处理。这种自动研究系统是根据计算机内存的一般语言信息进行工作,借助统计、比较、类推等手段,得出自己推断的结论。人工智能研究中的某些自然语言理解系统正在朝这方面努力,但目前还没有比较成熟的研究成果。

计算语言学可以说是计算机和语言学相结合的产物。这种结合已经得到丰硕的成果,除了上面说到的那些应用课题以外,还表现在对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影响上。语言的定义扩展了:语言已不仅是人类重要的交际工具,而且也是人机之间的交际工具。为了满足计算机加工的要求,计算语言学最大的特点就是要求语言的形式化,因为只有形式化,才能算法化、自动化。根据这项要求,近年来制定出一系列面向语言信息处理的自动分析方法,其中包括预示分析法、从属分析法、中介成分体系、优选语义学、扩充转移网络、概念从属论等等。这些自动分析方法,已在机器翻译和自然语言理解的系统中得到应用,并证明有效。语言的形式化是分层进行的。语法的形式化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人们已做了不少工作;语义的形式化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人们进行的工作还不多。而语义形式化问题解决得好坏,将大大影响语言自动加工的成效。因此,继续发掘行之有效的形式结构分析方法和语义分析方法,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探讨它们在不同系统中各自使用的限度,这是计算语言学中的重点研究课题。

第五代计算机要求人们赋予它听觉(识别口语)和更强的视觉(自动识别文字),赋予它说话能力(合成言语)和听写能力(语音打字),同时还要求人们赋予它理解自然语言并把某种(或多种)自然语言翻译成另一种(或多种)自然语言的能力。这样,计算语言学工作者又需要提供各种物理参数、语言概率性等方面的数据和各种应用软件,以便同有关的专家、工程师一道共同解决为计算机增添“翅膀”这个重大课题,使之真正成为“万能的智能机器”。

完成上述任务,必须靠整个语言学界的努力和合作。尽管面向机器的语言学有其独特性,在许多方面都要另起炉灶,但是实践证明,传统语言学的基础雄厚与否对解决一些新任务有很大关系,例如传统的英汉对比语言学研究得好,就会给英汉机器翻译提供很多方便。从这个意义上讲,计算语言学只有很好地吸取传统语言学的成果并加以改造,才能得到迅速发展。

参考书目

刘涌泉:《语言学的新发展》,《把我国语言科学推向前进》,湖北人民出版社,武汉,1981。

T. A. Sebeok, *Current Trends in Linguistics*, Vol. 12, Mouton, 1974.

(刘涌泉)

Ji Xianlin

季羡林 (1911~) 中国语言学家、作家、文学翻译家。生于1911年8月6日。山东省清平县(现改归临清市)人。自幼就学于济南市,1930年毕业于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同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交换的研究



生,赴德国留学,在格廷根大学从著名印度学家E. 瓦尔特施密特研究古代印度语言。1941年获格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因第二次世界大战,交通断绝,无法回国,即应聘在格廷根大学任教,并从著名语言学家E. 西克研究吐火罗语(或称焉耆-龟兹语)。1946年初夏返抵上海,应北京大学之聘为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至1983年,1978年开始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至1984年。

季羡林于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8年起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1979年起任中国南亚学会会长,1980年起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外国语言文学评议组负责人,第二届中国语言学会会长,1981年任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1983年被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会委员,1984年起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员会委员,1985年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等职。

季羡林精心研究中世印欧语言,有突出的成就。

① 在印度中世语言(包括阿育王碑铭用语、巴利语、俗语和混合梵语)形态学方面,他全面而系统地总结了小乘佛教大众部说出世部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特征,著《〈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一文;他发现并证明印度中世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犍陀罗语的特点之一,著《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1944)一文;他还发现并证明不定过去时是中世印度东部方言古代半摩揭陀语的语法特点之一,著《使用不定过去式作为确定佛典年代与来源的标准》(1949)一文。

② 在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方面,他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是无可置疑的,它所使用的语言是中世印度东部方言古代半摩揭陀语;他还阐明原始佛教采用放任的语言政策,考证了佛教混合梵语的历史起源和特点以及与语言问题相联系的印度佛教史上的其他问题。有关论文已编成《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一书。

③ 在吐火罗语的语义研究方面,他通过对《福力太子因缘经》吐火罗语本与其他语言的异本的比较,开创了一个成功的方法,写成《〈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1943)一文。

1980年以来,他开始研究和译释新疆博物馆收藏的

吐火罗语 A《弥勒会见记剧本》残卷,已发表《吐火罗文 A 中的三十二相》等 5 篇论文,受到了广泛的重视。

季羡林的论著还有《印度古代语言论集》(1982)、《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1982)、《关于大乘上座部的问题》(1981)、《商人与佛教》(1985)等。

季羡林又是勤奋的文学翻译家,他直接从梵文翻译了《沙恭达罗》(1956)、《五卷书》(1959)、《优哩婆湿》(1962)、《罗摩衍那》(7 卷,1980~1984),还著有《罗摩衍那初探》(1979)一书和《〈罗摩衍那〉在中国》(1986)一文。他在梵文文学的介绍和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此外,他还从巴利文、英文和德文翻译了一些文学作品,译本有《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

季羡林还从事散文的创作,作品有《天竺心影》(1980)、《朗润集》(1981)、《季羡林散文集》(1987)等。(参见彩图插页第 32 页)

(蒋忠新)

Jiarongyu

嘉戎语 (Jiarong language) 中国自称“格魯”的藏族使用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也有人认为属羌语支。主要分布在中国四川省阿坝族自治州的理县、马尔康、金川、小金、汶川、黑水等县以及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丹巴、道孚两县和雅安专区宝兴县的部分地方。使用人口 10 多万(1982)。分东部、北部和西部 3 个方言。嘉戎语(以卓克基话为例)有 32 个单辅音声母: p, ph, b, t, th, d, k, kh, g, ts, tsh, s, sh, f, fh, c, cch, j, s, z, ɟ, ʒ, h, m, n, ɳ, l, r, w, j; 201 个复辅音声母,分二合、三合两类,如 pts, sk, ɳm, wd, kr, sl, zw, phj, psr, skr, mpj, ŋgl 等;有 7 个单元音韵母: i, e, a, u, o, ə, ɐ, 6 个复元音韵母: ei, ui, ai, əu, ua, 58 个带 -p, -t, -k, -s, -r, -l, -m, -n, -ŋ 辅音韵尾的韵母;无声调。以词缀、助词和词序为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词缀有成音节和不成音节两种。助词较少。语序是主语—宾语—谓语,间接宾语在直接宾语前;形容词作名词的修饰语时在中心词后,代词和名词作修饰语时在中心词前,动词或形容词的修饰语在中心词前。名词有从属范畴,以在名词上添加与人称代词有关的前缀表示。动词有人称、方位、时态、命令、使动、反身等范畴,以前缀或后缀表示。有较丰富的派生构词方式。有敬称和非敬称的区别。

(瞿霭堂)

Jiaguwen

甲骨文 古汉字一种书体的名称。殷代人用龟甲、兽骨(主要是牛肩胛骨)占卜。在占卜后把占卜日期、占卜者的名字、所占卜的事情用刀刻在卜兆的旁边,有的还把过若干日后的吉凶应验也刻上去,最详细的一条将近 100 字。学者称这种记录为卜辞,这种文字为甲骨文(图 1、2)。甲骨文发现于河南省安阳县小屯村一带,是商王殷庚迁殷以后到纣王亡国时的遗物(公元前 14 世纪中期~前 11 世纪中期),距今已 3 000 多年。

甲骨文开始是自然流露,无人注意,1899 年王懿荣辨

认为商代文字,从事收集。1903 年刘鹗拓印《铁云藏龟》。早期的研究者有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等。罗振玉又搜



图 1 刻在龟甲上的甲骨文



图 2 刻在兽骨上的甲骨文

集实物拓印为《殷虚书契》等,并作考释。安阳殷墟考古发掘始于 1928 年,连续八九年,最大的收获是 1936 年夏发掘的第 127 号坑,得甲骨文 1.7 万多片。综合先后所得加以拼缀挑选,编印为《殷虚文字·甲编》和《乙编》,共收甲骨 13047 号。董作宾根据发掘材料作《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分甲骨文为 5 期,对文字的文法、字形、书体等的演变有所阐述,其后时有修正。陈梦家在所作《殷虚卜辞综述》中慎审总结,断代说遂基本可信。甲骨文考释方面学者颇多,成绩突出的有郭沫若、唐兰、于省吾等。孙海波采集编印为《甲骨文编》,初版在 1934 年,1964 年修正再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汇集 1899 年以来 80 年间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公私收藏以及流传海外的共 41 956 片,由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具体指导,编印为《甲骨文合集》。考古研究所 70 年代在殷墟发掘所得甲骨 4 589 片,由钟少林等 5 人编著《小屯南地甲骨》,增加了一批重要的资料。

甲骨文是现存中国最古的文字,大约有 4 500 个单字,可识者约 1/3。它的基本词汇、基本语法、基本字形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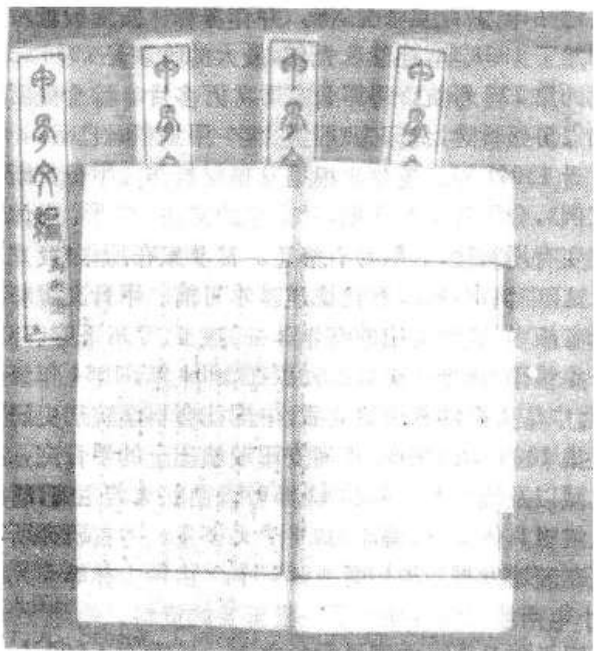
构跟后代汉语言文字是一致的。用许慎六书来检查,在字形结构方面指事、象形、形声、会意皆已齐备;在文义使用上转注(互训,即义近通用)、假借(音近通用)也都很清楚。甲骨文可以断代,早晚分明,从某些常用字的变化可以领会许多中国文字发展的知识。例如:①简化,形体复杂的字,日趋简单,笔画减少。②形声化,象形字增加声符,假借字增加形符,变成形声字。甲骨文是占卜者写刻的,有它的局限性,不一定包括商代的所有文字。而有些占卜术语,像贞田之类,一般人也未必通用。又由于是用刀刻成,不免变形,骤见不易理解。(参见彩图插页第1、2页)

甲骨文原来专指安阳殷墟所出,从发现至今已80多年,经过许多学者努力,取得很大成绩,在中国文字史上可以看作一个单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各地发现周人有文字的甲骨,如陕西省西安市沣西张家坡出土3片卜骨,山西省洪洞县坊堆村出土1片卜骨,北京市昌平区白浮村出土3片卜甲,陕西省岐山县凤雏村出土292片卜甲,又扶风县齐家村出土1片卜甲,6片卜骨。其中以岐山、扶风所出比较重要,片数既多,不同单字在250字以上。这些资料出土地点分散,年代早晚不一,内容简单,字形与殷墟不尽相同,确是中国考古学之新发现,而从中国文字史看,还没解决什么问题。(张政烺)

Jiaguwenbian

《甲骨文编》 殷墟甲骨单字汇编。有新旧两版。旧版为孙海波所编,1934年由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石印出版。新版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委托孙海波根据新资料修订旧版而成,列为考古学专刊乙种第14号,1965年由中华书局石印出版。孙海波(1910~1972),字涵溥,河南潢川人,北京师范大学研究院毕业,古文字学家。

此书新旧版的体例基本相同。所收甲骨单字按原



孙海波著《甲骨文编》

样摹录。正编14卷收已认识的和可以按偏旁隶定的字。分卷依《说文解字》。见于《说文》的字按《说文》字序编排,字条上方加篆文。不见于《说文》的字附在同部首字之后,字条上方加隶定写法。各字条多有关于字形或用例的简注。合文另编为一卷。不可识的字编为附录。书末附检字。书中各字条大都收有较多的异体。那些在甲骨文中出现次数不很多的单字,几乎每见必录。所以本书不但可供识字和研究字形之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能起索引的作用。旧版附有备查一卷,注明甲骨文资料中的常用字未被收录的字形的出处。新版取消备查,本拟另编同性质的《甲骨文索引》,跟《文编》分开印行,但是并未实现。

新版正编收单字1723个(其中见于《说文》的941字),附录收单字2949个,总共4672字。由于书中存在一些把同一个字的异体误认为不同的字或把不同的字误认为同一个字的异体的情况,上举这个总字数跟本书编纂时所据的甲骨文资料中的单字的实际总数是有出入的。

本书所收资料比较丰富,编纂工作也做得比较审慎,是学习和研究殷墟甲骨文的重要工具书。但是书中仍有不少摹录和释字方面的错误,已识之字被置于附录的情况也时有所见。本书编成后,又发表了不少甲骨文新资料 and 新的研究成果,本书已经显得有些过时了。

金祥恒编有《续甲骨文编》,是补充《甲骨文编》旧版的,1959年由台北艺文印书馆印行。(裘锡圭)

Jiaguwen Heji

《甲骨文合集》 殷墟甲骨的大型汇编。由郭沫若任主编,胡厚宣任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甲骨文合集》编辑组编纂。编辑工作从1960年正式开始。图版共13册,1979年10月起由中华书局出版,到1983年1月全部出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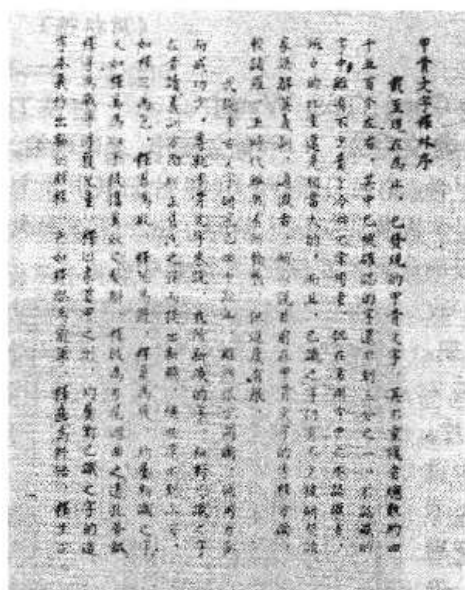
《合集》内容包括中央研究院殷墟发掘所得及国内外收藏的甲骨和拓本,共选录41956片,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第一次发表的。在编辑过程中,进行了辨伪、去重、缀合等工作,使《合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发现甲骨的最丰富的结集。

《合集》采用分期分类的编排方式,先将甲骨分为5期:第1期,武丁及其以前(自组、子组、午组卜辞附于本期之后);第2期,祖庚、祖甲;第3期,廪辛、康丁;第4期,武乙、文丁;第5期,帝乙、帝辛。每期又依社会历史内容分类:①阶级和国家;②社会生产;③思想文化;④其他。并分为21个小类,便于查检。《甲骨文合集》尚有释文、重要项目索引、来源表以及选本,将陆续出版。(李学勤)

Jiagu Wenzhi Shilin

《甲骨文字释林》 甲骨文研究著作。于省吾著。是于氏考释殷墟甲骨文字成果的汇集,1979年中华书局出

版。书分3卷。上卷收文53篇，是删订40年代出版的旧作《双剑谿殷契骈枝》及其续编、三编而成的。中、下两卷共收文135篇，其中有两篇是由原来分别收在《骈枝》及其续编里的文章改写而成的，9篇是改写或修订已发



于省吾著《甲骨文字释林》

表的论文而成的，其余各篇都没有发表过。另有附录两篇，其中修订旧作而成的和新写的各一篇。全书共收文190篇，绝大多数是对某个或某几个甲骨文字或甲骨文资料中的词语的考释，少数几篇是带有综论性质的，如卷一的《释一至十之纪数字》、卷三的《释具有部分表音的独体象形字》和附录的《释古文字中附划因声指事字的一例》。书前有自序，在介绍本书内容之外，还谈到了考释古文字的方法问题。于省吾考释古文字的态度比较严谨，本书中的考释有不少已经为学术界所接受。

(裘锡圭)

Jiadejia

贾德佳, S. K. (Sunīti Kumār Caturjya 1890~1977) 印度语言学家。1890年11月26日

生于加尔各答附近的西瓦布尔, 1977年5月29日卒于加尔各答。1911年在加尔各答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 1913年获文学硕士学位, 后留校任助教、讲师。1919~1921年留学英国伦敦大学学习语言学, 获文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为《孟加拉语的起源和发展》。1921~1922年入巴黎大学, 从J. 布洛克、A. 梅耶、伯希和(1878~1945)等著名学者学习印度雅利安语、斯拉夫语、澳亚语、粟特语、希腊语、拉丁语等。1922年回国后历任加尔各答大学比较语言学系教授。1936年起为孟加拉皇家亚洲学会会员。20世纪50年代曾来中国访问。贾德佳在历史比较语言学方面贡献突出, 着重研究印欧语系中的印度雅利安语。最著名的语言学



著作是《孟加拉语的起源和发展》(1926)。该书的绪论对印度雅利安诸语言的产生和发展作了详尽的论述, 是研究现代印度雅利安诸语言历史的重要著作。此外还著有《孟加拉语语音读本》(1926)、《印度雅利安语和印地语》(1942)、《拉贾斯坦语》(1950)、《印度的语言和语言问题》(1951)等。

(殷洪元)

Jiajie

假借 见六书。

Jiajiejie

假借义 指一个汉字被借为别的字而出现的与原义无关的意义。假借义不同于本义和引申义。本义是造字原有的意义, 引申义是由原义引发出来的意义。例如“须”字金文作, 《说文》解释为“面毛也”。“须”就是“鬚鬚”的“鬚”, “面毛”正是“须”字的本义。古书里有用为“等待”义的, 后来又用为“必须”的意思, 这都是假借义。又如“令”, 本义是“命令”、“号令”, 可是古人说“令闻令望”, “令”是“善”的意思。“善”是假借义。又如“常”《说文》训“下帛也”。可是又有“恒”的意思, 那是假借义。又如“诞”是“大言”、“妄言”的意思, 可是又有“诞生”、“生育”的意思, 那也是假借义。假借义是否另有它的本字往往不可考。

(周祖谟)

Jiajiezi

假借字 汉字是由象形、象意的文字发展起来的。有的外物有形象可以描绘, 有的意思可以利用图象和笔画来表现, 可是有很多代表某些事物的概念不能用象形、象意的方式随时造出文字来表现, 于是就假借已有的同音或音近的字来代表, 这种跟借用的字的形义完全不合的字就称为假借字。

假借字有两类。一类是本无其字的假借, 那就是上面所说假借字。如“束”, 甲骨文作, 象束物的形象。东方的“束”无形可象, 就借语音相同的字来表示东方的意思。又如“北”, 甲骨文作, 象二人相背。北方的“北”无形可象, 就借语音相同的来表示北方的意思。这就是本无其字的假借。许慎在《说文叙》里所说“假借者, 本无其字, 依声托事”, 就是这一类。在语言发展过程中这一类的字很多。如方圆的“方”, 歌曲的“曲”, 市郊的“市”, 甲冑的“甲”, 你我的“我”, 专门的“專”, 原因的“因”, 人才的“才”, 黑白的“白”, 巨大的“巨”, 容易的“易”, 时辰的“辰”等都是, 不胜枚举。

假借字的另一类是本有其字的假借。“本有其字”的意思是在日常使用的文字当中本来有表示某个词义的书写形式, 但是在使用当中不用本来约定俗成的字形而写为另外一个意义不相涉而音同或音近的字。这一类在秦汉以上的古书中极为常见。如《诗·陈风·宛丘》“子之汤兮, 宛丘之上兮”, 借“汤”为“荡”; 《豳风·七月》“七月食瓜, 八月断壶”, 借“壶”为“瓠”; 《小雅·苑柳》“上帝甚蹈, 无自暱焉”, 借“蹈”为“悼”; 《小雅·隔桑》“隔桑有阿, 其葉

有幽”，借“幽”为“黝”。这些都是本有其字的假借。

前一类可以说不造字的假借，后一类是在用字当中的假借。在用字当中既然本有其字，为什么还要另外写一个假借字呢，其中可能有两种原因。一种原因是写书者仓卒间写为一个音同的字，历代传抄因其旧而不改，另一种原因是某一时期、某一地区、或某一师承，经常习惯以某字代某字用，后世传写也就一仍其旧，这从《周礼》故书和长沙马王堆汉墓所出帛书可以略知消息。

参考书目

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三十二。

(周祖谟)

Jianhuazi

简化字 (simplified characters) 指汉字楷书简化的字。汉字在长期使用过程中曾经产生不少由繁体简化的简笔字，这种简笔字一直在民间流行。为使汉字便于书写，1956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今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提出简化汉字方案，把现在常用的繁体字加以适当的简化，后来又进一步把简化了的偏旁相应地类推到其他有同样偏旁的字。1964年公布的《简化字总表》包括先后简化的字共有2236个字，经国务院批准实行。

简化字是以通行已久的一些简体字为基础，又做了进一步的整理和改进，并且参考了草书和行书的写法，吸取其一二，以便书写，具体地说，有以下几种简化的方法：

① 采用古字。如：从（從）、众（衆）、礼（禮）、无（無），都见于许慎《说文解字》。

② 利用草书楷化。如专（專）、东（東）、汤（湯）、乐（樂）、当（當）、买（買）、农（農）、孙（孫）。

③ 简省笔画。如鱼（魚）、单（單）、变（變）、冲（沖）、劳（勞）、庄（莊）、烛（燭）、伤（傷）。

④ 用简单符号替代繁体的一部分。如观（觀）、戏（戲）、邓（鄧）、区（區）、岁（歲）、罗（羅）、刘（劉）、齐（齊）。

⑤ 取字的一部分。如习（習）、县（縣）、务（務）、雾（霧）、条（條）、广（廣）、医（醫）。

⑥ 取同音代替。如几（幾）、后（後）、系（繫）、向（嚮）、筑（築）。

⑦ 改换声旁，避繁就简。如钟（鍾）、辽（遼）、迁（遷）、邮（郵）、阶（階）、运（運）、远（遠）、扰（擾）、犹（猶）。

见汉字简化。

(周祖谟)

Jianti

简体 (simplified form) 指由楷体字简化的汉字字体。汉字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由繁复以趋于简约，这是总的一种趋势。隶书是篆书的简化，草书、行书又是隶书的简化，简体是正楷书的简化。楷书的减笔字在南北朝时期（4~6世纪）已经出现，到唐宋以后逐渐加多，大体都是一些常用而笔画又比较多的字。例如營：營、壽：壽、繼：繼、離：離、燭：燭、壯：壯、儒：儒、齊：齊、淵：淵、婁：婁。这些字大部分是受草书、行书的影响而简化的。

另外，有一类简体字是用两三笔简单的符号代替复杂的部分。例如树、戏、难、欢、对、观、刘、齐、乔、风、区、应、兴、敏、释、罗、岁。这些都是民间久已流行的简体字，一般也称为俗体字。现在使用的简化字是在前代已有的简体字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整理改进的。

见简化字。

(周祖谟)

Jianshoutang Suo Cang Yinxu Wenzil

《戡寿堂所藏殷虚文字》 甲骨文著作。王国维编。刘鹗（铁云）所藏甲骨，卒后分散，约1000片归其中表下氏。1916年冬，经下氏售于英国人哈同，由王国维编次考释成书。书图版部分署名姬佛陀，实际是窃名。

本书为石印，收入《艺术丛编》第3集，同时有单行本，装2册，共录甲骨653片。王国维考释有不少重要创见，如以本书1,10与《殷虚书契后编》上8,14缀合，确定商先公世系，证明《史记·殷本纪》有误；又论及相土、王亥、中宗祖乙等，对商代史研究颇有贡献。（参见彩图插页第12页）

书中所录甲骨，



王国维著《戡寿堂所藏殷虚文字》

大部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其余分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尚有少数下落不详。沈之瑜、郭若愚曾重加整理，撰有《〈戡寿堂所藏殷虚文字〉补正》（《上海博物馆馆刊》第1期，1981），可资参照。

(李学勤)

Jiangsu Sheng he Shanghai Shi Fangyan Gaikuang 《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 (General Survey of the Dialects of Jiangsu Province and the City of Shanghai) 调查研究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的著作。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调查指导组编，1960年7月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从1960年起，在汉语方言普查的基础上，各省（市）的工作重点转入总结方言普查成果，编写本地区的方言概况。本书是这类概况中第一部正式出版的。全书除“引言”外，分3部分：第1部分“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的分区”，是综合性的叙述，又分“上”、“下”两部分。“上”分别叙述了34个方言区的语音特点；“下”列方言地图42幅，图1~23是语音方面的地图，图24~42是词汇方面的地图，图前有说明、参考地图等。第2部分“字音对照表”，对照排列北京和20个调查点的2601个单字音，并注中古音。表前有说明和20个点的方言声韵调表。第3部分“常用词对照表”，对照排列21个调查点的567条常用词和词组，表前有说明和常

用词目录等。《概况》的主要成绩是根据普查材料，经过周密分析，提出江苏省方言分区的标准，阐述了各区的特点，一改过去对江苏省分区的笼统说法。它的出版，为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和进一步深入研究本地区的方言提供了重要资料。

(汤珍珠)

Jiang Yougao

江有诰 (?~1851) 中国清代音韵学家。字晋三，号古愚，安徽歙县人。江有诰在从事音韵学研究过程中，只见过顾炎武、江永(1681~1762)、段玉裁的书，后来才看见孔广森(1752~1786)的书，戴震、王念孙的学说他根本不知道。但是，他的研究结果却与王念孙基本相同。江有诰最初把古韵分成20部，比段玉裁多3部：①祭、泰、夬、废、月、曷、末、黠、鎋、薛独立为一部；②叶、帖、业、狎、乏5韵另立为一部；③缉、合两韵另立为一部。后来看到孔广森东、冬两部分分立，他很赞成，于是增加到21部。

江有诰是深入、全面、系统地研究古韵的学者，他既善于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又能用大量材料来解释具体问题。他以等韵作为辅助手段，从一字两读、谐声偏旁和先秦韵文押韵3个方面来分析古韵，从而彻底解决了平入相配和四声相配问题。这样，就勾画出了先秦语音系统的全貌，同时对古音构拟有重要意义。他的《谐声表》是按“同声必同部”的原则制作的，这对后来研究古音的人有重要参考价值。此外，江有诰还提出了古四声问题，认为先秦语言中也存在4种声调。他是第一个非常肯定地提出古音有四声的学者。他认为“古人所读之声与后人不同”，他说的不同是指调类不同。他认为先秦有些字的调类到《切韵》时代发生了变化，比如，从平声转到上声，或转到去声，等等。江有诰的著作有《音学十书》。

(谢纪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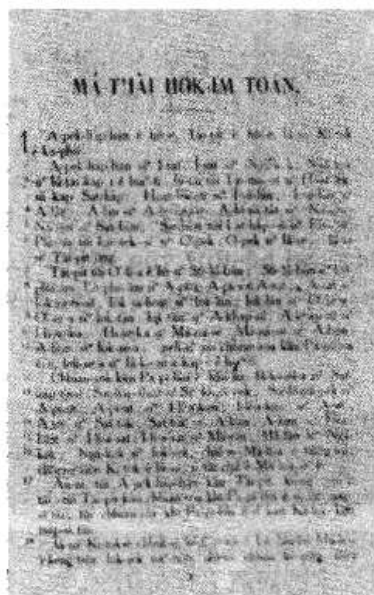
Jiaohui luomazi

教会罗马字 (missionary romanization)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来华传教士制订和推行的各种罗马字母(拉丁字母)拼音方案。主要指基督教传教士用来翻译《圣经》和帮助教徒学文化的方言罗马字。

教会罗马字的产生和推行 教会罗马字产生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那时海运开放，外国传教士纷纷来华传教。他们为了使教徒很快能够阅读《圣经》，把它译成方言，用罗马字拼写。教徒们学会这种言文一致的方言罗马字后，不但可以读《圣经》，也用来学文化。

教会罗马字最早产生于福建厦门，厦门话罗马字又叫“厦门白话字”，于1850年制订。在这之后，陆续出现了宁波话、潮州话、海南话、兴化话、福州话、莆田话、客家话、上海话、台州话、建瓯话、温州话、官话(北京话)等方言罗马字。这些方言罗马字在各地推行了几十年，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达到鼎盛时期，出版过17种方言的《圣经》，销数达10多万部。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厦门白话字”，除了《圣经》(见图)外，还出版了《圣经故事》、《四书译注》、《闽南音圣诗》以及小学用的修身、历史、地理、生



厦门白话字《圣经》

理、数学等课本，出版物总数在120万册以上。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国内外能使用“厦门白话字”的人，还有10万左右。

天主教会也做过一些罗马字的工作，在山东制订了山东话罗马字方案，出版有罗马字的《国民小报》和《教理问答》等书报。在台湾省台南也出版了闽南方言的类似的书籍。

教会罗马字在民国成立后不再盛行，

因为中国制订了“注音字母”，兴起了国语运动。

“厦门白话字”方案简介 “厦门白话字”一共有23个字母，其中17个是单字母，5个是双字母，1个是三字母。

字母

a[a]	b[b]	ch或ts[ʈ]	chh或tsh[ʈʰ]	e[e]	g[g]
h[h]	i[i]	j[dʒ]	k[k]	kh[kʰ]	l[l]
m[m]	n[n]	ng[ŋ]	o[o]	oʰ[oʰ]	p[p]
ph[pʰ]	s[s]	t[t]	th[tʰ]	u[u]	

这23个字母构成17个声母和41个单韵母。其中ts、tsh只拼a、o、oʰ、u，ch、chh只拼i、e，但民间喜用ch、chh，不用ts、tsh。

声母

p[p]	ph[pʰ]	b[b]	m[m]
t[t]	th[tʰ]	l[l]	n[n]
k[k]	kh[kʰ]	g[g]	ng[ŋ]
ch或ts[ʈ]	chh或tsh[ʈʰ]	j[dʒ]	s[s]

韵母

i[i]	u[u]	o[o]	oʰ[oʰ]
ai[ai]	au[au]	am[am]	ap[ap]
ang[ang]	ak[ak]	eng[eng]	ek[ek]
a[a]	e[e]	iu[iu]	io[io]
an[an]	at[at]	in[in]	it[it]
ong[ong]	ok[ok]	iang[iang]	iak[iak]
ia[ia]	iau[iau]	im[im]	ip[ip]
iam[iam]	iap[iap]	ian[ian]	iat[iat]
iong[iong]	iok[iok]		
ui[ui]	un[un]	ut[ut]	
oe[ue]	oai[uai]	oan[uan]	oat[uat]

注：鼻化韵加n于韵母右上角，例如“上架”为chiu^a-niu；非-p、t、k的促音用-h表示。

声调符号

阴平(无号) 阳平^ˊ 上声^ˋ 阴去^ˋ 阳去^ˋ
阴入(无号,加-p、-t、-k、-h) 阳入^ˋ(加-p、-t、-k、-h)

拼写举例

Lín tióh tùi bú-hoa-kó chhiū chhú phi-jū: tng i ki
nng hiòh hoat ê sùi, chiū tsai hē-thi^a kūn lah.

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摘自厦门话罗马字《马太福音》第24章32节)。

各种教会罗马字的比较 各种教会罗马字都采用了罗马字母(拉丁字母),而且都只用于拼写各地的方言,这是它们的共同点。各种教会罗马字的不同点有以下两个方面:

① 在用罗马字代替汉字的问题上意见不一。大多数推行者主张用罗马字代替汉字,认为“为了大多数人,目前那繁难的书写方法,必须彻底让位给那更实用、更少图形化、用罗马字母来代替的拼音制度”,“我们全部希望有那么伟大的一天,到那时候,中国各部分的文盲将要能够用一种拼音文字阅读”,甚至认为“繁难的方块字是20世纪最有趣的时代错误”。少数人主张把罗马字作为给汉字注音和帮助识字的工具,而不是代替汉字。例如宁波话的《马可福音书·序文》里说:“这一本《马可福音书》是用汉字和罗马字并排印的,为的是要帮助已识罗马字的人再学汉字。因其读罗马字时可以并看汉字,一个一个,一句一句,常用汉字渐都认识。若遇着了不认识的生字,就可以从罗马字里看这个生字是什么音,也能达到其中的意。”

② 在方案的设计上存在不统一以至相互矛盾的现象。主要有:

a. 同音异符。例如同是[ɔ]音,上海话拼写为 au,莆田话为 o,同是[y]音,福州、建瓯、莆田拼写为 u,宁波、台州为 ü,上海为 ui,广州为 ue。[ɿ],上海用 z,如“思”作 sz,而宁波、台州不用任何字母,“思”作 s。同是[ɐ]音,上海、宁波、台州、厦门、广州作 ts,建瓯、福州、莆田作 c。同是[p']音,上海、宁波、台州、广州作 p',建瓯、福州、莆田作 p,厦门、潮州、梅县作 ph。

b. 同符异音。例如 au 在多数地方用于表示 [au],上海却表示 [ɔ]。u 在潮州音表示 [u],而在其他地方表示 [y],an 在上海表示 [e],在潮州表示 [aŋ],在其他地方却是 [an]。

c. 标调法不一致。首先是标调或不标调不一致,大多数地方是标调的,宁波、温州、台州却不标调。其次是所用的标调符号不一致,例如同是阳平,在不同的方言罗马字中却分别用了^ˊ、^ˊ、^ˊ等4种符号。上海又与众不同,它采用了中国传统的圈读法,用一个小半圆圈标在左上角和右上角旁边表示上声和去声,平声不标,入声用-k或-h表示。

d. 词的分写连写不一致。除了多音节的人名、地名

用短横连起来,并且首母大写之外,其他的词语分写连写很不统一,不过,已经明显有了词的概念和按词连写的趋向。

教会罗马字对于中国后来的文字改革运动是有一定影响的。

参考书目

倪海曙:《中国拼音文字运动史简编》,上海时代出版社,1948。
周有光:《汉字改革概论》,文字改革出版社,北京,1979。
黄典诚:《从闽南的“白话字”看出拼音文字的优点》,载《中国语文》,1953,7月号。

(黄典诚 李乐毅)

Jiegouzhuyi yufa

结构主义语法 (structural grammar) 广义的指按 F. de 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做的语法研究,狭义的指美国 L. 布龙菲尔德学派分析语法的原则和程序。这里所讲的是狭义的。

20 世纪初,美国的语言学主要是和人类学配合,调查美洲的印第安语。印第安语的结构类型跟印欧语截然不同,传统语法对付不了,从而推动语言学家去探索新的路子。后来,哲学中的逻辑实证主义和心理学中的行为主义思潮在美国一些地方得势,以布龙菲尔德为首的一批语言学家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总结、提高实际经验,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分析一切语言的方法论。它标榜机械主义,反对精神主义,主张从可以观察到的语言的形式入手,用一套严格的程序客观地揭示语言的真实面貌,反对用传统的语法范畴去套各种语言,也反对在分析中利用意义。它的目标是以一批足够数量的语句作为素材,通过分析程序找出语言的结构,即语言中的单位及其组合模式。

结构主义语法内部有不同的派别。极端的派别以 Z. S. 哈里斯为代表,他主张根据纯形式的分布,用一套机械的办法来自动显示语言的结构。哈里斯的主张只是方法论的一种构思,它非常烦琐,没有人能在实践中贯彻。实际使用的方法可以 C. F. 霍凯特在该学派末期所归纳出来的原则和程序作为代表。

对语言构造的看法决定了分析语言的方法。美国结构主义学派把语言分成5层:语音、音位系统、语素音位系统、语法系统、语义。语音是物质方面的东西,语义反映说话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这二者是语言联系外界的边缘层。核心部分是音位、语素音位、语法3个系统。语言学研究的只是(或者首先是)核心,亦即语言的内部结构。但是要接触核心,必须通过边缘。所谓“通过”,是向被咨询人问清楚,在本族语言里某两个形式是不是相同,此外不必再问,否则就是超出规定范围,违背了机械主义的原则。分析语言,先从素材找出音位系统,包括全部音位及其组合模式。完成了这一步,素材中的语句就可以用音位标写,然后再对这个素材进行语法分析,找出语法系统,包括全部语素及其组合模式。至于语素音位系统,那是研究音位如何给语素编码的,它联结着音位系统和语法系统两方面。

结构主义语法有一套复杂的程序。总的说来,可以分为切分、归并、分类、组合4个步骤。切分是把素材中用音位标写的语句切成含意义的最小片段,叫做“语子”。归并是把语子中形式和意义都相同,或者意义相同而形式呈现有条件的差别的归成语素。后一种情况的产生,是因为语素音位系统可能赋予一个语素以几个音位形式。如果一批语子的意义相同,就可以把它们归并成一个语素,各语子可以认为是这个语素的变体。例如在英语的 *books*、*dogs*、*benches* 各词末尾可以切出语子 /s/、/z/、/ɪz/, 这些都表示复数,意义相同,其出现是因为前面有清辅音、浊辅音或者塞擦音,各有特殊的音位条件,分布上并不对立。所以我们可以建立表示复数的语素 {s}, 而语子 /s/、/z/、/ɪz/ 就是这个语素的变体。语素归纳出来之后,各语素变体间音位交替的条件逐步显现了,这就是语素音位系统。

描写一种语言的语法,不仅要找出全部语素,还要说明语素在语句中如何组合。语素是语法的最小单位,它们第一步组合成词,然后词与词组合成句法单位。词是句子中的一个片段,前后有可能的停顿点为界。按这个标准找出所有的词以后,还要进而归纳出语素组合成词的模式。词的数目很多,必须分类,在分类的基础上说明词的组模式。可靠的分类基础不是词的意义,而是词的分布方式,即词可能出现的环境。如果有一些词能同在一些环境中出现,这些词就可以归为一类。分类以后,就能找出各类词组合而成的基本格式。大于词的句法单位都是用这些基本格式一层层套起来的,可以通过层次分析的方法来揭示它们的结构。这样,语素如何组合成词,各类词又如何组合成句法单位(最大的句法单位是句子)的模式,都可以得到说明了。

美国结构主义语法的这套程序,叫做“发现程序”。它主要依靠形式特征来发现素材中的单位及其反复出现的组模式。它的优点是能够就语言本身来揭示语法面貌,显示各种语言的结构特点;它的缺点是缩小了语法分析的任务,只能重点解决词法的问题,句法方面它只做了一部分工作,语义结构根本没动手。N. 乔姆斯基批评它,说是只做了分类工作。不过它的分析结果使语法研究有增加广度和深度的可靠基础,因此是有贡献的。(见美国结构主义学派)

参考书目

L. 布龙菲尔德著,袁家骅等译:《语言论》,商务印书馆,北京,1980。(L. Bloomfield, *Language*,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New York, 1933.)

C. F. 霍凯特著,索振羽等译:《现代语言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C. F. Hockett, *A Course in Modern Linguistics*, Macmillan Publishing House, New York, 1958.)

M. Joos, *Readings in Linguistics*, New York, 1958.

(叶蜚声)

Jiekeyu

捷克语 (Czech language) 捷克斯洛伐克的两种官方语言之一(另一种是斯洛伐克语)。属印欧语系斯拉夫语族西支。分布于捷克斯洛伐克的西部(波希米亚)和中部(摩拉维亚)。使用人口约1000万。

捷克语的标准语是在中波希米亚方言基础上形成的,它保留了作为屈折语的共同斯拉夫语的基本特征:静词有格的形态变化,动词有人称、时和体的变化。12~16世纪期间,捷克语在语音、语法、词汇三方面都发展很快,使现代捷克语成为斯拉夫语族中离共同斯拉夫语最远的语言。

捷克语有5个元音,每个元音都有对应的长元音;有25个辅音,其中喉擦音有 *ch*[x] 和 *h*[ɦ](来源于共同斯拉夫语的 *g*)之分,颤音有 *r*[r] 和 *ř*[rʃ] 之分;词重音落在第一音节上。名词有7个格:主格、属格、与格、宾格、前置格、工具格、呼格。动词有完成体和未完成体两种,每种体的一部分词又可再分为一次体和多次体。词汇中有大量借词,主要来自德语。

捷克语的标准语有书面形式与口语形式。此外,日常口头交际中也使用通用捷克语,它带有波希米亚地区方言的特征,词形变化比标准语较为简单。

最早的捷克语文字记录,见于11、12世纪波希米亚地区拉丁文手抄本上的零星注释(见图)。14世纪开始有捷克文书写的历史、哲学、法学和文学著作。现代捷克



最早的捷克语文字记录

语使用26个拉丁字母,其中字母组合 *ch* 在捷克语中是一个字母,表示音位 *x*, *q*, *ɣ*, *w* 用于外来词, *g* 主要用于外来词;使用一个软音符号(ˇ)和两个长音符号(˘)和(˙)。(朱伟华)

Jieyin

介音 见等韵。

Jintianyī Jīngzhu

金田一京助 (Kindaichi Kyosuke 1882~1971) 日本语言学家。1882年5月5日生于日本盛冈市,卒于1971年11月14日。1907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曾获博士学位。

金田一对日语音韵、语法、语史等方面都有过独到的研究,还主编过一些有影响的词典(《明解国辞典》、《辞海》)和教科书(《中等国语》、《高等国语》),担任过日本国语审议会副会长,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为现代日语作出了贡献。

金田一最主要的成就是对日本少数民族阿伊努族的语言和文学的研究。早在东京大学学习期间,他就到北海道等地对阿伊努语进行实地调查,笔录和研究阿伊努族史诗《由卡拉》。他阐明了该史诗的内容、历史及其重要性,建立了《由卡拉》语法大纲,因而开拓了前人未曾达到的新领域。1932年因所著《阿伊努史诗由卡拉的研究》(两卷)获得学士院“恩赐奖”。其他著作还有《新语言学》、《国语音韵论》(1932)、《国语史·系统篇》(1938)、《新国文法》(1941)等。

(徐昌华)

Jinwen

金文 古汉字一种书体的名称。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铜器上铭文字体的总称(见图)。

宋代人创立金石学,研究金和石上的铭刻,金以铜器为主而限于铜,古今一切金属物品上的铭文皆在收集之列。这样,内容杂乱,没有意义。清代吴式芬(1796~1856)把商周铜器铭文编成《捃古录金文》一书。从中国文字发展的历史看有它的合理性,符合一些学者的要求,而且收集的资料多,考释严谨,影响颇大,金文一词遂有了界说。1916年邹安编印《周金文存》,也是资料多,印刷

好,风行一时。这时所谓金文皆指整篇的铭文,不称单字。1925年容庚编印《金文编》,把商周铜器铭文中的字按照《说文解字》的顺序编为字典,从此金文成为一种书体名称。金文出现在商代中期,郑州市白家庄出土饕餮纹鬲上有龟字,陕西省岐山县京当村出土吕戈上有吕字,北京市平谷县刘家河出土鼎和爵上皆有龟字,这类资料虽



周公东征鼎铭文拓本

不多,年代都比殷墟甲骨文早。金文下限断在秦灭六国,也就是秦用小篆统一中国文字时(公元前15世纪~前220年),约1200多年。

宋代人收藏铜器极重视铭文,如刘敞《先秦古器记》、吕大临《考古图》、王黼《博古图录》等,皆摹写铭文、作出考释;也有专门摹刻铭文的,如赵明诚《古器物铭》、王俅《啸堂集古录》、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等,皆有释文和考证;把铭文中的字编为字典则有吕大临《考古图释文》、王楚和薛尚功《钟鼎篆韵》,皆按照韵部排列,颇有

创见。清代学者走宋代人的道路而有发展,如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方濬益《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等,材料不断增多,释文考证时有可观。1937年罗振玉编印《三代吉金文存》,收铭文4000多件,印刷精致,没有释文。清代由于《说文》之学兴盛,声韵训诂研讨日深,在这种学风的影响下,铭文研究进步较快,不断出现专家,如许瀚《攀古小庐金文考释》,吴大澂《字说》、《说文古籀补》,孙诒让《古籀拾遗》、《古籀余论》、《名原》等,皆有创见,突过前人。金文的年代长,使用的区域广(黄河、长江中下游广大地方),材料如果不整理清楚,则研究工作会收效不大。例如,安徽省寿县朱家集楚王墓,出土铜器过千件,有文字者数百件。河南省安阳县小屯村妇好墓,出土铜器数百件,有文字者在百件以上。这两批铜器相距千年,差异很大,铭文掺在一起统称金文,很难说明什么问题。过去学者已理解这一点,王国维《两周金石文韵读·序》(1917)说:“搜周世韵语见于金石文字者,得数十篇,中有杞、鄫、许、邾、徐、楚诸国之文,出商、鲁二颂与十五国风之外,其时亦上起宗周、下迄战国,亘五六百年。”对时间地点观念很清楚,只是工作量太小了。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序文》(1931)说:“当以年代与国别为之条贯,……余于西周文字得其年代可征或近是者凡一百六十又二器。……其依据国别者,于国别之中亦贯以年代,得列国之文凡一百六十又一器。”这在金文研究中是划时代的创举,可惜规模不大。此后50多年来发现有铭文的铜器数千件,还没有学者整理和作出新的更大的成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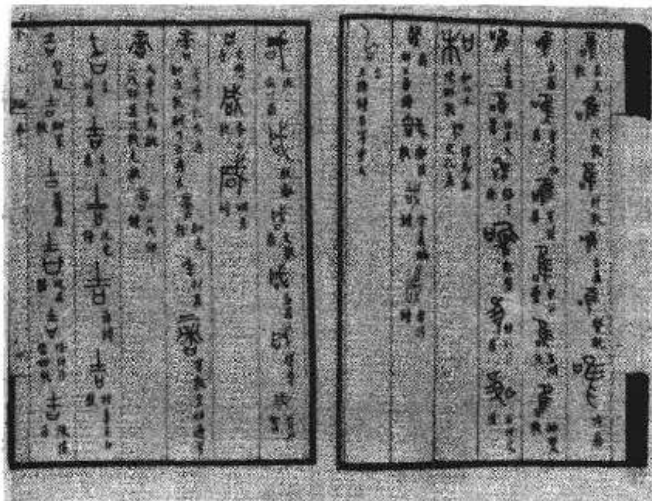
1985年容庚《金文编》修订第4版采用铭文3902件,收正文(可识的字)2420字,附录(还不能确定的字)1352字,共计3772字。这是今日可见金文的总数,虽不一定准确,也相差不远。这些字多半可以和《说文解字》相对照。先秦文字资料不限于金文,有甲骨、石刻、竹简、帛书、玺印、货币等,而金文终究是主要的,它反映秦用小篆统一文字前1000多年间中国文字发展变化的基本情况。(参见彩图插页第2页)

金文研究工作是多方面的,成绩也不一而足,管燮初《西周金文语法研究》是其中之一例。(张政烺)

Jinwenbian

《金文编》 金文字汇,容庚编著。容庚早年研习《说文解字》,1913年,读吴大澂《说文古籀补》等书,立志补辑。1917年,拟定《殷周秦汉文字》编撰计划,《金文编》为其一部分。1922年到天津,以《金文编》稿本向罗振玉请正。至1925年写定印行,为初版(参见彩图插页第14页)。1938年,补订重版,共收商周金文1804字,附录1165字。1959年印行校补本,科学出版社出版,列为《考古学专刊》乙种第9号。作者晚年继续增订,马国权、张振林先后协助。1983年容庚逝世,书由张振林完成,新版于198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共收2420字,附录1352字。

书中金文依《说文》部首排列。《说文》所无而见于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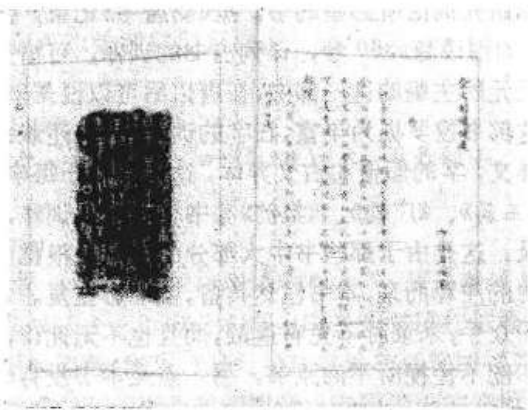
容庚著《金文编》

他字书的字,或有形声可识的字,都附列于各部之末。图形文字不可识的列为附录上,有形声而不可识的列为附录下。容庚释字谨慎,书中立说大多可信,王国维为本书初版撰序,对这一点曾特加称许。书后附采用彝器目录及引用书目,还有笔画检字,检索相当方便。

容庚另有《金文续编》一书,专收秦汉金文,于1935年印行。其体例与《金文编》大体相同,共收951字,附录34字,书后附采用秦汉器铭文,也有检字。(李学勤)

Jinwen Congkao

《金文丛考》 铜器铭文研究著作。郭沫若于1932年著,与《两周金文辞大系》为姊妹篇。内容包括《金文丛考》8篇,《金文余释》释字16篇,《新出四器铭考释》4篇,《金文韵读补遗》共40器。其中“丛考”部分论金文中所表现的周人的传统思想、谥法的起源、彝器人名的字义以及毛公鼎的年代等,考证详明,多非前人所能道。论毛公鼎的



郭沫若著《金文丛考》

年代一文,从铭辞中所透露的历史背景,从文辞中的熟语跟《诗》、《书》中文句的比较,从器物的花纹与形式等几方面来考察,推定其为宣王时器,可谓尽考证之能事。以此为法,可以做为判断彝器时代的准绳。其他解字辨韵各篇,大都可为定论。1954年作者把本书又与《金文余释之续》、《古代铭刻汇考》和《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中有关金文部分汇集为一书,仍名《金文丛考》。(周祖谟)

Jingyu

京语 (Gin language) 中国京族的语言。系属未定。与越南语(也称京语)基本相同。分布在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各县沿海地区。使用人口9000余(1982)。由于有相当一部分京族与汉族杂居,已有一半多的人改用当地的汉语粤方言。京语有28个声母,其中有4个是由于吸收粤方言借词而产生的。有带喉塞的浊塞音 $ʔb$ 、 $ʔd$,有几个唇化的舌根音。大部分元音有长短对立。有6个辅音韵尾: $-m$ 、 $-n$ 、 $-ŋ$ 、 $-p$ 、 $-t$ 、 $-k$,由11个元音音位或元音与元音或辅音韵尾构成103个韵母。有5个舒声调:33、22、214、45、11,原有2个促声调:45、22,由于粤方言借词的影响,新增一个促声调33。语音有简化的趋势。如越南语的 t 和 $ʔ$ 、 th 和 s 、 z 和 n 。中国境内的京语已分别读作 t 、 th 、 j ,此外,比越南语少 $-n$ 、 $-t$ 两个韵尾,原来的第3调(相当于越南语的“问声”)与第4调(相当于越南语的“跌声”)合并为一个调。词序和虚词为表达语法关系的主要手段。句子的基本语序是主语—谓语—宾语;动词带宾语和补语时,语序是动词—宾语—补语;量词可以单独用在名词的前面;以名词为中心的修饰词组,除数量词之外,修饰语居后。有大量的汉语借词,早期汉语借词有两种读音,新借词通过汉语粤方言借入。

(严学窘 欧阳觉亚)

Jingdian Shiwén

《经典释文》 解释儒家经典文字音义的书。唐代陆德明撰,凡30卷。书籍有音义创始于汉末魏晋之世,作者既众,互有不同。儒家所尊崇的五经以及《孝经》、《论语》之类,经师所作的音训最多。不过语有南北,音有楚夏,未能一致。陆德明在自序里说:“余少爱填典,留意艺文,虽志怀物外,而情存著述。粤以癸卯之岁,承乏上庠,循省旧音,苦其太简。……遂因暇景,救其不逮。……辄撰集五典、《孝经》、《论语》及《老》、《庄》、《尔雅》等音,合为三秩,三十卷,号曰《经典释文》。古今并录,括其枢要,经注毕详,训义兼辨。”从这些话可以知道他的书作于南朝陈后主至德元年癸卯(583)任国子助教的时候,他这部书不仅详记古今经师的注音(反切),而且经注并举,兼明义训。他不仅注解儒家的经书,而且也撰《老子》、《庄子》的音义。因为《老》、《庄》的著作在晋宋时代是比较盛行的。《尔雅》是解释语词名物训诂的书,旧日注家很多,所以更有必要集录在一起,为读经之助。

陈代以前先儒作音,大多只给经文注音,不给注文注音。所音经文则都录出经文全句。陆德明一改旧章,既注经文读音,也给注文加音,各书先标明篇章,然后摘字,标明音义,遇到必须分别的才全录文句。惟有《孝经》是当时童蒙开始要读的书,《老子》传本众多,文有差异,所以这两种书特标全句。他对前代的书音颇有斟酌,大体都照顾注者所理解的原书文义来采录读音。凡是典籍常用,他又认为合理合时的写在前面。其他音读,苟有可取,一并登录,标明氏姓,以免相乱。这种作法,成为后来作音义书的格式。陆德明生在陈末,所见古书极多,所以能

兼综各家,经他采录的有230多家。书中卷首叙述《周易》、《古文尚书》、《毛诗》、《三礼》、《春秋》三传、《孝经》、《论语》、《老子》、《庄子》、《尔雅》诸书的传受和注解的人极为



陆德明著《经典释文》

详备,是研究古籍流传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诸书的作者姓名、地望、官职都有记载,或详或略,都可以补史传的缺失。书中记载的音义对考证晋宋以后音韵的变迁和古代词义的转变以及一字的多音多义都有很大用处。这是一部极有价值的语言资料书。

《经典释文》在清代有徐乾学(1631~1694)《通志堂经解》刻本和卢文弨(1717~1795)抱经堂刻本,两者同出于明末的叶林宗的影宋抄本。叶抄是依钱谦益绛云楼所藏宋本移写,其中颇有脱误。清内府藏有南宋刻本,以前不为人所知,现为北京图书馆所藏,可刊正清刻本的错误处极多。又敦煌石室所出古籍中有《释文》十几种,可供校勘。《释文》原书本兼载音义,宋以后传本多存音删义,大失原来陆德明著书本旨。近有黄焯《经典释文汇校》本,以《通志堂经解》本为底本,既集录清人的校证,又与唐写本和南宋刻本比勘,极为详备,为读陆书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汇校》于198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参考书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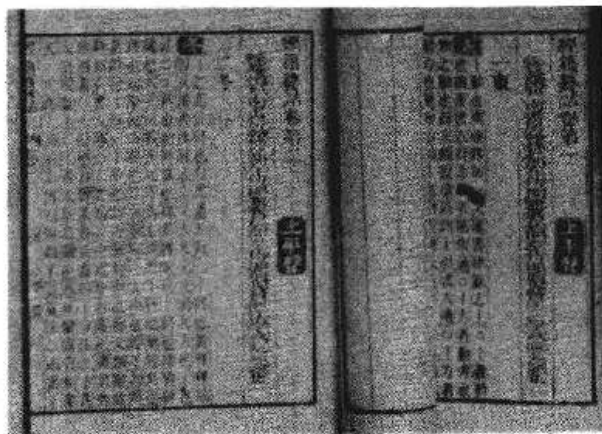
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原北平中国学院国学系印,1933。1984年中华书局有重印点校本。

黄焯:《经典释文汇校》,中华书局,北京,1983。

(周士琦)

Jingji Zuangu

《经籍纂诂》 汇编古书中的文字训释编排而成的训诂书。清代阮元撰集,臧镛堂、臧礼堂等纂校。嘉庆三年(1798)刊行。全书按照《佩文韵府》分韵编字,《佩文韵府》所没有的字就根据《广韵》或《集韵》增补。卷次按《佩文韵府》分一韵为一卷,共106卷,别有补遗106卷,分附于正编每卷之后。全书所辑录的文字训释都是唐以前的经传子史的注解和唐以前的训诂书、字书、韵书、音义书中



阮元主编《经籍纂诂》

所有的。采用古书达100多种,收字13349字(异体字不在内)。古代的文字义训和在不同古书文句中的训解几乎都汇聚在一起了。

书中每字下叙列所采录的训释,首先把以声音相近的词为训解的列在前面,然后再以本义居前,引申义和展转相训的居次,而以解释事物名称的居末。每一训释必写明所见的书籍和所训解的原文。如果是同一训释而分见于各书时,那就依次列举以证字有定诂,义有同训。如果一字二音,声调有不同,意义也有不同,就根据韵书的反切归类,分在两韵,秩然有序,若网在纲。打开一卷书,同韵的字俱在,检查一个字,各种书传的训解和正文都列在眼前,读者可以根据这些资料来审辨字义,哪是通常应用的意义,哪是在某一文句中所具有的特殊意义,也可以分辨哪是字的本义,哪是较早的意义,哪是引申义,哪是后起的意义,更进一步,还可以参考一字之下所列的各种训释来推考某书原来的注解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或不妥当,可以根据其他训解来订正。所以这部书是探索古代词义和研究训诂所必备的书。据《新唐书》记载,颜真卿著有《韵海镜源》360卷,详列古书的训释,可惜久已亡佚。阮元所主编的这一部书,在唐以后可以说是创举了。

这部书搜罗极为丰富,在字的训释之外,还兼顾到经传的异文,字的假借和古文异体,这些都列于每字之末,至于《玉篇》、《广韵》、《集韵》等书也有字义训释,本书均不录,这是由于那些书中大部分的训解是根据前代经传子史的注释而来,本书已然具备,就不必重复。本书由于成于众手,采录时不免有遗漏,而且也不无讹误,读者用时不能不检视所举的原书。另一点是本书没有给字加注音,一字二音,四声不同的,在列举字义时有相混不清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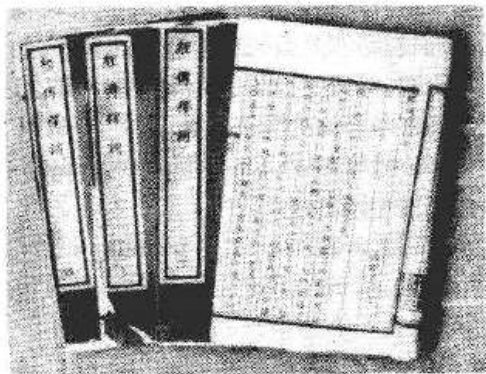
(周士琦)

Jingzhuang Shici

《经传释词》 解释经传古籍中虚词的专著。清代王引之撰。王引之以前有刘淇所著《助字辨略》一书,专门讲解虚词,王氏似未见到。刘书著于康熙年间,王书成于嘉庆年间,后于刘书80余年。当王引之时考据之学大兴,段玉裁、王念孙闢步于前,王引之继承父业,加以引

申,自然容易超过刘书。刘书虽疏略,但引证下至唐宋,王书则仅及西汉而止。这是王书以“经传”为书名,自不能论及“经传”以外的书的缘故,虽引《战国策》及《史记》等,大概他的意思这类书可以说是经传的附庸品。

《经传释词》共收虚字 160 个,虽以单音虚词为主,但有同义虚词连用的,也偶然随文论及,如“庸”字后,附及“庸何”、“庸安”、“庸诘”、“庸孰”4 词,这是他的高明



王引之著《经传释词》

处。然而《经传释词》仍有缺点,一是阙漏较多,甚至《经义述闻》论过的,《释词》也失载。《经义述闻》曾论《左传》宣公十二年“又可以为京观乎”,证明“可”即“何”,《释词》却失载。至于“可”也用表数之约略,如《史记·韩长孺传》:“太后、长公主更赐安国可直千余金。”王引之大概因为“经传”没有这种用法,因此也置而不论。二是偶有误解古书处,甚至因此断句失误,如卷二“焉”字,引《庄子·则阳篇》:“君为政,焉勿凶莽;治民,焉勿灭裂”,硬把“焉”字解作“於是”,其实“焉”字应属上读。还有若干解释不确切,为杨树达《词讼》所不取。然而此书到现在还有相当参考价值。《经传释词》初有家刻本,后有学海堂《皇清经解》本,钱熙祚《守山阁丛书》本。中华书局有排印本,并有附录数种。湖南岳麓书社的排印本,又附以黄侃、杨树达的案语 370 余条,印于相应文字的书眉。案语虽未必尽可信,但可以给读者以启发。

(杨伯峻)

Jingpowen

景颇文 (Jingpo writing) 见景颇语。

Jingpoyu

景颇语 (Jingpo language) 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景颇语支。主要分布在中国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潞西、陇川、瑞丽、盈江等地和缅甸的掸邦、克钦邦。此外,在印度也有使用者。中国境内的使用人口约有 2 万多(1982)。景颇语有 31 个声母: p, ph, m, pj, phj, mj, p3, ph3, f, ts, tsʰ, s, t, th, n, l, ɰ, ɰh, ʃ, ʒ, k, kh, ŋ, x, kj, khj, ŋj, k3, kh3, w, j。有 88 个韵母。元音 i, e, a, o, u 各分松紧, 构成 10 个单元音韵母和带 -i, -u 韵尾的 8 个复合元音韵母, 以及带辅音尾的 70 个韵母。辅音韵尾有 7 个: -m, -n, -ŋ, -p, -t, -k, -ʔ。有 4 个声调: 55、33、31、51, 其中 51 调出现较少。双音节词的前一音节大多弱化。以虚词和词序为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有一些形态

变化。人称代词单数加后加成分表示双数和复数; 单数以韵母的变化表示领格; 疑问代词重叠表示不定量的复数。动词的使动态有屈折式和分析式两种, 屈折式主要是在自动词前加词头表示使动, 有少数则以语音变化表示。量词较少, 名词计个体单位时一般不用量词。句尾词相当丰富, 通过屈折变化综合体现谓语的“式”、“人称”、“数”、“方向”等语法意义。单纯词中有不少双音节词。借词主要来自汉语、傣语、缅甸语等。四音格词比较丰富。景颇文创制于 19 世纪末, 是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 共有 23 个字母。多数音位用单字母和双字母表示, 少数用 3 个字母表示。中国和缅甸都用景颇文出版过词典、报纸、教科书等。

(戴庆厦)

Jingpo yuzhi

景颇语支 (Jingpo branch) 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语支之一。目前公认属这一语支的只有景颇语, 有人主张独龙族、洛巴语等也属这一语支。景颇语支主要分布在中国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和缅甸。景颇语支语言的特征介于藏语支和缅语支、彝语支之间: ①在词汇中, 有些词同藏语支同源, 有些词同缅、彝语支同源。双音节的单纯词较多, 前一音节往往弱化。这类双音节词与藏语支的单音节复辅音词对应, 在缅、彝语支里则与单音节单辅音词对应。②韵尾有 -m, -n, -ŋ, -p, -t, -k, -ʔ 等。在藏语支、缅语支里大多与相同的韵尾对应, 在彝语支里则与零韵尾对应。③有形态变化, 但少于藏语支, 多于缅、彝语支。④量词较少, 名词计个体单位时一般不用量词。⑤句尾词相当丰富, 通过屈折变化综合体现谓语的“式”、“人称”、“数”、“方向”等语法意义。

(戴庆厦)

Jiujing Ziyang

《九经字样》 一种辨正经传文字形体的书。唐文宗开成二年(837)翰林待诏朝议郎、权知河王友唐玄度撰。玄度奉敕覈定石经字体, 根据大历十一年(776)张参所作《五经文字》, 补其未备, 撰集为《新加九经字样》一卷, 与《五经文字》一同刻于石经之末。全书有 76 部, 有的字在偏旁上不好归部的统归杂辨部。共收字 421 字。书前所载开成二年八月牒讲到刊定字体的准则是: “如总据《说文》, 即古体惊俗; 若依近代文字, 或传写乖讹。今与校勘官同商较是非, 取其适中。”关于注音, 唐玄度在自序里说: “谨依《开元文字》, 避以反言, 但组四声, 定其音旨。”即采用唐玄宗《开元文字音义》的方法, 不用反切,



唐玄度著《九经字样》

而用直音。如果没有适当的同音字可注,就注出某平、某上、某去、某入,按四声来调音。这就是“但纽四声,定其音旨”的意思。跟《五经文字》反切与直音并用的方式不同。《九经字样》有石刻本,在西安陕西博物馆碑林。木刻本有《小学汇函》本,《后知不足斋丛书》本,商务印书馆所印《丛书集成》收有此书。(参见彩图插页第11页)

(周祖漢)

jufa lei xing yansuan

句法类型演算 (calculation of syntactical types) 根据句法类型来判定一个符号串是不是语言中成立句子的数理语言学理论。由语言学家Y.巴尔-希列尔和美国数学家J.兰贝克先后提出。句法类型演算是辨识语言的模型。这种理论认为,任何词都可以按它们在句子中的功能归入一定的句法类型。用n表示名词的句法类型,用s表示句子的句法类型,用n和s不同的结合方式表示其他的句法类型。

如果有某个词B,其后面的词C的句法类型为 γ ,而它们所构成的词的序列BC的功能与 β 相同,则这个词B的句法类型符号为 β/γ ;如果有某个词B,其前面的词A的句法类型为 α 而它们所构成的词的序列AB的功能与 β 相同,则这个词B的句法类型符号为 α/β ;如果有某个词B,其前面的词A的句法类型为 α ,其后面的词C的句法类型为 γ ,而它们所构成的词的序列ABC的功能与 β 相同,则这个词B的句法类型符号为 $\alpha/\beta/\gamma$ 。根据这种记法,可以写出英语中绝大部分词的句法类型。例如,John(约翰)的句法类型为n。poor John(可怜的约翰),poor后面出现名词John,它所构成的poor John的功能与名词相同,故其句法类型为n/n。John works(约翰工作),works前面出现名词John,它所构成的John works的功能与句子相同,故其句法类型为n\s。John likes Jane(约翰喜欢珍妮),likes前面为名词John,后面为名词Jane,它所构成的John likes Jane的功能与句子相同,故其句法类型为n\s/n。

John slept soundly(约翰睡熟了), soundly 前面的 slept 为 n\s, 它所构成的slept soundly 的功能与 n\s 相同, 故其句法类型为(n\s)\n\s。

John works here (约翰在这里工作), here 能把 John works 这个句子 s 转换为一个新的句子 John works here, 故 here 的句法类型为 s\s。John never works (约翰从不工作) 中, 由于 John 的句法类型为 n, 故 never works 的句法类型为 n\s, 可见, 句法类型为 n\s 的 works 前面加了 never 构成 never works 之后, 其句法类型仍为 n\s, 所以, never 的句法类型为 n\s (n\s)。

John works for Jane (约翰为珍妮工作), for 的作用与 John works here 中的 here 的作用相似,但后面还有一个名词 Jane,故 for 的句法类型为 s\s/n。

John works and Jane rests (约翰工作而珍妮休息) 中, and 把前后两个句子连接起来, 构成一个新句子, 故其句法类型为 s\ s/s, 等等。

把语言中的词列出一个完整的句法类型清单之后,就可以按如下规则对这些句法类型进行演算。

如果符号序列的形式为 $\alpha, \alpha \backslash \beta / \gamma, \gamma$, 那么就用 β 来替换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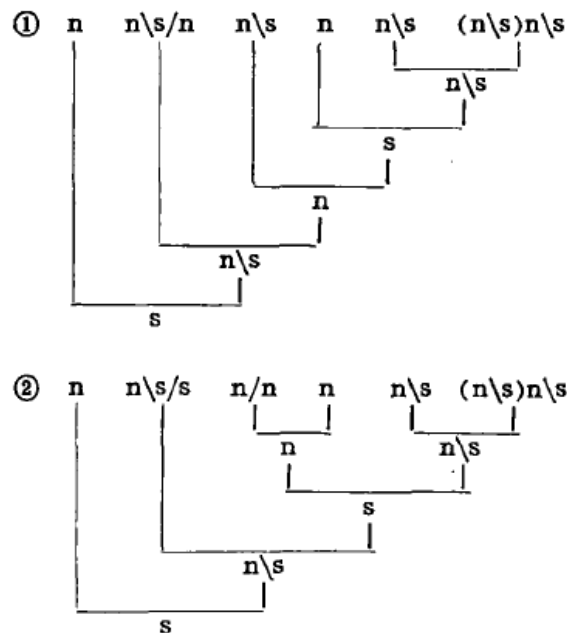
这个规则同时还包括下面两个规则：①用 β 替换形如 $\alpha, \alpha \setminus \beta$ 的符号序列；②用 β 替换形如 $\beta \setminus \alpha, \gamma$ 的符号序列。

根据句法类型及演算规则，便可对语言中的任何词的序列进行判定，辨识它是不是该语言中合格的句子。如果通过有限个演算步骤，可以把词的序列化为 s ，那么，这个词的序列便是语言中合格的句子。

例如，给 Paul thought that John slept soundly — 句中的每一个词都列出句法类型：

Paul thought that John slept soundly
 n n n n n\s (n\s)n\s
 n\s n/n (n\s/n)n\s/n
 n\s/n n/s
 n\s/s

这些句法类型共有 24 种组合方式,运用演算规则进行运算之后,最后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可见，这个词的序列是英语中合格的句子，但有两个结论，说明它在句法上有两种不同的结构，因而相应地有两种不同的意思：一个意思是“保罗想，约翰睡熟了”，*that* 是连接词；另一个意思是“保罗想，那个约翰睡熟了”，*that* 是指示代词，在动词 *thought* 之后作为从句中的连词被省略了。

这种句法类型演算,又称为范畴语法,它对于自然语言的自动分析是有价值的。

参考书目

Y. Bar-Hillel, *Decision Procedures for Structure in Natural Language*, «Logique et Analyse», 2-e année, No. 5, 1959.

(冯志伟)

K

论》(1901)、《普通语言学讲义》(1913)、《亚利安-欧洲语言的比较研究》(1914)等。

见博杜恩·德·库尔德内,新语法学派。

(戚雨村)

kal-he-qi-cuo

开合齐撮 见等韵。

kaikou

开口 见等韵。

Kal'erte yuzu

凯尔特语族 (Celtic group) 印欧语系的语族之一。凯尔特诸语言历史上一度通行于很广的地区。后来由于拉丁语逐渐取代了某些凯尔特语言,使它们的通行范围大大缩小,今天仅存于不列颠群岛的一些人烟稀少的地区和法国西北部的一个角落。使用人口共 200 余万。

通常把凯尔特语言分为大陆凯尔特语和海岛凯尔特语两大类。大陆凯尔特语以高卢语为代表,现存材料,仅有散见于希腊罗马史书中的专有名词、高卢故地出土文物上的铭文和保存在别的语言里的零星词语,例如拉丁语的 *caballus* (马)。大陆凯尔特语于 5 世纪消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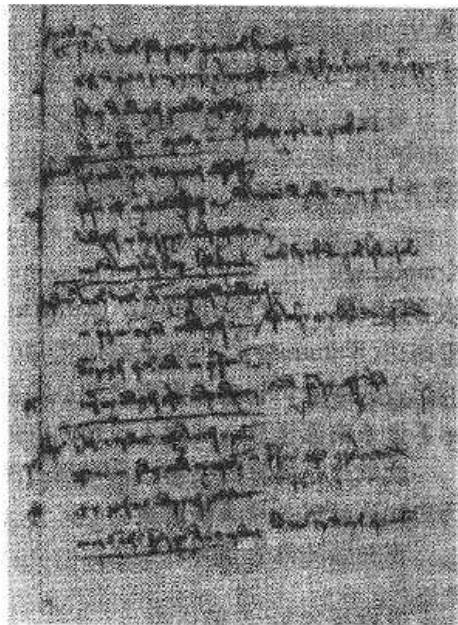
Kashan xuepai

喀山学派 (Kazan school) 19 世纪 70~80 年代在俄国喀山大学建立的语言学流派。它的创始人是波兰语言学家 J. N. 博杜恩·德·库尔德内,1875~1883 年他在喀山大学任比较语言学教授。主要成员有他的学生和同事 H. B. 克鲁舍夫斯基 (1851~1887)、B. A. 博戈罗迪茨基 (1857~1941)、C. K. 布利奇 (1859~1921)、A. H. 阿列克桑德罗夫 (1861~?) 等。博杜恩·德·库尔德内除讲课外,还经常邀集成员在他的寓所聚会,交流研究成果,评论新出图书和杂志上的论文。这一学派对当时的俄国语言学以及后来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派都有影响。

喀山学派成立的宗旨在于提出语言学中的重要问题,并进行理论概括。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写道:“‘喀山语言学派’的主要特征在于力求作出概括。这一目标遭到许多人的非难甚至怀疑,然而没有这一点,任何一门真正的科学都是无法想象的。”他要求:不要把字母当成实际的语音(因为拼法和读法往往不对应);划分词的语音部分和形态部分;弄清在语言的历史变化中,哪些只限于一个时期,哪些是长期进行的;并强调要研究活的语言系统和言语现象等。这一学派提出了当时很有创见的一些看法。音位这个概念就是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在喀山时期和他的学生克鲁舍夫斯基一起提出的。

喀山学派在不少方面与德国的新语法学派比较接近,如提出心理主义的语言观,区分言语的口头形式和书面形式,分析语言中心理方面和生理方面的相互关系,重视对活的语言的研究等。但是这两个学派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新语法学派的观点是完全建立在个人心理联想的基础上的,喀山学派则既采用这一学说,又吸收民族心理学的合理因素。新语法学派偏重历史,喀山学派则主张区分语言的静态(共时)研究和动态(历时)研究。博杜恩·德·库尔德内还对新语法学派的语音规则提出了批评。

除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外,对喀山学派的发展起重要作用的是克鲁舍夫斯基和博戈罗迪茨基。克鲁舍夫斯基出生于波兰,华沙大学毕业,在喀山大学获博士学位后任该校教授。他很早(1883)就提出“词是事物的符号”、“语言是符号系统”的观点,主张在符号性和系统性的基础上研究语言的发展规则,并说一个词有类比性联系(聚合关系)和邻接性联系(组合关系)。主要著作有《语言科学概要》(1883)、《语言学札记》(1891~1893)等。博戈罗迪茨基毕业于喀山大学,曾任喀山大学和喀山师范学院教授。他发展了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的一系列论点,强调语言的社会性,并主张既重视历时研究也重视共时研究。主要著作有《俄语语法通论》(1904)、《语言学和俄语概



科尼什语古文
片段

海岛凯尔特语分为盖德尔语(又称盖尔语)和不列颠语两支,即北支和南支。盖德尔语支包括爱尔兰语以及由此派生的苏格兰盖尔语和马恩语。不列颠语支包括威尔士语和科尼什语等(见图)。5~6 世纪,一部分科尼什人移居法国的布列塔尼,他们所说的语言后来称为布列塔尼语。科尼什语于 18 世纪末消亡。马恩语在 20 世纪仅有极少人说。苏格兰盖尔语的使用人口有几万。说威尔士语的约 60 万人,说爱尔兰语的约 50 万人,但在努力复兴中。

凯尔特语言属于印欧语言中的 K 类语言。凯尔特语

言区别于其他印欧语言的最大特点是，在共同凯尔特语时期丧失了原始印欧语的 *p 音，这种现象可见于科尼什语 lūn，布列塔尼语 leūn (拉丁语作 plenus “满”)，马恩语 ayr，爱尔兰语 athair (拉丁语 pater “父亲”)。由于古代词尾音节的失落，也由于同化作用，海岛凯尔特语普遍出现了“头音交替”，即一个辅音为另一个辅音所代替的音变现象。例如马恩语 mooar—vooar (大)；爱尔兰语 piopa (烟斗)—a phiopa (他的烟斗)；威尔士语 gwerdd (绿)—chollen werdd (绿榛子，gwerdd 的头音失落)。

凯尔特语言名词的格大都已经没有区别，但呼格和与格的某些独立词形还在使用，属格则或用加词尾或用调动位置来表示。性和数的区别依然存在。形容词除级外，多数没有变化。有定冠词，没有不定冠词。人称代词的用法复杂，包括存在一些和介词熔合的形式。

凯尔特语言在句法上的特点是动词在句子的首位；常用复合形式表示本来可用一个动词 (例如“有”) 表示的意义。凯尔特语言的基本词汇保留了印欧语早期的共同词语。

(周流溪)

kaishu

楷书 见真书。

Kannadayu

坎纳达语 (Kannada language) 又称卡纳里斯语 (Kanarese)。印度卡纳塔克邦 (旧名迈索尔邦) 坎纳达人的语言，也是印度宪法承认的语言之一。属达罗毗荼语系南部语族。使用人口约 2 000 万。

坎纳达语最早的文字记录可以追溯到 6 世纪。它的历史比马拉雅拉姆语要悠久。

南部语族几个语言的关系：

原始泰米尔-坎纳达语

坎纳达语 原始泰米尔-马拉雅拉姆语
 ↓
 泰米尔语 马拉雅拉姆语

现用文字始于 6 世纪。民族文学开始于 9 世纪中叶。

坎纳达语具有达罗毗荼语言的一般特点，例如辅音有 t (齿音) ~ t̪ (龈音) ~ t̪ʰ (卷舌音) 的对立。‘坎纳达’之名本身最后一个音节的 d 就是卷舌音 ɖ。但是卷舌音系列中的 r 音已经混入 l、ɖ 之类的音了。与此同时，坎纳达语又产生了别的达罗毗荼语言所没有的 h 音。例如 hesru (名字，泰米尔语为 peyar)。不过有些语言学家认为这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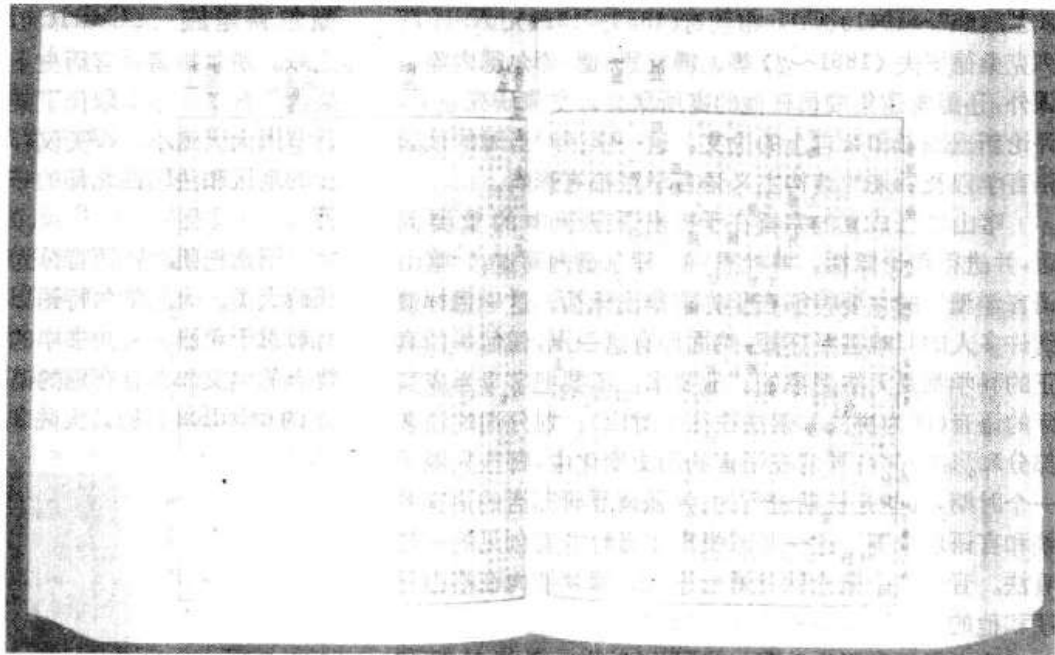
h 应该是原始达罗毗荼语言所固有的。在坎纳达语的某些方言中，在那些不位于单词开头的弱化音节里有元音脱落现象。

坎纳达语具有引人注目的社会方言：婆罗门、非婆罗门和“不可接触者”三种人所用的语言有明显的差别。

(周流溪)

Kangxi Zidian

《康熙字典》 清代康熙帝玄烨令张玉书、陈廷敬等参照明代梅膺祚《字汇》和张自烈《正字通》编纂而成的一部大型字典 (参见彩图插页第 11 页)。书成于康熙五十五年 (1716)，因定名为《康熙字典》。书分为 12 集 214



清代官修《康熙字典》

部，与《正字通》相同。书首列《字母切韵要法》和《等韵切音指南》，以便读者了解切音。又有《检字》和《辨似》。《检字》为检查疑难字而设，《辨似》是辨别笔画近似的字。书中每字下详列《广韵》、《集韵》、《古今韵会》等书的反切，并加注直音。字义之下都引经、史、子、集文句为证，并举出篇名，极有条理。对音义有疑的都加按辨析，颇便应用。而且收字极多，有 47 035 字。不过引书时有错误，道光十一年 (1831) 王引之著成《字典考证》一书，凡 12 卷，改正原书的错误有 2 588 条，足备参考。

(周士琦)

Ke'erkezlwen

柯尔克孜文 (Kirgiz writing) 见吉尔吉斯语。

Ke'erkezlyu

柯尔克孜语 (Kirgiz language) 见吉尔吉斯语。

Ke'erduofan yuzu

科尔多凡语族 (Kordofanian group) 见尼日尔-科尔多凡语系。

Kema yuzu

科马语族 (Koman group) 见尼罗-撒哈拉语系。

Keylsang yuxl

科依桑语系 (Khoisan family) 霍屯督人和布须曼人以及非洲南部其他非班图人使用的一组语言。共约 15 种, 分布于非洲南部。使用人口近 15 万。霍屯督人称他们自己为“科依”, 称布须曼人为“桑”, “科依桑”一词得名于两个名称的结合。

科依桑语系通常分为 3 个语族: 北部语族, 包括几种使用人口很少的语言; 中部语族, 主要包括霍屯督语、布须曼语; 南部语族, 包括几种使用人口很少的语言。此外, 有些语言学家把坦桑尼亚境内一些小社团使用的哈扎语和桑达韦语也归入科依桑语系, 作为独立的语言跟以上 3 个语族并列, 但这两种语言和科依桑语系其他语言的亲属关系比较疏远。科依桑诸语言一度在南部非洲通行较广。但是, 由于班图人从北向南移居。欧洲移民从南向北扩张, 说科依桑诸语言的人被挤到了卡拉哈里沙漠附近人烟稀少的地区。科依桑诸语言的突出特点是使用吸气音, 构成辅音的一个分系统。世界上只有科依桑诸语言以及相邻的几种班图语言, 如祖鲁语、柯萨语等才在讲话中使用这种音, 班图诸语言的吸气音也借自科依桑诸语言。科依桑诸语言基本的吸气音从 3 个(如桑达韦语中)到 7 个(如布须曼语某些方言中)不等, 通常分为: 齿槽吸气音、旁流吸气音、舌面吸气音(又称卷舌吸气音)、齿吸气音、唇吸气音、半圆唇吸气音以及腭吸气音, 词首通常是吸气音。科依桑诸语言都是声调语言, 有鼻元音。大多数名词、动词和形容词词根都是双音节的。某些语言, 如霍屯督语等有与自然性别相一致的性。

(黄长著)

Keshimi'eryu

克什米尔语 (Kashmiri language) 印度次大陆克什米尔地区的一种语言, 是印度宪法承认的语言之一。属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印度语支。使用人口约 300 万。它的标准语言形成于 14 世纪。

克什米尔语的音系里还有印度语言中常见的齿音、龈音和卷舌音的区别, 但是浊塞音的送气音已经消失。例如 bati(饭), 旁遮普语作 bhāṭṭ, dād(牛奶), 印地语作 dūdh, gur(马), 印地语作 ghora。鼻音有顺同化倾向。例如 dand(牙齿), 来源于梵语 danta, t 在 n 后变成 d, don(搅乳棒), 中古雅利安语作 daṇḍa(杖), d 被鼻音吞没。克什米尔语的名词有主格、对格、夺格和施动格。使用后置词, 如 garājas-andar(车房-里)。句子的基本词序是主语—动词—宾语, 与印度语言的通例(主语—宾语—动词)不同。它的词汇来源复杂, 有德尔德语、梵语、旁遮普语、波斯语的成分。克什米尔语的传统文字是沙拉达文; 现在通行波斯-阿拉伯文字。在印度教徒中, 梵文天城体也在使用。

(周流溪)

Kehua Benzl

《客话本字》 (Etymological Notes on the Hakka Dialects)

清代考证客家方言本字的著作, 光绪乙巳(1905)孟夏月序, 光绪丁未(1907)冬刊。作者杨恭桓, 字穆吾, 嘉应州(今广东梅县)人, 生卒年代不详, 研究方言和音韵。他的著作还有《韵学汇要》一书(未刊)。《客话本字》正文包括 5 篇:《客话双字》、《客话叠字》、《客话单字》、《客话补遗》、《客话源流多本中原音韵考》。全书收“多向所疑土谈有音无字者, 共一千四百余字”, 包括单音字、双音字和多音字。每条先列所谓本字, 后引用古籍以作考证, 旨在说明客话字汇“皆有所本”。如“癰, 音垒, 皮起也。今谓皮肤发红曰癰子”。本字反切如与今方言不合, 则“取土谈共读字以音之或切之, 先用切, 后用土音”。如刷字本奇逆切, 今改惊入声, 以与土谈相符合。每字之音义只取与土谈相合者, 其他与土谈无关者, 概不引录。编排次序仿照《康熙字典》。正文最后一篇《客话源流多本中原音韵考》对客家人和客家话的源流有所考证。作者认为“欲辨土谈, 须明反切, 欲明反切, 须识字母清浊”。所以, 这本书另有几篇附录, 讨论反切和字母清浊等, 即《反切详论》、《切字双音六十四字捷诀》、《三十六字母清浊位》、《字母分别》、《更正客话平仄清浊误读字》、《俗相沿误用字》、《字画辨正》。《客话本字》对于了解清代嘉应客家方言词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也可供考证客家方言本字的参考, 如“癰, 音渠, 瘦也。今人谓瘦曰癰瘦, 正合。亦作臞”。今按, 癰, 《集韵》:“权俱切。《说文》‘少肉’也。”音义皆合。但间有牵强附会处。如“蓬松: 蓬字俗呼盆上声, 蓬盆乃一声之转”。作者认为“p'un 松”中的[p'un]本字是“蓬”。但是在今客家方言中“蓬”读[p'un], 跟[p'un]不同。“蓬松”应当作“粉松”, 形容象粉一样松。今客家方言“粉”读[p'un]。

(游汝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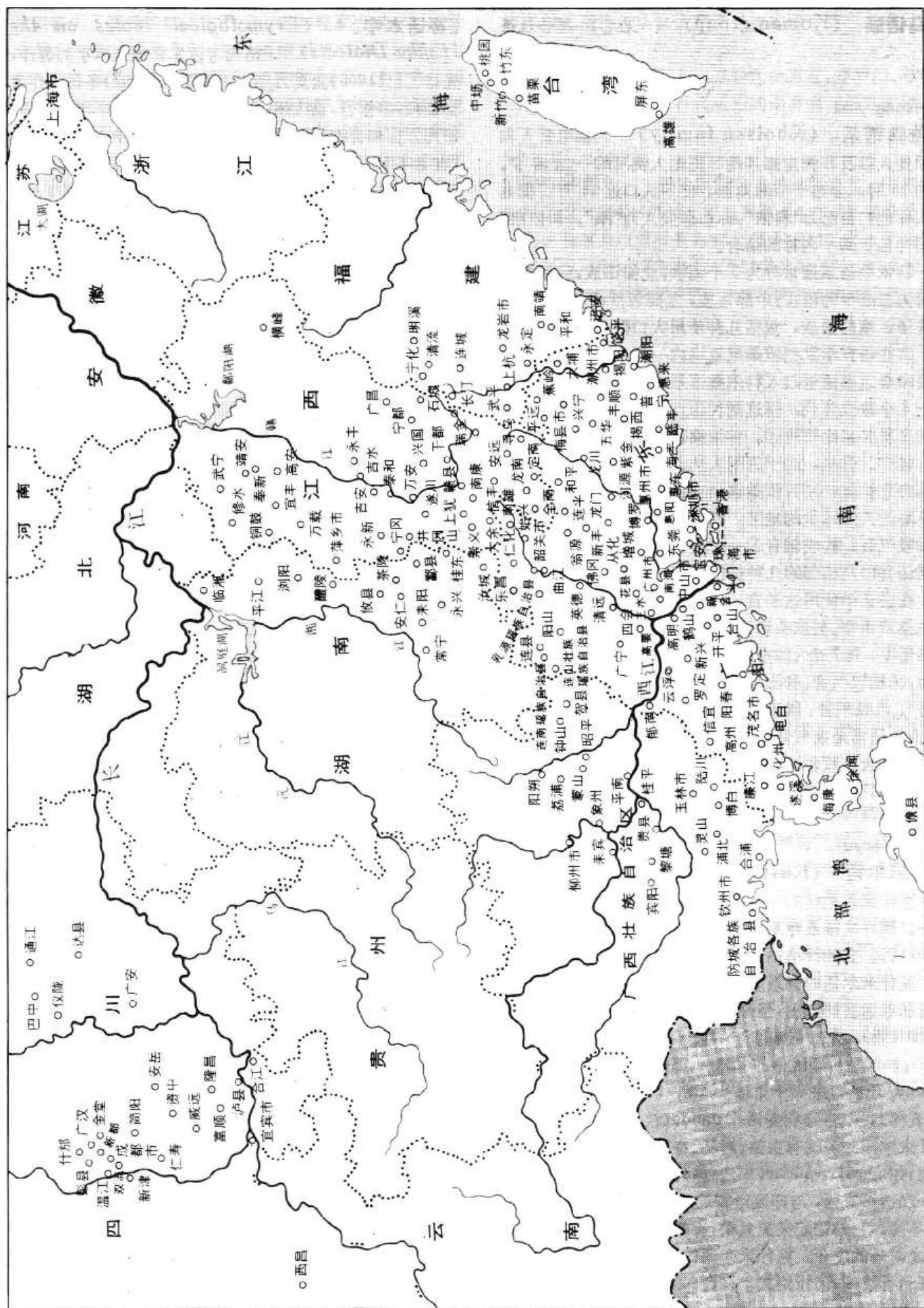
Kejla fangyan

客家方言 (Hakka dialects) 又称客家话或客话, 个别地方也称涯话、麻介话、新民话、土广东话。它是汉语七大方言中内部比较一致的一种方言。

通行地域 客家方言主要通行于广东东部和北部、广西南部、福建西部、江西南部、台湾、四川和湖南部分地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越南、菲律宾以及美洲的华侨、华裔中也有使用者。使用人口约 3700 万。客家话以梅县话为代表。

各省或自治区的通行地区大致如下:

①广东省纯粹属客家方言或以客家方言为主的县市有: 梅县、韶关、惠州、兴宁、五华、蕉岭、大埔、平远、龙川、和平、始兴、连平、新丰、河源、丰顺、紫金、南雄、翁源、博罗、宝安、惠阳、惠东、揭西、仁化、乐昌、廉江、曲江、乳源、连南、英德。此外, 饶平、潮州、揭阳、潮阳、惠来、普宁、陆丰、海丰、龙门、深圳、佛冈、清远、从化、花县、南海、增城、广州、东莞、中山、珠海、斗门、新会、连县、连山、阳山、广宁、三水、高要、云浮、高明、新兴、鹤山、开平、台山、郁南、



客家方言分布简图

罗定、阳春、阳江、信宜、高州、茂名、四会、化州、遂溪、海康、徐闻、电白、儋县以及香港的部分地区也讲客家方言。

②广西壮族自治区内客家方言是第3大方言。比较集中的地区是：陆川、博白、浦北南部与合浦东部；其次是防城、钦州与灵山断续相连的一片地区，以及以贵县为中心，沿铁路东南至玉林北部，西北到黎塘、宾阳地区；再次是贺县、钟山、昭平相连接的地区。此外，还有来宾、桂平、平南、象州、柳州、蒙山、荔浦、阳朔。

③福建省主要通行于长汀、连城、上杭、武平、永定、清流、宁化、明溪等县。此外，南靖县的曲江，平和县的九峰、长乐，诏安县的秀篆、官陂，龙岩西北部的万安（旧名溪口镇）等地说的也是客家方言。

④江西省主要通行于南部的兴国、宁都、石城、瑞金、会昌、寻乌、安远、定南、龙南、全南、信丰（不包括县城嘉定镇和部分农村）、大余、崇义、上犹、南康、赣县、于都等17个县和西北部的铜鼓县。此外，广昌、永丰、吉安、泰和、万安、遂川、井冈山、宁冈、永新、万载、宜丰、奉新、靖安、高安、修水、武宁、横峰的部分乡镇均讲客家方言。

⑤四川省主要通行于川西的成都郊区东山一带、新都、金堂、广汉、什邡、彭县、温江、双流、新津，川南的简阳、仁寿、资中、威远、安岳、富顺、隆昌、泸县、合江、宜宾，川中的广安，川北的仪陇、巴中、通江、达县，凉山州的西昌等县市的局部地区。

⑥湖南省主要通行于攸县、茶陵、酃县、汝城、桂东等县的某些乡村，其次通行于浏阳和平江县的某些乡村。江永、江华等地也有少数人说客家方言。

⑦台湾省主要通行于北部桃园以南的各乡镇和中坜、新竹、竹东、苗栗一带乡镇，以及南部的屏东县一部分乡镇和高雄县的美浓镇等地。除上述地区的汉族居民使用客家方言外，福建、浙江、江西、广东、安徽五省的畲族几乎都使用客家方言。

主要语言特征 语音方面 ①声母：

a. 古浊塞音和塞擦音（並、定、群、从、澄、崇）声母字，不论平仄，大都变为送气清声母。例如“别、辨”的声母是p'，“地、敌”的声母是t'，“旧、件”的声母是k'，“昨、捷、浊、住、助”的声母是ts'。

b. 古晓、匣母的合口字声母，多变读为f。例如“灰、辉、怀、谎、花、虎、婚、回、呼”的声母是f。

c. 部分古非、敷、奉母字，口语中念重唇音声母p、p'，保留了“古无轻唇”这一上古语音的特点。例如“飞、斧、肥、吠、浮、符”。

d. 古见组声母细音今读大都保持舌根音k、k'、h。例如“基、记、九”的声母是k，“欺、谦、求”的声母是k'，“希、喜”的声母是h。

e. 大都有唇齿浊擦音声母v。它来源于古微、影、云母和少数匣母的合口韵字。例如：“物、务、碗、蛙、威、屋、湾、窝、王、往、话、黄、皇、还”。此外，古喻母合口三等字

闽西客家话也有念v声母的，例如：“云、域、疫”。

f. 古知、照精组声母在客家方言内部的分化情况比较复杂。例如广东多数地区，这三组声母合流，念ts、ts'、s；部分地区知、照三（章）组声母念ts、ts'、s。照二（庄）组、精组声母念ts、ts'、s。例如：

	知	耻	池	证	齿	船	身
梅县	.ts ₁	'ts' ₁	.ts' ₁	tsən	'ts' ₁	.sən	sən
兴宁	.ts ₁	'ts' ₁	.ts' ₁	tsin	'ts' ₁	.sən	sin

	慎	煎	迁	钱	仙	羨
梅县	'sən	.tsien	.ts'ien	.ts'ien	.sien	'sien
兴宁	'suŋ	.tsien	.ts'ien	.ts'ien	.sien	'sən

古晓、匣三四等字和个别溪母字，在兴宁话中念s声母。例如：晓'sau，希.sɿ，虚.sɿ，休.su，气.sɿ，器.sɿ，弃.sɿ，以母字和不少影、云母字念z声母，例如：羊.zəŋ，样.zəŋ，盐.zəŋ，医.zɿ，衣.zɿ，音.zuŋ，英.ziŋ，约.zək，援.zən，圆.zən，员.zən，袁.zən，怨.zəŋ，远.zən，院.zən。广西陆川（南部乌石话除外）、贺县、贵县客家话大体上古精、照二（庄）组声母念ts、ts'、s，知、照三（章）组声母念ts、ts'、s。例如：津.tsin，珍.tsin，侵.tsim，深.ts'im，旬.sun，绳.sun。古知组一部分字的声母闽西念t、t'，例如：知.ti，猪.tu，竹.tu，珍.ten，张.təŋ，中.təŋ，池.t'i，超.t'io，抽.t'ieu。古章组一部分字的声母闽西念t、t'、j。例如：纸.t'i，诸.tu，真.ten，春.t'en，昌.t'əŋ，蛇.ja，书.ju。台湾省的美浓客家话知、照、精组合流。例如：灾、斋、猪、章的声母是ts，猜、差、丑、昌的声母是ts'，三、沙、书的声母是s。桃园客家话古精组和照二（庄）组字的声母念ts、ts'、s。例如：精、庄、从、初、心、生；知组和照三（章）组字的声母念t、t'、j。例如猪、章、丑、昌、船、书。四川华阳凉水井客家话古知、照、精组字的声母大都念ts、ts'、s，但有部分精组字的声母念t，例如：亲、戚、祭、枪、尽、刺。

g. 鼻音声母比较丰富。不少地区除有m、n、ŋ声母外，还有ɲ声母。ɲ声母出现在古疑、泥（娘）母三四等细音字和部分日母字中。例如：语、宜、人、牛、年、迎、日、眼、娘。

h. 古来母字大都念l声母，但古来母齐齿呼的小部分字的声母闽西长汀客家话白读念t，这是很特殊的。例如：李'ti，六.təu，笠'ti，鳞.ten，卵'lü，聋.log，力'ti，两'tioŋ，林.ten，刘.təu。

②韵母：

a. 绝大部分地区客家方言没有撮口呼韵母，撮口呼与齐齿呼混读。例如：

	吕	聚	取	须	居	区	虚	雨	与
梅县	.li	ts'i	'ts'i	.si	.ki	.k'i	.hi	'i	.i
闽西	.li	ts'i	'ts'i	.si	.fi	.f'i	.fi	'i	.i
桃源	.li	ts'i	'ts'i	.si	.ki	.k'i	.hi	'i	.i

b. 以 $\circ$ 或 $\circ$ 为主要元音的韵母较多。例如:

梅县	哥	梅	江	官	光	果	各	割	廓
	,ko	,mai	,kaŋ	,kuəŋ	,kuəŋ	'kuə	kək	kət	kuək
陆川	海	汉	房	良	学	桃	盗	脚	夺
	'həi	hən'	,foŋ	,liəŋ	hək	,t'ə	t'ə	kiək	t'ət
凉水井	毛	来	艾	看	上	强	么	脚	
	,mo	,loi	niəi'	k'on'	'soŋ	,t'ioŋ	mo?	tio?	
桃园	号	靴	开	欢	全	光	强	说	脚
	ho'	,hio	,k'ci	,fon	,t'ion	,koŋ	,k'ioŋ	foŋ	kiək
闽西	火	靴	招	娇	将	张			
	'fo	,fio	,t'ə	,kiə	,t'ioŋ	,t'ioŋ			

c. 古流开一厚、侯韵和开三尤韵字多数地区读 eu 韵,一部分地区读 iu 韵,个别地区读 eu 韵。例如:

	某	走	斗	狗	愁	口	谋
梅县	,meu	'tseu	'teu	'keu	,seu	'k'eu	,meu
美浓	,meu	'tseu	'teu	'keu	,seu	'k'eu	,meu
桃园	,meu	'tseu	'teu	'keu	,seu	'k'eu	,meu
兴宁	,miu	't'iu	'tiu	'kiu	,siu	'k'iu	,miu
闽西	'mew	'tseu	'teu	'keu	,t'ew	'k'ew	,mew

d. 古鼻音韵尾 -m、-n、-ŋ 和塞音韵尾 -p、-t、-k 在客家方言中不同程度保留下来。其中广东和广西、台湾等地保留得比较完整。例如:

	甘	团	醒	鸽	夺	锡
梅县	,kam	,t'on	'siaŋ	kap	t'ət	siak
陆川	,kam	,t'on	'siaŋ	kap	t'ət	siak
美浓	,kam	,t'on	'siaŋ	kap	t'ət	siak
桃园	,kam	,t'on	'siaŋ	kap	t'ət	,siak

广东兴宁只保留 -n、-ŋ、-t、-k 韵尾。例如:团,t'on、甘,kam、鸽,kak、夺,t'ət,四川华阳凉水井只保留 -n、-ŋ、-? 韵尾,例如:饭'fan、放foŋ、夹ka?,笔pi?,木mu?,闽西只保留 -ŋ 韵尾。例如:甘,kam、团,t'ū、半paŋ、横,vaŋ、鸽,ko、别p'e、白p'a。

③声调:客家方言的声调大都为 6 个。调类的分合与声母的清浊有关。古平声清声母字今读阴平,浊声母今读阳平,入声也按声母的清浊分为阴阳两类。上声去声一般不分阴阳,但古上声全浊声母大部分读去声,古次浊声母大部分读阳平。古去声字今仍读去声。少数地区没有入声(或入声只归为一个调类,不带 -p、-t、-k 韵尾),平、去声分阴阳,上声不分阴阳,只剩 5 个声调。

词汇方面 以梅县话为例:

①古词语的沿用。日常口语中普遍使用的古词语有索(绳子)、禾(稻子)、乌(黑)、面(脸)、食(吃)、颈(脖子)、饥(饿)、朝(早晨)、昼(中午)、行(走)、沸(沸腾)等。有一

部分是客家方言独自保留的古词语。例如:噍't'iau'(咀嚼),掇,no(两手相切摩),痞'p'u(食物发霉时表面长出来的一层白色的霉菌),傻,seu(傻),藪,teu'(窝),核,k'ai(肩挑),哺,pu(下午或傍晚),拗'au(折),疥,tsi(瘦小),嫫,nau(恨;不喜欢),崇k'ian'(牛鼻中环)等。

②方言词语的创新。由于方言区独特的自然环境、历史状况、风俗习惯、土特产以及不同的造词习惯形成了一大批方言词语,例如:雪枝(冰棍)、板(一种用米粉制成的糕)、□丸,pək,ian(一种肉丸子)、打樵(一种迷信活动)、播茶(一种饮料)等。

③借用其他方言或外语词语。有些借自粤语,例如:啱(刚刚、合得来)、靚(漂亮、美好)、咧(聪明、能干)等;有些借自英语,例如:袖衫的袖(shirt 衬衣)、波e(乒乓球)和波珠中的波(ball 球),嘜(mark 商标、标志);有些借自马来语,例如:接吻叫□[tsim](chium);在外国传入的物品名称上加“番”、“洋”、“红毛”、“荷兰”等,例如:番背(外国)、番片(国外)、番枳(肥皂)、洋遮(伞)、红毛泥(水泥)、荷兰豆(一种扁而薄,连豆荚一齐吃的豆类)等。

④词汇意义的差异。有些词语与普通话同义异形,例如:叫(哭)、面(脸)、热头(太阳)、火蛇(闪电)、心舅(媳妇)等;有些词语与普通话同形异义,例如:古典(故事)、打靶(枪毙);有些词语与普通话词形相同,但意义范围不同,例如:“唇”,普通话指人或某些动物口周围的肌肉,客家方言还兼指器物的口和边缘,如:锅唇、桌唇;“米”,普通话一般指稻米和去掉壳或皮以后的种子,如:糯米、花生米、高粱米。客家方言只指稻米,等等;有些词语与普通话词形相同而词义互相交叉,例如:“光”、“亮”、“明”,在客家方言和普通话中都是同义词,都有相同的用法,如:火光、光芒、亮晶晶、亮相、明亮、明了,但客家方言用“光”的地方,普通话则往往用“亮”或“明”,如月光(月亮)、灯太光(灯太亮),又如“细”和“小”,“夜”和“晚”,“日”和“天”,“破”和“烂”等词都有词义交叉和用法不同的区别。

⑤语法意义的差异(即词的语法功能)。客家方言的一部分词在语法意义上与普通话不同,例如:“鼻”,除作名词鼻涕外,还作动词“闻”、“嗅”;“爱”,除作动词喜爱外,还作助动词“要”;“烧”,除作动词燃烧外,还可作形容词“暖和”和名词“柴火”。

⑥构词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词素次序、重叠式、附加式和单复音词等方面。有些并列式和偏正式合成词的词素次序与普通话不同,例如:紧要(要紧)、闹热(热闹)、牛公(公牛)、人客(客人),等等,在词的重叠方式方面,单音名词、量词可重叠的范围比普通话大,重叠后有“每一”的意思,例如:碗碗(每一碗),枪枪(每一枪),铲铲(每一铲)。客家方言的单音动词和形容词一般都不能单独重叠,如需重叠,后面一定要加后缀 -e,如“细细e”(小小的),e 起弱化作用。但台湾客家方言的单音形容词可以重叠,重叠后起加强作用,例如:浓浓的(蓬乱的)、憨憨(很

傻);台湾客家方言有一些形容词甚至可以用三叠的方式表示最高级,例如:光光光(非常亮),苦苦苦(非常苦),热热热(非常热)。客家方言有一种比较特殊的“XAA”重叠式,它的构词能力很强,每个中心词后的重叠嵌音均不同,而且一定要加后缀-e,表示程度加深,例如:红邹邹e(红艳艳的)、肥不肥e(胖墩墩的)。在附加式方面,客家方言常用的前缀有“亚”(或“阿”)、“老”,后缀有“e”、“头”、“公”、“嫲”、“牯”、“哥”、“兜”(等),中缀有“哺”,如:亚爸(爸爸)、阿姐(姐姐),老妹(妹妹)、老公(丈夫),遮e(伞),日晨头、下昼头、石头,鸡公、鸭公、手指公、脚指公、虾公,亚陈嫲、亚娣嫲、亚三嫲、老张嫲,牛牯、羊牯,蛇哥、鸪哥,偌兜(我们)、偌兜(你们)、渠兜(他们),今哺日(今天)、秋哺日(昨天)、夜哺头(晚上)等。在单音词和复音词的比例方面:客家方言的单音词比普通话多。普通话有些复音词在客家方言是单音词,例如:兴(高兴)、识(认识)、皮(皮肤)、桌(桌子)等。

语法方面 以梅县话为例:

①人称代词的领属格可以通过变韵调和加“嘅”的方法表示,例如:

	主 格	领属格
第一人称	偌[.ŋai]	偌嘅[.ŋake]
第二人称	你[.ŋ 或 .ŋ]	你嘅[.ŋiake]
第三人称	渠[.ki]	渠嘅[.kiake]

②有特殊的疑问代词,例如:脉个(什么)、满人(谁)。

③有特殊的名词和量词、动词和量词的配搭关系。例如:

名词或 动词	人	歌	衣服	被子	星	田	叶	墙	饭	牛	来	走
量词	只	条	身	番(欢)	只	坵	皮	扇	餐	头	摆	转、摆

④双宾语的位置比较灵活:间接宾语既可以放在直接宾语之前,也可以放在直接宾语之后。谓语可以重复,分别加在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之前。例如:

偌偌渠一件衫。 我给他一件衣服。

偌偌一件衫渠。 我给他一件衣服。

偌偌一件衫渠渠。 我给他一件衣服。

⑤比较句的格式是甲一比一乙一过一形容词。例如:牛比猪过大(牛比猪大)。

⑥动词各种体的表示方法:a.动词前加“正[tsaŋ]”,表示动作刚开始,如偌正食饭(我刚吃饭)。b.动词后加“等”,表示动作正在进行或持续进行,如:偌吃等饭(我正在吃饭),你手e拿等脉个(你手里拿着什么)。c.动词后加“e”或“过e”,表示动作已完成,如:偌食e(我吃过了)。d.动词后加“□[p'et,]”或“得”,表示过去完成,如:渠一个月就食□四十斤米(他一个月就吃掉了四十斤米)。e.动词前加“盲”表示动作未开始,如:偌盲食饭(我还没有吃饭)。f.动词后加“转”,表示动作回复,如:偌着

转偌嘅棉袄去(你再穿回你的棉衣)。g.动词后加“□□”表示试一试,如:看 na'·e(看一看)、听ŋa'·e(听一听)。

⑦通过变调表示近指和远指。例如:

'ke e (这里) ke'e (那里)

'ke 边(这边) ke' 边(那边)

⑧处置式只用介词“将”而不用“把”,例如:偌将桌搬转来(你把桌子搬回来),偌将碗打烂e(我把碗打破了)。

⑨有些词在句中的词序不同,例如客家方言的范围副词“添”相当于普通话的“再”,但两者在句中的位置不同,前者放在谓语后面或句末,后者放在谓语之前。例如:听一摆音乐添(再听一次音乐),影张像添(再照一张像片)。作副词用的“多”和“少”放在动词的后面,如:拿多丢e(多拿一点),用少丢e(少用一些)。客家方言的“倒”相当于普通话“做得到”的“到”,但两者在句中的位置不同,如:学得e多知识倒(学得到很多知识)。客家方言的“去”和“来”放在宾语之前。例如:偌阿嚟去桂林(我母亲到桂林去),阿姐来工厂(姐姐没有到工厂来)。有时这类句子的“去……来”要配合使用,如:偌去耐e来(你上哪儿去了)?

⑩形容程度深浅的表达方式不同。例如:形容词单用,表示一般程度,形容词重叠,后加“e”(受前一音节的影响,e起同部位的音变),表示程度弱化。如:酸酸ne(酸酸的),形容词前加“e”,表示程度强化,相当于“很”。如:e'酸(很酸);形容词前加“唔知几”、后加“e”,表示最高程度,相当于“非常”,如:唔知几酸ne(非常酸);形容词前加“忒”表示程度过于,相当于“太”,如:忒酸(太酸)。

附:客家方言代表点的声韵调

	声 母					
梅县	p 爸	p' 爬	m 妈	f 花	v 挖	t 打
	t' 他	n 拿	l 拉	ts 渣	ts' 差	s 沙
	k 加	k' 夸	ŋ(ŋ) 瓦	h 下	θ 呀	
陆川	p 巴	p' 平	m 毛	f 花	v 话	t 丁
	t' 听	n 拿	l 来	ts 渣	ts' 干	s 纱
	ts 遮	ts' 车	ɕ 社	ŋ 义	k 家	k' 其
	kw 瓜	kw' 跨	ŋ 瓦	h 夏	j 衣	θ 鸦
长汀	p 把	p' 怕	m 门	f 飞	v 闻	t 到
	t' 道	n 南	l 路	ts 精	ts' 清	s 心
	tʃ 招	tʃ' 昌	ʃ 诗	k 哥	k' 葵	ŋ 危
	h 贺	θ 暗				
桃园	p 巴	p' 爬	m 马	f 花	v 娃	t 打
	t' 他	n 拿	l 拉	ŋ 二	ts 渣	ts' 茶
	s 沙	tʃ 遮	tʃ' 车	ʃ 蛇	k 家	k' 卡
	ŋ 牙	h 下	θ 哑			
凉水井	p 比	p' 步	m 吗	f 花	v 挖	t 打
	t' 地	n 礼	ts 渣	ts' 车	s 蛇	z 绒
	tʃ 挤	tʃ' 欺	ŋ 你	ɕ 西	k 家	k' 夸
	ŋ 外	x 下	θ 意			

韵母

梅县	a 亚	ai 埃	au 澳	ia 也	iai 解	iau 夭
	ua 瓜	uai 快	e 鸡	eu 欧	ie* □	ue* □
	ɿ 资	i 衣	iu 友	ɔ 属	oi 哀	io* 茄
	uo 果	u 无	ui 对	ui* 锐	am 暗	iam 艳
	em 森	əm 针	im 心	an 半	ian 间	uan 关
					(ien) 边	
	en 很	uen 耿	ən 正	in 英	on 安	ion* 软
	uon 官	un 文	iun 云	aŋ 冷	iaŋ 映	uaŋ* 矿
	oŋ 方	ioŋ 样	uoŋ 广	uŋ 风	iuŋ 用	ap 鸭
	iap 业	ep 粒	əp 汁	ip 立	at 八	iat 结
					(iet) 切	
	uat* 括	et 色	uet* 国	ət 质	it 一	ot 夺
	iot* □	uot* □	ut 不	iut* 曲	ak 百	iak 剧
	uak* □	ok 恶	ioŋ 约	uok 郭	uk 屋	iuk 育
	ɱ 唔	ɱ(ɱ) 五				

(带 * 号的韵母出现频率很小)

陆川	a 爸	o 多	ɛ 低	i 衣	ɿ 资	u 土
	y 住	ai 买	oi 爱	au 巧	ei 走	ia 夜
	iau 苗	iu 又	ui 悲	am 帆	əm 森	im 林
	iem 店	an 班	ən 敏	on 短	in 民	un 门
	ien 天	aŋ 生	oŋ 房	oŋ 公	iaŋ 青	ioŋ 相
	ap 法	əp □	ip 立	iep 贴	at 达	ət 北
	ot 脱	it 匹	ut 不	iet 洁	ak 责	ok 学
	ok 读	iak 锡	ioŋ 脚	ɱ 母	ɱ 你	ɱ 吴
长汀	a 家	e 北	o 多	ɔ 包	i 衣	ɿ 自、支
	ia 夜	ie 乙	io 茄	io 小	u 布	ua 瓜
	ue 爱	ai 发	ɰu 头	iaɰ 由	aŋ 山	eŋ 兵
	oŋ 东	oŋ 张	iaŋ 平	ieŋ 音	ioŋ 用	ioŋ 央
	uaŋ 关	ueŋ 昆	ɱ 五	iē 员	ū 川	
桃园	a 巴	e 细	o 毛	i 米	ɿ 子、时	u 夫
	ia 谢	ua 瓜	io 茄	ie 蚁	ai 矮	au 凹
	oi 爱	ui 非	eu 欧	iu 牛	iai 介	uai 快
	iau 尧	ieu 妖	am 暗	em 针	im 心	iam 炎
	an 半	on 安	en 恩	in 人	un 本	ian 烟
	uan 关	ion 软	iun 云	aŋ 罨	oŋ 方	uŋ 公
	iaŋ 影	uaŋ 藕	ioŋ 央	iuŋ 用	ɿp 十	ip 立
	ap 鸭	ep 涩	iap 叶	It 质	it 七	at 八
	et 北	ot 夺	ut 不	uat 刮	iet 别	uet 国
	iut 屈	ak 百	ok 恶	uk 木	iak 壁	ioŋ 约
	iuk 育					
凉水井	a 巴	o 玻	e □	i 衣	u 布	ɿ 资
	ai 鸡	oi 来	ei 肥	au 好	əu 周	ia 姐
	io 茄	ie 个	ua 瓜	iau 表	ioi 艾	iəu 有
	uai 快	uei 亏	an 班	on 官	en 鳊	ən 本
	in 兵	un 炖	yn 云	ien 变	uan 关	aŋ 螃
	oŋ 忙	uŋ 东	iaŋ 名	ioŋ 粮	iuŋ 穷	uaŋ 臂
	ɱ 不	ɱ 五	ɱ (表示惊异的语词)			

(另有 y、ye、yen、uar 四韵出现在借词、借字中)

声调

地 名	阴平	阳平	上声	阴去	阳去	阴入	阳入
梅县	44 天	11 田	21 古	53 地	22 北	55 石	
陆川	45 通	213 同	21 桶	51 痛	11 一	55 读	
长汀	33 诗	24 时	42 史	54 四	21 事		
桃源	24 天	11 人	31 海	55 会	22 北	55 石	
凉水井	55 先	13 人	31 饭	52 面	32 肉	55 月	

参考书目

- 袁家骅等:《汉语方言概要》,文字改革出版社,北京,1983。
 罗肇锦:《客家语法研究》,学生书局,台北,1984。
 董同龢:《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科学出版社,北京,1956。
 杨时逢:《台湾桃园客家方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22,台北,1956。

(饶秉才)

Kong Guangsen

孔广森 见阴阳对转。

Kufa xuepai

库法学派 (Kufa school) 阿拉伯语法学的一个重要流派。8 世纪产生于伊拉克的库法城。创始人 'A. 耳. 凯萨依 (731~806), 是古兰经训读学的七大名家之一, 担任过阿拔斯朝三代哈里发的国师。库法的阿拉伯语法学研究曾落后于南方的巴士拉, 但凯萨依首先南下向巴士拉学者求教, 再发展自己的语法体系, 形成了与巴士拉学派长期对峙的局面。

库法派学者不像巴士拉学派那样强调语言的普遍性和阿拉伯语的基本规律, 而强调语言的特殊性和阿拉伯语的特异现象。他们力图发现新规律, 以动摇巴士拉学派的理论基础, 从而另建一个阿拉伯语法体系。为此, 他们扩大语言研究的范围, 把那些非典型部族以及和外族接触频繁的部族的语言、一些似乎无权威性的史话、一些晚期的诗歌等等作为研究对象, 并且着重对《古兰经》中的特异词句进行分析。结果在格位理论、词的分类及其派生关系等许多根本问题上他们都提出了与巴士拉学派不同甚至完全对立的观点。阿拉伯语言学家伊本·安巴里 (1119~1181) 在他的《异议公判》一书中记述了这类分歧, 共有 121 处之多。

库法学派的著名首领是凯萨依的学生法拉 (761~822)。他对库法学派语法体系的确定作出很大贡献。他的主要语法著作是研究句法的, 名为《界限》, 这部书用了 16 年时间才写成。后代学者认为法拉的特色是比较讲求哲理。

与巴士拉学派相比, 库法学派的理论有明显的局限

性,逻辑上也不甚严密,但它的兴起却为阿拉伯语法学延续千年的论争揭开了序幕。100年后,巴格达学者吸收库法学派的长处来弥补巴士拉学派的不足,组成了第3学派——巴格达学派。(张甲民)

Kulwowelqj

库里沃维奇, J. (Jerzy Kuryłowicz 1895~1978) 波兰语言学家。1895年8月26日生于斯坦尼斯瓦夫, 1978年1月28日卒于克拉科夫。



库里沃维奇曾在利沃夫、维也纳、巴黎三个大学读书,是法国语言学家 A. 梅耶的学生。1929~1945 年任利沃夫大学教授, 1946~1948 年任弗罗茨瓦夫大学教授, 1948 年后一直在克拉科夫大学教书。他是波兰、法国、丹麦等国的科学院院士, 并获得巴黎、都柏林、芝加哥等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

库里沃维奇是印欧语言和闪语族语言的专家,也是普通语言学研究者。他在著作中讨论了印欧诸语言的语音和词形,闪语族语言和印欧语言中的元音交替现象以及近代印欧诸语言词法体系发展的年代问题。

在普通语言学方面,库里沃维奇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创始人之一。他指出语言要素应分等级,各要素的第一性和第二性职能要加以区分,还提出要对音系和语法这两层结构进行类型对比的综合研究。

库里沃维奇在 1947 年发表的论文《语言类比过程的性质》获得了普遍的赞赏。1962 年他在第 9 届国际语言学家大会上提出《关于内部重建法》的报告,引起与会者热烈的讨论。但是他后来提出的关于形态音位学的论点则引起争论,甚至受到严厉的批评。(易丽君)

Kushite yuzu

库施特语族 (Cushitic group) 见阿非罗-亚细亚语系。

Kuangmli Zhengsu

《匡谬正俗》 刊正误解字义和误读字音的书。唐代颜师古撰。师古名籀,以字行。先世为山东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市)人,后迁居京兆万年(今陕西长安境内)。生于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卒于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唐太宗贞观中为中书舍人,秘书监,奉诏与孔颖达(574~648)撰定《五经正义》,又著有《汉书注》100 卷,《急就篇注》4 卷。

原书本为未完之作,其子扬庭编为 8 卷,在唐高宗永徽二年(651)上于朝廷,有司录出副本存于秘书阁,因此流传后世。宋人刻板时避宋太祖赵匡胤讳,改题为《刊谬正俗》。

颜师古博学多识,精于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书中收有 182 条,指陈前人对书传之误解,并订正书籍传写之误和俗语俗音之失,可供学者参酌。其中确凿可信者固然不少,可是有些所论也过于牵强。不过这类驳正讹误的书在唐以前还不多见,直至中唐以后乃至宋代笔记杂考之类的书才多起来。颜师古这本书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清代卢见曾所刻《雅雨堂丛书》本,文字颇有脱误。黄丕烈(1763~1825)士礼居旧有影宋抄本,可以刊正今本误处甚多,北京图书馆藏有嘉庆十九年(1814)张绍仁移校本。

参考书目

周祖谟:《景宋本刊谬正俗校记》,载《辅仁学志》,19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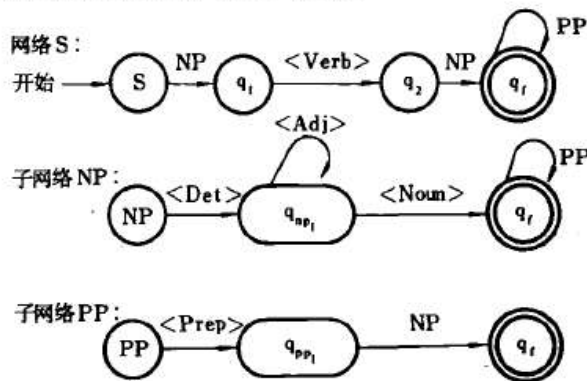
(周祖谟)

kuochong zhuanly wangluo

扩充转移网络 (augmented transition network) 自然语言自动处理的一种方法。1970 年美国人工智能专家 W. A. 伍兹提出,简称 ATN。它采用状态图来控制自然语言的分析过程。每幅状态图相当于一个网络,由状态和边构成,在状态图的各条边上,可以注明所分析的词,或词组类型符号(如名词词组注为 NP,介词词组注为 PP)。

每一个词组类型符号又可以作为一个子网络的开头,因而当采用扩充转移网络来分析自然语言的句子时,如果分析到某一词组类型符号,就可以转移到相应的子网络,如果处理结束或处理失败,可再回到原来的网络继续进行分析,直到分析完整个句子为止。

例如,用下面的扩充转移网络来分析英语句子,它由网络 S 及子网络 NP 和 PP 构成。



图中 S 表示句子, NP 表示名词词组, PP 表示介词词组, <Det> 表示限定词, <Prep> 表示介词, <Adj> 表示形容词, <Noun> 表示名词,最后状态标以 q_f , 用双圈表示。

如果输入的句子是 The little boy in the swimsuit kicked the red ball (那个穿游泳衣的小男孩踢了这个红色的球), 上面的扩充转移网络将按如下的顺序来进行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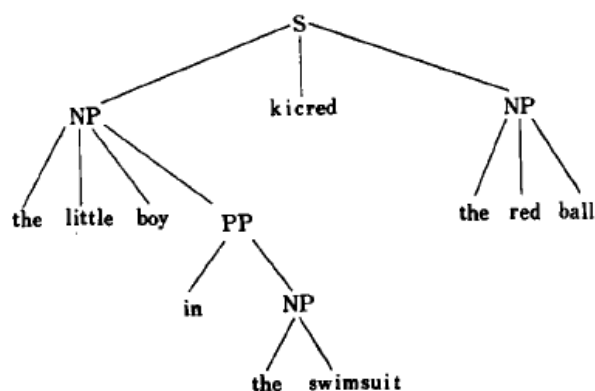
NP: the little boy in the swimsuit

PP: in the swimsuit

NP: the swimsuit

<Verb>: kicked

NP: the red ball



网络中从 S 出发,扫描到 NP, 由于 NP 是子网络的开头, 于是, 控制进入 NP 子网络进行处理; 当扫描完 the little boy 后, 遇到了介词词组 in the swimsuit, 于是, 控制又进入 PP 的子网络进行处理, 然后依次扫描

<Prep>即 in, NP 即 the swimsuit, 最后控制回到网络 S, 进入状态 q_1 , 扫描动词 kicked, 然后进入状态 q_2 , 以同样程序扫描名词词组 NP, 处理完这个名词词组, 即进入网络 S 中的最后状态 q_r , 句子分析完毕。在分析过程中, 扩充转移网络同时造出了如左的树形图, 来表示这个句子的结构。

根据这一结构来解释语义, 便可求得对自然语言的理解。

扩充转移网络在人机对话和机器翻译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许多自然语言信息处理的专用软件都是根据扩充转移网络的原理设计的。

参考书目

W.A. Woods, *Transition Network Grammars for Natural Language Analysis*, CACM 13: 591~606, 1970.

(冯志伟)

L

Ladinghua Xinwenzi

拉丁化新文字 (Latinized New Writing)

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前在群众中推行的汉语拼音文字方案。一般简称“新文字”。它除了北方话的方案外，还有方言的方案，但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是它的代表性方案，所以又简称“北拉”。这是一个在中国文字改革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的拼音文字方案。它的一些特点被吸收在汉语拼音方案中。

产生的经过 十月革命后，苏联掀起了一个被列宁称为“东方伟大的革命”的文字拉丁化运动。在这个运动的影响下，为了加速当时苏联远东地区10万中国工人的扫盲工作，莫斯科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中国问题研究所”开始研究中国文字的拉丁化问题。主要参加者有在苏联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萧三以及苏联汉学家郭质生、莱赫捷、史萍青等。1929年2月，瞿秋白在郭质生的协助下拟订了第一个中文拉丁化方案，并在10月写成一本小册子《中国拉丁化字母》。出版后，引起苏联语言学界很大注意。1930年4月，列宁格勒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中国研究室的汉学家龙果夫和瞿秋白、郭质生三人组成专门小组负责修订这个方案。不久瞿秋白回国，吴玉章、林伯渠等移居远东海参崴，这个工作由列宁格勒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组织的“中文拉丁化委员会”继续进行。委员会的主席是Л.阿列克谢耶夫，秘书长龙果夫，成员有萧三和一些苏联汉学家。委员会经过反复研究并参考了中国过去的几种主要方案后，在瞿秋白方案的基础上拟成“中国的拉丁化新文字方案”。1931年5月，这个方案经全苏新字母中央委员会批准，并于9月26日在海参崴召开的“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正式通过。

拉丁化新文字的原则和方案 海参崴大会通过的拉丁化新文字方案，包括原则和方案两个方面的内容。

拉丁化新文字的原则 共13条，其中主要的有：

①“必须创造一种通俗而接近大众的、适应现代科学要求的、国际化的拼音文字”；②“应该采用拉丁字母”；③“这种拼音文字拼写的不是文言，也不只以北京一地方言为标准的‘国语’，而是各大方言区的大众口语”；④“必须清除政治上有害、思想上不正确的词语，清除偏僻的土语，有机地输入国际上革命的、政治的、科学的、技术的词汇”；⑤“反对认为中国文字拉丁化是不可能的消极观点，也反对把汉字立即废除的‘左’的观点”；⑥“研究中国方言的工作极端重要，必须大大开展这个工作”。这些原则总起来说，就是汉语拼音文字必须现代化、国际化、大众化和方言化。

拉丁化新文字的方案 大会通过的方案只有北方话

拉丁化新文字一种。它的语音标准接近“老国音”，区分尖团，但不标声调。方案内容分以下4个部分。

①字母表和声母(原名“子音”)韵母(原名“母音”)表。字母表共有28个字母，其中5个用双字母表示(表1)。

表1 字母表

字 母		读 音		字 母		读 音	
大写	小写	注音符号	汉字	大写	小写	注音符号	汉字
A	a	ㄚ	啊	Ng	ng	兀	
B	b	ㄅ	伯	O	o	ㄛ	哦
C	c	ㄘ	雌	P	p	ㄘ	泼
Ch	ch	ㄘ	痴	R	r	儿	儿
D	d	ㄉ	得	Rh	rh	日	日
E	e	ㄜ	呃	S	s	ㄙ	思
F	f	ㄈ	佛	Sh	sh	尸	诗
G	g	ㄍ	革	T	t	ㄊ	特
I	i	ㄣ	衣	U	u	ㄨ	乌
J	j	ㄣ	衣	W	w	ㄨ	乌
K	k	ㄎ	克	X	x	ㄎ	赫
L	l	ㄌ	勒	Y	y	ㄣ	迂
M	m	ㄇ	墨	Z	z	ㄗ	姿
N	n	ㄋ	纳	Zh	zh	ㄗ	知

声母有22个。不列声母几(ㄣ)、欺(ㄎ)、希(ㄒ)，改用g(ㄍ)、k(ㄎ)、x(ㄒ)变读表示，即在i(ㄣ)、y(ㄨ)前面g(ㄍ)、k(ㄎ)、x(ㄒ)变读软音几、欺、希。韵母有35个，其中单韵母6个，复韵母14个，带声韵母(即鼻韵母)15个(表2)。

②音节(原名“音段”)的构成。分3种形式：a. 声母跟韵母相拼；b. 声母单独成为音节，有zh、ch、sh、rh、z、c、s、r 8个；c. 韵母单独成为音节。

③词儿的写法。共9条，包括a. 词儿连写；b. 词尾跟词儿连写；c. 界音法(即隔音法)；d. 数字的写法；e. 拟声词的写法；f. 助词的写法；g. 成语的写法；h. 略语和缩写；i. 特别写法(区分常见的少数同音词)。

④话的写法。主要规定大小写、标点符号用法、移行法和分节法。

⑤拼写举例(摘自叶籁士编《工人识字班用的拉丁化课本》)：

Ba sin wenz nianxui ixou, iao shchang yng sin
把新文字念会以后，要时常新
wenz kanshu siesin. Gang kaish siedi shxou, stiui
文字看书写信。刚开始写的时候，谁
ie mianbuliao iou cowu. Dansh bu iao xaipa, iao
也免不了有错误。但是不要害怕，要
buduandi sie, buduandi yng, iding manmandi xui
不断地写，不断的用，一定慢慢地会
shuliankilaidi.
熟练起来的。

表2 声韵母表

声母 (22)	b	ㄅ(伯)	p	ㄆ(泼)	m	ㄇ(墨)	f	ㄈ(佛)
	d	ㄉ(得)	t	ㄊ(特)	n	ㄋ(纳)	l	ㄌ(勒)
	g	ㄍ(革)	k	ㄎ(克)	(ng)	ㄋ	x	ㄒ(赫)
	zh	ㄓ(知)	ch	ㄔ(痴)	sh	ㄕ(诗)	rh	ㄖ(日)
	z	ㄗ(姿)	c	ㄘ(雌)	s	ㄙ(思)	r	ㄖ(儿)
			j	ㄐ(衣)	w	ㄨ(乌)		
单韵母 (6)			i	ㄐ(衣)	u	ㄨ(乌)	y	ㄩ(迂)
	a	ㄚ(啊)	ia	ㄐ(鸦)	ua	ㄨ(挖)		
	e	ㄜ(呃)						
	o	ㄛ(哦)			uo	ㄨ(我)	yo	ㄩ(药)
复韵母 (14)	ai	ㄞ(爱)			uai	ㄨ(歪)		
	ao	ㄠ(奥)	iao	ㄐ(要)			ye	ㄩ(月)
			ie	ㄐ(耶)				
	ei	ㄟ(欸)			ui	ㄨ(威)		
	ou	ㄠ(欧)	iu	ㄐ(又)				
带声韵母 (15)	an	ㄢ(安)	ian	ㄐ(烟)	uan	ㄨ(弯)	yan	ㄩ(渊)
	ang	ㄤ(央)	iang	ㄐ(央)	uang	ㄨ(汪)		
	en	ㄣ(恩)	in	ㄐ(因)	un	ㄨ(温)	yn	ㄩ(胤)
	eng	ㄥ(鞞)	ing	ㄐ(英)	ung	ㄨ(翁)	yng	ㄩ(雍)
变音	g, k, x 一列声母在 i, y 两行韵母前面变读 ㄐ(几)、ㄘ(欺)、ㄒ(希)		gi	ㄐ(几)			gy	ㄩ(居)
			ki	ㄐ(欺)			ky	ㄩ(区)
			xi	ㄐ(希)			xy	ㄩ(虚)

拉丁化新文字的推行 在苏联 1931年9月26日在海参崴召开的“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了“远东地区新字母委员会”，负责推行工作。大会以后，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就在苏联远东地区中国工人中传习，后来又在撤退到苏联境内的东北抗日义勇军部队中传习。“远东地区新字母委员会”举办了许多新文字的学习班、补习班和短期学校，编辑出版了课本、教材、读物和工具书，在伯力创刊了一份新文字六日报《Yngxu Sin Wenz》(拥护新文字)，汉字报纸《工人之路》辟了新文字专页。据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1933年统计，三年中出版的课本、读物、文法、词典共10万多册。

1932年10月26日，中国文字拉丁化代表大会召开第二次会议，讨论拉丁化新文字的出版和教学问题，并成立一个由11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对方案和写法进行若干修正。

在中国 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新闻封锁，迟至1932年才有人简单报道苏联推行中国拉丁化新文字的消息。接着在1933年，世界语者焦凤(方善境)翻译介绍了萧三的《中国语书法之拉丁化》，引起一些世界语者的注意。通过上海世界语者和苏联世界语者联系，才得到有关拉丁化新文字的各种资料，在上海世界语协会机关刊物《世界》的附刊《言语科学》上陆续发表，引起了各方面人士的注意和讨论。1934年，上海文化界人士陈望道、胡愈之等发起讨论提倡“大众语”，上海世界语者叶籁士等在讨论中介绍拉丁化新文字，认为是书写大众语、普及群众文化科学知识的最好工具。这个意见得到鲁迅的大力支持，他接连写了《论大众语——答曹聚仁先生》、《门外

文谈》、《汉字和拉丁化》、《中国语文的新生》、《关于新文字》等著名文章，并捐赠稿费作为出版拉丁化新文字书刊的经费。由于拉丁化新文字的简单易学，尽管国民党政府禁止和一些人的反对，它很快在青年学生和青年职工中推行开了。

拉丁化新文字在国内的推行可以分4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34年8月“中文拉丁化研究会”成立到1937年抗日战争前夜。以上海、北平、广州、闽南等地为中心。高潮是1935年“一二·九”学生救亡运动前后。第二阶段从1937年抗日战争发生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以上海、武汉、广州、香港和延安等地为中心。高潮是1938年上海难民收容所的新文字实

验和1940~1942年陕甘宁边区的新文字冬学。第三阶段是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上海和香港为中心。高潮是1947年民主运动前后。第四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召开。以上海、广州、武汉、旅大等地为中心。高潮是建国初期恢复推行。

拉丁化新文字从开始到结束，一直是个群众运动，因此在此推行的方式上总是带着群众运动的特色。推行主要通过下列一些方式：

① 成立团体。拉丁化新文字的团体成立很多，用研究会、学会、协会、促进会、推行社等名称。据统计，在运动初期，全国成立的团体有80多个，最早的是上海的“中文拉丁化研究会”(1934年8月)。成立团体最多的是“一二·九”学生救亡运动时期的北平。全国性的团体是1935年12月陶行知等在上海发起的“中国新文字研究会”。抗战开始后成立的团体也不少，有40~50个，但都难于开展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从1949年到1950年，全国有20多个市县成立了团体。

② 制订方言拉丁化新文字方案。各地制订的方言拉丁化新文字方案有上海话(后来改为“江南话”)、苏州话、无锡话、宁波话、温州话、福州话、厦门话、客家话、广州话、潮州话、广西话、湖北话、四川话等13种。其中以上海话新文字方案制订最早，在1936年2月公布推行。

③ 知名人士倡导。抗战前支持这个运动最积极的是鲁迅，还有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抗战初期，教育家陈鹤琴和语文学家陈望道组织和领导了上海的新文字工作(图1)。在北平，抗战前一些教授如语言学家王力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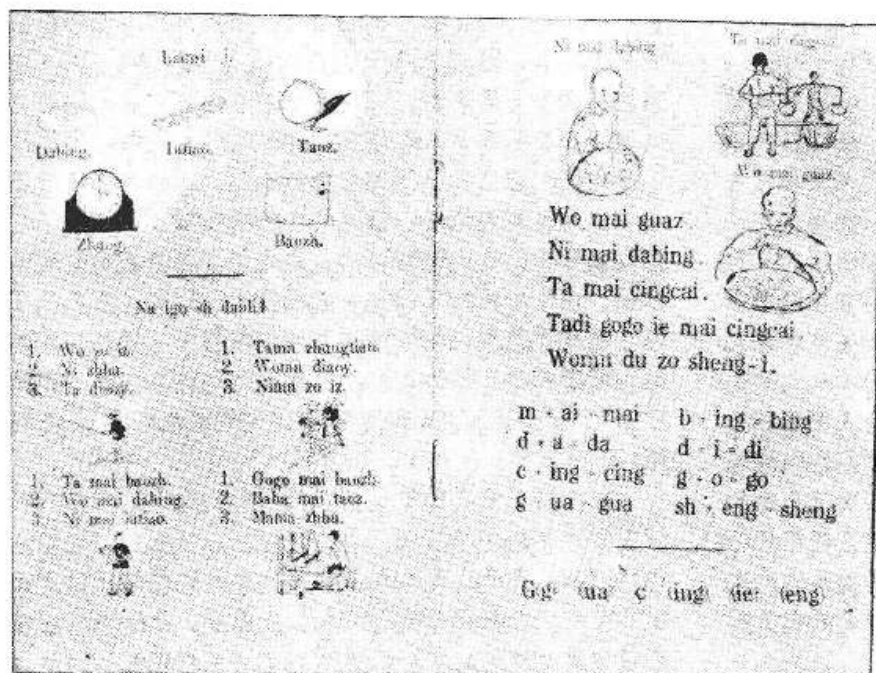


图1 陈鹤琴编的拉丁化新文字课本

赞助这个运动。在香港，积极支持这个运动的是北洋政府时代热心推行注音字母的张一麋，还有当地著名人士冯裕芳和香港大学教授许地山、马鉴、陈君葆等。在陕甘宁边区，毛泽东、朱德、吴玉章、徐特立、林伯渠、谢觉哉等都是拉丁化新文字的积极倡导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全国各省市和各高等院校成立的新文字团体几乎都有知名的学者教授参加。

④ 开班教学。全国各地开办的学习班，包括各种师资训练班、讲习班和识字班（即扫盲班），前后大约有1000多个，参加学习的有10多万人。抗日战争初期，上海举办了很多难民新文字班，陕甘宁边区举办了很多冬学新文字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东北各铁路局为了使用新文字铁路电报举办了很多报务员新文字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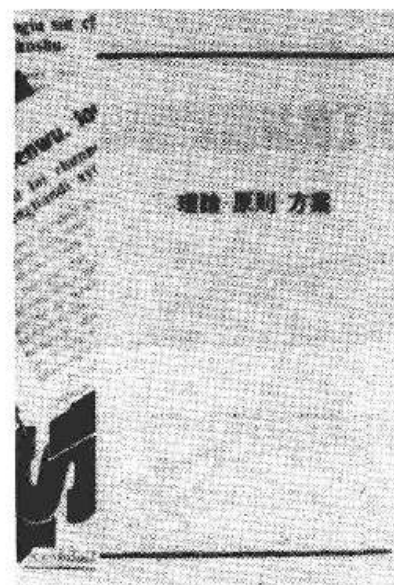


图2 《中国话写法拉丁化——理论·原则·方案》

⑤ 出版书刊。抗战前全国出版的图书包括概论书、课本、读物、工具书共61种，报刊36种。抗战初期上海出版的图书有54种，报刊23种；陕甘宁边区出版的图书有16种，报纸1种。其中影响较大的图书是上海中文拉丁化研究会编的《中国话写法拉丁化——理论·原则·方案》（图2）；刊物是上海出版的《Sin Wenz》（新文字）月刊、《Zhungguo Yjan》

（中国语言）半月刊和《语文》月刊，北平出版的《Beiping Sin Wenz》（北平新文字）半月刊；报纸是上海出版的《Womndi Shgie》（我们的世界）、《Dazhong Bao》（大众报）和陕甘宁边区出版的《新文字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新文字书刊的销售量猛增，达130多万册。上海新文字工作者协会编的《语文知识》月刊每期发行15万册。

⑥ 社会应用。拉丁化新文字的社会应用主要在东北铁路电报和海军的手旗、灯号、无线电通信方面。从1950年到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前，东北铁路电报全部用新文字。从1953年到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海军的手旗、灯号和无线电通信也全部用新文字。此外在课本和字典注音、速记、索引，以及

外国人学习汉语方面，有的也用新文字。

参考书目

- 中文拉丁化研究会编：《中国话写法拉丁化——理论·原则·方案》，拉丁化研究会出版部，上海，1935。
吴玉章：《文字改革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1978。
倪海曙：《中国拼音文字运动史简编》，时代出版社，上海，1948。
倪海曙：《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始末和编年记事》，知识出版社，上海，1987。
倪海曙：《中国语文的新生——拉丁化中国字运动二十年论文集》，时代出版社，上海，1949。

（倪海曙 尹斌庸）

Ladingyu

拉丁语 (Latin language) 概述 最初是意大利半岛中部西海岸拉丁部族的语言，和奥斯克·翁布利语同属古代印欧语系意大利克语族。从现存的古代铭文看，当时的拉丁语与奥斯克·翁布利语相互影响。由于罗马的强盛，罗马人的拉丁语逐渐在并存的诸方言中取得了优势，在罗马成立共和国后（公元前5世纪初）成为共和国的官方语言。公元前5～公元5世纪共1000年间，拉丁语是欧洲一个最强大的政治实体（罗马共和国之后继以罗马帝国）的语言。通过拉丁语，古典希腊语中的丰富蕴藏传到了近代欧洲。从拉丁语中派生出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法语、意大利语、罗马尼亚语等近代语言。拉丁文字和拉丁词汇是人类共有的语言资源。

语言特征 语言学家把印欧语系中的拉丁语归为k类语言，因为它的centum（百）之类的词，开头的辅音为[k]，但在罗马帝国后期的通俗拉丁语中，c在e、i、y、æ、œ等元音前，已经改读[s]或[tʃ]了。拉丁语的重音有一定的规则，如果倒数第2个音节是长音，重音就落在这个音节上，否则在倒数第3个音节上。语法上不用冠词，

名词有丰富的形态变化,保留了印欧语的呼格,但把印欧语真正的离格、工具格和大部分方位格归并成一个离格。动词的形态变化复杂,但比希腊语简单。由于动词有人称的变化,句子中的人称代词主语往往省略。还有异相动词,如 *loquor* (我讲),形式上是被动语态,意义上却是主动的;有独特的动形词,可作为分词和形容词使用。句子的词序比较自由、灵活。词汇基本上是来自印欧语的直接继承词,但也有许多来自其他语言的借词,例如早期希腊语借词 *cupressus* (柏树) 已同化于拉丁语,后来文学语言中又引进了保持希腊语原形的外来词 *cyparissus*。

历史 在罗马帝国全盛时期,随着罗马人军事和政治势力的扩张,拉丁语作为行政语言传播到西地中海的岛屿、伊比利亚半岛和高卢(今法国),直至多瑙河流域的达齐亚(今罗马尼亚),成为当时帝国核心地区使用的语言。5世纪,西罗马帝国覆亡,基督教会成为西欧的重要统治力量,与世俗政权并列。拉丁语是教会的官方语

言,4世纪的接近民间语的《圣经》拉丁文译本是最具权威的教科书,因此从5~15世纪这1000年间,拉丁语是教会统治下的宗教、文化和行政的语言,又是西欧各民族间的交际语言,称作“中古拉丁语”。同时,书面拉丁语和民间通俗拉丁语的差别越来越大。各地通俗拉丁语演变为各罗曼语种。较为规范的中古拉丁语吸收了包括日耳曼语词在内的新词语,也采用了基督教会的宗教术语。由于中古拉丁语在一定程度上已脱离了古典拉丁语,它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拉丁语作家看来不够规范和纯洁。后者的拉丁语以古典拉丁作家为范式,称作“新拉丁语”。至于民间通俗拉丁语可以说于8世纪末已告终结(图1)。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以后,各民族语言代替了拉丁语,但在学术领域里拉丁语仍有它的地位。医学、药理学、植物学、化学、天文学等学科的新术语仍采用拉丁语或拉丁化的希腊语词根作为构词的基础。由于罗马法在后世享有的声誉,不少民族语言的法律用语和行政用语中仍保留了许多拉丁语措辞和表达方式。中世纪以来欧洲的寺院学校和世俗学校,以学习拉丁语,特别是拉丁语法为主修课程,因而称作语法学校或拉丁学校。现在大学里的医科仍然设有拉丁语入门课程,作为理解医学和药学术语的基础。

现代天主教会沿用拉丁语为第一官方语言,在教堂

DEVCAIONVAC
YNDEHOMINESI

a 古拉丁文字手稿,字体为方形大写(4~5世纪)

ΨΕΙΝΑ· ΓΑΗΟΥΝΣΨΕΙΝΑ
ΒΑΙΨΤΑΒΑΙΡΙΑΣΝΗΨΗΣ
ΤΑΙΣΝΑΗΧΙΣΙΧΑΝΝΕΝ.

b 古拉丁文大写字体(4~8世纪)

Cum eris dōrpenata
māto ēur mōria
mōch. mōs quon

c 卡罗琳时代的拉丁文小写字体(约800)

frumentoque summis atque hu
consequens et pncipua nostra.
Naturae. Coenaeque non natura
mentur. Plebeia paupertas sumr

d 文艺复兴时期的复古体拉丁文字(1488)

Deus Jacob miserere n
mitte in adiutoriū meū
vriūm aīgelū gloriōsū

e 文艺复兴时期的拉丁文花体印刷体(1513)

图1 拉丁文字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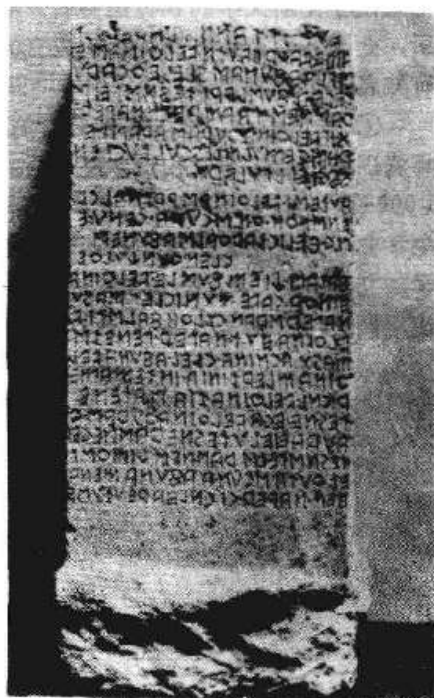


图2 伊特拉斯坎字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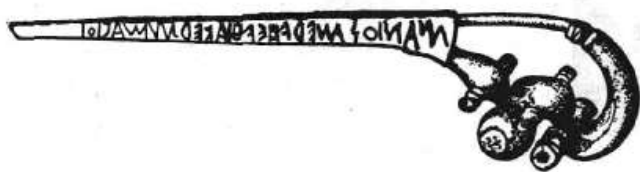


图3 饰针上铭文的译文:
曼尼厄斯为努马西尼斯制造了我

仪式中用拉丁语(直至1963年)。天主教會的拉丁语,另有它的演变,称“教會拉丁语”。

拉丁字母产生于公元前7世纪,其基础是伊特拉斯坎字母(图2),后者又源出希腊文字。最早的拉丁铭文是刻在一个金属饰针上的一句话(图3),考古学家鉴定,是公元前600年前制作的。拉丁字母曾被用作世界上许多语言的字母,或作为制订字母的基础。(参见彩图插页第46、47页)

参考书目

L. R. Palmer, *The Latin Language*, Humanities Press Atlantic Highlands, New Jersey, 1980.

F. Stolz, A. Debrunner, W. P. Schmid, *Geschichte der Lateinischen Sprache* (4 Aufl.) de Gruyter, Berlin, 1966.

M. Pei, *The Story of Latin and the Romance Languages*, Harper and Row, New York, London, 1976.

(杨业治)

Lahuwen

拉枯文 (Lahu writing) 见拉枯语。

Lohuyu

拉枯语 (Lahu language) 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在中国主要分布于云南省的思茅、临沧地区 and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分拉枯纳和拉枯黑两个方言。拉枯族人口30多万,操拉枯纳方言的人口占总人口的80%以上。在国外通行于缅甸、泰国和老挝。拉枯语有29个声母:p, ph, b, m, f, v, t, th, d, n, l, ts, tsh, dz, s, z, ʃ, ʧ, ɕ, ʎ, ʒ, k, kh, g, ŋ, x, ɣ, q, qh。其中舌叶辅音兼表舌面辅音,它们和舌尖辅音在声、韵配合关系上是互补的。有8个单元音韵母:i, e, ɛ, a, ɤ, u, ɔ, u 和一个韵化辅音韵母 y, 还有10个复元音韵母,主要出现于借词中。有7个声调:5个舒声调和两个促声调(促声调的元音为紧元音)。词序和虚词为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句子成分的次序是主语—宾语—谓语。数量词在名词中心语之后;动量词在动词中心语之前。人称代词分单数、双数和复数,第一人称复数又分包括式和排除式。处所指示代词分近指、远指、更远指和最远指。有些动词用变音、变调区分自动和使动。有些形容词可用变调加助词或只加助词以加深修饰程度与色彩。四音格词较丰富。外来词主要借自汉语和傣语。中国的拉枯族于1957年创制了拉丁字母的拉枯文,这种文字以拉枯纳方言为基础,以澜沧拉枯族自治县城区及其近郊的语音为标准音,共有26个字母。

(常竑思)

Lajlayu

拉珈语 (Lakkia language) 中国自称“拉珈”的瑶族使用的语言。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分布在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金秀瑶族自治县。使用人口约8500多(1982)。拉珈语声母包括腭化、唇化声母在内共35个,韵母120个。ʔb、ʔbl 两个声母出现频率少,在部分青年人中已消失。清的塞音和塞擦音有送气和不送气两

套,如p, ts, t, k, ph, tsh, th, kh等。固有词的送气声母和清化鼻音声母都只出现在单数调上。元音分长短,有一套鼻化元音,有的还能带鼻音尾。有6个舒声调,4个促声调。单音节的名词单独出现时往往带量词。指示代词分鼻音声母和边音声母两组,各有近指、中指、远指之分。数量词修饰名词时在名词之前,形容词修饰名词时大都在名词之后。指示代词修饰量词时指示代词在后。表示颜色、形状、味道等的状词修饰形容词时在形容词之后;副词修饰动词或形容词时一般是副词在前。单纯词以单音节词居多数。四字格词有AABB式和ABAC式。借词主要来源于汉语,也有部分来源于壮语。由于借词不断增加,语音中新增加ə和ɿ两个韵母以及33调。

(刘保元)

Lasike

拉斯克, R. K. (Rasmus Kristian Rask 1787~1832) 丹麦语言学家。1787年11月22日生于丹麦菲英岛, 1832年11月14日卒于哥本哈根。他与 F.



博普、J. 格林同被称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奠基人。1807年毕业于哥本哈根大学,但没有获得学位。1811年丹麦科学院设奖征求有关古斯堪的纳维亚语源流的论文,拉斯克用3年时间到瑞典和冰岛实地调查,1814年文成获奖。他的论文《古代北方语即冰岛语起源研究》举例证明拉丁语、古希腊语和

冰岛语塞音的对应关系,同时揭示这3种语言的词形的相似性。他指出,从语音演变可以看出语言间的亲属关系。他实际上大体解决了印欧语的辅音变化规律问题,这个成就后来为格林所继承,并用更明确的语言表述出来,成为“格林定律”。1816~1823年拉斯克到俄国、波斯、印度等处旅行,就地学习各种语言,这使他对印欧语言有更为全面的观察。1825年他任哥本哈根大学教授,后来写出了冰岛语语法、古英语语法和弗里西亚语语法等书。

(戚雨村)

Latuwelyayu

拉脱维亚语 (Latvian language) 又称莱蒂语(Lettish language)。苏联拉脱维亚的官方语言。属印欧语系波罗的语族东支,是该语族仅存的两种语言之一(另一种为立陶宛语)。使用人口近200万,其中约150万在拉脱维亚,其余近50万在拉脱维亚的附近地区和其他国家,主要是美国。主要方言有中部方言,利冯尼亚方言(也称塔赫米亚方言或西部拉脱维亚语),以及高地(东部)拉脱维亚语。现代标准拉脱维亚语以中部方言为基础,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早的文献见于1585年翻译的天主教教理问答手册。拉脱维亚语词的重音总是落在第一个音节上,音高重音已不复存在,任何由两个短音节构成的音节核心都表示一个区别性声调。它

的早期词汇跟立陶宛语相似,但具有更多的创新词;主要构词手段是借助后缀、前缀和复合构词法。拉脱维亚语属屈折型语言,但许多屈折词尾已失去;语法方面分阳性和阴性,单数和复数;名词有7个格:主格、属格、与格、宾格、工具格、方位格和呼格,动词有3个人称、3种时态:现在时、过去时、将来时。拉脱维亚语采用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字母,共33个字母,其中11个有变音符号:ā,č,ē,ģ,ī,ķ,ļ,ņ,š,ū,ž,表示特殊的音,如元音上的长音符(—)表示该元音是长元音。

(黄长著)

Lansitt

兰司铁, G. J. (Gustav John Ramstedt 1873~1950) 芬兰阿尔泰历史比较语言学家。生于1873年10月22日,卒于1950年11月25日。20世纪初开始研究蒙古语族语言及其方言,著有《蒙古书面语和库伦方言的语音比较》(1903)等。

从1906年开始执教于赫尔辛基大学,讲授蒙古-突厥语历史语言学,著有《论阿尔泰语中的数词》(1907)、《蒙古突厥语动词词干构造》(1912)等。1919~1930年,兰司铁为芬兰驻日本外交官。他利用当时有利条件从事日语及朝鲜语研究,撰写了《论朝鲜语》(1928)、《朝鲜语语法》(1939)、《日语史》(1942)等著作。1930年重返赫尔辛基大学执教,致力于阿尔泰诸语言的比较研究工作。1935年发表的《卡尔梅克语辞典》就是利用阿尔泰诸语言的资料编撰的历史比较辞典。代表作《阿尔泰语言学导论》是他毕生研究工作的结晶,也吸收了其他阿尔泰语言学家的成果。这部书由3卷组成:第1卷是阿尔泰语言比较语音学(1957),第2卷是比较形态学(1952),第3卷是前两卷的索引(1966)。在这部巨著问世之前他就逝世了,最后的编辑工作是由他的学生P. 阿尔托完成的。



兰司铁在阿尔泰语言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他一方面否定了阿尔泰语系与乌戈尔-芬兰语系有联系的说法,另一方面又扩大了阿尔泰语系本身的范围,把朝鲜语和古代日语也包括进来。他一贯主张阿尔泰诸语言具有亲缘关系,为阿尔泰语系的研究留下了丰富的遗产。

(清格尔泰)

Lao Nalxuan

劳乃宣 (1843~1921) 中国音韵学家,清末主要切音字母方案“官话字母”的增订者和在南方方言区的推行者。字季瑄,号玉初,晚年号矩斋,又号初叟。原籍浙江桐乡,生于河北广平,在江南长大。同治四年(1865)中举人。同治十年中进士。曾主持上海南洋公学和浙江大学堂。1905年开始推行官话字母,改称“合声简字”。他认为在南方推行京音的官话字母有困难,不合“言文一致”的原则,于是在王照原来方案的基础上,增加南京和

苏州音的声韵母,修订成“宁音谱”(南京话合声简字)和“吴音谱”(苏州话合声简字),后来又增加闽广音的声韵母,修订成“闽广音谱”(福建话和广东话合声简字)。他把这三个谱连同原来的京音官话字母,合成一部《简字全谱》,1907年在南京出版。1905年他请两江总督周馥、江苏巡抚陈夔龙、安徽巡抚恩铭奏准在江宁(南京)设立“简字半日学堂”,先教宁音,后学京音,4个月毕业。先后办了10期,毕业数百人,转相传授,推行于江浙两省。1908年,端方继周馥任



两江总督,又在江宁设“简字学堂”和“简字高等小学堂”。这时清廷正筹备立宪,慈禧召见劳乃宣,他面呈简字的好处,上《普行简字以广教育折》,说:“今日欲救中国,非普及教育不可;欲教育普及,非有易识之字不可;欲为易识之字,非用拼音之法不可。”提出小学一年级先学拼音简字,二年级再学汉字,一般人民都强迫学简字一年,识简字的人同样有公民权,又建议出版简字报纸,官府的公告、批词都用简字。慈禧批交学部议奏,学部始终不议不奏。1910年,他与社会名流赵炳麟、汪荣宝在北京成立“简字研究会”,改向社会宣传。他写信给学部尚书唐景崇说:“他日中国于汉字之外,另用一种主音简易之字以为辅助文字,可信其必有此事。”“于此事之必可行,且不可不行,自信甚笃。”1911年辛亥革命前夜,被委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兼学部副大臣,才到任就发生武昌起义,清帝逊位。民国初年劳乃宣退居涑水、曲阜、青岛。1913年“读音统一会”聘他为会员,不出席。劳乃宣的著作除《简字全谱》外,还有单行本的《京音简字述略》、《增订合声简字谱》(宁音谱)、《重订合声简字谱》(吴音谱)、《简字丛录》(简字的论文、演说、书信等的汇编)、《读音简字通谱》和《等韵一得》3卷及补编1卷。

(倪海曙)

Laowoyu

老挝语 (Lao language) 也称寮语。老挝的官方语言。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使用人口约250万。除分布于老挝外,也分布于泰国东北部和北部老挝族居住地区。此外,泰国、越南和柬埔寨的泰族,缅甸的掸族,中国的傣族,壮族也相通老挝语。老挝语是一种孤立型语言。元音分长短两类,共29个,其中有12个单元音,12个复合元音,5个特殊元音。辅音分高、中、低3组:①高辅音16个;②中辅音14个;③低辅音19个,共49个。其中有26个单辅音,6个复合辅音,17个结合辅音。辅音韵尾有-k、-t、-p、-ŋ、-n、-m、-j、-u。有6个声调。重叠词和量词相当丰富。以词序和虚词作为表达语法意义的基本手段,句子中主语在谓语之前,宾语和补语在谓语动词之后,名词的修饰语在名词之后,数词、量词和名词组合时,顺序为名词、数词、量词,但数词“一”置于量词之后。

基本词汇以单音节词居多,在佛教传入之后,吸收了大量巴利语、梵语和孟-高棉语借词,主要用于宗教和贵族生活方面。来源于巴利语、梵语的词汇,多数属多音节词,仍保留其母语的构词规律。老挝语有两种不同形体的拼音文字,一种较古老的称为“多坦”(意为“经文”),其形体和拼写均似旧傣仂文,现在仅见于寺庙的贝叶经,或在佛学院中使用;另一种称为“多老”(意为“老文”),它的形体

ສອນສຳປັດທີ 1

ປະລະ	ສາວົງ	ຊະລິ	ຊີວິ
ປະລະ	ມາສາ	ມະລິ	ຢູຕິ
ຫິນ	ດຸກະ	ຕະຕະ	ເລຼງາ
ຖິໄຊ	ຖຸກະ	ກະກະ	ເລລາ
ຄະເຊ	ໄປເຜີ	ຜູ້ເຮ	ຫຼີຜີ
ແລະມາ	ໄປເຜີ	ໝາເຮ	ຖຸກເຜີ
ສຳເຊ	ເຮົາເຮ	ໄວຂູ	ເລະເຊ
ມ່ຽມ	ເຮົາແກ່	ໄຈ	ແປະແລະ
ເຊື້ອສ	ເຮົາຜູ້	ວິກະ	ໂຈະໄວ
ເຊື້ອສ	ແອນຍ	ວິກະ	ໄຈະໄວ
ໂຊໂຊ	ເທວະໄປ	ເກົາໂຊ	ວັງວິ
ໄມໂສ	ເທວະໄປ	ເກົາໄປ	ຈາປິ
ເລື່ອງ	ເຜີເຮົາ	ວິຜູ້	ໄລ່ຜູ້
ຊິເຮົາ	ເຜີເຮົາ	ວິຜູ້	ໄລ່ຜູ້
ໄຊເຮົາ	ເຮົາເຮົາ	ວາເຮົາ	ຫ້າວິ
ໄຊເຮົາ	ເຮົາເຮົາ	ວາເຮົາ	ຫ້າວິ
ຜູ້ເຮົາ	ຜູ້ເຮົາ	ວາເຮົາ	ໄຊເຮົາ
ຜູ້ເຮົາ	ຜູ້ເຮົາ	ວາເຮົາ	ໄຊເຮົາ
ໄຊເຮົາ	ເຮົາເຮົາ	ເຮົາເຮົາ	ໄຊເຮົາ
ໄຊເຮົາ	ເຮົາເຮົາ	ເຮົາເຮົາ	ໄຊເຮົາ

“经文”同“老文”对照图

和拼写都近似当代泰文。两者都来源于孟-高棉文的改革体,是当今老挝官方通用文字。(庄镇城)

ledge

类隔 见汉语音韵学。

Leiplan

《类篇》 一部按部首编排的字书。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十一月丁度等奏称：“今修《集韵》，添字既多，与顾野王《玉篇》不相参协，欲乞委修韵官将新韵添入，别为《类篇》，与《集韵》相副施行。”仁宗命王洙、胡宿、掌禹锡、张次立等人相继修纂，到英宗治平三年(1066)由司马光接代，业已成书，治平四年缮写成功，上之于朝。旧称司马光撰，实际只是由司马光整理成书而已。

《集韵》是仁宗景祐四年(1037)命丁度、宋祁等开始修纂的,到英宗治平四年同司马光编定成书。《集韵》按韵编字,《类篇》按部首编字,两书相辅而行。《类篇》依据《说文解字》分为14篇,又目录1篇,共15篇。每篇又各分上、中、下,合为45卷。全书的部首为540部,与《说



司马光等著《类编》

文解字》相同，部首排列的次序变动也很少。本书是直接承接《说文解字》和《玉篇》的一部字书。所收字数 31 319 字，比《玉篇》增多一倍。《集韵》遗漏的字也都尽量收入，但《集韵》书中冗杂的重文就不尽采录，体例比较严谨。每字下先列反切，后出训解；如果字有异音异义，则分别举出，可与《集韵》相印证。且书中收有唐宋之间所产生的字不少，为研究文字发展的重要参考资料。旧刻有清代曹寅所刻《楮亭五种本》，现在通用的是后来姚鼐元的翻刻本，即一般所说的《姚刻三韵本》。（参见彩图插页第 10 页）

（周士琦）

(周士琦)

leixing yuyanxue

类型语言学 (typological linguistics) 又称语言类型学 (linguistic typology)。研究各种语言的特征并进行分类的学科。其方法是比较这些语言, 找出其相同和相异之处。

类型语言学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区别 学者们比较语言特征往往抱有不同的目的。第1种是追溯历史渊源，其方法是比较各语言的语法结构和最古老的基本词汇的语音和语义，发现这些语言之间的亲属关系。第2种是建立人类语言类型体系，其方法是按某些特征把语言分类，如把汉语和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波利尼西亚语族的萨摩亚语都归入孤立型语言（虽然二者并无亲属关系）。第3种是寻找人类语言的普遍现象或近乎普遍的现象，其方法是考察某一特征存在于多少种语言之中。这样做，同样不问所研究的语言是否有亲属关系。由于目的不同，第1种比较工作是历史比较语言学家的事情，第2、第3种才是类型语言学家的事情。

在语言类型研究方面有较大贡献的是德国的 W. F. 洪堡特, 美国的 E. 萨丕尔、R. 雅柯布逊和 J. H. 格林伯格, 英国的 S. 乌尔曼(1914~1976)等。

按特征对语言进行分类 远在 19 世纪初期,德国语言学家 F. von 施列格尔 (1772~1829) 就把世界诸语言分为 3 大类型,即孤立型、粘着型和屈折型。后来洪堡特又增加了编插语或称多式综合语。

孤立型语言包括汉语、越南语、萨摩亚语等等，其主要特征有两个：①实词通常不带语法标志，如汉语单词“信”不分单复数，可指一封信或几封信；②句法关系主要靠词序表明，如“我写信”不能改为“我信写”或“信写我”。粘着型包括蒙古语、日语、芬兰语、匈牙利语、土耳其语等等，其特征是一个词根（或词干）前面，尤其是后面有一串表示语法关系的词缀，每个词缀只表示一个语法意义，每个语法意义也只用一个词缀表示，词缀同词根之间在语音上界限分明，不融合在一起。如土耳其语 *odalarından*（从我的（一些）房间里）是一个词，其中词根 *oda*（房间）后面有后缀 *-lar*（表示复数），*-im*（表示第一人称单数的领属关系，相当于汉语“我的”），*-dan*（表示离格）等。屈折型包括拉丁语、希腊语、阿拉伯语等等，其特征是用词形的变化（即屈折）表示语法关系，而且往往一个词尾表示几个语法意义，如拉丁语 *am-o*（我爱）中词尾 *-o* 同时表示现在时、主动态、第一人称、单数、陈述语气等 5 项。

上述语言类型的三分法是有用的，因为它能指出语言的一些基本特征。但这只是大体的划分，并不是十分严密和准确的。同一类型的语言，其间也还有许多差异。有的语言还兼有几种类型的特征，如英语的有些动词一个词形表示多种语法意义（*He go-es* 表示陈述语气、现在时、主动态、第三人称单数），类似屈折型；英语词序比较固定，类似孤立型，但它的有些词根前后可能有几个表示语法意义的词缀，每个词缀只表示一个语法意义，词缀同词根在语音上不融合在一起，界线分明，又类似粘着型，如英语的 *un-affect-edly*（不矫揉造作地）中的 *un-* 表示否定，*-ed* 表示形容词后缀，*-ly* 表示副词后缀，用粘着方式串联在一起，所以有人说，英语是由屈折型走向孤立型的语言。

对于语言，除象上面那样按词表示语法意义的不同方式分类外，还可以按语音、语法或词义特征分类。

① 按语音特征分类的方法很多，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种是按词的声调分类。在声调语言中，词的声调也是词的结构的一部分，如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阴平声的“梯”的意义不同于去声的“剃”。在非声调语言中，词的意义与声调无关，如英语 *tea* [ti:] 不管用什么声调念，意义都是“茶”。

除此之外，还可以看音位系统有哪些成分，元音和辅音在音位系统中各占多大比重，一个音节由什么音位以什么方式构成等等，以此作为标准对语言进行分类。

② 按语法特点对语言进行分类，值得考虑的方法也很多。一般是同时考虑几种特点，如词序的移动是否影响语法意义，词类是否有形态标志，在句子中各词类的形态是否要彼此配合等等。有一种较为常用的分类法是按主语—谓语—宾语的位置分类，例如：把现代汉语和现代英语归入同一类，因为这两种语言中的名词都不用不同的词形分别表示主格或宾格，主语通常不能放在宾语的位置；把拉丁语、俄语归入另一类，因为这两种语言中的

名词和代词的词形通常能表示出主格和宾格，主语和宾语就是调个位置也不改变语法意义。

除此之外，也还有人用别的标准，如看各种语言的语法范畴（性、数、格、时等）各有什么特点，在不同词类中这些范畴各占多大比重等等对语言进行分类。

③ 按词义，也有许多分类法，其中之一是看词义理据性的高低。理据性高的语言中有很多复合词和派生词，其意义可由其组成成分的意义推求，如汉语“顶”+“针”成为“顶针”，德语 *Fingerhut*（顶针）也可由 *Finger*（手指）和 *Hut*（帽子）大致推测出其意义。理据性低的语言与此相反，它的单纯词很多，如法语 *dé*，虽然也指顶针，可是从断代看这是个单纯词，本身不能再加分析，不能从其组成部分求得其意义。

无论按语音、语法还是词义分类，都只是许多方法中的一种，现在还找不到绝对的、完善的分类法。

寻找人类语言的普遍现象 世界上共有多少种语言，现在还没有调查清楚。一个人更无法精通这么多的语言，因此谁也不能断定什么是人类所有语言都具备的普遍现象。下面所说，只是一些近似普遍的现象。

① 语音。每种语言都有元音和辅音；都有音段成分（如单个的 *b, d, m*）和超音段成分（如重音、句调）；都有 *i, a, u* 这 3 个元音。据雅柯布逊说，一切语言都有塞音，但是非洲、美洲和波里尼西亚有些语言没有擦音。

② 语法。几乎所有语言都有词类（如名词、动词等等）和语素类（例如有自由语素，如“人、书”；有粘着语素，如“们”）；几乎都有复合现象（木+器→木器）和派生现象（木+头→木头）。在许多语言中，单数人称代词都是由单音节构成（如汉语“我、你、他”；英语 *I, you, he*；法语 *je, tu, il*）。

③ 词义。在各种语言中，许多词都有本义和转义。如汉语“口”指嘴巴，也指河口；英语 *mouth* 也有同样的两层意义。许多语言都用“舌头”表示语言，如汉语“舌战”，拉丁语 *lingua*，英语 *tongue*，俄语 *язык*，希腊语 *glōssa*，西班牙语 *lengua*，芬兰语 *kieli*，匈牙利语 *nyelv*，土耳其语 *dil* 和哈萨克语、维吾尔语 *til* 等。

人类语言特有的属性 人类语言是一种信号系统，动物如蜜蜂、猴子也各有其信号系统。下述主要特征使人类语言有别于其他动物的信号系统。一切活的语言都由离散单位构成，都有音和义两个方面；都是开放性的；都能用旧形式表示新内容；都能讲真实的情况也能讲虚拟的情况；都能谈论不在眼前的事情和景象。

语言特征的进一步研究 一种语言内部的各种特征之间有各种联系，语言特征还会随时间的流逝而变化。

① 特征与特征之间的关系。有的语言学家提出“牵连规则”。例如，一种语言如果有塞音（如 *t*）和塞擦音（如 *ts*），就必有擦音（如 *s*）；如果有圆唇前元音（如 *y*），就必有圆唇后元音（如 *u, o*）。但反之不然。如果一种语言是宾语+动词型的，通常使用后置词，如日语；如果是动词+宾语型的，通常使用前置词，如英语。如果有表示位置相

近的词,通常也能用它表示“大约”、“接近”,如汉语“接近三点钟”的“接近”,拉丁语 *ad*, 英语 *about*、*around*, 俄语 *около*, 丹麦语 *omkring*, 法语 *vers* 等。

② 语言演变的趋势。在汉语言史上,位于前元音 *i*, *y* 前面的舌根音 *k*、*k'*、*x* 曾经腭化,位于后元音 *o*、*u* 之前则不发生腭化。在英语、俄语、法语、拉丁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德语、梵语等语言史中都有过类似的腭化现象。在词形方面,印欧语和闪语中都有不少语言名词逐渐失去词尾,但是动词词尾不易消失。

古英语形容词有 5 个格,现代英语形容词不再有格的范畴,词形由繁变简,由屈折型趋向孤立型。这类现象属历时类型学的研究对象。

语言类型研究的意义 学者们希望,通过语言类型研究,能发现语言演变的趋势,揭示人类语言的特点,进而探索人类特有的思维方式,揭示语言与历史背景、文化背景的关系。对于构拟原始语言,改进外语教学,创造人工智能,语言类型研究也能给予一定的帮助。

参考书目

J. H. Greenberg, *Universals of Language*, 2nd ed., The M. I. T. Press, 1966.

R. Jakobson, *Child Language, Aphasia and Phonological Universals*, Mouton, 1972.

J. H. Greenberg (ed.), *Universals of Human languag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伍铁平)

Li Jinxi

黎锦熙 (1890~1978) 中国语言文字学家。字劭西,湖南湘潭人。生于 1890 年 2 月 2 日,卒于 1978 年 3 月 27 日。1911 年毕业于湖南优级师范史地部之后,开始从事教育工作。1915 年应教育部之聘,到北京任教科书特约编纂员。1920 年开始在高等



学校任教,曾任北京高等师范、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国文系教授。1937 年随北京师范大学迁往西安,后来又辗转至汉中、兰州等地,任教授、系主任、师范学院院长等职。1948 年回北京,任北京

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并兼任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总主任。1949 年,与吴玉章、马叙伦等组织中国文字改革协会,任理事会副主席。1955 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曾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第二和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一、第二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黎锦熙从事语文教学和科学研究近 70 年,研讨的领域涉及语言文字的各个方面,有论文 300 多篇,专著 30 余部,影响较大的有 3 个方面,推广普通话和改革汉字,语法研究和语言教学,辞典编纂。

1916 年起,黎锦熙宣传言文一致,提倡“国语统一”,

积极从事选定标准语的运动。1918 年,与人共同呈请公布注音字母,同年 11 月教育部正式公布推行。于是又创制注音符号草体,并参加审音工作。1923 年与钱玄同、刘复、赵元任等组织“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于 1926 年拟订“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在这期间,他还创办了《国语周刊》,借以提倡白话文,推广共同语(当时称之为国语),宣传汉字改革。此后又发表了《国语运动史纲》(1934,商务印书馆),记述了自清末以来改革汉字、推行注音字母和国语罗马字、提倡大众语的始末,说明了有关理论、方法和纲领,是国语运动史上一部重要著作。1949 年以后,积极参加研究、制定汉语拼音方案、简化汉字等工作,出版了《中国文字与语言》(1951,北京师范大学)、《文字改革论丛》(1957,文字改革出版社)、《字母与注音论丛》(1958,文字改革出版社)、《汉语规范化论丛》(1963,文字改革出版社)等著作。1970 年又自创汉语双拼方案,曾用来书写日记,试图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前进。

黎锦熙在“五四”运动以前,就从事现代汉语语法的研究。1920 年在教学实践的基础上,系统地整理出白话语法规律,成为《新著国语文法》(1924,商务印书馆)。这是中国第一部较系统的白话语法著作,到 1955 年止,共印刷 24 版,对中国语法学界的影响很大(参见彩图插页第 25 页)。这本书的体系,一方面是借鉴了 J. C. 纳斯菲尔德的《英语语法》,另一方面是继承并修改了《马氏文通》的说法建立起来的。在语法分析方面,主要的标准是意义。词类包括:①实体词(名词、代名词),②述说词(动词),③区别词(形容词、副词),④关系词(介词、连词),⑤情态词(助词、叹词)。句子成分包括:①主要成分(主语、谓语),②连带成分(宾语、补足语),③附加成分(形容词的附加语、副词的附加语)。认为词类和句子成分之间有对当关系,所以词性随词在句子中的位置而确定,即所谓“依句辨品”。为了说明句子的结构,这本书采用了 A. 里德等人的图解法,以便显示句子的主干和枝叶。全书结构,以句子为中心,确认句子是语法分析的基础,提倡“句本位”语法。复句分为 3 类:①包孕复句,指一个母句包含子句的句子,如“我不知道他往哪里去了”。②等立复句,如“牙齿时常咬痛舌头,但是它们终究是好朋友”。③主从复句,如“尽管他不来,你也是要去的”。

1957~1962 年出版了《汉语语法教材》(与刘世儒合写),共 150 万字,体系与《新著国语文法》一致,但取材更为丰富,解释更为详细。此外还出版了《比较文法》(1933),拿白话与文言进行比较,着重讲词位和句式。词位即实体词(名词、代名词)在句子中的位置,归纳为 7 个位:主位(实体词用作主语)、宾位(用作宾语)、补位(用作补足语)、领位(用作形容附加语)、副位(用作副词附加语)、同位(用作与上 5 种同一的成分的)、呼位(离开上 5 种成分而独立的)。词位本来是《新著国语文法》中为避免词的变类太繁而采取的一种说法,这本书不过拿文言例句进行比较罢了。句式则用图解法说明各种句子的结构和句中虚词所起的作用。

辞典编纂是黎锦熙毕生从事的工作。1917年他就曾向当时的教育部提出编写《国语辞典》的建议,1923年促使“国语统一筹备会”设立“国语辞典编纂处”。1928年“国语辞典编纂处”改为“中国大辞典编纂处”,下设搜集、调查、整理、编著、统计5个部,计划到1948年成书3大册,共30卷,1932年着手编写。黎锦熙和钱玄同任总编纂,钱氏主管字的形体声韵,黎氏主管义训及复合词,曾印出《中国大辞典样本稿》。黎锦熙还写了《中国大辞典长编》(“巴”字十义及其复合词和成语一册,“芭蕉”、“囊荷”考辨一册,“把”字用法及其引申一册)。这部大辞典因为时局变化未能完成,但是积累了可贵的资料。1949年以前,黎锦熙主编出版的辞书有《国语辞典》、《新部首索引国音字典》、《增订注释国音常用字汇》、《中华新韵》等,对促进汉语规范化有重要作用。1949年以后,又主持编写出《汉语辞典》、《学习辞典》、《同音字典》、《学文化字典》等。这些辞书虽属中小型,但是由于出版迅速,及时适应了文化发展和教育普及的需要。

黎锦熙一生致力于语文教学和学术研究工作,作出了很多重要的贡献。他的研究成果,代表着一个时期内中国语言科学的研究水平。

参考书目

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商务印书馆,北京,1924。

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商务印书馆,北京,1934。

(张斌)

Li Yu

黎语 (Li language) 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黎语支。分布于中国广东省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各县。使用人口约81万(1982)。分俣、杞、本地、美孚、加茂5个方言。除加茂方言外,其他4个方言之间差别不大。俣、杞两个方言各分3个土语,本地方言分两个土语。俣方言的使用人口最多,约占自治州内黎族人口的58%。俣方言罗活土语有32个声母(其他方言的声母有20~31个),其中有 $^?b$ 、 $^?d$ 、 $^?j$ 、 $^?w$ 等带喉塞的声母,有一个复辅音声母 pl ,还有一个不带喉塞的舌根浊塞音 g 和一个近似闪音的 r 。有6个元音: a 、 e 、 i 、 o 、 u 、 w 。带韵尾时各分长短两套,共有12个元音音位。有8个辅音韵尾: $-m$ 、 $-n$ 、 $-ŋ$ 、 $-p$ 、 $-t$ 、 $-k$,其中 $-n$ 、 $-t$ 是罗活土语独有的。有99个韵母。有3个舒声调和3个促声调。其他方言有3~6个舒声调和2~4个促声调。受汉语的影响,大部分方言土语都增加了一定数量带介音的韵母。大部分的音节都有一定的意义。有一些特殊的表示否定的动词。黎语中汉语老借词较少,通过海南话(属汉语闽南方言)吸收新借词。词序和虚词是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主语在谓语之前,宾语和补语在动词之后。名词的修饰语除数量词组外,一般在名词之后。量词不能单独出现在名词之前。

(欧阳觉亚)

Liyuzhi

黎语支 (Li branch) 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语支之一。主要分布在中国广东省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除

黎语外,海南岛西海岸昌化江出海处沿江两岸有6万余居民使用的“村话”也列入黎语支。使用黎语支语言的人口约87万(1982)。黎语支语言的特点:声母简单,韵母复杂,有带喉塞的浊塞音 $^?b$ 、 $^?d$ 和喉塞音 $^?$;元音分长短两套,短元音不能单独作韵母,有 $-m$ 、 $-n$ 、 $-ŋ$ 、 $-p$ 、 $-t$ 、 $-k$ 等辅音韵尾;声调分舒声调和促声调,舒促两类声调的调值可以相同。与同语族语言有相当数量的同源词。虚词和词序是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句子的语序是主语—谓语—宾语,主语—谓语—宾语—补语。以名词为中心的修饰词组,除数量词外,修饰成分在中心词后。以上特点,与壮侗语支、侗水语支相同。黎语支还有自己独有的特点,如黎语中多数方言舒声调的数目较少,有的只有3个;有自己特有的一套数词;量词比较发达,但不能重叠,也不能单独用在名词之前;表示动物雌雄的词素要放在主要词素之前;数量词修饰名词时,只能出现在名词之前;时间副词“先”修饰动词时,位于动词之前。

(欧阳觉亚)

Libu Yunlue

《礼部韵略》 见韵书。

Li Deng

李登 中国三国时期音韵学家。作过左校令。根据隋代潘徽《韵纂·序》记载,李登编的《声类》是最早的古代韵书。《声类》已失传,唐代封演《闻见记》:“魏时有李登者,撰《声类》十卷,凡一万二千五百二十字,以五声命字,不立诸部。”它书转引《声类》注解字音有采用反切的,例如《汉书·高帝记》某字颜师古注:“李登、吕忱并音式制反”;也有用直音的,例如颜师古《匡谬正俗》卷七引《声类》、《字林》:“斡音管”。由于后人对封演《闻见记》所说“不立诸部”的认识不一致,所以对《声类》的编写体例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五声”,有人认为指声调,有人认为指韵部的粗略分类,“不立诸部”,有人解释为不分部首,有人解释为不分韵部,从而否定《声类》是韵书。至于这部书的体例真相,还有待于以后的深入研究。

(刘广和)

Li Fanggui

李方桂 (Fang-Kuei Li 1902~1987) 语言学家。原籍山西省昔阳县。1902年8月20日生于广州,1987年8月21日卒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1921年考入

清华学堂医学预科。1924年留学美国。先后在密执安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读语言学,是中国在国外专修语言学的第一个人。1928年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1929年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1948年当选为研究院第一届院士。

李方桂在学习英、德、法等现代语言的基础上,从印欧



语言学大师 C. B. 博克学习拉丁、希腊比较文法，古代波斯文，保加利亚文，立陶宛文，哥特文，冰岛文和挪威文。为了更好地深入理解印欧语言学，又从著名的梵文教授 W. E. 克拉尔克学习梵文，从 L. 布龙菲尔德学日耳曼语言的音韵、构词、语法和描写语言学理论。在人类语言学家 E. 萨丕尔的指导下，学习无文字语言的调查研究方法，实地调查了多种印第安语言。李方桂的学术成就主要有以下 3 个方面：

① 印第安语言的研究。李方桂调查的印第安语言属于阿塔巴斯基语族。1930 年发表了《马朵尔——一种阿塔巴斯基语》和《萨尔西语的动词词干研究》。此后又出版了关于印第安语的 8 种论著，其中有 4 种是调查研究赤坡岩语的成果。这些论著已经成为印第安语言研究的重要文献。

② 侗台(壮侗)语族语言的研究。李方桂从 1930~1942 年亲自调查研究了中国境内的云南、广西、贵州属侗台语族的壮、布依、傣、侗、水、佯僳、莫等约 20 种语言和方言，到泰国调查了泰语。他把台语分为北支、中支和西南支。有 5 本专著：《龙州土语》(1940)，《莫话记略》(1943)，《武鸣土语》(1956)，《佯僳语》绪论与音韵、语料、词汇(1966、1967、1968)，《水语研究》(1977)。他还发表了理论性、拟测性和描写性的几十篇论文，如《原始台语中系列先喉塞辅音的拟测》(1943)、《水语中声母和声调的分布》(1948)、《台语的复辅音》(1954)、《台语声母和声调的关系》(1962)、《台与侗水语言》(1965)。他的《台语比较手册》(1977)构拟了原始台语的声调系统、辅音系统和元音系统，观点明确，例证丰富，说服力强。这是李方桂 40 多年来深入调查、参证对比、反复构思、形成理论的结晶。这部著作对侗台语族语言的历史比较工作和培养更好更多的侗台语言研究人才，起重大的推动作用。

③ 汉语和藏语的研究。李方桂在 1929 年回国后，开始研究汉语音韵学。1931 年发表了《切韵的 a 的来源》，提出高本汉所拟《切韵》的 a 是从上古音的 a 和 ə 变来的。1932 年又发表《中古东冬冬沃的上古音》，他认为中古的东、屋、冬、沃是从上古的 uong、uonk、iuong、iuok 变来的。1971 年发表了《上古音研究》，这篇文章提出了新的上古音系统。

在藏语研究方面，他在 1933 年发表了《藏文的前缀音对词根声母的某些影响》，1955 年发表了《唐蕃会盟碑的研究》，这篇文章复原了碑文残字，考证的问题有 100 多条与前人不同，在碑文的汉藏对音部分，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论文是 1963 年发表的《敦煌汉藏词汇》，这是他对敦煌发现的一卷《藏汉词汇》的研究，并按照藏文字母的次序编出了索引。

李方桂在语言学上的贡献，不限于以上几个方面。他在 1955 年调查了台湾省高山族中的邵语，1956 年出版了《邵语记略》(与陈奇禄、唐美君合著)。1937 年他在英文《中国年鉴》发表的《语言和方言》一文提出了中国语言系

属分类的意见，至今为中外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他的语言学著作精湛丰富。他还培养了大批人才。(参见彩图插图第 32 页)

参考书目

Fang-Kuei Li, *A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Tai*,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77.

丁邦新：《非汉语语言学之父——李方桂先生》，载香港《中华文化复兴月刊》，第 7 卷，第 8 期，1974。

(傅懋勳)

Li Rong

李荣 (1920~) 中国语言学家。笔名董少文、昌厚等。浙江省温岭县人，生于 1920 年 2 月 4 日。1943 年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1946 年昆明北京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语学部毕业，同年任北京大学文学院研究助教。1948 年任讲师。



1949 年任山东大学文学院副教授。1950 年至今在中国科学院(1977 年 5 月起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工作，1982 年起任该所研究员兼所长，1985 年 9 月起任研究员兼顾问。1979 年创办《方言》季刊，一直担任主编。李荣的语言学著作有《切韵音系》(1952)、《汉语方言调查手册》(1957)、《音韵存稿》(1982)、《语文论衡》(1986)等。李荣研究汉语音韵的一个主要特点，是重视今音的研究，在掌握丰富的汉语方言资料的基础上，贯串古代文献，寻求语音构造、对应和演变的规律，故创见较多。50 年代，李荣与丁声树一起先后主持方言调查专业人才的培训工作和汉语方言普查工作。1983 年起，李荣与熊正辉一起主持编制汉语方言分区图集的工作。近年来的论文有《官话方言的分区》(1985)和《汉字的演变与汉字的将来》(1986)等。

(叶祥苓)

lishi bijiao yuyanxu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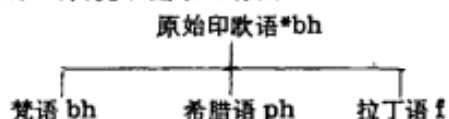
历史比较语言学 (historical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历史语言学 (historical linguistics) 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语言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地发展变化。一种语言会演变为数种语言。就是同一种语言，也有不同的发展阶段。研究这类语言发展变化规律的学科称作为历史语言学。历史语言学中采用的主要方法是对不同语言或者同一种语言的不同发展阶段作比较分析。运用这种比较方法研究语言历史演变的学科称为历史比较语言学。

历史比较语言学起源于 18 和 19 世纪的欧洲，研究重点是印欧语系诸语言的语音系统。1786 年英国学者 W. 琼斯在对梵语做了深入的研究之后指出，梵语同拉丁语和希腊语之间存在着非常有系统的对应关系。例如下表 3 组词在 3 种语言中的读音非常相近，就词首辅音而言，“三”在梵语、希腊语和拉丁语中都是 t，“父亲”都

意义	梵语	希腊语	拉丁语
三	trayas	treis	trēs
父亲	pitar	pater	pater
哥哥、弟弟	bhrater	phrater	frater

是p。这种系统的对应现象非常普遍,绝不可能归结为偶然因素。琼斯同时认为,要解释这种现象,只有认为它们共同源自现在也许已经消亡了的某种语言。接着,丹麦学者R.拉斯克、德国学者F.博普、J.格林等人在更多的语言中发现了类似的对应现象,并且根据这些系统的对应关系,推测了它们的共同起源——原始印欧语的表现形式,同时把原始印欧语同后来语言之间的关系用简洁明确的定律形式表现了出来,例如:



也就是说,假定原始印欧语有个*bh音(*表示没有文字记录,只是凭现有材料推想构造出来的),它在梵语中仍然保持不变,但是在希腊语中变成了ph,在拉丁语中变成了f,以这种方式来解说“哥哥、弟弟”在上述语言中的系统对应现象。

在拉斯克、博普、格林等人相继对印欧语系作了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德国莱比锡大学的一批学者把当时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取得的成果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加以总结,正式为历史比较语言学提出系统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这批学者称为新语法学派。他们提出的最重要的原则是语音规律无例外论。根据这条原则,语音变化完全受特定的语音环境的支配。一旦发生了某个语音变化,那么,同一语言地区中处于该特定语音环境中的音全都发生变化,不应该有例外现象出现。语言学界最初对他们提出的这条原则普遍持怀疑态度,因为以前发现的定律确有很多例外现象无法解释。但是,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早些时候所说的例外现象,其实也受着其他语音规律的支配,只是这些规律以前没有发现而已。后来,新语法学派的观点终于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在历史比较语言学中占据主导地位达半个多世纪之久,成为指导这个领域中研究工作的理论基础。尽管现在普遍认为,新语法学派未免夸大了语音定律的作用而没有给类比等因素以足够的注意,但是,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实践来看,新语法学派所提出的原则促使人们深入研究当时的语音规则尚无解释的例外现象,力图发现新的支配这些所谓例外的语音规则,对先前的规则加以修改和补充。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能够获得巨大的成绩,新语法学派所提出的理论原则有很大的功劳。

除了语音变化以外,类比也是决定语言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类比是比照某一模式的结构,用语法和语义上功能相同的新形式取代原来的形式。同语音变化单纯涉及到语音环境不同,类比牵涉到音系结构和语法结构之间的关系。类比变化有时会打乱语音变化的结果,后

者的一部分例外,可以由此而得到解释。

历史比较语言学问世以来,所取得的最大成绩就是对语言之间的亲缘关系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尤其是在印欧语系的谱系分类方面,获得了相当确凿的证据。其次是有助于人们对于有关原始母语的表现形态和使用地区的了解,例如,欧洲学者现在很有把握地认为,原始印欧母语起源于黑海以北的地区。

作为一种科学的研究工具,历史比较语言学不仅可用于印欧语系的语言,也可以用于其他语言。20世纪以来,瑞典汉学家高本汉、中国语言学家罗常培、陆志韦、王力、李方桂、李荣等人运用这种科学方法,构造了上古和中古的汉语语音系统,初步制定了汉语和有关语言的亲缘关系,把在中国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汉语音韵学研究提高到一个崭新的科学高度。

但是,历史比较语言学在方法上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对在所有子语言中都无残存表现的母语特征,比较方法是无法揭示出来的。同时,它也很难确定某一特征到底是原始母语的,还是在分化后的子语言中独立发生的平行性变化。再有,历史比较方法偏重于语言的前后相继,忽略了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根据这套方法所拟定的原始母语,是一个内部无方言差别的语言系统。现代学者则认为,一种语言,尤其是通行于广大地区的语言,无论怎么古老,内部只是基本相同,并非完全一致。法国的方言地理学家J.吉耶龙(1854~1926)在19世纪末期已经发现,一个地区的方言在语音上并不整齐划一。20世纪60年代美国W.拉博夫(1927~)发现,就是在纽约市内,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发音也不一样。所以一般看法是,把原始印欧语看做单一性的、规律绝对严格的、内部毫无分歧的语言,未免理想化。

参考书目

R. Anttila, *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Macmillan, New York, 1972.

W.P. Lehman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2nd ed.,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New York, 1973.

(陈 平)

lishi yuyanxue

历史语言学 (historical linguistics) 见历史比较语言学。

Litaowanyu

立陶宛语 (Lithuanian language) 苏联立陶宛的官方语言。属印欧语系波罗的语族东支,是该语族仅存的两种语言之一(另一种为拉脱维亚语)。使用人口共约300万,其中250万在立陶宛,白俄罗斯也有少量使用者。在国外的50多万立陶宛人中,绝大多数仍用立陶宛语,主要居住在美国,其次在巴西、阿根廷、中欧和西欧等国。立陶宛语的历史比拉脱维亚语古老。方言歧异很大,主要分为两支:低地立陶宛语,包括3种次方言;高地立陶宛语,包括4种次方言。现代标准立陶宛语以高

地立陶宛语的一种次方言为基础,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早的文献见于1547年翻译的马丁·路德(1483~1546)的教理问答手册。立陶宛语是近代印欧诸语言中最古老的语言之一,它保留了古老的音高重音、屈折变化及某些形式区别、特别是体词的形式区别。它保存的原始印欧语的格变系统,比古老的拉丁语和希腊语文献还要完整。这使它在印欧比较语言学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立陶宛语的声调对立只有在重读音节中才能形成,并在非重读音节中发生中和作用,同一个词的不同形态偶尔可在不同音节中重读;构词的主要手段是借助后缀、前缀和复合构词法;语法上分阳性和阴性,单数和复数,某些方言还有双数;有7个格:主格、属格、与格、宾格、工具格、方位格和呼格;动词有3个人称、4种时态:现在时、过去时、反复过去时、将来时。18世纪前曾采用哥特体字母,以后改用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文字,共33个字母,其中使用变音符号的有a、č、ę、ė、i、š、ų、ū、ž。

(黄长著)

lidu

吏读 ,又名吏札、吏吐、吏道。朝鲜文创制前借用汉字的音和义标记朝鲜语的一种特殊的文字形式。相传为新罗神文王(681~692)时期的鸿儒薛聪所创。实际上在薛聪之前已有不少早期吏读碑文。薛聪的贡献是把历代吏读文献归纳整理,使这种文字形式更加系统和定型。高丽李朝时期,吏读主要用于公私文书。吏读的特点:实词大致用汉语词,这些词进入句子时一般都按朝鲜语的语序,添加用汉字标记的表示语法意义的附加成分,这些附加成分朝鲜语称为“吐”。以1395年刊行的《大明律直解》中的一条律文为例:“徒役年限内良中老疾是去等如前论之为乎事”(汉文:若在徒役年限内老疾,亦如之)。其中,“是”、“为”、“事”只借用汉字的义,分别按朝鲜语读作“i”、“ha”、“il”,是训读。其他实词按当时朝鲜语的汉字读音。附于实词后的“良中”表示时间的位格,“去等”表示假定的谓词连接形,“乎”是谓词限定形,都是“吐”。吏读曾和汉文长期并用。朝鲜文创制后,3种书面形式同时使用,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现存的吏读文献有碑文、《大明律直解》和一些文书契约等,是研究古代朝鲜语极为珍贵的资料。

(宣德五)

Lituo-Luoman zhufangyan

利托-罗曼诸方言 (Rhaeto-Romance dialects) 属印欧语系罗曼语族。主要指分布于瑞士东南部和意大利北部的3种罗曼语方言的总称,有些语言学家也称为“利托-罗曼诸语言”。它包括弗留利语、拉迪恩语和罗曼什语。使用人口总计50多万,其中90%在意大利。这3种方言有若干共同点,但没有共同的历史和文学传统。语言学家通常把它们单独列为罗曼语言的一个小分支。这些方言过去分布的地区比现在广得多,北部远达多瑙河流域,但由于处在德语和意大利语这两大语言之

间,独立的发展受到影响,只能在人口稀少、交通不便的山区幸存下来。

3种方言中,只有罗曼什语取得了某种官方语言的地位,1938年就被瑞士政府列为第4种官方语言,居德语、法语、意大利语之后。它分布于瑞士与奥地利、意大利两国接壤的格里松斯州(也称格劳宾登州),使用人口约5万,仅占瑞士人口的1%。弗留利语分布于意大利北部与奥地利、南斯拉夫两国接壤的地区,使用人口近50万,但没有取得官方语言的地位。弗留利语的书面文献始于13世纪末。拉迪恩语分布于意大利阿迪杰河流域,使用者1万多人。“拉迪恩”一词偶尔被用来作为以上3种方言的总称。

拉迪恩语与拉迪诺语并不是一回事,后者是西班牙语方言。

(黄长著)

lishu

隶书 汉字一种书体的名称。隶书分秦隶、汉隶和八分。秦隶指秦始皇时期使用的简体字。汉代日常应用仍是隶书,但是形体、笔势不断发展,东汉中期出现庄重典雅的新体,熹平四年(175)以新隶体立石经于太学,成为国家的标准书体,魏以后称之为八分。

隶书形成于秦代,其渊源是久远的。战国时期政治、经济、文化迅速发展,文字应用日广,笔划趋向省减和平直。六国各自为政,文字省减各有异同。秦国沿用西周籀文为标准字体,变化极慢。秦始皇灭六国,以当时已趋省改的籀文为标准字体,推行统一文字的政策。汉代称省改前的籀文为大篆,省改后的为小篆(见篆书)。这都是上层使用的字。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说:“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晋代卫恒《四体书势》说:“下士人程邈为衙狱吏,得罪始皇,幽系云阳十年。从狱中作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损减,方者使员,员者使方,奏之始皇。始

皇善之,出以为御史,使定书。或曰邈所定乃隶字也。”小篆和隶书同是简化大篆而成的。其实秦人写简笔字并不是秦始皇统一中国时才有。秦国严格执行“物勒工名”的制度,历年各地出土战国时期秦国的兵器、漆器、陶器上笔划省减、直多弯少的简体字都出于工匠之手,已是隶书的雏形。程邈本是小吏,在狱中对照大篆把他熟悉的简体字加以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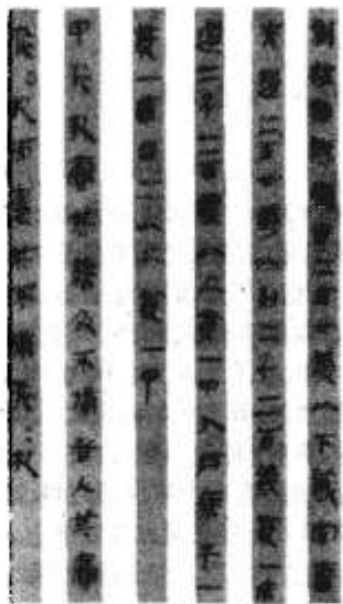


图1 秦隶(云梦秦简·效律)

是合乎情理的事。秦始皇使他出狱当御史来“定书”，是罕见的破格提拔，反映出简体字应用日广，急需规范化的形势。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约为秦始皇三十年的1200多枚竹简上就都是规则、熟练的隶书。秦推行小篆只是为保持秦人的篆书传统，具有政治意义，隶书在实际应用上已占优势。小篆比六国文字复杂难写，隶书比六国文字简易，更符合全国人民的需要。秦始皇用小篆统一文字，事实上变成了用隶书统一文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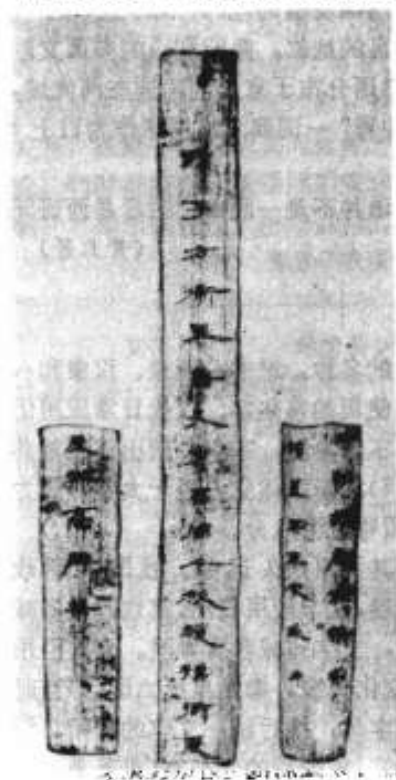


图2 汉隶(汉简《急就章》)

隶书的字体结构基本定型，继续简化的只是少数字，形体和笔势有很大的变化，明显地可分3期：

①秦隶，如云梦竹简，字形较方，杂有竖长形，少波势，略存篆意(图1)。②汉隶，如西汉武帝到东汉光武帝时期的居延汉简和敦煌、新疆各地出土的汉简，字形横向发展，竖短横宽，波势极大(图2)。③八分，如《熹平石经》，形体方正，笔划匀称，波势工整(参见彩图插页第7页)。

汉隶发展到八分，已经成为国家的标准书体。日常应用的字从笔法上继续简化，到魏晋又形成真书。真书在隋唐以前仍带有隶书的笔意，后人把魏晋南北朝的真书都称隶书，是对隶书范围的扩大。(张政娘)

Lisuwen

傣傣文 (Lisu writing) 见傣傣语。

Lisuyu

傣傣语 (Lisu language) 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主要分布在中国云南省怒江傣傣族自治州。使用人口约48万(1982)。方言差别不大，能互相通话。在缅甸、泰国北部也有使用者。傣傣语有p、ph、b、m、f、v、t、th、d、n、l、s、sh、z、j、f、h、g、k、kh、g、ŋ、x、y、h 28个声母。韵母以单元音为主，有i、e、ε、a、o、u、y、u 8个单元音，还有ē、ē、ā、ō、ū、ū 6个鼻化元音(自成音节)。有少量带i、u介音的二合元音。有6个声调：55、44、33、31、42、35，其中44调和42调只出现在紧元音音节上。词序和虚词是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句子成分的次序是主语—宾语—谓语。人称代词、名词修饰名词时，都在中心词之前。形容词、数量词组修饰名词时，在中心词之

后。状语在中心词之前，补语在中心词之后。有表示主语、宾语、状语、定语和各种语气的助词。宾语之后如加上助词，宾语、主语的位置可以互换；形容词之后如加上助词，可以提到被修饰的名词之前。多音节词大部分为合成词。有丰富的四音格名词和三音叠韵形容词。傣傣族现在使用3种文字：①20世纪初西方传教士创制的拉丁大写字母正反颠倒形式的拼音文字，共40个字母，用标点符号表示声调，这种文字通用于中国和缅甸的部分傣傣族地区。②20世纪20年代维西县农民汪忍波创制的音节文字，有1050多字，其中一小部分是利用汉字的音读和训读，通用于云南省维西地区。③1957年创制的拉丁字母新文字，主要通用于怒江傣傣族自治州，翻译出版了课本、书报等。(徐琳)

lianyu

连语 也作连语。这个词见于明代方以智《通雅》卷六《释诂》。方以智说：“连语者，双声相转而语连语也。”连语即连接不断的意思。指两个字合成为一个词，不能拆开来讲。《通雅》书中所讲的都是双声词，但是两个字为叠韵的也属于“连语”一类。例如“颉颃”、“玲珑”、“慷慨”、“消息”都是双声词，例如“苍茫”、“从容”、“殷勤”、“婆娑”都是叠韵词。这些都是不能分开讲的。“连语”现在通常称为“联绵字”或“联绵词”。(周祖谟)

lianmianzi

联绵字 (disyllabic roots) 两个字联缀在一起不能分开来讲的双音节词。从语言的角度来说，就是“联绵词”。联绵词在汉语里起源很早。在先秦以前上古时代，除了单音词以外，就是复合词和联绵词，不过联绵词所占的数量不是太多而已。联绵的名称见于宋代张有所著的《复古编》。联绵字可以分别为三类：一类是双声字，一类是叠韵字，一类是非双声叠韵字。例如“犹豫”、“留连”、“憔悴”、“荏苒”是双声，“徜徉”、“烂漫”、“叮咛”、“徘徊”是叠韵，“淡漠”、“翱翔”、“颠沛”、“滂沱”既非双声，也非叠韵。在这三类之外，有人把“叠字”(或称重言)也列入联绵字之内。如王国维所作《联绵字谱》。联绵字有些在古书中书写也不尽一致，例如“烦懣”或作“烦闷”，“逶迤”或作“委移”，“逍遥”或作“消摇”之类，虽然字不同，但是音同或音近，仍然是一个词。(周祖谟)

Lianmian Zidian

《联绵字典》 解释双声叠韵词的词典。近代符定一编。1943年出版。1946年中华书局重印，附有索引。符定一，湖南衡山人。全书36卷，依《康熙字典》例，分为子、丑、寅、卯以迄戌、亥等12集，按部首排列。所收以双声、叠韵词和叠音词为主，兼收一般的双音复词。例如“疲沓”、“发见”、“真伪”、“神采”、“秀才”、“终始”之类，体例未免芜杂。每一词下先注出《说文解字》大徐本的反切，《说文解字》没有的字就注出《广韵》或《集韵》的反切，然后解

释词义，并罗举古书用例和原书注文。此类资料大都取自前人著作杂纂而成。除经史注解之外，则取自诸子、《楚辞》、《文选》注和唐代以后的类书以及音义、小学书之类。摘抄采录之功多，解释判断之功少。作者所谓的“双声”指黄侃所立的古声 19 组，所谓的“叠韵”指古韵的 22 部。但是作者昧于声韵通转之学，所加按语多有不当。又称古无重唇音而有轻唇音，与语言事实不符，尤为荒谬。此书可作为一种材料书供检查之用。（周祖谟）

Lianmian Zipu

《联绵字谱》 编录古代联绵字的书。王国维编，收在《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中。本书按“双声之部”、“叠韵之部”和“非双声叠韵之部”分别排列。双声之部分声母的类别为影、喻、晓、匣、见、溪、群、疑、端、透、泥、娘、来、日、精、清、穿、从、床、心、审、邪、禅、邦、非、滂、敷、並、奉、明、微 23 类。叠韵之部分东、蒸、侵、谈、阳、耕、真、諄、元、歌、支、至、脂、祭、盍、緝、之、鱼、侯、幽、宵 21 部。声母类别近于章炳麟《新方言》所定 21 组，韵部分类则完全根据王念孙所定（王引之《经义述闻》卷 31）。书中所收联绵字只限于先秦两汉的经传、诸子、楚辞以及《尔雅》、《方言》、《说文解字》等书所有，其他不录。双声部分把叠字也一并收入。全书每一条下都详细注明出处，这是研究联绵词语很有用的一本资料书，根据这本书可以因音以求义，解决其中一些音义相关的问题。

（周祖谟）

Liangzhou Jinwenci Daxi

《两周金文辞大系》 青铜器铭文研究著作。郭沫若著。初版 1932 年 1 月在日本印行，手写影印，只有考释而没有图版。1934 年，郭氏汇集铭文及器形照片，编为《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共 5 册；次年又撰成《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共 3 册，均在日本出版，于是将初版作废。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作者对全书作了修改补充，抽换并增补了一部分材料，于 1957 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统名《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共 8 册，列为《考古学专刊》甲种第 3 号。

《大系》图录部分主要是图编和录编。图编印青铜器器形，共 263 件，录编分上下两卷，上卷收宗周器铭 250 件，下卷收列国器铭 261 件。考释部分分上下两编，与录编两卷相应。

《大系》选录了各家著录中重要的两周有铭青铜器，逐件加以考释研究。书中收有《彝器形象学试探》一文，作为图编的序说，将中国青铜器发展分为滥觞期、勃古期、开放期、新式期 4 大期。录编和考释则尽可能对所收器物作了分期和分域，使周代青铜器的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

书中考释不仅读释文字，而且着重阐发与古代社会历史有关的重要材料，与作者同时期所著《金文丛考》、《金文馀释之余》、《古代铭刻汇考》正续编等书相表里，为金文研究与社会史研究的结合奠定了基础。《大系》的许多观点，在古文字学界及历史、考古学界有深刻的影响。

（李学勤）

Linchuan Yinx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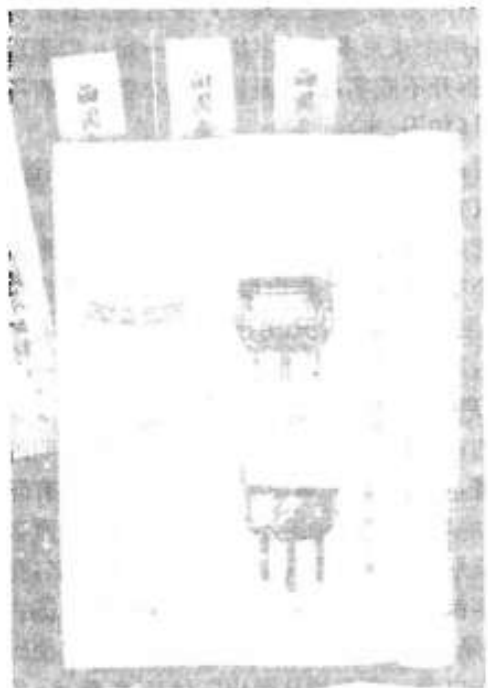
《临川音系》 (*Phonetics and Phonology of the Linchuan Dialect*) 研究赣方言和客家方言的著作。罗常培著。1936 年 5 月完稿，1941 年出版，1958 年 7 月北京科学出版社重版。全书 17.5 万字，分 6 章。第 1 章叙论，说明临川的地理位置和研究临川方言的意义。第 2 章和第 3 章分析了临川方音声韵调的音值以及本地音韵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由于有浪纹计的帮助，音值分析十分细致。第 4 章较详细地比较了临川方音与广韵音系、北京音系的异同。第 5 章列举了 22 类临川话跟普通话相差较远的词汇，对一部分“特殊词汇”作了一些词源学上的解释。第 6 章“标音举例”，有诗歌、故事、对话的标音。这本书对研究地点方言和编写地点方言的调查报告具有指导意义。

（饶秉才）

Liu Shipel

刘师培 (1884~1919) 中国清末民初语言文字学家、经学家。字申叔，曾名光汉，别字左龢，江苏仪征人。先世以治《春秋左氏传》名家。刘师培幼承家学，通“五经”文字、音韵、训诂。年二十就勤于著述，是《国粹学报》的主要撰稿人。有《国学发微》、《中国文学教科书》、《经学教科书》等著作。后赴日本，与章炳麟相识，为章氏《新方言》作序。当时思想倾向革命，但归国后，反依附清朝官吏端方。辛亥革命后，1917 年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延聘，任教授，主讲经史。提倡“国故”，完全与新文化运动相背谬。

刘师培著述宏富，他在语言文字学方面主要的成就在于发扬清代训诂学家所提倡的因声求义之说，并提出音近义通的理论。《左龢集》里有《字义起于字音说》。他



郭沫若著《两周金文辞大系》

说：“古人观察事物，以义象区，不以质体别，复援义象制名，故数物义象相同，命名亦同。及本语言制文字，即以名物之音为字音，故义象相同，所从之声亦同；所从之声既同，在偏旁未益以前，仅为一字，即假所从得声之字以为用。”这是他的学说的主旨。他又有《古韵同部之字义多相近说》（《左龠集》）和《正名隅论》（《左龠外集》），把声音相同、相近的都认为同义，未免以偏盖全，陷于谬误。然在《中国文学教科书》中所谈训诂学部分仍有可取。他的知识比较渊博，为文主汉魏，对社会学科多有研究，可惜死时仅 30 余岁。

（周祖谟）

Liu Taigong

刘台拱（1751~1805） 中国清代经学家、训诂学家。字端临，一字江岭，江苏宝应人。生于乾隆十六年闰五月初二日，卒于嘉庆十年五月二十二日。21 岁中试举人，会试礼部不第，留京师，授生徒。乾隆五十年（1785）方任丹徒县训导。为学自天文律吕，至于声音文字莫不深究。对于汉宋诸儒之说，不主一宗，无依傍门户之见。平生与王念孙、段玉裁、汪中、阮元等人相交甚深。所著书卷帙不多，但都是精粹之言。广雅书局刊本《刘氏遗书》有《论语骈枝》、《经传小记》、《国语补校》、《荀子补注》、《淮南子补校》、《方言补校》、《汉学拾遗》、《文集》等共 8 卷，其解《论语》“子所雅言”之雅言，“文莫吾犹人也”之文莫。释“摄齋升堂”之摄齋，以及《文集》中的《转注假借说》，都是确切不易之论。至于所校各书，证据详实，毫无臆测之病，这在清代学者之中也是不多见的。

（周祖谟）

Liu Xi

刘熙 中国东汉经学家、训诂学家。字成国，北海人（今山东高密一带），生当汉代末年桓灵之世，献帝建安中曾避地交州。据陈寿《三国志》所说，吴人程秉、薛综、蜀人许慈都曾从熙同学。著有《释名》27 篇，就音以说明事物得以如此称名的缘由，对后代训诂学因声求义的影响很大。其书一直传流至今。刘熙又有《孟子注》一书，见于唐代慧琳《一切经音义》引，今已亡佚无存。

见《释名》。

（周祖谟）

liushu

六书 中国文字学史上的名词。汉代的学者把汉字的构成和使用方式归纳成六种类型，总称六书。

六书一词出于《周礼》。《周礼·地官·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五曰六书，六曰九数。”书是写字。古代没有印刷术，得书难，儿童入学先写后读，所以书艺包括识字和写字，是文字之学。《周礼》是春秋时期的作品，传自儒家而没有师说。西汉末，刘歆崇信《周礼》，大力提倡，凭借政治力量在大学设立博士。刘歆《七略》：“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这是对于六书最早的解释，象形、象事、象意、象声

指的是文字形体结构，转注、假借指的是文字的使用方式，而转注重在字义，假借重在字音，对当时的文字分析极为清楚，在中国文字学史上可以说是很大的贡献。四象之名学术性很强，而在语言或书写上容易发生混淆，造成不必要的错误，所以不久他的后学们便作出修正。如郑众《周官解诂》，转注、假借不变，四象改为象形、会意、处事、谐声，其内容是一样的。

许慎受到刘歆的启示，费几十年的精力整理汉字，编成《说文解字》一书，叙曰：“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诂诂，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这对刘歆学说有所发展：①排定六书次第；②修正四象之名，使意义更明显；③六书下分别加以界说，并举例以明之。从此六书成为专门之学，千余年间学者研究古文字都没能超出它的范围。

许慎的成就无疑是伟大的，不足之处是受资料的局限，探索中国文字之原始构造却没能见最早的文字资料。《说文解字》成书于公元 100 年，所根据的文字资料是秦汉时期的篆书，也采用了先秦时期秦国籀文和儒家壁中经上的古文，没见到更早的文字资料，分析解说自然不免有不够或错误的地方。今日有甲骨文、商周金文、战国秦汉竹简帛书等大量资料，对汉字的产生和发展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回头看许慎的六书说自然不免有意见。试为简介如下：

①“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视而可识”是说人们直觉看得出来。这和象形相近，所不同者，形体是实，易于描画，事理是虚，表现出来就要委宛得多（如上、下）。“察而见意”和会意相近，要区别则靠分析偏旁。会意字是两个或更多几个字拼凑在一起，以表现一个意，指事字拆开不成字，或者是拆出一个字而仍有不成字的各种符号（如刃、末）。

②“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诂诂，日月是也。”诂诂，犹言屈曲。极言重视物体之状，不敢省简。

③“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形声字基本上由两个字组成，一个作为形的符号，一个作为声的符号。怎样产生也有两种情况。甲骨文中的象形字有的笔划多、区别大，写起来不免有困难。后来简化，加一个声符，便成了形声字，例如鳳、雞二字，形体不同，而凡、奚二声符是后加的；也有先用假借字后加形符的，如启明的启后加日旁作啓，昱日的昱先假借羽字，后加形符而有翊和翌。由于时间地域之推移，语音不同，文义变异，形声字又有增加声符或形符之例。形符、声符不限于象形字，指事、会意、形声字都可以作形符也都可以作声符。中国古籍很多，历史上经过几次整理，“飞禽即须安鸟，水族便应着鱼，虫属要作虫旁，草类皆从两中”（《经典释文·条

理》,这也增加了形声字。从商、周起,形声字成为汉字滋育之主要部门,在《说文》中形声约占文字总数的9/10。形声字既是形和声各占一半的地位,制造或整理文字者应当对形和声的部位有所规定,却未注意及此,于是左形右声、左声右形、上形下声、上声下形、内形外声、内声外形种种结构任意泛滥,使学习者诸多不便。

④“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比类是说把两个字拼在一起。合谊即会意。指撝即指挥。“以见指撝”是表现出目的和要求。文字上的形和声都有客观存在以为依据,只有意不容易表现,造字者可以有造字的意图,学字者可以有自己的理会,容易分歧。即以武、信而论,甲骨文有武字,上戈下止构造分明,也有止和戈两个字,但是怎么样能得出“止戈为武”这个意思?商、周文字中不见信字,战国文字中才有,作从言千声、从言身声各体,乃以讯为信。小篆中有信字,《说文》列入言部,是从言人声的形声字。信根本不是会意字。可见会意字的造字本义是很难理清楚的,学习文字的人只有承认现实,按照旧传的音义继续解说和使用下去。

⑤“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许慎把转注排在会意之后,说明它是以意为主。“同意相受”戴震解为“互训”,因为《说文》说:“老,考也”,“考,老也”。考老互训。“建类一首”则指部首而言。有些学者主张必须同部互训才是转注,例如草部有“蓄,蓄也”,“菑,蓄也”;“菑,苗也”,“苗,菑也”;即同意相受。从情理上讲是可以说得通的。

⑥“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假借字之发生有几种情况,一是字义不容易在字形上表现,取同音之字代用,不作新字,如我、汝、其、来之类。一是文字当使用时不够用,借字来顶替。许慎所举令长是秦、汉官制,令是施令,长是首长,皆属字义的引申,虽非本义,但不能称为假借。另一种情况是本有其字,写字的人提笔忘字,用同音字代替,只要音同便可假借,但是不免“人用其乡,同音异字,同字异音”(郑玄语),古籍中这种现象很多,学习文字的人应当理解。

总起来讲,《周礼·地官·保氏》的六书,内容模糊,究竟是什么,学者间有不同见解,一时不能解决,也不必急于解决,这只是历史上的一个名词的争论,没有实际用处。

刘歆六书说,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是六书具体名目的最初形式,在不足100年内经过他的弟子杜子春,再传弟子郑众、贾逵,三传弟子许慎等人的宣传和修正。从创意到建立,成为一门学问,即古老的中国文字学,在中国学术界存在1800多年。

刘歆以为六书是“造字之本”,这是托古改制,其实决不是先有入制定条例而后造字,六书是刘歆根据当时已有的文字知识归纳出来的名目,许慎通过整理文字的实践加以修正,才使内容明确。

许慎的成就是伟大的。但是他的六书说还不够精密。他的学说对后世影响很大,起过好的和坏的作用。近代

考古资料聚集日多,研究其文字从分析偏旁入手,取得很好的成绩,都是由于许慎的启示。中古时期学者崇拜许慎太过,揣摩傅会,作茧自缚,产生许多恶果。例如郑樵《六书略》,支离破碎,毫无用处,可以存而不论。

(张政烺)

Liushugu

《六书故》 一部用六书理论来分析汉字的字书。元代戴侗作。戴侗字仲达,永嘉人。全书有33卷,通释1卷。作者认为六书之学是读书的门径,而学者不讲已久,即使有人学,也往往陷于支离傅会,不得其要,所以就许慎《说文解字》订其得失,重新解释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书的意义。书中不沿袭《说文》540部,而别立479目,称其中189目为文。又有45目不易解释的为疑文。又称其中245目为字。文为“母”,字为“子”。字是与文的形体有一定联系的,所以称之为“子”。

戴侗把479目分为九类:一数、二天、三地、四人、五动物、六植物、七工事、八杂、九疑。每目之下把偏旁相同的字叙列于后。如“月”字为目,“月”下列“夕”,为指事字,“夕”下又列会意字“多”,“多”下又列谐声字“夥”,后面又列从“夕”的谐声字“夜”、“梦”、“夙”。这种系联的方法,与《说文》大不相同,戴侗称为“父以联子,子以联孙”,看起来似乎很有层序,但难以检索,反而庞杂紊乱。

戴侗把六书的次第排列为:一指事、二象形、三会意、四转注、五谐声、六假借。他认为侧“山”为“目”,反“人”为“匕”,反“欠”为“兑”,反“子”为“云”,就是转注,纯属臆说,毫无根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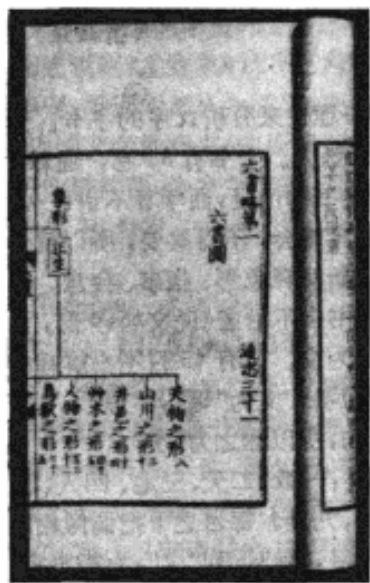
这部书的价值在于能援引钟鼎文来说明字形,又能明辨字义的引申不同于文字的假借。对于音与义的关系阐发尤其多。戴侗说:“书学既废,章句之士知因言以求意矣,未知因文(字)以求义也;训诂之士,知因文(字)以求义矣,未知因声以求义也。夫文字之用莫博于谐声,莫变于假借。因文以求义,而不知因声以求义,吾未见其能尽文字之情也。”他提出“因声以求义”,不仅为了解释形声字的声与义的关系,而且由此可知辨认古书中文字的假借。这是很重要的见解。

(周祖谟)

Liushulue

《六书略》 讲解汉字形体构造的书,宋代郑樵撰。收在他所著《通志》内。六书即许慎《说文解字叙》所说的指事、象形、谐声、会意、转注、假借6种造字的方法和原则。许慎虽然给六书作了解说,可是在他的书里并没有把所收的9000多字总的加以区分。郑樵首创六书分类之学。他在《六书略》里不仅把六书都分别举例,而且又细加区分,又有所谓“形兼声”、“形兼意”之类,竟增多至12类,以文字牵就六书,未免于理不合。自此以后,元代戴侗有《六书故》,周伯琦有《六书正讹》,杨桓有《六书统》,明代魏校有《六书精蕴》,赵古则有《六书本义》,赵宦光有《六书长笺》,几乎把六书分类看做是研究《说文》的惟一途径,众说纷纭,走入歧途。

但郑樵本人对文字演进的趋势并不模糊。他在本书《六书序》里说：“象形指事一也，象形别出为指事。谐声转注一也。谐声别出为转注。二母为会意，一子一母为



郑樵著《六书略》

谐声。六书也者，象形为本。形不可象，则属诸事，事不可指，则属诸意；意不可会，则属诸声；声则无不谐矣。五不足，而后假借生焉。”这些话还是有些道理的。郑樵还写有《六书证》，今已失传。

(周祖谟)

Liushu Yinjunbiao

《六书音均表》 研究汉语上古音的著作。清代段玉裁著。全书由5个表构成：①今韵古分十七部表；②古十七部谐声表；③古十七部合用分类表；④诗经韵分十七部表；⑤群经韵分十七部表。书名叫“表”，实际上并不是单纯的表，前4表都有论述和解说。



段玉裁著《六书音均表》

表一，先说明古韵分17部，然后列表，标示17部跟206韵目的对应关系，最后用文字阐述古韵分17部的原则，以及入声与阴声(或阳声)相配情况，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古音学见解。表二，首先论述主谐字相同，古音必同部的观点，然后按17部分别列出每一部所有的谐声偏旁，这是古音学上第一次肯定谐声偏旁同古韵有全面相应关系。表三，首先说明17部的顺序是按音相近、部次相邻的原则排列的，然后列表，把17部分成6类，最后论述了合韵的道理。所谓合韵指不同部而属于同一大类的字互相押韵的情况。表四，把《诗经》所有韵字，按17部逐一列出，这实际是摆出古韵分17部的证据，也可以说是古韵分17部的具体罗列。表五，目的、形式跟表四相同，列出的是《诗经》以外的经书(包括《楚辞》)中的押韵字。

《六书音均表》集中反映了段玉裁对古音学的贡献。他继承了顾炎武、江永的研究成果，并且加以发展，分古韵为17部。跟顾炎武、江永相比，他又多分出4部：①支、脂、之分开。段玉裁之前，《广韵》支佳、脂微齐皆灰、之咍3组韵，古韵归为一部，段氏第一次把它们分为3部，受到古韵学家的普遍赞扬，认为这是古音学上的一个大发明。②真，文分部。江永在顾炎武的第4部中分出元部，剩下的真、文仍为一部，段玉裁把真、文分为两部。③侯韵独立。江永把虞韵一半归入侯韵，这样做是合理的，但又把侯韵合到幽部去了。段玉裁把侯韵独立出来，既不入鱼部，也不入幽部。后两条也是被人称道的。《六书音均表》是段玉裁古音学研究成果的最精炼的概括。

(谢纪锋)

Longkanshoujing

《龙龕手鏡》 一部按部首和四声两相结合排列汉字的字书，辽代释行均作。行均字广济，俗姓于氏，卷首有辽圣宗统和十五年七月一日燕台悯忠寺沙门智光字法炬序。悯忠寺即现在的北京的法源寺。辽圣宗统和十五年即宋真宗至道三年(997)。此书原名《龙龕手鑑》，宋刻本因避讳而改为《龙龕手鏡》。

本书虽按部首编排文字，但部首又按平、上、去、入四声读音分为4卷。平声卷第一有97部，上声卷第二有60部，去声卷第三有26部，入声卷第四有59部，共计240部。每部之内所收的字又按平、上、去、入四声的次序排列。成为部首和四声两相结合的排列方法，这是前所未有的。在字书里别具一格。

智光的序文说行均作这部字书曾费时五载，收有26430余字。书中所列文字则有正体、或体、俗体、古文几种，但或体、俗体、讹体独多，杂然并陈。有的奇诡讹乱，不可究诘、难以下笔。此书分部也不同于《说文解字》、《玉篇》，差别很大。有些字只取字的开头上面几笔作为部首，如“一”部音徒侯反，齐、高、董、享、亢、亮、毫等字都归“一”部，但又别立“高”部。又如以“其”为部首，收基、蕞等字，全然不顾形与声的结构关系，与传统的分部法不合。这部书只能供考查俗字、或体之用。旧有北宋刻本，



释行均著《龙龕手鏡》

《四部丛刊》印有影抄本(参见彩图插页第10页)。

(周士琦)

longyamang yuyan jiaoxue

聋哑盲语言教学 (language teaching for the deaf-mute and the blind) 指聋哑人的语言文字教学和盲人的盲文教学。这两种人由于听力或视力失灵,不能进行正常语言活动或阅读,需要进行一种特殊教学训练,克服他们在语言文字上的障碍。

聋哑人的语言文字教学

聋哑人耳不能听周围世界的声音,失去了学习与应用有声语言的天然条件。他们之间或者他们与普通人之间的交际自然地或者自发地运用了手语(或称手势语,面部表情加手势)。这种自发的手语总是在小范围内进行。聋哑人的眼睛是正常的,他们跟普通人一样看得见字,因此可以学习并使用跟普通人同样的文字进行阅读,并跟普通人笔谈。就中国使用汉字的情况说,笔谈比起讲话来是非常缓慢和不方便的。使用拼音文字的民族,利用几十个字母的指式连续打下去就构成文字,交际起来方便得多,这叫指语。在中国,利用汉语拼音,就可以进行一般的指语交际。近代科学技术发达,或利用聋哑儿童的残余听力,或利用仪器设备(如助听器),或利用发音原理,取得口语和看话的效果。因此,聋哑人可能有4种语言交际手段:手语、文字、指语、口语看话。

对聋哑儿童说,这4种语言教育手段都是不可缺少的,口语看话可以取得最广泛的社会交际能力,是聋哑人语言技能的最高造诣。手语是最现实、最迫切的社会交际手段。指语是学习普通文字(汉字)、普通话对话、提高手语质量所必须的辅助手段。汉字是全面掌握中国文化的钥匙。

聋哑人的手语教学 在聋哑人的语言教学的4种形式中,手语占有优先的地位。接受教育者可以是汉字文盲,可以是指语文盲或者不会口语和看话的哑人,但是他不能不会手语,生活要求他必须一定程度地掌握某种

手语。汉字和指语在学习和应用上都比手语费事和困难得多,这就使得聋哑人之间一般总是靠打手势进行语言交际。由于手语的超方言以至超语种的性质,国际聋哑人协会得以作出手语型的国际通用聋哑语1500条供聋哑人在国际会议场合交谈,也作为国际会议的工作语言之一。

中国聋哑人手语的产生 中国地区广大,各地流行的手势很不一致,不利于聋哑人的社会交往。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于1959年整理修订了《聋哑人通用手语草图》,报请原内务部、教育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批准试行。先后共出版了4辑,共2000个手势图式,受到广大聋哑人的欢迎。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版的4辑草图大部分散失,中断了试行与推广工作。1979年8月3日至13日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筹备组在北京召开全国手语工



图1 汉语手指字母图

作座谈会,讨论制订了430个聋哑人手语新词统一的手势动作,在全国试行。1982年10月18日至26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手语工作座谈会,讨论和制订了640个聋哑人手语新词手势动作,由民政部、教育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出通知,在全国试行(图1)。

手语的结构规律 首先是词根的表达方法。①以一个单纯词的手势为根,如“红”、“爱”、“公”等;②以一个合成词的手势为根,如“首长”、“极其”、“数量”等;③一个手势动作可作不同词族的根,如“首长”可作“部长”、“局长”、“科长”的根,也可作“主持”、“主动”、“主流”的根;④以与某一事物相关的手势为根,如“学校”、“医院”、“商店”等以“房子”的手势为根。至于手势的语素意义的表示,则主要是形象化,以加深理解和记忆。不过

这个形象化更生动活泼，因为它是动的形象。手语的语素结构，类似汉字，但比汉字的路子更宽，因为它既有静，又有动，变化是无穷的。汉字的结构还受到历史的限制，增加了学习的难度；而汉语手语的构形则以当前事物为依据，有如看图识字，学习起来更加容易。

手语教学上存在的问题 ①手语教学和口语教学的问题，由于病理卫生和科学技术的发达，聋哑语言教育日益由手势表意(手语)走向口语和看话，理想的语言造诣可以作到聋哑人与普通人之间进行正常的交谈。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一些学校禁止学生使用手语。但由于手语本身的特殊的优越性，它还在聋哑儿童私下交谈中流通。就国际情况说，某些先进国家倾向于口语化，废除聋人手语。有的国家既重视口语，也不轻视手语，如日本、西班牙。也有对手语倍加重视的，如芬兰。他们认为手语是聋人独有的文化，当聋儿还不会芬兰语时却懂手语。手语是帮助聋儿学芬兰语的有力手段。1979年芬兰政府承认手语是聋人的第一语言，芬兰文是第二语言。现在芬兰人可以带手语翻译人员去大学学习，去参加政治性会议。每年有四五千名健全人学手语，这些为聋人服务的手语翻译都由政府支付工资。要解决聋哑人的语言问题，其正确途径应当是双管齐下，手语先行，既帮助学口语、看话，又帮助识字学文化，进一步帮助口语对话。②地方手语跟通用手语之间的矛盾。手语一向是不统一的，不同的交际范围有不同的手语表示法，学校之间、地区之间、南方与北方，打法都有差异，影响相互理解。但地方手语一经形成习惯，就相当顽固，彼此难以求同，象方言土语之间的情况一样，在聋哑人中推行《通用手语》存在着类似推广普通话的问题。目前推行的《通用手语》收词共3 000多个，大部分是已经通行的习惯手势，一小部分是经过改造的原有习惯手势，还增加了一些主要用于人名、地名和虚词的指语手势。此外，也移植过来一些国际通用的国名手势。《通用手语》不但提供了统一规范的手语图形，而且使手语有了书面的形式，但是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普通话型的通用手语还需要长期不断的努力。

聋哑人的口语教学 当前聋哑人的语言教学，必须发挥信息科学的优势，开展声像教学。将无声世界提高到有声世界。利用聋哑人残余的听力，进行听觉训练和语言培训。聋哑人虽失去听觉，但是视觉、触觉和动觉等器官特别发达，利用多器官吸收教育信息，效能比正常人更为敏感。使用现代化多功能的电化教学设备，训练聋哑人学习语言和知识，是最科学最有效的方法。不仅直接学习发音、识字，并由图像得知文词的意义，培养语言表达能力，达到能说会听、聋而不哑的目的。当前，一般能做到聋儿能模仿健听人学会发音，并能分析一个音节的声韵母，记下一个汉字的音素，把说话、写话和懂话结合起来。在听力完全失灵或无高功率助听器帮助时，他们可以看口形了解语义，叫做看话。看话实际上是用眼睛了解一个字的音节结构并联系上下文了解话语，这样，聋哑人的语言，除借助于助听器外，实际上就是在说

自己听不见但别人能听懂的话，看自己听不见但自己能懂的话。

盲人的语言文字教学

盲文，或称盲字，是针对盲人眼不能看的特点而设计的一种凸点，以供手指摸识的文字体系。这种文字体系是国际性的，1824年由法国的盲人 L. 布莱尔(1809~1852)发明。因此，国际上便以布莱尔的名字命名盲文。

布莱尔盲字 布莱尔盲字是全世界一致公认的盲文体系，由63个编码字符组成，每一个字符由1~6个突起的点儿安排在一个有6个点位的长方形里。这些凸出在厚纸上的成行的盲文可以用手指轻轻摸读。

为了确认63个不同的点式或盲文字符，数点位时是左起自上而下1—2—3，然后右起自上而下4—5—6。《布莱尔字符表》(图2)表明每个字符的构成以及它的最简单

第1行	1	2	3	4	5	6	7	8	9	10
第2行	k	l	m	n	o	p	q	r	s	t
第3行	u	v	x	y	z	and	for	of	the	with
第4行	ch	gn	sh	th	wh	ed	er	ou	ow	w
第5行	.	:	;	en		()	< /	in	)	
第6行	st	ing	*	ar	/	-				
第7行	一般 重音 符号	用于两 方缩写	斜体符 号，小 数点	字母 符号	大写 符号	大写 符号	大写 符号	大写 符号	大写 符号	大写 符号

1 • 4
2 • 5
3 • 6
布莱尔方位

图2 《布莱尔字符表》

的意义。字符表的前10个字母是由点1、点2、点4和点5组成的，如h由点1、点2、和点5所组成。a由点1所组成。当它们前边有第6行(见字符表)的数标图式时，这些符号就有了数值。字母k~t这10个字母是由给第1行的符号加点3所组成。其余5个字母(u、v、x、y、z)和5个很通用的词的表示法是给第一行的符号加点3和点6。如e是点1和点5(第1行)，对应的z就是1356。给前10个字母加点6，就组成了字母w和9个常用字母组合(第4行)。标点符号和两个附加的通用字母组合的构成是把第1行的符号下放在点2—3—5—6的点位上(第5行)，即降一格。3个词尾的字母组合，数标，以及另两个标点符号是用点3—4—5和6组成，如第6行所示。最后7个点式，如第7行所指出，是由点4—5—6所组成，在一般书面语里没有真正的对应。象数标一样，这些符号用作修饰成分放在任何其他符号之前。应用这条原则，各种符号可以发生多方面的作用。举个例子，点5加在

字母 a 符号的前面,就形成了“day”(日子)的布莱尔缩写形式(9 点缩为 2 点)。

布莱尔的盲字虽立即为他的同学们所接受、应用,但直到 1854 年,即他死后两年才被巴黎的学校采纳。1916 年,美国盲人学校正式采纳布莱尔原来的字母表和一系列缩写法。1932 年,英国和美国的盲人代理机构的代表在伦敦开会,通过了所谓标准英语布莱尔盲字方案第二级(指缩写程度)。1957 年对这个方案作了进一步的改进。

手写盲文不同于一般明眼人的写字,首先要备一个金属或塑料制成的盲字板和专用的椎笔,盲字板由大小相同的两片长方金属板结合而成,一头用铰链联结起来。两块板之间可以夹一张纸。这两块金属板的上一层,有蜂房形的小窗框,在每一个小窗框下面,在下层板里,有 6 个布莱尔点式的小窝儿。用铁笔头把纸压到下边的小窝里成凸点或浮雕。按布莱尔字符从右向左写;把纸翻过来,点儿就朝上,从左向右读。

布莱尔盲文也可以用特制的机器造出。这个机器有 6 个键,每个键跟布莱尔小窝儿的点儿相对应。第一个布莱尔书写机是 1892 年美国人 F. 霍尔所发明。晚近的盲字制作革新是电动浮雕机,类似电传打字机。制作大量布莱尔材料的拷贝,是用充当压印主盘的浮雕锌板作出的。1920 年以后产生了布莱尔盲字书写的交叉点制,可以浮雕一张纸的两面,不至两面的点儿互相损伤。近来,制定出一个计算机程序,能把英文自动译成缩略式凸字板布莱尔盲文。并从一个标准电动打字机键盘输出布莱尔盲文。

中国的盲字 中国曾有“康熙盲字”,属编码性质。以后有“心目克明”盲字,为拼音制。1953 年公布了“新盲字”,也是拼音制。它们都来自布莱尔浮雕六点制,但对 63 个字符意义的安排有所不同。“康熙盲字”利用它编数码以表示音节。后两者则尽量照用它的声母,此外或形同音异,或借单一字符表示汉语的韵母,构成双拼制。其实从使用字符的数目来说,以上三种汉语盲字方案都是用两方,即双拼制,反映了汉语语音特点。现行的“新盲字”于 1953 年公布。开辟了汉语普通话的简易体系的盲字的道路。(参见彩图插页第 40 页)

参考书目

L. L. Clark.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Technology and Blindness*, 4 vol., 1963.

《中国聋人》,《中国聋人》杂志社,北京,1979~1984。

(杜松寿)

Lusailuo

卢赛洛, J. P. (Jean Pierre Rousselot 1846~1924) 法国语音学家。1846 年 10 月 14 日出生于圣克劳。曾在巴黎天主教大学任教,在法兰西学院创设实验语音学的实验室。卢赛洛被认为现代普通语音学和实验语音学的创始人。他使现代语音学建立在坚实的学术基础上,并以实验结果得出语音的变化是长期而缓慢的而且是可以预测的结论。他在语音学中引进音位概念,

开辟了新的音位科学的领域。他致力于语音变化总趋势的深入研究,不局限于死的语音现象。卢赛洛的关于实验语音学的著作至今仍被视为经典文献而常被引用。他的代表作是《实验语音学原理》(1897~1908)。

(吴宗济)

Lu Zhuangzhang

卢慧章 (1854~1928) 中国清末第一个提出改革汉字和制订切音字方案的人。字雪樵,清咸丰四年生于福建泉州府同安县一个农民家庭。1928 年 12 月 28



日在厦门去世。18 岁考秀才未中,移居厦门。后到新加坡谋生,兼学英文。25 岁回厦门,以教华人英语和西人华语为业。当时正是提倡维新变法的时候,很多人主张普及教育以求国家富强。卢慧章受到民间方言韵书《十五音》和厦门话教会罗马字(白话字)的影响,认为要普及教育必须先有一套

“字话一律”的切音字(拼音文字)。他认为“国之富强,基于格致,格致之兴,基于男妇老幼皆好学识理。其所以能好学识理者,基于切音为字,则字母与切法习完,凡字无师能自读;基于字话一律,则读于口遂即达于心;又基于字画简易,亦即易于着笔,省费十余载之光阴,将此光阴专攻于算学、格致、化学,以及种种之实学,何患国不富强也哉”(《切音新字》序)。他经过 10 年研究,于 1892 年拟成一个“两字合切成音”的厦门话拼音文字方案,字母采用拉丁字母和它的变体,取名《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出版课本《一目了然初阶》(中国切音新字厦腔),在厦门传授。据说“只须半载,便能持笔抒写其所欲言”,“旅闽西人亦多传其学,称为简易”(1898 年都察院代奏文)。

1898 年卢慧章把他的方案呈交清政府审查。戊戌变法失败被搁置下来。1905 年他到北京,再次呈交方案。这时王照的汉字偏旁式切音字方案《官话合声字母》在北方流行,因此他放弃原来的方案,又用汉字笔画另订了一个新方案,写了一部京音的《中国切音新字》,第三次呈交清政府。但清政府不予采用。他只好回到厦门继续在民间推行。他在《北京切音教科书》上印了一副对联:“卅年用尽心机,特为同胞开慧眼;一旦创成字母,愿教吾国进文明。”

1913 年,“读音统一会”议订注音字母。他是福建省代表,坚持他的双拼式切音字。1915 年他用自己的方案出版《中国新字》。1916 年又出版《中华新字》。

(黄典诚)

Lu Deming

陆德明 (约 550~约 630) 中国唐代经学家。名元朗,字德明,苏州吴(今江苏省吴县)人。生于梁承圣年间,卒于唐贞观初年。陈后主时任左常侍,隋炀帝时为国子助教,贞观初年任国子博士,封吴县男。他编写的《经典释

文》是注释先秦古书的重要著作，共30卷。先秦经典文献的文字和意义，几经演变，后人理解发生困难，汉魏以来很多学者除了为古书作注以外还作音义。陆德明采集230多家说法，考辨异同，写出《经典释文》。陆书注释了《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孝经》、《论语》、《老子》、《庄子》、《尔雅》经文和注解里难字的音义。《经典释文》既是阅读古书的工具书，又为研究音韵训诂的学者提供了大量的宝贵材料。

见《经典释文》。

(刘广和)

Lu Fayon

陆法言 中国隋代音韵学家。名词，以字行，河北临漳人。年轻时与刘臻、萧该、颜之推等8人讨论音韵，后来据以编著著名韵书《切韵》。陆氏家族不见容于隋朝，因此陆法言的著作只是私家著述。但是到唐以下却大为流行，因为他的书吸取了以前诸家韵书的长处。到宋代，《切韵》的增订本《广韵》竟成为国家规定考试的标准。

见《切韵》。

(刘广和)

Lu Zhiwei

陆志韦 (1894~1970) 中国心理学家、音韵学家。浙江省吴兴县人。留学美国，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24年回国后，历任南京高等师范、东南大学、燕京大学教授、系主任和燕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



席、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任研究员，并担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陆志韦研究音韵学先从修改高本汉中古音学说入手，著有《中古汉语的浊声纽》、《证广韵五十一声类》(《燕京学报》25期)、《三四等与所谓“喻化”》(同前，26期，1939)、《试拟切韵声母之

音值并论唐代长安语之声母》(同前，28期，1940)等论文。否定了高本汉的j化说，提出了浊音不送气、纯四等没有i介音等一系列创见。此外还采纳了王静如的意见，为重出喉牙唇音拟了不同介音。创立了自己的体系，写成《古音说略》的《卷首》。从《切韵》音上溯，他用概率和统计方法，研究《诗经》音。他的分部结果，大致和清代学者相合。谈到拟音，因为坚持凡与入声押韵的“阴声”一定有浊塞音韵尾，结果使全部上古汉语没有开音节。这一点没有得到多数学者同意。从《切韵》往下，他研究了《皇极经世·天声地音》、《中原音韵》等古官话材料，写成许多散篇论文，还有专著《北京话单音词词汇》(1951)。他的研究接触到汉语语音史的各个方面。音韵以外，他还和别人合作研究语法，写过《汉语的构词法》等著作。

(俞敏)

Lu Jing

吕静 中国晋代音韵学家。大约生活在西晋末年，作过安复令，《字林》作者吕忱之弟，编有《韵集》。《韵集》是仅晚于《声类》的早期古代韵书。后魏江式《上古今文字源流表》说：“忱弟静别仿故左校令李登《声类》之法，作《韵集》五卷，宫、商、角、徵、羽各为一篇。”《韵集》一书早已佚失，它的若干逸文散见于古文献中。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韵目的小注里，有陆法言《切韵》以前五家韵书分韵异同的记载，其中有吕静《韵集》的情况。参与修订《切韵》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音辞篇》里批评吕静“成、仍、宏、登合成两韵，为、奇、益、石分作四章……”。这说明《韵集》跟《切韵》分韵有分歧。

(刘广和)

Lu Shuxiang

吕叔湘 (1904~) 中国语言学家。江苏省丹阳县人。生于1904年12月24日。1926年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外国语文系。毕业后，曾在丹阳县立中学、苏州中学等校任教。1936~1937年留学英国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1938年回国后，先后在云南大学、华西协合大学、金陵大学、中央大学、清华大学等校担任教学和研究工作。1952年调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1978年起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先后任研究员、副所长、所长。1954年起兼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1980年起又兼任副主任；同年被选为中国语言学会会长。1954~1964年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和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64、1974、1978、1983年连续当选为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和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法制委员会委员。1982年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198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吕叔湘长期从事汉语语法的研究。他在现代汉语方面的主要著作有《中国文法要略》、《语法修辞讲话》(与朱德熙合著)、《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等。《中国文法要略》上卷出版于1942年，下卷出版于1944年，与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出版时间接近。这两部著作都力图摆脱印欧语语法的羁绊，探索汉语自身的语法规律，可以说反映了20世纪前半世纪中国汉语语法研究所达到的水平。《中国文法要略》上卷“词句论”里讨论到句子和词组的转化，观察深入细致，是研究汉语句法变换关系的先驱。下卷“表达论”以语义为纲描写汉语句法，许多见解富有启发性。这部书是迄今为止对汉语句法全面进行语义分析的唯一著作。《语法修辞讲话》是普及性著作，1951年6月开始在《人民日报》连载，1952年出版单行本。这部书目的在于纠正当时社会上在使用语言文字方面的混乱现

象,由于内容切合实际,这部著作流传很广,影响比较大。《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出版于1979年。篇幅虽然不大,但把长期以来汉语语法研究中存在的种种疑难问题加以归纳、分析,对近年来的语法研究有一定影响。

1946年发表的《从主语、宾语的分别谈国语句子的分析》吸收了O.叶斯泊森《分析句法》的方法,对汉语的“主-动-宾”句式的各种变化作了比较全面而详尽的分析。1965年写的讨论方位词和形容词的文章根据大量语言事实进行细致的分析,从中可以看出吕叔湘治学朴实、严谨的精神。这些讨论现代汉语语法的单篇论文都收在《汉语语法论文集》(增订本,1984)里。

吕叔湘是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开创人。从1940年开始,他陆续发表了一系列论述近代汉语语法的论文。内容涉及指代词、语助词(在、着、底、地)、量词(个)以及某些句法问题。由于根据的语言资料丰富可靠,分析方法细致周密,所以创获很多。他的工作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这些论文收集在《汉语语法论文集》和《近代汉语指代词》(1984)两书里。

吕叔湘在语言文字的应用和语文知识的普及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这主要包括文字改革、汉语规范化、中小学语文教学、对外汉语教学、外语教学、文风问题等。关于这方面的论述有一部分收入《吕叔湘语文论集》(1983)里。

吕叔湘还翻译过一些人类学著作和文学作品,他的译文以明白晓畅见称。

吕叔湘一向关心中青年语文工作者的成长,1983年他捐献多年的积蓄,设立“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参见彩图插页第26页) (吕必松)

Lundun xuepai

伦敦学派 (London school) 现代语言学重要学派之一。创始人是J. R. 弗斯。他自20世纪30年代起,在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院语音学系与一些同事和门生一起逐步建立了这个学派,其中成员有R. H. 罗宾斯、W. 哈斯、弗礼德等。1960年弗斯去世后,他们分散在英国境内各大学和澳洲、美国各地工作。

17~19世纪,大英帝国版图日益扩张,语种日益复杂,既需要确立通行全境的标准英语,又需要通晓各非英语民族的语言。因此,英国的语言研究有其明确的实用目的,与德国历史比较语言学者偏重古史考证不同。在正音法、词典编纂法、速记术、拼写改革各方面,英国人在16世纪以后下了许多功夫。在弗斯之前,H. 斯维特和D. 琼斯对语音学贡献尤大。

弗斯是研究普通语言学理论问题的第一个英国人。他既熟悉琼斯的语音学,又吸收了B. 马林诺夫斯基(1882~1962)的人类学理论。他曾在印度教书8年,后来又用了15个月到印度专门研究当地的一些语言。因此,他的理论与其他学派不同,主要有如下几点:

① 与侧重语言结构的F. 德索绪尔派相反,弗斯特

别重视“社会性成分”。他说,“语言是人类的生活形式,并不是一大堆硬性规定的符号和标记。”他从具体观察中发现,人们在不同的交际场合使用着不同的词语、结构和格式,称之为“局限语言”。

② 弗斯对“系统”和“结构”这两个术语赋予了新概念。他所谓“结构”指语法序列(组合关系),如“我借书”、“你写字”、“他跳绳”,都是由主语+动词+宾语组成,这就是结构。他所谓“系统”指能在一个结构中同一位置出现的词,如在“我借书”、“我读书”、“我还书”中,“借、读、还”这3个动词就构成一个系统(聚合关系)。“借、读、还”都能与“书”一起出现,这种同现关系他称之为“搭配”。据他看来,非但语法有搭配,语音也有搭配。例如英语有lint[lint],link[liŋk],但是没有[liŋp],因为[ŋ]和[p]这两个音在这个位置上不能搭配。

③ 与美国结构主义学派相反,弗斯特特别强调意义在语言研究中的重要性。不过他所谓“意义”有其特殊内涵,因为他说,非但有词汇意义,还有“语法意义”和“音系意义”。他赞同马林诺夫斯基的说法,认为语言的意义来自“情境的衬托”。衬托有两种:一种来自语言之外,即言语活动的时间、地点、背景、说话人与听话人的关系等等;一种来自语言之内,即言语的上下文。“词汇意义”是言语所指的客观事物,“语法意义”是一个结构(词、词组或子句)与另一个结构之间的语法关系,“音系意义”则是一个音与一些别的音之间的关系。

④ 在音系方面,弗斯有两个独特主张:一是“多系统论”。例如英语pin,tint,kin中有[p,t,k],spin,stint,skin中也有[p,t,k]。一般人以为,这些可以合并,分别成为/p,t,k/3个音位。但是弗斯不同意。他说,pin,tint,kin的[p,t,k]是吐气的,spin,stint,skin的[p,t,k]是不吐气的,不能合二而一。他主张建立两个“系统”,一个是pin,tin,kin的词首系统[p,t,k],一个是spin,stint,skin的s-后系统[p,t,k]。弗斯的另一个关于音系的独特主张包括两项:“音声单位”和“节律分析”。他所谓的“节律”,指语音中的超音段特征,如重音、音高、音长、语调等等,这些至少与一个音节有关,并不限于一个音段。例如英语farm一般标为[fa:m], [a:]表示[a]是长音。但是弗斯说,实际上是[fam]这个音节长,并不只是[a]这个元音长。他主张改标为 $\underset{fam}{\text{L}}$ (L表示长音)。L是节律成分,不只属于[a],也不只属于[f]和[m]。farm抽出了“长音”这个节律成分,剩下的就是3个“音声单位”:f,a,m。

弗斯的声誉在1960年后日见其大,因为人们发现他有许多精辟见解,但是认为弗斯有缺点,因为他的文字晦涩,意义含糊,而且有时立论牵强。弗斯注意言语的背景,可以说是社会语言学的先驱。他的“局限语言”论已被发展为语言变体研究,他所谓“搭配”是一个有价值的发现,“情境的衬托”更是个有用的提示。但是他有时走极端,仿佛词和句子没有相对独立性。例如美国语言学家E. 萨丕尔举过这样一个例句——The farmer kills the

duckling (农民宰了鸭雏)。弗斯说这个句子毫无意义,因为鸭子总是等养大了才宰,这就未免强词夺理。弗斯所谓“节律分析”,是有道理的,但是他所倡导的标音法不便于书写诵读,所以连他的学生韩礼德也不采用。

弗斯讲了语音和语义,没有谈语法。关于这个问题,1975年英国T. F. 米切尔说,英国人分为两派:一派叫做“弗斯派”,如F. R. 帕尔默、H. 斯特劳曼和他自己,他们对语法的意见并不一致。一派叫做“新弗斯派”,如韩礼德、J. 埃利斯、G. N. 利奇、R. D. 赫德尔斯顿,他们都讲“系统语法”,以韩礼德为首。

伦敦学派注意语音、语义,研究社会方言和地方方言,探索语言心理,建立语法系统,结合文学批评,重视语言教学。对于以实用为目标的语言学习者,他们是热心的引路人。(王宗炎)

Luobinsl

罗宾斯, R. H. (Robert Henry Robins 1921~) 英国语言学家。生于1921年7月1

日。1949年牛津大学新学院毕业,获人文科硕士。1949~1954年任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院讲师,1954~1965年任普通语言学高级讲师,1966年升任教授。1968年获伦敦大学文学博士。1970年任该校语音学与语言学系主任。1974年任欧洲语言学会会长,1977年起任国际语言学家常设委员会会长。



罗宾斯是英国语言学家J. R. 弗斯的继承人之一,学过他的环境语义学和节律音系学。罗宾斯编写了《英国1930~1960年的普通语言学》(1963)和《马林诺斯基,弗斯和情境的衬托》(1971)等书。

罗宾斯对语言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出版《普通语言学》(1964, 1971)和《语言学简史》(1967, 1979)两本书。前者介绍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给初学者提出指导性意见,对弗斯和韩礼德二人的和欧美其他主要学派的学说都作了如实的介绍。后者对语言学在各地的起源和发展直到今日的情况作了比较全面而扼要的叙述,是很好的教材,但是对现代一些边缘学科如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数理语言学、计算语言学谈得很少,对汉藏语系的研究也谈得不深入。

罗宾斯对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印第安人的尤洛克语和爪哇的巽他语作过研究,出版了论文集。

(摩雅章)

Luo Changpei

罗常培 (1899~1958) 中国语言学家,教育家。满族。历任西北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筹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并任第一任所长。罗常培在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方言调查、音韵学研

究各方面都作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并有突出的贡献。自从高本汉发表了《中国音韵学研究》之后,罗常培首先和赵元任、李方桂合力把这部书以及作者的学风、方法介绍进来。高本汉调查方言忽视了东南方言,罗常培就作了《厦门音系》(1930)、《临川音系》(1940),此外还有皖南方言调查稿来补充高氏。这为年轻的汉语方言学填补了许多空白。高本汉的中古音研究结论并不十分妥帖,罗常培就写了《切韵鱼虞之音值及其所据方音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本3分,1931),并且利用梵汉对音材料写了《知



彻澄娘音值考》(“集刊”, 3本1分, 1931)。等韵作为音韵研究的辅助手段本来很有可利用的价值,但是所用术语含混费解,不便学人使用。罗常培就写了《释重轻》(“集刊”2本4分, 1932)、《释内外转》(“集刊”4本2分, 1933),加以解释。虽然没得到多数同行承认,但这种引导初学人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为弥补古音研究的缺欠,他和周祖谟合著《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1958),把研究上古音的人和研究中古音的人中间留下的空白填补了。为填补《切韵》以后到现代音的空白,他写了《唐五代西北方音》(1933)、《中原音韵声类考》(“集刊”, 2本4分, 1932)、《蒙古字韵跋》(图书季刊新1卷3期, 1939)、《王兰生与〈音韵阐微〉》(学术季刊1卷3期, 1943)、《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集刊”1本3分, 1930)、《北平俗曲百种摘韵》(1942)等著作。此外又主持编印《十韵汇编》(1935)和影印《通志七音略》等音韵学书籍。为普及音韵学知识,写了《中国音韵学导论》(1949),参加制订汉语拼音方案的讨论,创办北京大学语言专修科。总起来说,他的工作涉及音韵学的各个方面,涉及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学的各个方面,是一位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语言学家。(俞敏)

Luomanlyayu

罗马尼亚语 (Romanian language) 罗马尼亚的官方语言。属印欧语系罗曼语族东支。分布于罗马尼亚,此外在苏联、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匈牙利、阿尔巴尼亚、希腊和美国也有数量不等的使用者。使用人口约2200万。

罗马尼亚语从罗马帝国达契亚省一带以及多瑙河南岸使用的东部拉丁语演化而来,是东部拉丁语和达契亚土著语言混合的结果。语法结构、语音体系和大部分基本词汇均源于拉丁语。在历史上,曾受到古斯拉夫语、土耳其语、希腊语、意大利语、法语、俄语等的影响。罗马尼亚语的历史分4个阶段:①共同罗马尼亚语,是6~13世纪罗马尼亚民族形成时期使用的语言;②古罗马尼亚语,是13~18世纪使用的语言;③近代罗马尼亚语,是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使用的语言；④现代罗马尼亚语，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目前使用的语言。主要方言有 5 种：蒙特尼亚方言、摩尔多瓦方言、巴纳特方言、克里沙纳方言，以及马拉穆列什方言。各方言的差别主要在语音方面。罗马尼亚语的特点是：定冠词附在名词末尾，动词的将来时用助动词 *a vrea* (想要) 加动词不定式构成。词形变化比其他罗曼语言更丰富。保留了某些其他罗曼语言失去的拉丁语词。1860 年以前罗马尼亚语采用基里尔字母，后改用拉丁字母，有 5 个加变音符号的特殊字母：ă, â, î, ș, ț。



第一部罗马尼亚语福音书首页 (1561)

母，后改用拉丁字母，有 5 个加变音符号的特殊字母：ă, â, î, ș, ț。

(杨顺福)

Luoman yuzu

罗曼语族 (Romance group) 又称意大利克语族或拉丁语族。印欧语系中仅次于日耳曼语族的第 2 大语族。其语言主要分布在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瑞士部分地区、罗马尼亚、加拿大东南部、中美和南美各国。使用人口近 5 亿。

公元前第 2 千纪间，古意大利语进入意大利半岛 (比古希腊语进入希腊半岛略晚)。古意大利语诸方言通常分为两组：奥斯卡-乌姆布里亚语和拉丁-法利斯卡语。拉丁语最初只是罗马一地的方言，后来罗马发展成为政治文化中心，拉丁语便逐步取代了其他古意大利语方言，最后成为整个罗马帝国的官方语言。一种叫做“俗拉丁语”的拉丁语口语，在西班牙、高卢、里提亚等地广泛使用。在罗马帝国全盛时期，各地俗拉丁语很一致，但到了 5 世纪，西罗马帝国覆亡，版图分割，拉丁语的各地方言失去接触，开始了各自的独立发展，最后演变为各种近代语言：法语、普罗旺斯语、西班牙语、加泰隆语、葡萄牙语、撒丁语、利托-罗曼语、罗马尼亚语，组成罗曼语族。

罗曼语族通常分为东支和西支。这两支语言的传统分界是沿意大利的斯培西亚-里米尼走向划出的同言线。

该线以南的巴尔干罗曼语 (如罗马尼亚语) 属东支 (有的学者把该线以南的意大利语诸方言也包括在内)；该线以北的其他罗曼语均属西支 (有的学者把意大利语北部诸方言也包括在内)。但另一些语言学家不同意这种分法，主张把罗曼语族划分为 5 个语支：巴尔干-罗曼语支、高卢-罗曼语支、伊比利亚-罗曼语支、意大利-罗曼语支、利托-罗曼语支。

罗曼语之间相当一致，主要表现在许多源自俗拉丁语的词和语法形式上。它们采用了拉丁标准语言的某些词语以及构词模式和句法模式。但在长期发展过程中，许多罗曼语有了不小的变化。除罗马尼亚语外，其他所有罗曼语言都废弃了拉丁语的格系统；罗曼语普遍抛弃了拉丁语的中性。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中大部分阳性名词以 -o 结尾，而法语中通常以一个辅音结尾。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 3 种语言中大部分阴性名词以 -a 结尾，法语中以 -e 结尾。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构成名词复数的方式通常是加 -s，而意大利语则是把 -o 或 -e 改为 -i，以及把 -a 改为 -e。几乎所有罗曼语言都废弃了拉丁语的指示代词 *ille*，而发展了各自的定冠词，其中罗马尼亚语的冠词附着在名词之后。罗曼语动词没有经历名词变格那样明显的简化。大部分拉丁语动词形式都保留下来了，并创造了一些新的复合形式。罗曼语句法有广泛的一致性，除了因为它们有共同来源外，长期频繁接触、互相影响也是一个原因。

早期有些语言学家鉴于罗曼诸语言和凯尔特诸语言之间有许多共同点，主张把这两组语言合二为一，构成所谓“意大利克-凯尔特语族”，但由于无法找到公元前凯尔特语的任何文献，因而无法证明它们之间更进一步的亲属关系。

参考书目

- A. Meillet, et M. Cohen, *Les langues du monde*, nouvelle édition, CNRS, Paris, 1952.
W. P. Lehman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Inc., 1973.
C. F. Voegelin and F. M. Voegelin, *Classification and Index of the World's Languages*, Elsevier North-Holland, Inc., 1977.
A. Pei, *The Story of Latin and the Romance Languages*, Harper and Row, Publishers, 1976.

(黄长著)

Luo Zhenyu

罗振玉 (1866~1940) 中国古文字学家、金石收藏家。字叔蕴，一字叔言，号雪堂，浙江上虞人。清同治五年 (1866) 六月廿八日生于小官吏家庭，16 岁中秀才。光绪二十二年 (1896) 起，在上海创办学农社、东文学社，后在湖北等省任农务、教育方面职务。光绪三十三年，到北京任学部咨议。辛亥革命后，他自居遗民，策划清廷复辟，并参与了成立伪满的活动。民国二十九年 (1940) 五月十四日卒于旅顺。罗振玉自青年时爱好金石考订之学，生平著作 130 余种，刊印书籍超过 400 种。对

晚清以来发现的文物,如殷墟甲骨、西陲简牍、汉魏石经及清内阁大库档案等,他都作过搜集和研究,有重要贡献。

殷墟甲骨发现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两年后罗振玉见到刘鹗所藏,建议刘氏将拓本编为《铁云藏龟》印行。



随后探明甲骨出土地点,在卜辞中发现商王名号,于宣统二年(1910)作《殷商贞卜文字考》,同时将经古董商搜集的甲骨选编为《殷虚书契前编》。次年,命弟振常等到殷墟收购甲骨等古物。民国四年(1915),他又亲往殷墟调查。他有关甲骨的著作,还有《殷虚书契考释》、《殷虚书契菁华》、《铁云藏

龟之余》、《殷虚古器物图录》、《殷虚书契待问编》、《殷虚书契后编》、《殷虚书契续编》等多种。

关于青铜器,罗振玉编有《梦邨草堂吉金图》、《贞松堂集古遗文》、《贞松堂吉金图》等,而《三代吉金文存》20卷,搜集拓本尤为齐备,是最重要的金文汇编。

此外,他与王国维合著的《流沙坠简》,以及著录敦煌

写本的《鸣沙山石室秘录》、《敦煌石室遗书》、《鸣沙石室佚书》正续编、《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敦煌零拾》、《贞松堂西陲秘籍丛残》等,也有较大的影响。(李学勤)

Luobayu

珞巴语 (Lhoba language) 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语支未定。分布于中国西藏自治区东南部米林、墨脱、隆子等县及洛渝地区。使用人口约20万(1982)。珞巴语(以崩尼-博嘎尔话为代表)有23个声母,塞音和塞擦音有清浊对立;有8个元音:i、e、ɛ、a、o、u、ɯ、ə,各分长短,复元音韵母很少;有7个辅音韵尾:-r、-m、-n、-ŋ、-p、-t、-k。由元音和韵尾组成56个韵母。没有声调。句子语序是主语—宾语—谓语。名词修饰名词时,修饰成分居前;形容词、数词修饰名词时,修饰成分居后;副词修饰动词或形容词时,修饰成分大都在中心词之后。动词分一般体、现行体、完成体、将行体、即行体5种,用不同的语尾助词表示。量词比较少,数词可以直接修饰名词。双音节词占优势,大部分双音节词中只有一个音节有意义,另一个类似前缀的音节,没有意义。借词主要来自藏语。(欧阳觉亚)

M

Maba yuzu

马巴语族 (Maban group) 见尼罗-撒哈拉语系。

Madagasikay

马达加斯加语 (Malagasy language) 马达加斯加的官方语言之一(另一种是法语)。属南岛语系印度尼西亚语族,分布于马达加斯加本土及邻近诸岛。使用人口逾700万。

马达加斯加语和非洲大陆的语言没有亲属关系,而跟婆罗洲南部的马阿尼亚语有近亲关系。基本词汇非常接近,约45%一致。语言学上的证据表明,马达加斯加语是公元初年婆罗洲的商人带到该岛去的。马达加斯加语的主要方言包括:梅里纳方言、贝茨米萨拉卡方言、塔纳拉方言等。自1820年以来,在梅里纳方言(使用人口约500万)基础上形成的标准语,是这个岛国的官方语言。

现代马达加斯加语有6个单元音,2个二合元音,22个辅音。词类界限不很严格,动词有时、态(主动态与被动态)、式(陈述式、命令式)的变化,时借助前缀表示:m表示现在时,n表示过去时,h表示将来时,名词没有性、数、格的变化。基本语序为:谓语在句首,宾语紧跟其后,主语常在句尾,修饰成分须置于被修饰成分之后。马达加斯加语有许多外来词语,在不同历史时期分别从梵语、希腊语(特别是斯瓦希里语)、阿拉伯语、法语和英语引入。马达加斯加语采用拉丁字母。(黄长著)

Madingnel

马丁内,A. (André Martinet 1908~)

法国语言学家。1908年4月12日生于萨瓦县的圣-阿尔班-德-维拉尔。曾先后就读于巴黎高级研究学院、巴



黎文学院以及柏林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1938年任巴黎高级研究学院教务长。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因德国纳粹军队入侵逃亡到美国。1947~1955年任哥伦比亚大学语言学系教授及系主任。1955年起任巴黎笛卡尔大学教授以及高级研究学院教务长。1966年任欧洲语言学会会长。

马丁内的语言学说融合了布拉格学派的功能主义和F. de 索绪尔的结构主义。他认为语言主要是一种交际工具。他提出了双层切分的概念,作为区别人类语言与其他交际系统的主要标准。“双层切分”指语言可以切分为

一系列词素,词素又可以切分为一系列音位。人类语言只要有少量音位(通常不超过50个)就可以构成无数有意义的话语。这一概念已被学术界接受。

马丁内认为语言研究应从事实出发,而不应硬套什么理论或美国结构主义者的所谓“发现过程”。他认为音系学就是从语音的功能,如辨义、定界、表情等来研究语音。音段成分是音系的核心,而超音段成分则属边缘部分。在句法方面,他强调从词素的句法功能来分析句子,特别重视表示句法关系的功能词素。他认为语言演变导因于交际需要的改变,同时受省力原则和语言系统本身的制约。他的代表著作有《语音演变的经济原则》(1955)、《普通语言学要略》(1960)及《语言的功能观》(1962)。

1946~1948年马丁内曾任纽约国际辅助语协会(IALA)理事长。他对纽约语言学会的创立和会刊《词》的出版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廖秋忠)

Ma'ertayu

马耳他语 (Maltese language) 马耳他的官方语言之一(另一种是英语)。属阿非罗-亚细亚语系闪语族。使用人口逾30万。在澳大利亚和北美诸国的马耳他移民中也有数量不等的使用者。

马耳他语起源于古代迦太基语(一种闪族语言)。9~11世纪,阿拉伯人占领马耳他,阿拉伯语对岛上原有的迦太基语产生巨大影响,形成含有迦太基语成分的阿拉伯语。在此以后的几个世纪,马耳他多次为外来势力所侵占,从意大利语、法语和英语里吸收了大量外来词语,并逐渐脱离阿拉伯语成为一种独立语言。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马耳他语只是口头语言,没有文字。18世纪末、19世纪初,马耳他出现了用拉丁字母编纂的第一部马耳他语词典。1934年,马耳他文字形式经过修改定型。马耳他语用拉丁字母,但不用Y(y),增加了带点的Ġ(ġ)和Ż(ż)、不发音的H(h)和在词首不发音但在词尾发音的GH(gh)等4个字母。(杨优明)

Malatiyu

马拉提语 (Marathi language) 印度西部马哈拉施特拉邦及相邻的邦外几个地区的官方语言,印度宪法承认的语言之一。属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印度语支。使用人口近4000万。以马哈拉施特拉邦首府浦那市的语言为标准语。古马拉提语形成于12世纪。

马拉提语有长短元音,但i:~i和u:~u两种对立已经消失。元音开口度要求较严,有e~ε和o~ɔ两种对立。还有含糊元音和鼻化元音。辅音有ç和c的对立。词中辅音r-(h)往往反映出d(h)→r(h)的历史音变。马拉提语的名词有直格和斜格(复数往往无区别),斜格和后置词连用表示各种格的意义。人称代词有敬体和非敬体的区别;第一人称复数有“我们”和“咱们”的区别。名词有阴性、阳性和中性,关系代词也有这3个性。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分别用一套词形变化。句子的基本词序是主

语—宾语—动词。马拉提语的文字和印地语一样，采用梵文天城体。

(周流溪)

Malayalamuyu

马拉雅拉姆语 (Malayalam language) 又译马拉雅兰语。

印度克拉拉邦马拉雅里人(本义为‘山地人’)的语言，印度宪法承认的语言之一。属达罗毗荼语系南部语族，和泰米尔语近亲，是9~10世纪时从泰米尔语分化出来的一种语言。它有3个方言。使用人口约2200万。

马拉雅拉姆语具有达罗毗荼语言的一般特点。例如辅音中有t(齿音)~t̪(龈音)~t̪ʃ(卷舌音)的对立和c(硬腭音)~k(软腭音)的对立；卷舌音有r, l, n等。在前元音之前，软腭音k正在向硬腭音c转化，而原先的c却在消失。

马拉雅拉姆语是粘着型语言。构词通常使用词根加后缀的方式。往往用表示几个动作的词来表达别的语言只需要一个动词表示的动作概念。但是和泰米尔语不同，它已经没有把人称词尾加在动词之上的说法。

马拉雅拉姆语最早的文献见于12世纪上半叶，正式文字从泰米尔纳德邦的一种梵文字体(Grantha)演变而成，此外还通行一种草书(kolelutta)。(周流溪)

Malat-Bolinixiya yuxi

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 (Malayo-Polynesian family) 见南岛语系。

Malayu

马来语 (Malay language) 马来西亚联邦和文莱苏丹国的官方语言，也是新加坡的官方语言之一。属南岛语系印度尼西亚语族。分布于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泰国南部及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廖内和林加诸岛。使用人口约1000万。

公元7世纪，一种含有大量梵语词的古马来语已在南苏门答腊地区产生，它是当地广泛使用的商业语言。14世纪以后，有马来



图1 爪宜文字

亚、雅加达、安汶等地区方言，同时还出现了市场马来语，它是简化了的马来语，分布于南洋群岛。马来西亚的现代标准马来语，也称作马来西亚语，它在部分基本词汇、部分语音和某些形态与句法特征方面跟印度尼西亚语有所区别。马来语有6个单元音，



图2 马来语拉丁字母拼写法

3个双元音，24个辅音(其中6个是外来语的辅音)。语词多源于梵语和阿拉伯语。大部分词由两个音节词根组成，通过前、后、中缀构成派生词或表达某些语法意义。名词没有性、数、格的变化，重叠法可以构成复数和表示其他语法意义。马来语是分析型语言，句法关系由功能词和词序表示。句子的基本结构是主语—谓语—宾语，定语在名词之后，状语在动词之后。马来语最初使用源于印度的帕拉瓦文字，14世纪以后使用爪宜文字(图1)，是阿拉伯字母的变体。19世纪末，英国人把爪宜字母拼写法改成了拉丁字母拼写法(图2)。1904年后在马来亚推行了用拉丁字母书写的现代马来语，爪宜文还在马来亚和苏门答腊部分地区继续使用。(顾凤凰)

Malujia yuzu

马六甲语族 (Malacca group) 见南亚语系。

Maluofu

马洛夫, С. Е. (Сергей Ефимович Малов 1880~1957) 苏联突厥语言学家。俄罗斯族。1880年1月16日生于喀山，卒于1957年9月6日。1904年马洛夫进圣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系。在大学时代，参加了由俄国突厥学家B. B. 拉德洛夫院士领导的俄国科学院突厥语研究小组的活动，对古代突厥语和当时很少为人所知的中国新疆维吾尔语及甘肃裕固语产生了兴趣。1909~1911年受俄国中亚东亚研究委员会派遣，到中国新疆、甘肃一带调查研究维吾尔语和裕固语。在甘肃酒泉文殊沟寺庙中获得了珍贵的回鹘文《金光明经》写本。1913~1915年第2次来中国西北进行语言调查。1916年获突厥语文学硕士学位。1917年起先后在喀山、列宁格勒、塔什干等地的高等学校从事突厥语教学工作。1934年起在苏联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工作。193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

马洛夫一生共发表150余种论著。对古代突厥语和裕固语研究有重要贡献。1928年他整理出版了拉德洛夫遗著《回鹘语古代文献》。他在按语和注释中改正了拉德洛夫的许多错误。马洛夫的代表作有《古代突厥语文献》(1951)、《叶尼塞突厥文献》(1952)、《维吾尔语(哈密方言)》(1954)、《罗布泊语》(1956)、《裕固语词汇和语法》

(1957)、《蒙古和吉尔吉斯坦的古代突厥文献》(1959)、《新疆维吾尔语方言》(1961)、《裕固语(长篇材料记录和俄译文)》(1967)等。此外,马洛夫还积极参加了苏联各突厥民族文字的创制和改革工作。在培养苏联新一代突厥学专家方面也作出了不少贡献。(耿世民)

Maqidunyu

马其顿语 (Macedonian language) 南斯拉夫的3种官方语言之一(另两种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和斯洛文尼亚语)。属印欧语系斯拉夫语族南支。分布于南斯拉夫的马其顿以及边界以外的附近地区,使用人口100多万。

马其顿语起源于古斯拉夫语。12世纪以后,由于非斯拉夫语的长期影响,马其顿语同古斯拉夫语的差别日益扩大,终于演化为分析型语言,与绝大多数仍为综合型的斯拉夫语言不同。19世纪初,逐渐形成以西部方言为基础的现代马其顿标准语。

马其顿语用基里尔字母,采用表音正字法。有31个音位,5个元音,26个辅音。双音节词的重音落在第一音节上,多音节词的重音落在倒数第三音节上。有一种置于名词之后的定指后缀,有性、数的区别。还有指远近的标指后缀。形容词的比较级和最高级分别由语气词по-和нај-与形容词原级结合而成。名词变格系统几乎完全消失,格的关系借前置词表示。动词不定式已消失,但有4种形式的过去时、现在时和将来时,将来时借语气词ке构成。(黄雨辰)

Mashi Wentong

《马氏文通》 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汉语语法著作。原名《文通》。马建忠著。189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后陆续刊行,版本甚多。章锡琛依据1904年本校点,成《马氏文通校注》,195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1983年商务印书馆重排印行原书,并附索引。吕叔湘、王海棻合著《马氏文通读本》,逐章逐节加上按语和注释,1986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马建忠(1845~1900),字眉叔,江苏丹徒人,语法学家。年轻时在上海读书,学会拉丁文、希腊文、英文和法文。1875年留学法国,回国后帮助李鸿章办理洋务。马建忠提倡振兴工商业,主张富国先富民,要求学子既攻读中国圣贤的书,又精求西方的文明。他在《马氏文通》后序中说:“童蒙入塾,能循是而学文焉……微特中国之书籍,其道理可知,将由是而求西文所载之道,所明之理,亦不难精求而会通焉。”为此他花了10多年时间写成此书。全书以典范的文言文为研究对象,取材于四书、三传、史记、汉书以及韩愈的文章。例句有七八千。全书的系统模仿西方传统语法,同时也注重汉语实际。如词类系统,除了名字、代字、静字、动字、状字、介字、连字、叹字之外,增加了助字(语气词)。又如句法系统,拿静字(形容词)与动字(动词)并列,认为它们都能充当语词(谓语)。全书分10卷。卷一讲“正名”,介绍主要的术语。卷

二至卷九依次论述各类实词和虚词。虽然以词类为纲,但是具体分析时莫不依据语句。卷十论句读,是句法的总论。作者在《例言》中说:“是书本旨,专论句读。”这是《马氏文通》的特点。马建忠主张根据词义确定词类,同时认为词类和句子成分有对当关系。如果遇到不符合这种规定的情况,就用词类通假来解释。例如“其愚不可及也”中的“愚”为形容词,这里用作名词。他又认为“字无定义,故无定类”,与词类通假说不无矛盾。《马氏文通》编写期间,马建忠之兄马相伯(1840~1939)曾参与其事。这本书奠定了汉语语法研究的基础,它标志着中国文法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参见彩图插页第25页)

(张斌)

Mataixiusi

马泰休斯, V. (Vilém Mathesius 1882~1945) 捷克斯洛伐克语言学家。1882年8月3日生于帕尔杜比策,1945年4月12日卒于布拉格。曾在查理大学攻读日耳曼和罗曼语言。1912年成为该大学由捷克人担任的



第一个英语教授。对英语和英国文学史作过深入研究。1926年创建布拉格语言学会,终身任该学会会长。马泰休斯主张应用共时和功能观点研究语言,并采用静态分析比较的方法,即将某一种语言与其他语言的功能表达手段进行对比,以充分揭示该语言的特征,这就是他的“语言特征学”理论,

在句子研究方面,他有“实际切分”理论,认为在语言交际中通常是把已知信息作为表达的出发点,进而再传递新的信息,因此,在一定上下文中,句子都可切分为叙述出发点(即主题)和叙述核心(即述题)。重要著作有《捷克语与普通语言学》(1947)论文集等。

见布拉格学派。

(朱伟华)

Ma Xueltang

马学良 (1913~) 中国语言学家。1913年6月22日生于山东省荣城县。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和文科研究所。1949年以后,先后任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副教授、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文系教授和主任,该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197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马学良长期从事汉语及少数民族语言教学和研究,对中国彝族语言文字的调查研究做了不少开创工作。1947年在《彝文作祭献药供牲经译注》一书中最早指出彝语有松紧元音的对立。



所著《撒尼彝语研究》(1951)一书是中国第一部比较全面系统地描写彝语的专著。在与罗季光合写的《我国汉藏语系语言元音的长短》及《‘切韵’纯四等韵的主要元音》(1962)著作中提出了汉语元音在历史上也分长短和参证汉藏语系语言构拟古汉语的论点。他主编了反映中国民族语言特点的《语言学概论》,著有《彝语‘20’和‘70’的音变》(1980)。关于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民间文学和宗教方面的著述有《保文作斋经译注》(1949)、《彝文经典和彝族的原始宗教》(1980)、《云南彝族礼俗研究文集》(1983)。此外,他还主编《增订彝文丛刻》、《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1981),并与今旦合译《苗族史诗》(1983)等。

(胡 坦)

Mayawen

玛雅文 (Maya script) 中美洲玛雅民族的古文字。玛雅是美洲土著民族之一,居住在今墨西哥尤卡坦半岛和广大的四周地区。他们创造了美洲最古和最高的文化。

玛雅人用毛发制笔,用树皮制纸。玛雅文约有 270 个符号,常用的 170 来个。其中有表示整个词义的“意符”,但是大多数符号是不表意义、只表声音的“音符”。音符分为:①元音的音素符号(V 型),②元音和辅音的音节符号(VC 型),③辅音加元音或只表辅音的音节音素符号(CV 或 C 型),④辅音加元音加辅音的音节符号(CVC 型)。此外,还有少数只有规定的辨别功能的“定符”。

玛雅符号的外形很象小小的图画,实际上象形作用早已丧失。玛雅文是一种语词-音节文字,有人把它列为音节文字,因为音节符号处于主要地位。大致形成于公元前最后几个世纪。遗留的铭文最早的相当于公元 328 年,一直应用到 16 世纪,长达 1500 年以上,由于西班牙的入侵而毁灭遗忘。现存的写本只有 3 种,以存储地点命名为:①马德里写本,②巴黎写本,③德累斯顿写本。此外有不少石柱碑铭和古器物铭文。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释读玛雅文成功,使美洲自创的古文字重新在文化史上放出光明。西班牙占领以后,用西班牙字母(所谓“传统”字母)记录玛雅语的传说,有《先知集》等书留传下来。(参见彩图插页第 45 页)

(周有光)

Man-Tunggusi yuzu

满-通古斯语族 (Manchu-Tungusic group)

又称通古斯-满语族,通古斯语族。阿尔泰语系的语族之一。

分布和使用人口 满-通古斯语族分布在中国、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中国境内有 5 种语言(图 1):满语、锡伯语、赫哲语、鄂温克语、鄂伦春语。这些语言分布于黑龙江省的黑河市、逊克县、呼玛县、塔河县、富裕县、讷河县、嘉荫县、同江县、饶河县,内蒙古自治区的鄂温克族自治旗、鄂伦春自治旗、陈巴尔虎旗、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阿荣旗、额尔古纳左旗、扎兰屯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区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霍城县、巩留县、塔城县、伊宁市、乌鲁木齐市等地。苏联境内有 8 种语言:埃文基语、埃文语、涅基达尔语、那乃语、乌利奇语、奥罗克语、乌德盖语、奥罗奇语。这些语言分布于东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埃文基自治专区、雅库特自治共和国、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滨海边疆区、萨哈林州、堪察加州、马加丹州等地。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只有鄂温克语,分布于巴尔虎地区。另外,中国历史上还有女真族使用的女真语。

满-通古斯语族所包含的语言总数,由于研究者计算的方法不同,目前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数字。在苏联,把民族自称相同的苏联境内的埃文基语和中国境内的鄂温克语(旧称索伦语)视作两种语言,把鄂伦春语视作埃文基语的一种话;把民族自称相同的苏联境内的那乃语和中国境内的赫哲语视作同一种语言,把锡伯语视作满语的一个方言。由于鄂伦春、锡伯等语言,在独自发展的道路上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因此,在中国把它们视作独立的语言。

使用满-通古斯语言的民族总人口约 445 万。其中,中国约 439 万(1982),苏联约 5.64 万(1979),蒙古人民共和国 1 000 多。但是,中国的满族、赫哲族中的绝大部分人已经不使用本民族语;中国的锡伯族,苏联的埃文基、埃文等民族也约有半数人不使用本民族语。因此,满-通古斯语言的使用人口只有 7.4 万(中国约 4.6 万,苏联约 2.7 万,蒙古人民共和国 1 000 多)。不使用本族语的人,在中国改用了汉语,在苏联改用了俄语。

分类 满-通古斯语言最早分类是俄国学者 Л. 什连克于 1883 年提出的。之后,由于从事语言分类研究的人,对材料分析的侧重点不同,陆续提出了几种不同的分类,影响较大的有以下几种:

① 1932~1939 年苏联北方民族研究所科学考察协会语言学组的分类:

a. 北语支或通古斯语支。包括埃文基语(又称通古斯语)和埃文语(又称拉穆特语)。涅基达尔语和索伦语(即鄂温克语)划为埃文基语的方言。

b. 南语支或满语支。包括满语、那乃语、乌德盖语、赫哲语、乌利奇语、奥罗克语划为那乃语的方言。奥罗奇语划为乌德盖语的方言。

② 1954 年中国学者罗常培、傅懋勳对中国境内的满-通古斯语言的分类:

a. 通古斯语支。包括索伦语、鄂伦春语。

b. 满语支。包括满语、锡伯语、赫哲语。

③ 1955 年苏联学者 В. А. 阿夫罗林分类:

a. 北语群。包括埃文基语、涅基达尔语、索伦语、埃文语。

b. 东语群。包括那乃语、乌利奇语、奥罗克语、奥罗奇语、乌德盖语。

c. 西语群。包括满语、女真语。

④ 1958 年苏联学者 О. И. 苏尼克的分类以及 19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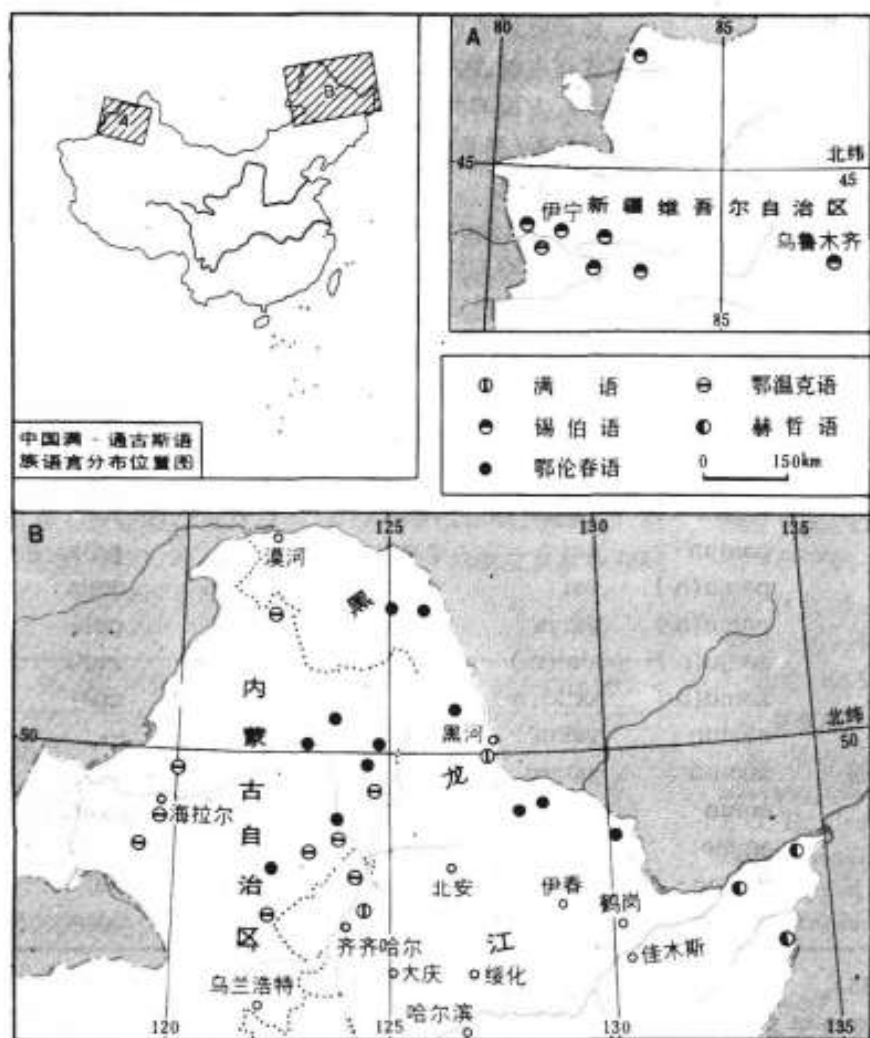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满-通古斯语族语言分布示意图

年苏联学者Г. М. 瓦西列维奇所作相似的分类:

a. 满语支。包括满语书面语及其锡伯方言或其他方言,女真语(只保留在文献中)。

b. 通古斯语支。包括西伯利亚次语支(或埃沃基次语支),包括埃文基语、埃文语、涅基达尔语、索伦语、黑龙江次语支(或那乃次语支),包括那乃语、乌利奇语、奥罗奇语、奥罗奇语、乌德盖语。

他们认为,这个分类是综合了近20年来的研究成果并提出了一个比较合理的、与以前不同的分类名称。

语言结构 语音 元音 a, ə, i, o, u 是满-通古斯语族所有语言共有的,在个别语言里还有元音 ɪ, e, ɛ, ɔ, ʊ, æ, y。这个语族共同的辅音有 b, p, m, w~v, d, t, n, l, r, ʈ, ʈʰ, ʃ, ʃʰ, ʒ, ʒʰ, g, k, x, ŋ。在一些语言里,还有和 g, k, x 相对立的 ɠ, q, ɣ, 和 ʈ, ʈʰ 相对立的 ɕ, ɕʰ, 和 ʃ 相对立的 s, ʃ 以及辅音 f, ɕ, ɕʰ, h 等。通古斯语支的语言有长元音,满语支的语言复元音多。辅音 r 以及个别语言中的 l, g, w, s, x, j, ŋ 不出现在词首。辅音的组合一般不超过两个音素,而且不出现在词首,也很少出现在词中。经常出现在词末的辅音有 l, r, n, m, 在满语中除状词外只有 n。在大多数语言里,词的第一个音节有轻微的重音。满-通古斯语族的语言有元音和谐律,但严整程度在各个语言中不

一样。共同的规律是,在一个词里出现的元音,要求在舌位的高低(相对意义上的高低)和唇状的圆展方面相互一致。附加成分中的元音也要按照上述要求相互协调。因此,在一些语言里,附加成分中的元音,根据词干元音的不同,可以有4种语音形式。如鄂温克语名词的宾格附加成分,元音有 a/ə/o/ɔ 4种。有的语言有3种,如满语动词陈述式过去时附加成分,元音有 a/ə/o 3种。语音结合产生的语音变化主要在辅音方面。在通古斯语支的一些语言里有大量的辅音同化现象,特别是逆同化现象,如鄂温克语:əxurbə(牛,宾格)读作[əxuppə]。

语法 满-通古斯语言属于使用后加成分的粘着型语言。如鄂伦春语 bəju(n)(词干)-mɲə:(表大表卑)-l(复数)-wə(宾格)-tin(领属)(把他们的那些大犴……)。使用虚词作为表达语法意义的手段,特别是满语支语言。如满语 si(你)xəŋən(城)i(领格)baru(虚词)gənəŋi(去)tətandə(虚词),bi(我)sini(你)əmgi(虚词)guŋu(朋友)arumə(做)gənəŋi(去)antaka(如何)?(你既然要进城去,我跟你作伴一同去怎么样?)满语支语言一般有5~7个格,而通古斯语支语言的格多至16个左右,其中表示方位意义的格就有好几个。除满

语和女真语外,各个语言都有领属范畴。领属附加成分不仅粘附在体词后,还可以粘附在副动词后。个别语言,如锡伯语只有人称领属,没有反身领属。各个语言的复数第一人称代词都有内包式(咱们)和排除式(我们)的区别。除满语支语言外,动词有人称形式。人称附加成分大都起源于相应的人称代词。状词在大多数语言里都很丰富。一般是主语在谓语前,从属成分在它所属的成分前。从句在主句前。充当从句谓语的主要是副动词和形动词。

词汇 由于各民族从事的生产活动、生活方式以及历史的发展不同,构成了各个语言词汇的特色。例如,满语里既有反映早期骑射、狩猎和社会组织方面的词,也有入主中原以后不断丰富起来的有关官职、宫廷器用、文化教育方面的词。鄂伦春族长期从事狩猎生产活动,因此有关野兽和毛皮的名称区分得很细,兽皮制品、桦树皮制品的名称也很多。鄂温克族从事畜牧业,赫哲族从事渔业,这些特点在词汇中都有反映。各种语言都有丰富的构词附加成分和利用合成法构成的各种类型的复合词,也有利用元音或辅音的交替构成在意义上和词形上相对称的词。此外,不少语言都有一些早期借自蒙古、雅库特等语言的词,俄语和汉语也为这些语言提供了大量表达新事物和新概念的词。



图2 《奥屯良弼伐狄碑》
(1210)所刻女真文(左)

代末在苏联曾以拉丁字母为基础创制了埃文基文、埃文文、那乃文和乌德盖文(后未使用)。1936~1937年这些文字改以基里尔字母为基础。

已知的最早文献为女真文《得胜陀颂碑》(1185)。

语言的亲缘关系 满-通古斯语言的亲缘关系发现于19世纪上半叶。这些语言的共同性表现在语音、语法、词汇的各个方面。例如,通过同源词的比较,可以确立元音间的对应关系(表1)。

通过辅音的比较,也可以确立一系列对应公式。例如[f]:[p]:[x]:[θ]:[h](表2)。

语法方面也有相当多的共同成分。如宾格、与格、从格~方面格的附加成分都显示出有共同的来源(表3)。

表 1

语 别	元 音					
满语	a	ə	o	u/u/o	u	i
锡伯语	a	ə	o/œ	u/o	u	i
那乃语	a	ə	o	u/o	u	i/e
乌利奇语	a	ə	o	u/o	u	i
奥罗克语	a	ə	o	u	u	i
乌德盖语	a	ə	o	u	u	i
奥罗奇语	a	ə	o	u	u	i
赫哲语	a	ə	o	u	u	i
涅基达尔语	a	ə	o	u/o	u/ə	i
鄂伦春语	a	ə	o	u	u	i
鄂温克语	a	ə	o	u	u	i
埃文语	a	ə	o/a	u/o/a	u/i/ə/e	i/ə
埃文基语	a	ə	o	u	u	i

文字 使用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的民族有12世纪参照汉文笔划创制的女真文(图2)、16世纪末参照蒙古文创制的满文,以及18世纪中叶以后在满文基础上逐渐发展形成的锡伯文。20世纪20年

动词陈述式现在-将来时(在一些语言中为经常体)、陈述式过去时、并列副动词等附加成分也是共同的(表4)。

词汇方面的共同性也很大。有些词在各个语言中都相同或相近(表5)。

研究简况 满-通古斯语言的研究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最先研究的语言是满语。1683年刊行的清代沈启亮编著的《大清全书》(附有简明语法要点的满汉词典)是研究满-通古斯语言最早的著作。之后,有关满语

表 2

语 别	唇	肝	裤子	锤子	多余
满语	fəməŋ	fəxun	faquri	folxo	fulu
锡伯语	fəməŋ	fəxun	faqar	—	fulu
那乃语	pəmun	pa:	pəru:	paloa	pulə:
乌利奇语	pəmu(n-)	pa:	pəru	palawu(n-)	pulə
奥罗克语	pəmu(n-)	pa:ya	pəru	palo	pulə
乌德盖语	xəmu(n-)	x'ai(n-)	xəigi	xaluga	xul'a
奥罗奇语	xəmu(n-)	xa:ki(n-)	—	xalua	xulə
赫哲语	xəmun	χakin	xəiki	χalqə	—
涅基达尔语	xəmun	χa:xin	xəjki:	xalka	xulə
鄂伦春语	əmun	a:kin	ərki	alkaʃan	uləkə
鄂温克语	əmmə	a:xin	əkki	alxa	uləxə
埃文语	həməŋ	ha:qa:m	hərka	halqa	hul-
埃文基语	həmun	ha:kin	hərki	halka	hələ-

表 3

语 别	宾 格	与 格	从格~方面格
满语	-bə	-də	-təi~dəri
锡伯语	-b/-v	-d	-təi,-dəri
那乃语	-wa/-ba (-pa/-fa)	-du	-dʒiadʒi~dʒi
乌利奇语	-wa/-ba(-pa)	-du	-dʒidʒi~dʒi
奥罗克语	-wa/-ba/-pa	-du	-dʒedu~tʃu
乌德盖语	-wa/-ba/ -ma(-fa)	-du(-di)/ -na(-ni)	—
奥罗奇语	-wa/-ba/ -pa/-ma	-du	-dui/-du,-dʒidʒi
赫哲语	-wə/-mə	-də/-du	-tki
涅基达尔语	-wa/-ba/-pa/ -ma	-du/-tu	-dukkoj/ -tukkoj
鄂伦春语	-wa/-ma/-pa	-du/-du	-jidʒik/ -ŋidʒik/ -gidʒik
鄂温克语	-wa/-ba	-du/-du	-gidʒi
埃文语	-w/-u/-m/-bu	-du/-tu:	-duk/-tuk(~ -nuk),-gi:/- -ki:/-ŋi:/-ŋi:/
埃文基语	-wa/-ba/-ma/ -pa	-du/-tu:	-duk/-tuk/ -gi:/t/ki:/t/ -ŋi:/t/-gi:/dʒi

的研究不断开展。1708年出版的清代官修的满文分类辞书《清文鉴》作为一系列以清文鉴命名的辞书的蓝本,从单语言发展为两种语言(满蒙、满汉)、3种语言(满蒙汉)、4种语言(满蒙蒙汉)、5种语言(满蒙蒙维汉)对照的辞书。1730年出版的用传统方法讲授满文的教科书《清文启蒙》(清舞格寿平著述)成了国内外研究满语的基础。辛亥革命后,中国在老满文和满文文献研究方面有一定的进展,这一领域的学者有李德启、广禄、李学智等。在俄国,18世纪20年代开始研究满语,到19世纪下半叶出版了И.И.扎哈罗夫的《满俄大辞典》(1875)和《满语语法》(1879)。日本、联邦德国等国家也出版了今西春秋的《满和对译满州实录》(1938)、《校注异域录》(1969),田村实造等的《五体清文鉴译解》(1966),E.豪尔的《满德辞典》(1952~1955)等关于满语和满文文献研究的

著作。

关于满-通古斯语族其他语言的研究始于19世纪上半叶。芬兰语言学家、民族学家M. A. 卡斯特连有关通古斯语言的著作具有开创的意义。20世纪20年代末期苏联开展了对北方民族语言的研究,把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后来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如Т. И. 佩特洛娃的《奥罗克语语法纲要》(1946),B. И. 琴其乌斯的《通古斯-满语比较语音学》(1949),Г. М. 瓦西列维奇的《埃文基语-俄语辞典》(1958),B. A. 阿夫罗林的《那乃语语法》(1959,1961),O. П. 苏尼克的《通古斯-满语动词》(1962)。70年代还出版了两卷本的《通古斯-满语比较辞典》(1975,1977)。在中国,50年代开展了对国内满-通古斯语言的调查,陆续发表了有关这些语言研究的论文和专著。1986年出版了锡伯语、鄂伦春语、赫哲语、鄂温克语的语言简志。在日本、联邦德国、美国也有一批学者从事这些语言的研究。如池上二良、J. 本辛、K. H. 门杰斯等。

参考书目

B. И. Ципиус. Сравнительная фонетика тунгусо-маньчжурских языков. Учпедгиз, Ленинград, 1949.

O. П. Суник. Существительное в тунгусо-маньчжурских языках.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Ленинград, 1982.

J. Benzing. Die tungusischen Sprachen. Versuch einer vergleichenden Grammatik, Wiesbaden, 1955.

(胡增益)

Manwen

满文 (Manchu script) 中国满族使用过的一种拼音文字。1599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和噶盖二人参照蒙古文字母创制而成。俗称“无圈点满文”或“老满文”。字母数目和形体与蒙古文字母大致相同。使用了30余年。留下来的文献有《满文老档》(图1)等。1632年清太宗皇太极令达海对这种文字加以改进。达海利用在字母旁加圈加点、改变某些字母的形体、增加新字母等方法,表达原来不能区分的语音,规范了词形,并改进了拼写方法,创制了专门拼写外来音的字母。改进后的满文有了比较完善的字母体系和拼写法,具有区别于蒙古文字母的明显特征,俗称“有圈点满文”。目前保留下来的满文文献绝大部分是用改进后的文字写的,例如《异域录》、《尼山萨满》以及一系列以清文鉴命名的辞书等。另外还有一种满文篆字,是参照汉文篆书于清乾隆十三年(1748)创制的。共有32种字体,依笔划的特征命名,如缪络篆、龙书等。用这种篆字刊印过乾隆皇帝的《御

表 4

语 别	现在-将来时	过去时	并列副动词
满语	-ra	-xa/-χa/ -ka/-qa	-mә
锡伯语	-r	-x/-χ/-k	-m
那乃语	-ra	-xa/-ka	-mi/-mari
乌利奇语	-ra	-xa	-m(i)/-mar(i)
奥罗克语	-j	-xa(n)/ -xә(n)	-mi/-mari
乌德盖语	-i	-ha	-mi/-mәi
奥罗奇语	-j	-xa	-mi/-maj
赫哲语	-ra	-χa	-mi
涅基达尔语	-ja	-ʃa	(-dʒa-mi)-naxan
鄂伦春语	-ra	-ʃa:	-mi,-nakan
鄂温克语	-ra	-ʃa:/-ʃa:	-mi
埃文语	-ra	-ʃa:	(-dʒ-mi:)-nikan/ -nikar
埃文基语	-rә	-ʃa:	(-dʒa-mi:)/[-dʒa- mi:(l)],-na/ -nal

表 5

语 别	心	手	眼	耳	坐	听	知道	怕
满语	niaman	gala	jasa	šan	tә	dondzi:-	sa-	gәlә-
锡伯语	niamәn	gal	jas	san	tә	dәndzi:-	sa-	gәlә-
那乃语	miawan	ʎa:la	nasal	šan	tә:-	do:ldʒi:-	sa:-	ʎәlә-
乌利奇语	me:wa(n-)	ʎala	isalr	se:(n-)	tә:-	do:ldi:-	sa:-	ʎәlә-
奥罗克语	me:wa(n-)	ʎa:la	i:sal	se:(n-)	tә:-	do:ldan-	sa:-	ʎә:lә-
乌德盖语	meәwa(n-)	ʎala	jehә	saŋka(n-)	tә:-	dogdi-	sa:-	ʎәlә-
奥罗奇语	mә:wa(n-)	ʎa:la	i:sa	sәe:	tә:-	do:gdi:-	sa:-	ʎә:lә-
赫哲语	mawun	nal	isala	čan	tә	dәldi-	sa-	lәlә-
涅基达尔语	me:wan	ʎa:la	e:sa	se:n	tәyә	do:ldi:-	sa:-	ʎә:lә-
鄂伦春语	mә:gan	ʎa:la	r:ʃa	ʃә:n	tәgә	do:ldi:-	ʃa:-	ʎә:lә-
鄂温克语	mә:gan	na:la	i:ʃal	ʃә:n	tәgә	do:ldi:-	ʃa:-	nә:lә-
埃文语	mә:wti-	ʎa:l	jasal	aʃә:na	tәy	dәlda-	ha:-	a:ʃʎә:lә-
埃文基语	me:wan	ʎa:lә	e:sa	se:n	tәyә	do:lgi:-	sa:-	ʎә:l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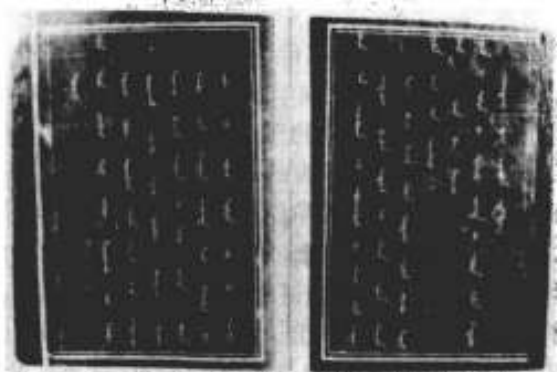


图1 《满文老档》无圈点本



图2 《御制盛京赋》

制盛京赋》(图2),但主要用于玉玺和朝廷的印章。

满文自左而右直写。有6个元音字母,24个辅音字母,10个专门拼写外来音的字母。基本笔划有:字头、字牙、字圈、字点、字尾两种不同方向的撇和连接字母的竖线等。标明句读的符号有V和∨。前者相当于逗号,后者相当于句号。字母出现在不同位置上,字形往往不同,有单用(即不和其他字母相拼)、词首、词中音节首、词中音节末、词末等几种字形。

满文在清代作为“国书”在文牒中与汉文并用,并编写过历史、文学和语言文字等方面的著述,翻译了《孟子》、《资治通鉴纲目》、《三国志演义》、《聊斋志异》等大量汉籍。辛亥革命后,满文基本上不再使用。现在保存下来的满文档案数以百万件计,是研究清初社会性质、清代历史、中国对外关系以及满语满文演变情况的珍贵资料。(参见彩图插页第30页) (胡增益)

Manyu

满语 (Manchu language) 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也有人认为满语是从满-通古斯语

族分离出来而成为阿尔泰语系中独立的分支。约从18世纪末19世纪初开始逐渐缩小使用范围,现在中国黑龙江省的黑河市和富裕县还有人能用满语进行口头交际。通常认为满语有北满方言和南满方言,后者是满族文学语言的方言基础。满语有6个元音:a,ə,i,o,u,u,有19个辅音:n,k,g,x,b,p,s,ʃ,t,d,l,m,ɬ,ɕ,j,r,f,w,ŋ。元音分阳性(a,o,u)、阴性(ə)和中性(i,u)。在大部分词里,同性元音互相和谐,异性元音互相排斥,中性元音可以出现在阳性元音和阴性元音的前后。辅音也有和谐的现象。舌根音k,g,x和小舌音q,ɕ,χ(k,g,x在元音a,o,u的前面读作q,ɕ,χ)不出现在一个词里。词的语音结构以开音节居多。除状词外,只有辅音n能出现在词末。大多数通古斯语支语言不能区分的辅音p和f,s和ʃ,在满语是对立的音位。满语既有粘着语的特点,又大量使用虚词作为表达语法意义的手段。名词没有领属形式,动词没有人称形式。主从复句比较发达。词汇反映了满族各个历史阶段的社会特点。由于满族大量吸收汉族文化,因此在词汇里有不少仿造汉语模式构成的词。



《满文老档》

16世纪末,在蒙古文基础上创制了满文。保留到现在最早的文献有《满文老档》(见图)等。 (胡增益)

Manyuzhi

满语支 (Manchu branch) 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的语支之一。包括满语、锡伯语和现在只保留在文献中的女真语。满语支语言分布在中国黑龙江省的黑河市、富裕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霍城县、巩留县、塔城县、伊宁市、乌鲁木齐市等地。使用满语和锡伯语的人口约2.7万(1982)。主要语言特点:①元音不分长短,复元音多。通古斯语支一些语言的长元音在满语支语言是短元音或复元音。如“肝”,鄂温克语为a:xm,满语为fahuun[faxun];“十”,鄂伦春语为ɕa:n,锡伯语为ɕuan。②通古斯语支一些语言的“元音+y~g+元音”的音组,大体上和满语支语言的单元音相对应。如“坐”,鄂温克语为təgə-,满语为te-[thə-]。③有音位f。④s和ʃ对立。如锡伯语suvdun(气),suvun(文化)。⑤有辅音和谐。g,k,x和q,ɕ,χ不能出现

在同一个词里。⑥η不出现在词首。通古斯语支一些语言词首的η,在满语支语言为g。如“去”,鄂伦春语为ηə-nə-,满语为gene-[kənə-]。⑦名词没有领属范畴(锡伯语除外)。⑧动词没有人称范畴。⑨动词的使动态和被动态在语音形式上没有区别,要靠被支配的名词、代词所接的格附加成分来分辨。⑩虚词比较丰富,是表达语法意义的一种重要手段。⑪不同程度地受汉语的影响。反映在词汇上,有相当数量仿照汉语的模式构成的词,如满语tangguu [taŋgu] (百) hala [χala] (姓); (<老>百姓)。

(胡增益)

Maonanyu

毛南语 (Maonan language) 原称毛难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主要分布在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环江县。使用人口约3万(1982)。毛南语内部比较一致,没有方言土语的差别。声母中的浊塞音b、d,鼻音m、n、ŋ和浊擦音w、j各有两套,其中有一套是带前喉塞音ʔ的。除单纯声母外,还有相当多的腭化、唇化声母,如环江下面的毛南语有66个声母,其中有16个腭化声母,13个唇化声母,有86个韵母;有11个元音:i、e、ɛ、a、o、ɔ、u、ə、y、ɿ、ʷ;有9个韵尾:-i、-u、-w、-m、-n、-ŋ、-p、-t、-k。单元音韵母都是长元音,带韵尾时a、i、ɔ、u、ə有长短的对立;元音和韵尾结合成80多个韵母。有6个舒声调和两个促声调,促声调又因元音长短不同各分化为两个不同的调值。没有词形变化。词序和虚词是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名词的修饰语一般在中心词之后,只有数量词组修饰语(“一”除外)在中心词之前。主语在谓语之前,宾语和补语在谓语之后。毛南语和侗水语支的水语比较接近。毛南语中有较多的汉语和壮语借词。

(梁敏)

Maonanyu

毛难语 (Maonan language) 见毛南语。

Melye

梅耶, A. (Antoine Meillet 1866~1936)

法国语言学家。1866年11月11日生于穆兰,1936年9月21日卒于沙托梅扬。

梅耶是F. 索绪尔的学生,23岁就在巴黎高级研究院代替索绪尔讲课,25岁在该院任印欧语比较语法研究部主任;1902~1906年在东方语言学校教亚美尼亚语;1906年任法兰西学院印欧语比较语法教授,直至1934年退休。

梅耶的研究范围极广。他编出了斯拉夫语和亚美尼亚语教材;他对伊朗语研究很有成绩;他论述希腊语史和拉丁语史的著作获得了很高的评价。他研究过日耳曼语、凯尔特语、波罗的语、亚尔巴尼亚语;他也探索过吐火罗语和赫梯语。1924年他和M. 柯恩合编了《世界语言》一书。他一生共出版了24种专著,540篇论文。可分为如下几个类型:①专讲某一种具体语言的历史,如《希腊语历史一瞥》(1920);②总述某一语族的共同特征,如

《日耳曼族语言的一般特征》(1908);③论述某一语系的各种方言,如《印欧语方言》(1908);④总括某一语系各种语言历史比较研究的成果,如《印欧系语言比较研究导论》(1903)、《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1925)。一般认为第④类是梅耶讲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的最重要的著作。在20世纪上半叶的法国语言学界,梅耶享有崇高的地位。

挪威语言学家A. 萨默费特认为梅耶有3个特点:①用精密的比较方法研究印欧语史;②从社会学角度说明语言演变的原因;③指出语音变化导源于心理机制。梅耶认为,没有文字纪录的原始印欧语现在是不能全部重建的,可是他构拟出了它的语音系统和语法系统。

见法兰西学派。

(岑麒祥)

meljleyu

媒介语 (intermediary language) 机器翻译中语言之间差别的对应体,两种或多种语言对译时的中介语言。采用媒介语时,机器翻译的过程是由原语至媒介语,又由媒介语至译语。由于原语分析和译语生成都只与媒介语打交道,而不与哪种具体的自然语言打交道,因而它们之间是相对独立的,在多语言机器翻译系统中,无论有多少种语言参与机器翻译过程,只需分别为每种语言制定一套分析系统和一套生成系统即可,这样,就减少了规则系统的数目,因而也就减少了机器翻译规则系统的研制费用以及在计算机上使用和存储机器翻译规则系统的费用。

对于任何特定的民族来说,如果采用媒介语,在机器翻译中只需要使用两个机器翻译系统:一个是从媒介语翻译成本民族语言的生成规则系统,一个是从本民族语言翻译成媒介语的分析规则系统。这样,媒介语就可以使各民族之间在机器翻译的领域进行真正的合作。

各国学者提出的媒介语方案很多,可归纳为如下6种类型:①利用某种自然语言作媒介语;②利用某种经过标准化和简化的自然语言作媒介语;③采用国际人造语言(如世界语)作媒介语;④用类属词典的方法建立一套诸自然语言间的对应关系系统,把这套系统作为媒介语;⑤根据诸自然语言的特点,选择对于计算机工作状况最有利的因素,建立一种类似于自然语言的媒介语;⑥不管参与机器翻译的自然语言的特点如何,根据某门学科的内容,设计纯逻辑的媒介语。

机器翻译的媒介语问题尚待继续研究。

(冯志伟)

Meiguo Jiegouzhuyl xuepai

美国结构主义学派 (American structuralists) 又称美国描写语言学派(American descriptivists)。20世纪20年代美国学者在调查美洲印第安语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语言学流派。以注重对语言结构形式的描写而著称。美国结构主义跟欧洲结构主义都强调语言结构的系统性,但又各有自己的特色。布拉格学派注重对语言结

构的功能进行研究,哥本哈根学派重视结构间的关系,美国结构主义则着重结构形式的描写。

这一学派的先驱是 F. 博厄斯和 E. 萨丕尔。博厄斯既是人类学家又是语言学家。他在《美洲印第安语手册》(1911)中所写的序言可以说是美国人类学家从事语言调查和研究的初步理论总结。其中强调:对语言事实要作客观的描写,不可用其他语言的或者传统语法的框框去套;为了描写不同结构的语言,应该创立新的概念和方法。萨丕尔也是人类学家兼语言学家,他的名著《语言论》(1921)把语言研究同人类心理、社会和文化联系在一起。他们都强调尊重美洲本地人民的言语,从而作出客观的共时系统的描写。以后美国结构主义者致力于对语言结构作形式描写,其基本信条和传统都来自此二人。

但是从整个学派的历史看来,核心人物是 L. 布龙菲尔德。他的《语言科学的一套公设》(1926)和《语言论》(1933)为美国结构主义奠定了描写方法的基础。从他的著作可以看出,在历史语言学方面他接受了欧洲新语法学派的传统,但在对语言结构的共时描写方面则继承和发展了博厄斯和萨丕尔的理论和方法。在语言结构的分析中,他主张以可以观摩到的语言素材为依据,反对用非语言因素(特别是心理因素)作为标准,并强调形式的分析和归类。由于布龙菲尔德的影响,20世纪30~40年代的美国结构主义被称为“布龙菲尔德时期”。

在布龙菲尔德之后,Z. S. 哈里斯的《结构语言学的方法》(1951)是这个学派的理论和方法最为谨严的代表作。他给语言结构分析规定了两项基本任务:①把话语里的单位(如语素)切分出来;②把有关的单位归类。在分析时,要根据语言单位的分布特征,用替换的方法来进行鉴别,因此有人把这种方法称为“分布主义”。他的工作方向是从小到大,先分析出语素,再分析语素组合的序列,最后得出语素序列组合的模式,可以说是从语素到话语。在结构分析和描述中,他采用抽象的数学方法,把语言单位转化成符号,然后按照公式进行运算。哈里斯和 C. F. 霍凯特等人是结构主义学派在布龙菲尔德之后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学说被人称为“后布龙菲尔德语言学”。

除哈里斯等外,这一学派还有 K. L. 派克、E. 奈达和 C. C. 弗里斯等人,各有自己的特点。他们从1934年开始,每年举办暑期语言讲习班。他们主要继承萨丕尔的学说,致力于把描写语言学的方法运用到人类一切行为的分析中去。例如,派克在结构分析中区分“位”(-emic,即语言中具有共性的成分)和“素”(-etic,即语言中具有个性的成分),并将这一区分运用于人类其他行为的分析。

在美国结构主义发展的进程中,1924年由博厄斯、萨丕尔、布龙菲尔德等人创建的美国语言学会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个学会1925年创刊《语言》杂志,作为美国结构主义学派的喉舌,每年还在夏季举办语言学讲习班,为学者们提供学术活动的场所。

总的看来,美国结构主义具有以下特点:

① 注重口语和共时描写。美洲印第安语很多都没有文字和历史的材料,这使得这一学派一开始就不得不从口语着手进行共时的形式分析。这种做法,跟欧洲学者着重书面文献的语文学和专搞历时研究的历史比较语言学都有显著的不同。

② 注重形式分析,避开意义这一因素。美国结构主义在结构分析中只注意可供验证的语言形式,不考虑心理过程,也不谈社会和历史等因素。在形式和意义的关系上,他们认为形式的对立能决定意义的不同。

③ 在结构分析中,主要是研究分布情况和运用替代的方法。结构分析的任务是从一堆语言素材中切分出独立的单位(如音素、语素等)并加以归类。在切分中,主要的依据是分布。所谓分布,是某个单位或特征在话语里出现的各种不同位置的总和,也就是它出现于其中的一切环境的总和。所谓替代,是在相同的环境里,某个单位能够用别的单位来替换。

④ 采用直接成分分析法。这一学派重视结构的层次,由此发展出直接成分分析法。所谓直接成分就是把句子按层次区分出它的组成部分。例如,英语 Poor John ran away (可怜的约翰跑开了)首先分成 poor John 和 ran away 两个直接成分,然后再把 poor John 分成 poor 和 John,把 ran away 分成 ran 和 away。如果不能在往下切分时,剩下的成分就叫做“最终成分”。上述例句的最终成分是 poor, John, ran 和 away。

⑤ 建立“语素音位”。这是把语法和语音结合而成的单位,包括出现在若干语素变体里的几个音位。例如,英语 knife/nayf/(刀,单数)和 Knives/nayvz/(刀,复数)包含同一个语素的两个不同变体,一个是 /f/, 一个是 /v/, 可以用语素音位 /F/ 总括起来,说这个语素的语音形式是 /nayF/。语素音位有助于语素的鉴别,它起了用一个概念统摄诸变的作用。

美国结构主义注重语言行为的描写,而不注重语言能力的解释;着眼于语言间的差异,而不重视语言的普遍性。它只要研究语言本身,而不重视与语言有关的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它的结构分析方法虽然最初是为描写缺少历史文献的美洲印第安语设计的,但已经相当广泛地应用于各种有悠久传统的语言,并取得了成果。赵元任的《中国话的文法》(1968,吕叔湘的译本叫做《汉语口语语法》,1979)即是应用这一方法来描写汉语的。

20世纪30~50年代,结构主义学派是美国语言学界的主流。50年代以后,随着 N. 乔姆斯基生成语法学派的抬头,并由于结构主义分析方法本身有局限性,它在美国逐渐失去了主导地位。尽管如此,这一学派所揭示的一些语言结构现象,所提出的利用分布和替换的方法,直接成分分析法以及把语音和语法相结合的语素音位的概念,都已被后人继承和发展。

见结构主义语法。

参考书目

G. C. 莱普奇著,朱一桂、周嘉桂译:《结构语言学通论》,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 1986. (G. C. Lepschy, *A Survey of Structural Linguistics*, Faber and Faber, London, 1970.)

D. Hymes and J. Fought. *American Structuralism*, in T. A. Sebeok ed., *Current Trends in Linguistics*, Vol. 13, pp. 903~1176, Mouton, The Hague, Paris, 1975.

J. T. Waterman, *Perspectives in Linguistics*, Second editi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970.

(赵世开)

Melguo miaoxie yuyan xuepai

美国描写语言学派 (American descriptivists)

见美国结构主义学派。

Meilanixiya yuzu

美拉尼西亚语族 (Melanesian group) 见南

岛语系。

Meizhou Yindi'anyu

美洲印第安语 (American Indian languages)

指分布于美洲各地的上千种土著语言。“美洲印第安语”只是一种基于地域概念的归类, 它的谱系分类的根据是不足的。在意见分歧的情况下, 这是一种比较简便的归类方法。美洲印第安语数量繁多, 差异很大, 而有文字的语言极少。其中许多语言, 学者们在对它们进行记录之前就已经消亡。有些虽未完全消亡, 但只有很少的老年人还在使用, 实际上已濒于消亡。在南北美洲, 西班牙语和英语等西方语言使用范围的扩大, 将进一步削弱这些语言。上述的复杂和不稳定状态, 给语言统计的工作造成了极大困难。现在粗略的估计是, 现存的和可考的印第安语加在一起约 1 000 种。

19 世纪以前, 语言学家对印第安语了解甚少。19 世纪以后, 北美的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在对北美印第安语进行调查的基础上, 开始了谱系分类的工作。由于没有早期的材料, 这一分类几乎完全是利用临场口语记录(当然往往也是不充分的材料)来进行的, 得出的结果也很不统一。

北美印第安语 通常指分布在墨西哥以北的美国和加拿大的印第安语, 根据 20 世纪 60 年代初的统计, 尚在使用的北美印第安语近 300 种。早期较有影响的分类有两种: 一是 1891 年在 J. W. 鲍威尔的主持下, 主要根据词汇上的相似提出的分类, 共划分了 24 个语系; 二是 E. 萨丕尔 1929 年的分类, 他把 24 个语系缩减后合为 6 大组: 爱斯基摩-阿留申、纳-德内、阿尔冈基亚-瓦卡什、霍坎-苏、佩努提亚、阿兹台克-塔诺安。近年又有各种分类法, 彼此距离较大。使用人数较多的北美印第安语有: 奥杰布华语、爱斯基摩语、那伐鹤语、克里语、切罗基语、苏语、克里克语等。

北美印第安语的主要特点如下: 语音方面, 发音系统纷繁多样, 西北海岸的语言有着丰富的音位系统, 喉塞音很普遍。许多语言有两类软腭音: K(发音相似于英语的 K 音)和 q(小舌音, 发音时舌位更靠后), 有些语言有前

K、中 K 和后 K 三种发音法。词汇方面, 词包括简单词干和派生结构。构词所使用的派生法通常包括添加词缀法和复合构词法两种。许多语言有多式综合词, 即在单词上添加词缀, 构成复合词, 表达一个句子的意思。语法方面, 主语的人称和数通常用动词的前缀来表示, 动词的时态和体通常用后缀表示(但有少数语言也用前缀表示)。名词的属有概念常用前缀表示, 前缀表示所有者的人称和数。

北美印第安语中, 只有切罗基语有印第安人自己创制的文字, 其他文字系统都是在欧洲文字影响下产生的。

中美印第安语 指分布于中美洲的印第安语, 这一区域包括墨西哥中部和南部、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英属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尼加拉瓜部分地区, 以及墨西哥西北部的部分地区。尚在使用的中美印第安语约 70 种。但是有些被当作中美印第安语的语言, 实际上并不在中美洲地区使用, 而只是因为它们跟其他中美洲语言同属一系。使用人口较多的中美印第安语有: 阿兹台克语、玛雅语、萨波特克语、奥托米语、米斯特克语等。

语言学家对于中美印第安语所知不多, 语系的划分很不一致。有的语言学家划分的语系多达 20 个以上。玛雅语系是中美各语系中最大的。中美印第安语语音多样化的情况很突出。不同的语言分别具有如下一些特点: 有清边擦音 lh、边塞擦音 tl、后软腭塞音 q、词首和词尾辅音丛。此外, 所有中美印第安语中的浊擦音正趋于消失。语法系统也各有特点。有的语言学家把中美印第安语分为 A、B、C 三大类: A 类语言的主要代表是奥托-曼格安诸语言, 其特点是句子结构向右扩展(修饰语在被修饰语后面), 综合程度较低, 使用前缀和前置词, 罕用复合构词法构词。B 类的主要代表是玛雅诸语言、阿兹台克语等, 属中间类型、中等综合型。句子结构通常向左扩展(修饰语在被修饰语之前)。C 类的主要代表是塔拉斯科语、托托纳克语等, 属高度综合型, 句子结构向左扩展, 大量使用后缀和后置词, 用语音交替构成派生或屈折变化。

南美印第安语 指分布于整个南美洲、安的列斯群岛以及中美洲部分地区的印第安语。跟北美印第安语比较, 学者们对南美印第安语的了解更为有限, 对它们的数量的估计分歧更大。有的估计, 南美印第安语多达 2 000 种。但一般认为仍在使用的语言不过 600 种, 它们彼此差别很大, 有人把它们划分为 70 多个语系, 但目前尚无普遍承认的分类法。南美印第安语中, 瓜拉尼语是唯一取得官方地位的语言, 它是巴拉圭的两种官方语言之一。其次, 在秘鲁和玻利维亚广为使用的凯楚亚语也很重要。

南美印第安语的主要特点如下: 语音方面, 各语言音位数目很不相同, 少的尚不足 10 个音位, 但多的可达 42 个; 普遍具有鼻元音系统。词汇方面, 向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大量借词。语法方面, 绝大多数南美印第安语都是加后缀的语言, 各语言的时态和体的具体范畴很不相同。等式句很普遍, 即把两个名词性词并列在一起、中间不用系词的句子, 如“他我兄弟”。

托忒文是1648年卫拉特高僧札亚·班智达(那木海札木苏)在蒙古文基础上改制的。它比较准确地表达卫拉特方言的语音系统。托忒文字母表包括31个字母。其中,表示元音的7个,表示辅音的24个。字母的形状和读音与现行蒙古文有些不同。用4个不同的字母分别表示4个舌位不同的圆唇元音。辅音k和g,t和d也分别用不同的字母区分开。设置了表示长元音的附加符号,并且规定了表示长元音的双写形式。

1945年,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蒙古族转用了以俄文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俗称“新蒙文”或“基里尔字母蒙古文”。这种文字的字母表比俄文多ə、ʏ两个元音字母。长元音用双写字母表示。(道布)

Menggu yu

蒙古语 (Mongolian language) 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官方语言,中国内蒙古自治区通用的一种语言。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分布于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内蒙古自治区以及辽宁、吉林、黑龙江、甘肃、青海等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蒙古族聚居区。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蒙古语属喀尔喀方言,使用人口约180万;中国境内的蒙古语分内蒙古、卫拉特、巴尔虎布利亚特3种方言,使用人口近300万(1982)。

现代蒙古语的主要特点(根据内蒙古方言察哈尔土语)是:元音丰富而辅音较少。元音除了有开口度、舌位、唇形的对立外,还有发音长短和舌根松紧(即阴性、阳性)的对立。有些辅音有腭化现象。语音结合比较自由,音节种类较多。绝大部分辅音既可以出现在音节首,也可以出现在音节末。在音节末还可以出现复辅音。有比较严格的元音和谐律。阴性元音和阳性元音不能出现在同一个单词里。在同性元音之中又有一定的唇形和谐。语法意义主要由附加成分和助词表示。词序和重叠词干也是重要的语法手段。附加成分可以依次递加在词干上,一般是构词的在先,构形的在后,具有构词和构形双重功能的介于二者之间。有后置词。静词有数、格、领属等范畴。动词有体、态、式、时、人称以及形动词、副动词等范畴。语序是主语在前,谓语在后;定语在中心词前;宾语和状语在动词前。根词绝大部分是单音节和双音节的。派生词由根词接附加成分构成,一个词根可以递加几个附加成分,合成词由词组固定化形成。词汇方面,有相当数量的汉语借词,也有一些突厥语、满语、藏语、梵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希腊语、俄语借词。

蒙古人民共和国于20世纪40年代采用以基里尔字母为基础的新蒙文。中国蒙古族使用从回鹘字母演变而来的蒙古文,从上到下连写,从左到右移行。

(清格尔泰)

Menggu yuzu

蒙古语族 (Mongolian group) 阿尔泰语系的语族之一。这是主张阿尔泰语系具有发生学性质的一派学者的意见。另一派学者认为蒙古语族是一个独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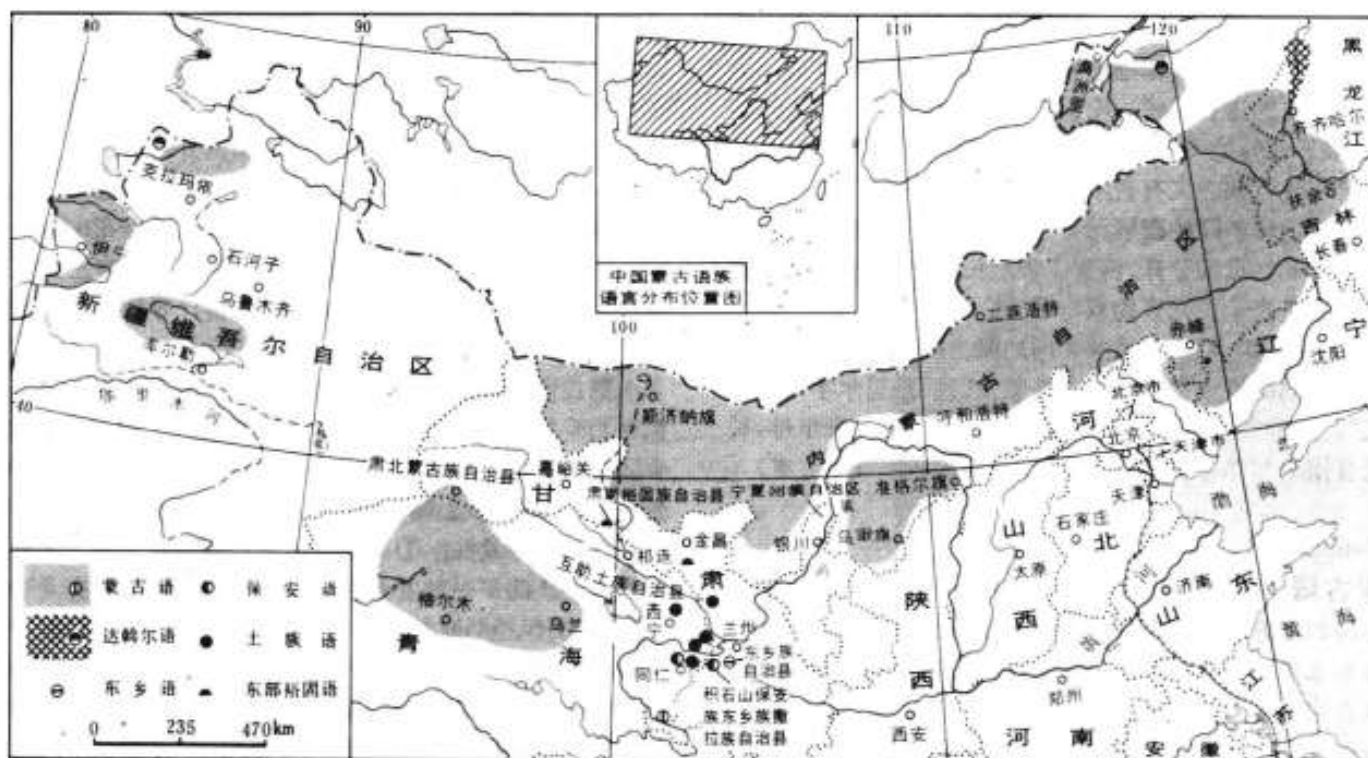
语族,在类型上与突厥语族、满-通古斯语族十分相近。蒙古语族包括9种语言:蒙古语、布里亚特语、卡尔梅克语、达斡尔语、莫戈勒语、东部裕固语、土族语、东乡语、保安语。历史上,中国境内的卫拉特语和国外的卡尔梅克语接近,巴尔虎-布里亚特语和国外的布里亚特语接近。现在这两种语和蒙古语的共同性不断增加,所以在中国境内它们处于蒙古语方言的地位。蒙古语族各语言主要分布在中国、蒙古人民共和国、苏联、阿富汗等地。使用人口约500万。

蒙古语族各语言结构上的一致性 蒙古语族各语言都有元音和谐律。如果用低-高、后-前、不圆唇-圆唇这3个区别特征,把元音排列为a~ə、i~i、o~ö、u~ü 4对,然后以此为尺度,去衡量现代9种语言的元音系统,就可看出彼此的一致性:①都有a和ə/e这一对元音。②其他3对元音的每一对至少保持一个元音,即至少有3个元音,多的保持两对加一个即5个元音,或三对都保持即6个元音。③在上述元音之外新增加的元音(借词中出现的)多的是3个,少的是一个。元音总数互相参差,但元音系统的面貌仍然彼此相似。把9种语言的元音各自按本语言的元音和谐律分为阳性、阴性及不分阴阳的中性(保安语不分阴阳,只有中性),把原有的元音及新增的元音分开排列,具体说明彼此的元音异同(表1)。蒙古语、布里亚特语、莫戈勒语、卡尔梅克语、东部裕固语、达斡尔语、土族语7种语言的元音都有长短两套,表中只举短的一套,双字母的表示这个元音只有长的,没有短的。左端元音当中的斜线表示线两边的不同元音,在某一语言中只能增加其中的一个。

蒙古语族各种语言辅音的一致性表现在塞音、塞擦音按清浊和送气与否来分,都只有两套。古代可能是以清浊对立为主;现代语言大多是在词首元音前面读为清音不送气和清音送气两套(通常用b、d、j[ɟ]、g、ɣ[ɣ]等符号表示前者,用p、t、č[ʧ]、k、q等符号表示后者)。在非词首部位时清音不送气一套只有当它的前后都是元音,或一边是元音一边是鼻音、边音、颤音时才可能浊化,或浊化并擦音化。软腭部位的塞音分为g、k与ɣ[ɣ]、q两个系列,前者只和阴性元音结合,后者只和阳性元音结合,这就是许多语言都具有的辅音和谐律。有的语言保存辅音的两个系列,但与元音结合时不受辅音和谐律的限制,这是后世演变的结果。塞擦音只有一套(或是ʧ,或是ʧ),个别语言多出齿音ʧ一套,是历史演变的结果。如果出现ʧ、ʧ、ʧ三套,其中一套往往是只拼写借词的。

总之,整个辅音系统比较简单,古代只有单辅音,有的语言后世才发展出复辅音,但其组合方式有限。多音节的词在音节构成上,第1音节可以只有元音,也可以是元音后有辅音,或元音前有辅音,或元音前后都有辅音。非第1音节元音后可以有或无辅音,但元音前必有辅音。这些,都是蒙古语族各语言语音结构上的共同性。

蒙古语族各语言在构词和语法上都运用3种“后置的手段”:①派生词的构词附加成分居于词根之后;②



中国蒙古语族语言分布示意图

表1 蒙古语族9种语言的元音系统分析

	蒙古语	布里亚特语	莫戈勒语	卡尔梅克语	东部裕固语	达斡尔语	土族语	东乡语	保安语
a	阳	阳	阳	阳	阳	阳	阳	阳	中
ə/e	阴ə	阴ə	阴e	阴e	阴e	阴ə	阴e	阴ə	中ə
ɪ	阳	—	—	—	—	—	—	—	—
i	阴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o	阳	阳	阳	阳	阳	阳	中	中	中
ō/ø	阴ō	阴ōō	阴ō	中ø	阴ø	—	—	—	—
u	阳	阳	阳	阳	中	中	—	—	—
ū/y	阴ū	阴ū	阴ū	阴y	中y	—	中	中	中
æ/â		阳æ	中â	中æ					
ɛ/ê	阳ɛ		中ê						
œ	阳œ	阳œ							
ɣ	阳ɣ								
e/ə/u		中ee			中ə	中e	中ə	中u	中e
原有元音数	8	7	7	7	7	5	5	5	5
新增元音数	3	3	2	1	1	1	1	1	1
阳性阴性数	11	8	6	5	4	3	2	2	0
中性元音数	0	2	3	3	4	3	4	4	6

表示形态变化的语法粘附成分居于词干之后；③表示词与词的关系，在格以外使用、起引介作用的虚词也居于被引介的实词之后（这种虚词称为后置词）。

蒙古语族语言的亲缘关系 蒙古语族语言来自原始的共同蒙古语。从词源上说，各种语言的大部分常用词是共同的，其语音形式的不同有对应规律可循。语法粘附成分和构词附加成分也有许多是同一来源。下面举几个方面的例子来具体说明。

① 用在名词词干后面的属格、宾格、与-位格、离格、造格在9种语言中的具体形式（表2）。

② 用在动词词干后面的动名词（或称形动词）未完成体（或称现在-将来时）、完成体（或称过去时）在9种语言中的具体形式（表3）。

③ 构词附加成分举*či和*la/*le两个。*či附加在名词性词根之后，派生出另一个表示有某种技能、专长或特性的人的名词。*la/*le附加在名词性词根之后，派生出一个表示与此名词有关的动作的动词。举5种语言为例（表4）。

④ 各语言有共同的构词附加成分也表现在数词上。加在数词词根之后，表示把某几个事物或人集合在一起的附加成分，各语言都包含着辅音l。举6种语言的具体形式（表5）。

⑤ 各语言之间的同源词表现出来的语音对应规律很多，从辅音对应（表6）和元音对应（表7）中各举一组。

表6中5种语言之间的辅音对应公式是：

$$x:h: \begin{cases} h \\ f \end{cases} : \begin{cases} h \\ x \\ f \end{cases} : \begin{cases} x \\ f \\ s \end{cases}$$

表 2

语 言	属 格	宾 格	与-位格	离 格	造 格
保安语	nə	nə	də	sə	galə
东乡语	ni	ni	də	sə	gələ
土族语	nə	nə	də	sa	la
东部裕固语	n/in/ə	n/in/ə	də	sa/se/so	aar/ceer/oor
莫戈勒语	ii	ii	du/tu	aasə/āasa	aar/āār
达斡尔语	ii	ii	d	aas/əəs oos/ees	aar/əər oor/eer
卡尔梅克语	n/iin/æə	ii/iig/g	da/ta	aas/æəs	aar/æər
蒙古语	n/iin/æə	ii/iig/g	d	aas/əəs oos/öös	aar/əər oor/öör
布里亚特语	n/iin/ai	ii/ji	da/ta də/tə do/to	haa/həə hoo/höö	aar/əər oor/öör

表 3

语 言	未完成体	完 成 体
保安语	gu	saŋ
东乡语	ku	sən
土族语	ku	sən
东部裕固语	gə/gə	(g)san/(g)sen/(g)son
莫戈勒语	qu/qui	qsoon
达斡尔语	gw	səŋ
卡尔梅克语	χə/xə	sŋ
蒙古语	x	sn
布里亚特语	χa/xə/χo	haŋ

表 4

语 言	*či	*la/*le
保安语	asuŋ-təi radəg-təi	牲畜—牧人 野兽—猎手
东乡语	asun-təu oudan-təu	牲畜—饲养员 谎话—爱说谎者
土族语	təmur-tə rdag-tə	铁—铁匠 野兽—猎人
东部裕固语	mal-tə em-tə	牲畜—牧人 药品—医生
蒙古语	mal-ti əm-ti	牲畜—牧民 药品—医生
		bakə-l- χitə-l- san-la- əndəyəi-liə- sam-la- dauu-la- sam-la- χaitə-la- sam-n- togoo-l-
		簸箕—簸 剪刀—剪 梳子—梳 蛋—生蛋 梳子—梳 歌—唱歌 梳子—梳 剪刀—剪 梳子—梳理 锅—做饭

表 5

保安语	lə	{ guru-lə deru-lə doru-lə	三个一起 四个一起 七个一起
东乡语	liə	{ suwugie-liə sangugie-liə	十五个(人)一起 三十个(人)一起
土族语	la	{ guraa(n)-la deere(n)-la	三个一起 四个一起
东部裕固语	la/le/lo	{ gurwa(n)-la derwe(n)-le doloo(n)-lo	三个一起 四个一起 七个一起
蒙古语	uul/üül	{ qurg(aa)-uul jis-üül	六个一起 九个一起
达斡尔语	ool/əəl	{ gwarb-ool durb-əəl	三个一起 四个一起

达斡尔语的“长”失去了词首的 x, 保安语的“毛发”失去了第 1 个音节, 东乡语的“毛发”失去了词首的 f。上面没有列出的莫戈勒语、卡尔梅克语、蒙古语、布里亚特语失去了所有这些词的词首辅音。这些都可以从比较中看出。

表 7 中所列各词, 比较观察的对象除了“粗”指第 2 音节以外, 其他都指词的第 1 个音节的元音。

这 8 种语言的语音形式

可概括为 5 种类型(表 8)。

从元音 yy 和 y 的有无看, 只分两个类型, 卡尔梅克语和东部裕固语出现 yy 和 y, 其他语言不出现 yy 和 y。

这几个元音在 8 种语言之间的对应关系可以概括为表 9。

蒙古语族各语言的远近关系及历史比较研究简史

古代的方言演变为后世的语言, 后世的语言再产生方言, 这样的分化过程在蒙古语族的历史上不只发生过一次。

经过几代人的调查研究, 多数蒙古语学者认为, 蒙古语族包括 9 种语言, 但也有人认为卡尔梅克语和布里亚特语不是独立的语言。除蒙古语、卡尔梅克语、布里亚特

语相近以外, 土族语、东乡语、保安语之间也比较相近。它们在历史上也可能是同一语言的不同方言。因此, 从今往古逆推, 近古某个时期蒙古语族可能只有 5 种语言。

从现代各语言的分布情况看, 如果沿北纬 40° 画一条线, 就可看出, 蒙古语、卡尔梅克语、布里亚特语、达斡尔语主要分布在线以北, 而莫

戈勒语、东部裕固语、土族语、保安语、东乡语分布在线以南。但是蒙古语学者在描绘蒙古语族历史演变时更喜欢用东西两个语组的说法。从语言特征的异同多寡来看, 东部语组包括蒙古语、卡尔梅克语、布里亚特语、达斡尔语、莫戈勒语, 西部语组包括东部裕固语、土族语、东乡语、保安语。卡尔梅克语、莫戈勒语虽分布在西部, 但卡尔梅克语和蒙古语最近, 莫戈勒语与蒙古语相近的程度也大于与西部语组相近的程度。两个语组又可能是从古代的两个方言演变而来的。再往上就是统一的古代蒙古语了。

蒙古语族历史上的书面语是以蒙古、卡尔梅克、布里亚特这一支语言的古代口语为依据的, 因此古代文献保

表 6

语 言	十	肝	年	羽毛	红	长	毛发
达斡尔语	xarəb	xələg	xoŋ	xudusw	xulaan	ortw	xusw
东部裕固语	harwan	helepen	hon	hodən	—	hdur	həsun
保安语	harwaŋ	helgə	hoŋ	hotuŋ	fulaŋ	ftə	suŋ
东乡语	haran	—	xon	xodun	xulan	fudu	usun
土族语	xaran	xelge	fon	foodə	fulaan	ʂdur	ʂdzu

表 7

语 言	满	粗	脸、面	心	容颜	脐	冷
达斡尔语	duuru-	buduun		ɕurun	ɕus	kuis	kuitun
布里亚特语	dūūrə-	būdūūŋ	njūūr	ɕūrən	ɕūhən	xūihən	xūitən
蒙古语	dūūr-	būdūūn	nūūr	ɕūr	ɕūs	xiis	xiitəfi
卡尔梅克语	dyyr-	bydyyn	nyyr	ɕyrkə	ɕysə	kiisə	kiitə
东部裕固语	dyyr-	bydyyn	nyyr	ɕyrgen	ɕəsən	kyysən	kyyten
土族语	dəuura-	budən	niuur	ɕirge	—	kuiidzə	kuiiden
东乡语	duru-	biədun	nu	ɕugə	—	kuişun	kuişien
保安语	dərge-	bəidun	nur	ɕirgə	—	kisun	kitan

表 8

达斡尔语 布里亚特语	前三个词读长元音, 当中两个词读短元音, 后两个词读复元音
蒙古语 卡尔梅克语 东部裕固语	前三个、后两个词读长元音, 当中两个词读短元音
土族语	前三个、后两个词读复元音(后一音素长), 当中两个词读短元音
东乡语	元音不分长短, 只后两个词读复元音
保安语	元音不分长短, 全部词读单元音

表 9

达斡尔语	uu	u	ui
布里亚特语 蒙古语	üü	ü	üi
卡尔梅克语 东部裕固语	yy	y	ii yy
土族语	əuu iuu	i	uii
东乡语	u	u	ui
保安语	u/ə	i	i

留了这一支语言(主要是蒙古和卡尔梅克)某个历史时期的语言面目。其他各支语言没有古代文献,但在现代口语里保存了某些古代语言的遗迹,在历史比较研究上很有价值。

蒙古语族从历史上就和周围的各种语言互相接触、互相影响。比较深刻的影响存在于东乡语和汉语之间,土族语、保安语和藏语之间,达斡尔语和满-通古斯语之间,莫戈勒语和突厥语、伊朗语之间。

蒙古语族的历史比较研究始于20世纪初。20年代苏联学者Б. Я. 弗拉基米尔佐夫的《蒙古书面语和喀尔喀方言的比较语法》起了开创和奠基的作用。50年代苏联学者Г. Д. 桑热耶夫的《蒙古语比较语法》指出了蒙古人、布里亚特人、卫拉特人(卡尔梅克人)在一定环境下,可以互相通话,而土族语、莫戈勒语、达斡尔语,在蒙古语族里各自单独居于特殊的地位。美国学者N. N. 波普于50年代写的《蒙古语比较研究导论》对于蒙古语的历史分期及每个时期的特征有扼要的论述。他在60年代写的《阿尔泰语比较语法》对于蒙古语族语言的分类提出了比前一

著作更正确的观点,把土族语(因为他未见到东乡语和保安语的材料)和达斡尔语各自独立为一支,把莫戈勒语、卫拉特语、卡尔梅克语、布里亚特语、蒙古语统属于第3支,下面再分两组:莫戈勒语、卫拉特语、卡尔梅克语为一组,布里亚特语、蒙古语为另一组。卫拉特语指中国境内的,卡尔梅克语指在伏尔加河一带的。后者受俄语影响,与卫拉特语已有距离。50年代末期蒙古人民共和国学者И. 罗布桑旺丹写的《关于现代蒙古语族语言和方言的分类问题》注意到了蒙古语族现代语言和现代蒙古语的方言应该有明确的界限,但他把卡尔梅克语(及卫拉特语)、布里亚特语(包括巴尔虎语)放在方言之列。

50年代开始的中国境内各民族语言调查的结果,证实了蒙古语族还应该包括东部裕固语、东乡语和保安语。在此基础上,中国学者清格尔泰主编的《现代蒙古语》一书中画出了从古代统一蒙古语演变到5个语支再演变为9种语言的图表。中国学者喻世长在《论蒙古语族的形成和发展》一书中提出了从共同蒙古语演变为9种现代语言的历史进程的假说,并指出了今后应该继续探讨的许多问题。

蒙古语族的研究成果为描写语言学和历史比较语言学开拓了新的领域。

参考书目

Б. Я. Владимирцов, Сравнительн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монгольско-письменного языка и халхаского наречия, Ленинград, 1929.

Г. Д. Санжеев, Сравнительн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монгольских языков, Москва, I, 1953, II, 1963.

N. N. Poppe, Introduction to Mongolian Comparative Studies, Helsinki, 1955.

清格尔泰:《中国蒙古语族语言和蒙古语方言概要》,载《蒙古

历史语言》(蒙文版),1957年第11期至1958年第7期,呼和浩特。

喻世长:《论蒙古语族的形成和发展》,北京,1982。

(喻世长)

Mengguizlyun

《蒙古字韵》 中国元代用八思巴字拼写汉语(也称八思巴字汉语)的韵书。本书编著于1269~1292年之间,编著者未详。元刻本流传至清代道光年间,后亡佚。现



《蒙古字韵》

在仅存一个旧写本,是元至大戊申(1308)朱宗文(字彦章,信安人)所做的校订本,也已流失国外。

本书校订本分为上、下两卷,上卷34页,下卷31页,外加封面3页、底页1页,共69页。第30页下半页(麻韵部分)至卷尾回鹘字样的上半页已残缺。本书内容包括刘更序、朱宗文序、蒙古字韵总括变化之图、校正字样、字母、篆字母、韵书正文、回鹘字样等。韵书正文分为15个韵(部):①东,②庚,③阳,④支,⑤鱼,⑥佳,⑦真,⑧寒,⑨先,⑩萧,⑪尤,⑫覃,⑬侵,⑭歌,⑮麻,各韵顺序按收声类聚,大致不紊。①~③为穿鼻韵,④~⑥为展辅韵(鱼兼敛唇韵),⑦~⑨为抵腭韵,⑩~⑪为敛唇韵,⑫、⑬为闭口韵,⑭、⑮为直喉韵。每一韵又分为若干韵类,每一韵类里面,按照声类的一定顺序(始见终日)排列同音字组,上冠八思巴字字头,下列所拼汉字,汉字标明平上去入(支鱼佳萧歌麻六韵有入)四声,四声相承,共收八思巴字814个,残缺处可补约35个,共收汉字9149个,残缺处可补约302个。序文每半页9行,每行12字;正文每半页10行,每行除所冠八思巴字外,各16字。

本书是用八思巴字拼写汉语“通用备检之本”。它反映当时汉语共通语语音最全面最系统,所以成为研究八思巴字汉语最为重要的文献资料。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外学者很重视这个文献并进行整理、转写、研究,取得了初步成果。本书又可以作为考译、解读八思巴字文物铭文的参考。

(杨耐思)

Meng-Han Cidian

《蒙汉辞典》(Mongol-Chinese Dictionary)

中国蒙、汉两种语文对照的中型词典。由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室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6年出版。收词5

万条左右,120万字,按现行蒙文字母顺序排列。以单词为主条,合成词为副条;同音同形异义词分别列条。以收录现代蒙古语词汇为主,兼收出现于重要文献中的旧词,也选收了一些富有生命力的方言词和部分常用成语。一般读者不易理解或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的词,都加了必要的注释。为了辨析词义,在有些词条里用短语或例句说明多义词的用法。全部主条的蒙文,都用音标注出蒙古书面语的读音。书内有附录160页,介绍蒙古语的语法要点、难读词的口语读法以及蒙古文的标点符号、基本笔画、回鹘蒙文、八思巴字、托忒蒙文的字母表。

(孙竹)

Mengwen Qimeng Quanshi

《蒙文启蒙诠释》 中国传统的蒙古语文学代表作之一。中国蒙古族学者丹金达格巴著。18世纪上半叶成书。书的全称是《蒙文启蒙诠释——清除错字之苍穹玛尼经》,简称《蒙文启蒙诠释》。全书约6000字,分3部分。第1部分叙述蒙古文字沿革及佛教传入蒙古的情况。首先介绍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关于回鹘式蒙古文字母分为阳性(紧)、阴性(松)、中性(或紧或松)3类的论述。然后提到八思巴创制蒙古方体字的经过。接着扼要记述拂思吉斡节儿制订回鹘式蒙古文拼写规则、翻译佛经以及在清代康熙年间用蒙古文翻译大藏经甘珠部的历史。第2部分根据拂思吉斡节儿《蒙文启蒙》的主要内容,对蒙古文字母的分类、音节和常用的语法形式(格、助词、语气词等)一一举例加以说明。在这一部分里丹金达格巴明确指出蒙古语音音和谐律的主要规则,以及在写法混同的情况下判断一个字母读什么元音的4种方法。他对新增加的辅音字母p、š、j的用法做了解释,对口语中一些词的读音规范问题进行了阐述。第3部分对蒙古语语音的发音生理特点做了分析。方法上借用了印度哲学的“五大”和中国哲学的“五行”的概念。这部著作概括了历代蒙古语文学家的研究成果,对蒙古文的规范作出了重要贡献。曾以手抄本、木刻本、铅印本等多种形式在蒙古族中广泛流传。

(奎干哈达)

Mengwen Zhiyao

《蒙文指要》 中国关于近代蒙古文规范的一套工具书。清代蒙古族语文学家赛尚阿(1798~1875)纂辑。道光二十八年(1848)刊行。一帙4卷。由“蒙文晰义”、“蒙文法程”、“便览正讹”、“便览补遗”4编组成。前两编为赛尚阿父亲的遗稿,赛尚阿整理。后两编为赛尚阿手著。这套书的宗旨在于传授近代蒙古文的规范写法以及满、汉、蒙3种语言的对译知识。“蒙文晰义”以满文为纲,同一条目的不同义项用汉、蒙两种文字分别注出,辨析词义以蒙古文部分较为细密。“蒙文法程”采取满、蒙两种文字对译的方式展示蒙古文语法形式的正确写法,包括附加成分和助词,赛尚阿统称为“虚字”。“便览正讹”主要对满、汉、蒙3种文字对照词书《三合便览》(清代蒙古族语文学

家敬斋公编)所收蒙古文部分的错字加以更正,同时也订正了汉文部分的一些讹误。“便览补遗”是对《三合便览》一书的补充,计增补 828 条。《蒙文指要》在倡导蒙古文规范方面起过积极作用,影响很大,曾多次翻印,并以手抄本形式在民间流传。(道布)

Mengdejlu yufa

孟德鸠语法 (Montague grammar) 数理语言学中采用内涵逻辑的方法来描述句子语义内容的一种理论。它的来源有二:一是 N. 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二是内涵逻辑。内涵逻辑是用于处理可能性、必然性等模态概念与时态的逻辑学,在 20 世纪 60 年代出现了模式理论之后才与现代语言学相结合。1970 年前后,美国数理逻辑学家 R. 孟德鸠(1932~1971)以及 D. 卡普兰、D. 卡比和后来的 B. H. 帕蒂、R. 库珀等人把内涵逻辑应用于自然语言的研究,最后由孟德鸠和 M. J. 克雷斯科尔把生成语法与内涵逻辑这两个领域的研究集中提炼为孟德鸠语法。

孟德鸠语法能够把用树形图表示的句子的深层结构转换为内涵逻辑表达式,从而揭示出句子的某些语义内容。但它还不是自然语言的句子所表示的实在意义。为了揭示出这种意义,还必须进一步研究语义理论,即内涵逻辑的模型论。这方面的研究最近已有很大进展。

孟德鸠语法的研究对于语言学理论、自然语言信息处理、逻辑学以至于认知科学都是很有价值的。

(冯志伟)

Meng-Gaomian yuzu

孟-高棉语族 (Mon-Khmer group) 见南亚语系。

Mengjialayu

孟加拉语 (Bengali language) 孟加拉国的官方语言。属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印度语支。分布于孟



图1 孟加拉语字母表

加拉国和印度的西孟加拉邦,以及特里普拉邦和阿萨姆邦部分地区。使用人口 1.6 亿。文字采用由古印度婆罗米字母演变而成的孟加拉体。共有 11 个元音字母,40 个辅音字母(图 1)。元音字母一般都有简写形式。孟加拉语有明显的清、浊辅音,送气和不送气辅音,卷舌和不卷舌辅音的区别。名词和代词有格和数的变化,名词没

有性的变化,只有一些指人的名词和来自梵语的极少数形容词有性的区别。动词有人称和时态的变化。方言较多,印度西孟加拉邦首府加尔各答一带的方言被公认为孟加拉语的标准语,以此为基础的现代孟加拉语普通话及其书面形式——孟加拉白话文——已在整个孟加拉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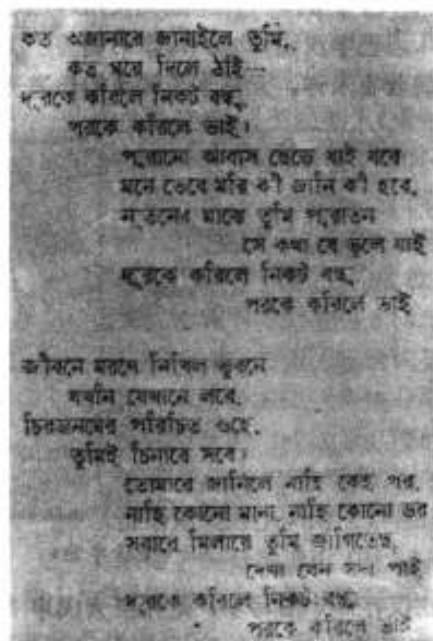


图2 泰戈尔《吉檀迦利》的片段

地区广泛使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一带的方言同孟加拉语普通话有明显区别,但达卡市现已通用普通话,孟加拉国各地有文化的人一般也都说普通话。印度著名作家 R. 泰戈尔(1861~1941)用孟加拉语进行文学创作(图 2)。孟加拉语最早的文献之一是 10 世纪的佛教诗歌《焦尔贾博德》。

(李臻山)

Mikeluonixiya yuzu

密克罗尼西亚语族 (Micronesian group)

见南岛语系。

Mianyu

勉语 (Mian language) 中国自称“勉”的瑶族使用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瑶语支。主要分布在中国广西、湖南、云南、广东、贵州、江西等省(区)的 90 多个县的部分山区,使用人口约 70 万(1982)。广东海南岛(自称“金门”)的苗族和越南、泰国、老挝、缅甸的瑶族使用的语言跟勉语基本上相同。勉语的声母一般比韵母少。塞音和塞擦音声母清浊对立。浊音声母可出现于各个声调。送气音声母一般只出现在单数调。韵母的主要元音多数分长短。有鼻音和塞音韵尾。声调和汉语的平、上、去、入各分阴阳的情况一致,变调与构词有一定的联系。虚词和词序为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作修饰语的名词、代词、状词和数量词组在中心词前,形容词一般在中心词后。第一人称代词的复数分包括式和排除式。量词和部分形容词、状词重叠后表示某种语法意义。数词有两套,10 以内的用固有词,10 以上的用借词。句子的语序是主

语在谓语前,宾语、补语在谓语后。词根基本上是单音节的。构词方式大部分是词根与词根相结合,带附加成分的词不多。合成词比较丰富,以修饰结构的居多。方言划分主要根据语言特点和自称的内在联系,不受地域的约束,大致上分为勉-金、标-交、藻敏3个方言。方言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词汇上。使用不同方言的人互相不能通话。3个方言都有不少的汉语借词。近几年瑶族语文工作者用拉丁字母设计了代表勉语的瑞文方案,正在一些比较聚居的县份进行实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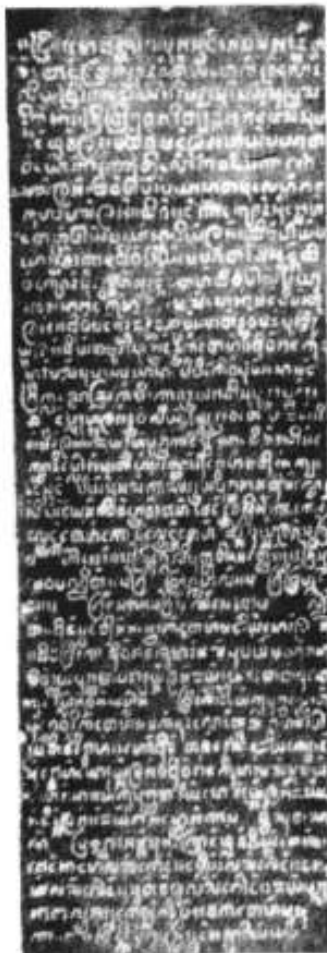
(毛宗武)

Miandianyu

缅甸语 (Burmese language) 缅甸的官方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缅语支。主要分布于伊洛瓦底江流域和三角洲地区。使用人口约2800万。主要方言有:仰光-曼德勒方言、若开方言、土瓦方言、茵达方言、德努方言、约方言、东友方言。仰光话是现代缅甸语的标准话。

缅甸语有7个单元音和4个双元音,双元音只出现在短促声调和鼻化元音中。辅音有28个单辅音、4个清化鼻辅音和32个复辅音。现代缅甸语有4个声调:高平、高降、低平、短促。在口语中有连读音变现象,主要是清音变浊音、各类声调变成轻声。古缅甸语中有很多复辅音声母和辅音韵尾,后来部分复辅音变成腭化音,辅音韵尾消失引起韵母和声调系统的变化。缅甸语属孤立型语言,基本词多为单音节词,由词首辅音或辅音丛加上一个单元音或双元音构成。名词没有性、数、格的变化;人称代词有男用和女用、尊称和卑称之分;动词没有时态、人称等变化。量词与汉语量词相似。主要的构词方式是附加(包括前缀、后缀)、插入、重叠等。通过这些方式可以改变词性和词义。基本语序是:主语—宾语—谓语。修饰语在中心词之前。句子中各成份之间的各种语法关系和感情色彩主要通过助词来表现。缅甸文字属于音节-音素文字。有33个辅音字母,元音在书写时除了在零声母时用字母外,一般都用符号代替。元音符号有上加、下加、前加、后加等几种。缅甸语最早和最完整的文献是“妙齐提”碑文(12世纪,见图)。

(汪大年)



“妙齐提”碑文

Mianyuzhi

缅语支 (Burmese branch) 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语支之一,包括缅甸语、载瓦语、阿昌语等。主要分布在缅甸和中国云南省。中国境内的使用人口约2700万(1982)。缅语支与同语族的彝语支较近,因此有些学者主张将二者合为一个语支,称缅彝语支。缅语支诸语言的同源词较多,并在声韵调诸方面都存在比较严整的语音对应。下面列举韵尾对应的几个同源词例子。缅甸语以仰光话为代表,阿昌语以陇川话为代表:

缅甸语	载瓦语	阿昌语	词义
aʔ ⁵⁵	ap ⁵⁵	ap ⁵⁵	针
teaʔ ⁵⁵	sat ⁵⁵	sat ⁵⁵	杀
naʔ ⁵⁵	noʔ ⁵⁵	lok ⁵⁵	黑
teō ⁵⁵	sum ⁵⁵	sum ⁵⁵	三
mji ⁵⁵	mjaŋ ⁵⁵	mzaŋ ⁵⁵	见

缅语支语言存在许多相同的特征,但也有一些差异。如:塞音、塞擦音除缅甸语分清浊外,一般没有浊音;缅甸语、阿昌语的鼻音和边音有清化和非清化的对立。都有复合元音和带辅音尾的韵母,载瓦语、阿昌语有-p、-t、-k、-ʔ、-m、-n、-ŋ等7个辅音韵尾,缅甸语仰光话只保留了一个塞音韵尾-ʔ,鼻音韵尾都已转化为元音的鼻化。动词都有使动范畴的形态变化,但表现形式不完全相同。除都有不送气(自动)和送气(使动)、浊擦音(自动)和清擦音(使动)两种交替形式外,载瓦语还有松元音(自动)和紧元音(使动)的交替形式,缅甸语、阿昌语还有非清化的鼻音边音(自动)和清化的鼻音边音(使动)的交替形式。

(戴庆厦)

Miaowen

苗文 (Miao writing) 见苗语。

Miao-Yao yuzu

苗瑶语族 (Miao-Yao group) 汉藏语系的语族之一。分苗、瑶两个语支。苗语支包括苗语和一部分瑶族说的布努语。瑶语支只有大部分瑶族说的勉语。居住在中国广东省增城、博罗等县的畲族(约1000人)所说的畲语也属此语族,但语支未定。

苗瑶语族语言分布于中国贵州省、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省、湖南省、广东省、四川省和越南、老挝、泰国、缅甸等国靠近中国的地区,使用人口在中国约有530万(1982),在国外约有70万。

苗瑶语族的语言具有汉藏语系语言的一些共同点。如每个音节都有声调,居于音节末尾的辅音有限,除少数复音的单纯词外,每个音节都有词汇意义或语法意义,词序和虚词是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等。

苗瑶语族还有一些与汉藏语系其他语族不尽相同而本语族两个语支共有的特点:①除个别地区外,都有鼻音韵尾,苗语支有-n、-ŋ,瑶语支有-m、-n、-ŋ。②元音不分松紧。③有和汉语相同的声调系统。古苗瑶语分平、

上、去、入四声。除个别地区外,现在四声又因古声母的清、浊各分化为两个声调,有的分化以后,又有合并现象。如苗语川黔滇方言的贵阳、惠水两个次方言阴入并入阴去,阳入并入阳平。④句子的主语在谓语前,宾语在作谓语的动词后。例如“我犁田”,苗语大南山话(在贵州毕节县,代表苗语支,以下简称大南山)说作ko⁵⁵(我)lai³¹(犁)la³¹(田),勉语大坪江话(在广西龙胜县,代表瑶语支,以下简称大坪江)说作je³³(我)lai²¹(犁)li:ŋ²¹(田)。⑤除个别作“好”、“坏”、“新”、“旧”讲的形容词外,形容词作修饰语时居后。例如“红花”,大南山说作paŋ³¹(花)la⁴³(红),大坪江说作pjaŋ²¹(花)si⁵⁵(赤)。⑥代名词、数量词组作修饰语时居前。例如“我父亲”,大南山说作ko⁵⁵(我)tsi⁵⁵(父亲),大坪江说作je³³(我)tje²⁴(父亲);“三只猪”大南山说作pe⁴³(三)to²¹(只)mpua⁴⁴(猪),大坪江说作pwo³³(三)tau²¹(头)tuŋ³³(猪)。⑦名词作领属性修饰语时居前。例如“哥哥的书”,大南山说作ti²¹(哥哥)le³³(的)nteu⁵⁵(书),大坪江说作ko²⁴(哥哥)nei³³(的)sou³³(书)。⑧没有后置的表示主动者、受动者的结构助词。⑨两个语支有相当数量的同源词。举例如下(右上角的数字表示调值,右下角括弧内的数字表示调类):

例词	苗语支(大南山)	瑶语支(大坪江)
毛	plou ⁴³	pjei ³³
四	plou ⁴³	pjei ³³
稻	mple ⁴³	bjaui ⁴³
舌头	mplai ⁴³	bjet ⁴³
儿子	to ⁴³	to:n ³³
死	tua ⁴³	tai ⁴³
杀	tua ⁴³	tai ⁴³
湿	nto ⁴³	do:n ³³
长	nte ⁴³	da:u ⁴³
戴	ntoŋ ⁴³	doŋ ⁴³
狗	tje ⁴³	tu ⁴³
熊	tjai ⁴³	tuop ⁴³
五	tsi ⁴³	pja ⁴³
房子	tsai ⁴³	pjaui ⁴³
村庄	zau ⁴³	lan ⁴³
窝	ze ⁴³	lau ⁴³
好	zoŋ ⁴³	lon ⁴³
虫	kaŋ ⁴³	tu:ŋ ⁴³
路	ke ⁴³	tuau ⁴³
蛙	qaŋ ⁴³	tu:ŋ ⁴³
蛋	qe ⁴³	tuau ⁴³
鸭	o ⁴³	a:p ⁴³
肿	au ⁴³	om ⁴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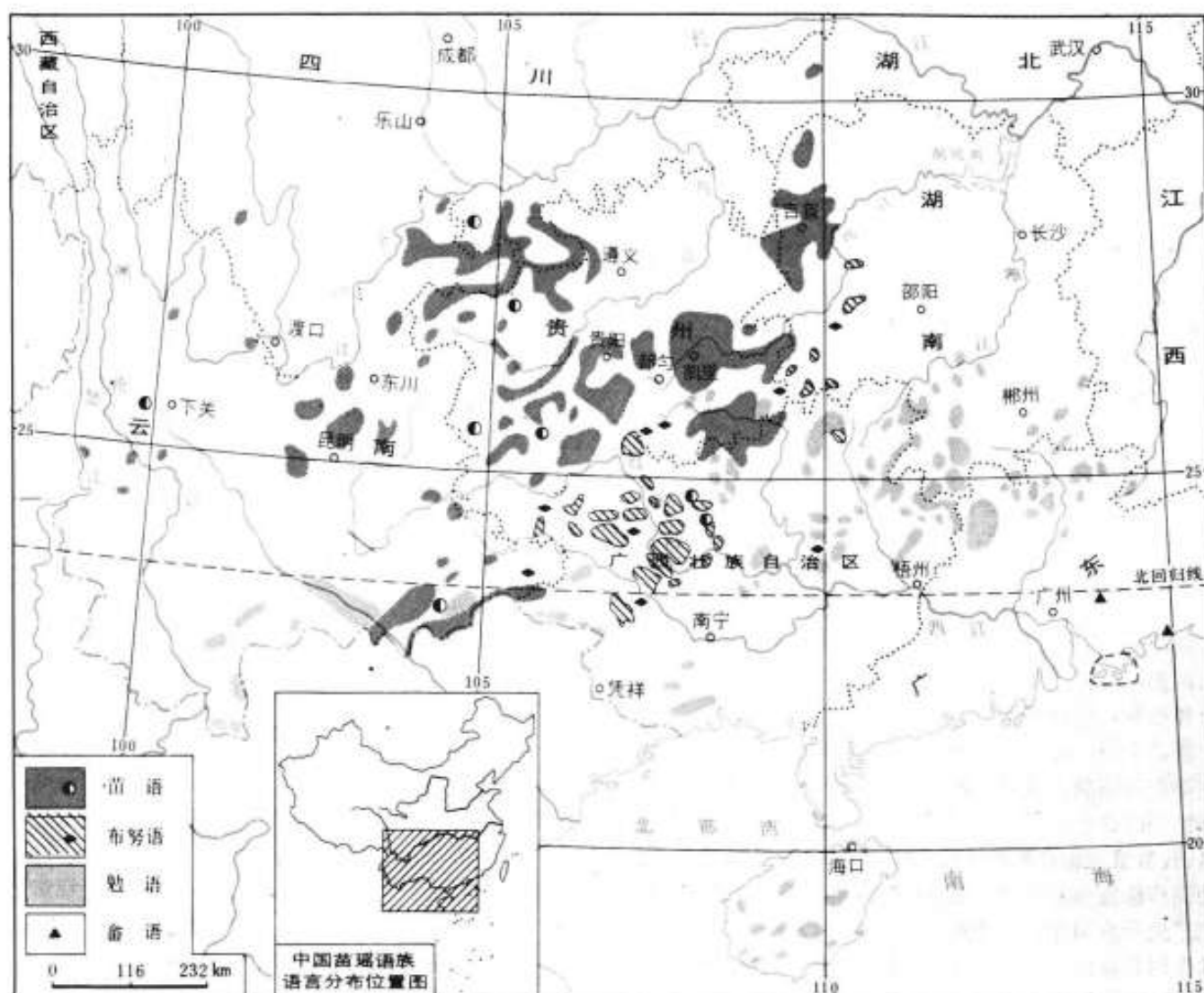
从上面举的一些同源词可以看出苗瑶两个语支的语音对应关系。大南山的声母pl、mpl、t、nt、tj、tɕ、z、k、q分别与大坪江的声母pj、bj、t、d、tɕ、p、l、tɕ、t对应;大南山的韵母ou、e、o、ua、oŋ、aŋ分别与大坪江的韵母ei、au/a:u、o:n/a:p、ai、oŋ、ɛ:ŋ对应;大南山的声调43、31、55、21、

44、13、33、24分别与大坪江的声调33、21、52、231、24、12、55、12对应。⑩两个语支都有大量的汉语借词。随着借词的吸收,都增加了新的韵母,改变或增加了某些语法意义的表达方式。例如大南山增加了ei、ie、iau、iou、ien、ue、uei、uai、uen、uaŋ等10个韵母,大坪江增加了ə、ən、ɿ等3个韵母。又如大南山和大坪江都分别借用了汉语的结构助词“的”,大南山读作le³³,大坪江读作nei³³。这个助词借入以后改变了一些修饰语的位置。例如“铁匠”、“屠夫”,大南山的说法分别是ku³³(匠)lou⁴⁴(铁),ku³³(匠)tua⁴⁴(杀)mpua⁴⁴(猪),现在可以分别说作ntou³³(打)lou⁴⁴(铁)le³³(的)nen⁴³(人),tua⁴⁴(杀)mpua⁴⁴(猪)le³³(的)nen⁴³(人)。“红衣服”、“高桌子”,大坪江本来的说法分别是lu:i³³(衣服)si⁵⁵(赤),tje²¹(台)taŋ³³(高),现在可以分别说作si⁵⁵(赤)nei³³(的)lu:i³³(衣服),taŋ³³(高)nei³³(的)tje²¹(台)。大南山的le³³和大坪江的nei³³可以使名词、代名词、形容词、动词、动宾词组修饰的名词省略,成为le³³字词组和nei³³字词组,其作用相当于汉语的“的”字词组,表示属于谁的或具有某种性质或接受、进行某种动作的人或物。例如:“哥哥的”、“你的”、“好的”、“煮的”、“做饭的”,大南山分别说作ti²¹(哥哥)le³³(的),kau³¹(你)le³³(的),zoŋ⁴⁴(好)le³³(的),hou⁴⁴(煮)le³³(的),ua⁴⁴(做)tuau⁴³(饭)le³³(的),大坪江分别说作ko²⁴(哥哥)nei³³(的),mwei²¹(你)nei³³(的),lon²⁴(好)nei³³(的),tsou⁵²(煮)nei³³(的),tsou²⁴(做)pa:ŋ²⁴(饭)nei³³(的)。

两个语支也有不同的地方:①苗语支没有塞音韵尾(布努语的壮语借词例外)和双唇鼻音韵尾,元音不分长短。瑶语支除个别地区外,都有塞音韵尾-p、-t、-k/?和双唇鼻音韵尾-m,元音分长短。②名词作限制性修饰语时,苗语支名词在修饰语后,瑶语支居前。例如:“猪肉”、“牛角”在大南山分别说作nqai³¹(肉)mpua⁴⁴(猪),ko⁴³(角)no³¹(牛),大坪江分别说作tuŋ²¹(猪)o⁵²(肉),ŋoŋ²¹(牛)tu:ŋ³³(角)。③除个别地区外,苗语支的量词可以单独修饰名词,表示定指单量。例如大南山lo⁴³(个)za²¹(锅)“锅”,to²¹(头)no³¹(牛)“牛”,瑶语支的量词不能单独修饰名词。④指示词作修饰语时,苗语支居后,瑶语支居前。例如“这个”、“这两位”、“那头牛”、“那两件红衣服”,大南山分别说作lo⁴³(个)na⁵⁵(这),au⁴³(二)len²¹(位)na⁵⁵(这),to²¹(头)no³¹(牛)o³³(那),au⁴³(二)lo⁴³(件)tuau⁴⁴(衣服)tuau⁴³(新)o³³(那);大坪江分别说作nai⁵²(这)no:m³³(个),nai⁵²(这)i³³(二)la:n²¹(位),wo⁵²(那)tau²¹(头)ŋoŋ²¹(牛),wo⁵²(那)i³³(二)tei²⁴(件)sjaŋ³³(新)lu:i³³(衣服)。⑤两个语支有大量不同源的词。如下页表。

从表中例词可以看出瑶语支的汉语借词比苗语支多。

苗、瑶语的归属问题是语言学界争论的问题之一。直到20世纪初,外国学者普遍认为苗、瑶语属印度支那诸语(即后来的汉藏语系),不过语族的划分不同。德国学者



中国苗瑶语族语言分布示意图

P. W. 施密特把苗、瑶语列入台语族。法国学者 G. 马伯乐主张苗、瑶语自成语族。英国学者 H. R. 戴维斯把苗、

瑶语列入孟-高棉语族。美国学者白保罗则把苗瑶语族归入他所创立的澳泰语系。白保罗学说在国外影响很大。中国学者一向主张苗、瑶语属汉藏语系的一个语族。近年有人认为苗语和汉语在发生学上有关系。

参考书目

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苗瑶语族部分）》，科学出版社，北京，1959。

P. W. Schmidt, *Die Sprachfamilien und Sprachenkreise der Erde*, Heidelberg, 1926.

G. Maspero, *Un Empire Colonial Français L'Indochine*, Tome I, Langues, Paris, 1929.

P. K. Benedict, *Austro-Thai: Language and Culture, with a Glossary of Roots*, HRAF Press, New Haven, 1975.

(王辅世)

Mlaoyu

苗语 (Miao language) 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在中国分布于贵州、云南、湖南、广西、四川等省(区)，使用人口约400多万(1982)。分湘西、黔东南、川黔滇3个方言。川黔滇方言内部比较复杂，又分川黔滇、滇东北、贵阳、惠水、麻山、罗泊河、重安江等7个次方言，有的方言或次方言还分土语。在国外分布于越南、老挝、泰

例词	苗语支(大南山)	瑶语支(大坪江)
雨	naŋ ⁵⁵	bjuŋ ⁵⁵
霜	te ⁵⁵	so:ŋ ⁵⁵
猪	mpua ⁵⁵	tun ⁵⁵
龙	zaŋ ⁵⁵	ɬun ⁵⁵
哥哥	ti ⁵⁵	ko ⁵⁵
坟	ntaŋ ⁵⁵	tsou ⁵⁵
斗笠	kou ⁵⁵	lap ⁵⁵
裙子	ta ⁵⁵	ɬun ⁵⁵
肉	nqai ⁵⁵	o ⁵⁵
碓	ɬo ⁵⁵	to:ɬ ⁵⁵
话	lo ⁵⁵	wa ⁵⁵
穿(衣)	paŋ ⁵⁵	tsu ⁵⁵
飞	zaŋ ⁵⁵	dai ⁵⁵
勤	nqua ⁵⁵	ɬen ⁵⁵
懒	ŋken ⁵⁵	lwei ⁵⁵
白	tjeu ⁵⁵	pe ⁵⁵
凉	tsa ⁵⁵	la:ŋ ⁵⁵

国等国靠近中国云南省的地区,使用人口有数十万,与中国苗语的川黔滇方言相同。

语言特征:语音方面,苗语声母多,韵母少。除黔东方言外,有带鼻冠音的塞音、塞擦音声母,如 mp、mph、nɛ、nɛh、nt、nth 等。只有一个鼻音韵尾,接前元音时读 -n,接后元音时读 -ŋ,没有塞音韵尾。有和汉语相同的声调系统。古苗语分平、上、去、入四声。现在除罗泊河次方言外,四声因古声母的清、浊各分化为阴、阳两调,分化以后又有合并现象,例如湘西方言西部土语,阴入并入阴上,阳入并入阳上。语法方面,主语在谓语前,宾语在作谓语的动词后。名词作领属性修饰语时在中心词前,作限制性修饰语时在中心词后;代名词、数量词组作修饰语时在中心词前;指示词、形容词、动词作修饰语时在中心词后(多数地区表示“好”、“坏”、“旧”的形容词作修饰语时在中心词前);状词非常丰富,其作用是修饰形容词和动词,表示速度、响声、状态、颜色、味道,状词作修饰语时在中心词后。词汇方面,单音节词较多,多音节的单纯词很少。有极为丰富的四音格结构,其中有的是词,有的是词组。有相当多的汉语借词。苗族在历史上没有本族文字。1905 年,英国传教士 S. 柏格理与苗族人士杨雅各等为滇东北次方言创制了一种拼音文字,通称柏格理苗文。1956 年根据苗语方言差别较大的情况,创制了湘西、黔东、川黔滇 3 种方言文字并改革了滇东北的柏格理苗文。4 种苗文都采用 26 个拉丁字母。老挝、泰国的传教士也曾为当地苗族创制了一种拉丁字母式的苗文。

(王辅世)

Miaoyuzhi

苗语支 (Miao branch) 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的语支之一。包括苗语和一部分瑶族说的布努语。使用人口约 500 多万(1982)。有人认为广西增城、博罗等县的畲族(约 1 000 人)所说的畲语也属这个语支,但还有不同意见。苗语和布努语都没有塞音韵尾(布努语的壮语借词除外),元音不分长短;名词作限制性修饰语时居后;除个别地区外,量词可以单独修饰名词,表示定指单量;指示词作修饰语时居后。苗语和布努语有相当多的同源词,语音对应严整。举例如下(右上角的数字表示调值,右下角括号内的数字表示调类):



柏格理用苗文书写的
马可福音(1906)

例词	苗语(以贵州毕节大南山话为代表)	布努语(以广西都安梅珠话为代表)
知道	pou ⁴¹	pa ⁴¹
我们	pe ⁴¹	pe ⁴¹
花	paŋ ⁴¹	pen ⁴¹
还(帐)	pou ⁴¹	pa ⁴¹
射	pau ⁴¹	pi ⁴¹
毛	plou ⁴¹	tɬa ⁴¹
四	plou ⁴¹	tɬa ⁴¹
稻	mple ⁴¹	ntɬe ⁴¹
叶子	mplog ⁴¹	ntɬaŋ ⁴¹
舌头	mplai ⁴¹	ntɬa ⁴¹
儿子	to ⁴¹	tun ⁴¹
答	te ⁴¹	te ⁴¹
杀	tus ⁴¹	to ⁴¹
哪	tu ⁴¹	tau ⁴¹

(王辅世)

Minfangyan

闽方言 (Min dialects) 又称闽语,俗称“福佬话”,是汉语七大方言中语言现象最复杂,内部分歧最大的一个方言。

通行地域 闽方言主要通行于福建、广东、台湾三省和浙江省南部以及江西、广西、江苏三省的个别地区。使用人口约 4 000 万。具体地点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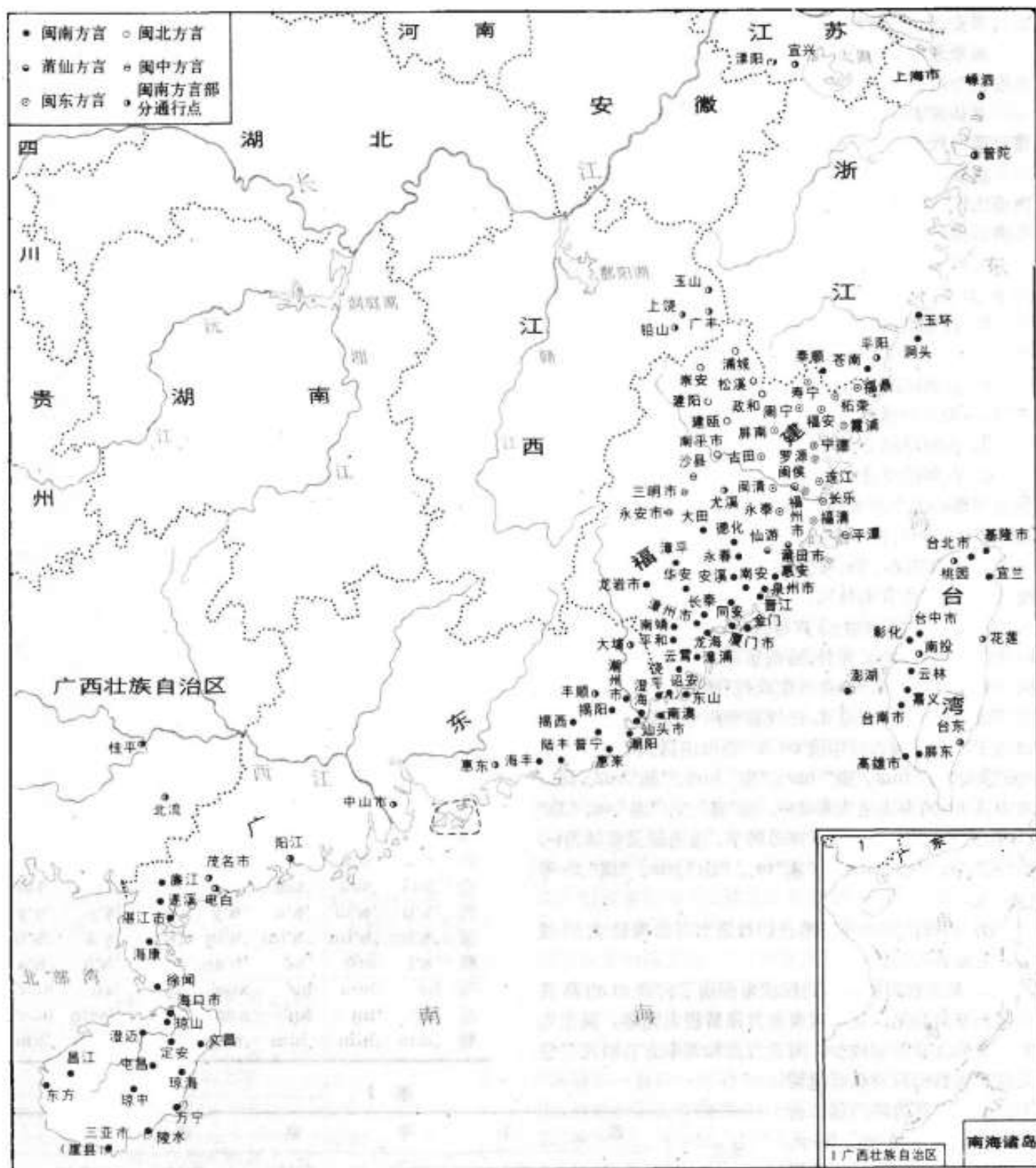
福建省的 54 个县市:福州、闽侯、长乐、福清、平潭、连江、罗源、闽清、永泰、古田、屏南、宁德、霞浦、周宁、寿宁、福安、柘荣、福鼎、莆田、仙游、厦门、金门、泉州、晋江、南安、惠安、同安、永春、安溪、德化、漳州、龙海、长泰、华安、南靖、平和、漳浦、云霄、东山、诏安、龙岩、漳平、大田、尤溪、永安、三明、沙县、建瓯、南平(城关除外)、建阳、崇安、松溪、政和、浦城(南部)。以上地区约占全省面积的 3/4。

广东省东部的 12 个县市:汕头、潮州、澄海、饶平、南澳、揭阳、揭西、普宁、惠来、潮阳、陆丰、海丰等,以及惠东、丰顺、大埔等县的一部分;海南岛的 14 个县市:海口、琼山、文昌、琼海、万宁、陵水、三亚、崖县、琼中、屯昌、定安、澄迈、昌江、东方(少数民族地区除外);雷州半岛的 5 个县市:湛江、遂溪、廉江、海康、徐闻。此外,主要通行粤方言的中山市和阳江、电白等县也有部分区、乡说闽方言。以上地区约占全省面积的 1/3。

台湾省的 21 个县市中,除约占人口 2% 的高山族地区说高山语,台北、彰化之间的中坜、竹东、苗栗、新竹等地和南部屏东、高雄等县市,以及东部花莲、台东的部分地区通行客家方言外,其余各地的汉族居民都说闽方言,约占全省人口的 3/4 以上。

浙江省南部泰顺、苍南、洞头、玉环等县的大部分和平阳县西部的少数地区,以及舟山群岛普陀、嵊泗县的一部分地区也说闽方言。

以上总计通行闽方言的县市约有 120 个以上。此外,



闽方言分布简图

江西省东北角的玉山、铅山、上饶、广丰等县的少数地方，广西省中南部桂平、北流等县的少数地方，江苏省宜兴、溧阳等县的少数地方，也有人说闽方言。散居南洋群岛、中南半岛的华侨和华裔中，数百万人祖祖辈辈也以闽方言作为“母语”。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缅甸以及印度支那各国的华裔社区中，闽方言也是主要的社会交际语之一。

分区 闽方言按其语言特点大致分为5个方言片，闽南方言、闽东方言、闽北方言、闽中方言和莆仙方言。

闽南方言 是闽方言中使用人口最多、通行范围最广的一片。包括福建省内以厦门、漳州、泉州三市为中心的24个县市。福建省以外各地通行的闽方言，基本上也属于闽南方言。闽南方言以厦门话为代表，潮州话、文昌话也分别在广东东部和海南岛有较大的影响。

闽东方言 通行于福建省东部，包括以福州为中心的闽江下游地区和以福安为中心的山区，共18个县市，以福州话为代表。

闽北方言 通行于福建省北部建瓯、建阳、南平(乡

区)、崇安、松溪、政和、浦城(南部),以建瓯话为代表。

闽中方言 通行于福建省中部永安、三明、沙县,以永安话为代表。

莆仙方言 通行于福建省东部沿海的莆田、仙游,以莆田话为代表。

主要语言特征 语音方面 ①声母:各地闽方言的声母比较一致,大都只有15个,称为“十五音”系统。不少声母保留了上古汉语的特点:

a. 没有唇齿声母f,古非敷奉声母字口语中一部分读为p-、p'-,读书音则为h-(或x-),即所谓“轻唇归重唇”。

b. 古知彻澄声母字,多读t-、t'-,即所谓“舌上归舌头”。

c. 古全浊声母並奉定从澄群字多读为不送气清音声母,少数读为送气的也很一致。

d. 古匣母部分字闽方言口语读为k-或零声母。

e. 古照组声母字与古精组字混读。塞擦音声母和擦音声母除闽中方言片永安话有两套外,其余各方言片都只有ts-、ts'-、s-一套(莆仙系的s-转为ʃ-)。

f. 少数古心、邪、书、禅声母字口语中读为ts-、ts'-声母(海南岛闽方言例外)。

g. 少数古云(喻三)声母的字,口语中读为喉擦音h-(或舌根擦音x-)。此外,海南话在声母方面有些特点与闽方言其他地区不同:有近似吸气音的声母ʃ、ɸ,如“边”的声母ʃ,“刀”的声母ɸ,送气塞音声母和送气塞擦音声母趋于消失。闽方言中读t'-、k'-的海南话大都读h-,如“天”hi、“拖”hua、“腿”hui、“空”hoŋ、“阔”hua,闽方言中读ts'-的海南话大都读s-,如“慈”si、“差”sa、“草”sau,此外,闽方言中读s声母的字,海南话又多读为t-,如“三”ta、“心”tiom、“索”to、“山”tua、“霜”to等(表1)。

②韵母:闽方言各地在韵母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主要表现为:

a. 闽方言的韵母不同程度地保留了古音中的鼻音韵尾和塞声韵尾。其中闽南方言保留较为完整,闽东方言、莆仙方言保留较少,闽北方言和闽中方言则几乎已无塞声尾韵而只有鼻音尾韵了。闽南方言的厦门话、台北话都保留了-m、-n、-ŋ、-p、-t、-k、-ʔ等辅音韵尾,例如厦门话:“南”lam、“本”pun、“东”taŋ、“十”ʃap、“植”(一)ʃit、“北”pak、“伯”peʔ。

b. 闽方言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文、白异读现象,闽南方言特别突出,几乎文、白两读各成系统(表2)。

c. 闽方言不少地区(尤其是闽南方言)有丰富的鼻化韵(表3)。

d. 闽方言不少地区没有撮口呼韵母。如闽南方言中的厦门、潮州、台北等地都没有y-韵(表4)。

e. 闽方言中部分地区存在着“双韵尾”的现象,主要表现在闽东、闽北、闽中三个方言区,例如:福州话有eiŋ(并)、aiŋ(垫)等韵母,建瓯话有eiŋ(音)、aiŋ(恩)、ieiŋ(延)、uaiŋ(贩)等韵母,永安话有eiŋ(边)、ieiŋ(扇)、yeiŋ(船)等韵母。

表1 闽方言各地声母特点对照

例字	厦门	潮州	台北	福州	建瓯	永安	莆田
飞	.pe	.pue	.pue	.pui	.xi	.pue	.pue
蜂	.p'aŋ	.p'aŋ	.p'aŋ	.p'uŋ	.p'oŋ	.p'aŋ	.p'aŋ
饭	puŋ'	puŋ'	puŋ'	puoŋ'	pyiŋ'	pm'	pue'
中	.tiŋ	.toŋ	.tiŋ	.tyŋ	.tœyŋ	.təm	.toeŋ
抽	.t'iu	.t'iu	.t'iu	.t'iu	.t'iu	.t'iau	.t'iu
直	tit	tik	tit	tiʔ	te'	'ta	tiʔ
病	pī'	pē'	pē'	paŋ'	paŋ'	pō'	pa'
房	.paŋ	.paŋ	.paŋ	.poŋ	.poŋ	.hm	.paŋ
蹄	.tue	.toi	.tue	.te	.tai'	.te	.te
齐	.ʃue	.ʃoi	.ʃue	.ʃe	'ʃai	.ʃe	.ʃe
除	.tu	.tu	.tu	.ty	'ty	.ty	.ty
姪	kim'	'kim	kim'	keiŋ'	keiŋ'	'kā	kiŋ'
皮	.p'e	.p'ue	.p'e	.p'ui	p'yē'	.p'ue	.p'ue
头	.t'au	.t'au	.t'au	.t'au	t'e'	.t'ə	.t'au
虫	.t'aŋ	.t'aŋ	.t'aŋ	.t'œyŋ	ʃ'aŋ'	.t'aŋ	.t'aŋ
猴	.kau	.kau	.kau	.kau	'ke	'kə	.kau
寒	.kuā	.kuā	.kuā	.kaŋ	'kuŋ	.kum	.kua
滑	kut	kuk	kut	kouʔ	ko	'kui	koʔ
鞋	.ue	.oi	.ue	.e	'ai	.e	.e
话	ue'	ue'	ue'	ua'	ua'	'uo	ua'
黄	.ŋ	.ŋ	.ŋ	.uoŋ	uaŋ'	'm	.uŋ
助	ʃo'	'ʃo	ʃo'	ʃou'	ʃu'	ʃou'	ʃə'
炒	'ʃ'a	'ʃ'a	'ʃ'a	'ʃ'a	'ʃ'au	'ʃ'o	'ʃ'o
山	.suā	.suā	.suā	.saŋ	.suiŋ	.sum	.ʃua
鼠	'ʃ'u	'ʃ'u	'ʃ'u	'ʃ'y	'ʃ'y	'ʃ'y	'ʃ'y
深	.ʃ'im	.ʃ'im	.ʃ'im	.ʃ'ig	.ʃ'eŋ	'ʃ'ā	.ʃ'ig
醒	'ʃ'ī	'ʃ'ē	'ʃ'ē	'ʃ'aŋ	'ʃ'aŋ	'ʃ'o	'ʃ'a
雨	hə'	'hou	hə'	xuə'	xy'	'xu	hou'
远	hŋ'	'hŋ	hŋ'	xuəŋ'	'yiŋ	'ʃyeŋ	hue'
熊	.him	.him	.him	.xyŋ	.xoeyŋ	.ʃiam	.hoeyŋ

表2

地点	歌	干	平	空	流	远
	文/白	文/白	文/白	文/白	文/白	文/白
厦门	.ko/,kua	.kan/,kuā	.piŋ/,pī	.k'oŋ/,k'aŋ	.liu/,lau	'uan/hŋ'
潮州	.ko/,kua	.kaŋ/,kuā	.p'eŋ/,pē	.k'oŋ/,k'aŋ	.liu/,lau	'ieŋ/hŋ
台北	.ko/,kua	.kan/,kuā	.piŋ/,pē	.k'oŋ/,k'aŋ	.liu/,lau	'uan/hŋ'

表3

地点	敢	影	关	边	张	章
厦门	'kā	'iā	.kuāi	.pī	.tiū	.ʃiū
潮州	'kā	'iā	.kuē	.pī	.tiē	.ʃiē
台北	.kā	'iā	.kuī	.pī	.tiū	.ʃiū

表 4

地点	鱼	女	袁	玄	月
厦门	.hi	'lu	.uan	.hian	ge ² .
潮州	.hu	'nuŋ	.ueŋ	.hieŋ	gue ² .
台北	.hu	'lu	.uan	.hian	guat.

③ 声调：闽方言各地都有入声调，声调数目6~8个，以7个为多见。闽南方言的潮州话有八声：平、上、去、入各分阴、阳；闽北建瓯话、闽中永安话都只有六声；闽北是平、上不分阴阳，而去、入分阴阳；闽中是平、上分阴阳而去、入不分阴阳。七个声调的地方遍布闽南方言的厦门、台北、海南、浙南等地和莆仙方言的莆田、仙游，以及闽东方言的福州、福安等地。闽方言中还普遍存在着复杂的音变现象，其中闽南方言、闽中方言有相当整齐的连读变调规律，闽东方言、莆仙方言在连读时音变涉及声母、韵母的变化。表5以潮州话两字组的连读变调为例。

表 5

原 调	变 调 情 况	
调类 调值	作为前一字	作为后一字
阴平 33	变 23	不变
阳平 55	变阴去 213	
阴上 53	变 24	前一字是阴平、阳平、阳上、阳去、阳入时不变 前一字是阴上、阴去、阴入时变为 21
阳上 35	变 21	前一字是阳上、阳去时变 21，前一字是其他声调时不变
阴去 213	后一字是阴平、阳上、阴去、阳去、阴入时变 42 后一字是阳平、阴上、阳入时变阴上 53	不变
阳去 11	变 12	
阴入 21	后一字是阴平、阳上、阴去、阳去、阴入时变 3 后一字是阳平、阴上、阳入时变阳入 4	
阳入 4	变阴入 21	

词汇方面 闽方言有一大批属于本方言区常见而其他方言少见的方言词。这些方言词有两个特点：一是继承古代的语词多，二是单音节词多。例如“卵”（蛋）、“目”（眼睛）、“瘠”（瘦）、“涂”（泥土）、“曝”（晒）、“裯”（袖口）、“拍”（打）等等，都可以从古籍中找到出处，也都是单音节词。此外，也有一部分闽方言词借自外语。这些外来词大

都借自印度尼西亚-马来语，形成了闽方言词汇中的独特色彩，例如厦门话“雪文”（肥皂）来自 *sabon*，“道郎”（帮助）来自 *tolong*，“洞葛”（手杖）来自 *tongkat*，“斟”（接吻）来自 *chium*。也有一些来历不易判明的方言词，例如“坵”（边沿）“嫩”（妻子）、“扬”（抽打）等。在闽方言的五个片中，有许多方言词是各片共有的，但也有不少方言词只存在于某一些地方。大致说来，在五个闽方言片中，闽东、闽南、莆仙三个沿海片词汇上比较一致，而闽北、闽中两个片，则有不少和闽东、闽南、莆仙不一样的语词。表6列举几个各片共有的典型的闽方言词。

语法方面 ①名词附加成分的运用。各地闽语都有词尾“团”（厦门一带称‘a，广东潮州、海南等地闽语称‘kiā或‘kia），大致相当于普通话的“子”（或“儿”），但使用范围很广，除表示小义外，还可以表示其他意义，如厦门话“戏‘a”（戏子，含轻蔑义），“平‘a”（人名，含亲昵义），“兄弟‘a”（弟兄，无附加义）；‘a也可以放在动词、形容词后面，表示附加的意义，例如“帮忙‘a”（稍为帮忙一下），“惹‘a”（傻孩子，形容词名物化）等。此外，还有一些特有的附加成分，如“声”（斤声、钱声）、“仙”（用于某种行业、某种特殊形象的人，如讲古仙，拐脚仙），“路”（“手路”——手艺，“食路”——食品）。部分地区的闽方言（如广东和浙江南部）还有表示小义的双词尾现象，即在“团”后面再加一个“拏”，进一步形容细小的程度，如潮州话：椅团（小椅子）——椅团拏（很小的椅子），海南话：牛团（小牛）——牛团拏（很小的牛）。②人称代词单复数的运用。闽方言各地人称代词的复数多通过语音的变化（在单数后加鼻音尾-n或-ŋ）来表示。例如闽南方言的几个地点（表7）。③数词“一”和指示词“这”、“那”的省略。量词前面的数词“一”或指示代词“这”（“那”）在闽方言中往往可以省略，量词直接与名词组合。例如潮州话：“斤米二角”（一斤米二角钱），“掙本书来”（拿一本书来），“张画雅绝”（这张画很漂亮），“只鸡肥死”（这只鸡很肥）。与此相关，指示代词“这”、“那”不能直接修饰名词，如普通话“这人很好”在闽方言说成“只个人很好”，不能说“只人很好”；同样，“这书”也只能说“只本书”，不能说“只书”。④“形容词—量词—名词”的结构形式在闽方言各地普遍存在，但能和量词直接组合的形容词不多，最常用的是“大”和“细”（小）。例如厦门话“大只牛”、“细泡灯”等。⑤动词“有”的特殊用法。闽方言动词“有”的用法很多，其中之一是放在动词的前面，表示完成时态。例如，福州话“我有收着汝个批”（我收到了你的信），厦门话“伊有食我无食”（他吃了我没吃），台北话：“我有买”（我买了），潮州话“你有睇电影阿无？”（你看了电影没有）。⑥宾语提前的现象比较常见。如“苹果买两斤”（买两斤苹果）的说法就很普遍。普通话“主语—动词—宾语”的句式在闽方言中常加上一个介词“共”（或“甲”），并把宾语提到动词前面，例如“我共汝讲”（我告诉你）。⑦动词“去”常用作补语，表示动作行为已成为结果，相当于“已经”的意思，例如“飞去了”（已经飞了），“死去了”（已经死了），“碗破去了”（碗已

表 6

地点	厝(房子)	箸(筷子)	鼎(铁锅)	冥(夜晚)	较(脚)	创(宰杀)	铰(剪)	必(裂)
厦门	ʂ'u	ti'	'tiā	,mī	,k'a	,t'ai	,ka	pit,
潮州	ʂ'u	tu'	'tiā	,me	,k'a	,t'ai	,ka	pik,
台北	ʂ'u	ti'	'tiā	,bī	,k'a	,t'ai	,ka	pit,
福州	ʂ'uo	'təy	'tiāŋ	,maŋ	,k'a	,t'ai	,ka	peiʔ,
建瓯	ʂ'io	ty'	'tiāŋ	maŋ	,k'a	t'i	,kau	pi,
永安	ʂ'iu	ty'	'tiŋ	,mō	,k'o	,t'i	,ko	pe,
莆田	ʂ'ou	ty'	'tia	,mō	,k'o	,t'ai	,k'o	piə'

表 7

地点	我	你	伊(他、她)	我们、咱们	你们	伊们(他们)
厦门	'gua	'li	,i	'gu(a)n	'lin	,in
台北	'gua	'li	,i	'gun(阮)'lan(俺)	'lin	,in
潮州	'ua	'lu	,i	'u(a)ŋ(阮)naŋ(俺)	'niŋ	,iŋ
浙江平阳	'guə	'lu	,i	'gu(a)n	'lien	,ien

经破了)。⑧特殊的比较方式。闽方言的比较句有特别的结构,福建、台湾的闽方言多用“甲—较—形容词—乙”表示,如厦门话“伊较悬(高)我”,台北话“高雄较大新竹”。也有简单一点的表达方式:“甲—形容词—乙”,如福州话“伊悬(高)我”。广东省内的闽方言(潮州话、海南话)比较的方式略有不同,“甲—形容词—过—乙”如潮州话:“牛大过猪”。闽方言的等式比较,常用形容词“平”的重叠来表示“一样”,如“我共伊平平悬”(我跟他一样高)。⑨“把”字句的表达方式。闽方言“把”字句的表达方式是把宾语提到最前面,后面跟一个“甲伊”(把它)即:“宾语—甲伊—动词”,闽南方言片各地普遍通行这种说法。例如:厦门话:“牛甲伊(kaʔ, i)牵出去”(把牛牵出去),潮州话:“衫裤甲伊(kaʔ, i)收起来”(把衣服收起来)。

附: 闽方言七个地点的声韵调

下面列举福建、广东、台湾三省五个闽方言片七个闽方言点的声韵调。其中闽南方言片三个点:厦门、潮州、台北;闽东方言片一个点:福州;闽北方言片一个点:建瓯;闽中方言片一个点:永安;莆仙方言片一个点:莆田。

声母

地点	边	普	文	门	地	他	泥	柳	争	出	时	日	求	气	语	俄	喜	英
厦门	p	p'	b(m)	t	t'	l(n)	ʂ	ʂ'	s	l(n)	k	k'	g	(ŋ)	h	θ		
潮州	p	p'	b	m	t	t'	n	l	ʂ	ʂ'	s	z	k	k'	g	ŋ	h	θ
台北	p	p'	b(m)	t	t'	l(n)	ʂ	ʂ'	s	z	k	k'	g	(ŋ)	h	θ		
福州	p	p'	m	t	t'	n	l	ʂ	ʂ'	s		k	k'		ŋ	x	θ	
建瓯	p	p'	m	t	t'	n	l	ʂ	ʂ'	s		k	k'		ŋ	x	θ	
永安	p	p'	m	t	t'	n(l)	ʂ	ʂ'	s				k	k'		ŋ	x	θ
							ʂ	ʂ'	ʂ									
莆田	p	p'	m	t	t'	n	l	ʂ	ʂ'	ʂ		k	k'		ŋ	h	θ	

韵母

① 厦门话韵母:

a(家)ɔ(姑)e(稽)o(哥)i(基)
u(居)ai(开)au(交)ia(遮)
io(蕉)iu(周)ua(拖)ue(杯)
ui(规)iau(桥)uai(乖)
am(甘)im(金)iam(兼)ɱ
(怀)an(干)in(新)un(军)ian
(坚)uan(番)aŋ(江)ɔŋ(公)
iŋ(景)iaŋ(漳)ioŋ(恭)ŋ(黄)
ap(角)ip(急)iap(夹)at(察)
it(实)ut(骨)iat(结)uat(发)
ak(角)ɔk(国)ik(极)ioŋ(略)
ā(衫)ɔ(毛)ē(嬰)ī(天)āī
(乃)āū(闹)lā(京)īū(羊)ūā
(寒)ūī(梅)iāū(猫)uāi(关)
aʔ(甲)ɔʔ(呕)eʔ(麦)oʔ(阁)iʔ
(铁)uʔ(托)auʔ(雹)iaʔ(削)

ioʔ(药)uaʔ(活)ueʔ(八)uiʔ(画)

② 潮州话韵母:

l(书)a(阿)e(下)o(奥)u(余)i(衣)u(有)ai(哀)oi(鞋)
au(后)ou(乌)ia(野)ie(腰)iu(幽)iəu(妖)ua(我)ue(话)
ui(为)uai(歪)
am(庵)im(音)iəm(淹)uam(凡)ɱ(姆)
aŋ(安)eŋ(英)oŋ(翁)uŋ(恩)iŋ(因)uŋ(温)iaŋ(央)
ieŋ(延)ioŋ(永)ŋ(黄)
ap(盒)ip(邑)iəp(叶)uap(法)ak(恶)ek(亿)ok(握)
uuk(乞)ik(乙)uk(突)oik(狭)auk(乐)iak(略)iek(逸)
ioŋ(育)uek(越)
ā(柑)ē(橙)ī(园)āī(爱)ōī(闲)āū(好)ōū(虎)lā(影)
lē(样)lū(幼)ūā(碗)ūē(果)ūī(畏)
aʔ(鸭)eʔ(厄)oʔ(托)iʔ(铁)uʔ(口)iaʔ(益)ieʔ(药)uaʔ(话)
ueʔ(划)ēʔ(口)īʔ(口)

③ 台北话韵母:

a(饱)ɔ(刀)ɔ(布)e(坐)i(备)u(富)ai(拜)au(豆)ia(也)
io(少)iu(酒)
iau(朝)ua(破)ue(回)ui(水)uai(怪)
am(痰)im(林)iam(点)ɱ(姆)an(班)in(宾)en(边)
un(本)uan(原)

aŋ(梦)ɔŋ(亡)iŋ(明)iaŋ(番)
ioŋ(章)ŋ(黄)
ap(答)ip(邑)iap(叶)at(力)
it(蜜)iet(别、热)ut(不)
uat(月)ak(北)ɔk(博)ik
(竹)iak(口)ioŋ(育)
ā(担)ī(边)iā(饼)īū(张)ūā
(半)ūī(煤)iāū(猫)
aʔ(鸭)eʔ(白)oʔ(薄)iʔ(碟)uʔ
(托)iaʔ(壁)ioʔ(着)uiʔ(血)

ua²(活)ue²(八)

④ 福州话韵母:

a(家)ɛ(亚)œ(初)o(ɔ)(歌(舌))i(ei)(基(冠))u(ou)(孤(故))y(øy)(顺(通))ai(开)au(交)ɛu(au)(沟(南))øy(ɔy)(催(鼻))ia(遮)io(ie)(鸡(雄))iu(ieu)(秋(寒))ua(花)uo(uo)(锅(过))ui(uoi)(杯(背))yo(yo)(桥(南))uai(歪)

aŋ(山)in(ɛin)(宾(井))uŋ(ouŋ)(春(寸))yŋ(øyŋ)(斤(近))eiŋ(aiŋ)(灯(茎))øyŋ(ɔyŋ)(东(洞))ouŋ(ouŋ)(红(红))iaŋ(声)ieŋ(ieŋ)(天(烟))uaŋ(欢)uoŋ(uoŋ)(光(光))uəŋ(yəŋ)(香(香))ŋ(怀)

a²(鸭)ɔ²(桌)i²(ei²)(亦(古))u²(ou²)(木(曲))y²(øy²)(育(叔))ei²(ai²)(默(八))øy²(ɔy²)(或(角))u²(滑(滑))ia²(额)ie²(ie²)(捷(只))ua²(话)uo²(uo²)(局(局))yo²(yo²)(若(灼))

⑤ 建瓯话韵母:

a(茶)ɛ(脐)œ(儿)ɔ(荷)e(欧)o(梅)i(时)u(吴)y(鱼)ai(犁)au(袄)ia(野)ie(热)io(茄)iu(油)ua(过)ue(麻)ye(蛇)iau(桥)uai(歪)

aŋ(南)ɔŋ(温)in(年)aiŋ(恩)œyŋ(云)eiŋ(音)iaŋ(正)ioŋ(阳)ieŋ(延)uaŋ(黄)uaiŋ(贩)uəŋ(文)uiŋ(安)yiŋ(弯)

⑥ 永安话韵母:

a(海)ɔ(家)e(犁)œ(头)o(包)u(果)l(时)i(衣)u(禾)y(竹)au(刀)ɔu(都)io(遮)ie(椅)iu(小)uo(麦)ue(快)ui(对)ya(纸)ye(吹)yi(木)iau(抽)

ɔm(汤)œm(龙)um(山)ym(咸)iam(穷)m(安)aŋ(工)eiŋ(边)ieŋ(扇)yeŋ(船)

ã(兵)õ(井)ĩ(办)ĩã(针)ĩõ(惊)uã(永)uĩ(问)

⑦ 莆田话韵母:

a(鸦)ɔ(窝)e(鞋)œ(梳)o(思)i(衣)u(夫)y(余)ai(哀)au(交)ɔu(乌)ia(也)iu(油)ua(蛙)ue(歪)ui(威)yo(靴)iuu(腰)

aŋ(安)ɔŋ(翁)ɛŋ(烟)œŋ(渊)oŋ(温)in(英)uŋ(光)yŋ(恩)iaŋ(淹)uaŋ(弯)yɔŋ(央)ŋ(怀)

a²(压)ɔ²(屋)ɛ²(厄)œ²(育)ɔ²(郁)i²(一)y²(役)ia²(叶)ua²(活)yo²(约)

声调

地点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阴入	阳入
厦门	44	24	53		21	22	32	4
潮州	33	55	53	35	213	11	21	4
台北	55	24	53		21	33	21	53
福州	44	52	31		213	242	23	5
建瓯	54		21		33	44	24	41
永安	41	33	21	55	24		12	
莆田	533	13	453		42	11	21(文) 11(白)	4(文) 35(白)

参考书目

罗常培:《厦门音系》,科学出版社,北京,1956。

董同龢、赵荣琅、蓝亚秀:《记台湾的一种闽南话》,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24,台北,1967。

袁家骅等:《汉语方言概要》,第2版,文字改革出版社,北京,1983。

詹伯慧:《现代汉语方言》,湖北人民出版社,武汉,1981。

陈章太、李如龙:《论闽方言的一致性》,载《中国语言学报》第1期,商务印书馆,北京,1983。

陈章太、李如龙:《论闽方言内部的主要差异》,载《中国语言学报》第2期,商务印书馆,北京,1985。

(唐伯慧)

Minyin Yanjiu

《闽音研究》(A Study on Fuzhou Phonetics)

研究闽方言福州话语音的著作,陶燠民(?~1934)著。原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0)第1本第4分。1956年北京科学出版社影印为单行本出版。全书除简单的“序说”外,分为7章,依次介绍了福州话的韵母、声母和声调,仿照国语罗马字拟制的“闽语罗马字”方案,叙述了声母类化律(即辅音在双音词非首音节连读时的同化音变规律)、连读变调规律,用表格形式就福州音和古音、国音作了简略的比较。最后在附录中介绍了福州话的反切语“仓前度”的形式。全书2.5万字,虽然原始材料不够丰富,但记音准确,语音描写细致,叙述简结精当,善于用表格说明问题,对福州话语音的主要特点作了科学的概括。“声调之音质变化”指出平、上声的单元音i、u、y,去声变为ei、ou、øy,平、上声的复元音ei、ou、øy,去声变为ai、au、gy;“声母之类化”列举了上字韵母引起下字声母的同化,例如枇杷[pɪβ<(p)a]、棉袍[mieŋ m<(p)ɔ]、戏台[çie l<(t)ai]、米缸[mɪ(k)ouŋ]等。书中揭示的规律和运用的科学方法对后来的方言研究有重要的启发。

(李如龙)

Mo'erdawelyayu

摩尔达维亚语 (Moldavian language) 属印

欧语系罗曼语族东支,是苏联境内唯一的罗曼语。分布于苏联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乌克兰的一些州。使用人口在250万以上。摩尔达维亚语源于拉丁语。公元2世纪初,罗马帝国占领现在的摩尔达维亚和罗马尼亚一带地方,传播了罗马文化和拉丁语。标准语开始于16~17世纪,形成于19世纪后半叶,20世纪有了规范语法和正字法。有西北、东北、中部和西南4种方言。语音上的特点是有较多的二合元音,分上升的和下降的两种。词汇中斯拉夫语、希腊语借词较多。语法方面,有性、数、格的范畴,词的屈折变化带有可分析的成分,有4种冠词:限定冠词、不定冠词、形容冠词和换喻冠词。最早的文字见于斯拉夫经文的译本(15世纪末~16世纪初)。19世纪以前以基里尔字母为基础,20世纪以来使用俄文字母。

(佟丕礼)

Mosike xuepai

莫斯科学派 (Moscow school) 19世纪

末俄国两个主要语言学派之一(另一个是喀山学派),形成于1880~1890年。创始人是莫斯科大学教授Ф.Ф.

福尔图纳托夫。其他代表人物有 M. M. 波克罗夫斯基 (1868~1942)、B. K. 波尔热津斯基 (1870~1929)、A. A. 沙赫马托夫、A. M. 彼什科夫斯基 (1878~1933)、M. H. 彼捷尔松 (1885~1962)、A. H. 托姆松 (1860~1935)、Д. H. 乌沙科夫 (1873~1942)、Я. M. 恩泽林 (1873~1961) 等。

此派的基本观点有的与德国新语法学派一致,如从心理学立场去理解语言的本质,主张严格运用语音规律。在研究方法上,他们认为,当不知道某一语言变化的出现是由于语音规律还是由于类推作用时,应该先用语音规律去解释,只有解释不通时,才考虑类推作用。但是他们与新语法学派有不同之处:他们强调语言的社会性,把语言看作众多单词和词组的总合;主张区分语言的内部历史与外部历史;重视语言史同社会史的联系,认为社会的变化会引起语言的相应变化(如语言分化、方言合并等);认为不仅思维依赖语言,语言也依赖思维。他们的某些看法同后来的法兰西学派、布拉格学派相近。

在印欧比较语法领域中,莫斯科学派有过一些重要的发现。19世纪90年代,福尔图纳托夫在波罗的-斯拉夫语中,发现了词重音在一定条件下由词首移向词末。这个发现,俄国语言学界称之为“福尔图纳托夫-索绪尔定律”,因为 F. de 索绪尔在同一时期在立陶宛语中也发现了同样的规律。例如动词“〔我〕拿”,梵语 *bhārāmi* 和古希腊语 *fērō* 重音都在词首,而俄语 *беру́* 则重音在词末,这是从词首移过来的。

在普通语法理论方面,福尔图纳托夫提出了一系列不同于前人的观点。他把词的意义分为两类:一类是同客观世界相联系的“现实意义”(词汇意义),另一类是语言本身所具有的“形式意义”(语法意义)。

他认为语法学是研究语言形式的科学,词法学研究单词的形式,句法学则研究词组的形式。词的形式就是词能够分解为“基本部分”(词干)与“形式部分”(词缀)的性能,具备这种性能的词是有形式的词,否则是没有形式的词。一个词能否分解取决于语言内部有无对应关系,即某一形式的存在必须以某些其他形式的存在为前提,这种关系必须通过一定手段表达出来。福尔图纳托夫强调,划分词类应该根据形式标志,而不应以逻辑、意义为依据。他将原始印欧语中的词分为有词形变化的(变格和变位的)和没有词形变化的(不定式、副动词、副词等等),并且认为在其他语言中也可以这样分。

按照他的看法,世界诸语言的形态分类法应该是:①粘着语(如乌拉尔-阿尔泰语);②曲折-粘着语(如闪语);③曲折语(如印欧语);④词根语(如汉语);⑤多式综合语(如美洲印第安语)。他认为词根语中的单词没有形式。

在句法学中,福尔图纳托夫以词组为基本概念,认为句子只是词组的一种,即所谓完整词组(有语法主语和语法谓语),而不完整词组通常只是完整词组的一部分。他强调,句子的语法分析应该不同于判断的逻辑分析。

莫斯科学派的某些观点现在已经被认为过时(如把词的形式仅仅归结为词缀的可分解性等),但是他们摆脱了传统语法的束缚,积极探索语言本身的形式标志,对语法理论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对后来的俄语界影响很大,常被称为形式学派。在国外,他们的理论得到哥本哈根学派 L. 叶尔姆斯列夫的肯定,后者在20世纪20年代指出,莫斯科学派的功绩在于,提出语言中的纯形式范畴问题,反对把语法问题同逻辑、心理问题混为一谈,主张区分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等。

(信德麟)

Mulaoyu

仝佬语 (Mulam language) 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分布在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及其附近的柳城、忻城、宜山等县。使用人口约9万(1982)。声母中清的塞音、塞擦音分不送气和送气两套,无浊塞音,有腭化和唇化声母。有的地方还有清化的鼻音、边音声母。韵母中元音多,部分元音分长短,有15个元音:*a, ǎ, ə, ɛ, ɛː, ɔ, ɔː, e, o, ɤ, i, y, u, w, ɿ*。有8个韵尾:*-i, -u, -m, -n, -ŋ, -p, -t, -k*。有8个调类:6个舒声调,2个促声调。老借词的读音,古“精”组声母大多数读*t, th*,“心”、“邪”也读*t*。虚词和词序为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名词或量词的修饰语,除数量词词组在前外,一般在中心词后。领属性修饰语可以放在前面,指示词在最后。句子的语序是主语在前,宾语在谓语之后,补语一般在宾语后,但有的补语也可在宾语之前。词汇中单纯词大多数是单音词。汉语借词占的比例大,本民族词素和汉语借词组合成词,本民族词和汉语借词并存并用的现象也很常见。借词还有一借再借的现象,例如“白”,有固有词 *cwa⁵⁵*,又有借词 *pa:k¹¹*,还有 *pe:k¹¹thai⁴⁴*“白菜”的 *pe:k¹¹* 和“白色恐怖”的 *pə¹¹*。这说明在吸收借词时是作为一个整体借入的。

(王均)

N

Naxiwen

纳西文 (Naxi writing) 见纳西语。

Naxiyu

纳西语 (Naxi language) 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分布在中国云南省丽江、中甸、永胜、宁蒗、兰坪、维西和四川省盐源、盐边、木里等县。使用人口约24万多。纳西语分西部和东部两个方言。西部方言的大部分地区，辅音都有p、ph、b、mb、t、th、dz、ndz等4类，擦音多分清浊，鼻音一般有m、n、ŋ、ɳ。单元音有i、y、e、a、ɑ、o、u、w、ʌ、ʌɪ。辅音可多达44个，元音可多达12个。语法方面一般使用“主语—宾语—谓语动词”的次序。如果使用表示主语、宾语的助词，可以有7种不同的句式。例如“老虎咬吃牛”可以有7种说法(la³³“虎”，yu³³“牛”，sha⁵⁵ndzu³³“咬吃”)：

- ① la³³ yu³³ sha⁵⁵ ndzu³³
(不用助词，主语在前，宾语在后)
- ② la³³ nu³³ yu³³ sha⁵⁵ ndzu³³
(nu³³表示前边是主语)
- ③ yu³³ la³³ nu³³ sha⁵⁵ ndzu³³
(la³³加上nu³³可放在宾语后)
- ④ la³³ yu³³ to⁵⁵ sha⁵⁵ ndzu³³
(to⁵⁵是表示宾语的助词)
- ⑤ yu³³ to⁵⁵ la³³ sha⁵⁵ ndzu³³
(yu³³带着宾语助词“to⁵⁵”可移前)
- ⑥ la³³ nu³³ yu³³ to⁵⁵ sha⁵⁵ ndzu³³
(nu³³和to⁵⁵两个助词并用)
- ⑦ yu³³ to⁵⁵ la³³ nu³³ sha⁵⁵ ndzu³³
(主宾助词并用，次序更可移动)

形容词用作修饰语，一般在被修饰词后面，如果在修饰的形容词后面加修饰助词ga³³，形容词就得移到名词的前面。如ba³³ba³³(花)，xy³³(红)du³³(一)ba³³(朵)(一朵红花)，xy³³ga³³ba³³ba³³du³³ba³³(红花一朵)。动词的前面加动态助词，表示动作的情貌，如加le³³表示动作的流动性，主要在平面或倾斜面上活动，加ga³³表示由下向上的动态，加the³³或e³³表示动作开始实现，加e⁵⁵表

示疑问。动词后边加me³³引起下文，在动词和名词中间加me³³表示前者修饰后者，ne³³用在动词后面，表示动作的持续，ia³³用在动词后面，表示说话人亲自看见这种动作。se³³用在动词后面表示动作的实现和完成。这种助词，还有许多。

纳西族原有图画文字、象形文字和音节文字。1957年创制了拉丁字母的新文字，现在已根据修订方案试验推行。

参考书目

和即仁、姜竹仪：《纳西语简志》，民族出版社，北京，1985。

(傅懋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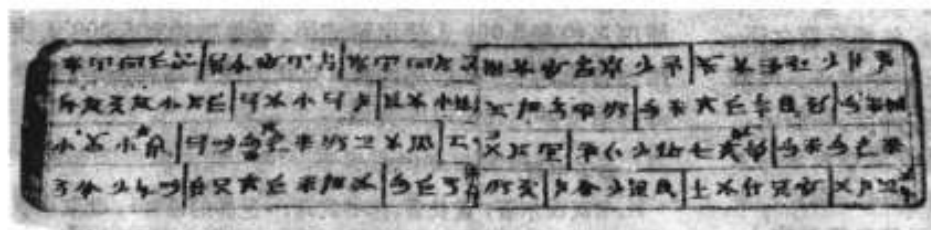
Nandao yuxi

南岛语系 (Austronesian family) 又称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分布于西自非洲东南的马达加斯加岛，东至智利的复活节岛，北自台湾和夏威夷岛，南至新西兰岛。1706年荷兰人H. 莱兰特发现了南岛诸语言的亲属关系。1836年德国人W. 洪堡特使用马来-波利尼西亚语这个术语来称说这个语系的语言。19世纪末德国人W. 施密特(1868~1954)把它们命名为南岛语。一般按地域分成印度尼西亚、波利尼西亚、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4个语族。这个语系主要由太平洋中各大小岛屿上的语言以及亚洲大陆东南端的中南半岛和印度洋中一些岛屿上的语言组成。语言的数目，有人认为有300余种，有人认为多达500余种。使用南岛诸语言的人口约2.5亿。

南岛诸语言属粘着型，词根加附加成分和词根的重叠(或部分重叠)是构词和构形的主要手段，附加成分有前加、中加和后加3类。德国人O. 谭博夫，日本人小川尚义、浅井惠伦、土田滋，美国人L. 戴安等都对古南岛语语音作了拟测。常用词大多为双音节。语法特点：人名、普通名词、方位名词分别加不同的冠词。代词有人称和数的范畴，第一人称复数有包括式和排除式的区别。动词有时、体、态、式等范畴。数词有十进位、五进位、四进位等计数法。大多数词根既能用作名词，也能用作动词。词序往往随着谓语的性质而变动，谓语有的语言出现在句首，有的语言出现在主语之后。

印度尼西亚语族 分布在加里曼丹、苏门答腊、爪哇、菲律宾、台湾、苏拉威西、马都拉、安汶、帝汶、马达加斯加等岛和马来半岛。包括中国台湾的高山族语言，印度尼西亚的印度尼西亚语、爪哇语、巽他语、马都拉语、米南卡保语、亚齐语、巴塔克语、布金语、巴厘语，马来西亚的马来语，菲律宾的他加禄语、比萨扬语、伊洛卡诺语、

比科尔语、邦板牙语、邦阿西楠语、伊戈罗特语、马罗瑙语，马达加斯加的马达加斯加语，越南的嘉莱语、拉德语，越南和柬埔寨的占语等。印度尼西亚语和马来语极为相近。印度尼西亚语的辅音有p、b、m、w、t、d、n、r、l、s、tj、dj、j、k、g、ŋ、h、nj、sj，元音有i、e、é、è、a、o、ó、u、ai、éi、au、



用哥巴文书写的纳西族神话《创世记》片段

ou; 重音一般在词的最后一个音节上。名词有专有人名名词、普通人名名词、专有物名名词、普通物名名词、物质名词、抽象名词之分。代词除有人称、数、格等语法范畴外,还有亲属式和社交式的区别。动词有态、时、体、式等语法范畴。形容词的级分同等级、不等级和最高级。这些语法范畴通过附加成分(前加、中加、后加)、助词或词根的重叠表示。词序一般主语在前,谓语在后,宾语在谓语之后,定语和状语在中心词之后。印度尼西亚语和马来语都有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文字,但设计略有不同。使用印度尼西亚语的超过1亿人,使用马来语的约1000万人。爪哇岛的中部和东部约有4500万人使用爪哇语,老爪哇文约在9世纪从印度南部传入,新爪哇文采用拉丁字母。爪哇岛的西部约有1300万人使用巽他语,巽他人采用老爪哇文,也采用拉丁字母的巽他文。爪哇岛东部和马都拉岛上约有800万人使用马都拉语,东部有一种苏曼尼波方言,作为教育上的标准方言。马都拉人传统上用老爪哇文,现改用拉丁字母的马都拉文。苏门答腊岛约有300万人使用米南卡保语,约有200万人使用亚齐语。苏门答腊岛的北部、中部和东部沿海一带约有150万人使用巴塔克语。巴塔克语原有16个基本字母的老巴塔克文,现改用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文字。苏拉威西西南的半岛上约有250万人使用布金语。布金文起源于老爪哇文。巴厘岛约有200万人使用巴厘语。菲律宾吕宋岛的中部和西南部包括马尼拉市在内约有1000万人使用他加禄语。他加禄文采用拉丁字母。菲律宾群岛中部的比萨扬语是宿务语、希利盖农语、萨马兰语的合称。宿务岛、保和岛、内格罗岛的东部、莱特岛的西部和棉兰老岛的北部约有800万人使用宿务语。班乃岛和内格罗岛的西部约有300万人使用希利盖农语。萨马岛和莱特岛的东部约有150万人使用萨马兰语。吕宋岛北部约有300万人使用伊洛卡诺语。比科尔半岛约有200万人使用比科尔语。吕宋岛上马尼拉西北的邦板牙省约有65万人使用邦板牙语。邦阿西楠省约有50万人使用邦阿西楠语。吕宋岛中部偏北的高山省约有25万人使用伊戈罗特语。明达瑙岛约有40万摩洛人使用马罗瑙语。菲律宾大多数语言辅音有p、b、m、w、t、d、l、r、n、s、j、k、g、ŋ、h、q,元音有i、a、u、ə。语法上有复杂的态和格系统,通过加附加成分、加助词、短语换位、重音转移等不同方式表示。马达加斯加岛约有700万人使用马达加斯加语,他们是大约1500~2000年前来自印度尼西亚移民的后裔,其中500万人说梅里纳方言,这是官方语言。越南和柬埔寨约有15万人使用占语。中国台湾的中部山区和东部沿海纵谷平原约有20余万人使用高山族语言,包括泰耶尔语、赛德语、邹语、卡那卡那布语、沙阿鲁阿语、排湾语、阿眉斯语、布嫩语、鲁凯语、卑南语、赛设特语、邵语、耶眉语。

波利尼西亚语族 分布在国际日期变更线以东,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新西兰、萨摩亚、汤加、纽埃、库克、土阿莫土、马克萨斯、瓦利斯、夏威夷、复活节岛等岛屿上。包括毛利语、萨摩亚语、乌维亚语、汤加语、纽埃语、拉罗

通加语、塔希提语、土阿莫土语、马克萨斯语、夏威夷语、拉帕努伊语等共约100多种语言、方言和次方言。波利尼西亚语族语言的辅音有p、t、k、m、n、ŋ、l、r、f、w、s、h、ʔ,元音有a、e、i、o、u,但长短元音是不同的音位。语法特点是名词前有不定冠词和定冠词,名词的复数在前面加特殊的助词,物主代词有独立形式,数词一般是十进制计数法(夏威夷语和马克萨斯语保存着古老的四进制计数法),形容词的级用句法形式表示,动词有时、体、态、式等语法范畴。谓语一般出现在句首。新西兰北岛现有20万毛利人,大约有一半使用毛利语。毛利文采用拉丁字母。萨摩亚群岛的西萨摩亚有12.5万人,东萨摩亚有2.5万人使用萨摩亚语。萨摩亚文采用拉丁字母。塔希提岛约有5万人使用塔希提语。塔希提文采用拉丁字母。汤加群岛约有7.5万人使用汤加语。汤加文采用拉丁字母。夏威夷群岛上目前约有7500人使用夏威夷语。夏威夷文采用拉丁字母。瓦利斯群岛约有5000人使用乌维亚语。纽埃岛约有5000人使用纽埃语。库克群岛约有5000人使用拉罗通加语。土阿莫土群岛约有5000人使用土阿莫土语。马克萨斯群岛约有5000人使用马克萨斯语。

美拉尼西亚语族 分布在赤道以南,太平洋西南斐济、新几内亚、俾斯麦、所罗门、圣克鲁斯、新喀里多尼亚、新赫布里底等岛屿上,包括斐济语、安布里姆语、利富语、莫图语、雅比姆语等。语言除有南岛语系的一般特征外,辅音有齿间音θ、ð,软腭化音kw、gw、pw、bw、kbw、kpw、gbw。有二合元音ae、ai、au、oi。名词按表示的事物对所有者关系的亲疏可分成两类。数词有五进制计数法。动词有人称和数的语法范畴,用加短尾代词表示。斐济岛约有20万人使用斐济语。斐济文采用拉丁字母。

密克罗尼西亚语族 分布在赤道以北和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马里亚纳、马绍尔、加罗林、关岛、吉尔伯特、特鲁克、波纳佩、帕罗、雅浦、瑙鲁、帛琉等岛屿上,包括马绍尔语、查莫罗语、吉尔伯特语、特鲁克语、波纳佩语、帕罗语、雅浦语、瑙鲁语、乌利蒂语、库赛语、塞班语、耶鲁脱语。语言的特点:有软腭化辅音,有元音同化现象。名词有数和领属格范畴。人称代词有复杂的数和分类系统。动词或动词前的时态助词加前加成分表示人称和数。马绍尔群岛约有2万人使用马绍尔语,马绍尔文采用拉丁字母。关岛约有4万人使用查莫罗语。查莫罗文也采用拉丁字母。吉尔伯特群岛约有4万人使用吉尔伯特语。特鲁克群岛约有2.5万人使用特鲁克语。波纳佩岛约有1.5万人使用波纳佩语。帕罗群岛约有1万人使用帕罗语。雅浦群岛约有5000人使用雅浦语。瑙鲁岛约有5000人使用瑙鲁语。加罗林群岛约有4000人使用乌利蒂语。库赛岛约有3600人使用库赛语。

参考书目

K.卡茨涅尔著,黄长著,林书武译:《世界的语言》,北京出版社,1980。(K. Katzner,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Funk and Wagnalls, New York, 1975.)

O. Dempwolff, *Vergleichende Lautlehre des Austronesischen Wortschatzes*, Zeitschr. F. Eing-Spr, Berlin, 1934~1938.

崎山理:《南岛語研究の諸問題》, 株式会社弘文堂, 東京, 1974。

C. A. Токарева, С. П. Толстова, *Народы Австралии и Океании*,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издательства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Москва, 1956.

I. Dyen, *The Austronesian Languages and Proto-Austronesian*, Current Trends in Linguistics, 1971.

(陈 康)

Nanya yuxi

南亚语系 (Austro-Asiatic family) 旧称澳斯特罗-亚细亚语系。分布在南亚和东南亚, 如中南半岛、马来半岛、印度中部、东北部和尼科巴群岛, 以及中国云南的西南部。约包括 150 种语言, 其中多数语言各有许多方言, 使用人口约 4 000 万。南亚语系通常分为 4 个语族: 孟-高棉语族、蒙(扪)达语族、马六甲语族和尼科巴语族。

孟-高棉语族是 4 个语族中包括语言最多(约 100 种)、使用人数最多(约 3 500 万)、地理分布最广的语族, 分布于从印度东北部到柬埔寨和越南等东南亚许多地区。主要语言有越南语、高棉语、孟语、巴拿语、帕科语、克木语、佤语、德昂(原称崩龙)语、塞当语、奇劳语、比尔语、布朗语等。

蒙达语族是南亚语系中的第二大语族, 主要分布于印度中部和东北部。包括 10 余种语言, 主要有桑塔利语、蒙达里语、库尔库语、喀里亚语。

马六甲语族分布于马来西亚的大陆地区和泰国的最南端, 从地理上讲, 该语族的语言跟南亚语系其他语言是隔绝的。包括 10 余种语言, 主要有塞芒语、萨凯语、雅昆语、塞诺语。

从前认为尼科巴语族只有一种语言——尼科巴语, 现在有的语言学家则认为它包括近 10 种语言, 但使用人口都很少, 总共不过 1 万人左右。分布于安达曼群岛南部的尼科巴群岛和苏门答腊西南部。语言有卡尔语、乔拉语、特雷萨语等。

语音方面, 南亚语系诸语言的主要特点是辅音系统比较整齐。塞音清浊的对立比较普遍, 有独立的清音送气系列。在孟-高棉语族的不少语言中, 有内爆发音作为前声门化鼻音和流音的情况。词尾塞音常常是不除阻的。元音系统比较丰富, 元音常区分为高、前、中、后 4 级。长元音很普遍, 但鼻元音不常见。除越南语等少数语言有声调外, 南亚语系诸语言通常都不是声调语言。

语法方面, 句子的一般语序为主语—动词—宾语, 但蒙达诸语言却是主语—宾语—动词, 形容词通常跟在它所修饰的名词后面; 句法中也使用唯被动结构, 常用前置词而不用后置词; 等等。

词汇方面, 词的结构通常是一个主要音节, 有时前面可再加上一个次要音节。主要音节的组成是“(辅音)—辅

音—元音—辅音”; 次要音节是“辅音—元音”或一个音节辅音。大多数词根都是单音节的。前缀和中缀较普遍, 但后缀不普遍, 蒙达诸语言和尼科巴诸语言例外。蒙达诸语言的形态变化比较复杂, 但越南语却没有形态变化。南亚语系诸语言常常从邻近的或有影响的大语种借词, 如越南语向汉语借词, 孟语和高棉语向梵语和巴利语借词, 同时失去许多原先固有的词。动物名称往往是禁忌词语, 因而多使用别称。通常以某个亲属词, 如“大叔”、“爷爷”之类来称呼它们, 后接描述该动物的双关语。经过若干时间, 别称变成标准称呼, 正规名称反而逐渐消失。

文字方面, 孟语和高棉语的文字传统最古老。字母形状和书写原则都来自印度文字。尚存的最古老的铭文、碑文是古孟语(6 世纪)的文字, 其次是 7 世纪前后古高棉语的文字。越南语在 8 世纪以前采用汉字, 20 世纪初改用拉丁文字, 外加一些符号和调号。南亚语系其他大多数语言只是近百年来才有文字。

参考书目

M. Ruhlen, *A Guide to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1975, 1976.

C. F. Voegelin and F. M. Voegelin, *Classification and Index of the World's Languages*, 1977.

(李道勇)

neiwalzhuan

内外转 早期韵图把所列各图划分的两大类。“转”, 梵文 parivarta 有两个意义, 一个是动词, 一个是名词。日本释安然(9 世纪人, 生卒不详)《悉昙藏》四说: “……如用 ka 字声对 a 阿 i 伊 u 瓠等十二韵呼之, 则生得下 ka 迦 ki 机 ku 钩 矩 矩反等十二字。次用 kha 字……得 kha 佉 khi 欺 khu 丘 丘反……ku 迦 迦合成矩音……迦 迦合成臚(鸡)音……。”这就是说, 用一个辅音轮流跟 12 个元音拼, 用 33 个辅音轮流跟所有元音拼都叫“转”。安然又说: “前十七章于三十四体文字母次第为体, 以一十二悉昙音韵次第为转。”这个“转”就是“轮转”的“转”。唐代玄奘(602~664)《大唐西域记》说: “详其文字, 梵天所制, 原始垂则: 四十七言。”安然说的元音 12 是 14 的略本, 辅音 34 是后代悉昙体(通用的是天城体)加了一个有特别写法的双辅音字母 ks。所以安然数的跟经典梵文不合。安然《悉昙十二例》说: “诸合字中有异呼法……或于多少上字随呼下转音, 余十一转呼摩多(主元音)音。”这就是说辅音群不但最后一个要受元音的逆同化, 别的也要受逆同化, 作下头的元音的势。唐智广《悉昙集记》刻石本举的例有“rku 欧鹿苟上……”, 说明在发 r 音的时候已经作圆唇势了。这个“转”是“转变”的“转”。以上两种意义, 都用动词义。梵文 parivarta 又是名词, 意义等于汉语的“章”、“篇”。一“转”就是印度悉昙的一章。

“内转”、“外转”的“内”和“外”究竟是什么含义, 明代吕维祺(1587~1641)《同文铎》说: “按内外之分, 以第二等字论也。二等别母无字, 惟照二有字, 谓之内, 以字少拘于照之内也。二等各母具有字谓之外, 以字多, 出于照之外也。”这些话似乎沿用《四声等子》文, 该书说: “今

以深曾止宕果遇流通括内转……江山梗假效蟹咸臻括外转……。”这只摆出了现象,并没说出“内”、“外”的真正含义,反倒把“内”改成“照之内”,“外”改成“照之外”,恐怕不是最初立名的原义。

后代有人不满意这种解释,就用现代人拟测的《切韵》音去解释“内”、“外”两个字。罗常培《释内外转》(《史语集刊》四本二分)说:“……所谓内转者,皆含有后元音[u]、[o],中元音[ə]及前高元音[i]、[e]之韵,外转者皆含有前元音[e]、[ɛ]、[æ],中元音[ɐ]及后低元音[a]、[ɔ]之韵。”并且附图如左。又说:

“线(指虚线)以上之元音非后即高,后则舌缩,高则口窄,故谓之‘内’;线以下之元音非前即低,前则舌舒,低则口侈,故谓之‘外’。”又说:“‘转’与‘啞’实即一字,于此应训唱诵。”这个说法和佛教徒的“转读”实践不合。王力认为“那纯然是以后人的语音学观点来解释,说服力不强”(《汉语音韵》)。所以说,这个问题还没有定论,只是相传的名称,有时候便于称说罢了。(俞敏)

Nibo'eryu

尼泊尔语 (Nepali language) 尼泊尔的主要民族语言之一,尼泊尔的官方语言。属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印度语支。除分布于尼泊尔外,在印度、不丹和锡金也有数量不等的使用者。使用人口超过800万。尼泊尔古代的文学语言形成于14世纪。18世纪廓尔喀族崛起,形成了现代尼泊尔王国的基础,因此尼泊尔语有时也称为廓尔喀语(Gorkhali)。一般地说,尼泊尔语和克什米尔语及印度拉贾斯坦邦的地方语言相似(见克什米尔语、古吉拉特语)。然而,尼泊尔语的语音仍保留着古代印度语言的某些重要特点;比如它仍有卷舌音 *utt*h (骆驼,孟加拉语作 *ut*) 和浊送气音 *bhat* (饭,孟加拉语、古吉拉特语也作 *bhat*,但克什米尔语作 *bati*)。由于尼泊尔全国过半数人口使用藏缅语言,尼泊尔语受藏缅语言的影响很深,尤其在词汇方面。尼泊尔语的文字采用梵文天城体。(周流溪)

Nikeba yuzu

尼科巴语族 (Nicobarese group) 见南亚语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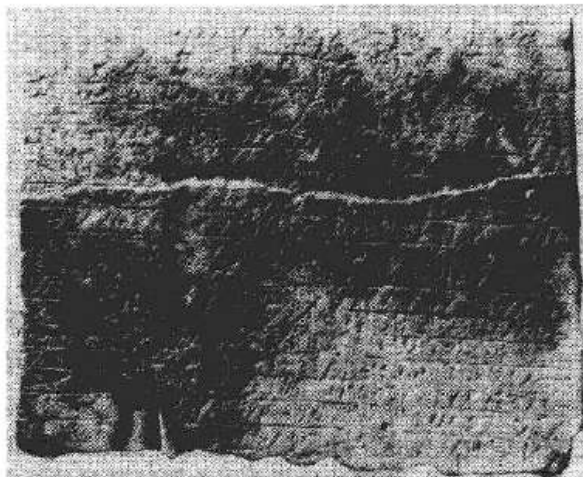
Niluo-Sahala yuxi

尼罗-撒哈拉语系 (Nilo-Saharan family)

分布于东非以及中部非洲以东地区的一组语言。使用人口2500~3000万。包括4个语族和两种独立的语言:沙里-尼罗语族、撒哈拉语族、马巴语族、科马语族以及富尔语和桑海语。

沙里-尼罗语族也称大苏丹语族。按照美国语言学家

J. H. 格林伯格的区分法,沙里-尼罗语族分为4个语支:库纳马语支、伯尔塔语支、中苏丹语支和东苏丹语支。但通常只分为东苏丹语支和中苏丹语支。主要语言有肯尼亚的卢奥语、苏丹的努埃尔语,还有马萨依语、萨拉语和努比亚语。大多数都是声调语言,词和语法形式都由声调高低去区分。中苏丹诸语言一般只有开音节(词尾为元音),其他沙里-尼罗诸语言则既有开音节,又有闭音节(词尾为辅音)。中苏丹诸语言有软腭-圆唇辅音 *kp* 和 *gb*,这是它们和其他沙里-尼罗诸语言的不同点。许多语言分齿塞音、齿龈塞音或卷舌闭塞音,一些语言分内破裂音和破裂音。大多数语言的元音系统丰富,元音一般有7个或更多。许多语言元音有长短之分。中苏丹语支的一些语言有鼻元音。语法方面,都没有名词类别;有些语言有语法上的性,有些语言则没有。几种语言的代词第一人称复数分为内包人称代词(包括听者在内)和外排人称代词(不包括听者在内)两种形式。几乎所有沙里-尼罗语



努比亚语碑文(约公元前50年)

言的名词都有单复数之分,有些语言用前缀,大多数语言用后缀表示。东苏丹语支的一些语言用后缀,也用声调变化、元音的长短或不同的元音音质表示单复数。努比亚语从古代起就有文字。肯尼亚、乌干达和苏丹的一些沙里-尼罗语言采用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文字。

撒哈拉语族分布于乍得湖以北和以西广大地区。主要语言为卡努里语,通行于尼日利亚东北部。马巴语族和科马语族均包括一些使用人数很少的语言,分别通行于乍得和埃塞俄比亚-苏丹边境地区。富尔语分布于苏丹西部。桑海语分布于马里的尼日尔河流域和尼日尔西南部。

参考书目

E. A. Gregersen, *Language in Africa*, Gordon and Breach, New York, 1977.

J. H. Greenberg, *Languages of Africa*, Mouton, The Hague, 1963.

(林书武)

Niri'er-Gangguo yuzu

尼日尔-刚果语族 (Niger-Congo group)

见尼日尔-科尔多凡语系。

Niri'er-Ke'erduofan yuxi

尼日尔-科尔多凡语系 (Niger-Kordofanian family) 非洲最大的语系。分布地区从非洲西部的塞内加尔,穿过上几内亚高原区到东部的肯尼亚,然后向南直到大陆南端的好望角,约有 900 种语言。使用人口有 2 亿多。

尼日尔-科尔多凡语系是美国语言学家 J. H. 格林伯格 1963 年提出来的划分概念,包括科尔多凡语族和尼日尔-刚果语族。前者只有几种语言,分布于苏丹科尔多凡省的努巴山区;后者是大语族,包括 6 个语支:西大西洋语支,43 种语言;曼迪语支,26 种语言;古尔(也称沃尔特)语支,79 种语言;库阿语支,73 种语言;阿达马瓦-东部语支,112 种语言;贝努埃-刚果语支,557 种语言。

西大西洋语支 分布于塞内加尔、几内亚和塞拉利昂。最重要的语言有弗拉尼语和沃洛夫语。弗拉尼语是游牧民族使用的语言,使用人口多达 600 万。乍得也有人使用这种语言。西大西洋语支的主要语言特点是:词尾、词首的辅音同时发生变化,以表示语法范畴,弗拉尼语尤其突出。

曼迪语支 是尼日尔-刚果语族中最小的语支,分布于马里、尼日尔、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等国。主要语言有班巴拉语、门得语、马林凯语和克培列语。主要语言特点是:①分自由名词和依附名词两类,后者如亲属词或身体部位名称。②都是声调语言,但声调区别话语意义而不是词的意义。门得语和克培列语使用音节文字,有几种语言使用以音节文字为基础的文字。

古尔语支 分布于布基纳法索和加纳北部地区。主要语言有莫西语,使用人口近 400 万。此外还有加纳、多哥和布基纳法索的古尔马语,加纳的达戈姆巴语以及马里和科特迪瓦的塞努佛语。主要语言特点是:名词中各类别的变化,通过同时添加前缀、后缀来表示,其中后缀最重要。这一点跟西大西洋语支诸语言相类似,但这里不是辅音交替,而是整个音节发生变化。在句子结构中用不同的后缀来区分部分动物名词、液体名词的类别。

库阿语支 分布于几内亚湾,从科特迪瓦往东,直到尼日利亚。主要的语言有尼日利亚的约鲁巴语和伊博语,每种语言的使用人口都在 600 万以上;还有加纳的特威语、加纳和多哥的埃维语、贝宁的丰语,每种语言的使用人口都在 100 万以上。库阿诸语言各有各的特点,有的语言的词有清楚的声调,有的语言则几乎完全失掉声调。大多数语言的词通常都很短,名词以元音开始。专有名词往往很长,都是复合词或几个词构成的短语。

阿达马瓦-东部语支 分布于从尼日利亚中部往东,经过喀麦隆、中非、扎伊尔北部,直达苏丹西部的大片地区。主要语言是桑戈语,这是中部非洲的交际语。它是一种简化了的语言形式,深受法语以及乌班吉河流域许多部族语言惯用法的影响。人们对这个语支的其他语言所知甚少。

贝努埃-刚果语支 它所包括的语言比上述语支的

语言总数还要多,分布地区也很广。从西海岸的尼日利亚到东海岸的坦桑尼亚,远至南部非洲,都有人使用贝努埃-刚果诸语言。班图诸语言是贝努埃-刚果语支最重要的分支,使用人口 1 亿左右。班图诸语言在所谓“班图线”以南地区通行,这条线从西边的喀麦隆一直延伸到东边的肯尼亚。从使用人口和地理分布来看,贝努埃-刚果语支和班图分语支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斯瓦希里语是最重要的班图语言,也是东非大部分地区使用的交际语。其他主要的班图语言有扎伊尔的卢巴语、刚果语和林加拉语;肯尼亚的吉库犹语;卢旺达的卢旺达语;布隆迪的隆迪语;乌干达的卢干达语;马拉维和赞比亚的尼昂加语;赞比亚的别姆巴语;津巴布韦的绍纳语;博茨瓦纳和南非的茨瓦纳语;莱索托和南非的索托语以及南非的祖鲁语和柯萨语。在班图诸语言中,使用人口超过 100 万的语言除斯瓦希里语外,还有祖鲁语、柯萨语、绍纳语、卢干达语和刚果语等 14 种。

班图诸语言最值得注意的特点是:它们的名词类别系统都一致。也称为“押头韵的”一致关系,因为句子中邻接词的词首,都有相同的音节作为前缀。除了斯瓦希里语之外,其他班图语言都是声调语言。关于班图诸语言的声调,还有一种特殊现象,即存在着一个“相反声调区”。这个地区以刚果西部为中心,这里的语言词和句子的声调,与其他地区班图语言的声调正好相反,高调变成低调,低调变成高调。有些语言的前缀由一个音节构成,另一些语言的前缀由两个音节构成。南部非洲的班图语言从邻近的布须曼语和霍屯督语借来吸气音,祖鲁语和柯萨语尤其多。

参考书目

E. A. Gegeresen, *Language in Africa*, Gordon and Breach, New York, 1977.

J. H. Greenberg, *Languages of Africa*, Mouton, The Hague, 1963.

(林书武)

nlaochongshu

鸟虫书 古汉字一种书体的名称。又名虫书、鸟书、鸟篆、鱼书。公元前 6 世纪至公元 2 世纪有鸟虫书。古人称鸟为羽虫,鱼为鳞虫,所以虫书可以包括鸟书和鱼书(图 1)。

鸟虫书是一种美术字体,其初只是为了美观,后来因为它笔画复杂,花样繁多,难于仿造,也用它写证件。大体都是用当时流行的篆书字体为骨干,任意加以改造和装饰,开始是作一些鸟或虫的形状连续在笔画上,常露出字形之外,不难辨认。后来逐渐发展成鸟虫在笔画之间,或即用鸟虫代替笔画。鸟虫的形状“随体诘屈”,和篆书字体很合谐,容易取得美观的效果(参见彩图插页第 4 页)。这种字体不能按照许慎六书分析解说,在中国文字学史上是一个骈枝。

中国青铜器时代末期,铜器上时用鸟虫书作为纹饰,常见于戈矛剑之类,钟铭也有,较早的有,吴王子于戈,吴

王僚即位(公元前526)前作(图2),楚王孙渔戈,楚司马子鱼(卒于公元前525)作,宋公栾戈(公元前514~前451),楚王舍璋戈(公元前488~前435),蔡侯产剑(公元前471~前457),越王勾践剑(公元前496~前465),越王者旨於赐矛(公元前464~前459),越王者旨於赐钟(公元前464~前459)。这些都是吴、楚、宋、蔡、越国之物,从地理看鸟虫书大约发生在长江中下游一带。许慎《说文解字·叙》列举



图1 鸟虫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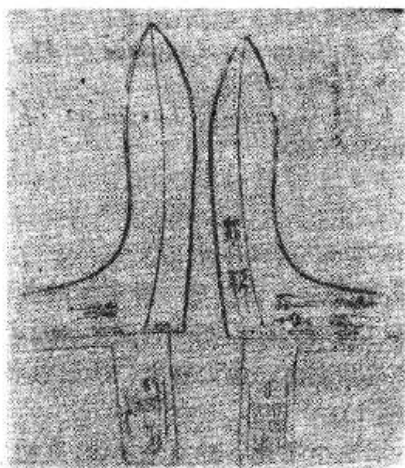


图2 吴王子于戈

秦书八体,“四曰虫书”,又举新莽时的六书,“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秦的虫书列在“刻符”和“摹印”之间,大约也是书幡信用的,所以能列为国家的通用字体之一。汉代印章有许多鸟虫书,当是为了谨防假冒。至于铜器(例如河北省满城县中山王墓出土鸟虫书壶)、瓦当(例如“永受嘉福”当)所见,则纯属装饰性质。东汉灵帝爱好书法,光和元年(178)二月,始置鸿都门学生,敕州、郡、三公举召能为尺牍辞赋及工书鸟篆者相课试,多至千人(见于《后汉书》及注)。鸟虫书是依附篆书发展起来的,在东汉篆书已是末路,鸟虫书失去了凭借,虽经皇帝提倡并无起

色,没留下什么字迹。魏晋以下通行楷书(真书),有的著名书法家也作鸟篆,只是仿古,没有实际用处。唐代武则天爱好书法,所作《升仙太子碑额》,以楷书为本,笔画上加一些鸟形,极不调协,怪异丑恶,无人仿效。

(张政煌)

Nuyu

怒语 (Nu language) 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语支未定。分布于中国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碧江、福贡、兰坪以及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等县。使用人口约1.8万(1982)。此外,还分布于缅甸喀钦邦北部恩梅开江流域。语言特点(以碧江县知子罗话为代表):有60个声母,其中单辅音声母45个,塞音、塞擦音、鼻音分清浊,擦音分送气与不送气;有15个复辅音声母,如pa, fa, ga, ma, na等;有85个韵母,其中单元音韵母38个,复元音韵母47个。元音分松紧,有鼻化元音和卷舌元音,无辅音韵尾。有4个声调:55、53、35、31。虚词和词序为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在指人的名词后加后加成分表示复数,在名词前加前加成分表示不同人称的人称领属。量词很丰富。人称代词变换韵母表示主格和领格,第一人称双数和多数分包括式和排除式,人称代词重叠表示反身,疑问代词重叠表示复数。动词有体、态、式、方向等语法范畴,分别用屈折变化、加附加成分及谓语助词等方式表达。助词有结构、谓语、语气3类,结构助词又分领属、施动、受动、处所、从由、比较、性状等。句子基本语序为主语—宾语—谓语。构词方式以复合为主,派生为辅。四音格词较丰富。借词主要来自汉语和傈僳语,少量来自白语和缅甸语。

(孙宏开)

Nuzhenwen

女真文 (Jurchen script) 中国金代女真人创制的文字。据《金史》记载,金太祖阿骨打命完颜希尹仿契丹字和汉字制女真字,于天辅三年(1119)颁行。20年后,金熙宗完颜亶又制女真字,于天眷元年(1138)颁行。前者称为女真大字,后者称为女真小字。但《金史》上关于女真大、小字的区别没有明确记载。传世的女真文(包括金代碑碣、墨迹和明代《译语》)主要是一种与方块汉字相似的单文。而日本《吾妻镜》所载的“银筒铭”女真文和1977年苏联滨海地区赛金古城出土的金代银牌女真文都是把两个单字并写在一起的。中国明代《方氏墨谱》和《弇州山人四部稿》中,又有上下叠写的女真文,于是学术界认为这种并写或叠写的女真文颇似契丹小字,或者就是女真小字。1973年陕西西安文物管理委员会在石台《孝经》碑中心的石柱卯眼内发现金人手书《女真字文书》残页(图1)以后,更加强了这种看法。一般以为女真文最初是表意字,继而为了适合女真语的语法特点,创制了词干字和词缀字,最后发展为按音拼写的文字,即金熙宗所制的女真小字。金世宗以后,废除并写、叠写,统用单文直书。

女真文创制后,主要用于官方文件。12世纪后期才

以女真文译汉文经书。金朝灭亡(1234)后,女真文仍通用于中国东北的女真各部,至15世纪中叶始废。传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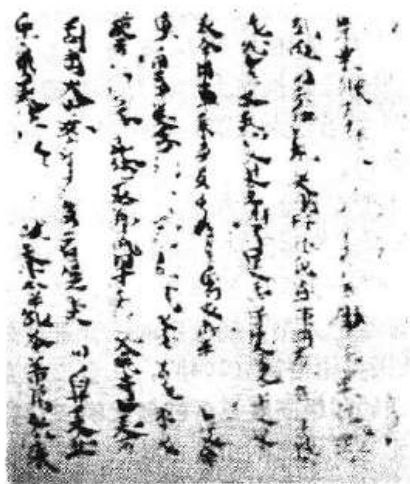


图1 《女真字文书》残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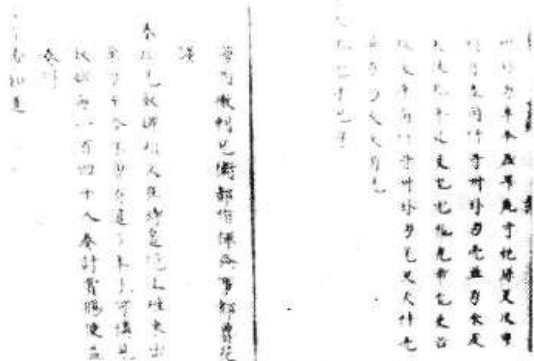


图2 《女真译语》来文部分

女真文文献有华夷译语、女真馆来文和杂字以及石刻、符牌、印章、器物铭文等。(参见彩图插页第30页)

(金启琮)

Nuowelyu

挪威语 (Norwegian language)

挪威的官方

语言。属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北支(又称斯堪的纳维亚语支)。使用人口除本国的420万外,移居美国的挪威人中约有60万。

挪威语经历过漫长的变化。1917年以来,挪威书面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规范:布克莫尔语和新挪威语。布克莫尔语的前身称里克斯莫尔语,新挪威语的前身称兰斯莫尔语。里克斯莫尔语指丹-挪联盟时期(1380~1814)在书面丹麦语的强烈影响下形成的一种丹-挪混合语。1814年挪威摆脱丹麦的统治,国民要求把里克斯莫尔语挪威化。著名作家H. 易卜生(1828~1906)等也对语言改革给予有力支持,于是里克斯莫尔语经历了三次拼写法改革,愈益靠近挪威语改革后的里克斯莫尔语更多地体现了挪威民族语言的特点。兰斯莫尔语系挪威语言学家I. A. 奥森(1813~1896)为了维护挪威本族语的传统于19世纪中叶所拟,他以挪威口语方言为基础,编出了语法和词典,1885年终于取得官方承认,称新挪威语。

布克莫尔语与新挪威语可以互通,两种语言均为教育用语和官方语言。实际上用布克莫尔语的约占人口80%,新挪威语在农民和渔民中使用较广。挪威政府曾采取措施,力图缩小布克莫尔语和新挪威语的差别,以形成一种共同挪威语。

挪威语的语音比较复杂,具有乐调重音(简单乐调重音和复合乐调重音),重读音节中元音音长和辅音音长相制约。语法经过很大变化,名词有两个格(共同格和所有格),定冠词作为后缀附着于词后,形容词分强、弱,动词无人称词尾。挪威语向低地德语借了大批词语,吸收了一批现代科技方面的国际通用词语,近期还向英语借了许多新词。挪威语共有29个字母,除26个拉丁字母外,还有æ、ø和å。挪威语跟丹麦语、瑞典语、特别跟丹麦语十分接近,这3种语言基本上可以互通。

(马思汉)

P

Paxi

帕西, P. (Paul Passy 1859~1940) 法国语音学家。1859年1月13日生于巴黎。父亲是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由于家庭教育,帕西自小就学会法语、英语、德语、意大利语等4种语言。虽然从未进过学校,但他16岁就考取文学士。他在巴黎高级研究学院学梵语和哥特语,19岁起从事英语和德语教学,教材以活生生的语音为基础,并自创了一套注音符号。1891年他得文学博士学位。1894年起任教于巴黎高级研究学院,主持“普通及比较语音学讲座”。

帕西是国际语音协会的创始人之一,先后任该会主席和秘书,并任会刊《语音教师》的主编。他草拟了国际音标原则,并参与了音标的制订。他的语音讲座及在协会的活动大大地推动了语音学的发展。他写过多种语音学专著和教程,其中《比较语音学概要》(1906)一书,1930年在中国出版了刘复的汉译本,对现代语音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

关于音标,帕西有3项重要意见:①要用宽式音标,反对用严式;②主张音标不可太多,以免不便使用;③提倡用音标教小孩阅读外语课文,并亲自进行实验。这3项主张,英国语音学家D. 琼斯十分赞成。

(叶蜚声)

Palwanyu

排湾语 (Paiwan language) 中国台湾省高山族排湾人使用的语言。属南岛语系印度尼西亚语族高山族语言排湾语组。分布在台湾省南端大武山脉地带,包括屏东县的三地、雾台、钱湾、玛家、来义、春日、泰武、狮子、丹路、牡丹和台东县的大武、土坂、达仁、金峰、太麻里等地。使用人口约5万(1982)。排湾语(以来义乡话为代表)有21个辅音:p, b, v, m, t, d, n, l, ts, dz, s, r, dz, l, ts, dz, k, g, ŋ, q, ?;有两个半元音:j, w;有4个元音:i, u, ə, a。词汇大多由两个音节以上的词组成,每个音节包含一个元音。音节结构有4种方式:元音、辅音加元音、元音加辅音、辅音加元音加辅音。重音大多落在倒数第二个音节上。派生词的构成可在词根前后加附加成分,在词根第一个音节的辅音和元音之间可插入中加成分。名词、代词有主格、属格、宾格,前面以不同的格助词表示。形容词有最高级范畴。动词的体有常体、进行体、一般完成体、过去完成体,时有现在时、将来时(现在时和将来时同形)、过去时;态有主动态、被动态、使动态;式有直陈式、命令式。分别以词根加附加成分或词根的重叠表示。基本语序为谓语在句首,主语、宾语在后,修饰语在中心词之前,名词、代词作修饰语时在中心词之后。

(陈康)

Paike

派克, K. L. (Kenneth Lee Pike 1912~) 美国语言学家。1912年6月9日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曾在密执安大学受教于E. 萨丕尔和L. 布龙菲尔德,1942年获博士学位。先后任密执安大学语言学教授、语言学系主任等职。1974年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曾任美国语言学会主席(1961)。

派克早期的贡献主要在语音学方面。他的专著《语音学》(1943)指出,语音学应严格区别于音系学,批评D. 琼斯和J. S. 肯尼恩(1874~1959)的语音分类,并提出以生理部位和机能为标准把人类可能发出的语音进行分类。其他著作有:《美国英语语调》(1945),从音位学角度划分出美国英语语调的四级高度及各种起伏模式;《音位学》(1947)是研究无文字语言的语音系统的指导性著作;《声调语言》(1948)提出了确定声调类型和数目的理论。

派克的近期贡献在语法和话语分析方面。他引申了语音学和音系学的等级系统,创立序位学,基本观点见于《语法分析》(1982)一书中。派克创立了分析整段话语或整篇故事的4个原则:位置、替换(或类)、功能、接合,他的观点在美国语言学界颇有影响。他后来把这套分析言语行为的方法推广来分析非言语行为,试图建立人类行为结构的统一原理,著有《论语言与人类行为的统一原理》(1967)。近年来,他对于应用序位原理来广泛地分析整篇文章和故事又有新的观点和方法,著有《文章与序位》(1983)。

(桂灿昆)

Pangzhepuyu

旁遮普语 (Punjabi language) 印度宪法承认的语言之一。属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印度(也称印度-雅利安)语支。分布于巴基斯坦东北部的旁遮普省和印度西北部的旁遮普邦,使用人口约7000万。旁遮普语源自古梵语,是在普拉克利特语(古印度通俗语)的一支白夏基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巴基斯坦境内的旁遮普语称拉亨达语或拉亨地语,又称西旁遮普语。使用者中穆斯林占多数。用乌尔都文字书写,印度教徒则用伦达体文字书写。拉亨达语有几种方言,标准语为沙赫布尔县的

ਜੇ ਘਰਿ ਕੀਰਤਿ ਆਖੀਐ
ਕਰਤੇ ਕਾ ਹੋਇ ਬੀਚਾਰੇ ॥ ਤਿਤੁ
ਘਰਿ ਗਾਵਹੁ ਸੋਹਿਲਾ ਸਿਵਰਿਹੁ
ਸਿਰਜਨਹਾਰੇ ॥ ਤੁਮ ਗਾਵਹੁ ਮੇਰੇ
ਨਿਰਤੁ ਕਾ ਸੋਹਿਲਾ ॥ ਹਰਿਵਾਰੀ
ਜਿਤੁ ਸੋਹਿਲੇ ਸਦਾ ਸੁਖੁ ਹੋਇ ॥੧॥
ਰਹਾਉ ॥ ਨਿਤ ਨਿਤ ਜੀਅਤੇ ਸਮਾ-
ਲੀਅਨਿ ਦੇਖੇਗਾ ਦੇਵਹਾਰੁ ॥
ਤੇਰੇ ਦਾਨੇ ਕੀਮਤਿ ਨਾ ਪਵੈ ਤਿਸੁ
ਦਾਤੇਕਵਣੁਸੁਮਾਰੁ ॥੨॥ ਸੋਬਤਿਸਾਰਾ
ਲਿਖਿਆ ਮਿਲਿ ਕਰਿ ਪਾਵਹੁ ਤੇਲ
॥ ਦੇਹੁ ਸਜਣ ਅਸੀਸੜੀਆ ਜਿਉ
ਹੋਵੇ ਸਾਹਿਬ ਸਿਉ ਮੇਲੁ ॥੩॥ ਘਰਿ
ਘਰਿ ਏਹੋ ਪਾਹੁਚਾ ਸਦਤੇ ਨਿਤ
ਪਵੰਨਿ ॥ ਸਦਹਾਰਾ ਸਿਮਰੀਐ
ਨਾਨਕ ਸੇਦਿਹ ਆਵੰਨਿ ॥੪॥੧॥

锡克教圣经《阿迪·格兰思》片段

语言。在印度境内的旁遮普语受印地语影响较大，也有几种方言，标准语为阿姆利则的语言。使用人口中锡克教徒占多数。文字为师说体（意思是宗师嘴里说出来的）。旁遮普语的语言和印地语的语音基本相同，但没有外来的音素。旁遮普语有3个声调，声调与音节结构有关系。语法结构也与印地语比较接近，但名词、代词、动词等的词尾变化不同。旁遮普语的词汇至今仍保留了较多的巴利语和普拉克利特语的词语，而这些词的形式在其他现代印度-雅利安诸语言里都已发生变化。有的语言学家认为旁遮普语是现代印度-雅利安诸语言中最古老的一种语言。

（殷洪元）

pangzhuān

旁转 指古韵阴阳入三类韵部的字在本类之内跟邻近的韵部押韵、谐声、通假的现象。这个名词是章炳麟开始立的。他的古韵学说见《国故论衡·成均图》篇和《二十三部音准》篇（见古韵）。现在举他的阳声（收鼻音尾）10部作例。

寒	諄	真	青	阳	东	侵	冬	蒸	谈
an	uən	in	ien	aŋ	əm	iem	um	im	am

寒部的“贯”字韵母是[-uan]。“琨”字或体作“𦉰”，造这个字的方言把“贯”字念成[*kuən]了。从后代人看，这是寒部字旁转入諄。用现代语言学学术语说，这是主元音变了。“监”、“严”、“滥”3个字的韵母主元音和韵尾是[-am]，“遄”字的韵母主元音和韵尾是[-aŋ]。《诗·殷武》用这4个字押韵，可能是有人把遄念成[*guam]了。“遄”这个阳部字就叫“转入谈”了。当然，也许作这首诗的人4个字全念[-aŋ]，应该也允许说是“谈旁转入阳”。不过历来的古韵学家都不声不响地遵守“少数服从多数”这条原则。“谈”跟“阳”在排列上并不接近，可是元音相同。用现代语言学学术语说，这是收尾音变了。

“公”字韵母是[-əm]。三国吴人刘熙《释名·释亲属》说：“俗或谓‘舅’曰‘章’，又曰‘公’。”《汉书·广川惠王刘越传》说：“背尊章。”唐代颜师古（581~645）注说：“今关中俗妇呼舅为‘钟’。钟者章声之转也。”这就是说，汉代方言说“章”，韵母是[-*aŋ]的“公”（公公），到三国时期有人念成收[*əm]。这个念法一直到唐代关中方音里还保存，可能经过一些变动，用章炳麟的话说，就叫“‘阳’旁转入‘东’”。这一次连主元音带收尾音全变了。

旁转大致包括上述3种情况，此外还有附带加、减介音的，变声调的，所谓“脂队二部同居而旁转”等零星的例子。从章炳麟的定义说，这只牵掣到古韵部。不过他自己举的例字，也有连声母也变了。

应该说明，清代的古韵学家排列他们的韵部，都按现代读音或是掺杂一些他们推测的“古音”相近不近来排。比方段玉裁在《六书音均表·古十七部本音说》里说：“第二部至第五部、第六部至第八部音转皆入于东冬钟。第九部东冬钟韵音转入于阳唐。第十部阳唐韵音转

入于庚……。”这说明他也是按声音接近，流动较多排列的。

章炳麟的名词术语也有所承受。戴震把阴、阳、入互相关注叫“相配互转”，把邻近的韵部里的字互相流注叫“联贯递转”。后者就是“旁转”的前身。

“旁”本来应该表示音相近从而位置也紧挨着。可是章氏特别突出“鱼”、“阳”两部“轴声”来，说它们跟一切韵部都接近：“……阳部与阳侈声阳弇声皆旁转……鱼部与阴侈声阴弇声皆旁转。”这样，一切部的字都可以流入“鱼阳”，再从“鱼阳”随意转入一切部——章炳麟叫“假道旁转以得对转者”就是一种例。这给后代想破字的人开了无限方便之门。

参考书目

章炳麟：《国故论衡·成均图》。

（俞敏）

Piya

《埤雅》 训诂书。宋代陆佃（1042~1102）作。佃字农师，越州山阴人。北宋神宗时为尚书左丞，著有《尔雅新义》20卷。本书也是20卷，专门解释名物，以为《尔雅》的补充，所以称为《埤雅》。书中始于释鱼，继之以释兽、释鸟、释虫、释马、释木、释草，最后是释天。陆佃当时以讲说《诗》义著名，在本书解释名物时，也以引《诗》中文句、推阐《诗》义的为多。书中解释字义，还夹杂有王安石《字说》一类的臆说，不足为训。书前有宣和七年（1125）其子陆宰序。

（周祖谟）

Piānyā

《骈雅》 解释双音词的训诂书。明代朱谋埭撰。埭字明父，一字郁仪，豫章人，宁献王朱权曾孙。平生无书不读，博学多闻，据《明史》本传称所著书有112种，其中《水经注笺》一书最为人所称道。

《骈雅》作于明万历十五年（1587），大体以解释双音词为主。凡两字成为一义的，以及字异义同的都类聚而加以解释，所以称为《骈雅》。内容实际包括两类，一类是语词，一类是品物名称。由于因承《尔雅》的体例编制，所以分为释诂、释训、释名称、释官、释服食、释器、释天、释地、释草、释木、释虫鱼、释鸟、释兽13目，凡7卷。所采词语出于周秦两汉以迄六朝的经史文集和唐宋类书，其中属于音声相转而写法不同的词很多，出处纷繁，难以理解。

《骈雅》旧有张海鹏《借月山房丛书》刊本。清代道光年间魏茂林作《骈雅训纂》，把原书7卷分为16卷，每条分别为注，引用的经史子集书有256种之多，各书都载明篇名卷数，并注明所根据的版本。如果是属于佚书之列，并注明从何书转录，一丝不苟。《骈雅》原书旧无音切，魏茂林注都根据所引原书一并注出读音。原书没有音切的，则根据《玉篇》、《广韵》、《集韵》补出。在清人所注解的古书中，体例最为精善。通行本为道光二十五年（1845）有不为斋所刻。

（周祖谟）

Pianzi Fenjian

《拼字分箋》 训解词义的书。清代程际盛作。际盛为江苏吴县人。本书分上下两卷。所解都是并列的词语,如“日月”、“寒暑”、“原野”、“表里”、“沐浴”、“孝友”、“切磋”、“翱翔”、“嫉妒”、“田畴”等。都是摘自古书,即以原书的解释为注。所收词语大体根据事类排列,与洪亮吉《比雅》相似。

(周祖谟)

pinlu cidian

频率词典 (frequency dictionaries) 按词出现频率的高低而编排的词典。

世界上第一部频率词典是1898年德国语言学家F. W. 凯丁编的《德语频率词典》,这部词典统计了110万个词的语言素材。20世纪初,美国教育学家兼心理学家E. L. 桑代克(1874~1949)编写了《教师两万词词书》(1921)和《教师三万词词书》(1944)。他做了大量的英语词汇的频率统计工作。中国第一部汉语频率字典是教育家陈鹤琴(1892~1982)编写的《语体文应用字汇》(1928)。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他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与助理员用了两年时间,分析了554 478个字,得出4 261个单字。这是一部汉语频率字典,而不是汉语频率词典。

频率词典按其内容可分为普通频率词典和专业性频率词典两大类。

普通频率词典 可分为单语言频率词典和多语言频率词典。

单语言频率词典 分为:①语义频率词典:有英国学者M. 韦斯特编写的《通用英语词表》(1953),收集了2 000个最常用的英语词,对于每一个多义词,统计了它的每一个意义的频率。②成语频率词典:在桑代克的倡议下,美国外语教学委员会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了一系列外语成语频率词典。例如,美国学者F. D. 切德勒尔的《法语成语词表》(1929)和E. 豪克的《德语成语词表》(1931)都以成语的中心词为词条,列出了各个成语的绝对频率和序号。③后缀频率词典:有桑代克的《英语后缀的教学》(1941)。他在每一个后缀的后面,注明由该后缀构成的词的数量,从而表示该后缀在英语中出现的频率。后缀频率词典不是针对单词而是针对语言的形态进行编写的,又可称为倒序频率词典,它对于了解各种语言形态在交际活动中的分布情况有很大作用,对于语法教学也很有用处,因此,倒序频率词典的编制很受语言学家的欢迎。④一般频率词典:在每一个词后,注明其绝对频率、相对频率及序号,有的还注明该词在各种文件中的分布情况。

多语言频率词典 有美国学者H. S. 伊通的《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比较频率词表》(1940),这是一本多语言对照的频率词典,以各语言中最常用的1 000个词为依据进行对照。由于各语言所选的样本及样本容量不同,因而各语言中词的频率的相对误差也各不相同。

专业性频率词典 有苏联学者C. И. 别列斯涅夫等编的《德语畜牧学频率词典》(1968),他们从151 000个词的语言素材中,统计出了2 050个常用词。苏联学者И. М. 阿列克谢耶夫和Л. А. 图里金娜合编的《英俄频率词典-最低限量的新闻词汇》从30万个词的语言素材中,统计出16 114个词(其中出现3次以上的有6 002个),并从另外30万个词的语言素材中统计出16 518个词组(其中出现3次以上的有1 963个)。其他如电子学等专业也编制了专业性频率词典。

过去,编写频率词典主要靠手工查频。近年来,人们开始借助于计算机查频。对于一些形态变化丰富的语言,首先由计算机将文章中的每个词还原成它的原形(即频率词典中作词条列出的形式),并注出每个词详尽的形态变化,输入计算机储存,然后由计算机进行频率统计,打印出频率词典。例如,苏联拉脱维亚共和国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数理语言学实验室就用计算机编写了《拉脱维亚语倒序频率词典》。北京航空学院计算机系用计算机对中国自1977~1982年汉字的使用频率进行了一项规模浩大的统计工作,他们从报纸、期刊、教材、专著和通俗读物等材料中,选出1 240余万字,分社会科学5类、自然科学5类,用计算机进行处理,得出这些材料中共使用汉字8 969个,并给出了这些汉字根据不同学科分类的26种使用频率表,这是目前统计规模最大的汉语频率字典。北京师范大学现代化教育技术研究所将24册现行中小学语文教材共106.8万字存入计算机,用动态方式生成了一个“汉语词汇信息库”,并进行词频统计,由计算机编制出总词频表和分别按年代、教学阶段、作者以及文体进行统计的分布词频表。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研究所采用人工与计算机相结合的办法,对近200万字的汉语语料进行词频统计,编制了《现代汉语频率词典》,收词31 159条,这是中国正式出版的第一部汉语频率词典。

(冯志伟)

Pingshuyun

平水韵 一指宋淳祐十二年(1252)刘渊刻印的《壬子新刊礼部韵略》。因刻书地点在平水(今山西临汾)而得名。此书把《广韵》韵目下所注押韵时可以同用的韵都合并起来,并把去声磴磴两韵并入径韵,共得107韵。元代黄公绍、熊忠《古今韵会举要》根据的就是此书。一指把107韵改并为106韵一派的韵书。这是把上声拯等两韵并入迥韵的结果。据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五说,这类韵书最早始于王文郁的《平水韵略》(1223),后来的诗韵,例如《佩文诗韵》等都是这一派的。

平水韵的影响很大。一方面它是文人作诗用韵的标准,今天作旧体诗词的,仍旧遵用。另一方面清代编纂的许多工具书,如《佩文韵府》、《经籍纂诂》等等,都是按平水韵顺序排列的。这样就扩大了学习、使用平水韵的范围。

见韵书。

(俞敏)

pingze

平仄 指古人把汉语四声分成的两大类。“平”指平声，“仄”指上去入声。

南北朝时期讲求文章声律，当时虽然没有平仄的名称，但是实际上就是利用字调平仄有规律的交错，来加强诗文的节奏感；过去把提倡运用平仄的功劳归于梁代沈约，其实这功劳应该归同时人周顒。周顒并不完全和沈约同主张，他只是永明运动（讲究形式美的诗派）的赞助人。《南史·周顒传》记过他的警句。有人问他：“山中何所食？”他说：“赤米白盐，绿葵紫蓼。”这是仄仄仄平对仄平仄仄。人问：“何味最胜？”他说：“春初早韭，秋末晚菘。”这是平平仄仄对仄仄仄平。这种安排平仄的方式，到了唐代进一步发展，就形成了近体诗，并且开始用平仄的名称来讲述这种诗体的声律。（俞敏）

Poluomi zimu

婆罗米字母 (Brahmī alphabet) 印度古代最重要的、使用最广的字母。Brahmī的原意“来自大梵天的”，是婆罗门为了给这种字母围上一圈圣光而捏造出来的。这种字母历史极古，与古代腓尼基字母有一些渊源关系。它是一种音节字母，自左向右横行书写。每一个字母代表一个元音或者后面带-a的辅音。如果辅音后面是-a以外的元音，则在字母上面、左面或右面另加不同的符号表示。如果辅音不带任何元音，则用涅槃点来标明。这种字母公元前6世纪已开始使用，变体颇多。近百年来在中国新疆发现的古代梵文以及其他文字的残卷是用所谓中亚婆罗米斜体字母书写的。

字母排列顺序系统而有科学性。下面是用拉丁字母转写的字母表：

元音	a	ā	i	ī	u	ū	e	ai	o
辅音									
喉音	ka	kha	ga	gha	ṇa				
腭音	ca	cha	ja	jha	ṇa				
顶音	ṭa	ṭha	ḍa	ḍha	ṇa				
齿音	ta	tha	da	dha	na				
唇音	pa	pha	ba	bha	ma				
半元音	ya	ra	la	va					
嘶音	śa	ṣa	sa						
气音	ha								

这是正规的婆罗米字母，主要用于书写梵文著作。其他一些古代语言也使用婆罗米字母。吐火罗文A（焉耆文）和B（龟兹文）都使用。但为了适应这种语言，字母数目有所增加，共增：ka, pa, ma, ra, la, śa, ṣa, sa, wa等字母。也可以转写为 k̄a, p̄a, m̄a, r̄a, l̄a, ś̄a, ṣ̄a, s̄a。

回鹘文在使用其他字母的同时，也使用婆罗米字母，增加的新字母与吐火罗文相同。另外又多增 qa, ga, ḍa, dza(ʔ), za, ʒa等字母。在元音方面，aya=ā, uyu=ū, eya=ē, oyo=ō。（参见彩图插页第50页）（季羡林）

Putaoayayu

葡萄牙语 (Portuguese language) 葡萄牙的官方语言，也是巴西、安哥拉、莫桑比克、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几内亚比绍、佛得角等国的官方语言。使用总人口超过1.5亿。属印欧语系罗曼语族西支。葡萄牙语最早的文献见于12世纪，标准语形成于16世纪。它的历史发展可分为两个主要阶段：古代葡萄牙语（12~15世纪）和近代葡萄牙语（16世纪至今）。葡萄牙语有14个元音，其中包括9个口腔元音 a, æ, e, ɐ, o, i, u 和5个鼻腔元音 ã, ẽ, õ, ɨ, ʊ。辅音可以分为塞音 p, b, t, d, k, g, 擦音 f, v, s, z, ʃ, ʒ, 边音 l, ʎ, 颤音 r, ʀ, 鼻音 m, n, ɲ, 半元音 j, w。重音一般落在倒数第二个音节上，以辅音结尾的词，重音一般落在最后一个音节上。书写时有4个读音符号：ː ˘ ˙ ˚。句法关系借助于词序和前置词等来表达，基本词序为主语—动词—补语。代词、名词、冠词、形容词有性和数的范畴，动词有人称、数、时、体、态、式的范畴。词汇的大部分来自拉丁语，科技词汇的词根一般源于希腊语。此外，从阿拉伯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英语、德语以及某些非洲语言也借用了语词。葡萄牙的葡萄牙语和巴西的葡萄牙语的基本语法大致相同，但语音差异较大。词汇方面，巴西葡萄牙语在历史上从印第安人诸语言以及从巴西的黑人语言中吸收了许多语词，以后又不断吸收了外来语词，并创造了许多具有巴西民族特色的新词。

葡萄牙语跟西班牙语很接近，但保留了较多的古代语言特征，例如：葡萄牙语词首的 f-，西班牙语是 h-，如（葡）falar，（西）hablar，一些音节已经简化或脱落，如（西）general，（葡）geral。葡萄牙语句法中有欧洲其他语言没有的“人称不定式”，即在动词不定式后面加上某一人称的词尾，用作宾语的代词放在动词之前，西班牙语则放在动词之后。葡萄牙语的文字以拉丁字母为基础，有23个字母：a, b, c, d, e, f, g, h, i, j, l, m, n, o, p, q, r, s, t, u, v, x, z，有3组辅音字母组合：ch, lh, nh，3个外来字母：k, w, y。（王复山）

Pumlyu

普米语 (Primi language) 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羌语支，也有人认为语支未定。主要分布在中国云南省兰坪、宁蒗、丽江、维西等县。使用人口约2.4万（1982）。分南部和北部两个方言。方言间差别较大，互不通话。鼻音 m, n 有清浊对立，除单辅音外，还有双唇音后加 z 的复辅音声母，南部方言还有各类塞音、塞擦音前加 s 构成的复辅音声母。韵母没有辅音韵尾。有单元音 i, y, e, ɐ, ɛ, a, ɔ, ɐ, o, u, ʊ 和鼻化元音韵母 ɨ̃, ʊ̃, ẽ̃, ẽ̃, õ̃ 以及带 -i, -u 韵尾、带 i-, u-, y- 韵头的复合元音韵母。南部方言只有55和31两个声调，北部方言有4个声调，55, 53, 13, 31。词形变化和添加助词为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句子语序是主语—宾语—谓语。名词和代词作名词的修饰语时在中心词之前，形容词和数词或数量

词作修饰语时在中心词之后;动词的人称、时间、趋向等语法范畴用前后加成分表示,一部分表示趋向的前加成分也表示时间。多音节的单纯词较少。(陆绍尊)

Pushituyu

普什图语 (Pashto language, Pushtu language) 阿富汗的官方语言。属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分布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西北地区。使用人口在阿富汗境内有1 000多万,在巴基斯坦的西北地区也有近1 000万。主要方言分为两支:南部方言,保留了古音sh和zh;北部方言(主要通行于巴基斯坦)采用了kh音和gh音。经语言学家考证,普什图语和梵语的语法十分近似,除具有较多的共同词语外,还有许多共同的词根。普什图语受印地语的影响很大,也吸收了许多波斯语和阿拉伯语词,但仍保留了古伊朗语的许多特征。普什图语有长元音和短元音各3个。名词与形容词都有性、数、格的变化,动词有人称和时、态等变化。普什图语采用经过修改的阿拉伯文字,有40个字母,8个纯系普什图语字母,其余是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字母。(董振邦)

Putonghua

普通话 汉民族共同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为了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的统一,为了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决定把汉民族的共同语加以规范,大力推广。1955年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确定了民族共同语的标准,给普通话下了科学的定义,制定了推广的方针政策 and 措施。

普通话的标准 民族共同语是对方言而说的,从规范化的角度来看,普通话就是标准语。普通话的标准包括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语音的系统性比较强,世界各民族语言的标准一般都以一个地点方言的语音系统作标准。北京是中国的首都,也是七八百年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过去的官话、国语基本上都根据北京音,所以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是最理想的。“北京语音”主要指北京话的语音系统,不包括个别的土音部分。

“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是说普通话是在北方方言的基础上形成并逐渐发展起来的,北方话的词汇是普通话词汇的基础和主要来源。如普通话“今天”、“下”、“雨”这三个词,在北方话里基本上是一致的,而在吴方言、闽方言里,“今天”可能写成“今朝”或“该日”,“下雨”可能写成“落雨”、“落水”或“坠雨”等。北方话词汇是普通话词汇的基础,但普通话词汇又比北方话词汇丰富得多。因为它还从其他方言里吸收了许多有特殊表现力的方言词,从古代汉语里继承了许多仍然有生命力的古语词,从外国语中借用了许多需要的外来词,同时又舍弃了北方话中某些过于土俗的词语。

至于普通话的语法标准,虽然北方话语法内部大体相同,但也还存在着一定差异,而且以口语而论,往往不

够充实,不够完善,所以普通话的语法不以北方话或北京话的口语为标准,而以经过提炼加工的书面语为标准,就是“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所谓“典范”的著作,是指具有广泛代表性的著作,如国家的法律条文,报刊的社论,以及现代著作家的作品等。“现代白话文著作”是相对早期的白话文著作来讲的。由于时代的关系,宋元的白话文或“五四”的白话文都和现代的白话文有了明显的区别。普通话语法用书面语作标准,也说明普通话不仅是民族共同语的口语,同时是有统一规范的文学语言。

由此可见,普通话并不是普普通通的话,而是现代汉语的标准语。它是现阶段汉民族语言统一的基础,是现代汉语发展的主流和方向。

推广普通话 1956年,国务院向全国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为了加强推广普通话工作的领导,又成立了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的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主任陈毅,副主任郭沫若、吴玉章等,委员43人。1958年,毛泽东主席号召“一切干部要学普通话”,同年,周恩来总理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上所作的报告《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中指出:“在我国汉族人民中努力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就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在推广普通话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了培训普通话师资,教育部、语言研究所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举办了普通话语音研究班,从1956年到1961年先后办了9期,各省市也分别进行了培训工作。为了适应普通话教学的需要,1957年前后开展了全国汉语方言的普查工作,并根据调查成果编写了帮助方言区群众学习普通话的手册,同时普通话的教材、读物也大量出版。为了整理和精简异读词,1956年成立了“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对1800多条异读词和190多个地名的读音进行了审议;1963年出版《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为语音的规范化提供了依据。为了检阅推广普通话工作的成绩,表彰先进,交流经验,促进工作,1958~1964年期间,文改会、教育部、共青团中央联合召开了4次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文化大革命”中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受到破坏,完全停顿。1978年,教育部发出了《关于加强学校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教学的通知》,1979年8月,文改会、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在北京联合召开了第五次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1982年文改会恢复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对《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再次进行审议。通过三年多的审议,于1985年12月通过了《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广播电影电视部正式公布。1982年11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写进了“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的条文,使推广普通话成了国家的任务,有了法律依据。30多年来,推广普通话的运动是有成绩的。全国能够听懂普通话和能够说标准或不太标

准的普通话的人,比过去多了几倍。从电影、电视、广播的语言来看,普通话的质量也比过去有很大的提高。台湾省已经普及了称做“国语”的普通话,在新加坡的华人社会和香港等地,80年代也掀起了学习普通话的热潮。但是从全国来看,离开普通话成为机关、学校、部队、企业、服务行业等各方面的标准通用语的目标还很远。推广普通话的运动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继续进行。

参考书目

罗常培、吕叔湘:《现代汉语规范问题》,收入《现代汉语规范问

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科学出版社,北京,1956。

王力:《推广普通话的三个问题》,载《语文现代化》(丛刊),1985,第2辑。

倪海曙:《推广普通话的历史发展(资料整理)》,载《语文现代化》(丛刊),1980,第1、2辑。

(颜逸明)

Putonghua Minnan Fangyan Cidian

《普通话闽南方言词典》(*Putonghua South Min Dialect Dictionary*) 见汉语方言词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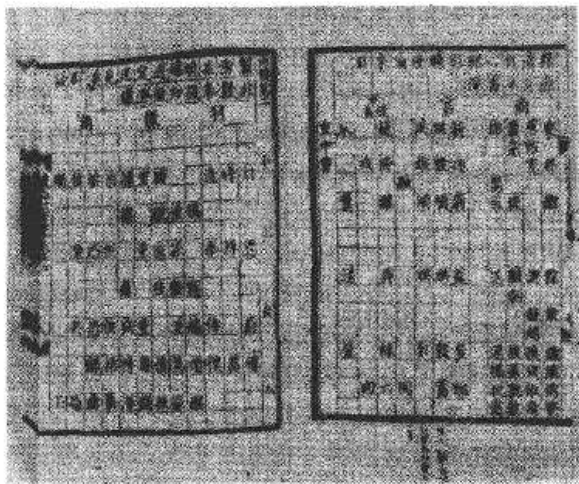
Q

qiylín

七音 见等韵。

Qiyinlue

《七音略》 现存最早的两部等韵书之一（另一部为《韵镜》）。南宋郑樵撰，原是《通志》的第36卷。原序说：“臣初得《七音韵鉴》，一唱而三叹！胡僧有此妙义，而儒者未之闻。”《通志·六书略·论华梵》说：“切韵之学，自汉以



郑樵著《通志·七音略》

前，人皆不识，实自西域流入中土，所以韵图之类，释子多能言之。”又说：“观今《七音韵鉴》出自西域。”由此推知，等韵图原是中亚或印度和尚创作的。郑樵《七音略》是依据《七音韵鉴》修订而成，《七音韵鉴》最早可能叫《韵镜》。那么《韵镜》、《七音韵鉴》、《七音略》可能是同一部书的不同版本。《七音略》的特色是：①每图题标“内转第一”、“内转第二”等等。②最上两行标“帮、滂、並、明、非、敷、奉、微、端、透、定、泥、知、彻、澄、娘、见、溪、群、疑、精、清、从、心、邪、照、穿、床、审、禅、影、晓、匣、喻、来、日”等字母，第3行标羽、徵、角、商、宫、半徵、半商七音分类。③每转以后有“重中重”、“轻中轻”、“重中轻（内重）”字样。此外都和一般等韵图相似。

见等韵。

(俞敏)

Qidanwen

契丹文 (Qidan script, Khitan script)

中国辽代为记录契丹语而参照汉字创制的文字。分大字和小字(图1)两种。相传大字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于神册五年(920)在突吕不、鲁不古等人的赞助下创制，小字是太祖弟耶律迭剌所创制，制字年代略晚于大字。契丹文主要用于碑刻、墓志、符牌以及写诗译书等。金灭辽后契丹文继续使用，并在女真制字的过程中起过很大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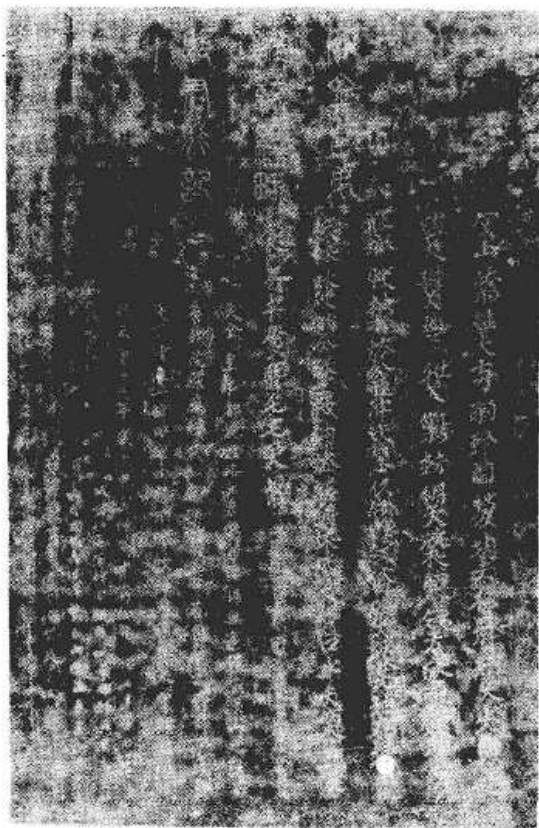


图1 用契丹小字刻写的《郎君行记》碑(1134)

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诏罢契丹字”，契丹文乃渐失传。契丹文图书全部湮灭，除《燕北录》和《书史会要》里收录的几个契丹字外，没有留下片纸只字。

1922年从中国内蒙古昭乌达盟辽庆陵首次出土了辽兴宗帝、后的契丹文哀册。1951年从中国辽宁锦西孤山出土了用另一种类型契丹文书写的萧孝忠墓志(图2)。此后，两种类型的契丹文碑刻、铭文陆续发现。根据近年来的研究结果，多数学者认为西孤山类型契丹文应是契丹大字，辽庆陵类型契丹文应是契丹小字。前者是一种表意方块字，其中夹杂一些直接借用汉字的形式。后者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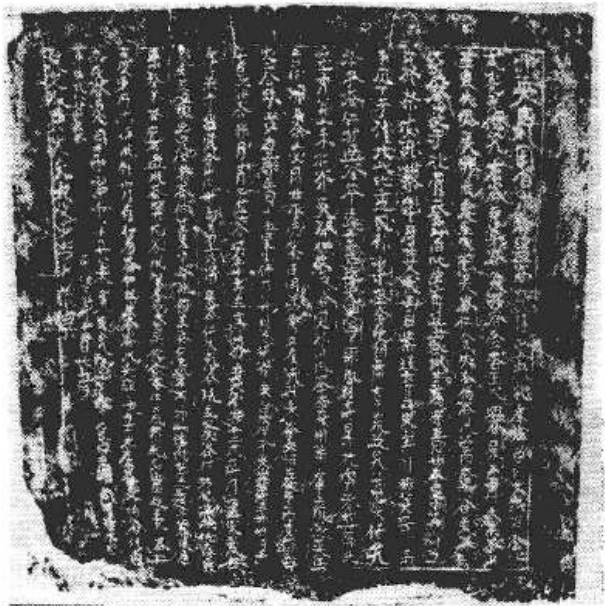


图2 用契丹大字刻写的萧孝忠墓志(1089)

一种拼音文字,利用汉字笔画形体创制出 300 多个原字,

按①、①②、 $\begin{smallmatrix} \textcircled{1} \textcircled{2} \\ \textcircled{3} \end{smallmatrix}$ 、 $\begin{smallmatrix} \textcircled{1} \textcircled{2} \\ \textcircled{3} \textcircled{4} \end{smallmatrix}$ 、 $\begin{smallmatrix} \textcircled{1} \textcircled{2} \\ \textcircled{3} \textcircled{4} \textcircled{5} \end{smallmatrix}$ 、 $\begin{smallmatrix} \textcircled{1} \textcircled{2} \\ \textcircled{3} \textcircled{4} \textcircled{5} \textcircled{6} \end{smallmatrix}$ 、 $\begin{smallmatrix} \textcircled{1} \textcircled{2} \\ \textcircled{3} \textcircled{4} \textcircled{5} \textcircled{6} \textcircled{7} \end{smallmatrix}$ 这样几种缀合模

式拼写成词(在个别情况下也出现 $\begin{smallmatrix} \textcircled{1} \\ \textcircled{2} \end{smallmatrix}$ 、 $\begin{smallmatrix} \textcircled{1} \\ \textcircled{2} \textcircled{3} \end{smallmatrix}$ 、 $\begin{smallmatrix} \textcircled{1} \\ \textcircled{2} \textcircled{3} \textcircled{4} \end{smallmatrix}$ 、 $\begin{smallmatrix} \textcircled{1} \\ \textcircled{2} \textcircled{3} \textcircled{4} \textcircled{5} \end{smallmatrix}$ 的

模式)。契丹本族语词大抵一个词写成一个字,汉语音译词则通常用一个契丹字标写一个汉字。这样书写的契丹字都可以由一个或几个原字构成。原字分正楷、行草、篆书等字体,篆体字的拼写方式异于正楷和行草,采取鱼贯式而不是层叠式。行文的款式自上而下竖写,自右而左换行,敬词抬头或空格。叠词中的后一个字有时用“:”代替。原字有一个书写形式代表几种语音或一个语音采用几种书写形式的情况。因此,同一个词或词素表现在文字上可以有不同的拼写形式。(参见彩图插页第 30 页)

(陈乃雄)

Qian Daxin

钱大昕 (1728~1804) 中国清代史学家、考据学家。字晓征,号辛楣,又号竹汀,嘉定(今上海嘉定)人。乾隆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侍讲学士,山东、浙江等地乡试主考官,广东学政。参与编纂《大清一统志》、《续文獻通考》、《续通志》。主讲于江南诸学院。对西北地理、元史、年代谱牒、金石铭文等均有研究;于音韵、训诂更有许多创见。主要著作有《二十二史考异》、《潜研堂文集》、《十驾斋养新录》、《元史氏族表》、《潜研堂金石文跋尾》等。在音韵学方面的成就主要是对古纽的考证。在钱大昕以前,研究古音的人,只注意古韵。最先注意到古纽问题的就是钱大昕。关于古纽问题,他提出 4 点:①古无轻唇音。认为中古轻唇音声纽在先秦一律读作重唇。②古无舌上音。认为中古知、彻、澄声纽,在先秦属于端、透、定声纽。③古人多舌音。认为中古照、穿、神等声纽(所举例字都是三等字),在先秦也属于端、透、定声纽。④古影、喻、晓、匣双声。认为中古喉音 4 个声纽在先秦基本属于同一类声纽。这 4 点都很有道理,特别是前两点,得到了后来学者的普遍承认。钱大昕没有关于音韵学的专著,对音韵学的一些论述收录在《十驾斋养新录》卷五和《潜研堂文集》卷十五。

(谢纪锋)

Qiangyu

羌语 (Qiang language) 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羌语支,也有人认为语支未定。分布在中国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茂汶羌族自治县及汶川、理县、黑水、松潘等县。使用人口约 13 万(1982),分南北两个方言。语言特

点(以南部方言桃坪话为例):有 64 个声母,其中单辅音声母 40 个,塞音、塞擦音都分清浊、送气和不送气。复辅音声母 24 个,如:xp, xm, xt, xq, pz, bz 等。有 44 个韵母,其中单元音韵母有 10 个: i, y, e, a, o, u, ə, ai, 复元音韵母有 19 个,带 -n, -ŋ 韵尾的韵母有 15 个。有 6 个声调: 55, 31, 51, 13, 33, 241。形态、助词和词序为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单数名词加后加成分表示复数。人称代词分主格、领格和宾格,用声母和韵母的屈折变化表示,第一人称双数和复数分包括式和排除式。量词很丰富,量词重叠表示轮番、逐次的意义。动词有人称、数、时间、体、态、式、趋向等语法范畴,表达方式有:声母、韵母、声调的屈折变化、加前加成分或后加成分、重叠词根等。结构助词有表示限制、施动、受动、工具、处所等意义的区别。句子语序为主语—宾语—谓语。名词、代词作名词的修饰语时在中心词前,形容词、数量词组作修饰语时在中心词后。指示代词作定语时前后均可。借词主要来自汉语、藏语。

(孙宏开)

Qiaoma

乔玛, A. de K. (Csoma Alexander de Kőrös 1784~1842) 国际藏学研究的先驱、西方世界第一位藏学家。匈牙利人。1784 年 4 月 4 日生于匈牙利春悉凡尼亚省赫若姆赛克县。1842 年 4 月 11 日去世。1807 年完成了高等教育,掌握了拉丁文。1815 年获奖学金入德国格廷根大学,钻研阿拉伯文、英文、希腊文和法文。

1819 年乔玛动身东来,路经 10 余国,到达克什米尔的拉达克。1823 年进入桑噶尔羊拉喇嘛寺,从藏族学者学习藏语、藏文。9 年间掌握了藏语、藏文,写成《藏英字典》(1834)、《藏语语法》(1834)、《梵藏英词汇集成》(1910)和《藏文大藏经甘珠文、丹珠尔解题目录》(1910)等一批开拓性专著;此外,还有一批涉及藏学的语言、历史、地理、文学、宗教、民俗以及医药等方面的论著。他的著作成为西方学者学习西藏学的津梁。1842 年乔玛前往拉萨访问,途中染恶性疟疾,病故于大吉岭。匈牙利学术界为了纪念这位学者,出版了他的全部遗著,重印了几种经典性著作,创立了乔玛学会、设立了乔玛奖学金。

(王 尧)

Qiaomusiji

乔姆斯基, N. (Noam Chomsky 1928~) 美国语言学家,生成语法创始人。1928 年 12 月 7 日生于美国费城,1955 年获宾州大学博士学位,此后一直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并任美国科学促进会委员、全国科学院院士、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

乔姆斯基大学时代学过数学、哲学,后来主攻语言学,师承著名语言学家 Z. S. 哈里斯与逻辑学家古德曼。1955 年写出《语言理论的逻辑结构》,当时未能出版,他提出形式语言分类法,并用于自然语言,通过数学模拟论证了当时盛行的结构主义语法不适用于描写自然语言。

1957年他的《句法结构》在荷兰出版,正面提出与结构主义背道而驰的生成语法。他主张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应从语言转为语法,研究范围应从语言使用转入语言能力,



研究目标应从观察现象转向描写和解释现象,研究方向应从处理语言素材转到评比语法假设,因此人们说他掀起了语言学界的革命,这一学说一跃而为国际上的语言学重要流派。

此后20多年来乔姆斯基不断地发展和更新自己的理论。1965年发表了《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试图建立包括句

法、音系和语义3部分的全面语法系统。20世纪70年代以来研究的重心逐渐由探究具体的转换规则转移到探究抽象的转换限制,这一变化体现在《形式与解释论文集》等著作中。他觉得,语法规则立得越多,产生的句子数目越多,但对规则的限制越严,句子的合格率才越高。所以生成语法必须既灵活又严谨,才能一方面做到生成一切句子,另一方面所生成的又都是合格的句子。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提出了普遍语法原则及参数的理论,通常称为“管辖与约束理论”,代表作为《论管辖与约束》(1981)。

乔姆斯基在哲学上提倡理性主义,批判经验主义;在语言学上提倡心理主义,批判行为主义。乔姆斯基认为人的语言能力中一部分是后天学会的,即通过经验获得的,另一部分是先天具有的,即全人类共同的。他强调人不仅有躯体,还有心理(或称心智)。限于目前的科学水平,还没有条件对人脑的心理机制作彻底研究,但是可以通过研究语法揭示心理的某些性质,所以说“语言是心理的镜子”。他对于经验和物质的看法不同于过去的理性主义者和心理主义者。他明确指出,人类先天的语言能力是生物遗传与进化的结果,并反复说明心理并不是独立的,而以物质为基础,研究心理只是在比较抽象的层次上探讨物质。近年来他惯用的提法是“心理——最终是大脑”,1984年以来把心理称为“心理/大脑”。他把语言学看作一种心理学,而最终是生物学,是研究人类这一最高等生物大脑机制的科学。语言学应该有真正的科学性,不仅是相对的科学性。

20多年来学术界对乔姆斯基理论有很多争论。老派语言学家纷纷反对,他没有答辩;本派学者不断批评,他边反驳边改进;分析哲学派猛烈抨击,他坚决反驳。当前各种语言学理论大都以乔姆斯基理论为参照点,哲学、心理学、逻辑学、计算机科学、生物学、神经生理学等各个领域都在讨论乔姆斯基的学说。

见生成语法。

(徐烈炯)

Qiaoben Jinji

桥本进吉 (Hashimoto Shinkichi 1882~1945) 日本语言学家。1882年12月24日生于日本

教贺市,卒于1945年1月30日。1906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1934年获博士学位。

桥本的研究涉及了日语的各个领域,其中以日语史、日语音韵和日语语法方面的成就最为突出。主要著作有《古本节用集的研究》(1916与上田万年合著)、《关于古代国语音韵》(1942)、《国语法要》(1943)、《国语法概论》(1946)、《新文典别记》(1935)等。



桥本进吉、时枝诚记和山田孝雄的语法学说被称为日本3大语法学说。桥本的语法学说的主要特点是从结构主义语言学出发,重视语言的形式方面,从音韵的角度考察句子,提出了“文节”(可译为句节或小音段)的概念。桥本的“文节”是“把句子作为实际语言切分出来的最短的一个片段”。“文节”是桥本语法的核心,桥本的词类划分和句子分析都和“文节”有着密切的联系。桥本认为句子是语音的连续体,前后一定有语音的停顿,句尾有特殊的语调。他认为句子是由若干“文节”构成的,而“文节”是由可以独立的“词”,或“词”再加上不能独立的“辞”(可译为附属词)构成。桥本的词类划分主要是以词在形态上能否单独构成“文节”为标准,他把词分为动词、形容词、形容动词、名词、副词、副体词、接续词、感叹词、助动词、助词等。

桥本的语法学说在日本语法学界占重要地位,有很大影响。40多年来它一直是日本学校语法的主流和基础。

(徐昌华)

qiekou

切口 一种利用反切原理为保密创造的话,近似黑社会的黑话,也叫反切语。1931年赵元任发表了《反切语八种》(《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第3分)一共介绍了8种“反切语”:

流行地	[ma] 这个音节的说法	名称
北京	[maika, meika, manta]	朱译
常州	[moŋla]	字语
昆山	[mopa]	切口语
苏州浦东	[mopa]	洞庭切
余杭武康		
苏州	[uo-mən]	威分
广州	[la-mi]	燕子语
东莞	[la-mi]	盲佬
福州	[la-mi]	度语

基本原则是把一个音节拆成声母(+介音)和韵母两截,中间插进一个韵母和一个声母(+介音),把该音节改装成两个音节。如第1种[ma],插进韵母ai和声母k,改装成[mai ka]。有时候还可以把改装后的两个音节颠倒过来,如第6种,先改装成[mila],再把两个音节颠倒过

来成[la-mi]。赵元任说：“从他上头可以看出许多点本地人对于本地音类的分合异同上的态度。”

见徽宗语。

(俞敏)

qleylnzi

切音字 (phonetic Chinese alphabet) 清末二十年间在民间产生和推行的各种汉语拼音方案。“切音”就是“拼音”，也叫“合声”。这些方案的字母形体有采用拉丁字母及其变体的，有采用汉字笔画和独体古文的，有采用速记符号的，有采用数码的，有自造符号的。已发现的方案，按所用的字母分有 27 种，按所拼的语音分有 30 多种(有些方案兼拼几种方音)。其中推行最广的是王照的采用汉字笔画式字母的“官话合声字母”，简称“官话字母”。

切音字的产生 切音字产生在清末变法维新的历史浪潮中。那时民族危机严重，一些人把中国跟西方国家以及日本相比，感到处处落后。他们看到这些国家富强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教育普及，而它们的教育普及大多得益于文字简易，也就是“切音为字”。切音为字的拼音文字有三大优点：①容易学。“字母与切法习完，凡字无师能自读”(卢慧章《一目了然初阶》自序)。②容易记。“基于字话一律，则读于口遂即达于心”(同上)。③容易写。“基于字画简易，则易于习认，亦即易于捉笔”(同上)。日本虽然也用汉字，但是在汉字之外创制了一套表音的“假名”文字，与汉字合用。汉字只表实词，虚词和词尾等都用假名表示，同时还用假名给汉字注音，这样大大便利了学习。于是当时一些有维新思想的人也纷纷创制中国的拼音文字，用来辅助汉字和普及教育。第一个有这种想法的是宋恕。他在 1891 年成稿的《六斋卑议》中提出“江淮以南须造切音文字多种，以便幼学”，并且主张仿效日本，实行强迫教育，儿童入学，先教拼音，后教汉字(《变通篇·开化章》)。

1892 年，卢慧章的《一目了然初阶》(中国切音新字厦腔)在厦门出版，出现了第一个切音字方案。这个方案的字母采用拉丁字母及其变体，拼厦门音，增加声韵后可兼拼泉州和漳州音。此后每隔一二年就有新的方案出现和新的著作出版。甚至同一年中出现几个方案和出版几种著作。继卢慧章之后，1895 年吴敬恒拟成拼无锡音的《豆芽字母》(又名《等韵简码》)，字母采用独体篆隶，有的或作省笔，或加变形。1896 年，蔡锡勇出版拼官话音的《传音快字》，力捷三出版拼福州音的《闽腔快字》，沈学发表拼苏州音的《盛世元音》，3 种方案的字母都采用速记符号。1897 年，王炳耀出版拼广东音的《拼音字谱》，字母采用速记符号。1900 年，王照拟成拼官话音的《官话字母》，并于 1901 年出版著作《官话合声字母》，字母采用汉字笔画。1901 年，田廷俊出版拼湖北音的《数目代字诀》，字母采用数码(汉字数字和阿拉伯数字)。1902 年，力捷三出版他的第二种拼官话音的方案，《无师自通切音官话字书》，字母仍用速记符号。1903 年，陈虬

出版拼温州音的《新字瓯文七音铎》和《瓯文音汇》，字母采用独体古文(蝌蚪文)。1904 年，李元勋的《代声术》成稿，字母采用汉字笔画。刘孟扬提出他的拼官话音的第一种方案《天籁痕》，字母采用汉字笔画。1905 年，杨琼、李文治出版《形声通》，字母采用汉字笔画。1906 年劳乃宣出版拼南京音的《增订合声简字谱》和拼苏州音的《重订合声简字谱》。这两个方案都是以王照《官话字母》为基础，增加方音声韵母制订的，是《官话字母》的方音方案。同年卢慧章出版拼官话音的《中国字母北京切音教科书》和拼福州音、泉州音、漳州音、厦门音、广东音的《中国字母北京切音合订》，字母采用汉字笔画。朱文熊出版拼苏州音的《江苏新字母》，字母采用拉丁字母。田廷俊出版他第二种拼湖北音的方案《拼音代字诀》和《正音新法》，字母采用汉字笔画。沈韶和出版《新编简字特别课本》，字母用数码(苏州码子)。1907 年，劳乃宣出版《简字全谱》、《京音简字述略》和《简字丛录》，在《简字全谱》中增加一个闽广音的合声简字方案。1908 年，江亢虎拟成拼官话音的《通字》，字母采用拉丁字母。同年章炳麟发表《纽文·韵文》，字母采用独体古字。刘孟扬出版第二种拼官话音的方案《中国音标字书》，字母采用拉丁字母。马体乾出版拼官话音的《串音字标》，字母采用汉字笔画。1909 年，宋恕拟成拼温州音的《宋平子新字》，字母模仿日本假名，采用少笔画的汉字为基本字形，再加以演化。同年黄虚白拟成拼官话音的第一种方案《汉字音和识字法》和第二种方案《拉丁文臆解》，前一种采用汉字笔画字母，后一种采用拉丁字母。刘世恩出版拼官话音的《音韵记号》，自造字母。1910 年郑东湖发表《切音字说明书》，字母采用汉字笔画。二十年中，切音字的方案和著作连续拟订出版，形成了汉语拼音运动史上的第一个高潮。

切音字的方案 27 个切音字方案中，字母采用汉字笔画的最多，包括独体古文在内，共有 15 个，占总数的 42%。这是受日本假名影响。但是后来也有人认为“与其造世界未有之新字，不如采用世界所通行之字母”(朱文熊《江苏新字母》自序)，主张采用拉丁字母，出现了纯用拉丁字母的方案。27 个切音字方案拼的音，以官话音居多，包括既拼方音也拼官话音的方案在内，共有 13 个，占总数的 35%。特别在后期，拼官话音成了主流，这与后来要求统一语言、推行国语有关。下面是清末切音字的几种代表性方案(括号内注的是汉语拼音)。

王照的《官话字母》采用汉字笔画式字母。

声母，称作“音母”或“字母”，包括单声母和声介合母，不列单声母 b、p、m、f，而用声介合母 bu、pu、mu、fu 来代替：

ㄅ (bi)	ㄆ (pi)	ㄇ (mi)	
ㄅ (bu)	ㄆ (pu)	ㄇ (mu)	ㄈ (fu)
ㄊ (d)	ㄊ (t)	ㄋ (n)	ㄌ (l)
ㄉ (di)	ㄊ (ti)	ㄋ (ni)	ㄌ (li)

ナ (du)	土 (tu)	又 (nu)	七 (lu, 口 (lü)
乚 (g)	𠂇 (k)	𠂇 (h)	
𠂇 (gu)	𠂇 (ku)	𠂇 (hu)	
𠂇 (j)	𠂇 (q)	𠂇 (x)	
𠂇 (ju)	𠂇 (qu)	𠂇 (xu)	
𠂇 (zh)	𠂇 (ch)	𠂇 (sh)	𠂇 (r)
𠂇 (zhu)	𠂇 (chu)	𠂇 (shu)	𠂇 (ru)
𠂇 (z)	𠂇 (c)	𠂇 (s)	
𠂇 (zu)	𠂇 (cu)	𠂇 (su)	
𠂇 (i)	𠂇 (u)	𠂇 (ü)	

韵母(称“喉音”),包括单韵母、基本复韵母和鼻韵母:

丁 (a)	ㄣ (ê)	ㄨ (o)	
一 (ai)	ㄛ (ei)	ㄜ (ao)	ㄟ (ou)
ㄚ (an)	ㄥ (en)	ㄤ (ang)	ㄨㄥ (eng)
ㄦ (er)			

拼法：左声母，右韵母，拼合成音。

标调：在韵母的四角加点。

拼写举例：与汉字并用(图1、2)或单用(图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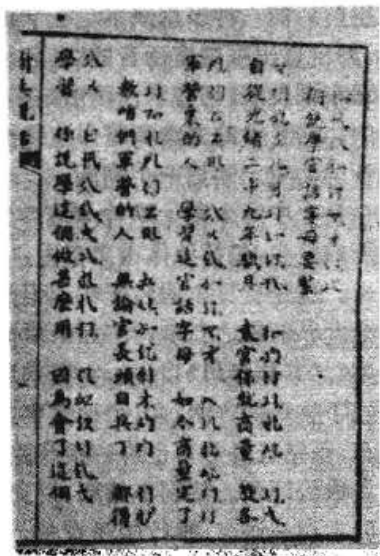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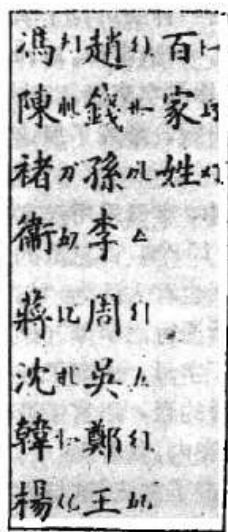


图 1.2 官话字母与汉字并用

刘孟扬的《中国音标字》 采用拉丁字母。

声母（称“仆音”）：

b(b)	p(p)	m(m)	f(f)
d(d)	t(t)	n(n)	l(l)
g(g)	k(k)	h(h)	
ğ(ğ)	x(x)	ş(ş)	
ğ(zh)	ş(ch)	ş(sh)	z(r)
ı(z)	c(c)	s(s)	



图 3 官话字母单用



图 4 官话字母单用

声介合母(称“副仆音”):

bi(bi)	pi(pi)	mi(mi)		
di(di)	ti(ti)	ni(ni)	li(li)	
du(du)	tu(tu)	nu(nu)	lu(lu)	lü(lü)
gi(ji)	xi(qi)	si(xi)		
gü(ju)	xü(qu)	šü(xu)		
gu(zhu)	xu(chu)	šu(shu)	zu(ru)	
fu(zu)	cu(cu)	su(su)		

单韵母(称“主音”):

a(ɑ) e(e) o(ou) y(ê) i(i) u(u)
 û(ü) -n(-n) z(i,ï) r(er)

复韵母和鼻韵母(合称“复主音”):

ai(ai)	ei(ei)	ao(ao)	
an(an)	en(en)	on(eng)	oi(i, 币)

标调:用 / (阳平)、∨ (上声)、\ (去声)、^ (入声) 四种符号标在“字尾主音之上”。阴平不标。

拼写举例(用短横连写):

güon-gué(中国) Lió-moñ-ien(刘孟扬)

in-biao-ïoi-šu(音标字母)

šian-ťai güon-gué gn air san šz nian xian búi i
en liáo(现在中国跟二三十年前不一样了)

蔡锡勇的《传音快字》采用速记符号。

声母(称“声”或“声母字”):

\ (b)	\ (p)	\ (m)	\ (f)	∨ (v)
(d)	(t)	~ (n)	5 (l)	
- (g)	- (k)	~ (ng)	∩ (h)	
		∩ (ngi)	∩ (xi)	
/ (zh)	/ (ch)	) (sh)	/ (r)	
· (z)	(c)	) (s)		
~ (y)	~ (w)			

韵母(称“韵”或“韵母字”):

∩ (a)	∩ (o)	c (e)	c (ê)	u (i)
- (u)	/ (ü)			
• (ai)	- (ei)	7 (ao)	^ (ou)	
~ (an)	/ (en)	~ (ang)	/ (eng)	
✓ (ia)	∩ (io)	∩ (ie)	7 (iao)	
✓ (iai)	- (iu)			
∩ (ian)	~ (in)	∩ (iang)	~ (ing)	
o (un)	o (ong)			
/ (üe)	○ (üan)	? (ün)	○ (iong)	

拼法:一声一韵,两笔相连,切成一音。

标调:用小圈标在字的两边,“偏左而近者为平声,偏左略远者为上声,偏右而近者为去声,偏右略远者为入声。上平则声与韵连笔,下平则声与韵分笔”。

写法:多音词可以连写。

拼写举例(图5、6)。

切音字的推行 切音字的方案制订后,大多只在小范围内传习,没有广泛推行,唯一在社会上推广的是王照的官话字母和劳乃宣的合声简字。从1901年《官话合声字母》出版到1910年官话字母被摄政王载沣查禁,10年中“传习至十三省境”,出版的拼音官话书“销至六万余部”(王照《官话合声字母》原序按语)。

官话字母和合声简字的推行,曾经得到社会名流如翰林院编修严修,桐城派古文名家、第一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以及袁世凯、周馥、端方等大官的赞助。吴汝纶于1902年去日本考察学政,深受日本教育普及、国

语统一和假名文字简易的影响。他在日本看到王照的著作,极为赞赏,决心回国推行,曾写信给管学大臣张百熙,建议小学四年都教官话字母拼音,第五年再教汉字,可惜他回国不久就去世了。为了争取清廷推行官话字母,1910年资政院开会,各地纷纷递呈说帖,资政院组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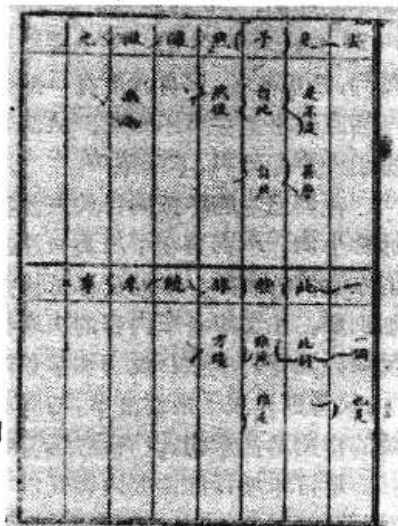


图5 传音快字拼写举例



图6 传音快字拼写举例

以严复为首的小组,审理这些提案,提出了报告书,同意推行切音字,作为“范正汉文读音”和“拼合国语”的工具,但不采用王照的官话字母,而另订方案,这是因为官话字母已被摄政王载沣查禁,不能再提了。1912年民国成立,汉语拼音运动进入了新的阶段。

参考书目

罗常培:《国音字母演进史》,商务印书馆,上海,1934(1959年文字改革出版社重印,改名《拼音字母演进史》)。

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卷一,商务印书馆,上海,1934。

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切音字运动)编年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

(倪海曙)

Qieyun

《切韵》 中国重要的书。隋代陆法言著,成书于公元601年。原书已经失传。20世纪初以来陆续发现了不少唐五代的写本和刻本。虽多是一些增订本的残卷和残页,

但借此可以了解本书的基本体制和内容。

《切韵》收字不多,据清代卞永誉(1645~1712)《式古堂书画汇考》卷八所载孙愐《唐韵序》所说,为 11 500 字。全书 5 卷,共分 193 韵。分韵的标准除了韵母本身的差别以外,还考虑到声调因素,同一个韵母,声调不同也分成不同的韵。193 韵的分配是平声 54 韵,上声 51 韵,去声 56 韵,入声 32 韵。平上去三声各韵都按一定的次序排列,相承不乱,只有入声有一部分韵出现了参差,次序与相应的平上去声不相配。从韵数和未乱的韵次上可以看出入声配阳声,不配阴声。

各韵之内的字按同音关系分成小组。这种小组后来通称小韵。小韵首字下用反切注出本小韵的读音,并注明本小韵的字数。字的训释都极为简略,常用字大多不加训释。注文中各项内容的次序早期写本一般是:训释,反切,又音,字数。反切和字数两项只见于小韵首字之下;又音则只属于所注之字,与同小韵其余的字无关。小韵的排列是任意的,没有固定的次序。

增订本增订的主要内容是加字、加注,目的在于增强《切韵》的字典作用。韵数和反切也略有变动。反切的变动大都限于用字的更换,读音并没有什么不同。韵数的变动以增加为主,一般是把《切韵》字数多的韵里不同开合的字分为两韵,如真韵分为真(开)、諄(合)两韵,寒韵分为寒(开)、桓(合)两韵之类。对《切韵》的韵母系统并没作什么变动。只有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略有不同,它较《切韵》增加了上声广和去声严两韵,又在业韵增加了小韵,不仅使原来只有平入两声的严韵系变成了一个四声具足的韵系,而且形成了与凡韵系的对立。这就造成了韵母系统的某种变动。但这毕竟是个别现象,影响并不大。因此可以说《切韵》增订本的语音系统就是《切韵》的语音系统。现存的《切韵》完整增订本只有两个。一个是故宫博物院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图1),一个是北宋陈彭年等编的《大宋重修广韵》(图2)。

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韵目下注有《切韵》与它以前



图1 《刊谬补缺切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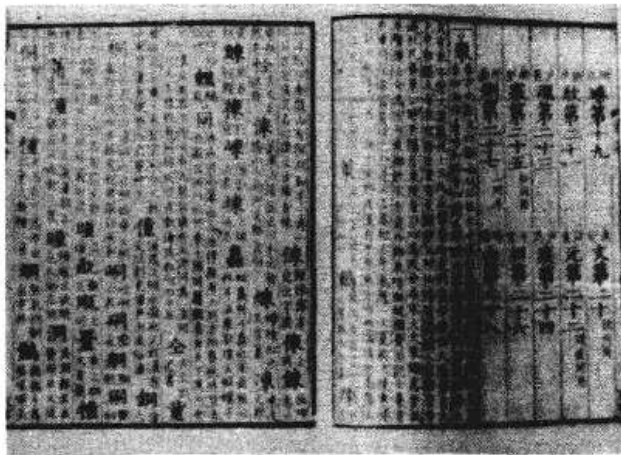


图2 《大宋重修广韵》

诸家韵书分韵的异同。虽不全备,但从中可以看出《切韵》分韵在诸家韵书中最为精密。所以问世以后不久,就在韵书中取得了权威地位。唐初被定为官韵,成为“临文楷式”,影响历久不衰。数百年间增订本层出不穷,而其他韵书则几乎全部湮没无闻。结果《切韵》就成为一部能把自己所反映的语音系统完整地流传至今的最早韵书。

参考书目

-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八。
刘复、魏建功、罗常培合编:《十韵汇编》,北京大学印行,1935。
姜亮夫:《瀛涯敦煌韵集》,上海出版公司,1955。
周祖谟:《唐五代韵书集成》,中华书局,北京,1983。

(邵荣芬)

Qieyunkao

《切韵考》 研究《切韵》语音系统的著作。清代陈澧著。作者认为《切韵》虽然亡佚了,但是间架还保存在《广韵》里,所以就利用《广韵》考证《切韵》的语音系统。《切韵考》是第一部利用反切研究韵书音韵系统的专著。作者考证出《切韵》有 40 声类,311 韵类。尽管后来的学者并不完全同意他的结论,但是很赞赏他创造的系联法(见《切韵音》)。直到现在还有人用这种方法研究某种韵书或反切材料的语音系统。

《切韵考》分内外篇。《内篇》6 卷,第 1 卷序例,第 2 卷考证声类,第 3 卷考证韵类,第 4、第 5 两卷把考证的韵类列成表,第 6 卷探讨某些理论问题。《外篇》是从等韵家的观点来重新排列《内篇》的内容,共 3 卷。第 1、第 2 卷是韵表,相当于《内篇》的第 4、第 5 卷,第 3 卷相当于《内篇》的第 6 卷。

(俞敏)

Qieyun yin

《切韵》音 (ancient Chinese sound system) 指《切韵》一书所反映的语音系统。《切韵》原书已经失传,但它的语音系统却完好地保存在两个增订本里。这两个增订本是故宫博物院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一般简称《王三》)和《大宋重修广韵》(一般简称《广韵》)。要了解《切韵》的语音系统,主要就是以这两部书为依据。

研究《切韵》的语音系统,一般分两步进行:先考求出

声、韵类别,然后再构拟出它们的具体音值。

《切韵》用反切注音。反切上、下字的选择是任意的,同声或同韵的字并不都用相同的反切上字或下字。因此要弄清楚《切韵》的声、韵类别,就必须在反切的分析和归纳上下一番工夫。最先有系统地研究《广韵》反切的是清末人陈澧。他在所著《切韵考》一书中,通过《广韵》反切对《广韵》的声、韵类别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他根据反切上字取声,下字取韵的基本原理,创造了一个研究反切的著名方法,后来通称之为系联法。陈澧在卷首《条例》中自述了他的方法。概括起来,有下列几点。

① 反切上字或下字同用的,被切字的声母或韵母必然同类。如“冬,都宗切”,“当,都郎切”,同用反切上字“都”字,则“冬”与“当”声母必然同类;“东,德红切”,“公,古红切”,同用反切下字“红”字,则“东”和“公”韵母必然同类。

② 反切上字或下字互用的,被切字的声母或韵母必然同类。如“当,都郎切”,“都,当孤切”,“都”做“当”的反切上字,“当”做“都”的反切上字,“都”和“当”的声母必然同类;“公,古红切”,“红,户公切”,“红”做“公”的反切下字,“公”做“红”的反切下字,则“公”和“红”的韵母必然同类。

③ 反切上字或下字递用的,被切字的声母或韵母必然同类。如“冬,都宗切”,“都,当孤切”,“冬”字用“都”字做切上字,“都”字又用“当”字做切上字,依次递用,则“冬、都、当”3字的声母必然同类;“东,德红切”,“红,户公切”,“东”字用“红”字做切下字,“红”字又用“公”字做切下字,依次递用,则“东、红、公”3字的韵母必然同类。

④ 《广韵》同音的字不会设立两个不同的反切,因而两个反切下字同类的,上字必不同类。如“红,户公切”,“烘,呼东切”,“公、东”韵同类,则“户、呼”声不同类。划分反切上字的类别,就以此为根据。反过来,两个反切的上字同类,下字必不同类。如“公,古红切”,“弓,居戎切”,“古、居”声同类,则“红、戎”韵不同类。划分反切下字的类别就以此为根据。

⑤ 反切上字有时两两互用,因而有实同类而不能系联的现象。如“多、得、都、当”4字声本同类,但“多,得何切”,“得,多则切”,“都,当孤切”,“当,都郎切”,“多”与“得”,“当”与“都”两两互用,4字因而不能系联。不过《广韵》一字两音往往互注反切,互注的反切既然同音,它们的反切上字当然同类。如平声东韵“冻,德红切,又都贡切”,去声送韵“冻,多贡切”。这里又音“都贡切”指的就是“多贡切”。既然“都贡”、“多贡”同一音,“都、多”两字当然声同类。凡上字实同类而不能系联的,据此以定其系联。

⑥ 反切下字有时也两两互用,因而也有实同类而不能系联的。如“朱、俱、无、夫”4字韵本同类,但“朱,章俱切”,“俱,举朱切”,“无,武夫切”,“夫,甫无切”,“朱”与“俱”,“无”与“夫”两两互用,4字因而不能系联。《广韵》平、上、去、入四声相承的韵,它们的分类也大多相承。凡

反切下字不系联,而相承的韵又分两类的,就据以定其分类,否则虽不系联,也定为同类。

就利用反切本身以求考《广韵》的声、韵类别来说,陈澧的方法基本上是站得住的。只有利用又音一点略欠妥当,因为《广韵》又音很多,是抄录另外来源的前人的反切,往往与正切相矛盾。不过陈澧在使用又音反切时显然有所取舍,没有多滥用又音。

陈澧的真正不足之处,在于把系联法绝对化了。他强调“惟以考据为准,不以口耳为凭”。实际上由于用汉字拼音的不易准确,加上历史音变因素的干扰,反切经常有不合常轨的现象,单纯地依靠系联,并不能分清所有的声、韵类别。后人鉴于此,在陈澧系联法的基础上,广泛地利用其他有关的材料和知识,终于逐步解决了大部分陈澧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

构拟音值必须以活语言为主要依据。构拟《切韵》的音值一般就是在比较现代方言读音的基础上往上对《切韵》音系的读音进行推测。语音的演变是有规律的。现代方言音系都是从《切韵》音系以及与《切韵》音系有共同历史渊源的其他方言音系按照各自的规律发展而来。它们都与《切韵》音系之间存在着直接的或间接的历史渊源关系和语音的对应关系。它们必然都在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程度上反映出《切韵》音系的某些特征。因此只要把现代方言的各种读音加以比较,再和《切韵》的声、韵类别及其结构规律对照起来观察,并参考其他历史语音资料及语音演变的通则,就可以拟测出《切韵》音系的大致音值来。试以《切韵》端、透、定3母为例,述其拟测过程如下:

先把这3母在现代方言里的读音对照列出:

方 言	端	透	定
北方方言、粤方言	t	t'	t'(平) t(仄)
客家方言	t	t'	t'
闽方言	t	t'	t
吴方言	t	t'	d'
湘方言(双峰)	t	t'	d

然后逐项进行比较、观察。先看发音部位。3母在各地都读作舌尖音,这与早期韵图把它们标作“舌头”音完全相合。因此可以假定《切韵》这3母也是舌尖音。再看发音方法。3母各地都读作塞音;端母清音不送气,透母清音送气,各地也一样。可以假定《切韵》也如此。定母北方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都读作清音,与端母或透母混而不分,显然与《切韵》不合,但吴方言、湘方言则读作浊音,与端母、透母互相区别,而早期韵图又把定母标作浊音,也正与吴方言、湘方言相合,因此可以假定《切韵》的定母是浊音。这个浊音吴方言送气,湘方言不送气,不相一致。不过吴方言的送气是浊的[tʰ],它不仅出现于塞音和塞擦音之后,也出现于[m、n、l]等通音之后,并且当通音声母的声调有阴阳对立时,则只出现于阳调,不出现于阴调。例如吴兴话“拎”读[lɿŋ](阴平),而“零”读[lɿŋ](阳平)。这都说明吴方言的浊送气不是原有的,而是在声调分化

为阴阳之后,在阳调的影响下产生的。这也就是说,早期吴方言端、透、定 3 母的格局与湘方言并无两样。另外,梵文字母对音也提供了类似的信息。从东晋到唐初大多以定母的“陀”字对译梵文不送气的 da,而以其他办法对译梵文送气的 dha,例如法显用“陀呵”两字拼合(法显译《佛光大般泥洹经》卷第五《文字品》第十四),阇那崛多用新造字“咄”(阇那崛多译《佛本行集经》卷第十一《习学技艺品》第十一),等等。这也证明定母当时是不送气的。据此可以假定《切韵》的定母是不送气的浊音。这样最后就得到:端 t,透 t',定 d。

用近代语言学的方法构拟《切韵》音值是 20 世纪初由外国学者开始的,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是取得较大成绩的第一个。不过高氏所做的工作是开创性的,缺乏借鉴,而所用资料的范围又有很大的局限性,他的结论有很多地方是不够妥当的。几十年来,在中外学者的努力下,又取得了不少进展。但由于拟音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要获得比较圆满的结论,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努力。

声母 陈澧之后,通过中外学者一个世纪的努力,基本上考明了《切韵》的声母系统,现开列于下:

帮组	帮 p	滂 p'	並 b	明 m	
端组	端 t	透 t'	定 d	泥 n	
来组					来 l
知组	知 t	彻 t'	澄 d	娘 n	
精组	精 t	清 t'	从 d		心 s 邪 z
庄组	庄 t	初 t'	崇 d		生 j 俟 s
章组	章 t	昌 t'	船 d		书 c 常 z
日组					日 n z
见组	见 k	溪 k'	群 g	疑 ŋ	晓 x 匣 y
影组	影 ?				以 0

以上共 37 个声母。“帮、滂”等是习惯上用的声母代表字。娘母和泥母出现的机会是互补的,有人认为应该并入泥母。其余的意见基本上一致。对音值的看法分歧要大一些。比如高本汉认为庄组应当读舌尖后音[ʈ]等;罗常培根据梵文对音则认为知组也应当读舌尖后音[ʈ]等;陆志韦根据梵文对音又认为船和常的读法应当互易,即常读[dʒ],而船读[z];主张泥、娘合并的人则以为日母应当读[n],等等。这些分歧都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来解决。

韵母 《切韵》193 韵中所包含的韵母目前虽然已经大致划分清楚,但有少数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如果按照最多的分法,可得 335 个韵母(包括王仁昫增加的广、严两韵),平上去声不分别计算,也有 163 个。现在把这 163 个韵母分摄开列于下,分别注明开合等次。三等韵按照韵图处理的不同分为 4 类。甲类指韵图放在三等的韵,乙类指韵图放在二、三、四等的韵,丙类指重组韵中韵图放在三等的唇牙喉音字,丁类指重组韵中韵图放在四等的唇牙喉音字及同韵的舌齿音字。为了方便,入声韵附在相承的阳声韵后面,不单列。每个韵母之下按声调各举一例,也可以兼作 335 个韵母的代表。无例的地方用圆圈表示。韵目和例字都据《王三》。

① 通摄

东一	东董送屋
东三乙	中○仲六
冬一	冬潼宋沃
钟三乙	钟肿用烛

② 江摄

江二	江讲绛觉
----	------

③ 止摄

支三丙开	羁绮议
支三丙合	亏诡痿
支三丁开	岐紫企
支三丁合	窥跬恚
脂三丙开	饥几冀
脂三丙合	逵轨愧
脂三丁开	伊旨弃
脂三丁合	葵葵季
之三乙开	之止志
微三甲开	机岂既
微三甲合	韦伟贵

④ 遇摄

鱼乙	鱼语御
虞乙	虞虞遇
模一	模姥暮

⑤ 蟹摄

齐四开	齐荠霁
齐四合	圭○惠
齐三乙开	移○○
祭三丙开	○○剿
祭三丙合	○○判
祭三丁开	○○艺
祭三丁合	○○锐
泰一开	○○泰
泰一合	○○外
废三甲开	○○刈
废三甲合	○○移
佳二开	佳蟹债
佳二合	蛙拐卦
皆二开	皆駭減
皆二合	乖○怪
夬二开	○○蚤
夬二合	○○夬
哈一开	哈海代
灰一合	灰贿队
哈三乙开	○○藪○

⑥ 臻摄

痕一开	痕很恨乾
魂一合	魂混愿骨
真三丙开	巾蠟僅乙
真三丙合	困窘韵茁

真三丁开	因紧印吉
真三丁合	均筠咍橘
臻二开	臻○○栉
殷三甲开	殷隐焮迄
文三甲合	君恽运屈

⑦ 山摄

元三甲开	言偃建歇
元三甲合	元阮愿月
寒一开	寒旱翰曷
寒一合	桓缓换括
删二开	删潜冻辖
删二合	关绾惯刮
山二开	山产桐黠
山二合	顽○幻滑
先四开	先铣霰屑
先四合	玄犬绚血
仙三丙开	愆蹇彦杰
仙三丙合	权眷眷厥
仙三丁开	甄遣遣子
仙三丁合	娟娟绢缺

⑧ 效摄

萧四	萧筱啸
宵三丙	妖薰庙
宵三丁	腰眇妙
肴二	肴巧效
豪一	豪皓号

⑨ 果摄

歌一开	歌哿箇
歌一合	戈果过
歌三乙开	伽○○
歌三乙合	鞞○○

⑩ 假摄

麻二开	加下讶
麻二合	瓜瓦化
麻三乙开	遮也夜

⑪ 宕摄

阳三乙开	阳养漾药
阳三乙合	王往况慢
唐一开	唐荡宕铎
唐一合	光晃旷郭

⑫ 梗摄

庚二开	庚梗梗格
庚二合	觥矿蝗虢
庚三乙开	京景敬戟
庚三乙合	荣永咏曷
耕二开	耕耿净责
耕二合	轰○轰获
清三乙开	清静劲昔
清三乙合	营颖甍役

青四开 青顶径锡
青四合 莹迥莛圉

⑬ 曾摄

蒸三乙开 蒸拯证职
蒸三乙合 〇〇〇血
登一开 登等嶝德
登一合 肱〇〇国

⑭ 流摄

尤三乙 尤有宥
侯一 侯厚候
幽三乙 幽幼幼

⑮ 深摄

侵三丙 音锦禁邑
侵三丁 愔枕鸩揖

⑯ 咸摄

覃一 覃感勘合
谈一 谈敢闾盍
盐三丙 淹奄儗敝
盐三丁 淹奄厌厝
添四 添忝忝怙
咸二 咸嫌陷洽
街二 街檻鉴狎
严三甲 严广严业
凡三甲 凡范梵乏

一等开口痕 ɛn 一等合口魂 uən
三等开口殷 iən 三等合口文 iuən

④ 韵尾一般认为有3种,一为元音韵尾,一为鼻音韵尾,一为与鼻音韵尾相配的入声塞音韵尾。现将这3种韵尾列表举例如下:

韵尾	出现的摄	例字
元音尾	i 止蟹 泰 ai	
	u 效流 豪 au	
鼻音尾:塞音尾	ŋ:k 通江宕梗曾 冬沃 oŋ:ok	
	n:t 臻山 殷迄 iən:iət	
	m:p 深咸 添怙 ɛm:ɛp	

声调 《切韵》把韵按声调分成4大类,并分别标以平上去入的名称,可见《切韵》有4个声调。有人认为《切韵》是四声八调,也就是说4个声调按声母清浊各分为阴阳。不过在《切韵》的反切下字里一点也看不出阴阳分化的痕迹。试以《王三》的四等韵为例,它们的反切上下字清浊配搭关系如下表所示:

	平	上	去	入
总数	81	73	80	57
清、清 %	24 29.63	26 35.62	29 36.25	19 33.33
浊、浊 %	11 13.58	9 12.33	7 8.75	12 21.05
清、浊 %	46 56.79	38 52.05	44 55.00	26 45.61

清浊混用的百分比都略大于或接近于半数,这说明《切韵》反切在切下字清浊的选择上完全是任意的,一点也没有清选清,浊选浊的倾向。由此可见四声八调说缺乏事实根据。

由于文献不足,对声调变化的语音制约条件又缺乏了解,《切韵》四声的调值目前还不能作有把握的构拟。

音韵结构 语音系统都有自己的结构规律,《切韵》音系当然也不例外。早期韵图把《切韵》的韵母分为四等列图,不同等的韵母与声母往往有不同的配合关系。现在按照韵图的办法把《切韵》各等韵母与声母的配合关系列一简表于下页。三等韵的丙丁两类因归字有不同意见,表中合在一起,不分列。声母以组为单位,但邪母、俟母、群母、以母分别从精组、庄组、见组、影组中抽出单列。+号表明有字出现。少数例外字从略。

从韵母的角度看,一等韵和四等韵相同,都和帮组、端组、来组、精组(不包括邪母,凡抽出声母的组,同此)、见组、影组共19个声母相拼。二等韵和帮组、来组、知组、庄组、见组、影组也是19个声母相拼。三甲韵和帮组、见组、影组共11个声母相拼。三乙韵和帮组、来组、知组、精组、邪母、庄组、俟母、章组、日组、见组、影组、以母共33

以上的分类有些地方学者们有不同的意见。例如臻韵(举平以赅上去入,下同)只有庄组平入声字,与真韵正好互补,有人主张臻与真应当合并。严、凡两韵的情况也类似。严韵只有平入声牙喉音字,与凡韵基本上互补,《王三》业韵“怯,去劫反”与乏韵“渴,起法反”对立。不过“怯”小韵有的《切韵》残卷没有收,大概是《王三》增加的。“渴”字“起法反”的音,经史音注中比较晚出,谐声偏旁也不合。同小韵的“妊”字,有的《切韵》残卷也没有收。可见这个小韵也不一定是《切韵》原有的。所以有人主张“严”与“凡”也应当合并。至于重组两类的划分则意见更为分歧。所谓重组是指支、脂、祭、真、仙、宵、侵、盐八韵中唇牙喉音两套对立的小韵而言。分歧出在重组两类与同韵舌齿音的关系问题上。上表所列是董同龢的说法。他认为重组四等与同韵舌齿音为一类,重组三等独立为另一类。有人则持相反的看法,认为重组三等与同韵舌齿音为一类,重组四等独立为另一类。陆志韦则又持另一种看法,认为重组三等与同韵知、庄、来三组声母为一类,重组四等与其余舌齿音为另一类。如此等等。

以上这些不同的看法对韵母的多寡难免产生影响。如果根据臻、真合并,严、凡合并,重组四等独立成类的意见,即邵荣芬《切韵研究》的意见,则《切韵》的韵母就只有325个,平上去声不分别计算则只有158个。

上表没有附列各韵的读音,这是因为各家所拟的读音分歧还相当大。比较一致的意见只有下列几点。

① 在四等具足的摄里,一等韵的主要元音偏低偏后,二、三、四等韵依次偏高偏前。试以效摄为例:

一等豪 a 二等肴 a
三等宵 æ 四等萧 ɛ(或 e)

② 在只具备一等和三等的摄里,一等韵和三等韵的主要元音可以相同,一、三等的区别由介音表示。例如宕摄:

一等唐 aŋ 三等阳 iaŋ

不同等而合为一韵的,也适用同样的原则。例如:

歌一等开 a 歌三等开 ia
麻二等开 a 麻三等开 ia

③ 合口有介音 u,三等有介音 i(或 j)。例如:

《切韵》中各等韵母与声母的配合关系

声母	一等	二等	三甲	三乙	三丙丁	四等
帮组	+	+	+	+	+	+
端组	+					+
来组	+	+		+	+	+
知组		+		+	+	
精组	+			+	+	+
邪母				+	+	
庄组		+		+	+	
俟母				+		
章组				+	+	
日组				+	+	
见组	+	+	+	+	+	+
群母			+	+	+	
影组	+	+	+	+	+	+
以母				+	+	

个声母相拼。三丙丁韵除不和俟母相拼外，和三乙韵所拼声母一样。声母最少的是三甲韵，最多的是三乙韵。

从声母的角度看，俟母只拼三乙韵，邪母、以母、章组和日组只拼三乙韵和三丙丁韵，群母则拼各类三等韵。端组只拼一、四等韵，知组、庄组只拼二、三等韵。精组只拼一、四等韵和三乙、三丙丁韵。只有帮组、来组、见组、影组共 11 个声母和各等韵母都相拼。

《切韵》音系的重要性 《切韵》音系是什么性质，是单一的还是综合的，学者们的看法很不统一。但有两点事实是大家都承认的，即《切韵》音系是一个内部一致的音系，并且是当时文化界所公认的权威音系。仅此两点，就使《切韵》音系在汉语语音史的研究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其重要价值大致有 3 方面。

① 《切韵》音系是今天了解 6~7 世纪之间汉语语音情况的重要根据。它的完整性和权威地位，又使它自然地成为汉语语音史中古时期的代表音系。

② 《切韵》音系是目前了解得比较确切的中古音系，研究《切韵》以前的语音系统要以《切韵》音系为出发点，要根据《切韵》音系往上推。举例来说，在谐声字里有很多下面一类的谐声例子：竹(知)→笃(端)，台(透)→胎(彻)，重(澄)→動(定)，农(泥)→浓(娘)，等等。主谐字和被谐字总是一边是端组声母字，一边是知组声母字。早期反切也有类似现象。例如陆德明《经典释文》所录徐邈(344~397)反切：纛，丁卫反(《尚书·立政》)；窞，敕尧反(《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涤，直的反(《礼记·曲礼下》)；曙，乃吉反(《左传》襄公二年)；等等。甚至《王三》、《广韵》反切也仍然有少数这类残余：椿，都江反(切)(江韵)；赧，奴板反(切)(潜韵)；等等。这都显示《切韵》以前端、知两组声母关系密切。从《切韵》音系本身看，端、知两组声母有比较明显的分布规律，即端组出现于一、四等，知组出现于二、三等，互不冲突。有少数例外，但不难解释。据此可以推知，魏晋以上端、知两组声母肯定没有区别，后来的区别是在不同的韵母条件下发生演变的结果。即

此一例，便可看出《切韵》音系在上推古音中的重要作用。

③ 研究《切韵》后的语音历史以及现代方言，可以利用《切韵》音系来解释语音的变迁。例如在张参(生卒不详)《五经文字》一书的注音中有这样一些反切：臙，必么反；臙，捕么反；杓，匹么反；擗，匹尧反；僂，匹微反。从《切韵》音系的角度看，不难确定这是一种音变现象。被切字都是宵韵唇音重组四等字，切下字都是萧韵字。它们互切，说明在张参的语音里，宵韵唇音重组四等至少有一部分字变入了萧韵。又例如浙江义乌方言有下面这样的对立字群，连 lie:(阳平)/莲 lie:(阳平)，迁 ts'ie:(阴平)/千 ts'ie:(阴平)，钱 zie:(阳平)/前 zie:(阳平)，仙 sie:(阴平)/先 sie:(阴平)。从《切韵》音系的角度看，这种对立也很容易解释。斜线前都是仙韵字，斜线后都是先韵字。它们的对立显然是古代仙、先两韵有分别的遗留。

从上述可知，《切韵》音系是汉语语音史中十分关键的一环。没有它，汉语语音史的研究决不可能达到今天的水平。

参考书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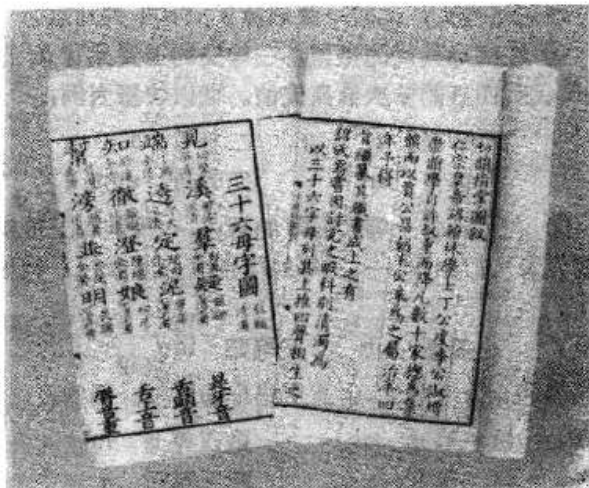
- 陈澧:《切韵考》。
高本汉著，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合译:《中国音韵学研究》，商务印书馆，北京，1938。
陆志韦:《古音说略》，哈佛燕京学社，北京，1947。
李荣:《切韵音系》，科学出版社，北京，1956。
邵荣芬:《切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2。

(邵荣芬)

Qieyun Zhizhangtu

《切韵指掌图》 宋代的一部等韵书。旧题司马光(1019~1086)作，并载光自序一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第光传家集中，下至《投壶新格》之类，无不具载，惟不载此书”，反映人们怀疑它是伪作。20 世纪 30 年代，发现一个南宋刻本，大家开始肯定它是宋代作品。后附明代邵光祖(?~1385?)检例一卷。

全书共分 20 图，自创次序，例如第 1 图收 [au]、[iau] 字和它们的入声。第 2 图收 [uŋ]、[iuŋ] 字和入声。完全打乱了《韵镜》、《七音略》遵守《广韵》韵目次序的陈规。这是第 1 个特点。《韵镜》、《七音略》入声(收 -k、-t、-p)



旧题司马光作《切韵指掌图》

韵配阳声(收-ŋ、-n、-m)韵,此书则用入声韵兼配阳、阴声(收元音)韵。例如“穀、哭”既在第2图配“公、空”,又在第3图配“孤、枯”。据戴震《答段若膺论韵》说,“上年于永乐大典内得宋淳熙初杨侯韵谱……于旧有入者不改,旧无入者悉以入隶之”云云,这一点虽不是独创,也足以反映宋人音系大大化简。这是第2个特点。为现代人用,本书比《韵镜》更方便。

南宋时的读书人用《指掌图》查出唐以前反切的准确读音,后来的音韵学者通过《指掌图》研究当时的语音系统。该书使用方法很简单。如要想知道“其九切”是什么音,先查上字“其”,在第18图牙音平声栏中查到“其”,“其”在“群”下,属群组。然后再查下字“久”,“久”在第4图牙音上声栏里,然后沿着“久”向左(或向右)查,查到“群”组所对的字,图里是“舅”字。这样就知道“其久切”的读音与“舅”的读音相同。

见等韵。

(俞敏)

qīngnián yufa xuēpài

青年语法学派 (Junggrammatiker) 见新语法学派。

qīngchūnyīn

轻唇音 见等韵。

Qīnggē'ěrtāi

清格尔泰 (1924~) 中国蒙古族语言学家。1924年6月生于内蒙古昭乌达盟(今赤峰市)宁城县。40年代初留学日本,回国后投身蒙古语文的教学、研究和组织工作。曾任内蒙古自治区蒙文研究会副主任、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语文工作委员会代主任、内蒙古大学副校长兼蒙古语文研究所所长等职,是第四、第五、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3年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现任中国语言学会、中国民族语言学会、中国蒙古语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族研究会常务理事,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所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所著《蒙文文法》(1949)是中国第一本用现代语言学方法系统介绍现代蒙古语的语法书,曾被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50年代,参加中国蒙古语族语言和蒙古语方言的调查研究,著《中国蒙古语族语言及其方言概述》,连载在1957~1958年的《蒙古历史语文》杂志上,受到国内外蒙古语言学界的重视。在1979年出版的《现代蒙语语法》中清格尔泰提出了一系列新见解。其他论著还有《蒙古语巴林土语的语音和词法》(1959)、《论蒙古语动词》(1960)、《关于蒙语规范化问题》(1962)、《蒙古语语音系统》



(1963)、《蒙古语助动词》(1965)、《中国蒙古语方言的划分》(1979)、《蒙古语动词特点》(1981)、《关于元音和谐律》(1981)、《满语口语语音》(1982)、《蒙古语塞音q、k的历史演变》(1985)等。与其他学者合作研究契丹文字,也取得了很大进展。

(陈乃雄)

Qīngwén Qīmèng

《清文启蒙》 中国清代用传统方法讲授满文的教科书。舞格寿平著述。雍正八年(1730)刊行。全书共4卷,有目录和序言。卷一分“十二字头”、“清字切韵法”、“异施清字”等6节。通过讲解“十二字头”(分成12类的满语音节表)介绍字母、字母读音、字母出现在词里不同位置上的不同字形。在“清字切韵法”等节里,着重说明拼写复元音的方法,有特定读音的词和字母笔画的先后次序。卷二为短文,共46段,每一段以一个话题为中心,长短不一,由浅入深,里面有常用词、词的语法形式和句型。卷三题为“清文助语虚字”。介绍后置词、连词、语气词以及作为助语虚字的名词的格,动词的时间、祈使、副动、形动等形式的附加成分和构词附加成分约100个,并有用法说明和例句,卷末列举了约130个常用的副词、代词和惯用词组等。卷四包括“清字辨似”和“清语解似”两节。对字形、读音、意义相近似的词作了辨异。此书是最早的满文教科书之一,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是国内外教授满文的基本教材和研究满文的基础。18和19世纪先后几次被译为俄文和英文。

(胡增益)

qīngzhuō

清浊 汉语辅音发音时候声带不颤动的叫清,颤动的叫浊。这两个术语是从古音乐术语借来的。《礼记·乐记》“倡和清浊”,《正义》说:“长者浊也……短者清也。”这是说管乐器长的音低,短的音高。辅音里声带颤动经常是低频的,所以借用浊来表示。早期等韵家把“见溪群疑”叫“清,次(第二个)清,浊,清浊”。后来等韵家有把“疑”等鼻音叫“次浊”的,也有在“清”、“浊”上加“全”字的(陈澧等人又借用“清”、“浊”来表示“阴阳”调)。另外,《韵镜》把鼻辅音也叫“清浊”。原意大约是指口腔无音,鼻腔出音。这种用法忽略了清跟浊的分别在于声带的状况。

(俞敏)

Qīngsī

琼斯, D. (Daniel Jones 1881~1967) 英国语音学家。生于1881年9月12日,卒于1967年12月4日。早年在剑桥大学学数学,又曾学法律,但不久即以语音学为终身工作。1907年得硕士学位后,任伦敦大学语音学讲师,1921年起任教授,1949年退休为荣誉教授。曾获得苏黎世大学和爱丁堡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1907年起先后任国际语音协会副秘书长和秘书,1950~1967年任主席。

琼斯是科学的语音学的先驱。他提倡在外语教学中采用语音学方法。曾先后到过欧洲各地以及印度和美国

讲授语音学,并担任英国广播公司语音部主任。他出版过关于多种语言的语音专著,其中包括俄语、印地语、锡兰语、法语、塞专纳语(属班图诸语言)和汉语粤方言。他提出“基准元音”的概念,首次借助“元音四边形”图示精确而系统地



对元音加以描述,为后来的学者所沿用。琼斯为多种语言创设了拼音文字,并致力于英语拼字法改革。

他认为音位由有关系的一组语音构成,不谈以对立为基础,因而与布拉格学派看法不同,他只承认元音、辅音是音位,不承认重音、语调是音位,因而与美国结构主义学派看法也不同。他的重要著作有《英语语音学纲要》(1918,1939)、《英语正音词典》(1917,1948,1956,1977)、《音位的性质和功用》(1950)。他长期任国际语音协会会刊《语音教师》的编辑。

(周流溪)

Qiongsl

琼斯, W. (William Jones 1746~1794) 英国语文学家。生于 1746 年 9 月 28 日,卒于 1794 年 4 月 27 日。通希腊语、拉丁语和欧洲近代多种语言,熟习梵语、波斯、印地等东方语言。1783 年起任英国驻印度法官,在加尔各答组织亚细亚研究会。他是最早翻译迦梨陀娑的名剧《沙恭达罗》的人。

在语言学方面,琼斯的最大贡献是提出印欧诸语言同出一源的理论,比 F. 博普早 30 年。1786 年他在亚细亚研究会的一次学术讲演中,指出梵语与希腊、拉丁语的联系。他说:“梵语……的动词词根和语法形式与希腊、拉丁语酷似,这决非偶然。任何考查过这三种语言的哲学家,不能不认为三者同出一源。不过始源语言恐已不存于世。同时也有理由假定(虽然理由还不很足),哥特语、凯尔特语与梵语虽然面目迥异,但与梵语仍属同源,而波斯语也属同一语族。”这一讲演全文见 W.P. 莱曼编《19 世纪历史印欧语言学资料选编》。

(许国璋)

Qulu zim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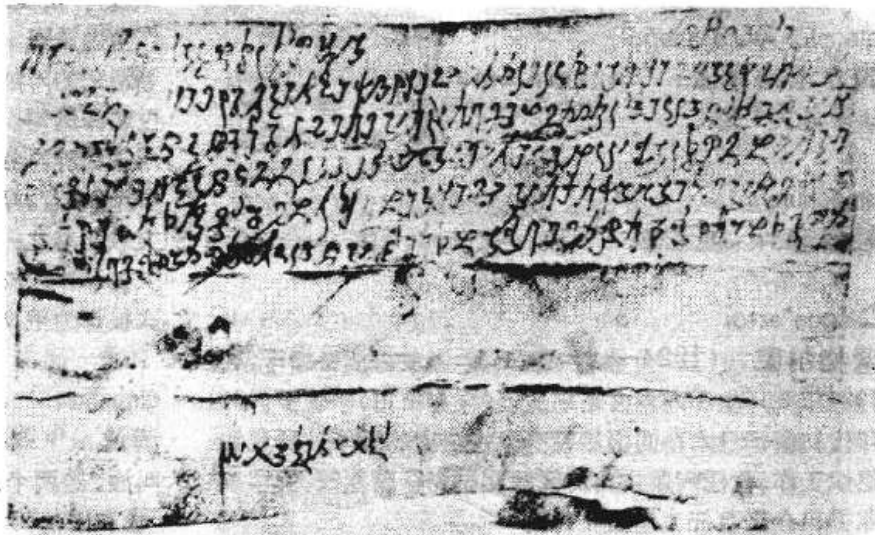
佉卢字母 (Kharoṣṭhī alphabet) 古代印度重要字母之一。意译为“驴唇”。使用区域极广,包括中国的新疆、印度西北部、巴基斯坦、阿富汗、苏联一些地区。使用范围也很大,货币、金属铭文、石碑、写经的桦树皮上都有这种字母。它由阿拉米字母演变而来,其原型可能在公元前 500 年间已传入波斯(今伊朗),公元前 4 世纪由波斯统治者带入北印度。

字母自右向左横行书写,与阿拉伯文相同。用拉丁

字母转写的字母表如下:

元音	a	i	u	e	o
辅音					
喉音	ka	kha	ga	ḡa	gha
腭音	ca	ḥa	cho	ḥh'a	ja
顶音	ṭa	ṭha	ṭh'a	ḍa	ḍ'a
齿音	ta	tha	da	dha	na
唇音	pa	pha	ba	bha	ma
半元音	ya	ra	la	va	ṽa
咝音	śa	ṣa	ṣa	sa	ṣa
气音	ha	ḥa			

在中国新疆考古发掘中已发现不少佉卢字母残卷。《法句经》是其中之一,今人名之为键陀罗语《法句经》。在古代于阗王国和鄯善王国遗址中发现了大量使用一种印度俗语写成的佉卢残卷(见图)。有人称这种语言为尼雅



佉卢残卷

俗语或鄯善俗语。(参见彩图插页第 28 页)

(季羨林)

Quanguo Wenzhi Gaige Huiyi

全国文字改革会议 (National Conference on Language Reform)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召开的第一次文字改革会议。于 1955 年 10 月 15~23 日在北京举行,参加的有来自全国除西藏外的 28 个省市自治区以及中央一级文字改革、教育、科学、作协、外交、邮电、新闻、广播、出版、民委、总政、全总、青年团、妇联等的代表共 207 人。这次会议的任务是通过《汉字简化方案》和推广普通话。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提出的《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和《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草案》,在会上作了充分的讨论后修正通过。会议还制订了普通话的定义,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并一致同意在全国大力推广普通话,首先从中小学和师范学校做起。举行这次会议的同时,中

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还举办了“中国文字改革文献资料展览”。会议通过了以下 8 项决议：

① 建议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把修正后的《汉字简化方案》提请国务院审定公布实行。

② 要求各报刊和文化教育机关广泛宣传简化汉字，各级学校使用简化汉字；出版和印刷机关立即着手改铸铜模，迅速采用简化汉字，并按照《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在出版物上废除异体字。

③ 要求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继续简化汉字、整理异体字的工作，并继续向群众广泛征求意见，早日完成汉字的简化和整理工作。

④ 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首先对全国各地小学、中学、各级师范学校分别作出指示，大力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并指示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有计划地分批调训各级学校语文教师学习普通话。关于部队推广普通话办法，建议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决定。

⑤ 建议在全国各省市设立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委员会，组织社会力量，特别是广播电台和文化馆站，大力提倡学习和使用普通话。

⑥ 建议中国科学院和各有关高等学校合作，进行全国方言调查，编写普通话的教材和参考书，以便利各方言区人民学习普通话。

⑦ 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进一步推广报纸、杂志、图书的横排、横写。

⑧ 建议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早日拟定《汉语拼音文字方案》草案，提交全国各界人士讨论并试用。

（叶籁士）

quānqīng

全清 见清浊。

quānzhūo

全浊 见清浊。

R

ren-jiduihua

人机对话 (man-machine dialogue) 中国用于自然语言理解的通俗名称。自然语言语音理解也可称为人机语音对话, 自然语言书面理解也可称为人机书面对话。

见自然语言理解。 (范继淹 徐志敏)

renlei yuyanxue

人类语言学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又称语言人类学(linguistic anthropology)。语言学的一个分支。综合运用语言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 研究语言结构、语言变化和社会文化结构的关系, 始于20世纪初期。从50年代起, 更加发展起来。美国早期的人类语言学家多出身于人类学。F. 博厄斯、E. 萨丕尔、B. L. 沃尔夫都对社会结构比较原始的北美印第安人的社会文化和语言进行过实地调查研究。他们在调查实践中, 逐步认识到: 调查研究任何语言都应当同时了解被调查人们的社会文化、经济结构、宗教信仰、地理环境、风俗习惯等, 进行人类学的调查必须懂得当地居民的语言。

尽管在人类学和语言学的调查研究中, 互相促进、相得益彰的关系已经在实践中得到了证明, 可是在语言结构和文化结构之间建立对应的关系, 还是比较困难的。沃尔夫曾经力图在某些语言结构和某些文化结构之间建立这种关系, 没有成功。法国人类学家C. 列维-斯特劳(1908~)认为, 语言学和人类学的关系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一种语言和一种文化的关系, 第二个层次是语言和文化的一般性关系, 第三个层次是语言学和人类学的关系, 并且指出语言学和人类学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层次。这个观点比沃尔夫前进了一步。

波兰人类学家、民族学家B. 马林诺夫斯基(1884~1942)在《原始语言中意义的问题》一文中指出, 要表达的全部事物是随着文化水平、地理、社会和经济的情况而变化的, 词的意义要根据一定的文化来分析词的功能。他很强调研究“语言环境”的重要性, 认为话语和语言环境是密切地交织在一起的, 语言环境对了解词义是必不可少的。他所说的语言环境不光指上下文, 而且包括文化水平和可能影响语义的一切因素。他的学生英国语言学家J. R. 弗斯继承和发扬了“语言环境”的理论, 并且提出了韵律学的新见解。后来逐步发展形成了弗斯语言学派(又称伦敦学派), 这个学派的“语言环境”理论是属于人类语言学的。

从50年代起, 美国的语言学理论有新的发展。人类语言学的调查研究工作也向前推进了, 人类语言学家就文化类型和语言类型进行了比较研究。如H. E. 德利非

尔在《语言学和人类学》论文集(1975)中发表了《北美土著的文化组合和民族组合》一文, 根据别的学者和他自己实地调查的材料, 进行比较研究指出: 北美土著的文化组合和民族组合是相当一致的。

语言学家和人类语言学家看到, 在语言研究中, 由于提出了“音位”这个基本单位, 语言学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的发展, 自然就想解决什么是文化的基本单位的问题。因为文化包括工具、制度、信仰、风俗习惯等许多不同类型的事物, 甚至也包括语言, 所以给语言以外的文化找出某个共同的单位是很不容易的。美国语言学家K. L. 派克用“phonemic”的后一部分“emic”来表示具有区别性特征的文化单位, 这个新术语似可仿照“音位”一词译为“文位”。他还用“etic”表示没有区别性特征的单位。有的学者主张使用non-emic代替etic, 可译为“文位变体”。这几个术语已经在一些文化人类学的著作中使用, 但实质问题还处于探索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组织语言学、民族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专家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语言调查和社会历史调查。1956年组织700多人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队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语言调查。1958年又组织了500多人的社会历史调查工作队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历史调查。语言调查队除重点调查语言文字、方言以外, 也要取得一些社会结构、民族特征、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的资料, 这就和人类语言学的调查内容有很多相同之处。语言调查者对社会文化有不了解的问题, 可以从社会历史的调查工作中得到补充。在中国进行了综合性的人类语言学调查, 并且发表了一些著作。例如傅懋勳1979年曾到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永宁人民公社对保留母系家庭特征的一部分纳西人的家庭和亲属称谓进行过现场调查。1980年他在《民族研究》第3期发表了《永宁纳西族的母系家庭和亲属称谓》一文。在这种母系家庭中, 妇女当家长, 掌握管理家庭的经济大权, 没有姨甥关系, 但有舅甥关系。这是母系家庭的重要特征之一。作者还通过母系家庭中对称关系的研究来观察亲属名称演变的历史。

社会语言学、民族语言学和人类语言学在研究内容上, 有很多交叉和重叠之处。

参考书目

M. D. Kinkate, K. L. Hale and O. Werner, *Linguistics and Anthropology*, The Peter de Ridader Press, Belgium, 1975.

B. Malinowski, *The Problem of Meaning in Primitive languages*, Supplement I in *The Meaning of Meaning* by C. K. Ogden and I. A. Richards, London, 1923.

(傅懋勳)

renmingxue

人名学 (anthroponomastics) 研究人名产生发展的规律、人名的结构及其社会功能和地理分布的学科。人名的产生和发展与各民族的社会情况和风俗习惯密切相关。由于社会情况和风俗习惯不同, 各民族的人名结构及其构成方法常有差异。

汉语人名系统中,属于人的专有名称的有姓(氏)、名字、别名、乳名、绰号。过去还有谥号和美称。姓和名(字)是现代汉语社会中每个人必不可少的名称,用来代表一个人,区别于别的人。

姓(氏):表明家族系统的称号。姓和氏本有分别,姓起于女系,氏起于男系。后来说姓氏,即指姓。南宋郑樵的《通志·氏族略序》(1161):“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姓所以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别;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三代之后,姓氏合而为一。”

汉族人究竟有多少姓,尚无精确统计。北宋时编的《百家姓》收集488个姓。明代的《皇明千家姓》收集1968个姓。《现代汉语词典》只收录现代汉族姓氏930多个。除单姓(赵、钱、孙、李等)、复姓(欧阳、司徒等)外,还有双姓,多见于旧时已婚妇女,一般无正式名字,双姓后加“氏”字即作为称呼,如李杨氏(夫姓李,父姓杨)、刘张氏(夫姓刘,父姓张)之类。

名字:人的基本名称,一般是一生下来时被人们赋予的,也有少数是成人时自己选择的。名字是任意起的,但有些又有限制,比如一个家族同一辈人的双字名中的前一个字按照家谱的规定是相同的,如志刚、志强、志新。

别名:基本名称(或正式名字)以外的名字,包括“字”、“号”、“乳名或小名”、“假名”。“字”是根据本名的涵义另取的别名,如班固字孟坚,岳飞字鹏举。“号”原指名和字以外另起的别名,后来也泛指名以外另起的字,如苏轼字子瞻,号东坡,陆游字务观,号放翁。宋以后在士大夫之间起别号之风尤盛,有多达十几个的。字和号皆为美称。古代男子二十而冠。《仪礼·士冠礼》:“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周礼注》:“号,谓尊其名,更为美称焉。”

假名:包括艺名、笔名、法名或其他代替真名的别名。如麒麟童是周信芳的艺名,鲁迅是周树人的笔名,一行是张遂的法名,朱红灯是义和团早期首领朱占鳌的别名。

乳名或小名:小时候起的非正式的名字,长大后在长辈口中有时还沿用。

绰号:也叫外号,由周围的人给起的补充名,常常是根据人物的某种特点或生活环境而起的,如智多星吴用,黑旋风李逵,泥人张,烤肉宛。

属于人名范畴的,还有所谓“谥”。谥为君主时代帝王、贵族、大臣等死后,依其生前事迹所给予的称号,如诸葛亮谥“忠武”,岳飞谥“武穆”。

另外,过去还有以官称、以地称的,如嵇中散(嵇康),杜工部(杜甫),孟襄阳(孟浩然),韩昌黎(韩愈)。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名的结构发生不少变化。例如,旧时的谥号早已废除,避讳之说(如丘之为邱,则以避孔子讳而加丩)也不复存在;今天的中青年一般不再有字和号。现在人们的正式名称就是姓(氏)和名(字),各种证件也只要求记录姓名。

中国世袭的姓氏制度始于周朝。当时只是贵族有名

有姓,而一般平民有名无姓(这一点与古代希腊、罗马相同,奴隶也是有名无姓)。复姓是后来出现的,而且多是从官职和封邑而来的,如公孙、司马、上官、司徒、欧阳等等。复姓变化较大,不少人把复姓改成了单姓,如公孙改姓孙,钟离改姓钟。自古以来,姓氏变化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所谓赐姓。唐代封建帝王赐姓最多,所以李氏遍天下。

名字最初主要是单名,隋唐以后双名渐多,此后1000多年双名一直居于优势。但近年来,单名又逐渐增多,致使重名现象更加严重。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1984年的统计表明:1949年以前,单名仅占总人数的6.50%,1949年10月~1966年5月期间占总人数的8.98%,1966年6月~1976年10月占27.81%,1976年11月~1982年6月占32.49%。另外,名字颇受时代影响,如“文化大革命”期间生的小孩,带“红”字的名字占第一位。

汉族人姓名的地理分布也有其特点。在上述的统计材料中,“陈”、“林”二姓为福建省的大姓,带“磙”(福建方言字,意为“美玉”)字的人名88个,全部出现在福建;带“𡗗”(广东方言字,意为“矮小”)字的人名28个,全部在广东地区。研究这种分布可以帮助人们探索人口流动的情况。

与汉族人名系统相近的,除国内一些少数民族外,还有朝鲜和越南(朝鲜的姓不到300个,“金”、“李”和“朴”三姓居大多数)。与它不同的,则非常多。如中国彝族、纳西族、傈僳族、哈尼族、景颇族、怒族、佤族等部分地区至今仍保留着父系制度下父名子名世代相连的命名制度(父子连名制),即父亲的名字最后一二个音节与儿子名字的头一二个音节相连,如此世代相传。这种连名制是父权制血统和财产继承权的重要标志。通过这种命名制度,人们可记诵数十代以前的祖先和谱系。

日本人的姓名数目庞大,且姓多于名,姓近7万,名4万多(据《图说日本语》一书载,姓约10万个,铃木、佐藤、田中、山本、渡边、高桥、小林、中林、伊藤、斎藤为大姓)。日本人的姓名模式同中国汉族人一样,姓在前,名在后。但转写成罗马字时,则同英国人,名在前,姓在后。日本的姓名一般用汉字,而且字形绝大多数与中国汉字相同,但读音迥然不同。

在英美等不少国家中,婴儿洗礼时赋与名字,叫做洗礼名或教名。由于很多人得到同样名字(教名),因而用别名加以区别,如John Redhead, John Hunter, John Scott。许多这样的别名分别固定在一些家庭中,并世代相传,就成了姓。其基本模式是名字在前,姓在后,与汉语的姓在前名在后的模式相反,但匈牙利语姓名的排列与汉语相同。

基本模式当中也有一些差别:美国和加拿大一般在名与姓之间另加一个名字(书面上常用首字母表示,如Kenneth L. Pike),称作第二名字或中间名,这个名字可以是已婚女人的娘家姓,也可以是其他。在欧洲,第二名字不太普遍,如果有,也是在洗礼(最晚在按手礼)时

得到的。在欧洲大多数国家,第一个洗礼名是重要的,第二个常省略。但在德国,最靠近姓的名字(即第二个名字)重要,不能省略。

俄罗斯人的姓名结构也是名在前,姓在后;它与汉族人姓名不同之处,还在于人的姓名结构中除姓、名字之外,还有父名。例如,父亲名字叫 Иван,儿子的姓名中加上 Иванович(父名),意为“伊万之子”;女儿的姓名中加上 Ивановна,意为“伊万之女”。名字、父名和姓是俄罗斯人姓名的全称。各种证件要求用全称,但在同事和熟人之间只用前两个,即名字和父名。俄罗斯人姓名有明显的性别标志。另外,还利用各种后缀构成名字的表爱小称、昵称或卑称,以表达一种特定的关系或感情。

人名学内容十分丰富,研究人名学对历史学、民俗学、人口学、语言学等学科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刘涌泉)

Ri'erman yuzu

日耳曼语族 (Germanic group) 印欧语系的主要语族之一。所属各语言使用于北欧、中欧(德国、奥地利、卢森堡等)、西欧(英国、比利时、荷兰),以及欧洲之外的英语国家和地区,总人口在 4.8 亿以上。

日耳曼民族约在公元前 750 年聚居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以及与此邻近的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日耳曼诸语言的最古历史材料见于公元前 1 世纪的拉丁文著作。公元 200 年起出现的北欧铭刻,是使用 24 个字母的一种文字体系。但是原始日耳曼语(日耳曼共同语)不象罗曼共同语那样保存着文字记录,因此只能通过历史比较法去构拟。通常认为,日耳曼诸语言是印欧语言内发生“日耳曼语音变”时分化出来的,这个音变就是:原始印欧语的 p、t、k 变为日耳曼语的 f、þ、h,同时 b、d、g 变为 p、t、k,而 f、þ、h 则变为 b、d、g。例如拉丁语的 decem(十)变成了哥特语的 taihun。

原始印欧语中的词根元音交替现象在日耳曼语言里还表现得很突出,如表 1。

表 1 词根元音随屈折而交替
 (“冻结”一词的不定式、过去时和过去分词)

原始日耳曼语	英语	荷兰语	德语	挪威语	丹麦语	瑞典语
*freosanan	freeze	vriezen	frieren	fryse	fryse	frysa
*fraus	froze	vroom	fror	frøs	frøs	frös
*frozenaz	frozon	gevroren	gefroren	frøsset	frøsset	frus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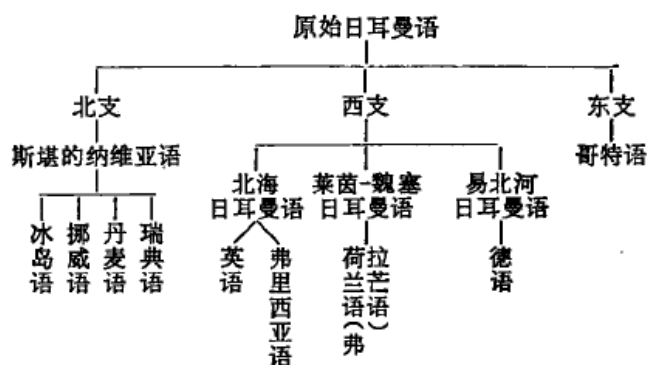
表 2 日耳曼语言词汇举例

	英语	荷兰语	德语	挪威语	丹麦语	瑞典语
五	five	vijf	fünf	fem	fem	fem
看见	see	zien	sehen	se	se	se
人	man	man	Mensch	menneske	menneske	människa
鞋	shoe	schoen	Schuh	sko	sko	sko
星期四	Thursday	Donderdag	Donnerstag	dorsdag	torsdag	torsdag

原始印欧语的单词重音不固定,日耳曼语言的重音却常常固定在第一音节上。原始印欧语的复杂词形变化在原始日耳曼语中得到简化(例如格从 8 个减到 6 个,式从 5 个减到 3 个),到了现代日耳曼诸语言里又进一步简化(例如德语只有 4 个格,英语的名词和冠词都没有格的变化)。与此同时,在句法上词序趋于固定。

词汇方面,日耳曼诸语言内部的相似性很明显,如表 2。

约公元前 250 ~ 公元 250 年间,日耳曼人的部落分化为 5 个部分(北日耳曼人、北海日耳曼人、莱茵-魏塞日耳曼人、易北河日耳曼人、东日耳曼人),日耳曼语形成 5 个方言。学者们习惯把现代日耳曼诸语言分为 3 支:北支、西支和东支,其中西支包括原来的 3 个方言。这种关系可以粗略地图解如下:



东日耳曼人(以哥特人为代表)曾扩张到黑海西岸和南欧。现存的早期哥特语文献主要是一部《圣经》残卷,使用源出希腊字母的一套文字符号。哥特语用 w 转写希腊语的 υ 或 α。这个 w 后来广泛用于各日耳曼语言,被称为“日耳曼 v”(其音值为[v]或[w])。哥特语于 16 世纪中叶在最后一块地盘克里米亚消亡。

继东日耳曼语之后,西日耳曼语也从共同日耳曼语中分离出来,并且演变为英语(7 世纪时由盎格鲁-撒克逊人带到英国)、弗里西亚语(形成于 11 世纪,主要使用

于荷兰北部一个省)、荷兰语(以 4~5 世纪进入荷兰的法兰克人的方言为基础发展而成)、德语。德语是 6 世纪前后日耳曼语言发生“高地德语音变”的产物。这个音变的主要特点是塞音在词首或重复出现时变为摩擦音(在元音后变为擦音),即 p→f, t→z, k→ch, 例如哥特语的 taihun 变成了高地德语的 zehan(现代德语为 zehn)。荷兰语有一个变体南非荷兰语(即阿非利堪斯语)。德语有一个变体依地语,为犹太人所使用。

北日耳曼语在 600~1050 年之间称为共同斯堪的纳维亚语。它的许多特点（特别是复杂的词形变化）还保留在冰岛语中。现代北欧各日耳曼语言是 16 世纪后发展起来的，它们内部（冰岛语除外）有很大的一致性。挪威的书面标准语甚至称为“丹麦-挪威语”，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北欧各语言在书写上的一个特点是把 5 个元音字母和几个特殊变音字母配套使用，后者有 y, æ (丹麦、挪威、冰岛使用；瑞典作 ä), ø (丹麦、挪威使用；瑞典、冰岛作 ö), å (丹麦、挪威、瑞典使用)。西日耳曼语言作 sh 或 sch 的词，北欧语言往往作 sk (表 2)。北欧日耳曼诸语言在语法上的共同特点如：名词所有格加-s；形容词比较级加-r，最高级加-st；定冠词可以作为后缀附在名词上；数词“一”的非重读形式用作不定冠词。这些语言之间当然也有差异，如挪威语和瑞典语在定冠词后的名词上还必须加上后缀，丹麦语不必这样做；瑞典语在“是”后用主格，丹麦语用宾格。

参考书目

P. M. Bergman, *Twenty-six Languages in Simultaneous Translations*, New York, 1968.

(周流溪)

Riyu

日语 (Japanese language)

日本国的官方语言。系属未定。有的学者认为，属于阿尔泰语系，也有人认为属于南岛语系。分布于日本列岛。约 1.2 亿多人使用。标准语为东京话，是以东京横滨方言为基础形成的。有两大方言：本土方言（包括东日本、西日本等方言）和琉球方言。

日语的语音系统比较整齐。现代日语中有 5 个元音，2 个半元音（古代日语有 8 个元音，并有元音和谐现象），23 个辅音。无前响复合元音。有清音与浊音的对立，但无送气音与不送气音的对立。音节构造简单，数目较少，

假名字源与字体表

平假名					片假名				
あ	あ	あ	あ	あ	“安”的草体	ア	ア	ア	行书“阿”的左偏
い	い	い	い	い	“以”的草体	イ	イ	イ	“伊”的左偏
う	う	う	う	う	“宇”的草体	ウ	ウ	ウ	“宇”的上冠
え	え	え	え	え	“衣”的草体	エ	エ	エ	“江”的右旁
お	お	お	お	お	“於”的草体	オ	オ	オ	古体“於”的左偏
か	か	か	か	か	“加”的草体	カ	カ	カ	“加”的左偏
き	き	き	き	き	“幾”的草体	キ	キ	キ	草书“幾”下半部的略笔
く	く	く	く	く	“久”的草体	ク	ク	ク	“久”的前两画
け	け	け	け	け	“计”的草体	ケ	ケ	ケ	“介”的异体
こ	こ	こ	こ	こ	“己”的草体	コ	コ	コ	行书“己”的前两画
さ	さ	さ	さ	さ	“左”的草体	サ	サ	サ	“散”的前三画
し	し	し	し	し	“之”的草体	シ	シ	シ	“之”的行书
す	す	す	す	す	“寸”的草体	ス	ス	ス	草体“須”的右旁
せ	せ	せ	せ	せ	“世”的草体	セ	セ	セ	“世”的草体
そ	そ	そ	そ	そ	“曾”的草体	ソ	ソ	ソ	“曾”的前两画
た	た	た	た	た	“太”的草体	タ	タ	タ	“多”的略笔
ち	ち	ち	ち	ち	“知”的草体	チ	チ	チ	“千”的行书
つ	つ	つ	つ	つ	“川”的草体	ツ	ツ	ツ	“川”或略体“州”
て	て	て	て	て	“天”的草体	テ	テ	テ	“天”的前三画
と	と	と	と	と	“止”的草体	ト	ト	ト	“止”的前两画
な	な	な	な	な	“奈”的草体	ナ	ナ	ナ	“奈”的前两画
に	に	に	に	に	“仁”的草体	ニ	ニ	ニ	“二”字
ぬ	ぬ	ぬ	ぬ	ぬ	“奴”的草体	ヌ	ヌ	ヌ	“奴”的右旁
ね	ね	ね	ね	ね	“祿”的草体	ネ	ネ	ネ	“祿”的左偏
の	の	の	の	の	“乃”的草体	ノ	ノ	ノ	“乃”的略体
は	は	は	は	は	“波”的草体	ハ	ハ	ハ	“八”的草体
ひ	ひ	ひ	ひ	ひ	“比”的草体	ヒ	ヒ	ヒ	“比”的略笔
ふ	ふ	ふ	ふ	ふ	“不”的草体	フ	フ	フ	“不”的前两画
へ	へ	へ	へ	へ	“𠂔”的草体	ヘ	ヘ	ヘ	“𠂔”的行、草体
ほ	ほ	ほ	ほ	ほ	“保”的草体	ホ	ホ	ホ	“保”的最后四画
ま	ま	ま	ま	ま	“末”的草体	マ	マ	マ	“万”的草体
み	み	み	み	み	“美”的草体	ミ	ミ	ミ	“三”字
む	む	む	む	む	“武”的草体	ム	ム	ム	“牟”的前两画
め	め	め	め	め	“女”的草体	メ	メ	メ	“女”的略笔
も	も	も	も	も	“毛”的草体	モ	モ	モ	“毛”的略笔
や	や	や	や	や	“也”的草体	ヤ	ヤ	ヤ	“也”的草体
ゆ	ゆ	ゆ	ゆ	ゆ	“由”的草体	ユ	ユ	ユ	“由”的最后两画
よ	よ	よ	よ	よ	“與”的草体	ヨ	ヨ	ヨ	“與”的上半部右侧
ら	ら	ら	ら	ら	“良”的草体	ラ	ラ	ラ	“良”的前两画
り	り	り	り	り	“利”的草体	リ	リ	リ	“利”的右旁
る	る	る	る	る	“留”的草体	ル	ル	ル	“流”的最后两画
れ	れ	れ	れ	れ	“礼”的草体	レ	レ	レ	“礼”的右旁
ろ	ろ	ろ	ろ	ろ	“吕”的草体	ロ	ロ	ロ	“吕”的上半部
わ	わ	わ	わ	わ	“和”的草体	ワ	ワ	ワ	“和”的右旁或“轮”的象形
ゐ	ゐ	ゐ	ゐ	ゐ	“为”的草体	ヰ	ヰ	ヰ	“井”的草体
ゑ	ゑ	ゑ	ゑ	ゑ	“惠”的草体	ヱ	ヱ	ヱ	“惠”的草体
を	を	を	を	を	“还”的草体	ヲ	ヲ	ヲ	“乎”的前三画
ん	ん	ん	ん	ん	“无”的草体	ン	ン	ン	(象征性符号)

除辅音 n 可用于音节末尾构成闭音节外,其余均为开音节。音节具有等时性,长音与短音具有区别意义的作用。分高低声调,声调变化只发生于音节之间。在东京话中,有元音清化现象。日语汉字的发音分音读和训读两种,近似汉字本来读音的叫音读,如“人”读为 $d\dot{a}in$,取汉字的字义而按日语的固有读法发音的叫训读,如“人”读为 $qito$ 。根据汉字从中国传入日本的时代和地区不同,音读又分为吴音(六朝时传入日本的中国南方音)、汉音(隋、唐时传入日本的中国北方音)、唐音(宋以后传入日本的中国南方音)。另外,在汉字中还包括日本人根据六书中的会意创造的汉字,叫国字。国字多半为训读字,如屈 $[nagi]$ (风平浪静)、辻 $[t\dot{s}uq\dot{c}i]$ (十字街)、畑 $[hata]$ (旱地),但也有音读或音、训两读的,前者如钚 $[bjo:]$ (图钉),后者如働 $[do:, hataraku]$ (劳动)。

日语的语法特点是:①词分为独立词与附属词两大类。前者在句中能单独使用,如名词、代词、数词、动词、形容词、形容动词、连体词、副词、连词、叹词等;后者在句中不能单独使用,只能附在独立词之后起一定的语法作用,如助词、助动词。独立词在句中的地位或语法职能由助词与助动词表示(连词、叹词除外),因此,助词与助动词在日语语法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②动词、形容词、形容动词有词尾变化,其变化以后面的粘着成分为转移。这个特点表明,日语是粘着型语言。③日语的词序比较自由,一般是主语在前,谓语在最后,宾语、补语在谓语前面,修饰语一定在被修饰语前面。句子以谓语为主,主语等省略较多。④敬语用法十分发达而复杂。文体有2种:以である、だ结束句子的叫简体,以ます、です等结束句子的叫敬体。⑤口语与书面语的差异、男女用语的差别比较大。

日语的词汇分4类:和语词(日语中固有的词)、汉语词、外来词、以及由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来源的词结合而成的混合词。和语词汇中,表示鱼类、树木、作物等名称的语词,以及象声词十分丰富,表示身体、天文、矿产资源和抽象概念的词语较少,都借自汉语。日语中汉语词的数量最多,占半数以上,其中包括在明治期间,日本向西方学习,在翻译西方书籍过程中,利用汉语的构词法创造的大量新词,或赋予古代的汉语词以新含意的词,前者如“现实”、“意识”、“哲学”等,后者如“经济”、“文化”等。汉语中同音异义词较多,如“机构”、“起工”、“寄稿”、“奇行”、“归航”、“气候”等都读成 $[kiko:]$ 。现代日语中有大量的外来词(一般指16世纪以后来自西方语言的借词),其中80%来自英语。外来语的传入增加了混合词的类型,如テレビ局(外+汉,电视台)、バタくさい(外+和,洋气)。混合词也有用和语词结合汉语词构成的,如力む(汉+和,使劲)。

日语的文字由汉字和假名两套符号组成,并混合使用。相传汉字于公元4~5世纪,由中国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成为古代日本的官方文字。后来日本人发明了假名(为音节符号),与汉字一起混合使用。假名有两种字体:平假名和片假名,各有73个。前者假借汉字的草书造

成,用于日常书写和印刷,后者假借汉字楷书的偏旁冠盖造成,用于电报、标记外来词、象声词以及特殊的词语。明治期间还出现了罗马字拼写法,主要用于标记人名、地名,或国际电报等方面,不是主要文字。

参考书目

市川喜三、服部四郎:《世界言語概説》(下卷)“日本語”,研究社,東京,1955。

国語学会編:《国語大辞典》“日本語”、“方言区画論”、“日本漢字音”、“日本語系統論、成立論”,東京堂出版,東京,1980。

古田东朔等:《新国語概説》,黑潮出版社,東京,1980。

(顾海根)

Rong Geng

容庚 (1894~1983) 中国古文字学家。字希白,号颂斋,广东东莞人。青年时随舅父邓尔疋学习《说文解字》,立志研究古文字。1917年,计划纂辑《殷周秦汉文字》,着手编著《金文编》。1922年,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研究生。1926年毕业后,任教于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曾主编《燕京学报》。1927年,任北平古物陈列所鉴定委员。1934年,倡议成立考古学社,出版《考古社刊》。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岭南大学中文系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1983年3月6日逝世。



容庚对古文字学的贡献,以青铜器方面为最多。金文字汇《金文编》初版于1925年,后一再增补重版,为研习商周金文者所必备。还编有《金文续编》,专收秦汉金文;又把所见秦汉金文汇编为《秦汉金文录》,可与《金文续编》对读。

容庚精于青铜器鉴别,曾鉴定清宫旧藏器物,编印为《宝蕴楼彝器图录》、《武英殿彝器图录》、《西清彝器拾遗》等书。选辑流散海外的青铜器,出版《海外吉金图录》。他又编选刘体智所藏青铜器为《善斋彝器图录》。自己的收藏,则汇编为《颂斋吉金图录》和《续录》。

容庚所著《商周彝器通考》,1941年出版,通论商周青铜器,上编(通论)分:原起、发见、类别、时代、铭文、花纹、铸法、价值、去锈、拓墨、仿造、辨伪、销毁、收藏、著录15章,下编(各论)分:食器、酒器、水器及杂器、乐器4章,附有大量图版,在青铜器研究上有重大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与张维持合编《殷周青铜器通论》,1958年科学出版社出版,列为《考古学专刊》丙种第2号。晚年研究书画碑帖,也有不少论著。

(李学勤)

Ruan Quan

阮诠 (Nguyễn Thuyên) 13世纪越南语文学家和诗人。出生于越南北部永富省下和县(一说是海兴省青林县),生卒年月无记载。1247年,他考选为太学生,以后曾在越南陈朝任职到工部、刑部尚书。据越南人吴士

连所著《大越史记全书》记载,1282年,即陈仁宗四年,“时有鳄鱼至泸江,帝命刑部尚书阮詮为文投之江中,鳄鱼自去。帝以其事类韩愈,赐姓韩”,因此又名韩詮。

阮詮精通汉文,祭鳄鱼文是用汉文写的。他是越南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个使用越南语和古代越文——“字喃”(chữ nôm)(意思是“俗字”)——创作诗赋的人。他还成功地把唐诗的格律应用于创作越南语的诗歌,形成了越南文学史上的“韩律”诗体。韩律的特点是依据古汉语四声分为平、仄两大类的原则,把越南语中的六声也分为平、仄两大类,作为诗律的基础。此后,韩律成为越诗的基本诗体,为越人所喜闻乐见。胡志明(1890~1969)写的一些越文诗,仍采用准确的韩律。后来出现的越南“六字、八字体诗”和“双七字、六字、八字体诗”的格律都采用了韩诗的平、仄音调。

以前,越南曾有人把阮詮说成是字喃的创始人。经过20世纪70年代前后的考证,字喃产生的年代肯定比阮詮要早。但正如《大越史记全书》所称,“詮能国语赋诗。我国赋诗多用国语,实自此始。”可见他是历代公认的用越南民族语文进行文学创作的先行者。自他开始,越来越多的诗人用字喃进行诗歌创作。在越南语文和民族文学发展史上,他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阮詮的主要著作有《飞沙集》(诗文集),现已失传。

(文 庄 金小明)

Ruan Yuan

阮元 (1764~1849) 中国清代经学家、训诂学家。江苏仪征人,字伯元,号云台。生于乾隆二十九年,卒于道光二十九年。乾隆五十四年(1789)及进士第,由翰林院编修历官户礼兵工等部侍郎,山东浙江学政,浙江河南江西巡抚,两浙、两广、云贵总督,太子太保体仁阁大学士。平生以提倡汉学,刊刻古籍,奖掖后进为事。任江西巡抚时,校刻《十三经注疏》,每一经都撰有校勘记,罗列众本,刊校异同,读者称便。在广东任两广总督时,主持学海堂,刊刻《皇清经解》,把清人所著各种经书的新注和解释经传文字的佳作汇刻成编,有180余种,1400卷,续刻8卷,对清代学术的发展影响极大。他还主持编纂《经籍纂诂》,把唐以前古书中的文字训释都荟萃在一起,检查一字,许多义训都呈现在眼前,是研究字义的重要资料。他对如何研究字义很有创见,与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学术见解相近,他又是王引之的先生。著有《擘经室集》58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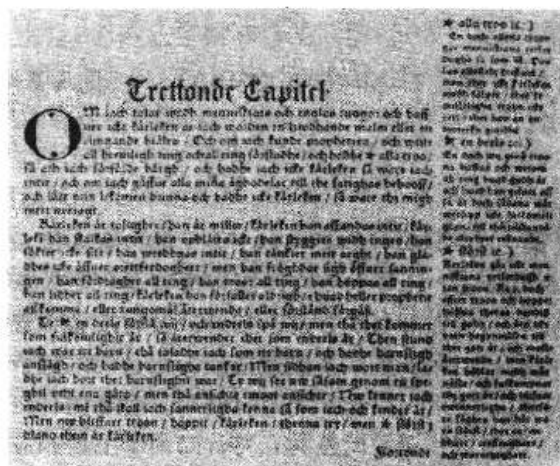
(周祖谟)

Ruidianyu

瑞典语 (Swedish language) 瑞典的民族语言,也是芬兰的两种官方语言之一(另一种是芬兰语)。属

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北支(又称斯堪的纳维亚语支)。分布于瑞典和芬兰,使用人口共约866万,其中不到800万在瑞典。

瑞典语形成于9世纪前后(600~1000),经历了古瑞



《新约全书》的瑞典文译本

典语(800~1526)和近代瑞典语两个时期。古瑞典语受拉丁语和德语影响很大。14~15世纪期间,瑞典语的语音和语法有很大变化;双元音变成单元音,单、双重音在这个时期形成;动词、名词、形容词和代词的形式趋于简化。1526年《新约全书》的瑞典文译本出版(见图),通常被看作近代瑞典语的开始。近代瑞典语又分早期(1526~1732)和晚期(1732以后)瑞典语。标准语开始于17世纪,它以斯德哥尔摩和梅拉伦湖地区的斯维尼亚诺方言为基础,也吸收了约特诸方言的某些成分。

近代瑞典语元音有长短之分,无复合元音,有ä、å、ö三个变元音。分单重音词与双重音词,后者包括一个主重音和一个次重音。无论是陈述句、疑问句或祈使句一般均使用降调。人称代词有性、数、格的变化。名词有性(中性、通性)和数的范畴,有肯定式与不定式,但除所有格须加s外,标准瑞典语名词没有格的词尾。单、复数定冠词加在名词词尾。形容词有性、数范畴和肯定、不定形式。形容词定冠词置于形容词之前。动词无人称变化,有时、态、式等语法范畴。句子成分的基本次序是:主语—谓语—宾语。非主语开始的句子,主、谓语必须倒装,但从句一般不使用倒装语序。词汇主要由3部分构成:即本族语词汇、外来词汇以及在两者基础上产生的新词汇。

瑞典语自1225年起采用拉丁字母书写,除26个拉丁字母外,另有ä、å、ö三个字母代表三个变元音。共计9个元音字母和20个辅音字母。瑞典语与丹麦语、挪威语一般可以互通。

(胡仁杰)

S

Sahala yuzu

撒哈拉语族 (Saharan group) 见尼罗-撒哈拉语系。

Salayu

撒拉语 (Salar language) 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西匈语支。主要分布在中国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化隆回族自治县的甘都、初麻以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的四堡子、大河家等地。使用人口约 5.5 万(1982)。各地语言比较一致。根据语音和词汇的差异,可分为街子土语和孟达土语。语音方面,以分布较广的街子土语为代表,有 8 个元音: a, e, i, ə, o, u, ʊ, y, 它们各有一个清化的变体。复合元音有 9 种: ia, ie, io, iu, iə, ua, ue, uo, ye, 后 5 种用于拼读汉语借词。元音和谐以舌位和谐为主。有 29 个辅音: b, p, m, f, v, d, t, n, l, r, s, z, ʈ, ʂ, ʑ, ʄ, ʃ, ʒ, ʝ, g, k, ŋ, x, ɣ, q, ɣ, ʁ, h。塞音、塞擦音都是清音,分送气和不送气两套。舌尖后塞擦音 ʈ, ʂ 多用于拼读汉语借词。舌根塞音 g 和小舌塞音 ʁ 只出现在音节首,不出现在音节末。语法方面,名词的人称领属附加成分不分单、复数。陈述式动词不带人称附加成分,但是有确定语气和非确定语气的差别。句子的基本语序是主语—宾语—谓语。词汇方面,派生法是构词的重要方式,但是带两个以上附加成分的派生词很少。撒拉语从汉语吸收了不少词语,也从藏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吸收了一些词语。撒拉族一般兼通汉语,有的还兼通藏语或维吾尔语,使用汉文。

(林莲云)

Samoyede yuzu

萨莫耶德语族 (Samoyed group) 见乌拉尔语系。

Samofelte

萨默费特, A. (Alf Sommerfelt 1892~1965) 挪威语言学家。1892 年 11 月 23 日生于挪威特隆赫姆。1965 年 10 月 12 日在奥斯陆逝世。他曾在奥斯陆、都柏林和巴黎大学读书,1918 年起,在奥斯陆大学先后讲授凯尔特语言和印欧语比较语法,普通语言学和社会学等。1931~1962 年任奥斯陆大学教授。他对爱尔兰语、威尔士语和法国布列塔尼半岛的凯尔特语言做过广泛而深入的调查,并写了关于印欧语言学的著作。他是调查澳大利亚诸语言的前驱之一。他致力于挪威标准语的描写,主编公认为权威著作的多卷本挪威语词典。他着重分析语言的内部结构,同时又认为语言与文化和社会有密切关系。他的著作主要有选集《语言的历时和共时研究》

(1962), 曾获得法国、美国、捷克斯洛伐克各国学者的好评。1946~1964 年,他担任国际语言学协会常设委员会秘书长。

(林书武)

Sapi'er

萨丕尔, E. (Edward Sapir 1884~1939)

美国人类学家、语言学家。1884 年 1 月 26 日生于德国劳恩堡(今波兰勒博尔克)。1939 年 2 月 4 日死于纽黑文。萨丕尔 5 岁时移居美国。1907 年起先后在加州大学、宾州大学从事研究与教学。1909 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10~1925 年任渥太华加拿大国立博物馆人类学部主任。1925 年起任芝加哥大学人类学与语言学副教授、教授。1931 年到耶鲁大学,任刚成立的人类学系主任。他担任过美国语言学会会长(1933)和美国人类学会会长(1938)。还被选为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



他发展了音位理论,根据语音的分布模式分析语音,是形态音位概念最早提出者之一,他把在词形变化中能互相替代的音位都归为一类。在历史比较语言学方面,他做了大量研究工作,探索语言之间的亲缘关系。他提出结构压力论,说语言变化(音位变化、形态变化)是由于受到语言本身固有的有关模式的影响。他根据吐火罗语的材料,按喉辅音假说研究古印欧语。他还认为印欧语言和闪族语言可能同出一源。萨丕尔认为不同语言的表达方式会对同一客观世界提出不同的分析和解释,这种观点后来被 B. L. 沃尔夫绝对化,成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他的语言人类学研究包括以下 3 个方面:美洲印第安民族及其语言、人类一般概念、文化和个性的关系。主要著作有《语言论》(1921)和《萨丕尔选集》(1949)。

见美国结构主义学派。

(廖秋忠)

Sai'erwelya-Keluodiyayu

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 (Serbo-Croatian language)

也称克罗地亚-塞尔维亚语。南斯拉夫的 3 种官方语言之一(另两种是斯洛文尼亚语和马其顿语)。属印欧语系斯拉夫语族南支。分布于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黑山,以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地区,使用人口约 1500 万。斯洛文尼亚和马其顿把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作为第二语言使用。主要方言有 3 种:什托方言、卡依方言和查方言。

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都在大致相同的时间迁来巴尔干,前者信奉东正教,后者皈依罗马天主教。两族在长期相处中使用一种语言,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存在着“一语两文”的局面,塞尔维亚人用基里尔字母拼写,克罗地亚人用拉丁字母拼写。塞尔维亚语是古斯拉夫语(即

教堂斯拉夫语)的地方变体,现存的最古文献见于12世纪。17世纪后称为斯拉夫-塞尔维亚语。19世纪中叶,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两地的改革者签定协议,将它定名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或克罗地亚-塞尔维亚语)。最重要的奠基人是武克·卡拉季奇(1787~1864)。它以两地通用的什托方言的依耶化次方言为基础。有30个音位,每个音位都有相应的字母,其中元音5个,辅音25个,有4种重音:长扬重音(´),短扬重音(˘),长抑重音(ˉ)和短抑重音(ˋ);元音无软化现象。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是屈折型语言,语法变化复杂。名词、代词和形容词有单、复数和阳、阴、中性之分,有7个格:主格、属格、与格、宾格、呼格、工具格和前置格。动词有7个时态:过去时、过去先行时、过去完成时、过去未完成时、现在时、

То је био афрички слон, још недорастао, млад и бујан;
били су му тек две године. Пре слона стигла је у Травник
прича о њему. Све се, одакле год сазнавало: како је путовао,
како је чуван и негован од пратње, и како је дочекиван, пре-
вожен и хранен од народа и власти. И већ су га прозвали
«фила», што на турском језику значи слон.

塞尔维亚作家I. 安德里奇小说
《大臣的大象的故事》(1950)片段

将来时和将来先行时,有6种人称变化,有完成体和未完成体之分,有不定式、形动词、副动词、命令式、虚拟式等。

(陈振华)

Sancang

《三仓》指汉代流行的《仓颉篇》、《训纂篇》和《滂喜篇》3种教学童识字的字书。秦代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爱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都是四言韵语,用小篆书写。汉代隶书盛行、改用隶书来写,合3篇为一书,断60字为一章,凡55章,称为《仓颉篇》。西汉平帝时(公元5)命沛人爰礼等百余人说文字未央廷中,扬雄又取其有用的字作《训纂篇》,来顺续《仓颉篇》,又改掉《仓颉篇》里已有的字,写成89章。东汉和帝时郎中贾鲂又作《滂喜篇》。后人合3书为3卷,以《仓颉篇》为上卷,《训纂篇》为中卷,《滂喜篇》为下卷。晋人合称为《三仓》。郭璞有《三仓注》3卷,见于《隋书·经籍志》和日人藤原佐世《见在书目》,今亡。

(周士琦)

sanshillu zimu

三十六字母 见字母。

Sanshi Song

《三十颂》中国藏族传统的文法书。据传为藏文创制者图弥三善札所著8种文法书之一,除另一本《性入法》外,其余6种失传。8种文法书中,《三十颂》是总论,全称为《授记根本三十颂》。一般认为,图弥三善札为7世纪人(其著作当为同时),而近人根据历史文献,并与8、9世纪古籍、碑文和出土简片对照研究,发现上述文法书中的记述与较古的藏文有多处不合,故对著者和成书

年代提出疑问。《三十颂》以偈颂体写成,提纲挈领地概述文法要点,有口诀的性质。偈句数目,因版本而异,如旧敬词句不计在内,本文有119句、120句、122句等几种。以4句为一颂,30颂正好120句,这就是《三十颂》名称的由来。《三十颂》从以后加字为中心的字母缀联的角度出发,论述正字法和语法问题,包括4部分:第1部分是字母分类和文字结构,共18句。将藏文分成辅音字母和元音符号两部分,指出可作为前加字的辅音字母有5个,可作为后加字的有10个。因从后加字出发,未能全面反映藏文的正字法,如上加字、下加字等都未特别说明。第2部分是虚词,共63句,约占全文的一半,是主要部分,简要介绍虚词的形式和意义。介绍虚词形式时,也是从后加字出发,如指出哪个后加字加上哪个元音就是某种虚词。比如10个后加字加上元音[ɔ],分别加在具有相应后加字的前接词后面,就是终结词。第3部分是关于后加字的论述,共17句,说明后加字的重要性。认为即使有基字、前加字、上加字和下加字,如果没有后加字,也无法构成词并表达一定的意义。这种“后加字中心论”是由于部分虚词的声母要按前接词的后加字发生变化,过份强调后加字支配虚词变化的作用而形成的。从这种观点出发,甚至人为地在开音节后面也加上一个后加字ꠤ(后经改革,已大部取消,只保留小部分以区别词形),使文字系统中不存在没有后加字的字形。这是受屈折变化复杂的梵文文法的影响。第4部分共22句,论述学习的方法。后世藏族文法学家的论著,都以此书为蓝本,进行注疏诠释,增加补充,自立体系的极少,因此这本书同《性入法》一起成了藏文文法的滥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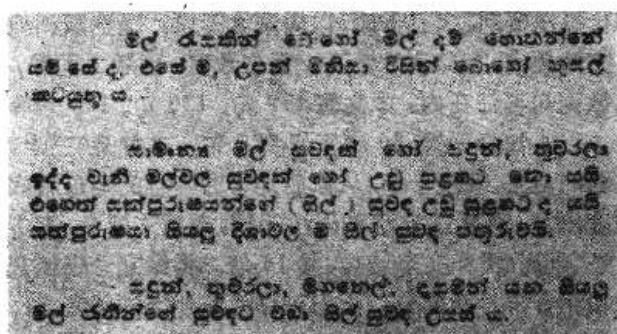
(瞿霁堂)

Sengjialuoyu

僧伽罗语 (Sinhala language) 斯里兰卡的官方语言。属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印度语支,和印度北部诸语言相近。斯里兰卡除北方省以外的大部分地区都通用僧伽罗语。使用人口约1100万,占全国人口的73%。

僧伽罗语形成于印度-雅利安人进入斯里兰卡岛的时期(公元前6世纪)。公元前3世纪,佛教传到岛上,僧伽罗语得到了丰富和发展。最初阶段的僧伽罗语和普拉克利特语(古印度通俗语)相近,公元4世纪后才脱离古印度通俗语而独立发展。僧伽罗语在13世纪进入近代阶段。13世纪写成的一部语法书《悉达特桑格拉沃》为僧伽罗语语法奠定了基础。僧伽罗语在发展过程中,受巴利语、梵语及泰米尔语的影响很深。有丰富的佛教文献。

僧伽罗语有16个元音,38个辅音。它是一种屈折型语言。名词有性、数、格(9个格)的变化;动词有时、态、体的变化,动词原形都以navā结尾。僧伽罗语中有很大一部分巴利语和梵语词语。16~18世纪,从葡萄牙语和荷兰语中吸收了一些词语,19世纪以来又从英语中吸收了大量词语。元音分长短,辅音分清浊、送气与不送气,没有重音、轻音的区别,也没有声调的变化。现代僧伽罗语



僧伽罗语《古佛经》片段

的口头语和书面语有非常明显的区别。

僧伽罗语最早的文字是婆罗米体,到7~8世纪才逐渐演变为僧伽罗体,一直沿用至今,自左而右书写。这种环形的僧伽罗体和印度南部达罗毗荼诸语言的字体近似。已发现的最早文字是公元前3世纪的石刻铭文。纯僧伽罗字母共36个,加上18个表示梵语语音的字母,共计54个。僧伽罗语基本上没有方言,古代马尔代夫的语言可以看作是古僧伽罗语的一种方言,但后来这种方言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语言——迪维希语。在现代僧伽罗语中,英语借词有不断增多的趋势。但英语中有个别词源自僧伽罗语,如tourmaline(电气石)、beriberi(脚气病)等。

(邓殿臣)

Shahmatuofu

沙赫马托夫, A. A. (Алекс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Шахматов 1864~1920) 俄国语言学家。1864年6月17日生于纳尔瓦,1920年8月16日卒于彼得格勒。1887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随即留校任教。自1910年起任彼得堡大学教授。1906~1920年任科学院俄罗斯语文学部主任、《俄罗斯语文学部学报》主编,主持科学院《俄语词典》(1891~1916)的编纂工作。

沙赫马托夫曾同Ф. Ф. 福尔图纳托夫一起研究并制定俄语拼写规则改革草案(1917年由苏联政府颁布实施)。他系统地研究了11~16世纪古俄语编年史文献,为俄罗斯标准语史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他发现了原始斯拉夫语时期的一条重音移动规律,可用以解释现代斯拉夫诸语言中的相应现象。

沙赫马托夫对语法基本理论的许多问题均有创见。在所著《俄语句法》(上下卷,1925~1927)中提出心理交际学说,认为句子是心理交际行为的体现。他第一次详尽地分析了单部句,改变了语法中一个句子必有主语和谓语两部分的传统观点。

他强调词法学是从属于句法学的辅助学科,并认为构词法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个观点由他的学生B.B. 维诺格拉多夫再次加以申述。他的主要著作除《俄语句法》



外,有《早期俄语史纲要》(1915)、《现代俄罗斯标准语纲要》(第4版,1941)等。

见莫斯科科学派、维诺格拉多夫。

(信德麟)

Shali-Niluo yuzu

沙里-尼罗语族 (Chari-Nile group) 见尼罗-撒哈拉语系。

Shantian Xiaoxiong

山田孝雄 (Yamada Yoshio 1873~1958)

日本语言学家。1873年5月10日生于日本富山市,卒于1958年11月20日。富山中学毕业后,他长期在中学和大学从事语文教学,后任东北大学教授。1929年获博士学位。1958年获得文化勋章。

山田在日语语法理论和日语语法史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研究,主要著作有《日本文法论》(1908)、《日本文法学概论》(1936)、《敬语法研究》(1924)、《国语学史》(1943)等。他在日本传统语法学的基础上,吸收了近代欧洲语法学的成果,形成了完整的体系,推动了近代日语语法学的建立。他的语法学说的特点是从逻辑学的角度出发,重视语言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和心理作用,对思想的表达方式作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句子是思想的具体表现,而句子得以成立的条件则是“用言”(指形容词、动词等具有“陈述能力”的词)所具有的“综合作用”。他的语法学说至今有着广泛的影响,《日本文法论》一书被认为是使日语语法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第一部著作;另外,山田对日语敬语法和奈良时代、平安时代语法的研究,开辟了日语语法研究的新领域,为日语语法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徐昌华)



Shanyuzu

闪语族 (Semitic group) 见阿非罗-亚细亚语系。

Shang Chengzuo

商承祚 (1902~) 中国古文字学家。字锡永,号契斋,广东番禺人。1921年起,以罗振玉为师,研习甲骨文、金文,后一度入北京大学研究所为研究生。1925年,任东南大学讲师。1927年,任中山大学教授。30年代在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及金陵大学任教。抗日战争爆发,随金陵大学南迁,后又在齐鲁大学、重庆大学、重庆女子师范大学等校任教授。1948年返中山大学任教至今。

商承祚在1923年出版的《殷虚文字类编》,是最早的甲骨文字典之一。1933年出版《福氏所藏甲骨文字》和

《殷契佚存》，均有考释，后者尤为丰富。在青铜器方面，1935年汇集于省吾、方焕经等藏器为《十二家吉金图录》；1936年将1923年山西浑源李峪发现器物27件辑印为



《浑源彝器图》，均为学术界称道。1933年，在《金陵学报》3卷2期发表《古代彝器伪字研究》，多有创见。其他研究甲骨、金文的论作还有不少。抗战初，商承祚路经长沙，注意到当地盗掘发现的大量战国文物，进行调查，在成都著《长沙古物闻见记》一书，于1939年刊行；后来又在1955年出版《长沙出土

楚漆器图录》，两书对楚文化研究起有重要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继续收集研究有关楚文化，特别是楚国文字的材料，陆续发表各种论著多篇。此外，专著还有《说文中之古文考》、《石刻篆文编》等多种。

(李学勤)

shaoshu minzu Hanyu Jiaoxue

少数民族汉语教学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for National Minorities of China) 在中国，少数民族在学好本族语言文字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习汉语文，是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的一项重要任务。少数民族学习汉语文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是由中国的民族分布、民族关系的特点以及少数民族繁荣发展的需要决定的，是长期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自秦汉起，中国就已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到现在，全国除汉族外还有55个少数民族。人口合计约有6700万，约占全国10亿人口的6.7%。其中人口在千万以上的只有一个壮族，百万以上千万以下的民族有14个，其余都在百万以下。各民族的分布，大致是“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各个地区普遍居住着几个不同的民族，没有大面积的单一民族居住区。汉族遍布全国各地，或则与少数民族杂居一起，或则成块地与少数民族相邻。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在各方面都结成极其密切的关系。历史上，汉语早已是各少数民族兼用的第二语言，同时成为各民族之间共同使用的交流思想的工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从根本上废除了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制度，各民族之间出现空前未有的团结。不同民族之间相互学习语言已成为一种新风尚。少数民族从自身的发展中深深体会到，在我们这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中，少数民族要迅速繁荣发展，除了学习使用本族语言文字外，还有必要进一步学习使用汉语文。因为汉字记载了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历史文化和经验，汉语是全国各民族相互交际共同使用的语言工具。学好汉语文已成为各少数民族的共同愿望。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少数民族学习汉语文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到现在，各少数民族中的干部、知识分

子和青年学生大多数已不同程度地学会使用汉语文。从小学到大学的各级学校中，已根据不同民族的情况，分别设置了汉语文课，编写了大量的教材，培养了一大批汉语文师资。30多年来，少数民族的汉语文教学已取得了不少经验。这些经验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① 必须从不同民族的实际出发采取不同的措施和办法。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中国少数民族存在各种不同的特点：有的民族（如藏、维吾尔、哈萨克等）人口较多，有大片的聚居区，懂汉语文的人较少，而有的民族（如白、纳西、阿昌等）人口较少，只有小片聚居区，懂汉语文的人较多；有的民族（如蒙古、藏、维吾尔、朝鲜、彝等）有历史较长的文字，而有些民族没有文字（如独龙、怒、德昂、布朗等）或只有新创文字（如景颇、拉祜、傈僳等）；有的民族社会发展较快，知识分子较多，而有的民族社会发展较慢，知识分子较少；等等。就是在一个民族内部，不同地区也往往存在许多差异。这些不同的特点，决定中国少数民族的汉语文教学应当根据不同的教学对象，采取不同的培养目标和教学方法，而不能搞“一刀切”。

② 必须针对民族学生的母语特点进行教学。中国55个少数民族分别使用80多种语言。这些语言分属汉藏、阿尔泰、南亚、南岛、印欧等5个语系。不同语系的语言，特点相差很大；就是同属汉藏语系的不同语言，各语族同汉语之间也存在许多不同的特点。少数民族学习汉语，常常受到母语的“干扰”，往往把母语的特点带进汉语学习中来。母语的“干扰”反映在语音、词汇、语法等各个方面。比如使用阿尔泰语系语言的学生，由于母语里没有声调，学习汉语时往往掌握不好音高的变化；又如使用藏缅语族某些语言的学生，由于母语里没有介词，学习汉语时使用介词是个难点；等等。如能针对学生母语的特点进行教学，就能有效地提高教学质量。

③ 善于处理少数民族语文同汉语文教学的关系，是取得汉语文教学效果的重要保证。过去的教学经验证明：学生掌握本族语言文字水平越高，接受汉语文的能力就越强，学习汉语文的效果就越好。所以，凡通行少数民族语文的地区，原则上应在掌握民族语文的基础上再安排汉语文学习。至于少数民族语文要学习几年，哪些课程用少数民族语文授课，汉语文从哪一年开始学习，二者如何衔接等问题，都应根据不同的情况决定，而不能强求一致。只有本族语言而无本族文字的民族，汉语文教学只能从小学一年级开始，这当中必须解决怎样使用民族语言授课的问题。

④ 依靠少数民族语文进行汉语文教学。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汉语时，其母语既有“干扰”的一面，也存在有利的一面。在教学的初级阶段，用少数民族语文进行翻译教学、对比教学，用少数民族文字给汉字注音释义，能帮助学生较快地、准确地掌握汉语、汉字。少数民族语文的辅助作用，可随学生的汉语文水平的逐步提高而逐步减少，最后转为全部用汉语进行教学。何时实现这个转变，应视学生的具体情况而定。

⑤ 必须大力培养熟悉少数民族语言的汉语文教师。少数民族的汉语文教学水平主要决定于教师的业务能力；而教师的业务能力，大多又决定于是否了解学生的语言特点。如果教师熟悉少数民族语言，就能在教学中做到因材施教，有的放矢。

⑥ 提高少数民族的汉语文教学水平，必须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加强理论研究。中国的少数民族汉语文教学，除了必须遵循语文教学的一般规律外，还要研究适合各民族特点的特殊规律。要深入进行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对比研究，研究怎样在教学中做到既要遵循汉语规律，又照顾少数民族学习汉语的特点。改革教材和改革教学方法是教学改革的两个重要环节。随着现代科学的迅速发展，怎样用现代科学的成果来改革少数民族的汉语文教学，是我们面临的新任务。（戴庆厦）

SheyIn

畬语 (She language) 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语支未定。畬族有 36.8 万多人，分布在中国的福建、浙江、广东、江西、安徽等省的部分山区，基本上都使用汉语客家方言，只有广东博罗、惠东等 4 个县 10 多个山村里的畬族，约 1 000 多人，自称“活聂”，他们在本民族的交往中使用原有的语言。畬语有单辅音声母 13 个。带鼻冠音的复辅音只出现在塞音声母类。韵母有 28 个。带塞音韵尾的基本上是借自汉语客家方言的词。有 8 个声调，与汉语的平、上、去、入各分阴阳的情况基本一致。词序和虚词是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名词、形容词、代词和数量词组作修饰语时，一般在中心词前，只有少数几个形容词在中心词后。指示代词有近指、中指、远指之分。形容词和量词重叠后表示某种语法意义。数词有基数、计位数、计月数、计日数 4 套，各有不同的使用范围。句子的主语在谓语前，宾语、补语在谓语后。词根基本上是单音节的。构词方式大部分是词根与词根相结合，带附加成分的词不多。合成词比较丰富，以修饰结构的居多。汉语借词特别丰富。根据各地畬语词汇的差异，可分为莲花、罗浮两个方言，不同方言的人互相可以通话。

(毛宗武)

sheshangyin

舌上音 见等韵。

shetouyin

舌头音 见等韵。

sheyin

舌音 见等韵。

shehui yuyanxue

社会语言学 (sociolinguistics) 研究语言与社会多方面关系的学科。它从不同的社会科学(诸如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心理学、地理学、历史学等)的角度去

考察语言，进而研究在不同社会条件下产生的语言变异。上述定义中的“不同社会条件”是一种变素，“语言变异”也是一种变素，因此社会语言学又可以说是研究社会与语言之间共变现象的一门学科。

社会语言学的二分法 有的学者从社会出发，把语言作为社会问题来研究，称做“语言问题的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例如同是独立国家，瑞士长期并用几种不同的语言，马来西亚却有从多语转为单一语的趋势，弄清两者的不同及其产生的原因，这是“语言问题的社会学”的任务。有的学者以语言为重点，从社会因素研究语言的变异，称做“社会问题的语言学”(sociological linguistics)。例如对这个人叫“阁下”，对那个人叫“先生”，这是一种称呼的变异，弄清为什么有此变异，这是“社会问题的语言学”的任务。

有的学者把社会语言学分为宏观和微观两部分。宏观社会语言学研究全局性、整体性问题，如语言规范化问题，主要民族语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互相影响问题，多语社会中产生的语言问题等等。微观社会语言学研究个人的、局部的问题，如某一社会阶层中产生的语音和语词(甚至语法)的变异，又如性别、年龄、行业、经济地位等对个人言语的影响等。社会语言学的宏观和微观研究是互相贯通的，并无不可逾越的界线。有的社会语言学家认为，这一学科的主要任务在于揭示：①语言有变异性，因人、因地、因时、因场合的不同而不同。②人与人接触，在传输信息的同时，也通过语言的变异来表明自己的身份、地位、态度。作为逻辑命题，对一个人说“出去”或“滚蛋”并无不同，可是在社会功能上就大不一样了。

社会语言学的起源和发展 自古以来，中外语文学家都曾讨论过古语与今语、文语与口语、标准语与方言在社会功能上的差别。欧洲 19 世纪的方言学家对于自己民族语言内部各种变体的调查，其实即是进行了社会语言学的工作。20 世纪前期，西方人类学家对语言与文化、语言与社团的关系所作的调查，对近时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也有启发。

“社会语言学”这个名称，自 1960 年开始流行。从那时起，社会语言学家所作的各种调查，大大加深了人们对社会与语言共变关系的了解。

语言与社会阶层 人们早就认识到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地域方言。社会语言学家指出，不同社会阶层的语言也有特点。他们把它称作社会方言。美国社会语言学家 W. 拉博夫(1927~)精心调查了纽约市上中等级百货公司里职员的语音，并用一句包含 fourth 这个词的句子作为调查手段。他发现，不同的 r 发音，实际上代表不同的社会阶层。有人清楚地发 r 音，有人发得不清楚或几乎不发。上层和中层的职员，发 r 音的百分比比较高(62% 和 51%)，于是发 r 音成为上层职员的标志。下中层的职员发 r 音的百分比要低得多(20%)，于是不发 r 音成为下层口音的标志。但是下层职员出于一种语言不安全感，在回答顾客问话的时候，往往尽力多发 r 音。

语言与社团归属 英语发音有各种异体,以“公认音”(RP)最受尊重,上层人士发这种音,向上层靠拢的阶层也发这种音。可是英国学者P.特鲁吉尔发现,在英国东部诺里奇工人区,人们不是放弃自己的口音去学那文雅的公认音,反而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工人坚持当地工人阶级的口音。因为只有这样说,他们才有亲如一家的感觉。他们的归属感决定了他们对口音的选择。

语言与种族偏见 人们从自己的语言习惯出发,往往对某种语言有好感,对某种语言有偏见。美国学者W. E. 兰伯特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市(法、英双语区)做过这样的试验:把一个英语、法语同样熟练的人的话语录在磁带上,放给一些大学生听,但不让他们看见说话人,只凭听话的印象来对说话人作出判断。出乎意外,在这个人说英语时,人们对他估计很高,说那人大概长得漂亮,个子很高等等,而在他们听同一人讲法语时,对他的估计就低得多。原来受试人把讲法语的人看成二等公民,所以一听见有人说法语,心里就有几分轻视。

语言与社会改革 近代中国有过一系列的语言运动,各自起到了社会改革的作用。陈原在他的《社会语言学》里指出:1918年前后兴起的白话文运动,同时也是反对旧的封建意识的文化革新运动。30年代在中国知识界中发生的大众语运动,实质上是前一个时期语言运动的继续;1942年在延安提出的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的口号,以及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后的简化汉字和推广普通话的运动,这些都是着眼于社会改革的语言运动。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汉语普通话越来越流行,统一的语言已经显示出促进中国现代化的功效。

异体语言的平等观 在社会语言学兴起之前,标准语是语言学家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正统的和受尊重的,与之相殊的土语、混合语、地域方言等则被认为是一种二等语言,不值得重视的。社会语言学兴起以后,这种偏见被取消了。社会语言学认为因地域、阶级、阶层、职业、性别、年龄而引起的语言变异是自然现象,由此而产生的语言异体都应予平等对待。英国英语应予尊重,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各种异体英语也应予尊重;过去一直被优势语言集团认为劣等语言的混合语(一译克里奥耳语)和比京语(旧译洋泾浜语)也已得到承认并被专家研究。

社会语言学与语言政策 在历史上,语言被认为是自然成长的社会现象。在中外历史上,都曾经有杰出的文学家提出过语言改革的主张,但是运用国家的语言政策对语言的发展加以指导,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有的事。随着民族自治、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如印度和苏联都感到有必要制订妥善的语言政策,一方面力求有一种全国通用语,但与此同时又必须尊重少数民族固有的语言和文化传统。非洲一些新兴的独立国家,由于历史原因,曾长期使用外国语(英语或法语)作为行政和教育的中介。这些国家的语言政策不尽相同,但无不以促进本民族文化为根本目标,其中东非斯瓦希利语的标准化运动尤其值得注意。同时,在上述国

家里使用的英语和法语,也越来越带本地的特色。此外,法国国内的净化法语运动(以抵抗英语语词的侵入为目的),希伯来语的复兴运动,瑞典语的语法简化运动,都是属于为了国家的政治和文化利益而制订的政策。语言政策往往关系到民族和睦,如果处理不当,甚至引起骚乱(例如比利时和加拿大),是必须慎重对待的。但是它的最终成果,多半是一种政治的和社会的安排,和语言学本身关系不大。因此,语言政策属于社会语言学的边缘部分,在许多图书目录里单独立项。

社会语言学的理论价值 有以下三个方面:

① 对语言提出了一种更为细致的同时又更为广阔的概念。除了方言学家外,传统语言学家研究的语言是拟想的单一纯净的语言。社会语言学家认为,语言不是单一的,是有变异的;变异又分地方性的(这是古人早已注意到的)和社会性的(这主要是社会语言学的贡献)。社会性的变异又分社会阶层的变异(上层、中层、底层等),职业性的变异(教师、律师、医师、军人等各自的语域)和语用性的变异(在家里、在办公室、在讲台上使用不同的语码)。传统语言学的研究限于语言的内部关系,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从语言外部关系着眼,后者的活动开拓了新的领域。

② 提出了语言研究的数量化概念。在现代语言学的研究领域里唯理语言学提出了形式描写的概念;社会语言学提出了数量化的概念。后者以一个具体的社团或行业、或公共场所、或年龄段为调查对象,根据拟定的调查项目取得关于一定的语言现象的调查数据,从而对正在演进中的语言变化作出数量化的概括。拉博夫和特鲁吉尔所作的调查,都各有上千个数据,作出了细密的分析和令人信服的结论。

③ 在历时和共时的研究之间提出了一个中间概念。自从瑞士语言学家F. de 索绪尔提出了历时和共时的理论后,人们一直沿用不疑。但是,时间是瞬息即逝的,语言是不断发展和变异的,纯净单一的共时态只能是心理现实(一种拟想),不可能是客观存在。对此,社会语言学家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社会语言学家可以在同一个时间里选择祖孙三代或三个不同年龄段的受试者,调查他们之间的语言变异,从而用共时研究的方法取得历时研究的数据,可以说在共时与历时研究之间架了一座桥梁。

参考书目

- 陈原:《社会语言学》,学林出版社,上海,1983。
祝晓瑾:《社会语言学译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1985。
G. Leech,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London, 1983.

(陈原 许国璋 王宗炎)

she

摄 等韵学家把几个音相似的韵合成的一个单位。“摄”本是佛教术语,梵文 *parigraha*, 等于汉语的“概括”、“包括”。日本释安然(9世纪人,生卒不详)《悉昙藏》说:“又如真旦《韵诠》五十韵头,今于天竺悉昙十六韵头,皆悉摄尽,更无遗余。以彼罗卢阿反家古牙反摄此阿阿引;以

彼支章移反之止而反微无飞反摄此伊伊引；以彼鱼语居反虞语俱反模真韵反摄此郭乌引；以彼佳胡眠反齐但今反皆古韵反移咸西反灰呼恢反哈呼来反摄此翳爱；以彼萧苏聊反霄相焦反周之牛反幽於虬反侯胡沟反肴胡交反豪胡刀反摄此汗奥；以彼东德红反冬都宗反江古邦反钟之容反阳移章反唐徒郎反京古行反争侧耕反青仓经反清七精反蒸之应反登都郎反春尺伦反臻侧耕反文武分反魂户昆反元愿袁反先苏潜反仙相然反山所森反寒胡安反琴果今反岑侧耕反覃徒含反谈徒甘反咸胡谈反严语秋反添德兼反盐余占反，及以诸入声字，摄此暗恶。如摄韵头，从韵皆摄。以彼平上去入之响，摄此短声，或呼平声，或呼上声……。”

《韵论》15卷在《新唐书·艺文志·小学类》里著录了。列在孙愐《唐韵》后头，唐玄宗《韵英》前头。又把“尤”韵改成“周”韵，看起来成书在武周时期。武周时期正是大规模译密教经典的时期。这部书毫无疑问得算等韵的萌芽。它在《日本国见在书目》里有10卷本，还有12卷本。10卷是5的倍数，该是书的本体。2卷可能是“明义例”等等，也许有了萌芽韵图了。这是开始用“摄”字的例子。《韵论》作者叫武玄之，也写作武元之。因为宋代人避“玄”字讳。日本钞本可能沿袭这个习惯。等韵书最早用“摄”字的书是《四声等子》和《切韵指掌图》的歌诀说明。梵文元音14个，字尾符号 m, h 两个。元音有4个不常用，所以数元音的或算12，或算16。等韵图分摄多数用16摄，模仿痕迹依稀存在。

(俞 敏)

Shengong

神珙 中国唐代和尚，大概是唐宪宗元和(806~820)以后的人。南宋张麟之《韵镜·序》说：“有沙门神珙，号知音韵，尝著《切韵图》载《玉篇》末。”今存《玉篇》后附《四声五音九弄反纽图》，相传为神珙所作。神珙说的纽，指纽切，即声和韵的拼合。由神珙的序言知道，第一张列有5个圆圈的图是五音图(图1)，第二张列有两个方图叫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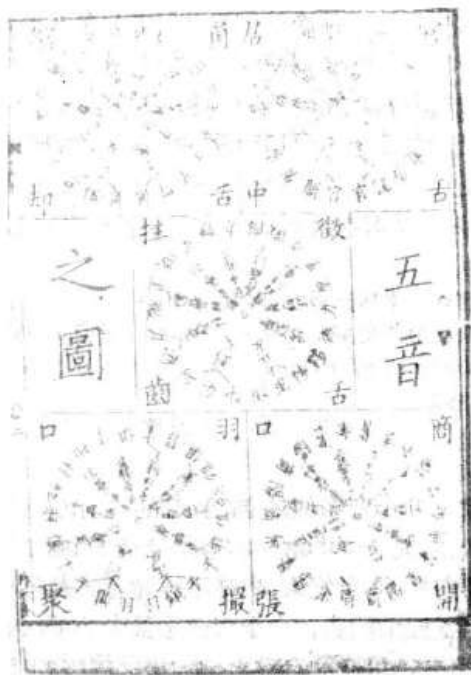


图1 五音图

弄图(图2)。他在序言里注明五音图是往左转着看，主旨是要说明反切的方法。但这两张图很费解，还没有人能作出令人满意的解说。神珙序言的上头有“五音声论”，提到了五音这个名称，列出东方喉声、西方舌声、南方齿声、北方唇声、中央牙声，和40个字例。这些字例和等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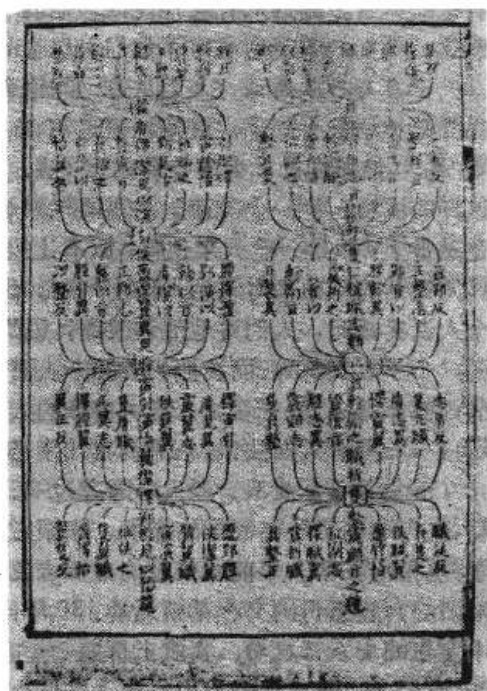


图2 九弄图

学上的三十六字母并不一致，可能是三十六字母的雏型。神珙自己在序言里却没提到五音声论，所以还不能断定五音声论出自他的手笔。

(刘广和)

shenjing yuyanxue

神经语言学 (neurolinguistics) 语言学的分支学科之一。它研究产生、接收、分析和储存语言的神经机制，以及这一机制与语言的关系。

人类很早就已注意到大脑与语言的关系。古埃及人曾经记录过由于脑部损伤而丧失语言功能的病症，也即现代所说的失语症。然而，真正科学意义的研究则是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的。1861年，法国医生P. 布罗卡(1824~1880)发现大脑皮层的一个专门区域(在左半球额下回后部)与言语的生成有关，该区域的损伤会导致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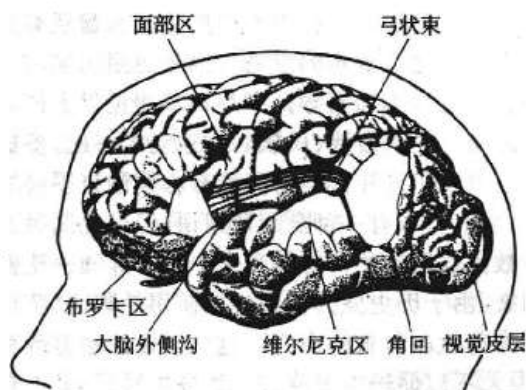


图1

者发音断断续续,或者虽然能说下去,但不能组成表示一定内容的话语。1874年,德国生理学家C. 维尔尼克(1848~1905)发现,大脑皮层的另一个区域(在左半球颞叶后部)控制着言语的接收和理解,这个区域受损的患者无法理解别人所说的话,甚至完全不能分辨语音。上述两个皮层区域,后来被分别命名为布罗卡区和维尔尼克区(图1)。

自那时以来,有关语言的神经机制的研究已经取得一定成就。现代解剖学和生理学已积累了大量有关人脑结构的知识,但是,活的人脑究竟怎样起作用,仍是一个谜。困难在于,人们无法打开活的人脑来直接进行研究。现代神经语言学广泛运用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病理学的方法,即观察大脑损伤对语言功能的影响;二是电子生理学的方法,即通过生物电的测试来观察大脑在言语过程中的活动。研究的结果表明,成人的言语中枢只位于大脑皮层的一侧,这种现象称为“单侧化”或“半球优势”。言语中枢位于哪一个半球,与习惯用左手还是右手有一定的(但不是绝对的)交叉联系:几乎所有主要用右手的人,其言语中枢都位于大脑左半球;用左手的人当中,60~70%也是左半球占优势,其余的人则是右半球占优势。听觉器官与大脑两半球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交叉联系,左半球的语言优势导致右耳的听觉优势。在一个人的两耳侧同时放出两个不同的语声,首先被感知并记住的通常是右耳侧的语声。这是因为右耳听到的语声直接送到左半球即能作出语言“解码”,而左耳听到的语声得先通过右半球再转送到左半球去进行分析(图2)。左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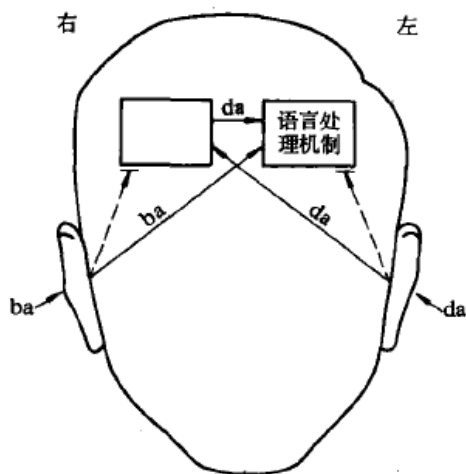


图2

偏向于感知非语言性的声音,如环境中的噪音、人的喜怒之声、音乐之声等。解剖学家发现,胎儿的大脑右半球略小于左半球;双耳听觉实验也证明新生儿的大脑左半球对言语刺激显示较强的生物电反应。左半球语言优势的形成,看来与遗传因素有关。但是环境因素和时间因素对于大脑两半球的定向分工也起着重要作用。儿童左半球的语言优势,是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建立起来的。初生婴儿的大脑右半球原来也有形成语言功能的生理基础,只是由于长时间只向一方面发展,使得右半球的语言能力受到了压抑。

失语症的研究可以为澄清言语中枢的形成、大脑两半球的分工、语言功能的定位等一系列问题。由于大多数人的言语中枢位于左半球,因此,言语障碍通常是由左半球的损伤引起的。失语症治愈的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患者的年龄。一般说来,4岁以下的幼儿,如果左半球受到损坏,右半球也能够较顺利地发展起语言能力。但4岁以上至青春期的儿童若患了失语症,其语言能力就会退步到4岁时的水平,需要过一段时间才有希望恢复原有的语言能力。这说明,在年龄较小阶段,儿童的大脑右半球仍有取代左半球而形成言语中枢的可能。不过,有的学者指出,言语中枢能转移到右半球的儿童,学习词汇没有困难,但联词造句的能力却会受到影响。如果左半球的损伤发生在青春期以后,那就会使人完全失去语言功能,因为成人的右半球已经过了发展语言功能的临界期。

关于言语中枢的单侧化及成人左半球的语言优势,专家们已取得比较一致的看法。但是,对于具体的语言功能是否与大脑皮层的专门区域相对应这一问题,仍有争议。长期以来流行于学术界的“定位论”认为,特定的大脑皮层组织控制着具体的语言功能,某个脑区的障碍会引起某种与之相联系的语言功能的丧失,比如布罗卡区和维尔尼克区的损伤会分别影响到语言的表达功能和听觉认知功能。现代有不少学者还相信,语音、句法、词汇和语义都有与之对应的专门的神经机制。不过,纯粹的病例并不存在,一种较突出的症状总是伴随着另外一些轻微的症状,这一事实使得一部分学者对“定位论”产生了怀疑,提出了“总体论”:人脑各部分组织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因而语言功能是统一的,人脑任何部位的损伤都可能影响到语言各方面的功能。有人指出,凡是失语症患者都缺乏一种基本的语言能力——用符号构成命题的能力。

上述两种观点孰是孰非,尚无定论。但狭隘的定位论或极端的总体论对于进一步的研究都是不利的。

(姚小平)

Shen Jianshi

沈兼士 (1886~1947) 中国语言文字学家,文献档案学家。浙江吴兴县人,与兄文学家、书法家沈尹默(1883~1971)都名重一时。生于清光绪六年农历六月十一日,卒于民国三十六年农历八月二日。沈兼士早年曾到日本留学,参加同盟会,并与马裕藻、钱玄同、许寿裳等人从章炳麟问学。归国以后,任北京大学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讲授文字学、《说文解字》等课程,并在北京大学创办研究所国学门,任主任职,积极培养史学、语言文字学、考古学各方面的科学研究人才。提倡调查歌谣、调查方言,开展新的学风;对于后进奖掖不遗余力。受到他的教导和启发的人,成为知名学者的很多。

沈兼士学识渊博,又精于诗文,尝与诗家樊增祥唱和。曾任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主持整理内阁大库明清档案事宜,并任北平辅仁大学文学学院院长,讲授有

关文字学、训诂学等课程。平生治学主张兼通博采,不为拘墟之见,因此对文字训诂发明独多,是中国近代最有见地的训诂学家。其主要的见解是从总体上探求汉语语词的语根,推寻语词表现在形音义三方面的嬗变,并提倡利用形声字的声符进行汉字的字族研究,以建立汉语语源学和字族学。最著名的著作是《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一文和《广韵声系》一书。零篇文字都收入《段砚斋杂文》内。最近中华书局又进行编辑《沈兼士学术论文集》,即将出版。

《广韵声系》最初由辅仁大学于1944年印出。此书取《广韵》里的字,按照谐声的系统编纂而成,体例有如清人的《说文谐声谱》。不过,清人的书以古韵部为纲领,此书则以四十一声类为纲领,凡谐声字的主谐字声组相同的归属为一类。作者在《编辑旨趣》中说:“吾人欲建设汉语学,必须先研究汉语之字族;欲作字族之研究,又非先整理形声字之谐声系统不可。”此书之主要旨趣约有下列4点:①叙列周秦两汉以来谐声字发达的史迹;②提出主谐字与被谐字训诂上文法上之各种关系;③比较主谐字与被谐字读音分合之现象;④创立以主谐字为纲之字典模范。由此可知这本书是作者为研究汉语字族而做的一次创举,是很重要的一本资料书,1945年辅仁大学出版。1986年中华书局根据原稿本影印出版,并附索引,颇便检阅。

(周祖谟)

shengcheng'yufa

生成语法 (generative grammar) 也称转换-生成语法。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一种语言学说。创建人N. 乔姆斯基。1957年他的第一部专著《句法结构》出版,标志着这种学说的诞生。最先起来响应的有语音学家M. 哈利,语义学家J. 卡茨,句法学家P. 波斯塔尔,心理学家J. A. 福多等。这个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为中心的学派,在几年内就一跃而为国际语言学界的重要流派。但是到了60年代后期,就内部分裂,70年代后更是声威渐减,而80年代又趋上升。目前该学派有东北语言学会与欧亚语言学会两个国际性组织,出版《语言学探索》等国际性学术刊物。

性质 生成语法学不是一般人所理解的语法学。其研究对象是内在性语言,而不是一般语言学家所研究的外在化语言。外在化的语言指言语行为,说出来的话,音义结合的词句等;内在性的语言指人脑对语法结构的认识,以心理形式体现。

范围 生成语法学研究范围限于人的语言知识或语言能力,而不是语言的使用。生成语法学一般不研究话语的社会内容、交际功能和说话的环境等等。

目标 过去结构主义语言学以观察语言现象并把它分类为目标,致力于搜集和处理语言素材;生成语法学以描写和解释语言能力为目标,提出语法假设和理论来揭示其规律,说明其原因。例如它要说明儿童为什么能在2、3年内学会语言。

表达方式 生成语法学与传统语法学的一个区别,是它使用数学那样的符号和公式来规定概念,表达规则,所以称为形式化的语法。

生成语法学家采用数学模拟的方法进行研究,其研究的对象是大脑的一种独特的认知系统——语法系统,因此乔姆斯基认为它属于经验科学,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学,最终将归入研究人脑机制的生物学。乔姆斯基说,与其把生成语法看作一种理论,不如看作一门“学科”,其性质和研究方法与以往的语言学有本质的区别,而其他自然科学则基本一致。

发展过程 一般人认为,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有4个发展阶段,但是他本人认为只有两个转折点。下文按他本人的意见,分语法规则系统和语法原则系统两项来叙述。

60年代的语法规则系统 早期的生成语法学家研究以数学的集合论为语法研究的基础。他们认为,每种语言都是句子的无穷集合,不能列举,只能用规则描述,因此学语言的人不可能一句句地学会,必须掌握语法规律。但是,一般人虽有说话和听话的能力,却并不意识到有哪些规律在起作用。生成语法学家认为,应该假设一套规则来描写语言能力。例如用语类规则来描述句子、词组等各种语类的内部结构,用 $S \rightarrow NP + VP$ 来表示一个句子,句子(sentence)由一个名词词组(noun phrase)加上一个动词词组(verb phrase)构成。这种精确的、形式化的语法称为生成语法。他们认为,传统语法学的规则太含混,只能意会,不易发展成精密科学;结构主义语法学的规则又内容太贫乏,只能作成分分析,不易揭示丰富多采的语言规律。他们主张采用更加灵活的规则——转换规则,以便反映出下面这种规律:“他吃了这个苹果”,“他把这个苹果吃了”,“这个苹果他吃了”,这3个句子虽然表面不同,但彼此之间有其内在的联系。转换规则也用形式化的符号表达,例如用 $X-V-NP \rightarrow NP-X-V$ 表示名词词组NP在句中变换了位置。用转换规则的语法叫转换语法,既生成又转换的语法叫转换-生成语法。现在一般称生成语法。

人的语言知识不仅有句法结构方面,也有语音和语义方面。例如我们都知道句子中哪个词应该读得最重,某个句子是什么意思等等,因此完整的生成语法应该包括音系规则和语义规则,分别描写人们头脑中潜在的音系知识和语义知识。

乔姆斯基于1957年后做了几年研究,到了1965年便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生成语法系统,包括语类、转换、音系、语义4个子系统,各子系统之间有一定的顺序关系。每个子系统都有一套规则,规则之间有一定的使用顺序,像用数学公式一样,逐步推导出句子来,不同的规则推导出不同的句子。这样,生成语法系统好比一部机械装置,运转起来能够生成某种语言中的一切合格的句子,而且只能生成那些合格的句子。

80年代的语法原则系统 经过不断研究,生成语法

规则越来越丰富,规则系统也越来越复杂,结果是有利于描写,却不利于解释,不利于说明儿童怎么掌握语法。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乔姆斯基从70年代起另辟蹊径。他认为,语法能力体现在辨别哪些句子合格,哪些句子不合格上,想要反映这种能力,不一定靠假设具体的规则来生成一切合格的句子,也可以靠假设更概括的原则来排除那些不合格的句子。他觉得,掌握语法主要是掌握一些抽象的原则,于是他逐步转而深入研究什么是原则,原则有什么作用,有什么特点。

原则的第一个作用是限制句子结构。例如“他不怕生病”可以改说成“生病,他不怕”,但是“他因为生病没有来”不可改为“生病,他因为没有来”。这是因为前一句虽把“生病”提前,动词“怕”能够管住后面的“空位”,后一句把“生病”提前,介词“因为”就管不住后面的“空位”了。这种空位他认为在语法上属于“空语类”,它必须受到严格控制,否则就不成句。这种对句子结构加以限制的原则叫做管辖,它是一个概括性原则,可以说明许多现象。例如英语要表达“谁买了什么”,可以说 Who bought what,但不可说 What did who buy;要表达“他看起来年轻”,可以说 He seems to be young,但不可说 He seems is young;又如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可以省略主语,英语、法语却不可以。以上现象,表面上好象彼此毫不相关,其实与空位的管辖有关。

原则的另一个作用是限制语义解释。在“小张说小李批评了他自己”中,“他自己”指“小李”,不指“小张”;而在“小张说小李批评了他”中,“他”可以指“小张”,不能指“小李”。这是因为“他自己”所指的对象必须约束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而“他”所指的对象则不在此范围之内。这个把语义解释加以限制的原则叫做约束。它也能说明不同语言中的各种现象,假如把以上这两个句子译成其他语言,语义解释也受到类似的限制。除以上所说这两条原则以外,还有其他原则,共同组成语法的原则系统。由于80年代的生成语法用原则系统取代了60年代的规则系统。现在通常用“管辖与约束理论”来概称对普遍语法原则系统的研究,简称“管约论”。

原则有普遍性,又有组合性。几条原则配合起来可以说明一组语言事实,另外几条原则配合起来又可以说明另一组语言事实。用为数不多的原则就可以解释各种语言中千变万化的现象,就象使用组合式家具那样方便。用普遍语法的组合理论最能说明各国儿童为什么都能在短短的2、3年内掌握如此复杂的语言,这在乔姆斯基看来,就是揭示人脑语言思维规律的科学假设。

评价和影响 对于生成语法,人们毁誉不一。当前活跃在国际语言学理论界的孟德鸠语法、广义的词组结构语法、词汇-功能语法、关系语法等各派学者均与生成语法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他们接受乔姆斯基某些观点,却又反对他的另一些观点(见乔姆斯基)。但是有两点大家基本上承认:生成语法与它早出现的理论相比,有根本突破;对比它后出现的理论有巨大影响。

参考书目

N. Chomsky, *Knowledge of Language: Its Nature, Origins and Use*, Praeger, New York, 1986.

F. Newmeyer, *Linguistic Theory in America*, Academic Press, New York, 1980.

A. Radford, *Transformational Syntax*,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81.

(赵世开 徐烈炯)

shengli yuinxue

生理语音学 (physiological phonetics)

研究有关语音产生和感知的一门学科,也称言语生理学(speech physiology)。这两个名词所包括的范围,严格说来有些不同。前者偏于社会科学而后者偏于自然科学,但一般并不予以细分。

发音器官的生理 人的发音器官大致可分为3个部分:①喉下,②喉部,③喉上。喉下有用来呼吸,并且也作为发音能源的各器官,包括气管、肺、胸廓、横膈膜和腹肌。喉部是声源器官,包括喉头、声带。喉上是用共鸣作用或阻碍作用来调节声音的各器官,包括口腔中各部及鼻腔(图1)。

肺是供给发音能源的主要器官,在胸腔内是一团有弹性的海绵状物质。它呼吸和吸气的动作受胸腔内各种肌肉如腹肌和横膈膜的控制。说话时横膈膜放松,由腹肌收缩,使腹部内脏器官向上挤压横膈膜,排出肺里的空气,经气管而达声门。这股气流就作为使声带颤动或冲破声腔中各阻碍、产生爆发或摩擦的动力。

喉头由甲状软骨、环状软骨、杓状软骨组成。甲状软骨是喉头最大的软骨,前部突出部分称为喉结。在颈部前方紧接在甲状软骨上边由肌肉联系的是形如马蹄的舌骨,作为舌的基础。环状软骨的结构形如指环,紧接气管上端。能吞咽食物的食道位于环状软骨后面。环骨下部的两边有一对关节面和韧带联系着甲状软骨。环状软骨作上下移动而甲状软骨作前后的斜向移动。这种运动与声带的音高变动有关。杓状软骨有一对,是喉的另一重要结构,由环状关节连在环状软骨的后部。这些关节使杓骨能作跨动和滑动。滑动使杓骨与关节轴作平行移动,而跨动使杓骨在关节轴的垂直方向作周围转动,使杓骨展开或收拢。这些动作关系到声带的松紧和声门的开闭(图2)。

声带位于喉的下端,主要由两片厚的韧带薄膜(或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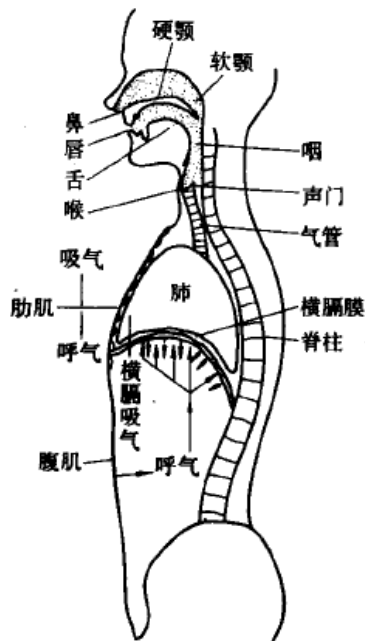


图1 发音器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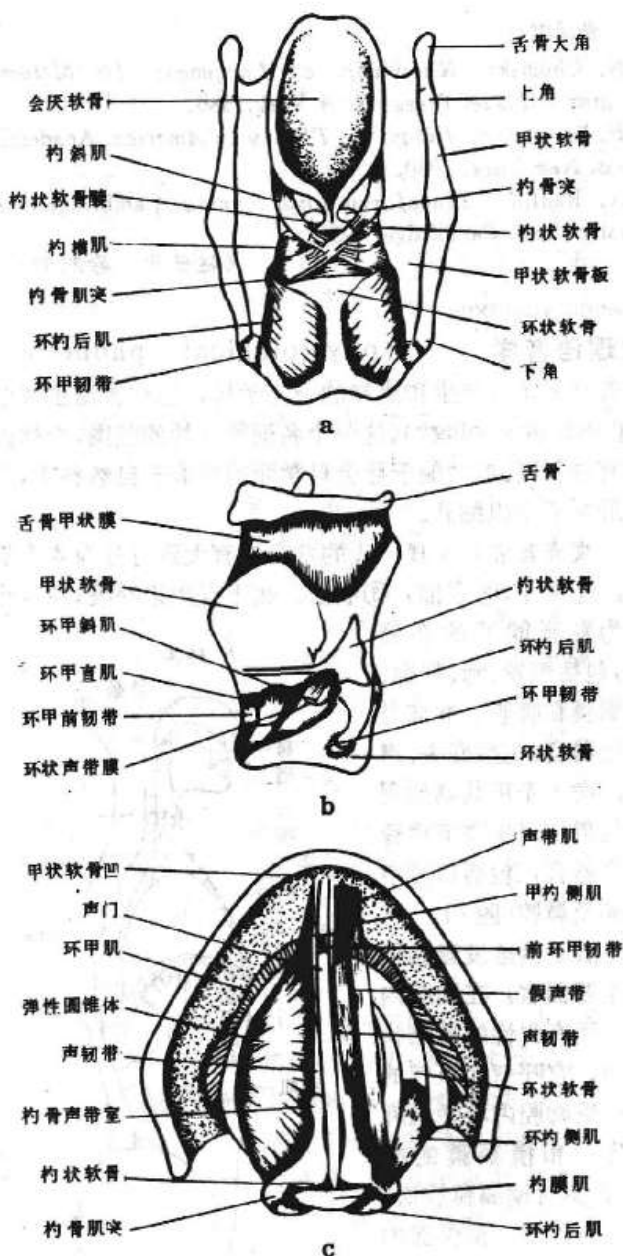


图2 喉头的结构

a 后视 b 侧视 c 俯视

声韧带)组成,还有纤维片(又称弹性圆锥)和肌肉纤维构成一个狭缝状的声门,成为呼吸时和说话时能够开闭的活塞。从冠状切面可见到这些甲状软骨、杓状软骨和声门的位置(图3)。声门的开度主要由于杓状软骨的动作。发嗓音时声门位置相对地收拢,而呼吸时相对地展开。声带的上端有一对假声带,位置靠边一些,在真假声带之间形成一个很小的腔室,称为“喉室”,假声带也称“室韧带”(图4)。假声带不能发音,但如收拢时就影响语音的音质。

会厌软骨如一片树叶,由韧带连在甲状软骨前方,最上端靠拢舌背后面,而由两边及中央的舌会厌襞联系。会厌的主要功能是在吞咽食物时关闭喉的通道,防止食物进入气管。声门展开时形成三角形,在发音时声带先闭拢,由肺送来的气流在一定压力下冲开声门,气流冲出后压力减弱,声带又因本身的弹性而重新闭合。这时由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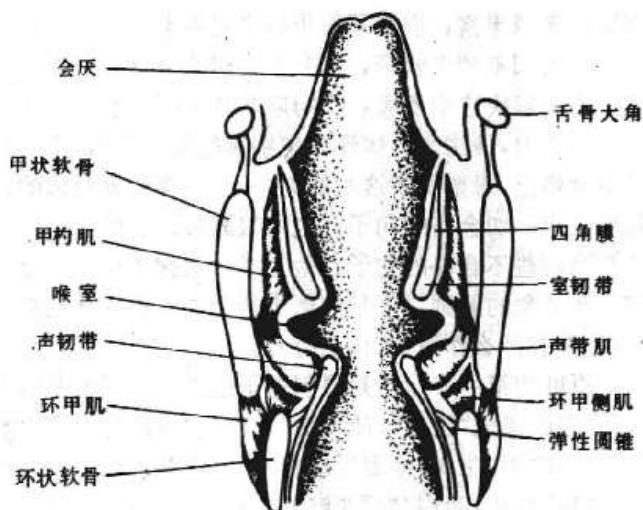


图3 喉的冠状切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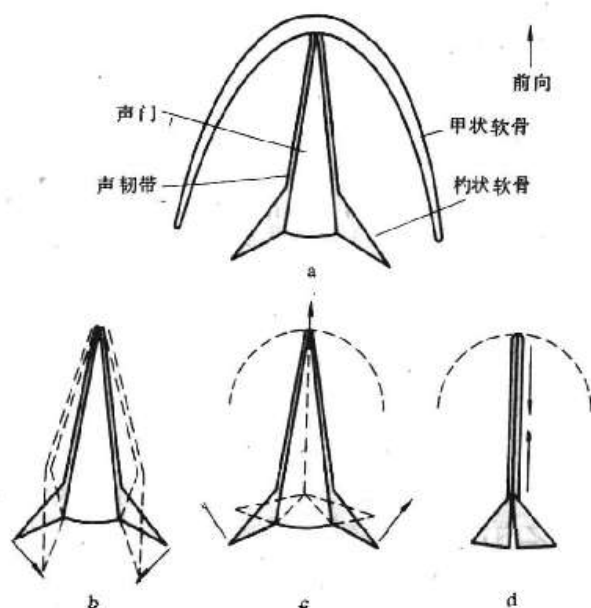


图4 声带动作示意

a 正常呼吸时状态 b 用力呼吸的外展作用
c 假嗓及耳语时的中央压紧状态 d 说话时全部关闭状态

继续送来的气流又因压力增大而再度冲开声门,如此连续开闭,使声带颤动而成声。声带每开闭一次称为一个周期,每秒钟的周期次数就是这个音的频率数。短而厚的声带频率高,长而薄的频率低。同一声带拉紧时频率高,放松时频率低。

气流通过声门,经过咽腔、口腔(或鼻腔),从唇部(或鼻孔)发出我们所听到的语音。这种声门以上的各腔统称为声腔。声腔内由于通道的扩展、收缩或变形而把声带的音调调节成各种各样的音。

口腔有3部分:①口壁,包括双唇、上下齿、齿龈、硬腭、软腭、小舌。②舌,分舌尖、舌叶、舌面和舌根。③咽(图5)。口壁中从上齿到软腭基本上是不动的器官,舌是动的器官,它的动作最灵敏,能作前后、上下等运动,与不动的器官靠近或接触而调节出各种音色。软腭的终端是小舌,它如同一个阀门,在发口音时,软腭抬高,抵住上咽壁、关闭鼻腔通道而成口音。发鼻音时,软腭下垂,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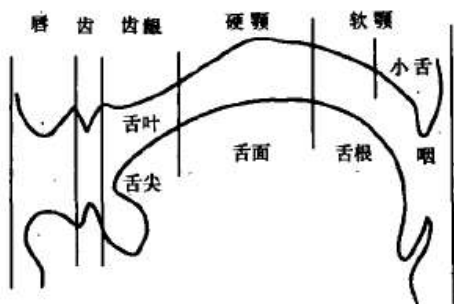


图5 口腔的各部位

开鼻腔通道,同时口腔中的某部分闭塞,而成鼻音。

听音器官的生理 语音由发音器官产生,达到对方耳中,通过听觉神经到大脑,表达了意义。所以人耳是感受语音的第一个门户,通称听音器官。人耳主要分为外耳、中耳和内耳3个部分(图6)。外耳由从耳的外部可以看到的耳轮和向里面延伸的耳道组成。外耳对听觉作用较小,但也有拢音的作用。耳道是一端敞开、一端封闭的管子,整个外耳形如喇叭。在收拢的一端封闭处是鼓膜,又称耳鼓,是一块椭圆形的薄膜。耳道收集来的声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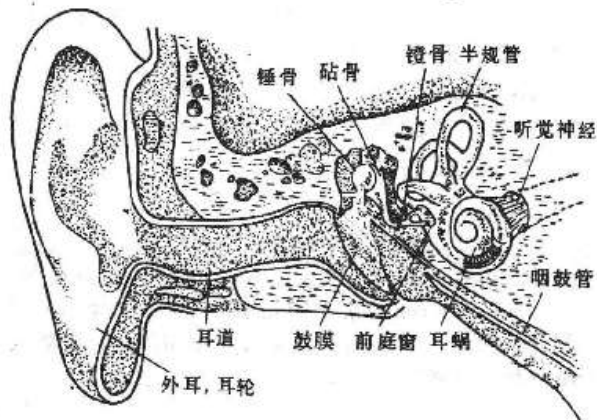


图6 人耳的各部分

使鼓膜振动,由于耳道共鸣作用,鼓膜上的声压要比本来的声压大好几倍。中耳由鼓膜与外耳隔开,它包括三块听小骨——锤骨、砧骨和镫骨。锤骨形如带柄的圆头锤子,柄端连着鼓膜,随着鼓膜而振动,锤子这一端紧接砧骨,它把振动传到形如马镫的镫骨,与中耳尽头的卵圆窗接触,使空气中的声波推动卵圆窗而达内耳。内耳是一个小而复杂的体系,包括前庭窗、耳蜗和半规管。其中最主要的是耳蜗。这是一条腔管,卷起来形如蜗牛的壳。蜗管内部充满粘液,由一层薄膜分隔为两部分,称为基底膜,上面附着2万多条的毛细胞,这是声音的感知器。声波振动从镫骨传到前庭窗,激发了基底膜的毛细胞,使它对不同频率作出响应。距前庭窗近的位置响应高频,而远的响应低频,这种振动通过听觉神经反应到大脑,使人感受到音色的区别和声调的高低。

语音的生理分类 语音学家向来把语音分为元音和辅音两大类,这两类都可以按生理机制的特征再分成若干类别。元音是经过声腔各部的共鸣调节作用而造成的不同音色的噪音。这种调节主要由舌的动作来担任。因此,元音习惯上按舌位来分类。一般是按“舌高点”(也就

是舌尖或舌面靠近上腭的一点)的升高和降低,分为高、半高、半低、低;又按其前伸或后缩,分为前、央、后等位置。据此作出的示意图称为元音舌位图。这些位置都是凭人的感觉而定的。有了X光照相的实验手段后,舌位就更清楚了。图7是汉语普通话10个元音的舌位图,是根据一个发音人的X光照相测定舌位的大致位置。图8是这10个元音的X光照相图。由各图可看到各个元音除了舌的高低前后有所不同外,咽腔的宽窄,唇和下颌的开闭也各有不同。所以单纯用“舌高点”来定舌位不完全符合生理条件。

图7 普通话10个元音的舌位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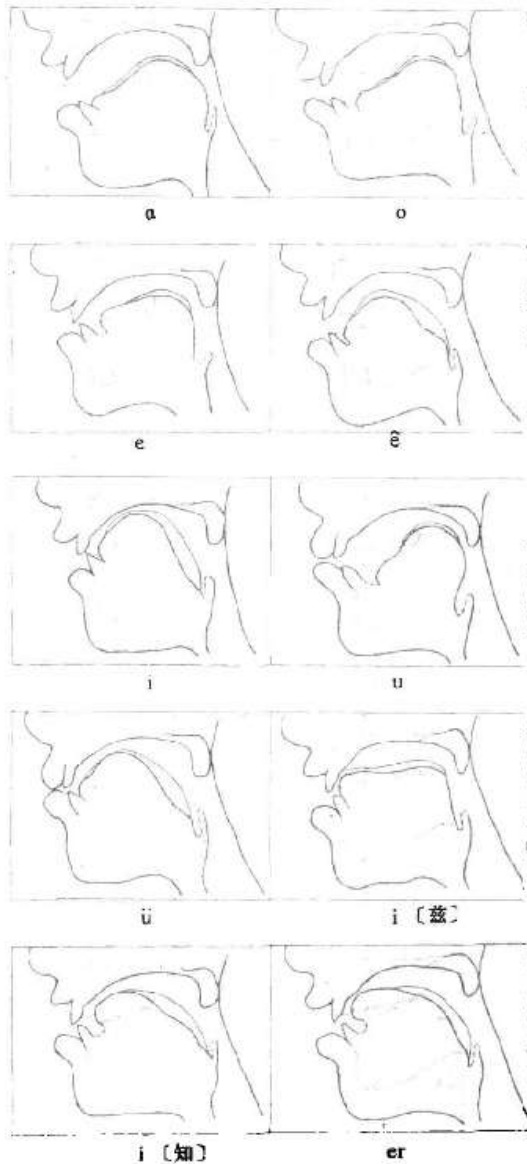


图8 普通话10个元音的X光照相舌位图

辅音的分类和元音不同。辅音是先由口腔中动与静的部分器官造成阻碍(成阻)然后释放(除阻)而成音。这些程序随时间而变,随阻碍程度而变,形成不同的发音

方法。同时辅音的阻碍点又因在口腔中的位置不同而有不同的发音部位。这两者构成绝大多数辅音的分类条件。辅音的发音方法,因它在除阻前后与声门开闭、声带动作的时间或程度上相配合的情况不同,而有“清”、“浊”,“送气”、“不送气”的差别;因它在声腔中由软腭上升或下垂,又造成“口”与“鼻”的差别。发音之前声门处于开放状态,除阻后开始声带颤动(元音开始)的是不送气清辅音;除阻前声带就已经颤动的是浊辅音;除阻后声门还继续开放片刻,肺部继续供气,然后声带开始颤动的是送气清辅音。

辅音的发音方法,按其声源的不同,又可区分为“启动作用”与“成音作用”两大类。“启动作用”按声腔中的气流过程,可分为三种不同的发音机制。

①“肺气流机制”,是以肺为启动部位,把空气排出肺部。这是绝大多数语音的发声动力。

②“喉气流机制”,以喉为启动部位,喉头抬高或降低,使口中气流排出或吸入而产生辅音。这类吸入的音如非洲语或高加索语中的缩气音。

③“舌气流机制”,以舌面对硬腭或软腭向前向后移动,使空气排出或吸入。如非洲的搭嘴音。

“成音作用”主要是由喉部的动作产生的音(包括声门的开闭状态和声带颤动的情况),它们也要以肺气流作为动力。语音中的元音和一切浊辅音都属此类。此外还有一些特殊的由成音作用而产生的辅音,如“耳语音”或“喃喃音”,发音时声带后端留出空隙形成一种气声;“挤喉音”,声门上方的结构封闭,喉头上移压出气流而突然松开,并伴随着噪音所发的音;“吱嘎音”发音时声带只有一部分颤动,但频率很低。有时在句尾的末一音素会出现这种现象。

根据发音生理的方法和部位,普通话的辅音可以分成几类(见表)。

普通话辅音分类表

发 音 方 法		发 音 部 位						
		双 唇	齿 唇	舌尖前	舌 尖	舌尖后	舌 叶	舌 根
清 塞 音	不送气	b[p]			d[t]			g[k]
	送气	p[p']			t[t']			k[k']
清 塞 擦 音	不送气			z[ʈ]		zh[ʈʂ]	j[ɕ]	
	送气			c[ʈʰ]		ch[ʈʂʰ]	q[ɕʰ]	
擦 音	清		f[f]	s[s]		sh[ʃ]	x[ç]	h[x]
	浊	w[w]				r[ʐ]	y[j]	
鼻 音	浊				n[n]			-ng[ŋ]
边 音	浊				l[l]			
半元音	浊	w[w]					y[j]	

如果把元音和辅音的生理条件列得更详细一些,可以更细致地描述元音辅音的生理特征。条件如下:

元 音	辅 音
舌位的高低	舌位的高低(随时间的变动程序,下同)
舌位的前后	舌位的前后
咽宽度	咽宽度
喉的高度	喉的高度(喉头升降度)
舌弯度	舌弯度
双唇距离	唇紧度
唇圆度	舌紧度
唇展度	声门开度及闭合情况
唇撮度(前伸)	软腭下垂度
软腭下垂度	声带颤动起始时间
声门形态	声门上、下的气流压力和流量

声调是有声调语言的辨义条件之一,特别是在一些亚洲的声调语言如汉语、泰语中,声调的音位和元音、辅音同样重要。构成声调的生理条件主要由声带颤动产生的频率。声调的高低变化就是声带颤动频率的变化。但在一种语言(特别是声调语言,如汉语)中所感到的不同声调,除频率变化是主要条件外,还有其他因素如强弱、长短及音色变化等。

不过,后几项一般不影响词义的辨析,特别是在汉语中。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成为语言的韵律特征。(参见彩图插页第34、35、36页)

参考书目

- 罗常培、王均:《普通语音学纲要》,商务印书馆,北京,1981。
P. Lieberman, *Speech Physiology and Acoustic Phonetics: An Introduction*, MacMillan Pub. Co., 1977。
H. M. Kaplan, *Anatomy and Physiology of Speech*, McGraw-Hill, 1960。

(吴宗济)

shengfu

声符 (phonetic complement) 汉字形声字

的表音部分。也称声旁。例如芬、氛、纷、份、份、忿等字都从分得声,“分”就是这些字的声符。声符跟字的读音在最初造字的时候可能是相同或相近的,但是经过时间长了,字音或声符的读音变了,就产生了差异。这种情形很多。例如“堂”、“棠”都音táng,可是声符是“尚”,“尚”的读音变为shàng,就与字音不同了。

就现在的读音来看,声符跟字音不同有3种情形:

①声母不同,如赴(fù)从卜(bǔ),桃(táo)从兆(zhào)。

②韵母不同,如废(fèi)从发(fā),结(jié)从吉(jí)。

③声母韵母都不同,如移(yí)从多(duō),途(tú)从余(yú)。这些

不同都牵涉到古今音异的问题。另外,也有些字在最初制字的时候就不那么严格,只求相近,不求相同,到了后代,约定俗成,也就不改了。

汉字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有些形声字产生了异体字,意符相同,而声符不同。如澼:淀、搏:搗、鎚:锤、汎:泛、暱:昵、筍:笋、餒:饿、癡:痴、擔:担、膽:胆、煙:烟、袴:裤。这些字的异体产生的时代有早有晚,现在一般应用后面的一个字,前面一个字就很少用了。(周祖谟)

shenglei

声类 指声母的类别,是某一类声母的总称。声类是从韵书(或其他材料)的反切系联或类似手段得来的,没有经过音位归纳处理。在某一种韵书(或材料)中,凡是反切上字能够系联在一起的,就算一个声类。例如,通过系联法证明,《广韵》见系声母分一、二、四等与三等两类,这表明见系有两个声类。如果按音位学的原则进行归并,这两类实际上是一类声母。陈澧考证出《广韵》有40声类,就三十六字母说,多出4类,即照、穿、床、审、喻各分两类,又把明、微合为一类。后来黄侔伯、白涤洲考证出《广韵》有47声类,即在三十六字母的基础上,把照、穿、床、审、见、溪、疑、晓、影、喻、来11组各分两类。曾运乾、陆志韦、周祖谟考证出《广韵》有51声类,即在黄、白47声类的基础上,又把精、清、从、心4组分为两类。

声类有时也指声母。等韵学家称声母为字母。清代钱大昕、陈澧认为字母这个名称是从梵文来的,用在汉字上不合适,所以改称声类。声类有时还指韵,最早的一部韵书叫《声类》(李登著,今亡佚)。清代古韵学家沿用了这一名称,例如孔广森《诗声类》,严可均的《说文声类》。

(谢纪锋)

Shenglei

《声类》 见韵书。

shengniu

声纽 (initials) 汉语声母的别名,也称纽或音纽。最初指韵书每韵中的小韵,一个小韵称一纽。后来等韵兴起,把一个字音分析成声母、韵母两部分,于是声母也就沿用了声纽这一名称。(谢纪锋)

shengxue yuyinxue

声学语音学 (acoustic phonetics) 用声学方法研究分析语音的学科。与言语声学(speech acoustics)相通,但研究重点有所不同,前者偏于语言学范围,后者偏于物理学范围;由于它们除本学科的基础外还需具备另一方的知识,所应用的理论和方法又互有联系,因之它们的界限有时不是十分清楚,只是各有侧重而已。

人的语音以声波形式由空气作为媒介传到对方,言语声波的特性分析是现代语音学研究的最重要手段之

一。言语声波的研究,早期都由物理学家进行。20世纪初分析语音只能用一种特制的浪纹计画出波形,用傅里叶分析尺对逐个周期的波进行测算,才得出表示声波特性的频谱和频率。到了50年代,动态声谱仪及其他声学仪器的广泛应用,使语音学迈进一个新阶段。此后20多年中,这方面的研究达到全盛时期,形成一门边缘学科——声学语音学。

语音的声学基础 ①声波:任何声音都有声源。声源由振动体产生。振动体分固体的振动体和空气柱的振动体。最简单的振动体如音叉,被敲击后又臂摆动,扰动周围空气,形成疏密相间类似水浪纹的波,称为简谐波,又称正弦波。它有一定的振动周期(每秒钟振动次数)。如果有两个叉臂长短彼此不同的音叉,同时受到敲击,就造成两个不同周期的振动,所产生的简谐波叠在一起而成为复合波。图1表示两个分别为100赫和500赫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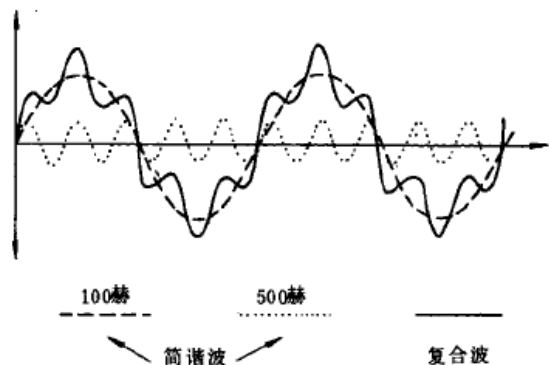


图1 简谐波与复合波

简谐波叠加成复合波。声带波是许多有规律的简谐波叠在一起的复合波,这些都属于有周期性的乐音。另外一种是没有规律的杂乱的波,它属于无周期性的噪音(图2)。显示声波的仪器主要为示波器(有阴极射线示波器或光点、机械等示波器)。波形的纵坐标表示振幅的大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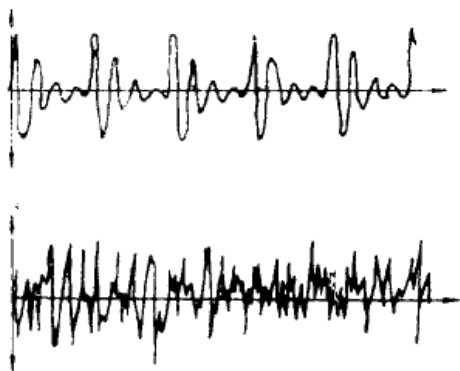


图2 上 周期性乐音 下 无规噪音

横坐标表示时间的长度。②频谱:复合波用傅里叶分析法能分解出若干正弦波,每一个简单的正弦波称为一个分量,各分量被画成垂直线排列在横坐标上,成为纵坐标,表示谐波的振幅,横坐标表示频率的二维频谱。频率最低的一条谐波谱线是基频,以上的第二谐、第三谐、……都是基频的2倍、3倍、……。不同语音(乐音)的频谱中,

各谐波的幅度搭配各有不同,其中有好几条谱线集成若干个峰值,称为共振峰。这是表示元音音色的重要信息(图3)。

言语的声学特征 言语声的声源有清音浊音的不同。清音由肺部气流通过敞开的声门后,遇到咽腔或口腔中某部分的阻碍,如果阻碍是狭缝状,就产生湍流,以辅音的擦音为代表;如果是闭塞状,在闭塞突然放开时,就产生一种脉冲,以塞音(又称破裂音)为代表。这些都是无规噪音。阻碍位置的前后,作用面积的大小,以及气流的长短、强弱等都决定了这些辅音的音色。浊音是由声带颤动发出的周期性脉冲,也就是噪音(又称乐音)。这类音构成语音中的元音或浊辅音。未曾受到调节的声带波形在二维频谱上表现如三角形。声腔具有它的自然频率特性。声带波被声腔的自然频率制约后就改变成语音的复合波。声腔由于舌位的运动,软腭的升降而改变了自然频率,于是造成不同的元音和其他响音(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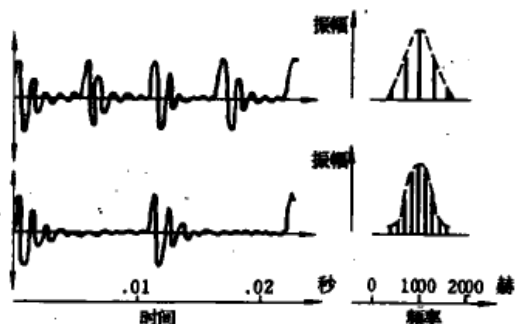


图3 复合波的二维频谱

左 波形 右 频谱 上 200 赫 下 100 赫

声带波

辐射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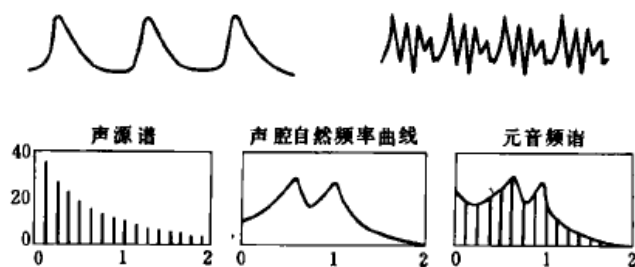


图4 噪音波受声腔调制作用示意图

语音的声学分析 言语的声学特征可以用各种声学仪器来分析。语音中的许多现象,诸如辅音的发音方法、发音部位,元音的音色,复合元音的动程,字调和语调的高低以及轻重音的强度等,都能直接或间接地作出定性或定量的分析结果。这些仪器中以动态语图仪尤为重要。(参见彩图插页第37页)

言语波模式 用示波器(较新型的语图仪也具有示波装置)作出的语音波形,所表现出来的语音模式可以分为:①无音段型,②爆发音段型,③无规噪音型,④准周期性乐音型,⑤无规性与周期性的混合型等。通过这些波形,大致可以辨认出是什么元音或什么辅音。但是发音器官的造形或动作稍有不同,波形就有变动,往往听

起来是同样的音而波形却不相似。因此用声波波形分析语音还不是最理想的方法(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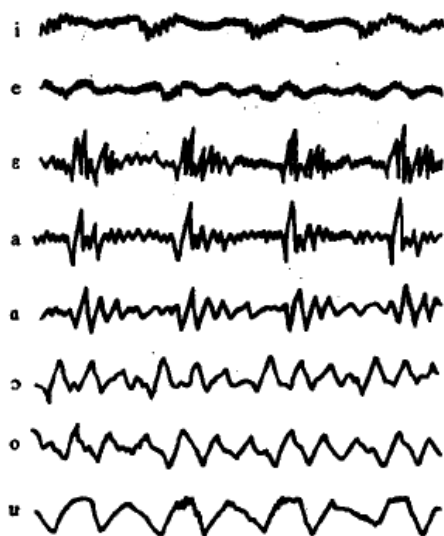


图5 不同语音的波形

动态频谱或语图的模式 用语图仪做出的语图,以纵坐标代表频率,横坐标代表时间,而以图中颜色的浓淡代表强弱,称为三维频谱。用在语音分析上的一般称为语图。语音在宽带语图上的表现,可分为几种模式:①短脉冲直条(又称冲直条),②无规则乱纹,③阔横杠。在分析辅音的发音方法上,冲直条表示塞音或塞擦音的除阻段;乱纹表示清辅音的摩擦段或送气段。横杠表示一切浊音,包括元音和浊辅音的基频和共振峰。这3种模式的单独出现或组合就构成一切语音的模式,它代表了一切语音的音色。在频率坐标上,共振峰横杠的分布位置代表某种元音或浊辅音,而冲直条和乱纹的分布区域(中心频率和下限频率)可用来辨认辅音的发音部位(图6)。



图6 语音的语图模式(三维频谱)

1 浊音横杠 2 元音横杠 3 清音乱纹 4 清浊混合音
5 冲直条 6 冲直条与乱纹混合

噪音起始时间与过渡音征 辅音与元音在一个音节中的交替,是由一个音位滑移到另一音位,有一个渐变的过程,这个过程或者连续不断,或者略断即连,视不同辅音而异。

在一个音节中,清辅音中的塞音连上后面元音时,由于清塞音声源是肺气流,而元音是声带音,塞音除阻后,声带音虽立即跟上,但还有很短的一段无声间隙,这一段的时长称为噪音起始时间(简称VOT),VOT的长短不同和闭塞辅音音色在听辨上有决定性作用。此外,辅音与元音或元音与辅音结合,中间那段过渡因在听感上是辨别辅音的征兆,称为过渡音征,在语图上表现为在元音共振峰横杠前部或后部有弯曲形状,一般以第二共振

峰最具有过渡音征的特点。音征的长短和弯曲的走势(或升、或降、或不弯而平)反映了这个辅音的发音部位。因此,噪音起始时间与过渡音征都是听辨辅音的重要参量(图7)。

现在把普通话的元音、辅音的声学参量选出若干有代表性的列表于下(表1、表2、表3各表中的数据

表1 普通话10个元音共振峰数据表(赫兹)

共振峰	性别	元 音									
		a	o	e	ê	i	u	ü	i(兹)	i(知)	er
F ₁	男	1 000	600	600	650	400	400	450	500	450	600
	女	1 100	900	700	550	350	350	350	500	450	750
F ₂	男	1 400	1 000	1 400	2 050	2 300	700	2 200	1 500	1 700	1 500
	女	1 550	1 300	1 450	2 400	2 900	650	2 300	1 500	1 900	1 750
F ₃	男	2 400	2 000	2 400	2 600	3 500	—	2 500	2 600	2 400	2 000
	女	2 600	3 000	3 200	3 000	3 500	—	2 750	3 100	2 600	3 6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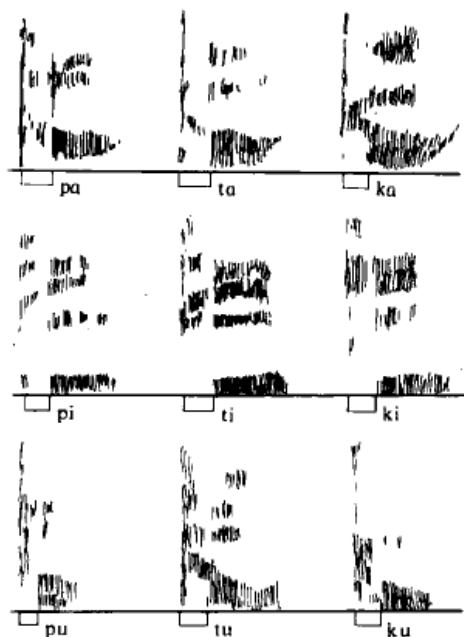


图7 音节语音图模式

选自《普通话单音节语音图册》)。

声学元音图 语言学家开始采用声谱来分析语音之后,为便于比较和描写,把这些声学数据转换成一种两坐标的图,它和通行的四边形元音舌位图很相似,称为声学元音图。它以元音的第一共振峰频率值F₁为纵坐标,第二共振峰频率值F₂为横坐标。坐标的分度有的用线性(等分),有的用对数或其他标准。这类图只是设法把不同元音及其变体在图上区别开来,作出的图大致和元音的舌位位置相当(图8)。用这种方法来研究复合元音,也可以根据复合元音的共振峰逐段量出数据来作图。这就能更形象地表达复合元音的动程和起讫点(图9)。

表2 普通话浊辅音声学数据表

辅音	长度(毫秒)	强度(分贝)	共振峰			音征长度(毫秒)	音征走势
			F ₁	F ₂	F ₃		
r	60	-5	550	1 800	2 650	52	降
m	63	0	300	1 200	2 350	40	升
n	34	-1	400	1 500	2 400	59	降
-n	74	-2	380	1 000	1 800	—	—
-ng	145	5	400	1 000	1 900	—	—
l	74	4	350	1 500	2 400	52	升
y(i)			300	2 200	3 500	0	平
w(u)			300	600	—	—	平
y(ü)			350	2 400	3 600	67	降

表3 普通话清辅音声学数据表

辅音*	长度(毫秒)	强度(分贝)	除阻段		VOT(毫秒)	音征长度(毫秒)	音征走势
			中心频率(赫兹)	下限频率(赫兹)			
b	6	-3	2 000, 6 000	1 000	8	33	升
d	7	-5	7 000		10	44	降
g	14	-5	1 600, 6 500		15	52	降
p	86	5	2 000, 6 000		85	0	平
t	104	13	2 000		104	14	降
k	94	7	2 000, 6 500		89	29	降
f	198	-1	7 000	5 500		44	升
s	186	0	7 000	5 000		37	降
sh	179	10	3 000, 6 000	2 100		70	平
x	186	11	6 800	3 800		112	降
h	160	8	7 000			0	平
z	134	5	7 000	5 400		45	升
zh	37	5	3 000, 6 800	2 000		67	降
j	44	-2	6 500	4 500		141	降
c	112	-2	2 000, 7 000	5 000		22	降
ch	141	7	3 000, 6 500	4 500		22	降
q	149	15	6 500	3 000		131	降

* 本表辅音在音节中均与元音a相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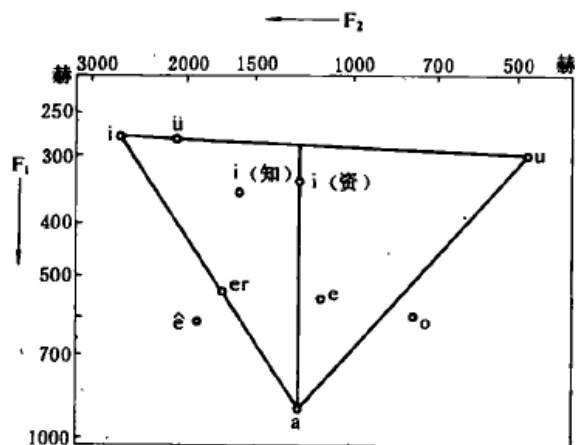


图8 普通话10个元音的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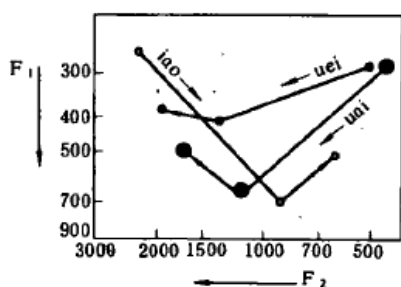


图9 普通话3个复合元音的声位

韵律特征的声学分析 语音的声学特性除音色外, 还有3种特性, 如音强、音高、音长, 总称为语音的韵律特征, 又称超音段特征, 它们都可以用语图仪或音强计、音高计等仪器来分析。音强显示语音的重音、轻音等强弱变化, 音高表现语音的字调与语调, 而音长则对语言节奏的快慢, 字与句之间的长短关系等加以准确地计量。图10介绍一句诗句用普通话、广州话和上海话3种方言来说出所作的窄带语图。从图中可以比较这3种方言中韵律特征的异同。这3种方言中, 除了音色不同之外, 声调的调形、变调的规律以及轻重音的分布都有区别。音高显示器和数据处理系统(参见彩图插页第37页)可以直接把语音的声调即时显示在荧光屏上, 比语图仪的速度更快。韵律特征研究在提高人工言语合成的质量上起着决定性作用。目前的声学研究已致力于韵律特征的全面分析。

参考书目

吴宗济主编:《汉语普通话单音节语图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 1986。

拉迪福吉德著, 吴伯泽译:《声学语音学纲要》, 载《方言》1980, 第1、3、4期。(P. Ladefoged, *Elements of Acoustic Phonetic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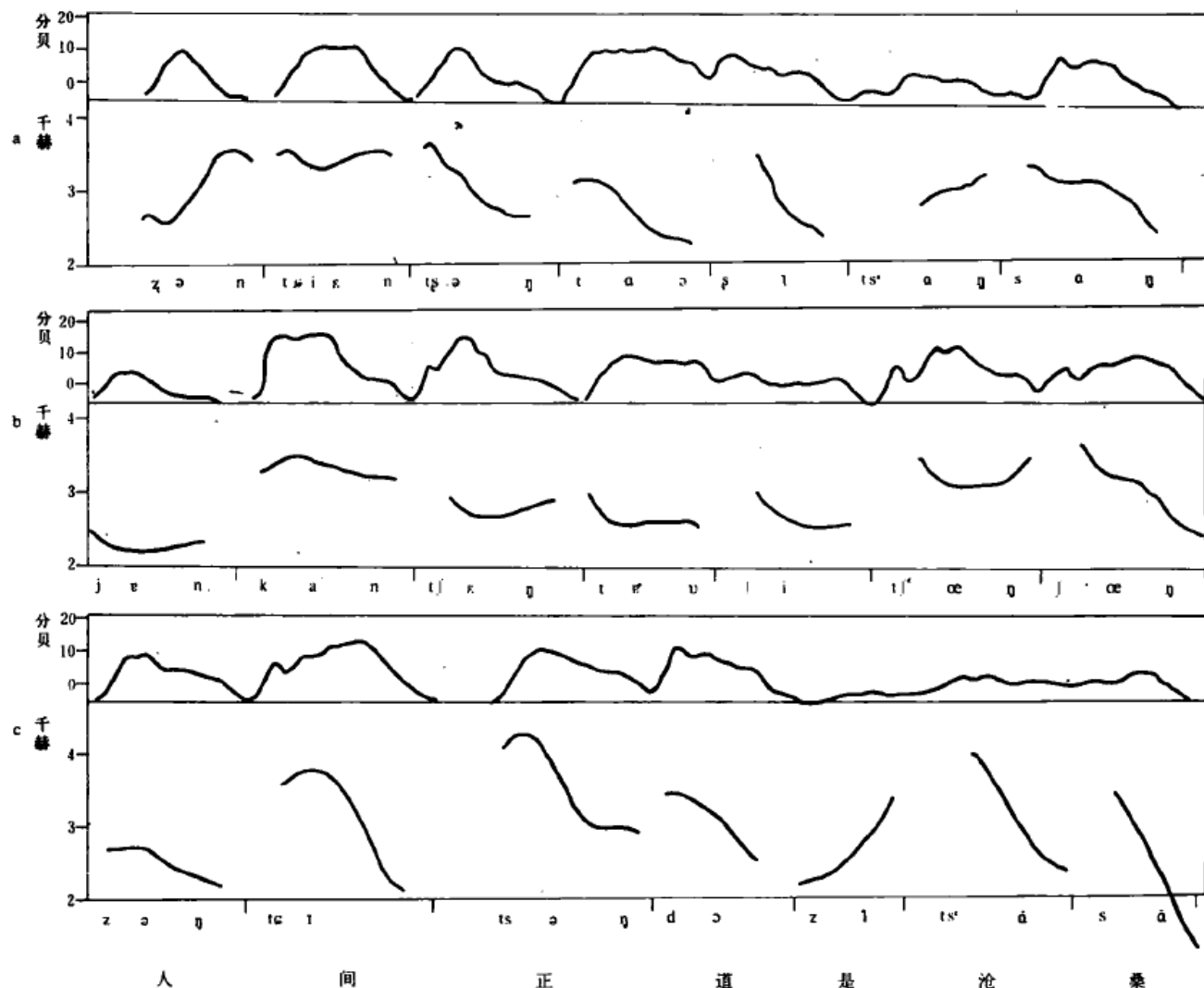


图10 汉语3种方言的韵律特征

a 普通话 b 广州话 c 上海话 图中上半部为音强, 下半部为音高显示, 均由女性发音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4.)

丹涅斯等著,曹剑芬、任宏谟译:《言语链——说和听的科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3。(P. B. Denes, E. N. Pinson, *The Speech Chain*, Anchor Press, New York, 1973.)

C. G. M. Fant, *Acoustic Theory of Speech Production*, Mouton and Co, S-Gravenhage, 1960.

(吴宗济)

shengxun

声训 从语词的声音方面推求词义的来源,以音同或音近的词为训,说明其命名之所以然的训诂方式。也称音训。声训起源很早。如《易经》:“乾,健也”。“坤,顺也”。“夬,决也”。“坎,陷也”。《孟子·滕文公上》:“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这些都是声训。到汉代,应用较广。汉末刘熙又作《释名》一书,专门用声训解说词义。从释词与被释词在声音方面的关系来说,声训约可分为4种:

① 同音。例如,“景,竟也,所照处有竟限也。”“晷,规也,如规画也。”“土,吐也,吐生万物也。”“盲,茫也,茫茫无所见也。”

② 双声。例如,“星,散也,列位布散也。”“火,化也,消化物也。”“木,冒也,华叶自覆冒也。”

③ 叠韵。例如,“山中丛木曰林。林,森也,森森然也。”“矢,指也,言其有所指向迅疾也。”“穀,埆也,体坚埆也。”

④ 音转相近。例如,“船,循也,循水而行也。”“癖,徙也,浸淫移徙处日广也。故青徐谓癖为徙也。”“鼓,郭也,张皮以冒之,其中空也。”“譬,拂也,牵引拂戾以制马也。”

这4种声音关系主要从形状、性质、现象、功用和人所感受等各方面加以推陈,以说明事物命名之所以然,其中也自有可取之处,然而每个名号各自为说,且又多出于主观推测,不尽可信。如《释名》说:“山,产也,产生物也。”《说文》说:“山,宣也,宣气散生万物。”义相近而不相同,难以抉择其是非。不过利用这些材料可以考查古音,取其因声求义的办法以探求语源。清代的训诂学家受《释名》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周祖谟)

shengsheng

省声 指汉字形声字的声符为某字的省略。省声的说法出于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许慎分析文字结构,凡形声字的声旁很明显的都注为“从某某声”。例如郊,“从邑交声”;超,“从走召声”。但是有些字的声旁的笔画并不完备,许慎根据当时的字音推断某声旁是某一个字之省略,注出“从某某省声”。如:

鬲部融,从鬲,蟲省声。

生部産,从生,彦省声。

夕部夜,从夕,亦省声。

火部炭,从火,岸省声。

火部炊,从火,吹省声。

夭部奔,从夭,贲省声。

广部疫,从广,役省声。

鹿部麋,从鹿,困省声。

玉部琬,从玉,琰省声。

这里有的字的声旁在小篆以前确实有不省略的写法,如旬从匀、夜从亦,都见于金文;産从彦,见于玺印;融从蟲、麋从困为籀文,见于《说文》。不过大部分不见于秦以前的文字。许慎所推定为某字之省的也未必都对,如“奔”字金文从夭,下从廾,廾象人奔跑的足迹,是一个会意字。廾后来写为廾,《说文》误以为是形声字,所以说“贲省声”,实际与古不合。虽然如此,其中大部分是有道理的。

(周士琦)

shengxing

省形 指汉字形声字的形符在形体结构上笔画有所省略。东汉许慎作《说文解字》分析汉字的字形,有的说“从某某”,如苗字“从艸从田”,孚字“从爪从子”;有的说“从某某声”,如呼字“从口乎声”,格字“从木各声”。这些都是由两个完整的字组成的。但是还有一类是说“从某某省”的,如喬字“从夭从高省”,蠶字“从老省从至”,戡字“从殺省式声”,军字“从车从包省”,再字“从爪𠂔省”。这些字许慎都认为有一部分不是完整的字,那是从某字省略而来的。许慎所说的虽然未必完全准确,如说類“从逃省”,弗“从韋省”之类,但是由此可以知道有些字在结构上确有省略,这对研究汉字造字的方法是很有帮助的。

(周士琦)

Shiciqu Yuci Huishi

《诗词曲语词汇释》 解释诗词曲中常见语辞的书。张相撰。张相精通文史,于诗词曲尤为娴熟。本书凡6卷,汇集唐宋金元明人诗词曲中常用的特殊语辞,如“须”、“则”、“却”、“且”、“镇”、“厮”、“解道”、“怎生”、“则箇”、“剗地”、“端的”、“兀自”之类,详加引证,解释其意义和用法。此类常见的语辞大都是历史上当时通俗的口语,或见于诗歌,或见于词曲,或见于戏文传奇,向来没有专书作过解释,而且一词不一定只有一个意思,要理解确切,势必要综览各家诗词戏曲作品,探求其文意,揣度其语气,寻索其确实的含义。设若索得一解,又必须施用于各篇都能通晓无碍才行,这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本书作者用了8年的时间专心从事这项工作写成书,标目537,附目600有余。这对研究唐以来文学作品的贡献极大。在此以前,黎锦熙曾在北京师范大学讲授过“近代语研究”一课,可惜没有成书遗留下来。

张相在这部著作的前面所写的叙言里谈到他探求词义的经过,一曰体会声韵,二曰辨认字形,三曰玩绎章法,四曰揣摩情节,五曰比照意义。而比照意义,又从异义相对、同义互文、前后相应、文从省略、取异文相印证等几种方法参互比较,这在研究词义方面比清代刘淇的《助字辨略》、王引之的《经传释词》用心更加细密。现代很多研究近代汉语语词意义的人都或多或少受其启示,全书的缺点在于有些义项分别较繁琐,有些语辞字同而音异者没

有标注读音,未免美中不足。此书在作者谢世后于1952年始由中华书局印行。

(周祖谟)

Shishenglei

《诗声类》 见阴阳对转。

Shilaxie'er

施莱歇尔, A. (August Schleicher 1821~1868) 德国语言学家。1821年2月19日生于迈宁根,1868年12月6日卒于耶拿。1850~1857年任布拉格大学教授,1857~1868年任耶拿大学教授。

施莱歇尔是历史比较语言学在19世纪中期影响最大的人物。他最早主张从本地人学语言,他自己就是这样学会了斯拉夫语、立陶宛语、捷克语的。他在哲学上受黑格尔的影响,在自然科学方面受达尔文的影响,这些是他的语言理论的根源。



施莱歇尔最重要的著作是《印度日耳曼诸语言比较语法纲要》(1861~1862),每章先写出他所构拟的原始印欧语形式(加星号为记),再写实的梵语、古希腊语、拉丁语、日耳曼语等形式。这个比较法为后来的新语法学派开辟了道路。

施莱歇尔把语言分为3类:孤立语(如汉语),屈折语(如印欧语),粘着语。他认为语言总是从孤立阶段经粘着阶段发展到屈折阶段,印欧语是最高阶段的语言,但是拿不出历史证据。他这个说法之所以曾经风靡一时,只是因为迎合了印欧人的种族偏见。

施莱歇尔提出“谱系树”模式。按他的说法,最早是原始印欧语,这像是树干,由此生出两支,一支是斯拉夫-日耳曼语支,一支是雅利安-希腊-意大利-凯尔特语支,从这些语支再分别生出日耳曼、立陶宛、斯拉夫、凯尔特、意大利、希腊、伊朗等语言。这个谱系树模式已为后人所采用,但只是为了大致了解语言的演变过程。语言不是在哪个年月突然分为两支的,一种语言分化为不同语言之后仍然彼此互相影响,这与树木各枝的互不相干不同。

施莱歇尔所设想的原始印欧语,结构很简单,只有几个元音,几个辅音,词法非常有规则。这个假说在他去世几年之后就为K. 布鲁格曼等所推翻。1905~1907年在土耳其发掘出了公元前1700~前1200年的赫梯文字,更证明施莱歇尔所构拟的形式需要修正。

施莱歇尔最早提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语言,他的《印度日耳曼诸语言比较语法纲要》是19世纪60年代对印欧语系最有系统的描述。但是由于掌握材料不够,他的语言类型三分法和印欧语言谱系描写法都不免粗疏,已由后人作了许多修正。

施莱歇尔还著有《立陶宛语手册》(1856~1857),这是立陶宛语的第一本科学描述。

(董光熙)

shisanzhe

十三辙 中国明清以来北方戏曲、曲艺等押韵用的13个韵部。“辙”也叫“辙口”,就是“韵”。“合辙”就是“押韵”,这是用顺辙行车做比喻的通俗说法。

“十三辙”的名称是:①中东,②江阳,③一七,④灰堆,⑤油求,⑥梭坡,⑦人辰,⑧言前,⑨发花,⑩乜斜,⑪怀来,⑫姑苏,⑬遥条。此外还有两道用儿化音节构成的“小辙儿”,“小言前儿”和“小人辰儿”。

由于十三辙是戏剧、曲艺工作者口耳相传的,辙名和它的排列顺序在书面记载上颇有分歧,如“梭坡”也作“索拨”、“油求”也作“由求”、“遥条”也作“么条”、“乜斜”也作“迭雪”等。至于排列顺序,上面所列是常见的一种,口头流传,多有参差。

十三辙只有13个辙名,相当于一般韵书的韵目,但“有目无书”。魏建功《说辙儿》(《国语周刊》103~104期)文中说:“究竟十三道辙是否有目无书?在北平的确没有书。求之于方音中,有些地方是有这种书的。”他举了徐州的《十三韵》,书面题名是《考字奇本》;山东的《增补十五音》,比十三辙多“支、虞”两目;湖北的《字音会集》,分14音,比十三辙多一“诗”目。山东属北方,徐州介南北之间,看来代表北音的十三辙并非全无书本,只是流行不广,以旧京兆(顺天府)为中心,这些书都不算数罢了。1937年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印行了《北平音系十三辙》(张洵如编著,魏建功参校),把按北京音系排列的一部字汇嵌入十三辙的体系之中,这是十三辙有目又有书的开始。1942年在重庆出版、1950年在北京校订印行、1986年天津古籍出版社新版的《北京俗曲百种摘韵》(罗常培著),其下卷称《十三辙字汇》,把100种北京俗曲里所有押韵的字按十三辙列出来,每字归辙,都有例证。这是第一部专为十三辙编写的字书。不过这些俗曲有从吴方言流入的,如《茉莉花》。

明清以来,官话方言区的地方戏,凡属皮黄系统、梆子系统的各剧种,都用十三辙。十三辙的被重视开始于清代中叶昆剧日益衰微、地方戏花部乱弹兴盛之际。其后皮黄戏来北京,发展为京剧,逐渐兴盛。京剧在字的唱念上虽因袭中州韵、湖广音,唱词押韵却自称用十三辙。十三辙在京剧中就取得标准曲韵的资格而沿用至今。十三辙在北方曲艺(如京韵大鼓)中也多被采用。此外各地方剧都自称奉十三辙,但实际上辙数有的不止十三。以越剧为例,实际用了16韵乃至更多的韵。至于辙的内容,即每辙所代表的语音,更多歧异。

《中原音韵》、《五方元音》等书对明清口头演唱的戏曲、曲艺影响如何,目前不能肯定。有人用《中原音韵》作招牌,可是不完全遵用。多年来,戏曲工作者使活语言与十三辙相结合,不依傍任何传统韵书,自然合辙;不按辙口列字写书,仍不妨碍它的使用。

“十三辙”有目无书，因此哪些字归哪辙，不易查考。但从京剧或曲艺的用韵，还能看出一些字所属的辙口。如“通中动重”（《打鼓骂曹》）属中东辙，“祥羊藏殃”（《捉放曹》）属江阳辙，“溪依洗离”（《烧棉山》）属一七辙，“泪悲对随”（《逍遥津》）属灰堆辙，“首头候由”（《打渔杀家》）属油求辙，“祸泼坐说”（《三娘教子》）属梭坡辙，“深林恨分”（《雪杯圆》）属人辰辙，“偏缘先然”（《凤还巢》）属言前辙，“马麻大咱”（《秦琼卖马》）属发花辙，“切业阙歇”（《贺后骂殿》）属乜斜辙，“来奈胎衰”（《天雷报》）属怀来辙，“路湖诉途”（《落马湖》）属姑苏辙，“道瞧高豹”（《南阳关》）属遥条辙。

以上所举都是京剧所用语音符合北京音的例子。但另外有所谓“上口字”，则不取北京音，如“请”字与“人、分”押韵（《空城计》）、“界”字与“怀、宰”押韵（《武家坡》）等等，这是由于京剧源出于皮黄而以湖广音唱念的缘故。如把京剧和梆子相比较，庚青韵在梆子系统并入中东，京剧则并入人辰，那就是两者分别受西北方言和长江流域方言的影响。现代京剧改革以来，“上口字”逐渐被废弃而改用纯粹的京音唱京剧，皮黄的“十三辙”将向北京音系的十三辙转化。

在十三辙发生、发展的过程中，究竟反映了哪些语音情况，要通过戏文、鼓词等大量的通俗文艺作品作统计与

十三辙与北京音系十八韵对照表

十三辙	北京音系十八韵	例字
中东	十七庚(eng, ing, ueng)	登兴翁
	十八东(ong, iong)	公兄
江阳	十六唐(ang, iang, uang)	张央光
一七	五支{-i[ɿ]}	知
	五支{-i[ɿ]}	司
	六儿(er)	而
	十一鱼(ü)	于
	七齐(i)	西
灰堆	八微(ei, uei)	非威
油求	十二侯(ou, iou)	钩休
梭坡	二波(o, uo)	婆郭
	三歌(e[ɤ])	科
人辰	十五痕(en, in, uen, ün)	真新文云
言前	十四寒(an, ian, uan, üan)	山淹官娟
发花	一麻(a, ia, ua)	巴家洼
乜斜	四皆(ê, ie, üe)	欺爷缺
怀来	九开(ai, uai)	该衰
姑苏	十姑(u)	初
遥条	十三豪(ao, iao)	高交

分析。这将有助于一定时间和地区语音演变的考察。十三辙不仅曾为戏曲等押韵服务而有所贡献，也给汉语语音史的研究提供了一部分有用的参考资料。

十三辙是否要继续使用下去，这首先须把十三辙与现代汉语普通话语音的“十八韵”做个比较。列出对照表如左下。

从表中看到：中东辙包括了“庚”、“东”，梭坡辙包括了“波”、“歌”，一七辙竟包括了4个韵“支、儿、鱼、齐”。语音分析和诗歌押韵是两回事，不必成为一对一的关系。审音要细，押韵可宽。因为有的辙字太少，合韵是免不了的。

十三辙这一押韵系统还附有两道小辙儿：

① 小言前儿 是儿化以后，“言前”和“发花”、“怀来”等辙合并成的一个小辙儿。例如：

过年儿——“年”属言前，“年儿”
人家儿——“家”属发花，“家儿”
小孩儿——“孩”属怀来，“孩儿”

属小言前儿

在一般市民的发音里，“街”儿化以后也入这一辙。

② 小人辰儿 是儿化以后，“人辰”和“一七”、“乜斜”、“灰堆”、“姑苏”、“梭坡”等辙合并成的一个小辙儿。例如：

听信儿——“信”属人辰，“信儿”
铁丝儿——“丝”属一七，“丝儿”
树枝儿——“枝”属一七，“枝儿”
小鸡儿——“鸡”属一七，“鸡儿”
唱歌儿——“曲”属一七，“曲儿”
半截儿——“截”属乜斜，“截儿”
来回儿——“回”属灰堆，“回儿”
水珠儿——“珠”属姑苏，“珠儿”
分拨儿——“拨”属梭坡，“拨儿”
唱歌儿——“歌”属梭坡，“歌儿”

属小人辰儿

（“儿”做韵脚，当然也入小人辰儿）

小辙儿在戏剧唱词中很少见，曲艺和民歌中出现较多。因为这里纯用北方话。两道小辙儿的妙用在于把本来不同的辙合为一辙，无论说或唱，都觉得带有俏皮味；而且扩大了辙口，更便于合辙押韵。大辙十三而主要的小辙儿是两道，也就因为这两道小辙儿收的词比较多。

（孙崇义）

Shiyun Huibian

《十韵汇编》 汇集唐、五代各种《切韵》、《刊谬补缺切韵》、《唐韵》写本和刊本共9种（残），外加《广韵》一种（全书），对照排比的韵书总集。各种残本都有简称。例如敦煌发现《切韵》残本第一种简称“切一”。编辑计划最初由刘复拟定。当时材料只有8种所以定名《八韵比》。到1933年，除《广韵》用原书剪贴以外，其余都重新抄写。各种残本按时代早晚在每页从上往下排，《广韵》在最底下。此外还附《广韵·校勘记》，又多加了两种残本，所以定名《十韵汇编》。1935年成书，由北京大学印行。书出来以后，给音韵研究家带来极大的方便。他们一方面用

这些残本校正《广韵》，一方面利用它推求《切韵》和稍先稍后各家韵书的原始情况。到故宫本唐写《刊谬补缺切韵》出来以后，这部书才不像30~40年代那样流行。1983年，周祖谟编的《唐五代韵书集存》出版，尽可能用照像印，避免重抄容易错的毛病，可以说是继承并且改善《十韵汇编》的作品。

(俞敏)

Shizhi Chengj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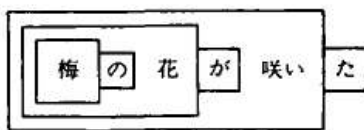
时枝诚记 (Tokieda Motoki 1900~1967)

日本语言学家。1900年12月6日生于东京，卒于1967年10月27日。1925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1943年获博士学位。

时枝在日语语法研究方面独创一格，提出了“语言过程学说”。他把语言看成是人的心理现象，认为“语言是思想的表达或理解。思想的表达过程和理解过程本身就是语言”。时枝的主要著作有《国语学史》(1940)、《国语学原论》(1941)、《国语学原论续篇》(1955)、《日本文法·口语篇》(1950)、《日本文法·文言篇》(1954)、《文章研究序说》(1960)、《现代国语学》(1956)、《国语问题与国语教育》(1949)等。



时枝语法学说的特点是从“语言过程学说”出发，建立自己独特的语法体系。他重视语言主体的作用，提出了“词”(独立词)和“辞”(附属词)的区分。“词”是被表达的事物或事项的客体概念的表现，是与主体相对立的，“辞”则是主体即说话人对被表达事项所持立场的直接表现。“词”和“辞”像套匣似地结合起来构成“句”；“词”是一个“句”包容另一个“句”，最后那个大“句”便构成句子。例如“梅の花が咲いた”(梅花开了)这个句子，可用下图来表示：



时枝把词、句子和文章都当作语法研究的对象，认为这三者都是思想的表达，各自成为一个统一体。这个“语言过程学说”和基于这个学说的“词”与“辞”的区分、套匣式构造等一系列独到的见解，扩大了语言研究的领域，推动了日语语法学的发展，在日本语法学界具有广泛的影响。

(徐昌华)

shiyán yuǎnxué

实验语音学 (experimental phonetics) 早期又名仪器语音学(instrumental phonetics)，是用各种实验仪器来研究、分析语音的一门学科。传统的语言学家多凭口耳来摹仿语音并依靠音标对语音进行描写。近

代有了能研究言语生理状况的医学器械，以及能测量、分析言语声的物理仪器，人们把它们应用到语音研究上，揭示出许多前所未有的语音现象。这些现象又反过来丰富、修正了传统语音学的若干解释和理论，这样就不只限于语音学的实验手段了，而形成了一门“实验语音学”。

研究范围 实验语音学主要的研究范围一般分为3方面。①人的发音机制，包括指挥语言的神经系统、肌肉活动、声带和声腔的发音动作，属于“发音语音学”(或“生理语音学”)。②语音发出后在空气中传播的物理特性，包括语音的四要素：音色、音高、音强、音长，属于“声学语音学”。③语音传入听话人的听官，造成听觉，又通过神经系统来理解等过程，属于“听觉语音学”(或“心理语音学”、“感知语音学”)。这一系列的语音产生过程构成一整套“言语链环”。每一环节视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应用各种领域的实验仪器，其关系大致如下面的示意图。

研究言语链环的实验方法示意图

言语链环	实验仪器/研究范围	分支语音学
中枢神经系统 a 内在程序 b 学知程序 电化的变化	语言学 神经解剖学	发音语音学
肌肉收缩作用	肌电实验	
气流启动	呼吸计 声门下气压实验 气流测试	
发声	喉镜装置 音高计	
调音	X光照相 腭位纪录 咽、鼻、口气压测验 气压计	声学语音学
空气扰动	声图仪 示波器 音高计	
	音强计 声级计	
听觉	心理声学 听力学	听觉语音学
感知	言语感知 语言学	

研究言语链环的实验方法示意图

言语的行为起源于人脑，人脑的语言功能是一般动物所没有的，即使高级动物如黑猩猩，也远不如人类。如图所示，人脑送出语言信息，通过神经达到言语机制的肌肉。神经脉冲使肌肉收缩，从而使发音器官的形状发生变化。前者可用肌电仪器，后者可用X光照相、腭位照相等方法来研究。说话时的呼吸、发声(噪音)和声腔调制所用仪器又各有不同，前者主要用气压、气流等测量仪器，后者则用X光和声谱等仪器。语言通过空气的传播由口到耳，使耳鼓膜振动而转成神经脉冲达到脑中，起了感知作用。同时声音也反馈到说话人自己的脑中，而起控制作用。

言语信息的形成和表达是连续性的,但实验手段的实施是离散的,例如把一个音节的舌位动程分为若干部分、把一串语音流分成若干段来研究,这期间有动与静的关系。实验语音学的手段,既要进行静的采样,也要观测动的规律。

发展概况 实验语音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4个阶段:

①前期:20世纪初到30年代前。早年的语言学家分析语音只能依靠音标来描写所要研究的语音,后来借用了医疗器械如浪纹计、假腭、喉镜等简单工具来分析发音动作和语音特性。

②中期:30~40年代。这期间语言学界应用实验方法研究语音,已有了一定成果。X光照相、腭位照相等对言语生理的研究有了帮助。在这以前的语音实验都还局限于用仪器研究语音,还未形成一门专业学科。

③近期:50~60年代。这期间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军事通信的需要,促进了言语声学的发展和实验仪器的改进。声谱仪已逐渐普遍应用于语音研究,由动态声谱仪(语图仪)作出的言语声谱模式已被公认,成为一种“视识语”(即“可见语言”)。由于语音的特性逐渐被揭示,归纳出许多语音规律,又上升到理论(如区别特征理论),从而丰富、订正了语音学本身。此外,生理实验也从静态分析提高到动态分析,应用的实验仪器如X光电影照相、动态腭位记录装置、频闪声带照相、肌电测试仪器等。录音器材有了磁带录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和仿真度。不同的语音人工合成和识别系统也由实验阶段而达到应用水平,实验语音学就在这一阶段建立了。

④现代:70年代到现在。电子计算机已普遍应用于语音分析。在这期间,语音研究已从过去的音素、音节分析扩展到成句成章的分析。除音色之外,超音段特征(包括音高、音强和音长)成为重要研究对象。言语的规则合成和识别的方案是计算机的常备项目。综合这些研究项目,配合新兴的人工智能、言语理解等需要,达到实验语音学的高级水平。同时,越来越多的经验证明,从事语音实验如只研究孤立的语音,而不综合语言学的知识,则对言语信息处理上将无法提高效能。因此实验语音学的研究离不开语言学的指导。

早期的实验语音学家首推美国的E. W. 斯克里普契尔,1906年他出版了《实验语音学研究》,同时还有J. P. 卢赛洛,1908年出版了《实验语音学原理》。两书提供了大量的生理实验方法和成果,是现代实验语音学的启蒙著作。50年代开始了言语声学的发展。美国的贝尔电话公司实验室、哈斯金斯研究组,瑞典的皇家理工学院言语通信系,英国的爱丁堡大学语音系都做了很多工作,为后来的实验语音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美国的H. 弗莱彻、J. L. 弗拉纳根、P. 拉德福格德、英国的D. B. 弗赖、瑞典的C. G. M. 方特等人。特别是美国的M. 朱斯是较早应用声谱仪来分析语音的一位语言学家。

中国的语言学家早在30年代就用实验方法分析汉语语音。有刘复的《四声实验录》(1924),王力的《博白方音实验录》(1931)。他们在法国学习语音学,用浪纹计做汉语声调的实验。当时他们在国内首先阐明了声调就是音高频率的变化关系。赵元任在30年代以后做了吴方言及广东、湖北、湖南等地的方言调查,罗常培调查了厦门及其他方音,都是用当时的唱片灌音和用浪纹计、渐变音高计等工具记录和分析语音。刘复创制了声调推断尺,是国内的第一种语音实验仪器。赵元任在南京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建立了具有国际水平的语音实验室,罗常培在北京大学创立了“语音乐律实验室”,这些都拥有完备的灌音设备和各种型式的浪纹计,以及从国外获得的一些生理实验仪器等。他们还与中央研究院的物理研究所合作,创制电子管的音调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继续开展语音实验工作。50年代中期建立了语音实验室,引进并自制实验仪器。这个室配合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历年来发表了许多关于普通话的生理和声学分析的论著,培养了新生力量。同时,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也开展了语音实验,作了许多语音分析、合成与识别的工作。另外,南京大学物理系也在声学语音学的教学研究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70年代后,国内有些大学为了配合语音教学,多在中文系成立语音实验室,如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等。一切有关言语通信工程的机构也从事语音实验。

应用领域 实验语音学发源于语言学的语音学,中途分家,最后又与语言学合并而成为现代语言学的组成部分。它的应用领域,可以说凡是与人类语言有关的学科,都有实验语音学的内容。简单举几个例:

在语音教学方面,如用生理实验演示发音部位,用声学实验演示发音方法和超音段特征,并在教学中使学者能亲自验证。又如根据实验成果可对双语者的语音训练起提高质量和加速进度的指导性作用等。

在言语处理方面,如分析出语音的主要信息参量,判断什么是必要的“载信单元”,什么是“冗余度”,找出语音在连续语言中的变量和恒量的规律,为通信传输、电声系统、合成识别、语音控制、特殊环境通话等一切言语工程提供可靠数据,并提高质量和经济效益等。

在言语矫治方面,如研究言语缺陷患者的发音机制及语音,指导矫治方案。为研制聋哑人的助听、助话等器具提供科学数据,分析脑部、喉肌等微电流帮助失语患者康复治疗等。

在语言学研究方面,如言语活动和语言控制的测验,音位系统的订定,语法结构与语音关系的分析,人类语言起源的探索,历史音变及横向干扰的研究等。

见生理语音学、声学语音学、感知语音学、言语病理学、言语识别、言语合成。

参考书目

C. Painter, *An Introduction to Instrumental Phonetics*.

University Park Press, Baltimore, 1979.

N. J. Lass, *Contemporary Issues in Experimental Phonetics*, Academic Press, New York, 1976.

(吴宗济)

Shijieyu

世界语 (Esperanto) 一种国际辅助语。由波兰医生 L. L. 柴门霍夫(1859~1917)创制。柴门霍夫是犹太人,生于俄国统治下的波兰,深感民族压迫之苦。他认为民族间的仇恨是由于互相了解不够,立志创造一种各民族之间的通用语,以增进了解。中学毕业时他已完成一种国际语方案,但父亲命他到外地学医,并在他离家后烧了他的国际语手稿。可是他毅然重新设计,终于在 1887 年以 Esperanto (怀着希望的人)的笔名发表了他的国际语新方案。以后人们即以 Esperanto 为语言名。1905 年举行了第一次国际世界语大会,确定柴门霍夫所著《世界语的基础》一书为该语言的准则,世界语因而能维持其统一性和稳定性,成为功能健全的语言。许多世界名著已译成世界语;柴门霍夫本人翻译了《圣经·旧约》和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等书;也出现了一大批直接用世界语写成的作品。现在全世界懂得世界语的人数超过 1000 万。

世界语的基础语法有 16 条规则。名词、形容词和动词的原形以及派生副词都有固定的词尾:名词为 -o,形容词为 -a,派生副词为 -e,动词(不定式)为 -i。人称代词加 -a 即成物主代词,基数词加 -a 即成序数词。名词和形容词都有单数、复数和主格、宾格之分,并有一致的词尾:复数加 -j,宾格加 -n。限定动词的直陈式词尾为现在时 -as,过去时 -is,将来时 -os;虚拟式词尾为 -us;祈使式词尾为 -u。分词共有 6 个形式。没有不规则动词。没有性的范畴。冠词只有一个不变化的形式 la。限定词、关系代词、关系副词和连接副词以及疑问代词和疑问副词等等自成一个互相关联而有规则的体系。数词的构成很合理,如“10”是 dek,“20”是 dudek,“12”是 dek du,“22”是 dudek du。世界语汲取了斯拉夫语言的某些句法特点,例如不用形式主语。词序在世界语句法中不起决定作用。

世界语广泛运用转化、合成、派生等构词手段,词缀都能自由构词。初创时确定的 900 多个词素,大部分取自罗曼语族,一部分取自日耳曼语族,少数取自斯拉夫语族,有些系人工构拟。在此基础上已建立了一个可观的词库,但并不造成学习上的重大负担。例如用词根 san- 和别的词素配合就得到下列各词: sana (健康的), sano (健康), sane (健康地), malsana (有病的), malsanulejo (病院), resanigi (医治), resaniĝi (康复), resanigejo (疗养院), kormalsano (心脏病)。每个世界语学者都有平等的权利按基础语法自由地创造所需要的词语和引进国际通用词,但无权修改基础语法。

世界语的读音和拼写是完全有规则的,做到了“一音一符”、“一符一音”。世界语共有 28 个音位,相应地用 28 个字母表示, a/a/, b/b/, c/ts/, ĉ/ĉ/, d/d/, e/e/, f/f/, g/g/, ĝ/ĝ/,

世界语字母发音表

世界语		国际音标	世界语		国际音标
大写	小写		大写	小写	
A	a	[a:]	K	k	[k]
B	b	[b]	L	l	[l]
C	c	[ts]	M	m	[m]
Ĉ	ĉ	[tʃ]	N	n	[n]
D	d	[d]	O	o	[ɔ:]
E	e	[e]	P	p	[p]
F	f	[f]	R	r	[r]
G	g	[g]	S	s	[s]
Ĝ	ĝ	[dʒ]	Ŝ	ŝ	[ʃ]
H	h	[h]	T	t	[t]
Ĥ	ĥ	[x]	U	u	[u:]
I	i	[i:]	Ŭ	ŭ	[u]
J	j	[j]	V	v	[v]
Ĵ	ĵ	[ʒ]	Z	z	[z]

h/h/, ĥ/x/, i/i/, ĵ/j/, ĵ/ʒ/, k/k/, l/l/, m/m/, n/n/, o/o/, p/p/, r/r/, s/s/, ŝ/ʃ/, t/t/, u/u/, ŭ/w/, v/v/, z/z。单词重音永远落在倒数第二个音节上。

世界语在 1906 年前后传入中国。蔡元培、钱玄同、鲁迅、胡愈之等都是世界语的积极提倡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世界语事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已出版专刊《El Popola Ĉinio》,办起了世界语广播。1986 年(世界语 99 周年)的国际世界语大会在北京举行。

世界语不是任何民族的本族语,它的传播取决于各个民族的自愿。它的进一步发展有待于各国世界语学者的共同努力。(参见彩图插页第 55、56 页)

(周流溪)

shijie zhuyuyan

世界诸语言 (languages of the world)

概况 关于世界上的语种数目,几十年来学者们曾做过不懈的调查和统计,以期得到比较确切的数字,但仍有争议。首先,语言本身在由一代人传给另一代人的过程中有变化,到一定阶段会形成若干方言,而方言的不断变化最终会产生新的语言;另一方面,已有的语言又可能由于社会和其他原因逐渐消亡。此外,由于不同学者使用的标准不同,语言和方言之间往往很难划出明确的界线。

划分语言的标准有几种。一般说,当语言变体发展到交谈双方不能互通的时候,它们就成为各自独立的语言。但这一标准也有例外。挪威人、瑞典人和丹麦人彼此用各自的语言交谈,能够互通,但人们通常把他们的语言看作是 3 种不同的语言;另一方面,阿拉伯语各方言之间差别很大,摩洛哥地区通行的阿拉伯语方言跟巴勒斯坦

坦地区通行的方言,其差别之大,犹如西班牙语之于法语,但人们并不把阿拉伯语诸方言分别看作独立的语言。另一种标准是看使用某一语言的社团是否有独立的文化。根据这一标准,人们一般认为荷兰本土的荷兰语和南非的阿非利堪斯语是两种独立的语言,尽管这两种语言可以互通;而荷兰语和比利时的弗拉芒语虽然在两个不同的政治实体中使用,却常被某些学者看作是一种语言。除此之外,还有语言-社会的和语言-民族的标准。但是,不同语言学家在具体运用这些标准的时候,往往具有较强的主观色彩和各自不同的侧重面,所以,到底算是一种还是几种语言,在许多情况下往往是由历史和习惯决定的,其原因十分复杂,试图单靠现有的语言标准去做出判断和解释,很难做到准确可靠。

由于语言与方言之间不易界说清楚,学者们在统计世界诸语言时,所得的数字往往出入很大。此外,非洲、美洲、澳大利亚等地本土人民所说的语言,学者们对它们的了解还非常有限,要弄明白确数当然就更加困难。而正是在这些地区,语言的数量相当大。因此有些语言学家主张,在目前情况下,对世界语言的数目只能作出某些近似的估计,一种估计是 2 500~5 000 种,还有一种估计是 4 000~8 000 种。

就使用人数来说,世界诸语言很不平衡,少数语言有可观的使用人数,而大多数语言使用人数则很少。有的印第安语少到只有几十个人,甚至几个人。个别语言,由于使用它的最后一个人死去,这种语言也随之消亡。如 1898 年,随着南斯拉夫克尔克岛上说达尔马提亚语的最后一人死去,这种语言也就不复存在了。全世界有 10 种语言的使用者加在一起,超过世界总人口的半数,它们是:汉语、英语、俄语、西班牙语、印地语、阿拉伯语、日语、德语、葡萄牙语、乌尔都语。另外,世界上几千种语言中,按使用人数排在最前面的 100 种语言,其总人数占世界人口 90% 以上;但又有 1 000 多种语言,其使用者加在一起还不到世界人口的 1%。这是世界诸语言使用情况的一个重要特点。世界语言的地理分布也很不平衡,大多数语言只在很有限的区域内起传递信息的作用,而少数语言却在十分广阔的区域通行,如英语、西班牙语。就语系分布而言,情况更是如此。印欧语系的语言,无论从使用人数还是从分布区域看,均堪称世界最大的语系,而北美有的印第安语的语系少到只包括几种语言,如爱斯基摩-阿留申语系实际只包括两种语言,使用人数也很少。

分类 一般地讲,世界诸语言有 3 种分类法:①类型分类法,②区域分类法(或称地理分类法),③谱系分类法(或称发生学分类法)。

这 3 种分类法的理论基础各不相同,因而根据这些方法划分语言类别,往往互有交叉。

类型分类法 传统的类型分类法主要根据词的形态结构(不是根据亲属关系)来划分语言。这是一种纯粹的共时分类法,它按照结构的同形特点,把语言划分为若干

类型,既不考虑它们的历史来源,也不考虑它们过去和现在的地理分布。根据语言的形态标准,一般分作 3 大类:①分析型语言(即国外学者所说的孤立语)。其特点是词基本上无专门表示语法意义的附加成分,形态变化很少,语法关系靠词序和虚词来表示。大多数分析型语言都是单音节的,其中许多语言有几个声调。汉藏语系的语言多是分析型语言,非洲的一些语言也是分析型语言。②粘着型语言。其特点是词内有专门表示语法意义的附加成分,一个附加成分表达一种语法意义,一种语法意义也基本上由一个附加成分来表达;词根或词干跟附加成分的结合不紧密。属于粘着型语言的有:古代的苏默语(已消亡)、乌拉尔、阿尔泰、高加索、达罗毗荼等语系的许多语言,以及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另一些语言如日语、朝鲜语、巴布亚诸语言等。欧洲的巴斯克语、非洲的斯瓦希里语、班图诸语言、美洲本土的语言等,也都属粘着型语言。英语的某些复合词具有粘着型语言的特点。有些学者认为,粘着型语言是介于分析型语言和屈折型语言之间的语言。③屈折型语言。其特点是用词形表示语法关系(一个格式往往可以表示几种语法意义)。词根或词干跟附加意义结合很紧密,往往不易截然分开;有的甚至用内部屈折来表达语法意义。屈折型语言的数量比粘着型语言的数量要少得多,但它包括两个重要语系——印欧语系和阿非罗-亚细亚(闪-含)语系的语言,如梵语、希腊语、拉丁语、阿拉伯语、希伯来语,以及欧洲的许多近代语言,如俄语等。

有些语言学家建议除以上三类语言外,再加一类“多式综合语”(中国有些学者也称“编插语”)。其特点是把主语、宾语和其他语法项结合到动词词干上,以构成一个单独的词,但表达一个句子的意思。属这类语言的如爱斯基摩-阿留申诸语言等。

晚近的形态分类法则是根据句子的基本成分——主语(S)、动词(V)和宾语(O)——在简单陈述句中的位置来划分语言。这样可以把世界诸语言划分为 3 个主要的类型:SVO 型(主—动—宾)、VSO 型(动—主—宾)和 SOV 型(主—宾—动)。句法系统在这里受各语言间的共性成分的影响。类型分类历来不及谱系分类用得广泛,主要是因为传统的类型分类仅着眼于语言的表面特征,使得许多情况无法界说清楚。通过考察语言的底层结构来确定那些对语言结构起支配作用的共性成分,是今天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由于这样的共性成分是可以认识的,因而有可能改变我们对类型分类可靠性和实用性的认识。

区域分类法 区域分类法是按地区划分语言的一种方法,它的主要依据是:由于地理上相邻,一些语言在长期的聚合过程中会获得某些共同的特征。一个地区的语言,往往会受到该地区具有文化优势的语言的影响,这些语言之间也会产生相互影响,从而在语音、词汇、语法上具有较多的一致性。这种方法使语言有可能取得较大的分类,不致过于繁琐。在某些地区的语言事实和语言亲属关系不够清楚的情况下,人们常把区域分类法和谱系

世界诸语言分类表

语系及分布地区	语族	语支	所属语言	备 注
汉藏语系(又称藏汉语系或印支语系) 主要分布于亚洲各国,特别是中国,此外,还有泰国、缅甸、越南、老挝、尼泊尔、锡金、尼泊尔、印度等国	汉		汉语(包括七大方言:官话方言、吴方言、赣方言、粤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湘方言)	关于汉藏语系的组成,历来有很多分歧意见,至今仍无一致的观点。中国许多学者通常把汉藏语系分作汉、藏、苗瑶、壮侗(侗台)四个语族,但国内外另一些学者认为,若把壮侗语族改为侗台语族,则该语族将具有更大的概括性,因为台语可以包括中国境外属于该语族的若干语言如泰语、老挝语等。关于藏缅语族的组成,也存在不同意见。汉藏语系的研究不及印欧语系的研究那样全面深入(个别语言除外),在语言识别和分类方面都还有不少问题尚待进一步探索。近年来还有人提出新的主张,比如有人对壮侗语族、苗瑶语族跟汉藏语系的关系提出了疑问,认为这两个语族应该是澳泰大语群的组成部分。关于这些问题的争论,还在继续进行。这里的分类,主要根据中国国内的通常做法,并适当参照近年来国外的一些新的研究成果
	藏	藏	藏语、嘉戎语、门巴语等	
		景颇	景颇语(分布于缅甸的景颇语又称克钦语)等	
		彝	彝语、傈僳语、哈尼语、拉祜语、纳西语等	
	藏缅	缅	缅甸语、库启-钦语、载瓦语、阿昌语等	
		未定	羌语、普米语、洛巴语、僜语、独龙语、怒语、土家语、白语等	
	苗瑶	苗	苗语、布努语等	
		瑶	勉语	
		未定	畲语	
	壮侗(侗台)	侗水	侗语、水语、仡佬语、毛南语、拉珈语等	
		壮傣(又称台)	壮语、布依语、泰语、傣语、老挝语、掸语、佤语、土语等	
		黎	黎语	
		仡佬	仡佬语	
印欧语系(有些学者——主要是德国的语言学家——有时称作印度-日耳曼语系,另一个名称雅利安语系已不常用) 就使用人数和分布区域而言,印欧语系是世界上最大的语系,分布于欧洲、南北美洲、亚洲南部和西部、非洲南部、澳大利亚、新西兰等	日耳曼	西支	英语、德语、荷兰语、弗拉芒语、依地语、卢森堡语、弗里西亚语、阿非利堪斯语等	依地语和卢森堡语都是在德语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北支	瑞典语、丹麦语、挪威语、冰岛语等	
		东支	哥特语	一千多年前已消亡
	罗曼(又称意大利克语族或拉丁语族)	西支	拉丁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卡塔兰语(又称加泰隆语)等	罗曼语族诸语言都是从拉丁语分化出来的,因此可以说拉丁语是罗曼诸语言的母语。罗曼语族除西支和东支的语言外,还包括几种克里奥耳化语言,如帕皮亚门托语、克里奥耳法语等
		东支	罗马尼亚语、摩尔达维亚语	
	凯尔特	北支	爱尔兰语、苏格兰盖尔语等	统称盖德尔诸语言
		南支	威尔士语、布列塔尼语等	统称不列颠诸语言
	波罗的		立陶宛语、拉脱维亚语(又称莱蒂语)等	
	斯拉夫	东支	俄语、乌克兰语、白俄罗斯语等	有的学者主张把波罗的语族和斯拉夫语族合并,构成波罗的-斯拉夫语族
		西支	波兰语、捷克语、斯洛伐克语等	
		南支	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斯洛文尼亚语、马其顿语、保加利亚语等	
	印度-伊朗	印度(又称东支,或称印度-雅利安语支)	梵语、巴利语、印地语、乌尔都语、孟加拉语、旁遮普语、马拉提语、古吉拉特语、比哈尔语、奥里亚语、拉贾斯坦语、尼泊尔语、阿萨姆语、克什米尔语、帕哈里语、信德语、梅瓦尔语、僧伽罗语、吉普赛语等	印度语支的近代语言都是从古梵语衍生出来的,但已发生了相当多不同于梵语的变化
		伊朗(又称西支)	波斯语、普什图语、俾路支语、塔吉克语、库尔德语、奥塞梯语等	
	希腊		希腊语	

续表

语系及分布地区	语 族	语 支	所 属 语 言	备 注
	阿尔巴尼亚		阿尔巴尼亚语	均已消亡
	亚美尼亚		亚美尼亚语	
	安纳托利亚		赫梯语、卢维亚语	
	吐火罗语		分为焉耆方言和龟兹方言	
高加索语系 大部分高加索语 言分布于黑海 和里海之间 的高加索山区, 小部分分布于 伊朗和土耳其	南部		格鲁吉亚语等	高加索地区面积不大,但语言纷繁,差别很大,有时甚至村与村之间的语言都不能互通。高加索地区素有“语言之山”之称。高加索诸语言中,格鲁吉亚语的使用者多于其他语言使用者的总数
	北部	西北支	卡巴尔达语等	
		东北支	车臣语、印古什语、阿瓦尔语、莱兹金语等	
乌拉尔语系 分布于从斯堪的 纳维亚往东直 达亚洲西北部 的广阔地带	芬兰-乌戈尔		芬兰语、匈牙利语、爱沙尼亚语、拉普语、莫尔多维亚语、马里语、沃恰克语、科米语等	有的学者常把乌拉尔语系跟阿尔泰语系联系在一起,因为这两个语系的语言有若干共同的形态特征。但多数人认为这些共同特征并不反映同源关系,而仅仅是没有亲属关系的语言间相互影响的结果
	萨莫耶德		涅涅茨语、塞尔库普语等	
阿尔泰语系 分布于西起土其 其,经苏联的 中亚地区,直 达蒙古及中 国,东迄太平 洋的广阔地带	突厥		土耳其语、阿塞拜疆语、土库曼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又称柯尔克孜语)、鞑靼语(又称塔塔尔语)、巴什基尔语、乌兹别克语、维吾尔语、哈卡斯语、楚瓦什语等	阿尔泰语系的组成一直有争议。近年来,不断有学者提出朝鲜语和日语与阿尔泰语言有远亲关系,并进行了大量比较,证明他们之间的相似点不是借用所致,而是有同源关系。根据这种理论,他们把阿尔泰语系分为西部语族和东部语族,把朝鲜语和日语包括在东部语族内。但也有不少学者反对这种观点。目前争论还在继续
	蒙古		蒙古语、布利亚特语、卡尔梅克语等	
	满-通古斯 (又称通古斯)		满语、埃文基语、锡伯语等	
古西伯利亚诸语言 (有时又称为极北诸语言) 分布于西伯利亚 东北角			楚克奇语等	古西伯利亚诸语言只是一种地理概念上的分类,并不构成传统意义上的语系,因为它们没有共同的来源。语言学家常把它们归并在一起,只是一种习惯做法。包括3组彼此没有亲属关系的语言和一种独立的语言。苏联学者把爱斯基摩-阿留申诸语言也包括在这个语系之内,但美国学者持异议
达罗毗荼(又称 德拉维达)语 系 大部分达罗毗荼 语言分布于印 度南部和中 部,少部分分 布于东部,个 别语言分布于 巴基斯坦	北部		库鲁克语(又称奥拉昂语)、布拉会语(唯一分布于境外的语言)、马尔托语等	达罗毗荼诸语言与其他印度语言之间虽有若干共同特征,但却没有同源关系,这些共同特征通常被看作相互影响的结果
	中部		泰卢固语、贡迪语等	
	南部		泰米尔语、坎纳达语、马拉雅拉姆语、图卢语等	
南亚(又称澳斯特 罗-亚细亚) 语系 主要分布于亚洲 东南角(越南、 老挝、柬埔寨), 但也散见于泰 国、缅甸、印 度中部、东北 部一些沿海岛 屿,以及马来 西亚和尼科巴 群岛	孟-高棉		越南语、高棉(柬埔寨)语、孟语、德昂(原称崩龙)语、克木语、帕科语、奇劳语、比尔语、佤语、布朗语等	关于南亚语系的组成,还有一些分歧意见。美国语言学家 C. F. 沃格林和 F. M. 沃格林把南亚诸语言看成一个松散的“大语群”
	马六甲		塞芒语、萨凯语、雅昆语等	
	蒙(打)达		桑塔利语、蒙达里语、库尔库语、喀里亚语等	
	尼科巴		包括近10种使用人数很少的语言,如卡尔语、乔拉语、特雷萨语等	

语系及分布地区	语 族	语 支	所 属 语 言	备 注
南岛语系(又称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 分布于从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到南美的复活节岛、北起夏威夷、南至新西兰的广大地区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语、马来语、爪哇语、巽他语、马都拉语、他加禄语、米沙耶(又称比萨扬)语、马达加斯加语、高山族语言、布金语等	近年来,国外有的学者把马来-波利尼西亚诸语言看作是南岛语系的一个语族,该语族包括南岛语系的绝大多数语言
	密克罗尼西亚		昌莫罗语、特鲁克语、马绍尔语等	
	美拉尼西亚		斐济语等	
	波利尼西亚		毛利语、萨摩亚语、汤加语、塔希提语、夏威夷语等	
阿非罗-亚细亚语系(又称闪-含语系) 分布于从阿拉伯半岛通过北非到毛里塔尼亚,往北远及高加索山区,往南直达赤道的大片地区	闪		阿拉伯语、希伯来语、阿姆哈拉语、提格雷语、提格里尼亚语、马耳他语、古叙利亚语、阿拉米语、古拉格语、哈拉里语、吉兹语等	近年来,国外一些语言学家主张用阿非罗-亚细亚语系来取代旧称闪-含语系。理由是闪-含并列容易使人感到闪和含各构成一个独立的语族,然而含语言实际上并不构成一个与闪语族相对应的独立语族。此外,旧称还含有种族分类的含义。尽管如此,有的学者今天仍沿用旧称。又有些学者认为,应在库施特语族中再划分出一个奥莫特语族,以构成与其他几个语族并列的独立语族,但其他一些学者则主张把奥莫特诸语言看作是库施特语族中的一支
	柏柏尔		什卢赫语、塔马齐格特语、卡布来语、图阿列格语(塔马舍克语)、瑞非安语、沙维亚语等	
	乍得		豪萨语等	
	库施特		索马里语、盖拉语、锡达莫语、贝贾语、阿法尔语、萨霍语等	
	埃及-科普特		科普特语(现仅用于礼拜仪式)	
尼日尔-科尔多凡语系 分布于从塞内加尔到肯尼亚、往南直达好望角的大片非洲土地	科尔多凡		包括苏丹努巴山区几种使用人数很少的语言	科尔多凡语族是一个非常小的语族,仅包括分布于苏丹科尔多凡省努巴山区的少数几种语言,而尼日尔-刚果语族则是一个非常大的语族,因而有的学者不用尼日尔-科尔多凡语系的名称,而用尼日尔-刚果语系来包括这两个语族
	尼日尔-刚果	贝努埃-刚果	斯瓦希里语、卢旺达语、隆迪语、索托语、卢巴语、科萨语、绍纳语、祖鲁语、刚果语、卢干达语、林加拉语、吉库犹语、芳语、别姆巴语、茨瓦纳语、斯威士语、尼昂加语等	
		曼迪	班巴拉语、马林凯语、门得语、克培列语等	
		古尔(又称沃尔特)	莫西语、古尔马语、达戈姆巴语等	
		西大西洋	弗拉尼语、沃洛夫语、泰姆奈语等	
		阿达马瓦-东部	桑戈语等	
		库阿	约鲁巴语、伊博语、特威语、埃维语、丰语、比尼语等	
尼罗-撒哈拉语系 分布于非洲东部和中部偏东地区	沙里-尼罗		卢奥语、努埃尔语、马萨依语、萨拉语、努比亚语等	
	撒哈拉		卡努里语等	
	马巴		包括一些使用人数很少的语言	
	科马		包括一些使用人数很少的语言	
	富尔		富尔语	
	桑海		桑海语	

续表

语系及分布地区	语 族	语 支	所 属 语 言	备 注
科依桑语系 分布于南部非洲	北部		奥恩语等	由于班图诸语言不断往南发展,今天科依桑诸语言只在卡拉哈里沙漠附近人烟稀少的地区使用;分布于坦桑尼亚的哈扎语和桑达韦语跟科依桑诸语言只有远亲关系
	中部		霍屯督语、布须曼语等	
	南部		包括一些使用人数很少的语言	
	哈扎		哈扎语	
	桑达韦		桑达韦语	
爱斯基摩-阿留申语系			爱斯基摩语诸方言、阿留申语等	
纳-德内语系			那伐鹤语等	
大阿尔冈基亚语系			克里语、奥杰布华语、布莱克福特语、夏延语、乔克托语等	
萨利什语系			包括一些使用人数很少的语言,其中有一些正濒于消亡	
瓦卡什语系			包括一些使用人数很少的语言	
大苏语语系			达科他语、温尼贝戈语、克劳语、切罗基语、莫霍克语等	
佩努蒂亚语系			玛雅语、基切语、玛姆语、凯克奇语、卡克奇克语、阿劳堪尼亚语等	分布于北美、中美和南美。美洲印第安语的其他几个语系都没有这种情况。因此有的语言学家主张把该语系在南美的几种语言划归南美的安第斯赤道语系
霍坎语系			特拉帕内克语等	
阿兹台克-塔诺安语系			阿兹台克语、塔拉胡马尔语、皮马语、雅基语、肖肖尼语等	
奥托-曼格安语系			奥托米语、萨波特克语、米斯特克语、马萨特克语、马萨瓦语等	
大奇布钱语系			库纳语、瓜伊米语等	
吉-帕诺-加勒比语系			加勒比语等	包括一些使用人数很少的语言,分布区域很广,从小安的列斯群岛到阿根廷南部,并从太平洋横跨南美大陆直达大西洋
安第斯赤道语系			凯楚亚语、艾马拉语、阿拉瓦克语、图皮语、瓜拉尼语等	安第斯赤道语系中的瓜拉尼语是印第安语中唯一拥有教育和行政管理双重功能的语言

分类法结合起来使用,有些学者对美洲印第安语和巴布亚等地的语言就是采取这种做法。

这里一个相关的重要问题是语言联盟(又称“语言区域”)问题,近年来它日益受到语言学家的广泛关注。所谓语言联盟,是指同一地区或毗邻地区通行的数种没有亲属关系的语言,由于长期接触,互相影响而获得语法、语音等方面的许多相似或共同特征。这种现象在19世纪还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不少人认为两种语言的形态只能是相互排斥,不可能混合,即便有也是一种畸形现象。包括A.梅耶在内的一些著名学者都持有这种观点。但是最近几十年来,一些语言学家的研究结果已经推翻了这种看法。事实证明,音位和形态系统的相互渗透并无界限可言。语言学家已经描写了许多具有混合体系(语音体系和形态-句法体系)的语言,证明语言渗

透所引起的语言联盟,是世界上几乎所有地区都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例如巴尔干语言联盟,所涉及的语言有现代希腊语、阿尔巴尼亚语、罗马尼亚语、保加利亚语,以及部分涉及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和土耳其语。虽然除土耳其语外,其他语言均属印欧语系,但大多不属同一语族(希腊语和阿尔巴尼亚语各构成一个独立的语族,罗马尼亚语属罗曼语族,保加利亚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属斯拉夫语族)。它们中除个别语言之间共同特点较多外,大部分语言并无密切的关系。但是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接触中,由于拜占庭文化在这个地区显示出的较强凝聚力和各语言间的相互影响、渗透,上述语言获得了被世人称为“巴尔干语言特点”的许多共同特征。这不仅表现在词汇平面上,也表现在音位和形态-句法平面上。今天,巴尔干半岛语言联盟所包括的地区,还有进一步扩大

的趋势。类似的例子还有印度次大陆、南非等地的语言联盟。对这种现象的进一步研究,无疑会给语言分类提出许多新的课题、展示新的前景。

谱系分类法 谱系分类法是近代用得最广泛的一种分类法。它主要根据某一共同母语在分化过程中保留下来的共同特征(语音、词汇、语法方面的共同成分)来划分语言。谱系分类和区域分类,都具有明显的历时性。在19世纪以前的好几百年中,《圣经》关于人种分布的传说对语言分类的研究产生过影响。1786年,英国学者W.琼斯比较了梵语、希腊语、拉丁语的某些共同特点之后,发现了其间的对应规律,于是提出印欧诸语言同属一系的理论。此后,历史比较语言学兴起,学者们用这种方法又研究了许多别系的语言。某些学者在谱系分类的基础上,企图重建“人类最初共同语言形式”(有的学者称作化石语言),以此来证明世界诸语言同出一源的假说。这种构造拟建立在层层假设之上,多半是无法验证的。受到学者重视的是有文献可据和推断周密的谱系分类,即历史比较语言学。

关于谱系分类的层次和术语,各国学者不尽统一,一般区分为语系、语族、语支等。语系是有共同来源的诸语言的总称,语系之下可根据语言的亲疏程度再细分为语族、语支。越往下,其成员的亲属关系越密切。德国语言学家A.施莱歇尔把这种关系概括为谱系树模型,即把同一语系的语言间的关系比喻为一棵树的形状,由根部和主干(语系)分出若干枝杈(语族和语支)。他把自己对语言类别的描述比作达尔文对生物进化类别的描述。德国的另一位语言学家J.施密特则提出了印欧语言传播的“波浪理论”(又称“波浪说”),以取代施莱歇尔的“谱系树”之说。施密特认为,原始印欧语由许多方言组成,其中新的语言成分从中心区向四周作波浪式传播。印欧诸语言由一系列共同语言特征联结在一起,这些语言之间并无明确的界限,是逐渐地,不明显地从一种语言过渡到另一种语言。他的理论对印欧语研究产生过较大影响。现在世界上许多地区的“语言联盟”现象是“波浪理论”的一个很好的印证。

对于亲属关系没有太多实证的语言,特别是像美洲和巴布亚等地那些调查还不够详尽的语言,近年来有些语言学家倾向于把它们划归在某一个联系比较松散的大语群中。由于使用的术语很不统一,或者术语相同,而内涵并不相同,世界诸语言的语系的划分往往出入很大,从三四十个到一百多个不等。另外,由于语言内部的情况千差万别,确定语言亲属关系往往有很大困难,对其中有些语言,有时只好满足于区域的分类。下面虽然主要是谱系分类,但有的地方也参照了区域分类的方法。在各语系中,印欧语系的研究是最深入的,分类也最详尽,而其他语系的界说则由于研究的深度不同而详略不一。一般来说,越往下细分,困难越大,分歧也越多。目前对世界上许多语言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细致,在下面的分类中,有些语言只划分到语族一层。

无论是类型分类法,还是区域分类法、谱系分类法,都首先有赖于对各语言作准确细致的描写,但是在许多情况下今天却难于做到。一个人由于情况所限,仅靠他个人的语言知识是不可能对世界诸语言作出接近实际的分类的。但他却可以综合前人或他人的研究成果来做到这一点。在这方面,较早的例子有法国语言学家A.梅耶和M.柯恩主持编写的《世界的语言》(1952),晚近的例子有美国语言学家C.F.沃格林,他的工作是值得称道的。他本人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北美印第安语,但他和F.M.沃格林合作出版的《世界语言的分类与索引》(1977),却把各国学者关于各语系、语族(甚至语支)分类问题的研究成果汇集于一书,客观加以介绍,并阐述自己的意见,使读者得以了解在某个语系、语族或语支的分类问题上各有关学者的不同主张,便于读者自己去分析比较。

美洲印第安语言 对于美洲印第安语的研究还很不充分。语言学家,特别是美国的一些语言学家,为拯救某些濒于消亡的印第安语,做了大量记录和分析。但由于印第安语数量很大(估计语言和方言逾1000种),且绝大多数没有文字,至今连这些语言的数字还难以确定。关于美洲印第安语的谱系分类分歧很大,有的学者划分的语系多达100多个。近年来有归并语系的倾向,有的学者用“大语群”这一术语来包括若干语系,但是都远非定论。某些学者甚至推测除爱斯基摩-阿留申等极个别语系外,北美、南美和中美的所有印第安语言最终都可能具有亲属关系,但这有待于语言学上的证实。

关于印第安语的划分,习惯上以墨西哥为界,以北的称作北美印第安语,以南(包括墨西哥)的称作中美和南美印第安语(有时统称为南美印第安语)。中美和南美的印第安语的数量比北美印第安语要多得多,但对它们的研究却逊于对北美印第安语的研究,文献资料更少。

巴布亚和澳大利亚诸语言 巴布亚诸语言主要分布于新几内亚岛,少数分布在新不列颠和所罗门群岛。几十年前,新几内亚在语言学上被称做不为人所知的地方。近年由于语言学家的努力,大部分新几内亚的语言得到了识别。岛上居民由于丛林遍地,基本上处于隔绝状态。语言多达650种以上。有的语言只有几十个人使用,有时相邻的两个村子的语言不能互通。学者们对这些语言的分类往往各执一说。有的把它们划归许多语系,然后把这些语系算作一个松散地结合在一起的大语群。分布最广的巴布亚语言是岛西部的本图尼语,其次是马林德语和宁博拉语等,在岛东部,主要语言包括恩加语、卡泰语和基怀语。

澳大利亚的土著语言多达200种以上,其中许多正在消亡。使用人数比较多的语言只有分布于托里斯海峡诸岛的马布亚格语,其他大部分语言只有几百个使用者。

系属不明的语言 语言间的亲属关系,只有在对语言进行充分调查的基础上才能确定,分类也才有根据。但是由于语言材料不足,更由于谱系分类法所依赖的历史比较法的局限性,世界上还有某些语言至今系属不明,如

西班牙和比利牛斯山西部法国部分省份的巴斯克语。学者们做过多种尝试,陆续将巴斯克语跟柏柏尔诸语言、阿尔冈基亚诸语言、已消亡的欧洲语言如伊比利亚语等进行比较,都没有得出结论,还有学者认为它是阿基坦人的语言的派生语;有的又说它跟高加索诸语言有远亲关系。但到目前为止,比较一致的看法仍认为它是一种跟别的语言没有亲属关系的独立语言。

分布于克什米尔西部喀喇昆仑山脉的布鲁沙斯基语,是另一种系属不明的语言。虽然它的语音系统跟印度诸语言、其语法跟达罗毗荼诸语言有相似之处,但它们之间却没有亲属关系,也没有发现与别的语言有亲属关系。

分布于库页岛和北海道附近岛屿的阿伊努语,曾有学者认为它跟日语有亲属关系,也有人认为它与印欧语有关系,近世学者又提出它属于古西伯利亚诸语言,但这些看法都没有得到普遍承认。

关于日语和朝鲜语的系属问题,也存在着争议。传统上,人们习惯于把它们看作是系属不明的语言,可是近年来,有些语言学家倾向于把它们(特别是朝鲜语)划归阿尔泰语系,甚至有的学者把日语划归南岛语系,这些都需要语言学上的确证。

系属不明的语言在其他地区还有一些,情况也不尽相同,有待于学者们进一步探讨。(参见彩图插页第57、58、59页)

参考书目

C. F. Voegelin and F. M. Voegelin, *Classification and Index of the World's Languages*, Elsevier North-Holland, Inc., New York, 1977.

M. Ruhlen, *A Guide to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Stanford University, 1975, 1976.

A. Meillet et M. Cohen(eds.), *Les langues du monde*,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Paris, 1952.

S. H. Muller, *The World's Living Languages*, 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 Co., New York, 1964.

G. L. Trager, *Language and Languages*, Chandler Pub. Co., U. S. A., 1972.

W. P. Lehman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Inc., 1972.

T. Byno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T. A. Sebeok (ed.), *Current Trends in Linguistics*, Vol. 11, Mouton, Holland, 1973.

(黄长著)

Shiming

《释名》 训解词义的书。汉末刘熙作。刘熙字成国,北海人。汉末避乱至交趾。《三国志·吴书·韦曜(昭)传》说曜在狱中上书称:“又见刘熙所作《释名》,信多佳者。”考曜入狱在孙皓凤凰二年(273),据此可知《释名》在吴末已广为流布,为学者所重视。

《释名》这部书是从语言声音的角度来推求字义的由来的。刘熙在自序里说:“熙以为自古造化制器立象,有物以来,迄于近代,或典礼所制,或出自民庶,名号雅俗,各方多殊。……夫名之于实,各有义类,百姓日称而不知

其所以之意。故撰天地、阴阳、四时、邦国、都鄙、车服、丧纪,下及民庶应用之器,论叙指归,谓之《释名》,凡二十七篇。”

今本27篇分为8卷。所释为天、地、山、水、丘、道、州国、形体、姿容、长幼、亲属、言语、饮食、采帛、首饰、衣服、宫室、床帐、书契、典艺、用器、乐器、兵、车、船、疾病、丧制。这代表刘熙对语词所表示的事物的一种分类。



刘熙著《释名》

刘熙解释事物所以如此称名的缘由,完全从声音上去探索。如“日,实也”,“月,阙也”,这种解释已见于《说文解字》,但是刘熙要说出道理来,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说:“日,实也,光明盛实也”;“月,阙也,满则[复]阙也”。全书都是这样考求语词音义之间的关系,说出缘由来。如说:“星,散也,列位布散也”;“春,蠢也,万物蠢然而生也”;“冬,终也,物终成也”;“彗星,光梢似彗也”;“身,伸也,可屈伸也”;“皮,被也,被覆体也”;“脊,积也,积续骨节终上下也”。

诸如此类都是就音以求义,在训诂学上称之为声训,也称音训。刘熙所加的声训,虽然有些是不无道理的,但是大部分都出于主观的推想,没有实际的根据,也并非经过系统的探索而得出来的,因而缺乏科学性。不过,远在1700多年以前就有这样具有语源学性质的书,还是很可贵的。其所以能流传下来而没有亡佚,与人民很想追寻语源的心理有关系。《释名》这部书对后代学者提倡因声以求义的训诂方法也有很大的影响。

《释名》书中记录了很多汉代通用的语词,可以跟《尔雅》、《说文》等书相参证。全书以声为训,或取同音字,或取同韵近字,或取声同声近字,由此可以考证汉末的语音,是一部极有价值的书,不能等闲视之。中外学者已有论文发表。

《释名》的传本只有明代的覆宋本,缺误已多。清代学者毕沅作《释名疏证》校勘其中讹误,有补苴之功。王先谦又作《释名疏证补》,续有刊正,可称善本。

参考书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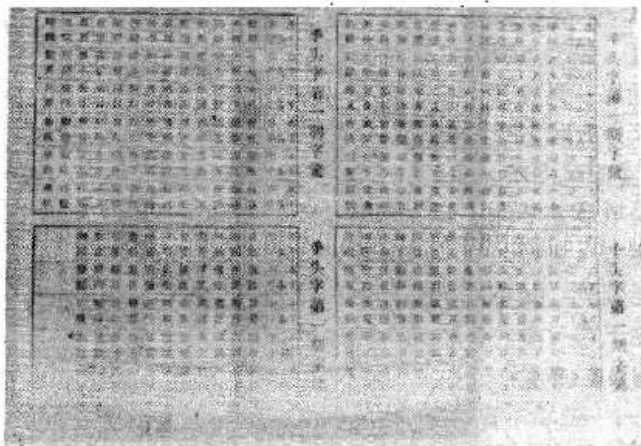
周祖谟:《书刘熙释名后》,收入《问学集》,中华书局,北京,1966。

(周祖谟)

shoutouzi

手头字 (conventional Chinese characters)

民间手头常写的俗体字。1935年初,上海文化教育界人士陈望道、胡愈之、陶行知等提出把这种俗体字用到印刷上去,使印刷体与手写体取得一致。1935年1月,他们成立“手头字推行会”,选定第一批手头字300多个(见图)。2月,由蔡元培、邵力子、郭沫若、郑振铎等200人和15家杂志社联名发表《推行手头字缘起》,说:“我们日常有许



第一批手头字

多便当的字,手头上大家都这么写,可是书本上并不这么印。识一个字须得认两种以上的形体,何等不便。现在我们主张把‘手头字’用到印刷上去,省掉读书人记忆几种字体的麻烦,使得文字比较容易识,容易写,更能够普及到大众。这种主张从前也有人提出过,可是他们没有实在做,所以没有什么影响。现在我们决定把‘手头字’铸成铜模浇出铅字来,拿来排印书本。先选出手头常用的300个字来作为第一期推行的字汇,以后再逐渐加添,直到‘手头字’跟印刷体一样为止。希望关心文化的先生们,赞同我们的主张,并且尽量采用这个字汇。”这300个手头字的很大一部分,后来被《汉字简化方案》所采用。

(傅永和)

Shouwen

守温 中国唐末、五代时期和尚。敦煌石窟曾经发现一个署有“南梁比丘守温述”的韵学写本残卷。据此推知,守温可能是后汉梁县(今河南省临汝县西)居民。是否汉族不能确定,因为梵文的 *raṣṣapradīpa* 可以译“守温”。守温韵学残卷载有30字母。标目和总数跟敦煌唐写本《归三十字母例》一致。

不芳並明 端透定泥 知彻澄日
见溪群来疑 精清从 审穿禅照
心邪晓 匣喻影

后来有人调整30字母的排列顺序,增加“非、敷、奉、微、娘、床”6个字母,形成等韵里通行的三十六字母。残卷还载有“四等重轻例”,其中各等的分界限等韵图《韵镜》完全吻合。证明等韵学最晚起源于唐末五代。残卷第2截有“两字同一韵凭切定端的例”,第3截有“辨声韵相似归处不同例”,反映出正齿声类二、三等不混,床禅有别,

轻重唇好像也有分别。不过,也有可能是参照梵文字母的体系来定汉语字母的。比如有些梵音有而汉音无,或者汉音有而梵音无的都舍去,因此只有30字母。

(刘广和)

Shuhote

舒哈特, H. (Hugo Schuchardt 1842~1927) 德国和奥地利语言学家。1842年2月4日生于德国哥达,1927年4月21日卒于格赖茨。曾在耶拿和波恩大学读书,是A.施莱歇尔的学生。1876年任哈雷大学教授,不久任格赖茨大学教授,讲罗曼语文学,直到1900年。

舒哈特是罗曼语专家,但是学问广博,旁及凯尔特语、巴斯克语、匈牙利语、柏柏尔语、高加索语。他有一套普通语言学理论,讲语音演变、词汇演变、语言融合、语言谱系和古代语言的性质等问题,这在当时侧重历史的语言学者中是少见的。

关于语音变化,他反对德国新语法学派的“发音不自觉,语音规律无例外”的说法,认为音变由心理因素决定,先是少数词少数人的音变了,后来才遍及各有关的词和人。但是对于语言变化过程的条件,舒哈特没有说明。

在研究词源时,舒哈特反对偏重语音,而坚持词的历史和意义才是最重要的。他要弄清词的地区分布情况,他说,不懂得 *foie gras* (鹅的肥肝) 怎么烹调,就不能说明在罗曼语中,“肝”这个词有什么历史。1909年R.梅林格创办刊物《词与物》,舒哈特为它写了许多文章。

舒哈特发表了一些关于语言融合的意见,和法国A.梅耶的观点不同。梅耶主张根据语法来判断某些语言之间是否有亲属关系,舒哈特认为词汇和语言的“内在形式”即语言中的观念和范畴才是最重要的,这个主张为后来的语言学家如A.萨戴贵特等所不取。

舒哈特说,在最早的语言中,一个词就是一句话,而这句话应当是动词性的。小孩说“妈妈”,那意思是“妈妈来啊”、“妈妈喂奶”或者“妈妈抱我”的意思。这个看法已为一般人所接受。

见新语法学派、梅耶。

(姚小平)

Shuyu

《蜀语》 (*Shu Dialect*) 解说四川方言词语、现存最早的分地考证常言俗语的著作。明代李实著。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据函海本排印,1937年6月在上海出版。

该书收四川方言词语600多条,一般先说明词义再注字音。如“皮裂曰皴,皴音村”,“露牙曰龋,龋音报”,“香圆稻米曰稞米,稞音晚”等。词语用字比较常见的,只作解释不再注音。如“腹泻曰过。汉书:食菜不招过,饮水不裂肠。”考证古音古义是本书的目的,所以许多条目是讨论读音、用字的。关于读音,如:“十读若诗。杨升菴曰:十,寔执切,入声,亦可作平声。如唐诗,三十六所临春殿,一一香风透管弦。又,绿浪东西南北水,红阑三百

九十桥。又，春城三百九十桥，夹岸朱楼隔柳条。”关于用字，如：“沃土曰鱼米之地。唐田澄蜀城诗曰：地富鱼为米，山芳桂是薪。俗作馀米，非。考田诗，本前汉书地理志：巴蜀民食稻鱼，无凶年忧。”“劈破曰斯。俗作撕，非。诗曰：斧以斯之。”有些条目写得比较具体、实际。如：“姐”，《说文》：“蜀谓母曰姐”，《蜀语》：“呼母曰姐。姐读平声，如呼女兄作上声。”这是分地考察方言的好处。后人效法《蜀语》的不少，如毛奇龄的《越语肯綮录》、胡文英的《吴下方言考》等都是考证一个地区方言词语的著作。该书所收词语虽然已有 600 多条，但遗漏颇多，所以后来又有张慎仪的《蜀方言》二卷（笈园丛书本）。此外，这本书注音用字有的过于生僻，如“禾麦之空壳曰粘，粘音庵”。以“庵”音“粘”作用不大。（颜逸明）

shuyu

术语 (terms) 各门学科中的专门用语。术语可以是词，也可以是词组，用来正确标记生产技术、科学、艺术、社会生活等各个专门领域中的事物、现象、特性、关系和过程。

基本特征 ①专业性。术语是表达各个专业的特殊概念的，所以通行范围有限，使用的人较少。②科学性。术语的语义范围准确，它不仅标记一个概念，而且使其精确，与相似的概念相区别。③单义性。术语与一般词汇的最大不同点在于它的单义性，即在某一特定专业范围内是单义的。有少数术语属于两个或更多专业，如汉语中“运动”这个术语，分属于政治、哲学、物理和体育 4 个领域。④系统性。在一门科学或技术中，每个术语的地位只有在这一专业的整个概念系统中才能加以规定。

术语往往由本民族的一般词汇（包括一些词素）构成。成为术语后，与原词的意义部分地或完全地失去了联系。术语也可来自专名（人名、地名），如“瓦（特）”（Watt），“喀斯特”（Carst）等等。但一般的专名不是术语，尽管它们也以单义性为基本特征。术语还常来自外来语，通过音译（如“雷达”、“坦克”）、意译（如“硬件”、“软件”）或半音半意译（如“拖拉机”、“加农炮”）等方式借入。在一些语言中越来越多的术语来自外来语。术语和外来语的引进方式虽有不少共同点，但二者之间不完全相等，有专业性，既是术语，又是外来语（或借词）；无专业性，则只是外来语。

另外，术语根据其使用范围，还可以分为纯术语、一般术语和准术语，其中纯术语专业性最强，如“等离子体”，一般术语次之，如“压强”；而准术语，如“塑料”，已经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逐渐和一般词汇相融合。

术语的产生和移植，规范化和标准化 术语是科学文化发展的产物。新事物新概念不断涌现，人们在自己的语言中利用各种手段创制适当的词语来标记它们，这是术语的最初来源。随着文化交流的发展，术语连同它们标记的新事物新概念传播开来，各族人民通过不同方式（自造或借用）把它们移植过来，这是术语的移植过程。

科技术语一般产生于科学技术发达的国家。同一事物或概念也可能同时在不同国家探讨和出现，因而会产生许多内容相同而形式不同的术语。另外，在术语的移植过程中，也会产生不少同义不同形的术语。术语的混乱，成了国际学术交流的障碍，这就需要语言学家和科技工作者共同努力解决术语规范化问题。不少国家成立了全国性的术语委员会，专门负责整理审定各种术语。

有些学者正在倡导通过转写方式创制术语，以使术语统一和标准化。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国际电工委员会（IEC）都设有专门的术语委员会，负责组织和协调这方面的工作。为了加强术语工作，1971 年还成立了国际术语情报中心。有的地区（如经互会国家）组织了术语协调委员会，协调本地区术语方面的工作。

术语工作的现代化 电子计算机的推广应用给术语工作带来了新的面貌。许多国家建立了术语数据库，并提供咨询服务。加拿大的术语数据库规模最大，存有 400 万术语，实际上已成为全国的术语中心。翻译工作者借助术语数据库的作用可以提高翻译速度和翻译质量，促进术语的统一。

中国的术语工作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十分发达，术语工作具有悠久的历史。荀子的《正名篇》是有关语言理论的著作，其中很多论点都与术语问题有关。汉唐时期的佛典翻译吸收了大量梵文的佛教术语。为了解决意译和音译问题，玄奘提出了“五不翻”原则。明代的科学著作翻译事业兴盛，中外学者合力译出不少有关天文历算、舆地测绘、农田水利和力艺之学的著作。19 世纪下半叶，以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为中心翻译了大量科学技术著作，引进了大量科学术语。例如，徐寿在译《化学鉴原》之前，中国只有一些最普通的化学元素名称，如金、银、铜、铁、锡、养气、轻气、氯气等。《化学鉴原》一书开始使用按照西文第一音节创造新字的命名原则，于是出现了钠、钾、锌、钙、镁等。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严复在翻译新名词时，一方面选用意译词，另一方面又创造了不少音译词。这个时期，胡以鲁在《论译名》一文中虽然力主意译，但也提出了不妨音译的十类词。这些都表明术语的制定和规范化一直是人们关心的问题。到了清末，要求译名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1909 年 5 月，学部奏派侯选道严复编定各科中外名词对照表及各种词典，9 月复奏设编订名词馆，以严复为总纂。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审定学术名词的统一机构。但没有发表什么成果。辛亥革命以后，博医学会、江苏教育会、中国科学社等单位进行了科学名词审定工作。1919 年成立了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1928 年大学院在上海设立译名统一委员会。但是，真正集中管理全国科学术语的审定工作，可以说是由南京国立编译馆（1932 年成立）开始的。它于 1933 年出版了《化学命名原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共编成各种术语约 50 种，其中已出版的近 20 种。1949 年后，术语工作开始了一个新阶段。1950 年 5 月，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的领导下组织了“学

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下设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医药卫生、艺术科学和时事名词五大组。1956年文化教育委员会撤销，国务院将学术名词统一工作交给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名词编订室”（中间曾改为“中国科学院翻译出版委员会名词室”）。“文化大革命”期间术语审定工作完全中断。1978年，国务院批准由中国科学院主持，筹建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几年来，成立了6个分科委员会，召开了一系列名词审定会和讨论会。1985年4月25日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在北京正式成立。主任为钱三强，委员约70人。委员会的工作范围涉及广义的自然科学领域，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球科学、生物科学、技术科学、农业科学、医学等。委员会的任务是：确定工作方针，拟订全国自然科学名词统一的工作计划、实施方案和步骤，负责审定自然科学各学科名词术语的统一名称，并予以公布施行。

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以前共出版160多种术语集，最早的几种是《中外病名对照录》（1909）、《英汉英军语词汇》（1911）、《英汉商业用语手册》（1913）、《华、德、英、法铁路词典》（1916）、《船学名词表》（1916）。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到1983年上半年，共出版760多种（其中大陆出版的约占660种）。

目前，多语种的术语出版物和带解释的术语词典日益增多，专业性的缩略语词典的出版也受到重视，如《英汉电子技术缩略语与缩语词典》（1981）、《英汉计算机缩略语词典》（1982）。为了使术语工作现代化，不少单位正在建立术语数据库。

参考书目

Ю. Д. Дешернев. Вопросы терминологии. АН СССР, Москва, 1961.

刘涌泉：《略论我国的术语工作》，载《中国语文》，1984，第1期。

（刘涌泉）

shuyu shujuku

术语数据库 (terminological data bank)

也称术语库。一种计算机化的术语集合。通常存储在磁性或光学载体（磁带、磁盘、光盘等）上，并根据程序进行检索或其他处理。

目前，术语数据库有3种类型：①面向翻译的，即双语或多语对照词表。②面向标准化的，这种类型的术语库为每个术语标记严格的定义。③面向知识的，每个术语带有代表一定概念的特征，对这些概念或概念网络的加工就是通向知识库的必经之路。

术语数据库最大特点是能快速查询和及时更新，同时还可可在它的基础上进行各种新的研究和处理。

对于术语工作的发展来说，术语数据库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它在促进术语标准化方面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术语数据库对翻译工作也有重大影响。由于查询方便快速，新词术语能及时补充，并有防止术语混乱的作

用，因而可使翻译速度加快，质量提高。

术语数据库建立的原则、方法和格式要由全国性的术语组织来制定，并要求各专业的建库小组严格执行。术语库的改动、扩充和更新，也要统一掌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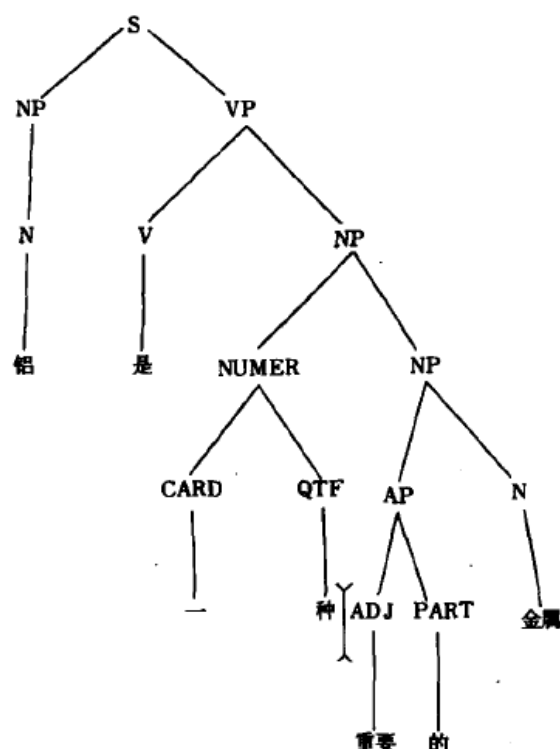
术语数据库的网络化是一个发展方向。有库无网，不能发挥最大效能。

（刘涌泉）

shuxing fenxifa

树形分析法 (tree analysis method) 自然语言自动处理中的一种分析方法，借助于树形图来说明句子中词与词、词组与词组之间的句法、语义和逻辑关系。

语言中的任何一个句子都隐藏着一个树形图。例如，句子“铝是一种重要的金属”中隐藏着的树形图如下：



这个树形图中，S表示句子，NP表示名词词组，VP表示动词词组，AP表示形容词词组，NUMER表示数量词组，N表示名词，V表示动词，CARD表示基数词，QTF表示量词，ADJ表示形容词，PART表示助词，它们都是标记。

树形图由结和连接结的枝组成，每一个结至少有一个标记，也可以有多个标记，其中，有的标记是表示词组类型或词类的，如S、NP、VP、V、N、PART等，它们不出现在具体的句子中，称为非终极标记。有的标记是表示语言中具体的词，如“铝”、“是”、“一”等，它们出现在具体的句子中，称为终极标记。如果一个结点上有多重标记，那么，除了上述标记之外，其他标记还可以表示词和词组的句法功能信息（如主语、谓语、定语、宾语、状语、补语等），词和词或者词组和词组之间的逻辑关系信息（如施事者、受事者、与事者等）和语义关系信息（如并列、原因、结果、

让步、比较、工具、时间、空间等)以及其他的语法信息。

树形图中各个结点之间,有两种关系值得注意:一种是支配关系,一种是前于关系。

如果在树形图中从结 x 到结 y 有一系列的枝把它们连接起来,而且所有的枝顺着同一方向,这即表示结 x 支配结 y 。例如,上面的树形图中,标有 VP 的结支配着标有 NUMER 的结,因为连接结 VP 与结 NUMER 的枝都一律从较高的结 VP 降到较低的结 NUMER;当 x 支配 y 时, y 就叫做 x 的后裔。

如果结 x 与结 y 是相异的, x 支配 y ,而且 x 与 y 之间没有另一个相异的结,这叫做直接支配。结 y 就叫做结 x 的直接后裔。在上面的树形图中,标有 VP 的结有两个直接后裔,即标有 V 的结和右边的标有 NP 的结,V 和 NP 这两个结称为姐妹。支配关系中不被任何其他结支配的结叫做根。图中,标有 S 的结就是根;被其他结支配而不支配任何其他结的结,叫做叶。一般说来,树形图是从上到下画出的,所以,根总是在顶部,叶总是在底部。

树形图中的两个结,只有当它们之间没有支配关系的时候,才能在从左到右的方向上排序,这时,这两个结之间,就存在前于关系,左边的结前于右边的结。在上面的树形图中,标有“铝”的结前于标有 VP 的结及 VP 所支配的结,因为结 VP 与结“铝”之间不存在支配关系,但是,标有“铝”的结不能前于支配它的 NP 及 N 等结。可见,支配关系同从左到右的前于关系是相互排斥的,也就是说,在树形图中,如果两个结 x 与 y 之间存在前于关系,那么, x 与 y 之间必定不能存在支配关系。并且,如果 x 前于 y ,则由 x 支配的所有的结都前于由 y 支配的所有的结。

根据这些基本性质,一幅树形图可以提供如下 3 个方面的语法信息:

① 句子中的词序,树形图中的各个叶按从左到右的前于关系排列起来,就是它所表示的句子的词序。这些叶之间是不存在支配关系的。

② 句子的层次:一个结的直接后裔就是这个结的直接成分,根据结之间的直接支配关系,便可看出句子的层次关系。

③ 词类信息、词组类型信息、句法功能信息、词与词或者词组与词组之间的逻辑关系信息和语义关系信息等。

树形图中的一个结可以与多个标记相对应,用多值标记函数 L 表示如下:

$$L(x) = \begin{Bmatrix} y_1 \\ y_2 \\ \vdots \\ y_n \end{Bmatrix}$$

$y_1, y_2, \dots, y_n$ 就是在一个结点 x 上可以标记的各种信息。

因而树形图既能提供句中词序和层次的几何值,又能提供词类、词组类型、句法功能、逻辑关系、语义关系的代数値。

参考书目

冯志伟:《汉语句子的多标记二叉树形图分析法》,载《人工智能学报》,长沙,1983。

R. Rustin, (ed.),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Algorithmic Press, New York, 1973.

(冯志伟)

shuli yuyanxue

数理语言学 (mathematical linguistics)

应用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来研究语言现象的一门新兴的语言学科,它使语言学与现代数学、计算机科学、控制论以及人工智能等学科发生密切的联系。

1847 年,俄国数学家 B. Я. 布利亚科夫斯基认为可以用概率论来进行语法、词源及语言历史比较的研究。1894 年,瑞士语言学家 F. de 索绪尔认为,可以用数学公式有规律地表达语言中的量和量之间的关系。他又把语言学与几何系统和只有复杂项的代数相比。1904 年,波兰语言学家 J. N. 博杜恩·德·库尔德内认为,语言学家应该掌握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语言学将根据数学的模式更多地扩展量的概念,并将发展新的演绎思想的方法。1933 年,美国语言学家 L. 布龙菲尔德更认为数学是语言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俄国数学家 A. A. 马尔科夫(1856~1922)甚至在 1913 年就采用了概率论的方法研究 A. C. 普希金的长诗《欧根·奥涅金》中的俄语元音和辅音字母的序列,从而建立了马尔科夫随机过程的数学理论。

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由于通信技术的发展,需要寻求语言的最佳的编码方法,以提高信道的传输能力,因而要对语言的统计特性进行精密的研究。机器翻译、情报检索等文献自动处理技术的出现,又要求精确地描述和解释语言的结构,建立语言的数学模型,并用数学方法来研究语言的语法和语义结构。

实践中提出的这些要求,使语言学中建立数理语言学成为必要,而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为数理语言学的产生提供了可能。例如,20 世纪以来迅速发展的概率论、数理统计、信息论、集合论、数理逻辑、图论、格论、模糊数学和抽象代数等数学部门,为用数学思想和方法研究语言提供了有力的武器;传统语言学内出现的 O. 叶斯泊森的“分析句法”,结构语言学内 L. 布龙菲尔德、Z. S. 哈里斯等人提出的辨别语素、分析层次的一套严格的语言研究方法,在这方面也有一定的启示作用。控制论采用的一些方法,特别是模拟方法,可以作为建立语言数学模型的借鉴;计算机科学中对程序语言结构和编译技术的研究,可以作为用数学思想和方法研究自然语言的参考;人工智能所探讨的有关智能活动的一般规律,对数理语言学的研究也有一般的指导作用。

1955 年,美国哈佛大学首先创办了数理语言学讨论班,1957 年正式开设数理语言学课程。此后,日本、苏联、联邦德国、罗马尼亚、法国、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英国、波兰、瑞典、民主德国相继开展这方面的教学和研究。中国从 50 年代末逐步开展了数理语言学的研究,在用数学

方法研究汉语的自动分析和生成、汉字信息处理、言语统计等方面,都取得一定成绩。有的单位还开设了数理语言学课程。

数理语言学主要包括3个方面:①代数语言学,②统计语言学,③应用数理语言学。代数语言学是采用集合论、数理逻辑、算法理论、模糊数学、图论、格论等离散的、代数的方法来研究语言,统计语言学是采用概率论、数理统计和信息论等统计数学的方法来研究交际过程中语言成分使用的频率和概率(统计规律),而把代数语言学和统计语言学应用于机器翻译、人机对话以及情报检索的技巧和方法的研究,就是应用数理语言学的内涵。

代数语言学的目的在于建立语言的代数模型,对客观的语言现实进行抽象的代数描述和理论上的精确分析,从而把语言学的某些方面改造成数学那样的演绎系统。代数语言学中的语言模型主要有分析性模型、生成性模型和辨识性模型3种,分析性模型主要采用集合论的方法,对语法的基本概念进行数学描述,生成性模型着重于研究形式文法和自动机理论,阐明形式文法及其与自动机的关系,辨识性模型则研究句法类型演算方法。此外,还有把句法与语义结合起来研究的孟德鸠语法。这些语言模型的研究,冲破了语言学传统的归纳方法的束缚,给语言学研究带来了变革性的重大影响,而且,语言现象经过模型刻画之后,更适于计算机处理,为自然语言的自动处理提供了手段(见代数语言学)。

统计语言学的目的在于建立语言的统计模型。采用统计方法来研究语言的音素和音位的,有语音统计学;研究亲属语言分化的年代,有语言年代学;研究文章风格的,有风格统计学。近年来,人们开始利用计算机进行自然语言的统计研究(见统计语言学)。

包括机器翻译、人机对话、信息存储、信息传输等在内的应用数理语言学,主要研究语言自动分析和语言自动生成的方法,目前则重视语义的形式化研究。数理语言学丰富了语言研究的手段和方法,并为语言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领域。

参考书目

冯志伟:《数理语言学》,知识出版社,上海,1985。

(冯志伟)

shuangshe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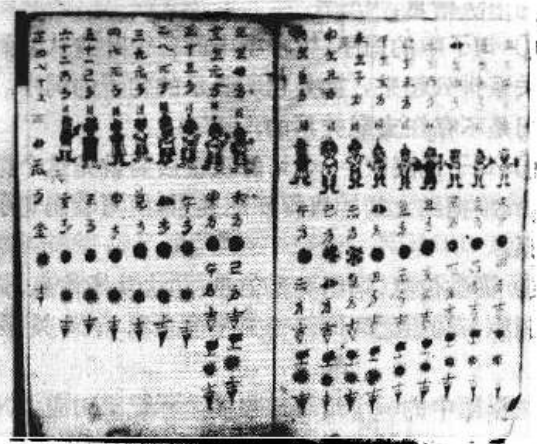
双声 (alliteration) 指两个汉字的声母相同。如普通话“大地”[tā dì]是双声,两个字的声母都是[t]。两个字是不是双声,不同方言区或不同时代的人认识并不完全一样。如闽南方言“农林”[lóng lín],“无面”(闽南话“没趣儿”)[bo bin]都是双声。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则不是双声。又如“五牛”两个字,从《广韵》音系看,五,疑古切;牛,语求切,是双声,但在现代汉语普通话则不是双声。

双声常常与叠韵连说。较早为双声叠韵下定义的是清代李汝珍(约1763~约1828)。他在《音鉴》中说:“双声者,两字同归一母,叠韵者,两字同归一韵也。”而双声叠

韵的实际运用早在南北朝时代就开始了。刘勰(约465~约532)《文心雕龙·声律》:“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睽。”可见,在那时候双声叠韵即已被文人认识到了。《南史·谢庄传》记载:“王玄谟问谢庄:‘何谓双声叠韵?’答曰:‘玄护为双声,漱碣为叠韵。’”王玄谟和桓护曾率兵北伐,在漱碣打过败仗,谢庄用解释什么叫双声叠韵来跟他们开玩笑(当时“玄”、“护”双声,“漱”、“碣”叠韵,在今天普通话里既非双声,又非叠韵)。这说明在当时士大夫阶层的生活中也已开始应用双声叠韵。(谢纪锋)

Shuiyu

水语 (Sui language) 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分布在中国贵州省的三都水族自治县及其邻近的榕江、荔波、独山、都匀等县,使用人口约28万(1982)。不分方言。在壮侗语族诸语言中水语的声母最复杂。如三洞话有71个声母,清塞音有不送气和送气的两套;有小舌音;浊塞音有b、d、ʔb、ʔd两套;鼻音有3套,如m、ɱ、ʔm等;擦音除分清浊外,还有前喉塞浊擦音,如ɕ、j、ʔj等;还有相当数量的腭化声母和唇化声母,如tj、tw等。有55个韵母,由长元音或带韵尾的长、短元音构成。有8个韵尾: -i、-u、-m、-n、-ŋ、-p、-t、-k。有8个调类:6个舒声调和2个促声调。虚词和词序为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量词可单独加在名词前面。名词或量词的修饰语在名词或量词后面(但数量词在名词前)。代词修饰量词时要加to⁵¹(的)字。句子的语序是主语—谓语—宾语—补语。合成词中,复合词的词素结构与词组的组合规则相同,派生词的附加成分以前加居多。有民族固有词与借词并存并用的现象。1949年以前有用于占卜、择日、看风水的符号,称为“水书”(见图);有类似汉字倒写、反写的形式,又



水书

称“反书”。这些字约有300多个,广大水族群众多不认识。长期以来,水族地区使用汉文。(王均)

Shuowen Guzhoubu

《说文古籀补》 集录中国秦代以前古器物文字的一部书。清代吴大澂(1835~1902)编。吴大澂字清卿,号恒轩,又号塞斋,江苏吴县人。同治进士,累官广东、湖

南巡抚。甲午之战，督师山海关，兵败革职。家藏古器物甚多，著有《密斋集古录》和《恒轩吉金录》。本书以集录古钟鼎彝器所见文字为主体，兼收石鼓文、古币、古陶器文，按照《说文解字》体例始一终亥部首次第编排。光绪九年（1883）初刻本收3500余字，光绪二十一年（1895）在湖南重刻，又增1200余字。所编文字都根据墨拓原本摹写上板，未见拓本的概不采录，足见著者极为矜慎，以免失真。同一字见于不同器物的，笔画小有不同也一一录出，均注明器名，每字下并略加训释说明。这是自宋代开始治彝器款识之学，历时800余年，从来没有的著作。所录之字多为《说文》所未收，这对研究古文字学的功绩很大。他从不同的古器物铭文中体悟到《说文》中的“古文”实际是周末的文字，古器物习见的字才是成周的文字。这种见解是前人所没有说过的，对研究《说文》的人大有启发。自吴大澂有《说文古籀补》以后，黄县丁佛言又作《说文古籀补》，补其不备。

（周祖谟）

Shuowen Jiezi

《说文解字》 中国最早的对后代影响极大的一部字典。东汉许慎著。书成于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到安帝建光元年（121），遣子许冲上之于朝。

自秦始皇焚《诗》、《书》百家语以后，在西汉时期五经立于学官的都是用隶书所写的“今文经”，虽然用篆书古文所写的“古文经”已开始出现，但一直为今文经家所排斥，到东汉时期才盛行起来。古文经家是有本之学，今文经家不明古人造字的条例，根据隶书，随意口说，荒谬不足信，所以许慎作《说文解字》一书，根据前代古文，首创分析文字结构的方法和理论，一扫西汉东汉间今文讖纬的谬说。

许慎在自叙里陈述作书的旨趣说：“俗儒鄙夫翫其所习，蔽所希闻，不见通学，未尝覩字例之条，怪旧艺，而善野言。……盖非其不知而不问，人用己私，是非无正，巧说豪辞使天下学者疑。……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稽撰其说，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旨，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书中所收文字包括篆文（即小篆）、古文（壁中书）、籀文（大篆）、或体、俗体。“文字”通常是作为一个词来用的。许慎在自叙里说：“仓颉之初作书，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浸）多也。”“文”指的是整体象形表意的字，“字”指的是结体有表形表声的合体字，所以他以《说文解字》为书名，后代常常简称为“说文”。

《说文》是一部有严整体例的著作。全书以小篆为主体，分析字形结构，根据不同的偏旁，分立为514部，始于“一”部，终于“亥”部。本于五行家言，认为万物始于一，毕终于亥。凡字形偏旁或笔画接近的字都归于一部，举偏旁居一部之首。部与部排列的顺序大体以部首的笔画和形体结构是否相近为准则，笔画结构相近的就序列在一起。

许书514部分为14篇，卷末叙目别为1篇，故为15

篇。每部文字的排列主要本着3个原则：①文字在应用上的意思是属于好的、善的列在前面，属于贬义的、不好的意思的列在后面；②一部之内，属于专名词的列在前面，属于普通事物名词的列在后面。③一部之内的字，义类相近的序次在一起，以便寻检。

每一篆文之下先言义，后言形体结构，最后或说明读若某。小篆之外，如有籀文、古文异体，则列其下，名为“重文”。全书共收篆文9353字，重文1163字。古书中所使用的文字大体具备，其中既有先秦所有的字，也有汉代新产生的字，为后代考查汉字发展的历史提供极宝贵的材料。近代以来识别甲骨文、金文，如果没有《说文解字》就难多了。因为有了许慎的书，所以现在得以读通大量的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

许慎分析字形，根据相传的“六书说”（见六书）。象形、指事由字形以见义。如说“气，雲气也，象形”，“上，高也，此古文上，指事也。”会意、形声则分别其组合成分，如“此，止也。从止从匕，匕即相比次也”。又“赏，赐有功也，从贝尚声”。凡言“从某从某”或言“从某某”，都是会意字；凡言“从某某声”的都是形声字。书中也有会意兼形声的，如“贫，财分少也，从贝从分，分亦声”。也有言“从某某省声”的，如“夜，舍也，天下休舍也，从夕，亦省声”。许慎做了这些分析，对我们理解篆书的结构大有帮助，下而考察隶变也可以知道其来龙去脉，不知篆书形体，就难以明其音义。如“夜”之从夕从亦，“春”（警）之从艸从日，屯声，都从篆书演变成今体的。所以清代道光年间黄承吉说：“不有《说文》，势必至今日举一字而不知其为何声，不知其为何义，甚至不知其属何偏旁。”（《梦陔堂文集》卷二《字义起于右旁之声说》）《说文》中的训释，或因形以说义，或取书传中的古训，灿然具备，虽为字书，实际也是一部极为重要的训诂书。后代的字书都援引《说文》训释，以为典要。至于依照《说文》的偏旁分部来编排文字的，更多不可数。晋代吕忱的《字林》，梁代顾野王的《玉篇》，宋代司马光等的《类篇》，下至明代梅膺祚的《字汇》，清代张玉书等的《康熙字典》等都按偏旁部首排列文字，惟部首多寡有不同而已。直至现代所编的字典辞书也要应用部首检字的方法。由此可见《说文》一书在中国字典学史上地位之重要。

《说文》在唐代虽然传习不废，但善写篆书的不多。代宗大历年间李阳冰善于规摹李斯小篆，并刊定《说文》，修正笔法，而臆说颇多。到南唐时徐铉、徐锴兄弟二人精究《说文》，徐锴作注，名为《说文解字系传》，凡40卷，详解许书，并纠正阳冰之误。南唐亡，徐铉入宋，于宋太宗雍熙初奉诏校定“说文”。将原书15卷各分上下。《说文》传本旧有后人所加音读，互有异同，徐铉改用唐代孙愐《唐韵》反切为定。经传古籍通用字有不见于《说文》的也作为“新附字”增入。书成奏上，由国子监雕板传布。今日所见《说文》，除《说文解字系传》外，有徐铉校定本（图1）。徐铉本通称大徐本，徐锴本通称小徐本。两本文字的次第略有不同。大徐本有《四部丛刊》影印宋本。原本为汲

古阁书,后归王昶,又归陆心源,今归日本东京静嘉堂文库。大徐本还有清代覆刻本,以孙星衍《平津馆丛书》原刻本讹字较少。同治间番禺陈昌治覆刻孙星衍本改为一篆一行,检索最便,有中华书局影印本,并附有索引。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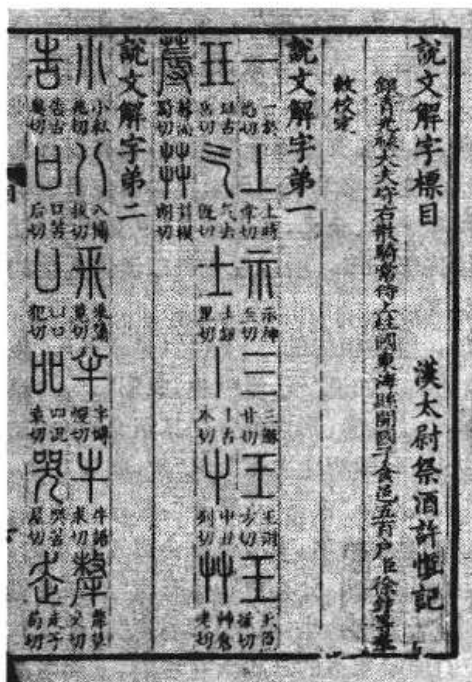


图1 徐铉校本
《说文解字》

锴书除《四部丛刊》影印述古堂抄本外,以清代祁雋藻翻刻影宋本最善。

《说文》尚有唐写本木部残卷一卷,存188字,清同治间莫友芝曾覆刻传世,并加笺识案语,名为《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笺异》(图2)。原件现藏日本大阪杏雨书屋。另又有口部数字,也是唐本,似为日人摹本。以木部残卷而论,



图2 《仿唐写本说文解字》

胜于大徐本处甚多。又徐锴编有《说文解字韵谱》一书,按唐本《切韵》韵次编排《说文》文字,徐铉又按唐代李舟《切韵》改订。意旨在于取便检查,稍具训诂而已。南宋时,李焘又有《说文解字五音韵谱》,依据宋代韵书编列,始“东”终“法”。三种韵谱都有传刻本。

《说文》中保存大量古字古义,为研究

的《说文句读》,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四家。

段玉裁从校勘刻本文字,考究许书体例入手,对全书详加注解,引据经传诠释许说,以许慎所加字义为字之本义,进而推衍其引申义、假借义,并定其古韵部属。考证详明,博大精深,创见极多,但也不免有武断处。

桂馥的《义证》意在证明许说,首先博引群书诂训,或数义,或十余义,依次序列,兼收详载,不加案断,供学者参订。然后别起,解说许书原文,厘订二徐讹误,资料丰富,条理秩如,极便参考。

王筠的《句读》在段、桂两家之后,就以段、桂所注和其他学者所论博观约取,取其精当处录出,而又略有增易更正,以便学者诵习。王筠又作有《说文释例》一书,专为解释许书体例而作。

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改变编排方法,以古韵十八部为纲领,同部的按不同谐声声旁分别排列,声旁相同的字顺序列在一起,改换了《说文》原本的次序,除解说许慎的训释以外,旁及字义的引申和假借,并且在许书原有的文字之外另附汉魏以前书中所见的字,以当补阙。

这四家的书各有特点,对文字学和训诂学都有极大的贡献。清人研究《说文》的著述极多。近代丁福保曾搜集所有关于《说文》的著述,不论卷帙多寡,汇总集为一书,名为《说文解字诂林》,举一字而众注俱在,极便研究。正编之外又有续编,搜罗不遗余力,琅玕珠玉,巨细不遗,可以说是许学渊海了。(参见彩图插页第9、14页)

(周祖谟)

Shuowen Shenglei

《说文声类》 利用谐声研究古韵的专书。清代严可均(1762~1843)著。

本书把古韵分为16部,即:一之、二支、三脂、四歌、五鱼、六侯、七幽、八宵、九蒸、十耕、十一真、十二元、十三阳、十四东、十五侵、十六谈,把《说文》所收正篆和重文全部分列在16部之中。编排体例是先标出古韵,在古韵下标出相应的《广韵》韵目,并指出与本部对转的古韵部。以之部为例。“之类第一:《广韵》平声之咍,上声止海,去声志代,入声职德,古音合为一类。与蒸类对转。”然后以谐声偏旁为子目,把同一谐声偏旁的字排列在一起,列出这一部所属的字。如从“之”得声,列有“芝”、“寺”等字,从“司”得声,列有“祠”、“嗣”、“笥”等字。今本《说文》缺漏的字,字外加“□”号做标记,并说明增补根据。例如:“𠂔,今《说文》无此字。《文选》阮籍《咏怀诗》注,《古诗十九首》注引有之”。作者认为古音应当在这一部而今音转入另一部的,字外加“○”号做标记。例如:“𠂔,读若纠。入宵类”。各韵部末尾标出该部的字数。

在严氏此书之前,戴震在《答段若膺论韵》中曾经提出过编写这一类书的设想,但未能实现。后来有好几个人编写这一类书,《说文声类》是比较好的一部。严可均在自序中说:“夫而后,群经有韵之文皆可读,古人假借之法无不包矣。”虽然有些夸大,但此书对查检或观察谐声与古韵的关系确实提供了很大方便。(谢纪锋)

Shuosijiwujie'er

捌思吉斡节儿 (Chos-kyi hod-zer) 中国元代蒙古语文学家、翻译家。约13世纪下半叶~14世纪上半叶在世,生卒年不可考。原名达麦多吉(Bdag-med rdo-rje,意为“无我金刚”),法名捌思吉斡节儿(Chos-kyi hod-zer,意为“法光”)。曾拜喇嘛教萨迦派第五代祖师八思巴为师。元成宗朝受皇家供养,仁宗朝为国师。著有《蒙文启蒙》(直译为“心耳”)一部,为回鹘式蒙古文规范奠定了基础,常为后世蒙古语文学家称引。原书已亡佚。据清代雍正年间成书的《蒙文启蒙诠释》记载,捌思吉斡节儿奉元武宗(海山)之命,首次用蒙古语翻译佛经。由于当时回鹘式蒙古文规范尚不完备,捌思吉斡节儿特为翻译佛经制订了新的正字规则。从《蒙文启蒙诠释》阐述的《蒙文启蒙》主要内容来看,捌思吉斡节儿明确地把回鹘式蒙古文字母区分为元音、辅音两大类。他认识到元音和谐律的存在,进一步把元音字母分成阳性(紧)、阴性(松)、中性(或紧或松)3组。列举了123个开音节和可以出现在闭音节末尾的11个辅音。在语法方面,对8种格的形式和所表示的主要意义以及各种助词的用法都一一举例加以说明。因此,这部著作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用价值。捌思吉斡节儿除用蒙古语翻译过《五守护经》、《十二因缘经》等佛经外,还把印度学者寂天的哲学著作《入菩提行论》译成蒙古文,并著《入菩提行论疏》。

(道布)

Silafu yuzu

斯拉夫语族 (Slavic group) 印欧语系的一个大语族,主要分布于欧洲和亚洲,使用人口逾2.5亿。斯拉夫语族各语言源于原始共同斯拉夫语,分3大语支:东部语支,包括俄语、乌克兰语、白俄罗斯语;西部语支,包括捷克语、斯洛伐克语、波兰语、卢萨提亚语(分上卢萨提亚语和下卢萨提亚语);南部语支,包括保加利亚语、马其顿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和斯洛文尼亚语。其中保加利亚语和马其顿语比较接近,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和斯洛文尼亚语比较接近。东部语支诸语言在14世纪以前只是共同东斯拉夫语的方言,14世纪以后分裂为3种独立语言。塞尔维亚语和克罗地亚语在19世纪初叶统一成一种语言。

斯拉夫语族诸语言比较相近,但是有些语言由于受邻近语言的不同影响,产生了不同的变化:捷克语有很多日耳曼语的借入成分,斯洛伐克语有很多匈牙利语的借入成分,保加利亚语中有很多土耳其语的借入成分。在共同斯拉夫语时期,词重音是不固定的。在现代,东部语支各语言的词重音仍不固定。西部语支的捷克语和斯洛伐克语中词的重音固定在第一音节上,波兰语词的重音固定在倒数第二音节上。斯拉夫语中只有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有乐重音,在重读音节上有升调和降调,用以区别不同词或不同的词形。在形态上,除保加利亚语和马其顿语外,斯拉夫语言的名词和代词都有格的变化。古代斯拉夫语言原有双数范畴,现仅存于斯洛文尼亚语和卢萨提亚

语中,其他斯拉夫语言中已经消失。保加利亚语、马其顿语、卢萨提亚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的去时一般过去时、完成过去时和未完成过去时,其他斯拉夫语言都只剩一种过去时。东部语支的3种语言以及保加利亚语、塞尔维亚语、马其顿语使用基里尔字母,西部语支的各种语言及克罗地亚语、斯洛文尼亚语使用拉丁字母。

(伍铁平)

Siluofakeyu

斯洛伐克语 (Slovak language) 捷克斯洛伐克的两种官方语言之一(另一种是捷克语)。属印欧语系斯拉夫语族西支。分布于斯洛伐克。使用人口约600万(包括在美国、加拿大、匈牙利、南斯拉夫等国的斯洛伐克人约100万)。

19世纪40年代,斯洛伐克语规划者、文学家L.什图尔(1815~1856)把斯洛伐克语中部方言加以规范化,称“什图尔斯洛伐克语”。经协商与修改,于1851年被宗教界与文化界多数人士认可为共同书面语。1863年,在马丁城建立的斯洛伐克联谊会决定推广什图尔斯洛伐克语。此后,随着使用范围的扩大,什图尔斯洛伐克语逐渐成为斯洛伐克各阶层公认的全民族标准语。

斯洛伐克语有3个方言群。西部斯洛伐克各方言跟捷克语中的摩拉维亚方言很接近,中部斯洛伐克各方言含有斯拉夫语南支语言的一些特点,东部斯洛伐克各方言则跟波兰语和乌克兰语有共同点。斯洛伐克语语音的特点是辅音多,特别是擦音和塞擦音多。除了有唇音、齿音和软腭音三套辅音外,还有一系列特殊的腭塞音。斯洛伐克语属综合型语言,使用词缀、元音交替、辅音交替表示语法意义,广泛使用添加前、后缀的方法构成新词。词汇中保留着源自斯拉夫语、波罗的语诸语言的常用词。文艺复兴时期以后,吸收了来自西欧各种语言,特别是德语和法语的借词。

斯洛伐克语使用拉丁字母和附加符号,词的拼写与实际发音一致。

(朱伟华)

Siluowenniyayu

斯洛文尼亚语 (Slovenian language) 南斯拉夫的3种官方语言之一(另两种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和马其顿语)。属印欧语系斯拉夫语族南支。分布于南斯拉夫西北部的斯洛文尼亚,以及匈牙利、奥地利和意大利三国与南斯拉夫接壤的地区,使用人口约200万。

斯洛文尼亚语源自古斯拉夫语。最早的文献见于10世纪。19世纪初叶,在以卢布尔雅那市为中心的中央方言基础上,形成统一的现代斯洛文尼亚标准语。斯洛文尼亚语有5个元音,20个辅音,采用25个拉丁字母作为相应的表音符号。标准语言有三种形式的词重音:长扬重音(´)、长抑重音(˘)、短重音(`)。斯洛文尼亚语是屈折型语言。名词有7个格:主格、属格、与格、宾格、呼格、工具格、前置格,分单数、双数、复数。动词有过去时、过去先行时、现在时和将来时。

(黄雨辰)

Sitanta'er

斯坦塔耳, H. (Heymann Steinthal 1823~1899) 德国语言学家。1823年5月16日生于格罗布兹格, 1899年卒于柏林。1863~1899年任柏林大学教授。他是语言学民族心理学派的代表之一。他认为言语是精神活动, 语言学属于心理科学。他追随 W. F. 洪堡特, 强调语言表现出民族精神的自我意识、世界观和逻辑, 民族的统一性和独特性首先反映在语言中。这些观点影响了新语法学派的早期研究。斯坦塔耳认为语言起源于拟声。他还传播洪堡特的类型语言学, 并加以修改, 但他个人的意见不为后人所重视。他的著作有《语法、逻辑和心理学》(1855)、《语言的起源》(第4版 1888)等。

(姚小平)

Siwaxiliyu

斯瓦希里语 (Swahili language) 又称基-斯瓦希里语(Ki-Swahili)。非洲东部和中部的通用语言。分布地区除坦桑尼亚和肯尼亚外, 还有乌干达、赞比亚、扎伊尔、卢旺达、布隆迪、马拉维、莫桑比克、索马里等国和东非沿海一些岛屿。属尼日尔-科尔多凡语系尼日尔-刚果语族贝努埃-刚果语支, 是这个语系中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 共约5000万。斯瓦希里语有十余种方言, 但不影响其为共同交际语。东、中非各国独立以后, 由于官方广泛采用, 斯瓦希里语得到很大发展, 有成为整个东非、中非地区通用语的趋势。

斯瓦希里语有 a、e、i、o、u 5 个元音, 辅音有 b、d、f、g、h 等 26 个。音节一般为元音结尾的开音节, 单词重音落在倒数第二个音节上。语法方面, 名词分为 8 类, 单、复数的变化在词首而不在词尾; 指示代词、物主代词、形容词等都随名词的类别和单、复数而变化, 各类名词有主语前缀和宾语中缀。动词变化较复杂, 有趋向式、使役式、状态式、反义式等。斯瓦希里语中的基本语词大多数是多音节的; 阿拉伯语语词约占 30%, 但按斯瓦希里语的规律变化。近百年来还借用有关现代文化内容的印欧语系语词。句子的结构是主语—主语前缀—时态—宾语中缀(有时省略)—动词—宾语。斯瓦希里语原来用阿拉伯字母拼写, 最早的文献见于 12 世纪。19 世纪中叶以后, 阿拉伯字母逐渐为拉丁字母所取代。

(沈志英)

Siwelta

斯维特, H. (Henry Sweet 1845~1912) 英国语言学家。1845年9月15日生于伦敦, 1912年4月30日卒于牛津。

1864年斯维特在海德堡大学读书, 学会了当时德国的语文研究方法。1869年进英国牛津大学。毕业后, 1901年任牛津大学讲师, 并以此终其身。

斯维特的最大贡献在语音研究方面。他是英国语音学派的创始人, 并且是现代语音学的奠基人之一。从1873年起, 他研究丹麦、俄罗斯、荷兰、葡萄牙、北威尔士、瑞典等语言的语音。他熟习 A. M. 贝尔的图像标音法(名为

“可见语言”), 但认为它太复杂难写, 另创“罗密克”标音法, 以拉丁字母标音, 最初采取严式, 后改宽式。这种宽式标音法, 就是现在所谓音位标音法。他与波兰学者 J. N. 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同时提出了音位的概念, 不过斯维特不用“音位”这个名称。他还与法国学者 P. 帕西等合作, 成立国际语音协会, 创制国际音标, 发行会刊《语音教师》。1877年他写了《语音学手册》, 1908年又写了《英语语音》。

在古英语研究方面, 斯维特在当时是首屈一指的。1867年, 他读到了丹麦语言学家 R. K. 拉斯克写的《盎格鲁-撒克逊语法》英译本, 对古英语发生兴趣。1871年, 他在英国语文学会会刊上发表谈古英语的文章。1876~1878年, 他研究古英语时期的各地方言, 写出了一些论文。1878~1885这8年间, 他专心研究古英语, 出版了《古英语文献选读》(1876)和《最古英语文献》(1885)。由此欧洲大陆学者公认他为英国最出色的语文学家。1897年他编成了《古英语学生词典》, 所下定义准确明了, 至今仍有价值。

1885年后, 斯维特主要研究英语语法和普通语言学理论。1892~1898年他出版《新英语语法》, 指出古英语时期是形态完整时期, 中古英语时期是形态削减时期, 近代英语时期是形态消失时期。由于词形变化越来越少, 他断定, 讲近代英语语法, 不能不着重逻辑和意义方面的问题。1900年他写了《语言的历史》, 内容简要, 议论精辟。他以严格的语音描写为基础, 并区分口语体和书面语体。他的《语言实用学习法》(1899)一书既有系统, 又富于启发性, 现在评价仍然很高。

见国际语音协会、帕西、拉斯克。

(刘世沐 廖秋忠)

Si Ge Minnan Fangyan

《四个闽南方言》 (Fouth South Min Dialects)
见汉语方言。

sisheng

四声 指汉语平上去入4个声调。南朝时期, 汉族人发现自己语言里有4个声调, 就给它起个总名叫“四声”。这种分类主要是看一个音节的调子是高、中、或低; 调形是升、平、或降。日本释了尊《悉曇轮略图抄》说: “四声本来无定, 一音低昂成异。”不过从现代方言看, 入声字音节末尾有塞音, 主元音也相应地短些。推测四声论初起的时候, 大概也一样。

这4种声调在当时的调值是什么, 这需要逐个说明。首先, 去声是低平调, 这是由梵汉对音推测出来的。梵文有3个调: 高平、低平、高降。在梵汉对音中, 总是用低平调对译低调音节, 特别是专门造了两个去声字“憊”“𪛗”, 对译 kṣamā、dāksina 两个词里的低调音节; 在六朝时期, 用“夜”、“𪛗”等去声字对译名词词尾的低调音节。由此可知, 从后汉到六朝, 去声一直是低平调。

其次, 上声是高平调。日本释安然《悉曇藏》引道暹

《记》说：“古‘脚’等廿五字，并下八字，总有三十三字……皆须上声读之，不可着其字而为平、去、入也。”这里的“字”是指字母，这是说念字母要用上声，而梵文字母恰好读高平调。失名译《阿弥陀佛说咒》，用“那上谟善上陀夜”对译 nāmōbuddhāya，凡是标明“上”的，都是对译高平调音节。由此可知，上声是高平调。上声的“上”不能理解成“升”。

再次，平声是中平调。“悉昙集记”附《林记》（宗杲著）说：“上声平声高下虽异，二音相类，以为一类。《韵诠》之意，专同此耳。”这是说，平声比上声低。释了尊引《元和新声谱》说：“平声者哀而安，上声励而举，去声清而远。”只有入声调值不清楚。

在现代北京音里平声分裂成“阴”、“阳”两类，上声去声保留，入声消失了。人们也把“阴、阳、上、去”叫四声。别的方言里也有这种情况，这都是术语借用。

（俞 敏）

Shisheng Shiyuanlu

《四声实验录》（Record of Experiments on the Four Tones）用语音实验仪器研究汉语方言声调的著作。刘复（1891~1934）著。1924年3月上海群益书社印行，1950年北京中华书局重印出版。书名上的“四声”是汉语声调的统称，所实验的方言的声调不限于四声。该书实验的方言共12处：北京、南京、武昌、长沙、成都、福州、广州、潮州、江阴、江山、旌德、腾越（今腾冲）。内容除“引言”外，分7个部分。第1部分“声音的断定”，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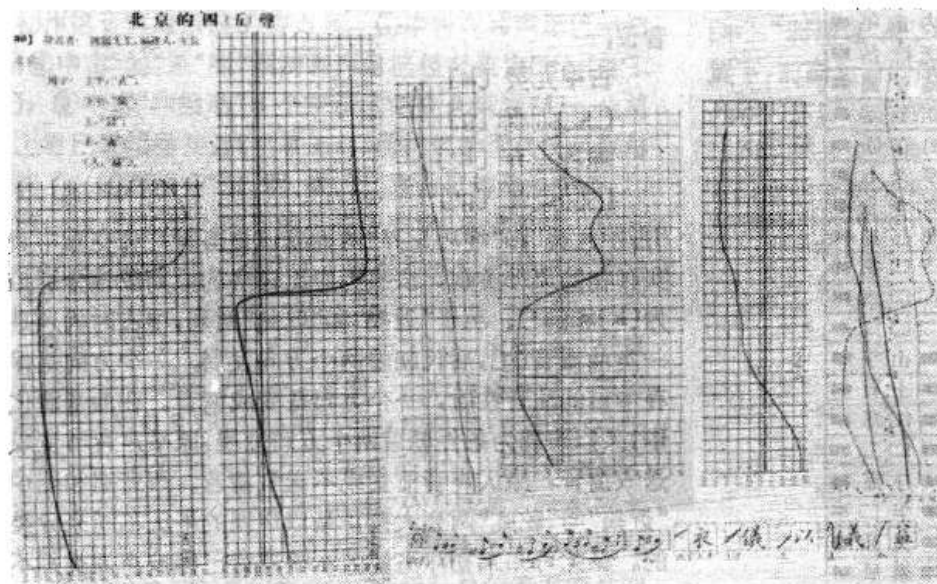
总图，总图后有一个五线谱图，接着是一组“标音符号”，画在所举的例字旁边。第7部分“余论（今日以前的四声论）”，搜集了历代和当时比较重要的关于四声的论述。本书在理论方面，特别是对乐理讲得很透彻；在实践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从调值来看，有许多声调曲线都不能反映真实情况；从调类来看也有一些错误。尽管有缺点，但在中国以实验语音学的方法研究声调，并写成专著的，《四声实验录》是首创。在它的影响下，罗常培的《临川音系》（1941）、王力的《博白方言实验录》（1931）等都是用刘复实验声调的方法确定声调的读音。（汤珍珠）

Songchu Bian-Luoyin

宋初汴洛音 指宋代初期即11世纪中叶中国开封（汴），洛阳（洛）地区的汉语语音系统，也就是当时汉民族准共同语的语音系统。

考求宋初汴洛音的书面材料 主要有宋初洛阳学者邵雍（1011~1077）的《皇极经世书》里的“声音唱和图”。邵雍祖籍范阳（今河北省涿县），30岁以后迁河南洛阳，是北宋初期唯心主义哲学家。他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由所谓“心”产生的。“心”是先天存在的绝对精神，又叫“一”。“一”产生“二”，“二”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没有形质的“神”。“神”产生“数”，从“数”的推演出发，不但可以说明过去和现实世界的万事万物，而且可以推测未来世界的治乱兴衰和人事的吉凶祸福。这就是他的哲学思想的核心，叫做象数学。邵雍把许多自然现象都纳入他的象数理论体系之中加以比附，用来推演世事。声音也是被纳入象数理论体系中的自然现象之一。邵雍认为语音包括宇宙间的一切声音。语音既无所不备而数又无所不包，所以可以用语音来表现数，用语言的变化关系来体现数的变化关系。因此从语音出发，就可以通过数的折合来推知万事万物的盛衰。为了数的需要，邵雍把他当时能辨别出来的语音特征全部加以分类，按“开发收闭”、“平上去入”等类别，分别与“水火土石”、“日月星辰”等自然现象相比附，列音排字以备推演。《皇极经世书》卷七到卷十就是专讲这些的。这4卷，每卷4篇，每篇两图，上下各一，共32个图。每篇的两个图中，上边一个

叫声图，下边一个叫音图。“声”指韵类，“音”指声类。这是邵雍自造的音韵术语。他把上边的“声”和“天”相比附，把下边的“音”和“地”相比附，称为“天声”、“地音”。“天声”和“地音”相唱和可以产生万音，因此称为“声音唱和”，也就是声韵互相拼合的意思。根据上述象数学的原理和邵氏用语音来代表数的用意可以推知，声音唱和图是一个象数的语音系统，既包括当时当地实际使用的语音/也包



《四声实验录》中的一页

物理学的角度说明“声浪”、“音的长短”、“音的强弱”、“音的本质”。第2部分“语音和乐音”，从语音与乐音的不同说明四声是高低的差别，指出了四声的基本条件。第4部分“计算及作图”和第5部分“声音与对数”，说明用精密的方法计算浪纹计上所画出的浪纹，并按数据画出图。第6部分“已实验的四声”，是12处方言声调的记录，某处方言有几种声调，就画出几张分图，然后把分图汇合成一张

叫声图，下边一个叫音图。“声”指韵类，“音”指声类。这是邵雍自造的音韵术语。他把上边的“声”和“天”相比附，把下边的“音”和“地”相比附，称为“天声”、“地音”。“天声”和“地音”相唱和可以产生万音，因此称为“声音唱和”，也就是声韵互相拼合的意思。根据上述象数学的原理和邵氏用语音来代表数的用意可以推知，声音唱和图是一个象数的语音系统，既包括当时当地实际使用的语音/也包

括若干当时当地实际语音中并不使用的音。邵雍原有的32个图不易看懂。今本《皇极经世书》有正声和正音总图，是后人为了邵雍32图作的纲领性的总音表(原书错字现已改正)。

正声图

	平	上	去	入
	日	月	星	辰
一	辟	日	多	可个舌
一	翕	月	禾	火化八
一	辟	星	开	率爱○
一	翕	辰	回	每退○
二	辟	日	良	两向○
二	翕	月	光	广况○
二	辟	星	丁	井亘○
二	翕	辰	兄	永莹○
三	辟	日	千	典旦○
三	翕	月	元	犬半○
三	辟	星	臣	引艮○
三	翕	辰	君	允霁○
四	辟	日	刀	早孝岳
四	翕	月	毛	宝报霍
四	辟	星	牛	斗奏六
四	翕	辰	○	○玉
五	辟	日	妻	子四日
五	翕	月	衰	○帅骨
五	辟	星	○	○德
五	翕	辰	龟	水贵北
六	辟	日	官	孔众○
六	翕	月	龙	雨用○
六	辟	星	鱼	鼠去○
六	翕	辰	乌	虎兔○
七	辟	日	心	审禁○
七	翕	月	○	○十
七	辟	星	男	坎欠○
七	翕	辰	○	○姜
八	辟	日	●	●●●
八	翕	月	●	●●●
八	辟	星	●	●●●
八	翕	辰	●	●●●
九	辟	日	●	●●●
九	翕	月	●	●●●
九	辟	星	●	●●●
九	翕	辰	●	●●●
十	辟	日	●	●●●
十	翕	月	●	●●●
十	辟	星	●	●●●
十	翕	辰	●	●●●

正音图

	开	发	收	闭
	水	火	土	石
一	清	水	古	甲久癸
一	浊	火	□	□近揆
一	清	土	坤	巧丘弃
一	浊	石	□	□乾虬
二	清	水	黑	花香血
二	浊	火	黄	华雄贤
二	清	土	五	瓦仰□
二	浊	石	吾	牙月尧
三	清	水	安	亚乙一
三	浊	火	□	□交王寅
三	清	土	母	马美米
三	浊	石	目	貌眉民
四	清	水	夫	法□飞
四	浊	火	父	凡□吠
四	清	土	武	晚□尾
四	浊	石	文	万□未
五	清	水	卜	百丙必
五	浊	火	步	白备鼻
五	清	土	普	朴品匹
五	浊	石	旁	排平瓶
六	清	水	东	丹帝■
六	浊	火	兑	大弟■
六	清	土	土	贪天■
六	浊	石	同	覃田■
七	清	水	乃	姝女■
七	浊	火	内	南年■
七	清	土	老	冷吕■
七	浊	石	鹿	竿离■
八	清	水	走	哉足■
八	浊	火	自	在匠■
八	清	土	草	采七■
八	浊	石	曹	才全■
九	清	水	思	三星■
九	浊	火	寺	□象■
九	清	土	□	□□■
九	浊	石	□	□□■
十	清	水	■	山手■
十	浊	火	■	土石■
十	清	土	■	□耳■
十	浊	石	■	□二■
十一	清	水	■	庄震■
十一	浊	火	■	乍□■
十一	清	土	■	又赤■
十一	浊	石	■	崇辰■
十二	清	水	■	卓中■
十二	浊	火	■	宅直■
十二	清	土	■	垢丑■
十二	浊	石	■	茶呈■

天声图上的“平上去入”指的是4种调类，按《切韵》音系或今天仍然保存着入声调类的方言，如粤方言、吴方言以及官话方言中的某些次方言来读，系统是很清楚的。地音图上的“开发收闭”大体相当等韵中的4个等次，但并不完全一致。“辟翕”的意思是开合。“清浊”的意思是不带音

和带音(一说指阴阳调类)。“日月星辰”和“水火土石”是用来跟语音“平上去入”和“开发收闭”相比附的自然现象。“天声”有10个小图，是因为“天干”之数10；“地音”有12个小图，是因为“地支”之数12。这也是为满足象数学的理论要求而硬性规定的语音类别，用来凑足整齐划一、各有定位的局面。为此，按当时当地可以发出来的语音定位，凡有音无字的韵类就用○来代表，有音无字的声类就用□来代表。此外还有许多位次按当时当地的实际语音系统不可能发出音来，韵类的位次就用●来代表；声类的位次就用■来代表。象数学家的许多神秘观念可以不必深究，但是从这种理论中可以看出他们对天地万物都追求一个以四分法为原则的整齐、配套的“正”的境界。语言也不例外，一切都是万古不易的自然安排。因此他们的象数语音系统中就应该有天声160位，地音192位，两数相乘应得30720个音。这就是天声、地音所代表的象数语音系统中包含着的天地间的正音的总数。从这两个图所表示的音的位次入手，同时参考其他历史资料 and 现代方言材料，按照汉语语音发展规律仔细分析，就可以大体求出宋初汴洛音的原貌来。

宋初汴洛音的声母系统 地音12类，每类4列，应得48声类。减去“九音”中无音无字及有音无字的土、石两列，共得46声类。但实际并没有那么多。以“一音”的4列为例，按唱和图的语音格局应该是4个舌根音声母。因为无论从中古音系看还是从日本借音看，这4列字都是舌根音类。所以按声音唱和图所规定的音韵位置来揣度邵雍本意，应该是下列这样4行互相对立的舌根塞音位：

古甲九癸 [k]

□□近揆 [g]

坤巧丘弃 [k']

□□乾虬 [g']

“古甲九癸”和“坤巧丘弃”两列应该是当时社会交际中真实存在的声母类别，按照历史比较法的原则应该分别拟为[k]和[k']。至于“近揆”和“乾虬”两列，中古时代只是一类浊塞音[g]，后代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方向是保存中古的浊音性质，一个方向是变成清音。在浊音清化中，又以声调为条件朝着两个方向发展：原平声音节变成送气清音，原仄声音节变成不送气清音。声音唱和图中“近揆”与“乾虬”两列大概正是以声调的平仄不同来分类的。据此可知宋初汴洛地区舌根塞音已经按声调类别不同分化为送气与不送气的两种清音。从历史上看这两列音都是浊音，所以邵雍都列入“浊”的一类。但是按当时实际语音看可能都是清音，但有送气与不送气之别，所以一分为二，以不送气的“近”列接配不送气的“古”列；以送气的“乾”列接配送气的“坤”列。这样处理就填满了象数学上所要求的四分法。所以“近”、“乾”两列字的处理法是历史上的类别和宋初实际语音类别混合的产物，按实际语音应该把“近”、“古”两列合并，把“乾”、“坤”两列合并。这就排除了四分法中舌根塞音的支离现象，实际语音中的

舌根塞音声母应该归并为下列的两类:

[k] 类: 古甲九癸近撰

[k'] 类: 坤巧丘弃乾虬

邵雍为迁就理论把舌根塞音强分 4 列, 并非杜撰而实有其语音背景。从现代方言看, 浊塞音的送气与否虽不能构成辨义的对立音位, 但确有 [g]、[g'] 这两种发音法。邵雍看到这种不同的发音, 就用来作为填充四分法空位的手段。此外梵文的舌根塞音是四分的。从理论上讲, 邵雍的 4 列和梵文的 4 类正好相当:

“古”列~迦[kā]

“坤”列~哇[kha]

“近”列~伽[gā]

“乾”列~重音伽[gha]

邵雍的学说来自其父邵古, 邵古曾受业于僧徒, 因此这种四分法的语音配列, 也许受僧徒影响。

通过上述这种语音考古程序, 考求出的宋初汴洛音声母系统大体如下:

双唇音 p(卜)p'(普)m(目)

唇齿音 ɱ(文)f(夫)v(武)

舌尖前音 ʈ(足)ʈ'(草)s(思)

舌尖中音 t(东)t'(土)n(乃)l(老)

舌尖后音 ʈ(照)ʈ'(赤)ʂ(山)ʐ(耳)

舌面前音 ɲ(二)

舌根音 k(古)k'(坤)ŋ(吾)x(花)ɣ(五)

零声母 ʔ(安)

宋初汴洛音声母系统的特点是: ①中古全浊声母已经清化; ②中古“知”系“照”系两种声母已经合流为 [ʈ]、[ʈ']、[ʂ]; ③中古“非敷奉”3 个声母已完全合流为 [f]。从总体上看已经相当接近《中原音韵》所代表的近代汉语声母系统了。④次浊音“疑、明、微、泥、来、日”等母一分为二, 一清一浊, 而且列入浊音的全是上声字, 条例分明, 应当是有语音作基础的, 只是还不能确定它们的音值究竟是什么。

宋初汴洛音的韵母系统 天声 10 类, 排除虚位后只得 7 类。这 7 类按现代各方音看, 系统大体不乱。每类之中一二(即日月)两列较洪, 三四(即星辰)两列较细。如“二声”一二两列为 [aŋ], 三四两列为 [əŋ]。[a] 洪 [ə] 细。同是洪音或细音, 内部又按“辟翕”分为两类, 按邵雍本意, “辟”类没有介音 [u], “翕”类有介音 [u]。对比传统的“十六摄”, 一个“声”可以包含几个“摄”。总的看系统是清楚的。其中不整齐的地方往往反映着当时语音上的变化。这是考求宋初汴洛音韵母系统的重要线索。以“一声”为例:

平 上 去 入

辟 多(果歌开一)可(果哥开一)个(果箇开一)舌(山薛开三)

翕 禾(果戈合一)火(果果合一)化(假衞合二)八(山黠开二)

辟 开(蟹咍开一)宰(蟹海开一)爱(蟹代开一)

翕 回(蟹灰合一)每(蟹贿合一)退(蟹以合一)

按中古音系看, “多可个”属果摄开口一等字, “禾火”属果

摄合口一等字。天声图把它们排成一个大类的“辟翕”两列, 系统秩然。只有“化”字特殊, “化”属合口字, 应列入“翕”类, 而且属假摄衞韵二等, 今音也与“禾火”不同。但天声图既把它们归为一列, 可见当时一二等韵读音的差别已经不存在了, 按日本汉字音看, 这些字的主要元音都是 [a]:

多 多少/たしょう (多~た~[t'a])

可 可能/かのう (可~か~[k'a])

个 個所/かしょ (個~か~[k'a])

禾 禾苗/かびょう (禾~か~[k'a])

火 火災/かさい (火~か~[k'a])

化 化学/かがく (化~か~[k'a])

据此可知这两列字的主要元音必读 [a]。再按“辟翕”的规定, “多可个”的韵母应该拟为 [a], “禾火”的韵母应该拟为 [ua]。另外两列: “开宰爱”是蟹摄开口一等字, “回每退”是蟹摄合口一等字。天声图分列一个大类中的“辟翕”两列也很整齐。按日本汉字音看这些字的主要元音也是 [a], 此外, 还有韵尾 [i]:

开 開明/かいてい (開~かい~[k'ai])

宰 宰相/さいしょう (宰~さい~[sai])

爱 愛読/あいどく (愛~あい~[ai])

回 回復/かいふく (回~かい~[k'ai])

每 毎毎/まいまい (毎~まい~[mai])

退 退席/たいせき (退~たい~[t'ai])

据此可知宋初汴洛音中上述两列字的韵母“开宰爱”是 [ai], “回每退”是 [uai]。按照语音规律, 在这样的语音配置下, 前高元音韵尾容易使主要元音变细一点, 所以这两列音的实际音感应该是 [æi] [uæi]。天声图把它们排在三四两列是完全合乎图旨的。经过上述的语音考古程序, 可以求出宋初汴洛音的韵母系统如下:

a	ia	ua	
i	i	ui	
		uei	
		u	y
ai		uai	
au	iau	(uau)	
aŋ	iaŋ	uaŋ	
əŋ	iəŋ	uəŋ	yəŋ
		uŋ	yŋ
an	ian	uan	yan
ən	iən	uən	yən
am	iam		
	im		

宋初汴洛音韵母系统的特点是: ①中古一二等韵合流, 三四等韵合流, 大体已出现“四呼”的格局。②中古止摄某些细音字已经变洪, 出现了舌尖元音 [ɿ] (即 [ɿ]、[ɿ] 二音)。

宋初汴洛音的声调系统 仍然是“平上去入”四类, 但实质上有许多演变 (一说“平上去”各分阴阳调, 再加

“入”声，共四声七调），主要是入声的[-k]尾和[-t]尾消失和浊上声字变成去声字。自《切韵》系韵书按四声排列韵目，都把入声韵和阳声韵联系在一起而不和阴声韵联系。也就是让收[-p、-t、-k]尾的入声韵和收[-m、-n、-ŋ]尾的阳声韵，按主要元音相同、韵尾发音部位相同的关系，四声相承来排列。如《切韵》音系的：

平	上	去	入
东 [-uŋ]	董 [-uŋ]	送 [-uŋ]	屋 [-uk]
仙 [-en]	猕 [-en]	线 [-en]	薛 [-et]
山 [-æn]	产 [-æn]	衲 [-æn]	黠 [-æt]
侵 [-em]	寝 [-em]	沁 [-em]	缉 [-ep]

这4列韵目，按读音看是：[-uŋ]~[-uk]，[-en]~[-et]，[-æn]~[-æt]，[-em]~[-ep]。可是声音唱和图把本来收[-t][-k]尾的入声韵全部改配阴声韵。如“一声”中“舌”字本属山摄薛韵，在《切韵》音中与“仙猕线”3个阳声韵相配，在声音唱和图中却与果摄的“多可个”3个阴声韵的位次相配。“八”字本属山摄黠韵，在《切韵》音中与“山产衲”3个阳声韵相配，在声音唱和图中却与果摄的“禾火化”3个阴声韵的位次相配，由此可见在宋初汴洛地区这些入声韵已经失掉塞音尾，与阳声韵相配不协调，所以改配阴声。因为入声失掉塞音尾后事实上已经与阴声韵一致，只是发音短促（有些韵主要元音稍有变异），所以比配阳声韵协调。不过“七声”中这类收[-m]尾的阳声韵仍有“十”、“妾”这样的入声字相配，可知当时收[-p]尾的入声类还保留着。由此可见宋初汴洛地区的入声变化有快慢两种，慢的一种是收[-p]尾的，快的一种只是开尾短调。此外，原来浊声母上声字变成去声字。邵雍的时代上距作《切韵》的陆法言400年左右，下距作《中原音韵》的周德清300年左右。《皇极经世书》声音唱和图所反映的宋初汴洛音与《切韵》音有相当大的差异而与《中原音韵》音相近，处于从中古音到近代音演变的过渡阶段。

参考书目

周祖谟：《宋代汴洛语音考》，《问学集》下册，中华书局，北京，1966。

陆志韦：《记邵雍皇极经世的“天声地音”》，载《燕京学报》，第31期，19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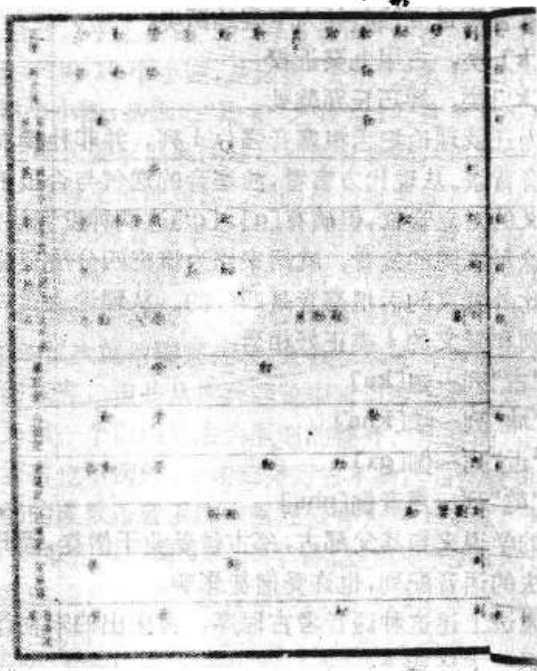
李荣：《皇极经世十声十二音解》，《切韵音系》附录，中国科学院印行，北京，1952。

（李思敬）

Song-Yuan Yilai Suzipu

《宋元以来俗字谱》（*A Glossary of Popular Chinese Characters Sinc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宋元明清简化汉字的重要资料。刘复、李家瑞编，1930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1957年文字改革出版社重印。

这本书收集了宋元明清12种民间刻本中所用的简化字6240个，计宋刊《古列女传》349个，《大唐三藏取经诗话》179个，《京本通俗小说》600个；元刊《古今杂剧三十种》963个，《全相三国志平话》385个，《朝野新声太平乐



刘复、李家瑞编《宋元以来俗字谱》

府》628个，明刊《娇红记》397个，《薛仁贵跨海征东白袍记》304个，《岳飞破虏东窗记》374个，清刊《目莲记弹词》（残）852个，《金瓶梅奇书前后部》470个，《岭南逸史》739个。其中，“宝”、“尽”、“礼”、“声”、“双”、“万”、“与”在各本都重见，“执”、“称”在11本中重见，“听”、“旧”在10本中重见，“个”、“芦”等在9本中重见。这6240个简化字合繁体字为1604字。平均每个繁体字有3.9个不同的简化字。与今天《简化字总表》相同的字有：实、宝、礼、声、会、怜、怀、揆、罗、听、万、庄、梦、阳、虽、医、凤、义、乱、皱、台、办、战、归、党、辞、断等330多个。（费锦昌）

Sugelan Gal'eryu

苏格兰盖尔语 (Scottish Gaelic, Scots Gaelic)

英国苏格兰地区凯尔特人(斯科特人)的语言。属印欧语系凯尔特语族(海岛凯尔特语)北支。斯科特人是5世纪从爱尔兰迁入的，在几百年的扩张中他们占领了大不列颠岛北部的一大片地方和赫布里底群岛。11世纪下半叶起，苏格兰逐渐内附于英格兰。16世纪时，苏格兰操盖尔语的人口占本地人口的50%，到20世纪只占1.5%。据60年代的调查，仅有8万多人还懂得这种语言。现在以盖尔语为主要语言的地方只有西部沿海的零星地点和赫布里底群岛。盖尔语内部方言分歧很大，有的地方竟要以英语为中介才能互通。

苏格兰盖尔语的许多特点和爱尔兰语相似。元音分长短，区别更细，有/e:~ε:~e/的对立和/o:~ɔ:~o/的对立。还有/ø:~ø/二音。辅音有软腭音质和硬腭音质的对立。有系统的“头音交替”现象。

盖尔语的词形变化很复杂，名词和形容词也不例外。句法上的一个特点是动词位于句首。例如 *Tha taigh againn* ‘是房子在我们’(我们有一所房子)。盖尔语中有

不少词早进入了英语词汇。例如 clann→clan(氏族), sluagh-ghairm→slogan(口号)。

苏格兰盖尔语使用拉丁字母文字, 拼写形式复杂。

(周流溪)

Suzhou Fangyan Dituji

《苏州方言地图集》(*Maps of the Suzhou Dialect*) 见汉语方言地图。

Sullwen

粟利文 (Sogdian language) 又称粟特文。古代粟利人使用的一种拼音文字, 用以记录当时流行于中亚及中国西北部的商业语言——粟利语, 也有人用这种文字书写宗教文献, 其中尤以佛经为多。这种语言属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伊朗语支, 同波斯语和古和阗语关系密切。有人认为现代苏联境内帕米尔高原的雅格诺比语即其遗存。粟利既是古代地名, 又是古代民族名和古代语言、文字名。在汉文史籍中又作粟弋、速利、孙邻、苏哩、修利、粟特等。在古波斯文和阿吠斯陀文中作 Sughda, 在巴列维文中作 Sūlik。此外, 还有 Surik, Sogd 等不同写法。粟利地处乌浒水(今阿姆河)与药杀水(今锡尔河)之间。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曾对粟利的地望和文字情况作过简要记述, 指出粟利文是一种拼音文字, 有 20 多个字母, 竖读其文。根据对中国新疆吐鲁番地区出土的粟利文残卷及其他考古材料的研究, 一般认为粟利文字母来源于叙利亚的阿拉米字母。阿拉米字母有 22 个, 粟利文借用了其中 17 个。这套字母只表示辅音, 不表示元音, 有 3 种变体: ①萨株建体, 随粟利移民传入许多地区; ②佛经体, 公元 500 年前后出现; ③草体, 最晚在 7 世纪前已出现。行款有从右向左横写和自上而下竖写两种。传世文献有摩尼教、基督教, 佛教经典和商业书信等。13 世纪蒙古族进入中亚后粟利文遂废弃。(参见彩图插页第 29 页)

(季羨林)

suming

俗名 也说俗言、俗呼。指在口头上普通说的名称。例如《尔雅·释木》:“藟, 羊枣。”郭璞注:“实小而员。紫黑色。今俗呼之为羊矢枣。孟子曰:‘曾皙嗜羊枣。’按依郭注, 羊矢枣今北方俗名‘黑枣’, 象柿子, 小而黑, 味极甜。同书《释草》‘藜、根’郭璞注:‘别二名, 俗呼韭根为藜。’”“俗”经常对“雅”而言, “雅”是接近书面的文语的, “俗”总是口头上说的。

(周祖谟)

suti

俗体 (vulgar form) 指民间手写的跟字书写法不合的汉字字体。例如, 盡作尽, 備作备, 答作答, 覓作覓, 變作变, 敵作敌, 順作顺, 獻作献。俗体字从六朝已入碑刻, 到隋唐时代俗体字更加增多。俗体字最大的特点是改变笔画, 而有的字声旁也有更改。如燈作灯, 墳作坟, 驢作驴, 遷作迁等字都是俗体。唐代颜元孙《干禄字书》

和王仁昫的《刊谬补缺切韵》里所收俗体字极多。宋元以后在戏曲小说刻板书里还经常应用一些俗体字, 其中很多字一直到现在还在应用, 有不少已作为正式的简化字。

见《宋元以来俗字谱》。

(周祖谟)

suyan

俗言 见俗名。

suji

速记 (stenography) 与文字相辅而行的一种书写系统。它是在文字书写形式不断演变的基础上, 为了适应快速书写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通常用比文字简单得多的笔画和一些缩写符号来表示语音或词语, 因而又可看作记录语言的一种快速书写方法。

欧洲速记起源于古希腊。古希腊的速记法以词为书写单位, 一个词用一个专用符号表示。要学会表示几千个词的词符才能应用。由于学习困难, 这种速记没有流传下来。古罗马拉丁文的第一个速记符号系统, 是政治家西塞罗(公元前 106~前 43)的秘书 M. T. 太罗创造的。太罗速记以拉丁文普通写法的草书笔画和一些缩写字母为基础, 开欧洲草书速记的先河。太罗用他的速记法记下了西塞罗的许多有名的讲演, 这种方法在欧洲被沿用了 1000 多年。

太罗速记的符号:

来源于普通写法的辅音符号

3 < | ~ / /
B G I N S T X

表示双字母辅音的符号

X /
ch ph

表示词的符号

^ 3 ~ /
Alius. Brevis. Non. Se

1588 年, 英国人 T. 布赖特采用几何图形的直线、圆圈和半圆弧线, 设计了一种英文速记法。这个速记系统的创制, 使中世纪宗教迫害狂中被摧残的欧洲速记得以复活。布赖特把他的速记系统献给伊丽莎白王后, 得到了出版这种速记法 15 年的专利权。此后英国又陆续出现了几种经过改进的速记系统。

1834 年, 德国的 F. X. 戈贝尔斯伯格设计了一种草书式速记, 对当时德国的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许多国家的速记法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837 年, 英国人 I. 皮特曼改进了前人的速记系统, 出版了一本《语音速记法》。它以几何式的正圆弧线和直线为基础, 采用了加粗笔画来区别两个发音近似的辅音, 把符号写在不同的位置以省去元音等方法, 因而获得了成功。皮特曼速记直到今天在英语国家中仍比较流行。

1888 年, 爱尔兰人 J. R. 格雷格(1867~1948)采用几何式椭圆弧线和斜直线, 设计了一种完全用轻线的速

3 500 字。《切韵》训解简单,有的字没有义训,《唐韵》字字有训解,而且旁证博引,比较详细。《唐韵》共 195 韵,比陆法言《切韵》多了两韵。(刘广和)

Sun Yan

孙炎 中国三国时期经学家。字叔然,乐安(今山东博兴)人。受业于郑玄,时人称为“东州大儒”。曾著《周易:春秋例》,为《毛诗》、《礼记》、《春秋三传》、《国语》、《尔雅》和《尚书》作过注,所著《尔雅音义》影响较大。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说:“孙叔然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创反语。至于魏世,此事大行。”后人据此以为孙炎首创反切,但后来发现,开始使用反切的时间早于孙炎。孙炎的《尔雅音义》今已失传。《经典释文》、《集韵》、《初学记》、《晋书音义》、《诗经正义》、《文选》李善注和《太平御览》等书里引用过孙炎《尔雅音义》的反切一百多例,从这所存不多的逸文里可以窥见它所反映的一些汉末语音现象。例如《尔雅释诂》取字下:“沈旋蒲板反,此依诗读也。孙、郭方满反”,箭字下:“郭陟孝反……孙都耗反”,《释虫》蟪字之下:“音壤,孙音囊”,等等,成为研究汉魏之际古音的可贵材料。(刘广和)

Sun Yirang

孙诒让 (1848~1908) 中国清未经学家、校勘训诂学家、古文字学家。字仲容,号籀廬,浙江瑞安人。道光二十八年八月十四日(1848年9月11日)生。同治六年(1867)乡试中举。光绪前期报捐刑部主事,签分后不久就称病归乡,专心著述。晚年有感于民智闭塞,国势衰微,颇致力于地方教育事业。光绪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1908年6月20日)逝世。

孙诒让治学的范围很广,其主要成就集中在古籍整理和古文字研究这两方面。前一方面的代表作有《周礼正义》(1905)、《墨子间诂》(1894,定本 1910)和《礼记》(1894)等书。后一方面的著作主要有《古籀拾遗》、《古籀余论》、《契文举例》和《名原》。文集《籀廬述林》(1916)也收了一些这方面的文章,如《籀文车字说》(卷三)、《毛公鼎释文》、《克鼎释文》(卷七)等。

《古籀拾遗》3 卷是订正宋代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清代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和吴荣光《筠清馆金文》这 3 种金文著录书中的考释错误的,光绪十四年(1888)刊行。《古籀余论》2 卷是订正清吴式芬《捃古录金文》中的考释错误的,成书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刊行于 1929 年。孙氏在小学和古文献方面有很深的功底。他研究金文,分析字形比较审慎,并善于利用古籍中的有关资料,成绩超过前人。《契文举例》2 卷是孙氏在光绪三十年(1904)读了刘鹗《铁云藏龟》(1903)



后所写的,1917 年由罗振玉据稿本影印出版。这是写得最早的一部研究甲骨文的专著,书中不免有很多错误,但是仍有一些值得重视的意见。

《名原》2 卷写成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刊行于民国初年。孙氏在此书中从文字学的角度总结了自己研究甲骨、金文的成果,在分析偏旁和说明字形的繁简变化等方面花了较大力量,对汉字的原始情况及演变原因也作了一些探索。近人多认为孙氏的著作代表了清代古文字学的最高水平。

参考书目

朱芳圃:《孙诒让年谱》(中国史学丛书),商务印书馆,1934。

(裘锡圭)

suolue ciyu

缩略词语 (acronyms, initialisms and abbreviations) 语言中经过压缩和简略的词语。谈话或写作中使用,以省时省力。

缩略词语可以分为:

①缩略语(acronyms),由一个词组中各主要词的一部分(通常是实词的第一个字母或第一个音节)复合而成。如 Laser (Light amplification by stimulated emission of radiation), radar (radio detecting and ranging) 和 aerosat (aerospace satellite)。

②首字母缩略语(initialisms),由一个词组中各主要词的第一个字母构成。如 PO (Post office) 和 USSR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③缩写词(abbreviations),指常用词的简便写法,缩写方式有: a. 截取词的第一个字母来代表这个词,如 C 代表 Carbonium; b. 截取词的前几个字母,如 Oct. 代表 October; c. 分别截取词中两个词素的第一个字母,如 kg. 代表 kilogramme; d. 截取词的第一个和末一个字母,如 Dr. 代表 Doctor。除上述 3 类外,近年来还出现了一些再次缩略的词语,如 ladar (激光雷达)由 laser 和 radar 构成; MSR (导弹发射地雷达)由 Missile Site Radar 构成。

缩略词语的写法通过专门的缩略语词典或一般词典已经固定。但其读音尚无确定规范。一般来说,缩略语当作普通单词发音,首字母缩略语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读,而缩写词绝大多数按原来的词读。

汉语的缩略语,又叫简称。简称是通过提取词组中的特征要素压缩而成,二三字的居多,四字以上的不多见。按其组成成分的不同,可分为 3 大类。①由原词语中的词或词素构成。两个字的缩略语如:文字改革→文改;扫除文盲→扫盲;人民警察→民警;华侨事务→侨务;清华大学→清华;人民公社→公社;科学技术委员会→科委;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社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政协。三个字的如:青年少

年→青少年,供销合作社→供销社,北京师范大学→北师大,人民代表大会→人代会,数学物理化学→数理化;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军,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文代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台;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中宣部。四个字的如: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北大附中,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清华附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亚太和联。五个字的如: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共同体。有一部分缩略语颠倒了全称的字序。如:第一女子中学→女一中;国营第三棉纺厂→国棉三厂。②由原词语中抽出各组成词中的共同成分与一个数词(或再加量词)构成。如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三好;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四个现代化;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五讲;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四美;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三热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双百方针;等等。③由简称再次缩略而成。如四个现代化→四化。

简称的结构方式一般与原词语的结构方式相同。如:“中国共产党”是修饰关系,简称“中共”也是修饰关系;“工厂矿山”是并列关系,简称“厂矿”也是并列关系;“扫除文盲”是动宾关系,简称“扫盲”也是动宾关系;“文字改革”是主谓关系,简称“文改”也是主谓关系。但个别的也有些变化,如“工业农业”是并列关系,而简称“工农业”是“工农”并列,与“业”形成修饰关系。

汉语的缩写词通过减缩词中的音节而成。如照相机→相机,劳动力→劳力,天津→津,浦口→浦。

汉语中过去没有所谓的首字母缩略语,《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文字辅助工具公布之后,这类词语才出现,如GB (Guojia Biao zhun), ZRG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文化的发展,缩略词语在各语言中都在大量增加。如有关缩略语的一部巨著《缩略语、首字母缩略语和缩写词词典》1960年第1版问世时约1.2万词条。1985年第9版已超过30万词条。缩略词语本来是为省时省力而出现的,但急剧增长的结果,适得其反:大量同形词给使用者带来不便。如《英语缩略语词典》(1979)上有17个TC,9个TCC,但《缩略语、首字母缩略语和缩写词词典》(1985)中TC已达144个,TCC已达56个。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不少学科出版了自己的缩略语词典。如《英汉电子技术缩略语与缩语词典》(1981)、《英汉计算机缩略语词汇》(1982)、《英汉工程技术缩略语词典》(1983)。

参考书目

陈建民:《现代汉语里的简称》,载《中国语文》,1963,第4期。
E. T. Crowley, *Acronyms, Initialisms and Abbreviations Dictionary*, Gale Research, Michigan, 1985.

(刘涌来)

Suoxu'er

索绪尔, F. de (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 瑞士语言学家,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奠基者。1857年11月26日生于日内瓦,1913年3月22日卒于沃洲。

生平和学术背景 索绪尔出身于日内瓦的一个学术世家,自幼爱好语言学。1876年,他进入德国当时的历史语言学中心莱比锡大学。1878年发表著名论文《印欧语的原始元音系统》,被誉为“历史语言学中杰出的篇章”。1881年在巴黎高等研究所教古代语言和历史比较语言学。1891年,他应日内瓦大学的聘请,教印欧系古代语言和历史比较语言学。1907~1912年讲授普通语言学,首创这一学科。1913年去世。去世后,他的学生C. 巴利和A. 塞什艾根据他三次讲授这门课程的听课笔记,参考遗留的手稿,整理成《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于1916年出版。



语言理论 索绪尔语言理论的要点可以概括如下:

语言和言语 人的说话既是个人的行为,又受社会的制约。索绪尔把这种现象统称言语活动。为了确切地规定语言学研究的对象,索绪尔把言语活动分成“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两部分。语言是言语活动中的社会部分,它不受个人意志的支配,是社会成员共有的,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言语是言语活动中受个人意志支配的部分,它带有个人发音、用词、造句的特点。但是不管个人的特点如何不同,同一社团中的个人都可以互通,这是因为有语言的统一作用的缘故。索绪尔进而指出,语言有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因此语言研究又可以分为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内部语言学研究语言本身的结构系统,外部语言学研究语言与民族、文化、地理、历史等方面的关系。索绪尔用下棋作比喻来说明两者的分野:下棋的规则是内部要素,至于棋戏的起源、传播,乃至制作棋具的材料、造型,都是外部要素。把木头的棋子换成象牙的,对系统无关紧要,可是增减棋子的数目就会深深影响到棋法,因为这是关涉系统的内部要素。索绪尔主张,研究语言学,首先是研究语言的系统(结构),开结构主义的先河。

语言的能指和所指 索绪尔进而论述语言本身的构造。他认为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符号由“能指”(Signifiant)和“所指”(Signifié)两部分组成。所指就是概念。能指是声音的心理印迹,或音响形象。索绪尔又指出,语言符号有两个特性:①符号的任意性,例如汉语火之所以叫huǒ,水之所以叫shuǐ,是任意的,无法论证的;②符号构成的是线性序列,话只能一词一句地说,不能几句话同时说。同时,索绪尔又有两点补充:①语言始终是社会成员每人每时都在使用的系统,说话者只是现成

地接受,因此具有很大的持续性。②语言符号所代表的事物和符号本身的形式,可以随时间的推移而有所改变,因此语言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

语言的系统性 语言的单位都是一定系统里的成员,本身是什么,要由它在系统里所处的地位决定,也即由与其他要素的关系来决定。这地位或关系就是它在系统中的“价值”。例如英语的 sheep 和法语的 mouton,它们都可以用来指羊,可是法语 mouton 同时指羊肉,而英语“羊肉”却是另一个词 mutton。因此 sheep 和 mouton 在各自系统里的价值不同。可见符号的所指不是预先规定的,而是由系统产生的。

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 在符号系统里面,最重要的是单位之间的关系。索绪尔指出,语言中的关系有“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两类。句段关系指语言的横向组合,例如词素组合成词,词组合成词组和句子。联想关系由心理的联想而产生,指语词的纵向聚合。例如“电灯”这个词会使人联想起各种以“电”起首,或者以“灯”收尾的词。

索绪尔揭示的两类关系,代表纵横两条轴线,成为每个语言单位在系统中的坐标。(见语言)

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 索绪尔创造了“共时”和“历时”这两个术语,分别说明两种不同的语言研究。他特别强调共时研究。例如现代法语的 pas(步)和 pas(否定副词)是两个词,在意义和用法方面彼此毫不相干,虽然它们在古代是同一个词。如果把这一历史事实纳入现

代法语语法,就会搞乱这两个词在现代法语中的价值,因为语言单位的价值取决于它所在系统中的地位而不是它的历史。语言学家必须排除历史,才能把语言的系统描写清楚。

学术影响 和 19 世纪不同,20 世纪语言学最显著的特点是共时描写占优势。索绪尔是实现这个转折的关键人物。他区分语言和言语,能指和所指;他指出组合和聚合的关系,系统和意义的关系,共时和历时的关系,这些都已成为现代语言学的基本概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是现代语言学的开创者。

索绪尔看到,语言作为符号系统不过是文化中例子之一(虽然是最明显的例子),此外像文字信号、礼节仪式、风俗习惯等也具有同样的性质,所以他主张建立一门“符号学”来研究这类现象。近几十年来,索绪尔所主张的符号学已经建立,他的理论在西方已经越出语言学的范围而影响到人类学、社会学等邻近学科,直接导致这些学科中的“结构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索绪尔不但是现代语言学的奠基者,也是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的创始人。

参考书目

高名凯:《德·索绪尔和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大学《语言学论丛》,第 6 辑,商务印书馆,北京,1980。

许国璋:《关于索绪尔的两本书》,载《国外语言学》,1983,第 1 期。

F. de Saussur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édition critique; préparée par Tullio de Mauro, Paris, 1972.

(叶蜚声)

T

Tagalog

他加禄语 (Tagalog language) 菲律宾的官方语言之一(另一种是英语)。属南岛语系印度尼西亚语族。分布于吕宋岛大马尼拉区以及马尼拉以北的5个省、以南的6个省和周围部分岛屿。作为母语使用的,有1200万人以上,作为通用语言使用的,有1000多万人。1937年菲律宾国语研究所正式把他加禄语定为菲律宾国语(Pilipino)的基础,菲律宾教育部计划在全国普及菲律宾国语。

他加禄语包括5个元音: a, e, i, o, u 和15个辅音: b, k, d, g, h, l, m, n, ng, p, r, s, t, w, y。有高、低音和词重音。他加禄语属粘着型语言。语法关系由前缀、中缀、后缀和词根紧密结合表示。词根约有3万个,多数是两个音节,有上百个词缀,常用的有20多个。动词系统复杂,特别是被动语态有3种不同的结构。基本词序是谓语—主语—宾语。吸收了不少梵语、汉语(主要是闽南话)、西班牙语和英语词。400多年前,菲律宾人就曾使用一种特殊的字母拼写他加禄语。16世纪中叶西班牙占领菲律宾后,改用拉丁字母拼写。(李林)

Tajik

塔吉克语 (Tajik language) 属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与波斯语相近。分布于苏联、阿富汗、中国、巴基斯坦、伊朗等国。在苏联,塔吉克人共有200多万,使用塔吉克语的地区,西北最远到布哈拉及努拉塔城北部,北面到塔什干以北奇尔奇克河上游,东北到乌兹别克共和国纳曼干市卡桑赛区 and 吉尔吉斯共和国邻近费尔干纳的扎拉拉巴德和奥什省,南面直到与阿富汗相连的边界。阿富汗的塔吉克人约300万,比较集中在北部和中部巴达赫善、卡塔干、马扎里-沙里夫、赫拉特等省。在喀布尔、赫拉特等大城市使用塔吉克语的居民占相当大比例。使用语言的人数与民族人数不相等;有的塔吉克人说别种语言,而非塔吉克人也有说塔吉克语的。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共有2.6万余塔吉克人,其中1.6万余人聚居在塔什库尔干县,说两种方言。大多数塔吉克居民使用萨里库尔方言,少部分使用瓦罕方言。在喀什地区其他县、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和田地区约有1万塔吉克人,大多使用维吾尔语。苏联境内的塔吉克语,有6个元音: i, e, a, u, o, u; 有24个辅音: p, b, m, f, v, t, d, n, l, r, ts, s, z, ʃ, ʒ, ʧ, ʤ, ʃ, ʒ, j, k, g, q, x, ɣ, h。名词有复数、泛称、受饰、受动等形式,皆用附加后缀表示。复数名词有后缀 ho 或 on; 泛称名词有后缀 e; 受饰名词有后缀 i, 表示与后面的修饰词联成词组; 受动名词有后缀 ro, 表示宾格。用词干变化表示动词的时间,如 dodan(给),过去时为 dod,

非过去时为 deh。动词的人称用后缀表示: 单数第一人称是 -am, 单数第二人称是 -i, 单数第三人称是 -ad(只用于非过去时); 复数第一人称是 -em, 复数第二人称是 -ed 或 -eton, 复数第三人称是 -and。联系动词(h)ast(是)可以附加人称后缀,也可以本身不出现而由人称后缀附加在合成谓语的非动词后表示相应的人称,用于单数第三人称联系动词一般须出现。苏联的塔吉克人使用以俄文字母为基础的塔吉克文。这种文字比俄文字母多6个带有附加符号的字母,即表示小舌浊擦音的字母 f、词末重读的元音 ū、小舌清塞音 k、圆唇央元音 ɣ、喉门清擦音 x、舌叶浊塞擦音 ŋ。阿富汗的塔吉克人采用阿拉伯字母拼写自己的语言。中国境内的塔吉克语(以萨里库尔话为代表)有6个单元音: i, e, a, u, o, u; 有8个复元音: ei, ui, oi, iu, eu, ou, au; 有30个辅音: p, b, m, w, f, v, θ, δ, t, d, n, l, r, ts, s, z, ʃ, ʒ, j, k, g, q, x, ɣ, h。词的语音结构以1~3个音节为常见。名词有4种格。名词原形就是主格,领格、与格、宾格用附加成分表示。人称代词、指示代词、疑问代词、反身代词变格时词干有变化。动词的时和体用词干的屈折变化来表示; 人称由词尾或词缀表示。萨里库尔话借词多来自维吾尔语、汉语。瓦罕话有一组翘舌辅音: t, d, ts, dz, s, z, ʃ, ʒ, 形成自己的特点。基本词汇也有一部分与萨里库尔话不同。中国塔吉克族没有本民族文字。知识分子除了使用本族口语外,也使用维吾尔文。整个说来,各方言之间具有相似的语法结构。句子成分的次序通常主语在前,谓语在后,宾语在谓语之前。(高尔铨)

Tatar

塔塔尔语 (Tatar language) 见鞑靼语。

Taiwan Yuyan Yuanliu

《台湾语言源流》(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Languages of Taiwan) 见汉语方言。

Telugu

泰卢固语 (Telugu language) 印度安得拉邦泰卢固人的语言,印度宪法承认的语言之一。属达罗毗荼语系中部语族。使用人口超过4000万,居同语系各语言之首。

泰卢固语的最早文献见于公元633年的铭刻。泰卢固人的民族文学始于11世纪。

泰卢固语具有达罗毗荼语言的一般特点,保留着不少古达罗毗荼语成分。辅音有 c(硬腭音)~k(软腭音)的对立,在前元音之前, k 有变为 c 的倾向。由于元音缩略的音变,泰卢固语产生了达罗毗荼语言中罕见的复辅音。泰卢固语是粘着型语言。它的构词法通常为词根加后缀。词的重叠也不罕见,如 garagara(白净白净)和 pa-kapaka(哈哈大笑)。

泰卢固语有几个方言,口语和书面语截然不同,成为

一种双言现象。它的文字和南部语族的坎纳达语相同。泰卢固语受雅利安语言的影响很深。(周流溪)

Talmi'eryu

泰米尔语 (Tamil language) 泰米尔人的语言, 印度宪法承认的语言之一。属达罗毗荼语系南部语族, 是本语系最重要的语言。分布于泰米尔纳德邦, 使用人口约 3 500 万。此外, 也使用于斯里兰卡部分地区(约 250 万人); 在东南亚、东非、南非、印度洋和南太平洋中的岛屿, 也有少数人使用。

泰米尔语有 5 个基本元音: i, e, a, o, u; 口语中有元音鼻化现象。有一系列很有特色的辅音, 如塞音除唇音 p 外还有 t(齿音)~t̪(龈音)~t̪ʰ(卷舌音)的对立和 c(硬腭音)~k(软腭音)的对立。但词首不用 t̪ 和 t̪ʰ 之类。没有复辅音。单词重音通常落在第一个音节上。

泰米尔语是粘着型语言。它的限定动词往往同代词主语结合, 如 pō-v-ēn(“去”, 相当于“我将去”)。基本词序为主语—宾语—动词。构词只使用后缀, 不用前缀。泰米尔语从印度雅利安语言中吸收了许多词, 但几乎没有引进什么语法结构, 相反在这方面还向它们输出。语言学家们长期以来曾试图证明达罗毗荼语言和同属粘着型语言的乌拉尔语言等的关系, 但未获成功。近来有人提出泰米尔语和日语有亲缘关系。这个问题仍有待研究。

泰米尔语在公元前 300~前 100 年间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文学语言, 并采取了南婆罗米文字。现代泰米尔文即由此发展而来。(周流溪)

Taiyu

泰语 (Thai language) 旧称暹罗语(Siamese), 泰国的官方语言。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使用人口约 5 000 万。有中部、北部、东北部和南部等 4 个方言区。曼谷话是泰语的标准语。泰语有元音 21 个, 其中单元音 18 个, 复合元音 3 个, 元音分长短, 可以区别词义; 有辅音 21 个, 其中 p, t, k, m, n, ʔ, ŋ, w, j 可以作韵尾; 有 5 个声调, 33, 21, 41, 45, 14。泰语是一种孤立型语言。基本词汇以单音节词居多。构词中广泛使用合成和重叠等手段。泰语中吸收了大量的梵语、巴利语和相当数量的孟语、高棉语、汉语、马来语和英语词汇。泰语词没有形态变化。词序和虚词是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基本词序是: 主语—谓语—宾语。定语在中心词之后。状语有的在中心词之前, 有的在后。数词、量词和名词组合时, 一般是名词在前, 数词居中, 量词在后。

泰文属于音位文字类型。13 世纪的兰甘亨碑文(图 1、2)是目前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泰文文献。据该碑文记载, 1283 年素可泰王朝兰甘亨大帝创造了泰语文字。实际上泰文是将孟文和高棉文加以改造而成的, 以后经过历代的改革形成现代泰文。现代泰文有辅音字母 42 个, 元音字母和符号 32 个。元音字母可以在辅音字母的前后出现, 还可以出现在辅音字母的上、下部位。有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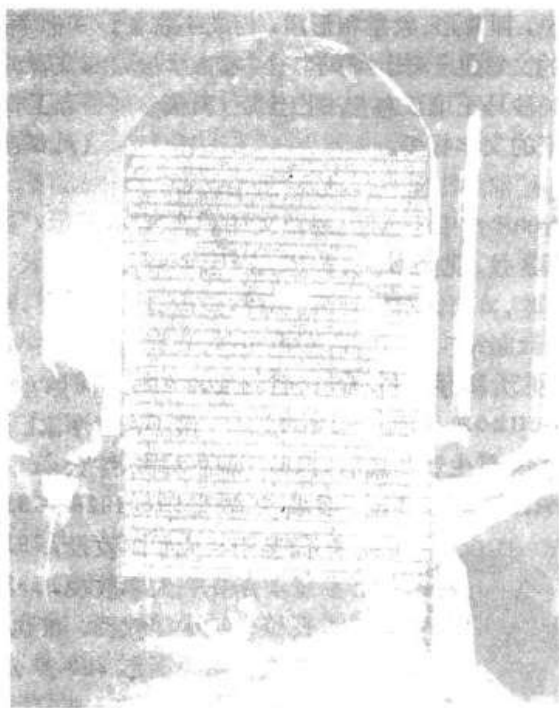


图 1 兰甘亨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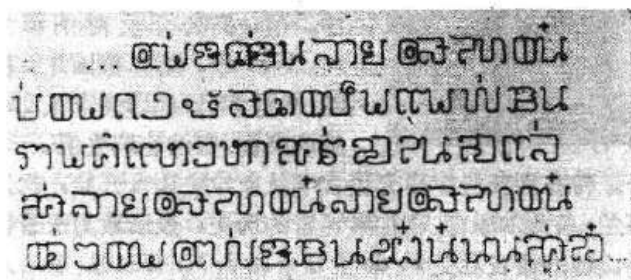


图 2 兰甘亨碑文

个声调符号, 标在辅音的右上方, 第一声调不标符号。泰文自左而右书写, 一般不使用标点符号。(傅增有)

Tang Lan

唐兰 (1901~1979) 中国古文字学家。字立庵, 浙江嘉兴秀水县人。早年曾就读于江苏无锡国学专修馆 3 年, 后从事《说文解字》和古文字研究, 深为罗振玉、王国维所称许。1932 年开始为各大学所延聘, 讲授古文字学, 1946 年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 调故宫博物院任陈列部主任、研究员、副院长等职。唐兰研究古文字最服膺清代孙诒让的偏旁分析法。识字至多, 不为臆断, 为学者所推重。



所著有《古文字学导论》、《殷虚文字记》、《天壤阁甲骨文存》、《中国文字学》等专著。《古文字学导论》是一本关于研究古文字的理论和方法的书, 提出许多极重要的见解。《中国文字学》中对古代文字的起源和文字的发展及演化, 论述极详。他不取古人的六书说, 而别创造字的

三书说,即象形、象意和形声,自成一家言。其他考证古文字的文章见于《国学季刊》、《考古学报》、《文物》等刊物。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出土后,积极参加整理工作,考释出来的文字极多。(周祖谟)

Tangyun

《唐韵》 见韵书。

Telubieskiye

特鲁别茨科伊, Н. С. (Николай Сергеевич Трубецкой 1890~1938) 俄国语言学家。1890

年4月16日生于莫斯科。1913年在莫斯科大学毕业,1913~1914年在德国莱比锡大学留学。1915~1916年



任莫斯科大学副教授,1918年任罗斯托夫大学教授,1922年任维也纳大学教授。维也纳与布拉格相距不过200多公里,1926年布拉格学派成立,特鲁别茨科伊即为该学派的中心人物。他一向公开反对纳粹主义。1938年,纳粹德国并吞奥国,6月25日他因受审讯而心脏病突发,在维也纳去世。

特鲁别茨科伊研究语言学从斯拉夫语言开始,次及芬兰-乌戈尔语言、高加索语言的历史,最后致力于音位学。他的语言观受 F. de 索绪尔和 J. N. 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的影响,认为语言是一个系统,内部成分互相关联,语音与言语有关,音位则与语言有关,因此语音学应研究言语的音,音位学则研究语言的音。他提出并强调音位的辨义功能。从1926年起,他用12年时间,收集了100多种语言的资料,从各个方面对有关音位的理论问题加以探讨。最后完成《音位学原理》一书,在他去世后由 R. 雅柯布逊于1939年整理出版。这是一部总结性著作,对音位及其特征、对立、位置和音位组合等问题作了详尽的论述,对音位的辨义对立进行了细致的分类。他提出了“对立中和”和“超音位”这些概念。“对立中和”指在某些位置上音位对立的消失,例如,俄语清浊辅音在多数位置上是对立的,但当处于词末时,由于浊辅音清化,清浊辅音的对立便消失了,如 пруд (池塘) 和 прут (树枝) 都念成 [plut]。“超音位”指对立中和时两个音位共有辨义特征的和,一般用大写字母标示,如 /P/、/T/、/K/。特鲁别茨科伊还著有《关于形态音位学》(1931)、《俄语的形态音位系统》(1934)、《音位描写指南》(1935)、《有关印欧语问题的一些看法》(1939)等。(戚雨村)

tlyu

体语 用双声词语说话,又叫双声语。“体”指声母而言,章炳麟《国故论衡》:“收声称势,发声称体,远起齐梁间矣。”章氏说的“发声”就是指一个字的开头辅音,就是体。

体语大多是诙谐的,有的甚至是俚俗的,庄重场合一般不用。中国南北朝时代盛行体语,最早见于史书记载的是《北齐书·徐之才传》:“(徐之才)尤好剧谈体语。”《徐之才传》说的体语,与一般的体语略有不同,比如他说一个姓卢的人是:“生男则为虬,养马则为驴。”卢、虬、驴3个字的声母相同,都是来纽。他正是用虬、驴来暗示那个人的姓——卢。

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记载:“陇西李元谦乐双声语。尝经(郭)文远宅……曰:‘是谁第宅过佳?’值婢春风出曰:‘郭冠军家’。元谦曰:‘凡婢双声。’春风曰:‘佇奴慢骂。’”这里的对话都是用体语。“是谁”两字禅纽,“第宅”两字定(澄)纽,“过佳”两字见纽,这句话是3组双声字,“郭冠军家”4个字都是见纽。“凡婢”两字並(奉)纽,“双声”两字审纽,这句话是两组双声字,“佇奴”两字泥纽,“慢骂”两字明纽,这句话也是两组双声字。这一类的体语是真正的体语。(俞敏)

Tonggusi yuzhi

通古斯语支 (Tungusic branch) 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的语支之一。较早的分类法,只包括埃文基语、埃文语、涅基达尔语、鄂温克语(旧称索伦语)和鄂伦春语。较新的分类法,在本语支内再划两个次语支:①埃沃基次语支,包括上述的几种语言;②那乃次语支,包括那乃语、乌利奇语、奥罗克语、乌德盖语、奥罗奇语和赫哲语。通古斯语支分布在中国内蒙古自治区的鄂温克族自治旗、鄂伦春自治旗、陈巴尔虎旗、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阿荣旗、额尔古纳左旗、扎兰屯市,黑龙江省的黑河市、逊克县、呼玛县、塔河县、讷河县、嘉荫县、同江县、饶河县,苏联的东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埃文基自治专区、雅库特自治共和国、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滨海边疆区、萨哈林州、堪察加州、马加丹州等地以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巴尔虎地区。语言的的实际使用人口4.7万多。中国1.9万余人(1982),苏联2.7万余人,蒙古人民共和国1000余人。

语言的主要特点:①元音一般分长短。②满语支语言出现在词首的 f,在埃沃基次语支为 h~x~0,在那乃次语支为 p~x。如“唇”,满语 femen[fəməŋ],锡伯语 fəməŋ,埃文基语 həməŋ,埃文语 həməŋ,涅基达尔语 xəməŋ,鄂伦春语 əməŋ,鄂温克语 əmmə,那乃语 pəməŋ,乌利奇语 pəmu(n-),奥罗克语 pəmu(n-),奥罗奇语 xəmu(n-),乌德盖语 xəmu(n-)。③满语支语言的 s 和 š,在通古斯语支语言是 j 或 s。如“斧子”,满语 suhe[suxə],鄂温克语 juxə,鄂伦春语 jukə,埃文基语 sukə,那乃语 surə,“耳朵”,满语 shan[ʃən],鄂温克语、鄂伦春语 š:n,埃文基语 se:n,那乃语 seā。④ŋ 可以出现在词首。⑤格的数目较多。⑥名词有人称领属和反身领属形式。⑦动词有人称形式。⑧动词使动态和被动态的语音形式不同。⑨组成句子结构的两个成分之间往往在数和人称方面存在着互相呼应的关系。如鄂伦春语 bi:(我,单

数第一人称)gəna-m(去,动词陈述式现在将来时单数第一人称)“我去”; mingi(我,单数第一人称,领格)əkin-iw(姐姐,人称领属单数第一人称)“我的姐姐”。

(胡增益)

tongming

通名 指一事物在广大语言地区内的共同的名称。例如“玉米”是一般的称谓,是通名,“玉蜀黍”是学名,“苞谷”是方言。又如“粟”是古书上用的名称,现在则通称“小米”。“莱菔”是书面上用的名称,如中草药有“莱菔子”,而口语通称曰“萝卜”。“玉米”、“小米”、“萝卜”都是现在较为通行的名称,所以称之为通名。(周祖谟)

Tongsubian

《通俗编》 辑录通俗词语加以解释,属于俗语考源一类的书。清代翟灏编。翟灏字大川,一字晴江,浙江仁和人。生于乾隆元年(1736),卒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乾隆十九年中进士第,曾任金华府学教授。本书采录前代书中所出现的各种常用词语,分天文、地理、时序、伦常、仕进、政治、文学、武功、仪节、祝请、品目、行事、交际、境遇、性情、身体、言笑、称谓、神鬼、释道、艺术、妇女、货财、居处、服饰、器用、饮食、畜兽、禽鱼、草木、俳优、数目、语辞、状貌、声音、杂字、故事、识余等38类。每类为一卷,共38卷,5000余条。每条举出出处,有的出于经史,有的出于笔记、诗文,大都是一般口里常说的词句,对考查一些词语的解释和故事的出典以及民间风俗等极为有用。不过品类较杂,关于作者、卷数篇名等项所记不很完备,是其缺点。同时钱塘人梁同书又作有《直语补正》一书,载《频罗庵遗集》卷十四,专记民间口头俗语,可与《通俗编》相补充。两书有1958年商务印书馆排印本。

(周祖谟)

tongxun

通训 在字书或古书的注释当中对多义字(词)根据通常使用的意义所加的解释。例如“庸”字训“用”,训“常”,训“众”,其中在古书中训“用”者为常见的训释,这就可以说是通训。又如“端”字训“正”,训“始”,训“本”(大端),训“耑末”,在古书中训“正”者为常见的训释,“正”就是通训。不过“庸”训“常”、训“众”以及“端”训“始”、训“本”也一样是常常使用的意义。凡是一般常用的解释都可以称为通训。但是如《左传》昭公十三年“吾庸多矣”,“庸”训为“功”;如《礼记·乐记》“端冕而听古乐”,“端”为玄衣,那就不是通训了。

(周祖谟)

Tongya

《通雅》 杂考事物名称和训诂、音韵的书。明代方以智撰。全书52卷,卷首3卷。《四库全书总目》归入杂家杂考类。

方以智(1579~1671),字密之,安徽桐城县人,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及第,曾官翰林院检讨、礼部侍郎,东阁大学士。明亡为僧,法名弘智,字无可,卒于清康熙十

年(1671)。平生博览群书。他说:“学惟古训,博乃能约。”这部书就是他平日读书考释字词音义积累纂集而成的。因为他在博学的基础上,要“观古今之通”,所以命名为《通雅》。

书首卷一为“音义杂论”,卷二为“读书类略”和“小学大略”,卷三为“诗说”和“文章薪火”。书中由卷一至卷五十二分为疑始、释诂、天文、地理、身体、称谓、姓名、官制、事制、礼仪、乐曲、乐舞、器用、衣服、宫室、饮食、算数、植物、动物、金石、谚原、切韵声原、脉考、古方解诸目,门类很细。举凡名称、事物的音义都原原本本详为考证,辨驳音义相传之误。

方以智说:“小学有训诂之学,有字书之学,有音韵之学。”《疑始》一卷和《切韵声原》一卷是讨论古今音韵的。《释诂》是专讲词义的。《谚原》是讲方言俗语的。从他的书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有关文字、声音、训诂的精辟的见解。例如,他说:“欲通古义,先通古音。”(《音义杂论》“方言说”条)这就是很重要的创见。由于他理解到音与义之间的关系,所以在讲古今方俗语词时就能从声音相转上观其会通。例如,他在卷一《疑始》“爾你而若乃一声之转”一条下说:“爾又为尔,尔又音宁礼切,俗作你,犹兒之有倪音也。”又卷四十九《谚原》中说:“某,古梅字。母、亩、每、马声皆通转。故今京师曰作么,读如麻;江北与楚皆曰么事,读如母;而南都但曰甚。苏杭读甚为申驾反,中州亦有此声。而秦晋之咱,则怎之转也。”这种用声音贯串的方法来研究语词的音义对清人有很大的影响。

(周祖谟)

tongyongzi

通用字 指在使用中可相通换用的汉字,包括同音通用、同义通用和古今通用。

同音通用指用一个同音字(或音近字)去替代另一个字,这种替代具有一定的常用性。例如《管子·入国》:“聾盲喑哑……不耐自生者,上收而养之疾。”《礼记·乐记》:“故人不忍无乐(yuè)。”《论衡·无形》:“试令人损益苞瓜之汁,令其形如故,耐为之乎?”“耐”是通用字,“能”是被换用的本字。古同音通用反映的是古音系统,如“耐”、“能”二字在古代分属之部蒸部,阴阳对转,韵母相近,在后代变得很不相同了。

同义通用指同义字之间的通用。例如“才”、“材”二字,在一般情况下,不可混用,但在指“有才能的人”这个意义上是同义字,可通用。《论语·子路》:“赦小过,举贤才。”《伪古文尚书·咸有一德》:“任官惟贤材。”又如“辑”、“集”在表示“安”、“安定”的意义上是同义字,可通用。《战国策·赵一》:“此先圣之所以集国家、安社稷乎?”《汉书·西域传》:“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

古今通用指古今字之间通用,也就是用古字代今字。例如表示擒获的意思,“禽”是古字,“擒”是今字。在唐代杜甫诗中用“禽”字,而宋代司马光等编的《资治通鉴》常用“禽”字。如:“将军禽操,宜在今日”(卷六十五)、“禽其司马而反千里之齐,安平君之功也”(卷四)。又如表示价

值的意思,“直”是古字,“值”是今字。唐以前作“直”,唐以后作“值”。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有用古字“直”的:“市中游侠儿,待佳者笼养之,昂其直。”

通用字与被换用字,二字字义不相同,只是在一定条件下在某个意义上可相通换用。如果二字字义完全相同,则属异体字。异体字间是“同”的关系,而不是“通”的关系。(曹先鞭)

tongyu

通语 指在广大地区里通常共同说的词语。见于汉扬雄所作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通语”是对“方言”来说的,即不是一方一地之言。例如《方言》卷一说:“娥、嫫,好也。秦曰娥,宋魏之间谓之嫫。秦晋之间,凡好而轻者谓之娥;自关而东,河济之间谓之嫫,或谓之姣;赵魏燕代之间曰姝,或曰姝。自关而西,秦晋之故都曰妍。好,其通语也。”扬雄所说的“通语”就是各地能通行的普通词语,含义也是一般性的,跟各地特有所指的方言词语不同。在扬雄书里“通语”有时也说“凡语”。

(周祖谟)

tongzhuān

通转 指一个汉字在押韵、谐声、假借等方面显示出读音从一个韵部转入另一个韵部的现象。汉族不用拼音字,讲音韵学最喜欢谈分类。在一个字押韵或是参加造谐声字或是假借为别的字从原来分定的韵部改入另外一个韵部的时候,人们说它“转”了,或说这两个部“相通”。有时候这两个词也混用不分。也有人利用它们讲声纽的变化,如牙音转喉音等等。讲通转这种作法有时候导致奇怪的费辞句。比如“用”唸[iuŋ],也当“因为”讲。在这个意义上,也写作本来象头盔的“冑”字的原形“由”[iou]。从语音学上讲,这是尾音脱落。章炳麟认为这是东幽对转,说:“东亦与幽对转,是假道于冬侵也。”因为他的古韵部在《成均图》的排列顺序是:东与冬侵两部紧相邻,而冬侵与幽相对。就是说“用”字从“东”出发,经过了“冬侵”、最后完成与幽部对转。这种讲法又不明白又绕弯子。

(俞敏)

Tongyin

《同音》 又译《音同》。中国西夏文字书。切韵博士党项人令呖犬长和唃廝灵长等于西夏早期编纂。后屡经修订,至少有5种版本,传世的有两种刻本,都是蝴蝶装。1909年在中国黑水城遗址(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境内)出土,现藏苏联。中国流传的是甲种本的石印本,内有序和跋。序言指出此书经西夏学士兀囉文信重新整理,跋尾又指明于西夏正德六年(1132),由义长重新校订。全书56页,共收大字6000多个,依声母分为重唇、轻唇、舌头、舌上、牙、齿头、正齿、喉、来日等9类。每类中发音相同的字合成一组,各组间以小圆圈相隔,没有同音字的独字列于各类之后。各大字下均有注字,一般为一个字,也间有二三个字。注释方式有:以同义字、反义字组成词

或词组,指明类属、用途和词性等。近年在额济纳旗又发现乙种本残页,编排和内容与甲种本稍有出入。《同音》是研究西夏语言、文字的重要文献。(史金波)

tongyuanzi

同源字 (words derived from the same root) 在汉字里有很多音同义近,或音近义同的字。这类字往往是语出一源。如“广”与“旷”,“坚”与“紧”,“空”与“孔”,“宽”与“阔”,“改”与“更”之类,语义相通(或相同),声音相近(或相通转),所以称之为同源字。如果语音毫无干涉,或音虽近而意义相去极远,就不能称为同源字。音同音近是推断是否同源的关键。假借字和异体字都不是同源字。因为假借字不是同义词或意义相近的词,异体字则是一个字的两种或几种不同的写法,只是同字而已,谈不上同源。同源是历史的概念。在汉字发展的过程中,一字一义的固然不少,一字兼有数义的也很多。如数义各不相关,这个字实际上是代表着几个不同的词,只是同音而已,当然也谈不上同源。

同源字实际也就是同源词。不同文字的同源等于是追溯语源。在声音上,就必须以上古音的声韵部类为基础去探求上古的读音;在意义上,就必须以古代的训诂和古籍中应用的词义为根据;分别何者为同源,何者非同源。研究同源字是一件很繁难的事,要把形音义三方面联系在一起探讨。

见字族、词族。

参考书目

王力:《同源字典》,商务印书馆,北京,1982。

(周祖谟)

tongji yuyanxue

统计语言学 (statistical linguistics) 数理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应用统计数学的方法来研究语言现象的语言学科。统计语言学的研究领域目前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① 统计语言单位的出现频率,如对词汇和音位、语素出现的频率进行统计研究。

② 统计作家的用词频率、词长分布和句长分布,以了解作家运用语言的风格;用这种方法还可判定匿名文章的作者。

③ 计算语言存在的绝对年代以及亲属语言从共同原始语分化出来的年代,这方面的研究叫做语言年代学,又称为词源统计分析法。此外,还可对亲属语言的语法、语音体系进行统计、比较。

④ 采用信息论方法研究语言的熵和冗余度。语言的熵就是在交际过程中语言符号出现的不定度。不定度的大小与语言的熵的高低一致。当语言的接收者接收到语言符号之后,不定度被消除,熵等于零,因而在交际过程中,语言接收者所得到的信息量恰恰等于被消除的熵。语言的冗余度是指语言中超过传递最少需要量的信息量的比例,在一般情况下,人们为了保证对方能够理解,总

是提供比实际需要多得多的信息量,因此,不论在书面语还是口语中,语言都有冗余度。

⑥ 探讨语言的一般统计规律。例如,在按频率递减顺序排列的频率词典中,词的序号越大,词的频率越小,序号与频率之间的关系可以用数学公式描述为一定的统计规律,这个统计规律叫做齐夫定律,因其研究者之一、美国语文学家 G. K. 齐夫而得名。

⑦ 运用随机过程论来研究语言,把语言看成彼此联系的字母序列,前一个字母决定后一个字母的出现,于是形成一条字母链,叫做马尔科夫链,因其最早的研究者俄国数学家 A. A. 马尔科夫而得名。

⑧ 研究文章中两个词之间、两个语法范畴之间、两个语义类之间或两个句法类型之间的间距,以揭示文章在句法或语义上的特征。

⑨ 研究语言的词汇与文章长度的关系,以揭示文章中词汇的丰富程度和差异程度。

统计语言学在数理语言学中有比较悠久的历史。古印度语法学家在研究《吠陀》时,就进行过单词和音节数目的统计。1851年,英国数学家 A. 德·摩尔根(1806~1871)曾把词长作为文章风格的一个特征加以统计研究。苏格兰学者 L. 坎贝尔于 1867 年、德国学者 W. 迪丁贝尔格于 1881 年都曾采用统计方法确定柏拉图著作的写作时期。1887 年,美国学者 T. C. 门登霍尔对英国文学作品、特别是莎士比亚的作品进行过统计分析。1913 年,马尔科夫研究了俄语中字母序列的生成问题,提出了马尔科夫随机过程论。1935 年,齐夫发表了齐夫定律。1944 年,英国数学家 G. U. 尤勒在《文学词语的统计分析》一书中广泛使用概率和统计方法来研究语言。1950 年,美国学者 M. 斯瓦德士进行了语言年代学的研究。1951 年,美国数学家 C. 申农采用信息论的方法研究书面英语中的熵和冗余度;美国学者 V. 英格韦对句法现象进行了间距分析。1954 年,法国学者 P. 基罗根据文章中词的频率分布提出了词汇丰富度的概念。1956 年,英国学者 G. 赫尔丹出版了《语言是选择和机遇》一书,系统总结了统计语言学的研究成果。近 30 年来,在语言统计中日益广泛地使用计算机,逐渐改变了传统的手工查频、统计的办法,提高了统计的效率和精度。

统计语言学大致可分为语音统计学、词汇统计学、语法统计学和语义统计学,分别研究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和语义的统计特征。从描写的角度出发,词汇统计学又可以分为年代统计学、风格统计学和分类统计学 3 个分支,分别根据时代的变化、作者写作风格的不同和语言的类属或起源对词汇特征进行统计分析。

统计语言学的许多研究成果,对于通信技术、语言教学和自然语言的信息处理都很有价值。

参考书目

G. Herdan, *Quantitative Linguistics*, Butterworths, London, 1964.

(冯志伟)

TuJuewen

突厥文 (Turkic script) 又称鄂尔浑-叶尼塞文、突厥卢尼克文。7~10 世纪突厥、回鹘、黠戛斯等族使用的拼音文字。通行于鄂尔浑河流域、叶尼塞河流域以及今中国新疆、甘肃境内的一些地方。

《周书·突厥传》称:“其书字类胡”;《北齐书》载:“后主命世清作突厥语翻涅槃经,以遗突厥可汗。”但未见关于这种文字的具体材料。1730 年,瑞典人 P. J. von 斯特拉连贝尔格(1676~1747)在《欧亚的北部和东部》一书中首次公布了一批用这种文字写成的碑铭。1884 年,芬兰人 J. R. 阿斯培林(1842~1915)出版《叶尼塞碑文》,对这种文字进行了初步研究。1889 年,俄国人 H. M. 雅德林采夫(1842~1894)等于蒙古高原鄂尔浑河流域和硕柴达木湖畔发现《阙特勤碑》(图 1)、《毗伽可汗碑》(图 2);



图 1 《阙特勤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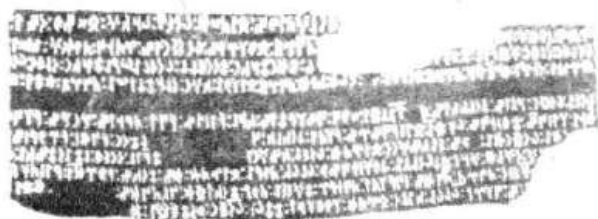


图 2 《毗伽可汗碑》

1890 年,芬兰人 A. O. 海开勒(1851~1924)又发现《九姓回鹘可汗碑》,为研究这种文字提供了新材料。1893 年,丹麦人 V. L. P. 汤姆森(1842~1927)释读突厥文获得成功,并于 1894 年刊行《鄂尔浑和叶尼塞碑文的释读——初步成果》。

清光绪十九年(1893),中国学者沈曾植(1850~1922)作上述三碑跋,继而王国维作《九姓回鹘可汗碑跋》。20 世纪 30 年代韩儒林(1903~1983)、岑仲勉(1885~1961)、王静如(1903~)分别对碑铭进行了译释及研究。

突厥文各种文献中所用字母数目不一,形体多样,一般认为有38~40个。大部分源于阿拉米字母,一部分来自突厥的氏族或部族标志,还有一些是表意符号。4个后元音a、ə、o、u及4个前元音e、i、ə、y都只用4个字母表示。元音字母在一定条件下常被省略。b、d、l、n、r、s、t、j 8个辅音用两套字母表示。一套只和后元音相拼,一套只和前元音相拼。字母不连写。词与词之间用双点“:”分开,但是偏正词组有时写在一起。行款一般从左至右横写,也有从右至左的。

已发现的鄂尔浑碑有11通,年代较久的是《雀林碑》(688~691年间建)。各碑分属突厥汗国(552~744)或回鹘汗国(744~840)时期。叶尼塞碑铭约80块,多为黠戛斯人的墓志,属9~10世纪。手写本文献20世纪初发现于敦煌、新疆的古楼兰废墟及吐鲁番。包括历史、传记、墓志、石刻、宗教文书、行政文件、日常器皿的刻文等。突厥文的释读扩大了突厥语族语言文字史及文学史研究的领域。

参考书目

- 岑仲勉:《突厥集史》上下册,中华书局,上海,1958。
С. Е. Малов, Памятники древнетюрк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АН СССР, Москва-Ленинград, 1951.
A. von Gabain, Alttürkische Grammatik, Wiesbaden, 1974.

(李森)

Tujueyu Cidian

《突厥语词典》(Turkic Dictionary) 用阿拉伯语解释突厥语的古代词书(原名 Kitabu Diwani Lug-

hat-it-Turki)。11世纪中国古代突厥语文学家、喀什噶尔人马合木德·喀什噶里编写。全书共收词7000多条,按词的语音结构分为8卷,每卷又分静词和动词两部分。各部分的词按语音结构的类型及阿拉伯字母的顺序排列。在释文中除例句外,还引用了许多谚语和民歌。有些词注明用于某个部落。此外,还有关于语音、词义的演变及语法问题的解说。在序言中谈到突厥语的重要性、编纂本书的目的、材料来源、体例、突厥语的构词法、回鹘字母、突厥各部的分布、各部落的语言特点,并附有突厥地区的圆形地图。《词典》不仅对突厥语研究极为重要,而且对喀喇汗王朝的历史、地理及民族学研究也有参考价值。马合木德·喀什噶里在巴格达完成这一著作后,献给了当时伊斯兰教国家政教合一的领袖哈里发乌布勒喀塞姆·阿不都拉·穆克台迪·比艾姆瑞拉。原本始终未被发现。现存的唯一抄本是13世纪抄成的(见图),藏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民族图书馆。这一抄本于1914年被学术界发现以来,已出版了铅印本、影印本、德文索引本、土耳其文、乌兹别克文译本。中国于1981~1984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维吾尔文译本。(参见彩图插页第3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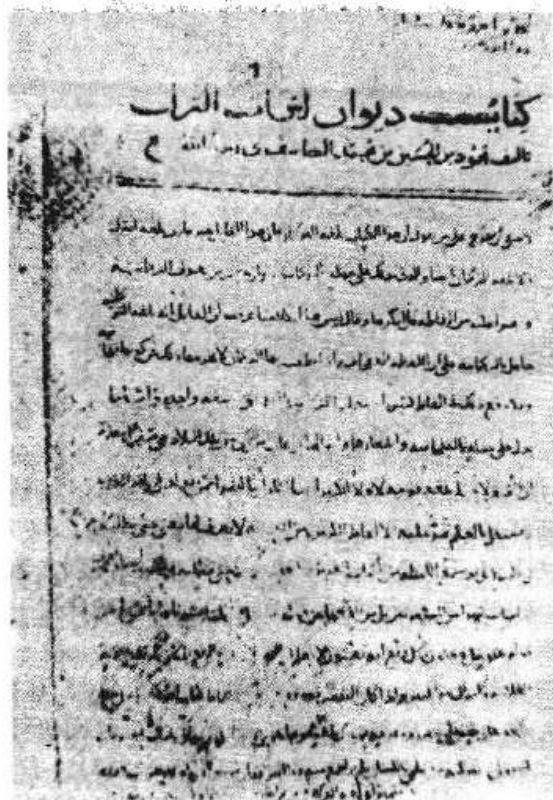
(陈宗振)

Tujue yuzu

突厥语族 (Turkic group) 阿尔泰语系的语族之一。“突厥”一词,在中国史书上指6~8世纪游牧于漠北广大地区,在语言上同属一个语族的古代部落联合体。其语言通称突厥语。广义的突厥语,包括本语族古代碑铭语言及后来各个时期的文献语言,现代几十种活的语言及其方言。狭义的突厥语则仅指古代突厥碑铭语言。

分布区域和人口 突厥语族的语言分布在西起巴尔干半岛,东至西伯利亚东部的勒纳河,南临阿拉伯半岛,北至亚洲大陆北端的新西伯利亚群岛这一广大地区。现代突厥语族语言在中国主要分布在新疆、甘肃、青海一带。有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乌孜别克语、塔塔尔语、撒拉语、西部裕固语和图瓦语。使用人口700余万(1982)。在国外,突厥语族语言主要分布在苏联、土耳其、伊朗、阿富汗、伊拉克、塞浦路斯、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蒙古人民共和国及地中海沿岸一些国家。有土耳其语、乌兹别克语、哈萨克语、鞑靼语、阿塞拜疆语、土库曼语、吉尔吉斯语、诺盖语、楚瓦什语、巴什基尔语、雅库特语、卡拉卡尔帕克语、库梅克语、维吾尔语、嘎嘎乌孜语、图瓦语、卡拉恰伊-巴尔卡尔语、哈卡斯语、阿尔泰语、卡拉伊姆语、哈拉吉语等约30种语言(包括和中国少数民族同名的语言)。

突厥语族的书面语言 古代突厥碑铭语言 以7~10世纪的鄂尔浑-叶尼塞碑铭为代表。已发现的鄂尔浑-叶尼塞碑铭有11通。其中《雀林 çuren 碑》属7世纪,建于颉跌利施可汗在位时(688~691,唐垂拱四年至天授二年之间),为突厥语族已发现的最古的文献。碑铭的文体



《突厥语词典》传世抄写本中之一页

证明,突厥语当时已有优美的韵文。《翁金碑》(见图)是第二突厥汗国的创立者骨咄禄可汗的记功碑,建于7世纪末或8世纪初,1891年发现于蒙古翁金河流域。

中古文献语言 ①东部以高昌为中心的回鹘文学语言,使用回鹘字母。9~15世纪主要通行于今新疆东部



《翁金碑》

至甘肃一带回鹘佛教徒中,代表文献有《弥勒会见记》等。②西部以黑汗王朝(10世纪下半叶~13世纪上半叶)为中心的喀喇尼耶语(黑汗王朝语言),使用阿拉伯字母,代表文献有11世纪的《福乐智慧》、《突厥语词典》等。

黑汗王朝以后时期文献语言 13世纪分化为3支:①在乌古斯语基础上形成的西支,通行于阿塞拜疆、土库曼等民族中。塞尔柱帝国、奥斯曼帝国以及土耳其的文

学语言也属这一支,代表文献有土耳其口头文学创作《科尔库特爷爷的故事》。②以钦察语为基础形成的北支,通行于金帐汗国以及鞑靼、哈萨克等民族中。③以回鹘-葛逻禄语为基础形成的东支,通行于维吾尔、乌兹别克等民族中。从帖木儿(1336~1405)时期开始称作察合台语。从小亚细亚到阿尔泰,往南到印度半岛的莫卧儿王朝,许多讲突厥语的民族都曾使用过这种文学语言。15世纪诗人N. A. 纳沃伊(1441~1501)的著作、16世纪的《巴布尔回忆录》、《突厥世系》等为其重要文献。

突厥语族现代文学语言 19世纪的革新运动促进了土耳其现代文学语言的发展。20世纪20年代以后,西亚、中亚及新疆一些使用突厥语的民族在本民族口语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现代文学语言,现在大约有20个突厥民族有了自己的文字。

突厥语族语言的特征 突厥语族语言除具有阿尔泰语系语言的共同特征外还有自己的一些特点。语音方面:①有元音和谐律。从已出土的唐代突厥文(属突厥、回鹘、黠戛斯)文献来看,a,ə,o,u 4个后元音和e,i,ø,y 4个前元音用4个符号表示;辅音中的b,d,l,n,r,s,t,j 8个音用两套符号表示,第1套只同后元音拼写,第2套只同前元音拼写;q,ɣ两个辅音只同后元音拼写;k,g两个辅音只同前元音拼写。②9世纪以前,突厥语固有词,词首甚少出现浊辅音r,l,n,m。③词首、词尾都不出现相连的两个辅音。④词的重音一般位于末一音节。语法方面,具有粘着语的形态特征,构形及构词是在词根或

词干后面加表示某种意义的后缀来实现。后缀的元音同前边词根或词干中的元音保持和谐,如土耳其语jol-da(在路上),mektep-te(在学校)。名词及名物化的实词有数、格、领属性人称、谓性人称等范畴。属同一范畴的后缀,在各语言中有语音变体,如“数”的表示法——哈萨克语:bala-lar(孩子们),qaz-dar(姑娘们);吉尔吉斯语:kitep-ter(书,复数),köl-dör(湖,复数)。格——多数语言有6个格(主格、属格、向格、宾格、位格、从格)。主格为零形态,其余各格借助于后缀来表示。“领属性人称”——土耳其语:anne(母亲),behim anne-m(我的母亲),senin anne-n(你的母亲),onun anne-si(他的母亲)。“谓性人称”——乌兹别克语:oquŋi(学生),oquŋi-min(我是学生),oquŋi-san(你是学生),oquŋi-dir(他是学生)。动词有时、人称、式、态等多种形态变化。连词不发达,但动词有发达的形动词形式和副动词形式起连词的作用。句子的基本语序是主语—宾语—谓语。如维吾尔语:men kitap aldim“我书买了”(我买书了)。修饰语在中心词之前。词汇方面,突厥语族语言的基本词汇,具有共同的词根词素,但语音上有变化(见下页表)。

由表中例词可以看出,古音z(或d)分别与现代的j音相对应,但是,有些现代语言仍保留着古音形式;大部分语言里词尾的y音,在一部分语言里或读作w音,或与前面音节的元音一起形成长元音。最古的词汇层有些为阿尔泰语系其他语族特别是蒙古语族所共有。如:突厥语mal(牲畜),muz,bos(冰),möldyr(雹子),börök,böb-rek(肾),tömyr,demir(铁),qara(黑)等分别与蒙古语的mal、mos、mondör、boir、tomor、xar同源;突厥语的qa(r)ya(乌鸦),erte(早),dalda(隐蔽处)等分别与满语的gaha、erde、dalda同源。词汇中有多种外来成分。较古的借词来自古汉语、梵语、古伊朗语。汉语借词如bit(笔)、luu(龙)、konqao(筌簌);梵语借词如,nom(典籍)、ŋeri~ŋery~ŋeri>ŋerik(战士,军队);粟特语借词如,aŋsam(傍晚),a:zu:n(境界,世界)。伊斯兰文化传入后,阿拉伯-波斯语源的借词占一定的比例。

中国现代突厥语的特征 中国现代突厥语具有不同发展时期的特征。①语音方面:基本上保持了前后相对的元音系统,但在维吾尔语中古代的i和ə的对立已消失,合并为一个i音位并产生了与之相关联的音位变体;a,ε在特定条件下出现同化或弱化现象;元音对应的系统,只保持了a—ε,o—ø,u—y 3套,而i,e在元音和谐中具有中性的性质。哈萨克语增加了新的音位ε;柯尔克孜语与图瓦语有长元音;撒拉语、西部裕固语出现了带擦元音及复元音。各语言元音和谐严整程度不一。辅音系统中,大多数语言塞音分清音p,t,k(送气)与浊音b,d,g(不送气)相对立的两套;撒拉语、西部裕固语清音送气与不送气对立,并有ɸ,ɸ',ɸ音。古代舌根音g,k和小舌音ɣ[χ],q分别与前元音和后元音相拼的特点在许多语言中已消失;由于各语言已大量吸收借词,词首已出现r,l,n,m等浊音,词末出现复辅音。②语法方面,仍保持粘着语

突厥语族语言例词

例词	突厥语词典	高昌馆杂字	维吾尔语	哈萨克语	柯尔克孜语	乌孜别克语	塔塔尔语	撒拉语	西部裕固语	图瓦语	哈卡斯语	土耳其语
脚	azaq	ardağ 或 adaq	ajaq	ajaq	ajaq	ojoq	ajaq	ajex	azaq	adaq	azax	ajak
耳	qulaq	qulaq	qulaq	qulaq	qulaq	quloq	qulaq	qulaχ	qulaq	qulaq	gulaχ	kulak
儿子	oyul	oyul	oyul	ul	u:l	uyil	oyul	oyul	oyel	o:l	o:l	o:ul
女儿	qəz	qez	qiz (qəz)	qəz	qəz	qiz	qəz	ane	gəz	urug	xəs	qəz
山	tay	tay	tay	taw	to:	təy	taw	taχ	tay	day	tay	da: (day)
石头	taf	taf	taf	tas	taf	təf	taf	taf	tas	daf	tas	taf
雪	qar	qar	qar	qar	qar	qor	qar	qar	qar	χar	χar	kar
路	jol	jol	jol	dol	dol	jol	jul	jol	jol	oruk	fol	jol

的特征。但名词的领属性后缀,在撒拉语里第一、二人称已不分单复数,在西部裕固语中已退化。如撒拉语:apa(父亲)-apa-m(我<我们>的父亲),apa-η(你<你们>的父亲),apa-si(他<他们>的父亲),西部裕固语:ana(母亲)-anaη(我<我们>的母亲),anaη(你<你们>的母亲),ana-sa(他<他们>的母亲)。西部裕固语的数词,保持突厥文、回鹘文文献语言的古老形式。动词陈述式在撒拉语和西部裕固语中不用人称后缀。如撒拉语:men(p'iser) oxu-ŋi(我<我们>读了),sen(seler) oxu-ŋi(你<你们>读了),vu(vuler) oxu-ŋi(他<他们>读了);西部裕固语:men bahrda(我去了),sen barəp dro(你去了),gol barəp dro(他去了)。③词汇方面,在西部裕固语、图瓦语里突厥语的古老成分占较大的比例;各语言吸收汉语、蒙古语、藏语、阿拉伯-波斯语,俄语及其他语言借词的情况不一。

突厥语族语言的分类 突厥语族语言的分类,始见于马赫穆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词典》。其分类原则是语音-语法特征。近代国外学者对突厥语分类进行了研究。比较流行的分类法有以下几种:苏联学者 A. H. 萨莫伊洛维奇(1880~1938)按语音-形态原则分类;美籍学者 K. H. 门格斯(1902~)按语音-形态原则分类,兼顾历史和地区分布;苏联学者 C. E. 马洛夫按年代特点分类;苏联学者 H. A. 巴斯卡科夫(1905~)按历史、地理、语音特征及分布状况分类。

突厥语族语言的文字 突厥语族语言在历史上先后使用过突厥文、回鹘文,以及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文字。中国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从20世纪30年代起使用经过改进的阿拉伯字母系统的文字。苏联各突厥语民族在20年代使用过拉丁字母的文字,30年代后改用以基里尔字母为基础的新文字。土耳其于1928年改用拉丁字母。(参见彩图插页第64页)

参考书目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语文工作委员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合编:《突厥语研究》(1,维吾尔文版),民族出版社,北京,1982。

A. 捷尼舍夫著,陈鹏译:《突厥语言研究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1。

K. H. Menges, *The Turkic Languages and Peoples*, Wiesbaden, 1968.

(李森)

Tumt Sanpuzha

图弥三菩札 (Thon mi Sambho ʔa) 中国藏文创制者和藏文语法学家。也称通密散布刺或土弥桑布札。生卒年不可考,出生于涅地(今西藏自治区隆子县)。图弥为氏族名,原名阿努,三菩札是梵音,意为西藏贤哲,是印度人对他的尊称。根据藏族史籍记载,是吐蕃王朝赞普松赞干布(617~650)时七贤臣之一。官至御前大臣。曾奉命赴印度留学,受业于天智狮子和婆罗门利敬,精研佛学和梵文,返藏后根据梵文兰查字母创制藏文正楷,根据乌尔都字母创制草书,被藏族奉为“字圣”。图弥三菩札创制藏文后,又著有文法书8种,今存《三十颂》和《性入法》两种,是最早的西藏文法书;翻译梵文经典21部,开藏译佛经的先河。

(瞿霭堂)



Tuwayu

图瓦语 (Tuva language) 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东匈语支。在中国主要分布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布尔津、哈巴河、阿勒泰和富蕴4县。使用人口约2000(1982)。图瓦语的元音比较复杂,分短元音、长元音和紧喉短元音3组,共26个。i、e、ε、y、ø、u、o、ʏ、ɑ各分长短,其中e位于词首时产生j化,ø位于

词首时产生 u 化。紧喉短元音有 8 个: i, e, y, ə, u, o, ʔ, a, 只出现在词首或多音节词的第一个音节中, 目前渐趋消失。元音的唇状和谐已较松弛, 舌位和谐十分严整, 唇状和谐以舌位和谐为基础。辅音有 19 个: p, b, t, d, k, g, w, s, z, ʃ, x, ʧ, ʤ, m, n, ŋ, l, r, j。重音一般落在词的最后一个音节上, 加附加成分后, 重音后移, 落在附加成分的最后一个音节上。名词、代词和数词各有 6 个格。名词、代词都有人称及数的变化。动词除了态、式、时、人称和数的语法范畴外, 还有体的语法范畴。句子的语序是主语—宾语—谓语动词。修饰语一般在中心词之前。时间或地点状语也可以离开中心词位于句子的开头。词汇中保留古代突厥语词较多, 还有较多的蒙古语和哈萨克语借词。

(傅懋勳 宋正纯)

Tu'erqiyu

土耳其语 (Turkish language) 土耳其多数居民的语言。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使用人口 4 000 多万, 其中有 150 多万在塞浦路斯、苏联、欧洲东南部和近东。现代规范标准语形成于 20 世纪 30~50 年代。元音和谐是土耳其语的突出特征之一。除借词外, 一个词的所有元音必须属于同一个类别 (前元音或后元音), 如 sargı (绸带) 中 a 和 ı 均属后元音, 而 sergi (展览) 中 e 和 i 均属前元音。有些附加成分的元音因词根中元音类别的不同而异, 如 gör-ür-üm (我看见) 的附加成分元音用 ü 与词根的 ö 取得和谐。土耳其语是粘着型语言, 语法范畴通过在词根上附加各种附加成分来表示。这些附加成分大都是可以分析的。名词有数、格等变化, 如 ev-ler-in (房子的), -ler 表示复数, -in 表示所有格。动词有态、式、时、人称以及动名词、形动词、副动词等范畴。词汇除突厥语族同源词外, 还吸收了许多来自阿拉伯语、波斯语、意大利语、希腊语、英语等语言的借词。近几十年来, 一些阿拉伯语、波斯语的借词逐渐被淘汰。土耳其语除主要的伊斯坦布尔方言外, 还有西部方言、卡斯莫努方言、东北方言和科尼亚方言等。土耳其语长期用阿拉伯字母书写, 1923 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 于 1928 年进行文字改革, 改用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文字。新文字有 29 个字母, 其中元音字母 8 个, 辅音字母 21 个。

(陈宗振)

Tujia yu

土家语 (Tujia language) 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 语支未定。分布在中国湖南、湖北和四川等省。使用人口约 20 万 (1982)。分北部和南部两个方言。语言特点 (以北部方言为代表): 有 21 个声母: p, ph, m, w, t, th, l(n), ts, tsh, s, z, tɕ, tɕh, ɲ, ɕ, j, k, kh, ŋ, x, ɣ; 有 25 个韵母: i, a, o, u, uɪ, ie, ia, iu, ai, au, ou, ui, ua, uɪ, ue, iau, uai, i, ā, ǎ, iā, uā, oŋ, ioŋ, 其中 uā, uǎ, ioŋ 3 个韵母只出现在汉语借词里。有 4 个声调: 55, 53, 35, 21。名词有领属格, 人称代词有单、复数和领属格, 动词有主动态和被动态, 有 17 种情貌范畴。句子语序为主语—宾语—

谓语。领属性修饰语在名词之前, 描写性修饰语在名词之后, 动词、形容词的修饰语在中心词之前, 补语在动词、形容词之后。南部方言有 26 个声母, 比北部方言多 5 个浊声母, 有 18 个韵母, 另有 12 个韵母专拼汉语借词用。

(陈 康)

Tukumanyu

土库曼语 (Turkmen language) 土库曼族的语言。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西南 (乌古斯) 语支。使用人口约 200 万。主要分布在苏联土库曼以及阿富汗、伊朗等国。土库曼语主要有特肯、约木德、艾尔萨林、撒拉尔、萨里克、巧乌都尔等方言。土库曼语元音保留了古代突厥语中的长元音, 即除 8 个正规元音 a, ä(e), i, i, o, u, ö, ü 外, 还有 8 个长元音 ā, ā, ī, ī, ō, ō, ū, ū。辅音方面的特点是有齿间辅音 s, z (这一点与同语族的巴什基尔语一样)。其余辅音一般同其他突厥语。语法方面像其他突厥语一样, 名词有数、领属人称和格的变化。动词有人称变位、式、态、时的变化和多种形式的形动词和副动词。使用后置词。土库曼语是在西部乌古斯语基础上形成的。但在其以后的发展过程中 (12~15 世纪) 受到克普恰克语组突厥语的影响。旧的土库曼书面语主要为诗歌语言。苏联现代土库曼语于 1917 年十月革命后形成。1928 年以前其文字采用阿拉伯字母, 30 年代采用拉丁字母, 1940 年后采用俄文字母。

(耿世民)

Tuzuwen

土族文 (Monguor writing) 见土族语。

Tuzuyu

土族语 (Monguor language) 又称“蒙古尔”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分布在中国青海省东部和甘肃省西部地区, 以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和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最集中。使用人口约 10 万 (1982)。分互助方言和民和方言。语音方面 (以互助方言为代表), 有 7 个元音: i, e, ə, ɛ, u, o, a。其中 i, e, u, o, a 各分长短 (互助方言的长元音在民和方言是相应的短元音)。ɛ 只出现在汉语借词中。复元音较多, 多为后响的二合元音。辅音有 26 个: b, p, m, f, v, d, t, n, l, r, ɖ, ts, s, ɖ, ʂ, ʂ, z, ɖ, ɰ, ɕ, j, g, k, ŋ, x, ɕ。元音和谐只涉及一部分元音, 主要表现在词根范围内。复辅音较多, 除个别情况外都出现于词首。以 f, x, ɕ 等形式保留着词首古音 h。第一音节 (尤其是词首) 的元音失落现象较常见。词的重音落在末一个音节上, 当词干后接有含元音的附加成分时, 随着音节的增加, 重音往后移动。语法方面, 各种格的附加成分形式简单, 没有变体。表示复数的附加成分 -sge 和 -ŋgula 比较特殊。静词和形动词作谓语时要加判断语气助词。副动词的附加成分种类较多。词汇方面, 保留着一些古词。汉语借词和藏语借词较多。派生法是主要的构词方式。

1979 年, 本民族的语文工作者设计了以汉语拼音方案为基础的文字方案 (草案)。

(照那斯图)

Tuhuoluoyu

吐火罗语 (Tocharian language) 原始印欧语言中的一种独立语言。20 世纪初在中国新疆发现了这种语言的残卷,最初定名为吐火罗语,后来有人认为不妥。经学者考释,此语言有两种方言。于是将吐鲁番、焉耆一带的残卷所代表的方言定名为焉耆语,将库车一带的残卷所代表的方言定名为龟兹语。德国学者仍保留吐火罗之名,将前者称为吐火罗语 A,或东吐火罗语;将后者称为吐火罗语 B,或西吐火罗语。最近又有人认为还是吐火罗这个名称正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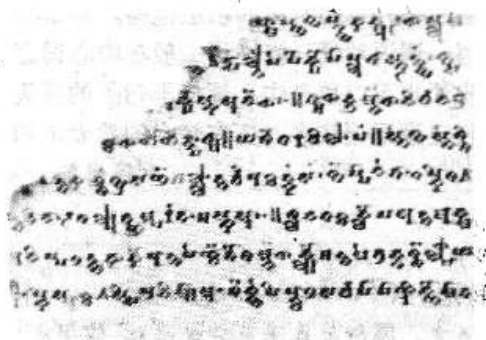
吐火罗语使用的字母是中亚婆罗米斜体字母。时间可能在 6~8 世纪之间。

吐火罗语的元音分简单元音与复合元音。辅音有喉音、腭音、顶音、齿音、唇音、半元音与流音、咝音、气音(声门音)、塞擦音。同梵语比较,最大的差别是:真正的吐火罗词中缺少清送气音、浊音和浊送气音。另一方面,吐火罗语又增加了一些新的标音符号。

吐火罗语的名词、形容词等有 3 个性:阳性、阴性、中性;有 5 个数:单数、对数、双数、复数、复合复数;格有双层结构:下层的格是主格、间接格、所有格、呼格(只限于西吐火罗语),上层的格是派生格,有具格、越格、随格、向格、从格、依格、因格(只限于西吐火罗语)。代词有人称、指示、疑问、不定等。有副词。在动词变位方面,有基础动词与致使动词;语态有主动与中间两种;数有单数、复数,双数极少;时态有现在时、未完成时、加重过去时、过去时;语气有虚拟、愿望、命令 3 种。

吐火罗语的发现有重大意义。对印欧比较语言学来说,它提出了一些新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从地理位置

上来看,它本属于东方的 S (Satem) 类语言,事实上却属于西方的 K (Kentum) 类语言。这问题到现在还没有完全令人满意的答案。对中印文化关系来讲,它弥补了一些过去没有解释的环节。最早的一些汉译佛教名词不是直接从梵文、巴利文译过来的,而是通过吐火罗语作媒介。对中国文学史来讲,它保留了一些剧本,比如长达 27 幕的《弥勒会见记》剧本(参见彩图插页第 29 页),比用汉文写成的剧本早六七百年(见图)。



1975 年在新疆发现的吐火罗文
《弥勒会见记》残片

参考书目

- E. Sieg, W. Siegling, W. Schulze, *Tocharische Grammatik*, Goettingen, 1931.
W. Krause und W. Thomas, *Tocharisches Elementarbuch*, Bd. 1, Heidelberg, 1960.
W. Thomas, *Tocharisches Elementarbuch*, Bd. 2, Heidelberg, 1964.
W. Krause, *Westtocharische Grammatik*, Bd. 1: Das Verbum, Heidelberg, 1952.

(李炎林)

W

Wa'enlɪxɪ

瓦恩里希, U. (Uriel Weinreich 1926~1967) 美国语言学家。生于维尔纽斯(当时属波兰, 现属苏联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犹太人。从小学依地语, 并且学会了希伯来语、德语、波兰语、白俄罗斯语和俄语。14岁移居美国。他受业于 A. 马丁内和 R. 雅柯布逊等人, 1951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从1952年起担任哥伦比亚大学依地语言、文学及文化讲座, 后来还担任语言学系主任。1953~1960年, 他是语言学杂志《词》的主编。

瓦恩里希对依地语言、文学及文化进行了毕生的研究。在语言学方面, 他所涉及的面也很广。早年研究双语现象, 系统地描述了由于双语或多语在一个地方同时存在而产生的种种互相干扰的现象, 干扰的机制, 干扰的语言结构因素及心理、社会、文化等因素。他的研究成为后来双语研究者的主要出发点。

为了调和方言学与结构语言学的矛盾, 瓦恩里希提出了以方言内部结构为基础来考察方言间的差异, 并且认为可以建立一个更高层次的“跨方言系统”用以描写方言间的异同。

60年代中期, 瓦恩里希着重于语义研究。他认为语义学的目的就是要阐明人们理解句子的能力, 语义是有结构的, 而且语义与句法虽然各有各的特征, 但是不能截然分开。这些看法对生成语义学派有影响。

在最后几年, 瓦恩里希和学生 W. 拉博夫(1927~) 等人提出了一个关于语言演变的新理论。他们说, 只有把语言看成一个井井有条的杂合体, 认为语言内部存在着有规则的差异, 而且分明可见, 才能把语言的共时结构与历史演变调和起来。在他看来, 演变是寓于语言结构的有规则的差异之中的。

瓦恩里希在语言学方面的代表作有《不同语言的并用》(1953)、《结构方言学有可能吗?》(1954)、《语义学理论探索》(1966), 以及与拉博夫等人合著的《语言演变理论的经验基础》(1968)等。 (廖秋忠)

Wa'erma

瓦尔玛, D. (Dhīrendra Varmā 1897~1973) 印度语言学家。1897年5月17日生于北方邦的巴雷利城, 卒于1973年4月23日。1918年瓦尔玛在阿拉哈巴德的缪尔中央学院获文学士学位, 1921年又在该校获文学硕士学位。1924年阿拉哈巴德大学设立印地语系, 他被聘为第一个教员。1934年赴巴黎大学进修, 在著名语言学家 J. 布洛克指导下学习语言学。1935年获文学博士学位, 其学位论文为《布拉吉语》(中古时期北印度的一

种重要文学语言, 现为西部印地语的一种重要方言)。瓦尔玛长期担任阿拉哈巴德大学印地语系主任, 印度斯坦



研究所所长等职, 晚年任贾巴尔布尔大学校长。语言方面的重要著作有《印地语史》(1933), 是印度较早的印地语史著作, 系统地论述了印地语语音和语法演变的历史, 该书至今仍是印地语史方面的重要参考书; 《印地语及其文字》(1933)是较早的印地语文字史著作; 《农村印地语》(1933)论述印地语的

各种方言; 《布拉吉语语法》(1937)是印度描写该语言最早的语法著作。他还主编过两卷本《印地语文学词典》(1952)。 (殷洪元)

Wa-Benglong yuzhi

佤-崩龙语支 (Va-Benglong branch) 见佤-德昂语支。

Wa-De'ang yuzhi

佤-德昂语支 (Va-De'ang branch) 原称佤-崩龙语支。属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也有人将它列入中央语族或崩龙佤语族, 但国内外大部分学者将它列入孟-高棉语族。在中国, 包括佤语、布朗语和德昂(崩龙)语。语言特点: 辅音比较复杂, 有30个左右, 有清化鼻音。复辅音比较多, 有双唇塞音、舌根塞音与流音 r、l 组合成的复辅音, 有带同部位鼻冠音的复辅音等。元音有松紧、长短的对立。能在元音后出现的辅音有 p、t、k、m、n、ŋ、ʔ、h 以及 l、l̥、r、s 等。词汇以单音节根词为主, 有许多合成词, 由两个词根组成, 组合形式主要有并列式、支配式和修饰式等。用语音变化表示语法意义。前加成分较多, 中加成分和后加成分很少。人称代词分单数、双数和复数。第一人称双数和复数又分包括式和排除式。基本语序是: 主语—谓语—宾语。名词的修饰语一般在中心词之后; 补语在谓语之后; 状语多在谓语之前。 (颜其香)

Wawen

佤文 (Va writing) 见佤语。

Wayu

佤语 (Va language) 属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佤-德昂(原称佤-崩龙)语支。在中国主要分布在云南省的沧源、西盟以及孟连、澜沧、双江、耿马和永德等县。使用人口29.8万多(1982)。缅甸境内也有这种语言的使用者。佤语分巴饶克、佤、阿佤3个方言。元音有松紧对立, 有复辅音。塞音和舌面塞擦音都分清浊, 除清擦音 f、s、h 和喉塞音 ʔ 外, 所有辅音都有送气与不送气之分。有 -m、-n、-ŋ、-p、-t、-k、-ʔ、-h 等辅音韵尾。词汇以单音节根

词为主,复合词以词根复合法为主要的构词方式。附加成分较少。有一部分单音节词用变换辅音、元音的办法表示人称代词的双数与复数、指示代词的近指与远指、不同的词性以及动词的他动与自动等。如 ?a? (咱俩), ?e? (咱们), pih (扫), bih (扫帚)。词序是表达语法意义的重要手段。修饰语在被修饰语之后。主语、谓语在不同语气的句子里位置不同。表示陈述、祈使和感叹的句子,一般是主语在谓语之前。疑问句一般是主语在谓语之后。

20 世纪初,在澜沧、沧源之间的岩帅一带曾有英国传教士设计过一套拉丁字母的拼音文字,但很不完备,不能确切地表达佤语。1957 年中国创制了拉丁字母的佤族文字方案,并用这种文字出版了词典、课本和通俗读物等。(周植志)

waiyu jiaoxue

外语教学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语言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指某一社区内进行的非本族语教学,一般在人们学会母语后在课堂里进行。

外语教学简史 外语教学的历史可追溯至古罗马时期的希腊语教学与中世纪欧洲各国的拉丁语教学,那时以讲授语法和修辞训练为主。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以捷克 J. A. 夸美纽斯(1592~1670)为代表的人文主义教育家既强调学习希腊、拉丁语,为复兴古代文化作准备,亦力主在学校开设现代语言课程,以适应民族交往的需要。此后,西欧把外语教学区分为古典语言与现代语言的教学,前者指古希腊语与拉丁语,后者指西欧一些主要的民族语言,如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等。17、18 世纪西欧的外语教学以古典语言为主;19 世纪后,现代语言教学逐渐取而代之。20 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现代语言教学的范围扩大至东、北欧和亚、非各洲的主要民族语言。

中国外语教学约开始于明代,1407 年设四夷馆,专修印度、缅甸等国语言。1757 年,清政府在北京设俄罗斯文馆,教授俄文。1862 年,改建为京师同文馆,先设英文馆,后陆续增设法文馆、俄文馆、德文馆、日文馆。同文馆的培养目标为翻译人员,学生约 120 名。1903 年后,在中学开设外语课。中国外语教学主要教授现代语言,语种的选择常受社会需要和教育制度的模式所影响。清末中学课程抄袭德、日,外语科目先以日语或英语为主,后又以德语或英语为主。辛亥革命后,课程设置效法英、美,以英语为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先以俄语为主,后又转为以英语为主。

外语教学法 分 4 个阶段:①1880 年以前,由于以古典语言(特别是拉丁语)的教学为主,采用的方法是语法-翻译法,强调以熟记语法规则和单词为手段。通过逐字逐句的翻译来训练阅读和写作的能力。②1880 年,欧洲兴起了外语教学改革运动。语言学家如英国的 H. 斯维特、德国的 W. 维叶托(1850~1918)、丹麦的 O. 叶斯泊

森、法国的语言教师 F. 戈安都认为传统的古典语言教学法难以适应现代语言教学的需要,要求改革。1887 年,国际语音协会提出 6 项原则:主张外语教学应从日常生活口语开始;要让学生熟悉语音、常用的句子和习语;语法教学要用归纳法;要让学生用外语思维;写作训练要先模仿后创作;笔头翻译应在提高阶段进行。于是出现了体现这些原则的直接教学法。1904 年,叶斯泊森发表《怎样教外国语》,他从教学目标、教学法和选材原则到教学手段、练习体系,总结了这个阶段外语教学改革的成果。③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交往频繁,促进了现代语言的教学,使用直接教学法教授外语的伯力兹学校应运而生,分布于欧美各国。H. E. 帕尔默在《语言的科学研究和教学》(1917)中提出从声音、音素、文字、词源、语义、句法等方面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M. 韦斯特提出通过阅读教外语的方法。这时开始注意训练学生运用语言能力的方法。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旅游业的急速发展,促进了外语教学在实践和理论方面的研究。美国政府曾在战时开办军队外语训练班,采用以刺激-反映论为基础的强化教学手段,开辟了外语教学的新途径。20 世纪 50~60 年代法国法语传播学习与研究中心编辑了一套采用视听法的基础法语教程,以试验视听法、听说法为中心的外语教学改革热潮随之而起。60 年代以后,语言实验室问世,视听法和语言实验室所提供的大量机械语言操练,被视为“理想的”教学法。不久,作为视听法理论基础的刺激-反映论受到生成语法学派的抨击,1963 年与 1970 年相继发表的《吉丁报告》与《宾州试验报告》均指出听说法并不比传统教学法优越,语言实验室对外语教学亦未见有明显影响。

外语教学的实践孕育着应用语言学的诞生,到 60 年代中叶,应用语言学大为兴盛。它把各语言学科的研究成果应用于探讨外语教学的规律,不但在教学法和教学大纲上提出新的主张,而且着重研究外语学习模式,提出各种学习模式的假设。L. 塞林克尔认为外语学习者在学中使用的是—种过渡语言,它既不是学习者本族语的翻译,也不是本族人所说的语言。过渡语言有其自身规律,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善。J. 舒曼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提出“文化移入”模式。他认为在外语学习过程中首要的是社会因素与个人感情因素。社会群体和个人对所教语言的态度,各民族间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差异,都会影响外语教学。因此,文化移入程度的多少决定了外语学习的成败。但舒曼的模式没有接触到外语学习的内部规律。S. 克拉申、H. 杜莱、M. 伯特提出“监察模式”,他们认为学习外语的心理过程有 3 个重要环节:①过滤。在外语学习过程中学习者只能吸收他所接触的大量语言素材中的一部分,因为个人的学习动机、态度、感情、心绪起了过滤的作用。过滤决定学习者该学习什么,学习到什么程度,用什么速度学习。②组织。学习者在头脑中逐步形成新的语言系统。在这个过程中,他会使用一些过渡性结构,

会犯各种语言错误,会按一定次序来学习语言结构。T. 贝弗和 D. 斯洛宾还发现语言难度和学习难度不相一致,但是按什么原则去决定学习难度,仍有待探索。③监察。过滤与组织属潜意识心理活动,而监察则是有意识的心理活动。学习语言可以通过接触,自然吸收,无需进课堂;亦可以在课堂里跟着老师正规地学习。通过后一途径所学到的语言知识可用以监察语言的输出,例如讲错话能自行改正,写的东西能自己润饰。至于能否进行监察,则取决于学习者的年龄、语言知识以及是否有时间、是否注意语言形式等。

上述假设虽有助于了解外语学习过程,却仍不能解释它的各种复杂现象。

外语学习者的内部因素 这是教学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首先是年龄。有人主张“从小学外语”,认为超过了青春期,人们的语言能力已固定在大脑左半球,因此成人学另一种语言要比儿童困难得多。但也有人认为难以断定儿童是最佳的外语学习者。就语音能力而言,儿童确有优势;但在词汇和语法能力方面,青年和成人的发展速度要快得多。一些研究者(如克拉申)指出,外语学习的年龄不但涉及神经生理因素,而且还与认知和感情因素、语言环境有关。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使儿童和成人在外语学习上产生差异。其次是学习动机和态度。这是过滤过程中的感情因素,它对学习的成败起决定性作用。研究表明,外语学习的效果不但和学习者对所学外语以及所处的学习环境的态度有关,而且还和整个社区对这种语言以及使用它的那个社区的态度有关。另外一个因素是外语学能。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有人受语法-翻译法的影响,把学能看成是驾驭语法和翻译的能力,现在一般认为它包括辨音能力,声音与符号相联的能力,对句子结构的敏感性,学习语言的归纳能力和强记能力,体现了听说法的观点。在行为主义的语言学习理论影响下,有人认为学能是一个学习者掌握一定份量的材料所需要的时间,强调外在的客观因素,而不是人的内在素质。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在认知心理学的影响下,人们认识到与外语学习有关的不仅是学能,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一般的认知方式。例如,有些“独立型”的学习者善于从语境中分离语言项目并加以归类,具有较强的学习外语的能力;有的学习者易受母语干扰,学习外语的困难较大。

外语学习环境 从广义上说,这是指有利于提高外语学习的效率和质量的客观因素。例如,具有交际需要的“自然的”语言环境比以学习语言结构和语法规则为主体的“形式的”语言环境,更有利于学习外语。学习者在交际中所处的地位也是一种外语学习环境。一种是无需作出反应的单向交际(如只是听或读),一种是只需作出有限反应的双向交际(如在听或读时,以母语或姿势、表情作出反应),另一种是接受与传递均使用外语的完全的双向交际。在初学阶段应让学习者作单向的或有限反应的双向交际,等到他们具有使用外语的能力后,才要求作完全的双向交际。语言环境中如有具体的指称对象,可

以帮助初学者理解话语的意思。从狭义上说,外语学习环境指学习者所接触到的特殊语言结构及其对外语学习所产生的影响。例如某些语言项目具有听觉或视觉上的鲜明特征,学习起来较为容易。语言项目的使用频率也是一种外语学习环境。一些重复率高的单词和句型会使学习者产生深刻的印象。

专用外语教学 指具有特定使用目标的外语教学。在专用外语中,首先可区分出科技外语与非科技外语,其次可区分出职业性专用外语(如旅店经理用外语、导游用外语,等等)和专业性专用外语(如化学用外语、经济学用外语,等等)。专用外语教学方式较灵活多样,可以在职训练,亦可以职前或职后训练;可以先学一般的外语,然后学专用外语,亦可以结合专业学习外语。专用外语的教学要求应明确具体,设计课程时要先对学习者的外语需要作调查和分析,然后编写相应的教学大纲和教材。

对于专用外语的教学,人们曾经以为是一般外语加上专业词汇。后来又认识到专业词汇的教学并非主要的。据 M. 因曼用随机抽样的办法对 11 万余词的科技读物的统计,专业词汇只占 20% 左右。在其余的 80% 的词汇里,10% 为功能词,70% 都是非专业和准专业的词汇。因而在专用外语教学中,人们转而注意专用外语的语体分析。例如英语科技文章中常使用公式、原理、符号、数字、缩略语等手段来表示数量关系,许多词有希腊、拉丁语的词根和前、后缀,常用表示逻辑语法关系的连接语、较长的名词性词组和被动语态等等。

外语测试 外语测试历来是在课堂内进行,方式大多是问答、作文、翻译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外语测试具有心理测量与结构主义相结合的特征。R. 拉多的《语言测试:外语试题的编写和使用》(1961)系统地总结了在结构主义语言学、行为主义外语教学法、心理测量方法三者相互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语言测试理论。这种理论的结晶是分立式测试。它采用客观性测试方法(主要为多项选择题),分别测试语音、语法、词汇、阅读等项目。以后,外语测试在心理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的影响下,具有如下的几个特点:①交际性测试的兴起。心理语言学对语言使用过程的研究和社会语言学者 D. 海姆斯提出的“交际能力”的概念,使人们认识到语言的整体性和语言活动的交际性,因此语言所测试的应该是综合的交际能力,一般认为包括语法能力(语法规则的知识)、在社会中使用语言的能力(话语使用规则的知识)和对策能力(言语与非言语交际的对策规则的知识)。交际性测试尽量使所测试的内容和方法符合用外语进行交际的实际情况,测试项目的设计较为生动活泼。随着交际教学法试验的深入,人们对交际性测试的性质、内容、方法和评定方式将会有更明确的认识。②逐渐制度化、专业化、标准化,并使用电子计算机。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陆续出现一些大规模的标准化语言水平考试,由专门考试机构命题、组织考试和评卷。标准化考试的核心是建立稳定的标准,依靠专家,并且运用现代化的管理手段和技术手段来保证考试

的可靠性、效度和区分能力。借助电子计算机评卷、分析试题,甚至命题。电子计算机的应用和考试的定量分析使语言测试日益成为一种精密科学。

外语电化教学 主要是利用广播、唱片、电影、录音、录像等手段辅助外语教学。根据视听教学法的原则,让学生在语言实验室里作大量的四步练习(刺激/反应/正确回答/重复正确的回答)曾经是一种很流行的电化教学活动。但是,这种活动不能代替教师的作用。70年代以来,由于微型电子计算机的逐步普及,它在外语教学中应用的可能性亦日益增加。目前,电子计算机多用于训练阅读、写作,或和录音机连接,以训练听力。电子计算机智能模拟功能可以用来编制新的练习,并对学生的反应作出分析和判断;如果进一步与言语识别器、言语合成器连接,在外语教学中应用的范围将更广泛。(参见彩图插页第39页)

参考书目

L. G. Kelly, *25 Century of Language Teaching*, Newbury House, Rowley, 1976.

H. H. Stern, *Fundamental Concepts on Language Teaching*, OUP, London, 1983.

H. Dulay, M. Burt & S. Krashen, *Language Two*, OUP, London, 1982.

A. Hughes & D. Porter, *Current Development in Language Testing*, Academic Press, London, 1983.

A. Robinson, *ESP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Pergamon Press, London, 1980.

(桂诗春)

Wang Guowei

王国维 (1877~1927) 中国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文学家。字静安,号观堂,又号永观,浙江海宁人。幼年肄业于杭州崇文书院。1898年入上海罗振玉所办的东文学社,学习外语、哲学、文学等新学。1907年与罗振玉同在学部任职。辛亥革命后,随罗振玉避居日本京都,开始进行古文字研究。1916年回国,在上海英人哈同所办仓圣明智大学任教授。1922年曾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信导师。1925年至北京,任清华研究院教授。1927年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



王国维平生著述宏富,成就甚多,而且能开风气之先。他在古文字研究方面,成绩最超卓的是甲骨文。因为罗振玉藏有两三万片甲骨,王国维利用这些材料考释出不少文字,而且他能以地下出土的这些实物材料跟史书相参证,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系统地考明商代的先公先王的名号、世系和称谓,立论精确,为学者所叹服。又为哈同作《载寿堂所藏殷虚文字》,诠释文字也多有发现。对甲骨学贡献极大。

王国维在金文研究方面也是成绩超卓的。所著《宋代

金文著录表》和《国朝(清朝)金文著录表》是检索宋代和清代书中所著录的有铭文的铜器的重要参考书。他还写了10多篇考释青铜器铭文的单篇文章,收入《观堂集林》。王国维解释文字极为矜慎,不知者则阙而不论,不为穿凿附会之说。他在《毛公鼎考释序》里说:“今日通行文字,人人能读之解之。《诗》、《书》彝器亦古之通行文字,今日所以难读者,由今人之知古代不如知现代之深故也。苟考之史事与制度文物以知其时代之情状,本之《诗》、《书》以求其文之义例,考之古音以通其义之假借,参之彝器以验其文字之变化,由此而之彼,即甲以推乙,则于字之不可释,义之不可通者,必间有获焉。”这一段话就是考释彝器铭文的方法论。由此可见王氏研究古文字深得三昧。他还提出“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也为学者所承认。

王国维除对古史、古文字研究有贡献外,对古音和训诂也有许多重要论著。如《补高邮王氏说文谐声谱》、《联绵字谱》、《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尔雅草木虫鱼鸟兽名释例》、《书郭注方言后》等都是信今传后之作。总之,王氏治学贵在贯通,实事求是,不固守前人成说,能精心比证,以实物与史书参验,决定是非,所以所得独多。

(周祖谟)

Wang Jingru

王静如 (1903~) 中国语言学家。1903年9月生于河北省深泽县。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1933~1936年在法国、英国、德国学习并研究语言学、中亚史语学、印欧语比较语言学以及汉学等。回国后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研究员和中法大学教授。1949年以后,先后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等。在西夏语文的研究方面做了开创性的工作。1930年著《西夏文汉藏译音释略》一文,对西夏语语音系统和语音特点提出了新见解,受到学术界的注意。1932~1933年著《西夏研究》3辑,对西夏语文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并对4部西夏文佛经逐字对译(用汉藏两种文字对照)。该著于1936年获法国院士会东方学“朱利安奖金”,他被推荐为法国巴黎语言学会会员。他在《西夏文木活字版佛经与铜碑》(1972)和《新见西夏文石刻和敦煌安西洞窟汉文题记考释》(1984)著作中,根据新发现的西夏文文物,对西夏语文的研究又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此外,对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如契丹文、女真文、回鹘文等也发表过不少论著,如《辽道宗及宣懿皇后契丹国字哀册初释》(1933)、《契丹国字再释》(1935)、《女真文晏台进士题名碑文初释》(1937)、《突厥文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译释》(1938)等。在汉语音韵研究方面,发表过《论开合口》、《论古汉



语之腭介音》(1948)等论著。

(戴庆厦)

Wang Li

王力 (1900~1986) 中国语言学家、诗人。字了一。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县人。生于1900年8月10日,卒于1986年5月3日。1913年小学毕业后失学。1916年在博白高等小学任国文教员。1924年入上海南方大学学习,次年转入上海国民大学。1926年考进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1927年赴法国留学,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32年回国,历任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广西大学、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岭南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中山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语言学系主任。1954年调北京大学任教授,直至去世。曾兼任汉语教研室主任,中文系副主任,并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副主任。1956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7年冬赴波兰讲学。曾当选为广东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广州市人民政府委员,北京市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至五届委员,第四、五届常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四、五、六届委员,第五、六届常务委员会委员。曾兼任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顾问,中国语言学会名誉会长,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



60年来,王力一直从事语言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为发展中国语言科学、培养语言学专门人才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36年发表《中国文法学初探》一文,对中国语法学界自《马氏文通》以来因袭英语语法研究的状况提出批评,同时对汉语语法的特点和研究方法做了初步探讨。1937年发表的《中国文法中的系词》,指出系词在古代汉语里不是必要的,汉语的句子也不一定都要有动词,这揭示了汉语不同于印欧语言的一个突出特点。他的《中国现代语法》(1943)、《中国语法理论》(1944)以及《中国语法纲要》(1946)等著作,以《红楼梦》为主要研究对象,建立了自己的汉语语法体系。在40年代,王力的语法著作和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都对汉语语法研究起了重要的影响。

王力在音韵学方面用力最勤。早年在法国专攻实验语音学,著有《博白方音实验录》(1931)。他的《中国音韵学》(1936,1955年再版时改名为《汉语音韵学》)一书用现代语音学理论解释传统音韵学的概念,叙述了传统的今音学(《广韵》音系)、古音学和等韵学的基本内容。此外,王力还发表了一系列研究音韵的论文,例如《南北朝诗人用韵考》(1936)、《上古韵母系统研究》(1937)、《汉越语研究》(1948)、《上古汉语入声和阴声的分野及其收音》(1960)、《古韵脂微物质月五部的分野》(1963)、《先秦古韵拟测问题》(1964)、《黄侃古音学述评》(1978)、《古无去

声例证》(1980)、《〈经典释文〉反切考》(1982)等以及《汉语音韵》(1962)、《楚辞韵读》(1980)、《诗经韵读》(1980)和《汉语语音史》(1985)等专著。王力在上古音方面的贡献有三:①脂、微分部。王力受到前人的启发,利用先秦韵字和谐声材料从与真、质(至)相对的脂部中分出与文、物(队)相对的微部,这个结论已为一般学者所承认。②在古韵部的构拟上,主张每个韵部只有一个主元音,阴声韵部都是开音节。对高本汉的学说(每个韵部有两个以上的主元音、阴声韵部大都收浊塞音尾-g、-d、-b、-r之类)作了修正。③认为上古声调分平入两大类,它们又各分长短二类,即长平、短平,长入、短入,后来演变为平、上、去、入四声。这就肯定了上古声调中除音高外音长也起很大的(甚至是主要的)作用。他认为,这种主张可以解释上古许多阴声字(即长入,中古多变读为去声)和入声字(即短入)相押的事实,同时也与汉藏语系许多语言具有的元音分长短的普遍特征相类似。这个说法受到研究汉藏语系比较语言学者的重视。

王力自40年代开始从事汉语词汇的研究,先后发表《古语的死亡、残留和转生》(1941)、《新字义的产生》(1942)、《理想的字典》(1945)、《词义的发展和变化》(1983)等文,着重探讨汉语词义演变的特点和规律。《新训诂学》(1947)和《训诂学上的一些问题》(1962)两篇论文对中国传统的训诂学做了认真的总结与批判。他还主张用历史发展的观点建立新的汉语语义学,他的《同源字典》(1982)是在词汇学方面贯彻自己主张的代表著作。

王力对汉语的语音、语法、词汇所作的描写的和历史的的研究,集中在《汉语史稿》(上、中、下,1957~1958)一书中。70年代末开始修订重写,分为《汉语音韵史》(1985)、《汉语语法史》和《汉语词汇史》三书。他的《中国语言学史》(1981)对中国2000年来的语文研究和语言学遗产做了比较全面的叙述和初步的总结。《清代古音学》一书则着重介绍、评论了自顾炎武以来清代的江永、段玉裁、戴震、孔广森、王念孙、朱骏声、江有诰和近代的章炳麟、黄侃等人在古音学上的成就。他主编的《古代汉语》教材(1962~1964,共4册,1980年修订)体系新颖、内容丰富,在国内外都获得好评。

王力重视语言文字的应用。他在文字改革、汉语规范化和推广普通话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和普及工作。早在30年代他就提倡文字改革,主张用罗马字拼音。1940年出版的专著《汉字改革》,分析了现行汉字的优缺点及改革的可能性,提出了改革方案。1949年后参加汉字简化、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推广普通话以及汉语规范化的研究工作,发表了多篇论文。

王力又是诗律学家。他的《汉语诗律学》(1958)对中国古代诗词的格律和语言特点作了精到的研究。1962年发表的《中国古典文论中谈到的语言形式美》和《略论语言形式美》两篇论文,则是他研究诗歌语言的另一重要成果,曾引起当时诗歌界的普遍重视。王力又是诗人,著有《龙虫并雕斋诗集》(1984)。

王力在语言学方面的专著有40多种,论文近200篇,共约1000万余字,内容几乎涉及语言学各个领域,有许多且具有开创性。这些论著正汇编为《王力文集》,20卷,1985年已出版前3卷。王力捐献这部书的稿费,设立“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金”,自1986年开始评选、颁发。(参见彩图插页第26页) (唐作藩)

Wang Niansun

王念孙 (1744~1832) 中国清代音韵学家、训诂学家、校勘学家。江苏高邮县人。字怀祖,号石瞿。生于



乾隆九年,卒于道光十二年。幼从父安国读书,稍长,从休宁戴震求学。乾隆四十年乙未(1775)为庶吉士,改工部都水司主事。嘉庆初年,官直隶永定河道。连年治水,最后因永定河水异涨罢官。居京师旂檀寺第,以著述自娱。著有《广雅疏证》10卷(见《广雅》),《读书杂志》82卷。王念孙对经传诸子最熟,而学

问师承戴震,以音韵之学为根基。曾辨析《诗经》、《楚辞》、《淮南子》、《易林》等书用韵,定古韵为21部,同时对古书中文字的假借、声音的通转都深有领会,所以超轶前人,独有创获。他认为“训诂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就古音以求古义,不必限于文字形体。在旧日训诂学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趋向于字族、词族的研究。《读书杂志》一书,校订古书的讹误,疏解前人的疑义,大都确凿不易,对校勘学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影响。《广雅疏证》、《读书杂志》旧有木刻本,现在都有新的影印本。王念孙又有《方言疏证补》、《释大》和《毛诗群经楚辞古韵谱》等著作,罗振玉都根据遗稿印入《高邮王氏遗书》内。

(周祖谟)

Wang Renxu

王仁昫 中国唐代音韵学家,字德温,唐中宗时人。曾作过衢州信安县尉,所著《刊谬补缺切韵》,是隋代陆法言《切韵》的一个现存的影响最大的增订本。大概写成于唐中宗神龙二年(706)。《刊谬补缺切韵·序》小注里说:“刊谬者,谓刊正谬误;补缺者,谓加字及训。”说他补正《切韵》的缺失有10多处。最重要的是增补了“广”和“严”两个韵,其余或是归并应该归并而《切韵》没有归并的小韵,或是纠正个别注释的不当。依照敦煌本、宋濂跋本计算,增加的字大概有5000多个。《切韵》原来没有义训的,王书都作了增补,还增加了一些又音。体例也略有改变,敦煌残卷《切韵》(S2683)是每一组第一字下先出训释,后出反切,再记一组字数;故宫本是先出反切,后出训释,再记字数。例如S2683号韵书残卷“绾,乌板反,一”,王书是“绾,乌板反,系,一”。这样更便于按字音检索。

(刘广和)

Wang Xianqian

王先谦 (1842~1917) 中国清代经学家、训诂学家。湖南长沙人,字益吾,号葵园。生于清道光二十二年,卒于民国六年。同治进士,曾任国子监祭酒,江苏学政,湖南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山长。平生致力于经学和史学,并且从事训诂研究和古书注释。著有《诗三家义集疏》、《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荀子集解》、《庄子集解》等书。毕沅原有《释名疏证》一书,惟注释疏略,王先谦又作《释名疏证补》一书,补其不备。王先谦除著书外,又曾继阮元之后辑刊《皇清经解续编》209卷,为研究清代经学提供极大便利。

(周祖谟)

Wang Yinshi

王引之 (1766~1834) 中国清代训诂学家,江苏高邮人。祖王安国,吏部尚书。父王念孙,直隶永定河兵备道。王引之字伯申,乾隆六十年(1795)举人,嘉庆四年(1799)进士,由翰林院编修为礼部尚书,又改为工部尚书。平生由治经学而深究训诂之学,用训诂以说经,又用训诂以校正群经。其学主要出于庭训。所著有《经义述闻》32卷,《经传释词》10卷。《经义述闻》所述,包括《易》、《书》、《诗》、《周官》、《仪礼》、《大戴记》、《小戴记》、《春秋内外传》、《公羊传》、《穀梁传》、《尔雅》等书,不为凿空之谈,不为墨守之见。前人聚讼不解的,以合于经意者为断。既熟于汉学的门户,而又不囿于汉学的藩篱。善于以声求义,发前人所未发。字有假借,则求其本字,以正其解,所以成就最多。书末卷三十一、三十二所载“通说”53条,更是精粹所在。所著《经传释词》一书专为解释经传中的语词而作,自九经三传以及周秦两汉之书凡有虚词的文句都一一搜讨诠释,“揆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为后来研究虚词的人开辟一条门径,贡献极大。

(周祖谟)



Wang Yun

王筠 (1784~1854) 中国清代文字学家。字贯山,一字蓁友,山东安邱人。道光元举人。生于乾隆四十九年,卒于咸丰四年。平生精究《说文》之学。所著有《说文释例》20卷、《说文解字句读》30卷、《说文系传校录》30卷。《说文解字》段玉裁注早出,《说文》大例,段氏虽有论说,但不完备,所以王筠又别为《说文释例》一书,补充段氏。其中同部重文、异部重文例,分别精细,确不可易。《说文解字句读》根



据《说文》段注，桂馥《说文解字义证》和严可均《说文校议》三家书，斟酌损益，取长截短，疏解许说，而又参以己见，力求简约易读，以便初学诵习，所以名曰《句读》。稿凡三易，10年才写成书。态度平实，既崇敬段氏之精深，又推重桂氏之博洽，但意有不同，也必称心而出，不为模棱两可之说。《说文系传校录》是就杭州朱文藻所作《说文系传考异》而改作。根据徐铉本不同的刻本和徐锴《说文解字系传》不同的刻本互相比证，以定是非，可为读《系传》者参考。

(周祖谟)

Wang Zhao

王照 (1859~1933) 中国清末主要切音字方案“官话字母”的创制者和推行者。字小航，号芦中穷士，晚年又号水东，河北宁河人。年轻时有维新思想，广读时务书，热心教育。光绪十七年(1891)中举人。光绪二十年中进士，点翰林。戊戌变法中上书言事，建议皇帝、皇太后出洋考察，从日本开始。变法失败，被革职拿办，逃往日本。对于日本的教育普及和“假名”与汉字合用，减少识字困难，深有感触。



1900年春末，他化装台湾和尚回国，先进山东，后游吴楚，阴历八月乘庚子之乱，回到被八国联军占领的天津，潜居一年，创制“官话字母”，著《官话合声字母》，署名“芦中穷士”。1901年由日本留日学生在日本替他出版，传出后，得到居住天津的翰林院编修严修和1902年去日本考察学政的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桐城派古文名家吴汝纶的赞赏。1903年，他不顾自己是被通缉的政治犯，冒险到北京办“官话字母义塾”，由学生王璞任教员，自己躲在屏后听课。义塾重印他的《官话合声字母》作为教材，改名《重刊官话合声字母序例及关系论说》，又出版注音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官话字母义塾丛刊》(又称《字母书》)。1904年，为了避免被人告密，具呈赴提督衙门投案。入狱三个月获释。因直隶总督袁世凯允许推行“官话字母”，他去保定办“拼音官话书报社”，出版供新军学习字母用的《对兵说话》。1905年重回北京，办官话字母第一号义塾，以后一共办了二十四号。“拼音官话书报社”也迁北京，先后出版用官话字母编写的《地文学》、《动物学》、《植物学》、《家政学》、《算术》等，还创刊一份《拼音官话报》。从此他一心推行字母，一直到1910年因《拼音官话报》触犯摄政王载沣，官话字母被禁为止。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1913年教育部召开“读音统一会”，聘他为会员，并举为副议长。会上他竭力主张议行拼音字，为白话教育之用。晚年定居北京德胜门内马家大院，筑屋名“水东草堂”，仍关心教育，赞成白话文运动，与胡适结交。他的著作除官话字母各书外，还有文集《水东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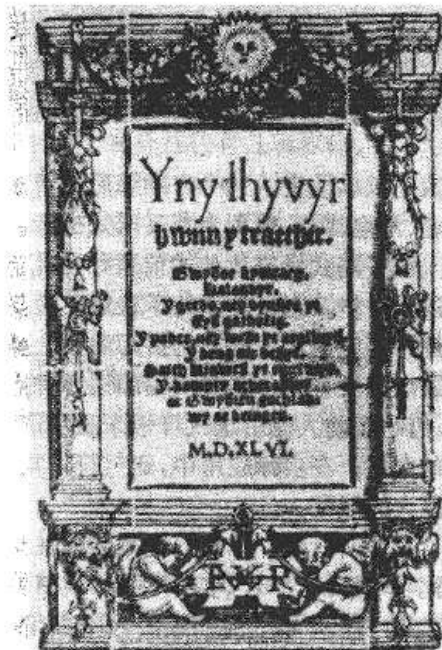
(倪海曙)

Wel'sershlyu

威尔士语 (Welsh language) 英国威尔士人的语言。《威尔士语法案》确认，它是威尔士地区的官方语言。属印欧语系凯尔特语族海岛凯尔特语南支。威尔士人的祖先(凯尔特人的一支)于公元前500年左右进入英国。公元7世纪盎格鲁-撒克逊人入侵，这支凯尔特人退到威尔士北部山区。13世纪威尔士并入英格兰，16世纪后渐受同化。根据1961年调查，本地仅有26%的人口(65.9万人)使用威尔士语。

威尔士语同海岛凯尔特诸语言一样有普遍的“头音交替”音变，如dyn(男人)，dau ddyn(两个男人)。元音通常是短音，但在重读音节里可以加长。单词重音通常落在倒数第二个音节上。

名词分阳性和阴性，复数的构成方式很复杂。动词有复杂的屈折变化；有动名词，无分词和不定式。有定冠词，没有不定冠词。人称代词除单用外，经常与名词、动词或介词融为一体。威尔士语的句法特点是动词位于句首，如Rhydd pawb bris‘出/人人/价’(人人出价)。时态多用复合形式，如Dyvot a oruc hitheu‘来(动名词)此事(关系代词)做(助动词)她也’(她也来了)。



威尔士语最古的宗教经典(1546)首页

威尔士语的文字采用拉丁字母，拼写和读音一致。字母的音值颇为独特，如dd[ð]、ll[l]、rh[r]、ch[x]、ngh[ŋh]、u(北方[u]、南方[i])、w[u]。

(周流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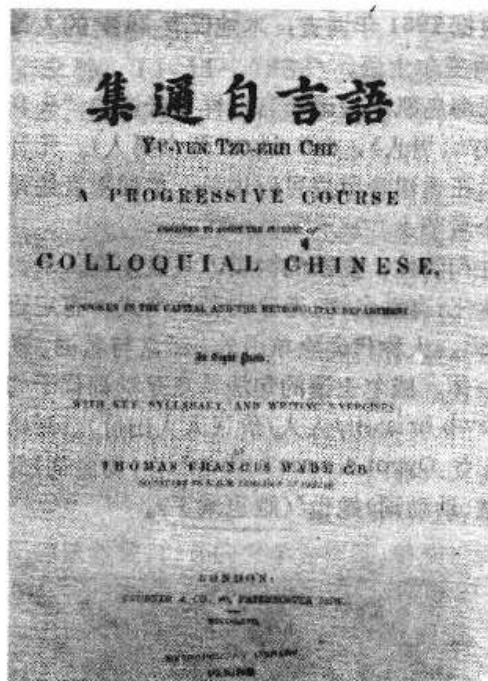
Weituomashi Pinyin

威妥玛式拼音 (Wade-Giles Spelling System) 又称“威妥玛-翟理斯式拼音”。这是从清末到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前，国内和国际上最流行的中文拼音方案。

威妥玛(1818~1895)，英国人。从1841年起在英国驻华使馆任职，1871年升为英国驻华公使。1883年回国。

1888年起在剑桥大学任教授,讲授汉语,直至1895年逝世。

威妥玛在华任职期间,为了外国人(主要是使用英语的人)便于学习和掌握汉语、汉字,先后写成《寻津录》(1859)和《语言自述集》(1867)两部著作。在这两部著作中,威妥玛使用他根据北京读书音制订的拉丁字母拼音



威妥玛著《语言自述集》

方案给汉字注音。这个方案以后被普遍用来拼写中国的人名、地名等,一般称为威妥玛式拼音。

威妥玛式拼音比他的前辈如马礼逊等人的拼音方案前进了一步。它虽然保持了接近英文拼法的一些特点,但是并不完全迁就英文的拼写习惯。威妥玛式拼音的最大缺点是没有充分考虑汉语的语音特点,拘泥于国际习惯,沿袭了前人使用送气符号来表示声母 p', t', k', ch', ts' 的办法。在实际应用中,送气符号常常被省略,因而造成很大的混乱。

翟理斯(1845~1935)也是英国驻华外交人员,著有《语学举隅》(1873)、《字学举隅》(1874)和篇幅巨大的《华英字典》(1892年上海初版,1912年伦敦再版)。这些书中翟理斯采用威妥玛式拼音来给汉字注音。《华英字典》后来成为当时邮电部门拼写中国地名的主要依据(见邮政式拼音)。

威妥玛式拼音方案如下:

声母

p[p]	p'[p']	m[m]	f[f]
t[t]	t'[t']	n[n]	l[l]
k[k]	k'[k']	ng[ŋ]	h[h]
ch(i)[tʃ]	ch'(i)[tʃ']	hs[ɕ]	
ch[ʃ]	ch'[ʃ']	sh[ʃ]	j[ɟ]
ts,tz[tʂ]	ts',tz'[tʂ']	ss[s]	

注: tz, tz', ss 只限用在舌尖元音[ɿ]前面。

韵母

a[a]	êrh[ə']	in[in]	uang[uaŋ]
o[ɔ]	ih[ɿ]	iang[iaŋ]	ung[uŋ]
ê[ə]	ũ[ɿ]	ing[iŋ]	
ai[ai]			ü[y]
ei[ei]	i[i]	u[u]	üeh[ye]
ao[au]	ia[ia]	ua[ua]	üo[yo]
ou[əu]	io[iɔ]	uo[uɔ]	üan[yan]
an[an]	ieh[iɛ]	uai[uai]	ün[yn]
ên[en]	iao[iau]	uei,ui[uei]	iung[yŋ]
ang[aŋ]	iu[iəu]	uan[uan]	
êng[əŋ]	iên[iɛn]	un[uen]	

声调 用阿拉伯数字1、2、3、4,分别表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标在音节的右上角。一般只在辞书里用。

拼写举例(摘录《语言自述集》言语例略)

na shui lai.

拿水来。

lao-yeh yao-ti shih liang shui, shi k'ai shui?

老爷要的是凉水,是开水?

yao liang shui hsi-tsao, yao wen shui hsi lien.

要凉水洗澡,要温水洗脸。

lien-p'ên li yu wen shui; na tsao-p'ên shih

脸盆里有温水;那澡盆是

lou-ti, p'a pu nêng tao shui.

漏的,怕不能倒水。

k'uai chiao jên shou-shih pa!

快叫人收拾罢!

(尹斌庸)

Wei'erna

维尔纳, K. (Karl Verner 1846~1896) 丹麦语言学家。1846年3月7日生于奥尔胡斯。1896年11月5日卒于哥本哈根。1872年进哥本哈根大学学习语言学。1876~1882年在德国哈莱大学图书馆工作。1883~1896年在哥本哈根大学担任斯拉夫语讲师和教授。

维尔纳一生著作不多,他之所以出名是由于对格林定律做了补充。1822年, J. 格林提出这样一条规则: 原始印欧语的清塞音 p, t, k 在日耳曼语变为清擦音 f, th, h, 原始印欧语的浊塞音 b, d, g 在日耳曼语变为清塞音 p, t, k, 原始印欧语的送气浊塞音 bh, dh, gh 在日耳曼语变为不送气浊塞音 b, d, g。

1875年维尔纳指出, 还有一些情况格林没有发现。在早期原始日耳曼语中, 原始印欧语的清塞音 p, t, k 确是一律变为清擦音 f, th, h, 正如格林所说。但在后期原始日耳曼语中, 只有位于词首或紧跟重读音音之后的原始印欧语清塞音 p, t, k 才变为清擦音 f, th, h, 而在其他位置的



清塞音 p、t、k 则变为浊塞音 b、d、g。这条规则对格林定律的一些例外现象作了说明,被称为维尔纳定律。

(岑麒祥)

Wei-Han Cidian

《维汉词典》(Uygur-Chinese Dictionary)

以汉语解释现代维吾尔语单词、复合词及常用词组的中型词典。新疆大学中国语文系编。1982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收词 2.3 万多条,连同列在词条内的词组、成语等共约 3 万多条。除常用词外,还收了一些专业名词和方言词。词条分正词条和副词条。单词、双词(指并列复合词、谐音词)和合成词为正词条,以正词条中的词开头的固定词组、科技术语、成语为副词条。正副词条均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维吾尔新文字字母顺序排列。正文前有前言、凡例、《维吾尔文字母表》及《音序目录》,正文后附有维汉对照的《我国少数民族简表》、《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名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县级以上行政区划表》、《世界各国和地区面积、人口、首都(首府)一览表》、《计量单位简表》、《节气表》和《化学元素表》。编纂方法的主要特点是:①动词以带 -maq、-mek 的动名词形式列入正词条,带 -x 的动名词以及形动词、副动词一般不列入正词条,只有名词化(成为独立、固定的名词)或具备独特的词汇意义时才列入正词条;②常用的国名、地名不列入正文,在附录中出现;可作人名的一般词在释文中单独说明,其他专作人名的词不收;③收入了一些口语词、方言词、旧词;④例句中收入了不少民间谚语。

(陈宗振)

Weinuogeladuofu

维诺格拉多夫, В. В. (Викто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Виноградов 1895~1969) 苏联语言学家、文艺学家。

1895 年 1 月 12 日生于扎莱斯克,1969 年 10 月 4 日卒于莫斯科。1917 年毕业于彼得格勒历史语文学学院及彼得格勒考古学院。1920~1929 年任列宁格勒大学教授。1930~1969 年任莫斯科大学教授,曾任苏联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俄语研究所所长、《语言学问题》杂志主编。参加过《苏联大百科全书》(第 2 版)、《俄语详解词典》、《俄语词典》、《普希金语言词典》的编纂工作。



维诺格拉多夫在俄语语法学、词汇学、成语学、标准语发展史、文艺作品的语言与风格、诗学等方面著作很多,并有创见。他认为语法学应分为单词、词组、简单句、复合句 4 部分。除传统的 10 个词类外,他将“状态词”和“情态词”视为独立的词类。他认为句法学的中心是词组和句子,词组是称名单位,句子是交际单位。他认为构词法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并把词的意义分为自由意义和非自由意义。他把俄语成语分为融合性成语、综合性成语

和组合性成语 3 种,确定了成语的界限和类型,丰富了成语学说。他所著《17~19 世纪俄罗斯标准语史纲要》(1938 年修订)为这门独立学科奠定了基础。此外,他还把语言学与文艺学的方法结合起来,探讨了文艺理论问题,著有《论文艺作品的语言》(1959)、《普希金的语言》(1935)、《普希金的风格》(1941)等。

(信德麟)

Welwu'erwen

维吾尔文 (Uygur writing) 维吾尔族使用的拼音文字。维吾尔族在历史上使用过突厥文、回鹘文、察合台文。现在中国维吾尔族使用的维吾尔文是在晚期察合台文基础上形成的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维吾尔文经过几次改进,最近的一次是在 1983 年。现行维吾尔文有 32 个字母,自右至左横书。每个字母按出现在词首、词中、词末的位置有不同的形式。字母表中的单式除代表该字母的独立形式外,一般出现在词末不可连字母之后;前式出现在可连字母之前;中式出现在词中两个可连字母中间;末式出现在词末可连字母之后。有些字母只有单式和末式。有些字母所带的符号除作独立形式和词首形式的标志外,还起隔音的作用。

正字法以语音原则为主,也参考形态和传统原则。词根上的语音变化、附加成分与词干在元音和辅音上的和谐都在文字上有所反映。因此,同一个词根往往有不同的书写形式,同一个附加成分往往有几种变体。

1965~1982 年间中国维吾尔族同时并用过拉丁化的新文字,主要在学校中使用。因全面改用新文字的条件尚不成熟,两种文字并用又不利于文化的发展,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从 1982 年 9 月起恢复使用老文字,而将新文字作为一种拼音符号予以保留,并在必要的场合使用。

苏联的维吾尔族现在使用以俄文字母为基础的维吾尔文。

(哈米提 魏革一)

Welwu'ery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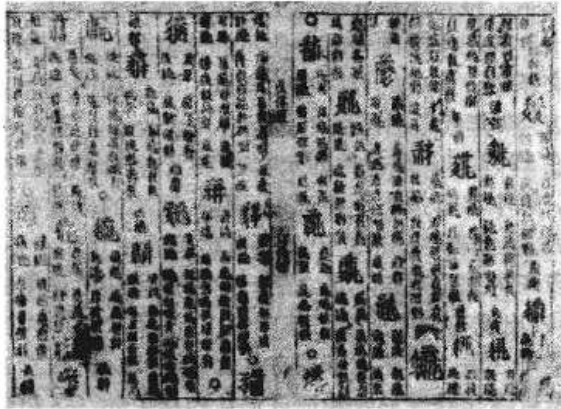
维吾尔语 (Uygur language) 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西匈语支。主要分布在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使用人口约 595 万(1982)。此外,在苏联的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等加盟共和国境内也有使用者。中国境内的维吾尔语分中心、和田、罗布 3 个方言。标准语以中心方言为基础,以伊犁-乌鲁木齐语音为标准音。有 8 个元音: a、e、o、ø、u、y、e、i; 有 24 个辅音: b、p、w、m、f、z、s、d、t、n、l、r、q、g、j、j、z、q、g、k、x、q、h。有元音和谐律。舌位和谐比较严整,唇状和谐比较松弛。有元音弱化现象, i 和 e 常作为 ε 和 a 的弱化形式出现。构词和构形附加成分很丰富。名词有数、从属人称、格等语法范畴;动词有态、肯定否定、语气、时、人称、数、形动词、动名词、副动词等语法范畴。表示各种情态的助动词很发达。词组和句子有严格的词序:主语在谓语之前,限定语在

中心词之前。词汇中除有突厥语族诸语言的共同词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汉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和俄语的借词。现在使用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维吾尔文。

(哈密提 魏萃一)

Wenhai

《文海》 中国西夏文字书。著者不详。约在 12 世纪成书。1909 年在中国黑水城遗址（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境内）出土，现藏苏联。原书有平声、上声、杂类 3 部分。出土为残缺本，蝴蝶装（见图）。上声部分全佚，平



西夏文字书《文海》平声第74页

声、杂类有部分残缺，余 3 000 多字条。平声 97 韵，每韵中所属字以声母和介音的差别为序，同音字集为一组，各组间以小圆圈相隔，无同音字的为独字。据西夏文字书《文海宝韵》和《五音切韵》知上声有 86 韵。杂类则是平、上两部分的补篇，其中又分平、上两类，每类内以声母九品音分部。每一字条的注释分 3 部分，第 1 部分以 4 个字分析字形构造，多采用合成法；第 2 部分以较多的字解释字义，方式有解说字义、组成词组、同义词和反义词相注、指明类属和用途等；第 3 部分以反切法注音，同音字组中反切上下字标在第 1 个字下面。《文海》是研究西夏语言、文字和社会历史的重要文献。

(史金波)

Wenxue yu Yuyan Jisuan Xuehui

文学与语言计算学会 (Association for Literary and Linguistic Computing) 简称 ALLC。

国际性学术团体。1973 年由英国 R. 韦斯比和 J. 史密斯倡议成立。会址设在英国剑桥大学。其宗旨是促进文学与语言计算领域的学术发展并加强学者之间的相互交际和了解。目前已有 33 个国家(包括中国)的学者参加它的活动。学会规定，每一个成员国需指定一名代表参加学会工作。代表的职责是负责联系本国的同行，并向学会报导本国研究工作开展情况。

学会下设 29 个专业组，按语种分的有凯尔特语组、汉语组、古典语言组、荷兰语组、英语组、法语组、中世纪德语组、文艺复兴后德语组、现代希腊语组、希伯来语组、冰岛语组、意大利语组、早期教会的、中世纪的和中世纪后的拉丁语组、挪威语组、斯拉夫语组、西班牙语组、瑞典语组；不按语种分的有圣经及有关古文献研究组、书目

组、计算机辅助教学组、教育组、词典学组、文学统计组、机器翻译组、软件组、言语处理组、标准组、结构数据库组、文献编辑技术组。

学会每年出版《文学与语言计算学会通报》3 期，《文学与语言计算学会学报》2 期。

学会除召开各种学术会议外，还不时举办研究班，普及推广文学与语言计算的方法和成果。

(刘涌泉)

wenzi

文字 (writing) 语言的书写符号，人与人之间交流信息的约定俗成的视觉信号系统。这些符号要能灵活地书写由声音构成的语言，使信息送到远方，传到后代。

文字的先驱 文字起源于图画。原始图画向两方面发展，一方面成为图画艺术，另一方面成为文字。原始人用图形来表达意思，通常称为“图形文字”。这种图形虽然能交流信息，但是跟语言并无联系。例如，画一个箭头表示“由此前进”，画一个人高举双手表示“欢迎”，大家都看得懂，可是如果用语言来说出图画中的意思，那就各不相同。你可以说英语，他可以说法语。这样的图形可以说是文字的先驱，还没有成为真正的文字(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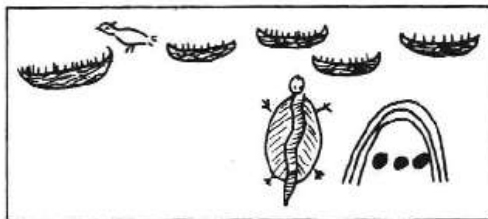


图 1 文字的先驱，举例：渔王率五舟，各乘若干人，历三日，渡湖，安抵对岸

表示意义的图画要发展到跟语言相结合，能够完整地书写语言，这才成为语言的有效记录，即成熟的文字。许多民族都创造过原始文字，但是只有极少几个民族的文字发展到成熟程度。有些文字，只能写出实词，不能写出虚词，阅读时候要由读者自行补充，这是不完备的文字。大多数民族都借入其他民族已经成熟了的符号系统，再加以修改补充，书写自己的语言。

词符与音节符并用的文字 名副其实的文字有 3 种主要类型：词符与音节符并用的文字、音节文字和字母文字。这 3 种类型代表文字发展的 3 个阶段。

如果每一个词用一个符号来表示，那就需要许许多多的符号，而抽象词仍旧难于写出，这样的文字是不切实用的。解决的办法是，把一部分词符改成只表音，不表意，夹在词符中间，那就成为词符与音节符并用的文字。这是最早达到成熟程度的文字类型。

用汉字书写的中文，基本上属于词符与音节符并用的类型。在古汉语中，表示实词的汉字大都是词符，表示虚词以及拟声和译音的汉字是音节符号。例如，原来表示簸箕的“其”字是词符，后来借来表示虚词的“其”，就成为音节符号了。又如，“丁当”、“可汗”都是音节符号。有

文字发展示意表

无文字时期 文字的先驱 完整的文字	图画 表形和表意的文字——描述法和认记法 表示语言声音的文字			
词符与音节符 并用的文字	苏美尔文字 (阿卡德文字)	埃及文字	赫梯文字	汉字
音节文字	楔形音节文字 (阿拉米文字) (胡里安文字) (其他)	西部闪米特音节文字 (乌加里文字) (腓尼基文字) (希伯来文字) (阿拉米文字) (其他)	爱琴海音节文字 (线形A文字) (线形B文字) (塞普鲁·米诺安文字) (塞普鲁文字) (发伊斯托文字) (比布鲁斯文字)	日本音节文字
字母文字		希腊文字 阿拉米文字(能表元音的) 希伯来文字(能表元音的) 拉丁文字 其他		朝鲜字母文字

些汉字只是多音节实词中的音节符号而不是词符,如“葡萄”是由两音节构成的词,要用两个音节符号写出。

汉字和假名混合体的日文是典型的词符与音节符并用的文字,其中汉字大都是书写词根的词符,假名是书写词尾、助词等的音节符。假名是从汉字变化出来的(图2)。

	a	i	u	e	o
	ア	イ	ウ	エ	オ
k	カ	キ	ク	ケ	コ
s	サ	シ	ス	セ	ソ
t	タ	チ	ツ	テ	ト
n	ナ	ニ	ヌ	ネ	ノ

(下略)

图2 日文假名举例

音节文字 词符与音节符并用的文字,如果丢掉了词符,全用音节符,那就成为“音节文字”。在任何语言中,词的数量是很大的,而且不断增加。音节的数目少得多,而且是相对稳定的。音节文字只要用数目有限的符号,就可以完备地书写语言。

日本有“假名文字运动”,主张不用汉字,全用假名。这个主张如果实现,日文就成为音节文字了。

埃塞俄比亚文字(近代体称为阿姆哈拉文字)是一种现行的音节文字。它用大致相同的符号代表相同的辅音,附带微小的笔画变化表示元音,成为音节符号(图3)。

比较一下日文的假名和阿姆哈拉音节符号,可以看

出其间的主要区别是,假名用不同的符号表示相同的辅音,阿姆哈拉文字用基本上相同的符号表示相同的辅音(比较图2和图3)。

有些音节文字,不管元音如何不同,辅音相同的音节都用相同的符号来表示。好比ka、ki、ku都写成k。这样就产生了所谓“辅音字母”。这样的字母虽然叫做辅音字母,可是带有不写出来的元音,仍然具有音节符号的性质,它是从音节符号向音素(音位)符号演变的中间形态。

公元前11世纪的比布鲁斯字母(阿希拉姆碑铭文字,发现于比布鲁斯,在今黎巴嫩,现名朱拜勒)是现存最早的已经解读的辅音字母,可以说是字母的老祖宗(图4)。

	a	ū	i	ā	ē	e	ō
k	𐤀	𐤁	𐤂	𐤃	𐤄	𐤅	𐤆
s	𐤇	𐤈	𐤉	𐤊	𐤋	𐤌	𐤍
t	𐤎	𐤏	𐤐	𐤑	𐤒	𐤓	𐤔
n	𐤕	𐤖	𐤗	𐤘	𐤙	𐤚	𐤛

图3 阿姆哈拉音节字母举例

𐤀	𐤁	𐤂	𐤃	𐤄	𐤅
𐤆	𐤇	𐤈	𐤉	𐤊	𐤋
𐤌	𐤍	𐤎	𐤏	𐤐	𐤑
𐤒	𐤓	𐤔	𐤕	𐤖	𐤗

图4 比布鲁斯字母

从字母的老祖宗间接传下来的阿拉伯字母是今天应用比较广泛的辅音字母。阿拉伯文字把同样的几个字母写在一起,要求读者根据上下文的不同而读成不同的词。这很象用字母来缩写语言。打个比方, d、p 两个字母连

ا	ب	ت	ث	ج	ح
خ	د	ذ	ر	ز	س
ص	ض	ط	ظ	ع	ف
ق	ك	گ	ل	م	ن

图5 阿拉伯字母举例

写在一起,成为 dp,但在一个地方要念成 dipu“地铺”,在另一个地方要念成 dapo“打破”。这样,虽然书写省事,可是阅读太不方便了。所以后来又在辅音字母上加几个点表示元音(图 5)。

字母文字 字母表示元音的方法有 3 种:①用独立的符号表示元音,例如希腊字母、拉丁字母等。②用不连接的分音符号表示元音,例如阿拉米字母、希伯来字母、阿拉伯字母等。③把分音符号连接在字母上表示元音,例如印度字母、阿姆哈拉字母等。第 3 种被认为是音节符号字母。第 2 种如果以不加元音符号为正体,也是音节字母。

严格意义的“字母文字”,既有辅音字母,又有元音字母。创造元音字母是希腊人的贡献。他们在公元前 8 世纪传入辅音字母,把其中几个改为专门表示元音,其余仍旧表示辅音,但是不再附带元音。这好比原来 k 可以表示 ka、ki、ku 的音,现在用 k、a、i、u 几个字母分别写成 k—a、k—i、k—u。这样就产生了“音素(音位)字母”。音素字母文字,在书写时候要把音节分析成为辅音和元音,在

A	B	Γ	Δ	E	Z
H	Θ	I	K	Λ	M
N	Ξ	O	Π	P	Σ
T	Υ	Φ	X	Ψ	Ω

图 6 希腊古典字母

阅读时候要把辅音和元音拼合成为音节。这是完备的拼音制度(图 6)。

完备的拼音制度的产生,使文字历史进入新的阶段。一切语言的声音,如果分析成为音素(音位),一共只有几十个基本的辅音和元音,只要用几十个字母就可以写出。跟音节字母相比,音素字母不但符号数目少得多,而且表音更加灵活。但是文字记录语音总有遗漏。例如重音、句调、节奏等等,字母文字还是不作表示的。

文字的表达方法 从单个符号来看,文字有 3 种基本的表达方法:表形(象形)、表意(会意、指事)和表音(假借、谐声)。具体的文字,往往混合应用几种表达方法,而以一种或两种方法为主。

原始图形文字主要用表形方法,可是也夹用表意方法,例如用点子或短线表示数目,所以又称“形意文字”(图 1)。词符与音节符并用的文字兼用表意和表音两种方法,所以又称“意音文字”。意音文字中间一般还有既不表意、又不表音、只有区别功能的所谓“定符”。从广义来看,区别功能也是一种表意功能。

除新设计的文字以外,音节文字和音素字母文字都在表音之中夹用表意。例如英文或法文中间,有些词的读音相同而拼法不同,有些词附带不读音的字母,这些由于历史或其他原因而形成的特点,今天成为具有区别词义的拼法。阿拉伯数字是表意符号,但经常夹用在表音

的字母文字中间,这也是表达方法的混合应用。

从语言的内容来看,文字符号所书写的“语言单位”是可小可大的。从小到大,可以分为 5 等:①音素或音位,用音素或音位字母。②音节,用音节符号。③词儿,用词符。④词组,用词组符号。⑤语段,用语段符号。今天各国的文字符号,极大多数代表音素或音位,少数几种代表音节。汉字有的是音节符号,有的是词符。代表词组和语段的文字现在没有。但是,文字中间夹进阿拉伯数字和科技符号,也可以表词、词组或语段。

文字的体式变化 体式是文字的外形。任何文字的体式都是不断变化的,可是成熟了的文字就变化很慢。现存资料开始于 5 500 年前的古埃及文字,早期大都是图形符号,主要用于碑铭,称为“圣书体”。这些图形符号大部

圣书体	僧侣体	大众体	圣书体	僧侣体	大众体

图 7 古埃及字演变举例

分已经失去表形性质,成为表意或表音符号。中期由于用软笔在纸莎草上书写,体式变为草书笔画,丢掉了图形的外表,主要用于书写经文,称为“僧侣体”。晚期笔画大为简化,主要用于写信和记帐,称为“大众体”。3 种体式很不相同,但是基本结构相同(图 7)。

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即两河流域,在今伊拉克)的苏美尔文字,可能更古于埃及文字。苏美尔文字早期也是以图形符号为主,后来由于在软泥板上用硬笔压刻成字,符号变成一头粗、一头细的短线条,类似楔子,称为楔形字(又称钉头字)。楔形字的笔画渐渐变得越来越简。这种以泥板为纸张、用压刻方法书写的奇特文字,以

早期 图形字	后期 图形字	早期 楔形字	古典亚 述楔形字	
				天
				地
				男
				女
				鸟
				鱼

图 8 楔形字演变举例

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为中心,传播到四周的民族,写成各种文字。其中最重要的是阿卡德文字,也就是巴比伦和亚述的文字,在历史上曾经是西亚的国际通用文字(图8)。

以上两种词符与音节符并用的文字都在一两千年前被废弃了。同类型的中国汉字,从殷商甲骨文算起,有3300年以上的历史,也经过多次体式变化,甲骨文、金文变为大篆、小篆,再变为隶书、楷书,同时又有行书、草书,但是基本结构未变。它屹立数千年,应用到今天。

文字的主要发源地,除北非、西亚和东亚以外,还有美洲的墨西哥(尤卡坦半岛)。那里的玛雅文字有别致的图形符号,但是也已经失去表形功能,成为以音节符号为主,兼用意符、音符和定符。最早的遗物是公元328年的刻碑。玛雅文字到16世纪被废弃(图9)。



意符 bolay, 美洲豹(象形)



意符 yaxum, 啄木鸟(象形)



音符 fzu (像骨骼)



音符 hal, 又作意符 yax, 绿。(像叶子)



定符(表示“神”一类)(像人脸,加龙目)

图9 玛雅文字举例

字母的传播 文字从原来创造的民族传播到另一民族,由于语言特点不同和应用要求不同,发生了矛盾。结果是,接受外来文字的民族,为了自己的需要,对传入的文字进行调整、补充或改革。汉字传到日本产生假名,就是由传播而改变的一个例子。

产生比布鲁斯字母的黎巴嫩,在地中海东岸,那里是古代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两大文化往来交流的走廊地带。当地的居民,后来被称为腓尼基人,意思是“商人”,因为他们主要经营商业。他们需要简便的文字来记帐,但是埃及文字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都太繁难。他们从埃及文字中的辅音符号得到启发,创造出一套辅音字母。这套字母的产生,比埃及文字和楔形文字晚2000年。这说明字母的产生是经过极长时期的酝酿才瓜熟蒂落(另一说认为比布鲁斯字母源出爱琴海音节文字)。

文字随着文化——尤其是宗教——传播四方。同一种文字可以传播到语言完全不同的民族。文字的类型跟语言的类型没有必然的关系。例如,日语跟汉语在语言类型上很不相同,可是日本采用了汉字。日语的特点只促进了假名的产生,没有妨碍汉字的采用。

字母在比布鲁斯形成以后,由于简便好用,不胫而走,无远勿及。在向东传播的路线上,形成阿拉米字母系统。今天的阿拉伯字母是这一系统的一种晚期变体。自

成系统的印度各种字母,流传于印度各邦、东南亚各民族和中国的西藏。印度字母系统可能也是从阿拉米系统分化演变而来。在向西传播的路线上,形成腓尼基字母系统,它变成希腊字母,又变成基里尔字母(又称斯拉夫字母)、罗马字母(又称拉丁字母)以及其他字母。东正教国家用基里尔字母,天主教国家用罗马字母。在过去的300年中,随着西欧国家的大扩张,罗马字母传播到非洲、美洲和亚洲许多国家,成为今天世界上流通最广的字母。(参见彩图插页第41、43~46页)

参考书目

B. A. 伊斯特林著,杜松寿译:《文字的发展》,文字改革出版社,北京,1966。(B. A. Истрия, Развитие письм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Москва, 1961.)

D. Diringer, *The Alphabet*, Hutchinson, London, 1947.

(周有光)

wenzl gaige

文字改革 (language reform) 有广狭二义。

广义指语言和文字的有计划发展,又称“语文规划”。狭义只指文字的有计划发展。这种有计划发展的目的是为了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所以又称“语文现代化”。由于条件和要求不同,文字改革有各种不同的模式。

语言的有计划发展:①推广共同语,包括民族共同语,多民族国家的全国共同语,几个国家共用的区域共同语。②学习外国语,包括殖民地的语言教育。③书面语的口语化。

文字的有计划发展:①在无文字民族中创制文字。②字母改革,包括拼写法改变,字母表的部分或全部改换;音节字母改为音素字母。③词符改革,a.词符整理,包括统一规范、减少数量、简化符形;b.词符补充字母,包括字母用于文字之外和字母进入文字之内;c.词符和字母的混合文字改为全用字母;d.词符文字改为字母文字。

发生文字改革的原因主要如下:①经济发展,例如农业社会发展为工业社会,在改进交通、设立工厂、普及教育的同时,要求提高语文效率。②人民迁移,例如欧洲人迁移到新大陆,建立国家,需要选择和推广通用的语文。③宗主国对殖民地推行教育用语;新独立的国家创制或选择文字。大国分解成几个国家,或者各自为政的地区合并成一个国家,都需要建立和推广国家的共同语文。④新的语文技术促成古老文字的改革。

中国汉族的文字改革 汉族的文字改革又称汉字改革。改革由群众运动开始,以政府的决定和实施为归宿。主要内容如下:

制定表音符号,统一汉字读音 汉字积累到6万之多,可是缺乏一套表音符号。1892年厦门卢懋章发表他设计的拼音方案,叫做“切音新字”(厦腔)。这样开始了中国人自觉的拼音化运动,而以前只有外国传教士的中文罗马化。根据“切音新字”,清末的拼音化运动被称为“切音字运动”。

从发表切音新字到中华民国成立(1912)的20年间,人们提出了近30种拼音方案,其中汉字式字母的占2/4,

速记符号式和拉丁字母式各占 1/4。

1913 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召开“读音统一会”，制定第一套法定的注音字母（后来改称注音符号），1918 年正式公布。从此，小学生先学注音字母，后学汉字。

可是，注音字母是汉字式字母，不便在国际间应用，于是，又制订“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1928 年由南京政府大学院（即教育部）公布，作为“注音字母第二式”（见国语罗马字）。

在苏联拉丁化运动高潮中，留苏中国共产党员和苏联语言学者设计了另一套中文拉丁化字母，在苏联华侨中用于扫盲。1933 年传入中国，称为拉丁化新文字，开展了一个拉丁化群众运动。

1955 年，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下设“拼音方案委员会”，制订拉丁字母的汉语拼音方案，1958 年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公布。汉语拼音字母在小学用于给汉字注音和拼写普通话，代替过去的注音字母和国语罗马字。不少文改运动者要求采用汉语拼音文字。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的政策是，以拼音辅助汉字，不是代替汉字。

汉字的简化和整理，书写序列的横排 清末开始提倡简化汉字。1935 年上海有 15 种杂志试用 手头字（300 个）。不久，南京教育部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324 字），但是立即收回不用。写字的人，一向喜欢写行书，行书中多半是简体字。简体字实际上存在已久，只是未被承认为正体。

汉字简化的要求，到 1956 年才得到政府采纳实施。这时候，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515 个简体字和 54 个简化偏旁），1964 年类推成为《简化字总表》（2 236 字）。

汉字原来是从上而下直行书写的，五四运动时期提倡改为从左到右横行书写，但是只在少数科技书刊应用。1956 年推广横行书写，用于一切报章，杂志和书籍，只有翻印古书等特殊场合仍用直行书写。

推广共同语，改用白话文 汉字和汉语拼音字母，都是书写汉语的符号，推广共用语是文字改革的中心工作。

在方言复杂的汉民族中间，需要一种大家通用的民族共同语。明清时代，最需要共同语的主要是官吏，因此共同语称为“官话”。老百姓大都安土重迁，不感觉共同语的需要。

到了清末，国家意识抬头了。在日本的影响下，把“官话”改称“国语”。提出了推广国语，扫除文盲，实行义务教育这一系列的时代要求。1919 年“五四”白话文运动要求文体改革，废文言，用白话。白话文运动就是把口头的共同语写成书面的共同语。

北洋政府的教育部实行了如下的改革：推行国语，在 1924 年决定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编辑标准音的《国音常用字汇》（1932 年才出版）。小学语文改用白话文，国文课改称国语课。应用文和文学作品逐步改用白话。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成为主导的现代文体。

1955 年举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把“国语”改称“普

通话”，给它下了定义：普通话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汉民族共同语（后来又加：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这时候强调各民族语言应当有平等的发展机会，不用“国语”的说法，避免以汉语强加于少数民族的误会。

经过 20 多年，各民族间的往来频繁了，大家感觉需要一种全国通用的共同语。1982 年新宪法规定：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汉族人口占全国的绝大多数。以主体民族共同语作为全国通用的共同语，是国际惯例。推广普通话不是废除方言，也不是强制少数民族学习，而是在母亲语以外自愿学习一种应用更广的共同语。

汉字改革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改进语文的应用技术。应用技术方面甚多，这里举 3 个例子。①汉字打电报要用“四码”（4 个数字代表一个汉字），不方便。清末就有人提倡电报拼音化。1925 年东北四洮铁路创办注音字母电报，不久推广到东北各铁路。1949 年改为拉丁化新文字电报。1958 年改为汉语拼音电报。在“文化大革命”中，取消了东北铁路拼音电报，改回“四码”。现在，新华通讯社和各大报社有部分驻外记者用汉语拼音打回新闻电报。②汉字排序不便，检查费事。有了注音字母和汉语拼音字母以后，开始了排检法的音序化。音序排检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单纯字母序列法，跟英文相同。另一种是“音节、汉字、音节”三层序列法。现在有多种词典和百科全书采用后一方法排列正文。③100 年前发明了打字机，字母文字的书写进入机械化时代。汉字也有打字机，但是只能由专业打字员应用。电子计算机可以更灵活地处理汉字。在小键盘上输入汉字，要把汉字编成代码，才能打入。另一种方法是，以词和词组为单位，打入汉语拼音，由计算机自动变换成为汉字输出，不用编码。这种智能化的从拼音到汉字的自动变换法，跟日文语词处理机的“假名汉字变换法”原理相同。

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在 1977 年采用汉语拼音字母作为拼写中国地名的国际标准。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在 1982 年采用汉语拼音字母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汉字在拼音的帮助下正在向应用技术现代化前进。

1958 年归纳文字改革为 3 项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这些任务，有的已经部分完成，有的是长期工作。

台湾省不谈文字改革，但是由于实际需要，做了不少工作。首先是推行“国语”（不称普通话），已经基本成功。学校都用“国语”为教学语言。其次是提倡标准行书，其中有许多简体字，不过只用于手写。第三是出版大量的注音读物，用注音字母直排，不同于汉语拼音字母横排。1986 年台湾省公布修订的国语罗马字，改称国语注音符号第二式，放弃字母标调，采用符号标调，跟汉语拼音方案接近。

香港官方文书一向用英文。群众口语通用广州话（称为广东话）。印刷用繁体字。香港在即将归还中国的前夜，情况正在变化。利用汉语拼音学习普通话的人多起来了。

香港和大陆的往来日益频繁,语文上必然渐趋一致。

国外华人社区也有文字改革问题。例如新加坡共和国的人民多数是华人。他们在1965年建国以后,除主要用英文以外,发生华语教育的改进问题。为了沟通方言,他们推广共同语,称为“华语”(不称普通话,也不称国语)。他们规定:在学校里只说华语,不说方言;在社会上多说华语、少说方言。他们采用简体字,因为简体字比较容易学易用;他们采用拼音字母,因为它就是拉丁字母,便于在新加坡和国际间应用。新加坡的成功,使它成为马来西亚和东南亚其他华人社区的榜样。

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字改革 中国有50多个少数民族。建立民族自治区(省一级)的有5个:内蒙古(蒙古族)、新疆(维吾尔族)、广西(壮族)、宁夏(回族)、西藏(藏族)。回族语文跟汉族相同。其他4区的民族都有自己的语文。

壮族原来只有不完备的“壮字”,是仿照汉字创造的壮语形声字(类似越南的“字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不久,创造了拉丁化的拼音壮文,共有32个字母,除拉丁字母外,有6个新字母和5个声调字母,1957年公布。拼音壮文是人民币上五种文字之一。1981年拼音壮文作了修改,取消了新字母,完全采用国际通用的26个拉丁字母。

维吾尔族在古代用回纥字母,10世纪时改信伊斯兰教,改用阿拉伯字母。20世纪50年代初作了正词法的修正。1959年制订拉丁化的新维文,1964年正式推行。1982年停止使用新维文,恢复阿拉伯字母的老维文。

内蒙古自治区的蒙古族用老蒙文,是从回纥字母改造而成的,拼写法复杂,与读音脱节。内蒙古曾一度使用斯拉夫字母的新蒙文,后来又恢复老蒙文。拟定了一个蒙古语的拉丁字母转写法,作为国际应用。

藏文是在7世纪时参照梵文字体创制的,现在没有改革的要求。也拟定了一个拉丁字母的转写法,作为国际应用。

此外,少数民族制订拉丁化新文字的还有:哈萨克族(情况同维吾尔族)、布依族、苗族、彝族、侗族、黎族、纳西族、傈僳族、哈尼族、佤族、白族。原有拉丁字母文字作了修改的有景颇和拉祜两种文字。西双版纳和德宏两种傣文也在原有字母基础上作了修改。这些新文字,有的在本族本地应用,有的只作原有文字的注音。

越南、朝鲜和日本的文字改革 越南、朝鲜和日本原来都用汉字,因此有跟汉族相似的文字改革问题。

越南文字经历了汉字、字喃和拼音文字3个阶段。公元之前,汉字传入越南。14世纪仿照汉字创造越南形声字(也有会意、假借),称为“字喃”,用越南语书写文学作品。字喃跟汉字长期并用,始终未能排除汉字的统治地位。17世纪欧洲传教士拟订多种拉丁化的越南语拼音方案,其中法国传教士A. de 罗德(1591~1660)的方案,经过修改成为今天的越南新文字。1885年越南南方首先成为法国殖民地,中小学开始教学拼音文字。1945年越南

成立民主共和国,以新文字为法定文字,废除汉字。

朝鲜使用汉字约有一千七八百年之久。起初用汉字文言。8世纪时,用汉字的音写朝鲜语,称为“乡歌”或“乡札”。又用汉字写成朝汉混合文字,其中有的是汉字汉义,有的是汉字记朝鲜语音(主要是虚词),语法根据朝鲜语,称为“吏读”。到15世纪,朝鲜文化发展,要求有更完备的文字,于是制订28个音素字母,1446年在《训民正音》一书中刊印公布。现在用40个字母,其中21个表示元音,19个表示辅音。这套字母人们称之为“谚文”(通俗文字)。谚文字母不作线形排列,而是叠成方块,向汉字看齐。每个方块代表一个音节。历代相承,积有1万多个方块,现代通用的有2700~3500个。1894年后汉字谚文混合体成为政府公文用的法定文字。朝鲜北方在1948年废除汉字,以纯粹的谚文作为法定文字,朝鲜南方仍旧用汉字谚文混合体,把汉字减少到1900多个,一般出版物很多全用谚文。

日本学习汉字汉文大约开始于3世纪。后来,把汉字当成记音字母,记录日本语,写成诗歌;或者跟表意的汉字混用,记载历史。起初用汉字记音是随便写的,后来慢慢有些条理,并把汉字简化,创造出日语的音节字母,称为“假名”。假名字母表称为“五十音图”。有两种体式,楷书体叫“片假名”,草书体叫“平假名”。到7世纪,出现夹用汉字而以假名为主的日文著作。日本也仿照汉字创造一些日本专用的汉字(所谓“倭字”),但是为数不多。明治维新(1868)以后,有意识地进行文字改革。推广以东京(江户)语音为标准音的国语。一般读物中的汉字全部在旁边注上假名,实行读音统一。小学语文课本从半文半白的文体改为口语化的文体。日本的文改运动者在1866年提出废除汉字,1872年提出改用罗马字,1973年提出限制汉字字数。日本“国语审议会”拟定的“当用汉字表”(1850个汉字),1946年由内阁公布,后来在1981年改为“常用汉字表”(1945个汉字),政府公文和一般出版物所用汉字以此为度。小学课本只用八九百个汉字,常用汉字表中有许多简体字。同时,整理了假名的使用法。日语罗马字起初有美国人设计的“黑奔式”(Hepburn)。后来,日本学者另订“日本式”,使拉丁字母更科学地表示日语。1937年内阁公布“训令式”,以“日本式”为基础而略作修正。国际标准化组织已经采用训令式作为书写日语的国际标准。但是日本铁道、外交、商人等习惯用黑奔式。今天日本的正式文字是汉字假名的混合体。全用假名不是正式文字。罗马字是辅助的拼音工具。

其他国家的文字改革 十月革命后,苏联实行文字改革。1917年公布俄文新正词法,把俄文字母从原来的37个减少到33个。1921~1932年间,苏联在少数民族中进行文字拉丁化运动,把原用阿拉伯字母的各种文字改为拉丁字母,给原来没有文字的各民族创制拉丁化新文字。后来,1936~1940年间,放弃拉丁化,改为斯拉夫化,向俄文看齐,把所有新创的拉丁化文字都改成斯拉夫字母。

蒙古人民共和国起初尝试把老蒙文改为拉丁化,后来在1941年向俄文看齐,改为斯拉夫字母的新蒙文。

土耳其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1928年把阿拉伯字母的土耳其文改成拉丁化,这种新土耳其文一直使用到今天。

印度尼西亚的文字在历史上经过三次改革。起初用印度字母,后来改为阿拉伯字母,最后又改为拉丁字母。这反映了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先后来到这个千岛之国。16世纪,荷兰人占领印尼,带来了拉丁字母。1945年印尼独立,以拉丁化的印尼文作为法定文字。印尼文的拉丁化是东方拉丁化的一件大事。

有古老文化传统的印度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字的大国。1950年独立后,要解决复杂的语文问题。在英国统治下,英文已经成为行政和教育的文字。独立后想要改用印地文代替英文,作为全国通用文字,事实上难于做到。印度各邦(相当于中国各省)大体上按照语言划界,每邦规定一种邦内的通用语文,有14种法定的语文。

非洲许多新独立国家都有语文问题,有的国家没有共同语,有的国家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们将长期采用殖民地时代沿用下来的宗主国语文作为行政和教育的语文呢,还是建立自己的民族语文呢,这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东非一些国家推广斯瓦希里语及其拉丁化拼音文字,作为几个国家的共同语文,准备以此代替原宗主国的语文。

历史较久的各种欧洲拉丁化文字,现在处于稳定状态。可是提倡改革者也大有人在。改革的目标是正词法的规则化和文体的口语化。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文的拼写法改革问题提到国会的议事日程上,但是没有通过。美国提倡商业文件的文体通俗化。基督教会已经把半文半白的英文《圣经》改译成便于朗读的现代口语。

在国际交往频繁的时代,语文规划扩大到国际关系。1945年成立联合国,立即发生工作语言问题。拥有150个以上会员国的联合国,规定以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俄语和汉语5种语言作为工作语言,后来又加一种阿拉伯语。有人认为工作语言太多是浪费。欧洲共同体现有12个会员国,由于工作语言问题没有解决,预算的很大一部分浪费于多重翻译。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法语是公认的国际会议语言。1921年华盛顿会议开始,英语与法语并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语的应用大为扩大。语文规划的学者们认为,应当规定一种国际通用语,使世界各国节省多重翻译的金钱和时间,便利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国际交流。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努力于制订各种非罗马化文字的罗马字母拼写法的国际标准,便利情报的国际传输和检索。这是国际关系中新发展的语文规划技术。

参考书目

周有光:《汉字改革概论》,文字改革出版社,北京,1979。

В. А. 伊斯特林著,杜松寿译:《文字的发展》,文字改革出版社,北京,1966。(В. А. Истрин, Развитие письм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Москва, 1961.)

(周有光)

Wo'erfu

沃尔夫, B. L. (Benjamin Lee Whorf 1897~1941) 美国语言学家。1897年4月24日生于马萨诸塞州温思洛普市。1914年进麻省理工学院学化学工程,毕业后,1918~1941年在哈特福德火险公司担任防火专家的职务。自1924年起先后研究过希伯来语、墨西哥阿兹特克方言和古代玛雅语,但是G. L. 特拉格认为他对玛雅文字的解释不正确。

1931年,沃尔夫到耶鲁大学跟E. 萨丕尔学人类学,1932年开始研究美洲印第安人河比语。30年代发表了一些论文,提出了“萨丕尔-沃尔夫假说”,1956年由J. 卡罗尔选编为《语言、思想和现实》一书出版。沃尔夫去世10年后,美国学者们对他的理论重新感到兴趣,1953、1958两年曾召集专门会议进行讨论。

沃尔夫认为,语言是文化,文化在语言中表述;语言是行动的中介,行动在语言中描写。作为人们行为体系的文化,只能存在于人们对周围世界的观念之中,只有了解这些观念是什么,才能了解什么是文化。在他看来,从语言到文化,从文化到语言,从文化到社会行为,从社会行为到文化,这些是封闭式循环性轨道,人们只能沿着这些轨道走动,不能离开它。

P. 伍尔夫森认为,沃尔夫这个假说虽然经过多次实验,还没有被完全证实,不过也没有被完全推翻。语言与文化有密切关系,但是学者们不承认语言能绝对决定人们的世界观和思维方法。

(王宗炎)

Wu'erduyu

乌尔都语 (Urdu language) 巴基斯坦的官方语言,也是印度宪法承认的语言之一。属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印度(又称印度-雅利安)语支。分布于巴基斯坦和印度、孟加拉等国。使用人口共1.5亿左右。

8世纪,穆斯林侵入南亚次大陆,带来了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土耳其语。这些语言和北印度的民间俗语萧尔斯尼语相结合,形成了早期的乌尔都语。11世纪穆斯林建都德里时,近代乌尔都语已基本形成。

乌尔都语有元音12个,辅音42个。语法和印地语的语法基本相同。名词和一部分形容词有性、数、形式的区别,代词也有数和某些形式的区别。形式分直接形式与间接形式,间接形式与后置词连用。动词有时、式、态的变化。基本词序为主语—宾语—谓语。乌尔都语从北印度的地方话,以及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土耳其语中吸收了大量词语,并吸收了波斯语的大量成语和构词手段。英国统治印度时期,乌尔都语又大量吸收了英语词语。乌尔都语和印地语各自的文学语言有较大差异,但它们有共同的口语,叫做印度斯坦语。其特点是,既不用很多的波斯和阿拉伯词语,也不用很多的梵语词语。在争取印度独立时期,甘地曾提倡以印度斯坦语为全国的正式通用语言。1947年印巴分治后,印度斯坦语没有得到推广,印地语和乌尔都语的距离逐渐扩大。乌尔都语是一

种有文学传统的语言。直到今天,有教养的穆斯林仍然以能用乌尔都语写诗为时尚。

乌尔都文字是在波斯-阿拉伯字母的基础上加以改变而制定的,自右向左横写。(山 兹)

Wukelanyu

乌克兰语 (Ukrainian language) 乌克兰族的语言,属印欧语系斯拉夫语族东支。分布于苏联乌克兰境内,北美洲也有少数使用者。使用人口约4400万。乌克兰语在斯拉夫诸语言中仅次于俄语而居第二位。最古的文献见于14世纪。14~15世纪在基辅罗斯书面语基础上,融汇当地方言特征,逐渐形成标准语。17~18世纪用大众口语写的文学作品相继出现,至19世纪初在标准语中取得巩固地位。作家И. П. 科特利亚列夫斯基(1769~1838)、Т. Г. 谢甫琴科(1814~1861)等人的创作作为现代规范的乌克兰语奠定了基础。有3种方言:北部方言、西南方言和东南方言。标准语是在东南方言基础上形成的。

乌克兰语在语音、语法和词汇方面与俄语有许多共同之处,不同之处也有规律可寻,因此两种语言可以互通。语音特征主要有:古代元音ы,и合并为и,发音介于两者之间;元音ѣ演变为现代的і;元音о,е在闭音节中演变为і;字母г表示浊擦音ɦ,в在词末尾或另一辅音前表示短ʏ;清音在浊音前浊化,但浊音在清音前或词末尾不清化。语法方面,乌克兰语的名词、形容词的性、数、格和动词的体、时、人称等跟俄语都很相近。阳性、阴性名词除6个格外,还有呼格。名词同数词“二、三、四”连用时,不象俄语那样用单数二格,而用复数一格。动词不定式词尾是-ти,第一变位法单数第三人称词尾失去-ть。过去时单数阳性的后缀是-в(读作ʏ),其他形式是-ла、-ло、-ли。词汇的基础是原始斯拉夫语词。此外,还有许多乌克兰语特有的词和借自波兰语等其他斯拉夫语言的词汇。文字以俄语字母为基础,共有32个字母,但没有俄语中的ы,э,ё,ъ,比俄语多3个字母:і,ї,є,以撇号(,)代替分音符号ъ。(信德麟)

Wula'er yuxi

乌拉尔语系 (Uralic family) 指分布于从斯堪的纳维亚往东,越过乌拉尔山脉,直到亚洲西北部广大地区的一组语言。分为芬兰-乌戈尔语族和萨莫耶德语族。使用人口约2000万。

芬兰-乌戈尔语族包括芬兰语支和乌戈尔语支,共约15种语言,分布于欧亚大陆广大地区。芬兰语支主要有芬兰语、爱沙尼亚语和拉普语。乌戈尔语支主要有匈牙利语、沃恰克语和沃古尔语。萨莫耶德语族分南、北两个语支,有4种语言。北支的重要语言是涅涅茨语(以前称尤拉克-萨莫耶德语),分布于西起苏联阿尔汉格尔斯市,东到叶尼塞河河口之间的广大北部冻土地带,使用人口约2.5万。南支的重要语言是塞尔库普语(以前称奥斯恰

克-萨莫耶德语),分布于稍靠南的西西伯利亚塔兹河两岸,使用人口约2000。

乌拉尔语系诸语言的特点:语音结构很不相同,芬兰语的辅音少,已失去腭化齿龈音。匈牙利语辅音多,有清、浊的区别。芬兰语有8个元音:і,ü,у,е,ö,о,ä,а,匈牙利语也有类似的元音系统。沃恰克语有7个实足元音,3个简化元音。元音有长短之分,如芬兰语的tulen(火的),tuulen(风的),tuleen(火中),tuuleen(风中)。有些语言有元音和谐现象,一般出现在一个词中。芬兰语、爱沙尼亚语和拉普语都有辅音交替现象。大多数芬兰-乌戈尔语词的重音落在第一个音节上。

有些乌戈尔语言的构词法属于粘着型,芬兰语、爱沙尼亚语则更多采用熔合法来构词。大多数乌拉尔语言的名词都有数和格之分,格的平均数目为12个,一般包括主格、受格、所有格和3种表示空间位置的格,这是各个语言系统的基础。

芬兰语、匈牙利语和拉普语的句子词序是主语—动词—宾语,萨莫耶德语诸语言的句子词序是(主语)—(宾语)—主要动词—(助动词),括号代表不是非有不可的成分。在变化了的主要动词上添加后缀,以跟主语的人称和数一致。例如:涅涅茨语:tiky pevsúmd'o-m saravna t'eñe-va? (直译:“那个傍晚很好地记住-我们”,即“我们牢记那个傍晚”)。动词“有”的意思,用动词“是”加上动作者的方位格或与格表示,如:“父亲有一幢房子”,芬兰语说isä-llä on talo (直译:“父亲-在是房子”)。句子中词的功能用格的后缀和后置词表示。

在沙皇俄国时代,萨莫耶德语语言没有文字。1931年,苏联政府为涅涅茨语和塞尔库普语引进拉丁字母。1937~1940年之间,拉丁字母为基里尔字母所取代。其他乌拉尔语言使用经过修改的拉丁字母,有些语言还采用一些变音符号。

参考书目

P. Hajdu, *Finno-Ugric Languages and Peoples*, Andre Deutsch, London, 1975.

B. Collinder, *Survey of the Uralic Languages*, Almqvist and Wiksell, Stockholm, 1957.

B. Collinder, *Comparative Grammar of Uralic Languages*, Almqvist and Wiksell, Stockholm, 1960.

(林书武)

Wulunbeike

乌伦贝克, C. C. (Christianus Cornelius Uhlenbeck 1866~1951) 荷兰语言学家。1866年10月18日生于荷兰沃尔堡,1951年8月12日卒于瑞士卢加诺。1888年在莱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892年任阿姆斯特丹大学梵语和比较语文学教授,1899~1926年任莱顿大学古日耳曼诸语言教授。

乌伦贝克在19世纪80年代研究巴斯克语。他反对关于巴斯克语跟芬兰-乌戈尔语族有亲属关系的假说,并认为原始巴斯克语已有综合性的动词词形变化。这些意见当时曾引起争论,但后来已被公认了。20世纪20年代,

他研究格林兰的爱斯基摩语,指出这种语言与印欧语系有几个接触点。1908~1938年,他写了一些关于美洲印第安语言的论著,其中最好的是《简明黑脚语法》。1935~1941年他指出,所谓原始印欧语并不是统一的语言,而是一群互相联系的语言的复合体,是经过长期的同化、局部的分化以及各式各样的调整校正而逐渐形成的。他认为,新语法学派那些关于“原始语言关系”、“亲属关系”和“原始语形式”的构想都与实际情况不符(见新语法学派)。(麦志强)

Wuziblekey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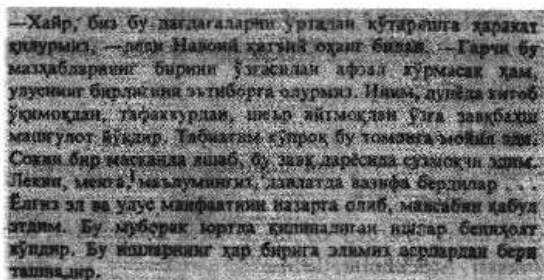
乌孜别克语 (Uzbek language) 见乌兹别克语。

Wuziblekeyu

乌兹别克语 (Uzbek language) 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主要分布于苏联乌兹别克共和国,此外,在土耳其、阿富汗等国以及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乌鲁木齐、伊宁、喀什、莎车、叶城、木垒等地也有人使用,中国境内称乌孜别克语。总的使用人口约1000万。

乌兹别克语有8个元音: i, e, æ, ʌ, ɔ, ɒ, ɵ, y, 其中 i 有两个条件变体 i 和 y。圆唇元音前后对立: y-ɒ, ɵ-ɔ; 有元音和谐现象。辅音有24个: b, p, m, f, w, s, z, d, t, n, l, r, ɖ, ʈ, ʃ, ʒ, g, k, j, ŋ, q, x, ɣ, h。

乌兹别克语属粘着型语言,其语法范畴与突厥语族的其他语言,特别是与维吾尔语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名词有格、数、人称的语法范畴。格有6个,即主格、领属格、宾格、向格、时位格、从格;数分单、复数;人称分第一、



乌兹别克作家艾别克的《纳沃依》(1945)片段

二、三人称。形容词有级的语法范畴。动词有人称、数、时、语态、式等语法范畴。时分过去时、现在时、现在-将来时。语态分主动态、自复态、被动态、使动态、交互共同态。式分陈述式、祈使式、条件式。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是形态变化,其次是词序、虚词和语调。一般情况下,主语在前,谓语在后,宾语在动词之前,修饰语在被修饰语之前。主要构词手段为派生法和合成法。此外,乌兹别克语有相当数量的阿拉伯、波斯、俄罗斯等语言的借词。突厥诸语言相互借用的现象在乌兹别克语中也很多。

1927年以前乌兹别克语采用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文字,1927~1940年采用拉丁化的文字,1940年以后改用以俄文字母为基础的文字(见图)。(程适良)

Wufangyan

吴方言 (Wu dialects) 习惯上称吴语,也叫江浙话或江南话。“吴”是古代地域名称的沿用。

通行地域 吴方言通行于江苏南部、上海、浙江、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角和安徽南部的一部分地区,大约有110多个县市,使用人口7000万左右。具体情况如下:

江苏省境内属吴语或以吴语为主的县市共有21个:丹阳、金坛、高淳、溧阳、宜兴、武进、常州市、江阴、沙洲、靖江、南通、海门、启东、常熟市、无锡、无锡市、苏州市、吴县、吴江、太仓、昆山。溧水县南部孔镇、新桥、白马等乡镇也属吴语区。上海市以及所属的10个县:上海、松江、青浦、金山、奉贤、崇明、南汇、川沙、宝山、嘉定都说吴语。浙江省除西部淳安(包括旧遂安)和建德(包括旧寿昌)两县外,基本上都在吴语区的范围之内,但浙江南部洞头、玉环、平阳、苍南、泰顺、庆元等县是吴语和闽语的交错分布区。建德县北部下包、乾潭及其以东的各乡镇,南部唐村、里叶、大店口等地仍在吴语区内。江西省东北玉山、广丰、上饶3个县和上饶市也是吴语区。此外,福建省西北角的浦城县县城及其以北的乡镇,安徽南部郎溪县北部的梅渚、岗南一带和广德县的下寺、芦村等地也说吴语。

分区 吴语按其语言特点可区分为5片:太湖片,台州片,东瓯片,婺州片,丽衢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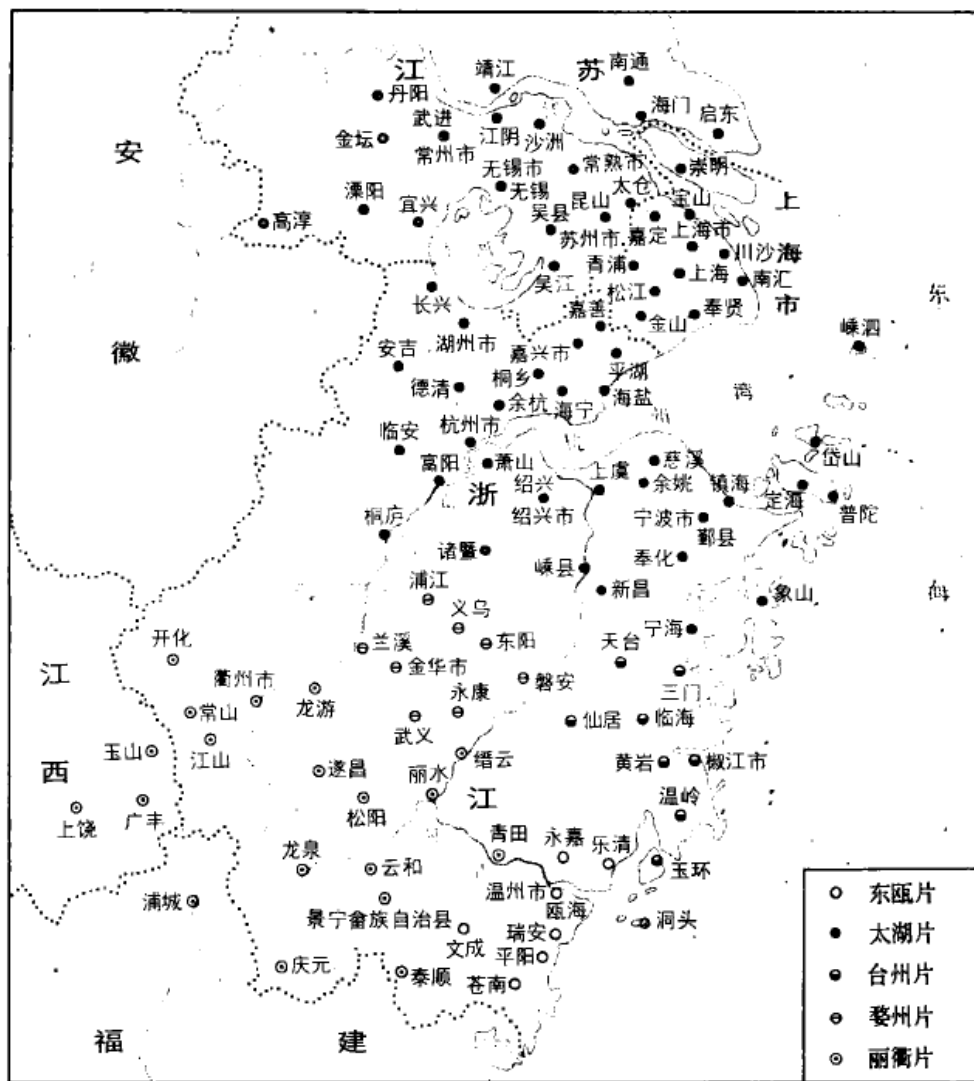
太湖片 即北吴语片,包括江苏吴语21个县市,上海市及其所属各县,浙江旧杭州、嘉兴、湖州3府,以及浙东旧宁波、绍兴两府,以上海话或苏州话为代表。这一片分布面积最广,使用人口最多,可再分6个小片:①常州小片,包括沙洲、江阴、武进、宜兴及其以西苏南吴语各县市和安徽郎溪、广德的部分乡村,江北靖江的老岸话,南通东部、海门和启东东北部的通东话也属这一小片。②苏沪嘉小片,包括上海市及其所属各县,常熟市、无锡市及其以东苏南吴语各地,浙江省的嘉兴市、平湖、嘉善、海盐、桐乡、海宁,江北南通、海门和启东南部的启海话属这一小片。③湖州小片,包括湖州市、长兴、安吉、德清和余杭。④杭州小片,即杭州市及其郊区。⑤临绍小片,包括临安、富阳、桐庐、萧山、绍兴市、上虞、嵊县、诸暨、新昌、余姚、慈溪和建德县的下包、乾潭以东乡镇。⑥明州小片,包括宁波市、鄞县、镇海、奉化、象山、宁海、定海、普陀、岱山、嵊泗。

台州片 包括天台、三门、临海、仙居、黄岩、椒江市、温岭、玉环,宁海县岔路以南和乐清县清江以北地区也说台州话。这片以临海话为代表。

东瓯片 即温州片,温州话旧称瓯语,通行于温州市、瓯海、永嘉、乐清、瑞安、平阳、文成以及洞头、苍南、青田的部分地区。这片以温州话为代表。

婺州片 包括浙江中部金华地区的金华市、兰溪、浦江、义乌、东阳、武义、永康、磐安,以金华话为代表。

丽衢片 包括处州小片和龙衢小片:①处州小片,包括缙云、丽水、云和、青田等县和景宁畲族自治县。武



吴方言分片图

义县南部旧宜平县部分、文成县的南田区、泰顺县北部和庆元县的东北部也属这一小片。②龙衢小片，包括龙泉、庆元、松阳、遂昌、江山、常山、开化、衢州市、龙游。福建省浦城县的北部，江西省的玉山、广丰、上饶和上饶市也属这一小片。这片以丽水话为代表。

主要语言特征 语音方面 ①塞音、塞擦音声母除送气不送气外，还有清浊的区别，古全浊声母一般仍读浊音。比如“报”（帮母）、“炮”（滂母）、“抱”（並母），上海、临海、温州、金华、丽水都不同音：“报”p 声母，“炮”pʰ 声母，“抱”b 声母。保留古全浊声母系统是吴语的本质特点，但各地浊音声母的多少不完全相同。如钱塘江以南绍兴、宁波、临海、金华、丽水、温州等地“茶”读 dz 声母，钱塘江以北海盐、平湖、嘉兴、嘉善、松江、上海等地一般没有 dz 声母，“茶”读 z 声母。

②没有翘舌音，知组、照组一般读 tʰ、tʰʰ、s 或 tʰ、tʰʰ、ʃ。比如“张、周”，上海、嘉兴、杭州、绍兴等地都是 tʰ 声母，临海、温州、金华、丽水等地都是 tʰʰ 声母。只有常熟、无锡和苏州话老派读类似北京话的 tʰʰ 声母。

③保存了声母 ŋ 和元音开头（或喉塞音）之间的区别。比如上海“傲”ŋoʰ“奥”oʰ，温州“傲”ŋʰʰ“奥”oʰʰ。

④古“微”母字多数有文白两读，文读 v（与“肥、房、坟”等字声母相同），白读 m（与“门、米、母”等字声母相同）。比如“问”，上海话、苏州话 vənʰ（文）mənʰ（白），温州话、平阳话 vənʰ（文）mənʰ（白）。

⑤古“日”母字也有文白两读，文读 z 或 z（与“时、树”声母相同），白读 n 或 n（与“泥、女”或“能、农”声母相同）。比如“人”，上海话 zənʰ（文）nənʰ（白），常熟话 zənʰ（文）nənʰ（白），温州话 zənʰ（文）nənʰ（白）。

⑥“鸟”字口语读 t 声母。比如上海话“鸟”与“吊”同音：tioʰ，温州“鸟”与“打”同音：tʰie。

⑦“打”字口语常与“梗、冷”同韵。比如上海话“打、梗、冷”都是 a 韵，温州话“打、梗、冷”都是 ie 韵。

⑧古“蟹”摄合口二等字不带 i 韵尾，古“咸”摄、“山”摄字鼻尾音失落，所以开尾韵比较多。比如“怪、快”（蟹摄）上海话、临海话都是 ua 韵，温州话、瑞安话都是 a 韵，丽水话

uo 韵，衢州话 ue 韵，“三”（咸摄）、“丹”（山摄）上海话 E 韵，临海话、丽水话 a 韵略带鼻化，瑞安、平阳都是 o 韵。

⑨鼻音韵尾少，古“深、臻、梗”三摄字韵尾相同。比如“金”（深摄）、“斤”（臻摄）、“京”（梗摄），上海、临海、金华都是 əŋ 韵，温州、瑞安、平阳都是 iaŋ 韵。

⑩端系合口一等字不带 u 介音。比如“顿、村、孙”上海都是 əŋ 韵，平阳“顿”aŋ 韵，“村、孙”œ 韵，丽水“顿”aŋ 韵，“村、酸”ue 韵。

⑪入声韵不以 -p、-t、-k 收尾，带喉塞尾或只有调类的区别。太湖片入声带喉塞尾，比如上海话“竹”tʰsoʰ，“木”moʰ，“直”zəʰ。东瓯片入声不带喉塞尾，如温州“竹”tʰəu，“木”mo，“直”dzei。婺州片入声字大量减少，比如武义“杂”和“造”同音，“末”和“满”同音。

⑫声调随声母清浊或松紧分阴阳。两个入声，阴入调值比阳入高。比如上海“百”阴入，“白”阳入，“百”高短调(5)，“白”低短调(2)。临海、金华、温州、丽水“百”和“白”也都不同调，“百”的调值总比“白”高。

词汇语法方面 ①单音节词比较多，其中包含大量的古代词语。比如上海话“囤”kʰəʰ（藏匿），《集韵》：口浪

切,音亢,藏也。“敲”t'v'(把包着的东西解开来),《集韵》:他口切,展也。“盪”bø'(水溢),《集韵》、《韵会》:蒲官切,音盪,洄也。

② 动词“下”常用“落”,如“落雨、落雪、落车、落山、坐(得)落、坐勿落、上上落落”。

③ 序数“二”常用“两”,如“两楼”(二楼),“二年级两班”(二年级二班)。十位数“二十”常用“念”,如“念一”(二十一),“念七”(二十七)。

④ 否定副词“不”以 fəʔ、vəʔ,或类似的形式出现,通常写作“勿”。如“勿要、勿是、勿做、勿讲、勿长、勿短、勿红、勿好、勿清爽”。

⑤ 名词前缀“阿”的使用范围比较宽,有用于排行、人名的,如“阿大、阿二、阿三、阿明、阿琴、阿芬”,有用于亲属称谓的,如“阿哥、阿妹、阿爸、阿叔、阿舅(常州指舅父,温州指妻子的兄弟)”。

⑥ “头”字常用作词尾。比如上海话、苏州话有“纸头”(纸)、“墙头”(墙)、“贼骨头”(贼)、“门口头”(门口)、“竹头”(竹子)、“鼻头”(鼻子)、“领头”(领子)、“寿头”(傻瓜)、“早浪头”(早晨)、“夜头”(晚上)、“隔壁头”(隔壁)等。

⑦ 太湖片除杭州、德清、余杭外,其他各地都没有“儿”尾词,也没有表示“儿”尾意义的音变现象。南部各片都有“儿”尾,或以元音鼻化,或以变调表示“儿”尾的意义。

⑧ 动词重叠常用 AAB 式,太湖片附加成分用“看”,如上海话、嘉兴话“吃吃看、问问看、看看看”,南部各片用“覘”、“望”、“相”、“起”,如温州“吃吃覘、想想覘、听听覘”,永康、武义“讲讲望、写写望”。

⑨ 单音形容词重叠方式比较灵活,可以重叠后加成分(ABB 式),也可以重叠前加成分(AAB 式),如上海话 ABB 式:红稀稀、白料料、暗促促、胖笃笃, AAB 式:血血红、蜡蜡黄、笔笔直、绷绷硬。

⑩ 双宾语句动词表示“给予”意义时,指人的宾语常用在指物的宾语前面。如“拨本书我”(给我一本书)、“拨张纸头我”(给我一张纸)。

⑪ 副词“快”常用在动词或形容词的后面,如“到快勒”(快到了)、“好快勒”(快完了,快好了)。

⑫ 动补结构后面的宾语常常提前,如“我饭吃过勒”(我吃过饭了)、“侬《红楼梦》看过哦”(你看过《红楼梦》吗)。

附:吴方言上海、临海、温州、金华、丽水等 代表点的声韵调

声母

上海	p 布	p' 批	b 步	m 米	f 粉	v 服	t 当
	t' 通	d 动	n 南	l 路	ʈ 争	ʈ' 粗	s 师
	z 时	ʈ 基	ʈ' 清	ʈ 群	ɲ 牛	ɕ 希	ʂ 徐
	k 古	k' 苦	g 共	ŋ 咬	h 虾	ɦ 鞋	θ 暗
临海	p 布	p' 破	b 步	m 木	f 飞	v 乏	t 帝

t' 通	d 动	n 南	l 路	ʈ 争	ʈ' 初	ɕ 治
s 思	z 曹	ʈ 蒸	ʈ' 出	ɕ 虫	ɲ 女	ɕ 刷
ʂ 齐	k 经	k' 缺	g 桥	ŋ 咬	h 瞎	ɦ 夏
θ 翁						
温州	p 布	p' 批	b 步	m 木	f 飞	v 服
	t' 通	d 动	n 南	l 路	ʈ 争	ʈ' 粗
	s 思	z 寺	ʈ 蒸	ʈ' 出	ɕ 局	ɲ 肉
	k 街	k' 客	g 街	ŋ 颜	h 黑	ɦ 鞋
	p 布	p' 派	b 步	m 迷	f 飞	v 肥
	t' 梯	d 地	n 你	l 犁	ʈ 资	ʈ' 雌
	s 思	z 时	ʈ 鸡	ʈ' 溪	ɕ 奇	ɲ 泥
	ʂ 柔	k 公	k' 空	g 共	h 荒	ɦ 鞋
	p 悲	p' 批	b 皮	m 妈	f 非	t 低
	d 提	n 男	l 李	ʈ 裁	ʈ' 菜	ɕ 旗
	z 曹	ʈ 艰	ʈ' 牵	ɕ 穷	ɲ 泥	ɕ 仙
	k 棍	k' 坤	g 厚	ŋ 艾	h 海	θ 安

韵母

上海	ɿ 知	i 基	u 波	y 吕	a 巴	ia 写	ua 怪
	ɔ 到	io 标	o 模	ɤ 口	iv 优	ɛ 来	ie 械
	ue 弯	ø 看	uo 官	yø 捐	ā 硬	iā 良	uā 横
	ā 忙	iā 旺	uā 光	əŋ 登	iŋ 紧	uəŋ 昆	yŋ 均
	oŋ 东	ioŋ 穷	aʔ 客	iaʔ 药	uaʔ 刮	oʔ 北	ioʔ 肉
	əʔ 色	uaʔ 骨	irʔ 吃	yrʔ 缺	əl 而	m 亩	ɲ (~奶)
	ɿ 五						
临海	ɿ 师	i 飞	u 布	y 许	a 街	ia 野	ua 化
	ɔ 到	ia 蕉	o 河	ɤ 走	iv 周	ø 南	yø 全
	ɛ 兰	ue 关	e 妹	ie 片	ue 灰	āŋ 硬	iāŋ 良
	uāŋ 横	ɔŋ 仓	iɔŋ 双	əŋ 闻	iŋ 精	uəŋ 温	yŋ 运
	oŋ 红	ioŋ 虫	aʔ 客	iaʔ 药	uaʔ 划	ɔʔ 确	ioʔ 桌
	oʔ 木	ioʔ 肉	əʔ 夺	uaʔ 骨	yaʔ 月	eʔ 夹	ieʔ 别
	əl 而	m 亩	ɲ 儿	ɿ 五			
温州	ɿ 朱	i 衣	u 威	y 安	a 班	ia 约	ua 弯
	ɔ 汤	uo 汪	yɔ 涌	o 蛙	yo 欲	ɜ 澳	ø 恩
	ɛ 哀	æ 杏	iæ 腰	ai 归	iai 益	uai 熨	ei 微
	au 欧	iau 幼	iu 收	əu 初	øy 苏	aŋ 昆	iaŋ 英
	eq 丁	oŋ 翁	ioŋ 拥	m 姆	ɿ 五		
金华(文读)	ɿ 时	i 鸡	u 姑	y 书	a 怕	ia 家	
	o 何	ai 该	iai 皆	yai 帅	au 曹	iau 苗	ei 美
	iei 蕉	uei 追	eu 偷	iu 手	an 南	ian 先	uan 官
	yan 川	aŋ 帮	iaŋ 张	uaŋ 光	yaŋ 双	əŋ 根	iŋ 贫
	uəŋ 坤	yŋ 春	oŋ 东	ioŋ 虫	əʔ 八	ioʔ 一	uoʔ 骨
	yaʔ 出	oʔ 福	yoʔ 叔	əl 儿			
丽水	ɿ 资	i 弟	u 租	y 女	u 去	a 办	ia 良
	ua 官	ʌ 包	ia 标	ɔ 带	uo 排	uo 爬	yo 遮
	ɛ 搬	ie 扁	ue 婚	yø 川	ei 杯	uei 归	əu 谋
	iu 周	aŋ 门	uaŋ 滚	oŋ 帮	ioŋ 雄	iŋ 兵	yŋ 训
	aʔ 百	ɛʔ 拨	ieʔ 铁	ueʔ 割	yeʔ 决	eʔ 北	ʌʔ 作
	ɔʔ 辣	ioʔ 脚	uoʔ 挖	oʔ 木	ioʔ 育	iuʔ 笔	yiʔ 桔
	əl 而	m 务	ɿ 红				

声调

古调类	平			上			去			入		
古声母 清浊	清	浊		清	浊		清	浊		清	浊	
		次浊	全浊		次浊	全浊		次浊	全浊		次浊	全浊
例字	刚	麻	同	古	老	淡	靠	帽	病	百	木	白
上海	53	=浊去		=清去	=浊去		34	13		5	2	
临海	433	211		42	=浊平		44	312		5	2	
温州	44	31		45	24		42	11		323	212	
金华 (文读)	334	213		534	=浊去		55	14		5	2	
丽水	24	11		44	=浊平		52	21 (或 231)		5	2	

参考书目

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清华学校研究院丛书第4种,北京,1928;科学出版社,北京,1956。

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调查指导组编:《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1960。

许宝华、游汝杰:《苏南和上海吴语的内部差异》,载《方言》,1984,第1期。

(颜逸明)

Wuxia Fangyankao

《吴下方言考》(The Textual Criticism of Wu Dialect) 清代记录、考证吴方言词汇的著作。胡文英(生卒年月不详)撰,刊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北京中国书店影印。

这本书搜集、考证常州、无锡、苏州一带的方言词语993条,按所属平水韵韵部分12卷编排,以四声为序。卷一至卷六是平声,卷七是上声,卷八是上声、去声各半,卷九是去声,卷十是去声、入声各半,卷十一、十二是入声。有的韵词条太少,就附在相近的韵里,如卷一东韵附有冬韵,江韵附有阳韵。如词条属多音节词,就根据最后一个音节来归类。如“花黄”条依“黄”字归入卷二“三江”。书中每一词条的内容,先用本字标目,并引出该词条在典籍中的出处,然后加以考释和举例说明它在口语中的用法。遇到生僻的字,注上吴方言的同音字,偶尔也用反切,例如:“卷二平韵三江勑音央顾野王《玉篇》:勑,劝也。案,勑,强劝彼为我用力也。吴中谓烦人劳动曰勑。”《吴下方言考》提供了不少当时吴方言中常用的口语和所考证的本字,对某些词语的注音有助于认识当时的吴音,这对研究吴方言的发展变化是宝贵的资料。该书因对所收词条都引经据典,探求本字,再加审音欠精,有时难免望文生义,穿凿附会。

(叶祥苓)

Wufang Yuany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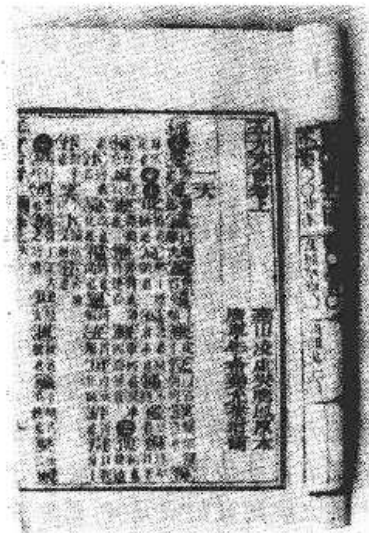
《五方元音》 明末清初北方官话民间韵书。樊腾凤著。樊腾凤(1601~1664),尧山(今河北隆尧县)人。书成在清顺治十一年(1654)到康熙三年(1664)之间。

本书深受“五音十二律”

学说影响,不过只在讲理论和某些分类原则的时候。他的韵分12类:①天(an、开、齐、合、撮,举一以该其余),②人(en),③龙(ong),④羊(ang),⑤牛(ou),⑥獐(ao),⑦虎(u,包括[ɿ, ʅ], ü),⑧驼(o,e),⑨蛇(ê),⑩马(a),⑪豺(ai),⑫地(i,ei)。声母20类:梆(b),匏(p),木(m),风(f),斗(d),土(t),鸟(n),雷(l),竹(zh),虫(ch),石(sh),剪(z),鹊(c),系(丝字省写,s),云(y),金(g),桥(k),火(h),蛙(w,θ)。

这里的竹、虫、石3组可能像现代赣榆方言“齐微”韵里的情形,后接[i]类音发[ɿ]类音,接非[i]类音发[ʅ]类音,所以在“天”韵里有“獐”[ʃien]和“山”[ʃan]的对立,“人”韵里有“真”[ʃin]和“臻”[ʃən]的对立。

虎韵以下有入声,可不分阴阳。因此在书前头《韵略》部分



樊腾凤著《五方元音》

都是5个字一组,象“匏母,虎韵”的“夫符府父福”。实际读音不见得这样。《韵略》收字也和正文有不合处,如“朴”字《韵略》在⑧驼,正文在⑦虎。

以上是北京大学藏旧钞本“宝旭斋”刻《新纂五方元音》的概况。现在通行本都是“广宁年希尧增补”本(见图)。流传极广,而且不只一种。除大量增字以外(也删少量字),音系也有改动,特别是在入声字上。比方“获”字,钞本放在“坏、淮、槐”等字下头,年本放在“禾、火、祸”等字下头。问获鹿县人,他们念音等于北京 huailù。北京书音念 huòlù。正好像北京口语“色”念 shāi,书音念 sè 一样。

这本书在北方一直流行到民国初年。人们常用它来查有音无字的音节该怎么写。

(俞敏)

Wujing Wenzl

《五经文字》 一种辨正经传文字形体的书。唐代宗大历十一年(776)国子司业张参撰。张参,新旧《唐书》无传,《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河间张氏”下有张参名,或即

此人。清代朱彝尊《五经文字跋》说：“按孟浩然集有《送张参明经举省诗》，钱起集有《送张参及第还家作》，而‘郎官石柱题名’参曾入司封员外郎之列，盖参在开元天宝间举明经，至大历初佐司封郎，寻授国子司业者也。”

大历十年六月张参奉诏校勘五经文字，并且书于太学屋壁。随后又收集疑文互体，根据汉熹平石经和《说文解字》、《字林》、《经典释文》等书，收经传文字 3 235 字，依据偏旁部首排列，凡 160 部，分为 3 卷。所收文字除见于易、书、诗、礼、春秋五经的以外，也兼收《论语》、《尔雅》



张参著《五经文字》

中的字。每字加注读音，而以注反切为主，兼注直音。所注反切多与《字林》音相合。经书文字的楷书写法自有《五经文字》以后才有了一定的准绳。所以这本书对汉字的规范化起了极大的作用。

不过，这本书的分部并不完全合乎《说文》。书中既以偏旁形体分部，但在分部上有以形旁为部首的，又有以声旁为部首的。如木部、手部为形，而才部、且部为声。或一部之内有以部首为形的，又有以部首为声的，未免与分部之意不合。又如卅部、十部之字随意割取偏旁，更为凌乱，不足为法。

原书最初书于国学讲论堂东西厢屋壁，后来改为木版。唐文宗间刻石经，附于九经之后。清代《后知不足斋丛书》从唐石本覆刻，字大清晰，最佳。（参见彩图插页第 11 页）

（周祖谟）

Wuti Qingwenjian

《五体清文鉴》 满文、藏文、蒙古文、维吾尔文、汉文 5 种文字对照的分类词汇集（参见彩图插页第 31 页）。编撰者和成书年代不详。有人估计完成时间为 1790 年前后，刊成时间不早于 1805 年。此书是清代官修的以清文

鉴命名的辞书中的一部。第 1 部清文鉴即《御制清文鉴》，编于康熙十二年至四十七年（1673~1708）。到乾隆末年，先后出版了《御制满蒙文鉴》、《御制增订清文鉴》（满汉两体）、《御制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御制四体清文鉴》、《御制五体清文鉴》等几种。《御制五体清文鉴》是以《御制增订清文鉴》为蓝本，在《御制四体清文鉴》满文、藏文、蒙古文、汉文对照词汇的基础上，加上维吾尔文而成，并增加和替换了少数词。词按意义分类。正编 32 卷，分 36 部、292 类、556 则，收词 17 052 条；补编 4 卷，分 26 类、71 则，收词 1 619 条；共收词 18 671 条。5 种文字的次序是满文、藏文、蒙古文、维吾尔文、汉文。其中在藏文栏下附有两种满文注音，一种叫“切音”（用满文字母逐个转写藏文的字母），一种叫“对音”（用满文字母为该词标音）。在维吾尔文栏下，附有“对音”。因此 5 种文字共有 8 栏。这部词汇集对沟通上述民族的文化起了桥梁作用。对探讨突厥语、蒙古语、满-通古斯语之间的关系有参考价值。所搜集的清代维吾尔文资料，以及为藏语词和维吾尔语词标注的实际读音，更为珍贵。1957 年，民族出版社根据故宫博物院所存抄本分 3 册影印出版，题名《五体清文鉴》。1966 年，日本出版了用拉丁字母转写的《五体清文鉴译解》。

（胡增益）

wuyin

五音 见等韵。

Wuyin Jiyun

《五音集韵》 见韵书。

Wuyin Qieyun

《五音切韵》 中国西夏文音韵书。著者不详。编纂于西夏（1038~1227）早期。现存 4 种写本，蝴蝶装，皆残。1909 年自中国黑水城遗址（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境内）出土，现藏苏联。其中一本有西夏皇帝御制序。序言表明此书在汉、吐蕃韵书的影响下，以西夏文韵书《文海宝韵》为基础编成。分为韵表、韵图两部分。韵表名为“九音显门”，纵行为韵，横列为声，依九品音分类，每类一表。韵图名为“众漂海入门”，自右而左以声分为唇、舌、牙、齿、喉 5 格，上下共分为 9 段，前 4 段为开、合口清音，5、6 两段为来、日母音，7、8 两段为平、上声韵的代表字。此书是研究西夏语音的重要著作。（史金波）

X

Xibanyayu

西班牙语 (Spanish language) 西班牙的官方语言,也是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的官方语言,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之一。此外,美国南部的几个州、菲律宾以及非洲的部分地区,也有相当数量的使用者。全世界说西班牙语的人在2.5亿以上。属印欧语系罗曼语族西支。公元前218年,罗马入侵伊比利亚半岛,拉丁语逐渐通行于该地区。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崩溃,拉丁语逐渐分化。通俗拉丁语演变为罗曼诸语言,其一即西班牙语。12~13世纪,卡斯蒂利亚的方言成为西班牙的最具优势的方言,现代标准西班牙语就是在卡斯蒂利亚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西班牙语也称为卡斯蒂利亚语,特别是在拉丁美洲。

西班牙语在语音、词汇、语法体系等方面继承了拉丁语的特点。共有24个音位,其中有a、e、i、o、u 5个单元音和19个辅音。b和v的发音相同,h不发音。此外还有大量二合元音和三合元音。重音很规则:以元音、n或s结尾的词,重音落在倒数第二个音节上;以其他辅音结尾的词,重音落在最后一个音节上。大部分词语源自拉丁语。由于历史上民族间的接触,西班牙语还受过日耳曼语和阿拉伯语的影响。15世纪,发现美洲新大陆,西班牙语传入新大陆(后来的拉丁美洲国家),同时也吸收了美洲本地语言中的一些词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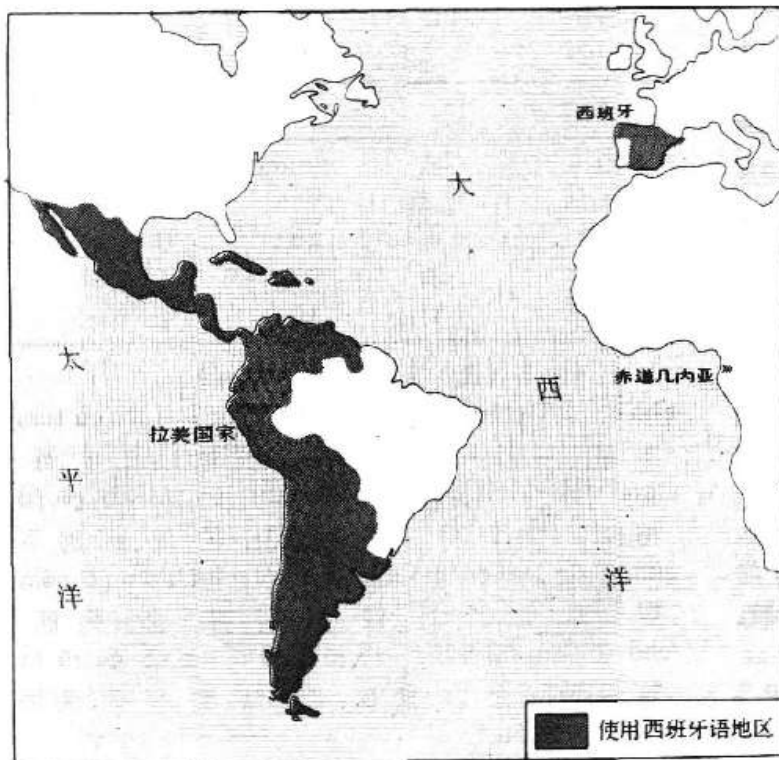


图1 西班牙语地区图

西班牙语属屈折型语言。经过长期演变,它的词尾屈折已大大简化。除作主语、宾语的代词及其反身形式外,拉丁语的格系统几乎已完全消失。名词分阳性和阴性,但在某些结构中还能见到中性的痕迹。复数在词尾加-s或-es。形容词在语法上与名词有协调关系,词尾变化与名词同。动词仍保留相当多的屈折,但很有规则。由于动词词尾已足以表示人称,主语往往省略。西班牙语采用拉丁字母,共28个:a、b、c、ch、d、e、f、g、h、i、j、k、l、ll、m、n、ñ、o、p、q、r、s、t、u、v、x、y、z。有些外来词和专有名词还使用w。

经过几个世纪的演变,拉丁美洲的西班牙语形成了若干地区方言,它们在语音、词汇和语法的某些方面具有不同于欧洲西班牙语的特点。发音方面有差别的例子,如拉美人把[e]发成[s],把[ʎ]发成[y],在语调方面也有

En efecto, rematado ya su juicio, vino a dar en el más extraño pensamiento que jamás dio loco en el mundo, y fue que le pareció conveniente y necesario, así para el aumento de su honra como para el servicio de su república, hacerse caballero andante, y irse por todo el mundo con sus armas y caballo a buscar las aventuras y a ejercitarse en todo aquello que él había leído que los caballeros andantes se ejercitaban, deshaciendo todo género de agravio, y poniéndose en ocasiones y peligros donde, acabándolos, cobrase eterno nombre y fama.

图2 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小小说《堂吉珂德》片段

一些差别。词汇方面有差别的例子如“马铃薯”,在西班牙称为patata,在拉丁美洲称为papa。此外,拉丁美洲还使用西班牙语的某些古词语,如“毯子”,在西班牙现称作manta,而在拉丁美洲仍称作frazada。语法方面有差别的例子,如拉丁美洲国家用ustedes(您们),而不用西班牙本土的vosotros(你们)。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和中美洲国家用vos(古语你)而不用西班牙的tú(你),在跟动词连用时,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如“你唱”,用cantás,而不用cantas。

参考书目

R. Lapesa, *Historia de la Lengua Española*, Gredos, Madrid, 1982.

F. Marcos Marín, *Linguística y Lengua Española*, Cincel, Madrid, 1980.

(岑楚兰)

Xibowel

西伯维 (Sibuwaihi 'Amr 'Ibn 'Uthmān 760?~796?) 阿拉伯阿拔斯朝早期语法学家。祖籍波斯设拉子地区,12岁随母移居伊拉克巴士拉城,在语言大师海利勒门下学习,终于成为阿拉伯语法巴士拉学派的首领。

西伯维对阿拉伯语的故乡阿拉伯半岛内志、希贾兹等地的典型阿拉伯语进行过广泛调查,写出了历史上第1部系统完整的阿拉伯语法,叫做《书》。这部长达千页的巨著,将词分为名词、动词、虚词3大类,以海利勒的格位学说为纲,概括出阿拉伯语的句法和词法,为整个阿拉伯语法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西伯维曾由巴士拉前往阿拔斯的新都巴格达,通过他的同乡叶海亚首相找到库法学派进行论战。库法学派首领古兰经训读学者凯萨依(曾任三朝国师)及其门徒事先早已安排好一些部族群众到场支持自己,他们反复宣称西伯维已经败北,使他当众受辱。西伯维饮恨返回故里设拉子,不久便与世长辞。

见巴士拉学派、库法学派、海利勒。(张甲民)

Xibu Yuguyu

西部裕固语 (Western Yugur language)

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东匈语支。分布在中国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的大河区、明花区等地。使用人口约4600(1982),占裕固族总人口的43%。无方言差别。语音方面,有8个基本元音: a, ə, e, i, o, u, ɤ, y, 6个带擦音音, ah, əh, eh, oh, uh, ɤh。有些词依据元音是否带擦音成分区别词义。例如: dat(锈)—daht(藏族), ugus(江)—uhgus(牛), et(做)—eht(到达)。有28个辅音: b, p, m, f, d, t, n, l, g, k, ŋ, x, q, ɣ, h, ʃ, ʒ, j, ɕ, ʂ, ʐ, z, v, s, z, r。塞音和塞擦音均是清音,分送气与不送气两套。有些词的读音保存着古代语音的特点。例如,词中、词尾有z音: azaq(脚), gez(穿)。词汇方面,保存着一些见于突厥、回鹘文献中的古词,例如: gohrtga(老奴)、bahgar(紫铜)、erehpdz(夫妇)、haja(手掌); 有大量的汉语借词,阿拉伯语、波斯语借词极少。语法方面,名词的人称附加成分已退化,除第三人称附加成分外,第一、第二人称附加成分极少用。数词从11~19, 21~29的结构特殊,保存了突厥、回鹘文献语言古老的计数法。就是把11~20作为一个阶段,11是11~20中的第1个,所以11由1和20组成,21~30作为一个阶段,29是21~30中的第9个,所以29由9和30组成。bər是1, jiyərma是20, 11是bərejyərma, dohgəs是9, ohdəs是专用来构成其他数词的30, 29是dohgəsohdəs。动词没有人称附加成分,缺乏连词,复合句不发达。在突厥语族语言中,西部裕固语保存古代的语言特点较多,受汉语的影响也较深。

(陈宗振)

Xiru Ermuzi

《西儒耳目资》 (A Help to Western Scholars)

明末天主教耶稣会来华传教士金尼阁(1577~1628)编著的一部帮助西洋人学习汉语、汉字的罗马字注音字汇。

金尼阁,法国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来中国,先到澳门,第二年去南京学习中文。后到南昌、建昌、韶州、杭州以及河南、山西、陕西等地传教。晚年居住杭州。1628年11月14日在杭州逝世。

1625年,金尼阁把利玛窦(1552~1610)等人的罗马字注音方案加以修改补充,写成一部完整的罗马字注音专著,叫做《西儒耳目资》,第二年在杭州出版。全书共分为三编:第一编《译引首谱》是总论,第二编《列音韵

谱》是从拼音查汉字,第三编《列边正谱》是从汉字查拼音。

金尼阁的罗马字注音方案只用了25个字母(5个元音字母,20个辅音字母)和5个表示声调的符号,就可以拼出当时“官话”的全部音节。这种比“反切”简单容易得多的方法,引起了当时中国音韵学者极大的注意和兴趣。有的学者还从中受到启发,产生了中国文字可以拼音化的设想。如方以智在所著《通雅》中说:“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事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

《西儒耳目资》的罗马字母拼音方案如下:

声母				
p[p]	'p[p']	m[m]	f[f]	v[v]
t[t]	't[t']	n[n]	l[l]	
k[k]	'k[k']	g[ŋ]	h[x]	
ch[tʃ]	'ch[tʃ']		x[ʃ]	j[ʒ]
ç[ʃ]	'ç[ʃ']		s[s]	
韵母				
a[a]	i[i]	u[u]	iu[y]	
o[ɔ]	ia[ia]	ua, oa[ua]	iue[ye]	
e[ə], [ɛ]	io[iɔ]	uo[uɔ]	iuen[yeŋ]	
ai[ai]	ie[iɛ]	ue, oe[uə]	iun[yn]	
ao[au]	iai[iaɪ]	uai, oai[uai]	ium[yn]	
eu[əu]	iao, eao[iaɯ]	uei, oei, ui[uei]		
an[an]	ieu[iəu]	uan, oan, uon[uan]		
en[en]	ien[iɛn]	uen, oen, un[uen]		
am[aŋ]	in[in]	uam, oam[uaŋ]		
em[aŋ]	iam, eam[iaŋ]	uem[uaŋ]		
ul[əʔ]	im[iŋ]	um[uŋ]		
ě, ú, ụ[ɿ]				
声调				
阴平	一	观	kuōn	山 xān
阳平	∧	文	vên	人 jīn
上声	、	古	kù	雅 yǎ
去声	、	教	kiáo	化 hoá
入声	v	学	hiǒ	业 niě

拼写举例(《西儒耳目资·自序》摘录)

hīm chí chūm hoá chāo siē kiām 'kiēu iǒ i iēn cǔ 'tūm
幸至中华朝夕讲求欲以言字通
siām 'tūm chí lì tán 'chū vên sin iēn ùl kù cǔ pǒ
相同之理但初闻新言耳鼓则不
cūm kuōn sīn cǔ mǒ kīm cǔ pǒ mīm 'kūm pǒ nēm
聪观新字目镜则不明恐不能
'chǒ lì tūm chí nūi í iǒ kiēu lūm kù xǔ 'cǔ iǒ fǎ
触理动之内意欲救聋瞽舍此药法
'kī táo vū iēu
其道无由

(尹武庸)

Xixlawen

西夏文 (Xixia script) 中国古代西夏党项羌族使用的文字。11 世纪西夏主李元昊称帝, 在广运元年(1036)颁布西夏文, 命野利仁荣加以演绎。其间西夏文与汉文并用。西夏国灭亡(1227)后, 党项后裔仍有人使用。元代居庸关石刻、明代中叶保定石幢均有西夏文(图 1)。以后湮没, 成为一种死文字。字体仿汉文楷书。但无一字与汉文相同。此外, 尚有篆字、草字(图 2), 共有 6 000 余字。每字由一至数个小方块字素构成, 分左、右、上、下、中等块, 每字均有含义。会意字占大多数, 形声字很少, 对转字更少。举例如下:

① 会意字: 如𐵄(马类), +𐵇(手)=𐵄𐵇(臂); 𐵄(小)、~𐵄(细), +𐵇(金属类)=𐵄𐵇(针); 𐵄(细)+𐵇(木类)=𐵄𐵇(刺)。有些字头、偏旁含义明显。如𐵄(人)、𐵄(水类)、𐵄(火类)、𐵄(草类)、𐵄(谷类)、𐵄(菜类)等都是会意字的构成部分。

② 形声(表音)字: 如𐵄音“嵬”。下举从“𐵄”文字: +𐵄(人)=𐵄(悟)、+𐵄(鸟类)=𐵄(禽、鸟)、+𐵄(火类)=𐵄(火焰), 皆音“嵬”。

③ 对转字: 如𐵄(草类), +𐵄(辛)=𐵄(椒), 将字素对转一下为𐵄(椒), 𐵄(地)转为𐵄(坤)。

西夏人用西夏文论述西夏文字、语言及幼学书籍的有《同音》(1132)、《文海》(12 世纪中叶)、《五音切韵》(1173)、《番汉合时掌中珠》(1190)、《三才杂字》(1223~



图 2 西夏文草书残页(1070~1071)

1226)等。(参见彩图插页第 29 页)

(王静如)

Xixiong yuzhi

西匈语支 (Western Huns branch) 阿尔泰

语系突厥语族的语支之一。按照苏联突厥语专家 H. A. 巴斯卡科夫(1905~)的分类法, 突厥语族的语言分为东匈语支和西匈语支。这是关于突厥语族语言的多种分类法之一。巴斯卡科夫所依据的是广泛的语言原则和历史原则, 即以语音、词汇、语法的特点和社会历史情况为依据进行分类。西匈语支的语言指古代分布在西方后来加入西匈奴和西突厥部落联盟的各部落及其后裔使用的语言。

西匈语支分布布尔加尔语组、乌古斯语组、克普恰克语组和卡尔鲁克语组。各语组均有古代和现代的几种语言。布尔加尔语、塞尔柱语、古奥斯曼语、波罗维茨语、喀喇汗国突厥语等是该语支中的古代突厥语, 楚瓦什语、土库曼语、土耳其语、阿塞拜疆语、鞑靼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乌兹别克语等是该语支中的现代突厥语。突厥语族的多数语言属于西匈语支, 使用人口也占绝大多数, 共约 9 200 万。西匈语支各语言的特点: 语音方面, 古代的 z、d、t 被 r 或 j 代替, 如 ura 或 ajaq 代替 azaq、adaq、atax(脚)等; 有 b-p、d-t、g-k、z-s 等浊辅音与清辅音的对立; 有 x、v、h 等辅音。语法方面, 复合句的结构比较发达, 并有许多连词, 包括借自其他语言的连词。词汇方面, 有大量的阿拉伯语和伊朗语的借词, 蒙古语的借词较少。

(陈宗振)

Xizi Qiji

《西字奇迹》 (Wonder of Western Writing)

明末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来华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用罗马字给汉字注音的 4 篇文章。从这 4 篇文章的注音中归纳出的拼音方案被认为是历史上第一个用罗马字拼写汉语的方案。

利玛窦于明万历十年(1582)来中国。先到澳门, 后到肇庆、韶关、南京、南昌等地传教。1598 年从南京到北京, 因传教受挫, 只住了两个月就返回南京。1601 年第二次到北京, 从此在北京定居, 直到 1610 年 5 月 11 日逝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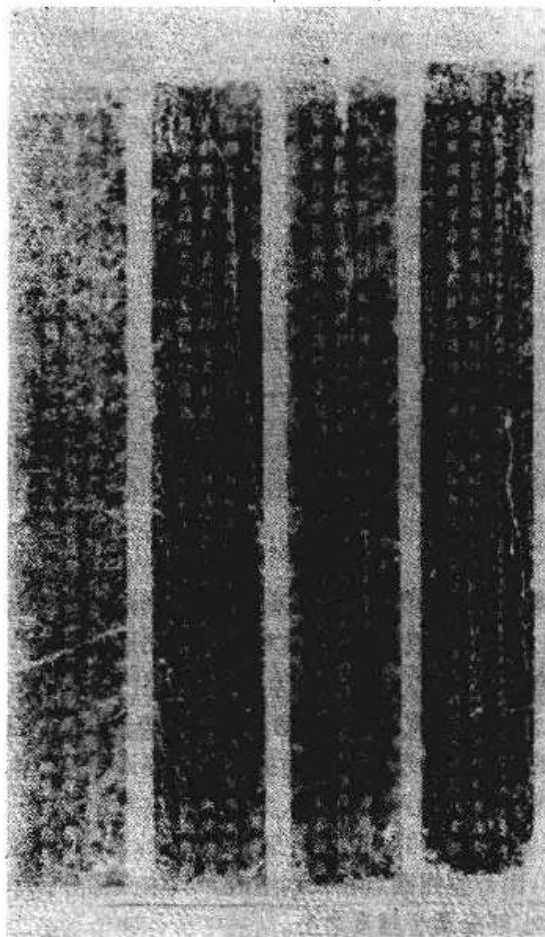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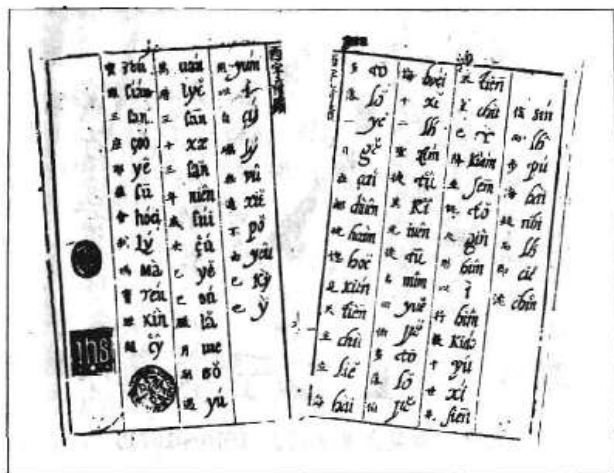


图 1 保定明代西夏文经幢(1502)



《西字奇迹》

1605年,利玛窦应用他和另外几位传教士拟订的用罗马字给汉字注音的一套方案写了4篇文章,送给当时的制墨专家程君房,由程君房编入所著墨谱《程氏墨苑》中。4篇文章的前3篇都宣传天主教教义,由教会单独合成一卷,取名《西字奇迹》,复制本现存罗马梵蒂冈教皇图书馆(在中国,习惯上把上述4篇文章称作是《西字奇迹》)。

这4篇注音文章一共有387个不同音节(不计声调)的汉字。根据这些音节的注音归纳出的利玛窦的拼音方案如下:

声母			
p[p]	p'[p']	m[m]	f[f] v[v]
t[t]	t'[t']	n[n]	l[l]
c,q[k]	c',q'[k']	ng,g[ŋ]	h[x]
ch[ʃ]	ch'[ʃ']	nh[n]	x[f] j,g[ʒ]
ç,c[ʃ]	ç',c'[ʃ']		s[s]

韵母			
a[a]	i(y)[i]	oa[ua]	iuen(yuen) [yɛn]
o[ɔ]	ia(ya)[ia]	uo,oo[uɔ]	iun[yn]
e[ə][ɛ]	io(yo)[io]	oe[uə]	yum[yŋ]
ai[ai]	ie(ye)[ie]	uai[uai]	
ao[au]	iai[iai]	uei,oei,ui [uei]	
eu[əu]	iao,eao, [iaɯ]	uan,uon [uan]	
an[an]	ieu[iəu]	uen[uen]	
en[en]	ien[iɛn]	uam,oam [uaŋ]	
am[aŋ]	in(yn)[in]	oem[ueŋ]	
em[əŋ]	iam,eam [iaŋ]	um(om) [uŋ]	
ih[əʔ]	im(ym)[iŋ]		
ě,ù,ü[ɿ][ʅ]		iu(yu)[y]	
	u[u]	iue(yue) [ye]	

声调

阴平	—	观	quōn	山	xān
阳平	^	文	vēn	人	gīn
上声	ˊ	古	cù	雅	yà
去声	ˋ	教	kiào	化	hoà
入声	v	学	hiō	业	niē

拼写举例(摘自《明末罗马字注音文章》)

quàm cāi vèn cǔ chǐ cōm yū rù nùl yē xí vù vèn hō
 广 哉 文 字 之 功 于 字 内 耶 世 无 文 何
 gín k'ì fuèn fì hō c'án k'í ngán vèn hū
 任 其 愤 排 何 堪 其 闇 汶 乎

(尹斌庸)

Xibolatyu

希伯来语 (Hebrew language) 以色列的通用语言。其他地区的犹太人也有不少使用这种语言。使用人口共计300万以上。属阿非罗-亚细亚语系闪语族。希伯来语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之一,其历史至少可以上溯至公元前1100年左右。几乎全部《旧约全书》都用这种语言书写(见图)。据《旧约全书》第1卷《创世记》载,它是由一个小的游牧部族带到迦南地区(今巴勒斯坦一带)去的。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希伯来语及其文化经历了长期的和复杂的演变。在世界许多地区,它仍然是把宗教和文化传统结合在一起的犹太意识的深刻根源之一。



《旧约全书》中的一页

希伯来语的历史始于《圣经》希伯来语,后者的特点是:基本词汇量很小,缺少描写性词语和抽象名词;具有三辅音词根,词以这些词根为基础,按照严格的规则插入元音、添加前缀或后缀等;动词系统时态很少,而且没有特定的形式来表示条件、虚拟和祈使等语气;文字由22个辅音字母(无元音字母)组成,自右至左书写。7世纪后,有人制定了一套符号来表示元音,称做“提伯里亚系统”,由一组组圆点和长划组成,其中大部分置于辅音之下,小部分置于辅音之上。

在希伯来语口语的早期历史中,它经历了相当大的

变化。公元 200 年左右,希伯来语口语逐渐消失。它作为犹太人口语的地位先后被阿拉米语、阿拉伯语和一些欧洲语言所取代。依地语便是犹太人迁徙到欧洲东部之后使用的一种方言,后发展为一种独立的语言。作为口语停止使用后,希伯来语继续被用作一种书面语言,不仅用于祈祷文和宗教典籍的研究,而且也用来撰写法律、科学和哲学文献,以及世俗的纯文学作品。作为书面语言使用的希伯来语,从犹太人说的其他语言中吸收了许多词语。这种情况在伊斯兰教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尤为明显,因为这些国家在研究希腊学术时,在哲学、医学、数学等科学领域中,迫切需要新术语;另一方面,在中世纪时期,诗歌和韵律散文的文学体裁发展了修辞和文体模式,并导致大量新名词和新形式的产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出现于 6~9 世纪的“礼拜仪式诗”,它以其特有的抒情性和形象化描述手法闻名于世。

中世纪和 18 世纪之间,希伯来语除了引进某些依地语成分外,变化不大。但 1882 年初,犹太人在后来成为以色列人居留地的地方重新定居,复活一种共同语成了当务之急。希伯来语口语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获得全面新生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一个叫做埃利泽·本-耶胡达的年轻俄国犹太人。他为复活希伯来语奔走呼吁,并在一切场合带头说希伯来语。但他曾遭到少数人的反对,这些人认为用《圣经》的语言来描述一些世俗的事情是读圣的。

从希伯来语作为一种口语被弃之不用到获得新生,其间它虽然主要用作宗教仪式语言和文学语言,但有证据表明,它偶尔也被那些不懂得其他语言的犹太人用作“媒介语”,如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在集市贸易等极少数场合,常把希伯来语口语用作一种“媒介语”。另外,在说拉迪诺语(一种犹太西班牙语方言)和阿拉伯语的犹太人社团中,有不少人也逐渐改说希伯来语。据此,近一二十年来有些语言学家一再指出:“复活”一词实际上是一种“误称”,因为希伯来语口语从来就没有真正停止过使用,尽管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它仅在极有限的小范围里使用。

从 19 世纪后期开始,希伯来语变成了一种以书面语言为基础的口头语言,它现在还在不断变化,以满足现代社会对词语的巨大需求和新的知识领域的不断发展。

参考书目

K. Kazner,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Funk and Wagnalls, New York, 1975.

R. L. Cooper, *A Framework for the Description of Language Spread: the Case of Modern Hebrew*, in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Vol. 36, No. 1, 1984.

(黄长著)

Xilayu

希腊语 (Greek language) 印欧语系中一种独立的语言。主要分布于希腊,使用人口 700 多万,其次在塞浦路斯有 40 多万、意大利有 10 多万、土耳其近 10 万。

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巴尔干地区、非洲和美洲的部分地区都有数量不等的使用者。全世界现今使用人口总计 1 000 万左右。希腊语是印欧语系中最早有文字记录的语言之一,仅略晚于赫梯语。

古希腊语的最早文献见于克里特岛上克诺索斯王宫废墟里的泥板文书,这是公元前 15 世纪前期希腊阿卡亚族人征服克里特岛时的遗物,用“线形文字 B”(原为克里特岛本土民族的文字,后为希腊人采用)刻写,希腊本土的迈锡尼和庇洛斯特城也发现这种文字(图 1)。1952 年英国人 M. 文特里斯破译了这种文字。



图 1 古希腊语文字

公元前第 2 千纪末多里亚族入侵希腊,迈锡尼文化衰亡。伊奥尼亚的希腊人开始采用腓尼基字母,并把原来只有辅音符号的腓尼基字母改为兼有元音符号,从而创立了希腊字母体系。这一重要发明给古典时期希腊语和希腊文化的传布提供极为有利的条件。各地的希腊部族采用这种字母书写各自的方言。希腊字母传给罗马人,成为拉丁字母,中世纪时又传给斯拉夫人,成为基里尔字母。

希腊民族各部落在公元前 2000 年前后从巴尔干半岛北部来到希腊本土和爱琴海岛屿,后来建立起众多的城邦国家,于是形成了各部落自己的方言。这些方言在希腊语言史和文学史上有重要意义。主要有 4 种:①伊奥尼-阿提卡方言,②阿尔卡底-塞浦路斯方言,③爱奥利方言,④西希腊语-多里亚方言。阿提卡方言(即雅典人的语言)是伊奥尼方言的分支。各方言之间在语音方面的差异非常显著,例如其他方言的 ā,在伊奥尼、阿提卡方言中变为 ē,阿提卡方言的 tt 相当于其他方言的 ss,使用的字母也有所不同,如阿提卡方言本来没有表示长元音 ē 和 ō 的字母 Η 和 Ω,公元前 403 年才规定采用伊奥尼方言的这两个字母。

4 世纪时,由于雅典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卓越成就,阿提卡方言逐渐在伊奥尼城邦采用,形成了一种以阿提

卡方言为基础并带上浓厚的伊奥尼色彩的语言。这种语言后来成为希腊文化世界的交际语,称 *koine*, 即“共同语”, 并由此演变为近代和现代希腊语。古希腊诸方言早已逐渐消失。

从荷马史诗起一直到公元前 4 世纪散文时期的希腊文学、哲学和历史著作, 都用希腊方言写作。史诗的语言就是伊奥尼方言加上爱奥利方言。史诗作者, 无论是什么地区的人, 都用这种适合于长、短、短六音步史诗格律的文学语言。挽歌的形式来自史诗, 也用伊奥尼方言, 无论作者来自什么方言区。

早期古希腊语及古典阿提卡语保存了原始印欧语的元音系统, 乐调重音也没有改变, 但辅音变动较多, 例如: 印欧语的喉音 *h* 在“线形文字 B”中还存在, 后来完全消失, 又如, 印欧语的 *W* 音, 在许多方言中已经消失, 如 *ξ* (羊), 印欧语为 *owis*, 拉丁语为 *ouis*, 但有些方言还保存着这个音, 这个字母在碑文中写成 *F*, 称作 *digamma*。



图 2 希腊早期的碑文(公元前 6 世纪)

古希腊语的屈折变化比原始印欧语简单。原始印欧语有 8 个格, 希腊语只剩 5 个, 但还保存着双数, 动词的中动语态, 过去叙述时和愿望语气。句法有很大发展。通过连词、副词等的运用, 希腊语可以表达思想上细微的关系。

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埃及和西亚后, 希腊文化和语言传播到中近东各地, 希腊共同语从希腊本土传到东地中海、北非, 直至西地中海。这些地区又产生新的文化中心(例如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公元 1 世纪基督教兴起,《圣经》流传地中海沿岸各地, 希腊共同语成为《圣经》传布的主要媒介。《圣经·旧约》于公元前 3~前 2 世纪译成希腊共同语,《圣经·新约》在成书的时候即是用希腊共同语写的。这种书面共同语受当时口头共同语的影响。

从 5 世纪西罗马帝国覆亡后, 帝国的中心移到君士坦丁堡, 称拜占庭时期(5~15 世纪)。这时期的希腊语称中古希腊语, 是希腊共同语的继续, 也是近代希腊语的前驱。但在这个时期的官方语言还是模仿古典的阿提卡语。

近代希腊语一般认为从君士坦丁堡陷落时(1453)开始。希腊语使用的范围大为缩小, 只在希腊本土和爱琴海岛屿及在其他国家的希腊人移民区使用。近代希腊语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口语, 称“民间语”; 另一种是比较接近于古希腊语的书面语, 称“纯语”。后者定为官方语言, 在文件、标语、科学著作、新闻报道中使用, 在宗教仪式、

国会讲演、大学讲课中也作为口头语使用。在文学创作中一直存在着民间语与纯语之间的争论, 到 20 世纪初民间语才取得了优先地位。

在近代希腊语里, 古代的乐调重音变成送气重音, 元音的长短音区别已经消失, 词首元音吐气(*h*)或不吐气符号已失去作用, 都不吐气, 但仍保留这些符号。古代元音 *η, ι, υ, ε, ο* 在近代语中都变成 *i* 音, 但拼写形式不变。在语法方面, 近代希腊语已失去了双数、愿望语气和过去叙述时。民间口头语中名词变格形式已高度简化, 书面语中还保留着一些旧的变格形式和类别。口头语和书面语的动词形态形式也有差异。特别在词汇方面, 近代希腊语从邻近民族或统治民族那里接受了大量借词, 而书面语还保留着许多古希腊语词。例如“酒”: 书面语 *οἶνος*, 口头语 *κρασί*, “冷”、“热水”: 书面语 *ψυχρόν, θερμόν υδωρ*, 民间语 *κρύο, ζεστό νερό*。

几乎所有语言都有古代形式和现代形式, 希腊语也不例外。但是, 现代人对古希腊语感兴趣的不仅是在历史、语言学或文学方面, 而且还由于它代表一个历史时期里(2300 多年前)人类用来描写和分析世界的一种语言工具。古希腊哲学、科学、逻辑学、数学创造的大量词语仍沿用至今, 现代很多新学科也借用希腊词语并根据希腊语构词规则创造新词来表达新概念和新发明。

希腊语字母表

名称	符号		转写	古代发音 (推测) ⁽¹⁾	现代发音
	大写	小写			
Alpha	Α	α	a	a	a
Beta	Β	β	b	b	v
Gamma	Γ	γ	g	g	ɣ, j ⁽²⁾
Delta	Δ	δ	d	d	ð
Epsilon	Ε	ε	e	e	e
Zeta	Ζ	ζ	z	dz, zd	z
Eta	Η	η	ē	ε:	i
Theta	Θ	θ	th	th	θ
Iota	Ι	ι	i	i	i, j ⁽³⁾
Kappa	Κ	κ	k	k	k, kj
Lambda	Λ	λ	l	l	l, λ
Mu	Μ	μ	m	m	m, mj
Nu	Ν	ν	n	n	n, nj
Xi	Ξ	ξ	x	ks	ks
Omikron	Ο	ο	o	o	ɔ
Pi	Π	π	p	p	p
Rho	Ρ	ρ	r(h)	r	r
Sigma	Σ	σ s	s	s, z	s, z
Tau	Τ	τ	t	t	t, d
Ypsilon	Υ	υ	y	y	i
Phi	Φ	φ	ph	ph	f
Chi	Χ	χ	ch	kh, c	x, c
Psi	Ψ	ψ	ps	ps	ps
Omega	Ω	ω	ō	ɔ:	ɔ

注: (1) 公元前 5 世纪阿提卡的发音 (2) 在前元音前

(3) 在元音前

参考书目

- M. Ventris and J. Chadwick, *Documents in Mycenaean Gree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3.
O. Hoffmann, A. Debrunner und A. Scheier, *Geschichte der griechischen Sprache*, 1968.
E. Schwyzler, A. Debrunner, *Griechische Grammatik*, 1968.



第一部大型详解词典,自1929年起陆续出版,收录了标准文学及口语的新旧词汇、主要科学技术语、方言词汇、诗体词汇等,释义精确详尽。每条都注明词源,由梵语演变的印地语词则注明其演变过程,名词等还注明可与其搭配的动词。例句丰富,大多数注明作者。他的其他著作有《语言学》(1923),《印地语言与文学》(1930),《语言的奥秘》(第1卷,1935)等。印地语文学学会曾授予他以“文学大师”的称号。贝拿勒斯印度教大学曾授予他以文学博士学位。

(殷洪元)

Xiamen Yinxi

《厦门音系》(Phonetics and Phonology of the Amoy Dialect) 见汉语方言。

Xiandai Hanyu Cidian

《现代汉语词典》(The Dictionary of Modern Chinese) 一部以记录普通话语汇为主的中型词典。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197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词典中所收条目,包括字、词、词组、熟语、成语等,共约5.6万余条。本词典注重推广普通话和促进汉语规范化,所以在字形、词形、注音以及释义各方面都具有革新的精神。为适应广大读者的需要,除一般语汇外,也收了一些常见的方言词语和旧时使用的部分旧词语,以及现代书面上还常见的文言词语。另外,还收了某些习见的专门术语。这是现在通用最广的一部词典。

在这部词典以前,也曾经有过现代语词典问世,但是收词、释义都有不足之处。其中新词较少,释义也往往失于笼统,不够确切精当,而又缺少用例。这部词典就大不相同,其中有很多创新的地方。收词方面较广,选择较细。解释特别注意科学性、知识性和准确性,力求详明。必要时还注明是口语,还是书中用的文语,或是方言。一词多义的,尽量根据实际用例,区别其意义,有分析,有综合,并且兼顾到语法和词与词在搭配上出现的意义。这些都是优点,远非旧词典所可比拟。

这部词典在单字条目下统领多字条目。单字条目和多字条目都有字形相同而字音或字义不同的现象,书中都分别处理,各立条目。如“好”(hǎo)和“好”(hào)形同而音义不同;如“薄”(báo)和“薄”(bó)形义相同而音不相同,各有适用范围。如此之类都分立条目,不使相混。这种处理方法是创新的方法,使读者由此可以分别形音义三者之异同。体例精当,审辨明晰,是本书的特色。

(周祖谟)

Xiandai Hanyu Fangyan

《现代汉语方言》(Modern Chinese Dialects) 见汉语方言。

Xiandai Hanyu Xiucixue

《现代汉语修辞学》 汉语修辞学著作。张弓著。1963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张弓(1899~1983),汉语修辞学家,江苏灌云县人。1924年在武昌师范大学毕业后,曾任教于天津南开大学、北京中国大学、北京师范学院等校。1949年以后任天津师范学院、河北大学教授。1957年入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分院,专门从事现代汉语的研究,并集中精力研究修辞学。《现代汉语修辞学》分10章。第1~3章为总论,说明修辞学的内涵、任务。第4~8章讲述修辞方式,即通常所谓修辞格。分析具体例证时,常常谈到修辞手段利用语言因素的情况。第9章论现代汉语寻常词语的

张弓著《现代汉语修辞学》

艺术化。第10章谈修辞和语体的关系,同时谈到现代汉语语体的类型。这本书的特点是:①注重语言因素和修辞的关系;②提出寻常词语艺术化的课题;③探讨现代汉语语体的类型。

(张斌)

Xiandai Hanyu Yufa Jianghua

《现代汉语语法讲话》 原名《语法讲话》,汉语语法著作。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法小组编写,1952年7月~1953年11月,在《中国语文》杂志上连载。修订后由丁声树、吕叔湘、李荣、孙德宣、管燮初、傅婧、黄盛璋、陈治文8人署名,书名改为《现代汉语语法讲话》。196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内容共分20章。第1章引言,第2章词类,第3章句法结构,第4章句子的基本类型,第5章主语、宾语,第6章修饰语,第7章补语,第8章时间词、处所词、方位词,第9章几个特殊的动词——“有、是”等,第10章助动词,第11章次动词,第12章连动式、兼语式、连锁式,第13章复合成分、复合句,第14章代词,第15章数词、量词,第16章副词,第17章否定,第18章问句,第19章语气,第20章构词法。

这本书着重语言事实的分析,并不着重体系的安排和解说。它以描写为主,较深刻地反映了现代汉语的结构规律。

词的分类根据词的共同性质和共同用法。共同用法指词的组合能力,共同性质指有共同用法的一类词共同的意义。如“人、马、姐姐、萝卜”都是事物的名称,前头都可以加数量词,它们都是名词。这是运用了功能标准或结构标准,它的依据是分布理论。析句方法则采取了层次分析。

这本书吸取了结构主义的一些方法,又并非拘泥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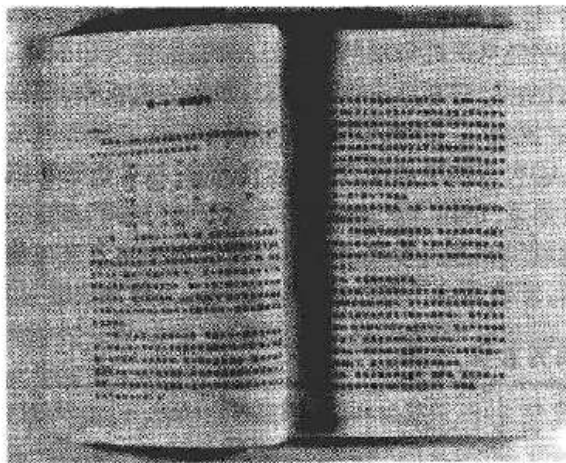
一种理论和方法。如析句只限于分析层次，并不作结构主义层次分析法中关于核心及其功能的分析，而是根据意义关系来区分 5 种句法结构：主谓、补充、动宾、偏正、并列。

这部著作的发表引起语法学界的广泛重视，也因此引起学术上的几次大讨论，如词类问题的讨论，析句方法的讨论。它在发展语法研究和改进语法分析方面，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林祥楣）

Xiandai Wuyu de Yanjiu

《现代吴语的研究》(Studies in the Modern Wu Dialects) 中国第一部应用现代语言学方法调查研究吴方言的著作。赵元任著。清华学校研究院丛书第 4 种，1928 年北京初版，1935 年再版，1956 年北京科学出版社重印发行。

全书共 6 章，分“吴音”和“吴语”两部分。前 4 章是“吴音”，讨论吴语各地声母、韵母和声调的音值和音类，列举各地的语音特点，总括吴语的共同特征，指出“吴语为江浙当中‘並定群’等母带音，或不带音而有带音气流的语言”。后 2 章是“吴语”，讨论词汇、语法问题，主要内容是 30 处 75 个词的词汇对照表和 22 处 56 种用法的语助词对照表。词汇对照表之后列举各地特别的词，如上海话“白相”(玩儿)、温州话“吃天光”(吃早饭)等。语助词对照表之后有成篇的记音材料。此外，本书还附有作者调查



《现代吴语的研究》第一章

时所用的各种表格。赵元任最先使用国际音标记录汉语方言，语音分析深入细致，并能联系古代音韵观察汉语的古今变化，使错综复杂的语言现象得到了科学合理的解释。各地声韵调和词语的异同都用表格的形式表示，便于对照，一目了然。本书调查点偏重江苏，浙江中部和南部的调查点较少，吴方言的复杂情况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反映。（参见彩图插页第 27 页）（顾逸明）

Xianggang Yueyu Yufa Yanjiu

《香港粤语语法研究》(Studies on Cantonese Grammar as Spoken in Hong Kong) 见汉语方言。

Xiangfangyan

湘方言 (Hsiang dialects) 又称湘语或湖南话，是汉语七大方言中通行地域较小的一种方言。湖南省有多种不同的方言，湘方言是其中最具有影响的一种。

通行地域 湘方言通行于湖南省的岳阳、南县、汨罗、湘阴、沅江、益阳、桃江、安化、宁乡、长沙、望城、株洲、湘潭、湘乡、双峰、涟源、娄底、新化、冷水江、叙浦、辰溪、邵阳、邵东、新邵、隆回、洞口、武冈、新宁、城步、东安、零陵、双牌、祁阳、祁东、衡阳、衡山等地，约占全省面积的一小半。此外，广西北部全州、灌阳、资源、兴安等 4 县也通行湘方言。使用人口估计在 2 500 万以上。

分区 由于社会、历史、地理以及政制变革等各方面的因素，古老湘语南、北、西三面长期以来处于官话方言包围之中，东部又受客、赣系方言的影响，以致语音系统不断产生变化，逐渐形成了新湘语和老湘语两种明显有别却又并存并用的特殊局面。从地理上看，新、老湘语的通行



湘方言分布示意图

地域恰好分布在北部和南部，因此，有人把它称为北片湘语和南片湘语，这就是湘语的两个方言片。新湘语和老湘语之间的差别主要表现在语音系统上。南片老湘语比较保守，古全浊声母字一般仍多念浊声母；北片新湘语受官话方言的影响而有逐渐靠拢官话的趋势，语音上突出的表现是由繁到简，古全浊声母字一般都念为清声母字了。北片新湘语主要通行于湘北、湘中一带，如长沙、株洲、益阳等；南片老湘语广泛通行于湖南中部、沅水东南、湘水以西和资水流域，如湘乡、双峰、邵阳、武冈等。

主要语言特征 语音方面 ① 声母：

a. 南片湘语比较完整地保留了古浊音系统。这些地方古全浊声母不论平声和仄声都念为不送气浊声母,如双峰话“大”念 da',“狂”念 gaŋ,湘乡话“排”念 ba、“道”念 dao'、“葵”念 gui、“在”念 dzai',冷水江(新化)话“皮”念 bi,“权”念 zyē。北片湘语古浊声母已清化,不论平声和仄声都念成不送气的清声母。如长沙话“爬”念 pa,“大”念 tai',“词”念 tɕi,“就”念 tɕiu',衡阳话“题”念 ti,“步”念 pu',“跪”念 kui'。

b. f-,x(u-)大都混读为 f-。例如长沙话“符”念 fu,“化”念 fa',“飞”念 fei,“灰”念 fei。

c. 古泥(娘)母字和来母字声母有混读现象,混读的情况是在洪音韵母前混,而在细音韵母前不混。如长沙话“奈”、“赖”都念 lai,“恼”、“老”都念 lau,“努”、“鲁”都念 lau,但“泥”念 ni、“梨”念 li、“纽”念 niəu、“柳”念 liəu,不混读。

d. 大部分地区(包括北片湘语和南片湘语)只有 t-,s 而没有 t',s'。古照系开口韵的字湘方言中大都念为 t-,ts-,s。但古照系合口韵的字却转为舌面声母 tɕ, tɕ', ɕ,这就形成“书”、“虚”不分,都念 ɕy。例如长沙话“朱”念 tɕy,“除”念 tɕy,“主”念 tɕy,“书”念 ɕy,“暑”念 ɕy。这些字全念舌面声母,韵母也相应转为 y。

e. 大都不分“尖”、“团”,如长沙“精”、“经”都念 tɕin,“细”、“戏”都念 tɕi。但也有部分地区如湘中的株洲、宁乡、衡山等地,湘西的叙浦等地,却有“尖”、“团”之分:“西”念 si 而不同于“希” tɕi,“齐”念 tɕi 而不同于“旗” tɕi,“酒”念 tɕiəu 而不同于“久” tɕiəu,“小”念 tɕiəu 而不同于“晓” tɕiəu。

② 韵母:

a. 鼻音韵尾一般 -n 多而 -ŋ 少。代表湘方言发展趋势的长沙话,鼻音尾韵已完全没有 -ŋ 韵而只有 8 个 -n 韵。古通摄舒声字长沙话念同古臻摄,如“东”念 tən,“工”念 kən,“红”念 xən,“宋”念 sən,“熊”念 cin,“勇”

念 in 等,形成长沙话中古深臻曾梗通五摄的字都混读为 ən, in 两个韵母的现象。

b. 元音鼻化的现象相当普遍。有的地方 -n, -ŋ 韵有向鼻化韵转化的趋势。如长沙话“搬”念 pō,与“班”不同音;“端”念 tō,与“担”不同音;“官”念 kō,与“关”不同音。湘方言中的鼻化韵多从 -n 韵变来,但部分 -ŋ 韵(古宕摄、江摄)也有向鼻化韵转化的趋势。例如长沙话“娘”念 niā,“将”念 tɕiā,“庄”念 tɕyā,“霜”念 ɕyā,“帮忙”念 pā, mā。

③ 声调:大部分有入声。声调数目一般是 5 个或 6 个。6 个声调是平、去分阴阳,上、入不分阴阳,如长沙话;5 调则平声分阴阳,上、去、入不分阴阳,如湘潭话。湘方言入声调的字都没有伴随塞声韵尾,即所谓“假入声”。例如长沙话的入声调值是 24,“一”字念 i',并没有塞声韵尾。

词汇语法方面 ① 湘方言的基本词汇和官话方言大同小异。南片湘语和北片湘语都存在为数不多的独特词语。下表以长沙、益阳、湘潭、双峰、辰溪、邵阳、新化、零陵、衡阳、岳阳十地为例来看几个常用的湘方言语词。② 有些常用语词,湘方言中词义的广狭和普通话不同。例如普通话“细”和“小”的含义有别,不能互换。而湘方言中“细”却兼有“小”的意思。如“小孩儿”双峰话叫“细人基”,“吃”、“喝”、“吸”等动词在普通话中各有用法,而湘方言中却一律用“吃”,如双峰话“吃饭”、“吃酒”、“吃烟”等,“伯伯”在普通话中专用于男性,而湘方言有的地方却有“男伯伯”(伯父)、“女伯伯”(伯母)的称呼。③ 湘方言中有一些常用词词形与普通话相同,而词义却截然不同。例如“白话”普通话中指语体文,而老湘语双峰、洞口等地却指“故事”;“谷”在普通话中指小米,在湘方言中却指稻谷。④ 有些常用词湘方言的词素部分与普通话不同。例如普通话“刮风”,长沙话、双峰话都叫“发风”,“打闪”长沙话叫“扯闪”。⑤ 动物性别的表示方法湘方言与普通话不同。普通话是在动物名称前加“公”、“母”或“雄”、“雌”,

长沙等地几个常用的方言词

地点	儿子	公牛	苍蝇	找	没有	肮脏	硬梆梆	什么	为什么
长沙	崽	牛公子	青头蚊、饭蚊子	寻	冒得	邋遢	梆硬的	么子	何解、为么子
益阳	崽	牯牛、牛牯子	绿头蚊、青头蚊、饭蚊子	寻	冒得	邋遢	梆硬的	么子,么	何解、为什么
湘潭	崽	雄牯子	青头蚊	寻	冒得	邋遢	梆硬的	什么	i' 的
双峰	崽	牛公子、黄牯、水牯	青头蚊、饭蚊子	寻	冒 ti	ma ⁴⁴ xufæ ³³ se	梆硬	么个	么咖(ka)
辰溪	儿、儿子	牛公、黄牯	屎蚊虫、饭蚊虫	lo ³³	没有、没得	pa ⁴⁴ la ⁴⁴	梆硬	吗 ka	为吗 kâ
邵阳	崽	牛公	青头蚊、饭蚊子	寻	冒得	ma ⁵⁵ u ³¹ 邋遢	梆硬的	么子	何咖、为么子
新化	崽	黄牯、水牯	铜蚊崽	寻	冒 ti ³³	p'æ ⁴⁵ læ ⁴⁵	梆硬	么 kə	为么 kə
零陵	崽、休崽	牯牛	饭蚊子	nian ³³	没得	邋遢	梆硬的	什么 tɕi	哪么
衡阳	崽	牛牯	min ⁵⁵ tɕiəu ⁵⁵	寻	冒得	邋遢	梆硬	吗 ko	吗里
岳阳	伢崽	牯牛	绿蚊子	寻	冒得	邋遢	硬梆梆	么里	为么里

湘方言却在动物名称后加“公”、“牯”和“婆”、“娘”等。例如长沙话“牛公子”、“牛婆子”，洞口话“狗牯”、“狗娘”。⑥在构词方面，湘方言有一些独特的词缀，用来表示一定的语法意义。例如益阳话的后缀 *ɬie*，用在各类实词后面，类似普通话的“儿”，含有主观上觉得小或少的意思，有时还包含一种喜爱或赞美的感情。如草 *ɬie*、花 *ɬie*（名词），一个 *ɬie*、一杯 *ɬie*（数量词），咯里 *ɬie*（代词），慢慢 *ɬie*、通红 *ɬie*、漂漂亮亮 *ɬie*（形容词）。⑦湘方言的“头”[*die*]、“子”[*ʂɿ*]相当于普通话的词尾“头”、“子”。但湘方言的“子”使用范围比普通话要大，许多在普通话中不加“子”的词在湘方言里也加上“子”，例如“老鼠子”、“星子”、“八哥子”、“蚂蚁子”等。⑧湘方言在语序上有一些特色，以长沙话为例：a. 宾语插入可能式结构内部：如放得鸡蛋稳（放得稳鸡蛋），扭螺丝不动（扭不动螺丝）；b. 宾语在结构助词“得”和补语之间：如睡得天亮都冒睡得被窝热（睡到天亮都没睡热被窝），炖好久还冒炖得咯几根骨头烂（炖了好久还没炖烂这几根骨头）；c. “很”和“净”常放在动词后面作状语：如休息夹[k'a]几天很的（很休息了几天），天天发净脾气（每天净发脾气）；d. 表时间、顺序的词“头”、“后”、“最后”等的位置：如你走头，我马上就来（你先走，我马上就来），他吃头，你吃后，我吃最后（他先吃，你后吃，我最后吃）；e. 间接宾语可以放在直接宾语前面。如送咯支钢笔你用（把这支钢笔送给你用）；f. 副词“再”的特殊位置：如再冒得便宜的哒（没有更便宜的了），再冒得大的哒（没有更大的了）；g. “一……也”“一……都”中“一”的语序挪后。如连不帮一点忙（一点忙都不帮），一天到晚冒得一点空（一天到晚一点空也没有）。⑨湘方言各地有不少用法特殊的虚词，例如长沙话的“起”*ɬi'*就有许多用法，常用的如：

表趋向：拿起来，借起走，送起来。

表动作正在进行：提起一篮子鸡蛋，穿起一套新衣裳，骑起一部单车。

表动作完成，并把结果固定下来：给他留起地址，用照相机照起你的丑样。

表示程度，充当形容词补语：咯一向的工作多得起堆。

又如辰溪话的语气助词“在”*tsai⁵³*颇具特色，用以表示动作正在进行或持续，相当于普通话的“着”。如：他们还企（站）哒那下在吗？（他们还在那里站着吗？），他唱哒歌在就措喊去了（他正唱着歌就被叫走了）。

新老湘语代表点的声韵调见附1、附2。

附1 新湘语代表点长沙话的声韵调

声母20个

p	帮爬	p'	抛配	m	谋满	f	夫花
t	对啼	t'	退太	l	南兰		
ɬ	自从	ɬ'	灿超	s	施所	z	日柔
ɰ	交朱	ɰ'	气出	ɲ	娘蚁	ʂ	向书
k	介狂	k'	苦课	ŋ	额按	x	悔汉
θ	以望						

韵母38个

〔开尾韵〕

ɿ	兹支	i	挤希	u	补姑	y	虚朱
a	岔纱	ia	家亚	ua	瓜瓦	ya	抓耍
o	梭合	io	脚学				
e	奢车	ie	些借	ue	国	ye	掘说
ai	派台			uai	乘外	yai	衰揣
ei	灰堆			uei	贵威	yei	谁
au	炮曹	iau	标消				
əu	够收	iəu	丢休				

〔鼻化韵〕

õ	酸半	ã	展陕	iẽ	片田	yẽ	捐宣
---	----	---	----	----	----	----	----

〔鼻尾韵〕

an	旁张	ian	粮江	uan	弯光	yan	装爽
ən	奔生耕	in	冰新穷	uən	棍文	yn	君永

〔声化韵〕

ɱ	姆	ɳ	嗯
---	---	---	---

声调6个

阴平	33	诗梯分
阳平	13	题时坟
上声	42	体使粉
阴去	55	帝试愤
阳去	21	递事份
入声	24	笛后弗

附2 老湘语代表点双峰话的声韵调

声母29个

p	巴摆	p'	普怕	b	排罢	m	妈梦
t	低都	t'	听托	d	大图	n	南兰
ɬ	兹炸	ɬ'	此擦	ɖ	时柴	l	梨拉
ɰ	鸡精	ɰ'	欺清	ɖ	其桥	s	思俗
ɰ	之止	ɰ'	痴耻	ɖ	池治	ɲ	你扭
k	哥公	k'	科孔	g	共狂	ʂ	西笑
ɣ	豪红					ʂ	诗失
θ	衣汪					x	好灰

韵母35个

〔开尾韵〕

ɿ	资	ɿ知	i	衣李	u	补普	y	鱼书
a	摆塔				ua	挖乏		
			ie	热白	ue	国合	ye	雪说
			ie	贝偷	ue	回灰		

ə	包刀	iə	标巧				
o	巴遮	io	野蛇				
u	波多	iu	溜秋	ui	为飞		
əu	都古						

〔鼻化韵〕

ã	班斩	ĩ	烟仙	uã	翻弯
(ẽ)		iẽ	般生	uẽ	管碗
õ	梗创	iõ	饼钉	uĩ	冤全

〔鼻尾韵〕

(an)

in 因晴

uən 温粉

aŋ 帮公

iaŋ 良央

yn 兄勋

〔声化韵〕

m 姆

n 你

声调 5 个

阴平 55 跛机

阳平 23 排给

上声 21 摆挤

阴去 35 拜祭

阳去 33 败忌

参考书目

杨时逢:《湖南方言调查报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北,1974。

鲍厚星、李永明等:《湖南省汉语方言地图三幅》,载《方言》,1985,第4期。

周振鹤、游汝杰:《湖南省方言区划及其历史背景》,载《方言》,1985,第4期,北京。

(唐伯慧)

xiangxing

象形 见六书。

Xiao'erya

《小尔雅》 汉代训诂书。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一篇,无撰人名氏。《艺文志》本于刘歆《七略》,西汉时当已有此书。不过,现存的《小尔雅》是从《孔丛子》第十一篇抄出别行,已经与《艺文志》不同。《隋书·经籍志》有李轨《小尔雅解》一卷,日本藤原佐世《日本见在书目》题李轨略撰。今已亡佚无存。今本《孔丛子》有宋仁宗嘉祐中宋咸注,题孔鲋撰。孔鲋为秦末陈涉博士,清人已定为伪书,可能出自汉末。《小尔雅》既见于《孔丛子》中,时代也不会很早。全书分为《广诂》、《广言》、《广训》、《广义》、《广名》、《广服》、《广器》、《广物》、《广鸟》、《广兽》、《广度》、《广量》、《广衡》共13章。前10章大体补《尔雅》所不备,对名物增益稍多。后3章释度、量、衡,为《尔雅》所无。乾嘉时代,《小尔雅》不大为人所重视。道光以后作注的有数家。如宋翔凤有《小尔雅训纂》6卷,胡承珙有《小尔雅义证》13卷。大抵汲取经传训解,以相参证,为世所重。其他如朱骏声有《小尔雅约注》1卷,葛其仁有《小尔雅疏证》5卷,任兆麟有《小尔雅注》8卷,皆有为而作,可资参考。

(徐 复)

Xiaoshuo Ciyu Huishi

《小说词语汇释》 解释中国古代小说词语的书。陆澹安编著,1964年中华书局出版。本书选择清代以上通俗小说64种,搜集其中不易索解的词语加以简单解释,并列举两三条出处。在解释中也常常举元曲中所见者为例,有举一反三的便利。所出条目有8000多条,其中有些是方言和行话,收集面也比较宽,对阅读古代话本小说颇为有用。但有些词语难字未附加注音。本书在词语汇

释之后又附《小说成语汇纂》2000多条,大都是古今相传的人民口头语,对研究语言的历史,考察人民的风习、思想和道德文化方面也有参考的价值。(周祖谟)

Xiaoxue Gouchen

《小学钩沉》 辑录古代训诂资料的书。清代任大椿编辑,共19卷。任大椿(1738~1789)字幼植,一字子田,江苏兴化县人,乾隆三十四年(1769)进士,由礼部职转为四库书馆纂修,官至陕西道监察御史。此书从前代古书中钩稽已亡佚的字书、韵书和训诂书,以其逸文按书分别编录,所以名为《小学钩沉》。其中包括仓颉篇(附仓颉训诂、仓颉解诂)、三仓(附三仓训诂、三仓解诂)、凡将篇、古文官书(附古文奇字、郭训古文奇字)、劝学篇、圣皇篇、通俗文、埤仓、古今字诂、杂字、声类、辨释名、韵集、杂字解诂、周成难字、小学篇、字苑、字林、音谱(李概)、纂文(何承天)、纂要、文字集略、广苍、字统(杨承庆)、韵略(阳休之)、证俗音、文字指归、切韵、字书、字体、异字苑、字类、字谥、古今字音、声谱、证俗文、异字音等。各书大体按照年代早晚排列。任大椿还著有《字林考逸》、《深衣释例》、《弁服释例》、《释缙》等书。此书前12卷经王念孙校订,后7卷由王引之刊正。书前原有仪征施朝幹所撰墓志,嘉庆二十二年(1817)汪廷珍序言,今并失去。现在通行的是光绪年间刻本。

(周祖谟)

Xiaoxue Souyi

《小学蒐佚》 辑录已经亡佚的文字音韵训诂之类的书76种,清末龙璋(1854~1918)编纂。清代学者辑录小学佚书始自任大椿(1738~1789)、孙星衍(1753~1818)。任大椿有《字林考逸》、《小学钩沉》,孙星衍有《仓颉篇》,主要辑自唐代玄应的《一切经音义》所引各种字书。清光绪七年(1881)黎庶昌(1837~1897)出使日本,得见许多古佚书,如顾野王原本《玉篇》、杜台卿《玉烛宝典》都是中国久已失传的书。后来唐释慧琳的《一切经音义》100卷、辽僧希麟《续一切经音义》10卷,又都由日本相继传入国内,由是补辑小学书的人渐多。如顾震福的《小学钩沉续编》,陈其荣辑《小学三种》。但引书卷次,标列不详,而且所辑佚书尚不足50种,所以龙璋又进行辑录。自《仓颉》以下,共计76种。其中分上下两编,上编属于字书和训诂书,有54种,下编属于音韵,有22种,可以说是集古代小学书之大观。此书主要利用慧琳《一切经音义》,引书都注明卷数。字书之部,每种都依据《说文解字》、《玉篇》分部编次集录;音韵之部每种都依据《广韵》四声分韵编录,颇便于检阅,远胜前人所辑的小学书。惟因排印于湖南,印本不多,流传不广。

(周士琦)

xilexingzi

楔形字 (cuneiform) 5500年前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人所创造的文字。这种文字有别致的书写方法:用硬笔在软泥板上压刻,形成一头粗、一头细的笔划,好

象是楔子或钉子,所以称为楔形字或钉头字。

楔形字在不同时代书写不同的语言。最早书写苏美尔语言。苏美尔人在公元前第4千纪来到美索不达米亚(今伊拉克)的南部,主宰这个地区1000多年。苏美尔语的系属不明。

下一个时期,也长达1000来年,楔形字书写阿卡德语言。阿卡德语言是一种古代的闪米特语。大体说来,前半期是巴比伦时期,以中部美索不达米亚为根据地;后半期是亚述时期,以北部美索不达米亚为根据地。巴比伦语和亚述语是两种不同的阿卡德语方言。在亚述帝国兴盛时期,阿卡德楔形字成为亚洲西部的国际通用文字。

楔形字又传播到四周的民族,他们是:阿拉米人,加西人,赫梯人,米当人和呼尔人,乌拉土人,最后还有波斯人。他们的语言彼此不同,可是同样采用楔形字。为了适合他们的语言特点和实用需要,他们对楔形字各自作了修改。

苏美尔楔形字遗留下来的泥板和铭文非常丰富。已经发现近3000片公元前2000年时候的文学作品泥板,和数以万计的法规、讼案、遗嘱、帐目、契约、收据、书信等的泥板。苏美尔楔形字中间有意符和音符。为了分辨同字异音和同音异字,有一些不表读音的楔形符号,加在本字的前后,表示意义类别,类似部首。例如“神”、“国家”、“山”、“鸟”、“鱼”、“数目”、“多数”、“阳性专名”等。苏美尔楔形字是一种语词-音节文字。

楔形字原来从上而下直行书写,后来改为从左而右横行书写,于是,全部楔形符号转了90度,从直立变成横卧。由于右手执笔,从左而右横写,楔形笔划的粗的一头(钉脑)在左,细的一头(钉尾)在右。

公元前18世纪的巴比伦楔形字,留下了使后世惊奇的汉穆拉比法典,这比远在其后的摩西法典完备得多。在巴比伦楔形字中间,许多表示实物或概念的“意符”,变成脱离原有意义而只表一定语音的“音符”。巴比伦人简化了苏美尔楔形字,只用640个基本字,由此组成全部语词。

公元前9~前7世纪的亚述楔形字,扩大了词汇,减少了字数。只用570个基本字,其中300个是常用的。晚期又向音节文字发展。亚述楔形字的图书馆藏有数以万计的泥板图书。内容有教义、神话、魔术、科学、数学、巫医、天文、法律、历史等门类。还有不少凿刻在多角形石柱上的记载。

阿拉米人在公元前5世纪前后应用的新阿拉米文,更加简单,只用113个楔形字,其中80个是音节符号,成为半音节文字。

最后,波斯人采用楔形符号作为字母,同时也用阿拉米字母。他们只用41个楔形符号,除4个表意符号(“王”、“州”、“国”和“神”)和一个分词符号以外,其余36个是标音字母。亚历山大灭亡波斯(公元前331)以后,楔形字和泥板压写方法不再有人应用了。

此外,在地中海东岸的乌加里特地方发现一块楔形

字母泥板。这是在古代北方闪米特字母的影响下,用32个楔形符号组成的。它比波斯的楔形字母早1000年。

楔形字泥板图书默然埋藏地下1500年。阿拉伯人在石柱上看到它并且知道它是古文字,但是并不认识它。直到19世纪才解读出来。解读工作从近而远,逐步前进。最早解读的是波斯楔形字,其次是新阿拉米楔形字,然后是巴比伦和亚述楔形字,最后,最繁难的苏美尔楔形字也基本上解读出来了。人类历史于是补写了辉煌的美索不达米亚古代文化的一章。(参见彩图插页第41、42页)

(周有光)

xiehouyu

歇后语 指说话时候把一段常用词语故意少说一个字或半句而构成的带有幽默性的话。通用的有两种。①原始意义的歇后语,指把一句成语的末一个字省去不说,也叫“缩脚语”。如《金瓶梅》里来旺儿媳妇说“你家第五的‘秋胡戏’”,就用来影射“妻”,因为“秋胡戏妻”是有名的故事,剧目。也有利用同音字的。如称“岳父”为“龙头拐”,影射“杖”字,这里代替“丈”。这证明在这个方言里,丈杖同音。②扩大意义的歇后语,在北京叫“俏皮话儿”,是指可以把一句话的后一半省去不说。如“马尾拴豆腐”,省去的是“提不起了”。有时候也利用同音字。如“外甥打灯笼”——“照舅(旧)”。

利用歇后语可以考出作者方音某些特点。如《金瓶梅》里有“開箱子打嚏噴,琐碎一大堆”,利用“啐”、“碎”同音。“啐”北京音念 cuì, 山海关音念 chui, 都不念《广韵》的“先对切”,这说明,在“啐”字的读音上,《金瓶梅》所用的方言与《广韵》音一致。

(俞敏)

xieyin

叶音 也称叶韵,叶句。“叶”也作“协”。南北朝以后的人读周秦两汉韵文感到不押韵,就临时改变其中一个或几个押韵字的读音,使韵脚和谐。这是由于不懂古今语音不同所致。例如,《诗·关雎》末章:“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清代阮元刻《十三经注疏》附《释文》说:“乐之,音洛,又音岳。或云协韵宜五教反。”这是因为诗里“乐”与“芼”(mao)押韵,“乐”念 yao(即五教反)最和谐。遇到两可的地方,很难处理。《诗经》里的《鄘风·柏舟》、《黍离》、《十月之交》都用“天”、“人”两个字押韵。据元代熊朋来《经说》说,宋代吴棫改“天”字读音为 tīn, 郑庠改“人”字读音为 rán。《诗·驺虞》每章最后都有一句可以不押韵的副歌“吁嗟乎驺虞”,朱熹让第1章副歌的“虞”随上文读 yá(朱注:叶音牙),让第2章副歌的“虞”随上文读 wéng(朱注:叶五红反),根本没有确定的标准。因此自从明代陈第提出所谓叶音恰好是古本音的说法以来,清代学者也极力反对叶音说。

(俞敏)

Xie'erba

谢尔巴, Л. В. (Лев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Щерба 1880~1944) 苏联语言学家。1880年3月3日生

于彼得堡,1944年12月26日卒于莫斯科。1903年毕业于彼得堡大学。在那里,他受过J.N.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的指导。1916~1941年任彼得格勒大学(今列宁格勒大学)教授。1943年起任苏联科学院院士,在科学院工作。



谢尔巴对语言的一般理论、普通语音学、实验语音学、语法学、词汇学、词典学以及外语教学法等均有研究。他认为语言现象有三重性,应分为言语活动(说话和理解的过程)、语言材料(说出的和理解的全部材料)和语言系统,而语言学的任务是再现语言系统。他把语法学分为消极的和积极的,

认为前者从形式出发研究语言结构要素的功能和意义,后者则应该教会人们用这些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在词法学方面,1928年他第一个提出,俄语中除传统的10个词类外,还有一类“状态词”,它在句中(主要是无人称句)同系词连用,表示某种状态,如можно(可以)、нельзя(不能)、надо(要)、светло(明亮)、холодно(冷)等。

作为列宁格勒音位学派的创始人,谢尔巴是音系学的奠基人之一。他早期的观点见于《俄语元音的音质与音长》(1912),后期观点反映在《法语语音学》(1937)和苏联科学院《俄语语法》第一卷(1952)中。他认为音位是语言中能够区别词与词形的音型。他把同一音位的各个实体(实际发出的音)称为“音品”(相当于“音位变体”)。他强调,不同的音有可能归并为一个音位,但相同的音不能分属于不同的音位。例如俄语 прут(细树枝)和 пруд(池塘)中的词尾辅音虽然写法不同,但发音一样,都属于音位/t/,同样,валы(巨浪,复数)和 волы(犍牛,复数)中的非重读元音虽然写法不同,但发音都是[а],即属于音位/a/的音品。

在外语教学方面,谢尔巴反对单纯摹仿,主张在外语学习的初级阶段要通过母语与外语的对比来排除本族语的干扰。

谢尔巴的主要著作有《论俄语中的词类》(1928)、《词典学原理初探》(1940)和《论语言现象的三重性与语言学中的实验》(1931)等。

(信德麟)

xinli yuyanxue

心理语言学 (psycholinguistics) 20世纪50年代新兴的学科。它研究人们学习语言和使用语言的心理过程,用实验方法来探讨语言行为的规律。

历史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对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表示过不同的看法,近代现代欧洲学者英国的F.培根(1561~1626),法国的R.笛卡尔(1596~1650),英国的J.洛克(1632~1704),德国的W. F. von 洪堡特、L. 维特根斯坦(1889~1951)也探讨过语言与行为及心理的关系。英国生物学家C. 达尔文(1809~

1882)从物种原始观察语言的进化和儿童的语言发展;德国心理学家W. T. 普雷耶(1841~1897)和W. 斯特恩(1871~1938)研究儿童如何学话;法国病理学家P.布罗卡(1824~1880)和德国的C. 维尔尼克(1848~1905)初步测定大脑左半球主管语言的部位。这些人为心理语言学做了准备工作。

美国的学者们在1952年成立了语言学与心理学委员会,1954年又出版了《心理语言学:理论和研究问题概述》。这标志着心理语言学的正式诞生。

美国第一代的心理语言学家是在行为主义心理学、结构主义语言学和信息论的影响下进行研究的。C. E. 奥斯古德(1916~)指出,语言在刺激和反应之间能起传递作用,例如一说“狼来了”,大家就警觉起来。但是狼真的来了人们才怕,如果虚报过几次,即使再说“狼来了”,人们也不怕了,可见词语和事实的作用并不完全相同。G. 米勒(1920~)把信息论运用于语言研究,发现词在话语中出现有一定的频率,可用概率来表示。但是人们如何使用语言,单靠信息论还是说明不了。

50年代中期,随着N. 乔姆斯基的转换语法的兴起,产生了第二代心理语言学家。这些学者观察过在实验环境下成长的一些聋哑幼儿,认为他们不经过母亲教导,也能用手势组成名词性词组和动词性词组,并把这两种词组组成一个系列,这可能是由于有天赋的语言能力。但是后来人们认为,心理学模式与语言学模式并不是互相对应的。

现在学者们认识到,心理语言学研究不能局限于验证某一语法模式是否正确,而应建立自己的独立体系,于是出现了第三代心理语言学家。他们不赞成对言语过程作抽象的分析,而强调在语言环境中进行实验,借以探测思维和交际的过程。

心理语言学家经常讨论的问题 语言习得 心理语言学家现在常用“语言习得”来代替过去的“语言学习”。他们认为,儿童为什么能在几年内学会母语,只是根据行为主义的“学习理论”的说法,说那是单纯的事仿,是讲不通的。美国学者乔姆斯基和D. 麦克尼尔(1933~)认为,只有假定儿童有与生俱来的语言习得机制,才能说明这一复杂现象。有许多基本语法概念,如句子的主语和谓语,名词性短语中的名词和修饰语,动词性短语中的谓语动词和宾语等等,都是通过这个机制得来,而不是摹仿学习得来的。

但是天生论者虽有所见,却忽略了客观环境对语言习得的作用。瑞士心理学家J. 皮亚杰(1896~1980)毕生研究儿童智力的发展,1975年他以80高龄来到巴黎与乔姆斯基展开辩论。他认为与生俱来的并不是语言能力,而是更广泛的认知能力。认知能力使儿童从客观世界得到各种概念,再把这些概念组成若干系列,这便是语言能力。他断言,语言能力是逐渐养成的,不是生来就有的。

早期的语言习得研究者着重儿童语言在结构上如何逐步发展,如幼儿最初用一个词就相当于一句话(“妈妈”

能表示“我要妈妈抱”，“我要吃奶”，或“妈妈你看”，后来用两个词作为一个句子（“要糖”，“要抱”，“要小狗”，都可省略主语“我”），最后才掌握成人通用的语法。但是近来受认知心理学和功能语法学的影响，研究的重点又转移到意义和功能如何习得，成人与儿童在语言交际上有什么特点，儿童学话用什么手段，语言发展和认知能力发展如何互相影响，说不同语言的儿童在学话过程中有什么共同规律等等问题，于是范围更扩大了。

言语的辨知和言语的发生 在使用语言时，人们要听懂对方的话，这是言语的辨知；自己又要能说出话来，这是言语的发生。

从心理学看来，话语内容的基本单位是命题。要听懂对方的话，就要知道它的命题，要弄清其中有多少个成分，各成分又以哪里为界线。从1965年起，美国学者M. 加雷特等人常常使用“卡塔研究法”，即故意在一句话不应该停顿的地方插入“卡塔”声（下文用星号表示），看听者有何反应。例如在两个结构不同但后半部词语相同的句子各插入“卡塔”声：

① As a result of their invention's influence the* company was given an award. （由于他们的发明，公司获得了奖赏。）

② The chairman whose methods still influence the* company was given an award. （那个想出办法帮助公司的董事长获得了奖赏。）在放录音时，两个句子的“卡塔”声都插在the与company之间。可是听者的辨知结果很叫人诧异，因为他们认为，卡塔声在第1句里发生在influence与the之间，在第2句里则发生在company与was之间。由此可知，在听话时，人们是把句子分成若干表示命题的短语或子句来理解的，并不受插入的噪音的影响。不过人们靠什么来建立命题，学者们却有不同看法。有人以为主要靠句法知识，有人以为语义起决定作用。其实两者都是不可缺少的。

关于言语如何发生这个问题，争论很多。人脑如何产生意念？如何把意念变为词语？又如何把词语通过发音器官说出来？这是个复杂的心理生理过程，对它难以进行直接观察。常用的办法是就一些不完整的资料，如成年人言语的失误（口吃，说错话），幼儿学话的语法特点，失语症病人的残缺混乱的言词等等来进行研究。一般认为，言语的发生，在意念形成之后有编制程序和执行程序两方面，但是，不是此先彼后，而是一边编订程序，一边就执行程序。不过详情如何，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

语言和思维 美国B. L. 沃尔夫认为，语言是“思想的塑造者”，它决定人们的思维，甚至决定人们对世界的看法。苏联Л. С. 维戈茨基（1896~1934）和瑞士皮亚杰则认为思维先于语言，儿童认知能力的发展对言语的发展有制约作用，例如要先有“所有”这个观念，才能学会语言中的“所有格”（如英语的mine, yours）。近来的实验表明，人们的感知能力（区别数量、形状、颜色）、认知结构（认识同一性、对立性、时空关系、因果关系）、社会范畴

（如亲属类别）对语言都有制约作用。1969年美国学者B. 伯林和P. 凯伊对20种语言进行过调查，发现各种语言中表示颜色的词虽有多有少，但是基本颜色词限于11种（黑、白、红、黄、绿、蓝、褐、紫、粉红、橙、灰），而且如果一种语言只有两个颜色词，那必然是“黑”（或“暗”）和“白”（或“亮”），如果只有三个，那必然是“黑、白、红”。美国E. 罗希的实验又证明，这些词表示的是色谱上最突出的颜色。他教新几内亚丹尼族人学本族语言所无的颜色词，发现他们学基本颜色词学得最快，可见人的感觉系统对语言学习是有制约作用的。此外苏联A. P. 卢利亚（1902~1977）和A. H. 列昂捷夫（1903~1979）二人还主张，意识活动虽然离不开语言，但是产生意识的根源是人和客观世界的相互作用，而不是语言。

语言的生理基础 语言是否因人类的生理基础特殊而为人类所特有？有些生物学家训练黑猩猩学人类的手势语或符号语言，曾获得某些进展，但不能证明这些动物在运用语言方面与人类有同样的认知功能。

美国E. 伦纳伯格和加拿大W. 彭菲尔德等人的研究表明，人的大脑和人类所使用的语言是经过亿万年进化的结果。大多数人大脑左半球管语言，右半球主要管语言以外的信息，和语言的理解只略有关系。在左半球中，又是前部与句法关系密切，后部则与语义关系较深。一般人靠右半球管音乐信息，音乐家却是用左半球的。美国T. 贝弗等人认为，左半球可能不是专管语言的，而只是有逻辑能力和系统处理信息的能力，所以他们主张人脑不一定有专管语言的机制。这个问题仍在讨论中，一门新学科（神经语言学）已经兴起了。

心理语言学的应用和贡献 心理语言学已经应用于通讯技术（研究信息的传递、感知和理解）、医学（研究失语症和神经官能症的原因和疗法）和人工智能研究（探讨如何模拟人脑的语言功能）。但是它的最重要的用途还是在教学方面（包括幼儿教育、外语教学、聋哑人语言教学等等），其目的是按不同的具体情况，摸索出一套有效的教学理论和方法来。

现代语言学一方面注意语言能力的形成（因此有生成语法学），一方面注意在特定条件下研究语言（因此有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兼有这两个特点，近年来它研究儿童认知能力的发展，青少年时期语言、逻辑、数学各种能力的相互关系，说话能力和阅读能力的特点和彼此的关系等等，都有了许多进步。

现代语言学流派有的讲理论而忽视验证，有的搞调查而无严密的理论。心理语言学有假设又有验证，因此引人注目。但是，在实验室考察具有高度智能的生物，还是难以达到预定的各种目标。不过，在语言学这个广大领域中，心理语言学已是较具有自然科学特征的学科了。

参考书目

- 桂诗春：《心理语言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
D. I. Slobin, *Psycholinguistics*, 2nd Edition, Glenview, Illinois, 1979.

H. H. Clark and E. V. Clark, *Psychology and Language*, New York, 1977.

A. Paivo and I. Begg, *Psychology of Language*, New Jersey, 1981.

D. Aaronson and R. Rieber (eds), *Psycholinguistic Research*, New Jersey, 1979.

A. Leontiev, *Psychology and the Language Learning Process*, London, 1981.

(桂诗春)

XInfangyan

《新方言》(New Dialect) 近代汇集汉语方言词语, 探求它们的本字和语源的著作。章炳麟撰。收入《章氏丛书》(1919, 浙江图书馆校刊)第4种。《新方言》收录方言词语800余条, 全书共分11卷: 释词、释言、释亲属、释形体、释官、释器、释天、释地、释植物、释动物、音表。前10卷收录方言词语, 基本上按词义分卷, 最后一卷音表, 包括古音韵母23部表和古音声母21组表。《新方言》吸取传统训诂学的研究成果, 根据文献资料 and 实际语言相结合的原则, 上稽《尔雅》、《方言》、《说文解字》等书, 运用声韵演变的规律, 以“对转”、“旁转”等理论来考查字音的发展, 以期达到“以古语证今语, 以今语通古语”的目的。经过作者的整理、考释, 古籍中的一部分难字由于跟现代的活方言互相印证, 变得较易理解。章氏弟子黄侃评论说:“已陈之语, 绝而复苏, 难谕之词, 视而可识。”这正恰如其份地指明了《新方言》的精萃所在。但现代的方言词语未必都能一一从古籍中找到依据, 也难以做到每一个方言词语都有“本字”可寻。章氏在《新方言》中强调“今之殊言, 不违姬汉”, 这是不切合语言发展的客观实际的。《新方言》卷末附岭外三州语60余条, 记录惠州、嘉应州、潮州的客话, 也用《方言》、《说文解字》、《尔雅》等书引证考释。

(叶祥苓)

Xinhua Zidian

《新华字典》 第一本按汉语拼音音序排列的小型字典。1953年新华辞书社编, 主编者为语言文字学家魏建功(1901~1980)。1953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印行第一版, 按注音字母顺序排列; 以后续有修订, 改用汉语拼音字母顺序, 转由商务印书馆重排出版。

这本字典颇具创新精神, 主要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 全书按音序排列, 另附《部首检字表》。书中采用的部首与一般字典基本相同, 但略有改动, 共有189部。如旧日字典的肉部、艸部、高部、鼓部、齐部、龟部等都并省, 而有些旧日字典根据《说文解字》篆书的写法不分的, 这本字典里都按楷书的写法分为两部, 如“刀”与“刂”, “火”与“灠”, “心”与“忄”, “水”与“氵”, 便于查检。这种办法在中国字典中是前所未有的。

② 所收单字有8500个左右, 在单字训解之下连带加出的复音词和词组有3200多个。复音词和词组都加有标志, 这样就兼有简单词典之用。

③ 在释义中分别标出引申义、比喻义和转义, 使读者能进一步理解多义词不同语义转变之间的关系, 对研究词义的发展颇为有用。这是编者用心之所在, 也是其他字典所不曾有的。

④ 这本字典第一版有不少名物的插图, 使读者更容易理解所解释的内容(后来重排删去)。

(周士琦)

Xinyi Huayanjing Yinyi

《新译华严经音义》 解释《华严经》中文字音义的书, 一般略称《华严经音义》。唐代释慧苑作。此书见于智昇《开元释教录》, 《新唐书·艺文志》未著录。《开元释教录》说:“慧苑, 京兆人, 华严藏法师上首门人。勤学无惰, 内外兼通, 华严一宗, 尤所精达。以新译之经未有音义, 披读之者取决无从; 遂博览字书, 撰成二卷, 俾读之者不远求师, 而决于字义也。”这里所说的“新译”是指唐武后证圣年间实义难陀所译, 凡80卷, 与东晋义熙末佛陀跋陀罗所译60卷不同。华严藏名法藏, 字贤首, 康居人, 唐玄宗先天元年(712)卒。慧苑生于盛唐, 所引古书的注解和古字书颇多。可供学者辑佚采录, 以为研究古代训诂者参考。

此书有2卷本和4卷本。原书依《释教录》当是2卷, 宋藏、明南藏为2卷, 明北藏才各分为两卷, 成为4卷本。旧有清代藏经堂删节本, 又有《守山阁丛书本》和《粤雅堂丛书本》。书名都题为《大方广佛华严经音义》。

(周祖谟)

xinyufa xuepai

新语法学派 (Neogrammarians) 语言学的一个学派。德语原文是 Junggrammatiker。19世纪70年代德国莱比锡大学 K. 布魯格曼、H. 奥斯特霍夫、B. 德尔布吕克(1842~1922)、A. 莱斯金、H. 保罗等人建立。因为他们对梵语与古希腊语的关系提出了新见解, 老一辈语言学家如 G. 库尔蒂乌斯等深为不满, 称他们为“青年语法学派”, 含有揶揄之意。但是他们欣然接受了这个名称, 后来人们也就沿用下来。在语言学界, 现在一般叫做“新语法学派”。

新语法学派的材料和思想, 导源于19世纪前期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家 J. 格林和中期的 A. 施莱歇尔等人。这个学派指出, 梵语有些词形比古希腊语距离原始印欧语原状更远, 原始印欧语词根并不都是单音节的等等。新语法学派强调两点: 一是语音演变规律无例外, 二是语音变化中的类推作用。

远在1822年, 格林就提出了语音演变规律, 人们也曾看到有些例外情况, 1875年 K. A. 维尔纳提出了补充说明。新语法学派因此觉得, 历史音变已得到了充分解释。1878年, 布魯格曼和奥斯特霍夫在一篇文章中宣称, 语音变化按规律进行, 没有例外, 跟自然科学一样, 有其严格的规律。他们说, 人类语言变化的因素不外乎心理、生理两种, 可是语音变化是缓慢的, 不自觉的, 所以“语音定律的活动完全是盲目的, 依照自然的盲目需要而

进行。”他们没有注意到，语言演变是社会历史现象。语言不是脱离说话人而存在的实体，语音演变要受社会和历史两方面的制约。语言并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有预见性，不能预言有什么音变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发生。

在类推作用中，新语法学派看到了语音演变的心理因素。类推作用是以某些词或形式为标准，改变另一些词或形式来与之看齐。如果这样，就会产生不遵循语音演变规律的现象。例如拉丁语变为古法语，按规律 a 音应有两种新发展：非重音的 a 保留原状，如“爱”的不定式由拉丁语 amare 变为古法语 amer，但是在 m 或 n 之前的重音 a 都变成 ai，如拉丁语“我爱”amo 变成古法语 aim，拉丁语“你爱”amas 变成古法语 aimes，拉丁语“他爱”amat 变成古法语 aime(t)。这样，在拉丁语中，同是一个“爱”的词根，在古法语就有 am-和 aim-两种不同的形式。后来法语以 aim-为标准进行类推，结果变成现代法语的 aimer、aime、aimes 和 aime、am-这个词根形式就消失了。这样讲类推作用，能说明许多音变现象，但是语音演变是复杂的，有的音变并非由于类推，而由于其他原因，例如避免产生同音词，避免与忌讳名称发音相似，或者对词源有所误解等等。只讲类推作用，仍然不能把一切例外都讲清楚。

新语法学派在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影响很大。除德国人外，其他国家的语言学家，如丹麦的 V. L. P. 汤姆逊和维尔纳、俄国的 Ф. Ф. 福尔图纳托夫等都自称属于这一派。新语法学派提倡研究活的方言，但受到方言地理学家 H. 舒哈特和 J. 吉耶龙 (1854~1926) 等人的强烈反对，他们经过实地调查之后，认为语音在空间和时间方面的情况复杂而且变动不居，不能像新语法学派那样划出清楚的界线，说什么地区的方言在什么时候总是发什么音，毫无例外。

(岑麒祥)

Xinzhū Guoyǔ Wénfǎ

《新著国语文法》 见黎锦熙。

Xindeyu

信德语 (Sindhi language) 属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印度语支。印度宪法承认的语言之一。主要分布在巴基斯坦的信德省，此外也用于俾路支省东部和印

度古吉拉特邦的卡奇区。使用人口约 800 万。信德语由通俗梵语的一种方言演变而来。信德 (Sindhi) 和印地 (Hindi) 原是一义。

信德语的音系里还保留着古代印度-雅利安语言特有的齰音和卷舌音的对立，即 r~ṛ, s~ṣ 等，如 uṭhu(骆驼)用卷舌音；但词中位置的-ḍ(h)有变为 r(h)的倾向，如 pəṛh-ənu(学习，中古雅利安语为 paḍhai 诵读)。鼻音后的辅音也常发生变化，如 ḍəndu(牙齿)，源出梵语的 danta，鼻音使 t 变为 d；ḍənu(贡金)，源出中古雅利安语 daṇḍa(杖，罚金)，鼻音将后随辅音吞没。信德语辅音系统的最大特点在于，它发展出一套吸气音——ḍ, ḍ, ḍ, ḍ, 如“牙齿”的实际读音为 [ḍəndu]。信德语在元音方面的特点之一是，它和其他印度语支西部语言一样，把中古的 a 变成了 ə (东部语言则变成 o 或 u)。例如 mərəno(死)，源出梵语 maraṇa，奥里亚语作 mārən，阿萨姆语作 mbrən。另一特点是它保留了词末音节中的短元音。例如 əkhi(眼睛)，梵语作 akṣi，中古雅利安语作 akkhi，在印地语中变成 ākh。信德语只有阳性和阴性，中性已消失，有单数和复数，主格和斜格。信德语使用波斯-阿拉伯字母，在印度学校里也用梵文天城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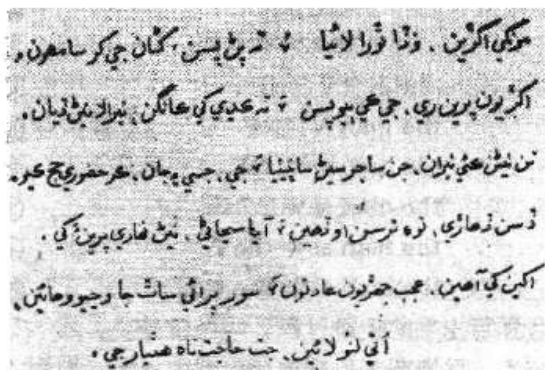
(周流溪)

Xing Gongwan

邢公畹 (1914~) 中国语言学家。原名邢庆兰。原籍江苏省高淳县，1914 年 10 月生于安徽省安庆市。1937 年毕业于安徽大学，随即考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2 年到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工作，同时在西南联合大学执教。自 1946 年南开大学复校起，一直任该校中文系教授。1953~1956 年赴苏联，任莫斯科大学教授。历任南开大学中文系主任、顾问、汉语侗台语研究室主任、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中国音韵学研究会顾问、中国民族语言学会理事等职。邢公畹在汉藏系语言比较、语言理论、汉语



语法等领域的研究工作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他在《诗经“中”字倒置问题》(1947)、《汉语“子”、“儿”和台语助词 luk 试释》(1948)、《汉台语构词法的一个比较研究》(1949)、《汉语遇蟹止效流摄的一些字在侗台语里的对应》(1982)、《说“鸟”字的前上古音》(1982) 以及《汉语和侗台语里的 -m, -ŋ 交替现象》(1986) 等论文中，从语法词序、语音对应等方面，特别是利用对应同源体系的研究方法，为论述汉语和侗台语的系属关系提出了丰富的论证。主要著作有他从 1947~1982 年的语言学论文选集《语言论集》(1983)、《汉语方言调查常识》(1982)、《远羊寨仲歌记音》(1942)、《蓬山摆彝语文初探》(1950，与罗常培合著)、《三江侗语》(1985) 等；译著有 JI. П. 巴思德涅耶娃的《论“红楼梦”》(1956)，N. 乔姆斯基的《句法结构》



信德语文字

(1979, 与庞秉钧、黄长著等合译)等。

(马庆林)

xíngshu

行书

汉字一种书体的名称。指介于草书和正体字之间的流畅书体。行书本是由正体字在日常应用中笔划连写或小有变异而形成的,既便于书写,又不象草书的难于辨认,所以宜于通行。从汉代至今,行书随着正体字的发展,而在体势、笔意上有所变化,成为适应性最强、应用范围最广、延续时间最长的书体。

从各地出土的有年号的汉简和亳县出土的曹氏家族的汉砖等材料看,东汉中期就有行书。世传东汉晚期刘德升造行书,这与说“王次仲初变古形”、“杜度滥觞于草书”一样,都是后世对于把已经流行的字体归纳出章法并且在传授方面有功的人的推崇,也反映出这几种书体形成的年代。汉魏之际,钟繇、胡昭以师法刘德升而著名。到西晋行书大行于世,朝廷立书博士,以钟、胡之法教弟子,包括行书,书法家也多以行书著称。东晋帝王多善行书。书法家中王羲之善行书,他的《兰亭叙》更是千古闻名的杰作(见图)。行书既是适于日常应用的字体,更是书信常用的字体。钟繇擅长八分、真书和行书,刘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中说:“钟书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也。三曰行押书,相闻者也。”“行押书”即行书,“相闻者也”即用作书信往还的字。历代书法家的行书墨迹也大部是书信。私人通信可以随意书写,各显本色。比较历代法帖和真迹中的书信,既可以看到行书的发展变化,也可以看到行书的指称范围之宽。《宣和书谱·行书叙论》说:“自隶法扫地而真几于拘,草几于放,介乎两间者,行书有焉。于是兼真则谓之真行,兼草则谓之行书。”“真行”与“行书”的划分,只是从鉴赏的角度作出的。



王羲之行书《兰亭叙》

张政烺)

xíngsheng

形声

见六书。

xíngshì wénfǎ

形式文法 (formal grammar)

数理语言学用于生成语言的文法。形式文法是数目有限的规则的集合,这些规则可生成语言中的合格句子,并排除语言中的不

合格句子。形式文法符号为 G , 文法所生成的语言符号为 $L(G)$ 。

定义 美国语言学家 N. 乔姆斯基把形式文法 G 定义为四个项目的组合:

$$G = (V_N, V_T, S, P)$$

其中, V_N 是非终极符号,不能处于生成过程的终点; V_T 是终极符号,能处于生成过程的终点; V_N 与 V_T 不相交,没有公共元素; S 是 V_N 中的初始符号; P 是重写规则,其一般形式为:

$$\varphi \rightarrow \psi$$

这里, φ 和 ψ 都是符号串。

如果用符号 $\#$ 来表示符号串中的界限,那么,可以从初始符号串 $\#S\#$ 开始,应用重写规则 $\#S\# \rightarrow \#\varphi_1\#$, 从 $\#S\#$ 构成新的符号串 $\#\varphi_1\#$, 再利用重写规则 $\#\varphi_1\# \rightarrow \#\varphi_2\#$, 从 $\#\varphi_1\#$ 构成新的符号串 $\#\varphi_2\#$, ……一直到得出不能再继续重写的符号串 $\#\varphi_n\#$ 为止,这样得出的终极符号串 $\#\varphi_n\#$, 显然就是语言 $L(G)$ 中合格的句子。

例如,在英语中,有如下的文法:

$$G = (V_N, V_T, S, P)$$

$$V_N = \{NP, VP, T, N, V\}$$

$$V_T = \{\text{the, man, boy, ball, saw, hit, took, ...}\}$$

$$S = S$$

$$P: S \rightarrow NP \wedge VP \quad ①$$

$$NP \rightarrow T \wedge N \quad ②$$

$$VP \rightarrow V \wedge NP \quad ③$$

$$T \rightarrow \text{the} \quad ④$$

$$N \rightarrow \{\text{man, boy, ball, ...}\} \quad ⑤$$

$$V \rightarrow \{\text{saw, hit, took, ...}\} \quad ⑥$$

这里,初始符号 S 表示句子, NP 表示名词短语, VP 表示动词短语, T 表示指示词, N 表示名词, V 表示动词。利用这些重写规则,可以从初始符号 S 开始,生成英语的句子 “The man saw the ball”, “The man took the ball”, “The boy hit the ball”, 等等。

“The man saw the ball” 的生成过程可写成如下形式,后面注明所用重写规则的号码:

S

$$NP \wedge VP \quad ①$$

$$T \wedge N \wedge VP \quad ②$$

$$T \wedge N \wedge V \wedge NP \quad ③$$

$$\text{the } N \wedge V \wedge NP \quad ④$$

$$\text{the man } V \wedge NP \quad ⑤$$

$$\text{the man saw } NP \quad ⑥$$

$$\text{the man saw } T \wedge N \quad ②$$

$$\text{the man saw the } N \quad ④$$

$$\text{the man saw the ball} \quad ⑥$$

这样写出来的生成过程,叫做推导史。

分类 乔姆斯基根据重写规则的形式,把形式文法分为 4 类:

① O型文法:重写规则为 $\varphi \rightarrow \psi$,并且要求 φ 不是空符号串。

② 上下文敏感文法:重写规则为 $\varphi_1 A \varphi_2 \rightarrow \varphi_1 \omega \varphi_2$ 。在上下文 $\varphi_1 \rightarrow \varphi_2$ 中,单个的非终极符号A被重写为符号串 ω ,所以,这种文法是上下文敏感的。

③ 上下文自由文法:重写规则为 $A \rightarrow \omega$ 。当A重写为 ω 时,没有上下文的限制,所以,这种文法是上下文自由的。

④ 有限状态文法:重写规则为 $A \rightarrow aQ$ 或 $A \rightarrow a$ 。其中,A和Q是非终极符号,a是终极符号,而 $A \rightarrow a$ 只不过是 $A \rightarrow aQ$ 当Q为空符号时的一种特殊情况。如果把A和Q看成不同的状态,那么,由重写规则可知,由状态A转入状态Q时,可生成一个终极符号a,因此,这种文法叫做有限状态文法。

各种形式文法的关系 每一个有限状态文法上下文都是自由的,每一个上下文自由的文法上下文都是敏感的,每一个上下文敏感的文法都是O型的。乔姆斯基把由O型文法生成的语言叫O型语言,把由上下文敏感文法、上下文自由文法、有限状态文法生成的语言分别叫做上下文敏感语言、上下文自由语言、有限状态语言。有限状态语言包含于上下文自由语言中,上下文自由语言包含于上下文敏感语言中,上下文敏感语言包含于O型语言中。

形式文法的理论是当代计算机科学的基础理论之一,在算法分析、编译技术、图像识别、人工智能等领域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参考书目

N. Chomsky, *Three models for the description of language*, *IRE Transaction of Information Theory*, Vol. 1, No. 3, pp. 113~124, 1956.

(冯志伟)

xíngxùn

形训 根据汉字的形体结构解说字义的训诂方式。据形说义,在先秦古书里已经出现。例如《左传》宣公十二年:“夫文,止戈为武。”昭公元年:“于文,皿虫为蛊。”韩非子《五蠹》:“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囗,背囗谓之公。”这些都是从字形的结构上讲字义的。“武”字从止从戈,意思在于武以定乱。“蛊”字从虫从皿,皿中有虫,有如腹中有虫为害。“公”字从八从囗(私),八是背的意思,所以说“背私为公”。汉代许慎作《说文解字》是注重解说文字形义的书,其中字下所加训释属于形训的例子很多。举例如下:

示:“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二(古文上字)。三垂,日月星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示神事也。”

王:“天下所归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

小:“物之微也。从八。丨见而分之。”

公:“平分也。从八从囗(段玉裁注:八从背私也。八犹背也。韩非曰:背囗为公)。”

右:“手口相助也。从又从口(段玉裁注:𠂇者,手也。手不足,以口助之)。”

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

品:“众庶也。从三口。”

巢:“鸟群鸣也。从品在木上。”

古:“故也。从十口,识前言者也。”

十:“数之具也。一为东西,丨为南北,则四方中央备矣。”

这些都属于形训。形训只是训诂的一种方式,用意在于推求造字的本义。不过往往出于主观的推测,最初造字的原意有时是很难说的,只有从古文字中可以窥见一部分。

(周祖谟)

Xingrufa

《性入法》 中国藏族传统的文法书。又称《字性缀联法》或《音势论》,与《三十颂》齐名。据藏文文献记载,同为藏文创制者图弥三菩札所著。据近人研究,特别是通过与早期藏文文献的比较和历史研究,对著者和成书年代提出了疑问。《性入法》与《三十颂》一样,用偈颂体写成,简明叙述字母分类、缀联规则及其所表达的语法意义,有口诀的性质。偈句数目,因版本而异,如旧敬词句不计在内,本文有135句和137句等几种。可分3部分:第1部分是字性分类,共12句,按发音方法将藏文字母分为阴性、阳性和中性等几类,这种字性的分类与语音的发音方法有一定的关系,但不完全符合;第2部分是前加字和后加字的字性分类、缀联规则及其作用和功能,共97句,约占全文的2/3,是主要部分。前加字和后加字的字性按其在音节中的实际发音确定,因此同上述字母的字性并不完全一致。比如𑄖作为基字是阴性,作为前加字是中性,作为后加字是阳性;第3部分共26句,论述字性分类和正确缀联的重要意义。缀联规则指两个方面:一是基字和前加字字性的配合关系;二是前一音节的后加字与后一音节声母的字性配合关系。如阳性前加字可与阳性或阴性基字结合等。作用和功能指加前加字或后加字所表达的语法意义。如阳性前加字可以表示动词的过去时等。从内容上看,《性入法》偏重语音和正字法,而《三十颂》着重语法虚词。《性入法》是从字性缀联的角度对《三十颂》的注释、疏证和补充。后世藏族文法学家都以这两本书为楷模,进行注疏诠释,因此它与《三十颂》一样,是藏文文法的经典著作。

(瞿霭堂)

Xiongyaliyu

匈牙利语 (Hungarian language) 也称马扎尔语(Magyar language)。匈牙利的官方语言。属乌拉尔语系芬兰-乌戈尔语族乌戈尔语支。使用人口1400多万,其中匈牙利本土约有1000万,其余400多万分散在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等国。匈牙利民族世称马

扎尔人,他们的祖先是乌拉尔以东大草原的游牧民族,于5~9世纪被迫西移,9世纪末定居于现在的匈牙利,并把自己的语言带到欧洲。匈牙利语有8种方言,各方言之间差别不大。语音的明显特点是元音和谐现象。元音按发音部位的不同分3类:后元音、前圆唇元音和前展唇元音,后元音和前圆唇元音一般不同时出现在同一个词中;辅音丛很简单,而且很少出现在词首。单词重音落在第一个音节上。匈牙利语属粘着型语言。语法范畴通常用加后缀的方法表示;名词有数和格的变化,无语法性别;形容词和数词作修饰语时无须跟被修饰语一致。匈牙利语的日期按年、月、日次序,姓名是先姓后名,与汉语同。词汇中有来自突厥语言、高加索语言、以及拉丁、斯拉夫语言的借词,现代有来自西欧语言,特别是德语的不少借词。匈牙利语文字采用经过修改的拉丁字母,并使用一些变音符号,如ó表示长元音,ö表示长的前圆唇元音等。

(龚坤余)

xiuclge

修辞格 (figures of speech) 也称辞格、辞式,是为了使说话增强表达效果而运用的一些修饰描摹的特殊方法。

修辞格可以从表达作用、结构特点和运用的原则3个方面加以分析。如比喻这个修辞格,从表达作用看,要比原来的说法更具体形象。说“骄阳似火”、“好风如水”,虽已有“骄”修饰“阳”,有“好”修饰“风”,却待有了“似火”“如水”,才把“骄阳”、“好风”给人的感觉具体而形象地描摹出来。从结构特点看,比喻可以分析出本体和比喻两个部分,又有表示比喻的词语“如、似、好象、如同、仿佛、一样”和“是、变成、变为”之类。本体和比喻都出现,用的是明白表示比喻的词语“如、似”等,叫做明喻,上面举的例子就是。所以明喻的格式是“甲如乙”。如果把比喻的词语改作“是、变成”等,表面上将比喻说成实是如此了,本体和比喻的关系比明喻紧切了一些。如说“你们是初升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表面上不明白表示是比喻,实际上却确是比喻,所以叫做隐喻。隐喻的格式是“甲是乙”。如果本体不出现,就借比喻来代本体,叫做借喻,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明喻是比喻和本体相类,隐喻是把相类说成相同,借喻是把比喻和本体合而为一了。这样,比喻和本体的关系自然更紧切。从运用的原则看,①比喻和本体必须在某一点上极其类似,但本质又明显不同。②比喻必须浅显,使人易于感受,捉摸。骄阳给人的感觉似火,却不是真的火,好风给人的感觉象水,却决不是真的水。“火、水”都是浅显的比喻,使人易于感受。如夸张这个修辞格,从表达作用看,是有意过甚其辞,以加深印象,加强感染力。李白《秋浦歌》有这样的诗句:“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天下哪有三千丈的白发!这只是夸张的说法。从结构特点看,必有表示过甚其辞的词语,“三千丈”是往大里夸张的词语。往小里夸张时也是如此:“谁谓河广?曾不容舫。”(《诗·卫风·河广》)“曾不容舫”是用来夸张的词语。还有一类表示

“超前”的夸张,“超前”就是把话说到事实头里去了,如:“酒未到,先成泪。”(范仲淹《御街行》)“未”、“先”等是表示超前的词语。从运用的原则看,夸张必须和事实有很大距离,往往是不可能的事。如只是稍稍言过其实,把三千丈说成三尺、三丈,倒反成为失实了。夸张也不同于说大话或捏造事实,说大话或捏造事实是要听的人相信那些虚假的话,夸张却并不要求人相信是真实,而是出于情理之外,可又在情理之中,听者读者自能意会的。如飞白这个修辞格,从表达作用看,是故意用上别字(即白字)记录实际语言,更真切地表达说话人的特殊口吻,增强真实感和生动性。鲁迅《鸭的喜剧》中写孩子把“爱罗先珂先生”说成了“爱罗希珂先生”,《红楼梦》第二十回中林黛玉取笑史湘云“咬舌子”,把“二哥哥”说成了“爱哥哥”,就都是飞白。从结构特点看,一般只出现于对话之中,是有意安上的别字。从运用原则看,在文字上说是别字,可又不是真的写错了;从语言上看,倒是更真实地记录语言,和一般写别字迥然有别。又如排比这个修辞格,从表达作用看,整齐匀称的语句,造成了反复重现的节奏,使语意特别顺畅,或者更增强了说话的气势。从结构特点看,一般三句以上,极少数例子只用两句。字面上同异相间,异中见同,以显其类比之理。如:“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处不可久,不行不可复。”(《管子·牧民》)从运用的原则看,可以构成排比的句子,意思上须有相同或相通之处;关系上可以是并列的,也可以是承接的。

数量和分类 中国修辞学著作所列修辞格往往多寡不一;修辞格的名目,有名同实异或名异实同的;修辞格如何划分大类,更是分歧。陈望道《修辞学发凡》所列举的修辞格及其分类,较有代表性,一般修辞学的论著大多在这个基础上增减变异。《修辞学发凡》列举了38种,即(甲类)材料上的辞格:比喻、借代、映衬、摹状、双关、引用、仿拟、拈连、移就,共9种;(乙类)意境上的辞格:比拟、讽喻、示现、呼告、铺张、倒反、婉曲、讳饰、设问、感叹,共10种;(丙类)词语上的辞格:析字、藏词、飞白、镶嵌、复叠、节缩、省略、警策、折绕、转品、回文,共11种;(丁类)章句上的辞格:反复、对偶、排比、层递、错综、顶真、倒装、跳脱,共8种。关于修辞格的数量,有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从个别的修辞格看,有兴亦有衰,从总体看,修辞格的数量在历史发展中是在增加的,但变动的幅度不大;二是一种修辞格往往可以再分,如借代可以分作旁借和对代,映衬可以分作反映和对衬,比喻之外又可以有博喻。这些不过是各个修辞格内部的变异,不能都作为独立的修辞格看待。

每一种修辞格有它自己的特点,如借代不同于比喻,排比不同于对偶,但修辞格之间又有共同之处,因此可以归成大类。划分大类的方法虽有好多种,但主要的依据不外结构和作用(表达功能)。修辞格既是根据表达效果建立的,表达功能自然更值得重视。但修辞格运用的是语言文字的材料,修辞格在结构上又往往有其特点,因此也要考虑到结构。

修辞格之间还有交互作用。比如夸张(铺张)也可以用比喻、借代或比拟来表现。“无耻的狞笑,骄傲的狂叫,就象是一万把刀扎在她的心上。”就是用比喻来表现夸张的。这种交互作用并不会使修辞格变得混乱。一方面,并不借助其他方法来表现的夸张依然存在,另一方面,用比喻、借代或比拟来表现夸张,都使夸张的运用取得了更好的效果。因此,这种交互作用是有积极意义的,它使某些修辞格更多变化了。

民族特点 修辞格是各种语言都有的修辞手段,但是不同语言的修辞格有不同的民族特点。汉语修辞格的特点和汉民族的语言文字密切相关。下面这些修辞格都能说明这一点。

对偶 这种修辞方法诗歌中常用,散文中也用。诗词中叫对仗,它是律诗格律的重要支柱。对联在明代开始流行,是这种修辞方法的独特运用。律诗中的名句不少出自对偶,对联更是雅俗共赏,为人们所喜闻乐见。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充分反映了汉语的特点,整齐对称而又抑扬和谐,给人以语言文字美的享受。

构成对偶的语言手段有三:一是音节。相对的两句,音节总数相等;相对的词,音节也相同。二是语法结构。相对的两句,语法构造相同或相近;相对的词,词性相同或相近。三是声调。相对的两句,平仄相对。如: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这副对联,上下两联都是11个音节;相对的词,音节也同。上联是主谓谓语句,下联也是。相对的词,词性也同:“墙上”和“山间”相对,都是方位名词。“芦苇”和“竹笋”相对,都是名词。“头、脚”和“嘴、皮”相对,都是名词。“重、轻”和“尖、厚”相对,都是形容词。“根底”是名词,“腹中”是方位名词;“根底”写作“根底”,和“腹中”更相近。“浅”和“空”都是形容词。上下联的平仄也是相对的。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三方面的要求已渐放宽,今天一般用对偶时不强求平仄协调,字面上也允许有重复了,但仍然与汉语的特点分不开。

回文 指调换词的排列次序,顺读倒读都可成文的修辞格。诗有回文体,代表作是《璇玑图》,《晋书·列女传》说是窦滔的妻子苏蕙字若兰的作品。共841字,回环反复地读,可得诗3752首,委实是空前绝后的巨制。这种回文体是一种诗体,是运用回文这种修辞格,把它推到极端造成的。它强求字面上的全部颠倒,不免有好些做作或勉强的地方,因此有人批评说虽“难能”而并不“可贵”。但回文体不等于回文这个修辞格。回文格倒正要求自然成理,自然成趣的。这个方法早见于古籍,《老子》一书中就有:“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现在口头也还说,如:“开水不响,响水不开。”“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文学作品中也能见到,如:“针连线,线连针。”“爱情是什么?什么是爱情?”运用汉语的单音节、双音节词,运用汉语语法手段的词序,才能在句子中进行这样的前后调动以形成可回环反复的格式。

顶真 也叫蝉联,把上一句末尾的词作为下一句的开头,使首尾相重,在形式上成为一种链式的结构,在表达上前后意思紧相扣,气势连贯而下。如:“茵茵牧草绿山坡,山坡畜群似云朵,云朵游动笛声起,笛声悠扬卷浪波。”(古月《草原春早》)这种方法利用了词序的变化,也利用了词语的重复。有时单用重复前句的方法,也能取得蝉联的效用。如:“返咸阳,过宫墙;过宫墙,绕回廊;绕回廊,近椒房;近椒房,月昏黄;月昏黄,夜生凉;夜生凉,泣寒蛩;泣寒蛩,绿纱窗;绿纱窗,不思量。呀!不思量,除是铁心肠,铁心肠,也愁泪滴千行。”(马致远《汉宫秋》)这是顶真的另一种形式。顶真的方法可以用于前后各句之间,也可用在章节和章节的衔接之处,取得相类的表达效果。

复叠 这种修辞格是利用汉语中词的重叠形式比较发达而造成的。汉语的形容词、动词有重叠形式,汉语的名词、副词、量词也有这种形式。重叠形式的语法功能和语法意义是语法上要研究的,这种形式如连续而集中地使用,就成为修辞的特殊方法了。如“弯弯的眉毛大大的眼,红红的嘴唇赛樱桃”(民歌),这里的“弯弯”、“大大”、“红红”分明是有意连续而集中地使用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这是李清照《声声慢》词中的名句,连续而集中地使用重叠形式就更多了。这种修辞格能加强描绘的色彩,在原有的语法功能和语法意义之上更增添了表达上的作用。

析字 这个修辞格的范围较大,无论和字形、字音、字义哪一方面相关联的修辞方法,都包括在内。顾炎武《日知录》引用“藁砧今何在?山上复有山。何日大刀头?破镜飞上天。”这首古诗作析字之例。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以为“藁砧”先衍义为“钹”,再从“钹”谐音作“夫”。“山上复有山”是“出”的化形。“大刀头”先衍义作“钹”,又从“钹”谐音作“还”。“破镜”是月半的衍义。因此说析字有三类,即“化形”、“谐音”、“衍义”。有的人把析字改作拆字,限于“化形”,范围就小些。不论范围大小,都是和汉字分不开的,或者利用汉字的形体结构,或者利用汉字的字音,或者利用汉字的字义。这个修辞格的作用不在析字或拆字本身,而是通过析字或拆字以增强表达上的某种情趣。

由于汉语的词单音节和双音节的占绝大多数,汉语又是有声调的语言,才便于构成对偶这种修辞格;由于词序是汉语重要的语法手段,才便于构成回文、顶真这些修辞格;由于汉语的词有较发达的重叠形式,才能用来构成复叠的修辞格;由于汉字的特点,才能用来构成析字或拆字的修辞格。和汉语汉字密切相关的并不限于以上几种修辞格;有的修辞格,还和民族文化、社会习俗有关,但和汉民族语言文字的关系,是尤其明显的。汉语修辞格的民族特点,正是汉民族语言文字特点的更集中、更突出、更富有色彩的表现。

修辞格研究的历史 汉语的修辞现象是丰富多彩的,也是历史悠久的。但如何认识和分析它却有一个相

当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修辞格的运用作为一种修辞现象,是较早地引起注意的。

《诗大序》说:“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六义之中,就有个“比”。“风、雅、颂”是什么?《诗大序》有明确的解说,“赋、比、兴”是什么?《诗大序》没有详细说。这个“比”既和“赋”、“兴”并列,“赋”和“兴”不是修辞格,自然不会只把“比”看作修辞格。“赋、比、兴”指的确实都是方法,但这是从文学的角度去分析,而不是专从修辞的角度去分析。在汉代,对“比”的认识,基本上停留在六义的范围之内,只是在具体分析上,又不可能完全不涉及修辞。

东汉王充的《论衡》,其中《艺增》、《仟增》、《语增》诸篇批评夸饰失实。夸饰也叫做夸张,究其实,《论衡》还不是讨论修辞格的夸张,而是反对华文饰辞。但是不可能因为反对华文饰辞而把夸张这种修辞现象也一起否定,于是《论衡》既批评华饰失实,也批评夸张,但又为一些夸张的现象辩解。这个矛盾,说明《论衡》在反对华文饰辞时也注意到不能把夸张都看作只顾形式的华丽而忽视内容的真实,不过在当时对修辞格还没有作独立的研究,因而也就无法把这种矛盾分析清楚。

南北朝时梁刘勰的《文心雕龙》中,“比”还是和“兴”放在一起,但《比兴》篇不仅举了不少比喻的例子,而且作了分析,以为“夫比之为义,取类不常;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宋玉《高唐》云:‘纤条悲鸣,声似箜篌。’此比声之类也。枚乘《菟园》云:‘纷纷若尘埃之间白云。’此则比貌之类也。贾生《鹏赋》云:‘祸之于福,何异纆繆。’此以物比理者也。王褒《洞箫》云:‘优柔温润,如慈父之畜子也。’此以声比心者也。马融《长笛》云:‘繁缛络绎,范蔡之说也。’此以响比辩者也。张衡《南都》云:‘起郑舞,蚤曳绪。’此以容比物者也。”这已经不是“六义”的范围之内分析“比”了。《文心雕龙》的《夸饰》篇,认为运用夸张的说法,“辞虽已甚,其义无害也”。在描摹情状时,“莫不因夸以成状,沿饰而得奇也”。这就不是从文质的关系来反对夸饰,而把夸饰看作有用有效的修饰描摹的方法了。

《文心雕龙》在《明诗》篇、《谐隐》篇论“离合”和“字隐”,大致相当于修辞学中所说的“析字”,《声律》篇所说的“吃文”是现在所说的“飞白”,《物色》篇论及“摹状”和“复叠”,《丽辞》篇探讨了“对偶”,《事类》篇专论“引用”,显然当时已经把这些都作为表达的方法来看待。对修辞现象和方法的分析不但加强了,而且已经不完全依附于文论,有了一定的相对独立性。这在修辞格的研究上跨出了一大步。

发展到宋元,诗话、笔记之类的著述,所论及的辞格已有30多种。南宋陈騌的《文则》,对今天修辞学中所列的辞格,如比喻、引用、仿拟、析字、复叠、节缩、省略、层递、错综、倒装等都分别作了分析。虽然象把比喻之法分作10种,即直喻、隐喻、类喻、诂喻、对喻、博喻、简喻、详喻、引喻、虚喻,未必切当,但毕竟既看重修辞格的分析和

研究,又将修辞格作为一种修辞方法来看待了。

从修辞格研究的历史可以看出,修辞现象中比喻、夸张这些方法的运用,古代早就引起了注意,在修辞研究的发展中,探讨得最多的是修辞格;最先从文论中分离出来,作为修辞的方法来研究的是修辞格,取得成果最多的也是修辞格,实在可说是源远流长。这和“五四”运动以后以修辞格作为主要内容而建立的修辞学是密切相关的。虽然“五四”运动以后建立的修辞学有借鉴国外修辞学的地方,但作为基石的,实是汉语修辞格研究的传统。

修辞格的地位 修辞格在修辞学中有一定的地位,但是以为修辞学就是辞格学,那只是一种误解。修辞格在“五四”运动以后的修辞学著作中确乎曾经处于突出的地位,是产生这种误解的主要原因。其实唐钺在《修辞格》一书中说过,修辞格“不过是修辞的一小部”,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也并非专论修辞格,而汉语修辞格研究的历史则更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现在修辞格以外的修辞现象、修辞方法、修辞理论的研究,所以更引人注目,正是修辞学的历史所提出的任务。

修辞格的地位应从修辞格本身的作用以及和其他修辞方法的联系中去考察。它是修饰描摹的特殊方法,这种方法是长期以来在运用语言中产生的,今后,还将继续为增强汉语的表达效果而发挥作用。从和其他修辞手段的联系看,它是一种不可缺少的修辞方法。正因为如此,修辞格的研究没有停顿,它还在扩大和深化。扩大指的是新的修辞格还在产生,值得进一步去发掘、整理;修辞格和其他修辞现象的联系,也逐渐引起更多的注意,如修辞格和不同语体的联系不一样,公文语体极少用修辞格,而文艺语体中修辞格的使用频率最高。深化指的是对已有修辞格的进一步分析,比如关于修辞格的标准,各个修辞格的特点,修辞格之间的关系等等。

能否正确看待修辞格的地位,和修辞学的发展密切相关。不能以修辞格排斥或取代其他修辞现象、修辞方法的研究,也不能反过来无视修辞格在修辞学中的地位。

修辞格既是修辞的一种特殊方法,这种方法又有着结构上的特点,因此,修辞格往往被人理解为一种程式,以为只要掌握这些不同的程式,就可以增强表达效果。程式总是比较固定的,而程式的运用却是千变万化的。比喻的程式很容易掌握,但寻找一个好的比喻却象找一颗红宝石那么难。修辞格在修辞学中的地位所以重要,并非只在于它对增强表达效果提供了一些程式,更重要的是在于以这些程式为基础可以不断地进行语言艺术的创新。

参考书目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教育出版社,1982。

(林祥稿)

Xiucige

《修辞格》(Figure of Speech) 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汉语修辞格的著作。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唐钺著。唐钺(1891~),字肇黄,福建人。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914年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和哈佛

大学研究心理学,1920年获博士学位。1921年回国,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所教育组组长,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及所长,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心理学教授,现为北京大学心理系教授。

《修辞格》参考英国学者J. C. 讷斯菲尔德的《高中英语作文》(1910),对汉语修辞格共分5大类27格。第1类:产生于比较的修辞格,包括显比、隐比、寓言、相形、反言、阶升、趋下6格。第2类:产生于联想的修辞格,包括伴名、类名、迁德3格。第3类:产生于想象的修辞格,包括拟人、呼告、想见、扬厉4格。第4类:产生于婉曲的修辞格,包括微辞、舛辞、冷语、负辞、诘问、感叹、同辞、婉辞、纤辞9格。第5类:产生于有意重复的修辞格,包括反复、排比、排句、复字4格。《修辞格》的用例,均取自古代诗词文赋,是一部文言修辞格。

《修辞格》所列诸格的名称继承了汉代董仲舒《春秋繁露》、宋代陈骙《文则》、元代陈绎曾《文说》等的传统。如婉辞、微辞见《春秋繁露》,显比、隐比即《文则》的直喻、隐喻,婉辞、隐比即《文说》的婉语、隐语。《修辞格》至今仍为研究汉语修辞学的重要参考读物,影响深远。(参见彩图插页第26页)

(张寿康)

Xiuci Jianheng

《修辞鉴衡》 中国第一部以修辞命名的著作。王构编著。王构(约1246~1309),字肯堂,东平人(今山东东平县)。元成宗大德年间(1297~1307),任济南路总管。

全书分两卷,上卷论诗,下卷论文。上卷末尾附论作



《修辞鉴衡》序

赋,下卷附论四六骈文。内容大都采自宋人诗话、文说、文集、笔记、说部、杂说,依类纂辑,共190余条,采书50余种,除其中10条未注明出处外,其余均一一注明。书中所引《诗文发源》(17条)、《诗宪》(3条)、《蒲氏漫斋录》(8条)等原书均已亡佚,赖《修辞鉴衡》存录一部分。又世上所传《吕氏童蒙训》已非全本,《鉴衡》所引录的34条多为今传本所未载,具有考证价值。全书共3万字,扼要阐述

了诗文批评、鉴赏、写法以及学习写作的门径。

《修辞鉴衡》刊本见诸著录的有四库全书本、指海本、文学津梁本3种。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藏有元至顺集庆路学刊本,这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刊本。1958年中华书局曾据此本影印。(参见彩图插页第26页)

(徐仲华)

Xiucixue Fafan

《修辞学发凡》 见陈望道。

Xu Kai

徐锴 (920~974) 中国五代时期文字训诂学家。广陵(今江苏扬州)人,徐鉉弟,字楚金。生于后梁末帝贞明六年,仕于南唐,起家为秘书省校书郎,后主李煜时,迁集贤殿学士,终内史舍人。国亡前一年,即宋太祖开宝七年卒。平生著述甚多,今仅存《说文解字系传》40卷,《说文解字韵谱》10卷。

徐锴精通文字训诂之学。《说文解字系传》实际就是《说文解字》注。因尊崇许慎,以其书为经,而自谦所作训解为传。这部书是自汉魏以后最早的一部有系统的,比较详密的注解。书中卷一至三十为《通释》,随文解释许氏原书的训解。卷三十一至三十二为《部叙》,推寻许书540部排列次序的意义。卷三十三至三十五为《通论》,是阐发文字结构的意义的。卷三十六为《祛妄》,是驳斥前人说字的谬见的。卷三十七为《类聚》,是取同类名物的字说明其取象的。卷三十八为《错综》,是从人事推阐古人造字的意旨的。卷三十九为《疑义》,是论《说文》所阙的字和字体跟小篆不合的。卷四十为《系述》是说明各篇著述的旨趣的。此书自上秘阁以后,传本极少。今本出自宋苏颂所传,阙卷二十五,用大徐本补足,已非完书。现在流传的刻本有清乾隆间汪启淑刻本,有马骏良刻《龙威秘书》本,又有道光十九年(1839)祁雋藻刻本。三者以祁本最好,且附有校勘记5卷,《龙威秘书》本次之。又《四部丛刊》有影印钱氏述古堂抄本,文字也颇有讹误。清代王筠有《说文系传校录》,可参阅。

《说文解字系传》以《通释》部分为主体,除引据前代古书以证明许慎训解外,还指出其他引申的意义,并从谐声字的声旁说明声旁与字义的关系,对后代训诂学家有很大影响。在《通释》中也往往说明古书的假借和古今用字的不同,有时还用今语解释古语,内容极为丰富,足见徐锴对于文字学和训诂学研究之深。《系传》在文字训诂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见《说文解字》)

《说文》唐本旧有反切,《系传》改由朱翱另加反切。徐锴所编《说文解字韵谱》,则依唐本《切韵》编排文字,目的是便于寻检篆体,原书注释并不完备。有冯桂芬刻本。其兄徐鉉据唐代李舟《切韵》重定的本子,有《函海》刻本。

(周祖谟)

Xu Xuan

徐鉉 (917~992) 中国五代时期文字学家。字鼎臣,广陵(今江苏扬州)人。生于后梁末帝贞明三年,卒于

宋太宗淳化三年。五代时期仕于南唐李璟、李煜。南唐亡，入宋，太宗时官右散骑常侍，又迁左常侍。事迹见《宋史》卷四百四十一。他精于文字学，善学李斯小篆。宋太宗雍熙初奉命与句中正、葛湍、王惟恭等校订许慎《说文解字》，一方面改正传写讹误，驳正唐代李阳冰刊定《说文》的谬误，另一方面略加解说，辨正别体俗字。《说文》传本旧有注音，颇不一致，徐铉改用孙愐《唐韵》反切，又增益许慎未收的经典用字，列于每部之末，称为“新附字”。雍熙三年(986)由国子监雕板，流传至今。现在通常应用的有影印宋刻本和覆宋刻本，为研究文字学和学习小篆的人必读之书。徐铉精于篆法。秦始皇东巡会稽，刻石铭功，原石已毁，幸有徐铉摹写石本传世，可与《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相印证。

(周祖谟)

Xu Shen

许慎 (58?~147?) 中国东汉经学家、文字学家。字叔重，汝南召陵(今河南郾城)人。《河南通志》卷四十九说许慎墓在郾城县城东35里召陵城下。今据郾城县文化馆调查，郾城县东30里召陵故城西3里有许庄，许慎墓冢即在许庄村东一里处。许慎在《后汉书》卷一百九下有传，但未载生卒年。据清代严可均《许君事迹考》和陶方琦《许君年表考》等所考证，许慎约生于汉明帝永平初，卒于桓帝建和初。



据《后汉书》本传称许慎“性纯笃，博学经籍，马融常

推敬之，时人为之语：五经无双许叔重”。曾为郡功曹，后被誉为孝廉，又为太尉府南阁祭酒，当即丞相府阁下之令史。安帝永初四年(110)与刘珍、马融等于东观校书。东汉时期，古文经盛行，许慎从名儒贾逵(公元30~101)问学，通籀篆古文。因鉴于当时俗儒说字解经多与古义不合，所以作《说文解字》15篇，成于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到安帝建光元年(121)遣子许冲上之于朝。

《说文解字》以小篆为主，并采录见于秦国所使用的籀文和六国古文，按514部首编排。每篆注明字义，并说明形体的结构，间或指明读音，是中国最早的最有权威的一部古文字的字典，对后代研究中国古代文字的形音义和文字发展的历史贡献极大。许慎还著有《五经异义》和《淮南子注》，已散佚不存。

见《说文解字》。

(周祖谟)

Xu Yiqiejing Yinyi

《续一切经音义》 解释佛经字义的书。辽僧希麟撰。希麟为燕京崇仁寺沙门。唐代慧琳《一切经音义》按照《开元释教录》所载经论作音，自《开元释教录》以后相继翻译的经论及拾遗律传等都没有音义，所以希麟继续模拟慧琳书作音义10卷，自《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起至《续开元释教录》止，总有226卷。所引古书很多，功用与慧琳书相同。

据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所考证，希麟书当撰于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即辽圣宗统和三年。此书有1745年日本高野山北室院沙门尧昌据高丽藏雕印本。丁福保曾据以影印，与慧琳书并行。

见《一切经音义》(慧琳)。

(周祖谟)

Y

yayln

牙音 见等韵。

Yakobuxun

雅柯布逊, R. (Roman Jakobson 1896~1982)

美国语言学家,原籍俄罗斯,犹太人后裔。1896年10月11日生于莫斯科,1982年7月18日卒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18年获莫斯科大学硕士学位。1920年移



居捷克。1930年获捷克查理大学博士学位。1939年希特勒占领捷克,他逃到北欧,先后担任哥本哈根、奥斯陆和乌普萨拉大学访问教授。1941年他移居美国。1946~1970年先后任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及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他是9个科学院的院士,并获得25个荣誉博士学位。雅柯布逊是莫斯科语言学会的创始人之一,1915~1920年任会长,又是布拉格语言学会的创始人之一,1926~1939年任副会长。

雅柯布逊对19世纪后期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新语法学派不满,主张从结构与功能两方面研究语言,致力于探索支配语言结构各层次的普遍原则。在音系学方面,他先后和H. C. 特鲁别茨科伊、M. 哈利等人共同发展了音位理论,并认为一个音位是由若干抽象的区别特征构成的,音位之间有对立关系。他还把这个强调对立关系的理论应用于语法与词汇,提出了所谓标记性。如英语 dog 是无标记形式,可指公狗,也可指一切狗,不论性别,而 bitch 则是有标记形式,只能指母狗,不能指公狗。在历史语言学方面,他主张立足于语言系统的整体来看个别的语言演变,反对把共时与历时研究截然分开。在心理语言学方面,他指出,在不同语言里儿童学会语言和失语症患者丧失语言能力,其发展过程方向相反并符合音系学原则。在语言功能方面,除表意义外,他还注意其他交际功能。他也研究诗学、韵律学、文学史、文化史、符号学和信息论等,著作超过500种。主要的语言学论著有《论俄语音系的演变》(1929),《儿童语言,失语症与语音共性》(1941),与C. G. M. 方特、哈利合著的《言语分析初探》(1952),与哈利合著的《语言原理》(1956),以及《选集》(1962年起已出版数卷)。(廖秋忠)

Yalln

雅林, G. (Gunnar Jarring 1907~)

瑞典突厥语言学家。1907年出生于瑞典北部的维肯。青

年时期曾在中国新疆及中亚各地进行语言调查,搜集了关于维吾尔语、乌兹别克语的大量资料。1933年发表博士学位论文《东土耳其语(即维吾尔语)语音学研究》,随即在隆德大学任突厥语副教授。1940~1973年曾从事外交工作,但没有中断过突厥学的研究。1968年起为斯德哥尔摩皇家文学历史古文物科学院成员。1970年成为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名誉会员。雅林主要研究现代维吾尔语,同时还研究乌兹别克语。代表作有《来自南疆的东土耳其语研究资料,故事、诗歌、谚语、谜语、民族学及历史资料的译文和注释》(1946~1951)、《中亚民间故事》(1973)、《东土耳其语-英语方言学词典》(1964)、《维吾尔-德语古文献词典》(1967)、《克利奇地方的乌兹别克方言材料及词汇表》(1937)、《阿富汗土耳其斯坦的乌兹别克语材料及词汇表》(1938)。此外,在地名学方面他也发表过一些论著,如《中亚突厥地名记述》(1961),与他人合作为S. 赫定的《中亚地图集》编了《地名索引》(1967),其中有雅林关于突厥语地名的研究。1978年应邀访问中国,1980年发表了《喀什的文学资料,译文、注释及词汇》。

(陈宗振)

yaxue

雅学 指研究《尔雅》的学问。古人有“仓雅之学”的说法。“仓”指《仓颉篇》,“雅”指《尔雅》。《仓颉篇》是字书,《尔雅》是训诂书。“仓雅之学”就是文字训诂之学。《尔雅》是中国最早纂集经传文字训诂的一部书,是战国以至秦汉之际研究文字训诂的人陆续编定的。汉魏时期已经有人作注。如樊光、李巡、孙炎都有注本。孙炎还有《尔雅音》。到了东晋时,郭璞又错综樊、孙,补其阙失,作《尔雅注》3卷,博洽周贍,远胜前人,一直流传至今。自郭璞以后研究《尔雅》的书就很多了。魏晋下至梁陈作《尔雅音》或《尔雅音义》的见于陆德明《经典释文》所载有好几家。宋代更有为郭注作疏解的,如邢昺作《尔雅疏》;有另为《尔雅》作注的,如郑樵作《尔雅注》。到了清代,著述更多。有校订《尔雅》文字的,有解释《尔雅》体例的,有仿照《尔雅》体例纂录古书的训解编排成书的,统归“雅学”之列。清代光绪间湖南胡元玉著有《雅学考》一书,收入《长沙胡氏杂著》,记述清代以前有关《尔雅》的著作,可资参考。清代有关雅学的著作极多,是雅学昌盛的时期。

参考书目

周祖谟:《重印雅学考跋》附《续雅学考拟目》,收入《问学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66。

(周祖谟)

yayan

雅言 这个名称最早见于《论语》。《论语·述而》篇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孔子在读《诗》、《书》和作宾相赞礼的时候都说的是雅正之言,即当时中夏区域的共同语,犹如明清时代所说的“官话”。

清代刘台拱在所著《论语骈枝》里解释“子所雅言”说:“五方之俗不能强同,或意同而言异,或言同而声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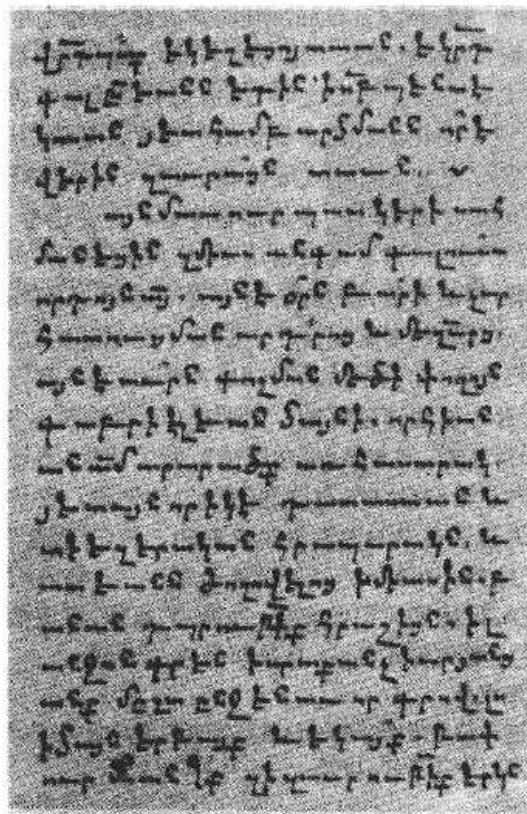
综集谣俗，释以雅言，比物连类，使相附近，故曰尔雅。《诗》之有风、雅也亦然。王都之音最正，故以雅名；列国之音不尽正，故以风名。……雅之为言夏也。孙卿《荣辱篇》云：‘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又《儒效篇》云：‘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然则雅夏古字通。”根据他这一段解释，可以理解“雅言”跟一般的“方言”有所不同。雅言是区域间的共同语，通行的地区广，有如说是广大地区的标准语。方言则不然，只流行在某一地区而已。因此“雅言”可以跟“方言”对称。

“雅言”作为一个词，还有另一个意义，是跟“俗言”相对称。“雅言”指文雅的语言，指一般书面语而言，“俗言”则指口头的俚俗语而言。例如“青蛙”是雅言，“蛤蟆”就是俗称。“蟋蟀”是书面用语，而“蛐蛐儿”就是口语。

(周祖谟)

Yameinlyayu

亚美尼亚语 (Armenian language) 印欧语系中自成一支的语言。分布于苏联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土耳其和中东一些地区也有相当数量的使用者。使用人口共约 550 万。亚美



亚美尼亚语草书体(1616)

尼亚语是印欧语系中最古老的有文字的语言之一，其发展可分为 3 个时期：5~11 世纪为古代期，11~17 世纪为中期(见图)，17 世纪以后形成近代亚美尼亚语。分东部方言和西部方言。亚美尼亚语有 6 个元音和 30 个辅音。许多词都源自伊朗诸语言，源于希腊语和古叙利亚语的多为科学和神学词汇。此外，亚美尼亚语的词汇也受到土耳其语的影响。名词有单复数之分，方言里还有双数

的痕迹。语法的性已经消失。使用后置定冠词。有 7 个格和 8 种变位。动词有态、体、人称、数、时的变化。亚美尼亚语基本上是粘着型语言，词有分析性成分。亚美尼亚

亚美尼亚语字母表

№	字母形式
1	Ա ա
2	Բ բ
3	Գ գ
4	Դ դ
5	Ե ե
6	Զ զ
7	Է է
8	Ը ը
9	Թ թ
10	Ճ ճ
11	Ի ի
12	Լ լ
13	Խ խ
14	Վ վ
15	Կ կ
16	Ն ն
17	Շ շ
18	Չ չ
19	Տ տ
20	Ս ս

№	字母形式
21	Յ յ
22	Զ զ
23	Շ շ
24	Ո ո
25	Չ չ
26	Պ պ
27	Ջ ճ
28	Ռ ռ
29	Ս ս
30	Վ վ
31	Տ տ
32	Բ բ
33	Գ գ
34	Դ դ
35	Ե ե
36	Զ զ
37	Է է
38	Ը ը
39	Թ թ

语字母(见表)为麦斯若波(约 361~441)创造，共 39 个，元音字母和书写方向(从左至右)均受希腊语的影响。

(佟丕礼)

yanyu binglixue

言语病理学 (speech pathology) 关于言语缺陷和诊治的学科。由于研究对象(包括先天的和后天的)如发音器官的伤残和运动神经的紊乱等不同，在学科上经常划分为言语缺陷的矫治和言语失常的恢复两大类。前者偏重于生理解剖，而后者则着重神经心理。这本来都属于医学范围，但因其都以恢复正常言语为目的，同时有许多工作如器官缺陷在手术后的发音矫正，言语失常在治疗中的说话锻炼，都需要语言学和实验语音学的知识，因此现代语言学中也常把这门学科列为研究项目。

言语缺陷 言语机制的伤残除后天的原因外，一般最常见的先天缺陷是缺唇、腭裂等现象。缺唇患者发音时对双唇音和唇齿音如 p, f 等，因唇部无法闭拢而常以喉擦音(如 h)代替。先天的腭裂多为上腭从后腭向前成不同程度的开裂，以致失去软腭和小舌，发音不得通过鼻腔，带有浓重的鼻音。上腭修复后，仍因缺少舌体向后高部运动的习惯，对舌根音一类的音发得不正，仍带鼻化色彩。所以对腭裂患者的言语矫正，消除鼻音是一难点。

声带缺陷 这是常见病，它影响嗓音质量，甚至有的成为哑巴。声带由于外伤或由于发育不良、闭合不全等原因导致沙哑或泄气。致哑的原因多种，多数是先天，自幼无法摹习语音，致使发音机制废置，终成哑巴。另一种是声带功能不全而变哑。对于前者，过去多用手势交谈。近

来可用“读唇法”来训练,使患者说话。但语言中的声调变化则因无法以口形表示,很难学会。近年来有声调显示仪器,可从屏幕上同时观察教师和自己所说话的声调曲线,而加以比较和调整,这样便有可能练习声调。半个世纪以来,医学界与现代语言学家合作,对研制聋人的“助听器”和失喉者的“助话器”已大有进展。一般的助听器对半聋者有用,它可以凭电路放大来增强听力。但因使用者的频率感知域各有差别,效率不高。近来在这方面有所改善,已有可以调节频率的助听器问世。对全聋的人,过去没有办法助其复听,后来有了“人工耳蜗”,可把小如纽扣般的器具埋在耳内来感应声浪,大致能获得听音的效果。现在又有用手指来代替耳鼓膜的“助听器”,形如烟盒,上有一排略如钢琴键的频率振荡键,话音送入此器,分析出几个共振峰而使相对应的键振动。聋人以几个手指接触各键而感到不同频率的共振峰能量,根据其键位和变动,可以“听”出是什么音。这是根据语音分析的参量而设计的“触觉助听器”。早期的助话器(或称人工喉)能摹仿人的嗓音,产生一个基频(例如 100 赫),但没有声调变化,发出的音很不自然,近来已经改进,可用手控按钮来改变基频,稍加练习即可发出自然的字调和语调。

言语失常 患者多为成人,由于受过惊吓、震荡或心理刺激,言语的神经系统受损,导致言语颠倒或脱误,使说话困难。语音方面的失常有多种,如:嘶哑、粗糙、干哑、气声、刺耳、低沉等等,这些有的是神经系统的问题,有的则属生理现象。前者为外因所致,例如用嗓过度或其他原因而引起声带麻痹;后者如先天声带不齐等,这些不属于言语矫治范围。但是下面几种言语失常则和语言研究领域有密切关系,如“失语症”、“口吃”和“童声遗留症”等。在治疗上需由医师与语言学家合作,才能取得较好效果。“失语症”的严重患者如语无伦次、答非所问,轻者如词句用错、“首音互换”(指一个句子中有两个音节的韵母相同但声母不同,说话时把两个不同的声母互换了)等。有许多病例多由脑部受损致使用语遗忘,不被遗忘的或不会说错的一些词或音,恰为幼儿时最早学会的词或音。因此对研究儿童言语习得具有重要意义。“口吃”的现象一般是说话不流利、无节奏或语音中断等。它有多种类型,主要的如词句中中断、音素或音节重复、音尾拖长、夹插别音、言语支离、措词累赘、吐字过重等。致病的原因,有的由于受到刺激,有的由于同伴感染,常见的如儿童摹仿口吃的同伴的话音而不觉成习,成长后也难以改正。矫正方法,除用药物治疗外,一般再施以语言训练,如:编排专用读物、跟随打拍说话、改变说话场所或话题等。这种训练是长期的,主要还在于患者自己努力克服,但不能紧张。“童声遗留症”也是一种言语失常现象,指成人说话仍用童稚声气,或在说话时,开始的几个词还正常,但随即转成高音调(如同假嗓),即使自觉亦不能控制。语言学家常称之为“发展中的失语症”,这同人类言语发展的研究有关(见感知语音学、生理语音学、声学语音学)。

参考书目

- B. Malmberg (ed.), *Manual of Phonetics*, North-Holland Pub. Co., Amsterdam, 1968.
L. Nicolosi, E. Harryman and J. Kresheck, *Terminology of Communication Disorders*, Williams and Wilkins Co., Baltimore, 1978.

(吴宗济)

yanyu hecheng

言语合成 (speech synthesis) 用人工产生语音乃至整段语言的技术。合成语音的装置叫做言语合成器或言语合成系统。早期的合成器是机械式的或电路式的,如今,言语合成已经计算机化了。言语合成技术不仅是深入研究语音特性的一种手段,而且也是实现人-机语言通信的一种手段。

在语音研究中,利用言语合成技术,可以灵活而精确地控制语音的特性参数,合成出各种各样的语音样本,通过对这些样本的听辨,逐步揭示出语音现象的机理。

言语合成与语音学 用合成技术来验证语音的特性,是言语合成主要功能之一。它可以验证哪些语音要素在传输中是必需的,哪些是多余的。可以检查语音中某一频段在传输中的有效程度;可以通过试验言语的“信噪比”来确定言语清晰度的最佳参量等等。语言学家在20世纪50年代晚期开始用合成来探索语音学上的问题,他们用加减参量、依存制约、转换切分等方法,对元音音位区域、复合元音的主次特征、辅音的发音方法和部位在辨音中的贡献、声调在辨义上的功能,以及一切韵律特征等的研究,提供了极其方便而有效的手段。

言语合成系统的类型及其发展 机械式的合成是比较早期的方法,用机械装置模拟人的发音,用人工控制可以发出简单音节。后来有人用电路方法模拟语音信号。声谱分析发展后,大量出现根据言语声谱来合成语音的装置。电子计算机问世,一切复杂的机械或电路的合成系统都用计算机来代替,并在功能方面有了进展。言语合成约可分为5个阶段:①40年代以前,是用机械或电路模拟语音的时代。②50年代有了新的进展,言语声谱分析已达到相当完备程度。辅音与元音之间的“过渡音征”画成模式,通过模式还音器能产生很标准的辅音,至今还有参考价值(图1)。③60年代,计算机应用于语音合成系统,言语的“规则合成”成为最先进的合成自然语言的



图1 辅音过渡音征合成模式举例

途径。④70年代以来,在规则合成的基础上,主要向合成的商品化发展,大量的多语言对译器充斥市场,多限于有限辞汇和低质量的音质。⑤80年代以来,提高合成的音质以及“文-语合成”,盲人阅读机等都有了相当成绩。这种连续语言的合成要求,展开了第5代言语合成的序幕。未来的言语合成,将是除了更仿真地合成语音外,还要包括一切语法、语气等特征,为人-机对话系统奠定基础。

计算机与言语合成 计算机能以极高的速度进行运算和控制,又能接受、存储和输出庞大的信息。然而,迄今为止,人和计算机之间的信息交换,几乎都是依靠键盘打字、屏幕显示和打印输出。人的话语是一种最自然、最有效的通信媒介,语音合成就是人-机对话最重要技术之一。

计算机的言语合成系统大体有3类:规则合成、单元编辑合成和录音编辑合成。

① 规则合成系统(图2)扎根于语音产生的声学理论。按此理论,任何一个语音都由声源激励、声道共鸣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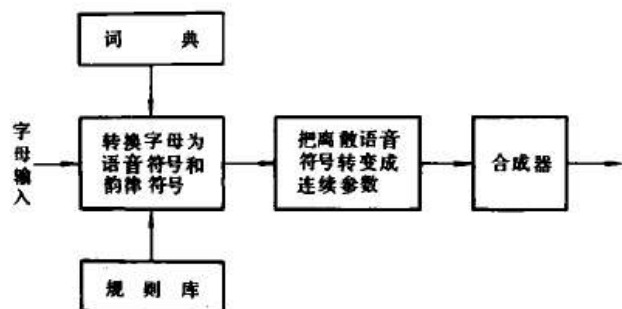


图2 规则合成系统的原理框图

口鼻辐射这3个过程产生。语音不同,产生该语音的一套声学参数也不同。这些参数有:控制音高的基频(对浊音而言),控制音强的振幅,控制音长的时间,控制音色的频谱包络,共振峰频率及带宽,线性预测系数(LPC),声道截面函数或调音参数等。用这类参数按照一定的规则来控制具体的合成器,就能合成出预定的语音或语句。

第1步,通过语音分析技术获得各种语音的上述基本参数,再通过语音学上的分析,归纳出由音素组成音节、由音节构成词组或句子时的各种规则,然后,将这些参数和规则存入计算机的存储设备中。合成时,计算机首先根据所选用的转换规则将输入的文本字母转换为一串音素符号。这一过程,或者通过字母-音素转换程序来完成,或者通过查寻存储好的发音词典来完成。与此同时,计算机还检查文本的句法,根据规则和词典决定音素序列的韵律符号。第2步,将这些离散的符号序列转变成一串连续变化的参数序列和数学函数,这些参数随时间平滑变化,它们携带着待合成的语音的频谱特征和韵律特征。第3步,用这些依时变化的声学参量再去控制具体合成器或合成程序,合成出预定的语音或语句。

具体合成器有终端合成器和调音合成器等类型。终端合成器多以共振峰为控制参数(也称共振峰合成器),

用滤波器组来模拟语音的频谱特征,使得最终合成出的语音谱包络逼近自然语音的谱包络。调音合成器则是以发音模型为基础,用几个发音参量来描写发音过程,这些参量通过规则转换出声道截面函数序列,进而控制合成器,合成出相应的语音。图3是一种发音模型的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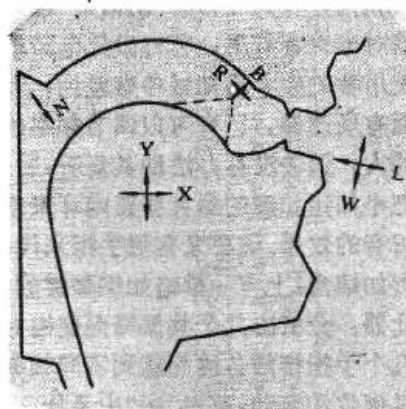


图3 一种发音模型示意图

图中L和W描写唇的合、撮和开口度,R和B描写舌尖的移动,X和Y描写舌体活动,N描写软腭的升降。对语音研究来说,共振峰合成器和调音合成器都有实用价值。

② 单元编辑合成系统。事先存入一套语音单元中每一单元的一小段数字波形,存入的单元可以是音素或音节,或者是某音素的脉冲响应波形。例如,存入所有浊音音素的一个周期的波形。合成时,将这些单元选择性地连接起来。

③ 录音编辑合成系统。事先把待输出的语句、短语、单词等进行录音、压缩和编码,然后存入计算机。使用时,在既定的指令串控制下,计算机对存入的信息进行检索、编辑和解码,输出话音。这种系统有如一种低数码率的录放机。

3种语音合成系统性能比较

类型	存储单元	存储量	系统构成	输出量	音质	与语音学关系
录音编辑	句、词	大	简单	小	良	不密切
单元编辑	音素、音节	中	较简单	大	不良	密切
规则合成	参数、规则	小	较复杂	大	良	较密切

在录音编辑合成系统中,存入的是原始语音的波形,所以还原出的语音音质比较自然,系统的构成也比较简单,整个合成过程所涉及的语音学知识不多。但由于受到计算机存储容量的局限,人们不可能把日常交谈和阅读时所使用的各种词汇和语句都存入计算机,只能按不同用途存入有限的语句和词汇,应用上受到较大的限制。

在单元编辑合成系统中,存入的是音节或音素,而一种语言的音节或音素数目总是有限的,例如汉语的音素只有30多个,以这些音素拼成的音节只有400多个。显然,这种方式能以较小的存储量来满足较大的词汇量输出的要求。例如,自然发出的“合成器”一词有一秒的时长,在录音编辑合成系统中,对此一秒的声波要取1万个点(即采样频率10千赫),每一点的数位编成12位的代

码,那么,存储量将是120千位。但“合成器”一词由7个音素组成(用汉语拼音注音为hé chéng qì),如果在某单元编辑合成系统中,为每一音素存10毫秒的波形,合成此词时只需0.84千位。但是,实际的发音动作是连贯的,一个音节由几个音素构成时,各音素间有许多变体,音节和音节之间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协同发音等关系。所以,编辑拼接时要作大量语音学上的处理。目前,这类处理技术还不太完善,因此这种系统虽然能输出的词汇量比录音编辑的多得多,存储量又小得多,但合成的音质不如录音编辑系统。

在规则合成系统中,存入的是描写语音特性的各种参量而不是波形本身,所以所需存储量比两种编辑合成系统小得多,而它能输出的词汇量是很大的,甚至是无限的。不过,在规则合成系统中,处处依赖编定的规则,语音现象又那么复杂,各音素或音节之间又相互影响,以致要归纳出比较系统的和完善的规则是不容易的。

目前,国内外对上述3种类型的语音合成系统都正在大力开发之中,有的系统已开始用于自动报时、天气预报、自动报电话号码、汽车自动报警、语音教学、导游语词翻译、发音玩具等方面。有的系统和语音自动识别系统合为一种应答系统,用于车站、机场自动售票业务等。在一种盲人助读系统中,输入文字后,系统就能流利地朗读起来。

见声学语音学、言语识别。

参考书目

J. L. Flanagan, L. R. Rabiner(ed.), *Speech Synthesis*, Dowden, Hutchinson and Ross Inc., Stroudsburg, 1973.

(吴宗济 杨顺安)

yanyu shibie

言语识别 (speech recognition) 机器自动识别言语的专门用语。这里的言语指话音,不是指书面语言,机器指电子计算机或由它构成的系统。

言语识别的研究内容极其丰富。从话音的发音情况和所要识别的单位看,可以分成两大类:单呼言语的识别和连呼言语的识别。从机器是否要预先训练来看,又可分为专人言语识别和通用言语识别。从机器听从话音的指挥角度来看,又有语言理解的专门系统等等。

单呼言语识别 发音时每发一次识别单位(单字、词、词组或短语、语句),必须停顿一下,停顿时间一般要求100~150毫秒,而每个单位(例如短句)内部不允许短于100毫秒。例如,口呼地名的识别,一个地名与另一个地名之间要求隔开100毫秒以上,但是在一个地名内部不得超过100毫秒的间隙,一个地名作为一个单位来识别,而并不识别一个地名由哪些字音构成。

连呼言语识别 发音人一口气说了一些话,字音之间不存在间隙,而是连续发音,要求机器识别话中每一个字。例如说“北京”这两个字音,要求机器识别“北”与“京”两个字。这就存在着音节切分的问题。要将“北”与“京”两个音的分界点找出来,可根据第二字的辅音来判

断;但如果第二字的辅音是浊音或是零声母,切分就非常困难。

专人言语识别 机器要求发音人首先把所用的字表念一遍或几遍,以适应这个发音人的特点,识别这个专门人的话音。当换一个人发音时,一般识别精度会明显下降。

通用言语识别 不用训练,机器即能识别很多人在一定范围内的话音。不用训练,指不需要适应专门人的临时训练。国外发表的一些实验结果,虽然能够与专人言语识别系统的结果相比拟,但是在计算机里存放的信息远较专人言语识别系统多。

语言理解系统 发音人说话后,计算机能懂其意思,并能分析关键字的含义,而不必逐字逐句地识别,这叫做语言理解系统。

发音人的识别与验证 从话音来识别发音人,称发音人的识别。发音人的验证是让机器对话音及发音人作出是与否的判定。

目前通行的言语识别系统的工作原理

① 模式匹配法的识别:以专人单呼言语识别系统为例,最常见的是“模式匹配法”。假定要求计算机能识别100个口呼中国地名(“北京”、“上海”、……),用户就得按照100个地名表,逐个训练计算机——呼一遍或几遍,计算机在它的存储器里建立参考模式,每个地名有一个或几个参考模式,用户可以随便呼出地名表中的任何一个地名,计算机将新呼进来的语音模式(参数)与存好的参数模式,逐个地进行比较,算好未知语音模式与每个参考模式的距离(或相似性),根据这个距离表,找出距离最小者(或相似性最好者)所对应的参考模式,从而判定发音人发的是哪个地名。构成模式的参数,一般用短时频谱数据。分析语音的短时频谱,可以用软件对经过模/数转换后进入计算机的数字式语言波来完成,也可以用专门的硬件——滤波器——组(模拟的或数字式的)来分析,这称为前置分析(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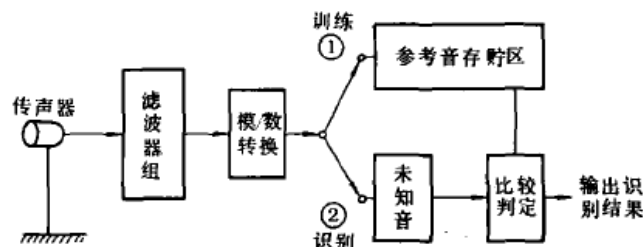


图1 模式匹配法识别系统的简单框图

② 特征提取法的识别:应用提取语音的声学特征来识别语言,与模式匹配法不同。这种系统较为复杂,它需要对语音的参数和变量进行大量而细致的研究,一般要对每一个语音特征作出最优比较选择,排除无关的数据,把那些似同实异的音区别开来。事实上择优办法也是两种方法的合用。首先在音素方面要有显著的层次,例如蜂音与啞音(浊音与清音),送气与不送气,音节切分,声

调模式等;其次用模式匹配法来识别一系列音素构成的模式。对于采用多大的语音单位,有人认为以音节或更大一些的语音单位来识别,比把音节分割成若干音素更为合理。目前,用这种方法识别比模式匹配法误识率大。特征提取法识别系统已有很多,这里介绍一种 APEL (声学-语音学单元)提取特征系统的框图作为代表(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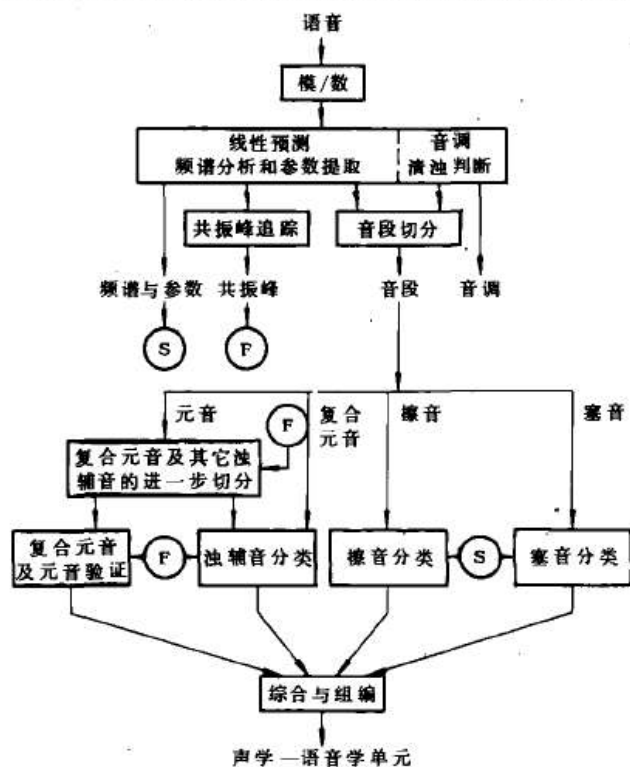


图2 声学-语音学分析系统框图

目前国内外言语识别的水平 专人单呼言语识别已达到实用阶段,国际市场上已有十多个商品,从简单的用几条口令的声控玩具到用上百条口令的电话订票系统。国外水平高一点的均采用动态规划的办法进行时域方面的伸缩匹配。国内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的言语识别组采用非线性时域规正的办法,将每一个言语图样规正为同样大小的图样,匹配比较时,只需一时一地进行比较,避免了动态规划技术耗时长,难以在计算机上进行实时识别的问题。连呼言语识别在国外的实验室里正进行着大量的研究。目前国外的个别商品据说能识别连呼言语,但与实用尚有距离。

就目前人们所掌握的技能来说,下列项目已经能够实现声控:如自动分检邮包,机器人的动作,传输带上的产品检验,话控锁,数据输入并算帐,一定范围的编辑系统,军事指挥命令的下达,航天器上的仪器操作,生产线上的控制等等,言语识别的研究成果还将深入到家庭,如声控开门、关门、拉窗帘、电视开关选台、电话拨号、家用机器人等等。

参考书目

S. R. Hyde, *Automatic Speech Recognition: A Critical Survey and Discussion of the Literature*, E. E. David, Jr. (ed.), *Human Communication: A Unified View*, McGraw-Hill Book Co., New York, 1972.

D. R. Reddy(ed.), *Speech Recognition*, Academic Press, New York, 1975.

(吴宗济 俞铁成)

yanyu

谚语 (proverbs)

人民口里常用的现成的话。谚语类似成语,但口语性强,通俗易懂,而且一般都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形式上差不多都是一两个短句。例如“吃一堑,长一智”,“远水不解近渴”,“吹什么风,落什么雨”,“忙中必有错”,“笨鸟儿先飞”之类,都是人民在生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带有实际经验的话。谚语内容包括极广。有的是农谚,如“清明前后,栽瓜种豆”,“六月六,见谷秀”。有的是事理谚,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有志者事竟成”。有的属于生活上各方面的常识谚,如“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七九河开,八九雁来”,“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等等。类别繁多,不胜枚举。谚语跟成语一样都是语言词汇整体中的一部分,在表达思想感情方面可以增加语言的鲜明性和生动性。

(周祖谟)

Yang Xiong

扬雄 (公元前 53~公元 18) 中国西汉时期文学家、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字子云,蜀郡成都人。成帝时为给事黄门郎。王莽时,校书天禄阁,官为大夫。以事被株连,投阁自杀,几死。少好学,博通群籍,多识古文奇字,



长于辞赋,早年作有《长杨赋》、《甘泉赋》、《羽猎赋》等。后来以为“辞赋非贤人诗赋之正”,谓为“雕虫篆刻,壮夫不为”,遂鄙薄辞赋,转而研究哲学和语言文字学。著《法言》、《太玄》,提出以“玄”作为宇宙万物根源的哲学观点,强调如实地认识自然现象的必要,并认为“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驳斥了神仙方术的迷信。

在社会伦理方面,崇尚儒家学说,主张一切言论应以“五经”为准则,反对老庄“绝仁弃义”的观点。于语言文字学,所著《方言》叙述西汉时代各地方言,被誉为中国方言学史上第一部“悬之日月而不刊”的著作,在世界方言学上也具有重要地位(见《方言》、《汉语方言》)。又续《仓颉篇》,编成字书《训纂篇》。扬雄著作除《法言》、《太玄》、《方言》外,原有集,已散佚。明代张溥辑有《扬侍郎集》,至清代严可均所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收其赋、箴等共4卷,最为详备。

(许宝华)

yangdiao

阳调 指汉语一个声调里浊声母的字分化出来以后形成的调类,调值一般比清声母字调低。在中国各方言里,平声分阴阳最普遍。

见阴调。

(俞敏)

Yang Shuda

杨树达 (1885~1956) 中国语言文字学家。字遇夫,号积微,湖南省长沙市人。生于1885年6月1日,卒于1956年2月14日。1897年,杨树达考入时务学堂。1905年,官费赴日本留学,辛亥革命后回国,在湖南省从事教育工作,任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国文教员。1920年在北京各大专院校任教。1924年,任北京高等师范(今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主任教授。1926年后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湖南大学教授等职。1949年以后,当选为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委员。

杨树达初治经书。留学日本时,参考日语和英语语法著《中国语法纲要》(1928)。他认为《马氏文通》有误解古书之处,因作《马氏文通刊误》(1931)。后又成《高等国文法》一书,虽大体仿马建忠之作,而于《总论》略取胡以鲁、胡适之说,于词头中稍采陈承泽、章士钊之说。撰刘淇《助字辨略》、王引之《经传释词》之精英,着重虚词和句读,揭示了文言语法的一些规律,是30年代的一部重要语法著作。其后又将《高等国文法》加以改编,打破语法体系,以词为纲,以注音符号为次序,另成《词诠》一书。全书收虚词472个,“首别其词类,次说明其义训,终举例以明之”(《词诠·自序》),集《马氏文通》以来虚词研究之大成,较之《助字辨略》等书,不但词性明确,而且论证坚强,举例详赡,至今还是检查古汉语虚词的工具书。杨树达还著有《中国修辞学》(1933),他“沉浸于旧闻而以钩稽之法出之”,深造自得,自成体系,无所依傍,198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出版。

杨树达在文字训诂学方面,平生精治许慎《说文解字》,又服膺段玉裁和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治学精神和成果。晚年治甲骨金文,有《积微居甲文说》、《卜辞琐记》(合订一本,1954)、《耐林廌甲文说》、《卜辞求义》(合订一本,1954)、《积微居金文说》(1952)、《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1937)、《积微居小学述林》(1954)等书。

除语言文字学外,杨树达对《汉书》用力极勤,最初写出《汉书补注补正》。1953年又把30年来多次温读《汉书》的心得,博考群籍,以及汉代文物,成《汉书窥管》。另有《汉代婚丧礼俗考》、《淮南子证闻》(1953)、《积微居读书记》(1962)、《盐铁论校释》(1957),后两种由他的侄儿在他身后整理而成。

(杨伯峻)

Yaowen

瑶文 (Yao writing) 见勉语。

Yaoyuzhi

瑶语支 (Yao branch) 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的



语支之一。中国境内自称“勉”的瑶族语言(见勉语)和海南岛自称“金门”的苗族语言,以及越南、泰国、老挝、缅甸的瑶语都属这个语支。在中国主要分布于广西、湖南、云南、广东、贵州和江西等6个省(区)的部分山区。使用人口约70万(1982)。与广西、云南毗邻的越南、泰国、老挝以及缅甸的一些山林地带也有使用者。这个语支的声母、韵母、声调都有逐渐简化的趋势。塞音和塞擦音声母清浊对立,浊的塞音和塞擦音声母同苗语支某些语言带鼻冠音的塞音和塞擦音声母相对应。送气音声母基本上出现在汉语借词中。韵母比声母复杂。元音一般长短对立。辅音韵尾有6个:-m、-n、-ŋ、-p、-t、-k。声调通常有8个,同古声母的清浊有密切关系。变调与构词有一定的联系。虚词和词序是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名词、代词、状词和数量词组作修饰语时在中心词前,形容词作修饰语时一般在中心词后。数词有两套,10以内的用固有词,10以上的用借词。句子语序是:主语在谓语前,宾语、补语都在谓语后。词根基本上是单音节的,带附加成分的词不多,有的附加成分已逐渐脱落。

(毛宗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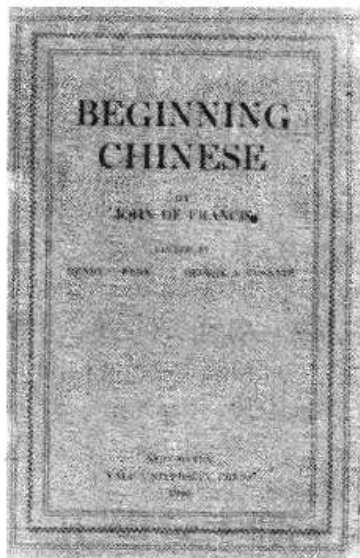
Yelu Fang'an

耶鲁方案 (Yale Spelling System) 美国耶鲁大学远东语言研究所 G. A. 肯尼迪于1943年拟订的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的方案。习惯上称为耶鲁方案。

1943年初,美国一批新学员包括即将来华参加抗日战争的军人集中到美国耶鲁大学,进行短期训练,学习汉语。为了适应这一需要,由肯尼迪负责拟订了一个拼写汉语的拉丁字母方案。这个方案主要用来编写汉语的口语教材,供学员作会话练习。如美国夏威夷大学 J. 德弗朗西斯编写的汉语教材《中国语初步》(1946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初版,1963年再版时改用汉语拼音方案)和 M. G. 图克斯伯里编写的《讲中国话》(1948)等,都是采用耶鲁方案直接拼写汉语口语(按词分写,不注汉字)的教科书。

耶鲁方案的主要特点是:①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②用 b、d、g 表示不送气清塞音, p、t、k 表示送气清塞音,不再使用送气符号;③用 y、w、yw 表示介音,如 tyān(天)、gwó(国)、jywé(觉);④用 r[ɿ]、z[ɿ] 分别表示两个舌尖元音(即“知”、“资”后面的元音);⑤用符号表示声调:第一声“—”,第二声“/”,第三声“v”,第四声“\”;⑥实行按词分写。

根据《中国语初步》和《讲中国话》归纳出的耶鲁方案



用耶鲁方案编写的汉语教材

的声、韵、调如下:

声母

b [p]	p [p']	m [m]	f [f]
d [t]	t [t']	n [n]	l [l]
g [k]	k [k']	h [x]	
j [tɕ]	ch [tɕ']	sy [ɕ]	
j [ɕ]	ch [ɕ']	sh [ʂ]	r [ʐ]
dz [ts]	ts [ts']	s [s]	

注: j [tɕ], ch [tɕ'] 用在齐齿呼和撮口呼之前;

j [ɕ], ch [ɕ'] 用在开口呼和合口呼之前;

sy [ɕ] 如果放在用 y 开头的韵母前面时, 省掉一个 y。

例如: syān (先), sywé (学)。

韵母

a [a]	eng [əŋ]	yan [ien]	wan [uan]
o [ɔ]	er [əʔ]	in [in]	wen [uen]
e [ə]	r [ɻ]	yang [iaŋ]	wang [uaŋ]
ai [ai]	z [ʅ]	ing [iŋ]	ung [uŋ]
ei [ei]			
au [au]	i (y) [i]	u (w) [u]	yu (yw) [y]
ou [əu]	ya [ia]	wa [ua]	ywe [yɛ]
an [an]	ye [ie]	wo [uo]	ywan [yen]
en [en]	yau [iau]	wai [uai]	yun [yn]
ang [aŋ]	you [iəu]	wei [uei]	yung [yŋ]

声调

阴平	-	fēiji (飞机)
阳平	/	píng cháng (平常)
上声	ˇ	nǐ (你) dzǎu (早)
去声	ˋ	kwài (快) chyù (去)

注: 轻声不标符号。

拼写举例 (录自《中国语初步》)

B: Dzài lái dyár chá ba.

再来点儿茶吧。

M: Hāu. Jèige chá butswò. Wōmen dzài Měigwó

好。这个茶不错。我们在美国

hēde chú chābudwò dōu shì Yīndù láide.

喝的茶差不多都是印度来的。

Méi Jūnggwó chá hāu.

没中国茶好。

(尹斌庸)

Ye'ermusillefu

叶尔姆斯列夫, L. (Louis Hjelmslev 1899~1965)

丹麦语言学家, 哥本哈根学派的创始人和主要理论家。生于 1899 年 10 月 3 日, 卒于 1965 年 5 月 30 日。出身于学者家庭, 从小爱好语言学, 1923 年毕业于哥本哈根大学, 1937 年起回母校任教, 主持比较语言学系。

1926~1927 年, 叶尔姆斯列夫在巴黎结识 J. 房德里耶斯和 A. 梅耶, 开始接触 F. 索绪尔的理论。1928 年, 他出版《普通语法学原理》。这本书描写语言的范畴, 明

显地反映出索绪尔关于语言是符号系统的观点和 E. 萨丕尔的概念范畴的影响。后来, 他又出版《格的范畴》(2 卷, 1935~1937), 明确地站在结构主义的“内在性”和“价值”观念的立场上阐述和描写格系统的理论基础。



1931 年, 叶尔姆斯列夫发起成立哥本哈根语言学学会。他和 H. 乌尔达尔 (1907~1957) 合作, 研究语音学和音位学, 写出了《音声学原理》, 1935 年在第二次国际语音学家大会上提出。接着, 他们把音声学发展成一般性理论, 创立“语符学”, 1936 年在国际语言学家大会上提出。1943 年, 叶尔姆斯列夫用

丹麦文出版《语言理论基础》一书, 这是语符学理论的代表性著作, 讲语言的共时研究。至于语言的历时研究, 他在《语言》(1943 年写, 1963 年出版) 一书中归入类型学语言的范围。

见哥本哈根学派、索绪尔。

(叶蜃声)

Yesibosen

叶斯泊森, O. (Otto Jespersen 1860~1943)

丹麦语言学家。1860 年 7 月 16 日生于兰内斯, 1943 年 4 月 30 日卒于哥本哈根。在哥本哈根大学学法语、英语和拉丁语, 1887 年得硕士学位。以后到伦敦、牛津、莱比锡、巴黎各地, 与当时的语言学界名人接触, 尤其得力于 H. 斯维特的教导。1891 年得博士学位。1893~1925 年任哥本哈根大学英语教授, 1920~1921 年曾任校长。

关于语言, 叶斯泊森有两个主要论点。一是语音和语法是外部形式, 意义是内部形式, 声音与意义有密切关系, 语音变化往往有意义因素, 因此, 他不赞成德国新语法学派的“语音规律无例外”的说法。二是印欧语系古代语言词法系统复杂, 近代语言词形变短, 语法系统简化, 这是进化, 不是讹误或退化。这些意见见于他的主要著作《语言: 它的性质、发展和起源》一书 (1922)。

叶斯泊森自青年时代起就对语音研究有兴趣, 他的《语音学》一书 (1897~1899) 是语音学的名著之一。他改革丹麦的英语教学法, 所编英语教材 (1895) 连续出了 19 版。

关于语法, 叶斯泊森认为讲句法应从意义到形式, 讲词法应从形式到意义。在《语言哲学》(1924) 中, 他把句法结构分为“接合”和“串连”两种, 前者如 The furiously barking dog (狂吠的狗), 后者如 The dog barks furiously (狗在狂吠)。他说, 在这两种结构中 dog 在等级上都是



“一品”,barking,barks 都是“二品”,furiously 都是“三品”。这个说法在 20 世纪 40 年代对中国的语法学家王力、吕叔湘有影响,但是“接合”是词组,“串连”是句子,结构不同,barking 与 barks 不应都算是“二品”。

叶斯泊森的英语史研究很精到,著有《英语的发展和结构》(1905)和 7 卷本的《近代英语语法》(1909~1949,最后两卷由助手续成)。1937 年他出版了《分析句法》,用符号来讲句法结构。

1928 年他创制了一种辅助性语言,名为 Novial,是“新国际辅助语”的缩写。英国文学家 G. B. 萧伯纳对它表示赞许,但后来不像世界语那样为人们所接受。

见新语法学派。

(刘保山)

Yiqiejing Yinyi (Huilin)

《一切经音义》(慧琳) 解释佛经字义的书。唐代翻经沙门释慧琳撰。唐贞观间玄应曾撰《众经音义》25 卷

(后来也称为《一切经音义》)。慧琳这部书所注的是贞观以后新翻译的经论和玄应没有注过的一些书,凡 100 卷,始于《大般若经》,终于《护命法》,总 1300 部,5700 余卷。他把玄应音和慧苑华严音义也收纳在一起,可以说是一部佛经音义集成成的书。据卷首试太常寺奉礼郎景审序称,大兴善寺慧琳法师姓裴氏,疏勒国人,为不空



慧琳撰《一切经音义》

三藏弟子,精于密教,对华夏文字声韵和印度声明都很有研究。书中所定字音以元庭坚《韵英》和张骥《考声》为准则;释义以《说文解字》、《字林》、《玉篇》、《字统》、《古今正字》、《文字典说》、《开元文字音义》等书为主,兼考经史注释,训诂典籍,用力 20 余载,以德宗建中末年(783)创制,至宪宗元和二年(807)才完成。元和十二年(817)二月三十日绝笔于西明寺。慧琳事迹也见于宋赞宁《宋高僧传》,惟说起笔于德宗贞元四年(788),迄元和五年(810)绝笔,以元和十五年庚子(820)卒于所住,春秋八十四。跟景审所述略有不同。但景审为当时人,似当以景审所说为是。

慧琳书成于中唐时期,所见古书极多。审辨声音,诂解字义,原原本本,较玄应书为详。论音,主秦音,不取吴音。如卷四“浮泡”条下注云:“上辅无反。《广雅》:浮,漂也。郑注《礼记》:在上曰浮。贾注《国语》:浮,轻也。《说文》:泛也。从水孚声也。吴音薄谋反,今不取。”案“薄谋反”是《切韵》音,当为六朝相传的旧音,“辅无反”当为《韵英》音,是唐代的北方音。慧琳采用当时的读法,是有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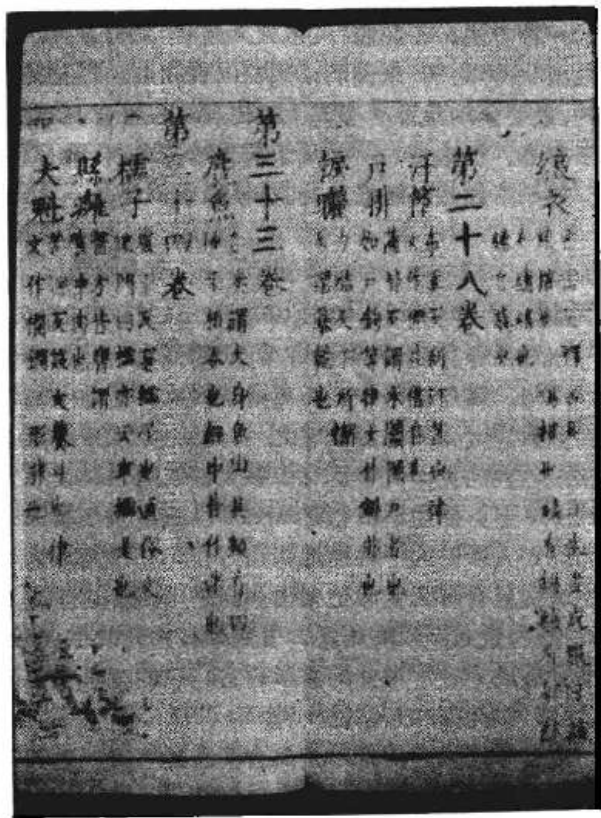
理的。其中解说字义,辨析字形,详引书证,不仅对研究文字训诂有用,而且对辑录古书、校勘古书也大有功用。

此书以高丽藏本最善。通行的为 1737 年日本狮谷白莲社翻刻本。民国十三年(1924)丁福保有影印本,并附通检,极便应用。近年海外已翻印有高丽藏本,行款保持原本之旧,字大悦目,较丁本清晰。(周祖谟)

Yiqiejing Yinyi (Xuanying)

《一切经音义》(玄应) 解释佛经字义的书。唐代大慈恩寺翻经沙门释玄应撰,凡 25 卷。《唐书·艺文志》著录,称《众经音义》,当为原来名称。考大藏经唐释道宣《大唐内典录》和本书道宣(终南太一山释氏)序都标题为《大唐众经音义》。今题《一切经音义》是由唐智昇《开元释教录》所改。此书存于释藏中。释玄应的事迹即见于《大唐内典录》。《内典录》说:“大慈恩寺玄应法师以贞观末历敕召参传,据拾藏经为之音义,注释训解,援引群籍,证据卓明,焕然可领。恨叙缀才了,未及复疏,遂从物故。”(《开元释教录》同)《内典录》作于高宗麟德元年(664),由此可知玄应当卒于麟德元年以前。玄应以前北齐沙门释道慧曾为《一切经音》。玄应继踵前修,又有撰集,所以深为当时人所重视。

此书仿陆德明《经典释文》例,从经中择字为注,形音义三者兼顾。梵语名号也一律注明音读,解说所译文字当否。注文中所引古书,除经传注释以外,以古字书训诂书为多。《尔雅》、《方言》、《说文解字》、《广雅》、《释名》、《玉篇》之类是今天还存在的;其中如《仓颉篇》、《三仓》、《通俗文》、《古今字诂》、《埤仓》、《声类》、《韵集》、《字林》、



玄应撰《一切经音义》

《字书》之类早已亡佚。清代学者发现这部书以后，从中辑录出多种佚文训释，对研究古代训诂极为有用。

《大藏经》有北藏板，有南藏板。南藏，明洪武刻于南京；北藏，明永乐刻于北京。乾隆五十一年(1786)武进庄圻官于咸宁，曾用咸宁大兴善寺南藏本刊行，并同钱坫、程敦、洪亮吉、孙星衍等人校订文字。然大都宗主《说文》，所说不尽妥当。同治间杭州曹鑑又翻刻本书，但讹误尚多。1935年商务印书馆影印南宋苏州陈湖延圣院磉砂藏本，一语一行，极为清楚，讹字也少，仍保留唐本面目。敦煌石室所藏书中有一部分残卷可资参证。国内还有山西赵城藏本。国外藏有高丽藏本。日本又有大治年间释觉严手抄本，略胜国内刻本。日本学者山田孝雄曾以大治本配高丽藏本编为一书，足供校勘之用。

(周祖谟)

yishengzhizhuan

一声之转 训诂书中解说两个词声音相同，语义相通，往往称之为“一声之转”。换言之，就是有双声相转的关系。例如王念孙《广雅疏证》解释《释诂一上》“撈、略，取也”这一条时说：“撈，通作劳。《齐语》‘牺牲不略，则牛马遂’。《管子·小匡》篇作‘牺牲不劳，则牛羊育’。劳、略一声之转，皆谓夺取也。”又《释诂四下》“蔞、菸、痿，慈也”一条，《疏证》说：“皆一声之转也。蔞者，《说文》：‘蔞，菸也。’……菸者，《说文》：‘菸，痿也。’……痿者，《说文》：‘痿，病也。’《小雅·谷风》篇云：‘无木不萎’。萎与痿亦同。《众经音义》卷十云：‘今关西言蔞，山东言蔞，江南言痿’。慈者，《玉篇》云：‘败也、萎慈也’。”撈略二字为来母双声字，蔞、菸、痿、慈等字为影母双声字，所以《疏证》都分别说明是一声之转。由双声说明词义之相通，这是训诂学上很有用的一种方法，在郝懿行《尔雅义疏》中更为常见。但是单纯用“一声之转”来说明语义相同或相近，那还是很不够的，最要紧的是要有书面上的佐证。佐证有两种，一是见于字书、训诂书，一是见于前人的文章内有明确的用例。如果不如此，随意立论，往往陷于错误。

(周祖谟)

Yidtyu

依地语 (Yiddish language) “依地”原义“犹太”，依地语即犹太语，在语言学上又称犹太德语(Judeo-German)。属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西支。这是中欧和东欧大多数犹太人的主要语言之一，此外，居住在美国、南非和以色列的犹太人中也有少数人说依地语，使用人口共约400万。依地语最初是9~10世纪居住在德国西南部的犹太人所讲的一种高地德语方言，它跟高地德语的主要区别是含有大量希伯来语词。14世纪，这些犹太人大批东迁，进入斯拉夫语区，受到斯拉夫语的很大影响，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语言。它的方言主要分西部、中部、东北部和东南部4种。

语言学家认为依地语是溶合多种语言的产物。它的语音模式基本上与德语相同，但增加了一些斯拉夫语的咝音和腭化辅音，词法也基本与德语相同，语词来源主要

有3个：来自德语的约占80%，来自希伯来语和斯拉夫语的约各占10%。在表示指小词、轻蔑词、动词前缀和开始完成体的意义，以及句法方面，受斯拉夫语的影响很大；希伯来语则在语音、词汇和语法3个方面对依地语产生一定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使用依地语的人口曾超过1000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欧和东欧的犹太民族经过战乱，人口锐减。战后随着年轻的犹太人越来越多地选择居住国的语言而放弃依地语，它的使用人口继续下降，甚至在以色列，一度逐渐被现代希伯来语所取代。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犹太学者的提倡和优秀文学作品的出现，依地语的使用者又逐渐增多。

依地语采用希伯来字母，自右至左书写。

(沈雁冰)

Ylwen

彝文 (Yi writing) 中国彝族使用的一种表意的单音节文字。从形体上看与汉字很接近，实际不是从汉字蜕变而来，可能是仿汉字造字方式创造的。如彝文中也有象形、指事文字(图1)。以象“头”，以象碗



图1 彝文

中的饭； (气)，字中的点，指出气处。还有以较突出的部分象形的，如非(脸)，突出鼻形。也有近似汉字的会意字，如 (孵)，表示鸟在有卵的巢上孵雏的意思。彝文文献古籍较多，主要是手抄本，刻本较少。较古刻本《太上感应篇》译述，全文2.29万字，是今存彝文木刻本文字最多的一部书。金石彝文，过去中外学者认为最早见于明代刻石，如云南楚雄自治州禄劝县的《镌字崖》，刻有彝、汉两种文字，是明嘉靖十二年(1533)的刻石。今贵州大方县安氏土司彝汉两种文字的《千岁衢碑记》，镌于嘉靖丙午年(1546)。近年来贵州大方县发现的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的铜钟(图2)，钟面铸有彝、汉两种文字，较上述刻石早60多年，是现存最早的彝文文献。大方县水西大渡河石桥建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桥上刻有彝、汉两种文字的碑记(参见彩图插页第28页)。彝文记述了水西土司安氏世代的历史，共有1922个字，是现存字数最多的彝文刻石，也是研究彝族社会历史、风俗习惯的珍贵资料。从文字发展规律看，彝文字数较少，因而彝文经书手抄本中大量借音表意。彝语有6个方言，各地方言

差异较大,假借文字也因地各异,这是彝文经书难解的原因之一。为使彝文能更好地为各方言区服务,四川凉山彝族地区以喜德语音为标准音、以圣乍话为基础方言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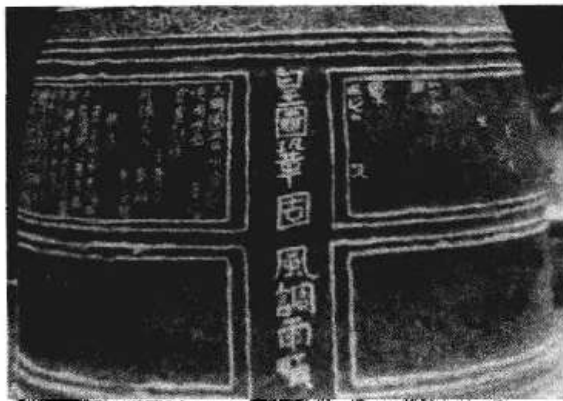


图2 铸有彝汉两种文字的铜钟

订了《四川彝文规范方案》,共确定 819 个规范彝字,于 1975 年开始在四川彝族地区推广使用,并设计了拉丁字母的“彝语拼音方案”,便于注音学习。(马学良)

Yiyu

彝语 (Yi language) 又称罗罗语(Lolo)。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主要分布在中国云南、四川、贵州、广西 4 省(区)以及越南、缅甸、泰国境内。中国境内彝语的使用人口约 400 余万(1982),分为北部、东部、南部、东南部、西部、中部 6 个方言。主要语言特点:①塞音、塞擦音、擦音分清浊两套。许多地区的塞音、塞擦音还有带与不带鼻冠音的区别。②除少数方言外,元音一般分松紧,但只在某些声调的音节里构成对立,如北部方言只在 33、44 两调的音节里对立。③韵母一般由单元音构成,没有塞辅音韵尾,但泰国碧栗彝语有 -p、-t、-k 韵尾。云南、贵州部分地区有少数复元音、鼻化韵和鼻尾韵。④有 3~5 个声调,调型简单。⑤词序和虚词是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基本语序是主语—宾语—谓语。⑥名词、动词、人称代词作定语时,在中心词前;形容词、数量词作修饰语时,在中心词后。有些副词修饰双音节中心词时,在中心词的两个音节之间。⑦量词丰富,有些方言的量词能直接修饰中心词,起后置冠词的作用。如北部方言量词起不定冠词的作用,东部方言部分地区量词起定冠词的作用。⑧有的方言有标志各种句子成分(包括主语、宾语)的结构助词。⑨一部分动词的自动态和使动态,用辅音清浊交替表示,如威宁彝语 gu⁵⁵(穿衣)、ku⁵⁵(使穿)。⑩有些方言以谓语动词、形容词的重叠、变调表示疑问,如凉山彝语 dzu³³(吃)、dzu⁴⁴dzu³³(吃吗?)⑪单音的词和词根占优势,构词后缀多,前缀少,复合词多,单纯词少。⑫四音格联绵词较丰富。(陈士林)

Yiyuzhi

彝语支 (Yi branch) 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语支之一。包括彝语、哈尼语、傈僳语、拉祜语、纳西语、基

诺语。主要分布在中国云南、四川、贵州、广西四省(区),使用人口约 630 余万(1982)。此外,还分布在缅甸、泰国、老挝、越南等国境内。

除哈尼语部分方言外,彝语支各语言的辅音都分清浊两套。除纳西语、彝语、哈尼语的部分地区外,各语言的元音全部或部分松紧对立。清浊辅音、松紧元音的出现,大都同辅音类别、声调性质有一定的制约关系。如傈僳语的清辅音在各调都出现,而浊的塞音、塞擦音主要出现在 33 和 31 两个调上;又如凉山彝语松紧元音只在 33 和 44 两调上对立;哈尼语松紧元音只在浊声母和清擦音声母后对立。韵母全部或大部是单元音,纳西语、傈僳语和彝语在云南、贵州的方言有少数复元音。没有塞辅音韵尾(泰国碧栗彝语有 -p、-t、-k 韵尾)。有 3~5 个声调,调型简单,没有曲折调。词序和虚词是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句子语序是主语—宾语—谓语。名词、动词、人称代词作名词的修饰语时,在中心词之前,形容词、数量词作修饰语时,在中心词之后。量词丰富。有的语言有标志各种句子成分(包括主语、宾语)的助词。单音的词和词根占优势。复合词多,单纯词少。彝语、傈僳语、纳西语、哈尼语、拉祜语有文字。与彝语支有一定关系而支属尚未最后确定的有白语、土家语等。

(陈士林)

Yifu

《义府》 训诂书。明末清初学者黄生撰。黄生字扶孟,别号白山,安徽歙县人,生于明熹宗天启二年(1662),卒年不详。在明为诸生,入清未仕。精通文字声音训诂之学。

《义府》分上下两卷,以解释经史子集书中的词语文句为主,附带诠释宋代赵明诚《金石录》、洪适《隶释》、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所载古碑文和梁陶宏景《周子良冥通记》中的一些词语,考证详明,无凿空臆断之论。如解《书·皋陶谟》“天明畏”即“天明威”。解《召诰》“厥既得卜,则经营”,释经营为“相步其基址也”。解《周书·武成》“血流漂杵”为“血流漂榘”,榘为大盾。解《诗·邶风》“死生契阔”,契阔为合离,跟死生同为对言。解《孟子·公孙丑下》“寡人如就见者也”,“如”作“宜”讲。解《周礼·考工记·玉人》“大圭,杼上终葵首”,谓斜锐其上,首作锥形。“终葵”二字为“椎”字之切音,急言之曰椎,缓言之则曰终葵。如此之类都精确不易。书中解释《史记》、《汉书》的词语,驳正前人误解处尤多。他深知字音相近往往通用,音转字变,而义不变,所以能有所发明,刊正前人之谬误。考证之功力与方以智(1579~1671)的《通雅》不相上下。

黄生还作有《字诂》一卷。《字诂》跟《义府》原只有抄本流传,乾隆时收入《四库全书》。道光间,黄生族孙黄承吉(字春谷,江苏江都人)从文宗阁《四库全书》本过录,把两书合为一书,并加按语,题为《字诂义府合按》。《安徽丛书》即据黄承吉本影印。《字诂》、《义府》两书也见钱熙祚所刊《指海》内。《丛书集成》根据《指海》本排印。

见《字诂》。

(周祖谟)

yìxùn

义训 以语词在语言中实际使用的意义直接解释词义，不从字形结构或字的音义关系上去分析推论的训诂方式。义训是对形训和声训而言。古书中文句下所加的注解和字书、辞书里所加的解释一般都是义训。义训总是以通语、常言去解释不易知的文语、古语或方俗语。例如：“簪，始也。”“干，求也。”“揆，度也。”“克，能也。”“愧，惭也。”（以上见《尔雅》）这些都是通训。对于名物，经常说明其属类、形状、颜色和功用。如“璧，瑞玉圆也。”“璜，半璧也（半圆形）。”“薰，香草也。”“菜，草之可食者。”“翠，青羽雀也。”“鉏（锄），立圃所用也。”“涧，山夹水也。”“袷，衣无絮。”“笼，举土器也。”（以上见《说文解字》）这都是属于义训一类。

义训解释的方式很多。常用的除了说“某，某也”以外，也说“某谓之某”，或“某曰某”。如《尔雅·释宫》：“宫中之门谓之闾，其小者谓之闼，小闼谓之閤。”又《释器》：“肉谓之败，鱼谓之馁。”又《释亲》：“妇称夫之父曰舅，称夫之母曰姑。”又《释水》：“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渚，小渚曰汜，小汜曰坻。”这些都是训诂中常见的方式。

(周祖谟)

yǐtǐzì

异体字 (doublet characters) 指汉字通常写法之外的一种写法，也称或体。这种字跟通常写法相比较，或在形旁上有所不同，或在声旁上有所不同。例如：

① 杯：盃 迹：跡 敕：勅 唇：脣

② 捶：搥 桴：枹 褙：袴 韵：韻

这里①是形旁不同，②是声旁不同。形旁不同，所表示的意义必然比较接近；声旁不同，声韵必相差不远。现在我们通常写的是前边的一些字，后边的一些字就是异体字了。有时一个字在字书和韵书里有几个异体，因为在社会上都曾经有人使用过，所以就都登录在一起，以备检查。

(周祖谟)

yìlǐn

译音 (transcription by nonlettered characters) 用非字母文字标记另一种语言的方法。用汉字标记外语的发音，就属于译音。其主要对象是外国人名、地名和术语。由于使用这一方法的人常受自己方言的影响，或选择汉字不同，因而译音词常不统一。为了译音规范化，中国编制了多种语言的汉字译音表。例如，中国地名委员会编的《外国地名译名手册》(1983)就附有英、法、德、西、俄、阿拉伯等语言与汉字的译音表。

(刘涌泉)

Yìdàlǐyǔ

意大利语 (Italian language) 意大利的官方语言。属印欧语系罗曼语族。除意大利外，还分布于圣马力诺、梵蒂冈城国和瑞士南部的提契诺州。使用人口共约6000万。意大利语同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罗马尼亚语一样，源自拉丁语。5世纪时，罗马帝国崩溃，各地

通俗拉丁语得到发展。在意大利半岛上，托斯卡纳地区的佛罗伦萨通俗拉丁语最具优势，逐渐成为意大利民族的共同语言。中世纪诗人但丁·阿利吉耶里(1265~1321)倡议以通俗拉丁语为意大利的统一语言，并用佛罗伦萨通俗拉丁语写出了著名的长诗《神曲》(图1)，为意大利文学语言奠定了基础，后人称为“意大利语之父”。继但丁之后，作家G. 薄伽丘(1313~1375)和诗人F. 彼特拉克



图1 《神曲》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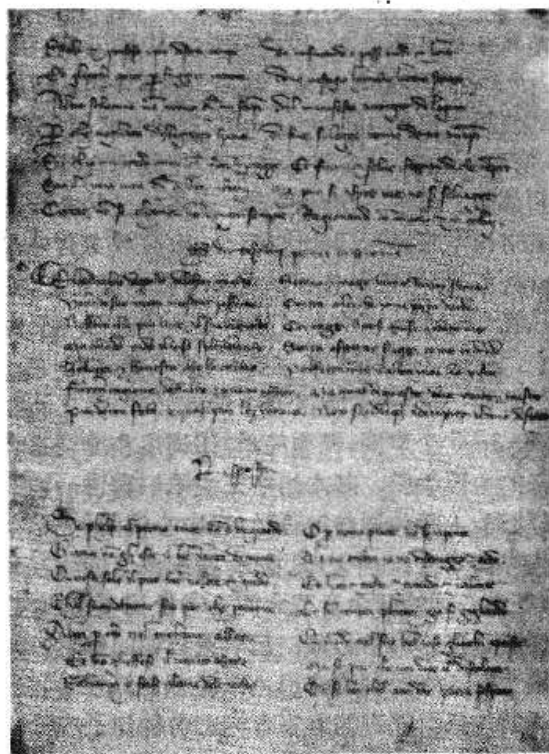


图2 彼特拉克《抒情诗集》的手稿

(1304~1374)的创作也丰富了佛罗伦萨通俗拉丁语(图2)。这3位大文学家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先驱，他们的文学语言影响及于全欧洲。从此，用民族语言创作和翻译成为风气。1870年意大利成为统一的王国后，意大利语便成为全国的标准语。方言主要有托斯卡纳方言、威尼斯方言、罗马方言、那波里方言、西西里方言、撒丁方言等。

意大利语的语音系统和西班牙语很相似，在读双辅音时要求有短暂的停顿，因此，节奏分明，富于音乐美。单

词一般都以元音 a、e、i、o、u 结尾,如 alba(黎明)、sole(太阳)、crisi(危机)、libro(书)、virtù(美德);结尾是辅音的词为数极少,多来自希腊语或拉丁语,如 lapis(铅笔)、virus(病毒)、pathos(悲怆)。除特殊情况外,单词重音一般落在倒数第 2 个音节上,语调平缓和谐,悦耳动听。意大利语语法跟其他现代罗曼语言大致相似。冠词分定冠词、不定冠词和部分冠词;名词和形容词有性和数的变化;复数用元音交替表示,阴性复数词尾为 -e 或 -i,阳性复数词尾为 -i;动词除人称和数的变化外,有复杂的语式和时态;语式有直陈式、命令式、条件式、虚拟式、分词式、副动词、不定式;时态分现在时、将来时(包括简单将来时和先将来时)、过去时(包括近过去完成时、远过去完成时、未完成过去时、愈近过去完成时、愈远过去完成时)。

意大利语的文字采用拉丁字母,共 21 个: a、b、c、d、e、f、g、h、i、l、m、n、o、p、q、r、s、t、u、v、z, 另有 5 个外来字母: j、k、w、x、y。每个字母都有固定的音,只有 h 不发音。发音和拼写一致。

参考书目

B. Migliorini, *Storia della Lingua Italiana*, II edizione, Casa Editrice Sansoni, Firenze, luglio, 1962.

N. Sapegno, *Compendio di Storia della Letteratura Italiana* (Vol. I), XVI edizione, «La Nuova Italia», Firenze, febbraio, 1960.

(费慧茹)

yifu

意符 (semantic complement) 汉字形声字的表意部分。也称形旁。汉字的形声字是由两个字组成的。一个字表示字义所指事物的属类,一个字表示字的声音。例如属于木一类和用木做成的东西,偏旁都从木,如松、柏、杨、槐、柱、梯、床、榻;属于水名或与水有关的,偏旁都从水,如江、淮、河、济、深、浅、游、泳、注、污。表示事物属类的称为意符,表示字音的称为声符。

意符在表意方面只是一种粗略的分别。生活中的事物是多种多样的,语词所代表的概念也是有具体的,有抽象的,古人造字也只能略分大类,把性质类似的、有关系的用同一偏旁来表示其意义。例如,犬是一种动物,狐、狼、猿、猴从犬,狮、獐大兽也从犬;陆生的矮小的草木从艸,如蒿、蓬、苏、葱、莎、兰、蕙、菊、萱;而水生的植物,如菱、荷、菱、蒲、苇等也从艸。足见意符只是起粗略的表类作用而已。

作为意符的字,有些在意义上是相通的。因此有的字有两种写法,这就是文字在使用上出现的异体字。如,𪔐:𪔐、𪔐:𪔐、𪔐:𪔐、猪:猪、暖:暖、堤:堤、坂:坂、塢:塢。现在这类异体经过整理,后面的字已经不用了。

(周祖谟)

yindiao

阴调 指汉语一个声调中清声母的字分化出来以后形成的调类,调值一般比浊声母字较高。日本释了尊《悉昙轮略图抄》说:“平声重,初后俱低。平声轻,初昂后低。上声重,初低后昂。上声轻,初后俱昂。去声重,初低后低。去

声轻,初昂后低。入声重,初后俱低。入声轻,初后俱昂。……四声各轻重:八声。”他的“轻”代表清声母字。到《中原音韵》(1324)开始给清声母字调加个“阴”字,给浊声母字调加个“阳”字。“阴阳”这两个字是汉族常用的哲学名词,本身读法又正是两种分裂后的调的典型,“阴”字从中古清声母来,“阳”字从中古浊声母来,所以后人多数沿用这个术语。现代方言广州话四声各有阴阳;闽南话除阳上变阳去与唐代李涪《刊误》描写当时的音一样以外,平去入各分阴阳;客家方言平入分阴阳;湘方言去声分阴阳;官话方言平分阴阳。

(俞敏)

yinyang duizhuan

阴阳对转 指上古汉语平上去声收鼻音和不收鼻音的字互相押韵、谐声、通假的现象,这是清代学者创立的术语。例如,《诗·小雅·谷风》本来是“三章、章六句”。押韵的格式是“OA(O)AOA”。一章句末字是“风、雨、惧、女、乐、予”,二章是“风、颙、惧、怀、乐、遗”。惟独三章是“风、鬼、死、葵、德、怨”。一章韵脚音是[-ia、-ia、-ia] (用汪荣宝《歌戈鱼虞模古读考》说),二章是 [-ei、-ei、-ei]或是 [-el、-el、-el]等等一类的音。元音和韵尾音准到什么程度不便肯定,但是韵尾一致是可以肯定的。惟独三章是 [-ei、-ei、-an]或是 [-el、-el、-an]。可以解释成用“怨”[-an]和[-i]或[-l]押韵,是押韵不严,也可以解释成这个诗人不会发[-n],只会发[-i]或是[-l],所以可以押韵。如果汉语古文献是用拼音字记录的,学者们只要说 -n 音变成什么音就够了。可是汉语用方块字,学者们只好说“怨”从元部转入脂(歌)部。就是从分定的部出发讲流转。

又例如,《诗·无将大车》“三章,章四句”。押韵格式是“OAOA”。末章句末字是“车、雍、忧、重”。第一章句末字是“车、尘、忧、底”。实际上这是 [-en、-ei] (或 [-el]等)押韵。清代学者说这是尘字从真部转入了脂部,所以能和底字押韵;也许可以说底字从脂部转入真部。其实只是 [-n]和[-i]或[-l]发音部位相同或接近,押韵欠严。

开始创造这理论的人是戴震。他把收尾音部位相同或是相近的古韵部叫“相配互转”,并且说“两两相配,以入声为之枢纽”。他把收鼻音的部比作“气之阳”,收元音或是流音擦音的比作“气之阴”。

戴震的学生孔广森(1752~1786)发展了老师的学说,并且化简了。在《诗声类》里他删去入声(闭口九韵“緝、合、盍、葉、帖、洽、狎、业、乏”除外),把戴震的“阴”、“阳”两个字沿用,定出九阴九阳十八部来,并且说它们都可以对转:

阳声 原 丁 辰 阳 东 冬 侵 蒸 谈
阴声 歌 支 脂 鱼 侯 幽 宵 之 合

章炳麟不同意孔广森一部只能配一部的对转理论,他在《国故论衡·成均图》里说:“(孔氏)所表,以审对转则优,以审旁转则寔:辰阳鳞次,脂鱼栉比,由不知有轴音,故使经界华离(错乱)首尾横决,其失一也。緝盍二部

虽与侵谈有别，然交广人呼之，同是撮唇，不得以入声相格。孔氏以缉盍为阴声，其失二也。对转之理，有二阴声同对一阳声者，有三阳声同对一阴声者；复有假道旁转以得对转者……非若人之处室，妃匹相当而已，……拘守一理，遂令部曲混淆，其失三也。”章炳麟自己立的部目是：

寒	淳	真	青	阳	东	侵	冬	蒸	谈
an	uən	in	ien	aŋ	ɔŋ	iem	um	im	am
						缉 ie			盍 ap
歌泰	脂队	至	支	鱼	侯	幽		之	宵
o a uəi, 去声	i	i	u	ou	iu	ai	au		

自注：“上列阳声、下列阴声、为‘对转’。其数部同居者同一对转。”这里的音值是从《二十三部音准》篇里的描写推出来的。

章炳麟《成均图》又说：“阳声即收鼻音，阴声非收鼻音也。然鼻音有三孔道。其一，侈音。印度以西皆以半摩字收之。今为谈、蒸、侵、冬、东诸部：名曰撮唇鼻音。其一，弇音。印度以西皆以半那字收之。今为青、真、淳、寒诸部：名曰上舌鼻音。其一，轴音。印度以缺字收之……名曰独发鼻音。”梵文用音节字母。“摩”是𑖀[ma]的对音。只留下 m- 就叫“半摩字”。“那”是𑖄[na]。“缺”本是𑖇[ā]。章炳麟学的是一派日本和尚里流行的悉昙，读[ā]作[aŋ]。《成均图》又说：“夫阳声弇者阴声亦弇。阳声侈者阴声亦侈，阳声轴者阴声亦轴，是故阴阳各有弇侈而分为四，又有中轴而分为六矣。”

讲阴阳对转的以章炳麟为集大成者。在研究部和部的关系上有贡献。不过也引起古文献学里随便破字的流弊。

20 世纪 20 年代，林语堂写过《陈宋淮楚歌寒对转考》（收入《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1933）、《燕齐鲁卫阳声转变考》（收入《语言学论丛》，1933）两篇文章，说“寒”部字念了“歌”部音或用“歌”部字记录是因为鼻尾音弱化，整个韵成了鼻化元音。依同样的道理“脂淳”对转也是鼻尾音弱化，两条对转都是方音现象。从《汉书·酷吏传》如淳注“陈、宋之俗言‘桓’声如‘和’”这句话，和《说文解字》日部“听、且明也（段本）……读若希”这句话看，林语堂的方音说是有所根据的。

《急就篇》全书（包括异文）1 000 多个谐声字里只有一个“玫瑰”的“玫”字有“脂淳对转”的嫌疑，还可以用受“瑰”字远同化来解释。从这里可以肯定“歌寒”、“脂淳”对转的确是方音。

1979 年，俞敏作《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发现 bhadrapāla 译成“跋陀和”，才知道“歌”部音可以是[-al]。再看 brhatphala（照欧洲大陆的习惯写，也就是 vrihatphala）译成“维于潘”，rāhula 译成“罗云”，才懂得“歌寒”、“脂淳”对转就是在音节末尾上[n]、[l]混乱。

参考书目

孔广森：《诗声类》，渭南严氏刻本。

章炳麟：《国故论衡·成均图》，浙江图书馆本。

俞敏：《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中国语文学论文选》，日本光生馆，东京，1984。

（俞敏）

yinhe

音和 见汉语音韵学。

yinwelxue

音位学 (phonemics) 见音系学。

ynxixue

音系学 (phonology) 又称音位学 (phonemics)。研究语言的语音系统的一门学科，包括对当代语言的语音系统的分析和对历史语音变化的研究两个方面。后者在中国传统称为音韵学。

中国最早研究语音系统的著作是隋朝陆法言所编的《切韵》，成书于 601 年。《切韵》把当时的汉语语音系统分析归纳为 4 声、206 韵，每韵内又根据声母的不同分为若干小韵，是世界上最早专门对语音系统做出全面分析归纳的专著之一。《切韵》现在只存残卷，宋代重修的《广韵》基本上保存了它的原貌。

在宋代时，中国受印度声明学的影响，开始出现了韵图一类的著作。韵图按韵分图，每图分列声母和声调，语音系统可以一目了然。韵图一类著作能够根据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的不同把声母分为唇、舌、牙、齿、喉和清、浊、次清、次浊等等，根据舌位和唇形的不同把韵母分为四等和开、齐、合、撮四呼等等，所描写的语音系统虽然大都比较驳杂，仍不失为音系学研究的先驱。

现代音系学的研究始于 19 世纪末期。波兰语言学家 J. N. 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和他的学生 H. B. 克鲁舍夫斯基(1851~1887)首先提出了“音位”的概念，欧洲的其他一些语音学家如英国的 H. 斯维特、法国的 P. 帕西、俄国的 JI. B. 谢尔巴都对这个领域进行过开拓性的研究。20 世纪 30 年代，欧洲布拉格学派的 H. C. 特鲁别茨柯伊等人发展了音位的概念，音位的研究在欧洲和美国迅速发展。美国描写语言学派在研究音位的理论和方法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对促进音系学的发展起了不小的作用。

由于学派不同，对音位的内容有种种不同的解释，归纳音位的方法也各不相同，但目的都是探讨语音系统的规律性，因此分析归纳的结果一般是大同小异的。归纳音位比较常用的概念是“对立”。在一种语言里，产生对立关系的音素必然分属不同的音位。例如，普通话“班”bān [pān]、“奔”bēn [pən]、“宾”bīn [pin] 里的 [a]、[ə]、[i] 在相同的语音环境 [p-n] 中出现能产生不同的意义，它们之间就存在着对立关系，应当分属 3 个不同的音位。音系学中通常用双斜线表示音位性标音，这 3 个音位可以分别写成 /a/、/ə/、/i/。

一个音位可以有不同的音位变体，例如，普通话“班”

bān[pān]、“帮”bāng[pāŋ]、“掰”bāi[pāi]、“边”biān[pian]里的[a]、[ã]、[æ]、[ɛ]读音不同,但都属于音位/a/,都是/a/的音位变体,分别出现在不同的语音环境[-n]、[-ŋ]、[-i]、[i-n]中。有的音位变体的出现没有条件的限制,例如南京和其他一些方言的声母[n]和[l]没有分别,同属一个音位,读哪一个完全自由,是一个音位的自由变体。

音位的组合有它的规则系统。普通话大多数辅音音位只能处于音节开头,不能处于音节末尾;元音音位可以组合成/iau/和/uai/音位序列,不能组合成/uau/和/iai/;辅音音位/f/不能和元音音位/i/组合成/fi/。这些限制都是普通话音位规则系统所决定的。

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语音系统,因而音位的内容和音位的组合规则也不相同。例如,普通话“宾”bīn[pin]和“拼”pīn[p'in]里的[p]和[p']在相同的语音环境[-in]中出现能产生不同意义,是两个不同的音位;英语pin[p'in](针)和spin[spin](纺织)里也存在[p']和[p]的分别,但[p']出现在音节开头,[p]出现在[s]之后,出现的语音环境不同,是同一个音位/p/的不同变体。

音位概念的形成和发展使得语音研究能够密切结合具体语言的语音系统,从各个具体语言的音位入手探讨语音系统的一般规律,现代音系学就逐渐形成。这不但大大推动语音理论的发展,而且有很重要的实践意义。自从现代音系学形成以后,语言的调查方法、拼音文字的创制原则以及语言教学的实践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国在现代音系学的理论和方法影响下,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开始了汉语方言和各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工作。50年代,这方面工作得到迅速发展,除调查研究工作外,并为一些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创制了文字。1958年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也是以现代音系学理论为基础制定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代科学技术飞跃发展,语音学和声学、生理学、心理学、医学等学科逐步结合起来,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对现代音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50年代,侨居美国的布拉格学派主要学者R. 雅柯布逊和瑞典著名声学家C. G. M. 方特、美国语言学家M. 哈利合作,以当时语声学研究成果为基础,系统地提出“区别特征”的概念,为现代音系学的发展开创了新局面。雅柯布逊等人主要从语音的声学特性出发,参考语音的生理特性,把一切语音归纳为12对区别特征,如元音性/非元音性,突发性/延续性,浊音性/清音性,集聚性/分散性,鼻音性/口音性等。区别特征是语言中能够区别意义的最小对立体,这些最小对立体都是偶值的。

60年代末期,美国语言学家N. 乔姆斯基和哈利合作,进一步发展了区别特征的理论,创立了“生成音系学”,成为近20年来对音系学研究影响最大的学派。乔姆斯基等人主要从语音的生理特性出发,把区别特征扩充为30多对,区别特征的偶值性更加突出,每对特征都可以用“±”号来表示,例如“+高/-高”,“+舌顶/-舌顶”,“+圆唇/-圆唇”,“+鼻音/-鼻音”,“+浊音/-浊音”等。

从区别特征理论看,传统语音学中元音和辅音的分别并不十分重要,30年代以后盛行的音位概念也可以摒弃不用,因为这些都可以用区别特征来表述。例如,普通话/p/和/m/是两个音位,它们的区别实际上只在“±鼻音”和“±浊音”这两对区别特征上,其他特征是这两个音位共同具备的,并不能起区别意义的作用。生成音系学是乔姆斯基创立的生成语法的一部分,除发展了区别特征理论外,还着重解释语音转换的规则,规则的书写形式是:

$$A \rightarrow B/X-Y$$

A和B都代表区别特征,→表示“变为”,X-Y表示转换的条件,前面用斜线和A→B隔开。这个形式可以读成“区别特征A处在X和Y之间时变为区别特征B”,也就是说XAY→XBY。生成音系学认为,一切语音规则都可以用这样的形式写出来。

对生成音系学的理论有种种不同评论,但它无疑是音系学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阶段。目前,对区别特征的模式还远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区别特征是否都是偶值的,也还有不同的看法。但区别特征的偶值选择特点符合电子计算机的二进制编码的要求,便于把语音研究和现代科学技术结合起来,因此受到广泛的重视,并已被应用到与语音信息有关的各学科的程序设计中去。

参考书目

R. 雅柯布逊等著,王力译:《语音分析初探——区别性特征及其相互关系》,载《国外语言学》1981,第3、4期。(R. Jakobson, C. G. M. Fant and M. Halle, *Preliminaries to Speech Analysis: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and Their Correlates*, 2nd edition, M. I. T. Press, 1952.)

N. Chomsky and M. Halle, *The Sound Pattern of English*, New York, 1968.

N. S. Trubetzkoy, *Principles of Phonology*,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Berkeley, 1969.

D. Jones, *The Phoneme: Its Nature and Use*, Cambridge: Heffer, 1950.

V. B. Makkai, *Phonological Theory, Evolution and Current Practice*,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Inc., New York, 1972.

(林 焘)

Yinxue Wushu

《音学五书》 研究汉语上古音的著作,顾炎武著。大约成书于1643年,全书分5个部分:①音论,②诗本音,③易音,④唐韵正,⑤古音表。

《音论》分上中下3卷,共15篇,论述古音和古音学上的重大问题,集中地阐述了作者对古音学的基本看法,是《音学五书》的总纲。其中重要的有4篇:①《古人韵缓不烦改字》。认为古人用韵比较宽,只要声音相近,听起来大致和谐,就可以押韵,今天读《诗经》不必改变某些押韵字的读音。②《古诗无叶音》。顾氏表示完全赞同陈第的主张,认为古人没有任意改读的情况,前人的所谓叶音,正是古人的实际读音。③《古人四声一贯》。认为古人虽有四声,但押韵可以不拘,不像唐诗那样押韵字必须声调相同。据顾炎武统计,《诗经》入声与入声押韵的占

7/10, 入声与平上去押韵的占 3/10。④《先儒两声各义之说不尽然》。认为前人关于一个字的不同读音可以表示不同意义的看法不完全对。比如中古以后“恶”字有两读,“爱恶”的“恶”读去声,“美恶”的“恶”读入声,顾炎武认为先秦没有这种分别。

《诗本音》详细地考查了《诗经》押韵字的古音,凡是他认为古今读音不同的字,都指明这个字古音应当在古韵的哪一部,并统计出在《诗经》中这个字出现多少次,在其他经书中作为押韵字出现多少次,与哪些字押韵。顾炎武自己认为这部书是《音学五书》中最重要的一部。

《易音》是考查《易经》押韵字古音情况的。基本方法与《诗本音》相同,但不象考查《诗经》那样把《易经》全部抄下来,而是选取了他认为用韵的章节,指出其中押韵字的古韵部。

《唐韵正》在于改正《唐韵》的所谓错误。顾炎武在研究古音上有复古倾向,凡是《唐韵》与古音不合的,他都认为是错了。实际是把本该放在《诗本音》里的许多证据拿出来另编一部书,可以看作是对《诗本音》的详细注释。

《古音表》是顾炎武对古音研究的总结,书中变更《唐韵》次序,把古音分为 10 部,用表的形式把它们列出。

《音学五书》从理论和实践上彻底否定了叶韵说,奠定了古音学的基础,开拓了音韵学研究的新领域。(参见彩图插页第 17 页)

(谢纪锋)

Yinyi Shu

音义书 专指解释字的读音和意义的书。古人为通读某一部书而摘举其中的单字或单词而注出其读音和字义,这是中国古书中特有的一种体制。根据记载,汉魏之际就有了这种书。魏孙炎曾作《尔雅音义》是其例。自晋宋以后作“音义”的就多起来了。一部书因师承不同,可以有几家为之作音,或兼释义。有的还照顾到字的正误。这种书在传统“小学”著作中独成一类,与字书、韵书、训诂书体例不同,所以一般称为“音义书”,或称“书音”。魏晋至梁陈之间的“书音”已亡佚无存,惟唐初陆德明《经典释文》中采录颇多。在唐代,《史记》、《汉书》也有音义,但早已亡佚。史部中只有天宝间何超所作《晋书音义》随《晋书》流传至今。

佛教经典在北齐时也有人作音。到唐代有两部最知名的音义书,一部就是唐高宗时释玄应所作的《众经音义》,另一部是唐宪宗时释慧琳所作的《一切经音义》。包容极富,为研究古音古义的重要参考资料。

(周祖谟)

Yinqi Cuijian

《殷契萃编》 甲骨文著作。郭沫若著。刘体智(号善斋)为著名收藏家,所藏殷墟甲骨约达 2.8 万片,其拓本名《书契丛编》,共 20 册。1936 年夏,刘体智托金祖同将《丛编》带往日本,供郭沫若选录。郭氏选辑 1595 片,次年在日本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全部换用新拓本,增多文字,由胡厚宣考释,



《殷契萃编考释》

维缀合的本书第 112 片对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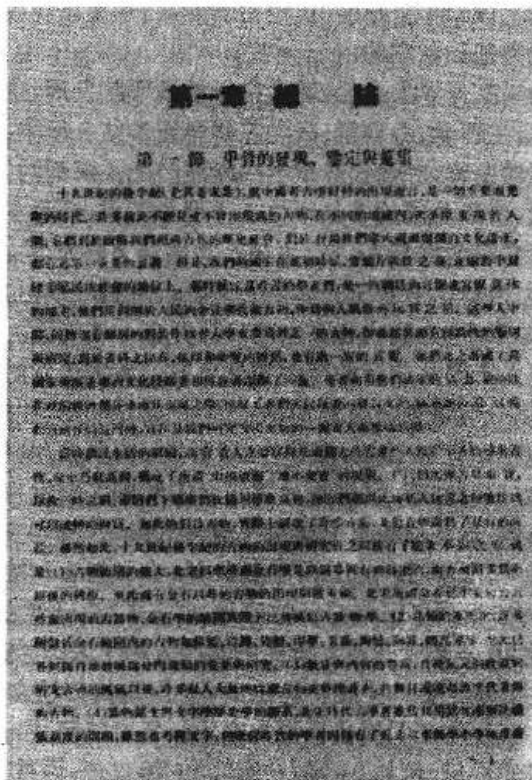
本书考释体现了作者很多新的见解。不少片的释文钩摹甲骨轮廓,可见原物行款。书末附有索引,便于查检。体例完善,值得后人取法。(参见彩图插页第 13 页)

(李学勤)

Yinxu Buci Zongshu

《殷虚卜辞综述》 甲骨文著作。陈梦家著。1956 年科学出版社出版,列为《考古学专刊》甲种第 2 号。

陈梦家自 1932 年从事甲骨研究,早期注重文字考释及商代礼俗、宗教、神话,后因作青铜器断代研究,觉得应从断代着手,全面整理甲骨,于 1949 年起撰《甲骨断代学》4 篇,先后在刊物发表。1953 年起编著本书,至 1954 年底告竣。全书共分:总论、文字、文法、断代上、断代下、年代、历法天象、方国地理、政治区域、先公旧臣、先王先



《殷虚卜辞综述》

妣、庙号上、庙号下、亲属、百官、农业及其他、宗教、身分、总结、附录，共20章。

本书综合前人研究甲骨的成果，补充新材料，并提出很多新的见解。书中重视利用考古发掘资料，并联系传世文献，在研究方法上开一新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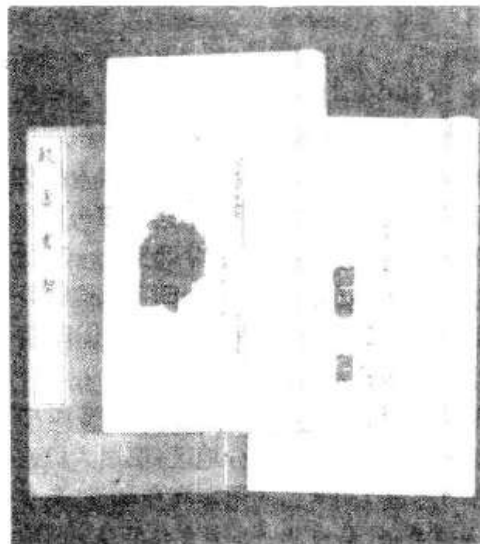
关于断代的两章，包括了《甲骨断代学》的内容。陈梦家分析中央研究院第13次殷墟发掘所得YH127坑甲骨及其他材料，区分出自组、子组、午组等等卜辞，提出它们应属武丁时期，而不像董作宾所主张是文武丁卜辞。这一重要观点，后来为许多学者所接受，有较大影响。

(李学勤)

Yinxu Shuqi

《殷墟书契》 殷墟甲骨著录。罗振玉编。即《殷墟书契前编》，是最重要的甲骨集之一。

清宣统二年(1910)，罗振玉作《殷商贞卜文字考》，当时所见甲骨不过数千，本人收藏只有七八百片。随后命



《殷墟书契》

古董商到安阳小屯搜集，先后所见达3万片，于是选编为《殷墟书契前编》20卷，至宣统三年编成，在《国学丛刊》石印发表。《国学丛刊》第1~3册连载了前3卷，共有甲骨294片。

辛亥革命，罗振玉到日本，重编《殷墟书契前编》8卷，于1913年以珂罗版印行，共有甲骨2229片。1932年又在上海重印。对照《国学丛刊》本与8卷本，前者有8片不见于后者。

1914年，罗振玉以所藏大骨及字细难拓的小片甲骨编为《殷墟书契菁华》1卷，共甲骨68片。1916年，选录所藏《前编》未收者为《殷墟书契后编》2卷，共甲骨1104片。1933年，又编辑所得各家甲骨拓本为《殷墟书契续编》6卷，共甲骨2016片。这3部书都是继《殷墟书契前编》而作。(参见彩图插页第12页) (李学勤)

Yinxu Wenzhi Leibian

《殷墟文字类编》 甲骨文著录。商承祚编。商承祚为罗振玉弟子。罗氏于1915年著《殷墟书契考释》一书，

1916年又将不认识的一些甲骨文字编为《殷墟书契待问编》。后来与王国维又增释了不少字。《殷墟文字类编》就是根据罗、王两家之说，并略参己见，按《说文解字》分部



《殷墟文字类编》

次序将《考释》中的文字重行编次而成的。甲骨文一字异形很多，本书都一一列出，颇便检阅。(参见彩图插页第13页) (周祖谟)

Yinshenyl

引申义 (transferred meaning) 由一个词的本义引申发展出来的相关的意义。例如“生”，《说文》：“象艸木生出土上。”《广雅释詁二》：“生，出也。”这是生的基本意义，也可以说是“生”的本义。由这个本义引申而有“生养”、“生产”、“生活”、“生命”等义。又如“徒”，《说文》：“步行也。”这是徒的基本意义。步行就是不乘车，古时步兵也称为徒兵。引申之，“徒”又训“众”，如说“圣人之徒”。徒行没有车船，引申之，“徒”又训为“空”。如说“家徒四壁”、“徒劳无功”等。引申义通常是对本义来说的，引申义必然跟本义在意念上有一定的联系，否则不能称之为引申义。例如《说文》：“向，北出牖也。”引申为“向背”的“向”和“方向”的“向”，但“向时”的“向”就不是引申义了，那是作为假借字而产生的假借义。朱骏声认为是“孺”的假借字。

见假借义。

(周祖谟)

Yindiyl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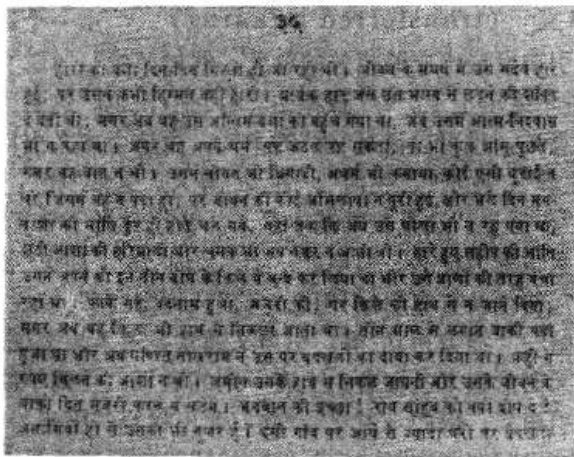
印地语 (Hindi language) 印度的两种官方语言之一(另一种是英语)。属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印度语支，是由古梵语发展而来的一种现代印度-雅利安语言。分布于印度中部和北部的中央直辖区德里特区、北方邦、中央邦、比哈尔邦、拉贾斯坦邦、哈里亚纳邦等地区。使用人口有2亿多，是印度国内最为通行的一种语言。此外，在毛里求斯、斐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圭亚那、苏里

南等地的印度裔居民中也有相当数量的人讲印地语。

印地语有 5 大方言,即西部印地语、东部印地语、比哈尔语、拉贾斯坦语和山地印地语。每种大方言里又各有若干方言。标准语的基础是通行于德里和梅拉特附近地区的克里波利方言,属西部印地语。

印地语标准语有元音 11 个,辅音 43 个。54 个音位中,有 1 个元音和 5 个辅音是外来音,只使用于外来语中。印地语原有的 10 个元音都有对应的鼻化形式。辅音中不但清塞音、清塞擦音等有对应的送气音,浊塞音、浊塞擦音、闪音等也都有对应的送气音。送气音和不送气音有区别意义的作用。一般没有重音,也没有声调。语法比梵语大大简化,名词有阴性、阳性和单数、复数的范畴。在少数代词中还保留了格的残余形式。名词格的形式已经消失。句中名词或代词跟其他词之间的关系是在名词或代词后面用后置词来表示。名词或代词等带有后置词时,其形式有一定的变化。动词除有人称、性、数等范畴外,还有体、时、式、态等范畴。句子的基本语序为主语—宾语—谓语。词汇方面,基本词汇大部分是从梵语演变而来的。各专业学科的术语,近来的趋向是直接取自梵语,或用梵语构词法创立新的梵语词。在穆斯林统治时期,印地语吸收了大量波斯语和阿拉伯语词。英国统治时期,它又吸收了大量英语词语,至今还在不断地从英语吸收新的词语。在吸收外来语同时,它还吸收了外来语的一些构词手段。

印地语使用天城体文字。这是一种音节拼音文字,



作家普列姆昌德长篇小说《戈丹》中的一段

由古代的婆罗米字母演变而来。自左而右书写(见图)。

(殷洪元)

Yindunxiyayu

印度尼西亚语 (Indonesian language) 印度尼西亚的官方语言。属南岛语系印度尼西亚语族。使用人口逾 8 500 万,占全国人口的 62%。印度尼西亚语以通用于马六甲海峡地区的马来语为基础发展而成。1901 年提出第一个印度尼西亚语拼音方案,用拉丁字母拼写,经 1947 年和 1972 年两次修改,采用了与马来语统一的拼音规则。

印度尼西亚语有单元音 6 个,复合元音 3 个,辅音 25

个。马来语本来没有复辅音,后来受西方语言的影响,吸收了不少复辅音。印度尼西亚语的词缀很丰富,构词和构形能力很强,词的重叠也起构词和构形的作用。名词、代词没有表示性、格的语法范畴,名词的重叠形式可以表示复数;动词没有表示时态的语法范畴,但有表示体、式、语态的语法范畴。词汇中吸收了大量的梵语、阿拉伯语、葡萄牙语、荷兰语、英语和中国闽南方言的词语,也吸收了不少爪哇、巽他、米南加保等方言的词语。句子成分的基本次序是主语—谓语—宾语,定语在中心词之后。被动语态的句型较多,在有标记的被动句型中由多种不同形式的词缀表示不同的语法意义,也有用词的组合表示的被动语态。

(黄琛芳)

Yindunxiyayu

印度尼西亚语族 (Indonesian group) 见南岛语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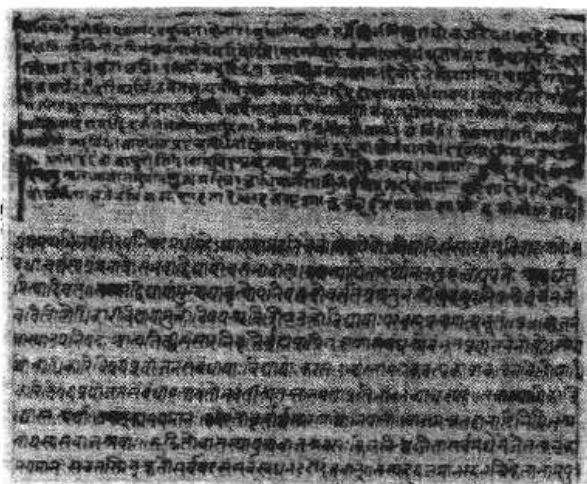
Yindu-Yilang yuzu

印度-伊朗语族 (Indo-Iranian group) 印欧语系的语族之一。根据语言学家的分析,这个语族的形成与原始印欧人的大迁徙有直接关系。原始印欧人从欧亚之间的某个地区向东西两个方向移动,向东的一支在伊朗、阿富汗一带停留一个时期,以后又分两支,一支留原地,一支继续向东南方向迁徙,最后进入印度。这就是这个语族形成的历史。本语族包括两大语支:①印度(又称“印度-雅利安”)语支,②伊朗语支。

印度语支约有 30 余种语言,分布于印度北部和中部,以及现在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部分地区,使用人口逾 4 亿。其中使用人口超过 1 000 万的语言有印地语、乌尔都语、孟加拉语、旁遮普语、马拉提语、古吉拉特语、比哈尔语、奥里亚语、拉贾斯坦语等。印度语支诸语言的发展情况较为复杂。最早的阶段是吠陀语,往后依次是史诗梵语,古典梵语;后二者差别不大。较迟的是各种俗语,巴利语是其中之一。后来发展到阿帕卜朗沙阶段。现在分布于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某些地区的印度语支诸语言,都由此衍变而来。

伊朗语支包括约 20 种语言,分布于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和苏联部分地区,主要语言有波斯语、普什图语等。伊朗语支诸语言发展的历史可以分为 3 个阶段:①古代波斯语。包括两部分,一是阿吠斯陀语,一是古代波斯语(用楔形文字)。②中世波斯语(3~10 世纪),包括安息语、中世波斯语、大夏语、花刺子模语、粟特语、和阗塞种语。③现代波斯语,直接来自中世波斯语,吸收了一些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词。阿富汗的普什图语是现代波斯语的东支。一些波斯语方言散布在帕米尔高原和邻近地区。

这两个语支关系极为密切。伊朗最古的圣典《阿吠斯陀》和印度最古的圣典《梨俱吠陀》(见图)中的个别诗行字句完全相同,足证它们同出一源。在词汇方面,



《梨俱吠陀》

很多也是同源，如：梵语：yajña（祭祀）、hotr（主祭僧侣）、mitra（神话）、ārya（雅利安，意思是尊重的），阿吠斯陀语：yasna、zaster、miθra、airya(āriya)；在音变方面，印欧语的长短元音 e、o、a 在印度-伊朗语中变为长短 a，例如希腊语 menos，梵语 manas，阿吠斯陀语 manah；印欧语 a 在印度-伊朗语中变为 i，例如希腊语 pater，梵语 pitr，阿吠斯陀语和古波斯语 pitar。以长短 a、i、u 收尾的词多数属格的语尾梵语是 -n-ām。两个语支也有不同之处：①梵语 s 变为波斯语 h，②伊朗语支的浊塞音或摩擦音与印度语支的浊或清送气音相当，③伊朗语支中的 z，印度语支中没有，④伊朗语支的复合元音 ai、au 在印度语支中变为 ē、ō。（季羨林）

Yin-Ou yuxi

印欧语系 (Indo-European family) 当代世界上分布区域最广的一个语系，使用者几乎遍及整个欧洲、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还有非洲和亚洲的部分地区。从 15 世纪开始，随着欧洲殖民势力不断扩张，一些欧洲语言陆续传到世界其他许多地区，这是印欧语系分布如此之广的直接原因。今天，以某一种印欧语言为自己母语的人，加在一起有 15 亿以上，接近世界人口的半数。需要指出的是，欧洲的巴斯克语、匈牙利语、拉普语、芬兰语、爱沙尼亚语、苏联的少数几种阿尔泰语言、乌拉尔语言、高加索语言，以及印度南部的达罗毗荼（德拉维达）诸语言虽然也分布于欧洲或印度，但均不属印欧语系。

名称的由来 “印欧语系”这个语言学术语出现于 19 世纪初叶，因该语系分布于印度和欧洲而得名。后来德国学者又参照同一模式，将其易名为“印度-日耳曼语系”。理由是，印欧语言中，最东部的阿萨姆语是一种印度语言，而最西部的冰岛语是一种日耳曼语言。这个术语在欧洲学者、特别是德国学者中比较通行。此外还有少数学者用“雅(利安)-欧语系”，但现代语言学最通行的术语仍然是印欧语系。

印欧语假说 早在 16 世纪，当欧洲的传教士、商人、探险者开始学习梵语后，就逐渐认识到印度的梵语与欧

洲的拉丁语、希腊语等语言之间有着广泛的相似性。这一发现应归功于 18 世纪英国的东方学学者 W. 琼斯爵士。他提出了著名的“印欧语假说”来解释上述语言之间的相似性。1786 年，琼斯在印度的一次演讲中指出，梵语跟希腊语和拉丁语以及古英语之间，无论是在动词词根还是在语法形式方面都显示出系统的相似点，而这种现象绝不可能是偶然的。任何语文学家都不能不承认这些语言衍生自同一原始母语。这种原始母语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原始印欧语（简称 PIE）。原始印欧语是一种假设的原始印欧人的口头语言，并没有任何文字记录。学者们只是通过对原始印欧语的若干后裔语言进行比较研究，来推断出它的某些特征。象吠陀梵语、采用迈锡尼线形文字 B 的希腊文、赫梯语等语言，到公元前第 2 千纪就已经明显分化了。通过比较这些已得到证实的分化形式，就能构拟出更为久远的形式。比较语法的研究，对证实“印欧语假说”和确立印欧语言之间的亲属关系起了重要作用。如表示“向前”的前缀或词，梵语为 pra，古斯拉夫语为 pro，希腊语为 pro，拉丁语为 pro，哥特语为 fra；表示“父亲”的词，梵语为 pitar，希腊语为 patēr，拉丁语为 pater，哥特语为 fadar。这些前缀或词显然分别来自原始印欧语的某两个词，通过分析比较，我们可知这两个词在原始印欧语中的首音应是 p。p 音在大多数后裔语言中保留下来了，只有在哥特语和其他几种日耳曼语言中才变成了 f。又如表示“母牛”的词，在吐火罗语东部方言中为 ko，梵语为 gāus，阿吠斯陀语为 gāuš，亚美尼亚语为 kov，古斯拉夫语为 gu-，拉脱维亚语为 govš，希腊语为 boūs，拉丁语为 bōs，英语为 cow。从这些形式可以构拟出原始印欧语名词 gʷous，并能证实上述语言间的亲属关系，从而使构拟的形式和关于早期共同来源的假设比较可信。

但是，关于原始印欧语的分布、范围、文化类型和语言结构等问题，一直还没有令人信服的解释。主要原因一是无文字记录，二是缺少原始印欧社会的文化遗物。学者们根据印欧语的一些同源词曾对原始印欧人的故乡加以推测。从印欧语言有表示“鲑鱼”和“山毛榉”等动植物的词，推测鲑鱼和山毛榉等生长的地方就是原始印欧人的故乡，原始印欧语就是从那里发展起来的。但另一些学者持异议，认为这种方法缺乏科学性，因为几千年前的自然生态环境，在许多方面都跟今天的情况大不一样。总之，各人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利用的材料不同，得出的结论显然各异。目前还没有一种完全令人满意的解释。

K 类语言与 S 类语言的二分法 印欧诸语言传统上分作两大类：K 类语言和 S 类语言。K 类语言包括拉丁语、希腊语、意大利克诸语言、凯尔特诸语言、日耳曼诸语言，以及赫梯语和吐火罗语。S 类语言包括波罗的诸语言、斯拉夫诸语言、阿尔巴尼亚语、亚美尼亚语和印度-伊朗诸语言。K 类语言得名于拉丁语中表示“一百”的词 centum，其特点是保留了原始印欧语的 /K/ 音，如拉丁语 centum（亦作 kentum），希腊语 he-katón，古爱尔兰语 cēt，吐火罗语 kánt；S 类语言得名于阿吠斯陀语中表示

“一百”的词 *satam*, 其特点是把原始印欧语中的软腭塞音 **K/* 变为齿龈清擦音 */š/*, 如阿吠斯陀语 *satəm*, 梵语 *śatam*, 伊朗诸语言 *satem*, 立陶宛语 *šimtas* 或 *šimtas*, 古斯拉夫语 *sūto*。长期以来 *K* 类语言被看作构成西部语群, 而 *S* 类语言构成东部语群。但是, 随着 20 世纪初在中国新疆一带的洞窟中发现吐火罗语文献 (见吐火罗语), 以及释读用楔形文字书写的赫梯语文献, 学者们看出, *K* 类语言和 *S* 类语言的地理分布不再象早先想象的那样简单。属东部语群的吐火罗语并不属 *S* 类语言, 而是一种 *K* 类语言, 因为它保留了 *K* 音。学者们分析了赫梯人留下的铭文, 发现赫梯语甚至还在原始印欧语分化为西部语群和东部语群之前, 可能就已经有了分化。此外, 语音方面的其他特点, 如 *bh*、*dh* 和 *gh* 在凯尔特诸语言、以及斯拉夫和波罗的诸语言中简化为 *b*、*d* 和 *g* 等, 都说明仅对印欧语言作 *K* 类语言和 *S* 类语言的二分是不够的, 这两类语言只是基本相符于印欧语系西部语群和东部语群。只能作为印欧语进一步细分的基础。学者们曾经就赫梯语跟印欧语系其他语言的关系争论了好些年, 甚至一度导致“印度-赫梯语系”的假说。

印欧语言的细分 印欧语系西部语群和东部语群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如下语族 (见表)。

日耳曼语族 约公元前 500 年前, 印欧语西部语群发生了一次重要的分化, 产生了所谓原始日耳曼语 (也称“条顿”语), 分化的导因是某些辅音发生了系统变化, 即所谓“日耳曼语音变”。从而使不送气清塞音 *p*、*t*、*k* 变为送气音, 浊送气音 *bh*、*dh*、*gh* 变为浊塞音, 浊塞音 *b*、*d*、*g* 变为清塞音。这一现象是德国学者 J. 格林在比较某些印欧语词的基础上, 于 1822 年首先发现的, 因而称为“格林定律”。日耳曼诸语言就是从这个新阶段发展起来的。日耳曼诸语言分西支、北支和东支, 西支包括英语、德语 (在德语基础上衍生了依地语和卢森堡语)、荷兰语、弗拉芒语 (也有学者认为弗拉芒语只是荷兰语的一种方言)、南非的阿非利堪斯语、以及弗里西亚语, 北支包括斯堪的纳维亚诸语言——瑞典语、丹麦语、挪威语和冰岛语, 东支的代表是哥特语, 但在一千多年前就已消亡, 因此有些学者不把东支算作日耳曼语族的一个语支。

罗曼语族 又称意大利克语族或拉丁语族。罗曼诸语言的共同母语是古拉丁语, 它曾经是幅员广大的罗马帝国的通用语言。罗马帝国衰亡后, 各地的拉丁语方言在彼此隔绝的状态下相继发展, 最终形成了各种独立的近代罗曼语。罗曼语族通常分东支和西支, 这两支语言的传统分界是沿斯塔西亚-里米尼线走向划出的同言线, 它大体上把意大利分为大陆部分和半岛部分。该线以南的巴尔干罗曼语, 如罗马尼亚语, 以及 19 世纪末已消亡的克尔克岛上的达尔马提亚语属东支; 该线以北的其他罗曼语属西支, 包括拉丁语、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 以及若干使用人数较少的语言或方言: 普罗旺斯语、撒丁语、利托-罗曼诸方言、加泰兰 (又称加泰隆) 语。

凯尔特语族 凯尔特诸语言在不同时期曾分布于从

印欧语系各语族及主要分布地区

语族名称	主要语言	主要分布地区
日耳曼语族	德语、英语、荷兰语、弗拉芒语、阿非利堪斯语、依地语、卢森堡语、弗里西亚语、瑞典语、丹麦语、挪威语、冰岛语、法罗语	德国、奥地利、瑞士、列支敦士登、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美国、荷兰、比利时、南非、以色列、瑞典、丹麦、挪威、冰岛、卢森堡、法罗群岛
罗曼语族 (又称意大利克语族或拉丁语族)	拉丁语、法语、普罗旺斯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加泰兰 (加泰隆) 语、罗马尼亚语	法国、比利时、加拿大、瑞士、意大利、圣马力诺、西班牙、葡萄牙、中美和南美各国、罗马尼亚
凯尔特语族	爱尔兰语、苏格兰盖尔语、威尔士语、布列塔尼语	大不列颠 (苏格兰和威尔士)、爱尔兰、法国 (布列塔尼半岛)
希腊语族	希腊语	希腊、塞浦路斯
波罗的语族	立陶宛语、拉脱维亚语	苏联 (立陶宛和拉脱维亚)
斯拉夫语族	俄语、乌克兰语、白俄罗斯语、波兰语、捷克语、斯洛伐克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斯洛文尼亚语、马其顿语、保加利亚语	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保加利亚
印度-伊朗语族	印地语、乌尔都语、孟加拉语、旁遮普语、马拉提语、古吉拉特语、比哈尔语、奥里亚语、拉贾斯坦语、尼泊尔语、阿萨姆语、克什米尔语、信德语、僧伽罗语、波斯语、普什图语、俾路支语、塔吉克语、库尔德语、奥塞梯语	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尼泊尔、阿富汗、伊朗、土耳其
阿尔巴尼亚语族 (独立)	阿尔巴尼亚语	阿尔巴尼亚
亚美尼亚语族 (独立)	亚美尼亚语	苏联 (亚美尼亚)
安纳托利亚语族	赫梯语、卢维语 (均已消亡)	小亚细亚 (今土耳其阿纳多卢地区)
吐火罗语族	吐火罗语 (分为焉耆语和龟兹语, 均已消亡)	中国新疆一带

安纳托利亚 (又称阿纳多卢) 到大西洋沿岸的广阔地带。后来, 处于上升地位的拉丁语逐渐取代了某些凯尔特语言, 使后者的使用范围大为缩小。凯尔特诸语言习惯分为两大类: 大陆凯尔特语和海岛凯尔特语。前者公元 500 年以前已消亡, 后者指不列颠群岛凯尔特诸语言, 以及通行于法国布列塔尼地区的布列塔尼语。迄今仅存的海岛凯尔特诸语言分为北支和南支。北支即盖德尔语支 (又称盖尔语支), 包括爱尔兰语、苏格兰盖尔语、以及 20 世纪已消亡的马恩语; 南支即不列颠语支 (又称布列塔尼语支), 包括威尔士语、布列塔尼语, 以及已消亡的科尼什语等。

波罗的语族 仅存立陶宛语和拉脱维亚语(又称莱蒂语)。波罗的诸语言,特别是拉脱维亚语的某些方言保留了较多的原始印欧语特点。鉴于波罗的语族和斯拉夫语族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有些学者主张把它们合二为一,构成一个更大的语族——波罗的-斯拉夫语族。

斯拉夫语族 5~10世纪,斯拉夫人从最初的居住地向各方迁移,最后到达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和整个东欧,形成3个斯拉夫人集团:东部、西部和南部斯拉夫人。他们的语言也逐步分为3个相应的分支:东支包括俄语、乌克兰语、白俄罗斯语;西支包括波兰语、捷克语、斯洛伐克语、卡舒比亚语和卢萨尼亚语(又称文德语或索布语);南支包括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斯洛文尼亚语、马其顿语、保加利亚语,以及古教堂斯拉夫语,后者是信奉东正教和拜占庭天主教的斯拉夫民族的礼拜仪式语言,也是最古老的斯拉夫语言。

印度-伊朗语族 印欧语系最东部的一个语族,所包括的语言比印欧语系任何别的语族都多,约有60种。分为印度语支(又称印度-雅利安语支)和伊朗语支。印度语支中,使用人数超过1000万的语言至少有9种:印地语、乌尔都语、孟加拉语、旁遮普语、马拉提语、古吉拉特语、比哈尔语、奥里亚语和拉贾斯坦语。其中乌尔都语和印地语常被西方学者看作是一种语言,称为印地-乌尔都语,有时则统称为印度斯坦语。其他语言还包括僧伽罗语、吉普赛语等。印度语支的近代语言都是从古梵语衍生出来的,但已发生了相当多的变化,大异于梵语。历来有学者主张从印欧语系中再划分出一个独立的达尔迪语族,与印度-伊朗语族并列,但另一些语言学家则认为应把达尔迪诸语言划归印度语支。主要的达尔迪语言是吉普赛语。伊朗语支包括波斯语、普什图语、俾路支语、塔吉克语、库尔德语、奥塞梯语,以及若干使用人数很少,且已消亡的语言。近年来,有些学者主张在印度-伊朗语族中再划分出一个努里斯坦语支(又称卡菲里语支),构成跟印度语支和伊朗语支并列的第3个语支,它包括6种使用人数极少的语言,全分布于阿富汗,个别的也分布于巴基斯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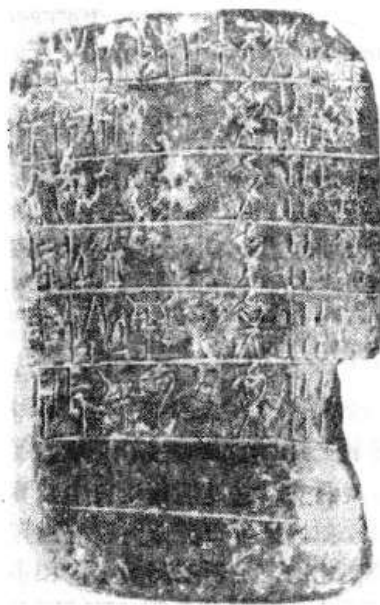
希腊语、阿尔巴尼亚语和亚美尼亚语各构成印欧语系中单独的一个语族。此外,安纳托利亚语和吐火罗语代表了印欧语系两个已消亡的然而却占有一定地位的语族。其中,安纳托利亚语族在历史上分布于小亚细亚(今土耳其的阿纳多卢地区)一带,主要包括阿纳多卢西北部用楔形文字书写的赫梯语,以及阿纳多卢西南部的卢维语。基督纪元开始前,这些语言就消亡了。吐火罗语族包括两支方言:东部方言,中国学者习惯称作焉耆语,西方学者多称为吐火罗语A;西部方言,中国学者习惯称作龟兹语,西方学者多称为吐火罗语B。这两支方言消亡的时间不详,有的学者认为是在9世纪以后。

印欧语系语言的主要特点 在印欧诸语言的早期阶段,共同特征比较明显,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语言间的差别逐渐增多,有的甚至出现了广泛的差别。尽管如此,

有些结构特征还是当代印欧语所共有的。语音方面,所有印欧语言都有较多的塞音,并有清浊对立,如p、t、k和b、d、g,但擦音较少;元音系统较严密,但w、y、r、l、m和n等响音,则既可起元音作用,也可起辅音作用;鼻元音不普遍;声调用来区别词义的情况极为罕见。在语言演变过程中,语音也发生了某些变化。如在印欧诸语言发展的远古时期,塞辅音的发音方法不下3种,而在现代印欧诸语言中减为两种,只在亚美尼亚语、库尔德语、奥塞梯语和某些现代印度语言里才仍然保留着3~4套塞音体系。另外,除前述日耳曼语音变外,希腊语中的唇化软腭辅音在不同情况下变为几个不同的塞音。在古希腊雅典城邦的希腊语中,K^w在a或o前变为p,在e或i前变为t,在u前变为k。语法方面,名词有性、数、格的变化,有自然性别;动词有人称、数、式、态的变化,有些语言还有体的变化。但是印欧语言总的发展方向是:屈折变化系统所起的作用逐渐由大到小,而词序和虚词在决定语法关系时所起的作用则越来越大。只有波罗的诸语言和斯拉夫诸语言等,仍保留了复杂的屈折变化系统。词汇方面,农业方面的许多常用词很相似,大多来源于某个早期共同形式。许多语言有结构相似的数词。

印欧语使用许多不同的文字。赫梯语用楔形文字和一种特殊的象形音节文字;古波斯语用楔形文字;梵语用天城体、婆罗米和其他文字;阿吠斯陀语等使用几种特殊的文字;新波斯语用阿拉伯文字;欧洲的语言则使用自古代腓尼基文字派生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字,主要有拉丁文字、基里尔文字等。

印欧语最古老的直接文献是用赫梯语的楔形文字书写的,可上溯至公元前14世纪或更早的时期。用迈锡尼线形文字B书写的希腊语早期文献(见图),出现的时间略晚于赫梯语楔形文字。而在20世纪初发现赫梯语和释读线形文字B之前,用梵文书写的吠陀经典之一——《梨



希腊语早期文献

俱吠陀》，通常认为就是印欧语系中最古老的文献。

印欧语的研究及其贡献 历史比较语言学是从对印欧语系的具体语言进行大量研究中产生的。W. 琼斯首次提出印度的梵语跟欧洲的希腊语、拉丁语、哥特语等语言有亲属关系。其后，欧洲的语言学家把琼斯的经验性见解提高到科学的论证。丹麦的 R. 拉斯克对于《古诺尔斯语和冰岛语的起源》(1818)做了探索；德国学者 F. 博普的《论梵语动词变位系统与希腊语、拉丁语、波斯语和日耳曼语的比较》(1816)第一次把梵语、波斯、希腊、拉丁、德语诸语言同出一源的情况做了详细的考证。琼斯称为“相似点”的现象，到这时已发展为对应关系。德国语言学家 J. 格林在他的《德语语法》(1819~1837)中提出了印欧诸语的音变定律，这一定律又在 1875 年得到丹麦语言学家 K. 维尔纳的修正，使原来认为是例外的现象得到统一的解释。德国学者 A. 施莱歇尔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集大成者，他吸取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达尔文的进化思想，写出了《印欧、梵语、希腊语、拉丁语比较语法概论》(1874~1877)，他是提出语言谱系观的第一人。K. 布劳格曼和 B. 德尔布吕克合著的 5 卷本《印度日耳曼诸语言比较语法概要》(1886~1900)更是这门学科的巨著。上述学者，无不从语言的实地调查开始，特别对梵语、波斯语、立陶宛语等古老语言，用力尤勤，他们中间，懂十几种语言的不乏其人，甚至懂几十种的也有，师承前辈，而又做到后胜于前，他们的工作赢得了世界学术界的尊重，今天，语言学研究的重点虽然已经转移，但是历史语言学的研究并没有中断，格林兄弟在 19 世纪中叶发起编纂的《德语词典》(1852)，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终于在 1960 年全书出版，便是一例。

参考书目

J. M. Anderson, *Structural Aspects of Language Change*, Longman Group Ltd, London, 1973.

W. P. Lehman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Inc., 1972.

P. Thieme, *The Indo-European Language*, in *Human Communications*, 1982.

A. Meillet, et M. Cohen, *Les langues du monde*, nouvelle édition, CNRS, Paris, 1952.

C. F. Voegelin, and F. M. Voegelin, *Classification and Index of the World's Languages*, Elsevier North-Holland, Inc., New York, 1977.

Bynon, Theodore, *Historical Linguis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T. A. Sebeok (ed.), *Current Trends in Linguistics*, Vol. 11, Mouton, Holland, 1973.

(黄长著)

Yingyu

英语 (English language) 属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西支。它是现代语言中颇具影响的一种语言。许多国家和地区都以英语为官方语言，它也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之一。由于在历史上曾和多种民族语言接触，它的词汇从一元变为多元，语法从“多屈折”变为“少屈折”，语音也发生了规律性的变化。在 16 世纪时，英语和意大利

语、法语、西班牙语一样，都是各自国家的民族语言。但是，英语在当时文化影响上不如意大利语和法语，在使用范围上不如西班牙语。4 个世纪以后的今天，英语在国际交往中使用范围最广，英语科技词汇基本上已成为国际上通用的术语。

英语史的 3 个时期 英语从 5 世纪中叶至今，历时 1500 多年，它原有的词形变化已大为减少。近代英语词形变化仅限于名词的数和生格，代词的性、数、格和动词的几个时态；形容词没有性数格的变化。近代英语动词的词形变化远比古英语简单，例如近代英语 *ride* 只有 5 个不同的形式，古英语 *ridan* 却有 13 个不同形式。英国语言学家 H. 斯维特把古英语时期称为“词形变化完备时期”，把中古英语时期称为“词形变化减少时期”，把近代英语时期称为“词形变化消失时期”。分述如下：

古英语时期 (450~1150) 古英语时期从不列颠岛被异族入侵开始。不列颠岛原是罗马帝国管辖的一个边远行省。5 世纪初，罗马帝国的驻军从岛上撤离，日耳曼民族的 3 个部落朱特人、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相继入侵，占领了岛上平原地区，把当地的凯尔特人赶到西部和北部山区。朱特人、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说的都是西日耳曼语支的方言，虽然各不相同，但是彼此相通。语言学家统称这些方言为古英语。入侵的盎格鲁部落人数最多，因此不列颠岛逐渐称为 *Engla-land* (盎格鲁人的国土)，这个词在现代英语变为 *England* (英国)；而这一国土的语言则称为 *Englisc* (盎格鲁人的语言)，这个词在现代英语变为 *English* (英语)。

从 8 世纪下半叶到 9 世纪中叶，斯堪的纳维亚人几次大规模侵入英国。9 世纪末，入侵者占领了英国东部的大半。1016 年，丹麦王克努特称王全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入侵者的语言属北日耳曼语支，它和早先侵入不列颠的三个民族所说的西日耳曼语差别不大，两者形成一种共处的局面。接触的结果是斯堪的纳维亚语(以古诺尔斯语为代表)的语词大量进入英语。例如：古英语 *lagu* ‘law’ (<古诺尔斯语 *log, lag*)“法律”，古英语 *hūsbonða* ‘husband’ (<古诺尔斯语 *hūsbondi*)“庄稼汉”，古英语 *æg* ‘egg’ (<古诺尔斯语 *egg*)“鸡蛋”等。

古英语的词形变化很多。例如：形容词有强变化和弱变化之分，并在性数格上和所修饰的名词一致，名词、代词和形容词都有 5 个格(主格、生格、与格、宾格和工具格)，各个格不一定有不同的形式(与格和工具格往往形式相同)。又例如，古英语动词分为两大类：强动词和弱动词。强动词通过词根元音变化构成过去时形式，弱动词则用齿音词尾 -d 或 -t 构成过去时。强动词相当于现代英语的“不规则动词”；弱动词大部分相当于现代英语的“规则动词”。

中古英语时期 (1150~1450) 中古英语时期以 1066 年诺曼人征服英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为起点。从此法语成为英国的官方语言，直到 1362 年，英国国会第一次正式用英语开会，并且法令规定以后一切法庭诉讼必须用

英语进行,英语才恢复了它应有的地位。在此以前的300年间,英语仅是在英国使用的3种语言之一。第一是法语(包括诺曼法语和巴黎法语),这是宫廷和政府的语言。其次是拉丁语,这是教会和学术界的通用语言。英国广大人民说的英语屈居第三位。这300年间,英国的文学创作用3种语言书写。直到14世纪,中古英语的中东部方言才逐渐取得了民族标准语的地位。

中古英语有好几种方言,但以中东部方言占优势,因为首都伦敦和具有极大文化影响的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位于这一方言区。中古大诗人G. 乔叟(约1343~1400)和同时期的优秀作家用中东部方言创作。乔叟大约使用8000个词,其中半数来自法语或罗曼语族的其他语言。乔叟的英语是日耳曼语和罗曼语相结合的产物:语法结构是日耳曼语的,词汇包含了大量罗曼语成分。这也是现代英语的特点之一。

从古英语到中古英语最重要的变化是词尾变化的减少。古日耳曼语的特点之一是重音一般落在词根或词干上,词尾总是非重读部位。由于轻读,古英语词尾的元音a、o、u逐渐弱化为e,读作[ə],这就削弱了词尾区别语法关系的功能。原先这些词尾的发音是有区别的,它表示不同的语法功能。例如,古英语 nama 'name' 的词尾 -a 标明这个名词是弱变格、阳性名词、单数、主格。但是这个 -a 词尾在中古英语弱化成 -e (古英语 nama > 中古英语 name),就失去了表示语法功能的作用,因为它既能表示单数主格,也能表示单数宾格或与格。在中古英语里,名词、动词和形容词的形式都简化了,只有人称代词保留了一些古英语的多种形式。由于词尾的语法功能大大减弱,中古英语不能不依靠词序来表示句子各成分之间的语法关系。古英语一个句子里的词序是自由的,有副词—动词—主语,宾语—动词—主语,宾语—主语—动词,主语—宾语—动词等种种格式。从现代英语的标准看,这样的词序叫做倒装,其实这些格式在古英语里极为普通。在中古英语里,倒装词序变得越来越少了。据统计,在古英语文献里,动词—主语这个词序的出现率约为35%,在中古英语散文里仅为4%。在中古英语时期,主语—动词—宾语的词序逐渐确立,终于成为现代英语的标准词序。另一方面,介词和助动词也配合词序来表示语法关系和功能。例如,介词 of 起了代替古英语名词生格的作用,介词 for 和 to 表示与格的各种语法功能。此外,一系列的助动词开始担负起情态动词的功能,表示“必须”、“能够”、“愿望”等态度和口气;而形容词的比较级和最高级,除了少数常用的形容词仍用 -er 和 -est 词尾外,绝大多数都用前面加副词 more 和 most 的办法来表示比较级和最高级。中古英语时期是英语从综合型转变成分析型的过渡时期。

近代英语时期(1450~) ① 15世纪以后英语的元音大移位。近代英语时期约从15世纪中叶开始,分为早期(约1450~1700)和晚期(约1700~现在)。晚期近代英语也就是现代英语。大约从1400年开始,英语就

发生了巨大的语音变化——称作“元音大移位”。这个变化延续了几个世纪,直到大约1750年才稳定下来。受影响最大的是长元音。见下表:

	晚期中古 英语 (1400)	早期近代英语 (1450~ 1700)	晚期近代 英语 (1700以后)	
mȃyn	/i:/	/əi:/	/ai/	mine
wē	/e:/	/e:/	/i:/	we
ēst	/æ:/	/e:/	/i:/	east
mōus	/u:/	/əu:/	/au/	mouse
tō	/o:/	/u:/	/u:/	to
stōn	/ɔ:/	/o:/	/ou/	stone
nāme	/a:/	/æ:/→/ɛ:/→ /e:/	/ei/	name

② 文艺复兴时期英语的特点。早期近代英语时期正好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在这一时期里,古代希腊和罗马的语言和文学的尊严地位得到了恢复。当时英国学者中有很多人精通古典语言,他们从希腊语、拉丁语借来许多词语。早期近代英语时期的名家如T. 莫尔(1478~1535)、F. 培根(1561~1626)以及后来的诗人J. 弥尔顿(1608~1674)和科学家牛顿(1643~1727)等,既用英语写作,也用拉丁语写作。希腊、罗马文学、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文学,这些都是当时英国作家吸取文学素材的宝库,也是吸取语言材料的泉源。据统计,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大诗人莎士比亚运用2万~2.5万个词。莎士比亚把外来语和本族语巧妙地结合起来,最著名的例子是《麦克白》中的一小段独白:

"Will all great Neptune's ocean wash this blood
Clean from my hand? No, this my hand will rather
The multitudinous seas incarnadine,

Making the green one red." (Macbeth II, ii, 60~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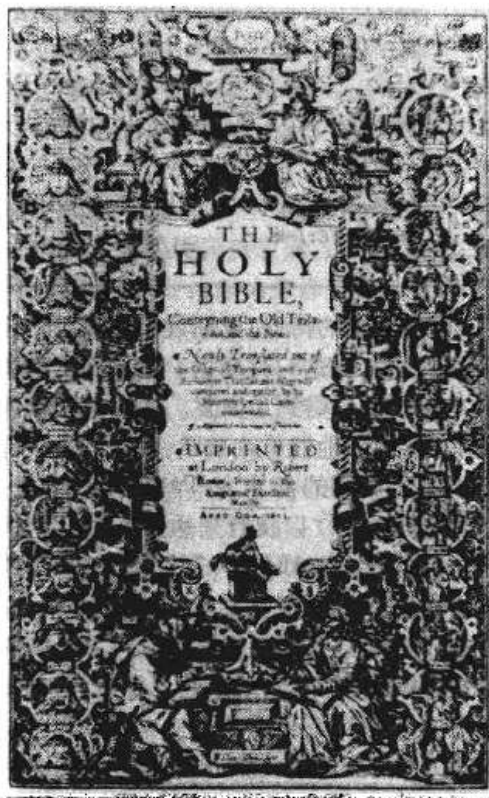
“大洋里所有的水,能够洗净我手上的血迹吗?不,恐怕我这一手的血,倒要把一碧无垠的海水染成一片殷红呢。”

这里形容词 multitudinous 和动词 incarnadine 都是外来语,动词 make 和形容词 green、red 都是本族语词。外来语和本族语词相辅相成,造成了生动的艺术效果。诗人弥尔顿的诗篇运用了大量拉丁语词,甚至用了某些拉丁句法结构,这也丰富了英语的表达能力。这两位大诗人的创作显示了英语特有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1611年出版钦定本英译《圣经》(见图)长期被认为是近代英语的句子结构和文体的楷模。这个译本文体质朴、节奏优美。莎士比亚作品的出现和钦定本《圣经》的诞生说明英语越来越成熟了。

③ 17世纪以后的英语。英语发展到17世纪,已成为能够和古代希腊语、拉丁语、近代法语、意大利语相媲美的文学语言。1662年正式成立的皇家学院提倡用质朴的英语探讨哲学和自然科学。从此,英语逐渐代替拉丁

语成为科学和哲学著作的语言。哲学家T.霍布斯(1588~1679)和J.洛克(1632~1704)主张文章要写得准确、清晰、合乎逻辑。文学家J.德莱顿(1631~1700)的散文为英语句法树立了规范。1755年出版的S.约翰逊编纂的《英语字典》第一次把英语作为全民语言记录下来,它对英语的规范化起了积极的作用。



钦定的《圣经》
英语本封面

英语词汇的扩大 17世纪,英语扩展到北美。18世纪,英语的使用在印度、澳洲、新西兰各地逐渐扩大。几个世纪以来世界各民族互相接触,给英语带来了数以千计的新词。19世纪产业革命以后,科学技术发展,科学家、哲学家、文学家创造了不少新词,而英语本身又具有开放性,这使英语词汇持续增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技方面的新词许多来自英语,新的政治、经济、文学术语也往往在英语里找到原词或原义。此外,英语在国际上的使用也从另一方面促使英语词汇的扩大。据估计,古英语的词汇约为5万~6万个,现代英语大辞典收入的词条多达65万~75万。一方面词汇在扩大,另一方面词的法力力求符合规范,这两种倾向同时在起作用。

自19世纪起,英语里大量出现短语动词,就是用浅易的动词加上副词或介词组成短语动词来代替那个较艰深的同义的(一般从拉丁语借来的)动词。例如,以bring about代cause或accomplish,以keep on代continue,以look into代investigate,以put off代postpone,以put up with代tolerate等。但是,这不是简单的代替,而是同时并存,互相补充。

英语的现状和未来 英语是当前世界上通行最广的语言之一。目前世界上把英语作为第一语言(本族语)的人口约有3亿,作为第二语言(即不是本族语,但为所在

国通用语)使用的人口约有2.5亿,共5.5亿。此外,把英语作为外国语使用的人约3~5亿。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和作为外国语这两种不同的使用法,说明英语正在愈来愈被看成一种国际交往的工具,它不再为一国或一个民族所专有,而是一种中性的信息媒介。

由于英语的使用范围极为广泛,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各种地区性变体。有的语言学家已经不再把伦敦或英国上层人士的英语作为唯一的标准英语,而把它作为地区英语之一来看待。除英国英语外,最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英语。美国在18世纪建国之后,本土语言仍以英国为宗。美国学者最初称它为“在美国的英语”。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国力大增,就有学者写出专著,自称为“美国语”。现在通称为“美国英语”。在四五十年前,这个术语通常被理解为美国人特有的语词和语法,从抱“纯洁主义”的英国文人看来,它不是纯正的英语。但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英语”一词的概念逐渐变了,只指在美国本土上使用的英语,而不论其与英国英语的异同。现在英国学术界也终于承认美国英语有它的独立地位,而且,除美国英语外,还有加拿大英语、澳洲、新西兰英语、南非英语等,它们也各有自己的地区性的语词和语法。其他像印度英语、东南亚英语、加勒比地区英语和非洲某些新兴国家的英语,也都各自具有语音和词汇上的特点。

美国英语和英国英语在语音上有相当明显的差别,拼写的差别则不是很大。在词汇方面,美国英语曾长期以英国英语为规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美国的大众传播媒介迅速发展,美国英语已反过来对英国英语产生影响,并且正在日益扩大这种影响。在文学作品上,这两种英语的区别比较明显,但在学术、科技文章方面,两国作者使用的是一种中性的共同文体。

参考书目

- A. C. Baugh and T. Cable,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3rd ed.,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1978.
G. L. Brook,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London, 1958.
O. Jespersen, *Growth and Structure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9th ed.,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54.
A. H. Marckwardt, *Introduction to the English Langua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42.
T. Pyles,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New York, 1964.

(李赋宁)

yingyong yuyanxue

应用语言学 (applied linguistics) 研究语言在各个领域中实际应用的学科。

特征和意义

应用语言学是语言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它着重解决现实当中的实际问题,一般不接触语言的历史状态;而理论语言学则着重探索理论问题,在总结规律时常涉及语言的历史状态。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理论要以

应用(实践)为基础,应用又以理论为指导。可以说语言理论是应用语言学的基本武器,而应用语言学则是鉴定各种理论的实验场。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人们在运用语言的过程中不断改善和扩大它的交际职能。这就是应用语言学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最初的语言,只有有声语言的形式。后来出现了文字,产生了书面语言,语言的应用扩大了;从时间上说,它能流传到后代,从空间上说,它能传达到远方。后来又出现了印刷机,语言的应用得到进一步扩大;不仅能流传到后代和远方,而且能比较快速地大量印刷,广为传播。录音机和电话的出现,又是一次飞跃,从此,语言不但可以保留其书面形式,而且也可以保留其语音形式,不但能以书面形式,而且能以语音形式迅速传递到远方。电视、传真、复印、录像、激光照排、卫星通信、模式识别、各种语言分析合成仪器、电子计算机等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出现,更把语言的应用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在“计算机文化”到来的社会里,语言已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交际工具,而且是人机对话的基础。

语言的应用范围每扩大一步,都会使语言的交际职能得到明显的提高。同时也会出现一些新问题。为了解决这些新问题,常常又必须采用一些新的方法和新的工具,而新方法和新工具的应用又反过来促进应用语言学以及整个语言学的发展。

历史和发展

语言研究的应用方面和理论方面最初没有划分开来,这是因为语言学不够发达,还不大必要作这种区分。19世纪初,语言理论方面的研究和应用方面的研究开始分化,例如,作为应用语言学一个分支的语言教学同当时着重探讨历史问题的语言学分了手。19世纪末叶,J. N. 博杜恩·德·库尔德内提出了“应用语言学”这个概念,但没有得到广泛的注意。20世纪以来,语言科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近三四十年,各方面向语言科学提出了一系列与科学技术、国民经济的发展有密切关系的新任务,应用范围得到了空前的扩大,这才使得语言应用方面的研究和理论方面的研究明确地区分开来,“应用语言学”这个名词开始广泛运用。

语言学由于应用范围的扩大,同其他学科的联系也增加了。过去,语言学只同文学、人类学、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心理学、哲学和文化史等有联系;而今,它同数学、信息论、控制论、物理学、电子学、医学、符号学、情报学、通信技术、计算机科学、自动化技术等发生了密切联系。语言学的领域如此扩展,无疑地带来了新的分工和一些部门的分化。有的人进行历史比较,有的人钻研理论,有的人解决实际问题,还有一些人则研究一些最新的、对国民经济有重大作用、而且与尖端学科相联系的边缘问题。所有这一切,都促成了应用语言学与理论语言学的分化。

任务和范围

应用语言学是一个较大的概念,可以说,同语言学应用有关的问题都属于应用语言学的研究范围。它同其他应用学科一样,是以直接满足社会需要为目标的,因此,它的研究范围由实践的需要来决定。根据近年来的发展趋势看,有必要区分为一般应用语言学和机器应用语言学。前者处理面向人的一些老问题,后者处理面向机器的新问题。

一般应用语言学 按其应用领域,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语言教学 它是应用语言学中最古老的一个分支,但成为一个独立学科是近几十年的事。编辑高质量的教材和参考书,研究切合实际的教学方法,一直是语言教学研究中的重大课题。随着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除一般的语言教学外,还开展了为不同目的和不同对象服务的第二语言教学、科技外语教学、双语制教学、聋哑盲教学。

在具有悠久文化历史的国度里,语言教学的任务更加繁重,以中国为例,古汉语文献及古典文学作品都极其丰富。如何在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既掌握好现代汉语的基础知识和写作能力,又获得一定的古汉语知识和欣赏古典文学作品的能力,这是一个特殊课题(见汉语教学)。对于多民族国家来说,除搞好各民族本族语言教学外,如何搞好第二语言(一般来说是主体民族的语言)教学也是一项重大任务(见少数民族汉语教学)。在当今世界,一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如何把外语教学搞好,使人们获得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工具,是摆在语言学家和外语教师面前的重要职责(见外语教学)。相反地,如何把本国语言,如汉语,教给外国人也是一个重要课题(见对外汉语教学)。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语言教学也在经历一个现代化的过程。语言实验室、计算机辅助语言教学应运而生(见计算机辅助语言教学)。

标准语的建立和规范化,文字的创制和改革 这里既有政策问题,又有技术问题。建立通用于各方言区的标准语,对于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统一和发展是极端重要的。在方言分歧的情况下,如何选好这种标准语的基础方言,又如何选好它的标准音,这是应用语言学所要解决的问题。为无文字的语言创制文字时,基础方言和标准音更是重要的依据。由于这种语言多半是从未研究过的,因而语言学家需要进行周密细致的语言调查,对比各方言点的音位系统、词汇语法系统,并在此基础上结合语言使用情况及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因素对基础方言和标准音加以确定。文字改革包括文字系统(字母表、正词法和标点符号)的部分改进和彻底更换。前者如苏联1918年俄文正词法的改革,后者如1928年土耳其的文字改革。

标准语的建立只是语言规范化的开始。为了确定语音、语法、词汇规范,需要编出相应的正音词典,规范语法和各种类型的词典。同时,还要采取各种措施提高人们的语言修养。

辞书编纂 这是应用语言学中同实际联系最密切的学科之一,同时也是反映语言研究水平的一个重要侧面。比如,词类问题研究不够,就不好在词典中为每个词标记词类。又如,某个汉字古音不详,在汉语历史大辞典中就宁可阙如。词汇是语言中变化最快的部分,新词新义不断涌现。及时、准确地把这些新词新义固定在词典中,指导人们如何运用,这是辞书对语言规范化最有效的影响。

为了满足人们多方面的需要,辞书品种日益增多。除一般性字典、词典外,还编纂了同音字典、构词字典、正字正词词典、同义反义词典、类语词典、词源词典、成语词典、俚语词典、谚语词典、典故词典、惯用语词典、歇后语词典、人名地名词典、各种方言词典、各种术语词典、缩略语词典、双语或多语对照或详解词典、大百科全书,最近又出版了很多频率词典和逆序词典。辞书业的兴盛反映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达。

翻译 这是文化交流的桥梁。直译和意译是从古至今一直有争论的问题。“信、达、雅”更是近年来争论的焦点。这些问题虽说带有一定的理论性,但也同翻译实践密切相关。至于传授翻译技巧,如何使译文达到与原文神似的程度,更是各种翻译教科书和翻译手册所要讨论的主要内容(见翻译)。

与翻译有密切联系的问题很多,如术语、标音、译音和转写,人名、地名研究。人名、地名的翻译一般都是根据“名从主人”的原则加以音译。但是,在各种不同的语言文字之间如何音译,采取标音法还是转写法,也是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目前的趋势是转写法占上风。在使用汉字的情况下,问题更加复杂,一般的标音和转写原则不适用,因而制定出各种对译不同语言的汉字译音表。使用汉字译音,带来了译名的驳杂现象,如 Reagan 译成“里根”、“列根”、“雷根”,New Haven 译成“纽黑文”、“新哈芬”。为了消除这种驳杂现象,并为了更好地贯彻“名从主人”的原则,不少人主张用汉语拼音照抄拉丁字母和转写斯拉夫字母书写的人名、地名。术语是科技语言最基本的载信单元。术语混乱必然要影响国内外学术交流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因而各个国家和国际学术组织(如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对术语的标准化十分重视。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术语大量涌现,译不胜译,因而术语国际化的倾向日益发展。如果音译,又发生怎样音译的问题,是标音还是转写,或是采取某种折衷的方法。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术语不同于人名、地名,移植进来之后便变成该语言词汇的一部分,这就是说,它不仅要化在其中,而且要生根开花。

除了上面这些课题外,一般应用语言学还涉及下列内容:①言语矫正学,协助医生治疗各种先天的和后天的言语病症(如腭裂、口吃、倒仓、塌中等等),使患者的语言功能得到恢复。②舞台语言研究,目的是指导演员如何进行发声训练,获得艺术语言的基本功。③建立国际辅助语,目的是探讨消除语言障碍的途径。④制定速记系统,以便于人们用简单的符号迅速记录语言。

机器应用语言学 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引起了科学技术的巨大变化,同时也为语言学开辟了新的发展途径。计算机一方面充当语言学工作者的得力助手,帮助语言学者对语言素材进行分类、模拟、分析和转换,另一方面又对语言学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要求武装它的“头脑”以发展它的智力(如赋予它检索能力、翻译能力),给它增添“翅膀”以赋予它听觉(识别口语)、更强的视觉(识别文字)、说话能力(言语合成)和听写能力(语音打字)。为了处理语言应用方面的这些问题,而且主要是跟机器打交道的一些新问题,工程语言学、机器语言学、计算语言学等应运而生。所有这些便形成了机器应用语言学的内容,其特点是研究如何利用电子计算机等先进工具来处理自然语言。目前研究得比较多的课题有以下几个:

实验语音学 20 世纪初便已萌芽,但真正成为一门实验性学科是近二三十年的事。最初,研究内容以发音器官和发音方法的生理实验为主。实验工具多借助医疗器械。后来发展到以声学实验为主,为通信工程提供各种参数。语图仪、X 光电影、动态腭位记录装置等分析仪器的出现,使语音研究从静态分析过渡到动态分析。电子计算机的应用,更使语音实验研究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由于计算机有快速处理大量数据的能力,成段语言的分析研究才得以进行。于是,语音实验从音素音节分析扩展到成句成章分析,同时超音段特征成了重要研究对象。这些都给言语的分析和合成创造了有利条件。由此可见,实验语音学作为一门边缘性学科在给电子计算机增添听说能力方面将起决定性作用(见实验语音学)。

机器翻译 电子计算机和语言的最早结合开始于机器翻译。作为第一次结合,这个选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表现在:一是机器翻译点燃了计算机非数值应用的火种,二是它的确成了一个无比广阔的试验场,许多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以及许多技术成果都是在它的基础上或启发下产生和解决的。不足之处,是由于机器翻译是一种比较高级的人工智能,难度大,不仅要求对一种自然语言有充分理解,而且要求把它等价地转换成另一种自然语言,因而至今尚未能真正或广泛地付诸应用。机器翻译经历了一个马鞍形的发展过程,从高潮到低潮,现在又进入一个日趋繁荣的新阶段,并成了第五代计算机的主要内容之一。实现机器翻译的技术条件目前已基本具备,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语言研究跟不上。不过,现在世界上已有十多个机器翻译和机助翻译系统在初步应用(见机器翻译)。

情报检索 科技情报的数量每 8~10 年增加一倍,在大量的资料中查找某些需要的东西,犹如大海捞针。手工检索和机械检索已进行多年,成效有限。采用电子计算机后,情报检索才出现了崭新的面貌,整个情报工作才得以进入“情报—计算机—电信”三位一体的新时期。情报检索系统中的关键是情报检索语言的建立。这种语言应具备能精确表达文献主题和提问主题所需的词汇语法手段,不应产生歧义,不受用户主观因素影响,并且便于用程序运算方式进行检索。为了提高情报检索系统的效

能,使其具有较高的查全率和查准率,在词汇方面如何消除术语的同义性和多义性,在语法方面如何求得既经济又足够的语法手段来表达必要的语法关系,这些都还需要进行认真的研究(见情报检索)。

汉字信息处理 随着计算机非数值应用范围的不断扩大,汉字信息处理问题越来越显得尖锐。汉字字形繁复,字数庞杂,而且存在大量的一音多字、一字多音现象。这给编码输入带来很大麻烦。目前虽然已有一些方案初步解决了汉字的输入输出问题,但如何求得比较理想的方案,使编码做到简单易学,操作方便,输入迅速,没有重码,而且易于进一步处理,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为了合理解决这个问题,有必要对汉字进行多方面的,即数理的、语言学的、工程心理学的分析研究。从语言学方面说,加强汉字的基础研究不仅对汉字信息处理是必要的,而且也是语言文字学的迫切任务。如书面语的统计研究(词、字、部件、笔划等)和口语的统计研究(多音节词、音节、音素、声调等)不仅有利于编码方案的设计,而且也有利于输入输出装置的研制,例如键盘的设计和字库的安排。

自然语言理解 这是人工智能的核心,因为人的各种智能活动最终都要以语言及其书面形式——文字来表达。自然语言理解中的困难问题,同机器翻译等机器语言学部门存在的问题一样,主要是区别各种同形多义现象,以及解决省略、替代等问题。

同形现象分布在各个平面上,以汉语为例,词的平面上,如“打”字,可以有“打人”、“打哪儿来”、“打篮球”、“打二两酒”、“打毛衣”、“打铺盖卷儿”、“打电报”、“一打铅笔”等意义。句子平面上,如“反对的是少数人”,其中“反对的”,可以是“反对者”(施事),也可以是“被反对者”(受事)。以上这些同形现象,除少数可以靠词本身加以排除外,一般都要靠句内上下文通过语义、结构手段来确定,个别的还需要依靠更大范围的上下文,或语用学知识(见自然语言理解)。

言语统计 这是一门老学科,但由于应用了电子计算机而获得了新生。过去用手工方式进行统计,困难重重,统计量不可能很大,而且有些数据,如语言单位的出现概率,也提供不出。近年来,利用电子计算机进行统计,既快又准,统计量不受限制,而且能提供多种参数,因而促进了统计语言学的发展。

进行言语统计,目的在于根据量的描述给出质的评价,即依靠定量分析得出定性分析。例如,人们对词进行频率统计,统计结果得知某些词出现几千、几万次,而某些词只出现三五次,甚至一次。由此可以做出这样的质的评价:前一类词是常用词,后一类词是非常用词。这些数据无疑对语言教学等工作是极为重要的参考。随着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的发展,言语统计范围不断扩大。例如,为了解决通信工程中提高清晰度和压缩言语信号的问题,进行了元音、辅音以及韵律特征等大量语音参数的统计;为了对语法进行精确描写,统计了语法形式、单位

和模型的用法;为了找到各种功能风格以及不同作家的风格特点,开展了计算风格学研究;为了确定标准汉字表和计算机内部标准码,进行了大量汉字字频统计。

进行言语统计,需要各种素材,这些素材的合理组织,便构成了语料库。语料库编排得合理与否,直接影响到语料效能的发挥。编排得好,提供的副产品就多,例如可以利用所存的语料编制逐词索引和建立为计算机辅助教学用的试题库,或进行各种对比研究。

少数民族语文的信息处理 中国一些少数民族至今仍使用古老的文字,书写印刷非常不便。近年来,继中文信息处理蓬勃发展之后,少数民族语文信息处理的研究也开展起来了。目前,已经进行语言信息处理研究的民族有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壮族、彝族和朝鲜族,其他一些民族也在酝酿之中。这将大大提高这些民族的语言文字应用水平,促进他们的文化教育事业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语言应用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文化的进步,新技术的涌现,使语言应用的范围日益扩大,使语言应用的潜力日益发挥,使语言应用的效果日益完善。从语言学的观点看,所谓信息化社会,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利用电子计算机等先进工具对语言文字信息进行各种处理(包括语言文字信息的储存、分类、统计、检索、转换、传输、控制和模拟等),目的在于建立现代语言信息系统,使语言文字得到最佳利用,使凝聚在语言文字中的知识信息发挥最大效能。

参考书目

刘涌泉:《语言现代化和计算机》,武汉大学出版社,武汉,1986。

S. P. 柯德爾著,上海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译:《应用语言学导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3。(S. P. Corder, *Introducing Applied Linguistics*, Penguin Books Ltd., 1979.)

(刘涌泉)

youxuan yuyixue

优选语义学 (preference semantics) 用于自动翻译的一种语义学理论,英国人工智能专家 Y.A. 威尔克斯于 1974 年提出。

语义单位有 5 种:义素;义式;裸模板;模板;超模板。

义素 它是最基本的语义单位,由义素构成义式,用以描写单词的语义;由义式构成裸模板及模板,用以描写简单句的语义;再由超模板描写更大的文句或段落的语义。威尔克斯确定了 80 个义素,分为 5 组:

① 语义实体:如 MAN(人类),STUFF(物质),THING(物体),PART(事物的部分),FOLK(人类的群体),STATE(存在的物质),BEAST(兽类)等等。

② 动作:如 FORCE(强迫),CAUSE(引起),FLOW(流动),PICK(挑选),BE(存在)等等。

③ 性状:如 KIND(性质),HOW(动作的方式)等等。

④ 种类:如 CONT(容器),THRU(孔)等等。

⑤ 格:如 TO(方向),SOUR(来源),GOAL(目标),LOCA(位置),SUBJ(施事),OBJE(受事),IN(包含),POSS(领属)等等。

此外,还有一种前面加星号的义素表示类别。例如,*ANI表示有生命的义素 MAN、BEAST 和 FOLK,*DO表示动作的义素。

义式 由左右加圆括号的义素构成。义素在义式中要按一定顺序排列,义式中最重要义素永远位于最右端,称为义式的首部,首部直接或间接地支配着义式中其他的义素。为了避免在义式中增加新义素,可由两个义素构成子式。用这样的义式能够精细入微地描述词义。例如,drink(喝)的义式为 drink→(((*ANI SUBJ)((FLOW STUFF) OBJE) ((SELF IN) (((*ANI (THRU PART)) TO)(BE CAUSE))))))。

最右边的义素 CAUSE 是首部,整个义式由若干个子式嵌套而成,在子式中,括号内两项之间存在着依赖关系。drink 义式中各子式的含义如下:

子 式	格/动作	值	解 释
(*ANI SUBJ)	SUBJ	*ANI	优先的行为主体是有生命的
((FLOW STUFF) OBJE)	OBJE	(FLOW STUFF)	优先的客体是液体
(SELF IN)	IN	SELF	容器是主体本身
(((*ANI (THRU PART)) TO)	TO	(*ANI (THRU PART))	动作的方向是人身体上的孔(即嘴)
(BE CAUSE)	CAUSE	BE	动作是属于引起存在(于某处)类型的

根据义式,drink 的意义可以这样理解:这是一个动作,优先的行为主体是有生命的物体(*ANI SUBJ),动作的优先客体是液体或者能够流动的物质((FLOW STUFF)OBJE),动作导致液体存在于有生命物体的自身内部(SELF IN),液体通过(TO 表示方向格关系)有生命物体上的一个特殊的孔进入体内。在这里,“优先”很重要,SUBJ表示动作的优先主体,OBJE表示动作的优先客体。

裸模板 是由一个行为主体义式首部(N_1)、一个动作义式首部(V)和一个客体义式首部或表示性质的义素(N_2)组成的能直观地解释得通的序列,其形式为3项义素:

$$N_1-V-N_2$$

这样的形式实质上就是表示句子主要成分——主语、谓语、直接宾语(或表语)的语义类。

例如,The old salt is damp 的裸模板有两个。一个是:

MAN-BE-KIND

其意思是“老水手消沉”,另一个是:

STUFF-BE-KIND

其意思是“陈盐潮了”。

用这种3项义素组成的裸模板,可以记录一切句子。

模板 如果义式序列的首部组成裸模板,那么,这些义式以及可能依附于其上的其他义式所组成的序列,就称为这一原文片段的一个模板。

例如,Small men sometimes father big sons (有时小个子男人是大个子儿子的父亲),这个句子可表示为两个义式序列。现将义式的首部与句子单词一一对应地写出如下:

Small	men	sometimes	father	big	sons
KIND	MAN	HOW	MAN	KIND	MAN
KIND	MAN	HOW	CAUSE	KIND	MAN

其中,CAUSE 是 father 作为动词(“引起产生生命”之意)用时的义式的首部。

第1个序列不能组成裸模板,因为它的 N_1-V-N_2 三联序列 MAN-MAN-MAN 在直观上解释不通,而第2个序列中的三联序列 MAN-CAUSE-MAN 可直观地解释为“人引起人的存在”,所以是一个裸模板,它是句子模板的核心部分,因此,它们的义式的序列就成了句子的模板。

超模板 把模板结合起来就形成超模板。在结合时,要找出各模板之间的指代和照应关系。例如,在下面的文句中:

Give the bananas to the monkeys, although they are not ripe. They are hungry.

(把香蕉给猴子,尽管它们没有熟。它们饿了。)

第1个 they 是指代 bananas 的,第2个 they 是指代 monkeys 的,这是因为 ripe 的义式满足 bananas 义式中被支配成分的条件,而 hungry 的义式满足 monkeys 义式中的条件。

除了上述5种语义单位之外,在优选语义学中,还采用了常识推理法则。

采用优选语义学来分析语言,不必经过形态分析和句法分析等中间阶段,形态和句法信息都由语义信息的单位表示出来,这样,就摆脱了传统句法分析的框框,使整个系统牢牢地扎根在语义的基础上,成为一个语义分析的完整系统。

参考书目

Y. A. Wilks, *An Intelligent Analyzer and Understander of English*,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Vol. 18, No. 5, 1975.

(冯志伟)

Youzhengshi Pinyin

邮政式拼音 (Postal Spelling System) 从清末到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前,邮电部门用来拼写中国地名的一套拉丁字母拼音方案。

中国的公众电信事业正式创办于1881年,在此以前由外国人开办的邮电业务中已经开始使用拉丁字母来拼

写中国的一些主要地名。1906年春在上海举行了“帝国邮电联席会议”，对中国地名的拉丁字母拼写法进行统一和规范。会议决定，基本上以翟理斯(1845~1935)所编《华英字典》(1892年上海初版)中的拉丁字母拼写法为依据。翟理斯式拼音实际上就是威妥玛式拼音。为了适合打电报的需要，会议决定不采用任何附加符号(例如送气符号等)。

邮政式拼音与威妥玛式拼音不同的地方主要有4点：①威妥玛式拼音基本上是按照北京语音系统拼的，而邮政式拼音加入了某些方音的拼法。最突出的例子如 χ 、 χ' 、 χ'' ，威妥玛式按北京语音拼作 chi 、 ch' 、 ch'' ，而邮政式按尖团音分别拼作 ki 、 ki' 、 ki'' 和 tsi 、 tsi' 、 tsi'' (邮政式一律省去送气符号)，如 Peking(北京)、Tientsin(天津)、Tsinan(济南)，等等。②威妥玛式拼音中的介音 u ，邮政式拼音中大多数写为 w ，例如 Ankwo(安国)。威妥玛式拼音中的 ou ，邮政式拼音作 ow ，例如 Chinchow(锦州)。③邮政式拼音规定，广东以及广西、福建一部分地区的地名，一律按当地的方音拼写(翟理斯《华英字典》中，附有各个汉字的广东、客家、福州、温州、宁波等9个方言区的方音拼法)。④1906年“帝国邮电联席会议”统一地名拼法以前，有一部分地名已经有了拉丁字母的习惯拼法，这部分地名保留不变。例如 Foochow(福州)、Canton(广州)、Amoy(厦门)等。

从以上可以看出，用来拼写中国地名的旧的邮政式拼音，是一个十分混杂的系统。尽管如此，由于过去国外出版的中国地图一般都采用了这种拼写法，因而被使用拉丁字母的各国作为拼写中国地名的标准。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以后，特别是成为国际标准以后，中国的地名就全部改用汉语拼音拼写，取代了过去的邮政式拼音。

邮政式拼音地名和汉语拼音地名对照举例：

邮政式拼音	汉语拼音	汉字
Hankow	Hankou	汉口
Ichwan	Yichuan	宜川
Kiangpeh	Jiangbei	江北
Kongmoon	Jiangmen	江门
Pakhoi	Beihai	北海
Pokpak	Bobai	博白
Shanghai	Shanghai	上海
Shiukwan	Shaoguan	韶关
Sienyang	Xianyang	咸阳
Tsingtao	Qingdao	青岛
Tseki	Ciqi	慈溪

(尹斌庸)

youwen

右文 指汉字字形右边的声符。汉字中形声字占大多数，在形声字中意符在左，声符在右的最多。如从木、从水、从人、从言的字，声符大都在右。声符本来是表音

的，但是在文字的发展过程中，同从一个声符的字在意义上有时又有联系，这就是声符兼义了。唐代欧阳询《艺文类聚·人部》曾引晋代杨泉《物理论》说：“在金曰坚，在草木曰紧，在人曰贤。”这说明晋人已经注意到声旁相同的字，如坚、紧、贤都从艮声，意义是有联系的。到宋代就有人专从声符来说解字义。沈括(1029~1093?)《梦溪笔谈》卷十四说：“王圣美治字学，演其义以为右文。古之字书皆从左文。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如木类，其左皆从木。所谓右文者，如戋，小也。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歹而小者曰残，贝之小者曰贱。如此之类，皆以戋为义也。”这就是说凡从“戋”声的字都有小的意义在内。《宋史》卷三百二十九称王子韶字圣美，太原人。神宗熙宁时附王安石，所以神宗与论字学，留为资善堂修定《说文》官。沈括说他解说字义以右边声符来定，“右文”的名称就由是而起。根据右边的声符说字义的这种学说就称为“右文说”。

宋神宗时，王安石为相，势倾朝野，曾著《字说》24卷，见于《宋史·艺文志》。《宋史·王安石传》说：“初，安石训释《诗》、《书》、《周礼》既成，颁之学官，天下号曰‘新义’。晚居金陵，又作《字说》，多穿凿傅会，其流入於佛、老。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说，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足见当时声势之大。但是他那些谬妄之言，到哲宗元祐中终被禁绝。陆佃作《尔雅新义》或用王安石说，也无可称道。

右文说创自北宋时期，到宋末元初时也有人敷衍其义，关键是声符与字义之间是否绝对相关。事实上，有的相关，有的毫不相关。同从一个声符的谐声字，可能具有不同的意义。例如从“段”声的字，如瑕、瑕、霞、蝦等具有红色的意思。《说文解字》说：“瑕，玉小赤也。”“瑕，马赤白杂毛。谓色似蝦鱼也。”又大徐本《说文》新附字说：“霞，赤雲气也。”但是从段声的字，如假、暇、遐等另有别的意思，都与红色无关。有的形声字的声符只表音，并不表义。如江、湖、河、海等字声不兼义。所以不可执一以概全，牵强附会。

不过，右文说在训诂学上并非毫无价值。这种学说对探讨语词意义的本源还是很有用的。例如从“仑”得声的字，如沦、轮、伦、论、纶等字都具备有条理、有伦次的意义，由此可以执简以驭繁，找出一组字所共有的“义素”。这从南唐徐锴的《说文解字系传》里已露出根苗，到清代的学者就提出“因声求义”的训诂方法，进而走向研究“字族”或“词族”的道路。因此，对右文说的得失也要有明确的认识。

参考书目

沈兼士：《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收入《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1933。

(周祖谟)

Yutianwen

于阗文 (Khotan script) 也称于阗塞文。古代称为“塞人”的民族使用的一种拼音文字，因19~20世

纪之交发现于中国新疆和田(古称于阗)而得名。其字母源出印度婆罗米文笈多王朝字体,有楷书、草书、行书之别。《大唐西域记》瞿萨旦那(于阗)国条谓其“文字宪章聿遵印度,微改体势,粗有沿革,语异诸国”。吐蕃文《于阗国悬记》亦谓“其文字悉同身毒(印度),习尚大有华风”。于阗文记录的语言属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伊朗语支,与今阿富汗境内的瓦罕语相近。元音有 a, ā, i, ī, u, ai, e, au, o, 辅音有 g, th, d, p, ph, b, tc, js, j, c, t, d, ts, ch, ks, ś, s, ss, s, ys, hv, h:。词类有名词、代词、数词、形容词、动词、副词、前置词、后置词、连接词等。名词有阴性、阳性,单数、复数,主格、宾格、属格、用格、方位格、呼格等形态变化;形容词变格与名词相同;动词有第一、第二、第三人称,单数、复数,现在时、过去时,陈述式、命令式、假定式、希望式,主动态、中动态等形态变化。19世纪末俄国驻中国喀什噶尔领事 M. 彼得洛夫斯基、英国驻中国喀什噶尔领事 G. H. 马继业最先在和田地区搜集于阗文文献,1901年德国梵文学家霍恩雷首次刊布。此后英国、法国、美国、日本等国派到中国新疆的“探险家”又获取了大量于阗文文献。现存于阗文文献属 5~11 世纪初,以佛经居多,也有少量世俗文书和词汇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在新疆陆续发现于阗文文献(见图)。英国



于阗文《佛顶尊胜陀罗尼》

学者贝利研究于阗文 40 余年,已发表《于阗文文献》7 册、《于阗文佛教文献》1 册,并著有《于阗文字典》1 部。

(黄振华)

Yu Xingwu

于省吾 (1896~1984) 中国古文字学家、训诂学家。字思泊,号双剑谿主人、泽螺居士、夙兴叟,辽宁海城人。1896 年 12 月 23 日生。1919 年毕业于沈阳国立高等师范。30、40 年代曾在辅仁、燕京、北京等大学讲授古文字学。1955 年起任东北人民大学(1958 年改名吉林大学)历史系教授。1984 年 7 月 17 日在长春逝世。

于省吾在古文字学上的成就主要集中在甲骨文和金文的考释上。他在 40 年代自印了 3 本考释甲骨文的专著,即《双剑谿殷契骈枝》(1940)及其续编(1941)、三编(1943)。50 年代以后又在刊物上发表了考释甲骨文的文章。后来他对已发表的甲骨文考释加以删订,加上未发表的甲骨文考释,编成《甲骨文字释林》,由中华书局在

1979 年出版。于省吾在从事古文字研究的初期,撰有《双剑谿吉金文选》(1933)。后来陆续发表了不少研究金文的文章。他在晚年准备把已发表和未发表的金文考释编成《吉金文字释林》,可惜没有完成就去世了。于省吾考释古文字的态度比较谨严。他强调研究古文字要注意“每一个字本身的形、音、义三方面的相互关系”,还要注意“每一个字和同时代其他字的横的关系”以及它们本身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字形之间的“纵的关系”,反对没有充分根据地任意考释古文字(《甲骨文字释林》序)。于省吾还曾致力于古器物 and 古文字资料的搜集整理,先后编著了《双剑谿吉金图录》(1934)、《双剑谿古器物图录》(1940)和《商周金文录遗》(1957)等资料书。他收藏过的古器物精品中有吴王夫差剑和少虞错金剑,所以用“双剑谿”(“谿”通“谿”,意为楼阁旁的小屋)为斋名。



于省吾在诠释先秦古籍方面也有不少成绩,主要著作有《双剑谿尚书新证》(1934)、《双剑谿易经新证》(1936)、《论语新证》(1941)、《双剑谿诸子新证》(1940,新版 1962)和《泽螺居诗经新证》(1982)等书。他认为研究先秦古籍应该充分利用地下发现的新资料,常常根据甲骨、金文等订正诠释先秦古籍的文字,所以他研究古籍的著作都以“新证”为名。

50 年代以后,于省吾还发表了一些根据甲骨、金文等资料研究上古社会、历史的论文;在考释古文字的时候,也努力利用关于上古社会、历史和民族学等方面的知识去解释文字的形义。

参考书目

于省吾:《于省吾自传》,载《晋阳学刊》,1982,第 2 期。

(袁锡圭)

Yu Min

俞敏 (1916~) 中国语言学家。天津市人。1940 年毕业于辅仁大学中文系。1947~1952 年先后在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任教,1953 年以来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俞敏在古汉语音韵、汉藏语比较、汉语语法等方面都有著作。他注意边缘学科,能从成段的经传子史中找问题。音韵方面的论文有《古汉语里面的连音变读现象》(1948)、《论古韵合韵屑没曷五部之通转》(1948)和《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1979)。《连音变读》依据现代语音学理论考察古文献,归纳出同化和增音等几个类型,对古异文、古音通转和构拟都提出了新见解。《通转》沟通音韵和语法,探



讨上古汉语派生新词的模式。《对音谱》以梵文校佛经译语，探其源并摆脱其束缚，从而使古音韵研究离玄想，脚踏实地。在汉藏语比较研究方面，俞敏把比较的领域扩大到了虚字和句法，从而使汉藏两种语言的亲属关系和先秦典籍中一些语法现象得到新的阐明。主要论文有《汉语的“其”跟藏语的 gji》(1949)和《汉藏语虚字比较研究》(1984)。前者证明“其”和 gji 同源，“彼其”、“何其”分别相当于 p'agi、gagi，“彼其之子”=p'agi mi adi，“实维何期(其)”=de gagi red，从而使古语疑难得解。后者更进一步有所开拓，比证了27个虚字，创获很多。在现代汉语语法方面，俞敏对于词类区分有创见。《评〈北京话单音词词汇〉》(1951)最早提出重叠式可以分开形容词和动词的界限的理论。(张永言)

Yufa Xilue Jiaohua

《语法修辞讲话》 汉语语法著作。吕叔湘、朱德熙合著。1951年6~12月在《人民日报》上连载，1952年北京开明书店出版。1953年另由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语法修辞正误练习》，全书修订后，1979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再版。内容共分6讲：第1讲语法基本知识，第2讲词汇，第3讲虚字，第4讲结构，第5讲表达，第6讲标点。这本书着重实际用例的分析，强调语言知识对语言实践的指导作用。不是只说明一些术语格式，就术语和格式举一些例子，而是更重视分析语言实践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以达到“匡谬正俗”的目的。这本书以语法为中心，以语法的基本知识为基础，提出分别主干和枝叶的分析方法，用这个方法去辨识句子的脉络，从这个脉络来观察结构上、表达上的正误，也联系词汇、修辞和逻辑的分析。这是使语言分析和语言实践紧密联系起来的一个新的尝试。这本书在出版后的30多年中，对语言教学以至语言研究，都有很大影响，在促进汉语规范化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参见彩图插页第25页)

(林祥福)

yufaxue

语法学 (grammar) 研究制约语言行为的规则——首先是研究联词成句的规则——的一门学科。一种语言的语法是该语言的语法规则的总和。

语法的概念 语言之有语法，语法之有制约作用，是语言本身所决定的。语言是线性的序列，序列里的基本单位——词——不是任意组合的，而是按规则组合的。由词组成的句子可以有许许多多变化——多到千百句里也可能没有两句完全相同。尽管变化这样多，本语言社团成员听起来(就语言讲，不涉及文化的和社会的因素)并不困难，这是因为凡是句子就有语法，也即是有为本语言社团所共同接受的规则。例如“家”、“三”、“房”是3个词，代表3个概念。但把这3个词排成“家三房”这个序列，在汉语社团里无人能懂，因为组不成一个句子。如果在“家”后面加“里”组成“家里”，在“三”与“房”之间加“间”组成“三间房”，使原来那个序列变成“家里三间房”，那就是一

个语法完整、意义明白的句子。这里所加的“里”和“间”并没有太多的实质上的意义，但起了造句的重要作用，这是因为这一句子体现了下面几条规则：

① “家”+方位词“里”→处所词组“家里”。

② 处所词组可以用作主语。

③ “三”+量词“间”+“房”→数、量、名结构。

④ 数、量、名结构可以用作谓语，前面不需要动词。

⑤ “家里”+“三间房”→主语+谓语→句子：家里三间房。

还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明语法的制约作用。用A、B、C 3个符号可以列成6个不同的形式：ABC、ACB、BCA、BAC、CBA、CAB。但是，用汉语“我”、“看”、“书”三个词，我们只能列出一个常用的合乎语法的语序，即“我看书”，还有一个很少单独用的语序“书我看”(例如，“书我看，电视不看”)。

这是因为：汉语语法一般要求主语在前，谓语在后，宾语又在谓语之后。这3个符号中，能充当主语的只有“我”和“书”，但既能充当主语又能把“看”用作述语的只有“我”。因此，“我”一般位于第一，“看”位于主语之后，列第二；宾语“书”位于“看”之后，列第三。汉语的语序规则已经决定最常用的只有一种词序形式，即“我看书”。

因此现代语言学认为，凡语言都有语法，都受语法规则的制约。这里所谓语法，与语法书中的“语法”不完全一样。语法书中的“语法”是语法学家归纳出来的，是第二性的；这里所谓语法，本体存在于本民族的(或社团的)成员的心理之中，是第一性的。由于本体语法的存在，没有读过汉语语法书因而也说不出什么语法规则的汉族人，也能说出合乎汉语语法的句子。这是因为人脑好象是一部无比灵敏的计算机，储存着无数语法规则，指导和制约句子的构造。这些规则的总和即是本体语法。

语法研究的不同出发点 语法研究的对象是制约语言行为的规则，这是一切研究者共同承认的。但是各研究者的出发点可以各不相同，大体上有下列各类：

从研究方法看，有实证主义的语法和唯理主义的语法。

从研究对象的时限看，有贯穿不同时期的历时语法和属于同一时间的共时语法。

从研究者的社会目的看，有规定性的语法和描写性的语法。

从研究者的教育目的看，有供语言学研究的语法和教学用的语法。

从所研究的语言的范围看，有普遍语法和语别语法。

实证主义语法和唯理主义语法 实证语法开始于古希腊(不过当时没有实证语法这个名称)，着重语法现象的分类；唯理语法17世纪开始于法国，着重语法现象的解释。实证语法说：“名词是人或事物的名称”，“形容词表示事物的特征”。唯理语法说：“天”、“地”、“水”、“木”代表物的本质；“圆”、“红”、“硬”代表事物的附质；本质独立存在，附质依附本质而存在。代表本质的词称为名词，

代表附质的词称为形容词”。可以看出,实证语法从词所反映的客观事物出发,唯理语法从词所代表的逻辑概念出发。几个世纪以来,实证语法和唯理语法都已经大大发展。现代实证语法有专门机构的语料库作为依据,不同于早期学者只限于个人的博览勤记;现代实证语法力求用客观标准对语法现象进行分类,而早期实证语法往往只凭常识分类。现代唯理语法从一种理论出发(例如N.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理论),试图解释整个语言行为,不同于早期一般性的逻辑解释。实证语法的任务是分类概括纷繁的语法现象,篇幅可以大到几大卷;唯理语法的目的在于显示某一语法理论的解释力量,写出语法规则的释例即可。

历时语法和共时语法 历时语法即历史语法,例如丹麦语言学家O.叶斯泊森的《近代英语语法》。此书上溯古英语和中古英语,概述15世纪起直到20世纪初叶的英语语法,共7大卷,材料引自1200种文史著作。共时语法的代表作可以举英国R.夸克等人合著的《综合英语语法》(1985),此书记录当代英语的语法实况,以“英语用法调查”和4家英语语料库为根据。叶斯泊森的历时语法记录英语语法500年来的演变,目的是述古以明今。夸克的共时语法记录一段时间(最近50年)里的语法,目的是述今以明用。前者记录语法的历史,后者记录语法的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历时研究不仅适用于古代,也可以应用于当代。共时研究不仅适用于当代,也可以适用于古代。例如,研究某一地区近50年来的语言变化(包括某些语法形式的细微变化),把祖孙三代的语法变化记录下来,便是一种当代的历时性研究。同样地,研究中古时期某种语言的语法,把同时期的有关资料放在同一个时间平面上来考虑,概括它的语法状态,这便是把共时语言态的研究应用于古代一个时期。

规定性语法和描写性语法 按通常的理解,规定性语法以语法学家的主观判断为准,描写性语法以客观的实际用法为准。例如,英语的“双重否定”(如I don't know nothing),规定性语法认为错误,描写性语法则认为在某些场合中不算错,好比朋友闲谈,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有用这个形式的。又例如汉语的“非去不可”,有“非得去”这一变体。规定性语法会对“非得去”不予认可,描写性语法则认为比较随便的场合可以接受。规定性语法往往被认为是学究式的保守的语法,描写性语法则往往被认为是开明的客观的语法;不过,在历史上,当一种语言处在语法形式杂乱无序时期,规定性语法应运而生,也起了匡谬正俗的作用。另一方面,描写性语法无论怎样宽容,也总得注明使用的语域。例如素以描写性原则著称的《韦氏三版国际英语词典》对ain't(不是)这一形式注明为“有文化的人在口语中常用”,这里“在口语中常用”几个字就意味着在书面语中不常用。因此,虽是描写,依然还有某种规定。一般地说,描写语言,总有适当的规定;描写言语,不妨列举变体。

供语言学研究的语法和教学用的语法 前者把语言

作为一种规则体系来研究,后者把语言作为一种供运用的工具来学习。前者的目的是了解通则,即明理;后者的目的是学会技能,即致用。

在一本供语言学研究的语法里,名词是这样定义的,名词的语法特点是:①可以受数量词修饰,例如:一支笔、三本书、几件事、一种风气;②不受副词修饰。例如不能说“很勇气”,但可以说“很勇敢”,不能说“早战争”,但可以说“早打仗”。当然,谓词有的时候也能受数量词修饰。例如“三分懊悔,七分忌妒。”“有两种快,一种是快而不好,一种是又快又好。”可是这些词还能受副词修饰(又懊悔又忌妒/非常快)。谓词可以受副词修饰,而名词不可,这是名词区别于谓词的地方。名词既然有了①可以受数量词修饰,②不受副词修饰这两条规定,名词的定义就有了客观根据,经得起验证了。(朱德熙:《语法讲义》,1982)

这个定义有几点值得注意:①和过去许多做法不同,《语法讲义》只用一个标准——词的语法功能——来区分词类。②定义提供了对它本身的有效性的检验(是否足以区分名词和谓词)。③把关键之点用最小的对比加以说明(“早战争”,“早打仗”等),用最经济的手段取得最大的概括。以上三点都代表现代语言学的严谨性。

在一本教学用的语法里,名词是这样定义的,名词表示人或事物的名称。一部分名词在构词上有独特的标志,如前缀“阿、老、小”等;后缀“子、儿、头”等。名词可以受数量词、代词、形容词、动词的修饰,一般不能受副词的修饰。(刘月华:《实用现代汉语语法》,1983)这个定义不是用一个标准,而是用三个标准,即意义、构词标志(形态)、句法特征(功能)。用三个标准而不是一个标准,当然理论上的统一性弱了一些,但另一方面却增加了形象性(如构词标志)和实用性,而这正是教学用的语法所必需的。

综括以上所说,供语言学研究的语法和教学用的语法可以区别如下:

	供语言学研究的语法	教学用的语法
目标	明语法的理	致语法的用
分类	分类要求有概括性和排它性	分类不要求十分严格,以说明用途为主
举例	以最少而又足够的例子说明类别	力求详实:例子本身就是学习材料
对象	语言的研究者,他们具有比较一致的学术兴趣	语言的学习者,他们的学习条件不尽相同

教学用的语法已有很长的历史,但历来是分类列举,在词法和句法之下各分大类和小类,给予定义和例证。供语言学研究的语法则在近几十年里兴旺起来,现在已呈诸说纷陈的局面,有生成语法、系统语法、层次语法、格语法、孟德鸠语法、关系语法等等。

普遍语法和语别语法 普遍语法指适用于各种语言的普遍性原则,语别语法指一种语言特有的语法规则系统。常见的语法著作大都是语别语法。普遍语法仅是一种哲学理论,还在研究阶段,它的研究方法有统计调查和理

论推演两种。统计调查的方法一般用几十种分属不同语系的语言为对象,比较各种语言的句法结构,然后归纳大多数语言共有的句法特征(例如词序)。这种研究方法的优点是一切结论都可以验证,缺点是由于例外太多,附加条件太多,结果所谓普遍现象几乎和个别现象相差无几。这类研究者可以美国的 J. H. 格林伯格为例。用推理方法研究普遍语法的学者可以乔姆斯基为代表。乔姆斯基认为句子是从潜存于大脑的深层结构通过语音和语义的处理而呈现为表层结构的,这一理论适用于人类一切语言。除了统计法和推理法以外,也还有理论上比较持平的另一派普遍语法论者,他们认为了解某些普遍性较大的语法现象,有助于我们对个别语言的宏观考察。例如:

①词可以聚合成词类,组合成句子;凡是语言都有词类(不管如何分类)和句法(不管包括什么规则)。

②在有形态变化的语言里,形态变化用来区别主格和宾格,在失去形态变化和本来就没有形态变化的语言里,主格和宾格往往决定于词在句子中的位置。词序这一语法手段和形态变化这一语法手段互相补充,构成语法手段的平衡。

③在欧洲各民族语言的长期演变中,从原来非常繁复的语法系统发展到近代比较简明的系统,可以看作是理性选择的结果。理性选择会在长时期里显出它的作用。

上述 10 种不同的语法研究,实际上只是两大类:一类是实证语法,包括历时和共时语法,规定语法和描写语法,普遍语法和语别语法。以上 6 种语法侧重点虽然不同,但都有实证语法分类详述的特点。另一类是唯理语法,普遍语法属于这一类。至于供语言学研究的语法,有的是解释性的,属唯理语法,如乔姆斯基的《句法结构》(1957);有的是分类性的,属实证语法,如朱德熙的《语法讲义》(1982)。唯理语法之所谓“理”,即是人类共有的逻辑思维,因此唯理语法很自然地又是普遍语法,又由于它的目的在于阐明一种语言学的理论,当然又是供语言学研究的语法。因此,虽有 10 种不同的语法研究,从根本上说只有实证语法和唯理语法两大类。但是,即使像乔姆斯基这样的唯理语法家,当他论述什么是不合语法的句子时,用来判为“不合语法”的标准还是实证语法的标准。他的深层结构,事实上也是按实证语法的原则(陈叙式、肯定式、主动式的单句)造句的。法国 A. 阿尔诺和 C. 朗斯洛著的《保罗·罗瓦雅尔语法》(1660)对传统的词类逐一作出唯理主义的解释,但词的分类本身却是实证研究的结果。没有实证语法作为基础,唯理语法将会无从着手。因此,我们可以说,实证语法是一切语法研究的基础。

语法范畴 语法范畴是语言形式的一个大类,包括词类、性、数、格、人称、时、态、体、式等。

词类 唯理主义语法家认为某些基本词类为一切语言所共有。他们认为,名词代表事物的本质,形容词代表事物的附质,动词代表人对事物的描述,副词代表这一描述的附带条件等等。实证主义语法家则认为,唯理主义的分类是逻辑概念的分类,无助于精确的语法描写。他们主张按客观的、可资验证的标准分类。对于有形态变

化的语言,用形态变化作词类标准;对于不具形态变化的语言,用句法功能作词类标准。有的汉语语法学家曾经有过“词无定品,句成品立”的说法,近时汉语语法学家精心设计了句法功能的分类标准,作出了相当成功的分类。

现代语法学对于词类的区分倾向于多层次分类。第一层次区分封闭类和开放类。封闭类如介词、代词、连词等。这一类的成员是固定的,新成员不易进入,因此称为封闭。英语动词中的助动词和元动词(*be, do, have*)也列入封闭类,这比原来把动词笼统地归入开放类更为精确。开放类如名词、一般动词、形容词,这一类的成员随时可以增加,因此称为开放。第二层次按形态或句法功能进行分类,各种语言区分出来的类别不必是统一的,也不受传统的“八大词类”所束缚,而各具自己语言的特点。例如汉语有谓词、量词、处所词等,与其他语言不同。第三层次是在个别词类之下的再划分,按语义进行。例如传统英语语法分副词为 4 类,1985 年 R. 夸克等人的《英语综合语法》则粗分为 7 类,细分为 23 类。单类之下的语义细分,是现代实证语法的一个特点。

性的范畴 性有语法的性和自然的性。人类的男性和女性,生物的雄性和雌性等,是自然的性。语法的性和自然的性不完全一致。“太阳”在德语是阴性,法语是阳性,俄语是中性。“月亮”在德、法、俄语分别为阳性、阴性、阴性,这些是语法的性。法语、西班牙语已失去中性,只有阳性和阴性。汉藏语系语言没有语法的性,只用词汇手段表示自然的性。至于语法的性怎样起源,语言学家还无法作出满意的解释。有人认为由于人本身有性的区别,于是很自然地把这种区分应用到物,作为一种便于区分的标志。在历史演变中,法语“冬”原是阴性,后因“春”、“夏”、“秋”都是阳性而变为阳性。德语“星期三”原为阴性,因其他周日之名都是阳性而变为阳性。英语名词在古英语时期有语法的性,中古英语逐渐废除,终于消失。以上变化可以认为是语法合理化的表现。

性的范畴在不同语言中适用的范围不尽相同。在德语、法语中适用于名词、冠词、代词、形容词;在俄语中适用于名词、代词、形容词和动词过去时。

数的范畴 主要指单数和复数,某些语言还有“双数”,如希腊语、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希伯来语的双数专指人的一双眼,一双手,一双脚;汉语的量词“双”,有人也认为是“双数”的标志。

数的范畴可以涉及名词、形容词、代词、动词。阿拉伯语有 *malikun* (一个国王), *malikāni* (两个国王), *malikūna* (诸国王) 3 种形式。阿拉伯语既有数又有性的范畴,因此它的动词变化形式随着三种人称,三种数,两种性的不同,理论上可以有 18 种变化;但由于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已经简化,实际上只有 13 种变化。

与数有关的概念是名词的可数性和不可数性。可数名词代表以单体形式存在的事物,如“椅子”、“孩子”、“梦”、“事件”。不可数名词代表不以单体形式而以物质

形式或概念形式存在的事物,如“砂”、“水”、“力量”、“经验”。这是就大体而言。实际上,可数和不可数之间可以互换,各种语言的可数与不可数的概念也不尽一致。汉语的可数名词有自己的个体量词,如“本”、“枝”、“匹”等;不可数名词则需要选用度量词,如“尺”、“斤”、“桶”等。

数也有自然的数和语法的数之别。列表如下:

自然的数		语法的数
A	可数	
	1	单数
	1+1	双数
	1+N	复数
B	不可数	零形态的数

格的范畴 上面说到性的阳类、阴类、中类和数的单类、复类,这些都可以存在于孤立的语词之中。格的情况不一样,它只能存在于一定的词组之中,因为格是表示词与词关系的手段。下面这个拉丁语句子包括4个名词,分别是主格、与格、生格、宾格(另一个是动词):

	Petrus	filio	Pauli	librum	dat.
	(彼得给保罗的儿子一本书)				
	彼得	儿子	保罗的	书	给
名词的格	主格	与格	生格	宾格	(动词)
句子成分	主语	间接宾语	定语	直接宾语	谓语动词

Petrus	主格,句子的主语,不受别的词支配;主格在严格意义上不是格;相反,它使句中别的名词“落”在一个格上(“格”的拉丁原词 cadere(动词),意即“落”)
filio	与格,从主格 filius 变来。它受 Petrus 的支配,成为受益(或受害)的对象,因而处在“与格”的地位
Pauli	生格,从主格 Paulus 变来。作为 filio 的定语,它说明 filio 是 Paulus 生的,即保罗的儿子。生格意为“由此生出”
librum	宾格,从主格 liber 变来。动词 dat 的直接宾语。dat (给)是现在时单数第三人称

传统语法学家认为名词有格的形态才算有格;因此,拉丁语、俄语、德语有格;法语和英语的名词已经失掉(或基本上失掉)了格的形式。不具格的形式的名词虽则充当主语、间接宾语、直接宾语,不应该看作主格、与格、宾格名词。现代有些语法学家如 C. 菲尔莫尔(1929~)则认为,格的形式消失,但格的概念不妨继续应用,以区别词与词之间的关系。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格语法”的理论。例如:

- Peter broke the window with a hammer.
彼得用锤打破了窗子。
- The hammer broke the window.
锤打破了窗子。
- The window broke.
窗子打破了。

从表层结构看,a的主语是彼得;b的主语是锤;c的主语是窗子。但是从深层结构(即语义)看,彼得是打破这个行动的施事者,窗子是被打破的受事者,锤是打破窗子的工具。显然,如果把三者都视为主格,那只是看到形式而没有看到实质。格语法提出新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即把彼得看作是施事格(即主格),锤是工具格,窗子是受事格(即宾格)。

汉语语法学家应用同一理论来解释某些句子里主语的功能。例如:

- 我昨天开了一个会。(施事主语)
会他昨天开过了。(受事主语)
这个会他用来贯彻政策。(工具格主语)
这个会大家给定了名。(与格主语)

同样地,汉语的宾语也可以有施事、受事、工具、与格之分。例如:

- 擦玻璃。(受事宾语)
来客人了。(施事宾语)
抽烟斗。(工具宾语)
给不给他?(与格宾语,即间接宾语)

汉语本来没有格的形态,但是有些汉语语法学家作了格的分析,使语法分析更加细致。

人称的范畴 人称有第一人称,说话者用来指自己;第二人称,用来指听话者;第三人称用来指所说到的人或事物。人称有数的特征(我,我们;你,你们;他,他们),这是相当普遍的语言现象。

汉语表示“数”的形式并不很多,但人称的“数”比较完备。拉丁语不同人称的动词有不同词尾形式:amo 我爱,amas 你爱,amat 他爱。在这种形式里,词尾已足以表示人称,所以人称代词“我”、“你”、“他”往往省略。相反,法语的3种形式是 je donne, tu donnes, il donne, 但动词的语音形式完全相同,表示人称的功能不够完备,人称代词 je, tu, il 就不能不加。这可以认为是语法系统的内部平衡。德、法、俄的“你”和“你们”是两种形式,而英语的“你”和“你们”是一种形式。西班牙语“我们”、“你们”有性别之分。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的“他们”、“她们”是两种形式(法 ils, elles, 西 ellos, ellas, 意 essi, esse),英、德、俄是一种形式,汉语在语音上也是一种形式。“他们的”、“她们的”在英、德、俄、法、西、意都不加区分。不同的语言往往有不同的人称体系,但本族语使用者都觉得自己的语言恰到好处。

时的范畴 自然的时和语法的时不同。自然的“现在”只能是一刹那或一点,在这一点之前是“过去”,在它之后是“将来”。语法的“现在”要宽得多。例如“他病了一个月,现在好了”这一句里的“现在”,所指的状态在说话之前已经开始,在说话之后还将继续,虽说是“现在”,却又在某种程度上包括过去和将来(图1)。

从图1的三幅图中可以看出,语法的现在,是对着过去而说的。同样地,语法上的过去和将来,是对着现在而说的。相反,自然的现在,只能指一刹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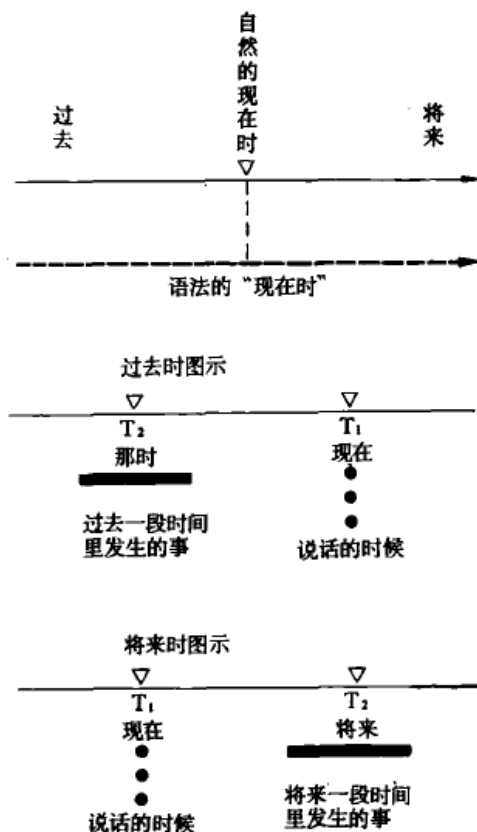


图1 时的三种概念

体的范畴 时的范畴表示动作(或状态)的时间,体的范畴表示动作(或状态)的过程,即:正在进行或已经完成,泛指全过程或特指开始或结束,多次发生或一次发生,时断时续或瞬息即止等等。

斯拉夫语言一般都有体的范畴,动词人称形式中体与时不可分割。俄语的任何动词,不是未完成体,如 читать (读,读着), учиться (学,学着), 就是完成体,如 прочитать (读了,读完), научиться (学了,学会)。未完成体有三个时态。例如:

Он читает. (他正在读。现在时)

Он читал. (他曾读过。过去时)

Он будет читать. (他将要读。将来时)

完成体没有现在时,只有两个时态。例如:

Он прочитал. (他读完了。过去时)

Он прочтает. (他将读完。将来时)

汉语没有时的形态范畴。有些语法学家认为它有体的形态范畴,例如“着”表示进行体,“了”表示完成体等。但是这样的分类是不够精密的,例如“台上坐着主席团”的“着”字表示的是一种静止的状况,而“屋顶上盖着一层厚厚的雪”的“着”字表示的是动作遗留下来的状态。至于“了”,它确有完成体的功能(做了一件好事),但有时“了”和“着”却很难区分。例如“开着窗户睡觉”:“开了窗户睡觉”,“着”和“了”在这样的上下文里几乎是同一意义。因此,汉语语法学家没有采用体的范畴,而把这一些词作为动词词尾或语气词来处理。

英语里的时和体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有一派语法学家不列体的范畴,只列12种时态。列表如下:

现在时 现在进行时 现在完成时 现在完成进行时
过去时 过去进行时 过去完成时 过去完成进行时
将来时 将来进行时 将来完成时 将来完成进行时
另一派则认为如果采用体的范畴,可以使英语的时态体系更为简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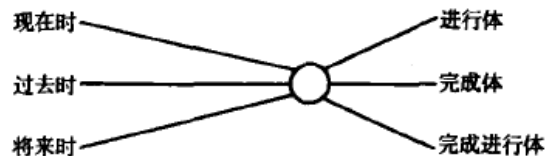


图2 英语的时态体系

夸克等人合著的《英语综合语法》提出了下列体和时的综合分析法(图3):

① 现在时 a. 状态。例如:

The earth moves round the sun. (地球围绕太阳运转。)

We live near Toronto. (我们住在多伦多附近。)

b. 习惯。例如:

We go to France every year. (我们每年去法国。)

She makes her own dresses. (她的衣服她自己做。)

c. 瞬间。例如:

I enclose (herewith) a form of application. (兹附上申请书。)

Here comes John. (瞧)约翰来了。]

② 过去时 a. 事件。例如:

The Normans invaded Britain in 1066. (诺尔曼人于1066年入侵不列颠。)

b. 状态。例如:

India was under British rule during the 19th century. (19世纪时印度在英国统治之下。)

c. 习惯。例如:

In ancient times, the Olympic Games were held at Olympia in Southern Greece. (古时,奥运会在希腊南部奥林匹亚地方召开。)

③ 现在完成时 a. 状态。例如:

That house has been empty for many years. (这房子已经空了好几年了。)

b. 事件。例如:

All our children have had measles. (我们的孩子都出过疹子。)

c. 习惯。例如:

The city has suffered from floods throughout its history. (这城市在历史上历受水灾。)

态的范畴 态分主动态和被动态。如语法主语是动作的施事者,句子里的动词称为主动态;如语法主语是动作的受事者,句子里的动词是被动态。例如:

汉语: 军队杀死了国王。 国王被军队杀死了。

英语: The army killed the king.

The king was killed (by the arm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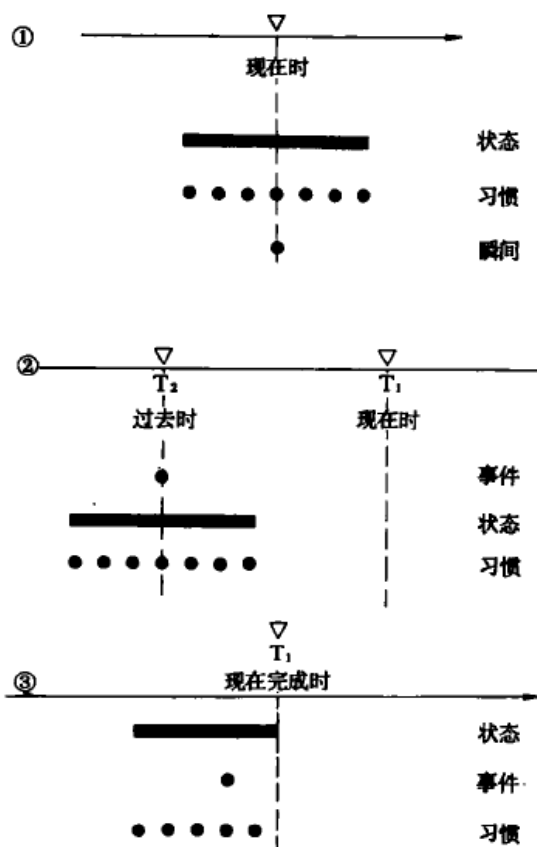


图3 现在时、过去时、现在完成时的三种概念

法语: L'Armée a tué le roi.

Le roi a été tué (par l'armée).

俄语: Армия убила короля.

Король был убит армией.

从上面例句可以看出,主动态在上列三种语言中无大差别,而被动态则各有自己的语法特征。英语、法语用 *be, être* 的一定形式加动词过去分词表示;俄语用 *быть* 的一定形式加动词的被动形动词短尾表示(也可用反身动词表示)。汉语用“被”、“给”等加动词表示。被动语态之所以用“*be*”作为谓词,一种解释是被动态的主要功能在描写一种状态,不像主动态那样叙述一种动作。

式的范畴 拉丁语有直陈式和虚拟式之分,以 *amare* (爱)的第一人称(未完成体)为例:

		直陈式	虚拟式
未完成体	现在时	<i>amō</i>	<i>amem</i>
	将来时	<i>amabo</i>	—
	过去时	<i>amabam</i>	<i>amarem</i>

拉丁语直陈式是常式,不是特殊的用法;虚拟式主要用在从句里,表示假想、命令、目的、结果,也用在间接引语里。德、法、俄语仍然有虚拟式这一范畴,英语的虚拟形式主要用在假想。

汉语的隐性范畴及其发现办法 汉语是少形态的语言。缺少形态,不等于没有办法把语法范畴区分出来。赵元任对此有过论述:

a. 这是上海,我喜欢上海,我到上海去。(✓)

b. 那是王家,我喜欢王家,我到王家去。(✓)

c. 这是摇椅,我喜欢摇椅,我到摇椅去。(×)

d. 我到摇椅那里去。(✓)

e. 那是你,我喜欢你,我到你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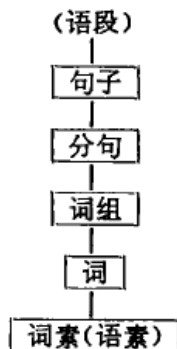
f. 我到你那儿去。(✓)

‘上海’、‘王家’、‘摇椅’、‘你’都是体词,都可以放在‘喜欢’后头,似乎一样,然而有区别。‘上海’、‘王家’是处所词,是名词的一个特殊的类,可以搁在‘到’后头;‘摇椅’是一般名词,‘你’是人称代词,都不是处所词,必须得在后边加上‘那儿’才能搁在‘到’的后头。可是这个分别没有明白的标记(是隐蔽的)。汉语里大多数语法范畴都是隐蔽的,不是有明白的标记的。”(吕叔湘译:《汉语口语语法》,1979,第11页)

上面赵元任论述中所用的“处所词”这一范畴所以能够确立,就是因为有了客观标准(能不能做“到”的宾语)可以区别“上海”(处所词)和“摇椅”(普通名词)的缘故。或者说,因为有了客观标准确定“上海”和“摇椅”的区别,才有必要另立处所词这一范畴。同样地,方位词和时间词两个范畴的确立也是由于各自有了分类的标准缘故。

近几十年中,关于汉语语法范畴的讨论,诸如词能否分类,分类以什么为标准,形容词、副词、代词、介词能否独立成类等问题,语法学家争辩很热烈。一般认为,用一种标准分类胜于用两种或多种标准;用可以验证的句法功能为标准胜于用难于验证的词义为标准;同时,在取得足够的区别性特征的前提下,概括胜于列举。

语法单位和语法层次 语法分析通常分层次进行,不同的层次有不同的单位。最低层是词素,高一层是由一个或一个以上词素组成的词,再高一层是词组、分句、句子,后三项都由前一个层次的一个或一个以上单位组成。句子之上还可以立语段,由一个或一个以上句子组成,但语段一般地作为语用学的单位考虑。图示如下:



词素 也称语素,是语法中最小的区别性单位,也是它的变体的总称。例如英语的{*s*}是词素,在名词词尾出现,代表名词的复数,区别于单数。它有3个变体: /*s*/ (如 *picks*), /*z*/ (如 *dogs*), /*iz*/ (如 *kisses*)。汉语的“啊”也是词素,在句末出现,表示一定的语气,用{*a*}表示,有4个变体:

/*a*/ 这是天大的事啊!

/*ia*/ 你快来啊!

/*wua*/ 他长得多高啊!

/*na*/ 画儿多好看啊!

词素可以分为自由词素和粘着词素。自由词素能够单用,即单独成词,如英语的 like(像,形容词),但作为词素又可成为形容词的词尾(如 lifelike, 栩栩如生的)。汉语的“电”也能单独成词(名词),但作为词素又可作为“电报”、“电灯”等词里的一个成分。粘着词素不能够单用,如英语 -ly, 它可以作为词尾粘在形容词后面,构成副词,但不能单独成词;汉语的“子”,是许多名词的标志(房子、枣子等),也只能依附于词干“房、枣”等,不能单用(“子”如表示“儿子”,能单独成词,在语法地位上与“房子”、“枣子”的“子”不同)。

词 词是比词素高一层的单位,由一个或一个以上的词素组成。词可以定义为最小的自由形式,可以由一个自由词素构成,例如“一所房”的“房”;也可能由一个自由词素加上一个粘着词素(如“房子”),或一个自由词素加上其他自由词素(如“楼房”、“砖瓦房”)构成。对于词的定义,语法学家历来争论很多,这里所提是一个大致可行的定义。词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繁忙的一个层次。词和词以下的层次由词法制约,词和词以上的层次由句法制约。汉语语法学家惯常称“词素”为“语素”,因为汉语有些单位(如“吗”、“呢”)可以称为词,不称为词素。但在普通语言学著作中,仍常用“词素”这个术语。

词组 词组是句法平面上的一组词。在词组里,主语和谓语不能同时出现。这是词组不同于句子的地方。例如, William invaded England(威廉入侵英国)是句子,但 William's invasion of England(威廉的入侵英国)是词组。前者有谓语,后者没有。

“理发”是词,“理了个发”是词组,英语 haircut 是词, a haircut 是词组。

自从生成语法出现以后,词组这一概念取得更为广泛的运用。早期生成语法把句子的生成过程看作是名词词组和动词词组结合成句的过程:

$S \rightarrow NP + VP$

在这里,“词组”包括一个和一个以上的词和词素,词组结构成为生成句子的单位,通过重写规则生成句子。

从形式看,词组可以分为动词词组,名词词组,形容词词组,介词词组,副词词组。从功能看,可以分为限定词组(即形容词性词组)、疏状词组、补足词组。

分句 在句子和词组之间有必要设“分句”这个层次,因为不这样,会引起一定的不便。下面是一个单句,里面还包含一个小单句:

“你得躲在一个[他无法找到的]地方。”

在这里,“他无法找到的”已具有完整的句子形式,但是它后面没有停顿,通常是一口气说完“他无法找到的地方”,因此称它为“分句”,而不称“句子”。一般说来,分句后面的停顿较短,句子后面的停顿较长。比较:

① 初一下雪。初二刮风。初三还是刮风。

② 初一下雪,初二刮风,初三还是晴天。

①列举三天的气候,每句自成起讫,每句结尾停顿较长,因为都是独立的句子。②说明“雪”、“风”、“晴”的因果关

系,前后关连,结尾停顿较短,三句都是分句。

分句一般地可以分为从属和并列两类。从属分句用从属连接词引出(如“因为”,“虽然”),并列分句用并列连接词引出(如“因此”,“但是”)。从属分句的主体部分,如“我听说他病得很重”的“我听说”过去一般地称为主体分句,现代语法学家则认为这只是树立了一个句架,不成为“主体”,因此有人建议定名为框架分句。

分句可以按不同的组成部分分类。以英语为例,主语(S),动词(V),宾语(O),补语(C),状语(A)五项主要组成部分中,可以有二项组合,三项组合,四项组合三类。

二项组合: SV He was reading. (他在读书。)

三项组合: SVO He was reading a novel. (他在读一本小说。)

SVC He became very angry. (他变得很生气。)

SVA He was lying on the grass. (他躺在草地上。)

四项组合: SVOO He gave me a book. (他给了我一本书。)

SVOC He thought the book very expensive. (他认为这本书很贵。)

SVOA He put the book on the table. (他把书放在桌子上。)

上述三类,还可以简化为:

SV

$$SV + \begin{cases} O \\ C \\ A \end{cases}$$

$$SVO + \begin{cases} O \\ C \\ A \end{cases}$$

也就是说,分句的基本结构是 SV 和 SVO 两类,两类都可以独立自足,也可以加上 O、C、A。

汉语语法学家根据汉语句子结构的特点,把句子分为主谓句和非主谓句两大类。主谓句再分为动词谓语句,形容词谓语句,名词谓语句;非主谓句可以分为无主句,独词句等。

句子 句子和分句都是主谓结构,只是句子结尾有较长的停顿,分句结尾的停顿较短。停顿较长是由于意思已表达完全;停顿较短是由于意思还没有表达完全,有待补充。例如,“我看书。我骑马。”两句都是句子。“书我看,电视不看。”则包含两个分句。

句子在形式上可以分为单句和复句,在语义功能上,则通常分为陈述、疑问、祈使、感叹四类。但在实际使用中,这样的划分显得不够精细,例如:

陈述:我喜欢白色衬衣。= 祈使:请你挑白色的给我。

疑问:谁知道呢? = 陈述:我不知道。

因此,出现一种新的分类法,即语用学的分类法。语用学不着重句子的形式和语法功能,而着重句子在使用中取

得的效果。它的分类法远为具体,在普通语法书所说祈使一类下面,按语用学就有命令、请求、吩咐、乞恕等区分。

语段 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句子能构成语段。事实上,当我们说,句子的语音特征是结尾停顿较长时,我们已假定句子后面还跟着别的句子。如果句子后面是空白,结尾停顿就不发生或短的问题。因此,从语用学的角度看,有句子当然就有语段。语段分析之所以重要,是由于①人在使用语言的时候,很少只说一句话,总是有上下文,上下文即是语段。②分析一句里各种成分的关系,是语法学家的任务;分析语段里各种成分的关系,是语用学家的任务。后者力求在语段中找出代词、限定词、时、态、性、数如何前后照应,用来说明语段中的人、物、事、态的关联性,弄清楚为什么一个普通读者能够把后面的句子跟前面的句子连起来构成一起有意义的语言事件。这是人机对话的一个研究课题,也是现代语言学的中心课题之一。(计国璋)

当代语法理论 指用一定的语言观解释语言的内部关系,近二三十年来在国际范围内有一定影响的语法理论。

法位学语法 以美国 K. L. 派克所著《语言与人类行为体系通论》(1967)为代表作。它的理论是:人类行为有 4 大特点:具有一定单位和概念;具有部分对整体的关系;与特定环境相联系;具有某种角度。语言也如此。语言具有三个等级系统:音位等级,包括音素、音节、重读群、停顿群;语法等级,包括词素、词、短语、子句、句子、段落、独白;所指等级,包括地点、一个人物、全部人物、事件、事件群。语言的使用有三个角度:静止的,如长期使用“太阳”一词,似乎“太阳”没有变化;运动的,如“楼要塌了”,表示过程;关联的,如“杯子在桌子上”,表示两物的关联。语言单位在具体环境中互相联系。任何单位都是具有轨位、类别、作用、接应四个特征的语法单位,简称法位,故有法位学语法之称。法位学语法超越了句子的限制,着重分析句群和段落。法位学语法曾被用来描写美洲印第安语。

系统语法 以韩礼德的《论英语中的及物性和主题》(1967)为代表作。系统语法认为,语言包括“系统”和“结构”两个要素。结构是语言单位的组合关系,是横向的,系统是语言单位的聚合关系,是纵向的。结构讲的是语法表层现象,是形式;系统讲的是语法的深层现象,是意义和关系。系统为讲话人提供了选择范围。因此,韩礼德提出“潜语言行为”和“实际语言行为”与乔姆斯基的“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相对。语言中有许多系统:数的系统,分为单数和复数;人称系统,分第一、二、三人称;性的系统,分为阴性、阳性、中性;时态系统,包括现在时、过去时和将来时。有些复杂系统要用精密阶进行多层次的区分。系统语法被认为是有助于计算机语言的设计。

格语法 以美国 C. 菲尔莫尔的《关于格语法的论证》(1968)为代表作。格语法不用生成语法所采用的 NP、VP 等概念,强调句子成分的不同功能,试图用不同的

“格”来表示语义关系。菲尔莫尔关于格的概念主要包括施事格、工具格、予格、结果格、方位格、对象格等。在①The door opened(门开了),②The key opened the door(钥匙把门打开了)两句中,the door(门)在①中处于主语地位,但门不能自己开,只能作为动作的对象,在②中 the key(钥匙)处于主语地位,但它也不能自己开门,只能是动作的工具。随着人们不断提出新的语言现象,菲尔莫尔也不断创造出新的格,但仍有许多关系无法用格来概括。格语法现在已停止发展。格语法的贡献在于证明了生成语法在语义研究上的局限性,也曾被用于教学。

层次语法 以美国 S. 兰姆的《层次语法纲要》(1966)为代表作。兰姆认为语言有 6 个层次:下音位层,音位层,形素层,词素层,义素层,超义素层。在各个层次中,都存在着配列关系和体现关系,前者指同一层次中诸单位的排列组合,后者指相邻层次中诸单位间的转化和联系。以 better 为例,从义素层分析出两个义素:“好的”和“比较级”;从词素层分析出 good 和 -er 两个词素;从形素层得出/gud/和/beta/,从音位层得出/b+e+t+ə/. 形素{gud}代表词素 good,反过来又由音位单位/g+u+d/来体现。(刘润清)

60 年代中期开始,人们对乔姆斯基的理论不断提出异议,新的语法理论陆续产生。这些新理论的共同之处是都以生成语法为参照点,以它为发展或争辩的出发点。

生成语义学 最早出现的是以 P. 波斯塔尔、G. 雷科夫、J. 麦考莱和 J. R. 罗斯为代表的生成语义学。最初他们与乔姆斯基的分歧在于理论内部的问题,诸如语法由哪些部分组成?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如何?乔姆斯基认为句法是语义的基础;而反对者认为语义是句法的基础,逻辑是语义的基础。乔姆斯基的语法至多包含句法、音系和语义三部分,而生成语义学派的语法包括语用的问题。雷科夫等把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大,而把描述的精确性逐渐降低,发展成“模糊语法”。一时颇为显赫的生成语义学到 70 年代初渐趋沉寂。

认知语言学 生成语义学派和格语法学派停止活动以后,雷科夫和菲尔莫尔感到语法并不是个严密的规则系统,它和其他心理现象一样,无法用数学方法来精确描述。于是他们的兴趣转向语法的一些外围问题,以加利福尼亚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为中心的一些学者在摸索新方向。他们给自己的新理论起过许多名称,最近趋向于叫认知语言学,但尚未出版系统的论著。

孟德鸠语法 坚持语法形式化方向的生成语义学家 B. H. 帕蒂、E. 巴赫等人转向孟德鸠语法。R. 孟德鸠(1932~1971)是数理逻辑学家,他认为自然语言与形式语言在理论上并无本质区别,语言学家对自然语言也能作精密的描述。70 年代起生成语法学家与逻辑学家开始合作,试图用内涵逻辑来处理自然语言。他们用句法规则生成句法结构,然后用翻译规则译成逻辑语言,再给逻辑语言作语义解释,通过迂回的办法做到语义形式化。孟

德鸠语法学家与乔姆斯基的一大区别在于前者不从心理学角度研究语法,认为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都不是经验科学,而是数学的分支。现在该学派分成几支,分布在美国麻省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得克萨斯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地,孟德鸠语法以其理论的纯洁性在语法理论界享有较高的学术地位。

广义词组结构语法 20世纪80年代从孟德鸠语法发展出一种新理论,称为广义的词组结构语法,代表人物有G. 盖兹达、G. 普伦、I. 萨格等。这种语法在词组结构规则基础上作了重要的改进,例如把线性关系和层次从属关系分别处理,用特征来分析名词、动词等的内部结构。它用单一的结构层次描述,没有深层、表层之分,用一种元规则代替转换规则。盖兹达等人认为这种语法不仅能起转换语法的作用,而且还能起转换语法起不到的作用。近年来乔姆斯基派研究的重点是比较抽象的普遍原则,而不是具体的形式化规则。在这样的背景下,广义的词组结构语法吸引了对语言的心理机制并不关心而对数理语言学有兴趣的语言学家。

词汇-功能语法 既重视形式研究又注意反映心理机制的语法理论是70年代发展起来的词汇-功能语法,代表人物为J. 布雷斯南。乔姆斯基认为句法研究中应该以动词词组、名词词组等结构为基本概念,布雷斯南主张以主语、宾语等功能关系(词汇-功能语法的“功能”指语法功能,不指交际功能、社会功能)为基本概念。词汇-功能学派一度以麻省理工学院为基地,现在已移至斯坦福大学继续发展。

关系语法 强调功能关系在语法中地位的还有以波斯塔尔和D. 珀尔马特为代表的关系语法。他们认为句法结构必须通过语法关系描述,各种语法关系组成语言的关系网络。普遍性的语言学理论的任务是定义自然语言中合格的网络;个别语言的语法研究的任务是确定该语言中的关系网络。70年代中期以后波斯塔尔为关系语法设计出形式化方案,采用代数式及弧线等几何图形来反映语法关系,又称弧对语法。从事关系语法、弧对语法研究的学者很少,但他们认为它是有特色的理论。

乔姆斯基的“管约论”面临各家新兴的语法理论,乔姆斯基不断发展和改进自己的理论。80年代的生成语法集中表现于管辖与约束理论,通常简称“管约论”(见生成语法)。

纵观当代各家语法理论,可看出一个总的发展趋势。语言学从内容到方法都倾向于形式论证。至于过去年代作为社会学、人文学和教学方面的研究,已逐渐归入社会语言学、文体学、应用语言学等学科。(徐烈炯)

参考书目

- 金岳霖:《知识论》,商务印书馆,北京,1982。
朱德熙:《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北京,1982。
A. Arnauld and C. Lancelot, *The Port-Royal Grammar*, Mouton, 1975。
D. Thrax, *The Grammar of Dionysius Thrax*, Translated from the Greek by Thomas Davidson, *Journal of Speculative*

Philosophy, New York, 1874.

O. Jespersen, *A Modern English Grammar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 Copenhagen, 1909~1949.

N. Chomsky,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MIT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65.

R. Quirk et al,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Longman, London, 1985.

E. A. Moravcsik and J. R. Wirth (eds), *Syntax and Semantics*, Vol. 13: Current Approaches to Syntax, Academic Press, New York, 1980.

yuwen jiaoxue

语文教学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as a native language) 见汉语教学。

yuyan

语言 (language) 人类特有的一种符号系统。当作用于人与人的关系的时候,它是表达相互反应的中介;当作用于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的时候,它是认知事物的工具;当作用于文化的时候,它是文化信息的载体。

语言的特点 动物如蜜蜂、金丝雀、黑猩猩等都各有其信号系统,但是比之人类语言有如下的不同:

动物的鸣叫或体态,是一个不可分离的连续体。人类语言不管是哪一种和哪个民族的,都可以分离出音位和词。

动物的呼叫声限于几个或几十个,它的信号系统是封闭性的。人的语言系统是开放性的,并且可以按一定规则把音位和词组合起来,生成无限的句子。

动物的信号主要以直接刺激为条件,人类的语言不同。人们能对即将来临的刺激作出反应,如“快躲开!”,也可以远在刺激发生之前作出反应,如“后果危险!”,也可以在碰到刺激时作出消极反应,如“不理这些!”。动物的信号系统基于本能,人的语言基于理智。

动物所得的经验,不能传给后代。人类因为有语言,可以把信息传到远方,也可以传给下一代。知识的积累,文化的形成,是有了语言才可能的。

由此可见,人的语言有4个特点:①可分离性,②可组织性,③理智性,④可继承性。其中最重要的是可分离性和理智性。没有可分离性,就没有可能按规则组成大大小小的语言单位。没有人的理智,就不可能既有应用规则,又有选择符号的自由,使语言成为一个开放性的、能表示各种思想感情的符号系统。

在语言这个符号系统中,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受规则制约,这可以用两条轴线来说明:横线代表组合关系,竖线代表聚合关系。

横线的组合关系 “这小姑娘有她的办法”这个句子运用了三条组合规则:①“这小姑娘”与“她的”在数的范畴上互相照应(不能改说“她们的”)。②“有”是及物动词,后面要有宾语(“她的办法”不能省去)。③“有办法”只能是人,不能是物,“这小姑娘”作为主语,在语义上符合这个要求(不能说“这抽象性有她的办法”)。

横线组合体现了语言的规则性。

竖线的聚合关系 例如下面这三个句子。

甲	乙	丙
这小姑娘	有	她的办法。
张永华	提出了	自己的方案。
我家那孩子	想出了	一个主意。

“这小姑娘”可以被“张永华”、“我家那孩子”代替；“有”可以被“提出了”、“想出了”代替；“她的办法”可以被“自己的方案”、“一个主意”代替。这里甲、乙、丙三组中的那几个单位，彼此间有聚合关系。选择哪一个，主要由语义决定，不由语法决定，因此与组合关系不同。

竖线聚合体现了语言成分的可替代性和可选择性。

语言的功能 语言的功能可以从三方面考察。

人与人的关系 语言是社会的粘合剂。见面时有说有笑，谈谈天气，拉拉家常，是社会对它的成员的要求。语言又是传输信息的工具。民主、法制、教育的实施有赖于语言作为中介，科学的传布有赖于通过语言获得信息并进行处理。

人与世界的关系 语言是认知世界的工具。语言中的实词(表示方位、时间、数量、性别、年龄、品质等)是人对事物的分类，虚词(已经、再、被、和、可是、如果等)是人给事物过程和事物关系加上的标记。语言又是艺术地描写世界的中介。苏东坡的诗“我持此石归，袖中有东海”，用艺术手法表现出非凡的想象，富有感染力，不同于认知世界的客观描写。

人与文化的关系 语言是文化信息的载体。人是文化的创造者和保持者，他认知世界，描写世界，并利用语言(包括口头的和书面的)把经验储存下来。

语言的发生 这里讨论的是人类创造语言要有什么客观条件，经过多少发展阶段，大约在多少万年前。

中国古代语文学家(如许慎)认为：人先要认知世界，然后获得语言文字的资源；人对事物命名，这就有字。字是形和声相结合的，能独立滋生，于是从有限的物像产生无限的字。

早期人类学家认为：随着人类的进化，发音器官逐渐完善，清晰的语言成为可能。随着复杂工具的发明，出现了群体劳动，也出现了用语言指挥群体劳动的社会现象。随着火的发明，部落增多，部落之间的信息交流促进了语言的发展。

现代人类学家认为：一切生物都有某种心智，心智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发展的，大体上可以分4个阶段：①简单反射阶段，如射向眼睛的光线逐渐增强，瞳孔就逐渐收缩，这不受意志的影响。②条件反射阶段。巴甫洛夫的著名实验表明，不用具体事物(食物)，只用符号(铃声)，也能使狗流出唾液，其条件是过去每次给食时都有铃声伴随。③工具阶段，如黑猩猩的手够不着香蕉，能用棍子把香蕉打下来，表明对外部世界有了一定的控制能力。④符号阶段，即使用语言符号对外部世界进行控制，这只有人才能做到。经过精心训练的黑猩猩，只能使用几个语言

符号，只有人能够用有限的符号表达无限的思想，治理外部世界。人类是什么时候才进入第4阶段的呢？据出土化石推测，人类进化过程如下：①手巧的人，即能使用工具的人，生存于180万~240万年前；②直立的人，生存于30万~150万年前；③智慧的人，从30万~10万年前开始。考古学家从后者的墓地里发现巨兽的骨化石，推测那时已有群体猎捕，需要语言来进行指挥，这个时候的人开始有了语言。不过，这个问题今天还在探索中。

语言的模式 如同化学有分子模式，数学有方程式一样，语言学也有它的结构模式。语言学家之使用模式，是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语言的一种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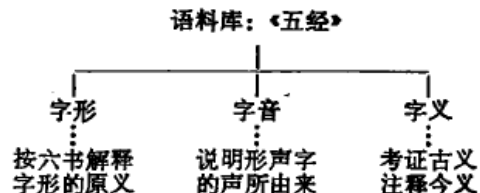
古典语言学(或称语文学)没有明确地提出模式，但是后人可以根据他们的研究，构拟出一种模式。

中国古典词汇学的模式 以许慎《说文解字》(公元100)为代表。

目标：语言文字教育；解释语言文字的起源，辨明古字形义，纠正当时文字书写的谬误。

研究重点：字形的解释，字音的考订，字义的注释。

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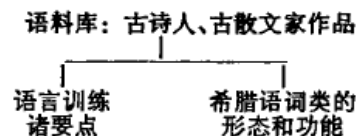


希腊古典语法学模式 以希腊狄奥尼西奥斯《语法规则》(约公元前100)为代表。

目标：语言教育，以古代诗人和文章家作品为规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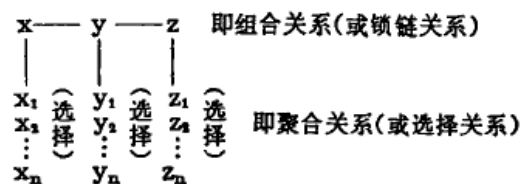
教育项目：朗读；语调；标点；字母；音节；长音节，短音节，普通音节；词的定义，句子的定义；词类：名词，动词，动词变位；分词，冠词，介词，副词，连词，代名词等。

模式：



从以上可以看出中西古典语言学的不同：中国重识字，重语源；希腊重朗读，重词类识别。文字不同，产生了不同的语言学传统。

索绪尔的组与聚合模式 现代语言学的语言系统观念的确立，首先应归功于F. de 索绪尔。索绪尔的组与聚合观念，形象地说明了语言的系统性。用图形表示：如以x、y、z代表句子的主要成分，那末 $x \rightarrow y \rightarrow z$ 是组合关系， $x_1, x_2, \dots, x_n$ 是聚合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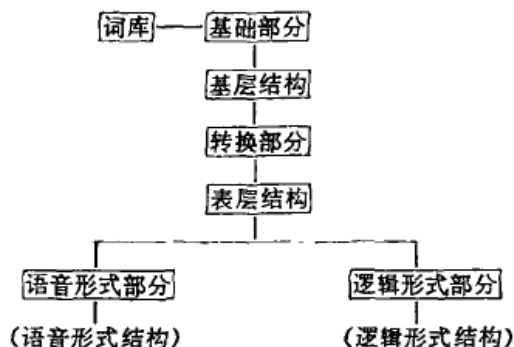


索绪尔这一理论不仅适用于语法，也适用于语音和词汇。从1916年开始，经过50年的时间，他的理论终于

得到后代学者越来越深的理解和越来越广的应用。

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模式 N.乔姆斯基这一理论在1957年提出的时候,曾被认为是语言学的革命。在他之前,语言学家致力于构拟语言的结构或纵论语言的功能。

乔姆斯基认为,构拟和纵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解释人能说出那么多的各不相同的句子。他把句子的生成性看作语言最大的特点,而语言学家的首要任务即是解释这一奇妙而复杂的生成现象。为此,他创造了句子的“基础部分”的概念。由基础进入基层结构,经过转换,表现为表层结构,即言语。1957年后,他曾多次修改自己的理论。1982年他所拟的图式如下:



乔姆斯基最初提出转换生成之说,把语言学从L.布龙菲尔德的结构主义下解放出来,确有革新的功劳。但是乔姆斯基的模式一直在不稳定状态之中。有人斥之为修修补补,有人誉之为不断革新,但是他的理论系统的附加条件愈多,解释力量也愈显薄弱,这是明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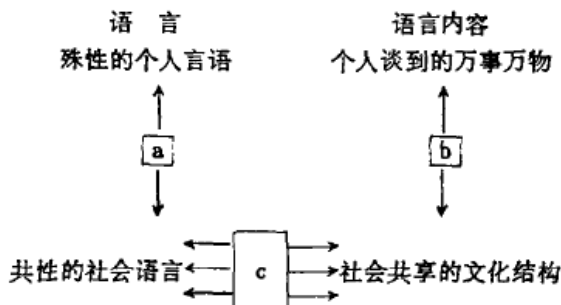
韩礼德社会语言学模式 韩礼德认为乔姆斯基所研究的对象是一个只在对语法学家说话的人,不是在社会里和一般人说话的人。乔姆斯基在书房里研究语言,只看重句子的语法性,但语言在社会上使用,还必须考虑句子的可接受性。

乔姆斯基所研究的是拟想的人,韩礼德所研究的是实在的人。乔姆斯基所追求的是一个规则体系,以说明

人的心智在语言中的活动;韩礼德把语言当作语义的蕴藏,目的在于分析这一蕴藏如何表现为语言。他研究的既是社会里的人,他的模式就不可能不是二元的,即以社会结构为一方,以语言系统为另一方。左下图是韩礼德的语言模式(1978,经过简化)。

可以看出,两个模式相比,乔姆斯基的模式抽象得多,也单纯得多,能够解释句子的生成性;韩礼德的模式说明了语言的社会性,但社会由多种因素构成,不易理出头绪。在韩礼德看来,乔姆斯基避繁就简,“是哲学上简化主义(reductionism)的表现”。乔姆斯基则认为,社会语言学仅是罗列现象,缺乏解释力。

美国 W. 布赖特的文化模式 这一模式不象韩礼德那样以社会为一方,以语言为另一方。它以语言行为为语言之一翼,而以语言内容为语言之另一翼,目的在说明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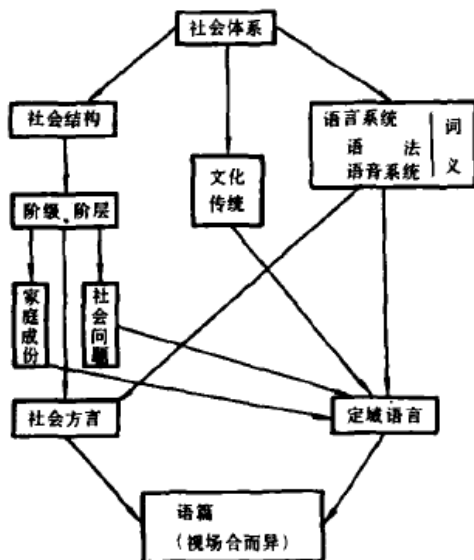
布赖特模式中的[a]把语言分为个人的言语和社会的语言,这与索绪尔的学说相同,但模式表明两者是互相渗透的,立论比索绪尔完整。[b]语言内容,分为个人谈到的万事万物和社会共享的文化结构,纵线说明互为影响,横线与殊性的个人言语及共性的社会语言相当。[c]说明社会共享的文化结构与共性的社会语言以多种渠道相互影响。这一模式说明言语和语言,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有可取之处。

现代语言学家从不同的语言观出发,提出不同的语言模式。注重语言内部关系的学者以深探自许,注重语言外部关系的学者以实地调查见功夫。这两方面的研究仍在发展。

参考书目

- 金岳霖:《知识论》,第4章Ⅷ“语言”,第6章“思想”,第15章“语言”,商务印书馆,北京,1983。
 E. H. Lenneberg, *Biological Foundations of Language*, Wiley, New York, 1967.
 M. A. K. Halliday,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Arnold, London, 1978.
 N. Chomsky, *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nding*, Boris, Dordrecht, 1981.

(许国璋)



韩礼德的语言模式

yuyan guihua

语言规划 (language planning) 国家或社会团体为了对语言进行管理而进行的各种工作的统称。所

谓规划或管理,是个广义的概念,包括语言的选择和规范化、文字的创制和改革等方面的具体问题。

语言规划通常是某种语言政策的体现。语言政策表现国家或社会团体对语言问题的根本态度。例如在殖民主义时代,殖民地政府通常推行语言同化政策,把宗主国的语言强加给被压迫民族,在正式场合禁用当地语言。在实现民族平等的国家,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双语政策。例如在中国内蒙古自治区,汉语和蒙古语都是官方语言。

语言规划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语言的选择。在多民族杂居的地方(例如印度的许多邦),往往只能选择一两个或两三个民族的语言作为官方语言。许多殖民地获得独立之后,都不再以宗主国的语言为官方语言(或至少不以它为唯一的官方语言),而以当地的民族语言为官方语言。在民族复兴的目标下,有时甚至采用某个古代语言,这个古代语言于是得以复活(当然还要使之现代化)。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已经赋予当地的克里奥耳英语(洋泾浜英语的高级形式)以正式语言的地位,从而为这个语言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在非洲,不少国家采用斯瓦希里语为通用语言。在联合国,选择了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汉语和阿拉伯语为工作语言。

在语言问题上采取协调措施也是一种语言规划。为了对抗英语的过大影响,法国和意大利就采取过保卫本国语言的协调行动。1954年荷兰和比利时两国开始共同使用新的荷兰语正词法,1980年两国又签订条约成立荷兰语联盟,比利时的弗拉芒语本是荷兰语的一种方言,这个联盟实际上使弗拉芒语进一步向标准荷兰语接近。马来西亚使用的马来西亚语和印度尼西亚使用的印度尼西亚语,是马来语的两种方言。1972年印度尼西亚语采用了和马来西亚语一致的正词法,从而促进了两国的语言合作和文化交流。在苏联和中国,那些新创文字的民族语言通例分别采用俄文字母和拉丁(汉语拼音)字母,也是为了方便少数民族和主体民族之间的语言合作和文化交流。

术语问题是语言规划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科技术语大量涌现的情况下,如何移植术语,用音译还是意译,这是关系语言发展和文化交流的大问题。术语的国际化对克服语言障碍和促进国际科技交流有很大作用。因此,很多国家和国际性组织对此十分关切(见术语)。

随着新技术革命的不断深入,语言信息处理问题已经提上各国语文工作的日程(见中文信息处理)。如何使自己的语言文字适于电子计算机加工处理,并适于参加国际信息系统的交流,以便早日进入信息化时代,这是各国正在筹划中的新课题。

(刘涌泉 周流溪)

yuyan jiaoxue

语言教学 (language teaching)

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特定方法的教学活动,是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教学的任务是培养、提高受教育者的语言

能力。它包括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的教学。

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 第一语言也称母语。在多数情况下,第一语言就是一个人所属民族的民族语言,所以也称本族语。第二语言也称非母语,非本族语,它包括本国内(多民族国家)别的民族的民族语和外国语。在中国,汉语是汉族人的第一语言,藏语是藏族人的第一语言,维吾尔语是维族人的第一语言,等等。同时,每种语言又是其他民族的第二语言。中国境内有50多个民族,各民族的民族语言都是合法存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在各民族语言中,汉语使用的人口最多,通行最广,国际上以汉语作为代表中国的语言。

大多数民族语,都有或多或少的,差别或大或小的若干方言,同时都以其中之一或者以某一方言为基础形成的共同语作为这个民族语的标准语,例如法语中的巴黎语,俄语中的莫斯科语,等等。在中国,就是以北京语音系统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的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推行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普通话对汉语各方言地区的人来说,仍是第一语言,因为无论是普通话或是方言,同属汉语,这里不存在第二语言的问题。

在美洲、欧洲、亚洲和非洲的某些地区,由于移民等种种历史的或社会的原因,第一语言、第二语言与民族语的关系不象在中国这样单纯、明确,有各种复杂的情况。例如,一对意大利夫妇移民到美国,他们的子女转进了美国的学校之后,必须象出生在美国的孩子们一样学习美国的法定语言——英语;同时,联邦政府有特定的法案保证他们有用母语接受教育的权利,这就形成了一种双语教学。等到这一代子女又有了子女,这第三代人很可能自幼就自然习得意大利语和英语两种语言,从而出现了一个双语家庭。在有的社区,一直通行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于是形成了双语区或多语区。在中国,类似的情况要少得多。

第一语言的教学——语文教学 每个人从一岁前后开始牙牙学语,他的父母以及周围其他的人也不断的教他说话,实际上第一语言的教和学的活动这时候已经开始。不过无论学者或教者,都是不自觉的,无计划的,因而从严格意义上说,还不能认为是正式的教学活动,而是从生活中自然习得的过程。进了幼儿园,保教人员会通过游戏等种种活动比较有意识的训练孩子们听话和说话,总的说来,也还是属于自然习得,和学龄后的语言教学有显著的区别。孩子们在上述自然习得第一语言的同时,也不自觉地习得了语言所负载的本民族的某些风俗习惯以至文化传统。换言之,他们习得的不是纯粹的“语”,还有“文”。他们习得了许多事物的名称,亲属间的称谓,问好、告辞、感谢、道歉等等的说法,各种节日的各种活动和事物的叫法;他们讲故事,猜谜语,唱歌儿,玩游戏,等等,充满了丰富多采的生活内容,无一没有“文”的因素在内。孩子们自然习得第一语言的过程,同时也是

自然习得本民族的语文的过程。

儿童入学后,学校根据教学计划教他们在已习得的口头语言的基础上学习书面语言,在更大的程度上丰富他们第一语言的材料,训练他们自觉地提高运用第一语言的能力——听、说、读、写的能力。在这个教学过程中,书面材料起很大的作用。学生在教师的有计划的教学帮助下,从那些材料里学习有关第一语言的系统的知识,进行听、说、读、写的锻炼,目的在于经过几年的学习充分理解、认识第一语言,并且掌握足够的驾驭它的能力。书面材料容纳了更加丰富的文学和文化的背景,而真正掌握、驾驭一种语言也正需要充分了解这种语言的文学和文化的背景。于是,第一语言的教学名副其实的成了语文教学。语文教学是一个整体概念,包含着互相包容、互相作用的几方面的因素——口头语言的教学,书面语言的教学,相关的文学和文化素养的教学。

语文教学一般是以一种阅读材料为主体(在现代并辅以形象的和有声的材料),加上按照一定的方案设计的各种训练材料,由教师按照一定的方法教给学生,学生在教师的帮助下学习,锻炼。

在不同的民族、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语言特点不同,社会状况不同,文学和文化背景不同,语言科学和教育科学的发展状况不同,教育政策不同,语文教学的内容和方式方法也有种种不同。在苏联,五年级以上分设“俄语”和“文学”两门课程;在有些国家的有些学校,课是一门,以阅读(不限于文学)为主,同时加一本教材教学语法和作文。语文教学的形成和发展既有若干客观因素(比如语言特点,文化传统等),科学技术因素(比如视听技术的发展等)的影响,同时也受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制约。例如,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后的语文教学和中世纪的语文教学,工业革命之后的语文教学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语文教学,都有十分显著的区别。

第一语言的掌握,无论对于每个人来说还是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教育、文化、科学的发展来说,都是极关重要的。所以古今中外毫无例外地对语文教学都异常重视,都十分注意有效地不断地改善语文教学的课程,包括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以及语文能力的测试方法等等。

在世界上为数不少的地区的人口口中还有相当比例的文盲,“扫盲”一直是这些地区的一个艰巨任务。此外,甚至在教育、科学发达的国家中,还有为数不少受过教育而阅读能力远远不能适应工作需要的人,这些人被称作“功能性文盲”。如何对他们进行有效率的阅读训练已经成为一个学术研究的课题,许多学者正在这个领域里进行研究和科学实验。

第二语言的教学 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内,各民族的民族语互为别的民族的第二语言。这种第二语言往往是在生活中由于直接接触而自然习得的,但是有的也需要有计划的教学活动。例如中国的各少数民族学习汉语就是这样(见少数民族汉语教学)。

外国语也是一种第二语言。一般情况下,外国语都

是在已经自然习得了母语之后,在母语环境中,经过有计划的教学活动来学习的。这时,母语习惯已经确立并且相当牢固,对于学习外国语有干扰作用,同时又缺少学习外国语的语言环境,因而学习外国语客观上有一定的困难。如果所学的外国语与母语属于很不相同的语言系属,语音、词汇、语法系统的差距都很大,学习起来困难就更多一些。此外,某些社会因素和学习者的心理等主观因素,对外国语的教学也起不小的作用。因此,外语教学一直是一种比较复杂而困难的工作。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国家之间以及各国人民之间的交往更加频繁,外语教学更为重要,受到更大的重视。每个国家在外国语教学方面各有适应它的情况和需要的措施,例如,在教学的哪个阶段(小学、中学)开始,设置哪些语种(单一语种,多语种),用多少时间,要求在口头上和书面上达到什么程度,等等。这些都与一个国家的各项政策,特别是教育政策有关,也与教育科学的发展有关。尤其是外语教学方法论的研究,20世纪空前的发达起来了,逐渐产生了多种不同的理论,多种不同的教学法体系和流派(见外语教学)。与此同时,外语教师的培训,外语教学所需的教材(包括教科书和形象化的、有声化的教材)的编制等等也都成了一些重要的专门化的工作。

狭义的应用语言学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与社会的许多方面有关系,语言是进行思维和表情达意的工具,与人的心理活动有关系。这些客观存在的关系促使语言学与社会学、心理学建立联系,并且产生了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这些边缘学科。语言教学的研究不仅与普通语言学有关,与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的关系尤为密切。于是研究语言教学规律的学问成了一门多科性的、综合的语言科学与教育科学相结合的应用科学,人们称之为应用语言学或狭义的应用语言学。所谓广义的应用语言学,除语言教学之外,还包括语言学与数学、物理学、生理学、电子学、信息论、控制论等等相结合而产生的许多应用学科。狭义的应用语言学是以语言教学为对象的一门应用学科(见应用语言学)。它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因外语教学研究的发展开始在英国和美国建立起来的,法国、联邦德国等也相继建立了这种学科,以至教学研究机构。当时就称应用语言学,没有“狭义的”这个限制语,至今仍有不少国家和地区以及不少学者这样使用这个名称。也有不少国家和地区以及不少学者仍用语言教学、语文教学等名称,不用“应用语言学”。以后又逐渐扩展到对母语教学的研究。直到现在,虽然对母语教学的研究,例如幼儿自然习得母语的过程及其规律性的发展,文字的认识、理解、记忆以及文字教学与语言教学的关系,书面语言能力(读、写)的发展途径等,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其主要成果仍在外语教学方法的研究方面。

参考书目

H. H. Stern,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Language Teach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张志公)

yuyan leixingxue

语言类型学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见
类型语言学。

yuyan moxing

语言模型 (language model) 数理语言学中模拟语言客观事实的抽象的数学模型。它不完全等同于语言客观事实,只是语言客观事实的某种近似物。在语言模型与语言客观事实之间,可以建立某种对应关系,但是,语言模型不能完全充分地描写语言客观事实,它只抽象描写语言中个别成分(词、句子等等)的性质及关系(句法、形态等等)。

语言模型与语言客观事实之间的关系,如同数学上的抽象直线与具体直线之间的关系。

语言模型是一个单纯的、统一的、抽象的形式系统,语言客观事实经过语言模型的描述,比较适合于电子计算机进行自动处理,因而语言模型对于自然语言的信息处理具有重大的意义。

语言模型主要有三种类型:①生成性模型,②分析性模型,③辨识性模型。

生成性模型从一个形式语言系统出发,生成语言的某一集合,如 N. 乔姆斯基的形式语言理论和转换语法。

分析性模型从语言的某一集合开始,根据对这个集合中各个元素的性质的分析,阐明这些元素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用演绎的方法建立语言的规则系统,如苏联数学家 O. C. 库拉金娜和罗马尼亚数学家 S. 马尔库斯用集合论方法提出的语言模型。

在生成性模型和分析性模型的基础上,把二者结合起来,便产生了一种很有实用价值的模型,即辨识性模型。辨识性模型可以从语言元素的某一集合及规则系统出发,通过有限步骤的运算,确定这些元素是一堆乱七八糟的词还是语言中合格的句子。如 Y. 巴尔-希列尔用数理逻辑方法提出的句法类型演算模型。(冯志伟)

yuyanxue

语言学 (linguistics) 以人类语言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的探索范围包括语言的结构、语言的运用、语言的社会功能和历史发展,以及其他与语言有关的问题。

近几十年来,语言学迅速发展,引起了整个学术界的注意。法国人类学家 C. 列维-斯特劳斯(1908~)把语言学家提出的结构主义运用于人类各种习俗和行为(包括舞蹈、恋爱和宗教)的研究,因此有人说语言学是先行科学。但是语言学与许许多多别的东西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牵涉到生理、物理、心理、数学、地理、哲学、美学、社会学、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工程学各方面的问题,范围既广,头绪又多,而且不能完全用实验方法来解决,所以,虽然某些学者对语言学评价很高,不少人还感到,语言学本身仍在成长中,并没有成为精密的科学。

语言学的性质和任务

语言学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语言学专指 19 世纪以来的语言研究和语言理论,广义的语言学包括语文学。语文学以研究古代文献和书面语为主,而现代语言学却以研究近代、现代语言和口语为主,兼顾其他方面。本条所说的语言学,是广义的语言学。

瑞士语言学家 F. 索绪尔把“语言”(即语言的体系,如汉语或英语的体系)和“言语”(即语言的运用,如用汉语或英语说的话)区别开来,以为前者重要,后者不重要。美国语言学家 N. 乔姆斯基把“语言表现”和“语言能力”区别开来,以为后者重要,前者不重要。本条所说的语言学,把这几方面都归入研究范围之内。

研究语言在某一时期的情况,叫做共时语言学;研究语言在不同时期所经历的变化,叫做历时语言学或历史语言学。共时语言学也叫描写语言学,这是与历史语言学相对的,但是因为描写语言学要对语言习惯如实描写,不加任何褒贬,所以有时又被当做是与传统语法或规定语法对立的学科名称。

除研究个别语言外,人们还对多种语言作综合研究,试图找出其中的共同规律,这叫做普通语言学。由于普通语言学是讲一般性理论的,所以又称为理论语言学。如果要把语言学知识运用于实际工作,那就是应用语言学。应用语言学本来多指把语言原理应用于教学方面,但是随着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发展,应用语言学的领域越来越广,已经包括文字创制、语言政策制订、语言疾病医疗、通信技术研究乃至人工智能研究等等。

人们对多种语言进行比较,所抱目的可能不同。19 世纪的欧洲学者想通过语音和词形的比较追溯某些语言的亲属关系,这叫做历史比较语言学。后来有人想要用比较方法发现人类各种语言的某些共同现象,这叫做类型语言学。近来还有人为了解决教学或翻译问题而对勘两种语言不同之处,这叫做对比语言学。

从古到今,语言学者们视线逐步转移,视野逐步扩大,探索逐步深入,雄心也越来越大:从古代语言转向当代语言;从书面语转向口语;从个别语言项目转向整个语言系统;从一种语言的某些配置转向多种语言的共同特征;从语言的表面形式转向语言的深层意义;从语言的结构转向语言的功能;从语言作为一个孤立的对象转向语言与社会、语言与人脑的关系;从人们如何说出和听懂语言到如何利用机器来分析、辨识、模拟和翻译语言。如果过去的语言学只是一家小商店,现在它已经发展成为百货公司,千门万户,五光十色,叫人眼花缭乱了。

语言学的起源和发展

公元前 600~前 300 年,语言学有 3 个中心:中国、印度和希腊。8 世纪以后,阿拉伯语言学勃然而兴,那是较为后起的流派,并且受到希腊和印度语言学的影响。19 世纪以来的西方语言学,主要是希腊语言学的继承和发

展,在某些方面也是古代印度语言学乃至阿拉伯语言学的继承和发展。中国语言学在周秦时代独树一帜,汉代以后音韵学受到外来影响,近代和现代的中国语言学者又从国外摄取了更多的营养。对于西方语言学,中国学者所产生的影响不多,但是中国语法学家提出的“虚字”、“实字”的区别,也曾引起欧洲学者 G. von der 加布伦兹(1840~1893)、O. 叶斯泊森等的注意和讨论。

中国语言学 中国语言学史大致可以分为3个时期:古代期(公元前3世纪~公元17世纪初,约为先秦至明末),近代期(17世纪初~1898年),现代期(1898年至现在)。

先秦时代,孔子只偶尔谈到语言问题。他说,“辞达而已矣。”墨子、荀子谈得多些。荀子(约公元前298~前238)说,“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正名篇》)这里正确地指出,语言有社会性,事物的名称不决定于它的本质属性,而决定于社会习惯。墨子(约公元前480~前420)多谈语言与逻辑的关系,这既是古代希腊哲学家所注意的问题,也是现代语言学家所常常讨论的问题。

中国的文字学和词典学(包括字典学)起源最早,地位也特别重要,因为汉字形体各异,数目也多。远在春秋战国至秦汉之间,就陆续编出了《史籀篇》、《仓颉篇》、《急就篇》等识字课本,拿来教学童。到了公元121年,更有许慎的巨著《说文解字》出现。此书分析字形,考究字源,注出字音,解释字义,是一部系统严密,包罗宏富的词书,当时在世界上无与伦比。不着眼于字形部首,而以字义为纲的是《尔雅》,约在公元前2世纪编成。这部汉语训诂学名著是中国最早的类语词典。汉代扬雄的《方言》也是一部开山的著作,为了积累这本世界上最早的方言词典的材料,他花了27年工夫,总共写成9000字。

中国的音韵学随文字学、训诂学而兴起,因为汉字有形、有义也有音。许慎《说文》已经讲字与字之间的语音关系。汉代末年(3世纪),孙炎在《尔雅音义》中开始讲反切,把字音分为声母韵母。魏代(3世纪)李登著《声类》,晋代(3~4世纪)吕静著《韵集》,开了韵书的先河。按四声分韵,大约始于沈约(441~513)的《四声谱》。以后各朝陆续有重要的韵书出现,如隋代陆法言等的《切韵》(约601),宋代丁度等的《集韵》(1037),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1324)。应当指出,从汉代开始的音韵研究,后来由于佛学东渐,梵语拼音字母传到中国,这就更加发展。因为许多音韵学古籍流传至今,所以我们对1000多年来汉语语音的演变能画出一个清楚的轮廓。

古代汉语单音词多,一个词儿不像印欧语那样有标明语法特点的屈折形式,因而在组词成句方面,虚字就特别重要。西汉《诗毛传》注解《诗经》,许慎《说文》讲文字,都谈到虚字的语法作用。远在1800年前,这些书的作者已经注意到汉语的语法特点了。

中国语言学的近代期有两项重要发展:一是清代经学复兴,周秦音研究、隋唐音研究、训诂研究、文字研究都

突飞猛进,超过了宋、明两代。1899年后,还开始了前所未有的甲骨文研究。二是西学东渐,西方传教士和外交官写了一些谈汉语语法、音韵、方言的书,懂得外语的中国人也逐渐增加,从外国著作得到某些启发。例如马建忠的《马氏文通》(1898)就致力于拉丁语法的学习,它是第一部有系统的汉语语法书,既采用西方传统语法观点(当时在欧洲占主导地位),又摸出了一些汉语所有而拉丁语所无的特征。

中国语言学的现代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1阶段由1898~1949年,第2阶段由1949年至现在。

在第1阶段,中国语言学有了很可观的发展。由于考古资料的发现,古文字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峰。由于西方语言学的启发,语音研究的成绩超过了乾嘉以来的学者。在语法方面,也试图摆脱印欧语系的羁绊,探索汉语自身特有的规律。

在第2阶段,最重要的成就是在实用方面,如制订正确的语言政策,推广汉语普通话,公布汉语拼音方案,合理地简化汉字,广泛进行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并为某些民族制订或改进文字。以上工作,有一部分仍在进行中。在音韵学、语法学、汉语史、汉语教材编写方面,已有显著的成就。关于现代和古代汉语,已出了几部有分量的词典,并正在编印其他词典。汉语方言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正在逐步深入。利用计算机进行语言研究虽仍在试验阶段,也取得了初步成绩。

古代印度语言学 印度语言研究发源很早,约在公元前6~前3世纪已达到了惊人的高度。波你尼约在公元前4世纪就写成了8卷本的梵语语法,描写古典梵语。20世纪的语言学家 L. 布龙菲尔德说,此书是“人类智慧的最高成就之一”,因为现代描写语言学所注意的许多问题这本书已谈到了。此书有两个长处:一是语音描写准确而有系统,二是把一个单词切分为词根和词缀,并列出了详尽的构词规则。全书文字极其简括,这可能是为了便于记忆和背诵,但是从现代读者看来,如没有注解便很难懂得。英国 R. H. 罗宾斯说,这是供语法专家用的语法书,而不是供教师或学生用的,因此与下文所说的希腊语法书不可同日而语。

古代至18世纪的欧洲语言学及阿拉伯语言学 远在公元前5世纪,希腊的哲学家就讨论语言的起源问题。有的说语言是自然产生的,有的说语言是约定俗成的。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派提出“整齐论”,认为词形和语法结构都有规则,语法形式与语义是平行的;斯多葛派则提出“参差论”,因为词形的单复数往往与语义的单复数不对应,语法性别也往往与自然性别不一致。

古代希腊学者只注意本族语,不注意外族语。自公元前4世纪以来,他们所关心的是什么是纯正的希腊语,因为他们所讽诵的荷马史诗等古典著作,在语言方面和当时的口语已经差别很大了。再说,他们虽注意语法,可并没有深入地研究语音。

约在公元前100年,狄奥尼修斯·斯拉克斯编成了第

一部希腊语法书,名为《语法艺术》。这书把希腊语词类分为8类,但是只讲词法,不讲句法。到了公元2世纪,阿波罗尼奥斯才写了一些讨论希腊语句法的书。他把句子分为主语、述语两部分,2000年来这是传统语法分析句子结构的基本原则。

继希腊语法学者而起的是拉丁语法学者。拉丁语是罗马人的语言,可是拉丁语法著作却以希腊语法为蓝本,因为这两种语言有不少地方相似。最有名的拉丁语法书是多纳图斯的《语法艺术》(约400年写成)和普里西安的《语法规范》(约500年写成),这些是中世纪长期奉为经典的著作。

在普里西安之后约200年,阿拉伯语言学者异军突起。8~12世纪,他们在巴士拉和库法两地(都在今伊拉克境内)先后建立了学派,编出了有名的阿拉伯语词典,并研究了阿拉伯语特有的三联辅音词根和发音方法。他们所下的词根、词缀的定义,对19世纪欧洲语言学者,尤其是对F. 博普很有影响。他们还有个长处——非但研究阿拉伯语,也研究土耳其语、蒙古语、波斯语。他们受希腊语言学的影响,但是比希腊语言学家的眼界要开阔得多。

与阿拉伯人相反,欧洲人在普里西安之后长期止步不前。直至过了1000年,才出现一部值得注意的语言学著作,这就是17世纪法国巴黎附近波尔瓦罗亚修道院所编的《普遍唯理语法》。17~18世纪,这书一直被广泛采用。在编写时,作者以R. 笛卡儿(1596~1650)的唯理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认为一切语言都是表达思想的,虽有民族之别,可都有共同特征。作为这一主张的证据,这书从希腊语、拉丁语、希伯来语和欧洲近代诸语言引了许多例子。作者把词分为9类,其中6类与人们的思维客体有关(如名词),3类与人们的思维形式有关(如连词)。他们还按逻辑来分析句子,说“看不见的神创造看得见的世界”这个句子就包含着3个命题:①神是看不见的;②神创造世界;③世界是看得见的。这种语言哲学,300年后美国学者乔姆斯基又重新倡导并加以发展。

由16世纪至18世纪末,欧洲人的视野逐渐扩大了,他们重新发现了古希腊语;学习了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认识了欧洲各国近代语言的重要性;接触了与欧洲语言大不相同的亚洲、非洲、美洲语言,也接触了与基督教传统大不相同的多种文化。尤其重要的是,18世纪末发现了亚洲的古梵语竟与欧洲的古希腊语、拉丁语等同出一源,又把波你尼的梵语语法翻译了过去。

19世纪的欧洲语言学 欧洲中世纪的语言学家心窍很窄,19世纪的人天地已大得多。他们利用当时的条件,大力开展历史比较语言研究(那时叫做“历史比较语文学”),同时语言类型研究、民族语言心理研究、方言研究、语音研究也有很大进步。

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工作,18世纪末年已经开始。1786年,英国W. 琼斯证明,亚洲印度的古梵语与欧洲古希腊语、拉丁语有共同的祖先。1799年,匈牙利人沙穆

艾尔,G.(1751~1830)又证明匈牙利语与芬兰语同出一源。到了19世纪,从事这种研究的就更多,如R. 拉斯克、F. 博普、J. 格林、A. 施莱歇尔等等都做了许多工作。他们考释历史音变,验证词项对应,给印欧语系编出了一个族谱。有的学者还根据梵语和欧洲古代语言构拟出原始印欧语的形态来。

施莱歇尔设想,一个语系正如一棵树,亲语是树干,子语是树枝,构成一个谱系树。他的学生J. 施密特(1843~1901)则提出“波浪说”,认为语言变异以一个地区为中心,像波浪一般范围逐渐扩大,首先强烈地影响邻近诸语言,距离远些,影响就来得迟些、小些。

除语言的历史演变外,有的学者还注意到语言与民族的关系问题。远在18世纪,德国哲学家J. G. von 赫尔德(1744~1803)就指出,民族语言与民族心理有密切的关系。到了19世纪,这个思想就由W. F. von 洪堡特来加以发挥。

洪堡特认为,语言有“外部形式”和“内部形式”。外部形式是语音,无民族之别;内部形式是语义和语法结构,因民族而异。他还说,人会说话,这是他所不可缺少的心智能力,这种能力使语言能适应环境,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所以,不管你怎么分析语言,总有一些东西分析不出来。他还说,思想与语言是互相依存的,一个词儿非但是某一事物的名称,还把这一事物纳入一定的范畴之内。他这些思想,给20世纪美国语言学家E. 萨丕尔和B. L. 沃尔夫开辟了道路。

洪堡特最有名的理论也许是他的类型语言学。他跟德国学者F. von 施列格尔(1772~1829)都认为语言有3种类型:孤立型(如汉语),粘着型(如土耳其语),屈折型(如拉丁语)。他觉得屈折型最好,可是又说,汉语虽然没有用形式表现出来的语法类别,却自有其优胜之处。

20世纪的西欧、北美语言学 现代国外语言学有3个主要区域——西欧、北美和苏联。自20世纪初期至中期,西欧各派陆续建立,各有其独立的传统。30~70年代,美国学者提出了一些学说,对西欧有影响。苏联的语言学者受西欧、北美的影响较少,他们的学说在西欧、北美也没有广泛传播,因此西方学者对它还没有详细而具体地加以评论。

从20~70年代,西欧、北美语言学有4项突出的发展:一是前半个世纪结构主义占统治地位;二是50年代生成语法异军突起;三是50~70年代数理语言学和计算语言学应运而兴;四是类型学研究和语言共性研究引起了广泛兴趣。与此同时,语言学与哲学、逻辑、心理学、神经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物理学、工程学打交道越来越多,关系越来越密切。有些交叉性学科变得十分专门,一般人已经觉得难以了解了。

一般认为,欧洲结构主义的鼻祖是瑞士学者索绪尔,但是他自己并没用过“结构主义”这个名称。他的理论见于《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这是他的学生根据听课笔记编成的,并不是他亲自写成的书。他研究语言采用3个二

分法:①把“言语”(个人的话语)与“语言”(语言的系统)分开。②把栅性的“聚合关系”(如在“快走”、“慢走”中,按语法“快”“慢”可以互相替换)和线性的“组合关系”(如在“快走”中,按语法“快”修饰“走”)分开。③把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分开,而且认为共时研究比历时研究更重要。这些理论,大部分已为语言学界所接受。

索绪尔说,语言是一个大系统,其中有词汇、语法、语音三个小系统,这三个小系统中又各有其许许多多彼此有联系的成分。在语言这个大系统中,无论给哪一个成分下定义,都必须考虑与其他成分的关系。这正如在一盘象棋里,要知道任何一个棋子的作用,都必须考虑与别的棋子的关系一样。他由此得出一个结论:语言是形式,不是实体。

在索绪尔的间接影响下,并且通过自己的摸索,欧洲好些学者在某些方面得到了与索绪尔相似的结论,因此都被认为是结构主义者。但是他们的侧重点各不相同,成绩大小、影响大小也各不相同。一般分为如下几个学派:①法兰西学派,也叫社会学学派,以 A. 梅耶、M. 格拉蒙(1866~1946)、J. 房德里耶斯为代表。他们认为语言与社会、文化二者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语言既是社会事实,又是文化的一部分。②布拉格学派,以 H. C. 特鲁别茨科伊、V. 马泰休斯、R. 雅柯布逊为代表。他们在音系研究方面有特殊贡献,并且着重语言的句法功能和风格特点。③伦敦学派,以 J. R. 弗斯、韩礼德为代表。弗斯提出语言的“多系统论”,他还指出语义与上下文以及说话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并强调词的搭配方式。韩礼德提出“系统语法”,最近还进一步提出“功能语法”,研究社会方言、规范语言、文章风格以及句子和篇章中各成分如何互相联系等问题。④哥本哈根学派,以 V. 布伦达尔(1887~1942)、L. 叶尔姆斯列夫为代表。他们充分发挥索绪尔的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体的理论,注重语言成分的相互关系,并且认为语言是人类所用的符号系统之一,其特征要与其他符号系统(如逻辑、舞蹈等)比较才能说得清楚。

美国的结构主义的兴起,差不多与欧洲的同时,但是背景不同,目的也不同。它的创始人是 F. 博厄斯,他所写的《美洲印第安语手册》出版于 1911 年,比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还早几年。但是一般认为,美国结构主义的主要代表是 L. 布龙菲尔德和 E. 萨丕尔。前者的《语言论》出版于 1933 年,后者的《语言》出版于 1921 年,都是这一派的奠基之作。不过,布龙菲尔德和萨丕尔的兴趣和主要倾向并不完全相同。

美国结构主义在 20 世纪初期勃然而兴,这是由于人类学研究的需要。当时美国的人类学者并不像欧洲的语言学者那样,要发现什么语言的共性;相反,他们觉得弄清美国土著语言(印第安人的各种语言)的特性才是重要的。在他们看来,应当首先关心的不是语言的一般原理,而是处理陌生的语言的方法。碰到一种自己不懂的语言,必须设法分析它的结构,做出正确的记录。

萨丕尔对洪堡特在 19 世纪提出的民族心理与民族

语言的关系深感兴趣,布龙菲尔德所崇信的却是哲学上的逻辑实证主义和心理学上的行为主义。在布龙菲尔德看来,语言不外乎刺激和反应,只有那具体的、可以观察到的刺激和反应才是实在的,至于意义,那是空灵飘渺,无法测度的,因此暂可不谈。布龙菲尔德虽然讲语言的结构和系统,而且有一套严格的分析方法,但是眼界比索绪尔狭窄。到了 50 年代, Z. S. 哈里斯等人就更着重语言形式的研究,希望完全把意义撇开,只凭一套“发现程序”就能把一切语言材料都分析得清清楚楚。

按照 D. 海姆斯的意见,布龙菲尔德派到 50 年代已经分为两支。一支包括 G. L. 特拉格、H. L. 史密斯、M. 朱斯,他们把语言分为音系、语法、语义三层;另一支包括 K. L. 派克、R. 朗格克尔,他们把语言分为音系、语法、词汇三层。前一支认为,语言学的任务是研究语言的结构,“超语言学”才研究语言与社会、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后一支也着重结构,但是把“序位”作为研究的重点,那是语法形式和语法功能相结合的单位。

对布龙菲尔德派提出挑战的是乔姆斯基,他在 1957 年出版了《句法结构》,1965 年又出版了《句法理论面面观》。他的学说称为生成语法。

乔姆斯基师承布龙菲尔德派哈里斯所创造的转换理论而加以改造,又师承布拉格派雅柯布逊所倡导的语言共性理论而加以发展。他批判布龙菲尔德派所崇奉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尤其是 B. F. 斯金纳的学说,而远继 17 世纪法国波尔瓦罗亚修道院语法学者的传统,发扬笛卡儿的唯理主义。在他看来,语法所要说明的不是语言表现(说出的话),而是语言能力(说话的心理过程)。他说,从未学过的句子,人们能说出;从未听过的话,一听就懂得——这是由于人有天生的“语言习得机制”。他认为,一个小孩听到的语言材料很有限,可是到了五六岁,已经能不经老师指导就总结出一套完整的语法规则来,这个平凡而奇特的事实,布龙菲尔德派从未想到,更无法说明。

1957~1965 年,乔姆斯基的看法大致如下:语言的基本单位是句子。句子的生成不是从意义产生形式,而是从形式产生意义。先有个句法语符列,这叫做“深层结构”。对深层结构插入若干个词,这些词按“转换规则”转换,于是深层结构变为“表层结构”。深层结构在转换为表层结构之前,经过“语义传译”,这就成为有意义的东西;表层结构形成之后,再经“语音传译”,这就成为有声音的东西。

乔姆斯基的学说,60 年代初期风行一时,可是到了 1965 年,生成语法派内部就开始分裂了。10 年前,乔姆斯基曾经批评过布龙菲尔德派,说他们有两个缺点:①不能说明歧义句。例如 Flying planes can be dangerous 这个句子,只有一个表层结构,但是有两个深层结构,一是“正在飞行的飞机可能是危险的”,一是“开飞机可能是危险的”。由于布龙菲尔德派的结构主义只讲表层结构,不提深层结构,它对歧义的产生无法解释。②不能说明主动

句与被动句的关系。例如 *The student has taken the book away* (学生拿走了书) 和 *The book has been taken away by the student* (书被学生拿走了), 二者表层结构不同, 可是深层结构相同。由于布龙菲尔德派只讲表层结构, 这个在意义上二而一的关系他们也无法解释。但是到了 60 年代中期, J. R. 罗斯和 G. 雷科夫对乔姆斯基同样也加以责难。他们说, 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也有缺陷, 因为它不能说明同义句。好比 *Seymour sliced the salami with a knife* 和 *Seymour used a knife to slice the salami* 这两句话, 表层不同, 可是最深层都是“西摩拿刀子切香肠”, 可惜凭着乔姆斯基那一套转换规则, 怎么也不能把二者统一起来。

60 年代后期, C. 菲尔莫尔 (1929~) 还从另一方面非难乔姆斯基。乔姆斯基把“名词短语”、“动词短语”这些句法单位作为“原始成分”, 以为这些是最深的根底, 可是菲尔莫尔却提出“格”的观念, 认为“施事”、“受事”这些语义关系才是最基本的层次。例如表示某人用钥匙开门, 可以说 *The man opened the door with the key*, 或 *The door was opened by (或 with) the key*, 也可以说 *The key opened the door*。

在这几个句子的表层中, 主语、宾语各不相同, 但是在深层结构中, *the man* (人) 总是施事格, *the door* (门) 总是受事格, *the key* (钥匙) 总是工具格。他所谓“格”不是传统语法中的语法形式, 而是语义关系, 所以他的学说称为“格语法”。

俄国和苏联语言学 19 世纪 60 年代以前, 俄语语言学研究已在本国展开, 编出了词典和语法书。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Ф. Ф. 福尔图纳托夫在莫斯科大学建立了一个学派, J. N. 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又在喀山大学建立一个学派。他们都研究普通语言学和历史比较语言学。博杜恩·德·库尔德内把“语音” (speech sounds) 和“音位” (phonemes) 区别开来, 对现代语言学尤其有贡献。

1917 年十月革命后, 苏联语言学有两个主要流派。一派继承俄国传统, 继续研究历史比较语言学, 同时又学习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例如 Л. Б. 谢尔巴。另一派反对历史比较语言学, 提出所谓“新学说”, 其领导人是 Н. Я. 马尔 (1864~1934)。马尔认为, 语言也跟许多别的社会现象一样, 是“上层建筑”, 有阶级性。他断言, 语言变化与经济基础的变化是步调一致的, 甚至印欧语中形容词分为原级、较高级、最高级, 他也说是历史上不同的阶级称号的遗迹。

马尔于 1934 年去世, 由 20~40 年代, 他的“新学说”在苏联占统治地位。1950 年, 苏联语言学界展开了辩论, Н. С. 斯大林 (1879~1953) 批判了马尔的观点。斯大林认为, 语言没有阶级性, 不是上层建筑, 因为它为全民服务, 对哪一个阶级都没有偏爱。语言不能在什么时候来一次“爆发”, 好像上层建筑要来一次革命那样。马尔的“革命论”, 在 1950 年后杳无声息了。1956 年后,

苏联语言学界又起变化, 语言学讨论重新展开。马尔的“新学说”不再有人附和, 但是对于斯大林的某些论点, 有人进行过批评; 对于西方语言学的新论点, 也有人介绍和评论。

按苏联学者 Ю. 斯捷潘诺夫的意见, 苏联语言研究的主要题目有两个: ①语言与社会, ②语言与思维。他认为苏联语言学家们上继俄国学者的传统, 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 能建立自己的语言理论。他推重 И. И. 墨山宁诺夫 (1883~1967) 的类型学, 谢尔巴的音乐学和语法学, В. В. 维诺格拉多夫的关于俄语、文学语言、风格学和诗学的理论。

语言学及其分支学科

语言学是研究人类语言的。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 它用声音来表达意义, 但是声音本身不是意义。把语言作为一个以音表义的体系来研究, 这是语言研究的中心。但是如上文所说, 语言学还与许多学科互相交错, 构成一条长而宽的地带, 其中包括好些分支学科。

语言研究的中心 语言既是具体的, 又是抽象的。说出来的话是语言的具体表现, 可以分为语音、语法、语义三层; 说话时所操的是某一种民族语言, 任何民族语言体系都是许多具体话语的抽象概括, 可以分为语音 (音系)、语法、词汇三层。着眼于不同的层次, 不同的方面, 语言学就有不同的分支学科。此外, 人们非但说话, 还使用文字。文字是声音的记录, 同时又有某些特殊功能, 它也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以上学科都注目于语言的结构本身, 可以说是语言学的中心, 有人管它叫做微观语言学。分述如下:

语音学、音系学 研究语音的物理属性、人类的发音方法、语音感知的生理过程等的是语音学; 研究一种语言有多少个不同的音, 这些音彼此之间有什么区别和关系的是音系学, 也叫音位学。不过, 有人把语音学的范围扩大, 连音系学也包括在内。

形态学、造句学、语法学 研究词的构成方式和曲折方式的是形态学, 也叫词法; 研究如何把词组成短语或句子的是造句学, 也叫句法。按传统说法, 形态学和造句学合起来就是语法学, 也叫语法。但是有人把“语法”的意义扩大, 除形态学、造句学外, 还包括语音、语义, 如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就是这样。

词汇学、词源学、词典学 研究词汇项目、词汇意义、词语演变的是词汇学。追溯词的来源和历史的是词源学。搜集许多词项, 把它分类、比较、注释的是词典学。中国的字典学是词典学的一个分支。

语义学、结构学、语用学 研究词项与概念及指称对象的关系, 揣摩各种词义的异同、正反、上下、交叉等关系, 剖析整个句子或其中某些成分的意义, 这是语义学。语义学如只管外延或字面意义, 而不管语言从社会环境得来的意义, 那仍然属于微观语言学的范畴。

但是, 即使只对语言结构本身进行研究, 也很难自成

一统。有人师承 C. S. 皮尔斯(1839~1914)、C. W. 莫里斯(1901~1979)、R. 卡纳普(1891~1970)的学说,把语言学看作符号学的一个分支。他们说,符号学包括三个部分:意义学、结构学和运用学。在一般符号学中称为“意义学”和“运用学”;在研究语言时就叫作“语义学”和“语用学”。意义学研究符号和所指客体之间的关系;结构学研究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运用学研究符号的意义与符号的使用者、符号的使用场合之间的关系。然而符号的客体是客观世界的各种事物,符号的使用场合是说话人所处的社会环境。一牵涉到这些,语言便再也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体系,语言研究也就再不限于微观研究,而伸展到语言之外,成为宏观语言学了。

文字学 这是研究文字的形态、体系、起源、演变和发展的学科。文字学研究世界上各种不同的书写系统,不限于一个民族或国家,但是按汉语习惯,也常把“文字学”作为汉语文字学的简称。

语言研究的边沿地带 语音研究、语法研究、词汇研究、语义研究、文字研究,这些是语言研究的核心。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边沿学科,简述如下:

语言教学与翻译 语言教学自古以来是语言研究的动力,又是语言理论发挥作用的场所。无论在中国,在印度,在希腊,最早的语言研究都是为了解释经典,教授学生。反过来说,语言研究有成绩,也会促进和改善语言教学。制订正确的语言政策,有赖于语言学的帮助;发现和仔细观察语言的历史演变,正确认识古代语言、现代语言、标准语和方言的关系,也不能没有语言学的指导。最近几十年来,语言教学法有许多改变或进步,都直接间接与语言学界的主导思想有关。

语言教学分为第一语言教学,第二语言教学和外语教学。第一语言教学,所教的是母语。第二语言教学在双语社团中进行,既教母语,又教另一种语言,例如加拿大魁北克省以法语为第一语言,英语为第二语言。在外语教学中,学生所学的是外国语,不是本社团日常使用的语言。由于学习对象不同,教学对象不同,学习环境不同,这三种教学各有其特殊的目的和方法。

翻译自古以来是外语教学中的重要科目之一,它要求把原以某种语言写成的作品的内容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由于各种语言自有其语音、语法和词汇系统,又自有其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译文很难做到与原文等价。翻译向来被看做一种艺术,可是现代人热心于寻找科学方法,待译的材料又日见其多,于是大家希望把翻译变为技术,甚至试图用机器来代人做翻译工作。这么一来,翻译就更成为语言学家的重要课题了。

社会语言学、方言学、方言地理学 语言是传递信息的工具,又是联络感情,消除隔膜的工具。风俗习惯代代相传,也依靠语言。但是即使是使用同一民族语言,语音、词汇、语法格式也因地区而异,因使用者的社会地位而异,还因交际场合和使用目的而异。研究这些问题的是社会语言学。

与社会语言学关系密切的是方言学。“方言”这个词儿,有两种不同的意义。自古以来,人们认为方言是民族语言的分支,因地区不同,交往不多而产生。汉代扬雄所谓“方言”,就是这个意思。研究这种区域方言的学科,称为方言地理学。但是近来学者们还注意到,即使在同一地区,甚至同一城市,人们的言语也因社会阶层、职业、年龄、性别等等而有或多或少的差异,于是热心研究所谓“社会方言”。这样的研究,与社会语言学就难分界限了。

修辞学、风格学、话语语言学 这三门也都是与社会语言学交叉的学科。修辞学公元前5世纪起源于希腊,包括雄辩术和作文法。中世纪以来,修辞学在欧洲学校里是人文学科之一。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就讲究外交辞令,后来又出了刘勰(约465~约532)的《文心雕龙》等专书,所以“修辞学”这个名称虽译自外语,千百年来修辞研究在中国早已是一门重要的专门学问了。到了19世纪,修辞学在欧洲便成了文辞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与文艺批评合流。

1902年,瑞士语言学家 C. 巴利提出了“风格学”这个名称。他认为,用语言来表达情感的方法是风格学应有的研究对象。近来又分为文学风格学和语言风格学。文学风格学近似修辞学,语言风格学近似社会语言学。20世纪初期,捷克语言学家 V. 马泰休斯又提出话语语言学。他注意那些比句子大的语言单位,短的如几句连贯的话,长的如整篇演讲、整本书,都是研究对象。这门学问一方面牵涉到语言作品的内容和使用语言的目的,一方面又牵涉到组成篇章的手段和表达意义的手法,因此与修辞和语法都有共通之处。

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副语言学 人们彼此对话时有物理、生理基础,也有心理基础。有人从语言出发去研究心理,摸索语言与感知、注意、记忆、学习等心理作用的关系;也有人从心理出发去研究语言,企图弄清楚人们如何说出话来,如何听到并理解他人的话。这些是心理语言学要干的事情。语言学家早已关心儿童学习语言的过程,但是自60年代以来,人们对小孩如何习得语言和各种不同的语言有什么共性这两个问题特别感兴趣,这是由于乔姆斯基假设人类有个“语言习得机制”,并且与瑞士著名心理学家 J. 皮亚杰(1896~1980)展开过争辩,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研究心理学,自然不能不研究人脑的神经。探索人们学习语言、运用语言的神经学基础,试图做出人脑控制言语和听觉的模型,这是神经语言学的任务。神经语言学的材料,一部分来自临床医学,如失语现象和口吃现象;一部分来自参量发音语音学,注意声音、语调、舌头运动、唇部运动如何彼此协调,尤其注意说话时的失误。

有的语言学家除研究人们说出的话外,还留神他们的音质和声腔,以及与语言同时使用或者单独使用的手势和身势。这种研究伴随着语言而发生的种种现象的工作,叫做副语言学,有时也称为伴随语言学。

人类语言学、民族语言学 正如洪堡特所说,民族语

言与民族文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社会制度、宗教信仰、职业、亲属关系等等会影响语言习惯;反之,语言对这些东西也有或多或少的影响。研究这些问题的是人类语言学(“人类学的语言学”的简称),它从人类学立场出发,用人类学原则来研究语言。人类语言学与社会科学交叉,尤其与民族语言学交叉。但是民族语言学只研究民族类型、民族行为程式与人们的语言之间的关系,人类语言学还有个特殊任务,就是设法把那些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语言记录下来。

数理语言学、计算语言学 数理语言学是研究语言中的数学性质的学科。使用数学方法来研究语言,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最初是统计音素、语素、词汇项目等等,后来就有人根据俄国人 A. A. 马尔科夫(1856~1922)和美国人 G. K. 齐夫的学说,运用数量计算学并使用各种模式来处理语言材料。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数理语言学正式诞生了。由于现代语言学要求精密化,数理科学如概率论、信息论、集论、数理逻辑等等又给它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于是数理语言学就发展很快。目前它包括三个部门:代数语言学、统计语言学和数理语言学。它的研究范围日益扩大,已从简单的词汇统计一直伸展到建立语言的代数模型,分析语义,探讨人工智能问题等等。

数理语言学兴起约 20 年后,计算语言学也应运而生。这时电子计算机已发展到第 4 代,成为语言学家的得力助手。计算语言学的目的,是阐明如何利用电子计算机来进行语言研究,其项目有统计资料,检索情报,研究词法、句法,识别文字,合成语音,编制机助教学程序,进行机助翻译等等。由于计算机存储量大,计算准确,工作速度快,又能用于起稿、改稿、存储文稿和各种资料,对于语言研究有很大的帮助。

哲理语言学、语言的哲理和语言哲学 上文谈过,最早谈论语言问题的是哲学家,目前哲学与语言学的关系更加密切。人们问:对于哲学概念的理解和阐发,语言学能起什么作用?人们又问:对于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和材料,哲学能起什么作用?在目前语言学用语中,“哲理语言学”(philosophical linguistics)指语言学家为解决这些问题而进行的研究,“语言的哲理”(linguistic philosophy)则指哲学家为研究语言而采用的方法。有人把二者合起来,统称之为“语言哲学”(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但是人们又往往把“语言哲学”用来专指哲学家对日常语言的分析和理解,如英国哲学家 J. L. 奥斯汀(1911~1960)所作的对日常语言的说明。

语言学家可能自觉地大谈其哲学,也可能不自觉地持某种哲学观点或者受某些哲学理论的影响。波尔瓦罗亚修道院的语法学家崇信笛卡尔;施莱歇尔把达尔文主义运用于语言史;马尔按照自己的理解去搬弄(严格地说是庸俗化)马克思主义;布龙菲尔德遵循逻辑实证主义;乔姆斯基发挥唯理主义——这些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显而易见,哲学观点不能不影响语言学家的理论体系,因此是必须注意的首要问题。但是哲学观点只是构成语言理

论的重要成分之一,并不是语言理论的全体。一个语言学家,如果有谁只因他采用某种哲学观点就把他全盘肯定或者否定,那是简单化的做法,无助于语言学的进步。

语言研究的展望

1975 年以后,语言学的进展比先前更加急速。对某些问题,各派意见渐趋一致;对其他问题,却又更加分歧。英国的新弗斯派,法国的功能语法派,苏联的语言学者,美国的生成语法派和各国众多的新兴学派,都继续进行着研究。中国的学者除继承前辈的传统并吸收国外的成果外,也正在试用新方法探讨新问题。

当今语言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是:语言学的本质是什么?乔姆斯基认为,语言学是研究作为心理状态的语言知识的,所以是认知心理学的一部分;但是人类心理又取决于大脑的物质结构,因此语言学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相反,美国学者 D. 海姆斯却认为,语言是社会现象,研究语言而不管它的社会功能,是既不合理也行不通的。他跟许多别的学者一样,确定语言不是自然科学,而是社会科学。这也就是说,不能只用自然科学方法来处理语言,而要用社会科学方法。

跟着这个争论必然产生另一个争论:研究语言应以结构形式为主,还是以语法功能为主?碰到一个句子,应该象乔姆斯基那样,先把它分为名词短语和动词短语,还是先分为主语和谓语?传统语法着眼于意义和功能,自然先讲主语、谓语;乔姆斯基从形式出发,却要讲抽象的短语结构和语符列。不过,60 年代前后,在美国和欧洲已经兴起了几种功能语法,如“依存语法”,“格语法”,“关系语法”等等。这些派别都与乔姆斯基背道而驰,可是侧重点和解释方法又各不相同。

研究语言,重点应该放在句子上面,还是放在更大的单位上面?这又是一个时常引起争论的问题。自古以来,语法主要是讲句子结构的,修辞学则既讲选词造句,又讲谋篇布局。如果研究语言的人想用技术手段来理解自然语言,处理那急剧增加的科技文献和社会信息,他自然力图用数学方法来处理语言。这样他就不得不以句子为主,因为在比句子大的单位中,可变因素太多,难以列出公式。可是如果他所关心的是交际功能和社会效果,他就不能不纵览全文,关怀全局,既谛视上下文贯串照应的方式,又探讨语言中那些情文相生,意随境变的问题。

语言学家自古以来常常谈到语言的共性。乔姆斯基及其追随者认为,可以从英语这样一种民族语言入手,摸出各种语言同有的共性来。J. H. 格林柏格走的是另一条道路:先列举若干种语言的相似点,再逐步找寻一切语言的共性。为了追求语言的共性,最近乔姆斯基已经放弃了大多数转换规则,另一派如 G. 盖兹达等人则连一条转换规则也不要。究其原因,无非是感到转换规则因个别语言而异,无法做到放之四海而皆准。

电子计算机的使用,是今天语言研究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借助于计算机,词汇研究取得了空前的准确性,

语法分析也达到了新的水平,语义分析则正在试验中。但是即使只是处理视觉和听觉材料,把两种材料彼此配合,计算机目前还远不如人脑;至于人生知识和社会知识方面,计算机比之人脑自然更相去悬殊。人工智能研究的目的是使机器能象人那样思维,那样控制并使用语言。不过到目前为止,语言还只有人类能灵活运用。有人相信,语言终将为人类和机器所共有。可是这究竟是快要出现的惊人局面,还是遥远的憧憬,今后的一二十年将会给我们一个比较清楚的回答。

参考书目

- 赵元任:《语言问题》,北京,1979。
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太原,1981。
R. H. Robins. *A Short History of Linguistics*, London, 1979。
G. Sampson, *Schools of Linguistics*, London, 1979。
E. A. Moravcsik and J. R. Wirth (eds), *Current Approaches to Syntax*, New York, 1980。

(王宗炎)

yuyanxue changyong fuhao

语言学常用符号 (symbols and conventions used in linguistic studies)

[] 方括号。表示语音成分、音素或音位变体,如 [ʃi:p]。

- 连字号。跟其他符号一起表示某个语音成分在词中的位置,如 m-表示 m 出现在 man 中的词首位置,-a-表示 a 在中间位置,-n 表示 n 在词末位置。

: 冒号。表示对立关系,如 [p]:[b], [t]:[d];

变音符号 9 个,根据不同情况,可加在普通字母的上面、下面或后面,表示的读音跟普通字母所代表的音有某些不同之处。如:

· 圆点号,加在辅音字母下面表示缩舌的发音动作,如梵语 ṭ, ḍ, 表示 [ṭ], [ḍ] 读翘舌塞音;· 还可加在表示半元音的字母下面,说明该字母应按元音发音;

/ 闭音符(也称尖音符),加在元音上方,如法语 présage(征兆)中的 é,表示 é 读闭口音[e];

\ 开音符(也称钝重音),加在元音上方,如法语 près(近)中的 è,表示 è 读开口音[ɛ];

˘ 软音符,法语中加在 a、o、u 前的 c 字母下面,表示 c 应发[s]音,如 façade(正面)、façon(式样;方法)和 reçu(得到)中的 ç 均读[s]音;

ˉ 长音符,加在元音字母上面表示长元音,如拉丁语 Pōpulus(白杨);

˘ 短音符,加在元音字母上面表示短元音;

˙ 鼻音化符(也称腭音化符),加在元音字母上表示鼻音化,如法语 bon[bɔ̃](好);在有些语言中加在字母上还可表示腭音化,如西班牙语 señor(先生);

˘ 两点符(也称分音符或变音符),表示元音交替,如德语 Schönberg(可爱的山);还可表示几个元音的分读,如英语 naïve[na:'i:v](天真的)等;

˘ 音调符(也称长音符,在希腊文中作 ˘),表示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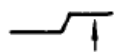
定程度的音高、音长、元音质等;在法语中置于除 y 之外的所有元音字母上,表示该元音字母读长音,如 tête[te:t](头)。

… 表示停顿或不再往下说。

/ / 斜线号、斜括号、或称“斜杠”。表示语音成分、音位或音步界限,如 /ʃi:p/。

// 用作音渡记号。表示声调群界限,同时表示升调,如 one, // two, // three,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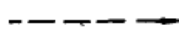
1, 2, 3, 4, …, 表示声调和音高的等级,美国有一些语言学家用 1 表示最高,2 表示高,3 表示中,4 表示低。



语调的升调符号。



语调的降调符号。



平(语)调符号。

+ 加音渡号。表示前后的音可以连读,如英语 an aim/an + eim/。

// 双杠音渡号。

双交叉音渡号。表示句子终结时的停顿和降调,如“任务终于完成了#”,或表示词的界限。

* * 双星号。表示位于两个星号间的是形态音位成分,如英语 *telegraf*(表示 telegraph)。

~ 波形号。表示音位对立,如 /n/ ~ /l/。

{ } 大括号(也作翼括号)。表示语法形式,如英语名词的复数语素 {-s};也可表示音节结构,即音位的组合,如 /b/, /p/, /m/, /n/, /e/ 等音位间可以有 {/b/ + /e/ + /n/} 的组合,但其中 /b/ 的位置可以容许 {/b/, /p/, /m/, /n/} 这组辅音的任何一个进入。

+ 加号。表示语素界限,如英语 man + ly。

| 单竖线号。表示两组语言成分(如音步、意群、词组等)之间的界限(参看 / / 号)。

|| 双竖线号。表示分句之间的界限。

||| 三竖线号。表示句子之间的界限。

(()) 双括号。表示被包容分句,即句子有内外两层,如英语 (The old man (who lives here) was fired)。

* 星号。①表示不合语法或不能接受的形式,如英语 *The cat sits on the mat (sit 是 sit 的过去时,加 -s 不合语法),*Colourless green ideas sleep furiously (直译为:无色的绿色的思想狂怒地睡觉)此句语法虽正确,但毫无意义,无法让人接受;②表示构拟或假设的形式,如 */kmto/(百),印欧语中一个从理论上构拟的形式,实际上并无书面材料证明它的存在。

< > 角括号。表示字素(文字系统中最小的区别单位),如拉丁字母中的 <m>。

italics 斜体字。表示用习惯拼写法书写的引文,有时还可用来表示外来语等。

> 表示“发展为……”,“变为……”,有时也表示

“大于……”。如俗拉丁语 *ficatus* > 法语 *foie*, 表示 *ficatus* 演变为 *foie*; 又如 $PIE_t > PG_{mc}$, 表示原始印欧语的 *t* 发展为原始日耳曼语的 *þ*。

< 表示“从……发展为……”, “从……变为……”, 有时也可表示“小于……”。如 *foie* < *ficatus* 表示 *foie* 由 *ficatus* 演变而来。

‘gloss’ “注释”。表示词项的意义或原词的翻译, 如英语词 *four*(四) 可用来表示翻译、解释和说明德语词 *vier*(四)。

→ 短语结构箭号。意为“重写为……”, 如 *sentence* (句子) → NP(名词短语) + VP(动词短语)。

⇒ 转换规则箭号。意为“转换为……”, 如按一定规则把某一英语陈述句转换为疑问句:

The man was a soldier ⇒
NP + Past + be + X ⇒
这个人是士兵。

Was the man a soldier?
Past + be + NP + X

这个人是士兵吗?

= 等号。表示“跟……相等”, “相当于……”, 如 $PG_{mc} = PIE_{t,t}$, 意为: 原始日耳曼语的 *þ* 相当于原始意大利语的 *t*。

≠ 非等号。表示“跟……不相等”, “不同于……”, 如英语 *John is eager to please* (约翰急于取悦) ≠ *John is easy to please* (约翰易于取悦)。

Ø 零形式。如英语 *sheep* 既可用作单数, 又可用于作复数 *sheep*, 用作复数时可以认为是添加了零词缀, 实际上无任何形态变化。

∈ 表示“是……的一个成分”, 或“属于……”, 如 $a \in A$ 。

∉ 表示“不是……的一个成分”, 或“不属于……”, 如 $a \notin B$ 。

⊂ 表示“被包括在……中”, 如 $a \subset A$ 。

⊃ 表示“包括……”, 如 $A \supset a$ 。

⊄ 表示“不被包括在……中”, 如 $a \not\subset B$ 。

⊈ 表示“不包括……”, 如 $A \not\supset b$ 。

≡ 表示对等关系或对等成分, 如 $A \equiv C$ 。

∪ 表示“与……一致”, 如 $A \cup D$ 。

∩ 表示“与……相交”, 如 $A \cap C$ 。

(赵世开 黄长著)

yuyi wangluo lilu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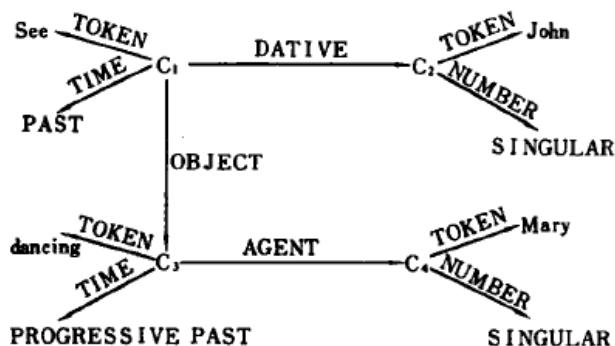
语义网络理论 (semantic network theory) 用于表示词与词之间的语义关系的一种网络理论。1973年由美国人工智能专家司马贺提出。其原理是以句中词的概念为网络的结点, 以沟通结点之间的有向弧来表示概念与概念之间的语义关系, 构成一个彼此相连的网络, 以理解自然语言句子的语义。

例如, *John saw Mary dancing* (约翰看到玛丽跳舞)。

这个句子, 可用下面的语义网络符号来表示:

C_1 TOKEN (see)
TIME PAST
DATIVE C_2
OBJECT C_3
 C_2 TOKEN (John)
NUMBER SINGULAR
 C_3 TOKEN (dancing)
TIME PROGRESSIVE PAST
AGENT C_4
 C_4 TOKEN (Mary)
NUMBER SINGULAR

这里, C_1, C_2, C_3, C_4 是语义网络中表示概念的结点。*see* 的意义项是 C_1 , *John* 的意义项是 C_2 , *dancing* 的意义项是 C_3 , *Mary* 的意义项是 C_4 。TOKEN 表示词项, TIME 表示时态, NUMBER 表示数, PAST 表示过去时, PROGRESSIVE 表示进行时, SINGULAR 表示单数, AGENT 表示主体格, DATIVE 表示给予格, OBJECT 表示客体格, 它们都是深层格。根据这样的语义关系, 这个句子可用语义网络表示如下:



采用语义网络来理解自然语言时, 首先分解输入句的句法关系, 同时分析句子的深层格结构, 记录语义关系, 最后求出输入句的语义网络, 借以理解自然语言的语义。
(冯志伟)

yuyixue

语义学 (semantics) 既可以指对自然语言中词语意义的研究, 也可以指对逻辑形式系统中符号解释的研究。前一类研究历来在哲学和语言学两个领域中交叉进行, 后一类研究有人称为纯语义学, 主要在逻辑学领域中进行, 但其中大量概念和方法都已引入自然语言语义研究。当前的发展趋势是两者汇流, 相得益彰。

哲学语义学 这是哲学家对自然语言的语义的研究, 围绕着什么是意义这一难题展开。

古希腊时代柏拉图(约公元前428~前348)以为既然词语是用来指称事物, 为它命名的, 词语的意义就是其所指对象。这种原始的观点称为指称论。可是有些词语, 例如“当今法国皇帝”, 虽然有意义, 却没有指称对象, 因为当今法国没有皇帝。于是有人退一步说: 意义是词语在

说话者和听话者头脑中产生的形象或者观念。然而这个说法也有缺点。说词语的意义是形象,太具体,因为同一个词可以唤起不同的形象;说词语的意义是观念,又太笼统,因为观念本身是未知数,靠观念来确定意义不过是用一个未知数代替另一个未知数。

由于观念论说明不了意义,有些哲学家如 D. 戴维森便试图另辟途径,确立词语与世界的联系。他们提出,语句的意义与命题的真假有关。这种观点称为真值论。在真值论基础上发展出真值条件语义学,可能世界语义学及各种模式-理论语义学。

L. 维特根斯坦(1889~1951)反对真值论,他认为词的意义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他的理论叫做用法论。用法论不象真值论那么狭窄,因为许多语句没有所谓真值,如疑问句、祈使句都无所谓真假,但是任何词语必有一定的用法。可是用法论也有缺陷,因为“用法”的概念不明确。英国哲学家 J. L. 奥斯汀(1911~1960)也反对真值论,他从另一个角度来弥补真值论的不足,他认为说话不仅是“言”,而且是“行”,因而话语有双重作用,一是陈述命题,二是起命令、请求、许愿、警告之类的言外作用。真值论研究前一种意义,言语行为论则研究后一种意义。对什么是意义的争论,还在进行。

历史语义学 语文学家早就关注语义问题,尤其是词义演变问题。中国和西方学者都作过大量而细致的词源和训诂研究。1893年,法国学者 M. 布雷阿尔第一次使用“语义学”这一名称,1897年出版了第1部专著《语义学探索》。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半叶,欧美学者整理、归纳了词义演变的各种现象,分为词义扩展、词义紧缩、词义升值、词义贬值等类别。英国 S. 乌尔曼在20世纪50~60年代出版几部著作,总结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结构语义学 在结构主义理论影响下,一些语义学者由历时性的研究转向共时性的研究,由研究一个词的语义变化转向研究词与词的语义关系。20~30年代,德国和瑞士的一些语言学家创立了语义场的理论,代表人物是 J. 特里尔。他们把一种语言中的全部词汇看成一个完整的系统,系统中各个词项按意义聚合成为若干语义场。每个词的意义都取决于同一场内其他词的意义,例如要确切了解“红”的意义,必须了解“橙”的意义。他们还有另一类颇为流行的方法,那是对词与词之间的同义、反义、多义、歧义、上义、下义等种种关系的研究。但是结构语义学有个局限性,即只以词或语素为单位,既没有考虑如何对词义内部结构进一步分析,也没有考虑如何把词义组合成词组、句子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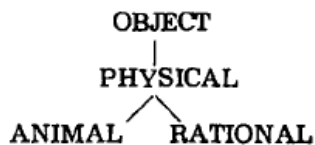
从40年代起,音系学家把音素分解为更基本的元素,美国人类学家也把各种语言中表示亲属关系的词如“父”、“母”、“弟”、“妹”、“夫”、“妻”等分解为男性、女性、成年、未成年、已婚、未婚等等成分。在他们的影响下,人们也开始采用成分分析法来研究语义。

生成语法学派语义学 1963年 J. 卡茨和 J. A. 福多发表了论文“语义理论的结构”,标志着生成语法学

家开始研究语义。次年卡茨和 P. 波斯塔尔的专著《语言描写的统一理论》出版,将语义学和句法学、音系学并列为生成语法学的3大分支。

生成语法学的总目标是描写和解释人们的语法知识,其中语义学的目标则是描写和解释人们的语义知识。每个说汉语的人都知道:“母亲”和“妈妈”语义相同;“男人”、“女人”、“老人”、“青年人”的语义不完全相同,但有共同之处,所讲的都是“人”;“人”的范围大,“男人”的范围小。语义学家的任务,就是假设一套理论来说明这些词语的意义特点及其彼此之间的种种关系。卡茨等以成分分析法为基础,设计出一套元语言来给自然语言的词语下定义。例如“单身汉”一词含有人、成年、男性、从未结婚等意义,因而词义可以用下面这一组元素表示:“HUMAN”、“ADULT”、“MALE”、“NEVER-MARRIED”。“男人”的词义可以用“HUMAN”、“ADULT”、“MALE”表示,“人”的词义只须用“HUMAN”表示。但是有的元素本身就是个复合体,例如“HUMAN”含有实体、物体、动物、理性等意义,可以进一步解析为:“OBJECT”、“PHYSICAL”、“ANIMAL”、“RATIONAL”。如果两个词语所含的元素相同,就彼此同义。如果两个词语有一个或几个共同元素,彼此之间就语义相似。共同的元素越多,语义越接近。假如甲词有3个元素,乙词除了这3个元素外还有第4个元素,则乙词的意义包含在甲词的意义范围之内。

除描写词的意义外,语义学还必须描写一切词组和一切句子的意义。在生成语法学派的句法学中,句法元素结合成有层次的树形结构,这叫做句法表达式。卡茨假设,在语义学中,语义元素也结合成有层次的树形结构,这叫做语义表达式,如 HUMAN 的语义表达式应该是:



句法学用句法规则把单词组合成词组,把词组组合成句子,把若干简单句组合成复杂句,这样便能造出无穷无尽的句子。语义学以句法表达式为基础,用语义规则把词的意义组合成词组的意义,把词组的意义组合成句子的意义,把简单句的意义组合成复杂句的意义,这样便能得出任何一个句子的语义。在分析句法的时候循着句子、词组、单词的顺序分解;在分析语义的时候,也可以相应地把大单位分解为小单位。这套语义理论,称为分解理论。

如上所说,语义理论以句法为基础,先生成句法表达式,然后转变为语义表达式。用纯语义学的术语说,这是语义学给句法表达式作语义解释,所以有解释语义学之称。60年代 G. 雷科夫等人提出过相反的观点,认为应以语义为基础,先生成语义表达式,然后变换为句法表达式。这种观点称为生成语义学。70年代起,生成语义学派失势,解释语义学派也进入低潮。生成语法代表人 N. 乔姆斯基现在认为,语义学只能处理一部分语义问题,尤其是与逻辑有关的语义,例如名词词组的指称关系,量词

的辖域等等,其他语义问题则属于语法以外的认识系统。所以到了80年代,生成语法学中的语义研究范围已大大缩小了。

孟德鸠语义学 卡茨等人的研究使语义描写做到了形式化、精密化,但是他们不考虑语言环境,不考虑词语与世界上事物的联系。有人批评这种语义学,说它是变相的句法学。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同时又坚持语义学的科学方向,一些生成语法学家从70年代初起开始转向孟德鸠语法。R. 孟德鸠(1932~1971)是美国逻辑学家,他认为自然语言与逻辑语言在本质上并没有区别,自然语言的句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都可以数学化。孟德鸠语义学以真值条件语义学、可能世界语义学和模式-理论语义学为基础,认为了解一个句子的语义就是了解该句子是否符合真值条件,是否真实反映世界上的情况。不过所谓“世界”,不一定指当时当地的现实世界,也可以指古代的、未来的、遥远的,甚至是幻想中的世界等等一切可能的世界。为了精密地描写自然语言中句子语义的真值条件,需要建立一个数学模式,使用一种元语言作过渡。孟德鸠语义学家设计出一套内涵逻辑系统作为元语言,将自然语言的句子翻译成元语言的句子,给元语言的句子作语义解释,从而得到相应的自然语言句子的语义,并用间接的办法保证语义描写的精确性。目前语言学家和逻辑学家正在通力合作,试图解决自然语言语义形式化这一难题。

其他 当前哲学界还有一些有一定影响的语义学流派及分支。游戏论语义学以J. 欣提卡为代表,主要研究逻辑量词,批评G. 弗雷格的语义合成理论与生成语法学派的语义理论。概念作用语义学以G. 哈蒙为代表,他强调语言符号在思考中的运算作用,认为词语的意义取决于表达的概念和思想的内容,而内容则取决于概念在感觉、推理中的作用。试图把语义学归结为心理学的还有目的论语义学。80年代中期以来,J. 巴怀士的情况语义学也开始受到大家注意。总的说来,目前哲学界对语义的兴趣比语言学界更大些。

参考书目

J. D. Fodor, *Semantic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80.

J. J. Katz, *Semantic Theory*, Harper and Row, New York, 1972.

J. Lyons, *Seman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77.

D. Dowty, R. Wall and S. Peters, eds, *Introduction to Montague Semantics*, Reidel, Dordrecht, 1981.

(徐烈炯)

yuyi yinzi

语义因子 (semantic factors) 也叫语义基元或义素。最基本的语义单位。美国J. W. 佩里和A. 肯特,英国Y. A. 威尔克斯都从不同的角度研究过语义因子。

威尔克斯认为,应该根据5个方面来选择语义因子:①有限性,即语义因子的数目应该是有限的,应少于它所

表示的复合概念的数目。②全面性,即适合于表达各种复合概念的语义。③独立性,即彼此独立。④不循环性,即不能互为定义而造成循环。⑤基元性,即不能再作进一步的分解。

佩里和肯特采用三字母组合来代表语义因子,第一个字母之后留下一个空白来表明语义因子与它所表示的复合概念的关系。例如,M-CH表示仪器,L-CT表示电,M-SR表示测量,R-HT表示温度,A表示所指语义因子与复合概念是属与种的关系,因此,MACH表示某种仪器;Q表示复合概念借助于所指语义因子进行活动,因此,MACH LQCT表示借助于电来工作的仪器;U表示复合概念所进行的活动为所指语义因子所确定,因此,MACH LQCT MUSR表示借助于电来进行测量的仪器;W表示复合概念作用于所指语义因子,因此,MACH LQCT MUSR RWHT表示借助于电来测量温度的仪器——这就是“温差电偶”这个词。给每一个词记上一个作用指标可指出相应的词在句子中的功能。例如,作用指标KQJ表示“在什么帮助下”,这样,KQJ—MACH LQCT MUSR RWHT便可表示“温度借助于温差电偶来确定”这个句子。

(冯志伟)

yuyinxue

语音学 (phonetics) 语言学的一个分支。研究人类语言声音的学科。主要研究语言的发音机制,语音特性和在言谈中的变化规律。由于它的内容关系到发音动作(生理现象),语声特性(物理现象)以及听感(心理作用),而人类的不同语言集体各有自己的语音特点,因此现代语音学的研究又需具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作为基础。

语音学(phonetics)一词在西方来源于希腊文φωνητικός,意为声音。早期研究范围比较广泛,除研究语音特性外还包括语言的读音或拼音学、语音系统学等。在中国传统音韵学研究中有关语音的描写和分类,也都属于语音学的范畴。但自近代科学的语音学发展以后,分类越来越细,定义也趋于严密,语音学就专指语音本身特点的研究了(见音系学)。

研究范围和对象

早期的语音学研究多只为了语言教学的需要以及语言研究的兴趣。近年来由于医疗器械的完善,人们能观测发音器官的动作和功能,就发展了生理语音学。由于声学仪器的发展,从前许多只能耳听的语言现象现在不但可以目测,而且可以用人工来合成,于是有了声学语音学。由于心理测验方法的改善,思维和听觉神经生理的研究日趋进步,言语控制、听觉反馈中的语音规律分析得越来越深入,又产生了感知语音学(或心理语音学),并发展为神经语音学。这是从研究手段来看的3大分支。最近,由于信息时代的前进和人机对话的需要,孤立研究语音已不能满足要求。因为人类的语言不是一个个孤立的

音的缀合,而是一系列相互依存制约而且多变的音的串连,同时语言又离不开社会环境和个人语言习惯,研究语音不能离开特定语言的规律(包括语法、修词、音变等),于是又提出了语言学的语音学。

语音学的研究对象,传统上一般只限于元音、辅音、声调、重音以及节奏、音变等,这些都属于定性研究。近来由于分析手段的进步和语音信息处理的迫切需要,又加强了语音韵律特征的综合研究和定量研究。

语音学的应用方面,近年来除教学和语言学研究外,已遍及与人的语言有关的各个学科,主要如:言语矫治、通信工程、自动控制、以及人工智能等方面。随着第五代计算机的开发以及人工智能和人机对话的探索,传统语音学的理论和成果已不能适应要求,所以最近又提出了第五代语音学或言语工程学。它综合上述生理、声学、感知和语言学等领域的知识来探求人类言语的变量和不变量,以便为技术革命服务。(见实验语音学、言语识别、言语合成)

国际音标

为了使纪录语音的符号比较一致,国际语音协会在1886年制订了一套《国际音标》,于1888年刊载于该会的刊物《语音教师》上,从此为世界语言学家所采用。其间几经增改,最近的一次修订是在1979年。这些音标和一些附加符号基本上满足了描写世界各语言中语音的要求(见国际音标)。

语音的发音机制

语音由人的发音器官产生,发出后变成声波,传到对方耳中,被对方接收理解而构成“言语交际”的一套链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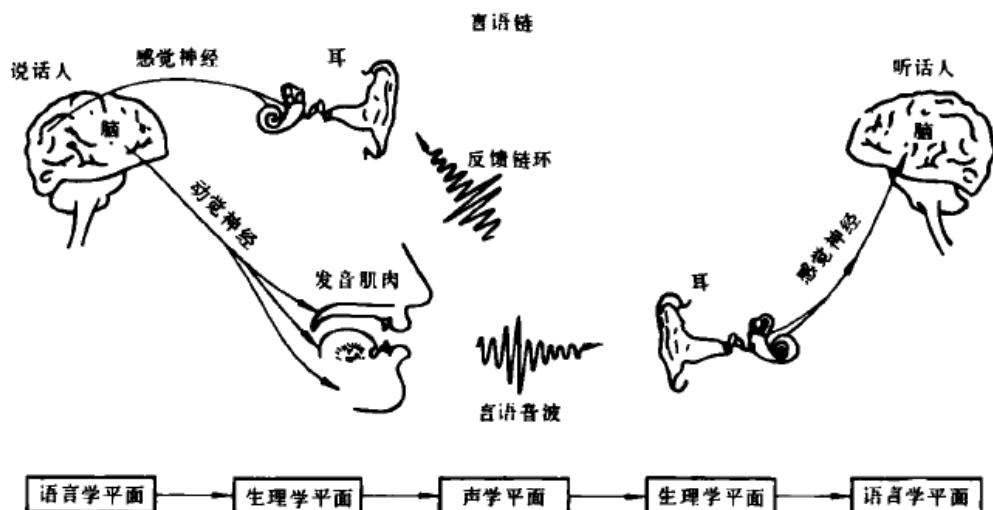


图1 言语链

称为“言语链”(图1)。因此,语音由发音器官产生,由听觉器官接收,这两部分的研究属于生理学和心理学范围,而言语音波的特性则属于物理声学范围,至于言语的控制和理解,则属于语言学范围。(见生理语音学、声学语音学、感知语音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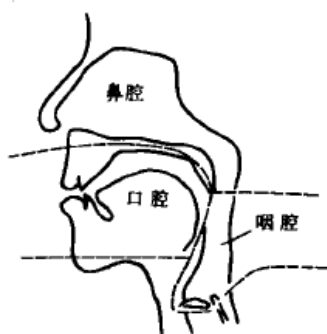


图2 调节语音的三个区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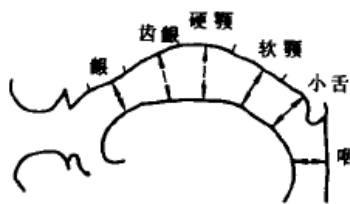


图3 声腔分段示意

发音器官分喉下、喉头、喉上3个部分。喉下部分由气管到肺。从肺呼出的气流成为语音的声源。喉头部分主要是声门和声带。声带是两条韧带,起着喉的阀门作用,它的闭拢和打开成为声门。声门大开时气流畅通,声门闭合,气流冲出使声带作周期性的颤动就产生“乐音”。喉上部分包括咽腔、口腔和鼻腔3个区域,主要起调节语音的作用(图2,另见彩图插页第3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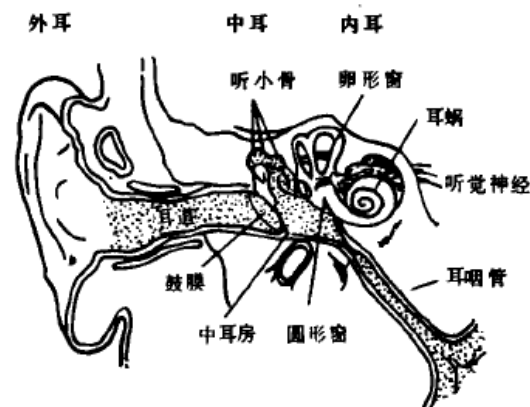


图4 听觉器官

口腔和鼻腔是调节发音的主要器官。鼻腔基本上是固定的,而口腔中则由于舌的伸缩、升降,小舌的抬起、下垂,使容积变化而产生不同的语音。口腔从唇部到声门总称为“声腔”,分成若干段(图3)。

听觉器官分外耳、中耳、内耳3个部分。外耳有耳轮、外耳道和鼓膜。耳轮收集音波,由耳道送到鼓膜,随音波而振动。中耳包括一组“听小骨”,联系着鼓膜而把振动传到内耳。内耳主要的

构件是耳蜗,里面的基底膜对声音的高低等变化起响应作用(图4)。

声带颤动时发出有周期性振动的乐音(又称噪音),在语音学上称为浊音。声门开时,气流通过声腔受到各部分阻碍而产生不规则振动的噪音,语音学上称为清音。

言语的声波在说者与听者之间传播而达到对方的耳朵里。声压的变化作用于听者的听觉器官,并产生神经冲动传到大脑而辨别和理解。说话人在说话时,语音也同时传到自己的听觉器官而起监听作用。

元 音

又称母音。普通话里如 a、i、u 等都是元音。早期人们已经知道元音是在口腔中无阻碍的音,而辅音则不同。后来用 X 光透视方法,观察到了发元音时口腔中各部位器官的活动状况。有了声学分析,又知道元音音色的不同都是由于声腔中共鸣值的不同而造成的。至于元音是怎样发生的,声带的动作怎样,也都有了分析的仪器。所以现在关于元音的知识已大为丰富。

元音的产生,简单说来是由闭着的声带被呼出的气流所冲击,作有周期性的颤动,经过口腔的调节有了共鸣而形成的。元音音色的不同,由口腔各部位,包括舌的高低、前后,唇的圆、展,以及下颌的起落来决定,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舌的位置。因此以前描写元音音色,主要是凭“舌高点”,也就是舌尖、舌面或舌根与上腭距离的大小来决定,而把唇的圆、展定为次要因素。近来根据实验,把元音的生理参数分得更多,如:①舌的高低度,②舌的前后度,③舌的拱度(凹凸度),④喉的咽宽度,⑤喉头抬高度,⑥唇的垂直高度(开口度),⑦唇的宽度(展唇度),⑧唇的前撮度(圆唇度),⑨软腭下垂度(鼻化程度),⑩声带闭合度(气声程度)等。

元音舌位图 语音学家作出三角形或四边形的图,把一种语言的元音前后高低(主要是参考舌位)位置标在图上,指出各元音的特点,据此可以帮助学话人自行练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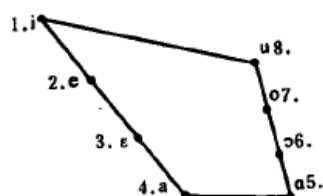


图5 标准元音图

发音,也便于教学。著称于世的,有英国语音学家 D. 琼斯的标准元音图(图5)。

这个图只包括 8 个元音,图中 1~5 是不圆唇元音,6~8 是圆唇元音。后经语言学家们修订,把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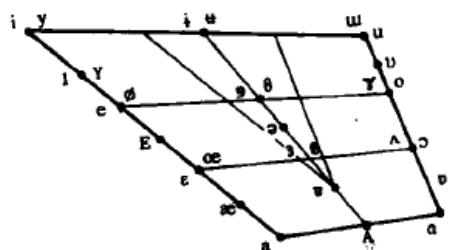


图6 国际音标元音图

多的元音位置标在一个图里(图6)。图中各条直线的左边是不圆唇音,右边是圆唇音。根据元音的声学参量也可作出类似舌位图的元音声位图。

元音的分类 元音按舌的升降,可以分为高、次高、次低、低 4 个等级,如图 1 的 i、e、ɛ、a 和 u、o、ɔ、ɑ,依次由

高到低。舌位越高,口腔越闭,越低就越开。另外,按舌位的前后又可分为前、央、后三个位置。如图 6 的左边都是前元音,右边是后元音,中间倒三角形内的是央元音。不前不后不高不低的是央元音[ə],又称混元音。

一般语言里的元音音位,至少有四五个,多的有十几个。在正常说话中,发这类元音时舌位不滑动的称单元音。有的语言中常有松紧对立或长短对立、起着辨义作用的两套元音,长的多半是紧元音,而短的多半是松元音。还有,发元音时软腭下垂,带有鼻音色彩的称鼻化元音。在北京语音中有些元音带有 r 色彩的,称卷舌(或翘舌)元音。

复合元音 在一个音节中有两个以上的元音结合在一起的称为复合元音。汉语中一般是两个到三个元音结合在一音节内。两个元音的称二合元音,如普通话的 ai、ao、ia、ua,三个的称三合元音,如普通话的 iao、uai,这些结合在一起的各元音的强度是不相等的,往往其中一个较强,其余较弱。因此按照这个强元音在音节中的位置不同,又分为前响、后响,或中响的复元音。如 ai、ou 等为前响,ia、uo 等为后响,iao、uai 等为中响。一般是在一音节中响元音的舌位比不响的要低些。复合元音中第一个元音如是 i、u、ü 的,称为介音。

复合元音的各个元音连在一起发音时,舌位从前一元音转到后一元音是逐渐滑动、而不是跳跃的。而且在普通话中,前响或中响复元音的末一个元音往往读得“不到家”,也就是舌位本来高的偏低一些,本来后的偏央一些。如[ai]→[ae],[ou]→[ou̯]。

辅 音

又称子音。普通话里如 b、p、m、f 等都是辅音。发音方法是,由于口腔中有了阻碍,呼出的气流通过这些阻碍而爆发成音或摩擦成音。发音动作的次序可分为三个阶段。一开始先把发音器官位置摆好的阶段称为成阻,已作势而还未出声的阶段称为持阻,声音发出时称为除阻。辅音的气流一般来自肺部,通过声门、声腔,由阻碍而成声。由于声门的开着或闭着而形成辅音的两种不同声源,声门开着,声带不颤动,成为爆发或摩擦的噪音,称为清辅音,声门闭合,肺部气流冲开使声带颤动,产生乐音,与爆发或摩擦同时(或先期)发出的,称为浊辅音。

辅音由于口腔中发音部位(阻碍部分)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音色,因此发音部位也是分析辅音的重要依据。口腔中的阻碍一般由静的器官和动的器官构成,静的多在上部,如上唇、上齿、上腭等,动的多在下部,如下唇、下齿、下颌、舌的各部等。软腭后端的小舌虽居上部,却非常灵活,它能上下移动而开闭咽通道,由此决定是口音还是鼻音。

辅音的分类 辅音的分类多数是既按发音方法又按发音部位。由于世界各种语言的辅音彼此不同,此详彼略,因此要拟订出一套包括世界语言全部辅音的表格是不可能完备的。国际音标表中的辅音已概括了大多数(表

1)。语音学家在分析某一特定语言的语音时每有修订和补充。下面按发音方法介绍一些主要的辅音。

塞音 又称爆发音。发音器官动的某部分向静的某部分靠拢,造成闭塞(成阻),气流从开着的声门流出,打开闭塞,爆发(除阻)而成音。除阻后声门立即关闭、声带颤动而接上元音的是不送气音,除阻后声门仍开着一小段时间,让气流继续流出,然后接上元音的是送气音。前者如普通话的[p]、[t]、[k],后者如[p']、[t']、[k']。

擦音 口腔中动静两部分器官靠近,形成缝隙,呼出的气流通过时产生噪音,成为摩擦音,如普通话的[f]、[s],英语的[v]、[ʃ]。

塞擦音 发音动作是先闭塞后摩擦。动静两部分器官在某一点先靠拢如塞音,除阻时阻碍微微放松,让气流通过如擦音。但是它和擦音的区别是成阻时先闭塞然后放松;它和塞音的区别是除阻时不马上放开阻碍而微留缝隙。不送气塞擦音除阻后紧接元音,如普通话的[tʃ]、[tʂ]。塞擦音在西方语言中有时作为复辅音处理。送气塞擦音则是除阻后肺部仍有气流冲出,通过阻碍然后接上元音,如普通话的[tʃ']、[tʂ']。

鼻音 口腔中动静两部分器官靠拢,构成如塞音的阻碍,软腭下垂打开鼻腔通道,声带颤动,气流在小舌处分两路,一到鼻腔,构成鼻音,一到口腔中被不同的阻碍部位挡住,造成不同的共鸣音色,如普通话的[m]、[n],上海话的[ŋ]。

边音 口腔中舌尖或舌尖后抵住上齿背、齿龈或硬腭,舌的两边(有时是一边)留出缝隙。软腭上升,声带颤动而发音,气流从齿边流出,然后释放,如普通话的[l]。有的边音同时带有摩擦,称边擦音,如广东台山话的[ɬ]。

颤音和闪音 下唇、舌尖或小舌的动的部分和上唇、龈、腭等的静的部分接触而振颤,使声带音成为颤抖的音。抖动多次的称颤音,接触一次而离开的称闪音。前者如俄语的[p],后者如英语的[r]。

半元音 又称通音。有些高元音如[i]、[u]、[y],发音时动的部分(舌高点)与静的部分距离很小,而造成轻微的狭缝摩擦。如普通话的[j]或[w]。

以上各辅音的声源大都来自肺部气流。另外还有几个辅音,发音时气流不是来自肺部,而是口腔中气压受喉头升降动作和舌头移动,成为打开闭塞的动力,这类被口内气压推动的音有以下3种。

① 挤喉音:阻碍状况如塞音,发音时声门和声门上的各阻碍都被封闭,喉头上移,推动闭锁着的口腔中的空气,形成压力。闭塞放开,声门外挤的气流逸出。如美洲印第安语的[p']、[t']、[k']。

② 缩气音:声门紧闭,口腔中阻碍与塞音同,喉头下降,使已闭塞的口腔中空气减压,除阻而成音。如非洲、美洲印第安语中的[b]、[d]、[g]。

③ 嗒嘴音:舌根上升抵住软腭,使口腔与声门隔断,这时使闭塞的双唇或舌尖与上腭等迅速除阻,造成口腔内气压变低而在阻碍处产生向内的爆发音(类似用

舌尖模仿马蹄的嗒嗒声)。非洲的祖鲁语有此音,如[ɬ]。

现代语音学研究辅音的特性愈来愈细致,除了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还分析“成声类型”,就是说除了声门上的过程如清浊、送气之外,有些语言中的浊辅音,因声带颤动方式不同而具有不同声型,也起着区别意义作用。如低语音,又称气音,声带颤动时闭合不全;喉音又称吱嘎音,声带一部分颤动正常,一部分动得缓慢;此外,还有耳语音,声带不颤动,气流因咽部收小构成摩擦而发出噪声。

表1 普通话辅音分类表

发音方法	发音部位	静	上唇	上齿	齿 龈	后 龈	硬 腭	后 腭
		动	下唇	下唇	舌尖前	舌尖后	舌面前	舌面后
塞音	不送气		[p]		[t]			[k]
	送气		[p']		[t']			[k']
擦音	缝			[f]				[x]
	槽	清			[s]	[ʃ]	[ç]	
		浊				[z]		
塞擦音	不送气				[ts]	[tʃ]	[tʂ]	
	送气				[ts']	[tʃ']	[tʂ']	
鼻音			[m]		[n]			[ŋ]
边音					[l]			
半元音	非圆唇						[j]	
	圆唇		[w]				[ɥ]	

韵律特征

又名超音段特征,传统也称节律(suprasegmental)。这是除元音、辅音等音色特征以外,包括音高、音强、音长和其相互关系的一切特征。它们在语音学中表现为声调、语调、重音、节奏。

声调 除了元音和辅音,声调也是语音的主要组成部分。声调由音调的高低变化来表现。声带的颤动受到控制而有快慢,使音调或高或低。一个人在自然状态的语言中,音调起伏的范围大致是稳定的。

世界诸语言可分为非声调语言和声调语言两类。非声调语言的声调担负着语气功能,而声调语言中的声调(表现在字调上)则同辅音元音一样,起着辨义功能。如普通话的“妈”mā、“麻”má、“马”mǎ、“骂”mà,发音相同,但因声调不同而意义有别。不同声调语言的音高模式有两类,一是音阶型,只用音阶高低分成等级的平调而不用升降调来区别调类,一是拱度型,用升降起伏或曲折的调形来区别调类(具备拱度的语言一般也同时具备平调)。语音调域宽的,各调值相差就大些,窄的就小些。不同的人之间,调域有大小差别,而同一人在不同语气中的调域也有变化。因此,语音声调的高低,是相对的等级而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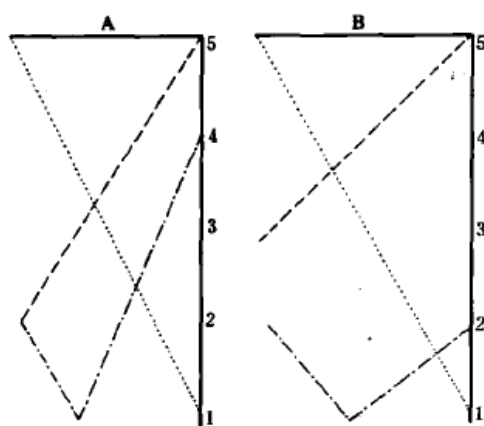


图7 普通话声调,男(A)女(B)两发音人的调值

绝对的调值。

普通话的单字调值,早期曾由刘复、赵元任用实验方法测试过,近来经声学仪器测试,调形调值已准确得多(图7)。

声调符号 过去语言学家常用高低曲线或五线乐谱来描写声调。赵元任于1930年发表的标调符号,或称标调字母,现在已为多数语言学家所采用。这是五度制的标调符号,把字调的平均相对音高分为低、半低、中、半高、高五度,分别用1、2、3、4、5表示。调号以竖线为比较线,左边加横线或曲折线表示声调的调级和拱度(调形)。

如普通话的四个字调: $\overline{1}$, $\overline{1}$, $\overline{4}$, $\overline{5}$ 。一种语言中的元音如有长短之分,则短调的符号可将横线缩短一半,如 $\overline{1}$, $\overline{1}$, $\overline{1}$ 等。普通话中的轻声符号,又用点来代替横线,如 $\overline{1}$ $\overline{3}$ $\overline{5}$ 等。

遇有变调时就把横线或点放在竖线右边,例如,原来的高平调变成高降调时,写作 $\overline{1}\downarrow$, 原来的高平调变成中轻声时,写作 $\overline{1}\cdot$ 。

连读变调 两个以上的音节连在一起说出时,原来的单字调常有变化。例如普通话口语中两上声连读,前上变阳平,如“好米”(好 $\overline{3}$ 米 $\overline{3}$)=“毫米”;“起码”(起 $\overline{3}$ 码 $\overline{3}$)=“骑马”。三上声连读,一般依语法结构分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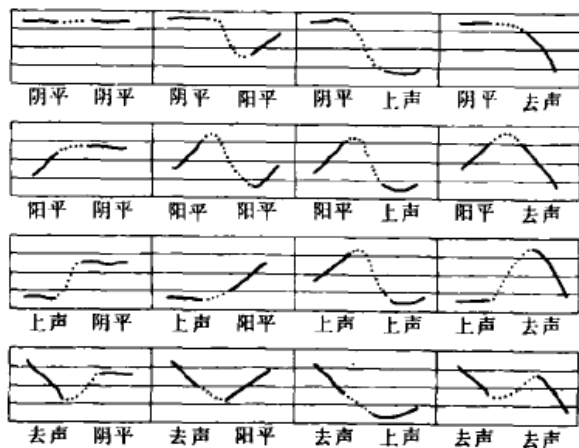


图8 普通话两字连续调模式

单双格或双单格。前者如“老厂长”,“厂”变阳平(厂 $\overline{3}$),而“老”变半上(老 $\overline{3}$),后者如“厂长室”,“厂”变阳平(厂 $\overline{3}$),而“长”为中短调的过度调形(长 $\overline{3}$)。一般说来,两字连读变调具有基本的连调模式如图8。三四字以上的连读变调除有少数个别规律外,都是单字调和两字连调的组合(图8)。

语调 语句的声调变化称语调。非声调语言(如英语、德语等)以语调变化为主,依语气态势的不同而变调。例如英语一般是陈述句的句尾降低,而提问句的句尾升高。声调语言(如汉语普通话)则以单字调和二字连调的调型为基本单元。在正常速度的语句中,即使有不同语气,这些基本调型仍能保持其原有拱度(升降曲折),只是在陈述句中,句尾调级落低而不是拱度变降,在提问句中,句尾调级抬高而不是拱度变升。所以绝对调值可以有变动,但一般调型是不变的。只有在加速语句中,调型才有较大变化。

重音 语音的轻重由发音气流的强弱来表现。一个句子中的词有重有轻,代表这个词的加强与否。在非声调语言中,一个词的音节重音一般具有区别词义的作用,称为词重音。例如英语的 'object(事物,名词), ob'ject(反对,动词)。在声调语言中,重音一般只代表语气,而不区别词义。在语句中,重音常落在一个着重的意群(语词的结合体)上,有时也能改变这个句子的意义,称为逻辑重音。

音节 一个语句分成若干词,一个词包含一个或几个语音单位,称为音节,它由一个以上的音素构成。例如英语的 communication 一词有五个音节, come 一词只有一个音节;而汉语的一个单字是一个音节,一个词包含一个到五个音节不等,但绝大多数是两个音节。音节的定义用一两句话来说清楚是困难的。过去语言学家对音节有种种定义,例如:“胸搏说”,一个音节有一次胸部搏动;“响峰说”,每个音节只有一个响音峰;“音节核说”,一个音节只有一个最强的元音或辅音作为核心;“肌肉紧张说”,说话时肌肉紧张和减弱一次成为一个音节等等。但是这些说法都不全面。因为在实际的连续语音中,根据这些说法来划分音节的结果就可能不一致。所以单独从语音生理来说,发音角度与听觉角度的音节划分就会有分歧,如果再根据语音描写上或音位分类上来分析,就会有更多的不同。

不过从一般声学现象来看,可以这样认为:①一个音节中至少有一个元音(有时是一个辅音)是起着核心作用的;②音节与音节之间在音强上有一个较弱的分界点。但如两个音节之间是元音相连而没有一个辅音来分隔时,则分界很不明显,如普通话的“西安”、“先”都拼 xian。

节奏 一般指语句中各音节的长短快慢。语句的节奏由句中各意群来组成,相当音乐中的拍子。语言的每“拍”包括一个到三个音节,以双音节为最普遍。拍子的长度常视整个语句的速度以及意群的主次而变,不象音

乐拍子那样严格。下面是普通话一句话的声学长度分析:

今天 已经 星期三 了 明天 就 国庆节 了
.3 .3 .5 .1 .3 .1 .5 .1

句中底横线代表一个意群,成为一个拍子。句下数字是这个意群的长度,单位是秒,可以从这句看出二字组的长度基本上是0.3秒,三字组都是0.5秒,而轻读的单字只占0.1秒。这两个三字组都是着重词,所以和二字组比较,相对地长些。

语音的变化。一个音和另一音相连,由于发音动作的自然度或其他原因,常常互相影响而改变了原来的读音,称为同化作用。前音影响后音为顺同化,反之为逆同化。顺同化如普通话的“鸭蛋”[jia tan]→[jia dan]。逆同化如“南门”[nan mən]→[nam mən],而前后都被同化如“三八”[san pa]→[sam ba]。

两个相似的音节相连,为避免重复或单调而使其中一个音变成另一个时,称为异化作用。如前述的两上声连读而使前一上声变为阳平,即异化的一种,此外还有弱化,如北京话“棉花”[mien xua]→[mien xuə] (“花”字变轻读,同时a→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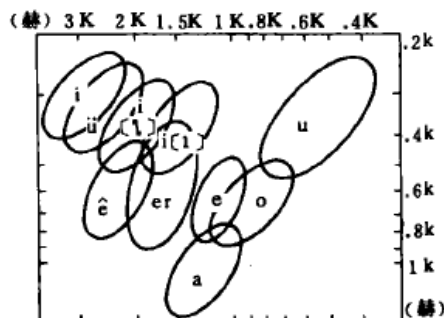
声调的轻声也属弱化现象。此外还有增音、减音、脱漏、换位、代替、转换等音变现象。这许多音变现象有的属于节省发音动作或韵律节奏上的原因,有的则属于历史演变或语言失误的结果。

音 位

每一语言集团中通用的最小语音单位如元音、辅音等音素,都有其固有的音质。这些音质在不同说话人之间,或不同语音环境之间有一定程度的变动范围。例如一个[e]可以读得开些或闭些,一个[i]可以读得明些或暗些,虽然有了变化,但辨义功能和原来正常的音一样。这

每一簇音称为音位,而每一变动后的音素称为音位变体。实验证明,两个相邻音位之间并没有整齐的界限,而且两音位的变体还有叠接交叉现象。图9是普通话10个元

图9 普通话元音音位变体声学位置图



音音位变体的声学位置图。每个音位圆圈里包括若干个音位变体。

区别特征

20世纪50年代初,西方语音学家鉴于以往的语音分析所采用的规格还不能表达语音的最小区别,于是产生了区别特征的语音分析理论。首创者为R. 雅柯布逊等人,他们认为一切语言的语音可以根据其生理特点和声学特性,用二分观点分为若干项最小对立体。如:①元音性/非元音性,②辅音性/非辅音性,③鼻音性/口音性,④集聚性/分散性,⑤突发性/延续性,⑥粗糙性/柔润性,⑦急停性/非急停性,⑧浊音性/清音性,⑨紧张性/松弛性,⑩钝音性/锐音性,⑪降势性/平势性,⑫升势性/平势性。

后来有人认为这些项目还不够全面,又逐渐加以修订。N. 乔姆斯基和M. 哈利另定了若干项。其中除个别与上述相同者外,按发音部位的有:①舌前/非舌前,②舌顶/非舌顶,③长缝/非长缝,④舌后/非舌后,⑤

表2 普通话元音、辅音区别特征表

	a	o	ə	e	i	u	y	ɿ	ʅ	ɐ	p	p'	m	f	t	t'	n	l	k	k'	-ŋ	x	ʈ	ʈ'	s	ʂ	ʃ	ʒ	ʈ	ʈ'	ɕ	j	w
元/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鼻/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集/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暂/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糙/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钝/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浊/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紧/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降/升	+	-	-	+	-						+																						+
夏/透											+	-			+	-			+	-		+	-		+	-			+	-			

注:普通话的辅音[y],先发[j],然后滑动到[y],因此本表不列。

舌面抬高/舌面不抬高,⑧舌面压低/舌面不压低;按发音方法的有⑦除阻/缓除阻。他们还把语音分为共鸣音/阻碍音两大类。中国有人又根据汉语语音特点,补充了几项,如:元音的开/合、齐/撮、洪/细,辅音的夏/透(不送气/送气)以及声调调型的升/降、平/曲,调域的高/低等。上页表2是普通话元音、辅音区别特征表。

语音的最小区别,在有些场合不一定能由二分特征来概括。例如舌位高低之间还有半高、半低;口音与鼻音之间还有半鼻音、不同程度的鼻化等等特征。因此又有人提出了与前不同的多分特征以及其他的理论。在实际语言中,从一音位到另一音位,中间可以存在无数个音位变体,也就是可分成无数个音素单元,而每一对相邻的音素单元又都构成对立。因此,如按辩证关系来看,则每一对对立体之间可分为无数个特征,而这些特征之间,又各为对立关系,可以称为N偶关系。用这种概念来分析语音,可以表达语音的相互关系。

参考书目

- 罗常培、王均:《普通话语音学纲要》,科学出版社,北京,1957。
R. 雅柯布逊著,王力译:《语音分析初探——区别特征及其相互关系》,载《国外语言学》1981,第3、4期。(R. Jakobson, G. Fant, M. Halle, *Preliminaries to Speech Analysis: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and Their Correlations*, 2nd edition MIT Press, 1952.)
P. Ladefoged, *A Course in Phonetics*,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Inc., New York, 1975.

(吴宗济)

yuyongxue

语用学 (pragmatics) 研究在一定的上下文里语言的使用,包括所产生的字面意义和蕴涵意义,以及可能产生的效果的学科。

语用学的概念首先是美国哲学家 C.W. 莫里斯(1901~1979)和 R. 卡纳普(1891~1970)在 20 世纪 30 年代前后提出的。60 年代,英国哲学家 J. L. 奥斯汀(1912~1960)和 J. 塞尔勒(1932~)先后发表了“语言行为”的理论;美国语用学家 P. 格赖斯提出了“会话中合作原则”的理论。以上三个学者的贡献使语用学从概念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

语用学和其他有关学科的关系 莫里斯和卡纳普认为:句法、语义、语用构成语言的三个基本方面。句法学研究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语义学研究符号与所指事物之间的关系;语用学研究符号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句法学回答的问题是:句子是按什么规则组成的?语义学回答的问题是:意义是按什么方法确定的?语用学回答的问题是:语言的使用在一定的上下文里产生了什么影响和效果?

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三者的不同。句法学追求的是规则,语用学要弄明白的是功能。语义学问:Ⅹ是什么意思?语用学问:你对某人说Ⅹ是什么意思?

20 世纪中叶以后成为美国语言学界主流学派的 N. 乔姆斯基语言学,以独立于上下文的句子为对象,探索

句子的生成规则;在此以后兴起的语用学,以上下文里的句子为对象,探索句子的不同的语用功能。语用学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正象社会语言学在研究社会与语言的相互关系中开拓了新的领域一样。

语用学和“会话中合作原则”的理论 自从格赖斯发表这一理论的 20 年中,不同的语言学家在赞同这一理论的同时,也发表过各自的解释。比较普通的一种解释是:会话双方有问有答,这是合作的基本形式,不然就不可能有会话。在此前提下,会话的双方各按语用的意图进行会话。如何分析各具意图和各具蕴涵的会话,是会话中合作原则理论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为此,格赖斯提出了 4 条准则,作为分析的标准:

① 关联的准则:是答其所问,或答非所问,或有所答有所不答?

② 信息适量的准则:是适量,还是低于适量,还是超过适量?

③ 信息真实准则:是真实,还是有真有假,还是全部是假?

④ 信息明白准则:是明白,还是有明有暗?

语用学的任务是弄清楚上述各种不同情况的蕴涵。

① 关联准则的例子:

问:某部长的报告不怎么样,你说呢?

答 a: 喔,你这样看。(部分关联。蕴涵:自己不表态。)

答 b: 天气凉了,该穿大衣了。(毫不关联。蕴涵:这个问题不好谈,不谈也罢。)

② 信息适量准则的例子:

问:在哪单位工作?

答 a: 在外事部门。(不说具体部门,略低于适量。蕴涵:为了保密。)

答 b: 在北京东城。(更低于适量。蕴涵:高度保密。)

答 c: 我那个单位,见大世面……。(高于适量。蕴涵:夸耀。)

③ 信息真实准则的例子:

问:你看小张怎么样?

答 a: 名师高徒,那会有错?(套话。蕴涵:恭维。)

答 b: 还不太了解。(套话。蕴涵:推托。)

答 c: 青年人嘛,总要看发展。(套话。蕴涵:现在还不行。)

除了“会话中合作原则”之外,英国语言学家 G. N. 利奇于 1983 年提了“照顾对方面子的原则”。利奇举了这样的例子:

母亲:有人把蛋糕吃掉了。

孩子:不是我。

利奇说,这里母亲只说“有人”,没有说“孩子”,是出于“照顾对方面子”。孩子看出蕴涵,所以马上说“不是我”。利奇又把这一点加以发挥:“凡是说什么会伤对方感情的话,总是避免直说为宜,使对方通过蕴涵来体会,以降低不愉快的程度。”利奇这一理论是有缺点的:①它很大程度上依靠词义的主观解释,对于什么是“照顾对方

子”，什么是“不照顾”，缺乏客观的区分标准；②这一理论也不妨归并在格赖斯的“合作原则”之下，成为一个附项。

语用学和“语言行为”的理论 “语言行为”理论的由来 语法学家通常把句子分作陈述、疑问、惊叹、祈使4项，仿佛这既是句子形式的分类，又是句子语用的分类。语用学家主张把句子的形式分类和语用分类严格区分开来，因为后者有丰富的蕴涵。例如：

- ① 谁知道？(教师问学生) = 有谁能回答这个问题？
(语用：测试)
- ② 谁知道？(回答调查人员) = 没有人知道 (此事奥秘)。(语用：否定)
- ③ (追忆某事)谁知道！(后来又发生这样的事)
(语用：惊讶)

上面三个句子的“谁知道”在形式上都是疑问，但是①的语用是测试，②是否定，③是惊讶。在情境上，①是课堂提问；②是回答查询；③是自我回忆。从这种角度看句子，可以看出句子不仅表示一个意思，而且也是代表说话人的一种行为，称为“语言行为”。

语言行为里的成事动词 语言行为的研究者往往特别注意语言中的“成事动词”，因为它们语用的力量特别明显。例如：“我把此书献给教过我的老师们。”这里的“献”即是成事动词，因为在说这一句话的时候，“献”的动作已经完成了。又如司令员对士兵说：“我命令你们向正前方射击”和法官在法庭上说：“我宣判你有罪”，两句中的“命令”和“宣判”都是成事动词。其他的例子如：

我判定他先到终点。
我把这动物归入猫科。
我命令你立即离开。
我保证下月十五归还。
我感谢您的盛意。
我宣布散会。

这类句子的语法形式有如下的特点：①主语为第一人称。②时间为瞬息的现在。③受事者为第二人称。④句子是肯定语气。

语言行为的类型 “语言行为”这个概念是奥斯汀的遗著(1962)和塞尔勒的著作(1969)中提出来的，他们把语言行为分为4种主要类型，不过他们提出的术语现在还没有完全确立。

① 发声的行为。即发出音、音节、词、词组、句子的行为。这是属于物理性质的行为，只表示字面的意义。

② 表示蕴涵的行为。即紧接物理性行为的心理行为，即紧接字面意义的蕴涵意义，诸如允诺、申述、祈求、命令、建议等。

③ 收效的行为。劝告——听从了劝告；警告——认识了危险；引诱——接受了诱惑；欺骗——受了欺骗；等等。收效的行为特别说明句子的力量。

④ 提出命题的行为。例如宣布发现一个新星，预测

将有地震；重述某哲学家的论点等。

上述4类的区分不是很严密的。例如示意类的“命令”也可以发展为“命令——接受命令”，即从②类归到③类；相反，警告不听，欺骗不遂，③类也就变②类。至于④类“提出命题的行为”，本质上仍属“示意”一类。这说明语用学家在把语言行为作语用分类的时候，碰到了很大的困难。但是这种困难是语用分析内在的矛盾。由于它涉及许多变素，严密的语用分类还有待探索。

语言行为理论说明句子的力量，合作会话理论揭示句子的蕴涵，二者的作用是不同的。但是语言行为理论超越了句子形式而看到其构成的行为，合作会话理论超越了句子的形式而看到上下文的关联性，都是透过字面而注意到语言的蕴涵，所以都是语用学的基本内容。

参考书目

- J. L. Austin,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62.
J. R. Searle, *Speech Acts: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69.
H. P. Grice, *Logic and Conversation* (1967), in P. Cole and J. Morgan eds., *Syntax and Semantics*, Vol. 3: *Speech Acts*, Academic Press, New York, 1975.
S. C. Levinson, *Pragma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83.
G. N. Leech,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Longman, London, 1983.

(许国璋 胡壮麟)

Yupian

《玉篇》 一部按汉字形体分部编排的字书。梁武帝大同九年(543)太学博士顾野王撰。顾野王(519~581)字希冯，顾烜之子，吴郡吴人。入陈为国学博士，黄门侍郎。《玉篇》卷首有野王自序和进《玉篇》启，这部书是奉命而作，呈给梁武帝之子萧绎的。书分30卷，可是《隋书经籍志》著录作31卷，《日本见在书目》同，可能是序文跟表启曾为一卷。野王作《玉篇》，在《说文解字》和《字林》之后，所分部首有增有减，与《说文》比较，少哭、延、畫、敖、眉、白、艮、饮、后、介、弦11部，增父、云、臬、尤、處、兆、磐、索、書、床、单、弋、丈13部，共542部，比《说文》多两部。部首排列的次序也有很大变动，主要是按照义类相近与否来安排的。

唐代封演《闻见记》称《玉篇》“凡一万六千九百一十七字”。今日我们看到的《玉篇》是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陈彭年等重修。唐代上元间孙强的增字本，收字有22561字，比封演所记的数目多5600多字，而注解大有删削，已经不是原本之旧。顾野王原本在宋代就已亡佚，只有日本还保存一部分传写本。日本现在所存有卷八、卷九、卷十八、卷十九、卷二十二、卷二十四、卷二十七几卷，其中除卷二十二、卷二十七不缺字以外，其他都是残卷。这些字都是唐代日本到中国的留学生和僧人传抄带回日本的。共存62部的2052字，相当原书的1/8强。这都是希有的秘籍。(参见彩图插页第8页)

从顾野王的原本来看，每字下不仅注明字义，而且举

出见于古籍的例证和前人的注解,先经传,后子史文集,最后是字书、训诂书,极其详备,字有异体也分别注明,跟今本很不一样。

顾野王在自序中说:“六书八体,今古殊形。或字各而训同,或文均而释异,百家所谈,差互不少。字书卷轴,舛错尤多,难用寻求,易生疑惑。猥承明命,预纆过庭,总会众篇,校讎群籍,以成一家之制,文字之训以备。”这说明他作《玉篇》的宗旨是要综合众书,辨别形体意义的异同,网罗训释,以成一家之言。《字林》收字 12 000 多字,《玉篇》比《字林》多 4 000 多字,这是在《字林》之后一部承前启后的重要著作。可惜后来经过孙强增删,又经陈彭年等重修,原书体例已大改变。

今本《玉篇》有宋本,又有元本。宋本有清代张士俊泽存堂刻本和曹寅扬州诗局刻本。元本有《四部丛刊》影印本。宋本卷首在野王序和进书启之后有“神珙反纽图”及“分毫字样”,而元本多《玉篇广韵指南》一卷。宋本注文繁富,而元本则大都减略,排比整齐,因而部中字的排列次第与宋本不相同,现在通常应用的是张士俊泽存堂刻本。(参见彩图插页第 10 页) (周祖谟)

yushl fenxifa

预示分析法 (predictive analysis method)

自然语言自动处理的一种方法。采用这种方法,在计算机从左到右按照一个方向分析句子的过程中,对于每一个词,都要给出其预示信息,以预示这个词之后可能出现什么样的语言成分。如果下面一个词满足这个预示信息,分析就可继续下去,反之,分析就停止。预示分析要采用后进先出栈来存贮有关预示信息。如果后进先出栈变空,则分析结束(见自动机理论)。

例如,如果要分析 The scholars study mathematical linguistics (学者们研究数理语言学)这个句子,首先,针对这个句子,提出若干条规则:

- ① $S \rightarrow \text{Art} + \text{NP} + \text{VP} + \text{NP}_1$
- ② $\text{NP}_1 \rightarrow \text{Adj} + \text{NP}$
- ③ $\text{NP} \rightarrow \text{Noun}$
- ④ $\text{VP} \rightarrow \text{Verb}$

其中,S 表示句子,Art 表示冠词,Adj 表示形容词,Noun 表示名词,Verb 表示动词,NP 表示名词词组,VP 表示动词词组,NP₁ 表示带有形容词修饰语的名词词组。

规则①表示 S 可由一个 Art,一个 NP,一个 VP 及一个 NP₁ 顺次组成,在这个规则中,Art 这个信息可以预示 NP—VP—NP₁ 这个符号串的出现。

规则②表示 NP₁ 可由一个 Adj 及一个 NP 组成,Adj 这个信息可预示 NP 这个符号的出现。

规则③表示 NP 可由一个 Noun 组成,Noun 这个信息不能预示什么。

规则④表示 VP 可由一个 Verb 组成,Verb 这个信息也不能预示什么。

所要分析的句子输入后,就记上有关的词类符号:

The scholars study mathematical linguistics.

Art Noun Verb Adj Noun

然后,根据上述规则,利用后进先出栈来进行分析。

先执行规则①,右端的第 1 个符号 Art 与输入句子中的第 1 个符号相配,故把 Art 的预示信息 NP—VP—NP₁ 顺次存入后进先出栈中,此时,后进先出栈中的情况见图 1。

接着扫描输入句子的第 2 个符号 Noun,这一符号与规则③中右端的第一个符号 Noun 相配,而 Noun 这个符号不预示什么,所以,在后进先出栈中抹去栈顶的预示信息 NP,这时栈中的情况见图 2。

再接着扫描输入句子的第 3 个符号 Verb,这一符号与规则④右端的符号 Verb 相配,而 Verb 这个符号不预示什么,所以,在后进先出栈中抹去栈顶的预示信息 VP,这时栈中的情况见图 3。

然后,扫描输入句子的第 4 个符号 Adj,这一符号与规则②右端的第一个符号 Adj 相配,而 Adj 这个符号的预示信息是 NP,故在后进先出栈中抹去栈顶符号 NP₁,然后存入 Adj 的预示信息 NP,这时栈中的情况见图 4。

最后,扫描输入句子中的第五个符号 Noun,这一符号与规则③右端的符号 Noun 相配,由于 Noun 这个符号没有任何的预示信息,故在后进先出栈中抹去栈顶符号 NP,这时,后进先出栈变空,而输入句子也扫描完毕,说明这个输入句子是合乎英语语法的,分析结束。

为了提高预示分析法的效率,可以给每个预示信息加一个“紧急数”,“紧急数”按其重要性的大小从高到低加以编号,在分析过程中,当预示信息实现其预示作用后,就将这个预示信息抹掉。

有的学者还提出了多路预示分析法。这种分析法能够对句子中全部可能的情况作出语法分析,在分析过程中,可以放弃那些与所分析的问题关系不大的线路,而着重分析那些与所分析的问题关系密切的线路,从而解决句法歧义等问题。

参考书目

A. G. Oettinger, *Automatic Syntactic Analysis and th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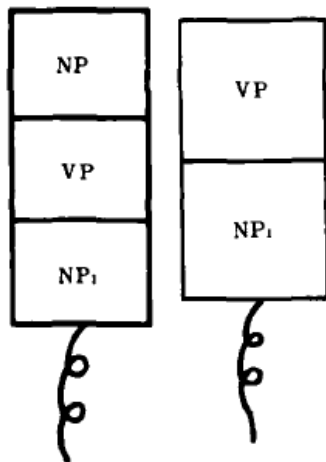


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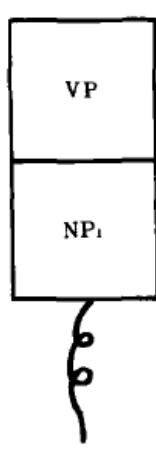


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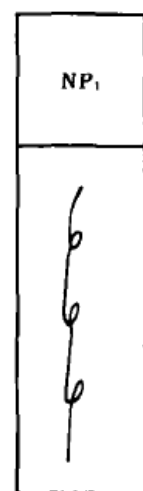


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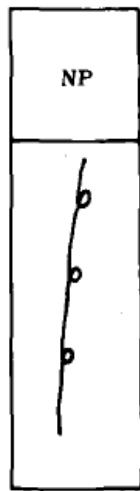


图 4

Pushdown Store, in Proceedings of 12th Symposium of Applied Mathematics, 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 Providence, 1961.

(冯志伟)

Yuenanyu

越南语 (Vietnamese language) 越南的官方语言。属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主要分布于越南沿海平原越族(也称京族)聚居地区。使用人口有5 000多万。中国广西防城沿海京族聚居地区约有1万人使用越南语。

关于越南语的谱系分类,自20世纪初起,便存在不同的看法。一些语言学者如H. 马伯乐(1883~1945)等,主要根据越南语音节有固定声调,单音节词占大多数,以及词序和虚词是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等情况,认为越南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或汉藏语系中独立的一支,另一些语言学者如W. 施密特(1868~1954)等,则根据越南语中有大量与孟-高棉语同源的基本词汇,而且语法结构与孟-高棉语基本相同等情况,认为越南语属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现代越南语言学者逐渐倾向于认为越南语属南亚语系。

越南语主要有北部方言、北中部方言、南部及南中部方言,以北部河内方言为标准语。其余两种方言有部分语音的变异,但语法结构相同,词汇差异不大,可以互通。

越南语语音包括单元音11个,辅音25个,构成162韵,辅音韵尾有-m、-n、-ŋ、-p、-t、-k等音。各音节之间界限分明。声调起区别词义的作用。标准语有平声、锐声、玄声、问声、跌声、重声6个声调。但在北中部和南部及南中部两种方言中各有5个声调。六声又可分为平、仄两类,平、玄两声为平,其余四声为仄,用于诗律。

越南语是一种孤立语,以不变的根词的词序和虚词来表示语法关系。句子的主语在谓语之前,宾语和补语在动词之后,名词修饰语一般在名词之后,但数词、量词修饰语在名词之前。词序或虚词改变后,语义也随之而变。

越南语构词的主要特点是每一个音节常常是一个有意义的单位,可以独立使用,这些单位又可作为构成多音节词的基础。绝大部分多音节词是双音节。在殖民主义统治时期进入越南语的法语词语(主要是科技词语)继续保持其原有的音节。在2 000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越南语从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不断地直接借用或改造使用大量词语。越南语中的汉语借词占相当大的比重。

10世纪以后,出现了越南古代文字——字喃。它是一种方块字,部分借用汉字,部分使用汉字中会意、形声、假借的方法构成。例如“日晒”(Mặt trời, 太阳);“月陵”(Mặt trăng, 月亮)。13世纪以后,出现用字喃写的诗歌,大量作品流传至今。阮攸(1765~1820)的《金云翘传》(图1)是字喃诗歌的代表作。17世纪,欧洲传教士制定了拉丁化的越语拼音方案,用于布道。1649~1651年间A. de 罗德在罗马出版的《越葡拉丁词典》和用拉丁化越南文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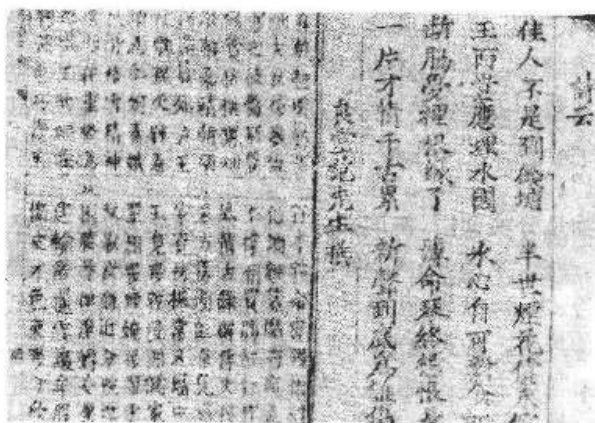


图1 字喃,《金云翘传》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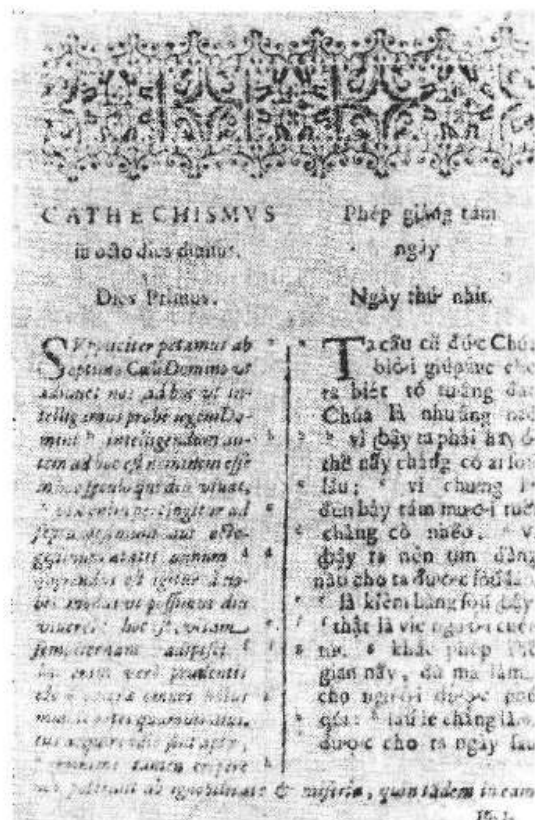


图2 《八天讲道法》第1页(17世纪中期)

的《八天讲道法》(图2)被认为是越南语拉丁化拼音的开端。拉丁化的越南文已成为越南人民获取文化知识的工具。

参考书目

王禄等:《越南研究·语言文集》,《越南研究》丛书出版社,河内,1975。

陶维英:《字喃的渊源、构造与演变》,越南社会科学出版社,河内,1975。

(文 庄)

Yueyan

《越谚》 (Yue Dialect) 清代辑录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和山阴(今浙江绍兴)两地方言俗语的著作。范寅(1827~1897)撰。光绪八年(1882)谷应山房刻印发行。《越谚》分3卷:上卷语言、中卷名物、下卷音义。语言卷所收的多为谚语。根据内容、形式和出处,分为18类:述古、警世、引用、格致、借喻、占验、谣谚、谜语、事类、数目、

十只、十当、头字、哩字、翻译禽音、骂骂讥讽、孩语孺歌和劝譬颂祷。其中“述古”和“引用”两类所收词语大都是见于典籍的书面语言，其余16类基本上是民间常用的口头俗语。“十只”、“十当”、“头字”、“哩字”等是把词语中有“只”、“当”、“头”、“哩”等字的分别列入这四类中。中卷名物是分类词语，按词义分为24类：天部、地部、时序、人类、神祇、鬼怪、疾病、身体、屋宇、器用、货物、饮食、服饰、禽兽、水族、虫豸、花草、竹木、瓜果、谷蔬、臭味、形色、技术和风俗。各类所收条目大都附加注释，如天部“虹”下，注明“吼，去声，即虹”。下卷音义分为10类：一字六音，四同一异，两字并音，叠文成义，字音各别，北方口音，重文叠韵，单辞只义，声音音乐和发语语助等。前6类着重分析字音，后4类介绍形容词的重叠形式，以及“呼其音而不得其文”的单音词，象声词和语气词。音义卷后有附论6篇，除《论雅俗字》1篇外，其余5篇都和方言本身无关。《越谚》3卷辑成(1878)后3年，作者又增辑《越谚剩语》2卷，附在《越谚》后面一起印行。《越谚剩语》上卷是“其妇孺常谈而不成句者”，下卷是“成句而为学士雅言者”。《越谚》如实记录了当时民间的口语，对研究浙江吴方言的历史演变，有较大的参考价值。但体例不够严谨，内容取材比较庞杂。

(叶祥苓)

Yuefangyan

粤方言 (Yue dialects)

又称粤语，俗称广东

话、广府话，当地人称白话，是汉语七大方言中语言现象较为复杂、保留古音特点和古词语较多、内部分歧较小的一个方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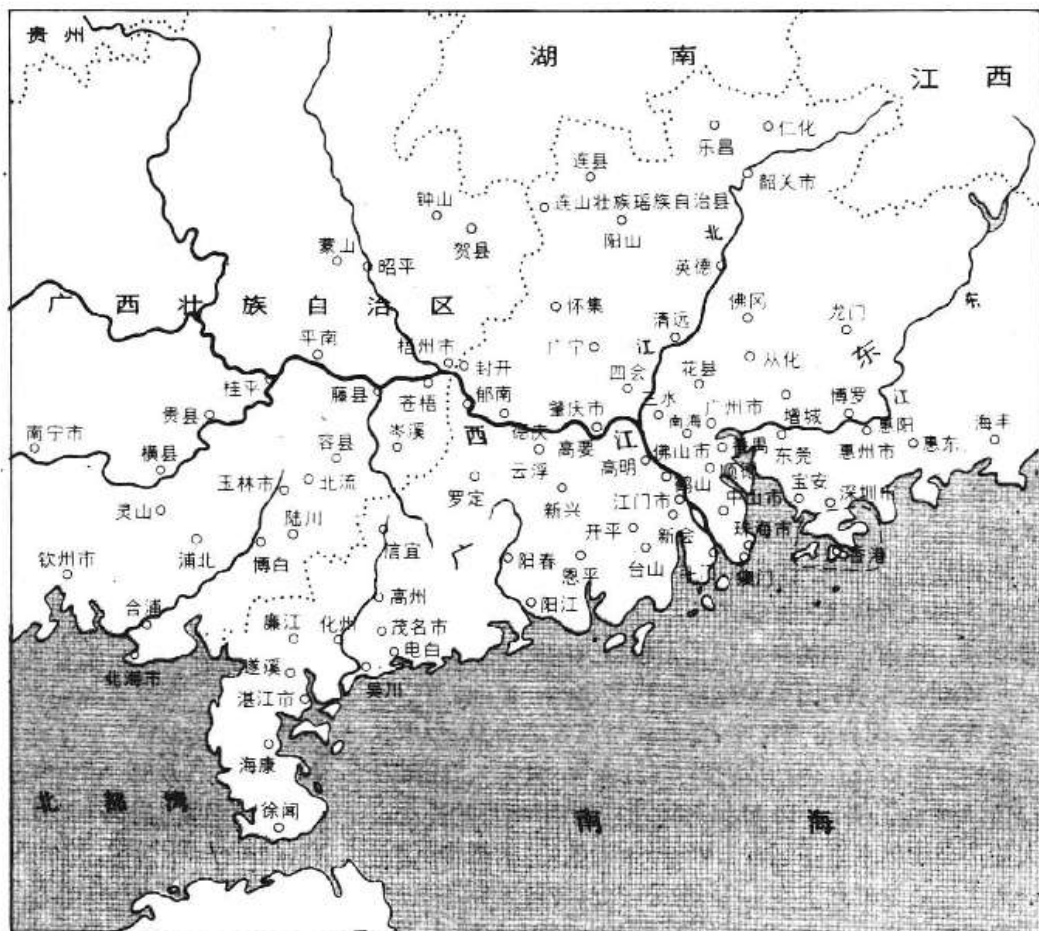
通行地域 粤方言通行于广东、广西境内，以广州话为中心。使用人口约4000万。通行地区大致如下：

广东省境内纯粹属粤方言或以粤方言为主的县市有47个，占全省面积的1/3以上，即广州、佛山、肇庆、江门、深圳、茂名、中山、珠海、南海、番禺、东莞、顺德、龙门、佛冈、增城、从化、花县、清远、连县、阳山、连山、怀集、广宁、四会、三水、高要、云浮、高明、新兴、鹤山、封开、郁南、德庆、罗定、阳春、阳江、信宜、高州、化州、吴川、台山、开平、新会、恩平、斗门、香港、澳

门。此外，惠州、韶关、湛江、海丰、博罗、惠阳、惠东、仁化、乐昌、英德、宝安、电白、遂溪、海康、徐闻、廉江等16个县市也有部分地区讲粤方言。

广西壮族自治区通行粤方言的县市有23个，即南宁、横县、贵县、桂平、平南、藤县、梧州、玉林、北流、容县、博白、陆川、钦州、合浦、浦北、灵山、北海、苍梧、岑溪、昭平、蒙山、贺县、钟山。此外，海外华侨及华裔中以粤方言为母语的也很多，他们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南北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美洲华侨和华裔几乎百分之90以上的祖籍都是粤方言区。

分区 粤方言内部按其语言特点和地理分布可以分为4个片：①粤海片，主要分布在广东省珠江三角洲、粤中、粤西南和部分粤北地区，是粤方言中使用人口最多、通行范围最广的一个片，以广州话为代表，它在粤方言中有很大的代表性和影响。②四邑片，主要分布在台山、开平、恩平、新会、斗门等县，以台山话为代表。③高阳片，主要分布在湛江市、茂名市所属各县和江门市所属的阳江县和阳春县，以阳江话为代表。④桂南片，主要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邕江、郁江、浔江沿岸的南宁市、横县、贵县、桂平县、平南县、藤县、梧州市，玉林地区的玉林县、北流县、容县、博白县、陆川县，钦州地区的钦州市、合浦县、浦北县、灵山县和北海市，梧州地区的苍梧县、岑溪县、昭平县、蒙山县、贺县、钟山县，一般以南宁话为代表。它的语音比较一致，但也存在一些分歧。桂南片按其内部的



粤方言分布简图

异同又可以分为四个方言小片：广府片、邕浔片、勾漏片和钦廉片。

主要语言特征 语音方面 ①声母：

a. 大多数地区没有浊塞音声母，但四邑片的开平、新会、恩平等地有b、d、g声母，例如：“忙”*baŋ*、“墨”*bak*、“能”*daŋ*、“诺”*dok*、“牙”*ga*、“雅”*ga*。台山话则只有g，例如：“牙”*ga*、“牛”*gei*。桂南片的容县、北流、岑溪、藤县等地也有浊塞音声母b、d，但它们不是来自古全浊声母並、定，而是来自古清声母帮、端（清音浊化）。如“巴”、“多”的声母都念浊塞音。

b. 多数地区只有*ts*、*ts'*、*s*或*tʃ*、*tʃ'*、*ʃ*，而没有*ts*、*ts'*、*s*和*ts*、*ts'*、*s*，即古精、知、照三组合流。例如：“知”*tʃi*、“池”*tʃi*、“周”*tʃeu*、“诗”*ʃi*、“走”*tʃeu*、“丝”*ʃi*，但四邑片的台山话比较特别，精组独立念*t*-（精母及从母去入声）、*t'*-（清母及从母平上声）、*ʃ*-（心母），知、照两组仍混为*tʃ*、*tʃ'*、*ʃ*。粤海片的顺德话精、知、照三组合为*c*、*c'*、*s*。桂南片的粤语也比较特殊：南宁话在止摄开口三等支、脂、之韵里，能区分*ts*、*ts'*、*s*（精组）和*ts*、*ts'*、*s*（知、照组）。梧州、桂平、平南等地，粤语精组声母变为*ts*、*ts'*、*s*，知照组声母变为*ts*、*ts'*、*s*。玉林、贵县、容县、北流、岑溪、藤县、合浦等地粤语只有*ts*、*ts'*、*s*。其中玉林、容县、北流、岑溪、藤县等地精组变为*t*、*t'*，心母变为*ʃ*，知照组声母变为*ts*、*ts'*、*s*。贵县话精知照三组声母合流为*ts*、*ts'*、*s*。钦州精、知、照三组合流为*ts*、*ts'*、*s*，心母变为*ʃ*。例如：

古声母	例字	南宁	梧州	玉林	贵县	钦县
精	资	<i>ts</i> -	<i>ts</i> -	<i>t</i> -	<i>ts</i> -	<i>ts</i> -
清	雌	<i>ts'</i> -	<i>ts'</i> -	<i>t'</i> -	<i>ts'</i> -	<i>ts'</i> -
从	瓷	<i>ts'</i> -	<i>ts'</i> -	<i>t'</i> -	<i>ts'</i> -	<i>ts'</i> -
心	小	<i>ʃ</i> -	<i>s</i> -	<i>ʃ</i> -	<i>ʃ</i> -	<i>ʃ</i> -
邪	词	<i>ts</i> -	<i>ts</i> -	<i>t</i> -	<i>ts</i> -	<i>ts</i> -
知	知	<i>ts</i> -	<i>ts</i> -	<i>ts</i> -	<i>ts</i> -	<i>ts</i> -
彻	痴	<i>ts</i> -	<i>ts</i> -	<i>ts</i> -	<i>ts</i> -	<i>ts</i> -
澄	持	<i>ts</i> -	<i>ts</i> -	<i>ts</i> -	<i>ts</i> -	<i>ts</i> -
庄	辘	<i>ts</i> -	<i>ts</i> -	<i>ts</i> -	<i>ts</i> -	<i>ts</i> -
初	厕	<i>ts</i> -	<i>ts</i> -	<i>ts</i> -	<i>ts</i> -	<i>ts</i> -
崇	士	<i>ʃ</i> -	<i>ʃ</i> -	<i>ʃ</i> -	<i>ʃ</i> -	<i>s</i> -
生	史	<i>ʃ</i> -	<i>ʃ</i> -	<i>ʃ</i> -	<i>ʃ</i> -	<i>s</i> -
章	止	<i>ts</i> -	<i>ts</i> -	<i>ts</i> -	<i>ts</i> -	<i>s</i> -
昌	齿	<i>ts</i> -	<i>ts</i> -	<i>ts</i> -	<i>ts</i> -	<i>ts</i> -
船	示	<i>ʃ</i> -	<i>ʃ</i> -	<i>ʃ</i> -	<i>ʃ</i> -	<i>s</i> -
书	诗	<i>ʃ</i> -	<i>ʃ</i> -	<i>ʃ</i> -	<i>ʃ</i> -	<i>s</i> -
禅	时	<i>ʃ</i> -	<i>ʃ</i> -	<i>ʃ</i> -	<i>ʃ</i> -	<i>s</i> -

蒙山粤语精组不读塞擦音，清母读塞音*t*，精、从、心、邪四母读成齿间擦音*θ*，例如清母“粗”*t'u*、“彩”*t'oi*、“参”*t'am*、“七”*t'et*，精母“租”*θu*、“尖”*θim*、“剪”*θin*、“节”*θit*，从母“坐”*θo*、“裁”*θoi*、“蚕”*θam*、“绝”*θut*，心母“苏”*θu*、“腮”*θoi*、“三”*θam*、“雪”*θut*，邪母“徐”*θy*、“巡”*θen*、“旋”*θun*、“习”*θep*。另外，有少数庄组字也读*θ*，例如：“邹”*θeu*、“愁”*θeu*、“助”*θu*、“饴”*θan*。只有知、章二

组的部分字才读塞擦音，例如“珍”*tʃən*、“趁”*tʃən*、“阵”*tʃən*、“侄”*tʃət*、“州”*tʃeu*、“丑”*tʃeu*、“质”*tʃət*、“出”*tʃət*、“债”*tʃai*、“差”*tʃai*、“柴”*tʃai*。此外，横县精组声母跟支脂之韵相拼时，变为舌尖边塞擦音、边擦音*tʃ*、*tʃ'*、*ʃ*（只拼舌尖元音*ɿ*）。例如：“资”*tʃɿ*、“词”*tʃɿ*、“思”*ʃɿ*。除桂南片有边擦音*ʃ*外，高阳片和四邑片台山县粤语也有*ʃ*（来自古心母）。如：“心”*ʃim*、“三”*ʃam*、“桑”*ʃoŋ*、“修”*ʃiu*。

c. 古端组在绝大多数粤方言地区都念*t*-、*t'*-、*n*-、*l*-，唯有台山、开平比较特别，端组字不读*t*-、*t'*-。古端母及定母去入两调的字读喉塞音^②，如台山“冬”*ʔəuŋ*、“刀”*ʔou*、“地”*ʔi*、“笛”*ʔiak*，古透母及定母平上两调的字读*h*-，如“同”*həuŋ*、“天”*hen*、“泰”*hai*、“淡”*ham*。新会、江门、南海九江、鹤山等地的端组字也没有*t'*，端母及定母去入声字仍念*t*-，透母及定母平上字却念*h*-。

d. 古非敷奉母字和古晓母合口一二等韵字声母都念*f*-。例如广州话：“非”*fei*、“夫”*fu*、“房”*fəŋ*、“福”*fuk*、“呼”*fu*、“花”*fa*、“荒”*fəŋ*、“忽”*fət*。但古非组字在粤海片的中山话却有少数念*h*-的。如“扶”*hu*、“奉”*hun*、“福”*huk*。

e. 古见组字今音不论开、齐、合、撮大都念舌根音*k*-、*k'*-或喉音*h*-。如广州话“叫”*k'iu*、“舅”*k'eu*、“晓”*hiu*。但古溪母合口韵有一部分字，在粤方言中转念成*f*-，如广州、南宁把“枯”念*fu*、“宽”念*fun*、“科”念*fə*。

f. 大部分粤语地区古微母字念*m*-声母，与明母同。如广州“微”念*mei*、“文”念*mən*，“物”念*mət*、“亡”念*məŋ*、“无”念*mou*。

g. 古全浊声母上声字部分念为送气声母。如“抱”*p'ou*、“舵”*t'ə*、“距”*k'œy*、“践”*tʃ'in*。南宁、梧州、桂平、平南、贵县、钦州等县市“並定群从澄崇”的字平声送气，仄声一部分送气，一部分不送气。玉林、容县、北流、藤县、岑溪等地平仄声韵均不送气。例如：

		袍	同	才	锄
南宁	平声	<i>p'u</i>	<i>t'uŋ</i>	<i>t'oi</i>	<i>t'o</i>
		<i>pou</i>	<i>tuŋ</i>	<i>toi</i>	<i>to</i>
玉林	仄声	<i>p'u</i>	<i>tuŋ</i>	<i>k'y</i>	<i>t'oi</i>
		<i>pou</i>	<i>tuŋ</i>	<i>ky</i>	<i>toi</i>

不过，南宁、桂平、梧州古全浊上声一部分仍为上声（阳上）送气，一部分变去声（阳去）不送气。例如：

倍*p'ui* 肚*t'u* 坐*t'o* 柱*t'y* 舅*k'eu*
步*pu* 杜*tu* 在*t'oi* 赵*tiu* 技*ki*

h. 粤方言各地都有*ŋ*声母，但来源不完全一致，广州大致是古疑母一二等字及部分影母开口一二等字念*ŋ*-，如“我”、“外”、“眼”、“安”、“欧”，而疑母三四等字极少念*ŋ*-。中山话疑影母字分得很清楚：除古疑母一二等字念*ŋ*-外，三四等字也有念*ŋ*-的，如“严”、“愚”。古影母字除个别外，一般不念*ŋ*-而念零声母，如“安”、“欧”。四邑片粤

语的 η - 声母,除来自古疑母一二等及部分三等字外,还来自古日母,如“疑”、“验”、“原”(疑母三等)、“日”、“热”、“而”(日母)。高阳片阳江话的 η - 声母来自古疑母一二等,但古影母字不念 η - 而念零声母,如“安”、“欧”。桂南片 η - 声母字亦来自古疑母一二等,如“我”、“外”、“牛”、“岩”、“岸”、“雁”。

i. 古日母字在粤方言区有两类念法:一类是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及粤西大部分地区和阳江等地粤语念 j -, 如“热”、“日”、“肉”。另一类是四邑片的台山话和桂南片的合浦话念 η - 或 η - (或 η -), 如“日、热、肉”等字台山话念 η - (与疑母混), 合浦话念 η - (不与疑母混)。中山话大部分日母字念 j -, 如“日、肉、若”, 但有一小部分日母字在高元音前面念 η -, 如“饶”、“热”。

j. 古影喻母字在粤方言中大都合流为零声母,但古喻母字在粤海片的南海、九江等地很多念成 h -, 如“夷、叶、羊、演”。在桂南片的贵县、横县等地,凡止摄开口三等支脂之三韵和遇摄合口等鱼虞二韵的喻母字,均念 h - 声母。例如:

移	姨	矣	异	余	雨	裕
贵县	hei	hei	'hei	hei	høy	'høy
横县	hi	hi	'hi	hi	hy	'hy

k. 大部分地区有半元音声母 w - 而无唇浊擦音 v 。但四邑片的台山、恩平、开平、新会等地均有 v 声母,它们的来源不尽相同。开平话的 v 声母来自古帮、匣、並、溪、影、喻等母,例如:“巴”, va 、“杯”, vai 、“摆”, vai 、“爸”, va 、“布”, vu (均属帮母)、“湖”, vu 、“话”, va (均属匣母)、“罢”, va 、“败”, vai (均属並母)、“会”(~计), vai (溪母)、“蛙”, va (影母)、“卫”, vai (喻母)。台山话的 v 声母来自古匣影喻母,例如:“和”, vo (匣母)、“委”, ve (影母)、“卫”, ve (喻母)。新会话的 v 声母来自古匣母、影母、喻母,例如:“华”, va (匣母)、“哀”, vui 、“蛙”, va 、“爱”, vui (均属影母)、“为”(作~), vei 、“维”, vei (均属喻母)。恩平话的 v 来自古晓、匣、影、喻母,例如:“诤”, vui (晓母)、“还”, van 、“幻”, van (均属匣母)、“威”, vui (影母)、“王”, vov 、“伟”, vui 、“旺”, vov (均属喻母)。

② 韵母:a. 粤方言大部分地区复合韵母和鼻音尾韵母、塞音尾韵母中元音 a 有长短之别,长元音为 a ,短元音为 ϵ ,是对立的音位,例如广州话:

带	帝	街	鸡	巧	口
tai	tei	.kai	.kɛi	'hau	'hɛu
三	心	蓝	林	翻	昏
.jam	.fɛm	.lam	.lɛm	.fan	.fɛn
腊	立	达	突	百	北
lap	lep	tat	tɛt	pak	pɛk

但四邑片粤语 a - 韵母没有长短 a 之分。例如:“败”与“敝”、“彭”与“朋”、“法”与“发”同音。

b. 多数地区有以 ϵ 为主要元音的一套韵母(大都属古三等韵字)。例如广州话:

ϵ :	朵	'tɔɛ	靴	.hɔɛ
ϵ ey:	堆	.tɔey	去	hɔey'
ϵ en:	春	.ʃ'ɛn	尊	.ʃ'ɛn
ϵ ɛŋ:	张	.ʃ'ɛŋ	上	.ʃ'ɛŋ'
ϵ et:	卒	ʃ'ɛt	出	ʃ'ɛt
ϵ ek:	略	lɛk	却	k'ɛk

c. 大部分粤语区没有舌尖前元音 i , 古止摄开口韵广州话是 η -, η -, η -, j - 声母后面念 i , 其他声母后面念 ei 。例如:资, η i, 雌, η i, 私, η i, 衣, η i, 碑, η ei, 基, η ei, 你, η ei, 四 η ei, 但桂南片的南宁、桂平、平南、横县有 i , 南宁、桂平、平南的 i 出现在 ϵ -, ϵ -, ϵ - 后面, 如“资”, ϵ i, “此”, ϵ i, “思”, ϵ i, 横县的 i 出现在 t -, t -, t - 后面, 如“资”, t i, “此”, t i, “思”, t i。粤海片的中山话和桂南片的合浦话不论什么声母,止摄开口韵一律是 i , 例如:“之、思、碑、基”。阳江话“事、辞、司”等字的韵母念 ei 而不念 i 或 i 。

d. 大部分粤语区有 $-m$ 、 $-n$ 、 $-ŋ$ 、 $-p$ 、 $-t$ 、 $-k$ 韵尾,例如:金, $kɛm$ 、人, ηen 、帮, $pɔŋ$ 、十, ηep 、列, lit 、各, $kɔk$ 。粤海片的东莞话还有 $-n$ 和 $-t$ 两个韵尾,咸摄开口三四等(盐叶、严业、添帖)字在东莞念 in 、 it 两韵,前者如“廉、严、甜”,后者如“接、业、插”。桂南片的钟山话 $-p$ 、 $-t$ 、 $-k$ 韵尾已消失,如“插、察、策”钟山话读作 $\epsilon'a$, 这种现象在粤语中是罕见的。

e. 绝大部分地区都有自成音节的 m 和 η , 前者如“唔”,后者如“吾、梧、吴、五、午、午、误、悟”。只有高阳片的阳江话缺 η , 例如“吴、五”等字念成 $uŋ$ 。

③ 声调:

a. 粤方言的声调数目较多,普遍有入声。粤海片多数为 9 个声调,最少为 6 个声调。例如:广州话为 9 个声调,即平上去各分阴阳,入声分上阴入、下阴入(中入)、阳入;中山话为 6 个声调,即平分阴阳、上声、去声、阴入、阳入。

b. 四邑片多数为 8 个声调,例如台山话平上去各分阴阳(阴去与阴平同调值)、去声、上阴入、下阴入、阳入。

c. 高阳片多数为 9 个声调。例如阳江话连同口语土字共 9 个声调,即平上去各分阴阳、上声、上阴入、下阴入、阳入、促阳平(只出现在口语中)。

d. 桂南片 7~9 个声调。南宁、梧州、钦州、平南、容县、北流、岑溪、藤县等地有 9 个声调,例如南宁话平上去各分阴阳,上阴入、下阴入、阳入。贵县平上去入各分阴阳,共 8 个声调。桂平和横县平上去各分阴阳、阴去、上阴入、下阴入、阳入,共 8 个声调。玉林、博白平上去入各分阴阳,阴入又分上阴入、下阴入,阳入又分上阳入、下阳入,共 10 个声调。合浦平分阴阳、上声、去声、上阴入、下阴入、阳入,共 7 个声调。钟山也有 7 个声调,平上去各分阴阳,阴平又因声母的送气与不送气分为上阴平与下阴平,入声已消失,转为平声和去声(见下页表)。

词汇语法方面 以广州话为例:

① 有许多特殊的词语,如“熨”(下饭的菜)、“搵”(找)、“嗟”(叫喊)、“𢆐”(能干)、“乜嘢”(什么)、“撈”(捞)

调类 地名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阴入 阳入										促阳平
	平	平	上	上	去	去	上	下	上	下	
博白	55 诗	213 时	33 使	23 是	51 试	21 事	5 识	33 摄	23 十	21 舌	
广州	55或53 诗	11 时	35 使	13 市	33 试	22 事	5 识	33 锡	2 食		
台山	33 诗	11 时	55 矢	21 是	(33) 示	31 示	55 识	33 吃	21 食		
阳江	33 诗	43 时	21 使	24 试	54 事	24 一	21 八	54 日	43 啤		
中山	55 诗	51 时	24 使	33 试	5 识	3 食					

(拿)、“翻”(睡觉)、“呃”(骗)、“拏”(掀起、揭开)、“踅”(蹲)、“呢啲”(这些)、“个啲”(那些)、“细蚊仔”(小孩儿)、“搵笨”(讨便宜)、“心抱”(儿媳)等等。

② 保存古汉语词语较多。如：“掀”^{wa} (用手指甲抓)、“孖孖仔”^{ga, ga' f'ei} (婴儿)、“黍离”^{f'i} (黏)、“搵”^{f'im} (抽、拔)、“斟”^{f'em} (倒)、“抚”^{t'em} (用拳头或石块等捶砸)、“屈”^{kwet} (秃、钝)、“敲”^{f'a} (拿、取、持)、“苴”^{f'a} (次差劣)、“睏”^{mei} (闭一眼)、“跲”^{kui} (疲倦、累)等。

③ 吸收英语词较多，如“波”(ball 球)、“的士”(taxi 出租汽车)、“菲林”(film 胶卷)、“骨”(guart 四分之一)、“箍臣”(cushion 软垫)、“花臣”(fashion 花样)、“快把”(fibre 纤维)等。

④ 名词带一个重叠成分构成 ABB 式的词比较普遍，如“口多多”(多嘴)、“心思思”(惦念着)、“眼白白”(眼光光)等。

⑤ 名词中表示小的东西用“仔”，如“刀仔”(小刀)、“凳仔”(小凳子)等。

⑥ 人称代词后加“哋”，表示复数，如“我哋”(我们)、“你哋”(你们)、“佢哋”(他们)。

⑦ 双音的语气词比较丰富，如“之嘛”(罢了)、“嘞咁”(了吧)、“啰嚟”(啦，提醒语气)等。

⑧ 表示“一”的数词经常省去而把量词直接放在名词前，如“本书”(一本书)、“间屋”(一间房子)等。

⑨ 普通话的指示代词“这样”和“那样”，广州话都用“噉样”来表示。

⑩ 动词的体较多，如“起嚟”表示开始体，“紧”、“开”表示进行体，“住”表示持续体，“咗”表示完成体，“过”表示经历体，“翻”表示回复体。

⑪ 有状语后置的现象，如“你去先”(你先去)、“饮一杯添”(再喝一杯)。

⑫ 双宾语的位置，一般指物的宾语在前，指人的宾语在后。如“我畀本书佢”(我给他一本书)。

⑬ 比较句用“A—形容词—过—B”表示，如“佢大过你”(他比你大)等。

⑭ “唔”(不)和表示可能性的副词“得”同用时，“唔”放在动词前构成“唔—动词—得”的格式，如“唔食

得”(吃不得)，“唔舍得”(舍不得)等。

附：粤方言 4 个片代表点的声韵调

声母

广州	p 巴	p' 叭	m 妈	f 花	t 打	t' 他	n 拿
	l 拉	f' 渣	f' 差	ʃ 沙	k 家	k' 卡	kw 瓜
	kw' 夸	ŋ 雅	h 虾	j 也	w 蛙	θ 呀	
台山	p 巴	p' 爬	m 麻	f 法	v 挽	t 杂	t' 才
	n 拿	l 罗	ɬ 四	f' 知	f' 超	ʃ 沙	k 家
	k' 巧	g 牙	ŋ 银	h 他	θ 呀		
阳江	p 波	p' 坡	m 么	f 科	t 多	t' 拖	n 掇
	l 罗	ɬ 梭	f' 知	f' 痴	s 尸	k 歌	k' 苛
	kv 姑	kv' 枯	ŋ 我	h 呵	v 窝	j 衣	θ 呀
南宁	p 巴	p' 怕	m 母	f 飞	t 刀	t' 他	n 奴
	l 卢	ɬ 资	ɬ' 次	s 思	ɬ 四	ɬ 知	ɬ' 迟
	ɕ 诗	k 家	k' 其	kw 瓜	kw' 群	ŋ 牙	h 好
	j 优	w 蛙	θ 安				

韵母

广州	a 呀	ɛ 诶	i 衣	ɔ 柯	u 乌	y 于	œ 靴
	ai 挨	ei 矮	au 拗	eu 欧	ei 非	iu 妖	ɔi 哀
	ou 奥	ui 煨	œy 去	am 监	em 庵	im 淹	ɱ 唔
	an 晏	en 恩	in 烟	ɔn 安	un 碗	yn 冤	œn 春
	aŋ 罨	ɛŋ 莺	ɛŋ 镜	iŋ 英	ɔŋ 康	uŋ 瓮	œŋ 香
	ŋ 五	ap 鸭	ɛp 急	ip 叶	at 押	ɛt 不	it 热
	ɔt 渴	ut 活	yt 月	œt 律	ak 客	ɛk 德	ek 尺
	ik 益	ɔk 恶	uk 屋	œk 约			
台山	a 他	i 雨	e 非	u 苏	ɔ 可、多	ai 大	
	iu 手	ei 邹	ui 鱼	au 老	ea 也	ɔi 改	
	iœu 廖	am 南	im 音	em 森	an 山	in 宾	
	en 天	un 元	œn 联	aŋ 能	ɔŋ 方	œŋ 虹	
	enŋ 胜	iam 严	ian 演	ɔn 门	yaŋ 圆	iaŋ 映	
	ap 合	ip 十	ep 笠	at 达	it 日	et 节	
	ut 月	œt 栗	ak 北	ɔk 国	œk 浊	ek 力	
	iap 接	iet 设	ɔt 物	yat 粤	iak 剧	ɱ 五	
阳江	a 鸦	ɔ 肩	ɛ 爹	i 衣	u 乌	ai 挨	
	ei 隘	au 拗	eu 欧	ɔi 哀	ou 奥	ei 非	
	ieu 休	iu 夭	ui 煨	am 监	em 庵	an 晏	
	en 恩	aŋ 盲	ɛŋ 崩	ɔn 安	ɔŋ 康	iem 今	
	ien 扁	ieŋ 香	im 阉	in 烟	iŋ 英	un 碗	
	uŋ 壅	ap 鸭	ɛp 急	at 押	ɛt 不	ak 客	
	ɛk 北	ɔt 渴	ɔk 恶	ieɕ 及	iet 蟻	iek 掠	
	ip 腌	it 乙	ik 亿	ut 活	uk 屋		
南宁	a 巴	ɛ 车	œ 靴	ɔ 多	i 比	u 布	
	y 猪	ɬ 思	ai 拜	vi 闭	au 包	eu 狗	
	ɔi 该	ui 杯	iu 标	am 担	em 金	im 兼	
	an 单	œn 斤	ɔn 干	in 边	un 本	yn 捐	
	aŋ 冷	ɛŋ 朋	ɛŋ 颈	œŋ 强	ɔŋ 当	iŋ 兵	
	uŋ 公	ap 答	ɛp 急	ip 碟	at 达	ɛt 笔	
	ɔt 割	it 铁	ut 活	yt 缺	ɱ 唔	ŋ 吴	

声调

调类 调值 地名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上阴入	下阴入	阳入	促阳平
广州	55或53 诗	11 时	35 使	13 市	33 试	22 事	5 识	33 锡	2 食	
台山	33 诗	11 时	55 矢	21 是	(33) 31 示	55 识	33 吃	21 食		
阳江	33 诗	43 时	21 使	54 试	54 事	24 一	21 八	54 日	42 喝	
南宁	55 医	21 移	35 椅	24 以	33 意	22 异	55 帖	33 八	22 食	

参考书目

袁家骅等：《汉语方言概要》第2版，文字改革出版社，北京，1983。

(饶秉才)

YueInyunhui

《粤音韵汇》(A Chinese Syllabary Pronounced According to the Dialect of Canton)

中国第一部用国际音标记录、研究广州方音的著作。黄锡凌(1908~1959)著。1941年上海中华书局初版，1957年3月中华书局香港分局重印出版，1979年4月重排发行，1981年1月重排本再次重印。全书177页。正文包括



《粤音韵汇》封面

检字索引、凡例、粤语韵目表、粤音韵汇检字、粤音韵汇凡例、粤音韵汇、广州标准音之研究等内容；卷首有容肇祖撰写的序言，卷末有两个附录：一是《粤音罗马字注音新法建议》，二是本书的英文导论和“书中使用音标说明”(英文)。《韵汇》以广州音53个韵母为经，19个声母为

纬，按韵母中的主要元音依次排列，同韵的字依声母顺序排，同韵同声的字再按声调排列。一字多音的都加注解，如在gau下的“校”注“校对”，tsai下的“差”注“差使”。变调、读书音、口语音、今读、旧读以及少数冷僻的字也分别加以注释。《广州标准音之研究》一章，详细叙述了广州音的有关问题，着力于揭示语音变化的情况及其规律，对于声调的复杂变化和分析尤为透辟。本书成稿于粤语研究尚处草创的时代。以其记音准确，立论精当、叙述详尽，易查易懂而获得语言学界的好评。对几十年来粤音的研究影响较大。

(唐伯慧)

yunb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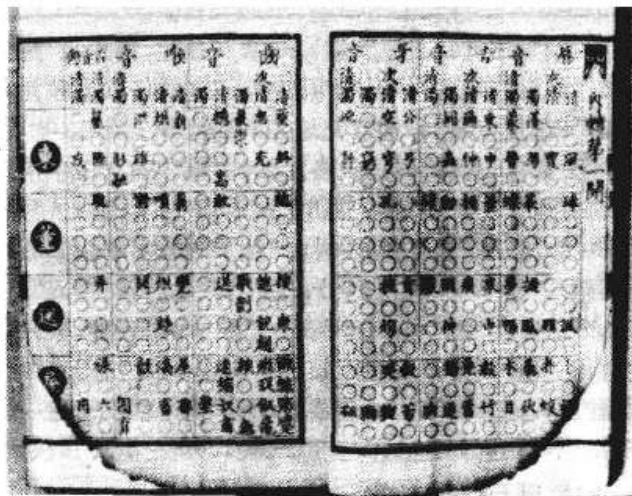
韵部 (rhyme categories) 古韵学家把古代韵文押韵的字分成类，每类叫一个韵部。例如，宋代吴棫

(约1100~1154)把古韵分为9部，郑庠把古韵分为6部。后来也推广到先秦典籍中没有用来押韵的字上去，如段玉裁把古韵分为17部。清初古韵学兴盛，这个词也有人用来指《切韵》系统韵书的“韵”。如《广韵》有206韵，段玉裁说：“是书依陆氏法言二百六部之旧。”这里说的“部”就等于平常说的韵，“二百六部”就是206韵。

(俞敏)

Yunjing

《韵镜》 现存最早的两部等韵书之一(另一部为《七音略》)。作者不详。南宋张麟之《韵镜序》说该书原名叫《指微韵镜》。南宋郑樵《通志·七音略序》说：“臣初得《七音韵鉴》，一唱而三叹！”张麟之《韵镜序》又说：“旧以翼祖



《韵镜》内转第一开

讳‘敬’，故为《韵鉴》。今迁祧庙，复从本名。”从这里看来，这部书的祖本可能叫《韵镜》，前头也许有“七音”一类字样。此书本名犯了宋太祖赵匡胤祖父赵敬的讳，所以改字。赵匡胤一即位就追上高祖以下尊号。看来成书可能在五代。但是不可能比敦煌出的署名南梁比丘丘守温的三十字母卷子更早，因为《韵镜》里已经用三十六字母了。

《韵镜》于宋代流入日本，清末黎庶昌(1837~1897)又从日本得到一个本子，后头有日本人宣贤作的跋，署享禄元年(1528)。实际上却是永禄七年(1564)翻刻本。黎庶昌刻入《古逸丛书》，这才重新流行。

全书共分43个图。每个图前头有“内(外)转第××开(合)”字样(见图)。韵目用206韵，说明当时音系离《广韵》和它的派生体系不远，可以归并，不用删改。只有蒸登职德放在全书最后。推测它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职德韵在闽南、客家两种方言里收[t]，客家方言蒸登也收[n]，跟正统《切韵》音和粤方言收[ŋ]、[k]的不同。所以提出来放在最后。

见等韵。

(俞敏)

yunlei

韵类 (rhymes) 指韵母的类别。韵书的单位“韵”里面可能再分几个韵类。陈澧《切韵考·序》说：“又取切语下字系联之，每韵或一类或二类或三类四类。”他的《切

韵考》的卷三就叫《韵类考》。从这里看,韵类的含义可能比韵更窄。当然,也可能等于韵。因为一韵有只一类的。

(俞敏)

yunmu

韵目 指从《切韵》以来的韵书为各个韵排列的目录。如《广韵》的上平声就把各个韵名按一定的次序列在卷首:东第一、冬第二、钟第三、江第四、支第五、脂第六、之第七、微第八、鱼第九、虞第十、……《广韵》每个韵底下注有“独用”、“同用”字样,后人把“同用”的合成一个韵,再稍加改动,合并成《佩文诗韵》,韵目是:一东、二冬、三江、四支、五微、六鱼……。日子久了,学者们也用这个术语称呼每韵的标目字。如“东”是全韵第一个字,也有人叫它东韵的韵目。这是借用。古音学家给古韵分部,也借用“东”、“冬”、“支”等字标目。也有另起炉灶的。朱骏声就用《易》卦名作标目字,如“鼎”、“壮”等等。供作词曲用的韵书往往用双字作韵目,如元代周德清《中原音韵》以“东钟”、“歌戈”等作韵目。

(俞敏)

yunshu

韵书 把汉字按照字音分韵编排的一种书。这种书主要是为分辨、规定文字的正确读音而作,属于音韵学材料的范围。同时它有字义的解释和字体的记载,也能起辞书、字典的作用。

起源 文字形体的变迁,反切注音方法的产生,是韵书发生的条件。汉魏以后,篆书、古文变为隶书、草书,字形变化很大,谐声字的声旁渐渐不能准确表达字音,这样,文字的正确读音便无一定的标准,不但写作韵文发生困难,人们的社会交际也多障碍。这就要求有规定文字正确读音的韵书出现。可能受了翻译梵文佛经的影响,汉魏之间产生了使用反切标注字音的方法,并且逐渐盛行起来。到了六朝,四声的现象被人发现,引起了文人的注意,文学创作特别讲究声律。这都为韵书的产生、盛行准备了条件。但是魏晋六朝的韵书大都依据方音编写,直至隋代统一南北朝以后,才出现了适应当时政治统一形势需要,便利各地人士应用的《切韵》。此后,唐宋明清各有“官韵”。目的在于为全国各地的士子读书写诗规定一种标准的字音。

根据文献的记载,中国最早的韵书是三国时期李登编著的《声类》和晋代吕静编著的《韵集》。但这两书早已亡佚。唐代封演《闻见记》说,《声类》是“以五声命字,不立诸部”。《魏书·江式传》说,《韵集》是“官商角徵羽各为一篇”。“五声”或“官商角徵羽”与后世的声、韵、调是什么关系,两书的体制类型是否与后世的韵书相似,现在都无从深考。根据《颜氏家训·音辞》所说“自兹厥后,音韵蜂出,各有土风,递相非笑”,可以肯定的是,六朝是韵书的大发展时期,出现了很多韵书。

《切韵》系韵书 隋代陆法言《切韵》是前代韵书的继承和总结,又是后世传统韵书演变的基础,是韵书史上划时代的著述。原书没有流传下来。现在可以看到的只是

敦煌出土的唐人抄本《切韵》原书(传写本)的片断和一些增订本(见《切韵》、《切韵》音)。

《唐韵》 这是《切韵》的一个增修本。唐代孙愐作,时间约在唐玄宗开元二十年(732)之后。因为它定名为《唐韵》,曾献给朝廷,所以虽是私人著述,却带有官书性质,比起较它早出的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还更著名。《东斋记事》说:“自孙愐集为《唐韵》,诸书遂废。”但原书已不存在。据清代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所录唐元和年间《唐韵》写本的序文和各卷韵数的记载,全书5卷,共195韵,与王仁昫《切韵》同,上、去二声都比陆法言《切韵》多一韵。不过从卞永誉所录《唐韵》序文中所记载的《唐韵》收字、加字的数目看,又不像是根据王仁昫《切韵》编修的。《唐韵》对字义的训释,既繁密又有出处、凭据,对字体的偏旁点画也极考究,使得韵书更加具有字典的性质。这也是《唐韵》更加受人重视的一个原因。

《唐韵》还有另外一种,是清代末年(1908)吴县蒋斧在北京得到的一部唐写本《唐韵》残卷。只有去声(有阙漏)、入声两卷。王国维认为这部《唐韵》残卷,就是《广韵》卷首所载孙愐《唐韵序》的后一部分所说的孙愐在天宝十年(751)对开元年间所作《唐韵》的修订本。其他学者虽然多不同意王国维的这种看法,但也有人认为蒋斧所收《唐韵》残卷是孙愐《唐韵》的一种增修本,只是成书时间可能稍晚于唐玄宗天宝年间。这部《唐韵》残卷,去声分59韵,比《切韵》的去声多出3韵;入声分34韵,比《切韵》的入声多出两韵。按照这种情形看来,同这些去、入声相应的平声、上声,分韵也应该都有增加。全书可能分204韵。这已经很接近于《广韵》分韵的数目了。《唐韵》小韵的数目,也较王仁昫《切韵》有增加。但所收字的总数却比王韵可能要少,注释很详细,引书极多,特别详于官制、地名、人名和姓氏。

唐代还有一部李舟《切韵》,它在收n音和收m音的阳声韵部的次序排列以及入声韵部和平、上、去三声韵部的配合方面,都有一些特点,对后世的韵书中韵目的排列是有影响的。但原书早已失传了。

《广韵》 全名《大宋重修广韵》,是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陈彭年等人奉诏根据前代韵书修订成的一部韵书。它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官修的韵书。由于《广韵》继承了《切韵》、《唐韵》的音系,是汉魏以来集大成的韵书,所以对研究古音有重要的作用。

《广韵》共5卷,计206韵,包括平声57韵(上平声28韵,下平声29韵),上声55韵,去声60韵,入声34韵。每一个声调中的每一个韵部和其他声调中相应的韵部,有一定的搭配关系。入声韵只和有鼻音韵尾的阳声韵相配,不和阴声韵相配。这样,原则上每一个阳声韵部都有平上去入四声相配。每一个阴声韵部都有平上去三声相配。音系是比较清楚的。

在唐宋的韵书中,声调是韵的组成部分,不同声调就算不同的韵。如果不计声调的不同,而以四声或三声归为一类(有4韵只有去声一种声调),《广韵》260韵就只

有 61 类。如果分出入声韵另计,或每韵中的字音又按洪音细音不同的等呼分析,使每韵都只有一呼,那么《广韵》的韵数还可分得更多。

《广韵》每卷的韵目下面都有一些韵目加注“独用”,或与某韵“同用”的字样。这对研究《广韵》音系和唐宋的实际语音,以及后来的韵书韵目的归并很有关系,非常值得注意。从王仁昫的《刊谬补缺切韵》开始,及至孙愐的《唐韵》,注释逐渐加多,并且引文都有出处,韵书便具有辞书、字典的性质。到了《广韵》,这种体制已成定型。《广韵》也可以说是一部按韵编排的同音字典。

《广韵》的字数,较以前的韵书增加得很多。据它卷首的记载,共收字 26 194 个,注解的文字 191 692 个。明代邵光祖《切韵指掌图检例》说:“按《广韵》凡二万五千三百字,其中有切韵(指反切)者三千八百九十文。”即有小韵 3 890 个。近年有人统计,《广韵》的小韵实际是 3 700 多个。总之,《广韵》的韵数、小韵数、字数都较以前的韵书有增加。这是很自然的,《广韵》的名称本来就有增广隋唐韵书的意思(见《广韵》)。

《集韵》 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即《广韵》颁行后 31 年,宋祁、郑戡给皇帝上书批评《广韵》多用旧文,“繁省失当,有误科试”(李焘《说文解字五音谱叙》)。与此同时,贾昌朝也上书批评宋真宗景德年间编的《韵略》“多无训释,疑混声、重叠字,举人误用”(王应麟《玉海》)。宋仁宗令丁度等人重修这两部韵书。《集韵》在仁宗宝元二年(1039)完稿。

《集韵》分韵的数目和《广韵》全同。只是韵目用字,部分韵目的次序和韵目下面所注的同用、独用的规定稍有不同。唐代初年,许敬宗等人曾经奏请批准把《切韵》里的窄韵和音近的邻韵合并使用。宋景祐初年,贾昌朝也奏请“窄韵凡十有三,听学者通用之”(《玉海》)。《集韵》韵目下面所注的独用、通用的规定和《广韵》不同的,可能就是按照贾昌朝的建议修订了的。如明内府本《广韵》文韵下注“独用”,《集韵》文韵下注“与欣通”。覆元泰定本

《广韵》吻韵下注“独用”,《集韵》吻韵下注“与隐通”。《广韵》问韵下注“独用”,《集韵》问韵下注“与焮通”。《广韵》物韵下注“独用”,《集韵》勿韵下注“与迄通”等等。都说明这种情形。还有许多字,《集韵》和《广韵》不是收在同一个韵部里,如“因”,《广韵》在真韵,《集韵》在諄韵;“多”,《广韵》在歌韵,《集韵》在戈韵等。此外,字的又音,《集韵》比《广韵》增了很多。

但是,《集韵》和《广

韵》主要的不同之处还在于《集韵》收字多,而且收的异体字特别多。一个字不管有多少不同的写法,又不管是正体,还是古体、或体、俗体,只要有点根据就收进来。有的字竟多到八九个写法。《集韵》共收 53 525 字,比《广韵》多收 27 331 字。缺点是对字的来源不加说明,不过字训以《说文解字》为根据,反切多采自《经典释文》,《集韵》这部韵书也是一本较好的字书(图 1)。

《礼部韵略》 《礼部韵略》和《集韵》都是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由丁度等人奉命编写的。《集韵》成书稍晚两年,《礼部韵略》在景祐四年当年就完成了。这部书是宋真宗景德《韵略》的修订本。由于它在收字和字的注释方面注意举子们应试常用的,较《广韵》、《集韵》都简略,所以称为《韵略》。又由于它是当时考官和应考的举子共同遵守的官韵,而官韵从唐代开元以来就由主管考试的礼部颁行,所以叫《礼部韵略》。

《礼部韵略》只收 9 590 字,仍为 206 韵。此书虽在当时引人注目,而对音韵学研究来说实在没有什么价值。但是,它同《集韵》一样,在韵目下面所注的“独用、通用”的规定已与《广韵》的不同,这对后来的韵书中韵部的合并,韵部数目的减少却是很有影响的。

《礼部韵略》的原本已不存在。现在只能看到《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5 卷)。本书没有写作者姓名,书的前面有两篇序。第一篇是南宋理宗绍定三年(1230)袁文煊序(“袁”或误作“余”),第二篇是宋理宗景定五年(1264)上元日紫云山民郭守正序。两篇序文都提到欧阳德隆《押韵释疑》一书,大约《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一书内包括着《押韵释疑》的“互注”。书中每个字下的注释是先列“官注”,即传统的一般解释,后附的“互注”,大致是对官注的疏解或补充。中间用一个带括号的“释”字隔开。韵部中上平声三十六桓的“桓”字作“欢”,是南宋重刊时修改的。

现在能看到的另一部《礼部韵略》的增修本,是南宋毛晃增注,他的儿子毛居正校勘重增的《增修互注礼部韵略》(5 卷),简称《增韵》。此书曾于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表进,大约成书就在那个时候。这原是毛氏的私人著述,它较《礼部韵略》增加了 2 655 字,增圈 1 691 字(《礼部韵略》的体例,凡是某字有别体、别音的,它的周围都有个墨圈作为记号,叫做圈字),订正 485 字。毛居正校勘后又增加了 1 402 字。《增韵》一书,清代无刻本。现在难以看到。

《壬子新刊礼部韵略》 南宋理宗淳祐十二年(1252)刘渊曾编写刊行过新的《礼部韵略》共 107 韵。因为是在平水刻的,所以也称为平水韵。

比这稍前,有金代王文郁的《新刊韵略》(1227)和金代张天锡的《草书韵会》(1229),都分 106 韵,这同宋末元初阴时夫《韵府群玉》分 106 韵是一样的。《壬子新刊礼部韵略》早已不存在,只能从元初黄公绍、熊忠的《古今韵会举要》一书了解到一些概况。

韵书的编写,到了金、元的《五音集韵》、《古今韵会举要》,在编制的体例和韵部的分合上有了新的变化。



图 1 《集韵》

《五音集韵》 金代韩道昭作。韩道昭字伯晖，真定松水人。据《至元庚寅重刊改并五音集韵》的第一篇序说，作序的时间是“崇庆元年岁次壬申长至日”，那是金卫绍王时，相当于1212年，较刘渊《壬子新刊礼部韵略》的成书刊行还早40年。这本书的情形可分3点来说：①全书分160韵，比《广韵》少46韵，比《壬子新刊礼部韵略》多53韵。平声共44韵，上声43韵，去声47韵，入声26韵。从韵部的归并情形及其在韵目下所注的独用、同用的规定来看，它不遵守唐宋人在韵书的韵目下注明的通用、独用的条例。经过归并比《广韵》减少的46韵，都分别记载在各有关韵目的后边，并加圆圈作为记号。②旧的韵书每一韵下同音字的排列，没有什么规则。使用起来很不方便。这本书是按三十六字母排列，次序是见组、端组、知组、帮组、非组、精组、照组、晓组、匣组、影组、喻组、来组、日组。正如序文所说，“以见母牙音为首，终于来日字。”这就等于注明声类，每一韵的字，都知道各属于什么声组。每一声类的字如有开合口的分别，都分开排列，并且注明等次。这在韵书的编辑体例上是一种很大的改革。所谓《五音集韵》的“五音”大约就是指喉牙舌齿唇。③据《至元庚寅重刊改并五音集韵》的第二篇序文，本书共53 525字，新增27 330字；注文335 840字，新增144 148字。《五音集韵》清代没有重印，现在只有少数元明刊本，一般不容易看到。

《古今韵会举要》 黄公绍在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1292)以前编过一部《古今韵会》，简称《韵会》。这是一部征引典故很多，很注重训诂的书。黄公绍的同乡，又在他家坐过馆的熊忠嫌《韵会》注释太繁，在元成宗大德元年丁酉(1297)编成《古今韵会举要》(图2)。此书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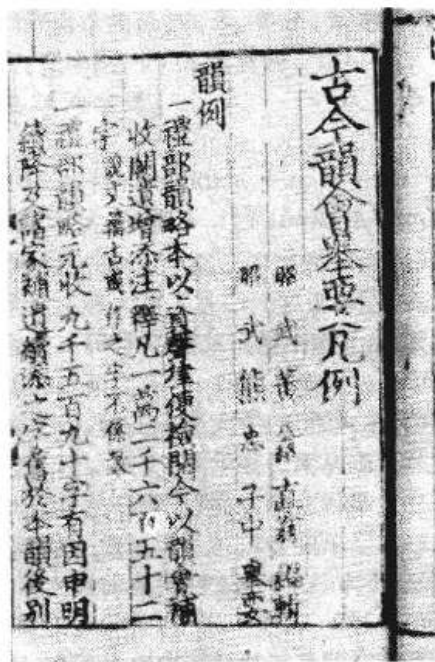


图2 《古今韵会举要》

《壬子新刊礼部韵略》晚45年，共分107韵，完全依照刘渊归并《礼部韵略》的方法。如和后来流行的诗韵相比，就是多了一个拯韵。但是这书有3点值得注意。①本书“韵例”中说：“旧韵所载本无次序，今每韵并分七音、四等，始

于‘见’，终于‘日’，三十六母为一韵。”实际上书中并未明白注出从“见”到“日”这三十六个字母，只是详注七音：角、徵、宫、商、羽、半徵商和半商徵。书中也没有注明字音的四等。所以此书在每韵下注明声类，和《五音集韵》的体例基本相同，但声类的划分和标注却有差异。②本书表面上虽为刘渊平水韵的韵目，而内中却隐藏着一种新韵目。可能反映元代的北方官话。“韵例”说：“旧韵所载，考之《七音》，有一韵之字而分入数韵者，有数韵之字而并为一韵者。今每韵依《七音》韵各以类聚，注云‘已上案《七音》属某字母韵’。”作者于东韵“拢”字下举例说：“且如东韵公东是一音，弓旁是一音，此二韵混为一韵者也；冬韵攻冬与公东同，恭鑿与弓旁同，此一韵分为二韵者也。”这里所谓“旧韵”，指传统的韵部，注明“属某字母韵”，才是作者认为合乎实际的语音系统。如东韵里公、东、通、空、同、蓬……等组字后注“已上属公字母韵”，东韵里弓、穹、穷、虫、融、隆、戎等组字后注“已上属弓字母韵”，东韵里雄、熊两字后注“已上属雄字母韵”。这“公、弓、雄”就是作者选用的韵母代表字。这种“某字母韵”，平声韵有67个，入声韵有29个。这种“字母韵”的实际语音意义，是颇值得研究的。③入声韵里，p、t、k 3个尾音的界线已经打破了。旧的入声韵韵尾，是很确定的。在本书里按照旧韵应分3种不同韵尾的韵部，却往往属于同一“字母韵”。这也是很值得注意的。本书明刊本载有《礼部韵略七音三十六母通考》，内中提到“韵书始于江左，本是吴音，今以《七音》韵母通考韵字之序，惟以雅音求之，无不谐叶”。看来本书的“字母韵”是反映当时的“雅音”，即当时一般的官话读书音的。此外，从本书注释的引文还可以辨析古书中许多异体字、通假字，可据以校勘有些书上引文的错误。这一点也是值得注意的。

词曲家新订韵书 随着元曲的兴起和发展，元代有了适应北曲需要的曲韵。元代泰定元年(1324)周德清作的《中原音韵》，就是根据元代许多著名戏曲中押韵的字编成，又用来指导作曲用韵，调平仄声律的。周德清在《自序》中称曲为乐府，说：“欲作乐府，必正言语，欲正言语，必宗中原之音。”这种明标以中原语音为编写韵书标准的主张，是对传统韵书编写原则的重大改革(见《中原音韵》音)。

《中原音韵》收的字数不多，只收5 876字(一说5 877字)。它和曲律、曲谱之类的书印在一起，单行本不多。比较好的本子有铁琴铜剑楼本，啸余谱本和讷庵本。

诗韵 《佩文诗韵》是清代一部权威的官书，士子进考场作试帖诗，必须遵守这一部标准韵书，大约和宋代的《礼部韵略》的作用差不多。这本诗韵分平上去入四声(平声分上下)，共106韵。这些韵目本来是南宋时宋人和金人删定沿袭下来的。因为过去一般都认为是从江北平水刘渊作《壬子新刊礼部韵略》分为107韵开始的，所以后来107韵或106韵的韵书相沿都叫平水韵，也即长时期来作旧体七言五言诗的人奉为金科玉律的《诗韵》。康熙时的《佩文诗韵》大约是那部大辞典式的《佩文韵府》的

单字本或节略本，同在康熙四十三年(1704)到五十五年(1716)编辑成书。共收 10 235 字。每韵中常用字列在前，罕用字排在后，而又每字都加了反切，这就把韵书向来以小韵统率同音字的好体例给打破了。使用起来很不方便，除供作诗的人猎取资料以外，也没有研究的价值。所以《佩文诗韵》虽然流行很广，在音韵学上却没有地位。

其他 《洪武正韵》是明太祖洪武八年(1375)乐韶凤、宋濂等 11 人奉诏编成的一部官韵。共 16 卷。从编辑人员的籍贯来看，绝大多数是南方人，而宋濂作的序文中却说，《洪武正韵》“一以中原雅音为定”。序文中批评《礼部韵略》的韵部“有独用当并为通用者，如东冬清青之属，亦有一韵当析为二韵者，如虞模麻遮之属”。他们根据所谓中原雅音，把旧韵归并分析之后，共得平、上、去声各 22 部，入声 10 部，共 76 部。《洪武正韵》的归并旧韵，不同于刘渊等人只是把整个的韵部合并在一起，而是要把每一个字都重新归类。这种方法与编《中原音韵》一样，但何字归何韵，却与《中原音韵》又有许多不同的地方。《洪武正韵》既以中原雅音为根据，对旧韵的反切亦不能不加以改变。根据刘文锦的研究，《洪武正韵》的纽部是 31 类(刘文锦《洪武正韵声类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 本 2 分)。清纽、浊纽的界限分明。这就出现了

一个问题：同是根据中原的语音，较《洪武正韵》早出 51 年的《中原音韵》只分阴阳，不分清浊，又取消入声韵部，一概派入三声；为什么刚刚过了 51 年，《洪武正韵》里又有了浊音、入声呢？这反映出《洪武正韵》既重视中原的实际语音，以《中原音韵》为标准音，又考虑到南方人读书说话中还有入声，所以恢复了入声，不采取周德清入派三声的作法。罗常培认为 14 世纪前后，北方有两种并行的读音系统：“一个是代表官话的，一个是代表方言的；也可以说一个是读书音，一个是说话音”(《论龙果夫的八思巴字和古官话》，载《中国语文》1959 年 12 月号)。《中原音韵》是反映方言即说话音的，《洪武正韵》是反映官话即读书音的，所以二者有同有异。《洪武正韵》在明代屡次翻刻，影响很大；而清代对此书却很轻视，没有翻刻过它。这固然有政治原因，然而也同它糅杂南北语音的毛病不无关系。

参考书目

戴震：《声韵考》卷一、二。

刘复、魏建功、罗常培合编：《十韵汇编》，北京大学印行，1935。

周祖谟：《唐五代韵书集存》，中华书局，北京，1983。

(曹述敬)

yuntu

韵图 (rhyme tables) 见等韵。

Z

Zaiwawen

载瓦文 (Zaiwa writing) 见载瓦语。

Zaiwayu

载瓦语 (Zaiwa language) 中国景颇族中自称“载瓦”的人使用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缅语支。在中国,主要分布于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潞西、陇川、瑞丽、盈江等县。在国外,分布于缅甸的掸邦和克钦邦。中国境内的使用人口约6万(1982)。载瓦语内部比较一致。有28个声母:p、ph、m、pj、phj、mj、f、v、ts、tsh、s、t、th、n、l、ŋ、f、j、k、kh、ŋ、x、kj、khj、ŋj、xj。有86个韵母,其中单元音韵母有10个(i、e、a、o、u各分松紧)、带-i、-u韵尾的复合元音韵母有8个,带辅音韵尾的韵母有68个。辅音韵尾有7个:-m、-n、-ŋ、-p、-t、-k、-ʔ。有3个声调:55、21、51。人称代词有形态变化,单数加后加成分(第一人称还改变元音)表示双数和复数,单数以声调和元音变化区分主格、宾格和所有格。动词使动态的语法形式有屈折式和分析式两种。屈折式有3种变化形式:不送气声母(自动)和送气声母(使动)交替;松元音韵母(自动)和紧元音韵母(使动)交替;浊擦音声母(自动)和清擦音声母(使动)交替。量词比较丰富,名词和动词计量时必须用量词。有谓语助词,体现谓语的式、体、数、人称等语法范畴。合成词中复合式居多、附加式较少。借词来自景颇语、汉语、傣语、缅甸语等。四音格词比较丰富。在中国,1957年创制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载瓦文,共26个字母。(戴庆厦)

Zang-Han Dacidian

《藏汉大辞典》 (Tibeto-Chinese Dictionary) 中国第一部兼有藏文字典和藏学百科全书性质的综合性藏汉双解大型工具书(参见彩图插页第31页)。张怡荪主编,1985年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张怡荪(1893~1983),原名张煦,四川蓬安人。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门,曾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等校教授。从1928年起长期从事西藏文化和藏汉词语的研究。抗日战争期间,他在成都主办西陲文化院,先后编成《藏汉集论词汇》、《汉藏语汇》、《藏汉译名大辞汇》和《藏汉大辞典资料本》(手抄本10册)。这些都为他主编《藏汉大辞典》积累了资料。1958年他率领编纂组前往拉萨,进一步搜集资料并邀请藏族学者参加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工作中断。1978年重新恢复编纂。

这部辞典收词5.3万余条,以一般词语为主,分基本词和合成词两大类。专科术语包括传统的“大五明”(工艺、医药、语言文字、因明、佛学)、“小五明”(韵律、诗学、

藻词、戏曲、星象)和文学、历史、地理等门类。此外,还收有旧时公文、封建法典、藏区习俗、农牧生产、器用服饰、赋税差徭等方面的用语;并收录了一部分方言词汇和新词术语。汉文释文采用现代书面语;佛学和因明术语基本上保留了传统的译法。书后附有《动词变化表》、《干支次序表》、《藏族历史年表》以及反映藏族文化特点的彩色图片百余幅。《藏汉大辞典》的成书,经历50多年,是藏汉等民族编写人员长期辛勤劳动的成果。(高炳辰)

Zang-Han Duizhao Lasa Kouyu Cidian

《藏汉对照拉萨口语词典》 (Tibeto-Chinese Lhasa Vernacular Dictionary) 中国第一部藏语口语词典。以记录现代藏语拉萨口语词汇为主,并用汉语解释词义。于道泉主编。1983年10月由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于道泉(1901~)山东临淄人。早年就读于齐鲁大学和北京大学,攻数学,精通藏语、蒙古语、满语、英语、法语、德语、梵语等。1931年将六世达赖仓洋嘉错情歌从藏文译为汉文和英文,轰动国际藏学界。1934年赴法留学,专攻土耳其文,后执教于英国伦敦东方非洲研究院。1949年归国,先后任北京大学和中央民族学院藏文教授。这部词典共收词语2.9万余条。除日常生活用语外,还包括一部分常用的新词术语、人名地名、成语谚语以及医药、科技、天文历算等方面的专业用语。以藏文正字为主要词目,按藏文字母顺序排列,少数无正字的口语词,依实际读音,用藏文拼写。遇有不规则读音,在正字后面用括弧注出俗字,以便初识字的藏族读者从音查字。此外,为了便于其他民族学习和研究藏语拉萨方言,每一词条后均附有准确的拉丁注音,并用汉语作详细的释义。较难解释的语法词附有例句。此书收词多,注音精确,释义详细,是学习和研究现代藏语拉萨方言的重要工具书。(胡坦)

Zang-Mian yuzu

藏缅语族 (Tibeto-Burman group) 汉藏语系的语族之一。

分布和分类 主要分布在亚洲地区的中国、缅甸、不丹、锡金、尼泊尔、印度、泰国等国境内。中国的藏缅语族语言主要分布在西南、西北、中南等地区。分4个语支:①藏语支——藏语、嘉戎语、门巴语等;②景颇语支——景颇语等;③彝语支——彝语、傈僳语、哈尼语、拉祜语、纳西语、基诺语等;④缅语支——载瓦语、阿昌语等。

由于语言情况比较复杂,有些语言的系属尚未确定或尚未取得一致的意见。如羌语、白语、土家语、怒语、独龙语、珞巴语、普米语、佤语等,有的学者认为应另立羌语支,包括羌语、普米语、嘉戎语等,有的则认为这几种语言应归入藏语支。有的认为白语应属彝语支,而有的则认为应另立一语支。有的认为土家语、怒语属彝语支,独龙语、珞巴语、佤语属景颇语支。

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语言学者通过调查又发

现了一些新语言,如木雅语、多续语、尔苏语等,但其性质和地位有待进一步确定。在国外,属于藏缅语族的语言有缅甸语、卢舍依语、列普查语、阿博尔语、姆鲁语等。已消亡的西夏语(10~12世纪中国党项族使用的语言)也属这一语族,它与彝语支比较接近。

语言特点 藏缅语族诸语言之间,除了存在一定数量的同源词外,在语音、语法、词汇各方面都有许多共同的特点,从中可以看出相互间的亲属关系。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语音和词汇上,语法上的差异较小。

语音 大多数语言都有声调,但数目较少,一般是3或4个。如独龙语有3个声调,景颇语有4个声调。也有两个声调的,如普米语箐花话有一个高调55和一个低调13。少数语言或方言没有声调,如珞巴语、藏语安多方言、羌语北部方言。但这些语言里的许多音节有习惯的音高。如藏语安多方言,一般是清声母音节读高调,浊声母音节读低调,例如hka⁵⁵(困难),fi¹¹(高兴)。声调的分类与分化同声母清浊的关系最密切,此外,还与元音的松紧和长短、韵尾的特点等都有关系。如藏语的声调因声母的清浊分为高低两类,清声母是高调,浊声母是低调。有的方言,清浊的对立虽已消失,但在声调上仍留下两类声母的痕迹。彝语支诸语言的声调,除了与声母的清浊有密切关系外,还同元音的松紧有一定的关系。松元音音节出现的声调数比紧元音音节多,声调的变化因元音松紧而有不同的特点。

许多语言的声母分清浊。清浊对立除了区别词汇意义外,有些语言还能区别语法意义。如彝语凉山话:ga⁵⁵(穿)和ka⁵⁵(使穿),gu³³(听见)和ku³³(使听见)。清浊的对立主要出现在塞音、塞擦音、擦音上,但有些语言,如缅甸语、彝语、普米语、阿昌语等,鼻音、边音也分清浊。在发展过程中,清浊对立有逐渐消失的趋势。在塞音、塞擦音、擦音上是浊的消失,保留清的;在鼻音、边音上是清的消失,保留浊的。声母的清浊对立消失后,有的语言转为不同的声调——原清声母音节读高调,原浊声母音节读低调,如藏语拉萨话;有的语言转为元音松紧的对立——清声母使元音变紧,浊声母使元音变松,如载瓦语;有的语言转为送气不送气的对立——浊声母变为不送气清声母,清声母则由不送气声母变为送气声母,如哈尼语碧约话。

有些语言有丰富的复辅音声母。如彝语、纳西语有mb-、nd-、ndz-、ndz-、ndz-、ng-等带前置鼻音的复辅音声母(鼻音的发音部位同后面的辅音相同)。羌语麻窝话有71个复辅音声母,如yp-、yts-、sp-、st-、zb-、zg-、xp-、xt-、yb-、ydz-、xd-、xz-等。嘉戎语梭磨话有197个复辅音声母,不仅有二合的,还有三合的,如pt-、bt-、gz-、sk-、qm-、py-、kl-和spy-、zgy-、mby-、wzd-等。复辅音声母单辅音化是藏缅语族的共同发展趋势,其演变方式有脱落、合并、分为不同音节等。

有许多语言的元音分松紧,如彝、傈僳、哈尼、拉祜、白、景颇、载瓦等语言。元音松紧的差别往往还伴随声调、

舌位等方面的一些差别。比较常见的是,在同一元音上紧的比松的调值略短且高,舌位略低。有的语言紧元音后还伴随喉塞音,如拉祜语。各语言的松紧元音同声母和声调的配合也有一些特点。如哈尼语绿春话的紧元音不同送气声母结合,紧元音出现的声调数目比松元音少。在来源方面,有的语言,如彝语、哈尼语、傈僳语等,是由原有的促声韵消失韵尾后使元音变紧,与不带韵尾的松元音形成松紧对立。有的语言,如载瓦语、景颇语等,松紧对立来源于声母的清浊。这两类语言与古藏语(藏文所反映的7世纪藏语语音)对比,前者的松紧元音韵母与舒促韵母对应,后者的松紧元音韵母与清浊声母对应。例如:

哈尼语(绿春话)	古藏语	词义
松元音韵母	舒声韵母	
y ⁵¹	dgu	九
ɬa ⁵¹	za	吃
sa ⁵¹	ɕa	肉
紧元音韵母	促声韵母	
ky ⁵¹	drug	六
se ⁵¹	bsad	杀
a ⁵¹ lg ⁵¹	lag	手

载瓦语	古藏语	词义
松元音韵母	浊声母	
kau ⁵¹	dgu	九
pau ⁵¹	fi ⁵¹	虫
tsam ⁵¹	zam-pa	桥
紧元音韵母	清声母	
tʃo ²⁵⁵	btsos	煮
tʃin ⁵¹	skyur-mo	酸
kji ⁵¹	skar-ma	是

单元音韵母比较丰富,复合元音韵母不发达。如藏语拉萨话有a、i、u、e、o、ɛ、y、ø、ɔ、ā、ī、ū、ē、ō、ē、ŷ、ō等17个单元音韵母,哈尼语绿春话有i、ī、e、e、a、a、ɔ、ɔ、o、o、u、u、y、y、w、w、y、y、l、l等20个单元音韵母。多数语言有少量二合元音韵母,但无三合元音韵母。彝语支语言的韵母以单元音韵母为主,少量的复合元音韵母主要出现在借词中。

除彝语支语言外,都有辅音韵尾,但发展不平衡。常见的韵尾有-p、-t、-k、-ʔ、-m、-n、-ŋ等。许多语言和方言存在着辅音韵尾简化、消失的趋势。塞音韵尾向-ʔ发展。如古藏语的-b、-d、-g等韵尾发展到现代,拉萨话仅留下-p、-ʔ两个韵尾,德格话只留下一个-ʔ。古缅甸语的-p、-t、-k等韵尾到了现代仰光话,都转化为-ʔ。鼻音韵尾向鼻化元音转化。如古藏语的-m、-n、-ŋ等韵尾发展到现代,在拉萨话里仅留下一个-m,同时出现了鼻化元音,在德格话里都转化为鼻化元音。彝语支语言,大多数地区的

辅音韵尾已全部消失,韵母都是开音节的。羌语的辅音韵尾虽比其他语言丰富,但大多是后起的,由音变、合音、借用等形成的。在同源词中,出现于其他亲属语言的辅音韵尾在羌语中大都脱落。

有些语言有弱化音节,如缅甸、景颇、载瓦、阿昌等语言。弱化音节出现在多音节词的第一个音节,读音轻而弱,舌位也有变化。如景颇语 $mā^{31}ja^{31}$ (人) 中的 $mā^{31}$ 为弱化音节,实际音值为 $mā^{31}$ 。在来源上,弱化音节一部分来自非弱化音节。如载瓦语的 $mji^{21}po^{21}$ (虫) 的 mji^{21} 由 mji^{21} (火) 弱化而成; 阿昌语的 $kā^{31}sen^{31}$ (黄鳝) 的 $kā^{31}$ 由 qa^{31} (鱼) 弱化而成。另一部分来自古代复辅音声母的前一辅音。如景颇语的 $mā^{31}qa^{31}$ (五)、 $jā^{31}gam^{31}$ (水獭)、 $fā^{31}khu^{31}$ (九) 等,前一音节都由古代复辅音声母的前一辅音演变而来。

语法 虚词和语序是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形态变化比汉语和苗瑶语族、壮侗语族丰富。有些语言(如嘉戎语、僜语等)的附加成分比较丰富,这也是表达语法意义的重要手段。后加成分最多,其次是前加成分,中加成分较少。各语言或多或少都存在语音交替的屈折形式。基本语序比较一致。主语在谓语前,谓语在宾语后;间接宾语在直接宾语前。名词、代词作定语时在中心词前;数词或数量词组作定语时在中心词后;数词或数量词组作状语时在中心词前;形容词作定语时一般在中心词后,但有的语言加了助词以后也可在中心词前。动词、形容词作补语时在中心词后。

动词的语法范畴比较丰富,有人称、时、体、态、互动、式、趋向等。常见的语法手段有添附加成分、语音交替、重叠等。人称范畴,在有些语言(如独龙语、羌语、嘉戎语等)中是在动词上添加附加成分来表示,附加成分由人称代词缩减或音变而成。如独龙语: la^{55} (找)、 $laŋ^{55}$ (我找)、 $nu^{55}la^{55}$ (你找)。动词的态分自动态和使动态,语法形式有分析式和综合式两种。综合式的语法形式,语音交替是常见的现象。除清浊交替如彝语凉山话的 bi^{33} (散开) 和 pi^{33} (使散开) 外,还有送气和不送气如阿昌语陇川话的 $pzau^{55}$ (垮) 和 $phzau^{55}$ (使垮)、松紧元音如载瓦语的 $tsuŋ^{51}$ (坐) 和 $tsuŋ^{51}$ (使坐)、不同声调如拉祜语的 tsa^{55} (吃) 和 tsa^{31} (使吃)、不同元音如普米语箐花话的 sa^{13} (笑) 和 se^{13} (使笑) 等交替形式。有的语言用前加成分表示使动[如景颇语的 $then^{31}$ (坏) 和 $fā^{31}then^{31}$ (弄坏)]。不同语言之间还存在一些同源的使动词。如“断”和“使断”二词,古藏语是 $chad$ 和 $bcad$,缅甸语是 $fə^{55}$ 和 fho^{55} ,彝语是 ge^{33} 和 khe^{33} ,载瓦语是 kju^{21} 和 $khju^{21}$ 。从使动词的同源关系中可以看出藏缅语族诸语言的亲属关系。互动范畴的语法形式主要是重叠,如羌语麻窝话的 xbi (爱) 和 $xbi\ xbi$ (相爱),普米语的 de^{13} (唱) 和 $de^{55}de^{13}$ (对唱)。有的语言用前加成分表示互动,如独龙语的 la^{55} (找) 和 $a^{11}la^{55}$ (互相找)。动词的式一般叙述式、祈使式、命令式、疑问式等。其形式有加助词、加附加成分、语音变化等。景颇语后加不同的句尾助词表示不同的式,如

sa^{33} (去), $sa^{33}n^{31}tai^{33}$ (你去), $sa^{33}n^{31}ni^{51}?$ (你去吗?) $sa^{33}u^{231}!$ (你去吧!)。普米语以动词词根韵母的语音变化表示命令式,如 tsa^{55} (洗), tsu^{55} (你洗吧), $thiē^{13}$ (喝), $thiāu^{13}$ (你喝吧)。

藏缅语族中许多语言的人称代词有格的语法范畴。分主格、宾格、领格 3 种,多出现在单数上,由语音变化表示。如哈尼语绿春话的第一人称单数:主格是 qa^{55} ,宾格是 qa^{31} ,领格是 qa^{33} 。

有量词,但发展不平衡。有些语言(如彝语支、缅语支)量词比较丰富,数词必须同量词结合后才能修饰名词。量词的作用除表示单位外,还能指明名词的类别、性质、形状等特征。而有些语言(如藏语、门巴语、景颇语)量词较少,数词可以直接修饰名词。如藏语拉萨话的 mi^{55} (人) sum^{55} (三),意为“三个人”。量词同数词结合的次序有两种,一种是量词在前,如景颇语的 $n^{31}sin^{33}$ (水) wan^{33} (碗) mji^{33} (一),意为“一碗水”;另一种是量词在后,如哈尼语的 tho^{55} (人) phi^{31} (一) ya^{31} (个) 意为“一个人”。量词大多来自名词、动词。有些语言,大多数名词计量时都可临时当量词用(双音节词多用后一个音节)。如哈尼语的 mo^{31} (马) phi^{31} (一) mo^{31} (匹),意为“一匹马”, $la^{31}ny^{55}$ (指头) phi^{31} (一) ny^{55} (个),意为“一个指头”。

有结构助词,表示支配、领属、主谓、被动、用什么工具、以什么方式、从什么地方等结构关系。有的句子成分可以借助结构助词改变语序,如带结构助词后,宾语可提到主语前,形容词定语可提到名词中心词前等。如景颇语的 gai^{33} (我) ji^{33} (他) phe^{255} (宾语助词) ja^{33} (给) $sā^{33}gai^{33}$ (句尾助词),“我给他了”,也可说成 $ji^{33}phe^{255}gai^{33}ja^{33}sā^{33}gai^{33}$ 。

词汇 藏缅语族语言之间都有一定数量的同源词。同源词都是最基本的词。例如:

藏(拉萨)	景颇	彝(凉山)	哈尼(绿春)	缅(仰光)	汉义
mi^{254}	mji^{251}	$no^{35}dz_1^{51}$	mja^{55}	mje^{255}	眼
pa^{34}	jan^{31}	su^{55}	sa^{31}	$a^{11}təa^{55}$	肉
qa^{35}	qa^{35}	hu^{55}	$qa^{31}de^{55}$	qa^{35}	鱼
chi^{44}	kui^{31}	$khui^{55}$	$a^{31}khui^{51}$	$khui^{55}$	狗
$ka^{55}ma^{13}$	$fā^{33}kan^{33}$	$mu^{55}pi^{55}$	$a^{31}gu^{55}$	$fə^{11}$	星
sa^{13}	ja^{55}	$dzui^{55}$	da^{31}	sa^{33}	吃
se^{255}	sat^{31}	si^{55}	se^{31}	$təa^{255}$	杀
tsa^{255}	$kā^{31}the^{251}$	$ndzo^{33}$	dza^{33}	$fə^{255}$	滴
num^{55}	$mā^{31}nam^{55}$	pi^{31}	no^{33}	$qā^{55}$	闻
$phir^{55}$	$pjen^{35}$	dzi^{55}	bjo^{55}	$pjā^{11}$	飞
ci^{54}	ji^{33}	s_1^{55}	si^{55}	$təe^{11}$	死
$kha^{54}ti^{254}$	kha^{55}	$khui^{55}$	xa^{31}	kha^{55}	苦
$cu^{55}mo^{13}$	$khgi^{33}$	ti^{55}	$thē^{55}$	fhi^{11}	酸
ne^{11}	ni^{31}	ni^{55}	ni^{31}	ni^{55}	近
sum^{55}	$mā^{31}sum^{55}$	so^{33}	so^{55}	$tə^{55}$	三
qa^{13}	qa^{55}	qa^{33}	qa^{55}	qa^{11}	我

词以单音节词和由单音节词组成的复合词为主,多音节的单纯词较少。构词方式有派生法和合成法两种,

以合成法为主。合成法主要有并列、修饰、支配、主谓等结构。此外,四音格联绵词比较丰富,表示不同的词义和感情色彩。音节结合的形式有AABB、ABAB、ABAC、ABCD等,二、四音节还有双声、叠韵的现象。(参见彩图插页第63页)

参考文献

罗常培、傅懋勳：《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概况》，载《中国语文》，1954，第3期。

R. Shafer, *Introduction to Sino-Tibetan*, Harrassowitz, Wiesbaden, 1966.

S. N. Wolfenden, *Outlines of Tibeto-Burman Linguistic Morphology*. London, 1929.

(马学良 戴庆厦)

Zandwen

藏文 (Tibetan writing) 藏族使用的一种拼音文字。主要通行于中国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省的藏族聚居区。此外,在不丹、锡金、尼泊尔和印度等国的藏族中也使用这种文字。藏文创始于7世纪前后,由30个辅音字母和4个元音符号组成。辅音字母又依其在音节中的位置和作用分为“基字”、“上加字”、“下加字”、“前加字”、“后加字”和“再后加字”。前4种字母表示辅音声母,后两种字母表示辅音韵尾。元音符号不单用,必须加在辅音字母的上方或下方。其中表示元音i、e、o的符号加在字母上方,表示元音u的符号加在字母下方。元音a不用符号表示。由于历史音变,现在正字中有的字母已不发音。藏文自左向右横行书写,部分复合声母采用字母上下叠写的方法表示。词不分写,音节之间用一小点隔开。短语和句子结尾用一条垂直线表示,章节段落结尾用双垂直线表示,全文或全书结束用四条垂直线表示。另有专门符号用于篇章书首。字体分为“有头字”和“无头字”两大类。前者主要用于印刷,后者主要用于书写。手写体又分为“粗通”、“粗仁”、“珠杂”等多种形式。最流行的草书叫“秋”,形体与印刷体相差甚大。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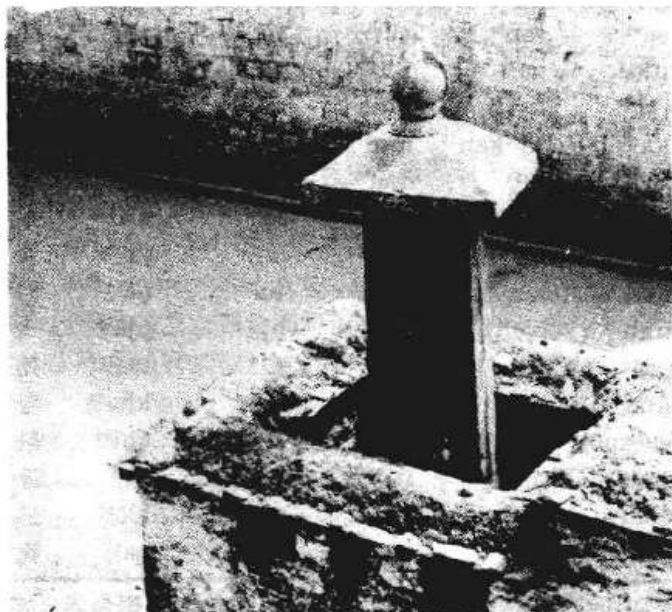


图1 《长庆会盟碑》



图2 《长庆会盟碑》碑文

了大批传统作品,还用藏文出版了大量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方面的书籍。藏文在使用上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胡 坦)

Zangyu

藏语 (Tibetan language) 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主要分布于中国西藏自治区和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等省以及印度、尼泊尔、不丹和锡金。中国境内的使用人口约387万(1982)。分卫藏、康和安多3个方言,方言之间差别较大。中国和国外的藏语略有区别。中国境内藏语(以拉萨话为例)有28个声母:p、ph、t、th、c、ch、k、kh、ts、tsh、ʈs、ʈsh、ʈs、ʈsh、s、ʃ、s、ɕ、ç、h、m、n、ɳ、ŋ、l、r、w、j。有17个单元音韵母:i、e、ɛ、a、u、o、ɔ、y、ø、ī、ē、ē、ā、ū、ō、ȳ、ō;有两个复元音韵母:iu、au;有28个带-p、-ʔ、-r、-m、-ŋ辅音韵尾的韵母;有4个声调:53、55、12、14,如pa⁵³(肉)、ca⁵⁵(东方)、ŋa¹²(我)、ŋa¹⁴(对我)。主要以虚词和词序表达句子成分的各种关系,但加虚词后词序比较灵活。动词有时态和式的语法范畴,以屈折变化和虚词表示。藏语的虚词分两类,一类是表示句子成分之间各种关系、时态和语气等意义的助词,另一类是单独或与时态和疑问助词一起表示动词的时态和语气的辅助动词。部分助词和辅助动词有独立和减缩两种形式。句子语序是主语在前,谓语在后;宾语在宾语后、谓语前;如果是双宾语,间接宾语又在直接宾语前。形容词、数词、指示代词作修饰语时在中心词之后。人称代词、名词作修饰语时需加领属助词,在中心词前。动词或形容词的修饰语在中心词前。构词方式主要是复合法,即词根通

过修饰、联合、支配、表述关系复合构成新词。卫藏地区的名词、代词、动词、形容词有敬称和非敬称的区别。

(瞿霭堂 格桑居尼)

Zangyuzhi

藏语支 (Tibetan branch) 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语支之一。主要分布在中国西藏自治区和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等省以及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印度、尼泊尔、不丹、锡金境内。藏语支所包括的语言可分为4类：①中国境内的藏语及有关语言，如嘉戎语、羌语、普米语、门巴语、珞巴语、僜语，但有不同意见；②尼泊尔境内与藏语更为接近的塔克巴、藏拉、木尔米诸语言；③尼泊尔境内的布南、卡瑙里、固戎、巴兴、伐尤诸语言；④北阿萨姆诸语言，如阿博尔语、米里语、达夫拉语、阿嘎语等，其中部分语言与中国境内的语言相似或相同，如米里语即珞巴语。藏语支所属语言的主要特点是：①有丰富的复辅音声母，如藏语和嘉戎语都在100个以上；②有较多的单辅音和复辅音韵尾，如嘉戎语和门巴语都有9个单辅音韵尾；③声调发展不平衡。有的语言，如门巴语、普米语有声调，有的语言，如嘉戎语、珞巴语没有声调。一个语言内部，有的方言有声调，有的方言没有（如藏语、羌语）。声调与其他语音要素（如声母的清浊、元音的长短、辅音韵尾的有无等）有密切的关系；④保留较丰富的屈折形态变化（如动词的时、体、人称、语态）；⑤动词有方位和人称的范畴；⑥存在动词和判断动词有类别范畴。

(瞿霭堂)

Zaomeishi

《早梅诗》 每个字代表一个声母的一首五言绝句，见于明代兰茂的《韵略易通》。用诗的形式写下来，为了便于记诵。原诗如下：

东风破早梅 向暖一枝开 冰雪无人见 春从天上来
d f p z m h n 0 zh k b s "v" rg ch ct sh l

下面一行是汉语拼音。这里0表示零声母即以元音开头的字。“v”是唇齿摩擦音。现代北京音香山一带摩擦极轻，天津音摩擦就极重。

从诗里归并声母看，“见”代表g-(gian)，“雪”代表s-(süe)，尖团字还分得开。这或许是作者在这一点上遵从多数方言，或许是当时“官话”语音确实有这种区别。从清乾隆八年(1743)“存之堂”(书坊名)写《圆音正考》，就汉字对译满语声音不准确提出批评一事看，后一个推测比较近真。

把《早梅诗》的声母按发音部位排起来，就得到：

b	p	m	f	"v"
d	t	n	l	
g	k	h		
z	c	s		
zh	ch	sh	r	

再加上0，恰好二十。

说这首诗代表的音韵格局是现代北方音的前身大致

不错。所以在后代讲音韵的书里，如清代李汝珍的《音鉴》等，都常引用。

把归并所得的字母作成诗并不止兰茂作过。远在唐代，就有日本和尚空海作过类似的《伊吕波歌》。李汝珍也作过“春满尧天……”《行香子》词。这么作，普及性提高了，可是把等韵从印度声明学传来的按发音部位分类和按发音方法排序次的严格科学精神削弱了。

(俞敏)

Zeng Yunqian

曾运乾 (1884~1945) 中国音韵学家。字星笠，湖南益阳人。历任东北大学、中山大学、湖南大学教授。曾运乾对音韵学的贡献主要是在声纽的研究上：①提出古纽“喻三归匣”、“喻四归定”的见解。中古喉音喻纽分两类，一类是三等字，一类是四等字，通称前者为喻三，后者为喻四。他认为在古音中，喻三跟匣纽是同类，喻四跟定纽是同类。这种看法，特别是喻三归匣，被大家所公认。②认为《切韵》音系不只韵类有洪细的区别，声类也有洪细的不同。声类和韵类的洪细恰好是相应的。他在陈澧《切韵考》确定的中古40声类的基础上，又增多11类，认为中古有51类声纽。曾运乾在考古、审音两方面的造诣都很高。著有《切韵五声五十一纽考》(《东北大学季刊》，1927，第1期)、《喻母古读考》(《东北大学季刊》，1927，第2期)、《尚书正读》(中华书局，1964)等书。

见古纽。

(谢纪锋)

Zhade yuzu

乍得语族 (Chadic group) 见阿非罗-亚细亚语系。

Zhang Kun

张琨 (Kun Chang 1917~) 语言学家。字次瑶。1917年12月17日生于河南省开封市。1934~1938年在清华大学中文系攻读，获文学士学位。曾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担任过助理研究员。1947年留学美国。1949年获耶鲁大学硕士学位。1955年获耶鲁大学语言学博士学位。1951年起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执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1963年转至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中国语言学、汉藏语教授迄今。1972年起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40年代，张琨对中国的苗、瑶、藏、纳西等少数民族语言进行过调查和研究。1947年发表论文《苗瑶语声调问题》，奠定了苗瑶语声调比较研究的基础。赴美国后，除继续研究苗瑶语外，侧重研究藏语和汉语音韵，他的《中古汉语音韵与切韵》(1974)、《古汉语韵母系统与切韵》(1976)和《藏语口语读本》(又称藏语语料，1~4册，1981



年出齐)受到语言学界的普遍重视。此外,他还发表了《藏语在汉藏语比较语言学中的地位》(1978)、《藏语口语中的时与体》(1981)、《汉藏语系的‘针’字》(1969)、《汉藏语系的‘铁’字》(1971)、《苗瑶、藏缅及汉语的鼻音塞声母:是扩散的结果还是同系证据?》(1976)等几十篇论文。他与李霖灿合编的《纳西象形文字字典》(1944, 1953再版)一直是纳西语文研究的重要工具书。

(王 尧)

Zhang Xiang

张相 (1877~1945) 中国语言文字学家。原名廷相,字献之,浙江杭州人。早年任杭州各学堂教师,讲授古文与历史。后应上海中华书局聘,任编辑之职。除主编文史课本外,又编有《古今文综》10册。1936年又与舒新城、沈颐、徐元诰等人主编《辞海》,包括语词和百科词语,体例谨严,内容丰富,出版之后,风行一时。50岁以后,专门研究诗、词、曲中不曾有人解释的语辞,经历六七年,写成《诗词曲语辞汇释》一书(1953年始由中华书局出版),成绩超卓,对研究古典文学和近代语汇贡献甚大。

(周祖谟)

Zhang Yi

张揖 中国三国时期文字训诂学家。张揖史无传记,唐颜师古《汉书叙例》说:“字稚让,清河人,一云河间人,太和中为博士。”后魏江式进表论书说:“魏初博士清河张揖著《埤仓》、《广雅》、《古今字诂》。究诸埤广,缀拾遗漏,增长事类,抑亦于文为益者,然其《字诂》方之许篇,古今体用,或得或失。”(《北史·江式传》)张揖精于文字训诂,所作各书只有《广雅》流传至今,《埤仓》和《古今字诂》宋以后已失传,唐人所作《一切经音义》每每引及。清人尚有辑录,龙璋《小学蒐佚》中辑录最为详备。

(周祖谟)

Zhang Binglin

章炳麟 (1869~1936) 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家、思想家、学者。又名绛,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曾参加早期革命运动和辛亥革命。任《时务报》撰述和《经世报》编辑,主编《民报》和《大共和日报》。章炳麟长期从事学术著述和教育工作,发表过大量学术论著,对中国近代哲学、文学、历史学和语言学均有贡献。

章炳麟在汉语音韵学研究方面的突出成就有4点:①在古韵的研究上,对王念孙、江有诰的古韵分部进行了修正,在江有诰古韵分部基础上,又分出一个至部、一个队部,定为23部,这对后来学者进一步确定古韵分部有重要参考价值。

③章炳麟以前的古韵研究大都在韵部的分合上下功夫,审音能力强的学者对古韵某部大致读什么音有自己的看法,但除戴震以外,从未有人明白地说出来过。章炳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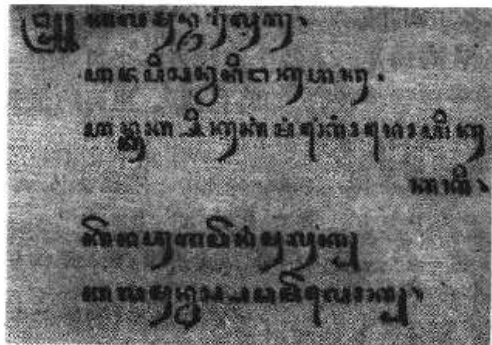


是用汉字描写古韵音值的第一位学者。③在古纽的研究上,提出了中古娘日二纽上古归泥纽的看法(见古纽)。④章炳麟是第一个对古纽有系统认识的学者,在《国故论衡》中列有“纽目表”,把古纽定为5类21个。此外,他继孔广森之后,进一步提倡阴阳对转、旁转的学说,创造了《成均图》。人们往往不满意他的《成均图》和对转、旁转说,因为它造成了无所不通,无所不转。但是应该指出,章炳麟的通转说与孔广森的通转说不同。孔广森通转说为古韵分部服务,章炳麟利用通转说来解释文字的转注、假借以及“孳乳”的现象。这是他作《成均图》的真正目的。章炳麟关于音韵学的见解,集中反映在他的《国故论衡》、《文始》两部书里。另外,他的《新方言》是利用音韵学讲方言词汇唤起民族自尊心的带有宣传革命精神的书。

(谢纪铤)

Zhaoway

爪哇语 (Javanese language) 印度尼西亚人数最多的民族——爪哇族——的语言。属南岛语系印度尼西亚语族。分布于爪哇岛中部、东部以及印度尼西亚西部部分沿海地区,使用人口约6000万。爪哇语的历史一般分为3个时期:12~13世纪为古爪哇语;14~17世纪为中古爪哇语;17世纪起为现代爪哇语。古代爪哇语深受梵语的影响。伊斯兰教传入印度尼西亚之后,使用阿拉伯字母。荷兰人侵占印度尼西亚后,改用拉丁字母(见图)。爪哇语有6个元音,20个辅音。重音落在单词的倒数第二个音节上。爪哇语是分析型语言,句法关系由功能词



爪哇文字

和词序表示。句子的基本结构是主语—谓语—宾语。定语一般在名词之后,状语在动词之后。有大量马来语、梵语、阿拉伯语、汉语、葡萄牙语、荷兰语及英语借词。

(许发兴)

Zhao Yuanren

赵元任 (Yuen Ren Chao 1892~1982)

语言学家。江苏省常州市人。1892年11月3日生于天津,1982年2月25日卒于美国麻省剑桥。1907年入南京江南高等学堂预科。1910年考取清华学校庚子赔款官费生留学美国,入康奈尔大学,主修数学。1914年毕业后继续在该校修习哲学。1915年转入哈佛大学,191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19年任康奈尔大学物理学讲师。1921~1924年任哈佛大学哲学系讲师、教授。1925~1929年任清华学校研究院导师。1929~1938年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语言组主任。1938~1963年先后在

夏威夷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加利福尼亚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1945年当选为美国语言学会会长。1981年北京大學授予名誉教授称号。

赵元任是理论与实际并重的语言学家。在语言学的各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杰出的贡献。

赵元任长期致力于推行国语(推广普通话)的工作。1922年出版《国语留声片课本》,1935年出版《新国语留声片课本》,在推行国语的工作上起了示范的作用。这两套唱片分别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推行国语的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的标准音是1920年的《国音字典》。当时的国音与京音(北京音)稍有差别。例如京音没有入声,国音有入声;京音不分尖团,国音分尖团。事实证明,这种兼顾古今南北的国音是无法推广的。后一个阶段的标准音是1932年的《国音常用字汇》。新国音把老国音里北京话没有的音都取消了。因此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是一致的。

赵元任在语音方面有异常的天赋。用他自己的话说:“年轻的时候调查方言,调查哪儿的话学哪儿的话,学哪儿的话象哪儿的话。不过这是末技。”(1981年5月21日在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会上的发言)他从1927年起从事方言研究工作,调查过吴语(江苏南部和浙江)、粤语、徽州话和江西、湖南、湖北三省的方言,发表过很多调查报告和专题论文,如《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中国方言中爆发音的种类》(1935)、《钟祥方言记》(1939)、《湖北方言调查报告》(1948)、《中山方言》(1948)、《台山语料》(1951)、《汉语常用植物词》(1953)、《汉语称呼用词》(1956)等。其中《现代吴语的研究》是中国第一部用现代语言学方法研究方言的著作。这部书包括30处的调查材料,他与四个同事合著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包括64处的调查材料。从这两部著作可以看出,研究一个地区的方言(面的研究)时,各处的调查项目应大体一致,才能进行比较。

赵元任在记音方法和记音工具上也有重要的贡献。他关于记音方法的论述主要见于《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1934)和《语言问题》(1959)第二讲《音位论》。《音位论》说明音位观念所以存在的理由以及归纳音位应该考虑的一些原则。《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一文阐明从语音材料归纳音位系统时可以有多种选择,答案不是唯一的。这篇论文现在已成为音位理论的经典著作之一。他设计的一套五度制标调字母,为记录和研究汉语(以及其他有字调的语言)的声调提供了准确、方便的工具。

在语法方面,赵元任最重要的著作是《中国话的文法》(1965)。这是一部方法谨严、系统分明的大书,有很多创见胜义。这部著作以直接成分分析法作为研究语法的主要方法,显然受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可是作者持论通达,从来不拿事实迁就理论。他说:“在语言现象中寻找系统性和对称性,在方法学上是可取的,只要不走得太过。”(《中国话的文法》)

《中国话的文法》根据句法功能区分词类,为每一类

词类下了比较严格的定义,这种做法跟以前的汉语语法著作有很大的不同。在具体分类上,把体词分为名词、专名、处所词、时间词、限定词量词复合词(三斤、这回)、名词定位词复合词(墙上、饭前)、限定词(三、每)、量词、定位词(里、上)、代名词(我、什么)。对于量词、助动词、介词等封闭性的词类,尽可能穷尽地列举其成员,一一描写它们的功能和用法。这些也都是以往所没有的。尤其是对语助词的分析,观察细致入微,描写准确周到,表现了这部书的一个特色。总之,无论从立论的深度说,还是从影响的广泛说,《中国话的文法》都是最重要的汉语语法著作之一。

《语言问题》是讨论一般语言学的。原是演讲记录稿(用英文写的《语言和信号系统》(1968)是根据此书改编的,内容大同小异)。作者学识渊博,见多识广;书中不乏明达的见解,精辟的议论,很少偏执的主张,读起来引人入胜。用美国语言学家M. 裘斯的话来说:“赵在语言上是从来没有错误的。”对于说汉语的人,这是很理想的语言学入门书。(参见彩图插页第2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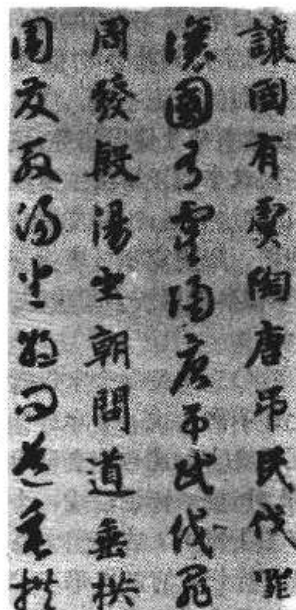
(李 荣)

zhenshu

真书 汉字一种书体的名称。指汉末继有波势挑法的八分书而出现的新书体。六朝以来,称之为真书、正书或楷书。这种书体沿用至今。

从西北地区出土的有年号木简看,东汉建武至永初(公元25~113)等简都是隶书,而永和二年(137)简已基本上是真书(真七隶三。见于张凤著《汉晋西陲木简汇编》,1931)。这是戍屯军治所的遗物,反映出当时官府中一般知识分子所用的书体。熹平四年(175)立于太学的《石经》是标准八分书,但是永寿二年(156)的陶瓶上的大部分题字已近似真书。可见王次仲作八分楷法的传说和蔡邕写《石经》,都是从保持隶书传统的角度对当时的正体字加以规范,而真书则是日常书写趋向简易的潮流

造成的新书体。西陲木简中有魏景元、咸熙,晋泰始、永嘉等简;石刻中有吴凤凰元年(272)的《谷朗碑》和不知年号的《衡阳太守葛祚碑》。其形体和笔画结构都已经完全是真书。可见真书在三国时期是通行全国的。世传魏初的钟繇(?~230)为“真书之祖”,虽无手迹流传,法帖中有《贺捷》、《季直》等真书的章表。刘宋羊欣说“钟书有三体,……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章程书应当是指钟繇的这些章表。章程与楷法同义,东汉八分书有了楷法,六朝人称



智永《真草千字文》

之为楷书。真书作为“传秘书，教小学”的章程书，又称真书为楷书，称八分为楷书。真书成为通行正体字，所以也称正书。

真书在应用中不断发展。东晋王洽写给王羲之的信中，回顾他们兄弟在真书、草书书法上的创新时说，“俱变古形，不尔，至今犹法钟（繇）、张（芝）”。但是六朝、隋、唐都把真书视为隶书的新体，所以把魏晋名家，包括王羲之、王献之的真书都称为隶书。隋唐的真书在书法风格上有了新的发展，如智永《真草千字文》（见图）中的真书和欧阳询的《醴泉铭》。后人以有以欧阳询为楷书之始的。这都是由于没有看到反映真书形成过程的资料，又把形体和笔画结构上的区别与书法风格上的不同混淆在一起而造成的。元代赵孟頫所写的《六体千字文》，古文、篆、隶、章草、真书、今草六体并列，展现了战国以来2 000多年间中国书体演变的概貌。

（张政烺）

zhengchiyin

正齿音 见等韵。

zhengtī

正体 (standard form) 指合乎字书规范的汉字字体。汉字从篆书变为隶书，隶书发展为楷书，自魏晋开始，字体的偏旁结构，已趋于一致。书写时要求符合字书的写法，凡合乎一般规范的就称为正体。正体的名称在唐代颜元孙《千禄字书》中已经出现。但民间写字，往往有一些别体字，与正体的笔画有不同。因而有俗体的名称。正体与俗体有时对称。例如召俗作𠂔，牀俗作𦉳，單俗作𠂔，回俗作囙，规俗作𠂔，柏俗作栢。这些都是见于《千禄字书》的。

（周祖谟）

zhengxiefā

正写法 (orthography) 又称正词法，正字法，指文字的形体标准和书写规则。源自希腊语 orthographia——orthós(正确)和 graphō(写字)。其社会功能是不考虑任何个人的发音或书写特点而使写法一致。广义的正写法包括字和词的正确写法、标点符号使用法等；狭义的正写法不包括标点符号。中国汉字的正写法主要规定字的正确写法和字体，故常以正字法为名；拼音文字的正写法主要解决有关词的书写问题，如规定字母表达音位的方法、词的定型化（分写、连写和半连写）、大写规则、移行规则等等，故常以正词法为名。

理想的拼音文字（字母音素文字）应该是一个字母对应一个音位，或相反。但事实上却不然：或一个字母标记几个不同音位，如英语 c 标记 [s] 或 [k]；或一个音位用不同字母标记，如德语 [f] 用 f、ff、ph 或 v 标记；或一个字母标记一组音位，如俄语的 я—[j] + [a]；或一组字母标记一个音位，如 [ʃ] 德语中用 sch 标记；有的字母不标记音位，如西班牙语的 h；有的音位无字母标记，如阿拉伯语的元音。

关于词的写法，一般遵守以下4个原则：①语音学原则：根据词的读音书写，即读音与书写一致，例如英语的 desk（书桌），俄语的 ученик（学生）。②形态学原则：要求书写时注意词的形态，同样的词素在任何地方都要写法一致，如俄语的 над-、под-、пред-，虽然其中的 д 有时读成清音。③历史原则：根据传统的写法书写，例如英语的 knight（骑士），虽有三个字母 (k、g、h) 不发音，但仍要书写。④分化原则：用不同写法区分同音词，如法语的 a（有）和 à（在），又如汉语的 chīdī hěnduō（吃的很多）和 chīde hěnduō（吃得很多）。事实上，任何文字的正写法都是以一个原则为主，兼用其他原则。

词儿连写关系到如何划分词和词组的界限。连写为词，分写为词组，两种成分中间加短横则形成为半连写形式。有些表达新概念的词组，开始时以半连写形式出现，以后逐渐演变成词组，如英语的 computer-assisted-design→computer assisted design（计算机辅助设计）。

词儿的连写不仅受各自语言的语音、语法、语义特点的约束，而且还受传统习惯（约定俗成）的限制。不合理的分写或连写会影响文字的可读性。在一些语言（如汉语）中分写过多易造成同音词的增长，降低阅读速度；而连写过多，可读性也差，如德语 Kraftfahrzeughaftpflichtversicherungsteilnehmer（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保险投保人）这个词由47个字母组成，读来费劲。类似这种情况一般采用半连写形式，便于阅读。

大写规则一般用于句首第一个字母或专有名词的第一个字母。但有的语言（如德语）任何名词的第一个字母都大写。

至于移行，现行办法都以音节为准，即移行必须照顾音节的完整性。《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试用稿）》中规定：“如果需要移行的地方原来已有一个短横，在下一行开头再加上一个短横。”这项规定不仅解决了日益增多的半连写形式的移行问题，而且也补充了一般移行规则的不足。

汉字正写法的主要内容是根据规范的汉字来纠正错字、别字，反对滥造简化字和滥用繁体字。1965年1月发布的《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6 196个汉字），为通用汉字的范围、印刷用字和语文教学建立了楷书字形规范。《简化字总表》（2 236个汉字）为使用简化字提供了参考。

参考书目

汉语拼音正词法委员会：《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试用稿）》，载《文字改革》，1984，第5期。

В. А. Добромеслов и другие, Правила русской орфографии и пунктуации. Учпедгиз, Москва, 1956.

（刘涌泉）

zhengyīnfā

正音法 (orthoepy) 又称读音法。民族共同语的读音规范或标准。源自希腊语 orthoépēia——orthós(正确)和 épos(说话)。正音法的任务是树立读音标准，从某些词的几种歧异的读音中选择一种作为规范。

正音法所依据的标准音是长期形成的。例如，作为

汉语标准音的北京语音是 600 多年前北京成为中国政治文化中心之后逐渐形成,并于 1955 年汉语规范化会议上最后加以确定的。正音法一经形成,便比较稳定地作为读音标准,不过它也随着语音的演变而缓慢地发生变化,出现一些新的读音标准,消除一些旧的读音标准。在普通话审音委员会于 1957~1962 年分 3 次发表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初稿》中,“波”的两个读法 bō 和 pō 被统一为 bō,“剥削”的两个读法 bōxuē 和 bāoxiāo 被统一为 bōxuē。这份《初稿》对汉语语音规范的确定和推广起了积极作用。1982 年 6 月重建的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又对《初稿》进行了修订,于 1985 年 12 月经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广播电视部审核通过,并定名为《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予以公布。

学校、戏剧(话剧)、电影、广播、电视在推行正音法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为了更好地推行正音法,不少国家编纂了专门的正音词典。(白水)

Zhengyin Shuyuan

正音书院 (Orthoepy Academy) 清雍正年间在福建、广东两省设立的北京语音训练班,由当地驻防的旗人任教。这种训练班的设置,是由于雍正六年(1728)下了一个谕旨,说:“每引见大小臣工,凡陈奏履历之时,惟有闽广两省之人仍系乡音不可通晓。”认为这些官员“赴任他省,又安能宣读训谕,审断词讼,皆历历清楚,使小民共晓乎?官民上下语言不通,必使胥吏从中代为传递,于是添设假借,百病丛生,而事理之贻误多矣。”因此谕令“福建、广东两省督抚,转飭所属府州县有司及教官,遍为传示,多方训导,务使语言明白,使人通晓,不得仍前习为乡音。”于是两省所属府州县都设立“正音书院”,招秀才举人学习京音(北京语音)。这种训练班到清代中叶逐渐停办。办的时间最长的是福建省的邵武县。直到现在,从邵武到浙西江山一带还通行一种官话,就是当时办“正音书院”的结果。广东省在清道光十六年(1836)出版莎彝等著的《正音咀华》,梁作辑的序中说:“恭读上谕,谆谆以闽广为念,务期谐声会意,娴习语言。”可见那时广东还在奉行这个谕旨。举办“正音书院”是封建时代统一官方语言的一项措施。(倪海曙)

Zhengzitong

《正字通》 一部按汉字形体分部编排的字书。明代崇祯末年国子监生张自烈撰。自烈字尔公,号芭山,江西宜春人。这部书总 12 卷,所分部首与梅膺祚《字汇》相同,凡 214 部。部首次序和每部之内的字次都按笔画多少来排,这也跟《字汇》一样,但是《字汇》注释比较简单,而《正字通》繁博得多。惟引书有的失注篇名,一字又有重见于两部的,都是缺点。清代修《康熙字典》即根据《正字通》,而加详备。《正字通》中所出方言俗语的意义,《康熙字典》有时不取,不免有贵古贱今之意。所以《正字通》在字典史上仍有一定的地位,足资参考。(周士琦)

Zheng Qiao

郑樵 (1104~1162) 中国宋代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字渔仲,生于宋徽宗崇宁三年,卒于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福建莆田人,居夹漈山,谢绝人事,勤于著述,聚书数千卷,好为考证伦类之学。所著《通志》200 卷,分年谱、纪传、二十略,在史学中独具一格。二十略中《七音略》、《六书略》是有关声韵文字的。《七音略》保存了宋代早期流传的四十三转的韵图,对研究《切韵》、《广韵》的音韵系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六书略》是用“六书”解说汉字构造的不同,首创“六书分类”之学。郑樵又著有《尔雅注》一书,不依傍旧注,别为新解,不失为一家之言。

(周祖谟)

Zheng Xuan

郑玄 (127~200) 中国东汉经学家、训诂学家。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县)人,生于汉顺帝永建二年,卒于献帝建安五年,《后汉书》卷三十五有传。玄少为乡啬夫,掌听讼,收赋税。后入太学受业,通习经传。于是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游学 10 余年,40 岁后始归乡里。因党锢之祸,杜门不出,从学者多至数百人。经 14 年,始蒙赦令,举贤良方正有道,辟大将军三司府,终不受命。平生著述甚富,长于古文经,有《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等书注,为学者所宗仰,传习不废。郑玄注经不专主一家,笺《诗》注《礼》,务求允当。尤精于名物训诂。心知经书中文字有假借,往往取本字解释,疑难之处涣然冰释。清人特重“汉学”,与许慎并称为“许郑”。

(周祖谟)



zhlyin

直音 用一个汉字直接标注另一个汉字读音的注音方法。甲音乙,是说甲和乙读音相同。例如,《尔雅》郭璞注:“钊音招。”意思是说“钊”和“招”读音相同。

从现有文献看,直音产生于汉末。唐代颜师古(581~645)注《汉书》,征引二十三家注,各家都有直音,其中汉末服虔、应劭最早。以后有全部用直音或主要用直音注音的专著,比如唐代唐玄度《新加九经字样》一卷,主要用直音注音;宋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记载:“《春秋直音》三卷,德清丞方淑智善撰,刘给事一止作序。”这部书全部用直音注音;明代章黼辑有《直音篇》,纂集了汉魏以后经传注释中的直音。

直音与读若相比,是注音方法的一个进步。读若只是指明两个字的读音相似,直音则指明注音字与被注音字同音,看了注音字,立即就能读出被注音字的准确读音。

直音也有一定局限,清代陈澧《切韵考》卷六说:“然或无同音之字,则其法穷;虽有同音之字,而隐僻难识,则

其法又穷。”事实的确如此。比如《广韵》“常列切”只有一个“折”字，没有跟它同音的字用直音法就不可能；又如《广韵》“尺制切”有8个字：“掣”、“蹇”、“蹇”、“蹇”、“蹇”、“蹇”、“蹇”、“蹇”，个个都是冷僻字，若用直音法，拿其中的任何一个给另外一个字注音，都等于白注。

尽管直音有这样的缺点，但从后汉以来，仍然经常有人采用，历经近两千年而不衰。这是由于人们注意克服它的缺点，发扬它的优点所致。当遇到一个字没有同音字或虽有同音字但很冷僻的情况时，就采用一个与被注音字同声韵而不同声调的字作注音字。这种做法起于唐代，唐玄奘称之为“但组四声，定其音旨。”他在《九经字样》中给“控”注音为“空去”，指明“控”的读音是“空”的去声，给“折”注音为“旃入”，指明“折”的读音是“旃”的入声，等等。《康熙字典》的注音是反切与直音并用，在找不到恰当字时，也采用改变声调的直音法。比如“𠂔”部“寡”字，在“古瓦切”下还有“瓜上声”的直音。隋以前的直音，情况有点复杂。现在举颜师古《汉书》注征引的各家直音为例，把直音的一些其他形式归纳如下：

① 甲音乙丙(或丙乙)之乙。用经典的成语，常用词语或俗语中的某一个字，为另一个字注音。《律历志》：“方尺而环其外，旁有廓焉。”郑氏注：“廓音条桑之条。”“条桑”出自《诗·七月》“蚕月条桑。”《地理志》：“垫江。”孟康注：“(垫)音重叠之叠。”“重叠”是常用词语。

② 甲音乙丙(或丙乙)。这与上一种形式相同，只是省略了“之乙”的字样。《礼乐志》：“群生嘒嘒，唯春之祺。”服虔注：“嘒音‘湛湛露斯。’”也就是“嘒音‘湛湛露斯’之湛”。“湛湛露斯”出自《诗·湛露》。《律历志》：“泛泛溟溟从高旂。”晋灼注：“溟音‘振旅闾闾。’”也就是“溟音‘振旅闾闾’之闾。”“振旅闾闾”出自《诗·采芣》。

③ 甲音乙丙(或丙乙)之乙。从形式上看与第一种相同，实际不是一回事。这种形式属于注音字有两读(或几读)，用表示注音字的某一个音义的固定词组来确定被注音字的读音。《五行志》：“匹马觐轮无反者。”服虔注：“觐音奇偶之奇。”“奇”有声母清浊两读，“奇偶”的“奇”是清声母读音，服虔认为“觐”与“奇”的清声母读音一致。《地理志》：“余杭。”孟康注：“杭音行伍之行。”《广韵》“行”有3个反切：胡郎切、户庚切、下更切(“更”，去声)，“行伍”的“行”是胡郎切，孟康认为“余杭”的“杭”应读胡郎切。

④ 甲音甲乙(或乙甲)之甲。注音字与被注音字相同，当被注音字有两读或几读的时候往往采用这种形式，在注音中兼有训释的作用。《高帝纪》：“明其为贼，敌乃可服。”应劭注：“为音无为之为。”“为”有平声、去声两读，应劭认为“为贼”的“为”与“无为”的“为”读音一致，平声。《武帝纪》：“夫刑罚所以防奸也，内长文所以见爱也。”晋灼注：“长音长吏之长。”“长”有平声上声两读，晋灼认为“长文”的“长”与“长吏”的“长”读音一致，上声。

⑤ 甲音甲乙(或乙甲)。这与第4种形式相同，只是省略了“之甲”字样。《高帝纪》：“沛侯濞重厚。”服虔注：

“濞音滂濞。”服虔的意思是“濞音滂濞之濞。”《广韵》“濞”有两读：匹备切，水声；匹诣切，水名。服注“音滂濞”，显然是取“水声”之义，应读匹备切。

⑥ 甲音乙。与第一种形式不同，这是通过注音来指明通假。《刑法志》：“政衰听怠，则廷平将招权而为乱首矣。”苏林注：“招音翹。翹，举也，犹卖弄也。”显然，苏氏意在指明“招”是“翹”的通假字，句中的“招”就应该按“翹”字的意义去理解，从而也就应该读“翹”字的音。这实际是以注音的形式训义，也就是通常说的破字，破读。《高帝纪》：“汉王跳，独与滕公共车出成皋玉门。”如淳注：“跳音逃，谓走也。《史记》作逃。”如淳认为“跳”即是“逃”的通假字，词义训“逃”，读音也应与“逃”相同，并引《史记》作“逃”为旁证。

①~③单纯注音，④⑤在注音中兼有训义的作用，⑥通过注音指明通假。《汉书》注的上述几种直音形式，基本上概括了直音的各种情况。(谢纪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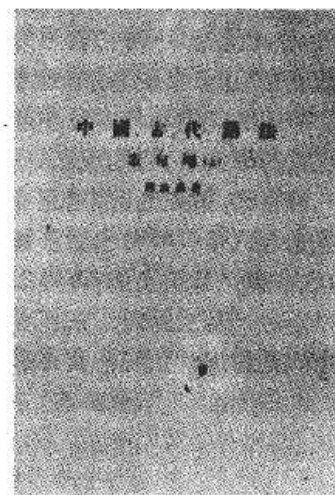
zhishi

指事 见六书。

Zhongguo Gudai Yufa

《中国古代语法》 古代汉语语法书。周法高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1959年出版称代篇，1961年出版造句篇，1962年出版构词篇。周法高(1915~)，语言学家，江苏东台人，1939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后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学习。1977~1985

年任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后任台湾东海大学中文研究所讲座教授。曾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多年从事古代汉语语法研究。《中国古代语法》以春秋战国的文献为主，上溯殷周，下探汉魏六朝的发展，是同类著作中最详尽的一部。称代篇分8章：首章论述代词的“位”和“序”；第2、第3章论人称代词和指示代词；第4、第5章论询问代词和其他代词；第6章论数词用法和计数法；第7章论代词性助词，主要谈“所”和“者”的用法；末章谈省略方法。造句篇分4章，对句型、词类、句子成分和复句分章论述。句型一章，主要论述判断句和说明句。词类按传统分实词和虚词，以下再分细目。谓语的格式有名谓式、使谓式、意谓式、主谓式、被动式等。复句分假设句、容认句、因果句、时间句、转折句、平行句6类。此外还讨论了语序、时间与方所、疑问与否定、语气与节律等。构词篇分4章，首章论音变及其与词类、句法的关系；



《中国古代语法》

第2章论重叠式,侧重叠音词、象声词、双声叠韵词的构词法和拟音;第3章论名词和动词的前附和后附词语;末章论复词及其组合形式。这本书的理论部分兼探古今中外诸家之说,亦有创见。书中材料和书证对今后研究古代汉语多所裨益。

(胡裕树)

Zhongguohua de Wenfa

《中国话的文法》(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见赵元任。

Zhongguo Shaoshu Minzu Yuyan Jianzhi Congshu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Collection of Descriptions of Chinese Minority Languages)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问题5种丛书之一。由丛书编辑委员会主编。主要读者对象是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语言工作者和民族工作者。从1980年起由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包括57种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原则上以语言为单位编写。每本简志包括以下内容:民族情况,语言的使用和分类情况,代表点的语音系统,词汇的一般特征、构词特点、借词情况,各词类的主要语法特点和句法等。方言差别较大和有文字的语言,简要介绍方言和文字的特点。每本简志都附有按一定顺序排列的语言或方言常用词1000~1500个左右。

(孙宏开)

Zhongguo shaoshu minzu yuyan jiaoxue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教学 (language teaching of Chinese national minorities) 中国有55

个少数民族,使用80多种语言,分属汉藏、阿尔泰、南亚、南岛、印欧等5个语系。文字有古文字(如蒙古、藏、彝、傣等民族的文字)和新创文字(如壮、苗、瑶、拉祜、傈僳等民族的文字)之分,文字性质和字母形式存在多种不同的类型。语言文字的使用情况大致可分为3种类型:一是使用本族语言文字的,如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二是除使用本族语言外还兼用汉语或别的少数民族语言的,如壮、仫佬、白、纳西等民族中有不少人兼用汉语,哈萨克、柯尔克孜、锡伯等民族中有不少人兼用维吾尔语;三是转用汉语的,如回族和满族,在壮、白、土家等民族中也有不少人转用汉语。但总的看来,少数民族中的大多数都使用本族语言,有文字的民族使用本族文字。各民族语言都经历过长期的历史发展,对各民族的社会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受到歧视、摧残,少数民族的语文教学不可能得到顺利发展。那时,只有少数地区有过少数民族语言教学,而且教学条件十分简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各民族享有使用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在少数民族地区广泛开展少数民族语言教学,发展使用少数民族语文的文化教育。中央民族学院在1951年建立了少数民族语文系,培养从事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教学、翻译的人才。到1985年止,

已开设了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柯尔克孜、壮、布依、傣、侗、水、黎、彝、哈尼、傈僳、拉祜、纳西、景颇、苗、瑶、佯、高山、满等语文专业。除了本科外,还开办了研究班、专修班,如突厥语研究班、古藏文专修班、彝语文献专修班等。为了帮助少数民族尽快地发展文化教育,还在地方和中央的民族院校培养了一大批从事少数民族语文工作的汉族干部。除了在学校进行少数民族语文教学外,各少数民族地区还在社会上广泛开展少数民族语文扫盲,培训了大量的师资。1981年以来,贵州省使用新创制的苗文、布依文、侗文进行扫盲,到1983年底已培训出近千名教师。在这期间,云南省也在12个少数民族中推行17种文字,培训了2000多名教师。

少数民族语言教学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①根据少数民族的意愿和实际情况安排教学。怎样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应由少数民族自己根据实际情况决定。不同的民族,由于语言文字的特点、社会的特点不同,语言教学的特点也不相同。语言教学的安排要有利于民族的发展和各民族的团结。②大力培养少数民族语文师资,特别要培养一批对本族语文有较高水平的少数民族教师。③做好语法、辞典、课外读物的编写、出版工作。这是搞好少数民族语言教学的基本建设。④研究不同方言区的人学习统一文字的办法和措施。中国许多少数民族语言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方言分歧,其中有些语言方言分歧很大,这对学习统一的文字带来许多困难。要研究标准音的选择问题、民族语言的规范问题、方言区的人怎样学习统一文字等问题。

(戴庆厦)

Zhongguo Wenfa Gexin Luncong

《中国文法革新论丛》 汉语语法讨论集,是1938~1943年间开展的文法革新问题讨论成果的汇编。主要作者有陈望道、方光焘(1898~1964)、傅东华(1893~1971)、张世禄(1902~)等。上海学艺出版社编成《中国文法革新讨论集》,1940年出版;陈望道改编成《中国文法革新论丛》,1943年重庆文津出版社出版;1958年《中国语文》杂志社重编,中华书局出版。这本集子的作者大多主张根据中国文法事实,借镜外来新知,参照前人成说,以科学的方法、谨严的态度缔造中国文法体系,反对《马氏文通》以来一些语法著作在不同程度上机械模仿外国的倾向。讨论的范围相当广泛,概括起来有5方面的问题:①怎样建立中国文法新体系;②怎样探索中国文法研究的新方法;③文言和白话文法要不要分开研究;④文法学和文字学、训诂学、词汇学的关系;⑤对于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1924)的评论。关于词类问题,陈望道提出“功能说”,主张依据词在组织中活动的功能来划分词类;方光焘提出“广义形态说”,认为应从词与词的相互关系、词与词的结合上来划分词类。他们都反对传统语法单凭意义划分词类的观点。在体制上否定了分部依附于析句、析句依附于分部的“一线制”,肯定了以析句合其纵、以分部连其横的“双轴制”。这次讨论,为摆脱机械模

仿作了宣传,所取得的成果,在以后的汉语语法研究中起了积极的作用。(参见彩图插页第25页) (胡裕树)

Zhongguo Wenfa Yaolue

《中国文法要略》 见吕叔湘。

Zhongguo Wenzhi Gaige Welyuanhui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 (Committee for Language Reform of China)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文字改革机构。直属国务院,成立于1954年12月。成立时有委员23人:丁西林、王力、朱学范、吴玉章、吕叔湘、邵力子、李维林、林汉达、胡乔木、胡愈之、马叙伦、韦恂、陆志韦、傅懋勤、叶恭綽、叶圣陶、叶籁士、董纯才、赵平生、黎锦熙、聂绀弩、魏建功、罗常培。吴玉章为主任委员,胡愈之为副主任委员,韦恂、丁西林、叶恭綽为常务委员;叶籁士为秘书长。1959年,国务院任命胡愈之、韦恂、丁西林、叶籁士为副主任。1980年3月,由于不少委员去世,又增补委员10人:马大猷、王竹溪、朱德熙、陈翰伯、张友渔、张志公、周有光、钱伟长、倪海曙、曾世英。由董纯才为主任委员,胡愈之、张友渔、吕叔湘、王力、叶籁士为副主任委员,倪海曙为秘书长。1983年7月增补倪海曙、唐守愚为副主任委员,唐守愚兼秘书长。1984年8月,又改由刘导生为主任委员,陈原、陈章太、王均、王力、胡愈之、吕叔湘、王力、叶籁士、倪海曙、唐守愚、周有光为顾问。1985年12月16日,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三十年中,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执行当前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和整理汉字,推广普通话,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做了大量工作,特别在头10年,做的工作最多。在汉字简化和整理工作方面,公布《汉字简化方案》(1956),编印《简化字总表》(1964);与文化部联合发布《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1955);并以常用汉字代替生僻地名35处;又与文化部联合发布《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1964)。在推广普通话方面:与教育部、语言研究所联合举办普通话语音研究班9期(1956~1961);与教育部和共青团中央联合召开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四届;与语言研究所合作成立普通话审音委员会(1956),审议异读词1800多条和地名读音190多个,编成《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在推行汉语拼音方面: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秋季起,全国小学开始教汉语拼音。在山西等省市开展注音识字,利用汉语拼音帮助扫除文盲,并在山西万荣县取得了成功的经验。中共中央为此于1960年9月发出《关于推广注音识字的指示》。此外在少数民族创造文字和少数民族及外国人学习汉语等方面,汉语拼音方案也发挥了作用。在头10年中,文改会所属文字改革出版社编辑出版了600多种文改书刊,其中包括大量注音读物。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工作遭到严重的破坏。以后逐步恢复,主要做了下列各项工作:

利用计算机对《辞海》所收16000多字进行了汉字结构及其构成成分的分析统计。利用计算机对1977~1982年间的汉字使用情况进行了频度统计。利用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抽样统计了10个省市的姓氏人名用字。对福建、广东、广西地名生僻字进行了调查,并编制这3个省区的地名生僻字表。对《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作了修订。使汉语拼音方案获得国际公认,由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和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分别决定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中国地名和在文献工作中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利用汉语拼音进行小学语文教学改革,即“注音识字、提前读写”实验。发表《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试用稿)》。在上海、广东、湖北、吉林、河南等省市成立省市一级的文字改革委员会。另有一些省成立文字改革办公室。(叶籁士)

Zhongguo Xiandai Yufa

《中国现代语法》 见王力。

Zhongguo zhuminzu wenzi

中国各民族文字 (writing systems of nationalities in China) 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文字。

中国民族文字的种数

中国境内有56个民族。汉、回、满3个民族通用汉文,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朝鲜、彝、傣、拉祜、景颇、锡伯、俄罗斯12个民族各有自己的文字。这些文字多数都有较长的历史。其中蒙古族使用一种竖写的拼音文字。这种蒙古文通用于蒙古族地区。居住在新疆的蒙古族还使用一种以通用的蒙古文为基础适合卫拉特方言特点的拼音文字。云南傣族在不同地区使用4种傣文。西双版纳和附近孟连等地区使用傣仂文,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大部分地区和景谷、双江、耿马、镇康、沧源的一部分傣族地区使用傣哪文,在德宏地区的瑞丽、潞西、遮放和澜沧、耿马部分地区的傣族使用傣绷文,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傣族使用金平傣文。因为蒙古族使用两种蒙文,傣族使用4种傣文,回族和满族使用汉文,所以上述15个民族共使用17种文字。此外,傈僳族中大部分信仰基督教的群众,使用一种用大写拉丁字母及其颠倒形式的字母拼写傈僳语的文字,还有维西县的一两个区使用当地农民创制的傈僳音节文字“竹书”。云南省东北部一部分信仰基督教的群众使用一种把表示声、韵、调的符号拼成方块的苗文。云南佤族中信仰基督教的少数群众使用拉丁字母形式的佤文。壮族、白族和瑶族的群众中,还有一部分人使用在汉字影响下创制的方块壮字、方块白文和方块瑶字。综上所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已使用文字的民族有21个,文字种类有24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又有壮、布依、苗、侗、哈尼、傈僳、佤、黎、纳西、白、土、瑶共12个民族和景颇族中说载瓦语的人使用新创制的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其

中苗族因方言差别大,分别给黔东、湘西和川黔滇3个方言创制了文字,给滇东北次方言也设计了一种文字方案。因此,现在共有16种拉丁字母形式的新文字(见表)。

中国民族文字一览表

民族	使用文字	民族	使用文字
汉	汉文	傣	傣仂文 傣哪文 傣绷文 金平傣文
回	汉文		
满*	汉文		
蒙古	蒙古文 托忒蒙古文	壮	新创壮文 方块壮文
藏	藏文	拉祜	拉祜文
维吾尔	维吾尔文	锡伯	锡伯文
哈萨克	哈萨克文	俄罗斯	俄文
柯尔克孜	柯尔克孜文	瑶	新创瑶文 方块瑶文
朝鲜	朝鲜文		
苗	新创黔东南苗文 新创湘西苗文 新创川黔滇苗文 新创滇东北苗文 新创方块拼音苗文	彝	音节文字
		傈僳	新创傈僳文 大写字母 傈僳文 竹书
景颇	新创景颇文 新创载瓦文	白	新创白文 方块白文
布依	新创布依文	佤	新创佤文 旧佤文
哈尼	新创哈尼文	黎	新创黎文
侗	新创侗文	纳西	新创纳西文
土	新创土文		

* 黑龙江爱辉、富裕两县的个别农村已经转用汉语的满族老人中,还有人会说满语并懂满文。

使用汉文的少数民族除回族和满族外,还有其他一些民族的部分人(没有列入表内)。除以上列举的文字以外,还有一些在历史上使用过,后来停止使用的文字。这些文字是突厥文、回鹘文、察合台文、于阗文、焉耆-龟兹文、粟特文、八思巴字、契丹大字、契丹小字、西夏文、女真文、东巴图画文字、沙巴图画文字、东巴象形文字、哥巴文、水书、满文等17种文字。这17种在历史上曾经使用过的文字,加上现在使用的40种文字,共有57种文字。

中国民族文字结构的分类

中国不但语言类型较多,文字类型也很丰富。从类型上看中国文字有非字母文字和字母文字两大类。

非字母文字 属于这一类的文字还可以细分为4类。

图画文字 在中国发现的图画文字有两种。一种是云南省纳西族的东巴图画文字,另一种是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尔苏人的尔苏沙巴图画文字。这两种文字共同

的特点是:①尚未形成固定的行款,有从左向右的,也有由右到左的。既有由上到下的,也有由下到上的。②常常利用字组构成的形象来表达比较复杂的意思。③读出来的经文中的词语,一般都比写出来的字多。尽管这两种图画文字还各自有些特点,它们的共同点说明,这类图画文字代表着从图画发展到文字的第一个阶段。东巴图画文字经书的册数很多,仅云南社会科学院东巴文化研究室和北京图书馆就收藏了8000多册,再加上其他单位收藏的,总数在1万册以上。在国外有些图书馆也收藏了一些。例如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了3000多册,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了500多册。关于纳西族图画文字的创始,现存纳西族石刻《木氏历代宗谱》中有“十六世祖牟保阿琮(约在12世纪下半叶至13世纪上半叶之间)且制本方文字”的记载。有些学者认为这种文字的创始时代应当在11世纪或者更早。

象形文字 主要是指文字形体的来源说的。它不只包括整体象某事物形体或状态的字和以象形字为基础构成的指事字,而且也包括由单体象形字结合构成的会意字和形声字。根据这个意见来看上古汉字,如商周时代甲骨、钟鼎上的文字,也都是象形文字。在大多数词根是单音节的汉藏语系语言中使用这种象形文字,基本上都是一个字读一个音节。云南纳西族的象形文字和贵州水族的水书中的大部分字,都是一个字读一个音节。纳西族的象形文字有以下3个特点:①一个字只能读一个音节;②以单体象形字为主,也有形声字、会意字;③就文字的作用说,已经由表意发展到表音。因此,只要两个字同音或语音相近就可以互相借用,同音和音近假借的情况特别多。用这种象形文字写的东巴已经还很少。它可能是在音节文字哥巴文的影响下产生的。纳西族由使用原始的图画文字进到一字一音的象形文字,是一个重大的发展。

楷书化汉字和在汉字影响下创制的几种文字 中国现在通用的楷书汉字,即使从晋初算起,也已经有1700多年了。它大体上是古代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和形声字通过隶书的楷体化。其中以形声字占绝大多数,其次是会意字。这两种造字法至今还是孳生新字的主要方法。后来创造的新字,主要是形声字,也有少量的会意字,在楷书汉字影响下创制的少数民族文字可分两类。

① 字形结构虽受汉字的影响,但有自己的特点,借用汉字不太多。属这一类的有契丹大字、西夏文和女真文。契丹大字是在汉字影响下创制的一种表意文字,汉语借词一般照汉字书写。据历史记载,女真文本有大字和小字两种,但是现在发现的女真文资料,从文字体系上看不出区别,不能断定是大字还是小字。这种女真文是参考汉字和契丹字创制的方块字,构成女真字的基本字。一部分来自汉字,一部分来自契丹大字和小字。来自汉字的基本字大半省去一部分笔画。契丹大字和女真字虽然都受汉字形体的影响,但是都有自己的造字方法。西夏文主要使用会意和形声两种方法,这显然是汉字的影响。

西夏字一直没有形成像汉字那样有规则的偏旁体系,并且使用把一个字里的两部分互换位置来构成新字的造字法。西夏文和女真文还大量使用省笔构字法,可能也受汉字省笔构字的影响。

③ 大量使用音读汉字和训读汉字的方法表达自己的语言,也用形声或其他方法创制表达本族语词的新字。方块壮字、方块白文和方块瑶字,都属于这一类。其中方块白文使用音读和训读法比较多。方块瑶字的构字法,各地不大一致。有的地方自创了不少字形,有的地方使用汉字比较多。这类方块文字是在较早时期产生的。例如,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发现的唐代用汉字写的碑文中,就夹用了一些方块壮字,在唐代樊绰的《蛮书》中,也有少量用方块白文写的字。在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境内还有明代白族用方块白文写的一些碑文。

音节文字 音节文字的共同特点是每个字表示一个音节,笔画比较简单。其中少数字来源于稍加变化的汉字,自己创制的象形字和指事字为了与其他字体协调一致,相当大的一部分已经不容易看出原来的形象。相当多的字体不能分析。这一类文字,目前发现的有3种,即彝文、纳西族的哥巴文和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县部分地区的傈僳族使用的“竹书”。这3种音节文字创制的时代以彝文最早,现存文献有明嘉靖年间的碑铭。现在凉山彝族正在推广规范彝文。云南和贵州的彝文也正在进行规范化的研究工作。哥巴文产生时代比较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已经不使用了。纳西族现在教学中使用1957年设计、1982年又经过修订的拉丁字母拼音文字。傈僳族的竹书是当地一位农民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创制的,其中有些字的笔画较多。现在这种音节文字还有一部分群众使用。

以上是属第1大类非字母文字的4类文字。第1类图画文字包括纳西族东巴图画文字和尔苏人沙巴图画文字两种;第2类是象形文字,包括纳西族的象形文字和水族的水书两种文字;第3类楷书化汉字和在汉字影响下创制的契丹大字、西夏文、女真文、方块壮字、方块瑶字和方块白文7种文字;第4类音节文字包括彝文、纳西族的哥巴文和傈僳族的音节文字竹书。总括起来,属于第一大类的非字母文字,共有14种。

字母文字 也称拼音文字。中国民族的字母文字可按字母形式的来源和其他情况,分成以下7类:

藏文、八思巴字、傣文、于阗文、焉耆龟兹文 这些文字的字母都是直接或间接参考印度的某种字母创制的。藏文是7世纪时参考梵文字母制订的。有30个辅音字母和4个表示元音的符号。由左向右横行书写。八思巴字是参考藏文字母设计的,但书写行款不像藏文而是仿照蒙古文,由上向下竖写,由左向右移行。1269年开始推行时,有41个字母,以后增加到57个字母。其中有7个元音字母。傣文是13世纪仿照印度南部的某种字母创制的。西双版纳的傣仂文和金平傣文的字母都分高低两组,每组表示3个声调。德宏傣哪文和傣绷文都不分高低音组,

原来在文字上都不能区别声调,50年代初期,为傣哪文设计了一套表示声调的符号,其他方面也有改进。

于阗文使用印度的婆罗米字母直体和佉卢虱咤(简称“佉卢”)两种字母书写。婆罗米字母自左向右横行书写,佉卢字母自右向左横行书写。在字母形体上也相差很大。在于阗地区已发现一些汉文和于阗文并用的文书,以及3世纪的汉文和佉卢字母并用的“马钱”。焉耆-龟兹文,旧称“吐火罗文”,这种文字书写的语言和于阗文同属印欧语系。焉耆-龟兹文使用婆罗米字母斜体、拼写焉耆和龟兹两种方言。文献多属5~8世纪。

粟特文、回鹘文、蒙古文、满文、锡伯文 粟特文来源于波斯时代的阿拉米文草书。回鹘文字母是参考粟特字母创造的。以后蒙古文字的制订参考了回鹘字母,满文字的制订参考了蒙古文字母。锡伯文是满文的延续。这5种文字的字母,有一线相承的关系。书写行款一致,都是由上向下竖行书写,由左向右移行(粟特文原先曾由右向左横行书写),同一个字母的单写,在词头、词中、词尾,形式上有些差别。粟特文不明确表示元音,回鹘文、蒙古文、满文和锡伯文都是表音素的字母文字。

察合台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柯尔克孜文 这4种文字都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同一字母的单写,在词头、词中、词尾,书写形式略有不同。都是由右向左横行书写,由上向下移行。察合台文不重视元音的区别,其他3种文字重视元音的区别。

突厥文 根据突厥文献早期发现的地点,又称鄂尔浑-叶尼塞文。有人根据字母形体与北欧如尼文相似,曾称突厥如尼文。因为这种文字一个字母可以表示某些元音和辅音的结合体,所以它是一种音素字母和复合字母混合型的文字。一般由右向左横行书写。使用时代约在6~10世纪。

朝鲜文、契丹小字和方块苗文 这3种文字在汉字的影响下,都把属于一个音节的字母拼成一个方块。1444年创制的朝鲜文有19个表示辅音和21个表示单元音和复元音的字母。这些字母按规定位置以音节为单位拼成方块字形。契丹小字创于10世纪。它的字素一般称原字或小原字。一个原字可以只表示一个辅音或元音,有的表示一个复元音,或表示辅音和元音的结合体。据估计共有300多个原字,现在只能认识100多个原字。用1、2个原字或多到6、7个原字大体上拼成一个方块。行款是自右向左,竖行书写。既可直写,又可横写。方块苗文是1905年英国基督教传教士和苗语滇东北次方言区几个知识分子为拼写当地方言共同创制的一种苗文。每个字用一个表示声母的大字为字的主体,表示韵母的小字母放在大字母的上方、右上角、右侧或右下角兼表声调。因为每个字都大体上构成一个方块,所以称为方块苗文。

俄文 新疆的伊犁、塔城等地有2900俄罗斯人,他们使用俄文。

拉丁字母形式的文字 拉祜族、景颇族和佤族的文字,都是拉丁字母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就使用。

前两种文字现在仍通用,拉祜文做了一些改进。旧傣文只有少数基督教徒使用,新傣文正在推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创制民族文字的工作 有准备有计划地为少数民族创制文字是在中国科学院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组织领导下进行的。50年代初,有重点地进行了小规模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然后开展了全国少数民族语言的普查。调查作用是多方面的,如为进行民族识别工作准备语言和社会方面的材料,了解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情况和群众对自己的语言文字问题有什么意见。其中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帮助需要创制文字的民族创制文字。从1956年开始,一些需要创制文字的民族不断地要求正在讨论的汉语拼音方案早日确定,以便他们考虑汉语同他们的语言相同相近的音,能在他们的文字方案中采用相同的字母表示,这就有利于互相学习语文和交流文化。1956年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起草了《关于少数民族文字方案中设计字母的几项原则》。经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讨论后,上报国务院。周恩来亲自主持国务会议,讨论修改通过了这个文件。文件的内容如下:

“ (1) 少数民族创造文字应该以拉丁字母为基础,原有文字进行改革,采用新的字母系统的时候,也应该尽可能以拉丁字母为基础。

(2) 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相同或相近的音,尽可能用汉语拼音方案里相当的字母表示。

(3) 少数民族语言里有而汉语里没有的音,如果使用一个拉丁字母表达一个音的方式有困难的时候,在照顾到字母系统清晰、字形简便美观、字母数目适当、便于使用和教学的条件下,根据语言的具体情况,可以采用以下的办法表示:(a)用两个字母表示一个音;(b)另创新字母或者采用其他适用的字母;(c)个别情况也可以在字母上附加符号。

(4) 对于语言中的声调,根据实际需要,可在音节末尾加字母表示或采用其他办法表示或不表示。

(5) 各民族的文字,特别是语言关系密切的文字,在字母形式和拼写规则上应该尽量取得一致。”

正是因为创制文字的工作中基本上贯彻了上述5项原则,所以在新设计的文字方案中,能够使各种语言共同音素,在书面语言里有相同相近的面貌。同时也保证了少数民族语言中特有的语音,得到充分的表达。这是中国语言规划的一项重要内容。在上述5项原则的指导下,根据语言调查研究的成果,开展了少数民族文字的创制工作。到目前为止,壮、布依、苗、侗、哈尼、傈僳、佤、黎、纳西、白、土、瑶12个民族和景颇族中说载瓦语的人创制了拉丁字母形式的拼音文字。现在还有一些有自己的语言而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他们将根据自己的意愿,创制文字或者选用现有对他们适用的文字。

参考书目

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4。

王静如:《西夏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八、十一、十三,北平。

清格尔泰等:《契丹小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5。

史金波等:《文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3。

李范文:《同音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

(傅懋勳)

Zhongguo zhuminzu yuyan

中国诸民族语言 (languages of nationalities in China) 中国境内各民族的语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实行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政策。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科研机构、民族教育机构,不断地进行少数民族语言和社会历史的调查。特别是在1956年组织了700多人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队、195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了500多人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分赴民族地区进行调查。这两种实地调查不但有力地推进了专业研究,而且为民族识别工作提供了必要的依据。到目前为止,已经确定了56个民族。在55个少数民族中,一个民族说一种语言的比较多。有的民族说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民族语言。例如:裕固族一部分人说属于突厥语族的西部裕固语,另一部分人说属于蒙古语族的东部裕固语。瑶族的绝大部分人说属于苗瑶语族瑶语支的勉语,一小部分人说属于苗瑶语族苗语支的布努语,另一小部分人说属于壮侗语族侗水语支的拉珈语。在一个民族说几种语言的情况下,民族内部的交际多使用汉语或其他互相懂得的一种语言。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语言学工作者,调查了一些新语言,如四川省的纳木义话,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侬话,海南岛的回辉话(其归属有待进一步确定)。其中也有在早期文献中已有著录,现在还活着的语言,如四川省的尔苏语就是华夷译语中的多续语。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数目可能在80种以上。

语言系属 中国民族语言除朝鲜语和京语系属未定外,分属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南岛语系和印欧语系。

汉藏语系 包括汉语和藏缅、壮侗、苗瑶3个语族。汉语在语言系属分类中相当于一个语族的地位。据1982年中国人口调查的数字估计,说汉语的人口有96800多万(某些少数民族一部分转用汉语的人口,未计算在内)。汉语有商代的甲骨文、铜器铭文和后世极为丰富的典籍。历代的字典、词典、诗词、韵文、韵书、声训的资料以及汉字本身的结构都给汉语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用汉字记录的少数民族语言资料,对古代某些民族语言的研究,也可作为重要的参考。

中国说藏缅语族语言的人口约有1560万。分布在西藏自治区、青海、甘肃、四川、云南、贵州、湖南、湖北等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包括藏语、门巴语、珞巴语、僜语、嘉戎语、羌语、普米语、尔苏语、独龙族、土家语、彝语、傈僳语、纳西语、哈尼语、拉祜语、白语、基诺语、怒语、景颇

语、阿昌语、载瓦语等。公元58~75年间的《白狼王歌》是用藏缅语族的一种语言写成的。唐宋以来南语的写卷、西夏语文的文献和各类字书,特别是唐以来藏语碑铭、木牍、写卷、刻印经典等用藏文写下的文献,对语言史和历史的研究,尤为重要。唐代樊绰《蛮书》所记乌蛮、白蛮语也属藏缅语族。纳西族的图画文字、象形文字和哥巴文的经书和彝文的碑铭、写本,也是藏缅语族的重要文献。藏缅语族语言还分布在缅甸、印度、锡金、不丹、尼泊尔、巴基斯坦和泰国。

中国说壮侗语族语言的人口有1900多万。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和云南、贵州、湖南、广东4省。包括壮语、布依语、傣语、侗语、水语、仫佬语、毛南语、拉珈语、黎语、仡佬语、佯僐语、莫话等。公元前500年左右的《越人歌》的语言属于这个语族。傣语有13世纪以来的文献。壮侗语族语言还分布在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和印度。

中国说苗瑶语族语言的人口约有530万。分布在贵州、湖南、云南、四川、广东5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包括苗语、布努语、勉(瑶)语和畲语(畲族大多数人已经转用汉语客家方言。说畲语的只有广东省惠东、海丰、博罗、增城4县的一些山村的居民1000多人)。苗瑶语族语言还分布在越南、老挝、泰国。

美国学者白保罗把壮侗和苗瑶两个语族的语言列入他提出的澳泰语系。中国学者多不同意这种意见,如王辅世在《民族语文》1986年第1期发表的《苗瑶语的系属问题初探》一文,仍主张苗瑶语族属汉藏语系,认为白保罗把苗瑶语列入澳泰语系证据不足,并对白保罗构拟古音的方法,提出了不同意见。

阿尔泰语系 从19世纪中叶起的一个时期内,不管称阿尔泰,还是称乌拉尔-阿尔泰,几乎都把乌拉尔诸语言和阿尔泰诸语言合成一个语系。自从芬兰学者G.J.兰司铁在《阿尔泰语言学导论》等著作问世后,已经确定乌拉尔诸语言应属另外一个语系。阿尔泰语系包括蒙古、突厥、满-通古斯3个语族的观点已经得到相当多学者的赞同。但是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这3个语族不应当合成一个语系。争论的焦点仍然在于大量相同相近的词根和附加成分同源还是借贷的问题。

中国说蒙古语族语言的人口约有390万。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黑龙江、辽宁、吉林、青海、甘肃等省。蒙古语族包括蒙古语、达斡尔语、东乡语、东部裕固语、土族语和保安语。有的学者认为古代的契丹语可能属于这个语族。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蒙古语,苏联的布利亚特语,卡尔梅克语(也称卫拉特语)和阿富汗的莫戈勒语也属这个语族。蒙古族有13世纪20年代回鹘式蒙古文的碑铭、元明以来的回鹘式蒙古文和八思巴字的文献。还有用汉字译音的《蒙古秘史》和其他重要文献。

中国说突厥语族语言的有700多万人,分布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海、甘肃、黑龙江等省。中国境内突厥

语族包括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又称吉尔吉斯语)、乌孜别克语(又称乌兹别克语)、塔塔尔语(又称鞑靼语)、撒拉语、西部裕固语和图瓦语。突厥语族语言还分布在苏联、土耳其、伊朗、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蒙古人民共和国、阿富汗和其他一些国家。突厥语族较早的文献是6~10世纪的突厥文的碑铭、写卷和8~15世纪的回鹘文的碑铭、宗教经典,还有11世纪的《突厥语词典》,新疆维吾尔学者已将这个珍贵文献译成维吾尔文出版。

中国说满-通古斯语族(也称通古斯-满语族)语言的人口约有4.6万。分布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和黑龙江省。满-通古斯语族包括满语、锡伯语、赫哲语、鄂温克语和鄂伦春语。现在满族通用汉语。黑龙江省爱辉和富裕两县还有少数农村的满族老人会说满语。12世纪的女真语文献属这个语族。满-通古斯语言还分布在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现存女真文最早的文献是1185年的《得胜陀颂》碑铭。1599年创制的满文有丰富的文献。

南岛语系 又称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中国台湾省高山族语言属这个语系的印度尼西亚语族。高山族使用派宛、阿眉斯、布嫩、鲁凯、赛夏、卑南、邵、泰雅尔、赛德、邹、沙、卡、雅美等语言。属印度尼西亚语族的语言还分布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尔加什等国。

南亚语系 中国属于这个语系的语言都属孟-高棉语族。人口约37万。分布在云南省南部边疆地区。现在研究工作做得较多的是佤语、德昂语、布朗语。据初步了解,还有克木语、户语属这个语族。孟-高棉语族的语言还分布在缅甸、柬埔寨、泰国和印度。

印欧语系 中国属这个语系的现代语言只有属斯拉夫语族的俄语和属印度-伊朗语族的塔吉克语。说俄语的有2900多人,说塔吉克语的有26500人,共约3万人。中国塔吉克族使用的语言和苏联的塔吉克语不同。苏联的塔吉克语属印度-伊朗语族东支,中国塔吉克语属印度-伊朗语族西支。中国古代属印欧语系的语言有粟特语和于阗塞语、焉耆-龟兹语,并有3、4、5世纪以来几百年间的文献。

朝鲜语和京语的系属未定。阿尔泰语言学家兰司铁把朝鲜语列入阿尔泰语系,但仍有不同意见。京语属南亚语系还是属汉藏语系或另有归属,也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 中国有些少数民族在古代就有自己的语文学家。他们对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进行过研究,写出了著作,取得了重要成就。藏族学者图弥三菩札于7世纪参考梵文,根据藏语的语音结构,创制了藏文。他还写出了主要讨论结构助词的《三十颂》和论语音、正字法及缀连规则语法意义的《性入法》。19世纪中叶,司都、却吉久赞出版了《藏文文法》。维吾尔族至晚在8世纪就参考粟特文创制了回鹘文。维吾尔族学者马合木德·

喀什噶里在 11 世纪调查了西域和中亚一带的突厥语言,编写出了《突厥语词典》,使我们能够了解 900 年前突厥语言的口语结构以及历史、地理、民俗等情况。蒙古族学者柳思吉斡节儿于 14 世纪初写的《蒙文启蒙》奠定了蒙文正字法的基础。18 世纪丹金达格巴的《蒙文启蒙诠释》、毕里贡达赖的《蒙文授业启蒙》都受到柳思吉斡节儿的影响。蒙族学者在清代编的词书中有满-蒙、满-汉-蒙对照词典和用蒙古语解释的《二十一卷本蒙文词典》。

欧洲学者尽管在 18 世纪就写过关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书籍,但是可以称得上语言学著作的,应当从 19 世纪上半叶说起。1834 年 A. de K. 乔玛,出版了《藏语语法》、1835 年 A. A. 博布洛夫尼柯夫(1821~1865)出版了《蒙古语语法》以后,关于藏语、蒙古语、突厥语的语法书和词典也陆续问世。在突厥语方面,还出版过方言词典、古突厥语词典和词源词典。美国和日本学者也写了一些关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著作。满语、土族语、达斡尔语和台湾高山族语言也有外国学者编写的著作。南方少数民族语言特别是云南、贵州的彝、苗、景颇、德昂(崩龙)等语言,1949 年以前也有外国学者编写的词典、语法一类的书籍。

中国现代语言科学工作者从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调查研究少数民族语言。赵元任的《广西瑶歌记音》和李方桂的《广西凌云瑶语》于 1930 年发表。此后,李方桂调查了壮侗语族的多种语言并且出版了《龙州土语》(1940)、《莫话记略》(1943)等著作。他在 1936~1937 年英文中国年鉴里写的《语言和方言》一文为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系属分类奠定了基础。40 年代罗常培调查过独龙、景颇、白、傣等族的语言。1942 年发表了《贡山俅语初探》,1944 年连续发表了三篇论藏缅族父子连名制的论文。闻宥调查了羌、彝等语言,发表了《汶川萝卜寨羌语音系》(与傅懋勳合作,1943)、《汶川瓦寺祖羌语音系》(1943)、《理番后二枯羌音系》(1945)等论文。马学良调查过苗语、彝语,发表了《湘黔夷语掇拾》(夷语,主要指苗语)(1938)、《保文祭经的种类达要》(1947)、《保文作斋经译注》(1949)。傅懋勳调查过彝语、纳西语、白语、羌语,出版了《维西么些语研究》(1940、1941、1943)、《丽江么些象形文古事记研究》(1948)。李霖灿、张琨、和才合著的《么些象形文字字典》和《么些音字字典》先后于 1944、1945 年出版。张琨于 1947 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发表了《苗瑶语声调问题》。他还调查过羌语、嘉戎语、藏语,论著多在 40 年代以后发表。

在 30、40 年代,虽然对某些少数民族的几个地方的语言进行过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对一种语言的方言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较少,调查的语种也不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1956 年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联合举办了少数民族语言调查训练班,组织了 700 多人的 7 个语言调查队,分赴有少数民族语言的 16 个省区调查了蒙古、达斡尔、东乡、土、保安、裕固、藏、彝、拉祜、纳西、傈僳、哈

尼、白、景颇、阿昌、羌、壮、布依、傣、侗、水、仡佬、毛难、黎、仡佬、土家、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塔塔尔、撒拉、苗、瑶、畲、锡伯、鄂温克、鄂伦春、赫哲、佤、塔吉克、京等 42 个民族的语言。三年的语言普查,主要取得以下成绩:①对有方言的语言,提出了划分方言的科学论据;②对各个语言的结构、语言亲属关系、语言之间相互影响,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并且有了比较全面的理解;③帮助要求创造文字的民族,提出了关于标准语基础方言和标准音的意见,并设计出拼音文字的方案;④在调查研究的实践中和专家的指导下,大批少数民族和汉族的语言学专业科研人员成长起来了。1960 年以后,除了不断地对调查资料不足的语言进行补充调查以外,又新调查了一些语言,如怒、独龙、基诺、门巴、洛巴、僮、德昂、布朗、回辉、尔苏、侏等语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共 57 本,已于 1986 年底出齐。台湾省的高山族说的语言现有十几种。已经发表的著作有李方桂的《邵语记略》(1956)、董同龢的《邹语研究》(1964)、李壬癸的《鲁凯语的结构》(1973)。在大陆上汉族和高山族的语言学工作者合作研究了台湾的阿眉斯、排湾、布嫩、泰耶尔 4 种语言并已出版了阿眉斯、排湾和布嫩三种语言的简志。对于新发现的一些语言或方言,也正在进行研究。1986 年上半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举行过一次语言识别学术讨论会,讨论了如何区别语言和方言的问题。现在这项工作仍在进行。

下面简略介绍一些研究著作。50 年代出版过罗常培、邢庆兰的《莲山摆夷语文初探》(1951)、马学良的《撒尼彝语研究》(1951)、袁家骅的《阿细民歌及其语言》(1953)、高华年的《扬武哈尼语初探》和《彝语语法研究》(1955)。这 5 本书都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调查的材料写成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调查的资料写成的著作很多。调查报告如:《藏语拉萨日喀则、昌都话比较研究》(1958)、《布依语调查报告》(1959)、《黎语调查研究》(1983)、《阿里藏语》(1983)。语法研究如:《布依语语法研究》(1956)、《壮语语法研究》(1957)、《景颇语语法纲要》(1959)、《傈僳语语法纲要》(1959)、《现代蒙语语法》(1980)、《藏文文法教程》(1981)、《壮语语法研究》(1985)、《苗语语法(黔东南方言)》(1986)。词典编写工作最多的是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对照的词典,如:《汉蒙词典》(1964)、《蒙汉词典》(1976)、《汉维词典》(1974)、《维汉词典》(1982)、《哈汉词典》(1980)、《汉景词典》(1980)、《景汉词典》(1982)、《佤汉简明词典》(1983)、《汉壮词典》(1983)、《壮汉词典》(1984)、《彝汉词典》(1985)、《傈汉词典》(1985)。于道泉主编的《藏汉对照拉萨口语词典》(1983)是第一部收词最丰富的藏语拉萨口语词典,对口语学习和历史比较研究,都有重要作用。张怡荪主编的《藏汉大词典》(1985)是迄今为止国内外出版的藏语词典中收词和解释最丰富的一部三卷本词典,不但对藏族语言文学的研究,而且对藏学其他方面的研究,也都是有益

的。在50年代创制少数民族文字时期,出版过《壮汉词汇》、《苗汉简明词典》(黔东南方言和川黔滇方言各一种)。1958~1962年间陆续出版了布依汉、汉布依、侗汉、汉侗、苗汉(滇东北次方言)等简明词典。

必须提到的还有研究民族语言的论文。其中特别是关于语音和语法结构的描写,或者比前人深入,有独到见解,或者探讨新的领域做出了很好的成绩。在语音方面,有的研究彝语支松紧元音的来源,有的探讨复辅音的演变,有的利用电子计算机分析藏语声调或研究藏语、蒙古语、维吾尔语输入电子计算机的问题。在语法方面,有的对一些语言的使动、时态、趋向、领属等范畴做了比较深入的分析,有的对维吾尔语的陈述语气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有的对蒙古语族和突厥语族的某几种语言提出了确定和非确定语气的范畴,有的对满-通古斯语族的个别语言提出了与此相应的亲知与非亲知语气的范畴。还有一些文章研究民族标准语和方言的关系,以及标准语的规范和正字法问题。有的文章探讨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翻译原则和技巧问题。在词汇方面,有的研究词和词之间的音义关系,有的研究少数民族语言中汉语或外国语的借词。过去研究汉语对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较多,后来也出现了研究少数民族语言对汉语的影响或少数民族语言之间互相影响的论文。还有研究社会结构对语言结构的影响、研究双语现象、研究混合语、研究敬语和禁忌语的论文。关于语言历史比较的研究也写了一些论文。如有的探讨苗语声类和韵类,并构拟原始苗语的形式;有的探讨汉语和壮侗语族或其他语族的同源关系。有的文章论证同语族的某个侧面,如壮侗语族量词的产生和发展、藏缅语族某些语言弱化音节探源、古苗瑶语鼻冠闭塞音声母在现代方言中反映形式的类型,有的论证蒙古语族语言的语音对应,有的泛论突厥语族语言的特点。研究少数民族古代文献的论文,不断地增多,如回鹘文《玄奘传》第七卷研究、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三弥底经》首品残卷研究及《弥勒会见记》第三品(1~5页)研究,《元朝秘史》语言的数范畴等。还有多篇文章谈对中国民族语文政策的体会,如:《社会主义时期是民族语文繁荣发展的历史时期》、《我国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法律保证》。

研究论文的大量出现,与出版园地扩大有一定的关系。原来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论文,主要依靠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主编的《中国语文》、《语言研究》刊载。从1979年起,有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主办的全国性的民族语言研究刊物《民族语文》(原是季刊,从1982年起改为双月刊)。从1981年起有华中工学院语言研究所主办的《语言研究》,从1983年起又有中国语言学会主办的《中国语言学报》。各民族院校和有关省区社会科学院的综合性刊物也常常发表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论文。还应当提到,过去主要用汉文发表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的论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用民族文字发表的研究著作逐渐多起来了。例如用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朝鲜文、傣文、壮文发表的语言学专著或论文越来越多了。

以上只是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一般情况。从过去看将来,今后语言调查的工作还将继续开展,重点是进一步调查空白语言并加强专题调查。民族语言在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中如何更好地发展和如何发挥更大的作用,将是今后研究的重要课题。语言的描写、语言类型的研究和历史比较研究要进一步加强。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如语言规划、双语现象的调查,语言相互影响和语言系属的研究,也会同时并进。语言学理论的研究,将继续在各种语言工作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加深。当然,也要进一步研究国外语言学理论,作为发展中国语言学的借鉴。(参见彩图插页第60、61页)

参考书目

- 罗常培、傅懋勳:《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概况》,载《中国语文》,第21期,北京,1954。
马学良主编、严学窘审订:《语言学概论》,华中工学院,武汉,1981。
王均:《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情况》,载《民族语文研究文集》,青海民族出版社,1982。
Fang-Kuei Li, *Languages and Dialects*, in *The Chinese Year Book*, 1936~1937。
P. K. Benedict, *Austro-Thai Language and Culture, with a Glossary of Roots*, HRAF Press, 1975。

(傅懋勳)

Zhongguo zhuyao yuyan xueke xueshu tuanti

中国主要语言学科学学术团体 (principal linguistic societies of China)

中国的语言学科学学术团体,可以分为全国性和地方性两类。属全国性的语言学科学学术团体,现有20个左右,其中“中国语言学会”和“中国民族语言学会”是综合性的,其他都是专业性的。地方性的语言学科学学术团体,多数是综合性的,如各省、市、自治区的语言学会。本条目只介绍全国性的主要语言学科学学术团体。

中国语言学会 1980年10月在武汉成立(见图),现有会员500多名。学会设有理事会,有理事、常务理事若干名。下设秘书处和学术委员会,负责处理学会日常工作和学术事宜。第一届名誉会长为王力,会长为吕叔湘。第二届名誉会长为吕叔湘,会长为季羨林。中国语言学会的宗旨是:“团结全国语言学工作者,努力发展和繁荣我国语言科学,为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会员主要是在语言科学工作方面卓有成绩的语言专业研究人员和高等院校语言学科教师。中国语言学会的会刊为《中国语言学报》和《中国语言学会通讯》。

中国语言学会成立以来,先后举行学术讨论会4次。1980年在武汉举行的第一次学术讨论会,报告了当代语言学各学科的研究状况和主要学术成果,后汇编成书,取名《把我国语言科学推向前进》,由湖北人民出版社于1981年出版。以后举行的三次学术讨论会,有一部分论文发表在《中国语言学报》第1~3期上。学术讨论会原则上两年举行一次。

1981年7~8月,中国语言学会委托福建省语言学

会在福建省建瓯县举办了“全国汉语方言研究班”，学员 59 名，研究班除讲授方言和方言调查知识外，着重训练方言调查技能，并分组在当地进行方言调查实习。

中国民族语言学会 1979 年 5 月在北京成立，现有会员 500 多名。设有理事会，有理事若干名。下设秘书处，负责处理学会日常工作。第一届和第二届会长为傅懋勳。中国民族语言学会的宗旨是：团结全国民族语言工作者，开展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为繁荣、发展中国民族语言工作做出贡献。会员主要是民族语言学者，或在民族语言研究和教学方面有较大成绩的民族语言工作者和民族语言教师。没有会刊。

中国民族语言学会成立以后，先后举行学术讨论会四次。1980 年 12 月在北京举行“第一次中国民族语言学术讨论会”，大部分论文收入《民族语文研究文集》，由青海民族出版社于 1982 年出版。1982 年 5 月在成都举行“全国壮侗藏苗瑶语言学术讨论会”。1984 年 8 月在哈尔滨举行“第二次中国民族语言学术讨论会”，部分论文收入《中国民族语言论文集》，由四川民族出版社于 1986 年出版。1986 年 8 月在贵阳举行“第三次中国民族语言学术讨论会”，大部分论文在有关刊物上发表。中国民族语言学会还同有关部门合办民族语言研究班，为各地培养了一批民族语言工作骨干。

全国性的语言学科学术团体还有：中国音韵学研究会，1981 年 5 月在武汉成立。现任名誉会长为周祖谟，会长为严学窘。每年举行一次年会，到 1986 年举行过 4 次，讨论的问题主要有：上古音系，上古音构拟，切韵的性质，等韵的价值，音韵学与现代方言语音的关系等。会刊为《音韵学研究》。曾举办音韵学研究班五期，学员 300 名左右。中国训诂学研究会，1982 年 5 月在武汉成立。现任会长为陆宗达。先后举行年会五次，讨论的问题主要有：什么是训诂，如何振兴训诂学，以及许慎、王念孙、段玉裁、黄侃研究。曾同有关单位联合举行纪念许慎、王念孙、段玉裁、黄侃学术讨论会。曾多次举办训诂学研究班，培养训诂学工作者 200 多名。会刊为《训诂研究》和《训诂学通讯》。中国古文字研究会，1978 年 12 月在长春成立。设有理事会，没有会长，理事会工作由理事轮流主持。各届理事会主持人为于省吾、商承祚、徐中舒、

张颢、胡厚宣、张政烺、姚孝遂。理事会下设秘书组，负责处理日常工作。先后举行年会 6 次，讨论的问题主要有：古文字的内容、性质，甲骨文分期，金文月相，中山王铜器，虢盘铭文，铜器断代，古文字教学等。会刊为《古文字研究》，已出版 15 辑。中国修辞学会，1980 年 12 月在武汉成立。现有会员 700 名左右。下设华东分会、华北分会、中南分会、东北分会、西南分会、西北分会。设有理事会，现任会长为张志公。先后举行年会 4 次，讨论的问题主要有：修辞学的性质、对象和任务，各种修辞手段，修辞有没有阶级性，修辞学的发展等。1982 年在上海举行了《修辞学发凡》出版 50 周年学术讨论会，1984 年在西安举行制订《修辞学大纲》讨论会。另外还编辑出版了《修辞学论文集》4 集、《修辞学和修辞教学》、《修辞理论与实践》等专著。曾同河南省语言学会合办《语文知识》月刊。汉语方言学会，1981 年 11 月在厦门成立，现有会员 100 多名。设有理事会，没有会长，理事会工作由理事轮流主持。主要活动是每两年举行一次学术讨论会，先后开了三次，讨论的问题主要有：某些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特点，方言的变调变音，新老派方言差异，汉语方言比较，汉语方言分区，方言字考释等。没有会刊。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1979 年 5 月在南宁成立。现任会长为严学窘，理事长为马学良。先后举行学术讨论会 5 次，主要讨论民族院校的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教学问题。没有会刊。中国教育学会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会，1983 年 6 月在北京成立。设有理事会，现任会长为吕必松。1985 年 8 月在北京举行第一届国际汉语教学研讨会，有 20 个国家和地区的 260 名代表参加，主要讨论汉语外语对比及对外汉语教学问题。会刊为《对外汉语教学》。此外还有中国写作学会、中国逻辑与语言研究会、全国高等院校文字改革学会、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全国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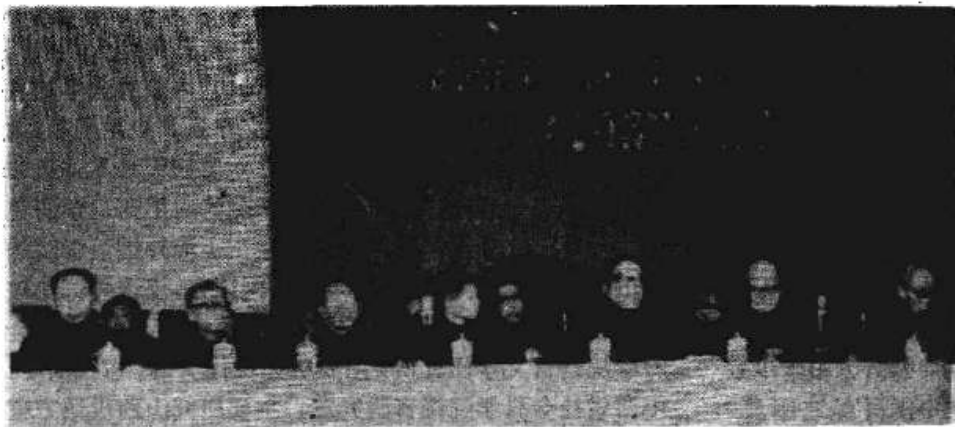
(陈幸太)

Zhongguo zhuyao yuyan yanjiu jigou

中国主要语言研究机构 (principal linguistic institutes of China) 中国专门性的语言研究机构，在 1949 年以前，主要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要从事汉语语文学、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及有关文献的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逐渐建立新的语言研究机构，到 1986 年，全国有 20 多个专门机构。另外，许多大学还设有主要从事语言教学但也兼顾语言研究的机构。

中国现有的语言研究专门机构，主要有以下几个：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简称“语言所”。1950 年 6 月创建，是中国科学院最早成立的几个研究所之一。建所以后，逐渐设立现代汉



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大会

语语法研究组、古代汉语研究组、汉语方言研究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组、语音实验室,以及图书资料室。1956年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组从语言所分出,在中国科学院属下另建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同年,由新华辞书社和汉语大辞典编纂处合并而成的词典编辑室归属语言所,后来又成立机器翻译研究组。1959年成立外语研究室。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语言所归属该院,设有现代汉语、近代汉语、古代汉语、汉语方言、语音、应用语言学、国外语言学等研究室,以及词典编辑室、《中国语文》杂志社、计算机室、图书资料室。语言学家罗常培、吕叔湘、李荣先后担任过语言所所长,现任所长为刘坚。

语言所的主要任务是,对汉语及有关的语言问题进行基础研究和理论研究,为加强现代汉语规范化服务。现在全所共有研究人员100多名,拥有一批国内外知名的学者。曾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合办普通话语音研究班,先后培训语言工作骨干数百名。所内研究人员的主要学术论著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现代汉语八百词》、《汉语的构词法》、《现代汉语句型》、《近代汉语指代词》、《切韵音系》、《切韵研究》、《两周金文语法研究》、《古代汉语虚词通释》、《昌黎方言志》、《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部分)、《普通话发音图谱》、《普通话音节语音合成》、《现代汉语词典》等。20世纪50年代曾组织推动了汉语方言全国普查,1955年曾召开“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对现代汉语规范化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国语言学会和汉语方言学会的成立及开展活动,语言所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语言所及其有关研究室主办的《中国语文》、《方言》、《国外语言学》、《中国语文天地》,在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研究室 简称“民族语言室”。它的前身是1956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60年代初并入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后,改为现名。设有壮侗语族、藏缅语族、苗瑶语族、蒙古语族、突厥语族、满-通古斯语族、社会语言学等研究组和图书资料组。现有研究人员70多名,其中高级研究人员占1/3。民族语言学家包尔汉、傅懋勤、罗季光、王均先后担任过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的所长和民族语言室的主任。现任民族所所长为照邦斯图(蒙古族)、民族语言室主任为道布(蒙古族)。

民族语言室的主要任务是,调查研究国内少数民族语言,为民族语言规范化服务,根据一些没有文字的民族的要求为他们创制文字,为要求改进或改革文字的民族制定改进或改革方案。民族语言室成立以来,先后出版了一批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报告,描写语法,双语词典,以及其他学术著作,如各种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分布图》等。在开展国际学术合作方面,开始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和文字问题”、“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比较研究”等课题的研究和《中国语言地图集》(少数民族语言部分)的编制。曾举办数期民族语言研究

班和培训班。曾组织推动全国少数民族语言普查,先后举行3次全国少数民族语言科学讨论会,讨论了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和少数民族文字的创制、改革及语言规范等问题。民族研究所主办的《民族语文》杂志,在国内外语言学界有较大的影响。

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 简称“语用所”。1984年9月成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1985年12月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领导。现设汉字整理、汉语拼音、计算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言应用及语言教学等研究室,以及图书资料室。现有研究人员30多名,其中高级研究人员近1/3。现任所长为陈原。

语用所的主要任务是,研究语言文字的应用问题,为加强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服务。语用所成立以后,比较重要的研究课题有:国家标准《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辅助集》的研究编制,汉字结构及其构成成分分析统计,现代汉语用字频度统计,汉语姓氏人名用字分析统计,汉字属性字典的编写,汉语口语研究,叫卖语言研究,作家作品语言研究,语言识别与侦破研究,汉语北方话基本词汇调查研究,普通话分级要求及其测试办法研究,新词新语新用法的规范和研究,儿童语言研究,小学“注音识字、提前读写”语文教学实验研究,汉语拼音正词法研究,图书资料自动检索系统研制等。前9个课题的研究已经完成,分别出版了专著。语用所曾于1985年7月举行“汉语拼音正词法学术讨论会”,1986年12月举行“汉字问题学术讨论会”。

除以上的研究机构之外,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语言文字研究专门机构。如中国人民大学的语文研究所,主要研究现代汉语、语文应用及文字改革;北京语言学院的语言教学研究所,主要研究对外汉语教学和汉语外语对比;北京大学的计算语言学研究,主要研究计算机对自然语言的理解;中央民族学院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主要研究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华中工学院的中国语言研究所,主要研究古汉语音韵、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及语言学同现代科学技术结合的问题;复旦大学的语文学研究所,主要研究现代汉语、汉语方言、汉语修辞和语言理论;吉林大学的古文字研究室、中山大学的古文字研究室、四川大学的古文字研究室、北京大学的古文字研究室,主要研究甲骨文、金文和战国文字;厦门大学的方言研究室,主要研究汉语闽方言;安徽师范大学的语言研究所,主要研究训诂学和编纂词典;内蒙古大学的蒙古语文研究所,主要研究蒙古语言文字及其应用问题;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外国语言研究所,主要研究世界诸语言及国外语言学理论;广州外国语学院的应用语言研究所,主要研究外语教学及教学法;上海外国语学院的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主要研究外国语言,汉语外语比较及外语教学,等等。属地方社会科学院的有:山东省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主要研究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山西省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室,主要研究山西汉语方言及俗语学;新疆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主要研究维吾尔

尔语、哈萨克语及新疆境内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语文研究所，主要研究蒙古语族诸语言。这些研究机构在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等方面，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发表了一批有价值的论著。（陈章太）

Zhongguo zhuyao yuyan yanjiu kanwu

中国主要语言研究刊物 (principal linguistic periodicals of China) 《中国语言学报》 中国语言学会主办的大型语言研究刊物，1982年创刊，不定期，1~2年出版1期，现已出版3期。每期30~40万字。主要选载中国语言学会会员和某些非会员的语言科学方面的论文。内容比较广泛，涉及现代汉语、近代汉语、古代汉语、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以及文字学、实验语音学、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等方面。

《中国语言学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具体编辑工作由执行编委轮流承担。第1期的执行编委是：朱德熙、周祖谟、王均；第2期的执行编委是：周祖谟、邢公畹、王均；第3期的执行编委是：王均、邢公畹、周祖谟。

《中国语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主办的语言研究刊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现为双月刊。以刊登现代汉语、近代汉语、古代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修辞，汉语方言，以及理论语言学、实验语音学、数理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等方面的论文为主。主要读者对象为语言文字研究工作者和大学中文系的师生。语言学家罗常培、林汉达、丁声树、吕叔湘曾先后担任过主编，现任主编为侯精一。

《中国语文》于1952年7月创刊。最初为月刊，由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合办。当时除刊登有关汉语研究和文字改革的文章外，还有普及语言科学知识、讨论语文教学、评论一般语文问题，研究介绍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以及其他国家的语言学等方面的文章。1957年以后，编辑工作由语言研究所承担。1963年改为双月刊，发表的文章以研究性质的居多，内容也较为专门。1966年被迫停刊。1978年复刊，仍以研究性的文章为主。

《语文建设》 中国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办的综合性语文刊物，由语文出版社出版。双月刊。主要宗旨是：宣传、贯彻国家关于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和政策，促进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研究语言文字的理论、应用以及中文信息处理问题，讨论并继续推动文字改革工作。主要读者对象为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各级各类学校有关专业的师生、语言文字研究工作者、一般语文工作者和爱好者。现任主编为王均。

《语文建设》于1986年2月创刊。它的前身是《文字改革》月刊，由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办，于1956年8月创刊。最初的刊名是《拼音》，1957年8月改名为《文字改革》。随着文字改革形势的发展，《文字改革》一度改为半月刊。1966年被迫停刊，1982年复刊。复刊后的《文字改革》为双月刊，1983年改为月刊，仍由中国文字改

革委员会主办，主要刊登汉语研究、文字改革、推广普通话、语言学知识、语文教学以及一般语文问题等方面的文章。《语文建设》及其前身《文字改革》，在普及语文知识、促进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进行文字改革、推广普通话、指导语文应用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方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方言研究室主办的语言研究刊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79年2月创刊，季刊，主要刊载汉语方言的调查报告和研究论文。读者对象为方言研究者、方言学教学者和方言学爱好者。现任主编为李荣。

《方言》每期大体有一个中心内容，如概况描写、语音分析、词汇记录、语法研究、本字考释、方言比较、分区论述等等。1984年以来刊登的关于汉语方言分区的文章和地图，引起学术界的注意。

《民族语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主办的语言研究刊物，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79年2月创刊，1979~1981年为季刊，1982年改为双月刊。主要读者对象为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者、教育者和工作者。现任主编为傅懋勤。

《民族语文》的宗旨是宣传国家关于少数民族语文工作的方针政策，研究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和发展中的理论及实际问题。发表的文章还涉及翻译理论和技巧，双语研究和民族语文教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调查研究，以及国内外有关学术论著的介绍、评述等。《民族语文》先后设立了“中国民族文字”、“中国民族语言概况”、“中国民族语言话语材料”、“民族语言调查研究讲话”等专栏，对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调查研究和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等诸语言的比较研究，起了促进作用。

此外，比较重要的语言研究刊物还有：《语言学论丛》，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专业主办，商务印书馆出版，1957年创刊，不定期，已出版13辑，主要刊登北京大学中文系师生的语言学论文，内容比较广泛，是一种综合性的语言学研究刊物。《语言研究》，由华中工学院中国语言研究所主办，华中工学院出版社出版，1981年7月创刊，半年刊，主要发表语言理论、汉语史、文字学、现代汉语、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等方面的论文，尤其重视语言学同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的研究，是一种大型的语言学研究刊物。《语文研究》，由山西省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室主办，语文出版社出版，1980年6月创刊，季刊，主要刊载语言学理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汉语方言、语文教学、文字及文字改革等文章，是一种综合性的语言研究刊物。《国外语言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国外语言研究室主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80年2月创刊，先为双月刊，1981年改为季刊，主要刊载介绍、翻译、研究、评论国外语言学重要论著的文章。《中国语文天地》，由《中国语文》杂志社主办，语文出版社出版，1986年2月创刊，双月刊，主要发表一般语文问题研究、语文应用、语文教学、语文评论、语文书刊评介等文章。

《外语教学与研究》，由北京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研究所主办，1957年创刊，季刊，主要交流外语教学信息、评介国外语言学理论、推荐应用语言学在国内的成果。《语言教学与研究》，由北京语言学院主办，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出版，1977年2月创刊，先是不定期，后为季刊，主要刊登语言教学理论、对外汉语教学、汉语研究、汉语和外语对比、汉语词汇统计、汉语句型分类、词义辨析、虚词诠释等文章，在对外汉语教学方面有较大影响。《语文导报》，由杭州大学中文系主办，《语文导报》杂志社出版，原名《语文战线》，1985年1月改为现名，月刊，内容包括语言和文学。语言学部分，主要刊登介绍、评论语言学研究新观点、新成果、新学科的文章，综述语言学各学科的研究情况和学术讨论情况。此外，还有延边大学中文系主办的《汉语学习》(双月刊)，全国高等院校文字改革学会主办的《语文现代化》(不定期，已出8辑)，中国写作学会主办的《写作》(月刊)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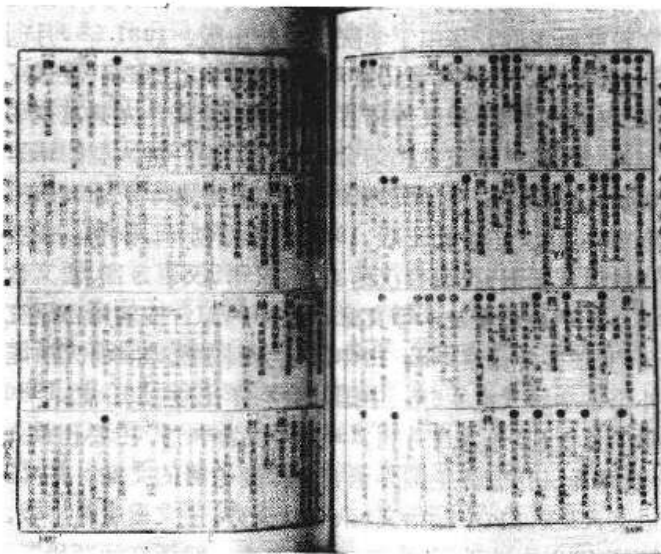
关于语文教学方面的刊物，主要有：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语文学习》(1977年10月创刊，月刊)，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学语文教学》(1979年7月创刊，月刊)，全国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主办的《小学语文教学》(1980年5月创刊，原为双月刊，1985年改为月刊)等。

(陈章太)

Zhonghua Dazidian

《中华大字典》 中国字典中收字最多的一种。陆费逵、欧阳溥存等编。本书共收字4.8万多，其中包括方言字和翻译的新字，较《康熙字典》多出1000多字。1909年开始编纂，1914年编成，1915年中华书局出版。因为这是20年代的书，在收词释义方面不免有过时的。但是书中却有不少特点，在中国字典编纂史上仍然有其地位。

这部字典分部与《康熙字典》相同，仍为214部，惟笔画相同的部首在排列次序上小有移动。每字下的注音都采用《集韵》的反切，并加直音，但又加注《佩文韵府》106韵的韵目，以资参照。书前附《切韵指掌图》，以明反切声



《中华大字典》

韵的类别。这本书的特点是解释简明，并有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字下每一义只引证一条，而每一义又都分行排比，眉目清楚，极便检阅。其中形体相同而音义并异的都另列为一字，义同音异的则止列一字，这种安排是一种创举。例如伤害的“害”(hài)跟训“何”的“害”(hé)，衣冠的“冠”(guān)跟“以为冠”的“冠”(guān)，都分为两个字来处理。书末附有笔画检字，以便寻检。其缺点在于释义过求详尽，有时不免重复，引书也有未出篇目的。然而这部字典是在《康熙字典》之后首先进行革新的一部字典，改正《康熙字典》的错误4000余条，还有许多地方可以补《康熙字典》之不足，仍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周祖谟)

zhongjie chengfen tixi

中介成分体系 (system of intermediate constituents) 根据外语-汉语机器翻译特点建立的一套特殊的句子成分体系。其中各个成分既不是原语成分，也不是译语成分，而是介于原语和译语之间的句子成分。中介成分是通过原语语法分析和语义分析并考虑到向译语的转换而得出的，它们属于“深层结构”的范围。中介成分不仅能表示成分的功能意义，而且还能表示成分的分布关系(成分与成分之间的联系，成分在句中的位置)和反映两种语言的对比差异。

中介成分体系不单纯是一套标记句子成分的符号，更重要的是进行多种语言对一种语言的翻译的工具。它还体现了目前中国多数机器翻译规则系统的编制方法和中国机器翻译工作者关于句子切分的理论认识以及他们对翻译技术的处理原则。

中介成分体系不单纯是一套标记句子成分的符号，更重要的是进行多种语言对一种语言的翻译的工具。它还体现了目前中国多数机器翻译规则系统的编制方法和中国机器翻译工作者关于句子切分的理论认识以及他们对翻译技术的处理原则。

中介成分体系和翻译系统的关系 机器翻译包括3个过程：分析(Analysis)，转换(Transformation)和综合(Synthesis)。这3个过程可以用3种方法实现：

- ① A→TS
- ② AT→S
- ③ A→T→S

利用第1种方法编制的规则系统，称为独立分析相关综合的系统。独立分析，就是原语分析只根据原语本身的结构特点进行，不考虑译语的因素，因此分析的最终结果是原语句子成分；相关综合，就是根据原语分析所得的成分进行原语向译语的转换，并在此基础上按译语规范组成译文。

利用第2种方法编制的规则系统，称为相关分析独立综合的系统。这里的相关分析，是指在原语结构分析的基础上实现原语句子成分向译语的转换，同时在转换过程中要参照译语规范，因此分析的最终结果是一套中介成分；这里的独立综合，是指只需根据中介成分本身提供的移位信息等组成译文。

利用第3种方法编制的规则系统，称为独立分析独立综合的系统。这种系统的特点是原语分析和译语综合都独立进行，而原语向译语的转换则利用一个独立的转换程序，或媒介语来实现。

3 种类型的系统都可进行一对一的翻译,其中独立分析独立综合的系统还可进行逆向翻译。在参与翻译的语言增多的情况下,第1种系统适用于“一对多”,第2种适用于“多对一”,第3种适用于“多对多”。如果把本族语译成多种外语(例如5种),采用第1种系统比较适当。这时只需研制一套为各语言通用的分析程序(独立的)和5套与之相应的综合程序(相关的)即可。但是,如果目的是把这几种外语译成本族语,采用第2种是完全必要的。这时只需编制5套分析程序(相关的)和1套综合程序(独立的)。如果考虑多对多翻译,就要依靠第3种,其转换部分可通过媒介语来实现。

根据中国目前的具体情况,要将各国的科技文献翻译成汉语,采用相关分析独立综合系统来进行多对一翻译是非常有利的。而采用这种系统,必然要有一套符号来标记相关分析的结果。这就是这套中介成分体系的由来。

制定中介成分的原则 一般语法划分出来的句子成分不能满足机器翻译的需要,因为它们只能表示成分的功能意义,而不能表示成分的分布关系并反映两种语言的对比差异。然而,一个成分如果本身不能表示分布关系,机器便不能得到它在句中与哪个词发生联系和处于什么位置的任何信息;如果本身不能反映出两种对比语言的差异,机器便不能在综合加工时直接得到把原语改造成译语的任何根据。因此,中国学者结合机器翻译的特点和要求提出了新的划分成分的原则。

① 逻辑语义原则:同传统语法中划分句子成分的原则基本一致。根据这一原则,划分出6大类句子成分,即主语类、谓语类、宾语类、补语类、定语类、状语类。插入成分和独立成分是状语的两个次类。

② 结构层次原则:句子是分层次的。该体系以动词(谓语)中心论为基础,认为句中最主要的一层是谓语。谓语是句中最大的联系中心,同时也是调整词序的主轴心。直接与谓语发生关系的成分叫直接成分(简称A成分),与谓语以外任一其他成分发生关系的成分,叫间接成分。而间接成分又根据它的联系词的远近分作两种:是前一词(组)或后一词(组)的称为近间接成分(简称B成分),不是前一词(组)或后一词(组)的称为远间接成分(简称C成分)。这样,上述6大类除定语无A成分外,又可分为A、B、C一些子类。

另外,根据谓语中心论的观点,非限定动词(分词、不定式以及部分动名词)也是句中较大的联系中心(它们可能带一堆宾语和状语),同时也是调整词序过程中比较重要的次轴心。因此,在这个体系中赋予“偏谓语”特征。“偏谓语”本身可以出现在直接成分层,也可以出现在间接成分层,但它所带的成分则只能是间接成分。

③ 对比差异原则: a. 根据成分在对比的两种语言中的位置相同与否,可分为“前置成分”、“原位成分”和“后置成分”。 b. 根据成分在对比的两种语言中是否有介词,可分为“介词性成分”和“非介词性成分”。

这套成分体系包括几十个中介成分。但这只是一个基础,人们在处理各自的语言时需根据具体情况有所增减,因为任何一对语言都不可能包括所有这些成分,同时也多少存在一些个别现象。这个体系不仅解决了相关分析独立综合的问题(即不管翻译什么语言,原文分析是什么样,而译文综合就使用一套),而且为译文综合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例如,机器见到“宾A”,便可知道它是同谓语发生联系的直接成分,没有移位信息,故可置之不理。又如见到“前介定B”,便可知道它是一个近间接成分,是介词短语作定语用,有前移信号,而且要移到前一词(成分)之前,因为B成分的联系词是前一词或后一词。

中介成分的建立 总括地说,这套成分体系是以结构分析为主要手段以语义分析为辅助手段建立起来的。具体步骤如下:一个句子通过查词典之后,其中绝大部分词已经得到词类标记及其他一些特征,包括根据词尾分析得到的特征。没有得到词类标记的多半是同形词,经过上下文分析,也会得到确定的词类。下一步便是构成词组。根据英汉对比研究,可构成7类词组,即名词词组、动词词组、形容词词组、分词词组、不定式词组、介词词组、副词词组。这些词组,通过上述制定中介成分三原则的加工,便可得出中介成分。而介词在句中起着重要的媒介作用,因此,介词的处理,对于中介成分的确定是一个关键问题。

当语法分析发生困难,不能解决句法歧义现象和得出正确译文时,要求助于语义分析。例如,We shall have a symposium on Monday 和 We shall have a symposium on mathematics tomorrow 这两句话,结构完全相同,如果单靠语法分析,很难得出on-phrase的不同作用。然而,借助语义分析,第1个on-phrase中的Monday为时间名词,与symposium无语义联系,故可判定为状语,作“前介状A”,第2个on-phrase中的mathematics为学科名词,与symposium有语义联系,故可判定为定语,作“前介定B”。又如,The fish was bought by the river 和 The fish was bought by the cook.两句话中都有一个由by引起的介词词组,并都处于谓语之后,都得“前介状A”成分,但前一个by当“在……旁边”讲,而后一个当“由”讲,其差别仅在于river是表示地物的名词,而cook是有生命的名词。

参考书目

刘涌泉等著:《中国的机器翻译》,知识出版社,上海,1984。

(刘涌泉)

Zhongwen xinxu chuli

中文信息处理 (Chines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在语言学、计算机科学、数学、心理学和自动化技术等学科的基础上形成的一门边缘学科,研究电子计算机对中文书面和口语信息进行各种加工的问题。

中文信息处理不等同于汉字信息处理。汉字信息处理系统是中文信息处理系统中非常关键的一部分,可以说是中文信息处理系统借以建立的工具。但是汉字信息

处理系统的研制成功,一般只解决了汉字的编码、输入、存储、编辑和输出问题,至于加工或处理什么,如何加工,那是中文信息处理的内容。中文信息处理系统(纯口语的系统和拼音文字的系统除外)以汉字信息处理系统作为自己的必备部件,同时还带有为不同目的服务的各种应用软件。中文信息处理系统的另一特点是以词而不是以单个汉字作为加工的基本单位。中文信息处理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信息处理都是自然语言处理的一部分(见应用语言学)。

在中文信息处理领域内,计算语言学工作者所研究的只是它的一般理论和方法,以及与语文信息加工有关的基础性工作。例如,汉字如何编码才能输入计算机,如何切分词,哪些是常用词和常用词组,如何进行语音识别与合成,等等。

中文信息处理研究项目 目前已经开展的有以下10项:

① 汉字信息处理:这是一项最关键的语言工程,汉字如不能进入计算机,图书情报工作自动化、印刷出版现代化、办公室事务自动化都将化为空谈。近10年来,汉字信息处理研究得到很大发展。曾设计了400多种汉字编码方案(见汉字编码),其中上机通过试验或已被采用作为输入方式的,已达数十种之多。研制了上百种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和设备。这些系统主要采用两种类型的键盘:一是笔触式大键盘,另一是小键盘。前一种除整体输入外,一般还有利用部件组合汉字的能力;后一种有的可兼容多种编码方案,有的还带有计算机引导的智能。

汉字信息处理除了在汉字编码方面进行研究外,还制成了若干种汉字输入输出专用设备,其中有各种类型的汉字输入键盘、汉字字库、汉字显示终端、汉字图形兼容终端、汉字印字机。成套的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包括汉字编码法、通用中外文键盘、通用中外文显示器、汉字打印设备、汉字库和系统软件等)已研制成功,并安排批量生产。一种最新式的编辑排版系统——计算机激光汉字照排系统也已研制成功。中国的字模生产有良好的基础,1985年5月国家标准局公布了《信息交换用汉字15×16点阵字模集及数据集》和《信息交换用汉字24×24点阵字模集及数据集》两项标准,为各种设备的设计和推广提供了有利条件。

为了使人们摆脱繁重的编码输入工作,汉字的光电自动识别研究提上了日程。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单位从事手写体和印刷体的识别研究。邮电部数据所和北京邮电学院提出了象限端点和转动惯量特征识别法,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提出了文字线长度识别法,上海公用事业研究所研制出数字条形识别系统,电子工业部第52研究所设计了提取汉字笔划特征的划分映射法,清华大学研制了有限制性手写体汉字识别系统。

为了使各种系统之间的信息交换有共同性,也使各种输入输出设备的设计有统一的根据,1981年国家标准局公布了《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简

称《汉字标准交换码》)。这个标准是根据汉字使用频度制定的,共分两级:一级3755个字,二级3008个字,共6763个字。为了满足少数用字量超过基本集的用户和台湾、香港等地的需要,正在制定《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辅助集》,辅助集将根据使用频度高低分作第一辅助集和第二辅助集,各收8000余字。

② 机器翻译:计算机和语言的最早结合开始于机器翻译。1956年,机器翻译被列入中国科学工作的发展规划。1957年,机器翻译研究工作正式开始进行。这可以说是中文信息处理的第一项工程。首先研究的是俄汉机器翻译,并于1959年成功地进行了试验,译文输出是代码,而不是汉字,因为当时没有汉字输出装置。1958年底至1960年初,又研制了一套英汉机器翻译规则系统。1966~1975年工作处于停顿状态。近年来,先后上机试验了英汉、俄汉、法汉、日汉和汉外(英、法、德、俄、日)机器翻译系统十余个。有的输出汉字译文。有的输出拼音译文。

语言的对比研究是机器翻译的语言学基础。在外汉机器翻译系统中调整词序是一个中心任务。词序的调整,首先必须分清层次和确定轴心。为了调整词序,有的系统还建立了一套特殊的成分体系,即中介成分体系。介词、连词和标点是机器翻译研究中的难点,对它们的正确分析是解决词序调整问题的关键。当结构分析发生困难时,需要进行语义分析。

③ 中文情报检索:为了提供标引和检索蓝本,1979年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编辑出版了10卷本的《汉语主题词表》。目前,中国已有上百个单位开展电子计算机情报检索的试验研究,其中十几个单位已进入定题情报服务(SDI)的应用阶段。不少单位正在建立各种汉字文献数据库,同时还在考虑联机网络问题。

情报检索系统中的关键问题是情报检索语言的建立(见计算机情报检索)。除一般的词汇语法问题外,中文情报检索系统中还有一个特殊问题,就是词的切分,因为检索是以词(关键词)为基础的。

④ 言语统计:中国利用电子计算机进行言语统计是机器翻译工作者开始的。1978年语言研究所和计算技术研究所合作研究ECMT-78英汉机器翻译系统的过程中曾编制一个排序统计程序,加工过一些外文资料和汉语拼音资料。1981年北京语言学院等单位开始对人工调查统计的词汇进行计算机处理。1985年完成了《汉语词汇的统计与分析》,在52万多字的汉字语料中统计出18177个不同的词,这些词出现的总和是374654次,出现最多的单音节词是“的”,出现最多的双音节词是“我们”。1986年6月又完成了《现代汉语频率词典》。1982年北京航空学院等单位开始更大规模的汉语统计工作,要在2000万字的语料中进行字频和词频统计。部分字频统计结果已经得出,从1977~1982年的1200多万字的语料中统计出8969个不同的汉字,并提供了这些汉字根据不同学科分类的26种使用频度表。

由于词的自动切分问题尚未解决,因而现在的词频统计都是在人工调查统计或人工分词的基础上进行的。

另外,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武汉大学利用计算机对《辞海》1.6万多个汉字的部件进行了统计分析,以研究汉字的结构特点。为了研究人名用字的使用情况,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山西大学根据人口调查材料对人的姓名分别进行了统计。很多省份“王”为大姓,而福建省“陈”、“林”为大姓。

⑥ 汉语理解系统:最近几年,随着人工智能的进展,语言研究所、心理研究所、自动化研究所和一些大学开展了汉语理解系统(人机对话)的研究。目前只限于书面语言理解,而且主要是问答型的。输入方式采用汉语拼音。上机试验结果表明,有的系统已有识别30多种句型的能力(见汉语书面理解系统)。汉语语音理解系统的研制正在酝酿之中。

⑦ 计算机辅助语言教学:近年来很多人关心这一课题。华东师范大学现代化教育技术研究所、哈尔滨工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单位已研制出语言教学软件多种(见计算机辅助语言教学)。

⑧ 语音识别和言语合成:语音打字的任务早在1958年便已提出。1964年实现了“元音识别机”,1970年前后又实现了10个口呼汉语数字的识别机。但利用电子计算机进行识别研究,则始于1972年。声学研究所利用语音图样匹配方法在一定范围内实现了单呼语言的识别,正确率达99.5%以上。哈尔滨工业大学利用音素分析法进行汉语识别,正确率达90%以上。

汉语合成的研究已在一些单位进行,一般尚处于研究实验阶段。清华大学自动化系最近试制成功一种会说话的中文计算机,机器里存有汉语声韵母等语言数据,计算机能自动根据拼音规则实现拼接,合成语音。

⑨ 方言研究:国外有人曾将汉语方言资料输入计算机,让计算机提供各个方言声母、韵母、声调的出现频率,以及鼻化、腭化现象分布的百分比。这些数据不仅有利于方言的共时描写和比较,而且还有利于检验各种历史构拟假说的正确性。目前,中国已开始利用计算机进行方言研究和绘制方言地图。

⑩ 索引、词表和词典的编制:1980年武汉大学开始语言自动处理工作,主要是编制逐字索引,同时提供汉字统计数据。他们计划编辑《现代汉语语言资料索引》23辑,收录现代著名作家9人的作品共33部,总字数500多万。前5部作品(《骆驼祥子》、《倪焕之》、《雷雨》、《日出》和《北京人》)的逐字索引和统计资料已相继印出。最近,他们又与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合作,完成了《论衡》的语词索引和统计资料。其他一些书籍的索引工作也在进行之中。

⑪ 修辞学研究:武汉大学等单位利用现有的语料库开始进行风格学研究,随着语料的扩充和统计方法的改进,将会提供不同作家的风格特点和各种风格对比研究的成果。

利用计算机编制词表、词典也已提上日程。语言研究

所正在编制《多语对照语言学词汇(英、法、德、俄、中)》。机编词典除能加快辞书的编辑出版过程外,还可以随时扩充、修改,保持词典的先进性。

中文信息处理研究方兴未艾。随着研究手段的改善和研究工作的深入,还将有更多更新的项目涌现。

参考书目

张寿萱、徐建毅、张建新:《中文信息的计算机处理》,宇航出版社,上海,1984。

刘涌泉:《中国的语言工程》,载《中文信息》,1985,第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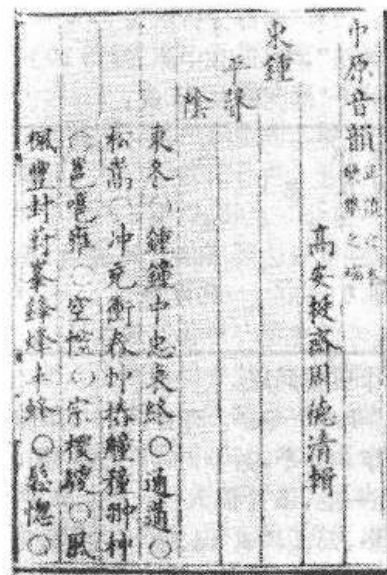
(刘涌泉)

Zhongyuan Yinyun

《中原音韵》 见《中原音韵》音。

Zhongyuan Yinyun yin

《中原音韵》音 指《中原音韵》(1324)一书所反映的语音系统。《中原音韵》是中国最早出现的一部曲韵著作(见图)。作者元代周德清(1277~1365),江西高安人。“工乐府,善音律”,对于元代盛极一时的北曲的创作和演唱了解得很深。他感到当时作曲、唱曲的人都不大讲究格律,艺坛上出现了不少混乱现象。他认为要使北曲发挥更高的艺术效果,就必须使它的体制、音律、语言都具有明确的规范,特别是语音的规范更为重要。于是他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在理论上进行了一番总结,完成了这部划时代的著作。



周德清著《中原音韵》

《中原音韵》的内容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以前韵书的形式,把曲词里常用作韵脚的5866个字,按字的读音进行分类,编成一个曲韵韵谱。韵谱分为19韵:东钟、江阳、支思、齐微、鱼模、皆来、真文、寒山、桓欢、先天、萧豪、歌戈、家麻、车遮、庚青、尤侯、侵寻、监咸、廉纤。每一个韵里面又分为平声阴、平声阳、入声作平声阳、上声、入声作上声、去声、入声作去声等类。每一类里面以“每空是一音”的体例,分别列出同音字组,共计1586组。第二部分称做《正语作词起例》,是关于韵谱编制体例、审音原则的说明,关于北曲体制、音律、语言以及曲词的创作方法的论述等。

考订《中原音韵》音的方法 《中原音韵》所代表的语音系统,主要反映在它的韵谱里,韵谱已经划分出了同音字组,至于这些同音字组各读什么音,韵谱本身不能回答,必须经过一番考订,才能了解清楚。考订的基本方法是以韵谱的音韵分类为基础,参考《中原音韵·正语作词

起例》的有关说明,比照同期的音韵资料,如黄公绍、熊忠《古今韵会举要》(1297),《古今韵会举要》转录的《七音三十六母通考》,朱宗文校订本《蒙古字韵》(1308),卓从之《中州乐府音韵类编》等,构拟整个音韵系统。

考订的具体方法,可以是先把韵谱中所有的同音字组按各种线索组成一个“等韵图”式的小韵表,然后构拟出各个同音字组的音值。

罗常培最先考订出《中原音韵》音 20 声类。他根据《中原音韵·正语作词起例》的说明总结出两个条例,“凡一音之中而括有等韵三十六母二组以上者,即可据以证其合并,偶有单见,不害其同,此一例也。”“凡全浊声母去声混入全清者,则平声虽与阴调分组,声值实与次清无别,此二例也。”这两个条例可以总称为“归纳法”,早年研究《中原音韵》音的学者,大都沿用此法。此法对于考订《中原音韵》音里绝大多数的声类是行之有效的,但用于分析“疑”与“影喻”的分并,古全浊塞音、塞擦音读全清还是读次清,却遇到了阻碍,至于古全浊平声的“声值实与次清无别”的结论也缺乏内部证据。所以后来的人对罗常培此法有所补充和发展,改称“内部分析法”。

声母 罗常培用“归纳法”,考订出《中原音韵》20 声类,后来的研究者又补充一个“仰”类,共 21 类:

崩 p	烹 p'	蒙 m	风 f	亡 v
东 t	通 t'	农 n	龙 l	
宗 ts	恫 ts'		嵩 s	
支章 tʃ	脂昌 tʃ'		施商 ʃ	戎 ʒ
工姜 k	空腔 k'	仰 ŋ	烘香 x	
邕 ʅ				

这 21 类声母中有如下几个重要问题。

“仰”类即中古音“疑”母的一部分,保存[ŋ]。《中原音韵》共收《广韵》“疑”母字 200 个,其中,138 个跟“影、云(喻三)、以(喻四)”同在一空,5 个混入“泥、娘”,57 个独自成空。“疑”母字跟“影、云、以”或“泥、娘”同空的,可以证明它们已经合并,或失去[ŋ],或变[n]。而独自成空的,不仅不能跟它们合并,而且跟它们(包括混入“疑”母字的小韵)发生对立。例如:

江阳 上声	第21空	仰疑	
	第2空	养痒以映影	
江阳 去声	第25空	仰疑	
	第4空	漾漾汤养样以快映影漾恙以	
萧豪 去声	第8空	傲弄整疑	
	第30空	奥懊澳影	
萧豪 入声作去声	第8空	虐疟疑	
	第1空	岳乐药以约影跃钥滴以	
歌戈 上声	第12空	我疑	
	第10空	珂影	
歌戈 入声作去声	第7空	虐疟疑	
	第1空	岳乐药以约影跃钥以	
车遮 入声作去声	第4空	业邕额疑	
	第3空	拽噎谒影叶以炸影	

参照同期的《蒙古字韵》,“疑”母字独立成空的,八思巴字汉语一律作[ŋ],与之对立的“影云以”母字,则作表示零声母的字母,可见《中原音韵》的声类里,的确有[ŋ]的存在。

浊音清化 在《中原音韵》里,中古浊音(全浊)字普遍地跟清音(全清、次清)字混并,上声的全浊音字一律变为去声,跟去声的全浊、全清音字混并。而在平声,中古浊音自成一调,不跟清音字混并。周德清在声调方面“平分二义”,是一大发明。他的平声阴来自中古清音字,平声阳来自中古浊音字。塞音、塞擦音的清音分全清(不送气)次清(送气)两类。塞音、塞擦音的浊音清化后,是变同全清,还是变同次清,这一点《中原音韵》韵谱本身无法显示出来,只有参证《中州乐府音韵类编》才能得到了解。《中州乐府音韵类编》平声分为三类:阴、阳、阴阳。所谓阴阳类是指同一个声母的字而能够阴阳成配偶的一类。《中原音韵》的平声阳类字,塞音、塞擦音是跟《中州乐府音韵类编》的次清音字成配偶而归入同一个阴阳类的。例如:

东钟 阴阳类——通:同/冲:重/邕:容/风:冯/烘:
红/葱:丛/烹:彭/

可见平声塞音、塞擦音浊音字清化后,是变同次清了。

唇音的分化与合并 中古音唇音字在等韵三十六母系统里,分化为重唇音“帮滂並明”和轻唇音“非敷奉微”,共八类。在《中原音韵》里,重唇音是三类(並母并入帮滂),轻唇音“非敷”合并,“奉”按浊音清化规律,也与“非敷”合并。例如:

齐微 去声 第4空 吠非沸费非肺废帝非
鱼模 去声 第11空 赴父釜辅非付赋傅富非……
真文 去声 第9空 忿分非粪奋非
寒山 去声 第19空 饭非贩贩非範非泛……

“非敷奉”同空,证明三类并为一类。

“微”母字在《中原音韵》跟“影、云(喻三)”的小韵对立。例如:

齐微 平声阳 微:围
上声 尾:委
去声 未:胃

前者为“微”母字,后者为“影、云”母字。

《中原音韵·正语作词起例》“诸方语病”也列举“网有往”等,《中州乐府音韵类编》平声“微”母字都属“阳”,不与“影”母字成配偶。八思巴字汉语作 w-。《中原音韵》微母字仍然自成一类,例如:

江阳 平声阳 第5空 忘亡微
上声 第12空 罔网网微
去声 第13空 望忘妄微
鱼模 入声作去声 第4空 物勿微

这说明“微”母字在《中原音韵》里独自成一个声母。

影云以合并 中古音“影、云、以”三类,在《中原音韵》里已经合并成一类。例如:

齐微 上声 第21空 委猥影唯以隗疑苇伟云
东钟 去声 第13空 用以咏云莹影

鱼模 入声作去声 第6空 玉狱^疑欲浴以郁^影育
 鸱以

知章庄三组字的合并情况 中古音“知彻澄、章昌船书常、庄初崇生”三组字在《中原音韵》里已并成一组。合并的情况,大致是“知三”组和“章”组混。例如:

江阳 上声 第18空 掌^章长^{知三}
 第9空 敞^章昌^{知三}初^{知三}

先天 平声阳 第14空 船^船传^缘三^三
 “知二”组和“庄”组混。例如:

萧豪 去声 第21空 罩^{知二}策^庄棹^{知二}
 江阳 平声阳 第9空 床^床撞^撞二^二味

也有“章”组和“庄”组混的,限于止摄开口字。例如:

支思 去声 第1空 是^是市^市常^常柿^柿侍^侍常^常士^士仕^仕使^使生^生示^示
 溢^溢蔚^蔚侍^侍常^常事^事崇^崇施^施书^书嗜^嗜鼓^鼓常^常试^试
 弑^弑书^书筮^筮视^视噬^噬常

像今山东、河南一些地方的方言。

也有“知三”组、“章”组、“庄”组混的,限于通摄字。例如:

东钟 平声阳 第8空 重^重虫^虫三^三慵^慵崇^崇崇^崇

像今天津、山东胶东一带的方言。

当时别的音韵资料,如《古今韵会举要》、《蒙古字韵》、《事林广记》中的“六十字诀”、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射字法》、陈晋翁字母、吴澄字母等,也都是把这三组并成一组的。罗常培拟作[ʈ, ʈʰ, ʈʰʰ]。

戎类的构拟 中古“日”母的变音,在《中原音韵》里自成一类,即“戎”类。罗常培拟作[ʒ]。陆志韦说它不是[ʂ]的浊音[ʐ],也不是[ʈ]的浊音[ʈʰ],它的性质是介乎软音跟硬音之间,所以拟作带引号的“ʐ”。王力拟作[ʈʰʰ]。

韵母 《中原音韵》音的韵母共46类。

东钟			uŋ	iuŋ
江阳	aŋ	iaŋ	uaŋ	
支思	ī			
齐微	ei	i	uei	
鱼模	u	iu		
皆来	ai	iai	uai	
真文	ən	ien	uən	iuən
寒山	an	ian	uan	
桓欢	on			
先天		ien		iuən
萧豪	au	iau, ieu		
歌戈	o	io	uo	
家麻	a	ia	ua	
车遮		ie		iue
庚青	əŋ	iəŋ	uəŋ	iuəŋ
尤侯	əu	iəu		
侵寻	əm	iəm		
监咸	am	iam		
廉纤		iem		

这些韵母是根据《中原音韵》韵谱所划分的小韵求出来的。韵谱以“每空是一音”的原则划清了小韵的界限。同

一个小韵的字必同音,不同小韵的字彼此必不同音。这种不同音有3种情况,即声母同而韵母不同;韵母同而声母不同;声母、韵母都不同。根据这种同音与不同音的情况,就可以考证出韵母来。下面就韵母的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略作说明。

一、二等牙喉音重出问题 中古一、二等开口韵字,在《中原音韵》里一般已经合流了,惟有牙喉音字一、二等仍然对立。例如:

皆来 一等 该开孩哀: 二等 皆揩鞋挨,
 寒山 一等 干刊寒安: 二等 奸慳闲颜,
 萧豪 一等 高 蒿 豪: 二等 交敲哮坳,
 监咸 一等 甘堪含庵: 二等 监嵌咸谗。

参照八思巴字汉语一、二等字元音相同,而二等字有一个模糊的腭介音[i]。这是新产生的音变现象。

在江阳韵里,二等牙喉音字与三等牙喉音字合流,例如:

江阳 平声阴 第1空 姜^姜江^江缸^缸江^江薑^薑疆^疆僵^僵阳
 第16空 腔^腔江^江槐^槐羌^羌阳
 上声 第1空 讲^讲港^港讲^讲讲^讲
 去声 第1空 绛^绛降^降虹^虹绛^绛强^强强^强
 第9空 巷^巷向^向项^项讲

看来,江阳韵里的二等字介音已经跟三等字介音没有区别了。除江阳韵外,开口二等喉牙音字与开口三等韵字都从不相混,并且不会在一个韵里同时出现。由此可知,两者的区分不限于介音的差别,而且元音也有所不同。

桓欢韵的韵母 桓欢韵字全来自中古的桓韵系,只一类。与寒山韵分立,是《中原音韵》音的一大特点。桓欢韵在元曲里是个险韵,一般不独用,周氏显然不能从曲韵归纳出这个韵部来,大概根据的是“中原之音”。《中原音韵·正语作词起例》辨“诸方语病”,列举“完有皖、官有关、慢有慢、患有缓、惯有贯”等例,强调桓欢与寒山的合口类有别。《古今韵会举要》、《蒙古字韵》归寒部,但自成一类,八思巴字汉语作 on,陆志韦拟作[uən]。

支思韵的韵母 支思韵的小韵不多,只有“舌齿音”,来自中古的止摄开口各韵系的“精”系、“章、庄”组字、“日”母字以及少数几个“知”组字。这类字的音变,早在北宋邵雍(1011~1077)的《皇极经世书》的“声音唱和图”里已见端倪,邵雍已把止摄开口“精”系字列在“开”类,稍后的《切韵指掌图》把它们改列在一等。《古今韵会举要》把这类字独立成一个“贲”字母韵,包括止摄开口“精”系、“庄”组字,八思巴字汉语作 hi。《中原音韵》成立一个新的韵部,与齐微韵分立,收字范围又有所扩大。

支思在元曲里与齐微同用,极少独用,周德清不能凭曲韵归纳出这一韵部,也必定是根据的“中原之音”。这一韵的韵母,陆志韦认为,最妥当的办法是把支思韵全拟作 i,这 i 音是[i、i]跟[i、ə]中间的一个音,还不是实在的舌尖音,不过借用 i 符号而已。

鱼模韵的韵母 鱼模韵的小韵可分为两类,一类来

自中古的遇摄一等韵以及三等唇音，一类来自遇摄三等韵。《古今韵会举要》、《蒙古字韵》也是分为两类：孤类，居类。八思巴字汉语作 u, iu。陆志韦认为《中原音韵》的 u 元音比较靠前，所以跟尤侯韵不混，曲韵里除入声字外，也不跟尤侯韵通押。

真文、庚青韵的韵母 真文韵从小韵的对立情况看，应该分为 4 类，开口和合口各为 2 类。从《中原音韵》的总的音变趋势看，开口类一二等跟三四等还可以区别，合口类的归并比开口类显得更为积极，《中原音韵》有的韵里二者都归并到一起了。但在真文韵里，合口类来自一等的小韵跟来自三等的小韵发生对立。例如《中古音采用《广韵》韵目》：

一等	魂/混/愿	三等	谆文/准/问
l	论	:	伦
ts	尊	:	遵
ts'	村	:	逵
s	孙/损/逊	:	询/荀
k	鲲/袞	:	君/窘
x	昏/混	:	薰/训
θ	温/稳/搢	:	氤/允/酝

庚青韵与真文韵的情形相同。这 4 类的主元音可参照八思巴字汉语作 hi=[ə]，真文韵 4 类可拟作 [ən、ian、uan、iuən]，庚青韵 4 类可拟作 [əŋ、iəŋ、uəŋ、iuəŋ]。

歌戈韵的韵母 歌戈韵平上去声字来自中古音歌、戈两韵系，本是一开一合，只是唇音字不分开合。在《中原音韵》里，除牙喉音字还保持原有的开合口对立外，其余都合并到一起了。例如：

平声阴	第 7 空	他拖佗歌陀戈
	第 5 空	莎蓑唆梭戈娑孽歌
平声阳	第 3 空	挪那歌按戈堆歌
	第 7 空	娃戈篦歌
上声	第 3 空	棵羸果撝果夥果伊果
去声	第 3 空	舵雷堕隋隋果剌过垛果驮大瘡个
	第 2 空	佐左个坐座过

参照《古今韵会举要》、《蒙古字韵》，这一韵也是分为两类，一类来自歌韵系，八思巴字汉语作 o，一类来自戈韵系，作 uo，唇音字可以参照八思巴字汉语归入 uo 类，歌韵的舌齿音字参照现代北方话也可归入 uo 类。这一韵的入声字来自一二等的不难分别归入 o、uo 类，来自三等（药韵）的字（唇音字除外），又全都互见于萧豪韵，可以拟成[iə]类。

萧豪韵一二等重出问题 在《中原音韵》里，开口一二等字一般已经混并，只有牙喉音字重出。在萧豪韵里，不限于牙喉音字，唇音字和“泥、娘”母字也有一二等重出现象。例如（前者一等，后者二等），褒：包，宝：抱，抱：豹，脑：挠。

《中原音韵·正语作词起例》辨“诸方语病”也列举“包有褒，抱有保，爆有抱”，可见周氏是强调这种区分的。但

又有杂乱现象，即这类声母的字也有一二等混并的。例如：

平声阳	第 15 空	袍豪跑跑跑跑跑袍豪
	第 5 空	毛笔旄茅蚤猫耄髦豪
	第 6 空	獠豪饶饶饶饶饶豪
去声	第 4 空	豹爆爆爆爆
	第 5 空	抱爆报暴号豹巧豹爆抱
	第 23 空	貌豪冒帽毫髦号茂豪

特别是“抱”与“豹”虽然对立，而两小韵内部却又是一二等混并的。同期的音韵资料如《古今韵会举要》、《蒙古字韵》都是把二者合并的，所以这种一二等重出现象很可疑。

-m 尾字转化为 -n 在《中原音韵》里，有少量 [-m] 尾字与 [-n] 尾字混并，例如：

真文	上声	第 14 空	牝品品
寒山	平声阳	第 7 空	烦繁幡幡幡元凡凡凡凡
	去声	第 19 空	饭贩贩贩贩范范范范范

这种混并只限于唇音字，显然是由于“首尾异化”作用所发生的。同期的音韵资料还受传统约束，没有反映出这种现象。

两韵并收字的读音 《中原音韵》有好些两韵并收字，其中大多数是成系统的，一共有 81 字，分 3 系：①东钟、庚青并收字——倾肱骸衰薨泓崩绷烹兄棚鸺官薨萌宏絃嵯横(平)泓荣猛猛永进孟横(去)咏莹，共 29 字。②鱼模、尤侯并收字——逐轴熟宿烛粥竹褥，共 8 字。③萧豪、歌戈并收字——薄箔泊铎度缚整浊濯燭着学鹤钹杓末沫暮寞莫落洛洛酪乐(lè)萼鸛鵲恶岳乐(现代音 yuè)药跃钥约略掠弱弱虐虐虐诺，共 44 字。

关于两韵并收字的读音问题，陆志韦认为：东钟、庚青跟鱼模、尤侯和萧豪、歌戈两韵并收的性质有所不同。

东钟、庚青并收字的读音，从历史上考察，属于梗、曾摄牙喉音合口和唇音，古音只有一读。跟《中原音韵》同期的音韵资料，如《古今韵会举要》、《蒙古字韵》、《中州乐府音韵类编》等所反映的也只是一读。《古今韵会举要》、《蒙古字韵》的这类字多数读如东钟，少数读如庚青；《中州乐府音韵类编》全收在东钟韵，注明“收”。这反映了一种新的语音演变趋势，即来源于梗、曾摄牙喉唇音字，这时已经变同通摄。从现代北方话各个次方言看，这类字也只是一读，大致是牙喉音字读为东钟型，唇音字读为庚青型。这类两韵并收字的读音，最合理的推断，是代表新、老两派读音并存现象。读为东钟韵是反映新的音变，是新派读音，读为庚青韵是老派读音，这也是语音发展的一种普遍规律。

鱼模、尤侯并收字全是入声，来自中古音通摄入声一等屋、三等烛韵，原来只有一读，跟《中原音韵》同期的音韵资料，如《蒙古字韵》、《中州乐府音韵类编》也只是一读。《蒙古字韵》读如鱼模。它的尤(尤侯)韵根本不收入声字，《中州乐府音韵类编》入声作平声阳的互见于鱼模与尤侯，入声作上声、入声作去声的只见于鱼模。互见

的,在鱼模的注“与尤韵通”,在尤侯的注“收”。从历史来源看,参证同期音韵资料,这类入声字的韵尾 -k 已经脱落,按元音归类,最宜于与鱼模合流。读为鱼模是实际读法,收入尤侯是反映曲韵通押现象。从元曲用韵的例子中可以得到证实。但也有另外一种可能,这里反映的是文白异读现象。从现代北方话各个次方言的情况看,这类中有些字,如“六”,已经普遍读成尤侯型了,可见当时已经孕育着这种新的音变趋势。

萧豪、歌戈并收字也全是入声,来自中古音江、宕摄入声二等觉韵,一等铎韵、三等药韵,另有“末沫”二字来自末韵(特例)。古音只有一读。同期的《蒙古字韵》也是一读,全收在萧(萧豪)韵,《中州乐府音韵类编》入声作平声阳的也只见于萧豪,入声作去声的除“末沫”二字只见于歌戈外,其余都是萧豪、歌戈互见。从语音的发展历史来看,参照同期的音韵资料,这类字原具有 a 类元音,其韵尾 k 转化为后高元音 u,于是与同类的“阴声韵”韵母合流,归入到萧豪韵是顺理成章的。这类字收入歌戈也是反映曲韵的通押现象,从元曲的实际用韵中,可以得到证实,从现代北方话各个次方言的情况看,跟鱼模与尤侯的情况相仿佛,当时已经孕育着歌戈型的新读法的演变趋势。

声调 《中原音韵》的调类归结为“平分二义”,“入派三声”。这是周德清的两项发明。他强调曲词平分阴阳是“作词之膏肓,用字之骨髓”。他详细地列举了各式各样的曲牌,指明什么地方该用“阴”字,什么地方该用“阳”字,这也是他的“独得之妙”。这跟现代汉语普通话和大多数方言一致,很好理解。至于“入派三声”,却引起后人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理解,至今尚在争论中。

《中原音韵》的韵谱,把原来的入声字,收于“阴声韵”的支思、齐微、鱼模、皆来、萧豪、歌戈、家麻、车遮、尤侯等 9 个韵里面,分别派入平声阳、上声、去声。他的“派入”,不是直截了当地跟平、上、去声字并在同一个小韵,而是单独成小韵,“次本韵后,使黑白分明”。他又在《中原音韵·正语作词起例》里进一步说明:“入声派入平上去三声者,以广其押韵,为作词而设耳。然呼吸言语之间,还有入声之别。”又说:“平上去入四声,《音韵》无入声,派入平上去三声。前辈佳作中间备载明白,但未有以集之者。今撮其同声,或有未当,与我同志改而正诸。”

一种看法是:《中原音韵》的“入派三声”,反映了当时实际语言的入声已经消失,分别变同平上去三声。周德清所说“呼吸言语之间,还有入声之别”,是就某种方言说的,或者拘泥古音系统。持这种看法的以王力为代表,近年又有一些研究者进一步加以论证。

另一种看法是:“入派三声”不等于“入变三声”。“入派三声”是为了曲词唱念方便扩大押韵范围,在戏曲语言里对入声字行腔吐字采取的变通办法,根据入声字的声母性质分别派入平上去,即全浊的派在平声阳,清(全清、次清)的派入上声,次浊的跟“影”母字派入去声。而在当时实际语言——共通语里,入声仍然存在,跟平上去声严

格地区别开来。持这种看法的以陆志韦为代表,后来有的研究者利用现代北方话次方言的材料,作了补充论证。

参考书目

- 陆志韦:《释中原音韵》,载《燕京学报》第31期,北京,1946。
杨耐思:《中原音韵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1。
李新魁:《中原音韵音系研究》,中州书画社,郑州,1983。

(杨耐思)

Zhongxiang Fangyanji

《钟祥方言记》 (The Zhongxiang Dialect)

见汉语方言。

zhongchunyin

重唇音 见等韵。

Zhou Deqing

周德清 见《中原音韵》音。

Zhou Shijing

周时经 (1876~1914) 朝鲜语言学家。初名相镐。1876年12月23日出生于朝鲜黄海道凤山郡。卒于1914年7月27日。幼习汉文,后入汉城培材学堂学习西方传入的新学。19世纪末20世纪初,朝鲜逐步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周时经痛感维护和推广本民族语文的必要性,在投身爱国政治活动的同时,致力于朝鲜语文的研究和教学,组织、领导了国文启蒙运动。1896年创建国文同式会,曾历任国语研究会委员、国文研究所委员等职。1907~1909年,在汉城尚洞青年学院国语讲习所举办过3次国语讲习班,培养了不少朝鲜语文研究人才。他参照前人研究的成果,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朝鲜语。1908年出版了讲稿《国语文典音学》。1910年发表代表作《国语文法》。这是一部以现代语言学为基础具有完整体系的早期朝鲜语语法著作,全书包括语音学、品词论、构文论等内容。以句子的分析为中心,用图解法分析句子的结构,比较清楚地显示了朝鲜语句子结构的层次。在品词论里,根据意义划分实词,把表示语法意义的大部分附加成分看作虚词。语音部分描述了朝鲜语语音的特点,揭示了朝鲜语语音变化的规律,确立了以形态学原则为主的拼写法体系,为现行的朝鲜文拼写法奠定了基础。1914年出版《语音》一书,书后附有朝鲜文横向的拼写法练习,认为朝鲜文应当突破方块字的束缚,推行横向的拼写法。

(宣德五)

Zhou Zumo

周祖谟 (1914~) 中国语言学家。字燕孙,北京人。1932年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1936年毕业于后考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语言组助理员。1938年起在辅仁大学国文系任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即任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并任中国语言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市语言学会副会长,北京市秦文学会会长,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等职。

周祖谟学识广博，自青年时代起就潜心研究中国语言文字之学。音韵、训诂是其学术成果最丰硕的领域，所著《问学集》，包括40余篇论文，集中了他关于古汉语声韵部类和《切韵》性质及其音系基础等方面的创见，并用



现代语言学理论评述了中国古代众多语言学著作的是非得失，态度谨严，不为凿空无根之论。所著另一部论文集是《语言文史论集》，包括语言、文学、历史几方面论文50余篇，又《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一分册与罗常培合著）论述了周秦至陈隋800年间韵部演变的过程，深受国内外语言学的重视。

1984年出版的《唐五代韵书集存》是总集唐五代韵书并考释其源流的一部大书，是作者30余年来搜集、整理、考订的总结性成果，是敦煌吐鲁番古籍整理工作中前所未有的专题著作，为研究汉语音韵、词汇、训诂提供了一批重要资料。

周祖谟长于古籍整理与校勘，著有《广韵校本》、《方言校笺》、《尔雅校笺》、《释名校笺》、《洛阳伽蓝记校释》等书。为普及语文知识，他还写了不少有关汉语规范化、普通话语音、辞典编纂等方面的文章。如《汉语词汇讲话》一书，很受读者欢迎。周祖谟长期在高等学校任教，为培养新一代语文工作者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王绍新 施光亨）

zhouwen

籀文 古汉字一种书体的名称，又称大篆。起于西周晚年，春秋战国时期行于秦国。

许慎《说文解字》以小篆为正字，共9353字。又收两类异体字，一类称古文，指古文经中与小篆不同的字，这是地区性的差别；一类称籀文，指《史籀篇》中与小篆不同的字，这是时代的差别。公元前220年，秦始皇帝按李斯的主张统一文字，首先是省改秦国自己的文字，然后再推行到各地。学者把省改前的称为大篆，省改后的称为小篆。

籀文，即大篆，出于《史籀篇》。《汉书·艺文志》说《史籀篇》是周时史官教学童的书，又著录《史籀十五篇》，本注：“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时（公元25～57）亡六篇矣。”魏晋以下此书全失。段玉裁推测“其书必四言成文，教学童诵之，《仓颉》、《爱历》、《博学》实仿其体。”王国维作《史籀篇疏证》，把《说文》所采籀文辑出加以解释，他说史籀非人名，《史籀篇》是“春秋战国之间秦人作之以教学童。”他的话有道理，可惜毫无证据。西周到秦的铜器铭文传世很多，根据这些资料可以看出：①西周晚期，约周宣王时出现了一种新风气，字体方正微长，行款整齐，笔划匀称，偏旁、结构有定，例如虢季子白盘（见图）、宗妇鼎等铭文，和籀文（王国维说：“作法大抵左右均一，稍涉繁复，象形象事之意少，而规旋矩折之意多。”）十分相

似，可认为是同一种书体。②秦继承了这种书体，铜器如秦公钟、秦公簋、秦公钟、商鞅量、杜虎符、新郢虎符等铭文皆自相似，五六百年间的文字变化不很大，这在同时期其他各国不曾有过。原因何在？最好的解释是当时有一个文字课本，严格教学。所以周宣王太史籀作大篆15篇之说，不宜轻易否定。

传世《石鼓文》、《诅楚文》皆战国中期秦的作品（参见彩图插页第5页）。前者关系国家礼仪，书法精美。后者是通行字体。两者皆属大篆，其中绝大部分和小篆相同，也有不少《说文》列举的籀文。《史籀篇》收有多少字已不可知，许慎所见9篇，举出了220个不同的字。如果按比例推测，全书15篇，和小篆不同的字约为《说文》正字的1/25。可以约略看出小篆和籀文的差异和李斯从事省改的成绩。

（张政娘）



虢季子白盘铭文

Zhu Dexi

朱德熙（1920～ ） 中国语言学家。江苏苏州人。生于1920年10月24日。1945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1946～1952年在清华大学任教，1952年在保加利亚索非亚大学任教，1955年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历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系主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语言学会第二届副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1984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朱德熙早年研究古文字学。50年代开始从事汉语语法研究。他在语法学方面的主要著作有《语法修辞讲话》（与吕叔湘合著，1951）、《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论文集，1980）、《语法讲义》（1982）、《语法答问》（1985）等。这些著作的特色是严谨、深入而多创见，并且重视语法规律和分析方法的探索；在研究现代汉语的同时，注意同古代汉语和方言比较。他在古文字研究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寿县出土楚器铭文研究》（1954）、《战国记容铜器刻辞考释四篇》（1961）、《战国文字研究六种》（与裘锡圭合写，

1972)、《信阳楚简考释》(1973)、《平山中山王墓铜器铭文初步研究》(1979)和《战国陶文和玺印文字中的“者”字》(1979)等。此外他还参加了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和马王堆汉墓帛书的整理工作。他考释古文字不仅重视字形的分析,而且注意古文字在上下文中的意义和语法作用。朱德熙在语法教学、修辞写作方面也有不少建树。

(陆俊明)

Zhu Junsheng

朱骏声 (1788~1858) 中国清代文字训诂学家。字丰芑,号允倩,江苏吴县人。生于乾隆五十三年,卒于咸丰六年。博学无书不读,娴习经史,擅长诗赋词章。嘉庆二十三年(1818)举乡试,为安徽黟县训导。著作甚多,刻版的只有《说文通训定声》和《传经堂文集》10卷。

《说文通训定声》凡18卷,是一部按古韵部改编《说文解字》的书。作者在《凡例》中说:“六书,形声之字十居其九。是编就许书五百四十部舍形取声,贯穿联缀,离之为一千一百三十七母,比之为十八部,以著文字声音之原,以正六朝四声之失。”这里说的“母”,指的是谐声字的声符。全书以谐声声符为纲,按音分别归属于古韵十八部。同从一个声符孳衍的字都联缀在一起,秩然有序。每字之下,先释《说文》本训,引群书古注为证,即所谓“说文”;次陈述字的引申义和因文字假借而产生的假借义,即所谓“通训”;最后举出上古韵文中的用韵来证明古音,凡同韵相押叫做“古韵”,邻韵相押叫做“转音”,阐明字音,即所谓“定声”。这三部分的主要部分是“通训”。“通训”部分,又有“转注”和“假借”两项。凡一字数训,在意义上有连属的称为“转注”,在意义上没有连属的称为“假借”。这跟许慎所说的转注和假借的定义已经全然不同,独成一家言。

《说文》中,字有不见于正篆,而见于说解中的;有具有偏旁,而没有正篆的;有只见于小徐(徐铉)本的;有别的书引《说文》的。本编都增补在内。其有见于《方言》、《广雅》和子史传记中的也列于每部之后,以备考索。全书共收字17240字,极为丰富。书前有“检字”,以便检查。总之,这部书不是专门为解释许说而作,乃是在《说文》本训之外,详举其他意义,以辨析何者为引申义,何者为假借义,对研究词义的发展和转变大有帮助。

此书始创于清道光十三年(1833),历时十数年,到道光二十八年才完成,二十九年于黟县学署雕版成书。现在有中华书局影印本。

(周祖谟)

Zhuji Bianlüe

《助字辨略》 解释古籍虚词的书。清代刘淇著。古人研究虚词的书不多,元代卢以纬于泰定元年(1324)前写了一本《语助》,这可能是第一本专讲虚词的书。可惜这本书只是启悟童蒙的书,不足以言著述。值得重视的专讲虚词的书,创始者要算刘淇的《助字辨略》。刘淇是

清初时人,据王元启《济宁图记人物列传》,刘淇祖籍确山,实居山东济宁。刘淇除《助字辨略》外,其《卫园集》当时已不能备知。又《清史稿艺文志及补编》记载有《堂邑县志》20卷,卢承瑛、刘淇编。刘淇的著作可能只有这些。

《助字辨略》实是第一本有较高水平的研究古籍虚词的书:①所收单词,除同音相通者外,有476字,较之王引之《经传释词》的160字,几乎有近3倍之多。②所收的例句,除先秦两汉古书以外,下及唐诗宋词,范围广泛。③所收复音词不少,甚至“等头”、“等闲”、“者边”等唐宋人常语也收了进去,约略计算有1140条。刘淇不收元曲,

说“他日别为一编”。近人张相编著《诗词曲语辞汇释》,是一本专讲唐宋元明诗词曲特殊语词的著作。张相在《汇释》叙言中说:“《助字辨略》范围较《经传释词》为广,古书而外,旁及诗词,惜元曲部分,自序云别编续出,迄未见有传本”。足见张相的《汇释》一书,是受了刘淇的影响,而补其所未及的。



刘淇著《助字辨略》

《助字辨略》初刻于清康熙五十年(1711),估计成书在此年以前不久。王引之的《经传释词》,自序于清嘉庆三年(1798),相距80余年。王引之生当乾嘉汉学盛世,成就自然超越刘淇,但刘淇筚路蓝缕之功实不可没。王引之的《释词》虽然精湛,而刘淇之书仍有《释词》所不及的,尤其是《左传·宣公十二年》“训之于民生之不易”,以“以”训“于”,杨树达《助字辨略跋》称其“最为精核”。刘淇此书,曾经几次木刻,但已难见到,早年开明书店印有章锡琛的校注本,他一方面校订脱误,一方面汇释各家注释解说,分别列于有关词句之后,排印出版,且附以索引,检阅方便。现在中华书局已有重印本。

(杨伯峻)

ZhuYin Zimu

注音字母 (Sound-Notating Alphabet) 中国第一套法定的汉字形式的拼音字母。1913年“读音统一会”议定,1918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1918~1958年在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前推行了四十年,目前仍在台湾省使用。又名“国音字母”。1930年国民党政府改名为“注音符号”。

注音字母的产生 注音字母的产生,与清末的切音字运动有关。清末二十年间,在民间产生了27种以“言文一致”和“普及教育”(后来又加“统一国语”)为目的的拼音方案,叫做“切音字”。其中王照、劳乃宜的《官话合声

简字》推行最广,影响最大。1910年冬,清朝政府为了筹备立宪,成立议会式的机构“资政院”,各地纷纷提出“说帖”(提案),要求颁行和推广王照、劳乃宣的《官话合声简字》,实施国语教育。会上成立一个“特定股员会”,由严复任会长,审查提案。审查的结果,提出4点意见:①“谋国语教育,则不得不添造音标文字”。②“将‘简字’正名为‘音标’,由学部审择修订,奏请钦定颁行”。③“音标用法有二:一、拼合国语。以开中流以下三万九千万不识字者之民智,而合蒙藏准回二千万里异语民族之感情;二、范正汉字读音。学校课本每课生字亦须旁注音标”。④“请议长会同学部具奏,请旨飭下迅速筹备施行”。学部把这些意见推到第二年(1911)夏天召开的“中央教育会议”讨论。中央教育会议议长张謇,副议长张元济、傅增湘。会议经过讨论,议决了一个《统一国语办法案》,提出5项办法:①设立“国语调查总会”。调查国语的“语词、语法、音韵”。②选择“雅正通行之语词、语法、音韵”作为标准,编纂“国语课本及语典、方言对照表等”。③审定“音、声、话之标准”。音“以京音为主”,声“以不废入声为主”,话“以官话为主”。④选定音标。音标的“音韵须准须备,拼法须合公例,字画须简,形式须美,书写须便”,并“须兼备行楷两种”。⑤“先由学部设立传习所,再由各省会设立,以次府厅州县”,“各学堂之教职员不能官话者应一律轮替入所学习”,“学堂各科亦须逐渐改用官话教授”。10月发生辛亥革命,清朝政府被推翻,这事就留给“民国”去处理了。

民国元年(1912),蔡元培任教育总长。7月10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临时教育会议”,通过《采用注音字母案》,决定先从统一汉字读音着手,实施国语教育,把清末资政院提出的“音标”改称为“注音字母”。用来给汉字注音。决议案内容共7点:①“教育宜普及,文字宜适用于一般人民,不得专为少数才俊计”。②“全国读音宜归一律”。③“读音一律,宜先定字音标准”。④“字音标准宜召集于音韵之学(不论中西)素有研究之人及通晓文两种以上之人,共同决议,并于各省城召集方音代表以备咨询”。⑤“字音既定,宜将一切音韵纳于少数母韵(字典等韵有三十六母、十二韵,母者辅音,韵者主音),凡一母一韵,皆用一韵表之,名曰字母(与日本假名功用相同)”。⑥“字母形体,但凡笔画简易,便于书写,由教育部征集各种字母形体,酌取其一”。⑦“编成切音字典,发行全国应用”。

同年12月,教育部根据这个决议案,筹备召开“读音统一会”,先成立筹备处,由吴敬恒任主任。筹备处制订和公布会议章程8条,并由吴敬恒起草《会议进行程序》一份,印寄受聘会员。

1913年2月15日,“读音统一会”在北京开会,选举吴敬恒为议长,王照为副议长。会员80人,除了各省选派的代表外,还有特邀代表30多人、部派代表10多人,实到44人。会期3个月(后来延长一星期)。会议第一步审定6500多字的“国音”,第二步核定音素和采定字

母。会上提出的字母方案很多,有采用汉字偏旁笔画的,有自造符号的,有采用罗马字母及其变体的,争论不休,最后接受浙江会员马裕藻、朱希祖、许寿裳、钱稻孙和部员周树人(鲁迅)等的提议,把会议审音用的“记音字母”作为正式字母通过。这套字母共38个,都是笔画很少的古字,其中15个采自1908年章炳麟“皆取古文篆籀迳省之形”制订的《纽文·韵文》。于是,这套汉字形式的拼音方案产生了。由于拼注的是“国音”,所以又叫“国音字母”。

字母通过后,议决《国音推行方法》7条,规定将小学“国文”科改为“国语”科,或另添“国语”一门,小学课本一律在字旁添注“国音”,中小学教师必须以“国音”授课。由于政局变动和保守势力的反对,这套字母到5年后的1918年11月25日才由教育部正式公布。

注音字母的方案 注音字母的方案,原为38个字母,公布时增加一个“儿”,成为39个。

声母二十四

- 《(见-) 古外切,与浚同,今读若格,发音务促。
 ㄅ(溪-) 苦浩切,气欲舒出有所碍也,读若克。
 ㄆ(疑) 五忽切,兀高而上平也,读若愕。
 ㄇ(见-) 居尤切,延蔓也,读若基。
 ㄎ(溪-) 本姑兹切,今苦兹切,古歌字,读若欺。
 ㄌ(娘) 鱼俭切,因崖为屋也,读若臑。
 ㄋ(端) 都劳切,即刀字,读若德。
 ㄊ(透) 他骨切,义同突,读若特。
 ㄋ(泥) 奴亥切,即乃字,读若讷。
 ㄋ(帮) 布交切,义同包,读若薄。
 ㄋ(滂) 普本切,小击也,读若泼。
 ㄇ(明) 莫狄切,复也,读若墨。
 ㄋ(敷) 府良切,受物之器,读若弗。
 ㄋ(微) 无贩切,同万,读若物。
 ㄋ(精) 子结切,古节字,读若资。
 ㄋ(清) 亲吉切,即七字,读若疵。
 ㄋ(心) 相姿切,古私字,读私。
 ㄋ(照) 真而切,即之字,读之。
 ㄋ(穿) 丑亦切,小步也,读若痴。
 ㄋ(审) 式之切,读尸。
 ㄋ(晓-) 呼肝切,山侧之可居也,读若黑。
 ㄋ(晓-) 胡雅切,古下字,读若希。
 ㄋ(来) 林直切,即力字,读若勒。
 ㄋ(日) 人质切,读若入。

介母三

- 一 於悉切,数之始也,读若衣。
 ㄨ 疑古切,古五字,读若乌。
 ㄩ 丘鱼切,饭器也,读若遇。

韵母十二

- ㄚ 於加切,物之歧头,读若阿。
 ㄛ 呵本字,读若阿。
 ㄜ 羊者切,即也字,读若也。

- ㄣ 余之切,流也,读若危。
 ㄤ 古亥字,读若哀。
 ㄨ 於尧切,小也,读若傲,平声。
 ㄨ 于救切,读若讴。
 ㄣ 乎感切,嗔也,读若安。
 ㄣ 乌光切,跛曲胫也,读若昂。
 ㄣ 古隐字,读若恩。
 ㄣ 古肱字,读若哼。
 ㄣ 而邻切,同人,读若儿。

浊音符号

于字母右上角作[']。

四声点法

于字母四角作点,如下图:



方案公布后,从1919~1932年,十四年中又进行了以下修正。

① 排定字母音类次序。1919年4月6日,教育部公布《注音字母音类次序》,把39个字母按照发音部位排成以下次序:ㄅㄆㄇㄋ(唇音),ㄌㄍㄖㄎ(舌尖音),ㄅㄆㄇㄋ(舌根音),ㄅㄆㄇㄋ(舌面音),ㄆㄆㄇㄋ(齿音),ㄌㄍㄋ(介母),ㄣㄣㄣ(单韵母),ㄣㄣㄣ(复韵母),ㄣㄣㄣ(带声韵母),ㄣ(特殊韵母)。

② 增加韵母ㄣ。1920年5月22日,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的审音委员会认为ㄣ母兼标[ɔ]、[ʏ]两音不便,决议标“质”、“日”、“陌”、“职”、“缉”等韵母时,在字母上方加小圆点,作“ㄣ”,以示区别。但1922年教育部公布《注音字母书法体式》,把“ㄣ”上面的圆点与字母相连,成为“ㄣ”,形成了另一个字母,使“注音字母”从39个字母增加为40个。

③ 韵母ㄣ兼作声母。1920年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临时大会决议,韵母“ㄣ”可兼作声母,与西文“R”和日文“ラ”相对应,译音时“R”与“ラ”都可转写为“ㄣ”。

④ 改变标调方法。1922年教育部公布《注音字母书法体式》,把原来在注音字母四角加点的标调方法改为在韵母上端加-(标阴平,可不用)、ˊ(标阳平)、ˇ(标上声)、ˋ(标去声)、ˋ(标入声,后不用)五种符号。

⑤ 改变拼音标准。1923年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五次大会决议,成立“修订《国音字典》委员会”,改注音字母的拼音标准为北京话的普通读音,不再拼“读音统一会”议定的“国音”。新的拼音标准(后称“新国音”或“京音”)与“国音”(后称“老国音”)有以下6点不同: a. ㄆ、ㄇ、ㄋ 3个声母不用。 b. 取消尖音。ㄆ、ㄇ、ㄋ不再与ㄌ、ㄎ拼,凡与ㄌ、ㄎ拼的字音,都按北京语音用ㄌ、ㄎ、ㄎ拼成团音。 c. ㄣ除作叹词外,分为ㄣ和ㄣㄣ两音,不过与ㄣ、ㄣ、ㄣ、ㄣ拼时,ㄣㄣ可省去ㄣ,作ㄣㄣ、ㄣㄣ、ㄣㄣ、ㄣㄣ。 d. ㄣㄣ改拼为ㄣㄣ。ㄣㄣ只作叹词用。 e. ㄣㄣ拼音时

只作ㄣㄣ和ㄣㄣ。 f. 入声不用,原有的入声字分入平上去各声。从1923年起,注音字母就一律按北京音拼了。

⑥ ㄆ、ㄇ、ㄋ列为国音字母。1928年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印行《国音字母》单张,把标志ㄆ、ㄇ、ㄋ三个字母读音的汉字“复”、“尼”和“额”周围加方框,表示“北平无相当的字可读”。1930年重印,又在字后用括号注明“苏”(苏音),并在3个字母的右上角加*号,注明“国音不用来拼音的字母”。从此这3个字母就专作国音字母用了。

⑦ 改变方案名称。1930年4月2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八十八次常务会议决议,改“注音字母”名称为“注音符号”,认为这个方案的功用“仅适注音,不合造字,称为字母,徒滋歧误,所以应改称为‘注音符号’,以副名实”。

⑧ 增加注音方式。1930年改“注音字母”名称为“注音符号”后,注音方式也从单注“国音”变为在必要时可以“字右旁注国音”,“左旁注方音”(1930年7月23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制定的《各省市县推行注音符号办法》第十九条),以利方言区人民识字。

⑨ 添补“ㄣ”母。1932年1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编订《国音常用字汇》特组会议”决定,为了说明上的方便,添补一个注音不用、单为说明音理用的“ㄣ”母,作为ㄣ、ㄣ、ㄣ、ㄣ、ㄣ、ㄣ、ㄣ 7个声母单独成音节时的省略韵母(虚母)。

注音字母的推行 “注音字母”公布以后,曾经作为汉字正音、传播“国语”、帮助识字和代替汉字的工具,推行了四十年。

作为汉字正音的工具,就是用它来给汉字拼注“国音”,首先用在字典上。

作为传播“国语”的工具,就是用它来拼写和学习“国语”,首先用在小学教科书上。

作为帮助识字的工具,就是把它注在汉字旁边,帮助不识字的人识字。由于目的在识汉字,不在学国语,所以既注国音,也注方音。

作为代替汉字的工具,就是在民众和儿童不识字的情况下,先学注音字母,后学汉字。碰到不识或不会写的字,可以用注音字母代替。如识字太少,也可以全用注音字母。

四十年中这4个方面的推行,除了代替汉字以外,其他都很有成绩,特别是在正音和推行国语这两个方面。《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以前的字典和词典注音,几乎都用注音字母注音。推行国语方面最成功的是光复后的台湾省,直到今天,台湾省的小学、中学、大学的语文课本和教材都用它来注音,还有1000多种儿童读物,以及今天台湾省的第四大报《国语日报》,都用带有注音字母的铅字排印。台湾省只用了十年多一点的时间,就通过注音字母在全省普及了“国语”。

参考书目

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商务印书馆,上海,1934。

罗常培:《国语字母演进史》,商务印书馆,上海,1934(1959年文字改革出版社重印,改名《拼音字母演进史》)。

(倪海曙)

zhuānxiě

转写 (transliteration) 用一种字母表的字符标记另一种字母表的字符的方法。最普遍的转写法是将基里尔字母、阿拉伯字母等非拉丁文字系统的文字符号转写成拉丁字母,一般称之为“罗马化”。日语音节字母用其他字母表的字符标记,也是一种转写。转写是不同字母表字符之间的转换,主要目的在于为每个字母或字母组合求出相应的一个字母或字母组合,而不在于求得实际发音,因而,字符转换时常注重形体一致而不注重发音是否相同。例如,граната、нового 和 легкий 中的г,都以g转写。由于字符之间的转写是唯一的,因而也是可逆的。例如,由Ленинград可转写成Leningrad,但也可还原。

(刘涌泉)

zhuānyì

转义 指汉语语词由固有的意义而转换借代出来的另外的意义。例如“昔”字,甲骨文作,象日在水浪下,当即潮汐的本字,后来转为“一夕”的“夕”。《春秋穀梁传》庄公八年说:“日入至于星出谓之昔。”《庄子·齐物论》说:“是今日适越而昔至也。”进而转为“往昔”、“昔日”之“昔”。又如“社稷”一词,古人称土神为“社”,“稷”为五谷之长,立稷而祭,以稷为谷神。古时天子、诸侯都要祭祀社稷,后来就以“社稷”一词称国家。又如“齿”是牙齿,年龄也称年齿。人以年齿相比列,凡不能比次在一起,非同一般的就说“不齿”。语言中又有“齿冷”一词,是讥笑的意思。张口笑久就齿冷,所以“齿冷”指可笑而言。这些都是转义。转义与原来的词义内容多少总是有联系的,假借义则全无联系,两者不同,不能相混。

(周祖谟)

zhuānyǔ

转语 指语词因声音有变转而别为一意义相通的语词。

语言变转,有因时而变的,有因方言地区不同而变的。晋代郭璞注《尔雅》、《方言》,每每说“语声转”,或说“语转”、“声转”。例如《尔雅·释诂》:“印,我也。”郭璞注:“印犹狎也。语之转耳。”又《释鸟》:“鸛鸛,戴鵄。”郭注:“鸛鸛犹鸛鸛,语声转耳。”这些都是声母相近而意义相同的词。又《方言》卷一说:“秦晋之间,凡人之大谓之奘,或谓之壮;燕之北鄙、齐楚之郊或曰京,或曰将,皆古今语也。”郭注:“语声转耳。”又卷三:“苏、芥,草也。”郭注:“苏犹芦,语转也。”又卷五说:“杞,宋魏之间谓之渠拏,或谓之渠疏。”郭注:“语转也。”又同卷:“薄,宋魏、陈楚、江淮之间谓之菑,或谓之麴。”郭注:“此直语楚,声转也。”(“楚”是伦楚的意思)这些都是韵母相同,意义也相同的词。自从郭璞解释语词提出“语转”、“声转”的观念以后,清代学者研究训诂,就从声音转变而意义相通这一条规律去说

明见之于古书中的音义相关的各类语词,或为古今语,或为方俗语。

“转语”这个名称始见于扬雄《方言》,如《方言》卷十说:“裸,火也。楚转语也,犹齐言焠火也。”清代戴震有《转语二十章》。其书不传,可是有序一篇,载于《戴东原集》。他把声音的变转,分为两类,一类是“同位”,一类是“位同”。“同位”为正转,“位同”为变转。这都是就声母来说的。“同位”就是发音部位相同,“位同”就是发音方法相同。如“端”、“定”两母相转是同位,如“端”、“精”两母或“定”、“从”两母相转是位同。他说:“凡同位为正转,位同为变转……凡同位则同声,同声则可以通乎其义。位同则声变而同,声变而同,则其义亦可以比之而通。”他认为由此就可以“疑于义者以声求之。疑于声者以义求之”。总之,用音义相求,才能把散漫的材料转为有系统的知识。上溯可以求语根,下推可以解语词分化的缘由。王念孙作《广雅疏证》,郝懿行作《尔雅义疏》,钱绎作《方言笺疏》,都以此阐发训诂,成就极大。

与戴震同时的人程瑶田又作《果臝转语记》说明有相同的声音组织形式的复音词,字义也每每相通。他说:“声随形命,字依声立;屡变其物而不易其名,屡易其文而弗离其声。”这就把许多双音语词字不同而音义相通的也纳入研究的范围来了。在清代训诂学中推寻语源方面又前进了一步。

(周祖谟)

zhuānzhu

转注 见六书。

zhuānshù

篆书 古汉字一种书体的名称。有大篆、小篆之分。大篆本名籀文,起于周末,后来行使于秦国。小篆又名秦篆,指秦始皇帝统一文字所用的书体,汉代沿用。后世称篆书,一般皆指小篆。

西周灭亡,平王东迁,秦处周之旧地,使用周的籀文,逐渐发展而具有秦的特色。战国时期,七国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削平六国,统一文字,采纳李斯的奏请,“罢其不与秦文合者”。这时秦使用已久的籀文也在省改,李



秦李斯书峰山刻石上的小篆

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却不尽相同，后世称为秦篆，又称小篆，而把籀文称为大篆。秦代小篆文字资料流传下来的有泰山刻石、琅邪刻石、峰山刻石(见图)、会稽刻石等，以及无数秦量、秦权、诏版。文字确已规范化，偏旁都有固定的形式和位置，形体竖长方，其空虚不足之处尽量用笔划填满，不顾象形、指事、会意等意义的体现。

许慎作《说文解字》，本意想说明中国文字的原始构造，但是他见不到很早的文字资料，所以用小篆 9 353 字作主要资料。小篆年代虽然不早，数量却很大，是中国文字发展史上的洪流，是千百年不断产生而汇集在一起的，解释文义，编造字典自然应当用此为根据。《说文》列出籀文 200 多字，古文 500 多字，作为重文，这是古代文字发展中由于某些原因而发生的，一般都是异体字，从分析字形探求文义看确乎不如小篆可信。

汉承秦制，文字方面也不例外，篆书仍旧是国家的标准书体。当时的高级文件没流传下来。而从皇帝玉玺、皇后玉玺、诸王金玉印、货币、虎符等郑重的文物可以看到，其文字虽各有类名(如刻符、摹印)，书体皆属小篆。王莽时的货币和权衡度量铭文也用小篆，不过笔划更加方正。许慎作《说文解字》目的是为了应用，其子许冲说：“自周礼汉律皆当学六书贯通其意。”《说文》这书也就是因为有用所以一直流传到今日。魏正始四年(243)刻三体石经，其中古文出自壁中经，隶书是已经流行了 400 年的通俗字体，而小篆则是作为传统的标准字体被重视而刻出。

(张政烺)

Zhuang-Dai yuzhi

壮傣语支 (Zhung-Dai branch) 又称台语支。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它是壮侗语族中分布最广、人口最多的一个语支。使用人口约 4 000 多万(1982)。根据语音特点和词汇的同异，壮傣语支可分为 3 个语组：①西南组，包括傣语、泰语、老挝语、掸语(在缅甸)和阿含姆语

表 1 三个语组在语法上的区别

语组	数词“二”以上(包括“二”)	数词“一”
西南	名词+数词+量词(树两棵)	名词+量词+数词(树棵 nuŋ¹)
中部	数词+量词+名词(两棵树)	量词+名词+数词(棵树 nuŋ¹)
北部	数词+量词+名词(两棵树)	量词+名词+数词(棵树 de:u¹)

表 2 三个语组在词汇和语音方面的异同

	¹天	²穿(衣)	³黄色	⁴他	⁵嘴	⁶池	⁷心	⁸哪	⁹手	¹⁰你	¹¹腿	¹²米	¹³胆	¹⁴月	¹⁵云	¹⁶睡
惠水布依语	bun¹	tan³	jan¹	te¹	pa:k⁷	tam³	tsu¹	lau²	vuŋ²	muŋ²	ka¹	hau⁴	di¹	du:n¹	vu¹	nuŋ¹
武鸣壮语	bun¹	tan³	hen³	te¹	pa:k⁷	tam³	sim¹	lau²	fuŋ²	muŋ²	ka¹	hau⁴	bi¹	du:n¹	fu¹	nin¹
龙州壮语	fa⁴	nuŋ²	læ:ŋ¹	min³	pa:k⁷	thum¹	sim¹	tpau²	mu²	maw²	kha¹	khau⁴	di¹	bə:n¹	pha¹	no:n¹
景洪傣语	fa⁴	nuŋ²	læŋ¹	man³	sop⁷	nəŋ¹	tsai¹	dai¹	mu²	muŋ²	xa¹	xau⁴	bi¹	dən¹	fa¹	nə:n¹
曼谷泰语	fa⁴	nuŋ²	lwuŋ¹	man³	pa:k⁷	nə:ŋ¹	tsai¹	dai¹	mu²	muŋ²	kha¹	khau⁴	di¹	duan¹	fa¹	nə:n¹

注：左上角是序号，右上角是调类。

(在印度阿萨姆邦，现已消亡)等；②中部组，包括中国壮语南部方言和越南的依语、土语、岱语等；③北部组，包括中国的布依语和壮语北部方言以及泰国的石话。北部组没有送气清塞音，古复辅音声母的音节在中部组变化最复杂；西南组的元音系统较复杂。3 个语组在词汇上的区别比较明显。在中国，北部组的壮语北部方言和布依语固有常用词中的同源词约有 75%，壮语南、北方言的同源词(中部组和北部组)约有 60~65%，布依语和傣语(北部组和西南组)同源词约有 40% 左右。各语组在语法上主要是一些虚词不同，代词及其使用情况也有明显区别；数词、量词和名词的组合次序，中部组和北部组名词在量词后面，西南组名词在量词前面，如表 1(括号内举例说明词序)。再以惠水布依语和武鸣壮语代表北部组，龙州壮语代表中部组，西双版纳景洪傣语和曼谷泰语代表西南组，举例说明 3 个语组在词汇和语音方面的异同(表 2)。表中左上角 1~8 是词汇上的异同，1~4 是中部组与西南组同而与北部组异，5~6 是北部组与中部组同而不同于西南组，7~8 是北部组与西南组同，9~16 是语音上的异同。从上面的例词可以看出壮傣语支三个语组之间的关系。

参考书目

Fang-Kuei Li, "A Tentative Classification of Tai Dialects" *Culture in History*, Edited by S. Diamond, New York, 1960.

(王 均)

Zhuang-Dong yuzu

壮侗语族 (Zhuang-Dong group) 汉藏语系的语族之一。

界说和地理分布 壮侗语族又称“侗泰语族”或“黔台语族”。分 3 个语支：①壮傣语支，包括壮语、布依语、傣语等；②侗水语支，包括侗语、水语、仡佬语、毛南语、拉珈语、佯僮语、莫语等；③黎语支，包括黎语。据研究，仡佬语也属于这个语族。壮侗语族分布在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贵州、广东、海南岛和湖南南部。壮傣语支的语言，国际上统称“台语”，也通行于泰国、老挝、缅甸、越南北方和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形成东南亚一个很重要的语言群。使用壮侗语族语言的人口，中国有 1 900

多万(1982),泰国约有3500万,老挝有200多万,其他国家和地区约有100多万。

与其他语言的关系 壮侗语跟汉语、苗瑶语、藏缅语至少有4个共同的特点:①语素的单音节性,也就是说,作为构成词、词组和句子的最小语言形式,一般是单音节的。②语素都有严格确定的音韵结构模式:“声+韵+调”。声调跟声母、韵母一样,也形成一个系统,在各语言和方言间可以对应,在这些语言的音韵史上,几乎都发生过浊音声母清音化的现象,原来的浊声母的痕迹普遍反映在声调种类的演变上。③表示语法意义主要靠实词的线性序列和虚词在序列中的诠释作用,当然也需要高低、轻重、升降等声律所起的诠释作用。壮侗语族诸语言跟汉、苗瑶等语一样,其语法体系都以词组为基础。④壮侗语跟汉、苗瑶、藏缅诸语有一些相似的词汇项目。传统上,按照这些特点把壮侗语族归属于汉藏语系,但由于壮侗语族诸语言与其他语言的共同词项之间的严格语音对应规律现在还没有找出来,所以这种归属也只是一种假设。1942年,国际上又提出一种新假设,认为黎语、仡佬语、拉珈语、拉祜语(在越南)等可以合称加岱语(Kadai)。从许多词项看,与其把壮侗语(还有苗瑶语)归属于汉藏语系,不如把它们归属于南岛语系,合成澳泰语系。

共同特征和类别 壮侗语族诸语言的共同特征和类别都是按两个标准来说的,一个是语法学上的语素的相似性,另一个是音位学上的音素和音素体系的相似性。

表1说明壮傣、侗水、黎3个语支的共同特征。例词右上角阿拉伯数字为调类,1为阴平,2为阳平,3为阴上,4为阳上,5为阴去,6为阳去,7为阴入,8为阳入。数字后加'表示另一调。

从表1可以看出3个语支的语言在语素和音素上(包括声调)的相似性,但也可看出3个语支语言中的差异性。比如侗水语“鸡,去,要”等词是把壮傣语相应词的短元音变长;当然也有相反的情况,如“死”。又如在“子女,忘记”等词中,侗水语的长a,在壮傣语里是高后元音。

侗水语支没有保存原始pl-、kl-之类的复辅音声母,壮傣语支(如武鸣、隆安的壮语,泰国的泰语)和黎语支却保存了复辅音(表2)。

由此可以看出同一个词项,黎、壮傣、侗水3个语支各有其音韵结构模式,但从黎语的模式常常可以看到跟其他两个语支的联系。比如词项“近”,壮傣语的kl-、khj-、k-跟侗水语的phj-、phy-对应,而黎语plaw³的模式则与两者都有关。又如词项“懒”,黎和壮傣两个语支的k-、kl-、khr-跟侗水语支的l-等对应,从而仡佬语的la:n⁴就很难肯定它必然是汉语借词了。词项“鱼”,壮傣语以pla¹等形式出现,而大部分侗水语则以mom⁶等形式出现,也可以认为mom⁶是不同于pla¹的另一个词(侗语pa¹借自壮傣语支),但双唇音m-却与p-有关,而黎语的ɬ-则是pl-失去p-之后的-l-的变体。

侗水语支应当再分为几个语组,比如在侗、水、仡佬等语言中有一系列清化鼻音,如水口侗语pa¹(来),paŋ³(草);三洞水语pa³(弓),pa¹(狗);仡佬语pa¹(回来),pa³(鼠);在莫语、佯僂语中则已消失。侗语、水语中有小舌塞音和舌根塞音的对立,如和里侗语qe⁴(屎),ko¹(笑);三洞水语qa¹(读),ka¹(龙)。莫语、侗语、水语中有舌面塞音和舌根塞音的对立,如莫语ta:i⁶(亲家),ka:i⁶(街);侗语ta³(茄子),ka¹(剩);水语ta⁶(茄子),ka¹(龙);仡佬语佯僂话、毛南语中无此对立。带喉塞音的浊塞音与鼻音声母在毛南语、水语中最多,在仡佬语、佯僂话、莫话中只有几个,侗语中没有。

表1 三个语支的共同特征

例词	侗语 章鲁话	水语 三洞话	莫语 方村话	仡佬语 大银话	傣语 景洪话	壮语 龙州话	布依语 羊场话	黎语 通什话
水	nam ⁴	nam ³	nam ³	nəm ⁴	nam ⁴	nam ²⁴	zam ⁴	nam ³
火	pui ¹	vi ¹	vəi ¹	fi ¹	fai ¹	fai ¹	vi ¹	fei ¹
子女	la:k ⁶	la:k ⁶	la:k ⁶	la:k ⁶	luk ⁶	luk ⁶	lu ⁷⁸	ɬak ⁷
鸡	ʔa:i ⁵	qa:i ⁵	ka:i ⁵	ci ¹	kai ⁵	kai ⁵	kai ⁵	khai ¹
去	pa:i ¹	pa:i ¹	pa:i ¹	pa:i ¹	pai ¹	pai ¹	pai ¹	hei ¹
来	ma ¹⁷	pa ¹	ma ¹	pa ¹	ma ³	ma ³	ma ¹	pa:u ⁴ 回
狗	ŋwa ¹	pa ¹	ma ¹	ŋwa ¹	ma ¹	ma ¹	ma ¹	pa ¹
猪	ŋu ³⁷	pu ⁵	məu ⁵	pu ⁵	mu ¹	mu ¹	mu ¹	pau ⁴
要	ʔa:u ¹	ʔa:u ¹	ʔa:u ¹	ʔa:u ¹	ʔau ¹	ʔau ¹	ʔau ¹	la:u ⁵
忘记	la:m ³	la:m ³	la:m ³	la:m ³	lum ³	lum ³	lam ³	lu:m ⁶
死	təi ¹	tai ¹	tai ¹⁷	tai ¹	ta:i ¹	ha:i ¹	ta:i ¹	ɬu:i ⁴
苦	ʔam ³	qam ¹	kam ¹	kam ¹	xum ¹	khum ¹	ɣam ³	ho:m ¹

表2 三个语支的差异

例词	黎语	壮语 武鸣话	壮语 龙州话	傣语	泰语	侗语	水语	莫语	仡佬语
近	plaw ³	klaw ³	khjau ³	kai ³	klai ³	tan ⁴	phjai ³	phjai ³	phyai ³
解(结)	plu: ²⁷	ke ³	ke ³	ke ³	ke ³	ljan ³	tsi ³	təi ³	tsi ³
懒	ka ³	klik ⁷	kja:n ⁴	xa:n ⁴	khra:n ⁴	khwət ⁷	hət ⁷	lut ⁷	la:n ⁴
黄蜂	plou ¹	tin ³	to ³ ;phen ¹	tən ¹	tə:n ¹	lin ¹ ; la:u ¹ ma:n ¹	lu ¹	din ¹	tən ¹ lu ¹
听	pleu ¹	tiŋ ³	tiŋ ³	faŋ ³	faŋ ¹	thiŋ ³⁷	di ³	hai ³	therŋ ³
鱼	ɬa ¹	pla ¹	pja ¹	pa ¹	pla ¹	pa ¹	mom ⁶	mum ⁶	məm ⁶
瞎	pla:u ¹	faŋ ³	bo:t ⁷	bo:t ⁷	bo:t ⁷	ko ⁴	ko ⁴	ʔbət ⁷	kha ¹

壮傣语支可以分为3个语组：北部组如贵州省的布依语，广西壮语北部方言（如武鸣话），泰国的石话；中部组如广西壮语南部方言的龙州话、德保话，云南南部的依语，老挝和越南的白泰语、依语、土语等；西南组如泰国、老挝、缅甸的掸语和云南西双版纳、德宏等地的傣语。3个语组在音韵上的差异见表3（带*号的表示原始壮傣语的声母）。

表3 壮傣语支三个语组在音韵上的差异

例 词	布依语 龙里话	壮语 武鸣话	壮语 龙州话	傣语 西双版纳话
眼 (*tr-)	ta ¹	ra ¹	ha ¹	ta ¹
死 (*tr-)	ta:i ¹	ra:i ¹	ha:i ¹	ta:i ¹
尾巴 (*thr-)	zu:ŋ ¹	ruaŋ ¹	ha:ŋ ¹	ha:ŋ ¹
石头 (*thr-)	zin ¹	rin ¹	hin ¹	hin ¹
抬 (*thr-)	za:m ¹	ra:m ¹	ha:m ¹	ha:m ¹
晾、晒 (*pr-)	ta ²	ta:k ²	phja:k ²	ta:k ²
破裂 (*pr-)	tia ²	te:k ²	phe:k ²	tek ²

在音韵结构模式上，北部组清塞音一般没有送气与不送气的对立，个别地区的送气音是后起的，如布依语普安话 *tham¹* < *t- (织)。原始壮傣语复辅音声母 *tr- 和 *thr- 在北部组和西南组的声母体系上有反应，如龙里话 t- 与 z-，武鸣话 t- 与 r-，西双版纳话 t- 与 h-，中部组的情况比较复杂。原始的 *pr-，西南组和北部组变为 t-，中部组变为 phj-、ph-。

壮傣语支的3个组里大量词项是共有的，说明它们的亲属关系，但是也有一些词项只见于两个组，另一组用另一个词。比如“天”，中部组和西南组用 *fa⁴*，而北部组用 *bun¹*；“胡子”，中部组和北部组用 *mum⁶*，西南组用 *not¹*；“刀”，中部组用 *pja⁴*，西南组用 *pha⁴*，相近，而北部组用 *mit⁸*，是另一个词（西南组也有用 *mit⁸* 的）。分析各组之间的词项是否相同，必须观察它们的全部音韵特点是否相同或相对应。比如动词“是”和动物量词“只”，乍一看都能对应，但是西南组的 *pin¹* (是) 从原始形式 **pen¹* 变来，中部北部组的 *pan²* (是) 从原始形式 **ben¹* 变来；中部组和西南组的 *tu¹* (只) 从原始的 **tua¹* 变来，北部组的 *tu²* (只) 从 **dua¹* 变来（以上音标右上角的 A 表示古平声）。所以无论从音韵上看还是从词汇上看，壮傣语支都应该分为3个语组。

语法特点：壮侗语族诸语言的语素绝大部分都是单音节的，但也有一些是多音节的。比如侗语里来源不明的词如 *ma³mən³* (蝴蝶)，*ma⁴fa:i¹* (螳螂) 和傣语里借自巴利和梵文的词如 *po²ti⁶jan²* (菩提心) 等。构造新词不重形态变化，常用派生法。有少数的派生词缀，都是由实词虚化而来。比如莫话 *la:k⁸* (子女)，虚化为前缀，说成轻声 *·lə*，如 *ləma:k⁷* (李子)、*·ləma⁴* (子弹)、*to²* (只)，虚化为 *·tə*，如 *·təma⁴* (马)、*·təka³* (大家)。合成词主要用复合法，如侗语 *na³* (脸) + *naŋ¹* (鼻) > *na³naŋ¹* (容貌)，*nam⁴* (水) + *ta¹* (眼) > *nam⁴ta¹* (眼泪)，*coŋ¹* (装) + *ka¹*

(耳) > *coŋ¹ka¹* (听)，*təi¹* (死) + *khwa:u³* (酒) > *təi¹khwa:u³* (醉)，*ʔəp¹* (嘴) + *kuŋ²* (多) > *ʔəp¹kuŋ²* (多嘴) 等。单音词有的可以重叠，如侗语量词重叠表示逐指，如 *tu²tu²* (每只)；但傣语量词不能重叠。形容词可以重叠，如傣语 *suŋ¹suŋ¹*，侗语 *phaŋ¹'phaŋ¹* (高高的))。形容词后附音节可以重叠，如傣语 *deŋ¹tən²tən²* (红彤彤)、侗语 *p'aŋ¹'gaŋ¹gaŋ¹* (高昂昂)。

句子经常由一个名词词组后面跟上一个动词词组构成。名词词组包含一个名词，后面可以跟上修饰语（另一个名词、形容词、指示词等）。量词一般都跟数词连用，而且要随名词的类别变换。由数量词构成的修饰语，侗语放在中心语前面，如 *jan²* (房子)、*ŋwe⁴* (瓦)、*jan²ŋwe⁴* (瓦房)、*lau⁴* (大)、*jan²ŋwe⁴lau⁴* (大瓦房)、*nai⁶* (这)、*ja²en¹* (两间)、*ja²en¹jan²ŋwe⁴lau⁴* *nai⁶* (这两间大瓦房)。傣语数量词放在中心语后面，如：*sə³la:i²soŋ¹phwn¹* *nan⁴* (衣服 + 花 + 两件 + 那 = 那两件花衣服)。动词词组包含一个动词，后面跟上一个名词做宾语，还可以跟上别的一些动词（也可以带宾语）。有一些后跟的动词表示趋向，侗语如 *ma¹* (来)、*pa:i¹* (去)、*ʔuk¹* (出)、*la:u³* (进)、*tha³* (上)、*lui⁶* (下)、*ʔuk¹pa:i¹* (出去) 等；傣语如 *ma²* (来)、*pa:i¹* (去)、*ʔok¹* (出)、*xau³* (进)、*xwn³* (上)、*luŋ²* (下)、*ʔok¹pa:i¹* (出去) 等。侗语：*ʔui¹'nam⁴* (流水)、*ʔui¹'nam⁴lui⁶ma¹* “流水下来” (流下水来)；傣语：*ha:p¹fun²* (挑柴)、*ha:p¹xau³ma²* (挑进来)、*ha:p¹fun²xau³ma²* (挑柴进来)、*ha:p¹fun²xau³hən²ma²* (挑柴进屋来)。还有一些后跟的动词或形容词表示结果。如侗语：*heu¹'tu²me¹fa²təi¹jan²* “打死那只熊了” (打死那只熊了)；傣语：*pat¹xa⁴mai⁴xa⁴t¹leu⁴* “吹枝树断了” (吹断了树枝)。第一个动词如果有致使性，其宾语对后面的动词则有施动性，如“叫你回去吃饭”，侗语说做 *sin³'na²ma¹'ti²əu⁴*，傣语说做 *hə:ŋ⁴'muŋ²pək⁶pa:i¹kin¹* *xau³*。

句子还可以由一个名词词组后面跟上一个形容词词组构成。如侗语：*nam⁴/lu¹'ma¹la⁴* “水/清来了” (水清了)；傣语：*dək⁷mai⁴/deŋ¹ma²leu⁴* “花/红来了” (花红了)。

句子还可以由一个名词词组后面跟上另一个名词词组构成。如侗语：*ma:u⁶/ti¹tsa:ŋ¹* (他/是) 队长；*fa⁴ma:u⁶/lət⁷'əo²sən⁶* (他们/都) 是 <是> 学生；*ja:u¹/pəp⁶pet⁷* (我/18 <岁>)。傣语：*mu⁴'ni²/van²ka:t⁴* (今天/是) 街子天；*kin³nai¹/sip⁷hoŋ⁶* (一斤/是) 十两。

有一些助词，特别是见于句尾的，用来表示疑问，命令，强调或者不肯定等。

壮侗语族的这许多语法特点跟汉语基本上一致。

研究的历史 中国对壮侗语族语言的研究始于1935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广西、贵州、云南的一些壮侗语族语言做过调查，出版过一些专著，如李方桂的《龙州土语》(1940)、《莫话记略》(1943)、《武鸣壮语》(1947)等；发表过一些重要论文，如1943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1本载李方桂的《原始台语声母中前喉塞音系列的假设》等。1943年后，北京大学文

科研究所和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对云南傣语、壮语做过一些调查。这个阶段的研究成果应该提出两件事：①学者们已经公认台语声调体系应分A、B、C、D 4类，每类再分阴阳两个次类，跟汉语相同。丹麦学者吴克德在1934年提出B类应与汉语去声对应，C类应与汉语上声对应，但是为什么许多台语方言浊塞音b-、d-声母（还有j-）的字不归入阳调类，却归入阴调类？这跟汉语声调演化的历史是不相对应的。李方桂在1943年提出原始台语声母中“前喉塞音系列”的学说解决了这个问题。②李方桂于1943年在《莫话记略·导论》中建立了跟台语并列的侗水语支，指出侗水语虽然跟台语同出一源，但是在古台语分化为近代各方言之前就已经跟台语分了家，并提出了后来被国际语言学界承认的“侗台语”这一术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对壮侗语族诸语言进行过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工作，主要目的是为了帮助少数民族创立和改革文字。其研究成果表现在社会实践上，很少表现在著述上。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共同组织的壮文工作队于1952年开始工作，1954年扩大组织，普查了广西56个县的壮语方言。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壮汉词汇》（1959、1984）和《汉壮词汇》（1983）等（参见彩图插页第28页）。1956~1957年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一工作队对贵州境内40个布依语方言点进行了调查，出版了《布依语调查报告》（1959）。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布依汉简明词典》（1958）和《汉布依简明词典》（1960）。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三工作队曾到云南西部和南部傣语区做过调查。侗语区于1956年进行过普查。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了《侗汉简明词典》（1959）和《汉侗简明词典》（1960）。1956~1957年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一工作队海南分队，调查了黎语100多个方言点，并通过调查对昌感的村话和临高、澄迈、琼山的临高话做出了初步判断：前者属黎语支，后者属壮语支。民族出版社于1979~1980年出版的壮语、布依语、傣语、侗语、水语、仫佬语、毛南语、黎语等的《简志》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黎语调查研究》（1983）就是在这些调查的基础上整理、补充写定的。在《中国语文》和《民族语文》两种期刊上也时常发表有关壮侗语研究的论文。（参见彩图插页第64页）

参考书目

王均等：《壮侗语族语言简志》，民族出版社，北京，1984。

Fang-Kuei Li, *A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Tai*,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77.

（邢公畹）

Zhuangwen

壮文 (Zhuang writing) 见壮语。

Zhuangyu

壮语 (Zhuang language) 原称僮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主要分布于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

区和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使用人口约1300万（1982）。分北部和南部两个方言，每个方言又各分几个土语。壮语有单纯声母和pj、mj、kj、kv、ŋv等腭化、唇化声母（南部方言还有送气声母）；有6个元音：i、e、a、o、u、w（有些地方还有ɛ、ɔ、ə）和9个韵尾：i、u、w、m、n、ŋ、p、t、



方块壮字（清代）

k。单元音韵母都是长元音，带韵尾时有长短元音的对立。各地的韵母数约在80~120个左右。有6个舒声调和两个促声调，促声调往往又因元音长短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调值。没有词形变化。词序和虚词是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名词的修饰语一般在名词后面，只有数量修饰语（“一”除外）在被修饰语的前面，指示词都在词组的最后面。句子中主语在谓语前面，宾语和补语在动词后面。过去各地使用一种类似汉字的方块壮字（见图）来记录民歌和人名、地名等，但这种方块壮字没有经过系统整理，各地不尽一致，所以从来没有成为正式通行的文字。1955年创制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1981年修改后全部采用拉丁字母。

（梁敏）

Zizhi Tongjian Shiwen

《资治通鉴释文》 解释司马光《资治通鉴》中文字音义的书。宋代右宣义郎监成都府粮料院史炤撰。卷首有绍兴三十年（1160）三月左朝散郎权发遣黎州军州主管学事缙云冯时行序。史炤，四川眉山人，字见可，苏轼兄弟以乡先生事之。

本书共30卷，依照《资治通鉴》原书（249卷）卷次文字顺序摘字注出音义，与陆德明《经典释文》、何超《晋书音义》之类相似，但参考前代书籍颇为详备。冯时行序文说：“字有疑难，求于本史，本史无据，则杂取六经诸子释音，《说文》、《尔雅》及古今小学家训诂辨释、地理、姓纂、单闻小说。精力疲殫，积十年而书成。”由此可知史炤取材之广。如《通鉴》卷首御制序“札”字下云：“札者栝也，编木如栝齿，即简札也。见唐《苏鹞演义》。”又“其要”下云：“一笑切，约也。贾魏公（昌朝）《群经音辨》云：要者总最之称。”其他各卷中引用前人之说的地方极多。间或也有驳正前人处。如御制序“无间”下说：“旧说不能间厕其

间,窃谓间乃閒隙之閒,言禹之德至盛无閒隙可议”即是一例。书中所注字音,有取自前代书音的,惟采用《集韵》反切的比较多。如“砥”音軫视切,“质”音职日切,“别”音笔列切,“橄”音邢狄切,“铁”音匪父切,“邻”音离軫切,“櫓”音笼五切,如此之类,不可胜数。此书在胡三省注之前,为读《通鉴》的重要音义资料。后来胡三省著有《通鉴释文辨误》12卷,对《释文》又有所刊正,可以与史炤书参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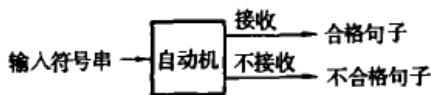
(周祖谟)

zidongji lilun

自动机理论 (automata theory)

数理语言

学中研究抽象自动机的理论。抽象自动机是一种能够识别语言的抽象的装置,它不是具有物理实体的机器,而是表示计算机运算方式的抽象的逻辑关系系统,这样的抽象自动机可以用来检验输入的符号串是不是语言中合格的句子,如果是合格的句子,自动机就接收它,如果不是,就不接收它。如图所示:



自动机可分为有限自动机、后进先出自动机、线性有界自动机、图灵机等几种。它们对语言的识别能力各不相同。

美国语言学家 N. 乔姆斯基等人建立了形式文法和自动机之间的联系,证明语言的形式文法与自动机之间存在着如下的对应关系:①若某一语言能用图灵机来识别,则它就能用 O 型文法生成,反之亦然;②若某一语言能用线性有界自动机来识别,则它就能用上下文敏感文法生成,反之亦然;③若某一语言能用后进先出自动机来识别,则它就能用上下文自由文法生成,反之亦然;④若某一语言能用有限自动机来识别,则它就能用有限状态文法生成,反之亦然。

这种关于形式文法与自动机的关系,反映了语言的生成过程与识别过程的内在联系,它已成为计算机科学的基石之一。这是语言学对于现代自然科学发生影响的一个明证。

(冯志伟)

ziran yuyan chuli

自然语言处理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人工智能领域的主要内容,即利用电子计算机等工具对人类所特有的语言信息(包括口语信息和文字信息)进行各种加工,并建立各种类型的人—机—人系统。

自然语言与人造(或人工)语言不同,前者是人类社会中自然形成的语言,人们借助它进行各种交际活动,如汉语、英语、俄语等;后者是通过人工设计创造出来的语言,如国际辅助语和计算机语言。自然语言处理是一个比较广泛的概念。自然语言理解是其核心,其中包括语音和语符的自动识别以及语音的自动合成。语言之间的

自动翻译是另一种高级的人工智能,涉及两种或多种自然语言的理解和处理问题。上述项目目前都还处于研究实验或初步应用阶段。自然语言处理中智能较低的工作,如语料的统计、分类、检索、分析等,早已付诸应用(见计算机情报检索、频率词典、统计语言学)。

在自然语言处理的领域内,计算语言学工作者所研究的只是它的一般理论和方法,以及与语文信息加工有关的基础性工作。随着计算机科学和语言学的发展,自然语言处理的条件将逐步改善,它的技术将逐步提高,同时,它所起的作用也会越来越大。可以说,自然语言处理是计算机文化的开路先锋。只有在自然语言处理这门工程技术推广普及之后,计算机在人类生活中的广泛应用才能得以实现。

(刘涌泉)

ziran yuyan lilie

自然语言理解 (natural language understanding)

俗称人机对话。人工智能的分支学科。研究用电子计算机模拟人的语言交际过程,使计算机能理解和运用人类社会的自然语言如汉语、英语等,实现人机之间的自然语言通信,以代替人的部分脑力劳动,包括查询资料、解答问题、摘录文献、汇编资料以及一切有关自然语言信息的加工处理。这在当前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研制第 5 代计算机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使计算机具有理解和运用自然语言的功能。

自然语言理解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内容涉及语言学、心理学、逻辑学、声学、数学和计算机科学,而以语言学为基础。自然语言理解的研究,综合应用了现代语音学、音系学、语法学、语义学、语用学的知识,同时也向现代语言学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和要求。本学科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语言究竟是怎样组织起来传输信息的?人又是怎样从一连串的语言符号中获取信息的?

自然语言理解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初开始研究,由于 N. 乔姆斯基在语言学理论上的突破和此后各家理论的发展,以及计算机功能的不断提高,目前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分为语音理解和书面理解两个方面。

语音理解 用口语语音输入,使计算机“听懂”语音信号,用文字或语音合成输出应答。方法是先在计算机里贮存某些单词的声学模式,用它来匹配输入的语音信号,称为语音识别。这只是一个初步的基础,还不能达到语音理解的目的。因为单凭声学模式无法辨认人和人之间、同一个人先后发音之间的语音差别,也无法辨认连续语流中的语音变化,必须综合应用语言学知识,以切分音节和单词,分析句法和语义,才能理解内容,获取信息。60 年代至 70 年代初期,研究工作一直停留在单词的语音识别上,进展不大。直到 70 年代中期才有所突破,建立了一些实验系统,能够理解连续语音的内容,但是还限于少数简单的语句(见自然语言语音理解系统)。

书面理解 用文字输入,使计算机“看懂”文字符号,也用文字输出应答。这方面的进展较快,70 年代初期取

得突破,中期以后又有所发展。目前已能在一定的词汇、句型和主题范围内查询资料,解答问题,阅读故事,解释语句等,有的系统已付诸应用。由于绝大多数语种使用的是拼音文字,计算机识别拼音字母已无问题,而输入又是按单词分别拼写,因此书面理解一般没有切分音节和单词的问题,只需直接分析词汇、句法和语义。但是汉语用的是汉字,无论是用汉字编码输入还是将来计算机能直接认识汉字,都要首先解决切分单词的问题,因为输入就是一连串汉字,词和词之间没有空隙。

书面理解的基本方法是:在计算机里贮存一定的词汇、句法规则、语义规则、推理规则和主题知识。语句输入后,计算机自左至右逐词扫描,根据词典辨认每个单词的词义和用法,根据句法规则确定短语和句子的组合;根据语义规则和推理规则获取输入句的含义;查询知识库,根据主题知识和语句生成规则组织应答输出。目前已建成的书面理解系统应用了各种不同的语法理论和分析方法,如生成语法、系统语法、格语法、语义语法等等,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目前存在的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迄今为止的语法都限于分析一个孤立的句子,上下文关系和谈话环境对本句的约束和影响还缺乏系统的研究,因此分析歧义、词语省略、代词所指、同一句话在不同场合或由不同的人说出来所具有的不同含义等问题,尚无明确规律可循,需要加强语用学的研究才能逐步解决。另一方面,人理解一个句子不是单凭语法,还运用了大量的有关知识,包括生活知识和专门知识,这些知识无法全部贮存在计算机里。因此一个书面理解系统只能建立在有限的词汇、句型和特定的主题范围内,计算机的贮存量和运转速度大大提高之后,才有可能适当扩大范围(见自然语言书面理解系统)。

参考书目

范继淹,徐志敏:《人工智能和语言学》,载《中国语文》1980,第4期。

A. Barr and E. A. Feigenbaum, *The Handbook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itman, London, 1981.

(范继淹 徐志敏)

ziran yuyan shumian lilie xitong

自然语言书面理解系统 (natural language understanding systems)

指人和计算机之间用自然语言书面对话的系统。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研究,早期使用关键词和模式匹配的方法,计算机只能应答有限的、固定格式的输入句,没有句法、语义分析和知识推理。70年代初取得突破。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又继续有所进展。建成的系统较多,各自使用了不同的语法理论和计算机程序。其中有代表性的分述如下。

J. 维诺格拉德的语法规则及其 SHRDLU 系统 维诺格拉德于1972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建成 SHRDLU 系统,把语言分析和知识推理综合在一起,在自然语言理解的研究中跨出了重要的一步。维诺格拉德认为,人听

到或看到一个句子是运用了全部知识和智力来理解的,包括句法、语义、上下文、主题知识和推理。计算机要理解自然语言也必须具有这些知识并使之相互作用。句法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语言究竟是怎样组织起来表达意义的?”而不是“怎样分析一个孤立的句子结构?”句法必须跟语义、推理密切配合,语义根据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作出推论以指示句法分析。语义学是句法学和逻辑推理之间的桥梁,语义学的目的是研究意义的表达形式。

SHRDLU 系统采用韩礼德的“系统语法”,计算机根据句法特征识别输入句的态、式、语气等,按句型逐层分解到词为止,语义分析和知识推理同时配合,以排除歧义和误解。获取语义信息后查询知识库,执行指定的操作或作出应答。这个系统贮存200条英语单词,能理解较复杂的英语句子。背景是8块颜色、形状、大小各不相同的积木,一个放积木的盒子和一只机械手,因此一般称之为“积木世界”。计算机能根据人打字输入的指令或问题在屏幕上显示操作或应答。例如根据指令抓起红色长方形大积木,回答某块积木之上是否放着某种颜色的积木等。

W. A. 伍兹的扩充转移网络及其 LUNAR 系统 伍兹于1970年提出扩充转移网络(简称 ATN),1972年在美国 BBN 公司建成 LUNAR 系统。ATN 是一种句法分析方法,也是一种计算机处理程序。生成语法缺乏短语结构中的规则和结构之间的直接联系;根据转换规则可能生成的语句又过多,构成“组合爆炸”,而把生成语句的过程颠倒为分析语句的过程困难也不少,因此计算机无法应用。ATN 建立了英语部分句型的有限状态转移线路网络,同时设置了某些操作技术,使上下文相关,并能重新组合结构成分包括复写、添加、删略、换位等。如此即可应用转换规则,充分发挥转换语法的效能。图1~3是简化了的扩充转移网络示意图。

图1是句型网络。S是初始态,有两个走向:句首是名词短语就转入状态 q_1 ,如为助动词则转入状态 q_2 。 q_1 又有两个走向:连接动词到达 q_3 ,或连接助动词转入 q_2 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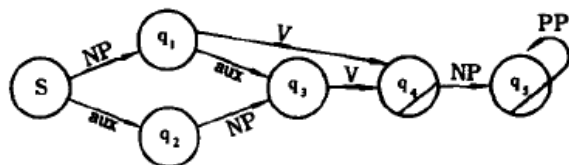


图1 句型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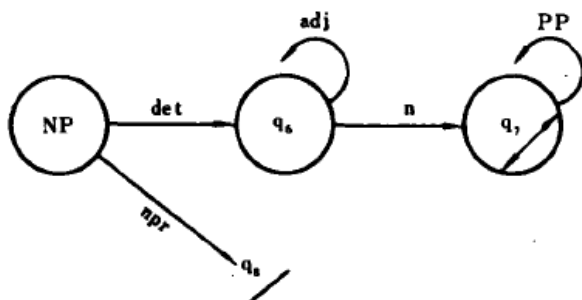


图2 名词短语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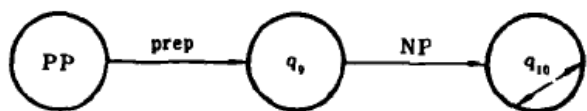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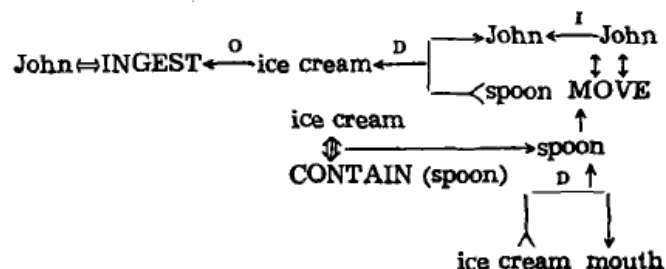
图 3 介词短语网络

连接动词到 q_1 。 q_1 是终结态(用斜线表示), 句子可在此结束(不及物动词句), 也可再连接 NP 到达终结态 q_2 (及物动词句)。 q_2 后还可能连接多个介词短语再回到 P_2 。图 2 是名词短语网络。NP 是初始态, 也有两个走向: 一条线路以限定词开始转入状态 q_3 , q_3 可连接多个形容词之后再连接名词到达终结态 q_7 , q_7 之后还可连接多个介词短语再回到 q_7 。另一条线路是专名或代词, 直接到达终结态 q_8 。图 3 是介词短语网络。PP 是初始态, 由介词转入 q_9 , 连接名词短语到达终结态 q_{10} 。

LUNAR 系统贮存英语单词 3 500 条, 主题是查询阿波罗登月舱带回的月球泥石采样的化学成分, 为地质学家检索信息服务。语句输入, 由 ATN 分析, 求出深层结构, 凭以解释语义, 并将语义信息编译成一种谓词演算查询语言, 检索数据库求得答案输出。例如人问: “有多少种角砾岩含有橄榄石?” 机答: “5 种。” 如再问是哪 5 种, 即列举该 5 种样品的编号。LUNAR 是第 1 个面向应用而又设计完善的系统。ATN 已成为自然语言理解研究中广泛采用的著名方法, 此后建成的不少系统, 包括语音理解系统 HWIM 在内都以 ATN 为基础。

R. C. 尚克的概念从属论及据此建成的诸系统 美国学者尚克于 1973 年提出概念从属论 (简称 CD), 同时在美国斯坦福人工智能实验室建成 MARGIE 系统; 1975 年尚克和他的同事在耶鲁大学建成 SAM 系统, 1978 年建成 PAM 系统, 1979 年建成 FRUMP 系统, 1980 年建成 IPP 系统。

CD 的主要内容是：人脑中存在着某种概念基础，语言理解的过程就是把语句映射到概念基础中去的过程。概念基础具有完善的结构，能根据初始的输入预期可能的后续信息。要使计算机理解自然语言就必须研究概念结构及其映射规则。句法只起一个指引作用，无需详细分析。概念结构由概念及其从属关系构成。常用动词和形容词可抽象为少数“语义基元”，表示行为和状态的基本概念。采用美国 C. 菲尔莫尔(1929~)的“格语法”，区分 5 种格关系。概念结构用图像标记法构成 CD 表达式，而句中任何隐含的信息都必须在 CD 表达式中表现出来。例如：John eats the ice cream with a spoon (约翰用勺吃冰淇淋)的 CD 表达式为：



→表示施动关系,INGEST 表示“摄入”的语义基元。包括“吃、喝、吞、咽……”等词。←^o表示受动关系,O是宾格。

表示方向关系, D是方向格。 表示工具关

系, I 是工具格。右端出现语义基元 MOVE(移动), 右下角出现名词 mouth(嘴), 而句中并无这类词语, 因为用勺不断把冰淇淋送入口中是本句固有的语义信息。这是 CD 跟其他析句方法的根本区别, 在解释语句和演绎推理时获得显著成效。根据上述, 将概念从属关系编入词典。语句输入, 由句法指引找出主要动词和名词, 查词典获得解释。例如输入 John ate the steak, 查 eat 条的注解为:

$$Vt\ X \Leftrightarrow INGEST \xleftarrow{o} Y \xleftarrow{\begin{cases} \rightarrow X & X: \text{animal} \\ \leftarrow \text{in } Y & Y: \text{food} \end{cases}}$$

代入句中名词(X 代以 John, Y 代以 steak) 即可得到理解。

MARGIE 系统按照概念从属论建成,是一个推理和语句解释的模型,能根据输入句推论出若干事实,包括原因、结果等。例如:输入“约翰给了玛丽一些阿司匹林”,计算机即输出:“约翰相信玛丽需要阿司匹林。玛丽病了。”语句解释即计算机能用其他词来解释输入句。例如输入:“约翰杀了玛丽,是掐死的。”输出则为“约翰扼死了玛丽。约翰掐住玛丽,玛丽死了,因为她不能呼吸”。

此后尚克学派将概念从属论加以发展，用于篇章分析，提出“模本”、“计划”、“目的”和“主题”等概念，使计算机能理解简单的故事。一个模本概述一种日常活动中的标准事件序列，如“餐馆模本”包括顾客走进饭馆，坐在餐桌前，服务员送菜单，顾客点菜，吃饭，付款等。计划是完成目的的手段，如“去某处”是总目的，完成这一目的的各种方法如骑车、坐公共汽车、开小卧车等是子目的，应列入总目的项下。主题则是背景信息，可据以预期行为的目的，如“爱情主题”隐含彼此保护、避免对方遭受伤害的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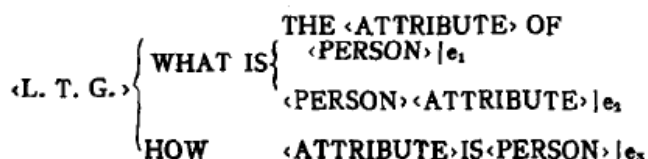
SAM 系统根据模本建成，能解释故事情节，回答问题，进行推论，并作出英语、汉语、俄语、荷兰语和西班牙语的摘要。例如输入“约翰走进一家饭馆。他坐了下来。他生气了。他走了。”输出为：“约翰饿了。他决定到饭馆去。他走进一家馆子。服务员没理他。约翰生气了。他决定离开这家饭馆。他走了。”计算机推论约翰离开饭馆是由于没有得到服务。因为“餐馆模本”中有服务员送菜单一条，而输入句中无此内容，却有约翰生气的句子。

PAM 系统由美国学者 R. 威林斯基建成，以目的和计划为理解故事的基础。也能解释故事情节，回答问题，作出推论和摘要。但无需模本中的事件序列，只提出目的和计划。如营救一个被巨龙拖走的人，只在“营救”这个总目的项下列举若干子目的，包括到达巨龙巢穴和杀死巨龙的各种方法，即可预期下一步的行为。同时能根据主题推论目的，例如输入“约翰爱玛丽。玛丽被巨龙拖走了。” PAM 系统即可预期约翰要采取行动营救玛丽。

句中虽无此内容,但据“爱情主题”可作出推论。

尚克学派又进一步研究语言理解和记忆的关系,概括各种具体知识结构为一般经验,综合句法、语义、知识、推理为一体,再建成 FRUMP 和 IPP 两个快速阅读系统。贮存 2 000 多条英语单词,对输入故事无需逐字分析,而是跳过某些词语提取主要信息。目前已能从报刊上摘录一些新闻故事。

G. 亨德雷克斯的 LIFER 分析法以及据此建成的系统 LIFER 分析法由美国学者 G. 亨德雷克斯于 1977 年在美国斯坦福研究所设计而成,提供了部分英语句型的句法-语义框架,同时采用 N. 乔姆斯基的重写规则和伍兹的 ATN 分析输入句。下图是 3 种句型的转移树,〈L. T. G.〉是 LIFER top grammar 的缩写,表示初始符:



其中〈ATTRIBUTE〉(属性),〈PERSON〉(人名)等非终结符属于语义成分。这种将某些语义成分嵌入句型的方法称为“语义语法”。用户可自行定义语义成分,构成语句以切合自己的用途,因而任何用户、任何主题均可应用。例如定义 〈PERSON〉= {John, Bill, Mary}, 〈ATTRIBUTE〉= {height, age, tall}, 即可理解输入句 What is the age of John? (约翰的年龄是多少?) What is Mary's height? (玛丽的身高是多少?) How tall is Bill? (比尔多高?)

根据 LIFER 分析法已建成若干系统,包括医药咨询、作业安排、资源分布等主题。最庞大复杂的是斯坦福研究所的 LADDER 系统(1977),能联结美国各地许多计算机的数据库,用户无需知道数据贮存在何处及其贮存方式,直接用英语查询即可得到回答。斯坦福研究所的另一系统 HAWKEYE (1977)则属于图像识别和自然语言理解的综合模型,计算机能根据图像回答问题。例如指着地图问:“从这儿到那儿的距离是多少?”

预计 80 年代自然语言书面理解的研究将在篇章模型和综合模型两方面发展,并建立一些应用系统。篇章模型如尚克学派正在进一步研究的故事理解,综合模型如斯坦福研究所的 HAWKEYE。此外,联邦德国汉堡大学于 1981 年建成一个“交通动态对话系统”,由彩色电视输入动态情景,用德语问答,主题是询问街上的交通情况。关于汉语书面理解的研究,见汉语书面理解系统。

参考书目

范维淹、徐志敏:《自然语言理解的理论和方法》,载《国外语言学》,1980,第 5 期。

A. Barr and E. A. Feigenbaum, *The Handbook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itman, London, 1981.

(范维淹 徐志敏)

ziran yuyan yuyin lilie xitong

自然语言语音理解系统 (natural speech understanding systems) 指人和计算机之间用自然语

言口语语音对话的通信系统。这是令人向往的前景。因为人用口语语音传输信息最快,最方便,而双手又是自由的,可以同时进行其他操作。

自然语言语音理解系统,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初开始研究,10 多年间一直停留在用模式识别的方法辨认单词的语音识别上,即在计算机里贮存某些单词的声学模式,用来匹配输入的语音信号。由于语音识别无法使计算机辨认连续语流中的语音变化,以及人和人之间、同一个人先后发音之间的差别,也不能排除噪声干扰,因此效果不大。单人口呼(一个人发音)输入,计算机不过识别 100 多个单词;多人口呼(不止一个人发音)输入,只能识别 10~20 多个单词而已。

70 年代初期认识到,必须综合应用语言学知识来研究计算机对连续语流的语音理解。1971 年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中心(ARPA)为语音理解研究(SUR)设立基金,要求在 5 年之内取得突破。具体指标是:使计算机能理解特定范围内的正常口语句子(连续语音),单词不少于 1 000,错误不超过 10%。在 ARPA SUR 计划下,到 1976 年先后建成了一些英语语音理解的实验系统,都能在有限的词汇、句法和特定的主题范围内理解英语口语句子。其中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卡尔奈吉-梅隆大学的 HEARSAY 和 HARP Y 系统,BBN 公司的 HWIM 系统。

HEARSAY 有两个系统。70 年代初期建成 HEARSAY I,随后改进,1976 年建成 HEARSAY II,以文件检索为主题,单词 1 011 个,只能接受单人口呼(一男)。HARP Y 系统的主题也是文件检索,单词也是 1 011 个,但能接受多人口呼(三男二女)。HWIM 系统的主题是旅游指南,包括日程安排和费用,单词 1 097 个,能接受多人口呼(三男)。

这些系统的设计互不相同,各自采用了特定的技术安排。但在总的方法上是一致的,即语音、词汇、句法、语义、语用的分析同时进行,互为补充,以确定输入句的内容。一般的处理程序是:分析输入语音信号的声学物理特征,根据音系规则归纳音位、音位变体、连续音变和语音省略以切分音节;根据构词规则作出可能的单词假设,称为“底端分析”。同时应用句法、语义、语用规则和主题知识,根据上下文预测输入句的内容,称为“顶端分析”。底端无需识别每一个语音信号,模糊不清的可以跳过;只要能提出句中某几个单词的假设,就能由顶端根据词的搭配、句法组合和主题知识前后左右加以推断,建立句中单词序列的一种或几种假设,再用底端的语音数据核实,择优选用。这种上下结合的分析方法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据 HARP Y 的实验,底端凭语音数据切分单词的准确率只有 42%,而语音、句法、语义综合分析的准确率高达 97%。HEARSAY II 的实验结果相同;增加句法分析,单词识别的准确率提高 25%;再增加语义分析,准确率又提高 25%。

ARPA SUR 计划之后又陆续建立了一些类似的系统,都未超过上述系统的成效。目前面临的问题是:能理

解的词汇、语句局限性过大,更不能区别语音近似的句子。HARPY 被认为是 ARPA SUR 计划中最成功的系统,也只能理解特定的有限态语句,句中不能替换任何单词。

70 年代后期和 80 年代初期,语音理解向纵深方向探索,同时开始设计某些专用性系统。例如澳大利亚堪培拉高等教育学院信息科学学校正在研制的 FOPHO 系统,输入澳大利亚英语口语语音,计算机经过识别、理解能转写为音标显示输出,为教学和科研服务。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不伦瑞克工业大学通信技术研究所则在研制一个输入德语口语语音、输出德语书面文字的系统,等等。

关于汉语语音理解的研究,见汉语语音理解系统。

参考书目

A. Barr and E. A. Feigenbaum, *The Handbook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itman, London, 1981.

(范继淹 徐志敏)

Zigu

《字诂》 解释字义的书。明末清初学者黄生撰。黄生字扶孟,别号白山,安徽歙县人。生于明熹宗天启二年(1662),卒年不详。在明为诸生,入清未仕。精于六书训诂之学。《字诂》凡一卷,共 107 条,取经史群书语词,考辨其音义,订正讹误,与颜师古《匡谬正俗》相类。黄生为学极有根柢,能从声音上考察字义,不为文字形体所困,在明代学者中极为突出。如谓“伏羲”与“包羲”古音相同,从“分”之字都有乱义,“怎”为“作么”合音,“咱”为“自家”合音等等,都精确不易,对清代的汉学家不无影响。黄生还著有《义府》一书,较《字诂》尤为渊博精深。

见《义府》。

(周祖谟)

Zihui

《字汇》 明代流行极广的一部按部首编排的字书。梅膺祚撰。膺祚字诞生,安徽宣城县人。《字汇》作于明神宗万历四十三年(1615),收字以《洪武正韵》为主,并参照《说文解字》、《古今韵会》等书,收入属于经史常用的字。凡属于怪僻的字一律不收。这部书具有很大的特点。一是他把《说文》、《玉篇》、《类篇》等的 500 多部首,按楷书笔画,改并为 214 部首,依照地支子丑寅卯等次序,分为 12 集,所收文字有 33 179 字。二是部首的排列次第按笔画多少叙列先后,少者在前,多者在后。一部之内的字除去部首笔画不计外,也都按余下的笔画多寡排列,极便检查,在检字法上是一大改革。三是一字之下先注读音,然后注解字义,字义以基本的常用义列前,其他列后。释义下列举古书中的例证,也采录一部分口语、俗语的意义,富有革新的精神。由是也就为中国字典的编纂法奠定了基础。后来张自烈作《正字通》,清代修《康熙字典》,都按照《字汇》的体例编定,足见其在字典编纂法上影响之大。

这部书在写字方面也给人一种规范。梅膺祚认为写字以不背于古,不戾于今为好,凡今时通行的,笔画正规的可用,笔画不对或过于从前的都不宜用。卷首又标

出运笔的次第,指出写字的笔顺。如“止”,先卜、后止,如“兆”,先儿、后又,等等,对村塾教学起到很大的作用。卷末又有“辨似”一项,教人辨别一些形体相似而音义都不同的字。如“刺”之与“刺”,“段”之与“段”之类,都须分辨,这对识字有很大帮助。《康熙字典》卷首也列出很多相似的字,就是承袭《字汇》而来。

(周祖谟)

Zilin

《字林》 一部按汉字形体分部编排的字书。《隋书·经籍志》题晋弦令吕忱撰,七卷。《魏书·江式传》说:“宣武帝延昌三年(514)式上表曰:‘晋世义阳王典祠令任城吕忱上《字林》六卷,寻其沉趣,附托许慎《说文》……文得正隶,不差篆意也。’”又唐代封演《闻见记》说:“晋吕忱撰《字林》七卷,亦五百四十部,凡一万二千八百二十四字。”由此可知《字林》即仿《说文解字》而作,收字比《说文》多 3 000 多字,兼有异体,不过仍分为 540 部,全书 7 卷。在刘宋时扬州都护吴恭曾撰《字林音义》5 卷,见于《隋书·经籍志》。唐代《字林》与《说文》并重,而且以此考取书学博士。宋代书中多称此书为 5 卷,可能传本不同。《字林》是《说文》与《玉篇》之间的一部字书,在字书发展史上很重要,可惜宋末以后就亡佚不存了。清乾隆间任大椿著有《字林考逸》8 卷,对研究文字训诂很有用。光绪间陶方瑞又有《字林考逸补本》,据隋代杜台卿《玉烛宝典》、唐代慧琳《一切经音义》等书补任书所未录。

(周祖谟)

zimu

字母 汉语音韵学家用来称呼音节开头的辅音(包括零辅音)的名字,相当于现代说的声母。这是悉昙、等韵从印度输入的术语。梵文摩多 māta 或 mātṛka 本来指元音说的,后来词义扩大到连辅音也包括了。传入中国以来,又只限用在开头辅音上。敦煌出土守温字母残卷列“不芳並明……”三十字母,后来有人“益以‘娘床邦滂微奉’六母”,就有三十六字母(见《等韵》)。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说:“卅六字母据中华之音……次第与《涅槃》同,可见其依仿涅槃也……其谓之‘字母’,则沿袭于《华严》也。”陈澧《切韵考·外篇》说:“每一类以一字为标目,便于指说。”即每类声母用一个汉字为代表。

(俞敏)

zishu

字书 以解释汉字形体为主,兼及音义的书。清修《四库全书总目》把小学类分为训诂、字书、韵书 3 种。以《尔雅》以下为训诂,《说文解字》以下为字书,《广韵》以下为韵书。这 3 种书各有所侧重。训诂书重在讲解字义,解释名物;韵书则重在分辨字音,依韵列字,并说明字义;字书与训诂书、韵书不同,重在据字形分部,说明字的音义。

汉字历史悠久,始终是以一个个单独的形体代表一个词,或代表一个语素,但形体的写法随世而有演变。由商、周的古文字发展为篆书,因篆书不便书写而又有隶

书、草书、行书、真书，因此研究字形和根据字形以考证音义的字书很多，大体可以分为以下5类：①学童习诵的识字书——这类书如汉代流行的李斯等的《仓颉篇》、史游的《急就篇》。或为四言韵语，或为七言韵语，《仓颉篇》已佚，《急就篇》保存至今。②按形体偏旁分部编排的字书——自东汉许慎作《说文解字》按篆书形体分立部首编排文字以后，仿照这样体例的字书很多，如梁代顾野王的《玉篇》、宋代司马光等的《类篇》、明代梅膺祚的《字汇》、张自烈的《正字通》、清代官修的《康熙字典》都是。③刊正字体的字书——唐代有颜元孙的《千禄字书》、张参的《五经文字》、唐玄度的《九经字样》，都是订正笔画讹误的书，下至宋代张有的《复古编》、元代李文仲的《字鉴》、明代焦竑的《俗书刊误》，都是这一类的书。④集录篆、隶、古文字的字书——如宋代郭忠恕的《汗简》、夏竦的《古文四声韵》、姜机的《汉隶字源》，以及近代容庚的《金文编》、孙海波的《甲骨文编》、罗振玉的《碑别字》等都是。⑤用六书分析文字的书——如宋代郑樵的《六书略》、元代戴侗的《六书故》、杨桓的《六书统》之类。（周祖谟）

Ziyang

《字样》 汉字楷体字书写的样本。自从汉代以后隶书向真书、行书发展，文字笔画之间，时有讹变。晋宋以后俗体增多，如亂字作乱，鼓字作鼓，经字作經，美字作羨，席字作廡，析字作析之类都与篆书、隶书不合。唐太宗贞观年间秘书监颜师古在秘书省刊正经籍，校定字体，辨别讹误、录成样本，以便讎校时做为准绳，当时称之为《颜氏字样》，后来博士杜延业又续修，有《群书新定字

样》。字样的名称就是这样来的。武后时，颜师古的四世从孙颜元孙又作《千禄字书》一卷，辨正字体的正俗，以为书写的楷式。唐代宗大历十一年（776），张参作《五经文字》，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唐玄度又作《新加九经字样》。由此楷书写法有了一定的规范。（周士琦）

zizu

字族 “族”是族类的意思，汉字在历史发展中的增衍繁多主要是形声字，同从一个声符的字可以有很多。其中有的只起表音的作用，有的不仅表音，还兼表义。表音兼表义的，可以归在一起，称之为“字族”（只起表音作用的不在其内）。从下面几组字可以看得很清楚：

- ① 工、功、攻（有攻治义）；
- ② 空、腔、控、控、控、空、控、控（有中空义）；
- ③ 非、扉、排、排、排、排、排（有排列和分列义）；
- ④ 绯、翡、非（有红色义）；
- ⑤ 龙、厖、咙、咙、咙（有杂和杂色义）；
- ⑥ 会、霰、浍、浍、绘、烩（有相会合义）；
- ⑦ 乔、骄、轿、桥、轿、轿、轿、轿、越、屏（有高出义）；
- ⑧ 句、钩、枸、枸、枸、枸、枸（有弯曲义）。

这里所举的几组字里声旁相同的，意义也都相类，只是涉及的事物各有不同，因而形旁有差异。从繁多的汉字中以音义相联的方法归纳在一起找出科学的条理来，对研究字义可以多一层理解。不过同一个声符所包含的意义不一定只限有一种，随时代的变迁，也可以增多有两种或三种。如上面所举的①②和③④即是其例。

（周祖谟）

条目汉字笔画索引

说 明

一、本索引供读者按条目标题的汉字笔画查检条目。

二、条目标题按第一字的笔画由少到多的顺序排列,笔画数相同的字按起笔笔形一(横)、丨(竖)、丿(撇)、㇏(点)、㇇(折,包括丨、丿、㇏等)的顺序排列。第一字相同的,依次按后面各字的笔画数和起笔笔形顺序排列。

一 画

《一切经音义》(玄应).....445
《一切经音义》(慧琳).....445
一声之转.....446

二 画

《二十一卷本蒙文词典》.....66
十三辙.....350
《十韵汇编》.....351
丁声树.....56
丁度.....55
七音(见等韵).....312(51)
《七音略》.....312
《卜辞通纂》.....26
八分.....10
八体.....11
八思巴字.....10
人机对话(见自然语言
理解).....326(547)
人名学.....326
人类语言学.....326
儿化音节.....64
《九经字样》.....233

三 画

三十六字母(见字
母).....333(551)
《三十颂》.....333
《三仓》.....333
《干禄字书》.....87
于省吾.....466
于阗文.....465

土耳其语.....389
土库曼语.....389
土家语.....389
土族文(见土族语).....389(389)
土族语.....389
大众语运动.....46
山田孝雄.....334
义训.....448
《义府》.....447
凡语.....71
《广州话方言词典》(见汉语
方言词典).....116(150)
《广雅》.....115
《广释名》.....115
《广韵》.....115
门巴语.....282
女真文.....304
《小尔雅》.....424
《小学钩沉》.....424
《小学蒐佚》.....424
《小说词语汇释》.....424
马丁内, A. 271
《马氏文通》.....273
马六甲语族(见南亚
语系).....272(301)
马巴语族(见尼罗-撒哈拉
语系).....271(302)
马耳他语.....271
马达加斯加语.....271
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见南
岛语系).....272(299)
马来语.....272
马其顿语.....273

马拉提语.....271
马拉雅拉姆语.....272
马学良.....273
马洛夫, C. E. 272
马泰休斯, V. 273

四 画

比布鲁斯字母.....19
《比雅》.....19
比喻义.....20
切口.....314
切音字.....315
《切韵》.....317
《切韵考》.....318
《切韵指掌图》.....322
《切韵》音.....318
开口(见等韵).....235(51)
开合齐撮(见等韵).....235(51)
互训.....213
瓦尔玛, D. 391
瓦恩里希, U. 391
王力.....395
王仁昉.....396
王引之.....396
王先谦.....396
王国维.....394
王念孙.....396
王照.....397
王筠.....396
王静如.....394
《五方元音》.....411
《五体清文鉴》.....412
《五经文字》.....411

五音(见等韵).....412(51)
 《五音切韵》.....412
 《五音集韵》(见韵书).....412(505)
 牙音(见等韵).....437(51)
 历史比较语言学.....255
 历史语言学(见历史比较语言学).....256(255)
 少数民族汉语教学.....335
 中介成分体系.....530
 中文信息处理.....531
 《中华大字典》.....530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教学.....519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519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520
 《中国文法革新论丛》.....519
 《中国文法要略》(见吕叔湘).....520(266)
 《中国古代语法》.....518
 中国主要语言学科学术团体.....526
 中国主要语言研究刊物.....529
 中国主要语言研究机构.....527
 《中国现代语法》(见王力).....520(395)
 《中国话的文法》(见赵元任).....519(514)
 中国诸民族文字.....520
 中国诸民族语言.....523
 《中原音韵》(见《中原音韵》音).....533(533)
 《中原音韵》音.....533
 内外转.....301
 日尔曼语族.....328
 日语.....329
 从属分析法.....43
 介音(见等韵).....229(51)
 《仓颉篇》.....31
 分辨网络.....81
 手头字.....362
 毛南语.....279
 毛难语(见毛南语).....279(279)

反切.....71
 反语.....73
 爪哇语.....514
 乌尔都语.....406
 乌伦贝克, C. C. 407
 乌克兰语.....407
 乌孜别克语(见乌兹别克语).....408(408)
 乌拉尔语系.....407
 乌兹别克语.....408
 丹麦语.....48
 风格学.....81
 计算风格学.....219
 计算机辅助语言教学.....219
 计算机情报检索.....220
 计算语言学.....221
 《订讹杂录》.....56
 六书.....260
 《六书故》.....261
 《六书音均表》.....262
 《六书略》.....261
 文字.....400
 文字改革.....403
 文学与语言计算学会.....400
 《文海》.....400
 《方言》.....76
 方言地理学.....77
 方言学.....80
 《方言调查字表》.....79
 《方言》续补.....79
 方特, C. G. M. 76
 心理语言学.....426
 双声.....366
 引申义.....453
 孔广森(见阴阳对转).....242(449)
 巴士拉学派.....12
 巴布亚诸语言.....11
 巴尔托利, M. G. 11
 巴尔-希列尔, Y. 12
 巴利, C. 12
 巴利语.....12
 巴斯克语.....13
 水语.....366

五 画

功能语言学派(见布拉格学派).....97(26)
 平仄.....309
 平水韵.....308
 正写法.....516
 《正字通》.....517
 正体.....516
 正齿音(见等韵).....516(51)
 正音书院.....517
 正音法.....516
 《玉篇》.....497
 古今字.....97
 《古今韵会举要》(见韵书).....97(505)
 古文.....102
 古文字学.....102
 《古文字学导论》.....108
 《古书虚字集释》.....99
 古四声.....100
 古吉拉特语.....97
 古西伯利亚诸语言.....108
 古纽.....97
 古叙利亚语.....108
 古音.....109
 古斯拉夫语.....99
 古韵.....109
 术语.....363
 术语数据库.....364
 本义.....19
 本字.....19
 世界语.....354
 世界诸语言.....354
 东乡语.....57
 东巴文.....56
 东匈语支.....57
 东部裕固语.....57
 布龙菲尔德, L. 28
 布列塔尼语.....28
 布努语.....29
 布拉格学派.....26
 布依文(见布依语).....30(30)
 布依语.....30

布朗语	28	冯·加班, A.	83	弗斯, J. R.	83
布鲁格曼, K.	29	汉文(见汉字)	128(195)	尼日尔-刚果语族(见尼	
布嫩语	29	汉字	195	日尔-科尔多凡语	
右文	465	汉字查字法	201	系)	302(303)
《龙龕手鏡》	262	汉字编码	199	尼日尔-科尔多凡语系	303
叶尔姆斯列夫, L.	444	汉字简化	205	尼罗-撒哈拉语系	302
叶音	425	汉字整理	208	尼泊尔语	302
叶斯泊森, O.	444	汉语	128	尼科巴语族(见南亚语	
卢赛洛, J. P.	265	汉语文字学	160	系)	302(301)
卢慧章	265	汉语方言	137		
甲骨文	223	汉语方言地图	150		
《甲骨文合集》	224	《汉语方言词汇》	150		
《甲骨文字释林》	224	汉语方言词典	150		
《甲骨文编》	224	《汉语方言调查手册》	152		
《四个闽南方言》(见汉语方		《汉语方言概要》	152		
言)	370(137)	《汉语方音字汇》	153		
四声	370	汉语书面理解系统	159		
《四声实验录》	371	汉语训诂学	167		
代数语言学	48	汉语词汇	133		
仡佬语	94	汉语拼音方案	157		
仡佬语支	94	汉语拼音正词法	159		
佤佬语	298	《汉语拼音词汇》	157		
他加禄语	380	汉语修辞	165		
外语教学	392	汉语音韵学	173		
印地语	453	汉语语法	177		
印欧语系	455	《汉语语法论》	183		
印度尼西亚语	454	汉语语音	183		
印度尼西亚语族(见南岛语		汉语语音理解系统	189		
系)	454(299)	汉语教学	153		
印度-伊朗语族	454	汉藏对音	191		
《尔雅》	65	汉藏词音比较	189		
《尔雅翼》	66	汉藏语系	191		
乍得语族(见阿非罗-亚细		《礼部韵略》(见韵			
亚语系)	513(4)	书)	254(505)		
生成语法	340	立陶宛语	256		
生理语音学	341	兰可铁, G. J.	250		
白文(见白语)	15(15)	半舌音(见等韵)	18(51)		
白话文运动	13	半齿音(见等韵)	18(51)		
白俄罗斯语	13	闪语族(见阿非罗-亚细亚语			
白语	15	系)	334(4)		
《白狼王歌》	15	对外汉语教学	60		
瓜拉尼语	111	《台湾语言源流》(见汉语方			
句法类型演算	234	言)	380(137)		
鸟虫书	303	弗拉芒语	83		

六 画

邢公畹	429
地名学	54
机助翻译	218
机器翻译	217
吉尔吉斯语	219
老挝语	250
西匈语支	415
《西字奇迹》	415
西伯维	413
西班牙语	413
西夏文	415
西部裕固语	414
《西儒耳目资》	414
亚美尼亚语	438
吏读	257
达罗毗荼语系	45
达海	45
达斡尔语	46
《成均图》	36
成语	36
百科全书	15
扩充转移网络	243
扬雄	442
《匡谬正俗》	243
当为	49
当作(见当为)	49(49)
《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	49
吐火罗语	390
吕叔湘	266
吕静	266
早梅诗	513
《同音》	384
同源字	384

回鹘文.....215
 舌上音(见等韵).....336(51)
 舌头音(见等韵).....336(51)
 舌音(见等韵).....336(51)
 乔玛, A. de K. 313
 乔姆斯基, N. 313
 朱骏声.....539
 朱德熙.....538
 优选语义学.....463
 低文(见低语).....391(391)
 低语.....391
 低-崩龙语支(见低-德昂语支).....391(391)
 低-德昂语支.....391
 伦敦学派.....267
 华夷译语.....213
 《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213
 自动机理论.....547
 自然语言书面理解系统.....548
 自然语言处理.....547
 自然语言语音理解系统.....550
 自然语言理解.....547
 行书.....430
 后起本字.....212
 全国文字改革会议.....324
 全浊(见清浊).....325(323)
 全清(见清浊).....325(323)
 会意(见六书).....216(260)
 合口(见等韵).....210(51)
 合文.....210
 合体字.....210
 匈牙利语.....431
 刘台拱.....260
 刘师培.....259
 刘熙.....260
 次浊(见清浊).....43(323)
 次清(见清浊).....43(323)
 冰岛语.....22
 江有诰.....227
 《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226
 壮文(见壮语).....546(546)
 壮侗语族.....543
 壮语.....546

壮傣语支.....543
 守温.....362
 安纳托利亚语族(见印欧语系).....9(455)
 字书.....551
 《字汇》.....551
 字母.....551
 《字诂》.....551
 《字林》.....551
 《字样》.....552
 字族.....552
 《关中方言调查报告》.....112
 许慎.....436
 异体字.....448
 阮元.....331
 阮诤.....330
 阳调.....442
 阴阳对转.....449
 阴调.....449
 《戏曲词语汇释》.....419
 孙诒让.....377
 孙炎.....377
 孙愐.....376

七 画

玛雅文.....274
 形训.....431
 形式文法.....430
 形声(见六书).....430(260)
 坎拿达语.....236
 杨树达.....443
 克什米尔语.....237
 声训.....349
 声纽.....345
 声学语音学.....345
 声类.....345
 《声类》(见韵书).....345(505)
 声符.....344
 芬兰-乌戈尔语族(见乌拉尔语系).....81(407)
 芬兰语.....81
 《苏州方言地图集》(见汉语方言地图).....375(150)
 苏格兰盖尔语.....374

劳乃宣.....250
 李方桂.....254
 李荣.....255
 李登.....254
 《两周金文辞大系》.....259
 时枝诚记.....352
 《助字辨略》.....539
 邮政式拼音.....464
 别名.....21
 别字.....22
 《别雅》.....21
 《吴下方言考》.....411
 吴方言.....408
 利托-罗曼诸方言.....257
 佉卢字母.....324
 体语.....382
 希伯来语.....416
 希腊语.....417
 言语合成.....439
 言语识别.....441
 言语病理学.....438
 库里沃维奇, J. 243
 库法学派.....242
 库施特语族(见阿非罗-亚细亚语系).....243(4)
 应用语言学.....460
 沙里-尼罗语族(见尼罗-撒哈拉语系).....334(302)
 沙赫马托夫, A. A. 334
 沃尔夫, B. L. 406
 沈兼士.....339
 羌语.....313
 《宋元以来俗字谱》.....374
 宋初汴洛音.....371
 词汇学.....40
 词典学.....38
 《词詮》.....41
 词族.....42
 词源学.....42
 译音.....448
 社会语言学.....336
 张相.....514
 张琨.....513
 张揖.....514

陆志韦……………266
 陆法言……………266
 陆德明……………265
 阿瓦涅索夫, P. И. ……8
 阿尔巴尼亚语……………1
 阿尔泰语系……………1
 阿拉米语……………6
 阿拉伯语……………5
 阿非利堪斯语……………4
 阿非罗-亚细亚语系……………4
 阿昌语……………1
 阿姆哈拉文……………7
 阿姆哈拉语……………7
 阿眉斯语……………6
 阿萨姆语……………7
 阿斯科里, G. I. ……7
 阿塞拜疆语……………7
 陈梦家……………34
 陈第……………34
 陈望道……………35
 陈彭年(见《广韵》)……35(115)
 陈澧……………34
 纳西文(见纳西语)……299(299)
 纳西语……………299

八 画

《现代汉语方言》(见汉语方言)
 言)……………420(137)
 《现代汉语词典》……………420
 《现代汉语修辞学》……………420
 《现代汉语语法讲话》……………420
 《现代吴语的研究》……………421
 青年语法学派(见新语法学
 派)……………323(428)
 析言(见浑言)……………419(216)
 耶鲁方案……………443
 直音……………517
 苗文(见苗语)……………289(291)
 苗语……………291
 苗语支……………292
 苗瑶语族……………289
 英语……………458
 拉丁化新文字……………245
 拉丁语……………247

拉珈语……………249
 拉祜文(见拉祜语)……249(249)
 拉祜语……………249
 拉脱维亚语……………249
 拉斯克, R. K. ……249
 转义……………542
 转写……………542
 转注(见六书)……………542(260)
 转语……………542
 齿头音(见等韵)……………37(51)
 齿音(见等韵)……………37(51)
 呼(见等韵)……………212(51)
 帕西, P. ……306
 凯尔特语族……………235
 《昌黎方言志》……………32
 罗马尼亚语……………268
 罗振玉……………269
 罗宾斯, R. H. ……268
 罗常培……………268
 罗曼语族……………269
 《国文法之研究》……………120
 《国文法草创》……………120
 国际计算语言学协会……………118
 国际音标……………118
 国际语言学协会……………118
 国际语音协会……………120
 国际辅助语……………117
 国语运动……………123
 国语罗马字……………120
 国语统一筹备会……………122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见中国文字改革委员
 会)……………120(520)
 图佻语……………388
 图弥三菩札……………388
 季羨林……………222
 侗文(见侗语)……………58(58)
 侗水语支……………58
 侗台语族(见壮侗语
 族)……………58(543)
 侗语……………58
 依地语……………446
 金文……………230
 《金文丛考》……………231

《金文编》……………230
 金田一京助……………229
 服部四郎……………84
 周时经……………537
 周祖谟……………537
 周德清(见《中原音
 韵》音)……………537(533)
 京语……………231
 《性入法》……………431
 法兰西学派……………67
 法语……………67
 注音字母……………539
 波兰语……………22
 波利尼西亚语族(见南岛语
 系)……………22(299)
 波你尼……………23
 波罗的语族……………22
 波铁布尼亚, A. A. ……25
 波斯塔尼, B. ……24
 波斯语……………24
 波普, N. N. ……24
 郑玄……………517
 郑樵……………517
 官话方言……………112
 实验语音学……………352
 《诗声类》(见阴阳对
 转)……………350(449)
 《诗词曲语词汇释》……………349
 话语语言学……………213
 房德里耶斯, J. ……80
 隶书……………257
 细音(见等韵)……………419(51)
 《经传释词》……………232
 《经典释文》……………231
 《经籍纂诂》……………232
 孟加拉语……………288
 孟-高棉语族(见南亚
 语系)……………288(301)
 孟德鸠语法……………288

九 画

《春秋名字解诂》……………37
 契丹文……………312
 标点符号……………20

荷兰语·····210
哥巴文·····94
哥本哈根学派·····95
贾德佳, S. K.·····225
速记·····375
载瓦文(见载瓦语)·····509(509)
载瓦语·····509
顾炎武·····111
顾野王·····111
唇音(见等韵)·····38(51)
夏姆孙德尔达斯·····419
特鲁别茨科伊, H. C.·····382
钱大昕·····313
《积微居金文说》·····218
徐铉·····435
徐锴·····435
《殷契萃编》·····452
《殷虚卜辞综述》·····452
《殷虚文字类编》·····453
《殷虚书契》·····453
爱尔兰语·····9
爱沙尼亚语·····9
部首·····30
郭沫若·····116
郭璞·····117
高山族语言·····94
高本汉·····92
高加索语系·····93
高棉语·····93
《高等国文法》(见杨
树达)·····93(443)
旁转·····307
旁遮普语·····306
唐兰·····381
《唐韵》(见韵书)·····382(505)
海利勒, 'A.·····126
浮士勒, K.·····84
容庚·····330
《资治通鉴释文》·····546
读曰(见读为)·····59(59)
读为·····59
读如(见读若)·····59(59)
读若·····59
预示分析法·····498

通古斯语支·····382
通用字·····383
通训·····383
通名·····383
通转·····384
《通俗编》·····383
通语·····384
《通雅》·····383

十一画

《埤雅》·····307
梅耶, A.·····279
教会罗马字·····227
副语言·····84
萨丕尔, E.·····332
萨莫耶德语族(见乌拉尔语
系)·····332(407)
萨默费特, A.·····332
黄公绍(见韵书)·····215(505)
黄侃·····215
基诺语·····218
梵汉对音·····74
梵语·····75
聋哑盲语言教学·····263
捷克语·····229
排湾语·····306
常言·····33
鄂伦春语·····63
鄂温克语·····63
崔世珍·····44
崩龙语(见德昂语)·····19(49)
假借(见六书)·····225(260)
假借义·····225
假借字·····225
象形(见六书)·····424(260)
商承祚·····334
章炳麟·····514
《康熙字典》·····236
《清文启蒙》·····323
清浊·····323
清格尔泰·····323
密克罗尼西亚语族(见南岛
语系)·····288(299)
婆罗米字母·····309

谚语·····442
《续一切经音义》·····436
维尔纳, K.·····398
《维汉词典》·····399
维吾尔文·····399
维吾尔语·····399
维诺格拉多夫, B. B.·····399

十二画

琼斯, D.·····323
琼斯, W.·····324
博厄斯, F.·····25
博杜恩·德·库尔德内,
J. N.·····25
博普, F.·····26
塔吉克语·····380
塔塔尔语(见鞑靼语)·····380(46)
联绵字·····258
《联绵字典》·····258
《联绵字谱》·····259
韩礼德·····127
韩道昭(见韵书)·····127(505)
《朝汉词典》·····33
朝鲜文·····33
朝鲜语·····34
斯瓦希里语·····370
斯坦塔尔, H.·····370
斯拉夫语族·····369
斯洛文尼亚语·····369
斯洛伐克语·····369
斯维特, H.·····370
董作宾·····57
葡萄牙语·····309
粟特文(见粟利文)·····376(375)
惠特尼, W. D.·····216
越南语·····499
《越谚》·····499
《厦门音系》(见汉语
方言)·····420(137)
雅言·····437
雅林, G.·····437
雅学·····437
雅柯布逊, R.·····437
喉音·····212

喀山学派.....235
景颇文(见景颇语).....233(233)
景颇语.....233
景颇语支.....233
程瑶田.....37
等(见等韵).....51(51)
等韵.....51
傣文.....47
傣语.....48
傅懋勤.....85
傈僳文(见傈僳语).....258(258)
傈僳语.....258
《集韵》(见韵书).....219(505)
奥里亚语.....9
粤方言.....500
《粤音韵汇》.....504
《释名》.....361
舒哈特, H. 362
畲语.....336
《番汉合时掌中珠》.....68
腓尼基字母(见比布鲁斯字母).....81(19)
《敦煌变文字义通释》.....61
《湖北方言调查报告》.....212
《湖南方言调查报告》(见汉语方言).....213(137)
湘方言.....421
曾运乾.....513
普什图语.....310
普米语.....309
普通话.....310
《普通话闽南方言词典》(见汉语方言词典).....311(150)
谢尔巴, И. Б. 425
媒介语.....279
缅甸语.....289
缅甸语支.....289

十三画

瑞典语.....331
楔形字.....424
楷书(见真书).....236(515)
概念从属论.....86

《蒙文启蒙诠释》.....287
《蒙文指要》.....287
蒙古文.....282
《蒙古字韵》.....287
蒙古语.....283
蒙古语族.....283
《蒙汉辞典》.....287
蒙(扪)达语族(见南亚语系).....282(301)
感知语音学.....87
掇.....337
捌思吉斡节儿.....369
频率词典.....308
歇后语.....425
《蜀语》.....362
锡伯文.....419
锡伯语.....419
《辞海》.....43
《辞通》.....43
《辞源》.....43
简化字.....226
简体.....226
韵书.....505
韵目.....505
韵图(见等韵).....508(51)
韵类.....504
韵部.....504
《韵镜》.....504
《新方言》.....428
《新华字典》.....428
《新译华严经音义》.....428
新语法学派.....428
《新著国语文法》(见黎锦熙).....429(253)
意大利语.....448
意符.....449
满文.....277
满语.....278
满语支.....278
满-通古斯语族.....274
数理语言学.....365
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332
宰利文.....375
福尔图纳托夫, Ф. Ф. 84

叠字.....55
《叠雅》.....55
叠韵.....55

十四画

瑶文(见勉语).....443(288)
瑶语支.....443
赫哲语.....211
赫梯语.....210
《戡寿堂所藏殷虚文字》.....226
嘉戎语.....223
僧伽罗语.....333
倭语.....53
豪萨语.....209
察合台文.....32
缩略词语.....377

十五画

鞑靼语.....46
撒拉语.....332
撒哈拉语族(见尼罗-撒哈拉语系).....332(302)
篆书.....542
黎语.....254
黎语支.....254
黎锦熙.....253
德昂语.....49
德语.....50
摩尔达维亚语.....297
《潮语词典》(见汉语方言词典).....34(150)

十六画

避讳字.....20

十七画

藏文.....512
《藏汉大辞典》.....509
《藏汉对照拉萨口语词典》.....509
藏语.....512
藏语支.....513
藏缅语族.....509

戴震.....48
繁体.....71
徽宗语.....215

十八画

翻译.....69

彝文.....446
彝语.....447
彝语支.....447

十九画

籀文.....538

二十一画

赣方言.....89

三十画

《彝文丛刻》.....44

繁体字和简化字对照表

说 明

本表所收以条目标题中出现的汉字为限,按繁体字笔画由少到多的顺序排列。笔画相同的字,按起笔笔形一(横)、丨(竖)、丿(撇)、丶(点)、㇀(折,包括乚、乚、く等)的顺序排列。新旧字形笔画不同的,按新字形。

七 画	訓〔训〕	陽〔阳〕	楊〔杨〕	輕〔轻〕	碼〔码〕	錫〔锡〕	禮〔礼〕	蘭〔兰〕
貝〔贝〕	記〔记〕	鄉〔乡〕	較〔较〕	趙〔赵〕	歐〔欧〕	錦〔锦〕	彌〔弥〕	鶻〔鹞〕
壯〔壮〕	庫〔库〕	細〔细〕	夢〔梦〕	爾〔尔〕	齒〔齿〕	錄〔录〕	縮〔缩〕	籌〔筹〕
八 画	書〔书〕	紹〔绍〕	賈〔贾〕	搥〔搥〕	數〔数〕	學〔学〕	十八画	釋〔释〕
協〔协〕	閃〔闪〕	十二画	載〔载〕	對〔对〕	餘〔余〕	獨〔独〕	瓊〔琼〕	譯〔译〕
兩〔两〕	陸〔陆〕	報〔报〕	頓〔顿〕	圖〔图〕	劉〔刘〕	鮑〔鲍〕	轉〔转〕	議〔议〕
亞〔亚〕	陳〔陈〕	葉〔叶〕	與〔与〕	箋〔笺〕	魯〔鲁〕	諺〔谚〕	叢〔丛〕	二十一画
東〔东〕	陰〔阴〕	達〔达〕	當〔当〕	語〔语〕	諸〔诸〕	諱〔讳〕	蟲〔虫〕	韃〔鞑〕
來〔来〕	務〔务〕	揚〔扬〕	號〔号〕	誥〔诰〕	諾〔诺〕	龍〔龙〕	簡〔简〕	攝〔摄〕
兒〔儿〕	孫〔孙〕	凱〔凯〕	節〔节〕	說〔说〕	論〔论〕	濁〔浊〕	雙〔双〕	鐵〔铁〕
門〔门〕	納〔纳〕	喬〔乔〕	傳〔传〕	齊〔齐〕	調〔调〕	十七画	鏈〔链〕	辯〔辩〕
九 画	紐〔纽〕	備〔备〕	遞〔递〕	廣〔广〕	談〔谈〕	檢〔检〕	謬〔谬〕	顧〔顾〕
風〔风〕	十一画	衆〔众〕	頌〔颂〕	榮〔荣〕	寫〔写〕	聯〔联〕	雜〔杂〕	屬〔属〕
計〔计〕	現〔现〕	鈎〔钩〕	鉉〔鉉〕	漢〔汉〕	選〔选〕	隸〔隶〕	閼〔阏〕	續〔续〕
訂〔订〕	萊〔莱〕	創〔创〕	會〔会〕	鄭〔郑〕	緬〔緬〕	韓〔韩〕	十九画	二十二画
為〔为〕	麥〔麦〕	詁〔诂〕	愛〔爱〕	賓〔宾〕	編〔编〕	聲〔声〕	輟〔辍〕	體〔体〕
韋〔韦〕	捫〔扞〕	詞〔词〕	鳩〔鸠〕	實〔实〕	十六画	擴〔扩〕	難〔难〕	鑒〔鉴〕
十 画	處〔处〕	詒〔诒〕	詩〔诗〕	劃〔划〕	樹〔树〕	臨〔临〕	蘇〔苏〕	龕〔龕〕
華〔华〕	啞〔哑〕	勞〔劳〕	話〔话〕	閩〔闽〕	橋〔桥〕	駿〔骏〕	麗〔丽〕	讀〔读〕
馬〔马〕	國〔国〕	馮〔冯〕	詮〔诠〕	隨〔随〕	機〔机〕	戲〔戏〕	繫〔系〕	聲〔聒〕
時〔时〕	動〔动〕	渾〔浑〕	義〔义〕	頗〔颇〕	頭〔头〕	優〔优〕	羅〔罗〕	二十三画
剛〔刚〕	鳥〔鸟〕	補〔补〕	資〔资〕	緒〔绪〕	薩〔萨〕	錯〔错〕	嚴〔严〕	驗〔验〕
員〔员〕	進〔进〕	運〔运〕	際〔际〕	網〔网〕	曆〔历〕	鍾〔钟〕	鏡〔镜〕	變〔变〕
郵〔邮〕	術〔术〕	費〔费〕	預〔预〕	維〔维〕	據〔据〕	鮮〔鲜〕	辭〔辞〕	二十四画
個〔个〕	從〔从〕	開〔开〕	經〔经〕	綿〔绵〕	舉〔举〕	講〔讲〕	臘〔腊〕	讓〔让〕
倫〔伦〕	許〔许〕	發〔发〕	遜〔逊〕	綜〔综〕	頻〔频〕	誣〔诬〕	識〔识〕	贛〔赣〕
師〔师〕	訛〔讹〕	結〔结〕	十四画	十五画	駢〔骈〕	謝〔谢〕	譜〔谱〕	二十五画
烏〔乌〕	淺〔浅〕	絡〔络〕	瑪〔玛〕	標〔标〕	盧〔卢〕	謙〔谦〕	類〔类〕	灣〔湾〕
島〔岛〕	啓〔启〕	統〔统〕	構〔构〕	樣〔样〕	積〔积〕	應〔应〕	關〔关〕	二十八画
倉〔仓〕	張〔张〕	十三画	輔〔辅〕	頤〔颐〕	錢〔钱〕	賽〔赛〕	二十画	慈〔慈〕

INDEX OF ARTICLES

Achang language	1	Armenian language	438	Burmese branch	289
<i>A Chinese Syllabary Pronounced According to the Dialect of Canton</i>	504	Ascoli, Graziadio Isaia (1829~1907)	7	Burmese language	289
acoustic phonetics	345	Assamese language	7	Byblos alphabet	19
acronyms, initialisms and abbreviations	377	Association for Literary and Linguistic Computing	400	calculation of syntactical types	234
addenda of Fang-yan	79	assonance	55	Caturjyā, Suniti Kumār (1890~1977)	225
<i>A Dictionary of the Chauchou Dialect</i>	34	<i>A Study on Fuzhou Phonetics</i>	297	Caucasian family	93
<i>A Dictionary of the Guangzhou Dialect</i>	116	<i>A Survey of the Changli Dialect</i>	32	Celtic group	235
Afrikaans language	4	augmented transition network	243	Chadic group	513
Afro-Asiatic family	4	Austro-Asiatic family	301	Chagatay script	32
<i>A Glossary of Popular Chinese Characters Sinc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i>	374	Austronesian family	299	Chari-Nile group	334
<i>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i>	519	automata theory	547	Chen Di (1541~1617)	34
<i>A Hakka Dialect in Huayang District Sichuan</i>	213	Azerbaijan language	7	Chen Li (1810~1882)	34
<i>A Handbook for the Surveys of Chinese Dialects</i>	152	Bai language	15	Chen Mengjia (1911~1966)	34
<i>A Help to Western Scholars</i>	414	Bai writing	15	Chen Pengnian (961~1017)	35
Albanian language	1	Bally, Charles (1865~1947)	12	Chen Wangdao (1890~1977)	35
al-Bustanī, Buṭrus (1819~1883)	24	Baltic group	22	Cheng Yaotian (1725~1814)	37
al-Khalil 'Ibn 'Aḥmad (718?~791)	126	Bantu languages	17	Chinese character encoding	199
algebraic linguistics	48	Bao'an language	18	Chinese characters	195
alliteration	366	Bar-Hillel, Yehoshua (1915~1975)	12	Chinese dialects	137
Altaic family	1	Bartoli, Matleo Giulio (1873~1946)	11	Chinese grammar	177
American descriptivists	279	Basque language	13	Chinese graphology	160
American Indian languages	281	Basra school	12	Chinese historical phonetics	173
American structuralists	279	Baudouin de Courtenay, Jan Niecisław (1845~1929)	25	Chines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531
Amharic script	7	Belorussian language	13	Chinese language	128
Amharic language	7	Bengali language	288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153
Amis language	6	Benglong language	19	Chinese lexicon	133
Anatolian group	9	Berber group	25	Chinese phonetics	183
ancient Chinese sound system	318	Blang language	28	Chinese Phonetic System	157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326	Bloomfield, Leonard (1887~1949)	28	<i>Chinese Pinyin Glossary</i>	157
anthroponomastics	326	Boas, Franz (1858~1942)	25	Chinese Pinyin orthography	159
applied linguistics	460	Bopp, Franz (1791~1867)	26	Chinese rhetoric	165
Arabic language	5	Bouyei language	30	Chomsky, Noam (1928~)	313
Aramaic language	6	Bouyei writing	30	Chos-kyi hod-zer	369
archaic Chinese initials	97	Brahmi alphabet	309	<i>Collection of Descriptions of Chinese Minority Languages</i>	519
archaic Chinese rhymes	109	Breton language	28	Committee for Language Reform of China	520
archaic Chinese sounds	109	Brugmann, Karl (1849~1919)	29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221
archaic Chinese tonymes	100	Bulgarian language	18	computational stylistics	219
		Bunu language	29	computer-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219
		Bunun language	29	conceptual dependency	

theory	86	Fang-yan	76	(1882~1945)	314
conventional Chinese		Fant, Carl Gunnar Michael		Hattori Shiro(1908~)	84
characters	362	(1919~)	76	Hausa language	209
Copenhagen school	95	Figuer of speech	434	Hebrew language	416
Csoma, Alexander de Kőrös		figures of speech	432	Hezhen language	211
(1784~1842)	313	Finnish language	81	hieroglyphics	8
Cui Shizhen(?~1542)	44	Finno-Ugric group	81	Hindi language	453
cuneiform	424	Firth, John Rupert(1890~		historical comparative	
Cushitic group	243	1960)	83	linguistics	255
Czech language	229	Flemish language	83	historical linguistics	256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Hittite language	210
		and learning	392	Hjelm, Louis(1899~	
Dagur language	46	formal grammar	430	1965)	444
Da Hai(1594~1632)	45	Fourth South Min Dialects	370	Hsiang dialects	421
Dai language	48	French language	67	Huang Gongshao	215
Dai writing	47	French school	67	Huang Kan(1886~1935)	215
Dai Zhen(1723~1777)	48	frequency dictionaries	308	Humboldt, Wilhelm Freiherr	
Danish language	48	Fu Maoji(1911~)	85	von(1767~1835)	211
De'ang language	49	functional linguistics	97	Hungarian language	431
Deng languages	53				
dependency analysis method	43	Gaoshan languages	94	Icelandic language	22
Derung language	58	Geba script	94	idioms	36
dialect geography	77	Gelao branch	94	indexing method of Chinese	
dialectology	80	Gelao language	94	characters	201
dictionaries of the Chinese		General Survey of the Dialects		Indo-European family	455
dialects	150	of Jiangsu Province and the		Indo-Iranian group	454
Ding Du(990~1053)	55	City of Shanghai	226	Indonesian group	454
Ding Shengshu(1909~)	56	generative grammar	340	Indonesian language	454
discrimination network	81	Georgian language	96	information retrieval by	
disyllabic roots	258	German language	50	computer	220
Dong language	58	Germanic group	328	initials	345
Dong-Sui branch	58	Gin language	231	intermediary language	279
Dong-Tai group	58	grammar	467	international auxiliary	
Dong writing	58	Greek language	417	languages	117
Dongxiang language	57	Greenberg, Joseph Harold		International Phonetic	
Dong Zuobin(1895~1963)	57	(1915~)	96	Alphabet	118
doublet characters	448	Grimm, Jacob(1785~1863)	96	Irish language	9
Dravidian family	45	Gu Yanwu(1613~1682)	111	Italian language	448
Duan Yucai(1735~1815)	59	Gu Yewang(519~581)	111		
Dutch language	210	Gui Fu(1736~1805)	116	Jakobson, Roman(1896~	
		Gujarati language	97	1982)	437
Eastern Huns branch	57	Guo Moruo(1892~1978)	116	Japanese language	329
Eastern Yugur language	57	Guo Pu(276~324)	117	Jarring, Gunnar	
Egyptian-Coptic group	8	Guarani language	111	(1907~)	437
encyclopaedia	15			Javanese language	514
English language	458	Hakka dialects	237	Jespersen, Otto(1860~1943)	444
Esperanto	354	Halliday, Michael Alexan-		Ji Xianlin(1911~)	222
Estonian language	9	der Kirkwood		Jiang Yougao(?~1851)	227
Etymological Notes on the		(1925~)	127	Jiarong language	223
Hakka Dialects	237	Han Daozhao	127	Jingpo branch	233
etymology	42	Hani language	125	Jingpo language	233
Ewenki language	63	Hani writing	125	Jingpo writing	233
experimental phonetics	352	Harris, Zellig Sabbettal		Jino language	218
		(1909~)	125	Jones, Daniel(1881~1967)	323
Fang-Kuei Li(1902~1987)	254	Hashimoto Shinkichi		Jones, William(1746~1794)	324

Junggrammatiker	323	Lhoba language	270	Melanesian group	281
Jurchen script	304	Li branch	254	metaphoric meaning	20
		Li Deng	254	Mian language	288
Kan dialects	89	Li Jinxi (1890~1978)	253	Miao branch	292
Kannada language	236	Li language	254	Miao language	291
Karlgren, Klas Bernhard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480	Miao writing	289
Johannes (1889~1978)	92	Li Rong (1920~)	255	Miao-Yao group	289
Kashmiri language	237	linguistics	480	Micronesian group	288
Kazak language	126	Lisu language	258	Min dialects	292
Kazak writing	125	Lisu writing	258	missionary romanization	227
Kazan school	235	Lithuanian language	256	misused characters	22
Kharoṣṭhī alphabet	324	Liu Shiwei (1884~1919)	259	Moscow school	297
Khitan script	312	Liu Taigong (1751~1805)	260	<i>Modern Chinese Dialects</i>	420
Khmer language	93	Liu Xi	260	Moldavian language	297
Khoisan family	237	London school	267	Mon-Khmer group	288
Khotan script	465	Lu Deming (550?~630?)	265	Monba languages	282
Kindaichi Kyosuke (1882~1971)	229	Lu Fayan	266	<i>Mongol-Chinese Dictionary</i>	287
Kirgiz language	219	Lu Zhuangzhang (1854~1928)	265	<i>Mongol Dictionary in 21 Volumes</i>	66
Kirgiz writing	236	Lü Jing	266	Mongolian group	283
Koman group	237	Lü Shuxiang (1904~)	266	Mongolian language	283
Kong Guangsen (1752~1786)	242	Lu Zhiwei (1894~1970)	266	Mongolian writing	282
Kordofanian group	236	Luo Changpei (1899~1958)	268	Monguor language	389
<i>Korean-Chinese Dictionary</i>	33	Luo Zhenyu (1866~1940)	269	Monguor writing	389
Korean language	34			Montague grammar	288
Korean writing	33	Maban group	271	Mulam language	298
Kufa school	242	Macedonian language	273	Munda group	282
Kun Chang (1917~)	513	machine-aided translation	218	mutual commenting	213
Kurylowicz, Jerzy (1895~1978)	243	machine translation	217		
		Malacca group	272	National Conference on Language Reform	324
		Malagasy language	271	National Language Movement	123
		Malay language	272	National Language Romanization	120
		Malayalam language	272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547
Lahu language	249	Malayo-Polynesian family	272	natural language understanding	547
Lahu writing	249	Maltese language	271	natural language understanding systems	548
Lakkia language	249	Manchu branch	278	natural speech understanding systems	550
language	475	Manchu language	278	Naxi language	299
language model	480	Manchu script	277	Naxi writing	299
language planning	477	Manchu-Tungusic group	274	Neogrammarians	428
language reform	403	Mandarin dialects	112	Nepali language	302
languages of nationalities in China	523	man-machine dialogue	326	neurolinguistics	338
languages of the world	354	Maonan language	279	<i>New Dialect</i>	428
language teaching	478	maps of the Chinese dialects	150	Ngnyên Thuyên	330
language teaching for the deaf-mute and the blind	263	<i>Maps of the Suzhou Dialect</i>	375	Nicobarese group	302
language teaching of Chinese national minorities	519	Marathi language	271	Niger-Congo group	302
Lao language	250	Martinet, André (1908~)	271	Niger-Kordofanian family	303
Lao Naixuan (1843~1921)	250	mathematical linguistics	365	Nilo-Saharan family	302
Latin language	247	Mathesius, Vilém (1882~1945)	273	Norwegian language	305
Latinized New Writing	245	Ma Xueliang (1913~)	273	Nu language	304
Latvian language	249	Maya script	274		
lexicography	38	Meillet, Antoine (1866~1936)	279		
lexicology	40				
<i>Lexicon of Chinese Dialects</i>	150				

		Standardizing National Language	122	Russian language	62
Old Slavic language	99	Present-Day Tasks of Language Reform	49	Saharan group	332
o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Primi language	309	Salar language	332
see introductory article of the volume		principal linguistic institutes of China	527	Samoyed group	332
oral Chinese understanding systems	189	principal linguistic periodicals of China	529	Sanskrit	75
original meaning	19	principal linguistic societies of China	526	Sanskrit-Chinese translation	74
Oriya language	9	proverbs	442	Sapir, Edward(1884~1939)	332
Oroqen language	63	psycholinguistics	426	Saussure, Ferdinand de (1857~1913)	378
orthoepy	516	punctuation marks	20	Schleicher, August(1821~1868)	350
Orthoepy Academy	517	Punjābī language	306	Schuchardt, Hugo(1842~1927)	362
orthography	516	Pushtu language	310	Scots Gaelic	374
Outline of Chinese Dialects	152	Putonghua	310	Scottish Gaelic	374
		Putonghua-South Min Dialect Dictionary	311	semantic complement	449
Paiwan language	306			semantic factors	490
Paleo-Siberian languages	108	Qian Daxin(1728~1804)	313	semantic network theory	488
paleography	102	Qiang language	313	semantics	488
Pali	12	Qidan script	312	Semitic group	334
Pāṇini	23	Qingge'ertai(1924~)	323	Serbo-Croatian language	332
Papuan languages	11	Questionnaire of Characters for Dialect Surveys	79	Shang Chengzuo (1902~)	334
paralanguage	84			She language	336
Pashto language	310	radicals	30	Shen Gong	338
Passy, Paul(1859~1940)	306	Ramstedt, Gustav John (1873~1950)	250	Shen Jianshi(1886~1947)	339
Paul, Hermann(1846~1921)	18	Rask, Rasmus Kristian (1787~1832)	249	Shouwen	362
perceptual phonetics	87	Record of Experiments on the Four Tones	371	Shu Dialect	362
Persian language	24	regulariz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208	Shyāmsundardas(1875~1945)	419
'Phags-pa script	10	Report on a Survey of the Dialects of Hunan	213	Sibuwaihi, 'Amr' Ibn 'Uthmān (760?~796?)	413
Phoenician alphabet	81	Report on a Survey of the Dialects of Hubei	212	simplific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205
phonemics	450	Report on a Survey of the Middle-Shanxi in Dialect Pronunciations	112	simplified characters	226
phonetic Chinese alphabet	315	Rhaeto-Romance dialects	257	simplified form	226
phonetic complement	344	rhyme categories	504	Sindhi language	429
phonetics	490	rhyme tables	508	single characters	59
Phonetics and Phonology of the Amoy Dialect	420	rhymes	504	Sinhala language	333
Phonetics and Phonology of the Linchuan Dialect	259	Robins, Robert Henry (1921~)	268	Sino-Tibetan family	191
phonology	450	Romance group	269	Sino-Tibetan translation	191
physiological phonetics	341	Romanian language	268	Sino-Tibetan word comparison	189
Pike, Kenneth Lee (1912~)	306	Rong Geng(1894~1983)	330	Slavic group	369
Polish language	22	Rousselot, Jean Pierre (1846~1924)	265	Slovak language	369
Polynesian group	22	Ruan Yuan(1764~1849)	331	Slovenian language	369
Poppe, Nikolaj Nikolaevic (1897~)	24			Sommerfelt, Alf (1892~1965)	332
Popular Language Movement	46			Spanish language	413
Portuguese language	309			speech pathology	438
Postal Spelling System	464			speech recognition	441
pragmatics	496			speech synthesis	439
Prague school	26				
predictive analysis method	498				
preference semantics	463				
Preparatory Committee for					

sociolinguistics	336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as		Va writing	391
Sogdian language	375	a second language for		Vendryes, Joseph	
Sound-Notating Alphabet	539	National Minorities of		(1875~1960)	80
standard form	516	China	335	Vernacular Movement	13
State Language Commission	120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as		Verner, Karl (1846~1896)	398
statistical linguistics	384	a native language	475	Vietnamese language	499
structural grammar	228	<i>The Textual Criticism of</i>		von Gabain, Annemarie	
Steinthal, Heymann		<i>Wu Dialect</i>	411	(1901~)	83
(1823~1899)	370	<i>The Zhongxiang Dialect</i>	537	Vossler, Karl (1872~1949)	84
stenography	375	Thon mi Sambho ʔa	388	vuglar form	375
<i>Studies in the Modern</i>		Tibetan branch	513		
<i>Wu Dialects</i>	421	Tibetan language	512	Wade-Giles Spelling System	397
<i>Studies on Cantonese Grammar</i>		Tibetan writing	512	Wang Guowei (1877~1927)	394
<i>as Spoken in Hong Kong</i>	421	Tibeto-Burman group	509	Wang Jingru (1903~)	394
stylistics	81	<i>Tibeto-Chinese Dictionary</i>	509	Wang Li (1900~1986)	395
Sui language	366	<i>Tibeto-Chinese Lhasa Vernacular</i>		Wang Niansun (1744~	
Sun Mian	376	<i>Dictionary</i>	509	1832)	396
Sun Yan	377	Tocharian language	390	Wang Renxu	396
Sun Yirang (1848~1908)	377	Tokieda Motoki (1900~		Wang Xianqian (1842~	
Swahili language	370	1967)	352	1917)	396
Swedish language	331	Tomba script	56	Wang Yinzhi (1766~1834)	396
Sweet, Henry (1845~		toponomastics	54	Wang Yun (1784~1854)	396
1912)	370	transcription	21	Wang Zhao (1859~1933)	397
<i>Syllabary of Dialect</i>		transcription by nonlettered		Weinreich, Uriel	
<i>Pronunciations of Chinese</i>		characters	448	(1926~1967)	391
<i>Characters</i>	153	transferred meaning	453	Welsh language	397
symbols and conventions		translation	69	Western Huns branch	415
used in linguistics studies	487	transliteration	542	Western Yugur language	414
Syriac language	108	tree analysis method	364	Whitney, William Dwight	
system of intermediate		Tujia language	389	(1827~1894)	216
constituents	530	Tungusic branch	382	Whorf, Benjamin Lee	
		<i>Turkic Dictionary</i>	386	(1897~1941)	406
Tagalog language	380	Turkic group	386	<i>Wonder of Western Writing</i>	415
Tajik language	380	Turkic script	385	words derived from the	
Tamil language	381	Turkish language	389	same root	384
Tang Lan (1901~1979)	381	Turkmen language	389	writing	400
Tatar language	46	Tuva language	388	writing systems of na-	
Telugu language	380	typological linguistics	251	tionalities in China	520
terminological data bank	364			written Chinese under-	
terms	363	Uhlenbeck, Christianus		standing systems	159
text linguistics	213	Cornelius (1866~1951)	407	Wu dialects	408
Thai language	381	Uighur script	215		
<i>The Dictionary of Modern</i>		Ukrainian language	407	Xibe language	419
<i>Chinese</i>	420	Uralic family	407	Xibe writing	419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Urdu language	406	Xing Gongwan (1914~)	429
on Computational		<i>Uygur-Chinese Dictionary</i>	399	Xixia script	415
Linguistics	118	Uygur language	399	Xu Kai (920~974)	435
The International Linguistic		Uygur writing	399	Xu Shen (58?~147?)	436
Association	118	Uzbek language	408	Xu Xuan (917~992)	435
The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ssociation	120	Va-Benglong branch	391	Yale Spelling System	443
<i>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i>		Va-De'ang branch	391	Yamada Yoshio (1873~1958)	334
<i>of the Languages of</i>		Va language	391	Yang Shuda (1885~1956)	443
<i>Taiwan</i>	380	Varmā, Dhīrendra		Yang Xiong (BC53~18)	442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as		(1897~1973)	391		
a foreign language	60				

Yao branch	443	Zhang Binglin(1869~1936)	514	(1902~1982)	8
Yao writing	288	Zhang Xiang(1877~1945)	514	Виноградов, Виктор	
Yi branch	447	Zhang Yi	514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1895~	
Yi language	447	Zheng Qiao(1104~1162)	517	1969)	399
Yi writing	446	Zheng Xuan(127~200)	517	Малов, Сергей Ефимович	
Yiddish language	446	Zhou Deqing(1277~1365)	537	(1880~1957)	272
Yue Dialect	499	Zhou Shijing(1876~1914)	537	Потебня, Александр	
Yue dialects	500	Zhou Zumo(1914~)	537	Афанасьевич(1835~1891)	25
Yuen Ren Chao (1892~		Zhuang-Dai branch	543	Трубецкой, Николай	
1982)	514	Zhuang-Dong group	543	Сергеевич(1890~1938)	382
Yu Min(1916~)	466	Zhuang language	546	Фортунов, Филипп Фёдорович	
Yu Xingwu(1896~1984)	466	Zhuang writing	546	(1848~1914)	84
		Zhu Dexi(1920~)	538	Шахматов, Алексей	
		Zhu Junsheng(1788~1858)	539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64~	
				1920)	334
Zaiwa language	509			Щерба, Лев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Zaiwa writing	509			(1880~1944)	425
Zeng Yunqian(1884~1945)	513	Аванесов, Рубен Иванович			

内 容 索 引

说 明

一、本索引是全卷条目和条目内容的主题索引。索引主题按汉语拼音字母的顺序排列,第一字同音时按声调(阴平、阳平、上声、去声)的顺序排列,同音同调时按汉字笔画由少到多的顺序排列,笔画数相同的按起笔笔形—(横)、丨(竖)、丿(撇)、丶(点)、㇀(折,包括丨丿乚等)的顺序排列。如以上各项完全相同,则按第二字的音、调、笔画和笔顺排列,余类推。用拉丁字母和阿拉伯数字开头的主题,依次排在汉字索引主题的后面。

二、设有条目的主题用黑体字,未设条目的主题用仿宋体字。

三、索引中人名一般附有人物的生卒年或活动时代,外国人名附有原文姓和名(或名的缩写字母)。

四、本索引后附有“外国人名译名对照表”,作为从外文查检中译名或从中译名查检外文之用。

五、索引主题之后的阿拉伯数字是主题内容所在的页码,数字之后的小写拉丁字母表示索引内容所在的版面区域。本卷正文的版面区域划分如右图。

a	d
b	e
c	f

A

阿昌语 1a

阿达马瓦-东部语支 303c

阿得利语 118a

阿尔巴尼亚语 1b

阿尔巴尼亚语文字 1c

阿尔楚尼, G. B. (G. B. Artsouni) 217a

阿尔卡底-塞浦路斯方言 417f

《阿尔泰语比较语法》 4a, 286e

阿尔泰语系 1f

《阿尔泰语言学导论》 (Введение в алтайское языкознание) 4a, 24d, 250b

《阿尔泰语言研究》 4b

阿尔托, P. (Pentti Aalto) 4a, 250c

阿非利堪斯语 4d

阿非罗-亚细亚语系 4f

《阿吠斯陀》 (Avesta) 454f

阿骨打 304e

阿贾米文字 209f

阿卡德文字 403a

阿卡德语言 425a

阿卡语 125c

阿拉伯《百科全书》 24e

阿拉伯文字 6b

阿拉伯语 5f

阿拉伯语法大纲 13a

阿拉伯字母 401f

阿拉米字母系统 403c

阿拉米语 6d

阿拉米语文字 6f

阿列克桑德罗夫, A. И.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Александров 1861~?) 235a

阿列克谢耶夫, П. М. (П. М. Алексеев) 245b

阿扁斯语 6f

阿姆哈拉文 7a

阿姆哈拉语 7b

阿努 388e

阿欧方言 94c

阿日毕德呼 66e

阿萨姆语 7c

阿萨姆语文字 7d

阿塞拜疆语 7d

阿斯科里, G. I. 7e

《阿达婆吠陀》 75d

阿提卡方言 417f

阿瓦尔语 93c

阿瓦涅索夫, P. И. 8a

阿低方言 391f

《阿伊努方言词典》 84b

《阿伊努史诗由卡拉的研究》 230a

阿兹台克语 281e

《阿Q正传》 14f

埃德蒙, E. (E. Edmont) 77f

埃德利, J. J. (J. J. Egli) 54e

埃及方言 6b

埃及-科普特语族(见阿非罗-亚细亚语系) 5b

埃及圣书字 8c

埃塞俄比亚文字 401c

埃维语 303c

埃沃基次语支 275b

埃文基文 276b

埃文基语 274f

《埃文基语-俄语辞典》 277d

埃文文 276b

埃文语 274f, 382f

《艾因书》 ('Al-'ayn) 126f

爱奥利方言 417f

爱尔兰语 9a

爱尔兰语文字 9b

爱沙尼亚语 9c

爱沙尼亚语文字 9d

爱斯基摩-阿留申诸语言 108f

爱斯基摩语 281c

安第斯-赤道语系 111e

安多方言 512e

安纳托利亚语 457f

安纳托利亚语族(见印欧语系) 457c

安阳殷墟的甲骨文 105d

按形体偏旁分部编排的字书 552a

奥杰布华语 281c

奥克语 67f

奥里亚语 9e

奥里亚语文字 9f

《奥罗克语语法纲要》 277d

奥斯特古德, C. E. (Charles Egerston 1916~) 426d

奥斯克-翁布利语 247f

奥斯特克-萨莫耶德语 407c

奥斯特霍夫, H. (H. Osthoff) 428d

《奥斯特罗米尔福音书》 62b

奥斯汀, J. L. (John Langshaw Austin 1911~1960) 486c, 489a

奥托-曼格安诸语言 281d

奥托米语 281e
奥依语 67f
澳大利亚的土著语言 360f
澳斯特罗-亚细亚语系 301a
澳泰语系 192a, 544b
澳洲英语 460d

B

八备 70a
八分 10a
八思巴 (1239~1280) 10d, 175c
八思巴字 10d
八体 11b
《八章书》(*Aṣṭadhyaṇī*) 23b
巴比伦楔形字 425b
巴比伦语 425a
《巴布尔回忆录》 387b
巴布亚语言 360f
巴布亚诸语言 11c
巴尔干-罗曼语支 269d
巴尔干语言联盟 359f
巴尔虎布利亚特方言 283b
巴尔托利, M. G. 11f, 78d
巴尔-希列尔, Y. 12b, 234a, 480d
巴格达学派 243a
巴哼方言 30a
巴黎写本 274b
巴利, C. 12c, 485d
巴利文三藏 12f
巴利语 12e
巴纳特方言 269a
巴饶克方言 391f
巴士拉学派 12f
巴斯卡科夫, Н. А.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аскаков 1905~)
4c, 415e
巴斯克语 13b
巴斯克语文字 13c
巴塔克语 300b
白保罗 (Paul K. Benedict) 192a, 291e
白川静 107c
白漆洲 (1900~1934) 112a, 345b
白俄罗斯语 13c, 62a
白俄罗斯语文字 13e
白话 500b
白话文运动 13e, 337b, 404c
白狼王 15a
《白狼王歌》 15a
白狼语 15b
白文(见白语) 15e
白夏基语 306f
白语 15c
白字 198e
《百家姓》 153e
百科词典 39d
百科全书 15e
《百科全书, 或科学、艺术与手工艺大词典》 16b
百科全书派 16b
百越 137e

百粵 137e
班巴拉语 303b
班第 66e
班图诸语言 17c, 303d
半齿音(见等韵) 52b
半球优势 339b
半舌音(见等韵) 52b
半元音 493c
伴随语言学 485f
邦阿西楠语 300c
邦板牙语 300c
邦格, W. 83b
包拟古 190f
包孕复句 253f
《宝篋楼彝器图录》 330e
保安语 18b, 285f
保加利亚语 18c
保罗, H. 18f
《保卫和发扬法兰西语言》 68b
《碑别字》 22b
碑铭体 8c
碑文 301d
北部方言 407a
北部语族 237a
北俄方言 62f
北方方言 112b
北方话 112b
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金 396a
《北京单音词词汇》 150b
《北京方言词典》 150c
《北京话轻声词汇》 150b
北京话声调 129d
北京话声母 128d
北京话韵母 129a
《北京俗曲百种摘韵》 350e
北京速记学校 376d
北京音 128b
北满方言 278d
《北美土著的文化组合和民族组合》 326d
北美印第安语 281c, 360e
北欧铭刻 328b
北片湘语 421f
北片新湘语 421f
《北平音系十三辙》 350e
《北平音系小辙编》 150b
北日耳曼语 329a
北语群 274f
北语支 274f
北中部方言 499b
贝茨米萨拉卡方言 271b
贝弗, T. (T. Bever) 393a
贝贾语 5d
贝努埃-刚果语支 303c
贝塚茂树 107a
被反切字 71c
被换用字 384a
被切字 71c
本地方言 254b
本土方言 329c
本无其字的假借 225e

本辛, J. (J. Benzing) 277e
本义 19b, 171c, 225a
本义与引申义的关系 171c
本有其字的假借 225f
本字 19c
本族语 478d
崩龙语(见德昂语) 49e
鼻化元音 492d
鼻音 493b
比布鲁斯字母 19e, 401
比哈尔语 454a
《比较文法》 253f
比较文学 76a
比较文学史 76a
比较语言学 212a
《比较语音学概要》 306b
比科尔语 300b
比萨扬语 299f
比兴 434b
《比雅》 19f, 172a
比喻 20b, 432b
比喻义 20b
彼捷尔松, M. H. (M. H. Петерсон 1885~1962) 298a
彼什科夫斯基, A. M. (A. M. Пешков-ский 1878~1933) 298a
彼特拉克, F. (Francesco Petrarca 1304~1374) 448d
《笔形查字法(草案)》 203b
闭口音 173e
避讳字 20c
避嫌名 20d
边音 493b
变体 95f
变易 172b
便览补遗 288a
便览正讹 287f
辨认 88b
辨识性模型 366a, 480b
辨物 37f
辨义性对立 27d
标点 20f
标点符号 20d
《标点符号使用法》 21a
标调字母 494b
标记项 27e
标记性 437c
标-交方言 289a
标音 21d
标准语的建立 461f
标准语和方言 见正文前专文 2
标准元音图 492b
《标准字形方案(草案)》 209b
表层结构 483f
表形 402c
表意 402c
表意文字 196e
表意字 59b
表音 402c
表音正字法 273b

别名 21e, 327b
别姆巴语 303d
《别雅》 21e, 172a
别字 22a
冰岛语 22b
并列关系 180c
并列式 177c
病理学的方法 339a
波尔热津斯基, В. К. (В. К. Поржезинский 1870~1929) 298a
波克罗夫斯基, М. М. (М. М. Покровский 1868~1942) 298a
波兰语 22c
波兰语文字 22e
波浪理论 360b
波浪说 482d
波利尼西亚语族(见南岛语系) 300c
波罗的-斯拉夫语族 23a, 457a
波罗的语族 22f, 457a
波纳佩语 300f
波你尼 23a, 75b
《波你尼经》(Pāṇinisūtra) 23b
波普, N. N. 24b, 4a, 286d
波斯塔尔, P. (Paul Postal) 340b
波斯塔尼, B. 24d
波斯楔形字 425d
波斯语 24e
波斯语文字 24f
波铁布尼亚, A. A. 25a
伯德惠斯尔, R. L. (R. L. Birdwhistle) 85b
伯尔塔语支 302d
伯力兹学校 392d
伯林, B. (B. Berlin) 40e, 427d
伯特, M. (M. Burt) 392f
伯希和 (Paul Pelliot 1878~1945) 191b, 213d
柏柏尔语族(见阿非罗-亚细亚语系) 5c
柏格理苗文 292c
《博白方音实验录》 353d, 395c
博杜恩·德·库尔德内, J. N. 25c, 235a, 365d, 484b
博厄斯, F. 25e, 280a, 483c
博弗龙, L. (L. Beaufront) 117e
博普, F. 26b
《博学篇》 161b
《博雅》 115c
博喻 432f
薄伽丘, G. (Giovanni Boccaccio 1313~1375) 448d
卜辞 223c
《卜辞琐记》 443c
《卜辞通纂》 26c, 106d, 117a
补卷法 17b
补远方言 218f
不变词类 50c
《不列颠百科全书》 16d
不列颠语文 235f
不同语言中词汇结构的共性成分 40e
布尔 4e

布尔加尔语组 415e
布尔语 4e
布金文 300b
布金语 300b
布克莫尔语 305d
布拉格学派 26e
布拉格学派的基本观点 27a
布拉格语言学会 26f, 437b
《布拉格语言学会学报》 26f
《布拉吉语》 391c
《布拉吉语语法》 391d
布莱尔, L. (Louis Braille 1809~1852) 264d
布莱尔盲字 264d
布赖特, T. (Timothe Bright) 375f
布朗语 28b
布雷阿尔, M. (M. Bréal) 489b
布利亚科夫斯基, В. Я. (В. Я. Буляковский) 365d
布里亚特语 285f
布列塔尼语 28c
布龙菲尔德, L. 28d, 280a, 365e
布龙菲尔德时期 280b
布龙菲尔德派 483d
布鲁格曼, K. 29b, 428e
布伦达尔, V. (Viggo Brendal 1887~1942) 95c
布罗卡, P. (Paul Broca 1824~1880) 338f
布洛克, J. (Jules Bloch 1878~1945) 391c
布瑞方言 30a
布嫩语 29d
布努语 29e
布斯, A. D. (A. D. Booth) 217a
布斯特, K. (K. Boost) 213f
布特哈土语 46b
《布依汉简明词典》 546b
布依文(见布依语) 30d
布依语 30a
《布依语调查报告》 546b
部首 30d
《部首查字法(草案)》 201f

C

操音 493a
蔡俊明 150c
蔡培火 150c
蔡锡勇 159c, 376b
蔡邕 10b
蔡璋 376c
《仓颉篇》 31a, 161c, 333b
草书 31d, 197e
《草书势》 32b
草体 375b
参差论 481f
岑仲勉 385f
查方言 332f
查莫罗文 300f
查莫罗语 300f

《察布查尔报》 419c
察合台汗国 32c
察合台文 32c, 399d
察合台语 32d, 387b
柴门霍夫, L. L. (Ludwik Lejzer Zamenhof 1859~1917) 117e
蝉联 433d
颤音 493b
《昌黎方言志》 32f
《长庆会盟碑》 512d
《长沙出土楚漆器图录》 335a
《长沙古物闻见记》 335a
长沙话 422a
常识语 442d
常体 95f
常言 33b
《常用简体字登记表》 205e
《常用简字表》 205e
《常语按》 147e
《常语寻源》 147e
常州小片 408d
超模板 464e
超音段特征 348d
《朝汉词典》 33b
朝鲜文 33d, 522e
朝鲜语 34a
《潮语词典》(见汉语方言词典) 150c
车臣语 93c
陈巴尔虎方言 63f
陈承泽 (1885~1922) 120d
陈第 34c, 109c
陈独秀 (1880~1942) 13e
陈鹤琴 (1892~1982) 308a
陈介祺 (1813~1884) 105d
陈澧 34d, 319a, 504f
陈梦家 34e, 107a, 452e
陈彭年(见《广韵》) 115e
陈荣衮 14a
《陈宋淮楚歌寒对转考》 450b
陈廷敬 236d
陈望道 35a, 519e
《陈望道文集》 36a
陈玉澍 (1853~1906) 66c
陈原 (1918~) 337b, 520b
陈章太 (1932~) 520b
陈治文 420e
衬托 127c
《称谓录》 147f
成分分析法 214c
《成均图》 36b, 450a, 514d
成声类型 493d
成素 95e
成语 36c
成语频率词典 308b
成阻 492e
程际盛 308a
程迥 257f
程瑶田 37b
程颐 214e
池上二良 277d

持阻 492e
 齿头音(见等韵) 52b
 齿音(见等韵) 52b
 《冲绳语辞典》 84b
 虫书 11b
 《重订合声简字谱》 315d
 重言 37c, 55f
 抽象自动机 547a
 除阻 492e
 《楚辞韵读》 395d
 楚科奇语 108e
 处州小片 408f
 川黔滇方言 291f
 《传经堂文集》 539a
 《传音快字》 159c, 376c
 《串音字标》 315e
 《春秋名字解诂》 37d
 《春秋名字解诂补义》 38a
 纯术语 363c
 纯四等韵 52f
 纯语 418c
 纯语义学 488f
 唇音(见等韵) 52a
 绰号 327c
 《辘轳录》 147d
 词 352b, 473a
 《词》 120a
 词的定义 40b
 词的分类 420f
 词的派生 41b
 词的写法 516d
 词的转换 41b
 词典 38a
 词典学 38a, 484f
 词儿连写 516d
 词法 484f
 词符 400f
 词符与音节符并用的文字 400f
 词干字 304f
 《词海点滴》 24d
 词汇-功能语法 341c
 词汇码 200f
 词汇统计学 385c
 词汇学 40b, 484f
 词汇演变 132b
 词汇语法 127c
 词汇语义学 40b
 《词集》(Vocabolario) 38b
 词类 178b, 469c
 词类的功能 129e
 词类活用现象 178e
 词类问题的讨论 183b
 《词论》 41f
 词素 40f, 472f
 词位 253f
 词形变化减少时期 458d
 词形变化消失时期 458d
 词义 252d
 词义变化 67b
 词义场 41e

词义分析 40c
 《词与语文》 26f
 《词源》 182c
 词源统计分析法 384f
 词源学 42b, 484f
 词重音 494e
 词缀字 304f
 词族 42f
 词组 473b
 词组结构语法 341c
 茨瓦纳语 303d
 辞 352b
 《辞海》 43a
 辞海编辑委员会 43b
 《辞海·增补本》 43b
 辞式 432b
 辞书编纂 462a
 《辞通》 43c
 《辞源》 43d
 次方言 139b
 次清(见清浊) 323e
 次浊(见清浊) 323f
 《从单句句法到话语句法》 214e
 从属分析法 43f
 从属关系语法 44a
 《丛书集成》 20b, 234a
 粗仁 512b
 粗通 512b
 麤 44c
 麤文 44c
 《麤文丛刻》 44c
 《麤夷条》 44c
 麤字 44c
 崔世珍 44e
 村上嘉英 150c
 撮口呼 184d
 错那门巴语 282a

D

嗒嘴音 493c
 达 70e
 达尔迪语言 457b
 达尔迪语族 457b
 达海 45a
 达罗毗荼语系 45b
 达麦多吉 369a
 达让 53f
 达斡尔语 46a
 《答段若庸论韵》 368f
 《答江晋三论韵》 173e
 鞑靼标准语 46c
 鞑靼语 46c
 鞑靼语文字 46d
 《大宝鉴》 16a
 大北方话 112b
 大波兰方言 22e
 《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 436e
 大俄罗斯 62b
 《大方广佛华严经音义》 428e
 大类分卷百科全书 16d

大陆凯尔特语 235e
 《大明律直解》 257b
 大南山话 290a
 大坪江话 290a
 《大清全书》 276d
 《大史》(Mahāvamsa) 12f
 《大疏》(Mahābhāṣya) 23e
 《大宋重修广韵》 318b, 505f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76c
 《大唐西域记》 23b, 375b
 《大唐众经音义》 445d
 大徐本 368b
 《大越史记全书》 331a
 大韵 73d
 《大藏经》 446a
 大众体 402f
 大众语运动 46e, 35f
 大策 11b, 197d, 543a
 傣文 47c
 傣端文 47c
 傣仂文 47c
 傣哪文 47c
 傣文 47c, 522c
 傣语 48a
 代词 178d
 代数语言学 48b, 366a
 戴侗 171e, 261c
 戴维斯, H. R. (H. R. Davies) 291b
 戴震 48d, 77c
 丹金 66e
 丹金达格巴 287d
 丹麦-挪威语 329a
 丹麦语 48f
 《丹麦语大词典》(Ordbog over det danske sprog) 39f
 《丹铅总录》 147d
 单侧化 339a
 单呼言语识别 441c
 单句的结构 181a
 单竖线号 487e
 单音词 177c
 单语言频率词典 308b
 单元编辑合成系统 440e
 但丁·阿利吉耶里(Dante Alighieri 1265~1321) 448d
 当代语言教师语音协会 120b
 《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 49b
 当为 49e
 《当用汉字表》 208b
 当作(见当为) 49e
 宕摄 320f
 岛邦男(1907~1977) 107b
 道拉方言 209e
 德昂语 49e
 德尔布吕克, B. (Berthold Delbrück 1842~1922) 428e
 德国学派 82b
 德宏傣文 47c
 德宏方言 48a
 德拉维达语系 45b

德莱顿, J. (John Dryden 1631~1700) 460a
 德累斯顿写本 274b
 德谟克利特 (Democritus 公元前460~前370) 16a
 德·摩尔根, A. (Augustus De Morgan 1806~1871) 385b
 德努方言 289a
 德语 50a
 «德语成语词表» (*A German Idiom List*) 308b
 «德语词典» 96a
 «德语频率词典» (*Häufigkeit Swörterbuch der Deutschen Sprache*) 308a
 «德语畜牧学频率词典» 308d
 «德语语法» (*Deutsche Grammatik*) 96a
 等(见等韵) 52d
 等立复句 253f
 等号 486b
 等韵 51b, 175d
 等韵图 51d, 175e
 僭语 53f
 低地德语 50a
 低地立陶宛语 256f
 低平调 370f
 狄德罗, D. (Denis Diderot 1713~1784) 16b
 迪丁贝尔格, W. (W. Dittinberger) 385b
 迪维希语 334b
 底端分析 550f
 地理语言学 77f
 地名 54b
 地名常设委员会 54f
 «地名起源和发展» (*Les Noms de Lieux, Origine et Evolution*) 54f
 地名委员会 54f
 地名学 54b
 «地名学» (*Geographische Namenkunde*) 54e
 «地名学» (*Nomina Geographica*) 54e
 地区百科全书 16d
 «弟子规» 154f
 «弟子职» 154f
 帝国邮电联席会议 465a
 逆系关系 180c
 逆用 174e
 第二代心理语言学家 426e
 第二类机器翻译系统 218a
 第二语言 478d
 第二语言教学 479c
 第三代心理语言学家 426e
 第三类机器翻译系统 218a
 第五代计算机 222b
 第五代语音学 491a
 第一部波兰语语法 22d
 第一部大型英语词典 38c

第一部汉语频率词典 308a
 第一次国际世界语大会 354a
 第一代心理语言学家 426d
 第一个国际音标方案 120b
 第一届全国文字改革工作会议 149a
 第一类机器翻译系统 217e
 «第一批简体字表» 205f
 «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 208f
 «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草案» 324f
 第一语言 478d
 第一语言的教学 478f
 第一组方言地图 77f
 «典论论文» 166c
 电子生理学的方法 339a
 调音合成器 440c
 «调韵指微» 52a
 «叠雅» 55c, 172a
 叠音字 133f
 叠韵 55d, 259a, 349b
 叠韵字 258e
 叠字 55e, 37c
 丁度 55f
 丁福保 (1874~1952) 368e
 丁声树 56a
 丁文江 44c
 钉头字 425a
 顶端分析 550f
 顶真 433d
 «订讹杂录» 56c
 定符 8e
 定声 539b
 定位论 339e
 东巴 56d
 东巴文 56d
 东北方言 13d, 34b, 126e
 东北语言学会 340c
 东部方言 46c
 东部拉丁语 268f
 东部摩揭陀方言 12e
 东部印地语 454a
 东部语支 369b
 东部裕固语 57a, 285f
 东京话 329c
 东南方言 34b
 东南亚英语 460e
 东欧学派 82b
 东瓯片 408f
 «东塾读书记» 34e
 东斯拉夫语 62b
 东苏丹语支 302d
 «东土耳其语-英语方言学词典» 437d
 «东土耳其语(即维吾尔语)语音学研究» 437d
 东吐火罗语 390a
 东乡语 57c, 285f
 东匈语支 57d
 东友方言 289a
 东语群 274f
 东韵 174f
 东州大儒 377a

董必武 (1886~1975) 205f
 董纯才 520a
 董同龢 213b, 321b
 董作宾 57e, 223f
 «董作宾先生全集» 57f
 动宾关系 183c
 动宾式 37a
 动补结构 130a
 动补式 37a
 动词的组配能力 41c
 动词谓语句 183c
 动词性谓语 180b
 动态频谱或语图的模式 346e
 侗僚语族 543e
 侗水语支 58b
 侗水语 544c
 侗台语 546a
 侗台语族(见壮侗语族) 191f, 543e
 侗文(见侗语) 58e
 侗语 58d
 «豆芽字母» 315c
 逗号 21b
 独立分析独立综合的系统 530f
 独立分析相关综合的系统 530f
 独龙江方言 58e
 独龙语 58e
 独体字 59a, 197f
 读如(见读若) 59b
 读若 59b, 174c
 读书音 143e
 «读书杂志» 396b
 读为 59d
 读音法 516f
 读曰(见读为) 59d
 杜莱, H. (H. Dulay) 392f
 杜林 161c
 杜延业 552b
 短脉冲直条 346e
 短语动词 460c
 «段砚斋杂文» 340a
 段玉裁 59f, 368c
 断句 181a
 对比差异原则 531c
 对比语言学 480e
 对立 450f
 对偶 433a
 对外汉语教学 60c
 对文 37e
 «对相四言杂字» 154a
 对音 175c, 412d
 对仗 433a
 对转 110f
 «敦煌变文集» 61f
 «敦煌变文字义通释» 61f
 «敦煌汉藏词汇» (*A Sino-Tibetan Glossary from Tunhuang*) 255c
 多变体语法 78e
 多分特征 496a
 多老 251a
 多路预示分析法 498f

多罗方言 94c
多坦 251a
多系统论 267e
多音词 177c
多语言频率词典 308c

俄国和苏联语言学 484b
《俄罗斯标准语语法概要》 8b
俄罗斯文馆 392b
俄文 522f
俄语 62a
《俄语句法》 334c
《俄语语法》 426b
《俄语语法通论》 235c
《俄语语法札记》 25b
《俄语元音的音质与音长》 426b
额尔古纳方言 63f
额尔雅巴雅尔 66e
鄂尔浑-叶尼塞文 385d
鄂伦春语 63d
鄂温克语 63f, 274c
恩泽林, Я. М. (Я. М. Эндзелин
1873~1961) 298a
儿化 64a
儿化音节 64a
儿化音节的音变 64b
儿化韵 184f
儿化韵母表 65b
《儿童语言, 失语症与语音共性》 437c
尔 169a
《尔雅》 65e, 38e, 169a
《尔雅补注》 66b
《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 66d
《尔雅郭注义疏》 66c
《尔雅匡名》 66b
《尔雅释例》 66c
《尔雅疏》 66a, 170e
《尔雅义疏》 446b
《尔雅翼》 66d, 66a
《尔雅音训》 66d
《尔雅音义》 65f, 72e
《尔雅正义》 66b
《尔雅注》 169f, 170d
《尔雅注疏校勘记》 66b
耳道 343a
耳蜗 343c
耳语音 344b
《遼言》 147c
《遼英圣览》 56a
二合元音 492d
《二十三部音准》 110e, 450a
《二十一卷本词典》 66e
《二十一卷本蒙文词典》 66e

发现程序 229c
发音器官 491d
发音语音学 352d
发展中的失语症 439c

法光 369a
法国学派 82b
《法句经》 324d
法拉 ('Al-farrā'a 761~822) 242f
法兰西学派 67a, 483b
《法兰西语言地图集》 (*Atlas Linguistique de la France*) 54f
法斯特, J. (Julius Fast) 85b
法语 67e, 257d
《法语成语词表》 (*French Idiom List*) 308b
《法语风格学纲要》 (*Traite de Stylistique Française*) 12d
《法语语音学》 426b
《番汉合时掌中珠》 68f
翻译 69b, 462a
翻译不可能论 69d
翻译可能论 69d
《翻译名义集》 70a
《凡将篇》 161c
凡语 71b
樊屠凤 (1601~1664) 411c
繁体 71b
反 72c
反巴比伦语 118a
反切 71c, 128c, 174d
反切的改良 73b
反切的起源 72e
反切上字 71c
反切系联法 34e
反切下字 71c
反切语 314f
《反切语八种》 314f
反切原理 71d
反书 366f
反语 73f
反证法 174e
范畴感知 88a
范畴论 183e
范畴语法 234f
范寅 (1827~1897) 499f
梵汉对音 74a
梵语 75b
《梵语、古波斯语、希腊语、拉丁语、立陶宛语、哥特语和德语的比较语法》 26c
《梵语千字文》 76a
《梵语语法》 (*Astadhyayā*) 26c
《梵藏英词汇集成》 313e
方光焘 (1898~1964) 519e
方濬益 (?~1899) 105a
方块白文 15e
方块苗文 522e
方块瑶字 522a
方块壮字 546e
方括号 487b
《方氏墨谱》 304f
方特, C. G. M. 76d, 451c
方体字 10d
方位词 179c
方言 131c, 176b

《方言》 76e, 137d, 147e, 165b
《方言别录》 147e
方言岛 139c
方言地理学 77f, 80a
方言地理学的课题和方法 78a
方言地理学与社会方言学比较明显的区别 80b
《方言调查字表》 79a
方言片 139b
方言区 139b
方言区分的四个层次 139b
《方言笺疏》 77d
《方言疏证》 77c
《方言》续补 79d
方言学 80a, 485c
方言研究 533b
《方言注》 77b
方以智 (1579~1671) 383c
方音调查表格 79a
房德里耶斯, J. 80e
飞白 432e
《飞沙集》 331b
非本族语 478d
《非草书》 32a
非官话方言 131d
非南岛诸语言 11c
非声调语言 493f
非终极标记 364f
《非洲的语言》 96c
非字母文字 521c
菲尔莫尔, C. (Charles Fillmore
1929~) 484a
腓尼基人 403c
腓尼基字母 (见比布鲁斯字母) 19f
腓尼基字母系统 403d
吠陀六分支 23b
吠陀语 75b
肺气流机制 344a
费尧特, W. (W. Viëtor) 120b
分辨网络 81a
分布 280d
分布主义 280b
分号 21b
分句 473c
分类词汇 38a
分类法 109c
分类统计学 385c
分立式测试 393e
分量 345f
分析句法 365f
分析性模型 366a
芬兰-乌戈尔语族 (见乌拉尔语系) 407c
芬兰语 81c
芬兰语文字 81e
芬兰语支 407c
丰语 303c
风格统计学 385c
风格学 81f
封泥文字 105d
冯·加班, A. 83a

冯家昇 216a
佛教梵语 75f
佛经体 375b
弗拉芒语 83c, 210c
弗留利语 257c
弗斯, J. R. 83d
弗斯派 268a
服部四郎 84a
浮士勒, K. 84b
符号 95e
符号学 485a
符号语 117d
福多, J. A. (Jerry A. Fodor) 340b
福尔图纳托夫, Ф. Ф. 84e, 484b
福尔图纳托夫-索绪尔定律 298b
《福尔图纳托夫选集》 84e
福佬话 292e
《福乐智慧》 216a, 387a
《福州方言词典》 150a
辅音 343f, 492e
辅音的分类 344b, 492f
辅音字母 402a
附录 17a
《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 506e
复叠 433d
《复社温夫书》 182b
复合波 345e
复合元音 492d
《复杂的句法整体及其主要结构特征》 214e
副语言 84f
傅东华 (1893~1971) 519e
傅懋勳 85d
傅婧 420e
富尔语 302c

G

噶盖 277e
改进后的傣仂文 47f
盖德尔语支 235f
盖格方言 1c
盖拉语 5d
概念从属论 86a
《干禄字书》 87a
感叹号 21b
感知语音学 87e
赣方言 89b, 138a
赣方言代表点南昌话的声韵调 92b
赣方言区 140e
刚果语 303d
钢和泰 (Alexander von Staël-Holstein 1877~1937) 74a
高本汉 92f, 99c
《高昌回鹘王国》 83c
《高等国文法》(见杨树达) 41f, 443a
高地德语 50a
高地德语方言 446c
高地德语音变 50b, 328f
高地立陶宛语 256f, 257a
高加索语系 93a

高卢-罗曼语 67f
高卢-罗曼语支 269d
高棉语 93e
高名凯 (1911~1965) 183d
高平调 370f
高山族语言 94b
高田忠周 107f
高阳片 500e
《高郎王氏遗书》 396b
戈安, F. (F. Gouin) 392d
仡佬语 94c
仡佬语支 94d
哥巴文 94f
哥本哈根学派 95b, 280a
哥本哈根语言学学会 95b
《哥戈俄虞模古读考》 74a
哥特体字母表 257a
哥特语 328e
格 484b
格的范畴 470a
《格的范畴》(Ategoriesdesos) 444d
格拉哥里字母表 99f
格赖斯, P. (Paul Grice) 496c
格林, J. 96a
格林, W. K. (Wilhelm Karl Grimm 1786~1859) 96a
格林伯格, J. H. 96c, 11d
格林定律 96b, 249e, 398f
《格林兄弟德语词典》 40a
格鲁 223b
格鲁吉亚语 96d, 93b
格鲁吉亚语文字 97a
格曼 53f
格曼德语 54a
格语法 484b
葛爱兹字母 7b
葛玛丽 83a
根 365a
功能说 519f
功能语法 483b
《功能语法引论》(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127f
功能语言学派(见布拉格学派) 26e
龚自珍 (1792~1841) 105a
共时的研究和历时的研究 见正文前专文2
共时语言学 480d
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 379b
共同罗马尼亚语 268f
共同斯塔的纳维亚语 329a
共同性质 420f
共同用法 420f
共振峰 346a
供语言学研究的语法和教学用的语法 468c
构成对偶的语言手段 433b
构词 177b
孤立型 251f
孤立语 355d
古埃及文字 402d
古埃及语 5b

古保加利亚语 99f
古本组 99a
古本韵 99a, 111a
古本字 19d
《古代北方语即冰岛语起源研究》 249e
古代的语音研究 187e
《古代汉语》 395f
古代葡萄牙语 309d
古代斯拉夫语言 369c
古代突厥碑铭语言 386f
《古代突厥人生活中城市的作用》 83b
古代突厥语 415e
《古代突厥语法》 83b
《古代突厥语吐鲁番文献研究》 83b
《古代突厥语文献》 272f
《古代彝器伪字研究》 335a
古代印度语言学 481e
古代至18世纪的欧洲语言学 481f
古典阿提卡语 418a
古典梵语 75b
古俄语 62b
古尔马语 303b
古尔语支 303b
古法语 68a
古高棉语的文字 301d
古汉语机器理解系统 159f
《古汉语里面的连音变读现象》 466f
古荷兰语 210c
古吉拉特语 97b
古吉拉特语的文字 97c
《古今法书苑》 10c
古今通用 383f
《古今图书集成》 15f
《古今韵会》 507b
《古今韵会举要》(见韵书) 507b
古今字 97c, 198e, 199b
《古今字诂》 514b
古拉丁语 248d, 456c
《古兰经》 6d
古罗马尼亚语 268f
古铭刻学 102f
古纽 97e, 313b
古普鲁士语 22f
《古钱大辞典》 107d
《古人四声一贯》 451f
古瑞典语 331d
《古诗无叶音》 451f
《古十七部谱声表》 110b
《古书虚字集释》 99d
古斯拉夫语 99f
古四声 100d
《古四声说》 100f
《古陶文彙录》 107d
古陶文字 105d
古文 102d
古文经 103b, 161d
古文奇字 199a
《古文声系》 174b
《古文四声韵》 103e
古文学家 103b

古文字学 102d
《古文字学导论》 108b
古无轻唇 97f
“古无轻唇、舌上”音的理论 176e
古无舌上 98a
古西伯利亚诸语言 108e
古玺 163e
《古玺文字徵》 107d
古叙利亚语 108f
古叙利亚语文字 109a
古亚细亚诸语言 108e
古音 109b
《古音表》 452b
《古音说略》 74f, 188c
《古音有无上去二声辨》 101c
古英语的词形变化 458f
古英语动词 458f
古英语时期 458d
《古英语学生词典》 370e
古韵 109b
古韵28部 215b
古韵31部 109c
《古韵同部之字义多相近说》 260a
古爪哇语 514e
《古雅篇》 107f
《古雅拾遗》 105a, 377c
《古雅余论》 105a, 377c
古字 97d
诂 167e
骨勒茂才 68f
《顾误录》 148b
顾炎武 111b
顾野王 111d, 497e
瓜拉尼语 111e
关系语法 341c
《关于汉语词族的几个新假说》 190f
《关于汉语方言普查工作的指示》 149a
《关于加强学校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教学的通知》 310f
《关于少数民族文字方案中设计字母的几项原则》 523b
《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 310d
《关于现代蒙古语族语言和方言的分类问题》 286e
《关于“语言单位的同一性”等等》 183c
《关中方言调查报告》 112a
《关中入声之演变》 112a
《关声调实验录》 112a
观念功能 127f
观念论 489a
官话 112c, 131c
官话方言 112b, 131c
官话方言岛 112c
官话方言(又称北方方言)区 140e
官话方言12个地点声调对照表 113b
《官话合声简字》 539f
《官话合声字母》 397b
官话字母 397a
官话字母义塾 397b
官韵 505c

管辖与约束理论 314b, 341c
管燮初 420e
管约论 341c
《广东方言词典》 150a
广东话 500b
广禄 277a
《广释名》 115a
《广西僮歌记音》 176a
《广雅》 115b, 169e
《广雅疏证》 115d, 171b
《广雅疏证自序》 171a
《广雅义疏》 115e
广义的梵语 75b
广义的突厥语 386e
广义的应用语言学 479e
广义的语言学 480d
广义的正写法 516c
广义形态说 519f
《广韵》 115e, 174f
《广韵》的声母 116b
《广韵》的韵类韵母 116a
《广韵声系》 172c, 174b
《广钟鼎篆韵》 162d
《广州标准音之研究》 504c
《广州话方言词典》(见汉语方言词典) 150d
《广州话普通话口语词对译手册》 150d
归并 229a
归纳法 534a
《归三十字母例》 362c
规则合成系统 440a
桂馥 116e
桂南片 500e
郭沫若 116f, 231b, 452c
郭璞 117b, 65f, 169e
郭守正 506e
郭忠恕 (?~977) 103e
《国朝(清朝)金文著录表》 394d
《国故论衡》 514d
《国故论衡·咸均图》 449f
国际标准化组织 363d
国际电工委员会 363d
国际辅助语 117c
国际功能语言学协会 28a
国际计算语言学协会 118b
国际世界语大会 354a
国际术语情报中心 363d
国际音标 118c, 120b
国际音系学代表会议 26f
国际语 117c
国际语学 117f
国际语言学协会 118f
国际语音协会 120a
《国际语音协会学报》(*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ssociation*) 120c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见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 520b
国内目前部分速记方案的声符 376d
《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概况》 191f

《国语法草创》 120d
《国语法之研究》 120e
国文同式会 537e
《国音常用词汇》 205c
《国音常用字汇》 124a, 205c
《国音汇编草》 208e
《国音推行方法》 540d
《国音字典》 123f
国音字母 539f
国语 128b
《国语法要说》 314d
国语讲习所 124a
《国语留声片课本》 515a
国语罗马字 120f
国语罗马字方案 121b
《国语罗马字模范读本首册》 122c
《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 121b
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 121b, 253d
《国语闽南话对照辞典》 150c
《国语入门》 183c
国语统一筹备会 122f
《国语法》 537e
《国语修辞学》 167b
《国语学史》 352b
国语运动 123c
《国语运动史纲》 253d
《国语周刊》 253d
国字 330a
《果赢转语记》 171f, 542e
过渡音征 346f
过滤 392f

H

哈给方言 94c
哈喀尼耶语 32d
哈里斯, Z. S. 125a
哈利, M. (Morris Halle) 451c
哈尼次方言 125c
哈尼文(见哈尼语) 125d
哈尼语 125c
哈萨克文 125d
哈萨克文字母表 125e
哈萨克语 126d
哈萨克语文字 126e
哈雅方言 125c
哈扎语 237a
海岛凯尔特语 235e
海拉尔方言 63f
海利勒, A. 126f, 13a
海姆斯, D. (Dell Hymes) 393f
《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 259a
海斯, D. G. (D. G. Hays) 43f
韩道昭(见韵书) 507a
韩礼德 127a, 477b
韩礼德社会语言学模式 477b
韩律的特点 331a
韩律诗体 331a
韩论 331a
韩儒林 (1903~1983) 385f
《汉布依简明词典》 546b

- 《汉朝佛教徒对音方言札记》(Notes on the Dialect of the Han Buddhist Transcriptions) 75a
- 《汉代婚丧礼俗考》 443c
- 《汉语简明词典》 546b
- 《汉语简论》 35a
- 汉隶 258b
- 汉民族传统文化与汉语修辞 165e
- 《汉书》 443c
- 《汉书·地理志》 54e
- 《汉书·地理志》 443c
- 《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 538a
- 汉文(见汉字) 130b, 195f
- 汉音 330a
- 汉语 128a
- 汉语八大方言的分区 140e
- 汉语词汇 133d
- 汉语词汇的历史发展 134d
- 汉语词汇的特点 133e
- 《汉语词汇讲话》 538b
- 汉语词类和句法成分的关系 181d
- 《汉语词族》 43a
- 《汉语大词典》 38d
- 《汉语大字典》 38d
- 《汉语的“其”和藏语的“gji”》 190a
- 汉语的缩略语 377f
- 汉语的音节 128b
- 汉语的主谓结构 129f
- 汉语方言 137b
- 汉语方言词典 150a
- 《汉语方言词汇》 150e
- 汉语方言的研究 147a
- 汉语方言地图 150f
- 《汉语方言调查手册》 152b
- 《汉语方言分区图集》 152b
- 《汉语方言概要》 152d
- 《汉语方言音字》 153a
- 汉语共同语 138c
- 汉语教学 153b
- 汉语句法结构的特点 129f
- 《汉语口语语法》 280f
- 汉语理解系统 533a
- 《汉语拼音词汇》 157c
- 汉语拼音方案 157d
- 汉语拼音正词法 159b
- 《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试用稿)》 159d
- 汉语拼音正词法委员会 159d
- 《汉语诗律学》 395f
- 《汉语史稿》 395e
- 汉语书面理解系统 159e
- 汉语文教学及其历史 153b
- 汉语文语转换系统 189d
- 汉语文字学 160e
- 汉语文字学的内容 160e
- 汉语文字学发展的历史 161b
- 汉语修辞 165a
- 汉语修辞格的特点 433a
- 汉语修辞学的历史发展 166e
- 汉语训诂学 167e
- 汉语研究 133a
- 《汉语音韵》 395d
- 《汉语音韵史纲要》 93a
- 汉语音韵学 173b
- 《汉语音韵学》 395c
- 汉语语法 177b
-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 267a
- 《汉语语法教材》 253f
- 《汉语语法论》 183d
- 《汉语语法论文集》 267a
- 汉语语法特点 181b
- 《汉语语法修辞新探》 167d
- 汉语语法研究 181f
- 汉语语音 183f
- 汉语语音的历史发展 185d
- 汉语语音理解系统 189b
- 汉语语音识别 189b
- 《汉语语音史》 395d
- 汉语语音研究 187e
- 汉语藏语同源说 189f
- 《汉语主题词表》 532e
- 《汉语越语研究》 395c
- 汉藏词音比较 189e
- 汉藏对音 191a
- 《汉藏语概要》 192a
- 汉藏语系 191f
- 《汉藏语系的“铁”字》 514a
- 《汉藏语系的“针”字》 514a
- 汉藏语系语言的分类与分布 191f
- 《汉藏韵轨》 190a
- 汉字 195f, 130b, 160e
- 汉字编码 199f
- 《汉字标准交换码》 532d
- 汉字查字法 201c
- 汉字的产生 196a
- 汉字的结构 197f
- 汉字的增繁与简化 198f
- 《汉字改革》 395f
- 《汉字和拉丁化》 246d
- 汉字简化 205a
- 《汉字简化方案(草案)》 205f
- 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 205f
- 《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 324f
- 汉字教学 153d
- 汉字进入计算机的三种途径 199f
- 汉字信息处理 532a
- 汉字信息处理系统 531f
- 汉字形体的演变 197b
- 汉字与汉语的关系 198b
- 汉字整理 208c
- 汉字正写法 516f
- 《汗简》 103e
- 杭世骏(1696~1773) 79d
- 杭州小片 408f
- 豪萨语 209e
- 郝懿行(1757~1825) 66c
- 号 327b
- 合口(见等韵) 51f
- 合口呼 51f, 184d
- 合体会意字 130f
- 合休记号字 130f
- 合体字 210a, 197f
- 合文 210b
- 合韵 110b, 173f
- 《合韵谱》 173f
- 合辙 350d
- 何文裕 94f
- 《河北方言概况》 151f
- 荷兰语 210c
- 荷兰语联盟 83d
- 赫尔丹, G. (G. Herdan) 385b
- 赫尔德, J. G. von (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 1744~1803) 482d
- 赫梯语 210f
- 赫哲语 211d
- 赫真话 211d
- 黑龙江次语文 275b
- 亨德雷克斯, G. (G. Hendrix) 550a
- 《恒轩吉金录》 367a
- 恒言(见常言) 33b
- 《恒言广证》 211f
- 《恒言录》 211e
- 横组合 41d
- 宏观社会语言学 336d
- 宏观语言学 485a
- 洪堡特, W. F. von 211f, 251f
- 《洪北江全集》 19f
- 洪亮吉(1746~1809) 19f
- 洪仁玕(1822~1864) 13f
- 《洪武正韵》 508a
- 洪音(见等韵) 52d
- 喉部 341e
- 喉结 341f
- 喉气流机制 344a
- 喉上 341e
- 喉室 342c
- 喉头 341e
- 喉下 341d
- 喉音 212c
- 后布龙菲尔德语学 280c
- 《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 74d, 466f
- 《后汉书·西南夷列传》 15a
- 后加字 512b
- 后加字中心论 333e
- 后进先出自动机 547b
- 后列(阳性)元音 2a
- 后起本字 212c, 199c
- 后起字 97d
- 后元音 492d
- 后置词 284c
- 后缀频率词典 308c
- 呼(见等韵) 51f
- 忽必烈 10d
- 胡厚宣 224e
- 胡怀琛 205c
- 胡鸣玉 56c
- 胡乔木 205f
- 胡适(1891~1962) 13e
- 胡宿 251c
- 胡文英 411b

胡先骕 (1894~1968) 14c
胡愈之 520a
《湖北方言调查报告》 212e, 151d
《湖南方言调查报告》(见汉语方言) 149e
湖南话 421d
湖州小片 408f
互助方言 389f
互训 213a
互用 174e
户撒话 1a
花体字母 51a
华北官话 112c
《华阳国志·南中志》 44c
《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 213b
华夷译语 213c, 305b
《华英字典》 398c, 465b
华语 405a
化形 433e
话语修辞 213f
话语语法 213f
话语语言学 213e, 28a
怀素 32c
《皇极经世书》 371e
《皇览》 15f
《皇明千家姓》 327a
《皇清经解》 331b
黄伯飞 150d
黄承吉 447f
黄淬伯 174e
黄公绍(见韵书) 507b
黄侃 215b, 428b
黄生 (1662~?) 447e
黄盛璋 420e
徽宗语 215d
回纥文 215e
回鹘-葛逻禄语 32d, 387b
回鹘式蒙古文 282c
回鹘式蒙古文字母表 282c
回鹘文 215e, 399d, 522d
《回鹘文写本菩萨大摩訶萨婆三藏法师传》 216a
回鹘文学语言 32d, 387a
《回鹘语古代文献》 272f
《回鹘语文献与福乐智慧》 216a
《回鹘语语言文字考》 215f
回文 433c
回文体 433c
会同馆 213c
会同馆本 213c
会意(见六书) 261a
会意字 197a, 415a
惠特尼, W. D. 216d
慧琳 445a
《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 174e
慧苑 428d, 445b
浑言 216e
混合梵语 75f
混合式编码法 200f
混元音 492d
活聂 336b
或体 448b

货币文字 105b
霍尔, E. T. (E. T. Hall) 85b
霍凯特, C. F. (Charles F. Hockett) 228e, 280c
J
机器翻译 217a, 462e, 532d
机器理解汉语-实验 I 159e
机器应用语言学 462d
机械式的合成 439e
机助翻译 218b
肌肉紧张说 494f
汲冢古文 103e
《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 104f
积极修辞 35c
《积微居甲文说》 443e
《积微居金文说》 218d, 443c
基本范畴分析法 40c
基本行为 86b
基本颜色词 40e
基本意义 19b
基本状态 86b
基里尔 (827~869) 99f
基里尔文字 62b
基里尔字母 99f, 417f, 403d
基里尔字母表 100b
基里尔字母蒙古文 283a
基里利查(即基里尔)的古保加利亚字母 18f
基罗, P. (P. Guiraud) 67e
基诺语 218f
基频 345f
基-斯瓦希里语 370b
基准元音 324a
基字 512b
吉尔伯特语 300f
吉尔吉斯语 219a
吉库犹语 303d
吉利亚克语 108e
吉普赛语 457b
吉耶龙, J. (J. Gilliéron 1854~1926) 77f, 80a
极北诸语言 108e
《急就篇》 219c, 450c
《集古录》 162d
《集古印谱》 104d
《集韵》(见韵书) 506b
集中识字 156c
挤喉音 344b
计算风格学 219e
计算机辅助语言教学 219f
计算机科学 365d
计算机情报检索 220f
计算机与言语合成 440a
计算机语言 547c
计算语言学 221d
注音字母 540d
季羡林 222d
济州岛方言 34b
继承词 50e

寂天 369b
加岱语 544b
加勒比地区英语 460e
加雷特, M. (M. Garrett) 427a
加茂方言 254b
加拿大的术语数据库 363d
加拿大英语 460e
加音渡号 487e
迦旃延那 75c
迦大基语 271e
嘉戎语 223b
《甲骨断代学》 35a, 452e
甲骨文 223c
《甲骨文编》 224b
《甲骨文断代研究法的再检讨》 107a
《甲骨文断代研究例》 106d
《甲骨文合集》 224e
《甲骨文字释林》 224f
甲骨学 102f, 106b
贾昌朝 506b
贾德佳, S. K. 225b
假借(见六书) 260d, 261b
假借文字 447a
假借义 225d
假借字 225e
假名 401b, 330c, 327b
假名字运动 401c
假摄 320e
间隔号 21c
监察 393a
监察模式 392f
兼语句 180d
兼语式 37a, 180c
《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数》 205b
简笔字 226a
简称 181e, 377f
简化字 226a
《简化字总表》 207f, 226b, 516f
简码 200f
简体 226c
简体字的构成 205b
《简体字典》 205e
《简体字谱》 205d
简谐波 345d
《简易字说》 205c
《简志》 546c
简字半日学堂 250d
《简字标准字表》 205d
简字学堂 250d
《简字全谱》 250d, 315d
简字研究会 250e
《数寿堂所藏殷虚文字》 226d
《数寿堂殷虚文字考释》 163f
箭号 488a
江淮官话 112e
江南话 408d
江摄 320d
《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 226f
《江苏新字母》 159c
江永 (1681~1762) 171a

- 江有诰 227a
江浙话 408d
《讲中国话》 443f
蒋斧 505e
蒋礼鸿 61f
降调符号 487d
交际性测试 393f
《交泰韵》 175a
交通动态对话系统 550c
《焦尔贾博德》 288e
焦斌 (1541~1620) 170f
《校注异域录》 277a
教会罗马字 227b
教理问答手册 257a
教名 327f
教堂斯拉夫语 333a
阶称范畴 34b
阶和范畴的语法 127c
节律分析 268a
节奏 494f
结构层次原则 531b
结构方言学 78d
结构分析 280b
结构学 484f
结构压力论 332e
《结构语言学的方法》 (*Methods in Structural Linguistics*) 280b
结构语义学 489b
结构主义语法 228d
结构主义语言学 340c
结果补语 180d
捷克语 229d
《捷克语与普通语言学》 273e
解释语义学 489f
介词 179e
介音(见等韵) 51c
《戒浮文巧言论》 13f
《界限》 242f
借词 176a, 178a
借代 432f
借喻 432c
今变韵 111a
今草 31e
今文经 168f
今文学家 103c
今音 188a
今字 97c
金代银牌女真文 304f
《金光明经》 215e, 272f
金华话声韵调 410c
金门 443d
金尼阁 (Nicolas Trigault 1577~1628) 414c
金尼阁的罗马字注音方案 414d
金平倭文 47c
《金石录》 162d
金石彝文 446f
金石学 102e, 104a, 230b
《金史》 304e
金田一京助 229f
金文 230a
《金文编》 230f
《金文丛考》 231b
《金文续编》 231b
《金文著录表》 163f
《金云翘传》 499c
金兆梓 (1889~1975) 120e
紧元音 492d
近代法语 67f
《近代汉语指代词》 267b
近代荷兰语 210c
近代罗马尼亚语 268f
近代葡萄牙语 309d
《近代入声之误》 100e
近代瑞典语 331e
近代希腊语 418c
近代亚美尼亚语 438c
近代英语时期 459c
《近代英语语法》 468a
近古音 187a
近古音时期 185d
近体诗 309a
《晋书音义》 452c
晋语方言 140f
京都话 112c
京师同文馆 392c
《京音简字述略》 250e
京语 231d
京族 499a
京族语言 192c
经 23c
《经典释文》 231e
《经典释文汇校》 232b
《经籍纂诂》 232c
《经义述闻》 396e
《经传释词》 232f
景颇文(见景颇语) 233d
景颇语 233c
景颇语支 233d
敬体 330b
《静嘉堂丛书》 115e
洞奈方言 30a
鸠摩罗什 (344~413) 70a
《九经字样》 233d
九弄图 338d
“九区”说 140f
《九姓回鹘可汗碑》 385f
《九姓回鹘可汗碑跋》 385f
九阴九阳十八部 449f
九音显门 412f
旧式标点 20f
旧韵 101d
局限语言 267d
句本位 253f
句读 20d
句段关系 379a
句法 180a
句法表达式 489e
《句法结构》 (*Syntactic Structures*) 314a
句法类型演算 234a¹
句法类型演算模型 480b
《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 314a
句法论 183e
句法学 489e
句号 21b
句型论 183e
句子 473f
句子实际切分法 213f, 273e
《骊字崖》 446f
军话 112c
《据古录金文》 104f
喀尔喀方言 283b
喀山学派 235a, 25c
喀什噶尔语 32d
卡巴尔达语 93c
卡比, D. (D. Gabby) 288a
卡茨, J. (Jerrold Katz) 340b, 489c
卡尔鲁克语组 415e
卡尔梅克语 285c
《卡尔梅克语辞典》 (*Kalmückisches Wörterbuch*) 250b
卡尔奈吉-梅隆大学 550e
卡尔特里方言 96e
卡菲里语支 457b
卡赫齐亚方言 96e
《卡勒瓦拉》 (*Kalevala*) 81c
卡纳里斯语 45b
卡纳普, R. (Rudolf Carnap 1891~1970) 95d, 496b
卡诺方言 209e
卡普兰, D. (D. Kaplan) 288a
卡契纳方言 209e
卡舒布方言 22e
卡斯蒂利亚方言 413a
卡斯蒂利亚语 413b
卡塔研究法 427a
卡依方言 332f
开合齐撮(见等韵) 51e
开口(见等韵) 51e
开口呼 51f
《开塞尔世界文学百科全书》 (*Cassell's Encyclopedia of World Literature*) 69d
《开元文字音义》 162a
凯楚亚语 281f
凯丁, F. W. (F. W. Kaeding) 308a
凯尔特人 397d
凯尔特语族 235d
凯萨依, 'A. H. ('Alī 'ibn Ḥamza al-Kisā'i 731~806) 242e
凯塞尔, M. M. (M. M. Kesser) 221b
凯特语 108e
凯伊, P. (P. Kay) 427d
楷隶 10a
楷书(见真书) 197b, 516a
楷书汉字 521e
《刊谬补缺切韵》 318b, 396c

《刊谬正俗》 243c
刊正字体的字书 552a
坎贝尔, L. (L. Campbell) 385b
坎纳达语 236b
坎纳达语文字 236c
看话 264c
康方言 512e
康熙盲字 265b
《康熙字典》 236d
《考古图》 162c, 230c
《考古图释文》 104b, 230c
考订《中原音韵》音的方法 533f
柯恩, M. (Marcel Cohen) 67a
柯尔克孜文(见吉尔吉斯语) 219b
柯尔克孜语(见吉尔吉斯语) 219b
柯萨语 303d
柯蔚南 (W. South Coblin) 75a
科尔多凡语族(见尼日尔-科尔多凡语系) 303a
《科里库特爷爷的故事》 387b
科里亚克语 108e
科马语族(见尼罗-撒哈拉语系) 302c
科尼什语 235f
科尼亚方言 389c
科特里亚列夫斯基, И. П. (Иван Петрович Котляревский 1769~1838) 407a
科特维奇, W. (Władysław Kotwicz) 4a
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 363f
科依桑语系 237a
可变词类 50c
可见语言 370d
克拉申, S. (S. Krashen) 392f
克劳森, G. (G. Clauson) 4c
克雷斯韦尔, M. J. (M. J. Cresswell) 288a
克里波利方言 454a
克里克语 281c
克里沙纳方言 269a
克里语 281c
克鲁舍夫斯基, H. B. (H. B. Крушевский 1851~1887) 450e
克伦语 192a
克罗地亚-塞尔维亚语 332f
克培列语 303b
克培列语文字 303b
克普恰克语组 415e
克什米尔语 237b
克什米尔语文字 237c
刻符 11b
客赣方言 89b
客赣语 138c
《客话本字》 237d
《客话源流多本中原音韵考》 237d
客家方言 237e, 141b
《客家方言词典》 150a
客家方言区 140e
《愬斋集古录》 367a
肯尼迪, G. A. (George A. Kennedy)

443e
肯特, A. (A. Kent) 490c
空语类 341a
《孔丛子》 424b
孔鲋 424b
孔广森(见阴阳对转) 449f
孔氏古文 102a
孔颖达 (574~648) 170a
控制论 365f
口壁 342f
口吃 439b
口腔 342f
口语看话 263c
口语音 143e
库阿语支 303a
库蒂拉, L. (L. Couturat) 117e
库尔特乌斯, G. (G. Curtius) 428e
库法学派 242c
库拉金娜, O. C. (O. C. Кулагина) 480b
库里沃维奇, J. 243a
库纳马语支 302d
库赛语 300f
库施特语族(见阿非罗-亚细亚语系) 5d
夸美纽斯, J. A. (Johann Amos Comenius 1592~1670) 392b
夸饰 434a
夸张 432c
宽式标音法 21d
《匡谬正俗》 243c
枉草 31e
《狂人日记》 14b
昆提利安 (Marcus Fabius Quintilianus 约35~约95) 82a
《困学纪闻》 147d
扩充转移网络 243d
扩大意义的歇后语 425e
括号 21b
阔横杠 346e
廓尔喀语 302b

L

拉博夫, W. (W. Labov 1927~) 80a, 336f
拉迪恩 257d
拉迪恩语 257d
拉迪诺语 257d
拉丁化的拼音壮文 405b
拉丁化的新维文 405b
拉丁化的越语拼音方案 499c
《拉丁化汉字拼音表》 35f
拉丁化新文字 245a, 404a
拉丁化新文字的方案 245c
拉丁化新文字原则 245c
拉丁文字 22c
拉丁语 247e, 67f
《拉丁语词库》 (Thesaurus Language Latinae) 40a
拉丁语族 269b, 456c
拉丁字母 68e, 546e

拉丁字母的拼音文字 58e
拉丁字母式的苗文 292c
拉丁字母新文字 258d
拉多, R. (R. Lado) 393e
拉亨达语 306f
拉亨地语 306f
拉枯纳方言 249b
拉枯文(见拉枯语) 249c
拉枯黑方言 249b
拉枯语 249b
拉珈语 249c
拉贾斯坦语 454a
拉克语 93c
拉罗通加语 300c
拉穆特语 274f
拉萨话 512e
拉斯克, R. K. 249d
拉脱维亚语 249f
《拉脱维亚语倒序频率词典》 308e
拉脱维亚语文字 250a
拉锡 66e
拉兹语 93b
《来自南疆的东土耳其语研究资料、故事、诗歌、谚语、谜语、民族学及历史资料的译文和注释》 437d
莱蒂语 249f
莱兰特, H. (Hadrian Reland) 299d
莱斯金, A. (August Laskien) 428e
莱兹金语 93c
兰贝克, J. (J. Lambek 1920~) 234a
兰伯特, W. E. (W. E. Lambert) 337a
兰甘亭碑文 381c
兰罗特, E. (Elias Lönnrot 1802~1884) 81c
兰茂 513b
兰司铁, G. J. 250a
兰斯莫尔语 305d
《兰亭叙》 430b
兰银官话 112d
劳佛, B. (Berthold Laufer 1874~1934) 189f
劳乃宜 250c
老巴塔克文 300b
老满文 277e
《老乞大谚解》 44f
老挝语 250f
老挝语文字 251a
老乌兹别克语 32d
老湘语 421d
《老学庵笔记》 147d
老爪哇文 300a
雷州半岛闽语 140c
累增字 97d
类比 256c
类隔(见汉语音韵学) 175a
类篇 251c
类书 15f
类推作用 429b
类型分类法 355c

- 类型语言学 251e
 <类音> 73b
 离析唐韵 111c
 <梨俱吠陀> (*Rgveda*) 454f
 黎锦熙 253b
 黎烈文 46e
 黎庶昌 (1837~1897) 504e
 黎语 254b
 黎语支 254c
 <礼部韵略> (见韵书) 506d
 <礼部韵略七音三十六母通考> 507e
 <礼记> 69f
 <李白忆归游诗> 32c
 李大钊 (1889~1927) 14b
 李德启 277a
 李登 254e
 李方桂 254f
 李盖蒂, C. (C. Ligeti) 4b
 李光地 (1642~1718) 73e
 李家瑞 374c
 李陵 15a
 李荣 255d
 李汝珍 (约1763~约1828) 366c
 李善 170a
 李实 362f
 李淑 56a
 李斯 31a, 161b
 李商 33d
 李学勤 107c
 李学智 277a
 李阳冰 103f
 李元昊 415a
 李舟<切韵> 505e
 里克斯莫尔语 305d
 理论语言学 480e
 <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 162d
 历时语法和共时语法 468a
 历时语言学 480d
 历史 131f
 历史比较语言学 482c
 历史比较语言学 255f
 历史语法 468a
 历史语言学(见历史比较语言学) 255f, 480d
 <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 279d
 历史语义学 489b
 历史音韵学 173b
 立陶宛语 256f
 <立陶宛语手册> 350d
 立陶宛语文字 257a
 吏读 257b, 34a
 吏札 257b
 吏吐 257b
 <丽江崖些象形文(古事记)研究> 85e
 丽衢片 408f
 丽水话声韵调 410c
 利冯尼亚方言 249f
 利玛窦 (Matthieu Ricci 1552~1610) 70b, 415f
 利玛窦的拼音方案 416b
 利托-罗曼诸方言 257c
 <隶释> 162d
 隶书 257e
 僂僂文(见僂僂语) 258d
 僂僂语 258c
 连词 179c
 连动句 180d
 连读变调 494b
 连贯性话语 213e
 连呼言语识别 441c
 连接号 21c
 连类 37f
 连续修订法 17b
 连语 258d
 莲花方言 336c
 谰语 258d
 联贯递转 307d
 联合动宾式 37a
 联合动词式 37a
 联合名词式 37a
 联合主谓式 37a
 联绵 258e
 联绵词 258e
 联绵字 258e
 <联绵字典> 258f
 <联绵字谱> 259a
 联想意义 40d
 梁河方言 1a
 梁启超 (1873~1929) 14a, 70c
 梁同书 383b
 两呼 141f
 <两周金石文韵读·序> 230d
 <两周金文辞大系> 259b
 <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 259d
 <两周金文辞大系·序文> 230e
 <辽道宗及宣懿皇后契丹国字哀册初释> 394f
 寮语 250f
 廖文英 162f
 列昂捷夫, A. H. (Алекс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Леонтьев 1903~1979) 427d
 列宁格勒音位学派 426b
 列维-斯特劳斯, C. (Claude Lévi-Strauss 1908~) 326b, 480c
 列兹吉语 93c
 林伯渠 245b
 林加拉语 303d
 林祝猷 214e
 林纾 (1852~1924) 14c
 林语堂 99c
 <临川音系> 259e
 临高话 546b
 临海话声韵调 410c
 临绍小片 408f
 零声母音节 184a
 零形式 488b
 令吹犬长 384c
 刘大白 (1880~1932) 35d
 刘导生 520b
 刘德升 430a
 刘鹗 (1857~1909) 105e
 刘复 188d, 374c
 刘孟扬的<中国音标字> 316c
 刘淇 539c
 刘师培 259f
 <刘氏遗书> 260b
 刘台拱 260a
 刘体智 452c
 刘文锦 508b
 刘熙 260b
 刘熙载 73e
 刘鋹 (约465~约532) 182b
 刘心源 (1848~1915) 105a
 刘渊 507f
 <流沙坠简> 270b
 琉球方言 329c
 柳宗元 182b
 <六朝别字记> 22b
 六例 70a
 六书 260c
 <六书故> 261d, 104e
 <六书略> 261f
 “六书”说与文字学的建立 161d
 <六书统> 104d, 162e
 <六书序> 262a
 <六书音均表> 262b
 <六书音均表一·古十七部本音说> 307c
 <六书证> 262b
 <六体千字文> 516a
 <六斋卑议> 315b
 <龙龕手鏡> 262e
 龙拉话 58f
 龙拉克-萨莫耶德语 407c
 龙衢小片 409b
 龙书 277f
 <龙文鞭影> 154f
 龙璋 (1854~1918) 424e
 聋哑盲语教学 263b
 聋哑人的口语教学 264c
 聋哑人的手语教学 263c
 聋哑人的语言文字教育 263b
 <聋哑人通用手语草图> 263d
 隆地语 303d
 陇川方言 1a
 陇川话 289d
 卢奥拉维特兰诸语言 108e
 卢奥语 302d
 卢巴语 303d
 卢恩, H. P. (H. P. Luhn) 221b
 卢干达语 303d
 卢鹿 44c
 卢赛洛, J. P. 265c
 卢旺达语 303d
 卢文弼 (1717~1795) 232b
 卢慧章 265d
 鲁迅 (1881~1936) 14b, 46e
 陆德明 265f
 陆佃 (1042~1102) 307d
 陆尔奎 43d
 陆法言 266a

陆费逵 205b
 陆澹安 424c
 陆志韦 266b
 录音编辑合成系统 440e
 路德, M. (Martin Luther 1483~1546) 257a
 露西方言 1a
 吕大临 104a
 吕静 266d
 吕坤 (1536~1613) 73c, 175a
 吕叔湘 266d, 520b
 〈吕叔湘语文论集〉 267b
 吕维祺 (1587~1641) 175d
 吕忱 551d
 〈略论语言形式美〉 395f
 伦达体文字 306f
 伦敦学派 267b
 〈论大众语——答曹聚仁先生〉 246c
 〈论俄语中的词类〉 426f
 〈论古汉语之腭介音〉 394f
 〈论古韵合估屑没曷五部之通转〉 466f
 〈论管辖与约束〉 314b
 〈论衡〉 434a
 〈论蒙古语族的形成和发展〉 286f
 〈论应用之文亟宜改良〉 14e
 〈论语〉 437f
 〈论爪哇岛的卡维语〉 (*Über die Kawi-Sprache auf der Insel Java*) 212a
 罗宾斯, R. H. 268a
 罗布桑旺丹, III. (III. Лубсанвандан) 286e
 罗常培 268c
 罗德, A. de (Alexandre de Rhodes 1591~1660) 405c
 罗浮方言 336c
 罗福成 68f
 罗、傅二人的分类法 192a
 罗季光 274a
 〈罗兰之歌〉 (*Chanson de Roland*) 68a
 罗罗 44c
 罗罗语 447b
 罗马方言 448f
 罗马化 542a
 罗马尼亚语 268f
 罗马字母 403d
 罗曼什语 257c
 罗曼语族 269b, 456c
 罗曼诸语言 413a
 罗密克标音法 370d
 〈罗摩衍那〉 (*Rāmāyaṇa*) 75d
 罗文笔 44e
 罗希, E. (E. Rosch) 427d
 罗顺 (1136~1184) 66a
 罗振玉 269f, 223d
 罗瑞灵长 384c
 逻辑式提问 221d
 逻辑语义原则 531b
 逻辑重音 494e
 〈保文作斋经译注〉 274a

裸模板 464c
 洛林方言 67f
 〈洛阳伽蓝记〉 382d
 珞巴语 270d
 M
 麻阿比字母 19e
 马巴语族(见尼罗-撒哈拉语系) 302c
 马伯乐, H. (Henri Maspéro 1883~1945) 74b, 499a
 马达加斯加语 271a, 299f
 马达加斯加语文字 271b
 马德里写本 274b
 马丁内, A. 271c, 27a, 67a
 〈马朵尔——一种阿塔巴斯基语〉 (*Mattole, an Athabaskan Language*) 255a
 马恩语 236a
 马尔, Н. Я. (Николай Яковлевич Марр 1864~1934) 484c
 马尔科夫, A. A. (Андрей Андреевич Марков 1856~1922) 365e, 385a, 486a
 马尔科夫链 385a
 马尔科夫随机过程论 385a
 马尔库斯, S. (S. Marcus) 480b
 马耳他语 271e
 马耳他语词典 271e
 马耳他语文字 271e
 马合木德·喀什噶里 386d
 马继业, G. H. 466a
 马建忠 70c, 273c
 马克萨斯语 300d
 马拉穆列什方言 269a
 马拉提语 271f
 马拉提语文字 272a
 马拉雅拉姆语 272a
 马拉雅拉姆语文字 272b
 马来-波利尼西亚语 299e
 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见南岛语系) 299d
 马来西亚简化汉字委员会 208b
 马来西亚语 272c
 马来语 272b, 454c
 马来语文字 272e
 马礼逊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 398b
 马林凯语 303b
 马六甲语族(见南亚语系) 301b
 马罗瑙语 300c
 马洛夫, C. E. 272e, 388c
 马其顿方言 99f
 马其顿文字 273b
 马其顿语 273a
 马钱 522d
 马萨依语 302d
 马绍尔文 300f
 马绍尔语 300e
 〈马氏文通〉 273b, 133b, 181f, 481d
 〈马氏文通读本〉 273c
 〈马氏文通校注〉 273b

马叙伦 205f
 马泰休斯, V. 273d, 26f, 213f
 马相伯 (1840~1939) 273d
 马学良 273f
 马扎尔人 431f
 马扎尔语 431f
 马佐夫舍方言 22e
 玛雅文 274a
 玛雅文字 403b
 玛雅语 281e
 玛雅语系 281e
 玛雅诸语言 281e
 麦克尼尔, D. (David McNeill 1933~) 426f
 〈麦克白〉 (*Macbeth*) 459e
 麦斯若波 (Mesrop 361~441) 438e
 〈蜜书·名类篇〉 44c
 〈满德辞典〉 277a
 〈满俄大辞典〉 277a
 〈满蒙文荟〉 66e
 满-通古斯语言的亲缘关系 276b
 满-通古斯语族 274c
 满文 277e, 278e
 〈满文老档〉 277e, 278e
 满文策字 277f
 满文字母 522d
 满语 278c
 〈满语语法〉 277a
 满语支 278f, 274f
 曼迪语支 303b
 曼谷话 381b
 〈漫谈“马氏文通”〉 35e
 盲人的语言、文字教学 264d
 盲文 264d
 盲字 264d
 〈毛公鼎考释序〉 394d
 毛晃 506e
 毛南语 279a
 毛难语(见毛南语) 279a
 〈毛诗重言〉 37c
 〈毛诗古音考〉 34c
 茅盾 (1896~1981) 70f
 冒号 487b
 梅福季 (Мефодий 约815~885) 99f
 梅里纳方言 300c
 梅耶, A. 279c, 67a
 梅庸祚 551b
 媒介语 279d
 媒介语方案 279e
 〈每日译报〉 35f
 美孚方言 254b
 美国结构主义 483c
 美国结构主义特点 280d
 美国结构主义学派 279f, 228f
 美国描写语言学派(见美国结构主义学派) 279f
 美国英语 460d
 〈美国英语语词〉 306d
 美国语 460d
 美国语言学会 280c

美拉尼西亚语族(见南岛语系) 300e
 美洲印第安语 281b, 360e
 《美洲印第安语手册》(*The Handbook of American Indian Languages*) 280a, 483c
 门巴语 282a
 门得语 303b
 门得语文字 303b
 门登霍尔, T. C. (T. C. Mendenhall) 385b
 门法 53e
 蒙(扣)达语族(见南亚语系) 301b
 《蒙鞑备录》 215e
 蒙古尔语 389e
 《蒙古书面语和喀尔喀方言的比较语法》 286d
 《蒙古书面语和库伦方言的语音比较》 250a
 《蒙古书面语语法》 24c
 蒙古文 282c, 215f, 283c
 蒙古文字母 522d
 蒙古新字 10d
 蒙古语 283a
 《蒙古语比较研究导论》 24c, 286e
 《蒙古语比较语法》 286d
 蒙古语族 283c
 蒙古字 10d
 《蒙古字韵》 287a
 《蒙汉词典》 287c
 《蒙求》 154f
 蒙文法程 287f
 《蒙文启蒙》 287e, 369a
 《蒙文启蒙诠释》 287d
 《蒙文启蒙诠释——清除错字之苍穹玛尼经》 287d
 《蒙文文法》 323c
 蒙文晰义 287f
 《蒙文元朝秘史(一)》 84b
 《蒙文指要》 287f
 孟德鸠, R. (Richard Montague 1932~1971) 288a, 490a
 孟德鸠的语义理论 288a, 490a
 孟德鸠语法 288a
 孟-高棉语族(见南亚语系) 301b
 孟加拉体 288c
 孟加拉语 288c
 《孟加拉语的起源和发展》(*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Bengali Language*) 225d
 《孟加拉语语音读本》 225d
 《孟子注》 260c
 《梦笔草堂万金图》 270b
 《梦溪笔谈》 72e
 弥尔顿, J. (John Milton 1608~1674) 459e
 《弥勒会见记》 387a, 390e
 米南卡保语 299f
 米斯特克语 281e
 米字格 154c
 秘密语言 111f

密茨凯维奇, A. (Adam Mickiewicz 1798~1855) 22d
 密克罗尼西亚语族(见南岛语系) 300e
 勉 443d
 勉-金方言 289a
 勉语 288f
 缅甸文字 289c
 缅甸语 289a
 缅甸语支 289d
 缅甸语支 289d, 509f
 苗文(见苗语) 292c
 《苗瑶语声调问题》 513f
 苗瑶语族 289f
 《苗瑶、藏缅及汉语的鼻冠音塞声母:是扩散的结果还是同系证据?》 514a
 苗语 291f
 苗语支 292c
 描红 154c
 描写语言学 480d
 妙齐提碑文 289c
 民和方言 389e
 民间语 418c
 《民族语文》 529d
 民族语言室 528c
 民族语言学 485f
 闽北方言 293f
 闽东方言 293f
 闽方言 292e
 闽方言的分区 293c
 闽方言七个地点的声韵调 296c
 闽方言区 139b, 140e
 闽南方言 293f
 《闽腔快字》 315c
 《闽音研究》 297a
 闽语 292e
 闽语罗马字方案 297d
 闽中方言 294a
 名词谓语句 180e
 《名物蒙求》 154f
 《名原》 106a, 377d
 名著或名家用字索引 38a
 名字 327b, d
 明代的《字汇》和《正字通》 162e
 明格雷利亚语 93b
 明斯克方言 13d
 明喻 432b
 明喻的格式 432b
 明州小片 408f
 铭文 103b, 301d
 《缪纂分韵》 105d
 模本 549e
 模式-理论语文学 489a
 模式匹配法的识别 441e
 摹印 11b
 摩尔多瓦方言 269a
 摩尔达维亚语 297e
 摩尔达维亚语文字 297f
 《摩诃婆罗多》(Mahābhārata) 75d
 莫尔, T. (Thomas More 1478~1535) 459e

《莫话记略·导论》 546a
 莫斯科学派 297f
 莫斯科语言学会 437b
 莫西语 303b
 墨山宁诺夫, И. И. (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Мешанинов 1883~1967) 484d
 墨脱门巴语 282a
 《墨子间诂》 377c
 某地某地之间语 77a
 某地语 77a
 模板 464d
 母音 492a
 母语 478d
 目的语言 69e
 么佬语 298e
 N
 那波里方言 448f
 那伐鹤语 281c
 那木吉勒玛 66e
 那乃次语支 275b, 382e
 那乃文 276b
 那乃语 211d, 274d
 那乃语方言 274f
 《那乃语语法》 277d
 那彦泰 66f
 纳昂方言 49f
 纳格尔, J. W. (J. W. Nagl) 54e
 纳斯塔里克体 32f
 纳沃伊, N. A. (Nizamidin Alisher Nawayi 1441~1501) 387b
 纳西文(见纳西语) 299d
 《纳西象形文字字典》 514a
 纳西语 299a
 纳西语文字 299d
 《纳西族图画文字〈白蝙蝠取经记〉研究》 85e
 《耐林庚甲文说》 443c
 南部方言 15c, 309f, 310a, 546d
 南部荷兰语 83c
 南部语支 369b
 南朝鲜的简化字 208c
 南岛语 299e
 南岛语系 299d
 南俄方言 62e
 南方方言 9d
 南非荷兰语 4d
 南非英语 460e
 南京国立编译馆 363f
 南满方言 278d
 南美印第安语 281f
 南片老湘语 421f
 南片湘语 422a
 南亚语系 301a
 南语支 274f
 南中部方言 499b
 喃音 344b
 瑙鲁语 300f
 内部分析法 534b
 内部语言学 378e

内涵逻辑 288a
 内蒙古方言 283b
 内容索引 17a
 内外转 301e
 内析期 177a
 内在性的语言 340c
 能指 378f
 喀奈方言 30a
 尼昂加语 303d
 尼泊尔语 302b
 尼夫克语 108e
 尼科巴语族(见南亚语系) 301b
 尼罗-撒哈拉语系 302c
 尼米兰语 108e
 尼日尔-刚果语族(见尼日尔-科尔多凡语系) 303b
 尼日尔-科尔多凡语系 303a
 <尼山萨满> 277f
 尼雅俗话 324d
 泥板文书 417d
 倪海曙 520b
 拟音 110e
 昵称 328a
 年代统计学 385c
 <年鉴> 17b
 粘着型 251f
 粘着型语言 355d
 娘日归泥 98b
 鸟虫书 303f, 11b
 涅涅茨语 407c
 牛顿, I. (Isaac Newton 1643~1727) 459e
 <牛津高年级学生通用英语词典>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 39b
 <牛津英语词典> 38c
 <牛津英语大词典补编> (Supplement to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39f
 纽埃语 300d
 组目表 514d
 纽约国际辅助语协会 271d
 纽约语言学会 118f
 农谚 442d
 努埃语 302d
 努比亚语 302d
 努尔哈赤 277e
 努里斯坦语支 457b
 怒江方言 58e
 怒语 304d
 <女论语> 154f
 <女神> 14f
 女真文 304e, 276a
 女真文<得胜陀颂碑> 276b
 女真小字 304f
 女真语 274d
 女真字 304e
 <女真字文书> 304f
 挪威语 305c
 挪威语词典 332c

欧斯科拉语 13b
 <欧亚的北部和东部> 385d
 欧亚语言学会 340c
 欧阳觉亚 150d
 欧阳溥存 530b
 欧阳修 (1007~1072) 104c
 欧阳询 516a
 <瓠文音汇> 315c

帕蒂, B. H. (B. H. Partee) 288a
 帕尔默, H. E. (H. E. Palmer) 392d
 帕拉瓦文字 272e
 帕罗语 300e
 帕西, P. 306a
 排比 432e
 排湾语 306b
 排湾语群 94b
 派克, K. L. 306d, 280c
 潘耒 (1646~1708) 73b
 <滂喜篇> 333b
 旁遮普语 306e
 旁征期 177b
 旁转 307a, 110f
 培根, F. (Francis Bacon 1561~1626) 459e
 裴学海 99d
 佩里, J. W. (J. W. Perry) 490c
 <佩文诗韵> 507f
 <佩文韵府> 308f, 507f
 彭菲尔德, W. (W. Penfield) 427e
 皮阿诺, G. (Giuseppe Peano 1858~1932) 117e
 皮卡尔方言 67f
 皮亚杰, J. (Jean Piaget 1896~1980) 426f

<毗伽可汗碑> 385d
 <埤仓> 514b
 <埤雅> 307e
 偏正式 135c, 117d
 篇章功能 127f
 <骈雅> 307e, 170e
 <骈雅训纂> 307f
 <骈字分笺> 308a
 片假名 330c
 拼音 71d
 拼音方案委员会 157d
 <拼音官话报> 397c
 拼音为主、字形为辅的编码法 200c
 拼音文字 546e
 <拼音字母查字法(草案)> 201d
 <拼音字谱> 315c
 频率词典 308a
 频谱 345d
 平 309a
 平调符号 487e
 平假名 330c
 平上去入 370f

平声 371a
 平水韵 308f
 <平水韵略> 308f
 平仄 309a
 <评<北京话单音词词汇>> 467a
 婆罗米体 334a
 婆罗米字母 309a
 破读 59f
 破折号 21b
 莆仙方言 294a
 葡萄牙语 309d
 葡萄牙语的文字 309e
 蒲立本 (E. G. Pulleyblank) 190f
 <朴通事> 44f
 <朴通事谚解> 44f
 <普遍推理语法> (Grammaire Générale et Raisonnée) 482b
 普遍语法和语别语法 468f
 普米语 309f
 普什图语 310a
 普什图语文字 310b
 <普通百科全书> 16c
 普通话 310b, 128b
 普通话的标准 310b
 <普通话闽南方言词典> (见汉语方言词典) 150c
 普通话清辅音声学数据表 347d
 普通话审音委员会 310e
 普通话10个元音共振峰数据表 347d
 <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 310f, 517a
 <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初稿> 209a, 517a
 <普通话异读三次审音总表初稿> 310f
 普通话浊辅音声学数据表 347e
 <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 205b
 普通频率词典 308b
 <普通语法学原理> (Principes de Grammaires Générale) 444c
 普通语言学 480e
 普通语言学的创始人 216e
 <普通语言学讲义> 235d
 <普通语言学教程> (Curso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12c, 482f
 <普通语言学文选>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по общему языкознанию) 25e
 <普行简字以广教育折> 250d
 谱系分类法 360a
 谱系树模式 350b

<七略> 260c
 <七修类稿> 147d
 七音(见等韵) 52a
 <七音略> 312a
 <七音韵鉴> 312a
 <威林八音> 175e
 齐齿呼 184d
 齐夫, G. K. (G. K. Zipf) 385a, 486a
 齐夫定律 385a
 齐齐哈尔土语 46b
 杞方言 254b

《奇觚室吉金文述》 105a
奇楞话 211d
启动作用 344a
气音 493d
契丹大字 312e, 521f
契丹文 312c
契丹小字 312e, 52 f
《契文举例》 105e, 377c
《千家诗》 154f
《千岁衢碑记》 446f
《千字文》 153e
前喉塞音系列 546a
前加字 512b
前列(阴性)元音 2a
前期词汇学 40d
前于关系 365a
前元音 492d
钱大昕 313b, 110b
钱玄同 (1887~1939) 111a
《潜研堂文集》 313b
黔台语族 543e
羌语 313c, 509f
强动词 458f
乔玛, A. de K. 313e
乔玛奖学金 313f
乔玛学会 313f
乔姆斯基, N. 313f
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模式 477a
乔叟, G. (Geoffrey Chaucer 约1343~1400) 459a
桥本的语法学说 314d
桥本进吉 314c
俏皮话儿 425e
切 72c
切分 229a
切口 314e
切罗基语 281c
切上字 71c
切下字 71c
切一 351f
切音 412d
切音法 45a
切音新字 403f
《切音新字》 159c
切音字 315a
切音字的方案 315e
切音字运动 403f
《切韵》 317f
《‘切韵’纯四等韵的主要元音》 274a
《切韵》的声母系统 320b
《切韵考》 318e
《切韵声原》 383d
《切韵五声五十一纽考》 513e
《切韵·序》 72e
《切韵》音 318f
《切韵音系》 74d, 188e
《切韵鱼虞之音值及其所据方音考》 268d
《切韵指掌图》 322e
《切韵a的来源》 188b
《切韵â的来源》 255b

《切韵》193 韵 320c
钦察语 387b
亲属词 40e
《秦汉金文录》 330e
秦隶 257e
秦始皇 257e, 542e
秦篆 543a
青年语法学派(见新语法学派) 428e
轻唇 97f
轻唇音(见等韵) 52a
清代的说文之学 163a
《清代古音学》 395e
清辅音 492f
清格尔泰 323b
《清文鉴》 277a
《清文启蒙》 323d
清文助语虚字 323e
《清仪阁古印偶存》 105c
清音 491f
清语解似 323e
清油 323e
清字辨似 323e
清字切韵法 323d
情报检索 462f
《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 21a
琼斯, D. 323f
琼斯, W. 324b
丘雍 115e
龟兹文 309c
龟兹语 390a
秋 512b
袁廷梁 (1857~1943) 14a
区别特征 27d, 451c
区分 88b, 495b
区域分类法 355f
区域语言学 78d
佉卢字母 324c
屈折型 252b
屈折型语言 355e
趋向动词 179e
瞿秋白 (1899~1935) 245b
去声 128f, 370f
圈字 506f
全国汉语方言学会 149c
全国文字改革会议 324f
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 364a
全拼音输入法 200c
全清(见清油) 323f
全浊(见清油) 323f
《劝学篇》 10b, 153c
《雀林碑》 386f
《阙特勤碑》 385d
群集 95f
《群己权界论》 70c
《群书新定字样》 87b
R
饶秉才 150d
人称代词 178e
人称的范畴 470e

人工智能 547c
人机对话(见自然语言理解) 326a, 547e
人机对话式机器翻译 218b
人机语音对话 326a
人际功能 127f
人类语言特有的属性 252f
人类语言学 326a
《人类语言中的普遍现象》 (*Universals in Human Language*) 96d
人名学 326f
人造(或人工)语言 547c
《人种学家眼中的世界诸语言》 (*Languages of the World: Ethnologue*) 11c
仁钦戈瓦 66e
《壬子新刊礼部韵略》 308f, 506f
任大椿 (1738~1789) 424d, e
日本的简化字 208b
日本三大语法学说 314d
《日本文学概论》 334e
《日本文法论》 334e
日耳曼共同语 328b
日耳曼语的5个方言 328d
日耳曼语言的分类 328d
日耳曼语音变 328b
日耳曼语族 328a
《日记故事》 155a
日旺 58f
日语 329c
日语罗马字 405f
《日知录》 22b
容庚 330d, 230b, f
乳名或小名 327c
入派三声 537b
入声 100d
《入声考》 100e
入声配阴声 111d
入声韵 186e
入为同声 100e
阮常生 211f
阮途 330f
阮元 331b, 232c
瑞典语 331c
《瑞典语词典》 (*Ordbok över Svenska Spraket*) 39f
瑞菲安语 5d
若开方言 289a
若买方言 49f
弱动词 458f

S

撒丁方言 448f
撒哈拉语族(见尼罗-撒哈拉语系) 302f
撒拉语 332a
《撒尼彝语研究》 274a
萨波特克语 281e
萨拉语 302d
萨里库尔方言 380c
萨里库尔话 380d
萨马兰语 300b

- 萨摩亚文 300e
 萨摩亚语 300e
 萨莫耶德语族(见乌拉尔语系) 407c
 萨林建体 375b
 萨默费特, A. 332c
 萨丕尔, E. 332d, 483c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 332e
 《萨丕尔选集》 332f
 塞尔库普语 407c
 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 332f
 塞林克尔, L. (L. Selinker) 392f
 塞努佛语 303b
 塞什艾, A. (A. Sechehaye) 378d
 赛尚阿 287f
 《三百千》 153f
 《三百千千》 154f
 三不易 69f
 《三才杂字》 415d
 《三仓》 333b, 31a
 《三仓注》 333c
 三代古陶文字 105d
 三分法 252b
 《三国志》 260b
 《三合便览》 287f
 三合元音 492d
 三路并进 47a
 三品说理论 445a
 三菩札 388e
 三十六字母(见字母) 186c, 551f
 《三十颂》 333c, 431f
 三书说 108d
 三竖线号 487f
 三四等合韵 52f
 三体石经 103d
 三维频谱 346e
 《三字经》 153e
 桑达韦语 237a
 桑代克, E. L. (Edward Lee Thorndike) 1874~1949) 308a
 桑戈语 303c
 塞擦音 493a
 塞音 493a
 僧伽罗体 334a
 僧伽罗语 333e
 僧侣体 402e
 沙赫马托夫, A. A. 334b
 沙里-尼罗语族(见尼罗-撒哈拉语系) 302c
 莎士比亚, W. (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 459e
 山地印地语 454a
 山摄 409e
 山田孝雄 334d
 闪-含语系 4f
 闪米特语 425a
 闪音 493b
 闪语族(见阿非罗-亚细亚语系) 5a
 单文 304f
 鄂善俗话 324e
 商承祚 334f, 453c
 《商周彝器通考》 330f
 上古声母 185f
 上古声纽 98c
 上古声纽的复辅音 99b
 上古音 185e
 上古音时期 185d
 《上古音韵表稿》 188c
 上古韵 186a
 《上广雅表》 115b
 《上海方言词典》 150a
 上海话声韵调 410c
 上加字 512b
 上声 129c, 370f
 上声下形 198a
 上下文敏感文法 431b
 上下文敏感语言 431b
 上下文自由的文法 431a
 上下文自由语言 431b
 上形下声 198a
 上字 71c
 尚克, R. (R. Schank) 549b
 尚克学派 549e
 少数民族汉语教学 335b
 少数民族语文的信息处理 463d
 邵晋涵 66b
 邵雍 371e
 绍纳语 303d
 会话 336b, 289f, 292c
 舌 342f
 舌气流机制 344a
 舌上音(见等韵) 52b, 98a
 舌头音(见等韵) 52a, 98a
 舌音(见等韵) 52a
 社会方言学 77f, 80a
 社会问题的语言学 336d
 社会学学派 483b
 社会意义 40d
 社会语言学 336c, 78d
 社会语言学的理论价值 337d
 社会语言学的起源和发展 336e
 社会语言学与语言政策 337c
 摄 337f
 申农, C. (C. Shannon) 385b
 身势语 85a
 深层结构 483f
 深摄 321a
 神珙 338b
 神经 87e
 神经语言学 338e
 神经语言学 490f
 《神曲》 448d
 神文 8c, e
 沈兼士 339f, 148c, 172c
 《沈兼士学术论文集》 340a
 沈括 (1031~1093?) 465d
 沈启亮 276d
 沈学 159c
 沈尹默 339f
 沈颐 43a
 沈约 (441~513) 187e, 309a
 沈曾植 385f
 审音 110c
 升调符号 487d
 生成方言学 78e
 生成性模型 366a, 480b
 生成音系学 451c
 生成语法 340b
 生成语法学 340c, d
 生成语法学派语义学 489c
 生成语法学与传统语法学的区别 340d
 生成语义学 489f
 生理语音学 341d, 490f
 声波 345d
 声带 341f
 声带缺陷 438f
 声调 128b, 344d, 493f
 声调的分类 252c
 声调的演变 132a
 声调符号 494b
 声调推断尺 353d
 声调语言 493f
 《声调语言》 306d
 声符 344e
 声类 345a
 《声类》(见韵书) 505b
 《声类出入表》 174b
 《声明论》 23c
 声母 345b, c
 声纽 345c
 声旁 344e
 声腔 342f, 491f
 声学语音学 345c, 352d, 490f
 声学元音图 347a
 声训 349a, 168b, 174d
 声音唱和 371f
 声音唱和图 371f
 《声韵同然集》 73d
 声韵学 173b
 声韵正转 48e
 声转 542c
 《昇仙太子碑额》 304d
 省略号 21b
 省声 349c
 省形 349d
 《圣经》(The Bible) 459f
 《圣经·新约》 51a
 圣书体 402d
 圣书字 8d
 《盛世元音》 159c, 315c
 失语症 439b
 师说体 307a
 《诗》 153c
 《诗本义》 170c
 《诗本音》 452a
 《诗词曲语汇释》 348e, 514a, 539d
 《诗大序》 434a
 《诗经韵读》 395d
 《诗三家义集疏》 396d
 《诗声分例》 110e
 《诗声类》(见阴阳对转) 110a, 449f

- <<诗>音上作平说> 101b
 <诗音上作平证> 215d
 <诗韵> 507f
 施莱歇尔, A. 350a, 360b
 施莱耶, J. M. (Johann Martin Schleyer 1831~1912) 117d
 施密特, J. (Johannes Schmidt 1843~1901) 360b, 482d
 施密特, P. W. (P. W. Schmidt) 291b
 施密特, W. (Wilhelm Schmidt 1868~1954) 299e, 499a
 施皮策, L. (Leo Spitzer 1887~1960) 82b
 <施事论> 127a
 十八韵 351d
 十二字头 323d
 <十驾斋养新录> 163b, 551f
 <十三经注疏> 331b
 十三辙 350d
 “十三辙”的名称 350d
 <十三辙字汇> 350e
 十条 70a
 十五音 138b
 <十韵汇编> 351f, 268e
 <十钟山房印举> 105c
 什连克, Л. (Л. Шленк) 274e
 什卢赫语 5d
 什图尔, L. (L'udovit Štúr 1815~1856) 369d
 什图尔斯洛伐克语 369d
 什托方言 332f
 石鼓 197d
 石田耕之助 213c
 时枝诚记 352a
 时枝的语法学说 352b
 识字教材 153d
 实词 179c
 实现手段 12d
 实验语音学 352c, 462a
 <实验语音学研究> 353c
 <实验语音学原理> 353c
 实证语法 467f
 实证主义语法和唯理主义语法 467f
 <拾雅> 172a
 史梦兰 55c
 史萍青 245b
 史诗梵语 75b
 <史学提要> 154f
 史游 219c
 史熠 546f
 史籍大策 102a, 538b
 <史籍篇> 538c
 <史籍篇疏证> 538c
 <世界的语言> 360d
 世界上第一次机器翻译试验 217b
 世界语 354a
 <世界语的基础> (Fundamento de Esperanto) 354a
 <世界语言的分类与索引> (Classification and Index of the World's Languages) 360d
 世界诸语言 354f
 世界诸语言分类表 356表
 市场马来语 272c
 式的范畴 472c
 事理谚 442d
 事实检索 221a
 视识语 353b
 视听法 392e
 室初带 342c
 释安然 51d, 301e, 337f
 <释补> (Vārttika) 23e
 <释常谈> 33b
 <释诂> 169a, 383d
 <释名> 361c, 169a, d, 260b
 <释名疏证> 361f
 <释名疏证补> 361f, 396d
 <释内外转> 302a
 释行均 262e
 <释训> 169a
 <释言> 169a
 <释彦> 147e
 手头字 362a
 手头字推行会 205d, 362a
 手写盲文 265a
 手语 263b
 手语的结构规律 263f
 守温 362c
 首音互换 439b
 首字母缩略语 377e
 <寿县出土楚器铭文研究> 538f
 <受禅表> 10b
 <授记根本三十颂> 333c
 父书 11b
 <书> 13a, 126f
 <书断> 10c
 书法教学 154c
 <书·洛诰> 101e
 书面理解 547f
 书面语和口语 132c
 书名号 21c
 <书史会要> 312e
 书信体 8d
 书音 452c
 舒哈特, H. 362d
 舒曼, J. (J. Schumann) 392f
 舒新城 43a
 暑书 11b
 <蜀方言> 363a
 <蜀语> 362f
 术语 363b
 术语库 364c
 术语数据库 364c
 术语协调委员会 363d
 述题 27f
 树形分析法 364d
 树形图 364f
 数的范畴 469f
 数理语言学 365d, 486a
 数理语言学讨论班 365f
 <数目代字诀> 315c
 数字语 117d
 双层切分 271c
 双轨制编码 200e
 <双剑谏吉金文选> 466d
 <双剑谏尚书新证> 466e
 <双剑谏殷契骈枝> 225a, 466c
 双交叉音渡号 487e
 双括号 487f
 <双名录> 55d
 双声 366c, 259a, 349b
 双声叠韵 366c
 双声语 382c
 双声字 258e
 双竖线号 487f
 双语教学 478e
 双韵尾 294d
 双轴制 519f
 <水经注> 54e
 <水经注笺> 307e
 水书 366f
 水语 366d
 <说“的”> 183c
 <说文古籀补> 366f
 <说文解字> 367b, 182a, 258f
 <说文解字诂林> 368e
 <说文解字句读> 396f
 <说文解字五音韵谱> 368c
 <说文解字系传> 435f
 <说文解字·叙> 304a
 <说文解字义证> 368c
 <说文解字韵谱> 368b
 <说文解字注> 368c
 <说文句读> 368d
 <说文声类> 368e
 <说文释例> 368d
 <说文双声·序> 72f
 <说文通训定声> 368d
 <说楸儿> 350e
 <说“自由”和“黏着”> 183c
 捌思吉斡节儿 369a
 司马光 (1019~1086) 251c
 司马贺 (1916~) 488c
 <思维与语言> 25b
 斯凡语 93b
 斯捷潘诺夫, Ю. (Ю. Степанов) 484d
 斯克里普契尔, E. W. (E. W. Scripture) 353c
 斯拉夫-塞尔维亚语 333a
 斯拉夫语族 369b
 斯拉夫字母 403d
 斯拉维伊科夫, П. (Петко Славейков 1827~1895) 18d
 斯洛伐克语 369d
 斯洛伐克语文字 369e
 斯洛文尼亚语 369f
 斯塔西里-里米尼线 456c
 斯坦塔尔, H. 370a
 <斯特拉斯堡盟约> (Serments de Strasbourg) 68a

斯瓦希里语 370a
 斯瓦希里语文字 370c
 斯维特, H. 370c
 斯维亚诸方言 331e
 <四川彝文规范方案> 447a
 四吠陀 75b
 <四个闽南方言> (见汉语方言) 149e
 四呼 141f
 <四角号码查字法(草案)> 202c
 <四库全书总目> 551f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160f
 四声 370f
 四声八调 321e
 <四声等子> 301f, 338b
 <四声实验录> 371b
 <四声通解> 44f
 <四声五音九弄反纽图> 338b
 <四书> 154e
 四夷馆 213c
 四夷馆本 213c
 四邑片 500d
 四译馆 213c
 <四音定切> 73e
 四字成语 134c
 四字语 181e
 松元音 492d
 宋初汴洛音 371d
 宋初汴洛音的声调系统 373f
 宋初汴洛音的声母系统 372e
 宋初汴洛音的韵母系统 373b
 宋代的金石文字之学 162c
 <宋代金文著录表> 394c
 <宋高僧传> 445c
 宋濂 508a
 宋恕 315e
 宋元间的六书之学 162d
 宋元明时代的字义研究 170c
 <宋元以来俗字谱> 374c
 苏德, J. F. (J. F. Sudre) 117d
 苏格兰盖尔语 374e
 苏沪嘉小片 408e
 苏哩 375b
 苏联哈萨克语文字 126e
 苏联吉尔吉斯语文字 219c
 苏曼尼波方言 300a
 苏美尔楔形字 425d
 苏美尔文字 402f
 苏尼克, O. П. (O. П. Суник) 274f
 苏语 281c
 <苏州方言地图集> (见汉语方言地图) 150f
 率利 375b
 率利文 375a
 率利语 375a
 俗 375c
 俗呼 375c
 俗名 375c
 俗体 375c
 俗体字 199b
 俗言(见俗名) 375c

速记 375d
 速记教学 376d
 速利 375b
 宿务语 300b
 粟特 375b
 粟特文(见摩利文) 375a
 粟弋 375b
 隋唐时期的训诂学 170a
 孙德宣 420e
 孙海波 (1910~1972) 163f, 224b
 孙锦标 33b
 孙邻 375b
 孙慎 376f
 孙星衍 (1753~1818) 424e
 孙炎 377a
 孙诒让 377b, 104f
 <娑摩吠陀> 75d
 缩脚语 425d
 缩略词语 377d
 缩略语 377e
 缩气音 493c
 所指 378f
 索科托方言 209e
 索伦语 274d
 索马里语 5d
 索绪尔, F. de 378d
 索绪尔的词汇模式 41d
 索绪尔的组合与聚合模式 476f
 索引、词表和词典的编制 533c
 他加禄文 380b
 他加禄语 380a
 他加禄语文字 380b
 塔巴萨兰语 93c
 塔赫米亚方言 249f
 塔吉克文 380d
 塔吉克语 380b
 塔拉斯科语 281e
 塔林方言 9d
 塔马齐格特语 5c
 塔纳拉方言 271b
 塔塔尔语(见鞑靼语) 46d
 塔希提文 300d
 塔希提语 300d
 <台湾闽南方言记略> 149d
 台湾声调体系 546a
 台湾省修订国语罗马字方案 122c
 <台湾语言源流> (见汉语方言) 149e
 台语 543f
 <台语比较手册> 255b
 <台语、加岱语和印度尼西亚: 东南亚的一种新联盟> 192a
 台语族 191f
 台州片 408f
 太湖片 408e
 太罗速记 375e
 太罗速记的符号 375e
 <太上感应篇> 446f
 态的范畴 471f

泰戈尔, R. (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 288e
 泰卢固语 380f
 泰卢固语文字 381a
 泰米尔语 381a
 泰米尔语文字 381b
 泰文 381c
 泰耶尔语群 94b
 泰语 381b
 <谈动词和形容词的分别> 35d
 叹词 179f
 汤加文 300d
 汤加语 300d
 汤姆森, V. L. P. (Vilhelm Ludvig Peter Thomsen 1842~1927) 385f
 <唐代长安方言> (*Le Dialecte de Tch'ang-an Sous Les T'ang*) 74b
 唐兰 381e, 108b
 <唐五代西北方言> 175c, 268e
 <唐五代韵书集存> 352a, 538a
 <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笺异> 368b
 唐玄奘 233f
 唐音 330a
 唐铎 (1891~) 434f
 <唐韵> (见韵书) 505d
 <唐韵考> 175b
 <唐韵四声正> 173d
 <唐韵正> 173d
 桃坪话 313d
 陶行知 362a
 陶燠民 (?~1934) 297d
 特拉格, G. L. (George Leonard Trager 1906~) 85a
 特里尔, J. (J. Trier) 41d, 489c
 特鲁别茨科伊, H. C. 382a, 27a
 特鲁吉尔, P. (Peter Trudgil) 337a
 特鲁克语 300e
 特罗扬斯基, П. П. (П. П. Троянский) 217a
 特斯尼耶尔, L. (Lucien Tesnière 1893~1954) 43f
 特威语 303c
 特征提取法的识别 441f
 体的范畴 471b
 体式 402d
 体语 382c
 天城体文字 454b
 天城体字母 75c
 <天籟痕> 315d
 <天启演志> 44c
 天下通语 138d
 <天演论> 70c
 田恭 15a
 条顿语 456b
 <铁云藏龟> 105e, 223d
 听觉器官 491f
 听觉语音学 352d
 听说法 392e
 听音器官的生理 343a
 通 173f

通东话 408e
 «通古斯-满语比较辞典» 277d
 «通古斯-满语比较语言学» 277d
 «通古斯-满语动词» 277d
 通古斯-满语族 274c
 通古斯语支 382e
 «通鉴释文辨误» 547a
 通密散布刺 388e
 通名 383a
 通摄 320d
 «通俗编» 383a, 147d
 «通俗常言疏证» 33b, 147e
 通训 383b
 «通雅» 383c
 «通艺录» 37b
 通音 493c
 «通用手语» 264b
 «通用英语词表» (*A General Service List of English Words*) 308b
 通用语言识别 441d
 通用字 383e
 通语 384a, 138d
 «通志·七音略» 268e
 «通志堂经解» 232c
 通转 384b, 173f
 同部 171c
 同化作用 495a
 同位 542d
 «同文铎» 301f
 同训 37e
 同义通用 383f
 «同音» 384c
 同音通用 383e
 同用 174e
 同语线 78b
 同源词 384e
 同源字 384d, 172c
 «同源字典» 172d
 童声遗留症 439b
 统计语言学 384e
 统计语音学 366b
 统官 216e
 «统一国语办法案» 540a
 突厥 386e
 突厥卢尼克文 385d
 «突厥世系» 387b
 突厥文 385d
 突厥语 386e
 «突厥语词典» 386b
 突厥语族语言的分类 388b
 突厥语族 386e
 突厥语族语言的文字 388c
 突厥语族现代文学语言 387c
 图阿列格语 5d
 图画文字 521c
 图灵机 547b
 图弥 388e
 图弥三菩札 388e
 图皮-瓜拉尼语族 111e
 «图说日本語» 327e

图瓦语 388f
 图像标音法 370c
 图形文字 400e
 土阿莫土语 300e
 土耳其语 389a
 土耳其语文字 389c
 «土风录» 147e
 土官话 112c
 土家语 389c
 土库曼语 389d
 土俗体 8d
 土瓦方言 289a
 土族文(见土族语) 389f
 土族语 369e
 吐火罗文 522d
 吐火罗语 390a
 吐火罗语字母 390a
 吐火罗语族 457c
 吐火罗语 A 390a, 457c
 吐火罗语 B 390a, 457c
 «兔园策» 154f
 推导史 430f
 «推行手头字的缘起» 362a
 托斯卡纳方言 448f
 托斯克方言 1c
 托忒文 282d
 托托纳克语 281e
 脱机检索 221a

W

瓦恩里希, U. 391a
 瓦尔玛, D. 391c
 瓦罕方言 390c
 瓦隆方言 67f
 瓦西列维奇, Г. М. (Г. М. Васильевич) 275b
 佉-崩龙语支(见佉-德昂语支) 391e
 佉-德昂语支 391e
 佉方言 391f
 佉文(见佉语) 392a
 佉语 391f
 外表化语言 340c
 外部语言学 378e
 外耳 343a
 外号 327c
 外来词 50d
 外声内形 198a
 外形内声 198a
 外语测试 393e
 外语电化教学 394a
 外语教改热潮 392e
 外语教学 392a
 外语教学法 392c
 外语教学改革运动 392c
 外语学能 393b
 外语学习环境 393c
 外字 45a
 晚期近代丹麦语 48f
 万伯里, H. (Vámbéry Hermann) 216a
 汪忍波 258d

汪荣宝 74a
 王安石 (1021~1086) 162d, 465e
 王构 (约1246~1309) 435b
 王国维 394b
 王静如 394e
 王均 520b
 王兰生 (1679~1737) 73e
 王力 395a
 «王力文集» 396a
 王念孙 396a
 王洽 516a
 王仁昫 396c, 505d
 王羲之 516a
 王先谦 396d
 王懿荣 223c
 王引之 396d, 171d
 王筠 396f
 王照 397a
 王照的«官话字母» 315f
 王洙 251c
 王子韶 170d
 威尔克斯, Y. A. (Yorick A. Wilks) 463f
 威尔士语 397d
 威尔士语文字 397c
 威林斯基, R. (R. Wilensky) 549f
 威尼托方言 448f
 威妥玛 (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 397c
 威妥玛式拼音 397f
 微观社会语言学 336e
 微观语言学 484f
 韦弗, W. (Warren Weaver) 217a
 韦斯特, M. (M. West) 308b
 闻墨 154c
 唯理语法 467f
 维尔纳, K. 398e
 维尔纳定律 399a
 维尔尼克, C. (Carl Wernicke 1848~1905) 339a
 维戈茨基, Л. С. (Лев Семёнович Выготский 1896~1934) 427c
 «维汉词典» 399a
 «维莱-科特雷敦令» 68b
 维诺格拉多夫, J. (J. Winograd) 548c
 维诺格拉多夫, B. B. 399b
 维特根斯坦, L. (L. Wittgenstein 1889~1951) 489a
 «维吾尔人的早期历史» 83b
 维吾尔文 399d, 400a
 维吾尔语 399f
 «维西底些语研究» 85e
 维叶托, W. (Wilhelm Viëtor 1850~1918) 392c
 卫拉特方言 283b
 卫藏方言 512e
 位同 542d
 位置分类 252c
 魏建功 (1901~1980) 428c
 魏晋南北朝的字书 161e

魏晋南北朝训诂义疏之学 169e
 《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 268e
 魏茂林 307f
 魏克尔, G. (Georg Wenker 1852~1911) 77f, 80a
 温州话 408f
 温州话声韵调 410c
 温州片 408f
 文白异读 143d
 《文法的研究》 35d
 《文法简论》 35e
 《文海》 400a
 《文海宝韵》 400b
 文节 314d
 《文史通义》 166d
 文体学 82a
 《文通》 273b
 文献检索 221a
 《文心雕龙》 166f, 214d
 《文心雕龙·声律》 366d
 《文心雕龙·章句篇》 182b
 《文选注》 107a
 《文学词语的统计分析》 (The Statistical Study of Literary Vocabulary) 385b
 文学风格学 485e
 《文学改良刍议》 14b
 《文学和大众语》 35f
 文学与语言计算学会 400c
 文言 132c
 文言复兴运动 46e
 《文言虚字》 172d
 文艺复兴时期英语的特点 459d
 《文则》 166d
 文章学 214d
 文字 400d, 130b
 文字的表达方法 402c
 文字的发展示意图 401a
 文字的先驱 400d
 文字改革 403d
 文字拼音化 131c
 文字通假 164f
 文字学与音韵学、训诂学的关系 164e
 闻一多 (1899~1946) 14e
 问号 21b
 《问奇集》 147d
 《问学集》 538a
 僂字 405e
 《我国汉藏语系语言元音的长短》 274a
 沃尔夫, B. L. 406d
 沃格林, C. F. (C. F. Voegelin) 360d
 沃拉普克语 117d
 沃洛夫语 303a
 乌德盖文 276b
 乌德盖语的方言 274f
 乌尔达尔, H. (Hans Uldall 1907~1957) 95c
 乌尔都文字 407a
 乌尔都语 406e
 乌尔曼, S. (Stephen Ullmann 1914~

1976) 489b
 乌戈尔语支 407c
 乌古斯语组 415e
 乌克兰语 407a
 乌克兰语文字 407b
 乌拉尔-阿尔泰语系 4c
 乌拉尔语系 407c
 乌利蒂语 300f
 乌伦贝克, C. C. 407f
 乌沙科夫, Д. H. (Д. H. Ушаков 1873~1942) 298a
 乌维亚语 300c
 乌孜别克语(见乌兹别克语) 408b
 乌兹别克语 408a
 乌兹别克语文字 408c
 无标记项 27e
 无规噪音型 346c
 无规则乱纹 346e
 无屈折拉丁语 117e
 无圈点满文 277e
 《无师自通切音官话字书》 315c
 无头字 512b
 无我金刚 369a
 无限词汇汉语语音合成系统 189d
 吴大澂 105f, 163e
 吴方言 408d
 吴方言区 140e
 吴敬恒 122f, 315c
 吴荣光 (1773~1843) 104f
 吴汝纶 317c
 吴式芬 (1796~1856) 104f
 《吴下方言考》 411b
 吴音 421a
 吴语 408d, 421a
 吴语区 408e
 吴玉章 (1878~1966) 245b, 520a
 吴械 (约1100~1154) 504c
 吴宗济 212e
 五不翻原则 363e
 《五方元音》 411c
 《五经》 154e
 《五经文字》 411f
 《五经正义》 170a
 《五经书》 69d
 五声 254e
 五声说 101c
 五失本 69f
 “五四”时期至1949年的语音研究 188a
 《五体清文鉴》 412c
 《五体清文鉴译解》 277a, 412e
 五音(见等韵) 52a
 《五音集韵》(见韵书) 507a
 《五音集韵·序》 72e
 《五音切韵》 412f
 五音声论 338d
 五音十二律学说 411d
 五音图 338c
 五种不翻 70a
 五种类型的编码法 200b
 五种祀典 58a

伍兹, W. A. (W. A. Woods) 243e
 《武威汉简》 35a
 武玄之 338b
 武元之 338b
 舞台音 62f
 舞台语言研究 462c
 物理主义 28f
 物量词 179f
 婺州片 408e
 X
 西班牙语 413a
 《西班牙语历史词典》 (Diccionario Historico de la Lengua Española) 40a
 西北方言 34b
 西北官话 112c
 西伯利亚次语支 275b
 西伯维 413f
 西部方言 46c, 389b
 西部拉脱维亚语 249f
 西部印地语 454a
 西部语支 369b
 西部裕固语 414a
 西大西洋语支 303a
 西汉方言区 137d
 西里西亚方言 22e
 西南官话 112e
 西南组 543c
 西旁遮普语 306f
 西日耳曼语 328e
 《西儒耳目资》 414c
 西塞罗, M. T. (Marcus Tullius Cicero 公元前106~前43) 82a
 西双版纳傣文 47c
 西双版纳方言 48a
 西吐火罗语 390a
 西西里方言 448f
 西希腊语-多里亚方言 417f
 西夏文 415a
 《西夏文汉藏译音释略》 394e
 《西夏文木活字版佛经与铜牌》 394f
 《西夏研究》 394f
 西匈语支 415e
 西语群 274f
 《西周金文语法研究》 230f
 《西字奇迹》 415f
 希伯来语 416d
 希伯来字母 416f
 希腊共同语 418a
 希腊古典语法学模式 476e
 希腊语 417c
 希腊字母 402a, 417e
 希腊字母体系 417e
 希利盖农语 300b
 希麟 436e
 析句问题的讨论 183b
 析言(见浑言) 216e
 析字 433e
 《昔时贤文》 154f

- «悉达特桑格拉沃» 333f
 悉县 51b, 175d
 «悉县藏» 51d, 370f
 «悉县集纪» 301f
 «悉县略图抄» 52c, 370f
 «悉县十二例» 301f
 «悉县要诀» 52c
 锡伯文 419a
 锡伯语 419d
 锡达莫语 5d
 «熹平石经» 10b, 515e
 习用语 36d
 洗礼名 327f
 玺印文字 105c
 戏曲成语汇集 419f
 «戏曲词语汇释» 419e
 系联法 318e, 319a
 系统 95e, 127d
 系统功能语法 127f
 系统语法 127d, 483b
 细音(见等韵) 52d
 瞎子话 215d
 狭义的梵语 75b
 狭义的突厥语 386e
 狭义的应用语言学 479e
 狭义的语言学 480d
 狭义的正写法 516c
 下加字 512b
 下江官话 112e
 下字 71c
 夏姆孙德儿达斯 419f
 夏琳 (985~1051) 103e
 夏威夷文 300d
 夏威夷语 300d
 厦门白话字方案 227e
 «厦门方言口语词典» 150a
 厦门话罗马字 227c
 «厦门音系»(见汉语方言) 148e
 «先儒两声各义立说不尽然» 452a
 «先知集» (*Chilam Balam*) 274c
 «暹罗番书» 213e
 暹罗语 381b
 咸摄 321a
 «现代阿尔巴尼亚语词典» 1c
 现代保加利亚规范语 18d
 现代标准拉脱维亚语 249f
 现代波斯语 454f
 现代词汇学 40d
 «现代俄罗斯标准语词典» 63c
 现代俄罗斯标准语时期 62d
 «现代俄罗斯标准语语音学» 8c
 «现代俄罗斯文学语言词典»
 (*Словарь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языка*) 39f
 现代俄语的标准音 62f
 «现代汉语词典» 420b
 «现代汉语方言»(见汉语方言) 149d
 现代汉语方言 138f
 现代汉语方言的分区 139a
 现代汉语方言学 148b
 现代汉语七大方言区 140e
 «现代汉语修辞学» 420d
 «现代汉语语法讲话» 420e, 133b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538f
 «现代汉语语言资料索引» 533c
 现代捷克语文字 229e
 现代罗马尼亚语 269a
 现代马其顿标准语 273b
 «现代蒙古语» 286f
 «现代蒙古语法» 323c
 «现代闽南语辞典» 150c
 现代斯洛文尼亚标准语 369f
 现代泰文 381c
 现代突厥语 415e
 现代突厥语族 386e
 现代维吾尔文 32f
 «现代吴语的研究» 421a, 133c, 148e
 现代音时期 185d
 现代语言学 480d
 现代爪哇语 514e
 现刊检索 221a
 现行朝鲜文 33e
 现行的哈萨克文 125e
 现行蒙古文 282d
 现行维吾尔文 399d
 现行藏文 512d
 线形文字 B 417d
 线性有界自动机 547b
 相关分析独立综合的系统 530f
 相配互转 173f, 307a, 449f
 «香港粤语语法研究»(见汉语方言) 149e
 湘方言 421d
 湘方言区 140e
 湘语 421d
 响峰说 494e
 象声词 180a
 象数学 371e
 象形(见六书) 260f
 象形文字 521d
 象形文字的特点 56e
 象形字 8e, 59a
 象骨 69f
 消板修辞 35c
 萧尔斯尼语 406f
 萧康、歌戈并收字 537a
 萧三 245b
 萧孝忠墓志 312e
 小波兰方言 22e
 小俄罗斯 62b
 «小儿语» 154f
 «小尔雅» 424b
 «小尔雅解» 424b
 «小尔雅训纂» 424c
 «小尔雅义证» 424c
 «小拉鲁斯辞典» (*Dictionnaire Petit
 Larousse*) 68d
 小人辰儿 351e
 «小说成语汇集» 424d
 «小说词语汇释» 424c
 小徐本 367f
 小学 160f, 167f
 «小学钩沉» 424d
 «小学蒐佚» 424e
 «小学韵语» 154f
 小言前儿 351d
 小韵 318a
 小辙儿 351d
 小篆 11b, 102e, 257e
 效摄 320e
 楔形字 424f
 楔形字母泥板 425c
 歇后语 425d
 叶句 425e
 叶音 425e
 叶韵 425e
 斜线号 487d
 谐声 173f
 «谐声表» 227b
 谐声字 185e
 谐音 433e
 谢尔巴, Л. В. 425f
 谢飞, R. (Robert Shafer) 192b
 谢甫琴科, Т. Г. (Тарас Григорьевич
 Шевченко 1814~1861) 407a
 蟹摄 320e
 心耳 369a
 心理/大脑 314c
 心理交际学说 334c
 心理文体学派 82b
 心理语言学 426c, 485e
 «心理语言学: 理论和研究问题概述»
 (*Psycholinguistics: A Survey of
 Theory and Research Problems*)
 426d
 心理语言学的应用和贡献 427e
 心理语音学 490f
 心目克明盲字 265b
 新阿拉米楔形字 425c, d
 新阿拉米文 425c
 新保加利亚语 18d
 «新潮» 14b
 «新词海» 24d
 新的八区说 140f
 «新读书通» 43d
 «新方言» 428a, 148a, 514d
 新弗斯派 268a
 新附字 436a
 新国际语 117e
 «新国语留声片课本» 122c, 515a
 «新华字典» 428b
 新几内亚中部大语群 11d
 «新加九经字样» 162b, 233f
 «新见西夏文石刻和敦煌西洞窟夏汉
 文题记考释» 394f
 «新刊钩略» 506f
 新曼俄话 28b
 新盲字 265c
 新蒙文 283a
 新挪威语 305d
 «新生活报» 419c

新式标点 20f
 《新文典别记》 314d
 新文字方案 126d
 新西兰英语 460e
 新湘语 421d
 新学说 484c
 《新训诂学》 395e
 《新译华严经音义》 428d
 《新英语语法》 370e
 新语法学派 428e, 256b
 新语言学 78d
 《新约》 51a
 《新约全书》 331e
 新韵书 175b
 新爪哇文 300a
 新证 466e
 《新著国语文法》(见黎锦熙) 253e, 182e
 《新字源文七音》 315c
 《新纂五方元音》 411f
 信 70c
 信德语 429c
 信德语文字 429e
 《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辅助集》 532d
 《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 532c
 《信息交换用汉字15×16点阵字模集及数据集》 532c
 《信息交换用汉字24×24点阵字模集及数据集》 532c
 星号 487f
 邢昺 170d
 邢公畹 429e
 行书 430a
 形旁 449b
 形声(见六书) 260f
 《形声通》 315d
 形声字 210a, 260f, 415b
 形式分析 280d
 形式派 84e
 形式文法 430c
 形式文法与自动机的关系 547b
 形式学派 298d
 《形式与解释论文集》 314a
 形态学 484f
 形态音位 332e
 形训 431c, 168b
 形意文字 402c
 性的范畴 469e
 《性入法》 431e, 333e
 姓(氏) 327a
 匈牙利语 431f
 匈牙利语文字 432a
 胸搏说 494e
 修辞 165a
 修辞格 432b
 《修辞格》 434f, 167b
 《修辞鉴别》 435b, 166d
 修辞学 81f, 165a, 485d
 《修辞学》(Rhetoric) 82a

《修辞学发凡》(见陈望道) 35b, 166d
 修辞学研究 533c
 修订《国音字典》委员会 541c
 修利 375b
 虚词 179b
 徐锴 435d, 162b, 367f
 徐乾学 (1631~1694) 232b
 徐寿 363e
 徐同柏 (1775~1854) 104f
 徐铉 435f, 162b, 367f
 许瀚 (1797~1867) 104f
 许敬宗 506b
 许慎 436b
 许郑 169e, 517e
 序列 95e
 序位学 306e
 叙利亚的方言 6d
 《续方言》 79d
 《续方言补》 79d
 《续方言又补》 79d
 《续甲骨文编》 224e
 《续开元释教录》 436e
 《续一切经音义》 436e
 玄奘 70a
 《愚诗》 6d
 选择适应 88b
 薛聪 257b
 薛尚功 104b
 《学记》 153c
 《学津讨原》 66e
 《学科要义》 16a
 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 363f
 学童习诵的识字书 552a
 学校的国语教育 124a
 《寻津录》 398a
 训 167e
 训读 330a
 训诂 160f, 167f
 训诂书 168a, 551f
 《训诂学上的一些问题》 395e
 训故 167f
 《训蒙字会》 33d, 44f
 《训民正音》 33d
 《训纂篇》 161c, 333b
 押韵 350d
 《押韵释疑》 506e
 牙音(见等韵) 52a
 雅 70c, 169a, 375c
 雅德林采夫, H. M. (H. M. Яценцев) 1842~1894) 385d
 雅格诺比语 375a
 雅柯布逊, R. 437a, 251f, 451c
 雅林, G. 437c
 雅尼次方言 125c
 雅(利安)-欧语系 455c
 雅浦语 300f
 雅学 437e
 雅言 437f, 138e, 168e

雅音 507e
 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公元前384~前322) 16a
 亚美尼亚语 438b
 亚美尼亚语字母 438d
 亚齐语 299f
 亚述楔形字 425c
 亚述语 425a
 咽 342f
 焉耆-龟兹文 522d
 焉耆文 309c
 焉耆语 309a
 《燕北录》 312e
 《燕齐鲁卫阳声转变考》 450b
 严复 (1853~1921) 70c
 严式标音法 21d
 严元照 (1773~1817) 66b
 《言旧录》 115a
 言语 378e
 言语病理学 438e
 言语波模式 346c
 《言语产生的声学理论》(Acoustic Theory of Speech Production) 76e
 言语处理 353f
 言语的辨知和言语的发生 427a
 言语的感知 87e
 言语感知的实验方法 88a
 言语感知的运动理论 88c
 言语感知过程 87e
 言语工程 353f
 言语合成 439d
 言语合成系统 76d
 言语合成与语音学 439e
 言语活动 378e
 言语矫正学 462c
 言语矫治 353f
 言语链 491c
 言语缺陷 438f
 言语生理学 341d
 言语声学 345c
 言语失常 439b
 言语识别 441b
 言语统计 532f
 《琴经室集》 331c
 颜师古 (581~645) 243c, 552b
 《颜氏家训·音辞》 72d
 《颜氏字样》 552b
 颜元孙 87a, 552d
 衍义 433e
 《宾州山人四部稿》 304f
 谚文 405d
 《谚文》 33d
 谚语 442d
 《谚原》 383d
 彦察 70a
 央元音 492d
 羊欣 430b
 扬庭 243c
 扬雄 442e, 137d

阳 449d
 阳调 442f
 阳平 128f
 阳声 110a, 307b
 阳声韵 48e, 186a
 杨恭恒 237d
 杨桓 162e
 杨慎 (1488~1559) 170f
 杨时逢 212e
 杨树达 443a, 172d
 杨选杞 73d
 杨雅各 292b
 杨元明 104a
 仰光话 289d
 《姚刻三韵本》 251e
 瑶文(见勉语) 289a
 瑶语支 443c, 289f
 耶鲁方案 443e
 耶律阿保机 312c
 耶律迭剌 312c
 《也松格碑》 282c
 叶尔姆斯列夫, L. 444c, 95c
 叶谷虚 121a
 叶籁士 246c, 520a
 叶尼塞-奥斯恰克语 108e
 叶尼塞碑铭 386a
 《叶尼塞碑文》 385d
 《叶尼塞突厥文献》 272f
 叶尼塞诸语言 108e
 叶斯泊森, O. 444e, 117e, 365f
 叶祥苓 151d
 《夜柔吠陀》 75d
 一般频率词典 308c
 一般术语 363c
 一般应用语言学 461d
 一名 21e
 《一目了然初阶》 315b
 《一切经音义》(慧琳) 445a
 《一切经音义》(玄应) 445d
 一声之转 446a
 一线制 519f
 一语两文 332f
 伊奥尼-阿提卡方言 417f
 伊比利亚-罗曼语支 269d
 伊博语 303c
 伊多语 117e
 伊戈罗特语 299f
 伊朗语支 454e
 伊犁-乌鲁木齐语音 399f
 伊洛卡诺语 299f
 伊斯坦布尔方言 389c
 伊特拉斯坎字母 249a
 依存关系 86b
 依地语 446c
 依地语文字 446d
 仪器语音学 352c
 《殷始》 383e
 疑问代词 178e
 彝文 448d
 《彝文作祭献药供牲经译注》 273f

彝语 447b
 彝语拼音方案 447b
 彝语支 447c
 《义府》 447e, 551b
 义式 463f
 义式的首部 464a
 义疏体 169f
 义素 463f, 490c
 义训 448a, 168b
 义长 384c
 亦名 21e
 异化作用 495b
 异体简化字 208a
 异体字 448b, 384a, d, 449c
 异文 174b
 异相动词 248a
 《异议公判》 242f
 《异语》 147e
 异语线 78b
 《异域录》 277f
 译名统一委员会 363f
 译音 448c
 《易音》 451f, 452a
 意大利克-凯尔特语族 269e
 意大利克语族 269b, 456c
 意大利-罗曼语支 269d
 意大利语 448c
 意大利语文字 449a
 意大利语之父 448d
 意动 120e
 意符 449b
 意义学 485a
 意译 69f
 意音文字 402c
 因声求义 171e
 因声以求义 164f, 171d, 261e
 阴 449d
 阴调 449c
 阴平 128f
 阴声 110a
 阴声韵 186a
 阴阳对转 449d, 186a
 阴、阳、上、去 371a
 苗达方言 289a
 音读 300a
 音符 8e
 音和(见汉语音韵学) 175a
 《音鉴》 366c
 音阶型 493f
 音节 181e, 494e
 音节符号 400f
 音节核心说 494e
 音节文字 195f, 401c
 音节-音素文字 289c
 《音论》 110a, 451f
 音纽 345c
 音品 426b
 《音谱》 147c
 音声单位 267e
 音声学 95c

《音声学原理》(On the Principles of Phoniatrics) 444d
 《音势论》 431e
 音素(音位)字母 402b
 音素字母文字 402b
 音位 495d
 音位变体 450f, 495d
 《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 188b, 515c
 音位的辨义功能 382b
 音位学(见音系学) 450d, 484e
 《音位学》 306d
 音位学标音法 21d
 《音位学原理》(Grundzüge der Phonologie) 382b
 音系学 450d, 484e
 《音系学原理》 27d
 《音学辨微》 52d
 《音学辨微·辨字母》 53e
 《音学十书》 188a, 227b
 《音学五书》 451f, 109c
 《音学五书·音论》 72f
 音训 168b, 349a, 361e
 音义书 452b, 170c
 《音译梵书和中国古音》 74a
 音乐语 117d
 《音韵》 147c
 《音韵阐微》 73e
 《音韵记号》 159c
 音韵结构模式 544a
 音转相近 349b
 《殷契萃编》 452c
 殷人刀笔文字 105e
 《殷商贞卜文字考》 270a, 453a
 《殷虚卜辞综述》 452e, 107f, 223f
 《殷虚书契》 453a, 163f
 《殷虚书契后编》 453c
 《殷虚书契菁华》 453c
 《殷虚书契考释》 106b, 163f, 270a
 《殷虚书契前编》 270a, 453a
 《殷虚书契续编》 453c
 《殷虚文字记》 107a
 《殷虚文字类编》 453c, 334f
 殷周金文 104b
 《殷周金文集成》 107c
 《殷周青铜器通论》 330f
 银简铭女真文 304f
 引号 21b
 引申义 453e
 隐喻 432c
 隐喻的格式 432c
 印地-乌尔都语 457b
 印地语 453f
 《印地语辞海》 419f
 《印地语史》 391d
 印地语推广学会 419f
 印地语文字 454b
 《印地语与文学》 420a
 印第安语 360d
 印度尼西亚语 454c
 印度尼西亚语拼音方案 454c

印度尼西亚语文字 454c
印度尼西亚语族(见南岛语系) 299f
《印度-日耳曼诸语言比较语法概要》
29c, 458b
印度-日耳曼语系 455c
印度斯坦语 406f, 457b
印度-雅利安语支 457b
印度-伊朗语族 454e
印度英语 460e
印度语支 454e, 457b
印度字母系统 403d
印古什语 93c
《印欧系语言比较研究导论》 279d
印欧语系语言的主要特点 457c
印欧语假说 455c
印欧语系 455b
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 75f
印欧语系各语族主要分布地区 456d
《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 209c, 516f
印太诸语言 11c
印支语系 191f
《英俄频率词典-最低限量的新闻词汇》
308d
英格韦, V. (V. Yingve) 385b
英国学派 82b
英国英语 460d
英汉机器翻译规则系统 532d
美式法语 68d
英特林瓜语 117e
《英文汉语》 20f
英文速记法 375f
《英雄国》 81c
英语 458c
《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比较频率词
表》(Comparative Frequency List
of English, French, German and
Spanish) 308c
《英语后缀的教学》(The Teaching of
English Suffixes) 308c
《英语语法》 182f
《英语正音词典》 324a
《英语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460a
《英粤·粤英辞典》 150d
缪洛策 277f
影组字 48d, 110c
影写 154c
应用数理语言学 366a
应用语言学 460f, 480e
《永乐大典》 15f
《永宁纳西族的母系家庭和亲属称谓》
326e
《咏史诗》 154f
用法论 489a
用六书分析文字的书 552a
优诺方言 30a
优选语义学 463f
攸乐方言 218f
尤卡基尔语 108e
尤卡基尔诸语言 108e

尤勒, G. U. (G. U. Yule) 385b
尤格克语 268c
《由卡拉》 230a
邮政式拼音 464f
犹太德语 446c
《惜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 76e,
137d
有圈点满文 277f
有头字 512b
有限状态文法 431a
有限状态语言 431b
有限自动机 547b
右文 465c
右文说 465d
《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
340a
《幼学琼林》 154f
于母 99a
《于阗国悬记》 466a
于阗塞文 465f
于阗文 465f
《于阗文佛教文献》 466c
《于阗文文献》 466c
《于阗文字典》 466c
于省吾 466c, 107a, 164a
鱼贯式 313a
鱼模、尤侯并收字 536e
俞敏 466f
俞樾 (1821~1906) 37f
《与山巨源绝交书》 101d
羽田亨 191b
语调 494d
语段 474a
语法 484f
语法单位和语法层次 472e
《语法规范》(Institutionis
Grammaticae) 482a
《语法讲话》 183c, 420e
语法统计学 385c
《语法修辞讲话》 467a, 167c, 183a
《语法修辞正误练习》 467b
语法学 467b, 484f
语法研究的对象 467e
《语法艺术》(Ars Grammatica) 482a
《语法艺术》(Tēchnē Grammatikē)
482a
语符学 95c, 444d
《语符学大纲》(An Outline of Glosse-
matics) 95c
语根 172b
语盟 27c
语气词 178c
语素 160e, 229b
语素的单音节性 544a
语素音位 228f, 280e
语素音位系统 228f
语文 153b
语文词典 38e
语文规划 403e
《语文建设》 529c

语文教学(见汉语教学) 153b, 478f
语文学 480d
语文学的兴起 见正文前专文1
语系 360b
语序 181c
语言 475b, 378e, 480d
《语言》(Language) 80f, 483c
《语言测试: 外语试题的编写和使用》
393e
语言单位 402d
语言的代数 95d
语言的单一性和多样性 见正文前专文3
语言的发生 476b
语言的功能 476a
《语言的科学研究和教学》 392d
《语言的历时和共时研究》 332c
语言的模式 476d
语言的普遍现象 252e
《语言的普遍现象》 96d
语言的嫡 384f
语言的生理基础 427d
语言的数学模型 48b
语言的特点 475e
语言的冗余度 384f
语言的选择 478a
语言的韵律特征 344e
语言的哲理 486c
语言地理学 77f
语言风格学 485e
语言规划 477f
语言过程学 352a
《语言和方言》(Languages and
Dialects) 255c
语言和机械化 见正文前专文5
语言和思维 427c
语言和语言研究 见正文前专文1
语言教学 478c, 485b
《语言科学的一套公设》(A Set of
Postulates for the Science of
Language) 280a
《语言科学概要》 235c
语言类型学(见类型语言学) 251e
语言理解系统 441d
《语言理论的逻辑结构》 313f
《语言理论基础》(Omkring Sprogteoriens
Grundlaeggelse) 95c, 444d
语言联盟 359c
《语言论》(Language) 28f
《语言论》(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 280a
《语言、逻辑和方法》 12c
《语言描写的统一理论》(An Integrated
Theory of Linguistic Description)
489d
语言模型 480a
语言年代学 384f
语言区域 359c
《语言实用学习法》 370e
《语言史的原理》 18f
《语言是选择和机遇》(Language as

- Choice and Chance) 385c
- 语言所 527f
- 语言特征学 273e
- 《语言文史论集》 538a
- 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 528d
- 《语言问题》 515d
- 语言问题的社会学 336d
- 语言习得 426e
- 语言行为 497b
- 语言行为的类型 497c
- “语言行为”理论的由来 497a
- 语言学 480c
- 语言学常用符号 487b
- 语言学的边缘地带 485b
- 语言学的起源和发展 480f
- 语言学的语音学 491a
- 《语言学文献》 (Acta Linguistica) 95c
- 语言学与心理学委员会 426d
- 《语言学札记》 235c
- 语言研究的开始和发展 见正文前专文 1
- 语言研究的中心 484d
- 《语言与机器》 217b
- 语言与社会改革 337b
- 语言与社会阶层 336f
- 语言与社团归属 337a
- 语言与时间和空间 见正文前专文 2
- 语言与种族偏见 337a
- 《语言》杂志 280c
- 《语言哲学》 444f
- 语言自动分析 366b
- 语言自动生成 366b
- 《语言自述集》 398a
- 语义表达式 489f
- 语义场 489b
- 语义传译 483f
- 语义基元 490c
- 语义理论的结构 489c
- 语义频率词典 308b
- 语义统计学 385c
- 语义网络理论 488c
- 语义学 488f
- 《语义学探索》 489b
- 语义因子 490c
- 语义语法 550b
- 语音 128b, 252e
- 《语音》 537f
- 语音传译 483f
- 语音的发音机制 491b
- 语音的生理分类 343c
- 语音的声学分析 346c
- 语音合成 189d
- 《语音教师》 120b
- 语音教师协会 120b
- 语音教学 353e
- 语音理解 547f
- 语音识别 547f
- 语音识别和言语合成 533b
- 《语音速记法》 375f
- 语音学 490e, 484e
- 《语音学》 306d, 444f
- 语音学标音法 21d
- 《语音演变的经济原则》 (Économie des changements phonétiques) 271d
- 语音乐律实验室 353d
- 语用所 528d
- 语用学 496b, 484f
- 语用学和“会话中合作原则”的理论 496d
- 语用学和其他有关学科的关系 496c
- 语用学和“语言行为”的理论 497a
- 《语助》 182a
- 语转 542c
- 语子 229a
- 《玉篇》 497e, 111e
- 预示分析法 498b
- 预示信息 498b
- 喻母 99a
- 喻三归匣 99a
- 喻世长 286f
- 喻四归定 99a
- 遇摄 320e
- 《御制满蒙文鉴》 412d
- 《御制满蒙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 412d
- 《御制清文鉴》 412d
- 《御制盛京赋》 277f
- 《御制四体文鉴》 412d
- 《御制五体清文鉴》 412d
- 《御制增订清文鉴》 412d
- 元音 492a
- 元音大移位 459d
- 元音的分类 492c
- 元音和谐律 2a
- 元音舌位图 492b
- 元音韵尾 128c
- 元音字母 402a
- 《爱历篇》 161b
- 袁复礼 (1893~1987) 216a
- 袁家骅 (1903~1980) 152e
- 袁文蔚 506e
- 袁希涛 122f
- 《原富》 70c
- 原始阿尔泰语 1f
- 原始共同斯拉夫语 369b
- 《原始汉语和汉藏母语》 190f
- 原始南方语系 94d
- 原始日耳曼语 328b, 456b
- 《原始台语声母中先喉塞音系列的假设》 545f
- 原始意义的歇后语 425d
- 原始印欧语 328b, 455a
- 源流差异 144c
- 远东地区新字母委员会 246b
- 约翰逊, S. (Samuel Johnson 1709~1784) 38c, 460a
- 约鲁巴语 303c
- 约特诸方言 331e
- 乐府 507f
- 乐音 345f, 491d
- 越南、朝鲜和日本的文字改革 405c
- 越南语 499a
- 《越南拉丁词典》 (Tủ điển Việt-Bồ-La-tins) 499c
- 《越谚》 499f
- 《越谚剩语》 500b
- 粤方言 500b
- 粤方言区 140e
- 粤方言四个片代表点的声韵调 503d
- 粤海片 500d
- 《粤雅堂丛书》 20b
- 《粤音韵汇》 504b
- 粤语 500b
- 《云南方言调查报告》 151f
- 《筠清馆金文》 104f
- 韵 109b, 174f
- 韵表 412f
- 韵部 504c
- 韵腹 184a
- 《韵会》 507b
- 《韵集》 147c, 266d, 505c
- 《韵镜》 504d, 51d, 312b
- 韵类 504f
- 韵类通转 171a
- 韵母特征 348d, 491a
- 《韵略》 147c
- 《韵略汇通》 147d
- 《韵略易通》 147d, 513b
- 韵母 345c
- 韵目 505a
- 韵谱 110b
- 《韵詮》 337f
- 韵书 505b
- 韵头 184a
- 韵图(见等韵) 51d, 412f, 450e
- 韵尾 184a, 321d
- 韵文 173c
- 再版修订法 17b
- 载瓦文(见载瓦语) 509b
- 载瓦语 509a
- 《模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 156e
- 赞美诗集 457c
- 《藏汉大词典》 509c
- 《藏汉对照拉萨口语词典》 509d
- 藏汉语系 191f
- 藏-克伦语 192a
- 藏缅语 192a
- 藏缅语族 509f
- 藏文 512a, 522c
- 《藏文大藏经甘珠文、丹珠尔解题目录》 312e
- 藏文竹木简牍 512d
- 《藏英字典》 313e
- 藏语 512e
- 《藏语口语读本》 513f
- 《藏语语法》 313e
- 藏语语料 513f
- 藏语支 513a, 509f
- 早梅诗 513b

- 早期古希腊语 418a
 早期近代丹麦语 48f
 早期近代英语 459d
 早期中古丹麦语 48f
 藻敏方言 289a
 造句学 484f
 噪音 491f
 噪音起始时间 346f
 仄 309a
 曾撮 321a
 曾运乾 513d, 99a
 《增订合声简字谱》 315d
 增圆 506f
 《增修互注礼部韵略》 506e
 《增韵》 506e
 扎亚·班智达 283a
 扎扎乌方言 209e
 《札述》 377c
 乍得语族(见阿非罗-亚细亚语系) 5e
 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 1845~1935) 398f, 465a
 占语 299f
 战国秦汉间的识字书 161b
 《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 102b
 张参 411f
 张次立 251c
 张弓(1899~1983) 420d
 张金吾(1787~1829) 115a
 张琨 513e
 张世禄(1902~) 519e
 张廷济(1768~1848) 105c
 张相 514a, 539d
 张旭 32c
 张洵如 150b
 张炎 182b
 张一磨 122f
 张揖 514b
 张伯荪 509c
 张友渔(1889~) 520b
 张玉书 236d
 张芝 32a
 张自烈 517c
 章炳麟 514b, 98c, 110e
 章草 31e
 章士钊(1882~1973) 14c
 掌禹锡 251c
 爪哇语 514d
 爪哇文字 272e
 赵明诚(1081~1129) 104a
 赵元任 514f
 照系二等归精系 98d
 照系三等归知系 98d
 哲理语言学 486b
 哲学语义学 488f
 轱 350d
 轱口 350d
 贞人 57f
 真书 515e, 197f
 真书之祖 515f
 真值论 489a
 真值条件语义学 489a
 臻撮 320f
 《整理汉字的意见》 205b
 整齐论 481f
 整字输入法 200b
 正齿音(见等韵) 52b
 正词法 516b
 正负对立 27e
 正楷 197f
 《正名篇》 363e
 《正名隅论》 260a
 正书 197f, 515e
 正体 516b
 正弦波 345d
 正写法 516b
 正音法 516f
 《正音咀华》 517c
 正音书院 517b
 正字 19c
 正字法 516b
 《正字通》 517c
 郑麟趾 33d
 郑樵 517d, 170d
 郑玄 517d
 支配关系 365a
 咬嘎音 493d
 《知不足斋丛书》 115b
 《知微音值考》 175c
 知子罗话 304d
 直接成分分析法 29a, 280d
 直译 70c
 直音 517f, 175f
 《直音篇》 517f
 《直语补正》 383b
 《直斋书录解题》 517f
 职业性专用外语 393d
 止撮 320d
 指称论 488f
 《指海》 447f
 指实 37f
 指示代词 178e
 指事(见六书) 260d
 指事字 196f
 《指微韵镜》 504d
 指语 363c
 致动 120e
 中波希米亚方言 229d
 中部方言 34b, 249f
 中部语族 237a
 中部组 543d
 《中等国文典》 182d
 中东部方言 459a
 中古保加利亚语 18d
 中古波斯语 24f
 中古法语 68a
 中古荷兰语 210c
 中古拉丁语 248d
 中古文献语言 387a
 中古音 186b
 中古音的声调 186e
 中古音的韵腹 186e
 中古音的韵头 186e
 中古音的韵尾 186e
 中古音时期 186b
 中古英语时期 458f
 中古爪哇语 514e
 《中国大百科全书》 16e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6c
 中国大辞典编纂处 123c
 《中国大辞典样本稿》 254a
 《中国的语言与方言》 191f
 中国地名委员会 55b
 中国地名学 55b
 《中国第一快切音字新字》 265e
 《中国古代语法》 518e
 中国古典词汇学的模式 476d
 《中国古典文论中谈到的语言形式美》 395f
 中国汉族的文字改革 403f
 《中国话的文法》(见赵元任) 515c, 133b
 中国境内的维吾尔语 399f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名词编订室 364a
 《中国拉丁化字母》 245b
 中国民族文字的种数 520e
 中国民族文字结构的分类 521c
 中国民族文字一览表 521a
 中国民族语言学会 526e
 《中国切音新字》 265f
 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字改革 405a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 519a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教学 519b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研究室 528b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527f
 中国世袭的姓氏制度 327c
 《中国速记学》 376c
 《中国文法革新论丛》 519e
 《中国文法革新讨论集》 519e
 《中国文法通论》 182e
 《中国文法学初探》 395b
 《中国文法要略》(见吕叔湘) 266f, 182f
 《中国文法中的系词》 395b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 520a, 404a
 中国文字改革文献资料展览 325a
 中国文字改革协会 157d
 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 157d
 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 245c
 《中国文字学》 381f
 中国现代突厥语的特征 387f
 《中国现代语法》(见王力) 395c, 182f
 中国新文字研究会 246f
 《中国新字》 265f
 《中国修辞学》 443b
 《中国音标字书》 159c
 《中国音韵学》 395c
 《中国音韵学研究》(É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92f, 175c
 《中国语初步》(Beginning Chinese) 443e
 《中国语法纲要》 395c

- 《中国语法理论》 395c
《中国语历史文法》 133c
《中国语书法之拉丁化》 246c
《中国语文》 529b
《中国语文的演进和新文字》 35f
《中国语言学报》 526c
中国语言学会 526e
《中国语言学史》 395e
中国诸民族文字 520e
中国诸民族语言 523d
中国主要语言学学术团体 526e
中国主要语言研究机构 527f
中国主要语言研究刊物 529a
《中华大字典》 530b
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 123d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310f
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 43b
中介成分体系 530d
中介语 117e
中立语 117e
中美和南美印第安语 360e
中美印第安语 281d
中平调 371a
《中山方言》 148e
中世波斯语 454f
中苏丹语文 302d
中文拉丁化委员会 245b
中文拉丁化研究会 247c
中文情报检索 532e
中文信息处理 531f
中文信息处理系统 532a
中心方言 46c, 399f
《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试用)》 156e
中亚婆罗米斜体字母 390a
《中亚突厥地名记述》 437d
《中原音韵》(见《中原音韵·音》) 533d
《中原音韵》的调类 537b
《中原音韵》的内容 533f
《中原音韵》的研究 84b
《中原音韵》声母表 534b
《中原音韵》音 533d
《中原音韵》音的韵母
《中原音韵》韵母表 535b
《中原音韵》20声类 534a
终端合成器 440c
终极标记 364f
《钟祥方言记》(见《汉语方言》) 148e
钟鼎文字 162d
《钟鼎篆韵》 162d
钟彝 32a
《众经音义》 445a, d
众源海入门 412f
重出喉牙唇音 52f
重唇 98a
重唇音(见《等韵》) 52a
重纽 52f, 321b
重文 367d
重音 494e
重音移动规律 334c
周春 (1729~1815) 66b
周德清(见《中原音韵·音》) 533d, 507e
周恩来 (1898~1976) 49b
周法高 (1915~) 518e
周祭 58a
《周金文存》 230b
《周礼·地官·保氏》 260c
《周礼汉读考·序》 59d
《周礼正义》 377c
《周秦名字解诂补》 38a
周时经 537e
《周书·突厥传》 385d
周无忌 150d
周顺 309a
周有光 520b
周祖谟 537f, 345b
籀文 538b, 161b
朱德熙 538e
朱骏声 539a, 368d, 505a
朱谋玮 307e
朱起凤 (1875~1948) 43c
朱熹 (1130~1200) 170e
朱宗文 287b
珠杂 512b
竹书 520f
逐字为训 182a
主从复句 253f
主题 214a
主谓式 177d
主谓谓语句 180f
助动词 179c
助字 182d
《助字辨略》 539c
《助字辨略跋》 539e
注音符号 539f
注音字母 539f
注音字母电报 404d
注音字母方案 540d
《注音字母书法体式》 541b
《注音字母音类次序》 541b
专科词典 38e
专名号 21c
专业性百科全书 16d
专业性频率词典 308d
专业性专用外语 393d
专用外语教学 393d
转换规则箭号 488a
转换语法 340f
转写 542a
转写法 542a
转义 542b
转音 539b
转语 542c
转注(见《六书》) 261b, 539b
篆书 542e, 551f
篆文 197b
《庄岳委谈》 147d
壮僚语 544c
壮僚语支 543b
壮侗语族 543e
《壮汉词汇》 546b
壮文(见《壮语》) 546e
壮语 546c
壮文工作队 546b
追溯检索 221a
《缙道斋彝器款识考释》 105a
准术语 363c
卓克基话 223b
浊辅音 492f
浊音 491f
着重号 21b
《资治通鉴释文》 546f
孛乳 172b
子音 492e
自动编排 221f
自动词典 218c
自动分析 221f
自动化翻译 217a
自动机理论 547a
自动研究 222a
自然分类法 108d
《自然史》 16a
自然习得 478f
自然语言 547c
自然语言处理 547c
自然语言理解 547d
自然语言书面理解系统 548c
自然语言语音理解系统 550c
字 327c
字的异体 199a
《字典考证》 236f
《字诂》 551b, 447f
《字诂义府合按》 447f
《字海》 162b
《字汇》 551b, 162e
《字林》 551d
《字林考逸》 424e, 551e
《字林音义》 551e
字母 551e, 345e
字母文字 402a, 522c
字母韵 507e
字喃 331a, 499c
字圣 388f
字书 551f, 160f
《字说》 162d, 170d
字体 512b
字无定类说 120e
字形分解法 200b
字形为主、字音为辅的编码法 200c
《字性缀联法》 431e
字学 160f
《字样》 552a, 162a
字样之学 164b
《字义起于字音说》 259f
字原 172b
字族 552d, 43a
宗白华 14e
综合性的百科全书 16c
《综合英语语法》 468b
纵聚合 41d
邹安 230b

邹语群 94b
《奏定学堂章程》 155d
诅楚文 104c
祖鲁语 303d
最保守的语言之一 22b
最早的拉丁铭文 249a
最终成分 280e
算称范畴 34b
左形右声 198a
《作为社会符号的语言》 127e
《作文法讲义》 36a

API 120b
ATN 243e, 548e
CD 549b
CD 理论 86a
COLING 118b

HARPY 系统 550e
HAWKEYE 550b
HEARSAY 系统 550e
HWIM 系统 550e
ICCL 118b
ILA 118f
IPA 118c
K类语言 455f
K类语言和S类语言的二分 455f
LADDER 系统 550b
LIFER 分析 550a
LUNAR 系统 548e
MARGIE 系统 549e
N偶关系 496a
O型文法 431a
O型语言 431b
PIE 455d
RJD-80型汉语人机对话系统 159f

S类语言 455f
SAM 549f
SHRDLU系统 548e
SOV型 355f
SVO型 355f
TK-84汉语人机对话实验 160c
VSO型 355f

3个价 127c
3种“后置的手段” 283f
4个范畴 127d
《17~19世纪俄罗斯标准语史纲要》 399d
19世纪的欧洲语言学 482c
20世纪的西欧、北美语言学 482e
1919~1949年的语文教学 155d
《1934~1951年论文集》 84a
1949年以来的语音研究 188d
8000台电话声控查号系统 189c

- Gardner, R. C.
Garrett, M.
Gazdar, G.
Giles, H. A.
Gilliéron, J.
Gleason, H. A.
Golding, W.
Goldman, N.
Gouin, F.
Grammont, M.
Greenberg, J. H.
Gregg, J. R.
Gregory, M.
Grice, H. P.
Grimes, B. F.
Grimm, J.
Grimm, W. K.
Grønbech, K.
Guiraud, P.
Guru, K. P.
Gyarmathi, S.
- F. X.
加德纳, R. C.
加雷特, M.
盖兹达, G.
翟理斯
吉耶龙, J.
格利森, H. A.
戈尔丁, W.
戈尔德曼, N.
戈安, F.
格拉蒙, M.
格林伯格, J. H.
格雷格, J. R.
格雷戈里, M.
格赖斯, H. P.
格兰姆斯, B. F.
格林, J.
格林, W. K.
格伦贝克, K.
基罗, P.
古卢, K. P.
基雅马迪, S.
- Jespersen, O.
Johnson, S.
Jones, D.
Jones, W.
Joos, M.
- Kaeding, F. W.
Kaplan, D.
Karligen, K. B. I.
Katyayana
Katz, J. J.
Kay, P.
Kennedy, G. A.
Kent, A.
Kenyon, J. S.
Kesser, M. M.
Kindaichi Kyosuke
Kotwicz, W.
Krashen, S.
Kuroda, S. Y.
Kuryłowicz, J.
- Labov, W.
Ladefoged, P.
Lado, R.
Lakoff, G.
Lamb, S.
Lambek, J.
Lambert, W. E.
Lancelot, C.
Laskien, A.
Laufer, B.
Leech, G. N.
Lehmann, W. P.
Leibnitz, G. W. von
Lenneberg, E.
Lévi-Strauss, C.
Ligeti, C.
Locke, J.
Longacre, R.
Lönnrot, E.
Luhn, H. P.
Lundell, J. A.
Luther, M.
- MacLay, R. S.
Malinowski, B.
- Mantaro J. Hashimoto
Marcus, S.
Markel, N. N.
Martin, W. A. P.
Martinet, A.
Maspéro, G.
Maspéro, H.
- Mathesius, V.
McCawley, J.
McNeill, D.
Meillet, A.
Mendenhall, T. C.
Menges, K. H.
Meringer, R.
Mesrop
Mickiewicz, A.
Miller, G.
Milton, J.
Mitchell, T. F.
Montague, R.
More, T.
Morris, C. W.
Morrison, R.
Motoki Nakajima
- Nagl, J. W.
Nawayi, N. A.
Newman, F. W.
Newton, I.
Nguyễn Thuyên
Norman, J. L.
- Osgood, C. E.
Osthoff, H.
- Paić, M.
Palmer, F. R.
Palmer, H. E.
Pāṇini
Partee, B. H.
Passy, P.
Patanjali
Paul, H.
Peano, G.
Peirce, C. S.
Pelliot, P.
Penfield, W.
Perlmutter, D.
Perry, J. W.
Petrarca, F.
Piaget, J.
Pike, K. L.
Pitman, I.
Plutarchos
Popp, F.
Poppe, N. N.
Postal, P.
Pottier, B.
Powell, J. W.
Preyer, W. T.
Priscian
Ptacek, P. H.
- 叶斯泊森, O.
约翰逊, S.
琼斯, D.
琼斯, W.
朱斯, M.
- 凯丁, F. W.
卡普兰, D.
高本汉
迦旃延那
卡茨, J. J.
凯伊, P.
肯尼迪, G. A.
肯特, A.
肯尼恩, J. S.
凯塞尔, M. M.
金田一京助
科特维奇, W.
克拉申, S.
库洛达, S. Y.
库里沃维奇, J.
- 拉博夫, W.
拉德福格德, P.
拉多, R.
雷科夫, G.
兰姆, S.
兰贝克, J.
兰伯特, W. E.
朗斯洛, C.
莱斯金, A.
劳佛, B.
利奇, G. N.
莱曼, W. P.
莱布尼茨, G. W. von
伦纳伯格, E.
列维-斯特劳
斯, C.
李盖蒂, C.
洛克, J.
朗格克尔, R.
兰罗特, E.
卢恩, H. P.
龙德尔, J. A.
路德, M.
- 麦克莱, R. S.
马林诺夫斯基, B.
桥本万太郎
马尔库斯, S.
马克尔, N. N.
丁建良
马丁内, A.
马伯乐, G.
马伯乐, H.
- 马泰休斯, V.
麦考莱, J.
麦克尼尔, D.
梅耶, A.
门登霍尔, T. C.
门格斯, K. H.
梅林格, R.
麦斯若波
密茨凯维奇, A.
米勒, G.
弥尔顿, J.
米切尔, T. F.
孟德鸠, R.
莫尔, T.
莫里斯, C. W.
马礼逊
中岛干起
- 纳格尔, J. W.
纳沃伊, N. A.
纽曼, F. W.
牛顿, I.
阮诠(又名韩诠)
罗杰瑞
- 奥斯古德, C. E.
奥斯特霍夫, H.
- 佩茨, M.
帕尔默, F. R.
帕尔默, H. E.
波你尼
帕蒂, B. H.
帕西, P.
波朗阁利
保罗, H.
皮阿诺, G. (一
译皮亚诺)
皮尔斯, C. S.
伯希和
彭菲尔德, W.
珀尔马特, D.
佩里, J. W.
彼特拉克, F.
皮亚杰, J.
派克, K. L.
皮特曼, I.
普卢塔克
博普, F.
波普, N. N.
波斯塔尔, P.
波蒂埃, B. (一
译鲍蒂埃)
鲍威尔, J. W.
普雷耶, W. T.
普里西安
普塔西克, P. H.

Pulleyblank, E. G.
Pullum, G.

Q

Qillian, M. R.
Quintilian
Quirk, R.

R

Ramstedt, G. J.
Rask, R. K.
Reland, H.
Rey, C.
Rhodes, A. de
Ricci, M.
Rivers, W. H. R.

Robins, R. H.
Rock, J. F.
Rosch, E.
Ross, J. R.
Roudet, L.
Rousselot, J. P.

S

Sag, I.
Samuel, G.
Sander, E. K.
Sapir, E.
Saussure, F. de
Schank, R. C.
Schlegel, F. von

Schleicher, A.
Schleyer, J. M.
Schmidt, J.
Schmidt, P. W.
Schmidt, S.
Schmidt, W.
Schuchardt, H.
Schumann, J.
Scripture, E. W.

Searle, J.
Sebeok, T. A.
Sechehayé, A.
Selinker, L.
Shafer, R.
Shakespeare, W.
Shannon, C.
Sherard, M.
Shyāmsundardas
Sibuwaihi

Sieg, E.
Sienkiewicz, H.
Simon, H. A.
Skinner, B. F.
Slobin, D.
Smith, H. L.

蒲立本
普伦, G.

奎利安, M. R.
昆提利安
夸克, R.

兰司铁, G. J.
拉斯克, R. K.
莱兰特, H.
雷伊, C.
罗德, A. de
利玛窦
里弗斯, W. H. R.

罗宾斯, R. H.
罗克, J. F.
罗希, E.
罗斯, J. R.
鲁德, L.
卢赛洛, J. P.

萨格, I.
沙穆阿尔, G.
桑德尔, E. K.
萨丕尔, E.
索绪尔, F. de
尚克, R. C.
施列格尔, F. von

施莱歇尔, A.
施莱耶, J. M.
施密特, J.
施密特, P. W.
施密特, S.
施密特, W.
舒哈特, H.
舒曼, J.

斯克里普契尔, E. W.
塞尔勒, J.
塞比奥克, T. A.
塞什艾, A.
塞林克尔, L.
谢飞, R.
莎士比亚, W.
申农, C.
司马侃
夏姆孙德尔达斯
西伯维(一译西拜韦)

西克, E.
显克维奇, H.
司马贺
斯金纳, B. F.
斯洛宾, D.
史密斯, H. L.

Sommerfelt, A.
South Coblin, W.
Spitzer, L.
Staal-Holstein, A. von
Steinthal, H.
Stern, W.
Strahlenberg, P. J. von

Strauman, H.
Štúr, L.
Sturtevant, E. H.

Sudre, J. F.
Swadesh, M.
Sweet, H.
Symonds, R.

Tagora, R.
Talmage, J. van N.
Tessière, L.
Tewkesbury, M. G.

Theokritos
Thomsen, V. L. P.

Thorndike, E. L.
Timūr-i-lang
Tokieda Motoki
Trager, G. L.
Trier, J.
Trigault, N.
Trudgill, P.
Tsuji Nobuhisa

Uhlenbeck, C. C.
Uldall, H.
Ullmann, S.

Vamberg, H.
Varmā, D.
Varro, M. T.
Vendryes, J.
Verner, K.
Viator, W.
Viator, W.
Vincent
Voegelin, C. F.
Voegelin, F. M.
von Gabain, A.
Vossler, K.

Wade, T. F.
Wahl, E. de
Wardhaugh, R.
Weaver, W.
Weinreich, U.

萨默费特, A.
柯耐南
施皮策, L.
钢和泰
斯坦塔尔, H.
斯特恩, W.
斯特拉连贝尔格, P. J. von
斯特劳曼, H.
什图尔, L.
斯特蒂文特, E. H.
苏德尔, J. F.
斯瓦德士, M.
斯维特, H.
西蒙兹, R.

泰戈尔, R.
打马字
特斯尼耶尔, L.
图克斯伯里, M. G.

忒奥克里托斯
汤姆森, V. L. P.

桑代克, E. L.
帖木儿
时枝城记
特拉格, G. L.
特里尔, J.
金尼阁
特鲁吉尔, P.
辻伸久

乌伦贝克, C. C.
乌尔达尔, H.
乌尔曼, S.

万伯里, H.
瓦尔玛, D.
瓦洛, M. T.
房德里耶斯, J.
维尔纳, K.
维叶托, W.
费尧特, W.
文岑
沃格林, C. F.
沃格林, F. M.
冯·加巴因, A.
浮士勒, K.

威妥玛
瓦尔, E. de
沃多, R.
韦弗, W.
瓦恩里希, U.

Weinrich, H.
Weisgerber, L.
Wells, J. C.
Wenker, G.
Wernicke, C.
West, M.
Whitney, W. D.
Whorf, B. L.
Wilensky, R.
Wilkins, D.
Wilks, Y. A.
Winograd, J.
Wittgenstein, L.
Woods, W. A.
Woolfson, P.
Wulff, K.
Wundt, W.

Yamada Yoshio
Yingve, V.
Yule, G. U.

Zamenhof, L. L.
Zipf, G. K.

Аванесов, Р. И.

Александров, А. И.

Алексеев, П. М.

Баскаков, Н. А.

Береснев, С. Д.

Бобровников, А. А.

Богородицкий, В. А.

Булич, С. К.

Буляковский, В. Я.

Василевич, Г. М.

Винаградов, В. В.

Владимирцов, Б. Я.

Выготский, Л. С.

Гоголь, Н. В.

Драгунов, А. А.

Кирилл

Контунова, И.

Конокопов, С. В.

Котляревский, И. П.

Крушевский, Н. В.

温利希, H.
魏斯格贝尔, L.
韦尔斯, J. C.
温克尔, G.
维尔尼克, C.
韦斯特, M.
惠特尼, W. D.
沃尔夫, B. L.
威灵斯基, R.
威金斯, D.
威尔克斯, Y. A.
维诺格拉德, J.
维特根斯坦, L.
伍兹, W. A.
伍尔夫森, P.
吴克德
冯特, W.

山田孝雄
英格韦, V.
尤勒, G. U.

柴门霍夫, L. L.
齐夫, G. K.

阿瓦涅索夫, Р. И.

阿列克桑德罗夫, А. И.

阿列克谢耶夫, П. М.

巴斯卡科夫, Н. А.

别列斯涅夫, С. Д.

博布罗夫尼柯夫, А. А.

博戈罗迪茨基, В. А.

布利奇, С. К.

布利亚科夫斯基, В. Я.

瓦西列维奇, Г. М.

维诺格拉多夫, В. В.

弗拉基米尔佐夫, Б. Я.

维茨基, Л. С.

果戈理, Н. В.

龙果夫
基里尔

科夫图诺娃, И.

郭质生
科特利亚列夫斯基, И. П.

克鲁舍夫斯基, Н. В.

Крылова, О. А.	Н. В.	Покровский, М. М.	波克罗夫斯基, М. М.	Томсон, А. И.	托姆松, А. И.
Кулагина, О. С.	克雷洛娃, О. А.	Поржезинский, В. К.	波尔热津斯基, В. К.	Троянский, П. П.	特洛扬斯基, П. П.
Леонтьев, А. Н.	库拉金娜, О. С.	Поспелов, Н. С.	波斯别洛夫, Н. С.	Трубедкой, Н. С.	特鲁别茨科伊, Н. С.
Лермонтов, М. Ю.	列昂捷夫, А. Н.	Потебня, А. А.	波铁布尼亚, А. А.	Тургенев, И. С.	屠格涅夫, И. С.
Лубсанванпан, Ш.	莱蒙托夫, М. Ю.	Пушкин, А. С.	普希金, А. С.	Турытина, Л. А.	图里金娜, Л. А.
Лурья, Л. Р.	罗布桑旺丹, Ш.	Распопов, И. П.	拉斯波波夫, И. П.	Ушаков, Д. Н.	乌沙科夫, Д. Н.
Малов, С. Е.	卢利亚, Л. Р.	Руднев, А. Д.	鲁德涅夫, А. Д.	Форгунатов, Ф. Ф.	福尔图纳托夫, Ф. Ф.
Марков, А. А.	马洛夫, С. Е.	Санжеев, Г. Д.	桑热耶夫, Г. Д.	Хаврошина, С. А.	哈夫洛尼娜, С. А.
Марр, Н. Я.	马尔科夫, А. А.	Сидоров, В. Н.	西多罗夫, В. Н.	Чехов, А. П.	契诃夫, А. П.
Месроп, М.	马尔, Н. Я.	Славейков, П.	斯拉维伊科夫, П.	Шахматов, А. А.	沙赫马托夫, А. А.
Мефодий	密斯罗普, М.	Солганик, Г. Я.	索尔甘尼克, Г. Я.	Шевченко, Т. Г.	谢甫琴科, Т. Г.
Мещанинов, И. И.	梅福季	Степанов, Ю.	捷潘诺夫, Ю.	Шренк, Л.	什连克, Л.
Москальская, О. И.	墨山宁诺夫, И. И.	Суник, О. П.	苏尼克, О. П.	Шерба, Л. В.	谢尔巴, Л. В.
Одинцов, В. В.	莫斯科里斯卡娅, О. И.	Толстой, Л. Н.	托尔斯泰, Л. Н.	Эндзелин, Я. М.	恩泽林, Я. М.
Петерсон, М. Н.	奥金佐夫, В. В.			Ядренцев, Н. М.	雅德林采夫, Н. М.
Пешковский, А. М.	彼捷尔松, М. Н.				
	彼什科夫斯基, А. М.				

(二)

(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阿波罗尼奥斯	А	鲍林杰, D.	Bolinger, D.	布赖特, T.	Bright, T.
阿尔楚尼, G. B.	Apollonios	鲍威尔, J. W.	Powell, J. W.	布朗, R.	Brown, R.
阿尔诺, A.	Artsouni, G. B.	贝尔, A. M.	Bell, A. M.	布雷阿尔, M.	Bréal, M.
阿尔托, P.	Arnauld, A.	贝弗, T.	Bever, T.	布龙菲尔德, L.	Bloomfield, L.
阿诺德, M.	Aalto, P.	贝克尔, J.	Bercher, J.	布鲁格曼, K.	Brugmann, K.
阿斯科里, G. I.	Arnold, M.	本辛, J.	Benzing, J.	布鲁斯特, W. N.	Brewster, W. N.
阿斯佩林, J. R.	Ascoli, G. I.	彼特拉克, F.	Petrarca, F.	布伦达尔, V.	Brøndal, V.
埃德蒙, E.	Aspelin, J. R.	波蒂埃, B. (— 译鲍蒂埃)	Pottier, B.	布罗卡, P.	Broca, P.
埃德利, J. J.	Edmont, E.	波颠阁利	Patañjali	布洛克, J.	Bloch, J.
埃里克森, L. M.	Egli, J. J.	波尔尼	Pāṇini	布斯, A. D.	Booth, A. D.
埃利斯, J.	Ericsson, L. M.	波普, N. N.	Poppe, N. N.	布斯特, K.	Boost, K.
埃利泽·本-耶胡达	Ellis, J.	波斯塔尔, P.	Postal, P.		C
胡达	Elizer Ben-Yehudah	波斯塔尼, B.	al-Bustani, B.	柴门霍夫, L. L.	Zamenhof, L. L.
艾特尔, E. J.	Eitel, E. J.	伯德惠斯尔, R. L.	Birdwhistle, R. L.		D
奥森, I. A.	Aasen, I. A.	伯恩斯坦, B.	Bernstein, B.	达尔加诺, G.	Dalgarno, G.
奥斯古德, C. E.	Osgood, C. E.	伯林, B.	Berlin, B.	达尔文, C.	Darwin, C.
奥斯特霍夫, H.	Osthoff, H.	伯斯塔尔, C.	Burstall, C.	打马字	Talmage, J. van N.
奥斯汀, J. L.	Austin, J. L.	伯特, M.	Burt, M.	大流士一世	Darius I the Great
	B	伯希和	Pelliot, P.	戴维斯, D. H.	Davis, D. H.
巴多玛	Barclay, T.	博德温, C. C.	Boldwin, C. C.	戴维斯, H. R.	Davies, H. R.
巴尔托利, M.	Bartoli, M. G.	博杜恩·德·库尔德内, J. N.	Baudouin de Courtenay, J. N.	但丁·阿利吉耶里	Dante Alighieri
G.		博厄斯, F. (— 译鲍阿斯)	Boas, F.	道格拉斯, C.	Douglas, C.
巴尔-希列尔, Y.	Bar-Hillel, Y.	博弗龙, L.	Beaufront, L.	道扎, A.	Dauzat, A.
巴利, C.	Bally, C.	博克, C. B.	Buck, C. B.	德尔布吕克, B.	Delbrück, B.
白保罗	Benedict, P. K.	博林, G. M.	Boling, G. M.	德·弗朗西斯, J.	De Francis, J.
班维尼斯特, E.	Benveniste, E.	博普, F.	Popp, F.	德莱顿, J.	Dryden, J.
包拟古	Bodmon, N. C.	薄伽丘, G.	Boccaccio, G.	德莱斯勒, W.	Dressler, W.
保罗, H.	Paul, H.	布莱尔, L.	Braille, L.	德利菲尔, H. E.	Driver, H. E.
				德谟克利特	Democritus

德·摩根, A. De Morgan, A.
狄奥尼西奥斯 Dionysios
狄德罗, D. Diderot, D.
迪丁贝尔格, W. Dittinberger, W.
笛卡儿, R. Descartes, R.
丁睦良 Martin, W. A. P.
杜倍雷, J. Du Bellay, J.
杜布瓦, J. Dubois, J.
杜克罗, O. Ducrot, O.
杜莱, H. Dulay, H.
多罗舍夫斯基, W. J. Doroszewski, W. J.
多纳图斯, A. Donatus, A.

F

法拉 'Al-farrā'a
法斯特, J. Fast, J.
法索德, R. Fasold, R.
方特, C. G. M. Fant, C. G. M.
房德里耶斯, J. Vendryes, J.
菲尔莫尔, C. Fillmore, C.
费尧特, W. Viētor, W.
冯·加班, A. von Gabain, A.
冯特, W. Wundt, W.
弗拉纳根, J. L. Flanagan, J. L.
弗莱彻, H. Fletcher, H.
弗赖, D. B. Fry, D. B.
弗朗索瓦一世 François I
弗里斯, C. C. Fries, C. C.
弗斯, J. R. Firth, J. R.
服部四郎 Hattori Shiro
浮士勒, K. Vossler, K.
福多, J. A. Fodor, J. A.

G

盖兹达, G. Gazdar, G.
钢和泰 Staël-Holstein, A. von
高本汉 Karlgren, K. B. J.
戈安, F. Gouin, F.
戈贝尔斯伯格, F. X. Gabelsberger, F. X.
戈尔德曼, N. Goldman, N.
戈尔德, W. Golding, W.
格拉蒙, M. Grammont, M.
格赖斯, H. P. Grice, H. P.
格兰姆斯, B. F. Grimes, B. F.
格雷戈里, M. Gregory, M.
格雷格, J. R. Gregg, J. R.
格利森, H. A. Gleason, H. A.
格林, J. Grimm, J.
格林, W. K. Grimm, W. K.
格林伯格, J. H. Greenberg, J. H.
格伦贝克, K. Grønbech, K.
古卢, K. P. Guru, K. P.
郭居静 Cattaneo, L.

H

哈尔维克, R. Harweg, R.
哈里斯, Z. S. Harris, Z. S.
哈利, M. Halle, M.

哈斯, W. Haas, W.
海利勒, 'A. al-Khalil, 'A.
海凯勒, A. O. Heikel, A. O.
海姆斯, D. Hymes, D.
海斯, D. G. Hays, D. G.
韩礼德 Halliday, M. A. K.
豪克, E. Hauck, E.
赫德尔斯顿, R. D. Huddleston, R. D.
赫尔丹, G. Herdan, G.
赫尔德, J. G. von Herder, J. G. von
赫拉克利特 Heraclitus
赫罗兹尼, B. Hrozný, B.
亨德雷克斯, G. Hendrix, G.
洪堡特, W. F. von Humboldt, W. F. von (一译洪堡)

惠特尼, W. D. Whitney, W. D.
霍布斯, T. Hobbes, T.
霍尔, E. T. Hall, E. T.
霍凯特, C. F. Hockett, C. F.

J

基罗, P. Guiraud, P.
基雅马迪, S. Gyarmathi, S.
吉耶龙, J. Gilliéron, J.
加布伦兹, G. Gabelentz, G. von der
加德纳, R. C. Gardner, R. C.
加雷特, M. Garrett, M.
迦旃延那 Kātyāyana
贾德佳, S. K. Caturjyā, S. K.
金尼阁 Trigault, N.
金田一京助 Kindaichi Kyosuke

K

卡比, D. Gabby, D.
卡茨, J. J. Katz, J. J.
卡罗尔, J. Carroll, J.
卡纳勒, M. Canale, M.
卡纳普, R. Carnap, R.
卡普兰, D. Kaplan, D.
卡图卢斯, G. V. Catullus, G. V.
凯丁, F. W. Kaeding, F. W.
凯萨依, 'A. H. al-Kisā 'i, 'A. H.
凯塞尔, M. M. Kesser, M. M.
凯伊, P. Kay, P.
坎贝尔, L. Campbell, L.
康拉迪, A. Conrady, A.
柯恩, M. Cohen, M.
柯蔚南 South Coblin, W.
科特维奇, W. Kotwicz, W.
克拉申, S. Krashen, S.
克劳森, G. Clauson, G.
克雷斯韦尔, M. J. Cresswell, M. J.
J.
克里斯特, D. Crystal, D.
克罗齐, B. Croce, B.
肯尼迪, G. A. Kennedy, G. A.

肯尼恩, J. S. Kenyon, J. S.
肯特, A. Kent, A.
库蒂拉, L. Couturat, L.
库蒂斯, G. Curtius, G.
库拉恩, C. Curran, C.
库里沃维奇, J. Kuryłowicz, J.
库洛达, S. Y. Kuroda, S. Y.
库珀, R. Cooper, R.
夸克, R. Quirk, R.
夸美纽斯, J. A. Comenius, J. A.
奎利安, M. R. Quillian, M. R.
昆提利安 Quintilian

L

拉博夫, W. Labov, W.
拉德福格德, P. Ladefoged, P.
拉多, R. Lado, R.
拉斯克, R. K. Rask, R. K.
莱布尼茨, G. W. von Leibnitz, G. W. von
莱兰特, H. Reland, H.
莱曼, W. P. Lehmann, W. P.
莱斯金, A. Laskien, A.
兰贝克, J. Lambek, J.
兰伯特, W. E. Lambert, W. E.
兰罗特, E. Lönnrot, E.
兰姆, S. Lamb, S.
兰司铁, G. J. Ramstedt, G. J.
朗格克尔, R. Longacre, R.
朗斯洛, C. Lancelot, C.
劳佛, B. Laufer, B.
雷科夫, G. Lakoff, G.
雷伊, C. Rey, C.
李盖蒂, C. Ligeti, C.
里弗斯, W. H. R. Rivers, W. H. R.
R.
利玛窦 Ricci, M.
利奇, G. N. Leech, G. N.
列维-斯特劳, C. Lévi-Strauss, C.
斯, C.
龙德尔, J. A. Lundell, J. A.
卢恩, H. P. Luhn, H. P.
卢赛洛, J. P. Rousselot, J. P.
鲁德, L. Roudet, L.
路德, M. Luther, M.
伦纳伯格, E. Lenneberg, E.
罗宾斯, R. H. Robins, R. H.
罗德, A. de Rhodes, A. de
罗杰瑞 Norman, J. L.
洛克, J. F. Rock, J. F.
罗斯, J. R. Ross, J. R.
罗希, E. Rosch, E.
洛克, J. Locke, J.

M

马伯乐, G. Maspéro, G.
马伯乐, H. Maspéro, H.
马丁内, A. Martinet, A.
马尔库斯, S. Marcus, S.
马克尔, N. N. Markel, N. N.

马礼逊 Morrison, R.
马林诺夫斯基, B. Malinowski, B.

马洛夫, C. E. Maion, C. E.
马泰休斯, V. Mathesius, V.
麦考莱, J. McCawley, J.
麦克莱, R. S. MacLay, R. S.
麦克尼尔, D. McNeill, D.
麦斯若波 Mesrop
梅林格, R. Meringer, R.
梅耶, A. Meillet, A.
门登霍尔, T. C. Mendenhall, T. C.
门格斯, K. H. Menges, K. H.
孟德鸠, R. Montague, R.
弥尔顿, J. Milton, J.
米勒, G. Miller, G.
米切尔, T. F. Mitchell, T. F.
密茨凯维奇, A. Mickiewicz, A.
莫尔, T. More, T.
莫里斯, C. W. Morris, C. W.

N

纳格尔, J. W. Nagl, J. W.
纳沃伊, N. A. Nawayi, N. A.
牛顿, I. Newton, I.
纽曼, F. W. Newman, F. W.

P

帕蒂, B. H. Partee, B. H.
帕尔默, F. R. Palmer, F. R.
帕尔默, H. E. Palmer, H. E.
帕西, P. Passy, P.
派克, K. L. Pike, K. L.
培根, F. Bacon, F.
佩茨, M. Paié, M.
佩里, J. W. Perry, J. W.
彭菲尔德, W. Penfield, W.
皮阿诺, G. Peano, G.
皮尔斯, C. S. Peirce, C. S.
皮特曼, I. Pitman, I.
皮亚杰, J. Piaget, J.
珀尔马特, D. Perlmutter, D.
蒲立本 Pulleyblank, E. G.
普雷耶, W. T. Preyer, W. T.
普里西安 Priscian
普卢塔克 Plutarchos
普伦, G. Pullum, G.
普塔西克, P. H. Ptacek, P. H.

Q

齐夫, G. K. Zipf, G. K.
乔玛, A. de K. Csoma, A. de K.
乔姆斯基, N. Chomsky, N.
乔叟, G. Chaucer, G.
桥本进吉 Hashimoto Shinkichi
桥本万太郎 Mantaro J. Hashimoto
切德勒尔, F. D. Cheydler, F. D.
琼斯, D. Jones, D.
琼斯, W. Jones, W.

R

阮淦(又名韩淦) Nguyễn Thuyên

S

萨格, I. Sag, I.
萨默费特, A. Sommerfelt, A.
萨丕尔, E. Sapir, E.
塞比奥克, T. A. Sebeok, T. A.
塞勒, J. Searle, J.
塞林克尔, L. Selinker, L.
塞什文, A. Sechehayé, A.
桑代克, E. L. Thorndike, E. L.
桑德尔, E. K. Sander, E. K.
沙穆尔, G. Samuel, G.
莎士比亚, W. Shakespeare, W.
山田孝雄 Yamada Yoshio
尚克, R. C. Schank, R. C.
申农, C. Shannon, C.
施莱歇尔, A. Schleicher, A.
施莱耶, J. M. Schleyer, J. M.
施列格尔, F. von Schlegel, F. von
施密特, J. Schmidt, J.
施密特, P. W. Schmidt, P. W.
施密特, S. Schmidt, S.
施密特, W. Schmidt, W.
施皮策, L. Spitzer, L.
什图尔, L. Štúr, L.
辻伸久 Tsuji Nobuhisa
时枝诚记 Tokieda Motoki
史密斯, H. L. Smith, H. L.
舒哈特, H. Schuchardt, H.
舒曼, J. Schumann, J.
司马贺 Simon, H. A.
司马侃 Sherard, M.
斯金纳, B. F. Skinner, B. F.
斯克列普契尔, E. W. Scripture, E. W.
斯洛宾, D. Slobin, D.
斯坦塔, H. Steintal, H.
斯特蒂文特, E. H. Sturtevant, E. H.
斯特恩, W. Stern, W.
斯特拉连贝尔格, P. J. von Strahlenberg, P. J. von
斯特劳曼, H. Strauman, H.
斯瓦德士, M. Swadesh, M.
斯维特, H. Sweet, H.
苏德尔, J. F. Sudre, J. F.
索绪尔, F. de Saussure, F. de

T

泰戈尔, R. Tagore, R.
谭博夫, O. Dempwolff, O.
汤姆森, V. L. P. Thomsen, V. L. P.
忒奥克里托斯 Theokritos
特拉格, G. L. Trager, G. L.
特里尔, J. Trier, J.
特鲁吉尔, P. Trudgill, P.

特斯尼耶尔, L. Tesnière, L.
帖木儿 Timūr-i-lang
图克斯伯里, M. G. Tewkesbury, M. G.

W

瓦恩里希, U. Weinreich, U.
瓦尔, E. de Wahl, E. de
瓦尔玛, D. Varmā, D.
瓦洛, M. T. Varro, M. T.
万伯里, H. Vambery, H.
威尔克斯, Y. A. Wilks, Y. A.
威金斯, D. Wilkins, D.
威灵斯基, R. Wilensky, R.
威妥玛 Wade, T. F.
韦尔斯, J. C. Wells, J. C.
韦弗, W. Weaver, W.
韦斯特, M. West, M.
维尔纳, K. Verner, K.
维尔尼克, C. Wernicke, C.
维诺格拉德, J. Winograd, J.
维特根斯坦, L. Wittgenstein, L.
维托托, W. Vietor, W.
魏斯格贝尔, L. Weisgerber, L.
温克尔, G. Wenker, G.
温利希, H. Weinrich, H.
文岑 Vincent
沃多, R. Wardhaugh, R.
沃尔夫, B. L. Whorf, B. L.
沃格林, C. F. Voegelin, C. F.
沃格林, F. M. Voegelin, F. M.
乌尔达尔, H. Uldall, H.
乌尔曼, S. Ullmann, S.
乌伦贝克, C. C. Uhlenbeck, C. C.
吴克德 Wulff, K.
伍尔夫森, P. Woolfson, P.
伍兹, W. A. Woods, W. A.

X

西伯维(一译西 Sibuwaihi
拜韦) Sieg, E.
西克, E. Symonds, R.
西蒙兹, R. Cicero, M. T.
西塞罗, M. T. Shyāmsundaras
夏姆孙德尔达斯 Sienkiewicz, H.
显克维奇, H. Shafer, R.
谢飞, R.

Y

雅柯布逊, R. Jakobson, R.
雅林, G. Jarring, G.
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叶尔姆斯列夫, L. Hjelmslev, L.
叶斯泊森, O. Jespersen, O.
伊本·安巴里 'Ibn'Al-'anbārī
伊通, H. S. Eaton, H. S.
伊西多尔 Isidore
依巴涅兹, D. C. Ibanez, D. C.
易加乐, S. C. Egered, S. C.

英格韦, V.	Yingve, V.	B. A.	Буллич, С. К.	密斯罗普, М.	Месроп, М.
尤勒, G. U.	Yule, G. U.	布利奇, С. К.	Буляковский, В. Я.	莫斯卡里斯卡娅, О. И.	Москальская, О. И.
约翰逊, S.	Johnson, S.	布利亚科夫斯基, В. Я.		墨山宁诺夫, И. И.	Мещанинов, И. И.
	Z	恩泽林, Я. М.	Энцелин, Я. М.	И.	И.
翟理斯	Giles, H. A.	弗拉基米尔佐夫, Б. Я.	Владимирцов, Б. Я.	普希金, А. С.	Пушкин, А. С.
中岛干起	Motoki Nakajima	福尔图纳托夫, Ф. Ф.	Фортунатов, Ф. Ф.	契诃夫, А. П.	Чехов, А. П.
朱斯, М.	Joos, M.	郭质生	Копоконов, С. В.	桑热耶夫, Г. Д.	Санжеев, Г. Д.
		果戈理, Н. В.	Гоголь, Н. В.	沙赫马托夫, А. А.	Шахматов, А. А.
阿列克桑德罗夫, А. И.	Александров, А. И.	哈夫洛尼娜, С. А.	Хавронина, С. А.	什连克, Л.	Шренк, Л.
阿列克谢耶夫, П. М.	Алексеев, П. М.	基里尔	Кирилл	斯捷潘诺夫, Ю.	Степанов, Ю.
阿瓦涅索夫, Р. И.	Аванесов, Р. И.	科夫图诺娃, И. И.	Ковтунова, И. И.	斯拉维伊科夫, П.	Славейков, П.
奥金佐夫, В. В.	Одинцов, В. В.	科特利亚列夫斯基, И. П.	Котляревский, И. П.	苏尼克, О. П.	Суник, О. П.
巴斯卡科夫, Н. А.	Баскаков, Н. А.	克雷洛娃, А.	Крылова, О. А.	索尔甘尼克, Г. Я.	Солганик, Г. Я.
彼捷尔松, М. Н.	Петерсон, М. Н.	克鲁舍夫斯基, Н. В.	Крушевский, Н. В.	特鲁别茨科伊, Н. С.	Трубецкой, Н. С.
彼什科夫斯基, А. М.	Пешковский, А. М.	库拉金娜, О. С.	Кулагина, О. С.	特洛扬斯基, П. П.	Троянский, П. П.
别列斯涅夫, С. Д.	Береснев, С. Д.	拉斯波波夫, И. П.	Распопов, И. П.	图里金娜, Л. А.	Турмытина, Л. А.
波尔热津斯基, В. К.	Поржезинский, В. К.	莱蒙托夫, М. Ю.	Лермонтов, М. Ю.	屠格涅夫, И. С.	Тургенев, И. С.
波克罗夫斯基, М. М.	Покровский, М. М.	列昂捷夫, А. Н.	Леонтьев, А. Н.	托尔斯泰, Л. Н.	Толстой, Л. Н.
波斯别洛夫, Н. С.	Поспелов, Н. С.	龙果夫	Драгунов, А. А.	托姆松, А. И.	Томсон, А. И.
波铁布尼亚, А. А.	Потебня, А. А.	卢利亚, А. Р.	Лурия, А. Р.	瓦西列维奇, Г. М.	Василевич, Г. М.
博布罗夫尼柯夫, А. А.	Бобровников, А. А.	鲁德涅夫, А. Д.	Руднев, А. Д.	维戈茨基, Л. С.	Выготский, Л. С.
博戈罗迪茨基, Богородицкий, В. А.	Богородицкий, В. А.	罗布桑旺丹, Ш.	Лубсанвандан, Ш.	维诺格拉多夫, В. В.	Виноградов, В. В.
		马尔, Н. Я.	Марр, Н. Я.	乌沙科夫, Д. Н.	Ушаков, Д. Н.
		马尔科夫, А. А.	Марков, А. А.	西多罗夫, В. Н.	Сидоров, В. Н.
		马洛夫, С. Е.	Малов, С. Е.	谢尔巴, Л. В.	Щерба, Л. В.
		梅福季	Мефодий	谢甫琴科, Т. Г.	Шевченко, Т. Г.
				雅德林采夫, Н. М.	Ядренцев, Н. М.
				М.	М.

本卷主要编辑、出版人员

总	编	辑	姜椿芳	梅 益
副	总	编	叶佐群	
主	任	编	赵建山	
责	任	编	李鸿简	郑伯麒
图	片	编	郇宗远	陈 林
地	图	编	郁可可	
资料	核对	统一	王铁柱	肖爱华
索	引	编	蒋仲英	马五一 殷华蕾
装	帧	版	面	设
计	张	慈	中	
责	任	校	对	周国信